赵紫阳文集 1980-1989

共四卷

1980–1982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主编　　1980年9月30日第7期

赵紫阳畅谈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

他指出，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病根已经查清，有充分信心能治愈这些病。“文化大革命”把一切推向极端，今日终于大彻大悟，反省到一九五七年以后的问题。

美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

西方经济正处在转折关头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第4—5版

引进外国先进经验，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这个重大课题解决好了，就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赵紫阳文集 1980–1989

共四卷

1980–1982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主编　　1980年9月30日第7期

赵紫阳畅谈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

他指出，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病根已经查清，有充分信心能治愈这些病。“文化大革命”把一切推向极端，今日终于大彻大悟，反省到一九五七年以后的问题。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我国著名科学家、经济学家马洪、钱学森、孙冶方、許涤新、宦乡、钱俊瑞、薛暮桥等举行座谈会

第4－5版

中国是一大片，世界是一大片，中国应当打进入世界市场

美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

西方经济正处在转折关头

引进外国先进经验，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这个重大课题解决好了，就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赵紫阳文集：一

第一卷

1980—1982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赵紫阳文集

第一卷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编

赵紫阳文集：翼

中文大学出版社

《赵紫阳文集（1950—1959）：第一卷（1980—1952）》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编
@香港中文大学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
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
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国际统一书号（ISBN）：978962—996—806—9
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传真：＋552 2603 7355
电邮：cup@cuhkeduhk
网址：www.chineseupress.com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1980-1989），Volumel（1980-1982）（in Chinese）
Edited by Editorial Grooup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978-962-996-806-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NT，Hong Kong
Fax：＋852 2603 7355
Email：cup@cuhkeduhk
Website：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出版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收录了赵紫阳自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至1989年去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函、批语等，共498篇，180余万字，依时间顺序分为四卷。

《文集》涵盖经济、政治、党务、外交、国防、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展示了1980年代中国高层推行的各种政策主张、理论观点及相关政治博弈，呈现了改革开放最初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细节。

《文集》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原始文献编纂而成，来源可靠、编排规范、忠实于原件，多数篇目属首次公开或首次完整公开。《文集》虽非同期文献的全部，却是迄今为止最系统、也最具规模的赵紫阳文献汇编，为还原和理解早期中国改革开放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对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也极具文献价值。

《文集》出版过程中，本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文本考订、原件比对、史实核查、信息增补等工作，力求达至文献史料出版的最高准确度、客观度。除文字史料外，本社对视觉史料也极为重视，试图通过对历史图片及原始文献的搜集和选用，将其携带的历史信息传递给读者。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6年5月

编辑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主要汇集了赵紫阳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件和批语等，近500篇。其中有一部分曾公开发表过，大部分则在当时党政机关的文件、简报上印发或传达过，是首次公开出版。

文集所涉及的十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和奠基时期。当时，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四化建设掀起了新的高潮。其间经历了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两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进行了国民经济大调整，制定并胜利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七五”两个五年计划，彻底扭转了文革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的被动局面，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第一步目标（头十年翻一番），从而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决心。

这十年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改革创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由工业、商业发展到其他第三产业，从承包经营、股份制试点到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到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对外开放；从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到实行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和保护环境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从立足国内到坚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主动迎应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勇攀世界科技新高峰。这套文集既见证了这十年间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逐步重新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也反映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工作难度异常巨大，为政者甘苦备尝的秘辛。这十年既有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有些不尽人意的遗憾；既积累了改革成功的经验，也有出现通货膨胀的教训。

从文集中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领导支持下，本书作者与胡耀邦、万里等同志一道认真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从而大彻大悟，立志为民，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崇尚法治，勇于开拓创新，努力遵循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在日新月异的新产业革命、新科技革命中尽心竭力，弃旧图新，不断探索新的为政之道、治国之策、兴业之本和强国之路，以掌握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主动权。这十年他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奉献给了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书中所反映的每一项巨大成就或一些难以避免的失误，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真实记载和深入研究这段难忘的史实和第一手文献资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学习和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让历史告诉未

来，促使我们进一步开拓思路，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融入世界，为实现振兴中华，攀登世界强国的新高峰而奋斗！

本书编辑组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组成。为保持文稿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在编辑中均保持了原貌，编者仅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4年4月

目录

一九八○年

研究新情况 全面贯彻调整的方针
研究新问题 把经济改革搞好
关于农工商联合企业问题
农业增产主要靠政策靠科学
在全国长期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
经济体制改革步骤要积极稳妥
关于发展家庭专业户养鸡的批语
对外贸体制改革中一些问题的意见
关于当前农村政策问题的一封信
关于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承包到人责任制的批语
会见世界银行代表团的谈话
关于国外贷款问题的一封信
建立东北商品粮基地是搞活全国农业的关键
用改革的思路解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有关问题
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是一项战略措施
关于节约能源和科研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今年经济形势和“六五”计划设想
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
专业联合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
国务院今冬和明年要抓的几项工作
关于编制长远规划和五年计划的设想
处理好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
刹住乱涨价滥发奖金的歪风
经济工作要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
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一年
抓好调整和改革 努力稳定经济
关于杜润生报告给胡耀邦同志的信
对农村建房占地问题的批语
在调整期间如何搞好改革

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必须搞对外合作
当前经济形势和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对石油部年产一亿吨原油包干的批语和指示
给四川大学陈力同志的信
关于煤炭开发的两个批语
调整时期经济工作的一些设想
要在调整中把经济搞活
对《济南石油化工厂财务混乱惊人》一文的批语
对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
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的思想要解放
企业整顿要把落实经济责任制作为突破口
利用税收调整国民经济的合理发展
从提高经济效益中找出路从挖掘潜力中求速度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财政工作要适应新情况 研究新问题
关于煤炭出口问题的批语
既要精神振奋又要实事求是
关于“六五”计划和一九八二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意见
挖掘企业潜力 提高经济效益
改革挖潜 聚资生财
关于今年经济情况和“六五”计划设想的通报
计划生育政策要放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
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保证经济责任制的健康发展
当前经济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上的讲话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景大有希望
想方设法把引进的石化项目搞起来
关于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
对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
在合作与发展的国际（坎昆）会议上的发言
怀念陈郁
技术改造是个战略问题
巩固稳定经济的成果实现讲求效益的增长
物价必须保持基本稳定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
同人大代表讨论物价等问题
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后的民事纠纷》一文的批语
研究经济新情况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
关于科技工作的一封信
一九八二年
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
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
关于国务院一九八二年上半年的工作部署
发挥城市作用促进工农业和地区经济发展
重视发展儿童消费品生产
提高经济效益搞好企业整顿和技术改造
打击走私贩私继续贯彻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厂长必须具有大学文化水平和实践经验
关于组建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批语和指示
让文明礼貌成为全民行之久远的风俗习惯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
围绕提高经济效益做好工业交通和整个经济工作
关于抽纱出口问题的批语
技术改造是振兴机械工业的重大步骤
有重点地建设山西特大型煤矿井
对当前财政和银行工作的几点意见
关于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意见
关于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及借用外债的意见
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形势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进展情况和三项议案的说明
组织“一条龙”开发新产品大有希望
充实加强井下第一线是搞好煤炭生产的关键
引进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应适当放宽政策
对制定“六五”计划的几点意见
听取国家计委赴苏考察小组汇报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时的讲话
农业和粮食是我国的头号问题
把山西建设为以煤炭为主的重化工基地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正确认识经济形势扎实做好经济工作
采取综合治理措施解决野蛮装卸等问题

商业要对工农业生产发挥促进引导作用
企业整顿必须抓住主要矛盾
开发西北新的产粮区与调整贫困地区农业结构问题
对大连市组织科研生产联合体情况报告的批语
“六五”、“七五”要为九十年代经济振兴作好准备
控制人口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给《四川日报》的复信
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
关于征收能源交通建设费问题
开创外交和国内经济工作的新局面
当前经济工作中应研究解决的新问题
给四川异钟水库工程指挥部的复信
适时调整化纤和棉织品价格改变居民衣料结构
关于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工作的意见
坚决制止乱砍森林和滥占耕地
建材工业要抓紧技术改造
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 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给山西省平鲁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复信
端正指导思想积极推进改革
在全国农业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关于进料加工出口问题的批语
对环保和出现酸雨等问题的批语
体育战线的成绩鼓舞全国人民建设四化的信心
不能让来投资的人吃亏
对开发海南岛问题的批语
充分发挥重庆市西南经济中心的作用
后记

一九八○年

研究新情况全面贯彻调整的方针

一九八○年一月一日

研究新问题把经济改革搞好

一九八○年三月十六日

关于农工商联合企业问题

一九八○年四月七日

农业增产主要靠政策靠科学

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
在全国长期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经济体制改革步骤要积极稳妥
一九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关于发展家庭专业户养鸡的批语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对外贸体制改革中一些问题的意见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关于当前农村政策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八○年六月十九日
关于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承包到人责任制的批语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日
会见世界银行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八○年七月十六日
关于国外贷款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建立东北商品粮基地是搞活全国农业的关键
一九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三日
用改革的思路解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有关问题
一九八○年八月十一日
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是一项战略措施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关于节约能源和科研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一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今年经济形势和“六五”计划设想
一九八○年九月二日
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
一九八○年九月十五日
专业联合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
一九八○年九月十八日
国务院今冬和明年要抓的几项工作
一九八○年十月十一日
关于编制长远规划和五年计划的设想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日
处理好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刹住乱涨价滥发奖金的歪风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经济工作要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
一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九八一年
抓好调整和改革努力稳定经济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
关于杜润生报告给胡耀邦同志的信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八日
对农村建房占地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日
在调整期间如何搞好改革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
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必须搞对外合作
一九八一年三月
当前经济形势和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四日
对石油部年产一亿吨原油包干的批语和指示
一九八一年四月至五月
给四川大学陈力同志的信
一九八一年五月六日
关于煤炭开发的两个批语
一九八一年五月九日、六月二十日
调整时期经济工作的一些设想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要在调整中把经济搞活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五日
对《济南石油化工厂财务混乱惊人》一文的批语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
对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
一九八一年六月、七月
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的思想要解放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三十日
企业整顿要把落实经济责任制作为突破口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利用税收调整国民经济的合理发展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从提高经济效益中找出路从挖掘潜力中求速度
一九八一年七月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
财政工作要适应新情况研究新问题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
关于煤炭出口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既要精神振奋又要实事求是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关于“六五”计划和一九八二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意见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九月三日、四日
挖掘企业潜力提高经济效益
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
改革挖潜聚资生财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
关于今年经济情况和“六五”计划设想的通报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
计划生育政策要放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保证经济责任制的健康发展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日
当前经济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在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景大有希望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
想方设法把引进的石化项目搞起来
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
关于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二日
对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六日、十一月十日

在合作与发展的国际（坎昆）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怀念陈郁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日
技术改造是个战略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
巩固稳定经济的成果实现讲求效益的增长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物价必须保持基本稳定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一日
同人大代表讨论物价等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
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后的民事纠纷》一文的批语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研究经济新情况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十九日
关于科技工作的一封信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二年
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
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关于国务院一九八二年上半年的工作部署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发挥城市作用促进工农业和地区经济发展
一九八二年二月五日
重视发展儿童消费品生产
一九八二年二月八日
提高经济效益搞好企业整顿和技术改造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
打击走私贩私继续贯彻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
厂长必须具有大学文化水平和实践经验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八日
关于组建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批语和指示

一九八一年七月至一九八二年二月
让文明礼貌成为全民行之久远的风俗习惯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日
围绕提高经济效益做好工业交通和整个经济工作
一九八二年三月四日
关于抽纱出口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
技术改造是振兴机械工业的重大步骤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七日
有重点地建设山西特大型煤矿井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对当前财政和银行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关于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意见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日
关于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及借用外债的意见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三日、二十日
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形势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进展情况和三项议案的说明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组织“一条龙”开发新产品大有希望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四日
充实加强井下第一线是搞好煤炭生产的关键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引进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应适当放宽政策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对制定“六五”计划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二年五、六月
听取国家计委赴苏考察小组汇报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时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二日、十四日
农业和粮食是我国的头号问题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
把山西建设为以煤炭为主的重化工基地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
正确认识经济形势扎实做好经济工作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
采取综合治理措施解决野蛮装卸等问题
一九八二年七月八日
商业要对工农业生产发挥促进引导作用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十四日
企业整顿必须抓住主要矛盾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七日
开发西北新的产粮区与调整贫困地区农业结构问题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对大连市组织科研生产联合体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八月八日
“六五”、“七五”要为九十年代经济振兴作好准备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
控制人口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
给《四川日报》的复信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九日
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
关于征收能源交通建设费问题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
开创外交和国内经济工作的新局面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当前经济工作中应研究解决的新问题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给四川异钟水库工程指挥部的复信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适时调整化纤和棉织品价格改变居民衣料结构
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
关于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坚决制止乱砍森林和滥占耕地
一九八二年十月八日
建材工业要抓紧技术改造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
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
—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给山西省平鲁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复信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
端正指导思想积极推进改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
在全国农业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关于进料加工出口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六日
对环保和出现酸雨等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
体育战线的成绩鼓舞全国人民建设四化的信心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
不能让来投资的人吃亏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
对开发海南岛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
充分发挥重庆市西南经济中心的作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后记

1982年6月25日，和山西省负责人在襄垣县豆店公社桥头大队农民白清娥家，与农民和基层干部交谈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问题

左上：1981年9月19日，参加检阅解放军北京部队和空军的军事演习（从左至右：李先念、秦基伟、邓小平、胡耀邦、杨得志、赵紫阳、华国锋）

左下：1982年3月，在河北省唐山开滦煤矿深入数百米井下考察，返回地面后与同行人员合影（右四李尔重、右六赵紫阳、左二白美清）

右：1982年7月，在甘肃省玉门油矿鸭儿峡矿区观看钻井队取出的地质岩芯样品

《赵紫阳畅谈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是就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接见香港新闻工作者时的讲话（1980年9月15日），收入本书时以《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为题

就任总理后，于1982年3月2日首次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就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所作的报告（首页）

《国务院公报》中收录的《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一文，是1982年10月24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年

研究新情况　全面贯彻调整的方针*

一九八○年一月一日

*　《研究新情况全面贯彻调整的方针》和后面《研究新问题把经济改革搞好》这两篇文章，是赵紫阳在中共四川省委有关会议上就当时四川省改革试点经验和问题发表的重要讲话。鉴于四川省改革先走一步，对全国各地有参考价值，中央报刊曾予以转载，供全国各地参阅。

一、今年的工业生产

今年，我们要力争农业、工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

工业问题，今年有些困难，也有一些新情况要注意研究。从四川省的情况看，主要应抓好几个环节：一是搞好三百个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试点；二是挖潜、革新、改造；三是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四是节约能源；五是把生产资料供应工作搞活。

由于国民经济的调整，今年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任务，要自己“找米下锅”。很多企业有一个怎么样围绕着市场需要来安排生产的问题，特别是机械、冶金行业。现在还存在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原来那个工厂生产的东西，现在没有任务，或者勉强生产了，卖不出去；另一方面，社会上很多需要的东西又买不到。今年工业生产就要研究这个问题。工业部门只是埋头生产，不问市场，这样不行了。尤其是那些因调整而任务不足的行业，更要解决这个问题。调整本身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需要。如，我们今后要加强商业设施，就有个设备问题，轻工业要发展，也需要增加设备，工厂挖潜、革新、改造也需要设备。所以，看来机械行业有个转产的问题，有个生产方向的问题。机械行业想重新回到过去那种情况，产品很单一，又小而全、大而全，这种结构是不行的，势必要改变。现在调整时期，任务不足，也给我们一个机会，促使我们注意研究市场，改变产品结构，搞好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这样，我们就可能闯出一条路子来。如果现在是全面大上的形势，物资非常紧张，搞什么设备还要“走后门”，产品质量再坏都有人买，有些企业就会不重视市场调节。现在有一些产品供过于求，我认为这正是改革工业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这就会逼着企业研究社会需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所以，我认为要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今年要突出抓增产节约，特别是抓节约能源。节约能源，单纯的限制一下，一般的少用一些，那还不行。要

和企业挖潜、革新、改造相结合。要把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进一步搞活。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例如，搞生产资料交流会、信托公司，等等。我们的物资管理体制也要采取一些措施把它搞活，有一些可以用交流会的形式，货栈的形式。

二、农业的增产主要靠政策靠科学

今后几年内，农业增产主要靠政策、靠科学。农业基本建设和机械化，只能根据整个国家财力、物力有步骤地进行。政策问题，由于多年来“左”的流毒比较深，发挥政策的作用，潜力还很大。不要以为我们这几年经过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这个潜力已经没有了。政策问题，主要的是如何进一步调动生产队的积极性和农民的积极性。

我国农业现代化，当然包括机械化。农业总是要实行机械化的，我们不能永远是手工操作。但是，要考虑轻重缓急。我国人口多，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搞机械化节约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安排不好，还会增加社会问题。机械化本身最大的效益是节约劳动力，不一定增加多少产量。特别是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对增加产量的作用并不那么大。所以，我们拿很大的力量投到这上面，现在看来不是当务之急。因为我们人多，把劳力节约出来，马上还没有地方去，原来想什么城乡挂钩，什么扩散产品，现在看也比较困难，因为城市劳力也多。所以，农业现代化的问题，我们应当着重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运用。这方面潜力很大。四川现在已经尝到甜头。比如说养蘑菇，就有科学技术，这是过去没有的。又如，温水养鱼，搞冷冻精液配种，也是好办法。还有农业良种，有了好种子，产量就提高很多。从科学种田来讲，这两年搞的多粟壮秧，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效果很明显。在成都坝子，有几个地方，水源没有问题，过去历来是渠灌、漫灌，现在改为喷灌，对玉米、小麦增产效果都很明显。又如配合饲料这个东西，以前觉得很神秘，最近许多公社都开始搞了，证明效果确实很好，也没有那么神秘。现在有一些还不够标准，说不上是配合饲料，实际上是混合饲料。原来我们农村养鸡、养猪，是有什么喂什么，有红苕就喂红苕，有苞谷就喂苞谷，这样饲料有很大浪费。现在简单一混合，有粮食，也有含蛋白质和纤维的其他饲料，猪吃了长得快，增重百分之三十以上。所以，农民很高兴，自己拿粮食换这种饲料。这说明这个领域里门路很多。我们搞现代化，应当重点搞这个。这方面有些需要机械，有些并不需要机械，至少不是全盘机械化。科学饲养，科学种植，科学栽培，这些方面有很多名堂。总之，现在要讲究科学。有人主张，农业现代化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农业机械现代化，一个是生物技术现代化，应该有个轻重缓急。我觉得有相当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后应该运用科学，把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用到农业上，这对提高单产，对利用资源作用很大。除此以外，还要根据自己的力量，有步骤地继续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我这里说的不单是农田基本建设，而是农业基本建设。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讲的就是农业基本建设。因

为，过去讲的农田基本建设内容有些狭窄，一讲就是水利、改田、改土，太窄了。农业基本建设范围就广一些，包括水利、改土，也包括建设配种站、种子站、晒场、仓库这些东西。现在我们农业建设究竟搞什么东西？应当从生产的需要出发，看哪个对生产最迫切，效果来得最快。有些生产队，一些很简单的非常必要的建设都没有，如保管室、晒场都没有，晒谷子的席子都没有，这些都影响农业生产，可以搞一些。从四川来讲，水利必须坚持搞下去。但前些年水利花钱很多，效果并不是都很好。所以，我有这么个想法：四川水利还要搞，但不能只是搞水利。有些基本建设并不需要花多少钱，从全省来讲，一年拿出几千万元钱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今后要挤出一点儿钱用在其它一些急需的事业上。我们现在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基本建设太差。如桑蚕可以大发展，但一个大问题就是没有蚕种，要建设蚕种场就得拿钱。畜牧、兽医也有很多东西要搞。总之，不能单打一，要全面一点。水利，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搞下去。其他的一些农业基本建设也必须安排上。过去长期只有一个农田基本建设的概念，现在要宣传农业基本建设这个概念，我们大家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农业机械化，看来应围绕着生产的需要，先解决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全国很多人讲这个问题。我看很有道理。当前农村中究竟是拖拉机更重要，还是农用汽车更重要？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很多拖拉机到公路上跑，很少下田？可见，运输比犁田还急需。过去多年来不研究农民的拖拉机上公路的原因。其实，农民是会算账的，他买辆拖拉机不下田，上公路，总有道理。这说明，拖拉机虽然是需要的，但更需要运输机械化。这是实事求是。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要从生产的需要出发。要研究什么投资最少，见效最大、最快。农业机械化问题，应当研究从何着手，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不少地区，烘干机很重要，可以减少很多发霉的粮食，又容易搞，应当重视。山区不先修公路，还能讲什么机械化？总之，农业的指导思想应该明确：搞农业要靠政策，靠科学；农业基本建设、机械化要量力而行；要改变过去只讲农田基本建设的思想，应当从农业基本建设这样一个概念去想问题；农业机械化一定要围绕生产需要去进行。

农村经济政策要进一步落实。农村有很大潜力，资源有潜力，人才也有潜力。关键就是要采用一些好的责任制形式，把人才和资源结合起来，使资源真正变成社会财富。最近找成都的同志谈养鱼问题，对我也有启发。以前我找他们谈了好几次，成都那么多水塘，为什么不养鱼，他们几次都对我讲还有很多问题，如没有饲料，还要供应粮食，等等。这次找他们谈，我说你们就包到户，谁会养谁来养，包下来，不要包那么高。他们说，你只要这样讲，鱼就可以养起来了。他们再没提饲料问题。可见，政策问题很重要。我们很多资源没有利用起来，一方面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光讲搞粮食，不讲搞别的；另一方面，与缺少明确的责任制也有很大关系。畜牧业这些东西，不像大田作物，更要精心管理，更要有明确的责任制。关于农村政策，我想在这里说几个问题：

（一）生产队的自主权问题。在四川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思想上还有

很多框框，根本的问题是不相信群众。强调生产队自主权后，可能我们讲话没有那么灵了，生产队可能不大听县委、公社领导的话了，这也可能带来一点损失；但是要看到承认生产队的自主权，他们的主动性增加了，积极性高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也高了，它所带来的好处，要比可能的损失大得多。强调生产队自主权，完全不出一点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本问题就像讲工业企业自主权的道理是一样的。生产队是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不把它搞活，而使全省五十多万个单位都处于被动状态，搞什么它也不用动脑筋，事事等上面布置，有什么好处呢？有的生产队打下来的谷子要发芽了，还非要等县委书记召开电话会布置，才能把谷子分下去晒，这怎么行呢？生产队没有自主权，这就不能使他们面向实际。所以，不把生产队搞活，不把生产队的主动权发挥出来，生产想搞好是困难的。生产队自主权问题，从省到县都要摸一摸情况，研究一下，要解放思想。这里，除了生产队财物、劳力不能平调，不能侵犯以外，重要的一条就是生产队自己的事应该由生产队自己决定。今后，对生产队下达生产计划，主要抓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主要经济作物，首先是棉花，在目前还要下达面积指标，其他那些计划面积指标都只供参考，什么水稻栽多少，包谷种多少，小春作物种多少，都是参考数字，主要由生产队自己决定。棉花因为价格低，群众不愿种，国家又很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还得下达播种面积的指标。大邑县的经验很好，他们说计划能否实现，根本的是要看计划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还是自上而下下达的。今后农业生产计划，主要应当自下而上提出来，自上而下作一些综合和调整，一个县把生产队的计划汇集后，看有什么问题，然后再给生产队做工作，不要什么都管得那么细。至于生产的技术措施，更应当由群众根据本地情况自己决定，我们可以提倡推广一些东西，但最后还是由生产队自己定。至于分配问题，管理形式问题，也应该这样。生产队管理怎样搞，上面不要管那么细，我们可以总结好的经验推广。

（二）适当调整自留地的问题。自留地各地可以安排适当时间进行调整。调整自留地，多数可以不动，只动两头，一是多得很多的，一是差得很多的，连抽带补恐怕还得增加一些自留地。按本队原划的每人平均数量为标准来调整，不足的户要补划，少数过多的户抽出，不要打乱原来基础重划。在调整自留地当中，要落实计划生育的政策，这很重要。不要一讲调整自留地就按现有人口划，实际上鼓励了盲目生育，这不对。要认真按中央和省里规定的计划生育政策办事。另外，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可以拿出一部分边远的或瘦薄的小片土地，按常年产量包到户经营，所包产量顶社员一部分口粮或饲料，超产部分全部归己。他自己把土壤改良好了，经营好了，超产收入的完全归他。原来已经划分饲料地的不再动，原来没有划分饲料地的，今后不再单独划分了。自留地加上这一部分包产地，不超过本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五。大体上将来农民自己经营的土地，一个是自留地，一个是小量包产的土地，可以顶一部分口粮或饲料。劳力弱无力经营的户可以不包，对他们的困难，生产队应加以照顾。还有社员房前屋后的范围也不要限得太死，要鼓励社员种植零星树木。怎么划，可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历史

习惯确定。

（三）社队企业问题。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但三级都搞确实矛盾很多，大队有条件的当然也可以搞，重点还是搞公社和生产队的。一个是把生产队多种经营搞好，一个是公社企业搞好。另外还有一种设想，也是一种试验，就是除了办好现有社队企业以外，今后兴办社队企业，应当多提倡生产队联办的形式，不要脱离生产队这个基础去办公社企业，而是要把公社企业建筑在生产队的基础上。这种生产队的联营，可以是公社范围的，也可以跨公社，一个区范围内几个公社联办。一个是生产队内部搞“四专”，专业队、专业户、专业组、专业人员；一个是生产队以上搞生产队联营，需要联合多大规模就联合多大规模，可能开始范围小，以后范围大，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这也是个新问题，应当很好研究。原来设想生产队通过发展社队企业过渡为大队所有制，然后又过渡到公社所有制，这个设想究竟怎么样？将来还要实践来作结论。这是个设想，也可能将来不是这个形式，而是在生产队这个基础上联合的形式。看来今后搞农、工、商一体化、专业化的形式，很可能是生产队联营的形式。要注意解决与生产队的利益联系起来，使生产队得到实惠的问题。社队企业要通过整顿，改进经营管理，挖掘潜力，努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创造更多的利润，并尽量从利润中提取一部分，给生产队纳入分配，使生产队和社员增加收入。

（四）因地制宜地逐步调整作物布局。现在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在农业上都实行作物种植区域化、专业化，搞大的地区分工。我们国家目前完全按这样的办法去做，还不具备条件。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那种带有自然经济性质的小而全的作物布局不应当改变。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发挥各种不同的自然条件的优势，在保证粮食和经济作物都增产的原则下，逐步地、合理地调整作物的布局，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使农业生产逐步区域化、专业化的重大措施，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也是发展生产的很大的潜力。这也是农业生产上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比如中江县南部地区适合种棉花，一般亩产可达百斤，而中部和北部地区就不适合种棉花，每亩只产六七十斤。但中部和北部种粮食，却可以超过南部。如果调整一下，南部多种棉花，中、北部多种粮食，这样就可以使棉、粮都得到增产。再如乐山市，过去棉花种植分散，以面积保总产，往往还完不成国家的生产任务。今年全省因受灾棉花减了产，他们却由于调整了布局，增了产；面积比以往减少了九千亩，单产和总产分别比过去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六和百分之十。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应当认真调查研究这方面的情况。县、社、队都应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自然条件，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使农业生产向区域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省、地也要抓好调整作物布局的试点。

（五）少数生产队太大可以分开。特别是过去“四清”运动中合并的大生产队，有的貌合神离，一直搞不好。我认为这些队是可以分的。当然不要搞运动，要逐步地、一个一个地解决，也不要怕一分就怎么样。有些大的队搞得很好，这就没有问题了。总之，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所有制的规模要照顾到群众觉悟程度，这是个原则。

三、抓商业工作

现在，流通环节的问题相当多，工业方面有个工商关系问题，农业方面也有个收购、推销问题。除抓工业、农业外，各级党委应当关心商业，抓商业，解决流通领域的问题。商业问题里面，一方面是商业本身有些问题，商业部门应当好好改进自己的工作；但另一方面商业确实也有很多问题需要地方党委帮助它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商业体制必须改革。但是改革只能有步骤地进行，改得太猛也容易引起物价波动等问题。大体上要恢复一九五七年的办法，有些容易恢复，有些一下恢复不了，要有步骤、有计划地恢复。体制不改，商业活不了。

商业活不了，工业就活不了，农业也活不了。

现在流通环节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工业搞活和农业搞活。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加强商业设施的建设。商业设施，如仓库、冷冻设备、冷藏车这些东西跟不上，这也是目前我们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很突出的薄弱环节。我们现在搞调整，也要包括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仓库、冷冻、冷藏车等设施不足，还是以前那个状况，你再发展生产，发展越多，由于不能及时收购和贮藏，浪费越大，多少年来由于商业设施跟不上，造成的浪费不知有多大。农产品发展起来，特别是鲜活商品多起来了，你不搞冷库、冷藏车这些设备，商业部门就没有办法，就不收购，你再责备也不行，这是个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今年起，我们各级都要拿一点钱搞商业设施。财政上还要进一步研究怎么给商业系统规定一点灵活的政策，解决投资问题。如从利润中留点成，或者可以先预支点钱，设施先搞起来，建好了以后再还。

除此以外，商业部门一定要积极地收购工业产品、农副产品，努力打开销路，为工农业服务。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都要减少盲目性，要关心市场，要根据市场的需要来生产。将来的趋势是商业对工业或农业统购包销的产品逐渐减少。因此，工业生产也好，农业生产也好，不根据市场需要来生产，光叫商业部门来收购，这样也不行。要从两方面讲：一个方面是商业部门一定要积极推销产品，帮助工业、农业打开销路；另一个方面是工业、农业生产单位，一定要避免盲目生产。特别是农副产品，现在要提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许多政策办法一落实，各项生产都会发展起来，如果不注意市场需要，将来有些东西就销不出去。总之，各级党委要抓商业、要抓流通环节。这个环节已经影响到我们现在能不能把工业和农业搞活的问题。

四、关于调整问题

以上说的几个问题，都在三年调整这个总题目里边。在经济工作中，总的是要全面贯彻调整的方针。过去经济工作中矛盾的焦点，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过多，挤了农业，挤了轻工业，挤了人民生活。调整的关键是要压积累，下基

建，加强薄弱环节。在这个问题上，要下最大的决心，不能小调，要大调，要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压缩长线，加强短线。剃平头不能达到调整的目的。越是财力小，越要集中投资，保证重点，打好歼灭战。但调整绝不是简单的压基建，而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牵涉到各个方面。基本建设规模缩小后，带来一系列新问题，过去被掩盖着的矛盾暴露出来了。机械、冶金等行业首当其冲，面临着根据市场需要组织转产和改组的问题。其它行业同样需要改变过去那种计划等上面、原料待分配、产品靠包销、产销不见面的做法。这些都涉及到经济结构、管理体制等根本性的问题。调整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调整和改革来解决。现在是形势逼人，非改不可。有的企业在去年任务不饱满的情况下，走向市场，一揽活儿，二推销，使企业有了生机。我们要正确认识调整中出现的新形势，不能只看到调整带来的困难的一面，也要看到这正是工业进行改造的大好时机，实行市场调节的大好时机，进行计划、物资等管理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我们要因势利导，趁热打铁，抓住调整这个中心环节，并把它同改革、整顿、提高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还跟不上，在很多问题上，思想还没有和调整的方针一致起来。我们必须自觉地按照调整的方针去考虑问题，观察形势，安排工作，该上的上，该下的下，齐心协力把经济调整这一仗打好。

研究新问题　把经济改革搞好*

一九八○年三月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共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第二部分，曾发表于1980年4月2日《人民日报》。

四川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不论是工业、农业还是商业，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已经迈出了比较大的一步，当然还是初步的。经济开始搞活了，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效果。情况是好的。但在企业扩大自主权、实行市场调节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大体上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的问题，基本上属于已经进行的初步改革，同尚未改革的整个经济体制、现行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就是通过改革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同现在的生产关系中某些方面的矛盾，同上层建筑中某些环节的矛盾。这方面的问题是主要的、大量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要进一步地改革，也就是要改革整个经济体制。但目前处于调整时期，进行大改大革的条件还不具备，经验不足，如果看得不准，改得不好，反会引起大的波动，因此不能骤然进行大改大革。但是，也不能对新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漠然置之，不去解决。在不能进行大改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在领导上、工作上、政策制度上多想办法，积极地解决这些矛盾。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企业扩大自主权、经济搞活以后，也会出现一些不正当的作法，搞歪门邪道。比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弄虚作假，挖国家墙脚，以邻为壑等等。这些是属于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并不是改革本身带来的，但也是改革中间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扩大下边的权力，把经济搞活；另一方面监督和检查工作要跟上去，执行纪律和经济立法工作要跟上去，符合规定的不要干涉，违反规定的及时制止。否则就会给某些人以可乘之机。只要加强领导，采取监督、检查、限制的有力措施，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要研究解决经济搞活以后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必须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四川的改革试点比较早，出现矛盾和问题也比较早，要使改革健康地发展，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和具体指导，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绝不要以为试点比较顺利，总的情况好，就掉以轻心。要知道，改革不进则退。我们是在总的体制没有变动的情况下，自下而上改革的，各方面矛盾很多，牵扯很大，如果不解

决新矛盾，就前进不了，甚至已经改了的也巩固不住。所以，从四川改革的情况来看，有一大批新问题，推着我们去研究、去解决。从全国来看，各省都在试点，四川改得早一点，有责任继续提供这方面的经验。

今明两年还不能大改，一两年内基本上还是按照现在的办法搞一些改革，四川就是工业改革十二条、十四条，商业调整改革的若干规定，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试点，基层供销社独立经营的试点等。两年内就搞这些，深度就这样了，主要是由点到面向广度发展；当然有的在深度上也可以继续作些试验和探索。四川的初步改革，就广度来说，是全国最大的，经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带来很多连锁反应，如果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好，就能为将来大改大革摸索经验，作好准备，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在改革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坚定性、坚韧性，要锲而不舍，抓住不放，长期搞下去，但步骤上要稳。对于改革和经济搞活以后出现的问题，一方面不要不知所措，重复过去那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教训，不能一有风吹草动，就犹豫徘徊，走回头路。另一方面，要注意加强领导，深入调查，精心研究，具体分析，因势利导，及时解决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不要放任自流。经济体制改革是四化建设中一个大问题，有关各部门都要加强具体指导。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如果不参加经济改革的实践，不研究解决经济改革中的问题，领导四化建设就有很大的困难。要钻进去，学会它。各级党委不要局限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要从整个经济改革的角度，从全局、从长远来多想一些问题。省委准备以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主，结合实际工作的有关部门和理论工作者，搞一个研究机构，集中力量，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研究改革中的新问题，摸索运动的规律，及时提出方案和对策。

关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最近同有关部门座谈了一下，看来还有以下问题需要注意解决：

（一）自有资金的使用和流向问题。企业扩大自主权后自有资金增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现在国家财政有困难，而企业的钱比过去多。从国家来说，要承认企业的物质利益，承认它的所有权，不去上收；同时，又要加以指导、协调，不能撒手不管。如何指导企业把这些资金用好，减少盲目性，发挥经济效益，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改革的深入，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企业有了资金，它就要扩大再生产，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解决：第一，它要扩大再生产，就有原材料、设备、施工力量等问题，有些它自己解决或通过市场调节解决，有些要在计划上给以安排；第二，它扩大再生产，往往从本企业考虑得多，而不大了解整个地区动力、原料的情况，不大了解其它厂是否也在搞同类项目，搞不好就会拉长长线，搞小而全，搞重复建设，这就需要经济领导机关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考虑到地区、行业长线、短线的状况和交通、能源等条件做好综合平衡，对企业进行指导、合理安排；第三，有的企业有了钱没有用场，有的需要搞挖、革、改[1]，自己的钱又不够，这就需要把企业自有资金组织起来，按自愿互利的原则和协商的办法进行调剂。可以通过银行进行调节，采取存款付息的办

法，把企业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作为中短期贷款，用于搞能源、轻化工等短线。或者采取合营的办法，投资分红的办法，使这些资金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二）利润留成悬殊，造成苦乐不均的问题。在扩大自主权企业中，有些利润很高，企业基金就多，有些又很低，形成行业之间、企业之间、不同产品之间苦乐不均的情况。这里讲的苦乐不均，不是指由于经营好坏造成的收益上的悬殊，主要是指资源条件、技术装备不同，特别是由于价格不合理造成的收益上的悬殊。过去，我们在理论上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因此价格与价值长期严重背离，利润悬殊很大，并不能真正反映经营的好坏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如，现在加工行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原材料、燃料工业和农机工业的利润就比较低；同是纺织企业，有的厂搞化纤、混纺利润就高，有的厂织坯布利润就低；在一个针织厂内，织尼龙袜利润就高，织线袜利润就低。利润高的付出的劳动不一定多，利润低的付出的劳动不一定少。苦乐不均的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职工积极性，影响生产发展。现在有些利润低的，如小五金和一些支农产品，企业就不愿去搞。解决这些问题，根本的是要改革价格体系，使之反映价值规律的要求。但这个问题很复杂，目前条件还不具备。在价格体系还不能作大的改革的情况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考虑以下一些办法：第一，在一个行业或一个企业内，研究定出一个合理的内部价格，作为计算利润留成和奖励的依据。上海纺织工业局就是这样搞的。但是，也不要调整得太多、太猛。我们政策的出发点，主要应当考虑直接生产者、直接经营者的积极性。在全行业内部，拉得很平也不行。第二，调整工商利润。第三，从税收上进行调节，有的要减点税，有的要加点税，如资源税、资产税，甚至可以加征企业基金所得税。第四，在企业利润留成比例上区别对待。总之，这个问题要逐步解决，不能急，不能搞平均主义，要注意保护搞得好的企业的利益，要稳步寻找一些解决苦乐不均的妥善办法。

（三）关于市场调节问题。在企业扩大自主权和实行市场调节以后，要注意加强计划指导，克服生产和经营的盲目性。现在企业比较注意市场需要，这是好的，但也带来一个问题，什么商品短缺利润高，就一拥而上都去搞，以致重复生产，造成浪费。经济领导机关要搞好调查研究，加强市场的预测预报，给企业以指导。在销售方面过去是采购人员满天飞，现在是推销人员满天飞。在一个时期内，对于打开销路，建立经济联系，有它的积极作用。但也要进行指导，采取一些措施，如设货栈、生产资料交易中心、委托代销等，建立经常的渠道，逐步改变推销人员满天飞的状况。

实行市场调节，就必然涉及价格的调整、价格体系的改革。在调整时期，价格体系不能大动，要尽量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中央已经定了这个方针，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农副产品、工业品中属于人民生活的必需品，零售价格要从严控制，不能随便涨价。当前物价上突出的问题，一是有些单位擅自扩大议价商品的范围，任意提高商品的销价，把应按计划调拨的商品按议价出售。要注意这个问题，不准这样搞。还有蔬菜涨价的问题。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

基地，不能把蔬菜拿到集市贸易去出售，必须由蔬菜公司收购，按牌价销售，如果搞产销见面，必须按照蔬菜公司的牌价，否则，要实行经济制裁。农副产品中，不是生活必需品的，如果品，可以组织城市直接到产区去议价采购，减少中转环节降低销价。二是有的企业自销产品的售价同商业零售价格不一致，特别是畅销产品任意提价，要同商业价格一致起来。三是原料提了价，加工产品是否提价？凡是生活必需品，销价不要提，可以用别的办法，如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从利润的分配上或税收上调节。物价不能政出多门，一定要严格检查，统一管理。对于违反政策随意涨价的，要严肃处理。

（四）扩大自主权与专业化改组结合问题。专业化改组是经济发展的要求，非搞不可。过去用行政的办法搞专业公司，看来不成功。上海以一个中心企业为主，把周围同行的小厂联合起来，搞专业化改组，重庆也开始这么搞了，这个办法看来是好的。搞公司，一定要从生产需要出发，不能一开始就搞全能的，把人财物、供产销都管起来。开始可以搞松散的公司，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五）发挥大城市作用的问题。扩大自主权以后，要按经济的内在联系组织商品生产和流通，使国民经济能够多快好省地发展，就需要研究如何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问题。最近，上海市同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省联合办企业，上海出技术，那些地方出原料、出劳动力，共同办厂或搞跨省公司，采取“补偿贸易”或其它办法，合理分配利益。利用这种形式，就在大城市同中、小城市之间，甚至同县社企业之间，建立了经济联系，这个办法很好。不仅可以把大城市的企业搞好，经济搞活，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起来。重庆、成都要朝这个方向做。企业扩大自主权后，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相关的企业就有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利益，就要求发展经济联系，要因势利导，建立大城市企业与外地的企业横向的经济联系。组织专业公司，也要建立在企业之间经济联系的基础上，打破条条、块块分割的状况。

（六）奖金问题。我们要作具体分析，凡是符合政策规定，体现了按劳分配，推动了生产的，都要肯定。现在有的单位滥发奖金，主要是违背政策规定，巧立名目，或者是搞平均主义，这些都不能体现按劳分配，不能促进生产发展，要认真检查，坚决改正。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做到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兼顾，保证国家多得。奖金的发放，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今年四川试点的企业，继续按照省里规定的办法去办。对于那些滥发奖金，搞歪门邪道，挖国家墙脚的，要进行调查，如果发得不合理，要坚决退回。现在有的单位搞生财之道，不搞正道，而是搞歪门邪道，要抓住最突出的，从严惩处。这需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最怕的是不加分析，眉毛胡子一把抓，一说纠正滥发奖金，连正当的奖励也不让搞了；一说要肯定奖金的作用，连最糟糕的滥发现象也不查了。

总之，经济工作一要搞活，二要严格纪律。搞活以后，既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就有人要钻空子。因此，越是搞活了，越要严格纪律，越要加强监督。我们要承认企业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这并不可怕；企业计较自己的经济利益，也不奇怪。这样，企业才有内在的经济动力，才有真正的积极性、主动性。上级领导

机关要善于运用经济杠杆，采取经济的办法，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对企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的错误作法进行干预，把企业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引导上正确的方向，使企业自身的利益同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推动生产的发展。经济搞活以后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止这些，还表现在许多方面，我们要很好研究解决。

注 释

1．挖、革、改，指企业挖潜、革新、改造。

关于农工商联合企业问题*

一九八○年四月七日

* 这是赵紫阳与当时农垦部负责人的谈话。

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可以有几种形式。

第一种是在有大农场群的地方办，如广东海南岛、黑龙江、新疆石河子、四川的阿坝地区。大农场群多在边远偏僻的地方，内地没有这个条件。

第二种，依靠分散的比较小的农场，先将这些小农场联合起来，以他们为基础同周围生产队联合。重庆、成都就适宜这种形式。联合并不是两种不同所有制的合并，主要搞专业化联合，开始可以搞合同制，搞生产前、生产后的联合，生产前的联合主要是生产资料的供应，生产后的联合主要是加工、冷冻、贮藏、运输。我到欧洲看到好多地方就是搞这种联合。我们的联合企业大量的是和周围的生产队签订合同，他们是否入股可以看看再说。签订合同完全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现行体制矛盾没有关系，要支持。要以生产队为对象，直接同生产队打交道。在经济上生产队和联合企业联系起来，公社就可以成为单独行政组织。中国三级所有怎么过渡，不一定是原来的想法，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再过渡到公社。生产队可能永远是一个生产核算单位。最近看了一个美国的材料，他们的生产单位大都是家庭农场，合作社经济是兴起的趋势。美国在六十年代，有些大工商业资本家财团渗透到农业里想搞大农场农业，效果不好。我们城市郊区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就是要同生产队搞联合，内地许多中小城市郊区适合这种形式。联合企业的加工厂同许多生产队联合起来，就有了可靠的原料。这个路子比较宽，这就不单是农场了，而是以农场为基础和周围生产队联系，把农民也吸引进来了。

第三种，一般公社怎么搞法？一般公社都有些社办企业，也要采取在生产队的基础上搞联合，困难的是没有依托。联合，所有制不动。水果、茶叶、蚕桑都可联合，可以搞加工厂，实行利润返还。这类加工厂太小了不行，但也不能搞得太大。搞社会化、专业化的联合。水果加工可以联合，包装可以联合。现在商业搞包装浪费很大，比如外贸，生产队把水果直接交给他们是多少钱，包装好了又是多少钱，包装的这笔钱就可归农民了，现在都归了商业。生产的某些环节如生产、加工、运输、饲料都可以联合。植物保护原来分散搞，现在四川有一个县联合搞了，用东方红喷雾器搞微量喷洒，生产成本大大下降，群众非常喜欢。至于养猪、养鸡开始不一定搞很大的，不一定搞万头猪场，要逐步发展。没有农场的

地方就可搞这种形式的联合企业。要有先有后，需要什么就先办什么，将来小生产也就变成大生产了，也就全部做到专业化、社会化了，这也就是农工综合体、一体化，我们叫“一条龙”。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个大问题，这是农业的组织结构问题，全国还没有接触这个问题。

中国人多，不要搞过分机械化的东西，但是分工要强调，分工分业，这就是专业化。一开始规模不要搞得很大，逐步前进。要提倡养奶山羊，山羊奶同牛奶一样，我喝过。一家一户都可搞。成都搞了千把头，旺产期一只羊一天可出十斤奶。学外国经验也要根据中国的情况来办。

大洪湖渔场属于重庆、达县两个地、市，怎么搞法，我主张搞企业，大家入股，独立经营。企业内部的事谁也不要干涉，可以搞个养殖公司，成立董事会，市、地、县代表参加，大政方针由董事会定。企业内部利润给谁，怎么分成，产品给谁，都由企业来定，谁也不能干涉。这样，企业就搞起来了。如果这个搞得通，几个城市周围还有几个水库就可利用起来了。现在都是行政区划在扯皮。长寿湖是另一种情况，没有这类矛盾。

长寿湖炸鱼的问题，要用经济办法解决，附近社队干脆要他们入股，他就不炸了。用调整物质利益的办法解决，不承认物质利益不行。这样就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和群众利益连起来以后，有人干坏事，群众就不同意了。

现在，流通环节的问题相当的多，压级压价的事固然有，但很大的问题是设施太少。前一段成都每天有几百头猪没办法收。冷库装得满满的，农民意见很大。外运活猪不行，我要他们搞厂外加工腊肉。四川的猪肝每天烂掉很多，卖不出去，搭配着卖。猪头、猪蹄降价处理。广东人喜欢吃猪肝，能运到广东就好了。农业国家发展生产，没有商业设施不行，东西一多就没法处理了。现在是羊皮有人收，羊肉没人要，二三角钱一斤。哪里有冷冻仓，那里生产就能继续发展。广汉有了冷冻仓，他们的兔子就可以继续养了。只讲农业不讲商业不行，要调整商业的设施。

城市近郊要搞科学方面的东西。农业现代化有机械化，也有科学饲养、科学种植和科学栽培的问题。比如养蘑菇，并不需要多少面积。日本大量养蚯蚓，一个平方米可以生产很多，拿蚯蚓喂鸡、养鱼，产量很高。近郊农业要搞工厂化，种菜要搞工厂化，养鱼要搞工厂化。不能只靠种地，要用科学开辟新的生产门路。

农业增产主要靠政策靠科学*

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共四川省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为什么只提两个“靠”

去年十月，我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过一次话，提出几年内农业增产主要靠政策、靠科学。我只讲了两个“靠”，而没有再加一些“靠”。当然从广义上讲，要靠的方面还很多。当时我想，讲的“靠”太多了，就体现不出这几年的侧重点，针对性就不那么突出了。我讲靠政策、靠科学时，有两个限制词，一个是“几年内”，一个是“主要的”。我所以这样提，第一，考虑到在几年内，国家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更多的物资用于搞农田基本建设，搞农业机械化。实际上，今年的水利投资比去年还减少了。第二，在政策上确实还有很大的潜力，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见效最快的。为什么提靠科学呢？这也是因为这方面潜力大，花钱少，收效明显，而各地对这个问题认识还不够，所以有强调的必要。这样讲，并不是说不要搞农田基本建设，搞机械化了，这方面的投资还是要尽量用好，讲究效益，但几年之内靠这些来更大的增产靠不住。当然，这是指一般的地区，像东北那些人少荒地多的地方，只要搞机械化，马上就可以增产，又当别论。

农业要现代化，根本解决农业问题，必须要有大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设，必须实现机械化。为此，国家必须大量地增加对农业的投资，这是肯定的。可是这只有在工业有相当的发展，有大量的资金积累以后才能办到。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全局上来看，国家对农业支援力量的大小，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的财力。像西欧、日本这些国家工业高度发展，有大量的资金积累，因而是工业补贴农业，而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农业补贴工业，还存在不等价交换。我们应当逐步减少不等价交换，并随着工业的发展，随着资金的积累，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逐步做到工业补贴农业。但是要一下子改变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我们由现在农业补贴工业逐步过渡到将来由工业补贴农业，归根结底，还是要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工业利润大量增加才行。看来在调整时期，以至调整后的一段时间内，无论工业还是农业，最迫切的头等重要的还是要把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搞上去。从全国来

看，现在经济建设矛盾的焦点，最短线的就是能源、交通、公路设施，另外就是科学、教育。这些都是最薄弱的环节。工业上现在之所以有百分之几十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就是因为煤、电、气不足。我们国家不论搞工业也好，搞农业也好，搞其它经济建设也好，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是前提条件，但是搞能源、搞交通，建设周期长，而且需要大量投资。所以说，在现在情况下，想要对农业增加很多投资还没有这个条件。

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样，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一定的时期内，农业能否在目前投资增加不大的情况下主要靠政策、靠科学，取得一定程度的增长呢？能否使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集中财力、物力，解决最迫切的能源、交通和适当加强教育、科学，以取得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动？如果能这样的话，就为今后更多地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创造了条件。现在就是要研究有没有这个可能。我认为是可能的。

首先，政策的潜力是不可低估的。中央两个农业文件下达后，变化这么大。省委发出和在全省贯彻100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生产队逐步富起来的意见》）后，那些长期低产多灾的穷困地区，采取的一些特殊办法这么灵，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多年来，我们的农业发展缓慢，中央两个文件一发，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变化这么大，无非第一是提价，这实际是很大的调整，第二是生产队有了自主权，第三是按劳分配，第四是责任制，第五是家庭副业，不外乎就是这么五条。贯彻这五条，一下子就使全国东南西北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明显的好转，多年来没有肉吃的地方有肉吃了，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四川省委100号文件下达后，群众就很欢迎，说这是致富的好文件。这里我说一下安徽的凤阳县，这个地方长期多灾低产，去年在那里搞了一条特殊政策，就是大包干，就这一条，凤阳县去年增产百分之五十，卖给国家的粮食，等于过去二十年的总和，每人口粮五百斤。当然那个办法是适合他那里的情况，不是说每个地方都可以那样搞。尽管各地区情况不同，但总的证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在农业方面的一套“左”的思想、“左”的政策，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全国有那么一些地方，估计有一亿人口，基本上是合作化以来就没有吃到多少甜头，或者三年困难时期垮下来后一直上不去，这些地方农民丧失信心，人口增加了，粮食还没有一九五七年多，究竟是什么问题呢？灾情也有，但不是年年都有。根本问题是挫伤了那里农民的积极性。显然这些地方不是自然灾害问题，而是政策问题。对这些地方国家每年都要调进很多粮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像这些地方，现在不是怎么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问题，而是要恢复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因为这里的农民对集体经济不相信，没有信心。为什么有的地方一搞包产到组一年就翻过来了呢？这说明调动农民被“左”的政策挫伤了的积极性，潜力是很大的。因此，在那些长期困难的地方，按照那里的情况，采取一些能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有些显然是临时性政策，是权宜之计，是迂回一下，首先解决农民的

温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前进。这样，在这些地方国家就能够减少很大一部分负担。只要我们思想解放，因地制宜，真正从实际出发去解决问题，这方面是有很大潜力的。

要解决生产方针上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考虑在生产方针上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这也是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我们要真正因地制宜，从人多、山区多、耕地少这个特点出发，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想问题，研究如何合理利用资源，趋利避害，发挥优势。这方面的潜力很大，窍门很多，可以多快好省。有些地方不适宜种粮食，硬要去种粮食，于是又要修水利，又要改土，花了很多工，投了很多资，效益并不大。如果因地制宜去搞畜牧，种经济林木，或者搞其它的东西，水利就可以晚点修，土地也不一定搞那么平，这就可以大大减少投资，创造的价值比种粮食还要高。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同国际市场结合起来了，不能光从自给经济去考虑，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上去考虑，这就可以发挥我们的长处。所以我们应该在继续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大搞农林牧副渔，这样门路就多了。不搞自给经济，要发展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包括到国际市场上去交换，这样经济就活了。我们中国要发挥人多这个优势，不仅工业上要搞劳动密集的产品，农业上也要搞劳动密集的产品。我们拿劳动密集的农副产品到国际市场上交换粮食，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现在就是我们的港口还不行。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建设，都要注意人多资金少这个特点，农业上还有个山区多、耕地少的特点。要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去想问题，去研究生产方针，去考虑长远的规划。

在全国长期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1980年4月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后，第一次在全国性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制订长期计划要认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重要课题"，强调"经济建设一定要十分重视经济效果"，"农业、工业发展主要靠政策、靠科学"等指导思想，对当时制订长期计划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首先，对依林[1]同志刚才讲的关于制订长期计划的方针和这次座谈会的评价，我完全同意。这是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四个半天会议的讨论，作了很好的综合，代表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意见；同时也是对这次座谈会的总结。下面，我讲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正确，供大家研究讨论。

一、制订长期计划要认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重要课题。到二○○○年达到什么目标？小平同志提出达到"小康"水平的概念。这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除了这个目标外，还有四化的路子究竟怎么走，怎样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课题。在中国搞现代化建设，如何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发挥长处，避免短处，值得好好研究讨论一番。这次大家都回顾了过去的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过去经济工作搞的结果不大理想，根本问题还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够，不实事求是，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去年，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真正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害。我们应当花大力气去研究、探索、认识这个课题。现在，有许多问题需要展开讨论。

比如，从近代历史来看，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在经济发达国家取得的，而是首先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的。胜利以后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应当大力发展生产。旧中国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没有经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在革命胜利，并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是不是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抓经济建设上，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应该注意发展商品经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这里面还有一个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存在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充分发挥它们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中的积极作用。

又如，中国是个大国，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如何发挥大国的长处，避免大国的短处，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国家大，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

力，建设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项目。但也要看到国家大，情况复杂，更加不平衡，加上交通不发达，通讯又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避免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不然，势必产生官僚主义，效率很低，压抑地方的积极性。

再如，我们国家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都很丰富。要研究如何发挥这些优势，充分利用资源，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的产品，即容纳劳力多、投资又少的产品，同外国进行交换。在技术政策上，要从我国的现实出发，有些要采用先进技术，同时要采用适用技术（中间技术）。这个问题也应研究。

同时，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而且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从这个现实出发，在确定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时，积累率就不能太高，发展速度不能要求太急。如果主观上要求过高、过急，欲速则不达，实际上反而慢，过去吃亏就是如此。

还有，在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下，经济结构是轻一点好，还是重一点好。是否可以用更大的力量多发展一些消费资料生产，解决积累、财政、就业、出口等问题。

当然，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决不止我上面讲的这几点，甚至可能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但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很好探索、研究，认真总结经验。

二、在讨论长期计划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经济建设一定要十分注意经济效果。这是经过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邓小平同志讲，注意经济效果是各项工作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过去不顾经济效果的毛病，一定要改变过来。过去经济效果差，是经济工作各种弊病的集中表现。我们搞建设三十年了，人民节衣缩食，付出了很大代价，但经济效果不好。这里面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

注意经济效果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我们的国家，各个地区、各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优势，这方面的潜力很大。如果我们不搞自给自足，自成体系，“大而全”，“小而全”，而是从各自的具体情况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就能大大提高经济效果，大大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有些地方搞地方的经济体系，明明是得不偿失，但也要干，造成很大浪费。这个问题除了我们有小生产的自然经济思想以外，我看，同我们的体制、政策有很大关系。由于大锅不开饭，就只能各自另起炉灶。我到四川，就搞小铁厂，因为老百姓没有铁锅。东北开了不少小铝厂，影响大铝厂供电，后来确定把产品分给地方一部分，各地的小铝厂就不搞了。有些地方，不适合搞煤的，要去搞煤，不适合搞铁的要去搞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说明我们政策上、制度上还有问题，扬长不能补短，不能互通有无。有的地方宜于搞经济作物，不给它粮食，也就发挥不了它搞经济作物的长处。所以就发生了在全国讲平衡时，每个省也讲平衡，甚至专区、县也讲平衡。大家都讲自给自足，这就根本谈不上发挥优势了。今后应该扬长补短，互通有无。要加强地方与地方之间，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经济联系，解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不产煤的省市，可以投资到有煤的地方去，搞联合经营。在经济改革中，根据生产的需要，提倡各地发展经济联系，搞联合经营，这样就加强了计划指导，避免重复建设。

联合有各种形式，如联合投资、合作办厂、产品交换等。在这方面要制订一些政策，立点法。如果体制、政策经常变来变去，大家就不放心，就不愿搞，所以要从政策、制度上作些规定。首先对于有突出优势的地方，要给它创造条件，给它机会。比如湿热带地区，全国约有五万平方公里，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地区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这就要帮它解决必需的条件。总之，要从体制、政策、办法上进行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搞各项事业，进行各项建设，都必须择优。哪个地方，哪项事业投资最少，见效最快，就先搞哪个，要打破部门和地区的界限。当然这样搞，会发生不平衡。我们要承认不平衡，允许不平衡，不要怕不平衡。允许一个时期的不平衡，正是为将来缩小不平衡创造条件。如果不首先把经济效果最好的地方搞起来，而是齐头并进一起搞的话，那么，哪里也搞不起来。例如教育，必须加强，但也要承认各地的不平衡，全国各地在教育上都按一个标准要求，国家的财力办不到。

如果能把四亿人口地区的教育搞好，人才就有的是，就可以输送给各方面去。对于教育问题，既要看到搞四化，培养建设人才的迫切性，又要看到我们国家大，全国不可能平衡发展。要有不同要求，抓好重点地区和重点学校，让一些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得快一些，多培养一些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总之，要解决怎样做到投资少，收效大。当然，我们不是要永远扩大差别，而是从我们国家现在人口多、底子薄的实际状况出发来考虑，把容易搞上去的先搞好，就可以达到多快好省。这样，也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差别会扩大一些，那些优势少的地方可能发展慢些，优势多的地方会发展快些，但优势多的地方先发展了，再回过头来帮助发展优势少的地方就有力量了。美国是先发展东部，后开发西部。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平均每人国民收入三千美元，而黑山地区只有五百美元。我们国家里，在一定时期内也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存在，应该允许这样。

三、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现在中央定下了积累率百分之二十五的杠子，这是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确定这样的积累率，对于经济的稳步发展，避免折腾，对于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都有很大的意义。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是，从今年开始，要在三四年内把积累率降到百分之二十五，这确实是矛盾和困难很多。

今后三四年是非常重要的三四年，是由被动转为主动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三四年搞得好不好，关系很大。在这三四年中，主要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使人民生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改善，当然幅度不可能很大，但必须有所改善。

二是无论如何不能继续发生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问题要解决，物价要保持基本稳定。通货膨胀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加重。如果通货膨胀扩大，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安定团结，保持局势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人、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但通货一膨胀，问题就大了。

三是为今后新的发展作最必要的、最基本的准备。在三四年后，要有新的速度，就需要作最必要的准备。主要是指生产建设上的准备。要通过调整，使比例

失调的状况能够改善，这就要上一些能源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建设项目。体制改革上也要有准备，二三年内要完成大改革的准备，现在还只是小改小革。

这三条，我们必须做到。但要做到会有很多困难，是充满着矛盾的。例如，去年财政有赤字，今年仍然有赤字，要避免通货膨胀，不能连续出现赤字；而用于消费的部分不仅不能减少，并要逐步增加一些；为今后发展作必要的准备，也需要一些投资，确实矛盾很多。在积累减少的情况下，出路就在于如何把钱用好，把经济效果提高。我们要从以下方面想办法：

一是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如果不下一些不必要的项目，必须上的项目就不可能上。

二是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只有把轻工业搞好，才能活跃市场，安排就业，增加财政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轻工业能源消耗也少。

三是要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把各种资金引到国家建设需要的方向上来，弥补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解决以小挤大，重复建设的问题。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在经济上搞联合，走联合之路。现在实行两级财政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后，地方和企业的钱会逐年增多，但无论如何再不能把地方和企业的钱收上来，这条路不能走。只能采取经济的办法，自愿协商，实行互利，搞合营或联合，把资金引导到国家急需的、重要的建设上来。比如轻工，与其各个地方自己搞，不如集中在条件好的地方搞，可以成立股份公司，分利润，分产品。国家要制订有关的政策，要立法，所有制不能随便变。这样，矛盾可能会缓和些。

四是随着整个经济战线大家按经济规律办事，讲究经济效果，以后流动资金会节约一部分下来。现在全国流动资金二千多亿元，数字这么大，一个主要原因是产销脱节，产品压在仓库里。今后货不对路的情况改善了，流动资金就可以减少，基建投资就可以适当增加，看来，节省出几十个亿到百把亿是可能的。我们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现在最困难的就是这几年，但这几年一定要搞好。现在的有利条件之一是可以借到外资。应该优先把外资用在调整上，这样就不会因积累率压的过猛而带来不良循环，就会减少一些矛盾，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不至增加新的困难，就能使调整进行得顺利一些。在这几年中，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外资这个有利条件，让外资为调整服务。

四、最近几年之内，农业、工业发展主要是靠政策，靠科学。以前我讲过发展农业，主要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工业也是这样，要靠扩大企业自主权，还有按劳分配和实行市场调节等；靠技术改造。我们能不能在一般不增加或不多增加投资的情况下，使农业、工业有一定的增长速度，使我们能够集中一些财力、物力去加强能源、交通、建筑业和城市建设呢？这是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这涉及我们对工农业的潜力怎么估计和潜力在什么地方的问题。现在工农业的潜力很大，最明显的是长期以来，“左”的政策和统得过死的体制限制了潜力的发挥。所以把体制搞活，政策适当放宽，潜力就可以挖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了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农村形势好转；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后，

利润迅速增加，就说明了这点。过去，统收统支那套办法使各经济单位浪费严重。这两年凡是试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产值比面上的企业并不增加多少，但利润却增加比较多，主要是浪费减少了，效益提高了。现在就是要靠把直接生产者、直接经营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要承认他们的物质利益，这样就能把多年没有挖掘的潜力挖出来。这是最现实的、吹糠见米的办法。现在“左”的一套的流毒是否全部肃清了？我看并不如此。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农业上中央两个文件的精神要进一步落实，工业上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也要继续抓紧抓好。

经济搞活以后，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大量的、主要的是，小改小革以后解放了的生产力同现行规章制度、同整个经济体制的矛盾。另外，放活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反映了我们的工作跟不上，即监督、检查与纪律跟不上。对改革后出现的问题怎么看、怎么办？总的讲，现在活得还不够，工作还跟不上，需要加以解决。这次改革一定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决不能重复过去那样“一放就乱，一乱就收”，而是要继续改革，把工作跟上去研究一些解决的办法。比如，财政体制改革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像原料产区同原来城市加工的矛盾，可以采取办联合企业的办法来解决。也可以采取把计划内统一调配的基数定下来，并保证调拨，超产部分可以拿到原来的工厂去加工，分产品或者分利润，不要自己再搞小加工厂。如烟叶等原料可以这样办。还有茶叶，精制茶利润大，归外贸搞；而粗制茶利润小，归社队搞，就不愿干。浙江等地采取规定粗茶交售的基数，超过计划部分送到精制茶厂加工，返回一部分利润或产品，就解决了矛盾。还有些产品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可以互通有无，在省、市、区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进行交换。总之，要在承认各自的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发展经济联系，避免重复建设和自成体系。这样既可以活，又不会乱。实际上这就是要在活的基础上加强计划指导。这个问题，各地方各部门可以进行研究。

注 释

1．姚依林（1917—1994），安徽贵池人。曾任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经济体制改革步骤要积极稳妥*

一九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的发言。

一、体制改革的步骤

大改什么时候搞？我认为两三年内不能大改，只能搞大改的方案，搞一些步子较大的试点。根本问题是，两三年内价格不能大改。价格不改革，体制大改中的什么价值规律作用，什么市场调节，就都会是空的。而价格是个大问题，大改搞得不好，要出大乱子。现在国内无论经济情况还是政治情况，都要求物价稳定，不允许大动。所以，从今年算起，三年内要搞好调整，不能大改。

但三年内，体制改革工作还要积极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为大改作准备，包括理论探讨，历史、现状的调查研究，积累和总结现有改革和试点的经验，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城市作较大步子的试点，拟定改革方案等等；二是抓好当前的改革。企业扩大自主权、市场调节、两级财政这三项改革带来很多变化、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二、体制改革工作怎么抓

体制改革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抓起来。原来中财委有四个调查组，有的可以不要了，如进出口小组的工作由进出口委员会搞。体制小组要保留并要加强，成为中央财经小组的体制改革办公室。它的任务是，在中央财经小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一起研究提出改革方案，起草文件，指导当前的改革工作。

三、要保护竞争，推动联合

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市场调节、两级财政或财政包干后，出现一些重大问题。当前体制改革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

（一）一些原料产区不愿把烟叶、茶叶、蚕茧等原料调给城市加工，矛盾十

分突出。

（二）企业、地方有了钱，而且越来越多。怎样把这些预算外的资金尽可能用得恰当一些，做到既有助于解决一些必须建设项目投资不足的问题，又防止地方和企业的盲目性。

（三）出现了地方封锁，搞地方保护政策，不许外地产品到本地销售，不许到外地订货。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如奖金问题，利润留成苦乐不均问题。但以上三个问题，原料问题、防止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问题，是当前更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要影响调整和改革。如果不制止封锁，那么，就会保护落后，我们说的发挥优势、提高经济效益都会成为空话。国务院要有一个态度，要采取措施。我们采取什么态度？要保护竞争，制止封锁，提倡在互利的基础上搞联合。要起草一个文件，由国务院发，让各地区、各部门都试点，推动联合。

可以有几种联合，如联合投资、来料加工，利润分成或返还利润、产品交换、互通有无、补偿贸易等。都要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方式联合。一定要搞互利政策，不搞互利，都走不通。要在互利的基础上搞多种形式的经济联系、经济联合。这个路子非走不可。

我的看法是，我们今后基建资金不能再恢复搞一个渠道。如果过去一个时期这样做有它的必要性，现在这个时代已过去了。今后，我们的投资渠道、资金来源，恐怕是多条的、多方面的，问题是要用经济办法，要有经济措施来吸引、筹措、集中各方面的资金。国家投资除用于国防建设外，主要搞一些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项目，如能源、大水利工程、港口等。其他建设、赚钱的项目，由投资公司、合股公司，地方、企业的资金来搞。此外，银行的作用十分重要。无论地方、企业的存款，银行都要给利息。有些新老企业，企业基金多，用不了，可以存入银行。银行吸收了存款，就可以把一部分用作长期贷款，起到筹措、集中资金的作用。我为什么讲多种形式的联合呢？因为，将来联合的路子会越走越宽。现在什么都压在财政部身上，那不行。中央财政只能量力而行。所以，联合不是权宜之计，它既可吸引、筹措各种资金，用于国家建设，解决国家资金的不足，还可以防止地方和企业盲目建设、重复建设。这样搞，将来所有制就复杂了。全民、集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都是社会主义的。

当然，搞联合，要自愿互利，要签订合同。现在地方、企业最怕的是“肉包子打狗”。合同要有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随意改变。谁改变，谁负经济责任。

竞争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市场调节基础上的必然趋势。竞争还能促使企业联合。例如，通过竞争，上海一个厂比不过四川一个厂，就主动愿意为四川那个厂生产配件。我们要做几条规定，保护竞争，推动联合。

四、关于公司和经济中心

这两个问题，今后我们要专题讨论，要早一点讨论。

体制改革中，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组织公司的问题。我不主张搞全国性的丝绸公司。现在这样搞法，就要打击四川农民养蚕的积极性。要研究一下。如果每个部都搞公司，就会把城市工业搞得四分五裂。

经济中心可以试验，搞它几个试点。

关于发展家庭专业户养鸡的批语*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 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1318期刊登一份材料反映，哈尔滨亚麻厂老工人王淑兰退休以后，利用家中八平方米的旧厨房，采用四层叠层笼养、全封闭、机械通风的办法，养了250只鸡，半年时间就向国家交售鸡蛋3000斤。这是赵紫阳在该材料上写的批语。

此件请印送主席、副主席、耀邦[1]同志并书记处、财经小组（扩大）、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参阅。

哈尔滨市退休女工王淑兰，一面带孩子，一面发展家庭养鸡，采用手工劳动和一些简单的机械，养母鸡二百五十只，一年产蛋三千斤，纯收入二千一百元。这个材料看了很受启发。四川江油县城关公社也有类似情况，社员在家里因陋就简养几十只鸡，效果也很好。看来采取这种经营方式发展养鸡事业，是解决大中城市禽蛋供应的一条投资小、见效快的路子，比搞大的机械化养鸡场容易得多。城市郊区的生产队，可以把养鸡包给一些热心的、有技能的专业户、专业人员去干，建立责任制。有关部门要帮助解决饲料问题，就地取材，选配适量的添加剂做成有营养的、成本低的配合饲料，供应给饲养人员。这样做，我们城市禽蛋的供应就可能很快好转。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赵紫阳

五月二十四日

注 释

1．胡耀邦（1915—1989），湖南浏阳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署主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党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外贸体制改革中一些问题的意见*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就广交会一份材料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材料反映，1980年春季广交会在外贸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积极开展工作，协调解决矛盾，坚持统一对外原则，维护了国家利益，效果很好。

主席、副主席、耀邦同志、书记处、副总理和国务院各委、外贸部党组：

送上春季广交会的一份材料，供参阅。前一段，对广交会、对进出口的问题反映很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外贸体制的改革带来了混乱。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缺乏分析的。应当看到，一年多来我国外贸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同三中全会以来外贸体制进行了一些初步改革，调动了各级的积极性分不开的。至于在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那是难于避免的，是需要我们工作跟上去的问题。正如广交会的化工等交易团那样，只要把工作做好，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我们绝不能留恋过去闭关锁国、独家经营、统得过死的老办法。今后外贸事业要大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稳妥地进行改革；同时，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认真加以解决。各级领导机关应精心研究、指导，做好统筹、协调工作，统一政策，统一价格，统一步调，及时解决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外贸部门要满腔热情地、积极主动地发现和总结在搞活的基础上加强统一管理的新经验、新办法，做到活而不乱，统而不死。以上意见，供参考。

赵紫阳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关于当前农村政策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九日

万里[1]同志并转耀邦同志：

最近看了几个地方的材料。目前正当夏种夏收的大忙季节，部分县社在所有制、责任制上仍在变动。如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有的还在继续扩大，有的又布置立即纠正，致使这些地方人心不定。这对当前农业生产是很不利的。为了不失时机地把今年农业生产抓好，特别是把秋收作物抓好，我认为当前对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应当稳定下来为好，使大家把精力集中到生产上，不要变来变去，错过农时。

根据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指示，需要组织农业部门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相结合，深入到不同类型的地区和社队，对包产到户问题作一些比较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争取在今年秋后能够形成一个中央文件，有个统一的、明确的说法，有领导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第一，在那些困难、落后的地方，可以包产到户；第二，在那些生产比较正常、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原则上不搞包产到户（至于社队的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可以包给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第三，现在有些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也搞了包产到户的，允许进行试验，经过一段实践看看结果如何。新华社《内部参考》第五十期登载了陕北米脂县孟家坪生产队的一个材料，这个队有十六户，共十二个男全劳力。生产队把粮食包产给八个男全劳力（老弱户和女劳力不包），另外四个男全劳力，有二人包放羊，有二人到农田基建队。四属户[2]和女劳力到农田基建队参加劳动，评记工分。结果，去年粮食总产量由三万多斤增加到六万四千斤，全队人均生产粮食一千斤，社员增加了收入，集体增加了积累。看来，在生产队的统一领导下，在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包产到人，比一般地平均包产到户要好，这是一种责任制的形式。不仅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的，应向这个方向发展，就是在那些落后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的，也要逐步朝这个方向引导。

以上问题，建议在书记处议一议，请酌。

赵紫阳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九日

注 释

1．万里（1916—2015），山东东平人。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中央建工部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铁道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四属户，指户籍在农村的现役军人亲属、烈士亲属、工人亲属和干部亲属的农户。这些农户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缺乏劳动力，当时需要生产队给予照顾。

关于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承包到人责任制的批语*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日

*　这是赵紫阳就新华社《内部参考》1980年第50期上刊登的陕西省米脂县的材料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

主席、副主席、耀邦同志、书记处、财经小组并国家农委：

陕北米脂县孟家坪生产队的这个材料很有特点，值得一看。这个生产队搞的不是一般的包产到户，而是在生产队的统一领导下，在专业化协作的基础上建立个人责任制，社员分工去包产种粮食、养羊、造林，搞农田基本建设，使这个穷山沟的面貌很快发生变化。这种生产责任制形式比一般的包产到户要好。它能够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把生产搞好；同时又不至于把生产队架空，改变队的统一核算，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这种办法，不仅产品比较单纯的社队可以这样搞；就是在生产多样化、经营门路多的社队也可以这样搞。生产队根据生产的需要和每个社员的特长，按专业分工协作，有的可以包产种粮食，有的包林业，有的包牲畜养殖，有的包工副业，有的包农机、防治病虫害等。包产种粮食，也不是每户都平均一份，会精耕细作的可以多包，劳弱户可以不包，去干其他活。总之，要分工合作，各尽其能。这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有发展前途的责任制形式。在那些困难落后的地方搞包产到户的，现在马上推行这种形式有困难，应逐步往这个方向引导。在那些生产比较正常、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原则上不要搞包产到户，已经包产到户的，应按这种形式进行试验，这样生产力就会大大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也会日益巩固。

以上意见，供参考。

赵紫阳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日

会见世界银行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八○年七月十六日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与世界银行副行长夏希·侯赛因（以下简称侯）谈话要点如下：

赵：请坐，欢迎你们。

侯：谢谢。

赵：你们都是世界银行主管东亚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官员，很欢迎你们常来。

侯：谢谢。

赵：相信我们的合作还会更好。我们将大力支持世界银行在中国的活动。今年五月你们的执行董事会决定恢复中国席位，这是一件伸张国际正义的大事。在这里，对麦克纳马拉[1]先生、副行长先生和所有为恢复中国席位做出努力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侯：谢谢。我带来了麦克纳马拉先生对您的问候。自从他来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在世界银行恢复代表权的问题已经完成了。我们希望不要多久，中国在世界银行的表决权的比重，将会同中国的国际地位相适应。麦克纳马拉先生正在努力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在三个月内具体研究中国和世界银行的合作。我在和中国官员的三天接触中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官员的坦率。我们认为，这对于建立相互信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你们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即实现现代化。我们希望世界银行在这方面将是你们的一个伙伴。

赵：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但是我们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实现现代化。我们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譬如资源丰富，这是长处。人口多，这既是长处，又是短处。人口多，劳动力充足，而且中国人是勤劳聪明的。但是人口多，负担也重，积累建设资金很困难，资金不足是我们搞现代化的困难之一。另外，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落后。国外朋友们对我们这方面的议论很多，反映我们办事慢，效率低，官僚主义严重。这个批评符合事实。但这不是中国工作人员的个人作风问题，主要是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我们的管理体制是五十年代仿照苏联的模式建立的，现在决心要改革。我可以告诉朋友们，从开始改革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今后将毫不动摇，坚定地改下去，当然我们

现在的改革是初步的，是小改小革。中国的经济改革，看来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一边实践和总结经验，一边前进，按照一个既定的方向，有步骤地在各个领域里把我们的改革推向前进。

我们的改革方向，是要把社会主义制度同发展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就是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在座的都是经济学家。过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的理论分析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它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国民经济由小生产状态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

我们改革的基本方面，主要有两点，一个是要使我们的企业或经济单位，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承担者，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都可以相当独立地进行自己的经营活动，包括生产和销售。每一个企业或经济单位都要进行经济核算，在一定程度上自负盈亏，也就是有自己的权力、利益和责任。我们现在提出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方向起步的。我所以说它是一个起步，因为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领域要改革。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要运用经济杠杆，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来引导企业的发展。一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销售什么，如何销售，不只是靠国家计划来调节，而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价格、利润、税收等经济因素来决定自己的经营方向，也就是说，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价格不只是要符合价值，还要考虑供求关系。

我这样讲，不是不要计划。我们讲的计划，主要是对生产起指导作用，而不是对生产的各个方面通过规定各种繁琐的具体指标来直接干涉企业。我们将来的计划应当是灵活的，而不是硬性的，对企业是一种参考，是建立在预测基础上的，主要是在宏观方面的。当然，我们要完成这么一个改革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两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在改革中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我们在两年的调整中，已取得相当的成效，这个成效同我们的改革是分不开的。你们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兴趣，可以在北京和四川找一些企业负责人谈谈，他们会比我讲得更生动一些。我上面讲的这方面的困难是我们经济管理体制的短处，要靠我们自己解决。

我们另一个困难是资金不足。关于资金问题，我们主要是依靠自己积累，但同时也要积极引进外资。这个总政策是已经确定下来了，我们将坚持这样做下去。现在国外一些朋友有议论，认为中国资金缺乏，但是很多国家和财团愿向中国提供的贷款，中国使用又不多，是不是中国的政策发生变化。我可以肯定地讲，我们这个政策没有变。

我们确实在一二年里使用国外资金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多，主要原因是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对外资如何使用得更合算，效果更好，需要一个摸索过程。大家知道，借钱是要还的，如果使用效果不好，就会影响中国的信誉。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当然，随着我们中国在这方面逐步取得经验，我们运用外资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这里我还想说一个问题，我们搞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

是我们缺乏基础设施。所谓基础设施就是指交通、能源、电讯、港口以至城市建设。大家知道，这是搞工业和其它事业的前提。

在这方面除了煤炭、石油这样少数几项外，其他基础设施，包括水电建设周期都是比较长的，往往是自己缺乏偿还能力。所以这些项目我们很需要得到世界银行的贷款，因为你们的贷款周期比较长，贷款条件比较优惠。我们有了这样的贷款把基础设施这个薄弱环节很快搞好，其他方面就可以利用商业贷款了。所以我们很欢迎世界银行在开发能源、发展交通、建设港口以及教育、电讯等方面提供贷款。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我们对人类贡献还太少。我们希望在本世纪末我们国家的面貌有一个变化，到那时我们对人类的贡献比现在会大得多。

侯：非常感谢您这样非常全面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设想。你们现在正在从事第二次革命。你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对本世纪末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都有很大影响。我的确希望你们正在采取的步骤将解放中国人民的潜力。世界银行不仅是一个借钱机构，也是一个搞建设的机构。我们希望世界银行同中国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借贷关系，而且使这个机构同中国为了解放伟大的力量而建立合作关系。我们对贵国经济、对你们的项目与计划还很不了解，但我们一定尽快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为此，我们需要贵国各个政府部门，例如计委、统计局、建委和各部的充分合作。你谈到中国需要外资，我们希望在适当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银行最大的客户之一。要做到这一点要花很多时间。原因之一是我们必须了解你们的计划、你们的项目，这要花时间。其次，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需要很大，世界银行正在找各种办法来满足它的需要。我肯定你们同我一样，希望中国在世界银行里面的地位不至于会影响朋友们及其他国家的地位，尤其是穷国的地位。你提到中国在四川进行一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工作，我们是要到四川去的。我们希望在那儿看到你和你的同事在这方面作出的成就。

赵：现在正是盛夏季节，在小暑和大暑之间。所以我对副行长先生和你的同事不辞劳苦到中国来为促进世界银行和中国合作所做的努力表示非常感谢。我相信我们有关部门会同你们很好配合的。它们会向你们提供你们需要的情况。请你，副行长先生回去以后，向麦克纳马拉先生致意。我们对他为了促进世界银行和中国的合作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努力表示欣赏。在你们访问后期，谷牧副总理要同各位会见，他是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我今天同大家会见是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欢迎，也表示对你们的工作的支持。将来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和谷牧副总理充分交换意见。

是不是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祝你们在中国生活愉快！

侯：谢谢。

注 释

1．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1916—2009），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时任世界银行行长，曾任美国国防部长。

关于国外贷款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小平同志并报华主席、先念[1]、陈云[2]副主席：

关于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提出向我贷款二十亿美元问题，经了解，其利率高达百分之八点七五至九点二五，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买方信贷利率都要高，条件并不优惠。但美国的这种贷款，对世界各国都是这个办法，并不是特别对我苛刻。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财经小组研究后，认为对这笔贷款可采取冷而不断的办法，可继续与其谈判，要求美方降低利率、放宽条件，把皮球踢给对方，而不通过外交途径直接回绝。目前，美国正在竞选总统，这样做，也可避免政治上引起不必要的波折。

另外，我正争取从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基金，借用长期低利贷款，这项谈判目前进行得比较顺利，这样处理留有余地，也有利于其他国际信贷的继续进行。

赵紫阳

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注 释

1．李先念（1909—1992），湖北红安人。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2．陈云（1905—1995），上海青浦人。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建立东北商品粮基地
是搞活全国农业的关键*

一九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黑龙江省考察时的谈话要点。

在东北建立商品粮基地对搞活全国农业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把全国的农业搞活，一个是要抓政策，一个是要贯彻因地制宜的生产方针。实行因地制宜的结果，全国多数地方的农业产值会大量增加，但粮食不一定增加很多。因为南方讲因地制宜，发挥本地优势，有些地方粮食种植面积就要减少。

要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考虑东北的商品粮基地建设问题。上一次在国务院汇报会上，我讲了东北建立商品粮基地，对支援全国把农业搞活，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东北不多搞一些粮食，全国农业很难搞活。

关于粮食问题，为了把全国农业搞活，采取三条方针：第一，确定每年进口一千万吨到一千五百万吨粮食的长期方针。一千万吨就是二百亿斤，一千五百万吨就是三百亿斤。我们进口这些粮食，可以使国内有些地方休养生息，有些地方可以贯彻因地制宜的方针。不要看三百亿斤粮食数量不大，作用可不小。进口三百亿斤粮食，是不是说就改变了我国粮食要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没有改变。十亿人口吃饭就不是三百亿斤粮食的问题，而是几千亿斤的问题。这三百亿斤粮食，只是为了使农业因地制宜、搞活一些的补充措施，丝毫不改变中国粮食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第二，就是在东北建立商品粮基地，希望能从东北多拿一百亿斤粮食，五年不行，十年嘛！十年以后从东北多拿一百亿斤粮食我看可能。第三，全国粮食征购任务虽然都定死了，固定了，但每年都有丰收地区，在丰收地区议价收购几十亿斤到一百亿斤粮食，这也是可能的。这三项加起来就是五百亿斤，全国也就好办了。所以，确定在东北建立商品粮基地，这是从我们国家整个农业上考虑的，是一项战略措施。就是这么一个来龙去脉。

黑龙江是搞现代化大农业的一块宝地

东北这个地方，首先是黑龙江，确实是我们国家具有建设现代化大农业优越条件的一个地区。建设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现代化大农业，东北，首先是黑龙江这个地方具备这个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黑龙江是具有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的优越条件的一块宝地。黑龙江人少，土地多，土地肥，有一定的降雨量，交通也比较方便。全国土地肥的地方有，但人口多。人口少，土地多的地方也有，但降雨量少，交通也不方便，如新疆。而黑龙江省这几个条件都具备。

另一个条件，在东北建设商品粮基地，省、地、县委，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都有很高的积极性，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可以讲是群众的强烈要求，因为这是使群众富裕的必由之路。有些事，从上面看应该搞，但下面没有积极性，这就搞不好。在东北建立商品粮基地，对国家利益大，对群众利益也大，上下都想到一起了。

再一个是有各方面的条件，有了路子。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好的地方，像克山县黎明大队、建设大队，爱珲县罕达气大队，友谊农场五分场，富锦县的开荒点等，虽然不能代表普遍水平，但它代表了一条道路，前进有了路子，有了经验。

再一个是有了措施了。拖拉机呀，贷款呀，肥料呀，都有规划，作了安排。总的看是有条件，有路子，有措施，大有希望。上下各方面共同努力，把这件事办成功。

农业机械化是建立商品粮基地的关键

在东北建设商品粮基地这件事，农业机械化是关键。土地多人少是个困难，但是有了机械化，它就可以转化为很高的生产率、商品率。抓住了机械化这个环节，黑龙江农业资源丰富，人少地多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所以爱珲县委书记的话讲得很好：“机械化显神威，农业优势大发挥。”抓住了机械化这个关键，整个东北商品粮基地这盘棋就活了。我们原来在北京也有这个想法，看了以后加深了。全国农业机械化，毫无疑问应当把重点摆到黑龙江，摆在东北，其它地方一时化不了，先化你们。搞农业机械化，要同作物种植区域化结合起来。这样，拖拉机后面的东西就容易配套了。东北搞农业这一套和关内有很多不一样，这里就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机械化前提下，施用化肥，化学除草，改良种子，狠抓这么几条，增加粮食产量。今后不强调粮食的单产多少斤。报纸也不宣传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主要强调总产的增加，总产增加才体现农业生产水平。在产粮区，主要讲每人生产多少粮食，每人占有多少粮食，向国家交多少粮食。这样，你荒地多，就扩大耕地面积；土地少，就努力提高单产。谁搞的粮食多，谁就有本事。机械化问题看来不仅可以扩大耕地面积，还提高单产。从一些地区的情况看，机械化加化肥，加化学除草，可以提高三分之一的产量。

关于水利问题，要依靠各地自力更生来搞。从灌溉的角度来讲，在那些地下水源比较丰富的地方，打井加喷灌是个好办法，当然也不排除其它措施。三江平

原排水问题要和扩大开荒一起来搞。要在排水确有把握的地方开荒。头几年在不需要排水的地方多开一些。因为这几年正旱，还可以，如果排水不解决，发起洪水来不但现在开荒没把握，过去开的能否保住也没把握。三江平原排水用水要一块一块解决，干渠和支渠配套要同时搞。光把干渠挖通了，没有支渠，有了涝灾照样淹。要搞一块受益一块。哪个地方排水不落实，开荒就不能落实。现在旱，如果将来涝，洪水排不走，沼泽地发起洪水来不走了，那你开荒就没有用了。

扩大家庭副业和自留地是容纳多余劳力的有效办法

农业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真正发挥机械化的优势，发挥机械化效率，就要实现全盘机械化。但是一经全盘机械化，就马上出现劳动力紧张变为劳动力充裕。农活全过程都是机械化，整个工序配套，大体上只要原来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就够了。因此，农业机械化后就发生个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省、地、县委要考虑这个问题。劳动力出路究竟怎样解决？急需总结经验来研究这个问题。在这里提出这么一个建议，我认为在这样一些地区，比较现实容易做到的是扩大家庭副业，扩大自留地。这是目前容纳多余劳动力最快、最有效的办法。越是机械化，适合用机械化搞大农业的地方，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越应该搞。有人提出养奶牛，我赞成这个意见。我看只要大量发展畜牧业，劳力多没活干的问题就可解决。

国营农场有条件的地方，也可划点地让家属搞。农场职工可以一个人在农场劳动，一个人在家养奶牛，养猪。中国人不是多吗？划给他一块地，让他去就业。自留地开放，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么，让他在这里“绣花”。黑龙江为了适应机械化的发展，划了作物带，这很好。农作物区域化就可以更好地发挥机械的力量。正因为这样，家庭副业、家庭自留地要扩大一些，搞多种多样的农副小商品，满足市场需要。机械化大生产，不外乎就是稻谷、大豆、小麦、玉米、甜菜，以及大面积能种的一些其它东西，不可能搞小商品。用机械化搞大农业，同时扩大自留地，扩大小宗作物的生产，两者可以并行不悖。

随着其它条件的具备，再逐步发展其他一些事情，比如社队工业，以及其它一些事业。但是那些东西需要很多条件，不是那么简单，不可能一下子大发展。东北这样的地方，将来机械化以后，剩余劳动力向哪方面发展，这个事情值得研究。但是可以肯定一条，东北搞社队工业不能像江苏那样，各地方有各地方的特点。社队工业搞些产品不那么简单，有产、供、销问题，还有技术问题，弄不好搞起来产品销不出去。我看了肇东县宋站公社的社队企业，那里是搞得很好的。但是像宋站那样的条件，在很多地方是没有的。另外，农村这些东西搞得太多了，将来还有城市就业问题怎么办？这些问题，我们的看法，不要因为搞了机械化，就对家庭副业、家庭自留地经济的作用估计不足。

黑龙江具有发展畜牧业和食品加工业的优越条件

东北不仅具备搞粮食基地的优越条件，还有发展畜牧业的优越条件。东北发展畜牧业，一方面它有相当大面积的草原可以放牧。今天在报上看到科学家讨论黑龙江这个地方草原利用问题，讲到人工种饲草，这个意见可以考虑。草原放牧也好，人工种饲草也好，这里是一个优势。除了草原以外，农业区本身也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发展畜牧业。从长期来说，这个地方在发展机械化搞粮食的同时，要把畜牧业也很好地发展起来。将来这个地方，一个是搞大田机械化，一个是搞畜牧业机械化。

畜牧业一发展，羊毛、奶制品加工，肉食加工问题就提出来了。根据这里的条件，我觉得黑龙江可以发展食品工业。食品工业讲来讲去是粮、肉、油、糖、奶，这五大原料，这里都具备。剩下的就是加工技术了。有了这些东西，各式各样的食品都可以做。黑龙江有这么多粮，这么多草，畜牧业就可以发展起来。有了畜牧业，发展食品工业又有了条件。黑龙江搞长期规划，要把食品工业考虑进去。食品工业在世界上是从农牧业分离出来的新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除了发展畜牧业、食品工业外，还要围绕农业搞生产前的服务和生产后的服务。生产前那套服务，就是供应化肥、农药、种子等等；生产后的服务，就是储存、运输、销售。这套东西也是一个很大的事业，这一部分原则上不应由城市下去占领，应由农村自己搞，通过农工商联合企业自己解决。在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联合的基础上可采取办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形式，这样逐步发展小城镇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总的来讲是这样一个思路：农工商结合，农林牧结合。

要注意机械化以后出现的新情况

这里大农业一搞机械化，会出现很多新情况、新事物，从现在开始就已经有了一些苗头，有的现在就提出来了，有的不久就会提出，希望能注意摸索一些经验。此如经济结构问题，组织结构问题，区域化、专业化、社会化、联合体等问题。现在有些说法是初步的，要进一步摸索经验。比如农业发展起来后，就有个仓库储运问题，这在东北比较突出，粮食多了，仓库不够用。仓库储运这一套组织，我的看法，不能搞官办的，要按企业办，而且最好是纳入农工商轨道。除了农工商以外，也可以搞些小的集体所有的。手工业、服务行业不仅要允许集体所有，还要允许个体搞。不如此，我们方便不了。服务行业，什么修鞋的，洗澡的，完全允许个体搞。服务行业由个体搞特别方便。将来农村小城镇一建设，有的是集体的，有的是工农商联合体的大商店。还能不能有点个体的？也可以，搞活一点嘛！搞仓库也不能都由公家办。

农民有了钱也可以搞仓库出租，谁用谁出钱。如果是国家粮食存在人家仓库也得拿钱。外国仓库就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这次你们不是要求解决农机修理的投资吗？我认为将来农机修理不挣钱不

行。我们多年来搞支农工业，一讲支农就要降价。你又让他降价，又让他支援农业。支援农业，为农业服务的这些单位越支农越糟，不能这样搞。今后宁可采取提高农产品价格，也不能降低支农产品价格。要不，谁搞支援农业谁就赔。将来农机修理价格要调整，否则农机服务事业不能发展起来。我们要把这件事情转变过来，让支农的有利可赚。我们原来那些想法不行，要为支农事业开辟一条路，让大家都多办一些为农业服务的事业。如果你让他赔钱来干，那人家当然不干。

要讲步骤　讲政策

在黑龙江农村，将出现一个新的形势。真正把机械化搞上去，很多新的变化就带来了。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下，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冷静。现在下边情绪很高涨啊！关键是两个问题。第一是要讲步骤。做到量力而行，不要一哄而起。比如现在有些地方，对买康拜因[1]很急迫，将来不要发生到处乱买，买一些破烂家伙，一趴窝就是一两万元。根据多年经济建设的教训，尽管这件事情是好事情，还是要稳步前进，开始慢一点不要紧，底子打好了以后迈的步子就会加快，不要一看那事情好就不量力而行，不讲步骤。

第二是要讲政策。抓机械化在黑龙江有很大的优势，但还必须注意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经济政策，要注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因为机械化的优越性掩盖了政策的重要性。好事情如果办不好，也可能是折腾，不要看得很容易。我们这次来考察，总的感觉很好，但不要看得太容易，这种事办成了实在了不起。

国营农场在黑龙江省是个很大的力量。开荒扩大耕地，搞机械化，农场是一支骨干力量。你们这里的农场，中央不上收了，以省为主。但要注意农场的自主权问题。农场是个大企业嘛！有的农场上百万亩土地，要扩大农场自主权。现在财政包干了，变化很大，还要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如农场农工商联合企业怎么搞，产品销售怎样给他们一点余地等，要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省里要把两股劲拧在一起，一是农场，一是人民公社。建设商品粮基地，既要对社队搞一些经济政策，也要对农场搞一些经济政策。

我们这次来考察还改变了一个观点。原来想往这里移民，来了以后看到黑龙江人少也是优势。如果人多了提供的商品粮就少了，那不行。所以第一，你们要控制人口盲目流入；第二，要搞好计划生育。

注 释

1．康拜因，即联合收割机，音译自combine。

用改革的思路 解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有关问题*

一九八○年八月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沈阳市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座谈会上的谈话。参加会议的有沈阳机床厂、沈阳化工厂、沈阳电缆厂、沈阳第八木制品加工厂、沈阳冶炼厂、沈阳卷烟厂、东北制药总厂的负责人。辽宁省委任仲夷、陈璞如、郭峰等参加了座谈。

今天请你们来座谈一个问题：扩大自主权的企业，如何再前进一步。你们感觉试点后有些什么问题还影响、限制、束缚企业生产，今后如何解决？

企业竞争起来以后，将来会有这种情况：有些经营得好的企业，产品质量好，成本低，销路广；有些工厂管理不好，产品没销路，就没事干。这就要看各家的本事了。他们没活干，这就出现了要求联合的条件。当然，我们的竞争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大鱼吃小鱼。但是，我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竞争后联合也是形势所迫。有些企业在竞争情况下不能生存。我在国务院会上讲，对这样的企业要“收编”，用好听的话讲叫联合。在竞争情况下会出现联合的可能，如果不竞争，就联合不起来，都是“宁作鸡头不为牛后”。一竞争有些厂子没活干了，发不出工资，就非联合不可了。优胜的企业也不要去新建多少厂房，你把那些厂子联合起来，搞专业化协作，厂房就有了，所以竞争能造成非联合不可的形势。在这个形势下，就有个因势利导问题。重庆铝加工厂是个大厂，四川省委给它外贸自主权，它的产品在远东畅销，香港一家铝加工厂被他挤垮了，宁愿作他的代理商。

实行市场调节后，为什么很多机械加工企业还可以吃饱，一些长线产品还有销路，这里有个假象。物资部门压了很多机械工业产品，没有进入市场。企业的产品可以降价出售，物资部门不能降价，积压的机械产品就卖不出去，压在仓库里。现在确定了一条，物资部门可以参加竞争。我估计，物资部门一出动，不少机械企业存在不下去，产品销不掉。该垮台的垮台，该淘汰的淘汰，这可以造成一种形势，叫企业感到照老样子搞不行了。现在是不管工厂办得怎么样，都心安理得，这怎么行！

我们的机械产品非打入国际市场不可。你们沈阳可以组织一个机械产品进出口服务公司。这个公司和各厂子不是上下级关系，是一种业务往来，它可以去外国考察，可以接待外商，向工厂介绍情况，介绍工厂和外商见面，收点手续费，

还可以为一些小厂搞代购代销（小厂都直接对外也不可能）。这个服务机构的业务如果搞得好，可以扩大到大连，甚至扩大到省外。服务公司的任务主要是服务、协调、协商以及代购代销。我们国家最缺的是服务性机构。成都有七八个待业青年搞的服务性公司，专门帮助工厂企业沟通关系，现在业务已发展到九个省市。这说明我们社会需要这类服务机构。

沈阳出现了新技术推广公司。搞这种服务性机构是需要的，要鼓励它，保护它。现在的问题是，争权要利的多，搞服务的少。解决这个问题是经济改革的一件大事。

省不要限制大市的权力。许多属于省的权力，都可以委托大市办。要给大市以方便，这样就省事多了。我在四川讲过多次，中央交给省的权力，要尽量放到大市。

要加速设备更新，首先更新那些直接关系到产品质量和节约能源的。比较关键的设备，更新要以节约能源和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属于一般增加产量的，只能逐年搞。关键设备的更新可以向银行贷款，可以边贷边还，边还边贷。将来对企业采取征收所得税办法，不要上缴利润。现在企业自主权不配套。扩大自主权，光是对企业有好处，搞得不好的没有坏处，这也不行。现在一是权不全，一是责不清。将来所得税一征，责任、压力就大了。比如我收你百分之六、七十所得税，然后其他房子、工资、奖金等等，国家都不管了，国家只规定个原则，剩下其它事都靠厂里自己去办。这样就搞活了，企业的责任也加重了。

老工人退休，子女顶替。这个得改！老工人退休，子女可以顶替，但是不能只在那个工厂顶，可以在全市范围招工，考试择优录取。现在这样搞，整个工人队伍越搞越差，不考虑个人兴趣、才能，“划地为牢”，根本不可能因才施用。有些医院、学校里搞顶替，问题更严重。子女顶替，包干就业，这两个东西把工人阶级技术水平越搞越低。哪个单位知识青年就在哪个单位就业，老子干什么，儿子就干什么，这种搞法不行。当然，一下子还改不过来，但要逐步改。

将来工厂要有提资权、辞退权。对不好好劳动的工人要有辞退权。我建议不用开除这个词，需要给工厂一个辞退工人的权力。如果真正给他这个权力，他不可能辞退多少。辞退一个就会影响一片。但是没有这个权不行，有的人胡搅蛮缠，谁也管不了。

机械产品价格可以上下浮动，但是消费品价格要稳定。钢材价格总的是向下浮动，有些小钢材也可以向上浮动。机电产品，有些质量很好、有销路的，价格可以向上浮动，大量的是向下浮动。只有允许浮动，才能把劳动力和资金吸引到短线产品上来。为什么长线长、短线短的问题老是解决不了呢？就是因为价格问题。不承认价值规律是不行的。

厂子都要作这个精神准备，将来国家对企业一般不投资，而是实行由银行贷款的办法。老厂改造、新厂建设、设备更新，都要靠贷款。要实行这样一条：使用贷款以后增加的利润，首先用来还贷款，然后再上交。

要搞技术革新。进行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项内容。

资金来源是自主权加贷款。将来准备采取这么一条政策，一个工厂折旧率是不是提高，要看它节能的情况。节能措施多的，设备折旧率就给它增加。新企业折旧率高，钱没地方用，老企业可以吸收它投资，发股票，搞联合，投资分利润。将来股票、证券业务也会逐步开展起来。你们可以先搞所得税试点，测算一下，按去年和今年这两年上交利润的平均数搞所得税。你们找财政部门参加算一下。不要害怕用贷款。哪个企业怕贷款，说明他没有信心。每个企业都应该在银行那里有很高的信用。将来银行也要进行改革，银行也要有自主权，钱贷给谁，由银行决定，各级行政部门不要干涉。日本银行贷款的时候严格得很，调查得很细，真正确定贷给你款以后，他就千方百计地帮助你，因为利益一致。

京津沪都没有包干，唯独对辽宁搞包干，这已是照顾了。不管怎么样，只要包下来，就比不包好，苦一年两年，过了一两年大有希望。

所得税可以搞试点，你们能不能按原来水平包下来。上缴利润不得减少，否则财政部门就不同意了。你们厂子可以和计委、财政部门研究一下，搞一个改造方案。我们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工厂有潜力，这个潜力被现在的某些制度束缚住了，所以要改革这个制度。如果你不是挖潜力，而是向财政部要钱，那就说明是制度上有问题。企业不能指望把本来交给财政部的白花花的钱，挖一块出来，那行不通。出发点是要承认工厂有巨大潜力，现行制度妨碍它，所以要改革。

城市住房要实行统建，建成以后出卖，房子商品化，企业和个人都可以买。房子可以分几等，有远郊的、近郊的、市内的，价格有差别。企业买一栋也可以，买多少套也可以。这样企业就不用自己去征地皮、买材料了。我在成都作过调查，企业自己盖房子，造价是三百元一平方米，买统建房子只合二百元一平方米，如果包括服务行业的面积，一平方米二百五十元就够了。这样搞，对执行城市建设规划也有好处。凡是形式主义东西都不要搞了。

关于工厂组织直接对外公司问题。公司有些可以搞松散的，业务也不一定一开始就搞很多，可以先从服务开始，从某些专业开始，或从外贸业务开始，先联合起来。不要一搞公司就人、财、物，产、供、销几大项都统起来，要有个发展过程，顺乎自然。九个市化工系统搞了一个销售、情报中心，中心设在武汉，有没有你们？这种形式很好。外国这种东西多了，机构很小，有的只有一两个房间，有个电话，很多问题可以解决。一搞公司就收厂子，这种做法要改变。联合必须是互利的。联合的内容，要由少到多，可以先从某一个专业开始，先易后难，由低级到高级。

对企业的社会负担要作一点调查，算一算社会负担占它的成本多少，将来干脆征一道税就算了，把税收交给当地，社会负担也交给当地。不能只交负担不交钱，也不能只交钱不交负担。解决企业社会负担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企业现有的服务部门联合起来，成立服务公司，专业化、社会化，经营独立，和市有关部门挂钩，原来企业拿的股金还是属于企业的，有利润可以分成。第二个办法是，调查一下，现在企业社会负担占它成本多少，将来干脆变为一道税。这个税就交当地政府，服务工作由政府管理起来。市政府每年开人民代表大会，收地方

税多少，怎么用的，公布出来。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就有内容了，大家也就关心了。现在光讲工厂社会负担大，着急也不能解决问题。负担总有来龙去脉嘛。在目前情况下，工厂如果不办子弟学校，都甩给社会也不行，地方政府也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得过渡，办法只能是逐步地把企业负担转向社会。

国家经委的同志从西德考察回来介绍，西德有一个制度，中学毕业以后进工厂做学工，还不算就业，一个月只领很低的生活费，由企业出钱送到市里职业学校学习，两三年后，学习成绩合格才能正式就业。我们也想搞过渡，至少可以缓和就业的矛盾。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搞一两年，考试合格再作正式职工。北京就要这样作，沈阳也可以试点。这将减少企业负担，同时对提高工人技术水平有很大意义。进工厂，先发一定生活费，边工作边学习，这比分到工厂包干就业好多了。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干，搞得松松垮垮。宁可一半人紧紧张张地工作，一半人紧紧张张地学习。外国人说，你们人多可以，我们人少不能这样办。我们说，人多也不应当这样，再这样下去，就把工人队伍的纪律搞坏了，把技术水平降低了。

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所得税以后，工资一分为二，一部分叫固定工资，一部分叫活工资。活工资部分可以变，个人劳动得好，企业经营得好，就多得，搞得不好就少得，今年好就多得，明年不好就少得，“水涨船高，水落船低”。这样就活了，厂和厂之间就有差别了。将来还要允许工人有小的流动，经营得不好的厂要垮台就是了，东西卖不出去，银行不贷款，工人不在那里干了。老实讲，以后要当好经理不容易。外国的经理比我们的经理紧张得多。这样一搞，企业的领导人不光是对上级负责，还要对职工负责。你搞不好，群众也不让你当领导。要是上级把他拿下来，他会说，我没有腐化，没有贪污，为什么降我的职？改革以后，你搞不好，群众就不拥护你，你这个厂长就要下台。这样，工人势必要选一些能干的人上来。

体制改革说起来很难，千头万绪，但是只要把主要的东西抓住，我看并不难。主要抓两条，一条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在这个基础上搞联合。还有一条是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包括对物价体系进行改革等。企业自主权是根本的，起步的，是基础。自主权问题，有人有点看法，说企业自主权不应从分配开始。但是，不从分配开始，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从分配开始，能够暴露很多矛盾，促使你去解决。改革不与工人利益相联系，他不关心。改革既然开始，就必须改下去，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解决出现的问题。

沈阳搞木材综合利用，和江苏一些地方搞内部补偿贸易，这是一个好力、法。联合的根本道路是给企业自主权。只要企业有了自主权，当地封锁不住。当然，要经过曲折，要有一个发展过程。

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最近国务院讨论了一次。自主权问题从分配开始，现在看分配问题本身也需要进一步改善。最根本的办法是搞所得税，国务院想明年搞试点，后年全面铺开。明年企业自主权试点要全面铺开。在分配问题上，明年大面积恐怕还是按今年办法。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从企业分配开始，

但决不能停止在分配上。企业自主权要扩大，我们用了“扩大”这个词，就是说企业原来的自主权太小了，要承认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独立经营的权利和地位。仅仅讲分配不够。明年在计划、产品销售、劳动、外贸等方面，都要前进一步，给企业以更大的权力。现在全国的情况不平衡。我在北京派一些同志到工厂看看，发现扩大自主权后，利润留成的钱虽然是企业的，但是它不能用，因为不论干什么还是都要上边批准。权力不能实现，有了权不能用，算什么自主权？等于没有嘛！现在要向生产领域、分配领域、流通领域进一步扩权，计划权也要解决。国家对企业计划不能管得那么具体，尽量少搞指令性的东西。

随着自主权扩大，工人当家作主的问题必须解决。从根本上讲，企业自主权不应理解为把这个权交给厂长，应该交给厂里的工人。因此，民主管理，工人当家作主问题要很好研究。职工代表大会要不要设常设机关，哪些事情必须经过厂长，哪些事情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都要研究。现在看，全民所有制企业那种高度集中的管理办法，使工人感觉不到他的主人翁地位。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反而感到工厂是他们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感到是受雇佣，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工人积极性。企业自主权一扩大，就要体现工人当家作主，也就是马恩说过的，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能参与剩余产品的分配。现在我们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无法参与对剩余产品分配方面的决定。问题的实质是承认不承认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我们搞了社会主义多年，有些工厂搞得死气沉沉，不是生龙活虎，不是朝气蓬勃，这与高度集权，统得过死有关。毛主席关于民主管理的思想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工厂没有一点自主权，因此实际上没有落实。工厂怎么建设，钱怎么分配，工人没有这个权。这恐怕是长期以来压抑工人积极性、影响工人关心工厂的一个重要原因。要看到，扩大企业自主权，从本质上讲，就是扩大工人当家作主的权利，工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有权参与剩余产品的分配，包括工人对于部的监督。关于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地位这个问题，南斯拉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创见。当然，他们采取的一些具体形式，我们不一定用。任仲夷[1]同志讲的一个想法很好，企业要从部门、地区的管辖下解放出来，使它能够相当独立地经营。

所以，企业自主权试点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除分配权要继续扩大外，相应的其它权力也要前进一步。扩权以后，还要在独立经营和互利的基础上搞联合。第二，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必须认真解决工人参加管理，工人当家作主问题。企业自主权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开始、一个基础。有些地方仅仅把它看成是利润留成问题，这就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意义理解得太浅太窄了。当然，存在利润留成问题，但绝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它是整个体制改革的起步，这着一活，全局就活，这着不活，全局就受影响。各级领导和经济管理部门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搞好服务、统筹、协调和监督工作。

注 释

1．任仲夷（1914—2005），河北威县人。曾任中共北平西北区委书记，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是一项战略措施*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率国家农委的人员到东北调研建设商品粮基地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七月二十七至八月十一日，我和国家农委李瑞山[1]同志到黑龙江、吉林了解建设商品粮基地的情况，回程途中顺道在辽宁住了两天。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

这次我们在东北，行程三千多公里，沿途农作物长势普遍较好，小麦已获丰收，如无旱霜等特大灾害，玉米、大豆、甜菜等作物也可望增产。我们所到之处，从黑河之滨到三江平原，从长春地区到长白山麓，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情绪很高。怎样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争取早富快富，逐渐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而且越到基层，信心越足，干劲越大。

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人少地多，土地肥沃，年降雨量五六百毫米，交通也较方便，是我国建设现代化大农业的一块宝地。从关内到这里有进入了一个新天地的感觉。中央关于在东北建设商品粮豆基地的战略部署，调动了东北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他们反映：过去是在富地方过穷日子，现在上上下下想到一起了，有奔头了。国务院规划的到一九八五年从黑、吉两省调出七十亿斤商品粮豆的任务正在各地落实。从了解的情况看，我们总的印象是：有资源，有路子，有措施，有群众基础，而且各地一般都留有余地，实现这个规划是大有希望的。如吉林省规划到一九八五年上调商品粮二十亿斤，而四平地委说，他们一个地区就可以包下这个任务。黑龙江省的国营农场，去年交售商品粮二十八亿斤，八五年计划可上交五十亿斤，等于全省当时的上调任务。

在和干部、群众的座谈中，大家都认为东北农业的潜力是很大的。黑、吉两省面积六十四万平方公里，比法国还要大一些（五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耕地和法国差不多。两省人口五千四百万，耕地二亿多亩，人平五亩多，一九七九年粮食总产四百七十二亿斤，人平占有粮食八百七十四斤，商品率很低，除本省消费外，去年调出的粮食才十一亿斤。而法国也是五千三百万人口，耕地二亿九千万亩，人平六亩，一九七九年谷物总产八百七十四亿斤，人平一千七百零八

斤，比黑、吉两省高一倍，出口的谷物每年在二百五十亿斤至二百九十五亿斤之间。除气温条件法国好一些外，其它自然条件也差不多。法国把农业搞上去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在黑、吉两省也有条件去搞。这些都说明差距很大，而潜力也很大，要实现每年调出粮食七十亿斤至一百亿斤的目标，是有现实可能性的。这几年，在东北涌现出了一大批收入高、贡献大的县、社、队。吉林偷树去年一个县就交售八亿斤粮食，计划今明年突破十亿斤大关。黑龙江爱挥县的罕达气大队，二百零二人，去年实现机械化，播种粮食一万五千亩，总产三百三十六万斤，人平占有粮食一万一千二百斤，交售给国家人平八千二百二十五斤，人平分配七百二十二元，每个劳力分配二千四百八十元。社员高兴地说："我们的收入相当于十三级干部！"榆树县富家大队人平土地四亩多，去年生产粮食八百八十万斤，人平占有粮食三千二百斤，交售二千二百斤，每个劳动日值三元。他们虽不能代表普遍的水平，但却积累了经验，指出了致富的路子。应当看到，实现国务院提出的任务还存在不少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措施落实，一面依靠社队的力量，一面依靠国营农场，就一定能够实现规划。东北之行后，我们对此感到更踏实、更有信心了。

二

根据这次调查了解，在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工作中，我们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机械化是关键。在东北这块人少地多的地方，农业机械化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机械化一上去，粮食生产就可以大幅度增加，就会很快形成很高的生产率、商品率。正如爱珲县群众所说："机械化显神威，农业优势大发挥。"著名的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引进了美国一套具有七十年代水平的农业机械，每个农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一九七八年二十一万斤，一九七九年四十三万斤，今年预计可达五十万斤左右。据他们说，如果全部采用国产的机械配套，每个农业工人每年也可以生产二十万斤。在黑龙江，我们看到一些后进社队靠机械化迅速翻了身。克山县建设大队人平七亩地，在一九七八年以前的十二年间，粮食亩产在一二百斤徘徊，社员分配长期人平六十元。去年县委帮助这个公社实行机械化，集中投入，一次配套，当年化，当年富，当年贷款当年还。这一年共收粮食三百九十七万斤，卖给国家二百四十七万斤，人平分配二百四十元，归还贷款二十八万元（包括旧欠四万元）。机械化不仅在开垦荒地上，而且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作用也很显著。据调查，机械化加上化肥，加化学除草，大约可以增加产量三分之一。当地农民总结的增产经验是："拖拉机加化肥，优良品种加大粪堆（农家肥）"。"要想富得快，开荒种小麦"（有了康拜因，开荒种小麦生产率很高），等等。黑龙江等地，具有搞现代化大农业的有利条件，在这里抓紧实现机械化就全盘皆活。实现机械化，每亩投资约三十至五十元，如果用低息或无息贷款，三年至五年可以还清。在这些地方机械化进度是可以加快的。国产的

农业机械，只要进一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并进行配套，农民也是欢迎的。

与耕作机械化相联系，要求解决作物种植区域化的问题。黑、吉两省都因地制宜地划分了大的作物种植地带，改变“小而全”样样都种的状况，作物成片集中种植。一些地方，看来已具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雏型。这一趋势目前正在发展。

二、积极抓好农、林、牧全面发展。机械化为充分利用东北的农、林、牧业资源，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提供了可能。农业一经机械化，不仅使农业由简单的手工劳动向机械化大生产发展，而且使过去的粮食单一经营向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发展，使自给自足为主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这是机械化后出现的新形势。在东北建设商品粮基地时，切不可忽视和放松了林、牧业生产。

在东北发展畜牧业有很大的优势。过去我们考虑畜牧业问题往往只想到边疆草原的潜力，以后认识到内地农区发展畜牧业也同样大有可为。现在看，东北不仅有上亿亩的草场，而且耕地多、粮食多、副产物多，饲料充足，农业机械化后，有一半以上的劳力解放出来，加上这里交通便利，工业有基础，的确具有发展畜牧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有希望的牧业基地。从东北的实际出发，除了有计划地养猪外，要大力发展牛羊。当地农民说：“机械化，马换牛，牛吃草，人吃牛。”这是很有道理的。大养奶牛，一举数得，应普遍提倡。现已有一些好的苗头。爱挥县四嘉子公社初步实现机械化后，腾出部分劳力喂养了三百五十八头奶牛，每年出售鲜奶五十万斤，活跃了市场，增加了收入。农牧业的发展，必然带动食品工业的发展。粮、肉、油、奶、糖，这五种原料都有了，就可以造出多种多样的食品来。将来不仅应把东北，特别是黑龙江的粮食调人关内，而且可以调出食品供应京、津、沈等大城市。这是有广阔前途的。

东北有几亿亩宜林地带，发展林业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黑龙江、吉林的许多社队，机械化后抽出一部分劳力，组成林业专业队植树造林，改造次生林，三五年就见成效。我们到过的吉林德惠县布海公社，从一九七三年开始育苗，按新农村的规划，以九十九晌地为一方，全公社造成二百二十七个网眼的防护林带，三年时间就完成了。以后又以两年时间在村前村后、屋前屋后种植，每人植树达到四百株。现在已经一片葱绿，每年间伐木材一千立方米，还为社员盖房八百多间。黑龙江的爱珲、克山等地有不少社队每人植树达到五亩至十亩。应当下定决心，经过五年到十年的努力，利用机械化后的有利条件，把东北的林、牧业发展起来，做到林茂粮丰，牲畜兴旺。

三、适应机械化的新形势，搞好专业化、社会化和农工商一体化。在东北，我们看到，农业机械化的结果，农村的劳力结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的生产队、大队是“小而全”，样样都搞。机械化后的必然趋势，是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克山县黎明大队实行机械化以后，根据生产的需要，按专业组织生产。全大队劳力有五百多人，分别组织了机耕、工副业、畜牧、多种经营、建筑、后勤、文教卫生等七个专业队。搞农业的，仅有机耕队四十人，积肥队六十人，就担负了全大队的耕作任务。其它很多生产活动，都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专业化、社会化了。在榆树、德惠等县，一些机械化属中等水平的社队

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首先是大队的农机站统一使用农业机械，实现专业化。他们超越生产队的范围，把全大队土地的机耕任务承担了；原来的生产划分成了专搞积肥、田间管理、畜牧、工副业等的专业小组。总之，机械化以后，原来许多事业从农业中分离出去，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大大减少，而从事生产前和生产后的服务性事业，以及生活服务性行业日益增加。这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标志着向现代大农业方向迈进。

与专业化、社会化相辅相成的是农工商一体化的发展。机械化以后，许多事业超出生产队、大队的范围，需要经济上联合，需要农工商的综合经营。队的内部的专业分工，和队的外部的专业联合应当结合起来。吉林省今年在榆树、怀德、农安三个商品粮基地县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他们的做法是：以县为单位，以一两个骨干企业为依托，按专业把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联合起来，如粮、油、糖、畜产品的加工，建材、建筑工业，运输等，梳成几条辫子，在生产、销售上实行各种形式的联合，效果较好。这种在全县范围内按专业自上而下先搭个架子，再逐步发展的办法，步子可能迈得更快一些。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下一步县与县之间，再逐步扩大联合。中国农村的劳力很多，机械化后多余劳力的出路是个很大问题。我们认为，这需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从农业分离出来的走上专业化、社会化的许多事业，原则上应当由农村自己来搞，走农工商结合的道路，城市着重从技术、装备等方面给予支援，不宜与农民争饭碗。

在专业化、社会化和农、工、商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黑龙江省提出建设小城镇问题，这很值得重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为生产、为生活服务的事业日益增多，农村新的居民点和住宅建设不断发展，将会逐渐出现一些小城镇，成为当地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我们要十分重视吸收农村社队的力量参加小城镇的建设和旧城镇的改造。这对活跃农村经济，进而逐步缩小城乡差别，都有重要的意义。

四、适当扩大自留地、家庭副业，搞好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机械化后多余的劳力如何安排是个很大的问题。除了广开门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外，看来把自留地扩大，把家庭副业扩大，是容纳多余劳动力的很现实、很有效的办法。让一部分劳力在自留地上精耕细作“绣花”，按照市场供需情况，生产一些小宗产品，对活跃农村经济有利，而且也是就业的一条出路。有的县、社干部认为，机械化以后，收入多了，自留地经济无足轻重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用机械化搞大农业，同扩大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生产多种多样的农副小商品，二者应当并行不悖。越是搞机械化的地方，越要注意发挥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经济的作用。榆树县义山三队，集体生产搞得不错，去年人平均分配二百三十元。他们重视家庭副业、自留地的收入人平一百五十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对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不应当苛刻对待，应该把它看成是潜力所在，看成是集体经济的重要补充。黑龙江省有的地方规定，队里的拖拉机可以为自留地耕种，肥料分配上给予安排等。东欧许多国家自留地经济占了很大比重，匈牙利等国还设有“自留地经济委员

会”。我们应当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把自留地、家庭副业搞好。

机械化以后，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应作为重要课题加以研究，不要因为机械化的优越性掩盖了政策的重要性。东北，不能硬搬关内那套作法，要从实际出发，破除“左”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什么样的责任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就应当采用。在机械化的地区，看来大队、生产队内部的分工协作，建立各种形式的专业队、组是很主要的形式。克山县黎明大队，实行“专、定、包、奖”的制度，有的包工到组，有的包工到人，有的联系产量计酬，有的实行计件。队里的一些家禽，还包到户饲养。榆树县富家大队实行“以晌定工，以垅计分，包工到户，责任到人，管理到棵，有奖有罚”的办法，对搞好大田田间管理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队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上，还开始出现了跨队的专业联合。这些办法，要进一步研究，总结推广。

五、在生产措施上，要切实解决防寒以及防旱、防涝的问题。早霜冷冻，是东北农业的最大威胁。机械化、科学种田都要围绕这个问题采取一系列趋利避害的措施。如选育早中熟高产品种，提早育苗、播种，改进栽培技术，适时收割，等等，这方面各地已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要总结提高，使这些经验配套，发挥它在抗灾中的作用。

防旱问题，除了量力而行兴修水利以外，应研究保墒抗旱的办法。黑、吉两省，一年种一季作物，年降雨量有五六百厘米，且集中在六、七、八几个月，冬春冰冻，蒸发量很小，这与南方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通过保墒，使土壤涵蓄一定的水分，解决一季作物保收的问题，是可以做到的。灌溉的方式，发展喷灌很有效，有些地方地下水源比较丰富，可以采取打井喷灌配套，经济划算，效果也好。在三江平原等沼泽地开荒，还必须注意防涝问题，对河流综合治理，保持生态平衡。在这里，扩大开荒要同排水防涝统一考虑。头几年，可在不需要修水利的地方多开一些。需要排水的地方开荒，一定要采取措施治理，不要因近几年天旱而存在侥幸心理。否则，洪涝一来，新开荒地受害，过去开的也保不住，而且一年涝，往往影响三年。防涝排水，要一块一块地解决，干渠和支渠同时配套，搞一片受益一片。

六、在工作部署上，要有步骤、有重点，稳步前进。当前东北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对开拓荒地，买拖拉机、康拜因表现出很高的热情，纷纷表示要提前实现建设商品粮基地的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看到存在的困难，注意不要一哄而起，不要见机器就买，不讲核算，不计效果。开始时宁可稳一点，慢一点，把工作做扎实，把底子打好，以后的步子就会迈得更大更快。在指导思想上要进一步明确择优的原则，讲求经济效果。开荒，搞机械化，首先要从那些效益最大、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开始，这样容易取得成功，收到实效，振奋人心。不要把投资、机械设备先陷在潜力小、效益差的地方，啃“硬骨头”，以致投资多年收不回来。从东北的实践看，一种是基础比较好的队，帮他一把，他就会较快地先化先富；另一种是一部分潜力很大的穷队，黑龙江采取投资重点使用，机械集中投放，一次配套的办法，一下就翻过来了，

贷款也很快偿还了。这样做，资金周转快，搞一批后再搞一批，化一片后再化一片，速度也加快了。

三

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是一项战略措施，对搞活全国的农业有重大的作用。这项工作涉及面比较广，必须切实加强领导，认真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才不致使规划落空。为此，我们建议：近几年内，国务院每年应专门讨论一次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的工作。国家农委每年应去一二次，进行调查研究，检查督促有关措施的落实，并经常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农机、农业、水利、粮食、农垦等部，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特别是农机部应把东北作为农业机械化的重点，集中力量，务必抓出成效。其他各有关部门，也要积极支持这一工作的开展。

关于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的政策、措施，国务院批转国家农委的报告已作了规定。这次去东北，三省还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和他们研究，议论了一些解决的意见。

一、调出粮食的亏损补贴问题。黑龙江提出，由于粮食购销价格倒挂，每多收购一亿斤粮食用于省内消费，省里要多赔六百万元，上调给国家一亿斤，要多亏两百万元。吉林也反映，国家核定该省财政包干基数中，粮油亏损指标为二亿一千八百万元，粮油差价补贴为一亿三千五百万元，一定五年不变。今后每年收购递增五亿斤，每年约增加亏损四千万元，形成收购增加，上交增多，亏损越大。我们的意见，不应当让调出粮食的省（区）吃亏，调出的粮食亏损，应由中央财政或调入粮食的省（区）负责。

二、建立农机修理站问题。黑龙江反映，全省一千零七十五个公社中，还有四百多个公社没有农机修理站，不能适应机械化发展的需要。鉴于农机站等单位往往是赔本的，因此，要求国家给一部分投资补贴，帮助公社建站。我们的意见，根据生产的需要，增加一些修理点是可以的，但不一定每个公社一个站，有的可以联合几个公社建站。

在有国营农场的地方，修理站不必另搞一套。对支农的问题，需要重新认识，改变旧的观念。过去，一讲支农就不能讲利润，一再降价，为农业服务的单位越搞越穷。支农吃亏，支农亏损，这个政策值得研究。主观上是想支农，实际上是限制了支农事业的发展，老是亏本，谁愿意干？长期以来，一方面我们把农产品的价格压得很低，一方面又叫有关部门去亏本“支援”，结果把积极性都搞掉了。解决农产品价格过低的问题，宁可逐步提高价格，也不要从支农事业上打主意。农机修理站也不能老是赔钱，要搞企业化，使它有一点利润。要提倡联办，国家也可以投资一部分，予以支持。

三、仓库问题。黑、吉两省反映目前仓库严重不足，一些粮食主产县更为突出。吉林省仓库容量仅五十亿斤，去冬今春有四十亿斤粮食露天保管。两省要求国家列入计划，投资兴建仓库。我们的意见，仓库储运事业，不能完全由国家包

下来建设，应当提倡联合的办法，集资兴建。仓库、冷冻、储存，是为农牧业服务的一种产业，应当企业化。修建起仓库，要实行收费办法，谁用谁出钱。

四、糖料加工问题。黑、吉等省，甜菜有大发展的趋势，现在加工能力不足。黑龙江今年甜菜扩大到四百万亩，预计可收二十八万吨，比去年增加一倍多。“六五”期间，计划续建、新建糖厂八座，新增能力二十三万吨，每年约需投资一点四亿元，国家只落实五千万元，差额很大。我们的意见，糖厂建设一定要有原料，不要搞无米之炊。投资不足部分，可以向银行贷款，或通过联办解决。

五、肥料、农机供应等问题，三省希望按国务院批转农委的纪要落实。另外，要求给省里一点自主权，除了上交国家任务以外的超产的大豆，允许地方出口一点，换一点磷酸二氨复合肥和必要的农业机械。这个意见，我们认为是合理的。两省还提出，国家已确定大豆由二角三分调为三角一斤，建议明年一月一日起实行，请有关部门考虑。

注 释

1．李瑞山（1920—1997），陕西延长人。曾任湖南宁乡县委书记，常德地委书记，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陕西省委第二书记，国家农委副主任、顾问。

关于节约能源和科研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一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四川代表团会上的发言。

过去总认为，能源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工业总的增长速度，这两年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一个带方向吐的苗头，去年能源增长百分之三点五，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八点五，今年预计能源增长百分之一点五左右，而工业总产值可以增长百分之七以上。这个变化很值得研究。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说明能源增长速度高于工业增长速度，不一定是个必然的规律。问题是要加快进行技术改造和改变产品结构，转向集约经营。这涉及到今后的能源方针。开发能源，投资大、周期长，还要相应地解决交通运输问题。我们能否开发和节约并重，近期主要靠节约能源来保持工业的一定的发展速度。如果这条路能走通，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就大有希望。节约能源，这两年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还是挖管理方面的潜力，而更大的潜力在于技术改造。是把投资用于新建煤矿等增加能源，还是用于技术改造节约能源，哪个更合算？这要好好算算账。看来搞技术改造节约能源更合算。我们要以节约能源为中心，进行技术改造和工业结构改革，这方面潜力大得很。我们的设备技术落后，工业结构整个说来是消耗能源较大的结构，而不是节能的结构。在世界上日本节能最好。它一年消耗的能源，折合标准煤六亿吨，同我国差不多，而生产总值相当我们四倍。日本用于能源技术改造的投资，比欧美大两倍多。在资本主义世界能源危机的情况下，它还提出八十年代工业增长要保持百分之六的速度，就是把宝押在节能上。为了节能，它采取了很多措施。在我们国家，节约能源的问题还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一方面感到能源紧张，另一方面浪费很严重，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能源问题，中央要统一考虑，地方安排计划时，也要通盘考虑。不能只算工业发展的账，不算能源平衡的账。

科研、设计等部门如何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很好研究。现在不少科研、设计等事业单位“衙门化”，它的编制、设备、任务都取决于上级，本身没有承担任务的积极性。可不可以改变这种体制，使它向企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除了长远、基础研究仍由国家定项目、出经费外，对搞应用研究、发展研究和设计的单位，采取国家计划与合同制结合的办法，国家只给一定的补贴，也可以下达任务，但更多地是靠使用单位同它们签订合同、提供经费，使之转上为使用单位服务的轨道。服务得好，业务就兴旺，可以跨地区、跨行业地发展；搞得不好，

就会被淘汰，科技人员会流动到别的单位去。这样，就可能改变现在一些科研、设计单位机构重复、架子大、效率低、经费平均分配、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状况，使科技事业更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

我们搞经济建设有不少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我看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体制问题，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旧的体制却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为什么有的人在国内不能很好发挥作用，一出去好像就很吃香，变聪明了，这值得我们深思；二是基础结构太差，能源、交通、港口等等，当然还有教育、科技。我们把体制改革搞好，把基础结构搞好了，就可以提高经济效益，把巨大的潜力发挥出来。

今年经济形势和“六五”计划设想*

一九八○年九月二日

* 这是赵紫阳向中央政治局的汇报。

第一个问题，关于今年的经济形势。

总的说是好的。今年年初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一九八○年的计划，现在看可以实现。这里我主要说几个大的轮廓。

第一，财政收支。现在看来，可以做到基本平衡。去年开人大，财政部的报告讲，今年财政收支平衡，后来在人大常委会就改口，叫基本平衡。现在看，基本平衡可以做到。到八月底，节余四十三亿元，去年同期是支大于收二十四亿元，比去年多六十七亿元。估计到今年底，赤字不会超过二十亿到三十亿元。前年我们的赤字是一百七十亿元，去年是一百二十亿元。今年可以做到赤字不超过二十亿到三十亿元，就是基本平衡。

第二，农业。今年的情况看来是一个全面增长的形势。粮食，预计夏收报上公布是增产六十亿斤，实际上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些。早稻是增产二十亿斤。也就是说，早稻加夏收增加了八十亿斤。秋季是一部分地方受灾，大部分地方长得比较好。当然，还要看东北早霜怎么样。全年预计可以增加二百亿斤左右。当然，估计不同，有的说可以增加更多一些。其他的经济作物和副业，绝大多数地方都比较好。棉花大概会到六千万担（去年五千四百万担）。去年的五千四百万担已经是历史最高水平。油料，大家都知道，油菜籽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五成）。花生也是大增产。糖料，预计今年可以达到七千七百万担，就是可以增长百分之十三，这就可以增加三十多万吨糖。生猪，情况是好的。多数地方还是猪多，不好卖。这里特别说，烟叶的情况很好，预计可以收到一千九百万担，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二。由于今年烟叶的丰收，加上现在采取的烟酒专卖措施，估计明年烟的供应会有较大的改变。这是讲主要几项。农业的产值，我估计可以达到增长百分之六左右。

第三，工业。预计今年增长可以达到百分之三。轻工业，可能达到增长百分之十一（一到八月数字是十二）。重工业，一到八月下降百分之八；从二季度以来，情况逐渐好一些，估计全年要下降百分之五。现在我们轻工业与重工业的产值大体上也是一半一半，轻工业的增长补了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五以后，预计全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工业，截止到八月，总的增长百分之一。但是第四季

度现在看来是个翘尾巴的形势。因为我们第一季度是负数，从六月以来逐渐回升，八月份的情况比七月份好，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二点五。

第四，市场、物价。一月到七月，社会商品零售额是一千三百亿元，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八点六，预计全年可以增加百分之九。这就等于实现的购买力。商业库存增加了百分之八点六。这个情况是好的。油料增加，混纺布（化纤）增加，自行车增加，手表增加，这都是比较好的东西。外贸进出口总的也是好的。进口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出口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五，全年计划可以完成。由于今年实行了冻结物价，加上农副产品和消费品增加，物价形势是基本上稳定下来了。上半年社会物价总的水平上升了百分之零点七。这主要是指国营商业卖的东西，不包括集市贸易（城乡集市贸易上升百分之三点二）。

第五，上半年净回笼货币没有完成计划。原来计划回笼五十亿元，实际只回笼四十亿元。虽然没有完成计划，也是建国以来回笼最多的一年，截止到八月底，大概净回笼二十三亿元左右，预计全年增加投放六十亿到七十亿元。货币问题，一方面是票子多了，另外还有一个新的情况。陈云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个分析，银行、财政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新的因素，特别是农村，手头存放的票子多了。今年一月底，市场货币流通量最多的时候达到四百亿元。一个是手头存的增多，一个是现在市场渠道扩大，比如农贸市场这个范围就比过去扩大了，商业的渠道也比过去大了。还有一个，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经营单位划小，都要直接用货币支付（过去很多不用货币支付），这方面都需要增加些通货。究竟这些因素要增加多少发行量，还要研究。现在还说不清楚，看法也不一致。人民银行讲，大概是五十亿元左右。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总的形势好，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当然，还有几个问题比较突出：一个，就是蔬菜问题，今年以来，多数城市都不好，城市人民反映强烈。原因我就不多讲了。这个问题还要专门很好研究。看来，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城市近郊兴趣不放在蔬菜上，可能是主要原因。因为他主要的兴趣是搞工业、搞副业。因此，蔬菜种植面积没有那么多。最典型的例子，像北京四季青这个地方，那么好的菜地，他在那里搞了个很大的厂房。还不是个别的，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煤炭情况不好。最近刚刚开了会，报上发了消息，万里同志抓了一下，秋里同志一直在抓。煤炭如果九月以后没有大的转变，冬季取暖用煤都会紧张。再一个，就是华北的水荒，特别是天津和北京。首先是天津，很有可能到明年以后，天津相当一部分工厂要停工。现在官厅水库的水只有四千万方，密云水库的水只有八千万方。

总的来讲，今年以来经济形势是稳步前进，经济工作正在逐步走上轨道。这么大的调整，社会比较安定，没有出什么大的乱子，这是不容易的。今年工业的增长速度只有百分之三，当然这是最低点了。从今年以后，会逐步有所回升。当然不会很高，但这是最低点。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是能够稳步上升的。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要稳一点，工作要抓紧一点，要振奋精神，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循序而进。中央提出的调整结构，稳定经济，逐步改

革，这个大章法和大措施，主要是个继续落实的问题。最近小平同志同外国人谈话后，大的章法就是这样，不宜搞很多章法，不宜出很多主意，主要是个贯彻落实的问题。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六五”计划问题。

现在看来，有这么几个问题（这是初步议论的看法）：

第一，速度。工业、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准备定在百分之四。执行的结果可能要超过，但是看来还是以定在百分之四比较好。过去，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外，其他的长远规划，统统没有完成过。所以，为了提高信心，宁可把计划放得低一点，将来能够完成，超过当然更好，不宜搞得太高。工业、农业都是百分之四，轻工业大体上是百分之七到八的样子。重工业增长定到百分之一，因为有个能源问题。重工业增长定高了，能源解决不了。想把国民收入也定到增长百分之四，就是刚才小平同志讲的，经济效益好一点，产值的指标搞得稳妥一些。过去一般概念就是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四，大约国民收入只有百分之三。国民收入低于生产总值（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二，而国民收入只有百分之六点一）。今后五年主要靠挖潜，工业、农业总值和国民收入都是增长百分之四。估计八四、八五年会稍高一些。“六五”定到百分之四。今后怎么样？小平同志问过这个问题。“七五”会比“六五”要高一些。经过“六五”的调整，我的看法，第七个五年计划肯定要超过百分之五。搞得好，这个十年有可能达到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五。第一个五年低一些，第二个五年高一些。如果我们第一个十年能够这样搞的话，第二个十年会更好。这是我的看法，姚依林同志他们都这样看，第二个十年就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七。这样，我们以前讲过的二十年里两个倍增的计划，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最近我也看了一点外国的材料，在箱根开的中日两国的经济讨论会，日本的一个专家也是这样讲的。他认为，我们第一个十年不要搞那么高，搞低一点大概是增长百分之四、五，第二个十年可以搞到百分之七、八。还有个世界银行在中国的调查报告，基本上也是这个论点。就是说，我们在第一个十年真正把国民经济搞成一个良性循环，根本解决经济结构合理化的问题，解决体制改革的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真正把企业的经济效果搞好。比例关系搞好，使资源、能源、交通这些基础结构有所改进，下一个十年肯定会好一些。把组织结构、产业结构、管理体制解决好，中国人是聪明的，资源有，如果更多地考虑些经济效益，不忙于追求速度，总的经济情况会好。“六五”定到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决不是说我们的经济没有前途。

第二，财政。现在讨论“六五”计划，大家都知道一点消息，主要就是财政比较困难，建设资金比较困难。现在准备五年方针怎么定呢？基本平衡，每年准备有个二十亿到三十亿元的赤字。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做到五年中间我们既能基本平衡，建设又有一定的规模？途径有这么一些：

（1）财政本身要采取一些增收节支的措施。举一个例子，譬如烟酒专卖，加上高级烟适当提价。第一，烟要发展，要多搞烟。烟叶情况，估计今后也会

好。第二，要多搞高级烟（甲级、乙级烟）。第三，专卖。烟叶专卖，就好调整，就好统一使用。现在很多烟叶是在小烟厂加工，加工了很差的烟。专卖，烟叶能统一调整，烟叶生产能够多一些，好一些。第四，甲级、乙级烟适当提高点价，丙级烟稍涨一些，其他不涨。这四个措施，每年可以多收三十亿到五十亿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当然，也会挨骂，但是也值得。骂的人不多，少数人骂，抽好烟的人骂。

再一个，税收方面，现在管得不严，漏税非常严重。税还想适当增加一点。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搞得太少了，太简化了，要适当增加一些。主要是整顿一下税收，加上财政监督、财政纪律。这个大概可以多搞二十亿到三十亿元，今年大概就多搞十几亿元（今年抓晚了）。每年还要发国库券三十亿到四十亿元，个人也要买一点，大概一半向个人发放，一半向企业和地方发放。

还有一个，在纺织上想些办法。现在纺织有比较大的潜力。国际上是化纤便宜棉花贵，我们国内是棉布便宜化纤贵。如果我们国内棉花搞上去，不进口棉花，多进口化纤，在国内扩大化纤的比例，而且化纤还准备降价。有一个专家算了一个账，一年可以搞四十亿元，至少可以增加二十亿元左右。再加上搞一些其他的高档产品（一九六二年陈云同志搞高级糖果，现在要搞一些高档产品，搞糖果不行了），价钱就要卖高一点。加到一起，大概可以搞到三十亿元。

另外，外贸的亏损要设法控制一下，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要控制一下。这样也可以减少很多开支。按原来算账，这里头也可以有一二十亿元。这都是可以搞的。这是财政本身。

（2）从国内筹措一批资金。现在我们资金困难，一个就是向国外借，另外也可以筹集一些国内资金。因为按我们国内现在这个经济体制，企业有钱，地方有一部分省份也有钱，中央的钱比较少。现在预算外的资金增加，预算内的有一千亿元左右，预算外的资金大概还有五百亿元左右。预算外，包括挖革改都在内。还有分成，企业的钱，留成的钱，各种各样的钱。另外，城乡储蓄增加的趋势也比较明显。一九七八年以前，每年的储蓄最多增加一百亿元。一九七九年以后，一年就可以增加二百亿元。不完全是个人储蓄。银行存款，过去每年增加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亿元，这两年增加比较快，一九七九年增加二百零五亿元，一九八○年又增加二百一十八亿元。这是总的。下面分开讲：企业存款，一九七九年为四百六十九亿元，一九八○年为五百七十三亿元，今年六月底就已经达到了五百六十二亿元。城镇个人储蓄，一九七九年为二百零二亿元，一九八○年为二百八十二亿元，今年六月底就达到三百二十三亿元。农村社员储蓄，一九七九年为七十八亿元，一九八○年为一百一十七亿元，今年六月底就达到一百四十四亿元。而且相当大部分是定期储蓄。看来，我们的消费品也没有那么多，将来要通过银行把地方的存款、企业的存款、个人的储蓄拿一部分来作为建设资金。多了不行，能拿多少还要研究。办法是通过发行债券，或者银行来办。就是说，把银行储蓄中本来用作消费资金的，转一部分为建设资金。甚至将来还可以把长期储蓄的利息提高一点，鼓励长期储蓄。长期的好动用，短期的不好动用。国内的资

金，中国不能完全按资本主义的办法。但是我们中国也不能完全只按过去的旧制度，只是财政这么一个口，收多少然后开支多少，还要通过银行筹集点资金。

（3）借国外的资金。国外的低利资金，将来还可能配一部分买方信贷。低利的自由外汇，像世界银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买方信贷不自由，低利资金有一部分是自由的，世界银行的，货币基金组织的，这是自由的。买方信贷，譬如说欧洲贷给我们钱，利息也不高，但是你要拿他的钱买他的设备。这些不能用多了，用多了对国内机械企业影响太大，但是可以用一部分。因为我们要搞能源、交通，在这几年内不搞一些，以后再借就比较困难。究竟国外的借款借多少，还要研究，现在计委初步提出个意见，折成人民币，一年可以用五十亿元，那就是十几亿美元。我想，还可以稍微多一些。多到多少，还要研究。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用我们借到的低利贷款、自由外汇，加上国内的黄金，首先把一九七八年搞的一批高利贷冲掉。因为这个我们负担很大。一九七八年搞的这一批，明年光还本付息六十五亿人民币，要连续二三年，三年以后高峰才能过去。

（4）企业降低成本，减少浪费。这个有很大潜力。要从增加财政来讲，它比生产的增长还要可靠一些。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况，每年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一，财政收入只能搞十亿元左右。如果成本降低百分之一，也是十亿元。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多年来吃大锅饭的办法，加上多年的经营管理混乱，浪费很大。我说的浪费，还不是人多，就是不负责任这种浪费。所以，现在企业的潜力特别大。这两天报上发了个消息，抚顺市今年生产全面下降（因为它是重工业），但是它今年财政收入不减少。首钢，铁少炼了三十万吨，钢少炼了十二万吨，今年财政收入大概比去年还要增加。就是说，企业的潜力是很大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政策，要能够把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觉得，今后这几年，一个是靠增加生产来增加收入，一个是要靠降低成本、减少浪费来增加收入。这里我估计潜力相当大。

（5）中央财政的负担要逐渐收缩一些。有一些事，将来中央财政不负责。中央对基本建设的拨款，将来主要用在能源、交通、城市建设一些关键问题上。一些轻工业，一些投资周期短、利润又比较大的项目，依靠地方、依靠企业来搞。刚才讲的通过银行的办法。中央财政的投资范围适当收缩，一开始能搞多少，还要研究。

第三，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农业，今后几年还是个持续增长的趋势。当然，天灾人祸，哪一年不怎么样，这完全可能。总的来讲，今后几年，农业还是个持续全面增长的趋势。粮食不可能增很多，因为有些地方粮食面积还可能减少一点。但是，棉花、糖、油料以及其他的各种土特产，包括山货，会有个持续的较大幅度的增长。今后五年内，每年进口一千三百万到一千五百万吨粮食，用来调整农业结构，解决经济作物、畜牧业的发展问题，很有必要这样搞下去，不动摇。今后我们的棉花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我在这里冒讲一句，如果我们政策不变，到一九八五年，我们很有可能搞到八千万

担棉花。棉花主要的希望在北方，而不是南方，光鲁西北就可能搞到二千万担。它原来是四百万担，去年达到一千零七十万担，今年还超过去年。我在鲁西北做过调查。北方种棉花，包括河北、河南、山东，这是非常合算的。在北方来讲，两斤粮食可以换一斤棉花。按国际市场来算，一斤棉花可以换十斤粮食。所以要多进些粮食，把棉花搞上去。再一个是糖，也是北方的甜菜希望最大，关键都是个粮食问题。我们用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把国内的农业结构逐步进行调整。我看，这在我们国内是有极大意义的一件事。当然，现在还没有搞到陈云同志讲的那个数字（二千万吨）。他讲是几年之内，可以长期地搞。总的我觉得，我们棉花、糖、畜牧业、水果这几样东西都可以大发展。

轻工、纺织、建筑材料。轻工里边，特别是最近耀邦同志讲的食品，包括各种各样的饮料。我们的饮料太少，为外国人搞一个招待会，端出来的就是啤酒、矿泉水、汽水三样东西。青年一代和我们老年不一样。不仅是旅游，国内市场，各种各样的饮料都很需要。还有个日用化工。农民生活改善以后，就可能冬天要用点雪花膏。农民如果每家买一瓶雪花膏，这就是个很大的数字。如果小孩子、独生子女再用点花露水，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总之，我们中国的日用化工，香料香精、化妆品，当然不能和国外比，但现在化妆品在街上很多都买不到。这些东西都是一本万利。食品和化工，我认为都有可为，这都是些赚钱的东西，可以回笼货币。重工业主要还是围绕着发展消费品，调整服务方向。不是不搞重工业，是重工业为什么服务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任务。

第四，小平同志讲的那句话，就是能源、交通带动整个工业。五年计划里头，我们还得下点力量，搞能源、搞交通。中央的投资，无论如何也要挤一些搞这些。外资也还要用一部分搞能源，搞交通。能源和交通如果不搞，肯定会妨碍整个经济的发展。当然，搞能源，一是开发，二是节能。五年之内，节能的技术改造是重点。我们这一个五年能不能为下一个五年作些准备，关键是两个：一个是能源、交通问题，一个是老企业的技术改造。

第五，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我们现在的企业所以效率低，一个是管理问题，一个就是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五十年代苏联援助我们的一百五十六项，已越来越成为一种落后的设备，特别是消耗能源比较大。再过上几年，我们现在的工业有相当一部分到了更年期了。当然，不是说全部设备都不要了，都要重新改。但是，原有企业在这五年要设备更新，技术改造。而且这一个挖革改不像我们过去讲的，专门是为了增加产量，应该重点是围绕节约能源，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挖革改过去主要是为了量的增加，今后应强调质的提高。这样，经过五年到十年，我们原有企业的面貌逐渐有了变化，这本身就积蓄了力量，就是生产力。而且，因为我们这一段新搞的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了，原有的企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都能够多搞一些。这样，重工业、机械工业不至于下降太多。现在我们的机械力量很大，完全有力量搞这个。为了提高经济效果，提高产品质量，也可以引进一些技术。技术改造在这五年里也应该很好地抓一下。

第六，进出口。我们要继续发挥现在国际的有利条件，发挥我们自己的优

势，以我们的优势来克服自己的弱点，在国际上交换。既然现在已经不是闭关自守了，就不能完全什么东西都靠自己来搞，应当利用自己的长处，同国外来交换，弥补自己的短处。无论农业、工业，都需要这样。讲一个简单的例子，譬如拿粮油这个问题来讲，如果我们善于同国外交换，有很多是非常有利的。刚才我讲的棉花是一类。现在讲油料。现在我们长江流域的油菜籽是大发展的趋势，因为农民收入也多，而且茬口也合理，也比较稳定。如果我们逐步地在东北从城市开始不吃豆油，吃菜籽油，把东北的大豆转为出口，那就非常合算。东北一年用三十亿斤大豆榨油，而东北的大豆，大家都知道，根本不是榨油的大豆，东北是含蛋白质高的大豆，美国对我们这个大豆非常有兴趣。它榨油出油率很低，但在国外卖价钱很好。如果说东北都少吃豆油了，那就是一大笔财富。因为长江流域的菜籽油多的是，这几年控制不住。菜籽油出口不行，不合算。国外也不愿意买这个东西。我们的大豆可以搞高蛋白质的食品和饲料，很多研究机构专门研究这个大豆，因为它的蛋白质很高。我们过去只强调自给，拿这种大豆去榨油，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能够有计划地、逐步地把农业结构加以改组，少种小麦，多种油菜籽；如果全国能够逐步逐步都吃菜油的话，这就能把东北的大豆、山东的花生替下来出口。当然，这要有个过程。如果逐步来搞，能够拿十亿也不得了。还有一些类似的东西。上一次我跟粮食部讲小麦和大米的问题，我们中国虽然大米很紧张，但中国是在世界上生产大米最多的国家。不仅现在，再过些年也是这样。总之一斤大米可以换两斤小麦，甚至还会更多一点。如果我们城市里边采取一些措施，多吃一些面粉（这要采取些政策措施），逐步挤出一些大米出口，一百亿斤大米就可以换二百亿斤小麦。当然，这不容易。像江苏、浙江一直到广东，主要都是用大米作食品，喂猪也是大米。湖南也是。但是，大米喂猪并不好，养分并不好，还不如苞米。如果我们将来把饲料工业搞好，用好的饲料换大米，又便宜，又把大米换出来出口，那是很合算的。现在我们已经换了一些。我说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不是闭关自守，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和国际市场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应当研究善于经营的问题。耀邦讲的善于运筹，就是通过交换，通过国际上的贸易，以己之长，补己之短。我觉得，这个方面，无论农业、工业，都有极大的潜力。这是一条。现在我们很多人考虑问题，好像还是什么东西都靠自己比较好。我觉得，真正的自力更生并不是这样一个概念。拿自己的东西换另外的东西，这怎么不叫自力更生？我并不是依靠你，我是拿我的东西跟你换。如果我们不是自力更生，他也不是自力更生。这个框框，现在还束缚我们很厉害。再一个，就是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区怎么样把它的工业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以进养出。上海、青岛、天津、广州已经这样做了，从国外进原料，搞产品，然后出口。

当然，全国其他地方也可以搞，但这些地方有很大的优势，经验、技术、交通、电讯、社会联系都有利。我在上海讲，将来上海相当大的力量是对外。还有天津。这样一搞，沿海这些地方，二亿人口，可以创造很多财富，也可以克服很多弱点。进出口我就讲这么一个观点。

最后，人民生活。那一天小平同志说了一下，大概这五年，人民生活不能提得太高，对消费的部分要有所控制。农产品提价问题，工资问题，奖金问题，都要有所控制。消费的部分不能增加太多。主要的是搞点宿舍，搞点房子。虽然个人的购买力是促进消费品生产的动力，但是太多了也不行，压力太大了不行。所以，还要控制一下。

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

一九八○年九月十五日

* 这是1980年9月15日赵紫阳在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后，第一次会见香港新闻界知名人士和记者的谈话摘要，当时曾以“赵紫阳畅谈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为题，在香港《大公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赵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阐述了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的许多重要意见，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相结合。这也是赵担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公开的施政宣言，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导思想。

我们现在不是要搞资本主义。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

这是新总理赵紫阳于九月十五日在会见香港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时讲的话。在讲这段话之前，他还引用了列宁的话，除了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这是他在担任总理以后第一次会见新闻记者。赵紫阳说，中国的病根已经完全弄清楚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进行治疗。他有充分信心能治愈这些病。参加会见的，是在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政协会议的香港新闻界知名人士，其中有《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和副社长兼总编辑李侠文，《文汇报》社长李子诵，《新晚报》总编辑罗承勋等。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第一社长王匡和第二社长李菊生也参加了会见。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以及中国现在的情况时，赵指出当前关键是我们是否已经看清楚问题所在。医生在处方之前，首先要找到致病的原因。如果能够查清病因，病就能治好。赵确信中国的病根，如今已经完全清楚了。我们有信心治愈这些病。

关于华国锋在人代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赵说，这并不是一个人的意见，而是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由中央总结出来的看法。赵说，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推到极端，我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的大彻大悟，反省到1957年以后的问题，那就得花上更多时间才能做到目前这样的解放思想。

赵说：中国曾经付出巨大的代价，目前正毫无保留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的经验。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工作将肯定地得到改进。人们不应期望事前搞出一套完整的办法，在一夜之间把什么都改变掉。这样做，弄不好，就会陷于全面被动。

我们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他说：只要方向正确，我们就能在实践中，一

边走，一边探索，稳步地前进。

中国是一大片，世界是一大片，中国应真正进入世界市场

他指出，在新旧交替的时刻，肯定会发生一些问题。香港一些人士反映外贸工作有些混乱。这正是新旧交替时期的反映，这也正是我们预见到的。在过去内外贸易分别由一个部门包办，统得很死，那就难免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某些省份迫切需要某些商品时，这种商品却在另一个省份积压很多。在国内尚且会有这样的事，对外贸易中问题当然会更多。

赵又说，中国是一大片，世界是一大片，如果只有一条线来沟通，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世界市场。

赵说，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我们统得太死，闭关自守，只是到现在才开始改变。但是，我们的立法还没有跟上，统筹协调的工作也没有做好，因而产生了一些难免的混乱。

他说，无论如何不能永远乱下去。如果说欧洲共同市场尚且可以做到协调，我们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呢？伦敦旅游协会是一个民办机构，但它却能够把航空、交通、旅馆各方面都协调得很好。我们今后要在立法范围内，放手去干，统筹协调，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前进。有些人说，中国现在官僚主义比以前少了，和外部世界的接触也比较多了。

引进外国先进经验，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这个重大课题解决好了，就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

赵紫阳强调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当前我们国家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引进外国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使之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这个课题解决好了，那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必须尽力解决这个问题。

他还说，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该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由于过去极左路线的影响，统得过多，无所不包，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我们过分强调了集中，企业缺乏自主权，不能发挥生产积极性。

他还说，从宏观经济出发，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又要吸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管理、经营方面的经验，还要承认商品经济的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就是通过商品经济和大规模生产发展起来的，银行起了杠杆作用。过去我们沿袭了苏联的管理方法，同时还继续采取了过去老解放区的那种以小生产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经济的管理方式。这一切阻碍了我们经济的大发展。

赵说，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毕竟比封建主义进了一步。如果连资产阶级

民主形式都不讲，岂不是向封建主义后退了。

（原载《世界经济导报》1980年9月30日第7期，译自香港《大公报》英文版增刊）

专业联合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

一九八○年九月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对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80年第2601期上刊登的一个建议的批语。

一机部贾庆林[1]同志的建议很好，请印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各同志和各位副总理参阅。同类型的工厂组成工厂集团，或在经济中心组织专业性的外贸服务公司，这样既有利于打进国际市场，把外贸搞活；又能把分散的企业组织起来，协调行动，联合对外。这种专业联合可能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请一机部机械进出口公司先选择几个中心城市的工厂，抓紧进行试点，摸索经验。

赵紫阳

一九八○年九月十八日

注 释

1．贾庆林（1940—），河北泊头人。河北工学院毕业，曾任一机部成套设备局团委副书记，时任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

国务院今冬和明年要抓的几项工作*

一九八○年十月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开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议程有四个：一是由我向同志们通报一下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分工，今冬和明年国务院要抓的几项工作；二是请万里同志讲一下国家机关的整顿和改进作风问题；三是请杜润生[1]同志对中央召开的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制订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文件作个说明；四是请杜星垣[2]同志对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作个说明。

国务院今冬到明年要抓的工作，总的来说，就是要贯彻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精神。整个工作要按照邓小平副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华国锋主席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讲话去办。他们的讲话中提到的很多工作，国务院应当认真贯彻落实。今天，我不是讲政府的全面工作，主要讲讲围绕经济工作要抓的几件事。至于外交、民族、政法、文教卫生，等等，都按人代会精神和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去办，我这里不再讲了。

一、进一步抓调整

今年的经济形势，总的来讲是好的，但也要看到当前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形势好的情况下，要看到潜伏着的、可能出现的危险。现在看，有以下几个因素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一是能源本身比例失调的情况比预想的严重，明年石油的产量比今年大约要下降四百万吨或者还更多一点。在当前能源缺乏的情况下，这四百万吨石油可不要小看，对生产、对财政收入、对出口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还有统配煤矿的产量也要下降一些。二是农业今年是个重灾年，南涝北旱，粮食减产可能在三百亿斤以上，棉花可能是保产甚至稍有减产。这不能不影响到明年。三是过去的欠账太多，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今年的财政赤字比向人大报告的预计要大一些，货币的投放要多一些。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要有足够的估计。

针对这些情况，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讨论时认为，明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总的讲，是要进一步抓调整，继续保持经济稳定。稳定经济主要有两

条，第一，物价，特别是主要消费品的价格，要保持基本稳定；第二，明年财政赤字无论如何要控制在五十亿元以内。做到这两条，要作很大努力。如果明年财政赤字突破五十亿元，连续几年的赤字都很大，那么，经济上可能就要出大的问题。“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是关键。我们进一步抓调整，有利于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有利于给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现在看来，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对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够，抓得不够有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以来，用较多的精力抓长远规划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这无疑是必要的，今后还要大力抓。但同时必须继续抓调整，对调整要采取一些得力的措施。应当认识，进一步抓好调整，是我们的经济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也是今后经济上出不出大问题的关键。

在思想指导上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在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搞活经济的同时，必须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计划的指导。我们要研究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在微观经济方面，在企业的具体活动方面，应该使它更活一些，这确实有很大的潜力；但在宏观经济方面，在决定国家全局的一些问题上，必须加强国家计划的指导。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立法一下子还跟不上，经济上的手段一下子也配不了套。在很多经济措施、经济杠杆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国家尤其应当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不论外国的经验也好，我们过去的经验也好，经济上活了以后，是会出现一些新问题的。有一些问题关系不大，国家不必干预；但对一些影响比较大的问题，国家必须进行干预，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健康地发展。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企业进一步搞活，把经济进一步搞活。但在一些重大的、关系全局的问题上，国家必须进行干预。这两方面要结合起来。在进一步抓调整，继续稳定经济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稳定经济，中心环节是要进一步解决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这里打个招呼，原来确定的一九八一年的基本建设规模要压缩，二十二个重大项目也要进一步研究。原来决定明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五百五十亿元，现在看来，不能搞那么多，只能按五百亿的规模搞。特别是重大的建设项目，一定要慎重，严加控制。再一个是要采取有力的措施，解决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以小挤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基本建设的规模也控制不住。这里包括挖、革、改在内，这方面的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也不少。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如不注意，今后势必会一年比一年严重。我们实行两级财政，扩大企业自主权，地方的钱、企业的钱会一年一年多起来，这是个好事，这一条政策我们坚定不移。今年我们执行计划的结果，中央财政有很大的赤字，而地方财政可能有三十亿元的节余，这三十亿元还不包括企业发展基金。实践证明，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以后，对调动企业经营的主动性、积极性，增产节约找门路，讲求经济效益，作用是很显著的。但是地方、企业有了钱以后怎么使用，用在哪里，不能用在哪里，国家要加强计划指导。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计划指导，我认为解决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然宏观经济，不仅是这一个问题，它包括的内容还很多。从当前看，控制基本建设规

模是第一位的。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计划指导，包括国家使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首先应该在基本建设上。我们应当想办法使地方和企业的钱，在几年之内更多地用在解决比例失调的方面，比如人民生活的欠账，像住宅、教育、必要的生活设施以及安全生产等，这些方面要多用一些。还要注意用在节约能源上。本来现在欠账就很多，薄弱环节就很多，所以千万不要从局部出发，把钱用在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上面，再去扩大比例失调。地方和企业把钱用在轻纺方面有积极性，因为资金周转快，利润比较大，又可以多安排就业。这是好的。但加强轻纺，也要避免盲目性，不能不顾客观条件，无计划地去扩大生产能力。现在轻纺主要的还不是生产能力的问题（当然有些方面有生产能力的问题），而是能源、原材料、质量、品种的问题，要把钱用在这些方面。近来纺织工业各地都在搞，一下扩大很多锭子，根本没那么多原料，建起厂子以后也只好闲起来。这种做法一定要改变。所以轻纺工业哪些搞，哪些不搞，要作分析。还有挖革改，也要分析，也不能盲目地、笼统地扩大生产能力。地方的钱归地方，企业的钱归企业，你自己有使用的权力，这是个原则。但哪些根本不能搞，哪些一两年内不能搞，国家要有规定。地方、企业的钱如何使用，也不是统统都要国务院批准。但国务院应当根据整个国家的情况，讲清哪些是长线，哪些是短线，哪些是薄弱环节，哪些是生产能力过剩，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哪些东西不准搞。像有些地方搞很多小烟厂，盲目地扩大纺织厂，这些都不行。各个地区都想根据自己的情况发挥优势，出产棉花的想搞纺织，出产羊毛的想搞加工，大量减少原料的外调，这样搞就会出问题。发挥各地的优势，改变生产布局，只能逐步地经过相当一个时期才能办到，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改变过来。我们国家正处在调整时期，还有相当的困难，各个地方都那样搞，会增加国家的困难。我这里只是原则上讲一下，还准备搞一条一条的具体规定组织实施。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中央用于建设的财政拨款，要逐步更集中地用在那些建设周期长，地方、企业、银行都没有多大积极性，但国家又必须搞的建设项目上去。如能源、铁路、港口、科学事业等。那些建设周期短、利润比较高的，应当更多地让地方去搞，让企业自己去搞，还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去搞。将来地方的钱，企业的钱，银行的钱，第一不搞盲目建设，第二用在大家有积极性的方面。这样就可以把国家财政拨款，也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一部分财政拨款，用在那些建设周期长、利润又不大，但又必须搞的建设项目上去。轻纺工业必须加强，但轻纺需要的建设投资，要更多地由地方去搞，更多地通过银行贷款去搞。当然这些要逐步地去做，但从明年开始就要体现这样一个方针。

还有社队企业的发展，也要适当控制，要认真搞好整顿提高。整个社队企业的发展要有个步骤。这里也有个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问题，也有个争原料的问题。还有个应当引起注意的普遍的问题是，社队企业占用土地的情况很严重，搞不好，过几年在这个事情上就要出很大的问题。当然社队企业、农工商联合企业要一步一步地发展，但要避免盲目性。我们国家农业人口结构的改变，究竟要个什么样的速度，农村劳动力出来多少去做工才合适，在长远规划里要很好研究。

这个事情搞不好，也会产生盲目性。农业人口转到社队企业，转为吃商品粮，这是一个趋势。从长远看，中国的农业人口总是要减少的。但人口结构的改变，要同经济发展的速度相适应，如果发生盲目性，一哄而起，搞得过快，也会出问题。

（二）进一步抓轻工生产，搞好轻工和市场。今年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明年还要继续这样做。要通过发展轻工，活跃市场，广开财源，回笼货币。明年的工业增长速度，主要靠轻纺。我们应当继续提高轻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包括那些虽然不是轻工，但属于生活消费品的比重。明年我们宁肯少进口一些设备，挤出一部分外汇，多进口一些轻工原材料、耐用消费品的零部件和部分回笼货币多的高档商品。物资部门、外贸部门的库存都比较多，明年要进一步清理压缩，用于轻工，用于市场。明年还要考虑适当减少钢铁生产指标，让出能源用于轻工。对上海和一些轻工生产比较集中的城市所需的原材料，要想方设法保证供应，产区一定要按计划调拨。这是一件很艰巨的事情，但必须这样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这个问题时，明确地提出来要保上海。当然不只保上海，天津也得保，各个省的省会和重要城市也得保。总之，农业上的原料，烟叶也好，棉花也好，羊毛也好，还有其他东西，必须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调拨计划。只有超计划的部分，可以自己支配，进行协作。只要这些城市生产能力有多余的话，就不要盲目建厂。我看至少两年以内，要坚决采取这个方针。两年以后，根据发展的情况再看。这就是说，第一，按照计划完成调拨任务；第二，超计划的部分提倡同城市进行协作，充分发挥城市的生产能力。如果确实原料很多，才允许增加一些生产能力。在原料产区和城市之间，国家要加强计划协调。

（三）节约能源。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明年要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去落实。首先明年的节能计划要很快搞出来。对消耗能源很大、成本很高、长期亏损的工业企业，特别是“五小”企业，要继续关、停、并、转，节省出能源。这里要采取一些政策，就像东北对待小铝厂那样的政策，小厂停下来以后，地方所需要的铝，由大厂给；地方所需要的钢材，由大厂调，规定一个合理的比例。像四川、贵州、云南的小化肥厂也烧天然气，而大厂天然气不够用，就可以把小厂停了，把天然气调给大厂，由大厂给一定数量的化肥。还有烧油，也要考虑停小厂，保大厂，大厂给返还东西。明年必须抓紧石油的节约，工业用油、农业用油、交通运输用油，都要研究一些节约的办法。现在世界闹能源危机，采取很多节油措施，而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节能的风气，明年一定要改变过来，在节能上真正做出成效。

（四）稳定物价。明年物价要保持基本稳定，无论如何不能够出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认为，所谓基本稳定，应当划出一些杠子。一是占整个社会商品零售额的百分之七十几的商品价格，要基本稳定；二是对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九十的中等以下收入的人，生活水平要保证，生活费指数不能超过多少，也要划个杠子。如果生活费指数超过了多少，国家就得采取措施。至于有些东西，比如甲鱼、螃蟹等，也可以在价格上放宽一些，随行就市。这些东西涨价，对中等以

下生活水平的人没有什么影响。所有的东西统统不涨价，一律稳定，也不行。很多零零星星的三类产品，如果价格管得很死，就没有了；一放活，要涨价，如果都要国家补贴，国家也吃不消。所以要有一个方针，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品价格要保持基本稳定。至于有些零星商品，并不影响百分之八十、九十的人的生活的，价格可以放活，收入多的人可以去买那些东西。还要注意，城市的蔬菜价格一定要稳住。农村的农贸市场的粮价也不能有大的波动。因为今年减产了，农贸市场的粮价一定程度的回升是很难避免的，但要通过必要的办法，使它只能回升到一定的水平，不能够大涨。还有很多二类产品和一些三类产品，国家也必须掌握一部分。在主产区，通过议购也好，派购也好，国家收购起来，以便解决城市最急需的供应。比如水果集中产区，像产苹果的地方，产葡萄的地方，产荔枝的地方，等等，国家商业部门必须收购掌握一部分，其余的由社队自己出售。议价问题要很好整顿一下，不能统统搞议价，议价商品的价格，也不能没有限制。现在除了粮、油、猪，很多农产品统统是议价，这个不行。这里有几种情况：小宗的零星的农副产品可以议价；有一些产品在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以后搞议价；有一些产品国家收购一部分，其余的搞议价。对这个问题，要有个办法。

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最近对经济形势讨论了几次，准备写一个文件，先向书记处汇报，再召开一次省长会议（和计划会议一起开），重点讨论经济形势，讨论明年进一步调整和稳定经济的措施。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也要进行讨论。

二、制定长远规划

制定长远规划的工作已经搞了半年，现在已有了一个十年规划的初步设想。这个初步设想，距离制定一个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十年规划，这个规划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还差得很远。我们过去制定规划是专讲生产指标的，现在制定的这个长远规划应该是经济的、社会发展的规划，不仅包括经济的要求，也包括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要求，包括社会福利、人民生活的要求；不仅有物质增长的内容，还要有劳动就业、节制生育、人口结构变化的内容。所以，我们搞的初步设想，离上面这些要求，还差得很远，工作量还大得很。真正制定出这样一个规划，任务还很艰巨，很繁重，需要时间。特别是我们目前处在调整时期，很多问题看得不清楚。从现在到开省长会议这一段时间，要集中力量抓一下调整和稳定经济问题，先把明年的计划安排好。省长会议后拿出较大的精力，继续去搞长远规划，力求搞好一些。鉴于我们制定计划的水平很低，数据、资料以及预测工作非常薄弱，因此可以考虑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十年规划的方针性的文件，然后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十年长远规划纲要。这是一个高方案。

第二个方案，在十二大提出一个十年规划的方针性的文件，然后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一个十年规划的轮廓设想。这个轮廓设想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都可以提两种设想，重要的生产指标两种设想，达到什么标准两种设想，重大措施也可以提两种设想，在以后的实践中来看看哪种更符合实际。与此同时，着重制定一个从明年开始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要求详细一些、准确一些。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我认为，以后采取五年滚动计划较好。就是每年都要搞五年计划，如明年起，就是八一年到八五年，后年就是八二年到八六年，顺延一年，每年都有五年计划，去掉一年加上一年。通过制定这样的五年滚动计划，两三年后，我们的计划工作就可能会有一个像样的水平。鉴于当前我们的经济工作水平比较低，只能够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因此，可不可以采取除了提个长远规划设想以外，重点搞五年计划，而且五年计划采取每年修订一次的滚动的形式。这是第二个方案。这样搞很有好处。如果按过去的办法，五年计划一订就算了，到后来看五年计划不行，结果越搞与实际的距离越远，越搞越没有指导意义，只好抛开，另外搞一年一年的计划，这就等于没有长远规划。如果搞滚动式的五年计划，计划工作的重点每年都放在五年计划上，每年修订一次，这样计划水平就可以逐步提高。这实际上解决了五年计划每年进行调整的问题，同时也把当年的计划定下来了。采取这样的办法，对提高我们制订长远规划的水平，对我们整个经济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提出这个想法，大家可以议论，然后省长会议议论，最后报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决定。

两个方案，不管采取那个方案，都要下很大力气来做这件事。

三、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是有效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承认企业相对独立性，是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这点开始的。一九八一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要前进一步，要在全国全面铺开，并且进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试点。财政部的同志建议，明年的这种试点不要搞得太多，我原则上同意。但光在个别企业试点也不行，要选择几个城市试点。总的来讲，明年试点不能搞得太多。因为，这个试点办法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如何，还摸不清楚。

与扩大自主权相配套，要酝酿和逐步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像计划、物资、劳动、物价、银行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这里就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脉络和轮廓，说说我们的想法。我们国家搞扩大企业自主权，政企分开，使企业相对地独立，在这个基础上，自愿地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另外，就是要建立行业组织。国家经委邱纯甫[3]同志考察日本行业组织有个报告，讲了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行业组织对推动企业联合，比现在的地区、部门的作用都大。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拿过来为我所用。行业组织，各种各样的协会组织，是民间的，或者是半民间、半官方的，是跨部门、跨地区的。它的任务就是搞服务、协调、培训人才。在扩权以后，要发展经济联合、行业组织、经济中心。同这样一个进程相适应，原来各经济主管部门，部委也好，局也好，就逐步

转为制订政策、立法，搞监督、协调、服务，进行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干预，搞技术交流和培训等工作，要使行政部门向这方面转化。所以，政企分开，权力下放，扩大企业自主权，在这个基础上，把分散的企业，一个一个独立的企业组织起来，发展各种形式的联合体，加上行业组织，加上经济中心，加上经济主管部门的统筹、协调、监督、服务，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充满活力。这就是我们设想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脉络、轮廓。当然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样搞就能使改革既积极又稳妥，改而不乱。

在改革中，我们一定要注意方向要准，决心要大，步子要稳，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我们这次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采取把一切方案搞好，一个早上全部改过来，而是要采取一系列的过渡办法。现在改革的方向定了，但是究竟这个路子怎么走，步骤怎么定，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我们还没有经验。改革的路很长，要很好寻找它的步骤、形式、方法。所以，第一，采取的步骤要始终很谨慎，要“摸着石头过河”，使改革的每个步骤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避免折腾。要承认我们的经济工作管理水平还很低。刚才讲了，经济资料也很不齐全，很多连锁反应在事前并不知道得那么清楚，那么准确。我们是一边摸索一边前进。总的是要前进，这要坚定不移。但步子不要一下迈得太大，一下迈大了再来调整就困难了。在改革中间，有些步子迈得不恰当，可以再移动一下，作一些调整，要有这个准备。步子迈得稳些，别的方面容易跟上去，产生了新问题也容易解决。第二，要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改革中间总会出现问题，要认真分析原因，正确总结经验，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不要走回头路，走老路。旧的东西确实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改革后一出现新的情况，容易不是用主要精力去研究如何适应它、解决它，而往往是想退回来，回到老路上去。这种情况是容易发生的，我们要警惕。

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困难是不少的。除了“左”的一套影响、小生产习惯势力的阻挠以外，从工作上来看，有两个问题，难度很大，又是改革最关键的问题。一个是打破地区所有制和部门所有制，这在整个改革中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不解决，联合也联合不起来，竞争也竞争不起来。但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现在有许多联合，从企业的共同需要来讲非常合理，但就是卡在这个地区，或者那个部门，因为涉及到部门、地区之间的利益。一些地区和部门，对企业之间发展生产的需要体会很差，但是对权和利归你还是归我，却成为他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这就会成为联合的障碍。我们要进行改革，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有些事涉及到这个地区、那个部门就难办，很合理的事情，就是走不通。为什么呢？说穿了，就是一个是权，一个是利，归你还是归我。要改革，非打破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不可。不如此，企业就不能合理地组织起来。二是价格体系。所谓按经济规律办事，所谓市场调节，归根结底是价格问题。多年来形成的商品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的问题很复杂，牵动面很宽。这个问题不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一句空话。但要改起来，确实是连锁反应很多。对这个问题，既要坚定，又要谨慎。特别是目前处于调整时期，财政还有赤字，搞不好往往会要

影响到整个物价的稳定，影响到经济建设，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这个问题不改不行，改得不好也要出乱子。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很困难、很复杂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是这么两个问题，其他的问题比较好办。在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要用心研究、妥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明年改革的部署，杜星垣同志还要讲。主要是一个继续试点，一个制定方案。

四、加强经济立法

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经济立法工作，逐步做到主要通过经济政策、法令，通过运用经济杠杆来指导和管理经济。现在对企业、对基层单位放活了，对它的干预减少了，但是没有配套的法令、法律让它遵循，因而发生了一些问题。很多问题的产生是这个原因，包括外贸。外国一个企业的经理有很大的权力，但在企业外边有很多法律、条条管住它。我们现在有很多权要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但必须有很多带有立法性的东西跟上去，使它有所遵循。经济立法是经济体制改革里面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已开始搞了一点，要继续积极地去做。

我们现在要首先把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全部经济立法拿过来一个一个研究，看哪些适合我们的情况，哪些不适合，作为我们经济立法的参考。经济立法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将来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法令，恐怕要有几千个就是了。明年和以后，经济立法问题要摆到国务院工作的重要日程上，要摆到各部的重要工作日程上。有些法令的制定，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和条例，先试行一段，经过实践，逐步完善；第二步再报经立法部门批准，成为正式的法律。

通过改革，下边逐步搞活以后，那么对企事业怎么进行管理呢？一个是联合，一个是行业组织，一个是经济立法，还有一个是统计。我认为统计工作是指导国民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只要统计搞好了，监督就比较容易搞，国家干预也就比较好搞。现在我们国家的统计太差。像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如果统计工作没有基础，经济工作就很难搞好。你说要管，那也很容易出瞎指挥。放活以后，统计工作没有跟上去，你就没有办法管理，干预也没法干预。因为哪些应当干预，哪些不应当干预，怎么引导，你搞不清楚。所以要搞好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和指导，必须加强统计工作。现在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怎样加强，请计委研究一下。一个统计，一个预测，这两件事能搞好，我们国家的计划指导就可以大大加强。通过经济杠杆，通过必要的国家行政手段，就可以使国民经济协调地、健康地发展。

五、逐步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过去这方面欠账很多，现在调整就是要逐步还账，逐步地使人民生活有所改

善。这个问题，也要根据我们的情况量力而行。明年工资、奖金，总的来讲是个稳定情况，不可能有大幅度的增长。工资也是在很小范围内的调整，依林同志讲了，只能有重点地解决知识分子以及机关干部中工资过低的问题。明年在生活上主要应当把市场供应搞好，把物价稳住。还有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事，如城市建设、住房、安全、卫生等方面要有所改善。明年住宅建设要继续抓紧，灾区生活安排要落实，城市蔬菜供应要解决好。改善人民生活包括的方面也是很广的，不要只看一面。明年把市场搞好，在物价、市场、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多用些劲儿。

现在人民生活中的爆炸性问题不少，就业、物价、住房、安全、环境保护等，确实问题很严重，人民确实是不满意的。但是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量力而行，逐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过多地许愿绝没有好处。最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议论了经济宣传问题，认为是个大问题。我们一方面要跟人民讲清楚，确实过去对人民欠账很多，人民付出了代价；同时也要讲，这两三年里，党和政府已经尽了相当大的努力，比如购买力的迅速提高，城市住宅建设的增加，就是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还必须讲，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根据我们的国力状况逐步解决。这样才是真正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执政党如果随便开支票许愿，最后没做到，比不许这个愿要糟得多。宁肯少许一点愿，最后做的结果超过。我看对关系人民生活的事情，要切切实实去做，大话少讲。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准备建议书记处正式讨论一下经济宣传的问题。

六、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

万里同志要专门讲这个问题，我不多讲了。我只简单说两点。今年以来，方针、办法议了不少，但有的做了，有的还没做。今后国务院的工作，有一个狠抓落实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和各委都要加强检查督促，各部也要认真地抓落实。今后国务院一定要树立起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的作风。我们机关现在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压了许多干部，不管今后机构怎么调整，各部都用不了这么多人。一九五七年以前，当时毛主席主张向科学技术和文化进军，这是很对的。那个时候，很多干部开始学业务，学科学，有些还派到苏联去学习。但一九五七年后，讲外行领导内行，就不学了，就轻视知识，轻视专业，排挤以至打击知识分子。应该说这样把老干部耽误了。现在我们的干部构成，同东欧国家对照，就看出了问题。这一点就没有他们高明。南斯拉夫也好，罗马尼亚也好，胜利以后，老干部都进行了专业训练。我们去访问时遇到一些经理、厂长，都受过专业训练，是大学程度。而我们却是大批“万金油”[4]干部一直搞下来了。现在我们机关还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中青干部，科员、科长、副科长，处长、副处长，有一层人，专业知识少。反正现在我们用不了这么多人，要想法给他们重新学习的机会。我讲的是专业学习，专业训练。专业学习要补课，特别要组织学习经营管理。让这些干部成为什么自然科学家，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要培养他们能够掌握系统工程学方

面的知识，搞经济工作的懂得怎样经营管理，搞科研的知道如何组织领导科研工作。我最近同农业部的同志谈，他们部里有九百人，拿出二百人通过训练增加专业知识。建议各个部都可以进行专业训练，搞学院也好，搞学校也好，补习班也好，要补这一课。我们的大学也要根据条件，增加这方面的专业。各个部都要筹办这个事情。我们这一代被耽误了，不要再把他们耽误了，这些人好多年龄也不小了，再过几年也就晚了，错过时间就可惜了。所以，第一，要给他们受教育、学习专业的机会；第二要给他们一个涌现的机会。我们在干部路线上有一个问题，就是不通过涌现的办法发现干部，使用干部。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条值得我们学习，有的人也没有什么资格，反正你干得好就可以晋升。现在我们经济改革需要大批经济人才，需要大批会搞联合、会搞行业工作的人才。把这批人从机关里抽出来训练以后，撤出去，到下边去搞企业联合，参加行业组织的筹备工作。干事也好，科长也好，只要搞得好，就当经理、总经理，就当协会的会长、副会长、高级顾问。我们很需要这样做，给他们一个涌现的机会。我过去同国家经委讲过这个事，由他们规划一下，现在看来不要等，给各部门打个招呼，都可以按这个路子去搞。至于行业组织怎样搞，安排一个会议，范围可以广一些，请经委邱纯甫同志介绍，看外国那么多资本主义企业是怎样联合起来组织行业公会的。我们要么就是统得死死的，要么就是下边一放活，就没有什么办法去调整、协调。总之一句话，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那一套办法，我们对社会化大生产的一套生产、经营管理形式和办法太生疏了，现在需要学习。

另外，专门说一下认真处理人大提案的问题。在这一次人大和下一次人大会议之间，国务院和各部门要把处理人大提案的工作摆到议事日程上，而且要落实到计划和工作安排上。绝不能采取人大会开完就算了，等到下一次人大要开了，才匆匆忙忙搞个东西去应付。应当把落实和处理人大提案的问题，作为两次人大会议之间的经常工作，一年要抓几次，检查几次。这件事由国务院办公厅负责。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对待人大提案的认识和态度，都得有所变化，要使提案成为改进和推动政府工作的动力，不能像过去那个样子。

我就说这么六件事。这六件事是影响到各方面的，至于日常工作，那就由各个部门的同志去安排了。

注 释

1．杜润生（1913—2015），山西太谷人。曾任太行六分区专员，太行行署副主任，中共中原局、华中局、中南局秘书长，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办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2．杜星垣（1914—2011），福建霞浦人。曾任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广州市委副书记，一机部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四川省委书记，国务院秘书长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3．邱纯甫（1915—2005），江苏丹阳人。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办公室主任，冶金工业部党组成员兼办公厅主任，太原钢铁公司党委副书记，河北省冶金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兼进出口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国家计委顾问，中国包装总公司董事长，中国包装技术协会会长。

4．万金油，即清凉油，由华人富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在20世纪初制售的“虎标万金油”而得名，是用薄荷脑、樟脑、桂皮油、丁香油、按叶油等加石蜡制成的膏状外用药物，可治头痛、轻微烫伤等，应用范围很广，但不能治大病。人们常以此比喻什么都能做，但什么都不擅长的人。

关于编制长远规划和五年计划的设想*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日

* 这是赵紫阳给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

主席、副主席并耀邦同志：

关于长远规划，原来准备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十年建设的方针性文件；然后，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一个十年建设的规划纲要。

第一件事，正在进行。预计在十二大以前，把一些重大的方针问题理出一个头绪来，是可能的。

第二件事，受到几个因素制约：一，统计资料不全，也不够准确；二，我们的计划水平不高；三，目前正处在调整时期，很多问题还看不清楚。要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前编制规划纲要，要求似乎高了。

我考虑，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以前，可否不搞十年建设规划纲要，而是搞一个十年建设轮廓设想。不是规划，而是一种设想，一种预测。内容也可以跳出过去的框框，搞得粗一些，主要是对十年内应该解决和可能解决的经济建设问题、科技文教建设问题以及重大的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做一些综合研究。其中，许多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采取哪些措施，可以不是提一种设想，而是提两种以至多种设想，留待在实践中检验。

明年是“六五”的第一年。要着重搞好五年计划。对五年计划的要求，要详细一些，准确一些。过去搞过五次五年计划。“一五”比较好，顺利地完成了。“二五”以后的历次五年计划，都没有真正起作用，往往是越搞距离越大，最后只好撇在一边。这样，实际上等于只有年度计划，而没有中期计划，使年度计划失去指导。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建议，今后采取五年滚动计划。例如，明年搞八一年到八五年的计划；到后年，去掉一年，加上一年，顺延为八二年到八六年的计划。这样，可以根据上一年的实绩和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既利于落实当年的计划，也利于始终保持一定的预见。这样，也可以在实践中提高我们计划工作的水平。

上述这个想法，我已在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各部长均参加）提出，征求大家的意见。

这一设想，是否可行，请批示。

赵紫阳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日

处理好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省长、直辖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分析经济形势，研究经济工作应当采取的方针和重大措施。国务院起草了《关于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切实抓好调整、保证经济稳定的几项重要措施》，是一个讨论稿，经过这次会议讨论修改，然后报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审批。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国务院进一步讨论明年计划，感到经济工作上有些重大问题需要提出来研究，有必要请各省、市、自治区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来共同商议。这次会议和计划会议衔接起来开。先讨论国务院的这个文件，最后也要拿一段时间把明年计划议一下；至于具体问题，由下一段的计划会议去讨论。国务院文件写了十二条，我不一一讲了，只就我认为需要统一思想的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讲一些意见。现在讲以下六个问题：

一、在大好的形势下必须看到潜在的危险

当前的整个形势，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形势是大好的，但是有着潜在的危险。搞得好，大好形势就可以发展下去；搞不好，就要出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形势大好这一点，姚依林同志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已经讲了，这是事实，有很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首先农业的情况是好的。三中全会决定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以及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下去后，可以说是非常灵。今年虽然粮食减产三百亿斤左右，但农村基本是稳定的，直到现在粮价还是比较平稳。前不久，我到河北受灾的易县，那里自由市场的苞谷一角五分一斤。至于安新，就是白洋淀那个地方，粮食没有减产，苞谷一角四分一斤。由于我们的政策放活了，有相当一些地方，粮食虽然受灾减产，但多种经营收入不减，或者减得少。今年这么严重的天灾，农村的形势还是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提出，要把农民这头稳住。现在看，农村基本上稳定下来了，这是一件大事。工厂工人也是高兴的。大多数职工的工资、奖金等收入有了增加，生活也有了改善。最近三年合计，社会购买力增加了七百七十亿元（过去二十年来，平均每年只增

加五十亿元）。除去物价上涨的因素，大多数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还是增加不少的，生活都有相当的改善。现在购买手表、电视机等高档商品、中档商品的人多起来了。工业生产这两年是继续增长的，去年增长8.5%，今年预计增长8%左右。这些都是在能源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取得的。城乡市场比较活跃，社会商品零售额今年头十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5.8%。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今年头十个月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34.4%。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势头是好的。

但是，从整体看，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我们经济工作的被动局面并没有扭转过来，而且还潜伏着一种危险。危险在什么地方呢？从局部看，从眼前看，不太明显。但从整体来看，加以分析，就比较容易看得清楚。所谓危险，所谓被动局面并未扭转过来，反映在很多方面，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在分配上，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就财政来说，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各种消费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于是财政就发生赤字，货币投放量增加，如果不采取坚决的措施，看来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去年财政赤字是170亿元，今年财政赤字实际上可能还是在170亿元左右（财政上算是110亿元，另有60亿元由银行负担）。明年财政赤字原来测算为50亿元，现在看来要是没有有力措施，还可能同今年的数字差不多，而且后年还会有赤字。如果连续几年有这么多的赤字，我国的经济就可能出大问题。去年银行增发了56亿元票子，今年又要发70亿元票子，明年如果不采取措施，还可能发90亿元票子，这样三年累计就要多发票子200多亿元，相当于一九七八年以前的全部货币发行量。而且，外汇也出现了不小的逆差。这样下去，通货膨胀，物价就会大幅度上涨，经济就会出现恶性循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民由于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所增加的收入，工人由于提级和发奖金所增加的收入，都可能重新失掉。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等由于没有奖金，实际生活水平更将严重下降。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不仅是经济问题，政治局势也就不能稳定。东欧有的国家，就是因为基本建设摊子大，积累率高，消费也高，维持不了，就靠多发票子，多借外债，最后导致群众起来闹事，出大乱子。

第二，基本建设规模大大超出了我们国力的可能。这几年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压缩下来，而且越来越大，有控制不住之势。同时，基本建设内部也存在着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长线产品的项目多，短线产品的项目少；加工工业项目很多，能源、交通很薄弱。我们国家经济的根本情况是，能源和交通满足不了工业和其他各项事业的要求，卡脖子就卡在这里。现在的工业生产能力，由于能源和原材料不足，有相当一部分是闲置的。因此，从当前看，工业主要不是加工能力不足的问题，而是能源、交通严重不相适应的问题。但现在基本建设中这些项目上不去，而加工工业项目、消耗能源多的项目还在大量增加，这里搞起来挤那里，那里搞起来挤这里，新厂挤老厂，小的挤大的。这种情况如不加以改变，就会长期打消耗战，甚至使整个经济长期徘徊不前，谈不上有什么速度。

以上这些问题，不是一时造成的，是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造成的恶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全局不稳，改善人民

生活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当下决心抓好调整，退够，并且尽量退得好一些。

当前很需要把经济形势好好地分析一下，弄清在大好形势下还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各地和各部门的同志由于所处的地位，对全局性的问题不大容易看清楚。我们前一个时期也不是现在这样看的。促使我们认识这一点，倒是最近三件事起了作用：一是农业受灾，粮食减产三百亿斤左右；二是石油明年预计要下降五百万吨；三是今年财政赤字比原来的预计增加了几十亿元。在讨论明年计划时碰到这三个情况，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重新研究，一研究就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今年没有这三条，可能一年以后，至少是几个月以后，才能看到这个问题。我们整个经济潜藏着的危机，不仅仅是明年原油下降五百万吨，今年粮食减产三百亿斤和财政多了几十亿元赤字，问题比这还要深刻得多，复杂得多。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同志们不加掩饰地、实事求是地把问题摆出来，共同研究，以便求得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各省市、各部门的同志对形势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很有必要，这是我们统一步调，战胜困难，发展大好形势的前提。

二、我们的方针是狠抓调整，稳定经济

在经济工作上，总的讲是要继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从当前经济情况的实际出发，明年要突出地抓调整，抓经济的稳定。我们要扭转经济工作的被动局面，避免前面所讲的可能出现的危险，关键在于搞好调整。这是因为：

第一，只有抓好调整，才能根本扭转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为今后发展打下基础。最近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现在退得不够，要退够。看来这两年吃亏就吃在这里。这两年由于没有像一九六一、六二年那样退够，调整的决心不大，局面没有改变过来。一九六二年那时退够了，工人回乡两千万，停了很多小高炉，等等，虽然当时损失很大，但国民经济很快就恢复过来了。从当前经济情况看，只有搞好调整，坚决退够，才能很快见效，取得主动。

第二，只有抓好调整，才能为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创造必要的条件。总的讲，调整和改革要结合进行，不能等完全把调整搞好了再改革，但改革要有利于当前的调整。现在如果不狠抓调整，不用很大力量解决经济失调的问题，只是把企业搞活，那也不巩固。只有国家在宏观经济上抓调整，同时又在微观经济上尽量搞活一些，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第三，只有抓好调整，才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搞好调整，稳定经济，是使经济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也是保证政治局势稳定的一个关键。

前一段我们对调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该退的没有退够，还有些该退的没有退。现在看来，该退的不但必须退，而且必须退够。明年整个经济工作

要以调整为中心来进行安排，再不允许对调整采取抵制的态度，采取阳奉阴违、敷衍应付的态度。考虑地方、部门的利益，一定要把位置摆恰当，要从国家的全局出发，从整体利益出发。如果国民经济这个整体搞不好，全局出了问题，覆巢之下无完卵，哪个部门、哪个地方也好不了。只有在全局稳定的情况下，才能有部门和地方的利益。

总之，为了扭转全局的被动，防止整个经济出现大的问题，就需要坚决地、认真地抓调整，抓稳定。稳定经济，对明年提出两条要求：一是财政赤字无论如何要控制在五十亿元以内。二是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明年发票子一定要控制在三十亿元以内，一定不能多发。这样，人民生活才能基本稳定。当然，做到这一步，还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如果赤字还有五十亿元，总是不稳定的因素。因此要多想一点办法，各方面的开支都要紧缩。

抓好调整，稳定经济，还必须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即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上加强计划调节。要把国家在宏观经济上的计划调节，同充分调动基层生产经营单位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计划调节和国家干预，应当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这是很重要的。只是这样还不行，必要时还应采取一些行政的办法，指令的办法，规定哪些准许搞，哪些不准搞。当前我们讲在宏观经济上国家干预，就是要解决文件上说的四条：一是切不可在改革中使基本建设规模失去控制；二是切不可使加工工业的发展失去控制；三是切不可使工资福利的增长失去控制；四是切不可使物价的变动和外汇的收支失去控制。加强计划调节和实行必要的行政干预，首先要解决这四个控制。

我们今后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在处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上，我看就是“牵牛鼻”和“放牛腿”的关系。不是用很多绳子把牛腿捆住，而是要把牛放开走，同时又必须牵住牛鼻子加以引导，让它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在宏观经济方面，国家的计划调节和干预，包括运用经济杠杆、行政手段、组织协调等方面。目前讲宏观经济的控制，是不是同改革有矛盾，或者说改革就不搞了？不是。恰恰相反，在经济工作上，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计划调节和国家干预，和在微观经济上把它搞活，使二者结合起来，这正是我们改革的方向。当前经济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要研究如何在宏观经济方面发挥计划的调节作用，而在微观经济方面调动各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同于苏联的模式，也不同于南斯拉夫，更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要把调整和改革，把宏观经济的协调和微观经济的放活结合起来，使改革有利于调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

三、突出地抓压缩基本建设和搞好关停并转

解决积累和消费超过国民收入的途径，除了要增加国民收入以外，主要有两条：一是压积累，基建投资占了积累的相当一部分，因此压积累首先要压基建。二是适当控制消费。过去两年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工资，在改善人民生

活方面应当说尽了很大的努力。这对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是很必要的，不如此就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形势。但这是属于偿还多年欠账的性质。在调整的这几年内，不可能继续再迈这样大的步子了。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解决。人民生活的提高，归根结底，只能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增长。建设要量力而行，消费也要量力而行，不能开大口子，不能乱许愿。在当前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能做到的应当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尽量去做，但二十多年的欠账，都想在几年还清，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喊叫也解决不了。我们切忌把群众的思想引导到这方面来。

这次调整最重要、也很难做的，第一是压缩基本建设；第二是关停并转，就是下马。当然，不是统统下马，有的下，有的还要保。没有这两条，被动局面就扭转不过来。这是一九六一、六二年行之有效的经验。这次会议可不是大上的会议，而是一个停缓的会议，关停并转的会议。抓好这两条，我们的经济才能稳定，才有希望。

当前调整的关键是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明年基本建设的总规模要大大压缩，同时该上的如能源、交通等还要有计划地上一些。钱就这么多，所以要下很大决心，多停建、缓建一批项目，以便能够上一些急需的项目。这么办虽然要受一些损失，但这个损失比长期打消耗战要小得多。要把那些效果差、耗能多的项目，特别是那些生产能力有余的“长线”，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停下来。文件中说，要打破部门、地区界限，大中型项目由综合部门直接安排，不再采取这个部门给两个亿，那个部门给一个亿的办法。基建投资的分配，不受原来行业之间投资比例的限制。中央的基建投资不再分下去，要高度集中，真正合理使用，按项目直接安排。

压基本建设不光是压小的，压地方的。这次国务院对22个引进项目动了手术，大力压缩。许多项目停建后，引进的设备要封存。这些封存的设备要尽量检验好、保管好，当然也难免有损坏，但权衡利害得失，总比长期背包袱，把整个国民经济拖垮要好得多。中央的项目，该下马的，中央下决心。地方的项目，该下马的，地方也必须下决心。为了稳定全局，必须坚决动“手术”，把包袱甩掉。当然要尽一切努力，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调整的另一个关键，就是要切实搞好关停并转。当前能源不够，原料不够，不能供应大大小小那么多工厂。在生产上，必须关停并转一些工厂。现在各地盲目生产、重复生产的问题很大，办起的工厂许多是无米之炊。例如，全国已拥有棉纺1660万锭，本来就吃不饱，全部开动尚缺棉花二千万担。但近两年来在产棉区又新建了不少棉纺厂，在建规模达300万个锭子。全国县以上酒厂原来有1500多个，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据17个省市的统计，就办起小酒厂12000个。全国计划内的卷烟厂83个，年产能力1500万箱，完全可以吃掉全国的烟叶。去年以来各地又办起小烟厂100多个，形成了小挤大，落后挤先进，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这些做法，只能加重我们的困难。所以要下决心，把那些没有原料、没有能源、消耗大、产品质量差，严重亏损的企业关掉。关掉以后，工人养起来，搞培

训。这个问题，要相应采取一些经济政策。小厂原料消耗高、亏损大，大厂没原料开工，干脆把小厂关了，把原料拨给大厂，由大厂给他分一点产品，或给一些补偿，这样对全局有利。比如四川、贵州，还有云南，天然气很紧张，大的化肥厂吃不饱，小化肥厂还在大量消耗，干脆停一些小厂，把天然气调出来给大厂，原来生产碳氨的调给他一些尿素，在经济利益上进行一些调剂。我看很多厂都可以采用这个方法，涉及中央各部和地方的关系的，由国家计委加以调整；涉及省和县的关系，由各省加以解决。关停并转工作，要同工业的改组、搞专业化协作，同发展经济联合结合起来。对关停并转的企业，要注意善后工作，处理好遗留问题，避免发生混乱。

以上两条，可以说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下决心做好了，就能取得主动。全局主动了，各地也才会真正掌握主动。

四、把分散的资金和现有的原料使用好

在调整中，我们有个很大的困难是资金不足，尤其是中央财政每年增加有限，用于支付每年必要增加的消费基金就所剩无几了。重要的是要把国内分散的资金使用好，发挥它的效益。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分灶吃饭以后，地方和企业的资金逐渐多起来了。这点和以前不同。地方有了一点钱，企业手里也有了一点钱，这是好事。但如果用得不当，也可能出问题，甚至出相当严重的问题。当前突出的问题是资金渠道多，很分散，使用很不合理。前面已经讲了，各地资金用于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铺摊子的现象很严重，盲目性很大。因此，文件中讲了今后中央和地方的投资要有个适当分工。现在中央财政有赤字，从地方看，多数省区有结余，少数省区也有赤字。算总账地方结余大约二十五到三十亿元。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地方总想搞些有收益的工业。明年中央财政中的基建投资不多，主要搞些能源，搞些交通，还有一些在建项目要续建，没有力量搞别的东西。如果地方的钱不去搞短线，而是搞长线，问题就大了。因为既没有原料，也没有动力，即使把工厂盖起来，将来也开不了工，要开工就得把给别人的原料、动力挤掉，这个地方挤那个地方，新的企业挤老的企业，后进企业挤先进企业，小企业挤大企业，这样弄得缺口很大，大家吃不饱，无论对全局、对长远都很不利。尤其在调整期间，更不能这样干。现在不管谁的钱，都要用在有利于调整的方面，用在搞短线，解决生活的欠账、能源和交通的欠账，用在教育、卫生等这些方面来。

应当认识，从总体上讲，当前工业不是规模小了，而是规模大了，生产能力多了，各方面不能适应。在这种状况下再去新建工厂，就没有效益，就造成浪费。如果地方的钱都用去扩大工业生产能力，不搞短线，不还欠账，就会加重我们的困难，扩大比例失调。所以国务院讨论认为，在这几年之内，地方的钱一般不搞工业。当然能源非搞不可。除此以外，有些小的项目，你那个地方确实很需要，又有能源，也不争原料，而且技术也先进，也可以搞一点。但从总的投资使

用方向上说，不要再去多搞工业。这样我们就能够上上下下同心协力解决比例失调的问题。

把地方的钱用来盖点房子，搞点能源，搞点交通，搞点城市建设、教育卫生，这是不是同搞工业有矛盾？没有矛盾。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下一步更好地去发展工业。我们的工业建设，一条要量力而行，还有一条叫做循序而进。回顾二十多年来我们搞工业，由于要求过急，不讲循序而进，光是孤立搞工厂。工厂不是个孤立的东西，它需要很多东西配合，需要“基础结构”，包括各种服务行业。我们许多基本建设项目往往不充分做好前期工作，就急急忙忙地去搞，后来又发展成简易投产，发展成“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许多项目，不考虑各种条件的配合，不考虑能源、交通，也不考虑城市公用设施和生活服务等，总是孤立地去建设。这种作法，是违背建设规律的，结果必然出问题，往往搞起来也不能发挥作用，或者遗留一大堆问题。实践证明是不行的。现在还是搞一些基础结构，搞一些宿舍，搞一些城市建设，以及教育、科学设施等等，为以后的发展作好准备。文件中对地方、企业的钱用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原则规定。将来还要具体化，详细规定哪些东西在一定时期内就是不能搞。全国明明是长线的，尽管在某个地方、某个部门是短线，也不能搞。

除了上面讲的各地的资金要用之于调整的需要以外，国家还准备想办法集中一批分散的资金用于关键的项目上。地方、企业的资金，是谁的还是归谁所有，这条政策不变。不能又把地方、企业挤得干干的，统统拿到中央来，走回头路。但是现在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如何正确地、适当地集中使用好多种渠道的资金。国家明年准备发行国库券五十亿元，专门征集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的资金，采取认购，也就是分摊的办法，给一定的利息，连续搞几年到十年，主要用于能源建设。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用这个办法，南斯拉夫也是如此。我们也要采用这个办法，就是说钱是你的，但是你得买一些国库券。我们承认各地方各企业的合法利益，让大家发挥积极性，多增加收入，同时要求大家买一些国库券，使国家能够把资金适当集中一些。除此之外，还要搞计划协调，将来有些项目，虽然是用你的钱，但政府可以组织地方和企业在一起讨论，搞什么，不搞什么，进行协调，也可以组织经济联合，再加上前面讲的用行政命令的办法，通过这几条，把分散的资金使用得合理一些。

原料问题。当前我们原料的增长不能满足工业的需要，为了把现有的原料使用好，真正提高经济效果，国务院讨论时提出要保上海、保天津，要保其他历来的轻工业基地。各个省各个地区也有自己的轻工业基地，也必须保。各个原料产区必须按计划完成调拨任务，这要立法，要正式发布命令。只有保证完成计划调拨任务以后，其余的部分，才能到条件好的地方去搞来料加工或搞合营，可以分产品，也可以分利润，但不能另起炉灶建新厂。当然，将来农业发展了，原料多了，加工能力不够时，可以逐步搞些农工商联合企业，搞些地方工业。

现在，各地都在讲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个方针是正确的。至于在当前条件下如何实施这个方针，那就不能离开我们国家经济结构的现状，不能离开全

局。地方发挥优势，也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改变经济结构不是在一个早上就能实现的，否则就会带来混乱。我在四川讲过，四川就是“第三世界”，你不可能一下改变过来，就要承认上海是“第一世界”，同它搞协作，搞互利。“第三世界”要采取和“第一世界”合作的方法，或者和“第二世界”合作的方法。一下子把自己变成“第一世界”，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个逐步变化的过程。全国原来形成的这种经济结构，只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逐步改善。比如说，今后哪一类厂子不要在上海搞了，作些这样的规定是对的。今后有多余的电力、原料，应当由原料产区去搞。但不能说现在就要把上海的厂子关起来，由你去搞。上海的技术比较好一些，生产效率比较高一些，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一些，在你这里搞又多花了一套设备的投资，经济效果也不好，这种重复建设是极大的浪费。轻纺工业要发展，主要也不是要扩大生产能力，而是要提高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把低级产品变为高级产品，消耗大的变为消耗少的，价廉物美，适销对路。这才是发展轻工的正确办法。轻工贷款今年二十亿元，有相当部分是盲目扩大生产能力的，这种作法要改进。加强轻工也有一个如何做的问题。总之，今后各部门、各地方都一定不要再去扩大比例失调。

顺便讲一下发展社队企业、农工商企业的问题。这个方向是对的，但也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去搞。一哄而起，遍地开花，也会带来很大困难。搞不好，就把很多原料消耗掉了。本来这些原料可以制成较好的产品，但结果制成比较差的产品，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社队要富起来，就要真正增加社会财富，而不应着眼于社会财富的转移。财富不增加，只转移，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富起来，因为这是个分配的问题。社队企业和农工商联合企业，都要注意克服盲目性。社队企业在能源、材料、产、供、销等方面都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社队企业占用土地也很随便，这也是个大问题。现在城市郊区菜地被占用很多，最近不少城市蔬菜供应紧张，除了气候、政策方面的问题外，还与近几年郊区盲目搞加工、搞产品扩散有很大关系，有些社队不愿种菜，把许多劳动力调去搞机械加工。大中城市都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郊区历来种菜的社队，应当主要种菜，保证城市供应，而不要盲目安排搞加工工业。社队企业、农工商联合企业都要注意整顿提高，把基础打好，稳步前进。

五、关于明年的计划和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

完成一九八一年的计划很艰巨。明年要压基建，原油又要减少，国民经济还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主要抓几条：一是力争明年农业丰收，这在文件上已经有了。夺取农业丰收，看来主要还是靠政策，特别是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是会发挥很大作用的。二是采取切实措施发展轻纺工业，增加消费品生产。这是在能源困难的情况下要保持一定速度的一个主要措施，因为轻纺工业消耗能源少一些。同时，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也是明年活跃市场、回笼货币、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的措施。各级政府对轻纺工业要

当成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来抓。要把一部分进口各种设备的外汇，转为进口原料和某些零部件，生产一些市场急需的高档消费品。明年重工业的比重要减少一些，钢铁要比今年指标每年增长4%—5%就不得了。而我们每年增长7%—8%，人民生活却不能改善。这说明，尽管我生产增长的速度不算低，但经济效果不好，突出地表现在一是生产上消耗大，效益差，真正创造的社会财富少；二是基本建设上投资效果差，浪费大，形成的生产能力小。国民经济说起来增长了多少多少，但不少是虚假的，有些产品有“产值”而没有使用价值，没有成为有用的、社会所需要的财富，没有成为真正可分配的国民收入。这种状况暴露了整个经济建设的效益很差，人民付出了代价，但得不到应有的好处。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走另外一条路，就是速度不那么高，但是国民收入、社会财富的情况比较好，经济效益比较高。我们应当研究今后走这条路子。我看这是可能的。

第一，靠挖潜。今后除了能源、交通和特别重要的项目外，主要依靠原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搞好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而不再去多铺新摊子。

第二，靠提高质量。今后各种产品要提高质量，而消耗并不增加。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出路。同样一个产品，消耗的能源、材料差不多，但由于低档变中档，中档变高档，净产值就会增多。这样，虽然本身消耗并不那么多，但是速度出来了。这样的国民收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虚假的，是真正可分配的收入。

第三，靠讲求效益。要加强经营管理，减少浪费，使整个经济建设的经济效益提高，用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好的效果。工业上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科学技术水平的问题。我们不能光靠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来解决工业发展速度问题，而必须靠科学技术，发挥科学作为生产力的作用。首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考虑科学技术工作的方针、任务和部署问题。这样，我们将来的速度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高，但经济效益却比较好。

以上几条抓好了，不一定要搞大量的基本建设，不一定要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国民经济也会有一定速度的，而且效益会更好些。我认为，我们应当走这条路，有可能走这条路。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开创一条路子。

六、关于经济宣传问题

这个问题在文件上写了一段。前一段经济宣传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当前经济宣传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批判“左”的路线、“左”的思想、“左”的政策，消除其影响。在批判“左”的错误中，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第一，对中国的三十年究竟怎么看？讲错误多得很，讲失误多得很，作为批判“左”的错误，可以揭发很多严重问题。如果没有这些错误，我国的情况会好得多。就是有这么多问题，我们三十年是不是漆黑一团？不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很

值得注意。不能简单地拿欧洲、美国、日本同我国类比，他们的情况跟我们根本不同。他们在什么基础上，搞了多少年？最近接待了一些外国总统、总理，他们对我们都有个好的看法。他们到中国来，看到中国确实很穷，但又都说，看起来从农村到城市，中国人还是满健康的。最近世界银行有些人到陕西，这是我国比较穷的地方，他们参观后认为，第一确实你们很穷，第二比印度还好得多。虽然我们国民收入平均很少，但是我们的国民收入在分配上的差别不是太大。有一些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国民收入跟我们差不多，平均每人250美元左右，甚至比我们高，每人平均400、500美元，他们的社会问题就严重得多。我到过一个亚洲国家的大城市，你一进这个城市，大概像我们解放前的上海那样，一边是高楼大厦，花天酒地；一边是大面积的贫民窟，那个贫民窟很难设想是个什么样子。在沙滩上面用一些塑料纸盖起来，下边就是一片席子，又热又臭。繁华的大街上，只要红灯一出现，车子一停，就有很多小孩子冲过来，给你擦车，向你要钱。我们中国的情况比这好多了。外国对我们也有一种说法，你们三十年尽管有很多教训，但还是有成绩的。十亿人口的国家，你们的成绩很大。不要小看这十亿人口，十亿人口就是不好办。十亿人口的国家世界上就这么一个，五亿人口以上国家，全世界只有两个，印度并不比我们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们肯定建设得比印度好得多。所以现在要来总结经验教训，作为我们今后的借鉴。我们确实犯过很多错误，受过很多折腾，造成很大损失，但是总的要看到，三十年来中国并不是搞得一塌糊涂，还是有很大成绩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还讲什么要有信心，就是一句空话。

第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两年人民生活有了提高，不能闭着眼睛看不到这个事实。当然有一些人没有提高，有些人还降低了，但大多数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确实还有很多问题，物价啦，房子啦，等等。这几年国家是尽了很大的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三年，全国四分之三左右的职工升级。许多企业实行了奖励制度，加上岗位津贴，再加上有两千万人就业，大多数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收入增加了。国家统计局用抽样的办法，对八万六千户职工家属生活费用作了调查。平均每个被调查的职工的收入，包括经常性收入和一次性收入在内，每月为六十三元。平均每一就业者赡养1.8人（包括职工本人在内）。就这些职工家庭的全部成员来说，平均每人每月收入达到三十五元八角。当然并不平衡，有差距。每人每月生活费达到五十元以上的户占9.3%，这是高水平的。收入在15元以下的户占2.1%，他们的生活确实非常困难。现在，一般说，党政机关、科技、文教、卫生等部门的职工困难比较多一些。真正直接在工厂的工人，这两年收入有增加。农村也是一样，农民收入也增加了。所以，我们不要光讲欠账，还要讲这两年花了很大力量还老账。从国家的财力来看，做到这一步是尽了很大力量，再过多要求是不可能的。

第三，揭露矛盾，讲存在什么问题，一定要考虑我们现在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如果当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天天去讲，要求解决，那等于开空头支票。比如城市污染的确很严重，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有些是能够解决的，有些由于经济

条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一时是解决不了的。对于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天天宣传，讲了后，又怎么办？人民有困难，国家也有困难，许多困难是多年积累下来的，要通过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解决。我们应当关心群众生活，但要扎扎实实做工作，而不能空口许愿。

经济宣传，我今天就讲这么三条。在批判“左”的错误中，同时要注意三点。第一，三十年不是一塌糊涂。第二，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数人收入还是增加的，人民生活已经有了改善，这是事实。当然也有一些人没有改善，物价也有提高。第三，不要宣传一些近期不能解决的矛盾。这就是说在经济宣传上必须围绕着调整和稳定经济来宣传，不能离开调整和稳定来讲这些问题。调整时期要多宣传同心同德，克服困难。要实事求是地讲问题产生的原因，如何解决，以及正在采取的措施。如果不全面讲，就会造成问题很容易解决的错觉，结果你又不能解决，致使群众失去信心。

刹住乱涨价滥发奖金的歪风*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一次研究北京市物价问题座谈会上的谈话。姚依林、刘卓甫、王磊、薛暮桥、林乎加和北京市财办、物价局的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今天找北京市的同志来谈谈物价问题。物价上涨，北京的反映比较突出。群众议论的问题，一个是特殊化，一个是物价，更集中的是物价。现在是管不住，管不好，我担心明年春节，可能大幅度上涨，很可能出问题。北京市委、市政府应用主要力量抓物价，把涨价风刹住。刹涨价风，北京要带头。要有加强管理的办法，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国务院要直接抓一下北京。

物价很可能牵动奖金，真正是超额劳动的奖金，要保护，要保护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但不能为了得奖转嫁负担。奖金要控制，超额劳动可以发奖，现在有的不是，而是转嫁负担。这样发奖金，人家不满意。奖金要整顿。不搞运动，但要雷厉风行。我主张市委、市政府要拿出很大力量来抓。典型的要处理一些人，当然要保护工人的积极性。奖金必须整顿，要是只对超额劳动发奖金，就没有危险。但是，很多不是超额劳动的也发奖金。结果奖金发得多了，很多群众不满意。正当的，不超过两个半月的奖金，还要发。滥发奖金，就会转嫁负担。很多好东西，一开始就把路子走歪了。我们不搞运动，要组织力量检查整顿，不准走邪路。

物价问题，奖金问题，你们研究一下，我们也要研究。

关于议价问题，或是恢复派购，或者严格管理。过去想恢复派购，但管死了也不行。议价价格上涨，主要是各地国营商业、供销社和集体企业到主产区抬价抢购造成的，只要加强管理，是可以管住的。可以把产地价格涨一点，直接运到销地，减少中间环节，销地的价格可以不涨或少涨。对于长途贩运，得有个说法。现在农民出去经商的很多，农民反映很大。滥涨价，变相涨价的问题，能不能管住？对集市贸易、农贸市场，要加强管理。

当前物价只准降不准涨。议价不准超过现在水平，可以规定最高限价。

经济工作要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

一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刚才依林同志讲了国务院提出的初步盘子，并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因为还要开第一书记会议，我们这个会议可以结束了。昨天上午国务院开了常务会议，提出在会议结束时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要打个招呼。

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要退够。国务院提出的初步盘子还很粗，仅仅是看水平够不够，基建投资三百二十亿元，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发生什么情况，请常委考虑这样行不行。现在常委不是认为退多了，而是怕退得不扎实。三百二十亿元可能还要往下退，大体上只会下不会上，只会少不会多。同志们可以把这个精神带回去。

我们原来考虑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无论如何不能爆发危机，再是这次调整总要考虑以后的速度，特别是能源、交通。现在看来，这种两全其美的想法不好，容易影响克服面临危机的决心，不能考虑那么多，退三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要解决经济工作中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彻底地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做不到的事不要勉强去做。要按照常委的指示精神，坚决退够，做到平衡，不爆发危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解放思想。首先要考虑退够，把盘子定下来，放在退够的基础上，然后再考虑怎样退得好一些。

我们的认识，可能还没有完全反映真实情况，还要仔细研究。我们只会认识得不够。现在不是把问题讲严重了，过头了，还是我们认识够不够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二十多年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带来的严重问题认识不够。我们现在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在经济工作方面，计划工作方面，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

二、调整要强调集中统一。根据过去的经验，克服困难，必须讲集中统一。当然，不是什么都由中央统得死死的，主要是指关系全局的大的方面，即在调整方面扭转经济工作被动情况的重大措施必须高度集中统一。至于生产上、流通上必须搞活的还要搞活。一方面要承认企业、经济单位和地方的权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一方面要在大的调整措施上保证中央和主管部门能够指挥得动。现在想来有这么几个方面需要集中统一：一是重大方针政策和带全国性的措施；二是基

本建设总规模，哪些可以搞，哪些不可以搞；三是重要物资，包括主要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只有完成国家调拨计划之后，各地才能自己处理；四是财政税收，财政纪律要集中；五是对外贸必须坚持统一对外。现在讲集中统一，不赞成笼笼统统回到过去那样搞死。集中统一是有利于在一些扭转国民经济被动局面的重大的调整措施上能够有很高的效率。

三、关于调整和改革问题。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但仅仅是开始。我们经济工作的弊病集中表现在经济效果差，根本的问题是要进行改革。改革要坚定不移。当前的问题，一是我们目前正处在大调整时期，调整是关键，是中心，是决定全局的，因此改革只能在调整中进行，步子不能迈得太大。有一些可能影响调整的改革要往后放，如价格体系的改革，就要往后放。当然不是一点不改。再是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总之，改革要采取一系列过渡的措施办法，而不是一下全改。

扩大企业自主权、市场调节，也是在困难情况下把企业搞活、提高效益的重大措施，也是有利于调整的。这次调整不同于一九六二年的是，在调整中要把经济搞活，把企业搞活，增加商品。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原来设想明年全面铺开。现在可以有三种方案：一是全面铺开；二是继续搞好六千个试点企业，不全面铺开；三是在继续搞好六千个试点企业的基础上，对面上的其他企业实行财务包干。哪个方案好，请大家研究。

发挥优势的方针是对的。讲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是为了避免搞大而全、小而全。现在看，各地方发挥优势，一是不能离开全国的全局，二是只能逐步进行。因为涉及经济结构改组的问题，不能变动得太大太快。发挥优势要按这个来搞。

奖金问题，总的讲，这两年企业搞奖金，对调动职工积极性、改善职工生活起了好的作用，大部分是发得合理的，但确有一部分不合理或很不合理。今后奖金制度要继续实行，超额劳动必须给予奖励，而滥发奖金则必须制止。明年要搞个文件。

四、几件紧急的事情请各地抓一下：

1．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

2．紧缩基本建设支出。

3．制止对森林乱砍滥伐。

关于制止破坏山林的紧急通知稿，大家提的意见比较多。有两个办法，一是将来修改森林法；一是现在先发个紧急通知，规定几条，先把乱砍滥伐制止住。第一，所有采伐都要纳入计划，凡是超过国家计划的一律停止采伐。第二，议价要改，要规定个比例，比如木材议价不得超过生产计划的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议价价格的幅度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第三，木材不能开放自由市场，非林区群众自有的木材进入市场要经过一定机关的批准。第四，机关、团体、部队不得到林区和市场采购木材。其他问题将来修改森林法再解决。

制止破坏山林不能再拖了，不要等国务院通知，各地能采取什么措施就采取

什么措施。

五、增产节约。解决当前困难，一是要退，一是要增产节约。首先要把轻纺工业搞上去，供应市场，回笼货币。一九六二年时靠高价商品，现在要靠生产大批适销对路的商品，包括高档商品。除此以外，要清仓。外贸、物资、商业都要清仓。基本建设下马后多出来的建筑材料要多供应农村。

明年工业生产要与调整和改革相结合，要狠抓企业整顿和改组，提高经济效果。要改善经营，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我们不仅要通过竞争来促进企业的联合，还要通过调整来促进企业的改组和联合。要节约能源。明年能源投资不可能增加，甚至要减少，今后几年也不可能多增加。因此节约能源更加重要，要想各种办法节约能源。

军工生产的产品，要进一步抓好，要纳入各级计划。军工搞民品，各级都要统一协调一下。

六、粮食问题，绝不能放松。我们一年进口一千多万吨粮食，把经济作物搞活，这个方针是对的。过去讲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半修正主义，是不对的。但我们国家要进口更多的粮食是不可能的。现在进口一点粮食，主要是为了把棉花和糖搞起来，减少进口。各地不能因为要致富、要增加收入、要发展多种经济作物，而要求减少粮食上调量或增加调人。各地调整作物布局，不能建立在减少粮田和要求国家增加供应的基础上。我们发展经济作物要靠开发荒山荒地，不能靠减少粮田。各地要控制减少粮田的趋势，想方设法增产粮食。

这次会后，从国务院开始到各省、市、自治区，都要组织大批于部下去，搞三件事：一是压缩清理基本建设，二是清仓压缩库存，三是检查物价。各级领导要带头下去抓调整，各级政府要组织力量，重点抓调整。

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陈云同志的讲话，分析了经济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经济工作的许多重大原则。他讲的十四条，都贯穿着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精神。照这些原则去办，对于我们渡过困难，使经济建设走上正确的轨道，具有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根据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十一月二十八日讨论明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时的讲话和陈云同志这次讲话精神，代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就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为什么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

在经过将近两年时间的调整工作之后，现在提出从明年起还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这是中央在对当前经济形势作了全面估量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

现在，全国的经济形势很好，但是有潜在的危险。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好形势，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对于经济中还有困难，大家也这是赵紫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对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强调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必要性、紧迫性，对调整的主要政策措施作了系统部署。他特别强调要加强领导，正确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对于当时全国各地统一认识和行动，全面贯彻落实调整方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普遍感到了。但对于困难的严重性，对于潜伏着一个很大的危险，搞得不好，可能爆发经济危机，有些同志还将信将疑。这次经济困难，同六十年代初有很大不同。那次最突出的表现是，农业和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们吃不饱饭，很多人得浮肿病，农村甚至饿死人，商品供应十分紧张，物价上涨很多，当时大家对经济困难都有切身的感受。这一次，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是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落实了农村经济政策，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民得到实惠，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广大农村是稳定的。工业生产在能源几乎没有什么增长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特别是轻工业生产的增长幅度较大，加

上农副产品供应增多，市场供应情况是比较好的。两年来解决了一千多万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城镇住宅建设的规模也是空前的。城乡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都有所改善。经济体制实行初步改革以后，企业和地方有了一些机动财力，增强了经济活力，景况比过去好多了。但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来看，应该说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性。去年财政赤字一百七十亿元，今年大约也是一百七十亿元，靠向银行借贷和透支过日子。这两年，银行增发了一百三十亿元的票子，可以说货币流通量已经接近了要引起经济危机的临界点。现在物价上涨，而且商品涨价的面相当大，人民议论纷纷。如果不对经济进行大的调整，明年财政仍然要出现庞大的赤字，银行还要增发大量的票子，其结果必然是物价暴涨，整个经济就可能发生危机。那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民和职工在经济上得到的好处就会失掉，就会引起很大的不满。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政治局势也难以稳定。对于经济中潜伏着的危险，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认识得很不够。随着问题的逐步暴露，经过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的讨论，进一步把矛盾摆开，问题的严重性和调整的必要性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造成当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问题的成因由来已久。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纠正。工业生产上追求高指标，基本建设摊子铺得很大，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比例关系出现了严重失调。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我们没有足够估量十年破坏所造成的后果，也没有清理经济指导工作上“左”的错误，还是急于求成，提出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把已经超过国力的基本建设规模又搞大了。我们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这个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进口成套设备的规模也搞大了，超过了实际的需要和可能。这种冒进的错误，加剧了比例关系的失调，更加重了财政经济的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本来应当成为经济建设工作的一个根本转折。但是，这一年多来，我们对问题的严重性还是认识不够，党内思想也不一致。在提高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以后，基本建设总规模没有退下来，二十二个大的引进项目该停的没有停，地方和企业又盲目地上了一批重复建设项目。国防战备费、行政管理费和各项事业费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又增加了。这样，在分配上，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各种消费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因此，虽然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中央决定对经济进行一次大的调整，是完全必要的。从当前来说，只有这样做，才能克服困难，消除潜在的危险，保证经济全局的稳定，逐步地使我们的经济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自觉地进行全面的经济调整，也是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摆脱“左”的思想和做法的束缚，真正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办各项事业都量力而行，循序前进，讲求实效，使经济的发展同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密切结合，从而避免今后再次出现经济比

例的严重失调。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比例的大失调，爆发了危机，不得不进行大调整，费了五年的时间。那时把困难渡过去了，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得到清理，经济情况一好转，老的一套“左”的方针政策又继续贯彻执行起来，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的前两年，以致又一次酿成了比例的严重失调，潜伏着新的经济危险。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端正过来，并且坚持下去。我国的民主革命所以获得胜利，就是因为我们党经过几次失败之后摸清了中国的国情，纠正了“左”的错误，找到了一条自己的革命道路。全国解放以后，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多次跌跤子，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我国基本的国情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了解要把我国这样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为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经过长期艰巨的努力。因此在指导方针上老是急于求成，老是犯“左”的错误。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把指导方针搞端正，我们就能够较好地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就能够使我国的经济协调地、健康地稳步发展，避免再发生大的折腾。

我想，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否可以作这样的判断：总的来说形势是很好的，但潜伏着大的危险，只要坚决采取调整措施，危险就可以消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好的形势就可以发展下去。

二、明年经济调整的要求和初步方案

根据中央常委的指示精神，为了稳定经济，明年的调整工作总的要求是三条：一是基本上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不出赤字，而且不给后年留下窟窿。二是基本实现信贷收支平衡，不再搞财政性的货币发行。三是把物价基本稳定下来，特别是把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价格稳住。

按照这些要求，我们对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期间酝酿的盘子又作了一些调整。当时的方案是，一九八一年的财政收入九百七十六亿元，比今年预计的财政支出少一百四十亿元，为了把收支打平，支出比今年净减九十亿元，另外发五十亿元国库券来弥补收支差额。经过这一段研究，感到这个方案还不踏实。明年发几十亿元国库券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全部要用于弥补今年的赤字，并且后年再要发这么大数量的国库券就困难了，如果发不了，财政又会出现窟窿。因此确定，一九八一年的各项支出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再减少五十亿元，同今年的预计支出相比，净减一百四十亿元，把收支打平。四十亿至五十亿元国库券照发，用于弥补今年财政赤字。发行国库券时，各地方、各部门应尽力多承担些，有条件的个人也可以自愿认购一点，注意不要把企业挤得太狠了。

怎么减？首先减基本建设投资。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由今年的二百四十一亿元减为一百七十亿元，减少七十一亿元。加上地方、部门和企业自筹、银行贷款、国外到货设备安装工作量以及其它建设，总规模由今年的五百亿元，减为三百亿元。

其次，压缩国防费，压缩行政管理费。国防费由今年的XXX亿元减为XXX亿

元，减少XX亿元。行政管理费由六十二亿元减为五十七亿元，减少五亿元。

其他各项支出，有增有减。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有所增加。增减相抵，净减三十七亿元。

这样减下来，当然许多方面困难很大。把许多事业费减下来，把国防战备费减下来，要做艰苦的工作。把基本建设投资压缩下来，大批工程要停建，大量设备要封存，要承担很大的损失。同时，能源、交通的薄弱状况得不到加强，对今后发展会有影响。这些都应当看到，并且向全党说清楚。但是，为了全局的稳定，现在只能也必须这样安排。而且在今后几年内，也不能希望基本建设投资有什么增加，国防战备费和行政费用还要继续执行精兵简政的原则，使支出的比例有所降低。

这里说一下明年中央要向地方借用一部分财政收入的问题。明年的财政收支，从全国来看是打平了，但分开中央、地方来看，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赤字，只好要求地方财政节约开支八十亿元左右，借给中央使用。这样做，当然给地方增加了不少困难，有些需要办的事情就不能办了。但是，如果不这样做，中央赤字那么大，日子过不去，又得向银行透支，增发票子，结果还是要转嫁到地方和老百姓身上，其后果更坏。希望地方支持中央渡过困难。

把财政收支搞平衡，银行就可以不再搞财政性发行，这对于稳定物价会起重大作用。但是，由于人民生活要保，对于没有奖金收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那一部分职工，明年还要适当加一点工资。城镇的待业人员明年还要继续安排一部分就业。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购买力还会继续提高。因此，明年社会购买力仍将有较大的增长，市场商品的供需矛盾仍然比较大。这同六十年代初的那次调整不同，那时精减了近两千万职工，财政开支和社会购买力同时大幅度降了下来。现在，要保证物价的稳定，在保证财政、信贷收支平衡的同时，必须下大力量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

明年在生产上，要突出抓农业，抓轻工业，抓节约能源。明年的农业投资要减少，发展农业主要还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看到中央关于农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巨大作用。在农业内部的结构上，除了以畜牧业、林业为主的县旗和主要经济作物基地以外，要把粮食生产放在第一位，粮食的播种面积不宜再减少。增加经济作物产量，主要靠实行责任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且要利用一些没有利用的土地，一般来说不能挤占粮田。在抓好农业的同时，要注意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的发展。明年轻工生产增长百分之八的速度，必须保证完成，并力争超过。所有轻工企业都要努力降低消耗，提高产品质量，扩大适销对路的中高档产品的比重。钢产量比今年减少四百万吨，腾出燃料动力和运输力保轻工。一切有条件的重工业企业，包括军工企业，都要了解市场的需要，有计划地积极地生产消费品。商业、外贸和物资部门要压缩库存，拿出一部分商品供应市场。各行各业都要继续抓紧节油、节电、节煤、节水的工作。

在计划方案确定之后，各地方、各部门都要下大力气抓生产。我们所说的退，主要是指基本建设投资要减少，各项开支要压缩，超过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可

能的加工工业要控制，过高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但是在生产上要采取积极态度，不能只看不利因素，而不看到和不利用有利因素。凡是客观条件允许、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生产任务，要坚决完成。把社会需要的、有条件搞上去的生产搞上去，这也是调整的要求。在生产上，要确定两条原则：一不搞高指示；二不允许对有条件实现的指标也不接受，不努力完成。没有完成国家规定指标的，不能享受超产待遇，不能提奖分成。调整要搞几年？把基本建设退够，消灭财政赤字，明年就要努力做到。但是要把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调整过来，需要更长的时间，整个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都要继续进行调整。我们要准备慢，争取快。只要把该退的退够，把脚跟站稳，将来可能前进得更好一些。

三、加强集中统一，正确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

为了搞好调整，克服当前的困难，避免在后退中发生混乱，必须加强集中统一。这次中央常委在讨论明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时，强调了要集中统一。邓小平同志说，历来解决困难，权是要集中的，不是分散的，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

现在强调集中统一，指的是在宏观经济方面，在扭转国民经济被动状况的重大调整措施上要高度集中统一，要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具体说，有下列几项：

（一）对于中央决定的调整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要集中统一，不能三心二意，不能阳奉阴违，不能顶着不办。

（二）各种渠道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管起来，综合平衡。各省、市、自治区的建设规模和投资方向，要经国家计委审查，由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各部委的基本建设，由国家计委统一安排，不受原来行业之间投资比例的限制。

（三）财政税收制度和重大财政措施要集中统一。任何地方、部门和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应该上交的税收和利润，不得超越国家规定的权限免税收。

（四）任何地方、部门和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守信贷管理制度和现金管理制度。非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不得在计划以外增加贷款。各级党政机关不得强令银行增加贷款。

（五）国家规定的重要物资的调拨计划，包括重要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必须坚决完成，不能打折扣。轻纺工业的原料，全国要首先保证上海、天津、北京的需要，各省、市、自治区要保所属轻纺工业集中城市的需要。凡是同大厂争原料、争燃料动力而生产技术落后的小厂，要关停并转。

（六）坚决执行国务院十二月七日发出的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任何地方、部门和企业都不得违反。

（七）统一规定发放奖金的条件，严格检查监督制度，坚决制止滥发奖金。

（八）加强外贸和外汇的管理。外贸体制改革以后，要加强内部协调，统一

对外，联合对外，防止互相拆台。对于地方、部门和企业以各种形式向外借款，要规定严格的审批办法和统一管理的制度。

以上八条，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必须坚决执行。违反者，要追究责任。

搞好调整，稳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这是大局，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对地方的利益、部门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应当兼顾，不能忽视，但必须服从整体的利益，服从大局。如果全国的经济不稳，通货恶性膨胀，不论哪个省、哪个单位都要波及，没有例外。我们应当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共同承担困难，战胜困难。这是我们多年来克服困难的有效的经验。上面讲的一些措施，有些是从调整时期的具体情况出发而采取的，有些也是我们进行体制改革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和行政干预，是保证整个经济协调发展所必需的。

现在强调集中统一，并不是什么都要集中，把什么都搞得死死的，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这次调整，要汲取六十年代初期调整的成功经验，同时要有新的特点。这就是在加强宏观经济计划指导和行政干预的同时，继续发挥企业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主动性，把该搞活的事情搞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经济体制作了一些初步的改革。实践证明，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对搞活经济，提高经济效益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经济形势之所以这么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否则，就没有今天这个局面，困难还会更大。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同经济体制不合理密切联系的。过去体制的最大的弊病，一个是权力过于集中，一个是吃大锅饭，把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束缚住了，造成经济的僵化，使经济发展失去活力和弹性。这种体制如果不加以改革，我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经营管理的水平和经济活动的效果。因此，在改革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就企业来说，一方面要严格制止它盲目建设和滥发奖金，另一方面对企业应有的权益必须加以保护，不得乱加干预。在调整时期，前一段行之有效的一些改革要继续坚持，改革的成果要巩固和发展，少量新的改革试点也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具体说来是：

（一）已经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的六千多个企业，要继续把试点工作搞好，认真总结经验，使各项办法不断完善。试点范围不再扩大。

（二）面上没有进行试点的企业，继续实行企业基金制度，或者实行财务包干办法。亏损企业减亏增盈的，也应当给予奖励。

（三）少数企业和个别城市，已经进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试点的，要继续进行，取得经验，但试点的单位不要搞得太多。

（四）市场调节，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继续搞好。主管部门要加强市场预测和预报工作，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以减少盲目性。

（五）继续促进企业的改组和联合。要利用调整的有利时机，在对企业关停并转中，按照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改组工业，打破地区、部门所有

制，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形成新的生产力。在作法上，要把自下而上的联合同自上而下的规划和协调结合起来。

（六）企业内部领导体制的改革，要按照中央的规定，先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要搞好企业的民主管理，所有企业要认真发挥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的作用，发挥工会的作用。

（七）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这些改革搞好了，不仅不会妨碍调整，而且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调整的进行。当然，在调整时期，各项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些改革从长远来看是合理的，必须搞的，但同当前调整有矛盾的，就推迟进行，如整个价格体系的改革，近几年内不能搞了。把改革的步子放慢一点，稳一点，准一点，可以使各级领导集中精力抓好调整，也可以使改革本身健康地进行。调整搞好了，就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努力提高经济效果，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

把基本建设投资减下来，会不会出现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现在看，如果不坚决退下来，不退够，就要爆发危机，那就根本谈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甚至影响政局的稳定。当然，退下来以后，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经过几年的努力，把脚跟站稳了，可以更好地前进。一种是，工作做得不好，生产就有可能长期上不去，甚至出现萎缩的局面。我们要争取前一种可能，避免后一种可能。关键就在于，在搞好调整的同时，能不能使各方面的经济效果有一个大的提高。

长时期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的道路，热衷于大搞基本建设，集中大量的资金建设新厂子，特别是投资大、工期长的重工业厂子。许多基本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很差，各项建设之间又互不衔接，甚至搞了一大批不具备建设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工程，搞了一大批已经属于长线的加工工业。其结果占用的财力物力很多，建设周期拖得很长，不能形成生产能力，或者建成了也不能正常生产。而对于已经建设起来的老企业，则不用极大的精力把它们经营管理好，不注意它们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以致使它们长期陷于高消耗、低质量、产品性能多少年如一日的落后状态。同时，在生产上追求产值，不顾市场需要，产销脱节，造成大量积压。生产的这种落后的、盲目的不合理状态，又造成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紧张，促使再去扩大基本建设的规模，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规模。这几乎成了一种顽症，使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条路子，是靠紧缩人民消费、保持过高的积累率来维持的。表面上看，生产的增长速度并不算慢，但是真正创造的社会财富很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今后再也不能走这条老路了。我们应当寻找一条新的路子，不是靠多上基本建设，多铺新摊子，大量增加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而是主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进行合理的技术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扩大社会生产。这条路子，速

度可能不那么高，但是经济效益会好，社会财富会增加得多，人民得到的实惠也会多。只有走这条路子，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好发展生产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财政经济的困难，求得经济的稳定增长。

多年来，在经济工作中形成了一种争投资、争物资，争去以后不问使用是否合理、不问投资效果好坏、不问创造财富多少的坏习气、坏作风。拿经济效果来说，同我们过去曾经达到过的较高水平相比，大体上是，现在两块钱办的事情只相当于过去一块钱办的事情。在工业生产中，按单位产值提供的利税计算，每年国家大约少收入两百多亿元。按单位产值和单位商品零售总额占用的流动资金计算，现在要多占用流动资金几百亿元。过去花三年到五年时间建成投产的项目，现在要花八年到十年。在生产、基建和流通方面浪费之大，是惊人的。对于这种情况，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收效不大。如果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各个经济单位都能把主要精力转到抓经济核算、抓经济效果、抓减少浪费，那我们的经济局面就会大为改观。

我们要抓现有的三十多万个企业，提高其经济效果，把它们的潜力发挥出来。要做到这一点，空喊不行，必须在经济发展的方针上来个转变，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来个转变，而且要有一系列的具体工作、具体措施跟上来，包括企业的整顿、企业的改组、技术的改造、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调整的这几年里，我们要抓紧时机下功夫把现有的几十万个企业整顿好建设好，首先是把几千个大中型企业搞好。有几项工作要抓紧进行：

（一）一定要做好企业的各项基础工作，健全责任制，搞好经济核算，建立起正常的生产秩序和严格的劳动纪律。

（二）抓关停并转，结合进行企业改组，发展各种形式的联合。

（三）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对现有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首先是节约能源的技术改造。要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加强新产品的试制工作，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机械工业要由过去主要为基本建设服务转到主要为现有企业技术改造服务。这样做，机械工业就不是没有多少事情干，而是可以大有作为。今后的引进，要大大减少成套设备的进口，主要买技术、买软件，把技术引进和老企业的改造结合起来。

（四）要建立比较正规的职工教育制度，有计划地实行全员培训。

总之，在调整时期，一是要把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调整好，使经济结构逐步趋向合理；二是办好现有企业，提高经济效果。要经过几年的努力，使我们的现有企业在组织程度、经营管理水平、生产技术水平等方面有一个显著的提高。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在这同时，要加强资源普查、地质勘探、规划设计、方案论证等建设前期的准备工作，为今后必要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今后的基本建设，同样要在提高投资效果上下功夫，用较少的投资、较短的时间，形成较多的有用的生产能力。

我认为，只要这样做了，就不会出现生产长期徘徊的局面，我们的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五、做好这次调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这次大的调整，是经济建设方针的根本转变。它牵动全局，影响到各个方面。同六十年代的调整相比，现在物质条件比那时好，但工作难度比那时大。因此，需要把全党全民的精力集中到这方面来，上下一心，全力以赴，务期必胜。

搞好调整，从根本上说，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和安定团结局面的发展。但进行这么大的调整，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如果动荡不安，这里干扰一下，那里干扰一下，调整就无法进行。现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成堆，社会矛盾很多，而且在调整过程中，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应当注意三条：第一，要引导干部和群众，以大局为重，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它各种问题的解决，必须服从于调整。调整搞好了，经济稳定了，生产发展了，可以为解决其它问题创造更好的条件。现在，不论有什么理由，都不允许妨碍经济调整和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第二，我们在调整的具体政策、措施和步骤上，事先应尽量考虑得周到一些，慎重一些，力求不引发乱子。一旦发生乱子，领导干部必须履行职责，深入群众，做好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第三，教育干部和群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惕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趁调整之机，进行捣乱。对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决不能听之任之，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和批判。对一切违反宪法破坏法制的活动，必须依法取缔。我们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使调整得以顺利进行。

处在当前这样一个大的转变的时期，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重要的在于统一全党的思想，特别是保持高级干部思想认识的一致。邓小平同志讲过，到本世纪末，经过努力，我们也只能达到小康的水平。陈云同志这次着重讲了，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的。某些在国际贸易方面具有或暂时具有特殊条件的小国和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我认为，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这是统一全党思想的最重要的一条。总结过去的经验，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老是犯“左”的错误，搞冒进，受挫折，问题就出在离开了中国的国情。现在搞四化，搞经济建设，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统一到这点上来。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水平低的大国搞建设，不能急于求成，不要指望一下就出现什么奇迹，什么人也没有这个本事，只能量力而行，循序而进，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我们讲解放思想，就是要正视中国的国情，破除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们才能在当前的调整工作和以后的经济建设中，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有共同的语言和统一的行动。

实事求是地把国情讲清楚，可以使人民体谅国家的困难，理解我们的方针，增强前进的信心。现在有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有些埋怨、失望情绪，其根源也在

于不了解自己的国情。大而穷，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世界上只有印度和中国两个。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国大党领导，一个是共产党领导，很可以比较一下。印度独立三十多年了，一九七九年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只有一百六十七美元，粮食按人口平均只有四百一十七斤，而且贫富悬殊。我国的情况比印度好，这是世界上公认的。如果不是几经折腾，我们的情况肯定还会好得多。现在，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总结历史经验，从过去的失误中，分清是非，汲取教训。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三十年来，在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并不是一团漆黑；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党和政府在困难的条件下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尽了很大努力的。我们的事业是在不断前进的，悲观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过去，我们对自己的国情，认识得不够，考虑得不够，也宣传得不够。今后，要把这个问题向干部、群众讲清楚，使大家认识国情，看自己，比人家，办事情，提要求，都不能脱离这个现实，这在调整时期尤为必要。

为了领导和组织好这次调整，必须使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次调整，对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对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一个考验。我们要在调整过程中，端正党风，改善领导，培养干部，加强党的战斗力。要进一步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与群众同甘共苦，克服特殊化、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必须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生活，但是必须反对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歪风邪气，不允许涣散党的组织。现在有些干部思想波动，精神不振。有一种说法，“书记等着免，厂长等着选，干部等着减”，反映了这种情绪。各级党委要抓紧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所有的老、中、青干部，都振作精神，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积极工作，为调整的胜利和国家的中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要通过调整，在党的建设上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这次会议只能把调整的方针、调整的总盘子和一些重大措施定下来，许多具体问题要在以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逐个解决。为了使调整工作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中央准备采取一系列措施。要印发一个向干部和群众宣讲的宣传提纲，全面地分析当前的形势，把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讲清楚，把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动员起来。根据调整的总的要求，国务院将陆续制订一些具体措施和实施细则，并将组织各部委的领导干部，带领一批得力干部下去，同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同志结合在一起，抓基本建设项目的清理，抓企业的整顿、改组和联合，抓清查仓库，抓物价的检查和整顿。要切实抓好下马工程的收尾工作和关停并转企业的善后工作，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发生混乱。要切实转变领导作风，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和检查制度，改变拖拉推诿、无人负责的现象。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提出的办法是否可行，请中央常委和到会的同志批评指正。

一九八一年

抓好调整和改革　努力稳定经济*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1981年元旦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元旦到了，我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九八○年刚刚结束。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继续前进的一年。当前经济形势很好，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形势。形势好，主要表现是：通过初步的调整和改革，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把广大基层生产经营单位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经济开始活了。第一，农村通过休养生息，经济开始繁荣，农民这一头基本上稳住了。去年虽然是个重灾之年，南涝北旱，粮食减产三百亿斤左右，但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发展较快，农业总产值预计可以和前年持平。特别是棉花，总产可达五千万担，比前年多收六百四十万担，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第二，工业生产比预期的要好，工业内部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全年工业总产值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八，其中轻工业增长百分之十四。连续两年，轻工业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重工业。第三，市场商品供应增加，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由于增加就业，提高工资，发放奖金，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因素，使城乡购买力比前年增加三百亿元。过去是许多基本生活资料供应比较紧张，高档商品很少有人问津。现在情况变了。一般消费品基本上能够保证供应，不少中高档消费品供不应求。城市住宅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新建面积预计可以达七千万平方米。第四，民族地区，因地制宜，治穷致富，方向明确了，开始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第五，经济体制的改革，迈出了新的一步。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保护竞争，推动联合，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等方面，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发展，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总之，势头很好。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展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很好的形势。

在大好形势下，新的一年怎么办？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召开了省长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经过反复研究，慎重考虑，认为一九八一年在经济工作上，我们的方针是狠抓调整，稳定经济。现在，不是要大上，而是要继续调整；不是进行小的调整，而是要进行大的调整；某些方面不但要继续退，而且要退够。这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的：

从当前的经济情况看，尽管形势很好，但是潜伏着可能爆发的危险。这集中反映在积累和消费的分配，超过了国民收入，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各种消

费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因而连续几年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赤字。一九七九年财政赤字达一百七十亿元。去年财政收入虽然可以基本完成计划，但开支过大，赤字将超过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中的估计，达到一百几十亿元。这就不得不向银行借贷和透支。两年来，银行已增发一百三十亿元票子。如果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今年还会有大的赤字，还要再发九十亿元左右的票子。如果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恶性循环，三中全会以来改善人民生活的成果就会丧失，不仅经济不能稳定，也会影响政局的稳定。这是二十多年来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当然，不是说现在已经不得了了，而是说，我们应当有冷静的头脑，察微而知著，防患于未然。党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治标，而且要治本，准备向人大常委会建议，从根本上进行大的调整，改变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逐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长痛不如短痛，今年就要基本上做到不出赤字，不再搞财政性的货币发行，把物价基本稳定下来，特别是要把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价格稳住。现在采取这个重大决策，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只要坚决采取调整措施，潜在的危险就可以消除，经济工作就可以转向主动，三中全会以来好的形势就可以发展下去。

这次进一步的调整，不是一时的应急之计，而是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和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它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底子薄、水平低的大国搞建设，不能急于求成，不要指望一下就出现什么奇迹，什么人也没有这个本事，只能量力而行，循序而进，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努力。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多次跌跤子，受挫折，就在于离开了中国的国情，指导思想上老是搞冒进，急于求成，犯“左”的错误。这次我们自觉地、清醒地进行全面的调整，就是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彻底摆脱过去那一套“左”的思想和做法的束缚，真正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站稳脚跟，稳步前进，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避免今后经济上再发生大的折腾，更有利于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而实现四个现代化。

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要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和切实搞好关停并转。今年基本建设的规模要大大压缩，包括一些超出我们国力的大的引进项目在内，都要退够。现在各地重复生产、盲目生产的问题很大。办起的工厂，许多是无米之炊，能源不足，原料不够，于是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对那些没有原料、没有能源、消耗大、质量差、亏损严重的企业，要坚决关停并转。另一方面，国防费、行政费、管理费和其他开支，都要紧缩。人民生活的改善，也要量力而行。要扎扎实实多做工作，不要轻易许愿。当然，对于没有奖金收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那一部分职工，今年还要适当增加一些工资。压缩基建，关停并转，紧缩开支，虽然要承受一些损失，增加一些困难，但是，从全局看，这样退够，要有利得多，主动得多。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今年准备发行四十亿到五十亿元国库券，主要由各地

方、各部门、各企业认购，有条件的个人也可以自愿认购一点。

在调整期间，不必要的基本建设要下，各项开支要紧缩，但生产要努力搞上去。特别是农业、轻工业和有关人民生活的日用品的生产，能源、交通的建设，以及科学教育卫生文化事业，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发展。要努力增产质优价廉、适销对路的消费品，活跃市场，回笼货币，增加财政收入，满足人民需要。商业、外贸和物资部门，要压缩库存，拿出一部分商品，投入市场。各行各业，都要突出地抓节约能源的工作。要从各个方面，开源节流，增产节约，以利于克服困难，搞好调整。

这次调整，牵动全局，影响到各个方面。小平同志说，历来解决困难，权是要集中的，不是分散的，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现在强调集中统一，是指在宏观经济方面，在扭转国民经济被动局面的重大措施方面，要集中统一。但并不是什么都要集中，把什么都搞得死死的，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这次调整，要吸收六十年代初期调整经济的成功经验，同时要有新的特点。这就是以调整为主，把调整和改革结合起来，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计划指导和行政干预的同时，继续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把该搞活的事情搞活。应当看到，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经济体制进行的一些初步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对搞活经济，提高经济效益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经济形势之所以这么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在调整时期，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同当前调整容易发生矛盾的，要推迟进行，把步子放慢一点。但前一段行之有效的改革，要继续坚持，改革的成果要巩固和发展；少量的新的改革的试点，也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在改革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上，既要慎重，又要坚定，政策不能变来变去，要取信于民，取信于企业。搞活，是很不容易的，非常可贵的，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一点丢掉了。

这次调整，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某些方面的退，正是为了以后更好地进。我们要通过调整，抓紧工作，使各个方面的经济效果有一个大的提高，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长期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的路子，热衷于大搞基本建设，铺新摊子，忽视已经建设起来的老企业的改造和发展，使它们长期陷于高消耗、低质量、产品性能多少年如一日的落后状态，盲目追求产值，产销脱节，大量积压。表面上看，生产的增长速度并不算慢，但是创造的社会财富很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这条路子，是靠紧缩人民消费，保持过高的积累率来实现的。我们不能再走这条路子，而应当走一条新路子。这就是要努力提高经济效果，主要依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进行合理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扩大社会生产。这条路子，速度可能不那么高，但是经济效益会好，社会财富会增加得多，人民得到的实惠也多。只有走这条路子，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好发展生产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财政经济的困难，求得经济的稳定增长。现在，不论在生产、基建和流通方面，浪费十分惊人，潜力是很大的。因此，在调整期间，一是要把国民经济重大

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解决好，使经济结构逐步趋向合理；二是要抓紧时机，下功夫把现有几十万个企业办好，提高经济效果，把潜力挖掘出来。要认真搞好企业的整顿，企业的调整和改组，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企业的体制改革，经过几年的努力，使我们现有的企业在组织程度、经营管理水平、生产技术等方面有一个显著的提高。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搞好调整，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动荡不安，这里干扰一下，那里干扰一下，调整就无法进行。要把工作做细，做扎实，注意克服不安定的因素。在调整的具体政策、措施和步骤上，打算尽量考虑得周到一些，慎重一些，力求不引发乱子。这次不少基本建设项目要下，一部分企业要关停并转，涉及到几百万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发生混乱。这次不能像一九六二年那样，精减大批职工下乡，而是要采取这样一条政策，基本工资照发，队伍不散，不使他们闲散到社会上去。要组织他们参加一些必要的生产劳动，例如设备的保管和维修，新产品的研究和试制，以及绿化环境，搞市政建设等。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个时机，有计划地对职工进行正规的培训，补“智力投资”这一课，提高职工的文化科学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把这件事抓好了，意义很大。如果说，调整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须采取的一项积极措施，那么，培训就是这种积极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把现有的职工安排好以外，明年还要尽量广开门路，通过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城镇个体经济，继续安排社会上的待业人员就业。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动员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积极行动起来，保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保障调整的顺利进行。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同时，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的、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工作继续做下去，但要警惕极个别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趁机进行破坏。对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要坚决打击，决不能对这些非法活动放任不管。对这极少数人实行专政，才能充分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当然，进行这种斗争，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运用宪法和法律作为武器。经济上的调整，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是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只要我们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振作精神，艰苦奋斗，当前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调整是能够搞好的，我们的国家是很有希望的。

关于调整问题，国务院将向人大常委会正式提出报告。今天趁这个机会，先和大家谈一谈。如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作出新的贡献！

关于杜润生报告[1]给胡耀邦同志的信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八日

耀邦同志：

送上杜润生同志报告一件，其中反映了我的一些看法。请考虑可否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副总理一阅，并在《内部参考》上刊登。请批示！[2]

赵紫阳

元月十八日

注 释

1．指杜润生随赵紫阳到鄂、豫、鲁三省贫困地区考察后给中央的报告。该报告汇报了上述贫困地区自1978年实行包产到户、尊重农民生产自主权以后带来的巨大变化，反映了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把这些农村的好政策稳定下来。报告中多处引用了赵紫阳在考察时的讲话。

2．胡耀邦在此信上批示："按紫阳同志的意见印发和登《内部参考》。（润生同志的信可不登）。胡耀邦一月十九日。"

对农村建房占地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对新华社《内部参考》1981年第19期《农村建房要十分注意节约用地》一文的批示。

《内参》十九期《农村建房要十分注意节约用地》一文，值得重视。农村经济形势好转后，纷纷准备建房，这当然是大好事，但如在占地上失去控制（还有社、队企业占地），将会招致严重后果。建议农委、建委联合进行一次调查，并为国务院拟出一个农村建房和办社、队企业节约用地的规定（法规），以公布执行（必要时，可提交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布）。以上请农委、建委研究，并将意见告我。另外，黄老（克诚[1]）还提出农村建房不要宣传，农村住房不像城市那样紧张，建筑材料应优先满足城市的意见，亦请考虑。

请星垣同志指定一位秘书长过问一下这事。

赵紫阳

三月十二日

注 释

1．黄克诚（1902—1986），湖南永兴人。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曾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中纪委第二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在调整期间如何搞好改革*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两年来的改革，方向正确，成效显著，由于经验不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地方、企业自主权扩大，尽管这个权还扩得不够、不完全，但这些权的使用在一些方面与宏观经济的要求发生矛盾，产生了一些重复建设、盲目生产、滥发奖金、哄抬物价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不利于调整，也妨碍改革。怎么解决？采取老办法，把放下去的权统统收回来，这是没有出路的，又会回到“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老路上去。我们要采取新的办法、走新的路子，即在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研究采取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制约办法。

第一，要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要用经济杠杆、经济手段、经济利害关系来调节部门、地方、企业的经济活动，使微观经济活动符合宏观经济的要求。

要发挥税收杠杆的作用。税收不像物价影响面那么大，在调整期间价格不能大动的情况下，可更多地利用税收来调节。

用税收促进调整。对一部分长线产品、重复生产严重的产品加税，促使企业截长补短，有利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化。

用税收促进改组。对搞“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厂加税，促使企业走专业化协作的道路。特别是要使企业摆脱地区、部门的束缚，合理地组织起来，必须改上交利润为上交税收。要研究改组公司和联合体的利改税问题。

用税收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把一部分企业由于价格不合理而多得的利润通过税收收上来，解决企业之间利润水平相差悬殊带来的苦乐不均问题。

用税收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通过税收的调节，使经营水平比较好的企业得利，迫使经营水平差的企业改善管理，长期不改善的就被淘汰。目前扩权试点中，哪个办法有利，企业就选择哪个，搞不好不吃亏、也不担责任的做法要改变。

用税收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一部分产品需要减免税以外，今后重要的是加税。对一切有营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要征税，还要通过税收逐步改变目前地方财政结余、中央财政赤字的状况。

要运用税收杠杆，必须改变目前“协商办税”的做法。税收是国家调节经济利

害关系的重要手段。采取协商办法，谁都愿意减税，不愿加税，使许多应该采取的税收措施久拖不决、难以实施。税务部门一定要加强，根据税收任务增加入员编制。

在调整期间，价格要保持基本稳定。不可能大动，但小动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不能设想价格哪一天可以一下子调整合理，只能采取逐步调整的办法。因此，需要尽快搞出价格改革的长远规划，定下改革的总盘子，然后制订分步骤实施计划。当前，配合调整，可以把一部分利高的长线产品的价格调下来，或实行浮动价格，适当提高对市场价格影响不大的短线产品的价格。配合工业改组，逐步把一个行业内部各产品之间的比价调整合理。为解决行业之间利润水平相差悬殊的问题，可先调整出厂价、批发价或中间产品的价格。在联合企业、行业或局的范围内可以推行内部价格。要按质论价，实行优质优价的价格政策，鼓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

银行贷款要实行“择优扶持”的原则。对适销对路的产品优先贷款，对长线产品控制贷款，对与大厂争原料、燃料、动力而消耗高、质量差的小厂，要停止贷款。要实行差别利率、浮动利率和加息制度。对需要发展的行业的贷款，利率可低一些；对限制发展的行业，利率可高一些。对逾期归还、积压物资和财政性开支占用的贷款，要加收利息。要增设银行网点，开办代办业务，解决群众排队储蓄的问题。发展金融事业，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是扩大就业的重要门路。

第二，要制订经济法规，实行法治。

我们国家缺乏经济法规，多年来靠行政命令、首长意志来管理经济。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要靠经济法规、规章制度来管理，使各种经济活动有法可循、有章可依。体制改革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搞活经济的同时，要用经济法规来制约。搞市场调节，就要有市场管理。扩大企业自主权，就要有相应的管理企业的办法。各项改革如果不形成规章制度，就难以进行下去和取得成效。因此，要把制订经济法规的工作摆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要组织有关部门及高等院校，立即着手制订各种法规。这方面可以借鉴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些经验，把他们的各种法规翻译过来作参考。在法规没有制订出来以前，可先制订各种管理条例、规定，经过试行后逐步形成法律。有了法，就要有执法机构，要建立仲裁机构和经济法庭。要赋予执法机构应有的权力，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第三，要加强经济监督工作。

要发挥物价、税务、银行、统计、财政和工商行政等机构对企业的监督作用。把经济活动的各种信息及时收集起来，便于作出正确的宏观决策；对微观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保证宏观决策的贯彻执行。

由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如何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由国务院办公厅会同各部门起草有关的条例、规定和法规。

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必须搞对外合作*

一九八一年三月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家能源委和进出口委组织六十多名专家、学者研究讨论渤海中日石油合作问题汇报后的讲话摘要。

在海上勘探开发石油[1]，必须搞对外合作，这个方针要确定下来，坚持下去。我们现在财力不足，技术不高，要面对这一现实，利用当前国际条件，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加快海上石油开发。

注 释

1．中国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是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70年代国务院曾经作出决定：“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开展海上石油勘探开发，石油部可以采取平等互利的贸易方式，直接与外国石油公司建立商务关系，开展对外合作。”1980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渤海和南海北部湾分别与日本和法国的石油公司通过双边谈判，签订四个石油勘探开发合同。当时，有人提出对外合作开发海上石油是“出卖资源”，“丧失主权”，“得不偿失”。为此，经国务院同意，于1981年3月，由能源委、进出口委组织有关部门六十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渤海中日石油合作这一主题，从技术、经济、税务、法律等方面进行充分论证，对合作的必要性取得一致认识。赵紫阳听取汇报后，充分肯定这次讨论，并作出上述明确的表态。1981年H月，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赵紫阳讲到与外国合作勘探开发海上石油时宣布：“我国政府确定，根据互利原则，近期内招标，加紧勘探，尽快投入开发建设。”1982年2月8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海洋石油开发，在国务院对外合作和自营开发相结合的方针指引下，经过石油系统广大干部工人共同努力，为进一步开发海洋石油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996年中国海上生产油气当量500万吨，2010年当量5000万吨。现在中国海洋石油开发方兴未艾。

当前经济形势和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今年第一季度的形势是好的。财政收大于支，货币有较多的回笼，轻工业增产，商品销售增加，物价稳定。这说明调整见到了效果。但要实现中央工作会议的要求，任务还相当艰巨，要再接再厉，抓紧抓好。

二、要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实现今年财政收支平衡。今年能否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事关全党的信心问题，具有政治意义。必须力争实现财政平衡，至少要做到基本平衡。现在不要讲赤字可能有多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开支一定要卡紧，控制集团购买力也有潜力。关于支出开口子的问题，要逐项审查一下，哪些事情现在还不能办，就明确讲清楚；哪些事情必须办，也要明确规定是中央财政解决还是地方财政解决，不要把矛盾下放给地方。在紧缩财政开支的同时，企业资金要继续搞活。企业购买国库券后剩余的资金，应允许使用。要向企业讲清楚，哪些事情不能搞，剩余资金也不能一下用完，要分批安排，由省、市、自治区负责审批。今年一季度对企业资金控制紧一些是必要的，但是有的地方可能死了一点。既要节流，又要开源，以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职工宿舍建设规划比去年减少了，在今年已经安排的基础上，要适当开点口子。增加宿舍也是调整，今后要强调宿舍建筑的配套，以住进多少人为完成任务的标准。

三、回笼货币要抓紧。议价要收紧一些，议价范围要控制，议价要逐步降低，以利稳定物价，减少货币投放。要把生产搞好一些，争取今年下半年多组织些商品回笼，非商品性回笼也要组织好。农村收回农贷，要强调一下，尤其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抓紧货币回笼的同时，也要有些必要的投放，把中短期贷款搞得活一些。生产投放的重点，一是轻纺消费品，二是短线产品。在工商关系方面，商业部门收购减少，工商矛盾较大时，银行要注意放宽贷款尺度，商业部门要把市场需要的商品尽可能收购下来，以利生产和流通。今年重点抓调整，前一段的理解主要是压缩基建和企业关停并转，对生产调整注意不够。今后要讲增产增收，生产应当有一定的速度，否则矛盾解决不了，还会产生新的矛盾。

在抓紧货币回笼的同时，要研究市场需要多少货币量才合适的问题。现在流通的票子多，和一九六二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市场情况是好的，特别是

农贸市场价格平稳。除几种耐用消费品比较紧张外，还没有发生抢购现象，甚至有些商品降了价群众也不买。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需要保持多少货币流通量，请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很好研究。

四、企业整顿问题。企业要抓好厂长责任制、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劳动纪律、经济技术的基础工作和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近两年，农业方面一些政策措施落实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工业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成效不大，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真正解决好按劳分配的问题。对于企业的现状，必须要看到两点：一是多数企业有潜力，浪费严重；二是吃大锅饭的现象普遍存在。企业的整顿，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加强企业职工的责任心，减少浪费，这是吹糠见米的措施。具体办法有以下几条：第一，全国有六千个企业已经实行扩大自主权试点，总结经验，继续提高。搞得好的多得，搞得不好的少得，不能中途退出。第二，亏损企业实行包干办法。在原有亏损的基础上，适当减少一些亏损额，对企业包干。第三，对于一些小工商企业和服务行业，要考虑提前一步实行自负盈亏，即由利润上交改为征收所得税的办法。第四，选择若干城市试行按行业、按公司利润包干的办法，和技术改造结合起来。另外，个体所有制要适当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实行以上办法，没有危险性。也可能出些问题，可以用经济杠杆、经济立法和经济监督办法加以管理。一定要看到，中国这样大，千百万个大小企业都躺在计委、财政部身上吃大锅饭是不行的。

五、关于纠“左”的问题。要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不要搞形而上学。不要搞层层检讨，不要上挂下联。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具体总结经验。要注意保护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要振作革命精神。基层同志的革命精神，始终是可贵的。“左”或右，是讲上边领导的指导思想。日常工作，具体指标，很难说是“左”或右，往往属于情况判断上的问题。涉及指标高低，逐级联下去不得了。其结果是，任务越小越好，困难越少越好。纠“左”的问题，从领导总结指导思想是重要的，但不能层层搞。

六、关于奖金问题。当前奖金发放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存在平均主义，生产表现不论好坏，奖金基本一样，有的甚至把奖金变成了附加工资。发了奖金，并未真正起到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作用，生产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次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要下决心，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强调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如果把现在这种状况扭转过来，把奖金和小组核算、个人劳动定额、责任制结合起来，工交战线就会大有起色。奖金问题，要贯彻执行国务院十号文件规定的基本精神，进行整顿。第一，巧立名目的、滥发的奖金，必须取消。第二，绝大多数地区的奖金要比去年降低，发放奖金总额要有明显的减少。第三，平均奖金水平已经超过一个半月的，不一定一下压到一个半月；去年没有达到一个半月水平的也不要再增加。第四，有特殊情况必须多发奖金的，要报经有关部门批准。这个问题，请劳动总局、经委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订出一个有关奖金问题的补充规定，以便执行。这次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可以找几个大市具体商谈一个执行办法。

七、物价问题要持慎重态度。现在市场物价刚刚稳定一些，不宜轻易变动。要看到过去工业产品，首先是轻纺产品的利润高，是建立在原材料价格比较低的基础上取得的。现在农副产品原料和工业产品原料提了一些价，企业就发生了成本提高、利润减少甚至亏损的现象。这就暴露了工业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落后。要求工业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加强经营管理，减少消耗，降低成本，增加收入。

今后价格问题要很好研究。现在外贸亏损，主要原因是国内外价格不挂钩。出口产品，按工厂成本还是按国内销售价计算盈亏，也是个问题。国内有些商品的收购价和销售价也是倒挂。这些问题长期拖下去不解决，财政赔不起。我们对价格问题心中要有个数。要用两年的时间，把我国的主要商品，按照平均利润率，计算出合理的价格应当是多少，并编制出一套商品价格目录。价格问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八、关于学上海问题。这次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可以考虑不提学上海的口号，只讲把上海和沿海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引进、移植到内地。这些经验对内地是很适用的，比学外国的经验更为有效。学习要用科学方法，不要搞运动。经委要编好上海和沿海地区经验资料，供各地学习。上海等地要有咨询机构。去上海的人数必须控制，上海老工人要合理使用。学习上海经验，可以首先规划若干城市。日本有行业协会，我们也可以搞行业协会或咨询服务公司。

沿海城市以进养出问题，要专门研究。沿海可以发展来料加工，等于劳务、技术、能源出口。没有原料，从国外进口，加工成成品，组织出口。企业搞联合体，搞工贸结合。沿海城市对外发展经济往来，面向国外。内地的原料和产品，面向国内。沿海内地各自发挥优势，各得其所。这个问题请经委组织外贸、商业等部门组成专门小组，先到沿海地区进行调查。

各项服务行业种类很多，方面很广，群众很需要，既有利于安排就业，又可回笼货币，需要大力发展。但是服务行业分别属于几个部门，缺乏统一领导，存在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关服务行业的方针政策、体制、服务网点建设规划和相互关系等问题，由国务院财贸小组和体制改革办公室共同负责进行研究，并可请北京市搞一些试点。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国务院对今年的工作已经作了安排，同时开始着手制订“六五”计划。今天，我准备就今后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讲一些意见。

在调整国民经济中，大家普遍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在压缩基本建设、紧缩各项开支以及能源紧张的情况下，今后生产和财政收入能不能稳定增长，人民生活能不能逐步有所改善，新增加的劳动力能不能得到安排？这是制订“六五”计划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工作受“左”的错误的影响，急于求成，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结构畸形发展。过去走的这条路子投资大，消耗高，增加社会财富少，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今后不能再走，也走不下去了。

出路何在？国务院讨论多次，认为出路就在于提高经济效果。有的同志说，现在是“遍地皆黄金”，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关键是要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把各方面的潜力挖掘出来，大大减少各个领域内的浪费，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如何提高经济效果呢？还是这样两句话：一是调整，二是改革。通过调整和改革，在稳定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国民经济结构合理化，经济体制合理化，企业组织合理化，走出一条发展我国经济的新路子来，使国民经济能够协调发展，稳定增长，实现良性循环。走这条路子，投资比较少，积累率不那么高，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

今后，我国经济建设走什么路，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现在提出下面几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

我们在经济调整中，正在采取压缩基本建设，紧缩开支等措施，这对于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稳定经济是非常必要的。这项工作丝毫不能放松，要继续抓下

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稳脚跟，消除潜在的危险。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进一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这是更为艰巨的任务，需要更长的时间。经济结构调整合理了，就能出效益，使我国的经济稳定地发展。所以，调整国民经济是积极的方针，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全面理解调整的内容和意义，才能正确地执行这个方针。

在调整经济结构中，要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到重要位置上，认真抓好。这是使我国经济结构合理化的关键一着。

发展消费品生产，有利于增加收入，回笼货币，繁荣市场，稳定物价，增加出口，节约能源，安排劳动力，使国民经济尽快摆脱困难。从根本上说，不断满足人民吃、穿、住、用、行以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人民政府应尽的职责。东欧有些国家长期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带来消费品匮乏，这是造成他们国内人民不满、政局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

发展消费品生产，相应地要求机械、电子、化工、冶金、建筑材料等部门提供设备和各种原材料，这就要求改变“重工业自我循环，轻工业自我奋斗”的不合理状况，使重工业转向主要为消费品生产服务。我们强调发展消费品生产，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重工业，而是对重工业提出了调整的任务，要求重工业的发展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相适应，要求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最终消费品的生产相适应，更好地发挥重工业的作用。所以，发展消费品生产，实际上将引起整个经济结构的改变，使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合理的内在联系逐步得到恢复，使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更好地衔接起来，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果，积累和消费的矛盾也就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到什么位置，实际上是中国经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历来讲农、轻、重，但在计划、方针、措施上，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老是想从重工业、从钢铁工业上起飞，形成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吃了不少苦头。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在建设方针上，应当从以钢为纲、片面发展重工业转向着重发展消费品生产，使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消费资料的生产相协调，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发展消费品生产，在我们这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里有着广阔的市场。这是发展我国经济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今年一月，我到豫东和鲁西南的兰考、东明、菏泽去了一趟，那里是有名的穷地方。这两年落实了农村经济政策，农民收入大大增加。农民说，往年上面来人，我们一定跟你要粮食，现在要“三大件”，要化肥。过去老百姓没有钱，工业品在那里几乎是空白，现在好多商品都脱销了。估计全国有一亿五到二亿人口的地区是这种情况。这几年人民群众的购买力提高，城乡都出现“持币待购”的现象。外国人很羡慕中国这个市场，而我们长期以来却忽视自己的市场，商品不足，不是去积极发展它，满足需要，而是靠发票证，抑制需求。当然，某些生活必需品在供不应求时，发一下票证是可以的，但长期依靠这个办法，就会把市场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搞没有了。现在，

许多高、中档商品有销路了，推动我们去发展生产。

发展消费品生产，要从重点城市、名牌产品抓起，上海、天津、北京以及其他轻纺工业生产的重点城市要先走一步。要根据市场的需要，排出一批适销对路的产品，落实措施，把它抓上去。要以生产名牌优质产品的工厂为中心，组织专业化协作，进行大批量生产。要同工业的调整、改组紧密结合起来，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尽量利用原有企业和关停并转企业的厂房、设备和技术力量，一般不搞新建。所需资金，除企业自筹以外，可以由银行给些中、短期贷款。需要的设备，主要由我们自己造，必要时，也可以引进一些技术和少数关键的零部件。在发展中，注意不要一哄而起，到处铺摊子，以后又收缩，造成损失。要搞好行业规划，认真进行市场调查和预测，稳步前进，避免盲目性。发展消费品生产，不能追求数量，粗制滥造，而要强调质量，做到花色新颖、品种多样、质优价廉、适销对路。我们的导弹、卫星都可以上天，轻工产品的质量问题为什么不能解决？只要集中力量，从材质、工艺、设备、管理等方面入手，组织军工、民用工业、科研部门等几个方面进行协作，就可以攻破技术难关，提高质量。要妥善安排好各类消费品的生产，兼顾内销和出口、农村和城市的不同需要，以及兄弟民族的特殊需要。在努力增产价值高、回笼货币多的高档商品的同时，对人民群众需要的利润不高的大路货，尤其是品种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也不能忽视。今年，我们就要下力气把消费品生产抓紧、抓好，做出成效，在“六五”期间，使消费品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抓好能源的节约和开发

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就是能源、交通、城市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相当落后。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投资和较长的周期。在制订长远规划中，应当认真地加以研究，切实地作出安排。在调整时期，把这些基础设施搞好，就能为今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当前，能源比较紧张，特别是石油探明的后备储量不足，产量有可能下降，影响很大。中国无论如何不能靠进口石油过日子，这要作为一条国策定下来。解决能源问题，应当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内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当前，首先要抓节能，特别是节油。今后十年，如果每年都能在上年的基础上多挤出一二百万吨油出口，我们在经济上就会增多一些回旋余地。

全世界产油上亿吨的国家只有九个。我国年产一亿吨油，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是我国经济的一张王牌。问题是我国石油从一千多万吨上升到近九千万吨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盲目地把石油的消费量增加上去了，浪费了宝贵的财富。现在，我们要从根本上考虑国内的用油问题。目前，我国每年出口原油、成品油一千七百万吨，剩下八千多万吨全部在国内消费了。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和日本差不多，但产值只及日本的四分之一。每万吨能源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现在大体上只相当于“一五”期间的一半，比一九六五年还低百分之二十，能

源的浪费到了惊人的地步。目前，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每吨二百七十美元，重油的价格只比原油低百分之十至十五，油就是“金子”。我反复考虑，如果原油产量不能大幅度增加，就要下决心到一九九〇年把国内用油控制在六千万吨左右，再挤出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吨油出口，换来的外汇用在开发煤炭、电力和相应的铁路、港口建设上。这样，就能为能源和交通的建设提供大量的资金，并有助于扭转我国的外汇收支逆差。

节油的潜力是很大的，首先要把烧油这个大漏洞堵住。一九八○年全国作为燃料油烧掉四千万吨，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真是太可惜了。烧油最多的行业是电站，共一千六百四十万吨；其次是工业锅炉和炉窑，共一千三百多万吨。各部门自备电站一年也烧油三百三十万吨。节油的重点，要放在烧油的电站、工业的锅炉上，办法是烧油改烧煤。有关部门算了一笔账：如果从现在起，烧油改为烧煤，每年节省二百万吨油，到一九九〇年，可达到一年省油二千万吨，这就需要四千万吨煤来代替。改为烧煤的投资，包括新建电站、相应的煤炭开发、铁路和码头的改造等，共需二百亿元。十年间累计省油一亿一千万吨，不算价格上涨因素，可换汇三百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八百四十亿元。用去二百亿元，再除去成本一百九十亿元（按每吨一百七十元算），还净赚四百五十亿元。如果留有余地，按一九九〇年达到节油一千五百万吨计算，十年累计节油八千二百多万吨，除去成本，也净赚二百九十亿元。现在，要走好第一步，今年就下决心从各方面挤出一百万吨油，明年挤出二百万吨，共计三百万吨出口。有这三百万吨作基数，这样每年驴打滚，就可使烧油改烧煤的步子加快，用油换来的外汇也越来越多。所以，要渡过困难，搞活经济，这是重要的一着。开发能源需要建立专用基金。以上讲的以煤换油、节油出口的钱，就是能源基金的重要来源。其次，还要考虑动用一点国家储备，再借一些低息的外资。有以上三个方面的资金，专款专用，就可以加快能源的开发。在编制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进行综合平衡时，一定要保证这个重点，坚决这样搞，积十年、二十年，就会见效。在开发能源中，过去对水电注意不够，今后要特别重视利用水力资源，建水电站。近期内主要是以煤代油，挤出石油出口。从长远来讲，应当努力以水电代煤、代油，节约石油、煤炭出口。

三、依靠现有企业

过去一讲发展生产，就向国家要投资，搞新建，铺摊子，这是以前搞经济建设的老路子。在新形势下，要使建设方针来一个根本的转变。今后发展国民经济，主要不是依靠建新厂、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而是依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逐步由外延为主转向内涵为主，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今后五年以至更长的时间，除了能源、交通等薄弱环节还要新上一些必要的项目以外，基本上不搞什么新建，就是靠现有的企业吃饭。正如农业上我们主要依靠八亿农民在现有耕地上精耕细作、增加产量一样，在工业上我们也是主要依靠四千多万职工在现有企

业里搞集约经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我们工业的摊子是相当大的。全国工业企业有三十七万多个，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有五千一百亿元。目前，资金短缺，能源不足，不允许多搞基本建设。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采取坚决依靠现有企业的方针。现在企业各方面浪费很大，效益很差，许多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至今还未达到历史的最好水平，更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五千多亿元资产的作用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人说，我国现在的经济是“克朗猪”，只有“骨头”没有“肉”，今后是育肥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是投资的时候，今后是真正出效益的时候。要把有限的资金和物资优先用于现有企业的改造上。今后基本建设的投资，要更多地用于老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六五”期间达到多大比例，可以具体研究。

在调整时期，我们要下功夫把现有企业，尤其是几千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办好，把它们的潜力挖掘出来。现在不少企业管理混乱，劳动纪律松弛，生产秩序不正常，亏损增加，如果不抓紧整顿，依靠原有企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各级主管部门要重视这项工作，把基础打好。企业的整顿，要围绕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果来进行。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加强企业管理，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严肃劳动纪律。我们的工厂，有些产品不是不能做，也不是不能做得更好，而是因为责任制不健全，按劳分配原则没有很好贯彻，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操作马马虎虎，所以产品质量不好。现在农村的形势很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把农民的收入与劳动成果挂钩，落实了按劳分配，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工矿企业里，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好。按劳分配的原则，理论上是被大家承认了，但是，在实践中，不少企业还是搞平均主义，奖金没有少发，钱没有少花，可是没有换来好的经济效果。要研究如何把克服平均主义，改革工资制度与加强责任制结合起来。当前，要推广一些工厂实行的记分计奖、上海纺织系统试行的小组超额计件奖以及其它行之有效的办法，把职工的工资和奖金收入，同岗位责任、经济效果挂起钩来，坚决纠正乱发奖金和平均发放奖金的错误作法，使奖金真正起到鼓励超额劳动的作用。要建立生产技术责任制，先从厂长责任制抓起。党政要明确分工，企业的重大问题经党委讨论决定以后，属于生产、行政上的工作，经营管理方面的事务，由厂长负责实施。要划分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和科室、车间、班组负责人的职责范围，实行逐级负责，一层一层把责任搞清楚，并要规定相应的考核、奖惩制度。要加强各项基础工作，全面推行厂、车间、班组的经济核算。与此同时，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进行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细致的思想教育，使干部和群众顾全大局，振奋精神，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天津手表厂原来规定的定额比较低，想提高一些，但工人不接受。后来发动“国家有困难，工人怎么办？”的讨论，定额很快就落实了。还要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完善企业的民主管理，在决定企业的大政方针方面，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办好工厂。

每个企业都有很大潜力，但更大的潜力在于把企业合理地组织起来，实现工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我国的工业企业是按部门、地区管理的，形成部门林立，条块分割，多头领导，管理分散，不仅使现有企业不能通过互相协作，形成更大的生产力，反而由于互相牵制、自搞一套，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严重阻碍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种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分割状况不解决，工厂的潜力是很难挖掘出来的。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进行工业改组和促进企业的联合。要按照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和生产发展的需要，根据不同行业、地区的条件和特点，实行专业化改组，把企业组织成各种形式的公司或联合体。公司集中管理的范围和程度，应根据不同的条件，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提高经济效果来确定，有的可以实行人、财、物、产、供、销的“六统一”，有的也可以在产、供、销上先统一起来，组成比较松散的联合。

在调整改组的基础上，要大力进行技术改造，加速企业的技术进步。企业要重视技术工作，不断开展技术研究和试验，采用各种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发展各种新产品，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改善性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各级计划部门和主管部门要安排一定的资金和物资，为企业的技术改造提供必要的条件。公司或联合体要按照行业规划所确定的改造方向，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这样，合理的组织，为技术改造创造条件，指明方向；技术改造，又使合理的组织发挥更大的优越性。把二者结合起来，就能充分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取得更大的经济效果。

四、搞好机械工业的改组和改造

机械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关系极大。我们应当确定这样一个方针，要发展什么行业，就要相应地把为这些行业提供装备的机械工业搞上去。不能一说发展什么，就靠进口设备。这是某些产油国家所走的道路。他们一是美元多，二是机械工业基础差。我们与他们不同，不能采取这个办法，要立足于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机械工业。引进外国的东西，是为了发展而不是削弱我们自己的工业。当前要着重抓好机械工业的改组、改造，这既是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现代化的起步工作。机械工业的改组、改造，就是要实行专业化协作，使机械工业的组织合理化，改造落后技术，使机械工业的技术现代化；就是要调整服务方向，从主要为基本建设服务，转到“四个服务”的方向上，即为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服务，为国内市场服务，为扩大出口服务，为国防现代化服务。通过改组、改造，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新产品，改进技术服务，以现代化的设备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以优质的耐用消费品满足市场需要，并积极打入国际市场，增加机械产品的出口。

日本五十年代振兴机械工业的措施，对我们有参考价值。日本机械工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满足军火生产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战后生产能力过剩，没有饭吃。当时日本机械工业存在的问题，同我们现在相类似：设备陈旧，

技术落后，重复生产，产品批量小、品种杂、型号多、性能差，缺乏竞争力。一九五六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机械工业振兴法》。他们的方针是，通过抓基础部门，如工作母机、测试设备、通用的基础零部件等，来带动整个机械工业的发展。他们选择十九种产品（以后扩展到四十种），作为“特定机械工业”，规定一九六〇年在产品性能、质量、成本上要达到的目标。为帮助企业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企业专业化，即组织措施。采取限制品种，减少规格，划分各企业的生产范围，改组“兼业厂”，规定一种产品只能集中在几个企业生产，一个企业只能集中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变多品种、小批量为专业化的大批量生产。通产省还向企业发出“共同行动”的指令，要他们联合生产一定品种的产品。二是技术现代化，即技术措施。制订企业技术标准制，规定特定企业必须采用的生产设备、检验设备、质量控制制度和生产人员的技术水平，并发放专项贷款，帮助企业更新设备，推行“机械设备国产化”。他们当时认为，结构上存在严重缺陷的机械工业，单靠市场经济自然循环的作用，已经不能改变，必须靠政府的直接干预。日本政府的这些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五年间，机械工业的生产增加了三倍半，产品质量有很大提高，在国际市场上打开了销路。

我国的机械工业现在已有相当规模，但体系杂乱，管理分散，小而全、大而全，装备水平差，效率低，结构很不合理。实行市场调节、自愿联合，对改变机械工业的局部不合理是有作用的，但不能改变整个机械工业的不合理状况。特别是在目前价格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下，完全由企业自由选择，还会加剧结构的不合理。所以，要使机械工业结构合理化，以至整个工业结构合理化，在调整时期，就必须从经济的全局和社会的需要出发，采取行政办法和经济办法，实行改组。在改组过程中，要注意调整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听取企业和主管部门的意见，使改组的措施符合实际，真正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改组中，难度最大的是要打破地区、部门的界限。我的想法是，从行业搞起，从中心城市搞起。先建立各种行业组织，进行调查，提出行业改组规划。然后对规划展开可行性的辩论，经过充分论证和比较，确定改组方案，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以后组织实施。同时，要围绕中心城市的重点企业和重要产品，组织专业化协作，不受地区和部门的限制。

改组中，要从全国着眼，从中心城市着手，处理好全局合理与局部合理的关系。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产品和重复生产严重的产品，由中央有关部门根据全局合理的原则提出改组规划；一般产品，由地方根据中央提出的改组原则进行规划，以地方为主。

改组中，一定要立足于取得实效，通过改组，实现大批量生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做到适销对路。不能追求形式，为改组而改组，也不要搞成新的大而全、小而全。当前任务严重不足而又没有发展前途的厂子，可以划过来，与轻纺工业的厂子合并、改组，搞专业化协作，不要搞成新的全能厂。有些重工业厂或军工厂，可以根据工艺相近的原则，与轻纺工业的厂子固定协作关系，上一条生

产线，搞零部件。不要一说发展消费品生产，就什么都想自己包下来，结果投资大、批量小、周期长。

改组、改造中，要认真研究企业的技术改造方向和产品方向，从各个方面落实措施。要抓好技术标准的制订工作，规定产品的批量、质量和能源、原材料消耗量，以及必要的技术设备条件，以法令形式公布。在一定期限内，凡是达到规定标准的，允许开业，允许继续生产；凡是达不到规定标准的，要停产整顿，服从改组。各部门、各行业应立即抽调人员，从重要产品入手，进行这项工作。把这项基础工作做好了，不仅有利于推进工业改组，而且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重复建设、重复生产。

整个工业都有改组和改造的任务。机械工业改组、改造的许多原则，也适用于其它工业。改组、改造是个很复杂的工作，势必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阻力，需要各地、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亲自抓这件事，协调和解决出现的各种矛盾，有所突破。

五、沿海与内地合理分工、发挥优势

现在世界上有个“南北对话”的问题，可以说，在我们国内也有个“东西对话”的问题。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西部内地比较起来要落后一些。如何使东西地区之间在经济上有个合理的分工，发挥所长，从而使全国整个经济发展得更快，这是长期规划必须考虑的问题。

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工业城市，有很多优势，一是靠海，交通方便；二是经营水平、管理水平、技术水平比较高，具有发展外贸的有利条件。许多沿海国家和地区，像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就是靠搞加工出口发展起来的。我们是个大国，内地占的比重大，从整个国家来说，不能靠装配加工立国。但是，像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以进养出的政策应放开一些，从国外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装配以后出口，逐步加大这方面的比重。这等于出口技术，出口劳动力，既扩大了就业，又增加了外汇收入。今后，我们要注意发挥沿海城市的这个优势，支持它多出口，把国内生产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要建立专厂、专车间，作为外贸出口基地，集中力量搞好出口商品的生产，提高档次，降低成本，参加国际竞争，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当然，内地也要利用自己的具体条件，努力生产传统的出口商品和发展一些新产品出口。

内地也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有丰富的原料，有广大的市场，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工业已初具规模，而且还有不少先进的设备，应当把它的作用发挥出来。在沿海工业逐步转向加工出口产品，转向高精尖产品的同时，要把一般产品逐步让出来由内地生产。目前原料短缺的一般产品的生产能力，沿海地区不要再扩大了。比如上海、天津、青岛就不要再发展一般棉纱的生产能力了，不能粗粮、细粮都吃掉，总要让出一部分来给别人吃。作为内地来说，不能一说发挥优势，有烟叶的就大办烟厂，有棉花的就大办棉纺厂，造成沿海生产优质产品的工

厂原料不足，停工停产。这个转变过程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步子一下迈得太快了不行。从目前看，内地的原料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任务，调给沿海。超过计划的部分，双方可以协商，调节税利或返还一部分产品给内地。

近期内，沿海地区会发展得快一些，从长远看，更大的潜力在于内地。内地工业要赶上来，把潜力挖掘出来，很现实的一个办法，是向沿海学习，特别是要把上海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移植到内地来。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上海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有长期的技术积累。拿上海来说，它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经济效果都比全国高得多。现在上海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一千六百美元，比天津多七百二十美元，比北京多六百九十美元。资金利润率，上海为百分之五十七点六，为北京、天津的两倍多，广州的四倍多，武汉的六倍。如果全国各重要城市接近或达到上海同行业的水平，固定资产不变，产值和税利就会成倍地提高。

学习现代化技术，是不是一定要学外国的最新技术呢？新技术应该学，但也要具体分析，要根据我们的吸收和消化能力，循序而进。现在很多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多采用适用技术，不一定都引进最先进的。对中国内地来说，上海的许多技术就是适用技术。内地的工厂不一定都要到外国去买最先进的技术。把上海的技术学到手，比起学外国，更现实、更接近一些。我们的技术应该是从东向西逐步转移。外国的先进技术，一般地说，可以先在上海，以及天津、广州这些基础较好的沿海城市消化，再逐步向内地的大、中城市推广，这是一个比较妥善的办法。

学上海，不光是学技术，硬件、软件都要学，尤其要学经营管理。工业可以学，商业等其它行业也可以学。江苏纺织行业学上海，湖北按行业请上海的老工人帮助，都收到了好效果。学习和移植上海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应贯彻到日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去，持久地进行，不要搞突击，一拥而上，纷纷派人到上海去，搞形式主义，这样是学不到实实在在的东西的，上海也吃不消。请国家经委和有关部门研究组织一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广上海等地的经验。

沿海和内地之间，要发展各种经济联系：一是联合的办法。主要是搞技术扩散。上海等沿海城市的一些产品，有市场，但在当地扩大生产又没有条件，可利用内地的厂房、劳力、原料，由沿海城市出技术，搞联营，办分厂。二是搞技术转让、技术输出。宜昌有个棉纺厂，上海派出技术人员给他们设计、安装、指导，实行利润提成，两年提完，上海保证它第一年一等品率达到百分之八十。这是个办法。三是搞人才输出。上海等地的退休老工人，是很宝贵的财富，要有计划地请到内地来帮助工作。四是咨询服务。上海可以建立咨询服务公司，在经营上、技术上为内地服务。总之，沿海对内地，有技术输出、知识输出、人才输出的任务，这是沿海地区应该做的贡献。

在生产的布局上，除了注意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以外，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还要考虑国防建设的要求，有计划地使军工生产向内地转移。一

六、发挥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现在的问题是，要把科学技术的作用切实发挥出来，使它真正成为提高经济效果、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

国外有一种评论：中国在某些难度很大的尖端技术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攻坚能力；但在大批量的质优价廉产品的生产技术方面，却相当落后，水平很低。这种看法，值得我们重视。我们要注意克服科技工作和经济工作相互脱节的毛病。在长远规划中，要把经济、科技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考虑。

科学技术，门类很多，应当为各个方面服务，但重点应当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为解决国民经济中具有重大经济效果的问题服务。基础研究不能忽视，但大量的应当是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开辟性的工作要做，但要特别重视世界上已经有了的、适合于我国情况的生产技术。要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充分发挥独创精神，在应用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科研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研究确定今后的科研任务，选好课题。

当前，要着重抓好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工作。我们有许多单项的科研成果，不能配套应用；许多新产品，长期停留在样品、礼品、展品阶段，不能大量投产；不少新技术，长期局限在军工生产中，没有及时普及到民用产品的生产中来；引进的一些新技术，没有很好消化吸收，加以推广。今后，要组织好科学技术由实验室向工厂转移，军用向民用转移，国外向国内转移。

要做好科学技术的转移工作，需要逐步改革生产与科研的管理体制，采取不同的形式，加强科研部门同生产单位的联系。科研单位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各类应用研究所应当同企业挂钩。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建立研究所、研究小组，也可以按行业建立研究所。生产、设计、施工以及咨询等方面，可以由科研单位与生产单位订立各种经济合同，包括联产计酬的经济合同，进行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应该允许打破地区和部门的界限，谁服务得好就找谁订合同。还可以逐步向高级的形式发展，组成各种形式的科研生产联合体或公司。

在调整期间，必须大力加强职工的教育，尤其要加强对新工人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无论是关停并转的企业，还是生产任务饱满的企业，都要抓紧这项工作。同时，要编制各种技术规程和技术标准，加强技术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并且先行一步，做好下一阶段的技术论证和新产品的设计工作等。我们不仅要看到当前，而且要看到下一步的发展，搞好科研，搞好智力开发。现在抓得越紧，将来就越主动，我们就能在新的基础上前进。

七、节约资金、用好外资

建设资金不足，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困难之一。我们不能靠压缩消费基金来提高积累率，主要靠增产节约，靠现有企业挖掘潜力，提供积累。这方面涉及的问

题很多。这里着重讲一下节减流动资金的问题。

马克思说过："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注意了投入资金的不断增长，但却极为忽视资金使用效率的不断提高。去年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达到三千亿元以上，但周转慢，效率差。据统计，一九八○年国营工业流动资金周转的次数为三点一次，比历史上最好水平一九六五年的四点八次低得多；国营商业内贸部分流动资金周转次数为二点三次，也没有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二点六次。各部门占用流动资金过多，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于库存物资长期积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经济体制不合理的综合反映。我们要争取在几年内节减流动资金百分之十左右。这要从宏观经济决策、计划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等方面，采取措施来解决。对企业来说，要逐步推行固定资产有偿使用、流动资金全额付息的制度，调整税率和利率，使企业既有内在动力，又有外部压力，自觉地节约使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这项措施抓好了，如果一年能省下流动资金二三百亿元，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合理利用外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吃了一些亏，应当吸取教训，但不能因噎废食。第三世界有些国家成为中等发达的国家，除了发石油财的以外，没有哪个不利用外资的。在坚持自力更生的条件下，合理地使用外资，特别是使用一些低息的、带援助性质的贷款，弥补我国资金的不足，对四化建设是有利的。

利用外资，一定要细致地谨慎地进行可行性研究，不能仓促拍板，盲目进行。低利的外资主要用在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利用外资开发能源，既可以缓和能源紧张的状况，又有一定偿还能力，要下决心干这件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海外协力基金以及一些国家政府借给我们的低息贷款，要考虑重点用于这些项目。当然，轻纺工业周转快，换汇多，也可以用外资，以进养出。过去对国外资金没有同需要国内配套的资金统一起来考虑，往往国内的钱都安排完了，使引进的项目无法配套，条件优惠的外资无法利用。今后，在制订年度计划、长远规划中，要对国内、国外资金通盘考虑，统一安排，使已有的急需的建设项目尽快建成投产，不要有一笔外资就另上一个新项目。用好外资是个新课题，尤其对大笔贷款的使用，要有专门机构组织专家进行研究。

八、开辟就业的新门路

今后，我们不搞很多新的基本建设项目了，这就给就业增加了困难。在安排城镇劳动力就业问题上，也要考虑开辟新门路：改变劳动力结构，发展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包括商业、金融、通讯、城市公用事业、科研教育、文化娱乐、旅游等，也就是国外所说的"第三产业"。

从世界上看，工业发达的国家，由于他们生产力水平比较高，国民收入比较

多，“第三产业”发展很快。一些国家“第三产业”占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短期内达不到这么大的比例，但就我们现在这个家底，服务行业应该容纳比现在更多的人。解放初，上海、天津的工业就那么一点，但在服务行业中养活了很多人。后来“骨头”与“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就业的路子越走越窄。现在，一方面城市很多人等待就业，另一方面服务业很少，人民生活很不方便，需要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事业和劳动密集行业。在长远规划和城市规划中，要作为专题进行研究。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把它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发展商业、手工业和其它服务行业，要采取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安排就业的主要方向。各级地方政府要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和本地区的实际需要，制订发展集体、个体经济的规划，解决它们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包括资金筹集、货源供应、招工带徒、产品价格、工资劳保等方面的政策和管理集体、个体经济的条例。经营方式也应灵活多样。商业、服务行业，过于集中，吃大锅饭，不可能有好的服务质量。东欧有的国家，把基层零售业包给或租给个人经营，据说效果不错。辽宁省营口县把浴室包给职工经营，效果较好。黑龙江省宾县供销社把长期亏损的两个门市部，包给售货员个人经营，他们想尽办法搞好服务，节约开支，很快扭亏为盈。可以考虑，先把小型的零售商店和服务网点逐步办成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有的可以办成夫妻店。要经过试点，逐步在面上推开。

九、继续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存在的比例失调、产需脱节、效益低、浪费大等问题，是同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分不开的。要显著地提高整个经济活动的效果，除了要有一个正确的建设方针、合理的经济结构以外，还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一定要坚定而又稳妥地把这件关系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大事抓好。

改革经济体制，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要改变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状况，把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下放给企业；改变单一的计划调节，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把经济手段和行政干预结合起来，主要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法规来管理经济，等等。根据改革的总方向，我们对改革的脉络和轮廓有过一些设想：要逐步实行党政企分工，权力下放，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职工民主管理的权力；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建立行业组织，把企业合理组织起来；改变封闭的少渠道、多环节的商品流通体系，建立多渠道、少环节、开放的商品流通市场；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等。与这些改革相配合，需要在计划、财政、税收、价格、银行、商业、物资、外贸和劳动工资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的方向

和内容，是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的。随着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改革的步骤可能会有所变动，但改革的总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两年来，我们对经济体制作了一些初步改革。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开展了市场调节；贯彻“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的方针，发展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和协作；进行了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家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的试点；实行工贸结合，发展外贸出口；以及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的存在等。这些改革从生产、分配、流通以及所有制等方面，开始突破现行经济体制的束缚，对推动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为今后的改革探索了道路。总的来看，改革的方向是对的，效果是好的。

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以后，我们对改革的部署相应地作了一些改变，这是必要的。在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难以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总的改革步子比原来设想的要放慢一些，改革要服从调整。但是，也要看到改革对调整的促进作用，许多调整措施必须与改革配合才能奏效，有些改革是与调整密不可分的，这些有利于调整的改革就应当积极进行。从长远看，我国经济要稳定协调地发展，还有赖于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经济体制。因此，强调调整，决不意味着改革的停顿，而是要以调整为中心，使调整和改革相辅而行。

为了巩固改革的成果，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同时也为今后的改革创造条件，在微观经济搞活以后，必须相应地研究如何加强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指导。当前，在经济生活中重复建设、盲目生产、以小挤大的现象有所发展，滥发奖金、补贴的情况比较严重。解决这些问题，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是采取堵死的办法，还是采取疏导的办法？是把微观经济的决策权统统收上来，还是在搞活的同时加强管理？如果采取前一种办法，就会回到“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老路上去，这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应当采取新的办法、走新的路子，使微观经济的活动符合宏观决策的要求。

一是要发挥物价、税收、利率等经济杠杆的作用。在调整期间，价格体系不可能进行全面调整，但逐年进行一些小的调整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在物价不能大动的情况下，要更多地发挥税收的作用。税收的牵动面比较小，但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却相当大。应当利用税收来控制盲目建设，限制长线产品的生产，促进工业改组，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鞭策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银行也要通过发放贷款、调整利率，使企业的活动符合经济调整的要求。

二是要通过经济法规来制约。我们提倡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并不是不要行政干预。这里所说的行政干预，除了采用指令性指标的办法来管理和控制微观经济活动以外，大量的还是通过经济法规和规章制度来管理，以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要抓紧做好经济立法工作，否则改革就难以前进，取得的成果也很难巩固。

三是要加强经济监督，发挥工商行政、统计、物价、税务、银行、财政等机构对企业的监督作用。

最近，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了当前企业改革的问题，提出了几条意见：第一，六千个国营企业已实行的利润留成办法不再变动，不能有利就干，不利就退出。试点办法要继续搞好，进一步完善。第二，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选择若干城市，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按行业利润留成的办法。上海的冶金、纺织系统已经这样做了，有利于解决苦乐不均的问题。这是企业利润留成办法的进一步发展，是经济联合的必然趋势。第三，对亏损企业，原则上都可以实行亏损包干的办法，超亏不补，减亏留用，两三年不变，以推动企业发挥主动性、积极性，扭亏增盈，战胜困难。第四，对大量分散的小企业，包括零售商业、服务行业，可以考虑提早实行上交所得税、自负盈亏的办法。这样，有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搞好经营管理，改进服务工作，增加国家和企业的收入。此外，还要注意发展个体经济，允许个人经营小型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客货运输业、房屋修缮业等。在我国国营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应当允许个体经营者招少量的帮手和学徒。这对发展生产，活跃市场，满足人民需要，扩大就业，都是有好处的。

关于改革的部署，在“六五”期间，前两三年应着重巩固、完善已有的改革，抓好新的改革的试点，总结经验，培训干部，做好全面改革的各项准备和基础工作。以后根据经济调整的情况，继续推进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体制改革办公室草拟了《关于调整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在大家讨论修改以后，还要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意见，然后制订具体方案，予以实施。

以上九个问题，是一些初步的考虑。今天提出来是为了征求意见，进行酝酿。有些重要问题还没有包括进去，比如加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搞好综合平衡的问题，还有发展农业、发展教育事业的问题，都很重要，需要另作研究。以上讲的概括起来就是：稳定经济，调整结构；依靠老厂，挖潜改造；改革体制，提高效益。这条路子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按这条路子走，我认为是有希望的。

对石油部年产一亿吨原油包干[1]的批语和指示

一九八一年四月至五月

一、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石油部《关于稳住一亿吨原油年产量需增加的钻井和建设工作量的报告》上批示："请催一下秋里同志，并尽快落实。可否考虑在此基础上一包三年。"

二、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听取康世恩《关于石油部一亿吨原油年产量包干的具体方案》汇报后指出："石油部一亿吨原油年产量包干，一包五年，包到一九八五年。"国务院随后正式批准实施这个方案。

注 释

1．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石油勘探投资和勘探工作量大大减少，储量增长速度跟不上原油产量增长速度，老油田自然递减加快，油田调整和增产措施的资金受到限制，1980年全国原油产量1.05亿吨，较1979年的1.06亿吨有所下降。1981年国民经济调整，国家大幅度压缩基建投资，给石油部的投资17亿元，仅为1980年的一半，石油勘探开发资金严重不足。当时石油部领导给国务院写信，要求增加投资，不然1981年原油产量将从1亿吨降到8700万吨。这样下去，势必再次出现原油进口的局面。国务院领导见信后，深感问题严重，赵紫阳第二天就在研究1981年计划的会议上，专门听取汇报，决定给石油部增加5亿元投资。但要保住年产原油1亿吨，还有很大困难。赵紫阳作出上述批示后，1981年6月石油工业原油年产量1亿吨包干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出台。石油工业实行1亿吨包干政策后，扩大了石油企业自主权，增强了企业活力，解决了石油勘探开发资金严重不足的困难。1981年到1985年共筹集石油勘探开发基金117.3亿元，相当于国家投资的93%，石油勘探工作量第六个五年计划比第五个计划增加了54%，1983年起出现储量增长幅度高于产量增长幅度的新局面。全国原油稳定1亿吨的基础上，逐年增长，1983年原油产量突破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达到1.25亿吨，从1979年世界第九位上升为第六位。1亿吨年产原油包干政策是石油工业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开创了工业战线行业改革的先河，使中国石油工业走出困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给四川大学陈力[1]同志的信

一九八一年五月六日

陈力同志：

你的论文我已阅过。我认为你提出的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在改革初期阶段，更应该区别不同企业，实行多种经营管理办法。你的论文，我将批给中央财经小组所属的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薛暮桥[2]同志）进行讨论，讨论的意见可由他们告你。

近两个月，因我到外地出差两次，加上出国等原因，你的文章看得晚了，至今才给你复信，希谅！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五月六日

注 释

1．陈力（1930—），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硕士生导师。1981年初，她撰写论文提出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分类管理、抓大放小的思想和建议，获得中央领导和读者的广泛赞同。

2．薛暮桥（1904—2005），江苏无锡人。时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体改办顾问。曾任政务院财经委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家体改委顾问。

关于煤炭开发的两个批语

一九八一年五月九日、六月二十日

对于余秋里[1]一九八一年五月三日报告[2]的批语

看了秋里同志的报告，很令人高兴。总得要振奋精神，才能有所作为。综合采煤机的问题，同意秋里同志的意见，请煤炭部、能源委同有关部门研究落实。

另据煤炭部报告，如让他们出口四十万吨精煤，就可买回井下安全的一套技术，整个煤炭生产的安全工作就会有大的改观，亦请计委、能源委同有关部门研究。

印发国务院常务会议，各委及有关部。

赵紫阳

五月九日

对梅行[3]一封信[4]的批语

梅行同志的意见很好。连同秋里同志的报告印发财经小组、计委、建委、经委、能源委、机械委、煤炭部、电力部、经济技术中心。秋里同志的报告，对开发山西（包括河南豫西）煤炭提出了很重要的方针和设想。这件事，关系着今后国民经济建设战略部署的全局。应集中力量把研究、论证、规划进一步深化、具体，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开发方案。我已将秋里同志报告批给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及马洪[5]同志，请他组织专家讨论论证。请财经小组及各有关同志都关心一下这件大事，认真研究一下。

赵紫阳

六月二十日

注 释

1．余秋里（1914—1999），江西吉安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能源委主任。曾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中顾委常委。

2．余秋里在该报告中提出了发展煤炭生产要坚持机械化方向、提高煤矿机械化水平的建

议。

3．梅行（1919—2000），江苏张家港人。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曾任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周恩来总理秘书，中央办公厅财经组组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4．梅行在1981年6月18日一封信中同意余秋里提出的方针性意见，同时提出了加强规划、节约投资和发挥投资效果、研究国内机械制造能力等七条建议。

5．马洪（1920—2007），原名牛仁权，山西定襄人。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曾任国家计委委员、秘书长，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化工部第一研究院院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长，国家机械委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调整时期经济工作的一些设想*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与马洪的一次谈话。

一、第六个五年计划主要搞经济的调整，调整时期速度不可能高，但也不能没有速度。没有一定的速度，整个经济就会萎缩。第七个五年计划的速度也不可能太快，不能要求“七五”时期也像前次调整以后那样，有很高的速度。这是因为，这次调整同1962年那次调整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注意了和1962年那次调整相同的东西，而对于和1962年不同的东西，研究不够。采用1962年那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全部问题，是不可能的。要研究这次调整同1962年那次调整的不同之点。

二、“六五”期间的速度不能太快，但不能没有一定的速度。1962年那次调整不但没有速度，而且有两年是负数。今天国民经济的发展能不能有负数？总的来讲，不能有负数。如果这样，问题就会很大。因为工人减不下去，农产品价格又提上来了，轻工业由于农产品的提价和进口原料比重的增加，即使有一定速度，利润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增长。所以，整个工业没有一定的速度不行。不仅如此，还应当看到，1962年那次调整，“小土群”[1]和许多“摊子”都被撤销掉了，很多人因撤了摊子回农村去了，不用国家再发给工资，速度虽然低，甚至是负数，但背上的包袱被甩掉了。这次调整，虽然也搞关停并转，但工厂的工人一个都没有减少，都得照发工资，奖金少发，还有意见；同时，还要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工厂关的很少，关了的，设备要维护，工人工资照拿；没有关的，人和设备也都闲着没事干，照样开支各种费用。还有许多材料、设备在积压，基建工人在窝工，背上还背着这个大包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没有一定的速度不行。不可能有高速度，但也不能没有一定的速度。否则就不可能保持经济的稳定。现在3%的速度看来是低了些，如果能争取到4—5%的速度，那就好了。

三、1962年那次调整，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到1964、1965年速度一下子就上去了，1964年达到17.5%，1965年达到20.4%，1966年达到17.3%。这当然带有一定的恢复性质；而且在那些年代，石油生产逐年有所增长，这对于解救当时的经济困难，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如果期望在“六五”期间速度低些，而到“七五”时速度就会一下子搞上去，这种想法不符合实际。现在没有什么恢复问题，而且许多情况，如工人工资、奖金增多，农产品价格提高，能源增长不上去，甚至

还会下降。这种情况，同1962年那次调整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再要求那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的。以上两种情况都要向党内和党外、干部和人民说清楚，使大家有个底，有个奔头。

四、计委的预测，今后四年，每年赤字100亿元；财政部算的账赤字更多，财政没有出路，这个问题要很好研究。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进一步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暂时冻结资金和物价，这是必要的，正确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怎样使经济活动起来，使财政摆脱困难。只有经济活动起来了，才能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经济不活动起来，不增加生产，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最近抓了一下消费品的生产，收到一些效益。但重工业部门大量的工人没有事干，设备闲着，基建队伍很多人在窝工，许多设备搁在仓库里，许多材料在积压，还要发工资，出保管费、维护费。总之，只在消耗，而不能创造出新的财富。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除主要抓重工业的调整、为日用消费品服务外，能不能从银行拿出10亿、20亿、30亿元来周转一下，使经济活动起来？

五、目前，农业生产形势喜人，日用、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也搞得不错，要继续大力抓下去。要使“六五”期间的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重工业。能源工业我们是要尽一切力量去发展的，最成问题的是机械工业和冶金工业。根据当前的能源供应量，在搞好调整使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的条件下，我们的机械工业、冶金工业有没有出路呢？能否使他们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而避免负数呢？我想是有可能的，应当努力争取做到。

六、机械工业，有大量的制造能力在那里闲着。现在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只占用机械制造能力的15%—20%，余下的制造能力如何利用？为什么不可以有计划地预先安排一些大型电站设备、采煤设备等，由国家贷款组织生产，因为这些设备生产周期长，不是在需要时一下子就能制造出来的。现在安排生产，过几年总是需要的。尤其是对那些能耗高、效率低的锅炉，要下决心进行技术改造，作出规划，今年改多少，明年改多少，五年改多少，相应地要回炉多少，都应列入计划之内。能不能在十年之内基本上把这类锅炉全部都改造成为能耗低、效率高的锅炉？必要时，可以引进样机。

七、冶金工业，如果能够采取有力措施：（1）降低铁与钢之比；（2）提高钢材的成材率；（3）提高质量，提高合金钢的比重；（4）增加品种规格。那么，即使分配的能源有所减少，也能够获得一定的增长速度。

八、在上述这些方面，我们确实要想些办法，不能把我们的重工业看成是包袱，而应当看成是宝贝，想方设法使它活起来。经济搞活了，财政赤字也就可以解决。怎样使经济活起来，使生产活起来，把现在看起来是消极的东西变成为积极的东西，这是当前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速度虽然不能高，但也要有一定的速度，就要在这方面想办法，不然轻工业也不能较长时期维持现在这样的速度。

九、货币流通量和拥有的实物量的比例怎样才是合理的？过去是1：8为最好，1：7也好，1：6以下市场上就有点紧张了。到了1：5以下，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我们过去都是按这个比例来估量经济形势的。这个比例，基本上是“一五”时

期的经验数据。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农业实行联产计酬的责任制，集市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工厂也有一部分产品实行自销，货币的流通量肯定比过去增多了，今天货币流通量和拥有的实物量这个比例，究竟应以多少为宜，要研究。

十、资金不足，怎么解决？有三个办法：一是发展生产，搞活经济；二是把人民消费基金的一部分转化为积累，就是要搞好储蓄，长期储蓄的利率要适当提高一点；三是利用外资。

十一、利用外资，这是中央已经定了的方针。外资一定要利用，问题是怎么用，用到哪里最合算。我们现在不会利用外资。有外资可以利用，这也是我们这次调整同1962年那次调整很大的不同之点。那时我们的国际环境，不但没有外资可以利用，而且苏联还向我们逼债。这次许多国家争着要借钱给我们，但我们用不出去，或者用得很不得当。要利用外资，就要付利息。付利息，对我们当然是个负担，但却可以把经济搞活，就好像抢救病人给输点血一样。

我主张开发煤炭工业也考虑利用一点外资，但用外资大量买外国的设备不行。这样做，不仅对目前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很不利，而且对将来我国工业的发展也不利。

十二、这次“决议”草案，对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作用问题，作了修改。我认为很好。这是我们今后进行经济改革的重要的指导思想。国民收入的分配，基本建设的投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石油、煤炭、重型机械、重要的金属、化工、建筑材料等等，不仅产品单一，而且重要，必须纳入国家统一的计划，由国家直接控制。与此相联系，大企业的自主权力，也不能过大。至于产品复杂的中小型企业，与市场联系比较密切，它们的自主权，则应当比大企业大一些。对这些企业，有的要实行包干，实行间接计划，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当然，不仅国家在制订计划时，而且大型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中，都应充分考虑市场的需要。

十三、对于余秋里同志提出的开发山西煤炭的重要方针，要抓紧进行论证。这个问题，过去就议论很久了，一直没有解决。这次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注 释

1．“小土群”指1958年大跃进期间为完成年产107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到处搞小高炉、土高炉和群众运动大炼钢铁的做法，造成了人力、财力、物力的极大浪费。

要在调整中把经济搞活*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五日

* 这是赵紫阳与薛暮桥、马洪、刘明夫、房维中、梅行、吕培俭、刘礼欣、邱晴、杨培新等的谈话要点。

一、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非常正确，否则经济稳定不下来。现在要冷静分析这次调整和一九六二年调整，有哪些不同之点。一九六二年是“小土群”、小高炉拆掉，基建下马，工人下乡，工资也就少发。现在是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不能解散，而且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进口的原料还涨了价，支出少不了。基建下马后，基建队伍窝工，机械工业闲着，物资积压在仓库，工人工资照发，只是节省了购买砖瓦灰砂石的货币投放。

上次调整，一九六四年就开始上三线建设。调整期间，必须进行必要的建设，积蓄新的力量。现在，如按一九六二年的办法，三四年内不能有新的建设。必须从国内找到新的资金，同时运用外资，进行必要的建设。

二、要想办法，从国内筹集资金。一九六二年农民购买力下降，大批工人下乡。这次城乡购买力增加，今后几年还会继续增加。企业的资金也多起来，渠道多，增加快。这是这次调整的有利条件。走老路，资金集中，钱就少。搞包干等办法，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钱就多。广西国营农场包干，就扭亏为盈。王光英说：遍地皆黄金。吃大锅饭，大家都不去捡。包干、自主权，企业、小组、个人实行经济责任制，潜力就能挖出来。现在预算内的钱在财政部，预算外的有五百多亿元。要是高度集中，钱不会有那么多。当然，钱用得不当，也不行。要调动企业积极性，给以经济利益，挖出潜力来。然后再用债券等方式，在不影响企业积极性的前提下，把钱聚拢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要研究。利润分散在许多企业里，依靠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把它集中起来，由财团在投资政策指导下使用。对企业，包干有负作用，但不包干负作用更大。要使企业积极起来，然后对其盲目性，实施经济管理。国家让它包干，一定程度的自负盈亏，独立核算。

企业内部，工人收入高低要和劳动成果联系起来。现在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整顿离不开改革。现在不同于解放初期，光讲政治，不讲经济利益，整顿不下去。现在有些改革不搞，利润就下降。云南有个企业，原来实行包干，年赚五十万元；现在不包了，亏损六十万元。企业包干，怎么

包？试点时，企业认为有利就包，不利就不包。应改变制度，有奖有罚，不试不行，企业不改善经营管理不行。改革，举棋不定不行，步子稳一点可以。过去我们集中了又分散，分散了又集中，几次循环，说明单集中、单分散都不行。假如统收统支再搞下去，不出两年，还会要求改革。这是规律。联合国调查报告，说我们分散就比例失调，解决失调又集中。这次有点不同，既讲经济规律，又提改革。过去讲集中没有解决积极性问题，搞分散助长盲目性。改革的步子要稳，但要坚决走出一条路来。如果没有企业包干，去年财政收入不到一千亿元，恐怕九百亿元也达不到。企业因农产品提价，增加成本，又对职工发各种补贴，又让增加了许多人，活儿又不多。正是因为包干，才有现在的财政收入。

参加世界银行工作的人讲，日本战后初期靠什么，很大部分是储蓄，现在储蓄也还是主要资金来源。存一天也是好的。世界各国都发债券筹资，这对投资者有利。而我们只靠财政搞收入，然后量入为出，搞点建设。企业有自有资金、折旧、发展基金，过去一时往上收，一时往下放。今后是否既给企业权利，又对资金使用于哪些方面作出规定，并从经济上加以引导。过去战争年代我们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今后我们是否实行分权以调动企业积极性，从减少浪费中挖潜，使之变成财富。然后在承认各单位利益的基础上，由银行用各种办法把资金集中起来，用于主要方面。银行储蓄使待用资金转变为长期资金，由消费基金转为建设资金。经济办法就要支付较高利息。储蓄、债券，要政治动员加较高利息。要讲爱国储蓄，四化储蓄。提倡节约，转变社会风气。但银行吸收存款、发行债券的利率也要提高，如存放利率倒挂，差额可由财政补贴。贷款利息可考虑提高。财政因此少收的利润，可由银行多上缴来弥补。财政暂不要发公债，还是由银行发行债券。债券由总行发，地方不要发，广东、福建例外。

问题在于银行工作要改进。中国的银行不适应新的情况。世界银行的人说我们计划水平低。他们确定的基建项目，百分之九十五是成功的，采取四大步骤：（1）精挑细选。（2）彻底核算，用影子价格。有些企业赚钱，但不一定创造多少剩余价值，一定要用真实价值彻底算一算。（3）严格审查。（4）系统分析。还要审查企业负责人有无能力。项目从审查到确定，花两年时间。世界银行有几千个专家，由审查的人负经济责任。我们的计委、建委管建设，但没有经济责任。

以后银行搞建设，要让这些花钱的人负责收回投资。我们的银行要吸收人才，也可以委托设计院帮助审查。要规定计委、银行各负什么责任。有些项目，计委不管，由银行择优。国家规定方向，银行落实、监督，保证回收。世界银行的放款都能回收。日本的银行也这样。我们的银行要从下列三方面改进：（1）吸收存款，日本的银行狠下功夫，挨家挨户去吸收，而我们储蓄还要排队，农村储蓄无门。今后储蓄、保险都要发展。银行的机构和工作都要加强。（2）今后对建设项目，银行要审查，银行要负责。（3）银行还要学会经营运转，现在我们的银行是靠存款利息低赚钱。

苏联没有接受银行是社会化大生产最灵活的调节机构这个思想。社会化大生

产，商品生产，离不了银行。城乡钱多，可以办储蓄，还可以试办紧俏商品先交钱后给货。国家按交钱先后次序交货。第二年才能给货的，可付给利息。这就可以清除排队，消除特权。倒卖，原来就有，不要怕。

三、财政地方包干，负作用是助长了地方所有制，许多政策不好办。已经包了的，要收回一点，即基建不包干。全国的基建钱太少。水利经费要全国统一使用，否则华北水源问题，黄河防汛，长江防汛，怎么办？基建支出要统一，财力集中一点。地方只包行政、教育、城建。包仍然要包。一部分省，广东、福建、江苏、浙江、黑龙江要求包下去。要承认，财政包干以后，行政费用确实是节约了。

四、要采取措施，消除财政赤字。只想依靠集中，把预算外的资金纳人财政，不行。（1）要搞烟酒专卖，靠提价和增加一级烟，二三年后可增收五十亿元。混合烟今年试销一百万箱，逐步扩大。（2）税收，整顿企业，可增加五十亿元。（3）正常增加每年五十亿元。（4）多进口化纤、少进口棉花，降化纤布价格，提棉布价格，可增收二十亿到五十亿元。这样五年增收一千亿元，平均每年增收二百亿元，是可能的。不要去动预算外资金。预算外资金由银行用经济办法动员。让企业把潜力挖出来，然后用计划指导、政府干预、银行吸收、协商筹款等办法引导使用于需要的方面。现在下面提的意见是："国库券买了，借给中央财政的钱也拿了，剩下的钱为什么还不让我们用？"

五、利用外资问题，不能形而上学，走极端，一会儿用，一会儿不用。如不能用，世界银行怎么会放那么多款？一九七八年利用外资失败在哪里？为什么由企业直接利用外资的来料加工和中外合营就搞得好？用于资源开发，没有多大危险。铜，我们并不多，还账给他们一半，这不行。资源丰富的，可以。计委一个工程师提工业靠技术，国家要有优势产业。我们要讲计划平衡，立足于国内，但也要讲扬长避短。要有经济支柱，经济优势。某些资源，如煤炭是优势。将来海上可能产油几千万、上一亿吨，但陆上产油可能下降，全国保持年产一亿二三千万吨。煤炭比较可靠。钨也可以加工出口。可以利用外资，是这次调整中的有利条件。

六、不可能在生产萎缩的情况下解决财政问题。开支减少，收入可能减得更多，过几年又欠很大一笔账。生产不想些办法，不仅将来没有新速度，而且原有摊子也会消耗殆尽。现在工业固定资产三四千亿元，消耗下去，维持都困难，更没有新速度。不仅化工、冶金、机械，连轻纺工业也这样。

因此，调整期间，要有设备更新和必要的建设。钱、人、设备都是有的。基建，并不会增加多少投放。基建工人窝工、机械工人窝工、物资积压，全是现成的，就增加一点购买砖瓦灰砂石的货币支出来启动。要利用调整，把企业的设备更新搞起来，把重工业搞活，把经济搞活。设备更新在西方国家，是生产衰退还是上升的标志。四川宜宾金属电解厂，从银行贷三百万元更新设备，两年已还款二百二十万元，一年增八十万元利润，还节省了大量电力。设备更新，把机械工业搞活，并使工厂有新的水平，使能源、原材料消耗降低。旧设备换下来，作为

废钢铁利用，可缓一口气。

要讲生财、聚财、用财之道。聚财，要明确就是依靠银行集中预算外各种资金。用财之道，就是讲开发煤炭、交通，由银行组织银团，搞三十亿元基金。用世界银行贷款办法办，不纳入预算，不搞成拨款。煤炭不怕多，多了可以出口。中国煤出口，条件好，因为离缺煤国家和地区近，日本、东南亚和港、台都缺煤。澳、美、非、加拿大有煤，但距离较远。其次是设备更新先配合节约能源，改烧油为烧煤。然后是机械工业更新换代。这仅是一些想法。请经济研究中心议出结果，提出建议。

对《济南石油化工厂财务混乱惊人》一文的批语*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

耀邦同志：

建议将济南化工厂的材料印发给省、市、区座谈会一阅。

目前工业企业财政上缴日益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计划不能完成，同目前许多企业财务管理混乱，财经纪律废弛，有很大关系。越是大的，赢利多的企业，往往这方面的问题越严重。

很有必要在调整、改革的同时，当前突出抓一下对企业的整顿。把整顿财务管理，遵守财政制度，严肃财经纪律，作为企业整顿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方面潜力很大，而且见效会快。据估计，如全党认识一致，大力去抓，留有余地的估计，也可增加财政收入几十亿元。请酌！[1]

赵紫阳

七月三日

注 释

1．胡耀邦在此件上批示："连同紫阳同志的意见，一起印发。胡耀邦　七月三日

对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

一九八一年六月、七月

* 这些意见是根据赵紫阳1981年6、7月间几次谈话的内容综合而成的。

一、国民收入的分配，基本建设的投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石油、煤炭、重型机械、重要的金属、化工、建筑材料等等，不仅产品单一，而且重要，必须纳入国家统一的计划，由国家直接控制。与此相联系，大企业的自主权力，也不能过大。至于产品复杂的中小型企业，与市场联系比较密切，它们的自主权，则应当比大企业大一些。对这些企业，有的要实行包干，实行间接计划，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当然，不仅国家在制订计划时，而且大型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中，都应充分考虑市场的需要。

二、整顿企业是挖掘企业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收入，减轻财政困难最现实的办法。从国家经委开始，各级经委一定要真正把企业整顿工作抓起来。最近听说有些企业相当混乱，有的违法乱纪。要与企业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是对的，但有的不是靠搞好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果，而是搞转嫁负担，化大公为小公，损害国家利益。企业的正当经济利益，一定要保证用正当的方法、正当的手段去取得。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给企业以经济利益，但同时必须进行国家监督，反对违法乱纪。现在有的企业领导人，不去教育工人认识全局利益，而是一起设法对付国家，国家有什么样政策，他就有什么样办法对付国家，这样会走向反面的。要把这些问题作为整顿企业的内容。整顿企业要和推行经济责任制同步搞。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谋取经济利益，决不允许化大公为小公，违法乱纪，弄虚作假。现在要注意这种倾向。要反对那种不顾国家利益、脱离国家监督、搞本位主义的倾向。不注意这些东西，资本主义社会里那套用来对付国家的东西都来了。总的是两条：一是实行包干，按劳分配；一是加强监督，制止本位主义、弄虚作假、违法乱纪。讲经济责任制，就是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但不注意解决上面这些问题，“吃大锅饭”的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讲包干，按劳分配，就要克服上面讲的这种倾向。

袁宝华[1]同志说，整顿企业的“牛鼻子”在搞好企业的领导班子，把那些造反起家、派性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清出领导班子，然后逐步使企业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意见是对的。

工厂的按劳分配怎么搞？现在农村搞了联产责任制，形势有很大变化。为什

么工业花的钱不少，却起不了大的作用？我在天津就讲了这个问题，这是工业上一个大问题。在工厂，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没有和责任制结合起来。政治思想工作也要和按劳分配结合起来。袁宝华同志讲了按劳分配五种办法（注：1、计件工资，2、浮动工资，3、超额奖，4、按利润比例提成，5、类似农村联产责任制的新方式），还可以考虑试行包干的办法。包干是分级核算，一定程度的独立核算，一定程度的自负盈亏，这个办法简而易行，又比较明确。什么样的企业应采取这一办法，如何试点、推广，要具体研究，总结经验。

三、积极开发煤炭，特别要首先集中力量开发山西的煤炭，因为那里条件最好，花钱少，收效快。秋里同志作了调查，有一个报告，提了很多好的方针性意见。每个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都有“支柱”。我国煤炭资源很丰富，煤炭可以作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因此，开发煤炭问题是个经济战略问题。

开发煤炭可以利用外资，但主要还是靠自己。要从国内挤点资金出来；要自己制造设备，包括采掘、提升、洗选、运输、发电、煤炭化工等等设备，以此提高我国机械工业的组织水平和制造能力。对开发山西煤炭应有个综合规划，并与开发全国煤炭的综合规划统一考虑，与开发全国能源的综合规划统一考虑。

当然，煤炭以及整个能源的节约工作决不能放松。近期内，必须以节能为主。从长远考虑，积极勘探和开发煤炭、石油资源，充分利用水力发电，充分利用低质煤发电，是个战略性措施。

总之，能源的开发及合理利用，应作为我国实现四化的一个战略重点。

四、我国现在的物价很不合理，必须逐步调整。改革经济体制，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要的一条是价格问题。从长远和全局看，价格体系不改革，整个的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前进。

但是，在理论价格没有搞清楚以前，在没有搞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全面的改革方案以前，在经济局势没有确实稳定和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没有完全消除以前，物价不能大动。物价怎么动，要讲究战略战术。考虑物价问题不仅要从经济上着眼，而且要重视政治因素。调价特别是提价一定要谨慎，没有全局观点，不作全盘考虑，零敲碎打，必然改不好，甚至要引起很大的问题。

最近两年，物价以稳定为主，或者说是基本不动，只调整个别非常不合理又明显影响生产的商品价格。应当看到，稳定经济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物价刚刚稳住，如果搞得不好，会引起思想混乱，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不利。少数产品的价格，调整的步子也不能大，宁肯不足，不要过头；不足的可以继续调，过了头就难以退回。凡是影响人民生活的主要商品，继续实行财政补贴办法，决不能让人民群众吃亏，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城市凭证供应副食品的制度不能取消，以保证低收入群众的生活必需。在生产没有发展起来以前，平价定量供应，至少十年不变。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水平，至少稳定三年到五年。对农民的派购任务不能取消。穷困的地区，经过一两年比较富起来了，也要实行派购，不然，国家负担不起。

多进口化纤，少进口棉花；降低化纤布的价格，提高棉布的价格，要做通盘考虑。煤炭、木材的价格怎么调，要先研究妥善办法。

注释

1．袁宝华（1916—），河南南召人。时任国家经委主任。曾任重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冶金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物资总局局长，物资管理部部长，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的思想要解放*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三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听取进出口委汇报会议上的发言。

我觉得，我们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在对外经济往来领域中思想解放最差。（谷牧[1]同志：对。）这也是多年来的传统观念造成的。应该怎么理解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和贸易完全是两码事。不等于说进口东西越少，越是自力更生。完全靠借债生活，依赖外国，当然不行，但是，以我们之所长补我们之所短，这完全是正常的，这就是自力更生。日本资源有困难，但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优点，克服资源缺乏的缺点，这也是自力更生。中国跟日本完全不同，但我们也必须用我们的长处去克服我们的短处。今后中国经济建设走什么道路？是不是还要走基本上封闭的道路，自给自足的道路？这个问题，在党内没有解决。当然，去年在外贸体制改革中，由于没有经验，也确实出了一点乱子，但这仅仅是局部的东西，从总的方面来说，中国对外关系还是应该大大开放，现在是刚刚开了一点门。这是个基本方针，如果这个基本方针不定，就没有方向了。我们自己有很多优点，由于我们认识上的原因，组织上的原因，还没有能够发挥。不扬长就扬短了。比如国际市场，我们有什么地位？一年两次交易会，这本身就是封闭式的方针，世界上很多市场对我们来说是空白。

进出口委这个《对外经济贸易工作汇报提纲》是好的。基本观点，大政方针，国务院都议论过，我说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出口发挥优势，究竟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在这么几个方面：

（1）资源。当然，很稀有的金属要谨慎。我们的王牌主要是煤炭。如果我们石油的情况出现一个比较好的情况，还是出口石油好。但从十年、二十年来说，中国的煤炭是个好东西。出一千五百万吨比较少，如果出五千万吨煤炭，就可观了。煤炭价钱肯定是上涨的。缺煤的国家恰恰在太平洋沿岸，运输线很近。煤炭出口有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必须下决心解决以煤节油的问题。一九八五年以前，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出口煤而继续烧油。一吨油二百美元，一吨煤多少美元？差两倍多。一九八五年究竟能出多少煤？必须在以煤节油的前提下考虑。长远讲，煤炭出口量应该增加，再把水电搞起来，出口煤就更会增加。

（2）劳务，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各种技巧劳动，这个局面，我们要逐步

打开。

（3）机械。

第二，进出口本身的经营，进什么，出什么，以什么换什么，有很大潜力。比如进口粮食，把棉花和食糖搞上去。

第三，要从串换上，从运筹上，从经济效益上多想办法。现在没有人组织这个事。怎么进，怎么出，这里面有很大学问，有很大的潜力。进出口委如果有兴趣，可以管管这个事。过去我们不懂，总以为种棉花挤粮食，其实不然，鲁西北农民说，这几年棉花上去了，粮食也上去了。因为棉花多了，肥料就多了。他们的口号是一亩粮食吃饱饭，一亩半棉花作贡献。有些先进队提出种一季粮食吃饱饭。一季小麦就是四百斤。现在他们只要求超产棉奖励二斤粮食要兑现不变。我找临清县委书记谈，他们说，种棉花可以促进粮食生产，三四年内，光鲁西北就可以搞到二千万担棉花。适当多进口一点粮食，发展棉花，棉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另外，国外化纤便宜，国内棉花便宜，我们可以倒腾，国内降价销化纤，棉织品和针织品出口，这一倒腾，就可以多赚钱。如果东北城市改变一下吃油习惯，改吃菜籽油，把大豆替下来出口，又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我们中国油菜籽是大发展的趋势。华北大发展棉花，华南大发展油菜籽，把东北的大豆和华北的花生拿来出口，非常合算，可以多换回大量外汇。要把进出口搞活一点。以进养出，也有很多文章。

第四，沿海要放手搞进出结合，几年内就会产生明显的效果。现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办法，我们沿海都可以搞，不外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我们的体制改革，除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外，所有沿海都要研究。我对上海同志说，上海主要是对外，它的条件优越得多。把第一线的外贸真正搞活了，就是一亿多人，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第五，外贸体制改革不要一刀切。我主张，沿海城市，首先是上海、天津，多放宽一点。特别在来料加工、来样加工、产销结合、内外贸结合方面，要给他们更多的权力。我主张上海搞西装托拉斯，进料出口，产销结合。上海手帕已经搞了工贸结合的公司。

第六，外贸要把推销员队伍的建设放在重要的地位。现在这方面我们非常薄弱。真正接近外国商人的是这些人。这些人要会外语，能谈判。听说上海有四百人，占全国的一半。这四百人中，能独立工作的不到二百人，真正优秀的比例很小。现在是人家进来谈判，将来主要是出去，到国际上去。外贸的收购主要靠政策，重点是推销。外贸部要在国外建立自己的销售网，搞自己的推销员，国内就是建立产销结合的公司。我在上海找银行信贷员、财政专管员座谈，他们讲了好多很好的意见。他们讲的意见同王光英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非常熟悉企业的情况，他们说，企业潜力大得很，问题是条条框框太多，卡住了。将来从这些人中间提拔一些干部上来，提一批。他们讲的如何利用信贷等手段挖掘企业的潜力，讲得很好。

请外贸部领导注意，外贸部讲一九八○年是“左”。你们这样讲，能把外贸部

同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我已经在国务院讲了两次，你们把一九八○年的问题看得太多了，把成绩看得少了。对一九八○年的外贸如何估计，直接涉及到今后外贸部的工作，你们这样讲，到底要把外贸部那么多干部带到哪个方向上去？你们外贸部党组要注意。你们这种看法，同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书记处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当然，也可能你们是正确的，但是，你们同国务院、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不一致，这个问题你们还要认真对待。外贸会议主张外贸要稳一点，我也赞成，实际上，今年以来搞得太死了。比如广交会的服装不够卖，但上海的服装订货却大大减少。机械委员会规定五千万元以上要报审，也卡得太死了。

注 释

1．谷牧（1914—2009），山东荣成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进出口委主任。曾任中共山东省济南市委书记、市长，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国家建委副主任、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特区办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企业整顿要把落实经济责任制作为突破口*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家经委汇报企业整顿情况时的讲话。

工业上的问题主要是靠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工人的积极性。一定要把企业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问题搞落实。企业生产任务不足，要设法搞活些。另一方面要把多余的人坚决拿出来，就地学习，就地培训，这对将来也有好处。不要把那么多人窝在那里，只讲整顿劳动纪律还不行。对这项工作至今还没有落实，一定要狠抓落实。

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企业利润留成实行改“环比”大家有些意见。第一年上去了，第二年怎么办？这次我去胶东，他们有个办法，叫三年滚动包干，比如先一定几年（三年），明年再加一年，后年再加一年，总是一定三年，这样就不会发生到了哪一年到期了要重新定基数，谁也不敢翘尾巴的问题。我听吕培俭同志讲，他倾向于全额分成，但企业觉得没有多大油水，比例小，努力不努力区别不大。这次我在上海同他们讲，能不能在1980年（或1981年）基础上一定几年，每年递增包干，或者是三年滚动包干。全额分成就是“旱涝保收”，搞好搞坏差不多，还是平均主义。

对经济责任制这个问题采取的方针是大框框先定下来，不宜过早定型，方向定了，允许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推行经济责任制，主要还是解决两个平均主义，一个是国家对企业，一个是企业内部。现在可以看出推行经济责任制是个有效办法，但由于各个地区、各个企业的情况、条件不同，具体怎么搞，不要过早定型化。由于价格不合理，企业潜力不一样，包干以后，会引起许多新的矛盾，也要看到工业和农业不完全一样，工业之间有许多牵扯，有的产品利润就多，有的就低。总之，这些矛盾要在实践中去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但是搞经济责任制有可能走出一条路子来。

厂长是工厂的“主要负责人”，这个提法怎么样？应该是“厂长是工厂行政的主要负责人，书记是工厂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以后我们不要再提“一把手”、“二把手”。

条例中规定厂长的责任提到：“完成国家计划和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不要发生误解。“充分发挥”可以不要“充分”两字，按六中全会决议的提法好，去掉这两个字，可以改为“注意”两字。

工厂一直要求有开除权，这个问题要解决，先在一些试点企业里试行，这个问题不解决，纪律整顿不好。企业的财权固然重要，但人权也很重要。过去被开除的人，现在还在闹翻案。广东珠海市石景山旅游中心，服务工作质量是全国服务行业中最好的，除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和考核制度外，他们还有对职工的开除权，前后开除了七人，估计以后就会很少开除了。据北京饭店的同志讲，对那些有偷窃行为的要有处分和开除之权，但落实不了。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被开除了的，现在还到处告状，这怎么行？

整顿企业的问题，你们讲了几条是好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能不能贯彻落实，如何才能贯彻落实？比如企业领导班子问题等。

搞经济责任制，我看可能会引起企业一系列变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许多新的矛盾，虽然搞的形式和农村不完全一样，也比农村复杂得多。归根结底，要依靠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毛主席早就讲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群众，发挥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问题在于过去只讲政治，不承认物质利益。搞社会主义，加快建设要依靠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既要加强政治工作，又要注意物质利益。企业潜力很大，尽管现在企业有社会负担重等这样一些弊病，仍然有很大潜力。企业越大，潜力越大，就是背了这么多闲人，只要包干搞好了，潜力还可以挖得出来。为什么有潜力？问题是现在企业里吃大锅饭，无人负责。

整顿班子以及基础工作，这些都和推行经济责任制、搞包干是相联系的。财政部在云南调查的报告，我很欣赏。云南农垦统一搞包干，推动了企业的定额、统计这些基础工作。没有定额，搞计件工资、经济核算都有困难。搞经济责任制，就需要加强企业管理。没有经济利益企业就没有动力。经济责任制搞好了，企业不称职的领导班子、车间干部就混不下去了。如果没有这一条，整顿领导班子，什么人下去，什么人上来，就很难说。不把经济责任制搞好，办好企业就没有基础。企业整顿你们搞了几条，看来推行经济责任制是一个突破口。当然，经济责任制的具体形式现在还不能定型，但是要很好地抓住这个突破口来推动企业的整个整顿工作，推动企业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

关于定员定额问题。严格按照定员定额组织生产，劳动部门、工会、经委要组织工作组，一批一批地整顿。必须动手才能改变，只议论改变不了现状，要组织人员下去搞，要有新突破，一般号召部署解决不了，因为确有一些实际问题，没有一点办法谁也不愿去试。

关于整顿财经纪律。整顿财经纪律，仅一般号召不行，也是要组织力量对企业一批一批地去搞，去检查，去整顿。

总的来说，企业整顿要抓经济责任制作为突破口，推动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和企业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

关于厂长工作条例。厂长的职责明确几条我赞成，厂长能完全做得到的、行得通的，可以简要地搞出几条，哪些事厂长能办，哪些事要通过党委，给厂长的权责划个范围，其他比较复杂的纳入工厂法。是不是要一下子像这个条例那样搞那么多，搅和在一起？比如厂长的奖惩势在必行，但在现行体制下，搞不好会引

起很多问题。厂长发年终奖，书记怎么办？有的会说：搞好搞坏都是你厂长的，那我不管了。如果马上这样搞，结果会怎么样？这是件好事，但有的条件成熟，有的还不成熟，如果强调全面执行，会带来不少问题。是先把这个条例发下去呢，还是先划出几条简要的能办得到的规定？你们考虑一下。

厂长可以开除工人。但要先搞一批试点，全国所有企业，一下子都这么搞怕行不通。被开除的人劳动部门包下来，你们也可以检查开除得对不对。先搞一批试点，搞好了，第二年再扩大。普遍地搞现在还不行。

利用税收调整国民经济的合理发展*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汇报时的讲话。

对长线而利大的产品，要提高税率，适当限制其发展。对短线而利小的产品，要适当调低税率，鼓励其发展。就是说要利用税收这个经济杠杆，来调整国民经济的合理发展。

陈云同志非常重视税务工作，1951年就说过，县委宁可少一个常委，也要有一个县委常委来当税务局长。

我在上海召开了一次财政驻厂员、银行信贷员座谈会，了解到他们的作用很大。冶金企业的财政驻厂员提出八九条增加财政收入的合理化建议，工厂基本上都采纳了。这些建议包括实行材料节约单项奖，作用和效果是好的。

现在国家没有一个部门考虑基建项目的投资效果，只考虑每年投资多少，搞什么项目，无人考虑在投资以后如何更好收回投资问题，这是我国搞基本建设的最大弊病。银行信贷员对工厂发放信贷，就要考虑投放多少，效果如何，何时能收回贷款。我的意见，计委今后确定基建项目后，要交由银行负责，认真计算、考核、检查其投资的效果，不如此不行。目前搞基建只从需要出发，不考虑经济效果，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这样对搞一个基建项目，就要进行论证，进行可行性研究。

这次我在上海，对外贸体制问题研究了一下。外贸体制要改革，不能搞得太死了。对待出口高亏产品问题，凡是中央外贸部门认为有些出口产品是真亏，而地方认为这些出口产品是假亏，可以让地方实行工贸结合来经营出口。上海服装行业可以搞产销结合的公司，有权进出口。其他几个沿海城市也可以这样做，外贸部来组织协调。

凡是外贸部门认为经营出口的产品是高亏的，可以由地方实行工贸结合来经营出口，自负盈亏，这条原则可以定下来。

我们办什么事，不能一刀切，不能一窝蜂。外贸体制改革，也不要一刀切。对上海、天津等城市要放宽，权力应大一些。沿海城市放手搞进出口结合，几年之内可以有大的成效。先把沿海城市工贸结合搞活一些。当然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进出口更要搞活一些。以后逐步推行到内地。对外贸体制改革，不一定说搞就统统搞，说不搞都统统不搞。这样不行，一定要区别对

待，分类指导。

目前对有些问题的改革，既要统筹兼顾，全盘考虑，又要对看准了的先进行实践。如我这次到山东胶东，听到反映海带问题。一方面各地很需要，另一方面海带又有积压，卖不出去，我看主要是海带经营环节太多，应划一定地区由山东经营。

改革工商税制，总的原则是对企业产品利润和税收的合理调整，不能影响物价，不能转嫁负担，影响消费者的利益。有些特殊产品（如烟、酒），可以实行专卖。

城乡小商品的价格要进行适当的、必要的调整，有的价格势必要有浮动，有的价格要由国家补贴。

小商品的价格问题，由国家经委牵头，物价总局、轻工部、财政部等部门参加，研究提出一个办法。

山东省搞经济责任制，不仅工业企业搞，而且已发展到商业、饮食业（经营环节），据说效果很好，请经委注意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进行工商税制改革，增加财政收入不是主要目的，而是为了保证中央财政收入能够得到稳定增长，企业产品利润的合理调整和分配，不能在消费者身上打主意。增加财政收入要从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增产增收、增收节支上下功夫，要从整顿财经纪律上想办法。明年财政问题要早研究，如何包法。

最后总起来讲几点意见：

1、改革工商税制是企业产品利润的合理调整和分配，不能转嫁负担。

2、改革工商税制，可以分步骤地进行，有些可以在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

3、今天汇报的《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不作为定稿，可以先发下去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意见。

总之，一个企业利润太高，不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可适当提高税率，多征点税。有的产品利润太高，又不能调价（如手表等），通过税收形式进行调整，就比较恰当。

从提高经济效益中找出路
从挖掘潜力中求速度*

一九八一年七月

* 这是赵紫阳在1981年7月中下旬赴上海、江苏、山东等地就经济调整和改革进行现场调查指导时的讲话综合稿。他在讲话中系统阐述了在经济调整时期如何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积蓄力量，以便更好地前进等问题。他指出要在大力发展消费品的同时，相应地把重工业的调整搞好；抓好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以建立经济责任制为突破口整顿好企业；重点抓好能源交通带动工业的发展；筹集使用好国内资金；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千方百计使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性和前瞻性。

七月中下旬，我们到上海、江苏、山东等地作了一些调查，同省市委的同志、基层干部、驻厂的专管员信贷员、经济理论工作者、工商界人士一起，座谈讨论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的意见。在此前后，国务院和中央财经小组也曾对编制“六五”计划和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提出了对策。上次我在四月十四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曾讲了怎样提高经济效果，走出一条发展我国经济的新路子来。这次围绕调整时期如何保持一定速度，积蓄力量，以便更好地前进讲一些看法，可以说是上次讲话的继续和补充。下面共分八个问题讲。

一、调整时期必须保持一定速度，积蓄力量

目前我们正在编制第六个五年计划，速度问题引起了全党的关注。近来我们一直在考虑，在这次调整中，国民经济的发展究竟能有一个什么样的速度，五年之后能不能积蓄起力量，使我们在调整以后有一个新的起

点？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过去调整的历史，分析当前经济状况，以便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次调整与一九六二年那次调整，有相同的地方，但有很多地方显著不同。一九六二年那次调整，把“小土群”和许多效益差的企业关掉了，两千万职工精简回到农村，不仅基本建设的投资大大缩减，连消费基金也大大减少，背上的包袱很快扔掉了。所以，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间虽然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但到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很快就恢复过来，提出了搞“三线”建设。这说明已经

积累起力量了。这次调整却大不相同，国家的负担比一九六二年大得多。一些工厂关停了，工资还要照发，职工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随着就业人员的增多和工资的调整，工资总额增加了，奖金也增加了；农产品提价以及外贸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使国家补贴大为增加，今年将达二百三十亿元之多；不少基本建设项目下了马，但引进的设备还得进来，贷款和利息要照付，维护保管也得花钱；文教、科研等必要的经费还得增加。总之，财政上的困难很大。形象地说，上次调整是甩掉包袱前进，而这次是背着包袱前进。这种情况决定了：第一，这次调整不可能有较高的速度，因为多年来遗留下来的许多欠账要偿还，我们所采取的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系列调整、改革措施，贯彻落实还有一个过程，有些马上还不能奏效；第二，这次调整，也不能没有一定速度，更不能像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那样速度出现负数。那时候以紧缩求平衡，可以收到积蓄力量的效果。这次单靠紧缩就不行。据测算，要是保持百分之三以下的速度，五年中连财政赤字也不能解决，即使今年基本打平了，后四年赤字还会出现，稳定经济的目标难以实现，更谈不上积蓄起力量。而且，在五年以后，在“七五”期间速度也不可能快起来，生产就有萎缩的危险。这几年困难一点不要紧，关键是要为今后积蓄起力量，奠定好基础，这样，“七五”的后期也才可能有较理想的速度。根据有关部门的预测，“六五”期间至少保持百分之四的速度，“七五”期间保持百分之五六的速度，事情就比较好办。有了一定的速度，才能保持一定的财政收入，才有积累。所以，调整期间保持一定的速度十分重要，它有利于当前经济的稳定和今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政治上的安定和国家的巩固。

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汲取过去的教训，指导思想上决不能急于求成，超越客观的可能，搞不切实际、不讲实效的高指标；同时也要防止指标越低越好，任务越少越好，消极悲观，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应该达到的速度也不去争取。这次调整，同一九六二年相比，有不利的方面，但有利条件也不少。这几年工农业生产一直是上升的，市场供应比那时显著好转，休养生息、藏粮于民、寓富于企业的政策已见效果，国际条件对我也十分有利，物质技术基础比一九六二年雄厚得多。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企业潜力大得很。只要我们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完全可以克服困难，在经济建设上缓过气来，由被动转向主动。

“六五”期间，为了保持一定速度，当前稳定经济、紧缩开支等一套措施，必须继续贯彻，不能松懈；同时为了活跃经济，调整结构，还需要采取一些新措施。陈云同志讲过，先死后活。要看准一个，放活一个，量力而行，循序而进。从根本上说，必须走提高经济效果之路，使投资不那么多，效果比较好，人民能够得到更多实惠。我们所要求的速度，应当是实实在在的，是真正使社会财富增加，符合需要的产品增加，可供分配的收入增加，而不是虚假的、水分很重的产值、产量指标，不要这边从工厂里生产出来，那边又积压在仓库里。以下讲的七条，中心思想就是要从提高效果中找出路，从挖掘潜力中求速度。这样做，才符合我国国情，才会收到实效。

二、在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同时，相应地把重工业的调整搞好

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是把国民经济搞活，使调整时期保持一定速度的重要一着。今年初，中央提出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以后，已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开始取得成效。据1—7月统计，轻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1.7%，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一九八○年的47.1%上升到占50.6%。供应市场的消费品花色品种增多，对回笼货币、增加收入、满足人民需要起了良好的作用。看来这条路子是对的，要坚决按照国务院的部署继续抓下去。当前特别要重视广辟门路，提高产品质量，做到适销对路，避免盲目性，反对粗制滥造，以便站稳脚跟，稳步前进。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新情况，就是重工业下降比较大，而且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今年1—7月，重工业的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8.3%，在一些重工业比重大的地区，下降的幅度更大，超过了轻工业增长的速度。这种情况在调整过程中是很难避免的。有些小企业，船小好掉头，而一些大企业要改变服务方向，掉过头来就不那么容易。重工业的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即使消费品增长很快，也可能弥补不上。今年上半年虽然轻工业增长较大，但整个工业的增长速度只有0.8%，全年要达到3%的速度就很吃力。还要看到，重轻工业之间是互相联系、按比例发展的，重工业掉不过头来，继续大幅度下降，必将限制轻工业的发展。如不采取措施，继续让重工业萎缩下去，今年和以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都会受到影响。我们不应把重工业当成“包袱”，而应当使它在调整过程中，在能源许可的情况下，尽快活起来，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要使重工业活起来，并不是要大办新厂，铺摊子，多耗能源，而是要有一些新的办法。

第一，重工业的根本出路是要调整服务方向。重工业可以直接生产一些耐用消费品，但比重不会很大。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多年来重工业自我服务的状况，更好地为发展消费品生产服务，为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服务，为外贸出口服务，在服务中求得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乡经济活跃起来，社会对工业品的需求增多，轻、重工业都有广阔的市场。而且随着对外经济开放方针的贯彻，外贸事业的发展，国际市场也大量需要优质价廉的工业品。我们的重工业，一方面摊子多，战线长，“吃不饱”；另一方面有很多东西又“吃不了”。所以，最关紧要的是要改变服务方向，提高服务质量。外国公司和我合作，在南海开发石油，预计总投资二三百亿美元。一是设备修理，一是生活服务，如果我们善于利用，可以拿回一百亿美元，这是一笔大生意。今年底就要投标，明后年就要全面展开。我们是主权国，具备着有利条件，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权。问题是我们的机械工业、冶金工业、造船工业能不能担当起这个任务。如果我们不及早动手，恐怕这笔生意大部分要被香港、新加坡抢去。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把中央有关部门的力量、把广东省的力量组织起来，建立起修理基地、生活基地，力争多承包一些

项目，这就会带动我们的重工业以及轻工业、服务行业等。至于国内市场需要的许多工业产品，重工业部门服务方向转过来以后，是大有可为的。事实说明，有些企业转变得快，就得到发展。如首钢今年生铁任务比去年减少二十九万吨，钢减少十二万吨，总产值要比去年减少9%。但他们却创造了减产增收、提高效益的经验，全年利润上交预计将达到3.12亿元（包干为2.7亿元），比去年增长8.7%。他们的办法就是通过建立经济责任制，发动职工扭转服务方向，增产市场上适销对路的产品，主攻节约能源，低消耗，上半年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只要方向对头，在实践中路子是会越走越宽的。

第二，通过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来振兴重工业。整个国民经济都需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包括重工业在内。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详细讲。技术改造开展以后，不仅机械、冶金、建材等部门可以活起来，而且过五、六年，原有企业的面貌就会有个较大的改观。我赞成对现有库存的机电产品进行清理，不行的就报废，研究个办法来。不报废旧的，新产品就出不来。现在不是“推陈出新”，而是“推陈限新”，限制新产品。今后更换的设备就回炉炼钢，不要国营企业转给集体企业，集体企业转给街道企业，街道企业转给社队企业，从整个社会来看，这样还是增加了能源和交通的负担。第三，国家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支持重工业的调整、发展。基本建设总是要搞的，像电站、矿山机械等重要的大型设备，要花几年才能造好，在国家计划确定以后，有些项目可以预先安排。还有一些重工企业，只要采取一些灵活的措施，帮助解决一下困难，很快就上去了。我国最大的镍生产基地—金川镍矿，第一矿区已接近枯竭，第二矿区设计规模年产三万吨，到去年底，已完成投资三亿一千万元，还差一亿四千万元资金即可建成，一九八三年就可产镍一万五千吨。他们提出向国库借八千吨镍在国内外市场销售，解决资金问题，投产后四年就可将镍全部归还国库，每年利润可以增加到一亿元。现在国家储备的镍已达十一万吨，超储很多，借出八千吨，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却救活了一个企业。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只要认真对待，重工业活起来是有办法的，我国国民经济能够出现一个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相得益彰的新局面。

三、抓紧搞好技术改造、设备更新

抓紧调整时期，把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搞好，这对于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积蓄力量都有重要作用。过去，我们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外延，建新厂。即使搞一些挖潜、革新、改造项目，照上海同志的说法，还是搞“厂内外延”居多，形成“生产挤辅助，辅助挤仓库，仓库挤马路”的现象。今后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必须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在内涵上多做文章。调整过程中，扩大再生产在外延方面搞得很少了，如果内涵上不具体、不落实，就有两头失落的危险。通过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来挖掘潜力，是扩大再生产走以内涵为主的道路的主要内容。这项工作不落实，依靠现有企业发展生产的方针就会成为空话。农业

上，我们主要靠政策，靠科学，取得了显著效果；同样，工业上，也主要靠政策，靠科学技术，使技术进步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的整个工业，都要通过改组、改造，才能走向振兴、繁荣。当前处于调整时期，基本建设规模大大压缩，钢铁、水泥等材料也没有那么紧张，机械工业大量的生产能力在闲置着，应该是进行技术改造的好时机。如果这几年不把它摆在重要日程上，切实做出成绩来，那么，企业的设备再拖几年，有的磨损加大了，有的越来越陈旧，甚至要报废，成了老牛拉破车，整个工业生产就有可能垮下来。这几年把设备更新、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抓好，一可以使老厂得到改造，增加新的生产能力，提高经济效益；二可以使重工业有活干，带动机械加工工业、原材料工业等的发展。看起来不像新建一些厂，增加那么多产量，但却使我们整个工业在质上提高了。扎扎实实地搞几年，就可以使我们的大批企业有了新的装备、新的工艺和技术，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上有了新的提高，我们的工业就有了新的起点。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普遍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这次在上海，听到一种说法，“没有任务的企业，天天忙于找任务；有任务的企业，天天忙于完成任务”。领导精力顾不上研究技术改造问题。应当统一认识，下决心把这件事抓起来。

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不是笼统地、单纯地追求搞自动化，而要根据我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自动化是需要的，但要分别轻重缓急。中国劳动力多，这个问题现在不迫切。工业上应当考虑如何运用科学技术成果，把知识密集和劳动密集结合起来。知识密集不一定都是搞自动化，不要在这方面花很大的力量。外国用“集约”这个词，强调减少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讲中国式的“集约”，主要不是强调这点，而要讲提高质量，降低消耗，节约能源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工业的技术改造、挖潜、革新，要围绕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是围绕改革产品结构。要使产品日新月异，不断升级换代，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要有大批优质价廉、式样新颖、适销对路的产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上海市轻工局系统提出今后要围绕日用化学、食品两个行业和十五大类产品，开展技术革新和设备更新，重点研究推广电子、水处理等八个方面的新技术，使轻工产品“数量要增加，质量要升级，品种要发展，缺门要填补”。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二是围绕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降低消耗，改革工艺和设备。比如全国一千二百多万千瓦中低压发电机组，年耗标准煤约四千万吨。用二十万千瓦大机组代替，每一千瓦一年就可节约一吨标准煤，如果几年内改造一半，一年就节约六七百万吨标准煤。三是要围绕充分、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综合经济效果来进行。比如石油化工，很多有用成分由于我们加工的深度不够，没有综合利用，因此赚不了钱，有的还要亏本。要是在技术上、设备上、工艺上进行革新，就能把被抛弃的有用成分提取出来。不断进行技术改造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过程。技术改造，不要一哄而起，一窝蜂，一刀切。应当在调整的前提下，在企业的联合、改组的基础上进行。上海的经验，就是按行业统一规划，不能一个厂搞一套，那样容易产生盲目性，形不成力量。企业的改组、联合，由于涉及地区和部门的所有制，阻力很大。根据前一段的经验，看来需要从中心城市或工业基

地开始，按行业或按生产要素组织起来的办法较好。既不是由省、地、县来打破部门的界限，也不是由部门来打破地区的界限。从中心城市、工业基地做起，按生产的需要组织起来，逐步扩展，就较容易解决条条块块的矛盾。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有一系列政策问题需要解决，如怎样使企业对新产品的研制和新技术的采用有内在的动力，所需的资金、设备、材料怎样得到解决，等等。有关部门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根据新的情况提出办法来。我看在计划安排上，还是应当贯彻“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后新建”的方针，从各方面保证企业的技术改造，进行挖潜、革新。

技术改造，要同发展科学技术紧密结合，使科学技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现行的体制，把科研和生产分开，各管各，两张皮。在生产第一线，科技人员普遍不足。上层科研部门却集中大批科技人员，脱离生产实践，这种情况急需改变。去年以来，有些科研部门与生产部门联合，组成经济联合体；有些地方，试行了技术联产责任制，使科研部门能够直接面向生产，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也有了科研试验场地。现在许多新产品、新技术，还达不到商品化阶段，不能普遍推广，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做到能供生产上实际采用，采用了能见到实效。我们制订的“六五”计划，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同经济发展规划很好地结合，使科学技术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把技术改造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重要课题认真研究。在“六五”期间，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要有重点，集中抓几件大事。如改造锅炉、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可以节约几千万吨煤炭，应作为一个重点来抓。目前我国铁钢比还大于1，发达国家一般在0.7左右。钢发展到三千万吨的时候，废钢铁就比较多，炼钢应多吃废钢铁，少用生铁。机械工业也要以钢代铁、以焊代铸。钢铁比每降低0.1，按目前产量，一年可节煤六百多万吨。各行各业都有一些经济效果很好的新工艺和设备，如水泥的窑外分解，平板玻璃发展浮法工艺，火力发电搞高参数大容量机组，猪皮多层利用等，应当看准方向、确定重点，规定一些重大的技术措施和技术政策，组织力量，促其实现，使科学技术在调整期间发挥更大的威力。

四、以建立经济责任制为突破口整顿好企业

整顿好现有企业，是挖掘企业潜力，提高经济效果，增加财政收入，克服困难的最现实的办法，也是使我国工业建设走上新路子的根本措施。这几年在企业的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努力下，完成了国家计划，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有所改善。但是必须看到，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还相当落后，产品消耗高、浪费大，许多经济技术指标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上海金山石化总厂在国内是个经营得比较好的企业，花了七亿美元的投资，我叫他们都按国际价格算，他们说，这样每年只能盈利五百万美元。可见我们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目前工业企业利润上交减少，亏损面大大增加。今年1—7月，工业累计上交利润229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2%，除纺织、轻工外，其它部门都有下降。企业的

亏损面上半年达到31.5%，亏损金额达到21.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5%。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经营管理的不善、财务管理的混乱，却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当前必须在调整、改革的同时，突出抓一下企业的整顿，向企业的落后状态开战。企业不整顿好，我们经济建设中千百万个基层细胞活动不正常，调整和改革的措施不能很好贯彻，就无法实现良性循环，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整顿企业，国家经委提出了六条标准和要求。我看重点还是要抓好整顿、建设领导班子和整顿、完善企业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和全面经济核算。整顿班子和基础工作，这些都和推行经济责任制相联系的。抓住经济责任制这个突破口，就可能引起企业一系列的变化。办好企业，归根到底，要依靠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靠人的作用。调动企业和人的积极性，一方面要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另方面必须承认他们的物质利益，二者必须结合。全国几十万个工业企业，几千万职工，如果他们没有积极性，什么事都搞不好，不管你上边怎么着急，电话会、现场会不知开多少，也是收效甚微，事倍功半。把政治思想工作和承认人们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适当地调节人们的物质利益，就会出现一种势如破竹的形势，农业证明了这一点，工业战线也开始有这方面的好苗头。现在企业各方面的潜力非常大，这点大家都承认。可是许多事无人负责，潜力挖掘不出来，问题就在于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之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情况没有解决。实行经济责任制能有效地克服这两方面的平均主义。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通过包干或利润留成等办法，正确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同时企业内部也要建立经济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正确处理好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从而使企业和职工都有了办好企业、挖掘潜力的内在动力。抓好建立经济责任制，可以推动企业的其它工作。最近，我看了财政部的一个调查材料，云南省农垦系统过去长期亏损，统一搞包干，推动了定额、统计这些基础工作，很快扭亏为盈。因为没有一套比较先进、合理的定额，搞经济核算，搞计件工资或记分计奖都有困难。一实行经济责任制，这些工作都要跟上去。过去吃大锅饭，领导班子差一点还可以混下去；实行经济责任制后，你这个厂长当得不好，车间主任当得不好，与大家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群众就不选你。没有这一条，不进行教育，什么人选上来，什么人下去就很难说。所以，当前要以推行经济责任制为突破口，来带动企业的整顿工作。

今年以来，工矿企业和商业服务行业，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正在试行以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不少省市通过包干，一层包一层，把年初难以落实的财政任务基本落实了下来。天津市就是按行业一个局一个局包干。山东济南市对企业采取“上五包”、“下五保”的办法，即市包局，局包厂，厂包车间，车间包班组，班组包个人；个人保班组，班组保车间，车间保全厂，厂保局，局保全市，层层负责，奖罚分明，目标明确，人人主动。全市国营工业企业今年上交利润落实任务20115万元，比去年增长7.6%。上半年已完成952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目前价格不合理，外部条件不稳定，给包干带

来一定困难。包干基数如何定，要很好研究。但是，有个总原则：国家的收入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要保证增加。在这个前提下，兼顾企业、个人的利益，决不能挖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要把管理工作跟上去，制定先进合理的定额，认真搞好核算，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上多下功夫。现在包干的方式，多种多样，具体形式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过早定型化，要允许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通过包干、按行业利润分成等办法，实践一个时期，可能为今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税代利创造条件，打下基础。

整顿企业，要把加强财务管理、遵守财政制度、严肃财经纪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不少企业的财务管理混乱，财经纪律废弛。少数企业领导干部，迎合某些职工的落后情绪，弄虚作假，损公肥私，截留上缴利润，偷税漏税，搞邪门歪道，乱发奖金和名目繁多的补贴，这种现象必须加以制止。光偷税漏税一项，今年只是稍微抓一下，全国就是五六亿元。如果把企业的“跑、冒、滴、漏”堵住，那么一年增加几十亿财政收入不成问题。我们坚定不移地主张改革，把微观经济搞活，把作为基层细胞的企业搞活。但放活以后，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有的人以搞歪门邪道来对付国家。过去吃大锅饭，干不干一个样；现在权、责、利挂钩了，他开动脑筋了，好的、坏的点子都会有，就可能以不正当的手段去攫取利益。对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回头走老路，一切都收回来，统得死死的。而是应当在对企业放活的同时，在宏观上加强对企业的计划指导、管理和监督。这两个方面要同步，活一分，监督的东西要强化一分，在矛盾中前进。过去往往是用唐僧念紧箍咒的办法对付孙悟空，以后要用如来佛的办法，让他在自己手板心里活动，就在这个范围内活，超过这个范围就要限制。既放活，又监督，我们还没有成熟的经验。要么就活，要么就死，“死”“活”没有走出一条路来。在新的形势下，要研究这个问题，走出新的路子。我认为，一是要加强经济立法，从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做起，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逐步制订一大批经济法规、条例、条令、办法来，使企业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二是有大批人进行监督。企业的合法权利，不能加以干预，但是，越轨的行为，要有人代表国家进行监督、检查。除了各经济主管部门，财政、银行、税收、工商行政等部门要加强监督外，我在上海同派驻工厂的财政专管员、银行信贷员座谈，感到他们工作得很好。这些同志很有经济头脑，既监督企业，又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看来驻厂的税收员、专管员、信贷员，这几员是需要的，就是要有一大批人找企业的毛病，并帮助它解决。我们要研究和创造这方面的经验。整顿企业，一定要把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搞落实，把轮训工人和干部落实。经委、工会、劳动部门和各主管部局，要组织工作组，一批一批地整顿。车间里泡那么多人，没多少事干，把人都搞懒了。定员以后，坚决把多余的人拿出来，就地组织轮训。上海金山石化总厂是个现代化企业，在国内也是搞得好的。日本朋友对他们的建议有两句话：管理要努力，队伍要培训。这有一定道理。我在渤海采油平台上也看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现在设备现代化了，职工队伍的水平也要求现代化。我们引进的一些现代化设备，花钱是按现代化的要求花的，但是使用时不是按现代化的方

法用的，我们的硬件是现代化的，软件不一定能现代化，以致造成很大浪费。应当强调，在调整时期，必须把职工轮训这项基本建设抓好。现在老工人一天天退休，新工人如不抓紧培训，我们工人队伍的政治和技术素质会日益下降。要抓紧培训工作，进行智力开发和投资，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别轮训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的学习侧重解决基本功的问题，技术人员学习侧重解决技术老化的问题，管理干部侧重解决经营思想问题，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要整顿劳动纪律。工厂的许多干部一直要求有辞退工人的权力。这个问题不解决，劳动纪律难以整顿好。广东珠海市石景山旅游中心，服务质量是全国同行业中最好的。除有严格奖惩制度、考核制度外，他们有对职工辞退的权力，而且实行了。这件事可先搞一批试点。辞退工人，要征求工会意见，辞退以后由劳动部门包下来，另行安排。要制订具体办法。

整顿企业领导班子，除了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散、懒问题，老化问题外，还要解决企业里党政分工的问题。我们现在普遍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长的职责要明确几条，哪些事厂长能办，哪些事要通过党委，要划个范围。厂长是行政的主要负责人，要把生产、行政的指挥权交给厂长，由他对生产、行政和经营管理全面负责。

副厂长必须对厂长负责。要尽快把厂长工作条例制定出来，公布试行，逐步完善。现在，企业党委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有了工作条例，再加上一个厂长工作条例就比较齐全了，企业就有所遵循了。

五、抓能源、交通带动工业的发展

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在制订“六五”计划时，我们既要考虑当前的困难如何渡过，又要考虑什么时候国民经济能够出现转机，开始良性循环。在“六五”以后或“七五”后期，国民经济有没有一个较快的速度，能不能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得怎样。一九六二年那次调整，石油的产量是直线上升的，由五百多万吨，发展到七六年的近九千万吨，支撑了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次调整以后，国民经济靠什么支撑呢？当然，石油必须继续抓。要稳住现在一亿吨的产量，并抓紧海上石油的开发。除此以外，必须下决心挤出力量抓煤炭。我国已经探明的煤炭储量有6500亿吨，居世界第三位，是我国经济的又一张王牌，应当把这个宝藏开发出来，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支柱。调整时期经济上各方面矛盾很多，一定要综合平衡，一定要有重点。通过抓煤、石油、水电、交通，机械、冶金、建材、建筑等行业也有活干了，重工业也就带活了。正如邓小平副主席指出的，抓能源、交通，以能源带动工业发展的路子是对的。在制定长远规划中，必须考虑这个由被动转向主动的战略布局。

能源问题，近期内主要靠节约。节油、节煤、节电、节水，要大造舆论，要有强有力的措施。上次讲的以煤代油、以水电代油，节油出口的措施必须坚决落

实，节油的任务必须保证完成，决不能放松。同时，要认真考虑能源的开发，否则下一步棋活不了。既要抓当前就能见效的，也要抓五年、七年才能见效的，把当前与长远结合起来。

要把开发山西煤炭作为重点来抓。山西的煤炭资源丰富，品种齐全，投资小、见效快，距海岸线也较近，应当把它建设为面向全国的能源基地。山西已探明的煤炭储量为二千亿吨，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且煤质好，埋藏浅、面积大、煤层厚、倾角缓，建设大中型矿井的投资和建设周期，都比全国平均水平少三分之一，吨煤成本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四分之一。现在年产1.2亿吨，调出7200万吨。根据山西省、煤炭部和专家的测算，到一九八五年产量可达到1.55亿吨，调出一亿吨；一九九〇年达到二亿吨，可调出1.5亿吨，比今年净增八千万吨。能源研究会建议，要像五十年代搞大庆油田那样来开发山西煤炭，这个决心要下。这不仅是缓和近期能源紧张，摆脱国民经济困境的应急措施，而且关系着今后国民经济建设战略部署的全局。

为了把晋煤开发好，余秋里同志提出要充分发挥现有矿井的作用和老基地的作用，坚持两条腿走路，贯彻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经过专家论证，认为这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开发山西煤炭，要从调整时期的现实情况出发，立足于近期内多出煤。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这几年怎么办，这一段如不能增加煤的产量，就不能缓过气来，困难就不能渡过。所以，在开发的方针上，应该是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基础上，近期内以多搞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中小矿为主，大的项目不能多搞，像平朔露天矿那样年产千万吨以上的现代化大矿，只能搞个别的。即使是大矿，也要一次设计，分期建设，分期投产，以求早出煤、多出煤。秋里同志提出的坚持老矿的挖潜、革新、改造，对一些储量丰富、开采和运输条件较好的矿井，进行有计划的改造、扩建或在老矿区建一些新井，再加上认真对煤矿进行整顿，我看这是近期增产煤炭的有效措施。为了调动山西各级开发煤炭的积极性，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政策和措施。比如在粮食上，要给予支持，今后在煤矿就搞两种劳动制度；帮助山西统筹规划，建立以煤矿为基础的综合生产基地，逐步形成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科研、机械部门要为开发山西煤炭提供精良的设备等。计委、能委、煤炭部、财政部等单位应会同山西省研究制订出方案来。

开发煤炭，必须同交通运输同时考虑。山西现有五条铁路干线，境内铁路运输能力已超过饱和临界限度。加上铁路车辆不足及省内短途集运能力的限制，致使全省积压煤炭一千多万吨。与晋煤外运相关的省外运输线路通过能力和港口吞吐能力，也相差很远。交通运输已成为开发晋煤的重要限制因素，必须坚持运输先行的方针，大力进行建设。据专家估算，开发煤的投资和交通运输的投资为1：1，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对煤炭的采运失调问题，要统一规划，加快步伐，综合治理。铁路、港口的建设，应抓紧进行。此外还要注意加大洗煤比重。山西煤炭的人洗率只有百分之九，比全国平均人洗率18%低一半，这个问题要解决。还可利用洗下的煤，建设坑口电站，外送电力，尽量减轻铁路运输负担。

为了适应煤炭工业发展的需要，应改革管理体制，实行产运销统一。煤炭的

产、运、销工作，原来是由煤炭部统一管理的。一九七八年开始，改为煤炭部门管生产，物资部门管运销。现在看来，这种体制使产销不能直接见面，难于合理组织生产，合理利用各类品种的煤炭资源。化工部的专家提出，晋城地区的无烟块煤成分适合作化工原料，一吨要顶普通煤二吨用，但过去却调去烧了。如果统一管理，产销结合，将晋城煤1200万吨调给中南、华南、辽宁的化肥厂作原料，可顶出现在用的原料煤2000万吨，而且可以使中小氮肥厂每年增加利润近十亿元。经征求经委、能委、计委等单位的意见，看来煤炭的管理体制应当改革，有步骤地把产运销统一起来好处多。

开发山西煤炭的资金问题，主要是靠国内积聚资金，也要利用一部分外资。平朔露天矿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合资经营问题，经过技术经济中心组织专家论证，认为是可行的，应组织力量把论证、规划进一步具体化，提出开发方案与外商深入谈判。利用出口煤这个条件，借用一些低息的外资是可能的。我们从各方面挤一挤，想些办法，把晋煤开发这件事抓紧，几年之内是会见效果的。

此外，水电建设也应重视。特别是对在建的大中型水电站，如葛洲坝、白山等，能多投一些资，加快建设步伐，几年之内可多装二三百万千瓦投产，顶出烧的油、煤，这也是一个投资少、见效快的办法。

六、筹集和使用好国内资金

调整时期最大困难是财政赤字，资金短缺。我们不仅要消灭赤字，摆脱财政困难，而且必须积聚一定的资金投入建设，为今后经济的发展争取有个较理想的速度创造条件。全国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都应当很好研究生财之道，聚财之道和用财之道。

怎样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概括起来有四个办法：一是发展生产，搞活经济；二是紧缩开支，适当控制消费；三是利用好国内资金，把分散的、该集中的资金适当集中，同时把人民的消费基金的一部分，通过银行聚集起来，转化为积累，用于建设；四是适当利用一定数量的外资。

解决财政困难和资金不足，根本办法是要把经济搞上去，使城乡经济活跃起来。当前一方面财政很困难，另一方面经济上的潜力又很大。如何把它挖掘出来，增加财政收入，要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采取一些新办法，不能完全搬用老办法。现在第一位的问题，不是中央能拿多少钱，地方拿多少钱，列入国家预算的多少钱，而是使整个社会财富增加。要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努力生产，减少浪费，提高效益，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来。只要生产上去了，经济效益好了，不管钱在哪里都好办。所以解决财政困难，第一位的问题是提高效益，增加财富，其次才是搞好分配，看国家拿多少，地方拿多少，集体拿多少，个人拿多少，实行三兼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方和企业的钱多了，工人、农民手中的钱也逐渐多起来，这是同一九六二年那次调整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之点。应该说回旋余地比那

时大多了。我们的银行存款，过去每年增长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亿元。这两年增加很快，一九七九年增加205亿元，一九八○年又增加318亿元。企业存款一九七八年为368亿元，一九七九年增为469亿元，一九八○年增为573亿元。城镇储蓄一九七八年为154.4亿元，一九七九年增为202亿元，一九八○年为282亿元，今年六月末为323亿元；农村社员储蓄也由一九七八年的56亿元，增加为一九七九年的78亿元，一九八○年的117亿元。这说明，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积极性调动起来，创造的财富多了，钱比以前多了。但这些钱比较分散，不可能都纳入财政上来。如果简单地采取行政手段收上来，由国家高度集中使用，一收，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就没有了，第二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钱了。在资金这样分散的情况下，矛盾怎样解决呢？国家搞必要的建设缺乏资金，而某些地方和企业有了钱，就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横冲直撞，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冲击很大。对这些分散的资金，不能简单地去收，应当采取经济办法，因势利导，集中起来。钱，你的还是你的，但要引导用到国家需要的方向上来。如果采取老办法，就山重水复；相反，如果走新路，就会柳暗花明。我们一方面应采取切实措施，增加财政收入，这是必要的。另方面要发挥银行在筹集资金中的积极作用，通过银行再分配，作为财政再分配的补充。

筹集国内资金，可以采取储蓄、债券、保险、办信托吸收游资等办法。日本战后资金也很困难，日本政府通过银行把分散在千家万户的闲散资金集聚起来。日本一九六四到一九七三年，平均储蓄率为12.8%，一九七八年我国的储蓄余额中，定期存款占80%，有200亿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投入建设用的。目前我国职工的储蓄率才上升到9%，发展的余地还相当大。各种形式的储蓄，包括有奖储蓄都要积极开展。同时，每年可以视情况发行一部分能源建设债券或重大建设项目的公债券，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购买。这样每年几十亿元是可以拿到的。长期储蓄的利息和放款的利息，可适当提高一点。有些建设项目需要贴息的（如公共工程基础设施），财政上可酌情给予补贴。上海郊区，对凭票供应的自行车、缝纫机，试行预收货款、分期交货的办法，既方便群众，又有利于回笼货币，限制倒卖票证、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据几个试点单位的调查，农民预购自行车、缝纫机的货款，约有20%—40%是从银行提取的，大部分是家里贮存的现金，这对回笼货币也是有作用的。还有其它一些办法，可以试验。集中起来的资金，不纳入财政预算，主要通过银行去办，让银行真正发挥作用。

银行筹集的资金。如何使用？应当实行计划指导，资金的筹集和贷款的发放，都要纳入综合的财政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进行综合平衡。贷款要有物资保证，做到有钱、有物。贷款的项目，由计委安排，但需由银行进行核算，择优发放。我国现在没有一个部门和机构认真考核基本建设的投资效果，只考虑每年投资多少，搞什么项目，没有考虑投资后如何收回。计委管计划，建委管施工，银行管拨款，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形成发钱的不管收钱，用钱的不负责还钱，这是我国基本建设工作上的最大弊病，造成的浪费不知有多大。今后要逐步进行改革，建设项目的拨款，要转给银行管，投资的回收也由银行负责。对建设项目，

一定要讲效益，不要花了投资，长期不受益。基本建设应当有个总体规划，特别是对大的建设项目，要考虑从哪里搞起，是从头搞起，从尾巴搞起，还是从中部搞起，要认真进行核算，选择出最佳方案，做到逐步受益，不能十年不受益。这样，对银行、对计划、基建部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世界银行发放贷款的经验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他们要求做到“精心挑选，彻底核算，严密监督，系统分析”，每一个项目都要经历六个阶段的建设项目周期，即项目的审选、准备、确认、谈判、执行和监督，最后评价。确定一个项目一般要两年时间。他们选定的项目，95%以上都是成功的，基本上按期收回了贷款。我们也要注意改进银行的工作，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把资金管好、用好。

七、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我们进行四化建设，战略上不能囿于自给自足的经济思想，墨守国内自我循环的陈规，必须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开放的方针，立足国内，放眼全球，把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大力开展对外的经济技术交流。我们讲坚持自力更生，这同发展对外贸易并不是矛盾的。不能说出口越少，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就越好。在经济上，以人之所长，补我之所短，形成我国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这就是坚持了自力更生。这个基本方针要定下来，否则没有明确的方向。这几年我国对外贸易有了显著进展，四年来平均出口增长速度为13.7%，高于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的速度。

一九八○年出口达到180亿美元，比一九七七年增长1.4倍，进口203亿美元（含地方的15亿美元），增长1.8倍。这是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反映，是外贸体制初步改革的成果。不能认为前两年外贸搞了“高指标”，搞“左”了；更不能把“外贸工作有个大的发展”的提法，也当成错误的东西来加以批判。从我国的国力、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看，外贸工作不是发展过快，而是不相称。在调整时期，外贸工作有需要也有条件搞得快一些。这对于我们克服当前的困难，积蓄更多的力量是有益的。

外贸出口，要发挥我国的优势，确立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拥有一大批拳头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我们要利用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资源。钨、锑、钒、钦等稀有金属和稀土等资源，我国在世界上很有地位，但这些都是战略物资，出口要谨慎。石油和煤炭，是我国经济的两张王牌。随着节油和海上石油开发的进展，要增加石油出口量，赚取外汇。煤炭，我国藏量丰富，而太平洋沿岸不少国家缺煤，运输比较方便。国际市场对煤的需要量持续上升，价格上涨也较快，要积极开发出口，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骨干商品。

我国农业上也有许多优势。大米的产量，我国占世界第一位，大豆、花生、芝麻等也曾大量出口。我们应当有计划地逐步改变食物构成，从城市首先做起，由吃大米为主逐步改变吃小麦，由吃豆油、花生油为主逐步改吃菜籽油，腾出大米、大豆、芝麻、花生等出口换回小麦、玉米，这在经济上是划算的，对改善食

物营养成分也有好处。我国还有传统的土特产品，应大力发展，占领世界市场。

二是劳力。承包工程、劳务出口刚打开局面，近年来已对外签订4.6亿美元的合同，今后发展的前景是好的。此外，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技巧劳动产品的出口，要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工艺品享有盛誉，要发挥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的特色，尽量使日用品美术化和工艺品日用化，以适应国际市场广大客户的需要。供观赏的贵重的高级工艺品，只能搞少量的；大量的还是要搞实用的美术工艺品。服装，尤其是上海的西装是有基础的，这实际上也是劳务出口。要认真搞好设计，适应世界的潮流，研究外国人的特点和服装的发展趋向，加上中国的特色，独立设计自己的出口服装，做到新颖、美观、适用，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三是机械产品。许多机电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已逐步减少和停止生产，要抓紧时机走出去，进入世界市场，特别要注意发展成套设备的出口。缪云台[1]先生建议，自行车的出口我国应当占世界第一位。船舶出口也很有希望，到今年四月底，已签订六十万吨民用船舶的出口合同，成交金额五亿七千万美元。香港联成轮船公司董事长包玉星[2]先生估计，由于地理条件和劳力、技术条件，到一九九〇年中国的船舶出口将达三百万吨至四百万吨，在十年至十五年内逐步取代日本。这个估计可能有些偏高，但他的分析是正确的，只有中国具备条件取代造船业日益走下坡路的日本。增加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是改变出口结构的重要方面，是外贸方面调整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在设备更新换代和填空补缺中，把引进技术与自行研究设计结合起来，积极研制创新，树立信誉，创出牌子。

进出口的经营应当改善和加强。要讲运筹、经营、串换。出口什么，进口什么，经营得当可以搞得很划算。怎样搞才对我国有利，这里学问很多。比如现在国际市场上是化纤织品便宜而棉织品贵，而我们国内却相反，棉织品便宜而化纤织品贵。我们可以多进口化纤，少进口棉花，多消费一些化纤织品，腾出棉织品增加出口，再配合进行一些价格上的调整，这样一进一出，可增加收入十多亿元。

这次在上海座谈时，许多企业都认为现在外贸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脱节。工厂反映是："捆住手脚搞生产，蒙着眼睛搞外销。"对外做生意，跟着走是不行的。现行外贸体制，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把经营外贸的实体放在企业和企业联合体上，把外贸部门由收购经营改为代理业务，要逐步地朝这个方向改。现在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如工贸结合，组织专业性的出口联合，按口岸组织出口协会等。外贸体制的改革不要一刀切，要说搞，就统统搞，要说不搞，就统统不搞，这样不行。一定要区别对待，分别指导。福建、广东的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既不同于福建、广东的特区，又不同于内地。这次在上海，我就向他们讲，上海要向外挤，不要向内挤。他们的条件较好，对外关系历来就比较多，比较熟悉，灵敏度比较高。要利用这个条件，让上海等沿海城市放手搞外贸，搞产销结合，工贸结合。沿海工业缺乏原料，国内原料供应不足时，可到国外找米下锅。比如炼油厂，现在普遍吃不饱，可否考虑

进口原油加工后出口，以进养出。对沿海城市进料加工、来样加工，应放宽政策，多辟渠道，大力发展。还有一些出口商品，到底真亏假亏，各有各的说法，争执不下，可否确定一条原则：凡是外贸部门认为是高亏的出口商品，而生产部门或产地认为不是的，可以由产地或生产部门实行工贸结合来经营出口，自负盈亏，外贸部门只负责统筹协调。我国沿海地区近一亿人口，这些地区外贸发展了，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际市场上，我们还有很多空白，要有计划地开拓市场，扩展贸易。既要巩固传统的市场和原有的客户，又要在中东、拉美以至西欧、北美开辟新阵地，发展新客户。要组织好国际商情网和销售网。外贸部门要把建设推销员队伍放在重要位置。这支队伍力量非常薄弱，懂业务、会外语、能谈判的全国不过八百人，而能出国独当一面谈判的还不到一半。现在是以请进来谈为主，将来要以走出去为主。外贸收购固然很重要，但外贸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推销上。要下力量培养精明能干的推销员队伍。广东机械设备出口公司派出一个五人推销组，到巴西、阿根廷等四国，推销了机电产品二千六百多万美元。对做出成绩的优秀推销员要提拔。推销员应当有一级的、二级的、三级的……，好的推销员级别可以相当于副经理、经理，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都应当提高。有了一支精干的推销员队伍，我们的外贸事业才有希望。

八、千方百计使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

努力把农业搞上去，是调整经济结构的最重要的内容，是调整时期保持一定速度的关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的情况是喜人的，农村是欣欣向荣的。尽管遭受了较严重的自然灾害，今年夏粮仍获丰收，预计比去年增产六十亿斤以上，油菜籽增产五成以上，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结束了吃进口油的局面。尤其是后进地区这两年变化更大。像皖北、豫东、苏北、鲁西北，以及其他地区，可以说出现了多年所没有见到过的大好形势。这次，我们沿途看见，许多农民早出工，晚收工，在所包的那块土地上真正是在“绣花”了，积极性非常之高。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在调整时期争取农业稳步增长。

发展农业，靠政策，靠科学的潜力都很大。政策的威力，还没有充分发挥，不止是管两三年，而是会长期起作用的；至于发挥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更有广阔的天地，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这两个方面抓住了，就把调整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有机结合起来了，它将给整个农业生产和农村形势带来巨大的变化。

不断巩固、完善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落实农村各项政策的中心环节，必须认真抓好。一年多来，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出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有的联产，有的不联产；有的包到组，有的包到人、包到户；统一经营的内容也不尽相同。这是农村生产关系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对生产力的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像去年、今年这样严重的旱涝灾害，如果没有联

产责任制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要取得这样的好收成是不可想象的。应该看到，各种联产责任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农民的愿望。有的同志担心，包产到户和大包干以后，会不会瓦解集体经济，走单干老路。我认为，我们对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创造性，切不可低估。在我们党多年的领导和教育下，我国农民是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办好集体经济的积极性的。农民要求摆脱的并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以及各种“苛捐杂税”，即不合理的负担。这是问题的实质。我在四川时，就听农民说，第一锄头是给国家挖的（上征购），第二锄头是给大队挖的，第三锄头是给队长、会计挖的，第四锄头是给八大员挖的……，最后一锄头才是给自己挖的。这样，农民哪有多大积极性呢！多年来，我们在农村中最大的教训，就是许多事不是顺着农民的劲干，而是与农民憋着劲干，老说群众落后，越批他越不起劲，越没有积极性。为什么各种责任制，特别是联产责任制一出现，就有不可阻挡之势呢？就因为它合乎民意，顺乎民心，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皖北、在内蒙古、在贵州、在鲁西北，看来变动的结果都相当好。许多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地方，又出现了向统一经营的方向发展的趋势，经济联合的因素逐渐增多。一些经济基础比较好的社队，在专业承包的基础上也向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现在，责任制正在发展、变化，究竟如何变，各地有各地的情况，不必硬性规定一个模式，应当在群众的实践中去不断巩固、完善和进一步发展。实行联产责任制后的一些具体问题，如烈军属的优抚、干部的补贴、民办教师的待遇、水利灌溉、农田基本建设等，只要同群众商量，是可以迎刃而解，找出办法的。在这方面已经创造了一些经验。各级领导的注意力，不应当在概念上打圈子，而要密切注意新情况、新问题，细心研究和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创造，引导群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要忧心忡忡，硬性去“纠偏”；也不要撒手不管，任其自流。现在农民还是惊弓之鸟，怕变。我们的各项经济政策，要稳定。政策有连续性，人心才稳定。

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这是繁荣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这是致富的道路。农业科学工作者提出，要树立“大农业”、“大粮食”的观点，这是有道理的。粮食生产我们必须始终抓紧，丝毫也不能放松。但是过去我们在“左”的思想和主观主义的指导下，不顾客观条件，不因地制宜，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扩大播种面积，为此而搞了一些人造平原、围湖开垦、深翻土地等投资大、费力多、效果小，甚至破坏了生态平衡的蠢事，加重了群众和社队的负担，结果一些地方越搞越穷。今年年初到兰考，那里的老农就对我说：“这里是多好的落（花）生地呀！一亩要收三百斤。可是以前老叫我们种粮食，‘过长江’，结果一亩只收几十斤，多可惜呀！”所以，我们在政策上、措施上要从有利于促进农业因地种植出发，使粮、棉、油、糖、烟等作物合理布局，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把我国的自然资源充分地、合理地利用起来。现在，北方发展棉花、花生，长江流域发展油菜，东北发展甜菜、葵花子、大豆，看来是一种趋势。比如鲁西北棉田由一九七八年的三百多万亩发展到一九八〇年的八百万亩，产量从189万

担增加到821万担。我与那里的地、县委书记座谈，他们提出，只要按现行政策不变，超产一斤皮棉国家奖售粮食二斤，加价百分之三十，那么他们可以再扩大面积，全省可以由现在的九百六十万亩，扩大到二千万亩，争取产量再翻一番。这对国家、对社员都是有利的。有关部门算了一笔账，按国际市场价格，进口一斤棉花至少顶七斤小麦。从国外进口一吨棉花需人民币5800元；在国内，包括加价、粮食亏损在内，只需要3900元。因此，国内多发展棉花，粮食不够，适当进口一些也是划算的。从山东的实践看，棉花地多属于轻度盐碱地，种粮食并不高产，有许多社队把好地换来种粮食，虽然粮食面积减少，但总产仍能不减或少减，能收到以粮保棉、以棉促粮的效果，鲁西北的口号就是“一亩粮食吃饱饭，一亩棉花作贡献”。所以，在种植上，要给社队以自主权。当然，调整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作物布局，使之合理化，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要积极地、稳妥地进行。像山东的棉花、花生，东北的大豆、甜菜，内蒙古的甜菜，福建、广东、广西的甘蔗，都要在长远规划中作为专题进行研究，有计划地搞，使我国的农业能够逐步周转过来，有个良性循环的结构。

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许多地方还没有摆在议事日程，这方面的潜力更大。杂交水稻、鲁棉一号大面积推广的成功，已经显示出威力来。我国农业要走一条投资不那么大、效果比较好的路子，必须把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放在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实践已经提出了很多课题。比如，种子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极端重视。现在良种的蜕化很严重，不论种植业和养殖业都迫切需要把良种繁育和推广的体系建立起来。拿养猪来说，现在大膘肥猪已不大适应消费者的需要。每头活猪出口到香港，瘦肉占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的，90公斤要卖170美元；而瘦肉占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的，只能卖70美元；瘦肉不到百分之四十的，只能卖40美元，三头顶不上一头，我们一年向香港出售120万头肥猪，就要少收一亿多美元。现在湖北、北京等畜牧研究部门，已经培育了一些瘦肉型的品种，要逐步试验推广。又如肥料问题，现在我国的肥料结构很不合理，氮、磷、钾肥的比例是1：0.23：0.003，用磷肥很少，而钾肥更谈不上。农业科学工作者建议，今后应大体维持1：0.7：0.2的比例比较适合。我们要发展复合肥料，增加磷、钾肥的比重。同时讲究效益，计算投入产出，看肥料用在什么地方最合算。高产地区每亩一般已施氮肥一百多斤，主要应改变肥料结构，多施磷、钾肥。原来低产缺肥的地方，氮肥增产的效果还比较大，同样施一斤氮肥，要多拿几斤粮食。还有农药问题，要着重研究高效低毒农药和生物农药。随着家禽家畜的发展，配合饲料的研究、推广要跟上去，并投入工厂化生产。此外，林业、畜牧业、渔业都有一些急迫的科研课题。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以后，学习农业科学技术逐渐形成高潮。农业科研部门和科学工作者，要投入这个高潮。

在农业上，我们应当有战略设想。要从长远打算，调整好农村生产关系，改革农村管理体制，发挥我国农业的优势，逐步改善基础脆弱的状况，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使农业内部结构趋于合理。为此，建议制订新的农业发展纲要，使农村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全面地发展起来，使广阔的农村真正走向繁荣。

注 释

1．缪云台（1894—1988），云南昆明人。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民国时期曾任云南省政府委员兼农矿厅厅长，国民参政员，行政院政务委员，立法委员，国大代表。1949年去港后赴美，1976年回国定居。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包玉星（1920—2005），浙江宁波人。时任香港联成航运公司董事长。曾在上海多家银行任职，并在其兄包玉刚经营的香港环球航运公司供职，后自己创业成立联成航运公司，1980年曾在大连造船厂订购两艘2.7万吨级货轮，并就发展中国造船和航运事业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

同志们：

我今天是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看望大家来了。学位委员会的这次会议，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各方面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方面的专家，特别是许多第一流的专家都到会了。这是我们今年继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以后，科学界群英云集的又一次盛会。大家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从今以后，我们新中国的学位制度，去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学位条例，就可以逐步地、具体地实行了；不久将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博士、硕士和学士了。我看这是中国的教育史和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解放以后的创举。全国人民对这件事都会是非常高兴的。

这次开会期间，正是连续高温、盛暑时节。这几天非常闷热。而且到会的很多专家、教授都是已届高龄的老人。我看了会议统计的材料，七十岁以上、以至到八十岁以上的，占到会的差不多四分之一，但是大家不顾炎热不辞辛苦、振奋精神，为实现新中国的学位制度，为培养和选拔我们的高级专门人才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精神十分感人。党中央和国务院感谢同志们，并且向同志们表示祝贺。祝大家在祖国的繁荣、发达的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财政工作要适应新情况　研究新问题*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听取财政部汇报时的插话和讲话。

只要有钱，不管在哪里，都好办事，这是最基本的一条。现在群众有钱，企业有钱，中央各部的钱也比过去多，就是财政部钱少。

对外债，讲得那么厉害。实际上，偌大一个中国，才四十几亿美元外债，除了其中几笔账（二十几亿美元）是一九七八年一脚踩空搞坏了以外，到今年年底就只有十几亿美元的外债。很多债是借得好的。菲律宾借了一百二十亿美元外债，波兰这样一个国家也借了二百亿美元外债。我们当然不能这样搞。

除了低利贷款以外，欧洲贷款一个钱不用不行。中国人办事就是喜欢一窝蜂，一刀切，要么就什么样的钱都借，曾经想五百亿、八百亿美元的借，借买方贷款；要么就高利贷一个都不借，为了保护民族工业，买方信贷也不要了。我们过去是忽而都进口成套设备，忽而都不进口。宝钢连耐火砖都是进口的，说是进口快，我们自己生产慢。打摆子[1]的毛病很厉害。我们要正常温度，不要打摆子。要搞点中庸之道，学孔夫子的办法，不要搞绝对化。欧洲的买方信贷主要是设备，不能多借，但为什么不能用一点呢？我们国内和它配套嘛。用二三十亿美元的欧洲买方信贷，我看没有什么危险。现在进口设备花五千美元都要拿到北京来批准，这么大国家，花五千美元都要中央批还行？整个利用外资问题，各种资金如何搭配使用，由进出口委员会拿总，然后由计委综合平衡。

老干部的安置是要花一笔钱的。

到今年年底，大概军工各部可签五十亿美元的出口合同，这样搞很有好处，军队自己的装备、科研费，都可以解决。

煤、电、冶金可不可以包干？为什么不可以包干？上海冶金局包干后，国家不投资了，上缴利润没有减少，本身的科研费也解决了。中央几个部前几年的包干，现在看效果是好的，农垦的包干是好的，还可以考虑扩大几个部包干。总之，吃大锅饭的办法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包干要逐渐搞，原则上要包，但不要一下子都搞，要搞稳当点。

对农用柴油，国家完全不补贴不行，要定个优待价基数，超过部分不优待。如果价格完全不优待，农民年底一算账，会说刚得到一点好处，你们又拿回去了。我考虑，可以使用这种办法，即柴油、电可以搞定额，定额不要搞高了，不

要一年一定，可以多定几年，定下来以后，今年节约了，明年还可以用。这样可以解决天旱天涝用多用少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到年底把多余的油拿去做饭的问题。农业上用油、用电有个季节性问题，大旱大涝不给是不行的，但吃大锅饭敞开口供应的办法浪费太大。没有经济办法不行。各条战线都要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有两大问题，一是上层建筑扯皮体制的问题，二是分配方面吃大锅饭的问题。扯皮体制一下子不容易解决，解决吃大锅饭问题一抓就灵。农业上优待供油、供电不能吃大锅饭，要用经济的办法。水利也有极大的浪费。如果实行多用水多交费，少用水少交费的办法，就可以增加百分之三十的效益，大大减少浪费。中国要提高经济效益，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要消灭浪费；而消灭浪费，就要同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用经济的办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农业、工业都要这样办。农业搞了责任制，开了脑筋，很见效，工业也已开始见效。在用水不交费的地方，也可以规定超过多少就交费。现在农村用电没有电表，用水没有水表，在这方面，要搞点设施。现在是没有水的地方连喝的水都没有，有水的地方就敞开用。

要认识到，水就是能源，节水就是节能。对这些问题，将来经委都要研究，搞些经济的办法，做出规定。

这个办法不行。（注：指财政部汇报提纲提的对粮棉油的收购根据国家批准的征购基数，核定一个超购加价补贴数包给地方，超过部分，外调的由国家补贴，内销的由地方自己负担的办法。）这样搞，就是政策变了。有些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定收购数字，只收多少，超过这个数字就不收了，你自己到市场去卖。但粮棉不存在这个问题，多收粮食比进口粮食好得多，多收棉花也比进口棉花好得多。花生油也不存在这个问题，豆油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用的葵花种子不对，是食用的种子，出油率低，要改用国外的油用葵花种子。现在多余的葵花籽可以卖给人吃，有很多地方缺。

这里有两笔大账：甲乙级烟增产，提价，提高质量，一年可增收五十亿元；税收调整，加上整顿“跑、冒、滴、漏”，一年也可以增收五十亿元。这两笔就是一百亿元，五年就是五百亿元。烟酒提价，明年就可以见效。有人会骂，但骂还是骂，买还是买，拿这个去鼓动造反也鼓动不起来，这和肉提价不一样。

烟提价主要是提甲、乙级烟的价，丙级的提几分钱，丁级以下不提价。抽烟的是整个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因提价受到影响的又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问题不大，但收入很可观。所以，烟酒是生财之道，增财之道。

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发行公债，群众从银行取出存款买公债，还不如银行认购。日本等好多国家解决财政问题都是靠发国债，日本国债的百分之六十是银行认购，它每年发的国债占整个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我们是通过银行解决，还是通过财政解决，可以研究。

我赞成利息高一点。今后国家银行投资、贷款的利息也可以高一点。这样，对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也有好处。如果贷款利息高，就不会发生自己有钱不用而向

银行贷款的事。这样，国家的资金也不会搞得那么困难。

我们国家现在财政困难，除了十年干扰外，原因之一，就是情况变了，我们国家对外开放了，进出口贸易扩大了，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了，但是财政的办法没有变，解决资金的办法没有变，一方面是有钱，另一方面又没有钱。财政问题基本上是个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按照老路子走，确实是山穷水尽；如果按照新路子走，就是柳暗花明。按老办法处理新情况，没有出路。我在上海听一个民主人士讲了一个很尖锐的意见，他讲，要讲求时效。他说，外国高利贷是个基本趋势，外国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的利息都敢用，我们连百分之七八的利息都不敢用，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家的周转快，我们的周转慢。我们中国搞基本建设，是一个企业全面搞，从头搞到尾，整个投产，十年都可以不受益。这是外国人不敢搞的。外国人搞建设，从头开始的也有，从尾开始的也有，从中间开始的也有，三四年后就可以受益，受益以后资金再周转扩大建设。任何一个国家，百分之十的利息十年不受益也不得了。我们可以先搞一部分能受益的，逐年受益，逐年偿还贷款。

财政部这个汇报，有相当一些内容是在经济中心讨论过的；有些是一家之言，不一定对；有些是属于财政本身增加收入，减少“跑、冒、滴、漏”的措施，可以马上执行；有些还需要研究。

财政问题，我最近想得比较多，我对财政问题提出几个基本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国家的财政出现赤字，今年、明年的困难相当大，这是事实。第一个观点，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得把经济搞上去，还是从生产、从经济上面想办法，这是一个总的精神。现在一方面我们财政很困难，另一方面我们经济上的潜力很大。第二个观点，我们现在考虑财政问题、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必须要考虑到新情况、新问题，要有新的办法，不能走老路，不能完全搬用老经验。这两个问题，都直接涉及到我们经济的路子是越走越宽，还是越走越窄。我认为，讨论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我们经济上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到新情况。六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的政策必须适应新情况，如果不适应新情况，财政上的措施可能同新情况对立起来，就会限制中央采取的新方针、新政策和新改革，而且矛盾会越来越大。因此，财政要适应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这样路子就会越走越宽。这是两个基本的观点。最近大家也是按这个精神讨论的，但也不完全是，我认为有些观点不完全符合这个精神。

第二个问题，除了财政本身如何采取增加收入的办法以外，这里面有很多办法是可以采用的。现在比较，关键的东西，第一位的问题，还不是说中央拿多少钱，或者列入预算多少，首先是要增加我们整个社会的财富，提高经济效益，使全党各级干部，所有的企业和广大职工，包括农民，能够减少浪费，增加财富，提高效益。钱不管在哪里，只要不浪费，只要经济效益有了显著的提高，文章就好作了。第二，才是我们如何把钱用得比较集中，合理分配。如果这个问题我们考虑得不恰当，从一方面来讲，好像减少了困难，从根本上讲，却增加了困难。比如现在国家财政困难，把钱都集中起来，从中央财政上看，增加了些钱，结果

把经济搞死了，把企业积极性打掉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就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反过来，如果我们整个经济搞活了，效益增加了，在这个基础上，中央财政的困难就比较容易解决。我们考虑问题首先从哪方面去考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最近想来想去，我们现在和一九六二年有很多相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点。如果我们现在简单地按一九六二年的办法，搞高度的集中，就是企业也没有钱，农民也没有钱，机关也没有钱，简单地把钱集中到中央财政上，那我们就很可能不是出现良隆循环，而是出现经济萎缩，结果，财政渡不过困难。因此，我们现在首先是应该把经济搞活，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家去挖潜，大家去消灭浪费，大家去提高效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考虑如何使用钱的问题。我很欣赏建设银行刘礼欣同志的意见，他说，国内到底有没有资金，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没有钱，理由是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物价上涨。另一种认为，国家财政没有钱，但是体制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地方财政有钱，企业有钱，人民手里也有些钱，只要方法对头，还是可以筹集一些资金，用于必要的建设。他说，他同意后面一种意见。他说，要在国内筹集建设资金，以银行的再分配作为国家再分配的一种补充。我同意他的观点。绝不可以单从解决财政的困难出发，而把企业搞死了，把企业的积极性打掉了。

第三个问题，现在我们中国虽然经济困难很大，但另外确实潜力很大，问题是如何把潜力真正挖掘出来。要把潜力挖掘出来，必须依靠大家的积极性，依靠企业的积极性，依靠地方的积极性，依靠农民的积极性，依靠职工的积极性，没有这一条，不可能把潜力挖掘出来。要使他有积极性，就必须要给他以经济利益，必须同他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要把企业积极性调动起来，必须给企业以物质利益；要把个人积极性调动起来，必须给个人以物质利益。当然，这要和政治思想工作结合起来。我在上海讲了这个观点，对不对，我今天提出来。解放后，毛主席关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观点，就是要搞群众运动，依靠大家的积极性解决困难。我认为，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对的。为什么毛主席这样一个设想没有成为事实？建设时期和战争时期不同。战争时期，我们依靠政治思想工作；建设时期，政治思想工作还需要，但没有物质利益不可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方面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不承认物质利益的原则，不承认群众的物质利益，所以，毛主席的这个方针不能实现。吃大锅饭的问题不解决，大家的积极性就不能调动。农业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归根结底，是解决了吃大锅饭的问题，承认了他们的物质利益。我们的工业、商业浪费大得很，但是很多单位一包干就变了。当然，包干怎么样完善是另外一个问题。包干不包干大不相同，联系物质利益同不联系物质利益大不相同。财政部的调查很说明问题，军工各部的包干，实践证明是好的，有很大的积极性，农垦的包干有很大的积极性，企业包干有很大的积极性。要包干，就会发生财政分散的问题，相对的说，国家财政账上的钱就会减少。现在同一九六二年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的体制改革出现了一个很好的情况，现在我们预算外还有一大笔资金，这笔钱，我们还可以用的。如果反过来，我们经济现在搞得很死，就不可能有这笔

钱。现在预算外资金三年增加了一百二十亿元，一年增加几十亿元，如果我们现行政策不变，今后还会增加，现在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嘛。搞经济责任制（现在我们讲经济责任制，确切不确切不管它），把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去挖潜革新，去向浪费开战，这样一搞，社会财富就增加，但是这个社会财富并没有完全集中到国家财政手里。资金分散，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外面钱这么多，个人、单位钱这么多，财政部钱这么少。照我们过去的想法，很简单，全部冻结，你的钱也是我的，马上可以拿回一百多亿元，但是明年就没有钱了，以后就没有钱了，这就是我们过去走的路子。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走这条路子。要适应我们的新情况，一是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二是在收入增加、资金分散的情况下，合理调度、合理使用，而不能采取把资金简单的收回集中的办法。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值得很好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要发挥银行的作用，通过银行，把分散的资金合理的使用，这是我们目前不走老路而又能解决新的矛盾的好办法。

除此之外，在经济上还有一个总的问题，就是在调整时期，必须要使我们的国民经济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这也涉及到很多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规划，计委初步想工业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四。百分之四行不行？还能不能再多一点？至于如何使速度再多一点，这里面还有些问题要进一步研究。一是挖潜，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提高效益，减少浪费。二是使国民经济有一定的速度。有了这两条，财政困难就可以渡过，财政问题就比较好办。财政本身，我看有些措施可以先搞，比如解决“跑、冒、滴、漏”，实行财政监督等。

总之，企业合法的收入，应当得的利益要保护，不能变来变去。非法的东西，歪门邪道的东西，必须加强监督，这样就不是鞭打快牛。

物价问题，就是不要在消费者身上打主意，但有些方面牵动不会有多大，比如烟酒提价和某些税收的调整，可以搞，这不会有什么问题。还有些生产结构的改革，也不影响消费者。比如降低化纤价格，提高棉布价格，一年可以提高二十多亿元。

当前一个工资不能提得多，一个农产品价格不能提得多。

今天听了财政部一篇汇报，大家考虑考虑。编制五年计划，集中反映在财政问题上。如果财政问题解决得好，五年计划就好搞；如果财政搞不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通过财政把经济问题解决好，既对经济有好处，又对财政有好处。财政部的很多意见是好的，有的可以早点执行。

在改革中，必须对企业违法乱纪的东西加强监督，不是只要活，不要监督。越活越要监督。

注 释

1．打摆子，即疟疾病，由带疟原虫的疟蚊叮咬人体后经血液传染的疾病，其症状为周期性发冷发烧，有时浑身发抖，俗称发疟子或打摆子。这里借以形容经济工作中忽冷忽热、忽高忽低的现象。

关于煤炭出口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 这是赵紫阳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普的一封信的批示。

秋里、谷牧同志：

请你们主持开会专题研究一次，提出解决办法。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扩大地方煤炭出口这个问题，如果把政策搞活一些，以出口煤炭所得外汇，解决出口中运输、港口的困难，路子就会越走越宽，办法越来越多，就可逐步改变目前这种困境。如何？请酌定！此件印发财经小组各同志。[1]

赵紫阳

八月二十五日

注 释

1．谷牧阅后批示：“请能源委和进出口委一起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提出方案。谷牧八月二十七日。”

余秋里阅后批示：“新三同志：遵照紫阳、谷牧同志批示办。我意请你同进出口委员会、计委、铁道部一起研究，究竟能出口多少合乎标准的煤？今年多少？‘六五’期间多少，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请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先由我和谷牧同志一起听一次汇报，然后报中央财经小组审定。余秋里八月二十九日。”

新三，即王新三（1914—1991），辽宁抚顺人。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曾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抚顺矿务局局长，国家计委燃料工业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

既要精神振奋　又要实事求是*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听取国家经委关于全国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情况汇报后的讲话。

一、关于速度问题。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工业生产发展有一定的速度，以便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积蓄力量。但是，不能勉强提出那种经过努力而达不到的速度。总的要求是，既要精神振奋，又要实事求是，二者缺一不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情况、政策和措施上，不能脱离实际去追求高速度。经验证明，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好了，速度也就上去了。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也要取得好的经济效益。目前，精神不振的问题在我们干部中间确实存在，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经济问题，要从经济方面仔细认真地进行研究，要根据实际情况定指标，能搞多少就搞多少，不能单纯从政治、从需要出发。要接受过去的教训。指标定多高比较合适，归根到底，要看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如果我们把情况弄清楚了，可能会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比较快的速度。当前，我们要沉住气，要保持正常温度，不能打摆子，不要刮风。

二、关于工业生产推行经济责任制问题。总的方向是明确的，要继续搞下去。考虑到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与农业上推行责任制的情况大不相同。因此在推行经济责任制过程中，要尽可能地预计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加以研究解决。要防止有的企业根据利润多少来安排生产，发生生产与国家计划、社会需要相脱节的问题；有的企业一搞包干，就忽视产品质量，甚至转嫁负担。另外，还要注意瞻前顾后，照顾左邻右舍。职工收入要稳定增长，个人所得部分不能搞得多了，不能今年钱多就多发，明年钱少就少发，不要反复。企业多得一点问题不大。对这个问题，如果不加强领导和监督，不严加控制，就会出大问题。这次工交座谈会不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明年就可能往后退，作检讨。

推行经济责任制后，对工厂多余的劳动力如何安排，应当注意研究解决。对工厂里不合格的领导班子，要加快调整，不要再等待。采取什么方法，可以研究。

三、关于企业挖革改问题，主要指的是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今后几年，除较大的能源、交通运输和军工项目以外，我国的工业主要依靠现有企业。过去我们只注意量的扩大，不注意质的提高，搞“外延”，不搞“内涵”。这样不能改变工

业的面貌。今后要坚决把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转到“内涵”上去。这个方向要定下来。要考虑如何把各种渠道的现有资金合理利用起来，搞挖潜、革新、改造。还要有计划地引进一些新的设备，加强技术改造。有些旧设备，特别是机械设备，要逐步换掉、回炉。企业搞挖潜、革新、改造，有些要纳入计划。这次工交座谈会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计委、建委、财政部、机械委都要派人参加。国务院准备召开专门会议，全面系统地研究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问题。

四、关于计划安排问题。明年的工业生产能早安排的要早作安排，如今后要用的重型设备，只要看准了的，都要尽可能地早一点定下来，不要等年度计划。进口原材料所需的四十亿美元外汇，要抓紧研究解决。

对于库存积压的产品，特别是机电产品，要认真清理，哪些可以报废，哪些经过改造可以利用，哪些已经改进了可以继续安排生产，不要笼统地认为有库存就不安排生产。机械工业更新设备，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也可以允许用户招标。

五、关于联合问题，现在不要只是一般号召，要一个个地搞，一批批地搞。打破部门、地区界限，要从城市开始，首先从中心城市开始，从工业基地开始，就地搞联合，然后逐步向外扩展。这可能是个捷径。上海高桥地区以石油化工为中心的联合企业，搞得比较快，要认真总结和推广他们的经验。搞联合，关键是要讲求经济效益和资源的合理利用。目前全国有七千万吨石油可以加工，如果再增加一些，打破部门界限，搞好联合，合理进行加工和综合利用，几年之后，就可以拿回一笔很大的财富。

六、关于城市用水问题，要采取紧急措施，认真抓好。一方面投一点资开辟新的水源，另一方面要狠抓节约用水。今冬明春，华北和北京、天津的农业用水，要让一部分出来，保证城市的生活和工业用水，这是全局。农业上除了蔬菜以外，要多种旱田作物。天津交国库券和借款以后剩下的一亿二千万元资金，解冻了的应先用来解决水的问题。[1]

注 释

1．此件赵紫阳曾经送请陈云审阅，送审时写道：“陈云同志：上面谈了有关速度和责任制的问题，文字不长，可看一下。如有指示，希告。赵紫阳九月三日。”陈云批示：“紫阳同志：此件今天才看到，完全同意。陈云九月九日”。

关于“六五”计划和一九八二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意见*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九月三日、四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八二年计划控制数字的说明》汇报时讲话的要点。

总的同意这个《说明》，特别是第一部分“对今年经济形势的估计”，第二部分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六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课题”和“六五的速度”。至于具体展开的部分，比如财政等，还可再研究。讲几点看法：

一、速度。同意工农业生产、国民收入“六五”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都定为百分之四。执行结果，会超过百分之四。当然，工作要做好。小平同志说，不带水分的百分之四不简单；陈云同志说，不带水分的百分之四有后劲。现在总的说，中央机关特别是综合部门，对困难这一面，基本上是看到了。但对存在的潜力，往往估计不足。现在与一九六二年不同，有这么大的摊子，经过十年破坏，浪费大，效益差，一方面是困难很多，另一方面是潜力很大。省市区的同志对潜力看得比较多，但对宏观制约看得不够。速度定为百分之四比较稳妥，比较主动，定高了各方面矛盾更多，又没有好的措施，落实不了。特别是过去的长期计划多次没有完成，这次一定要完成。我对今年财政实现基本平衡很注意。这是一个政府信誉的问题。年初讲了，年末做到了，这很重要，可以提高人民对我们党和政府的信任。否则，不管你讲多少理由，分析得再好，你再讲明年的就没人听了。现在至少可以讲，经过今年三月人大常委会议批准的调整计划可以基本实现，形势的发展基本符合人大常委会议的预计，这就比较好。所以，留有余地好。今年财政不要勉强平衡，有二十亿元赤字就算基本平衡。前年赤字一百七十亿元，去年赤字一百二十一亿元，今年二十亿元，一年比一年好嘛，没有坏处。要瞻前顾后，如果今年勉强平衡，明年再出赤字，反而被动，没有好处。

如果这个五年计划执行结果，能够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四或者超过一些，下个五年计划增长百分之五或者超过一些，总的十年平均可能达到百分之五甚至以上。下个十年，速度还会高一些。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上，日本人士认为，中国头十年的速度可以安排百分之四，在这十年中打好基础，作好准备，后十年的速度可能达到百分之八。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估计，中国“六五”的速度百分之四至五，“七五”百分之五至六。在定“六五”速度为百分之四的时候，要展望一下今后

二十年。原来说，国民生产总值在去年基础上今后二十年实现两个倍增，也不是不可能的。第一个十年速度百分之五，大体可以增长近百分之七十；第二个十年速度百分之七，大体可增长一倍，基本上就是两个倍增。我说这个问题，目的是要说明，第一个十年干什么，第一个五年干什么，第二个五年干什么。第一个五年，甚至第一个十年，不能完全从增长速度上看工作，速度可能慢一些，但是有调整、改革和各项准备工作在里面。如果这十年勉强搞快，第二个十年再下降就不好。本世纪内逐步往上增长，对人们有鼓舞作用。

计委这个本子上说，"六五"计划要以调整为中心，我也同意。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个五年是争取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五年。五年以后，经济要进入良性循环，以后步步高。因此，这五年是很关键、很重要的五年。在这五年中，产业结构要基本解决，产品结构要有相当大的变化，组织结构要有所突破。现有企业经过技术改造要在面貌上有相当的变化。另外，在能源、交通方面要有适当的建设规模，为以后的发展作必要的准备。这五年，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同时为全面改革作好准备。全面改革，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价格体系的改革，二是彻底的官商分家、政企分开。改革中最大的困难，也就是价格问题和打破地区、部门所有制的问题。这五年速度虽然只有百分之四，但上面这些方面的工作搞好了，下一个五年就会快一些。不然，下个五年可能还是老样子。所以关键要看下一个五年是呆滞的，甚至后退的，还是走上良性循环，稳定增长的。要做到这一点，"六五"没有必要的速度也不行，不然周转不过来。速度问题，要作科学论证，给人以信心。这五年时间非常重要，有些老框框要冲破。各方面都要围绕搞好这五年多想些办法，围绕五年计划中的矛盾考虑采取措施。这五年没有什么作为，下个五年就不好办。世界银行说，中国现在借点外债，实际上是买时间。这句话讲得非常好。这五年中，我们的战略储备，包括黄金储备，能否压一点？现在卖黄金，是买了时间"重振家业"。现在不卖，将来搞不下去了再卖，那是"破落户卖家当"。又比如借外债，只要真正用得恰当，这五年不要顾虑太多。现在借外债，可以为能源、交通作必要的准备。是要付一些利息，但目前国内大量工人窝工，通过利用外资使他们有事可干，实际上抵销了一部分利息。这比坐吃山空、什么也不干好。罗斯福[1]在一九三三年危机时期搞田纳西的建设，是有道理的。我赞成你们的第二方案，再借一百亿美元。这五年多借了，下个五年可以少借。"输点氧"，现在有这个条件。如果看准了，一个黄金，一个战略储备，统统压低一些。卖点黄金，压点储备，多借点外债，把经济搞活了，以后再来补偿。所以，这五年关系很大，不能从完全正常的情况去想问题。一是能否走上良性循环，二是能否为今后的发展作必要的准备。做到这两条是最大的胜利。

二、财政。这个五年能否过去，财政是第一位的问题。财政困难怎么克服，如果没有办法，那为以后作准备等就都谈不上。这五年要寄希望于挖潜力，基本的道路与农村差不多。农村形势好，好就好在农民积极性高了。这是不是唯心论？不是。为什么？因为过去多年来农业生产的条件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但被人的积极性不高抵消了。现在农民积极性提高了，物质条件发挥了作用。这个道

理在工业上也是一样。现在工业增加的固定资产和增加的能源、原材料，由于吃大锅饭，并没有很好发挥作用。实行经济责任制，把职工积极性调动起来，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当然，工业上搞经济责任制，形式与农业不同；那是形式问题，而不是本质问题。前天陈云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实行责任制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特别是对打破吃大锅饭、打破铁饭碗，将起很大作用。小平同志说肯定会见效。生产责任制，农村先搞了，情况很好，工业、商业势在必行。当然，比较复杂，步子要稳。定额、质量、成本工作要加强。

只要政策对头，使人们有了积极性，并且把积极性引导到改进经营管理上来，避免那种单纯追求利润，工业的潜力就会发挥出来。这种潜力在于：一是经营管理，二是技术改造，三是综合利用。前提是要用政策调动积极性。我们要搞个惩罚条例，第一罚款，小错罚款；第二开除。干部也要有记过、罚款。现在我们不搞运动，但是光有奖没有罚不行。

现在解决财政问题，主要是两条：一是采取政策，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推行技术改造，搞好综合利用；二是通过银行，集中一部分资金。此外，财政本身也要有几条增收节支措施。本子上讲了几条，有些打少了，我认为要打足。看准了的措施，要把任务提出来，然后去落实。比如烟、酒方面的增收措施就打得不够；企业违反财经纪律，截留收入，偷税漏税，“跑、冒、滴、漏”，整顿好了，一年可以增收几十亿元；减少棉花进口，增加化纤进口，加上多生产一些名牌高档产品，每年可增加几十亿元收入。此外，各种补贴，外贸亏损，都会有变化。对企业不能竭泽而渔。不要一方面采取政策搞活，另一方面又用各种办法把企业的钱收走了。年年向企业、机关、团体发行二十亿元国库券行不行？企业要实行经济责任制，要舍得给他一点，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样，他会有办法的。吃大锅饭不行，要采取包干的办法。包干的里面有许多复杂问题，我们要进行研究，逐步加以解决。但凡是包了的都有效果。农垦部包得最早，就好起来了。军工各部不包，也不会有现在的局面。当然，包了以后，钱就分散了，财政集中的资金相对的要下降。那要用另外的办法来解决，通过银行把资金集中起来使用。增加财政收入，不能光盯着增加产值，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到降低生产成本。现在光讲人增加了，原材料涨价了，不讲浪费。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只增收四十亿元，主要是浪费大、效益差。安排计划，不能不考虑减少开支，增加收入，要把企业潜力挖出来，节省开支，减少浪费。真正搞得好，生产增长百分之一，不是增收十亿元，而是增收更多。要抓一批企业的技术改造，投入很少，马上能为国家增收。过去从增加生产能力上考虑多，从效益上考虑少。今后要从提高效益、增加收入上多考虑。增加收入，国内用各种方法筹措资金，加上国外借款，一是目前日子可以过得去，二是可以为今后作点准备。

国家预算外的资金，把它用好，是篇大文章。今后五年，通过提高效益、增加收入，预算外可能有一大笔钱，这是好事。问题是如何把它的使用引导到正确的方面来。怕它钱多不行，拿过来也不行。拿过来，就没有了。搞好了，很多事情可以靠它，减少财政的负担。将来要统一安排，多种渠道。要解决重复建设和

物资平衡的问题。统一安排，分头去办，统统通过银行也不行。这样就活了。实际上，这两年已向这方面迈步了。

这个五年计划的安排，搞什么不搞什么，投资用在哪里？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向钱看，另一个是向前看。就是说，一个是用在提高效益的方面，哪个来得快，经济效益好，就用在哪里；哪些生产增加收入多，就要优先安排。一个是要为以后的发展作准备，即能源、交通等属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建设和挖潜、革新、改造资金都要这样用。要抓大企业，减少浪费，有很大潜力。各部要下去蹲点，一个副部长包几个企业，抓它几千万元。钱多了，归谁都好办。计划的粗线条定了以后就要搞这个，不能撒胡椒面。今后几年，办什么事，最后都要落实到钱上，我给你多少钱，你交给我多少钱。实际上是让大家都去提高经济效益。对所有的工厂，要搞两件事：一是要按国际价格计算一下他的原料和产品，计算一下他的成本，计算他的盈亏，让他知道落后多少；二是搞内部价格，不与市场联系，作为内部计算、考核、奖惩的依据。现在我们搞“影子”价格，一方面是为将来改革价格作准备，一方面也可用以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总之，克服财政困难，要作为整个五年经济安排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能源、交通，这个东西非搞不行。能源、交通搞了，其它方面差一些将来也好办。煤矿建井规模，转到“七五”的最好不小于一亿二千万吨，不行就借钱。整个经济好转了，背一点利息没有关系。为今后发展作准备，有两个方面：一是能源交通的建设，一是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当然，技术改造要有重点。还有个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稀土金属，要引起我们的注意。特别是西北、西南水电多，有些矿产资源，开发不十分困难，也可借点外债。我们要彻底打破闭关自守的观念。我们已经是开放的国家，搞平衡不能只限于国内。有色金属是我们的优势，要以我之长补我之短。当然，也要量力而行。这样做，虽然欠些债，但过几年总有东西了。如果光怕冒风险，局面永远打不开。有条件不用，很可惜。当然，要用就要用好。

山西煤炭的开发，国家和各省都投些资。国家的投资首先满足铁路。在基本条件上国家要下功夫搞，全部都包下来不行。最卡脖子的、最困难的、谁也不愿意搞的，由国家搞。现在中国银行、华润公司有钱不愿在国内投资，除扯皮体制外，缺乏基础设施是原因之一。因此，“六五”留缺口不要留在铁路，宁可留在工厂企业，有潜力可挖。如果铁路解决了，会有人到山西去投资开发煤炭。

每年能转到能源、交通的投资有多少？不搞水平法，需要的就搞，不需要的就不搞。每年能否给能源、交通增加五十亿元？包括内部转移和借外资，再加上油改煤资金。小平同志说，再穷也要搞能源、交通，不搞是不行的。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已经压得很少了，挖、革、改主要靠企业、地方的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有一部分挖、革、改，如节能，财政负担利息补贴。基本上甩出去，外国都是这样搞的。

能源的开发计划，一定要把南海、海上石油开发考虑进去。

请韩光[2]同志研究，建设周期长的项目，如何边建设边受益。要提出规程，分

期投产，以投产后的收入来扩大再生产。

今后不要盲目扩大生产能力。要改进工作，从北京开始。讲浪费，在我们这里，在计委、建委。很多项目是在我们这里拍板的。

由于现在采取的政策与六十年代不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并不能减少多少社会购买力；相反，如果适量扩大建设规模，并不会冲击市场，而且可以减少物资积压，减少窝工。有的同志提出，现在的论证都是讲道理、没有量的分析，这很对。我们的工作粗就粗在这里，什么“正确的”、“必要的”、“适当的”、“科学的”等等，如果没有数据，这些都是空话。界限究竟在哪里？要有数字根据。比如，基建投资减少到多少，就是得不偿失，上到多少是适当。要寻找合理的界限，不要在概念上争吵。并不是基本建设搞得很少，购买力一定减少。如果下得过多，得不偿失；上得过多，又出问题。

四、发展消费品生产。看来门路很广，如化纤、糖、食品、日用化工、建筑材料等等。适应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要很好发展消费品生产。用的固定资产少，耗能也少，利用外资容易。

消费品生产要好好抓。要发展日用化工，日用化工可以搞很多东西。还有食品，包括饮料，很多野生植物可以搞饮料。葡萄酒、果子汁，不是没有销路。食品、建筑、日用化工，要搞，不用多少投资。现在老讲农副产品收购多就补贴多，如果变成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出卖，情况就不同了。这个思路是对的。从长远看问题，粮食部门要经营食品，把一部分粮食加工成制成品出售。要看到购买力提高后出现的新情况，农民用起牙膏、香皂、雪花膏、洗发膏就不得了。一定要看到购买力是促进生产的动力。因此，一方面要控制购买力，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现在回笼货币的措施跟不上。

你们的农业指标是否列低了？我看棉花一九八五年可能搞到八千万担，只要政策不变。北方的甜菜，要下决心放手让他发展。棉花、糖料主要靠北方。有些地种粮食产量很低，可以种甜菜嘛！这样农民也富了，经济也搞活了。粮食想很大增长不大可能，其他会有大的增长。不是讲自力更生嘛，拿我的东西换国外的东西也是自力更生。现在国际条件发生了变化，除非发生战争，可以以我之长，通过国际交换，补我之短。不要仅从国内市场考虑，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棉花搞到八千万担，情况就大不同了，可以不进口棉花，进口化纤。棉纱，要花功夫搞；糖，今年要花些钱，可由银行贷款。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调整农业结构，一斤棉花奖给二斤粮食。食品、饮料多了，人们的粮食消费会减少，不一定很紧张。

这次从新加坡回来，路经广州，发现广东的物价涨得很厉害，蔬菜三毛钱一斤，有的四毛钱一斤，同水果一样价，无外快收入的干部意见很大。工人问题不大，主要是机关，特别是军队。郊区工业占地要限制，要发展蔬菜。成都过去蔬菜不成问题，现在也发生问题。问题在于农民愿意搞工副业，不愿意种蔬菜。这个问题要系统解决一下，要有个办法，必要时也要搞个文件。蔬菜的价格一定要稳住，不能完全讲经济规律。城市近郊区的种菜面积和所需劳动力要保证。如果

蔬菜地搞工业，一亩地要征它多少税。不然发展下去，城市将没有菜吃。这个问题请依林同志找人论证、探讨、分析，总之是要解决的。形势再好，没有蔬菜吃不行。

五、技术改造。这既是使这五年有一定速度所必需，也是为今后作准备。重工业要有一定速度，不外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为发展消费品生产服务；二是为技术改造服务；三是能源、交通一搞，也会给重工业提出任务。我们对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如果不搞节能，不提高质量，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不采用新技术，那就不能为今后发展作准备。那就是老牛拉破车，会越拉越慢。

如果在调整时期不下决心搞设备更新，让设备继续破旧下去，再过五年还要搞调整。不搞设备更新，很多工厂将难以为继，包括鞍钢这样的厂子。还有上海的厂子，如果不抓设备更新，再过七年就要垮下来。调整时期不搞技术改造，就不能积蓄力量。而且这样一搞，重工业就活了，能源消耗也就少了。光讲利库不行，现有的六百多亿元库存机电设备，哪些必须报废，要查清，如果把不能使用的报销一百亿到二百亿元，国民经济的情况就会好些，不能采取“推陈储新”的错误政策。现在确有很多陈旧观点，算小账不算大账。许多问题要从新的观念考虑，不能老算小账。搞了二十多年，许多设备已到了更新的时候。对设备现状要作分析，五十年代的设备，再过几年就是三十年，对整个工业摊子怎么估计，如果不把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提到重要地位，我们将前进不了。

关于节能问题，请能源委会同经委，提出今后五年的几大措施，不要多，三大措施也好，四大措施也好。先准备，在国务院专门讨论一下。国务院今后不再讨论一般方针，一般方针都已经定了，要讨论重大措施。比如，计委黄毅诚[3]同志提出的集中供热和热电联产，可行性究竟如何，算不算一大措施？又比如玻璃的浮法生产，水泥的窑外分解，等等。在这些技术改造方面的措施，需要多少投资、材料，先搞哪些城市。要目标明确，落到实处。

六、国际市场。要充分利用开放以后的有利条件，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现在主要是如何更充分利用，而不是利用过头。乱子是有，这只是发展长河中的曲折。我们对现在这种有利的新的国际条件，还没有认真研究，还没有真正认识和适应。多年来的自给经济根深蒂固，不善于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筹划。外国人百分之十八至二十利息的外资都敢用，我们连百分之七八利息的外资也不敢用。现在国际上有没有本事，就看敢不敢用高利贷。我们国家资源丰富，这是有利条件，但不要因此忽视通过国际贸易解决问题。特别是沿海一带，有一亿多人口，几个大的中心城市，本事、人才、国际联系等都有，要发挥这个优势。

讲物资平衡，要包括国外市场，以我之所长补我之所短。不是什么都靠自己才叫自力更生，这个观念要打破。这也是个框框，正在破，还没有完全破。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有些东西在国内平衡不了，通过国际市场就解决了。至于打起仗来，转入战时经济，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扶持棉、糖生产，把农业搞活，作用很大。

总而言之，财政、能源交通、消费品生产、技术改造，还有国际市场，五大问题，抓好了，局面就转过来了。

计划大的盘子定下来以后，比较重要的大项目要有十年设想。一是要确定明年就要上的项目，新上的要有新章法；一是要排十年的，十年中搞什么不搞什么。在建项目中，十年不搞的，要坚决收摊子。

我讲的这些问题，计委这个本子上基本都有，已经议论过多次了，以后还要一个个讨论。

“六五”计划控制数字，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一九八二年计划控制数字可以先发下去。十月份还要开一系列会，对一些重大措施进行讨论。

注 释

1．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552—1945），生于美国纽约。1932年当选美国总统，为应对经济危机实行增加公共事业投资、扩大就业、刺激对外贸易、加强银行监督和振兴工业、农业等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成功，史称“罗斯福新政”，在二战中曾连续四届当选总统。

2．韩光（1912—2008），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时任国家建委主任。曾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中纪委常务书记。

3．黄毅诚（1926—），湖北枣阳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北京重机厂厂长，国家能源部部长。

挖掘企业潜力　提高经济效益*

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我今天着重讲一个问题，就是挖掘企业潜力、提高经济效益问题。

我看到《财贸战线报》上有田欣毅[1]同志的一篇文章，后来听了他的意见，又看了他在这个会上的讲话，有些新的启发，趁这个机会来讲一讲。

抚顺市的经验说明了什么？它是个重工业城市，今年内煤、油、钢、铝都减产，但是可以完成财政上缴任务，做到减产不减收。北京首钢也是这样，今年铁产量减少30万吨，钢产量减少12万吨。按原来的计算方法，收入要减少，但是他们没减少。我在上海听冶金系统的财管员讲了一篇道理，他们搞了八项政策，挖了不少潜力，努力完成财政任务。今年二月在天津，我同王光英[2]同志谈话，他讲了一个观点，说我们国家的工业和商业企业，遍地是黄金，但是被白白浪费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的工业潜力很大，浪费更大。集体的、小的企业可能好一些。对我们的企业怎么看，一方面要看到企业有很多困难。例如能源不足，交通紧张，社会负担过重，原材料和燃料提价，成本提高，征地要钱等等，还有工厂像个小社会。当然，这些问题有的如工厂的社会负担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但是企业还有多大潜力、多大浪费，就讲得不够了。企业潜力大，浪费大，到处是黄金。认识不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今后几年的经济工作关系极大。

我今天讲的企业潜力，主要是讲经济效益，讲成本，讲节约，不是讲生产增长多少，能力扩大多少。企业有多大潜力的问题，需要我们搞工业的同志很好地重视和解决，中央各部的同志要到大厂去解剖解剖。今年、明年以至整个“六五”期间，产值增长速度有一定限度。

我主张调整时期要有一定的速度，要振奋精神，不能指标愈低愈好，但是调整时期要有太高的速度也不可能。因此，收入的增加，要着重从提高经济效益上打主意。

我们工厂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体制，造成企业、工人缺乏内在动力，不关心本企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地区所有制、部门所有制造成部门、地区分割。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这么大的工业摊子，这么多的固定资产和生产能力，长期没有很好发挥经济效益。今后几年，由于能源、交通、原材料的制约，我们的产值增长幅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大。去

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提出能不能走速度不怎么高，经济效益比较好，国民收入比较高的那样一条路子。多年来潜力没有充分挖掘出来，今后有这个可能。最近几年，我们解决财政困难，首先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现在工业速度与财政收入大致有个比例，产值增加1%，财政收入只增加10亿元。如果每年增长4%—5%，财政收入只能增加40亿—50亿元。但是真正把企业的经济效益抓一抓，一年就不是10亿元，而可能是几十亿元。田欣毅同志讲了抚顺钢厂和石油二厂的例子，石油二厂原油加工量年年减少而上交利润三年跨了三大步。看来，如果我们还是单靠增加产值来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事情就并不乐观。如果从企业挖掘潜力，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想办法，情况就好得多。

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工业有很大成绩，有很多好的经验，但总的来看，工交企业的经济效益是非常差的。我们每个工厂从购买的原材料到出售的产品，如果都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恐怕很多要赔钱。如果工资、燃料动力也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能站得住的就寥寥无几，特别是加工工业和制造部门。现在农副产品提价，轻纺工业就吃不消了。这说明我们的工业技术落后，特别是经营管理落后。从原料到成品，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作这样一个对照和比较，对促使我们加强经营管理很有好处。搞石油化工本来很赚钱，但是我们的化纤纺织厂，如从原料到产品都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很多企业甚至要赔钱。今后我们应当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认真研究如何挖掘企业潜力，减少浪费，降低消耗，降低成本。这样，每年产值同样增长4%—5%，而创造的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就要高得多。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对以上问题认识一致，接着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把潜力挖出来？为什么我们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权，搞利润留成、包干，在企业内部搞奖金，搞计件和超额计件工资、浮动工资等等呢？主要是为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来挖掘潜力，搞经济责任制，也是这个出发点。现在之所以浪费那么大，消耗那么高，除了设备落后、经营管理落后外，就是企业、职工的经济利益没有落到实处，就是一个企业经济效益好坏和企业、工人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要使几十万个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几千万职工来挖掘企业潜力，就要给职工以一定的物质利益。毛主席一贯讲，办工业要依靠群众，发挥职工的积极性。

这是正确的。不能只强调政治挂帅，不讲物质利益。政治思想工作要加强，同时，要讲物质利益，只讲一面，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就上来了，大家关心本企业的经营管理、本企业的经济效益，一起眼睛向下，挖掘潜力。

一九七九年我还在四川工作时，到中央开会，讨论财政包干，当时我有一个提法，调动第一线的积极性，只要大家关心经济效益，就能创造出可观的社会财富。田欣毅同志讲，全国六千个重点企业，如果每个企业都能节约挖潜100万元，就是60亿元，等于工业增长6%所增加的财政收入。我是相信这个话的。为什么现在搞经济责任制？就是要动员千千万万人挖掘潜力。田欣毅同志讲，给企业让一小步，国家财政收入进一大步。这就是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我们

一些搞财政工作的同志尤其要看到这一点。搞工业的同志，要看到搞责任制就是要使工人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关心工厂，搞好工厂的生产，挖掘各方面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一定要明确这一点，不然搞经济责任制的路子就会走歪。

搞了利润留成、包干、经济责任制，使企业和工人挖掘潜力有了动力。我们一定要因势利导，抓住企业整顿这个环节，把经营管理认真提高一步。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有的同志说，经济责任制这个办法是好的，但必须在领导班子强，经营管理有基础的企业才能实行。我看有些道理。但是也有的同志说，如果不同企业、个人利益结合起来，经营管理就落不到实处。因此对少数原来基础比较好的企业来说，就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对多数企业来说，实行经济责任制调动积极性后，要迅速把企业整顿和经营管理工作跟上去。如果经营管理混乱，不仅达不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还有可能搞歪门邪道。今年实行经济责任制，摊子铺的这么大，是由于财政任务完不成，仓促上马的。现在推行的经济责任制，主要是从利润上包干。目前由于价格等不合理因素，利润这一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工人创造的价值。但是，企业的职工的积极性起来了，把这种积极性引向哪里，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用在认真改进经营管理上，还是不择手段，搞歪门邪道？因此，我们一定要因势利导，把企业领导和工人的劲头引到整顿企业和改善经营管理方面来。总之，这次会议讲经济责任制，要注意如何乘机会狠抓企业整顿和经营管理，把干部、工人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这不仅是今年，也是今后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挖掘企业潜力，一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二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搞技术改造；三是合理利用资源。这就是田欣毅同志讲的向经营管理要财富，向挖、革、改要财富，向综合利用要财富。他最后还讲了一条政策。抚顺市就是靠这些要财富，做到了减产增收。

企业整顿要抓经营管理工作，但不只是这一条。还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调整领导班子，推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对企业整顿都是很重要的。我今天主要讲讲经营管理。

第三点，昨天耀邦同志提出要深入实际抓问题，打破框框闯新路，这个话讲得很好。我们要少开会，少发文件，要面向实际，眼睛向下。

这次会议后，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工交各部都要抓一批潜力大的企业，把经济责任制落实，把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包括围绕经济效益搞技术改造，加强资源合理利用和组织联合、协作等。今后，除一般的计划安排外，投资、设备、材料要围绕着经济效益比较显著的一些大的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进行安排。我接触了一下石油化工，愈感潜力大。这种情况上海有，抚顺、江苏、天津也有。纺织部科研院一个所长，提出一个观点，说现在炼油厂一年放空，烧掉的丙烯、芳烃多达60万吨，若用来作为涤纶和绵纶的原料，经济效果很好。中国是一个年产原油1亿吨的国家，炼油厂能力8000万—9000万吨，实际加工7000万吨。但是，石油、纺织、化工的炼油厂各有各的搞法，有一些炼油厂只搞粗加工，其余都当作燃料烧掉了。

当前，工业上有两大弊病，一是吃大锅饭，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二是地区、部门分割，扯皮体制，资源不能合理利用。如果把它们改过来，也就是两大潜力。例如：火电站的炉渣可以作为生产水泥的原料，但是电站归电力部管，水泥归建材部管，利用炉渣生产水泥，就没有人去考虑。四川有不少煤炭和硫铁矿是共生的，但是搞煤的只挖煤，丢掉硫铁矿；搞化工的只要硫铁矿，丢掉煤，就看他们的上级是谁，就听谁的话。为了综合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势必要走协作和联合的道路。实行了经济包干，企业有了自主权，这些问题可能解决得好一些。今天讲的这些，对今后几年国民经济能否搞好，对全国大范围推行经济责任制能否搞好，是一个关键问题。

我再补充说一点，工交各部，还有地方，都要由负责干部下去，选一些潜力大的真正能提高经济效益的重点企业，看它们有些什么办法，凡是可以发挥最好经济效益的，你们就可以提出要安排的项目、资金和材料，开出单子，送国家经委和财政部审查，研究安排。今后，特别是工交各部的领导同志，一定要眼睛向下，抓一批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去挖掘潜力，要财富。我们的计划工作，就是要围绕提高经济效益来考虑问题。经济效益大的，优先安排。哪里投资少、见效快，资金就放在哪里。

注 释

1．田欣毅（1928—2016），时任辽宁省抚顺市财政局局长。曾写文章主张“给企业让利一小步，国家收入进一大步”，应邀在这次全国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上发言。

2．王光英（1919—），北京市人。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改革挖潜　聚资生财*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

*　这是赵紫阳就田欣毅关于解决财政困难的意见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各位副总理并有关部委的一封信。

抚顺市财政局长田欣毅同志关于解决当前财政困难的意见值得重视，现推荐给你们参阅。

抚顺市是以重工业为主体的，今年由于调整，许多企业任务严重不足，生产下降。照过去的观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利润降低、收入减少，似乎是“天公地道”的。然而抚顺市财政经济部门的同志不这样看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发动群众挖掘潜力，制订了减产不减收的三十条措施，取得了成效。全国还有相当一批企业也做到了增产增收或减产增收，节支增收。抚顺经验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不是个别企业而是全市性的。

抚顺和全国很多地方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企业的潜力极大，尤其是那些大的企业，确实是遍地皆黄金。由于多年来实行大锅饭的体制和政策，使工厂经营者不关心自己的经营成果，劳动者不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对到处存在着的增收节支的潜力熟视无睹，不去过问，以致管理混乱，开支大，成本高，浪费严重。目前整个国家面临着财政困难。克服财政困难的重要途径，就在于要通过政策，把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关心企业经营的好坏，积极主动地改善经营管理，挖掘潜力，降低消耗，减少浪费，增加收入。这样就可以真正做到提高经济效益，抚顺市的三十条和各地推行的经济责任制就体现了这一精神，这是当前克服财政困难应当考虑的第一位的问题。其次，在实行这种办法以后，总的讲，经济效益提高了，社会财富增加了，国家收入也会增多，但相对地说所占的比重要比过去少一些，而企业和个人手里的钱会逐渐多起来。这就有一个如何搞好分配的问题，除了通过财政的分配以外，有一个通过银行再分配作为补充的问题。银行要运用经济办法，积聚资金，用好资金，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用到国家建设需要的方向上来。以上两个方面，就是财政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是从实际出发解决当前财政问题的重要方针和政策。抚顺市的同志说：“一方面我们国家很穷，另一方面又挥金如土，根子在于现行的一些办法把企业捆得很死，使他们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这话讲得很好。所有财政、工交部门的同志都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如果仍然按照老框框、老办法去办，就好像“山重水

复”；如果根据新情况，按照新办法去办，就会“柳暗花明”。

中央各部、各省市的领导同志要像田欣毅同志建议的那样，少开会，少发文件，眼睛向下，深入实际，亲自下去抓一些潜力大的骨干企业，研究增收节支的政策措施，帮助企业切实改进经营管理，扎扎实实地解决一批问题，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作出贡献。

关于今年经济情况和“六五”计划设想的通报*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

* 这是赵紫阳向中央政治局所做的关于1981年经济形势和“六五”计划设想的汇报。

今天主要是向政治局的同志通报一下经济情况。今年的情况还只是预计，因为刚刚进入九月，至少到十一月才能完全看清楚眉目。关于五年计划的问题，现在正在讨论，过一个时期可以提到政治局来通过。我只是把一些情况，一些议论，简要地吹个风。

第一个问题，关于今年的经济形势。

总的说是好的。今年年初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一九八一年的计划，现在看可以实现。这里我主要说几个大的轮廓。

一、财政开支。现在看来，可以做到基本平衡。去年开人大，财政部的报告讲，今年财政收支平衡，后来在人大常委会上就改口，叫基本平衡。现在看，基本平衡可以做到。到八月底，节余四十三亿元，去年同期是支大于收二十四亿元，比去年多六十七亿元。估计到今年底，赤字不会超过二十亿到三十亿元。前年我们的赤字是一百七十亿元，去年是一百二十亿元。今年可以做到赤字不超过二十亿到三十亿元，就是基本平衡。

二、农业。今年的情况看来是一个全面增长的形势。粮食，预计夏收报上公布是增产六十亿斤，实际上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些。早稻是增产二十亿斤，也就是说，早稻加夏收增加了八十亿斤。秋季是一部分地方受灾，大部分地方长得比较好。当然，还要看东北早霜怎么样。全年预计可以增加二百亿斤左右，当然，估计不同，有的说可以增加更多一些。其他的经济作物和副业，绝大多数地方都比较好。棉花大概会到六千万担，去年的五千四百万担已经是历史最高水平。油料，大家都知道，油菜籽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五成），花生也是大增产。糖料，预计今年可以达到七千七百万担，就是可以增长百分之十三，这就可以增加三十多万吨糖。生猪，情况是好的，多数地方还是猪多，不好卖。这里特别说，烟叶的情况很好，预计可以收到一千九百万担，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二。由于今年烟叶的丰收，加上现在采取的烟酒专卖措施，估计明年烟的供应会有较大的改变。农业的产值，估计可以达到增长百分之六左右。

三、工业，预计今年增长可以达到百分之三。轻工业，可能达到增长百分之

十一（一到八月数字是百分之十二）。重工业，一到八月下降百分之八；从二季度以来，情况逐渐好一些，估计全年要下降百分之五。现在我们轻工业与重工业的产值大体上也是一半一半，轻工业的增长补了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五以后，预计全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工业，截止到八月，总的增长百分之一。但是现在看来第四季度是个翘尾巴的形势，因为我们第一季度是负数，从六月以来逐渐回升，八月份的情况比七月份好，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二点五。

四、市场、物价。一月到七月，社会商品零售额是一千三百亿元，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八点六，预计全年可以增加百分之九，这就等于实现的购买力。商业库存增加了百分之八点六，这个情况是好的。油料增加，混纺布（化纤）增加，自行车增加，手表增加，这都是比较好的东西。外贸进出口总的也是好的，进口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出口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五，全年计划可以完成。由于今年实行了冻结物价，加上农副产品和消费品增加，物价形势是基本上稳定下来了。上半年社会物价总的水平上升了百分之零点七，这主要是指国营商业卖的东西，不包括集市贸易（城乡集市贸易上升百分之三点二）。

五、上半年净回笼货币没有完成计划，原来计划回笼五十亿元，实际只回笼四十亿元。虽然没有完成计划，也是建国以来回笼最多的一年，截止到八月底，大概净回笼二十三亿元左右，预计全年增加投放六十亿到七十亿元。货币问题，一方面是票子多了，另外还有一个新的情况。新的因素，特别是农村，手头存放的票子多了。今年一月底，市场货币流通量最多的时候达到四百亿元。一个是手头存的增多，一个是现在市场渠道扩大，比如农贸市场这个范围就比过去扩大了，商业的渠道也比过去大了。还有一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经营单位划小，都要直接用货币支付（过去很多不用货币支付），这方面都需要增加些通货。究竟这些因素要增加多少发行量，还要研究。现在还说不清楚，看法也不一致。人民银行讲，大概是五十亿元左右。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总的形势好，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当然，还有几个问题比较突出：一个，就是蔬菜问题，今年以来，多数城市都不好，城市人民反映强烈，这个问题还要专门很好地研究。看来，除了其它原因之外，城市近郊兴趣不放在蔬菜上，可能是主要原因。因为他主要的兴趣是搞工业、搞副业，因此，蔬菜种植面积没有那么多。最典型的例子，像北京四季青这个地方，那么好的菜地，他在那里搞了个很大的厂房。这还不是个别的。还有一个，煤炭情况不好。最近刚刚开了会，报上发了消息，万里同志抓了一下，秋里同志一直在抓。煤炭如果九月以后没有大的转变，冬季取暖用煤都会紧张。再一个，就是华北的水荒，特别是天津和北京。首先是天津，很有可能到明年以后，天津相当一部分工厂要停工。现在官厅水库的水只有四千万方，密云水库的水只有八千万方。总的来讲，今年以来经济形势是稳步前进，经济工作正在逐步走上轨道。这么大的调整，社会比较安定，没有出什么大的乱子，这是不容易的。今年工业的增长速度只有百分之三，当然这是最低点了。从今年以后，会逐步有所回升，当然不会很高。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是能够稳步上升的。在这种

形势下，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要稳一点，工作要抓紧一点，要振奋精神，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循序而进。中央提出的调整结构，稳定经济，逐步改革，这个大章法和大措施，主要是继续落实的问题。最近小平同志同外国人谈话后，大的章法就是这样，不宜搞很多章法，不宜出很多主意，主要是个贯彻落实的问题。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六五”计划问题。

现在看来，有这么几个问题（这是初步议论的，初步的看法）：一、速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准备定在百分之四。执行的结果可能要超过，但是看来还是以定在百分之四比较好。过去，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外，其它的长远规划，统统没有完成过。所以，为了提高信心，宁可把计划放得低一点，将来能够完成，超过当然更好，不宜搞得太高。（邓小平：不要有水分。陈云：扎扎实实的百分之四。）工业、农业都是百分之四，轻工业大体上是百分之七到八的样子。重工业增长定到百分之一，因为有个能源问题。重工业增长定高了，能源解决不了。想把国民收入也定到增长百分之四，就是刚才小平同志讲的，经济效益好一点，产值的指标搞得稳妥一些。过去一般概念就是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四，大约国民收入只有百分之三。国民收入低于生产总值（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二，而国民收入只有百分之六点一）。今后五年主要靠挖潜，工业、农业总值和国民收入都是增长百分之四。估计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会稍高一些。“六五”定到百分之四，今后怎么样？小平同志问过这个问题。“七五”会比“六五”要高一些。经过“六五”的调整，我的看法，第七个五年计划肯定要超过百分之五。搞得好，这个十年有可能达到平均递增百分之五。第一个五年低一些，第二个五年高一些。如果我们第一个十年能够这样搞的话，第二个十年会更好。这是我的看法，姚依林同志他们都这样看，第二个十年就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七。这样，我们以前讲过的二十年里两个倍增的计划，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最近我也看了一点外国的材料，在日本箱根开的中日两国的经济讨论会，日本的一个专家也是这样讲的。他认为，我们第一个十年不要搞那么高，搞低一点大概是增长百分之四、五，第二个十年可以搞到百分之七、八。还有个世界银行在中国的调查报告，基本上也是这个论点。就是说，我们在第一个十年真正把国民经济搞成一个良性循环，根本解决经济结构合理化的问题，解决体制改革的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真正把企业的经济效益搞好。（小平：还有比例关系。）比例关系搞好，使资源、能源、交通这些基础结构有所改进，下一个十年肯定会好一些。（陈云：六机部讲，造船公司代替了部，这种形式将来会多起来。现在条条块块很多。）把这个组织结构、产业结构、管理体制解决好，中国人是聪明的，资源有，如果更多地考虑些经济效益，不忙于追求速度，总的经济情况会好。“六五”定到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决不是说我们的经济没有前途。

二、财政。现在讨论“六五”计划，主要就是财政比较困难，建设资金比较困难。现在准备五年方针怎么定呢？基本平衡，每年准备有个二十亿到三十亿元的赤字。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做到五年中间我们既能基本平衡，建设又有一定的

规模？途径有这么一些：

（1）财政本身要采取一些增收节支的措施。举一个例子，譬如烟酒专卖，加上高级烟适当提价。第一，烟要发展，要多搞烟。烟叶情况，估计今后也会好。第二，要多搞高级烟（甲级、乙级烟）。第三，实行专卖。烟叶专卖，就好调整，就好统一使用。现在很多烟叶是在小烟厂加工，加工成很差的烟。专卖，烟叶能统一调整，烟叶生产能够多一些，好一些。第四，甲级、乙级烟适当提高点价，丙级烟稍涨一些，其它不涨。这四个措施，每年可以多收三十亿到五十亿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当然，也会挨骂，但是也值得。骂的人不多，少数人骂，抽好烟的人骂。（李先念：骂是骂，买还是买）。

再一个，税收方面，现在管得不严，漏税非常严重。税还想适当增加一点。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搞得太少了，太简化了，要适当增加一些。主要是整顿一下税收，加上财政监督、财政纪律。这个大概可以多搞二十亿到三十亿元，今年大概就多搞十几亿元（今年抓晚了）。每年还要发国库券三十亿到四十亿元，个人也要买一点，大概一半向个人发放，一半向企业和地方发放。

还有一个，在纺织上想些办法，现在纺织有比较大的潜力。国际上是化纤便宜棉花贵，我们国内是棉布便宜化纤贵。如果我们国内棉花搞上去，不进口棉花，多进口化纤，在国内扩大化纤的比例，而且化纤还准备降价。有一个专家算了一个账，一年可以搞四十亿元，至少可以增加二十亿元左右。再加上搞一些其它的高档产品（一九六二年陈云同志搞高级糖果，现在要搞一些高档产品，搞糖果不行了），价钱就要卖高一点。加到一起，大概可以搞到三十亿元。

另外，外贸的亏损要设法控制一下，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要控制一下。这样也可以减少很多开支。按原来算账，这里头也可以有一、二十亿元。这都是可以搞的。这是财政本身。

（2）从国内筹措一批资金。现在我们资金困难，一个就是向国外借，另外也可以筹集一些国内资金。因为按我们国内现在这个经济体制，企业有钱，地方上一部分省份也有钱，中央的钱比较少。现在预算外的资金增加，预算内的有一千亿元左右，预算外的资金大概还有五百亿元左右。预算外，包括挖革改都在内。还有分成，企业的钱，留成的钱，各种各样的钱。另外，城乡储蓄增加的趋势也比较明显。一九七八年以前，每年的储蓄最多增加一百亿元。一九七九年以后，一年就可以增加二百亿元，不完全是个人储蓄。银行存款，过去每年增加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亿元，这两年增加比较快，一九七九年增加二百零五亿元，一九八○年又增加二百一十八亿元。这是总的，下面分开讲：企业存款，一九七九年为四百六十九亿元，一九八○年为五百七十三亿元，今年六月底就已经达到了五百六十二亿元。城镇个人储蓄，一九七九年为二百零二亿元，一九八○年为二百八十二亿元，今年六月底就达到三百二十三亿元。农村社员储蓄，一九七九年为七十八亿元，一九八○年为一百一十七亿元，今年六月底就达到一百四十四亿元。而且相当大部分是定期储蓄。看来，我们的消费品也没有那么多，将来要通过银行把地方的存款、企业的存款、个人的储蓄拿一部分来作为建设资金。多了

不行，能拿多少还要研究。办法是通过发行债券，或者银行来办。就是说，把银行储蓄中本来用作消费资金的，转一部分为建设资金。甚至将来还可以把长期储蓄的利息提高一点，鼓励他长期储蓄。长期的好动用，短期的不好动用。国内的资金，中国不能完全按资本主义的办法。但是我们中国也不能完全只按过去的旧制度，只是财政这么一个口，收多少然后开支多少，还要通过银行筹集点资金。

（3）借国外的资金。国外的低利资金，将来还可能配一部分买方信贷。买方信贷不自由，低利资金有一部分是自由的，世界银行的，货币基金组织的，这是自由的。买方信贷，譬如说欧洲给我们钱，利息也不高，但是你要拿他的钱买他的设备。这些不能用多了，用多了对国内机械企业影响太大，但是可以用一部分。因为我们要搞能源、交通，在这几年内不搞一些，以后的准备就比较困难。究竟国外的借款借多少，还要研究，现在计委初步提出个意见，折成人民币，一年可以用五十亿元，那就是十几亿美元。我想，还可以稍微多一些。多到多少，还要研究。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用我们借到的低利贷款、自由外汇，加上国内的黄金，首先把一九七八年搞的一批高利贷冲掉。因为这个我们负担很大，一九七八年搞的这一批，明年光还本付息六十五亿人民币，要连续二三年，三年以后高峰才能过去。

（4）企业降低成本，减少浪费。这个有很大潜力。要从增加财政来讲，它比生产的增长还要可靠一些。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况，每年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一，财政收入只能搞十亿元左右。如果成本降低百分之一，也是十亿元。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多年来吃大锅饭的办法，加上多年的经营管理混乱，浪费很大。我说的浪费，还不是人多，就是不负责任这种浪费。所以，现在企业的潜力特别大。这两天报上发了个消息，抚顺市今年生产全面下降（因为它是重工业多），但是它今年财政收入不减少。首钢，铁少炼了三十万吨，钢少炼了十二万吨，今年财政收入大概比去年还要增加。就是说，企业的潜力是很大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政策，要能够把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觉得，今后这几年，一个是靠增加生产来增加收入；一个是要靠降低成本、减少浪费来增加收入，这里我估计潜力相当大。

（5）中央财政的负担要逐渐收缩一些。有一些事，将来中央财政不负责。中央对基本建设的拨款，将来主要用在能源、交通、城市建设一些关键项目上。一些轻工业，一些投资周期短、利润又比较大的项目，依靠地方、依靠企业来搞，刚才讲的通过银行的办法。中央财政的投资范围适当收缩，一开始能搞多少，还要研究。

三、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农业，今后几年还是个持续增长的趋势。当然，天灾人祸，哪一年不怎么样，这完全可能。总的来讲，今后几年，农业还是个持续全面增长的趋势。粮食不可能增很多，因为有些地方粮食面积还可能减少一点。但是，棉花、糖、油料以及其他的各种土特产，包括山货，会有个持续的较大幅度的增长。我觉得，陈云同志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讲到的一个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是这样讲的，宁可进口二千万吨粮食，

解决经济作物，解决畜牧业等。陈云同志讲的是二千万吨，现在还没有一下子搞这样多，现在还不到一千五百万吨，是一千三百万吨。今后五年内，就是按进口一千三百万到一千五百万吨搞下去，不动摇。这样，我的看法，今后我们的棉花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我在这里冒讲一句，如果我们政策不变，到一九八五年，我们很有可能搞到八千万担棉花。棉花主要的希望在北方，而不是南方，光鲁西北就可能搞到二千万担。它原来是四百万担，去年达到一千零七十万担，今年还超过去年。我在鲁西北做过调查。北方种棉花，包括河北、河南、山东，这是非常合算的。在北方来讲，两斤粮食可以换一斤棉花。按国际市场来算，一斤棉花可以换十斤粮食。所以要多进些粮食，把棉花搞上去。再一个是糖，也是北方的甜菜希望最大，关键都是个粮食问题。我们用一千五百万吨粮食，把国内的农业结构逐步进行调整。我看，这在我们国内是有极大意义的一件事。当然，现在还没有搞到陈云同志讲的那个数字（二千万吨）。他讲是几年之内，可以长期地搞。总的我觉得，我们棉花、糖、畜牧业、水果这几样东西都可以大发展。

轻工、纺织、建筑材料。轻工里边，特别是最近耀邦同志讲的食品，包括各种各样的饮料。我们的饮料太少，为外国人搞一个招待会，端出来的就是啤酒、矿泉水、汽水三样东西。青年一代和我们老年人不一样。不仅是旅游，国内市场，各种各样的饮料都很需要。还有个日用化工，农民生活改善以后，就可能冬天要用点雪花膏，农民如果每家买一瓶雪花膏，这就是个很大的数字。如果小孩子、独生子女再用点花露水，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总之，我们中国的日用化工，香料香精、化妆品，当然不能和国外比，但现在化妆品在街上很多都买不到。这些东西都是一本万利。食品和化工，我认为都有可为，这都是些赚钱的东西，可以回笼货币。重工业主要还是围绕着发展消费品，调整服务方向。不是不搞重工业，是重工业为什么服务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任务。

四、能源、交通。小平同志讲的那句话，就是能源、交通带动整个工业。五年计划里头，我们还得下点力量，搞能源，搞交通。中央的投资，无论如何也要挤一些搞这些。外资也还要用一部分搞能源，搞交通。能源和交通如果不搞，肯定会妨碍整个经济的发展。当然，搞能源，一是开发，二是节能。五年之内，节能的技术改造是重点。我们这一个五年能不能为下一个五年作些准备，关键是两个：一个是能源、交通问题，一个是老企业的技术改造。

五、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我们现在的企业所以效率低，一个是管理问题，一个就是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五十年代苏联援助我们的一百五十六项，已越来越成为一种落后的设备，特别是消耗能源比较大。再过上几年，我们现在的工业有相当一部分到了“更年期”了。当然，不是说全部设备都不要了，都要重新改。但是，原有企业在这五年要设备更新，技术改造。而且这一个挖革改不像我们过去讲的，专门是为了增加产量，应该重点是围绕节约能源，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挖、革、改过去主要是为了量的增加，今后应强调质的提高。这样，经过五年到十年，我们原有企业的面貌逐渐有了变化，这本身就积蓄了力量，就是生产

力。而且，因为我们这一段新搞的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了，原有的企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都能够多搞一些。这样，重工业、机械工业不至于下降太多。现在我们的机械力量很大，完全有力量搞这个。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产品质量，也可以引进一些技术。技术改造在这五年里也应该很好地抓一下。

六、进出口。我们要继续发挥现在国际的有利条件，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以我们的优势来克服自己的弱点，在国际上交换。既然现在已经不是闭关自守了，就不能完全什么东西都靠自己来搞，应当利用自己的长处，同国外来交换，弥补自己的短处。无论农业、工业，都需要这样。讲一个简单的例子，譬如拿粮油这个问题来讲，如果我们善于同国外交换，有很多是非常有利的。刚才我讲的棉花是一类，现在讲油料。现在我们长江流域的油菜籽是大发展的趋势，因为农民收入也多，而且茬口也合理，也比较稳定。如果我们逐步地在东北从城市开始不吃豆油，吃菜籽油，把东北的大豆转为出口，那就非常合算。东北一年用三十亿斤大豆榨油，而东北的大豆，大家都知道，根本不是榨油的大豆，东北是含蛋白质高的大豆，美国对我们这种大豆非常有兴趣。它榨油出油率很低，但在国外卖价钱很好。如果说东北都少吃豆油了，那就是一大笔财富。因为长江流域的菜籽油多的是，这几年控制不住。菜籽油出口不行，不合算；国外也不愿意买这个东西。我们的大豆可以搞高蛋白质的食品和饲料，很多研究机构专门研究这种大豆，因为它的蛋白质很高。我们过去只强调自给，拿这种大豆去榨油，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能够有计划地、逐步地把农业结构加以改组，少种小麦，多种油菜籽；如果全国能够逐步逐步都吃菜油的话，这就能把东北的大豆、山东的花生替下来出口。当然，这要有个过程。如果逐步来搞，能够拿十亿斤也不得了。还有一些这样类似的东西。上一次我跟粮食部讲小麦和大米的问题，我们中国虽然大米很紧张，但中国是在世界上生产大米最多的国家。不仅现在，再过些年也是这样。总之一斤大米可以换两斤小麦，甚至还会更多一点。如果我们城市里边采取一些措施，多吃一些面粉（这要采取些政策措施），逐步挤出一些大米出口，一百亿斤大米就可以换二百亿斤小麦。当然，这不容易。像江苏、浙江一直到广东，主要都是用大米作食品，喂猪也是大米。湖南也是。但是，大米喂猪，养分并不好，还不如苞米。如果我们将来把饲料工业搞好，用好的饲料换大米，又便宜，又把大米换出来出口，那是很合算的，现在我们已经换了一些。我们现在不是闭关自守，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和国际市场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应当研究善于经营的问题。耀邦讲的善于运筹，就是通过交换，通过国际上的贸易，以己之长，补己之短。我觉得，这个方面，无论农业、工业，都有极大的潜力。现在我们很多人考虑问题，好像还是什么东西都靠自己比较好。我觉得，真正的自力更生并不是这样一个概念。拿自己的东西换另外的东西，这怎么不叫自力更生？我并不是依靠你，我是拿我的东西跟你交换。如果我们不是自力更生，他也不是自力更生。这个框框，现在还束缚我们很厉害。再一个，就是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区怎么样把它的工业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以进养出。上海、青岛、天津、广州已经这样做了，从国外进原料，加工产品，然后出口。当然，全国其他地方

也可以搞，但这些地方有很大的优势，经验、技术、交通、电讯、社会联系都有利。我在上海讲，将来上海相当大的力量是对外。还有天津。这样一搞，沿海这些地方，二亿人口，可以创造很多财富，也可以克服很多弱点。

最后，人民生活。那一天小平同志说了一下，大概这五年，人民生活不能提得太高，对消费的部分要有所控制。农产品提价问题，工资问题，奖金问题，都要有所控制，消费的部分不能增加太多。主要的是搞点宿舍，搞点房子。虽然个人的购买力是促进消费品生产的动力，但是太多了也不行，压力太大了不行。所以，还要控制一下。

以上只是些初步的看法。

计划生育政策要放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计划生育问题会议上的发言。

有人告诉我，真正在农村不超过两胎，到本世纪末，人口年增长率不超过百分之一。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四以上，粮食增长超过百分之二，人口增长百分之一，我们的人口就没有什么危险，就比较稳妥。

中心问题要讨论清楚。我在四川从来没有提农村实行一胎化。城市里面肯定可以做到，肯定不要开一胎化这个闸，农村里面要有一个合理的要求，要有一个比较坚定的长期的政策。如果农村政策严重脱离实际，即使一个地方，一个时候，搞出点东西来，不能持久下去。我跟慕华[1]同志谈过，这是一个大政策。如果我们定政策定到一个不可能的基础上，形成基层干部和群众严重对立，最后反而会变成放任自流，人口会泛滥。农村不能因为搞计划生育，而不实行生产责任制，把各方面的螺丝都拧得很紧。

现在农村的计划生育有两个问题：第一，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计划生育如何适应新的情况，防止自流状态。现在，相当一些地区责任制落实以后，自流了，搞不好，几年以后人口会大泛滥。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二，要抓紧，政策上不适当放宽也不行，多数地方农民不接受，结果也会使基层干部撒手不管。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政策上适当地放松，同时又抓紧工作。政策适当放宽，和多数农民取得一致，我们的计划生育还有希望。如果不注意这个情况，结果相当一些地区，包括四川，会出现自流。至于政策放宽到什么程度，有两个方案：第一，干脆提倡一胎，采取切切实实的办法来鼓励，农村还是有些人响应，可以生一胎。还有一些人，因为生理上的关系，只能生一胎，还有不能生的。剩下的可以生两个，第一个生女孩子，第二个还生女孩子，再生不行了，群众舆论也通不过。真正做到这一点，增长率就超不过百分之一。这样搞，可能解决大问题，经过工作，跟相当多的农民站在一起，避免严重的强迫命令。现在我们要注意，真正工作抓得紧的，强迫命令相当严重。在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只要一胎是不可能的。硬着头皮搞一胎化，命令主义还要大发展。四川的命令主义也够严重的，相当一些地区，跑到外地去生，生了以后带回来，你能把她杀了？

第二，也可以考虑另外一个办法，一般的还是一胎，但是第一胎生了女孩

子，可以同意再生一个。这样讲有个毛病，公开承认重男轻女，好像生女孩子不算孩子。文件上不能这样写，可以用另外一个话，比如说某些人确实有需要，思想上实在不通，也可以批准生第二个。

城市生一胎，农村提倡一胎，允许两胎，杜绝三胎，或者农村一般也是一胎，某些确有需要、思想特别不通的可以两胎（实际上指第一胎是女孩子，还可以生一胎）。万里同志主张，这个话上面不要讲，可以叫基层干部掌握。

总而言之，为了真正把计划生育工作搞下去，我们的政策必须放在农民能够接受的基础上，以避免严重的强迫命令，避免自流。如果政策不符合农村的实际，会从另外一个方面助长自流，基层干部搞不通，就撒手不管。特别是在农村实行责任制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针对这个实际，定得越严越行不通，最后人口大泛滥，这就是辩证法。搞包产到户，搞责任制以后，根据新的情况，抓紧工作，政策上从农村实际出发，这样下去，人口不一定像刚才讲的那样。应该看到，这几年搞计划生育有点基础了，多数农民不一定要求多生。

搞包产到户，搞责任制以后，做计划生育工作，除了政治上进行宣传教育以外，主要的还是经济上的奖励和惩罚。比如独生子女包产可以低一点，田可以多包一点。超过两个，不允许生的生了，经济上罚，交多少公益金、公积金。甚至可以考虑正式立法，农村超过两胎的，城市超过一胎的，征一道税。罗琼[3]同志有个材料，如果在农村只准生一胎，独生子女有优待，农村生产队矛盾解决不了，生产队的负担也吃不消。有些可以生两胎，有些生一胎，经济上负担不一定那么大，矛盾也少。

我的基本观点，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农民占绝大多数，只要本世纪减到百分之一，到下一个世纪，人口就不会再增加。关键是这个世纪，只要不超过百分之一，经济上没有问题。在中国这个国家，如果我们硬是要减到千分之五、千分之六，本身就脱离中国实际。如果中国这个国家还是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中国没有前途。农村真正杜绝了三胎，一般不到两胎，城市一胎，或者一胎多一点，基本上一胎，这样，递增率我估计不会超过百分之一。整个发展中国家百分之二以上，如果我们减到百分之一，很了不起了。

注 释

1．陈慕华（1921—2011），浙江青田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曾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部长，外经贸部部长，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罗琼（1911—2006），江苏江阴人。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曾任全国妇联常委、宣传部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常委。

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最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都议论了今年的经济形势和“六五”计划的问题，今天把一些主要的看法吹吹风。具体计划数字，计委很快就发下去。

一、今年的经济形势

现在已经过了八个月，总的来讲，今年的经济形势是好的。据预计，今年二月姚依林同志在人大常委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提出的修改了的今年计划可以实现。

大家最关心的，也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今年财政情况究竟怎么样？前年财政赤字一百七十亿元，去年赤字一百二十亿元。依林同志那个报告讲，要争取今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根据现在的情况看，这个任务今年可以做到。截至八月底，全国财政（包括中央和地方）节余四十三亿元，去年八月底是支大于收二十四亿元，两项相加是六十七亿元，就是说，今年财政比去年少六十七亿元的窟窿。什么叫基本平衡？就是赤字在二三十亿元左右。国务院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今年硬是要做到财政平衡，一点赤字也没有，也是可以做到的，不外乎把今后四个月的开支进一步压缩就是了。但是这样对整个经济建设不一定有利，而且要考虑今后每年是不是也安排得一点赤字也没有？根据目前各方面情况来看，“六五”期间每年保持财政基本平衡，恐怕对经济有利，不一定做到完全平衡，赤字多了当然也不行。是不是今年就做到一个赤字没有？经过全面衡量，得失相较，不一定非得勉强这样去做。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也谈过这个论点。所以，今年还是要作到财政基本平衡，赤字控制在二十亿元左右。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事情。如果今年十一月下旬开人代会，我们再来讲有一百多亿元赤字，人们就会没有信心了。今年二月讲的，最后做到了，这对鼓舞全国人民的信心有好处。中国的财政赤字由前年一百七十亿元、去年一百二十亿元，今年做到二十亿元，这就是一件很大的事。

农业情况。虽然这一段灾害较多，但总的讲，今年农业情况很好。农业靠政策，今年是真正发挥了威力，显示出了它的巨大作用。假如说，今年农业减产，也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灾害严重嘛。但从全国来看，今年是全面增长的形势。

一个是粮食，我估计大体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农业部门估计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还有的同志更乐观一些。如果今后不再出现更大的灾害，今年的粮食生产有可能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七九年，总产六千六百亿斤。另一个是经济作物以及农村的各种副业，今年的增长幅度会是比较大的。棉花，今年可能达到六千万担左右。只要我们的政策不变，今后棉花还是会继续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现在的问题就是不要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限制发展棉花。棉花的主要希望在北方，而不是南方。我们很有可能在今后逐渐减少棉花的进口，甚至不进口。糖料，形势也很好，大概会增产百分之十以上。只要有适当的政策，北方的糖大有前途。问题就在于要改变我们过去那种自给自足经济的指导思想。北方，一个粮，一个棉，一个糖，如果能够很好地贯彻因地制宜的方针，可以增加很多产量。像黑龙江、辽宁、吉林西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盐碱地种粮食产量并不高，种甜菜相当好。进口粮食要外汇，进口糖需要更多的外汇，那为什么一定要少进口粮食多进口糖？没有必要嘛。中央的方针定了，下决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以便我们在国内合理地调整农业结构，使那些不适合种粮食而适合种棉花、糖料、花生的地方，去种棉花、糖料和油料。这也叫合理地利用资源。中国的农业，如何能够在可能的条件下（每年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很有文章可做。盐碱地、沙地硬去种粮食，它就对不起你，如果沙地种花生，盐碱地种油料、棉花，就会发挥优势。至于家庭副业、畜牧业情况都是很好的。今年的农业产值，原来计划增长百分之五点六，我看有可能完成。因为家庭副业、多种经营有很大的发展。

工业情况。今年的增长速度很低，到八月底，工业产值才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一，估计到今年年底可以达到百分之三，主要问题是重工业下降很多。一至八月，轻工业增长百分之十二，重工业下降百分之八。这是个累计，从第三季度起，重工业开始出现回升。估计全年轻工业增长百分之十一，重工业减少百分之五，相抵之后增长百分之三。这可能是我们国家工业增长速度少有的低的一年。但是要看到，今年这么大的调整，整个工业没有下降，还保持了百分之三的速度，这如果没有强调发展消费品生产的方针，大力发展轻纺工业，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么大的调整，基本建设投资一下压缩几百亿元，很多重工业没事干，在这样情况下，整个工业还保持了百分之三的速度，是不容易的。当然，在第一季度，我们在工作上、思想上有一些问题。一个，客观上是这么大的调整，重工业一下要把服务方向改变过来，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另一个，对调整的理解上、认识上有些不一致；再一个是，精神不那么振作，松下来了；还有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情况下，有些搞得过死了一点。当然在去年那样的情况下，有些事情一下看不那么准，先把它稳住，先搞死一点，看一看，也是必要的。

市场的情况也是好的。一至八月，社会商品零售额，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三，全年可能达到百分之九。一方面社会商品零售额有增加，另一方面截至八月底商品库存增加九十六亿元，增加的东西有粮、棉、油、化纤、自行车、手表等。农贸市场是稳定的。由于农业的丰收，工业消费品的增加，加上冻结物价等

原因，物价基本上是稳定下来了。当然还有一些不够巩固的因素。上半年农贸市场市价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百分之三，国营商业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不到百分之一。货币的情况，原预计今年上半年回笼五十亿元，下半年投放八十亿元，相抵之后全年投放三十亿元，这个数字看来打不住，可能要超过，估计达到五六十亿元，这同农副产品收购大量增加有很大关系。这个不可怕，不是财政性发行。另外，由于全国经济搞活，有很多新的情况，完全用过去的一些观点、数据来分析现在货币的情况，也不完全适合。陈云同志提到这个问题，说大家手中的票子多了，特别是农民手里钱多了，家里就要放点钱，这是不参加流通的，总有多少个亿吧。这个问题还在继续研究中。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货币流通量大大增加了。过去农村卖粮、买化肥不需要用货币，转账就行了，现在农民卖粮不少是各自去卖的，要给现钱，货币当然就增加了。还有农贸市场扩大等原因。看来增加货币投放，有它的客观原因、客观需要，有客观的新情况。当然，总的是票子多了，这也是要承认的事实。

财政、农业、工业、市场、物价、货币问题，总的就是这些情况。这么大的调整，出现这么个形势，应该看到总的来讲是好的。这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采取的方针政策分不开，尤其是农村。陈云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又说，农村也好，工业也好，都是很好的形势。当然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下边我还要讲。

二、关于“六五”计划的一些设想

第一，速度问题。

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怎么样？经过计委反复考虑，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定为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工业、农业、国民收入都定为百分之四，比较恰当。今年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今年是百分之三，明后年是百分之四，八四、八五年超过百分之四。今后粮食生产不可能增长那么多，但是，农业的多种经营，包括经济作物、副业、畜牧业增长速度会大于粮食，农业产值的增长不会太低。工业的增长，执行的结果可能超过百分之四，但是现在定到百分之四，比较恰当，留有余地嘛。这个百分之四，大体上是说，轻工业递增百分之七，重工业递增百分之一。我们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外，所有的长期计划都没完成过，我们这次制定的“六五”计划无论如何要完成。这次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定到百分之四，国民收入也定到百分之四，是不是太低了，是不是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希望了？不是。我的看法是，调整时期要有一定的速度，速度太高不行，如果速度定得过高，可能给国民经济造成新的不协调，增加更大的负担。如果速度太低，国民经济很可能会萎缩下去，那样我们就积蓄不起力量，以后就无法前进。我认为，如果有百分之四的速度，经济效益也就是国民收入情况又比较好，我们就可以基本上克服五年中间的困难，而又为以后的发展准备条件。按照现在的设想，如果我们这个五年能够有百分之四的速度，执行的结果超过一些，下个五年，就是“七五”期间，增长速度可能定到百分之五，执行的结果可能超过一些。

这样，八十年代，我们就可能有个百分之五的速度。下一个十年，肯定会出现一个新的速度。这个新的速度是多少呢？据计委的测算，下个十年可能是百分之七。这点同最近日本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一批人的看法比较接近。他们都认为，中国“六五”计划，速度不宜搞得太高。如果按刚才我说的，第一个十年执行结果是百分之五的速度，第二个十年是百分之七的速度，我们就能基本上实现两个倍增的计划。这样，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经济情况就比较好了。“六五”期间这五年，是什么样的五年呢？我的说法是，这是我国争取国民经济根本好转的五年。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五年，把基础打好，使国民经济出现一个稳步上升的形势。我们的政治形势是稳定的，这五年经济调整得比较好一点，中国是大有希望的。如果这五年摆布不恰当，我们也还有可能走一步退一步，走两步退一步。这五年当中，我们还是要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个方针。必须使我们的产业结构基本上合理，产品结构有相当大的变化，组织结构有所突破，现有企业经过技术改造在面貌上有相当的变化，能源交通要有适当的建设规模。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为全面改革作好准备。这五年，我们既要有一定速度，又要使整个国民经济摆脱不良循环。完全没有速度，不可能摆脱不良循环；片面地追求高速度，也不能摆脱不良循环。可以说，这五年是由不良循环转向良性循环的五年。这五年内，我们要有一定的速度。没有一定的速度，就没有生产资金，人民的消费也保持不了，那就不行了。这个速度就是百分之四，或是百分之五，保持这样一个速度，为今后的发展作必要的准备。要实现上述要求，关键是三个问题：

一是发展消费品生产。发展消费品生产包括农业、轻纺工业等，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领域和很大的潜力，眼光不能只限于自行车等几大件。比如，我们最近议论的建筑材料的生产问题，或者说整个建筑业的问题，这是非常有活力的积累资金的产业，世界上很多国家把建筑业作为一大经济支柱。但是，我们的建筑业却完全没有活力，等于一个服务行业，是一个不赚钱的行业。当然，这里有很多矛盾一下解决不了。把建筑业搞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些同志熟悉香港，熟悉新加坡，建筑业在他们那里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建筑材料在我们国家来讲，已经成了工农联盟的问题了。农民有了钱就要盖房子，建筑材料既可以大量地回笼货币，又可以满足农民的需要。盖房子，城市没有玻璃，农民更没有玻璃，只要有玻璃供应，我看可以销售几千万标箱。再如食品工业，包括饮料，路子宽广得很。我们这里举行一个招待会，端出来的三样东西，第一个矿泉水，第二个桔子水，第三个啤酒，就是这三样东西，再多的没有了。如果到国外，端出一盘子，有上十种。当然，我们不是一下子就有像外国那样大的市场。但是，现在青年人的嗜好同老年人不一样。饮料这个路子很宽广，饮料的原料，利用农村的山地，发展多种经营完全可以解决。至于食品，更是如此，人民生活稍微提高一点，对食品的要求也就提高了。我最近宣传日用化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看中国的妇女总还是要打扮打扮。农民生活改善以后，每家用点雪花膏、花露水、香皂等等，这就有很大的销售量。总之，日用化工方面的东西我们很缺。刚

才我只讲了化妆品，其实日用化工，何止化妆品。要看到中国的变化，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扎紧腰带只搞重工业。群众的生活水平高了，特别是农民收入多了，就有多方面的需要。我国人民的生活虽然不像有些发展快的国家那样，但生活要求也在逐渐多样化，这在城市、在农村都可以看得出来。总之，发展消费品生产，农业、轻工业的路子很宽广。消费品发展起来以后，积累问题，消费问题，财政问题都比较好解决。而且生产这种东西，消耗能源少，投产快，多数可用银行贷款进行周转，不需要国家投资。

发展消费品生产本身会带动重工业的发展，不要把消费品生产同重工业对立起来。消费品的生产需要重工业为它服务，也就推动了重工业的调整，促进重工业改变服务方向，这是重工业搞活的关键。重工业的调整，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第一位，而不是离开消费品的生产孤立地去发展重工业。消费品生产没有重工业，也发展不起来。在今后的五年里，这是第一条重要方针。

二是抓技术改造。就是现有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的技术改造。我们这五年，要使重工业不要下降的太多，而且还有一定的速度，为今后的发展准备条件，我看很关键的问题是企业的技术改造。企业的技术改造如果排上议事日程，重工业首先是机械工业就有事情干了。机械工业一活，其他原材料等行业也就有个如何跟上的问题。有两种方针：一是抓紧技术改造；一是现有企业都摆在那里，有形损耗、无形损耗五年，那时想走也走不动了。我在国务院会议上讲，我们的工业不少到了“更年期”，就是苏联援助我们的156项，到现在也二十五年多了，而且当时那些设备在世界上也不是最先进的。应当围绕节约能源、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增加花色品种进行技术改造，在一些老企业里，采用先进技术，搞先进设备，意义很大。

为什么突出讲技术改造，而不讲挖革改？挖革改的概念不太明确，挖革改中的挖潜力，很多是在落后的基础上加落后，扩大产量。我们必须对现有的工厂进行技术改造，首先是机械工业，使它技术上有所前进，浪费减少，消耗降低。我们过去的挖革改，主要是数量的增加，而不是质的提高。当然，现在也不是对过去的设备一风吹，全部换新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究竟怎么样改造，是一篇大文章，要专门讨论。如果不这样做，设备会越来越破，形成老牛拉破车，越走越慢。我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过这样的话，就是现在仓库里的不少东西必须报废，老是利废，很落后的设备再来装上去，没有必要。现有库存的六百亿元机电设备报销它多少个亿，我们的情况就会好一些。现在我们仓库里还有钱昌照[1]先生那个资源委员会的东西。这些东西占在仓库里，没有任何意义。把旧东西回炉，作为废钢铁，至少可以腾出仓库来嘛。无论如何不要像广东过去卖咸鱼那样“推陈储新”，新的咸鱼来了存起来，先卖臭的，臭的卖完了，新的也臭了，所以老是吃臭咸鱼。我们现在也有类似的问题，物资部门仓库里的东西有相当一部分要报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拆下来的设备交给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拆下来的设备交给街道工业，街道工业拆下来的设备交给社队企业。汽车就是这样的问题，很老的汽车还在那里跑，新的汽车不能生产。当然，仓库里的东西

有些要利用，有一些必须要报废。挖革改必须突出技术改造，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设备、技术、工艺，要有一个新的面貌。这样经过五年，原有的企业就有新的变化。当然，这是长期的任务。中国现在不适于大量地采用最新的设备和技术，条件还不具备；但是，也不能在很落后的技术上越搞越落后。主要应当采用适用技术，来改造原来很落后的技术。我国劳动力比较多，特别是在自动化的问题上要分轻重缓急。工业发展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同时要为今后的发展作必要的准备，那么，技术改造问题，就必须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来。

三是以能源交通带动整个工业。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能源的问题，第一是节约，五年中间，甚至“七五”计划的前期，靠新建项目解决能源问题，跟不上。技术改造要把节能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节能我们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这是依靠改善经营管理，依靠轻重工业结构的改变节省的。节能，更重要的是技术改造，在五年内要把关键的技术措施搞上去，计委、能源委已经有了一些想法，要具体落实。既要发展消费品生产，又要使重工业有一个最起码的速度（百分之一也是起码的速度），如果不节约能源，就是空话，就要回到老问题上去了。为什么要发展消费品生产呢？为什么重工业不能不调整呢？能源紧缺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一搞消费品，回头一看，重工业下降太多，又要重工业上，重工业一上，消耗很多能源，消费品又要下。为什么这两年轻工业能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前进，根本问题是重工业让出了能源。如果是重工业一上，就像翘翘板，这头翘起来，那头下去，这头再翘起来，那头又下去，没有出路。所以现在我们既要发展消费品生产，又要使重工业有起码的速度，这样我们这五年就好办了。做到这一点，关键的问题是能源的节约。这个矛盾只有靠节约能源去解决，因为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终究是有限度的。节约能源应该摆在技术改造的第一位。

当然，只靠节约也不行，还必须有一定的建设规模。必须下决心挤出资金（包括内资、外资），使能源交通建设有一定的规模。最近国务院会议讨论，能源、交通问题，交通是第一位，特别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应当优先放在交通上。因为有了交通，能源才有人投资，地方愿意投，企业也可以投，甚至还可以集股。如果交通问题不解决，就是再好的煤矿也没有人去开，开了以后运不出来。现在能源中的煤炭问题，首先还是卡在交通上，如果交通情况好一些，煤炭还可以多搞一些，还有潜力可挖。从发展上来讲，首先把交通落实，至于能源，可以调动其他的力量来搞，比如山西煤，余秋里同志讲，如果交通没问题，很多省愿意投资搞。当然，不是说，对煤炭不下大力量投资。世界上搞工业，都得先解决交通问题，资本主义发展也是从交通开始，有交通才有贸易，有贸易才能刺激商品生产，然后生产力才能发展。过去我们长期按自然经济的模式搞，对基础结构的东西太忽视了。

我认为，有了以上这三条，在五年中间就会有一定的速度，并为今后的前进作好必要的准备。

这里顺便说一下，方毅[2]同志讲的优势产业，稀有金属和稀土金属问题，我认为值得注意，过去其他同志也提过这样的建议。当然，当前规模搞得太大不行。

看来，早一点下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很有必要，这是国内的需要，也可以出口换外汇。

第二，财政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财政困难，没有钱。要消费，又要建设，又要开发能源，又要进行技术改造，出现财政赤字，等等。这个问题怎么办？从财政本身采取一些措施，包括调整价格、税收，严格财政纪律，加强国家财政监督等，可以解决不少问题，这方面我不多说了。看来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出路，在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现在是一方面财政困难，一方面浪费极大，遍地是黄金。完全靠产值速度的增长来解决财政困难并没有很大的作用。由于各种原因，去年财政收入只占工农业生产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五左右，按现在的经济效益，每年总产值增加百分之四，只有四五十亿元的财政收入，也就是每增加百分之一，只有十亿元，这说明经济效益太差，浪费大，成本高。所以只从增长速度上来解决财政困难还不行，就是再提高百分之一，只能增加十亿元，百分之二，二十亿元，五年加起来也不多。今年有许多企业减产增收，最近专门请了抚顺市财政局长田欣毅同志作报告。抚顺是重工业城市，生产全面下降，但收入可以不减。北京市的首钢，今年铁少产二十九万吨，钢少产十二万吨，收入不减少。什么原因？就是企业的潜力很大，挖出来就是很大的财富。长期以来吃大锅饭，企业没有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职工不关心自己劳动的经济效果，以致浪费很大，成本很高。最近国务院讨论，提出每个企业从原料到产品，一律按国际价格算算账，这样算下来，亏损企业可能占百分之八十。如果工资也按外国的标准算，亏本的企业可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很多企业说是有利润，实际上很多是原材料价值的转移，铁、煤、木材便宜，过去还有个农副产品便宜。农副产品稍一提价，轻工业就吃不消了。什么原因呢？过去靠农产品的剪刀差，靠农产品价格低。这是长期以来管理落后，技术落后，浪费大，成本高，经济效益太差的结果。这既是我们很大的弊病，又是很大的潜力，问题是怎么搞法。现在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在解决吃大锅饭上开刀，我认为选择这个突破口是对的。现在讲经济责任制，不外乎企业不能吃大锅饭，工人不能吃大锅饭。企业经营好的，可以多得一些，经营差的少得一些，工人也要解决按劳分配的问题。农业生产责任制讲来讲去，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吃大锅饭的问题。为什么这几年农田基本建设搞得没那样多，投资也没那么多，农业生产上得很快呢？根本问题，就是不能吃大锅饭。这一条非常灵。工业搞经济责任制，肯定会出现好的效果，当然，工业比农业要复杂些，有个生产的连续性，一环扣一环，还有个外部条件问题，但是道理是一样的。要根据工业的特点，研究工业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形式。最近在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同志高度评价这件事，说现在搞的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其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他还说，农业搞的结果，很有效，工业、商业势在必行。当然工业、商业跟农业不一样，我们要搞稳当一点，要具体分析，要精心地从实践当中去寻找好的形式，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完善。要把企业的潜力挖出来，使企业关心经营管理，工人关心劳动成果就必须同他们的利益结合起

来。当然，还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如领导班子振奋精神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两条：一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振奋精神；二是要通过政策，把企业、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实行经济责任制，把企业、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企业关心改善经营管理，工人关心自己劳动的经济效益，这是个基础。但能不能搞好，会不会出其它的毛病呢？这就得对企业进行整顿，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跟上去，这样才能使经济责任制健康地向前发展。因为我们讲政策，讲经济责任制，主要是同利润联系起来的。而利润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今天的情况下并不能完全体现企业经营的好坏和劳动的好坏。如果其它方面的工作跟不上去，这里面漏洞甚多，可以搞邪门歪道的东西很多。经济责任制只是个突破口，能不能搞好，起到应有的作用，关键是能不能把经营管理抓上去，把整顿企业抓上去。没有经济责任制，整顿企业、改进经营管理，就没有群众基础，企业本身没有积极性，工人也没有积极性。建立经济责任制后，要因势利导认真地搞企业的整顿，认真地搞企业的经营管理，整顿劳动纪律。这样就不仅仅是同利润挂钩，而是把企业的整个经营管理水平抓上去。经济责任制只是个突破口，各个省、各个部都要抓自己的骨干企业，把企业整顿搞上去，把经营管理搞上去。越是大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部管的企业，比下面管的企业浪费大，潜力也大。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搞了一个骨干企业的材料，很说明问题。全国三十五万个工业企业，有大中型企业四千四百个，骨干企业二千一百多个。这二千一百多个骨干企业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业总产值，五分之一的国民收入，二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利润加税收五百亿元，占百分之五十二。所以要抓骨干企业，抓大头。这五年，关键是要提高经济效益。这五年不是一般的五年，困难是很多的，怎样把各方面的力量用好，如果能达到刚才讲的结果，就过了一关，三十几年积累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积累的一些问题，就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就能取得主动。各个工业部门，都要作个计划，抓企业的整顿，最后出什么成果，讲多少条都可以，如整顿领导班子等等，但最后没有一条提高经济效益不行。拿多少钱出来，增加多少利润，增加多少税收，减少多少成本开支，得拿出成果来。部长、副部长下去抓一个骨干企业，搞那么几条，增收节支一千万元、五百万元，我看就是很大的成绩。当然，不是乱来。就是思想工作加政策，把整顿企业搞上去，把经营管理搞上去，把劳动纪律、财政纪律整顿好，在这个基础上搞技术改造，作到投资少，见效快，效果好。综合利用也有很大的效益。各部门领导干部下去后，要为企业着想，研究如何增产，增收节支，尽快地、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这就能出成果。

以上是解决财政问题的出路，是基础。按这个路子走下去，效益会好，财富会多，钱会多起来。但是并不是统统归到财政部，因为渠道多了，相对地说财政收入占的比例甚至还会比过去下降。这是个新情况。但是，不能走老路，不要看到企业有钱，部门有钱，又觉得不好，又想改变政策，把它统统拿回来。拿回来以后，第二年就没有了。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在资金分散的情况

下，如何用经济的办法使资金的使用符合宏观经济的要求。看来主要应发挥银行的作用，就是发挥银行集中资金和调动资金的作用。过去是统收统支，钱都拿到财政部了，银行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现在发挥银行作用既有必要，也有了可能，要加强银行的集中、调动、运用资金的作用。今后国家财政，主要用于基础结构，搞那些收益少、周期长、没有钱赚的、非搞不可的项目。凡是那些有利可图的，周期比较短的，逐步转给银行贷款解决。我对田欣毅同志讲话的批语讲了两个方面，解决财政问题，第一通过政策，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挖掘潜力，把经济搞上去；第二通过银行集中资金，运用资金。这是解决财政问题必须走的路子。

除了筹集和使用好国内资金外，还有个利用好外资的问题。现在国际条件很好，外资一定要利用，不要顾虑太多。只要真正使用得当，对我们克服困难，争取时间是有利的。

现在很多单位不敢用我们银行的贷款，不敢用外资。在外国，高利贷都敢用，我们是低利也不敢用，这说明我们经营没有本领，有本领的也发挥不了，这个要破掉。哪有搞经济不用贷款的？将来银行的利息还不能太低，银行为了筹集资金，需要提高存款利息，因此，贷款利息也要提高，这样就逼着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缩短建设周期。计委计算，我国建设的项目平均建设周期八年，比美国、日本长得多。建设周期太长，与战线长、无偿拨款有很大关系。反正上马了，上马了就慢慢地搞嘛。资本家背利息就要算账，日本人讲，哪有建设项目搞八年的。他们是边建设边投产，外国的企业大部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现在是百分之十几的利息，一搞十年不受益，哪个资本家受得了？将来国家财政担负两部分，一部分是急需国家财政拨款的，这也不能是无偿，要由建设银行收一定的利息；一部分是利息补贴。有些项目建设周期长，利息高，国家财政只负责补贴一部分利息。我们要逐步往这方面过渡，开始可能有些困难，但这样搞，我们的工业才真正有希望，才能真正出人才，出实业家。现在这种搞法，搞好搞坏一个样，不可能出实业家。建设周期长，原因是很复杂的，有政治因素，有计划不周、无息拨款等等，也还有设计上的问题，要研究如何缩短建设周期。计委搞的数学模式，认为周期缩短，在同样的条件下，就可以减少积累和消费的矛盾。这个论点是对的。为什么外国的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没有我们那么严重呢？除了生产的目的，第一部类、第二部类比例关系等问题以外，还有个建设周期问题。周期越长，积累同消费的矛盾就越尖锐；周期越短，积累同消费的矛盾就适当减少。也就是说，第一部类、第二部类安排恰当的话，周期要是缩短些，积累就可以稍微多一点。我们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当然有些问题一下解决不了，但要逐步着手解决。又如开发煤炭，余秋里同志主张多搞中小型的，我支持这个意见，因为来得快，周期短嘛，投产后，投资很快收回了，又可以再投资。《资本论》第二卷讲资本的周转、资本的循环问题，我们要认真进行研究。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讲资金周转，不讲资金循环是不行的。现在不少单位两个钱不顶一个钱用，如果周转合理，一个钱可以顶几个钱用。过去有很多原因，其中有政治原因，现在这个问

题解决了，就得真正按经济规律、按经济办法研究经济建设问题。今天给建委的同志出个题目，就是如何缩短建设周期，以及建筑业如何搞活，这两个问题要作为大事进行研究。上面讲的是生产、建设领域的经济效益问题，至于流通领域内的经济效益问题，我们还没有很好研究。

第三，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作用。

我认为我们目前面临三大问题：一是扯皮的体制，这是外国人讲的，我借用过来，部门、地区、条条、块块扯皮；二是吃大锅饭的政策；三是自给自足经济的观点。这三个问题，如果不逐步地改，我们的经济没有出路。关于体制问题，是比较麻烦的事，还要在实践中摸索。吃大锅饭问题，要下决心解决。这里讲一下自给自足的经济观点问题。应当看到这个问题根深蒂固，做生意、搞计划就是从自给自足的观点出发。社会化大生产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交换。今天的世界就是国际交换，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取长补短。根据地时代过去了，帝国主义封锁的时代也过去了，我们已经进入国际市场，今后的基本形势就是这样，不会哪一天又回到封闭的经济里。有的会说，战争打起来怎么办？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战时经济问题。什么是自力更生？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了这样一个观点，以自己的长处通过交换补自己的短处，这就是自力更生。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的才是自力更生吗？如果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自力更生。我们又不是靠外国人恩赐来生活，我们是靠交换，用我的劳动来同你的劳动相交换，而且是有利的交换，是为了发挥我们的优势，这还不是自力更生！只要思想转过来了，这本身就有很大的潜力。比如，粮食部利用国际市场善于经营，我看就不会赔钱。我们要研究中国怎样发挥优势产业，怎样同外国交换，怎样交换才有利。我们不能完全在国内求平衡，必须把圈子打开。有些东西我们硬是短线，硬是没办法，但是，我们也有优势，为什么不能发挥我们的优势，来弥补我们难以克服的弱点。也可能我们的优势，对有的国家来讲是劣势。如中国再怎么搞小麦，也赶不上加拿大和美国。但是中国的盐碱地可以种棉花。国际市场上总是棉花贵，小麦便宜，这是不能够改变的，种小麦容易机械化，劳动生产率高，棉花生产总是困难些。所以，我们要以自己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也就是说，有一个善于利用国际有利条件来经营的问题。不少行业就有很多这类东西，要善于运筹，善于经营，这本身就是很大的学问，也就是说有很大的潜力。我国现在是个开放的国家，已经进入了国际市场，被封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每个同志思想上一定要适应这种形势，适应这种新的情况，这样才能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中国人历来是会做生意的，商业部和外贸部许多同志也都是会做生意的。但是，就是有长期传统的观点束缚着，不能使他们的才智得到很好的发挥。要通过改革，调动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性。特别是沿海地区，有二亿人口，有上海、天津等大的中心城市，在经营管理、技术水平、交通运输、同国际的联系等方面，都比内地具备更多的有利条件，应当采取一些必要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这些地区在对外贸易方面的作用。我们学会利用国际市场，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今后国民经济搞得快一点或慢一点，搞得好一点或差一点，有很大的关系。

我今天讲的轮廓，第一是速度问题，怎样看这五年的问题；第二是财政问题；第三是国际市场问题。我们今后制定五年计划必须考虑这些问题。

注 释

1．钱昌照（1899—1988），江苏常熟人。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和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

2．方毅（1916—1997），福建厦门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保证经济责任制的健康发展*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北京市关于工业、交通、建筑、商业等行业推行经济责任制汇报时的讲话。

今年推行经济责任制，国家不可能拿到很多钱，但企业的收入会有很大的增加，问题是个人拿多了不好办。第一年企业的潜力大、浮财多，第二年再搞老办法，不一定上得去。企业职工要保护已得的利益，今年奖金分一百元，明年得五十元，就会影响积极性。因此，一定要考虑明年、后年怎么办，不能以后无以为继。个人所得不能弄得太高，不能太冒尖，必须加以控制。这是一条重要的政策。这样做，一方面使个人消费基金不致增加太多，同时也有利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走上轨道，否则就会为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设置新的障碍。因为，现在个人一下子拿得很多，以后企业的经营管理真正改善了，而奖金又不可能有更多的增加，工人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

要看到今年搞包干，主要不是从体制改革考虑的，是由于财政任务落实不下去才搞起来的，是仓促上马的。包干把利润作为考核企业唯一的指标，从中国今天的实际情况看，很不完善，容易发生很多流弊。利润不一定能完全反映企业的经营水平，利润大的企业不一定贡献大；有些利润小的企业，不一定贡献小。这样包下去，形成一个不合理的基数，以后再动它就很困难。人都是往高处走的，往低处走很不容易。眼光要看得远一点，要把可能出现的麻烦考虑在前面，把工作做在现在。一方面要实行包干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但又要看到利润包干有很多不合理的因素。现在就怕头脑昏昏，指导思想不清醒，只看到暂时的好处，看不到可能出现的麻烦。总之，一要调动积极性，二要克服平均主义，三要不使个人所得太多，这三条一定要掌握。现在要做好企业职工的思想工作，特别是要把企业领导的思想做通，要讲为国家分忧，要讲瞻前顾后、照顾左邻右舍。思想工作做好了，办法就有了，可以做到既不给个人发得太多，也不一定就影响工人的积极性。

北京搞经济责任制劲头很大，人人都在算账，说明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要防止搞歪门邪道。现在的情况是，不承认企业的利益，企业没有积极性，企业一旦有了利益，就拼命扩大它的利益，所谓经济的内在动力就在这里。那些好的企业就会在改善经营管理、挖掘潜力上下功夫，而有些企业就会搞歪门邪道。不把

歪门邪道堵住，企业就不会真正在改善经营管理上下功夫，改革就达不到目的。因此，监督就要跟上，但也不要像过去那样一管就死。要看到，有些地方的工业局并不完全代表政府，他们要为企业谋利益，因而对企业的监督有所削弱。要看到这个变化，国家要制订监督、控制的办法，对企业各种违法行为要给予制裁。

要使企业在改善经营管理上下功夫，必须做好企业的整顿工作。推行经济责任制可以促进企业的整顿，但不能代替企业的整顿。过去搞利润留成等，都是在经营管理好的企业搞，现在一下子都包了，好的、差的企业都搞，情况就比较复杂。企业的整顿工作必须跟上，现在，各主管部门要组织大批的人下去抓企业的整顿。要定出几条大框框，作为整顿企业的依据，北京市要很好讨论一下。经委、财政、银行、工会都要组织人下去，首先抓大型骨干企业的整顿，以大带小，把经营管理抓上去。一批消耗高、长期亏损的企业是关停并转的问题，对于这类企业，光讲救活不行，有的企业不宜救活。小铁厂非关不可；小化肥厂有的不关，有的就要关。

管理企业不能光有奖，没有罚。北京市可不可以开除工人？是否北京市带个头，经过市人民代表大会立个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开除、辞退工人。开除、辞退的职工，劳动服务公司可以吸收。工厂不能开除工人，劳动纪律就搞不好。此外，还要有经济处罚。厂子里有一批所谓“尖子”人物，人数不多，影响很坏。没有一套办法，无政府主义解决不了。治国要有一套办法，治厂也要有一套办法。新加坡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小国，受世界各地的影响，但社会风气比较好，其中一条重要原因是执法很严。在禁止抽烟的地方抽一支烟就要罚款，乱吐一口痰也要罚款。个人私自携带武器，被查获就要判处重刑。治理国家、治理工厂，没有法、没有纪律不行。当然，也要防止不应该开除的乱开除，开除职工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被开除的也可以上告，由法院仲裁。总之，管理企业一个要有奖，但不能搞得太多；一个要有罚，包括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今天请总工会、劳动总局的同志来，就是想在北京试点，搞一个整顿劳动纪律的办法，包括干部失职造成损失要罚款、扣工资。对企业中的贪污盗窃案件，要像抓治安整顿那样严肃处理。

对企业的奖金必须控制，确定一个最高限额，超过这个限额的转为集体福利基金或储备基金，现在没有核实到企业的要核实到企业。定额落后不能搞计件工资，计件工资问题要认真研究。包干不能只包利润，还要把产量、质量、成本包进来，只包利润现在条件还不具备。要提倡递增包干，一定三年，稳定增长；或者搞滚动包干，过去一年，再加一年，使企业提前知道。

国家整个价格要调整合理，时间还相当长。企业里可以搞两种价格。一是内部价格，就是生产价格，这是考核指标。首先从纺织行业搞起，搞出一个比价，棉布虽然市场价格低，但生产价格高；化纤市场价格高，但生产价格低，化纤的利润要在内部转移一部分给棉纺。二是有些工厂搞国际价格与国内价格比较，用以考核企业的经济效益。搞起两种价格，就有利于判断我们现在的改革是越来越合理，还是越来越不合理。

我讲这些都是在肯定经济责任制的前提下来说的。陈云同志讲，体制改革、经济责任制，其意义不下于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现在农业搞了生产责任制，其它行业势在必行，但问题是工业比农业复杂得多。现在不要光讲它的好处，要注意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为此，要拿出办法。由国家经委牵头，计委、体制改革办公室、财政部、劳动总局、总工会参加，搞出几条意见，再找山东、辽宁、京、津、沪五家研究。经济宣传要按照现在讲的精神来宣传。

当前经济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最近在北京听到了一些情况，感到有些问题需要注意，今天请你们来座谈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工业上实行经济责任制问题。企业搞经济责任制，就是包干了，这个方向是对的，是没有问题的。截至现在，从主流来看，从效果来看，总的是好的。但是，对这件事也是很担心，如果搞不好，可不可能出一些相当大的乱子？不久前国家经委召开企业整顿座谈会，国务院听取汇报时，也曾提出过一些问题。经济责任制要搞，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已经解决了。问题是一下子就搞那么多，要防止出问题。陈云同志也专门打过招呼。现在搞经济责任制，企业包干，基本上是一哄而起，是一下子搞起来的，全国大概有百分之六十七十，甚至还多，而且是仓促上马的。为什么说是仓促上马的呢？各地方搞这个东西，多不是从改革上出发的。因此也没有试点，没有一批一批地搞，相当一部分是因为财政任务分不下去，才一下包的。我七月份去山东，听山东同志简单地说了一下，当时只听到好的一面，很多问题没想透。现在再回过来一看，实质上我们对企业搞了一个从利润上挂钩的办法，就是苏联的利别尔曼[1]的办法。具体说就是企业的分配，企业得多得少，工人得多得少，就是看完成利润多少，就是利润指标。当然利润是一个极大的动力，我们始终不能离开这个东西。从根本道理来讲，城市对工业搞包干，包括商业，农村包产到组、到户、到人，道理和原则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但是，工业、商业的情况，比农村要复杂得多，不一样。农村包得很简单，一个是集体所有制，一个是它的产品是一次完成，它也没有上下左右这种复杂的关系。但是，工业不同，工业有很多前后左右的关系，而且很多是全民所有制。农业包干，问题简单得多，交国家多少，交生产队多少，留给自己多少，发挥积极性没有问题。但是工业如果只跟利润挂钩，别的东西跟不上去，流弊就很多。比如说，跟利润挂钩，还按不按计划去办；再如纺织行业，他少搞白布，多搞化纤，一下子利润就上来了。还有一种情况，他生产以后还有一个销售问题，卖得出卖不出？按我们现在的这套制度，产品制造出来了，利润也就有了，但那边收进去压在仓库里边。他可以不考虑社会需要，搞突击生产，生产多了，利润就高。如果只跟利润挂钩，利润包了干以

后，不接着把其他措施跟上去，如必须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等，那就会发生好多问题。

过去有一种说法，我们搞经济责任制，就是包干要在企业经营搞得比较好的一些厂子，企业经营管理差的条件就困难一些。后来也考虑过，通过包干来促进企业的整顿，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也讲过，经济责任制，也就是包干，要做为整顿企业的突破口，推动企业的整顿。现在这样一包，由于面很大，有很多企业的管理很乱。现在的问题是，在包干以后，是不是能够把整顿企业、改进经营管理的工作跟上去，跟上去问题就会少一些，就能前进一步。跟不上去，恐怕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会搞邪门歪道，就会大大助长企业的邪门歪道。所以，在经委召开工业交通座谈会时，我专门讲了这个观点。就是经济责任制要因势利导，要能够推动企业的整顿，推动企业经营管理的改进。我们各级领导，要拿出很大的力量抓这件事，避免经济一包干，其他工作跟不上去，出现一些邪门歪道，转嫁负担。表面上看利润很多，收入很高，实际结果不是那种情况。现在发现有两个问题：一是不按计划，北京市一些小商品大量减少，有些已经绝迹，不生产了；再就是哪个赚钱，搞哪个。还有一些长线或短线的产品，企业生产以后，就转给另外的部门。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如果说，我们的整个价格是符合价值的，那按利润包干，抓利润这个牛鼻子是可以的。利别尔曼的理论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价格和价值背离得很厉害，价格并不能反映价值，利润的多和少并不能反映一个企业经营管理的情况。比如，搞煤炭、白布的，利润就很少，搞另外一些东西就比较赚钱，它不能反映实际状况。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大一批企业的承包搞了包干，退也退不下来了。而且退下来也不行，原来的财政任务落实不下去，是靠这个包下去的。现在一定要集中力量，抓经营管理，抓企业的整顿。我们是从分配入手，从包干入手，去推动企业的整顿，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使企业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而不是单纯追求利润。

第二个问题，关于奖金问题。从当前情况看，如搞不好，今年第四季度，奖金很可能要大翘一下尾巴，因为包干了。包干的好处使大家有积极性，这里边有的是正常的挖潜，但有些是搞的邪门歪道。据了解，现在很多地方企业，都准备把相当大的一部分钱作为奖金或计件工资发给个人。今年上半年，第一季度工作做得粗了一点，有点影响，弯子转得太陡。第二季度很多地方情况好一点，开始好转。可不要从第三季度，特别是第四季度，又来一次奖金的大泛滥。我的看法，如果今年给群众发钱发得很多，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会造成极大的困难。因为你这个企业发多了，那个企业也要多发，就要互相追逐。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个人消费的购买力已经没法对付了，没有那么多东西卖给他。我以前讲过，如果企业同个人比较起来，企业要多得一些；企业和国家的分配，有的地方一下扭不转，企业多得了一点，当然也不好，还是应该国家多得一点，这个后果还没有那么严重。如果分给个人很多，肯定会造成很大的困难。你明年怎么

办？如果有一部分企业一下子分得很多，这势必造成大家向它看齐。因为现在有些问题我们一下子说不清楚，它正道走不通，那就走邪道。去年的事实就是个证明。去年下半年奖金泛滥了一下，今年第一季度就造成很大的困难，向下一压，工人情绪马上低落。今年第二季度情况开始恢复正常一些，如果下半年又冒上去，那明年还得向下压。与其明年压，不如今年少发。这个问题上次讲了一下，这次再打个招呼，有关部门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各地同志回去，在省、市、区委讨论一下，应该采取切实的办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宁可按现在的办法，应该发给他的，留一部分作为公共福利，也不要分给个人，将来可以盖房子嘛。要作为奖金的部分很多是重复的。比如说，原来有一个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五作为奖金，现在一包干，又有一个完成包干定额的多少，有的还不只是一个重复，有好多重复。这样，加到一起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还有一个计件工资，现在看来，计件工资也必须有控制地进行，不能普遍号召搞。已经搞了的，要认真进行整顿。特别是全额计件，完全计件。现在我们一些工厂连定额都没有。陈云同志经验还是多，他一听说搞计件工资，马上提出，计件是可以的，但必须要把定额搞好。搞“计件工资不封顶”的，只能在有条件的企业进行。今天听说，山东济南第一机床厂实行计件工资，它的计件都是零件，根本配不成产品。有的零件多，有的零件少，统统搞计件，按计件发工资，最后厂里根本配不起套，机床出不来，怎么办？还有很多市场上销路不太好的产品，也搞计件。有的搞计件没有一点限制，他就加班加点，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在目前我们整个经济还很不协调，企业管理还很差的情况下，普遍地搞全额计件工资，恐怕条件不行。当然，能够按计件的应该搞计件，这是对的。普遍搞全额计件，条件不行。从按劳分配的道理来讲，能搞，但必须把工作跟上去。现在大面积地搞，我看工作跟不上去。超额计件的问题要小一点，因为它原来还有定额嘛！但超额计件有很多也是重复奖，这就不对了。

总之，今年第四季度奖金不能发得太多，这是一条原则。工作现在做我看好做，到明年再往下压难度就大了。我们宁可现在受点影响，也不要造成明年更大的困难。因为很多厂子的甜头，群众还没有拿到手嘛！办法就是，一部分按原来的杠子分给个人，一部分转作集体福利，如果第四季度奖金大冒一下，就不单单是国家多拿少拿的问题。一个根本原则是不能够再让工人的工资和奖金超过劳动生产率很多，这几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是下降的，工资加奖金是上升的，而且是上去就不能下来。这将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困难。要按劳分配，但总的钱不能发得很多。这是两个问题。究竟发多少合适，经委在研究。总的原则，还是要控制在原来各地根据国务院补充规定的奖金杠杠上。还有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包干以后，超额这一部分，不要急急忙忙地发给个人，这同工人关系不是很大。

第四季度总的生产形势是会好的，包干以后的形势也是好的，但现在已经看到很有可能在奖金问题上大翘一下尾巴。这就会出现一些企业奖金搞得很高，对周围产生影响；一些企业今年这样搞了，明年还得往下降；还有一些很不合理，

搞了一些邪门歪道。我们现在这样的包干，因为是全民所有制，很可能出现越是落后的企业，越是经营管理混乱的企业，包干以后，一下子增加收入很多。如果放到企业里也没多大的问题，它可以搞技术改造，如果分给个人，明年肯定要下降。四川搞过，有这个经验。第一年它很落后，一说利润分成，马上调动了积极性，当年增加很多收入，第二年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个人收入今年无论如何不能分得太多，现在把工作做到，比明年再往下拉困难要少得多。

第三个问题，关于农村问题。我们讲农民富，主要是靠农民生产致富，就是发展生产。这个我们不怕，农民收入越多越好。但不能在价格上再打主意。我说的价格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提价。现在我们的农产品中有许多价格不合理，如果按照合理不合理讲，还得提价。但提价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状况。除了提价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议价产品失去控制，扩大议价范围，降低计划收购基数，等于变相提价。许多同志知道，由于我们整个国家经济水平比较低，工业经营管理比较差，技术也落后，现在农副产品的价格再提高，国家是吃不消的。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棉花国家收购以后，纺织行业除了化纤以外没有多少钱赚。这是一个大变化，纺织行业过去从来都是赚钱的，现在纺纱、织布没有钱赚。因为棉花价格提高了，一个是提价，一个是增产的棉花加价，一个是进口棉花成本也高。所以，现在大家愿意搞化纤，拿化纤补棉花。现在化纤也卖不出去，已积压了十二亿米，到年底还要增加五亿米。化纤也得降价，不降价销不出去。前一段小平同志讲，工人、农民的消费得适当控制。真正依靠生产发展增加的购买力不可怕，问题在于城市用奖金，农村用农产品提价，或者用这样那样的国家让利的办法增加收入，是必须控制的。讲让利，就是按征购、派购[2]的基数，再超过部分，如搞加工等，让一点利是允许的，但基数不能下降。我们有相当一些地方原来是有计划收购数字的，现在很多没有了，相当大部分变成了加价或议价。我看，第一，降低国家计划收购基数，把它转为议价或加价，不能再搞了，当然超计划的可以。第二，过去有计划收购任务的，去年一下子搞掉了，我主张有些还得恢复。最近看到广东一个电报，提出要进行整顿，这个意见很好。近两年，国家在关心人民生活方面，根据现有的财力，是尽了最大努力的。现在，在城市、在农村，还得讲“三兼顾”，农民还得讲支援国家建设，工人还得讲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兼顾，不能只顾一头。让利问题、降低收购基数、扩大议价、加价范围都得整顿，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陈云同志说，我们的国家总得是两条，一是吃饭，二是建设，不能光讲吃饭，不讲建设。工人生活的改善，应当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生活的改善，要依靠发展农业生产，不能依靠把属于国家的收入转归农民。这样搞的结果会是老百姓收入增高，国家收入减少，不能维持，搞不下去；老百姓的收入也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农业上的问题，以前我在四川也讲过这样的观点，如搞农、工、商联合企业，把一些加工转给农民，办社办企业，就是把一部分加工利润，转给农民，原则是对的，方向是对的，但究竟搞多少，归根结底，要看工业有多少积累。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是工业补贴农业，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如果工业积累很少，国家就没有力量去

补贴农业。因此，我们现在只能划个杠杠，原来的基数不能再变，今后增长部分可以采取一部分归农民、集体，一部分归国家。现在不少是降低了国家收购基数的，主要是扩大议价范围问题。另外，整个农产品价格恐怕要稳定一个时期，当然个别的不是完全不解决。总的讲，调价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

第四个问题，要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现在不论是搞工业的同志，搞农业的同志，搞县、区、公社工作的同志，还得讲一下三兼顾的问题，不能站在一边，只顾一头。工业里现在普遍存在一个相当严重的现象，就是小平同志批评思想战线上的问题，叫做涣散、软弱。现在很多企业领导干部对一些不良倾向不敢抓，不敢管，迁就一些群众中间的落后的东西。有些企业领导干部现在实际上已经跟一些工人中的落后情绪结合在一起，对付国家。不管怎么样，先抓一批钱，发给工人，工人就拥护他，日子就好过。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了。现在很多厂子的财会人员出现两本账，不给国家讲真话，了解一些情况相当困难。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如不及时注意，发展下去是很严重的事情。总的来讲，要用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承认企业的、社队的、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这是非常对的。但是，还要有一个全局观念，还得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只搞一头不行。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前面讲的奖金要少发，不要搞歪门邪道，农副产品不要变相涨价，就解决不了。

今年总的情况是好的，财政能做到基本平衡；农业情况也是好的，虽然有些地方遭灾不少，但粮食还是增产的，原来估计接近一九七九年的产量，就是历史最高水平，其它也是大丰收的。物价，由于冻结和其它一些原因，稳定了下来，现在就担心年底物价上涨，有这种危险。工业，今年我们进行了这么大的调整，没出什么乱子，比原来预计的情况要好，不是负数，估计到年底产值可能增长百分之三，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五，轻工业上升百分之十一。明年预计增长百分之四。

今天就讲这么几个问题，打一个招呼，大家还可以议一议。

注 释

1．利别尔曼（Evsei Grigorievich Liberman，1897—1981），苏联经济学家。1962年9月发表《计划·利润·奖金》一文，对前苏联经济改革提出建议，主张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建立在利润分配的基础上，刺激企业挖掘潜力，完成计划，多得利润和奖金，引起了普遍重视。但在中国曾将其视为“利润挂帅”、“奖金挂帅”和“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2．征购、派购：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农产品分三类进行管理：一类指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由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统一征购，禁止上市交易。征购系国家按粮食折实向农村社队即农民征收农业税和统一收购农民余粮及大宗农产品的简称；二类指畜、禽、水产、水果、糖料、茶叶等农产品，由国家下达收购计划即派购任务，农村社队和农民完成国家派购任务后，超产部分由国家收购或加价收购，也可在当地集市上销售；三类指除一、二类之外的小宗农产品，农村社队和农民可以在当地进行集市贸易，但禁止长途运销。

在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与邓小平、胡耀邦等观看解放军北京部队和空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军事演习后发表的讲话。

同志们！

我代表国务院，向参加演习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任务！祝贺你们在新的起点上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全军面貌迅速改观。这次演习，士气这么高，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这么好，这么多部队，这么多军兵种，这么多科目，组织得这样严密，协同得这样准确，整个演习进行得有条不紊，我们看了以后，大家都精神为之一振。这决不是一日之功，这是我军优良军政素质的体现，也是我军整个工作和战斗力水平显著提高的集中反映。前天下午，我们又请北京军区的同志向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区来的同志进一步介绍了组织这次演习的经验。大家看了演习，听了报告，都认为启发很大。目前在国家机关工作中，存在着一种涣散软弱、松垮疲沓、推诿扯皮、不负责任的习气，对工作危害极大，必须坚决克服。如何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精神状态、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适应于四化建设的要求，是我们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中的一项重大任务。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同志，都应当通过这次演习，受到教育，振作精神，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发扬团结协同的风格和扎扎实实的作风，把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建设成为有高度效能的工作系统，把各项工作大大提高一步。

同志们都很关心经济工作。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一九七九年初，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但是，当时全党的认识并没有统一，中央的方针并没有落实，计划指标仍然偏高，基本建设战线仍然过长，比例失调的问题仍在继续发展，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以致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赤字，票子发得过多，物价上涨。去年第四季度，中央察觉了这一潜在的危险，提出了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全党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决策。特别是解放军，带头响应号召，带头克服困难，对调整工作的顺利展开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这次调整，总的情况是好的。这么大的调整，没有出什么乱子，形势比原来预计的要好。今年已经过了八

个多月，预计可以完成今年二月人大常委通过的修改后的国民经济计划。前两年财政赤字很大，前年一百七十亿元，去年一百二十亿元。由于坚决压缩基建规模，增收节支，今年可以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尽管气候反常，灾情严重，但今年粮食产量不仅不比去年低，而且有可能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七九年。各种经济作物是全面增长的形势，预计棉花可以创纪录，达到六千万担左右，油菜籽增产五成，糖料增产一成多，烟叶增产三成。农业总产值可以完成计划，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五到六。由于调整，重工业困难很大，预计将比去年下降百分之五。但轻工业是大发展的局面，全年将上升百分之十一。轻重工业升降相抵，工业总产值可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由于农业、轻工业都搞得比较好，市场供应和货币回笼的情况也比去年好。就全国范围来看，国营商业零售价格上升幅度不到百分之一，农贸市场价格上升百分之三点二，应该说，物价是基本上稳住了。今年进行了这么大的调整，生产的增长速度下降到了最低点，但从全年来说，并不是负数，仍然保持了一定的速度。第一季度是负数，第二季度开始回升，第三季度又比第二季度好。由于各种比例关系正在逐步趋于合理，第四季度的情况肯定比第三季度好，明年肯定会比今年好。

中央提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个根本转折。过去我们的经济工作在“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走的是一条不讲经济效益、浪费大、消耗高的老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新路子。这条路子，投资比较少，积累率不那么高，效益比较好，增加的社会财富多，人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现在，从生产、建设到流通领域，各方面的浪费都很惊人。浪费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潜力大，只要把它挖掘出来，就是巨大的社会财富。在整个经济工作中，我们要着重解决提高经济效益这个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围绕这个关键，我们必须采取以下方针：

（一）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这样，既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又有利于繁荣市场，回笼货币，增加收入，安排劳动力。同时，又有利于使重工业活起来。要切实改变“重工业自我循环，轻工业自我服务”的状况，使重工业调整服务方向，转向主要为消费品生产服务。

（二）依靠原有企业，认真进行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由以外延为主，逐步转向以内涵为主；由粗放经营，逐步转向集约经营。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主要围绕着节约能源、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增加花色品种进行。企业的专业化协作和改组、联合，要同技术改造、合理利用资源结合起来。技术改造搞好了，既可以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带动重工业的发展，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而且几年以后，就可以使企业在重要的设备、工艺、技术上出现新的面貌，为以后的发展作必要的准备。

（三）抓能源、交通带动整个工业。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是当前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它严重影响着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能源方面要认真贯彻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从改善经营管理、调整产品结构、进行技术改造等三个方面，大力节约能源，以适应调整时期经济发展的需

要。与此同时，还必须下决心拿出一定的资金、材料、人力，使能源、交通建设有一定的规模，这不仅是缓和近期能源、交通紧张，渡过当前经济困难的应急措施，也是积蓄力量，为今后的建设打好基础的战略部署。

（四）开辟生财之道、聚财之道、用财之道，解决财政困难。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资金短缺、财政困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出路，在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一方面要通过政策，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挖掘潜力，减少浪费，搞活经济，增加收入；另方面要通过银行，运用经济办法，把分散的资金筹集起来，用于国家必要的建设上。就是说要以银行再分配作为财政再分配的补充。除了运用好国内资金外，还要用好外资。

（五）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发展对外贸易，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作用。我们要冲破长期以来的自然经济观点的束缚，打进国际市场，加快进出口事业的发展。通过国际交换，互通有无，以我之长，补我之短，这就是坚持了自力更生。我们要学会同外国做生意，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骨干商品，注意发挥沿海地区的有利条件，有计划地对外开拓市场，扩展贸易。

（六）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是一套完整的方针，调整和改革是相辅而行，互相促进的。当前，一定要以调整为中心，同时必须进行有利于调整的改革。陈云同志最近指出，改革经济体制，解决吃大锅饭、铁饭碗的问题，其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在宏观方面，要加强计划指导和监督管理，搞好综合平衡，把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调整好；在微观方面，要把经济搞活，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把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同企业经营管理的好坏和职工劳动成果的好坏联系起来。有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能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的体制、方针、政策，就可以使我国经济建设走上一条投资少、效益好、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现在正在讨论制定“六五”计划，已经有了一个轮廓。“六五”期间，要认真贯彻上述各项方针。整个“六五”，应该是争取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五年。这五年的速度不可能过高，但必须有一定的速度，才能为今后的发展准备条件。五年当中，要在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方面做出显著成绩；要把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在扎扎实实地抓好节能的同时，积极加强能源建设和交通建设；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并为全面改革做好准备。达到了这些要求，也就是打好了基础，积蓄了力量。这样，就可以摆脱不良循环，转向良性循环，虽然速度不是很高，但后劲会越来越大，整个经济就能够稳步健康地发展，形势就会一年比一年好。总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有希望的，但是，不能走老路，必须走新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弊病是有办法克服的，但是，一定要把基础工作做好，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只要振奋精神，实事求是，注意研究新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我们的经济建设是肯定可以搞好的。

最后，我想讲一讲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和拥军优属的问题。我们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从来都是非常好的。军民一家，几十年来，历来如此。“四人帮”的破坏，从反面教育了我们，使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军政团结、军民团结的

可贵。今年以来，在广西法卡山和云南扣林山抗击越南侵略的战斗中，在四川、辽宁、陕西、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和其他一些省、市、自治区的抗灾抢险斗争中，军队广大干部战士奋不顾身，为祖国为人民立下了功勋。在这次演习中，各部队进一步发扬了“老八路”的光荣传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积极帮助群众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为人民办好事。十万大军，进驻三县一市，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实兵演习，不仅没有出现什么纠纷，而且涌现了这么多的拥军爱民的生动事例，掀起了军政、军民团结的热潮，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张家口地委反映，军队同志是“以身作则、拨乱反正”的模范，处处为人民着想，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军队的形象，是同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一切从事地方工作的同志，都应当讲团结，顾大局，自觉地维护解放军的威信，积极支持军队的工作。各级政府，都应该根据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的新情况，进一步把优抚工作做好，都有责任把安置军队转业干部的工作做好。从军队退休干部的住房建设问题，到海防、边防部队的家属就业和子女入学问题，都应当抱主动热情的态度，尽力解决。这次演习，阵地正好选在长城脚下。在张家口一带的山上，可以看到古代长城的遗迹。新的长城，真正的长城，完全打不破的长城，是军政、军民的亲密团结。我们应当为巩固这座新的长城，作出新的贡献！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景大有希望*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庆祝国庆三十二周年招待宴会上的祝酒词。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二周年了。各位来宾和朋友应邀出席今晚的招待会，和我们一道庆祝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节日，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

一九八一年对我国各族人民是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我们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经验，分清了是非，进一步统一了我国人民的思想，加强了团结，鼓舞了前进的信心。今年，我们对国民经济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解决了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形势比预计的要好。农业生产，尽管气候反常，不少地区暴雨成灾，不少地区旱情严重，但是，由于政策正确，农民积极性很高，粮食产量预计可以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七九年，各种经济作物将全面增长。工业生产，在使内部各种比例关系趋向协调的同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在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积极努力下，情况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好。重工业正在调整服务方向，轻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市场物价基本稳定，财政收支可以实现基本平衡。我们面临的困难是不少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干群团结，军民团结，这些困难正在被我们一个一个地战胜。

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要把我国逐步建设成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大量的艰苦的工作要做。我们要在不断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同时，在经济建设上走出一条投资比较少、经济效益比较好、各方面协调发展的新路子来。我们国家的形势是好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是大有希望的。

今天，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叶委员长的谈话，充分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现在台湾海峡出现了和缓气氛。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早日实现全民族大团结作出贡献。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同我们携起手来，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努力，来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七十周年。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对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七十年来又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我谨向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需要和平，世界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多种形式的合作和交往，继续增进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当前十分动荡的国际局势下，我们将坚定地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起，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和政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的了解和支持。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同情和支持我国的外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提议：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二周年，

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

为世界和平，

为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

为出席今晚招待会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想方设法把引进的石化项目搞起来*

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

* 这是赵紫阳与房维中、马洪、赵维臣等的谈话。

最近想了几个问题，提出来请你们研究一下。

一、要不要把二十二项引进项目中的几个石油化工项目搞起来？我多次说过，要研究这次调整和上次调整有什么不同。我感到我们往往把这次调整的困难方面讲得多，而对有利方面讲得少，实际上这次调整比上次调整有不少有利条件。以前我们讲有些引进的建设项目难以下马，包袱丢不掉，也是当作困难来讲的。其实这里也有有利的一面，问题在于这些被我们当成包袱的项目是停下来放在那里好，还是设法把它利用起来好？放在那里，大宗的设备费已经花出去了，还要花保管费、维护费，而且搞不好还会腐蚀损坏。与其这样，我看还不如设法把它利用起来。因为主要的钱已经开支了，安装起来，再要花的钱就少了，而收益却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这些项目也可以说是投资少，见效快。两相比较，动用起来比把它当成包袱放着对我们更有利。前一种做法是上策。

为什么说动用起来是上策？因为，搞别的新的基本建设项目花钱更多，时间更长，经济效益不如上这些项目。而搞这些项目，有的搞两三年就能见效，到“六五”期末、“七五”期间就能大大增加收入，获得效益。当然，不能由此否定确定二十二个项目时的错误。但错误既已铸成，如何正确处理，减少损失，并为国家生利，就要好好斟酌一下。

上这些项目要考虑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原料。现在一亿吨原油使用极不合理，大部分烧掉了，要设法合理使用，用煤代油，并搞综合利用，深度加工，把油省下来搞石油化工，提高效益。二是电力。我想应该用挤小保大的办法来保证这些石油化工项目上去以后所需要的电力。即把那些耗电过多，效益很差的小钢铁、小化肥停下来，节省电力，保证大厂的需要。三是投资。前面说过，主要投资已经花了，还要花一些，可以利用一部分国内的储蓄存款，也可以借一些外资。

这件事，要从宏观经济上作些论证，看看是否可行。

二、企业要进行调整。以前我们讲调整，主要是讲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在工业内部是调整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等等，这可以称之为工业调整。这种调整工作，现在基本上接近尾声。今天我要讲的不是这种工业

调整而是企业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要把耗能高的、效益差的、重复生产供过于求的、质量低劣的企业下决心关掉。这大部分是小企业，但也不是把所有小企业都关掉。效益好的小企业当然不能关。而是关掉那些耗能多、长期亏损、产品质量很差，而又属于长线的企业。关掉这些企业节省下来的能源，来保证那些耗能低、收益高的大企业、先进企业。这也可以称之为“挤小保大”。在确定调整方针时，曾说企业要关停并转。执行这个方针，有一个过程，去年是提少关停多并转。这是考虑到政治上安定的要求。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先关停后并转，多关停少并转。明年调整的重点是不是要放在这方面。这样做，可以腾出电来，腾出煤来，保证大企业的需要，保证经济效益好的企业的需要。从目前的形势看，只要我们对关停企业的职工安排得当，政治上不会有大的风险。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地区调整。这是指某些吃电、吃煤最多的产品的生产，在地区安排上，要进行必要的调整。现在有些地区电力供应很紧张，而又承担着很多耗电多的产品的生产任务，如华东、东北。有些地区则电力比较富裕，例如甘肃等地。是不是可以考虑，根据电力生产和供应状况，对某些地区的某些产品的生产任务进行一些调整。例如，可以把东北、华东地区一些耗电多的产品的生产任务调整到甘肃等地。这样既可以减轻前一类地区电力紧张状况，又可以充分利用后一类地区的电力。现在东北电力很紧张，但又是生产铁合金，又是生产电石，又是生产铝锭，耗电很多，需要从外地运进很多煤。只是辽宁省就要运进一千多万吨，这是很不合算的。我想，与其运一千多万吨煤到辽宁去生产这些产品，还不如让甘肃或其它电力充裕的地区生产这些产品。例如炼铝，甘肃既有这类工厂，又有电力。这种调整困难并不很多，而效果却好得很多。上海地区也有与辽宁类似的情况，也可以采取同样办法处理。还有华东、东北地区有很多小化工厂，耗能很多，其中能耗低的可以保留，但那些能耗高、效益差的，可以关掉，以省出一部分煤电，保当地的大企业。在这样做的时候，那些关掉小化肥厂的地方对化肥的需要，国家应该以大化肥厂生产的化肥予以满足。这个问题，请房维中[1]同志协同经委的同志搞一个文件，在十一月初交稿。

三、整顿企业。这一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年，有一定的成绩。最近经委又提出关于整顿企业的六条原则性标准。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它具体化，真正落实，不能流于口号，要见诸具体的行动。特别是在提高经济效益上，要做出显著的成绩。整顿的内容很多，如领导班子、职工队伍、管理制度、劳动组织、劳动纪律、财经纪律、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等。所有这些方面都要有实在的内容，要有具体的标准和要求。

例如，现在企业普遍存在着人浮于事的现象。整顿劳动组织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整顿劳动组织，就要有合理的定员定额。广东江门有个食品厂，规定职工都要经过认真的考试，及格的列为编内人员，不及格的列为编外人员。对编外的要进行正规的训练。训练后，经过考试合格的再进人编内，不合格的和本厂不需要的，则转入服务行业。转入服务行业，也要经过有关专业的训练。如果不服从分配，就要扣工资以至停发工资。关停并转的企业，也要对职工进行各种业务

训练，有的通过训练转入服务行业。职工不遵守劳动纪律屡教不改的要处分，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要警告、记过甚至留厂察看、开除厂籍；党员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还要受党纪处分。

又如，现在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也很严重。整顿财经纪律也是整顿企业的一项重要内容。要规定一个制度，财务人员造假账的要受法律处分。如果厂长或党委书记指使财务人员造假账，要加重处罚。今年十一月要从各部抽出一些精干的人员集中起来进行训练，然后下去对工厂进行抽查，对于弄虚作假严重破坏财经纪律的，要大张旗鼓地处分一批人。

企业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是要整顿，并围绕上面这些整顿工作来做。

做好这些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

总之，在整顿企业方面要提出具体要求，订出具体标准，要想出些具体办法。请马洪同志组织计委、经委和有关的同志，在十一月份搞个文件出来。

四、要研究政府机构主要是国务院机构的改革问题。现在国务院有很多部，又有很多委，往往互相牵扯，要考虑如何改革现有机构，解决扯皮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希望社会科学院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五、企业技术改造究竟叫固定资产更新好，还是叫什么别的好，可以研究。技术改造目前要以节能为主。

注 释

1．房维中（1928—），辽宁海城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员，国家计委研究室负责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

关于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听取国家农委党组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一、收购农产品定基数我同意，可以办。但是现在基数低的不能提高，基数高的要降下来。这样两头来，国家吃不消，要说服农民。我在山东说，胶东生产那么好，不全是农民自己的力量，也有国家的扶植。鲁西北过去那么穷，刚刚翻身，你不要攀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就行了。在确实具备条件时才有可能解决。要从全局着眼，我们努力的基点是发展生产。定了基数，对基数外的产品，紧缺时价格允许向上浮动；多余卖不出的，如猪、菜籽油，价格是否也可往下浮动。两者同一原则。基数外价格浮动，就可以给农民一个信息。要全面研究这个问题，有些农产品卖不掉，是前几年物资缺时提价过高造成的。

商业不要着重从价格上打主意，要多从流通上想办法，这是很重要的。

有些农产品如棉花、油料、糖，基数外的不能自由处理，还要卖给国家，但给予加价奖励；有些可以自由处理。今年高产区降基数主要是粮食，其它一步步地搞。国家没有那么多钱。从根本上说，农产品价格还是低的，但不能很快调整。在农产品价格上，要统一思想。这几年农业增长，农业振兴，靠三条：一是政策放宽；二是收购价格提高；三是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当然，政策是主要的。进口粮食这一项每年要补贴三十多亿元，提价要一百二十亿元。调价我们不后悔，但年年动是不行的。那样下去国民经济要崩溃，工业生产没有发展，积累没有增加，你没有东西向农民交换，东西又得涨价。光靠增加消费品生产也不行。当前影响农民积极性的主要不是价格问题。当然，将来到一定时候，提价也有必要。

今天农民富裕主要是靠发展生产，而不是靠提高价格。现在要适当稳住，过几年经济好转后再提。十年、二十年提高一倍（依林同志：恐怕要更长些），还是有剪刀差。几年内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大文章，也不要用这法那法来冒。耀邦同志谈的思想非常对。目前每年补贴二百亿元，价格再提高，实在吃不消。现在收购、进口都是要补贴的。方向是要减少统购、派购，但也不能像广东那样大量变成议价。这样怎么办？二类商品还是要派购，像柑桔，北京这样的城市一点不吃不行嘛？总得派点，供给城市和外宾。可以有个基数，基数外的加点价。有些农村很多东西都变成议价。现在全党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够统一，主要是中央没

把情况向大家讲清楚。

我们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开通渠道。有些东西不是多了，而是渠道不通。各省和中央部门的同志要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

县以下供销社要使其独立经营，可以自己到各地去找销路。

把基数定下来好。这次开会来的人中农业方面的，同财贸方面意见不尽一致，可把文件带回省里去议一下。

基数定了后，超基数部分有的自己处理，有的享受加价，照顾一下农民，搞基数是好办法。

二、供销社改集体可以今年拿几十个县试点。可能有些问题事先想不到，一试点，矛盾就会暴露出来，光争论解决不了。试一年，看有什么问题，总结一下，好的话明年就推开，搞得不好，试点再延长一点。

三、农民负担问题。有些问题，如民办教师都由国家发工资，将来也不一定采取这种办法，这涉及国家教育方针和国家财政状况。经济落后的地方，问题出在不分情况平均摊派。有些事情，国家可以出多少钱，农民再看自己的财力办。

四、要给同志们说一下，不要带个对改革的失望情绪回去，本来大家希望这次会议有个大突破，今天听了，好像有点失望。75号文件、13号文件刚刚实行，还将继续起很大作用，还有很大潜力。现在不是另外找一个更大的窍门，主要问题还是继续贯彻13号和75号文件。耀邦同志讲方兴未艾，贯彻的是少数地方，不到一年发个文件，解决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是必要的，但带有根本性大突破的文件是不可能的。

责任制各地总的情况是好的。有些问题一时还看不清楚，不要急急忙忙说得过死。除了继续完善，总结经验，还要继续注意群众在责任制中创造的新事物和带启发性的问题。

除了责任制，有两件事农业上要很好注意：

第一，真正从科学的角度上研究要做些什么事。科学技术问题提到日程上还很不够，多年不注意这个问题。山东出个鲁棉一号就起了很大变化。这个领域要很好来抓，当然不是去提大而空洞的计划。要从这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第二，在农业措施方面，如果能从取得更大经济效益的角度，从投人产出上考虑，还有很大潜力。这么多年干了不少事，但过去农民积极性不高，显示不出作用；现在农民积极性高了，就显出作用了。就肥料而言，如四川把温江的氮肥拿出一部分给产量不高的地方，就能比用在温江增加更多产量。给温江换用一点磷肥、钾肥，也能更多增产。水利也是如此，已有的水利如能解决好配套管理，就可增大效益，可能有百分之三十的潜力，现在水的浪费很大。要从经济效益、科学技术投入产出来研究生产规划经营上的合理性，当然国家还要投点资。恰恰多年来搞农业的同志对这方面很不重视，包括我在内，把这些抓好就可达到耀邦同志方兴未艾的论断。

顺便提一下土地问题。珍惜土地，节省每一寸土地要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去潘家口水库，沿途看到唐山农村城镇到处建新房，围大院，不知占去多少土地！农民盖房当然是好事。对此要有个立法，除了正在搞的土地法，先把占地问题搞个东西出来，首先是不能放任占用土地。而有些工业必要的建筑用地往往要价很高，久拖不能解决。毫无节制地占地，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对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六日、十一月十日

* 这是赵紫阳两次召集起草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人员座谈时讲话的要点。

报告要写得鼓舞人心，同时要使人感到踏实，能解决人们许多疑问和困难，从中找到信心。

讲今年的成绩时，背景要讲清楚。这次是又一次大的调整，同一九六二年那次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么大的调整，如果没有轻工业的增长，不会有现在的局面。重工业非调不可。开始时，有的同志感到基本建设投资由五百亿元压缩到三百亿元，搞不好，可能要出乱子。现在看，这次调整进行得相当顺利，情况比原来预想的好。当然，对调整所采取的措施，开始时不可能全面，是逐步认识、逐步发展的。要把这些都写出来，除了讲好的，也要把当时的背景、形势、怎么走过来的，作些叙述和分析。这次是六十年代以来的第二次大调整，不调整，潜在的危险消除不了。调整了，至多速度跌到百分之三。今后是回升，今年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好，明年肯定比今年好。

对去年十二月工作会议必须充分肯定，不能搞一段又怀疑起来。最近讲重工业的气氛太浓了。

不要再笼统提轻、重工业的概念。要从消费品生产及为发展消费品生产服务来着眼分析工业。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在重要地位，不是短期的事情，不然不能回笼货币，增加收入，稳定市场，满足人民需要。在现阶段，要把整个国民经济调理顺当，发展消费品生产是重要方面。贵州的同志提出，抓消费品生产把两头带起来了，一头是农业，一头是原材料工业，这有一定的道理。苏联现在已明确提出生活资料的增长优先于生产资料的增长。苏联、东欧国家多年来商品匮乏，我们也一样，不抓消费品生产，经济活不了。要讲我们面临什么问题，为什么要突出消费品生产，讲清它同经济全局的关系，同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不要把轻、重工业对立起来，要展开讲，回答一些问题，讲清利弊得失、经济内在的联系。讲清了，使人感到有新意。

今年的成绩，离开调整说不清楚。今年形势好的第一个标志，不能讲农业。讲农业，也不能只讲农民的积极性，要看到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作用。第一个标志，要讲财政赤字下来了，做到收支基本平衡，物价稳住了。要讲保持了经济基本稳定，还有一定的速度。我们这次调整，代价无

非是降低了百分之二三的速度。当然，现在财政收支的平衡、经济的稳定还不巩固，还要看我们采取什么方针。

要利用起草报告的机会，搞清一些问题。可以不讲“六五”计划的具体内容，但要设想划分发展阶段。我看大体上七年左右是一段。我们的发展速度，不可能永远就是现在这个数字，以后有可能高，但七八年内不可能出现。为什么速度低下来了？因为多年比例严重失调，急需调整。要从国情出发，分析现状，找到正确的方法。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发展中国家中本事比较大的一个，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几年的时间，调理好了，能够出现一段高速度。从长远来讲，中国会有一个经济振兴的时期。应当看到这个趋势，要有这个雄心壮志。过去发生急性病，不对，但也要反对悲观论。这几年理顺了，后劲就大了。从战略上讲，本世纪后一段我国国民经济能够出现发展速度比较高、经济效益比较好的时期。但是，关键是要在这几年内打好基础。五至七年这一段的重要意义，不在于速度要高多少，而是要贯彻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把基础工作做好，积蓄力量。这样就会先慢后快，有后劲。

我国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是好的。我国现在整个经济的基数并不高，劳动力也不困难，资源还远远没有开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很好发挥出来，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两个倍增、小康水平的口号不要丢，但不要用“起飞”这个词。对中国经济的展望，要给人们以希望，要从发展趋势上作判断，把最近几年要做的事同远景联系起来。我们一方面要把当前的工作如何做得更扎实，另方面也要考虑中国今后究竟如何发展。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只要政治稳定、方针正确，经济发展的速度都在百分之七八以上。我们马上达到这个速度不行，跑不起来，但经过一段调整、改革时间，到八十年代后期，会出现一个新的速度，中国的振兴一定会到来。

要把“六五”期间搞些什么事情提出来。除了搞好调整，把其它基础工作搞好外，要着手通盘规划、具体部署并开始进行体制改革。我们在改革上打了几个前哨战，活是活了，但流弊很多。一个价格体系，一个劳动工资制度，这是宏观上的两个大问题。搞一段时间，经济稳定后，总得来一次大的改革。

企业要分别几种情况，不能一律对待。我的想法是把企业、产品分成四类，关系国家命脉的关键企业，以及关键产品，搞指令性计划；一些不需要纳入计划或无法纳入计划的产品和企业，搞市场调节；中间的两类企业，有的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的以市场调节为主，加以计划指导。我们五十年代就是这样搞的。这是改革的大部署。

整顿企业的一条，要把改组和调整的内容加进去。企业调整，具体说就是关停并转。要摆脱被动局面，一是整顿，一是调整、改组。一九六二年关停并转的是“小土群”，现在关停并转的是长线和高消耗那部分。还要解决大厂吃不饱、小厂盲目发展的问题，但阻力很大。要把整顿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揭露各个领域的严重浪费。不把企业整顿好，真正讲究经济效益，调整工作也不能进行。

要对国情作出分析，对经济现实作出分析，引出前途光明的结论。从基本条

件讲，没有理由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本世纪内实现“两个倍增”计划，要有一段扎扎实实的工作，理出头绪，才能由过去比例严重失调转变为新的振兴。要从战略角度讲清楚五至七年内由比例严重失调到新的振兴的转折，这是争取经济根本好转的时期。这一段最根本的是贯彻八字方针。从调整来说，砍基本建设投资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不能再砍了，但调整的内容还有很多，要把各方面的事情理顺。要充分地讲清这一段工作的意义，由不良循环转向良性循环。结构不合理，速度就有虚假。搞好了这一段工作，中国的经济就过了关。

战略上要乐观，战术上要重视。讲国情，一方面要分析有很大的潜力，一方面当前又存在巨大困难，要经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才能达到光明。这两面都要看到，只看到一面就不能有正确的决策。要认真对待，采取正确的方法，促使转化，不能急于求成。同时，又不能消极悲观，一定要振奋精神，努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

现在实行开放政策，有个资产阶级“香风臭气”的问题，一定要警惕，要教育干部有抵制的能力，经得起考验，进行这场斗争，但也不能因此而不开放。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确有必要，但我们并不是因为有糖衣炮弹就不进城了。

在合作与发展的国际（坎昆）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主席先生：

我很高兴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对于东道国墨西哥政府所作的周到安排，我表示衷心感谢。

当今世界有两大问题，一个是维护和平，一个是促进发展。这两个问题紧密相联，不可分割。我们这次会议，在加强国际合作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如能取得积极成果，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也将是有益的贡献。

战后国际形势中的一个根本变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他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他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却与此远远不相适应。他们的经济发展正在继续受到外部条件的重重阻挠。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经济困难。三十多个最不发达国家，至今仍然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大多数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国际收支逆差日益增加。许多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损害和债务负担的加重，经济发展速度正在减慢。就是石油输出国，也由于在国际市场中技术、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垄断控制，难于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工业化，而且它们以有限的、不能再生的石油资源换得的国际货币盈余，还由于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而无法保值。总之，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有共同的处境。他们过去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和掠夺，现在都在继续遭受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严重束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下，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强烈的共同要求。他们的要求，是符合社会发展进程的，是正义的，完全合理的。

发达国家当前也确实处于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困境。发达国家的经济困境有其本身的深刻的社会原因。过去发达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不发达国家的贫困的基础之上的。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独立，广大人民日益觉醒的情况下，这种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已经越来越难于继续维持下去了。如果发达国家继续坚持以不公正、不平等的态度对待发展中国家，南北关系的紧张势难避免。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能得到顺利的增长，发达国家势必遇到日益缩小的原料供应和销售市场。因此，发达国家强调自己的经济困难作为拒绝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

的理由，是不明智的。发达国家许多有远见的人士，即使从他们本国的利益出发，也认识到了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和改善南北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们的这种符合时代潮流的见解，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在这种形势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许多发达国家提出了在南北关系中“要合作，不要对抗”的主张。

无庸讳言，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不断改革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否则，合作将难以维持，对抗将难以避免。因此，无论是国际经济援助、私人投资、技术转让、贸易、金融，都应当符合公平合理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必须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不得干涉他们的内政，不得操纵他们的经济命脉。必须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而不应该加深他们的依附；他们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无权状态必须改变。当然，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要根据本身的情况进行必要的国内改革。但是，现在正是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严重地妨碍着发展中国家为此而作的努力。只有改变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才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从而使南北关系得到改善，使世界经济有所复兴。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应该采取全面和整体的解决办法，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扎扎实实的努力。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确有一些紧迫问题，需要优先予以解决。这种解决，应该是实现全面、整体解决的步骤，应该符合发展中国家长期发展的需要，应该有利于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进程，而不应该成为脱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根本目标的有限措施。

为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了及早解决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多年的努力，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议。中国政府认真研究了这些建议，认为可以按照以下原则，促进为发展而进行的国际合作：

第一，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以及实行集体自力更生的一切努力。

第二，按照公平合理和平等互利的原则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

第三，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根本目标和解决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紧迫问题，正确地、密切地结合起来。

第四，发展中国家有权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发达国家不应该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改革作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前提。

第五，积极推动旨在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南北谈判，以利于发展世界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

主席先生，为了改善南北经济关系，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尽快发动联合国主持下的全球谈判，并使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也正是这次会议邀请信所明确提出的一个主要目标。现在许多国家提出，第三十四届联大决议规定的全球谈判应该在今年年底以前或至迟在明年年初实际开始。中国坚决支持这一主张。

我向在座的各国领导人呼吁，让我们共同表示早日召开全球谈判的意愿，共同表示我们将竭尽全力使全球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十分严峻。南北关系能否改善，同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密切相关。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政治问题。世界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会议寄予巨大期望。我们不应该辜负他们的期望。我们的会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中国愿意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起，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谢谢主席先生。

怀念陈郁[1]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日

陈郁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每当我回想起与陈老相处的十多年，眼前总浮现着这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工人运动前驱的高大形象。

陈老对党非常忠诚，他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忠于党。在革命和建设的第一线，他英勇战斗达半个世纪，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的一生。陈老无私无畏，品德高尚，襟怀坦白。他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他坚持原则，是非爱憎异常分明。

陈老对工作，对同志，对群众，都怀着满腔热情。他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密切联系群众，作风平易近人。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很感人的。

我在五十年代与陈老相识，当时他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但是，仍然朝气蓬勃，焕发着革命青春。陈老在困难面前总是保持革命乐观主义。后来我知道，他在三十年代，即使处于逆境之中，也对革命充满信心。陈老还有一种十分可贵的品质，就是勇于进取，敢于创新。他对那些落后的、不适应形势需要的东西大胆改革；而对新事物则满腔热情，积极支持。

陈老这些突出优点，体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优秀品质，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当前的“四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我们要学习陈老的高尚品质，为创造社会主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努力！

陈郁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注 释

1．陈郁（1901—1974），广东宝安（今深圳）人。1925年入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辽西省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中央燃料工业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长。

技术改造是个战略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听取李人俊[1]关于上海技术改造汇报时的讲话。

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要围绕提高产品质量、节约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来进行，技术改造要有重点，更新设备也要有重点，不能提全面更新设备。

看来向坂[2]、小林实[3]的意见有些道理。解决城市拥挤的办法，一个是生产专业化，分出部分产品让别的厂生产；一个是立体化，楼上楼下，尽量少占面积。上海市产品要向外挤，扩大出口，和内地搞联合。但市内老工业区要坚定地向立体发展，不能再走“生产挤辅助，辅助挤仓库，仓库挤马路”的老路。要体积小、占地少、压缩生产占地。老市区要有一个规划，有多少面积，发展多少工厂，如何建住房和仓库，仓库也要社会化，不要各企业都建。

有个好消息，北京市住房价格只降低百分之四十，就有人买了。买房的有教授，有干部，也有工人。我原想能收回三分之一的建房投资，也可以。住房要商品化，个人和小企业都可以买。旧城市改造要找出一条路子，天津、上海、沈阳、广州都有这个问题。要向上发展，要分一部分出去，要专业化。企业技术改造一定要和城市改造结合起来。

技术改造，引进外国技术要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盲目追求自动控制化程度高。资金不够要利用外资，借自由外汇，买国内设备是否可以，要算一笔账。这可作为一个问题研究。把外汇换成人民币，把人民币换成外汇，按2.8元兑换一美元计算，中国银行要起沟通媒介作用。这样一搞就活了。中国银行要有在一年里控制兑换的限度。上海市利用外资太少了，才三千多万美元，天津用了一亿美元，北京用了多少？上海牙膏厂改造得很好，工厂占地少，品种多。

顺便说一句，要支持荣毅仁[4]的工作，要把他们的工作搞活。他们现在离不开我们的体制，要像天津王光英一样，另开一个渠道。我们现在的体制有很多赚钱的事不能办。他们可以向国外借钱，买东西，换成人民币。有几个企业比较活动一些，可以拾遗补缺，补漏洞，对我们的事业有好处。但不能都这样搞。

原来说生产速度上不去，但一抓就上去了。十月份生产形势很好，什么原因，要总结经验。要利用外资搞技术改造，搞良性循环不能离开增产来搞。国外搞城市改造进行得很快，钱从哪里来的？我这次到广东，从边境上看到香港比前

几年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建了很多大楼，我们的老城市改造多少年搞不成。在国外用推土机把老城市一推，看起来是个大浪费，但实际上把建筑业带动起来，把建筑材料工业也带起来了，这样可以养活很多人。外国把建筑业作为一个支柱是有道理的。老城市改造方式值得研究。

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是一个重大问题，新产品试制、产品升级换代费用，可由人民银行给贷款，从新产品收益中来偿还，若归还不了从企业承包自有资金来偿还。贷款是个办法，也可以再开一个小口子，摊入成本，但同时也要强化财政监督。科学与生产结合是很大的问题。

非机械部门愿意自己制造设备，也是过去造成的。过去一机部主要服务对象是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是通用设备，不供应专用设备，不负责供应配件。所以，非机械部门都自己搞机械修理厂。纺织机械过去是搞得好的，这一点应该肯定，但现在不能提倡。机械工业与冶金工业密切，机械与冶金要扭在一起，机械工业的技术改造有个钢材质量问题。冶金要为机械服务，机械要为冶金技术改造服务。可以先选这么几个试点，计划部门要组织协调。经委要抓这项工作。

增税比调价好，税可以上交国家。利润过高的产品，一是应提高原材料价，但可能影响面大；一是提高制成品税收。价格改革不能拖得太久，完全用税收调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价格问题，还有劳动工资问题，这是两个前提条件。这是从生产环节上来讲。

上海的技术改造有自己的特点，上海是老工业基地，很拥挤，技术改造一定要少占地。我向上海的同志说，一是向外挤，多出口，一是与内地联合。老城市改造要走出一条路子。解决厂房拥挤，一是向上发展，搞高层建筑；一是向外发展，与外地搞协作，专业化协作。

今天请你们来，一是听听你们的意见，一是和你们讲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大城市技术改造列入国家计划。危害大的还是不负经济责任的部门所有制。要扩大城市的权力，就是搞中心城市，首先是沿海几个大城市，以城市为中心搞规划，比如上海市计委、经委来搞技术改造规划报经国家计委、经委审查批准。

技术改造要与工业改组结合，以地方为主。几个大城市的技术改造要列入国家计划。不是一般号召，至少要先搞上海、天津、北京、沈阳等几个大城市的规划，以大城市为主，结合工业改组。讨论时各部参加，列入计划，由市负责执行。列入计划就带有法律性。抓中心城市既是解决部门所有制、又是解决地区所有制的突破口，从中心城市突破可以打破条条块块问题。中心城市改造计划经批准列入“六五”规划，讨论请各部参加，定了以后，由地方执行。就照此办。搞联合比较复杂，搞协作比较简单。大城市一搞协作，带有地区性，全国性，要逐步积累经验。

还有大工业基地的改造。南京石化公司最近提出把现有上缴的两千七百万元减少七百万元，用来进行技术改造，几年后上交可达到一亿元。

不能讲全面技术改造，全面设备更新。要有重点，特别是设备更新要有重点。设备更新，提高折旧率要进行分析，比如房屋的折旧率可以低一些。生产中

的关键设备、最活跃的设备要提高折旧率，总的折旧率要稍为提高一下，特别是机械行业，一时不能提高也要把核心部分设备提高。随着财政情况的好转，整个折旧率提高一些，现在是不得已的办法。法国在二战后抓了设备改造更新，现在比英国发展得快了。我们现在有些办法不是从整个社会的新陈代谢来着想。

这个五年计划第一抓消费品生产，第二抓技术改造，第三抓能源、交通，第四抓体制改革，包括机构改革。

技术改造是个战略问题。大城市技术改造要弄个新章法，今后把某些大城市的技术改造列入国家计划。这个月薄一波[5]同志回来后要讨论一次技术改造问题。你们可以根据今天的精神搞个文件，技术改造与工业改组相结合，技术改造与老城市改造相结合，技术改造要与利用外资相结合。

注 释

1．李人俊（1914—1999），浙江温州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华东财经委秘书长，燃料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建筑工业部部长，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董事长。

2．向坂正男（sakisaka Masao，1915—1957），日本经济学家。曾任日本内阁经济企划厅局长，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日方首席代表。

3．小林实（Kob叮ashi Minoru，1932—1993），日本银行家。曾任日本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兼调查部长，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日方代表，访华七十多次。1996年其亲属遵照遗愿捐赠7000万日元在清华大学设立“小林实中国经济研究基金”。

4．荣毅仁（1916—2005），江苏无锡人。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

5．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机械委主任。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财政部部长，国家经委主任，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中顾委副主任。

巩固稳定经济的成果实现讲求效益的增长*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计划会议开得是好的。大家学习了中央常委同志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后五年计划主要方针的讲话，进一步了解了经济全局和中央的指导思想。在讨论明年计划草案时，改变了过去争投资、争项目的现象，对解决财政、煤炭等困难问题作了比较恰当的安排。

我想说几个问题，请大家研究。

一、明年和今后几年，要继续巩固稳定经济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稳步前进

今年经济形势总的看，比预料的要好，越来越好。取得这样好的形势，从根本上来说，是来自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上进一步调整的方针，和一系列稳定经济的重大措施。这一点非常重要，要有明确的认识。在这一年中间，我们在某些事情、某些措施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那是局部性的。

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政治经济形势一天天好转，逐步走向稳定。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在矛盾非常突出时，大家都很警惕，一到矛盾稍有缓和，就容易大意。应该看到，现在不稳定的因素虽然缓和，但并没有根本消除。所以一定要巩固调整取得的成果，并进一步采取措施，减少、消除这些不稳定的因素，绝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加重不稳定因素的措施。否则，刚刚缓和下来的矛盾，可能重新激化起来，那样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对于这个问题，在明年和今后几年，都要掌握住，形势好的时候更要注意。

第一，财政赤字问题。原计划明年赤字四十亿元，现在计划调整后，有的省财政收入任务减了一点，中央背了一点。明年计划安排的财政赤字可能不止这个数字，当然这不是最后的结果。中央多背一点，是为了让大家不至于超负荷，并能够前进和超收。明年财政上不仅五、六十亿元的赤字不能出，而且四十亿元的赤字也不该出。今年赤字预计不超过三十亿元，明年如果超过四十亿元，群众马上会有明显反应。赤字增加是经济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这在国内会使一些人

丧失信心，对国外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年初在人大常委会上讲，今年财政要实现基本平衡，我们做到了，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前年财政赤字一百七十亿元，去年一百二十亿元，今年不超过三十亿元。就这一条，对于增强人民的信心有很大的作用。现在人民最怕的是再折腾，出乱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经济发展慢一点，但稳一点，不出乱子，人民就高兴。不能今年基本平衡，明年又冒出很大赤字。所以，尽管计划上列了几十亿元赤字，我们还是要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增收节支，做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

第二，基本建设。现在经济形势好一点，明年基本建设无论如何不能重新冒上来，又出问题。基本建设中，财政拨款部分容易控制，但要防止信贷和筹款部分失去控制。我赞成通过银行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这是今后集资的一个方向，是大有可为的。但明年究竟能够搞到多少，我们的头脑要清醒，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出乱子。不要财政拨款收缩了，而信贷又膨胀。不能今年刚好一点，明年又冒一下子，后年再调整，忽上忽下不得了。宁可明年有意识地少搞一些，看准了力量确实没有用完时，后年再上。迟一年问题不大，搞冒了，再收缩，钱就白丢了。要发挥银行的作用，各种资金渠道要利用，但是必须有控制，要有综合的财政计划，宁可留点余地，切不可冒了。筹款、集资不要搞很多渠道，如投资信托公司等，最好通过银行办。不然就会把银行存款变成基本建设资金，又没有一个部门统一调度，就会使基本建设规模失去控制。今后恐怕还是搞两个渠道，一个是财政，一个是银行，其他的可以委托银行办理。头绪太多，就可能发生信用膨胀。还是要两点论，一方面，经济搞活后，财政上钱少了，企业和个人的钱多了；但从另一方面看，经济搞活才两年，企业和人民手中究竟有多少钱能够集中起来搞建设，恐怕不会很多。当然将来会多起来，但明年还不会多。所以对信贷必须要有控制。

第三，现在货币发行较多，仍然是潜在的危险。当前，货币发行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因素。老百姓手持现金多了，流通渠道多了，必然要求增加货币流通量。因此，今年年底全国货币流通量可能达到四百亿元，比两年前增加一倍。总的还是可以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认为目前票子发得不多。事实上，票子还是发得多了些，只是没有超过警戒线，不致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在军政费用减少、基本建设拨款压缩、信贷控制的情况下，货币投放的增加，主要来自奖金和农副产品的议价、加价方面。

这两年人民生活的提高，包括农副产品提价、工资奖金总额的增加和增建民用住宅等，带有还账的性质，是正确的。但工人的工资、奖金，农副产品的提价、加价、议价，今后不能再像前两年那样大幅度增加了，只能做些小的调整。归根结底，消费的增长，不能超过工农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然经济就不能稳定。今后工人、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生产的增长。

关于奖金的问题，明年要定个方针，就是奖金总的水平基本维持在今年水平上，不能超过。当然，不是把每个企业、每个人的奖金搞死，而是讲全国奖金总

额不能再增加了，要稳定一下。这一点，要向工人进行教育，经过工作是可以说通的。这个方针早一点确定下来后，可以防止明年在奖金发放上，上半年冒、下半年压。总之，奖金总水平要稳定，要经过整顿，在分配上搞得合理一些。

农副产品不能随便降低征购、派购基数，议价要整顿。原有的征购、派购基数随便取消了的，要恢复，即使工作艰巨也得搞。必须看到，农村确定征购、派购基数后，农民多卖给国家的商品，大部分是议价、加价的，有的比原来的收购价要高一倍。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农民手中这么多的票子，国家用什么办法回笼，国家有没有那么多的工业品同农民相交换。当然，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可以促进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另外，以农副产品作原料的工厂可以搞技术改造，改善经营管理，用来解决因原料提价而带来的成本增加或企业亏损问题。农副产品如果再降低派购、征购基数，扩大议价品种，增加货币的投放，农民就会有钱买不到东西。农村里有的农民收入增加很快，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农副产品超购部分都是议价、加价，而工业品供应是平价，这样是不能持久的。长此下去，势必造成工业品被迫涨价。有人主张对一些高档的名牌紧俏产品搞优质优价，这个问题要专门研究。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让农民搞多种经营，主要是讲不能随意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议价的面也要适当控制。今后商业部门对农民有两个任务：一是帮助把农副产品收购起来，推销出去；二是对市场过多的商品，通过价格政策和收购政策加以指导，减少生产的盲目性。如油菜籽，长江流域今后几年还是个大发展的趋势，如果都加价收购起来，最后可能是大批菜籽油在仓库里积压变质。有些农副产品确实供过于求，不能都要国家加价收购，那样国家就负担不了。农副产品除了向国内推销外，还要打开国际市场。对苏联、东欧这一块的贸易还是要搞。比如猪肉，就可以向苏联和东欧出口。总之，农副产品增产了是件大好事，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至少要做到不能随便提价、扩大议价和降低收购基数。

第四，利润留成、盈亏包干等经济责任制以及其他管理体制的改革，总的要求是明年要稳定一下，总结经验，加以完善，不迈大的步子。经济责任制，是在今年财政任务落实不下去的情况下实行起来的。没有经过很好的试点，实际上是一下子铺开了。它的方向是对的，效果是好的，但也带来许多新问题，需要很好总结，加以完善、消化。当然，有一些改革明年还要抓紧，如外贸方面，特别是沿海城市，政策还要适当调整，把进出口搞好、搞活。

以上讲的四点，主要的意思是要巩固稳定经济的成果，不要助长不稳定的因素。这些问题，都贯彻了一个微观经济搞活、宏观经济要集中统一的思想。我们既要看到微观经济搞活、宏观经济调整，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要看到相互矛盾的一面。现在看来，如果不创造条件在宏观经济上进行改革，只强调微观经济搞活，那么，矛盾就很大。因为目前处于调整时期，宏观上不能搞大的改革，这对微观经济搞活不能说不是个制约。微观经济搞活不能超过调整的要求。不能脱离了宏观经济，脱离全局，只讲企业搞活。由于体制、价格和经济结构等不合理，经济杠杆作用和经济立法跟不上，就使微观经济搞活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快、太

大。不能放弃中央集中统一这个基本方面。

明年速度“保四争五”必须是没有水分的、质量好的、产品适销对路的，是真正有经济效益的。要非常强调这个问题，不要一讲速度，又去盲目追求产值，长线产品、质量差的产品大量增产。这边产量产值上来了，那边仓库里积压起来了，这实际上是浪费了原料、材料、能源、运力和资金。这种蠢事，我们绝不能再干了。今后，看一个地区的速度是快是慢，要看它那里生产的产品构成，以及产品是适销还是积压。我建议今后立个制度，凡是哪里发生积压，就要迅速组织人下去检查，如果积压的产品质量差，不适销，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就要停止收购和停止贷款。现在已经出现降低产品质量，盲目扩大长线产品生产，以致造成积压的现象。我们要求在产品质量好、适销对路的基础上求速度，这才是真速度。过去的那种形式主义不能再搞了，在这一点上要拨乱反正。明年的速度要求比今年高，产品质量和适销对路方面必须比今年做得更好。各地同志回去要很好检查一下。现在有些东西仓库里积压很多，可是还在拼命生产。有些生产长线产品的企业就是要关停并转，要搞死，不能搞活。它越活，对整个社会危害就越大。

二、要把整顿企业放到重要位置上

明年要下力量整顿企业。这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项基础工作，也是当前克服严重浪费、增加国家收入、减少以至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物价的一个重要手段。怎样整顿企业？关键是要整顿、提高领导班子。现在有些领导班子，除了不够年轻化、专业化以外，就是涣散、软弱，成了落后意识的代言人，不敢抵制不良倾向。这种情况，在有些企业中相当突出。

整顿企业的具体内容，一是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二是整顿劳动组织。现在企业普遍人多，明年下决心搞定员定额，多余的工人去学习和培训，有的可以去造林、修路等。工厂这么多人，要是不搞定员定额，讲什么经营管理、加强劳动纪律、健全原始记录、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那就很困难。工厂应当有考核制度，合格的工人定员定额，分班轮换，不合格的去学习。当然，合格的也要组织轮训，提高水平。总之，不要泡在企业里。否则，整顿好企业没有指望。康永和[1]同志讲，首钢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人，就是搞别的工作。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劳动就业的文件，今后就业主要安排到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搞个体劳动，不准再往人员过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里塞人。三是整顿劳动纪律。要有奖惩条例，如北京市就搞了一个奖惩条例。四是整顿财经纪律。现在有的企业财务管理相当混乱。今年冬季，中央各部门就要组织人下去，对企业执行财政纪律的情况进行抽查，各地最好也组织一下。整顿要抓骨干企业，要派人下去帮助和检查，把全面整顿和重点整顿结合起来，一批一批地搞。

三、调整企业结构

我们今年的调整，抓了压缩基本建设、紧缩开支，调整了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这些方面明年要继续抓，同时还要抓调整企业结构。现在企业结构不合理，属于长线产品、重复建设、盲目设厂的，必须关停并转。比如机械加工工业，虽然有的方面还不够，但总的讲是厂子多了，人多了，国家没有那么多原材料，也没有那么多生产任务，就是再过几年还是如此。所以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实行改组，关停并转一批。

今年上半年讲过少关停多并转，工人工资照发，对稳定局势有好处，但不能长期这样下去。重点搞并转，结果放松了关停。有些企业不首先下决心关停，就不可能合理地进行并转。现在有的企业自己找饭吃，你挤我，我挤你。于是，什么"推销奖金"、"回扣"、贿赂等都出来了。今后企业调整必须抓关停并转，否则，企业结构不会合理。

东北、华东地区要围绕解决能源紧张问题进行企业调整。这两个地区能源将长期紧张，要有综合对策，不能只是一个办法，要采取多种办法。一是加快能源开发，加强交通运输，增加能源供应；二是大力开展节能。除此以外，还要按照地区能源平衡的原则，进行企业调整，对耗能多的企业进行布局调整。有些炼铝、铁合金企业要向西部有动力的地方转移。另外，还必须按照能源投入产出效益进行择优，把能源首先供应给那些耗能低、经济效益高的企业。当然，这会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问题，但利益的分配毕竟是第二位的。首先要考虑怎样能多为国家创造财富，其次才是各级财政收益的分配。要择优，绝不能以劣挤优，这应当成为一个大的政策。调整企业结构，解决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长线产品的问题，在这两个地区更有紧迫性，应该做出规划。

四、基本建设经济效益问题，应该引起全党的重视

今后几年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搞基本建设，整个基本建设规模不可能有较多的扩大。当然可以利用一些外资，但不会太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基本建设投资不算少，预算内和预算外加起来，还是有相当数量的。问题是投资的浪费太大，今后能不能从各方面研究一下，在投资效益上下功夫，把投资效益真正提高。前天，吕正操[2]同志到我那里，他讲铁路建设投资不算少，就是效益太差。一九六五年以前，十六年投资八十八亿元，修了一万三千公里铁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年，投资二百五十九亿元，修了不到一万二千公里。不仅铁路如此，整个基本建设的投资效果都差，主要是建设周期长。这同计划上的大上大下，建设的前期工作差，没有搞好设计就施工，施工组织与经营管理不善有关；另一方面就是内部、外部各方面向基建伸手、揩油。现在一说要上什么项目，大家都揩油。征地，农民揩油；城市建房，关系户就不得了。现在是老章程不适用了，新章程又没有。例如，征地现在是议价的办法，有的生产队漫天要价，这怎

么行？这方面要立法，至少搞些条例，制止各种混乱现象。

五、技术改造和科技问题

技术改造是今后我国走上经济振兴的一项战略措施。最近经济研究中心讨论这个问题时，薛暮桥同志讲，今后五到十年，企业的技术改造是中国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关键之一。从明年开始，把挖革改资金的百分之四、五十真正用于技术改造上。要在原有的水平上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搞节能等等，而不是用于扩大外延的基本建设。

赵东宛[3]同志关于科技问题的发言是好的。科技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考虑怎样把计划、科研、生产拧在一起。赵东宛同志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要有推广现有科技成果的规划，并且要计算出今后的发展速度靠科技增长多少。各地都要把推广科技成果排出项目，算出效益，列入计划。第二，对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要组织攻关。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科技的服务方向，以及如何把分散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的问题。陈云同志最近跟我讲，科技战线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力量分散。他回忆五六十年代，靠攻关搞出很多成果。关键是计划与科研结合起来，工厂生产与技术革新结合起来，围绕攻关课题把科技力量组织起来。这样，才能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

注 释

1．康永和（1915—2013），山西交城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劳动局局长。曾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世界工会联合会书记，劳动人事部顾问，全国政协常委。

2．吕正操（1905—2009），辽宁海城人。时任铁道兵政治委员。曾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3．赵东宛（1926—），河南南阳人。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曾任富拉尔基第一重机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劳动人事部部长，人事部部长。

物价必须保持基本稳定*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与北京市、商业部、物价总局等单位负责人座谈时的讲话。

一、这次调价总的是顺利的，但也引起了一些市场风波，在一些地方这个风波还不小。烟酒提价，多数群众是理解的。但也有些群众，主要是一些又吸烟又喝酒、又准备结婚的青年人反映比较强烈。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抢购粮食、白布、白糖、呢绒、火柴的情况。原来估计烟酒提价会挨一些骂，但没有想到反映这么多。对这些问题，我们绝不能小看。群众对物价是很敏感的，稍不注意，就会出问题，物价波动可能会酿成政治问题。我们的工作要紧紧跟上，对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解除人们的疑虑。宣传解释工作做得粗的，要进行补课，讲清这次调价的意义。对于谣言，不能放任不管，要采取适当方式辟谣。现在谣言很多，越传越多，有的很离奇。说什么“面粉要涨价，今后不用粮票了”，“从明年开始不发布票了”，“明年全面涨价，每人要补贴几元钱”，等等。根本没有这些事，而我们一些干部却信以为真。对那些别有用心的煽动性的谣言，要进行追查。首先要教育干部和群众不要听信谣言。至于那些违反物价纪律的案件，则要及时严肃处理，不能优柔寡断，拖而不决。

二、烟酒提价后，要采取一些严格措施把物价稳住。现在群众就怕以烟酒开路，其它跟着涨上来。有的说“联想过去，担心未来”。就是说，联想一九七九年八类副食品调价后许多商品涨价，就心有余悸，担心今后再出现这种情况。一九七九年那次调价，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对连锁反应控制不够。有些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带头，趁机捞一把，不该涨的也涨上去了，到现在群众还有意见。目前，群众的心理状态是，怕涨价风又要刮起来。这次可要汲取上次的教训，要特别谨慎，马虎不得。凡由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管理的零售价格，不经国务院批准，谁也不能提价，即使目前价格不合理也不能涨价。这要作为一条纪律定下来，零售价格无论如何要管住。至于内部价格，工商、工农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该解决的应经领导机关研究解决，但市场价格不能动。现在许多企业要求涨价，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部门，都说利润少，亏损大，至于调价以后的连锁反应，那就不考虑了。还是要强调继续贯彻去年国务院295号文件精神，切实把物价稳住，因为这是安定团结的需要，也是稳定经济、发展生产的需要。

三、对企业的提价要求应很好分析，不能一有亏损就要提价。现在，一些企

业要求提价的理由，就是企业发生亏损。而且，这种要求常常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表面看来，似乎都有一些道理。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一些提价要求是不合理的。现在，各方面统一认识至关重要。企业亏损，有客观原因，如原材料、燃料提价等，但有许多是主观原因造成的。只要检查一下企业财务，认真分析一下商品成本，就能发现许多费用不该摊到成本里。若把这些不合理的成本剔除出去，有些企业就不一定亏损，或可以少亏损，有的商品不提价也有一定利润。现在，在改善经营管理方面有许多事情可做，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从这方面下功夫，好像不提价企业就活不下去了。不应有的亏损，也要国家补贴，或通过提价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这种不合理的提价要求就不能答应。至于小商品，现在却有不少企业由于亏损不积极生产。你们提出由工商双方协商定价，对这一点我一直很担心。我的意见，不能在这个时候凑热闹。总而言之，有些小商品，宁可在一段时间少生产、不生产、脱销，也不能在价格上搞自行提价。要从多方面想办法解决小商品的生产供应问题，有些可以采取减税或补贴的办法。即使将来采取协商定价的办法，也要严格控制，分品种有步骤地进行，再不能一哄而起。

四、农副产品价格要整顿。这几年，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总的看是正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财力的可能。今后一段时间，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能再从价格上打主意了。要使农民富，应是增产致富，不能靠提价。提价只涉及国民收入的分配，并不创造社会财富。经过这一段时间，对派购逐渐认识一致，估计现在任务能够派下去了。但基数不能太低，减基数就等于变相提价，就要加重财政负担。各地自行规定的加价、补贴、利润返还等都要整顿，议价范围太宽的就要缩小。加价收购的部分，有些要控制。油菜籽、葵花子价格，万里、依林同志已经讲了，要采取适当措施控制一下。我看这件事早定早主动，不然，国家包袱越背越重。农副产品价格的调整，不能只从农民考虑，必须首先考虑国家全民的利益，要“三兼顾”，要有利于加强工农联盟。现在，确实有些人不大懂得购价动了销价难于安排的道理。购价提得过高，一是城里人吃不起，用不起；二是国家补贴不起。我们财政收入一年还不到一千亿元，要开支的方面却很多，再增加多少补贴确实很难。请依林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讲整顿农副产品价格问题，把道理和危害讲清楚，以统一全党的思想。明年上半年再开一次物价会议，研究整顿措施，下达执行。

五、蔬菜价格要坚决稳住。现在，城市群众对蔬菜最为关心，意见也最大。有个别地方，集市菜价与水果价格差不多，群众怎么吃得起？如果我们对蔬菜问题再不加注意，会脱离群众。要稳住菜价，关键是大中城市、工矿区的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对建筑用地和种菜用地统筹规划，制定计划，把蔬菜生产切实搞上来。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看，当前对蔬菜生产必须实行计划种植、计划收购，并要解决好近郊区农民的生产经营方向问题。郊区社队要以种菜为主，对近郊农村办工副业，必须采取限制的方针。要研究解决社队企业的征税问题。（依林：种菜和工副业的矛盾已存在二十多年了，现在越来越尖锐，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城市的蔬菜问题没法解决。）请段云[1]、田纪云[2]同志召集有关部门研究一

下，要同国有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竞争。前一段，商业部开了九个城市的蔬菜会议，搞了一个文件，国务院已经转发，对有些问题做了规定。为了引起各地领导同志对蔬菜问题的重视，请王磊[3]同志搞个材料，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议一议。

注 释

1．段云（1912—1997），山西蒲县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物价小组组长，国家计委顾问。

2．田纪云（1929—）山东肥城人。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任贵州省财政厅副厅长，四川省财政局局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王磊（1914—1994），山东莱州人。时任国务院财贸组组长。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商业部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系统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和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这个重要报告是在综合赵紫阳当时十几个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吸收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而形成的。报告中很多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提法，都用的是赵紫阳的原话。理解这篇文献，要和阅读本书所载的其它重要文章结合起来，同赵紫阳与报告起草小组的两次重要谈话（见本书第314页）结合起来。这个报告连同其它几篇重要文章，是赵紫阳从四川省调到国务院工作后，多次深入改革和建设第一线，同各地负责人、广大基层干部、工农群众一起座谈总结形成的。他的这次政府工作报告，还广泛吸收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最后修改定稿。从指导思想到文字表述，都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总结与创造。

各位代表：

从去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零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政府对于内政、外交各方面的工作，先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过六次报告。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经济工作。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和各位代表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就当前的经济形势，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向大会作以下报告，请予审议。

一、当前的经济形势

过去的一年，我们的经济工作是在巩固已有的成绩、克服面临的困难中前进的，是在进一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的过程中前进的。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国务院对当时的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作了进一步的全面分析，发现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一九七九年以来，国家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各种支出大大增加，尽管步子走得快了一点，但总的说是做得对的。在这同时，国家预算内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减得很不够，行政费用还继续增加，这就使各项开支的总和超过了财政收入。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连续出现很大的财政赤字，货币投放量过多，物价上涨。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

决，一九八一年还会有一百几十亿元的赤字，那么，几年来人民生活所得到的改善必将丧失，比例失调的状况将进一步加剧，国家经济生活将发生严重混乱，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难以巩固和发展。

鉴于这种情况，国务院在去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召开全体会议和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对经济工作进行了讨论。随后，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召开工作会议，在对全国形势作了符合实际的估量的基础上，作出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决策。

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今年二月，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提出关于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报告，对原定的一九八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概算进行必要的修订，以便在今年争取实现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并把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下来。人大常委会审议并批准了这个修订方案。

今年以来，各级政府坚决执行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一系列紧急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根据前十一个月的实绩，现在可以有把握地向大会报告：一九八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可以胜利完成，稳定经济的目标能够基本实现。今年进行这么大幅度的调整，又遇上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工农业生产总值不仅没有下降，而且将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以上，整个经济形势比预想的好。我国国民经济已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经济的稳定，首先表现在实现了财政和信贷的基本平衡。从去冬以来，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同心协力，加强集中统一，严格对财政金融和物价的管理，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和各项行政费用，增收节支，开辟财源，使今年的财政收支计划得以实现。财政赤字从一九七九年的一百七十亿元、一九八○年的一百二十七亿元，预计降低到今年的二十七亿元。在很短的时间内，财政收支从有很大赤字达到基本平衡，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对政府的高度信赖，依靠人民的艰苦奋斗，却比较顺利地做到了。这证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我在这里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表示感谢。

在取得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同时，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物价总指数的上涨幅度今年比去年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是稳定的。但有些商品价格确有上涨，有些地方蔬菜价格上涨得比较多。我们一定要努力增加生产，改善供应，加强物价和市场管理，严格物价纪律，坚决地、认真地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

农业的全面增产，是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尽管今年不少地区遭受到严重水旱灾害，全国农业形势依然很好。粮食总产量预计可以接近一九七九年的水平，是建国以来第二个高产年。棉花继去年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之后，又有新的突破。油料在连续三年大增产的基础上，又增长百分之十七左右。糖料产量将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以上。林业、畜牧业、渔业都取得了新的成绩。社队企业继续有所发展，社员家庭副业的发展更快。全国农村生机勃勃，广大社员喜气洋洋，农业发展方兴未艾，一切关心八亿农民命运的人们，对此都感到极大的振奋。如

果不是努力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

今年我国许多地方遭到的水旱灾害，是历史上少有的。经过当地党政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战斗，全国各地的积极支持，战胜了灾害带来的种种困难，迅速恢复了生产，群众生活得到了妥善安排，社会秩序稳定。长江上游和黄河上游都发生特大洪峰，出现严重险情，经过沿岸广大军民的英勇奋斗，终于使洪水驯服人海。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龙羊峡水电工程和刘家峡水电站都胜利地经受住了考验。成昆铁路、宝成铁路和陇海铁路宝天段遭到洪水和泥石流袭击，破坏严重，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修复。国内外对灾情深切关怀的人们，对此无不表示欣慰和敬佩。在这里，我谨代表国务院，向受灾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向参加抢险救灾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铁路员工，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轻工业生产，由于采取了着重发展日用消费品生产的方针和一系列具体措施，有了大幅度增长。今年轻纺工业的总产值预计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二。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洗衣机、电风扇等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有的增长了百分之几十，有的成倍增长。棉纱、棉布、化学纤维、食糖、纸张、卷烟等主要产品，都可以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轻纺工业产品的花色品种增多，质量继续有所提高，高中档产品显著增加，日用百货日益丰富多采。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国的市场比前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日用消费品生产连续几年的大幅度增长，对于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繁荣市场，活跃经济，保持整个工业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增加财政收入，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重工业生产，由于正在调整中，今年的产值预计比去年下降百分之五左右。这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批重工业企业停止了能源消耗很高、积压严重的长线产品的生产，腾出能源用来保证轻工业生产的需要，这是必要的、合理的；有相当一批重工业企业，过去长期主要为基本建设服务，今年由于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设备和其它生产资料的订货相应减少，以致生产下降，这在重工业内部调整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的过程中是难免的；还有一种情况，由于有些同志对于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行动迟缓，应该早转产的转晚了，造成一些重工业产品的生产不该下降的也下降了，这种倾向正在纠正。今年下半年以来，重工业在改变服务方向、压缩长线产品、增加入民生活急需的产品和出口产品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并已初步见效，重工业生产从第四季度起已经开始回升。此外，地质勘探工作取得了近年来较好的成果。铁路、水运、公路、民航和邮电部门完成计划的情况是好的，各项重要物资和旅客的运输基本上得到了保证。

基本建设要退够，是今年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投资的使用比过去合理了。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今年二月修订计划时减少为三百亿元，后来又追加了八十亿元。这八十亿元中，有三十五亿元是用于增加住宅建设投资，其余用于增加日用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增加石油和交

通的建设，以及一部分必须恢复的国外引进项目的建设等等。今年基本建设投资的重点，首先是放在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纺工业上，其次是放在能源、建材、交通运输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和城市公用事业方面所占的比重，都比过去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已经施工多年的葛洲坝水利枢纽第一期工程，加快了建设步伐，今年六月已经通航，第一台十七万千瓦机组已经试运转，并开始发电。辽阳、天津、四川三大化纤厂，已基本建成投产。原定今年全部投产的项目，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按计划实现。这种情况是多年以来没有过的。

科学研究工作，在密切结合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指导下，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无论在农业、工业、国防和其它方面，应用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推广新技术，消化引进的先进技术，步伐都已加快，效果更加显著。一九八○年全国涌现出重大科研成果二千六百多项，今年又继续增加，已经应用于生产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五十。杂交水稻、鲁棉一号等优良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在粮棉增产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今年工业部门试制的新产品和试验的新工艺有上万种，其中半数已投入生产。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广泛应用，使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三颗卫星的成功，是我国科学技术继去年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以后的又一项新成就。

对内对外贸易都有了扩大。国内市场商品货源增加，供应情况比较好，社会商品零售额今年预计将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九。为了平衡社会商品供应量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原来估计今年要动用商品库存几十亿元，结果在购、销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今年的商品库存不但没有减少，还可能增加近百亿元。城乡集体所有制商业和作为国营、集体商业补充的个体商业都发展得比较快，在增加经营网点、商品品种、服务项目、营业时间等方面弥补了国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不足，方便了人民的生活。我们同国外的经济技术交流有了新的扩展，进出口总额今年将比去年有较多的增长。合资经营、补偿贸易、来料加工、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等方面，做得比过去扎实，有了显著的进步。

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随着农业的全面增产，农民收入在前两年有较大增加的基础上，今年又有了显著的提高。收入大幅度提高的社员、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和县，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集体分配平均每人在三百元以上的大队，一九七九年有一千六百二十二个，一九八○年增加到五千五百六十九个，今年比去年又将有较多的增加。特别可喜的是，原来条件较差、生产落后的一些地区，如鲁西、豫东、苏北、淮北等地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都有大幅度提高，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生活改善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新建住宅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农村新建房屋达九亿平方米。在城镇中，今年一至九月安排了四百七十七万人就业。对中小学教师、部分医务人员和体育工作者，决定从今年十月份起提高工资级别。在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情况下，今年职工住宅建设投资仍然保持了去年的水平，全国各城镇职工住宅的竣工面积可达到八千万平方米，相应的水、电、公用交通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比去年好，交付使用的面积比去年多，城市人民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城乡人民的储蓄存款，今年一到十月增加

了九十五亿元，达到四百九十四亿元，这是广大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对我国经济发展前途充满信心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这次进一步的调整，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发展过程是健康的，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这次调整难度很大，原先估计，可能会出一些乱子，结果进行得相当顺利，大乱子没有出，小乱子也极少，并且迅速得到了解决。经过调整，基本上达到了稳定经济全局的要求，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提出，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根本转折。

从一九七九年起，我们就开始调整农村政策，保障生产队的自主权。在近三年的时间内，我国农村广泛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这是社会主义农业在我国具体情况下新的管理形式和分配形式。我们紧紧抓住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和发展多种经营这两个重要环节，同时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决定每年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这对于调整作物布局，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对于农村的休养生息，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工业方面执行八字方针的情况和农业稍有不同。在工业中是以调整内部比例关系为主，辅之以必要的改革。在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方面，去年底作出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的决策之后，更好地落实了在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银行贷款、挖革改、基本建设、利用外汇和引进技术、交通运输六个方面优先保证轻工业发展的措施。今年以来，又进一步确定从重点工业城市抓起，以生产名牌优质产品的工厂为中心，组织专业协作，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进行大批量生产，并且组织有条件的重工业企业和军工企业生产人民生活需要的耐用消费品，使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继续上升。同时，重工业为轻工业、农业服务的部分扩大了，这就促使工业内部的结构开始趋于合理。与此同时，三年来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些初步的改革，使企业增加了活力，对于克服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现象，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起了很好的作用。

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国家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轻部分地区的农村税收负担，共计减少财政收入五百二十亿元，相应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这三年城镇共安排两千多万人就业，加上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国家增加财政开支和减少财政收入共四百零五亿元，相应地增加了职工的收入。这两部分共计减收增支九百二十五亿元，比原来设想的六百亿元多出百分之五十四。此外，国家用于农用柴油、农业用电、农机、化肥、民用煤，以及外贸进口的粮食、棉花、糖等的价格补贴共二百三十四亿元。正是因为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解决一些多年遗留下来的困难，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使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上升到今年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积累所占的比重，相应地由百分之三十六点五降

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应该说，过去那种积累和消费的L喇严重失调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一年来的经济调整，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也要看到，国民经济中的潜在危险还没有完全消除。今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主要是在紧缩支出的条件下实现的，是不巩固的。要继续保持财政和信贷的基本平衡，做到消费品生产的增长同社会购买力的增长相适应，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并在此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还需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和作出艰苦的努力。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一个全局性的、关系到国家长远利益的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自觉性和严肃性，就仍然有可能重犯过去多次犯过的错误。

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曾经提出用三年的时间，做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对于这一方针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就调整来说，既要调整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又要对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组织结构等进行调整，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因而经济调整的内容比原来设想的要广泛得多。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更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国务院认为，有必要从今年起再用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样才能真正站稳脚跟，打好基础，更好地前进。

各位代表：

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确是好的。今年的经济情况是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好。与去年同期相比，工业总产值第一季度下降百分之零点二，第二季度增长百分之一点七，第三季度增长百分之三，十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点六。明年和今后的经济发展，肯定会比今年更好。

一年来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经济战线上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作了艰苦的努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教育、科学、文化、新闻、出版、卫生、政法、外交等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体育战线今年以来捷报频传，最近女子排球队又第一次夺得了世界冠军，这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全国各族人民是一个鼓舞。我谨代表国务院，向上述各条战线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军事训练，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积极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守卫在边防的部队和民兵，保卫扣林山、法卡山的英雄们，时刻警惕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挑衅和入侵，保卫着我国的神圣边疆。全国公安干警、司法人员在维护社会安全、打击犯罪分子、改造教育失足者的工作中，做出了出色的成就。我谨代表国务院，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

我们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调整，不仅要努力解决大量财政赤字的问题，控制市场物价的上涨，消除潜在着的危险，迅速达到经济全局的稳定，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求得国民经济的稳步前进、健康发展。为此目的，就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曲折，但是总的来说，成绩是巨大的。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八点一倍，国民收入增长四点二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二十六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提高一倍。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同时，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我国三十二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比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低得多，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同人民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

我国经济建设效益不高，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我国经济文化解放前十分落后，解放后又长期受到国外敌对势力的威胁甚至侵略，因而需要集中财力物力，迅速发展重工业，奠定工业化的基础，增强国防力量。我国长期处于被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封锁的状态，因而在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我国人口既多，增长又快，生产发展所增加的社会财富，相当大的部分要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很不利于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除了这类客观原因以外，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着“左”的错误，很多方面没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再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不能不严重地妨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妨碍经济建设的发展，妨碍经济效益的提高。过去“左”的指导思想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直到现在，不少反映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不仅低于经济发达的国家，而且低于我国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水平。当前，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组织结构、工业布局和经济布局都不很合理，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也存在着许多弊病，这些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最大障碍。今后，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使我国经济更好地持续发展。

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下列十条方针。这些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建国三十二年来的经验积累，特别是近三年来的经验积累。

一、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是保证国民经济全面增长的关键。今后国家对农业的投资虽将逐步增加，但不可能很多。发展农业生产，进行农村建设，仍然主要靠政策，靠科学。

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早已建立并且巩固起来。广大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一方面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另一方面要求摆脱过去管理体制上的集中过多、生产上的瞎指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各种不合理负担。近三年来，我们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对农村生产关系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多年来创造的物质技术条件得到更好的利用，农业生产力得到又一次解放。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总结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和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坚持农业集体经济实行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努力改进和完善各种类型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农村各项经济政策。

发展农村经济，首先要合理利用现有的耕地，同时一定要把大片的山地和丘陵，广阔的草原，大小江河和星罗棋布的湖泊塘堰，以及海涂海域，都逐步地、合理地、充分地利用起来。过去发展农业，常常把视野局限于现有的耕地和粮食种植业，以致路子越走越窄。今后要强调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动员三亿多农村劳动力，广开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我们的方针是，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在保证粮食生产稳步发展的前提下，使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各项经济作物和其它农副产品得到普遍增长。要巩固和发展商品粮生产基地，继续办好国营农场和农垦事业，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在积极发展中要注意合理布局。城市郊区的农民要以种菜为主，蔬菜的种植面积要切实保证。要大力保护和合理使用现有草原，积极加强草原建设，努力提高载畜量，同时在广大农村发展家畜、家禽等各种养殖业，使我国畜牧业有个大的发展。总之，在祖国的大地上，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处处充满无限生机，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依靠群众，生聚有方，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就能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个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应该是我们的国策。要积极开展农业自然资源的调查，分别制订全国的和省、县的农业区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社、队的土地利用规划，努力实行科学种田。现有耕地中，如黄、淮、海地区的盐碱地，南方的红壤土等，都应该主要依靠当地人民群众的努力，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运用二十多年来积累的科研成果，逐步进行综合治理。基本建设即使非占用耕地不可，用地也要严加限制；农村建房要有规划，绝不能乱占滥用耕地。

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情况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过去我们对这一点重视得很不够。今后要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宣传，使广大群众和干部了解开发、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节约用水的重要性。我国水资源分布很不均衡，利用得也不充分、不合理。现在有些地方水源十分缺乏，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必须同整个国土的整治结合起来，对全国的水资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勘察，作出合

理利用的规划，逐步做到统一管理，大力提倡节约用水，防止水质污染。现有的水利工程必须管好用好，充分发挥效益。

我国森林面积小，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生态平衡的状况越来越差。这个问题，如果再不加以有效的解决，就将犯下影响子孙后代的历史性错误。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现在必须立即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严禁滥伐，防止森林火灾和病虫害，发动全国人民植树造林。当前植树造林的重点，应该放在广大平原和丘陵地区。燃料紧张的农村，首先着力营造薪炭林。在农村和城市郊区，在沿海和边疆，凡是有条件营造成片林木和果树的地方，都要以生产队、生产大队或公社为单位，组织专业造林队，坚持长年造林。国家林业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保护和扩展现有林业基地，认真抓好林地更新，发展综合利用，同时在黄河、长江和其它江河的上游大力造林种草，搞好水土保持。国务院已经拟定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提请大会审定后公布执行。

在发展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的整个农业经济的同时，还要考虑和安排整个农村的建设。农村的交通运输、小水电、沼气、建材、建筑、农副产品加工，村镇的公共建设，农村的商业服务业、银行信贷、文化教育和体育卫生等等，都可以而且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发展。我国农村拥有大量劳动力，根本不用愁有事无人做。问题在于，一是人们乐意去做，有积极性，这就要有正确的政策；二是做得好，收益大，这就要采取适用的科学技术。各门各类、各行各业、每件事情，都要制定适合各自情况的具体政策，采用合乎需要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要把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很好地结合起来，合理地使用几亿农民的劳动投资，进行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经济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富裕繁荣。

我国农业要走出一条投资较少、经济效益较高的路子，必须把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放在重要的位置，把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向自然界索取我们所需要的更多农产品。建国以来，在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良种的培育和推广，得到的经济效益往往是全部研究经费的几十倍、几百倍甚至更多，充分显示了科学研究这种智力投资的巨大威力。现在，我们希望在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改进耕作制度、搞好作物布局、改变化肥结构、实行合理施肥、生产高效低残毒农药、有选择地推广适用的农业机械等方面，有关部门能进一步集中力量，在较短时间内作出更加显著的成绩。

发展农业靠政策、靠科学。政策和科学还是要靠农村干部和农村科技人员来推行的。随着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干部、科技人员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干群关系一般说来是更加亲密了。对于那些光荣地艰苦奋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农村干部和科技人员，全国人民是尊敬和感谢他们的。我们要从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对他们切实地加以关心，并采取具体措施，鼓励他们安心地积极地做好工作。

二、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农

村形势越来越好，农业向轻工业提供的原料愈来愈多，城乡人民的货币收入年年增加，这对于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消费品工业的更快发展，就会通过交换，进一步促进农业、重工业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更好地适应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同时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稳定市场物价，安排更多的人就业，从而有助于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巩固。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还将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有利于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的妥善解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把着重发展消费品工业放到重要地位。为此，能源和物资的供应，贷款和投资的分配，科学技术力量的分配和科研课题的选定，以及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引进，都应该注意保证消费品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消费品工业生产的发展具有广阔的领域和很大的潜力。目前，城乡人民迫切需要的是耐用消费品、纺织品、食品（包括饮料）、民用建筑材料、日用化工产品、文化保健用品、旅游和其它服务业所需产品等等。对这些行业的发展，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规划。要充分利用我国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的条件，多发展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工业。要兼顾农村和城市，内销和出口，以及各少数民族的特殊需要，组织供产销的平衡，加强计划性，加强市场调查和预测，克服盲目性。在增产社会需要的高中档商品的同时，切不可忽视人民群众需要的利润不高的大路货、小商品的生产。要强调提高质量，做到花色新颖、品种多样、质优价廉、适销对路。决不能单纯追求数量，粗制滥造。上海、天津等老工业基地，进一步发展消费品工业有很多优势和潜力，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并且要努力同其它城市和地区协作，从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方面，把其它城市和地区的消费品生产带动起来。各地要保证完成各种消费品工业原料的收购和外调任务。原料的分配，要首先保证老工业基地的需要。

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加快发展消费品工业生产，不仅不会妨碍而且会促进重工业的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增长，对重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越是协调，交换和周转越快，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会更加迅速。保持两大部类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的长远方针。现在的问题是，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一些重工业过多地为新建项目服务的偏向。今后，重工业的发展，除了适当生产一些耐用消费品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调整服务方向，扩大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提高适应能力，更好地为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服务，为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服务，为出口服务，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重工业的出路所在。重工业部门调整服务方向和内部结构的工作做得越好，抓得越紧，就越主动。

重工业的发展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鉴于重工业生产一般周期较长，准备若干年后建设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所需要的设备，现在就要着手设计、生产。发展重工业要十分重视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如对能源和矿产的勘察及开发设计，对重要新产品的科学研究、技术试验、工艺设计，以及人才培养、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等等，都必须及时做好。以上这些工作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必不可少的，重工业部门的广大职工要为此作出努力。

三、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能源、交通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今后能不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能不能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交通问题能否得到恰当的解决。

解决能源问题的方针，是开发和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我国目前能源的产量仅次于美国、苏联、沙特阿拉伯，但是单位能源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却比许多国家低得多，比我国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最高水平也低得多，能源浪费现象十分惊人，说明节约的潜力很大。这几年节约和少用的能源，主要是通过调整轻重工业结构得来的。通过改进经营管理和技术改造来节约能源，进展还很小。必须在这些方面提出严格的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格规定各类产品的能源消耗定额，关掉一批严重浪费能源、产品不符合社会需要的工厂，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落后的耗能高的设备和生产工艺进行技术改造，以保证节油、节煤、节电等各项节约任务的完成。首先争取单位能源所创造的国民收入超过我国曾经达到过的最高水平，然后逐步接近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的水平。

世界上年产石油一亿吨以上的国家不到十个，我国是其中的一个。一亿多吨石油是我国一笔很大的财富。合理利用这笔财富，对于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具有重大的作用。现在全国作为燃料烧掉的石油有四千万吨，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应该烧的，这是很大的浪费。国务院已经决定，在今后十年内采取必要措施，逐步用烧煤来代替烧油，把替出的石油用于国内加工或出口，由此而增加的收入，再用于能源和交通的建设。目前我国原油的加工深度很低，许多可以作为化工原料的成份没有裂解分离出来，没有合理利用。一亿吨石油所创造的价值同工业发达国家比较，相差很远，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浪费。要大力改组、改造现有的炼油、石油化工企业，提高原油加工的深度，发展石油化工综合利用。这不但可以增加出口，而且可以促进我国化纤、塑料、橡胶等化工合成产品的发展，增加市场日用消费品的供应。总之，用好一亿吨石油，是一件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的大事，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通力合作，务必完成。

能源的开发和生产，要兼顾当前的需要和长远的发展。我国煤的储量极为丰富。煤的开发，近期内要以改造、扩建现有的矿井为主，新建矿井应以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见效快的中小型矿井为主，大型矿井也要分期建设，分期投产，以求早出煤，多出煤。要把开发山西的煤炭作为重点来抓，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内蒙古、贵州等地煤炭的开发也要做出合理安排。电的生产和建设，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火电和水电，逐步把重点放在水电上，有水力资源的农村要发展小水电，以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发电成本。石油的生产和建设，要抓好大庆等现有油田的技术改造和挖潜革新，近几年把总产量稳定在一亿吨的水平上，还要尽可能地集中一些资金，加强新油田的开发。要大力进行石油、天然气资源的普查和勘探，增加后备储量，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

我国海上石油的勘探情况，是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很关心的。我在这

里高兴地向大家报告：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新进展，南海、黄海部分海域已完成地震普查工作，渤海、北部湾已经有一批探井出油，前景是良好的。我国政府确定，根据互利原则，近期内招标，同外商合作，加紧勘探，尽快投入开发和建设。

能源和交通的建设要结合起来进行，交通还应该先走一步。因为有了交通，开采出来的煤炭才能够及时运出。若干年内中央的建设投资，应该首先考虑交通包括港口建设的需要。目前运输能力不足的铁路区段和吞吐能力不足的港口，必须首先加强技术改造。交通和水利部门要通力合作整治内河航运，大力提高航运能力。同时，要充分利用沿海的海运能力。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加强公路建设，组织好各种运输工具来加强短途运输。要加强邮电通讯的建设。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交通运输适应整个生产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四、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对现有工交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既能改变重工业任务不足的状况，使当前的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速度，并且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又能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技术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今后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创造条件，储备力量，这是使我国经济走向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过去，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建设新厂，这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已经有了几十万个工业交通企业，今后扩大再生产必须主要靠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许多企业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效说明，这样做比新建企业投资少，见效快，经济效益高。

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要根据我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由于我国人力资源丰富而又资金不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统统要求最新技术，片面追求自动化。进行技术改造要紧紧围绕提高经济效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降低消耗，降低生产成本；二、改革产品结构，使产品升级换代，提高性能和质量，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三、合理地利用资源，提高综合利用水平。

进行技术改造要有总体规划和各行业的具体要求，首先抓好工业发达的中心城市和一批骨干企业，分批分期地进行，决不能不作研究，不讲效果，一哄而起，各行其是。各行各业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正确的技术装备政策，拟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全面规划，有准备地进行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的改造和革新。机械工业要及早进行改造和改组，努力设计和制造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适应各行各业技术改造的需要。技术改造规划，要列入国家计划。改造的项目，要一个一个地安排落实。

我国一部分重点企业，设备陈旧，效率很低，耗能很高，应该有计划地代之以效能更高的设备。但是，这项工作要量力而行，在目前条件下，绝大多数企业主要是增添或更新个别的关键设备，改进生产工艺和运行流程，加强新产品的设计和试制。应该发动广大职工群众，提合理化建议，实现生产技术的革新。

为了有效地推进技术改造，今后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要把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资金统一安排使用。应该在较短时间内制定出符合我国情况，有利经济发

展的设备更新政策。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率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情况逐步提高，以利于合理地缩短企业设备更新的周期。今后凡是企业的折旧基金、利润留成部分中的生产发展基金，以及上级部门拨给的有关资金，都应该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这些资金的分配和使用，都要纳入财政计划和信贷计划，不得用于新建项目和其它支出。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适当利用外资，把技术改造同技术引进结合起来。

五、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为了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必须分批地有计划地对现有企业进行全面整顿。

企业的全面整顿，当前要特别注意做好以下四项工作：一是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搞好全面计划管理、质量管理和经济核算工作。二是整顿劳动组织，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有计划地进行全员培训，坚决克服人浮于事、工作散漫的现象。三是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劳动好的应该给予表扬和奖励，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而又屡教不改的，企业有权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经济的或行政的惩处，直到辞退和开除。四是整顿财政纪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工作。违反财政纪律，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截留上交利润，偷漏税款的，对有关人员和领导人员要追究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围绕以上工作，要着重做好整顿领导班子的工作，克服某些领导班子存在的涣散、软弱、臃肿、老化等现象，同时把中青年干部和技术业务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要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加强以厂长为首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指挥系统。

在企业整顿中，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和完善经济责任制，首先要明确企业对国家、职工对企业承担的经济责任，同时赋予企业一定的经济权限，给企业和职工应有的经济利益，使责、权、利三者结合起来，发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健全厂内经济核算制度，促进生产的发展。目前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之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十分严重，实行经济责任制就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使企业和职工都有办好企业、挖掘潜力的内在动力。这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重要环节。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推行经济责任制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实践中稳步前进，努力创造出适合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特点的责任制形式，不要一哄而起，不要一刀切。在推行责任制的过程中，必须有平均先进定额，产品质量只许提高不能降低，成本只许降低不能提高，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必须加快，产品必须适销对路，不准违反国家纪律擅自提价。必须切实加强对企业的监督，要制定财务、工资、奖金、福利等各种规章条例和实施办法。增收部分的分配，要坚持首先是国家多得，其次是企业多留的原则，企业利润留成的增长幅度不能超过生产或利润的增长幅度。必须坚决制止各种通过歪门邪道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要结合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企业和职工真正认识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从而把他们的积极性真正引导到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正确轨道上来。

企业的整顿工作要点面结合，有步骤地进行，准备在两三年内，分批完成。

第一批先选择对国民经济有特别重大意义的近三百个企业，用半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整顿完毕，然后总结经验，再一批一批地整顿下去。整顿工作原则上应当在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国务院各工业部门和各省市区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以及各级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应该带领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协助搞好整顿。各级都要做好规划，组织实施，加强指导，使企业的整顿工作真正取得实效，切忌走过场，流于形式。在整顿企业的同时，要整顿和加强主管部门的工作。

企业的整顿工作，要同企业的调整和改组结合起来进行。首先要对那些产品产量供过于求而质量很差、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很高、长期亏损、污染严重的企业，分别不同情况，坚决地实行关、停、并、转，使国家有限的能源和原材料，用于那些产品质量好、消耗低、经济效益高的企业。全国地县小铁厂由四百六十六个减少到现在的二百七十六个，保留的小铁厂加强了管理，结果炼铁焦比由九百五十公斤降到七百零五公斤，生铁成本由三百零三元降到二百四十三元，亏损由六亿三千万元减少到一亿元，可见搞好关停并转的经济意义是很大的。国务院已经责成有关部门制定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设厂标准，规定必须达到的生产批量、产品质量和物资消耗的最低要求，凡是限期内达不到这些要求的，必须停产整顿或者关闭。在能源短缺的华东、东北地区，要严格限制耗能多的产品的生产，尽可能把这类产品安排到能源比较富裕的地区去生产，以利于能源供需的地区平衡。各地区、各部门要识大体，顾大局，树立全局观念，做到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在企业的关、停、并、转工作中切实保护好国家财产，妥善安排好停产企业职工的学习、培训和劳动。利用停产时间和生产任务不饱满的时间，抓紧对职工进行政治的和技术的培训，这是一种花费很小收益很大的智力开发。现在，许多生产任务紧张的企业的职工，正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学习；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特别是需要关、停的企业的职工，更要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进行学习。这种学习，实际上是增加我们潜在的生产能力，为未来的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

六、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当前，我国在经济建设中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财政困难，资金不足。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采取正确的政策，调动全体职工、所有企业和各个地方的积极性，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提高经济效益。这也就是真正的生财之道。目前在我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中，增收节支的潜力是很大的。按照现在的生产规模，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只要降低百分之一，一年就可以增加收入二十亿元。全国流动资金大大超过了应该拥有的数量，如果能够加速周转，减少百分之二三的占用量，就可以节省出七十亿到一百亿元的资金。现在许多大中型项目的建设周期很长，只要努力加以缩短，就可以大大减少施工队伍的工资支出，早投产就可以早为国家提供利润和税收。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就一定能够把客观存在的增收节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样，我们就不仅能够坚持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而且可以多筹集一些资金来发展生产建设事业。

千方百计地增产增收，增加社会财富，这是一切经济部门都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解决财政问题的基础。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多了，国家的财源就充裕了。财政部门要尽力帮助经济部门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同时充分发挥监督的职能，保证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防止浪费。经济部门要密切协同财政部门，做好聚财、用财的工作。各级政府不仅要把生产单位应该上交的税利收上来，而且应该想更多的办法，用更多的力量，扶助生产，发展生产，以增加更多的收入。决不能因为财政有困难，就取消既有利于调动地方、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全局的改革。如果那样做，就会堵塞增产增收的路子，反而加重财政困难。

在各方面收入增加的基础上，要从财政、税收等方面采取适当的办法，保证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要加强税收和海关工作，恢复一些税收，开征一些新税，实行烟酒专卖，堵塞“跑、冒、滴、漏”，把一切应该收上来的钱都收上来，把一切应该集中的资金都集中起来。在这同时，还要通过银行的信贷业务，有计划地运用一部分地方、企业以及个人的存款作为建设资金。这样，既可以把相当部分闲散的资金和消费基金转化为建设基金，又可以适当缓和购买力的增长和商品供应之间的矛盾，减轻市场的压力。这对于存款者和国家都是有利的。许多基本建设项目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以后，效果很好，应当积极扩大这种办法的实行范围。另外，还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开展保险、信托等业务来筹集资金。筹款、集资也要防止失去控制，防止信用膨胀。必须加强和发挥银行聚集、调动及统一管理信贷资金的作用。

随着经济的活跃和地方、企业财政权力的扩大，国家预算外的资金数量将逐步增多，目前约为国家预算收入的一半。把这部分资金同国家预算内的资金结合起来，统筹安排，纳入计划，合理使用，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很多事情可以用预算外的资金去办，以减轻国家的负担。今后，中央财政的投资范围应该逐步收缩，主要用于能源、交通、新兴工业等。至于一些投资周期短、利润比较大的项目，城市建设的一些项目尽可能用地方和企业的财力去兴办。同时，必须加强财政监督，严明财经纪律。对企业、部门和地方的合法利益要切实保护，对其非法所得要坚决制止。

总之，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是有的，增产节支的潜力是很大的，事在人为。例如，抚顺市是以重工业为主体的。今年由于调整，许多企业任务严重不足，生产下降。照过去的观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利润降低、收入减少，似乎是“天公地道”的。然而抚顺市财政经济部门的同志不这样看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发动群众挖掘潜力，制订了减产不减收的三十条措施，取得了成效。全国还有相当一批企业也做到了增产增收，节支增收。所有财政经济部门的同志都要像抚顺的同志一样针对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实际出发，探索解决财政问题的新办法。全国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都应当很好地研究生财之道、聚财之道和用财之道。如果仍然按照老框框、老办法去办，就好像“山重水复”；如果根据新情况，按照新办法去办，就会“柳暗花明”。

七、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我国被封锁的时代已经

过去了，目前已同世界上一百七十四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往来，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交换的扩大，而且已经从国内交换扩展到国际交换。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扩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以及发展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所有这些都是以自己的长处，通过国际间平等互利的交换，补自己的短处，这不但不会妨碍而且只会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在经济工作中，我们应该彻底抛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点。一切闭关自守、墨守陈规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一切单纯依赖外力、迷信外国的思想和行为也都是错误的。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的经验还不够，必须认真学习。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一是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二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

扩展对外贸易，增加出口是关键。应该放开手脚进入国际市场，争取出口的增长率经常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要根据我国的情况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发挥我国资源丰富的优势，增加出口矿产品和农副土特产品；发挥我国传统技艺精湛的优势，发展工艺美术品和传统的轻纺工业品的出口；发挥我国劳动力众多的优势，发展进料加工；发挥我国现有工业基础的作用，发展各种机电产品和多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加工产品的出口。某些产品，可以采取以进养出的办法来扩大出口。把产品拿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接受检验，将有力地促进我们改善经营管理，增加品种，改进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从外国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几年来有成功的方面，也有失误的事例，应该加以总结。既要反对束手束脚，拖延不决，也要反对轻信轻诺，草率从事。今后主要应该引进技术和进口自己不能制造的单机、关键设备，不要都搞成套设备进口，不要重复引进，不要只进口设备不引进技术，不要在引进后不加以消化和推广。

尽量多利用一些外资以加快我国经济建设，是完全必要的，首先要利用那些低息的、条件比较优惠的贷款。在工作中，使用外资一定要细致地、谨慎地进行可行性研究，讲究经济效益，不能仓促行事。能在多大规模上利用外资，归根到底，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国内的工作，主要是偿还能力、配套能力和消化先进技术的能力。近期内可以利用的长期低息贷款，主要应该用在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对于那些生产国内外市场急需产品的中小企业，在使用外资、引进技术上应该更加放手一些。这些企业数量很多，它们大都只要引进一些适用的关键技术和设备，所需资金不多，就能很快大幅度地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很快就能偿还。这种利用外资的方式，对于我国发展生产是很有利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我们根据平等互利原则，欢迎外国人来投资，联合开矿、办厂、办其它事业，但是外国投资者必须尊重我国的主权，遵守我国的法律、政策、法令。我国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了经济

特区，这方面的经验应该及时总结。特区在采用外国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方面，在利用外资方面，要放手去做。我们的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特区工作中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保持有关部门职工和当地居民的社会主义的精神道德风貌。

为了适应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展，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的作用。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福州、厦门等城市，应该在这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我们还要及早动手，采取各种方式，培养一大批熟悉国际市场和国外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的对外经济贸易专家、技术干部和推销人员，组织好国际商情网和包括销售后服务的推销网。对现有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体制，要继续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既坚持国家的统筹安排和统一对外，又能调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性。

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加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国际的合作。各国政治、经济界有远见的人士，也认识到中国这个市场的巨大潜力及其对今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深远意义。我们应当审时度势，积极做好工作，不断扩大和加强同一切愿意与我们在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技术交往的人士的联系和合作。

八、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国过去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在管理方面是权力过分集中、政企不分，在分配方面是吃大锅饭、平均主义。近年来，我们按照服从调整、促进调整、配合调整的要求，在农业、工业、财贸等领域，在所有制形式、计划管理形式、经营管理形式、分配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搞活经济，促进生产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这些改革还是局部的、探索性的，工作中也出现了某些前后不衔接、相互不配套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总结前一段改革的经验，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反复的科学论证，尽快拟定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逐步实施。

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经济的必要补充。在我国，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在制定计划时也要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对于带全局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要加强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不同企业的经济活动，要给以不同程度的决策权，同时扩大职工管理企业的民主权利；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做法，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法规来管理经济。根据上述改革的基本方向，我们对改革的轮廓有如下一些设想：逐步实行政企分工，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单位；改变那种由地区和部门互相分割、壁垒森严的现象，按照专业化协作的要求和生产的需要，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把企业合理组织起来，同时建立为企业服务的各种行业组织；改变封闭的、少渠道、多环节的商品流通体系，建立多渠道、少环节、开放的商品流通市场；以大中城市为

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与这些改革相配合，需要在计划、统计、财政、税收、价格、银行、商业、物资、外贸、劳动工资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是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陈云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说过："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陈云同志这个意见对当前的改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设想，根据企业在国计民生中所占地位的不同，根据企业所有制的不同，根据企业产品的重要性和种类、规格的多少不同，可以分别实行不同的管理方法。大体上有四种类型：一是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的。这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骨干企业或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它们的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大部分，但品种不是很多。二是按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生产的，这是品种繁多的小商品，分散在许多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中生产，不可能也不便于统一计划管理，它们的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小部分。在这两大类之间，还有两类产品和企业。一类是大部分按国家计划生产，小部分由企业自行组织生产，这一类基本上接近前一大类，但又有所不同；另一类是大部分由企业按照市场变化组织生产，小部分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这一类基本上接近后一大类，但也有所不同。这样一种管理体制，既不同于过去我们那种统得过死的体制，更不同于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它可以把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提高经济效益，按照社会需要组织和发展生产。

要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更好地发挥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的作用，控制长线产品，发展短线产品，促进工业改组，调节企业利润水平，鞭策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此外，还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工作，发挥工商行政、统计、财政、银行等机构对经济的指导和监督作用，使企业经济活动符合整个经济发展的要求。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国民经济从管理制度到管理方法的大变动，是各方面经济权益的大调整，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在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因此态度要积极，步骤要稳妥。每项改革都要认真调查研究，进行可行性分析，制定周密的方案，经过试点，逐步推广。要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前进，稳步地完成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

九、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我们正在从事现代化建设，需要培养大量的各类各级专门人才和大批熟练的劳动者。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带根本性的建设。我们的教育、科学的发展还是很落后的，教育、科学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之间的比例也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四个现代化就无法实现。

我们教育的基本方针是明确的，这就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和又红又专的人才，坚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现在的任务是要根据

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情况来进一步贯彻执行这个方针。高等教育在数量上要积极稳步地发展，特别要注重质量上的提高。它们的专业设置、领导体制、教学方法和内容等方面，都要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除正规大学外，要大力发展业余、电视、函授大学，鼓励自学成材。在中学教育方面，要逐步改变普通高中过多、职业中学太少的状况，积极发展中等专业学校，大量培养技术工人和中级专门人才，以利于劳动就业和提高职工队伍的文化技术与政治思想水平。同时要注意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关心他们学业上的成长，不能片面追求升学率。最近，叶圣陶[1]代表发表了题为《我呼吁》的文章，批评了当前中学和一部分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词意恳切，表达了学生、教师、家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希望有关各方面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切实加以改正。小学教育也要切实解决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使学生在身体、知识和品德方面得到全面的健康的成长。学校、家庭、社会要互相配合，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学校都要加强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学，这是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要加强法制教育，设置相应的课程。此外还要培训大批合格的幼儿教师，使更多的学龄前儿童能够进入幼儿园，并且能够受到适应他们身心特点的教育。

我们必须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切实加强对全体职工的教育。这里要专门讲一下农民教育的问题。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非常繁重的任务。现在是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了。各级政府要努力把农民教育办好。农民夜校、冬学等形式历来为农民群众所欢迎，应该广泛采用。但不能用它们来代替正规的中学和小学。现在有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农民认识到学习科学文化的重要，有学习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有些农民又想让他们的子女从事辅助劳动，舍不得送他们去上学。各级政府要针对这种情况，对农民进行教育，说服他们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做到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也是明确的。科学技术门类很多，应当为各个方面服务，基础研究决不能削弱，但整个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点应当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为解决国民经济中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关键问题服务。现在的任务是要把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使它真正成为强大的生产力，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

为了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当前要抓好已有的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近年来我们积累了大批科研成果，同时也引进了不少先进技术。这些都是已经到手的财富，如能抓紧消化和推广，将会产生很大的效益。要组织好科学技术由实验室向生产转移，单纯军用向军民兼用转移，沿海向内地转移，国外向国内转移。去年以来，不少科研、设计部门同生产部门组成各种形式的联合体，采用了一些新形式和新方法，如合同制、有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农业技术联产责任制、农业技术咨询合同制等，使科研、设计部门能够直接面向生产，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使科学的普及和技术的推广有了内在的动力。这些做法，

对于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很有利的。

我国的科学技术总的来说还很落后，但也并不是什么都落后。就某些领域来说，我们在科研力量、实验手段和科研成果等方面，都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不应低估我们自己的力量。为了适应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现在有必要向全国科学技术领导部门、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人员，提出一项任务：组织起来，加强协作，进行科学技术攻关。我们必须经过有关部门和专家反复研究和论证，选择一批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如培育优良品种、改良土壤、水土保持、植物保护、农药更新等方面的农业增产技术，食品的储藏、保鲜和加工技术，纺织品的后整理技术，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技术，煤炭和石油综合利用技术，有色金属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技术，以及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带关键性的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的研究等，集中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进行攻关。这是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希望大家予以足够的重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能够攻克较多难关的时候了。我们应当相信，我国的科学技术人员是有决心有能力攻克这些难关的。

十、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持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我们进行经济建设，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我们过去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片面强调基本建设，忽视人民生活。在基本建设中，又片面强调扩大重工业的建设规模，忽视消费品工业的建设，忽视住宅和城市其它公用设施的建设。其结果，经济效益很差，人民生活不能得到应有的改善。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进一步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坚决纠正这种偏向，为改善人民的生活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城乡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今后，国家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调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调整工资、奖金中某些不合理部分，并且扩大职工住宅、城市公用设施、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建设。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处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时，首先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这是今后必须坚持的原则。

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只能逐步发展，人民生活也只能逐步有所改善，改善的步子不可能一下子迈得很快。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不能高于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居民购买力增加的幅度要同社会消费品供应增长的幅度相适应，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和比重。所有这些，都是客观经济规律。如果违背这些规律，只顾当前生活，不顾生产和建设，在改善生活方面要求过高过急，必然会损害人民和国家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目前存在的滥发奖金的现象必须坚决制止，损公利私、损大公利小公的违法行为必须追究责任。有些企业和单位的领导干部，迎合一部分不顾大局的人们的要求，用各种办法损害国家利益，这是绝

对不能允许的。

为了保证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可能：或者是严格地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国家建设逐年扩大；或者是控制不严，措施不力，听任人口继续大量增长，从而既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也不能很好地进行经济、文化、国防的建设。二者必居其一。厉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农村，农村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以后，原有的一些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部分地区出现了出生率回升的趋势。这种情况不能放任自流。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做好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并且不断加强计划生育的科学研究，改进技术措施。现在许多地区已经实行的奖励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限制两胎和多胎的办法，应该继续贯彻执行。同时，要坚决反对和防止违法乱纪的行为。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这就是我们的人口政策。我们要求全国上下为着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前途，为实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的目标，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各位代表：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以上讲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原则上都适用于各少数民族地区，在贯彻执行中又应该从本地区的特点出发，同本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全国解放以来，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牧业、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少数民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去年，我们特别重申了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允许各民族自治地方采取适合各自经济条件和民族特点的具体政策，这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起了良好的作用，必须继续坚持。国家要在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等方面，给少数民族地区以必要的支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提高文化，改善生活。我们要在各族人民和干部中认真地、反复地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互助，坚持民族平等，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这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方针，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

国务院提出的以上十项经济建设方针，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应该说明的是，这些方针之所以到今天才能够比较系统地、具体地提出，而不能提得更早些，是因为过去我们的实践还不够，国民经济的现实发展还没有把各种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暴露得现在这样充分，以致人们不可能从中得到应有的认识，做出应有的判断和结论。不久以前，中共中央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才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总结过去经济建设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重新衡量利弊得失，提出上述的方针政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分析和明确区别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

晚年错误，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贯穿毛泽东思想全部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成为我们研究我国经济问题的更加锐利的武器。各位代表可以看到，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其中的根本精神、根本原则，是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的。这十条方针经过大会审议、修改、通过后，还要在各方面的实践中，反复接受考验，不断补充修正，使它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完善起来。

三、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当前，国务院在努力做好各项经济工作的同时，正在继续抓紧编制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在指导思想上和具体安排上都要有一个大的转变，以充分体现对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要求，走出一条发展国民经济的新路子，体现上面讲过的十条方针及其提高经济效益的中心思想。这个计划从去年就已经开始研究基本轮廓和主要指标，但是因为忙于进一步调整经济，也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一些，至今还没有编制完成。计划草案制定以后，国务院将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现在我向大会报告的，是正在拟定的方案的一些要点。

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要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六五”期间，要求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等或接近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同时要求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继续合理地降低积累基金所占的比重，适当提高消费基金所占的比重，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六五”期间，要把主要的力量用于调整经济结构，整顿现有企业，对重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这样，就可以积蓄力量，为在“七五”期间进一步对现有工业交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打下较好的基础。

我们要用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调整我们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组织结构，使之逐步合理化，同时对各种经济管理体制逐步进行全面的改革。由于这个期间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任务十分繁重，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还在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六五”期间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很快。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一定的增长速度。我们要争取的速度，必须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扎扎实实的速度。也就是说，是经济效益比过去好得多，又能够为今后的发展积蓄力量、打好基础的速度。

只要我们在这个期间能够打好基础，消除经济中现存的各种弊端，比例关系协调了，各方面的关系理顺了，就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后劲”就会越来越大。“七五”的发展速度有希望比“六五”高，再后十年的发展速度有希望更高一些。这就是说，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我们将很有可能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在这个振兴时期来到的时候，我国经济将有相当可观的发展速度和实际效益。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有较大的提高。我国教育、科学、技

术、文化和国防也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振奋精神，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到那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就可以从新的起点出发，比较快地达到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作出这样乐观的展望，是有充分根据的。

我们全部工作的重心已经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将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我们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已经端正。我们已经积累了宝贵的建设经验，并将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我们已经建设起相当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利。当然，我国的经济建设也还存在着不少的不利条件。这些不利条件不能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它们毕竟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是能够克服的。而我们的有利条件则是长远起作用的根本的因素。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我国丰富的资源还远远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经营管理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还很落后，这些当然是我们应该正视的弱点，但是也表明了我国在各个方面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我们不但有了自己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且还可以借鉴、利用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不需要一切都从头做起，重复人家已经走过的弯路。因此，只要路子走得对，从一个长时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是比较快的。

我国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废除了剥削制度，原来为剥削者侵吞的那部分社会财富已全部归人民所有，从而整个社会财富可以合理地有计划地增长和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优越性。由于过去长时间内经济指导思想上存在“左”的错误，经济管理工作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使社会主义固有的优越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生产责任制和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实行等等，对于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使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将起重大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发展前景问题上，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既要防止那种看不到我们的有利条件，对前途缺乏信心，对现代化建设悲观失望的情绪；又要防止那种看不到我们目前仍然存在的困难，看不到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复杂，企图速胜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必须树立长期建设的战略思想，实事求是，讲求实效，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努力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各位代表：

一九八二年是第六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也是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第二年。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我们必须鼓足干劲，扎扎实实地做好当前的工作。明年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巩固稳定经济的成果，继续保持财政、信贷的收支基本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使国民经济的发展

速度比今年高一点。一九八二年的计划，要求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今年预计的百分之三提高到百分之四，并在执行中力争超过。国民收入也安排为比今年增长百分之四左右。这就要求明年的农业和轻纺工业继续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重工业要由今年的生产下降转为上升。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要求消费部分增长百分之五点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百分之八；积累部分增长百分之三点二，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的投资增长百分之五点七。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费用的支出增长百分之五点九。积极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必要的劳动者个体经济，采取各种方式妥善安排城镇待业人员就业。要使城乡人民的生活继续得到改善。明年要用很大的力量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对那些消耗高、产品质量差、长期亏损的企业，下决心实行关、停、并、转。为了实现明年的计划，无论是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商品流通和财政金融等各个经济领域，都必须狠抓经济效益，争取做出显著成绩。《一九八二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要点（草案）》，已经提交本次大会讨论，建议大会予以原则批准。国务院将根据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加以修改后，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各位代表：

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两者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离的。我们只有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才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久发展，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精神文明的范围很广，它的主要内容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这是一个社会文明与否和文明程度的标志。任何社会都要发展它所需要的这方面的精神文明。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这方面的精神文明，有更普遍更迅速的发展。我们要大力加强智力开发，增加智力投资，使智力投资同生产建设投资的比例相协调，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这是由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并且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制度性质的。目前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一方面的问题正在更加突出，成为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其它多方面的工作，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我们的社会成员愈来愈广泛地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风尚和劳动态度，树立高尚的思想情操、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树立自觉的守法精神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持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祖国，发扬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我们的社会成员在处理人民内部的关系，包括各民族人民之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干部群众之间、军民之间、先进后进之间、较富裕者与较困难者之间，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买方卖方之间、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都要求能够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团结、互相帮助，能够顾大局，讲原则，讲公平信实，做好本职工作，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

在处理同外国人的关系上，能够做到既不骄慢自大，也不卑躬屈节。在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上，能够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逐步完善起来，坚信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成熟而逐步实现，并且能够为实现这种理想而作出脚踏实地的持久不懈的努力，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阴暗面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既不抱天真的幻想，也永不悲观失望。发展这种思想方面的精神文明，对我们的官僚主义的各种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办法。一年多来，在克服官僚主义弊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改变干群关系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干部作风中出现了不少令人振奋的新气象。但总的说来还不能令人满意。最近，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对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又进行了多次研究和讨论，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改变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层次繁多、互相扯皮、人浮于事、副职虚职过多、工作效率很低这类不能容忍的状况，以便有效地领导现代化建设工作。国务院决定，从国务院各部门首先做起，进行机构改革，限期完成。政府机构的改革，对于振奋广大干部的精神，进一步改善我们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对于我们整个经济的调整和改革，都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工作人员，应该在实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任务中，为地方各级政府作出表率。在政府机构的改革中，国务院各部门将作较大的裁减或合并，人员将尽量精简，领导干部将有较大的变动，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人大常委会，届时予以审议和批准。

在精简机构的同时，要用行政立法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部门的职责权限，以及各个行政机构内部的各个组织和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要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的严格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坚决纠正相互推诿、办事拖拉、对工作极不负责的恶劣习气，坚决扫除热衷于搞文牍旅行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衙门作风。在精简机构的过程中，要有计划地把思想政治好、有业务知识和实践经验、有领导才能的优秀中青年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努力实现领导人员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

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都要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到下级、到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从明年一月起，准备从中央和地方抽调大批干部，由国务院各经济部门的领导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同志带队，下去帮助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工作。各级于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带头恢复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新的成绩。

各位代表：

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有各条战线的密切配合、促进和支持。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努力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统一战线一直是我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法宝，也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法宝。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方面的爱国人士，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同中国共产党有着长期合作的传统。广大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建设，关心着祖国的强大和统一，

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一定要对各级干部认真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再教育，在工作中充分尊重和认真听取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作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我们要按照叶剑英[2]委员长宣布的方针和原则，按照胡耀邦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促进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统一祖国愿望的早日实现。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要提高战备观念，加强军事和政治训练，为巩固国防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我们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我们奠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促进入类的进步事业。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沿着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道路，奋勇前进吧！

注 释

1．叶圣陶（1894—1988），江苏苏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民进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2．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曾参加广州起义，历任八路军参谋长，北京市市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同人大代表讨论物价等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

* 这是赵紫阳参加第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四川代表团讨论时的发言。

物价问题，大家都关心。当前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是稳定的，但有些商品价格确有上涨，特别是蔬菜。物价为什么有些涨，从根本上讲，同票子发多了有关系。三年来，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减轻部分地区的农村税收负担，提高职工工资，以及城镇安排就业，实行奖励制度，国家减收增支，累计起来是九百多亿元。这使工人、农民相应增加了收入。如果按全国人口平均，三年内每人在这方面多收入九十元。当然，国家工作人员、文教科技卫生人员等，比较起来收入少些，但广大农民、工人这几年的生活，确实有显著的改善，购买力确实增加了。过去，人民生活水平多年没有提高，在粉碎“四人帮”后，采取上述措施是必要的，不迈这一步不行。但是，这几年消费的增长超过生产的增长，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而有些群众在心理上还不满足，同外国比，总想生活能够很快地提高。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是对的，但要正确引导，使大家懂得，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不能高于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居民购买力增加的幅度要同社会消费品供应增长的幅度相适应。如果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这样下去，我们的经济就会崩溃。

现在，工厂企业中存在滥发奖金的问题，互相攀比，不管生产搞得好坏，奖金都向高的看齐，结果，奖金总额控制不住，效果也并不好。农村中，有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拿不上来，都成了议价、高价。很多东西价格倒挂，都要国家补贴，在这方面投放的货币越来越多。今后，对群众消费的增长要稳一点，就是适当抑制一下。在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搞活流通，使货币尽快回笼的同时，还要想办法减少票子的发行。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企业必须整顿好，降低成本，减少浪费，提高经济效益，这方面潜力很大。二是奖金总额必须控制，不能滥发，不能再膨胀。三是在农副产品的购销上，要坚持“三兼顾”的原则。国家统购、派购任务必须完成，多余的产品，才可以加价议价。对那些发展过多的、滞销的东西，不能长期要国家用高价收购。要通过价格政策，对农民的生产起到指导作用。

关于最近部分烟酒提价、涤棉等化纤产品降价的问题，这是经过多次讨论才定下来的。我们国家要发展化纤，不降价，就发展不起来。总的算账，降价比提

价的金额多。烟酒提价幅度大的，主要是中华烟、五粮液等高档货，原来以为影响面不那么大，没有估计到现在青年工人中抽好烟、喝好酒的也不少。提价后，北京摆出一批高档的烟酒，一下子就卖光了。有个老太太，准备儿子结婚，一下拿一百三十多元，买了十条中华烟。这是个普通工人的家庭。这说明，人民的购买力确实比过去提高了。

关于蔬菜问题。每个人天天都要吃菜，这个影响最大。近两年，许多城市的蔬菜很贵，不是个好的趋势。一个重要原因，是郊区农民认为搞工业合算得多，不愿意种菜，又有大片的菜地变成了工厂。有的是办社队企业，有的租给城市企业单位作仓库、堆货场、停车场等。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报告里强调，城市郊区的农民要以种菜为主，蔬菜的种植面积要切实保证。对于近郊区发展社队企业要加以适当限制。要拿出一系列具体措施来，把蔬菜的生产和供应搞好。

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后的民事纠纷》一文的批语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耀邦同志：

这篇材料是光明日报内部刊物《资料与文稿》上刊登的，反映了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发生的各种民事纠纷。

看来，农村实行各种责任制，特别是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地方，必须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基层发生瘫痪、瓦解的现象。作为集体经济单位的大队、生产队，必须的经济领导职能仍应保留；特别是公社（乡）、大队（村）作为基层政权的职能必须相应强化。不然的话，农村的各种混乱现象，就难以避免地会蔓延起来。

请你考虑，这篇材料可否印发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参阅。[1]

赵紫阳

十二月十三日

注 释

1．胡耀邦在此件上批示："将这个材料和紫阳同志的批语印成书记处参阅文件并发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的同志们。胡耀邦十二月十四日。"

研究经济新情况　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讲话

我要说一下。我们今年的财政情况是不错的，我在人代会上讲今年财政有二十七亿元的赤字，实际上估计不会到这个数字，二十亿元也不到，这是可以肯定的。为什么今年报二十七亿元呢？因为明年财政紧张。因此，今年我们提前还国外的账，今年替明年还账十亿元，减轻一下明年的负担。明年就看我们的整个经济效益怎么样了。现在算账那还是差得很多了，会议上我讲了三十亿元，不敢多讲，人大代表都强烈要求消灭三十亿元赤字。就算账来讲，明年的财政问题还不小，至少是五六十亿元赤字。上次计划会议讲是四十亿元，我后来讲，无论如何，我们明年赤字不要搞到四十亿元。今年如果二十七亿元，明年三十亿元，明年的报告就比较好讲；如果今年二十七亿元，明年搞个五十亿元，报告都不好做。当然，不是为了报告。因为人民把这看成是整个经济好转的状况怎么样。但是，应当说潜力也是很大的。在这个方面，如果是提高经济效益，整顿企业，对违法乱纪、违反财经纪律的，好好整顿一下，全党真正努力可以争取明年的财政进一步好转。今年财政情况比原来预计要好一些，但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的外债，明年、后年是还账高潮。所以要留有余地，提前做好还债的准备。

我看了一些材料，生猪主要是两个问题。我同意这样的提法，这个情况现在很严重，但是，也是可以解决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抓的话，明年全国会真正出现猪肉紧张的严重情况，那当然后果就很严重了。因为现在城市承认农村形势好，首先就是有猪肉吃。生猪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原因，就是过去农民养猪，除了国家奖售以外，生产队也有一定的奖励。比如说，很多地方生产队或者给饲料地，或者给饲料粮。我所知道的，像四川，两三年来就实行斤猪斤粮，不管国家给多少，生产队和农民算账，是斤猪斤粮，一斤猪肉一斤粮食。国家给的粮食当然现在没有变化。生产队给的这一部分粮食过去是拿牌价来算，牌价粮食养了猪，猪肉调价以后，农民养猪是合算的。为什么这几年猪发展得很快？一个是农业情况好转，一个是政策鼓励，因此，社

员养猪这几年发展很快。为什么今年有下降的苗头，几乎是不分南北。从东北到广东，从四川到山东，丰收的也好，不丰收的也好，去年受灾不受灾的，生猪都下降？当然不是粮食问题。我前几天问了一下，四川的同志说，现在那里猪肉供应没有问题，收购也没有问题，有些地方卖猪还难。但是，实际上养猪数量也在减少。那就是说，猪肉紧张的情况今年没有出现，明年就可能出现。出现早的地方，现在已经有了。一部分地方的县城以下，甚至中等城市，现在猪肉供应已经紧张了。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时候，没有把生猪奖励的措施同时落实下去。当然，去年大家感到猪肉比较多，研究的问题不是鼓励养猪，都是限制养猪也是一个原因。责任制，特别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没有把养猪落实下去。农民包了土地以后，粮食是自己的，这个他要算账了，是拿粮食养猪还是卖高价？因为粮食是议价的。因此农民就不愿养猪。过去生产队鼓励养猪，按牌价给你粮食，你去养猪卖；现在地到了农民手里，农民生产的粮食都是自己的，除了完成国家公购粮以外，剩下的粮食是到市场去卖呢，还是养猪？就是说，饲料地的问题没有落实，没有随着粮食到户以后，把养猪的任务也落实到户。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请河南刘杰[1]同志讲一讲，他们最近抓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根据你分的土地，养多少猪，或者叫饲料地，或者叫养猪地，养猪多，多分地，不养猪，少分地。必须有个任务。因为完全由农民哪个合算就干哪个，那问题就会很多。

第二条原因，如果不把养猪作为一个任务，现在农民就算账了，是养猪合算，还是养兔子合算，还是养鸡养鸭合算？

生猪下降，主要是这两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根本的东西，如果完全由农民什么合算干什么，而不是作为一个任务，如果我们没有随着责任制的变化而相应的采用新的鼓励养猪的措施，没有跟上去，这样一下子就发生问题了。我最近找了几个同志谈，他们讲，大概主要是这么两个原因，当然，其他原因还有了，养牲畜多了，养牛呀，养驴呀，因此不大愿意养猪了。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从市场上看，猪肉的收购和供应还看不到紧张，但是，农村养猪在下降；另一种情况，现在市场供应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猪肉一少，就发生很多问题，二道贩子就来了，国家就收不到手了。但是，我认为这是派生的。因为去年我们就不怕投机倒把，有二道贩子去卖更好，那时的根本问题是卖猪肉难嘛。现在猪开始一紧，肉就高价收购了。这是派生的。当然，也增加了紧张，但看来这不是主要的。

现在农村里面有几个新情况、新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我们有些工作要跟上去。城市几乎全国没有例外的是蔬菜紧张，一直有这个问题。郊区不愿意种菜，愿意搞别的东西。农村就是养猪问题，郊区就是蔬菜问题。看来，给我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还得有计划。当然，计划不能像过去搞得那么死了。我看，主要的还是通过任务、合同、政治思想工作。总之，主要的东西还得有个计划，如果完全由农民哪个合算就干哪个，那将来确实发生一个问题。现在就有这种情况，国家不需要那么多的，它偏偏去生产，产生积压；而整个社会很需要的东西，它

不去搞，而我们又不能够完全用价格去调节。对农业生产的问题，主要用价格去调节，今天还不具备这个条件；而计划调节取消的话，那当然会发生问题了。那就会发生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却大量生产，社会上需要的东西不生产。各地方反映，烟叶明年可能要搞到一千二百万亩。面积种得太多了。当然，有些东西我们不急于去改变政策。比如长江流域的油菜籽，今年基本上种上了，面积大大扩大了。现在国家仓库里已经积压了很多油菜籽，如果明年再搞得很多，就发生一个处理不了的问题，而且收购价格又比较高。总之，对农业生产，还得根据社会需要有所指导。陈云同志讲的，我们今天还不具备完全用价格去调节的条件。如果完全用价格调节可以解决，油菜籽多了就降价，猪少了就涨价，涨价就促进生产嘛。但现在价格又不能动，随着市场变动，总得有个办法来指导它。现在很多问题是边走边看。去年猪很多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农村会发生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问题，不要久拖不决，该解决的就解决。蔬菜问题看来抓得晚了。蔬菜是什么问题呢？原因也可以讲很多，但是根本的问题，是郊区农民只愿搞工业，不愿搞蔬菜。而这个问题完全由农民随着价格走，那就不行。当然，也有对农民教育的问题，对农民指导的问题。城市蔬菜、农村生猪，现在看来这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通过银行聚集资金，同时通过银行支援建设，作为一个方向，作为今后聚集资金的一个重大措施来讲，我认为这是应该肯定的，有利的，而且路子会越走越宽。问题就是，明年一年究竟能搞多少，在我们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以前，还是谨慎一点好。不要把这么一件好事搞乱。如果搞乱了明年，后年又收，这就不好了。因此，上一次计划会议上我说了一下，首先一条，就是不要离开银行另起炉灶去搞筹集资金。这样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去统一调度，把把口子。比如企业资金，个人储蓄，本来这个钱在银行里，如果另外搞很多投资公司，那就是说，银行存款可能大大减少。我们现在银行大量的钱是流动资金，周转资金。如果很大一批钱不通过银行，而通过各种投资公司变为基本建设投资，又没有一个总的口子去掌握这个情况，那就会发生实际上把现在银行用于流动资金的部分转去用于基本建设。总的来讲，除了财政以外，我们另外调节资金，还是要充分发挥银行的作用。也可以办一些投资项目，最好通过银行去办。盖房子也好，城市盖宿舍也好，都可以通过银行筹集资金，发股票也可以。总而言之，我们刚刚开始，步子不要迈得太大。明年能够搞多少，看一看。后年可能还可以搞得更多一些。不要一下子撒开，最后出问题。总的来讲，我们经济经过调整以后，今年各方面有很大的好转，但是潜在的危险没有完全消除，或者说没有根本消除。在这方面，如果不谨慎，也可能把我们今年一年来的努力，已经缓和下来的矛盾，明年又重新激化起来。这样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上都是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搞不好，明年物价会来一个波动。总而言之，票子的问题很值得注意，不管基本建设也好，农副产品收购也好，奖金也好，票子发得太多，就要出问题。又要稳定物价，又要多投放，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统一的，根本的经济规律没法改变它。发很多票子出去，基本建设也好，农副产品价格也好，奖金也好，工资也好，开了很

多口子，又要稳定物价，没有人有这个本事。很多事情都有个承受能力问题。我们前几年农副产品提价也好，奖金也好，总的来讲，我认为，迈这一步是必要的，因为多年来人民生活没有多少提高。农村十多年，每人每年增加收入不到一元钱，江苏这个富地方也是这样子。如果不迈出这一步，今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这样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光讲责任制还不行，责任制是第一条，还有个价格。总的来讲，农村提价减税加上城市奖金和各种补贴，三年国家多开支九百个亿。总的说，迈这一步是必要的，我历来讲不后悔，但是看来步子迈得大了一点。这个步子迈这么大以后，我们必须用几年缓过来。经过几年积累，我们情况就好了，就会有一些钱去搞建设了。已经迈得比较大了一点，从政治上考虑，也是必要的。如果现在还按前几年的想法去搞，我们经济上不可能稳定。而这一点，我们全党要统一思想。我认为，现在很多问题，提出都是必要的，而且我认为也是不难解决的，关键是在于党内能够思想统一起来。

今年调整就是证明，只要统一思想，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在为什么着重说这个问题呢？主要的是我们今年形势好了一点，有些矛盾缓过来一些，只怕我们形势稍微好一点，明年再反复一下。当然，这一次提价也证明，物价很容易波动，不那么简单。

指标问题看来问题不大，“保四争五”，甚至更多一些都有可能，关键是怎么能够多收入。昨天小平同志问我，贷款为什么没有用呀？还有世界银行的人讲，你们为什么软贷款要那么多，硬贷款不可以多要一点？这很有道理，软贷款期限是五十年，实际上没有利息；就是硬贷款多搞一点，利息也不多。但是，问题就在于国内财政困难，没有配套资金。我们国家在财政上不想一些办法去克服困难，筹集一百亿元的资金，是不行的。不外乎少开支一些，工人、农民少花一点，多收一点。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的讲话

说一个问题，农业调整作物布局的问题。调整作物布局，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效果很好，因地制宜，对过去多年来瞎指挥造成的作物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很大的纠正。另外，对现在国内必需而又大量进口的主要物资，一个糖，一个棉花，这两年扩大了播种面积，产量大大增加，这个对国家、对人民都是非常有利的。

现在提出这么个问题，因地制宜种植这个方针，还受不受别的因素制约？是有一个东西制约着它。这个制约的因素就是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大政策来讲，我们只能够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不能再多进口。这个我们过去谈过多次。这一点希望同志们能够了解。（杨易辰[2]：长期进吗？）现在也没有准备短期进，没有准备减少，至少在本届政府，没有准备减少。下届政府我不敢讲。我的想法，下届不管谁来，只要有这个可能，最好也不要减少。但是，这是我们进口粮食的极限，受这个制约。如果由于我们调整作物布局，粮食面积减缩过多，进口一千五

百万吨打不住，那我们国家就会发生问题。因为，国际上再多买，有困难；另外，如果我们确实粮食进口过多，就会造成依赖性，被国外卡住脖子。所以，因地制宜和因国制宜必须结合。我们国家十亿人口吃饭还是头等大事，不能离开我们整个国家的基本情况，来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考虑因地制宜。这是一个大局，影响到很多方面，这是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意见，根据这么一个情况，中国调整作物布局只能限制在这个范围内：第一，多年来的瞎指挥，就是过去讲的“以粮为纲”，过分强调粮食的结果，把很多不适合种粮食、而且过去也不是种粮食的土地勉强去种粮食，这于国于民都不利。这种情况是应该作调整。据现在了解，这个问题这两年来应当说步子迈得不小，已经基本解决了。第二，根据我们整个国家的需要，现在还在大宗进口的两种主要商品，一个是棉花，一个是糖，适当地、逐步地、有计划地扩大一些面积，主要是北方的甜菜和北方的棉花，不是南方。我认为，南方的甘蔗面积，除了荒地，不要扩大了。主要是北方的盐碱地，像东北、内蒙古这些地方，发展一些甜菜。因为这些地方种植面积比较大，产量也低，潜力比较大。根据这种情况，按照国家已经确定的政策，北方的糖、棉花，面积上有所发展。其它地方的作物的调整，恐怕要控制。我们的粮食播种面积大量缩减不行。从全国总的来讲，粮食播种面积就到现在这个水平差不多了，不宜再减。现在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大概十六亿亩多一点。我们现在没有很大的把握今后每年单产有大幅度的提高，因此粮食面积再过多地减少，最后势必又要被迫把经济作物砍掉。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是限死的。这样是不是说，我们农业的多种经营，就没有门路了呢？不是。今后农业的多种经营应当主要放在还没有充分、合理利用的一些丘陵、山区、水面、海边。就是说，利用还没有充分、合理利用的资源，而不能把眼睛只放到现有的耕地上。现有耕地上的经济作物，应当主要是提高单产，提高质量，而不能继续把眼睛放到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面积上，这个方针要定下来。在原有耕地上，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布局基本上到此差不多了。当然，局部的小量的作一些调整那还是允许的。总的来讲，在原有耕地上，经济作物和粮食播种面积的比例要在现有水平上稳定下来。

第三点意见，粮食包干问题。原来万里同志、依林同志已经把这个问题定了。我最近了解了一下这个情况，大家都要求包干，中央也采取包的办法，这是好的。我在这里告诉同志们一个底，现在包干的水平，就已经包括了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中央手里只有四十亿斤机动粮。我今天要讲的，这四十亿斤不能作为救灾粮。粮食各地方包干以后，上调不增加了，但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用粮和中央各部门的工业用粮还会要增加，这是肯定的。这样就和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发生了矛盾了，势必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打不住。所以，各省必须自己在包干的范围内以丰补歉，多年调剂，就是中央的四十亿斤再不能用来救灾。比如说，云南包干调进十亿斤，如果云南发生了大灾，十亿斤可能不够，怎么办呢？这个年度来讲，中央调进可以超过十亿斤。但是，如果第二年云南丰收了，

调进就要少于十亿斤，那就可能是七亿斤，或者六亿斤。包干要几年算总账。这以前我跟周惠[3]同志讲过这个想法，给各省包干的粮食要多年调剂，算总账，中央起调拨、周转的作用。不能你包了十亿斤，哪一年丰收了，粮食你自己用了；受了灾，中央调给你粮食，那就不是包十亿斤。因此，中央没有救灾粮，中央只能协助各省进行多年调剂。我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各地注意一下。我们前几年为了休养生息，有一些省份当时定的调进粮食的基数比较高，包括云南、贵州、内蒙古，还有其他一些省份。是不是需要呢？是需要，因为前几年搞得很苦。但是，农村情况一好，我认为，不应当销那么多粮食。过去我们一开始考虑搞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就是想通过这个办法使农民少吃国家的统销粮，而使国家虽然不能够多购，但可减少一点返销。现在看来，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些省份不要农村情况一好，粮食用不完了，就缩小粮食面积。不要这样，粮食还是储备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些地方都是生产不稳定的地方，要准备应付灾害。丰收年，农民少返销的粮食储存起来，以丰补歉。我们也不要你的，存到仓库里。不要丰收了，粮食多了，就搞协作呀，出口呀，改经济作物呀，山区粮食补助呀。第二年或第三年发生灾害了，怎么办？还向中央要粮食？这个是没有的。因此，受了灾，中央给你调拨了粮食以后，必须还。没有受灾以前，必须把能够节省的粮食积蓄起来，准备以丰补歉。不如此，明年、后年就可能突破进口粮食一千五百万吨。就是这样，中央的余地也很小。

再一个，原来老的商品粮基地，尽管有很多矛盾，还必须搞粮食。原来产粮的地区不搞粮食，统统一个省一个地区来考虑问题，那不行。至于有一些矛盾，群众中间有一些实际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国家的财力，逐年考虑如何解决，以调动生产商品粮地区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但产粮的地方还必须继续生产粮食，这一条要定下来。

注 释

1．刘杰（1915—），河北威县人。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曾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地质部副部长，三机部副部长，二机部部长，河南省省长。

2．杨易辰（1914—1997），辽宁法库人。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曾任中共辽西省委书记、省长，黑龙江副省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顾委委员。

3．周惠（1918—2004），江苏灌南人。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交通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

关于科技工作的一封信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耀邦、小平同志：

杨振宁[1]先生对我国科研方针和重点的来信送上，可抽空一阅。我是同意这种看法的。从我国的情况出发，科技界（包括科学院系统）应该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技术开发和产品研究上来，而不应该在基础方面花很大的力量。据张劲夫[2]同志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前，科学院的方针是侧重应用，而不是侧重基础。目前科学院的方针并不是这样定的。

不久前，一位美籍华裔科学家田长霖[3]先生在北京科技界有一篇讲演，也是主张中国科技力量应当主要用在应用上，讲得很尖锐。科学院有录音带（我只看过记录，未听录音），你们如有时间，可以听听录音。因为我知道，在科技界思想认识上有分歧，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对科技为四化服务是会有影响的。

以上看法，不一定正确，供参考。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 释

1．杨振宁（1922— ），安徽合肥人。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2．张劲夫（1914—2015），安徽肥东人。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中顾委常委。

3．田长霖（Chang-lin Tien，1935—2002），美籍华裔科学家，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校长。

一九八二年

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

* 这是赵紫阳召集杜星垣、薛暮桥、马洪、周太和、廖季立、宋平、房维中、梅行、白美清等座谈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谈话。

我去首钢看了一下。实行经济责任制以后，全体职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心工厂，工厂的经营管理和职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厂容环境确实有了改变。大厂的环境污染，完全靠国家计划来安排不行。集体福利，消除污染，要靠厂子的机动财力逐步解决。我很注意在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工厂，如何把实现国家全面计划结合起来，一个是改善经营管理，一个是完成国家计划，特别像首钢这样的大厂，在实行国家指令性计划之下，如何发挥经济机制的作用实行责任制，实行利润包干分成，不能把企业搞得光光的。要使企业有点财力，搞点改造，搞点福利，也减少国家负担。对企业管理要考虑两个东西，一是要有全局观点，一定要完成国家计划和财政任务；一是要有相对的自主权，有机动财力把企业搞活。

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如何按照国家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也就是在计划指导下发挥经济机制的作用。实行国家指令性计划，企业不等于没有机动权。国家安排的基建计划、生产计划，要有一定灵活性。企业实行利改税的办法，大企业实行所得税加调节税的办法和实行利润递增包干，哪一个办法好，还可以研究。小企业可以征收所得税，自负盈亏。

总的说来，1982年要把经济责任制搞清楚，怎么看待，放在什么位置上？在国家同企业的关系中能不能把经济责任制同加强国家计划指导，把各种指标统一起来落实下去。企业对职工的关系要与全面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再逐步进行技术改造，使企业有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进行整顿，走上健全的轨道。

实行经济责任制，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要与宏观经济的控制统一起来，与企业的全面整顿结合起来，要认真总结一批好的典型，通过一些典型调查，解剖一下，解决一些带方向性的问题。有一批大型企业，还要有一批中小型企业。据说北京实行经济责任制好的企业有三分之一。今年的工作全面整顿企业从实行和完善经济责任制入手。

经济体制改革要有一个总体规划，如何进行规划和工作部署？我国管理体制还要偏重中央集权，哪些事中央管？哪些事地方管？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如何分管，以及政企分开如何分

法，现在还没有成熟的经验。

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要搞，分成几种类型，如何实现，分几步走，要搞出来，总之，既要统，又要活。

中央机构改革，只是精减机构和人员。现在的体制改革，要考虑我讲的四种类型：一种是直接计划，一种是间接计划，还有是中间两种。还有企业的隶属关系如何解决好。

今年内要拿出几个月时间，把苏联的体制研究一下。我们不能把苏联的一套完全撇开。苏联的体制，中间已改革了几次，但是并未改好。最近勃列日涅夫[1]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了几句真话，认为苏联国民经济计划未完成是僵死的指标造成的，讲了苏联的食品匮乏是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认为苏联农业减产，不能只归之于天气。他们已经感到这些矛盾问题，但是不敢动。我们敢不敢动，我们还落后于苏联。我们体制改革的设想，还要从大的方面考虑，只研究东欧国家的还不行。要把苏联体制改革的全过程研究清楚，特别要研究他们的生产联合公司及运用经济机制的情况，把整个历史上的改革，包括赫鲁晓夫[2]时代，并结合东欧的改革，研究清楚。

一是要研究苏联改革的经验，二是要研究我国五十年代的经验，包括三大改造以前的经验。

可以组织一个小组，到苏联大使馆去搞一个时间。要研究苏联如何改革的，还要突破苏联的一套。这些，只有把苏联体制弄清楚以后再办。苏联有计划经济，也有市场调节，有的搞活了，也有的搞乱了。

由宋平同志负责，计委牵头，组织四至五人，体改办参加，作为我驻苏大使馆的客人，去苏联进行系统的体制改革的调查，决定后写一个报告，给外交部去办。

体制改革工作，一是抓经济责任制，发挥责任制的积极作用，限制消极作用，把奖金发放等问题也要整顿一下；二是搞一个长远的体制改革方案，以及具体实行步骤。

重庆试点你们搞不搞？沙市也可以。关于企业的调整，关停并转的文件，周太和[3]同志建议缓一下发，可以再研究一下。

调整、整顿、改革、改造要综合起来研究一下。

今年财政工作总的搞法，要拟出一个眉目来，然后再看明年，近两年怎么办，现在的办法不要轻易动。当前的问题，如要调整财政包干基数，关键是基本建设投资。要不要划给地方包，只要地方包行政费，不包基本建设，解决不了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大。还是把问题弄清楚，搞不清楚就办，问题可能更大。现在财政上的根本问题，是财政困难，有较大的赤字。还不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如何划分的问题。去年财政收入是不错的，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还是要把问题摸清楚，现在财政问题虽有困难，还可以过得去。烟酒专卖和调价，到明年可以增加三、四十亿元，关键问题是现在把物价稳下来，就可以前进一步。

注 释

1．勃列日涅夫（Leonid Ilyich Brezhnev，1906—1982），生于乌克兰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苏联元帅。

2．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1894—1971），生于卡利诺夫卡，曾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3．周太和（1914—2010），江苏淮阴人。曾任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国防工办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顾问。

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对《电力部一周之内办妥一件涉及到两部一省的事》简报的批语。

这是一个好消息。办事拖拉，效率低，几乎成了我们国家机关工作的一个通病。我们主观上都希望把经济建设搞得快一些，但许多部门办起事来却慢吞吞的。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财富。但在我们不少同志的头脑中，对时间的价值往往毫不在意，多一天少一天无所谓。须知在我们国家里，一天创造的国民收入就是十亿元，提供的财政收入就有二点九亿元。许多宝贵财富就在画圈圈、踢皮球中跑掉了。这不仅在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而且消磨人的意志，把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进取精神也搞掉了。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必须解决体制、机构方面的问题，同时也要解决精神状态、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责任心和主动性、创造性是大不一样的。电力部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建议各部委讨论一下这件事，在当前的机构改革中，切切实实地抓一下改进作风、提高效率的问题，使我们不但有新的机构、新的班子，而且有新的作风、新的面貌，把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一步。

关于国务院一九八二年上半年的工作部署*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

根据党中央指示，国务院今年上半年要着重抓好以下四件事：

一、切实抓好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工作

机构精简，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这是中央的已定方针。国务院要把精简机构作为今年上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邓小平同志讲，这是一场革命。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必须切实搞好，搞到底。这个决心要下。这项工作虽然难度很大，但是也要看到：第一，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第二，要相信广大干部的觉悟。经过革命斗争锻炼多年的老干部绝大多数是顾全大局的，我们的党是有战斗力的。只要领导的态度坚定明确，相信群众、相信党，是能够做得好这项工作的。

根据中央书记处一月二十八日会议讨论的精神，做好这件事，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

（一）改革机构。坚决改变机构重叠、部门林立、层次繁多、分工不合理、职责不明确的状况，重叠的要撤销，业务相近的要合并，要大大减少国务院直属机构和部委内部的司局。

（二）配好部、局两级领导班子，真正把部、局两级班子搞精干。每个部配部长一人，副部长二至三人、三至四人，每个司局配正副司局长二至三人。要向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革命化迈出一大步。为了避免部、局班子成员的年龄过于集中在较高的年龄界限，这次部、局级班子成员要有出有进，不能只从现有班子成员中挑选，必须选拔一些新的、年轻优秀的同志进领导班子。

（三）安排好老干部退休、离休。从这次开始，使干部的退休、离休制度化。要制定退休办法，规定退休年龄，部长不超过六十五岁，司局长不超过六十岁，女同志不超过五十五岁。这次要强调按退休规定办事，除特别需要的个别人经过上级批准继续任职外，到了退休年龄就退休、离休。对退休的同志除个别确有专长、身体又能胜任的可以在协会、学会等民间组织参加研究工作外，一般的

不要再作安排。不能把各种学会、行业组织也搞老化了，使它们缺乏活力。中央组织部考虑对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按革命年限发给补贴的办法。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问题，也应该按历史问题加以解决。这种办法是人民对老革命干部的功劳给予的荣誉和报酬。

（四）轮训干部。书记处研究认为，这次我们的口号是“精简机构”（或“改革机构”）、“轮训干部”。不提“精减干部”，而是讲对干部进行轮训。我们的事业是要发展的，是需要人才的，安排好干部的轮训非常重要。对那些三十岁至五十岁的比较年轻的同志，要轮训，学业务、学文化。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现在认识了，就要坚持这样做，使这部分同志经过学习，提高业务能力，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中央还决定，这次对各部门的编制只定额不定人，不定谁是编内、谁是编外。多余多少人，抽调多少人轮训，学习后工作，工作一段后又去学习，在学习和工作中分别进行考核。采取这个办法，一般干部情绪就稳定了。

另外，凡是部门从其他地方、单位借调的人员，除个别优秀的、属于培养提拔的对象以外，一律回到原单位。

现在，外贸、内贸、水利、电力等部正在试点，进行得比预想的要顺利。除了试点单位外，为了加强领导，国务院领导同志按书记处决定和分工要抓好主管部门的机构改革工作，帮助部委党组酝酿制定领导班子配备方案，特别是一、二把手的配备。工作要做细，但时间一定要抓紧。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已经传达了，要抓紧工作，争取机构合并和领导班子配备在二三月份就要搞出头绪，上半年基本完成。

二、要严肃处理经济上的重大犯罪案件

这件事中央已有明确方针和具体部署，国务院也曾提出过，这是关系到我们党风政风的大事，到了非处理不可的时候了。陈云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决不简单是沿海地区的走私问题，在经济领域中的投机倒把、贪污受贿，还有哄抢国家财产等，都必须严肃加以处理，刹住这股歪风。证据确凿、情节严重的，一定要从严从速依法处理。国务院要带头伸张正义，维护社会主义经济，主动地配合纪委和司法部门搞好这一工作，这是政府的责任。对这件事，关键是要抓，要有人管。今年要处理几件重大案件，开个头。我们虽然不搞运动，但抓大案要雷厉风行，毫不手软，一抓到底。大案一抓，人心为之一振，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会议决定由杨静仁[1]、杜星垣同志具体负责抓这项工作。

三、搞好生产

搞好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政府的中心任务。领导干部的精力放到精简机构上是必要的，但同时必须抓好生产，上半年就要做出成

绩来。今年一个月来，全国生产形势是好的。为了进一步安排好工业生产，准备在二月中下旬，以国务院名义召开全国工业生产会议，主要解决把今年工业生产搞上去的一些关键问题：

（一）今年工业要努力实现“保四争五”的任务。但必须是没有水分的、不徒虚名的增长速度，产品质量要好，成本要低，要适销对路。对那些已经积压很多的产品，如涤卡等，要采用行政和经济手段限产或停产。不要一面大量积压，一面又盲目追求产值，大量生产。过去那种“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的现象再不能重复了。

（二）要研究怎样把能源和交通运输搞上去。重点解决好山西等地的煤炭运输问题和节约能源问题。节能的潜力很大，今年要进一步下功夫抓。现在，一些耗能大的产品，如华东、东北的铁合金还在出口，这是很不划算的，该关停的要关停，该限产的要限产。不能一般号召，要拿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今后国务院抓经济工作，应做到：一是要充分发挥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有些政策规定不要搞那么死，重大问题要同地方协商解决；二是有些事关系到全局的利益，看准了后，要敢于决定，决定以后，要坚持到底。要有权威，令行禁止，不能听之任之，使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

（三）要着重研究和部署企业的整顿问题。今年必须围绕提高经济效益，按照中央二号文件的规定，把整顿企业的工作扎扎实实地抓好，务必抓出成效来，这是我们工业今后能否上得去的一个关键。要统一部署，作好安排。会议开完以后，各部委都要抽调得力干部下去，协助各地抓好企业整顿，结合解决企业的调整和必要的改革问题。必须关停并转的企业也要确定下来。社队企业的调整、整顿问题要搞好，要从改变税收等方面进行一些调节，使它同城市的国营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竞争。财政部要会同农委、农业部、经委研究一个办法，报国务院审批。

这次会议由经委准备，杜星垣、袁宝华同志具体负责。计委、农委、进出口委、机械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综合部门参加。会议作好准备后，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一次，然后再开。

四、编制好“六五”计划

国家计委要抓紧时间在上半年编制出“六五”计划草案。计划草案中除了其他内容外，要注意两点：一要有能源、工业技术改造、消费品工业、科技等方面的专题规划和政策措施；二要有今后一个时期基本建设的重大项目，把建设的骨架子定下来，主要是能源、交通方面的项目，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设想。五月份要拿出草案报国务院讨论审定。七月以后报书记处、政治局审定后，提请十二大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

注 释

1．杨静仁（1918—2001），回族，甘肃兰州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曾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发挥城市作用
促进工农业和地区经济发展*

一九八二年二月五日

* 这是赵紫阳考察华东鲁、苏、浙、沪四省市与当地负责人和沿途基层干部群众谈话的要点。

一、扩大城市管理经济的权力，充分发挥城市的作用问题

近年来，涌现了一批发展速度快、经济效益好的城市，如常州、苏州、无锡、南通、沙市等。这次，我们重点了解了常州的经验。常州城市人口三十八万，一九八一年工业总产值达到41.5亿元，比上年增长10.4%，上缴的税利人均近一千五百元。以一九五二年为基数，三十年来，工业产值每年递增10.7%，财政收入每年递增11.7%。人民生活也有相当的改善。全市就业问题已基本解决，四年来新建职工住宅一百二十多万平方米，人平居住面积达到4.4平方米。全员劳动生产率、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产值率、百元产值的成本率等经济指标，在江苏居于前列。常州的经验比较全面，值得我们重视。

常州的经验，过去有许多调查和概括。如说它善于组织“一条龙”大协作，重点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等。其实，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值，只占全市的四分之一左右，并不占主导地位。“一条龙”是一条好经验，但也不是它的根本经验。我们认为，常州经验最可宝贵之处，在于它的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一条龙”之所以能组织得好，关键就在市委领导有力。没有市委这个“龙头”，“一条龙”是形不成的。常州市委能够从全局出发，把全市的经济工作统起来，统筹安排，集中指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确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常州有四百多个企业，但市委是有权威的，由市委牵头，能够把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企业拧在一起，为着一个统一的目标而协同动作。围绕不同时期生产发展中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他们组织了全市的力量，多次攻克了难关，使生产提高到新的水平。全市的技术力量，可以统一调配；各种资金，可以捆起来统一使用，叫做“吃拼盘”；重要物资由市物资局全行业包干，统一调度，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把企业三天以上的存煤都调出来由市里统一调拨使用。当然，这些都不是无偿平调，而是既有统一安排，又照顾经济利益。在组织措施上，除重大问题由市委拍板外，还设有“一

条龙”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集体办公，联合审查，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当机立断。

常州市的集中领导的权威，是建立在善经营、路子对的基础上的。他们不断地充分地利用原有企业，组织综合生产能力，“滚雪球”式地向前发展。用他们的话说是“桌子上唱大戏”。他们以名牌优质产品为中心，突破地区、部门、行业和所有制的界限，对现有企业充分利用，合理组织，统一规划，积极改造，组织“一条龙”协作生产和各种形式的联合体，定点协作，配套成龙，从而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和提高了竞争实力。全市现已组织“龙”五条，专业公司九个，总厂十二个，工艺协作中心十一个。而且，横向联系发展到上海，到苏、皖、晋等省。在协作、联合的具体作法上，一是坚持产品归口管理，隶属关系可以不变；二是坚持平等互利，利益均沾，在市场价格不动的情况下，通过内部协作价格来调节主机厂和配件厂的经济利益；三是坚持必要的思想教育和行政干预。经过改组、改造以后，新产品、优质产品不断涌现，现全市共有金质奖商品二个，银质奖商品二个，优质和名牌商品六十个，畅销国内外，经久不衰。在全市初步形成了一个以轻纺、电子为主，内外结合，以外为主的经济结构。常州这种立足于现有企业，围绕优质产品就地就近组织专业化协作，使联合、改组、改造紧密结合，是投资少、效益好、加快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条正确的路子。

在大城市中，上海也有同样的经验。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市虽然也有一些中央部属企业，但市委有权威能够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在全市组织协作、联合，挖掘生产潜力，提高生产水平。这是使上海发展快，经济效益在全国最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常州的经验在许多城市却推不开？汤永安[1]同志深有所感地说，在南京，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能力就是抓不住，组织不起来，市委无能为力，不像常州那样一呼百应。原因就在于，在南京市，中央各部、省属各厅局插手管企业多，体制多头，管理分散，厂子的块头大，效益差，工业的组织程度很低，形不成综合的生产力。这在许多市，尤其是省会所在地，是个普遍现象。如在四川，成都市比重庆市的组织水平就差得多，重庆市委有一定的权威调动各个厂，因为重庆市过去是个直辖市，有这个基础。

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总结、研究加快城市经济发展步伐的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我们认为，上海、常州等地的基本经验，是我们管理城市三十二年来经过曲折、不断探索得来的，它们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投资小、速度快、人民能得到实惠的新路子。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在国家的整个经济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全国二百一十六个市的不完全统计（不含市辖县），人口约有一亿二千多万，拥有的工业企业数占全国的24%；职工队伍近二千万，占64%；固定资产原值二千四百多亿，占全国的67%；工业总产值三千二百多亿，占71%；一年上交的税利七百多亿元，占82%。但现在城市的平均经济指标一般要比上海、常州低一至二倍，如果能够通过调整和改革，把经济效益大大提高一步，使城市的建设加快，将对整个国家财

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起重大的作用。在调整期间，需要通过稳步的改革，把上海、常州等先进城市的经验推开，适当扩大城市管理经济的权力，充分发挥市在组织领导经济中的作用。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城市建设起来的工业摊子是相当大的，问题是条条、块块的分割，不能很好组织起来。从城市来看，它在经济上与外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较少受块块观念的束缚，如果说一个省、一个地区可以闭关锁国，搞自成体系，而一个市却比较困难。因此比较容易打破条条块块的束缚，在调整、改组、联合、技术改造上打破门户之见，合理地组成综合生产能力。这里的关键是要在管理体制上进行一些改革，适当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市，创造条件，让它有权就地就近组织联合，然后由中央有关部门进行全国性的协调。这可能是使城市经济上得最快的办法。

初步设想：政企分开是改革的方向，目前要逐步过渡，是否可以考虑，中央各部、省属各厅局，不要直接管理企业，主要管规划、协调，管产品、质量标准、技术规程，管情报、科研、服务、监督，管全国性的协作、攻关。这样各部、各厅局没有直属企业这个“亲生儿子”，超脱一些，反而能公正一些，站在全局立场上处理问题。即使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由中央直属（如石油、铁路、煤炭、电力、邮电等），但协作、配套、联合方面的权力，也要下放一些归市。对像上海那样的大城市，要学习上海的经验，把权力下放给市委，天津市可以试行。同时也可以考虑增加几个中央直属市（如重庆）。对中小城市，省的各工业厅局应当大大裁并，不直接管企业，由市里把企业统管起来。可以先选择一两个省会试点。各省可以有条件地增设一部分省辖市。在中小城市，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应加强市经济委员会管理企业的职能。市属工业局可以合并、撤销。一个单位可以多挂几个牌子，应付上面各部和厅局。经委下面直接管厂，管公司，并使公司、总厂逐步成为经济实体。公司、总厂也要处理好与企业的关系，公司以抓经营为主，企业以抓生产为主，这样联合体才有生命力。这些改革设想，要由点到面，总结经验，逐步推行。

二、工业经济责任制问题

去年，从落实财政任务入手，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一下子推开了。现在看来，总的讲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对改变企业面貌，提高管理水平起了推动作用。当然，问题也不少，现在真正搞得比较好的企业，从北京和济南的情况来看，大约只占20%—30%。如果把搞得好的企业，像首都钢铁公司和济南市几个厂的经验，认真加以总结，在其他工厂中推广开来，那将会产生更好的效果。首钢原来管理水平就比较高，去年实行经济责任制，把全厂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每个班组、个人，才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使改善经营管理变成了广大职工的自觉要求。过去他们也建立了许多规章制度，但那时不能完全落实，搞了经济责任制之后，由于工人的利益同企业的经营成果挂起钩来了，增强了工人主人翁的责任感，有了改善管理的积极性，这样原来那一套管理制度才

得到落实，并且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首钢的经验和济南同志们讲的有许多共同之处，都认为工业实行经济责任制是势在必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的继续和发展。七九年扩权试点，重点在于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现在实行的经济责任制还要求进一步解决好调动企业内部工人积极性的问题。实行经济责任制，改变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使人们自觉地关心劳动的成果，这个根本道理在城市和农村是一样的。但是实行起来，工业比农业要复杂得多。农业分工不太细，包产也简单。工业有个长线短线、利大利小的问题，还有配套协作的问题。因此，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要真正搞好，使它健康发展、逐步完善，可能要比农业生产责任制走一段更长的路程。中央二号文件把完善经济责任制作为企业全面整顿的第一个内容，今年要狠狠地抓，下更大的功夫，花更大的气力。实行经济责任制，一要达到增产增收，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不要盲目追求产值，但必须追求效益；二要做到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关系。增加的利润，国家应当多得。

当前，完善经济责任制，需要研究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一定要把实行经济责任制和加强计划管理结合起来。去年是从财政任务落实不下去而搞起来的，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好像经济责任制就是搞利润包干。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如果只考核利润，就容易产生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偏向，同国家计划脱节，同社会需要脱节。比如生产化纤布利润高，工厂得利多，但生产多了，造成积压，对社会就是浪费。靠价格这个经济杠杆来调节，这在理论上是对的，但目前物价不能随便动，因此必须把利润包干和加强计划管理统一起来。通过实行经济责任制把国家对企业的计划管理加强起来，使企业能够按国家计划生产，按社会需要生产。

第二，一定要把实行经济责任制同加强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在企业内部要层层落实责任制，把责任和利益落实到每个职工，推动改善经营管理，进行技术改造，而不是离开这些东西，离开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的正道，去片面追求利润，搞歪门邪道。实行经济责任制，把职工的利益同企业的经营成果挂起钩来，目的是为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更好地挖掘企业的潜力，提高经济效果。过去我们提出企业内部要搞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员培训以及推广优选法、统筹法，等等，这些都是好的。但由于缺乏内在动力，往往搞了一阵，坚持不下去。搞这些东西，工人是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如果职工得不到什么利益，积极性就不能持久，不能成为他们自觉的要求。现在就要有意识地把完善经济责任制同改善经营管理，搞好技术改造结合起来。

第三，在我们国家现有的生产水平下，职工个人所得不能增加太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对职工做好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把职工个人所得基本稳定在现有水平上，不能增加太多。消费基金占多少，这关系经济的全局。票子发多了，国家没有那么多东西。这几年就业面扩大了，加上奖金和各种补贴、福利，工人实际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农村搞了生产责任制，实行了其它经济政策，农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目前城市里工资级别低而又没有奖金的一部分人生活

存在一些困难，需要逐步加以解决。但总的来说消费总额不能增加太多，步子不能迈得太大。今后几年里，在生产发展、职工实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基础上，还需要逐年增加一定的积累，用于建设。奖金问题，总原则是在原来的范围内进行合理分配。企业留成基金要用于技术改造，改善环境卫生、劳动保护、集体福利、修建宿舍等，还可以贮备一部分，以丰补歉。

关于计件工资问题，纺织部写过一个报告，要求在纺织系统推行岗位工资全额计件的办法。在这个部门实行计件工资本来是有条件的，但是算了一笔账，工资大体上要增加近一倍，这就要慎重从事了。搞计件工资，不仅有条件具备不具备的问题，还有一个工资总额如何控制的问题。这几年职工人数增加很多，许多工厂人浮于事。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搬运工、煤矿井下工等少数工种以外，原则上计件工资在全国目前不再扩大了。已经实行的，要加以整顿，定额要先进，单价要合理。如果条件不具备的要停下来。

总之，要使工业经济责任制真正完善起来，还要做很多工作，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要认真研究，努力工作，在今年作出成绩。

三、工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问题

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上海市提出的当前技术改造的八个重点，是应该引起所有工业城市注意的。这八个重点是：（1）围绕发展日用消费品生产，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的生产技术装备，有重点地更新落后设备，发展品种，提高质量；（2）以节约能源为中心的技术改造，重点是能源消耗大的电业、冶金和化工，要继续改造中低压发电机组，大力发展集中供热，推广使用沼气；（3）积极抓好为农业服务的技术改造，着重研究开发适合多种农作物需要的氮磷钾复合肥料、高效低毒的农药和配合饲料；（4）加快港口、码头和铁路编组站的改造，合理组织分流，改进运输方式；（5）发展基础原料、材料、基础元器件和基础件，包括金属材料、化工材料、建筑材料、电子元器件和液压件、密封件、轴承等；（6）机械、仪表工业要为各行各业的技术改造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并从中不断地提高本身的技术水平；（7）加强科研及测试基础；（8）开展对“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变废为宝。每个城市，特别是重要的工业中心，都应该学习上海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特点，拟定本市技术改造的重点，并付诸实行。

进行技术改造，需要机械工业以先进的技术设备，装备各个部门，使整个国民经济有步骤地转移到现代化技术基础上来。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机械工业应先行一步，进行自身的技术改造。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其性能、质量、效率和水平，节约能源、原材料和劳动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瞄准五到十年国内外的需要，形成成套的生产能力，增加适销对路的产品的品种和产量，扩大机电产品的出口。

在目前经济调整时期，一方面机械工业面临着任务不足的严重困难。现在我

们钢材积压2100万吨，许多机械厂闲着，基建队伍也没多少事干，还照样开工资，照样出管理费。另一方面，许多工厂设备又日益老化。能不能想办法从哪里“启动”一下，有所突破，使工业实现良性循环呢？可以考虑通过国家银行贷一点款，把钢铁材料转供机械厂，机械厂加工成设备，赊销给所需要的单位，把旧设备换下来。这并不花很多钱，设备就占投资的85%，其它要搞一点土建，投资可由地方或企业自筹解决。这样一搞，积压的钢铁有了出路，废钢铁增多，钢铁比会减少，机械工业活了，冶金工业也带动起来，国家的税利收入增加，工厂的面貌也发生新的变化。这件事今年就要起步，要抓几种产品，抓几个市，抓几个大企业。就是说，要围绕节能，抓锅炉、汽车、变压器、水泵、风机等五种产品；抓上海、天津、北京、沈阳四大市，逐个审定他们的方案，组织实施；抓鞍钢、南化几个大企业的改造。取得经验以后再推广。

技术改造中，要尽量选用国产设备，保护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可适当引进外国的适用的先进技术和某些关键设备。常州、南通、杭州、宁波等地利用一些外资或中国银行的贷款进行技术改造，花钱不多，效果很好。常州利用一美元外资，可以增加12元产值，2.5元税利，搞得快的，一年多就可以收回，银行得息，财政得利，工厂也上去了。看来沿海、沿江城市，有消化能力，多引用一些这种中小额贷款是有好处的，没有大的危险性。

同技术改造有关的，还有一个技术标准问题。我国的技术标准，相当大的部分是沿用苏联五十年代的旧标准，许多已经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必须抓紧重新审订，公布施行。

四、改进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问题

我们国家的经济，是计划经济。一切经济活动，应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根本的方针。这次考察，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是：在编制计划时，如何把中央的直接计划同地区的协作计划更好地衔接起来，使计划更加切合实际。

我国人口多，幅员广，经济、技术水平都比较低，发展不平衡，经济又很分散，组织程度低，加上统计不准，情报不灵，中央要想通过一个包罗万象而又符合实际的直接计划把经济统起来是不可能的，硬要这样，只能计划和实际两张皮，最后等于无计划。

计划不反映实际是我们工作中一个大问题。比如，年初增长速度订为4%，年底却搞到7%—8%，这倒是好事，但说明我们的计划准确程度不高。南通市去年23亿元产值，计划只下达15亿元（包括省的），三分之一靠自己找饭；那里烧了50万吨煤，计划供应的只有30万吨，其余是通过协作同山西换来的。计划外很大一块就是地区协作。

现在看，计划应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上而下的中央直接计划，一部分是自下而上的地方计划和地区协作计划。地区协作计划过去一直没有在全国计划中反映出来。要真正解决计划、实际两张皮，在进行综合平衡的时候，应当包括

这一部分。两者综合起来，构成国家的统一计划。

地区协作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调节？看来还是属于计划经济，因为地区协作计划是地方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承认它比不承认好。有许多产品只靠中央调拨是不行的，中央也管不过来。地方之间搞协作，产品进行调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有。广东汕头地区和珠江三角洲订合同，用油换米，不然，汕头地区适于种花生，却不得不种大量番薯解决粮食问题，珠江三角洲适于种稻谷，也不得不种花生解决吃油问题，一协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各自发挥了优势。四川温江地区也和河南协作，用小麦换玉米，解决猪饲料的问题。我们不少地区的协作，是沿海和内地的协作，实际上是“东西对话”，中国资源多在西部，而技术、资金、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和内地，出于需要，互通有无，是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山西多调一些煤给江苏，江苏多搞一些消费品给山西，大家都有好处。从全局看，也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地区协作计划，成了中央直接计划的补充。

承认地区协作计划，可能与中央计划有矛盾，麻烦也会多一点，但可以不断地进行调节来解决矛盾。使这一部分进入国家综合平衡的范围之内，实际是加强了国家计划；若把它排斥在外，反而削弱了国家计划。

这样做，有三种发展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地区协作计划不断扩大，冲击了中央直接计划；第二种可能是中央直接计划不断扩大，地区协作计划不断缩小；第三种可能是两者都有所调整和发展，中央直接计划部分，更加符合价值规律，逐步缩小价格和价值的背离程度；地区协作计划更好地反映中央直接计划的要求，增加统一计划的成份。国家只能管大的，管其中的主要部分，而给地方主动地留出一部分，让地区之间互通有无，弥补国家计划的不足，发挥地方的优势。这样发展，可能使国家计划不断完善化、合理化。

这样做会不会冲击中央计划呢？只要引导得当，是可以避免的。中国的行政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要通过行政干预，保证实现中央计划的主导作用。为了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中央手里必须有几个硬东西，例如，一个是有权给地方安排任务，地方非完成不可；一个是牢牢地掌握住税收等经济杠杆，进行适当调节。税收权一定要掌握在中央手中，否则就会乱。

计委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地区协作计划，帮助各省搭桥，进行综合平衡，不合理的协作可以干预，但又不要统死。把地区协作计划综合到全国计划中去，只能加强而不是削弱对经济的计划指导。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论证，做出合理的决定。

五、坚持实行农副产品收购基数制度问题

浙江省自一九七九年以来，省委和省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对茶叶、蚕茧、柑桔、黄麻、木材、毛竹、桐油、糖料、水产、松香、生漆等十四种二类农副产品，分别确定了收购基数，一定几年不变，超产留成或议价收购的办法，一

九八一年又对油菜籽的收购确定基数，实践的结果是好的。

比如，茶叶：确定全省收购基数为110万担，按同年调拨给指定的国营茶厂的实绩为调拨基数，一定五年，超产部分60％由供销社统一收购和调拨，40％由社队自行处理。结果，一九八○年收购135万担，一九八一年达到156万担。

柑桔：一九八一年确定120万担基数，一定两年不变，是按重点产区收购70％、一般产区收购60％的购留比例确定的，完成派购任务后，社队可以自行处理，也可以由供销社议购议销和代购代销。过去一年只收购60多万担，而一九八一年却收购149万担，其中牌价收购113万担，议购36万担。牌价收购的除去外调后，还平价在杭州市、宁波市等城市供应了一部分，卖完为止。其余的卖议价。

油菜籽：近年来，油菜籽的面积上升很快，浙江全省1979年与1981年相比，面积由275万亩增加到375万亩，收购量由26400万斤增加到51000万斤。为了适当控制油菜的发展，1981年起省政府规定收购基数为四亿斤，一定三年不变。超过部分，不再加价，按牌价收购，农民也可以自行处理。这个政策下达后，今年油菜籽播种面积下降约60万亩，控制了盲目发展。

浙江省对农副产品实行定基数派购的制度，虽然不尽完善，有个别产品也还收购不起来，但它的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体现农业经济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一个好办法。可以说，它和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农村生产和交换方面必须坚持的两项基本制度。定基数，实际上是一种计划指导。基数以内的，农民必须保证完成，国家在价格上予以保护；超产部分，要根据社会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紧俏的产品，可以加价；滞销的产品，可以降价，按市场供求情况实行浮动。这个办法，农民是能接受的。台州地区的农民就提出：一要确定基数，二要定得合理，三要几年不变，四要超过计划部分多渠道收购。农民的这些要求是合理的。

现在我们国家对农副产品价格倒挂的补贴大量增多，成为财政上的沉重负担。实行这个办法，能体现“三兼顾”的原则，有利于减少国家补贴，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发展生产，也有利于改善城乡关系，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看来，对一些重要的农副产品，在农村实行派购基数的制度同城市实行定量供应的制度是必须的，互相衔接的。供应城市居民的东西，定量以内的平价，定量以外的，高进高出。菜油目前实行了这个办法，效果是好的。这种办法，看来相当长时期内要实行。浙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

六、在城市进行一次生动的经济形势的宣传教育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在农村、城市都为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作了最大的努力，大多数群众是满意的。但也要看到，现在城市一部分人中间，有一股无名之火，动不动就骂人，有的大城市更严重。虽然，真正不满意的是少数，但这些人有市场，影响不可低估。其中还有个别别有用心的分子，唯恐天下不乱。城市有些人不满，固然与物价上涨有关系。一部分人口多就业少的家庭生活

困难，而社会福利和救济又没有跟上去，所以有气。我们的思想教育也配合不够。看来需要在今年选择一个适当时机，在城市普遍进行一次生动的经济形势的宣传教育。向城市居民全面算一算账，把问题摊开。应该让群众了解，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后的几年，国家是在什么情况下来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物价涨了多少，国家对城市人民补贴多少，就业增加多少，工资奖金总额增加多少，住宅增加多少，耐用消费品销售增加多少，城市储蓄增加多少，都一笔笔地摆开算。全国有一本账，从一九七九年到去年，三年共安排回城的、城镇待业青年二千六百万人，新建城市职工和居民住宅二亿多平方米，国家每年对农副产品销售倒挂的补贴增加到二百多亿元，等等。每个城市也都有一本账，通过事实、数字来说话。存在的问题也要实事求是地讲清楚。比如党政机关干部、科研人员、教师，集体企业一部分职工实际收入提高不多，甚至有下降。可以让群众公开把意见讲出来，便于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也便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样做，多数群众就会搞清真相，消除误解。我们在宁波市绣衣厂，听一位女党支部书记讲了几句很深刻的话，她说，工人讲，这几年，一是（口袋里）钞票多了，二是物价也涨了，三是算算（口袋里）钞票还是多了，四是人们的要求也高了。工人群众是非常通情达理的。如果我们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经济宣传，老工人就不敢讲话，正气树不起来，流言蜚语就有相当大的市场。这项工作应该先找几个城市试点，再全面铺开。

注 释

1．汤永安（1925—2015），山东莱西人。时任南京市政府副市长。曾任常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江苏省工交办副主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常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国家体改委顾问。

重视发展儿童消费品生产*

一九八二年二月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一次会议上关于重视发展儿童消费品生产的谈话。

请找轻工部和其他有关部门了解一下儿童玩具一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问题，要对儿童玩具一类产品的销售作市场预测，看看消费者究竟需要些什么产品。

最近我的老伴带着外孙，到商场买了一辆儿童三轮车，款式陈旧，质量粗糙，同五十年代的产品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差。这件事使我很有感触。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好。特别是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成了父母亲的“皇帝”，大人想方设法来满足孩子们的要求。全国的城市有一亿多人口，农村有八亿人口，我们生产一些什么样的消费品来满足城乡儿童的需要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的玩具以及其他儿童消费品，可能主要销在城市，要作调查研究，如何把广大的农村市场也打开来。现在国际上玩具的生产和智力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结合起来了，玩具生产变成了一个行业。我们的玩具生产以及其他儿童消费品的生产尽管也发展了，但总的说很不适应社会需要，这件事很值得认真研究。再说，这件事办好了，对回笼货币也有好处。请专门开会研究一下儿童玩具以及儿童其他消费品的生产和销售问题，把问题摆出来，产生一个报告，并提出解决的有效措施。请李智盛[1]同志向有关方面传达这个意见，并负责督促检查。

有的同志说，生产玩具需要木材，请研究一下，能否少用木材或不用木材，多用些铁皮和塑料。

注 释

1．李智盛（1925—），陕西神木人。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研究员，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副主任、副部长。

提高经济效益
搞好企业整顿和技术改造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

* 这是赵紫阳等在听取国家经委关于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准备情况汇报时的谈话。

先按这个准备的内容到天津去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议中间回京汇报一次。这次会议要突出三个重点。

第一个问题，今年怎样实现一个没有水分的，经济效益比较好的生产速度。现在大家的劲头大，产值搞上去，不仅5%，可能5%以上。今年的危险，可能发生在不注意经济效益的问题上。要避免搞无效劳动，不搞那种不为社会承认和需要的劳动，能不能避免，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万里同志：我们搞经济工作，就要搞经济效益，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那是硬功夫。年初开这个会很重要，要抓经济效益这个硬功夫。）

化纤布限产怎么样？恐怕要有点硬办法。讲了这么久，一月份仍然生产这么多，一般号召不解决问题，要直接通到厂，生产涤纶混纺布的主要厂要按日上报产量，这件事要立即去做。如果再盲目生产，要追究责任。东北、上海的铁合金要限产，也非这样搞不行。不能把能源、原材料、活劳动、物化劳动消耗了，压在那里卖不出去。

长丝停止进口了没有？总的讲，长丝不是多了，而是突然一下子进口太多，国内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能否采取简单的办法，通知海关，停止进口。要采取断然措施，看准了的，没有一个硬办法是刹不住的。进出口委和有关部门赶快研究一下，哪一些东西现在不能再进。

年度计划应该根据产销情况进行调整。如涤纶混纺布首先要坚决限制生产。限多少，请计委、经委、纺织部很快研究，落实到厂。其次要积极疏通渠道，扩大化纤布的销售。但愿是个大畅销的形势。第三，从总的趋势来看应逐步降价，但不急于去降。一年之内两次大幅度降价，没有必要，也没有好处，搞不好造成人们的观望心理。

第二个问题，把能源、交通的生产、调运、节约安排好，使今年的工作有所前进。

第三个问题，企业整顿问题。今年企业整顿怎么抓法，文件都有了，在提问题时要更突出一些，做出具体部署。

这次工交会议一定要解决问题，已经有了政策规定的和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都不要拿到会上去讨论。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抓落实、抓具体。

关于政策问题，总的是要稳定、完善，不会有大的变动。包干、扩大自主权、所得税等都要稳定。必须改和能够改的，搞几条，在会上议一议，经过修改报国务院审批。例如社队企业纳税，除个别产品外，按统一税率纳税，不能优待，否则就挤垮了城镇集体所有制。（万里同志：不能保护落后。）

关于关停并转问题。体制改革办公室搞了一个调整文件，还不成熟，可以先发到会议上讨论。对关停并转，总的还要搞，一些同志说，上半年事情比较多，强调过分会引起一些问题。是否作为企业整顿的一个内容，不单发文件。

关于政治思想工作，要扶正压邪，敢于同错误的思想、行为和歪风邪气作斗争。（谷牧同志：要有点斗争性，一般说不行。）（万里同志：给正气撑撑腰。）

现在有必要在城市里认真进行一次经济形势的宣传教育。在城市里，好多问题我们没有讲清楚，有些人有点无名之火，动不动就骂人，还很有市场。我们要讲清楚给人民于了一些什么事，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三大爱（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三小爱（爱企业、爱集体、爱本职工作）的教育，贯彻落实陈云同志提出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使多数人把真相弄清楚了。宣传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正确进行经济工作的宣传，认真抓一下。城市究竟怎么样？很多同志有点灰溜溜地，好像对不起人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三中全会以来，党给人民办的事，任何时期都比不上。六百万人就业，国家一年补贴几百个亿，宿舍盖了多少，工资、奖金的提高，要摆开来讲，每家都要算账。

经济工作的宣传报导，要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一致起来。新华社对冒尖户宣传要注意，不要再宣传了，在农村没有普遍意义。一年靠什么搞一万元，有些是投机倒把来的，在城市有很大的副作用。顺便打个招呼，请人民日报、新华社注意，对冒尖户不要宣传了，特别是万元户。我国农业发展极不平衡，逐步富起来的地方，农民手中的钱多了，要提倡首先把钱用到发展生产、改善住房条件等上面去。对极个别的冒尖户、农民坐飞机旅游、进城吃烤鸭等一类事情，不要再广为宣传，防止引起副作用。（万里同志：对老干部安排的宣传也要注意，不然老工人有意见。全国发展很不平衡，要照顾全局。）

关于工业企业的调整、改组、联合问题。我去常州的时候，建议采取广东清远县的办法。常州的经验很好，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常州没有中央企业，没有省属企业。社会主义大协作，“一条龙”所以能行得通，是因为市委说话算数。常州经验的精华，是能组织协作。现在，常州的工业书记调到南京，他说，我到南京就毫无办法，很多看得到、摸得着的生产力，就是组织不起来。南京真正搞活，不得了，一个南京可以变五个南京。因此，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有两种工业城市：一种是上海，权力很大，不管什么企业都能调得动，都能组织起来。第二种是中等城市，如常州、无锡、沙市、襄樊等，事实证明，这些城市搞成功了。但

省会就不好搞，哪一个省会搞得好了？重庆就比成都好。成都，都是山头，都要插手。陈巫显同志在湖北增加了几个省辖市，就好搞了。地辖市都不大好搞起来，干预太多。城市组织联合、协作，是很大的生产力，但现行体制限制太大。上海和中央体制并无什么矛盾，统一管理企业。能不能再试一个天津？扩大它的自主权。

关于技术改造问题。重大技术改造项目，特别是鞍钢等大型企业的技术改造，机械部门、科研部门和使用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研究如何改造。利用国内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很重要，要把国内已有的先进技术好好用起来。二汽就是以“聚宝”为主，适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像鞍钢这样的重大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定下来以后，由冶金、机械部门组织去搞，尽可能采用我们已有的先进技术，不要各搞各的。

关于技术攻关问题，会上要集中讲讲。今年技术攻关从什么地方开始，每个部门还有企业如何组织攻关，要把这个课题突出出来。工业部门的科研单位，要坚持以应用技术研究为主，积极为生产服务。各个部门、各个企业要围绕技术改造、节能等，组织攻关，明确任务，提出课题。没有任务、课题，很难组织攻关。计委、经委、机械委、科委，要在一起好好研究一下攻关怎么搞，从今年内开始着手搞起来。

关于有偿技术转让和打破封锁问题，这次能不能订几条，在会议上征求意见。要订出几条打破封锁的办法。例如，到外地择优购买设备，任何人无权干涉。现在机械工业出现了买方市场，这样才有了服务态度，才有质量，才有新产品。现在封锁严重极了，有的地区用行政命令，不许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有的省规定，谁买他的汽车就供油，银行就贷款。应该规定，谁也无权这样搞，这样搞是犯法的。要保护竞争，这样，调整改组才有可能。这些问题，光讲道理不行，还要有硬性规定，行政办法。我不相信，实行了财政包干，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国务院是中央政府，要有明确态度，银行贷款一律不能支持搞封锁。（万里同志：在报上公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不能搞地区封锁。经济上一方面要进行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有有效的办法，这次你们要议几条。

打击走私贩私
继续贯彻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广东和福建两省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讲四点意见：

第一点，广东、福建两省几年来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国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对内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广东、福建两省搞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方向都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要继续坚持，不断总结，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不断有所前进。

第二点，要进一步认识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现在揭露的材料，已经令人触目惊心，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特别是要看到对党、对干部队伍的腐蚀相当严重，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毒化相当严重。

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情况如此严重，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我们既要敢于利用目前国际的有利条件，对外坚持开放政策和对内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以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必须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场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不能因为实行开放政策，就看不到这一点；也不能因为看到这一点，就对已定方针发生动摇。要清醒地充分地认识这一斗争的严重性、长期性，并认真对待。只有这样，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和对内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也才能取得成功。对此，既要有充分的信心，也决不要掉以轻心，更不能昏昏然，糊里糊涂，那样肯定会招致严重后果。

这次会议的重大收获，是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进一步提到了全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第三点，坚决地把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斗争进行下去，搞到底。无论广东还是福建，领导上都要继续以大的力气抓好这件事。通过斗争，一则打击犯罪活动，一则教育干部。要通过办案子，揭露材料，使广大干部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虽然不搞群众运动，但必须教育干部。要坚决地搞下去，不要半途而废，更不能“水过鸭背”。打击走私贩私、惩治贪污受贿，总的精神应当是坚决一些，严厉一些，必要时还要开杀戒。当然，要搞准，不能多杀人。但是，对这个问题不采取坚决、严厉的态度，就制止不下来，而且会越来越

陷入积重难返的境地。我估计，受贿问题广东会相当严重。为什么这样讲？从国内发生的问题看就可以说明。我这次去浙江，宁波地委书记郑重地向我提出，他说，现在不搞点关系户根本办不了事情。如果不搞，我们的社队企业都要垮，搞不到原材料，货运不出去，产品销不出去。这些问题谁也认为不对，但谁也不得不这样搞。一个企业不这么搞，马上产品就销不出去，来不了原料、材料。据反映，现在下面到北京一些单位来办事，要是不送东西也难办成。香港、澳门反映，跟一些国人打交道，就要给东西。广东同外商打交道的人相当多，收东西的面也会相当大。开始是占点小便宜，沾了边不改，就会越陷越深，愈演愈烈。现在如不下决心转过来，发展下去，我看至多三年就无法收拾。如果这些问题刹不住，精神文明搞不起来。不反对坏的东西，好的东西就提倡不起来。

我赞成不搞运动，抓大案、要案，而且重点是内部。但是，下一步如何解决？要通盘考虑。这场斗争不只是办几个大案，更重要的是通过办案教育干部。今后要加强立法，发现一个，处理一个，要研究制定一整套监督、检举、检察、处置的条例、办法。如果只是办几个案子就结束，现状不会有多大改变。干部在一定的时候要洗手洗澡，把过去的问题讲清楚，贪污受贿的财物全部退出来，并保证以后不再干了。不仅广东、福建，全国都要这样做，要有全盘布局。

现在需要开始着手制定一个惩治走私贩私、贪污、行贿受贿的条例，加以公布，从严执行。不要只看到面大、人多的一面，而且要看到另一面。人民对这些东西是极为不满的，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将会大大增加全国人民搞四化的信心。要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并认真坚持执行，使我们在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对内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中自己不腐化，党不变质。今年如果我们能把这两件深得人心的大事抓好：一个是进行机构改革，克服官僚主义；一个是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严肃处理经济方面的重大犯罪案件，那么就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国人民的精神会为之一振，社会的风尚会为之一变，国外对我们也会有一个新的看法。

第四点，陈云同志讲，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总结经验，两省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目前也是要认真总结经验。两省成绩是主要的，总的说，已确定的方针政策今后要坚持；当前主要应总结经验，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对某些不适当的规定、办法也要作一些调整。这样做，正是为了使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更好地、更健康地实行。经过总结，认识统一了，政策界限更明确了，管理跟上了，也就为采取进一步灵活、特殊的政策措施作了准备。不是说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已经够了，还有不够的一面；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总结一下，使干部头脑清醒一下，把工作跟上去，这样会搞得更好。本来有些还可以开放的，但现在还不能搞，就是因为干部水平跟不上，管理跟不上。所以当前一个时期要集中抓一下总结经验。

有些什么问题需要我们解决，你们还要留下来谈。上午姚依林同志讲的我同意。

（一）关于计划管理问题。两省实行特殊政策也好，灵活措施也好，还是以

计划经济为主，要搞好综合平衡。当然，计划工作要注意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起来。

（二）进口消费品向内地省份倾销、高价抢购外省农副产品出口问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

（三）统一对外问题。现在两省的一些县社企业都可以对外发生经济贸易关系，一些港澳商人同县社企业直接挂钩，这就为走私行贿、投机倒把、腐蚀干部制造了温床。两省既然实行特殊政策，对外适当分权是可以的，但像现在这样多头对外，放得太多是会发生混乱的。还是要适当集中，统一对外。应研究一些措施，制止这方面的混乱现象。此外，对地方留成外汇的使用，也必须加强统一管理。

（四）物价和货币投放问题，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农副产品议价太多，怎么转过来？我认为，要开好县委书记会议，准备一场大争论。农副产品统购派购搞起来不容易，放开容易；放了以后就不好收。我估计，没有一场大的争论收不回来。二是奖金不控制不行，要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

（五）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当然，两省可以搞快一点。但是，看来两省的力量用于技术改造少了，用于搞新摊子多了。基本建设规模在全国要调整压缩，广东、福建不同一点，但也要适当控制，量力而行。如果要求过高过急，也容易助长下面乱搞。

解决这些问题主要靠省委认真调查、研究。

厂长必须具有大学文化水平和实践经验*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对李力来信的批语。

燕山石化总公司原向阳化工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李力[1]同志对新颁布的厂长条例提的几点意见值得重视，请印发中央常委、书记处、国务院常务会并全国工交会议参阅。

李力同志特别提出，对于国家的骨干企业来说，厂长必须实际上具有大学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的实践经验，副职只设一人，这是他多年来当厂长的经验，切中企业的时弊。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利于改变我们企业的落后面貌，使之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当然，厂长条例刚刚颁布，不必急于修改。我意可在企业整顿中，先选少数企业试行。根据试行效果，再作考虑。

注 释

1．李力（1921—2006），锡伯族，辽宁沈阳人。时任北京燕山石化向阳化工厂厂长、党委书记。曾任沈阳化工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化工部合成材料处处长。

关于组建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批语和指示

一九八一年七月至一九八二年二月

一、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在上海高桥炼油厂《组织联合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的报告上批示：“必须直接动手，突破一点，首先解决上海高桥地区的联合，取得经验，然后再着手第二个，第三个。”同年十一月，成立了我国首家特大型跨行业石化企业—上海高桥化工公司。

二、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对联合石化、化工、纺织等部门的企业新成立的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做出指示：“公司一成立，就已经实现了联合。石油化工总公司是联合的产物，要发挥联合的优势，使石油化工的综合利用和经济效益有比较明显的增长。”[1]

注 释

1．石油化工管理体制改革，牵动条条块块的利益，方方面面议论纷纷，很多人赞成，也有些人不赞成。1982年2月19日赵紫阳对于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财政部等四个部委《关于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报告》做出明确指示，对原来分属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等部门主管的炼油厂、石油化工厂和化纤企业实行集中领导，统筹规划，对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实行统一管理。1983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正式成立。李人俊任党组书记、董事长，陈锦华任党组副书记、总经理。该公司的成立，对于用好一亿吨石油，搞好石油化工综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打破了条块分割，改组改造石化企业，实现石化企业的联合，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让文明礼貌成为全民行之久远的风俗习惯*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开始时的讲话。

全民文明礼貌月从三月一日起就要开始了。

我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国人民都来积极参加这项活动，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级干部在这项活动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号召全国人民通过文明礼貌月的活动，努力改变我国的城市，首先是大中城市的面貌，清除环境脏、秩序乱、不讲礼貌的现象，使它变得清洁，有秩序，所有的市民和各方面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都要讲礼貌。城市首先要这样做，乡村也要逐步跟上来。

全国城乡都来讲清洁卫生，讲文明礼貌，就能增进健康，振奋精神，整顿公共秩序，加强团结互助，减少混乱现象，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社会风气。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目标，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对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

我们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做事从来就讲“认真”两字。我们决定开展文明礼貌月的活动，就一定要认认真真和扎扎实实地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都要根据当地具体条件，订出具体要求和具体措施，从切实易行、人人做得到和人人应该做的事情着手，做好组织工作，深入进行督促检查，使文明礼貌月的活动取得明显的成效。我们立志改革，一定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在全国开展了“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五讲四美”活动。这是我国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活动得到了各族各界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今后，我们要把这项活动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要做到有计划，有目标，有组织，有措施。从今年开始，我们年年都要举行“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逐年扩大范围和提高标准，使它成为我们全国人民的一项行之久远、功效卓著的风俗习惯。

我们中国素来以文明古国、礼义之邦著称。在过去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以讲清洁，讲秩序，讲礼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赞扬。我们一定要发扬这一光荣的革命传统。

让我们大家动员起来，人人讲清洁，人人讲秩序，人人讲礼貌，把我们伟大

的祖国建设得更加清洁美丽、团结友爱、繁荣昌盛！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日

各位委员：

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工作，是举国瞩目的一件大事。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以后，两个多月来，这项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好。现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国务院精简机构的方案和进展情况

现在，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已定，安定团结的局面日益巩固，政府机构的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条件也已成熟。抓紧做好这项工作，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重要的一环。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一结束，国务院根据这次大会决议的精神，在对政府各项工作做出全面安排的同时，立即有步骤地着手进行国务院和所属各部、委的机构改革。中共中央对此作了这是赵紫阳就任国务院总理以后，首次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就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所作的报告。这是在遭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与破坏后，国务院为适应新形势需要进行的首次重大机构改革，从而揭开了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序幕，为政府系统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精简机构、提高效能，搞好宏观调控，促进职能转变，准确发挥政府功能，打下了基础。阅读本文，要和阅读他《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进展情况和三项议案的说明》（见本书第463页）以及《关于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意见》（见本书第453页）等文结合起来，以便全面了解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有关情况。

明确的原则指示，胡耀邦同志、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同志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经过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同志反复研究，经过多方面地听取意见和充分酝酿，现在精简国务院机构的总体方案已经初步拟定。各部、委的精简工作，正在积极而又深入细致地全面展开。先行一步的十二个单位，在机构设置、部局两级领导人选和机关人员编制等方面，已经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国务院机构的改革，首先必须改进国务院本身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率。因此，我们建议，减少副总理，设国务委员，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现有副总理十三人，减为二人。国务委员的职位相当于副总理级，一部分兼任部长或委员会主任，一部分为专职委员。他们受总理或国务院常务会议委托负责某些方面的工作和重要的专项任务，在对外事务中经总理委托可代表总理进行重要活动。国务院常务会议是国务院的日常领导工作机构，在总理主持下，负责对国务院职权范围内的各项重要工作进行领导和决策。

国务院各部、委和国务院直属机构、办公机构的设置，必须做到分工合理，职责分明，机构精干，提高工作效率。根据重叠的机构撤销、业务相近的机构合并的原则，拟将现有的九十八个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裁减、合并为五十二个左右。其中，部、委由五十二个裁并为三十九个，直属机构由四十一个裁并为十个，办公机构由五个裁并为三个。此外，国务院现在还有临时性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委员会等各种非常设机构四十五个，这些机构绝大部分都要撤销，其工作由各有关部、委承担。国务院和各部、委的机构精简之后，工作人员编制约为三万二千人，比现在的四万九千人减少三分之一左右。

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国务院第一位的任务是领导经济建设。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特别是搞好战略性的长期规划，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国家日常经济活动的指挥必须集中统一，目前领导多头、管理分散的状况必须改变，为此决定重新组建国家经济委员会并扩大其职权和业务范围。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农业、工业、基本建设、铁路交通、财政金融、内外贸易各部门当年经济技术活动中需要组织协调的事项，统一由国家经委负责。国家当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也由国家经委负责组织实施。撤销现有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和国务院财贸小组，它们主管的业务一部分由重新组建的国家经委负责，一部分划归有关的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技术政策，会同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提出重大的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组织协调科学技术力量进行攻关；科学技术规划和生产技术工作分别划归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使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防工业办公室合并，统一管理国防工业的科研试验和生产工作。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各部、委行动很快，第一批先行一步的十二个单位已经取得了令人高兴的成果。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合并组建水利电力部的方案，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合并组建商业部的方案，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组建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方案，都已经分别酝酿成熟。国务院管理供销合作事业的行政机构同商业部合并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这个群众组织仍然对内对外开展必要的活动。保持部的建制不动的化学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都已经分别提出了内部机构精简方案。裁并部、委的方案和新的部长人选经这次人大常委会审

议批准后，就可以立即付诸实施，按新的建制开始工作了。

从以上十二个单位的改革方案来看，机构臃肿、领导班子老化和人浮于事的状况，将有很大的改变。这些单位精简后，部级单位由十二个减到六个；部内的司、局级行政机构由一百八十个减到一百一十二个；机关工作人员的编制，由原有的八千六百九十三人，减到五千八百六十四人，减少百分之三十三。变化最大的是部、局两级领导班子精干了，副职大大减少了。部长、副部长原有一百一十七人，现在配备二十七人，减少百分之七十七。正副司、局长原有六百一十七人，现在配备三百零四人，减少百分之五十一。

这些单位精简后，部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将由六十四岁降到五十七岁；司、局级干部的平均年龄，将由五十九岁降到五十三岁。大学文化程度的于部，在部级领导班子中，将由原来的百分之三十一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八；在司、局一级，将由原来的百分之三十二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五。新提拔的领导干部，有部长二人，副部长五人，正副司、局长五十七人。这些情况表明，在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方面，向前迈进了可喜的一步。

在机构改革中，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许多老同志认为，我们这次主动地进行国家机构的改革，搞好新老干部的交替，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为子孙后代立个榜样，定个规矩，这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许多老同志高高兴兴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满腔热忱地推荐年富力强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他们说得好，退是为了进，个人退下来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定将更好地前进。许多老同志在主动申请退休离休或退居二线以后，为了把机构改革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完成得更好，他们仍然为国操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思考种种方案，物色优秀人选，认真负责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这种对革命事业认真负责、忠J自耿耿的高尚品德，是十分令人感动的。许多中、青年干部表示，一定要很好地向老同志学习，谦虚谨慎，努力工作，接好革命的班。我们的干部队伍，不愧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培养教育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这支队伍，胸怀全局，不谋私利，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们以革命事业为重的高度觉悟，是机构改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两个多月来，尽管机构改革的任务很重，牵涉面很大，但它没有引起任何纷扰或业务的停顿，政府的各项实际工作都一直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的国家是稳定的，全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是好的。这充分表明，经过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强有力的拨乱反正措施，政治秩序已经稳定，政治生活已经正常。这也充分表明，关于改革政府机构的决策深得全国的人心，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这项重大改革。那种畏难的情绪，悲观的情绪，无所作为的情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国外有些幸灾乐祸的人评论说，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改革。这种预言只能以彻底破产告终。

二、基本方针和几项主要工作

我们国家政府机构的改革工作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总结经验，乘胜前进。

今年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机构改革问题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但这是一场对于机构、体制的革命，而不是对于人的革命。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十分重要的。目前，机构臃肿、层次重叠、职责不清、效率很低的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进行这场革命。如果不进行这场革命，党和政府正确的方针政策就不能充分贯彻，官僚主义严重和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就不能真正克服，那样，我们的事业就没有希望。用革命的精神来进行这场重大的改革，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我们的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决心要大，工作要细。首先要有必胜的信心，同时要稳步前进，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国务院前一段的机构改革工作，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进行的。今后，我们还要这样做。

国务院认为，根据上述基本方针和前一段的实践，在机构改革中，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工作，重点解决好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必须首先明确各部门及其所属机构的任务和职责范围。通过这次机构改革，一定要坚决改变那种分工不合理、职责不分明的状况。只能因事用人，决不能因人设事。一个机构可以办的，就不要设许多机构；一级机构可以办的，就不要设几级机构；一个人可以办的，就不要配备几个人。每个机构，每个人，负什么责，办什么事，都要有个章程。第一批先行单位的精简工作，就是从认真讨论机构的职责范围入手的，今后各单位也都要这样做。机构精简之后，还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各部门上下左右之间的工作关系。举例来说，国务院各部、委之间的关系，国务院各部、委同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及其所属厅、局之间的关系，行政组织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机构怎样才能更好地管理企业事业单位并为它们服务，这些问题都要一一研究清楚，订出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过去种种互相扯皮、互相推诿和无人负责的现象，固然是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表现，但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职责不清、分工不明造成的。我们只有认真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才能更有效地为人民办事。

第二，选贤任能，配备和建设好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环。在国务院各部、委，关键是配备好部、委和司、局两级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精干，要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部的正副职配备三至五人，司、局的正副职配备二至三人。部长的年龄，一般不超过六十五岁；副部长和正副司、局长的年龄，一般不超过六十岁。考虑到干部的现状和工作的交替需要有一个过程，经过上级批准，个别的年龄可以大一些，作为一定时期的过渡。配备领导班子，不能只从现有成员中挑选，必须注意选拔德才兼备的比较年轻的干部。要注意培养选拔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以及近几年在政治上或经济上严重违法乱纪的人，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撤下去。

第三，认真安排好老干部退休离休和退居二线的工作。从这次开始，要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使干部退休离休和退居二线这件事制度化。我们的国家是经过了长期革命战争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批的老同志不仅在革命战争时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在建国以后为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为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这批老同志为中坚，为骨干，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了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三十多年来，我们所以能够战胜许多风浪，克服许多困难，使社会主义事业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同我们有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分不开的。我们要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继往开来，必须继续依靠这支队伍，并且有秩序、有步骤地解决好新老干部的接替问题。国务院各部、委都有相当数量的老干部要退休离休，各单位要认真负责地把这件事安排好。老干部退休离休之后，主要的任务是继续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写好写完自己的革命历史，教育青年一代，并尽可能采取适合于自己条件的方式为人民服务。他们的基本政治待遇不变，对在生活上和医疗上确有困难的同志，物质待遇略为从优。这样做是符合人民的意愿的。除了退休离休的以外，有些老干部身体还好，有比较丰富的领导经验和专业知识，但因年龄或名额的限制，没有进入领导班子，退到了第二线。这些老干部，有的可以担负一定职责的顾问，有的可以参加一定的调查研究、参谋咨询和检查监督工作，有的可以从事力所能及的科学教育文化活动或多种社会公益活动。总之，这些都要一一落实，使所有退休离休和退居二线的老干部，都能各得其所。

第四，切实加强干部的轮训工作，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素质。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建设。建国初期曾经着重进行过这项工作，但是后来中断了，吃了很大的亏，是一个严重的失策。现在必须把这项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下决心，花本钱，进行智力投资。目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过多，其中许多人又没有认真钻研和精通专业，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他们大多数人毕竟已经有了相当的工作经验和业务能力，能够继续在国家所需要的各种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这对我们在精简机构以后分期分批地轮训干部，也是一个有利条件。因此，这次精简，各部门编制只定额不定人，不定谁是编内、谁是编外。只要有条件学习的，都要为他们创造学习的机会，轮流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本领。学习一段再工作，工作一段又去学习，在学习和工作中分别进行考核，从中陆续选拔优秀干部到更需要更适当的重要岗位上去。我们的事业在发展中，迫切需要各种具有新的专业知识的人才。干部轮训搞好了，干部才干增长了，我们的事业肯定会发展得更好更快，由此而产生的效果是不可估量的。

国务院认为，坚决执行上述基本方针，认真做好上述主要工作，机构改革肯定会健康地向前发展。机构精简了，工作效率必将有所提高，但要真正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还必须进一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制度和工作作风。我们不仅要革臃肿的机构的命，而且还要革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的命，革形形色色官僚主义作风的命。如前所说，我们所进行的这场深刻的革命，是要改革

国家行政机构中那些同经济、文化、政法等各项建设需要不相适应的部分，而不是革什么人的命。为了更好地解决体制改革这个难度最大的问题，国务院建议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总理兼主任，负责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今后我们在各项改革中不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和阻力，都要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去克服它们，努力把国务院建设成为机构精干、工作效能高、密切联系群众、很少官僚主义习气的政权组织。

三、提请批准和任免的事项

（一）提请原则批准国务院精简机构的初步方案；批准增设国务委员；批准将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合并组建水利电力部，将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合并组建商业部，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组建对外经济贸易部。

（二）提请批准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总理兼主任。

（三）提请任命钱正英[1]为水利电力部部长，刘毅[2]为商业部部长，陈慕华为对外贸易部部长，秦仲达[3]为化学工业部部长。煤炭工业部部长仍由高扬文[4]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仍由郝建秀[5]担任。

（三）提请免去李鹏[6]的电力工业部部长职务，钱正英的水利部部长职务，王磊的商业部部长职务，牛荫冠[7]的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职务，赵辛初[8]的粮食部部长职务，谷牧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郑拓彬的对外贸易部部长职务，陈慕华的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职务，孙敬文[9]的化学工业部部长职务。

各位委员：

我们政府机构的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现在只是开了一个头。就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来说，第一批已经提出精简方案的单位，待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将方案付诸实施，还要继续做大量的工作。尚未提出精简方案的单位，待方案确定后，将由国务院分批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在精简工作中，一定要确保工作、精简两不误，决不允许发生松懈、脱节和混乱现象，决不允许贻误工作，影响生产。各省、市、自治区政府的机构改革，除个别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在适当时机进行试点外，一律从明年开始。总之，我们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坚定不移地把机构改革工作做好，不断地完善政府工作制度，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使政府机构的工作作风和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我的报告完了。请各位委员审议。

注 释

1．钱正英（1923—），浙江嘉兴人。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曾任水利部副部长、部长，电力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2．刘毅（1930—），山东乳山人。时任商业部部长。曾任山东省财贸办主任，商业部副部长，国家旅游局局长。

3、 秦仲达（1923—），山东荣成人。时任化工部部长。曾任大连化工厂厂长，化工部生产办主任，燃化部生产组组长。

4．高扬文（1917—2004），山东蓬莱人。时任煤炭部部长。曾任冶金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北京市委书记，国家能源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5．郝建秀（1935—），山东青岛人。时任纺织部部长。曾任青岛国棉八厂副厂长，青岛市委副书记，纺织部副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6．李鹏（1928—），祖籍四川成都，生于上海。时任电力部部长。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兼国家体改委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7．牛荫冠（1919—1992），山西兴县人。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曾任江西省政府副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

8．赵辛初（1915—1991），湖北黄梅人。时任粮食部部长。曾任湖北黄冈地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副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

9．孙敬文（1916—1998），河北黄骤人。时任化工部部长。曾任城建部、石油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石化部副部长、部长、顾问，全国人大常委。

围绕提高经济效益 做好工业交通和整个经济工作*

一九八二年三月四日

* 这是赵紫阳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搞好今年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交流了经验，研究了措施。大家反映，这次会议抓得早，指导思想比较明确，中心比较突出，开得是好的，对今年的工交工作将会有很大推动。现在讲以下几点意见：

一、关于提高经济效益问题

全国工业生产在去年取得很大成绩的基础上，今年一开始又有新的进展。从一、二月份的情况看，势头是好的。看来，今年实现“保四争五”的发展速度是完全可能的。今年的危险，主要不是能不能增长4%或5%的问题，而是可能发生不注意经济效益的问题。据反映，目前层层加码、压产值指标的情况还是不少的。中央提出今年“保四争五”，已经考虑到各省的计划增长速度，列入了国家的统一计划。但是，有些地方和部门下达指标时，又不顾条件层层加码。大家想把产值搞多一些，把增长速度搞快一些，这是无可非议的。在调整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不能认为速度越低越好。问题在于要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我们要努力实现效益又好、产值增长又快的目标，这样的速度高一些当然好。如果只追求产值，不顾效益，这样的“速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不如搞扎实一点好，以免务虚名，受实害。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忽视产值，而是忽视效益。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增加产值上劲头很大，对提高经济效益却重视不够，或者停留在口头上，缺乏切实有力的措施。国务院认为，当前有必要强调端正工业生产上的指导思想，就是说，要讲求经济效益，有一个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速度。不仅工业生产上是这样，在基本建设、流通领域，以至整个经济工作中，都有个端正指导思想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在工业生产上不顾效益，盲目追求产值增长，办了很多蠢事。在1958年以后的几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产值的水分相当大，浪费十分严

重，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也还有这个问题。去年虽然水分比过去少了一些，但是许多地方在第四季度上得很猛，也带来一些问题。各省都要对去年速度中的水分计算一下，使头脑清醒。盲目追求产值增长的结果，势必造成大量物资积压。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81年末商业部门库存超储积压的主要产品有58种。有些产品从局部看，增产是有利的，但从全局看，就恰恰相反。像华东、东北等地本来能源就十分紧张，有些地方却大量超计划生产铁合金等耗能高的产品出口，使华东、东北电网能源供应，不得不靠“寅吃卯粮”超负荷发电来维持。这样下去，不仅使比例失调加剧，而且必然会重复发生过去那种“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的现象，最后还得靠银行发票子来补窟窿，致使国家和人民受实害。如果说过去没有经验，做一点蠢事难以避免；那末，现在应当学得聪明一些，绝不能继续干过去那种蠢事了。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注意经济效益是各项工作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我们应当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挖潜力，求速度。去年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提出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其核心就是提高经济效益。既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方针，我们在行动上就要体现这一方针，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今年我们一定要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有个大的转变，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我们讲经济效益，首先应当明确这样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要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前半句是讲要尽可能地节约，使活劳动和物质的消耗尽量减少；后半句是讲要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在这里关键是产品必须“符合社会需要”。只是讲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还不行，这个提法不能体现经济效益。如果产品不是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得越多，浪费就越大。所以，我们生产的产品，包括质量、花色、品种，也包括一定的数量极限，必须符合社会需要，适销对路。这种需要，是现实的需要，是适合于现实投资水平和购买力水平的需要。社会需要是多方面的，有生产的需要，有生活消费的需要，对两大部类的产品都有要求。社会需要是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不断地变化的，各个阶段各有不同的需要，各个地区也各有其特殊的需要。不论生产高中档产品，还是生产大路货，都要符合社会的需要。只有产品符合社会的需要，才能使它的劳动消耗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能使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得以实现，不致成为无效的劳动，成为无用的东西。

我们的计划，应当从全局出发，瞻前顾后，尽可能地反映社会的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产品不符合社会需要，不适销对路，就谈不上按比例地、协调地发展。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恰恰忽视了这个根本点，因而发生许多问题。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这正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很好地研究社会需要，不断地满足社会需要，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这个指导思想，必须牢固地树立起来。全党搞经济工作，应当在尽量节约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上下功夫，在符合社会需要上下功夫，努力在提高经济效益上走出一条新路子来。

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难度相当大。符合社会需要为什么不容易做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认识上的限制。社会需要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的，特别是事先不容易看得那么清楚，往往是在市场发生商品脱销的时候才知道缺，在仓库里积压得满满的时候才感到多。这就需要及时了解社会需要，了解市场的变化和趋势，改进和提高计划工作水平。另一个原因就是利益关系问题。我们要给企业以一定的利益，也要承认和照顾地方一定的利益。不承认这种利益就会吃“大锅饭”，大家都可以不负责任；但给了一定的利益，部门、地区、企业就容易按自己的利益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部门、地区、企业的决策有些是符合社会需要的，有些是和社会需要背道而驰的。有些产品，明明同社会需要对不上号，还要照常生产，工厂可以照拿利润，地方可以多得分成，商业部门、物资部门收购起来积压在仓库里也不着急，因为到最后要由国家的财政包起来。这样，产值中的虚假现象就长期存在而得不到解决。因此，提高经济效益，除了企业要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以外，从根本上讲，牵涉到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问题，要靠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体制来解决，否则没有出路。但是，我们也不能等经济体制改革好了，经济结构调整好了，再来行动。在当前体制不合理、结构不合理、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充分发挥领导的作用，就是说要加强计划指导和行政干预，加强监督和检查。各级计委、经委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发现积压的情况要负责查清，进行具体分析和认真处理。凡是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只是由于流通环节上的问题而积压下来的，要积极加强推销工作，特别是要打开农村的销路，有的还要打开国际市场的销路；对那些明明社会不需要的产品，从全局看属于不合理的产品，就要采用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坚决实行行政干预，不要怕得罪人。有些产品，的确生产过多了，就要限制生产。有些产品一时短缺，也不要一哄而上。我们讲经济效益，不仅要看到眼前的、局部的效益，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长远的、全局的效益。为了使生产的产品符合社会需要，除了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计划，采取行政干预和经济措施外，必须加强市场预测，改进计划工作。同时要尽快制定、公布产品的经济技术标准和建厂标准，严格执行，以制止盲目建厂、盲目生产。

把经济工作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是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做出成效，这是经济战线广大干部、职工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对我们大家的新考验。

关于当前的工业交通工作，大家反映比较集中的是能源、交通问题。我讲三点：第一，煤炭部、铁道部、交通部要进一步作出努力，把煤炭生产搞好，把调拨和运输搞好。今年头两个月煤炭生产情况是不错的，运输也是好的。但按计划调拨执行得比较差，要采取切实的措施，扭转这种状况。第二，各地要按照能源供应情况安排生产，对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的要求，应同当地的能源供应求得平衡，否则就会落空。现在有些地方自己提出很高的指标，然后又要求国家多调煤炭，这是办不到的。第三，能源供应当前不可能再增加，出路主要靠节约，要千方百计在节约能源上想办法，不如此矛盾无法解决。

二、关于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和全国一盘棋的问题

陈云同志最近对经济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再次强调：我们的国家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国家建设必须是全国一盘棋；必须执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根本方针。同时还指出，经济特区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这些都是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方针、原则问题，是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指示，同我们在经济工作上近几年所采取的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是一致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计划指导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没有这些改革，就没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这是首先必须肯定的。但是，在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上述几项原则。这也是我们党多年来坚持的根本方针和政策，不能放弃和削弱。现在，我们既要看到开放、搞活所取得的成绩的一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开放和搞活以后，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问题。对此，我们既要敢于利用目前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对已定的正确方针发生动摇；同时又必须足够地看到带来的问题，不能熟视无睹，放任不管。我们现在强调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强调全国一盘棋，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头脑清醒，采取措施，防止和解决出现的问题，正确地健全地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为了把国外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知识以及能够为我所用的资金引进来，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然开放，总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坏东西、坏影响。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等活动会在某些地方和单位泛滥起来，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腐朽思想会侵蚀我们党的肌体，干部队伍中某些意志薄弱者可能被“糖衣炮弹”所击中，党风、民风可能被污染。我们党曾经有过几次在实行新的重要政策和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的时候，提出要警惕被资本主义腐蚀的问题。一次是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当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克服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走出去，打开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同时，党中央明确指出，要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防止党内发生问题。那一次我们搞得很好，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大大发展了我们的力量，开创出了一个新局面，我们党没有被腐化，反而变得更加坚强。第二次是解放战争胜利后，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由农村进入城市，面对花花世界。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接着又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那时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状况非常好，经受住了考验。这一次我们利用国际国内有利条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又面临着一场新的严峻的考验。这一次在国内国外，特别是国际上，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我们党的影响，比前两次大得多，也严重得多。而且，由于经过十年动乱，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损害。所以，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及时向全党提出警惕被资本主义腐蚀的问题，

敲起警钟，清醒头脑，振奋精神，坚定意志，经受住这个考验。

现在，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等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比1952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这些东西对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的腐蚀相当严重，对整个社会风尚的毒化相当厉害，如不从现在开始立即开展坚决的斗争，再过两三年，在某些地区就会积重难返，无法收拾。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和对内实行搞活经济政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突出表现。同经济领域中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在新时期内整个反对资本主义腐蚀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长期的。这是一个关系我们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们国家兴旺还是衰败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我们要充分认识经济领域中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提高我们搞好这场斗争的自觉性。如果对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不给予坚决有力的打击，不只物质文明的建设必将受到很大破坏，而且精神文明的建设也根本提倡不起来。现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又搞“文明礼貌月”活动，群众讲，这样搞好，有希望了。经济战线各单位，一定要把这一斗争坚决进行到底，决不能走过场。当然，我们进行这场斗争，不采取搞运动的办法，而是采取办案的办法，特别是要抓一些重大案件的处理。这一斗争要结合企业的全面整顿、财务大检查来进行。要通过整顿和检查，发现线索，加强调查，查清问题，严肃处理，打击犯罪分子，教育广大干部。同时，要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堵塞漏洞，使犯罪分子无空子可钻。这样做，就会对改善经营管理，搞好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起到推动作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经济领域中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近来有所滋长。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又一重要问题。我们在国内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对地方下放部分权力，对企业扩大自主权，是为了调动地方、部门、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使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振兴我国国民经济。扩权、搞活以后，也容易产生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削弱和摆脱国家的统一计划，干扰和分割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影响全国一盘棋。有些地方和单位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观察和处理问题，而是从局部、从自己的利益上打算盘。对上，不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损大公肥小私；对左邻右舍，以邻为壑，损他人以利自己；对外，不执行统一对外、联合对外的政策，自相倾轧，肥水落到了外人田。比如，现在不管社会需要，不顾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盲目建设、盲目生产的现象还不少。有些地方，统购派购任务也被冲掉了。地区之间搞经济封锁比较严重，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我们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有统一的计划，统一的国内市场，决不能搞成一个省一个市场。如果那样搞，对我们国家政治上、经济上带来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又如在对外贸易上，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竞相削价、互相拆台的现象比较突出，已蒙受到不少损失。这样互相拆台，结果地方、企业得小利，而国家受大害。

为了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必须坚持大计划、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摆正全国一盘棋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对那些错误做法，国家就是要干

预，要令行禁止，决不能各搞一套。

（一）在对外贸易上一定要坚持统一对外、联合对外。在扩大地方、部门的某些外贸权限以后，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多头对外、竞相削价的错误做法。在外贸上适当扩大地方权力，这是必要的，但同时必须切实解决同类产品联合对外销售的问题。要以主要口岸为中心，组织同类产品出口的联营，加强协调，加强管理。特别是沿海九省市，按地区扩大外贸权力后，更要加强同类产品的联合对外，切实防止在外贸上自成体系的倾向，以免割断传统的、历史的协作关系。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必要的办法，以中心城市、主要口岸为依托，加强协调和联合。

（二）国家计划调拨的产品，包括农副产品，必须严格按计划执行。不得扣留自用，或拿去搞协作，议价出售。

（三）坚决纠正地区之间搞经济封锁。凡是按国家标准生产的合格产品，按国家计划定点生产的产品，除按计划调拨的以外，允许在全国销售，企业有权自行选购，各地党政机关不得干预。如有违反，企业有权抵制。要关心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适合由当地生产的产品，要从技术、设备等方面给以支援和帮助，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有更大的发展。

（四）物价和税收管理制度必须集中统一。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地方、部门、单位都不得擅自变动税率，自行减税或加税。凡属国家物价管理权限范围内的产品价格，不经国务院批准，不准擅自提价或降价。

陈云同志讲，当前经济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总结经验。我看不仅特区，也不仅广东、福建两省，全国都有个认真总结经验的问题。国内搞活经济的一些改革，外贸体制上的一些改革，都需要回顾和总结，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实解决出现的问题，以便使经济体制改革健康地深入地开展下去。比如企业扩大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是必须坚持的，但确实有个利润如何分配的问题，如何做到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兼顾，国家得多少，企业得多少，个人分多少，采取什么分配形式较为恰当等，都要认真研究。企业扩大自主权后，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也要相应跟上去。对地方适当分一些权是必要的，但应研究怎样避免块块之间搞封闭式经济体系，避免可能产生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不使它影响全国经济上必要的集中统一，影响全国一盘棋。外贸体制一方面应注意如何发挥各级各单位的积极性，一方面又要防止在外商面前，自己同自己竞争，挖自己的墙脚，这也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总之，对外坚持开放政策，对内坚持搞活经济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对存在的问题要重视，经验教训要总结。这样做，正是为了今后更好地推进改革。关于改革问题，初步的打算是：

（一）已经实行的经济政策今年总的不变，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在处理经济利益的政策上，国家对企业，国家、企业对个人，大体稳定在去年国家规定的做法和水平上，但个别单位存在极不合理现象的，要作适当调整。

（二）今年还要考虑明年怎么办的问题。要通过总结经验，提出对已实行的

政策、措施明年如何补充、完善和调整的意见。看来大致有二种情况：一种是方向对、效果好的，就坚持。另一种是方向也是对的，但有某些副作用，只要管理跟上去就能解决的，应继续实行，加强管理，使它巩固和完善；如果根本方向是对的，但在相当时期内管理工作不可能跟上去，副作用还不能消除，这种情况就要作适当调整。再一种是政策措施不恰当的，明年要适当改正。不管怎么改，总的精神是把加强集中统一和搞活经济结合起来，在全国一盘棋原则和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调动地方、部门、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

（三）要尽快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搞出来，使改革有个长远的打算。

三、关于企业的全面整顿和企业的调整问题

要提高经济效益，必须下功夫把企业整顿好。否则，一切工作都没有基础。关于整顿的目的、要求、方针、政策，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作了明确规定。我再着重说几点：

（一）今年第一批整顿的，要选择那些问题比较多、潜力大、急迫需要整顿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好的企业不要占很多，问题多的要先整顿。这些企业整顿好了，经济效益可以很快提高。有些企业领导班子强、基础工作好，由他们自己搞，或者放后一点搞。根据这个精神，各地确定的企业整顿的名单要重新调整一下。

（二）要重点抓好企业领导班子的配备和领导制度的改革。从国务院这次机构改革的情况看，调整充实企业领导班子的步子可以迈得大一些，搞得精干有力一些。中央机关一改，对企业会有很大推动。企业里人才很多，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熟悉业务、德才兼备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大有人在，应选拔一批进领导班子，使领导班子能够向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方面大进一步，有个明显的变化。为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次整顿中，选配企业的正副经理、正副厂长，应该有一个年龄限制。除了像鞍山钢铁公司这样的特大型企业，或者像中国船舶公司这样的全国性公司以外，正副经理、厂长应尽量配备五十岁以下的，最多不超过五十五岁。党委书记、职工代表大会负责人年纪可以稍大一点，但也不能太大。有些同志在企业里不到退休年龄，身体还好，可以退到二线，做参谋、顾问、咨询工作。有的同志建议大型骨干企业要选相当于大学程度的、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同志当厂长，这个意见好。有的企业如果选大学程度的人当厂长有困难，至少也要选具有中专程度的，或自学成才的。在这次整顿中把企业领导班子配好，企业的面貌才可能有大的变化。

（三）认真实行定员定额和职工轮训。这次机构改革以后，中央机关的大批干部都要组织学习、轮训。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事。在这次整顿企业中，随着经济责任制的落实，也要下决心把多余的职工调出来学习，坚持搞下去，几年后我们整个职工队伍的水平就会发生变化。把多余的人都泡在车间、班组里，弊病很多，一定要改。各地要努力创造这方面的经验。

（四）切实加强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全面整顿企业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各级经委和工业交通各部、各厅局要具体抓，蹲点组要

真正蹲下去抓。中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今年暂不进行机构改革，以便集中精力做好企业的整顿和其它各项工作。中央各部也要有专人负责，不要因为机构的变动而影响工作。要求有关各部立即开会研究，制定规划，派出蹲点组。国家经委要检查督促。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地搞两三年整顿，把企业的各项基础工作做好，达到中央的要求，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个企业调整问题。关停并转那些产品不符合社会需要、耗能很多、长期亏损的工业企业，制止盲目地新办工业企业，这是提高社会综合经济效益，实现企业结构合理化、工业布局合理化的一项积极措施。考虑到今年要重点进行企业整顿，又要处理经济违法案件，还要实行机构改革，工作量很大。因此，1982年企业调整的工作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首先是关停那些耗能特别高的冶金厂、化工厂，产品质量很差的机械厂、电子厂，经济效益很低的炼油厂，以及同先进企业争原材料、燃料、动力的某些县社工业企业。还要组织力量对企业摸底排队，制订调整企业的规划和关停企业的具体处理办法，为明年有计划地开展这一工作做好准备。

同时，还要注意有步骤、有重点地抓好企业的技术改造。在目前经济调整时期，一方面许多机械厂任务严重不足，而两千多万吨钢材却存放在仓库里，基建队伍也没有多少事干，还照样开工资，出管理费；另一方面工厂设备又日益老化，有些已到了非更新不可的地步。能不能想办法从哪里“启动”一下，使各方面都活动起来呢？可以考虑通过卖方信贷的形式，由银行贷一笔款给机械厂，把钢材转给它们，由它们加工成效能高的新设备，卖给需要的单位，把效能差、耗能高的旧设备换下来。这并不要花很多钱，因为进行技术改造，在一般情况下，设备就占投资的85%左右，其它还要搞一点土建，费用不多，可由地方或企业自筹解决。这样一搞，积压的钢材有了出路，机械工业活了，可供回炉冶炼的废钢铁增多，冶金工业也带动起来，国家的税利收入将要增加，工厂的技术装备水平也会发生新变化。第二汽车制造厂去年试行这个办法，效果良好。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今年就要起步。要围绕节约能源来进行，首先抓锅炉、汽车、变压器、水泵、风机等几种重要产品和一些基础元器件的改造。要抓好鞍山钢铁公司、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等大企业的技术改造，取得经验再行推广。

四、关于财政问题

1981年由于贯彻前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抓了调整，财政情况比预计的好。财政收入完成年计划的102.8%，收支相抵，财政赤字比向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的27亿元还少。但是，财政上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今年的财政预算还列有赤字30亿元。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形势好的一面，又要看到今年财政上有潜在危险的一面。如果不能实现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财政赤字增大，势必增发货币，影响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

今年总的精神是要巩固稳定经济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稳步前进。无论如何不能在经济初步稳定以后就掉以轻心，把潜伏着的危险重新激化起来。因此，中央和国务院要求，要进一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继续保持财政收

支、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

解决财政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要努力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搞好增收节支。除了已经部署的要继续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改变重工业服务方向，认真整顿企业等以外，还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稳定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现在货币投放多，各种补贴多，财政负担很重。1981年国家对30多种商品补贴达到320亿元，其中80%以上是和农副产品的价格有关。这两年农副产品虽然提价很少，但加价、议价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农副产品的实际收购价格仍在步步上升。解决这个问题，总的来讲，政策要稳定，但超过政策界限、突出不合理的，应加以调整。要参照浙江等地的做法，确定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基数；原来放弃了这个办法的地方，应当把它恢复起来。有些新产区到今年已过了三年，明年要考虑重新确定合理的征购任务或征购所占的比重。对超购加价、议价，也要予以整顿和控制。

（二）奖金的发放要加以控制。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今年大体稳定在去年水平上，重点放在解决发放中的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使奖金真正发挥作用。乱发奖金的现象要坚决纠正。

（三）严肃财政纪律，加强监督检查，堵塞跑冒滴漏。现在不少企业乱摊成本、偷漏税款、截留上缴利润等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必须引起重视，加以解决。年初进行的财务大检查收效不错，应继续进行。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四）基本建设投资一定要控制。现在列入计划的属于财政支出的基本建设，不可能有大的突破，但用自筹资金、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搞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已经相当大。这里面问题不少，各省、市、自治区要检查一下，有些项目效益很差，该停的要停下来；该继续进行的，要研究怎样把资金用好。再一个问题是，有些地方自己设立投资信托公司，拉走银行存款去搞建设。总的看，钱就是那么多，你这边搞了投资信托公司，他那边银行的存款就少了，实质上是把本来一部分用于流动资金的贷款，转向了基本建设，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现在重申，除了由国务院批准和委托有关部门批准的投资信托公司外，所有投资信托公司都交给银行。筹集、使用资金的任务一律交由银行办理，不能脱离银行另搞一套。总的讲，现在我们的整个经济形势已经走出“锅底”，但潜在的危险并未根本消除，宁可把问题估计得重一些，绝不能掉以轻心，盲目乐观。

五、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

在新的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决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加强。多年来我们的政治机关忙于搞运动，如何做好经济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还缺乏一套完整的经验。我们应当下功夫研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根据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同职工思想实际结合起来，做到有的放矢，真正解决问题。这次会议讨论了怎样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介绍了大庆油田加强职工

队伍建设的经验，天津碱厂通过学习厂史和中国近代史，开展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这些都比较生动，比较实际，具有说服力。我们要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坚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等根本指导方针和原则，在职工思想上扎根，在工作中落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在农村、城市都为改善人民的生活作了最大的努力，大多数群众是满意的。当前城市人民的思想状况总的说是稳定的、向上的。也要看到，现在城市里有少数人还不大满意，有一些牢骚。看来有必要在今年选择一个适当时机，在城市普遍进行一次生动的经济形势的教育。要通过这一教育，向城市居民全面地算一算账，让广大群众了解，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国家是在什么情况下来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物价涨了多少，人民收入增加多少，国家对城市人民补贴多少，就业增加多少，工资奖金总额增加多少，职工住宅增加多少，耐用消费品销售增加多少，城市储蓄增加多少，都一笔笔地摆开算算。全国有一本账，从1979年到1981年三年：安排回城的、城镇的待业青年2600万人；新建城市职工和居民住宅2.2亿平方米；国家每年对农副产品销售价格的补贴增加到200多亿元。职工工资总额1981年比1978年增加251亿元，增长44%；职工年平均工资由1978年的614元，增加到1981年的772元，增长25.7%，等等。每个城市、每个企业、每个单位也都有这样一本账，要通过事实、数字来说话。对存在的问题，也要实事求是地讲清楚。比如党政机关干部、科研人员、教师，集体企业一部分职工，实际收入提高不多，甚至有所下降。可以让群众公开地把意见讲出来，便于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也便于改进我们的工作。从上海、辽宁、徐州等地进行教育的结果看，这样做，大多数群众会明白真相，消除误解，感到党和国家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人民谋福利。上海第二织布厂通过算账，原来一谈生活问题就有牢骚怨气的职工，也变得心平气顺，干活有劲了。宁波市绣服厂一位党支部书记，她讲了几句很深刻、很客观的话。她说，工人讲，这几年，一是口袋里钞票多了，二是物价也涨了，三是收入支出仔细算算，还是口袋里钞票多了，四是青年人的要求也高了。工人群众是非常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认真进行经济形势教育，正气就能更好地树起来，流言蜚语就没有市场。

通过经济形势的教育，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引导人民群众，充分认识我国的国情，树立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思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各方面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生活的改善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实现，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是不对的，不能实现的。在生活问题上，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类比，也不能同盛产石油的国家或某些靠加工繁荣起来的国家和地区类比。为了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为了使全体人民达到“小康”的水平进而过更富裕的生活，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这就需要认真落实“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人民生活需要逐步改善，但也有个量力而行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投入建设，不断扩大再生产，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这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只讲生活

享受，分光吃光，不搞建设，富裕的生活是永远不会到来的。我们要通过教育，使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建设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目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我们深信，今年经过打击经济领域里的违法犯罪活动，提倡建设精神文明，加上经济形势的教育，人们的精神就会大振，社会的风尚也会大为好转。

关于抽纱出口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就陈云对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抽纱处来信的批示和1973年关于抽纱出口的谈话写的批语。

谷牧、慕华、拓彬同志：

陈云同志的批示和潘彤[1]等同志的来信及陈云同志1973年对抽纱出口的谈话，请你们找有关同志研究一下，提出解决办法。

对目前抽纱出口多头对外和收购库存积压问题，我同意：一、发许可证；二、不够自营条件的口岸，不经营这项业务；三、由总公司负责，组织口岸协调小组，加强管理，有仲裁权。至于是否划为一类商品，收上来由总公司统一经营，请你们研究提出意见。

印发国务院常务会议。

赵紫阳

三月十六日

注 释

1．潘彤，时任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抽纱处处长。

技术改造是振兴机械工业的重大步骤*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关于机械工业技术改造问题写给薄一波、吕东和万里、姚依林、袁宝华、财政部谢明的一封信。

今日我又把机械工业技改的文件看了一遍，感到很好。特别是首批改造，抓三十个产品、一百个厂、三百个协作厂及科研设计单位，整个机械工业的技术改造，将由此入手而逐步展开，这是十分正确的部署。可以说是向着振兴机械工业进军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对整个机械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希望机械委（未交接前）、一机、四机部继续抓紧组织落实。

昨天国务院常务会议似有几点还未明确起来：（一）首批改造单位提高折旧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原则同意，可以同财政部一起，逐个厂子解决（有些厂自有资金多的，也可暂不提高）；（二）对首批改造的科研、设计单位，或改造花钱多而对本单位受益不大的企业，可以从机械行业折旧费上缴国家经委的部分中拨出专款解决；（三）机械行业的研究、发展费用，国家要逐年增加一些，增加的费用，集中用于首批改造单位的新产品研制上。如你们同意，可附在昨日上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纪要上。

有重点地建设山西特大型煤矿井*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对山西煤炭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徐成山来信的批语。

请将山西煤管局副总工程师徐成山的来信摘要印发国务院常务会议各同志、经委、计委、煤炭部、城乡建设部、技术经济中心参阅。我认为徐成山同志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早出煤，多出煤，我们在如何开发山西煤矿的问题上，一方面要抓紧对现有矿井的技术改造，并在老矿区新建、扩建一些中小型矿井。这样投资小，工期短，出煤快。这一方针必须坚持。同时，应根据山西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地质精查储量，有步骤、有重点地建设浅部特大矿井或露天煤矿。从西曲矿井的施工经验看，在四年左右即可开始早期生产，五六年左右即可建成。当然有些大矿也可以采用一次设计，分期建设的办法。来信中提到的西曲矿井的施工经验等，值得重视，煤炭部和有关部门要加以总结。

对当前财政和银行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汇报后的讲话要点。

一、今年要继续做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赤字不能超过三十亿元。目前财政、经济情况是好的。但是，要实现今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财经纪律大检查和抓经济大案这些有利条件，大力组织收入；同时，要制止乱开减收增支的口子。财经检查要很好地抓下去，第一要查彻底，第二要争取多收回。要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我们的企业，现在也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违法户、严重违法户，要将这个名称叫出来，我们的政策不能使违法户占便宜，使守法户吃亏。今后应当始终坚持这个原则。目前较突出的问题是，各方面对控制财政支出有所放松，新冒出的问题和要求追加的支出比较多，这对财政平衡是很大的冲击。所以，今年财政平衡的关键，还在于控制开支。同意批转财政部《关于严格财政管理，制止乱开减收增支口子的报告》。

关于增加税收、银行工作人员的问题，此事要抓紧，发个文件，规定两条：一是招收条件，二是限定招收期限。

二、今后财政必须再筹集一部分资金，用于国内必须的重点建设。可以研究如何想办法把分散在部门和地方的钱，集中几十亿元，比如三十亿，一是搞煤炭交通方面的建设，二是搞原来已经进口的一些成套设备项目的建设。现在住宅的建设固然还是要搞的，但不能搞得太多。近几年每年竣工八千万平米，国家可以少搞一点，主要依靠企业自有资金去搞。

三、要综合研究外汇的使用问题。去年我们的外贸是顺差。现在一方面中国银行及外贸外汇低息存在外国银行不用，另一方面国内建设又大量借用外国人的高利贷款。其原因是，借用外资可以免税，而用国家自己的外汇资金，却得不到这种照顾。从一个部门、一个企业来看，借用外国人的钱，尽管是高利贷，也比用自己国家的外汇合算。但从国家这个全局来看就不利了。我国的财政资金不足，可是外汇是顺差，而又不利用，这不是正常现象。从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看，有少量外汇逆差是正常的；外汇顺差多了，不好。现在首先要考虑，用自己的外汇提前偿还外国的高利贷款，力求今年内还完。我们自己的企业，欠自己国家银行的债，总比背外国的高利贷要好。这条原则定了后，就决心去办，办得越

早越快越好。中国银行的外汇还贷款后，剩余的部分还可以用一部分来搞国家急需的重点项目的建设，也可以用来支持国内企业的技术改造。另外，对国际黄金市场趋势，也要进行预测，注意行情变化，价格低的时候，也可买一点黄金。外汇的使用问题，要统盘研究。由计委牵头，组织财政、银行、外贸以及经济研究单位进行研究，提出解决办法。

四、要少发票子，必须坚持第一控制开支，第二控制投放的原则。除用外汇搞点必要的建设项目外，基建规模一定要严加控制。为此，就要控制银行贷款。还要研究进口一些不排挤国内生产，而市场需要的原料性的产品，如生产复合肥料的原料，还有糖和木材等。这样既可以减少外汇顺差，又可回笼人民币。

控制货币投放的措施，一方面是要压缩和减少滞销商品的生产和收购，一方面是积极组织商品的推销。今年的商品销售额增长不快，主要不是供不应求，而是有些商品质量下降，或者是货不对路。要研究商品结构问题。有些商品在城市滞销，到农村可能就销出去了，甚至是畅销商品。现在的一大问题，还是销售渠道不通，主要是商品下不了乡。商业部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作为今年的重要工作来抓，要采取有力措施，光开会不行，要做具体的组织工作，大力推销。新闻宣传部门也要密切配合，推广一些好的经验。

流动资金的使用，也要加以控制。明确规定，生产无销路的产品不给贷款，销路不好的产品减少贷款，减少收购。农村议价、加价农副产品的收购也要控制，超过国家收购计划的产品，国家可以少收，也可以不收。浙江省对这一条执行得坚决，他们那里油菜籽的生产基本上控制住了。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暂时看是刺激了生产，到头来反而会起破坏生产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要开个会研究一下，对新产区可以把基数适当提高一些。对老产区的原则是既不伤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超计划收购的产品也作必要的控制。

关于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意见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日

一、国家体改委要组织各经济研究机构、各经济管理单位有经验的干部来共同进行工作。北京有几十个研究所，可组织各方面经济学家、专家共同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调少数人到体改委来是需要的，大部分应和研究单位建立固定的协作关系。各地体制改革的“种子”，可以暂时不调。调人要以经济研究人员为主，要从研究单位选人，搞实际工作的人员不要太多。应有研究能力。搞研究工作的也要有点实际，理论与实际要结合。经济研究中心和体改委的人员可以互相兼一下，下面各组人员也可以兼任。经济研究中心要的四个同志都可以调来。经济研究和技术经济研究两个中心属于社会组织性质，顾问可以用聘请的办法。

二、体制改革归根到底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计划与市场，二是条条与块块即管理经济的部门原则和地区原则的关系问题。其它问题都可围绕这两个问题来研究。第一个问题更带根本性，条条、块块问题实际上也和计划与市场问题有联系。所以体制改革问题，在我国归根结底是要搞好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不能说计委拟定计划体制改革的方案，由体改委将其纳人总体规划中，这样不确切。体制改革要把计委、经委组织起来一起搞。一起搞经济体改规划，也就是以计划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是赵紫阳召集薄一波、杜星垣、薛暮桥、马洪、安志文、周太和等研究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谈话要点。

三、对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或四种模式：

一是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情况有多少差异，基本上是市场经济；二是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模式，两国虽然有不同，但都不用指令性计划，主要通过经济杠杆来进行计划调节；三是苏联模式，它的改革，主要是使计划指标体系合理化和更多地利用物质原则；四是我们自己如何使计划和市场结合，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为辅。苏联是实行指令性计划，用计划体系来控制，我们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也可以说是计划体制改革。

陈云同志讲过，计划经济为主，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他去年在杭州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计划经济，同时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我在去年人代大会上讲过三句话：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同时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当然这种设想是长远的，当前还是第一步需要研究。

川大一位经济学者（陈力）提出能否把企业分类，我和陈云同志谈过。陈云同志说，他从来没有说过把什么产品都纳入国家计划。我提出可以把企业分四类：一类是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二类是市场调节，按市场变化的需要进行生产；还有两类企业，一类是大部分按国家计划生产，小部分由企业按市场需要自行组织生产；另一类是大部分由企业按照市场变化组织生产，小部分按国家计划进行生产。这种分类是改革的第一步，还是长远的，还待深入研究。

四、必须研究我国五十年代的经济管理经验。在三大改造以前，为什么经济管理又统又活，研究一下，直接计划占多少，间接计划占多少？当时，个体农民是汪洋大海，城市集体和个体经营仍占相当比重，计划管理很有效，并未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现在我国按产品计划，不到50%。苏联计划经济也有改革，匈牙利也不是完全搞市场经济。要研究苏联、匈牙利和我国自己的经验。

五、改革的总体设计也不一定是最终目标。可以是分步骤地改革，同时要考虑同步配套。根据今天的调查研究和对过去的经验总结，搞出一个设想目标，也不一定是最终目标。同时根据两年改革的结果，提出明年需要改些什么。

你们提出的成立体改委的意见，先把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主要人员名单，以及当前工作安排两个意见修改一下，提出报告。至于工作任务与各部委关系还可以研究修改。总之，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计划与市场，一个是条条与块块。过去曾说过要打破条条块块的束缚，要把企业从部门和地区分割管理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现在来看各企业要完全摆脱行政部门管理还相当远，这个问题未解决前，就有一个管理经济的部门原则和地区原则如何结合的问题。苏联赫鲁晓夫看出苏联经济管理缺乏横向联系的弊病，因此搞经济区，除军工部门，其它经济管理部门都撤销了，结果地区的联系加强了，专业削弱了，地方主义发展了，比条条的危害更大，发生了问题。以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搞得比较稳，保留了地方一定的分权，加强和恢复了专业管理部门，比如中央集中的财政收入，赫鲁晓夫改革前占80%，赫改后只占40%，现在占60%，但仍面临改革前的矛盾，现在又在搞共同体，这些经验都值得研究。

归口部门不一定直接管企业，纺织部的经验值得研究，中央部只管方针政策，规划、计划、技术经济指标、标准化等，搞得较好。轻工部也是这样，不过管的行业比较复杂一些。上个月在天津开会时，曾约广东李建安[1]、江苏汪冰石[2]等座谈，他们认为中央归口部不要直接管企业，省也不管，由中心城市来管。除了有些部门，如电力、石油、造船等，可以搞全国性的托拉斯外，很多部都可不直接管企业，这个路子如果走得通，才可以发挥大、中城市经济中心的作用，要总结现有的经济管理经验。不可能设想中央部都取消。部可以管企业，但不是都直接管企业。要总结纺织部的经验。

体改委机构设置、人员编制需要调进入员，我同意。你们去同有关部门协商，办理手续，房子及行政事务由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办理。

注 释

1．李建安（1922—1993），河南遂平人。时任广东省副省长。曾任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省经委主任、省计委主任、省顾委副主任。

2．汪冰石（1918—2003），安徽怀远人。时任江苏省副省长。曾任南京市委地方工业部部长，南京汽车厂党委书记，江苏省经委副主任，徐州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市委第一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关于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及借用外债的意见*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三日、二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六五”计划时的发言要点。

第一，稳定经济；第二，在不影响稳定的前提下，可以稍有赤字，一年有三十亿元赤字没多大关系。物价要涨一点，没有什么可怕。这就是边缘政策，不一定绝对平衡。

我认为长期计划打点赤字也不要紧。现在有赤字，年度努力结果可能没有赤字。

现在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话讲多了。过去占那么高是剥削农民的结果。三中全会以来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十五年的欠账，不能再回过头来，说分配政策发生了错误，走一步否定一步。当然，我也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紧一点。

赤字我讲过了，打一点没什么问题。对农民，想紧一点，又怕农民不满。城市不满，农民再不满，那就不好了。农民用柴油，可以定量，定基数，以后再买到市场去买。这样简单易行，农民也可以接受。

总之，我们国家每年保留点赤字，外贸上有些逆差，借一点外债。这三条都在可能承受的基础上，使经济能稳定的基础上。这三条对我们有利，否则不利。当然，过头不行，要很谨慎。

总的是计委这个盘子。二千亿元之外加二百亿元。一能源，二交通，三搞活企业。一面解决“六五”速度，一面解决与“七五”衔接。总盘子按计委的定。讨论中提的问题，计委再去研究。农村问题，还要谨慎一下，不要一下子搞急了。农产品问题，可以从农民打点主意，但不能搞多了。

（万里：棉花、油料、烟叶搞基数，我同意。）今后控制不能那么增了，过去已经拿的，不要轻易动。

很大的潜力，还是两个。第一，企业好好抓整顿，效益还会提高的，这个靠得住。第二，在几年内，分配关系，指公有的，需要有一个变化，企业利润留成不能搞那么多，地方也要打紧一点。国家应当多掌握一点，用于重点建设，小的少搞一点。大的不上去，小的搞起来也没用。不仅财政，银行也如此。

一是提高效益；一是从企业、地方挤一点，银行挤一点；再是利用外资。

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形势*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会见几内亚比绍外宾时的谈话。

一、关于我国的对外政策

我们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仍然是毛泽东主席在世时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国的对外政策可概括为三个基本点：

（一）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同第三世界国家坚定地站在一起。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以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的正义事业。中国根据自己的力量和可能，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我们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起，为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共同斗争。我们坚决支持“七十七国集团”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所做的努力。

（二）反对霸权主义。中国认为世界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争夺的态势是苏攻美守，所以主要危险来自苏联。苏联出兵捷克，特别是出兵侵占阿富汗，支持越南出兵侵柬，并加紧在波斯湾、印度洋争夺，咄咄逼人。中国之所以把反对霸权主义的重点指向苏联，是因为它到处采取攻势，打着国际主义和支持第三世界人民斗争的招牌，自命为发展中国家的“天然盟友”，具有欺骗性。中国侧重反对苏霸，绝不是认为美国不是霸权主义，也不是不反美霸。中国既反苏霸，也反美霸。中国的对外政策是有原则的，独立自主的。美国仍在搞霸权主义，如在南部非洲，美国一直支持南非阻挠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广大非洲国家相对立；在中东，美国顽固地支持以色列，与阿拉伯人民为敌；在拉美，它支持反动独裁政权，压制广大人民的反帝民族民主运动；在朝鲜，它拒不从南朝鲜撤军，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对中国，美国实际上坚持搞霸权主义，直到现在仍向台湾出售武器，把台湾作为其在太平洋上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中国在反对苏霸的同时，也反对美霸，不管美国在哪里搞霸权，我们都坚决反对，对所有受美霸之害的国家我们都支持。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采取团结的政策，决不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制造分裂，中国也不以某个国家对苏态度如何

来排队。中国不反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接受苏联援助，只要有可能，他们从苏联得到一些援助，也是好的。我们决不因此而对他们抱偏见或嫌弃，决不把他们视为亲苏国家。但我们根据自己同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愿意提醒朋友们在接受苏联援助的时候，要保持警惕，不要上当，因为苏联在给你援助时往往是别有用心的。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它们的地位和处境不同，把斗争的锋芒指向美国，需要苏联的一些援助，对此我们是完全理解的。有些国家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把美国视为斗争的主要敌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是支持的。但是，要注意前门拒狼后门防虎。国际斗争历史上这种教训是很多的。

（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对外政策的目的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同几内亚比绍一样，都面临着严重、艰巨的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需要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世界和平能否维护，不在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我们的斗争，所以我们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

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二、关于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

我国建国三十多年来，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上解决了十亿人民的温饱问题。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基本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相当的重工业基础。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同我国人民所付出的劳动是不相称的。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发生过一些较大的挫折：一个是五十年代末期的“大跃进”，另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总结经济上遭受挫折的教训，就是经济建设上要求过急，政策上过激。建设上的过急，使摊子铺得过大，超出了我们国力的可能，结果不得不收缩，一进一退，损失很大，也耽误了时间，由主动变为被动。政策上的过激，往往挫伤人民的积极性。结束十年动乱后，一九七八年又犯了些错误。这是由于看到十年动乱，经济停滞不前，急于把经济搞上去，摊子又铺得过大，引进技术设备也过多，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连续出现财政赤字，货币投放量过多，物价上涨，使我国出现潜在的危险。所以不得不从一九八○年起进行经济调整，把基本建设压缩了百分之三十。采取这些坚决的调整措施后，去年经济发展速度虽有所降低，但基本上消灭了财政赤字，稳定了物价，国民经济基本上稳定了下来。从今年一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回升，脱离了危险期，重新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在开始执行调整政策时，干部和人民中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现在都看清楚调整的方针是正确的。

我们在调整时期，除压缩基本建设外，在政策上作了适当的放宽，采取了一些灵活措施，以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过去搞得过死。现在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实行允许全民、集体、个体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存在的经济体制。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但过去搞得过于集中，统得过死，影响工厂、农村的积极

性。现在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发挥基层单位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国家统一计划与生产单位的自主权结合起来。这些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几年农村形势很好，主要是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组织起来，都成为人民公社社员，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但在组织起来后，统得过死，分配上长期搞平均主义，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农民的劳动报酬没有同他们的劳动成果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几年推行了小组或个人生产责任制，即在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采取了小组或个人承包制，使小组和个人的劳动报酬同劳动成果结合起来，既发挥了集体的优势，又调动了小组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进展情况和三项议案的说明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各位委员：

自从二月下旬召开的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闭幕以后，机构改革工作在国务院各部、委全面展开，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这个基础上，国务院向这次会议提出了三项议案。现将情况说明如下，请予审议。

这两个月，我们集中力量抓了国务院各部、委的机构设置和新的领导班子的配备，因为只有把这两个问题首先解决好，才能实现机构改革的各项要求，保证各项工作有秩序地进行。经过这一段的紧张工作，我们已经完成了国务院各部、委的组建工作，并且提出了新的领导人选。进展得比较快的部、委，它们所属的司、局机构及其领导人选也已确定。其他部、委的司、局机构和领导人选，在五月份内基本上可以定下来。总起来看，进展是很顺利的。原来设想到的一些难点，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先行一步的部、委所取得的试点经验，对工作的全面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在上次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中，曾经建议减少副总理，设国务委员，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作为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集体领导机构。上次会议批准了这个建议。现在，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审慎的研究，我提议：由万里、姚依林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继续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任命余秋里、耿飚[1]、方毅、谷牧、康世恩[2]、陈慕华、薄一波、姬鹏飞[3]、黄华[4]、张劲夫为国务委员，其中，耿飚继续兼任国防部长，方毅继续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黄华继续兼任外交部长，张劲夫兼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陈慕华兼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长，已由人大常委会上次会议批准。国务院秘书长由杜星垣继续担任。原副总理杨静仁、张爱萍[5]分别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担负着负责工作，不再提名他们担任国务委员。过去国务院副总理人数过多，经过这次调整，副总理由十三人减为二人。至于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组成人员，原有十五人，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必要的，人数并不多，现在仍保持十四人，应该说是恰当的。

国务院原有五十二个部、委，经过这次机构改革，裁减合并为三十九个，加上上次已经批准设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这次提议设立的广播电视部，总共设置四十一个部、委。

关于部、委一级机构的变动问题，我已向这次会议提出了专门的议案。由于裁减合并而组成的新的部、委，在议案中都讲了，还有几个建制不动而改了名字的部，这里说明一下。原地质部增加了矿产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的任务，改名为地质矿产部。原第二机械工业部改为核工业部，原第三机械工业部改为航空工业部，原第五机械工业部改为兵器工业部，原第七机械工业部改为航天工业部，这几个部过去用的是代号，现在看来不必再这样做了。

在四十一个部、委中，有七个部、委的部长、主任人选已由上次会议确定；有十一个部、委的部长、主任没有变动，除了前面已经讲到的国家科委的主任和外交部、国防部的部长以外，还有财政部长仍由王丙乾[6]担任，公安部长仍由赵苍璧[7]担任，地质矿产部长仍由孙大光[8]担任，邮电部长仍由文敏生[9]担任，航空工业部长仍由莫文祥[10]担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仍由李梦华[11]担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仍由杨静仁担任。对其余二十三个部、委的新的部长、主任人选，我已向这次会议提出了请求任命的建议。上次已任命并公布了六个部的副部长，其余三十五个部、委的副部长、副主任人选，将由国务院任命并公布。

经过这次机构改革，据三十八个部、委的统计，除兼职的部长、主任以外，共有正副部长、正副主任一百六十七人，比原有的五百零五人减少三百三十八人，减少百分之六十七；他们的平均年龄为五十八岁，比原来减少六岁；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干部原来占百分之三十七，现在提高到了百分之五十二。据二十八个部、委的统计，原设有司、局机构七百二十个，现在减少到四百八十八个，减少百分之三十二；正副司局长原有二千四百五十人，现在减少到一千三百九十八人，减少百分之四十三；他们的平均年龄原来是五十九岁，现在减少到五十四岁；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干部原来占百分之三十六，现在提高到了百分之四十九。

各位委员：

现在，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的组建和新的领导班子的配备。从机构改革的第一步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从机构改革最终要达到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来说，我们的工作还刚刚开始。因此，我们还要本着革命的精神，继续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必须进一步明确各部、委的职责范围。各部、委的工作任务是什么，怎样完成这些任务，都要搞得清清楚楚。前一段在这方面已有了大体的规定，现在要进一步具体化，并且让全体工作人员都知道。国务院副总理减少了，机构和层次也减少了，部的作用就更重要了。这就需要加重各部的责任，使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各部、委的领导干部都要振奋精神，大胆负责，认真做好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凡是各部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都应该独立负责地主动解决好，不要事情不分大小都向国务院请示。各部对于自己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也要适

当扩大他们的权力，加重他们的责任，不要包揽他们的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克服官僚主义、事务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各单位之间过去长期不协调、相互推诿的事情，这次一定要摆到桌面上来，讨论清楚，作出明文规定，记录在案，认真遵行。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前一段在国务院主持下开了几次会，明确规定了相互间分工和协作关系，计委和经委还确定了定期举行联系会议的制度。可见只要把问题摆出来，是不难解决的。各部、委间凡是需要经常会商的问题，都要定出定期合议的制度。各部、委内部机构的职责分工和各项工作制度，国务院工作人员的守则和工作纪律，都要很快地制定出来。所有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充分发挥主动精神，勇于把对人民、对全局有利的事情担当起来。

二、必须认真做好老干部的安排工作。国务院过去对干部退休制度已作过规定，最近又对老干部离职休养的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应该认真按照这方面的规定执行，该退休、离休的就退休、离休，使干部的退休、离休经常化、制度化。对退居二线工作的老干部，要注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但也要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本人的条件，实事求是，不要因人设事。既要发挥退居二线的老干部的作用，又要使新的领导班子放手工作，把担子挑起来。

三、必须切实抓紧干部轮训工作。这是进行智力投资，积蓄力量，准备发展的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这次机构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有计划地抽出大批干部去学习。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现在有一种轻视业务技术学习的现象，有些单位不愿意送干部去学，有些干部自己也不愿意学，这种风气必须坚决加以改变，否则必将延缓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今后干部的学历和业务技术学习的好坏，要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内容，作为使用和提拔干部的一项重要依据。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从现在开始把这件事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立即着手筹备，及早付诸实施。各部、委的干部轮训，原则上由各部、委自己负责，并且要同本部门、本系统的工作业务密切结合起来。干部轮训的规划、课程和所需要的教材、师资、房子等，都要一一落实。各部、委不论现有的公用房屋多么紧张，也要挤出房子来用于轮训干部。四、必须保证完成紧缩国务院工作人员编制的任务。定额不定员不等于没有编制。国务院整个工作人员编制精简三分之一左右的要求要努力实现，并且要把编制定额落实到各个具体单位。紧缩编制必须是真正的紧缩，绝对不允许弄虚作假。今后任何部、委要增加编制，必须经过国务院批准，不得擅自增加或变相增加。过去借调的干部，除确因工作需要列入现有编制的以外，应一律送回原单位。

以上任务是繁重的，工作是大量的。如果不把这些工作做好，不仅难以巩固机构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还将功亏一篑。在一九八二年内，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机构改革工作，是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也应当是它的一个重要内容。机构改革以及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连同打击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的整顿党风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四件大事，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现四个现

代化的重要保证。我们一定要使这次机构改革善始善终，达到预期的目的。

注 释

1．耿飚（1909—2000），湖南醴陵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

2．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石油部副部长兼大庆石油会战总指挥，燃化部部长，石油部部长，中顾委常委。

3．姬鹏飞（1910—2000），山西临猗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部长，中联部部长，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

4．黄华（1913—2010），河北磁县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曾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

5．张爱萍（1910—2003），四川达县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四师师长，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工办副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获上将军衔。

6．王丙乾（1925— ），河北蠡县人。时任财政部部长。曾任财政部预算司司长、副部长，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7．赵苍璧（1916—1993），陕西清涧人。时任公安部部长。曾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兼省民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委员，武警部队政委。

8．孙大光（1917—2005），安徽寿县人。时任地质部部长。曾任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交通部北洋区海运管理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国家计委地质总局局长，地质矿产部部长。

9．文敏生（1915—1997），山西垣曲人。时任邮电部部长。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河南省委常务书记、副省长，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

10．莫文祥（1923—2013），山东夏津人。时任三机部部长。曾任沈阳松陵机械厂厂长，沈阳市委书记，三机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

11．李梦华（1922—2010），河北平山人。时任国家体委主任。曾任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奥委会主席，全国体育总会主席。

组织“一条龙”开发新产品大有希望*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就上海组织“一条龙”开发化纤新产品写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各人员并有关部委的一封信。

现将上海市组织“一条龙”开发化纤新产品的材料推荐给你们，请参阅。

大家所熟知的常州、苏州组织“一条龙”的经验，更多的是进行专业化协作，扩大生产能力。从上海这个材料看，其实组织“一条龙”也是开发新产品的一种有效办法。上海市围绕化纤新产品的开发，把纺织系统的三十个厂同生产化纤原料的金山石化总厂以及有关科研所组织起来，从生产到科研，从原料到加工，从前段工序到织物后整理，从龙头到龙尾，都紧密配合，协同动作，从而能够在开拓新产品、提高经济效益上取得成效。这个办法，不仅对化纤行业，而且对整个工业新产品的开发，都具有普遍意义。

当前工业战线特别是消费品工业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切实改变产品式样陈旧、性能落后的状况，使产品不断升级换代，努力研制更多的新材料，采用更多的新工艺，创造更多的新产品。只在“小而全”、“大而全”的工厂内部兜圈子，是难以适应这一要求的。上海的作法，给我们以启示。在开发新产品上采取“一条龙”的办法，适当调节各方的利益关系，打破部门分割，互利互惠，通力合作，把各方面的力量围绕一个共同目标组织起来，就有利于把蕴藏着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各级经委和工业部门要认真注意发现和研究这方面的新情况、新经验。在产品的升级换代上，要像上海、常州的工人、干部、科技人员那样，有一股子劲，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好，人好我转”，那么，我们的工业战线就大有希望。

充实加强井下第一线
是搞好煤炭生产的关键*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对煤炭部关于全国统配煤矿动员倒流采掘工人归队下井情况报告的批语。

这是一个好报告。看了后使人感到煤炭部这一段的工作确有起色，问题抓得比较准，措施比较有力，效果也是好的。

在煤矿，充实加强井下第一线，是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关键。如果第一线的斗志不高，思想波动，队伍不稳，就很难把煤炭工业搞上去。而要稳定井下第一线，当前必须把大量采掘工人倒流井上的问题切实解决好。首先是领导干部的子弟要带好头。干部端正作风，子弟带头下井，才会出现“许多人二话不说就下井”的局面。这件事再次说明，要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改变涣散无力的状况，除了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搞好经济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以外，还应紧密结合生产，不断调整和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们的企业里，人与人之间要恢复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同志式的新型关系。对职工群众，要尊重他们，关心他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提高他们的主人翁觉悟，增强他们的责任感，使他们心情舒畅、全力以赴地投入四化建设。

引进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应适当放宽政策*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对国家经委邱纯甫、董绍华关于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改造中小企业调查报告的批语。

此件值得一看。

引进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同引进大型成套设备不同，应当放手一些。政策适当放宽，审批权限适当下放，手续力求简化。应当注意防止大量重复引进，但对某些我们还不能制造（或虽勉强可以制造，但不能保证质量），而经济效益又很显著的，短期内有一点重复引进，也并不可怕。现在应当采取措施，进一步扫除障碍，以促进引进技术、改造中小企业这项工作的开展。

建议由经委牵头，计委及有关部门参加，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议定几条办法、措施，通知各地执行。

目前有些地方已经采取的由有关部门集中会审，多少个图章一次盖的办法，我看是可以提倡的。另外，最主要的，是要加重大、中城市的经委、计委在引进技术、改造原来企业上的权限、责任。许多问题，只要依靠他们就地就近协调解决，就可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一些官僚主义，基层企业就会感到方便一些。

对制定“六五”计划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月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家计委党组先后三次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六五”计划编制情况时发表的一些谈话。

一、关于农业

粮食问题需要好好研究。现在有些适合种粮食的地方，由于经济利益关系，农民为了多收入，改种了别的，这种趋势对国家很不利。还有些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仍然种粮食，自然也不合理。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宜种粮的种粮，不应改种别的作物；不宜种粮的，应改种适宜的作物。但我国人口多，吃饭是个大问题，适合种粮食的耕地又不多，从全局考虑，应首先保证粮食稳步增产。凡是适合种粮的地方，不应改种别的，并且要努力提高单产，增加总产。不宜种粮的地方，要合理开发，有的地方可用来发展食品原料。比如承德地区，在很陡的山坡上种粮食，产量很低，而且不利于水土保持，如果改种板栗、红果，产量很高，收入多，也有利于食品的多样化。因此，在处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关系上，粮食的播种面积不能再减少，同时要因地制宜地分别不同地区进行适当调整。总之，首先要保证粮食稳步增产，同时要逐步解决有关生态平衡和合理种植问题。

二、关于能源、交通

解决能源问题，要考虑今后一、二十年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原来计算，到2000年我国平均每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时，需要标准煤20亿吨，这是按落后的消耗定额算的。从各种条件看，那时要生产这么多能源，根本不可能，实现人均1000美元的目标也就毫无希望。最近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上日本学者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与能源消耗增长之比，1973年以前为1：1，现在是1：0.7，九十年代将进一步下降为1：0.4。日本能源消耗低，主要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在今后二十年内，科学技术会有很大发展，只要把耗能定额大大降低，到2000年时可以不消耗那么多能源。当然，我们在降低能源消耗的同时，还

必须加快开发能源，否则也没有出路。

现在要考虑的问题，还是邓小平同志所关心的，为下一个十年作准备的建设规模究竟多大？可否考虑在可能的条件下，再适当增加一些重点建设项目。比如，煤炭的在建规模可否再大一点，铁路修建是否再加快一点，电力投资能否再增加一些。这样，一些正在施工的项目，建设进度就可以加快。只要交通、能源的重点项目搞上去了，我们就可能在“六五”期间实现“保四争五”，“七五”期间实现“保五争六”，甚至还可能有更快一些的速度。

日本五十年代经济很困难，但他们看准了煤炭、交通确实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环节，就集中力量去搞。他们把这种做法叫做“倾斜式”的建设方式。我们同日本当时的情况不同，但对确实看准了的重点，还是应当下决心去搞。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冒冒失失，又来折腾，但对一些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事，应努力去争取，不要过于求稳，无所作为，贻误时机。今后几年是很关键的时刻，除了继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以外，要从各方面挤出资金投入重点项目的建设，主要是开发能源和进行交通运输的建设。这样才能理顺比例、提高效益、打好基础、积蓄力量。重点建设搞不上去，就谈不上在八十年代为以后发展做好准备。当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第一，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不搞“高指标”一类的蠢事；第二，可以做到的，一定要努力争取做到。能够做到而不努力去做，明明做不到而去乱碰乱撞，两者都不会得到人民的原谅。

为了加快重点项目建设的速度，在计划上、资金分配上，既要防止不切实际的贪多求大，冒很大风险，又要适当地把弦拉紧一点，否则不行。我们在近期内不要勉强去追求多么高的速度，而是要抓住重点，为今后的发展作准备，打基础，使实劲。在目前情况下，没有必要把库存、储备搞得太多，应该把资金搞活，变“死宝”为“活宝”，用于建设。

三、关于基本建设

增加的能源、交通投资加到哪里？主要加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有项目，使之缩短建设周期，提前完成；二是新项目的勘察设计，搞好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增加投资，怎么用，是个重要问题。要把钱用在最急需的能加快建设的方面。

中国工业的发展，总应该在一个时期内有较高的速度，如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这就要求逐年都有一定的建设规模。可不可以考虑：一是在原有项目上增加投资，加快速度。比如水电，新上“二滩”一下子不行，但把投资加给葛洲坝，建设进度就可以提前，这就是速度。煤矿也是这样，山西的煤矿，不仅小窑改造可以加快，大矿的改建扩建也可以加快。二是要抓紧准备好一批新项目，搞好前期准备工作，一则可供选择，二则以应急需，一旦有钱有物，要上就上。

今后无论是利用外资的项目，还是国内资金的项目，必须改变基本建设不按程序办事的状况，再不要搞那种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事了。安排基本建设

项目，首先要搞好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为后十年经济振兴作准备，应是全国上下集中全力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关键是计划，在计划中要列勘察设计项目。过去是急功近利，没有钱搞准备工作，长期打被动仗。以后凡是下一个五年要搞的项目，上一个五年就要把这些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可行性研究和勘察设计等工作都搞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有了内资或外资，就可以上去。凡确定要上马或者已经上了马的，不要再论证来、论证去。准备工作需要花点钱，但是前期工作做好了，就能真正缩短建设周期，摆脱被动局面。要下决心从计划上转过来，经常准备一百来个大中型项目，把勘察、设计、可行性研究等工作都事先做得好好的。这样，整个基本建设工作就主动了，长远规划也有了基础。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四、关于财政

要考虑适当集中财力，但现行政策不变，财政分灶吃饭、扩大企业自主权继续搞，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中央集中的比例要提高，也就是要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基数。中央财力增加后，就不向地方借钱了，但国库券还照发。为下一个十年作准备，进行重点建设，中央没有一定的财力不行。中央财力集中多少，用什么形式集中，分成比例和财政基数动多少，要搞一个方案。中央适当集中财力以后，重复建设也会减少。

为了适当集中财力，要适当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同时从控制财政补贴方面打点主意。看来，对农民的利益不动一点不行，但要谨慎，不要搞猛了，各方面都好好议论议论。比如，对化肥、柴油，可不可以提点价或减少些补贴；或者考虑搞定额供应，定量内的不动，超过的提价，行不行？农民现在卖农产品给国家也是这个办法，即有平价有加价。这样，高对高，低对低。这个办法，穷的地方因为用化肥少，主要享受平价，将来生产发展了，化肥用得多了，超过定额，再加价。

油菜籽，现在多了，超过需要。明年确定实行“倒四六”的收购办法，可以限制一下。但是，光这一条，播种面积可能还控制不住。估计今冬还会大发展，小麦和绿肥的播种面积还要减少。可否考虑规定一个收购数量，超过的，由农民自己处理。浙江采取了这个办法，油菜籽就控制住了。四川、安徽等省没有这样做，面积还在扩大。现在必须这么办，过几年需要发展时，可以取消这个规定。现在适当控制油菜籽的发展，对国家、对农民的长远利益都有利。

计委汇报提出1985年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不打赤字。我赞成。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应当争取做到这一点。

五、关于利用外资

要采取积极态度，尽可能多利用一些外资，“六五”期间不包括合营项目，准备借200亿美元，主要用于能源、交通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

使用外资要合理安排，今后应尽可能不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凡是国内有制造能力，又有资金、材料，可以自己生产的，就不从国外进口。但有些设备，国内虽有制造能力，但目前没有资金和材料，不能生产，从国外进口又比较合算，也可以适当进口一些。比如电站设备，为什么不可以进口一些呢？这样进口设备，对国内机械工业也有好处，因为总要搞些配套的东西。所以，考虑问题不能只从一个侧面去想。国内能不能制造是一个方面，还要考虑引进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是否有利，有利的就可以干。当然，立足点还是放在自力更生上。现在国内资金不足，经济建设想快快不了。要为九十年代作准备，办法之一，就是尽可能利用一些外资。当然，方向要对，不能盲目。第一是搞基础建设，第二是搞技术改造。要搞确能很快见效的。

除了一般的利用外资以外，与外资合营的局面必须打开。要统一思想认识，现在是老怕吃亏，局面打不开。资本家为了取得利润，有时投资也要冒点风险。我们不能把政策搞得太死，要使外国人感到有点吸引力，愿意同我们合营。因此，我们要研究吸引外资的具体办法。

六、教育、劳动工资

五年计划、十年规划，要加强教育。从“六五”开始，教育要加钱。用在哪里？是大学还是中小学？要很好研究。

购置和发射广播卫星，电视、教育可以共用。地面站国内自己搞，有关地区共同建设，共同受益。广播卫星搞起来了，可以扩大复盖面积，大大发展广播电视教育，还可以举办农业科学等各种讲座。这是为教育为广播办一件大事。

我们的经济效益不好，与管理人员水平不高和缺乏专业人才有直接关系。当前急需解决的是充分发挥中年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作用。中年知识分子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人才，他们现在是科研、生产以及管理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但是，这部分人的工作任务重，家庭负担重，而工资待遇又很低，健康状况不好，使他们的作用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六五”期间国家要挤出一部分钱来，增加他们的工资，从今年开始就行动起来，争取三年以内基本解决，为他们创造比较好的工作条件。要立即着手研究具体方案。中年知识分子的工资解决了，年青的看到有奔头，情绪也高了。这样一来，整个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当然，也会发生一些矛盾，但不要怕，可以以后再研究解决。

妥善安排待业青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集体主义训练，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进行技术业务学习，参加一定的劳动，如城市绿化、环境卫生等，并发给他们一定的生活费，等到招工时，择优录用。这比都安排在企业里要好，也可以避免实行子女顶替办法（矿山、井下、地质勘探、森林采伐、盐业除外）的弊病。

七、关于企业的调整和整顿

“六五”期间，企业的调整和整顿要下决心搞。“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业企业由19万个增加到38万个，增加了一倍。特别是机械工业增加很多。据最近从苏联考察回来的同志说，苏联工业很集中，州以下不搞机械工业，因此重复建设少，技术比较先进。而我们不是这样，大量的钢材消耗在这里。计委、经委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机械工业太分散，需要集中，这要作为一条方针定下来。这对减少重复建设、重复生产，减少浪费、亏损，很重要。各行各业，凡是生产技术落后、经济效益很差、能源消耗高、与先进企业争原料的企业，要坚决关停并转。调整、改组要与企业的整顿、技术改造结合起来进行。社队工业也得进行整顿，社队企业要发展，问题是搞什么。调整和整顿，对缓和能源、原材料供应的紧张，提高技术，提高效益，改进产品质量，增加财政收入都有好处，虽然工作难做，但不下这个决心不行。

八、关于加强计划管理

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计划管理，包括直接计划（即指令性计划）、间接计划（即指导性计划）两部分；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直接计划，一部分为间接计划，一部分为市场调节。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除中央的计划以外，还有地区与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协作。这些经济协作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应该加强对这一部分的计划指导，成为国家统一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其合法化。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十分必要的。对这个问题要研究和总结经验，不要回避。各级计委把这项工作搞好了，计划工作就会闯出一条新路子。

对于小商品，可以考虑实行市场调节，随行就市，国家不统一规定价格，也不补贴。当然，要有步骤，不能一下子都放开。要根据国家的经济状况，逐年放，一年放几个品种。对于小商品，一是放出去，一是把一些生产单位改为集体所有制，适当发展个体所有制。

九、关于制定十年计划和专题规划

20年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后10年，这是全国经济工作大的战略部署。前10年的主要任务：一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效益和一定的速度，二是要为下一个10年作好准备。这些准备工作主要是：（1）调整、整顿、改革。（2）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3）重点建设，主要是能源、交通。（4）培养人材，加强干部训练。

“六五”计划搞好以后，接着就要集中力量搞“七五”计划，也就是前十年的计

划。同时，要搞几个专题规划，如：十年农业规划、十年能源交通规划、二十年科技规划。

听取国家计委赴苏考察小组汇报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时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二日、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听取柳随年、刘国光、郑力汇报考察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情况时的讲话要点。

一、经济效益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弊病，这一点现在大家都认识了，但治的药方不一样，药的剂量也不同。苏联包袱重，不敢轻易动，他们还强调部门所有。保加利亚各部不负经济管理责任，强调发挥经济组织的作用，各部只管计划、技术、协调。保加利亚企业的权力比苏联大，企业只上交税收，一般占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余下的部分再做出几项扣除。国家不包工资，企业经营得不好，工资发不出去，得靠企业基金，或向银行贷款。国家向企业下达七个计划指标，价格由国家定，外贸由国家控制，除个别企业外，不允许企业直接同外商签订合同。匈牙利提出反垄断，把大企业分成小企业，使其具有法人地位。

现在可以说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南斯拉夫，走的最远；第二种，是匈牙利；第三种，保加利亚，价格、外贸比匈牙利死，但企业自主权不小；第四种，是苏联。看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不管走的远一点、近一点，或者停一下，走一下，有时甚至后退一下，只是步子不同，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相同的，从长过程看都是前进的。就是南斯拉夫理论上也承认有计划。匈牙利取消了指令性指标，但宏观经济的活动要求有个东西去影响，从理论上讲就是要学会运用经济杠杆，但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受许多条件限制，如价格、灵敏度等，所以在改革中完全把指令性指标搞掉，在实际上是不行的。

对企业没有个东西制约不行，但你搞一个指标，他就会想另外一套办法来对付你。过去在这方面矛盾不大，因为同企业没有利害关系，企业什么指标都可以接受。现在要讲企业利益，不能再回到大家都不讲利益、都不负责任、消极怠工的老路上去了。但一讲企业利益，就会发生许多矛盾，看起来很麻烦，实际上比过去那种没有矛盾要好的多，这是一个进步。我们要承认企业利益，又要调节矛盾，经济体制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解决好需要相当长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解决了。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国家都在前进，苏联在前进，匈牙利也在前进。赫鲁晓夫是搞改革的，开始因为没有经验，走了一些弯路。但他揭露了苏联体制中存在的许多毛病，说明这种体制不是完美无缺的。苏联和匈牙利改革了一下，又后退一下，但每次前进都不是简单的

重复。苏联对改革持慎重态度是对的，我们也应当慎重。不能说苏联就找到了一条路子了，他们也在完善。我们要注意苏联的经验是对的，因为它是大国。

二、苏联工业管理坚持部门原则，说这样利于技术进步和专业化，既然如此，那就让部门主要管技术、管规划行不行，为什么非要把企业管起来？有一个例子对我有启发，纺织部管得就不错，纺织企业都在地方，部管定技术、规划等，管得很好。相反有的部直接管企业管得并不那么好。能不能有另外一种考虑，除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由中央管外，哪些权力应当集中在部，例如建新厂要报部审批，部还要负责统一规划、搞新产品试制等等，企业的具体经营由地方负责。要对不同的企业、不同事情有个不同的处理办法（马洪同志：能不能使企业既不归部，也不归地方）。要研究一下，不要先从原则出发，要从实际出发，企业同国家关系是一层，国家中又有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企业只向国家纳税是个长过程，一下子不行，还有个联合过程，这个路程比较长。可望见的时期内还有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要解决。如何把城市的潜力发挥出来，企业横向联系不能靠搞托拉斯。常州发展很快，因为它靠统一组织了几条“龙”，如果上面几十个部插进去就办不成，就会把城市搞得支离破碎。常州一个市委书记调到南京就无能为力了，因为条条太多。但如果国家从上到下都搞块块，又要出现重复建厂、划地为牢的问题，科技进步、专业化协作也会受影响。现在的企业，有部门领导、地区领导，外边又加一层中央领导。条条强了，就把地方给吃了；地方强了又把部门吃了，这是个相当难的问题。要研究给予地方哪些权，限制他们哪些权。以省、以县来管不行，以城市工业为基础，组织协调，又不影响专业化，行不行？

三、苏联企业一个婆婆，这点好，值得我们研究，至少在政企没有分开以前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企业的婆婆太多。现在呼声很高，下达给企业的指标互不衔接，遇到问题找谁，谁也不负责任。许多企业留恋五十年代，也是这个原因。通过企业联合当然是个途径。苏联的食品纲要加强了区一级，要求以区为单位搞综合体，把食品加工、储藏、运输都联合起来。

四、苏联农产品收购价格把原来超计划加价部分都加到采购价格上，是全国平均计算呢，还是以地区以农庄为单位计算呢？如果按农庄计算，这样，每个农庄的价格就不一样了，这种办法恐怕不行，如果全国统一计算，那就会使原来一些加价多的集体农庄减少收入，从而影响生产。广东1966年实行超购奖励，外调粮食12亿斤，文化大革命一批判，奖励条件也没有了，粮食产量也下来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农副产品的价格不管你采取这种或那种形式，总的趋势是提高的，东欧、苏联都一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改革，看来，重点一要放在搞活上，把政策放宽一点；二要放在价格上，提高一点农副产品价格，使农民多得点利益。

五、里根[1]攻击勃列日涅夫25%的农业人口，养不了2.6亿人，说美国百分之几的农业人口不仅养活美国，还有余粮供全世界。苏联搞了那么多军队，还有很多工业，否则他们的日子会好过些。苏联现在城市还帮助农村抢收，我们这些年算是不下去了，实在是劳民伤财。苏联农村落后，看来根本问题还是集体化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们对农业问题看得很清楚，归根结底，没有农民的积极性不

行，但是积极性大了，盲目性就出来了，无论农业、工业都有这个问题。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让他有点盲目性肯定不行。有点盲目性不要怕，只要积极性带来的好处超过盲目性造成的损失就行。但有些东西要卡死，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产品、大企业要强调统一性、计划性，有些小的就让他有点盲目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总是有一部分生产能力闲置着。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在大的方面避免经济危机就不怕。小型项目的引进不要怕重复，半年就偿还了，怕他干什么，但是，上亿元的关键项目不能重复引进，我们要悟出这个道理。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发挥，有些积极性会带来一些盲目性，要研究他们的得失。首先要把宏观经济计划好，宏观经济摆不正，局部是补不上的。

我同苏联的观点有点不同，我说小企业的自主性可以大些，大企业的自主性不能太大。对小企业也有个哪些要管，哪些不要管的问题。有些定了点的企业不一定就搞得好，没定点的企业因为它要生存，必然拼命地搞，也可能搞上去。我们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大批淘汰企业，但完全没有一点淘汰也不行。

六、市场调节要稳步搞，走稳点。计划为主，70%、80%、90%都是计划为主，但计划和市场的杠杠划在哪里，现在还说不准，要在逐步放的过程中摸索。苏联经济发展的量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从粗放转入集约阶段，节约能源，节约劳力、原料，不搞这个不行，但也不容易。

实际上，经济越大越好管，大企业、大产品的规格质量都比较好管，不容易管的是轻工业和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可以考虑走农业的路子。农业由国家供应生产资料，农民自负盈亏，农产品多了，国家不能包收购，让他们自己去卖，少了采取加价的办法，这也是计划，服务业、缝纫业、饮食业可以搞自负盈亏，或包给集体经营。农村有些专业户养鸡、养猪效果很好，一个养鸡户比过去一个集体养得还多。现在要进一步发展就要求别人为他们服务，要求有几个帮手，这个问题城市已经解决，农村还没解决。这里有个经营者与劳动者之分。如果政策再活一点，我看还可以发展。现在农村有一批会经营的人。城市小工业，这样一搞也就活了。

七、苏联的这套管理办法适合于管理大工业、重工业，要高度集中，也要搞企业一定的自主权，这套办法可以用。

苏联对重大项目的确定比较细致，科学性强，我们个人拍扳的多，不一定准确。

八、我们现在是计划上有些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又管得太多。我们的国家这么大，交通不发达，信息不灵，小的管不了，要有所抓紧，有所放松，大的不能撒手不管，要管，要严格纳入计划。小的工业搞市场调节，重要的企业要加强计划。苏联的石油、天然气上去了，对苏联经济起了很大作用，天然气管道一通到国外，他的外汇收入又可以使经济更活些。

九、对苏联的体制要注意研究，它的建设搞上去了，他们搞那些建设是由部长会议定的。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也有个建设问题。国家建设同企业的自主权是两回事，钱少了搞不了多少事，中央必须集中一些财力，其实，资本主义国家

集中也挺厉害，对地方、对企业都不例外。

还是我讲的四类企业、四种产品，不能把全部都纳入计划，要抓主要的、大的建设。生产力布局要集中管，不然中央干不了什么事，大的物资分配权也要管起来。总之，要有死有活，大计划、小自由；小的放松点，出了乱子也不要紧。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也是通过财政集中财力搞基础设施的，大的基础工业国家不搞，上不去。

十、宏观经济他们下的功夫比我们大，基础也比我们好，他们搞了20年规划、10年规划、5年规划，我们连十年规划还搞不出来。

十一、小企业容易掉头，市场也正需要这些厂子满足。煤炭、重型机械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容易搞计划。我国三大改造前，“一五”计划时期的经验要总结。那时对还没有实行合营的私营企业就是采用经济手段，国营企业是起主导作用。

不可能把很多东西都纳入计划，否则会管死，造成积压。我们也不能全部搞市场。马克思说，计划经济有可能实行，是因为工业的集中，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就可以搞计划。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大企业决定我国经济命脉的，必须搞指令计划，一是需要，一是可能。现在有些东西不能直接计划，为什么出现一放就乱的情况，主要是价格不合理的问题没解决。一些改革放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讲的价格不是自由价、而是官价，价格不合理，一放宽就乱，增加了宏观与微观的矛盾。价格要达到基本合理，不改不行，但改不好就会出问题。看来，如果国家价格基本上合理，有相当一部分可以不搞官价，宏观与微观的矛盾也就不大。

价格应当走个什么路子，看来，零售价不动，先调批发价格是个过渡办法。

十二、体制改革。匈牙利的步子大些，但它是个小国，依附性大，靠进口能源，价格同国际市场挂钩。苏联总的是前进的，它国家大，步子搞得稳当点，宏观经济、关系国计民生的要加强计划，步子搞稳一点是应当的。苏联的办法大体上还是可以的，不能轻易否定它，应当历史地看。苏联是老二，除美国外，英国、法国、日本都不如它，有它优越性的方面，不要抱成见。它农业没搞好，有一定自然条件因素，产量不稳，幅员大，搞水利有困难，用五年平均水平计算产量是对的，这个五年平均比上个五年增长就不错。

十三、你们花了不少时间研究，方法是对的。苏联的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你们要在小范围内组织一些讲座，不登报。不一定大家都取得统一的认识，哪些办法是可取的，哪些不可取，我们哪些进行得好的，证明是对的，都可以议论议论，明确几条。

十四、最近经委搞了一个关于企业联合的材料说，联合企业的产值已占全部产值的38%。上海最近在纺织业搞联合，按最终产品（化纤产品）搞了20条龙，从最终产品向上、向外搞联合，把一些企业、科研单位都联合起来了。常州也是这样开始的。看来，在一个城市搞联合是可以的，交给一个部就不行。搞新产品的生产，也可以按上述办法搞联合。日本的机械工业同冶金工业关系非常密切，

我们就不如他们密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的计划经济值得研究，宏观经济搞得很好，国家干预受到企业的欢迎，他们穿一条裤子。

苏联企业对工资不封顶这一点有启发，但这样，每年实际发的工资肯定要超过计划数，因为对完不成计划的企业要保证基本工资，对超额完成计划的企业要增加工资，这就是为什么工资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因。

苏联对冷、背、残、次商品一年处理两次，这一点比我们还好，我们都压在库里动不了。山西一位同志关于改革基本建设管理提了八条意见，我看有些还可以，其中有一条，把一个工程项目的投资一次拨下去，不准追加，我把他的意见批给经委研究去了。

什么是定额净产值？我们国家实行什么指标好，是定额净产值、销售额，还是几种指标加在一起？他们现在还在研究用什么指标比较合适，而不是取消指标，把指标搞的更合理一些。

注 释

1．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1994），时任美国总统。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皮科城，曾任电台广播员，电影和电视演员，美国电影演员协会主席，电影业委员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1984年连任。

农业和粮食是我国的头号问题*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等的谈话要点。

一、农业长远发展问题

农业发展长远规划上有什么矛盾问题，搞几个题目，由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组织讨论一下，国家计委参加领导。

国民经济要搞三个专题规划：要专门搞一个农业十年规划，还有能源十年规划和科技二十年规划。

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着眼来搞农业长远发展规划，对农业问题要系统研究，清醒地看到问题的所在。现在，农业形势转过来了，形势很好，但还有许多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就是一个。责任制今后如何发展，也尚待解决。

现在，对发展农业的办法提得不少，但能改变局面的办法不多。只是一般的提倡，不能改变局面，这样下去不行。要搞地区开发，比如黑龙江农场贡献很大，一年提供商品粮三十多亿斤，改变了黑龙江的农业局面。印度在旁遮普邦搞绿色革命，搞好一个地方，解决了40%的商品粮。苏联开荒也不能讲是完全失败，也是改变了局面的，商品粮占到全国的40.9%；开发中亚地区发展棉花，成绩也很大。我们在鲁西北地区发展棉花，也是成功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这种经验。在这方面，我们要考虑在十年、二十年内一定要有所作为，打开局面。瑞士雀巢公司在专门研究世界食品问题，公司的负责人说正在搞一个如何维持世界这么多人口食品的关键性研究，他说文章作在大豆上。粮食的概念可以宽一些，不光讲谷物，而要讲食品。农业是基础。最近，小平同志讲了，耀邦同志也讲了，我国的农业问题尤其是粮食问题，八亿农民问题，解决好了，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都好办了。

在组织讨论时，可以展开争论，为农业发展长远规划提供依据。除了请农学家参加讨论外，还要请经济学家、食品工业等方面的专家参加。只讲战略不讲战术也不行。要算经济账，看怎样办经济效益好。我们越穷，资源越不能合理利用，越是浪费。先要搞清哪些是不合理的，怎样才是合理的，用什么办法（政策上、措施上、步骤上）使它达到合理。要从经济学上研究怎样搞好过渡，使设想

转化为现实。农业要看五十年。

可以发一些材料，比较一下外国的经验。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农业是成功的。国外一致认为中国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这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看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材料，他们也说2000年的农业，主要靠单产，搞立体农业，间作套种，搞劳动密集型农业；搞耗能太多的农业，不适合我国的情况。

二、粮食与经济作物问题

我最近曾对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萨乌马讲，我国进口粮食一千五百万吨左右，这是个限度。用这些粮食调整农业结构，搞好了，还要逐步少进口一些。农业规划只能建立在自己解决粮食问题上。

吃饭是我国的头号问题，要研究到2000年时十二亿人的吃饭问题。

我国适合种粮食的耕地不多，再开荒潜力也不大。我国的农业资源不差，但按人口平均则不能说很多，粮食耕地尤其少。因此，我认为，从全国整体考虑，适合种粮食的地方，不宜再种别的东西。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要充分合理地开发利用，可用来发展其它的食品原料，如搞畜牧场，产肉奶，搞木本粮油，淀粉，搞植物蛋白的直接食用等。食品工业是个大问题。中国不能走外国的路。日本、美国的食品工业，大体是：占工农业产值的10%，占劳动就业的比重也是10%，食品费支出占工资收入的比重也是10%以上。他们也都是六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这与购买力和消费水平有关系。不搞加工不行，日本的水果在加工不发达时，也常常大批地烂掉。有人说，“方便食品”是食品工业新纪元。我们一下子搞成这个样子还不可能，可以慢慢地搞起来。

搞多种经济作物增加收入，这是对的。但不宜把适合种粮食的耕地改种经济作物，这样，势必使很不适合种粮食的坡地继续种粮食，影响生态平衡。现在粮食主产区和高产区感到种粮食吃亏，这要从整个社会经济效益来考虑。国家对这些对地区应采取政策，给予一定的补偿。除了别的办法外，例如对苏州、烟台、嘉兴一类地区，可以在社队工业上给以特殊的支持，别的地方不准搞的，可以准许这些地方搞，靠社队企业养农业，保持这些地方的粮食优势，使这些地方的农民种粮食与种经济作物得到大体一样的收入。这样，可以使适合种粮食的地方多种些粮食，再搞些加工业，以增加收入，达到农业生态和经济上的良性循环。粮食与经济作物价格悬殊太大，要逐步缩小。

我国的食物构成，我看一百年内也要以粮食为主，但要逐步补充其它食品。将来人口增加了，我国人均粮食能保持现在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加上其它食品的发展，如水果、木本粮油、肉、奶、鱼等，增加一些热能，就很不错了。

南方发展畜牧业，要注意到那里的草山，有些是退化的结果；有些海拔太高，很多草是牲畜不能吃的，必须加以改造。在那里要采用改造草场和割草圈养的办法，不宜搞放牧。

要因地种植，搞好经济区划。南方棉花可以减少，北方可多发展棉花。南方

的甘蔗要适当控制，在北方发展甜菜，使南方多生产些稻谷。黄红麻不能多搞了。

水土保持不解决不行。有相当一些地方，要山区大量开荒种粮。这主要是缺粮食的压力大，以致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也得种，这要逐步调整。过去山区历来是用山货来换粮食。如果平原地区适合种粮的不多种粮，从全局来说，作物布局就无法调整。“两湖熟，天下足”。棉区与粮区可挂钩搞协作。

总之，良田不许随便占用，这要定为国策。

几个地方的开发，如三江平原、黄淮海等地，要好好研究论证。“六五”中三江平原的开发要搞，那里一定要修水利。新疆的棉花要发展，条件比较好，主要是要解决水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统计上粮食年年增产，每年平均增一百多亿斤。如果真有那么多，怎么会出现那样多缺粮的紧张状况？实际没有增产那么多而报得多。这几年，粮食确实多了，但上报的数偏低。

三、农产品中商品性的产品应有计划地发展

过去搞农业，没有商品化观念。商品化，要有一系列的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一定要同时抓好储存、运输等基础建设，农产品才能变为商品。农业上有些东西，成不了商品就是废品。现在总的看，东西不是多，而是少（有的是季节性的多），但搞不好，少的也会嫌多了。不能随便地普遍号召家家户户搞，一哄而上。例如，我在四川提倡养山羊，因加工、运输等许多措施没跟上，不到三年，山羊就卖不出去了。想降低羊肉价，提高羊皮价，动员农民卖羊皮，自己吃羊肉，推动起来困难也不少。养兔也是这个问题，也要建冷冻厂。专业户养兔很好，但普遍号召家家户户养不得了。要搞商品基地，小而全的自然经济不行。要适当区域化，一片片地搞，同时要搞加工、冷冻、储存、运输，否则，多少年问题都解决不了。其它方面跟不上，就使得有些资源无法利用。有的东西好一点，如干果比较好办些。

总之，商品要搞专业化，要适应集中，要有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只靠普遍号召家家户户搞。

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问题

这几年农业形势好转，粮食多了，原因是人的积极性起来了，责任制解决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民积极性问题，使多年来水利、农机、化肥等投入发挥了作用。但这些作用也是有限度的，今后还必须继续搞投入，继续建设物质基础，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否则增产不能持久。要研究如何合理地投入，使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不改变撒胡椒面的办法，就没有奔头，就改变不了局面。

水利问题要专门研究，认真总结，摆脱过去的框框，建议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好好议一议。不是说不要搞水利，我历来没说不搞水利，但要好好总结。三十年来，水利事业第一有伟大的成绩，第二有相当严重的问题。水利发挥的效益，同国家和群众所付出的代价不相称，差得很多。过去搞运动，大呼隆。瞎指挥在水利工程方面是严重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不要怪哪些部门，如果多听听水利部门的意见，情况还会好些。这是全党的事，主要是各级党委。现在要认真总结，希望把这次水利讨论会开好，给中央写个意见出来，取得一致的看法。

五、农业科学技术问题

科学技术的力量绝不能忽视，今后二三十年内，世界农业会出现一些新东西，可能有大的突破。我们要看得远一些，现在农业的路子太窄。过去我们太轻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各级领导干部不熟悉科学技术，知识太缺乏。

农业科学技术问题要好好研究。一定时期内着重抓哪些项目？当然是多层次的，各地区都要抓，但是中央抓什么，要提得明确些。

农业科学技术今后五年、十年主要搞什么，真正能见效果的，要花一些力量，投一些资，把它搞上去。比如：种子、复合肥料、高效低毒农药等要下功夫。农业的地域性大，不同品种适合于不同地区。如杂交水稻，在一定的地区长得很好，在一些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就不行。扬花时期，受气温的影响很大，温度低了不行，太高了也不行。

搞农业技术推广站，要注意搞不好就会吃了饭干不了活，农业事业费成了人头费，花了钱作用不大。科研经费也要适当集中，力量要组织起来，有重点抓几件有成效的事，不集中就办不了事。

把山西建设为以煤炭为主的重化工基地*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山西考察时关于煤炭开发问题的谈话。

山西要发挥自己的煤炭资源优势

山西省的特点是煤炭资源特别丰富，得天独厚。煤炭的储量有二千亿吨之多，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目前年产一亿三千万吨，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多；调出八千五百万吨，相当于全国调出量的百分之八十。山西的煤田储量大，煤质好，埋藏浅，投资省，成本低，统配矿吨煤成本只有十五元，比全国统配矿的平均水平低四分之一，而且全省上上下下都有开煤的积极性。据省里规划，今后每年可递增煤一千万吨（其中统配矿三百多万吨，地方国营矿二百多万吨，社队矿四百多万吨），预计到一九八五年产煤一亿六千万至一亿七千万吨，调出一亿二千万吨；一九九〇年规划产量二亿吨，调出一亿五千万吨，如铁路运输条件允许，产量可达二亿七千万吨，调出二亿吨。这次到山西看了以后，更加深了这样一种认识，开发山西煤炭确实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山西煤田与内蒙古准格尔煤田连成一片，要把山西省和内蒙古西部、豫西、陕北、宁夏的煤田联起来考虑如何开发。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一片离天津、石臼所等沿海港口，都不过五六百公里，比苏联的东煤西运、美国的西煤东运的两千公里的距离要近得多。如能积极开发利用，山西将有希望成为中国的鲁尔、萨尔。

要发挥山西的优势，把它建设成为以煤炭为主的重化工基地。山西省不搞煤炭，不搞重化工就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山西省也讲农、轻、重，恐怕行不通。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只能就整个国家来讲，或者就一个经济区来讲，不能每一个地方都讲，不能每个省、每个县都这样要求，那就会成为“大而全”、“小而全”了。从山西来讲，农业当然不能放松，轻工业也应结合本地的特点搞一些，但重点是要搞重工业，搞煤炭，搞煤化工，搞耗能多的重工业，因为你有这么好的资源条件嘛。至于轻纺工业品不够，可以从外省调一些进来，不必过分去追求自给率。山西不能离开与国内各地的协作，不能离开与国际的联系。应该通过交换，以己之长，补己之短。要看到，有了能源，就什么东西都可以转换，不一定样样都要配套，都自己搞。不能抑制自己的优势，而花很大的力量去勉强搞不是

自己所长的东西。

从长远、从全局来看，山西不仅要向全国供应煤炭，成为能源基地，而且要逐步建设成为我国的一个重化工基地。由于向外运输困难，山西要想办法多吃掉一些煤。一是发展煤化工，搞炼焦、煤气、焦化产品，搞化肥。山西潞城化肥厂已确定上马，要加快建设。二是搞电站，有些可以搞坑口电站，向华北、中南、华东输电。电厂用水问题，要妥善解决。从匈牙利引进的风冷发电设备，比一般机组要节水一半，可以考虑引进技术，自己多制造几套。现在地方对办电不积极，感到无利可图。应从政策上考虑给地方分一些利，如交一点地方税，利润分一点成等，以调动地方办电的积极性。山西增加电站的问题，计委、水电部要很好研究。三是发展一些高能耗、少用水的工业。如利用现有的基础加以扩大，多生产一些耗能高的合金钢、铝锭、电石等产品。应利用进山西的空车皮运一些矿石进来冶炼。在全国的工业布局上，要考虑让山西、西北多发展一些耗能高的工业，而让沿海多发展一些耗能少、技术高的工业。

山西省各项事业的发展，要有一个统盘安排和长远打算，因此要搞长期的综合规划。鉴于开发山西的重要性，为了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协同动作，加快山西重化工基地的建设，建议国务院批准设立以山西为中心的国家计委、经委分会，协助山西省委、省政府开展工作，组织协调，制定综合开发规划，组织实施，尽快把这个基地建设好。这对全国经济的发展，将有重要作用。

开发山西煤炭一要解决运、二要解决水的问题

开发山西煤炭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能不能运出去，二是有没有水。煤、运、水是互相联系的。运输畅通，煤炭也就有出路了；水解决了，煤炭可以就地多发电，多搞煤化工，运输的压力也就减轻了。如果运输不出去，水源解决不了，那么挖出来的煤也不能有效利用。所以煤、运、水，要综合开发。

开发山西煤炭，关键在运输。现山西各地压煤很多，主要矛盾是运输能力不足，特别是铁路运输能力不足，互相挤。有煤运不出去，就打击了群众挖煤的积极性。而且存煤自燃，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开发山西煤炭，铁路要先行。目前全省不论统配矿，还是地方国营矿、社队煤矿，普遍是“以运定产”。百姓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叫，经济活跃”。如果运输能力加大，煤炭放开手搞，还能够大量增产，群众也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我们从雁北走到晋东南，到处都议论运输紧张。在制订长远规划中，可否这样考虑：在一九八五年以前，山西省煤炭不要再增加多少投资了，多搞些技术改造，把投资加到铁路上，集中解决运输问题，一九八五年以后转过头来，再增加煤炭投资。

增大铁路运输的能力，除了要按已定的计划，加快老线的技术改造外，在新线建设上，应有个战略布局，作通盘考虑，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认为，铁路建设应同海运联系起来考虑，把山西与海港之间的运输线打通，使晋煤可以出口，也可以沿海运输到华东、华南。能不能设想在几年之内集中力量修一两条

铁路直通海港（如秦皇岛），搞适合我国情况的长大列车，专门拉煤，这样全局就活了。南北运输，要充分考虑水陆联运。请计委、铁道部、交通部组织一些专家，包括经济专家，进行论证，提出方案。另外，还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增加一些机车、车辆。东欧国家的记账外汇也可以利用来进口一些机车、车辆，国内也可安排多制造一些。

平朔露天矿是中外合资的第一个大项目，一定要搞好。现在合资经营是两面怕，我们怕当李鸿章，外国人怕陷进来吃亏。就这项合资经营来看，总的还是合理的，不给一定的好处，外国资本家是不会来的。但运输是个大问题，这个矿开工时间、出煤时间，都要与运输的建设同步。如果我们的运输能力一时跟不上去，又要保证运走外国人分的四百万吨煤，那就会把我们的出口煤挤掉，搞得我们很被动。要注意没有准备好，运输跟不上，就不要轻易同意开工，工程的进度要有个合理的安排。

金、木、水、火、土五行，山西是缺少水和木。水的资源不多，要统筹安排，搞好规划，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活用水，做到合理用水，节约用水。挖煤要消耗水，但挖煤本身就可以开发水资源。山西煤管局的资料，挖一吨煤，包括洗煤、生活用水在内，用水量是一点二吨，但挖一吨煤本身要排水零点八吨。要是把这些水利用起来，就会起很大作用。山西潞安矿务局五阳煤矿年产煤一百一十万吨，他们把挖煤出的水回收了百分之九十二，利用二百五十万方水，但投资并不多，只花了六七十万元，每吨煤的投资不到一元。这个经验很值得重视，山西在水的利用上，应该走在全国煤矿的前面。

加快山西煤炭开发的一些方针、政策问题

这几年要重点转到抓紧对现有煤矿的技术改造，并在老矿区新建、扩建一些矿井，这样投资省、工期短，出煤快。看来综合采煤机组在山西的效果是好的。它的支架并不难造，主要是采煤机的电机部分，我们制造的还赶不上国外的，过不了关。可以引进一些技术和材料，组织有关部门协作攻关。山西使用的综合采煤机，现在没有提折旧，这不利于维持再生产。煤炭部、财政部要研究定出一些办法来。煤矿技术改造中，要重视安全生产的问题。现在煤矿的伤亡事故还是不少。煤炭部的同志说，只要出口五千万吨煤，就可以把煤矿安全方面的制造技术引进来，这是值得的。引进来以后，国内再逐步制造，解决全国煤矿的安全问题。

在山西，地方国营和社队煤矿的产量，约占全省产量的一半。像我们看过的襄垣县煤矿和夏店公社、境亭公社合办的煤矿，都是办得好的。地方和社队，是一支很大的力量，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加强管理，去掉他们乱采乱挖的盲目性，调动他们办矿的积极性。社队小煤窑，一要联合，二要改造，坚决走这条路子。夏店公社和履亭公社合办的煤矿，去年产煤三万六千吨，盈利十万元，改造扩建后，到一九八四年可达年产二十一万吨的能力，盈利一百四十多万元。这个

煤矿成立了理事会，大的事情如生产计划、经济开支、上多少人，由理事会决定。经理对如何完成任务有自主权，可以当家作主。两个公社和所在大队出劳力，出资金，按股分红。所在的范家岭大队占一股，夏店公社占七股，虎亭公社占二股。这个矿管理得比较有秩序，效益较好。这种联办的方式，应予提倡。社队煤矿所得的利润，也不要分光了。要预留一部分生产基金，用于技术改造。生产基金留多少，福利基金留多少，分红多少，将来要立个法。小煤窑的改造，除了自筹资金外，还可以使用一些低息的贷款。也可以和外省合作，吸收一些资金。总之，小煤窑的技术必须提高，安全必须搞好，但要保持自己的特点。统配矿和地方社队小矿，要互相学习，取其优点。在合理开采、安全生产、技术改造方面，小矿要向大矿学习；在与农民结合上，在勤俭办社上，大矿要向小矿学习。整个国营工业企业的管理上，都要考虑吸取小矿的优点，这要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研究。

山西一方面要抓紧现有矿井的技术改造，这个方针必须坚持；另方面，也要有重点地建设特大矿井。建大矿井，应尽量缩短建设周期，力争早出煤，多出煤。根据已有的经验，一个办法是多开井口，一个办法是一次设计、分期建设。比如三百万吨的煤矿，规划好了，第一期先搞一百万吨。这样就能合理利用资源，投资省，周转快。矿井的基本建设，可以试行包干制。全部投资的概算定下来以后，由基建部门承包。多年来我们基建投资概算，一再突破，有些部门搞“钓鱼”政策，预算一再增加，工程一再延期，几乎成为一种通病。要想法改革，搞承包制，搞包干建设，一次包定，提前完工、节省投资的受奖，否则要受罚，双方订立合同，共同遵守，国家监督执行。这方面要闯出一条路子来。

煤炭系统有一些特殊问题，矛盾很多。现在，不少矿使用了轮换工，从全局考虑，这是合理的。山西的农民也要靠挖煤吃饭。一个是社队自己办煤窑，农民自己挖煤；一个是当轮换工，参加国营矿挖煤。这样做好处很多，可以保持职工队伍的健壮，同时，也可以减少临时户口。轮换工，可以三五年一换，一个队五个人，这五个人回去，那五个人再来。当然，试行轮换工也要注意保留一些技术骨干。煤炭部要搞个轮换工的条例，订个统一的办法试行，逐步完善。现在用轮换工，只能少量的搞。因为大多数煤矿并不缺工人。不能为了搞轮换工，原来的工人不动，加些农民进来，增加国家负担。要从实际出发，真正需要多少，就搞多少，逐步推行。

因职工顶替，女工大量增加，有些矿成为女儿国了。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研究顶替制度如何改革。矿区要通盘考虑，多发展一些容纳女工的行业。比如搞些服务小组，三五个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上边有个公司，管组织，管业务指导，管教育，不管经济核算。有些职工家属也可以在家里照管孩子和家务，把家务搞好，也是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我们现在是低工资、就业多，一个工人平均只赡养1.8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这么低。当然，这方面的改革还有个过程。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过煤矿中的“以工代干”问题。基层干部制度要搞活一

点，基层干部实行选举，谁选上来当队长、工段长，就拿队长、工段长的津贴。当什么干部就按什么干部待遇，不当干部就是工人，拿工人的薪金，当干部时的津贴也就相应减下来。原来的“以工代干”，要考核录用。如果笼统把“以工代干”的都提为干部或定为干部，有些人搞干部工作又不胜任，将来有很多麻烦。符合条件的，可以定为干部。不能胜任干部工作的，就仍去当工人。

统配矿有不少临时户，长期是“黑人黑户”，这个问题要研究个办法，可不可以由煤炭部、公安部、商业部会同拟个条例，规定具备什么条件的，允许带家属，上户口。比如说，当了多少年工人，还有什么条件，划出具体杠子，报国务院批准实行。这些多年积压下来的问题，原则上是要想法逐年解决。将来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实行轮换工的制度。

煤价太低，不利于生产，像东北、四川等地，许多小煤窑都关了，统配矿也亏本。但煤矿调价，牵动面很大，要慎重。也可以考虑计划内定基数供应的部分是一种价格，超出基数供应的部分是另一种价格。这个问题很复杂，应由计委、煤炭部、物价局会同研究，提出办法来。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山西考察时关于农业问题的谈话。

关于调整农作物布局问题

最近，我们正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制订农业长期规划问题。我国农业的基本特点是，人多地少，适合种粮食的耕地不多，再开垦荒地潜力也不大；但是，可供利用的农业资源还是不少的，今后若干年内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在制订长远规划中，想到1990年，想到本世纪末，首先谈到的是粮食问题。我国现有人口10亿，估计到2000年是12亿，吃饭是第一位的大问题。适合种粮食的土地本来就不多，由于种种原因，还在日趋减少。现在每年进口粮食1500万吨左右，虽然对10亿人口来讲还是很少的，但对合理调整作物布局有很大作用。进口粮食也有一定限度，太多了也不行。所以，粮食生产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从整体上来考虑，我国适合种粮食的土地还是要种粮食。不要因为解决收入问题，每个地方都拿出一些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比如长江三角洲、洞庭湖地区、珠江三角洲等，适合种稻米，就种稻米好了；还有你们这里的一些坝子、平川适合种粮食，也得种粮食。至于这些地方农民感到种粮食收入低，不如改种别的划算，这个问题国家应从政策上考虑解决，给以适当的补偿。适合种粮食的地方，要种粮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那些不适合种粮食的、目前还在种粮食的地方改变过来。现在山区还有相当一部分坡地，坡度很陡，叫“挂地”、“大字报地”，仍在种粮食。上次我在承德，这次在五台，都看到不少这样的坡地。这样搞的结果，水土流失严重，旱灾呀，下游河床淤积呀，生态平衡问题永远不能解决。这样对全局是不利的。现在看来，作物布局的调整在有些地方还必须搞。有些还得退耕还林、退耕还牧。这样的土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还不清楚，可能还不少。如果那些适合种粮食的地方也改种经济作物，粮食的产量要减少，那么这些地方就无法改过来。所以，要从全局上考虑，使粮食和经济作物真正能够因地制宜种植，发挥优势。这是一个方面。

另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农业资源不少，有很多山区、丘陵、草地、水面可以利用，可以解决一部分食品问题。在我国人民的食物构成上，有两种观

点都是片面的：一种认为，中国可以向外国学习，以吃肉为主，这行不通；另一种认为，中国要完全靠吃粮食，这也不行。从长期来看，中国仍然是以吃粮为主，但是要逐步改变，增加其它成分。食物的构成是很多的。比如在山区发展畜牧业，养牛，养羊，养兔子呀，太行山还可种柿子、核桃、枣树呀，这些都是食物嘛。这样，就需要发展食品工业。中国人总不能老是这么穷，随着人民购买力的提高，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食品中制成品总得占一部分。当然，这要有个过渡的时期。

在制定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中，这是一个大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经济政策。现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许多地方都想减少粮田面积，扩大经济作物。每个省、每个县、每个公社这么一搞，适合种粮食的土地拿出一部分改种经济作物，那势必使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还得开荒。这样，既不能实现生产上的良性循环，又不能实现生态上的良性循环。在山区，过去历来是出山货，吃平川的粮食。现在搞得山区没山货，不管条件如何，都开荒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用力很大，收效甚小。大寨田有些是可以搞的，比如坡地比较缓一些的，搞了后效果好；有些坡度那么高，搞成大寨田，费劲很大，很难巩固，大雨一场就冲垮了。去年四川发洪水，就冲坏了不少。不如植树种草，发展多种经营更适合一些，同样可以解决收入问题、吃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转弯大概需要10年、20年。

调整作物布局，有些地方如平原解决得差不多了，有些山区还得调整。现在看来，没有全国的布局，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搞不行。要搞区域规划。有的地方就是要种粮食，如果收入少，应该从另外方面考虑解决，如支持他们发展社队企业，或在价格上给以补贴等，使农民种粮食同种经济作物的收入大体相当。这样，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山区就可以解放出来，山货就多了。从长远来考虑，要有许多过渡，一下解决有困难。

这里，就联系到一个水利方针问题。水利是要修的，过去30年修水利，第一有伟大成绩，第二有相当严重的问题。水利所发挥的效益，同国家和群众付出的代价不相称。光是修水利，要是水土保持、造林问题没有解决，水利的效果也不好。一个是没有水；一个是上边植被越破坏，下边修的水库淤积就越厉害。这方面应摆脱老框框的束缚，很好总结经验教训。

在制订规划中，食品工业要很好研究。今后粮食、多种经营，都要大力发展商品性生产。商品生产不同于自然经济，它有它的规律。只要是商品生产，就要有一系列的设施跟上去，像加工、运输、储存等。比如，在山沟里养牛羊，就要加工、往外地运输。因此，发展食品工业，发展商品生产，除了普遍号召以外，作为规划讲，各地要有重点，有所侧重。要搞商品生产就要专业一些，集中一些，以便解决相应的基础设施。现在，一般来讲，我们搞多种经营还带有副业生产性质，有啥搞啥，还没有商品生产的观念。商品生产的观念，同自然经济的观念、发展副业生产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同志还不熟悉商品生产，将来的规划要考虑这个问题，要用商品生产的观点去指导生产。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

这两年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质上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大调整。经过两年时间，基本上调整过来了。这次大的调整，不但农业生产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且持续增产，欣欣向荣。这主要是责任制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像晋北、豫东、鲁西北以及全国许多很困难的地方，情况比以前好多了，解决了吃饭问题；原来物质条件好的地方，什么水利、机械、化肥呀，现在更发挥作用了。这次调整，中央有号召，群众自觉搞，可以说是符合群众的需要，顺应历史的潮流。不然的话，农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

农业生产责任制，不是说到此为止了，农村生产关系也不是调整到这里就完了。现在，要防止两种现象：一种认为现在群众积极性这么高，就大事告成了；另一种就是老框框，一说要有统有分，在包的基础上搞联合，马上又是过去"左"的那一套，那就会把农民的积极性又压下去。农民怕变，就是怕这种变；因势利导的变，实际是农民的要求，他并不认为是在变。在保持农民积极性的基础上，如何根据农民的要求和生产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是全党面临的新课题。我们要总结经验。从发展看，中国农村不可能是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尽管现在有些地方一搞责任制，实际上是一家一户自然经济的搞法，在一个时期内，这也是必要的。因为，目前生产水平很低。实行责任制后，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有了积极性就好办了，生产就发展了。但还要解决发展商品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的问题。当然，这个路子比较长，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今后路子怎么走，不能用一个固定模式去套。要密切注视群众中间的新创造，研究它，分析它，取其利，去其弊，使责任制不断健康地向前发展。全党要像合作化时期领导合作化那样，集中精力研究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

报上登的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党校的调查报告，讲责任制中统、分、包的关系，讲得比较确切。责任制中有统有分，包是统与分的结合。承包是一种好的形式。雁北地区实行的工副业专业承包，农业实行"以劳划成，以成包产，以产定地，土地联片"的办法，劳力强的多包，劳力弱的少包，无劳动能力的不包，这是比较先进的，但也不要排斥其它办法，几种办法可以并存。当然，就是这种办法，也有两个问题不大好解决：一是定产比较麻烦，大家愿意定低一点，不容易定准；二是受了灾，评减产多少也比较麻烦，好坏地受灾不一样，种什么作物也不一样，评灾比较复杂，农民怕基层干部不公平，容易引起纠纷。当然，其它几种形式，比如按人劳比例承包土地，完全按人口平均承包土地，也各有优缺点。是搞专业承包，还是按人劳比例包，按人头平均包？统哪些，分哪些？先专后包，还是先包后专？包到户，还是包到组？是联产，还是不联产？这些都要根据群众的自愿和生产的发展来定，不拘一格，出现一点问题也不要大惊小怪。凡这类问题，我看有两条：一是方向明确，二是不必着急，可以慢慢来。等到农民都感觉到是个问题的时候，自然就可以解决。有一个因势利导、水到渠成的问题，

勉强搞不一定好。1979年最先搞包产到户的地方，那时上上下下都不那么明确，有的就走过了曲折的路。农民第一年搞包产到户，不仅平均包土地，而且拖拉机也拆的拆，卖的卖，机井也不要了，渠道也填了。第二年觉得不对头，又开始买拖拉机，把渠道、机井也恢复了。去年1月我去兰考，县委书记给我讲，一开始包，地都分成一条一条、一垄一垄的，第二年农民感到不利于生产，就作了调整，比较集中成片了。现在有些按人口平均包地的地方，一开始农民都高兴，愿意都包一块地。慢慢在实践当中，有些人就愿少包一些土地；有一些劳力强、技术高的又愿意多包一些土地。还有一些能工巧匠，专业户、重点户呀，多种经营搞开以后，他就做不过来，感到包土地是一种负担，很可能愿意少包或不包土地。责任制是会起变化的，农村终究还是要向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但是必须看到，农民需要有经营的自主权。在我们国家，家庭式的或小组为单位的承包制，这种经营方式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各种层次的经济联合。因为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劳动力多地少，我国的农业将来可能是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而不一定搞耗能多、自动化程度高的。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就是劳动加科学，这样一种性质的农业，它不一定需要大规模经营。农业大规模的统一经营，在我们国家大部分地方不一定适合，多年来证明了这点。从实践上来看，这种农业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美国的农业到今天，还是家庭农场为主；西欧国家基本上也是家庭农场。所以农业跟工业不同，当然工业也不是和过去人们想的，都是大的，还是有大有小。美国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成功的并不多，往往竞争不过家庭经营的农场。家庭农场需要别的方面来配合，需要什么呢？农业机械公司呀，饲料、化肥公司呀，植保公司呀，商业的购销公司呀，等等，需要这样一些社会化的生产前的、生产后的公司来为它服务。当然美国的家庭农场比我们还是大，土地还是多。我国又是山地，又是平原，自然条件也很复杂，人多地少。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将来也不一定都再回到以生产队或大队为单位统一经营，像农民家庭式的承包制、小组的承包制，很可能在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但是，以家庭或小组的承包单位搞“小而全”，什么都有一点，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这种形式将来也不可能长期存在。如果那样长期存在，我们农村就没有出路了。作为方向来讲，我认为它还是要变的，变向专业化、社会化、商品生产，同商品生产的发展相适应。看来这个过程是相当长的，而且全国参差不齐，有的可能早，有的可能晚。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的需要，来因势利导，逐步过渡。我们从现在算起，准备10年、巧年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也不要一个早上都搞，也不要全国一样，有的可能快一点，有的可能慢一点。

在完善、发展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培训基层干部的工作十分重要。山西省搞责任制起步比较晚，但训练教育基层干部这一条抓得紧，省委专门拨出经费，一年多来下功夫训练了35万干部，解决了同群众“顶牛”的问题，工作很快就跟上来了。据我们知道的情况，全国相当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对这一次大转变、生产关系的大调整是“不理解”，“不适应”，思想不通，发牢骚。出现了混乱现象后，他不摇头，不点头，放弃领导。加上对新的一套不适应，“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

会”，出了问题不知所措。因此，必须进行再教育。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是什么，该怎么样办，通过轮训，向干部讲清楚。这样就可以使基层干部明确方向，改变领导不力的状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各地都要继续抓好。

关于专业户、重点户问题

专业户、重点户的出现，是一件新事物，它是专业化商品生产的雏型，是农村走向专业化、社会化的过渡形式，将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值得重视。像晋东南地区，目前专业户、重点户已发展到14万户，占总农户的14%，还有继续发展之势。

专业户的发展，它就慢慢从“小而全”里面分离出来了。第一步首先是与农业和种植业分离。专业户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可能不搞种植业了。进一步发展，畜牧业或者其它业自己也要分离。养鸡的，也不是从孵小鸡开始，而是有的专门孵小鸡，有的专门养大鸡。养猪的，可能有的专门养母猪，有的专门养公猪，有的专门养肉猪。种植业里面将来可能有人专门搞育种，搞植物保护，慢慢就分离开了，专业化了。专业化本身就要求社会化。一专业化，就你为我服务，我为你服务。还有个产供销问题。比如销售，你现在自己养鸡，自己到街上卖鸡蛋，将来就可以专业化了，卖鸡蛋专业化，可以托人专门去卖嘛！当然这个东西有个前提，是要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农村畜牧业的发展，就可能产生牛奶加工的问题。将来农业的发展结果，就可能产生食品加工的问题。这都需要人去做，他一搞，就专业化了，从农业里就分离出来了。总之，发展方向是专业化、社会化，但经营单位还是很小的，还是承包的办法。

现在农村政策一放宽，马上出现一种情况：会经营的人、有技术的人就大有用武之地，会出现一批冒尖的专业户、重点户。他们大体上是两种人：一种是有手艺的能工巧匠；一种是回乡知青，他们钻研技术，有文化，接受新东西快，脑子灵活。在全国农村，特别是在商品比较发达的地方，才搞了两年，就出现了这样一批人。他们的本事很大，非常善于经营，技术水平又高，经营的事业发展很快。像襄垣县桥头大队的重点户王明安，过去生产队猪场5个人搞饲养，现在他一家包了，饲养生猪46头，还种地17亩，每天磨粉100多斤。武乡县石窑会大队高庭朝父子二人，承包林业，两年荒山造林530亩，育苗67亩，一户两年造林等于该大队30年造林总和的一半。专业户、重点户中已出现不少万斤户，也有万元户。随着重点户、专业户的发展，就出现了联合的问题。一种是专业化联合，户与户之间，或者是会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的联合。善于经营的人和一般的劳动者怎样联合，是个新课题。这当中要注意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光有劳动者的积极性还不行，还要照顾经营者的积极性。这就不能像办过去合作社那样的合作形式，社长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要采取适当形式，使会经营的人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有些地方搞合股，也可能是一种形式，在实践中继续去创造。将来可能出现多种形式的专业联合、专业联合体。联合固然是一种形式，但专业化不一定都

搞联合，也可能有一部分是一家一户的专业分工长期搞下去。在专业的基础上社会化，客观上也是一种经济联合。我搞一种专业，你搞一种专业，你搞一道工序，我搞一道工序。我这种专业离不开你，你这种专业离不开我。它不是自然经济，不是“小而全”。

最近，看了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报道浙江金华地委书记提出的意见，值得研究。这些意见概括起来有三条：第一，今后农村发展的道路必须走专业化、社会化的方向；第二，必须使农民有自己的经营自主权。有些将来可能走上集体联合公司，相当一部分还是家庭经营，就是承包的办法，由农民自己经营。这一条很重要。过去，主要的问题是农民没有经营自主权。因此，农民没有积极性。实行责任制后，农民同集体的关系是承包关系，和整个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但是，经营还是农民自己负责。第三，必须突破以队为基础的框框。金华地委的同志认为，生产队作为劳动组织、分配单位则太大，作为生产社会化的协作单位、多种经营单位又太小。广东的同志也提出，双包到户后，生产队的作用不大了，应以村为单位，副业可以承包到组、到户，农业承包到户。村子很自然形成一个单元，农田基本建设、农村的文化、教育建设，都要靠村来搞，发挥村的作用。比较小的村，几十户的村庄，百把户的村庄，这样搞有利。太大的村，几百户上千户那就不行。以上这些东西，同商品生产的发展是一致的。一定要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解决。不能靠政治运动，不能靠主观随意性，想怎么就怎么。

农村有些问题我们要沉住一点气，看一看，明显的经济犯罪要抓。凡是有对的，又有不对的，有些虽然看来不是发展方向，但社会又需要的，最好多看看，将来能找到一个存利去弊的方法。把起积极作用的方面保护起来，消极方面加以限制，去掉副作用。不要采取“戴帽子”、“割尾巴”简单取缔的办法。戴上帽子一下子没有了，矛盾并没有解决。每一个东西的产生，都有它的需要。我们要研究用什么办法代替它，如何引导它，不要用简单的办法把它割掉。雇工问题出现了，农村中有一些户刚刚开始产生雇工，不一定马上采取行政措施去解决，要研究用什么形式来代替。重点户、专业户、会经营的人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必然会超出家庭的范围。他要发展商品生产，人手不够，怎么办？采取什么好的形式，现在还没有找到。不能再采取过去那种办集体的办法，走老路，搞来搞去，又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城市里我们开了口，一个人可以找2个帮手，带5个学徒，还是叫个体经济。农村现在还没有研究好。广东高要县有个叫陈志雄的，他会经营鱼塘，一开始包了8亩鱼塘，产量提高得很快。很多队愿把鱼塘包给他，他包了300亩，产量很高。他管不过来，又雇了人，工资高，每月100元左右。完成了生产队的承包任务，生产队满意，被雇的人也满意，他自己也发了大财。让他搞下去，可能包到上千亩。安徽芜湖市有一个炒“傻子瓜子”的，这个人走了很多地方，各地炒瓜子的方法他都作了研究，取各家之长，他现在炒出的瓜子质量好，价钱比别人便宜，他雇了10来个人，每月90多元工资，他自己更多，生意很好。对这些事，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资本主义，要取消；另一种认为，这些事给

我们以启示，这样会经营的人才，为什么30年来不能发挥作用？我们能不能找出这样一条路子，既能发挥人才的作用，又能克服消极的方面。北京郊区就有些人很会养鸡。将来能不能搞集体经济承包制，同集体经济挂钩，吸收他们来搞。但要让善于经营的人来牵头，这样对国家有利，对集体有利，对个人也有利。现在的小饮食店，服务行业，也可以考虑采取这种形式，包给一个人来经营，吸收其他人参加。总的原则应该是：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第二，不要走过去的老路。要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取其利除其弊。这些善经营者、有技术的人，让他们把才能发挥出来，对社会生产力会有很大提高，这是利；弊病，就是雇工、剥削、投机倒把等。要研究一下，因势利导，逐步寻找、研究恰当的办法，把积极的方面保存起来，把不利的方面加以限制、去掉，不要简单从事。

专业户确实是个突破。这刚刚开始，还要发展，在发展中有些什么问题，要很好地研究，当然有些明显的影响比较大的违法的要处理。总的讲，要调查研究，要沉住气，天塌不了，不要急急忙忙。各种意见都可以讨论，可以动口，不要动手。不要一棍子打死，打死就没有了。这些事也不要在报上宣传。从根本上讲，要从群众的实践创造中解决这些问题，办法在办公室里是很难想出来的，要从群众中精心去发现好的经验。有些东西刚出现，不完善，要研究；有些东西可能要允许，但要加强管理。

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央指示中专门讲了，一条是不要把运动搞到农民、工人中去；还有一条，经济搞活以后由于管理制度、办法没有跟上而发生的问题，不要作为违法问题处理。有些事界限还没有分清，比如长途贩运，什么可以贩运，什么不可以贩运，现在国家还没有规定，所以还不要打击。当然这些问题要调查研究，等讨论后，将来要立法。再搞上一段看。

关于推广农业科学技术问题

这次我们看到，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给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农业生产要持续地增产，要靠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要靠推广科学技术、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对科学技术的力量，决不可忽视。今后20、30年内，世界农业一定会出现一些新东西，可能有大的突破。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今后5年、10年搞什么，真正能见效果的，要下功夫扎实抓几项。像种子、复合肥料、高效低毒农药等，要千方百计搞出成绩来。各地也还有许多好的生产技术，应因地制宜推广。比如，壶关县晋庄大队“有机旱作”的经验就很好。秋天雨水比较好，雨后土壤水分保养好的时候，就深翻，加进农家肥、磷肥，第二年播种时不犁不翻，可以保水抗旱。1973年广东海南岛有些地方种植甘蔗时采用过这种办法。那里有很多荒地，过去种甘蔗种不成，后来采取这种办法，在台风后，深开沟、深挖、深翻，下有机肥，秋天种上；长半年，第二年春天旱时，已扎了根，抗旱能力强，旱不死；到5月下雨，就长起来了。后来我们提倡这种办法，1亩地甘蔗由半吨产到3吨以上。看来这种办法特别在北方有普遍意义。

专业户、重点户是学科学、用科学的带动力量。我们的科研人员应当把他们作为联系的重点。要提倡搞技术联产责任制；还有防疫，可以搞技术承包合同制，保险也可以搞，也需要。养多少猪，养多少鸡，收一点费，万一发生了问题，发生瘟疫死掉了，可以赔偿一部分。这样，专业户、重点户的顾虑就少一些。防疫的人员，可以和重点户签订合同，我来包，检查、指导、打防疫针，你也出些费用，如果发生了问题，也要赔一些。要研究这些办法。这样，搞科技的、防疫的，也就有用武之地了。也不是像过去应付差事，吃大锅饭。谁搞得好，专业户、重点户就信任他，欢迎他，他的事业就发展了；不好的，不负责任的，谁也不找他。好坏就考验出来了，这样就把科技、防疫带动起来了。还有饲料工业，重点户一发展，饲料工业就重要了，加工、储运这一套就带动起来了。

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这些科学技术推广机构如何设置，也应好好研究，总结经验。过去用行政的办法，一个公社设一个，人配齐了，成了机关，结果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即使服务搞得好，推广成绩大的，也局限在一个公社，作用受到限制。我们不少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和技术推广机构，经费养了人，吃了饭，要搞研究和应用，一无手段，二无经费。看来一个公社设一个摊子，没有那么多的科研人员，钱花了，起不了多大作用，不一定再采取这个办法。有关农业、畜牧业、多种经营的科研和应用，可以考虑在一个县搞几个服务中心或科技咨询处，同农民签订联产承包合同。搞得好的事业就发展，搞不好的就赔本。这样，科研的成绩越大，经费就越多，科研的力量也越大，科学研究事业也就搞活了。

正确认识经济形势扎实做好经济工作*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第一点，当前的经济形势

总的来看，今年以来经济形势是好的。无论农业、工业、财贸，工业中无论轻工业、重工业，形势都是好的。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主要是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今年各个方面都在进步，人民群众的信心增强了。但是，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我国财政经济情况还没有根本好转。要达到这个要求，还要经过长期、艰巨的努力。我们说财政经济情况没有根本好转，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

首先是财政还存在很大困难。财政是国家经济情况的综合反映，虽然去年比前年好，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又增加二十多亿元，但要看到去年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是在大量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情况下取得的。今年的计划原来安排三十亿元的赤字，从上半年的情况看，财政收入虽然比去年同期增加，但支出增加更多。上半年收大于支不到二十亿元，比去年同期少了三十亿元。如果不抓紧，今年赤字有超过原来计划的危险。讨论"六五"计划的时候，预测最近几年都还有赤字。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能够承受的情况下，一个短时期内有少量赤字，也不可怕。但不能靠大量赤字来搞建设，必须保持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现在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为了今后的发展，想办一些必要的事，也感到有些捉襟见肘，周转不过来，原因就是财政困难。

财政困难有多种因素。我们认为，主要来源于工业的经济效益差。当然，工业企业本身也有许多困难，如要安排就业，农产品和其它原材料有些提了价，工资和奖金增加了一些等，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但必须看到，企业的整顿工作还抓得很不够，工业在提高经济效益上转变还不大，许多企业在改进经营管理、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还很不理想，使工业利润上缴计划完成得不好。其它行业也都存在经济效益差的问题。来自工业的收入是财政收入的大头，工业的效益不好，就势必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造成财政上的困难。

二是能源和交通严重落后的情况，短期内还不可能根本改变。这几年，我们

在调整农、轻、重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同时，虽然在能源的节约和开发上、在交通运输的建设上做了一些工作，但从国民经济的总体上看，能源、交通的建设仍大大落后于加工业的增长，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今年以来，油、煤、电、运全面紧张，供需之间的矛盾很大。还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才能得到缓和。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没有大的改观，要实现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是不可能的。

三是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严重不合理。现在，适合社会需要的和短线的产品生产不足，而产销不对路的和长线的产品又生产过多，库存积压加大，工业企业产成品占用资金上升很快。今年五月末，全国工业企业产成品占用资金为二百一十二亿元，比去年底又增加二十三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品种花色陈旧、质次价高、产销不对路的滞销货。改变这种产品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需要做艰苦的工作，不是一下就能做到的。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也是这样，全国企业由“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九万个发展到三十八万个，有不少是盲目发展、重复建设的，消耗高、质量低、效益差，亏损面相当大。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加重了我国经济上的困难。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企业的整顿，有待于具有相当深度和相当范围的改革。

总之，对经济形势既要看到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今年各方面又继续向前发展；同时也要看到财政经济情况还没有根本好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地、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第二点，今后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

大家很关心的“六五”计划的编制即将完成，在制订“六五”计划中，我们也联系讨论了今后二十年如何发展的问题。根据中央常委的多次讨论和去年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精神，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大体分为两个战略阶段：八十年代这十年，主要是理顺比例，提高效益，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到九十年代的十年，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小平同志最近接见外宾也讲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国在本世纪末，将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中间，八十年代的十年，变化不会很大，主要变化在九十年代，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那个时候，中国的日子就好过了，但也并不富裕。到那时，我们将建立起很可靠的、良好的前进基础。然后花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真正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我们要积极做好当前的工作，为今后经济的振兴创造条件。

九十年代的经济振兴能不能实现，决定于八十年代这十年究竟怎么搞。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前十年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太高，但基础工作、准备工作必须扎扎实实做好，这是关键。前十年基础打好了，后十年有可能出现高速发展的时期，比如每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长，而且水分少，效益好。我看这是完全有希望达到的。耀邦同志讲，不能把困难留给后代。要实现这一点，最重要的

是我们要在八十年代把工作做扎实，这样就给后人奠定基础，开辟经济振兴的光明前景。

八十年代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为下一个十年做好准备，关键是抓好四条：

（1）搞好调整、整顿和改革。六月初在日本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我，中国的调整原来说搞三年，现在又说要搞到一九八五年，究竟调整要搞多久？我说，作为一九七九年提出的那种意义上的调整，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农轻重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缩小赤字，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可以说基本达到了。现在讲的进一步调整，不是简单地下马、收缩，而是要进一步使我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包括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这个意义上的调整，还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抓好了调整和整顿，把各种关系理顺当，正如陈云同志所指出的，这样才有“后劲”。除了进一步抓好调整和整顿外，中国的经济体制必须全面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的合理化。不改革没有出路，但要有计划地、稳步地进行。八十年代要解决这个问题。

（2）要认真抓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对大多数行业来说，主要不是扩大生产能力，而是要真正围绕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为了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当把机械工业的改组、改造放在重要地位。劲夫同志的讲话中提到，我国机电产品二点八万个品种，其中需要更新淘汰的有一点六万个，约占百分之六十。现有的风机、水泵，大多数是仿苏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老产品。轻工业产品，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五六十年代水平，百分之二十左右是三四十年代水平。设备落后、技术落后、工艺落后，因此产品就落后。如果不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不认真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我们就不能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四个现代化就会落空。当然，这件事也不能一下子全面铺开，应当分别轻重缓急，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像机械工业首批抓三十个产品、一百个厂、三百个协作厂及科研设计单位，使整个机械工业的技术改造由此着手而逐步展开。这就是正确的部署，是向着振兴机械工业进军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对整个机械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都具有重大意义。

（3）集中力量搞好重点建设。中央常委很关心为下一个十年作准备的建设规模问题，最近我们讨论来讨论去，形成一个观点，就是要千方百计挤出一些资金来搞重点建设。由于财力、物力的限制，“六五”计划以至“七五”计划的基本建设总规模不可能铺得很大，需要适当控制。但在计划安排中，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点一定要突出。所谓重点建设，主要是指能源和交通运输的建设，也包括救活一九七八年以来引进的一些成套设备，把它安装起来。抓好重点建设，加快煤、电、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之在今后十年内有相当大的变化，这是使整个国民经济由被动转向主动的重要一环。基础设施太薄弱的问题现在不解决，将来还得搞调整。日本五十年代经济也很困难，但他们看准了煤炭、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就集中力量去搞，他们叫这种做法是“倾斜式”的生产方式，后来取

得了成功。世界上也有不少类似的经验。我们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凡是看准了的事，一定要下决心搞，宁肯把弦绷紧一点，各方面挤一挤，也要拿出力量来干。搞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不能像过去那样冒冒失失，又来折腾；但对一些经过努力能做到的事，要努力争取去实现，不能过于求稳，无所作为，贻误时机。当然，搞重点建设也需要量力而行，讲求实效。除了适当增加一些新项目外，对一些在建工程，要增加一些投资，缩短建设周期，加快建设进度；还有一些重大项目的前期工作也要抓紧搞，列入计划。只要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搞上去了，我们就可能不仅在“六五”和“七五”计划期间实现“保四争五”、“保五争六”的速度，而且九十年代会有更快一些的速度。

（4）大力培养人才。前十年除了在物质上作准备外，还必须在人才培养上为以后的发展作准备，要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出来。要通过各种方式，培训干部和各种技术人才，大力提高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为此，对教育方面的投资要适当增加，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待遇，特别是对中年知识分子的待遇要抓紧解决。

第三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一些要求

今年上半年预计全国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九以上。由于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上升的幅度很大，基数高了，所以今年下半年增长速度会减慢。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全年还是维持“保四争五”的目标，不作更改。

下半年总的讲，要继续认真抓经济效益，切实解决产品的质量、品种、消耗、适销对路等问题；努力增收节支，完成利润上交任务，确保全年财政收支计划的完成，财政预算打的三十亿赤字，只能少，不能多，劲要用在这些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水分比较少的增长速度，经济才能继续保持稳定。要看到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还跟不上，搞不好就会今年上明年下，各方面都造成不良影响。

今年下半年要继续认真抓企业整顿。几年来我们大多数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但确实有少数企业很不像话。最近看了一个材料，甘肃盐锅峡化工厂一位同志写信反映该厂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个厂从一九七一年投产以来，年年亏损，一年比一年多，十一年共亏损二千五百二十万元，即使全厂工人什么都不干，每人每月发二十五元生活费计算，也可发四十五年。厂里歪风邪气很厉害，经营管理混乱。这个厂很典型，但也不是个别的。这样的企业只要整顿好了，潜力很快可以挖掘出来。各地对整顿工作要加强领导，决不能走过场。

下半年要在开发能源、增加运输力量方面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同时要强调进一步抓节约能源。谭启龙[1]、鲁大东[2]同志对我讲，四川今年抓了安三个表：水表、电表、气表。这样一抓，许多单位天然气节约一半，水、电也节省很多。浪费遍地皆是，稍微一抓就见成效。前面说的全国现有的风机、水泵多是性能落后、耗能很高的老产品。据统计每年耗电占全国用电量的百分之二十八，应加快

步伐，一批一批进行更新改造。锅炉比较复杂一些，也要有计划地改。节能的问题，决不能松劲，看来还得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包括对那些消耗能源多，而产品质量差，供过于求，大量积压的，要限制生产。经验证明，解决产品大量积压的问题要抓两头，一方面要沟通城乡商业渠道，扩大销售；另方面必须及时调整生产计划，进行限产。这就是要实行“灵活反应”的计划指导。

下半年除了继续突出抓企业的整顿外，对企业的调整，企业的关停并转也要开始着手抓。质量差、消耗高、亏损多的企业不进行关停并转，社会经济效益是不可能提高的。我这次到山西，长治市委讲，去年还有亏损企业十八个，今年以来进行调整，关了三个，并了一个，到五月份，大部分企业已扭亏为盈，只有二三个还有亏损。总之，对企业的调整，要逐步列上议事日程，明年要进一步抓。要搞好调查研究，制订规划，狠抓落实。

第四点，国务院的机构改革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国务院机构改革前一段时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进展是顺利的。但机构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各单位一定不要松劲，不然就会功亏一篑。各部委除了继续抓好老干部离休退休和安排、完成紧缩人员编制的任务、轮训各级干部工作外，还必须把改进工作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作为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切实抓好。机构合并精简以后，适应新的形势，各部委要制定工作制度，明确职责范围，改进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使我们不但有新的机构，新的班子，而且有新的作风，新的面貌，把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一步。以上这些，工作量还很大，也很艰巨。当前机构改革这件事，也如同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如果松下来，不仅不能扩大成果，原有成果也巩固不住，还可能走回头路。所以一定要善始善终，继续前进，不能半途而废。

这次机构改革，是在经济体制没有全面改革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不可能是很彻底的，并且势必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已经改革了的机构，不仅同多年的习惯势力、传统作风发生矛盾，而且同尚未改革的现行经济体制会发生很多矛盾。比如现在一个部只有四五个正副部长，要是按照老办法，开什么会都要部长来，这一条就吃不消。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已经改革的行政机构是向前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遇到困难就后退，走回头路呢？这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所以，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就必须相应从工作制度、作风、方法等一系列方面加以改进，甚至涉及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比如，国务院和各部委领导干部减少了，机构精简了，就要考虑把有些权力下放一些，不要过于集中，以发挥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今后遇到矛盾，遇到困难，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领导思想上必须明确这一点。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我们是在经济体制没有全面改革以前先进行机构改革的，因而是不彻底的。但应利用这个改革，去促进经济体制和许多方面的改革，为今后的全面改革创造条件。

注 释

1．谭启龙（1913—2003），江西永新人。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曾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政府主席，山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革委会主任、省人大主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四川省顾委主任。

2．鲁大东（1915—1998），河北馆陶人。时任四川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曾任重庆市委副书记、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四川省顾委副主任。

采取综合治理措施解决野蛮装卸等问题*

一九八二年七月八日

* 这是赵紫阳对上海港八区装卸队长李仁源反映野蛮装卸问题材料的批示。

上海港装卸队长李仁源同志反映的材料值得重视。“文化革命”以来的一个长时间里，由于思想工作薄弱，制度废弛，装卸工作和储运工作中较普遍地存在着随意偷窃、野蛮装卸、保管不善等问题，不仅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声誉，政治上的损失更不可低估。上述情况，尽管国内外曾有过多次反映，中央和国务院也作过多次批示，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看来，对这样一个“老大难”问题，仅仅是一般地批一下，讲一下，已经不够了。要真正地彻底地加以解决，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增强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外，还必须深入下去，对包装、运、储、装卸中的技术装备、操作规程、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等各个环节，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找出症结所在，提出综合治理的措施。此事建议请经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的同志，并吸收一些熟悉这方面情况的、热心于改变这种状况的、退居二线或离休的老同志参加，先以港口为重点，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应采取的对策，报送国务院审定。上述意见，请抄送外贸、交通、铁道、商业部及物资管理局。

商业要对工农业生产发挥促进引导作用*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听取商业部汇报时讲话的要点。

一、商业要在生产流通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商业对生产不是“砍”和“赶”的关系，应是“促”和“导”的关系。“促”就是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导”就是引导生产部门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持生产。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都由商业包下来，对消费、对生产都不利。

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在生产、计划管理、体制等方面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商业部门要十分认真地分析、研究农村的新形势。商业工作要有利于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现在农业生产实际上是以农民家庭或小组作为承包单位进行的，从长远看，农业生产必然要向生产专业化、社会化发展。商业要促进这种发展，不能限制商品生产的发展。

过去的管理体制有许多弊病。主要是工厂不关心市场，市场的变化也影响不了工厂的生产；工厂不关心技术进步，甚至抵制技术改造；城乡有本事的人不能发挥作用等。现在经济一搞活，能人就出来了，他们搞商品经济很能干。当然，发展中也难免会出现缺点、弊病，但要沉住气。采取简单的办法消灭这些东西很容易，但搞不好往往把有能力的人也打下去了，把搞活经济的优点也消灭了。要研究如何因势利导、存利去弊的路子，通过实践找到更好的代替形式。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货畅其流，活跃市场，一富国家，二富农民，这是件大好事，各方面的工作都要适应这个形势的发展。

二、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优质不优价，劣质不降价，这不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不要把价格调节和计划指导对立起来。对农业生产要实行计划指导，价格调节应作为计划指导的一种重要手段。农村的自主权要多一点，限制措施要少一点，办法要活一点。

农业生产发展了，经济搞活了，农民同国家交换的商品就多了。商业就要通过价格调节农业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把农民纳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系。

对价格问题要作全面分析研究。如中国农村市场的发展趋势如何，购销能力究竟有多大，有关部门要提出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对农业生产实行价格指导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要定得合适，有许多东西应该逐步实行浮动价格，这样有利于农业的合理布局。价格如果定高了，会刺激生产的盲目发展，并把销路堵死。

城市小商品的发展，可以考虑通过试行工商企业协商定价的办法，打开一条路子。现在的小商品，一种是以工业品为原料的，价格高，销不动；另一种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价格低，造成生产萎缩。有的省有计划地把小商品的价格开放了一点，就起到促进生产的作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市影响大，小商品价格的调整可以放后一点。

有些滞销产品完全走降价的路子，最后不一定多销。有些东西，在这个地方降了一点价，可以多销一些；但如果各地同时降价，销量就不一定增加很多。如化纤布，要研究市场的购买潜力究竟有多大。如果大幅度降价，财政上就受不了。总之，要全面分析，不能让表面现象掩盖问题的本质。

三、农副产品收购政策要稳定

现在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收购总的情况是好的。对已经发现的一些问题，可以研究，但改革收购政策要慎重，全面改革需要有一个总体设计。现在只能小解决，不能大解决。不要因几十亿斤粮食的缺口就对农副产品收购政策进行大的变动，要防止把刚刚好一点的形势又搞下去。

粮食统购、派购、加价的政策不能轻易改变。要坚持粮食收购基数，基数就是任务，就是义务负担。粮食不怕超产，要下决心使适合种粮的地方安心种粮。从长远考虑，粮食增产主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此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重点产粮区要逐年降低一点收购基数。第二，多生产的粮食通过议价或加价收购，使农民种粮食的收入与种经济作物的收入不要悬殊太大，保持他们种粮食的积极性。算总账，加价、议价粮还是比进口粮合算，可以考虑增加国内粮食收购数量，减少进口，把减少进口粮食的补贴转为对产粮区的加价补贴。第三，不要给山区压粮食生产任务，要鼓励、帮助山区发展土特产品生产，但价格不能定得很高，以免过分刺激山区土特产品的发展而加剧与产粮区的矛盾。本来适合种粮食的地区，为了增加收入而改种经济作物，既不符合自然规律，也不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调整农业布局就很难落实。

棉花收购政策不要变，还是一斤棉二斤粮，要钱给钱，要粮给粮。现在有些地方缩小粮田改种棉花，从根本上说是钱的问题，这是农民的自发转移。可以搞粮棉挂钩，在完成粮食基数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作物，多交棉花，多给粮。我国的棉花（包括糖）不是多了，而是太少，还要因地制宜，继续发展。有些农民投机取巧，在应种粮食的地方不种粮食而种棉花卖高价，不能允许。

当前农副产品收购方面，一是粮食问题，不要因为暂时有缺口就大动干戈，

要搞稳一点。这两年粮食购销平衡如有困难，可以暂时多进口一点，以免把农村经济搞死，得益不多，失利甚大。二是有几种农副产品多了，主要是价格太高，盲目发展，如油菜、烟叶、红黄麻等，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限制。三是南北方、新老产棉区收购基数高低悬殊、收益不均的问题，要逐步适当调整一点基数，但不要太猛。

对于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

（一）原则同意把现在的一、二、三级批发改为两级批发，大大收缩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二级站，但步骤要稳一点。

（二）对农副产品今后应当逐步减少定基数的品种，扩大按比例加价的品种。属于在相当时期内鼓励继续发展的品种，可规定牌价收购和加价收购的比例；属于需要控制发展的品种，在实行比例加价的同时，确定收购计划，计划外的实行浮动价格。

（三）将商业部食品公司经营的业务（包括经营机构、设施、购销调拨）划归农牧渔业部，是一项大的改革。把生产和供应拧在一起，可以减少矛盾、提高效益，从长远看，这条路非走不可。但具体做法需要认真研究，目前暂不作决定。

（四）对高利商品要加税，收入归中央，可以按比例返回给地方一部分。这样既可以保护地方积极性，又可以减少盲目生产的弊病。

（五）要关心商业职工的生活，逐步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但涉及工资制度的问题，要通盘考虑，目前一律不动。

企业整顿必须抓住主要矛盾*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听取全国企业整顿座谈会汇报时的讲话。

一、工业的发展速度要和能源的可能相平衡

东北不再热衷于更高的增长速度了，这很好。更高的速度就要烧油，绝不能再把石油用于燃料，不然这个门一开，好上不好下。拿油发电去争那个速度，好多东西生产出来又积压，不如直接出口油合算。我主张国内国外统一算一算账，用烧油生产铁合金上算，还是进口一些铁合金、出口油上算？要怎么合算怎么干。拿油发电，要很谨慎，搞不好，上去容易下来难。在特殊情况下一定要烧，也必须限期限量，明确什么时候停止烧油。根本的问题是工业的发展速度要和能源的可能相平衡。我们不能勉强争那个速度，把煤炭库存吃光，又去烧油，搞不好明年速度还要下降。用这种办法缓和煤的压力，这不是个好办法。不是说绝对不能烧油，暂时周转一下还是可以的。不顾能源的可能去强求速度，不可能有好的效益，势必造成被动。用油去发电，本身就违背经济效益的原则，这就是把速度放在效益之上了。有很多事情就是一步一步越陷越深，最后不能自拔，对烧油的问题就要注意不能造成这样一种形势。

二、整顿要出成果，出效益

要把辽宁、黑龙江的材料再分析一下，如果真是整顿的结果那就很好。整顿要出成果、出效益。要分析一下，胸中有数，真正整顿出了多少效果。有很多地方搞整顿是从反浪费人手的。不光是沈阳，牡丹江也是这样。牡丹江市通过搞查、比、算活动，今年头五个月，地方预算内企业上交利润比去年同期提高73%。上海有一个材料分析，原材料占总成本的84%。企业原材料的浪费很大，不能光讲社会负担重、原材料提价、贷款利息高等客观因素。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企业应该把这些变为改善经营管理的动力，通过挖潜节约，把外部增加的负担补回来，而且还要超过。日本政府就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原材料、能源价格的提高，通通不能简单地进入成本、减少利润。油价提高了1.5倍，物价只许提

高22%。因此，第二次石油冲击，对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而美国就不行。美国条件比日本好得多，大部分油是自产的，进口的只占三分之一，而日本全部靠进口。

三、对企业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我们对企业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同志们要求给企业以利益，以自主权，给予一定的活动余地，这都是对的。不能把企业捆得死死的，无论如何不能走这条路。最近，苏联一个院士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苏联工业生产下降，主要是企业自主权太小，成堆的指标把企业捆死了。一个生产一亿米布的企业，连动几百卢布的权都没有。解决的办法，他只讲了物质刺激，没有讲改善经营管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要求是对的，是应该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动动摇摇。

但是，另一方面，当前工业领导上有一种倾向，就是简单地把国家利益划给企业一块，企业多得，国家少得，而不是通过一种政策，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一方面要给企业以利益，另一方面也要给企业以压力，有压力才能显出来企业经营的好坏。想在优越的条件下，简单地把国家的利益划给企业一块，这不是改革的目的。企业要有一种思想，要把加税、加利息等等当成一种动力，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挖掘潜力，提高经济效益。不能打破了“吃大锅饭”又搞另外一种“吃大锅饭”。要吃“小锅饭”，只能发那么多“米”，经营好的够吃以外还有节余；一般的紧紧张张刚够吃；经营不好的吃稀饭。

我们的政策、办法要奖勤罚懒。特别努力，经营好，收益大的，得到的利益就大；经营一般的，能够过得去；经营得差的，理所当然地不应得到利益，甚至要受到适当的处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锻炼出一大批善于经营的企业和企业家，真正把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当然，企业有困难，负担很重，但是主要是从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来解决。企业不能又想改革，又想旱涝保收。要想一种办法，即在不吃“大锅饭”的条件下，让企业紧紧张张地过日子，这样有好处。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什么搞得好一些，就是没有人给它开“包饭”。这两年，有些企业任务不满，其中相当一部分打开了局面。但是有的“三大件”定点的企业，因为打了保票，进步就不大。没有定点的企业，却紧张起来了，努力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很有进步。这说明，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让企业躺在优越的条件下“吃大锅饭”。要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去搞，扩大企业自主权就能发挥作用，就能使企业领导干部和工人的注意力转到改善经营管理、挖掘企业内部的潜力上来。

企业的浪费，主要是原材料、动力消耗大，废品多。社会的浪费，主要是质量不好，产销不对路，产品积压。吉林省安图县出的牙签，剔一次牙就断一根，而且还断到牙缝里。剔一回牙，过去用一根，现在用四根，社会效益降低了三倍。去年我去墨西哥，从上海买来的棉毛衫，质量不好，穿了两次就开线了。上海整个工业，原材料、动力消耗占成本的84%，如果降低1%，就可以增加利润

2.5亿元。企业要认真从这方面努力。应当从改善经营管理，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来克服浪费，挖掘潜力，增加收入。

总之，企业必须要有自主权，使它有用武之地。但是要有个限度，就是不努力挖潜就没有利益，经济利益必须建筑在努力挖潜上。这应该是一个主要的指导思想。不能光讲权、光讲利。决不能回到“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但是给企业的条件很优越也没有好处。要靠政策，不能靠照顾。不能靠减少国家的利益去搞改革，要凭企业的真本事。苏联那个院士的文章说，对什么样的厂长，国家应当给他较大的权力。我看有两种厂长，一种是以首钢周冠五为代表的，他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把企业搞好，对国家多做贡献，这种厂长就要给他权大一点；另一种就是光想着挖国家，对这种厂长，权就不能给他。

四、企业整顿要敢于触及尖锐矛盾

对尖锐的问题不敢触及，就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克服领导软弱状态。领导班子、劳动组织、人浮于事、关停并转，这几个问题不敢触动，那还算什么整顿？根本的是决心问题。领导班子还是那么老，人还是那么多，有能力的上不来，这怎么行呢？企业里那么多人放进去，连拿出来学习都不干，我们党的战斗力哪里去了？

整顿企业，必须抓住企业的主要矛盾。不敢触动主要矛盾，整顿就流于形式。在整顿中，要认真把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经济责任制的完善；整顿劳动组织，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整顿劳动纪律；整顿财政纪律等工作做好。但是，目前企业整顿普遍存在四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一是领导班子，二是劳动组织，三是人浮于事，四是关停并转。解决这些问题，不要光看到困难的方面，还要看到这是广大干部、工人的要求，是有群众基础的。不要光听表面上的种种议论，不能空泛议论企业整顿的重要性，重要的在于敢不敢动手。决不能因为有这些问题，对党的事业采取敷衍的态度。要相信党，要相信群众。领导态度要坚决，把道理摆到桌面上，群众是会接受的。优柔寡断，犹犹豫豫，阻力就更大。中央和国务院机关改革，对企业整顿领导班子是很有利的形势。中央机关都能解决，企业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呢？根本的问题是软弱、消极，怕得罪人，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把多余的人拿出来搞智力开发，搞培训，又不是失业，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要有信心。黑龙江就敢碰硬，为什么他们敢碰，别的地方就不敢碰？多余的人不能光搞学习，还要搞劳动积累，哪能坐着吃！城市有很多事情可以作，如搞土建、植树等等。社会上有那么多事没有人做，工人又放到车间里没事干。只要领导坚决，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也是对领导的考验。对参加学习的人，可以拿工厂工人奖金的平均数，用这个钱，买一点书，买一点学习参考材料，为学习创造条件。搞体力劳动的，可以搞定额，超额的有奖。

整顿企业不能花花哨哨，经验出了很多，面貌依然如旧。这样，那叫什么建设性整顿？我说过，成绩不能估计过高，这些问题不解决，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变

化。企业整顿大量的就是这四个问题，就是黑龙江所说的，要敢于碰硬。这些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一个省、一个市抓住几个企业，在这几个问题上把它搞开，整顿就会势如破竹。有的企业，领导班子老化，工作不负责任，还发牢骚。这些问题不解决，工人的精神也不可能振奋起来。企业整顿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现在是决心太小。首先是要有决心，没有决心，企业就整顿不好。国家机关机构改革的情况说明，只要领导有决心，就会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要敢于解决企业中的问题，影响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的问题不解决，企业就没有希望。

什么叫整顿？整顿就是要解决主要矛盾，解决尖锐的矛盾，要不为什么说整顿？！整顿不是要你抹稀泥，搞蒸馏水消毒。我们整顿企业是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是顺乎潮流的，是正义的事业，有理走遍天下，为什么不敢下决心呢？

五、关于领导班子年龄问题

我在天津全国工交会议上讲的是50岁，现在55岁，已经作了让步了，不能再退了。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明确年龄界限，年龄界限不能突破。不突破阻力小，一突破阻力就更大。中央都没有照顾，基层企业更没有什么可照顾的。有的部长超过了年龄但身体很好，跑步能跑几千米，都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再根据情况安排。企业应允许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搞二线工作，担当某一项任务，某一方面的代表，这个厂不行，可以到另外一个厂搞二线工作。你们可以向干部讲，中央那么多老同志，为什么让耀邦当主席，让我当总理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能退居二线，企业里的老同志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

六、关于企业自主权问题

给予企业的自主权不要变，不能再回到老路上去。但是地方和企业所得比例，要比原来稍低一点。这样才能使国家有点钱，办成几件有益的事情。有很多事情不从全国考虑就不行，例如能源、交通问题。如果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能源、交通没有大的改善，谁也活不了，谁也快不了。能源、交通、铁路、港口、电力建设周期都很长，必须由国家来搞。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表现。

七、加强基础工作必须训练人才

要训练人才，没有人才不行，特别是财会人员。不训练人才，再讲也不行。这也是基本建设。基础工作要加强定额管理，要搞技术标准。说了很多次了，哪个部搞了？

对专利法问题要讨论一次，早定下来，我看要搞专利法。有人说这要受国际专利法的约束，对这个问题应该从长远看，我们不能贪图眼前小利、保护落后。我们搞专利法，对国内发明创造和企业技术改造都会起促进作用。

八、关于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

关于在整顿企业中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按中组部《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座谈会纪要》办。

以工代干问题。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原来的以工代干；一个是今后的以工代干问题。对原来以工代干的要严格考核一下，确实够条件的就当干部，不够条件的还是回到生产岗位上去。有些人确有一些文化、技术，够条件的，经过严格考核，合格的可以算干部。今后不要再搞以工代干，工人选上当干部，就享受干部待遇，落选了就回去当工人。这个问题，劳动人事部和组织部要搞一个正式文件。

部队转业干部问题。转业干部，地方必须安排，要多方面安排。来了先热情接收下来，家庭、生活先安排好，然后分别进行培训。大企业可以以企业为单位，小企业可以以市为单位，进行专业培训，培训好了再进入岗位。除转业干部以外，工厂干部主要从本厂提拔，一般不从外边进入，当然工厂之间调剂是另外一回事，要同各地打个招呼。

关于1%晋级权问题，同意列入成本，从工资总额里开支。你们提出的几条限制很好。将来再过几年职工升级了，要不要扣指标呢？我看还是扣好。扣，他可以不乱来。过几年，国家有个升级面，因为你先升了，就把指标扣回来，比如，一年升1%，五年加起来就是5%，就应该扣5%。这样老实人就不吃亏了，也可以避免有了这个指标他当年就随便用掉。如果你那个厂没有能人，1%的指标今年没有用，明年还可以用。如果当年没有用，到年底指标不算了，那厂长就要挨骂了。既给他这个权力，又要他不能滥用，这样才能鼓励厂长认真负责，把这个1%的晋级权用好，真正奖励那些有特殊贡献的人。

总的来说，你们这个文件都是好话，关键看能不能实现。这几年重点是抓整顿，整顿要和调整、改革结合起来。整顿的好坏最终要看经济效益。一是要看敢不敢触动主要矛盾，解决问题；二是要看经济效益有没有提高。对企业的自主权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总的一条，真正搞得好的可以得到利益，搞得不好的就不能得到利益，不能搞歪门邪道，形成另一种“吃大锅饭”。要扩大企业自主权，给它活动的余地，也要给它压力，不能让它躺在国家身上。

这几年的调整中，在生产资料方面出现了一点买方市场，虽然是不自觉的，但也显示了它的好处，使企业关心市场了，不要重新再把它统死。在消费品方面，也出现了买方市场，一定要有意识地引导企业把它作为动力，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苏联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横向联系，市场和消费情况反馈不到企业里来。所以企业要有一定的自销权，要掌握一定的产品，比例可大可小，不能

把企业搞得太死了，搞死了对国家不利。

总之，我们的经济是向前发展的。财政部讲了好话，财政问题不能推到财政包干上，很多是调整上发生的问题。如果不改革，那些问题一样存在。一方面要看到改革使财力有些分散，但也必须看到改革调动了地方、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总的财政收入还是多了，财政还是好转了。财政部也不同意取消财政包干。所以，改革一是要坚持，二是要完善，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问题，要认真研究，逐步解决。

中央财力要适当集中。现在企业留利水平大约是12%，要稍降一点，降到10%左右。什么都要有一个适度，要想让每一个企业都得到好处恐怕不行，要奖勤罚懒。

开发西北新的产粮区与调整贫困地区农业结构问题*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考察甘肃、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时的谈话要点。

一、开发新的产粮区

这是作长远规划时需要研究的问题，否则，粮食无法解决，农业结构也难于进一步调整。

中国农业资源不算差，但适合种粮食的耕地并不多。宜种粮地必须种粮，这样，才能使那些非常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把农业结构调整过来。

现在，相当大的地区，特别是南方平原地区，农业结构已经调整得差不多了。但确有一部分地区，主要是山区，南方北方都有，很不适合种粮食，仍在勉强种粮。结果粮食产量很低，破坏了生态平衡，水土流失严重。这样的地方，应该继续调整。调整的速度不可能太快，因为归根到底，调整的关键在于粮食，没有粮食，是调整不过来的。

这几年进口粮食，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有利于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结构。今后要继续进口。但进口总有一定限度，至多一千五百万吨，或者二千万吨，再多就不可能了，外汇、运输都有问题，国际市场也供应不了，何况还有风险。

所以，从长远考虑，要采取大一点的措施，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开发新的粮区。

黑龙江三江平原的开发，已在进行论证。甘肃的河西走廊，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宁夏的河套地区，条件如何，前途如何，是否宜于开发，也需要调查研究，组织论证。

河西走廊的可垦荒地很多。酒泉地委的同志说，这个地区有五百万亩宜农荒地。甘肃省委的同志说，酒泉、张掖、武威三个地区共有五百万亩。数字不一，可能是标准不同。要进一步摸清底子，数量看来是不少的。

河西走廊的荒地，只要能灌上水，就能长草，长粮食，“有水就有地”。酒泉地区年降雨量虽然只有几十毫米，但祁连山脉下来的雪水，从三月到十一月，径流量达三十一亿立方米，加上地下水三十七亿立方米，共六十八亿立方米，全区

七十四万人口，平均每人九千多立方米水。这样丰富的水资源，合理利用，潜力大得很。酒泉地委的同志说，三十亿立方米地表水，现在十亿立方米流掉了；引入渠道的二十亿立方米中，又渗漏蒸发了十亿立方米；利用了十亿立方米，浇了一百五十万亩地。如能再利用一些水，比如减少五亿立方米渗漏，就可以开发七十五万亩地。这里日照长，土质好，粮食产量高。开荒头两年，亩产就有二三百斤，种到三年以后，一般能打四五百斤粮，比在现有耕地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容易得多，而且都是商品粮。看来，开发河西，比较可靠，比搞引挑工程划得来。一九五八年为什么搞引挑不搞河西？其实，河西有了粮，定西也就有了。

河西走廊，水渠已经普遍修起来了，问题是渗漏。已经引进渠道的水，又漏掉了，很可惜。宁可少修新的工程，也要把现有渠道的衬砌搞好。衬砌搞好了，渗漏问题解决了，一条水渠可以顶两条用。这等于铁路修复线，是最现实的，事半功倍，来得快。这叫挖掘现有渠道的潜力，也是一种改造挖潜。这里有卵石，有石灰石矿，又有电，可以建水泥厂，就地解决衬砌用料。规划一下干、支、斗、垅渠，上下有所分工，逐步来。要多少投资？用贷款的方式行不行？这里农民比较富，酒泉地区每人平均收入二百五十一元，四口之家就是一千元，可以搞点劳动积累。

一是搞好衬砌，防止渗漏。再就是加强管理，节约用水。四川抓节能，企业职工家里普遍装了三个表（电表、气表、水表），非常见效，节约了一半。这里水资源多，也不能浪费，要多想点办法，把节约用水同扩大耕地结合起来。浇地要有人管，实行责任制。要研究如何节约用水，比如能不能搞喷灌。收费要合理，定出标准，不超过标准的如何收费，超过标准的如何收费。一亩地到底浇多少水合理，值得研究。现在酒泉地区每亩用六百立方米水，到底怎么样？水浇得过多，从长远看，并没有好处，容易盐碱化。酒泉地区有四十万亩下湿地，能不能改用井灌？不要以为反正有雪水，就不必打井了。井灌和开沟排水相结合，既可降低地下水位，改造低洼地盐碱地，提高产量；又可节约地表水，扩大新的耕地。总之，有很多问题可以研究。

柴达木是盆地，水流不出去，地形和河西走廊不同，但也有一些条件是类似的。这里有昆仑山脉的雪水，水资源更丰富。日照时间也长，昼夜温差很大。

青海省委的同志说，柴达木有三十亩小麦，亩产高达二千斤。面积虽小，说明潜力很大。世界上不少小麦高产区出在高原。柴达木盆地已有耕地七十万亩，省委考虑，准备逐步开发二百万亩。条件如何？如何开发？将来能不能一部分作粮食基地，一部分作饲料基地？需要综合研究，搞个区域规划。

宁夏河套地区潜力也不小。十一个县，现有三百五十万亩水浇地，亩产稳定在五六百斤上下。还有三百万亩没有浇。自治区党委认为，有可能再搞一百万亩自流灌溉。这里电多，可以提水，提了水，不一定都种水稻，也可以种旱粮。河套地区有一百二十万亩盐碱地，用井灌沟排的办法综合治理，效果很好，亩产可从二百斤提高到五百斤。

初步印象，河西、柴达木、河套地区，很可能是有开发前途的。到底如何，

需要论证。如果河西能开发五百万亩，柴达木二百万亩，河套扩大灌溉面积一百万亩，改造盐碱地一百万亩，那也很可观了。

我们在新疆垦荒，是成功的。苏联在中亚地区开荒，出过一些问题，但总的来看，也是成功的。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的自然条件，同新疆比较接近，同苏联中亚地区也有类似之处。要注意运用新疆的经验，也要注意研究苏联中亚地区的经验。

二、调整陇中和西海固[1]地区的农业结构

甘肃中部山区，包括整个定西地区在内，有十八个县，五百多万人口，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年降雨量约三百至四百毫米，但集中在八九月份。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极不稳定。解放以来，大灾重灾有十一个年头。人均收入不到五十元，现金收入更少（定西地区每人五元）。吃粮经常靠返销，养牲口没有草，烧锅烧炕没有柴，几十万人没有水喝。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七个县，一百五十万人口，同陇中毗连，也是最困难的地区。

过去是恶性循环：越穷越开荒，越开水土流失越严重。要走上良性循环，必须有两个转变：改变生态环境，调整农业结构。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但是，一定要有长远打算，否则，困难会越来越大。

今年大旱，上半年只下了六十毫米雨，但从榆中到会宁，到定西，一路上看，柠条，红柳，沙打旺，草苜蓿，都可以长。据说，通渭的申家山，种红豆草，长得很好。兰州水土保持站的技术人员说，“灌草为主，恢复植被”，讲得很有道理。同沙漠研究所的同志座谈，同甘肃省委和宁夏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座谈，意见一致。看来，第一位是恢复植被，其次才是种什么。种草，种灌木，最容易成活，既能保持水土，又能做饲料，做燃料，做肥料，有的还可以做编织的材料。这就可以满足群众的迫切需要，同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了。饲料和燃料的问题不解决，群众就来铲草皮，“斩草除根”，不良循环就会继续扩大。过去破坏植被，是从砍乔木开始，然后砍灌木，铲草皮。现在恢复植被，就要倒过来，从种草种灌木入手，循序渐进。能够种成花果山，用材林，当然好，但一下子办不到。乔木要下山，种在川地，有水的地方，公路两旁。坡上主要是种草，种灌木。

一下子退耕太多，也吃不消。先退陡坡地，缓坡地可以缓一缓，一步一步来。

缓坡地，川地，要集中肥力，劳力，提高单产。这样，粮食总产量不一定会减少。可以搞点工程，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十几、二十度以下的地不一定都要修梯田，梯田也不一定修得很平，当然，搞点防护措施是必要的。提高单产，主要抓保墒，把仅有的一点水用好。这一带，正常年景，有三四百毫米雨，如果能把保墒问题解决好，一年一季庄稼是有保障的。压砂地产量高，就是因为能保墒。要多想点切实可行的保墒办法。晋东南的壶关县，有个山区生产队，他们种

谷子是秋天深翻，春天不犁。第一年秋天深翻后，施下土杂肥，封起来，第二年春天下种时，不犁不翻，亩产可达六百斤左右。秋天深翻，可以蓄水，春天不犁，避免蒸发。这种办法，对陇中和西海固地区是否适用，可以试验试验。定西地区在山上种树，秋天挖坑，春天再种，成活率高，看来也是这个道理。

除了保墒，还要选择耐旱的作物，培养耐旱耐瘠的品种。种什么，要根据这里的条件，不能光看高产不高产。高产的作物常常不耐旱，今年雨水多，捞一把，明年雨水少，又输光了。过去我们常吃侥幸心理的亏。要研究寻找适生作物，这个领域里，未知的东西多得很。

沙漠研究所的同志说：雨量在四百毫米左右的，可以搞旱作农业；二三百毫米的，就得搞半农半牧；雨量再少的地方，只能根据水资源条件，搞灌溉农业。这种分析的方法是对的。在陇中、西海固这样的地方，如何搞好旱作农业和半农半牧？如何保墒？采用什么作物品种？要把题目出给科研部门，向科学家提出来，请他们研究。还要重视群众的经验。定西群众用淤洪的办法治理沟坝地，对上下游都有利，就是一条好经验。修水窖，也是群众创造的，多少年来山区群众就靠这个办法解决喝水问题，一度丢掉了，现在回过头来还得采取这个办法。会宁的姑娘出嫁，要打听婆家有几口窖，可见水窖的重要。

调整农业结构，要有规划，有责任制，一步一步落实，不能一边退耕，一边又去开荒。西海固七县的粮食征购任务已实行减免。要把减免同退耕、恢复植被联系起来。减免多少，就应该退多少陡坡，把草和灌木种好，否则就不能免那么多。同时，还要提高粮食单产。随着单产的提高，再进一步扩大退耕，还草还牧。甘肃省委研究，打算对陇中地区的穷困队在粮食征购上实行减免政策。可以考虑，把工作做得细一点，根据几年的平均数，把粮食包干基数确定下来：购销相当的，免掉；购大于销的，定购；销大于购的，定销。一个县内，可以有征有购有销。在确定粮食基数的同时，把调整结构、恢复植被的任务落实下来，使农民心中有数。有了方针，有了规划，实行责任制，政策稳定，坚持下去，搞它多少年，肯定是会见效的。

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在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国家给点支援，给点粮，给点钱。甘肃同志提出以工代赈，这是对的。与其单纯救济，不如帮助改变生产条件。同时，要教育群众，不要养成依赖心理。国家也有困难，补贴也不能太高。

河西和定西，河套和西海固，要联系起来考虑。河西和河套开发起来了，商品粮增加了，就能支持定西和西海固地区调整农业结构。干旱地区，也可以向地广人稀的灌区搞点移民。但是，有组织地移民，很多是失败的；自动移民，倒是能巩固住。可以考虑，结合搞水利，衬砌，开荒，定些政策，定些办法，吸引农民自动地流向这些地区。这样可能慢一点，但花钱少，效果会好得多。

这里是黄河上游。调整农业结构，改变生态环境，搞好水土保持，对下游关系极大。陇中和西海固群众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治理黄河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篇大文章，内容很多，很值得加以研究。

注 释

1．西海固，指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六盘山区的西吉县、海原县和固原地区。

对大连市组织科研生产联合体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八月八日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联合形式（不久前上海为开发新产品组织二十条龙，也是这种形式），值得重视，应继续总结、宣传这方面的经验，予以推动。大、中城市在这方面应大有作为，这里的计委、经委，科委应协同配合给以支持。中央各部对所属企业、科研单位，应鼓励他们参加当地这种联合，不要从中限制。

“六五”、“七五”要为九十年代经济振兴作好准备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计划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这次全国计划会议开了20多天。开始时依林同志作了报告，讲了“六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工作重点和需要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8月14日听了宋平[1]同志关于全国计划会议情况的汇报，大家对这些问题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六五”期间还是要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努力“保四争五”，并使“七五”的情况比“六五”更好一些。“六五”以至“七五”，要从两个方面为九十年代经济振兴作好准备：一方面，抓好调整、整顿和改革，把各方面的关系理顺，使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逐步合理化；另一方面，抓好重点建设（主要是能源、交通）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经过讨论，意见比较一致。

讨论中大家反映，矛盾比较大的，是财力分配问题。去年下半年，我们较多地讲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邓小平同志也讲要积极利用外资改造中小企业。这是很重要的。九十年代要出现经济振兴，如果企业的面貌没有改变，设备、工艺、产品还是那个老样子，就没有什么希望。这就需要认真搞好以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为重点的技术改造。但是，我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能源、交通严重落后，光搞技术改造还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能源、交通没有一定的建设规模，那么我国的经济，八十年代不可能有一定的速度，九十年代也不可能振兴。因此，近半年来讲重点建设讲得多一些。现在看，决定后10年经济发展的，除了前10年要搞好调整、整顿和改革以外，就是要搞好技术改造和重点建设。这就发生一个资金问题。重点建设，地方、企业很难考虑。虽然地方也可以联合起来搞能源，毕竟有一定限制，恐怕主要是由中央投资。如果中央不掌握必要的财力，就不好办。当然，可以利用外资开发能源、交通，我们有这个条件。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要办的事情很多，如果不尽可能利用一些外资，矛盾不好解决。但是，借用外资也要有自己的资金配合，而且借用买方信贷、进口设备搞多了，对国内机械工业也有影响。所以，还是要多从国内集中一些资金。会议提出集中200亿元搞重点建设，不集中过不去，就是这个原因。能不能咬咬牙，大家承担困难。当然，不止这200亿元，还要从农民、企业那里想些办法。从会议简报反映的情况看来，各地同志对此顾虑比较多。这个问题我也还没有想清楚。不采取措施集

中200亿元，国家的重点建设成问题，“六五”计划就要重新调整。但是这样做，会不会挤地方、挤企业挤多了，又把大家的积极性搞下去。200亿元能否拿到，或者这一头拿到了，那一头又丢掉了（指影响积极性，生产下降）。如果拿到200亿元，而企业的技术改造被挤掉了或者搞得很差，这就有问题。因此，对于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两者也要统筹兼顾。究竟合理的界线划到哪里，很需要仔细研究一下。矛盾就在于：如果不集中这200亿元，我们的建设规模就不能搞那么大，就必然影响今后10年、20年的发展；如果不统筹安排好，集中搞得不适当，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影响了企业技术改造的开展，这也不好。

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现在还没有想清楚。最好的方案，是既按原来的盘子，多拿200亿元保重点建设，又不挫伤农民积极性，企业的积极性也不挫伤，技术改造不受大的影响。这就要很好研究一下，拿多少，如何拿。现在既顾虑拿多了，影响积极性，影响技术改造；又顾虑拿少了，影响建设规模，而地方和企业的钱也不一定能真正用得恰当。怎样能集中一些，又不影响其他方面，很值得好好研究。解决的办法，要很好地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总的看，企业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有相当潜力，要把这作为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力的、可靠的措施，全党思想统一，真正面向企业，去挖掘潜力。应当看到，中国经济现在这么大个摊子，今后只要搞得好，是会明显地出效益的。这几年企业增加不少负担，3年城镇安排劳动就业2600万人，直接间接压到企业，实际上许多企业并不缺少劳动力。企业的奖金、福利、实际工资总额增加很多，还有农业原料的价格上涨。因此，这几年企业负担加重，表现为利润减少。今后几年不会再给企业加这么多负担了。最近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材料，进行了分析，认为这3年企业如果没有这些原因，利润还是有相当大的增长。当然，不是所有企业都是这个情况，在行业之间、行业内部，差别很大。如首钢，一直是钢铁行业经济效益最好的厂子，今后几年之内经济效益还将有很大提高。它实行了经济责任制，搞得比较好，积极性起来了，今后3年产量不增加，每年上交利润递增6%（3年上交的利税等于它的全部固定资产）；还要有一部分资金用于本厂的技术改造，每年总的要递增百分之十几。所以，今后向企业怎么拿，要想个办法。国家拿多少，要有个区别。企业挖潜搞得好，可以多留一些。这几年实行经济责任制，有些企业确实搞得好；也有些企业确实搞得不好，等于挖国家。目前企业利润留成由6—7%上升到13%。现在要集中一部分资金，不能简单地作个规定，比如10元钱，国家拿7元，企业剩3元，或者国家拿8元，企业只剩2元，而是要鼓励企业多创造利润，既多上交给国家，自己又可以多得。这就是说，解决国家集资进行重点建设和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矛盾，在于挖掘潜力，提高效益。要通过挖潜，增加上交，也增加自己技术改造的资金。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今年下半年要在抓好企业整顿的同时，做好调整、改组企业的准备工作，明年坚决把那些消耗大、质量差、盲目生产、与先进单位争能源和原材料的厂子，进行关停并转。这项工作的难度较大，有些地方不大积极，

但非下决心不可。

总之，要考虑怎样把全党的注意力放到企业的整顿、调整、改组上来，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应当使搞得好的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去武装自己，搞得不好的只能处于困境，甚至不能存在。考虑企业的改革，调动积极性，不能简单地给企业以利益，而不承担什么义务，不能搞好搞坏都得利。要使它努力挖潜，搞得好，多交了国家，自己的技术改造资金也有了，职工福利也有了；如果搞得不好，国家要的必须照交，自己就没有福利，不能盖房子，甚至不能生存。不能搞平均主义，搞得好的资金紧张，没有力量进行技术改造，搞得差的既得利益照旧，“旱涝保收”。这个问题要很好研究。应当看到，放宽政策后，许多企业是为国家作贡献的，但也有挖国家的，要迫使企业不去挖潜就不能存在。把企业的潜力挖掘出来，一是要有政策，二是要有好的领导班子，有“明白人”。光有政策调动积极性，没有好的领导班子不行。现在有一批懒人占了国家便宜，也确有一批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上闯出一条路子。不能搞好搞坏都是留成10％或者n％，这样，肯定社会财富增加不了。今后不是简单地你拿多我拿少，而是不提高经济效益就没有出路。应当研究一些办法，如何通过挖潜提高经济效益，解决矛盾，这要作为一个方针。

第二，上面讲到，一个重点建设，一个技术改造，在资金分配上有矛盾。今后如果搞得不好，很可能有相当大一部分资金，既不用在重点建设，也不用在技术改造，而是用在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大上。这个问题，多年来很难解决。今后几年能否下决心改变过来，把这部分用于扩大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的资金减下来，一部分转向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一部分转向企业的技术改造。现在担心的，不是国家集中多一些，或者少一些，而是需要搞的东西搞不上去，不需要搞的东西继续扩大。如果能源、交通上不去，一般加工工业扩大了生产能力也开不了工。如果现有企业的设备、工艺、产品的落后面貌五年、十年没有什么变化，就会使我们处于很困难的地步，那就确实希望不大。只要下决心少搞一些一般的加工工业，就会适当缓和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的矛盾。有什么办法，能把一般加工工业的建设停下来，要很好研究。这笔钱集中起来用于搞能源、交通也不算少。

20年内单位产值能耗要比现在降低一半，如果达不到，就不能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只要大家思想一致，鼓起干劲，做好工作，是有可能的。2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平均每人国民收入也就是800美元左右，相当于现在中等发展国家的水平。连这个也达不到，那实在讲不过去。如果企业不进行技术改造，不降低消耗，到那时就需要20亿吨原煤，这根本不可能达到。而且消耗那么大，国民收入要增加那么多也不可能。世界银行代表团的经济学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算慢，但还是比较穷，重要原因就是经济效益比较差，搞了一些东西不产生效益。现在东北、华北因能源不足，有相当一批生产能力闲置，“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大家都吃六、七分饱。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容易，这与现行体制、政策、制度有关。全面改革体制、政策、制度要有个过程，不能完全

等。如何通过计划和各级领导解决这个问题，即真正搞企业的技术改造，而不是名为技术改造、实为一般的扩大生产能力。在今后的长远规划中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些一般的扩大生产能力控制住，把资金转到技术改造方面来。要尽量在政策、制度上采取一些措施，鼓励他搞技术改造，限制他搞一般的扩大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

过去的体制有两个根本弊病：一是产销脱节，生产者不关心市场，不关心社会需要；社会的需要，市场的要求，对生产不能起及时的反馈作用。几乎苏联、东欧国家，也都是这样。因此，始终是卖方市场，产品质量差，大量积压，服务很差。二是企业不关心技术进步。这些总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在很多政策措施促使企业不关心技术进步。苏联想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收效也不大。应当说，我国现在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指导工业生产中，没有占一定的位置，不少地方和企业还是满脑子的追逐产值：“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三季度战高温、夺高产，四季度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要研究一些政策，促使企业也好，迫使企业也好，总要把发展生产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国家盲目竞争，搞不好就倒闭，但迫使企业关心市场，关心技术进步。我们国家的好处是企业不倒闭，但企业没有搞好技术进步的动力、兴趣和积极性。今后20年，真正抓科技，依靠技术进步，许多现在看来是困难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否则，“翻两番”确实相当困难。从领导机关到企业，要考虑如何把精力转到抓技术进步上来。只要真正这样做了，经济效益就出来了。最近有些好的经验，比如上海围绕新产品开发，搞了“20条龙”；大连市围绕新产品、成套设备，搞生产、科研共同体，把不同企业从头到尾、各个工序连接起来，把科研、设计、生产连结起来，办法好，投资少，改进了设备、工艺、设计、管理等。还有天津市按行业搞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发展规划，都是值得重视的。现在盲目扩大生产能力花钱不少，而在改进技术方面，企业没兴趣，上边没渠道。这些问题，在计划上、指导工业生产上都必须想法去解决。如果我们用很大的毅力、决心去做好这件事，那就大有希望。各个大中城市，各个工业部门，都要抓技术改造，抓技术进步，按行业搞出规划，规定每年搞些什么事情，按期完成。

中央集中一些资金，可能有两个后果：一是搞得不好，挤了技术改造的钱；一是搞得好，把那些搞一般加工工业的建设压下来，真正用于技术改造的钱并不减少。现在企业技改资金中用于技术改造的只有20%左右，70—80%用于一般的扩大生产能力（其中有一部分是需要的）。这20%的钱不能减少，还要增加。国家怎么拿，拿多少，要通盘考虑。要防止中央挤地方、地方挤企业、企业挤技术改造。否则，虽然集资搞了能源、交通，但是企业的技术改造没有搞，设备、工艺不更新，能源的消耗降不下来，甚至更大，那么新增的能源可能还抵不上消耗的增加。因此，今后20年如果不依靠科技的进步，那是没有希望的。不能靠落后的生产工艺、设备和产品去实现翻番。一定要解决生产与科研相结合的问题，克服企业盲目扩大生产能力、不关心技术进步的倾向。

总之，关于集中资金的问题需要很好研究。但是，解决的途径只能从上述这些方面来考虑。光考虑集中多一点，少一点，不能解决问题。要做到中央能集中必要的资金进行重点建设，而企业的积极性又不受过大影响，技术改造还能够有步骤地进行。出路在于努力挖掘企业潜力，坚决把盲目扩大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的钱减下来，这个决心必须下。当然，究竟集中多少，还要进一步研究。财政部还要召开财政厅局长会议进行讨论，要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出路，包括拿多少，怎么拿，采取些什么措施。

下面简单讲一下农业问题。

（一）赞成这么个观点：发展农业靠政策、靠科学，同时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适当增加农业的投入。但是，投入什么，用在哪里，增加什么效益，还要很好研究。不赞成一个省、一个省地分投资，不能撒胡椒面。有限的资金要真正用在有效益的地方。各省区也应这样做。

（二）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关系。汇报提纲中说，“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目前的17亿亩水平上”，总的看，需要有这么多。但是，势必有些不适于种粮食的耕地要转到其他方面。最近去甘肃定西地区看了3个县，如果不保证一定的粮食供应，那里不可能有农业的良性循环。没有饭吃就开荒，越开越穷。一闹旱灾，不仅人没有吃的，牲口也没吃的。如果上述17亿亩是包括全部的话，那非减少一些不可。比如定西地区，还有承德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就得减少，不然调整不过来。当然，现在讲的17亿亩也包括不全，估计有相当部分，不包括在这17亿亩之内。这几年有些山区盲目开荒，破坏水土，不调整不行。当然，要逐步解决，步子太大也不行，现在要强调的是，适合种粮食的地方无论如何不能再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洞庭湖地区、番仔阳湖地区和成都坝子等，要严格控制，粮田面积决不能再减少，要能增加一点才好。

全国要选择条件好的地方再开垦一些，“六五”后3年做好规划，作好准备，有些地方可以开始起步，到“七五”期间真正着手搞，一直搞到下个10年。看来能开垦的耕地不多，但总还有些地方可以开发，有些可以用来种粮食，有些可以用来种经济作物（原来种经济作物的面积就可减少一些）。开垦，需要的投资大一些，在哪里搞，要很好研究一下。黑龙江三江平原是个地方，新疆、甘肃河西走廊也是比较好的地方。现在祁连山的冰川不是减少而是扩大了，即山上的降雨量增加了，山下的水多了。新疆、河西、柴达木，水资源很好，问题是要搞点水利工程。柴达木地区，小麦一季1千斤没有问题。河西小麦一季也有五六百斤，如果肥料、技术跟上去，七八百斤没有问题。这些水资源好的地方，粮、棉都可以种。采取一些正确的政策，不要从内地移民，依靠当地农民和自动流入的人口去开发，国家给以支持，主要是搞水利，几年时间就搞起来了。如何开垦，要作些调查研究，搞好规划。

（三）森林破坏没有停止，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搞个文件，考虑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据去湖南凤凰县拍电影的同志反映，那里还在大量砍伐树木，有个7万亩的林场，砍得只剩1万亩了，还在分和砍。要组织点人，

把情况集中一下，研究森林政策，哪些分，哪些不分；大树是否一定要分到户？现在农业、养殖业的情况很好，但盲目开荒、砍伐森林还在泛滥。这是解放以来第三次森林大破坏，还没有停止。要采取紧急措施，搞那么几条，坚决予以制止。盲目开荒、砍伐森林，几个月带来的损失，几十年恢复不了，一代人恢复不了。今年的植树造林搞得很好，但如破坏森林的行为不制止，会出现造的少，砍的多。要组织大检查，通过立法，追查破坏的责任，严重的要判刑。

注 释

1．宋平（1917—），山东莒县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国家计委劳动工资局局长兼劳动部副部长，西北局计委主任，三线建委副主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

控制人口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听取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去年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计划生育问题，后来中央、国务院发了十一号文件，中央一直很关心这件事。现在谈一些意见，概括起来讲四个问题。

一、控制人口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要长期坚持下去

控制人口，是我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重大方针，要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定下来，长期地持续地真正地贯彻下去，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地做下去。

控制人口，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对四个现代化的前途有重大的影响；也关系到我们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不控制人口，中国四个现代化就会遭到绝大困难。可以这样说，我国四化建设的方针也好，政策也好，要真正能够取得好的效果，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控制人口。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其它再好的政策都很难收到满意的效果。

中国人口不控制不行。这是一件非抓不可的大事，决不能放松。我们现在制订的长远规划，不仅是经济规划，而且要搞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社会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就要围绕着人口问题来考虑，如教育、卫生、住房、交通等都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

我们现在人口太多了，必须看到人口问题的尖锐性、紧迫性。中国有%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东半部和西半部情况不一样。只一般地讲960万平方公里、10亿人口，还不能说明中国人口问题的尖锐性、紧迫性，还要看到大约94%的人口，住在东半部的4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另外6%的人口，住在西半部的4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里面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如四川省面积有57万平方公里，有9000多万人，其中有7000万人口住在10万平方公里的四川盆地里。从全国看，大概有四、五亿人口住在很狭小的地方，比如珠江三角洲、福建东南部、江浙、胶东、辽东等沿海地区，人口很稠密，住得非常挤。中国的基本情况，第一叫做人口多，耕地少，适合开垦的耕地也很少；第二，我国的农业资源总的来讲是丰富的，但按人平均还是有限的，不能够说是很多的。人口太多，吃饭、住

房都是大问题。展望十年、二十年，食物构成不会有很大改变，粮食还是第一位的问题。如果吃不饱就会影响人民的身体素质。人口太多，普遍地实施教育就有很多困难，普及中等教育难度很大。这就会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受到影响，人口素质受到影响。

总之一句话，中国人口不能过多地增长，增加那么多不得了。我们一定要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是不是能够控制到十二亿，关键是要看我们的工作。

二、中央十一号文件的基本精神，不是放松计划生育，而是要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能够行得通、取得好的效果的基础上

中央十一号文件怎么正确理解呢？我的理解，不是放松计划生育，而是为了使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能够真正长期坚持下去，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比较符合实际的基础上，建立在行得通的基础上，要使多数人支持，至少相当一部分人支持。任何一项政策没有群众基础是行不通的。如果一下70—80%的人成为积极力量不可能，至少要有30—40%的人是积极力量，再团结一部分人，就形成一种舆论。这样，我们计划生育的路子就会越走越宽。随着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民文化程度、思想觉悟的提高，医疗、避孕药具供应的改善，计划生育就会逐渐变成中国人民的一种习惯。有的人担心计划生育稍微放宽一点就可能收不住，结果证明放宽一点能更好地贯彻。山东的同志说得好："开了小口子堵了大口子，开了前门堵了后门"。我看这个思想很重要。现在我们有些人还有点迷信，好像政策稍微实事求是一点，就怕什么浪潮啊。你不实事求是，靠生硬的办法，靠搞计划生育的同志在那里坐催，我看是不能持久的。这样搞，干部在农村也很孤立。那种担心开了口子会收不住的想法，是多余的。问题在于我们要把工作做好。

我们的政策要定得适当，合情合理，特别是在那些比较落后的地方。政策合理一些，能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在农村又形成了一种舆论，少数人完全无计划生育的问题也容易解决。政策如果不放在能够做得通的基础上，就不能持久，结果会助长超计划生育。我相信，应当解决的问题干脆给他解决了，把各项工作跟上去，那么超计划生育的就可以大大减少。现在有些地方计划生育只是在公社以上讲，到村里根本没人听你的，那里完全无计划，还是自流状态。

形成自流状态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领导不重视，对计划生育的重大意义不认识，工作抓得不紧，这个就是领导的问题，工作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要求太高太急，同群众距离太远，结果没法贯彻，欲速则不达。

考虑人口政策、生育政策，既要看到问题的尖锐性和紧迫性，又要瞻前顾后，不能光顾目前。我们一定要看得远一点。比如，从长远来讲，男女的比例问题还得考虑，还有每一家如果都只生一个孩子，将来赡养人口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这些都是领导上要思索的问题，不必宣传，也不能因此而影响我们的决心，现在还是要狠抓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还是要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

子。

中央十一号文件下去以后，你们各省都有一些办法或规定，刚才不是讲四种情况嘛（指农村生育政策全国有四种执行情况），我主张稳定，现在就按各省自己定的办。各地现在的规定，将来证明可能有的严了一点，有的宽了一点，宽或严，反正现在都不动，就按照这个去做。在做的时候，领导机关要探索、研究、分析，经过两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能不能立个计划生育法。这个法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情况，定出什么人可以生一胎，什么人可以生两胎；就是在同一个农村里，什么人可以生一个，什么人可以生两个，都必须明确地立法。立了法不能装在葫芦里，要公开宣布，使大家心中有数。这样，政策订得合理，就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超计划生育的可以大大减少。你只应当生一个，生了两个，你就违法。他不应当生两个，干部允许他生两个，那也是违法。要是他本来有条件生两个，你不让他生，他可以告状。没有法不行，有法不公布也不行。去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搞计划生育的同志都主张把这个主动权放到下边去。作为一个过渡办法，我是赞成的，现在只能这样。但是，这个主动权都交给基层干部，就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他可能首先把生二胎安排给自己家里，安排给他的亲朋好友；有些同他关系不好的，明明人家够条件可以生二胎，他就不让生。你执行政策不公，人家就不听你那一套。基层干部如果掌握上有亲疏，不公正，就容易引起矛盾激化。

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因地制宜搞计划生育，但要适当放宽。

三、要总结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如何搞好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

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怎样使计划生育能够适应，工作能够跟上，需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农业生产责任制一搞，人们的积极性起来了，但是不要因此使计划生育出现自流，造成人口泛滥，把责任制带来的好处抵消了，甚至还会出现负数。现在看来，情况还是好的，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两种生产一起抓”的经验要总结，好的经验要介绍。

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农村和城市就不一样，沿海地区与边疆地区也不一样，文化水平、经济状况、工作基础都不一样，差异很大。为什么在城市一胎就容易被接受呢？无非是城市人民文化水平高一点，又是靠工资吃饭。拿工资的人要算算账，反正一个月工资就是五十元、六十元，多养一个孩子就多花掉二、三十元。农村就不一样，我们讲人多生活差，而农民的实际经验是人多了还比较好办事，现在许多地方实行生产责任制就是按人口平均包地。当然和开始搞计划生育时也不一样了，现在农民要生很多的孩子，也不行了，首先他自己就不好意思，其次也没有很多人支持，这两年农民的思想是有相当大的变化的，舆论在农村变了。这是我们计划生育的伟大成绩。

实际困难还是要照顾的，完全不照顾，硬干是不行的。在一些地方，生育政策如果规定得太严了，或者那里经济、文化、工作基础又差一些，他要是第一个

生的是女孩子，就可能要溺婴、弃婴，反正他要生一个男孩子。当然这些问题我们也不要夸大，但是很值得注意。

计划生育是移风易俗的事，过去要求又这么急，工作中间发生一点命令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不要大惊小怪，不要过多的责备。但是也不能听任这样下去，还得想办法从各方面逐渐减少这种事。

我听到你们反映的一个问题，觉得有必要考虑解决。就是计划生育工作搞得越多，花钱就越多，财政负担就越重，这个事要研究一下。将来能不能搞个“平均征收”的办法，在一个省一个地区内统一收费，集中使用，可以在地区之间、县之间进行调节，按照实际工作多少去开支，这样就比较合理。还有一个独生子女的奖励问题。奖励一层一层都包下来，那里的独生子女越多，那里越负担不起。我觉得如果真正政策搞合理了，不能主要靠奖金。这个问题一下也不要轻易改动，究竟怎么解决，要调查研究，看将来有没有一个好的代替办法。

四、搞好避孕药具的科研、生产和供应，这是搞好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保证

认真做好避孕工作，是减少工作粗暴的一种办法。药具问题如果能真正搞好，就会减少阻力，减少后遗症。避孕药具的科研、生产、供应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不大力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就会增加很多阻力，就不会取得好的效果。你们给各地讲讲，要下点力量，中央要搞，地方也要搞，经委、计委、科委和卫生部等有关部门都要把这件事摆到一定的位置上。

计划生育搞得好不好，是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如何的一个反映，光靠发动群众，没有科学技术指导是不行的。有些医疗条件差的地方，大月份引产搞不好，造成死亡事故，或者产生严重的后遗症。一个地方发生一起这种事，影响周围几十里，影响好几年，增加很多阻力。要特别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计划生育，工作量大，难度大，有些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工资没评上，提级没提上，还有的挨打、挨骂。这些同志在工作上为国家为人民作了贡献。

给《四川日报》的复信*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九日

* 《四川日报》社为纪念创刊三十周年，曾致信赵紫阳请求题词。赵紫阳未题，复信表示祝贺。

《四川日报》党委：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

在《四川日报》创刊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向报社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祝同志们进一步办好报纸，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赵紫阳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九日

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六五”计划财政平衡问题的请示》时的讲话。

我简单说个概念。一、财政困难；二、根源在于多年来经济工作不讲经济效益。从一九五七年以来，投了相当大的资，三线就一千亿元，但经济效益差，对人民欠下了很多的账。农产品价格低，工资多少年没有调整，房子没有建。这种状况掩盖了经济效益。粉碎“四人帮”以后，不能这样了。农产品价格不能不提，工资不能不加，劳动力要就业，房子要盖。这样，企业成本就要增加，利润就减少。没有这些措施，就没有今天的好形势。企业包袱很重，利润下降。什么时候才能变？要靠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这要有一段时间，工厂利润才能增加。到那个时候，才能说“四人帮”造成的问题，过去错误造成的问题，解决了。这就是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企业经营面貌有个根本的改变。过去的利润，是靠低原料低农产品价格、低工资赚的。现在不行了，要靠提高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今年一至八月，工业上升有百分之九点一，利润只增长百分之一，但这也比去年强了。现在有两种看法不对。说人民福利提高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这非搞不行，是还账。当然，长期不行。还有人说，打倒“四人帮”，你们还讲这个问题。“四人帮”打倒了，但问题并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财政负担已经到顶了，今后改善管理，增加的部分都可以转为财政。“六五”财政平衡，今天不讨论。也可能支出打少了，也可能收入打少了。

今天讨论集中资金。财政预算内只有二百亿元，能源交通搞不上去。于是提出今后三年集中二百亿元资金。计划会议上讨论了，原则拥护，但都不赞成拿。我也不赞成到会上去讲。我犹豫。不拿，能源交通上不去。地方可以搞一点能源交通，但规模不会大。后十年振兴，没有相当规模的能源交通，就实现不了。现在算的账，不那么准，但大致不差。产值翻两番，能源要增加到二十年翻两番，就可能是放空炮。但是，我也很担心，刚刚地方、企业搞活一点，又集中，把积极性搞掉，把技术改造挤掉。计划会议结束时，我讲了一次话，两个方面都能接受。又能集中资金，又不影响积极性。两个方面都能接受，我知道没有解决问题。我所以去东北，就是要研究这个问题。宋平同志愿意同我去，就是想说服我同意集中二百亿。我现在提出的方案，报告里讲了，没讲清楚。现在预算内资金

一千零五十亿，预算外资金五百七十亿。五百七十亿中有一些不能动。我主张来一个简单办法，除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原则上都要抽一点能源交通费。比例不大，比如百分之十。不能取得太多，取多了搞不成。一家都集中一点，加起来就可以办些事情。假如有四百亿可以抽，那百分之十就是四十亿。企业只要努力，不会受到多大影响。各地方用的钱并不完全适当。只要安排适当，也不会受多大影响。要你百分之十，影响你少搞点盲目建设，不影响你技术改造。搞得好，不会影响你积极性。中国的事，面宽一点，好办事；面窄了，抽少数人头上，不好办。众人拾柴火焰高。除了抽能源交通费外，靠银行集中一部分信贷搞能源交通。保险收入，中国银行利息，都要集中一点。吕培俭，听说前年你们开支六亿，去年就开支二十五亿，你至少压下十亿，三年三十亿。银行要挤一挤。现在财政困难，银行肥，要多交一点给财政。财政拨款三十亿，是不是一点不多？财政还有潜力。这样二百亿差不多。拱拱手，大家都抽百分之十，作贡献。

关于征收能源交通建设费问题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

今天下午请大家来，只谈一个问题，就是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讲的四大方针中的一条：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问题。今年七月的计划会议上提出集资二百亿元，并提了十条集资措施。会后基本的反映，一是赞成，二是对集资办法意见甚多，顾虑也比较大。后来请各省的同志来，我讲了讲自己的一些想法。主要意思是，前十年要真正做准备，不下决心集中资金搞能源交通建设不行。但要集中资金，确实又怕把地方、企业的积极性搞掉，特别怕挤掉企业的技术改造。我们今后十年，一手是搞重点建设，一手是搞技术改造。因此就要想一个办法，既能集中二百亿元资金，又不影响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技术改造又能有步骤地继续进行。这是可能的。我们的企业潜力还很大，如果真正把企业的潜力挖出来，集中一点资金，不会影响企业的技术改造。现在各地方用于扩大一般加工业生产能力的钱还相当多，只要能把这部分资金减少一些，集中资金问题就解决了。

那次我讲了以后，各省多数同志说可以接受，计委也说可以接受。但具体采取什么办法集中二百亿元资金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上次我去辽宁，跟同去的综合部门的同志议了一下，共同找了个办法。回来后又议了一次。昨天在耀邦同志那里又谈了一次，耀邦同志认为可行。这是赵紫阳召集参加党的十二大的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座谈讨论征收能源交通建设费问题的发言。

我们议的办法，主要是征收能源交通建设费，叫税也可以，就是从全部预算外资金中提取百分之十。东西南北中，包括中南海、大会堂的参观票收入，也包括科研设计单位所得的报酬，还有各单位的小金库，国家行政机关的节余经费等，统统一律平等，从自有资金中拿出百分之十。想来想去，要找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我认为这个办法就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就是哪一个单位都穷，钱比较紧张。但你拿一点，我也拿一点，大家都拿一点，集腋成裘，国家就能办成几件大事。每个单位拿一点钱出来，不至于有什么了不起的影响。就要你预算外资金的百分之十，你有本事多搞，也不多要。原来的政策不变，不把企业捆住。

今天把我们议的原则、办法跟大家见个面。大体讲三个问题，一是要不要集中，二是集中多少，三是怎么集中。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原则、力、法定了，然后十月才能开财政会议，再开计划会议。

一、征收能源交通建设费，或叫能源交通建设税，从全部预算外资金中提取百分之十。范围是全民所有制单位和省、市、县所属大集体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广东、福建两省也在内。据统计，一九八一年全国预算外资金共有五百七十七亿元，提取百分之十，是五十七亿七千万元。估计其中有一部分，如大修理基金、农业税附加、中小学学杂费、育林基金等，不宜提取，所以确定每年实际提四十亿元，三年共一百二十亿元。具体范围和办法，将在十月召开的财政会议上进行专门讨论。

二、人民银行的中短期贷款，抽一部分转到能源交通建设上，每年十亿元，三年共三十亿元。

三、人民银行的利润，每年多上交财政十亿元，三年共三十亿元。

四、国家财政每年增拨基本建设投资七亿元，三年共二十一亿元。原来实行的发国库券、向地方借款的办法，继续实行。

开创外交和国内经济工作的新局面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接见出席驻外使馆政工会议的大使、参赞时的讲话。

我看你们的会议开得是好的，很有收获。主要的收获就是听了耀邦同志的讲话，这是今后外交战线加强团结、改进工作的指导思想，应该很好学习。耀邦同志提出要开创外事工作的新局面。这次会议应该成为一个起点，成为开创外事工作新局面的一个动力。十二大以来，外交部是中央各部中第一个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部，这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的外交队伍是在相当特殊的环境下工作的，有很多特点：你们的工作环境主要在国外；工作对象主要是外国政府、外国的上层人士、外国人民；而你们的身份则是国家的代表，中国人民的代表。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应当首先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要求应当更严格。

去年，我出访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以后到了广东的深圳和珠海特区。我听了当地同志的汇报，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特区究竟应该“特”在哪里？所谓特区，就是在经济上要实行特殊的政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不能只限于这一个“特”，只要求这一个“特”。特区的干部和群众应当有特别高的觉悟，特别好的风气，特别好的道德，特别严格的纪律，特别高的工作效率。不是只有一个“特”，而应当有好几个“特”。这样，那一个“特”才能起到好的效果。如果只注意一个“特”，其他都没有了，那个特殊政策也就搞不好，不可能起到应该起的作用，甚至会发生副作用。在深圳，我对市委的同志说，对调到深圳来工作的干部要把这一点讲清楚，不要光讲什么工资高、待遇高、高级耐用消费品多等等，否则就要打败仗。现在我建议做外事工作的同志都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你们是在特殊环境下工作的，要很清醒，特别是在现在。现在我们讲对外开放，讲生动活泼，同外国有了更多的交往，这都是很必要的。但我们同时必须注意到，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又在这样的政策下，同外国的接触大大增加了，更要清醒地想一想自己是在什么特殊情况下工作的，应当对自己提出什么要求。因此，我说外交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重要。

十二大决定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明年下半年起，要开始整党，这是对全国、全党提出的普遍要求。外交部门怎么办？我看不能降低标准，降格以求，应当从高、从严。希望你们在贯彻十二大精神，建设精神文明，加强思想政

治工作等方面走在前面。特别要注意党性和党风的问题。要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就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

谈谈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专门讲了外交政策。写外交这一部分是下了很大力气的。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比过去更明确、更完善了。这就对我们外事、外交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耀邦同志讲要开创外事工作的新局面，我认为提得很及时。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做的条件。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外事工作的方针、政策，提法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但实际上是在逐步进行调整。这次十二大文件中关于外交政策这一部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酝酿，总结了这一段实践的经验，包括对美、苏两霸的问题和对第三世界的问题，确实是更明确、更完善了。只要按照十二大提出的外交政策、方针去贯彻，就一定能够开创出外事工作的新局面。

过去我们总的外交路线是正确的，是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但应当说，在实践中有些界线还不那么明确。

举一个例子：在同第三世界各国的交往中，能不能以它们对待苏联的态度来划线？过去一部分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很清楚，不是全面深入地分析它们的情况，而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主要以它们对苏联的态度来决定我们对它们的态度。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这个问题在认识上逐渐解决了，在工作和行动上也在调整。“反对两霸，侧重反对苏霸”这个总方针是正确的，但不能因此就以对苏联的态度来划线。把这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分清楚，不仅同我们总的方针不矛盾，而且有利于执行我们的总方针。两霸是客观存在。我们为什么反两霸？就是因为在客观上有两个超级大国在搞霸权主义。为什么要侧重反苏霸？因为苏霸有更大的进攻性和欺骗性，这也是客观存在。现在这个基本形势还没有变，所以我们要继续执行这个方针。但如果以苏划线，就不能壮大我们的力量，甚至有可能削弱反霸斗争的力量，不利于执行我们的总方针。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对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是不满意的，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它们同美霸的矛盾更大。如一些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同美国的矛盾就更尖锐、更突出。它们从自己的具体处境出发，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美帝国主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它们不这样做，就会脱离本国的人民。我们应当坚决支持它们的斗争，加强同它们的团结。如果采取简单的办法，不加分析，以苏划线，就可能冷落和疏远它们，使它们无法理解我们的政策。这种情况不能说很严重，但也曾经出现过，有些国家感到不能理解我们的态度。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第三世界有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它们反苏，并不是反对它的霸权主义，而是由于它们从根本上就是反共，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这丝毫不涉及苏联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对苏联的态度是“六十年一贯制”，列宁在，它反；斯大林在，它也反；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当政，它都反。在反对苏霸的斗争中，它们有可能和我们采取某些联合行动，我们不应

当拒绝；但从本质上说，这些国家掌权的人物是一些反动的、腐败的、名声很臭的统治集团（如塞拉西[1]皇帝、巴列维[2]国王等等）。他们迟早要被自己的人民打倒。因此，我们在同他们采取某些联合行动时，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把关系搞得很热。否则就有可能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中造成错觉，似乎我们同这些统治阶级拉得很紧，而苏联霸权主义反倒同这些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似乎苏联在支持进步力量，我们却在支持腐败的统治阶级。如果那样，就有可能影响我们国家的形象，有可能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中增加苏联的影响，显然这是很不利的。

我举这个例子，并没有责怪同志们的意思。从过去长时期主要反对美帝，到七十年代初主要反对苏霸，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在这样大的转变中，要求所有的同志一下子都把界线搞清楚，是不可能的，出现一些模糊思想也是很难避免的。事实上，尽管认识上存在某些模糊，但是在中央的领导下，工作上并没有产生什么严重后果。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认识确实已在实践中逐步更加明确，在工作上开始进行调整，中央的精神已被更多的同志所理解和掌握。现在又开了十二大，我们的外交方针政策确实是更加明确、更加完善了。因此，我们就有条件更好、更有效地执行中央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独立自主，纵横裨阖，大有可为。我们要很好地分析研究情况，更加主动地开创外事工作的新局面。要全面开创新局面，根本的问题在于很好去领会和贯彻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所讲的外交工作的方针、政策。

再举一个例子：对第三世界的工作问题。这是我们外交路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和团结这个问题上，我们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概念，提出来请大家考虑。

首先，在政治上，必须坚决支持他们反霸、反帝、反殖、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同第三世界各国，仅仅讲政治支持不行，还要注意搞经济上的合作和交往，现在第三世界的国家，都还有一个摆脱贫困，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的任务。因此，我们还必须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合作和经济交往，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从全局、从战略、从发展上讲是越来越重要。我们决不能因为它们穷、技术落后而嫌弃它们。我们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也经常说：如果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经济上严重落后，长期处于非常贫困的境地，世界经济就不可能景气，政治上也不可能稳定。第三世界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70%，资源丰富，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各有长处和短处，彼此间加强合作和交流很重要。

第三点，我们不能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搞恩赐和施舍。我们没有那么大力量，对他们也没有好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光靠别人帮助，不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没有前途的。革命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我们只能量力而行，只能从自己的实际能力和对方的实际需要出发。如果搞很大的项目，既超越了我们的能力，对他们来讲，还会成为包袱。

第四点，不搞则已，要搞就要搞好，要负责到底，要重合同，守信用，一定要使对方真正得到实惠。

第五点，区别不同情况，开辟多种渠道，这一条很重要。第三世界各国情况不同，很复杂。我们对最穷、最落后的国家，应当搞点雪中送炭，给点援助，主要是小型的，容易管理、容易掌握的项目。现在看来，这样搞的都是成功的，例如传授农业技术，派医疗队，给他们搞一些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公共设施、公益设施，例如修建小的会场、体育场、医院，人民可以天天使用，我们负担得起，管理上也不复杂。对有钱的发展中国家，就不能同穷国一样对待。看来，对第三世界的多数国家进行经济上的合作和交流，主要不是搞援助，而是做买卖，应该在互相需要、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要在这些方面多想办法，多开渠道。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的同志，都要在这方面下点功夫。过去对这方面研究不够，办法不很多。将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我们同第三世界经济合作的路子肯定会越走越宽。不仅如此，现在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关键是要搞好调查研究。

总之，对第三世界经济上的合作和交往，一定要积极，热情，从实际出发，讲究实效，下功夫开辟多种渠道，不要搞恩赐，不要作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革命不能输出，建设也不能包办，都必须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努力，我们只能予以促进。

现在讲讲国内情况。

第一，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情况都是很好的。我现在主要讲讲经济情况。我们前年开始调整，现在已经出现的好形势，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料。农业情况是好的。这几年不管气候是好、是坏，总的来说，农业一直在向前发展。今年粮食产量，如果不再发生大的灾害，估计可能比去年有大幅度的增产，有可能超过1979年。1979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丰收年景。

现在农副产品比较丰富，有些已造成积压，如油菜籽、烟叶等。这里我想着重讲一下消费品问题。现在国内消费品市场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是1953年以来最好的。五十年代以来，市场上消费品匮缺，许多东西要发票、凭证，这种情况大约延续了二十余年，现在已经大有改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往往不被同志们所注意。商品匮乏现象，大概在实行以中央计划为主或公有制占优势的国家里都没有解决，可能南斯拉夫、匈牙利好一些，苏联这方面也不行。我认为，苏联的经济搞得还是可以的，但在消费品匮乏这个问题上，它也没有解决好。目前在我国有些消费品已经开始出现了买方市场，不再完全是卖方市场了。过去物资缺乏，大家非常羡慕上海货和天津货。今年上半年出现了新情况，竞争很激烈，很多地方商品降价，挤上海的市场，包括手表、电视机等。现在中国老百姓买东西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是持币抢购，而是“持币选购”或者“贮币待购”，等待降价，等待质量好的新产品上市。城乡居民储蓄直线上升，总额已超过620亿元。现在有些商品如化纤布，大量积压，卖不出去。消费品生产上来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这种趋势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今年上半年已很明显。

这种现象，并不是在牺牲重工业的情况下出现的，而是在重工业开始回升的情况下发生的。去年下半年重工业已开始回升。今年头八个月统计，重工业增长

了9.8%，超过了轻工业的增长速度（8.5%）。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困难，在前进中还有很多矛盾，今天不可能展开讲。但可以说，从主流来看，两年的调整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在连外国人都开始承认了，讲中国好话的开始多起来了。当前世界经济还是不景气。去年福特来时，打保票说1982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一定好转。今年尼克松来，又说到1984年可以好转，一下推迟了两年。当然，世界经济会有回升，但幅度不会那么大，时间要推迟。至于我们，只要按十二大方针稳步前进，我们的经济肯定大有希望。

第二，财政方面，今年努力增收节支，可以继续实现收支基本平衡，年初计划有30亿赤字，现在看来不会超过。但还有很大困难，还有赤字，而且是在增加存款、发公债、借外债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需要继续用五年时间，才能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现在，我想讲一下，为什么形势这么好，财政还会有困难？打倒“四人帮”已经六年了，究竟问题在哪里？

我们国家的财政困难，是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后果。从1958年直至粉碎“四人帮”前，我们国家在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搞了很多项目，光是三线就投入1000亿元。花了大量的财力，但由于指导思想有问题，正如陈云同志所说，主体错误是“左”的错误，所以经济效益很差，在人民生活方面留下了大笔的欠账。严格说起来，从1957年起，职工的工资就没有进行过大的调整。农副产品同工业品的比价非常不合理，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城市住房长期不建，越来越紧。两千万以上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没有就业。这些情况，直至粉碎“四人帮”前后，延续了将近二十年。“四人帮”打倒了，欠账要还，这就是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从1979年到1981年，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国家多花了442亿元；提高工资和实行奖金，多花了300亿元；增加城镇2600万人就业，花了105亿元；城市修建职工住宅，三年建了2.2亿平米，又多花了152亿元。仅以上四项，国家在三年内多花了1000亿元，相当于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平均一年330多亿元。增加城市就业、提高工资和实行奖励的巨额支出，很大部分由工厂负担起来，这提高了工业品成本，也就不能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

我们这三年的调整，同1962年的调整很不一样。1962年是甩包袱，城市人口下乡，工人减少，粮食定量减少，农副产品价格冻结。而这次调整，国家花了1000亿元。这种情况下，还能出现现在的好形势，这是很了不起的。能不能不还账？如果不还的话，中国人民再好，也是不可能永远接受这个状况的。所以“四人帮”粉碎后，账非还不可。这是我们财政困难根本原因所在。应该说，这几年工厂企业做了很大努力。现在，账还得差不多了。如果说，过去三年企业努力增加的收益，大部分因还账而抵销了，那么，今后企业的利润，就会有更多的部分转化为积累，成为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的资金。

第三，到本世纪末，实现两个倍增，翻两番，究竟可不可能？有些同志认为，翻两番算不了什么，轻而易举。这当然不对，但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多。更多的同志，对翻两番信心不足。耀邦同志讲了这个问题。这次中央提出两个倍增，

是经过充分分析和研究后确定的。我认为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

有些同志说，过去搞了三十年，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今后二十年如何既能有较好的效益，又能有较高的速度？对过去几十年的情况，应当作个分析。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搞经济建设，实际上也只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五年时间。1958年后，我们一直是折腾，调整，再折腾，再调整，就是这么个历史。今后二十年，不仅是不折腾了，而且要下决心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这就好了。我们的国家，终究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因此潜力也很大，而且资源丰富，中国人还是比较有本事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完全应当有一段时间的高速度发展。苏联虽然在体制、指导思想等方面有问题，但也有过一个相当长期的高速度发展。当然我们中国今后高速度发展的时间，不可能出现在八十年代。八十年代，首先要把各种关系理顺，主要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不理顺各种关系，不可能出现高速度。现在能源、交通卡脖子。北京经常停电，而山西、宁夏、青海的煤拉不出来，在自燃。我们多年来不重视能源建设，单纯搞加工。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经济搞不好，能源交通不活，全局活不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工厂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很多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的设备、技术。设备不更新，技术不改造，想快也快不了。扭转经济上失调的问题，比解决政治问题往往花的时间要更长。因此，比较高的速度不可能出在这十年。中央并不要求“六五”、“七五”计划期间有高速度，因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如果这十年我们能把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搞好，把能源、交通以及企业的技术改造搞好，把教育、科研工作搞好，下一个十年肯定会有较好的效益和较高的速度。这是符合中国情况的，也是必然的结果。第一个十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六，第二个十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九，只要达到这个速度，二十年内就可以翻两番。

有些同志认为，基数越高，速度就会降低。这种观点不一定站得住脚。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史来讲，一般地说，速度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符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再一个要看是否把重大的科学技术成就运用到生产中去。简要点说，一个是生产关系，一个是科学技术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许多国家在经济上发生了一个飞跃，除了占廉价石油的便宜以外，就是因为它们采用了新技术。它们的基数低吗？它们搞了几百年了！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把军工的尖端技术普遍移植到民用工业，带来了一次工业革命。从科技上来讲，往往是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带来一个时期生产发展的高速度，然后速度放慢，经过一个时期又产生新的技术上的飞跃。这次在十二大上，经济学家孙冶方[3]同志说：苏联认为基数越高、速度越低，是因为苏联长期不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他们只重视新建，搞新摊子。孙冶方同志的这个分析很有道理。长期以来，苏联片面地搞这样一种外延型的扩大再生产，这就不能不使发展速度受到影响，形成基数越高、速度越低的局面。如果我们走自己的道路，重视能源交通问题，重视技术进步，改造老厂，同时也切实有效地搞些必要的新建项目，使老厂和新厂都充分发挥扩大再生产的作用，我们国家就会有高速

度的发展。

所以我的结论是，信心不足的第一个原因是对我国的具体情况缺乏分析；第二个原因是对技术进步、技术改造的作用估计不足。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执行十二大报告中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论述。中国多年来搞工业，搞经济建设，都是铺新摊子，要发展，就新建一个厂子，再要发展，再建一个，等这个厂建成，那个厂已经落后了。这种搞法，实际上是只让少数新厂担负扩大再生产的任务，而让为数众多的老厂只从事简单的再生产。如果沿用过去这种老的方法、老的指导思想去搞工业，翻两番确实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7000亿人民币的产值，消耗掉6亿吨标准煤。如果按比例扩大，总产值翻两番，能耗也得翻两番，那就是20多亿吨煤。光这一条，就办不到。所以一定要改变一个传统观念，不是在老设备、老技术、老产品、老工艺的基础上翻两番，那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一次飞跃，靠技术进步增长的部分可能有一半多。我们翻两番，必须建立在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落后的基础上，至少要有一番靠技术进步来实现。这对我们搞经济技术的领导同志来讲，是个新课题、新的指导思想。过去没有这方面的观念。我们提出，今后二十年，工农业生产总产值翻两番，达到2.8万亿元，但热能消耗只能增加一倍。做到这点难不难？难！但能做到。我们在这方面大大落后。1万元产值消耗的能源，且不谈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大概平均比我们要少百分之三、四十。日本消耗能源同我们一样多，也是6亿吨标准煤热量，用于工业的还更少，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1万亿美元，接近于我们的四倍。所以我讲，只要真正把轨道转到技术进步上，潜力很大，翻两番不成问题。要研究一下，到公元2000年，我们能不能普遍使用工业化国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经普及了的通用技术。这里讲的，并不是它们九十年代的技术，也不是七十、八十年代的尖端技术，而是讲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通用和普及的技术。到本世纪末还有十七、八年，我们应当基本上做到，不然怎么进步？所以现代化问题，不是简单地翻两番，而要解决一个科学技术现代化问题。否则，叫什么现代化呢？这对我们许多同志来讲，是个新问题，还没有这方面的觉悟，搞技术进步的思想还没有树立，一提发展经济，总是考虑建新厂，增加生产能力。我们现行的很多规章制度，也妨碍了技术进步，使企业对技术进步不感兴趣。这里涉及到价格政策、经济体制等许多问题。沈阳水泵厂最近几年搞了十种新的节能水泵，可以节电25%，非常出色。但搞新产品，开始时批量不大，成本较高，他们搞了十项新产品，企业留成却减少了30多万元，结果是谁搞技术进步谁吃亏。所以，我们要真正把经济建设转到技术进步上，势必涉及一系列的改革，扫除障碍，使企业对技术进步有兴趣。这个问题苏联没有解决，但他们一直在抓这个问题。严格讲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这个问题。但中国有一个特点，只要真正看到了问题所在，是可以抓起来解决的。国内经济形势，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已经全面讲了。我今天就讲这几点。

注 释

1．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l，1892—1975），埃塞俄比亚最后一位皇帝。曾因抗击意大利法西斯侵略闻名，晚年被门格斯图推翻，在幽禁中去世。

2．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1950），伊朗国王。1979年被伊斯兰革命推翻，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掌权，巴列维流亡国外，1980年在埃及开罗病逝。

3．孙冶方（1908—1983），江苏无锡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

当前经济工作中应研究解决的新问题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经济工作时的发言。

一、消费品生产的形势问题

总的看，我国现在经济上出现了一个很好的形势，市场上不仅农副产品比较丰富，而且日用消费品变化很大，市场供应紧张的状况基本上得到缓和。现在消费品也出现了买方市场，这是我们国家从一九五三年以来没有过的。实行计划经济类型的国家除个别小国外，没有哪个国家出现过这种形势。这是两年来认真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结果。但是，也带来一些新问题：

——今年上半年以来，日用消费品滞销、积压，轻工业增长的速度

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下降。今年一至八月，轻工业比去年同期增长8.5%，而重工业却增长9.8%。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轻重工业的比例调整到什么程度比较恰当，很值得研究。

——消费品越多、越滞销，群众持币选购的心理就越严重。一方面东西卖不出去，一方面城乡居民储蓄又直线上升，八月底已达620亿元。

——消费品开始出现竞相降价推销的情况。据反映，在上海已出现内地产品削价倾销同上海争夺市场的现象。大城市与中小城市、沿海城市与内地之间在商品推销上的矛盾在增加。

面对当前这种形势，我们应当正确进行指导，使这种好的势头能健康地发展下去。为此，必须对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研究，采取正确的对策。要看到，消费品生产、销售中出现的问题，并不简单是消费品工业本身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问题，需要系统研究解决。消费品工业本身，应当千方百计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成本，真正做到物美价廉、适销对路。

在流通环节上，必须解决堵塞问题，特别是要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品下乡，在农村打开销路。要考虑趁现在这个机会，认真解决一下商业上推销工业品相应的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国务院决定改变过去工业品流通按城乡分工的体制为商品分工、城乡通开的新体制。有些地方、单位认识上不一致，执行不力，要继续做工作消除阻力。目前一、二、三级站机构设置重叠、臃肿，批发与零售利润悬殊

（批发利润约占三分之二，零售占三分之一），很不利于商品推销，要研究进行必要的改革。

为了扩大推销，要考虑价格问题。上海的同志认为，化纤、耐用消费品不要急急忙忙降价，特别是不要无计划、无通盘考虑地降价，在目前情况下越降价可能会增加群众的观望心理，并不能多销多少，反而使财政收入受影响。他们主张目前价格稳定一下。当然，消费品价格下降是必然的。是否可以考虑今后选择适当时机，对价格进行一次有升有降的改革。消费品价格确实不合理的，经过认真准备，有领导、有计划地降一次价；同时对价格很不合理，国家补贴很多，负担很重的东西的价格也相应调得合理一些。如城市服务行业的收费现在很低，发展不起来，应适当调高一点。还要注意运用税收杠杆，对那些高利产品加一道税，把一部分利润转作税收上缴。这样有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质量，有利于限制盲目发展。

二、技术进步问题

我们提出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到2000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究竟靠什么呢？翻两番不能建立在旧设备、旧技术、旧工艺、旧产品的基础上，必须主要靠技术进步。这是思想上、工作上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还是现在的水平，设备技术还是老样子，光所需的能源就无法解决，翻两番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一半要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到2000年，如果我们能把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基本普及的技术在我国普及，那么，我们就完全有把握翻两番。要把我们企业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就得靠政策，靠技术进步。多年来形成的要增加产量就靠建厂子、扩大生产能力的传统观念，一定要彻底改变。当然，今后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建设一些新厂也是必要的，但在新形势下，各级领导一定要把技术进步摆在重要位置，下力量抓好。

我国旧的管理体制的一个根本弊病是妨碍技术进步，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都不利于技术进步。在现行体制下，搞新产品、用新技术，费力气，担风险，企业心不在这里。迫切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使企业对生产新产品，使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有兴趣、有实惠，也有压力，要感到非这样不可。这就需要我们对一系列规章制度进行改革。

在技术进步、技术改造、科学技术工作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我们的科学家、专家，把科研力量、科研机构组织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实际中去。十月份国务院召开的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要特别注意奖励那些在现代化建设中真正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就是要讲经济效益。现在我们一方面人才不够，一方面又积压人才，浪费人才。要号召科技人员投身到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办法就是把各个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组织起来，参加攻关，参加搞规划，使科学与生产密切结合。

集成电路对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关系极大，要像五十、六十年代攻“两弹”[1]一样，高度集中，组织攻关。各部门要积极支持，军工部门也要参加。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国务院直接抓。

三、要认真抓一批大企业

大企业搞好了，贡献大。要挖掘潜力、稳定财政收入，搞好现代化建设，必须抓好一批大企业。首钢的经验给我们以启示，它表明，只要政策对头，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不要多少投资，就可以使首钢每年上缴国家利润递增6%，用自己的资金改造企业，产值到1995年翻两番，累计可上缴利润63亿元，而且使自己改造成一个现代化钢铁企业。要把挖潜、改造、整顿、改革同为国家多做贡献配上套，一个一个大企业进行研究落实，制定技术改造、挖掘潜力的规划，使这些规划符合国家计划的宏观要求；落实经济政策，通过“包”或“利润分成”等形式，给予企业一定的经济利益，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同时整顿充实领导班子。这样，就能逐步闯出一条大企业以计划管理为主，又能调动下面积极性的路子。各省、各部门都要抓几个大企业。只要路子走对了，大企业完全可以搞得生龙活虎。

对国家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大城市，也要一个一个抓，研究措施。大城市、大企业形成我国工业的主体，按照国家计划进行改造后，我国经济建设就会出现十分可观的变化。

今后我们的改革就是要抓两头，大的抓住，小的放开。对大企业要抓好，对小企业、小商品要放得更活一些。

四、必须适当扩大沿海城市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自主权

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中，要注意发挥沿海城市的优势。中国的东部和西部经济上是存在着矛盾的。从长远看，完全靠内地供给沿海城市原料，加工成商品后再销到内地，这个路子会越来越窄。要加强沿海同国际市场的联系，上海等沿海城市要“内联外挤”，所需原料、材料逐步转向国际市场，商品要往外销售，以改变原材料紧张、销路有困难的被动局面。我们不能自己把自己捆死。新加坡、香港可以靠加工，日本完全靠外国资源，我们沿海城市为什么不行？关键是要给沿海城市一定自主权，利用外国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竞争。除广东、福建已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外，首先是要给上海、天津更多的自主权。在引进技术，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等方面，办法要从上海出。各部门要帮助上海提出一个实施办法来。其次是大连、青岛、宁波等港口城市。不要一下铺得很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五、对原材料工业特别是“三材”[2]的供需状况要预先研究对策

随着重工业的发展，重点建设的展开，“三材”供需之间的矛盾会更突出，尤其是钢材、设备的需求会日益增多，不事先考虑，过两年又会发生“无米之炊”。或者还是按照老办法搞，又得从矿山搞起，十年见不了效果。当前可考虑多进口一些钢材，这比买设备划算；买旧船拆卸，这等于买钢铁，价格也很便宜；几年内趁世界经济不景气，利用工厂倒闭之机，派专家小组悄悄出去，有计划买一些七八成新的设备。此外，石油价格的趋势、两伊战争后承包工程的竞争、世界经济不景气的预测等，都需研究。

六、组织全国石化总公司，用好一亿吨油的问题

把一亿吨油用好，进行深度加工，综合利用，会出很大的经济效益。可否将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的和各地炼油厂、石化厂（原料），组成全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实行产供销统一，对这个问题的可行性要进行研究。据估计这样石油深度加工后，可为国家增收100亿元，这个金娃娃要抱。

注 释

1．“两弹”指原子弹和氢弹。

2．“三材”指木材、水泥、钢材，是当时十分紧缺的物资。

给四川升钟水库工程指挥部的复信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刘纯夫[1]同志转升钟水库工程指挥部：

你们的来信已收阅。听到升钟水库大坝即将竣工的消息，我很高兴。升钟水库是四川省的第一个大水库。希望你们继续努力，精心施工，分段建设，分段受益，保证工程质量，提高经济效益，早日全面完成水库和配套工程的建设，为四川省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至于为升钟水库题词一事，可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著名的书法家撰写，我就不写了，感谢你们的盛意。

祝水库工程的全体同志在今后的建设中取得新的胜利！

赵紫阳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注 释

1．刘纯夫（1925—1998），山东栖霞人。时任四川省副省长。曾任南充地委统战部部长，阆中县委第一书记，南充地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适时调整化纤和棉织品价格
改变居民衣料结构*

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

* 这是赵紫阳给胡耀邦、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各成员的一封信。

目前国务院正在对今年消费品生产出现的新情况和应采取的对策进行讨论。待讨论告一段落，将向常委、书记处汇报。

讨论中一个集中的问题，是降低化纤、涤棉混纺布的价格，同时适当提高纯棉布价格，以解决化纤织品的滞销、积压、限产问题，同时又不至因此而减少财政收入，并可促进十亿人民衣料结构（以化纤布代替纯棉布）的逐步改变（这是早晚总得要解决的问题）。这样的决策，虽然影响面广，可能会有不小震动，但对整个经济会带来极大好处，对于合理改革价格也是一个突破。

讨论中，暮桥同志有一篇发言，大家同意他的分析，现送上，可抽空一阅。

关于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 这是赵紫阳与宋平、顾卓新、吕克白等谈话的要点。

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常常碰到条条块块的矛盾。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长期按条条、块块管理，搞了几十年，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同我们体制差不多的苏联，长时期强调按条条管理，有时也强调按块块管理（如赫鲁晓夫时期），但时间不长，主要还是按条条管理。现在又搞经济综合体，如在西西伯利亚，就搞了一个油气生产综合体，也是想解决条条、块块的矛盾，把各个部门的工作协调起来。我国过去也搞过大区、协作区，那还是按块块进行工作，结果又多了一层，也不是成功的经验。有些事情，完全按条条或行政区去办都很困难。

我国条条、块块到底怎么搞法好？方向究竟怎么样？五十年代比较强调按条条管理，那时有个好处，部门定了就行，企业办事感到比较方便，但存在不少矛盾，有一个条条与块块如何结合的问题。经过"文化大革命"，绝大部分企业交到地方管理，企业利润同地方财政连在一起了，虽然与地方的关系密切了，但企业中有些事地方又解决不了，比如有些厂的生产纲领、计划安排、原料供应、产品分配等，地方就定不了，还得找各部，于是形成多头领导。现在企业普遍反映：一是婆婆太多，希望由一个头主管就行了。二是现在向企业要东西的单位多，而要解决企业的问题，又找不到一个单位负责，希望下达任务的主管单位，同时必须解决厂里反映的问题。看来要解放生产力，现行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必须解决，但又不能回到五十年代的老路上去。

从经济上看，上海市实际上是面向全国的，它与长江三角洲的各个城市关系特别密切，如苏、锡、常，杭、嘉、湖，还有宁波，这一批中小城市等于是上海的卫星城，与上海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这是历史上形成的。旧中国行政和经济是分开的，经济上是单独的一套。现在我们的党委、政府要管经济，但我们不能从行政上把这些城市划归上海。因此，需要考虑如何打破条条、块块的框框，真正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这一地区的经济更好地组织起来。这样就提出建立上海经济区的问题。这一工作可先从规划做起。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地区，可以先着手搞统一规划。通过规划，把地区、部门的矛盾解决，而不是从组织上动手，简单地把这些地区划归上海，上海还是上海，苏、

锡、常，杭、嘉、湖的行政隶属关系都不变。搞这样的经济规划，既不能从地方的角度出发，又不能从部门的角度出发，而是要从全国的角度出发考虑，推动这个地区的经济同全国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此，就要有一个机构来协调部门之间的关系，地方之间的关系和部门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任务。经过规划，促进地区的联合，企业的联合，把生产力解放出来。统一规划后，该列入地方计划的，仍列入地方计划；该列入部门计划的，仍列入部门计划，可以不改变企业的隶属关系和所有制关系。这样就把国家的统一计划分解到各地区、各部门去了，使经济区内地区、部门的计划同国家计划紧密衔接起来。经济区发展下去，会演变成什么样的情况，还要从实践中看看。这是同整个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有联系的。如果将来政企逐步分开，政府对企业不必再过多地进行行政干预，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企业之间、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经济联合，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企业的自主权也会越来越大。企业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向政府交税，分交一部分利润，企业的经济活动有一定的自主权。如果其他方面的改革都能跟上，那就可能出现经济管理体制的新面貌。中间要经过哪些过渡步骤，还有待今后的实践提出来。

看来经济管理体制将来不会再走大区、协作区的路子，也不是条条、块块依旧，而是走依靠中心城市和工业基地的路子，通过中心城市和工业基地把条条、块块协调起来，形成合理的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当然，就全国来说，在做法上要有先有后，不能一哄而起。现在先选两个点着手试验。一个是上海，这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出口基地。作为经济区来看，这一片总不能以南京为中心，或者以杭州为中心，只能以上海为中心。另一个是山西能源基地，将来是以煤炭为中心的重化工基地。主要搞煤炭、电站、重化工，还有冶金工业的建设。这个区域虽然没有上海那一片复杂，但也有很多部门在山西，还要联系内蒙古的准格尔等地一起规划，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是不同于上海经济区的另一种性质的规划。

这两个地区的规划是试验性质，有可能走出一条新的路子，也可能走不通，我们需要进行这方面的探索。由于这样做会触动条条、块块的某些利益，估计这个试验会是困难重重的，但有个机构专门去研究这些问题，就容易看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哪里，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如果这个试验搞得好，可以解放生产力，那就是经济管理体制的一大改革。这两块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是全国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一个是全国很有希望的煤炭为中心的重化工基地。这两块取得经验了，再搞几片。

条条、块块、中心城市，三者的关系究竟怎样解决？三者的作用究竟怎样发挥？我的想法是：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企业和重要的产品，由中央集中管理。因为事实上地方很难解决他们的问题，由中央集中管比较好。这些企业也可以组成全国性的公司，如石化公司、汽车公司等。即便这些全国性的、集中管理的企业，包括公司，有一个权力必须交给中心城市或工业基地，这就是参加当地的经济协作。不论哪个部门的公司或工厂，在这方面都必须服从中心城

市的领导。经过协作，把企业的一部分潜力挖掘出来。

另一种类型是非全国性的企业，中央各部不直接管理，不是一般地讲交给地方管，而是要交给中心城市管。当然，中心城市也是块块，但它与一般的块块又有所不同，它能够比较多地考虑经济协作的问题。当然这一类企业有一些方面条条也应当管。看来，中央各部门主要是管规划、管技术政策等，这方面我们也有一些经验。全国纺织系统的厂子都是分散由各地管的，但纺织部抓住几件事不放，搞得比较好。从全行业的发展着眼，他们一是抓了生产手段，即抓纺织机械的改造更新，很有成效。现在我国纺织工业的技术水平并不是太落后的。苏联机械工业的管理也很集中，一般不允许地方搞机械制造业，也是抓生产手段。二是抓纺织行业的定额管理。虽然纺织厂是各省市管，但定额全国是统一的。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三是抓新产品的试制，抓标准化。还有，抓原材料的供应等。对分散到地方管理的企业，部门管什么，纺织部提供了初步的经验，抓住这几条，整个行业就容易搞好了。

所以，要总结各部、各地的经验，既要使企业领导不多头，又能发挥中心城市、部门的作用，部门管什么，城市管什么，研究出一套合理的管理办法来，不要一说集中就什么都集中，一说分散又什么都分散。过去我们不是根据企业的性质、地位、作用来确定如何管，有些时候是单纯从经济利益上考虑，像大庆油田这样的大企业，都交给了地方管理，利润一旦减少，又上交回来。概括起来说，在经济管理上，该集中的，要集中；该分散的，要分散。中央集中管理的，要注意如何发挥中心城市、块块的作用；地方分散管理的，要注意如何发挥条条、部门的作用。

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也要从实际出发。比如，发展对外贸易，沿海城市条件就比较好。首先是上海地区要千方百计打入国际市场。香港、新加坡都没有原料，因为地处沿海，海运方便，靠加工，经济发展了。上海的基础不比它们差，为什么不能像它们那样靠加工发展呢？无非是在体制上，政策、制度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自己把手脚捆住了，这需要改革。我们应当给上海一些对外经济交流的机动权，别的地方不给，就是给上海，使它有吸引力，能靠加工发展，把周围地区的产品吸引到上海来出口。这主要是指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方面，要使上海比其他地方的权力大一些。历来上海考虑问题，从全国出发多一些，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因此，国家计委、经委的某些权限，可以委托给上海办。我已同上海市的同志谈过，请他们起草一个条例，报国务院批准。

规划上海经济区，必须考虑“向外挤”的问题。现在世界经济不景气，虽然困难一些，但可以挤进去，过几年复苏了，大有生意可做。要充分运用上海地区参加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上海的经济发展方向，是要吃国外的原料，制成品往外销售，国内着重供给上海的能源。中国的东部与西部实际上有一个经济利益关系问题。西部地区的原料运到沿海地区加工，产品又运到西部地区使用，在运输上不知道造成了多大的浪费。长期这样搞下去，使西部地区永远供应原料、半成品，也是不行的。当然，这只能逐步转，现在还必须保证把上海所需要的原料调

拨去。从全局考虑，我们应当把沿海地区搞活，首先是使上海地区发挥作用，积极打入国际市场；同时逐步使沿海地区的技术向西部转移，利用当地的原料就地加工销售，使东部、西部地区的经济都能够繁荣起来。我们的长远规划必须有这个战略设想。上海经济区的规划，也应按这个思路去考虑。

能够利用沿海这个有利条件的城市，还有天津、大连、青岛、宁波、广州等。像天津是用上海的方式，还是用别的方式好？还可以研究。要有步骤地先把沿海城市搞活。

关于经济区的规划工作如何开展，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由顾卓新[1]同志负责；成立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由郭洪涛[2]同志负责。这两个办公室都作为国务院的派出机构。这个机构的性质、任务，怎么进行工作，先议几条，报国务院批准。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不是站在条条、块块的立场；而是要从全国的角度去研究、处理问题，协调经济区内条条与块块的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个办公室应分别在上海、太原设办公地点，在北京要有个落脚点。

首先搞经济区的规划。经济区规划工作，先从调查研究入手。掌握这个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经济情况，参考各部委的有关规划方案，从实际出发制定出经济区的经济发展规划方案。搞规划，也可以先从某些行业开始。如机械工业，上海有什么打算，周围的苏、锡、常、杭、甬等地有什么打算，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结合国家机械工业改造的设想，定出本地区的机械工业规划来。还有外贸，也可以以上海为中心，先搞个外贸规划。是从机械工业、外贸或者从能源、交通的规划搞起，你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派干部参加这两个规划办公室的工作。在规划工作上，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要经常与两个办公室取得联系，给予帮助、指导。有一些六十岁左右的司局长、副部长，身体好，能力强的，可以抽调一些参加这个工作。这些同志实际工作经验多，搞经济区的规划能提出许多有见解的意见来。办公室不要很庞大，要搞得精干一些。这是一项新的工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需要一批有志之士，开创出一个新局面来。

注 释

1．顾卓新（1910—2002），辽宁义县人。时任中顾委委员。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委书记、第二书记、省人大主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

2．郭洪涛（1909—2004），陕西米脂人。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曾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务院六办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计委顾问。

坚决制止乱砍森林和滥占耕地*

一九八二年十月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制止乱砍滥伐森林问题

对情况要有个实事求是的估计，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九八○年十二月国务院发过一个制止乱砍滥伐的《紧急通知》，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了《林业决定》，全国情况虽有好转，但一些地方乱砍滥伐之风一直没有停下来，现在有的地方又在蔓延、滋长。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怎么得了？中国森林很少，林业又有它的特殊性，破坏容易恢复难，如果不注意，几个月的破坏，就会造成多少年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我们当前要突出地抓一下保护森林的问题。要采取坚决的措施，把这股乱砍滥伐之风压下去。

乱砍滥伐的原因，主要还不是林业管理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无政府主义，不正之风，少数人目无法纪，带头向山林进军，抢发“砍树”之财。现在就有那么一些人，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致富，而是靠侵占、哄抢国家资财发财。国营林区、林场也有乱砍的。对这些违法乱纪行为，必须严办。

对于林业管理体制和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部门要调查研究，逐步解决。但是，绝不能把这些看成是乱砍滥伐的借口。要批驳那些乱砍滥伐还有什么“合理性”、“合法性”、“不可避免性”等等错误说法。现在我们政策方面不合理的事情还很多，有的一时也难以解决。譬如，木材价格不合理，这是长期形成的，现在一下还不能完全解决；还有木材供应紧张，有缺口，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但这能成为违法乱纪、乱砍滥伐的理由吗？不能。我们不能等到这些问题解决了，再来制止乱砍滥伐，那就会把树都砍光了。现在就是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先把砍树之风压下来，不准再破坏。保住森林，不准破坏，这就是最大的道理，一切小道理都要服从这个大道理。你们不是讲要“治标”、“治本”吗？不准破坏，这既是“治标”，也是“治本”，以法治林也是“治本”。我们不能一边造林，一边又大肆破坏森林。要以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干预这件事，要严格按法律办事。

只是一般地发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必须有决心，有气势，有切实有效的措

施。有决心才能有办法。河南省内黄县前几年破坏森林严重，省委下决心追查，处罚了几个为首的不法分子，砍树风就刹住了。要坚决查处。上面要有决心，但保护森林关键在县，要把责任放到县委头上。有些群众哄抢国有林，就是社队支持、县委放任所致。全国每个县都要进行一次护林检查，如有破坏森林的情况，必须限期停下来。如不制止，就是失职，就要追究县委、县政府的责任。对近几年乱砍滥伐严重，至今仍未停止的地方，要选择典型案件，追查清楚，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

全国要选择几个抢占国有林、乱砍滥伐严重的地区，以中纪委为主，国务院有关部委派人参加，协同省里直接查处一批毁林案件，大张旗鼓地处理一批为首分子。当地如有人抵制、包庇，要认真查处，追查到底。决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查就是“事出有因”，不了了之。新闻宣传部门要密切配合这一工作，多造舆论。

对林业政策方面出现的问题，要注意研究。看来，把国有或集体的大片成材林分给个人，这在方针上有问题。不少地方把成材林成片分给个人后，群众怕政策有变，分到手后把绝大部分大树砍掉了。荒山分下去，群众会种树；成材林分下去，他就要砍。有些地方干部管得好，情况可能好一些。但我们不能把个别的典型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我们过去往往拿个别典型到处去套，结果出问题。当然，有的林区群众出门就是国有林，不划点树木给他，那也不行。但是即使这样的地方，也不宜把大片的林子分下去。没分的不要再分了，已经分了的，也不要收回，但要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好，不然又可能引起大砍。照顾林区人民的利益问题，根本的办法在于把林区大量的劳务，如整地、修路、植树、护林等包给社队，而不是把大片成材林分给群众。

关于省里超计划采伐问题，计委要研究一下，省里的木材生产计划是不是也可以纳入国家计划。除此以外，不准层层加码，搞计划外采伐。木材缺口大，要研究多搞代用品，要提倡节约用材，不要因为木材便宜就随意浪费。

这次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个《紧急指示》，专讲制止乱砍滥伐问题，别的不讲，就写那么几条。这件事要抓紧，抓晚了损失更大。

关于解决滥占耕地建房的问题

切实解决滥占耕地建房问题。这个问题和乱砍森林一样，都是带有根本方针性的问题。我国人多地少，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节约耕地。这几年来，由于搞活经济，农民开始富起来了，纷纷要求建房，这当然是好形势。但是如果不加控制，滥占耕地，发展下去，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前些时候黄克诚同志看到报纸上报道农村大量盖新房、住的多么宽敞的消息，就给我打电话，说这样宣传会引起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占地太多，要注意。黄老的看法是很有远见的。一位泰国华侨到广东潮州探亲，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回去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潮州最近几年大盖“下山虎”（三面有房的院子）和“四点金”（四合

院），这是自杀政策。潮州地区一千二百万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四分耕地，这样占地盖房怎么得了？发展下去，那人就要上天，当“空军”了。建房如果放任自流，不会比人口放任自流造成的后果小。所以，这个问题要注意，要有远见，对农民进行引导。不能只提倡建新房，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农民的居住条件应当逐步改善，但不能提倡住得太宽敞。中国人多地少，就是要住紧一点。一般农村，没有条件盖很多高层建筑，也不能都盖成独门独院，拉开距离，那就不得了。改善农村居住条件，主要是把房屋设计得更合理，改善房内设施和卫生条件，把家里搞得适用、干净卫生一些。占地少，又住得方便舒适。我们看，日本的房子一般都盖得很小，是有道理的。他们是个岛国，耕地非常宝贵。我们也要从节约土地考虑，研究中国乡村的房屋建设。

当前首要的，是要把城乡建房滥占耕地的歪风刹住。第一，对于机关、企业和干部滥占耕地建房的，要选择一些突出的违法事件，严肃处理，有的要没收，有的要登报。第二，农村建房面积必须控制。一种办法是，各地根据不同情况，按人或按户规定建房面积，一般以原有宅地为基础，不宜扩大。另一种办法是，规定村子建房范围，只准在规定面积内搞“内涵”，不能扩张“外延”。具体如何搞法，各地可以研究。总之，不能占耕地。第三，农村建设要搞好规划，规定标准设计，有关部门要积极给予支持和指导。

从今天研究的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现在农村政策如果出问题，很可能不是出在所有制问题上，如个人劳动、个体经营等方面，而是出在自然环境、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的问题上。这种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短时间不注意，就会带来长期难以弥补的损失。譬如，农村开展多种经营是好事，有的地方把荒山分到户也是可以的，问题是群众利用荒山去干什么。如果是植树种草当然好，如果上山毁林开荒，只想着眼前抓一把，那肯定要来个大破坏。宣传“万斤户”也要注意，如果这万斤粮是靠毁林开荒来凑数的，那后果就很不妙。这是得不偿失。乱砍滥伐树木，滥占耕地盖新房，也都是这样。如果不注意，几年工夫，造成水土流失愈来愈严重，森林、耕地大量减少，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看到事情好的方面，也要看到在好的事情掩盖下的消极的一面。在大好形势下，我们要特别注意限制和纠正那些带有破坏性的问题。

我们要坚持搞活经济的政策，但在有些问题上不能“活”。计划生育不能“活”，森林砍伐不能“活”，城乡占地不能“活”。对这几项要有明确的政策加以限制。如果不加限制，若干年以后，它所造成的后果可能就把我们搞活经济带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效益抵销了。到那时我们再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教训，就晚了。

中国人多地少是面临的现实，很多问题需要从这一特点出发去考虑。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这是就整个国家来说的，要按人口平均，土地和其他资源都不算丰富。这是一个大的制约因素。这一点要提起大家注意。要十分珍惜我们有限的土地、资源。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不可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

这个文件（指林业部和城乡建设部的《请示报告》）加个批语，以中央、国

务院的名义批转下去，要全党上下抓好这件事。这两件事，难是难，但只要全党一致就不难解决。计划生育这件事是最难的，但只要大家认识一致，下决心抓，也能抓好。这件事使我们很开脑筋，说明只要方向对，决心大，全党上下一致，我国许多重大的、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下决心，全党一致，任何难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建材工业要抓紧技术改造*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听取国家建材局汇报时的谈话。

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要靠技术进步。要解决新产品试制和采用新技术推广的问题。

听说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要达到800亿元，这就超过了1978年的规模了。怎样用好800亿元，要很好研究一下，一是用于能源交通，二是用于技术改造。少用在一般项目上。银行的贷款要卡紧。

我们国家要把每年的一亿吨石油用好，把800亿元的投资用好。要研究有些什么有效措施。

现在水泥很紧张，特别是大水泥更紧张。今年建材的生产和建设情况如何，今后如何打算，你们谈一谈吧。

你们讲与英国皮尔金顿谈判，合资建设上海耀华浮法玻璃生产线，过去英商条件苛刻，要收我国各浮法厂的提成费。这就是因为我国没有专利法，有专利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说锦西水泥厂生产特种水泥需用重油得不到保证。为什么生产水泥要烧油？为什么还不改过来？即使停产半年也要改，先用进口水泥暂时顶替一下。剩下两个烧油的厂可轮着改过来。

要下决心搞技术改造。水泥工业的技术改造要以窑外分解为中心，窑外分解要快上，今后新增生产能力尽可能搞窑外分解。只是工艺过关还不行，还要使配套设备制造过关。国内解决不了的关键设备要引进，既买设备，也买制造技术，要舍得花点钱。高温风机、大型减速机的技术引进，经委、计委要抓紧落实。大连造船厂就是走合作生产的道路，开始自己生产的少些，逐渐增加，就是用“脱壳”的办法。真正关键的东西靠测绘不行，否则就没有专利了。

技术改造问题。经委、计委要抓一下专业设备的引进政策。要有长远打算。那些关键设备国内未过关，必须买的设备，要和引进专利技术结合起来，不需要成套引进。对自己既不要估计太低，也不要估计过高。下决心围绕技术改造引进一些关键设备和专利技术。这样做机械部门也不反对，都上去了。到本世纪末，各行各业都要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成熟的技术在我们国家大量应用起来。跨上这一步很重要。没有这个技术政策不行。各行各业都有个

设备更新问题。引进设备结合引进专利。单独引进专利很困难，花钱多。

到本世纪末要生产多少水泥？（杜恩训[1]答：估计两亿吨打不住。）按两亿吨计算，就要五千万吨煤，这可不行！加上建材其他产品用煤更多了，建材工业降低能耗是件大事，不搞技术改造吃不消，使用水泥不讲节约不行。节约水泥有什么措施？经委要研究在施工中节约水泥的问题。

你们说发展建材工业要解决政策问题很值得研究。棉花就是靠政策对头，今年又是大丰收。只靠指令，多少年也没上来。要研究政策，要利用经济杠杆，否则就事倍功半。建材是回笼货币的行业，要努力搞上去。不仅销城市，还要销农村。对新型建筑材料要扶植，我赞成免税，免了税就不要免利了。

1985年达到300万平方米新型建筑材料太少了，这不成比例。要多搞一些新型建筑材料，既节省能耗，扩大使用面积，又缩短建设工期，很好，要推进一下，支持一下。

要抓些大企业，像首钢那样。定个政策，企业有了钱，按国家规定的计划去发展。首钢是先包后规划，把经济责任制同长远规划联在一起。明确权责利，一定十年、十五年。通过规划解决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你们建材工业也可选几个企业搞，计划一下，条件不成熟的不搞，成熟一个，包一个。现在大厂的经济责任制找到了一条路子，例如首钢。小厂也有办法，就是自负盈亏，征所得税。就是不大不小的，还缺个办法。

在安徽铜陵建熟料基地，供应上海熟料，这个办法好。在沿江的地方可以多发展些熟料基地，计委要规划一下。我国东部、西部有个加工和原料的矛盾，搞加工的利润高，搞原料的利润少，如果把西部的原料价格提高了，他就不一定搞加工了，矛盾就好解决了。

建材设计力量不够，可以与别的部门协作，签长期合同。你要调他的人很困难，可以找他订长期合同，例如军工部门。这次搞科技规划要动员军工力量参加。按行业搞技术发展中心。

可以中央和地方合资一起搞，分产品，分利润。不论大中小厂都可合资经营。

建材很重要，现在缺口大，真正搞起来也不难，要研究如何搞上去。一是研究搞活的政策，如何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业就是这样。我的一个老战友来信讲，他大儿子今年种了10亩半麦子，收6500斤；二儿子种11亩收8000斤；三儿子种8亩收6000斤，比过去产量增加一倍多。

农业搞上去了。煤炭也有点办法，经济煤的办法，统配矿怎么办？是不是定个基数，超产部分加价。建材工业也要想点办法，搞点灵活政策，各方面搞活一些，鼓励大家积极性。化纤没人号召，到处都搞，搞的那样快，甚至拿外汇去买原料，就是有个利益问题。计划也能调动，但只靠计划不行，还得有个政策，用经济办法，计委、经委要研究个办法。上调地方水泥每吨补助25元，今年上调250万吨，明年还可多搞些。五十年代发展小化肥、小水泥很快，但是技术没上去，今后要集中资金搞先进的技术。过去不愿搞大的，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系，

一搞大的就拿走了。

建材工业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如何把建材搞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另一个是技术改造。建材工业现在的生产技术太落后了，不改造，用老技术发展吃不消。目前我国水泥工业基本上是四十年代水平，还有三十年代的，烧成用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平板玻璃的生产技术也很落后。今后扩大生产一定要采用新技术，不能饥不择食。现在再上落后工艺，以后还得改造。要明确走技术改造的道路。又要发展，又要建立在比较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建材是耗能多的工业部门，不改造，能耗高，搞不起。要发展水泥，又要搞技术改造，耗能多就限制了本身的发展。坚定地走技术改造的道路，搞改造如影响生产，可以采取先扩后改。

讲先进技术当然是适合我国的适用技术。如平板玻璃，要发展浮法，但不一定都搞浮法。

新型材料免税免利问题，请计、经委和财政部再研究一下，搞点政策、措施，搞上去了再取消优待。

建设熟料粉磨站的办法很好，要注意熟料产区的利益。

改进包装很重要。还要重视发展农房所需混凝土构件。

注 释

1．杜恩训（1919—1990），河北献县人。时任国家建材局局长。曾任贵阳市副市长，建工部生产局局长，建材部副部长。

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
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

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党和政府感谢你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现在，我想就四个同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工作都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讲一些意见，和同志们一起研究。

一九八○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是七千一百亿元。到二○○○年，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翻两番，达到二万八千亿元左右。这是全国经济战线、科技战线和其它各条战线共同的战略目标。我们财力物力的条件如何，能不能保证实现这个目标？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从资金、能源、材料的条件来说，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概念，叫做又不具备、又具备。因为按照我们现在已经达到的技术经济指标来计算，资金、能源、材料都严重不足；但是，如果我们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能够在二十年的建设过程中，逐步地转到新技术的基础上来，把各项技术经济指标都提高到全新的水平，那么，我们的资金条件、能源条件、材料条件，是可以保证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

一九八○年，我们生产的各种能源，折合成标准煤，相当于六亿三千万吨。七千多亿元的总产值，就是靠这六亿多吨燃料和动力来实现的。赵紫阳在讲话中提出“振兴经济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这一战略方针，对深入进行科技体制的改革，确定了指导思想，推动中国科技工作、经济建设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开拓了新的局面。

到本世纪末，能源供应量大体上可以翻一番。能源翻一番，能不能保证总产值翻两番？又不能、又能。如果继续停留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按照我们现在总产值和能源之间的比例关系，那就只能使总产值翻一番。但是，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把总产值和能源的比例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情况就不同了。从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水平来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里面，我们也是落在后边的，更不用说同发达国家相比了。日本现在每年消耗的能源同我们差不多，大体上也相当于六亿吨标准煤；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的三四倍。当然，这里也存在着不可比的因素，如能源结构不同，产品结构不同，但差距如此之大，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技术水平比我们高。到本世纪末，我们还达不到那样的

水平，但是，我们应当力争达到能用十二亿吨标准煤来实现二万八千亿元总产值的水平。要达到这种新的水平，光靠少数企业、一个行业或几个行业提高技术水平是不行的；全国各行各业所使用的耗能高的设备，都必须更新换代；这还不够，各行各业还应该进行一系列的重大的技术改造，改变工艺流程和产品结构。这样，才能把能耗大幅度地降下来。冶金部的同志作了一些研究，初步设想，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改革产品结构，使我国的冶金工业在不大量增加能源消耗的前提下，做到产量翻一番，经济效益超过一番。所以，能源不足的部分，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来补足。过去每年开计划会议，大家都向能源部门伸手，向计划部门伸手，要能源，争能源。我看，今后肯定要出现一个新情况：各行各业都来向科学技术伸手，向在座的和全国的科技工作人员伸手，向你们要开发能源和节约能源的先进技术。同志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材料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水泥，木材，金属材料，合成材料，各种各样的新材料，代用材料，都得向科学技术要。生产材料的部门会向你们伸手，要你们提供生产更多更好材料的先进技术，使一吨材料能顶几吨用。使用材料的部门也会向你们伸手，要你们提供降低材料消耗的设计、工艺、设备、产品等等。所以，要解决能源和材料不足，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

资金问题现在非常紧张。这种紧张情况，还要延续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底子薄，就是那么一点钱，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必须统筹兼顾，量力而行。问题是我们现在经济效益太低。拿基本建设来说，一元钱的基建投资，只能形成七八角钱的固定资产；而在国营工业企业中，一元钱的固定资产，只能实现产值九角六分。如果停留在现在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上，产值翻两番，投资就得翻两番。何况二十年后，现有的固定资产将消耗得差不多了。而且，有了固定资产，并不能进入生产过程，还必须投入流动资金。而我们现在国营工业企业占用的流动资金，已相当于固定资产的四分之一以上。这样计算下来，二十年内得筹集多少资金！现在我们的财政收入，一年也不过一千亿元多一点。当然，在二十年过程中，我们国家的财源是会逐步地增长起来的。但是，总有一个限度。如果硬要拚命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势必压缩消费基金，重新引起比例失调，搞得紧张不堪，造成经济活动紊乱。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出路在于改善经营管理和采用先进技术。经营管理是一门科学，是我们当前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改善经营管理，可以很快见效，把巨大的潜力挖掘出来。今天我主要是讲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技术进步也可以生财。重大的技术进步，往往可以为国家生大财。国务院最近组织专家论证，如何用好一亿吨石油。专家小组的初步结论是：必须提高炼油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的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水平，抓好这一条，每年可以增加上百亿元的收入。首都钢铁公司是办得很好的一个企业，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出色。他们在发动全体职工深入讨论以后，决定在三年内进行十二项重大的技术改造，改造所需的钱，由内部积累和技术改造所得的效益来解决，不向国家伸手。不仅如此，他们除了上缴税金以外，还准备在三年内向国家上缴利润十亿五千万元，相当于首钢现有的全部固定资产总值。湖北省襄樊市，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的三

年内，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工业总产值已经翻了一番，上缴给国家的利税翻了一番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可以发挥多么巨大的作用！我们的资金状况，如果按照现有的技术经济指标计算，要保证总产值翻两番，存在着相当大的一个差额，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来解决。

这就是财力物力条件又不具备又具备的情况：躺在老的技术基础上，翻两番的财力物力条件就不具备；力争转上先进的技术基础，就可以更好地运用已有的财力物力，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翻两番就具备条件。为什么不沿用现在的技术经济指标把战略目标定在条件完全具备的水平上呢？如果那样，叫做原地踏步，"好处"是轻松，但是，不能前进，现代化实现不了。

从上面讲的情况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老技术、老设备、老材料、老工艺、老产品的基础上，按照现在已经达到的技术经济指标，翻两番是办不到的。但是，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基础上，翻两番是办得到的。不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个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个目标就有实现的把握。十二大的文件说，要力争翻两番。我们的"力争"，首先在于力争科学技术进步。

因此，工业，农业，各行各业，老厂，新厂，都要抓住技术进步这个环节，把生产转到新的先进的技术基础上来。我们常说，今后搞经济建设，不能走老路，要走新路，不能把宝押在外延扩大上，主要应当靠内涵。当然，我们今后仍要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工厂，但是，中国这么大，光靠建设少数现代化的新厂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这一点很重要，一定要搞清楚。老厂必须进行技术改造。它们是汪洋大海。如果汪洋大海的面貌不改变，老是处在落后状态，整个技术经济指标就无法达到先进的水平。新厂，不仅在建厂时要用先进的技术武装起来，建成以后，还要继续不断地采用更先进的技术。现在技术老化的周期越来越短，再先进的技术，过不了几年，就落后了。技术不进步，故步自封，是没有前途的，是一定要被淘汰的。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我们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办好这件大事，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经济振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点，应该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一条基本的指导思想肯定下来。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旦应用于生产实践，就是强大的活跃的社会生产力。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条基本原理。这个道理，小平同志讲过多次。最近在党的十二大上，耀邦同志再一次着重讲了科学技术问题。我们应该把这些思想体现到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真要搞现代化，就要真正依靠科学技术进步。部长，省长，市长，县长，厂长，领导经济工作，都要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技术。领导干部如何依靠科学技术？主要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可不可以暂且概括成四句话：一是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二是给科技战线出题目；三是为科技工作创造条件；四是为科研成果运用到生产中去开辟道路。其中有许多事情，对我们许多同志来说，是比较生疏的。但是，既然要翻两番，既然要搞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要学会如何做好这些生疏的、艰苦的、意义重大的工

作，而且一定要学得很认真，做得很扎实。今后，一切财政经济领导部门，包括财政、金融、商业部门，都要吸收有科学技术知识，热心支持科学技术进步的同志参加领导。否则，思路打不开，政策不能很好贯彻。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时候了，不能再晚了。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经济建设中的一个指导思想问题：搞现代化，振兴经济，翻两番，一定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

第二个问题，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怎么办？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科技工作者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来，特别是要投身到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来。科研工作领域很广，课题很多，第一位的，是要研究经济建设中有重大经济效益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课题。科技工作者应当在各个方面作出贡献，最重要的，是要在推动生产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方面，作出贡献。

这些本来都是老话。去年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科技发展方针，讲的也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旧话重提？一是因为这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希望，翻两番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大家对科学技术工作者寄以厚望。二是因为我们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发展不平衡，有些难度很大的理论课题和尖端技术，我们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量大面广的生产技术却相当落后。必须围绕着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围绕着消化吸收和应用推广先进的科技成果，把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力量组织起来，急起直追。三是因为我们国家科技人员少，科研经费少，浪费不得。必须分别轻重缓急，把十分宝贵的人力财力物力，用到刀刃上去，不能分散力量。四是因为现在强调提出了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因此，必须同时强调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你依靠我，我面向你，水乳交融，通力合作，就可以更好地完成共同的战略目标。尽管是老话，根据上面四条实际的理由，很有必要重新说一说。

面向经济建设，会不会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我看，不仅不会影响，而且会促进科技繁荣。科学技术所以是生产力，就是因为它可以应用到生产中去，发挥实际的作用。科技现代化所以是关键，就是因为它可以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难题。面向经济建设，正是为了使它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我们应当加强应用科学的研究，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课题，本来就是为生产服务的。基础研究的许多课题，也是可以间接地为生产服务的。因此，能够直接或间接应用到生产中去的课题，是绝大多数。面向经济建设，可以使科学技术中这些最急需的领域首先兴旺发达起来。当然，在基础研究方面，也确有一些课题，现在还无法在生产中应用。对于特别擅长于研究这类课题的同志，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劳动，请他们继续安心研究下去，但是，至少在当前一段时间内，恐怕就不可能投人更多的力量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了。考察一下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凡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也总是比较发达。为什么？因为它们有经济实力，有钱办学校，有钱办科技，科研设备好，搞科研的人也多。经济是基础。经济上不去，科技也不可能上

去。我们的国家，在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以后，经济实力比较雄厚了，就好办多了，那个时候，我们投入基础研究的力量也可以比现在多一些。但现在不行，因为受客观条件限制，科技人员太少，必须组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到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这样做，国家可以富得快一些，既可以保证实现翻两番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又可以使急需发展的科技领域首先发展起来，也可以为我国未来科技事业的全面繁荣，创造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

所以，我认为，明确地提出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必要的，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有利于发展科学技术事业。

如果同志们同意这些意见，我就想进一步讲一讲：怎样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来组织科学技术工作。

我认为起码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来确定科研的任务、课题。第二件事，按照这个指导思想，调整科研体制和科研力量。第三件事，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完善对科技人员的考核制度和奖励政策。这三件事，都很重要，都要做。我今天主要是出题目。文章谁来做？由科委会同各有关部门来做。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又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是可以做出三篇好文章来的。今天我也讲一些初步的意见。先谈谈第二件事和第三件事，第一件事放到后面再说。

现在的科研体制，不能适应于面向经济建设的要求。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科技难题，不能很快地反映到科研单位中来。科研单位的成果，生产单位也不大了解。各个方面的科研力量之间，组织得不够严密，不够协调。有些完全相同的课题，几十个单位都在搞，在低水平上重复劳动；有些很有经济效益的课题，却无人问津。部门之间，壁垒森严，听说还有一些互相拆台互相封锁的事，这就很不好了。除了体制问题以外，恐怕同不健康的思想作风也有关系。科技力量的分布也不合理，有些单位人多事少，而有些单位，特别是第一线的科技力量，又过于薄弱。某些科研单位内部，人员结构不成比例。有些单位，名为科研所，其实并没有多少科技人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但是长期拖下去不好，对工作不利。我看，科研体制要通盘规划，分步骤解决。牵动面大的，要慎重从事，务必不要打乱重大课题的研究；调整后大有利于工作的，就要抓紧解决。可以考虑，首先抓这样几条：第一条，抓紧建立一些行业技术开发中心，数量不要多，但要办好，让它们真正起作用。任务要明确，就是要集中力量搞本行业的技术改造、技术进步规划，搞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成为名副其实的为社会服务的生产技术开发中心。不一定都设在北京。人员既要精干，又要配套，可以以各产业部门或大型企业已有的科研机构为基础，调整充实。如果现有力量确实不足，其它方面的科研机构就应当抽调优秀的科技人员大力支持。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具体条件，通过招考、推荐等各种办法，逐个审查，合格的就收。原单位人浮于事的，用非所学的，应当放行，不得留难。这些中心办起来以后，要面向本行业，特别是广大的中小企业，为它们服务。有的中心可以由一个部门组织；有的中心则应该打破部门界线，跨部门组织，但可以以某一个部门为

主。第二条，大的专业公司和骨干企业，特别是已经确定要进行重点技术改造的大型骨干企业，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后，也可以仿照上述办法，建立或加强本企业的技术开发中心。它们主要为本企业服务，也可以适当地为其它企业担负一些科研任务。这种中心，数量也不要多，先试点，办好一批，再办一批。第三条，不打乱原建制，不改变隶属关系，分别情况，用"科研、设计、生产、服务一条龙"、"科研、设计、生产联合体"、农业现代化综合试验基地、科研合同制、技术咨询服务、兼职等多种形式，鼓励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挂钩。科学院、高等学校以及其他科研力量比较雄厚的科研单位，都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科技人员，支持那些科技力量薄弱的企业，帮助他们工作，编制不动。我们许多科技人员，早就有此要求，渴望为经济建设多出点力，苦于渠道不通，"服务无门"。我认为，应当为他们把"门"打开，使有作为有抱负的科技人员，都能够畅通无阻地投身到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来，贡献才智，施展身手。

至于奖励制度，发明者应当受奖励，这一条已经用条例的形式肯定下来了。优秀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创造者应当受奖励，这一点也已经用条例的形式肯定下来了。今天受奖的同志，就是根据这两个条例评选出来的。你们的工作非常出色，丰富了知识的宝库，创造了物质的财富。许多同志还创造了很大的物质财富。今天受奖的发明中，年经济效益在一千万元以上的有十三项，其中在一亿元以上的有六项。一项发明，推广以后，一年就能取得这样的效益，这是多么大的贡献！而且，你们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这对正在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全国人民是莫大的鼓舞。我还想指出一点，就是现在对科技人员的奖励政策和考核制度不够完善。因为在广大的科技工作人员中，以及在工人、农民和管理人员中，有许许多多的同志，他们虽然没有发明、发现，但是，他们在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和推广应用已有科技成果的工作中，在栽培、养殖、勘探、设计、施工、制造、技术管理、质量检验、标准化研究、计量、测试、劳动保护、医疗卫生、环境建设、物资储藏、交通运输、科技情报等各种工作岗位上，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也为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作出了重大的甚至杰出的贡献。今天请了一百多位这样的同志列席大会。我们也要向全国千千万万这样的同志致敬，向他们表示感谢！应该为他们制定技术进步奖励条例，按照他们对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的贡献，有的由企业奖励，有的则应由地区或部门奖励，直至由国家给以奖励。奖励，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讲面子，也不能讲资历；就是一条，要讲贡献，讲对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的贡献。贡献越大，越要奖。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做出重大贡献的，更要奖。同样，在对科技人员进行考核时，在处理科技人员的职称问题、待遇问题、工作条件问题时，也必须以他们对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的贡献作为重要的依据。还应当制定各种鼓励的政策和办法，支持科技人员到厂矿企业去，到农村去，到边远的地区去，到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科技人员本来就少，现在有的单位，对他们重视不够，使用不当，不能人尽其才，对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没有给以应有的关心，这种情况应当迅速改变。我认为，这样做，对贯彻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

有利，对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有利，对经济建设有利。

第三个问题，把科技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参加规划，参加攻关。

我们想在计划工作上作点改进。要改进的地方很多，这里只讲三点：一是想使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社会发展这三个方面协调得更好。二是想看远一点，作些长远打算、总体设想、大的决策。因为好多问题，特别是最重大的问题，不仅年度计划无法解决，五年计划也无法解决。现在，正在搞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科技方面则要看远一步，准备规划到本世纪末。三是要把全国规划更好地建立在行业发展规划、经济区域发展规划、重点企业技术改造规划的基础上。因此，需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搞各方面、各层次的规划。搞规划，实质上就是搞调查研究。为了减少一点盲目性，系统地研究一下各行各业、各个经济区域、以至各个重点企业的发展前景，花点力量是值得的。

那么，动员科技工作人员参加哪些规划呢？上面说的那些规划，都要有科技人员参加。科技规划，科技工作人员当然要参加研究。全国的规划，也必须有科技工作人员参加，但人数终究有限。因此，我认为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必须组织科技人员，参加行业规划、区域规划和重点企业规划。

行业发展规划非常重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只是按照某种累进率去作机械的推算，因为那种东西靠不住。在行业发展规划中，不要把注意力单纯集中到产量问题上去；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朝什么方向发展，达到什么技术水平，采取什么技术政策和装备政策，全面地透彻地冷静地调查研究一番，系统地思考一番，有个总体设想，通盘规划。方向问题，要按照宏观经济的要求和各行各业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联系，作些大的决策。到二○○○年在生产技术上达到什么水平的问题，应当按照我国的国情，充分地进行科学论证。全国在技术进步方面的总的目标，作过一些初步酝酿，可不可以这样设想：到本世纪末，把经济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已经普遍采用了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我国厂矿企业中基本普及，并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技术体系。这是个大问题，到底怎么定，要从实际出发，周密研究，慎重论证，不可能也不急于马上定下来。全国如何定，取决于各行各业的需要和可能。只有在各行各业的发展目标明朗化以后，全国吐的决策才能比较切合实际，比较有把握。各行各业，情况不同，到底在技术上能达到什么水平，要实事求是，不要“争先恐后”地去“赶超”，切忌一刀切。一个行业内部，也要作具体分析。比方说，机械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装备部，应该适当超前；但很多大型农机就不必去瞄准人家了。方向问题、目标问题不明确，技术政策和装备政策就会摇摆不定，攻关也就无所适从。行业规划确定之后，就作为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依据；将来新建工厂，如果不符合技术政策的要求，达不到一定的技术水平，就不允许建设，这对盲目建设也是一种很好的限制。行业规划是一件大事。光经济工作人员参加是解决不好的，必须由经济工作人员和科技工作人员共同研究。

除了对现有的行业作出规划以外，还要在建立新的行业方面有所考虑。比方

说，建立饲料行业的问题，就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再比方说，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应该把计算机软件行业建立起来？如果需要的话，应该采取哪些部署？根据我国的特点，可以建立哪些有资源优势的、技术密集的、劳动密集的行业，这事已说过多次，现在到了应该具体化的时候了。

区域规划，不是要各省、各县都去搞面面俱到的规划。重要的是要有一些经济区域的规划，比如长江三角洲的区域发展规划，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和重化工基地的区域发展规划，以及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发展规划等等，从中研究一些大的方向、大的决策。许多科技工作同志，过去在这些方面提过一些重要的意见。有些意见，基本一致。有些意见，不尽一致。需要全面权衡利弊，取长补短，择善而从。

全国虽有三十八万个厂矿企业，但作为国民经济骨干的只有千把个，它们的技术状况和经济效益如何，对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起决定性的影响。所谓把发达国家已经普遍采用的生产技术在我国基本普及，首先要在这些骨干企业中普及。国务院已经决定，先对鞍钢等一大批重点骨干企业作出技术改造规划，分期分批组织实施。

刚才说，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现在经济战线正在搞规划，遇到许多问题，必须请科技工作人员来“面向”，共同议论一番，共同研究解决。不仅搞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同志要参加，搞基础研究的同志也不妨参加，看看这些规划同自己的专业有什么关系，自己的专业能为经济建设作出哪些贡献？科技工作人员参加规划，至少能起两个作用：第一，可以贡献自己的知识，起一种参谋作用。第二，可以了解经济建设的实际，了解它们当前的和今后的需要，从而使自己在考虑本学科的方向、重点和课题方面，看得更全面，更准确。

接下来就是攻关：围绕着规划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难题，把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力量组织起来攻关。这件事，不能等规划全部定下来再落实。看准一批，就要落实一批。有一个问题要专门谈几句：应该扩大视野，不要把攻关的含义理解得很狭窄。第一，重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应当列入攻关任务。这里有许多科学技术问题。大的决策如果失当，对经济效益往往会产生极端严重的、无可挽回的影响。第二，国内攻关和技术引进应当相互衔接，既不要重复，又不能脱节。大部分课题应由国内攻关解决。一部分课题，如在国内研究费时太长，花钱太多，就应通过引进，加以解决。引进以后的消化吸收工作，应当像国内研究一样，列为攻关课题，扎扎实实地组织落实。

攻关不是目的。取得成果以后，还要很快应用，推广开来。过去我们也有不少成果，但是没有很好地应用推广。必须组织科学技术成果由实验室向生产转移，单纯军用向军民兼用转移，沿海向内地转移，国外向国内转移。从中间试验、工业试验、小批量生产直到大量生产、普遍推广，每一个环节都要打通。在技术转移中，要提倡社会主义协作的优良风格，反对技术封锁的不正之风。同时，应当尊重创造成果的单位和科技人员的劳动，保障他们合理的利益。

这次搞规划，搞攻关，要真搞，不要假搞。行业规划，尽管是预测性的，但

这是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因此，必须实事求是，有根有据。重点工厂的技术改造计划，重大的科研攻关项目，一经批准定案，就要列入国家计划。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严肃的事。许多同志反映，攻关要有条件保证。这个意见是合理的。攻关项目的落实，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必要的经费，必要的科研条件，必须落实。另一方面，科研责任制也必须落实，必须及时地拿出用得上、用得起的科研成果来。因此，在确定攻关课题时，要十分慎重。没有经济效益的课题不要列进去。凡是需要列为重点课题的，必须是在一定期限内能够产生重大经济效益的。要防止出现"重点项目，重点浪费"的现象。科研管理水平，科研工作效率，都必须努力提高。

组织科技工作人员参加规划，参加攻关，这是领导的责任。这是一项大规模的组织工作，必须有层次、有步骤、有条不紊地落实。必须在一个有权威的、有效率的、精干的机构统一筹划统一指挥下，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和力量。党中央、国务院将就此作出决定。

我国科技人员少，是弱点。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好，能够把大家的力量组织起来。这是我们的优势。五十年代，我们有组织半导体、计算机和尖端技术攻关的成功经验。六十年代，又有组织九大机电设备攻关的成功经验。这次攻关，任务更重，意义更大，应该组织得比前两次更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地方，不管哪个方面的科技工作人员，都是国家的科技力量，应当打破部门界限，不分主角配角，根据国家的急需，在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下，亲密无间、协调一致地并肩作战。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部门，在保证完成国防建设任务的前提下，也应当组织相当的科技力量，参加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在参加规划的过程中，在组织攻关的过程中，科技战线和经济战线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第四个问题，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问题。

农村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后，大大激发了八亿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相比之下，如何提高工业企业对技术进步的积极性，显得更为迫切，更为突出。

我想，应当为企业讲句公道话。企业的同志也很苦恼。他们说，搞新技术，缺乏三个力：动力，压力，实力。搞新技术得不到好处，没有动力。不搞也没有关系，没有压力。即使想搞，也困难重重，新产品试制费太少，没有实力。上个月我到辽宁去。听说沈阳水泵厂搞了二十二种新产品，其中有九种高效节能水泵，可以为社会创造很好的效益，但价格问题解决不了，结果工厂赔了三十多万元，少发了奖金，工人受了委屈。现在大庆油田向他们买水泵，订了个合同，把节能所得效益的一定份额归给制造水泵的企业，这个问题总算解决了。但是，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比方说，铁道部生产道岔的工厂，改进了工艺，把产品的使用寿命从一年提高到三年，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怕订货减少，影响产值，对工厂无利，这项新工艺就被搁置下来了。

个别工厂对技术进步不积极，这好办。许多工厂都缺乏积极性，就必须到我

们的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上找原因。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有两个根本弊病。一是不能很好地鼓励企业关心社会的需要，关心市场的需要，其结果是产需脱节。二是不能很好地鼓励企业关心技术进步，其结果就是大家通常说的“几十年一贯制”。这两条是互相联系的。不关心市场，不想搞新的花色品种，对新技术就不会有兴趣。不搞新技术，新产品也出不来。最近两三年，开始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但问题盘根错节，只能逐步理顺。应当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中，着力解决上述两大弊病。应当围绕着解决这两大弊病，来考虑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各项具体措施。在计划体制、经济政策、以至行政手段等各个方面，都要梳梳辫子，通盘考虑，逐步解决。

计划体制方面，要解决计划指标体系的问题。以总产值为主要指标，弊病很大，不利于降低消耗，降低成本，不利于采用新技术。施工企业按基本建设工程量提取管理费，弊病也很大，居然出了这样的问题：重锤浅夯的技术和设备都研制出来了，可以加快施工进度，又能节约材料和能源，但是，因为减少了工程量，影响了管理费，施工单位不愿用！治本的办法一时定不下来，就要考虑先采取一些治标的办法。看来，在国家下达的计划中，不仅要有生产新产品、推广新技术的要求，而且要有淘汰陈旧产品、禁用落后技术的要求，并把这些要求明确地列到主要考核指标中去。

必须解决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问题，为技术进步开路。比方说，财政方面，要解决新产品试制费的经常性来源问题。信贷方面，要更好地扶植新技术新产品。税收方面，要实行鼓励技术进步的税收政策。价格方面，要研究如何切实贯彻按质论价的原则，不仅实行优质优价，而且实行低质低价，对劣质陈旧产品规定惩罚价格。商业、物资、外贸方面都要研究改进包购包销的办法，要使生产新产品的企业有一定的自销权，不能使生产陈旧劣质产品的企业得过且过。现在经济政策方面，很多规定是妨碍技术进步的。我举一个例子：洗煤优质优价等问题没有解决好，结果，煤不洗就外运，运输如此紧张，每年却多运了几千万吨石头。再一个例子是税收：国家的政策是多引进技术，少买成套设备。但在税收政策上，却往往有利于引进设备，不利于引进技术。我们的经济政策应当是鼓励技术进步的政策，决不应当成为技术进步的阻力。

我是举例式地提出一些问题。这也是出题目。文章由各有关部门来做。不要局限于我所点到的问题。要打开思路，从提高企业对技术进步的积极性着眼，全面地进行检查。各有关部门都要做两篇文章：长远怎么办？近期怎么办？不要坐在办公室里写。要到企业里作点调查研究。写好以后，还要送到企业里去，征求企业的意见，请他们发表意见。企业认为真能解决问题了，再报国务院审批。

总之，为了提高企业对技术进步的积极性，就要切切实实地去解决问题。要明确方向，一年解决一批问题。

九月间，国务院开会，决定实行科技成果有偿转让。十月上旬，国务院决定，重点建设前期工作的科研费用，应当从基建投资中解决。十月中旬，国务院又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决定再解决几个实际问题：

一、国家掌握的技术开发费用，在明年原定数额的基础上，追加百分之九十四。

二、各产业部门掌握的技术开发费用如何调剂增加，由各产业部门研究，提出意见。

三、企业利润留成，过去分为三部分，即：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奖励基金。今后改划为四部分，即：一般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奖励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必须用在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上，不准挪作他用。一般发展基金，也应该主要用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不要在老的技术基础上去扩大生产能力。在奖励基金中，应有一定份额，专门用来奖励对技术进步作出贡献的职工。

四、担负研究新装备任务的某些机械工业企业，经国家批准后，可以按照产值或销售额的一定份额，提取技术开发费用。其他行业的工业企业试制新产品，凡列入计划的，经批准后，在一定年限内，可以允许把新产品试制费分期分批摊入成本。具体办法另定。

五、由物价局提出实行按质论价、优质优价、对劣质陈旧产品采取惩罚价格的实施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希望这五条办法，能够解决一点问题。从根本上说，这里有一个生财之道和用财之道的问题。现在搞一般的基本建设，扩大加工能力，谁都有钱，积极性高得很。但是，搞重点建设，搞技术开发，就没有钱了。该用的钱不用，花小钱得大利的事不办，不该花的钱乱花，症结在这里，出路也在这里。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一条指导思想明确树立起来以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都应该把它贯彻体现到生财用财之道上去：在开发新技术上用财，又通过新技术生财。这个问题解决了，科技战线和经济战线就都活了。我们常说要搞良性循环，这也是一种良性循环。

当然，除了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以外，在企业的干部结构、劳动力结构方面也存在着问题，不利于技术进步。这方面的问题，今天不准备谈了。

同志们！今天我就讲四点意见：经济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组织科技人员参加规划，参加攻关；提高企业对技术进步的积极性。讲的都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照我看，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党的十二大已经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各条战线，都在研究如何开创本战线的新局面。我讲的这些意见，如果对开创科技战线、经济战线的新局面都能有所推动，我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给山西省平鲁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复信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

平鲁县委、县人民政府：

我非常高兴地读了你们的来信。晋西北是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的地区之一。平鲁县今年喜获丰收，粮食总产量突破一亿斤，油料超过一千万斤，社员人平分配达到一百三十二元，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改变了“三靠县”[1]的面貌，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希望你们在胜利的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总结经验，扎实做好工作，继续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注意保持生态平衡，争取农、林、牧和工、副业持续增长，把平鲁县建设得更好。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

注 释

1．“三靠县”是对贫困县的一种习惯性说法，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支援、花钱靠贷款”。

端正指导思想积极推进改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全国计划会议汇报时的讲话。

这次全国计划会议开得是好的。宋平同志代表计委党组所作的汇报，我同意。现在讲以下五点意见，供大家参考。其中有些事，是我们的一些初步设想，向大家先吹点风。

一、关于一九八三年计划指标

经过这次会议讨论后，一九八三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就算定下来了，然后按法定手续报人大批准。在讨论中，对少数指标还有些意见，这是正常的。过去的情况往往是在定计划的时候总是说完不成，可是最后到年底还是完成了，甚至超过。明年的计划，不是脱离现实可能的高指标。现在党中央、国务院都不想搞那种高指标了。我们知道，各地方、各部门想留点余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留得太多了，全国计划平衡就有困难。所以，还是按照这次确定的指标去做，大家积极努力去完成。

二、关于翻两番问题

十二大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要比一九八○年翻两番。这对全国人民是很大的鼓舞。但是，怎样实现这个伟大的任务，值得很好研究。我看首先要端正做计划、定规划的指导思想。不要思想没有搞端正，就匆匆忙忙地从单纯增加产值、铺摊子上去想问题。实现翻两番，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思想搞明确，扎扎实实地把当前的各项工作做好。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把注意力放在制订和实施提高经济效益的措施上来，在这方面要多下功夫。这些工作多做一分，翻两番就增加一分保证，增加一分可能性。如果指导思想不搞端正就去算账，尽搞那些产值高、容易搞的，不从整个经济工作的全局、不从提高经济效益上考虑，那就会助长盲目铺新摊子、追产值，从而对今后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问题。现在已有这种苗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十二大提出的力争翻两番，是

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来实现。要是只从增加产值上考虑问题，拣不花气力的事，产值高的就搞，而不愿做花气力的基础工作，不注意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过几年产品价格下降了怎么办？对这些事，要有个通盘的长远的考虑。各地、各单位根据十二大确定的战略目标，制订规划是必要的。但订规划前首先要把指导思想搞清楚，明确今后经济建设究竟走什么路。十二大开完不久，中央就提出经济振兴靠什么的问题。近几年，我看就是要靠抓好整顿、进一步调整和改革；从长远看，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总之，不是靠去铺摊子、追产值。

三、关于企业的整顿和进一步调整

明年的工作，“六五”期间后三年的工作，要真正在企业的整顿和进一步调整上下功夫。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企业整顿的问题，尽管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能估计过高。一句话，企业整顿现在没有过关，问题没有解决。应当看到，许多企业问题相当严重，管理混乱，水平低下，浪费严重。像甘肃盐锅峡化工厂那样混乱的情况，整顿一下并没有解决问题。这样的厂矿决不是个别的。上海的同志在座谈会上说：“现在全国一年八百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三千亿元流动资金，三百亿元补贴，要研究这三项大钱怎么管好用好，发挥出更大的效益来。现在全国上万亿元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一年只创造这么一点财富，实在说不过去。”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太低，投入多，浪费大，效益差。所以，从明年开始，今后三年各级领导必须在整顿企业上下功夫，用大力抓好这项工作。这件事抓得不好的话，基础打不好，效益就出不来。在企业管理混乱的情况下去搞技术改造，去搞改革，就是建筑在烂摊子的基础上，一定不会产生好的效果。

企业整顿好的标志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真正把经营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搞好。这包括计划管理、质量管理、财务制度、成本核算、物资管理，还有生产指挥调度等一系列基础工作。我们要认真抓两三年，真正把整顿搞好，把基础工作抓落实，把企业的内部条件搞好。首钢为什么搞得好？主要就是基础工作搞得扎实，有过硬的基本功。要把基础工作搞好，一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班子不好，带头人不行，基础工作一定搞不好。二要有合理的政策，使企业有搞好经营管理的动力。领导班子也好，政策也好，都要落实到制度上，推动企业把各项基本制度、基础工作建立和健全起来。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不实行经济责任制，不解决“吃大锅饭”、“铁饭碗”的问题，企业就没有动力。现在有些小企业，一实行包干就改变面貌，就是因为把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有了积极性，就要引导用在做好基础工作上。否则，就会管理混乱，无人负责。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企业的管理也必须现代化。从长远来看，当前整顿企业，加强基础工作，也正是为管理的现代化创造条件。所以，这几年把企业认真整顿好意义很大。不如此，就很难前进。

从明年开始，还要进一步搞好企业调整。调整有两重意义。原来讲调整，主

要是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农、轻、重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等。那种意义上的调整，经过前一段的努力，已经基本完成了，效果是好的。当前经济形势这么好，就是调整带来的。当然，还有一些事情要做。现在讲的调整，是进一步的调整，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的进一步调整。主要是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产品结构，还有技术结构，使之合理化。这是含有新内容的调整，比过去的调整更深入了。

现在企业的组织结构很不合理，什么“长线”、“短线”，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以劣挤优、以落后挤先进，等等，使整个社会经济效益很差，造成的浪费大极了。如果不进一步调整，经济联合、技术改造也困难。现在是调整进入了新的阶段。要进一步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就得实行关停并转。不仅工业、交通有这个问题，商业上也同样存在。比如三级批发机构，同在一个城市，地委有一套，市委也有一套，这决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实质上是封建割据性质的东西。这一点东欧有些国家也比我们好一些。最近听访问匈牙利的同志回来说，匈牙利把所有工厂的机修、热处理、锻压铸造车间等统统划出来，单独进行核算。这些车间单独核算后，不吃大锅饭了，他们与原来厂子的关系是合同关系。这样它才积极揽活，服务态度也才可能好。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合理的联合和改组。还有些社会服务机构，如食堂、幼儿园等，也应当首先让它独立起来，单独核算。四川攀钢服务公司，就是用这种办法，据说也搞得好。我们就是要定这么几条，组织实施。针对当前企业设置、企业组织很不合理的情况，今后三年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进一步搞好企业结构调整，应当关停的必须关停，应当并转的必须并转，逐步使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这样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才有可能出效益，出速度。

为了把企业调整工作做好，首先要搞好规划。规划，要从全局出发，按行业搞，按中心城市搞（包括工业基地），并使两者结合起来，以避免盲目性。企业的进一步调整，企业的关停并转，在一定意义上说，比前两年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农、轻、重比例，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难度大得多，因为它涉及各方面的利益。但这个“老大难”问题必须解决。今后几年能不能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这是一个重要环节。我们一定要在企业的整顿和进一步调整上做出成效，这一关非过不可。各级领导要提高认识，下决心抓好。

四、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问题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通病。外国人评论说，社会主义类型国家里，有一种“投资饥饿症”，争投资，铺摊子。这个弊病，是我们大批建设资金使用效益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后的经济建设要想搞好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得靠大家，靠各地、各部门的努力。第一位的问题，是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也就是控制基本建设的规模。最近陆续看了一些材

料，所有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派，包括波兰的、匈牙利的以及苏联的，他们主张不同程度增加市场调节的部分，增加企业活动的自主权等。此外还有一条，就是都主张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这一点是共同的。没有一个改革派主张把固定资产的投资放开的。而且认为，这种旧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病，在改革中如不加以注意的话，会发展得更严重。东欧有些国家在这方面就出了大问题。这几年，我们已看到固定资产投资失控的危险性。在今后改革中，固定资产的投资如果搞得太活，问题会更严重。对这个问题一定不能等闲视之，掉以轻心。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体制越是要改革，越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如果不加控制，超出国力的可能，我们整个经济工作、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矛盾都会发生。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势必拉长战线，延长工期，停工待料。过几年维持不下去，又得调整，一上一下，造成的浪费和损失不知有多大。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势必挤生产，挤生活，挤维修，整个社会搞得很紧张。这两年经济生活刚刚有些好转，市场商品开始丰富多彩了，如果又大上基本建设，“三材”和机电产品的供应又要紧张，随着能源更紧，刚刚出现的部分商品的买方市场就会没有了，又都不再讲质量、品种，不再讲服务态度了。市场供应紧张起来，社会经济生活绷得很紧，那么改革也不可能顺利进行。

多年的经验反复证明，国民经济失去平衡，不得不被迫进行调整，常常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而来的。在我们国家，大家都有盲目扩大生产能力的积极性，没有什么制约。不像外国，一说经济萧条，固定资产投资马上减少。我们国家不受什么制约，搞了几年不行就下马，反正可以向财政部报销。这样上马下马，国家就搞穷了。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经济效益差，浪费巨大，一个是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如“大跃进”、“超英赶美”、“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不切实际地提出高指标，追求高速度；另一个就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有不少搞法，局部看似乎有利，但对全局不利，结果局部利益也保不住。由于这两个原因，三十多年来，挫折—调整—好转—挫折—调整—好转，反复折腾。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的了。现在要真正接受教训，千万不能再那样搞了。切不可为局部利益障碍了自己的视线，影响全局。这一点，希望各地的同志回去向党委、向政府的负责同志汇报清楚。摊子铺得大，全局搞得很紧张，结果谁也上不去。即使一时上去了，没有原材料，没有能源，投不了产。这方面的苦头我们吃得够多了。这次我们无论如何要避免过三年再来一次折腾、又来一次调整的情况出现。今后我国的经济能不能振兴，我们的战略目标能不能实现，二十年有无希望，首先就看这三年我们怎么搞法。要是能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按十二大指出的路子去搞，情况就会一年比一年好。现在的形势刚刚好转，加上要力争实现翻两番，就很有可能又旧病复发，盲目扩大基建规模。那么，我们的调整很可能没完没了，下一个五年计划，也得是个调整计划。那可真正要发生“政治危机”呀！有人就会抓住把柄攻击说，这是共产党的本性决定的，你们的根本制度决定的，因为你们过去花了那么多学费还改正不了，还不觉悟嘛。现在虽然还没有出现这种严重情况，但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需要我们提到这样的高度来

认识。

二是掌握好资金使用方向。现在我们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七八百亿元，到底用在哪里？总的规模要控制，又要保重点建设，又要保技术改造，唯一的出路是要压中间这部分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一般性的扩大生产能力的项目。因为这部分一般性的加工工业，现在能力有余，企业又容易得利，积极性高。这就是说，“要保两头，舍中间”。一般性的扩大加工生产能力的建设项目，即使你那个地方是需要的，也不能搞。下决心少搞一些，不影响大局；搞多了，要影响大局。“中间”部分搞少了，容易补救；“两头”搞少了，造成的后果是难以补救的。所以，除了控制规模要有个办法外，对控制中间这一部分建设项目，也要搞一套办法，要卡紧，几年之内硬着头皮不让搞。不是说我们是官僚主义体制，层层批示、互相扯皮吗？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发展一下“官僚主义”，就是要层层报批，经过很多手续，最后使它搞不成。但真正属于技术改造项目，权力不能太集中，还得放活一些。放活以后，有可能发生名为技术改造、实为基本建设的现象。这也不怕，我们可以加强检查、监督。在最近几年，对中间那部分一般性扩大加工能力的项目，我们就是要抠紧一些。宁肯将来检查有抠得太紧的缺点，也不使将来说控制得不严。对技术改造项目，要放宽一点，搞活一点。监督之权交给各有关部门，交给银行。凡是乱来的，要通报，给以经济上的处分、罚款甚至没收投资。

三是加强基本建设的前期工作。许多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像可行性研究、勘探、设计等，都是做得马马虎虎的。常常是争到项目以后，才回头去做这些工作。结果一施工、一投产，各种问题都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浪费，而且往往多少年也改不过来。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要是资本家经营，就是上吊也不行。为什么事前不把地质、水文资料搞清楚，不把设计搞好呢？这是对人民不负责呀！当然，对有些单位来说，过去没有经验，今后决不能再这样干了。前期工作搞不好的，宁肯推迟建设。现在我们同世界银行打交道，它审查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比我们的要求严格得多，细致得多。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应当说我们的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今后一定要严格按照审批程序办事，不能再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上了马再不断追加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不当，是我们国家多年来造成浪费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固定资产投资花那么多的钱，但还是这么穷，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基本建设常常规模过大，投资使用不合理，前期工作差。这是效益不好的主要原因。其次才是微观方面的问题，如施工单位的管理不善等。作为建筑工程部门来说，不应该强调其它方面，应该从自己方面努力。作为国家来讲，首先是计划管理的问题。有人说，计委不该管的事管得很多，该管的事又没有管起来。这个说法虽不完全正确，但值得我们思考。作为各级计委，首先要把固定资产投资管好，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浪费。计划工作也要像科技攻关那样，抓那些影响经济效益大的东西，争取这方面对国家、对社会多做一些贡献。这件事主要应由计委来抓，要制订一些办法。当然也不能只靠计委，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大力支持；需要各

地、各有关部门大力协同，走出一条新路子。

五、关于改革问题

总的讲，现在不改革，就很难前进。现在许多工作，包括企业整顿、企业调整、技术改造、基本建设等，都涉及改革问题。在改革中间，碰到很多困难。有些事没有看准，需要继续探索。但是，有些看准了的，改革后肯定是好的，却很难前进；明明很合理，就是办不通，有点“步履维艰”。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牵制很大：一是价格等经济手段不合理，二是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不合理，需要加以解决。

改革，需要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包括价格、税收、信贷等。很多问题应当通过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特别是通过价格来调节，以促进社会经济活动的合理化。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由于现行价格很不合理，相反会促使企业经济活动向不合理的方向发展。看来价格体系不改革不行。对价格的改革，既要谨慎，又要逐步地进行。就是说，不要贸然行事，要考虑到政治上、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在总的保持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某些商品的价格应当有升有降。看准了的，一年解决它一两个关键问题，明年这方面就要有所突破。要实行优质优价、劣质劣价，有些商品应当有季节差价，使价格尽量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人民生活。除此以外，税收、利率等经济杠杆也应当很好利用。

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的不合理，也大大影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造成对企业、对经济工作管理不合理，严重妨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上面讲的价格体系改革的困难，也与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有关系，经济手段的运用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有联系的。我们现在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条块分割、城乡分割的体制，造成生产重复，流通堵塞，壁垒森严，互相牵制。这种体制不改变，经济体制就很难改革，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很难实现，整个社会的浪费也很难减少。

我们的生产和流通领域，都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生产上如何减少重复生产、重复建设，流通上如何搞活畅通，我们有一些想法，提出来和大家研究，有些还要先进行试点。

一个是要注意发挥行业的作用。讲发挥行业的作用，并不是主张按部门的原则管理。全国各地千行百业，各搞各的，就不得了。总得有个部门从全国的利益出发，把本行业的一些大的事情统管起来，如发展规划、技术政策、质量标准、技术改造等，统筹兼顾，进行协调。全国纺织系统在这方面就管得不错。还有一些全国性的公司和少数对全国有重大意义的企业，看来也需要由中央有关部门集中管。但有些权力要交给地方，如组织企业之间的协作之权，要交给所在的城市。

另一个是要注意发挥城市的作用。我们现行的体制，削弱了城市的作用：城乡分割，人为地切断了城乡的经济联系；一个城市里的企业，有中央直属的，有省、地、市属的，条块分割，切断了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形成很多不同的体

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有一些中等城市，地委一个体系，市委一个体系，各搞一套，各有各的工业，各有各的社办企业；在商业方面，各有各的批发站；造成的重复浪费，不知有多大。这种体制，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很不发展的条件下，在过去主要搞政治运动的情况下，加上照搬苏联的经济管理办法沿袭下来的。现在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社会化生产在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扩大，这种体制就显得很不适应了。在新形势下，要求我们改革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我们的方向，是要实行条块结合、城乡结合的体制，当前要适当扩大中心城市的权力，让它放开手脚，发展生产，搞活流通，发挥中心城市和工业基地作为经济枢纽的作用，从而带动广大农村和集镇经济的繁荣，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根据以上原则，怎么改呢？我们有以下一些想法，这还不是定论，提出来和大家一起酝酿、研究。

（一）适当缩小省级部门管理企业的职权，扩大中心城市管理企业的职权。可不可以考虑，下一步省属各厅局不直接管企业，或只管很少几个，把企业下放给城市去管。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为什么南京工业发展快？就是省不直接管工业。为什么有些地方工业发展慢，就是因为省管工业。这是很有道理的。比如广东省，省里的厅局不要直接管企业了。在广州的，就交广州市管；在佛山的，就交佛山市管。这一条如能实行，省级机关可以大大精简，机构可以搞小一点，精干一点，发挥综合部门的作用。省级厅局今后干什么呢？主要是负责行业的规划，制订技术政策，进行协调，组织检查监督，为企业服务等，抓一些大的问题。

（二）在经济比较发达、有条件的中等城市的地方，实行市地合一，市委既领导工业，又领导农业，既管城市，又管农村。这样农村工作能不能管好呢？从实践看，是可以管好的。六十年代，我们都怕大城市扩大郊区搞不好，结果松江专区交给上海市管，以后通县地委交给北京市管，都是搞得不错的。大城市可以管好农村，中等城市也是这样。辽宁的经验可以证明。辽宁省除了西北部的少数地区外，都是市管县，以中等城市为依托，把附近的县管起来。他们搞的时间长了，效果是好的，至少是城市工业、县办工业和社队工业成为一个体系了，对工业的调整、改组、改造，减少重复建设，发挥城市作用，支援农业都有好处。我问过辽宁省的同志，这样管会削弱农村工作吗？他们说，没有削弱，管得很好，县委也习惯了。搞现代化建设，城市领导农村，是一条规律。看来，在有中等城市的地区，与其城乡分割，各搞一套，不如城乡统一管理。浙江的温州、杭州已在这样做了。可不可以在江苏省试一试点，再取得一些经验。

（三）增设省辖市。有些城市已经成为本地区的经济中心，可以考虑改为省属市，郊区划大一点，把周围的县管起来。一个省，一个自治区，增加几个省属市也是便于管理的。看来把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交给地委管理，不是成功的经验。城市属地委管以后，地委往往从市里收权，市里发展不起来。陈丕显同志到湖北省后，就把一些地属市改为省属市，这几年工业有很大的发展。有条件的

地方，这样做好处多。

（四）把地区这一级改为省里的代表机关，搞成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地区委员会和相当地区委员会的组织，是党的省、自治区委员会在几个县、自治县、市范围内派出的代表机关。"宪法修改草案，也没有把地区作为实的一级。"文化大革命"前地区一级也是虚的，以后才搞成实的了。今后，凡是没有条件实行市地合一的地方，要逐步执行党章、执行宪法的规定，把地区一级变成代表机关，不要管那么实，权力予以缩小，机构大大精简。它的职能主要就是代表省、自治区督促检查，总结经验，考核选拔干部，协调地区内的一些矛盾。这样有许多事就一下从省会、从中心城市直接通到县了，可以减少许多机构、许多环节。市、县的主动性、积极性也能够更好地发挥。

以上几种形式，根据各省区的条件进行改革。沿海和内地、经济发达的地区和边远山区情况都不相同，在全国允许多种形式并存，不一刀切，强求一律，在实践中去发展、完善。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总体设计、总的蓝图还没有搞出来，但有些事已经看得比较清楚的，应该办的，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像前面讲的，调整企业呀，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呀，减少流通环节呀，改起来阻力很大，就是不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阻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所以我们这次进行行政机构改革，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将起很大促进作用。这是和全国战略重点转移一致的。至于步骤，可以搞得稳当一些，先行试点，逐步推开，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嘛。我今天之所以讲这些，吹吹风，就是想请各地的同志考虑考虑这个问题，积极稳步地把改革搞好。

在全国农业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

现在我们说农业生产责任制要稳定、完善和提高，或者说要总结、稳定和完善。讲稳定，农民很高兴，各级干部也希望稳定。在工作中我们也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但要认识到，农民对稳定的理解就是不要变，也就是农民欢迎的东西，你不要变。而实际上农业生产责任制却天天都在发展，在发展中变化。当前突出的是，在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越来越成为主要的形式。这种责任制的主要特点是，以农民家庭为承包单位，生产和经营上有自主权，分配上克服了平均主义。这些特点，已经渗透到各种生产责任制中去。看来，联产承包制这种形式还要发展，将从部分地区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地区。究竟什么样的地方不能实行这种办法，我看可能会有，但不会很多，甚至可以说很少。各个地区要有一点精神准备，不要再堵它，不要再筑墙了。上次我去甘肃河西走廊时，当地一些同志对我说，他们那个地方不能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是高产地区，有水利灌溉，小麦亩产五百斤，公共积累和公共财产比较多等。当然，中央历来讲要因地制宜，不能勉强。但是，我从河西到了宁夏河套地区，县委的同志说，他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了一年，前后情况大不一样，获得了大丰收。我到了一些生产队，访问农民，都拍手叫好。河套与河西相比，没有多大的差别，都是高产地区，而河套的水利灌溉还要好一些。不久前，我去辽宁省，有的同志也说，他们的西部、北部地区可以实行这种承包制，其他地区农民不要求实行。我建议他们不要说哪些地区一定不能实行。今年辽宁旱灾很严重，但是，凡搞了“双包”的，减产幅度都很小。实践证明，实行与不实行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大不一样。最近，辽宁省委开了会，不再提哪些地方不可以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了。

现在全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队实行“双包”责任制，有的地区比例还大些。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农业领域还在扩展和发展，而且势必向工业、商业、服务业和科技领域扩展，从乡村向城镇扩展。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农村调查回来的同志反映，承包制使社队工业的弱点、弊病减少了，生产力提高了，脱产人员也少了，并增强了竞争能力。有不少单位，原来亏损的很快变为盈利，而且涌现出一

批善于经营的人才。实际上对社队工业是一个改造。从前一段的实践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工业、商业中推行承包制，在农村完全可以放开一些，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因为它不像城市涉及的问题那么多，没有什么危险。

在实践过程中，双包责任制本身也得到丰富和发展，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完善，适应性更加普遍。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同，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多种经营开展情况不同，双包制在贫困队是一种搞法，在富裕队又是一种搞法；水田是一种包法，旱地是另一种包法；多种经营发达的地方是一种包法；多种经营少的又是一种包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百花齐放。当然，它的主要特点，即农民有了自己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和分配上克服了平均主义，不论在哪种形式中，都保留下来。过去，我们把双包责任制看成只是那些生产水平低下的贫困地区所适合的简单办法，经过两年实践，逐渐发展成为有统有分、“几统一”下的承包制。它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进了，成为当前农村中的主要责任制形式。以前我们讲农村实行的是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现在，还可以这样讲。但确切地说，主要实行的是多种形式的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

最近看了江苏宜兴县实行农业包干到户的材料。宜兴是苏南太湖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县，农业和多种经营比较发达，分工比较细。这里也是以工副业补农业，工副业占全县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集体分配人均达到一百七十八元。他们在农、副、工专业承包，统一经营的基础上，实行了包干到户分配。开始他们在农业上是联产到劳、分户生产、超产归己，包产以内按工分分配。后来感到按工分分配弊端较多，于是在今年根据群众意愿，改为按户包干分配，把各种上交的提留核算到户，以户为单位出售粮食和进行结算，多售多得，超额归己。实际上是把粮食和收入两部分都包到了户。机械、植保、灌溉等技术性强的农活，仍由专业组（队）统一进行。工副业利润的返还，也不再“洒杨柳水”，主要依照务农社员包产的产量和出售商品粮的多少，核定到户，包产多、出售商品粮多的就多得。工副业人员一般只包“人口田”，不包“劳力田”。其劳动报酬，采取年初确定承包任务，通过调节其包干上交任务和工资总额，达到与务农社员收入大体平衡。如果种的“人口田”包产指标作为自留粮还不够的，需集体补进多少也在年初定死。不论包农业，包工副业，都签订合同，分季兑现。他们采取的这种形式比较复杂一些，但到了农户计算还是比较简单，包定以后，社员都一清二楚。他们不仅在全县中等水平的队搞了，收到好效果；而且在富裕队也搞了，效果也好。目前全县分配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百分之七十二，种粮食和搞工副业社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今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十一亿七千万斤，增产二亿三千万斤，单产上升到一千一百五十多斤，总产和单产都创造了历史的最好水平。一至九月，工副业产值四亿多元，比去年同期上升约百分之九。宜兴县的事例说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受生产力水平高低、多种经营内容多少的限制，不同地区都可以采用，原则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具有不同的形式而已。所以，根据两年来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第一，不要再划定框框，硬性规

定哪些地方不能搞承包制；第二，要善于寻找不同情况下的承包制形式，予以总结推广。这样，就可以使农户、以小组为承包制单位的积极性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当然，可能经济越发达、工副业越多、分工越细的地方，这种形式就越复杂一些。承包制如同任何事物一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总之，农村生产责任制实际上是在不断发展中。这两年来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生产关系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但没有什么震动，成绩是很大的。主要是这种形式符合生产的需要和人民的要求，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此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领导上不要搞“一刀切”，不刮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允许大家在实践中去探索，发现和总结群众的经验，及时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发挥群众的创造性。今后我们还应当继续这样做。

二、关于专业化、社会化和经济联合问题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加上贯彻中央、国务院发展多种经营的指示，农业和工、副业全面发展，农村出现了发展商品生产的新形势。而且，这种趋势会日益发展。随着承包制的进一步推行，专业户、重点户的大量涌现，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迫切需要生产前和生产后的服务，如技术推广、供销、加工、储存、运输、提供信息等，要求组织专业化、社会化的联合形式。以小家庭为单位承包后，像上面说的那些事，有些自己经营起来是有困难或不合算的，需要从家庭承包中分离出来，联合经营，进行合作。这里所说的在分工分业、专业承包基础上的经济合作，不是再回到原来生产队、大队、公社的框框里的联合，而是围绕着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在供销、加工、储存、运输、植保、良种、机械耕作、水利灌溉等方面，进行专业化、社会化的联合。这种联合，现在已经有了一些雏形。比如，浙江金华地区成立各种专业公司，与农民建立合同制。广东中山县建立技术服务公司，还组织有专业的协会。四川的新都、内江等地建立技术承包责任制，或进行有偿的技术咨询服务。大竹县通过基层供销社，从事供销、加工、技术服务等工作。这些经验都是好的。

目前各种形式的新的联合，有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现出来。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从农民中间、从专业户中间发展起来的小型联合，如养鸡户中，有的专门从事孵小鸡，有的专门收鸡蛋运输、推销。为一定范围内的其他农户服务，互相建立经济联系。这些事可以由一个家庭来承担，也可以是几户、几个人联合的形式。这种形式的联合，范围比较小。另一种形式是，自上而下地由国营商业系统、供销社系统、农技部门等搭起架子，与农民建立联系，开展服务工作，在服务中发展。这种形式的联合，范围比前一种要大得多。各种专业公司、植保站、畜牧兽医站等，都可能演变成这种形式。从发展看，将来主要的可能是供销社，由供销社把这些服务工作承担起来。在国务院讨论商业问题时，我曾经讲过，供销社体制改革，一是要吸取五十年代供销社“三性”的特点，即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二是要适应农村商品生产发展

的要求，向农工商结合的方向发展。农村生产经营的基层细胞是家庭或小组的联产承包单位。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据商品生产发展的需要，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建立起不同层次的产供销、农工商结合的联合形式。将来供销合作社很可能变成综合服务的合作经济形式，成为开展、组织和推动供销、加工、储存、运输、技术等各方面服务的中心。当然也不排斥有其他的形式。例如有些地方以原来的社队企业为依托，形成服务中心。我们现在也不急于说一定要采取哪种形式，从实践中再看一看。我认为，提倡生产前和生产后的服务工作，支持和推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应摆到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把它作为发展农村大好形势的一件大事来抓。

还要看到，农村商品生产一发展，就需要解决相应的基础设施问题。农副产品要变成商品，要许多基础设施才行。现在好多宝贵的物资，堆在产地运不出来，只好烂掉。商品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已成为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个重大障碍。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的经济领导部门要制定规划，对重点支持什么、发展什么商品，要连同仓库、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一并考虑进去。这些事光靠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除了使农民保证农业自身的投资外，应该鼓励他们逐步把资金用在商品流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像修仓库、办加工厂、修公路等等。国家应当制定一些经济政策，包括民办的仓库、公路的收费办法，使农民有利可得，又能促进商品生产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发展。这方面，我们要开辟出一条路子，既要公办，也要民办。国家可以办，农民也可以集资办，这也是一种经济合作的形式。从以上讲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分工分业、专业承包的推行，组织经济联合，已经成为形势的需要和农民的要求。这种联合，不能再完全回到过去生产队、大队、公社的框框里去；也主要不是三五户承包户的临时互助。这种互助虽然灵活、多样，但它是松散的、不稳定的，不可能发展得很大，也解决不了经济合作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实行专业化、社会化，把农民家庭承包或小组承包的经济，通过各种形式，联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大经济的周围，包括同城市国营大工业、国营交通运输业、国营商业和国营农场、国家科研单位等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并通过合同制等办法。把它们的主要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这在性质上是经济的联合，不是行政力量的联合；是自愿互利的联合，不是强制吃大锅饭的联合；是计划指导下的联合，不是离开国家计划轨道的联合。这就是列宁所主张的，通过合作制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思想。这种联合，是建筑在社会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筑在小农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通过这种经济上的合作、联合，加强了对农民的计划指导，加强了承包户经济同整个国家大经济的联系。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也表现在这里。可以说，在分工分业、专业承包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前、生产后各种服务工作的经济联合，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现在，许多农村工作干部都在等待如何解决经济联合的问题，需要把这个问题明确一下，这对今后农村工作是有好处的。

三、发展粮食和经济作物问题

这是农村中的一个大的问题，总的方针还是中央13号文件中的两句话："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一说搞粮食就忽视多种经营，一说搞多种经营又对粮食放松。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处理好的。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就是中国农业在多种经营上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当然按人口平均，中国的农业资源也不是很多的，如果讲耕地就更少了。但我们确实有很多资源没有充分利用，而且过去利用面也比较窄。一讲利用资源就是种粮食，不管条件如何，没有水就修水利，土地不平就改平，一切为种粮食创造条件。结果费力大，效果差。现在我们认识到了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农业资源的重要性。适合种粮食的地方，必须种粮食。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也不硬去种，而去种其他适合的作物。如盐碱地种棉花，沙地种花生，就很合算。一九七九年我去欧洲的法国、希腊等地看了看。在地中海北岸，包括法国南部，夏季干旱，很少下雨，如果种粮食，水利的投资大、费用高，水资源也不足，但他们大力发展果树，结果成为很富裕的地区。希腊的荒山秃岭也很多，种粮食是不毛之地，但他们种油橄榄，收入也很高。中国有很多山地，荒山荒坡，还有许多地方水面多，潜力是很大的。如果政策对头，把利用这些资源的路子打开，我看前景是十分可观的。

这里有个界限问题，不要一说多种经营，就把那些适合种粮食的地方改种经济作物。由于价格的关系，农民种经济作物的收入可能多一点，把宜粮地改种经济作物，这不能叫因地制宜，也不是经济、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适合种粮食的地方改种别的作物，创造的价值实际并不增多，因目前价格上不合理而造成的多收入一点，只是一种假象。从全局来看，是不利的。这是我们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上下应该统一认识。当然，发展多种经营，食品原料来源会多，食物构成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在我国也是有潜力的。但是，认为中国在食物构成上可以走西欧的道路，或者走新西兰、澳大利亚的道路，把大量的土地都拿去种草养牛，靠喝牛奶、吃牛肉，那就是奇谈怪论。中国食物构成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道理很简单，植物蛋白转化为动物蛋白，质提高了，量却减少了。如果由主要吃粮食改为吃肉，中国的耕地面积还要扩大很多才行，或者人口要减少。所以，粮食终究是第一位的大问题。从宏观讲，从长远看，决不能掉以轻心，盲目乐观。中国的耕地少，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因此，不管有多少矛盾，适合种粮食的耕地，决不能改种别的。这应当成为我们长期的国策，必须下决心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在有条件开发的地方，还要逐步开发一些出来种粮食。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能片面地只从农民增加收入、只从农民的眼前利益来考虑问题，应当从全局、从长远出发，做好农民的思想教育工作。事实上有些粮食产区改种经济作物也并不合算。像江西扩大种棉花，产量很低，要几十斤粮食才换一斤棉花。四川种棉花，产量也很低。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发展甘蔗也是不经济的。连广东北部都不种甘蔗，湘南、赣南种上能高产吗？不如种粮食经济合理。

棉花、糖料要逐步在北方、在新疆等地发展。这样，才真正是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我们现在进行作物布局的调整，有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把那些适合种粮食的土地坚决保住，提高单产，增加总产，然后才有可能把那些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有计划地改种别的作物，或者退耕还林、退耕还牧。为了使粮食主产区种好粮食，要研究一些经济政策。一是要考虑有计划地、逐步地适当降低粮食主产区的征购基数，超产部分实行加价、议价收购；二是按牌价出售给国家粮食的，根据合同也按牌价保证供应生产资料，如化肥、柴油等。如果卖议价，那么供应的生产资料也按议价，低来低去，高来高去。总的一条原则是，要保证商品粮主产区的农民收入同种经济作物大体相当，不让他们吃亏。具体办法，要进一步研究。

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统一认识，对干部和农民群众进行教育，同时要采取一些经济措施。

四、农业区划问题

我们很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把我国的农业区域规划搞好，从总体上研究各个地区的特点、作物配置的最佳方案和所应采取的经济、技术措施，真正做到地尽其利，趋利避害，发挥优势。过去，我们农业上在很多大的方面缺乏研究。就拿北方来说，以前是一个模式，都是种粮食。为了种粮食，土不平就改土，天旱就修水利，很少考虑水资源够不够用这个前提。看来北方相当多的地方，水资源不足，无法搞灌溉农业。据农业科学院分析，年降水量在四百毫米以上、分布又比较均匀的地方，可以不搞灌溉农业，只要从耕作制度、作物品种、栽培技术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抗旱措施，也能够夺得稳产高产。在北方水资源缺乏的地区，想像南方那样都靠修水库灌溉，是不可能办到的，要十分重视把现有的水资源利用好。在东北地区，年降水量六七百毫米，一年种一茬作物，照说水是够的，要研究为什么一季作物还经常闹旱。华北地区年降水量在四百毫米以上的地方，也要研究通过合理的耕作制度、选育耐旱高产良种、做好水土保持等工作，解决抗旱问题，注意保墒。山西壶关县晋庄大队，针对当地的情况，秋冬蓄水，深翻，下土杂肥，第二年春天不翻耕，点种上谷子，年年亩产五百斤以上，叫做春旱秋抗，这是成功的经验。西北地区农民也有这个经验。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农田水利建设应当继续投入力量搞。但在水资源严重不足的地方，就要注意保持水土、平地保墒，坡地上有条件地搞些水平梯田，不要不讲投入、不计成本、不顾后果，硬去普遍搞水浇地。我们要向农业科技部门提出保墒抗旱、稳产高产的新课题，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研究出切实有效的措施。

农业今后要进一步发展，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应当更加重视对自然规律的研究，把农业的各种措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要把思路打开，不要只走一条路，否则就会越走越窄。我在四川的那几年，遇到干旱，当时我们就提出水路不通走旱路，结果农业连续增产。现在也应当这样，针

对北方的干旱地区，针对南方的易涝地区，我们要研究不同对策，采取综合治理的科学技术措施，把农业生产搞得更好。

五、农村大好形势下需要注意的问题

农村形势很好，但我们头脑要清醒，尤其要注意那些带有破坏性的问题。我主要是指滥占耕地和乱伐森林两个突出的问题，如不注意，后患无穷。

三中全会以后，农民逐渐富裕起来，适当改善居住条件，盖些新房，这本来是好事，报纸上宣传一下也是必要的。但要冷静地分析一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究竟提倡住得很宽，还是提倡住窄一点，把房子布置得紧凑、适用、清洁一点。我看只能提倡后者。中国人多地少，就决定了不能住得怎么宽敞，城市、农村都应这样。今年六月我去日本，看见日本的房子不少也是鸡窝式的，住得很窄。他们有几个观点深入人心，叫做人口众多，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因此住宅建设注意节约用地。我国过去老是讲地大物博，可是很大一片是高山地区，三四千公尺以上能够都住人吗？我国还有个盖大房子的传统，又高又大又不适用。现在不少城市都盖了不少新村，标准也偏高了，负担不起。搞这样的样板，其他的怎么办？唐山市建筑的住宅也存在这个问题。国家投资都花得差不多了，还有相当多的住户搬不进新房，仍住防震棚。这几年多盖一些房子是应该的，因为多年来没有盖了。这三年住宅建筑面积，农村每年六七亿平方米，城市六七千万平方米，木材和其它建筑材料都很紧张，森林砍了许多，耕地占用不少。今后住宅要继续建，但这个规模难以为继了，需要适当缩小一些，要瞻前顾后，长期打算。前些时候，泰国华侨回到广东潮州，看到那里到处大盖“四点金”（四合院）、“下山虎”（三面是房子），感到非常惊讶。潮州地区人均只有三四分地，这样滥占耕地盖大院，将来都去当“空军”喝风吗？所以，从长远利益着想，不论城镇和乡村，滥占耕地建房的现象必须坚决制止。各级领导要当成一件大事来抓。

现在森林的破坏十分严重，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的第三次大破坏。有些地方乱砍滥伐的现象至今没有制止下来，有的还在蔓延。要是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过几年森林就要砍光。木材这种商品，是几十年才能形成的，稍一放松，几天砍光了，几十年都恢复不过来。我们不能以任何理由说乱砍森林是合理的。对木材这种商品就是要管严、管好。国外对森林的管理严格得很，我们太软了不行。不能搞无政府主义，听之任之。严重破坏森林的案件，要彻底追查，严肃处理。

上次我讲过，现在农村如果出问题，很可能不是出在所有制问题上，而是出在自然环境、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上。这种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如果不严加制止，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这一套政策所带来的效益就会有不少被抵消掉。

我讲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的指导思想。现在形势一天天明显好转，很多事情要想远一些。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解决好改善生活与进行建设的关系问题，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前几年改善生活的步子迈大一点，是很有必要的。今后步子不能再迈得太大了。生活的改善，要靠生产的发

展，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了实现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我们必须提倡勤俭建国，艰苦奋斗。

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作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请大会审议。

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

一九八○年，也就是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国务院曾拟订出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基本轮廓和主要指标。当时，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整个国家正在紧张地进行拨乱反正，国民经济正在进一步调整，许多问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行深入研究，必要的资料也由于十年动乱的破坏而很不完全，因此还缺乏编制出一个比较完备的五年计划的客观条件。这两年来，国务院在抓紧经济调整的同时，对经济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十条方针，经大会审议通过。在这之后，国务院又组织各有关方面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多次的研究和讨论。现在，我国国民经济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第六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已经编制完毕。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要求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内力争实现我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要求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七年的五年间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也就是说要求全国各行业、各企业普遍显著提高经济效益，在保证经济文化建设费用逐步增加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条件下，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按照这样的部署，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在这个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计划为三千六百亿元，将兴建一批具有现代水平的

新工程，并在部分重点企业中实行重大的技术改造。用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经费计划为九百六十七亿元，比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五百七十七亿元增加百分之六十八。城乡居民按人口平均的消费水平计划提高百分之二十二，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一。这个期间，将保持国家财政、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是在调整中稳步发展的计划，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计划，是使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同整个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前途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有极为重要的关系。

第六个五年计划草案已经分送给各位代表。这里，就计划的要点和一些有关问题作以下说明。

一、关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

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使工农业生产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是我们制订计划的一项重要原则。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一九八五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千七百一十亿元，比一九八○年的七千一百五十九亿元增加一千五百五十一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由二千一百八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六百六十亿元，工业总产值由四千九百七十二亿元增加到六千零五十亿元，都是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在执行中争取达到百分之五。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产值计划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五，重工业产值计划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到一九八五年，全国粮食产量计划达到三亿六千万吨，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三；棉花三百六十万吨，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纱三百五十九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食糖四百三十万吨，增长百分之六十七点三；原煤七亿吨，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九；发电量三千六百二十亿度，增长百分之二十点四；钢三千九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五点一。实现了这个计划，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将进一步趋于协调。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年的二十八年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的速度是百分之三点四，“六五”计划期间要求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到五，这是不低的，是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六五”计划规定的工业增长速度比过去二十八年的平均速度要低，这是因为工业调整的任务还很艰巨复杂，在近期内能源产量不可能有较大的增加，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过去二十八年的工业发展速度虽然不低，但是效益很差；而“六五”计划要求的发展速度虽然低一些，却是以较高的经济效益为前提的。“六五”计划要求，产品质量要不断改善，花色品种要适应社会需要，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要有较多的降低，这些方面的要求都比过去高得多。着重于提高经济效益，这是“六五”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从我们的历史经验来看，计划指标经过综合平衡，订得稳妥一些，留有余地，对于保护和发挥劳动人民和生产单位的积极性，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都有好处。一九八一和一九八二两年计划执行的结果，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都超过了“六五”计划规定的年平均递增速度，全国上下都高兴。我们所以没有把后三年计划要求的发展指标调高，也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经过第六个五年

计划的努力，各方面的关系理顺了，整顿工作做好了，又完成了为第七个五年计划准备的一批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实现了一批重大的技术改造和科技攻关，第七个五年的发展速度必将高于第六个五年。只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特别是在人才培养、重点建设和实现社会生产的技术进步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第八个五年和第九个五年的发展速度肯定还会再高一些，从而使全国进入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样，我们就能够按照党的十二大所确定的二十年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到本世纪末争取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

二、关于基本建设的规模、重点和企业的技术改造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计划安排二千三百亿元，大体保持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水平。五年内施工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共八百九十个，比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少得多。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吸取了过去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投资效果不好的教训。“六五”计划基本建设投资的重点是能源、交通建设，这方面的投资占总投资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五，比过去有所提高。同时，适当安排了农业、轻纺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城市公用设施、商业、外贸等方面的建设。五年内施工的大中型建设项目，计划在一九八五年底以前全部建成的四百个，其余将转入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建设。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用于现有企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的资金为一千三百亿元。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年的二十八年中，这方面的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六五”计划把这个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将使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得到提高，并有利于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下面，着重讲一下能源、交通、农业的建设计划和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重点。

煤炭工业建设，五年投资一百七十九亿元，重点用于开发山西煤田以及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煤田，同时开发豫西煤田，山东、安徽、江苏煤田和贵州煤田。五年内新建一百万吨以上的大型矿井二十八个，加上中小型矿井的建设，全国煤矿建设总规模将达二亿二千万吨。计划在一九八五年底前建成投产八千万吨，结转到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建设的有一亿四千万吨。为了加快煤炭工业的发展，我们的方针是抓两头：一是集中力量开发大露天矿，首先把资源条件好的霍林河、伊敏河、平朔、元宝山、准格尔等五大露天矿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建设起来；一是抓紧现有矿井的技术改造和中小矿井的建设，挖掘潜力。这样投资省，出煤多，见效快，既可以使近几年和十年内煤炭产量有显著增长，又可以为下一个十年煤炭工业的更大发展打下基础。

石油工业建设，五年投资一百五十四亿元，重点勘探东北松辽盆地、渤海湾、河南濮阳地区和内蒙古二连盆地，并适当加强新疆准噶尔、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普查勘探，继续加强东部老油、气区的地质普查勘探，争取探明一批新油田，

同时积极开展海上石油的勘探和开发。五年内，新增原油开采能力三千五百万吨，天然气开采能力二十五亿立方米。这样，我们就可以补充原有油井产量由于每年采收形成的自然递减，使五年内石油年产量稳定在一亿吨的水平上。

电力工业建设，五年投资二百零七亿元，重点是继续开发黄河上游、长江中上游和红水河流域的水力资源，建设一批大型水电站，同时在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内蒙古东部、两淮、豫西、渭北、贵州等地以及用电量大的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地区，建设一批坑口电站和火电厂。五年内新建和续建装机容量四十万千瓦以上的水电站十五个，二十万千瓦以上的火电站四十五个，三十万千瓦的核电站一个，加上小型电站的建设，全国电站建设总规模为三千六百六十万千瓦。计划在一九八五年底前建成投产一千二百九十万千瓦，结转到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续建的有二千三百七十万千瓦。这个安排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要，在计划执行中将根据条件的可能，努力加快电站建设，同时大力节约用电。

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建设，五年投资二百九十八亿元，主要用于铁路和港口建设。五年内全国新建铁路铺轨二千公里，建成复线一千七百公里，建成电气化铁路二千五百公里。到一九八五年，山西以及内蒙古西部、宁夏煤炭的外运能力将由一九八○年的七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二千万吨，通往东北的运煤能力将由一九八○年的一千四百万吨增加到二千九百万吨。在大连、秦皇岛、天津、青岛、石臼所、连云港、上海、黄埔、湛江等十五个港口建设一百三十二个深水泊位，到一九八五年全国沿海港口吞吐能力将由一九八○年的二亿一千七百万吨增加到三亿一千七百万吨。继续建设长江等内河航运工程。加强公路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条件。同时，大力加强邮电通信建设。这些建设任务完成以后，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紧张的状况将有所缓和。

在农业建设方面，重点是加强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的防洪能力；建成河北潘家口水库、大黑汀水库和天津引滦输水工程，缓和京津地区工农业用水的矛盾，继续建设黑龙江三江平原、江西鄱阳湖地区、湖南洞庭湖地区、安徽得史杭灌区等商品粮基地。逐步建立和健全优良种子的繁育推广体系。继续建设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防护林体系，以治理黄河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和西北地区的风沙化。继续开展全民植树运动，绿化祖国。禁止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牧区开荒。扩大人工草场面积，计划由一九八○年的三千二百万亩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一亿亩。建设一批畜禽良种场、饲养场和饲料加工厂。五年内扩大淡水养殖面积一千六百万亩，海水养殖面积五十万亩。这些，对于改进农牧渔业生产的条件，将会起积极的作用。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并且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矿产资源和地质资料，“六五”计划期间要积极加强地质勘探工作，加快找矿和资源评价的进度，同时做好水文、工程和环境地质工作。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重点，是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改进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增加社会急需而又短缺的某些产品的生产能

力。五年中，要对鞍山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哈尔滨、上海动力设备制造基地的所属工厂，大同、开滦、抚顺等大型煤矿，天津、湖北、辽宁、四川、山东的大型碱厂等相当一批重点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逐步改变这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的技术面貌。机械工业是为各个方面提供技术装备的部门，技术改造必须先行一步。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对生产量大、使用面广的机电产品，特别是耗能多的汽车、拖拉机、内燃机、工业锅炉、水系、风机、中小型电动机等进行技术改造，促使它们更新换代。要研制一批精密高效机床、仪器仪表等关键设备，抓紧一大批工具、元器件、基础件的升级换代。发展一批农牧渔业和轻纺工业需要的技术水平较高的设备，努力提高发电、轧钢、采掘、洗煤、运输、海上石油勘探和石油化工等方面的大型成套设备的制造技术。实现了这些要求，国民经济的生产技术面貌将会发生可喜的变化。

三、关于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不断提高全体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和科技文化水平，既是保证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又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第六个五年计划安排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百分之十五点九，其中一九八五年将达到百分之十六点八，比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百分之十一有了较大的提高。应该承认，这方面的经费还是比较少的，但是限于财力，目前只能做到这一步。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方面的经费还要逐步增加。

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到一九八五年全日制高等学校招生数将从一九八○年的二十八万人增加到四十万人，增长百分之四十二点二；在校学生达到一百三十万人，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六。五年内大学毕业生共一百五十万人。在这同时，广播、电视、函授、夜大学等高等教育也将有较大的发展。一九八五年招收研究生二万人，比一九八○年增长四点五倍，五年内毕业研究生四万五千人。为了提高高等学校的教学水平，国家确定用专款为一批重点高等院校建设比较先进的教学实验设施，新建和扩建一批实验中心。要调整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改进教学方法。过去专业划分过细，学生知识面狭窄，不能适应各项建设工作和继续深造的需要，对于毕业后的就业和转移工作领域也往往造成困难，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要认真加强对大学生、研究生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加强经常的有针对性的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真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劳动者。继续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各门各类的中等职业学校，特别是农林牧副渔、医护、财贸、政法、文教等方面的职业学校。普通中学也要适当增设职业技术教育课程。要创造必要的条件，把部分农村普通高中改为农业职业中学。要注意发展学龄前教育，加强师范教育。到一九八五年，争取全国大部分县普及或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城市普及初中教育。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努力全面地提高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逐步改善

教学条件。普及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这是全国教育战线的一项十分繁重、艰巨、迫切的任务，全国人民都要动员起来给以大力支持。凡是教育事业发展得好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地、市、县和基层组织，凡是积极为教育事业作了贡献的教师、教育行政人员和其他人员，都要加以表扬；对教育工作不热心的干部，要给以批评；对挪用教育经费、妨碍教师工作甚至侮辱伤害教师的人员，要严加处分。要在全社会造成普遍重视教育工作的风气，使人人都认识这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根本基础。

在科学技术方面，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在全国推广农业、轻纺工业、能源、电子、机械、原材料工业，化工和制药、运输和邮电等方面确有成效的四十项重大科技成果。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生产建设中带关键性的三十八个科技项目的一百个课题进行攻关，争取其中相当一批项目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取得成果，并推广应用。在着重发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同时，加强基础研究，使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可靠的指导力量和后备力量。不论是应用研究或基础研究，都应该按照学科特点尽可能地面向经济建设，为生产的发展服务。要把科学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提高到同科学研究本身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的成绩应该同样受到表扬和奖励，克服轻视推广应用的倾向。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省、市、自治区公用的情报中心、分析测试中心、计量中心、计算中心、应用数学咨询服务中心，为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

在大力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重视发展社会科学，加强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管理学、哲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民族学、文艺学、语言学、国际关系等的研究。要努力阐明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用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要填补空白学科，加强薄弱学科，改善研究工作的条件。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文学艺术、电影、电视、广播、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项文化事业和卫生、体育事业都将有相应的发展。电影故事片的摄制，必须在努力提高质量的前提下增加数量，计划由一九八○年的八十二部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一百二十部。积极发展科学教育影片和纪录像片。广播电视要提高节目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加强节目的制作和传送手段，提高技术质量和人口覆盖率。全国各种报刊、杂志、书籍的出版总量，一九八五年达到四百五十六亿印张，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积极提高造纸、印刷、出版的技术和质量，努力改变目前的落后状况。基本上做到市市有博物馆，县县有图书馆和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切实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文化设施。我们的各种精神产品，虽然大多数也是以商品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各级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充分认识到，发展这些产品的生产首先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因此，必须注意它们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注意它们在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方面的作用，而不能单纯追求利润。各项文化艺术事业和学术研究，都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继续肃清十年内乱所遗留的错误影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堕落腐朽的文化。要继续深入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降低各种疾病的发病率，迅速消灭一些还没有最后消灭的烈性传染病。加强海关检疫，以防一些已被消灭的传染病又由国外传人。在卫生工作中，要继续坚持城乡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五年内增加卫生专业人员六十万人，新增医院病床二十五万张。大力提高节制生育的技术水平，保证控制人口计划的顺利实现。积极发展城乡体育运动，普遍增强人民体质，努力提高体育运动的技术水平。

四、关于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要继续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按照统一计划、统一政策、联合对外的原则，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计划规定，到一九八五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将达到八百五十五亿元，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点八，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八点七。其中，出口总额将达到四百零二亿元，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八点一，高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进口总额将达到四百五十三亿元，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九点二，略高于出口的增长速度，这对加快国内的生产建设是有利的。积极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努力增加出口，是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基础。要积极扩大轻纺产品、工艺品和各种土特产品的出口，特别是提高机电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有计划地组织石油、煤炭和某些资源丰富的稀有金属等产品的出口，对某些消耗能源太多的产品要限制出口。一切出口商品，必须努力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提高竞争能力。这对于促进我国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都会起积极作用。根据国内建设的需要，改进进口结构，适当提高新技术和关键设备在整个进口中的比重。继续积极有效地利用国外贷款，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或同外商合资经营，把对国外资金的利用扩大到适当规模。要特别注意发挥沿海城市在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中的作用。除广东、福建继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外，要给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引进和消化技术、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和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毫无疑问，我们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而绝对不能削弱和损害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

五、关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控制人口的增长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继续提高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五年内，通过发展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将在城镇吸收二千九百万人经过一定训练后就业。全国平均每个农民的纯收入将由一九八○年的一百九十一元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二百五十五元，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六，这个速度高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八

○年二十六年中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三的水平。全国职工的工资总额一九八○年为七百七十三亿元，一九八五年将达到九百八十三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四十二亿元，增长百分之四点九。一九八一年已经提高了教育、卫生、体育战线部分职工的工资，一九八二年和以后的三年将陆续提高其余职工的工资，并积极着手工资制度的改革。中年知识分子多数工资过低，负担又重，他们的工资应该有较多的增加。这样做，相信全国广大工人和干部是会理解的。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人民收入的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将有较大的提高。到一九八五年，城乡居民按人口平均的消费水平，将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一，高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年二十八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点六的水平。其中，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点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二。社会商品零售额一九八五年将达到二千九百亿元，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七。

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将继续得到改善。五年内预计农民新建住宅二十五亿平方米，在农村新建公共福利设施三亿平方米。全国城镇全民所有制单位五年合计建成住宅三亿一千万平方米，平均每年六千二百万平方米，等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年二十八年中平均每年建成住宅面积的二点六倍。与此同时，还将加强城市公用设施的建设，坚决制止环境污染的加剧，并使重点地区的环境有所改善。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根据今年七月一日的普查，我国人口已经超过十亿。今后人口的年自然增长率，必须控制在千分之十三以下。一九八五年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必须控制在十亿六千万左右。这两年，人口净增率有所回升，今后若干年将有更多的男女青年进入婚育期，正值人口增殖高峰，实现人口控制的目标将是一项极端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普遍提倡晚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否则就将影响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进行有说服力的教育，大力破除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封建习俗，着重保护女婴和生女婴的母亲。只生一个女孩并且把她抚养好、教育好，比只生一个男孩更应该受到表扬、支持和奖励。全社会对于溺害女婴和虐待女婴母亲的犯罪行为都要坚决予以谴责，司法机关要坚决给予法律制裁。

六、关于财政、信贷的基本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保障人民收入正常增加和保障企业应有自主权的情况下，要通过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开辟财源，使国家财政收入由下降转为上升。要合理安排和控制各项财政开支，加强财政监督，坚决反对浪费，以便把财政赤字压缩到最低限度，同时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确保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基本平衡。

计划规定，五年合计国家财政收入为五千九百五十三亿元，其中一九八五年为一千二百七十四亿元，比一九八○年增加一百八十九亿元。五年合计财政支出为六千零九十八亿元，其中一九八五年为一千三百零四亿元，比一九八○年增加九十二亿元。财政支出的安排首先是保证重点建设，逐步增加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开支，同时保证军政费用必不可少的需要，按期偿还国外借款的本息，适当照顾其它方面的开支。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是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五年内，除了国家每年增加对这些地区的财政补贴以外，国家财政还将拨出二十五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这些地区的建设，比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二十二亿元。这五年计划安排平均每年有财政赤字三十亿元左右。一九八一年实际执行结果为二十五亿元。今后在年度计划的执行中，也要努力增加收入，严格控制支出，力争财政赤字少于三十亿元。

市场物价是关系千家万户的大事。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以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今年以来各地认真执行国务院《关于坚决稳定市场物价的通知》，总的来看情况是好的。国营牌价没有大的变动，有些品种的价格还略有下降，今年一到九月市场零售物价总水平同去年末持平。今后几年中对少数极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要作有升有降的必要调整，以利于生产的发展，但这种调整也必须在保持市场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行。

各位代表！第六个五年计划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的计划，它既包括建设物质文明，也包括建设精神文明。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除了上面已经讲到的发展各项文化事业以外，还有许多重要内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在党的十二大已经提出了一个总的纲领，今后需要逐步加以落实。这里只着重讲一讲发展职工教育和改变社会风气这两点。

大力提高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现代科学文化、生产技能的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战略任务。今后我们要着重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各级各类干部和工人的正规学院和正规学校，同时也要举办一些期限较短、课目较少的训练班，使职工教育比较快地走上正规化。除了国家现有的学校要承担职工培训任务以外，各行业和有条件的企业也应该举办学校和训练班。我们还希望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都来重视这项工作。正规地进行职工教育，应该有严格的入学标准和考核制度，有一定水平的切合实际需要的教材，有胜任教学工作的合格教师，能够对学员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各种专业知识的教育，能够使学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在学习以后确实有明显的提高。除了系统教育以外，还要根据广大职工中实际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结合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各个时期的任务，对职工进行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寻求和创造新的方式方法，力求使思想教育工作生动活泼，有战斗力、说服力和吸引力。要大力普及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的教育，普及共产主义思想、信念、道德的教育，普及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革命纪律的教育，普及职业道德的教育，普及法制教育，普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普及高尚的审美观念和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教育，使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立志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得到发扬，使民族自尊心和荣誉感得到提高，使越来越多的职工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

积极造就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在今后五年内争取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为此，要努力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改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不断改进人们的劳动态度、工作态度和服务态度，反对各种极端不负责任、“一切向钱看”、闹本位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营私舞弊、利用职权“开后门”等等不正之风。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同时，必须全力反对和制止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那种连人格、良心、荣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商品化的可耻弊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在党内要按新党章所规定的各项标准进行整党以外，在社会上也要普遍采取守则、公约、文明村、文明街、宣传网等各种形式，扶持正气，祛除邪气，对危害社会的不良风气进行综合治理。我们有党的正确的坚强领导，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国家机器和进步的社会舆论，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并且能够在全社会形成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强大力量，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友好合作的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经过努力，争取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扭转社会风气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人民专心致志地心情愉快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各位代表！在提请这次大会审议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同时，国务院也提出了一九八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草案，请一并审议。

第六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各项生产建设任务是积极的，也是比较稳妥可靠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在计划编制过程中曾经进行了认真的综合平衡，但有些地方仍然可能考虑得不周到，在执行中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妥善处理。全国上下，一定要团结一致，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努力解决好各种实际问题，保证在执行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计划中取得全面的胜利。

“六五”计划前两年的执行情况

第六个五年计划已经执行了近两年，这里把前两年执行的情况向各位代表作如下的报告。

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正式提请这次大会审议之前，国务院根据“六五”计划的初步设想，曾分别制订了一九八一和一九八二两个年度计划，并经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这两个年度计划，执行情况都是良好的。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一九八一年计划为百分之三点七，实际达到百分之四点六；一九八二年计划为百分之四，预计可以达到百分之六点四。两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五点五。整个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变化。

农业生产持续地全面高涨，农村欣欣向荣，这是全国经济形势以至政治形势日益好转的重要基础。农业总产值一九八一年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七，一九八二年预计比一九八一年增长百分之五，两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五点三。尽管不少地方连年出现了严重的水旱灾害，粮食仍然连年增产，一九八二年预计达到三亿三千五百多万吨，比去年增产一千多万吨，超过了大丰收的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预计同一九八○年比较，棉花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九，油料增长百分之三十九，糖料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点二，茶叶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猪牛羊肉总产量增长百分之六点八。其它多种经营的发展也比较快。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特别可喜的是，许多农业生产比较落后的地区，在一两年或两三年内迅速地大面积地改变了面貌，这是建国以来很少有的。这就最有力地说明，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八亿农民对党和政府更加信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前途充满了信心。

工业消费品生产迅速发展，市场商品供应日益充裕，消费品匮乏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这是我国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从未有过的新情况。轻工业总产值，一九八一年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一，一九八二年预计比一九八一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一，两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九点六。一九八二年预计同一九八○年比较，纱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三，呢绒增长百分之十二，毛线增长百分之四十二，食糖增长百分之三十三，自行车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缝纫机增长百分之六十一点七，电视机增长一倍，洗衣机增长九点九倍。许多消费品的质量有了提高，花色品种增多。商业部门在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增加商业网点，改进服务态度方面，作出了新的成绩。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一九八一年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八，一九八二年预计比一九八一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九，两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九点四。这两年在人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吃、穿、用各类商品大多数供应比较充裕，人民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市场供应情况能够取得如此迅速的改善，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重工业在调整中抓紧能源的增产和节约，改进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生产由下降逐渐转为上升。重工业总产值一九八一年比一九八○年下降百分之四点七，一九八二年预计比一九八一年增长百分之九，两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九。重工业改变了过去为自身服务过多的状况，为农业、轻工业提供原材料和装备的部分，为技术改造服务的部分，比重都有所提高。许多重工业企业还直接为市场生产了一批耐用消费品。燃料、动力和一些重要原材料的产量，从前两年的停滞甚至下降转向逐步回升。一九八一年比一九八○年，原煤增长百分之零点二，原油下降百分之四点五，电力增长百分之二点九，钢材下降百分之一点七，水泥增长百分之三点八。一九八二年预计比一九八一年，原煤增长百分之四点六，原油增长百分之零点五，电力增长百分之五点一，钢材增长百分之一点九，水泥增长百分之八点六。经过调整后重工业生产重新回升，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部门，积极为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服务，也做出了新的贡献。

财政收入连年下降的趋势开始扭转，这是经济调整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综合反映。从一九七九年起，由于调整经济和解决长期以来特别是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国家财政收入连续三年下降。一九八一年国内财政收入比一九七八年减少一百多亿元，减少近百分之十。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不断好转和采取了许多增收节支的措施，这种下降局面今年可以结束，预计从明年起国家的财政收入将转向回升。在这同时，我国外汇收支连续两年出现顺差，为今后进一步扩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全国高等学校由一九八○年的六百七十五所增加到一九八二年的七百二十九所，招生数由二十八万人增加到三十一万人。高等院校专业设置的调整和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工作有所加强。这两年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六千多项，研制成功的新材料有上千种，在经济建设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最近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艺、卫生等事业都在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体育战线连续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新成就。

以上情况表明，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已经基本上趋于协调。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现在的调整工作，就是要在统筹安排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农业、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使国民经济在稳定发展中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我国经济这种不断向前发展的好形势，同当前世界经济萧条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近年来许多国家的经济先后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困境，生产停滞或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债务沉重，通货膨胀。有的国家的失业率和物价上涨指数，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峰。不少国家这种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已经到了难以承受以至影响国内政局的地步。面对这种状况，许多国家苦于找不到出路。在世界经济如此不景气的时候，我国国民经济却在克服种种困难中胜利前进，这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

这几年我国经济形势既然越来越好，为什么国家财政还有一些赤字？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作一些历史的分析。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中，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我们国家在生产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经济结构很不合理，经济体制中存在着许多弊端，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中浪费严重，经济效益很差，在人民生活方面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在这个时期，职工工资没有进行正常的调整，农副产品同工业品的比价很不合理，城市住房越来越紧张，大量待业青年没有得到安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作出极大的努力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国家用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支出四百四十二亿元，用于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金制度的支出三百亿元，用于安排城镇二千六百万人就业的支

出一百零五亿元，用于增加城镇职工住宅的支出一百五十二亿元，加上减免农村税收、增加进口商品价格补贴等方面的支出，共达一千四百多亿元。这样，国家财政增加支出和减少收入的项目很多，而长期造成的经济效益很差的情况，还没有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根本改变，这就造成了财政上入不敷出的困难。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着重提出了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过一年来的努力，情况正在逐步好转。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为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作出更大的努力。

各位代表！这两年经济形势发展得越来越好，是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同坚决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和其它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分不开的。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五讲四美”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新的社会风尚正在发扬，各条战线上不断涌现出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芒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在党的十二大以后，许多地方开展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三热爱”活动。它与原来的“五讲四美”活动，正在汇合成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统一的活动。这个活动的深入开展，对于普及新宪法提出的“五爱”社会公德，无疑将起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两年通过对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社会秩序明显好转。今年一月至九月，全国刑事犯罪案件的发案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五点七。全国查处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从今年一月到九月共有十三万六千零二十四件，已经结案处理的四万四千六百六十三件，其中依法判刑的有二万六千二百二十七人。在斗争的震慑和政策的感召下，有四万四千八百七十四人投案自首，坦白交代。在这些经济犯罪案件中，有一批是非法所得数额巨大、情节恶劣的大案要案，其中的主要案犯，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老虎”。现在有的人还在说什么“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从高级领导干部中抓出一批经济犯罪分子才叫做打“大老虎”。今年打击经济犯罪的大量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目前已经揭露出来的十几万经济犯罪案件中，有极少数或多或少牵涉到个别高级领导干部，比如有的官僚主义严重，受了犯罪分子的欺骗；有的对子女管教不严，以致子女堕落为犯罪分子；有的本人也有某些不正之风，等等。对这类问题，已经或正在严肃处理。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高级领导干部本人有严重经济问题。事实证明，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核心是可以信赖的。前一段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规模很大，而斗争的进展是健康的，对案件的处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因此没有引起不利的社会震动，没有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妨碍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这表明党和政府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通过前一段的斗争，基本上刹住了猖獗一时的公开的走私贩私活动，沉重打击了一批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诈骗等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保卫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现代化建设。当然，打击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犯罪活动是一项长期的斗争。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前进和城乡各界居民的安居乐业，我们对于一切拒绝改恶从善的犯罪分子的斗争，是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放松的。

总之，这两年执行第六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许多没有解决，这两年的经济工作中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消费品现在大大增多，但出现积压滞销现象，如不认真研究，加以解决，就必然会影响今后消费品的生产。我们在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面临的困难还很多。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争取在“六五”计划的后三年作出更大成绩。

全面实现“六五”计划的主要措施

我们要在今后三年内全面实现第六个五年计划，就其中的经济发展计划来说，关键在于按照去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和今年党的十二大的精神，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从当前国民经济的全局来看，必须切实管好用好计划安排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坚决调整和整顿好现有企业，大力促进社会生产的技术进步，继续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只有这四个方面的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从事经济工作的各级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有显著提高，才能取得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为“七五”计划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创造出更好的条件。下面我先着重讲一讲这四个问题，最后再专门讲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问题。

第一，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切实保证重点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按计划完成。

我们要不断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必须保持一定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新的基本建设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第六个五年计划在这方面安排了三千六百亿元的投资，把这笔资金管好用好，使计划安排的重点建设项目能够按期建成投产，使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取得显著的成效，这对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将起重要的作用。

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经验反复证明，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这是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上发生的几次重大挫折，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从经济上来说，都是同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分不开的。基建规模过大，不仅会造成建筑材料供应紧张，建设周期拉长，而且必然会挤生产，挤维修，挤人民生活，使企业不能保持正常生产，使人民生活不能得到必要的改善。一旦这种局面无法维持下去，就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大批基建工程下马，大量设备积压以至报废，许多为基本建设服务的工厂减产停产，大量施工队伍窝工。这种大上大下所造成的浪费和危害，是我国过去经济建设中最大的浪费和危害。经过调整，一旦形势好了，往往旧病复发，又去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这方面的教训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深刻了，今后再也不能重犯这种错误了。第六个五年计划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安排是适当的，可是目前又出现了某些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的现象，许多地方和单位上了不少计划外的建设项目。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加以解决。

在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同时，必须使资金按照正确的方向，得到

合理的使用。所谓合理的使用，最重要的就是一要保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二要保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两项是实现我国经济振兴的主要依靠。为了确保这两项，就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扩大一般加工工业能力的盲目建设压下来。

集中力量搞好以能源、交通为中心的重点建设，使国民经济中这两个最薄弱的部门得到改善和加强，这是使整个国民经济转向主动的重要环节，是关系经济建设全局的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的全局活不了，各个局部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制约，想快也快不了。这几年时机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努力从各方面挤出资金、物资，保证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的需要，缩短建设工期，提高投资效果。当前，国家计划内的重点建设项目缺乏资金，而地方、企业的自有资金大幅度上升，计划外的建设项目大大增加。必须采取措施，适当集中财力，保证重点建设。国务院已经决定，所有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国家预算外收入，城镇大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纳税后的利润，除少数免于征收的项目外，一律按一定比例向国家交纳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这是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应尽的义务，大家应该从大局出发，踊跃交纳，支持这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在这同时，对于地方、企业和社队的自有资金，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和适当的多种形式，引导和组织它们用到国家急需的建设方面来。

为了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和保证建设资金的合理使用，提高投资效果，国务院作出了以下规定。

一、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包括国家预算内的拨款、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都必须由国家计委和省、市、自治区计委进行综合平衡，统一纳入国家计划。不论哪个地区和部门，如果突破固定资产投资的计划，都必须事前按照隶属关系报请上级批准，否则以违反财经纪律论处。

二、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一律由国家计委审批；小型基本建设项目，一律由省、市、自治区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不经过国家计委和省、市、自治区计委综合平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确定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除国家规定企业有权自行安排的以外，由各级计委会同各级经委，按照规定权限审批。在国家计划外追加大中型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必须经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后，报国务院审批。

三、所有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事前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和技术经济论证，没有做好勘察设计等建设前期工作的，一律不得列入年度建设计划，更不准仓促开工。违反这个规定的，必须追究责任。

四、所有确定进行建设的项目，一律实行“五定”，即定建设规模，定投资总额，定建设工期，定投资效果，定外部协作条件，并且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度。计划部门和主管单位，必须按照合理工期分年拨足投资和保证相应的物资供应。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要对基建投资、工程质量和建设工期，实行各种形式的包干制和责任制。

五、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由建设银行统一管起来，按计划监督使用。建设银行必须严格忠于职守，如有渎职现象，必须依法查究。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确保能源、交通建设，确保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目的都是积极的。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态度坚决，雷厉风行。负责审批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的有关部委，工作中一定要坚持原则，提高效率。该管的，一定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管好。需要审批的项目，要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审批，不得徇私武断，不得拖延推诿。至于企业用自有资金进行的节约能源、增加品种、提高质量的设备更新和技术革新措施，应该由企业因地制宜地作出安排，以利于生产的发展。

第二，坚决调整和全面整顿现有企业，努力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我国现有企业的组织结构很不合理，经营管理很落后，这是当前妨碍经济效益提高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解决起来难度很大的问题。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年的十年间，我国工业企业由一九七〇年的十九万五千多个增加到三十七万七千多个（不包括农村队办企业），增加近一倍，这固然对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加上不少干部缺乏应有的知识，这种发展当中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许多企业由于原材料和能源供应不上，开工不足甚至不能开工生产；有的工艺和技术落后，物资消耗高，产品质量差，甚至完全不符合社会需要，大量积压；有的缺乏最基本的经济核算制度，消耗无定额，成本不核算，长期亏损；有的缺乏最必要的规章制度，管理混乱，无人负责，纪律松弛，浪费现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经过这几年的调整和整顿，情况有所好转，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到现在为止，全国还有相当数量企业的技术经济指标没有达到过去曾经达到过的较好纪录，有近百分之三十独立核算的国营工业企业亏损，今年的亏损额预计达四十多亿元。这种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和经营管理落后的状况，一方面使不少先进企业由于能源和原材料被落后企业占用而不能开足马力生产，一方面大量的落后企业却消耗了宝贵的能源和原材料而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这就既加剧了整个社会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紧张，又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的增长。这种状况不改变，整个工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就很难有进一步的提高，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也很难得到实现。这种状况不改变，大批落后企业心安理得地依赖先进企业的劳动成果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不仅不利于鼓励先进和改变落后，而且还由于争夺能源、原材料、运输能力和市场，使各种不正之风得以蔓延滋长，破坏社会主义的正常经济秩序和良好社会风气。因此，在调整和整顿企业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必须十分坚决。对于这一点，各级政府和全体经济工作人员必须统一认识，以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利益为重，采取坚定有效的措施，毫不动摇地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再也不能拖延了。

国务院决定，从现在起立即按照产品分工由归口部门协同地方组成强有力的领导小组，制定行业规划，提出企业调整方案。对以下三类企业，必须首先实行关停并转：一、物资消耗高、产品质量差、经营不善而长期亏损的企业；二、生产供过于求、产品大量积压的企业；三、与先进企业争能源、争原材料、争运输能力、争市场的落后企业，特别是那些盲目发展起来的以劣挤优的企业。各地区

和各部门都要制定为期两年的企业关停并转计划，提出关停企业的名单和实施步骤。所有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的企业都必须限期转亏为盈，做不到的企业一律停产整顿。毫无疑问，这项工作的开展需要克服许多阻力，需要妥善解决必然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但是非做不可，并且非做好不可。这项工作由各级经委负责组织落实，并进行督促、检查。关停的国营企业，职工必须服从国家统一调配。一时不能分配固定工作的，也要按照严格的纪律，组织起来学习和进行其它有益的社会劳动。关停企业的财产、物资，要由专人负责维护，绝不允许发生哄抢、私分等破坏现象，如果发生，要依法严惩肇事者，并追究工厂和当地主管部门行政负责人的领导责任。开设新厂，必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发给营业执照；没有营业执照的，一律依法取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使职权，任何部门不得阻挠干预。社会主义制度是迅速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先进制度。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鼓励怒羞，决不能保护落后。目前在税收、价格、信贷等方面存在的许多妨碍先进、保护落后的制度和办法，必须逐步予以修订。

整顿现有企业的工作，步伐要加快，质量要提高。在今后三年内，必须把现有企业整顿一遍。企业整顿的关键是二条：一条是建立起好的领导班子；一条是建立和健全各种管理规章和责任制度；一条是制定出以节约能源、原材料为重点的技术改造规划，确定合理的产品发展方向。企业整顿好的标志，是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职工都有联系生产成果的明确的责任制，劳动纪律和劳动态度有明显的改善，产品适合社会需要，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和综合经济效益都显著地高于整顿前的水平。经过整顿的企业，要由上级主管部门组织联合工作组，按照中央规定的标准逐个进行验收，不合格的必须补课。

在对现有企业进行整顿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抓好大企业，使它们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方面走在前列。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认真抓几个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生产潜力大的大企业，一个一个地进行综合治理。如果各地区、各部门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不亲自去抓一两个重点企业，不和广大群众一道去取得亲身体验的实际经验，只停留于一般号召，就永远也不可能取得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必要知识和主动权，就不能继续胜任他们所担负的领导工作。

结合企业的调整和整顿，要认真加强财务管理、物价管理、税收管理和信贷管理，严格财经纪律。凡是侵占、挪用、截留国家收入，违反国家规定乱摊成本、多提利润留成的，一律要加以纠正，并如数追回全部款项。国家规定的产品价格，必须严格执行，不得随意变动。违反物价纪律的，要依法严肃处理。国家制定的税收法令，任何地方和单位无权改变。擅自决定减税免税的，要坚决纠正，如数追回税款。企业偷漏和拖欠的税款，必须限期补交国库，并课以罚款。凡是使用国家资金和财政拨款举办的各种建设事业，其实际效益必须达到计划和设计规定的要求，不得造成损失浪费。坚持信贷管理的集中统一，各级银行不得违反国家计划和政策规定滥发贷款，也不允许任何人强制银行贷款。必须采取坚

决有效的措施，纠正一切化大公为小公、损公肥私的违法乱纪行为。宪法已经规定实行审计制度，审计机构有权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任何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一律不得干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要模范地执行和维护国家的财经纪律。任何人违反财经纪律，都要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处。执法犯法的，要加重处分。对于那些坚持原则，敢于同违反财经纪律行为作斗争的同志，要坚决给以支持和鼓励。任何人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必须依法从重惩处。

第三，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

经济振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目前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总的来说大大落后于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是我们的短处，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认真去做。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全面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社会生产的技术进步。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要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进而向更高的水平迈进，更需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翻两番，决不仅仅是个量的概念。如果停留在目前落后的技术水平上，翻两番就会落空。要把经济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已经普及了的适用于我国的先进技术，逐步在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得到比较普遍的采用。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业部门，都应该力争技术进步。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必须统一认识。有些同志一说发展生产，往往只是考虑建新厂，铺新摊子，很少考虑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这种观点不改变，还是用旧思想、旧方法去指导生产建设，即使建设起一批技术比较先进的新企业，大量的现有企业却面貌依旧，仍然是老设备、老技术、老工艺、老产品，整个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显著提高效益，不可能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差距，甚至还会扩大这种差距。这种情况当然是我们要竭力避免的。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在重病中仍然十分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并就翻两番必须主要依靠技术改造的问题，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发表于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他指出，“基数大，速度就低”不是社会生产发展的规律，而主要是忽视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结果；只要不再“冻结技术”、“复制古董”，有重点有步骤地把几十万个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做好了，生产发展的速度就一定会快起来。他建议，应该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缩短折旧年限。国务院认为，这些论点是正确的。今后，应该根据国家财力的可能，采取积极的态度，逐步提高折旧率。国务院已责成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财政部共同研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以便使企业逐步拥有更多的财力来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在推进技术进步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把科学技术人员很好地组织起来，参加规划，参加攻关。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各方面的科学技术专家参加，从现在起就抓紧工作，编制行业发展规划，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发展规划，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规划，以及全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纲

要。应该通过规划，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技术政策，提出到本世纪末需要和可能达到的技术水平，并且确定逐步淘汰落后技术的具体要求。举例来说，我国发展合金钢特别是低合金钢的元素资源比较丰富，要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努力提高合金钢特别是低合金钢在钢产量中的比重，应该作为发展我国冶金工业的一项重要技术政策确定下来。水泥生产的窑外分解法可以节约能源三分之一以上，这也应该作为发展水泥工业的一项重要技术政策。各行各业都要从实际出发，确定切实有效的适合自己特点的技术发展方向，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电子工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别重大的作用，我们应该非常重视它的发展，并把电子技术逐步应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条件较好的沿海和内地的大中城市，要积极帮助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提高生产技术水平。要根据全国生产发展的需要，围绕着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项目，把各种科技课题配起套来，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各方面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分工合作，进行攻关。特别要认真组织有关专家参加重大建设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和勘察设计，仔细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保证建设前期的工作做得更好。对这方面的事情，国务院将组织有关部门，统一规划，制定落实措施，力争在两三年内打开新的局面。

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是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过去几年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很不够。凡是国内迫切需要而又一时解决不了的生产技术，必须在调查研究、统一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手续，及时地积极地从国外引进，并且认真组织科学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做好消化和推广的工作。国家要在外汇和国内配套资金上给予支持。国家经委已经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了今后三年引进三千项先进技术的规划，以加强现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要一项一项地加以落实，保证其如期实现。至于国内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量能够解决的问题，当然要首先充分动员国内的力量来解决，不允许舍近求远。

必须采取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把企业改进技术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建立行业的和企业的技术开发中心，发展科研、设计、生产之间的各种形式的联合。国家、地区、部门和各行各业的生产建设计划，既要规定发展新产品的任务，又要有淘汰落后产品的明确要求。今后考核企业，要把是否增加新产品和采用新技术以达到成本低、产量高，作为一项重要标准。现在许多产品的技术标准已经很落后，要由国家经委组织各有关部门，从一九八三年起陆续修订。重要产品要实行国家发给生产许可证的制度，不合标准的不准生产。要坚决实行按质论价的价格政策，制定和施行专利法，建立奖励新产品和技术革新的制度，同时废除那些阻碍技术进步的规章制度。要广泛发动群众，学习先进生产者，提合理化建议，鼓励企业和广大职工把促进技术进步、改善经营管理的活动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

最近期间，我国科学界，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都在悼念和学习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年科学家蒋筑英[1]同志和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中年工程师罗健夫[2]同志。他们两位在我们国家所急需的科学技术方面作出了具有世界水平或国内

先进水平的发明创造，都是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们从开始工作的时候起，就呕心沥血、含辛茹苦、废寝忘食地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全部精力和智能，直至身患重病，仍然顽强工作。他们遇事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始终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他们的事迹是人们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的活教材。我们希望全国科学界、技术界、知识界和各行各业的全体党员、团员、全体爱国青年和全体劳动者，都以他们为榜样。希望一切有知识分子的单位，都能进一步端正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认真落实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信任和保护他们，让他们放手施展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抱负。除了确有组织能力、适宜于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以外，要让他们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专业。这样，我们相信，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一定会有一个迅速的巨大的发展。

第四，积极稳妥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改革经济体制，是全面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五十年代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这次的改革是要打破“大锅饭”、“铁饭碗”那一套旧框框，真正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其意义不下于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近三年来的初步改革，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各种重大比例关系正在趋于协调，这就为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要经过周密的研究，可能试点的还需要经过试点，逐步积累成熟的经验。但在目前情况下已经是必需和可能的改革，应该积极进行。现在整顿企业、调整企业、推进技术改造、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搞活商品流通等许多工作，都涉及经济体制问题，不改革就很难前进。因此，改革的进程有必要也有可能适当加快。全面的改革，预期可在“七五”计划期间逐步展开。今后三年内，一方面要抓紧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另一方面要更积极更深入地进行各项改革的试验。

根据多年来的经验，要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地协调发展，必须正确贯彻执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把大的方面用计划管住，小的方面放开，主要通过工商行政管理和运用经济杠杆加以制约。国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上，加强对涉及重大比例关系的主要经济活动的集中统一管理，特别是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方向和重大建设项目，消费基金的增长，必须按计划严格控制。在企业经营管理、商品购销、流通渠道、劳动就业以及社会服务方面，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在工作步骤上，首先要把实行指令性计划的骨干企业和重要工农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管好，把实行市场调节的小企业和小商品放活。至于中间那一块，即实行指导性计划的企业和产品的管理办法，由于情况比较复杂，目前各种经济杠杆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结合价格、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改革，通过更多的试点，摸索经验，逐步解决。

无论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要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为了克服企业不关心社会需要和技术进步的弊端，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必须根据不同企业和产品的情况，积极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特别是价格的调节作用。由于长期的历

史原因，现在各种商品比价不合理的现象相当普遍，往往使企业向不合理的方向发展，严重阻碍着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非常有害于国家财政的正常收支，归根到底，对于人民生活的总的改善也是不利的。价格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必须周密计划，慎重处置，切忌贸然从事。国务院认为，在“六五”计划后三年，全面改革价格体系的条件尚未成熟。对少数极不合理的商品价格，可在确保市场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有升有降的调整。对企业之间利润率悬殊的矛盾，应该首先通过推行内部价格结算等办法来逐步解决。工业用燃料和部分原材料价格过低，不利于生产和节约，助长了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逐步进行调整。但调整这些价格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更好地降低消耗，决不允许任何企业借此擅自提价，把负担转嫁给消费者。至于三类小商品的价格，可以分期分批改由工商双方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协商定价或企业自行定价，随行就市，上下浮动。从一些地方试点的情况来看，这样做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有利的，不仅起到了鼓励生产、满足供应、方便生活的作用，而且仍然保持了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为了提高商品质量，促进和调节商品流通，必须坚决实行按质论价，并合理规定批零差价、季节差价和地区差价。

今后三年内，在对价格不作大的调整的情况下，应该改革税制，加快以税代利的步伐。这不但可以更好地发挥税收在经济活动中的调节作用，而且将进一步改进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过去，对国营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管理办法，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近三年来，在四百多个工业企业中进行了以税代利的试点，其中有的是全市、县的试点，有的是一个城市范围内的全行业试点。总的来看，效果是比较好的。参加试点的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明显地高于总产值的增长，特别是实现利润和上交税费的增长，大大高于总产值和销售收入的增长，说明它们的经济效益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在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长部分中，保证了大部分以税金和资金占用费的形式上缴国家，企业所得也增加了，对国家和企业都有利。因此，把上缴利润改为上缴税金这个方向，应该肯定下来。这项改革需要分别不同情况，有步骤地进行。对国营大中型企业，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实行税利并存，即在企业实现的利润中，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和地方税，对税后利润采取多种形式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合理分配。这一步在“六五”计划期间就开始实施。第二步，在价格体系基本趋于合理的基础上，再根据盈利多少征收累进所得税。对小型国营企业，准备在今后三年内分期分批推行由集体或职工个人承包，租赁等多种经营方式，实行国家征税、资金付费、自负盈亏的制度。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调整部分产品的工商税率，开征一些必要的新税种，进一步发挥税收集聚资金和调节生产、流通和分配的作用。实现了税利制度的这些改革，将使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深刻的变化，把实行企业经济责任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推进一步，使企业的利益同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

现在经济生活中城乡分割，条块分割、生产重复、流通堵塞、运输浪费、领

导多头、互相牵制等现象，都同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机构设置有关。这种情况不改变，许多合理的事情办不通，整个社会的浪费很难减少。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注意发挥行业的作用，一是要注意发挥城市的作用，特别要着重发挥大中城市在组织经济方面的作用。要按照这两条原则，结合企业的改组联合，逐步合理调整企业的隶属关系。全国性的公司和少数大型骨干企业应该由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大量的企业应该逐步改由城市负责管理。对属于城市管理的企业，行业主管部门要从全局出发，负责抓好发展规划、经济政策、技术政策、技术标准、新技术的推广、新产品的开发等工作。对属于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的企业，所在城市要负责组织好生产协作等工作。至于在同一个城市范围内的企业，不管属于哪个行业，它们的铸锻、热处理、机修、电镀等部分，以及各种生活服务设施，要由所在城市负责，逐步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服务，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要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这是改革的方向，需要有领导、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试点，积累经验，逐步实施。

为了使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机构设置适应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最近江苏省政府决定，在即将展开的机构改革中，进行一些试验。主要是：省一级的厅局基本上不直接管理企业，现有的省属企业改由所在城市管理；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实行地市机构合并，由市领导周围各县；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行政公署作为省政府的代表机关，负责对所属各县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但原由行署管理的企业改由所在市、县管理。广东省清远县试行由县经委统一领导全县企业的经济活动，几年来已取得很好的效果。看来，实行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精简机构，减少层次，提高效率，而且对促进城乡结合、条块结合，推动企业组织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都大有好处。

现在，进入交换的农副产品和工业消费品都比过去丰富得多了。这是经济形势中的一个新特点。相形之下，商品流通体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于形势的要求。现行的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从五十年代沿袭下来的。当时实行这种体制，有利于限制和改造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在商品不足的情况下控制货源。二十多年来，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必须把改革流通体制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毫无疑问，国营商业应该在商品流通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应该注意发挥集体商业和个体商贩的积极作用，注意发挥生产企业在自销商品方面应有的作用。必须坚决打破地区封锁，克服城乡堵塞，积极开辟各种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真正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做到货畅其流。为此，国务院已责成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召集各有关部门，把从事商品流通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进行研究和论证，从速提出商业流通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和必须采取的有效措施。

体制改革，头绪纷繁。今后三年内，除了制定全面改革方案外，在具体工作上，重点是做三件事：一、对国营企业逐步推行以税代利，改进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二、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解决“条条”和“块块”的矛盾；三、改革商业流通

体制，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通过这三项工作，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带动起来。

最后，着重讲一讲农业和农村工作问题。

这几年农村形势很好，主要是由于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推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大包干，最初出现在贫困边远地区，很快就扩展到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富裕地区。不仅生产落后、经营单一的队采用了，而且经济发达、专业化程度高的队也陆续推广了这种办法，现在已成为大部分地区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大包干办法本身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成为有统有分、统分结合、联产计酬、包干分配的家庭（或小组）承包的责任制形式。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利益直接，责任明确，方法简便，保证了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克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所以，它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适应各种地区的不同情况，收到良好的效果。据许多地方反映，实行这种责任制以后，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干群关系有很大改善，行政上的官僚主义、瞎指挥、贪污浪费等等恶劣现象大大减少。目前联产承包责任制已从少数地区扩展到全国大多数地区，从农村扩展到城镇，从农业扩展到其它领域。它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受到群众的欢迎，决不是偶然的。这证明它是现阶段在农村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形式。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稳定、完善和提高农业生产责任制。对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允许存在，在实践中完善、提高。对群众乐意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其他形式，一律不能去堵，应该积极支持，帮助解决出现的问题。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如何适应当地的水平和特点，切实解决好统、分、包的问题。

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专业户、重点户的大批涌现，农村商品生产的日益发展，组织经济联合已开始成为形势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这种联合已不再是过去旧框框里面的联合，而是围绕着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加强生产前和生产后的服务，在技术推广、供销、加工、储存、运输、植物保护、提供信息等方面，进行专业化、社会化的合作。通过多层次、多种形式的联合，通过合同制等办法，把农民家庭或小组承包的经济活动，同国营的社会主义大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国营农场、国家科研单位等挂起钩来，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通过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和合作，将不断加强对农民的计划指导，把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更好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长远看，在分工分业、专业承包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前、生产后各种服务工作的经济联合，将极大地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展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和光辉前景。现在这种联合已经出现了一些雏形，包括专业性的生产联合，产供销联合，以及技术服务性的联合，等等。我们要因势利导，让多种联合形式在实践中发展提高，不断总结经验，不要急于肯定一种形式或否定一种形式。总之，在联合的问题上，要实事求是，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尊重群众的首

创精神，做到水到渠成，稳步前进。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这是指导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完整的方针，对任何一方面稍有忽视都会产生片面性。我国人多地少，吃饭问题始终是第一位的大问题，粮食生产必须抓得很紧很紧。适合种粮食的耕地必须种粮食而不能改种其他作物，这必须作为一个长期的政策定下来，绝对不能动摇。对主要的粮食基地，应该采取一些具体政策，以保证粮区农民有利可得。另一方面，正因为人多地少，我们决不能把劳动力都集中到有限的耕地上，而必须放眼整个辽阔的国土，重视利用山区、丘陵、草原、水面的丰富农业资源。在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和保持生态环境不恶化的前提下，放手发展多种经营，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充分利用农村资金，合理开发自然资源，而且有利于保护和促进粮食生产，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发展农业生产，要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尽快建立为农业服务的科技研究、推广体系。要鼓励农民自己举办各种力所能及的科学文化设施，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同时要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倡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资金积累和劳动积累，因地制宜地举办必要的农业基本建设。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主要应该用于那些靠农民自己力量办不到的建设项目上，如大型水利工程、重点林区开发、公路干线、电讯等等。

现在，农村中有两股歪风，一是滥占耕地建房，二是乱砍滥伐森林，后果十分严重。党中央和国务院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今后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毫不留情地制止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教育干部和农民群众，为全国和子孙后代的幸福着想，不能只顾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而破坏全国的长远的利益。

各位代表！

我们要全面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的方针，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继续加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要遵循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宪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更好地保障全国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要继续打击经济领域和其它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进一步整顿社会治安。在今后三年内，要动员政府各部门和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在争取实现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使刑事犯罪案件明显减少，坚决打击蓄意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的反革命活动，坚决消灭那些危害妇女儿童安全和毒化社会风气的丑恶现象，为第六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我们一定要继续加强国防建设，进一步提高国防科学技术研究水平，改善部队的技术装备，提高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加强民兵工作，增强我国的防御力量，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在今后三年中，我们还要坚定不移地把政府的机构改革工作继续做好。今年以来，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就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的调整来说已经基本完成，但距离所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未完成的任务还很艰巨。目前，工作效率低和官僚主义作风，仍然

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不利于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且还有使前段机构改革成果重新丧失的危险。国务院各部门，一定要建立起各种严格的责任制度，做到人人职责分明，事事有人负责，坚决扫除那种办事拖拉、互相推诿的坏作风。一定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作系统的调查研究，坚决扫除那种不调查，不研究，主观主义地决定重大问题的坏习气。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市两级的政府机构改革，今年冬天就要开始进行，争取明年上半年完成。县和基层政权两级的机构改革，要求在明年冬季和后年春季做好。这样，全国政府机构的改革在一九八四年春季就能完成。做到了这一步，我们的工作就会更加主动了。

各位代表！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鼓舞下，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第六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八三年的年度计划经过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之后，将使我国人民近期的奋斗目标更加明确，并且把当前的工作同长远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鼓舞大家更加坚定地向着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迈进。各级政府的工作很繁重，责任很重大。我们要开创新局面，既要大胆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又要勤奋学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循序前进。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还很多，任务十分艰巨，我们一定要把广大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积极性都充分发挥出来，大力发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只要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第六个五年计划一定能够圆满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我们的伟大祖国一定会一年比一年兴旺发达、繁荣富强起来。

注 释

1．蒋筑英（1938—1982），浙江杭州人。曾在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和光学传递函数装置，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2．罗健夫（1935--1982），湖南湘乡人，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被誉为中国式的保尔。

关于进料加工出口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六日

将陈云同志批语发国务院常务会议。

转慕华、劲夫同志一阅。进料加工出口，等于劳务出口，首先抓沿海城市，如何使沿海城市放开手，请准备意见，抽时一议。

对环保和出现酸雨等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时任城乡建设部部长李锡铭《关于解决上海市环境污染和各地出现酸雨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

宋平同志并高扬文（煤炭部党组）同志：

这是一件大事，请着人论证，采取有效措施。我国用煤越来越多，不考虑环境是不行的。应在长期规划中有切实安排。

赵紫阳

十二月八日

体育战线的成绩
鼓舞全国人民建设四化的信心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人大会堂接见参加第九届亚运会胜利归来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时的讲话。

今天，书记处的同志、国务院的同志、人大常委会的同志、政协和军委的同志一起来看望你们。你们在这次亚运会上取得了十分好的成绩，为国家争了光，对全国人民是个极大的鼓舞。体育战线这几年捷报频传，我们曾经在三次大的会议报告中，提到了体育的好形势。在十二大上，耀邦同志讲了体育战线的形势；我在去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和今年五届五次会议上，都讲了一段体育战线振奋人心的成绩。在每一次报告中讲到体育战线的好形势的时候，都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鼓掌。体育战线取得的胜利已经远远超越了体育这个领域，鼓舞了全国人民向四化进军的信心。体育战线能攀登高峰，为什么别的战线不行呢？事在人为嘛！过去我们国家被人家称为“东亚病夫”。当然，“东亚病夫”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解决了，但彻底把这顶帽子甩掉，而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我看是你们这次。这是个很大的胜利。

耀邦同志去年会见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讲到“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我借用他这两句话来嘱咐大家。体育战线是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但是还要坚持两分法，才能更上一层楼。报纸上是这样评价体育战线的，叫做“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体育健儿们在世界体坛大显身手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因此，要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

不能让来投资的人吃亏*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

* 这是赵紫阳与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应湘、副总经理何炳章，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郑裕彤等谈话的要点。

我们的体制问题，像一个个绳结一样，要慢慢解，要按规律解。不能急，越急越不行。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优点，讲了话是算数的。我们的国际地位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利用外资，应当照顾到来投资者的利益。总不能谁到中国来让谁吃亏。到大陆来投资，政策上可以放心。在政治上，你们曾担心会不会被指为阶级敌人，我说肯定不会。对你们的企业也不会实行国有化、公私合营。当然，你们在兴办企业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不会让你们吃亏。如果你们选的项目正确，不仅你们的投资有保证，也保证你们有一定的利润。

我们的政策是长期稳定的。这方面，你们已有亲身感受。你们几位带头来投资，很有远见，是“勇敢分子”，起了示范作用。外国也有些企业家很勇敢。南海石油就有很多外国人投资，汕头也将要兴建外资或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他们都是“勇敢分子”。我再重复一句，不能让来投资的人吃亏。

关于香港的不平等条约，几十年来我们都没有承认。我们将在一九九七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在恢复行使主权以后，我们的方针是港人治港。英国人来管不行，那没法向中国人民交待。香港要换个旗子，就像小平同志说的，可改称中国香港，拥有高度的自治权。我们不把香港纳入大陆的体制。大陆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香港不能这样，要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主体。所以，即使是在香港投资也不要紧，放心经营。留在香港的资金也没有问题。

对开发海南岛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

* 这是赵紫阳给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谷牧的批语。

海南岛不作特区，但在对外合作给以较多的自主权，我认为是需要的。建议由你主持，召集有关部门参加座谈一下，把能够定的问题先定下来。属于政策问题，海南孤悬海外，我认为可以从宽（不会影响内地）；需要中央投资支持的，也应采取积极态度，量力而行。海南虽属广东包干范围内，但可直接给予支持，使该岛上得快些！

充分发挥重庆市西南经济中心的作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与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王谦的谈话纪要。

一、发挥重庆重点城市的作用。重庆不仅是四川的经济中心，而且是西南的经济中心；这几年扩大重庆的作用不够。要扩大重庆的职权，要把省管的职权下放给重庆，计划要单列。除了省照顾重庆之外，中央也要适当照顾重庆。省里有的经济实权，市里基本上要有。

二、重庆要开放。经济中心要伸出去，不只是在国内，而是在国外，要广泛地进行经济联系，包括外贸，重庆要有一定的外贸独立权。

三、重庆管理范围要扩大。永川地区除少数县外，应划归重庆。如永川、大足、合川、江津、铜梁等县。

四、省厅局不管企业。中央企业（除少数外）、省属企业都要归市里统一组织生产和经济活动。长江运输可以直接去香港等地。

五、经济体制改革要和市里机构改革结合考虑。所有经济工作都归经委管，农委可不撤销，省里计、经委可以合并，市里可以分开。市里的局主要搞成综合性的，实行规划、统筹、服务、监督。

六、财政问题，可能是争执较大的问题。是否可像首钢一样，实行递增包干。

后记

一、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者检索查看，这部文集以时间顺序编排，按年份分为四卷：第一卷（1980—1982年），第二卷（1983—1984年），第三卷（1985—1986年），第四卷（1987—1989年）。

二、编入本书的所有文稿，均系第一手原始文献资料。为了保存文稿的原貌，在编辑过程中只对原稿进行了文字订正和必要注释，有的添加了标题。文中的数字和计量单位等，亦沿用当时的习惯表述，未按新的规定改动和换算。

三、参加文集收集、整理、编辑、录入、排版、校对工作的同志，都是一批热心改革开放事业和关心党史国史研究的志愿者，还有许多老领导和老同志给予了热情鼓励和鼎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四、限于条件和水平，在本书编辑中难免有疏漏、错讹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知情者批评指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5年10月17日

赵紫阳文集：二

第二卷

1983—1984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赵紫阳文集
第二卷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编
赵紫阳文集：二
中交六李公服社
《赵紫阳文集（1950—1959）：第二卷（1983—1954）》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编
⑥香港中文大学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
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
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国际统一书号（ISBN）：978962—996—807—6
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传真：＋552 2603 7355
电邮：cup@cuhkeduhk
网址：?chineseupresscom
几e Collectedwo南ofZhaoZiyang（1绍0-1989），VolumeZ（1983—1984）（in Chinese）
Edited by Editorial Grooup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978-962-996-806-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NT，Hong Kong
Fax：＋852 2603 7355
Email：cup@cuhkeduhk
Website：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出版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收录了赵紫阳自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至1989年去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函、批语等，共498篇，180余万字，依时间顺序分为四卷。

《文集》涵盖经济、政治、党务、外交、国防、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展示了1980年代中国高层推行的各种政策主张、理论观点及相关政治博弈，呈现了改革开放最初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细节。

《文集》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原始文献编纂而成，来源可靠、编排规范、忠实于原件，多数篇目属首次公开或首次完整公开。《文集》虽非同期文献的全部，却是迄今为止最系统、也最具规模的赵紫阳文献汇编，为还原和理解早期中国改革开放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对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也极具文献价值。

《文集》出版过程中，本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文本考订、原件比对、史实核查、信息增补等工作，力求达至文献史料出版的最高准确度、客观度。除文字史料外，本社对视觉史料也极为重视，试图通过对历史图片及原始文献的搜集和选用，将其携带的历史信息传递给读者。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6年5月

编辑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主要汇集了赵紫阳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件和批语等，近500篇。其中有一部分曾公开发表过，大部分则在当时党政机关的文件、简报上印发或传达过，是首次公开出版。

文集所涉及的十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和奠基时期。当时，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四化建设掀起了新的高潮。其间经历了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两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进行了国民经济大调整，制定并胜利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七五”两个五年计划，彻底扭转了文革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的被动局面，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第一步目标（头十年翻一番），从而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决心。

这十年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改革创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由工业、商业发展到其他第三产业，从承包经营、股份制试点到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到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对外开放；从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到实行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和保护环境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从立足国内到坚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主动迎应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勇攀世界科技新高峰。这套文集既见证了这十年间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逐步重新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也反映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工作难度异常巨大，为政者甘苦备尝的秘辛。这十年既有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有些不尽人意的遗憾；既积累了改革成功的经验，也有出现通货膨胀的教训。

从文集中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领导支持下，本书作者与胡耀邦、万里等同志一道认真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从而大彻大悟，立志为民，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崇尚法治，勇于开拓创新，努力遵循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在日新月异的新产业革命、新科技革命中尽心竭力，弃旧图新，不断探索新的为政之道、治国之策、兴业之本和强国之路，以掌握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主动权。这十年他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奉献给了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书中所反映的每一项巨大成就或一些难以避免的失误，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真实记载和深入研究这段难忘的史实和第一手文献资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学习和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让历史告诉未

来，促使我们进一步开拓思路，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融入世界，为实现振兴中华，攀登世界强国的新高峰而奋斗！

本书编辑组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组成。为保持文稿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在编辑中均保持了原貌，编者仅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4年4月

目录

一九八三年
海南岛要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工商企业的改革应采取不同形式
关于发展教育事业给钱昌照同志的复信
在经济工作上要多看几步棋
天时人事日相催
加强干部的正规化培训
应在煤的转化和综合利用上下力气
争取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
让中非友好事业世代相传
军队搞点农副业生产有利于丰富供给和减轻民负
必须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
搞好水利建设发展旱作节水农业
发展农业要增强经济效益观念
企业改革要优先保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发展大好形势继续抓好工交战线的工作
为推动南北谈判和加强南南合作而努力
对钢材实行工贸结合和优质优价很重要
地矿部是全国地质工作的综合部门
要认真总结三十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
统一金融必须建立中央银行
提高工业生产经济效益要见到成效
政府工作报告
节能工作要坚韧不拔地抓下去
关于平朔露天煤矿项目审批问题的一封信
加快发展我国食品工业的意见
集中财力保重点提高素质促转变
重大技术装备要开展国际合作与军民结合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值得研究和借鉴
引滦入津工程是重点建设的一个好典型
搞好社会治安是全党全国的大事
系统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素质等十个重要问题

团结各族人民开发建设新疆
国营农场可以实行职工承包办家庭农场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是提高企业素质的关键
援外工作要量力而行和尽力做好
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夺取新胜利
抓紧争取教育轻微犯罪者
关于调整化纤布和纯棉布价格给耀邦同志和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
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
分步进行价格改革逐步理顺经济关系
停止生态破坏实现良性循环
二汽要在改革开放和提高效益中走在前列
关于汽车工业实行技贸结合的批语
发挥福建优势办好经济特区
军工技术转民用应予鼓励和支持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首先要制定规划
新型建材公司要搞成经济实体
发展大好形势理顺经济关系
争取国际优惠条件建设好广东核电站
大型煤矿是否与外商合营值得重新考虑
中国的科技体制非改革不行
从中小学开始加强外语教学和普及计算机知识
祖国建设需要精通世界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人才
关于推广河南省禹县平原造林经验的一封信
一九八四年
增进了解促进友好维护和平
对中央政法委“严打”部署征求意见稿的批语
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理顺经济和提高企业素质需要研究的一些问题
关于企业改革和技术改造等问题的意见
加强行业协会发展食品工业
重大技术装备一定要确保质量
视察重庆时的谈话要点
视察贵州时的谈话要点
视察湖南时的谈话要点
给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的复信
妥善解决经济工作和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关于怎样管好企业的几点意见
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听取中国石化总公司工作汇报时的谈话
运用科学技术加快油田发展大有可为
我国石油工业发展潜力很大
听取建材工业发展纲要汇报时的谈话
在庆祝我国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大会上的讲话
深化改革搞活企业
应用科研单位应实行有偿合同制和课题承包制
政府工作报告
团结起来发展石油工业战线的大好形势
关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问题致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
实事求是地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
坚持改革加速改造使鞍钢做出新贡献
扬长避短革新改造走出一条发展我国冶金工业的新路
靠改革开放加快我国石油工业发展
进一步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
关于机械工业领导体制改革问题
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意见
我国汽车工业面临大发展的新形势
对《人口控制和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批语
二线企业调整必须搞军民结合型
在欢迎参加第二十二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宴会上的祝酒辞
对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草稿的修改意见
在安徽省党政军负责干部会上的讲话
中国科技大学要为国家建设输送更多人才
在江西考察听取省委常委汇报时的讲话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团结起来开创科委工作新局面
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设方针
对方毅同志开发有色金属报告的批语
给李德生同志的信
接见出席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来宾时的谈话
给王震同志的信
贯彻中央《决定》稳步推进价格改革

给薛暮桥同志的信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广东要继续在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中走在前面
深圳特区要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经验
振兴上海充分发挥全国经济中心的作用
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促进农业协调发展逐步放开农副产品价格
关于改造和振兴上海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给中央的请示
后记
一九八三年
海南岛要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一九八三年一月
工商企业的改革应采取不同形式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关于发展教育事业给钱昌照同志的复信
一九八三年二月三日
在经济工作上要多看几步棋
一九八三年二月五日
天时人事日相催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三日
加强干部的正规化培训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应在煤的转化和综合利用上下力气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争取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让中非友好事业世代相传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军队搞点农副业生产有利于丰富供给和减轻民负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必须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
搞好水利建设发展旱作节水农业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发展农业要增强经济效益观念

一九八三年三月
企业改革要优先保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日
发展大好形势继续抓好工交战线的工作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
为推动南北谈判和加强南南合作而努力
一九八三年四月四日
对钢材实行工贸结合和优质优价很重要
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
地矿部是全国地质工作的综合部门
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
要认真总结三十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一日
统一金融必须建立中央银行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提高工业生产经济效益要见到成效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三年六月六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节能工作要坚韧不拔地抓下去
一九八三年六月八日
关于平朔露天煤矿项目审批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
加快发展我国食品工业的意见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
集中财力保重点提高素质促转变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重大技术装备要开展国际合作与军民结合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值得研究和借鉴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引滦人津工程是重点建设的一个好典型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搞好社会治安是全党全国的大事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日
系统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素质等十个重要问题
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
团结各族人民开发建设新疆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国营农场可以实行职工承包办家庭农场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是提高企业素质的关键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七日
援外工作要量力而行和尽力做好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夺取新胜利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
抓紧争取教育轻微犯罪者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日
关于调整化纤布和纯棉布价格给耀邦同志和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
一九八三年十月五日
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
一九八三年十月九日
分步进行价格改革逐步理顺经济关系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五日
停止生态破坏实现良性循环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日
二汽要在改革开放和提高效益中走在前列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关于汽车工业实行技贸结合的批语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发挥福建优势办好经济特区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四日
军工技术转民用应予鼓励和支持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首先要制定规划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新型建材公司要搞成经济实体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发展大好形势理顺经济关系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争取国际优惠条件建设好广东核电站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六日
大型煤矿是否与外商合营值得重新考虑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九日
中国的科技体制非改革不行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从中小学开始加强外语教学和普及计算机知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祖国建设需要精通世界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人才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关于推广河南省禹县平原造林经验的一封信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九八四年
增进了解促进友好维护和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日
对中央政法委“严打”部署征求意见稿的批语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
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一九八四年二月八日
理顺经济和提高企业素质需要研究的一些问题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
关于企业改革和技术改造等问题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加强行业协会发展食品工业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重大技术装备一定要确保质量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视察重庆时的谈话要点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日至五日
视察贵州时的谈话要点
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至九日
视察湖南时的谈话要点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至十六日
给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的复信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妥善解决经济工作和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关于怎样管好企业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日
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
听取中国石化总公司工作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七日、十三日

运用科学技术加快油田发展大有可为
一九八四年四月九日
我国石油工业发展潜力很大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
听取建材工业发展纲要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
在庆祝我国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
深化改革搞活企业
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
应用科研单位应实行有偿合同制和课题承包制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三日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团结起来发展石油工业战线的大好形势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关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问题致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实事求是地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九日
坚持改革加速改造使鞍钢做出新贡献
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
扬长避短革新改造走出一条发展我国冶金工业的新路
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
靠改革开放加快我国石油工业发展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二日
进一步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七月七日至十三日
关于机械工业领导体制改革问题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
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我国汽车工业面临大发展的新形势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对《人口控制和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日
三线企业调整必须搞军民结合型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

在欢迎参加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宴会上的祝酒辞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八日
对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草稿的修改意见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在安徽省党政军负责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日
中国科技大学要为国家建设输送更多人才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日
在江西考察听取省委常委汇报时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
附录：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过
团结起来开创科委工作新局面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
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设方针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九日
对方毅同志开发有色金属报告的批语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九日
给李德生同志的信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
接见出席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来宾时的谈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
给王震同志的信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
贯彻中央《决定》稳步推进价格改革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给薛暮桥同志的信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广东要继续在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中走在前面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
深圳特区要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经验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振兴上海充分发挥全国经济中心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九日
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促进农业协调发展逐步放开农副产品价格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关于改造和振兴上海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关于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给中央的请示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后记

1984年12月19日，代表中国政府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中英联合声明》上正式签字。
左上：1983年8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视察
左下：1984年3月，在四川地方领导杨汝岱、杨析综、王谦等的陪同下
考察重庆嘉陵机械厂
右：1984年3月，在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的陪同下考察湘西山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84年3月26日，就香港回归问题给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的复信
1984年7月9日，庆祝鞍山钢铁公司开工三十五周年时的题词
1984年5月26日致邓小平信的手迹，收入本书时以《关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问题致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为题
1984年10月25日，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请示》上的批语，《请示》一文收入本书时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为题

一九八三年

海南岛要实行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一九八三年一月

* 这是赵紫阳和国务委员谷牧访问非洲十一国归来后，在海南岛召开广东省委和海南区党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我国第二大岛海南岛要充分利用当前国内外有利条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尽快地开创一个经济建设的新局面。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比较慢，国家要给予支持和帮助，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港口、交通、能源等问题要一个一个地解决，集中力量，搞成一件再一件，要下功夫抓出成绩来。海南岛要充分利用四周环海的优势，利用海运的条件，把港口交通搞上去。世界上许多海岛发展都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交通方便。海南岛把港口交通搞上去，内陆和国外的资源就可以利用。要鼓励和欢迎侨资和外资到海南岛来投资兴办各种企业。

全岛要加强纪律教育，反对无政府主义，特别要把自然资源保护好，把森林保护好，绝不允许用任何借口来破坏资源，破坏森林。只有加强了管理，把内部整顿好，才能给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谷牧同志和海南岛负责同志一道，通过调查研究和多次会议讨论，提出了开发建设海南的一些方针：

——给予海南岛以更大的自主权，在经济建设上让它能够因地制宜地考虑决定全岛的工作。除了实行“以岛养岛”的方针外，中央各部门和广东省都要从财力上给予支持，认真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参照深圳、珠海的办法，更加放宽。可以利用外资、侨资在海南投资建设，一切外资合作项目，将得到优惠待遇。

——加强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对外开放创造条件。可把兴隆、三亚等地逐步建成旅游中心。

——发展对内联合。欢迎内地各先进地区、工厂企业来海南岛投资、合作经营或独立经营，共同开发海南岛；要发展岛内现有国营企业同外资、内资的联合，充分发挥海岛农垦、铁矿等大国营企业共同开发海南的作用。

工商企业的改革应采取不同形式*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经济形势时的发言。

工业商业改革，要按照不同企业、不同生产水平，采取不同形式，不能采取一种模式，没有把握的还是要探索，搞不好，会给改革带来新的问题。

对工业企业采取何种包的办法，要从实践中研究。农村改革比工业、商业改革，牵涉比较少一些。农村改革，是从最困难的地方开始，先在一亿二千万人口中实行包干。我当时也没考虑全国就搞包干。经过实践，效果是好的。农村包的形式，根据不同的生产水平，也互不一样。江苏无锡的包干形式，如果没有两年酝酿，也出不来。工业商业改革必须要有这个过程。要按照不同企业，不同生产水平，采取不同形式，不能采用一种模式。首钢的包干形式，饮食业、服务业就不能采用。比较重要的生产单位实行包干，确有一个国家计划问题，应当采取不同形式。要把体制改革放在全部工作的突出地位。体制改革现在还没有完整的模式，还是探索中前进。看准了的要积极，没有把握的还是要探索。要防止老是走不动，但也要有领导有步骤地搞。工业、商业改革，与农业不同。没有把握不要动手。搞不好，会给改革带来新的问题。饮食业、服务业一包就灵，主要突出经营责任制，这有普遍意义。但包干形式应有所不同。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已搞专业化，没有剩余劳动力问题。这种类型，专业分工与责任制如何结合起来。如果要四季青实行凤阳的办法，那肯定是倒退。体制改革要在实践中解决。复杂的问题，步子稳一些好。看准了的，大胆一点，一步一步搞，可能会有突破。凤阳的办法推开以后，对东北也有影响。杨易辰讲，责任制要同东北特点相结合，东北机械化程度高。杨易辰讲的是对的。工业、商业体制要改革，主要抓经营责任制，联产承包。饮食业、服务业可以搞，大企业要有步骤地搞，采取不同形式。广东南方大厦搞包干，设分店。东方宾馆一九八一年以前最糟糕，一九八一年以后搞包干，情况很好。国家计划要与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依靠好的企业推动生产的发展。我赞成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要灵活一些，但究竟怎样搞，要很好研究。

知识分子搞些自由职业是可以的，但科学院的知识分子都到外面去搞承包，又会产生什么问题？科学院帮助工矿企业应当是有偿的，对有关人员应给予奖励，增加收入应征收所得税。科学院工作的是知识分子，国家机关科技人员也是

知识分子。对第二职业，目前匈牙利也有矛盾，不怎么宣传。对技术人员退休后的待遇也要有节制，否则会造成国营企业老师傅大批退休。对知识分子，一可以自谋职业，二可以有偿，但报酬如何分配，要作研究。路子要一步一步走，否则会带来一堆不容易解决的矛盾。

军工部门人才潜力大，顾虑也大。应当研究如何鼓励知识分子到高原、到边远地区去。否则，知识分子会倒流。

我赞成从管理体制上解决人才的流动问题，一般地议论原则不行，要议上几条办法出来。

关于发展教育事业给钱昌照同志的复信*

一九八三年二月三日

钱昌照同志：

访非回国以后，收到了您的来信。您这样高龄，仍在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操心，这种精神使我深受感动。对教育工作，老一辈都十分关心。前不久，陈云同志曾对千家驹[1]同志“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的文章和来信作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提出方案。您信中提出的关于建立统一领导教育事业的机构和召开教育会议两项建议，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已请中宣部、教育部就此作进一步研究，提出具体意见，报书记处、国务院审批。今后您还有什么考虑，请不吝赐教。

春节将到，祝您健康长寿，阖家安泰！

赵紫阳

一九八三年二月三日

（此复信抄告中宣部、教育部）

注 释

1．千家驹（1909—2002），浙江武义人。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国务院财经委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1989年留居美国洛杉矶，2002年在深圳病逝。

在经济工作上要多看几步棋*

一九八三年二月五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吕东关于召开全国工交会议和王丙乾关于财政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一、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和今后的发展趋势，需要做认真的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很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今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如果搞得好，使胜利的形势继续向前发展；搞得不好，也会困难重重，带来很多问题，影响到今后。我们在经济工作上，要多看几步棋，至少要看到下一步。

当前有两个问题很突出：一是原材料、能源很紧张。在企业扩大自主权，有了积极性以后，原材料如果供不应求，就会出现抢购现象，价格就可能控制不住。生产资料价格一涨，可能导致消费品也得涨价，那就会使市场紧张。二是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问题。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轻纺工业开始出现速度下降甚至萎缩的现象。有些产品增产了，货不对路，造成积压；而一些优质名牌产品却又脱销。特别是由于重工业上得很猛，在原材料、能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势必形成基建挤生产、重工业挤轻工业。重工业上得很快，主要原因又是基建上得太猛。一九八二年基本建设总规模突破八百多亿元，一年增加一百四十多亿元，这在建国以后也是少有的。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加以注意，就有可能使这两年进一步调整而出现的好形势好景不长，计划绷得很紧，原材料、能源、市场供应有可能全面紧张，改革也将受到阻碍。历史经验证明，我们的国家，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而出乱子，往往是在形势好转的时候。在经济工作上，危险并不在于继续搞活，而在于宏观经济方面是否会发生问题，决策、布置是否恰当。当前经济工作中很多问题还不清楚，如出现了哪些新情况，原因是什么，还潜伏着什么问题，发展变化的趋向如何，都应该认真研究，分析透彻，以便采取对策。计委、经委要组织有关部门、经济理论界讨论，并吸收地方的同志参加，提出看法，必要时报书记处审议。

二、工业商业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我们的方针是，第一要坚决改，不能犹豫观望；第二，要经过试点，有领导、有步骤地改。根据工业、商业的不同特点，寻找不同的形式，不能一哄而起，一刀切。这样做，可能会稳妥一些，如果搞得不适当，折腾几年也转不过来。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端，推行以承包为中心的经营责任制，既不能看得很神秘，也不能看得很简单。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没有解

决的问题，我们有可能摸索出一条路子来，但不能设想几个月、一年就能解决。农业上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经过四、五年的时间。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有所不同，它比农业更复杂，需要有个反复实践的过程，在探索中前进。小企业好办，大中型企业如何搞，我们的经验还不足。作为一项改革制度，不仅要看一年，还要看几年。总的原则是要真正做到挖潜力，出效益，实现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

对国营工业企业，除了极少数具备条件的大型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的办法外，应普遍推行利改税的办法，税后利润还余下很多的，再采取各式各样的承包办法。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实行利改税，就把二者的经济利益基本上划清了。在企业和职工的关系上，实行各种经济责任制，就把职工的所得同企业经营成果挂起钩了。所以利改税，既能使国家的收入有保证，又能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这比利润分成的办法好，没有什么危险性。因此，首先要搞利改税，不要动摇，今年普遍推广。利改税的具体方案另议。

商业体制改革中，实行政企分开的问题，一下子还做不到，要积极创造条件。对零售商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可以实行承包的办法，逐步推开。大的百货商店不要全面铺开，先搞几个进行试点，取得经验。批发商业如何搞，另行研究。

三、工资改革要跟上，今年内要拿出全面改革的方案。在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划清后，企业劳动生产率真正提高了，从原则上讲，工资、奖金不应该封顶，多劳可以多得。但现在条件还不具备，尤其是大中型企业要谨慎。要防止有些不具备条件的企业，趁此放开肚子吃“大锅饭”，工资、奖金大幅度增加，从国家财政收入中挖一块，而换来的效果并不好。现在的问题是奖勤可以，罚懒不容易做到。如果搞浮动工资，浮上去容易，浮下来难。目前这个办法也不能大面积地搞。要研究利改税后，实行各种承包办法，怎样合理解决工资、奖金的问题。要瞻前顾后，通盘考虑，提出方案。

四、必须控制财政赤字，实现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一九八二年的财政赤字一定要压缩到三十亿元以内，要认真检查核实去年财政收支情况。如果落实下来还有差额，再考虑用中国银行的结益上交一部分来弥补。一九八三年财政赤字也必须严格控制在三十亿元以内，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今后对中国银行可以采取结益分成办法，超过多少上交，定个比例。

解决财政问题，一是要开辟财源，增加税收；二是要控制支出，减少负担。现在，地方、部门、企业掌握的资金不少，而国家财政很困难。针对这一新情况，财政要研究如何开辟财源的问题，不要限制各方面搞活，但要增加一些税收。如对农村专业户和收入高的户，要搞个征税办法试行。要坚持按财政体制的规定办事，今后的支出也不能再由国家财政包下来，该由部门、地方拿的钱，或要共同分担的，都要分别按体制规定办。对地方的支出，特别是一些经济富裕的地方，要多加控制，以保证中央有一定的财力，保重点建设。

五、流动资金由人民银行统一供应和管理。同意今后财政部不再增拨流动资金，每年可以从中央财政减少二十四亿元的支出。目前八百亿元的定额流动资金拨给银行后，新、老企业苦乐不均的问题，将由银行来调剂解决。有些事情，光靠经委、计委在上面审批不行，需要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如认为不应多办的企业，贷款利率就要高一些；要鼓励发展的企业，贷款利率就要低一些；有些要限制发展的企业，甚至可以停止贷款。今后基本建设资金，还要再转一些作银行贷款。人民银行的权力不能分散，必须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和领导下，指导生产，引导建设。

天时人事日相催*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1983年春节团拜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的春节祝词。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举行一九八三年春节团拜。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在座的各位同志、各位朋友，向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和各界人士，向保卫伟大祖国的全体解放军指战员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全体公安干警，向退休、离休的老同志，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向帮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国专家，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亲切问候！

当举国欢度新春佳节的时候，还有千百万劳动者和指战员，坚守在生产、工作和战斗岗位上，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愉快、健康和安全，忘我地劳动着。在这里我向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二年是我国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年。这一年里，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通过了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符合新时期建设党纯洁党的要求的新党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新宪法，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我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继续向前发展。国民经济在调整、整顿和改革中稳步前进，欣欣向荣；农业生产持续全面高涨，粮、棉获得创历史纪录的丰收；工业生产计划超额完成；市场繁荣兴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在政治、经济形势越来越好的情况下，各族人民喜气洋洋，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决心在今后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去年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一不是我们党、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勇于改革得来的。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更加努力地沿着改革的方向前进。我们将完成省、市、自治区和地、市两级领导机构的改革，进一步在领导班子中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我们要在经济领域和其他方面加快改革的步伐，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有领导有步骤地改，经过试验，分期分批，循序前进。既不能犹豫观望、等待不办，也不能一哄而起、一刀切。我们在农村进行改革，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了大约五年时间。由于采用了典型示范，先易后难，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在实践中探索、逐步统一认识的办法，使

这场规模如此宏大、意义如此深刻的改革，进行得极为顺利、健康，效果十分明显，超出人们的预料。城市工商业和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无疑将比农业方面的改革更为复杂。但是农业改革的成功，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城市工商业和其他方面改革的方向，增强了信心；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指导改革顺利、健康进行的正确方法。我们要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领导好改革工作。

我们必须继续抓紧经济工作，进一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努力提高生产、建设、流通领域的经济效益。要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搞好重点建设，为今后的发展准备条件。

我们要大力加强教育、科学和文化工作，彻底清除轻视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知识分子，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更加专心致志地从事四化建设，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我们要从今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开展整党工作，整顿党的组织，扫除不良作风，纯洁党的队伍，增强党的战斗力，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中国人民任何时候都珍惜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不久前，我和国务院的一些同事到非洲十一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加强了我国同非洲国家的联系。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友谊，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乘此机会，把他们的热情和友谊传达给我国人民，并向他们再次表示感谢。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一如既往，进一步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入类进步事业。我们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开展友好往来，扩大经济技术交流。

在我们欢度春节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台澎金马和港澳同胞，深切怀念国外侨胞。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大家同心协力，把祖国的统一大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相信，结束中华民族被人为分割局面的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同志们、朋友们！今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我们共庆佳节，辞旧迎新，一定要发扬破旧立新，勇于改革的精神，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新的进展，作出新的成就！新春伊始，祖国大地，一片春色，“天时人事日相催”[1]。面临着新的光荣任务，我们要珍惜时日，振奋精神，艰苦奋斗，踏实工作，向着新的胜利前进！

祝同志们、朋友们节日愉快！

祝各位老同志、老朋友健康长寿！

注 释

1．引自杜甫《小至》诗：“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馆动飞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小至为冬至的前一日。

加强干部的正规化培训*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给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的祝词。

因为工作忙，不能参加这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了，深以为歉。请你们转达我对会议全体代表的问候，预祝这次会议圆满成功。

希望中央党校和各级党校认真总结经验，改革教学工作，加强干部的正规化培训，既要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的教育，又要丰富他们有关经济建设的知识，提高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水平和管理能力，为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应在煤的转化和综合利用上下力气*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对国家科委副主任杨浚报告的批语。

我同意这个报告的看法和建议。不久前，我已批过国家经委赴东德的煤化工考察团的报告。总之，认为煤化工、煤气化应当提到我国今后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最近，陈云同志告诉我，要注意保护环境问题，这个钱总是要花的，晚花不如早花。我看，今后我们在煤的综合利用和转化上下力气，就既充分合理利用开发了资源，也为保护环境、治理污染采取了根本性的措施。因此，应作为一个方针性重大技术政策问题看待。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许多部委的分工，涉及长期计划，涉及到今后这种联合企业的管理体制，因此，请国务院科技小组就此与有关部委讨论一下，提出先抓什么，后抓什么，如何分工的意见，报国务院审批。

印发国务院常务会议，科技小组、计委、经委、科委，煤炭、化工、电力、城乡建设部。

争取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就开展一九八三年“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发表的广播电视讲话。

同志们：

在一九八三年“全民文明礼貌月”到来的时候，我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祝愿这项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活动在今年取得新的成绩，并且希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积极、更加认真地参加和开展这项活动。

去年三月，我国第一次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一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社会风气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日益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有了明显的改观，广大群众和干部精神振奋，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事实证明，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是动员亿万人民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种好形式，对促进物质文明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党的十二大提出，今后五年内要在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同时，争取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党风的根本好转。为了推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中央决定把“文明礼貌月”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今年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内容，除了原有的“五讲四美”外，增加了“三热爱”，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这样就使“文明礼貌月”活动，内容更加全面，目标更加鲜明，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为了加强对这项活动的领导，中央还决定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也将建立这样的委员会。

今年的“文明礼貌月”活动，是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日益良好的情况下开展的。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人民群众建设精神文明的自觉性正在不断提高。今年三月，恰逢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二十周年，又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各界人民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精神，积极实现第六个五年计划，在各条战线上开展改革的时候。所以，这次“文明礼貌月”活动要有更高的要求。要在去年着重治理脏、乱、差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好优质服务、建立优良秩序、创造优美环境，绿化祖国大地，进一步掀起学习雷锋、学习先进的热潮，进一步开展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活动。还要继续抓紧抓好计划生育，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内容。通过以上活动，在全国人民中形成更加坚定的共同政治信念，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先公后私、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风尚，更加发扬光大；使人们生活在安定、美好的社会环境和文明、健康的社会风气之中，能够心情舒畅、专心致志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要有改革、创新的精神，都要脚踏实地、讲求实效。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要根据各自的职责范围，从实际出发，制定具体规划，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好“文明礼貌月”的各项活动。每个公民都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从自己的岗位做起，发扬主人翁精神，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要自觉地改善学习、劳动、工作、服务态度，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维护社会公德，努力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的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在对外交往中，要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维护祖国的荣誉和尊严。对外国客人应以礼相待，一视同仁。党中央和国务院相信，经过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今年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一定会比去年搞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有实效。

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解放军指战员，要站在改造社会风气的前列，在“文明礼貌月”活动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和带动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各级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则，积极领导。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扎扎实实地做好这项工作，经过若干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能够取得伟大的成绩。

全国各族人民行动起来，搞好一九八三年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夺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

让中非友好事业世代相传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我和谷牧国务委员、吴学谦外长等访问了十一个非洲国家。一般的情况，新闻机构已经报道过了。现在我就有关这次访问的几个主要问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一、为什么访问非洲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我们前往非洲访问，这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各条战线上普遍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在继承建国以来所确定的基本方针的基础上，我国的对外政策也逐步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从而更加完善、更加明确了。近几年来，我们在对外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行动。对苏联，我们坚决反对他们奉行的霸权主义政策，揭露他们对我国安全的威胁，同时，同他们开始对话，进行关于改善两国国家关系的磋商。对美国，在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我们对他们奉行的霸权主义政策并不姑息迁就，对他们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等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斗争。我们明确地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维护第三世界的权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积极支持七十七国集团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关于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斗争。我国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同印度的关系也开始有所改善。我国同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友好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国同日本、西欧的经济、贸易、技术等方面的往来正在稳步地扎实地发展。总之，由于对外工作的方针更加明确更加完整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得更好了，加上国内政治局面日益安定，经济情况日益好转，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也更大了。

在对外活动中，我们经常讲两句话：一句是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对外政策的总方针。超级大国争霸，受害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了解、友谊和团结、合作，是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全世界一百六十多个独立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有一百二十多个，占了百分之七十以

上。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非洲国家有五十来个，又占了百分之四十。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次访问非洲，就是想比较集中地加强对非工作，为开创对非工作新局面准备条件。所以说，这次访问，是贯彻执行十二大制定的对外工作方针的一个重大步骤。

二、为什么选择这十一个国家

这次访问，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还债”。一九六〇年以来，非洲有四十三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来我国访问过，其中，最近两年间来访的就有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六十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以后，虽然李先念同志在七十年代也访问了非洲四国，但政府首脑没有回访过，“欠债”很多。这次不可能一下都还清。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访问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几内亚、扎伊尔、刚果（布）、赞比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肯尼亚十国。后来由于对方坚持要求，又加上了加蓬。其实，在我们访非的消息传出以后，就有不少别的非洲国家提出希望我们也去访问，实在难以一一安排，只好婉言告谢。

为什么选择这十一个国家？这是有考虑的。主要是它们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各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十一个国家，地处非洲的北部、西部、中部、南部、东部等不同地区，幅员有大有小，独立有先有后，政治倾向和经济政策各不相同，都是我国的友好国家。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人口最多，独立最早，同我国建交最早，1973年中东战争后同苏联关系破裂，逐渐同美国接近，戴维营协议后它在阿拉伯国家中处境相当困难，但在阿拉伯地区有重要地位，在中东问题上有重要影响。阿尔及利亚在争取独立的七年抗法战争中，我国曾大力给予支援，它独立后与苏联关系较好，在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中影响较大。摩洛哥同美国关系密切，在非洲和阿拉伯“温和派”国家中有代表性。几内亚是黑非洲独立最早、同我国建交最早的国家，前几年与苏联关系较好，杜尔总统是黑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元老之一。加蓬同西方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扎伊尔是中部非洲的大国，与美国关系较多。刚果是中部非洲同我国建交最早的国家，同苏联订有“友好合作条约”。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都是前线国家，我国给予经济援助较多，卡翁达总统和尼雷尔总统都是黑非洲老一代的政治家。津巴布韦独立才三年，在争取独立的年代里，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给以大力支持，它对我国也特别友好，独立后执行种族和解和团结白人的政策。肯尼亚在黑非洲国家中属“温和派”，同西方国家关系密切，近几年来同我国关系有发展。总之，这次访问的十一个国家，各有各的特点。访问这些国家，表明我们愿意同所有非洲国家积极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有选择地访问各种不同类型的非洲国家，对于全面地、有比较地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学习他们的长处，进一步做好对非洲的工作，也是有必要的。

三、访问的主要成就

这次出去，二十九天，访问了十一个国家。日程很紧，主要是会谈。国际形势，非洲形势，双边关系，都谈了。我们和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回国之前，我对中国的记者同志讲了，至少在七个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点：第一，大家都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第二，都反对大国主宰小国，反对强权政治。第三，都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第四，都主张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第五，都主张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第六，都主张采取实际步骤开展南南合作。第七，都愿意积极发展彼此间的双边关系。这些共同点，是今后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和协调行动的基础。因此，访问是成功的。

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共同点？是不是会谈"谈出来"的？当然不是。有两个大前提：一个大前提是，中国和非洲都属于第三世界，遭遇相近，处境相似，利害一致。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共同语言。再一个大前提是，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采取的政策是符合中国人民、非洲人民、世界人民的利益的。否则，一驳就倒了，不可能有说服力。这两条是根本的。没有这两个大前提，访问不可能有这样好的结果。

当然，会谈也有会谈的作用。有些事情，不说不大清楚。当面谈谈，可以增进了解，消除隔阂。事实上，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在某些问题上确实有些不大放心，想知道我们的底。有些是带点共同性的，比如说，中国究竟是反一霸还是反两霸，中国是否继续重视第三世界的穷朋友？有些则是不同的。一些同苏联关系比较紧张、同美国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对我们同苏联开始对话以及在售台武器问题上对美国展开斗争不理解，怕我们的政策变了。另外有些国家，同美国关系比较紧张，接受苏联援助较多，怕我们简单地"以苏划线"，另眼相看。这次见了面，就针对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谈。当然，不能到这个国家谈这一套，到那个国家谈另一套。那不合我们的原则。我们是全面谈，实事求是地谈，把原则谈清楚。中国反两霸，不是反一霸，因为客观上存在着两霸，两个超级大国都在搞霸权主义。苏联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等地搞霸权主义，美国在中东和南部非洲等地搞霸权主义，两霸都在全世界争霸，两霸都在非洲插手，这都是客观事实。苏联虽在局部地区被迫处在被动防守地位，但苏攻美守的总态势并未改变，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总估计也没有改变。苏联仍在威胁中国安全。我们侧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绝不意味着不反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坎昆会议上，在选举联合国秘书长问题上，在中东和南部非洲问题上，我们都同美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管哪个超级大国在哪个地区、哪个问题上搞霸权主义，中国都反对。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国都支持。中国反对两霸，不是无原则地搞平衡，搞等距离，而是具体分析，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主持正义。从形式上看，在美国插手的问题上中国的政策似乎同苏联有某些接近点，在苏联插手的问题上中国的政策似乎同美国有某些接近点，这是不难理解的。同样，第三世界各国，有的对美国斗争多一点，有的对苏联斗争多一点，我们也是理解的。有些国家从苏联方面得到一些援助，这并不影响我们同他们的友好关系。当然，作为朋友，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他们，在前门拒狼的同时，最好也提高一点警惕，注意后门防

虎。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持反霸；在双边关系上，我们愿意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平相处。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违反了中美建交公报，中国当然应当维护自己的主权。苏联领导人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谈当然是可以谈的，关键是要有实际行动。即使国家关系不那么紧张了，能够睦邻相处了，只要他们不放弃霸权主义政策，我们就决不停止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国在处理自己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时，不是从中苏、中美关系出发的，而是从第三世界的共性、共同利益出发的，因此，中国同他们的友好关系是稳定的，有牢固基础的，不受国际风浪影响的。中国永远和第三世界国家同命运，共呼吸。我们反对两霸的坚定立场和各项对外政策，就是从第三世界的共同利益出发的。坚持中非友好，是中国既定的国策。我们到非洲来访问，更具体体现了我们同非洲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决心和诚意。这次同十一国领导人会谈，他们都比较满意，比较放心。气氛很好，很亲切，开诚布公。谈了以后，彼此更了解更信任了。政治会谈所以成功，主要是靠实事求是，具体分析，这样做非常主动，很得人心。如果简单地“以苏划线”或“以美划线”，这次访问决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同十一国领导人直接接触，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不少情况。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即使是同某一个超级大国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也决不是同那个超级大国没有矛盾，更不是甘心受制于人。在双方领导人单独会谈的时候，这种情况表现得更明显一些。事实上，近几年来，不少非洲国家都在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逐步同两霸拉开距离，更加积极地奉行不结盟政策。我们在各次会谈中，着重阐明了我国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国无求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在独立自主地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这一点，我看对他们是有启发的。处理国际事务，就怕依附于某个大国。一旦独立自主的潮流蓬勃发展起来，超级大国肯定会越来越陷入困境。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估计。

刚才说了我们同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许多共同点。是不是我们同他们“毫无差异”了呢？那也不可能。关于某个国际问题，大多数国家同意我们的建议，但也有几个国家表示为难。我们表示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们介绍了背景，讲明了道理，即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转不过弯来，将来在一定条件下，对其中有些国家终究是会起作用的。我们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要给他们以继续观察、继续思考的时间，让实践来证明是非曲直。我们应当有风度，有气量，把眼光放远一点。

四、非洲的独立运动

非洲各国的独立运动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55年亚非会议时，非洲只有几个独立国家，现在已有五十来个。当然，独立了，还有维护和巩固独立的问题，这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非洲争取独立的斗争还没有最后结束。我所接触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对南部

非洲的问题都非常关心。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纳米比亚争取早日独立的斗争，一是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南非种族主义统治集团在美国支持下，一方面，在南非本土继续推行野蛮的种族压迫；另一方面，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对南部非洲的前线国家不断发动军事入侵和进行破坏、颠复活动。就在我们到达津巴布韦的前几天，南非当局指使破坏分子炸毁了莫桑比克通往津巴布韦的输油管，使津巴布韦的石油供应发生困难。

我国在南部非洲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的罪恶行径，坚决不同南非当局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们一贯反对美国在南部非洲问题上与整个非洲人民为敌的立场。过去，我们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安哥拉人民和莫桑比克人民的正义斗争。今天，我们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反对南非和美国把古巴从安哥拉撤军作为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军的前提条件，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应该联系起来。我们在赞比亚会见了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人盖恩戈布[1]，邀请了努乔马[2]主席访华。我们在赞比亚会见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坦博[3]，在坦桑尼亚会见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波克拉[4]，表明我们对南非所有反对种族主义的民族解放组织是一视同仁，而不是亲一派、疏一派的。我们对前线国家面临的威胁也表示关切。我们的立场得到了非洲各国的好评。现在，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正在进行艰苦的斗争。在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这场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北非阿拉伯国家共同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中东问题。事实上，这也是全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中东地区长期以来已成为一个火药库，这是帝国主义种下的祸根，也是超级大国争夺的结果。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中东爆发了四次战争，局部性的武装冲突更是经常发生。去年以色列公然武装入侵黎巴嫩，屠杀巴勒斯坦难民，至今仍拒绝从黎巴嫩撤军。中东问题的核心是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问题。以色列虽已被迫退出了西奈半岛，但仍然占领着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几十年来，中东问题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由于以色列当局凭借美国的靠山，自恃拥有军事优势，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在阿拉伯国家内部，由于两霸插手，也矛盾重重，主张不一，使问题更为复杂。经过黎巴嫩事件，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更加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去年九月，阿拉伯国家首脑在摩洛哥的非斯举行会议，通过了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八点方案，这是阿拉伯国家在中东问题上第一次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一个重要的新发展。

我国对中东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坚决支持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这次我在同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三国领导人的会谈中，重申了我们的原则立场，强调以色列必须撤出一九六七年所占的阿拉伯领土，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返回家园、民族自决和建立国家的权利应当恢复；在此基础上中东各国都应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对于一切有利于中东问题公平、合理解决的倡议和努力，我们都给予赞赏和支持。至于采取什么具体方式，我们尊重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作出的抉择。对非斯方案[5]，我们明确表示支持和赞赏，指出它是合理的，求实的，是全面、公正解决中东问题的

基础。我国的上述立场受到了北非三国的赞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6]还专程从突尼斯来到阿尔及尔，感谢我国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现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正处在艰难的时刻，我们相信，只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

五、非洲的团结问题

在我们访非期间，非洲国家领导人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非洲各国人民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历来是相互支持的。非洲各地区性组织一个接一个诞生。最重要的是，1963年5月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当时有三十一个成员国，现在已发展到所有已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二十年来，非洲统一组织已被公认为非洲团结的象征。

当然，非洲团结也不是没有问题。这本来也不足为怪。非洲各国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统治，彼此之间难免存在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独立以后，各国处境不一，内外政策也不可能相同。问题是超级大国一插手，情况就复杂化了。这就不能不影响到非洲的团结，影响到非洲统一组织的活动。

非统组织按惯例每年要召开一次首脑会议，第十九届首脑会议原定于1982年8月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举行。但由于西撒问题、乍得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使会议无法召开。各国领导人在同我们的会谈中都为此表示忧虑，认为这是非统组织“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甚至尖锐对立，但他们都表示要继续努力，积极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7]提出“必须挽救非统组织”。刚果总统萨苏[8]说，已派人同各方接触，寻求解决途径。扎伊尔总统蒙博托[9]表示要坚决维护非统宪章。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虽然在西撒问题上相互对立，也都表示要维护非统组织。肯尼亚、几内亚等国领导人还明确地指出，是大国对非洲事务的插手，加深了非统组织的矛盾，使非统濒临分裂。肯尼亚总统莫伊[10]表示，他作为非统组织执行主席，将为非统首脑会议的召开继续努力。前几天有消息说，非统十二国接触委员会已在肯尼亚开会决定，非统第十九届首脑会议将在今年五六月间在埃塞俄比亚开会。我们为此感到欣慰，衷心希望会议得以顺利召开。

在访非期间，围绕着非洲团结和非统复会问题，我们作为非洲国家的朋友，尽力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非洲团结，对于非洲国家来说，确实太重要了。这是同非洲的前途息息相关的大问题。非统组织万一瘫痪，对非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对谁有利呢？仅仅对唯恐天下不乱的超级大国有利。第三世界内部也会有矛盾，有争论，但这毕竟是朋友之间的问题。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则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利益。我们对各国朋友都说，希望大家都以大局为重，求同存异，耐心协商，互谅互让，以解决分歧，维护团结。中国不介入非洲国家内部的争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外来势力插手非洲事务。维护第三世界内部的团结，反对超级大国干预第三世界内部事务，这是反霸斗争的一项长期任务和重要组成部

分。各国领导人都对我国的立场表示赞赏。今后，对于非洲国家之间以至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纠纷，我们仍应坚持这一方针。

六、关于经济技术合作

这是会谈的重点之一。

非洲各国都在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非洲的自然条件相当好，幅员广大，森林多，草原多，可耕地多，气候好，各种矿藏非常丰富。建设是很有前途的。我们访问的十一个国家，在经济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但也遇到了困难。有些国家，像几内亚、坦桑尼亚、扎伊尔、赞比亚，困难相当大。在我们同卡翁达[11]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的当天，赞比亚宣布货币贬值百分之二十。访问坦桑尼亚时，正值桑给巴尔独立日，他们的领导人在庆典大会上向群众宣布，坦桑尼亚的经济“生了重病”，“要吃苦药”。其他一些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些困难。他们的困难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如缺乏资金，技术落后，管理跟不上等等，这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在由穷到富的前进进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困难。要探讨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也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中转嫁负担。恐怕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是不受经济危机波及的，而且仍在继续受到冲击。现在他们都在研究改革国际经济关系和开展南南合作的措施。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刚果、坦桑尼亚等国，还在总结建设经验，调整经济政策。我们在访问期间，也向某些国家的领导人介绍了一些我们自己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

非洲国家在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正在调整经济，自己也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双边的经济技术合作问题究竟应该怎样处理？他们会提出一些什么要求，我们能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双边会谈的结果会怎么样，这是出访以前比较担心的问题。国务院为此召集有关部门专门进行了多次研究。过去我们对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对他们发展民族经济很有帮助，对加强中非友谊起了巨大的作用，影响非常大。而且应当看到：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也有力地支持了我们；我们在今后的四化建设中也离不开第三世界。当然，过去在具体工作中也确有一些问题，个别项目规模过大，超出了我们的国力，经济效益也不那么理想。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对这次出访中有关经济事务的谈判作了三点决策：第一，对已经建成的项目，应该帮助他们维修，继续提供零配件，并主动向他们建议提供管理服务，充分发挥这些项目的经济效益。对已经承担建设的项目，必须保质守约，认真建好。第二，对最困难的和特别需要帮助的朋友，应在可能范围内提供必要的援助。主要是搞一些投资少、效益好、影响大、直接为当地人民服务的项目。第三，总的来说，今后应当把重点转到以互利为基础的经济技术合作上来。因此，决定主动向非洲国家提出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如果主要搞单方面的援助，那是难以普遍、难以持久的。互利合作，路子就可以越走越宽。他们有我们需要的原料，我们有适合他们的技术。我们还可

以提供设备，进行技术服务和管理服务。可以合资经营，也可以合作生产。打开思路，积极探索，肯定是可以找到不少门路的。上述三点决策，都不是为了敷衍他们，而是切合我国和非洲国家实际的、我们能够做到、他们又能得到实惠的办法。

在会谈中，我们提出了这些主张，反映是好的，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他们也通情达理，一般都没有提出过高的要求。几内亚的杜尔[12]总统同我们会谈时，第一句话就说："几内亚经济有困难，但中国也有困难。"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公开向自己的干部和人民说，中国过去是在自我牺牲的情况下向非洲提供援助的。有些国家，还向我们提出了合作开采某些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以及合办中小企业等具体建议。我们准备在进行考察以后，再同有关国家进一步商讨。当然，这也要经过试验，积累经验，由小到大，由易到难，稳步发展。但态度必须积极，工作必须抓紧。四项原则，是真的，不是假的。各经济技术部门，驻外使馆，都应当深入调查研究，努力探索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的新领域和新途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凡是对方有需要，我们有能力，对双方都有利的事，就应当积极去研究，去探索。

在会谈中，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我们根据上述精神，一一作了处理。有些项目，已投产多年，需要维修或提供零配件，我们同意加以安排。关于坦赞铁路，我们向坦、赞两国提出了愿意帮助他们搞好经营管理的建议，不久将由三国有关部门举行专门会谈。扎伊尔今年到期的一千万美元借款，我们同意他们用当地货币归还，把这笔钱转为双方合作项目的中方投资。对津巴布韦，我们同意再增加二千万元人民币贷款。对肯尼亚体育场的建设工程，我们也同意增加约一千五百万元人民币贷款。这十一个国家，除扎伊尔外，我们在双边贸易中，都是出多进少或只出不进，他们希望我们多进口一些商品，我们表示将积极予以考虑。摩洛哥要求增派医疗队，我们也同意了。这次在会谈中议定的具体事项，主要就是这些。

会谈了，下一步就是落实。有的要进行考察论证，有的要付诸执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牵涉到各部门、各地区，相当复杂，一定要组织好，配合好。过去我们有些事情，效率太低。前年穆加贝[13]总理访华，谈定了几个项目，一年过去了，进展不大。这次到津巴布韦，穆加贝总理又提了出来，我们只好作自我批评。凡是办不到的事，就不应承诺，这一点，大家现在比较注意了；已经承诺了的事，我们必须采取负责态度，这一点，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今后都应特别注意。

进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对国内工作无疑是一种促进。但归根到底，要把对外工作做好，基础在于国内。自己有实力，有长处，有技术，有管理经验，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就什么都好办。因此，务必抓紧国内工作，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七、关于中非友好

这次访问，我们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中非友好深入人心。我们所到之处，无例外地都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隆重的欢迎。今天，我要借此机会，代表中国政府，再一次向非洲十一国政府和人民表衷心的感谢。

这次访问，受到了非洲舆论和世界各国舆论的密切注意和广泛重视。他们在评论中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是一次“赢得人心”的访问。他们指出，中国通过这次访问，“再次表达了对非洲正义事业的支持”，进一步“肯定了中国同第三世界的传统友好关系”，“为中非友好合作打下了新的牢固的基础”。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许多非洲国家，尽管我们这次没有前往访问，他们的社会舆论同样对我们的访问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一次对整个非洲大陆的友好访问。许多非洲报刊，用最美好的语言称颂中非友谊，他们说，中国是非洲国家的“患难之交”、是“靠得住的朋友”、“全天候的朋友”。

确实，中国在非洲的形象非常好。这是非常可贵的，是我们多年工作积累的结果。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如此信任，是对我国长期以来对非工作的最好的验证，证明我们的对非政策，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符合非洲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当他们进行独立战争的时候，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独立。在他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积极帮助他们建设。非洲朋友们如实地指出，中国对他们的支持和合作，同某些大国根本不同：中国从来不附加任何条件，从来不指手划脚，从来不干涉他们的内政。有的国家的领导人还说：中国不仅教他们“捕鱼”，而且教他们“养鱼”。他们对中国如此友好，如此信任，使我们更加体会到中非友谊的可贵。中非友谊来之不易。我们珍视中非友谊，就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毛主席、周总理为我们制定的中非友好的方针，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一正确的方针。

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如此之好，也是同中国在非洲的工作人员的献身精神分不开的。我们在非洲的技术人员、工人处处都受到称赞，我们的医疗队员被称为“最受欢迎的人”。他们守纪律，有道德，勤奋工作，艰苦朴素，勇于克服困难，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时刻都在为发展中非友好添砖加瓦。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使非洲人民直接而具体地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我代表国务院向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并且希望我国今后一切到非洲和其他国家去工作和学习的同志，都来发扬这种优秀的品质和作风。

国务院认为，在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在全体人民群众中，都要进行中非友好的教育。这要成为一项经常的工作。一切中国公民，都要以中非友谊为重。我们还应该教育青年和儿童，教育我们的后代，使中非友好事业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

注 释

1．盖恩戈布（Hage Gottfried Geingob，1941—），时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人组党）副主席，反对当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西南非洲的统治，支持西南非洲（后更名为纳米比亚）独

立。

2．努乔马（samuel Daniel shafiishuna Nujoma，1929—），时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1990年当选纳米比亚独立后首任总统，连任至2005年退位。

3．坦博（oliver几mbo，1917—1993），南非黑人解放运动领导人，时任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主席，1991年当选为非国大全国主席。

4．波克拉（John Pokela，1922—1955），时任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非泛大）主席，主张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当地非洲人把南非称为阿扎尼亚，意为黑人之国。

5．非斯方案，1982年9月在摩洛哥非斯举行的第十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以沙特建议为基础的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八点方案，事实上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和以土地换和平的构想。

6．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1929—2004），时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曾任巴解法塔赫领导人，巴勒斯坦武装力量总司令，巴勒斯坦总统。1994年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7．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1922—1999），时任坦桑尼亚总统。曾任坦噶尼喀总理、总统。1964年与桑给巴尔合并后，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任总统，1985年辞职，由姆维尼继任。

8．萨苏（Denis sassou一Nguesso，1943—），时任刚果（布）总统。曾任刚果（布）劳动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

9．蒙博托（Mobutu 565'seko助ku Ngbendu wa za Banga，1930—1997），时任扎伊尔总统。曾任刚果国民军参谋长、总理兼国防部长，并将刚果更名为扎伊尔。1997年被卡比拉推翻下台。

10．莫伊（Daniel arap Moi，1924—）时任肯尼亚总统。曾任地方政府部长、内政部长。

11．卡翁达（Kenneth David Kaunda，1924—）时任赞比亚总统。曾任北罗德西亚人民大会党总书记，民族独立党主席，不结盟运动主席。

12．杜尔（AhmedS亡kou TOur已，1922—1954），时任几内亚总统。曾任几内亚政府主席，民主党总书记。

13．穆加贝（Robert Gabriel Mugabe，1924—）时任津巴布韦总理。曾任津非洲民族联盟总书记、总裁、解放军总司令，总理兼国防部长，总统，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主席。

军队搞点农副业生产有利于丰富供给和减轻民负*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参观全军农副业生产和蔬菜及绿化展览时的讲话要点。

你们的展览很丰富多采。

军队搞农副业生产，丰富供给，减轻民负，利国、利民、利军，过去讲保障供给，现在供给已保障了嘛，应当讲丰富供给。

军队农副业生产，第一是成绩很大，第二是潜力很大。全军粮食生产平均亩产才四百斤，现在全国南北方都不是四百斤了。要在现有基础上，挖掘潜力，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发展多种经营。

军队生产也要讲究个办法，把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地方搞责任制，军队怎么搞？当然不能像地方那样，谁包收入归谁，谁包就可以先富起来。但包还是可以包的，包就是包责任，实行定、包、奖。打仗可以分任务，包山头。搞工程也可以包，承包点劳务嘛。（万里：像六十六军那样承包引滦工程）。搞生产也要有明确的责任，可以搞奖励吧！精神奖与物质奖相结合。

军队搞生产有它的特殊的规律，要靠你们很好研究。

人员要专业化，不要调来调去，锄了草就走了，搞不好，彼此不分责任。老换班，浪费很大。小平同志讲机械化，机械化搞好了，可以减少生产用兵，这也是一种节约。

北京部队在华北平原引种“汕优二号”杂交水稻，是个新闻，“汕优”杂交水稻对气温要求很高，北方种能行吧？是不是因为去年华北地区气温比较适宜？今年可以再试验一年。如果你们的经验能推广，将对北方水稻增产起重要作用。

腌制小菜成本高吧？我在成都看了给西藏的脱水菜，不知为什么成本那么高？在外国，如保加利亚，脱水菜已经商品化，可以大量供应。伊朗大量进口的就是保加利亚生产的脱水菜。要降低成本，才能普及。这些小菜上没上市，可以上市嘛！你们的小菜到市场上卖，我就去买。

你们的绿化搞得不错，人民解放军就是要为绿化祖国多做贡献。（万里：要做排头兵！）

必须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汇报时的讲话。

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对整个形势的看法。

现在形势很好，多年来没有这样好的形势。但是，现在需要考虑，这么一种好的形势如何保持它继续健康地发展下去，避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好形势好景不长”的情况，关键就是要控制基本建设的规模。我们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像今天这样好的形势。当然，就其深度、程度、特点不完全相同，但是历史上不是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形势，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形势都很好，但好景不长。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形势一好，基本建设规模就大上，就失去控制，最后破坏了这种好的形势，有一些甚至被迫再进行调整。现在我们在这种形势好的情况下必须要控制基本建设的规模，绝不要再重复出现形势一好基本建设就失去控制的情况，要汲取过去的教训。

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是讲总规模不能多，但是在基本建设规模里面，重点建设必须增加。不仅保证重点项目，还要加强，不如此，就不能为下一个十年打下基础，我们的四化建设就要出现困难。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这个问题，计委同志都拥护这个意见。既然重点建设规模必须增加，因此就要下决心压缩地方上和各部门一般性的基本建设，这一点很不容易，关键是中央要下决心。我们中央是有威信的，中央下了决心是可以控制的。我们过去多次调整，中央下了决心都调下来了嘛，既然规模大了都可以下来，为什么不可以控制呢？关键是中央下决心，常委下决心。问题关键不在计划委员会，关键是中央常委的决心。部门的问题、各地方的问题光有计委不行，人家不听计委的，如果中央决心下了，我认为是可以控制住的，大家也会拥护的。但是，这件事也会使地方上有相当大的抵触，部门相当大的抵触，原则同意，具体不赞成是相当普遍的，遇到具体问题就很难办。

另外，为了避免过去的教训，我主张技术改造要放宽一些。技术改造也可能出一点问题，什么基本建设混进去啊，对外重复引进啊，但是无碍大局。基本建设要严，技术改造要搞活一点，避免出现另外一种倾向。而且前十年抓技术改造也是为后十年振兴做准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前十年关键是三个问题：一是重点建设，二是技术改造，三是体制改革。前十年把这三件事真正搞好了，二十年翻

两番大有希望。

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计委、经委要明确分工：计委主要抓两件事，第一长远规划，第二基本建设，特别是重点建设。小平、耀邦同志都批评过，我们在重点建设问题上抓得不够有力，进展不快，现在这种抓法不行，必须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抓一百五十六项那样，集中抓，那时有很大一个班子，很集中，特别前期工作做得比较好，选厂址都搞得比较好。计委必须用很大力量抓基本建设，设计问题，建设周期问题，选厂址的问题，按时投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对国家关系太大了。过去一种是不搞；一种是搞了抓得不紧，拖得时间很长；还有一种搞了毛病很大，后遗症很大。所以，要改变计委的工作，明确分工，一个长远规划，一个基本建设。这两个搞不好打计委的屁股。年度计划的执行，特别是技术改造放手让经委去搞。当然，这样一来工作上会有一些矛盾，但不影响大局。现在计委工作负担太重，什么事都集中在计委，就不可能把主要的事情抓得很实在。

第二个问题，财政收入这样少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

过去我们国家多年来的情况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多，现在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六。现在要农民富，要企业富，我都赞成，但是还有一条，你富国家也得富，光讲农民富，光讲企业富，不讲国家富不行。当然，一般讲农民富、企业富，国家就可以富，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情况。现在是农民收入年年增加很多，企业收入年年增加很多，国家收入增不上去。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随着企业收入的增加，国家收入必须要增加。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果没有国家财政来调整投资方向，搞重点建设没有多大希望。光靠大家钱很多，大家联合干还不行，不仅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不行，就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行，资本主义国家建设周期比较长的工程，如铁路也好，矿山也好，电站也好，新型工业也好，都是靠国家投资搞起来的。财团、资本家搞的都是加工工业，包括美国，美国西海岸开发也是国家投资，日本铁路国家投资占很多，电子工业也是国家投资；至于英国、法国，这种工业是国有的。交通、大型能源建设这些大型项目想靠下面自发搞起来，那是不可能的。

在国家财政里面，中央掌握的收入和地方掌握的收入的比例也必须改变，中央掌握太少。过去我在地方是代表地方讲话的，前天我向小平同志讲了，因为中央掌握的财政过少，现在已经妨碍了中央制定的统一政策的贯彻，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现象。中央掌握的钱少，下面又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政策要中央考虑，比如知识分子要提高工资，钱谁来出？地方出还是中央出？国家进口粮食亏损的钱地方出还是中央出？进口棉花亏损的钱是中央出还是地方和工厂出？最典型的例子是，山西的综合采煤机，我们花了几十亿美元，搞了一百套综合采煤机拿到山西和各地用，这就发生个折不折旧的问题。现在山西使用没有折旧，这不是笑话吗？为什么没有折旧？谁来负担？折旧可以，中央出钱，要煤矿出钱山西省委不答应，因为影响他的财政收入。又如耀邦同志经常讲的一个问题，有些地方粮食卖不出，有些地方没有粮食；没有粮食的地方向中央要，为什么？就是因为粮

食多的省要把粮食调出来就得议价算账，调人粮食的省要求按牌价给他，这就发生了一个补贴问题，十亿斤粮食就要补一亿五千万元，这个钱谁来出？这种现象已经影响到政治上的统一，影响到政策上的统一贯彻，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再发展下去，就会影响国家统一，出现南斯拉夫那种现象。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外国对中国的调整评价很高。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并不是不知道南斯拉夫的经济必须调整，一九八○年久拉诺维奇[1]到我国来，他主动讲经济必须调整，但他搞不下去。南斯拉夫经济应当怎么搞他们是知道的，但搞不动，中央讲话要跟地方协商，讲来讲去，地方不赞成就有否决权，一直到现在调整不了。当然，他们也提出要决心调整。我认为财政问题不简单是财政问题，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必须有财政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政治上统一将来可能发生问题。所以，国家财政收入如果不进一步增加，财政收入里面中央财政不增加，一定会影响四化建设的进程。

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原则同意的话，具体办法还要进一步研究，尽量采取地方上同意的办法。

第三个问题，对企业的政策。

我觉得对企业的政策应该是两条：第一条，要承认企业的利益，要给企业以活力，调动积极性，不要把手脚都捆起来，让他们在改善经营管理，挖掘潜力方面有所作为。第二条，对企业必须要有压力，必须把担子压在身上。在我们国家改革绝不能走企业轻轻松松可以发大财的路。如果轻轻松松就可以发财，不可能调动先进企业的积极性，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企业家。现在我们进行改革都是谈判，哪个方案对我有利我接受那个方案，那个方案对我不利我就不接受，不是要改变吃大锅饭吗？那我还吃大锅饭。要不然就答应我什么条件，要不然就吃大锅饭，这不行。因此，要立法，一是要这么搞。外国搞税收并不征求企业意见，国会一通过税收就加上去了。据我所知，国家对企业的条件中国是很宽大的，除了过去吃大锅饭以外，现在条件也非常宽，比较优惠。所以，说“中国对企业太温和”那个话我是赞成的。我最近看了匈牙利的材料，匈牙利对企业相当厉害，一方面开个口子，另外就逼它，所以企业不改进经营管理，不努力工作，这个企业就混不下去。外国是自然淘汰，企业家有进取心，我们改革的结果也必须是真正鼓励先进的企业，而不能随便什么企业都得到奖励。如果是随便什么企业都可以得到奖励，对我们国家不利，而且也搞不起。

一个动力，一个压力，不能随随便便就增加很多收入。这两年企业也没有改多好，但钱可比过去多多了。最近三年，每年银行存款增加一百亿元。现在银行存款一共三千六百亿元（包括积压物资），其中属于存款二千一百亿元；各级财政的存款七百亿元，企业存款七百亿元，城乡个人存款近七百亿元。有些企业没有改善什么管理，奖金发得很多，企业富起来了，但国家搞得很穷。因此，对企业要讲两条：一个我给你活力，不能把手脚都捆起来；二是担子不能太轻，使他们有压力才行，我们改革要朝这个方向努力。

第四个问题，关于奖金封顶问题。

这个问题有一段过程。一九八○年主张不封顶，那一年搞的结果效果不好。因为奖金问题在企业内部发放很不合理，不封顶，发得很多，更加剧了不合理。一九八○年下半年觉得不行，一年增加三十多亿元，因此就要调整，把奖金就封顶了。一九八一年下半年，全国出现财政包干，由于当时财政分不下去，首先是辽宁的经验，以后是天津经验，以后北京、山东也要求，财政对企业包干，当时我也很赞成，包干以后封顶问题有一部分突破了。这个突破也要作个分析，现在看来有一部分效果好，有相当多的效果还是不好。所以，一九八二年又统统稳定在前一年的水平上。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一，封顶不是个好办法；二，必须具备很多条件以后才能不封顶，在条件没有具备的时候，还不得不封顶；三，要根据现在的情况分别对待，可以不封顶的如井下工、搬运工。如果仓库没问题，运输没有问题，可以搞计件工资的，还有很多先进企业，确实管得很好的，可以不封顶。有一些现在还没有条件的地方，要先创造条件，然后才解决不封顶的问题。现在不能笼统提不封顶，如果笼统提不封顶，搞不好又是几十个亿抛出去了，这就为下一步改革工资造成新的困难。要搞一个方案，哪些封顶，哪些不封顶，准备在工交会议上讨论，然后在书记处定案。

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下，即使将来不封顶了，国家对消费基金（工资、奖金）还必须有一系列控制和节制的办法。企业不能完全自由。匈牙利有个节制的办法，我认为是好的，我是赞成这个办法的，但是，我们的条件不具备。匈牙利什么办法呢？企业在工资上有很大的自主权，经营的好，可以多发工资或奖金或分红，但有一条，国家有一个工资总额，比如这个企业一万元工资总额，可以超过，但每超过一块钱就要交给国家两块钱；一百块钱实际上只能多发三十元。什么道理呢？消费基金扩大了，国家为了解决购买力，需要准备物资。我主张我们用累进税的办法加以控制。一，将来企业工资应当和企业经营的好坏挂钩，经营得好多发，经营得不好低一点；二，工资发多少，将来不封顶时也必须有一个节制办法，消费基金完全失去控制就叫没有计划。对这个问题就我所接触的改革家没有一个人说社会消费基金可以不加控制。

我们现在说的封顶是对一个行业、一个企业来讲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封顶，按人不封顶。首钢也是封顶的，当然它标准高，三个月的工资。按人是不封顶的，有人得的多，有人得的少，现在全国都是这样，企业封顶，人不封顶。将来企业不封顶了，也要有一系列控制办法。采取什么办法，再研究制定。

注 释

1．久拉诺维奇（Veselin Duranovi亡，1925—1997），时任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曾任南斯拉夫总统。

搞好水利建设发展旱作节水农业*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陕西考察时的谈话纪要。

搞农业，搞水利，也要进行决策论证，进行可行性研究。

关于黄河中上游的水利工程，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初步设想，如大柳树（或黑山峡）水库，万家寨水库，龙门水库，以及小浪底水库等等。这对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解决工业用水，以及根除黄河下游隐患，会有重要的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全面统筹，综合论证。第一要算水账，第二要算效益。水就那么多，这个水库浇了多少地，那个水库还能浇多少地？上中下游都要用，水到底够不够？如果不够，就要研究用到什么地方合算。反正就那么多水，是浇沙漠，浇丘陵，还是浇旱原？这就要论证，看哪些工程投资少、经济效益大。

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不大讲投入产出，不大讲成本核算、经济效益。工业不讲，农业更不讲，今后要改过来。无论工业农业，都要树立经济效益的观念。搞农业、搞水利，同搞工业一样，也要进行决策论证，进行可行性研究，提几个方案，加以比较，选择最佳方案。这样，可以提高我们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也不至于浪费农民的积极性。

中国农业不能都靠灌溉解决问题，要十分重视群众搞旱作农业的经验。

水利电力部的专家们说，龙门水库的地质工作已进行了八年，现在选的坝址比较可靠。把龙门水库修起来，据说可以浇一千万亩地，渭北就可以变成一个大粮仓。

看来，龙门水库也可能要上。但是，渭北的同志不要把宝押在修龙门水库上，因为至少在近期内用不上。即使上，这么大的工程，从设计到施工，从建成枢纽工程到渠道配套，要多长时间？恐怕在二十年内不一定用得上。过去我们常常把问题看得很简单，好像一修水库，什么都解决了，其实需要很长时间，近期内指望不上。我看，渭北，陕北，都要好好研究旱作农业的经验。这是最现实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很重要。但同时要确立一个基本观点：中国的农业不能统统都靠灌溉来解决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水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南方的水多一点，但也不算太多。北方则严重缺水。农业，工业，都要用水。北方工业用水

这样紧张，好多同志在十几年前还无法想象。那时想得很简单，发展工业，盖工厂就是了，根本没有想到工业用水也会成为问题。现在不同了，大家都认识到了，工业也要用水，没有水，盖了工厂也没有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长远规划里，要认真研究水的问题，包括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问题在内。

不搞灌溉能不能解决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解决问题。国外有一种说法，年降雨量在四五百毫米以上，就可以不搞灌溉农业。怎么办？搞旱作农业。渭北地区，陕北地区，平均年降雨量有四百多毫米，五百多毫米，种两季作物水不够，种一季作物就够了。关键在于保墒。小麦并不是低产作物，保墒搞好了，一季小麦也有很大潜力。

这里的特点是春天旱，但秋季雨水集中。秋天把雨水积蓄起来，春天避免蒸发，就可以秋水春用。从西安到韩城，从铜川到延安，走一路，看一路，找干部谈，找技术人员谈，都有许多好办法。合阳县的水浇地并不多，但小麦长得很好。他们采取的办法，同山西壶关种谷子的办法差不多：秋天深翻，土质疏松，一次施足底肥（叫做“一炮轰”），吸饱水，春天不翻，蒸发少，墒情好，种上后一亩旱原就能收小麦五百来斤。黄陵县的示范农场把保墒问题同增加土壤肥力、进行精耕细作结合起来，一百亩小麦，亩产六百斤。这个农场的技术人员杨贵本同志说，过去，总以为黄陵的问题是“旱、粗、薄”，把“旱”字放在第一位，好像不修水利就毫无办法。经过几年实践，他们的认识有了变化，把这三个字颠倒过来，努力解决“薄、粗、旱”的问题。他们着重搞轮作，苜稽和小麦轮作，大豆和小麦轮作，油菜和小麦轮作，农家肥多了，土地由瘠变肥，耕作层由薄变厚，保墒也搞得更好了。周围的农民向农场学，普遍提高了产量，有一户还超过了农场，小麦亩产达到八百斤。延安也有许多好经验，如山地搞水平开沟种植法，沟壑筑坝淤地等。总之，要十分重视群众搞旱作农业的经验，从选择耐旱的作物和品种，一直到采用有利于保墒的耕作制度和栽培方法，都要总结，因地制宜，一块一块地推广。农业要一块一块地搞，不能千篇一律。中国的事情，就怕千篇一律，要搞大家都搞，要不搞大家都不搞。那种领导方法，不是好办法。

秋水春用这种保墒办法，对相当一部分地区是适用的。海南岛有的地方春天旱，种甘蔗出苗不齐，改为秋季种，甘蔗产量就提高了。四川武胜县，坡地上种苞谷，也是怕春旱。他们的办法是秋天深翻，开沟，施土杂肥，春天不耕，刨坑点种，就把墒抓住了。去年在山西听到了壶关种谷子的经验，今年在陕西又听到了合阳种小麦的经验，基本道理都差不多，对春旱而秋季雨水集中的地区是适用的。外国讲免耕法，我们中国在春旱严重的地方，恐怕可以搞点秋天深耕施肥、春天不耕法。目的是保墒，尽量减少蒸发。

搞旱作农业，大旱之年怎么办，能不能稳住？稳产这件事，只能是相对的，不能强调得过分。在农业产量问题上，我看哪个国家都稳不住。澳大利亚是个发达国家，农牧业现代化程度很高，去年大旱，它也没有办法。我们考虑问题，不能要求大旱之年也能稳得住，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只能要求在正常年景得到较高的产量。渭北地区是五年一大旱，三年一小旱。如果采用好的旱作经

验，三年正常，能打六百斤；一年小旱，收它四五百斤；一年大旱，只能得三百斤；那末，五年算总账，仍然可以平均打到五百斤左右。所以，搞农业，不能着眼于一年，要看平均数。我们搞计划，往往只讲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什么产量。其实，这很不科学，谁知道那最后一年是风调雨顺还是大旱大涝？有的国家现在作计划，已经改了，不讲最后一年达到什么产量了，而是讲五年平均达到什么产量。我看这种计算方法，比较合理。

节约用水应成为经济建设的重大政策。

近期内不能指望大水库。小的水利工程，还是可以靠得上的。扬程不太高的提水灌溉，在既有水源又有电力的地方，还是可以搞的。当然，要找出一个合理的限度，比方说在渭北地区，扬程在一百米或一百五十米以下的提水工程，看来还是可以搞的。超过了一定限度，扬程过高，就划不来了。

搞灌溉农业，必须十分注意节约用水。到底采用什么灌溉方法？大水漫灌，既浪费水，效果也不好，搞得不好，还盐碱化。中国的灌溉农业到底怎么搞？我们这个国家，尤其北方，要搞省水型的农业。节约用水，国内外都有一些办法。一种是把渠道衬砌好，一种是喷灌，一种是滴灌。陕西韩城的对岸是山西万荣县，据说万荣县的办法是在地里埋瓦管，渗灌。这一带，有煤有土，自己烧窑，无非是劳力投资。要算算账，把几种灌溉方法对比一下，成本如何，效益如何？节约了水，不仅降低了用水成本，而且可以扩大灌溉面积，也就等于多修了水利工程。这个里边，很有文章可做。中国水这么缺，工业，农业，都要节约用水。这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项重大政策。

一是研究节水的办法，一是实行节水的政策。不收水费，或者水费收得很少，节约用水就行不通。合阳县委书记说，他们那里的水浇地，每亩地浇一水，水费成本是六七元；浇两水，成本要十二元；还有浇三水的，成本达十八元。但有的根本没有向农民收水费，有的收了，也只是每亩收二元。大量的是国家补贴。这样不行。把灌溉建立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是不能长久的。农民没有买水的观念，节约用水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而且，旱原缺水，水是非常宝贵的，这里在等救命水，那里却在大量浪费水，矛盾也很大。

水利建设，过去成绩很大，但浪费也很大。长此以往，无以为继。今后水利建设要实行这样一条方针，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国家不共农民的产，农民也不靠国家的补贴吃饭。水利用工，应当给农民以合理的报酬，不搞无偿劳动。农民用水，必须向国家缴纳水费，不能老是由国家贴钱。也可以把水利用工作为投资，在农民用水时逐年扣除。我看，水费一定要收，而且不能把水费标准定得太低。收水费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可以推动大家节约用水。

发展农业要增强经济效益观念*

一九八三年三月

* 这是赵紫阳同延安地委负责人的谈话摘要。

延安这几年有很大的变化，也有很好的经验。现在延安开始欣欣向荣，令人振奋。群众和干部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听了很高兴。

你们要认真总结自己的主要经验。你们说，一是政策好，二是国家支援，三是措施、办法对头。很好，希望你们从这三个方面好好总结。

关键是政策。过去有些地方也想改变落后社队面貌，但没有从政策上去考虑，只是整干部，换干部，不相信当地干部。一九七七年以前，四川江北县就采取过这种办法，结果问题解决不了，越落后越整，越整越落后。改变面貌，主要靠政策。搞了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了，落后面貌也就改变了。所以，首先要有正确的政策，这是第一条。

国家给了你们一些支援。要总结如何用好这笔钱。国家力量有限，这些资金只能用在最困难的地方和潜力大的地方。要一块一块地搞，不要撒胡椒面。中国的事情就怕要搞都搞，要不搞都不搞。国家力量大，就多搞几块，搞大块；力量小，就少搞几块，搞小块。这也是毛主席老人家讲的抓两头。有了好的政策、措施，加上一些支援，一块一块地搞，就可以事半而功倍，一块一块地变。还要想点办法，使国家支援的这笔钱，又投放，又回收，能够周转起来，连续不断。

所谓措施对头，就是要讲效益。过去农业不讲成本，不讲投入产出，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农业今后也要搞可行性研究。就这么多财力、物力，用到什么地方合算，要比较，要论证。农业要树立经济效益的观点，因地制宜，选择最佳方案。这样，各级负责同志领导农业的水平就可以提高。

我觉得我们搞农业不能光走水利一条路。当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很重要。但是，要明确一个基本观点，中国的农业是不可能全靠灌溉的。我们国家也没有那么多水。中国十亿多人口，人均占有的水并不多，特别是北方，水就那么一些，灌溉也不能用那么多水。工业用水也厉害得很。华北在十年前还没有想到办工厂缺水。凡是不灌溉也能解决问题的，就不要靠灌溉。外国有个观点，年降雨量在四百毫米以下，才非搞灌溉不可。这里年降雨量在五百毫米以上，就要着重研究如何不灌水而夺得高产。因此，保墒很重要。你们这里有很多好办法。山地按等高线横向开垄，利于保水保土保肥，比纵向开垄产量提高五分之一，这是

一种好办法。你们讲的“一炮轰”（注：秋季深翻后，把农家肥、碳按、磷肥混合起来，一次垫底深施），我也很感兴趣。在渭北，合阳县的同志也讲了这种办法。渭北、陕北一带，雨量虽少，但集中在七、八、九月，这就为保墒提供了条件。秋季深翻，加上“一炮轰”，把水分积蓄起来，种上小麦，春季不耕，减少蒸发，度过了春旱，就好办了。四五百毫米雨量不算少，种一季作物是够用的，关键在于保墒。外国搞免耕法，我们在秋天雨水多、春旱严重的地区，可以搞秋天深耕、春天不耕法。我在渭北看了几个县，合阳水地并不多，但小麦长得很好。许多没水地的地方，产量并不比浇水的差。我看有两条，一是有保墒的经验，一是靠政策，搞了责任制。黄陵县农场有个农艺师叫杨贵本，大学毕业，他搞的一百亩试验田，小麦亩产上了六百斤。周围的农户跟他学，都增了产，有一户还超过了他，亩产达到了八百斤。他讲，他们那里过去讲“旱、粗、薄”，旱字当头，好像不修水利，就毫无办法。现在认识有了变化，把三个字倒过来，解决“薄、粗、旱”的问题。他们很注意轮作，搞油菜、大豆、首蓿同小麦轮作，地力肥了，耕作层厚了，对保墒也有利。保墒问题，同耕作技术、施肥方法有很大关系。过去老百姓对旱地不下工夫。现在实行责任制，农民中间蕴藏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他们是舍得下投资的。听说你们这里有些地方小流域治理搞得很好。坝地也是个好东西。你们要想些办法，既搞包干到户，又要使打坝不受影响。

山区退一些耕地，逐步还林还牧，搞多种经营，路子就宽了。要制止开荒，避免破坏生态平衡。西北要从根本上改变面貌，需要有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不可能一个早晨就都种了草，栽上树。要在由恶性循环变为良性循环的中转点上下功夫。平原多搞点粮食，山区才能少搞点粮食，逐步循环过来。你们这几年搞得很有成效，要好好总结一下，请西海固、定西的同志也来看看。

要搞智力投资。陕西也好，延安也好，必须搞智力投资，培养技术人员。不培养人才是难以上去的。延安地区最迫切需要的是中专，不是大学。全国大学本科多，大专少，中专也少，教育结构不合理。中专学生作用很大。现在工厂里做出成绩的，很多是过去的中专生。大学不要多搞本科，搞一些必要的大专，学二年。你们很需要中级以下的技术人员，高级的，可以同西安、北京商量，支援你们一些。你们这里重点要放在中专上。电视大学很好，去年全国毕业九万二千人，学得不错，都发了文凭，国家投资少。电视大学如此成功，是因为中国人用功。延安把转播工作搞好，许多人就可以进电视大学，你们还可以组织辅导中心，电视机一开，大家都来学。

企业改革要优先保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日

*　这是赵紫阳邀集出席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的鲁、沪、鄂、粤、川、辽、甘七省市负责人座谈时的讲话摘要。

你们说形势好，我也说形势好，但现在财政收入不上去，情况很严重。国家如果没有必要的财政收入，必要的重点建设如何上得去，经济怎能持续增长？八十年代不搞重点建设，九十年代能出现经济振兴吗？今年一二月份财政情况不好，工资、奖金增加，国家得小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大头，这怎么行？现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不一致，如果宏观经济没个出路，微观经济也不能巩固。财政收入的增长同国民经济的增长太不相称。去年工业增长百分之七点几，财政收入只增长百分之一点几。电力、原材料消耗那么多，钱到哪里去了？无非是下面得多了，或者是经济效益很差。我们国家历来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一，财政增收十亿元，这还是没有强调经济效益的时候。现在，提高经济效益问题已经讲了三年，财政收入还是上不去。

我们国家这么大，又不发达，如果不通过国家财政集中资金进行再分配，大的能源、交通项目怎么搞上去，其它必要的建设项目怎么上？增加财政收入，不是财政部要收入，而是国家通过财政进行再分配。集中资金，没有这么一个渠道，光靠联合集资，能行吗？小的项目联合集资可以办，真正要把最近二十年的建设搞好，大的重点项目仅靠联合集资是办不起来的。国家的财政收入是个极大的问题。总要想办法把国家财政收入搞上去。这里有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如同组织一个战役，总的方面打了败仗，你一个连、一个排打得再好，还是不行。现在是否局部讲得太多，整体讲得太少？放开眼睛一看，问题非常明显。从一个企业、一个地方看，好的例子多得很。但是，工资、奖金增加了几十亿元，财政收入没有增加，这样行吗？说民富国穷，那是虚假的，是昙花一现的。没有国家的兴旺，怎能有人民的富裕？当然我们也不能再搞竭泽而渔，重复过去的错误。但是国家财政收入不改善，国家振兴就不可能。我们国家虽然穷，但是地方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就在于能够集中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一五”期间如果没有一百五十六项，能有工业化的基础吗？八十年代不适当集中力量搞重点建设，能有九十年代的振兴吗？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要通过财政渠道，解决一个省、一个地方无力解决或者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集中暴露的是财政问题，但这涉及到一

系列问题。

过去几年，提高工资、发放奖金、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改善人民的生活福利，都是必要的，带有还欠账的性质。不如此，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调动，但应有个幅度。我们国家底子薄，现在还没有到强调福利的时候，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很多基础设施要搞，不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农民能一直富下去吗？企业一时富了能够维持下去吗？当然，我们也要牢记过去的教训，人民生活要逐步有所提高。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这一点，就不适合我国国情。我认为这是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当前全国形势确实很好，但要冷静地往前看一看，把各方面的关系摆正。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教育人民看远一点，支持国家重点建设，考虑到长远利益，要像“一五”期间搞一百五十六项那样。不然，我国经济不可能有持续稳定的增长，更不可能出现九十年代的振兴。

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认为是合理的，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什么叫按劳分配？过去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对，反过来一个月一下子就增加一百多元收入，这能叫按劳分配吗？由于价格不合理，或者由于长期落后，早就应该达到的水平达不到，结果一包，企业和职工的收入一下子大冒上去，这是不合理的。一个月奖金拿到七八十元，再加上原来的工资，相当于一个副教授的收入，这能叫按劳分配吗？有个家庭，一个儿子在先进企业，劳动纪律严格，经营管理也好，每月奖金有限，一个儿子在落后企业，搞了承包，奖金拿到六十元，一个牢骚满腹，一个“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能叫按劳分配吗？城市和农村情况不同，企业设备好坏、生产什么产品、卖什么价钱，都是国家规定的。这些情况不考虑，都“按劳分配”，合理吗？有的企业搞承包，头一年奖金七八十元，第二年没有油水，情绪又低了。我们实行这样的政策能行吗？政策要定在合理的基础上，积极性才能持久，如果不合理，积极性就巩固不下去。城市与农村的改革，原则都是要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但是城市要复杂得多。鲁西靠棉花发家，收购一百斤棉花，二十斤是牌价，八十斤是高价，所以很快就富了起来。南通长期以来就是棉花高产区，收购一百斤棉花，二十斤高价，八十斤是平价。鲁西的情况，南通的农民还不一定知道。城市就很不同。西单菜市场，卖菜的工作量最大，承包后还要扣发百分之二十基本工资，卖鸡的奖金可以拿到七十元，经理就不敢发，还得搞点平均主义。像农村“以副补粮”一样，卖菜的也要抽些人卖鸡，“以鸡养菜”。问题不是不能解决，但是比较复杂。什么叫“按劳分配”，概念要清楚。按恩格斯的说法，在同等条件下，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报酬。现在，得多得少，全是靠机会。城市改革既有迫切性又有复杂性，要经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现在的问题是要头脑清醒。城市要真正解决按劳分配问题，必须是价格体系要根本解决。这要有一段时间。

计件工资有个定额问题。我们的基础工作太差，好多企业搞平均先进定额搞不出来。计件还有个上下左右的问题。从一个厂看，实行计件好，但社会效益不一定好。因为有些产品销不出去，质量不好，有的这道工序上去了，那道工序上

不去。煤炭最好实行计件，但如果运不出去，一个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社会得不到效益。现在光讲理论不行，还要考虑现状。物价很不合理，企业组织结构很不合理，调整任务还很重。不考虑这些情况，孤立地去搞一些事情，出发点好，后果就不一定好。这种情况在工业里相当不少。比如，装卸实行计件没有问题，也可以不封顶，但也有个卸了以后能不能疏运出去的问题。货物不压在船上了，但又压在码头、仓库里，也不行。实行计件工资要具备条件，有的也可以在搞的中间创造条件。

看来利改税比包干矛盾要少一些，可以调动积极性。恐怕不能两种办法随他挑。有利就干，无利不干不行。利改税基本定下来，除少数企业外，基本是搞利改税。比较来讲，税收有利于处理三者关系，不用年年吵基数。改革的方向是税收不是包干。有人还建议，在价格没有调整以前，收货物税。不同商品不同税率，利高税高，利低税少。总之，从方向上，是走税收的道路。

工业企业同农业不同，是在大锅饭里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大锅饭不能完全解决。在我国，奖勤容易（这里的"勤"还有真有假），罚懒罚不下去。到时总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让他跳楼吧！奖易罚难这个问题要看到。最后变成搞得不好的，照吃大锅饭；搞得好的，另起炉灶，去吃小锅饭去了。这就很难办。现在企业存款累计达到七百亿元，而国家财政继续困难。

我们对企业不要捆死，这一条要坚持，但也不能给企业的条件太优越。一不死，二又不能太宽。改革不能光由死变活，还要由宽变严。严了，才能挑起担子。日本小林实讲："中国对企业的政策太温和。"这个话有道理。一个政策下来，有些企业可以搞得很好，有些企业紧紧张张、勉强过日子，有些企业很困难，这样才能促使企业千方百计改善经营管理。才能出人才。对企业又活又宽，我们搞不起；搞活给动力，搞严给压力。

现在形势很好，往前怎么搞，要很好考虑。以上讲的这些问题，都有联系。

从财政到企业，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改来改去，要增加财政收入，不然就改不下去。现在财政一年收入一千零三十亿元，基本建设三块钱顶不了过去的一块钱，问题大得很。基本建设除了战线长以外，这个问题也要认真研究。我们搞经济振兴，是真搞不是假搞，这些问题都有，要认真研究解决。现在，到处卡油，造价比过去高一倍两倍。一九五六年基建投资二百多亿元，等于现在的七百亿元。现在的五百多亿元，实际上顶不上过去的二百亿元，这个问题太大。现在的基本建设，百分之四十是非生产性建设，这也是需要的。人民拥护，大家高兴，但是这样搞下去，二○○○年的振兴就没有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国情、对现状的冷静分析。例如，农村把一切都说成双包的成果就不科学。如果不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不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情况又会怎么样？广东如果不调进十二亿斤粮食，还像过去每年调出三亿斤，你的大好形势会怎么样？这很清楚嘛！什么事情都要作科学分析。当然，在我们实行提价、进口、开放集市贸易等等的条件下，包与不包确实不大相同。我们对农村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是正确的。形势好了，往前考虑要作很好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话又说回来，还得搞重点建设，原有企业还要搞技术改造。要使经济振兴，人民富裕，还得在八十年代正确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要在人民当中进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教育，还要靠全国人民努力。要搞重点建设，在一定时期内不能不影响到人民的消费。当然，老勒紧腰带、竭泽而渔不行，但也不能只讲老百姓富，不讲重点建设；只讲眼前，不讲长远。这样很不符合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欧洲一些国家福利上得很高，已经很难维持，感到负担非常沉重，但又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尚且如此，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更不能这样搞。人民生活水平要逐步提高，但如果不搞建设，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能再提高了。

实行利改税，先收百分之五十五以后，税后利润采取各种办法，要照顾现有留利水平。企业有积极性。总的精神是积极推广。既得利益不合理的，不能保。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留利水平低，按百分之五十五收，还得减税或免税；第二种情况是留利多一点也多不了多少、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就不再搞税后利润分配。手续尽量简化；第三种税后还有很多利润，采取各种形式承包。第二种情况的企业，数量不要搞得太少。这部分企业基本保既得利益，手续要简化。对商业包干，要加强检查，不能转嫁负担，克扣消费者。不要商业职工叫好，老百姓骂娘。

改革无论如何不能搞运动。农村改革在全国那么大范围进行，改得很好。

很重要一条是大家都沉住了气，有思考、研究自己特点的时间。问题就怕沉不住气。过去讲形势逼人，逼好的时候少，逼坏的时候多，一逼就急，就沉不住气，慌慌张张往前赶。已经讲了，不搞运动，不搞突击，就比较好。凡是沉不住气的时候，事情没有搞好过。改革态度要积极，但有的地方可以快一点，有的地方可以慢一点，不要东张西望。过去，形势一好就大上，一大上就倒霉，还得调整。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屡次出现。现在头脑不要发热，这是小平同志讲的，已经讲两次了。

实行利改税，企业留利确实不合理的，要调整，不要怕影响积极性。

他的积极性不下来，别人的积极性上不去。严重不合理的，坚决改。

控制奖金，生产不一定差；多发奖金，生产也不一定好。奖金不封顶，今年至少要冒出去四十亿元，给今后工资改革造成极大的困难。个人不封顶，企业总额要封顶。匈牙利的改革，有两个东西控制很严：一是工资总额超支加税，超一块钱，征两块钱税，有三块钱才能增发一块钱。这很有道理，是宏观经济问题。二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征国家建筑税。“投资饥饿症”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是造成比例失调的重要原因。匈牙利企业很活，但对以上两个问题控制很严，不控制就会天下大乱。

奖金基金封顶是笨办法，是不得已的办法。必须充分估计企业的现状，有的企业干部思想作风不那么正，钱花了不少效果并不好。封顶不合理，但不封顶要有条件。凡是可以控制得住，同时对超过工资总额部分实行收税，可以不封顶。各地自己也可以搞个单行法，收累进税。不具备条件的，不能随便取消封顶。总

之，第一要逐步取消封顶，第二要有节制办法。工资可以浮动，但突破工资总额部分要收税。封顶问题要根本解决，还是要解决价格问题。

发展大好形势继续抓好工交战线的工作*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这次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开得是好的。会议期间，传达了中央常委、书记处批准的国家计委、经委党组《关于当前经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袁宝华同志作了报告，张劲夫同志召开了一些座谈会，讲了许多意见，万里同志也对会议提出一些意见，这些我都同意。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就当前经济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和看法。

一、发展当前大好形势，关键在于要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

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总的说是好的，是建国以来比较好的一个时期。要使好的形势继续发展下去，避免过去出现过的"大好形势好景不长"的情况，关键在于要控制住基本建设规模。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一九五六、五七年的形势是很好的，但到了一九五八年，一搞大跃进就不行了。经过调整，一九六四、六五年的形势也是很好的，但"文化大革命"一来，又搞乱了。造成这种反复的原因很多，从经济上看，最重要的是基本建设规模失去控制。我们的历史经验是：形势一好，就要大上，特别是上基本建设，铺新摊子；一大上就引起全面紧张，经济比例关系失调；实在搞不下去了，就被迫来个大下。这样就形成调整—好转—大上—再调整。这种反复折腾的现象，不应该也不允许再重复了。

我们党有个好处是，当经济上出现比例失调、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下定决心，全党全国一动员，就可以调整过来。一调整，经济形势就好转了。就拿这次来说，我们国家能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年那种经济形势下调整过来，而且正处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的。世界上不少国家对此都很羡慕，把我们这次调整迅速取得成效看成是一种"奇迹"。其实这种奇迹以前也出现过。一九六一、六二年那么困难，全党一动员，下决心调整，一九六三年形势就有明显的好转。我们这个党搞调整还是有力量、有办法的。世界上有些国家想搞经济调整，但做起来困难重重，收效不大。

建国以后，我们两次碰到大的困难，由于全党思想统一，行动一致，下决心

调整，形势很快就好转了。但好转以后往往又容易忘记。这次我们一定注意不要重复这个错误，再搞大上了。近来有些不好的现象已开始露头。一九八二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猛增一百多亿元。从历史上看，基本建设投资一年增加上百亿元，除这次外有过三次，即一九五八年、一九七〇年、一九七八年，都出了问题。去年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也潜伏着一个危险。这种趋势至今还在继续发展。如果不加控制，就会重新发生基建挤生产、挤维修、挤市场、挤生活的现象；就会引起物资的全面紧张，物价上涨，使已经形成的某种程度的买方市场再次失掉；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就会受到阻碍，难以继续进行下去。当然不是说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而是说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最近，邓小平同志两次讲到，形势好了，不要头脑发热。这对指导我们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十分及时，十分重要。我们在大好的形势面前，一定要接受历史教训，保持清醒头脑，做到“事不过三”。当务之急，是要控制住基本建设规模。只要基本建设的规模不铺得那么大，稳步前进，现在的好形势是可以保持和发展下去的。如果不接受教训，你上我也上，要上大家上，这样搞下去，恐怕再一次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一点，全党同志要从全局、从宏观上考虑，统一思想。

国外有人评论说，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一种通病，叫做“投资饥饿症”，喜欢争投资，搞基本建设，摊子铺得很大，而经济效益很差。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科学，但从我们自己三十多年的经验来看，确实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在我国经济建设史上，曾多次出现过由于基本建设规模搞大了，搞过了，导致经济工作发生挫折。

我们的方针是，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要控制，重点建设必须加强，技术改造还要放宽。因此，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压缩一般的基本建设，压缩计划外自筹资金搞的基本建设。打开窗户说亮话，就是压地方和部门的一般项目，保全国的重点项目。要使我们的建设规模与我国的国力相适应，并且能够集中人力、财力、物力，用于重点建设，同时用于技术进步。

基本建设规模怎样控制，需要进一步研究。现在首先要统一思想，使大家对整个形势有个清醒的、全面的认识。至于控制的办法，应当采取行政的手段，加强计划的控制，加强监督与检查，同时还要采取经济的办法制约。我是赞成抽建设税的。对计划外的基本建设，除了能源、交通等项目以外，一律要抽税，比如抽百分之三十的税，造价高了，他就少建一些了。抽建设税是一个办法，还可以采取其它经济办法。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发生两个问题：一是消费基金失去控制；二是基本建设规模失去控制。所以洲门采取收建设税的办法，所有的基本建设都要抽税。这些经验，我们可以参考。总之，要千方百计想办法、下决心把基本建设规模控制住。

二、全国要支援重点建设

要使我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经济振兴，必须从现在起，大力加强重点

建设。大家知道，如果没有五十年代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的建成，就不可能打下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现在同样可以这么说，如果不下大力去建设一大批能源、交通以及其它必要的、技术先进的大型骨干项目，就不可能有九十年代的经济振兴。

为了解决多年来的遗留问题，还一些欠账，这几年多搞了一些非生产性建设，是必要的。据去年统计，非生产性建设已经占基建规模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五，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不能长期这样下去。在工业建设中，兴办一些小企业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兴办小煤窑、小水电、小火电以及技术先进的专业化的小厂，搞一些联结干线的公路支线、小型仓库等基础设施，应当予以支持和鼓励。但是要看到，对我国国民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影响经济全局的，是大型骨干工程。正像在战争年代打仗一样，地方军和游击队有很大的作用，而决定战争全局胜负，还得靠野战军。如果我们只着重于建设中小企业，我国的经济就不可能起质的变化，就不可能完成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任务。所以，必须下决心加强重点建设，首先是保证“六五”计划中安排的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重大项目的建设，同时抓紧做好为长远发展做准备的二百七十九个重大项目的建设前期工作。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国家的重点建设，去年以来多次讲到这个问题，提醒我们注意。我认为这是具有战略眼光和远见的。不这样做，我们是要犯大错误的。对于这项工作，我们抓得不紧，措施不够有力。现在应该迅速改变这种局面。

重点建设，不仅中央要抓，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抓，要恢复过去的优良传统。现在需要提出一个口号：“全国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了后十年的经济振兴，为了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动员全国的力量，支援重点建设项目，决不允许分散力量，各搞各的。“一五”时期，我们胜利地完成一百五十六项工程，就是由于有全党的统一认识，有全国的大力支援。一九六四年以后进行的三线建设，尽管在部署上有缺点，但能进展得那么快，也是因为有全党的统一认识和全国的支援。我国是一个穷国，但又是一个大国，如果能够适当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是能够办成几件大事的。要是大家各搞各的，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前十年和后十年都会白白过去，无所作为。现在要很好汲取“一五”时期搞一百五十六项的经验，切实把重点建设搞好，这是我国经济振兴的物质技术保证，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局部服从全局，地方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

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我认为首先就是能够适当地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搞一些有决定意义的建设项目。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国家，这一点尤其重要。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就很难办到。不管我们的经济体制怎么改革，这个优越性是不能丢掉的。

我们必须切实改进和加强对重点建设的领导。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最近，我从陕西韩城过龙门，到山西河津铝厂去看了看。这是一个投资十亿元的大厂，

十年前就开始建，已经花了投资一亿一千万元，以后下了马。今年七月又要复工，但是，组织领导无人负责，建设工地很混乱，没有统一的指挥，连设计总图都没有。征地问题也很严重，老百姓听说要征地，一夜之间在每一亩地里都要插上几十棵树苗，借此向国家要高价。这种做法很不妥当。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现在有些重点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做得很差，仓促开工，技术装备政策也没有定下来，采用什么技术和设备都心中无数。特别严重的是不少项目敞开口子花钱，是“无底洞”，浪费不知有多大。现在国家掌握的计划内的基建投资总额每年只有五百多亿元，其中用于重点建设的才二百多亿元。而不少工程的造价却成倍增加。比如天生桥水电站，原来说需要投资六亿多元，后来说八亿元，现在又说十七亿元还不够。与重点工程有关的一些地区、部门、单位和农民，都想趁机揩油。照这样搞法，我看四化就没有希望。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看来光讲调动积极性还不行，还要讲整顿、讲纪律。对重点建设必须认真加强领导，搞好整顿，配好班子，明确职责，严明纪律。不然，钱白白花了，却没有什么效果。有两点必须强调：第一，我们必须集中财力、物力；第二，必须把集中起来的财力、物力用好。重点建设属于哪个地方、哪个部门，那里就要认真负起责任来。成绩优异的，要给予嘉奖。工程质量差、工期拖得很长、投资大大超过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必要时要绳之以纪律。今后国家计委要把抓好重点建设作为一项重大任务，这就是管大事。要向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群众普遍进行支援重点建设的教育，那种乘机揩国家油的现象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重点建设在哪里，那里的党组织和所有的干部、群众，都应当大力支持。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要造成支援重点建设的舆论和社会风尚，人人以为重点建设作贡献为荣。

三、必须适当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

要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进行，必须努力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现在全国财政收入太少，上不去；中央财政更是入不敷出，靠借债度日。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的四年中，国民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四左右，尽管有的地区财政收入是上升的，而国家财政收入（不包括国外借款）却下降了百分之三点八。当然，这中间有调整的问题，有些是必要的，但不能长期这样下去。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九七八年为百分之三十七点二，一九八○年降为百分之二十九点六，一九八二年降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一九八二年的财政收人中，包括了四十二亿元国库券，如果扣除这个因素，财政收入下降的幅度更大，它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二十五。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就无法搞重点建设。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有困难，而中央财政困难更大。这几年中央财政年年有赤字，而地方财政尽管各地区之间不平衡，但总起来算还是有结余。

一九七八年全国财政集中过多，在财政收入中，中央的收入也集中得过多。为了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并且适当扩大地方和企

业的财力，把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适当降低一些，是必要的。这个调整已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减少，国家重点建设的开支不得不作大量压缩。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一九七八年为三百九十六亿元，一九八二年下降为二百一十五亿元。一九八三年采取了集中能源、交通建设资金的办法，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也不过二百七十九亿元。在国家投资中，用于电力、煤炭、石油工业和交通运输的投资，一九七八年为一百八十六亿元，一九八二年只有一百零一亿元，一九八三年计划也只增加到一百三十亿元。这样，就使能源、交通运输的建设规模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规模大大缩小了。发电装机容量，一九七八年新增五百万千瓦，一九八二年只新增二百九十四万千瓦。尽管重点建设投资减少，中央财政仍入不敷出，这几年每年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靠向地方借款、向银行透支、向国外借款来弥补。这种局面，显然难以支撑下去。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我们必须兼顾人民的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在发展生产、增加国民收入的基础上，要逐步使人民富起来，使企业的收入增加；同时，也要使国家逐步富起来，使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只讲人民富、企业富，不讲国家振兴，不行。只讲下放、分散，不讲适当集中，不行。只讲搞活，而不讲全国的统一性，那也不行。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不适当集中财力、物力，就办不成什么大事。很明显，如果中央不掌握必要的财力，重点建设无法安排，中央的重大决策就无法贯彻，什么三峡工程、核电站工程、大型露天煤矿工程、大的冶金工程和大的交通运输工程，都干不成就是了，必须增加的智力投资也要落空。邓小平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强调下放，但经验证明，解决问题历来靠集中。现在这种状况不改变，长期下去，带来的肯定只能是经济的停滞。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我们既不能竭泽而渔，把企业搞得干干的，把农民搞得干干的，工人多年不提工资；也不能片面地强调福利，只讲消费，不讲建设。不搞建设，消费从哪里来？那就没有基础嘛。即使勉强搞一个时期，也是不会持久的。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

党的十二大已经决定，要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一九八三年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集中得还不够，还要再多集中一些。国家计委提出，从一九八四年起，以五年为期，中央每年再多集中三十亿至四十亿元，以便配合动用五十亿美元的外汇结余，进行一批专项重点工程建设。中央已经批准了这一方案。如何集中，办法要专门研究。主要途径，是要减少地方、部门和企业的自筹基建投资。从自筹基建投资和土建工程量大的更新改造投资中抽建设税的办法，可以研究。农民和收入多的城镇居民也要为国家重点建设作贡献。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要稳定在一九八二年的总水平上，不再增加，其中很不合理的，要适当调整。在集中资金的同时，还要相应集中原材料，以保证重点。国务院已责成有关部门提出方案。总之，集中财力、物力，大势已定，办法另议，今天先吹个风。

四、改革的步伐要加快

总的来讲，我们要继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还有许多新的内容，要继续进行，整顿还要花很大力量去抓。调整也好，整顿也好，如果不同改革结合，是很难进行下去的。所以，现在适时地把改革突出起来，是有必要的。要加快改革的步伐，通过改革推动调整、整顿；抓调整、整顿，也可以促进改革，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当前改革的势头是好的，问题是如何指导好改革工作，使之健康地发展下去。

当前城市的改革，工商业的改革，要像农村那样，首先解决吃大锅饭问题，克服平均主义。城市工商业要改革的东西很多，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汲取农村的经验，突出地抓住这个核心问题，就能够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挖掘潜力，增加社会财富，改善服务态度，对国家对人民都大有益处。尽管目前其他方面的改革还不配套，增加了工作的困难，但还是应当抓住这个环节，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

对城市工商业的改革，既要看到它的紧迫性，又要看到它的复杂性。天津市的同志分析了城市与农村的不同点有八条。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讲讲它的复杂性。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城市工交和商业企业。它们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承担者。它们通过税利形式上缴给国家的，据统计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这点就与农村根本不同，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比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复杂得多。搞得不好，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目前经济体制、特别是价格体系不合理，一下子又不能进行根本改革，加上企业之间，有机构成的高低很不相同，先进和落后的差别很大，潜力大小的差别也很大，这些问题带来的复杂性也要看到。由于有这些因素，我们在解决违背按劳分配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弊病时，搞得不好，又可能出现另一种形式的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苦乐不均的现象。企业之间、职工之间，应当实行按劳分配，不应当拉平。但由于体制和价格的不合理，由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潜力不同，即使同样努力，企业提留的基金差别也会很大，这样企业之间又可能造成新的不合理的苦乐不均，这也是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复杂性就在这里。这样也不可能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也会引起其他企业、其他职工的不满。而且一下子收入冒上去的企业，积极性也不可能持久，今年上去了，明年也许就下来了。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农村不同，农村是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大家都习以为常，队与队、户与户差别很大，可以有万元户。工人就不同，工厂主要是全民所有制，资金、设备、产品都是国家的，工厂建在哪里，商品怎样销售，价格怎么确定，都是国家计划规定的。同等的劳动，如果收入悬殊过大，是不利于职工团结的，不利于调动整个职工队伍积极性的。在实行承包制中，普遍遇到如何合理确定基数的问题。往往是越落后的企业，基数越低，包了以后一下利润冒得很多，工人一下所得很多。这不是靠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得来的，而是发落后财，发体制和价格不合理的财。这样轻易发财，对国家、对企业都没有好

处，对职工的长远利益也没有好处。还要看到一个问题，城市企业的社会化程度比农业高，各方面联系非常密切。而我们又是在整个经济体制没有全面改革的情况下，进行城市改革，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病，解决企业自负盈亏问题的。当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有了积极性以后，要使企业能够按照国家政策的规定和社会的需要，真正在改善经营管理、挖掘企业潜力上去增加收入，谋求自身应得的利益，而不是去搞歪门邪道，向消费者转嫁负担，除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外，必须相应地有一套监督、检查的法规、制度、章程加以制约和引导。否则，企业为了追逐自身的利益就很容易发生问题，如利大大干、利小不干、以劣充优、缺斤短两、变相涨价等。从企业、从微观看，是得到了利益；但从宏观、从整个社会看，却使国家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现在有些地方已开始出现这种不好的苗头。如不注意抓紧认真解决，改革就难以奏效。这点也比农村复杂一些。当然，城市改革的复杂性，还不只这些。我们要看到以上这些问题，想办法加以解决，逐步完善。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决不能因此裹足不前。

对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讲，解决企业同国家的关系，今后主要是改上缴利润为纳税，而不是搞利润包干。农村实行的承包制，主要是集体所有制内部的承包。在城市里解决企业同国家的关系，不能照搬农民内部的那种承包办法。当然一些小企业，不是国家企业的主体部分，可以放开，采取什么形式都可以，不影响大局。国务院确定，除了少数具备条件经国家批准的大型企业，实行首钢那样递增包干，以及某些亏损企业和微利企业可以继续实行包干办法以外，总的来讲，全民所有制企业要积极推行利改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增加企业的活力。这点必须明确，因为：

第一，符合改革的方向。现在的利改税办法还不能全部取消利润上缴这种形式，在一些企业里还要税利并存，过渡一段时间。随着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价格体系的合理调整，将来就可以进一步划分税种，哪些税归中央，哪些税归地方，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自主权和自负盈亏的问题，并有利于冲破条条块块的束缚，促进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所以，利改税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这一改革实际上改变了我们多年来仿照苏联那种管理体制的模式。

第二，能够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全国有四百多个工业企业和七百多个商业企业进行了利改税试点，结果都是好的，说明利改税的办法能够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北京市有四个厂实行了这个办法，我同他们座谈，他们都认为很有成效，大大推动了企业的各项工作，激发了职工的劳动热情。那种认为利改税不能调动积极性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更有利于解决好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之间的关系，保证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在目前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利改税比包干的办法更有利于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减少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不合理的苦乐不均的问题。前面讲过，包干的基数很难定准确，后进企业包干基数低，很容易占便宜。包干以后，稍一用劲，利润就冒出一大截，尽管它比先进企业的贡献少得多，但奖金却比先进企业拿得多。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会影响先进企业职

工的积极性；同时对这些企业来说，头年上去了，第二年又有个保护既得利益的问题。如果不保护，积极性就掉下去了。一句话，在全民所有制企业里，不宜这样搞。比较起来，利改税的办法，可以减少发生这类问题，容易实行，没有多大的风险。反正先交百分之五十五的所得税，税后利润不多的，或比过去略少一点的，就算了，不再收也不再补了。税后利润比较多的，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分成，包干，或再加一道调节税等办法都可以。这样，使国家收入能够稳定地增长，企业和职工也能够从提高经济效益中得到好处。

利改税有以上这些优点，所以，今后推广的主要形式应当是利改税，今年的步子要迈大一些，尽量推行这个办法。现在还没有实行包干的，就搞利改税的办法；已经包干的，应尽量换算改过来；有一些包得合理，确实能保证国家得大头的，可以不予改动，明年再说。但只能是少数，不能是多数。包得很不合理的，一定要改过来，不要怕这少数单位的积极性降下来。它们的积极性不降下来，其它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就上不去，越是不合理的，越要改。小型工交企业以及修理业、服务行业和小型零售商业，关系不大，可以更放活一些。但是大中型企业要抓住。当然，在税后利润部分的分配上，还是要照顾到企业的积极性，网开一面，使企业有个奔头。

今后国家对企业的政策，要有两条：一要放活，二要加压，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不可偏废。不能只讲放活，不讲加压，也不能只讲加压，不讲放活。唯其活，才能加压；加了压，搞活后才能真正挖掘潜力。过去，一方面对企业管得很死，捆住了手脚；另方面，对企业又很宽厚，不是高标准、严要求。日本一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对企业太温和了，在外国办一个企业比中国要难得多。把企业捆得太死，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使企业无所作为，这样不好。应当搞活，让他们有用武之地。但是，如果对企业太温和，老是为企业争优厚条件，没有一点压力，使企业成为温室之花，轻轻松松地过日子，那也不利于培养企业的进取精神，不能真正锻炼出企业家。而且又活又宽，国家也负担不起。福建的一位同志在这次会上说：“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允许企业倒闭，允许工人待业。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好、多年亏损，不能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就可以让它倒闭。倒闭就是淘汰。倒闭的企业，职工发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企业如果怕倒闭，工人如果怕待业，就得好好把企业办好。”这个观点，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我们在政策上放活是可以的，但要给企业压担子，使那些真正有本事、善于经营的人，能够施展本领，得到应得的利益，使那些马马虎虎、经营乏术的人混不下去。不如此，我们的企业就没有竞争性，就没有生命力。我们管工业、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树立这样的指导思想，要把它作为企业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解决。

关于今年企业职工调整工资和奖金问题，昨天书记处已经讨论了，通过了两个文件，请大家按照文件执行，这里不多说了。还有加强职工教育，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两年取得很大成绩，但不平衡，今后要改进，要抓智力开发、智力投资。完全靠国家投资办学，培养人才的速度不可能加快。还得靠地方、靠企业大家动手，自己办学培养人才。特别是电视大学、电视中专、夜校等，适合中国的

情况，是一种好的形式，要创造条件搞，大城市可以先行一步。

顺带讲一下机构改革、地市合并的问题。最近，有些地方，不管够不够条件，有没有经济比较发达的中等城市，都要求搞地市合并。秘诀就在于都不愿意把地委变成虚的，一改成市，就成实的了，干部也可以安排了。这样做，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以城市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来个换汤不换药。最近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已发了通知，请各地注意这个问题。我看可以采取三种形式：具备条件的，实行地市合并，城市领导农村；不具备条件的，地委可以保留，地区精简机构中，人员编制必要时也可以放宽一点，过渡一个时候；增加一点省属市，适当扩大这些市的郊区，根据实际情况，让它带一二个县。上次我讲了增加省属市的问题，没有引起大家注意，其实这也是一种好的办法。湖北省把沙市、宜昌、襄樊改成省属市，发展就快。地市合并也好，增加省属市也好，都要紧紧围绕我们改革的方向、目标去搞，才能真正收到预期的效果。

五、努力抓好今年的生产

今年总的要求是：继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加快改革的步伐，一定要使今年的经济效益有明显的提高，要争取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这里着重说一下为什么老是讲要注重经济效益，而不要片面追求产值速度。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一定的速度是不行的。不仅九十年代要有较高的速度，八十年代也要有一定的速度，不重视速度是不对的。但是，鉴于历史经验，片面强调速度，往往容易使人们忽视经济效益，其结果，速度上去了，但是“水分”很大，浪费严重，国家和人民都得不到更多的实惠。同时，一个时候速度上去了，基础工作不搞好，也难以持久，难以做到年年稳定增长。因此，正是为了求得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增长速度，求得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必须特别强调经济效益。也就是说，我们要力争经济效益好的增长速度，力争能够持续、稳定的增长速度。

应当说明，迄今为止，我们还是以总产值增长额作为计算速度的唯一指标，而总产值这个指标是有很多缺陷的。首先，它把物质消耗的数量包括在内，重复计算的部分很大，不能表现新增加的社会财富。例如，工业总产值中，物质消耗的比重大约占百分之六十七，新增加的净产值大约只占百分之三十三；农业总产值中，物质消耗的比重大约占百分之三十二，新增加的净产值大约占百分之六十八。因此，就总产值来说，数量显得很大，但是真正新创造的价值则少得多；而且物质消耗越高，产值就越大。其次，总产值是按照工厂计算的，一个企业产品生产出来了，不管质量是否有所提高，能否销售得出去，都计算总产值。因此，它不能反映产品的质量、品种的情况和是否符合社会的现实需要。由于总产值指标有这些缺陷，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曾经用商品销售总额或净产值来代替总产

值，但商品销售总额和净产值不仅计算复杂，而且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以净产值的增长额作为计算速度的依据，容易刺激企业什么利大就生产什么。因此，一直到现在，在他们那里总产值指标并没有完全废除。我们的计划部门也正在研究采取什么样的计算方法，能够体现数量和质量的统一，速度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在新的计算方法没有找出来以前，只好继续沿用总产值来计算。但是，对总产值的这些缺陷，各级领导要心中有数，有清醒的认识。总产值不能作为计算速度的主要指标，因为总产值实在不能正确地反映速度，不能反映经济效益。我们往往一强调速度就压产值，一压产值就毛病百出，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要鼓地方、企业的干劲，但一定要鼓到扎扎实实地改进工作、全面提高经济效益上，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一定的增长速度。现在我们的经济效益在一些方面虽然有所提高，但总的讲，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重视经济效益的思想，在各级领导中间还很不牢固，很容易一下子抛到脑后。看来还要经过多少年，还得通过改革才能解决。

今年一、二月份的生产是好的，工业总产值累计完成八百七十五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点二，是继续增长的趋势。但也出现一些新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忽视经济效益的情况又有抬头，值得重视。这集中反映在财政金融上。今年一、二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一百三十八亿元（国内部分），比去年同期减少二亿四千万元，主要是企业收入下降了。而支出却比去年同期增加十亿元。收支相抵，结余十九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十二亿元。从银行提供的资料看，一、二月份累计净投放货币二十亿八千万元，比前四年同期净投放量都多。货币投放增多的主要原因：一是农业丰收，农村的投放量增加三十七亿元，这是属于正常的因素。二是工资性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二十一亿七千万元，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五，而去年同期仅增长百分之六点九。三是今年以来，各单位从银行提取存款增加得多，归还的贷款增加得少。如去年一、二月中央财政存款增加三亿四千万元，而今年却减少十四亿六千万元。后两种都有不正常的因素。全国到二月末，市场货币流通量达到四百五十九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四。对一、二月份的状况，国家统计局有个说法，就是生产增长，流通扩大，财政收人下降，关键在于工商企业经济效益差。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今年头两个月，工业企业平均每百元产值上缴利润只有十八点五一元，比去年同期减少零点七五元，下降百分之三点九。商业和供销社平均每百元销售额上缴利润为三点二六元，比去年同期减少零点七九元，下降百分之十九点五。我讲这些材料，是为了说明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还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做大量的工作，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在大好的形势下，我们要察微知著，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努力做好工作，这样才能推动当前的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

为推动南北谈判和加强南南合作而努力*

一九八三年四月四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第三世界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北京南南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主席先生，诸位贵宾，中国同事们：

今天，我有机会为北京“南南会议：发展战略、谈判和合作讨论会”揭幕，并且为一九八二年“第三世界奖”授奖，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首先，请允许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对讨论会和授奖式的举行表示祝贺，对第三世界基金会为此而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并且对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贵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次北京南南会议，是在世界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发展中国家正在为此研究对策的时刻召开的。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正经历着一次三十年代以来最深刻的经济危机，影响所及，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许多国家生产停滞或下降，贸易条件恶化，国际收支出现巨额逆差，濒临外债清偿危机。这既严重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振兴，也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动荡和不稳。这是当前世界一个突出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这次北京南南会议将就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南北谈判及南南合作等重要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和探索，是十分及时和很有意义的。

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它们正在不断探索，总结经验，继续实践。它们所面临的共同课题是：从本国实际出发，制定和执行符合国情、能够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能够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的发展战略，以加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科学技术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当然，各国的情况不同，适合于这一国家的发展战略，未必也适合于另一国家。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长处，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子。但是，中国有句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交流经验，互相切磋，肯定可以使我们大家都受到启发，得到教益。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还必须具备必要的外部条件。这首先是对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根本的改革。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统计资料证明，发展中国家是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直接受害者，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又使它们被迫承受了更加沉重的负担。显而易见，

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必须同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一场非常艰巨的斗争。

超级大国对于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或则顽固地加以拒绝，或则采取冷漠的态度。这就更需要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团结和合作，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历史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必要条件。中国愿意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道，联合一切愿意改善南北关系的发达国家，为实现联合国通过的有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行动纲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以及第三个国际发展战略而共同努力。

全球谈判是谋求全面、整体地解决南北之间问题的可取形式，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良好途径。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举行全球谈判尤为必要。第三世界国家为此作了大量工作，有关方面也已进行了反复磋商。我们完全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加强协商，为消除障碍而发动谈判共同努力。

当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困难深重，确实有一些紧迫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认为，应该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长期目标同解决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紧迫问题正确地、密切地结合起来。第三世界各国可以通过充分协商，求同存异，提出一些迫切而又切实可行的项目，在各种南北谈判的场所协调行动。

不久前召开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经济宣言》、《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集体自力更生宣言》和《经济合作行动纲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对推动南北谈判和加强南南合作有积极意义。今年六月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六次大会是近期内南北对话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们希望，主要的发达国家能在这次会议上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使会议取得成果。

我们高兴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已经开始取得一些进展，各种区域性和专业性的组织有所发展，贸易往来、能源合作、资金互助、劳务合作，以及合营企业和技术服务等等，有所扩大。我们也高兴地注意到，第三世界国家关于加强南南合作的种种设想，从全球性到区域性的安排以及从关税、贸易、货币金融、技术转让，到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合作，正在逐步充实和具体化。

南南合作的重大意义已越来越清楚地为人们所认识。第三世界国家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不少国家已经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处境相似，他们之间的合作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平等和公正的原则，具有互助互利的性质。因此，南南合作必将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广阔的前景。加强南南合作，既可以增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实力，又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南北谈判中的地位，对于冲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具有伟大的战略作用。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把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根本立足点。中国人民同第三世界

各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一贯是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的。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和支持南南合作，努力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不久前，我在访问非洲十一国时提出：中国政府愿意本着“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努力探索各种途径和方式，发展同非洲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这同样适用于中国同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逐步发展，中国愿意对南南合作作出更多的贡献。

为了逐步推进南南合作，我们十分赞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实行“穷帮穷”的原则，让合作的各方都能得到好处，并且注意照顾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困难。我深信，循此前进，南南合作必将日益发展，取得丰硕的成果。

各位代表都是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领域内经验丰富的知名学者和专家。这个讨论会为各位代表提供了一个交换意见和交流经验的讲坛。我相信，在各位代表的积极参与下，讨论会将会提出各种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我衷心祝愿这次讨论会取得圆满成功！

主席先生，各位贵宾，中国同事们：

现在，我愉快地执行第三世界基金会委托我的向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授予一九八二年“第三世界奖”的光荣任务。

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自一九六〇年成立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成就，在第三世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这个研究所为协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水稻产量和质量培育出了许多水稻良种。这些良种不仅能够显著地提高产量，而且能够抵抗病虫害，缩短成熟期和节省用水量。这个研究所在水稻遗传学、生理学和土壤学等学科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些成果已经在第三世界广为传播。

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农业、食品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第三世界基金会决定授予这个研究所一九八二年的“第三世界奖”，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对此是当之无愧的。请允许我向该所所长斯瓦米纳坦博士，并且通过他向该所全体科学家、专家和工作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我预祝他们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对第三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我还愿意借此机会对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同我国的有关单位的友好合作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希望这种合作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

对钢材实行工贸结合和优质优价很重要*

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

* 这是赵紫阳对方毅和李东冶关于发展低合金钢、合金钢工作部署情况报告的批语。

我同意方毅、东冶[1]同志的报告。关于钢材工贸结合目前是否已具备条件，请国家经委讨论确定。钢材优质优价问题很重要，其它产品都有这个问题，能否从今年起就逐批对一些产品进行调整，请劲夫与物价小组的同志讨论议定。建议将这一报告印发有关部委。

注 释

1．李东冶（1917—2013），山西平陆人。时任冶金部部长。曾任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鞍山市委书记、鞍钢党委书记，冶金部副部长兼鞍山市委第一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地矿部是全国地质工作的综合部门*

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

* 这是赵紫阳听取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一、关于实施《矿产资源法》的监督执行问题

地质矿产部应代表国家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督。这一条应予明确。地矿部应该是《矿产资源法》的监督执行部门。

二、关于全国地质工作分工问题

可以明确一条，地质矿产部是全国地质工作的综合部门，工业部门的地质单位和地质工作，应接受地质矿产部的业务技术指导；计划的编制与监督执行，也可由地质矿产部统筹管理。你们可以拟出几条，与计委商定。与有关工业部门的分工，原则上可以按地质工作阶段分工，具体的你们同各有关工业部门协商。也可设想将来地质部直属队伍成立另外一个独立的单位，这样你们的地位就超然了，可能好管一些。

三、关于地质部门基建投资和勘探费问题

地质部门的基建投资，应考虑适当增加，要着重把地质部的队伍的装备加强，有步骤地在六个大区各建成一个配套的测试中心。应该多给地质矿产部一些技术装备资金，请计委给予考虑，可以拨一点外汇给地矿部，也可以考虑向世界银行给地质部贷些款。地质勘探费不足，使地质工作量逐年萎缩的情况不应继续下去。

要认真总结三十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的谈话要点。

有的同志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思想领域总结经验比较系统，经济领域没有认真总结，拨乱反正不够。老早有人提出，这个任务应当什么时候去完成？当然，三中全会以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五次会议，十二大，都概括了几条，也是总结。但是，经济方面的拨乱反正，总似乎不如政治思想领域集中突出。经济思想方针政策，全党还不统一，不如政治领域那样深入人心。因此，存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总结三十年经验的问题。小平同志说过，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是真正的拨乱反正，主要是陈云同志讲的十四条，但那没有展开论述。总之，经济方面的东西比较散一些。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一次，十二大一次，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五次会议一次，但没有一次非常集中。本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有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说经济工作应当有一个专门的总结。这次人大会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放到将来再解决？经济领域发生折腾的可能还存在。政治上再搞阶级斗争为纲、搞"文化大革命"不可能了。在经济建设方针方面，党内没有真正展开讨论。"大跃进"也批评了，但没有展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怎样发生、形成、发展的，没有讲清楚。这个问题在党内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用我的话来说，毛主席在中国建设方针上有唯意志论，想创出个奇迹。现在对什么是右了，保守了，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还不那么清楚。看来，这届人大不可能解决，但确有这个问题。经济上大反复一次的危险仍然存在。有一些省市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盲目性，不大清醒。是不是有一场群众运动就可以把生产力大大发展起来？能够出现这样的奇迹吗？还是那个想法，只要路线对头，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国家就可以出现奇迹。这种想法，有多少人是作了科学分析，有多少人是凭感情用事？这种思想并不是没有市场。比如，对江苏的汇报怎么看？农民富起来是不是那么容易？有一个对历史经验总结和对现状分析的问题。毛主席有些经济思想在党内还有影响。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这几年已经提出来的方针，如经济效益，两个阶段，重点建设，集中分散，调整整顿，等等，在党内不容易认识一致。比如，经济效益很难认识一致，而要吹掉很容易。因为它是软的，而产值、速度是硬的。我本来以为，我们这些人是

过过瘾的，其实不然。上海对速度就感到压力很大，辽宁郭峰[1]也同我讲过。包括翻两番，作为国家的远景是可以的，但各个地方都搞，就感到压力很大，很容易把人引向追求产值。而经济效益、效率，这些东西很不牢固，很不容易确立起来。稍有一些空气，就可以吹掉。可能要经过一些反复，一年两年，两三年中可能解决不了。从一九八○年底提出的问题，十二大提出的观点、方针，到现在还不牢固，要在这些问题上紧紧抓住。

注 释

1．郭峰（1915—2005），吉林德惠人。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曾任辽北省委副书记，辽西省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辽宁省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省委第二书记，中顾委委员。

统一金融必须建立中央银行*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银行问题时的讲话。

银行不能变成地方银行。金融不能分散，分散了天下大乱。银行必须管住。要宣传这个观点。出问题出在银行。原来我主张扩大银行自主权，现在看不能扩大。扩大银行自主权，就是扩大地方党委自主权。全国金融必须统一。集中统一，集中表现在银行。存款增加，只要银行贷款使用方向适当，不会出大问题，如果银行出问题，就管不住，要搞几年。总之，银行要集中统一，这是新情况。现在要解决，正式搞中央银行，另外搞工商银行。不要一身二任。中央银行不搞贷款，就是监督各个银行，搞资金调度。

提高工业生产经济效益要见到成效*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对吕东关于提高经济效益和从银行集中资金两个调查报告的批语。

请将吕东[1]同志的两件报告，以白头文件印发书记处、国务院常务会议，计、经、科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在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情况和问题，建议由经委牵头，计委、财政部及有关方面参加，认真地议一议，逐项提出解决的措施和作出安排，然后提交中央财经小组讨论通过，在今年八月召开的全国工交会议（主要讨论提高经济效益问题）上予以贯彻。

提高工业生产的经济效益问题，我认为应当由国家经委抓总，认真负起责任来，务求经过一段时间努力，能真正见到成效。

注 释

1．吕东（1915—2002），辽宁海城人。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曾任冶金部副部长、部长，三机部部长，国家机械委副主任，国家经委主任。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三年六月六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

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过去五年的回顾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各级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五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日益正常，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关系重新获得加强，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整个社会一年比一年安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国务院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加强了对经济、政治和其它社会生活的民主管理，在全国建立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特别是新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国务院和省、市、自治区两级政府机构的改革，在密切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作效率方面，有了初步成效。全国各族人民心情舒畅，建设热情不断高涨。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贡献，正在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还复查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对被错划为右派的作了改正，对原为小商小贩、手工业者被错划为资本家的作了改正，给已经改造成守法劳动者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摘了帽子，宽大释放了大批在押的原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人员，妥善地解决了一系列的历史遗留问题。打击经济领域和其它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起了保证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作用。尽管现在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需要继续消除的不安定因素，但是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已经实现的安定团结局面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的伟大祖国是一定能够长治久安的。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和破坏不了这种历史趋势。

国民经济扭转了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走上健康发展

的轨道。经过这几年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状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到一九八二年，积累率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调整到百分之二十九，消费基金有了较大增长。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八提高到一九八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六，轻工业所占比重由百分之三十一点一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点四。结合着积累与消费和农轻重这两大比例关系的调整，国务院还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曾经出现的较大财政赤字问题，实现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在调整时期，既保持了经济全局的稳定，又保持了不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九八二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千二百九十一亿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六，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三。这说明调整经济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取得的成果是十分显著的。

农业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困境，实现了持续的全面高涨。这几年，国务院执行一系列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农村政策，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粮食进口和减少一些地区的征购任务，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一九八二年同一九七八年相比，仅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一项，农民增加的收人达二百六十亿元。与此同时，调整了作物布局和农业结构，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了多种经营。特别重要的是，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长期存在的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把小规模的分户经营与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结合起来，继承了合作化的积极成果，从而使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统一了起来，并且同时得到充分发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进步。尽管农村工作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已经尽善尽美，但是就全局来看，过去几年所进行的工作，确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了工农联盟，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一九八二年同一九七八年相比，我国粮食增长百分之十六，棉花增长百分之六十六，油料增长一点二六倍，糖料增长百分之八十三，烤烟、桑蚕茧、猪牛羊肉等都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大家知道，过去几年中严重的自然灾害并不少，而全国农业总产值仍以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七点五的速度前进，超过了一九七八年以前二十六年平均每年递增率的一点三倍。全国原来低产贫困的二百四十多个县，绝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一些出名的穷县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一跃而为新的商品生产基地。农村的逐步繁荣兴旺，为我国经济、政治形势的好转奠定了基础。

消费品工业扭转了长期落后的局面，重工业逐步端正服务方向，整个工业在调整中持续增长。这几年，我们把消费品生产放在重要地位，使轻工业比重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四年内，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八，超过重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三点四的速度。许多市场紧缺商品的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自行车增长一点八倍，缝纫机增长一点六倍，手表增长一点四倍，电视机增长十点四倍，化学纤维、布匹、呢绒、食糖、皮鞋等也都大幅度增长。冶金、化工、建材、机械等重工业，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努力扩大服

务领域。它们为农业、轻纺工业、市场、技术改造和出口提供的产品，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品种不断增多。重工业生产在调整中已由下降转为上升。由于调整轻重工业结构、加强能源管理和进行节约能源的技术改造，仅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两年就节约和少用了四千万吨标准煤。正因为工业结构经过调整和整顿而日趋合理，尽管前四年内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平均每年只增长百分之一点九，而整个工业却以每年递增百分之七点二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经济调整的一个重大胜利。

城乡市场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八二年同一九七八年相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一千五百五十九亿元增加到二千五百七十亿元，增长百分之六十四点八，平均每年增加二百五十三亿元，比一九七八年前的二十六年平均每年增加四十九亿元，高出四倍多。长期存在的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大为缓和，肉禽蛋的社会零售额一九八二年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一点一倍，食油供应状况有了显著改善。日用工业品绝大多数供应充裕。过去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现在已大部分敞开供应。人民群众购买消费品有了较多的选择余地。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一九七八年的三百五十五亿元增加到一九八二年的七百七十二亿元，四年增长一点二倍。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由百分之四十六点五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七九年以来，国家统一安排的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四百四十项，对促进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九七八年决定引进二十二项成套设备已到货部分所负的高利外债，到一九八二年底已经基本还清。在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地区试办的经济特区，开始取得积极的成果。近年来，我们还积极发展旅游事业，扩大了对外友好往来。在当前世界经济萧条、国际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的持续上升和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逐步扩大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正确性。

经济体制进行了初步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和有益的经验。这几年，我们在对农业体制进行重大改革的同时，还在城镇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扩大工商企业的自主权、改进城乡流通体制和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坚持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四年中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业职工增加六百零三万人，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九，城镇个体劳动者从十五万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七万人。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国营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一批国营小商业、饮食服务业和小型企业开始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或者由职工集体、个人承包经营。许多原来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工业生产资料，现在实行了方便用户的灵活多样的供应办法。对过去统购包销的工业消费品，开始采取计划收购、定购、选购和企业自销等多种购销形式。我们改变了过去工业品流通按城乡分工的体制，进一步疏通了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渠道。在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打破地区和部门的界限，组织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和经济区方面，正在着手工作。对基本建设的管理办法和外贸体制，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所有这些，对调动地方、部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活跃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提高经济效益，都起了良好的作用，并且为进一步改革积累

了经验。

长期存在的轻视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逐步得到纠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已由五百九十八所增加到七百一十五所，在校学生从八十五万六千人增加到一百一十五万四千人。五年招收研究生四万三千多人，比“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还多百分之八十三。由研究生院和大学分别经过严格的考核，授予博士学位十八人，硕士学位近一万五千人，学士学位三十多万人。正规地授予博士学位，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各种类型的成人高等学校，包括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等，一九八二年在校生已达六十四万多人。单一化的中等教育结构初步有所改变，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三年来增加两倍。到一九八二年底，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总计达两亿零七百万人。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日益深入人心，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进行重大科技项目的攻关。五年来在农业、工业、国防、新兴技术和尖端技术以及基础研究等方面，获得比较重要的科技成果一万三千多项，其中得到国家奖励的发明有四百一十八项，有些项目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进展。文化艺术战线的思想活跃，创作繁荣，作品质量逐步提高。这儿年，共有两千四百多件文学艺术作品在全国性的评奖或会演活动中得奖。五年出版图书十一万种，共印二百三十九亿册（张）。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发展。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全国医院床位由一百八十五万六千张增加到二百零五万四千张，专业卫生技术人员由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人增加到三百一十四万三千人。全国各地深入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城乡卫生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对于增强人民体质起了重要作用。我国体育健儿多次打破世界纪录，在国际比赛中夺得多项冠军。他们的出色成就，鼓舞了亿万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为振兴中华而献身的精神。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一九八二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达到二百七十元，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一倍。五年中，农村新建住宅二十二亿平方米，有几千万农户搬进了新居。在城镇，五年安排三千八百多万人就业，加上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职工生活也得到明显的改善。一九八二年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五百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三。五年中国家用于城市职工住宅的投资共四百八十亿元，新建住宅三亿五千万平方米，相当于一九七七年前十九年新建住宅面积的总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一九八二年底，城乡储蓄余额达六百七十五亿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二点二倍。这几年我国城乡人民生活的明显改善，是大家都切身感受到的。

国防建设和国防力量有了新的加强，保卫了祖国的独立和安全。人民解放军全面贯彻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方针，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有了显著提高。通过初步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军队的编组、指挥向合成军方向迈进了一步。部队的军事训练、思想政治工作、院校建设、后勤保障和军事学术研究有

了加强，干部的指挥能力和专业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优良传统得到发扬，军政、军民关系日益密切。一九七九年春，由于越南当局在我国广西、云南边境多次猖狂武装挑衅，我军被迫进行了胜利的有节制的自卫反击。民兵组织经过改革、调整，减少了数量，提高了质量。国防科研和生产有了发展，新型战术和战略武器的研制取得了新成果。国防实力的不断加强，是我国各族人民专心致志地从事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取得了外交工作的新成就。我们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续发展了同各国的关系。在过去五年里，我国又同十五个国家建立了邦交。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现在已增加到一百二十九个。在此期间，我国领导人出访了九十个国家，有八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国家的团结和友谊，有了新的发展和加强。我们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我们坚持原则，伸张正义，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各位代表！过去的五年，是我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克服种种困难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的五年，是人民心情舒畅、国家蒸蒸日上的五年。

我们在过去五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指导思想和方针上实现了根本性转变的结果。当着一九七八年初本届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得到清理和纠正。一九七八年二月国务院向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除了在政治上有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的问题以外，对我国经济建设还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使建设规模大大超过国力允许的限度，加剧了由于十年内乱造成的重大比例失调和经济困难。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得到纠正，后果将不堪设想。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这几年来，遵循三中全会的精神，遵循五届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我们在政治上坚决清除长期存在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造成的种种恶果，同时排除种种右的干扰，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在经济上坚决纠正仍然存在的片面追求高指标、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的错误，坚持了从我国国情出发和量力而行、积极奋斗、循序前进的原则。一九七九年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特别是一九八○年底决定的对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是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拨乱反正，是把我国经济引上健康发展轨道的根本转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众多，物质技术基础仍然比较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中国的国情办事，是我们必须采取的正确建设方针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只能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既不应当超越客观条件，勉强去做不可

能做到的事情，又要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做好那些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过去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发生的几次比较大的曲折，除了其它方面的原因以外，都是由于脱离我国实际，在指导方针上要求过高过急所造成的。牢牢记住历史的经验，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是保证当前好形势继续发展而不至于重蹈覆辙的首要条件。

全国人民从拨乱反正的实践中进一步增强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重新焕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巨大热情，这是我们取得一切胜利的力量源泉。这五年涌现出大批的英雄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和省、市、自治区劳动模范的有三万八千五百多人，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的有四万二千九百多人，被评为三八红旗手的有七万一千八百多人。赵春娥、奕弗、张华、蒋筑英、罗健夫、雷雨顺、安坷、朱伯儒、李俊甲、张海迪等同志的感人事迹和崇高情神，鼓舞着全国青少年和亿万人民。在这里，我代表国务院，向艰苦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各族人民对政府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从政府工作本身来说，至今还存在着许多缺点，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在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中，经济效益不高，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十分严重。市场和物价的管理工作还做得不够好，不少地方发生了某些商品特别是副食品涨价和变相涨价的情况。精神文明建设在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思想文化艺术领域中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现象。社会上的歪风邪气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有力的制止，经济犯罪和其它一些恶性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在少数政府工作人员中，官僚主义的恶习和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不正之风，还没有得到有效纠正。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和认真地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

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

本届国务院经过对过去五年工作、当前形势和面临问题的研究，认为对下届政府的工作需要提出以下建议，请大会予以审议。

今后五年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和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

（一）关于经济建设

党的十二大确定，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必须分两步走。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〇年的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从一九九一年到二○○○年的后十年，争取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作出的正确决策。今后五年是打基础的关键性五年。我们一定要在这五年中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加快改革的步伐，抓紧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保证经济的稳定增

长，并为以后的发展积蓄力量，创造条件。

今后五年，首先要保证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生产相互协调地向前发展。必须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争取生产的发展达到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实实在在的速度。从现在的情况看，“六五”计划规定的生产发展速度可以超过，“七五”期间的发展速度有可能比“六五”高一些。当然，我们讲速度，必须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绝对不能片面地追求产值、产量。要保证各项产品不断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适销对路，真正增加社会的有效财富。二十年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是就全国来讲的。至于每个地方、部门和企业，有的要翻得多一些，有的翻得少一些。必须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讲究经济效益，服从全国的综合平衡。为了在今后五年内保证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面发展，必须坚定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一系列农村基本政策，不予改变。要继续稳定和完善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贯彻执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同时逐步增加对农业的投资，积极改善农业的生产技术条件。进一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重点改善商品粮棉地区的排灌条件。加快发展化肥工业，逐步提高复合肥料以及磷肥和钾肥在化肥施用量中的比重。积极发展饲料工业，大幅度提高配合饲料的产量，努力加强和改善草原建设，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努力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抓紧优良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因地制宜地采取改良土壤、改革耕作栽培制度、防治病虫害等综合技术措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加快造林育林的步伐，合理利用现有森林资源，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现象。在促进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的同时，必须引导重工业更好地为农业、轻工业和技术改造服务，坚持在能源和原材料供应、运输条件、投资和贷款分配、外汇使用等方面优先保证轻工业需要的方针。轻工业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开拓新的生产门类，保证消费品生产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发展，使已经出现的比较好的市场供应情况得到保持和扩展。

今后五年，必须大力加强能源、交通等方面的重点建设，积极推进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重点建设的成败，关系现代化的前途，关系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都要支持重点建设，全体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都要为推进重点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六五”计划安排的续建和新建的大中型项目共八百九十个，其中已开工建设的投资在五亿元以上的重大建设项目有九十三个。“七五”期间还将兴建一批重大项目。我们要从水电、火电和核电三个方面，加快电力工业的发展。在黄河上游、长江中上游干支流和红水河流域，逐步建设一批大型水电站；在山西、内蒙古、安徽两淮、贵州六盘水等地的煤矿区，逐步建设一批大型坑口电站。为了扩大煤矿建设规模，一方面要抓紧山西和内蒙古几个大型露天煤矿的开发，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加快中小煤矿的建设。石油工业要重点加强陆上和海上的普查勘探，力争尽快探明一批新的油气田。解决能源问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开发和节约并重的方针，凡是新建项目都要采用节约能源的新工艺、新技术，合理利用能源。铁路建设将以增强煤炭运输能力为重点，积极改造老线，修建必要的新线。适应国内经济建设和对外贸易的需要，要加强沿海港口、内河、公路和航空运输

的建设，进一步改善邮电通讯设施。在着重抓好能源、交通建设的同时，要相应地进行冶金、化工、建材、电子、机械等工业的建设，积极加强地质勘探工作。大力推进企业的技术改造，同重点建设一样，是全面完成“六五”计划，迎接新的经济振兴的重要条件。今后五年要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以提高产品的性能和质量、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为中心，加快现有企业特别是重点行业、重点城市的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使它们的生产技术水平有一个显著的提高。

今后五年，必须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坚决控制人口增长。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城乡人民的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各种副食品的供应将不断改善，人民的穿着水平将继续提高。自行车、手表等一般耐用消费品可以基本上满足人民的需要，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将日益增多地进入城市和农村家庭。必须大力加强市场和物价的管理，继续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城镇和农村都将继续建设大批新的住宅。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要与生产发展相适应，同住宅区的建设配套进行。要抓紧扩大一些大城市的供水能力和煤气供应能力，进一步改善公共交通条件。积极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搞好环境保护。无论是推进生产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都要求继续把控制人口增长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这是我们的国策，是根本性的战略措施。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普遍提倡晚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小孩，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认真落实有效的节育措施，坚决保护女婴和生女婴的妇女。为了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要依靠各方面的力量，积极举办各种形式的养老事业。

在执行今后五年各项工作任务的过程中，我们要十分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的进一步繁荣。

我们要完满实现上述任务，特别是实现加强重点建设的任务，当前面临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财力不足，资金严重分散。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四年间，我国社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六，生产的发展速度不算低，而国内财政收入却下降了百分之三点三。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统一思想认识，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使它得到迅速的改变。否则重点建设就得不到财力物力的保证，八十年代打基础的任务就要落空，九十年代新的经济振兴就没有希望。国务院认为，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认真解决好这个问题。

第一，大力提高经济效益，积极扩大财源。

这几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效益不好，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成本和商业的流通费用降不下来。工业企业可比产品的成本，一九八○年上升百分之零点九，一九八一年上升百分之一，一九八二年也没有降低，只这一项每年就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四、五十亿元。一九八二年亏损工业企业的亏损金额达四十二亿元，加上粮食企业、商业企业的亏损，总额达一百多亿元。这种情况如不迅速改变，必将严重影响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各部门、各地方和所有企业一定要牢固地树立提高经济效益的观念，绝不能只讲投入，不讲产出，只向国家要投资，不为国家作贡献。

我们强调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决不能只停留在一般号召上，必须成为真正有效的实际行动。不论调整也好，整顿也好，技术改造也好，体制改革也好，都必须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目标。整顿企业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工作，必须进一步提高质量，继续抓紧进行，确保一九八五年前把现有企业认真整顿一遍。国家计划规定的降低生产成本和各种费用的要求，必须落实到每个地方、部门、企业和事业单位，切实保证完成；凡是完不成的企业，应按比例扣减利润留成。国家规定的税利上交任务，一切单位都必须如数上交。凡是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完不成税利上交任务的单位，原则上不得调整职工工资。企业占用流动资金，必须分别情况规定合理限额，不允许擅自超额占用。凡是有经营性亏损的企业必须限期做到扭亏为盈，否则坚决实行关停并转。一切单位和全体职工要立即动员起来，努力增产节约，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提高工作效率，同一切铺张浪费、纪律松弛、无人负责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各地方、各部门和各企业事业单位，都要制定提高经济效益的奋斗目标，提出具体措施，并且一一落实。

第二，合理分配国民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这几年国家财力不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集中的财力过少，资金过于分散。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二下降到一九八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由于过去长时期内积累的问题很多，这几年多拿出一些钱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和增加企业自有资金是必要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应当有所下降，但某些措施步子迈得大了一些，再加上财政管理不严，各方面漏洞很多，以至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的幅度过大。在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预算外资金却大幅度增加，由一九七八年的三百七十一亿元增加到一九八二年的六百五十亿元，四年间增长百分之七十五点二。资金的严重分散，使基本建设的总规模控制不住，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现象有所增加，消费基金的增长也难以控制，特别是滥发奖金、滥发实物和补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种状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国家的重点建设就上不去，经过很大努力恢复起来的正常经济秩序和比例关系有可能重新被打乱，中央重大决策和措施就不能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能顺利地进行。

党的十二大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都明确提出了集中资金加强重点建设和严格控制基建规模的方针，但由于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很不足，政府的措施也不够坚决有力，检查监督不严，以致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国务院认为，今后必须把合理分配国民收入，克服资金分散现象，适当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我们必须兼顾人民的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在发展生产、增加国民收入的基础上，要逐步使人民富起来，使企业的收入增加；同时，也要使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使国家逐步富起来。职工工资、奖金和福利基金的增长，必须低于企业利润和上交税金的增长，坚决制止乱发奖金的现象。农民收入的增加，必须主要靠发展生产和降低成本。目前国家

负担的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其它补贴已经达到三百二十亿元，如不采取措施今后还会大幅度增加，这是国家财力无法承担的，因此必须加以控制。我们对企业不能再回到过去统收统支的老路上去。但是，在企业新增加的利润中，必须主要通过税收和规定合理的税后利润留交比例的办法，保证国家得大头。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必须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确保重点建设和其它中央开支的需要。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一定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提倡顾全大局，树立局部服从全局的观点。现在，在一些单位存在的乱摊乱挤成本、偷税漏税、截留应当上交的国家收入、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等种种违法乱纪现象，必须加以整顿和纠正。各级领导干部要勇于维护国家的利益，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同这类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三，正确地确定基本建设的总规模，努力保证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大力提高投资效果。

我们要为经济振兴打好基础，必须使基本建设保持必要的规模，但这个规模一定要同国力相适应，不能超过财力负担和物资供应的可能。如果违反这一客观经济规律，就会受到现实生活的惩罚。目前我国基本建设的总规模已经不小，问题是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的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的投资没有达到计划的要求，而地方、部门和企业用自筹资金和用各种贷款进行的基本建设控制不住，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超过计划过多。我们一定要把这种状况及时地改变过来，在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总规模的前提下，集中全国的力量建设起一批现代化的骨干工程和改造一批现有的重点企业，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打下强大基础，准备好充分的后备力量。

作为重点建设的大型骨干工程投资量大，建设周期长，还要有一系列的项目为它配套，因此重点建设项目在一个时期内也不能搞得过多，必须量力而行，瞻前顾后，统筹安排。不然的话，就会把短时间内可以见效的建设项目挤掉，就会挤农业生产、挤轻工市场、挤智力开发，严重影响经济的近期增长速度，甚至会重新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整个国家的基本建设，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由国家计委负责综合平衡。对于重点建设项目，国家计委、各个主管经济部门和有关的地方政府，都要像“一五”时期建设一百五十六项工程那样，认真做好建设前期的准备工作，严格按照基建程序办事，精心筹划，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目前基本建设中浪费现象十分惊人，许多重点项目的投资超过工程概算。据对一百七十六个在建的大中型项目的检查，现在要花的投资就比原来的概算增加一百八十五亿元，其中固然有些是原概算偏低，但大量的是由于种种不合理的因素造成的。今后必须对基本建设实行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度，杜绝各种浪费，决不允许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向重点建设单位乱收费用和敲诈勒索。国务院决定，这次大会之后立即组织必要的力量，对重点建设工程进行检查，表扬好的，揭露和批评不好的；对玩忽职守造成严重损失浪费的，必须绳之以政纪法纪。我们一定要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人民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资金真正管好用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必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六五”后三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现在的进展情况是：利改税的第一步，经过半年的准备，今年六月一日起已在全国国营工商企业中开始实施；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组织生产和流通的作用，正确处理条条和块块之间的矛盾，正在结合政府机构的改革，扩大试点；关于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方案，已在全国范围内试行。这三项改革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突破，目前虽已开始，但大量的工作还在后头，必须继续抓紧进行。

我国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正在加紧研究，通盘规划，争取尽早制订出方案，进行试点和局部实行，以便在“七五”期间有步骤地全面展开。全面改革经济体制，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改革计划体制，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指导。计划体制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根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按照企业、产品和任务的不同，分别采取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管理办法。加强经济预测工作，逐步建立科学的计划决策、编制、综合平衡、考核和责任制度，健全和完善计划体系。国家在正确运用行政、立法等手段的同时，要更好地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各种经济杠杆，切实加强统计工作和统计监督，引导地方、部门和企业的经济活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保证国家计划任务的实现。

第二，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织生产和流通，发展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主要是：以城市为中心，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组织各种经济活动，打破地区间、部门间、城乡间的分割。按照专业化协作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继续进行企业的改组联合，逐步实现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合理化。认真消除种种壁垒和堵塞，开辟多种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做到货畅其流，逐步形成跨行业跨地区的经济区和经济网络。这方面的工作，首先从沿海大中城市、内地试点城市和某些新的重点建设基地做起，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可以适当放后一些进行。

第三，改革财政体制和工资制度、劳动制度。进一步完善利改税的制度，开征一些必要的新税种，合理调整税率，按照税种划分中央收入、地方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收入，改进和稳定国家与企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逐步改革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使职工收入同社会经济效益、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的劳动贡献密切联系起来。逐步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择优录用，选贤任能，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灵活调节劳动力，促进人才的成长和合理使用。

我们正在和将要进行的各项改革，目的是要克服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中的弊端和缺陷，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经济体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但它当然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不是要动摇、背离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社会主义自身基础上的自我改进、自我完

善。这种自我改进、自我完善，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自觉地进行的。通过改革，要使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日益巩固和发展，使它的各项具体制度日益健全和成熟起来，推动社会生产力顺利向前发展。当然，经过一段时期的集中的全面改革，在新的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以后，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其它条件的变化，经济体制中这个环节或那个环节的改革，还是要不断进行的。

过去几年中，我们在农村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农业改革和城市工商企业的改革，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经过改革，使生产经营单位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同自己的劳动成果和整个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所有制形式不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化程度不同，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得多，我们只能从农村改革中吸取那些共同性的经验，而不能把那些只适用于农业经营管理的具体形式，照搬到城市工商企业和其它事业中来。我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城市工商业，城市改革的情况如何，对国民经济的全局关系极大。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继续调整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改革时，必须充分考虑经济的承受能力，既要态度坚决，又不能操切从事。凡是需要和能够进行试点的，都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国务院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一些小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不难纠正的，但是，必须保证不出大的问题。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和措施，必须有利于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有利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各项经济活动取得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利于兼顾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确保国家财政收入逐年有合理的增长。任何地区、部门和企业单位的改革，都必须以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为前提。只有坚持这样做，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

当前，在部分同志中存在着一种观点，把改革单纯看成是权力和利益的分散。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有害的。对企业的具体经济活动管得过多过死，不利于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是不对的，适当放宽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于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应当集中的必须集中。削弱这种集中，那就不是前进，而是倒退，就不能保证我国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对于企业应有的权力和利益，是必须尊重的。但首先应当明确，随着改革的逐步展开，对企业的要求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责任将日益加重。以责、权、利三者结合为特征的各种经营责任制，责任是第一位的。立志改革，不应该热衷于为局部争利争权，而应当自觉地认识和履行自己的责任，致力于改善经营管理，推动技术进步，加强劳动纪律，扎扎实实地做好各种基础工作，提高经济效益。所有企业，全体职工，都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各级经济领导机关和企业单位，都要尽力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同改革的要求相适应的水平上来。

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级领导必须认

清改革的根本宗旨，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原则。任何一项改革，不仅要考虑到自身的合理性，而且要考虑到同其它改革的关联和配合；不仅要考虑到近期的效果，而且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要把改革同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的整顿和技术改造很好地结合起来，互相推动，互相促进。在改革过程中，要坚持和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深入细致的、有说服力的宣传教育，统一大家的认识，克服各种影响改革正确进行的错误思想。从国务院起，各级政府都要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尊重和支持群众中一切符合改革方向的新创造，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因势利导，有条不紊地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前进。

（三）关于教育科技文化建设

我们今后应该十分重视智力开发，把以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为重点的文化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实现经济振兴的必要前提。大力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可以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强大的原动力。这个问题，全国人民都很关心，不少同志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各级政府必须坚决克服轻视文化建设的错误倾向，把智力开发提到重要日程上来。

当前，要把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加速培养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放在突出的地位。国务院最近批准了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采取多层次、多规格、多种形式，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今后五年，计划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由一九八二年的三十一万五千人，增加到一九八七年的五十五万人，增长百分之七十五。与此同时，采取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管理干部学院、教师进修学院等多种形式发展高等教育，使这方面的招生人数由一九八二年的二十九万人增加到一九八七年的一百一十万人，即增长二点八倍。为了保证这一计划的实现，国家将负责解决有关重大项目的建设投资和物资供应。我们还要从政策上、组织上采取措施，创造条件，鼓励自学成才，有计划地轮训中青年干部，壮大各方面的专家队伍。

我国中等专业教育多年来发展缓慢，形成中等和高等专业人才的比例严重失调，不利于加强和充实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力量，造成教育投资的严重浪费。要进一步抓紧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有计划地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五年内使职业高中在校学生数占到整个高中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为了推动这一改革，要加快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培训，提倡具备条件的科学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到职业学校兼职兼课，提倡厂矿和正规学校联合办学。

目前，越来越多的工农群众和青少年，已经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掌握科学文化和政治理论的重要，一个学科学、学文化、学政治的热潮正在兴起，各级政府、企业和社队应该努力办好职工教育和农民教育，满足他们的要求。中、小学教育是基础。要大力培养中、小学师资，帮助他们提高教学水平，在全社会养成尊重教师的良好风气。要努力普及初等教育，抓紧扫盲工作，首先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幼儿教育十分重要，要有计划地发展，并且从办好幼儿师范抓起，逐步加以整顿和提高。在各级各类教育事业中，都必须注意编写好教材，改进教

学方法，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经济振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从今年二月起已集中几百位科学技术专家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编制一九八六年到二○○○年的科技发展规划。同时制订农业、能源、交通运输、计算机、机械工业、原材料工业、消费品工业等行业的技术政策和装备政策。这将为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规划的制订，提供可靠的科学技术依据。计划在“六五”期间进行的三十八个重点攻关项目和四十项重大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要继续逐项落实。除国家确定的重点攻关项目外，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都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确定自己的攻关项目。此外，政府正在组织有关科技力量，参加二百七十九项重大预备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和重大建设课题的研究工作。我们还要认真做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推广工作，通过技术引进和合作生产，较快地把我国的生产技术提高到新的水平。

科技人才的统一管理和合理使用，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后准备采取以下措施：（1）通过编制规划、科技攻关、建立技术开发中心等，打破部门、地区界限，集中调配和合理使用全国科技力量。（2）有计划地从一些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部门抽调一部分科技力量，加强能源、交通、轻工、农业等科技力量薄弱的部门；从力量富裕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抽调一部分人员，充实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师资。（3）建立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制度，使科技人员从积压的部门流向需要的部门，奖励他们到中小城市、农村、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4）对全国科技人员，建立分级和分行业、专业的双重管理制度。（5）改进对科技人员的考核、晋级、评定职称和奖励制度，促进中青年科技力量的成长。

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对建国以来各方面的成就和经验教训进行历史的总结，对国际上各方面的思潮进行有分析的研究和批评，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一个学科门类齐全、布局合理、各有特点、协调发展、具有现代化手段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

我们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坚持不懈地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人民，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些部门应当围绕不断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这个中心，进一步安排好事业的调整、体制的改革、队伍的整顿和基本设施的建设，适应群众中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兴趣的多方面的需要，努力创造和输送更多更好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组织各种适合不同群众需要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要大力加强广播电视电影、出版印刷发行、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青少年宫、体育场所等的建设，以满足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习和娱乐的需要。要继续保护好历史文物。我们要努力采用现代化的制作和传播手段，采取多种方式，向人民传播科学知识，介绍人类优秀的思

想文化成果。我们的作品应该生动地深刻地反映我国人民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激发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巨大热情。我们向人民输送的精神食粮，不但要满足他们正当的娱乐和高尚的审美要求，而且首先要满足他们多方面的求知欲望；不但要使他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得到提高，而且要达到大大提高他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目的。

为了保证精神产品的质量，各级思想文化领导部门，必须尊重艺术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文艺体制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必须在继续克服“左”的错误的同时，对于已经有明显表现和恶劣影响的某些精神产品不顾社会效果的完全商品化的倾向，给以足够的警惕和注意，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切实纠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它们同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那种唯利是图、盲目进行的商品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多数精神产品是以商品形式进行流通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自由泛滥。一切严肃的、爱国的、革命的作家和艺术家，绝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和表演当作牟取名利的手段。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对作品的社会效果不负责任的倾向，是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不兼容的，必须继续批评这种倾向。我们所有的思想文化艺术工作者都要十分珍重自己对人民所负有的重大责任，十分珍重人民的期望。

要大力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在发展现代医药的同时，要注意发展我国传统医药，克服忽视祖国医药宝库的现象。继续坚持预防为主、城乡兼顾、中西医结合的方针，逐步改革现有的医疗制度，加强各级医疗卫生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继续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有效地防治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积极开展城乡群众性体育活动，重点抓好学校体育工作，努力提高体育运动的水平。

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加强文化建设的关键。各部门、各地方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切实改进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对知识分子的劳动的报酬应该逐步适当提高。鉴于目前中年知识分子骨干的工资偏低问题比较突出，尽管国家财政还有困难，在今后也要尽可能拿出一些钱来，把他们的工资收入逐步提高到与其职务和职称相适应的等级线内。

为了进行智力开发，加强文化建设，包括教育、科学、文艺、体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比例关系逐步协调起来，国务院决定今后逐年增加文化建设方面的投资。除了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外，要充分调动各地方、部门、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和广大群众进行智力投资的积极性。从国家、集体和个人几方面共同努力，来加强我们的文化建设。

（四）关于政法工作

为了保障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加强政法工作，努力消除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各种违法乱纪的消极现象，实现

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新宪法是我国人民治理国家的总章程。要教育和组织人民认真地实施新宪法。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以身作则，坚决维护宪法的尊严，成为执行宪法的模范。希望各级人大代表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这方面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监督。我们要根据宪法的规定继续改革和完善政府的机构和领导制度。省、市、自治区政府的机构改革要继续抓好，善始善终；县和基层两级政权的机构改革，将在今冬明春逐步展开。各级政府要努力改善领导制度，改进领导作风，健全工作责任制，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实行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的各种有效监督，切实克服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一切政府工作人员都必须严守法纪，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那些给国家财力物力造成重大损失的严重官僚主义者，坚决执行包括降职、降级、撤职在内的各项政纪，触犯刑律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凡属无视国家法纪，肆意侵犯人民民主权利，利用职权谋私利，参与经济犯罪和其它犯罪活动的，一律依法惩处，不能姑息养奸。

要继续抓紧经济立法和行政立法的工作。国务院准备陆续制定一批经济法规，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政府经济部门和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员，都要努力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经济活动，消除各种犯罪分子可以利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加强和改革政法公安工作，实行综合治理，是实现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基础一环。几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努力，社会治安虽有好转，但尚未恢复到建国后的最好状况，某些地方凶杀、抢劫、强奸、盗窃等刑事犯罪问题还比较突出。最近发生的劫机事件，暴露了我们的管理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和问题，政法机关的某些专政职能没有得到强有力的行使，有些单位政治思想上的麻木和敌情观念的薄弱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我们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只要各级政府、政法部门和全体人民密切合作，我们就完全能够更有效地为防止和消除这些恶性案件而斗争。极少数敌对分子和不可救药的惯犯要犯，不管他们如何暗中破坏，如何挺而走险，他们终将逃脱不了应得的惩罚。我们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继续有力地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和其它犯罪活动，决不能松懈这方面的斗争。同时各级政法部门要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协同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做好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的工作。要加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其治保、调解组织的建设，进一步推动群众制订街道居民公约、乡规民约和工作守则等活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自觉维护社会治安，遵守公共道德。要发动广大群众自己做思想疏导和调解工作，使人民内部的各种纠纷及时得到解决，不致激化。进一步整顿劳改、劳教场所。努力办好各种形式的工读学校。要激发失足青年的自尊心，并负责给已经悔改的失足者以正常的生活出路。

为了适应政法工作的需要，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队伍的建设，全面提高政法公安干警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技术装备，加强他们的战斗力。全体政法公安干警，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必须具备对国家

对人民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质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断地增强群众观念、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要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积极举办中等和高等政法院校，搞好在职干警的正规训练工作，把政法公安队伍真正建设成为人民热爱的、训练有素的社会治安的柱石。

各位代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务院提请这次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不断增强足以适应现代国际环境需要的国防实力。人民解放军要加强军政训练，努力提高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水平，提高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合成作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要有重点地抓紧武器装备的科研、试验和生产，加速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要改进兵役制度，加强民兵建设。继续发扬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加强国防，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是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的神圣任务。

（五）关于外交工作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平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超级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是当今世界祸乱的主要根源。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政府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努力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促进入类进步事业的发展。

第三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强大力量。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基本立足点。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权利的斗争，是我们的神圣义务。我们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和阿富汗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越南和苏联军队必须立即无条件地、全部地分别从柬埔寨和阿富汗撤走，由柬埔寨人民和阿富汗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斗争。以色列必须从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去。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应当得到恢复。我们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人民维护独立、主权和反对外来干涉的斗争。

目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进入以发展民族经济来巩固政治独立的历史新阶段，并且已经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由于过去长期遭受外国的统治和掠夺，现在又继续遭受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束缚，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这一正义立场。我们认为，开展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对于推动南北谈判、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一向互相支持，互通有无，近几年来，又在发展经济技术合作方面迈出了

新的步子。今后，我们将继续本着“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为促进这种合作的不断发展作出更大的努力。

不结盟运动创始以来，对维护世界和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最近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对解决当前世界上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我们衷心祝愿不结盟运动继续坚持它为自己规定的独立、自主、非集团的宗旨和原则，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强权政治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中国一向关心同自己的邻近国家保持和发展睦邻关系。

我们唇齿相依的兄弟之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以坚定的步伐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进。中国人民永远珍视同朝鲜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热烈祝贺他们在各条战线上的胜利，坚决支持他们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

中国同日本在一九七八年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在一九八二年提出的发展中日关系的“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三项原则，得到了日本朝野的赞同。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深信，只要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排除干扰，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一定会日益增强和发展。

我们感到痛心的是，在过去几年里，由于越南当局侵占柬埔寨，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排华反华，本来十分友好的中越关系恶化到了严重对立的地步。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愿为改善中越关系而继续努力。今年三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阐明了我国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改善中越关系的立场、主张和建议，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支持。我们希望越南政府以越中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

我们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在维护东南亚和平与安全的斗争中有了可喜的发展。我们还满意地看到，中国同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的传统友谊和合作关系正在不断加强。中国同印度的关系近几年来也有所改善。中印两国有过两千年的和平交往，应该能够友好相处。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印边界问题，完全可以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不应该妨碍我们敦睦邦交。我们愿意继续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而努力。

我国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友好合作正在不断深入地向前发展。中国人民对罗、南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光辉成就感到高兴。他们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

中国人民对东欧其它各国人民也怀有友好的感情。我们关心他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近年来，我国同东欧各国之间在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往来逐渐增加。我们相信，通过共同的努力，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是可以继续改善的。

中国赞赏和支持西欧各国加强联合，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同西欧、北美、大洋洲的许多发达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事实证明，不同社会制

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平等合作。我们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努力扩大和加深同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和交流。

中国和美国自一九七九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关系是有发展的，但是远未达到本来应该达到的水平。美国制定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地违背了它在历次中美公报中公开承诺的义务和双方商定的建交原则。中国政府和人民是重视中美关系的，但是决不能容许中国的主权受到侵犯，内政受到干涉。美国政府应当切实信守历次中美公报，不再做有损中美关系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这样中美关系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中苏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中苏两国人民都关心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从去年十月开始的中苏磋商中，中国方面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我们认为，改善中苏关系，应该从解除苏联方面对中国安全的现实威胁着手。这是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我们期持着苏联方面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其诚意。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已经载人了新宪法。这些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政府将坚持不渝地贯彻执行。我们将始终如一地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为人类争取进步，为世界争取和平！

各位代表！

国家的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是我们的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在内，都急切地盼望着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能早日实现。现在海内外一切愿意看到祖国统一和富强的炎黄子孙，都在采取各种方式，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目标的实现。我们对一切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感谢。我们要继续努力，早日结束台湾海峡两岸人为的分裂局面。我们还将在适当的时候收回香港主权，并且采取适当措施维持香港繁荣。我们一定要继续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我国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大团结，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和繁荣昌盛而共同奋斗。

今后五年，对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其它各项工作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五年。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存在着种种困难。我们一定要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实事求是，埋头苦干。只要我们坚持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过目前这段仍然比较艰辛的路程，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更加坦荡的康庄大道。

节能工作要坚韧不拔地抓下去*

一九八三年六月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全国节能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节约能源问题。今后二十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一半靠增加能源产量，一半靠降低能源消耗，两个方面任务都很重，但潜力也很大。这几年节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从今后任务来看，节能的确是任重道远。前几年，一个是搞了经济结构调整，轻工业上来，重工业下去；再一个是扫了浮财，当然，浮财还多得很。真正靠技术改造，技术进步，靠管理节能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企业，即使是在这些企业，也只是刚刚开始。随着今后节能向深度、广度发展，越来越要依靠技术进步，工作将越来越艰巨，难度也将越来越大，阻力也大。现在的经济体制，经营管理和现行经济政策的许多弊病，都障碍着节能的开展。节能的进一步深入，必然触及到这些问题，牵涉到地区、部门和企业的利益。这些问题，必须一步一步地解决。节能工作松不得，现在不能松，“六五”不能松，“七五”不能松，“八五”、“九五”以后都不能松。节能涉及到现在体制、制度上许多问题，要排除万难，坚韧不拔地抓下去。要越抓越有成效，越抓办法越多，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

第二个问题，节能机构在机构改革中不能削弱，而要加强。要有称职的机构和人员抓节能，无人负责，什么事也搞不成。现在正在进行机构改革，下面机构改革，上面一般不要讲话。但有些问题要讲话，节能就是需要加强的机构，这是“弱小民族”，“少数民族”，应该受到保护，其它机构可多减一些，节能机构不应该精减，要有一批人抓节能。这个话可以传出去。如果你这个单位节能机构削弱了，节能又搞不好，就证明你忽视了节能，当然，有了机构抓不好也不行。

过去讲过，要搞一个抓节能的管理体系，一直抓到企业，真正的重点在企业，节能机构要精干，节能人员要懂行，要能够胜任（万里插话：要精干，能干，敢干），不要成为安置干部的地方。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一些科研机构，实际成了安插机关，地市合并也有这个问题，这些问题都要注意。

第三个问题，节能要从上面采取计划、行政和立法干预，要有经济政策，要使节能的受到鼓励，浪费的受到惩罚，使企业感到节能有利，浪费无利，反而有害。要使生产节能设备的企业有好处，采用节能设备的企业也有好处。这个问题过去讲了多次，光有笼统的方针，不解决问题。要先抓一些大企业，一年解决它

几个大问题。沈阳水泵厂生产了节能设备，去年少收入三百万元。这值得研究。生产节能设备，应当优质优价，允许节能设备价格向上浮动，如浮动百分之十。也可先搞几种产品，搞它五种、十种产品，确定下来以后，经委要下力气抓，从生产到推广，排除万难，有什么问题，就打通什么关节，包括计划干预、通报批评、奖励、扣罚等等。总之，要从经济、行政、立法甚至包括中纪委在内的各方面干预，进行综合治理。一年搞它几件事，这样抓下去，就会有结果。否则，年年讲政策，年年解决不了。

对于耗能大而又确实浪费很大的设备，也要确定限期更换，而且规定用企业的自有资金换；过期不换的，就把它的折旧资金收回来。经委对这些事要做得有力一些，一方面要立法，另一方面还要先将由国家供应能源的大企业管起来，逼企业节能。规定什么设备不能用，什么样的工厂不能生产。这样，一年抓住几个，有把握看准了的，定下来，立个法，抓住不放。光一般讲不行，等条件好了再抓也不行。

对地区、部门和企业的节能，既要有动力，又要给压力。日本为什么节能，它没有能源，日本的国民心理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即国土狭窄，没有资源，所以就要设法打出去，就要抓质量，把质量看作关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为什么江苏节能好，就因为能源缺；为什么天津、大连、青岛节水好，也是逼上梁山。四川天然气少了，省委下决心安装三表（气表、电表、水表），结果民用气、民用电下降很多。讲节能，这是一条经验，一个是鼓励节约，一个是严格配给，不给那么多，这样就逼着非节约不可。从地区、城市到企业，规定它一年产值增长多少，能耗下降多少，一年只给多少能源，订个考核指标，办法自己想去。协作煤可以搞，但也要规定个数量，不能超过。

第四个问题，今天只是就节能方面总的说一下，按照你们的汇报提纲，能办的事先办起来。有些问题，如征收能源税问题，还得讨论一下，今天不能具体定。

最后讲一下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问题。全国长远计划基本定下来以后，要认真抓一下企业的根本问题。提高经济效益，一要抓企业的产品质量，二要抓降低消耗，必须使企业真正加强经营管理，搞好技术进步。面上的问题要用价格、税收等经济办法，对大企业还可以行政干预。降低原材料、能源消耗提高产品质量，这是企业的经济效益所在，同时也是对能源的节约，因为所有原材料的节约，都是能源的节约。企业技术改造，目标不是减人，主要是降低原材料、能源消耗，提高产品质量。上海工业成本构成中，原材料占百分之八十六，企业整顿也好，改革也好，都有要瞄准降低消耗、提高质量这个目标。具体办法，一个是进行技术改造，一个是改进经营管理，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办法，把企业的精力转到这方面来，三面包围，网开一面。这是整个工业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原有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已经混不下去，工业不前进，就无法生存，要逼着企业进行一场革命。从国外来讲，闹一次经济危机，就垮一批企业，而另一批企业就更上一层楼。下一步围绕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经委的工作

还要讨论一下。工业到底怎么抓，过去靠低价农产品，低价的原材料、燃料，我们还搞不好，这些东西涨了价，怎么办？看来工业不攻一下关，总的问题解决不了。对工业的政策，总的有三条：一是不走过去老路，不搞死，不搞统收统支；二是企业对国家承担的任务要加重；三是企业能否混下去，看你的本事，班子不行，整顿班子，根本无法生存的，就让路。总之，国家一方面要给企业自主权；另一方面对企业要严格要求，要想办法把企业的工作逼到这方面来，真正把经济效益搞上去。经委要把这些想法具体化，计委要从计划上体现出来。这样做，要克服很多阻力，打通很多关节，要有计划地排排队，一批一批地加以解决。

关于平朔露天煤矿项目审批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

依林、宋平同志：

小平同志批示送上，请按批示办理。

这样大的项目，当然要按基建程序办事。煤炭部的可行性报告，报送时间太迟，但此事不宜再拖，只有请计委打破常规，抓紧完成审批手续了。估计审批中会有一些不同看法，但鉴于这个项目大的问题已基本搞清，有些细节，短时又难以统一认识，因此，只要没有大的风险，我认为应该予以批准。某些小的方面即使可能吃点亏，但争取了时间，权衡得失，还是值得的。

此事工作过程中，煤炭部确有缺点，我将向他们指出，要他们今后注意！哈默[1]何时来，必须给以答复，如月底不行，可考虑推到下月初。无论如何，七月份要完成这一项目的最后法律手续了，否则影响太大。以上请依林同志直接抓一下。

如还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可由国务院开会议定！

（以上抄告小平同志阅知。）

赵紫阳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

注 释

1．哈默（Armand Hammer，1595—1990），美国企业家，祖籍俄罗斯，生于纽约。时任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他作为十月革命后第一个与苏联合作的西方企业家，曾与列宁建立了友谊。1979年应邓小平邀请访华，决意投资建设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后因经营困难将股权转移给了中方。

加快发展我国食品工业的意见*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就发展中国食品工业写给张劲夫和吕东的一封信。

两位胡老[1]的信和民建、工商联的建议，我都看了。现转送给你们，请研究办理。我认为，两会[2]召开的传统食品咨询工作座谈会开得很好。他们提出恢复传统食品，走出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食品工业新路子，是很适时、很重要的，所提建议也是可行的，我完全赞同。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发展食品工业，有关部委和各界人士做了许多工作，使我国食品工业有了发展，传统风味食品正在逐步恢复。但由于“左”的错误和其它方面的原因，传统食品有的已经绝迹，有的质量下降，名不符实，急需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战后很多国家食品工业都有很大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了很大的比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对食品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利用我国传统食品的优势，发挥这一特长，把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工业搞上去。这是我们各级政府应当列入议事日程的一项重要的工作。鉴于我国食品工业分散在各个地方和许多部门管理，迫切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协调。现在已经建立的食品工业协会，应进一步充实和加强，负责做好协调、规划工作，对有关政策法令提出建议。国家经委要支持帮助食品工业协会开展工作，并对各地、各部门进行督促检查。请你们就二老的信和两会的建议深入讨论，向国务院提出报告。

注 释

1．两位胡老，指胡厥文和胡子昂。

胡厥文（1895—1984），上海嘉定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曾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中国机械工业协会会长，上海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委、主委。

胡子昂（1897—1991），重庆巴南区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曾任重庆市工商联主委、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委、主委，全国人大常委。

2．两会，这里专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集中财力保重点提高素质促转变*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集中资金加强重点建设问题，去年小平、陈云同志就提出来了，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也讲了这个问题。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了多次讨论。最近，中央常委和书记处会议又进行了研究。根据这些会议的精神，刚才依林同志作了系统的说明，我完全同意。这里，再着重说明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重点建设上不去，全局就活不了。

我们必须从国民经济的全局上，认识系统解决能源、交通建设问题的重要性。能源供应紧张，交通运力不足，这是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大家都感受到了的，都认为应该解决。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认识、行动就不那么一致。现在基本建设总规模越来越大，一般性的加工工业越来越多，而能源交通建设却上不去。为了实现翻两番，许多地方和单位都想多上一些加工项目，包括一些耗能很大的项目。大家都在考虑翻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首先要明确：能源、交通紧张，是长期的趋势，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上不去，没有动力，没有原材料，加工工业搞得再多，也是白费。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六五”、“七五”的发展速度无法保证，而且有可能还要被迫进行一次大的调整，经济振兴更无从谈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

强调加强以能源、交通为中心的重点建设，控制地方加工工业的发展，那么今后各地的经济建设应当主要去抓什么呢？除了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和抓好地方的能源交通项目以外，主要精力应当放在改善现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推进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上。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潜力很大，很有可为。我认为，只要今后我们一手抓住重点建设，一手抓住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我们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好，工作就会越来越主动，整个经济建设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一定要把基本建设总规模控制住，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了。去年和今年的人大会上，都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今年再控制不住，就会影响经济稳定，也无法向人民交代。各地区、各部门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凡是超过今年国家计划的，都要及早下马。迟下不如早下，长痛不如短痛。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技术落后、消

耗高的项目，要坚决停下来。要建立责任制，省、市、自治区的建设规模，由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负责；部门的建设规模，由部长、厅长负责；银行贷款突破国家计划，由银行行长负责。

在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看得远，抓得狠，当机立断。不然要误大事。现在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说，一九八○年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及时地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奠定了进一步调整的思想基础，保证了这几年经济的稳定发展；那么，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集中力量搞好重点建设奠定思想基础，从而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迈进一大步。

第二，集中财力物力，势在必行。

这几年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不算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不算低，但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但没有增长，还有所下降。一九八二年财政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这种情况，只能是在一定时期的一种特殊情况，长此下去将难以为继。苏联和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之外，财政收入一般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也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当然，有些口径不完全可比。我们的国家财政，不仅要承担重点建设的开支，还要承担文教事业经费和军政费用。现在一年的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显然太低了。解决资金过于分散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是哪一个人随意决定的。要保证重点建设，就必须集中财力和物力。不是可以集中，也可以不集中，而是非集中不可。现在许多地方、部门和企业手里的钱多了，也使国家有资金可集。

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过分集中不利。但是，也正因为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必须保持必要的集中，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性，才能集聚必要的财力、物力，兴办一些于国于民有利的事业。适当集中财力、物力，就可以办成几件大事，这已经为过去的历史所证明。要实现二十年的战略目标，必须适当地集中财力、物力，这更是理所当然的。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六年间，平均为百分之三十四，最高的年份达到百分之四十六。现在当然不能搞那么高。从实际情况出发，看来今后把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步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八到三十是恰当的。这样做，既不会走过去集中过多的老路，又能保证国家必要的开支。至于集中资金的办法，依林同志已经讲了，我原则同意，请大家进一步讨论，怎样做得好一些。不论采取什么办法，必须集中这么多。

“七五”期间基本建设总规模摆在什么数字上比较好？我看，按三千五百亿元的方案安排，大体上是适度的、可行的。从国力的增长来看，“七五”期间国民收入有可能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左右。五年基本建设投资三千五百亿元，分年投资大体上是，在一九八五年预计六百多亿元的基础上，一九九○年达到七百八十亿元左右，平均每年增长不到百分之五。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都大大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但各方面绷得过紧。“七五”期间，按现在的设想安排，应该说是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当然，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作出很大努力，才能实现。

一方面我们必须集中资金，另一方面必须堵塞漏洞。否则，辛辛苦苦集中起来的资金还会被冲销掉。现在要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必须刹住乱涨价、乱摊派的歪风。去年下半年，许多地区出现了生产资料乱涨价的现象，今年以来在继续发展，对基本建设单位乱摊派的现象也是有增无已。据有关部门的材料，全国有些钢厂，不经过国务院批准，由地方和企业自定了产品的临时出厂价，比国家规定的价格高出很多。有的企业还规定了提取管理费、劳务费等。现在议价的钢材每吨比国家牌价高出二百至三百元。木材、水泥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地方和单位向建设工程特别是向重点建设乱收费用甚至敲诈勒索，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最近，耀邦同志连续批了两个向建设单位伸手要钱、“吃大户”的材料，国家计委已经会同有关部门去调查处理。据财政部估计，现在工业成本中原材料和燃料部分，议价比重约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议价平均比牌价高出百分之三十，一年约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一百多亿元。在基本建设工程总造价中，乱摊派的费用至少占百分之十，一年等于多支出五十亿元。

这种乱涨价、乱摊派的歪风如果不坚决刹住，就会使工业生产成本普遍上升，造成轮番涨价，带头把市场物价抬起来；就会大大提高基本建设工程的造价。违反国家规定的这种乱涨价、乱摊派所拿走的收入，都落到小单位和个人手里。而由于增加成本和提高造价所减少的收入和增加的支出，都将落到国家的身上。比如今年一月至五月，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八点二，而财政收入却只增加百分之零点一。这个情况很值得我们重视。这样下去，国家下很大决心，从各方面集中的资金，很可能又被各方面捞走了。同时，这种歪风不坚决刹住，国民经济就要遭到破坏，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和经济犯罪活动也难以制止。我们主张把国民经济搞活，但决不允许部门、地方和企业违反国家规定各行其是，以致把国民经济搞乱。如果我们现在不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任其发展，那就不可收拾。

目前，有些生产资料的价格确实偏低，应该由国家通盘考虑，逐步进行调整，决不允许地方、部门和生产单位自行提价。属于国家统配的物资，必须执行国家的牌价，不允许乱搞议价。凡是自行提高了价格的，要坚决改过来，其非法收入一律没收，归国家财政，并追查责任。（邓小平：什么时候刹住？什么时候可以改呀？胡耀邦：先在我们这里统一思想，大家要去抓，要处理几件。邓小平：就是该抓的要抓，该进班房的要进班房，没有别的办法。总之，这个会所以要快开，就是要争取下半年。今天是六月二十五日，七月半能不能扭转？大家定个协议，七月半为期，还有二十天。现在开会的人就先打招呼，各地方、各部门自己心中有数。胡耀邦：该批评的批评，该撤职的撤职。邓小平：必须在七月半扭转这种局势，二十天时间。）对于乱向建设单位收取费用的，必须坚决制止，严重违法乱纪的要依法制裁。总之，对于破坏国家计划经济、破坏重点建设的乱涨价、乱摊派的歪风，必须严肃处理，不能纵容姑息。

对于乱发奖金、乱发补贴的现象，也要采取坚决态度加以制止和纠正。今年一至五月，国营民用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实现利润减少百分之三点三，上交利润减少百分之九点九，而职工奖金支出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三。这种

情况如果不扭转，不仅今年国家财政收入计划将完不成，而且消费基金的增长将失去控制，使市场供应发生问题，物价稳不住。我们坚持计划经济，决不能使基本建设规模失控，决不能使消费基金失控。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由于这两方面失控，尾大不掉，以致经济陷入困境。这个教训，我们一定要记取。

关于今年的财政问题，这里多说几句。总的说，今年国家财政不容乐观。现在收入上不去，支出又不断增加。一至五月，财政收入仅大于支出四亿五千万元，大大低于前几年的同期水平（一九八一年同期为四十八亿元，一九八二年同期为三十亿元）。搞不好，全年三十亿元赤字的计划将大大突破。货币回笼的情况也比往年差，今年一至五月回笼二十三亿元，而一九八一年同期为三十九亿元，一九八二年同期为四十六亿元。如果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大量增加，经济的稳定就要受到影响。现在中央、地方和部门都要抓财政收入，并且严格控制支出，以免下半年过不去时拿起刀子砍支出。

第三，继续搞活，不走老路。

对这次集中资金，国外有一种评论，认为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强调集中的老路。国内也有些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搞死了，搞多了。必须明确，我们不是只讲集中，不讲搞活，不是回到过去统收统支、竭泽而渔的老路上去，而是要坚持改革，继续前进。这是因为我们坚持进行改革的各项基本政策不变。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农副产品的采购价格基本不动，扩大企业自主权不改变，对生产、流通领域和技术改造在政策上还是放活的，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也是继续实行的。我们讲集中，是指在宏观经济方面的一些大的决策必须统一；我们讲控制，是指对不符合全局利益的经济活动加以严格限制，比如对基本建设规模和消费基金总额要严加控制，对价格、信贷的管理要严加控制等等。这是在前进的过程中用新办法来解决新问题，是放活以后加强管理，使工作跟上去，根本不是不要改革，不是不要搞活。正是由于过去几年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才有今天的形势，才有这么多分散的资金可供集中。所以，我们面临的任务，是继续前进，是在放活以后，因势利导，存利除弊，进一步完善改革；在保护地方、单位和职工、农民的正当的积极性的同时，限制消极因素，用计划管理、行政干预、法律手段和经济杠杆把企业的经济活动引上对全社会有利的方向，使改革得以健康发展。

至于集中资金的数量，是否会搞多了、过头了，也是作了反复考虑的。现在提出的方案，是经过核算，提出了适度的要求，并且是有步骤分地区实施的。几种措施不是一起出台，倾盆大雨，也不是搞一刀切，因而不至于把生产经营单位和职工、农民的积极性打下去。

从农村来看，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我们一般不作变动，这就稳住了大头。现在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在分配上作一些小的调整。一是对某些生产资料的价格略有提高，以减少国家的亏损；二是对奖售粮和经济作物地区的返销粮，稍微减少了一点倒挂补贴；三是在农民增加收入和逐步富裕起来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点税收。这三条影响是不大的。据测算，这些措施全部实行后，每个农民平

均每年少得七八元。一方面各地应努力把各方面加给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减少下来，一方面国家这头多拿一点，农民是会接受的。去年全国农民每人平均增加收入四十六元。今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农民的纯收入仍将继续增加。在一九八二年平均每个农民纯收入二百七十元的基础上，一九八五年预计增加到三百一十二元，一九九〇年预计增加到三百九十元，平均每年仍可增长百分之四到五。

从城市来看，集中资金的措施除了增加银行上交以外，主要是两项：一是把能源交通建设基金的征收比例，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十五；二是开征税率为百分之十的建筑税。两项一年约可增加财政收入五十亿元，也不算多。现在许多地区仍在纷纷要求追加自筹投资，可见过去订的征收百分之十的比例小了，大家手里还有钱，提到百分之十五并不多。当然有些行业要照顾。开征建筑税，是会影响地方建设规模的。但资金、材料就那么多，只有地方、部门、企业少搞一些一般项目，国家才能多搞一些重点项目。大家都要齐头并进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做到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现在的集资方案，体现了这个精神，数额并不过分，企业、社队是负担得起的。我们对企业、对社队采取的政策，不是不给他们增加收入，而是要使他们在增加收入的基础上，为国家、为长远利益多作一点贡献。事情本来就有两个方面，既要放活，又要管理；既要承认各单位的利益，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又要保证国家得大头，有力量办几件大事。这是一对矛盾，只能在经济生活的运动中不断加以调节。匈牙利在改革、扩权以后，也遇到这个问题。企业的资金多了，就想盲目扩大基本建设，盲目扩大生产，以取得更多利益，于是国家就进行控制。他们有个说法，叫做“在控制和反控制中生活”。这个说法，我看是有道理的。在新形势下，我们应当学会运用新的办法。

第四，我国工业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挑战，面临着一个如何提高素质的新的转变。

我们的企业，过去是靠低价的原材料、廉价的农副产品和较低的工资支出维持生存的，所得的利润，大部分是原材料和农副产品价值的转移。这种情况，掩盖了企业的落后面。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农副产品价格提高了，有些原材料价格也提高了，职工的工资支出也增加了。因此，造成成本上升，亏损增加，靠减少上交利润来过日子。据统计，工业企业的成本，一九八○年上升百分之零点九，一九八一年比一九八○年上升百分之一而一九八二年又比一九八一年上升百分之零点四。去年工业企业的亏损额达到四十七亿元，上升百分之四点三。国家的建设资金从哪里来？靠农业这头很有限，积累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靠工业。现在很多赚钱的企业都不赚钱了，赚钱多的赚少了，国家的财源也成了问题。今后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将逐步提高，职工的工资还会继续调整，这是总的趋势。客观形势向所有的工业企业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靠老办法，靠现有水平，混不下去了。如果我们的企业不来一个根本转变，不在质量上、素质上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在国内就没有生命力，在国际上就没有竞争力，就没有出

路。一句话，不前进，就无法生存。对这样一个重要和尖锐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引起各级经济部门和广大企业的普遍重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只是提出来，初步酝酿一下，这次会议不可能深入讨论。

造成当前企业经济效益差的重要原因，从企业内部来说，是经营管理落后和技术落后，是工人队伍的思想和技术素质下降，纪律松弛，以致产品的质量差，消耗高。从整个社会来说，是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而且现在还在继续搞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大量兴建那些工艺落后、产品供过于求的企业，不断加剧企业技术落后和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这几年我们对企业的调整和整顿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没有触动这个根本问题，没有抓住这个要害。在解决重点建设问题的同时，各地方、各部门有必要集中力量狠抓一下企业的问题，把基础工作抓好。

我们讲要使企业实现一个新的转变，要提高素质，就是要把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降低物质消耗，提高产品质量，这是整个工业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是大有可为的。现在我们企业的能源、原材料消耗都很高，许多还没有达到历史的最好水平。同国外比，差距更大。国民生产总值每一亿美元所耗的标准煤，我国为二十一万吨，苏联为十二万吨，美国为九万一千吨，日本为三万七千吨。虽然经济结构各不相同，但我们耗能高却是事实。我们的许多工业品，质量很差，花色品种单调，几十年一贯制，不能适应社会需要。我们的工业品（也包括农产品），长期比较缺乏，市场供应紧张，过去是有无的问题。现在情况不同了，不论国内市场，国际市场，都有个讲求质量的问题。同样数量的产品，在国外高档与低档的价格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比如纺织品，我们出口的许多都是大路货，只能摆地摊。看来老是在盲目扩大产量上兜圈子，不在质量上下功夫，是没有前途的。

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一要改善经营管理，二要促进技术进步。否则，就会成为空话。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和许多政策、措施、办法，不是鼓励、引导地方和企业关心经营管理的改善和技术的进步，不是限制他们盲目增加产量、粗制滥造，而是相反。今后，我们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不论计划管理也好，行政干预也好，经济办法也好，法律手段也好，应该一边促进，一边加压，迫使企业把力量转到改善经营管理、推动技术进步、降低物质消耗和提高产品质量上来。这些都是基础工作。整顿也好，改革也好，改组也好，最后都要落脚到这方面来。利改税经过进一步完善后，国家同企业的关系已经固定下来了（要抓紧完善利改税的工作，这既可进一步解决企业的盈亏自负，也有利于解决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今后企业的目标不应放在从国家财政那里挤，挖财政一块，向国家争利；而应当攻关，把劲用在提高企业的水平上。企业能不能生存下去，能不能日子过得更好些，就看自己有没有本事。

必须看到，要做到以上这些，从外部条件来说，还涉及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在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条件下，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水平，提高经济效益，都受到很大限制。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企业就不可能改变管理落

后、技术落后的面貌，不可能使我们的企业实现提高素质的新的转变。我们应当立足于全局，按行业、按产品，从经济区和中心城市着手，进行规划、改组、联合和改造，坚决而有秩序地实行关停并转，把原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好。对新建的企业，要有建厂的标准，产品的质量和批量标准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不准新建。

总之，我们现在的工作，一方面要从宏观上为实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作好安排，搞好布局，把关系全局的重大骨干项目建设好，搞好综合平衡，避免出现大的曲折；另方面就要考虑把作为国家经济细胞的几十万个企业的基础工作真正搞好，把经济效益搞上去。这样，我们国民经济的振兴就大有希望。（邓小平：紫阳同志讲的这篇话，下面一个问题比前面一个问题更重要。前一个问题容易解决，二十天为期。企业管理、企业改造这个问题十分大。农村问题解决了，城市问题是什么？落后！相应地要涉及商业、流通环节的改革问题。这次会议集中解决集中财力问题，那些问题以后专门研究。）

重大技术装备要开展国际合作与军民结合*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听取林宗棠关于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工作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我们的效率实在太低了。关于抓重大技术装备问题讲了很久，中央财经小组也专门开了会，要赶快行动起来，不要老空议论。要抓得实在一些，把方针政策具体化。

最近我到东北，在伊敏河看到了本溪汽车厂出的68吨汽车。第一台质量还可以，后面几台质量很差，协作件质量不好，材料也不好，不能用。机械工业的产品质量的确是个大问题，总是解决不了。有什么办法才能解决呢？

还有另外一种恶性循环。现在我们采取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这是必要的，但是，搞不好，会越保越老大，越不求进步，越保越落后。澳大利亚就不保护，谁质量好，价格便宜，就买谁的。现在机械工业质量不好，但是有人自己还不承认落后，这样很不好。质量问题不能只听制造部门的，主要要听使用部门的意见。落后要认账，这样才有前进的动力。当然，有些东西即使落后一些，我们自己也要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不能因保护而甘心落后。

搞重大技术装备时，要把军工的技术力量充分利用起来。有些引进技术，如密封、焊接、液压等，军工部门都过关了，要把军工力量、技术引进和科研攻关密切结合起来，在军转民的基础上，再引进一些技术，加上自己科研攻关，有些技术问题就能解决了。重大技术装备要通报给军工部门，请他们看哪些他们能搞。要实行有偿技术转让办法，要长期搞下去。

现在有些设备制造任务，使用部门要安排在他自己的工厂生产，机械部门要安排在他自己的工厂生产，部门观点比较严重，矛盾很多。今后，重大技术装备可实行投标的办法，择优选厂，谁有能力干，谁的质量好，谁的价钱便宜，谁能保证建设进度，谁的服务态度好，任务就交给谁。

现在有的单位是先争任务，任务一到手，就开一个单子，向国家要大钱，不给他就不干。都这样开单子，那就不得了啦！重点项目重点浪费。这是一种不正之风，要坚决纠正这种不正之风。

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的屁股一定要坐正。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公正合理地处理这些问题。

宝钢二期热连轧和热连铸，要和国外合作设计，合作制造。要外国人总负

责，否则使用部门不放心。这样做，国内制造部门也就认真负责了。不然，最后是无人负责的。要外国人总负责，可能价格要高一些（如3%—5%），要多花一二千万美元。这笔学费还是要花的。

货比三家，最近出了不少问题，外商很有意见。要注意，不要造成谁先让步（指转让技术）谁吃亏。

通过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提高自己的设计制造能力，提高自力更生能力；

二是改变一下机械制造部门的门户偏见；

三是要纠正争任务、要高价的不正之风。

另外，李鹏同志建议，十大装备中增加一项铁路长大重载列车及其电子程控系统，以改变铁路的落后面貌，请你们研究一下有无必要。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值得研究和借鉴*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听取廖季立等考察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汇报时的讲话。

一

匈牙利“中央管理和商品关系、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机联系”，那不和陈云同志讲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样了？（廖季立[1]：匈牙利的市场调节大。）匈牙利的计划管理很明确，叫“中央”。“国民经济按计划发展的中央管理”，为什么不改成把中央的计划管理和商品关系、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机结合？这不是很清楚吗？就是中央计划管理嘛。第一叫中央，第二是计划，就是中央的计划管理。“国民经济按计划发展的中央管理”，还有不按计划发展的中央管理吗？文件上，这句话很费解，这恐怕是个翻译问题。中央的计划管理与商品关系、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机结合，这就比较通俗易懂了。

它是一个适应了经济发展一定阶段的要求，它与集约化、经济效益联在一起。甚至南斯拉夫也讲过这个观点，就像苏联这种模式的中央计划，也可能在南斯拉夫建国初期是重要的，但是以后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了。南斯拉夫讲过这个话，卡德尔[2]在他的文章里讲过，他没有完全肯定，他讲也可能是需要的，但是长期这样搞肯定是不行的。南斯拉夫、匈牙利，包括苏联，都是这样，进入集约化，改革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了，很不一样了。但是初期由粗放进入到集约的过程中，由片面地强调速度，依靠劳动力，依靠资源，依靠大量建设新厂，把这些都联系在一起，这时候中央集中性的计划经济是需要的。这时候，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国家需要用大量资金建设新厂。在这个时候更多地采用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强调速度的时候，这种形式是可以的。等到劳动力已经少了，资源已经越开越困难了，比较远了，而且企业需要转入集约化经营的时候，需要由外延转到内涵的时候，这时候经济体制改革就摆上来了。他们或多或少的是这种看法。但我怀疑这种看法。按这种说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怎么解释？那时候，他啥也没有，他搞了新经济政策。以后说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就搞成了一个模式。很显然，新经济政策在苏联是很重要的一段，那时候不是劳动力也多，基础也没有，资源也没动，那不应该采取这种形式？（马洪：过去的失误，想找个下台阶

的说法。）这种解释法（指南斯拉夫、匈牙利的解释）恐怕是不恰当的。反过来，可以这样讲，到了一个什么时候，企业经济体制如果不改，就混不下去了，无法再进步了。这不等于说，原来那样搞就完全正确。其实，越是开始经济基础薄弱的时候，商品生产应该越要强调，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越要强调。我觉得，商品生产问题，越是落后的国家越应当很好地强调，因为有个发展，有个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有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社会主义胜利都是在落后的国家，都是在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小生产汪洋大海的国家，这么个时候，这种情况下，简单地都用所有制来改造，用中央计划经济管起来，有需要的一面，没有用商品生产发展的规律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小生产到大生产转变的过程，这是一面。我看，恐怕这个道理更重要一些。在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这句话，这是我主张加的。还是把它统一起来。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三句话。从我们国家的实践来看，计划经济里边有三个问题：一个是纯粹的市场调节，这不是陈云同志讲的那个概念。陈云讲的自发的、盲目的市场调节，在我们国家只能是小量的，就是农贸市场、小商品、农村的三类商品，这个确实是自发的、盲目的调节，不影响大局，完全是自由价格。现在除了这个以外，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这个关系，必须包括一个运用经济手段引导、推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个是我们很大的课题。不能把计划经济和运用价值法则、运用经济手段对立起来，恰恰相反，现在完全证明了这一条，不运用价值手段，不可能实现计划经济。这也不等于都废除指令性计划，有些废除，有些不废除。废除也好，不废除也好，总之都得运用价值法则、价值规律。不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你讲的那个计划、计划调节是空的，是不可能达到的东西。三十多年的事实太多了。多少年来没肉吃，多少年来没有油吃，搞得我们国家不仅进口粮食，还进口食油。价格一调节，马上就有了。后来油菜籽那么多，计划调节怎么也调不下去，价格一降不就调下来了！大豆提到三角三，一下子大豆就多起来了，多了没有办法再减价吧。计划不用经济手段不行，过去好像计划手段就是计划手段，单纯叫指令，单纯的行政手段。我们经济手段运用得越来越好，指令性的指标减少了，对生产是很有好处的。但是，经济手段运用得不好的时候，没有充分运用的时候，当然不得不更多地保留一些指令性指标，这有一些可能是暂时的，有一些可能是被迫的，不得已的，但是它是必要的。我们国家将来发展的方向，将来搞得越好，指令性指标越可能缩小；搞得越差，指令性指标就越多。生产搞得越好，票证就越少；生产搞得越差，计划搞得越糟，票证就越多。不能说，票证多、指令性的指标多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可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个不是盲目的、自发的调节，这是真正讲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也就是要运用经济手段，使社会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如何达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一个是通过指令性指标的方式，一个是通过经济手段、经济政策的办法，达到有计划按比例。有计划按比例，是个客观的东西，计划是主观的东西，都按你国家的那个计划去完成，不一定是有计划按比例。这是两码

事。我们很多搞计划的同志到今天对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你说计划完成得好和坏，是说按你那个计划，还是说使社会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有计划按比例这个规律是个客观的东西，我们的社会发展是否有计划按比例，这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个客观事实。计划符合实际了，并且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有可能达到这一步；计划不符合实际，或者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和政策，你那个计划和客观经济的发展就要脱节。毛主席讲，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把价格和计划对立起来了，是第一、第二，老大、老二的问题。这个恐怕不行。你那个钢材想多生产，把价格一提就上去了。我的话说回来，我不是不赞成搞指令性的计划，我是说我们这个经济计划，是指令性的指标越多搞得好，还是越少搞得好？经济手段、经济杠杆运用得自觉了，熟练了，充分发挥作用了，计划中指令性指标就可以逐渐缩小，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经济杠杆还不能充分运用，或者还不具备什么条件不能运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不更多地运用一下行政手段，也就是指令性指标手段，去控制。尽管是事倍功半，但是还是必须要采取的，不然就乱套了。我看就是这么个关系。因此，在相当时期内，在相当的产品、相当的企业，既要有指令性计划，又要研究如何运用经济手段。我们现在的发展趋势，指令性计划、行政手段在减少。这几年改革的实践证明在减少。不是正在研究水果要退出计划吗？还有什么要退出。比如肉，就很明显，如果肥肉、瘦肉的价格一改变，矛盾就解决了。

二

我们的国营经济、大的工厂，大的方面若不能很好地发挥优越性，小生产的精心管理、细心经营的优点也没有，这两点都跑掉了。我前几天在齐齐哈尔，看了一个家庭养鸡厂。他讲他养鸡的密度是世界第一。生蛋的鸡一平方米四十只，当然分好几层了，养了几年了，没有生病；肉鸡一平方米七十只，就一个宿舍，挤得要命，后边开辟了一块很小的地方，养了几千只鸡。他那个房子挖了个地窖，一年四季恒温，密度大了，也不用电了，自然温度够了，也不用电照明，精心饲养啊！

看来，匈牙利是把计划和运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统一了。更好地注意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同计划经济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我认为它这个观点是对的，能不能完全做到是另外一个问题，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这样，不能把这个问题当成对立的东西。

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灵活地利用调节手段，要把信息搞灵通。上半年的事到第二年上半年才知道，一年都过去了，再搞调节就跟不上了。搞信息，将来也不能光靠下边报，他给你报假的，要上当。资本主义国家靠什么掌握信息？它有一套社会研究机构，有一套专门搞信息的社会组织，它就靠这个，谁要资料它都给你提供。它有些办法，有些手段，也不是光靠统计，加强调查啊，分析啊，各个方面。外国有些经济资料的发表，有些是国家的，有些不完全是国

家的，有些信息是分析出来的。搞信息，上个月的情况，至少下个月能知道，这就可以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经济手段、调节手段要集中。计划不能光靠行政手段，不能光靠分解指标，必须要靠经济手段。指标这个东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它有办法对付你。你搞这个指标，它用另外一个对付你。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样搞，运用调节手段，必须要有信息。调节手段一成不变也不行，情况变了，你还没有动，跟不上了，这就有信息问题。计划一定要用点现代化的手段。计算中心数据储存要准确，储存的数据是假的，显示出来不可能准确。

制定计划编一年看两年，就是编一年计划，往后预测两年。（马洪：《六十条》里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春季。）那是另外一个意思，它是三年定下搞多少，三年中今年多搞一些，今年不多搞，三年怎么能完成？今年又要看今年春天，三年最后落到头年春天。

三

越是集中，越可以按马克思的本来观点办。马克思为什么搞计划经济？他就是认为资本主义高度集中，就可以为实行计划经济创造了条件。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办法又过分强调行政手段的控制，这本身就是一个战时经济的手段，就是统制型经济的手段，完全是一种强制的。日本用这个词，日本战后是一种统制型的经济。希特勒也是这样的统制型经济，那是非常时期。正常情况下，越是小生产、企业多，越没有办法用行政管理。过于强调行政管理，就必然是官僚主义，必然是非常复杂的上层计划机关，官僚主义、行政管理机关，就必然束缚生产力。正当的说法，应当是这样。对小国来讲，应当说更有条件实行直接计划经济。对大国来讲，经济越复杂，地域越辽阔，直接计划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照道理来讲，应当是这样。像我们国家，我早就说过，我们的计划只能管一些最主要的东西，其它一些事情管不管关系不是很大。现在主要是管不住，那些通常管的事情太多结果管不了。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计划性，到了什么程度？你测一测，差得很。但是我们计划的方法、计划的体制、计划的内容，又是包罗万象。你看我们国家有什么计划性，有什么计划啊？没有多少计划性。现在真正起点作用的，是国家哪些东西？实在必须要控制的，我看要控制住。归根结底，要集中多少钱，要搞些什么项目，要集中多少物资，哪些东西要服从调动。就是这么几项、几件事，其它管得怎么样，管不住。你管来管去，煤炭不就管住了几个统配煤矿，三亿五千万吨。几个统配煤矿嘛，三亿五千万吨中有些地区内部的也不能管。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一条叫做要收缩战场，不要再管那么多了。就是哪些非要管的，现在不能放，并且为了达到要管住的目标，要采取些什么经济手段。一个是必须要管的，现在搞来搞去，不就是按这个办法吗？什么集中财力啊，搞重点建设啊，为了这个东西，有些用行政手段，有些用经济手段嘛，我管住几件大事，其它的东西可以放给地方管。你地方自己去管，你要管什么我不管。另外，逐步用经济的办法来推动它，引导整个经济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再一个，有

些明显的东西，要立法，加强综合职能部门、监督部门。我们还是管得太多，完全可以不管那么多。管得多了，也管不住。可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将来，我们这样搞了，其它很多东西就是要预测，不管的东西要有预测。社队企业这几年发展多少，可以预测一下。将来很多消费品指标都可以搞预测，不管。化纤搞多少，棉布搞多少，正当经济手段搞对头了，自然地会按照市场情况生产。可以研究一下，我们少管一些事，其它就是预测，用经济手段调节。我们必须管住的几件事，要有有力的措施，行政手段也好，经济手段也好，都必须有，要保证你要管的东西能够管住，必须要有有效的手段。

四

现在搞经济研究，经济部门要培养些翻译。你没这方面的翻译，到国外参观，搞一些混乱的名词，你翻不过去，他翻不过来，会增加许多混乱的概念。将来经济管理是一门大的科学领域，要培养这个领域的翻译，知道怎么翻。不然不能交流，这也是工具。现在主要是翻译不熟悉，他们用的概念，在我们这里用什么概念表达；我们用的概念，在他那里用什么概念表达。很多都是直译的东西，直译的东西多了，很费解。

他们企业现在还交不交利润给国家？（廖季立：不交）完全是税收，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它怎么搞。我们明年不是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吗？怎么完善法？他这个利润的概念没有税后利润上交，我们明年不是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吗？就是把税后利润取消，统统通过税收的形式。他对企业收几道税？（廖季立：产品税、工资所得税、城乡发展税、利润税、分红基金（奖金）累进税。此外还有投资税、土建税等等）。

五

我们的企业利润，有个价格合理不合理的问题，价格不合理的问题总得解决。总而言之，企业如果不用利润来表现，企业会搞繁琐哲学，流弊很大。不用利润考核，用什么考核？用产值考核？用净产值考核？用产品质量、数量来考核？用销售额考核？总之，不管怎么讲，最后集中的效益还是利润，这是目标，改革最后要改到与利润挂钩上。但是前提必须是价格合理。什么时候才能很充分地挂钩呢？这就要价格合理，困难也就在这里，目标也在这里。想来想去，不与利润挂钩的话，改革会很复杂，指标也会很难调动。必须与利润挂钩。但是，我们这个挂法流弊很大，为什么？因为价格不合理。我们可以通过税收作适当的调节，但是很难完全改变。什么纯产值、净产值那也很复杂。赚钱多的，少给它钱；赚钱少的多给他钱，这恐怕行不通。

我们研究匈牙利的经验时，要看到它是一种特定情况下出现的，像他们工资

增长的控制，搞得这么厉害，也是有原因的（它是要还债），随着情况的改变也是要改变的，是活的。当然这些办法是可以用的。这些办法比搞死好，用这些控制的办法，经济的办法，不要搞死，你一搞死，企业就没有积极性了。他这些办法，不管怎么样，网开一面。

六

调节手段，集中到比较集中的部门，考虑面要比较广。调节手段都拿到财政部不行，他们考虑问题，一切都是从增加财政收入出发，而不是从整个国家经济来考虑。也不能放到经委，他们是企业利益代表，为企业争利。我看中国应当把它放到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一班人，专门搞这件事，这是一个最大的事。要搞改革，要放活，又要有一套办法来控制，控制中间又不能搞偏了，要从全局出发，改革成功不成功，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多的问题是没有这个调节，有的条件又不具备，得逐步创造条件，完善条件。矛盾不断发现，又不断解决。一个是集中的，一个是考虑问题又是全面的，全面调节各种关系。要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放到体制改革委员会，叫经济调节组，出个东西，经过各个部门，通过国家法令来办。没有这个东西，改革搞来搞去都不行。现在也不能放在计委，我们计委是搞控制的。财政部只要增加财政收入就行，经委就是扩权，都不行。因为我们现在职能部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放在体改委，搞个经济调节手段的行政机构，工作有的通过各部门，有的通过国务院来办。

用经济办法管计划，增加用经济的手段去加强计划的办法。我最先看到的是涅尔什[3]的东西，简单的说法就是改变用指令体系、用指令计划来控制企业，而是用经济杠杆和立法的手段来影响企业。当然后来搞来搞去也遇到价格问题。用经济手段最重要的是价格，价格又有限制，如消费品价格又不能动等等，所以后来他们又出现一些反复。

七

今天，听一听，基本上清楚了。把情况再兜一兜，分别把计划方面的情况，财政、税收方面的情况，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等问题，再进一步把它搞清楚。

总的来讲，我们有几个问题得解决：

第一，计划体制得改。这几年我们对计划体制的改革抓的不够，没有认真研究计划体制怎么改革，是加强指标，还是用经济手段？把匈牙利的办法进一步弄清楚以后，研究在我国怎么搞。我们这两年实际上也突破了一些东西，今后，看我们怎么有计划、有步骤地去改。

第二，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这个问题与计划体制的改革不可分，但又不完全是这个问题。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我认为可以走快一点，因为事实上我们已

经这样走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就是改变为税收。现在我们的利改税不行，实际上还是利润总额分成的一种变种，目的是防止包干力、法大发展，先把阵地占住。

但是这种办法企业并没有自负盈亏，而是平均主义还很厉害。我看匈牙利的办法我们可以逐步采取，解决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反正是搞几种税。如果税收问题解决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由利润变成税收，既解决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也有利于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样企业自主权就扩大了，企业扩大自主权以后，就会发生奖金等问题，当然我们也不一定像匈牙利那样，搞得那么繁琐，但是总要有个办法来管它，来影响它。现在我脑子里想一个问题，财政部恐怕要考虑一下，如果这一步走了以后，我看对我们国家会变化很大。事实上，我们原来试行利改税的五百多个企业都是好的，像北京的几个企业都是很好的。四川利改税的企业也是好的。他们所以好，就是自负盈亏了。可是目前的利改税就没那么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还有个税后利润分配问题，企业经营好、经营差都差不了多少，但要改变它，就发生个税收水平问题。原来利改税最大的弱点就是一个企业一个税率，试点是可以的，虽然制定税收都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测算的，定下来后，企业也有积极性，但是从我们整个国家来讲，就没有办法推广。如果全国制定几个统一的税率，就会发生一个究竟定在什么水平上的问题。如果定得过高，按先进企业去定，那么我们国家落后企业就会垮掉很多；如果按中间偏上来定，我是主张按中间偏上来定，就必然会失掉一部分利润。这要很好地研究，究竟会失掉多少？我倾向按中间偏上的水平定，我是主张下个决心准备失掉一部分利润。本来它们的利润是上交的，如果按中间偏上，一部分经营很好的企业就会留一部分利润，我考虑就让给它，但可以用另外的办法控制它使用。基本建设不能搞，奖金不能发，把钱只好存到银行。这部分作为财政收入可能要减少，而银行的钱增加了，这也是暂时的。如果1高得对头，两年就过去了，而且损失不大，反正钱在银行里放着，就是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这一点不敢让，那势必发生先进的一个税率，中间的一个税率，落后的一个税率，最后大家一个样。如果中间偏上，我就可以达到，经营水平高的企业我们让一点，这就和现在的包干倒过来了，现在的包干越落后越占便宜。税率一高，先进企业能得到的就比落后企业多了。按中间偏上来定水平，也会发生落后企业、落后地区，在一定时期还要给它点照顾，完全不照顾一下会垮掉很多。这一部分要经过批准，在若干年之内，比如西南某些企业，在一年、两年或几年之内减税，在几年之后照征。落后的企业国家再补点，先进的企业也不往外拿，财政上就是要增加一点负担。看来这一步不想搞，我们的改革就很难前进，如果这一步搞了，危害也不会很大，不外乎就是先进企业留利多一点，利润率高。再一个就是品种问题，总不能一个产品搞一种税率，但是要划分多少等，因为我们现在价格水平不同，价格又不能一下子改得很合理，价格高的利润高一些，价格低的利润低一些。下半年认真把国家与企业的税收问题研究一下，明年先在一部分城市试点，后年就把它搞开。这个问题一搞，我们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问题大体上就解决了。相应地还有

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与地方有个大问题，我认为也有道理，匈牙利有这个意见，美国也是这个办法，还有小林实也提了这个意见，中央与地方问题看来得倒过来，不能地方平衡预算以后再上交，就是分享税划分之后，基本上中央要多拿，既不是要地方平衡预算确定上交比例，也不是在中央平衡基础上大家都吃大锅饭。划分税收的方针是中央多控制财源，然后固定中央税收的百分之多少拨给地方，这样才能解决钱怎么用的问题。日本也是这个办法，美国也是这个办法。美国联邦收入很大一部分都返回给地方，匈牙利也是这样。这个问题看来与地方的矛盾会比较大。我们将来研究中央与地方划分税收时，必须贯彻这个原则。中央要把全国的税收的税源大部分掌握到国家手里。除了中央直接开支以外，还必须有一部分由过去中央向地方借钱而改为中央补贴给地方。补贴了，对地方花钱也就可以干预了。这么一搞，再加上基本建设控制，工资怎么控制，就纳入轨道了。企业这么搞就独立了，不说什么“条条”，也不说什么“块块”，实际上条条块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基础上，相应地进行企业组织结构的改变，包括组织合理化，管理部门怎么超脱，企业的联合等。

第三，价格必须动。要好好研究匈牙利的经验，看来动，它也不怕。

这三个问题：第一，是计划体制问题；第二，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第三，是价格。把这三个问题如果都能搞出个道道来，有个步骤，我看我们的改革速度，就会突破了。现在看来，改革的路子比较清楚了。

你们去了那么久，可以再向下面业务部门详细介绍一下，计划、财政、工业、企业管理经验等，详细介绍一下，然后再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改。税收要抓紧搞。

注 释

1．廖季立（1915—1993），江西吉水人，时任国家体改委专职委员、副秘书长。曾任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局长，国务院体改办秘书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2．卡德尔（Edvard Kardelj，1910—1979），生于斯罗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市，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创立者。曾任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联邦政府副主席，联邦议会主席。

3．涅尔什（Nyers Rezs6，1923—），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市。在担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主管经济工作的书记时，是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后被免职任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复出后曾任匈社工党主席、社会党主席。

引滦入津工程是重点建设的一个好典型*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考察引滦入津工地时的讲话。

引滦工程搞得很好，打了很漂亮的一仗。这几个月来，在北京传说这里的新闻很多，很鼓舞人。引滦工程有许多很可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全国正在展开的大规模的重点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志们都知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引滦工程，对解放军参加这个工程所做出的贡献和非常好的表现，作了很高的评价。

这次我和启立[1]、建秀、纪云同志，还有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志到这里来，就是想告诉同志们：希望你们把经验认真总结一下，以便能够把引滦工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在全国重点建设中、在各条战线推广，这对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有重要的意义。参加引滦工程的两支部队和天津市委，都要好好总结一下。你们已经写过一些材料了，刚才也作了很好的介绍，我想还需要进一步总结提高。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目前我们正在展开重点工程建设。重点建设搞得好坏，对四化建设关系重大。如果大部分的重点建设都能够做到质量好、周期短、投资省、效率高，那么，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就可以加快。但是应当说，目前相当多的基本建设，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什么“胡子”工程，周期无限地拖长，投资几倍地超过，质量很差，效益不高，互相扯皮，互相揩油，过一道关就扒一层皮等。我们搞重点建设要集中财力、物力。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就是把人民，把各个地方、各个单位节约起来的物力、财力集中起来，也会浪费掉，达不到我们预期的目的。我以前讲过，如果将来搞成这么一种结果，就对不起人民，国务院就无法交代。因此需要而且必须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改变这种状况要严明纪律，加强检查，揭露矛盾，追究责任。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些好的典型、好的作风、好的经验来振奋人心，振作人们的精神。这些年像你们这样好的经验、好的作风、好的风格，确实听到的比较少。你们的经验非常可贵，特别是现在可贵。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在社会风气不好、纪律松弛的情况下，你们来了这么一个突破，出了这么好的一个典型，特别可贵。如果在五十年代，这种情况是不少的。现在不是说我们要整顿党风，整顿社会风气，要实现三个根本好转吗？应当从各项具体工作开始抓起。一方面要表扬好

的，一方面要揭露坏的。所以，我觉得引滦工程的经验很值得好好总结一下，认真推广。

经验很多，怎么总结，有多少条？我现在说不清楚，靠你们了。你们都是实践者、直接参加者、领导者，经验是你们创造的。你们负责总结，我们负责推广。对照我们目前的基本建设、重点建设，我感到有几条很重要。

第一，重点工程必须是真正重点。对引滦工程，天津市上上下下都把它真正作为重点来保，参加施工的两支部队也全力以赴，没有这一条，其它的就谈不上。重点工程必须始终是重点，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不少重点工程没有真正当成重点去搞，抓得很不得力，这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看来必须解决。重点工程决不能多。但确定为重点后就必须要保，集中力量，一鼓作气把它搞好。决不能上了马以后稀稀拉拉，那样就会误事。

第二，必须有坚强的组织领导。重点建设没有好的组织领导都是空的，工作无法搞好。搞好重点工程首先一条是要有好的领导班子，包括各级领导班子。这个班子要有好的作风，有正确的决策，精通业务，很善于做组织工作。你们这里有很多好的经验，不断地发现人才，不断地充实健全班子，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所以各项工作搞得很出色。

第三，正确的经济政策必须同革命精神相结合。长期以来我们在工作中确有否定正确经济政策的现象，如不讲按劳分配、“吃大锅饭”等；但现在也确有一些不重视发扬人的革命精神，不注意精神状态的问题，需要切实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光讲道理不行，各级领导必须要有好的作风。你们刚才讲了很多这种例子，如言传身教结合、关心战士等。领导要深入第一线，到最困难的地方，直接帮助那里解决问题。越是艰苦的地方，领导越应该去。要关心第一线，关心从事最艰苦工作的那些同志，包括在生活上的关心。把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就能充分调动广大干部、战士、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重点建设中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

最后，我还想讲一下解放军积极参加和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指引下，在邓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我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比如军民共建文明村、文明镇，就是河北保定地区驻军和当地群众创造的，现已在全国逐步推广。事实证明，哪里开展了这项活动，哪里的精神面貌就发生显著的变化。这几年，部队在参加抢险救灾中也发挥了骨干作用，哪里有重大灾害，哪里有危险，军队就出现在哪里，恢复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还有在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活动中，部队也作了突出的贡献。这次六十六军和铁道兵参加引滦工程的建设，又为军队参加国家重点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引滦工程的经验看，军队有计划地参加国家重点工程，是进行四化建设的重要形式之一。这是国家的需要，形势的需要，对推动整个国家建设和部队建设都有重要意义。我们的军队，是一支组织性强、纪律严明、思想觉悟高、作风过

得硬的人民子弟兵。引滦和其他许多工程经验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最艰巨的工程、最困难的地方，攻难点，过难关，解放军起了巨大作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所以，有计划地抽调一部分军队参加重点建设，有利于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的进度，推动四化建设的进程。同时，部队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本身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特别是政治思想上的提高，这是最重要的收获。部队参加重点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密切军民、军政关系，增强军民团结，有利于部队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和组织纪律性的加强，有利于培养“两用人才”，学会打仗和建设两套本领。总之，有利于提高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民团结，是我们的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军政、军民关系曾经受到严重损害，留下了一些疙瘩。在当时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产生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看来这些问题在我们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任务中，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据我所知，四川过去军民关系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前年四川大水灾，在非常危险、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解放军奋不顾身地帮助老百姓抢险救灾，人民从这里看到了我们军队的本质，说解放军还是解放军，仍然无愧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政治上产生很大影响，军民关系有很大变化。这次我们军队参加引滦工程以后，天津人民也是有口皆碑，说“老八路回来了”。这样一个收获是非常可贵的。“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在历史的长河中毕竟是短暂的，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出现那些问题，不足为怪。我们应当向前看，在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中，军民团结一致，并肩战斗，结成新的友谊。这里我着重讲政治思想上的收获，至于在部队建设其他方面的收获，部队的同志还可以进一步总结。

总之，应当把引滦工程的经验系统地、全面地总结，加以介绍，认真推广，促进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建设，使我们经济建设战线精神为之一振，面貌为之一新，把现在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大大扫除一下，把好的东西发扬光大。

注 释

1．胡启立（1929—），陕西榆林人。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曾任全国学联主席，清华大学副校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市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电子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搞好社会治安是全党全国的大事*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根据中央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这次政法工作会议集中讨论了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大政方针和行动部署。这是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这次会议的时间虽短，但开得很好。刚才巫显同志已经作了很好的总结，我完全同意。耀邦同志在外地视察工作，他委托我在这次会议结束时讲一讲。这里，我着重讲以下四个问题：

一、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是保障四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大决策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传达贯彻小平同志、中央常委和书记处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指示。中央认为，小平同志、中央常委和书记处提出的方针、政策、措施和部署，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对于我们解决社会治安问题，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大决策。

小平同志、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一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二是照这样办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治安，确实很不好。刑事犯罪案件越来越多越严重，不少地方犯罪分子横行霸道，无所顾忌，群众没有“安全感”，出现了“坏人神气，好人受气，积极分子憋气，基层干部泄气”的不正常现象。这主要是我们心慈手软，打击不力造成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早已深为不满，有强烈的呼声。过去我们含含糊糊，回避问题，没有正视这个现实。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击中了要害，抓住了关键，大家感到震动很大，教育很深，大快人心，大振人心。

我们与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并不是没有办法。过去我们抓得不好，主要是思想混乱，决心不大，部门之间互相掣肘，缩手缩脚。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解放了我们的思想，解开了我们的手脚，是我们同犯罪分子作斗争、搞好社会治安的有力武器。我们有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的拥护支持，有过去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经验、办法，犯罪分子又都早已暴露，浮到面上来了，只要认真贯彻中

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就一定能够搞好社会治安。我们已经看到，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传达到哪里，哪里就群情振奋，斗志倍增，显示了巨大的威力。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动员令，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坚决打击，一网打尽，就一定可以实现社会治安的好转，甚至不要两三年，社会面貌就一定会改观。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

我们还必须认识，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不只是对社会治安的好转有很重大作用，它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要看到，贯彻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搞好这一斗争，对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保障社会主义建设，提高敌情观念，加强党纪、政纪，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不经过这场重大的斗争，党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是不可能做到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顺利进行。

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小平同志多次讲过，必须采取这样两手：一方面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方面也必须看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以后带来的问题，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一切坏东西的侵蚀，既要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同时又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实行开放、搞活政策，经济逐步繁荣起来以后，避免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犯罪活动泛滥、社会很不安宁、道德风尚日益败坏的不治之症，使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良好的精神风貌、思想作风、社会风气。我们应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重要性，理解中央常委指示的重要性。

二、关键在于全党统一认识

要贯彻执行好中央常委和书记处关于从重从快，坚决打击，一网打尽的指示，关键在于全党要统一认识，政法部门要统一认识。认识一致，才能步调一致，行动有力。我们党有个好传统，只要全党上下认识一致了，就一定能够齐心协力，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学习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我认为在以下四个问题上，要取得一致的看法：（一）现在的治安情况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应当怎么估计？这是一个前提。（二）治安情况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打击不力？（三）是实行从重从快的方针，还是从轻从慢的方针？从重从快与加强法制是不是对立的？严厉打击与综合治理是不是对立的？（四）要不要采取统一组织行动的办法，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一网一网地撒？这次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在这几个主要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基本上一致了，中央政法委员会的报告和刚才巫显同志的报告，也作了回答。这里，我想着重讲以下几点看法。

关于严厉打击犯罪分子与综合治理的关系，应当看到二者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综合治理包括很多内容，有专政的手段，有行政的手段，也有教育、感化的手段等。但是，运用专政手段，依法严惩犯罪分子，是综合治理中首要的一条。首先要有政法机关的威慑力量，然后说服教育和其他手段才能起到充分的作

用。在犯罪分子活动嚣张、肆无忌惮的情况下，教育、感化就不可能起多大作用。严厉打击，使犯罪分子感到这样下去没有出路，此路不通，才有可能规规矩矩地接受教育、改造。我们应当审时度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少地方仍然是犯罪活动很猖狂的时候，不加强专政的威力、不严厉打击罪犯的气焰，其它措施就无法奏效。采取坚决打击的办法，再辅之以其它办法，才能收到综合治理的效果。

关于从重从快与加强法制的关系，也应当看到二者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法制本身，就包括了宽和严的内容，体现了宽严结合。我们强调依法办事，坚决惩治犯罪分子，正是依法办事的表现。对法律，我们必须遵守。但是决不能把法律条文的含义和量刑的幅度硬往有利于罪犯而不利于人民的方面去解释，去裁决。要看到我们的法律还很不完备，已有的法律经过实践证明也还有不完善、不严格的地方，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通过立法机关或司法、行政机关作出必要的补充，或作出适应新情况的新解释，而不应当因此束手无策，放松对人民的保护和对敌对分子的打击。我们的法制决不是要使犯法的人无所顾忌，而群众同犯罪活动作斗争则困难重重。现在的状况是很不正常的，应当坚决纠正过来。要使我们的法律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政法部门、公安干警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锐利武器，使人民感到法律是保护自己的，因而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使违法犯罪分子感到法网森严，没有可以侥幸的机会，谁犯了法，谁就逃不脱法律的制裁。这才能伸张正气，压倒邪气，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分子才会越来越多，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充分显示出威力。

为了适应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我们要逐步搞出一套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制。中国的社会是很复杂的，我们进行法制建设，要看到这种复杂性，不要想得过于天真。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了一百多年，清皇朝垮台后军阀混战十多年，蒋介石统治了二十多年。新中国只有三十多年，中间又有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十年内乱。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我们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也必将长期进行下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加强，不能削弱。人民民主与对敌专政是对立的统一，我们必须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但不能因此而忽略了专政，产生片面性，不对敌人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我们的法制，要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服务。资本主义的法制，搞了三百多年，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而且资本主义的法制，永远也不可能制止和消除犯罪现象，相反，资本主义世界犯罪现象正在继续恶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我们决不能对资本主义法制抱任何幻想。我们和他们社会制度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的法制观念和道德思想，千万不能照搬。目前出现的犯罪分子嚣张，群众缺乏安全感，政法干部束手无策的这种状况，决不符合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本来的要求。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在法制建设上搞得更完备，更健全，更加适合我国的国情，以发挥专政机关“刀把子”的作用。

这里还要说一下这次在打击刑事犯罪中对流氓团伙必须狠狠打击的问题。现在很多流氓团伙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有的就是反革命小集团，他们仇恨我们的

社会主义制度，同无辜群众为敌，以残酷的手段向社会报复，以杀人越货、强奸妇女、放火爆炸等来发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仇恨。他们绝大部分不是老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也不是老的四类分子，其中虽然有旧病复发的老手，但多数是在旧的刑事罪犯的影响下，在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这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的社会渣滓。这种社会渣滓的迅速发展，除了由于对他们打击不力以外，党内的太平观念，忽视或否认阶级斗争的观念，放松思想斗争而片面强调宽大的倾向，也是重要的原因。我们要认清流氓团伙的性质，决不要小看了他们的破坏作用，实际上他们类似“黑社会”。在这场斗争中，必须坚决予以摧毁。对其骨干分子，要统统抓起来，对流氓集团的头子，要严加惩处。一般的成员要勒令限期到派出所登记，具结悔过、拍照片、留指纹、存档案。坚决打击首恶分子，就可以挽救一大批陷得不深的失足青年，使他们迷途知返。这也是综合治理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三、全党动员，首长动手，发动群众，首先打好第一仗

按照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这次行动，要首长动手，层层负责，广泛发动群众，统一组织行动，有声势、有威力，一网一网地撒，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这是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一定要列入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从一开始就抓得很紧很紧。党委一把手要亲自抓，及时解决行动中出现的新问题。各行各业，工会、青年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都要积极投入这一斗争，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发动群众，参加到斗争中去。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动员。但是，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上，一般不要公开宣传。如何宣传，由中央宣传部另行部署。为了统一行动，及时解决问题，中央决定在此期间，各级政法机关，公、检、法、司法机关实行联合办公，集体办案。

中央常委和书记处要求我们以三年为期，解决问题。这就要抓紧行动，作好部署。我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要组织好第一个战役。时间不宜拖得太久。首先在国庆节前要普遍地、狠狠地搞一次大的行动，撒一次大网。这个决心非下不可。一定要把第一炮打响。这点非常重要，各级领导必须引起重视。这是因为：第一，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行动的条件。党心、人心都渴望这样办，形势也要求这样办。第二，这样作，才能打开局面，出现一个对敌斗争的有利形势。现在，群众和基层干部仍有一些疑虑，还要看一看我们是不是真正下决心，能不能解决问题。在国庆节前集中先打击一批，把浮在面上的犯罪分子扫荡一次，并且及时公开宣判，才会使群众受到有力的鼓舞，消除怀疑，积极参加斗争；才会使犯罪分子受到沉重打击，促使他们分化瓦解。这以后才有可能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揭发检举，把隐藏很深的坏家伙挖出来，把斗争引向深入。在整个斗争中，要注意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狗急跳墙。要整顿、组织治安保卫委员会和治保积极分子

的队伍，使我们同犯罪分子的斗争建筑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这样就能彻底扭转好人怕坏人的局面，促使社会风气大转变，使群众扬眉吐气，把坏人置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孤立境地。所以，国庆前的行动，对于整个第一个战役，对于争取斗争的全胜，都有决定的意义。

四、加强政法部门的建设

我们的政法机关不仅不应削弱，而且应该加强。现在斗争很复杂，必须加强政法部门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政法公安部门要改变人们心目中软弱无力的形象，就必须在这场斗争中真正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的威力，要同仇敌汽，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服从命令听指挥，当保卫人民利益的忠诚战士。立法机关、一切人民团体、以至每个爱国公民，都要作他们的坚强后盾，支持他们，维护专政机关的革命权威。鉴于目前任务重，政法部门力量普遍不足，准备适当增加一部分干警编制，重点加强薄弱环节。

政法部门在这场斗争中，要考验队伍，整顿队伍，发现和选拔优秀的中青干部，充实领导班子，并注意加强干警的训练，大力提高队伍的素质，培养建设一支政治思想好、精通业务的过得硬的政法干警队伍。要大力表彰对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同时对队伍中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不法分子，严肃加以处理。

要发挥政法部门的职能作用，提高政法队伍的战斗力，还必须加强他们的技术装备和物质建设。目前处于第一线的公安干警的技术装备太落后，很不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尽管国家财政经济还存在困难，各方面都应当节约，但是花一些钱用在逐步使公安干警的技术装备现代化上，是必要的，这是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当然，这个钱也要用好，不要浪费。公安部已经向国务院写了报告。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困难也要挤出一些钱用在这个方面。中央要把这笔钱列入财政预算，各地也要尽可能地拨一些经费，解决地方公、检、法、司法机关的急需。还有一些政法方面的基层建设，如派出所、交通队、消防队、边防站、民警、司法助理员、人民法庭的办公生活用房等，也要纳入地方建设规划，给以支持。

还有，抓一些犯罪分子，要有地方放，而且是长时期地关押、改造，所以必须建设一批劳改、劳教场所，注销户口人员劳动的场所、收容审查场所也需要解决。各地要想法积极予以支持，解决好这些具体问题。过去不少劳改场所都交出来了。这次应研究尽可能交回一些给劳改部门。这方面也要花一些钱，中央和地方都要帮助解决。

同志们！新的一场伟大战斗就要开始了，中央希望政法战线的全体同志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发扬机智勇敢、顽强战斗的精神，抓紧准备，抓紧行动，在国庆前打好第一仗，打出一个新局面来，夺取第一个战役以及整个斗争的全胜！预祝同志们旗开得胜！

系统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素质等十个重要问题*

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第六次常务会议上的讲话。在审阅这个讲话以后，胡耀邦批示："思路和方向完全同意。是否还可以发宽一点？每省市是否也可发一份请他们看？使他们也打开思路，多想点问题。胡耀邦八月二十五日。"邓小平批示："退紫阳同志。这个题目出得好，希望如期实行。邓小平八月二十九日。"陈云批示："紫阳同志：你去新疆前讲的一些经济问题设想，我看过几遍。我觉得要有一些设想，很必要。我有几点意见，请你斟酌。（一）中央的财政收入要达到百分之七十，才能做些大事。（二）农民收入的速度，不能太快。要继续增加收入，但幅度不能太大。（三）城市工商业改革已有几年经验，似应总结一下经验，以便继续前进。这些意见对否，请斟酌，供你参考。陈云八三年九月十三日。"

今天是出题目，部署一下。

去年以来，我们搞长远规划。今年上半年，主要抓了重点建设方面的一些事情。当然，现在还刚刚开始落实，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大体上已有了部署。今年下半年，要开始着手研究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如何提高现有企业的素质。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很重视这件事情。小平同志说，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比重点建设复杂得多。今后二十年，我们要抓紧两件事，一个是重点建设，再一个就是提高企业素质。从某种意义上说，重点建设也是为现有企业服务的。现有企业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部分、主要基地，吃饭和建设，都得靠这个。我们国家目前财政困难很大，全年的收入才千把亿元，捉襟见肘，办不成多少事，根本原因是企业的素质太差，经济效益不高。企业的面貌如不改变，要解决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就非常困难。所以，这件事情，关系甚大，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谈不上四个现代化。

过去我们也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但研究得不系统，没有搞透。今年下半年，要理出一个纲要来。如何提高企业的素质、质量，这是个总题目。企业的现状如何，今后二十年，路子怎么走，出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效益，都要调查研究，作出分析。这里，有经营管理问题，有技术进步问题，有职工队伍包括领导干部的水平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势必涉及整个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涉及到体制改革、企业结构调整、企业整顿、技术改造、智力投资等等。这是一项大工程，要组织一个超越部门的班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通盘研究。建议由吕东、马洪同志负责，计委、经委、体改委、科委、科学院、社会科学院、书记处研究

室参加，国防科工委也要参加，广泛征求企业家和理论界的意见，好好下些功夫，用半年时间，搞出一个提纲挈领的文件来，列入长期规划。有了这个东西，就有了方向了，今后该采取哪些大的政策、措施、步骤，心里就有数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下面讲的其他一些问题，都同这个问题有关。

第二个问题，城市改革问题。

农村改革，效果很好。城市改革，现在还是初步的，探索性的。对城市改革必须采取积极态度，不改革是没有前途的。问题是按什么路子改，先改什么，后改什么。城市和农村情况不同。农村改革，主要是解决集体所有制经济内部的关系问题。城市主要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看来，首先要解决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关系问题，然后才能解决好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问题。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是解决企业内部关系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企业就会想方设法把负担转嫁到国家或消费者身上来。过去对这一点认识不足。今后的城市改革，首先要解决企业的活力问题，第二才有可能真正解决职工的积极性问题。

刚才讲了提高企业素质，现在又讲企业的活力。所谓活力，一方面，必须使企业有改善经营管理、关心技术进步的权力和利益。要给他们这样做的权力，并使他们在作出努力收到效果以后，确实能够得到自己的利益。这样，企业才会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旺盛的进取精神。这还不够。另一方面，还必须造成一种形势，使企业非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不可，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归根到底，就是国家不开大锅饭，不让企业躺在国家身上。东欧有个经济学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之一，是对企业搞那种“无微不至的”、“父亲般的”照顾。日本的一个经济学家也说，中国对企业太宽容了。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对国家，对企业，都没有好处。片面地为企业争利，听任企业挖国家的利益，不符合改革的方向。同样，把企业的手脚捆得紧紧的，使企业成为算盘珠子，拨一拨，动一动，那也是没有前途的。

解决国家同国营企业的关系问题，应该抓住哪一个环节？我看，要抓完善税制这个环节：通过进一步完善税制，使企业得以按照国家政策的规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是当前解决国家和国营企业关系的主要环节。除此以外，现在还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目前正在实行的利改税，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的办法，虽然把上缴利润纳入了税收的轨道，采取了税收的形式，但同过去的总额分成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进一步完善税制，就是不仅要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改变上缴利润的制度，使企业在照章纳税以后，利润归己，盈亏自负。这样，企业才有可能独立核算，并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竞争。

现在，企业之间，特别是行业之间，不可比的因素很多。这主要是价格不合理造成的。现在价格背离价值的现象很严重。近期在价格不可能作通盘调整的情况下，应当更多地利用税收这个杠杆进行调节。首先要设置不同税率的产品税：价高利大的产品，以及供过于求的产品，征重税；价低利微的产品，征轻税，有的还可以免税。这样，行业之间苦乐悬殊的矛盾就可以缓和；同时，也有利于供

求矛盾的缓和。在行业内部，由于资源条件不同，设备条件不同，同样存在着不可比的因素，这也要想办法，例如通过资源税、固定资产税等进行调节。在征了各种调节税以后，最后再统一征收所得税（有的同志提议，“所得税”的名称不确切，应改称为“利得税”）。因此，通过完善税制，是有可能使各种企业处于大体相同的条件下，独立核算，进行竞争的。

关键是要把税率设计好。税率定在什么基准上？我的意见，行业之间以及产品之间，大体应以我国目前的平均利润率为基准；在同一行业同一产品内部，则以中等偏上企业的水平为基准，不按上海企业的水平设计，也不按西藏、内蒙古企业的水平设计。纳税以后，经营好的企业，利润就多，经营差的企业，有的利润少，有的没有利润，有的甚至亏损。对一般的落后企业，可以规定减免年限，给以照顾，限期赶上来；太落后的企业，就不能照顾了，只有淘汰、倒闭。这样做的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国家的财政收入可能少收一些，但两三年后，形势就会改变，因为落后企业也被迫赶上来了。至于先进企业多拿一点，这不要紧，无非是作一些规定，允许用在哪里、不许用在哪里就是了。要允许先进的企业壮大自己，搞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发展生产，扩大销路，乃至设立分厂。这种发展，可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是符合宏观要求的，对国家有利，应当加以支持。

在这个基础上，还要重新划分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将来，要打破隶属关系，一切企业，不论中央企业还是地方企业，一律向当地的国家税务机关纳税。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问题上，既不能回到过去的过分集中，也不能在地方平衡的基础上再来确定中央拿多少。宁可中央补贴地方，不能中央向地方借钱要饭吃。中央和地方之间，要按照税种，划分收入：有些税种，收入全部归中央；有些税种，收入全部归地方；有些税种，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共享。走了这一着棋，就必然会在经济生活中进一步引起一系列的变化，有些是很大的变化，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

我们经济体制中有两条弊病是大家经常讲的：一条是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以及部门和地区之间，互相分割；再一条是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以落后挤先进。这两大难题，如果想就事论事地去解决，都行不通，阻力很大，事倍功半。通过完善税制，这些问题就有可能迎刃而解。因为所谓部门利益、地区利益，无非是企业归谁、上缴利润归谁的问题。这种“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实际上都是上缴利润制度的产物。税制完善以后，部门所属的企业和地方所属的企业都向税务局纳税，这就在经济利益上同条条块块脱了钩。这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同样，以落后挤先进的现象所以能够存在，根源在于落后企业受到保护，先进企业却受到限制。实行新税制以后，全国同类企业都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竞争，先进的企业有了发挥优势的活力，落后的企业面临淘汰的危险，因势利导，就可以大大加快联合、改组和专业化协作的步伐。顺便说一个观点，过去重复建设之风所以煞不住，除了条条块块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原因：供不应求嘛！供不应求的局面不改变，单纯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就难

以奏效。这种例子多得很。我在广东工作的时候，段君毅[1]同志在一机部工作。那时，广东要搞小合成氨，段君毅同志就对我宣传说，不能一个省一个省搞，要全国协作，要靠上海。我听了很有道理，就去说服省计委。省计委的同志说，你不要听他的，上海至多只能给你两套设备，解决不了问题，还得靠自己。广东一大批小合成氨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因此，要防止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应该有两条：一条是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例如规定质量标准，批量标准，能源消耗标准等等，达不到标准就不发许可证，不准开业，日本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另外还必须有一条，就是要支持先进的企业，给他活力，让他发展壮大，开足马力，大批量地上去，质量高，成本低。你能满足他的需要，经济效益又好，他还去搞那种落后的东西干什么。

所以我看，完善税制是一把钥匙，可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为城市的全面改革开辟道路，也是提高企业素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税制问题，我看要下个决心。只要基本路子对，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出点小毛病，那不可怕，及时纠正嘛！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问题，企业内部的按劳分配问题，条块矛盾问题，重复建设问题，企业组织结构问题，技术进步问题，节约挖潜问题，总之，影响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的一系列问题，都不好办。这个问题不宜迟，能不能早一点把新的税制设计出来，明年找一些地方开始试行？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由田纪云、王丙乾同志负责，廖季立和经济中心的同志参加，起草两个文件：一个决定，一个细则。这里有大量的测算工作，可以委托一些大学的经济系去做。有了初步方案以后，还可以找一些外国的经济专家来，请他们提提意见。

第三个问题，改革计划体制。

提高企业素质，完善税收制度，都涉及到计划体制问题。这几年，没有把改革计划体制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是一个缺点。计划体制的改革，可以先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我们的国家计划，只能抓主要的，重点要很突出，不能包揽过多。国家计划，要抓重大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抓重点建设；抓经济调节手段。至于一般性的事情，可以不管，放开。计划究竟管什么？这个问题要研究。我们国家大，应该更合理地分配积累和消费，更好地集中资金办一些大事，等等。但是，经济文化落后，管理水平低，统计资料不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则恰恰是我们的弱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什么都想管，一是不起作用，二是官僚主义，僵硬，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完善税制以后，企业的活力增大了，经营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了，如果计划还是管得那么死，那是不能适应的。总之，不要管那么多，少管一点，管主要的，要管就管好。

二、要加强经济调节手段的作用。匈牙利的经验值得注意。日本也很重视经济调节手段。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很大，办法就是把物价、税率、利率等经济调节手段抓得紧紧的。国家想发展什么，就用调节手段加以支持；想限制什么，就不支持，不优待。我们的计划指标，有指令性

的，有指导性的，这都是必要的，但对指标的作用不要估计过高，不要以为下达了指标，就把它管住了。其实不见得。这几年，对烟叶、油菜等等，真正起作用的，是价格。将来，即使对指令性指标，也要注意发挥调节手段的作用；对面上的经济活动，更要学会运用调节手段。加强调节手段的作用，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更有条件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运用物价、税收、信贷、工资等调节手段，来达到计划规定的目标。当然，从不会到会，需要一个过程，但方向应该是更好地运用这些经济调节手段。

三、用什么指标考核企业？最近，启立同志从上海回来，写了一封信，建议主要用净产值来考核企业，这个办法，比现行的办法好，但据说也有它的局限性，计算也比较复杂。现在，我们还不能废除总产值这个指标，因为翻两番就是用总产值计算的。将来考核企业，归根到底要看它新创造的价值（m），就是说，看它能上缴多少税，有多少利润。由于价格不合理，现在企业的税利还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但是，企业的利益必须同它的经济效益和经营好坏挂钩，这样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考核指标不能太复杂，强调“健全”考核指标不一定是个好办法。指标越繁琐，越难办，矛盾越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会想各种办法对付你。在过渡时期，到底用什么指标作为考核企业的主要依据，很值得研究。

计划体制，建议由胡启立同志负责，宋平、安志文[2]、廖季立、柳随年[3]同志参加，马洪同志也参加，下半年提出改革方案。

第四个问题，外贸体制的改革。

中国的对外贸易究竟怎么搞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已经布置过了。总的原则是，既不能现在这样多头对外，盲目削价竞争，外汇收人归地方、部门，亏损向中央报账；又不能再回到过去那种一切统死，生产和销售严重脱节的老路上去。要抓紧研究，下半年拿出方案来。

第五个问题，价格问题。

除了理论价格要继续研究以外，在价格方面，明年准备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某些生产资料要提价。匈牙利在这一方面步子迈得很大。他们是向国际市场价格看齐，宁可给补贴，也要提高生产资料的价格。我们对初级产品的价格也要适当作一些调整，主要是矿石，生铁，木材，水泥，煤炭。木材的价格太低，不提价，代用品就发展不起来。有些东西，可以一方面提价，一方面加税，把企业的收入拿回一部分到国家手里来。这些初级产品提价以后，有些企业可能吃不消，那就补贴，补在明处，至少使企业知道自己过去是在靠廉价的原材料和燃料过日子，并没有赚钱的真本事。至于农副产品价格，明年要稳定。

二是坚决实行优质优价。质量好的产品，新产品，应该优价。同时，一定要实行劣质劣价，对低劣产品搞惩罚价格。这件事明年要出台。即使不能全面出台，也要先搞若干种产品，解决一批。

这两件事，对市场物价影响不大，明年可以先做。由张劲夫、宋韵文[4]同志负

责，下半年提出方案。

第六个问题，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

启立同志建议搞“两级分配”制，这个思路是对的。在工资问题上，国家不必直接搞到职工头上。国家就管到企业，由企业根据国家的政策去解决职工的问题。国家要控制职工人数，控制工资总额，也要规定出大体的工资标准。经营好的企业，职工的工资可以高于国家标准；办得不好的企业，只能低于国家标准。具体问题，如什么时候升级，升级面大小等等，一般都可由企业自己去处理。工人有意见，向企业提。国家一是用法令进行控制，一是用税收加以节制，比方你这个企业要突破工资基金的比例，就得向国家额外缴一道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应该解放思想。建议由胡启立同志负责，赵守一[5]同志参加，研究一些新的办法出来。除了工资制度以外，劳动制度（这个问题更复杂）如何改革，也要进行研究。下半年内，一是研究改革的方向，二是考虑明年先搞些什么。

第七个问题，建筑材料工业和建筑业。

这个行业，在西方曾经被称为发展经济的支柱之一。本世纪内，中国的建材工业和建筑业应当有个大发展。搞得好，是一大财源，可以回笼大量货币。中国的建筑业和建材工业究竟怎么搞法？要组织个班子，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展望一下我国的建材工业和建筑业会出现什么形势，如何发展，如何搞活，方向是什么，先搞什么，后搞什么。可以组织一些有见解的人鸣放一番，不要受什么框框限制，经过研究，形成一个纲要，纳入长远规划。这件事情，由李锡铭[6]、吕克白[7]同志负责。

第八个问题，电子工业。

电子工业如何振兴，也要搞个纲要出来。我讲的不是计算机攻关，那件事情已经另作部署；也不仅仅是指电子工业部所属的企业，而是指我们国家的整个电子工业这个行业。要把今后发展电子工业的重大方针、重大措施提出来，形成一个纲要，纳入长期规划。

我看，如何发展电子工业，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有求实精神，不要好高骛远。中国就这么大的力量。现在要下决心搞小型机、微型机，用来改造整个国民经济，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这样做，有市场，可以赚钱，电子工业就活了，而且能够促进整个经济发展。不要热衷于搞那些大家伙。大家伙，一共用不了几台，可以买嘛！日本并没有一下子就搞那些很大的家伙。南朝鲜没有搞，香港、台湾也没有搞，但他们的电子工业相当活跃。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问题是什么时候有。这个世纪我们不在大家伙上搞赶超。现在，必须把为技术改造服务、为管理服务的微型机、小型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归根到底，经济是基础。搞电子工业，搞科学技术，不能从追求最先进的东西出发，而应当从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经济实力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那个时候，什么都好办了。这件事情，总的请万里同志负责，电子计算机办公室具体抓。

第九个问题，食品工业和饲料工业。

这在我们国家是个很大的问题，很有发展前途，也要专门搞个纲要，作为长期规划的一部分。要跨部门，统一规划。由王磊、袁宝华、李瑞山同志负责，下半年交卷。

第十个问题，引进国外人才。

引进人才，要统一计划，统一政策。渠道要多样化，主要是利用民间形式。这件事，小平同志已委托依林同志挂帅，方毅、宋平同志参加。考虑到他们工作非常忙，建议增加张劲夫同志，由他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上面讲了十个问题。总之一句话，为了把我们的经济工作继续推向前进，除了落实已有的部署以外，还要抓住一些带根本性、长远性的问题，组织专门班子，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拿出方案或纲要来，由财经小组审议后，报中央定案。

注 释

1．段君毅（1910—2004），河南范县人。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曾任西南财经委副主任兼工业部部长，一机部副部长、部长，铁道部部长，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常委。

2．安志文（1919—），陕西子洲人。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曾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西北三线建委副主任，六机部部长，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顾问。

3．柳随年（1929—2002），陕西绥德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体改委委员，国务院副秘书长，物资部部长。

4．宋韵文（1910—1994），山西太原人。时任国家计委顾问兼国务院物价小组组长。曾任国务院财经委秘书长，轻工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建委、计委、机械委副主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

5．赵守一（1917—1988），陕西渭南人。时任劳动人事部部长。曾任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政协主席，安徽省委书记，中宣部副部长。

6．李锡铭（1926—2008），河北束鹿人。时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曾任水电部副部长，电力部副部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7．吕克白（1917—1999），河北宁晋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顾问。

团结各族人民开发建设新疆*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汇报时的讲话。

这次我和胡启立、郝建秀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同志，同王恩茂[1]、司马义·艾买提[2]、谭友林[3]等同志一起，从南疆到北疆，共跑了十一个地、州、市，行程近六千公里。十几天走了这样多的地方，当然只能是走马看花，没有时间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对新疆只能有个轮廓的印象，但是确实在不少问题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刚才王恩茂同志作了汇报，启立同志讲了话，都讲得很好，我都同意。下面就如何开发新疆，讲些初步的想法。有的只是提出问题，出题目，大家来研究，文章靠大家来做。我主要讲以下四个问题：

一、开发新疆的一些战略设想

今年五月胡耀邦同志在新疆视察时就指出，要积极开发新疆，开发大西北，使新疆和整个大西北成为我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最重要的基地。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共同看法，是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设想和整体布局。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美国是先开发东部，在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再开发西部。苏联是逐步由西向东开发，现在重点放在开发西伯利亚。看来我们国家也是这样一种趋势，将来也要把力量从东边逐步转向西边，开发大西北。

在开发大西北中，我个人的看法，新疆处于优先的地位，应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经济区域来考虑。这不仅因为新疆在国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六千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而且在经济上、在我国四化建设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新疆面积有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六分之一，物产资源丰富，开发条件好。之所以说新疆得天独厚，主要是指：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有三座大山，三大盆地，十多条河流，浩瀚的戈壁滩，发达的山岳冰川，蕴藏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加上海拔不高，日照长，辐射强，积温高，温差大，这些因素天然地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富有生机的整体，这些因素运用得当，可以形成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创造出无限的财富。它优于西北其它地方。像这样各种条件具备的地方，在世界上也是不多的。

从农牧业资源看，光、热、水、土四大要素，新疆都有良好的条件。全疆全年日照平均二千五百五十至三千五百小时，太阳总辐射量全年平均为130—150千卡／平方厘米，仅次于青藏高原。虽然无霜期短一些，但积温高。积温平原地区为3000—4000℃，吐鲁番盆地高达5500℃。地面水年径流量约九百亿立方，地下水动储量约二百亿立方，共一千一百亿立方，相当于黄河、淮河、海河三条大河水资源的总和。按现有人口计平均每人占有六千六百方，如按五千万人口计，每人平均占有二千多方，比现在华北地区人均占有多几倍。另有草原七亿亩，土地后备资源一亿亩，相当于四川省的现有耕地。

从能源和矿产资源看，西北六个内陆沉积盆地，三个在新疆，总面积七十二万八千平方公里。据新疆石油局的初步测算，准噶尔盆地可以拿到八十亿吨石油储量，塔里木、吐鲁番盆地都已发现储油结构，远景相当可观。煤炭的储量是一百六十多亿吨（已探明工业储量三十七亿吨），居全国第三位。水能蕴藏量为三千二百九十万千瓦，仅次于西藏、四川、云南。初步研究，可开发利用的有一百六十九个站址，可装机九百万千瓦，发电六点五亿度。各种有色金属矿产也很丰富。

所以，从资源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疆是祖国四化建设中尚待开发的一块宝地。根据新疆的优势，展望新疆的前景，我们有理由认为，新疆可能成为国家未来的一个重要的畜产品基地、经济作物（棉花、糖料、果品）基地和石油能源基地。

开发新疆，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看到困难和制约因素。主要有：一是资源不清；二是资金不足，国家短期内不可能大量投资；三是人才缺乏；四是基础设施差。这些需要逐步解决。因此，在开发的方针和部署上，应当积极开发，突出重点，循序前进。根据国家的总体设想和新疆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新疆的开发，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八十年代主要是作好准备，并进行一些投资省、周期短、效益好的、国家和人民生活急需的重点建设。九十年代要逐步展开建设的规模，适当加快建设的步伐。为此，从现在起，我们就必须把新疆的开发列入全国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

新疆要发展的产业很多，作为经济支柱的行业、重点行业，将是以下五个：

第一，农牧业。这是第一产业。新疆将来的人口会增加，粮食必须自给有余，而且还要生产大量的饲料，所以要继续重视粮食生产。但根据新疆的自然条件，应当特别突出发展畜牧业和棉花、糖料、瓜果的优势。不仅牧区要大力发展畜牧业，农区也要农牧结合，积极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奶牛、奶羊。新疆要提供大量的肉食、奶制品、果品，为逐步改变我国食品结构作出贡献。一位美国华人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西北将是未来的动物蛋白质生产中心。这是颇有见地的。新疆还要利用这里突出的天然有利条件，发展棉花、糖料和瓜果，扩大商品性生产。

第二，石油和石油加工业。按照石油部和新疆石油局的设想，一九九〇年准噶尔盆地石油要产八百万吨左右，二○○○年将达到二千万吨，除外运的以外，将

有八百万吨留在本地加工。这就可以带动一系列的产业。这是新疆的第二个大产业。

第三，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由于新疆有发展畜牧业、经济作物、瓜果业的优势，这就为发展食品工业、饲料工业和棉毛加工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行业有机构成小，就业比较多，利润比较高，发展起来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第四，动力工业。主要是开发煤炭和利用水力资源，发展水力和火力发电。

第五，建筑材料工业。就地取材，发展水泥、砖瓦等工业，以满足当地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这几个重点行业发展了，就可以带动其他行业，使这个地区的经济繁荣、人民逐步富裕起来。

要发展这些产业，从新疆的实际情况看，必须首先解决两大问题：命脉和动脉的问题，即水利和交通问题。讲基础设施，这两条是最根本的，有了这两个前提条件，其他产业的开发才有条件，新疆的经济才可以活跃起来。

没有水，“天上不飞鸟，地下不长草”，新疆就可能是不毛之地，农牧业发展不起来，绿洲农业也就不存在。没有水，工业也发展不起来。比如克拉玛依油田进一步发展，就碰到水不够的问题。前面讲过，新疆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一，就是有三座大山上的冰川，这是可靠的、比较稳定的水资源，是“固体水库”。一定要珍惜这个宝贵资源，合理利用这个宝贵资源，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更多地造福于人民。新疆这个地方，开发到什么程度，能创造多少财富，第一个决定因素是水利。解决水的问题，一靠开发，二靠节约，合理使用。在水利建设上，要强调统一规划，综合利用，加强管理，引蓄结合，井灌与渠灌结合。新疆很多地方的地形是冰山下面有一个冲积扇，一部分水在地面上流走，一部分水成为地下水。要考虑在冲积扇近处使用地下水，下游使用地面径流，这是合理用水、节约用水、减少盐碱化、提高灌溉效益的一个重要措施，应首先在生产建设兵团试点，积累经验，逐步在群众中推广。新疆整个水资源的开发和节约上都有极大的潜力，要从政策上、从科学技术上去挖掘这方面的潜力。

新疆的交通运输不发达，运输距离长，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在规划上、在经济发展的决策上、在方针政策上都要考虑这个问题。要对铁路、公路、空运作综合的经济分析，进行核算，采取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以适应整个新疆经济开发的需要。

关于新疆的开发，如何确定战略步骤和发展方向，我们提出以上一些初步想法供参考。今后，自治区要研究，国家计委也要研究，最后报中央、国务院审定。

二、抓紧工作，为新疆的大规模开发作好准备

新疆下一步大规模开发，取决于近期内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八十年代还剩下七个年头，这七年重点搞什么，对今后关系极大。我看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件

事：

第一，制订规划。新疆的地理环境有它的特点，三座大山、三大盆地相间组合成一个大的自然经济区，而且区域内又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一些小的经济区，所以，既要有全疆的整体发展规划，又要特别注意区内各个小经济区域的规划。如伊犁河谷地带，就应该有个小区规划。又如围绕准噶尔盆地石油的开发，包括水、煤、运、建材、农副产品的供应等，这涉及伊犁、阿尔泰等地区，也应有综合的开发规划。此外还有一些重要行业，需要制订专题发展规划。自治区要好好组织力量搞。国务院指定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的同志到这里来，帮助把新疆的"七五"计划和后十年的设想尽快制订出来。

第二，做好资源勘探和重大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要有计划地开展矿产资源的勘察，首先把重点放在石油、煤炭上，把资源的情况摸清楚。已确定和将要确定的水利、交通、能源和其他重大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要有专人负责，一个一个做好。比如南疆库尔勒至阿克苏铁路干线建设的前期工作、几条大河流的开发设计，要抓紧进行。

第三，根据可能条件，进行一些必要的建设。从新疆的实际出发，重点还是应放在水利、交通、能源、建材、食品、轻纺等方面。要分别轻重缓急，建一个成一个，切忌铺大摊子，拉长战线。比如在水利建设方面，近期内先考虑上黑孜水库、和田河两大支流引水控制工程、伊犁哈什河托海电站。同意利用叶城已开采的油气资源，建一个天然气化肥厂和相应的发电站，规模可以先小一点。乌鲁木齐到乌苏的铁路，在做好前期工作的条件下，要早一点开工。乌鲁木齐石化总厂十一万五千吨乙烯工程，已列人国家前期准备项目，争取"七五"开工。这里只举几个例子，究竟搞那些项目，搞多少，什么时候搞，哪些列入中央投资项目，哪些列入地方项目，哪些由两家共搞，将由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国家计委商定，在"六五"后三年和"七五"计划中，作通盘考虑，量力而行。

这几年，国家支持新疆的建设尽了很大努力，在"六五"期间财政包干每年给新疆十亿元，并递增百分之十。鉴于国家近期资金比较困难，自治区内的自有资金也应首先用在关键项目的建设上，把自治区自筹和国家帮助结合起来。

第四，智力开发，培养人才。要特别注意大力培养本地的各种建设人才，这是最可靠的途径。除了扩大大专院校的招生名额外，要多办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初中级技术人员。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举办电视大学、电视专科。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对现有各级干部，要认真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

要采取多种形式引进人才和技术，包括请一些外国专家来，特别是沿海各省市，要尽量给这里以支持。引进外地人才，要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围绕一定的项目，一定的课题，签定合同，完成任务以后再回去。搞什么，请什么人，自治区计委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回去准备与上海打个招呼，请他们与新疆建立多种形式的技术协作关系。这方面应当制订一些政策，使技术人才乐意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使内地的省市也乐意搞"智力支边"，互助互利。

第五，十分注意讲求经济效益，充分挖掘潜力，以积累资金。开发新疆，资

金从何而来是个大问题。没有国家的支持不行，但新疆本身也应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开辟一些生财之道。结合当地的特点，兴办一些盈利的产业是需要的。我认为近期内最重要的是要靠挖掘潜力，各行各业都要注意这点。

新疆的工业在全国来说还不是发达的，但已有了一个不小的摊子，拥有四千多个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五十三亿二千万元，按人平均水平在全国来说是不算低的。由于主观客观上的种种原因，现在许多经济指标还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更不用说与先进地区相比了。如一九八二年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实现的利润和税金，全国的平均数是二十四点六元，新疆是十六点四元，为全国的百分之六十六；全民所有制工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全国平均是一万二千一百三十三元，新疆是八千五百零二元，为全国的百分之七十。这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潜力很大。如果能赶上全国的平均水平，财政收入就可成倍地增加。所以，要下决心整顿好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重视技术进步。必须明确这样一个观点：只有具备了较好的经营管理和技术发展水平，才具备进一步发展工业的条件。不久前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我国工业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对新疆来说，这个问题更尖锐，更突出。一定要下大力抓，早抓早主动。

不仅工业应当挖潜，农业也是如此。新疆具有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的良好前景，但现有耕地存在着极大的潜力。近几年内应该把重点放在挖潜上，提高效益上。不论农业、畜牧业都应这样。挖掘潜力，提高效益，关键在于进一步落实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首先要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新疆的农区执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动得早一些，而牧区才刚刚开始，要继续抓。全疆现有耕地人均三点七亩，平均单产才二百多斤，只要增施肥料，科学种田，产量可以大幅度上升。提高畜牧业的商品率也有着很大的潜力。就水利来讲，现有设施的潜力也很大，用水不合理和浪费十分严重。各级渠道十五万公里，防渗漏的只有一万四千公里。全疆灌溉耕地平均引水量每亩为一千一百方，高的每亩一千五百至二千方，不仅无益，反而加速了土壤的盐碱化。如果采取必要措施，运用恰当的政策，就是现在这样多的水，至少可以多灌百分之三十的土地，投资省，效果好。需要有一个有权威的机构统一管好用水。

三、在经济决策中要注意扬长避短

我们到了新疆后感到，在经济上这里的优势很明显，但弱点也很明显。突出的是地处边睡，远离海洋，运输距离较长。前面讲过的其它困难和弱点，如资源不清，人才缺乏，水利建设跟不上等，这些都是属于可以开发解决的，唯独运距长是无法改变的，而且将长期发生影响。运距长，相应地成本就增加，产品的竞争力就大为削弱。考虑新疆的经济建设，必须重视这一问题，要千方百计避开和减少这个不利因素的作用，发挥自己的优势。

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一切要围绕提高经济效益来考虑。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后，全国不是闭关自守了，各个省区也不再搞封闭式、半封

闭式的自给经济了，需要而且可能在省区之间进行商品交换，以至国际之间进行商品交换，互通有无，扬所长而补自己之不足。每个地区都应当研究设置适宜于当地生产条件的、具有优势的、可以成为经济支柱的产业，生产并输出价廉物美的商品，输入在本地区生产成本高的或没有的商品。这种地区间的专业分工，彼此交换，将使各个地区的资源、劳力和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凡是这样做的地方，就可能使自己的经济得到发展，富裕起来。这在世界上是不乏其例的。如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是这样。新疆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应当采取什么对策，特别是面对着运距长这个根本弱点应当采取什么经济决策，是很值得研究的。

新疆运输线长，输出商品成本高，但同样从外地输入商品运价也高。象轻纺工业品，上海、天津等外地出产的运进来，加上运价，成本也提高了。随着价格体系的改革，将来地区的差价会扩大，这就为发展本地的工业，特别是发展具有本地民族特点的工业，供给本地市场需要提供了条件。只要从本地的实际出发，认真加以研究，多品种，少批量，花色品种不断更新，质量达到一定水平，成本也比较低，适合本地群众需要，也是能够占领本地市场的。因此，既不要搞自给经济，要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发展商品交换，输出自己具有优势的独特的商品，输入本地缺乏的质优价廉的商品；同时又要注意凡是本地市场需要、而又有条件、有技术生产的商品，计算起来比外地输入合算，就应就地生产。不仅全疆如此，区内的小经济区也可以这样做。

又如发展对外贸易，新疆诚然条件不如沿海地区。它距海岸远，却又距中亚、距海湾国家比沿海近，加上风土习俗的关系，新疆以自己的具有特点的优质产品，特别是生产一些名牌拳头产品来开拓这一个方向的外贸市场，也是有前途的，比之沿海并不逊色。新疆所需的一些商品，也可从这个方向就近进口。这方面对外经济贸易部要给以支持。

又如，新疆的特点是出产原料。棉花、羊毛，都很有名。现在有一种倾向，都想搞加工业，认为这样赚钱。这主要是现行价格不合理造成的。原材料价格低利润小，加工产品价格高利润大，这种情况是会改变的。新疆的优势，不一定在搞加工业。当然，搞一些是必要的，但不要盲目发展。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就是靠出口羊毛、糖、矿石、粮食成为发达国家的。随着国家对原材料价格的提高，输出原料也是有利可图的。像羊毛，把它洗干净运出去，既有钱可赚，又少占运力，从社会经济效益看，也是经济合理的。

这里，还要讲一个问题：在开发中注意生态平衡，保护环境。新疆的植被只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一，是一个大的弱点。首先应大力抓好植树种草，保护好现有的森林和草场。新疆山上，许多是水源林，像果子沟里我们看到的云杉，很多长在石头上，长在沙砾上，砍了以后不可能重新长起来，而且后患无穷，植被会遭到破坏，气温也会起变化，对冰川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没有绿色林带，“固体水库”也会失去屏障，土地沙化会日趋严重。所以，植树种草，恢复植被，在全疆说来是一件大事，可以说关系到今后开发的成败。耀邦同志在北方旱地农业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很强调这点，他指出，实现北方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第一位的工作是种草种树。这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森林宁可少伐多栽，绝不能只顾眼前，砍伐过量。新疆的水、土资源，要舍得拿一部分出来，植树种草。利用夏季洪水灌溉，成片造林，是个可行的办法。造林，要乔木、灌木结合，要多搞一些防护林带或成片的林区。牧区要保护好草原。要使森林、植被不被破坏，涉及到如何解决农村燃料。农村能源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应很好研究。从新疆看，要采取种薪炭林、利用太阳能、发展沼气等多种办法。阳光是这里一种非常好的资源，特别是在吐鲁番，在南疆地区具有优势。要把利用太阳能作为重要的科研课题进行攻关，力争近期内突破。为此，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国家科委、农牧渔业部和农村能源研究中心等单位要加以支持和帮助，研制出一种热效率高、成本低、使用方便的太阳灶来，在农牧区推广。只有把农村燃料问题解决了，才能逐步恢复植被，秸秆还田，保持地力。新疆的生态破坏是很值得注意的。在巴音郭楞州，州委汇报说有四个恶化：塔里木河下游日益沙化，博斯腾湖日益咸化，巴音布鲁克草原日益退化，焉耆盆地日益碱化。这种现象在全疆都存在，有的地方更严重。全疆已开垦的土地有三分之一盐碱化，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隐患。这是开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一定要引起各级干部的重视，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争取生态的逐步好转，实现良哇循环。新疆各地已创造了一些经验，如和田县布扎克公社建设“五好”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九团治理盐碱地的经验等，要大力推广。

在开发新疆中，生产建设兵团也有个如何发挥优势的问题。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由各族人民组成的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在建设新疆、建设边境中将继续发挥骨干作用。这几年兵团工作有很大成绩，从一九八一年开始扭转了多年亏损的局面，兵团所属的工业、农牧业和其他事业有很大发展。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兵团农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苏联国营农场那种模式，努力探索，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形式。兵团在体制上、经营方式上要进行改革，要实行农林牧、农工商相结合，既要成为全区性的综合公司，又要起到大的工程开发公司的作用。兵团作为一个大公司、大企业，在内部要采取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特别是在农牧场内，要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说要“大农场套小农场”。这种小农场是家庭农场的形式，但又不是“小而全”，而是专业化的。各个团场主要不是靠行政的手段，而是通过各种经济纽带、经济合同，通过生产前后的植保、加工、运输、储存、技术推广、物资供应等方面的合作，把家庭式的小农场同团场联系起来，组成兵团大农场的整个体系。这个改革，应通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开。兵团要放宽政策，帮助各族职工安家立业，扎根边疆。在对外上，兵团也不要搞封闭式的体系，而应该向社会开放，为当地服务。在统一规划下，兵团可以和地方合作兴办各种事业；兵团办的企事业，也可以吸收当地的力量参加，通过经济合同办事，避免各搞一套，重复建设。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同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开发新疆作出新的贡献。

总之，这个问题还有待于研究。这里之所以提出这个方法问题，是为了使同

志们能够打开思路，更好地研究本地的特点和情况，以作出正确的决策。

四、加强团结，进一步发展新疆的大好形势

这次我们在新疆考察，大家都感到新疆形势很好，成绩很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王恩茂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新疆各方面的工作都有显著的进步。新疆各族人民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认真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各项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乌鲁木齐军区各部队，在军队建设和支援地方建设上，在稳定新疆形势、保卫祖国边疆的工作中，也取得很大成绩，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整个新疆形势都很好，主要表现在：一是团结方面，二是建设方面。这几年团结增强了，建设事业发展了，各族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祖国边防也更巩固。

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加强民族团结，是第一位的大事，是搞好各项工作的关键。在新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离开了这个关键，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自治区党委和王恩茂同志紧紧抓住这个关键不放，下很大功夫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新疆各民族的团结，这是很正确的。正因为这样，才使全疆出现了安定团结、经济发展的好形势。今后要开发新疆，建设新疆，就必须继续发展这种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对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些不安定团结的因素，要清醒地看到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措施去消除它、解决它，进一步使各方面的团结合作，包括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新老干部的团结，特别是各民族人民和干部的团结，大为增强。这是大规模开发新疆的前提和保证。

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需要做的工作很多，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在思想上应当明确的两个观点：一是在新疆各民族之间，“两个离不开”；二是新疆各族人民一定要紧密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之中，这种凝聚力，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在新疆，多民族共同生活，这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在我们国家里，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根本利益完全是一致的。各个民族，情同手足，休戚与共。这次我们到新疆，到处听到讲“两个离不开”，即搞好新疆的工作，发展新疆的各项事业，离不开少数民族，同时离不开汉民族。这种说法，是很确切、很正确的，可以说是历史经验的简要总结。新疆的各个民族，各有长处，各有优点，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从历史上看，也是“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凡是各民族团结和睦、友好相处的时候，就是社会安宁、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时候；凡是民族之间闹纷争的时候，那就是人民受苦、颠沛流离的时候。我们应当进一步开展教育，使“两个离不开”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为增强团结打好思想基础。

新疆长期以来就是祖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各族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为维护祖国的统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在战略上、在经济上，新疆都是祖国非常重要的地方，新疆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勤劳勇敢的人民，将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中国之所以称为地大物

博，就表现在有新疆，有西藏，有内蒙古，有青海这些地方上。所以，新疆在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事业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新疆的开发，新疆各族人民的富裕，也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援。从建设来说，不论在资金、材料、技术上，光靠本地的力量是很不够的，需要同内地、同全国各地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也就是说，新疆的发展如何，是同整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今后随着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对新疆的支援将不断增加，新疆的建设步伐将逐步加快。从历史上看，凡是整个国家处于强盛的时候，各民族就友好相处，经济交流就发展，人民也就安居乐业；凡是整个国家处于衰弱的时候，也就是各民族灾难到来的时候，外来势力就会乘虚而入。这次我们走访各地，高兴地看到，不论哪个民族，都有着热爱祖国，热爱党中央，拥护十一届二中全会路线的发自内心的真挚的深厚的感情。他们一心向祖国，一心向中央，给我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应当使这种思想进一步在各族人民心中扎根，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的统一，发展大好形势。

前面讲了，形势好表现在一个团结上，一个建设上。没有民族团结这个关键的条件，经济建设就搞不好。那样，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就无法改善，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也很难改观。所以，归根到底，建设问题同团结问题是丝毫不能分开的，团结搞好了建设才可能搞好；建设搞好了，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了，也才能逐步从根本上改变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逐步缩小和消除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上的差别。

为了积极开发新疆，建设新疆，为四化作出贡献，中央要求新疆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把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一切言行要有利于民族的团结，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对于干部来说，这是衡量德才兼备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是党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任何有损于民族团结、有损于祖国统一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批评、制止和纠正。

最后，我还想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新疆的发展。小平同志、耀邦同志和中央常委作过很多指示，中央书记处也多次讨论新疆工作。希望新疆各族工人、农牧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生产建设兵团全体职工，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把新疆的各项工作搞好。新疆的开发，虽然比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起步晚，但是往往是后来者居上。我们殷切希望新疆的同志努力奋斗，后来居上。

注 释

1．王恩茂（1913—2001），江西永新人。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曾任八路军三五九旅副政委，西北野战军第二军政委，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

2．司马义·艾买提（1935—），维吾尔族，新疆策勒人。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曾任策勒县县长，自治区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家民委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谭友林（1916—2006），湖北江陵人。时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曾任工程兵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政委。

国营农场可以实行职工承包办家庭农场*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新疆乌鲁木齐听取赵凡、林乎加等人汇报农垦工作会议情况时的谈话。

你们写了这个汇报要点，不必按材料说了，主要说一下有什么问题。去年盈利多少？（赵凡[1]：除去奖金净盈利6.%亿元。）

过去亏损，去年盈利近7个亿，成绩很大。要把钱使用得当，集中资金保重点。

（赵凡：关于农垦企业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据二十一个省、市、区统计，包干到劳到户的已经占78%。）你们这个统计高了，恐怕没有这么多。

（赵凡：这次会上，大家对紫阳同志在农七师说的农场里边套家庭农场很感兴趣，讨论得很热闹。）那好。

（林乎加[2]：黑龙江、新疆，大田要轮作，大面积机械化作业，还有些矛盾。）

轮作、机械化，这些问题在实践中都可以解决。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扎兰屯有一户，不是农场，承包了土地，拖拉机站把拖拉机折价卖给他。他种一千亩小麦，两季就把拖拉机的钱还清了。现在黑龙江的嫩江地区有许多农户要求承包土地开荒，划五百亩、一千亩，到银行贷款买拖拉机，收割时请康拜因来。土地多的地方包到机组，有的把拖拉机、土地都包到户，黑龙江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当然，我们是不是都搞到户，要研究。但是可以肯定这种形式开荒可以大大减少国家投资。过去，我们想的是靠国营农场开荒，要国家花那么多钱，根本不需要。当然，修水利、盖房子、修道路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要一些投资。中国农民经营有自主权后，很多事想象不到。现在我们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官办形式，一句话，要彻底摆脱苏联国营农场的模式。国营农场内部，要把职工家庭用多种经济形式联合起来，成为有机的经济联系。可以搞承包，可以搞产前、产后服务。农场划给职工家庭一部分土地承包，大拖拉机、康拜因也可以包到户，承包一定面积，这也是专业户。土地交报酬，租用拖拉机收费。产后的储运、加工、销售由国营农场组织，也可以包给个人。第一，是家庭承包的；第二，是专业化的。农场与各专业户之间，通过经济合同联系起来，农场成为专业户的经济纽带，这样农场就活了。也可以说，这是“大农场套小农场”。

陈实[3]同志，你们兵团以后不要再吸收固定职工，可以有计划地在甘肃定西招

收一些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来承包土地开荒。定西那里太困难了，非移民不可。定西人会种地，会打石头，当兵体检都合格。他们来后独立经营，你们支持三五年。一开始可以借房给他住，立住脚以后，结婚或接老婆来都行。这种自营家庭农场，是国营农场的组成部分。不要一来就吸收为工人，拿固定工资。这比过去那样办国营农场可以大大节省投资。第一批招一二百人就行，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赵凡：允许职工办家庭农场，大家愿意回去搞试点。）

这些事都要先搞试点，不要一哄而起。

（赵凡：石河子条田、林网、水利是配套的，黑龙江垦区推行机农合一承包，已经有两年多了，还是适合的。大条田划成小块种几种作物，不合适。）你们先划出一角给专业户，试一试。不需要一户又种这样又种那样“小而全”，还是要搞专业化，要成片包。

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畜牧业。农场对畜牧业重视不够。我说的畜牧业，是搞奶牛、奶羊，家庭圈养，农场搞奶制品加工。（林乎加：有些杂牌乳粉，现已不好销了。）销路要看到农村，全国有百分之十的人购买力提高了，市场就非常大，有百分之十的人购买高档商品，就会打开销路。特别是农村，价钱贵了不行，化纤就很能说明问题。大家还穷，买了自行车、手表就完了。购买力一提高，有百分之十的人买加工食品，食品工业就有无限的前途。

（林乎加：大包干后，每个职工要负担各种管理费五、六百元。）干部也得包地，层层都包，没有吃闲饭的，费用就少了。农场都得变成公司，不光是搞生产管理，还要学会搞经营。

我最近到齐齐哈尔，看到一户养三十五头奶牛的专业户。一头奶牛产奶五千公斤，一年利润七千元。当然，那里有草，他有一个儿子、一套机械，专门到外边打草，还不够，要购买三分之二的草料。交一斤奶，市里给一定数量的饲料，不足部分在市场上买玉米，也不贵，饲养成本占百分之六十。

内蒙古把草场也划到户，有两种形式，一是全部划到户，一种是把冬草场划到户。这样一划，就把草场改良落实了，农民就搞围栏，有的还施肥、打井、灌水、撒草籽，搞草场建设。牲畜包到户，冬窝子包到户，搞了草场建设，牧业就发生了变化，真正讲经济效益。养什么羊，养多少，种什么草，他自己就考虑了，草场载畜量就合理了。有的地方载畜量不是过大，问题是夏天草多，冬天不够，是个调剂问题。关键是冬春草场的建设，只要包到户就落实了，经营就合理了。牧区开始有人经商，办仓库，将来可能搞冷库，经营畜产品到城市。伊犁有一户农民包一台拖拉机搞运输，三年交四千元，我问他今年能赚多少钱，他说赚几千元。中国有很多人很会经营，过去是管死了，大家都等着，你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包下去，能人就出来了。

你们应当研究概括几句话，究竟办什么样的农场，采取什么形式，对内怎样对外怎样，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国营农场内部实行职工家庭承包办家庭农场，很可能将来是主要形式，家庭农场是专业化的。有个专业户问我，可以不可以请人，一个月给一百二十元。我说可以，在城市可以请两、三个至五个学徒、二个

帮手，你也可以。当然我们不提倡雇多少人。今后农村会经营的人办家庭农场，不会经营的人搞劳力入股分红。中国的家庭农场不能搞大了，三五个人，七八个人是可以的。个人收入多也不怕，可以收税，完全有办法节制。（胡启立：南斯拉夫是用三个办法控制，一是限制雇工人数，二是限制土地面积，三是超过收入限额的收累进税。）我们也可以控制。这样一搞，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官僚式的管理经济的办法就破掉了。农场就是综合公司，这样必然涉及农场管理体制大的改革。

农场对外要向社会开放。你们可以与其他单位合营，也可以和农户搞合营，和地县合办企业，统一规划，避免重复。有的是社会为农场服务，有的是农场为社会服务。农场是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是公司。

我现在说的还是粗线条的想法，国营农场怎么办，要概括几条，你们在会上好好讨论研究一下。

（对赵凡）你们干脆就叫总公司。不过你们农垦局那么多人，公司吃得消吗？（赵凡：农垦部改为局后，人已减少，老弱病残已离、退休。）你们人太多，但主要是使用不得当，不能把人才和资源开发利用结合起来。

职工家庭农场发展起来，不知场内能拣多少撂荒地，把它利用起来。（赵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严格禁止哄抢国营农场财产问题。）

我去海南岛时就讲过这个问题，要把无政府主义刹住。安徽普济圩农场受水灾被哄抢，要严办。对趁天灾哄抢国家资财的为首分子，要严加惩处。

（赵凡：关于国家对农垦实行财务大包干制问题。由于实行财务包干，调动了企业积极性，扭亏为盈。使农垦能继续滚雪球。会上大家要求一九八五年以后继续实行这个办法。）

这一问题，到一九八四年即明年再说。据我知道，没有人打农场的主意。你们交税嘛！交税后利润都是你们的。

（赵凡：像工业那样利改税，影响农场滚雪球发展。）可以对你们适当照顾一下。

（赵凡：耀邦同志视察新疆时让兵团造林种草、发展畜牧，跟你讲的意见一样。耀邦同志说：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每年给个把亿，两个部已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希望国务院、国家计委做出安排。）

造林、种草，对！

注 释

1．赵凡（1916—201叫），河南郾陵人。时任中国农工商联合企业董事长。曾任北京市委农工部部长、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农林部、农垦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

2．林乎加（1916—），山东长岛人。时任农牧渔业部顾问。曾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农业部部长、农牧渔业部部长。

3．陈实（1916—1993），山东泰安人。时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曾任新疆军区运

输部部长，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水利部副部长。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是提高企业素质的关键*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接见全国第五次质量管理小组代表会议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今天把参加质量管理小组代表会议的同志们请到中南海，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见见面，并听取几个优秀小组汇报成果，以表示党中央、国务院对经济战线各个企业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关心、重视和支持。袁宝华同志汇报了开展这一工作的情况、问题和意见，我都同意。我认为，要搞好全面质量管理，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解决认识问题

应当在全党、全体干部、特别是在经济战线的全体职工中，讲清楚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对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提高对这一工作的认识。

大家知道，提出我国经济工作要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已经三年了。今年我们又提出，我国工业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挑战，面临一个如何提高素质的新的转变。经济效益问题，企业素质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产品质量如何和物质消耗多少，是一个企业素质的主要标志。要提高企业素质，就必须、也只能围绕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来展开工作，就是说，投入要少，产出要既多又好。当然，提高企业素质还包含很多内容。最近，经委的同志和社会科学院马洪同志组织了一个小组进行研究，拟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分析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因素，提出解决的办法。但目标只能一个：投入要少，产出要既多又好。在经济工作中，我们还不能像一些国家那样主要去搞自动化，节约人力。我国有我国的情况。我们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就是增加社会财富，增加国民收入，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我国工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个是质量差，另一个是消耗大，与国外先进水平比，差距非常大。这是我国工业的症结所在。我们讲经济效益，讲企业素质，讲劳动生产率，必须主要考虑这两个问题。刚才听了四个质量管理小组的汇报，他们的经验也说明，只要围绕这两个问题下功夫，就会取得显著成效。

经济效益问题，质量和消耗问题，搞得好不好，关系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到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我们讲翻两番，目的是要增加实际创造的财富。但是现在讲翻两番，是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的。总产值这个指标，是有很大缺陷的，现在还没有别的指标来代替它。总产值如果翻两番，国民财富可能翻两番，也可能是翻三番；也可能只翻了一番。比如，好的灯泡、差的灯泡，产值都是一百元，但差的只用五千小时，而好的却用一万小时，实际的价值相差一倍，而统计表上产值都是一百元。这就有个质量问题，耐用不耐用的问题。又如冰箱，好的冰箱耗电低，放东西可保持两个星期不坏，而差的冰箱放东西进去一个星期就坏了。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把注意力放在总产值的增长上，而应当放在实际创造的社会财富上，放在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上。

提高质量，有一系列工作要做。抓好全面质量管理很重要。宝华同志在汇报中讲，要从事后检验把关变为工序控制，从管结果变为管因素，这是一条好经验。我们知道，最后检验与每道工序都严格检验，效果大不一样。总装以前的各个工序，如果及时地严格地把关，把不合格品及时去掉，就可以减少后道工序的消耗，避免浪费，这是很大的节约。我们应当发动广大职工，运用科学方法，对生产和经营的各个环节，实行全面质量管理，道道工序都把关，保证产品的优质低耗。

降低消耗非常重要。从工业的情况看，产品的成本中，物质消耗即原料、燃料、材料，一般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工资部分只占百分之十左右。降低物质消耗是降低成本最主要的因素。同样的产品，消耗少，功能好，就等于使用价值提高了。这样也就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国民收入，提高了经济效益。提高质量，实际上就是多创造了财富，降低消耗也同样是多创造了财富。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对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对提高企业素质有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是把整个国民经济提高效益、提高素质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一个良好的形式，一件打基础的工作。通过这样一种形式，这样一种方法，这样一个措施，就可以使提高效益、提高企业素质不至限于一般号召，而是真正落到实处。

刚才听了四个小组的汇报，感到很新鲜。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在我国也可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这个新事物，是把我国多年来开展的群众参加管理的经验（两参一改三结合），同国外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相结合的产物。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东西，也不能因循守旧，完全只相信我们过去那一套。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把自己的经验加以总结，把好的东西，成功的东西同国外先进经验结合起来。搞好全面质量管理，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正是这样一种产物。我们过去讲群众路线，没有很好同先进的管理制度、同先进的科学方法相结合。刚才几个小组的汇报，有系统的分析，有科学的数据，体现了群众活动与科学技术的结合。先进方法光是靠自上而下的推行是不行的，但是光讲群众路线，不让群众掌握先进方法也是不行的。质量管理小组既有群众的积极性，又讲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是有生命力的，是符合四化建设需要的。要搞好这一项活动，使

它持久地、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既要有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的领导，同时又必须和经济措施结合起来。

总之，一方面应看到我们工业的产品质量很差，消耗很高，浪费严重，企业素质低下，现在是一个很尖锐的矛盾，是四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另方面，从你们先进小组的事迹，从各地创造的经验又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是潜力很大，大有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开展质量管理小组的活动，对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四个现代化建设，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要解决政策问题

这件事要真正搞好，必须逐步地解决一些政策问题，使之有利于促进大家重视质量，重视减少消耗，有利于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现在这方面问题很多。我们的方针是要质量、要效益、要素质。我们的一些办法呢，却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鼓励追产值，鼓励重数量。我们这一套体制是成龙配套的，一下子还不好改。但必须逐步解决。政策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必须首先解决企业吃大锅饭的问题，这是个前提。大锅饭不能吃了，才能使企业不躺在国家身上，促使他们从内部想办法，考虑如何提高效益，减少消耗，提高质量。没有这一条，其他的就很难办。农村解决了吃大锅饭问题，一下子农村形势就好转，而且越来越好。工业方面，国营企业要不吃国家的大锅饭，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像农村那么简单，因为农村是集体所有制。但是，必须解决。不管怎么说，就是要解决企业负责盈亏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理论界还有很多争论。叫盈亏责任制也好，叫自负盈亏也好，实质上就是要解决企业不吃大锅饭，实行自负盈亏的问题。当然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自负盈亏，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政策下的自负盈亏。看来，企业搞自负盈亏，不能像农村那样，采取一般的承包的办法，那是行不通的，因为企业的水平等各个方面都不一样。看来应当主要是通过税收，各企业都要向国家缴税，缴了税之后，剩多剩少，都由企业负责。将来不仅企业发展基金、福利、奖金由企业负担，还必须负担一部分工资，工资也不能由国家全部包下来。

（二）实行优质优价。如果一个能用五千小时的灯泡是那么多钱，只能用三千小时的灯泡也是那么多钱，这就不能体现人家创造的价值，也不能鼓励人们提高质量。优质不优价，这在我国是个大的问题。优质优价不实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就很难真正解决。一方面要优质优价，另方面要劣质劣价。在价格上既要体现鼓励，也要体现惩罚。刚才一波同志讲，沈阳水泵厂搞了很好的水泵，节约了很多电力，但是价格并没有提高，工厂生产这种产品，多付了劳动，多付出了投资，但出售价格还是一样。对社会贡献很大，但本厂那一年的各种基金还少了很多，这样，就不能调动积极性。后来，大庆油田与他们签订了合同，给他们加了点价，才解决了问题。

（三）制订奖励政策。质量管理小组的活动，出了成果，确实检验合格，确实显著地提高了经济效益，就要有奖励。

我看，先就定这么三条政策。第一条，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解决吃大锅饭，解决国家同企业的关系问题。要使企业把整个注意力用在挖掘潜力上和提高经济效益上。第二条就是要实行产品优质优价。第三条就是奖励政策。不仅是质量管理小组，包括全体职工，凡是在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方面有了成果的，做出了很大贡献的，都要有适当的奖励。除了精神奖励外，还要有物质奖励。

第三，一定要抓紧职工的培训

刚才，听你们小组的汇报时就感到，要搞好全面质量管理，没有文化，没有科学知识不行。群众活动，群众路线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先进的科学方法要结合起来。这本身就有一个文化水平、技术水平的问题。你们汇报时，都讲了管理小组内的文化水平，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提高企业素质，必须提高职工素质。职工素质，除了政治思想之外，必须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我们现在很多厂的领导同志还不懂得这点。一个真正的先进企业，如果没有工人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不可能办到的。文化、技术水平很低的职工队伍，不可能掌握先进的工艺，先进的科学方法和管理技术，不可能生产出先进产品。这几年，经委在抓这件事，我觉得还应该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厂内的职工培训，全员培训，要与提高企业素质联系起来。没有这一点，企业素质是无法提高的。有位在国外工作的学者，分析了中国职工的文化水平，得出结论说，中国全民所有制现有职工的教育水平是八年左右，如果在未来二十年里职工的教育水平没有提高，那么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就只能达到一万七千亿元，完不成翻两番的任务；如果能提高到十年，工农业总产值可达到三万六千亿元，超过翻两番。这个数值不一定那么准确，但是把职工的文化技术素质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我们四个现代化联系起来，提出问题，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很多事实都说明，没有文化的职工队伍，是不可能使我们的企业办成先进的企业、现代化的企业的。为什么我们从国外买来的不少先进设备，不能发挥它的作用呢？除了其他原因，像思想状况、管理问题等以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职工文化技术水平太低，掌握不了。所以，职工的培训一定要抓紧。要把它同提高企业素质联系起来，下大力抓好。

第四，要稳步发展，不断提高

开展全面质量管理，特别是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要稳步发展。质量管理小组，首先就要讲质量，质量第一，把这个精神贯穿在所有的活动中，不要搞形式主义。我认为这件事是很有希望的，可以给四化建设做出大的贡献。但真正要搞

好并不简单。目前全国有二十七万个小组，真正把这二十七万个小组都搞好，就不得了啊！现在才五百个优秀小组，这同二十七万个小组相比，比例太小了。要使更多的小组成为先进小组。质量管理小组的作用，一是它本身出成果，二是它对全厂职工起骨干带头作用。一个企业有几个好的小组，它必然带动整个职工队伍，大家都注意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所以，质量管理小组要注意稳步发展，不要追求一定要有多少个小组，或者占了职工队伍的多少。要认真搞好，提高质量。一部分企业真正搞好了，就可以带动许多企业；一个企业几个小组搞好了，就可以带动全体职工。我们要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求发展。多年来，我们有搞形式主义的毛病，这是个不好的传统。一哄而起，讲究数量，讲究形式，要啥有啥，但是，有名无实。这种作法，流弊甚大。刚才我讲，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新鲜事物，对我们四化建设会作出很大贡献。搞得好，确实是大有希望。但是，不要把名誉搞坏了，不要去降低质量。一哄而起，巩固不住，不会起多大作用。

今天见到大家，我很高兴，也感到大家确实做了很好的工作，给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谢谢大家！

援外工作要量力而行和尽力做好*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接见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要注意培训人员，这件事花钱不多，意义很大。我们培训的人员，他们自然对中国友好一些，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培养什么“亲华派”，最主要的是帮助他们培养人才，这是真正对他们负责。第三世界没有人才是不行的。我们要在人员培训上舍得花力气，不要光重视物的援助，而不重视人员培训。不然，搞那么多项目有什么用！苏联这一点抓得紧。今后要明确我们的援外经费不是专门搞物的、搞成套项目的，要包括培训人员在内。最近我和崔月犁[1]部长谈到医疗队的问题。我们如果多拿出几十万元，就可以帮助第三世界的人民解决很大的问题，比你给他盖工厂作用大。（陈慕华同志：医疗队的影响很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医无药，我们派了医生去没有药，所以以后还要拿点药。）是呀！有医无药，过去完全不收费，现在收费还很高。（陈慕华同志：将来要区别对待）过去，帝国主义到中国搞文化渗透，还懂得办教会、看病，争取人心，它那样做当然是为了麻醉人民。

将来，会堂、文化宫、体育场、体育馆可以搞一些，但不要搞那么大。现在我们搞的一般偏大，有的地方一个体育馆可以容纳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何必搞那么大呢？花钱很多。当然，他们要求搞大的，但是这个主动权在我们手里。搞得小一点，可以快一些，也便于管理。这个问题，以前中央和有关方面议论过多次，虽然是非生产性项目，但对人民开展文化、体育运动有帮助，政治影响也好。总之，现在有一个钱少了如何用得好一点的问题。钱多固然好办事，但用不好也不一定都好。如对某些国家我们援助了那么多钱，结果搞成冤家对头。钱少一些也不一定就搞不好，越是钱少越要搞好，要讲清这个道理。钱少了就一定要用好、办好。钱多了嘛，你别的差一点也不要紧，一好遮百丑。

现在，要拿出更多的钱去搞援外是不可能的，但即使钱不多，也要把援外工作搞好。钱越少越要热心，越要负责任，这一点很重要。如果钱少了，人也松了，不重视了，那这个事情的结果肯定会很坏。钱越少越要重视，越要搞好，越要热心，这就叫量力而行，努力搞好。量力而行是指钱，努力搞好是指精神。要有这么一种精神。物质条件是变了，没有那么多东西了，精神不能变，发扬国际主义，帮助第三世界人民的精神不能变。你们所谓思想认识不一致，是否指的就

是这些？我看就是要把这个思想搞通。要用辩证的观点看这个问题，不能说重视对外援助，就多要钱。对外援助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承包是一种形式，我们到国外办企业是一种形式，还有就是经援项目，这都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吕学俭[2]：有的经援项目可以发展为合营。）我们将来应当研究在国外与私人搞合营，不要光和他们政府搞合营，它经济上负责。

（吕学俭：承包经援项目，希望国家能免予征税。）这个税不要征了，开明一点嘛。由哪个单位承担包干，它节余的钱，可以不征税，鼓励他们的积极性，这也没有好多油水。（陈慕华同志：总的来说，还是少花钱的，它在那里拖拖拉拉，拖长了项目建设时间，增加了支出，还是要来报销。）

这个会开得不错。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你们所讲的一些方针我看很好嘛！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因此不可能向第三世界朋友提供力所不及的物质援助。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没搞清楚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我们力量所不能承担的、过大的援助任务。这是由于没有经验，经过这几年总结，这个问题认识了。我们不能提供那么大的援助，这不仅仅是由于我们暂时经济困难和进行经济调整，即使今后财政经济情况好一些，我们也不能提供力所不及、不能胜任的援助。当然，随着我们国民经济的好转，我们的援助数额会增加一些。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援助第三世界国家不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可有可无的。绝不能这样看。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穷，但是个大国，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第三世界提供一些援助，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

我们要反对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一说要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就不考虑我们的能力；第二种是，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认为过去办了一些力所不及的事。当然，那些事办了也是好的嘛。但是看来不能长期办下去，所以现在把它适当收缩一下。如果就因此认为好像这件事情不重要了，是可有可无的，那就不对了。要进行教育。这一条，我们全党要统一认识。首先是各级领导要重视这件事，把对外援助作为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这点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变化。只要我们能够做的，一定要尽力做好。越是力量小，越要搞好。既要量力而行，又必须尽力而为。你们文件中讲的，“用有限的援外资金，力求取得最好的政治影响和经济效果。”这个话讲得不错，这里面有很多文章可作，重视不重视，钱用得恰当不恰当，要认真研究。

各部门一定要积极承担中央确定的援外任务，这是个政治任务。当然也不完全是政治，还是有报酬的，不要让你们亏本，赚也赚不了多少钱，至少保本嘛，保本也是光荣的。要把援外任务看成是应尽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你们文件中说，有的认为这件事是“油水不多，麻烦不少，责任重大”，我们这就叫光荣嘛。如果油水很大，没有麻烦，没有责任，这个事办起来那有什么光荣呢？总的讲，我们现在的援外任务不是太多，各省市、各部门一定要认真完成。

我们的援外资金减少了，而工作做得好，那也可能适当抵消一些由于资金少而造成第三世界朋友方面的误解。如果钱少了，也没有精神了，大家不负责任

了，那确实会严重影响到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现在第三世界某些国家对我们就有些议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拿不了那么多钱，这不是不愿意多拿，而是确实没有力量。“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拿多少钱去援外，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勉强不得。如果勉强去做，也不能持久。但是，我们已经确定的援助任务，一定要办好。如果不去做，那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能够做的事，我们必须做好，做不好就不应该，那确实人家就会说你中国变了，对第三世界朋友不热心了。我们为第三世界力、点好事，钱少了，热心不能减退，这种精神不能减弱。一定要说清楚，援外任务是个政治任务。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我们派出国的人关系很大。这次我去非洲访问，对这点印象非常深刻。非洲朋友对中国人的印象特别好，这固然是毛主席、周总理为我们制订了对第三世界的政策，特别是对非洲的政策很正确，我们也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援助，但主要是中国人在那里表现得好。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就是从在那里的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来认识我们国家的。他们对我们国家非常钦佩，觉得我们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和我们在那里工作的同志的表现是分不开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搞坏。现在，我们在国外的医疗队、施工队伍和工作人员，是否真心诚意为那里的人民服务，是否真正地把非洲人民当成自己的兄弟，这个问题很重要。过去，我们的出国人员艰苦奋斗，不搞特殊，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热心为当地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在非洲朋友的印象中非常深。所以，你们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非常重要。现在，虽然我们对外提供援助的钱少了，但要把事情办好，我们在那里的工作人员要继续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我相信，这样即使我们钱少一些，我们在第三世界人民面前的形象仍然会是好的。如果钱一少，认为这件事情不重要了，马马虎虎，工作做得很坏，再加上把国内一些不正之风带出去，特别是那些承包单位，可能更厉害一些，那就必然会使朋友感到中国的形象变了，钱也少了，工作也办得不好了，人也变坏了。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当然，怎样把事情办好，有很多经验，也有些教训，这次你们已作了报告和总结。

最后，还要强调一下承担援外任务的问题。今天，中央各部的同志在，各省市的也来了。希望参加会的同志们回去向党委、向党组的负责同志汇报。今后援外任务不算很多，但关系甚大，关系到我们国家的荣誉，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大家要以大局为重，要勇于承担。担子也不重，不要推来推去的。承担了任务以后，一定要认真负责搞好（陈慕华同志：还要长期打算，不能老想着收摊子）。将来，我们也可以搞评比，凡是承包援外任务的，都可以评比一下，看哪里搞得好，哪里搞得坏，也要比较一下，比个风格嘛。赚钱的项目就那么积极，搞援外就那么消极，那不是向钱看吗！现在不是反对向钱看吗？你领导机关就向钱看，这个话恐怕不大好交待吧。当然，有些事要从政策上解决。比如有一个承包得的多，援外得的少的问题，这可以逐步研究。因为现在财政困难，一下也很难解决，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可以逐步研究一些办法。但不能以此为借口，一定要有多少钱才负责任。这不行。在座的同志都是搞援外工作的，你们是积极的，我

今天讲的这些话也不完全是讲给你们听的，请你们回去给负责同志讲一下，给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和各部的党组书记讲一讲，然后向有援外任务的地方和工厂讲一讲。

注 释

1．崔月犁（1920—1998），河北深县人。时任卫生部部长。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卫生部副部长。

2．吕学俭（1928—1999），山东荣成人。时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曾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

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夺取新胜利*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庆三十四周年招待会上致的祝酒词。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同志：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临今晚招待会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各国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这里，我还要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和各级干部，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节日的问候！

今年以来，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新的成就。

农业生产在全国较大地区发生水涝灾害的不利条件下，预计仍可超过去年大丰收的历史最高水平，广大农民的收入比去年又有增加。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在发展和逐步完善。

工业生产在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中稳步发展，增长速度超过了原计划，经济效益也有所提高。国营企业利改税的工作全面展开，城市改革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重点项目的建设逐步展开，并将进一步加强。城乡市场更加活跃和繁荣。

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也迈开了新的步伐，取得了很大成绩。

精神文明建设的进展，首先表现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正在逐步加强。为了防止和消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精神污染，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采取积极的措施。

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坚决依法从重从快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这个行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新闻、出版和体育事业，都有了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强。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这些成就，进一步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心，鼓舞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

我们面临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尽管还有许多困难有待于我们去克服，但是我们坚信，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团结一致，振作精神，艰苦奋斗，扎实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在欢度国庆的时刻，我们特别怀念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最近邓小平主任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意愿和利益。

我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

我们深信，通过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我国各族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面对当前动乱不已、紧张不安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努力。

我们将继续积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侵略扩张，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同其它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我们将长期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同其它国家的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

我们要不断加强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我们特别致力于同近邻国家发展睦邻关系。

我们将积极增进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交往。

我们谋求继续发展同西欧、北美、大洋洲国家的良好关系。

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根据双方协议的各项原则得到稳定的发展。

我们期待中苏关系能够消除目前存在的障碍，实现正常化。

我国执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并且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我们将始终如一地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起，为维护世界和平，为争取人类进步而共同奋斗。

现在，我提议：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四周年，

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

为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

为世界和平，

为出席今晚招待会的各国使节和夫人的健康，

为各位来宾和朋友的健康，

干杯！

抓紧争取教育轻微犯罪者*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日

* 这是赵紫阳就新华社对上海国棉十五厂在打击刑事犯罪中做好有轻微犯罪青年转化工作的报道写给刘复之、李广祥的批语。

复之[1]、广祥[2]同志：

此件请重视。轻微犯罪者惶惶不安，正是抓紧教育的良好机会，望一边继续深挖打击，一边争取教育轻微犯罪者，机不可失。

赵紫阳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日

注 释

1．刘复之（1917—2013），广东梅县人。时任公安部部长。曾任公安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司法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李广祥（1917—1998），山西文水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曾任广州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公安部一局局长。

关于调整化纤布和纯棉布价格
给耀邦同志和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

一九八三年十月五日

耀邦同志、政治局常委并书记处同志：

目前国务院正在对今年消费品生产出现的新情况和应采取的对策进行讨论。待讨论告一段落，将向常委、书记处汇报。

讨论中一个集中的问题，是降低化纤、涤棉混纺布的价格，同时适当提高纯棉布价格，以解决化纤织品的滞销、积压、限产问题，同时又不至因此而减少财政收入，并可促进十亿人民衣料结构（以化纤布代替纯棉布）的逐步改变（这是早晚总得要解决的问题）。这样的决策，虽然影响面广，可能会有不小震动，但对整个经济会带来极大好处，对于合理改革价格，也是一个突破。

讨论中，暮桥同志有一篇发言，大家同意他的分析，现送上，可抽空一阅。

赵紫阳

一九八三年十月五日

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

一九八三年十月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召开的新技术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敏锐观察世界产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新趋势、新动向，经过深入学习、填密思考，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高度，率先及时地提出要把握时机，研究应对世界新产业革命和新科技革命的战略方针和总体构思，并组织有关部门专家组展开讨论，研究对策，陆续制订了促进中国高新技术快速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实施方案与计划，促使中国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阅读他这一讲话，要与本文集第三卷所载的发展中国高新技术的“八六三”计划的规划和方针措施（见本文集第三卷第323页和第360页）等文献结合起来阅读，以了解其实施进程和战略意义。

今天请了有关方面的同志，包括沿海几个省市、国务院综合部门和一些科技单位的同志，开个座谈会。座谈一下所谓的“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或“新的产业革命”的问题，研究一下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什么，相应地采取什么对策，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次座谈只能起到出题目的作用，开一个头，以后还要展开讨论。今天我先讲几点看法：

一、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国际上议论得很热烈。是不是有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第四次产业革命”），工业发展历史如何划分，现在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按照西方比较流行的一种分法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第二次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第三次是在二十世纪初开始，以电力、化学制品和汽车的发展为标志。而这一次将是第四次。其特征是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光导纤维、激光、海洋开发等新技术的广泛利用。这次新的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的结果，将使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

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谈论这个问题的文章连篇累犊。日本《经济新闻》连续报道了这方面的内容。美国学者奈斯比特[1]出版了《大趋势》一书，指出当前美国社会出现的十大趋势，其中主要有三大趋势，即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集中转向分散；从国家经济转向世界经济。这些趋势预示着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动向。还有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2]发表的《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在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两次文明的浪潮之后，现在依靠全新的技术、开发全新的材料的第三次浪潮即将到来，预言这个浪潮将冲击旧的生产方法和社会传统。不管叫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好，叫第三次浪潮也好，他们都认为，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六十年代达到高度工业化以后，现在要从工业社会转入信息社会，或叫做知识、智力社会。他们说，信息社会就是大量生产知识，“知识的生产力已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这些论点，都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后经济和社会变化的一些动向。不管他们讲得确切不确切，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这样一种信息：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或者几十年之内，将会有这么一个新情况，现在已经突破和将要突破的新技术，运用于生产，运用于社会，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新的飞跃，相应地会带来社会生活的新变化。这个动向，值得我们重视，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并且应当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确定我们在十年、二十年的长远规划中，特别是科技规划中，应当采取的经济战略和技术政策。

二、为什么应当注意这一动向呢？如果确实出现那种状况，科学技术有重大突破，新的技术革命兴起，整个世界有一个社会生产力的新的飞跃，那么，对我们来说，对今后向四化进军来说，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

过去我们经济的发展，错过了很多机会。十九世纪末，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日本抓住时机，搞了明治维新。而稍后一点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机会丧失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有长达十多年的繁荣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经济复苏过来，接着又来了这么一个大变化，许多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日本由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给它的机会，经济起飞了。其他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欧的，南美洲的，亚洲的南朝鲜、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等，利用这个机会，主要靠外资搞加工，也发展起来了。但是，我国在那时却陷在“文化大革命”中，搞“阶级斗争为纲”，把大好时机耽误了。

现在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新的技术革命来临的话，我们究竟怎么样呢？我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时机利用得好，抓紧应用新的科技成果，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使我们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缩小。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我们处理不当，或者漠然视之，那就会使我们同发达国家，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扩大，有可能把我们甩得更远。我们应当努力争取第一种可能，避免第二种可能。我国的经济建设、科技事业，应立足于当前，努力把目前的各项工作抓好，同时应当高瞻远瞩，展望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想一想我们从中应借鉴些什么，注意些什么，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搞得好一些。

三、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3]不久前访问上海时，对《世界经济导报》记者说：“七十五年后中国将成为亚洲的最大强国”。他有两条根据。第一条根据说，“中国经济现在已超越经济发展中的‘起飞’阶段。从历史上看，一般国家都能在经济‘起飞’以后，迅速赶上先进国家”。罗斯托把社会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指大工业出现以前的农业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等六个阶段。看来他可能把我们的情况估计高了。这一点姑且不论。他的另一条根据和理由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以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为借鉴，跳过某些传统工业的发展阶段，直接采用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经济部门可以直接进入以遗传工程、激光、微型电子计算

机为标志的新时代。譬如中国，现在就可以同时采用所谓的第三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在较先进的经济部门尤其要注意吸收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这将对中国经济起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也许可以不经过第二次浪潮的发展，而采取全新的路线达到第三次浪潮的文明。这个观点，我认为值得重视。一方面，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我国的经济建设，不能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能任意逾越那些必经的发展阶段；另方面又不能亦步亦趋，一切都照人家走过的路从头走起。尽管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比先进国家落后了几十年。但是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的今天所处的条件和环境终究是不同了，因为许多技术都成熟了。技术发展是多层次并存的。比如我们现在经济还不发达，既有牛车、马车、人拉车，同时也有飞机、汽车、轮船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因此我们在一些领域里，有可能跳过某些传统工业发展阶段，采用比较先进的科技成果，直接进入以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激光、光导纤维等为标志的新时代。对此要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政策，要很好地加以研究。如果利用得好，我国的经济是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的。

四、宦乡[4]同志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同志所写的《关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说：“目前在我国，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知识技术密集等三种类型的产业都有，但比例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我们应以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为借鉴，按先进的比例建立和改进自己这三种密集型产业并存的体系。”文中还说：“我们的总目标是使我国经济、特别是工农业水平在本世纪末达到世界先进工业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水平，这是正确的。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部分部门和产品的技术和工艺达到当时（本世纪末）世界的最先进水平。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这点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些观点，我认为是重要的。

我们国家在技术上到本世纪末要达到世界上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水平。这是从总的水平来说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情况不同，有的可能达不到，有的应当搞得更好些，把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掌握好。从全国来看，我们不可能把整个产业结构都搞成知识密集型的。我们有许多传统的工业，有相当一部分资本密集的工业，现在还需要向进一步工业化的方向发展。但同时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也应当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办一些知识、技术密集的产业，增加这方面的比重。在我们国内，哪些地区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发展知识密集产业的条件比较好呢？无疑是沿海地区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今天请了上海、天津、江苏、广州的同志来一起研究，就是为了引起这些地区的重视，利用自己的优势，把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搞上去。

沿海地区这样做很有必要，也很迫切。我们应当看到当前国际分工出现的新变化。时不我待，机不可失，你不搞，别人要搞，竟争非常激烈。正如宦乡等同志文章中指出的，目前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的半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巴西、智利、南朝鲜等，都在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正在把一些劳动密集和污染严重的产业逐步缓慢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对资本密集的

行业（钢铁、重化工、汽车等）进行以自动化、节约能源和不污染环境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改造；同时积极建立和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的新兴产业。可以预计，十至二十年后，由于这种产业改组，发达国家将不会继续采用目前这种因劳动力低廉而委托半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装配和加工的办法，后者因而将失去继续获得高增长的动力；同时，过去二十年中这些发展中国家依靠出口主导发展经济的战略也将失去依据。现在，这些半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在谋求改组自己的产业结构，纷纷设法向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开始试图建立高技术、高知识的精密产业的方向过渡。比如和我们沿海地区隔海相望的南朝鲜、台湾都在搞产业结构的改组，提出要搞知识、智力密集的产业，还有南美的巴西等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当然，我们能不能搞，那是另外的问题。面对这种竞争的形势，我国沿海地区必须注意发展新技术。以前我们提出上海要“内联外挤”的口号，这是正确的，应继续坚持。沿海地区还应当根据国际经济、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来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特别是象上海、天津、广州、大连这样的城市，应当逐步建立和发展知识、技术密集的产业，使它所占的比例逐步扩大。因为这些地方资源和能源缺乏，而交通、港口设施和技术基础比较好，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比较强。根据我国工业的战略布局，将来一些资本密集的产业，如钢铁、重化工、重型机械可能逐步集中到中部、西部原料产区。沿海地区不应当多搞大量消耗资源的产业，而应发展知识、技术密集的产业。这是“内联外挤”所必需的，既有利于向外开拓市场，又可以对内加强联合。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使我国产业结构中三种类型并存的比例关系逐步得到改善，趋于合理，从而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五、注意微型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世界上的某些新技术，如登月技术，我们不一定急于搞，也不一定马上用得上。生物技术，有些我们应抓紧研究；光导纤维，国外在大量搞，我们应当引起重视；机器人，如果用于解决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等问题，是需要的，如用在节约劳动力方面，在我国就不是当务之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认为对微型机的利用，一定要摆在重要的位置，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国外，现在微型机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就生产领域来说，它可以用于管理，用于生产过程的控制，用于技术改造等，而且效果很显著。

新技术发展的结果，企业正在向小型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从集中转向分散。前面说的《大趋势》一书的结束语中，讲到由于电脑的使用，使“金字塔”或“树型”企业结构崩溃，变成了水平式的横向结构。日本、美国的很多经济学者都提到了这个概念。今后企业组织结构发展的趋势是，纵向的“树型”结构（如大公司、大托拉斯）将减少，而横向的网状结构要增多。在西方，过去日本小企业比较多，美国大企业比较多。现在美国的大企业也在分化、减少，小企业在增加。有一个材料说，美国的小型企业在五十年代每年增加不到十万家，而现在每年要新增六十万家。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是搞小的手工业作坊，小的工厂，以后互相竞争，大鱼吃小鱼，资本集聚和集中，形成大托拉斯、跨国公司。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产生了大量专业化的小企业。最近西方很多文章论述小

企业的优越性。小企业很灵活，但技术是先进的，建立在社会化基础之上的，因此富有生命力。我国也有许多小的企业，江苏就有许多县社工业，看来是有前途的。问题在于不要搞“小而全”，要调整，要改造，要采用新技术。

微型机的应用，对老企业的改造，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改造，将会起到我们想象不到的作用。我看了上海《解放日报》关于微型机应用于里弄工厂的报道，感到很高兴。上海有些落后的里弄小厂，在关键地方把电脑安上，产品质量一下就上去了。所占的地方不用扩大，有的还减少了许多，厂子的面貌很快发生根本的变化。上次我参观机械工业展览时，机械工业部的同志告诉我，由于机械加工中心这种机床的出现，整个生产线大大缩小了。一个机械加工中心，就起到一条生产线的作用。采用这个办法去改造小厂，很多陈旧的机器都可以拆掉，夹具、模具也可大大简化，这适合于搞多品种、小批量。可以很快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资消耗，提高经济效益。至于大企业的技术改造，采用微型机更应重视。这样做，也有利于逐步改善产业结构。上次国务院开会时，我就提出：我国的电子工业究竟搞什么东西？当然，大型的电子计算机，必要的也应搞一些，但重点还是要抓微型机的使用与制造。因为：第一，技术上比较容易掌握；第二，应用后创造的价值大；第三，这样做电子工业本身也有活力了。听说上海微型机已供不应求，许多企业都去订货。无论从我国工业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方向看，都需要突出抓一下微型机的应用问题。

六、关于信息。信息在经济建设中，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信息系统，是我国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之所以形成这样，根本问题是我们对信息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过去我们还没有信息这个概念，不大懂得信息的作用。对信息，认为有没有，早一点、晚一点，没有多大关系。信息准确灵通，传递时间缩短，工作效率和生产效率就会大大提高，经济决策也才能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上。信息系统的发展，会把许多产业带动起来，社会进步的速度会加快很多。所以，信息对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进步，都有巨大的作用。英国学者班雅伦[5]在香港说：信息技术是社会进步的关键，对中国来说，掌握信息技术，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可以快十年。他是怎么计算的，还不大清楚，也可能不一定那么准确，但是可以说明，把信息系统搞好了，四化的战略目标是能够提前实现的。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对外贸易也好，国内经济也好，都要把信息当成一个大问题抓起来，投一些资，引进一点技术，制造一些设备，训练一批人才。我们搞工厂多少个亿都花了，信息系统所需要的投资，只要下决心，适当安排，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国家这么大，发展又很不平衡，一说搞信息系统，就全国都一样的搞法，那也办不到，国家财力负担不起。我看可以先从东部地区搞起，比如在京津唐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就可以先行一步，把它搞好一些，然后逐步向内地扩展。宦乡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建议成立国际经济信息中心，怎么搞法，请对外经济贸易部提出方案；国内的信息系统怎么建立，请国家计委提出方案。

七、关于统计。统计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没有精确的统计，经济建设就难以搞好。现在我们请外国专家来咨询，来研究经济问题，首先碰到的就是提供数

据的问题。我们的统计工作，虽然比某些发展中国家要好一些，但总的看来，基础很差，水平不高。有不少数据，我们还拿不出来；有些数据即使能拿出来，准确度也不高，甚至还有一些是“神仙数字”。数据如果不准确，在电子计算机里储存起来也无用，信息渠道再灵通也起不了作用。明年我们要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计算税率，就需要许多基础数字；我们要讨论价格体系的改革，进行成本核算，也牵涉许多统计数字，否则就算不清楚。统计工作这种落后的状况，很不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我们国家要现代化，首先统计工作得现代化，统计资料要准确，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看来我们的统计工作要搞好，必须拿几年时间扎扎实实地搞基础工作，要组织一些专门人才来搞。请国家统计局就如何加强统计工作代国务院起草一个决定，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后公布。

八、关于具体作法。为了使研究深入进行，提出一些有见解的东西供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时参考，建议成立两个小组，国务院一个，上海市一个，组织专家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探讨，提出对策。研究的题目就是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边进行讨论、研究、分析，一边提出方案、建议，务必拿出成果来。国务院这个小组，由马洪、张寿[6]、朱路基[7]、吴明瑜[8]同志负责，马洪同志牵头，吸收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上海市的那个小组，由市委研究如何组成。两个小组都面向全国。上海小组一身二任，既研究全国，又可联系上海经济区的发展加以研究。总之，要研究出一个最佳方案，使我们国家在“新的工业革命”来临的时候，能够措置得当，得到一个飞跃发展的机会。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必须重视智力开发，大力加强人才的培养教育。未来的技术革命突出地说明了智力的重要性，掌握知识的重要性。有人把它称之为“知识革命”，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企业要现代化，关键是要提高人的素质。现在引进的先进设备，就有不少我们掌握不了，如武钢一米七轧机，海上石油平台，上面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我们就不懂。下一步要发展现代化的信息系统，要普遍运用电脑等，没有相当高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不行的。钱学森[9]同志说，在新的时代，生产工人的劳动技能不是主要以体力为基础的，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的，因此要求他们也是专家，也是知识分子。在就业人口中，不仅要中学水平的，而且大学毕业的也要占到几分之一，要培养大量的硕士、博士。提出这样高而广泛的智力和知识的要求，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对培养人才，教育人民，一定要作为百年大计，加以重视，积极搞好。教育的改革，应当抓紧进行。这方面请教育部提出方案。“新的工业革命”带来的信息，要做的事不止在教育、科技方面，它必然涉及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事先作出决策，作好安排。“凡事预则立”。只要我们把握时机，迎头赶上，中国的经济振兴和社会繁荣是大有希望的。

注 释

1．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1930—），美国学者。曾任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相继出版过《大趋势》、《亚洲大趋势》、《中国大趋势》等著作，曾预测网络兴起和全球一体化，并预

言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2．托夫勒（Alvin Tomer，1928—），美国未来学家。曾当过工人、记者和《幸福》杂志副主编，出版过《第三次浪潮》、《权力转移》等著作，指出人类经历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正进入信息社会。

3．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1916—2003），美国经济史专家。曾任美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顾问、主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发展经济学先驱，提出了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和国家战略抉择问题。

4．宦乡（1909—1989），贵州遵义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曾任《文汇报》副主笔，驻英国代办，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驻欧共体大使。

5．班雅伦，英国学者。曾提出信息技术是社会进步的关键，认为中国掌握了信息技术，现代化可以快十年实现。

6．张寿（1930—2001），江苏常熟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信息中心主任。曾任中国船舶工业公司总经理，国务院经贸办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

7．朱镕基（1928—），湖南长沙人。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后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生产办、经贸办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8．吴明瑜（1931—），浙江德清人。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曾任国家科委委员兼科技政策局局长，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9．钱学森（1911—2009），浙江杭州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协主席，著名科学家、火箭专家，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工程论先驱，获两弹一星功勋章。

分步进行价格改革逐步理顺经济关系*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五日

* 这是赵紫阳听取物价问题汇报时的讲话。

价格如果不调到基本合理，其它改革就谈不上，实现四化也不可能。价格不合理，企业难以考核，经济效益就讲不清楚。利改税走了一大步，但仅仅是利改税还不行。我们在经济方面的根本矛盾，是工厂的经济效益太差，特别是缺乏促使企业提高效益的动力、压力和活力。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经济工作中的矛盾就不会减少，财政赤字也不会减少，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就不可能。

要使几十万个企业把经济效益搞上去，关键是两条：一要自负盈亏，二要价格基本合理。价格不合理，就很难搞自负盈亏。什么时候解决了这个问题，国民经济真正的良性循环才会出现。价格改革这一关不过不行，但也不是一次革命论。第一步先要达到大体合理，就是你们说的低水平理顺。可以设想分两步解决，准备一两年先走一步，下一步再看。现在调整物价的状况是费力很大，收效甚微。很明显，我们不可能回到五十年代的情况，把一切都统死，不讲物质利益。即使这样，也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不会再出现六十年代那样，一调整，经济情况就好转，价格就降下来。我们必须使不合理的价格现状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件事越拖，矛盾越大。想完全没有一点影响来解决价格问题，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等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以后，再解决价格问题。可否设想价格大调整一次，就让人民币贬一次值。把各方面的关系适当摆平一些，工资也结合搞，随物价的上涨相应提高工资，动它一次。

企业靠自己了，就能把潜力挖出来。北京十几个试点工厂搞利改税、自负盈亏，都有很大变化，说明工厂里的潜力很大。前一段有个失策，全民所有制企业没有把同国家的关系解决好就搞包干，那是不行的。因为行业之间的利润水平不合理。要先把企业同国家的关系解决好，再让企业自负盈亏，企业效益就会有很大提高。价格不改革，就包不公平。税制改革，可能把不合理的问题合理化一步。但光搞利改税，不搞价格改革，难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企业的利润如何考核，孙冶方主张按资金利润率，可以研究。我们不拿出一个统一标准，就会各有各的标准。

对价格改革，一是顾虑物价上涨，但价格不改，多发票子，物价也要上涨。二是顾虑调价以后，国家财政拿不回钱来。能不能拿回来，关键看你政策怎么

定。退一步说，即使调价会影响一些财政收入，但能为以后提高经济效益打开一条通道，也是划得来的，不外乎暂时影响二、三年。照现在的办法搞下去，财政没有出路，经济不能理顺，而且矛盾会越来越大。物价改革是系统地有准备地大调一两次好，还是年年动一点好？看来，年年动一些，结果是动不了，问题越积压，越严重。价格改革，第一步若能把不合理的部分解决百分之五十也好，主要调整工业品的价格，农产品价格基本不动，过几年再说。因为妨碍改革的主要是工业品价格。把农产品价格稳住，调整工业品价格，国家财政不仅不减收，还能增加一些收入。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结果，使原材料工业的利润增加一些，加工企业利润会减少，甚至只有微利。这样，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后，它就会去挖潜，过几年利润可能又增加上来。如果消费品价格上涨不多，农业继续增产，国家从农民那里拿一些回来，对农民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价格改革涉及到工业如何改革。工矿企业要从吃大锅饭变成自负盈亏，价格变动影响职工生活，可以研究采取挂钩的办法，哪一年物价变动大，那一年工资也适当调整。比如物价上涨10%，就把工资当中70元的部分增加10%，抵消物价上涨的影响。对农村就不补了。初级产品提了价，企业增收，国家同时就对企业加税，把它拿回来。改革生产资料价格，要从整个城市改革的角度来考虑。什么时候能够实行企业自负盈亏，潜力就能挖出来，财政经济状况就有可能根本好转。城市改革，就是要使企业在一定的政策指导下实行盈亏责任制。如果价格不合理，考核企业就没有标准。所以要调整工业品价格，解决企业之间利润合理分配问题，减少畸重畸轻现象。价格的合理调整，会带来效益的提高；效益的提高，又能为价格的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价格改革，我倾向于：第一，农产品价格基本不动；第二，调整工业品的价格，解决企业自负盈亏的问题，减少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当然，价格的调整既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宜零敲碎打。应该是动一次之后几年不大动，不能年年都大动。把经济理顺，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把价格理顺。价格长期背离价值，又怎么能把关系理顺呢？我们讲，提高企业素质，一说就涉及价格，涉及企业自负盈亏，权责利如何结合。要使企业在同等价格条件下，搞得好的收益就可以高，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许多事实说明，吃“你”的是一种吃法，吃“我”的又是一种吃法。这是不行的，总得创造条件改变这种办法。价格改革要为城市改革创造条件，不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就不可能。第一步是价格改革，第二步解决企业内部的按劳分配。今后两三年价格不改革，城市改革就要推迟。明年进一步搞利改税，后年或大后年价格改革要跟上去。搞利改税，也要考虑价格改革的因素。设计税率，要跟价格改革配套，或者搞两套税率，调价前后各用一套。经常年份还是要讲物价基本稳定，只作小调整；隔上几年，有领导地比较大幅度地调一次价。现在我们人民的生活，有很多是有补贴的。按统计数字，我国国民收入每人年平均220至250美元，外国人说实际上是500至600多美元。现在最迫切的是工业品价格的改革。不宜把调价的步子分得太细。现在价格是上升的，光议价、市价上升就不少，步子太细了，实际上调不成。所以，不宜零零碎碎地搞，

例如煤炭即使每年提3元，也会有反应，但是年年动3元，得十年才能调合理。

物价调整，就是暂时影响财政几十亿元，也要调。不能光从财政上看问题，要从理顺经济关系上看问题。就是国家财政拿些钱，银行存款还可以收回一部分。

总之，大锅饭不改，神仙也没有办法。不改革，就不能前进，不能提高效益，不能提高企业的素质，企业就没有动力。价格不合理，就把四化后腿拖住了。零星改革要和两三步的大改革相结合，第一步大改可以考虑在后年、大后年进行，或“七五”的第一年出台也行，做到低水平理顺。明年可以先小调。反正一句话，没有一点震动前进不了。调整物价，阵痛是不可避免的，暂时有影响，很快就会好起来，换来主动。不能“足将进而趑趄，口欲言而嗫嚅”[1]一句话，城市必须改革；城市要改革，价格必须改革。至于哪一年搞，不是主要问题，要看承受力如何，但是思想必须明确，先内部研究，把方案搞好。

注 释

1．见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

停止生态破坏实现良性循环*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谈话要点。为解决“三西”贫困问题，他亲自到现场调研，下决心每年由中央拿出2亿元拨款，10年共20亿元专门用于支持“三西”地区制止生态破坏，恢复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并成立了国务院“三西”建设领导小组主持其事，开中国扶贫工作之先河，为后来设立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利用冯纪新[1]、李子奇[2]同志在北京的机会，谈谈河西、定西的问题，主要谈河西怎样搞法。

国家每年拿出两亿元作为“三西”[3]建设的专项资金，十年二十亿元，在当前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要认真办成一些事。就怕把钱撒下去了，什么也落不到。有些事需要花钱，有些事不需要花钱，或者不需要花很多钱。最近看到农牧渔业部畜牧局一位同志写的一封信，已经转给你了。这位同志以前还写过信，说有了“三西”领导小组，每年两个亿，如果国务院再成立一个畜牧领导小组，又有钱了。这个思想是不现实的。“三西”是个很特殊的地方，拿点投资是为了把那个地方转变过来。李子奇同志最近经过调查研究，提出甘肃中部治穷致富的近期目标和八条措施，讲得很好。

耀邦同志最近讲了西北的战略方针，要念“草木经”，种草种树，发展牧业，调整农业的经济结构，是完全对的。实现这个方针要分步骤，要创造很多条件，要分轻重缓急。哪些项目主要靠群众办，哪些项目必须靠国家投资办，都要实事求是，很好研究。耀邦同志在甘肃讲，有一些事主要依靠群众办。如种草就应该主要靠群众，不需要花很多钱。当然种草种树有些基本的东西还是要有投资的，如优良草籽的培育，将来发展畜牧业的畜种改良，等等。种草也要有很多条件，如解决燃料奇缺的问题，不然种了又铲，还是长不起来。

停止生态破坏，要创造条件，要分步骤。整个甘肃的农业经济结构要改变过来，我看要几十年，甚至要半个世纪。当然是逐步改变的，怎样逐步改变过来，就要很好研究。连外国人也认为，整个西北将来应该是中国动物蛋白的资源地。在指导思想上要转过来，西北的同志要下很大功夫研究如何转化的问题。

河西不修水利，什么也搞不起来，开发河西就是一句空话。当然修水利也不一定搞新工程。河西没有水，就不能种树，没有水就什么也没有，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牛羊也没法活。定西养那么多人，我看是困难的。定西的人不转移

一些出来，定西的植被也很难完全恢复。以前国务院讨论的时候，万里同志提出把定西的人基本都转出来，曾经考虑过这个意见。但是后来又考虑，这个事不简单，几百万人搬到哪里去呀？定西转出一部分人，还是要考虑的。要让他们定居，来回流动不好。河西的开发和定西植被的恢复，是个相互支持的关系。河西修水利，定西的一部分人往河西转移。没有河西的开发，单纯做定西的文章，这个文章不好做。开发河西是定西恢复植被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解决定西问题的保证。

定西究竟怎样恢复过来，甘肃要很好研究。不要求多么快，只要扎扎实实一步一步走，在改变当中，就有希望。实际上那个地方的恶性循环还在继续。所以总的方针提出来以后，这个大的战略部署如何实现，步子怎么走，互为条件的因素怎么摆法，怎么创造条件，怎么分轻重缓急，恐怕要经过两、三年的摸索，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两亿元投资用在什么地方？我看主要用在必须国家支持的地方，用在那些为实现整个战略方针创造条件的项目。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也不是说其他项目一点也不搞，是要有重点。如果完全用在定西，恐怕有些有效果，有些不一定有效果。比如修水利，如果在河西投资修水利，逐步把定西的一部分人往河西转移，这样做合适，还是在定西修水利合适？要认真比较。

至于现在大量投资用到畜牧业上，更是不顾条件，是不现实的。现在连水都没有，草也没有，还不是无米之炊！要逐步创造条件。总的战略方针定了，不仅是甘肃，而是整个西北，总要经过一些步骤，创造很多条件，才能实现。我现在还担心，你们十年以后交个什么账？这是挤出来的两亿元投资，就怕今年这么个主意，明年那么个主意，十年以后老百姓还是老样子，人家找上门来问我们，就不好交待了。十年二十个亿，这不是个小数，国家的财政状况你们是知道的。投资用的得当，而且坚持下去，坚持多少年才能见到好处。究竟怎么用，提出个总的想法，请你们领导小组和甘肃的同志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改变面貌，宁可放的时间长一点。就怕搞了多少年，还停留在恶性循环上，还是河山依旧。什么时候说开始好转了，能听到这么个报告就放心一大半了。只要是停止了破坏，向好的方面转化，就说明我们有了一定的经验了。究竟哪些措施在当地是行之有效的，定西地区还没有找到路子。延安可以说基本上有了路子了，因为陕北有400毫米的降雨，种草种树都可以，而定西有很大面积的常年降雨只有300毫米左右。至于河西是另外一种类型。

定西为了恢复植被，畜牧业的发展速度不能要求太快。如果草还没种上，就发展畜牧业，那就会继续破坏植被。为了恢复植被，为了将来发展畜牧业，恰恰在一定时期内，在生态破坏还没有停止以前，畜牧业的发展要控制，不能急功近利。特别是发展山羊要注意。你叫他圈养，他也不会圈养，当地群众没有这个习惯。本来是为了恢复植被，为了停止破坏，如果畜牧业发展太快了，效果会恰恰相反。像走路一样，目标是往正前方走，但如何走法，有时要往西或者往东走一走才能走到正前方，直走反而过不去。不然的话，植被还没有恢复，草还没有长

起来，草根还没有固定下来，三年一大旱，草就退化，风一吹，牲口一扒，就是继续破坏植被，越想发展畜牧业，越发展不起来。到一定时候，植被恢复了，草长起来了，还是要发展畜牧业的。所以，在恢复植被这个时期不要压畜牧业指标，要真正提高质量，提倡圈养，否则树长不起来，草也长不起来，植被不可能恢复。退耕还林还牧给补贴我赞成，但也不要追求数字，要有计划地逐步进行。总之一句话，像定西这样的地方，要讲条件，不能急功近利。积累了几百年的问题，几年就想变化，恐怕不行。那个地方大的前提条件不解决，想一下跳跃过去，是很困难的。现在先抓向好的方面转化，只要旧的循环停止，新的循环开始，那就是新的、历史性的转折，这就不容易。这一段下功夫走到这一步，就有希望。现在不要求草丰、畜肥。也不要因为老天爷帮了两年忙，国家扶持了一下，有了点变化，就认为是良性循环开始了。

停止生态破坏，第一是解决燃料，第二是解决饲料，还有解决滥开荒的问题。那个地方燃料问题不解决，什么都办不成，要支持一点煤炭。我们现在搞太阳灶恐怕不行，这方面的经验不多，看表演可以。当然，最坏的地方也可以选个好点，我们三十多年上了很多当。太阳灶的维修怎么样？材料是不是有问题？成本多高？能不能引进些材料，或者同国外合作搞一些质量比较高的？这涉及到成本问题，150元搞一套，是不是就过关了？什么事不要一开始就铺得很宽。开始搞点侦察性的，或者叫试验性的，搞成了，确实看准了，真正过关了，再下决心。比如太阳灶，如果确实能代替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燃料，成本虽然高一些，但为了把那个地方恢复过来，也可以搞。就怕说是很好，到时候又不是那么回事。四川的沼气说是很好，我去看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好。我问过几家农民，比如沼气的料怎么办？各家各户都把肥料放下去搞沼气了，农村要积肥，一施肥，把各家各户沼气池里的肥料都掏干了，沼气就得停。这种事，你去参观是看不到的，如果突然去了，池子里就没有料。这里边有很多制约因素，研究沼气的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个情况。沼气有个如何运转的问题，要有两套料。我们的沼气设备、维修、材料方面的问题都不小。西北包括新疆这些地方的光照条件好，是个优势，燃料又那么缺，太阳灶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是现在不要急于搞那么多。先认真地搞一些点，确实过关了，真正有了效益，然后可以下决心。我总觉得一家一户搞太阳灶，维修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它也不是个孤立的东西，还要有很多条件相配合。国外用风车很多，我们的风车也没有过关，因为都是低标准。低标准的东西买来很便宜，也可以参观，实际用起来不行。试验电炊我不反对，但靠电解决燃料不可能。如果家家买了电炊设备，没电了，还是用不上，这是可能的。我主张兰州市下决心搞煤气，否则污染太厉害。我在青岛郊区看到许多农户有土暖气，就是在灶里装个管子，连接几个暖气片，烧水烧饭时暖气也热了，不另外烧。整个屋子的温度是不是比烧炕还要好？是不是比烧炕节约？可以研究一下这种土暖气。

河西是利用雪水，春季水少，夏季水就多，很可以研究利用雪水旺季搞控制工程。基本上是以春季的水多少来确定农业的种植面积。夏季水多，上游用不

了，放到下游就盐碱化，可以控制起来扩大种草。

我们讲解决温饱，不一定就是解决吃粮问题，从广义来说就是要有生活出路，粮食可以买嘛。现在有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全国的粮食形势比较好，不要求你们一定搞多少粮食，当然总得有粮食。河西也不是修了水利只种粮食，还可以种棉花。当然，河西必须搞些粮食，因为甘肃长期运粮也不是个办法，运费太高。从长远来讲，定西要做到粮食自给，很不容易。

定西修水利比较困难，但淤坝地（或叫沟坝地）要花点钱。我看那里沟坝地的产量还是比较稳定的。沟坝地优于梯田，可以蓄水、保墒，土壤也肥，还可以保持水土。有了沟坝地，从上到下就可以退耕。如果封山，有300毫米左右的雨，草也可以长起来。过去学大寨搞了很多梯田，有成功的，很多是不成功的。小流域治理包干到户，是个成功的经验。定西的沟坝地资源有多少？每人能不能搞到两三分沟坝地？

只要提高水费，节水办法就出来了。河西搞滴灌，种棉花等经济作物和葡萄、果树，搞家庭果园。滴灌省水，省水就可以扩大灌溉面积。现在城市没牛肉吃，新疆的牛又卖不出去，原因是卖牛肉要倒挂。我在四川提倡养山羊，山羊养起来了，没有销路。四川人不喜欢吃羊肉，又运不出去。

家庭农场不要一下子搞那么多，将来是可以的。将来会出现自己有拖拉机的农户。黑龙江有了一批家庭农场，贷款买拖拉机，开荒几百亩、上千亩，种一季小麦，康拜因收割，一年就把农业机械的投资收回来了。

定西农村的计划生育不大好搞，究竟搞个什么要求合适？如果是提倡一胎，不超过两胎，这样可能在当地得到多数人的拥护，计划生育才能在那个地方真正开展起来。

李子奇同志提出，中部地区条件千差万别，采取各种措施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同类型的地区应当有不同的办法，突出自己的重点，不搞“一刀切”，不可一哄而上。这些意见，是很好的。鉴于我们多年来的教训，就是要强调实际效果。提出的口号和要求都要实事求是。最重要的是努力迎接恶性循环的停止、良性循环的开始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性转折的到来。实现耀邦同志提出的改变西北面貌的战略方针，有个步骤问题，创造条件的问题，条件相互转化的问题。政策和步骤都要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

我很赞成林乎加同志刚才汇报的意见。你们开的会，我也没什么意见。要不断地检查效益，找出合适的路子来。周总理生前就很关心这个地方的问题。今后的路子靠你们走了，办法靠你们去总结。一开始不要急，只要路子对头，就会形成一种发展的形势。不要勉强去办那些办不到的事。

我再表示一下，我很担心这件事。现在国家拿出两亿元投资，解决这三块地方的问题，有些同志不理解，有意见，说清楚因为那里是最困难的地方，也就没有意见了。如果十年以后还不见效，那时候意见就大了。不要求你们一定达到多高水平，要求高不一定效果就好。动机好也不一定效果就好。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可多啦。

注 释

1．冯纪新（1915—2005），安徽金寨人。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农委主任，江苏省副省长，八机部副部长，甘肃省省长，中顾委委员。

2．李子奇（1923—2014），陕西神木人。时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曾任甘肃白银市委书记，省轻工厅厅长，省委书记，省顾委主任。

3．“三西”地区，指甘肃省河西地区、定西中部干旱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这三个特别贫困地区。

二汽要在改革开放和提高效益中走在前列*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考察二汽时的谈话要点。

这次到二汽，想多听听你们汇报，多讨论一些问题。如技术进步、技贸结合、联营公司以及你们的一些设想。

技贸结合，问题很大。一方面进口的东西很多，重复引进；一方面外贸亏损很大。看来要行政干预，要搞个专门小组来处理这个问题。今年进口钢材800多万吨，但与引进技术没有结合，需要技术时还要另外花钱引进。

你们二汽的能力很大，吃不太饱，主要是差材料，能不能按国家比价，你们向国家买外汇进口材料，那你们的生产就可不受限制。（黄正夏[1]：姚依林副总理来二汽视察时，也是这个主张，并提出二汽应有独立的外贸自主权。我们计算过，二汽可以按国家规定的2.8元人民币折价换1美元，进行外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在引进技术上，欧洲开明些。过去也翘尾巴，现在市场不景气，只要你买他的东西，即可让技术，要抓紧时机。邮电部技术改造，原来有些关键东西想自己干，现在也确定引进，这样水平会高些，上得也会更快一些。你们是全国的几个试点企业之一，工资改革的办法也可以不变嘛。例如实行岗位津贴、职务工资、对职工升级晋升及处置权等等。总之，要按劳分配、奖惩严明。

铸造二厂长桥自动线是仿造的还是自己设计的？（张广瑜厂长答：完全是自己设计的。）自己能设计这样的自动线很好。

三线建设都是采用老厂包新厂的办法，这是三线建设的方针。这个方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定了的。四川的三线工厂都是老厂包建的。三线建设一线是出了很大力气的，他们把工程技术人员、“好枪好马”都调到了三线建设。（饶斌：没有一线的支援，三线建设搞不好）。“文化大革命”中，批“洋奴哲学”。批是批，进口设备还是进。三线工厂的不少关键设备大都是进口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买专利，实际上也是为了进口设备。

当然，“文化大革命”是要否定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建设成就是不能完全否定的，比如讲成昆铁路、攀钢，那么多化肥厂等都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对建设是有干扰的，干扰大一点的单位，建设成就少一些，干扰小一些的单位，建设成就大一些。总之，“文化大革命”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建设成就

不能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建设是成功的，你们二汽就是成功的一个例子。

一汽从动工建设到投产一共是几年？（饶斌：一汽从施工到投产共是三年，如果把设计和生产准备的三年加上，一共是六年）。

那么，你们这里的建设周期就长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恐怕是受了一九七〇年全国计划会议的影响。那次计划会议，全国树立了两个“典型”，一个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树你们二汽的干打垒，“四边建厂”；另一个典型是上海的马天水。这两个“典型”对全国的影响很坏，对三线建设的干扰很大，你们二汽恐怕就受了这次会议的影响。（黄知真[2]：二汽恢复名誉，是在1979年初汽车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以后。）

目前一般机械工业产品，总装的利润太高，零配件的利润太低。产品滞销时搞联合容易，产品紧俏时搞联合就不容易，这个矛盾你们是怎么解决的？你们是不是把利润有意让点给协作厂？我考虑，开展协作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总装方面的问题，对协作件的质量不放心；二是协作厂方面的问题，协作产品重复纳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协作厂总是想自己装车，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也是一大障碍。现在全国有七十多个汽车厂，汽车还是供不应求，叫做厂多，批量小，浪费大，经济效益低。现在都说联合好，都赞成联合，但都要以我为核心。过去是卖方市场，不是买方市场，所以很难联合起来。这在我们国家还是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你这里却有100多个单位，这是个很大的联合。

你们二汽是在困难中逼出来的，所以你们的服务态度好些。但是，现在机械工业有个很大的问题，一到倒霉时，服务态度就好；产品紧俏时，服务态度就不好。服务好能坚持下去就不错了，我们由于体制没有改革，还可能走回头路。这几年，凡是发展快的企业，凡是成绩大的企业，都是过去产品销路不好的企业。有的企业形势一好很快旧病复发。现在机械工业的服务态度比以前好些了。我同周建南[3]同志说过，机械工业要特别注意，很可能旧病复发。我们机械工业过去长期供不应求，就免不了粗制滥造。我看各种产品只有供稍过于求，才能促进进步。现在的问题是供不应求，“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所以服务态度不好。但是，要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依靠体制改革。三年之内很难解决。你们在困难中求生存，为了求生存想出了好多办法，牌子一响，（黄知真：他们现在牌子就很响。）产品又俏，不但不能进步，还可能倒退，服务态度就可能不好。整个机械工业都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提醒你们及早注意，我今天讲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这个目的。机械工业还有一个老毛病，东西好坏不听用户意见。我同周建南同志讲，评价你们机械工业好坏的标准，只能是用户，用户说好就是好，用户说不好就是不好。不能由制造部门自己说。在我们国内，这个问题还可以争，在国外争就没用，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人家就是不买你的。始终要以用户为标准，首先承认东西不好，这样才能进步。其他部门如纺织工业部，也有这样的问题，总认为自己的产品好，不听用户的意见。这与供不应求有关，与独家生意有关。过去我们不大懂，这个问题为什么老解决不了，经过这次工业调整，我们

懂了，整个工业一九八一年后有了好转，现在情况又有了变化。根本问题是解决体制问题，从领导上来讲，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你们的材料我都看过了。欧洲的工业很萧条，他们就缩小产量，组织力量搞攻关，搞技术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在一次经济危机之后，都要出现新技术，不然不能生存。所以很注重开发新产品，搞新技术。美国虽然失业很多，但在产品开发方面，工程技术人员没有失业的，他们总是把技术人员组织起来搞产品开发。我在富拉尔基参观一重时，就向他们说，你们停产时期没事干，你们可以搞技术改造，光是找饭吃不行。为什么不去改造、开发新产品，应该把力量组织起来搞改造、开发新产品，迎接新的好转嘛。当然，国家计划也有问题，国家无计划，他们不知道找出路。过去，对新产品开发的位子摆得很不够，研究也很不够。当然，体制上也有问题。总起来讲是两个问题：第一是认识问题，第二是体制和政策问题。一台汽车有的能跑10万公里，有的能跑20万公里，这个差距很大，所以，产值很不可靠，他反映不了质量，反映不了经济效益。我们长期以来只讲数量，不讲质量，不讲效益，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出的超英赶美，也是指数量而言的。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确实不行。

你们这里后方厂能不能搞？与国外合作搞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目的不是为了节约劳动力，而是为了提高质量。加工中心，特别对改造一些老厂，改造城市也是适应的。两个加工中心配起来可以代替一条生产线，有的一个加工中心就可以代替一条生产线。上海用微型机改造里弄小厂起了很大的作用。加工中心不仅大厂起作用，而且对老厂、对小厂都起作用。大一点吨位的汽车很需要。不过柴油现在很缺（饶斌：这与国家的油料政策有关系。）如果多炼了柴油，会缺少什么油？（孟少农[4]：主要是烧重油，特别是烧原油多了。）

当然要少烧重油，不过不烧重油，燃料就成问题。中国为什么烧重油？因为燃料困难，以油代煤，把节省的煤换取外汇，每年都是三四百亿美元。这些外汇用来开发煤炭工业。如果多生产了柴油，就少了汽油。而柴油价格低了，炼油厂不愿意干；但要把柴油价格提高，农民又不干。我讲这个问题，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要你们注意农用柴油有增加的趋势。按道理讲，用轻型柴油汽车代替拖拉机搞运输较好，但很难改变。因为拖拉机既可耕地，又可搞运输，你的汽车只能搞运输，不能耕地。农民很难搞两套投资，又买拖拉机，又买汽车，农民搞不起。（孟少农：将来汽车价格低了会改变这个局面）。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国韩丁夫妇，但至今没有解决。（黄知真：主要是农民只能买一样，不能买两样。）还有个农村道路问题，汽车下不了公路。

为什么中国汽车运输发展不起来？外国铁路萧条，中国的铁路很拥挤，这是为什么？中国汽车运输发展不起来，一个是铁路运费低，二是公路质量差，汽车吨位太低。中国的汽油价格还是便宜的，如果按国际油价一提高，汽车厂都要垮台。为什么公路运输车辆不多，航运也不行，利用率也很低。武钢专门修了个码头搞煤运输，他不用码头要用铁路。这样势必加重铁路的负担。国务院下文件100公里内不准用火车运，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汽车吨位小，公路质量太差，都

是汽车发展不起来的原因。按照中国的情况，汽车根本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要发展汽车运输，减轻铁路压力。但要研究为什么会出现公路运输发展不起来的情况。

外国对我们中国感兴趣的是两条：一条是劳动力，一条是市场；我们对外国感兴趣的也是两条：一条是技术，一条是资金。这就叫取长补短，互相利用。我们的目的是要技术，对我们需要的产品，可以合资，可以让些市场，特别是对欧洲。凡是我们需要进口的，确实是先进的技术，我们可以让一点市场，这是我们最大的王牌，他们真正愿意让技术、让资金，我们就可以让一部分市场，当然要货比三家。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是市场。我们也准备让出一部分市场，特别是对欧洲那些国家，这个方针已经定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和中国合资，外国人认为造价低，劳动力便宜。但是一干起来，往往不是这样，达不到国外的要求。因为中国的管理水平差，尽管有便宜的劳动力，最后算起账来，还不如国外昂贵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生产不出价格低的产品，所以外国人往往不愿意和中国合资，如果能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欧洲愿意干，他们是为了与日本、美国竞争。合营企业，除了你们说的，还有这么两条。

日本，有人说它是“经济动物”。不和中国搞合营，这是日本的国策，它是不会轻易把技术和资金转让给中国的。将来真正能拿到技术的，恐怕是欧洲，还有美国。欧洲可以，但是东西贵一些。美国想拉中国，怕我们靠到苏联一边去。日本那么需要煤炭，他也不和中国合营开发煤田。只要外国确实让技术，我们可以让点市场，这也是我们的国策。外国最不愿意干的是补偿贸易，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个市场问题。

你们算经营好的，整个机械工业的效益是很糟糕的。你们这里效益不错，但机械工业总的说来是不行的。饶斌同志你是前任部长，你也在这里，当然不是怪你。（饶斌：我有责任。）责任不在机械工业部门领导，要对我们的现状有正确的认识。国外办企业，一般利润都是18%左右。外国银行贷款10%的利息有人敢借，中国只有7%的利息没有人敢借。我们落后的技术，落后的管理，经济效益低，是中国工业的特点。俗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你们算是先锋。什么叫现代化？光在数量上翻两番，不算是现代化。翻两番只是个奋斗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我们对现状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现状就是落后。外国办企业很讲利润，科威特和南京合营一个企业，提出要保证他25%的利润，我们一算，中国不但得不到利润，还要补贴。中国人办企业，就是不讲利润。我讲这个话，是要所有搞工业的同志知道我们落后。这个问题不解决，财政上不去。一个管理，一个技术，一个工人素质，还有政策体制。到今天，搞工业的同志不知道工人的文化水平和企业效益的关系。今天我们工人的文化程度，恐怕平均只有五、六年，也就是小学水平。管理素质差，技术素质差，工人文化水平低，是企业必须解决的。再一个，中国有的人就是有奴隶主义，与外国人合作就认真，给自己搞就不认真。外国人订货的产品，就认真搞。同样一个产品，说是给国内搞的，就不认真，这不叫做“以夷制华”吗？对外国人承包的项目，中国人认真；军工产

品认真，因为怕军法从事，援外项目认真，因为怕打屁股。中国人给中国人搞就不认真，这个部给那个部搞也不认真。还有一个样品是好的，小批量也可以，大批量就不行了，第一批产品是好的，第二批就不行了。

68吨汽车第一批五台不错，第二批就不能用。我问他们为什么？是什么道理？他们说：都是这样。这说明中国人的技术、管理并不是不行，就是不认真。给外国人办事精心，给中国人就马马虎虎，很多不是本事问题，而是不认真，不严格。我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过多次，我们现在进口的一些国外最好的设备，都不能发挥最好的效益。石油工业部的企业管理算好的，但他们进口了一台很好的船台，使用了两年，还有些资料未翻译过来。有一次，我到这个船台上去看，看到船台上有个救生艇似的东西，我感到很新鲜，提出要坐一坐，我倒不是有意要考他们。可是管这个艇钥匙的人却半天才找到。找到后，他却将钥匙从顶上往下边扔，这多危险，要是掉到海里怎么办？这说明我们的管理不行。还有，你们可能听说了吧，北京建国饭店工人工资很高，开始很多人想去，现在不少人想退出来。为什么？因为工作很紧张，感到很累，不自由。有的说，宁可到北京饭店拿低工资，不愿到建国饭店拿高工资。工厂的严格管理问题很重要，为什么效益低，一个是管理问题，管理上马马虎虎；一个是劳动纪律问题。现在规定工厂的厂长有开除权，一个厂一年开除几个人，我看有好处。我讲工业，总是讲工业落后，这是事实，不讲不行，不这样讲，搞不好现代化。对二汽利润递增包干延长时间，我是赞成的。这个问题可向国家报个计划，搞什么项目，经过中汽公司、机械工业部，报国家财政部审批。首钢开始时递增率6%是勇敢的，现在提高到7.2%，是想继续搞包干。去年听说你们二汽也要搞。我没有什么意见，现在延续几年，我原则上也赞成。是不是也要学习首钢，提高一点，可能容易通过一些。如果财政部没有大意见，我没有意见。这个想法，是为了好通过一些，并不是为了多要你们加1%。当然，这样企业的压力要大一些。

我说，企业要有压力，可能压垮一部分，只有有压力，才能变为动力，企业才能进步。

我赞成把二汽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既然张劲夫同志、宋平同志等都批了意见，表示同意了，应当列上。要看到外国汽车运输大量发展。我们国家汽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必须发展汽车。同样铁路也不多。印度有6万公里，苏联有18万公里，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时只有1.8万公里，有8000公里是日本人干的，现在是5万公里。三线办工厂，要修铁路，办学校，建医院，你这里办工厂，也办社会，办城市，也要建铁路，不办不行。现在搞建设，主要是受到交通、能源的制约。资本主义国家是先办学校，再办铁路，再办工厂。

你们应当比翻两番还要多一点。翻两番，既要从数量概念上说，也要从质量上说。一台汽车跑10万公里和跑20万公里相比，从使用价值上说就翻了一番。

汽车出口前途怎么样？我想，你们一是可以出口汽车，二是可以用人民币按照1比2.8比价买外汇，然后进口材料，这样你们的汽车生产可以不受限制。还可考虑一下另外一种方法，你们同钢厂商议，用外汇进口一些矿石，让钢铁厂加

工，让他们供给你材料，这样可能比进口钢材便宜，武钢的一米七就缺少优质矿石。你们可以同钢铁厂签订协议，让他们加工，成品材料归你们。这也叫来料加工。来料加工是好事，但如果全国都大量搞来料加工就非出问题不可。我们有些体制改革是非驴非马，漏洞百出，变成了地方加工。比如广东糖厂亏损就是搞来料加工搞的。农民把甘蔗拿到糖厂去加工，糖都叫农民拿走了。这样国家不控制怎么行？我们国家要搞产品税，只要是生产同一种产品，就缴纳同一种产品税。这样就可限制重复生产，对大批量生产、经营好的企业没影响，差的自然就存在不下去。这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企业实行利改税，是一把钥匙，可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比方上海手表销售价是80元，成本是12元，假使征收产品税60元，除去成本12元，还可得到8元钱的利润，小的表厂就发展不起来。汽车也是这样，一辆汽车征收3000元税，小厂就搞不了。同类产品谁有优势，谁就发展，谁劣势，谁就垮台，这是结果，要这样做也要两年，但可缓期执行。现在国家是国家，企业是企业，机械部不代表国家，冶金部也不代表国家，唯一代表国家的是财政部。工资也要改革，将来国家可只包到厂，不包到人，确定工资总额，超过了要收税。我抓改革从四川开始，今年是第五年了，算明白了一个道理，企业与农村不一样，复杂得多。要划清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不划清楚，改来改去，还是改在财政部身上，这个关系划清了，不会存在厂长和工人一起向国家争利，各部同工厂一起向国家争利，这样，可以促进企业内部的改革。当然，有许多企业，像你们这样的企业，可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效益。但有很多企业不是这样。根本解决办法要靠改革。实行利改税，特别是实行产品税，全国的企业可能垮掉三分之一。但是这也有好处，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活力。有淘汰，才有进步。外国厕所都安电话，为什么？因为讲究效益。中国工业的发展光靠觉悟、光靠党性不行，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正如你们所说的，叫做“背水一战”。企业一包就行，说明有潜力。谁先进谁好，谁落后谁就不行。城市改革和农村不同，首先要解决企业对国家吃大锅饭，然后解决企业内部吃大锅饭。将来普遍实行中央这一套，有的企业就不好混了，但企业的权力大了，创造效益的能力也大了。目前的利改税是过渡办法。（刘西尧：钟表如果征收60元产品税，我们四川的钟表厂都只有关门。）这个数字，我是随便说的，只是举例说明一个道理。税率、税制要研究，改产品税以外，还要适当收点调节税，是为了给效益差的企业调节调节，把好的企业的利润调剂点给差的企业，这是过渡性质的。

你们的报告我看了。对来华的外国专家，要体谅他们的处境，不知是不是你们的报告中写的。（黄正夏：报告中有一条建议，最好通过他们的公司请他们来。）外国人来华回去后，都要向情报机关汇报，泄露了机密老板要辞退他。你要问外国人一个什么技术问题，他们一般不作正面回答，只是摇头或点头，摇头表示不对，点头表示对，不表态表示不行。他们怕回去丢了饭碗，我们要理解，要保护他们。路费问题已经解决了，国务院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就这个问题，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了一个文件，我为这个事专门开了一次国务院会议。你们有什么事可以找这个小组。外国人来华，有些可以给报酬，有的还可以给重金。

我有一个讲话，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在这个讲话中，我说了外国人说中国职工的文化水平要达到12年，也就是中专或高中水平。钱学森认为，美国职工将来要达到大学水平，否则不能搞信息社会。我们要达到中专水平，光靠国家教育不行，要靠企业自己办。你们这样的企业，哪一年要求干部达到大学水平、职工达到中专水平，要有个计划，有个目标。这个问题不解决，四个现代化是不行的。有些外国进口设备，把外文译成中文写成条子贴在上面，有时贴的条子脱落了，就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就用不成。有一次，一个船台突然全部停电，找不出原因。后来一查，就是因为一个电工戳错了部位。有些岗位，可以搞大学生来操作，搞岗位津贴，不然的话，损失太大。职务工资制未实行前，可以先搞岗位津贴进行过渡。职工培训，在厂里来讲是头等大事，不能光搞物。现在比较重视物，还没有认识到人，人和物相比，人是头等大事。要对职工进行考试，考试不及格的要从岗位上拿下来，考试好的上岗位。重要岗位要搞岗位津贴。职工培训提出来很久了，但是还没有引起普遍重视。

联合是个大问题，企业有联合要求，主要障碍是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不同意。搞联合要注意质量，有些关键零部件可以搞点进口。外国人讲，你们导弹都可以搞，为什么民用产品上不去？卫星都可以上天，为什么焊接和密封问题就解决不了？有些零部件国内解决不了的，可以买外国的，我赞成。你（指黄正夏）的看法，联营能否天长日久地发展下去？你们愿意这样长久地干下去嘛。（黄正夏：我们愿意长久干下去，但在目前，还存在不少体制方面的问题。）黄正夏同志，你现在有这个想法，可能干下去，但以后别的领导有没有这个想法？恐怕很难说。我想，可不可以在联营厂利润提高的基础上，再分点利润给你们？当然，要想取之，必先予之。你们应当把联营厂抓得紧紧的，让他们离不开你们，从长远利益看，使他们有利可图。千万不能搞“小而全”，要专业化，一搞专业化就真正联合起来了，“小而全”就联合不起来。

外国的高速公路和汽车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汽车载量小，公路质量差，运输效益低，所以汽车运输发展不起来。体制不改，价格不变，汽车运输很难发展。我们的价格是违背资金利润率的规律的。最近国务院开了一个会，城市改革，要么在一个行业里改，要么全国一起改。如果价格改革分三步走的话，这个五年计划的末尾，或者下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中国价格将有一次大的改革。价格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要改变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改变价格，这两个不变，中国改革不可能实现。不改不行，否则，就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通过价格改革，来提高企业素质。提高企业素质，没有压力不行。改革的结果，总是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先哭后笑，最后笑的多。

技贸结合，我向来是赞成的。冶金部一年进口850万吨钢材，如果搞技贸结合，就可以不进口那么多钢材，就可以节约外汇，还可换到很多新技术。我再讲三条意见。

第一条，我认为二汽的工作搞得是好的。二汽建设过程虽有“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也有教训，但总的来说建设是成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二汽有

很大的变化。在全国来讲，二汽是一个很活跃的企业，有很多好的经验。新产品开发、联合、重视技术力量、班组建设，还有对外开放等方面，都是好的。二汽虽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设起来的，总的来讲是成功的。经营也好，有很大成绩。我送你们四句话：“解放思想，振作精神，不断革新，年年向上。”希望你们今后本着这个精神继续发展。

第二条，饶斌同志和你们讲的许多设想，我是同意的，包括改革运输结构不合理，都是正确的。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汽车运输应当加强，要搞大批量生产，发展多品种，搞新车型，这些设想都很好。关于联合问题、同国外合作问题的设想，也是好的。看来汽车工业和整个机械工业一样，总的来讲素质差。像二汽这样的厂子（包括一汽）应当瞄准国外的一个企业来比，或某种产品来比，要有一个对手。要承认自己技术落后，管理落后，文化落后。在国内自己与自己比，与同行比，也是落后的，部颁标准就是落后的。现在我们同国外有很大的差距。总而言之，世界上面临着新的工业革命。这将是个飞跃，这个飞跃可能出在本世纪末，也可能出在下世纪初。对我们来讲，一是机会，二是挑战。十年内乱我们错过了，今天面临着新的挑战，搞得好，可能同世界先进水平距离缩小；搞得不好，差距还可能更大。我们要力争搞好的前途，尤其是微电子技术、加工中心等这类工业，要注意抓紧。当然，我们要进步，首先还是要抓管理，管理落后，即使有先进的技术也不行，要搞管理现代化、技术现代化、人才现代化。一定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首先要有危机感，承认自己真正落后。不能光同国内比，实际国内是落后的水平，光同国内比你们就可能会骄傲一番。要知道，我们和其他国家同在一个地球上，现在国外技术突飞猛进，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要跟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走。今后几十年中国进步要加快，我们可以从中间插进去，迎头赶上去。职工队伍，一是文化水平，二是劳动纪律。我们的劳动纪律不如过去。文化水平上不去，工人阶级素质下降，必须抓紧培训。这些问题完全靠国家办学不行，企业要自己搞。技术人员也有个知识老化、知识更新的问题。听说你们对这个问题抓得不错，一定要很好地抓下去。

第三，我同意你们厂包干延长到一九九〇年。具体怎么搞法，还要和经委、财政部研究。

国外资本家办工厂，没有什么基建阶段，总是干一部分，投产一部分，力争很快收回资金。国外建设还有一个特点，投资都是找银行贷款，要支付很高的利息。生产的利润总要大大高于银行的利息，否则，资本家不干。中国过去基建投资不计利息，所以总想多要投资，投产也慢。外国还十分注意投入、产出。早投入，一定要早产出。订设备，也要讲效益，使它充分运行起来。有的先建后方，后建前方，早发挥效益；有的先装配，先出成品，以后慢慢用盈利来建设、扩充，进展都是很快的。

（饶斌同志说，技贸结合提了很久，现在是可以解决组织问题了，我给你写了个文字材料，请总理批。）

我先看看，技贸结合我是赞成的，我到机场看报告，批了后由秘书用电话传

给你。

注 释

1．黄正夏（1921—2009），湖北襄阳人。时任二汽党委书记、湖北省十堰市委书记、市长。曾任湖北省沙市市委书记，国家科委局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黄知真（1920—1993），江西横峰人。时任湖北省省长。曾任江西上饶专署专员，江西省委副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3．周建南（1917—1995），江苏宜兴人。时任机械部部长。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4．孟少农（1915—1988），湖南桃源人。时任二汽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曾任一汽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东风汽车联营公司副董事长，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汽车专业开创者。

关于汽车工业实行技贸结合的批语*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就饶斌关于汽车工业实行技贸结合的建议写给张劲夫、陈慕华、吕东并姚依林和田纪云的批语。

一、饶斌[1]同志提出汽车工业实行技贸结合，利用汽车进口引进技术，或引进技术结合进口汽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它如机械工业、冶金工业也应利用进口成套设备和大量钢材，以此作为一张“王牌”，与外商谈判引进技术。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请劲夫同志主持，召集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待我回京后，国务院开会听取汇报确定。

二、在国际市场中，有几种主要商品，如钢材、化肥、核电成套设备等，中国已经成为大主顾，而西方又苦于没有市场，他们为了向中国出口商品，是可能转让一些新技术给我国的。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技贸分离，部门之间各搞各的，进口商品不管引进技术，因而未能利用大量进口的有利条件引进一些新技术。这种傻事我们过去干得不少。我多次讲过，应把技贸结合、进出结合作为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考虑以冶金、汽车行业作为突破口，先行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推广。

三、关于技贸结合的具体组织形式，比较彻底的办法是在对外经贸部领导下，把钢材、汽车的进出口业务统一起来，由冶金部和汽车公司负责，经贸部可代理业务。目前如实行起来还有困难，作为过渡形式，也可以采取饶斌同志建议的办法。冶金部亦可仿此办理。

四、经委要建立一个组织，专门抓技贸结合。应明确规定：今后凡是大批进口设备、材料或其它主要商品，必须同时考虑引进技术，进货单位和部门不得各行其事。

五、陈云同志讲，外贸要略加改良。上述改进办法，就属这类性质。以上意见，请酌处。

赵紫阳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注 释

1．饶斌（1913—1987），吉林市人。时任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董事长。曾任哈尔滨市市长，一汽厂长，一机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二汽厂长，一机部部长。

发挥福建优势办好经济特区*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四日

* 这是赵紫阳听取福建省委、省政府汇报时的讲话。

一、对福建工作的看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建的工作有很大的起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今天主要讲的是经济建设，政治等其他方面就不多讲了。这几年，就从经济工作、经济建设来讲，福建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四年来工农业生产年递增速度为8.6%，高于全国7.3%的水平，工业、农业的情况都是好的。这说明中央确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以及对广东、福建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正确的，取得了成效。特别要指出的是，福建省委、省政府比较注意集中财力、物力来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非常好的。你们不是把资金、物力首先拿去搞一般性的加工工业，搞重复建设，而是搞基础设施，搞一些关键性的工程，如你们讲的十大工程等，这就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然，估计重复建设的问题你们也不会一点都没有，但比较重视搞基础设施，这也是福建要发挥自己优势的前提条件。福建有很多有利条件，地处沿海，又是侨乡，但过去建设落后，基础设施差，进不来，出不去，有利条件就不能发挥，很多可能性如引进技术、引进资金、对外交流等，不能充分加以利用。过去由于处在一线，特别是面对台湾，有军事情况，这方面的建设也不可能摆到议事日程上。现在台湾海峡的形势和世界的形势都有了很大变化，我们的认识也有变化，福建省委、省政府及时把基础设施的建设摆到日程上来，我认为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你们比有些省抓得好一些。

顺便提到，你们在汇报中讲，四年来福建同台湾的差距扩大了，原来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相差五倍和七倍，现在分别拉大到七倍和十倍。你们引用这个数字来说明，四年来福建与台湾经济建设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是扩大了。我看这不一定准确，也不一定科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台湾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经济并不那么好，而福建经济增长率并不低。据了解，近四年台湾的总产值的增长率逐年下降，从一九七九年的增长8.08%，下降到一九八二年的增长3.76%，四年平均增长才5.86%，低于福建

的增长率，怎么能说差距扩大了呢？再说，你们汇报中讲了，福建这几年以很大的力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并不能马上表现为经济的增长速度，它是为今后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只讲国民生产总值，它就表现不出来。另外，台湾的国民收入究竟增加多少可供分配的？跨国公司拿走了多少？这些都不清楚，有很多不可比的因素。所以，我认为这样比较不一定确切，不一定科学，而且对提高福建人民进行四化建设的信心也不一定有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了四年，做了这么多工作，同台湾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三倍，这样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认为没希望了，一是产生急性病。我主要是认为这样讲不确切、不科学，也没有好处。

再说，你们说的福建和台湾过去相差七倍，这个数字严格说来也是不够准确、不够科学的，不宜公开引用。我们有时在某些方面用一些数字同国外比，从一个侧面反映某种趋势。但必须看到，中国和境外的统计口径不同，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照一些国家的统计，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折成美元只有280美元，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人均280美元能有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呢？外国专家估计我国的国民收入大概在人均500美元左右。外面和我们的统计口径不一样，价格因素很大。当然，作为我们自己说，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有不少失误，今天在经济上还是个落后的国家，要看到这个差距。作为研究问题，可以这样比那样比，但是引用要注意，宣传更要注意。要准确，要实事求是。这是顺便说的。

总的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建工作的成绩很大，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比较快，抓基础设施有很大成绩，这是我的第一点印象。

二、发挥福建优势的问题

耀邦同志去年十一月来福建视察时说："希望福建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头。"这是中央和全国人民对福建的期望和鼓励，福建应当经过长期的努力，长期的工作来实现这个目标。

我认为，耀邦同志的这句话，最主要的是告诉福建的同志，要在今后建设中更好地去发挥自己的优势，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去进行建设，从而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你们汇报提纲中说："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我们进行研究，认为一切要从福建的实际出发，才能把福建的事情办好。"这句话讲得很好。福建的经济建设要加快，要搞好，就要更好地研究福建的实际，从福建的特点出发，发挥优势，改变或避免不利条件。福建这几年总的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以很大的努力，继续这样做。

讲发挥优势，也不是要齐头并进，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轻重缓急，要有步骤。不仅福建应该这样，全国也是这样。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财政、物资都比较困难，首先要考虑怎么搞法，才能使经济效益更好。这就要求区分轻重缓急，要有重点、分步骤地进行开发、发展，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前进。

福建有许多优势，你们在汇报中也作了分析。比如地处沿海，山多水多，是

著名侨乡，对外通商早，联系较多等。这些优势，有一些现在就有条件发挥，有的将来才有条件发挥。这次来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沿海这个优势。福建省有五百多万华侨在外，同海外经济技术联系比较方便，渠道多，信息比较灵通。现在我们国家要考虑发挥整个沿海地区的作用。沿海地区总的来说交通比较便利，即使要搞基础设施也不是太困难，搞个港口就可以走出去。世界上海岛国家发展比较快，就是这个原因。福建不是海岛，而是沿海，三千多公里海岸线，别的沿海地区有的条件福建大体都有。有些条件，如华侨多这一点，有的沿海地区没有，福建却有。因此福建应充分运用这些有利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引进技术、引进资金，搞消耗能源少、技术密集的轻型加工业。我认为这就是福建的优势，不这样搞不行。我们沿途看到几种产品，觉得很好。如三明的微型电机、厦门的电容器元件、福州的微处理机，还有一些社队企业的产品。要好好地总结经验，不断发展。这样渠道会越来越多，规模会越来越大。从这些地方的情况看，引进技术、资金的项目不一定一下搞得很大，要以中小企业为主，是专业化的，但技术是先进的，产品质优价廉、款式新颖。主要是引进技术，包括引进部分关键设备，有些国内不能解决的原料也可从国外进口一部分。

沿海地区如何发挥优势，要考虑如何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同志们都知道，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世界上有相当一批国家和地区，是靠装配加工出口发家的。台湾、新加坡、南朝鲜、香港等就是趁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处于经济繁荣时期，利用自己交通方便、信息灵通、劳动力便宜的条件，从发达国家转移部分原料、部件来加工出口，使自己的经济得到很快发展。这一情况延续了十几年。现在这个条件不如那时了，因为西方世界经济萧条、衰退。据宦乡等同志研究，从十至十五年的长期看，西方经济不可能再出现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那样持续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而是将在低速增长、基本停滞、结构失调和周期频仍中渡过。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有些人说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由于新技术的采用，生产力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但近期不可能出现。在沿海地区，加工出口不是根本不能搞了，但要像新加坡、台湾、南朝鲜、香港那样，依靠加工出口使自己经济起飞，这条路走不通了。因为国际市场发生了变化。不过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经验，继续搞一些。

这里要指出的是，我们和他们不同，我们还有很大的国内市场。沿海地区引进先进技术搞轻型加工，包括机械、电子、食品、耐用消费品等，只要品种多样、款式新颖、质量优良、成本低廉，国内就会有市场。如泉州的涤纶花，如在国内销售会有很大市场，客商可以赚更多的钱，他就不会吵着要走了。现在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引进技术、原料需要外汇，有个外汇平衡的问题。在目前国际市场竞争剧烈，各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下，沿海地区引进技术、进口原料生产的产品都要到国际市场回销，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走晚了一步，人家这样搞的时候，我们还在搞“文化大革命”，等我们看到这是个出路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又进入一个滞胀时期。所以，我们在向外开拓市场的同时，也要研究如何

利用国内市场。唯一的问题就是外汇平衡。福建要研究这个问题，国家也要研究这个问题。要发挥沿海引进技术、资金的优势，生产出好的产品，一部分外销，一部分在国内市场销售。我们国家还有相当大一部分要依靠进口的商品，如能在沿海生产，就不必进口了，这部分商品的外汇平衡不会发生问题；有问题的是一部分国家并不进口而国内市场需要的商品，要引进技术、进口原料加工在国内销售，就有个外汇平衡的问题。我们应当研究采取多种途径来解决外汇平衡，不是简单地依靠加工出口、扩大外贸来解决，只有这样沿海地区的经济才能活起来。对外贸易是取得外汇的重要途径，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单靠贸易来解决外汇平衡，目前困难比较大。这几年外贸发展，但亏损很严重，国内抬价收购，到国外降价出售，财政负担不起。这种情况一定要改变。我们赚取外汇的途径还很多，有比单纯贸易外汇还合算的，如旅游、劳务出口，还有侨汇，利用国际优惠贷款等。在你们这里，侨汇问题要认真考虑。现在侨汇实际是下降了，要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争取侨汇。如果我们能在其他方面多取得一些外汇，就可以使沿海的一部分加工产品在国内销售。沿海搞的加工应是技术先进的，要为内地工业技术改造服务。沿海要为内地提供较好的零部件、基础件、元器件，同时也为满足国内市场需要服务。沿海如能从这方面走出一条路来，对积累资金，回笼货币，减少外贸亏损都是有好处的。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福建是可作较大文章的。

总之，沿海地区人多地少，能源比较缺乏，一般不宜搞消耗能源多的大型骨干企业，主要应搞技术密集的轻型加工业，有些既是技术密集又是劳动密集的。要多办中小厂，专业化、社会化，引进技术，生产“洋货”。轻型加工业，可以是专业化、大批量生产，也可以是多品种、小批量的，这样灵活方便，应变能力强，就业人员也多。这个办法不仅对福建适用，可能对广东、浙江、江苏等一些地方也是适合的。将来慢慢形成沿海和内地的合理分工，内地用“洋货”就用沿海生产的这种“洋货”。

福建第二个突出优势就是林业。福建有发展林业的好条件，这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木材生长周期比较短，造林条件非常好，而且群众又有长期经营森林的经验，我看了闽西北一些林区，形成了很深的印象。我们要共同努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如果像你们说的，从现在开始，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木材年采伐量增加几百万立方米，那对我们国家将是一个很大的贡献，群众的收入也会大大增加。当然营林周期长，国家可加以支持。从一些地方的经验看，营林期间也不是都没有收益，沿途都听说可以套种、间作，十年左右还可适当间伐。发展林业不仅是原木生产，还可搞林业加工、林产化工等等。

我认为以上两个优势福建要特别注意，要继续努力，把它发挥出来。中央也要给以必要的支持。福建还有其他一些优势，如水利资源丰富，可以发展小水电，耀邦同志来时也强调了这一点。此外还有渔业、建材、食品等等，也要逐步开发。

要发挥这些优势，必须同时抓好两件基础工作：第一要加强能源、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福建这几年用了很大力量来克服这方面的弱点，今后要继

续加强，中央给以必要支持。解决能源问题无非两条，一条是在福建这里搞，一条是外面搞了送进来。第二必须抓紧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这方面的潜力也很大。

三、经济特区的方针

厦门特区经过几年努力，已有个初步基础，主要是搞了一些基础设施，现在已开始进入吸引外资办厂的阶段。

中国搞特区究竟解决什么问题？过去我们也不大明确。如说解决就业，我认为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不要说厦门特区只有2.5平方公里，就是10.5平方公里、20.5平方公里，又能解决多少就业问题呢？要说是加快我们工业发展速度，又能加快多少呢？不要说拿全国来平均，就拿福建二千六百万人平均，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不是岛国，不是小国，通过搞个特区像新加坡那样，就能使整个经济发展起来，那是不可能的。特区如何发挥作用呢？这要从全国的经济建设、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考虑。现在，世界上纷纷在议论，由于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光导纤维、激光、海洋开发等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二三十年内，世界将发生一次所谓新的工业革命。日本学者也认为，现在技术革新的周期在缩短，过去是“十年一小变”，现在是“三年一大变”。他们都在研究对策。不管这种说法确切不确切，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得到一个信息：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现在已经突破和将要突破的新技术，运用于生产，将会出现社会生产力的新的飞跃。我们应当注意抓紧时机，采用新的科研成果，发展我们的经济，缩小我们同世界上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因此，从长远看，必须使我国现在的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三种产业并存的结构逐步得到改进，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适当增加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沿海地区首先是特区具备这样的条件，担负着这一重要的任务。要通过特区这个窗口，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为整个国家的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我们在特区，第一要给外商优惠条件，现在已开始这样做了。第二要坚持我们有所得，就是要把先进技术拿过来。将来在优惠条件中也要包括给一部分市场。现在外商与我们合作，廉价劳动力对他们已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我们国内还有许多环节，效率低，虽然劳动力便宜，但其他效率不高，各种服务质量也不高。对外商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我国的市场。因此要以市场换技术。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讨论对西欧的经济技术合作，我就讲过这个问题。西欧产品没销路，需要市场；我们需要技术，你只要把真正先进的技术拿来，我就允许你一部分甚至全部产品在国内销售，互通有无。

办特区，我们原来没有经验，深圳开始是搞旅游、建住房，当然那也比不搞好。后来有些同志看了后说，光搞这些不行，还是要搞工业。我看只一般讲搞工业不行，应该通过特区搞到比较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区要作为一个窗口，引进技术，再移植到其它地方。在特区我们不必着急，不必急于一下子办多少一般

性的工厂，因为从增加产值、增加就业讲，意义不是太大。一般的技术可放在其它沿海城市，不必放在特区。有些技术确实先进的，没有办在特区，也可给以特别的优惠待遇。如果我们特区方针不明确，将来会发生矛盾，大家都要往特区挤，或者所有城市都要求和特区同样的待遇，那就不好办。我们要坚持拿到先进技术，这点应当明确。现在中央方针已经定了，特区不能办得太多，就是现在这么几块，将来即使再增加一点，看来也不会多。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已办的特区，搞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这对整个国家的四化建设是有益的。

四、对省里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意见

胡平[1]同志和省委其他同志提出的需要请中央解决的那些具体问题，宋平同志已回答了，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同意他的意见。

基础设施，特别是港口，现已开辟的福州马尾、厦门东渡港，首先要搞好配套，发挥作用。还有二期工程、煤码头、粮码头要继续建。除此以外，不必急于再铺新点。如果将来火电站要摆在嵋洲湾，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就要搞煤码头，这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如果火电站摆在厦门、福州，那媚洲湾就不能马上排上队。虽然这是世界少有的天然良港，但现在还摆不上议事日程，可行性研究可以先搞。厦门国际机场既然已建立起来，就要向外通航，飞日本、香港、新加坡都可以，他们也可以飞来，就是只到厦门，不到北京，这与民航现有的航线也没有多大矛盾。铁路建设方面，要首先抓好现有铁路的改造，搞电气化，提高运载能力。已开工的漳泉铁路可以继续修建。

外贸亏损、财政赤字、自筹基建指标，要带回去研究。今年的外贸亏损问题还是要实事求是，要算算账，究竟亏多少，地方能负担多少？负担不了的，只好中央挑起来。基建指标能压的要坚决压下来，确属压下来有困难的，你们提出意见，另行研究。本月十日，要开全国计划会议，有些问题在会上定。

福兴财务公司的问题，我们要回去研究。由于福建的情况比较特殊，如果你们的意见不会引起大的连锁反应，也可以给予考虑，就是按你们说的，在每年增加的信贷资金中拨出一个比例，用于技术改造，或者某些周期比较短的基本建设，主要是用在技术改造上。银行信贷资金，国家一定要管住，只管财政不管银行，那是空的。现在新疆等省区也是提这个问题，他们也有理由，我们还没有开口。原来有个存贷挂钩，现在取消了，这个不能再恢复。回去看看连锁反应大不大再定。我们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要不搞大家都不搞，要开了口子就越来越大。不是有这样的话吗，叫做“此墙不许画，我来画一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我多次讲不能这样。要搞大家搞，最后大家都搞不成，就是好事，效果也不好。

物价问题，福建已注意了。物价上涨归根结底是两条，一是消费基金过多了，二是基本建设搞多了，这样票子就发多了。票子多了，没有那么多东西，物价自然就贵了。福建、广东两个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省，都是物价高的，

直接原因是农副产品价格特别是议价提得太多，基本建设搞大了，工厂奖金发多了。你们的资金虽然用的比较集中，搞了基础设施，但从全省讲，资金还是比较分散的。你们预算内资金十三亿元，预算外资金就有十二亿元，差不多是一比一，而全国是二比一，企业利润留成放得比较宽。很多事有它的客观经济规律。资金太分散，大家都去搞，效果不会好。还是集中力量，有重点、有步骤地搞，效果好得多。搞对了后劲大，搞不对也会出现虚假的繁荣。当然我们中国现在还不是虚假的繁荣，但不注意，也会出现问题。这几年我们很好的一点是，虽然财政困难，但银行存款大量增加。不过使用时要谨慎，因为这不是财政拨款，而是老百姓的存款，主动权在老百姓那里，他看票子稳定就存着；如果物价上涨超过一定限度，老百姓感到存款不合算，就会减少存款甚至提取存款，出现挤兑现象，那我们就经受不起，就会出大的问题。这几年财政困难，银行放活一点可以，但有一定限度。票子发多了，物价就会上涨。物价完全不涨是有困难的，但年年涨、涨得太多也不行。所以物价问题要十分注意，一年、两年不要紧，长期涨下去是不行的。

最后再说几句话，福建条件很好，这几年工作有很大成绩，今后要取得更大成绩，还是要靠全省各级干部加强团结。团结很重要，这也不只是对福建讲的，我在新疆、内蒙古也是这样讲的，全国都是这样。耀邦同志在六届人大会议之前同民主人士协商时讲了两句话：“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两句话，一个是团结，一个是建设。团结加强了，建设才能搞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全党的团结大大加强了，但“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社会上遗留下的不团结的因素还是很多的，需要继续努力清除这些不团结因素，进一步加强团结。首先是党内的团结，干部之间的团结，包括新干部与老干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团结。现在我们要整党，整党最后也是要落在增强团结上。七大，毛主席讲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路线统一了，团结增强了，所以取得了全国的胜利。现在我们整党也要达到团结的目的。要本着团结的愿望去整党，通过整党使全党空前地团结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建省委做了大量工作，团结步步加强，希望今后进一步努力，加强党内、各级干部的团结，发挥福建各种有利条件，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那样福建就能实现耀邦同志的希望，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头。

注 释

1．胡平（1930—），浙江嘉兴人，时任福建省省长。曾任福建省副省长兼省计委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特区办主任。

军工技术转民用应予鼓励和支持*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对核工业部第五研究所成功将萃取炼铀工艺移植于炼钨简报的批语。

这是又一项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的重大成果，应予鼓励，并给以支持，使之用于生产，获得明显经济效益。科技领导小组对军工技术向民品转移而取得重大成果的项目和单位应及时予以通报表扬。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首先要制定规划*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 这是赵紫阳关于设立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与鲁大东、钱敏、郑汉涛的谈话。

三线建设[1]的调整改造，就按你们所讲的那样去办。你们起草几条，报国务院批准，宣布办公室成立，就开始工作，组织力量摸情况。工作的重点要放在调查研究和制定规划上。当前三线企业的工业生产，国务院各部会抓的。但有些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生产问题，也可以摸一摸。总的要求是：三线的企业要经过调整、改造，使它发挥作用。要通过联合、协作，把三线企业组织起来，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使它的作用发挥出来。调查研究和进行调整，要从长远观点来考虑。三线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设备，花了那么多投资，怎样发挥作用，要好好研究。

对三线建设如何看，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三线建设问题很多，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很严重，是一个“包袱”；另一种看法认为，三线建设是个“宝”。三线建设现在不少技术人员、工人都不安心，怕搞不好，会影响士气，因而不敢正视存在的问题。这两种看法，都有片面性。三线建设要分析，存在的问题要正视。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年复一年地往后拖，也不行。三线建设，总的讲不要笼统提配套。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看，势必有些厂子要加强，有些厂子不能再投资，有些厂子要关停，有的还要逐步搬迁，适当集中一点。对三线建设，不要一般性地讨论，议来议去，把下边的思想搞混乱了。搞个机构，静悄悄地在小范围内研究，把情况弄清楚，提出方案。

三线的工厂，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搞得比较好的。比如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是成功的。当然也不会没有干扰。这个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活了，过去的弱点得到弥补，现在发挥作用了。

第二种，在建设过程中受过干扰，但基本上是成功的，经过工作，可以巩固下来，发挥作用。如攀钢。攀钢二期工程看来还要继续搞。

第三种，确实没有发展前途的，要关停。当然也不能一阵风关掉，但领导上要心中有数。对这部分厂子，一是不要再去加强了，它的生产任务，由别的工厂去承担；但要想办法，使那里的技术力量继续起作用，可以支援别的厂子。二是

有的可以逐步转移。如九院，就集中到四川绵阳市附近，方案已经定下来了。这部分厂要关、停、并、迁。迁，也不是由三线迁到一线，而是就地适当集中。有些三线工厂同上海挂钩，实际上想回上海，那不合适。对这些情况，要摸清楚，采取谨慎的方针。

三线建设，得有个方针，有个规划。不然，很多厂子，长期方向不明，那是不利的。

总的讲，三线建设是这么三句话：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现在有两种倾向要防止：一是完全肯定，要搞大配套、大投资；二是否定三线，要离开三线，掉尾巴，再回到沿海。这次不能在经济决策上大掉尾巴了。三线建设花了一千多亿资金，现在要通过调查、规划，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使它的作用很好地发挥出来。

三线工厂的调整、改造，要从全国着眼，要从长远着眼。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是跨地区、跨部门的机构，要促进军民结合；促进部门和地区的企业搞联合、协作，使它尽可能早一点发挥作用。无论从长远或从近期规划看，都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三线地区设备很多，技术人员也很多，应在这个基础上吸收外国技术，进行改造。军用技术转到民用要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军工技术水平比较高，和国外合作，起点就可能高一些。

三线工业要为全国工业的技术改造服务。军工厂也可以生产一些民品。但不要把更多的力量用在搞一般的民品上，你挤我，我挤你。军工厂为了找饭吃，用那么高的技术人员和那么好的设备去搞一般的民品，是不合算的。三线的军工企业应在设备、元器件方面，攻一些民用工业解决不了的技术关键。如果技术上还不行的话，结合引进一些国外先进技术，就解决了。军工应该和民用工业搞技术协作，长期建立固定协作关系。军工厂可以为民用工业生产专用设备和重要的零部件，供全国工业长期配套。这样很多技术问题可以解决，三线军工厂也不会打打停停了。最近，核工业部五所把炼铀的萃取工艺移植于炼钨，取得了成功。这项新工艺可提高回收率百分之八，生产周期缩短三分之一，质量大大提高，“三废”[2]大量减少。我在他们的报告上批过这样的话：“这是又一项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的重大成果，应予鼓励，并给以支持。”这类事应当提倡、支持。

研究三线的问题，不仅研究工厂，还要考虑科研机构如何发挥作用。三线的科研单位摆得不少，技术力量比较强，设备也比较先进，应把很多技术攻关任务交给他们。比如电子工业的元器件，就可以利用他们的力量。如果能够解决技术关键问题，大批量生产，就可以作出很大贡献。要发挥科技人员和工人的积极性，就有个政策问题。技术人员还有个知识更新的问题。这些你们都要研究。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有大量工作，首先是搞好规划。办公室总的是计委代管。许多实际工作要依托国防科工委。这是一件新工作，搞一段再看，要不断实践，不断总结。

注 释

1．三线建设，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为了战备的需要，把东部沿海地区视作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南和西北腹地为三线，按照“山、散、洞”（即依托山区、分散隐蔽和进入山洞）的布局，从沿海内迁和投资新建了大批军工企业，总投资达一千多亿元，统称为三线建设。

2．“三废”，指造成环境污染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

新型建材公司要搞成经济实体*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考察中国新型建材公司和北京新型建材厂时的谈话。

现在全国搞了不少旅游饭店，用了很多国外进口的材料。如果你们能生产和供应，就可以省很多外汇。广州、上海、南京、北京都搞了很多大旅游饭店，是用外汇搞的吧？我们的旅游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因为中国的地方大，可看的东西很多。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北京、上海旅馆紧张，卡住了，所以其他地方就去不了。发展旅游业，就要建很多旅馆。

要把建筑业、建材工业搞成赚钱的行业。但光赚国家的钱不行。现在是建材供给建筑，建筑业建了房子租给老百姓，还是赚国家的钱。（李锡铭同志插话：还是要实现建筑商品化。）一个住宅商品化，一个把建筑材料销到农村，还要供应室内的装饰材料。现在我们每年从国外进口多少新型建筑材料？要花多少外汇？不管是我国建的，合资建的，只要是在中国建的，都要统计一下用了多少国外的材料。要计算一下，用户是用你们生产的材料合算，还是用进口材料合算。

卫生陶瓷为什么我们搞不好？（有同志说：主要是由于小五金不配套。）可以进口小五金，和国内的陶瓷配套。进口小五金在国内配套，不是比全套从国外进口要好吗？（赵维臣[1]同志插话：根据总理指示，经委马上组织两个组，调查研究建筑小五金，请建材、建筑部门参加，轻工部也参加。调查完了就搞规划。王燕谋[2]同志插话：建议也调查建筑卫生陶瓷。）反正有一条，我们搞不了的可以进口，在国内成套供应。这里也有一个体制问题，各单位进口产品有外汇，生产企业要进口配套件就没有外汇，这个问题要解决。也可以请国外设计，或进口配件，需要的外汇由国家拨给，你们拿人民币买。这就比全部从国外买节省外汇多了。企业从国外买配件，可以拿成品换外汇，回笼人民币也可以。有些环节、有些部门搞不通的，要想法去打通它。

现在这个摊子归谁管？（李锡铭：归经委管，叫国家建材局。）一年投资多少？（杜恩训：明年安排的不到六个亿，能不能多安排些正与计委研究。）你们提出总共要两亿美元外汇、三亿元人民币，明年就要两个三千万元，是公司要的吗？（杜恩训：是公司要的。除此以外，还有几个中小基地配套，明年还要四千万元，至少三千万元。祁峻[3]：两个三千万元是直属的，另外四千万或三千万元是地方的。）

你们都说新型建材好，建材系统本身就要积极发展它，可以把发展水泥等的投资转移一些来发展新材料。建材工业投资总数多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投资内容分配的比例可以改变。当然，水泥等传统材料还是要大力发展的。

改革管理体制，搞活一些，我是赞成的。给一定投资，自己滚动发展，滚几年再说。新型材料是个新事物，环节太多，事情就难办。工厂要搞好生产，要进行科研，原则上应自己负责。新材料公司要的钱，准备让中国银行拨给你们贷款。贷款后你将来没有外汇可以拿人民币还，用两块八人民币还一块美元。现在新型材料还不是大量出口的问题，只要能把进口的材料顶下来，就可以节省外汇。你这个公司现在还不大，干脆搞成个经济实体，由小到大，一开始就搞成个实体公司，就是产供销、人财物统一，包括将来进口的材料、配套件等都搞起来，把卫生陶瓷甚至小五金都搞起来，要注意配套。你这个公司一定要使产品配套。当然，也不一定什么都自己搞，有的可以和别的部门搞协作、联合，搞“一条龙”。为了扶持公司的发展，公司可以五年免交利润和所得税，但工商税还得交吧？（祁峻：工商税可以交。）总之，我赞成公司的体制搞得活一些，自主权大一点，这样你这个公司就要真正负经济责任。（祁峻：那是没问题的。）今后你们就要和中国银行、人民银行打交道。

发展新型建材，可以买一点二手设备，可以和国外合作。合作的形式，有些是引进设备；有些是请外国人来帮助设计；有些是进口一部分自己解决不了的零配件，自己能解决的部分国内制造。首先要把牌子搞好，把产品搞好，然后慢慢地扩展，不要一开始自己搞不好又勉强搞，搞得信誉很差就不好了。

公司管理体制的问题，请经委和国务院办公厅研究一下，可以明确几条：一是你们这个公司实行人财物、产供销统一，是个经济实体；二是公司在银行单独立个户头；三是总局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公司，扩大公司自主权。项目审批就不要通过总局（指建材局），如果需要计委、经委审查的，就由计、经委审查，不经过总局这一级。

我看大体上就是这样，国家建材局的问题，你们研究一下。是不是叫总字我不管，相当于一个总局，给你这个权力。新型建材公司还是归总局，是总局下面的公司，但是要把这个公司的权力扩大，就是总局不要多干预它。局里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放给它。至于对巨的口，你们局还是一个口。恐怕大体上就是这个样。苏联的公司都是这样，他们的公司都是部下属公司，归部领导。部、总局都属政府机构，公司是经济实体，不然建筑材料分两个摊子，也有很多矛盾。丝绸、烟草等公司也是这样，归部管。但是有一个扩大企业权力、扩大公司权力的问题。请经委与国务院办公厅好好研究一下。

注 释

1．赵维臣（1929—），黑龙江阿城人。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国务院生产委副主任、经贸办副主任，中国联通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王燕谋（1932— ），江苏张家港人。时任国家建材局副局长。曾任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建材局局长。

3．祁峻（1912—2000），河南固始人。时任国家建材局顾问。曾任建工部陶瓷研究院院长，建工部副部长。

发展大好形势理顺经济关系*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一、关于一九八四年计划安排

今天汇报的一九八四年计划，并不那样完善，矛盾不少，各方面还有些不同看法，但看来也只能作这样安排。还是历次计划会议上的那句老话，各地区、各部门把任务背回去，木材、煤炭、钢材指标也好，财政收入、基本建设指标也好，都背回去。大家提的要求、意见，都有自己的道理，也值得同情，但不能都解决。就是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批准这个计划，大家努力去完成。

二、关于如何发展经济工作大好形势

今年的生产形势很好。原来担心，上半年重工业速度那么高，会不会把轻工业挤掉？现在看来，执行结果比较好，重工业有较大增长，轻工业的增长幅度也不小。再是原来担心农业受灾严重，会减产。现在看，出乎意料，又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收成。总之，生产形势很好。

在我们看到大好形势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现在经济还没有理顺。要理顺经济，任务还十分艰巨。如果不逐步理顺经济，要保持和发展目前的有利形势是困难的。我们今后面临着一个如何理顺经济的问题。我们说的理顺经济，一方面，要在计划安排上使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逐年有所改善。这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等，要一下子解决不可能，但比例关系要逐年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改革，包括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劳动工资制度，等等。进行改革，同目前财政存在严重困难之间是有矛盾的。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改革搞不好，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不改革，财政困难的局面永远也解决不了。解决财政困难，确实还有很多潜力可挖，会上大家也提出了许多办法。从根本上说，企业素质不提高，财政困难就不可能解决。现在有两个东西回不去了，一个是消费水平回不去了，一个是工业生产成本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回不去了。长期以来，我们的工业是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

原材料赚钱。当然，今后消费基金要控制，但总不能再把工资又减下去，把农产品收购价格减下去。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工业的经济效益，提高工业企业的消化能力和承受能力，提高企业的素质，这个任务很艰巨。提高企业的素质，包括企业进行改革的问题，也包括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改善经营管理。不改革，企业不会真正有活力。但要改革，财政又相当困难，弄不好会承受不了。所以今后几年的工作，一个是如何使比例关系逐步得到改善，一个是如何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使改革能够顺利地进行。改革要照顾财政困难，同时又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财政困难，这是一篇很复杂的、很不好做的文章。现在已经成立几个小组在研究各方面的改革方案。如计划、外贸、物价、劳动工资、税收等。明年争取利改税的第二步能够出台，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没有价格体系的改革，没有计划体制的改革，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从一九八○年十二月确定进一步调整以来，这几年经济的发展总的是好的。我们面临很多矛盾，归结起来是这么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使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逐步有所改善，一个是如何处理好财政困难和改革的关系，在我们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搞好改革。解决好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出现良性循环。我们要努力工作，能不能争取三四年把这个关过去。

这里，我还要重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现在讲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指思想战线。经济战线，中央没有这个提法。当然经济领域有些问题还不清楚，可以继续探讨。有这样那样的意见都可以讲。比如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总原则是正确的。至于如何实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是一个探讨的领域，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有些没有把握、敏感的问题，容易造成思想混乱的问题，尽量在内部讨论，不要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听说有些地方反映，部分群众和干部对农村政策是否要变，对企业的政策是否要变，存在一些疑虑。所以，顺便讲讲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在经济还没有理顺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要出现失控的现象。否则，不仅不能为改革创造条件，还会造成新的困难和混乱。因此，在整个经济没有理顺，没有条件进行全面系统改革的时候，对经济必须加强控制，不要这边戳一下，那边戳一下，出现失控现象，使经济困难越来越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改革就难以进行，甚至被迫再次进行调整。总之，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全面系统的改革，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一些改革；另一方面在整个经济关系没有理顺之前，绝不可放松控制。

最近陈云同志反复说了几条，一是外贸要集中，二是财力要集中，这是两把钳子。中央的财政收入要达到百分之七十。现在是百分之六十左右，一下子达到还有困难，但这是个目标。相应地，包括物资要适当集中，外汇也要适当集中。三是消费要控制。陈云同志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不能太快。最近又说，地方、企业、农民的所得不能再多了。当然，这不是说不能随着生产的发展增加收入，而是说农民不能再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收入，不能靠减少积累去增加

消费，工人、农民收入的增加，不能超过生产的增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这样。四是货币发行不能到三位数，一百亿就是三位数了。最近陈云同志连续讲了这四个问题，我们理解是，既包括逐步理顺比例关系的问题，也包括为整个经济的改革创造条件的问题。如果比例不协调，消费失控，赤字扩大，钞票发行过多，带来物价上涨，改革就要推迟。如果被迫再进行一次调整，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很大的政治问题了，涉及到人民对党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问题。这是个全局，需要上上下下都重视。

三、关于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

（一）明年的基建规模相当高了，已经达到了六百五十亿元。好处是把许多该打的都打进去了。但要说清楚，这是最大限度，到此为止，不再追加了，不能再“八月十五放光明”了。六百五十亿元，一次出台，好坏就这么多了。原来我想再压一点，但考虑到明年许多项目进入施工高峰，压多了会拖长工期，投资效果不好。所以，就不压了。但只能这么多了，到此为止。

（二）财政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要靠提高企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近一两年要靠大家抓紧一些，扭亏增盈，反对浪费。万里、一波、任重[1]同志都讲了很多好意见。抓紧一点，搞严一点，肯定是会有效的，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困难。分配的财政收入指标，只能超过，不能减少。明年财政增收一百亿元，甚至更多，是有可能的，这不是高指标。应当说，这方面各省市的差别很大，有的抓得好，有的抓得不那么好。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工作。大家一努力，明年的财政任务肯定可以完成。

（三）票子问题，今年预计增发钞票一百一十亿元左右。这要好好分析一下，究竟为什么发那么多？基本建设规模扩大，农副产品收购增加，外汇顺差占款，各占多少？明年绝不能再增发这么多了。票子一年多一些问题不太大，但年年发这么多就不行。明年的信贷问题要抓紧，在减少钞票发行方面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包括多用一些积存外汇。现在外汇积存压了二百多亿人民币。明年总的是银根要抽紧。这可能要影响一点生产，但只要影响不太大，抽紧一点很有必要，不然钞票发多了，可能出大问题。现在三千多亿元银行资金中，有一千亿元是人民的存款，这是个大水库。这个水库蓄点水，有好处，但要有个安全线。如果搞不好，决了堤，全局皆输。必须维护人民币的信誉，不然物价上涨，老百姓挤兑，经济承受不住，那就可能真要发生一次“金融危机”。明年至少在某些方面要把银根抽紧一些，再把占压银行资金的东西放出一些，回笼一些票子，以减少发行量。要使票子的发行控制在一定限度，不能今年发一百亿元，明年再发一百亿元。这件事要考虑得周全一些，明年票子发行绝对不能到三位数。

（四）钢材、煤炭等，就像计划本子上讲的那样，生产、供货单位还没有完全接受指标，需要单位的缺口很大。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如此，背回去，发挥主观能动性，靠努力工作去完成。

（五）消费基金一定要适当控制，工资奖金不能乱来。工资的自费改革，只限于少数厂子是可以的。但现在搞那么多，整个工资改革的方案还没有定下来，就呼拉搞开了，这是有问题的。我重申一下，自费改革就是自费，国家不负责，今后也不能打入成本。你没有钱就退下来，改不起就收摊子，包括试点在内，三年之后国家也不出钱。你搞几百万人也好，一千万人也好，一概不能造成既成事实，让国家来负担。原来有个印象，纺织行业的基础比较好，我曾提出过，挡车工能否试验工资改革，经过讨论，大家不大放心，没有定下来。一个行业的工资改革，一个市的工资改革，像这样大的事，先斩后奏不行。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历来讲要谨慎。上去容易，要下就下不来。整个工资改革的具体方案还没有定，一个行业、一个市全面搞工资制度改革，那怎么行。

注 释

1．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县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中南局第二、第一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争取国际优惠条件建设好广东核电站*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六日

* 这是赵紫阳听取李鹏和叶选平关于中国核电代表团访问英国、法国和芬兰汇报时的讲话。

一、应该采取措施，把核电站总造价降下来，对英国人（合营公司）算一本账，对我们自己算一本账。核岛买法国的，常规设备买英国的，但我们自己是否也可以生产一部分配套设备呢？（李鹏：根据芬兰和南朝鲜的经验，核岛和常规设备国内都可以分交一部分，大约占设备价格的20%左右。）这就很好哦，设备贷款就可以少借一点呢。（李鹏：核燃料可以由国内提供天然铀或浓缩铀，由法国加工，我们只出加工费。）这又可以减少买燃料的贷款。还有商业贷款能不能少借一点，由人民币支付，广东省能不能向人民发行一点核电站建设公债，每年一亿元，整个建设期就是八亿元。（叶选平[1]：可以考虑这样做。李鹏：水电部也可以从压油基金中挤出一点钱。）这很好嘛，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向外国借那么多商业贷款，少支付一些利息。浮动费用还会有的，但也可以减少，这样总造价就降下来了。不需要背那样多的债了。至于由中国银行担保或由中国银行组织借款，是可以的。哈默来开的那个平朔露天煤矿，也是中国银行担保的。广东核电站在中国土地上，理应由中国出面担保。由中国银行组织贷款，甚至自己发放商业贷款，也都是可以考虑的，我们现在外汇有结余，要看投到哪里对我们更有利。你们应该组织专家，考虑不同的条件，多做几个比较方案，例如自己能分交多少，自己能出多少钱，能养活多少借款，少付多少利息。至于香港占多少股份，也可以计算几个方案，少占一点，也许对我们有利。这些问题都需要仔细计算论证一下，便于决策。

二、广东核电站设备可以买法国、英国的，但中国要发展核电，设备要靠自己制造，如果法国核技术好，可以买法国的，通过合作生产，逐步把技术学到手。如果合作生产第一台、第二台学不到手，生产第三台、第四台总可以学到手吧？至于常规设备技术，我们是否还要向英国买呢？（李鹏：不一定需要，因为英国90万千瓦核机组是在他的66万千瓦烧煤机组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我们国内正在生产60万千瓦烧煤机组，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加以改造，但这要和一机部同志商量一下。）中央已决定开大型露天煤矿，建设坑口电站，来解决能源的需要。因此，不但要搞60万千瓦烧煤机组，还要搞90万千瓦、100万千瓦的烧煤机组。技术上自己不行的，可以引进专利。搞坑口电站，不是说不搞水电，但由

于当前国家资金有限，只能逐步把重点放在水电上，中央已原则同意上三峡，小平同志是赞成的，已向陈云同志汇报过，陈云同志也表示同意。当然只能上低坝方案，不能再留有余地。一留余地投资就要增加，还会引起川东一百多万人长期动荡不安。三峡的电可以一部分给广东。（叶选平同志：能给广东多少电，时间上能否赶得上？）当然三峡电主要解决华东的需要，给广东送一点，也不妨碍广东搞核电。因为过去对红水河论证过，光靠水电不行，还必须火电或核电配合。

三、10%利率的贷款条件不算优惠，能不能争取更低一点的条件。（叶选平：和英国人已谈了三年，我们至今没有一句肯定的话，希望这次中央原则上批准这个项目上马，这样和英法谈判时，争取比现在略为优惠的条件也是可能的。李鹏：国际市场利率在下降，九国君子协定［OECD口四月份要开会，进出口信贷也可能要降，总趋势对我们有利。法国人表示，买他们的东西，密特朗访华时，可能带点优惠条件来。）

我们早就原则上同意广东核电这个项目，不是说为了搞，让你们去谈判嘛。当然，谈判到这个程度，不表示一个态度，再继续下去也有困难。你们是否已向计委汇报过。（李鹏：已和宋平同志约过，他这两天忙，答应下周听汇报。）请计委、经委开个联席会议，听你们一次汇报，并先议出个意见来。我在出国前，尽量抽时间再听一次，争取把这件事定下来。

注 释

1．叶选平（1924—），广东梅县人。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省科委主任。曾任国家科委三局局长，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大型煤矿是否与外商合营值得重新考虑*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九日

* 这是赵紫阳对宋平关于开发陕北神木煤田意见的批语。

完全同意宋平同志的意见。今后大型矿是否采取与外商合营方式，值得重新考虑。因为今后煤主要是国内用于发电、燃料，而合营则售价太高，国内补贴不起，如出口，国际市场容量并不可靠，国内煤十分紧张。因此还不如利用国外贷款自己开发，同时同国外搞技术合作（地质、设计、培训），甚至可请外国人来当经理。另外，今后引进大型煤矿设备，最好同苏、东欧国家合作生产。

宋平同志的信及批的意见，抄告高扬文同志、煤炭部党组及财经小组、常务会议各同志。

中国的科技体制非改革不行*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第103次会议上的讲话。他明确提出中国科学院的三项任务是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地有选择地参加开发或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必须着重解决科学研究与生产脱离和使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作用这两个主要问题。他的这个讲话，进一步阐明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关于中国科学院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同中央和国家机构改革工作小组《关于中国科学院机构改革几个问题的意见》，都提出了中国科学院应该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值得中央重视。我基本同意这两个文件中的主要观点。

一、关于中国科学院的任务和体制问题

科技工作的任务，中央一向是明确的，经过去年全国科技奖励大会，进一步明确了，具体化了。当时我代表中央讲了话，提出中国的经济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方针，无疑也应当是科学院工作的方针，科学院要切实贯彻这个方针。

关于科学院的任务，我同意两个文件中的提法，必须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地有选择地参加开发或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中心点是加强应用研究。中国科学院这么大的力量，如果不把主要力量用在加强应用研究上，不积极参加开发、发展工作，那就要考虑科学院在四化建设中到底应当占个什么地位了。科学院不是大学。我们对基础研究历来是重视的，当然，“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一些干扰，今后要继续重视。现在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今后二十年我们国家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过程中，科技人才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科学院能不能做出自己的贡献。要说二十年不出什么重大理论成果，二十年以后再出也可以；要说二十年在应用研究上没有进展，没有成就，那就不知道中国还要落后多少年。其实，中国的理论也不少，二进制的发明者是中国，八卦就是二进制，更不要说火药、指南针等。英国的理论也很多，但英国的经济今天处在很难跟上的地位。抽象地讲问题讲不清，唯一要考虑的是二十年后中国怎么样，这二十年中对科学技术的要求是什么？本世纪末，中国经济要翻两番，中国的科技人

员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小平同志的高明之处，在于早在前几年就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变为生产力，过去可能是二百年时间，现在可能是三年时间。一个新思想、新理论，对我们无疑是重要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但是，更重要的是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即使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少一些，下个世纪再得也可以。这一点不必再多争论。为整个国家着想，为整个人民着想，要求科技人员，就是要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中国经济最落后、最紧迫、时间感最强的就是这个。当然，我完全同意，不搞基础研究，光搞应用研究是不行的。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地有选择地参加开发、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这三句话调个顺序也可以。原来写的是"认真"重视基础研究，我改成"继续"重视基础研究，要实事求是，什么事情都要"认真"不可能，都要"大力"也做不到，都要"大力"等于不说。除了讲应用以外，还讲了开发，为什么还要讲开发？因为科学院集中了大批科技人员，国家科技人员的精华在这里。现在，很多实验室里的成果，不能很快变为真正的商品。我们从国外引进的技术不能消化，不能真正用于生产，消化以后不能创新。这些问题是转化为生产力最现实的东西，没有科学院的帮助，时间会拖得很长。当然，要有层次，不能把科学院变成一般的新产品研究所。我们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有一批人才，要重视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假如今后体制有变化，更多的研究所转到工业部门，科学院的研究所少一些，开发工作就可以更多地转出去。

任务就是以上三句话，方毅同志赞成，嘉锡[1]、东生[2]同志赞成，两个调查组基本上是一致的意见，既然这样，书记处就把它定下来，学部委员会就好开会了。这个任务定下来之后，科学院要做艰苦的工作，不是在口头上，要真正在思想上搞通，在实际工作上贯彻。当然，要出安民告示，长期从事基础研究的同志不会变动工作，而且会继续支持他们搞下去，比如陈景润[3]继续去搞他的"猜想"，如能获得诺贝尔奖也是莫大的光荣。但要动员一些有条件、有精力的同志参加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很大意义的研究工作。今后十年二十年，看科学院的工作，就要以这个方面的成绩大小为主要标准。

关于体制问题，要采取慎重的态度，除几个定下来的问题以外，其它问题要慎重。关于工程科学院的问题是把科学院一分为二，设工程科学院，还是搞虚的，使专家有个讲话的地方，因为分歧比较大，今天不定，可以再研究。中国的习惯，上面一分，下面就要分。搞两个实体，搞不好就要发生问题，至少在今天没有把握，可以继续研究。总之，体制改革要谨慎，学美国不一定合适，学苏联也不一定合适。

二、关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问题

中国的科技体制非改不行，主要应该围绕两个问题：

第一，要有利于克服科学研究同生产的脱离。苏联的体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是经常把加强科研和生产的联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说明苏联科研和

生产是脱离的。我们有很多成绩，但总的来讲，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自己的科研成果，长期不能用于生产，变为高质量、低成本的商品，这不能不说是科研与生产脱离的一种表现。美国一个公司从科研、开发到拿出产品，投到市场竞争的时间很短，我们不行。有些地方三个月、半年能办成的事，我们要五年才能办成。由于科研与生产长期脱离，科研部门根本不考虑产品的使用价值，搞出来就算完事了。光搞出来不行，得卖出去才行。这个问题，在苏联是顽症，在我们国家也是顽症，一定要想办法克服。我主张组织专门小组，认真探讨。讨论要思想解放一点，因为这是解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这种改革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效率，是关系到我们同国外的差距是缩小还是扩大的问题。世界上科学技术过去是十年一小变，现在是三年一大变，且不说过去是百年一小变，中国古代是千年一小变。我们现在这种体制、搞法不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出成果来。

第二，要使中国仅有的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作用。当然，首先要有政策上的工作，这方面中央一直在抓，例如落实中年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政治思想上的工作我今天不讲。在组织体制上，一方面人才不够，一方面大量积压人才，有人无用武之地。相当一些科研单位，包括高等院校，积压了很多人才。现在一方面要请外国人讲学，引进智力，一方面要把国内的智力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发挥作用。三十岁是干事的时候，外国三十岁左右成名成家，在我们这里根本排不上号，没有实践的机会。五十年代，广东的第一个沙石高坝是南雄县一个技术员设计的，这个坝当时在广东是最高的。为什么由他来搞，因为南雄县就这么一个水利技术人员，而当时广东水利设计院里很多比这位技术人员水平高的中青年技术人员，在院里多少年，总排不上用场。研究单位压人太多。学校里的高材生、尖子，到研究所里是“重孙子辈”，只好跑龙套，跑十年就老了。这是很大的浪费。

怎么改才能达到目的，要实践，但不能老是议而不改。整个科技体制改革问题，建议书记处和有关方面组织小组专门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提出方案。

注 释

1．卢嘉锡（1915—2001），福建厦门人。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曾任厦门大学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严东生（1918—），浙江杭州人。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曾任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所长，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3．陈景润（1933—1996），福建福州人。著名数学家，曾因证明哥德巴赫猜想“1十2”获中国自然科学一等奖。

从中小学开始加强外语教学和普及计算机知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对邱纯甫建议的批语。

送耀邦同志批示。我意此件转教育部阅处。邱纯甫同志建议的两件事，我都赞成。为了适应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便于同国际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从中小学开始就加强外语教学，使大学毕业生的外语水平普遍达到外语学院毕业生水平，这是很重要的。至于如何实施，是否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增设外语课，请教育部研究提出意见。普及计算机知识尤其硬软件知识的教育，也非常必要。这对提高教育队伍本身的素质，采用先进技术，推进现代化事业，都具有重要作用。教育部应该认真重视这个问题，采取措施，从课程上体现出来。在教育工作上，我们要有战略眼光，考虑得深一些。

祖国建设需要精通世界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人才*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新年前夕向留学生发表的录像录音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

一九八四年的新年和春节就要到了。在欢度佳节的时候，你们想念我们，我们也想念你们。我代表国务院向在国外留学的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

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大家极为关心的。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年年超额完成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现在，可以有把握地告诉大家，第六个五年计划肯定可以提前超额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转到健康发展的轨道。第七个五年计划也正在制订中。我们正在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不仅要继续开采陆上的石油，而且要开发海上油田。不仅要有星罗棋布的中小电站，而且要开发利用长江、黄河的水利资源。不仅有水、火电站，而且要积极发展核能发电。我们还要开发大型露天矿，建设行驶长大列车的铁路干线，开辟新的深水良港。与此同时，还将对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分期分批地进行技术改造，特别要抓紧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的改造，使它们首先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在农村，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后，大大调动了农民向生产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积极性，一个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正在兴起。我国的经济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扎扎实实的步伐，不断向前发展。

当然，我们在建设中还存在着不少困难。比如建设资金不足，经济体制不适应，经济效益不高，等等。最大的困难是人才不足。四化建设，需要知识，需要技术，需要人才。既要有各方面的初中级人才，更要有精通世界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的高级人才。当今世界技术更新的周期日益缩短，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亟需我们迎头赶上，攻克难关。祖国派同志们到国外留学，正是为了获得新的知识，博采各国之所长，以补我国之所短，从而使我国的建设能起步高一些，发展快一些。现在，举国上下，不分职位高低，不论年龄大小，大家都在发愤学习。同志们在国外，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应当充分加以利用，以期学得更多、更深、更好。所有的出国留学人员，不论是公费的、自费的，都是祖国的儿女，国家都一视同仁，寄予厚望。祖国和人民殷切地希望你们专心致志地学，踏

踏实实地学，努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外国人掌握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够掌握。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同志们身处国外，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传统，维护祖国的荣誉，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在革命的年代，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远涉重洋，勤工俭学，探索救国的真理，经过长期英勇斗争，终于结束了旧中国受外人奴役的屈辱历史，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现在，一个新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在你们这一代的肩上，就是要学好建设国家的本领，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甩掉我们国家贫穷落后的帽子，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富强发达。

你们在国外，我们在国内，振兴祖国的共同目标把我们紧紧地联在一起。尽管远隔万里，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祖国建设日新月异，前程光明，给有志青年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天地。同志们学成归国，大有用武之地，大可施展抱负。我们深信，在国外留学的同志们一定能够在科学领域里勇于探索，精益求精，满载而归，不负众望。

最后，祝大家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就！

谢谢。

关于推广河南省禹县平原造林经验的一封信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杨钟、文涛[1]同志：

转去原河南省林业厅副厅长徐枫同志关于禹县实现一年绿化情况的一封信。看了这封信，使人感到非常高兴，很受鼓舞。从这里，我们看到平原造林确实大有可为，很有潜力。请你们负责和报社的同志研究，在报纸上介绍这一经验。

地处平原地区的禹县能够实现一年造林，一年绿化，很主要一点是由于全县从上到下，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长期做了准备工作。在推广他们的经验时，主要应推广他们如何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而不要笼统号召一年绿化，也不要发动大家去参观。否则，反而会造成不良后果。过去我们推广经验，往往是点上很好，一推广到面上就搞形式主义。这个教训，一定要记取。

请林业部选择十几个或更多一点县，认真做好规划，参照禹县的作法，狠抓落实，把造林搞好，这些县在步骤上，也应先从若干公社、乡搞起，逐步推开，以尽快取得成效，把绿化大地的工作搞得更扎实，更有起色。以上意见请酌。

顺致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注 释

1．雍文涛（1912—199刘，贵州遵义人。时任林业部顾问。曾任林业部副部长，中南局秘书长，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林业部部长。

一九八四年

增进了解促进友好维护和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日

* 这是赵紫阳访问美国时，1984年1月10日在白宫南草坪里根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和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上的两次讲话。

一、在白宫南草坪里根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的讲话

总统先生和里根夫人，女士们，先生们：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带来了十亿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我要感谢里根总统，他的盛情邀请使我有机会访问你们伟大的国家。

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我这次到贵国来访问的宗旨，是谋求增进相互了解，稳定两国关系，促进中美友好，维护世界和平。我想，这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全世界人民所希望看到的。

今年是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远航中国二百周年。那次历史性的航行，开拓了中美之间的联系。过去两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史中有过友好相处和交往，也有过相互对抗和冲突，但是友谊的种子始终蕴藏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中。正是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两国领导人的政治远见，使我们两国能够结束长期相互隔绝和对立的局面，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自从中美建交以来，总的来说，我们两国关系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大大增加，相互了解进一步增进，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有明显的扩大。但是应当承认，中美关系的发展远未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也出现过起伏和曲折，还存在着困难和障碍。

中国一向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中美关系得到发展。美国政府领导人也不止一次表示重视中美关系，希望这种关系能够稳定和持久。我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就需要我们双方互相尊重，都本着既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又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的精神来处理面临的问题。中美两国都严格遵守双方在历次公报中确定的原则，履行各自承担的义务，中美关系就能够结束颠簸不定的状况，走上平坦的道路。

五年前，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这个讲台上说过：“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我们今天依然持有这一信念。目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

时刻。用你们美国人常讲的话来说，就是既面临重大的挑战，也有着巨大的机会。我们应当勇敢地接受挑战，充分地利用机会。

当前的世界局势十分动荡不安。各国人民都为世界的前途深感忧虑。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都应当意识到自己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重大的责任。在未来的几天中，我将同里根总统和贵国政府其他领导人进行会谈，就发展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我们从来不把中美关系的意义局限于一般双边关系的范围，而把它看成是影响世界全局的大事。我们主张和平，不仅因为中国需要和平、友谊和建设，而且也因为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友谊和发展。中美两国的友好相处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大因素。全世界人民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防止的。

总统先生，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我感到亿万人民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期待我们对发展中美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贡献，我们不应当辜负他们的期望。

我刚才提到，今年是中美开始交往的二百周年。这是一个人们往往要进行回顾与前瞻的时刻。我相信历史将教会我们更加友好地相处。我祝愿美国人民幸福，祝愿中美关系稳定持久地向前发展。

谢谢大家。

二、在白宫里根总统举行的国宴上的讲话

总统先生、里根夫人，女士们，先生们：

我对贵国的访问，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今晚我应邀出席这个隆重的国宴，深感荣幸。请允许我代表我的同事，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里根总统和夫人，向美国政府和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五年前，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喜悦，对世界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既有多方面的发展，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障碍。中美关系的颠簸不定，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我希望这种不稳定的局面早日结束。

发展中美关系是我们双方的共同愿望。我很赞赏里根总统说过的，中美两国注定要通过合作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由于分歧遭到削弱。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都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增进友谊，而不愿意让分歧发展到破坏我们友谊的基础。中美问题的主要分歧，或者说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我希望双方能够严格遵循历次中美公报中共同确定的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履行各自承诺的义务，使我们之间的分歧得到解决。

今天的世界依然动荡不安。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更加尖锐，南北矛盾尚待解决。侵略战争的火焰在一处还没有熄灭，在另一处又燃烧起来。严峻的现实使我们大家都不能不为世界的前途担忧。同时，这也增加了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

民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中国愿意同他们一起，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制止军备竞赛，反对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中国一向反对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我们早就宣布，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对歧视性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批评态度，但我们不主张、不鼓励核扩散，自己也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其它国家发展核武器。凡是真正有助于实现核裁军、制止核军备竞赛和消除核战争威胁的倡议，我们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该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和平共处。我们愿意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我这次到贵国来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探讨进一步促进中美友好关系的可能性。

我今天已经在坦率、友好的气氛中同里根总统和他的几位内阁成员进行了会谈。通过这些会谈，我们增进了相互了解，双方都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都认为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并愿意采取积极态度进一步加强合作。我衷心希望我的这次访问和里根总统四月份对中国的访问，能够促进中美关系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稳定、持久地向前发展，以造福两国人民，有利世界和平。

请允许我举杯，为里根总统和夫人的健康，

为布什副总统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所有朋友们的健康，

为美国人民的幸福，

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世界和平，

干杯！

对中央政法委“严打”部署征求意见稿的批语*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

* 这是赵紫阳就中央政法委关于巩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第一战役成果和准备转入第二战役征求意见稿写给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的批语。

复之同志：

此件初读一遍。总的精神是好的，完全正确的。今后一是按原定方针坚定地把第一战役继续进行下去，同时准备第二战役；二是根据形势发展，应强调政策，防止胜利形势下，头脑不清醒而产生扩大化与其它违犯政策行为；三是从长远讲，要准备长期斗争，加强有关这方面的基础与技术建设，提高技术水平和战斗能力。这最后一条，对我们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应认真重视，并吸收国外适合我用的经验。以上，请酌！

赵紫阳

二月六日

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一九八四年二月八日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1]（以下简称霍），赵紫阳（以下简称赵）

霍：中国农村的改革扩大到城市工业部门进展情况如何？

赵：农村改革的基本原则和路子适用于工业企业，但做法不同，要多走几步。解决企业同国家的关系问题，用利改税的办法。为了避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去年部分企业实行利改税，部分仍实行利润上交。实行利改税是解决企业同国家之间的大锅饭问题。企业本身要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做到这点，才能解决企业内部的大锅饭问题。实行多劳多得，要根据技术水平、熟练程度、工作情况，规定级别。工资制度要改革。利改税一年或两年改完，尚未定下来。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的差别在于，前者没有同国家关系的问题，城市里则有企业占国家便宜的问题。

霍：进行改革之后，工人收入有差别，是否会引起大家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看法？

赵：根据农村的经验，绝大多数人拥护改革，只有少劳多得者不拥护。现在中国不是贫富不均的问题，而是平均主义问题。我们也注意到有人收人比别人多一些，要采取福利措施保证生活，农村也要征所得税，有救济金。城市改革允许存在几种所有制，小工业、手工业、服务行业，允许办私人企业。现在之所以商品多了，市场繁荣，就是因为有多种所有制。政策允许雇工，请帮工，可以有五个徒工，超过了也不禁止。还要看，还要研究。

霍：城市里有私人企业，规模多大？发展到什么程度就要变成国营的？

赵：通过征税来调节。很多人搞得好，管理得好。通过征税后，允许他们办。“傻子瓜子”一年收入三十万元，雇了几十个人，他经营得好。

霍：改革后允许办私人企业，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同以前不一样了？

赵：我们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人口多，没有经过商品经济很发达的阶段，即资本主义。列宁搞军事共产主义，后来搞新经济政策，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市场繁荣，商品增多，就是因为多种经济共存。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同时利用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霍：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意义深远，对中国对世界都有重要意义，我在澳大利亚到处讲这件事，在国外访问时也讲。但中国的政策将来会不会变。

赵：这取决于政策是否得到大家的拥护，是否能使大家得到利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家都怕变，这就保证不会变。第二要采取组织措施，各级领导都要建立第二、第三梯队。邓小平同志本来是众望所归，可以当总书记、主席，但让胡耀邦同志当。现在物色第三梯队，就不会出现个别领导人离开领导岗位后，接班人采取什么政策大家无把握的情况。

霍：同意赵总理的意见，政策会不会变，看效果，看各方是否支持。就军方来说，经济发展了才能改善军队的装备。

赵：军队不是孤立于社会，他们的家属就是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现在很拥护，起初他们不理解，不赞成，后来看到有效，就赞成了。基层干部的态度影响上层干部。

霍：听说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有阻力，情况是否改变了？

赵：主要是认识问题，多数不是什么有组织的反对。原来对老一套习惯了，对改革有怀疑，后来看到效果后就变了，变得积极拥护了。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县一级干部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开始不理解，看到效果才改变。农村工作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好做。你为我们作宣传，不会使你为难的，改革一定会成功的。

霍：你们一定会成功。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些东西，如精神污染、整党，是否会引起改变？

赵：中央规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就不怕了。我访问美国时，有人问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再次发生？我答，当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大家没有经验，以为可以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有了那次实践经验，搞不起来了，这不是少数人的意志决定的，谁再要发动也发动不起来了。

霍：城市企业有的经营得不好，会不会被好的合并掉？

赵：有，但是少。先解决利改税，有的可以多留一些钱。

霍：多留钱分给工人，还是扩大再生产？

赵：国家规定比例，分工资、福利、扩大再生产三部分。

注 释

1．霍克（Robert James Lee Hawke，1924—），生于南澳大利亚州。时任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总理。曾任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主席，联邦议员。2001年任博鳌亚洲论坛主席。

理顺经济和提高企业素质需要研究的一些问题*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的谈话要点。

一、关于理顺经济和争取财经情况的基本好转要解决哪些问题，不把情况搞清楚，不能下决心。切忌“病急乱投医”，否则将会越来越不顺。要研究一下财经情况基本好转的标准是什么。

二、提高企业素质是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当前主要抓什么？主要是解决企业“吃大锅饭”的问题。首先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正确解决企业和职工的关系。实行企业自负盈亏，才能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使它内有动力，外有压力，非力求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不可。如果企业不自负盈亏，老不盈利，总是亏本，它还有什么生命力，这样的企业怎么能够存在下去？

企业自负盈亏是针对企业“吃大锅饭”、“统负盈亏”而提出来的。当然，自负盈亏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完成国家的计划和各项财政上缴任务；同时，它的全部财产，包括利用自有资金扩大的固定资产，都属国家所有。它并没有而且不可能改变企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我们所说的盈亏责任制，实质上就是有条件的自负盈亏。自负盈亏应当允许有多种形式，不能拘泥于一种形式。现在还不完全具备实行自负盈亏条件的企业，要努力创造条件做到自负盈亏。这样做了，目前农村的那种好的形势，就有可能在工业企业中出现。

三、要把经济理顺，必须下决心解决价格不合理的问题。要发展商品生产，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如果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商品生产就发展不起来，或者会给投机倒把提供机会。你要把经济搞活，而价格却搞得死死的，那怎么能搞活经济呢？要使货畅其流，不把价格搞合理是不行的。比如，生猪饲养和猪肉供应这个问题，有的地方认为，以县为单位统一核算不能货畅其流，要以省为单位核算才能货畅其流；其实，在价格不合理的条件下，这样做，省与省之间还不能货畅其流，要改为全国范围来核算才能做到货畅其流，这就要国家包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吃大锅饭”。这个问题如果不从价格来改革是解决不了的。农村是这样，城市也如此。当然，解决物价问题，牵涉到许多方面，既要认真考虑我们可能的承受

能力，又要保持社会的安定。因此，需要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经过慎重的考虑，采取系统工程的办法，提出几种设计方案，反复进行比较，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四、工业企业承包的问题。前年普遍搞了一次，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价格不合理。各个企业的任务不一样，又有利大利小的不同。有的企业技术改造的任务很重，有的企业就不是这样；有的企业要淘汰，并不需要技术改造。包干要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定，等于一个企业一个税率，几十万个企业怎么能够定得合理？

五、企业本身的发展全靠自己去滚动，这不符合计划经济的原则。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的权力，应该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可以搞某些技术改造和某些改善生产设施。但是像生产力合理配置这一部分，企业是不能包的。少数大的企业，经过慎重考虑，由国家批准，实行首钢那样利润递增包干（包括技术改造的包干）是可以的。但审批时，必须严格控制，否则，一放松就会层层加码。如前所说，由于价格不合理，生产任务、利润、技术改造任务的不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必要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的。有的同志设想，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就可以使企业主动地完成技术改造的任务，这当然是进行技术改造的一种好办法。但是有些企业利润很少，比如许多煤矿，它的技术改造任务自己并不能包得起来；要包，也只能包企业本身职工福利方面的事情。许多企业不实行利改税是不行的，否则它们就要求实行利润递增包干。总要给企业以出路，不然大企业难以维持下去。

六、实行利润递增包干，利大的企业愿意这样做，利小的企业就不愿这样做。而盈利多的企业，并不都是国家特别需要发展的企业，这种企业，自己滚大了，国家并不需要。资金这样分散使用，国家重点建设，如能源、交通等建设所必需的资金又从哪儿来呢？

七、首钢实行利润递增包干是作为特殊的情况处理的。首钢的试验是成功的，对它的经验要进行分析，看哪些具有普遍意义，才能推广。原来确定首钢有一部分生铁要调给天津和唐山的钢厂炼钢的，如果全部留给首钢自行炼钢，这样做，从首钢来看，是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从全局来看，未必有利。

八、有的同志建议，对农村的工业企业、对小的工业企业，还是放开一点，让它们有一个大的发展为好。因为这类企业建设快，经济效益比较高。这样搞它两三年，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更有利于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个意见，也请大家议议。

关于企业改革和技术改造等问题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汇报时的讲话。

一、企业改革必须解决扭亏增盈问题

看了你们会议简报，一是大家都很关心改革问题，给企业以活力和动力。二是很关心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三是都希望在总的改革盘子没有出来以前，在一些方面是不是允许大家去探索一下。这三条意见，我认为都是好的。当然究竟怎么办，会后还要研究。

对改革问题，去年国务院开会提出过十个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属于改革问题。各部门都搞了一些方案，刚向国务院汇报了一次，还是个轮廓。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价格问题。价格问题同企业的自主权是有关系的，是很难分开的，还有劳动工资问题。国务院还准备议几次。在国务院还没有议之前，今天还不可能谈什么意见。究竟今年步子怎样走，现在国务院正在议这些问题。

去年十月中央开了经济问题座谈会，突出了扭亏增盈问题。不管改革怎么改，不管今年是怎么搞法，扭亏增盈这个问题说起来涉及很多问题。去年大家归结了这么一条，抓与不抓大不一样。你们也讲了这个问题。这次经济工作会议，必须继续贯彻去年十月讲的扭亏增盈。

我的基本看法，我们国家的经济，作为前提条件，价格问题不改革、不解决，恐怕经济很难理顺。但是，价格问题实在太复杂，而且涉及到一系列问题，我们又没有把握在很短的一两年之内就进行一次大的价格改革。现在，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况。因此，我主张今年下半年搞第二步利改税，这是定了的，不能等价格改革。当然，我也认为利改税的第二步在价格体制没有改革之前，矛盾不能根本解决。这是中外经济学家的一致看法。中国的价格积多年造成的不合理状况，恐怕短时间内没有多大把握加以解决，我们不能等。原来有个意见，现在搞利改税，将来价格调整以后又要改。但是，如果等价格改革，利改税就要推迟。利改税推迟了，企业的自主权也要推迟。所以，我倾向于利改税的第二步能不能早一点拿出来。当然，大家对利改税的第二步有一些不摸底，有一些看法。我看这个问题不要紧。出来以后不合适，再调整嘛。不外乎企业负担重了还是轻

了。但是，利改税的第二步，可以肯定地讲，企业自负盈亏的性质比去年的利改税要前进一大步。作为企业来讲，自负盈亏的程度比去年的利改税要前进一大步。去年的利改税实际上是总额分成，第二步的情况就不同了。原来有一个想法，利改税按中等偏上的水平设计税率，现在看来行不通，实际上税率只能中等偏下。后进的地方，税率必须定低一点，不能定高，先进的地方要留下一块。这样，财政准备少收十几亿元到二十亿元。大体上，多数企业原来的既得利益可以保持，先进的企业可以多得一些。在这个起跑线上，解决自负盈亏。这样，动力和压力的问题至少要比现在的情况前进一大步。能不能适当缓解一下价格的不合理，还要从实践来看。要解决是不可能的，但是，能不能缓解一下，使我们能争取时间创造条件进行价格改革。提出这个问题，大家都想一想。

我在这里着重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在价格很不合理的情况下，又没有税收来进行调节，解决企业自主权问题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样讲？既然要企业有自主权，它就要有生产的自主权，搞什么，不搞什么。千家万户，几十万家企业，价格很不合理。企业有了自主权以后，要想让它不根据自己利益决定多生产什么、少生产什么，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价格不合理，小企业没什么问题，因为它不负责市场，哪个利润高就搞哪个。大企业就有问题，比如说原来生产生铁的，势必就要炼钢轧材，利润可以马上上去；要是出卖生铁，它没有利。实行产品税，利高的税高一些，利低的税低一些，适当缓解一下，但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城市与农村有很大的不同，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企业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自负盈亏，要创造使企业自负盈亏的条件。一句话，根本解决企业的活力和动力，归根结底还是自负盈亏。农民所以一下子有了积极性，因为农村社队原来就是自负盈亏，现在不同的是各个农户自负盈亏。骨干企业都是国家包的，叫你生产生铁，叫你生产钢材，叫你生产优质钢，叫你生产化纤、棉布，都是国家计划的。而自负盈亏以后，企业的收入、工人的收入同它的利润挂钩，实际上是以利润为标准。价格很不合理，势必阻碍企业自负盈亏。现在想通过税收的办法，创造一些条件，使企业能够早一点搞自负盈亏。在改革当中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现在，还是照你们会议讲的去办。国务院还要开会，一方面讨论价格问题，同时可能先搞第二步利改税。第二步利改税，不可能一下子全国搞成一个税率，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要照顾一下地区差别，相对地解决企业自负盈亏。这样，企业的积极性比现在更好一些。

二、关于老企业技术改造的资金问题

越是急待改造的企业，越是对递增包干没有兴趣，有没有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纺织系统，不可能吧。像鞍钢这样的企业，递增包干恐怕就不一定行。武钢是可以的，首钢更没问题。鞍钢这些企业，投资比较大，现在潜力很小。有这么个矛盾。这里有个原则要议一下，大企业大的技术改造，不列入国家计划，完全

靠自己滚动的办法恐怕不行。关于企业自主权的问题，意见也不一致。小企业是没有问题的。大企业的重大技术改造，涉及到设备、材料，多少个亿元的投资，还是要列入国家计划。我讲的是大的企业，像铁路、大的钢铁企业，首钢是递增包干办法，那是当时特殊情况下允许的企业。小企业靠自己滚动是可以的，服务行业也是可以的，比如旅店，搞好了可以再开一个。整个作为一个方针来考虑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原来我提出的十个问题里没有这个问题。基本建设项目是列入国家计划的，列入国家计划也可以采取包干的办法，我这里讲的包干不是利润包干。有一个说法，搞递增包干花自己的钱和花国家的不一样，那不是一个递增包干的问题。大的技术改造列入国家计划搞包干，同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大的基建项目不是准备采用包干的办法吗？大的技术改造恐怕也要采取这个办法，由国家规定任务，一共投资多少，包给你使用，节约归己，不够自己负责任。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将来我们国家大企业的改造走什么路子。这个问题关系到计划指导和企业自主权的界限划到哪里。现在不主张企业有自主权的意见是没有了。小企业的自主权是没有问题的，服务行业更不用说了。大的骨干企业自主权的杠杠究竟划在哪里，这是个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方向问题。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有争论，大体上是三派意见。究竟哪一派意见是正确的，应该采用哪一种意见，还看不大清楚。一派意见是孙冶方同志的主张，他是我们国家最早主张企业按价值规律办事的经济学家，但是他认为要把企业的自主权严格地控制在简单再生产的范围内，属于大的生产力的布局、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应当通过国家计划实行。在我们国家最早主张企业拥有自主权的、最早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就是这位老人家，而且没有随风倒，一直坚持几十年，直到临终。第二种意见是基本赞成孙冶方的主张，大框框是这样，但是不等于说简单再生产就是在质量上、数量上维持原来的规模，除了福利、奖金、工资之外，在发展基金上应该有一定的余地，完全限制在简单生产上是不是太少了一些。第三派意见主张企业扩大再生产基本上依靠自己。这就涉及到企业将来的动力、活力，企业的自主权杠杠划到哪里。这三种意见中，现在第二种意见多一点。这是讲的骨干企业、大的企业。至于小企业，将来实际上可以实行八级累进税后的全部自负盈亏，其他骨干企业可以实行有条件的自负盈亏。十二大提出盈亏责任制，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自负盈亏。自负盈亏中，属于扩大生产能力、扩大再生产这一部分，将来发展的方向，是靠企业自己去搞，还是靠计划？农民靠自己，小企业也是靠自己，骨干企业是靠自己，还是基本上靠计划？现在大家都讲企业自主权，但往往不大一样，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正在讨论。我看了简报，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是技术改造，一个是动力、活力。技术改造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大的技术改造不列入国家计划不行。当然，也不是要企业完全等着国家，你自己有力量搞一些还是要搞的。大的改造不列入计划，主要靠企业自己去搞，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钱的不一定是真正需要改造的，需要改造的依靠自己却没有钱。比如二汽和一汽，一比就可以比出来，二汽是个新企业，正在蓬勃发展的企业，生产力和利润每年增长很多，可以搞新的

技术进步，扩大生产能力。一汽呢，递增包干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钢铁企业、铁路也是这样。

将来基本建设一定要包干，技术改造也要包干，把任务、规模定下来，把款项拨给你，实行企业负责制，或者企业自己解决多少，国家解决多少，包给你，节约归己，把国家的钱变成自己的钱。现在有这个问题，完全靠一年一年地拨款，也没有个总的一项一项地拨款，企业感到花这个钱是国家的，如果把国家的钱变成企业自己的钱，情况会好一些。

座谈会上，劲夫同志讲了个很好的意见，银行必须实行不同的利率，任何国家都是这个办法。当然不同的利率由国家来规定，不能银行自行其是。有一些企业确实利润很高，是扩大再生产的，国家也不是十分需要的，银行利率可以适当高一些，因为它有还贷能力。还有一些企业，技术改造十分需要，自己又没有钱，包干也好，利改税也好，总之它自己没有那么大潜力。比如富拉尔基的一重，设备老了，自己生活都顾不了，实行利改税也好、包干也好，积极性可能高一点，但一年也增加不了多少，而它大量的老设备需要改造，资金需要很多。像这种情况，国家就得有点优待的力、法，就是实行低息的或无息的贷款。利率差从哪里解决呢？可以从财政补贴，这个利率差比较少。这是贷款的办法，把利率的补贴列入计划。不然的话，越是需要改造的企业，越是借不到钱，也不敢借，借了也无力偿还；而有些国家不很需要、自己却有条件的企业，它就敢借款，就会发展很快。比如现在的纺织行业就有点危机，化纤降价、棉花不补贴，全行业不景气，要把提价等因素的影响消化下去，没有别的途径，只有走技术进步的路子。就是要改造设备，提高产品质量，它自己又没有钱，如果借利率很高的贷款，又无能力偿还。像纺织这样行业的技术改造，如果没有一些政策，任其自流，谁有钱谁就搞，谁没钱谁就不搞，这样过三年回头一看，不仅理不顺，而且问题会更严重。所以，从宏观考虑，一些行业，一些老企业，潜力大的和潜力小的，要区别对待。像纺织行业，最近我看了个材料，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三、关于外贸问题

今年外贸收购计划，我路过上海，他们也反映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采取国家收购比去年减少九十亿元，凡是各个地方自己能够解决的，可以多收一点。原来工业和外贸相互扯皮，互不公开，有些工业利润还高，外贸出口亏损很严重，过去是互相保密，现在就不能收购这样多了。但有些地方工业愿意让一点利，有些地方愿意让一点税收。这样外贸还是愿意继续多收购一些，可以不亏损或少亏损了。一种是外贸代理，一种是外贸多收购一点。这种情况，各地抓一抓是否还可以？上海说如果中央能够松动一下这个口，他们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样，迫使原来工贸互相扯皮，现在就有共同命运了。不然外贸要亏损，又不能亏损那么多，你要卖那么高的价钱，外贸就不收了。与其不收，还不如工厂降点价，把利润压低一点。外贸代理是一个办法。有些土特产品，主要是由于亏损而

不是对外没销路，可以通过工业退税让利出口。亏损有真亏、假亏的问题。外贸亏损，但工业是赚钱的。像这种情况，如果从外贸这个角度硬是让它停止生产，工人就可能失业，不如让点利，让点税收，这样外贸部门还可以多收购一点。农产品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外贸不卡一下，也解决不了，还是不让利，不让税，统统都卖给你。能不能通过这个办法，推动一下，使工厂降低成本。有些工厂降低成本还是有潜力的。有的地方说，外贸不代理，企业自己可以出，这里就有很多新的矛盾。现在外贸亏损有两种产品，一种产品确实不划算，搞来搞去，搞到外国，劳民伤财。还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是集中反映到外贸亏损上，就是国家赔钱，实际上是国家财政补贴。但是工厂还是有利的，或者是有潜力的。税收还是可以降低一点的。解决的办法，一种是外贸代理，地方自负盈亏；还有一种，外贸、地方、企业三家，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共同研究一下，在国际市场还有销路的情况下，如果工厂还有潜力，工厂让点利，财政让点税，就可以多维持一部分生产。

还有一个问题，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还没有解决，就是外贸转内销的问题。为什么外贸不自己销？你没有网点，靠小商小贩也可以嘛，百货大楼可以卖嘛！直接给国营商店。外贸收购了一大批，卖不出去转内销。这部分商品质量是比较好的，在国内是高档的，价格是低档价格。有许多很便宜的东西，简直令人难以相信。究竟钱让谁赚走了？全国各地都有出口转内销，叫“特大喜讯”，经常有人排队。出口转内销，外贸亏是一定要亏的了，因为收购价格很高，内销杀价杀得很厉害。外贸部门说是商业杀它的价，商业部门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最后是国家吃亏。每年出口转内销，全国不知要亏多少，可以算一算这个账，能减亏多少？每年至少可以减少四亿元亏损。

近几年外贸有个比较大的发展。发展当中要有个分析，传统市场、传统商品即使亏损，我们也得保，因为它是传统产品。国际市场，一个时期一个变化，过了这个阶段可能就好了。但是，我们这几年的发展中，确有一些盲目性。比如蘑菇，本来在国际市场就是个饱和的东西，过去中国没有搞，主要是南朝鲜、新加坡在搞，后来我们搞起来，一下子发展很快，你搞我也搞，要搞大家搞，这个东西容易搞嘛。但是国际市场容量就那么大，搞得太多就出不去，加上外贸多头对外，廉价出口，结果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现在国外还有几个案子告中国倾销。蘑菇全面开花的结果，就把一开始建立的几个蘑菇出口基地给冲垮了。珍珠发生过一次，统一后好了些。要研究一下，一种传统产品、传统市场，还有这几年盲目发展的产品，超过了国外市场的需要，不仅现在超过，即使市场回升，我们的生产力也是过多的。这些产品如果不转内销，不以内销为主，再想保也保不住。这不仅是亏损问题，而且是个盲目生产问题。有几种东西，抽纱也是这样。抽纱过去有几个传统生产的地方，一个是潮州，一个是烟台。潮州本身也有盲目发展。潮州原来是多少数量，烟台原来是多少，现在是全面开花，千家万户都去搞。其他地区过去从来不搞的，现在也搞。国际市场并不存在一个很大的空额，它也是个挤来挤去的问题。五年时间内，外贸进出口总额由二百亿美元增加到四

百亿美元。翻了一番。所以要做个分析。我很赞成这样一个观点，外贸亏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能单纯就外贸亏损来解决外贸问题，要分析，有一些传统产品、传统市场、传统数量，不能因为扭亏，一下子把它们搞光了，退出了市场，老百姓转业也没法转。至于那些搞多了的产品，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只有关停并转。所谓转，包括转内销，国内市场很大嘛！当然，出口转内销也有个适销对路的问题。有些高档出口商品，农村并不需要，要转一转。当然，转也不能一声号令。

外贸工作，在继续稳定和发展中间有个调整问题。这里我用了个稳定，从长期来说还要发展。当前可能是稳定。对五年来盲目发展起来的东西，我们要保一些质量好的。还要保多年来扶植起来的老出口基地，多年来老百姓靠那个生活，你把它冲垮了，老百姓吃什么？新基地才搞二三年，可以生产别的东西嘛！这个问题，光是外贸部门是解决不了的。但是外贸部门要提供信息。究竟外贸部门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要研究分析一下。我也不主张这件事突然一二个月，二三个月或者一年解决这个问题。有些要大发展，有些要稳定，有些要紧缩。这就有调整问题了。紧缩就是调整。这就有个老基地、老产品、老市场，有个质量问题。外贸亏损是个大问题，但我们考虑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纯从亏损去考虑，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外贸部要好好研究一下，各地、各级都要很好协助外贸部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避免盲目性。不要把指导思想只是放到一九八四年的亏损上，减少多少亏损。要看到我们这几年发展中间确有盲目性。你今年不转，明年也得转，今年不停，明年也得停。这就希望外贸很好分析，研究一下。

这几年，我在国务院多次讲过了，外贸部要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往往对国际市场信息没有个基本的估计。资本主义市场它有好多很偶然的因素，一下子价格就可能涨得很高，一下子又可能跌得很低，我们不能盲目地跟着国际市场跑。要考虑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现在，我们外贸越来越大，占那么大的比例，根本不考虑国际市场，国内就是自己这一套，这不行。但也不能盲目地跟着国际市场价格跑，那样国外价格很难稳定。比如不久前国际市场茶叶大涨价，原因就是印度搞了三个月停止出口，一下子价格冒上去了。现在它又开放了，价格可能又要下降。有一些商品在国外的容纳量是不太多的，但可能一次把价格抬得很高。过去，我们外贸部门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国外市场一紧，价格已经涨得很高了，国内赶快抬价收购，布置扩大生产。等到你布置了，生产搞上去了，国际市场价格又降下来了。人家把牛偷走了，我们去偷那个拴牛桩子，结果被人抓着了，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给生产单位也造成很多盲目性。高价收购刺激它，搞出来以后又停止收购、杀价，造成损失很大。上次我说过，这类产品将来必须保持相当的库存。国外价格上涨时，我也不增加多少收购，就销库存，把库存的东西拿出去；国外市场价格下降的时候，我还照常收购。通过库存调节，来对付国际市场，这恐怕要能沉得住气。我们往往有时看着广州交易会，商人来了，开张了半个月，才知道什么东西看涨好卖，一看涨就抓，就布置生产，扩大生产，结果秋季交易会行情就变了。比如高档的工艺美术品，过去中国很有名，现在也

是搞得太多了，自己跟自己竞争。高档的工艺美术品，在国外终究有多少人去买？我讲这一段，就是不要把外贸亏损总是看成简单的问题，是个大问题，长此下去国家确实负担不起。现在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办法，一下子降多少，这要进行分析，也不能简单地从压缩亏损上考虑问题，不然明年又可能出现另外的问题。这一点，我希望外贸部门、各个地方好好分析一下，特别像上海、天津，你们掌握的外贸信息不一定比外贸部差，你们也很好研究一下，哪些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你们也不仅了解本地方，还有行业。比如地毯，天津口岸应当是有信息的，国外市场、国内生产能力究竟怎么样？通过几个口岸，结合外贸部好好研究一下，经过今年以及今后两三年，既有稳定，也有发展，同时也有调整，恐怕要这样来解决问题。我这是讲一些想法，再具体还要很好研究，要信息分类分析产品。

四、关于上收企业问题

现在下边有人反映我们向上收企业收得很多，除了几个大公司以外，各部还有收企业的吗？原来我们有过这个意见，全国只搞这么几个大公司了，今后即使再搞也不会多。除此之外，各部没有搞大公司，也在收企业，这个做法好吗？我觉得改革总得有个方向，即使有些改革一下子还实行不了，但是现在要展望一下。靠增加中央直属企业解决中央财政问题，恐怕这个路子不可取，也不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方向还是靠搞税制，当然哪一天能完全实行是另一回事。将来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是分税，这个方向已经大体定了。国家和企业也是靠收税，当然税种不一样。有产品税，有八级累进税。产品税体现一种价格差别，利润的多少，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解决了，中央和地方来分税，这是世界通行的办法。哪些税归中央，哪些税给地方，哪些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这样，大家都吃税收，企业就可以独立经营了。当然，国家税收也不会很轻。如果将来是这么个方向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不必考虑中央要掌握多少个直属企业来解决财政问题。要走这个路，就少了一条收企业的理由。再一点，我们现在既然强调大城市的作用，中心城市的作用，各部又收企业，就不利于走改组、联合的路子。有条件、有必要组织的全国性公司，或者大地区性公司，当然是要管企业的，我指的不是垂直性公司，而是从解放生产力出发的公司。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大企业中央都要收回，这种做法不可取。有色、石油化工那都是我们这儿定的，那是要搞的。

五、关于建立集体企业社会保险基金问题

二轻系统能不能有一个办法过渡一下，不要一个厂包一个厂的。国营企业有劳保福利，二轻企业退休工人是各厂管各厂。一个是小企业放开，二轻放开，这是一条，是探索性的了。第二个奖金也可以跟它的营业效益挂钩，不机械地管它

是几个月。第三还是用工资总额控制。超过工资总额的收劳保福利费，慢慢地以城市为单位，把集体企业工人退休后的劳保福利问题统一解决，不是一个厂包一个厂。这就是说，奖金一放开不加以控制，将来会发生问题。新企业退休工人很少，交了税以后留下的钱很多，一下子工资奖金发得很高，过上几年企业老了，退休工人的负担都要它背，这样就背不起了。能不能在企业的包袱比较轻的时候，就开始征收一种劳保福利基金。将来是按行业还是按城市，还是按地区，这个问题在集体所有制企业里是个大问题。

小企业放开以后，哪个赚钱它就搞哪个，包括所有社队企业都有这个特点。它不承担国家计划，也不负责安排市场。所以，一放开以后，利润很低的它不干，就要掉头了，这是它的优点，转化比较快。一是经营搞活了，二是可以跟着市场走。一般地讲，会经营管理的，只要真正放开，工资就高于国营企业。像这些企业，完全不顾后，工人五十岁了以后怎么办？这部分人劳保福利谁负责？所以，像这些企业放开以后，必须筹划一部分社会保险基金。这样，一方面可以适当制约一下它的工资，不要一下子分光吃光，避免将来企业混不下去。国营企业也得考虑这个问题。以前不是出过一个题目嘛，实行两级工资管理，或者将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实行奖金不封顶。不封顶，总还要有个节制的办法。对放开的小企业、自负盈亏的小企业，这个办法恐怕要赶快研究。

加强行业协会发展食品工业*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接见杜子端、韩林光时关于发展中国食品工业的谈话。

一、食品工业要加强行业管理

你们搞的内部材料我看了。现在看来，对食品工业，要从加强行业管理上做文章。成立食品工业部不行，矛盾太多。就像机械部那样，对军工的和其他部门的机械工业还是管不了。而且，成立食品工业部后就不超脱了，对轻工业部、农牧渔业部、商业部系统办的食品工业就不好协调了。看来还是要搞好行业管理，要按照这个方向来考虑建立组织。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家来办食品工业，一个部门垄断起来不行。如果成立食品联合总公司，那同多部门管理也有矛盾。食品工业大量的是小行业小企业，分散在各地，多数行业不适宜于建立全国性的公司。而且成立全国性公司以后，忙于业务经营，精力就分散了，不利于搞好行业管理。所以，食品公司、联合公司，地方可以搞，但全国性的不要搞。

看来还是应该加强食品工业协会。食品协会是推动食品工业发展的行业组织。还可以在经委内成立一个协调各方面的领导小组或办公室。对外，就叫食品协会，对内是行政上的协调机构。主要任务是加强行业管理，搞好统筹、规划、协调，制订政策、标准，搞好食品卫生、检验、科学技术等项工作。

至于成立食品技术开发总公司，我是赞成的。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开发新兴行业、新技术、新产品，开发资源，搞好技术引进、咨询服务，发展联合等，对外经过批准后也可以搞合资经营。

可以考虑把管协调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食品协会、技术开发公司三个机构搞在一起，一套机构三个名义，三种手段都用。适合用什么名字时，就用什么名字。

二、食品生产要满足多方面的需要

食品工业的发展要考虑两个方向。

一个是搞高档食品，开发新产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收入增加，生

活水平提高，购买力提高，对食品的要求也提高了。如城乡收入高的，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就是五千多万人。如占百分之十的人收入高了，那就是一亿人，这是很大的数字。还有一些教授、专家和收入高的城市郊区农民，以及国外的旅游者等，都是需要高档食品的。这方面的要求在不断增加，很有发展前途。

另一方面，要发展城乡人民需要的大众食品。我们不能光搞高级的，还要考虑广大农村、广大城市居民的需要。这个市场潜力很大。比如现在啤酒已经销到农村，就是一个证明。食品工业大量分布在县以下的小城镇。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农村食品工业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社队企业中的食品工业，要努力满足农村需要。这样发展起来后，既能增加收入，又可以安排很多人就业。

除了发展传统食品以外，要注意大力开发新产品。适应各方面的不同需要，还应搞好方便食品、老年食品、儿童食品等。特别是现在独生子女多了，玩具、服装和儿童食品的需要量增长很快，很有销路。

要研究食品工业的发展，研究上述问题。这里有质量问题，也有品种问题。要尽力满足城乡人民对食品的多方面的需要。

食品工业市场很大，潜力很大。但是食品加工以后，价格就会增加，要考虑城乡人民购买力水平的问题。除了国家规定的实行计划价格的品种以外，食品工业许多都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不可能都纳入计划。搞市场调节放活以后，也会产生一些盲目性，比如盲目建厂、重复建设等。这点也不要害怕。县以下小城镇，举办小型食品厂和城乡的前店后厂，它们比较灵活，除了国家的专卖产品外，只要有原料、有市场，就可以让它发展。有一点重复生产也不要紧。这些小厂以劳务为主，固定资产占用得少，周转快，适应能力强，“船小好掉头”，原料、市场发生变化后，它可以很快转产。所以不要怕它有一些盲目性。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加强管理，让它们在竞争中提高，在竞争中发展。

食品工业遍布城乡，大量在中小城镇。除了专卖的产品以外，哪个厂生产什么，不要由国家来定点。你一定点，他就会躺到你身上了，今天要这个，明天又要那个，使你的精力陷到事务中去了。这不是好办法。

三、要搞好行业规划

食品工业全国性的全面规划，一下子搞起来有困难，作用也不太大。规划不宜无所不包，应围绕着以下问题来考虑：支持什么行业，开发什么行业，发展什么产品，在哪里发展，以及限制或禁止发展什么等。要提出发展的方向、政策、措施、实施步骤等，抓一些大的问题。

行业规划，要搞超部门的。要从全局出发，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出发来搞好食品工业的行业规划。要加强专业协会的工作。专业协会不能放在哪个部门，成为部门的协会。要使它成为食品工业各个行业的服务组织、技术咨询组织。专业协会可挂在食品协会，也可挂在公司和企业。

四、要用经济的办法促进联合

要给食品协会以经济手段。有了经济手段，就有了发言权，可以支持、促进食品各行业的发展，支持新兴行业、新产品，打开销路，并推动企业的联合。

经济的办法、行政的办法和食品协会协调的办法，三种手段应一起用。要在计委、财政部等有关综合部门开列户头，拨给一部分周转资金，或给予低息、无息贷款。另外，要拨一些外汇，搞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要搞一些试验厂，也可以收手续费。

五、注意搞好食品工业的科学研究

对各个部门的科研技术力量，如食品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都可以给任务，委托他们进行科研，拨给他们一些科研费用。也可以请专家当顾问。这样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食品工业的技术进步就会加快。

今天讲的，回去向劲夫、吕东、宝华同志汇报。请劲夫同志主持会议，计委、财政部、商业部等有关部门参加，对食品技术开发公司等问题定上几条，就好办了。

重大技术装备一定要确保质量*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工作汇报时的谈话。

一、关于从欧洲引进技术问题

我们要利用欧洲市场经济不景气、可能卖技术给我们的有利条件，争取多从欧洲引进一些技术。过去我们往往利用欧洲杀美国和日本的价，最后和美国、日本成交。不能老这样，以后也可以利用美国和日本杀欧洲的价，最后和欧洲成交。

二、关于择优选点问题

有些单位先要任务，再伸手向国家要大钱，这不行。有些什么任务，可以公布出去，大家来投标。或者不叫“投标”，叫“申请”也可以。要审查一下他是否真正有能力，条件是否优越。一定要进行审查，进行比较，选出真正好的，最后签订合同。军工部门也要参加。假如我们有两个、三个厂都具备条件，竞争一下、择优选点有好处。一定要签订合同。

三、关于保证产品质量问题

大型设备一定要确保质量。用户要派代表驻厂、主成套厂要派代表驻配套厂，严格把关。制造部门一定要对产品严格要求，确保质量，确保成套，负责到底，否则不行，不能不负责任。

四、关于轻重缓急、量力而行问题

我们不能什么重大设备都马上自己搞。有些设备需要量很多，一定要自己搞；有些设备需要量很少，就不必自己搞，可以买人家的。从长远来说，重大设

备都要立足国内；但近期内则不一定就全部都自己做。大型设备研制也有一个集中力量问题，例如，我们有了一百吨大汽车，是否还要一百五十吨的？年产千万吨级的露天煤矿可以用一百吨的汽车，千万吨以上的煤矿难道就一定不能用？我不是说一定不要搞一百五十吨汽车，但若花钱很多，力量牵涉很大，就不一定自己搞。如果将来有特殊情况，非要用不可，数量少也可以买嘛。

我们这十一套重大设备是都要搞的，这个方针是坚决不变的。但是要量力而行，有些项目先上，有些晚上，要好好排个队。若都齐头并进，花钱很多，我们花不起。一定要分轻重缓急，排个先后，哪些项目成熟的可以先搞，哪些现在先做准备，将来再搞。有些设备难度很大，自己研制把握不大，而工程建设又要得很急，可以先进口，不一定马上自己研制，但可先做些准备工作。

五、关于统一归口问题

搞重大装备要统一归口，统一行动。各部门之间发生矛盾，意见不一致时，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要裁决，李鹏同志、吕东同志可以拍板，我们一定支持。实在矛盾大的，裁决困难的，可以给国务院写个报告，我们来批，支持你们就是了。

六、关于经费问题

重大技术装备今年需要的科研经费，就由财政部增拨。今后要研究确定一个渠道。这些钱不是用来搞一般科研的，而是搞设备研制的，是大型设备的开发费，应列入建设项目，由基建费用中支出。有些基建项目尚未列前期费用的，财政部可以先预拨一部分。此外，每年再另拨几千万元科研经费给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做周转机动用。你们要的机动外汇额度（指直接从国外购买元器件、仪器仪表和小设备、小工具等所需），可以同意。

视察重庆时的谈话要点*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日至五日

* 1984年3月1日至16日，赵紫阳率领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芮杏文、安志文、朱镕基、迟海滨等人到重庆、贵州、湖南等省市考察调研。这是赵紫阳在此行第一站重庆时发表的谈话。

一、要重视推广重庆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等企业的经验

（一）实行利改税，企业内部搞责任制，奖金可以不封顶。重庆市建筑一公司的经验不错，把企业搞活了。一公司的经验证明，企业有没有活力，效益好坏，不在于利改税还是递增包干，关键在于企业内部实行不实行各种经济责任制；责任制落实不落实，关键又在于职工工资、奖金是不是同企业效益挂钩，把奖金封顶的盖子揭掉。

一公司的经验还证明了一条，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不一定要搞递增包干。但是，如果国家与企业这一头的关系没解决好，企业内部责任制也行不通，反过来奖金和工资浮动又会搞到国家头上来。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是税收关系。利改税，对国家财政收入有好处。利改税第一步对调动企业积极性要差一点，利改税第二步准备在今年第四季度出台。利改税第二步出台后，就会为企业内部搞好责任制创造条件，今年第四季度出台，明年就会大见成效。你们不用担心，财政准备少收二十亿元回来，产品税的税率按中间偏下的水平设计，这样后进地区的亏损面就不那么大了。交了产品税、地方税、所得税后，剩下的就是企业的了。对利大的企业，主要是华东、上海，在所得税之前加一个利差税。要讲清楚，这就是“鞭打快牛”，承认差别是为了消灭差别。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过几年再调整税率。调整后要稳定几年，但局部调整年年都会有的。亏损企业、微利企业可以实行包干，但要尽可能多搞税收形式。比如微利企业就是收一道比较低的产品税，不收所得税。煤炭就只收百分之几的产品税。亏损行业，甚至产品税也可以免它几年。当然这个办法说合理也不一定合理，但是可以把价格不合理造成的矛盾适当缓解一下。这就争取了一个条件，可以把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整推迟几年再搞，这样就比较稳当一点，保险一点。

真正按经济规律考虑问题，面临的第一位问题就是调整价格。因为制定“七

五”计划就要先理顺经济关系，理顺经济关系，就要调整价格，而调整价格，财政就要净拿出一百五十亿元到二百亿元用于价格改革。这一关冲过了，三五年后我们的经济就会大为好转。但也有一个问题，中央再挤出一百五十到二百亿，用于调整价格，那就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这几年其他什么事也不能搞了。讨论来讨论去，认为要搞重点建设，就不可能拿出一百五十亿元。原来我说过，不动价格理顺经济不可能。最近在北京开了两次座谈会，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通过税收，缓解一下生产资料价格造成的矛盾，把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整推迟一下，腾出时间，集中解决农副产品价格倒挂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流通就搞不活，买难卖难的问题也不可能解决。道理很简单，谁经营谁赔钱，就没有积极性。过去东西少，补贴也少。现在农业丰收，去年全国粮食收购了一千七百亿斤，按牌价收购的只有五百亿斤，加价收购的一千二百亿斤；棉花丰收，光这一项国家就要补五十亿元。如果农业再丰收三年，财政就难以为继了。到时候没钱买，农民卖不掉了，就要减少面积。所以，价格倒挂带来的副作用很大。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也很复杂，还得有步骤地分几次解决。但倒挂的问题必须解决，什么买难卖难、交通运输、仓库等，都不是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是价格不合理。价格倒挂，直接影响流通，反过来又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实行利改税后，如果把企业内部的承包责任制搞好，利改税的作用会更明显。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是通过利改税，解决企业内部的关系，是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相应地解决奖金不封顶，把工人的收入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起钩来。奖金同利润挂钩，必须有制约。将来工资实行两级分配的办法，国家规定企业的工资总额和正常的增长幅度，比如，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你可以超过，超过这个幅度，国家要征税。用这个办法来控制消费基金。现在福建正在试行这个办法。这样就可以做到企业不吃国家的大锅饭，企业内部也不吃大锅饭。国家对企业既不封死，又有制约，企业内部问题也就解决了。为什么超额要征税？就是因为价格不合理，利润水平不合理。如果不征税，就会造成企业之间严重的苦乐不均。当然，根本解决要靠调整价格，在没有根本解决价格问题前，要靠税收来调节。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某个企业的利润特别高，因为有个平均利润率的问题，平均利润率制约工资水平。我们国家缺乏调节手段，有的企业长期利润很高，有的又很低。我们不能让一些利润高的企业拿高工资。只要制约的办法拿出来，就可以放开，我看危险不大。如果全国办法一时拿不出来，各地可以先拿出办法，进行试点。重庆可以同利改税第二步一起搞，今年取消封顶，促进企业内部搞好责任制，可能很快会见效。这个办法其他城市也可以搞。

奖金不封顶，就要搞好企业内部的责任制，不然就会造成奖金泛滥，分光吃光。去年搞了利改税，但没有认真把企业内部的责任制抓起来。现在要在利改税的基础上，认真抓一抓。怎么抓？市建一公司的经验就很好。但是不是就这一种形式？我看不一定。责任制可以搞多种多样的形式。我们农村改革最大的成功，是没有什么压力，允许各种形式并存。城市改革，也要因势利导，要不断总结，

不要固守一个框框，既不要保守，也不要不成熟就贸然推广。工资、奖金和利润挂钩，计件工资，浮动工资都可以试验嘛！通过两三年摸索，完善责任制。一开始先找那些经营管理比较好的企业搞，然后推开。这样，提高企业素质就有了内在的动力，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和职工生产的积极性就可以结合起来了。同时，要狠抓一下大中企业的劳动纪律整顿。现在劳动纪律很差，松松垮垮。我们整顿企业要突出抓一抓劳动纪律，也得搞几条措施，一是企业要有一定程度的自负盈亏，解决经济利益问题；二是企业内部实行各种各样的责任制，在分配上搞点物质刺激。要趁这个劲把企业整顿推动一步，企业素质就能提高。看来企业里头没有几条行之有效的东西不行。要在两三年内使企业面貌有个变化，职工的组织纪律性明显提高，把不负责任、管理混乱造成的大量浪费加以克服，也就是把企业的潜力挖出来，近几年内我们要靠这个吃饭。

重庆建筑一公司的经验，很值得推广，要好好总结。重庆搞，省里可以试点，全国建筑行业也可以推广。现在为什么农民建筑队进城效益高，主要是人年轻，能吃苦。江苏的建筑队，全国都反映很好，主要是效益高，成本低，质量好。当然有个分配问题，只要内部责任制搞好了，效益就可以大大提高。

（二）贸易中心是促进商品流通的一个很好的形式。重庆建立贸易中心、批发市场，集体、个体都来进货，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过去商业上有两句话，第一叫掌握货源，第二叫安排市场。那是从苏联模式套过来的，主要是商品少的情况下提出来的。现在消费品多了，很多东西都可以放开，直接进货，直接交流。搞活流通，最重要的是减少环节，减少费用，降低成本。现在买难卖难，与流通不活有很大关系。贸易中心，大、中、小城市都可以搞，大家都可以到大中小贸易中心、大小批发中心去买东西，这样渠道就畅通了。农副产品要在集中产地搞贸易中心，工业品在城市搞批发中心。如柑桔就可以在重庆搞批发中心。除了搞贸易中心，小城镇还可以搞加工中心。

贸易中心这个办法，如果国家不有计划地搞，整个国营商业系统就势必处于被动地位。通过贸易中心这种形式代替过去的行政区划，就能打破流通领域的条条块块分割，解决行政区划调拨、分配商品的问题。新渠道一打开，旧的渠道非改变不可，最后逼出一条路子来，促进商业体制的改革。中心城市是商品集散中心，金融信息、技术服务等要相应搞起来，这就体现了经济中心的作用。

（三）嘉陵厂的经济联合体是“很开眼界，又长志气”的典型。嘉陵厂生产摩托车，组织经济联合和专业化协作的经验很好，要迅速扩大批量，避免重复布点、盲目发展。现在拖拉机、汽车、摩托车都有盲目发展的趋势。有些行业不怕盲目发展，如食品工业，因为它没有多少固定资产。汽车、摩托车之类要有计划，不能盲目发展。我们要支持那些条件好的、质量高的厂搞联合，增加批量，站住脚。重庆嘉陵摩托车如能搞到一百万辆，就可以挤掉很多厂。避免重复布点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要支持质量好的厂扩大批量。只讲限制不行。大批量生产，可以降低成本，淘汰那些盲目发展的。今后大企业同各地的联合，可以采取嘉陵同日本本田的办法，给你软件、技术设备，盈利后分成。上海帮助武汉、徐

州，就是采取在销售利润中提成的办法。重庆要生产汽车，四川有这么多军工厂、机械厂，可以搞联合体，出了名，站住了脚，就可以命名为三汽。总之，要搞成一个完全协作的汽车公司，能搞成这个形式，我们就支持。

军工系统科技人员很多，要采取多种形式支援民用企业，你原来是那个单位的还是那个单位的，所有制不变，签订合同，给点报酬。这些事，在一个市里统一抓，比上面抓好办一些。你不动他的人，就不必经部里批准，厂里同意就行了。

成立专业公司后，局可以少一些，搞得更综合一些。与中央各部门对口，一个局可以挂几个牌子嘛！有些公司也可以直接对上面的部。成立公司，就要减少局，这是个必然规律。将来中央各部的方向也是要减少。你们计经委既然合并了，就不要再拆了。不要因为整党提了意见，又分开。不要走老路，合了又分，分了又合，走一步退两步，搞了多少年还是那个样子。我有个总的想法，合了就不再分了，要逼出一条路子来。

二、要充分发挥重庆中心城市的作用

我认为中心城市和直辖市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是想走不是直辖市而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道路。上海、天津是直辖市，如果局限于他那个块块，也不一定能起经济中心的作用。经济上的信息、服务、生产中心同行政区划是两个概念。在重庆，因为总的体制没有改变，不搞计划单列，问题解决不了。省里各部门把得严严的，也不好动手动脚。将来省的机构要大大精简，什么时候精简很难说，也许到本世纪末。省里主要定政策，监督，检查，把教育、文化、基础设施搞好，不会影响财政收入。各厅局代表政府，最终得政企分开。政企不分，就没有国家；政企合一，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企业，就什么也不是了。现在没有一个代表政府讲话的。中央一些工业部、委也不代表国家，只代表企业讲话，没有矛盾面，把矛盾面集中到财政部，财政部代表国家。因此，对法定的东西执行不了，对他有利的就干，不利的就不干，没有对立面，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关。将来中央各部委也好，省的各厅局也好，前途就是大大精简，有几个综合性大一些的部门，主要是搞立法、检查、监督。企业没有独立性，不能相对地摆脱部门的束缚，就不可能出现联合体。中心城市要从这个角度看远一点。重庆是四川的一个市，在经济上起中心城市的作用。用经济办法，重庆不但可以超出重庆市的范围，也可超出四川省的范围，但这条路是漫长的。这条路子怎么走开，要慎重，要摸索前进。解决条块问题，就是要通过中心城市，使中心城市的作用进一步扩大，条块的作用逐步缩小。现在取消各局不行，但不冲一冲也走不动。重庆离昆明远，同贵州的关系要密切一些。重庆要首先辐射到贵州、川东，提供跨省的经验。中心城市辐射出去，一靠能量，二靠交通。成都也不小，是省会所在地，也是中心城市。

发挥重庆中心城市作用，省上可以成立一个重庆改革领导小组，国家体改委

派代表参加。

三、开发能源交通要搞一些见效快的项目

现在对地方上的能源、交通建设要放宽点。有些地方算2000年翻两番的账，如果没有能源，能翻两番吗？去年翻番的风吹得很大。每个地方都去算翻两番的账，而且都去搞加工的东西，一厢情愿，那又会出现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的速度，那到2000年就可以翻两番。但是，到2000年还有十几年。简单地去翻两番，大上大的加工业，搞重复建设、盲目建设，那是很危险的。我们翻两番，要靠政策，要靠能源建设，要靠技术改造。

开发能源、交通，还有个长远和当前的问题。中央搞大的，投入时间很长，这就有一个“七五”、“八五”靠什么的问题。我们国家总得要有几亿农民搞别的东西。将来华东和沿海地区的社队可以拿出钱来搞加工业，生产一些质量比较好的产品，同城市竞争。西南、西北的农民干什么？我认为开矿是个很大的出路，山西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四川有许多小煤窑，有大量的黑色、有色金属，也不是说县以下就不可以办。广东英德县四十万吨硫铁矿就是农民搞的。中国的农民多，劳力多，特别是四川，土地不多，可以去开发水电、煤炭、有色金属。这就要把长江搞通，把各地的水路、公路，同长江连接起来，丰水期用船，突击运输，修些仓库存起来，做到常年生产，常年运输。当然，对开矿、挖煤要进行指导，要经过申请、批准，不能乱挖，要有规划，开始规模不能太大，分期开采，逐步搞些机械化。这样搞投资少，来得快。现在我们要搞重点建设，没有重点建设就没后劲，但“七五”、“八五”断了气，也就没后劲了。所以，各地都有个技术改造问题，有个搞能源、交通解决近期需要的问题。如果大家都等着重点建设，不解决近期需要，工业就会萎缩，重点建设也没有资金了。所以，超收的能源、交通费，中央下决心不要，留给地方，作为中央对地方的投资，搞一些见效快的小煤窑、小水电、小铁路、公路、码头、节能等项目，用在什么地方，效益如何，给国家计委报个账。这样，地方需要的能源就可以不光靠中央了。

现在上上下下都讲长江没很好利用，有这么好的一条江为什么不利用，老在那里修铁路？为什么不把工厂布置在长江两岸？工业布局，一个靠城市，一个靠资源。有人说长江两岸资源不那么多。光说注意不够不行，还要找找究竟是什么原因？沪州化工厂靠长江，建了码头，也没有好好利用；武钢修建时就考虑了利用长江，还为它修建了码头，就是不用。出现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值得好好研究。你们搞船队直通上海，往返周期缩短，运量增加，这说明不花投资，或少花投资，也可以出效益，水路如此，公路也如此。你们还可以搞些短途，修高质量公路。

四、西南和四川目前经济发展主要是发挥自身优势

耀邦同志讲了，西南的开发要先于西北。中国的东西矛盾，不仅现在存在，若干年后也会有。从目前发展经济来讲，若干时间内，重点在东部，但不是绝对不搞西部。要在一定条件下转移，东部不到一定程度不可能向西部转移。苏联建设向西伯利亚转移也是如此。当然，作为战略考虑，从长远考虑，将来发挥作用是西部，因为资源在西部。这是历史的必然发展，但什么时候到来，还很难讲。现在还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自的优势。西南有着特殊的问题，就是花了一千多亿元，搞了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就是大规模地开发西南。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加快发挥经济效益。另外，要有重点、有计划地开发能源、交通。开发西南，还要做好前期工作，现在很多资源还没搞清楚，攀西的资源就很丰富。把前期工作做好，国家说上就可以上。不然一旦确定要上，你又拿不出资料来。开发西南，要有大量投入，可以考虑利用外资。

西南、四川和重庆发展轻工业，要有自己的特点，看哪些有发展前途。如食品工业和重庆讲的玉米制药、饲料工业、饮料等都有特点。你们的农副产品，如柑桔，不要只搞罐头，要搞饮料。四川要研究一下国外的饮料品种。中国的饮料要同中药材的利用结合起来，要同食物保健结合起来。这件事，广东搞得很好。四川要搞食品，要搞饮料。

还要注意农村市场。你们要研究西南农村市场，这个问题，上次我在成都讲过，外边运东西到西南来运费高，开发西南农村市场，出路很大。中国的农村人口多，某一种东西，大家都用，就不得了。

视察贵州时的谈话要点

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至九日

去年油菜限产是不是狠了一点？能不能降点价？过去老百姓坐火车从重庆带玉米，从遵义带瓜子，使这趟车最挤，但很赚钱。油菜降二年看一看，看二年不行再刺激一下。油菜籽要提高单产，菜油要薄利多销，扩销路，多渠道，组织到不产油的地方直接推销菜油，减少环节。要多渠道，一视同仁。要安排好车皮，菜油多了不调出去怎么行？

川东包括贵州把陡坡逐渐退还种草，以后再种树。这里雨水多天气好。现在农村搞了责任田粮食恢复了，还草还林比西北容易。种树间种草，这在西南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人多地少，到处开荒，加上山羊乱放，不行。要恢复植被，长短结合，种树种草。湖南南山牧场搞了草场，草长得很好。草山如何消灭杂草，必须消灭后再种上豆科饲草，不然羊不吃，不要看到草多就能养羊。南方不宜放牧，收草、圈养，这样才能保护植被。山羊破坏植被厉害。西南一人一亩耕地种好就够吃，再发展山货很快能富。香港人说：峨嵋天下秀，原来是几块大石头。有的地方在风景区种茶叶，一开垦非常难看。

桐油是不是政策问题，统得太死？国家干脆不统购了。多少年这个政策没有解决好，放了就活了，也好销了。以后可能政策要下来。桐油退出统购成为自由商品，自己买卖。降价打开销路，国家随行就市收购。当前桐油积压主要是出口受限制。回去讲一下，西南、西北的桐油、生漆都是主产区。你贵州一年国家收多少，其余你自由处置。现在棉花都已是这样，鲁西北的棉花都自由买卖。泸州、赤水河加上你们这一带酒业还是应发展一下，种高粱发展酒业，这是你们的优势。

退耕还林要有计划，搞点副业增加收入。山上种粮不是办法，要还林、还草、还药。原来说杂交水稻川东不行川东也种，川南不行川南也种上了。你们可出去学习一下。南山草场经验说明，南方改造小山，发展起来比大草原的草长得还好。

长江两岸，宜宾以下，不靠铁路，搞小煤窑，搞成短途运输，通过长江下去。民办公助搞小煤窑，先投资不要多，少一点，以后搞成十万吨，联起来运到长江两岸，分散向长江走。不要搞大码头、大煤场。乌江下游、湖北也可参加进来。长江以南从贵州到宜宾，有条件可建大矿，先搞小煤窑。还有一种方案，不

外运搞火电站，确实可靠。100万吨煤可搞20万千瓦火电站。这里条件好，有水。湖北缺煤要从山西运，从长江运得不够，就是因为没有东西运。你们的煤运不出去要用长江。全省不一定一个办法，要用分流的办法。靠铁路用铁路，靠水的修小公路到长江。仁怀从赤水河到长江，几种办法都用。搞个小煤场，枯水期压一压煤，丰水期就运，五到八月大量往下运。这可搞个规划，两省协作也可以，中央铁路也规划一下。这一块搞几百万吨煤还是可以的。四川与江苏合办船队，他们可投一点资，你们订个长期合同，联合起来搞。

经营管理和技术专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有的有技术、有文化但不会经营。有的有文化、有技术，能经营。有的文化低，但有技术会经营。以后班子中要考虑这部分。日本松下幸之助[1]，他并不懂电子，后来成了大企业家。外国的董事长，他不一定懂技术，但他懂经营。外国经营家是第一的，然后才是技术。将来不要分公办和民办教师，国家给你钱都一样。可搞各种基金会，国外有很多基金会。

电价全国搞个基数，价格不能大调整，这是个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东北电价一提高就要出问题。成都水电的一级电费贵，非常不合理，但这涉及到老百姓，不好变，一变问题比较大。现在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多的是。可从钢厂、轧制厂返一部分利给铁厂，搞二次分配，以调动铁厂的积极性。这是调整目前价格不合理的暂时办法。

这两年你们发展速度快。过去基数低，但发展速度不快。现在的政策解放了山区，过去落后的地方以后发展会越来越快。

国家进口1500万吨粮食很正确。没有这1500万吨粮农业就翻不过身来。1500万吨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城市暂时不吃国内供应的粮食了。这样就缓和了对农村的压力。棉花可以不进口。国内粮食收购总量1800亿斤，其中征购粮仅有1000亿斤，其余是加价收购的。这一部分可加价销出，但大部分还是要按平价销出，这样财政的负担增加了。给农民休养生息，搞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发展奶牛、肉牛一定要有优良品种。山区资源丰富，可发展林业、畜牧业，为国家提供农副产品。牛要真正发展肉牛。农区可提供肉、奶、耕三用牛，草原要发展奶牛和肉牛。搞专用牛也要专业化，专业化才能搞出优良品种。外国一头奶牛可产6000—8000公升奶。他们对奶牛每年都要评选一次。南方草场比大牧区来得快，因那些地方多数是高原。内蒙古草原退化严重。阿坝草甸型草原，海拔太高，要搞很多基础设施，电、路、设备。有了这些才能发展商品生产。南方关键是要发展人工草场。过去南方草场一看到处都是草，但不少是杂草，能吃的并不多，很多还是纤维粗的茅草。因而要改造草场，发展畜牧业。这件事与造林同样重要。南方人多，没有很大的草场，提倡圈养，组织人收草圈养，有计划地割草，不破坏草场。过去放任牲口自由吃，把草场破坏了。我去新西兰、澳大利亚一看，认为可以改变草场。一个草场一个品种，加上商品生产的那一套，加工、贮藏等。现在农、林、水、牧个人承包都能解决。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喊了多少年，现在搞了小流域承包治理后就绿化了。虽然是个开头，但改变了过去造林不

见林、花钱不少成绩很小的状况。

中国搞计划经济没有条件，上半年不知道下半年情况，今年不知道明年的情况。去年沿海大量向日本供应廉价铁，今年又高价进口。如果有一点预见性，储备一点，就不会这样。

铁路上是不是计划内外一本账。如果这样他没有积极性，计划内多少，计划外你们要给点，他才可能有积极性。

要分别出协作煤和统配煤的计划。原下达的计划是统配煤，协作煤靠自己挖潜力。现在一本账不好办。中央从来没有反对过计划外的协作煤。现在山东、江苏用汽车直接拉煤，回去每吨180元至200元，这些国家都不干预。山西变成了煤的自由市场，成了奇货可居，价格一天比一天高。山西省对煤价可以有一个幅度。协作煤价要有一个幅度，按照议货的品种，用提供技术服务的协作办法来搞。地方协作煤中央从来没有准备干预，地区协作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是国家计划的补充。如果搞死了，江苏活不下去。一年江苏要搞1000万—2000万吨协作煤。多开辟一些小煤窑，多开一点通道，利用长江、赤水河。能通大江的小煤窑可以搞。你们与江苏省搞好协作，但要保证国家计划的调配。运输单靠铁路不行，要打通江河渠道。你们这个地方可在小煤窑的适当地段建火电站，与大电网联起，与四川联起。贵州的煤从国家考虑，一是修铁路运煤在外省搞电站，一是在这里搞电站向外输出电力。

上攀枝花钢铁项目有个上二滩水电站的问题。由于当时三峡水电站能不能上还是个问题。搞攀钢只好上二滩。但一是周期长，二是要上三峡。国务院开会研究三峡，只有我一票反对。后来小平也坚决了。我怕一下子上去又像宝钢一样，建设周期长，十年后才见效益。后来定了低坝方案，大家都同意。巧0米正常行水位，坝高165米，再加10米防洪水位。发生特大洪水时，淹上不淹下。现在移民30万人，不超过50万人，这部分人今后靠吃商品粮、种柑橘。装机1300万千瓦，移民50万人，投资200亿元。这是最近定的，今明两年准备，后年上马。现在要在上三峡的基础上，考虑水电的开发。以不影响上游水电和西南水电的开发为原则。上三峡、上红水河电站，二滩、乌江、红水河这一片多得很。三峡不影响上游上水电站，只是轻重缓急的问题。火电还是要上，不然有一个配套问题，还有一个“七五”、“八五”的动力问题。火电周期仅四年。可在黄河边搞小煤窑，建大电厂，利用黄河水。

将来长远发展，一定要把耗能工业放在西面。西电东送，不能在东面搞高耗电工业。西南开发要与有色金属冶炼结合起来。电力不能出口，但可通过冶炼有色金属出口，这本身就是一种能源出口。有个问题未突破，即与外国合营开发资源。从外国贷款只能买设备，最多能占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靠国内。而国内一机部的意见，合营较好，地区占一半，他们出一半，设备还可造一点。不行还可借一点高利息的贷款，把我们的消费品卖了还贷。这个问题还未突破。国外对中国信心不足，有色金属欧洲兴趣大。搞合作开发作用大，光用国外买方信贷受限制大，国内配套跟不上。用外资只能进设备，进口他们的钢材都不行。国外借

贷都是高利息的。国内无钱也可搞起来，但我们的效率低、周期长，债务大了不容易还。煤与外国人合营不行。一合营成本提高，工资也高。成本高了又不一定卖得出去，再转成内销，要大量赔钱，我们国内煤又不够。但有色金属不同，要和水电一起搞，有色金属的开发，把冶炼捆在一起，搞加工出口。这样争取外资是可以的。天然气前景好，提点价，把天然气开发搞起来。你们贵州磷矿也好办，可以搞磷钱。这里电多，可以搞电解黄磷。这个问题可以考虑，运黄磷出去也是能源出口。总之，搞电厂送电是一种办法，搞铁路运输、黄磷、洗精选煤、焦炭、搞耗能工业都是办法。这样布局和效益都要好一些。产原料的地方可先发展耗电工业就地加工，就地冶炼。沿海主要用外国原料，这样可把耗能有色金属出口，然后进口原料解决沿海的问题。应逐步改变，向这个方向调整。

铁路运输要改车箱，用两个车头一拉一推，可增加百分之几十的运力。电气化后可增加运力一倍。我们现在一列车拉得太少，一个车皮60—70吨。车皮要加长、加大，车站、线路问题不大，过桥问题也不大，搞成专门运煤的专列。铁道部长的大的列车可搞一点，大额车，地方铁路，搞双轨复线都要研究一下。第一搞铁路电气化，第二研究国外的大额车。路轨轻，车辆少，站线短，是我们铁路的不足之处。计委要研究一下，西南改善铁路和电气化要花多少钱。把原煤变成精煤、焦炭，把磷矿变成黄磷。煤要先选好，选一下就能节约百分之二十的运力，价钱也提高了。

我们很多问题在上面搞不清，到下面看一下就清楚了。如能源问题，煤与运，运是主要的。真正解决了运的问题，要多搞一点煤还是容易的。可以让社队参加开采，外国人搞煤矿急的是加快资金周转，搞一个矿周期短。我们总想把开采年限搞长，认为这才是合理的。煤矿开采不要搞上百年的。

要考虑“七五”的特点。我考虑如何能转过去。现在矛盾多，要煤，就要开矿。如强化开采，就可少一点开矿点。随着国家资金情况好转，也可以开新矿点。现在一说还可开采50—60年，为什么不能30年，30年都下世纪了。现在科技发展了，再有50年是个什么样子，有什么新技术都说不清。分期开采，国外也是这样。山西有个副总工程师讲，大矿不一定周期长，道理就是多开口子，先开一个口挖，周期就可缩短，煤炭部不赞成。美国一个长期搞石油地质专家认为，美国的石油设计思想是保守的。实际我们也完全如此。外资就是强化开采，合营以后，开采年限就在15—20年。资源开发，有色金属不一定这样，煤炭可以这样。打一个井进行强化开采，快出煤、多出煤。提前出了煤发了电，能创造多少财富。这与你新开采到底哪个效益好。小矿、余量不大的煤矿不一定这样搞。二三十年内可以这样搞，这二三十年是我国很关键的年代。又要建设，又要体改，很多矛盾需要解决，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资源丰富的为什么要开采100年？为什么不可以50年采完搬家？五十年代的矿，90年后可搞强化开采，缩短服务年限。可以集中搞电站，周围由小煤矿送煤。小煤窑可以给贷款，这样搞电站不修铁路了。不过这要看条件。有的矿开采不容易。新建矿就不要这样。

今后这十五年非常重要，这两年要搞好十五年的建设规划。如何搞得好一

点，矛盾少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总的十五年，矛盾这样多，如何有效地解决。如一个小孩子背稍重一点的东西并不影响生长，如果让他去背很重的东西就把他压坏了，长不到三十岁就背不动了。整个要有规划。今后要比现在好些。计委要组织一批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耀邦和我都主张计划外协作的东西可联合起来搞，国家计划部门不要干预。耀邦提出西南经济协调会要坚持平等互利、轮流坐庄的原则，不要搞成封闭经济。华北在天津开了两次会，搞了十几个办事处。华北搞协作是成功的，他们之间展开了相互协作。你们三省四方开个会，我们派人参加，搞好后责成宋平同志联络此类事。广西希望能成为西南协调会的正式成员。三省四方搞个规划，各方最好能派人参加。开第一次会最好能有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注 释

1．松下幸之助（Konosuke Matsushita，1894—1959），日本和歌山县人。跨国企业松下电器创始人，时任松下公司顾问。曾任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他在公司经营管理中从日本实际出发，创立了事业部制、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等，是世界著名企业家。

视察湖南时的谈话要点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至十六日

一、关于粮食生产的问题

粮食情况还要看两年，大的方面要作些决策。现在与国外签定了长期进口合同一千五百万吨，不能变，从美国进口六百万吨，明年到期，去年还少购了二百万吨。

苏联和东欧都需要进口粮食，我们可以向苏联、东欧出口，但出口要签定长期合同，临时合同他们不放心。现在，在粮食上我们与外国签定长期合同是不是很有把握？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国内的粮食是不是过剩了？就湖南来讲，好像粮食多了，但也有些地方不够吃，林区就不够吃。省委就不敢多给林区粮食指标，因为有个高买贱卖的问题。从全国来讲，是粮食渠道不通，缺粮的省不愿意多调人，粮多的省不愿意多调出，一句话，就是价格倒挂，收购价高，销售价低，这就使粮食本身不可能很好地流动。粮食是商品，粮食部门经营没有很大的积极性，经营越多，亏得越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物往贵处销，这是客观规律。我们国内所谓商品流通问题，价格不合理是重要的原因。小商品放开了，但大动脉、大产品，很多是价格倒挂。过去他可以吃大锅饭，亏多了还是那么多工资，现在涉及到利润问题、利益问题，经营越少亏得越少，经营越多亏得越多。很多农副产品是倒挂，外贸也是这个问题，他没有积极性。当然，这里面还有个经营环节问题。这些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好。因为，第一是生产确实多，价格不合理；第一是流通环节不通，渠道太少，环节太多，加剧了这个矛盾。但价格不合理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今年你们的柑桔，大家说没有卖难的问题，说什么汽车出了力，火车出了力，我看最主要的是放开了，经营者有积极性，价格在那里起作用。这不是生活必需品，但如果粮食等所有的必需品都这样，那就不行。职工的工资不高，吃不消。现在价格问题，从整个来讲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助长人为困难，助长买难卖难。为什么流通环节不通，主要是经营者没有积极性。去年粮食棉花大丰收，国家收购量大幅度增加。但由于购销价格倒挂，要卖就得赔钱。这是一个新问题，是我们国家多年来没有遇到的问题。我们国家过去没有多少东西，商业部门主要是两大任务，收购产品，安排市场，那时倒挂的情况没有现在这么大。不单是粮食，其他农副产品除

了完全放开的外，都有倒挂的问题。

粮食问题，我们暂时解决的办法，一是增加库存。要修一点仓库。我们国家要储存一点粮食，到第二年新粮上市时，要有点后备。这就要国家投资，建一点仓库，占用一部分贷款。二是增加出口。大家说粮食多，但现在还没有把握向外国签订长期出口合同，与外国签定长期合同，没有几年很难看准。说粮食多，但猪肉又紧张，全国有十四个省吃从四川调进的猪肉，粮食多可以多养猪。苏联需要猪肉，我们跟苏联谈判，这还是块王牌，今年出口五万吨，已在北京跟苏签定了合同。在粮食出口上，现在看来可以采取转口的办法，转卖一部分给苏联。苏联需要粮食，他宁可不要美国的，要我们的，他跟美国竞争，要美国的感到丢脸，我们给粮食他可以要。在粮食问题上，陈云同志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他几次提醒我们，无论如何不要说中国粮食多了，在这个问题上要谨慎一点。储粮食，也要采取多种办法，建仓库那也不是一下子能建起来的，还可以采取其他一些办法，比如，叫专业户保管，国家出保管费，正如我们国家仓库储粮有管理费一样。还要研究开辟加价销售市场，包括用加价粮食加工食品、饲料，饮食业不收粮票等办法。你们还可以与北方换杂粮搞饲料。（毛致用[1]：运费高、环节多。）不通过粮食部门可以搞通，通过粮食部门环节就多。过去我在四川时，就拿小麦到河北、东北换包谷，换回包谷酿酒、作饲料，还赚了钱。大米出口是不是有一点甜头？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比小麦高一倍，因为世界上产大米的国家不多。粮食多了总有办法解决，总的讲，现在不是粮食多了。

适合种水稻的地方还是种水稻，不能各个地方都搞多样发展。从粮食结构来讲，大米不是多了，杂粮也不是少了。从整个世界上来讲，大米不是多了。不然为什么一斤大米换两斤小麦呢。大米也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就要商品流通嘛，至于一下有困难，交通跟不上，这是暂时的因素。像美国，种玉米的就是完全种玉米，大片都是玉米。像英国，东部是小麦、西部是玉米。当然，你这个地方不适合于种大米，可以种杂粮。我看从全国交流来讲，种大米不会吃亏的。不能说流不动我们就少生产。流不动是流通的问题，要从流通上解决。也可能等你今天改了，明天流通就通了。所以，看远点，我说就不一定要改大米。商品生产就要各个地方发挥各自的优势。将来国家非发展饲料生产不可，饲料也可以交换。我们国家还要进口粮食，我们可以进口饲料调换大米嘛！调不动是价格问题，这都是一些暂时的矛盾。现在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用饲料把农民用于饲料的那一部分大米交换过来。如果我们用这种饲料，花费不比大米多，这种饲料喂猪比大米更合适，农民就会愿意交换，大米作饲料并不好。譬如北方的红薯，就已经跳出了口粮的范围，北方不吃红薯了，红薯变成饲料了，并且每年大量出口给日本，能出口为什么不能交换呢？将来饲料还是要搞配合饲料，充分利用豆科作物等。粮食要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水源不足的地方，保一部分水稻，另外再种一部分经济作物是可以的，如果是为了品种齐全，那就不是商品生产的观点。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有很多经营环节上的问题。现在粮食调进调出占的运力比正常商品交换占的运力要多得多。将来这种不合理的运输要大大减少。在发

展粮食生产上，种两季水稻再种一季杂粮，都是禾科，本身是一种不合理的做法，除了掠夺性的经营，或者是实在没有饭吃，逼着非这么干不可。

二、关于林业生产的问题

湖南森林覆盖面积大，林业还是搞得好的。

大跃进时湖南是比较稳的，只是庐山会议以后头脑发热。所以，毛主席批评“见事迟，抓得慢”。但从中南五省来说，大跃进，瞎指挥，湖南不算是最厉害的。湖南毁林开荒不算严重，第一没有四川严重，第二没有广东严重。湖南对林业的呼吁比较高，平化[2]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做得好的，每次到北京开会都呼吁这个问题。广东肇庆地区，到处是“大字报”田，川北、川东到处是“大字报”田，湖南这方面的情况好多了。这与湖南粮食一直比较好有很大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中南地区，一个湖南，一个广西，农业是稳步上升的，并有较大增长。一九六五年广东比湖南的粮食多五十亿至八十亿斤，到一九七二年两省差不多，可能湖南稍高一点，以后湖南就更高了。由于这个原因，在湖南的于部中会不会带来什么想法，是不是认为可以了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从中南几个省来讲，从一九六五年以后，你们的农业、供应都比较好。一九七〇年我在湘中下放劳动，那时长沙市场的供应好，这与粮食生产好有很大关系。当然，这不是说湖南没有困难的地方。

现在只要有可能，木材还要多进口一点。木材有两个问题，有些地方是采伐太多，有些地方是路不通，运不出，都涉及到一个投资问题。如果是投资能够多点，有些地方就可以多采伐些，有些林区就可以休养生息。我们跟苏联谈判，谈到木材进口，他这是一张王牌，原来说XXX万立方米，到现在还没答应。木材从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口，运输线很长，亏损很大。

三、关于张家界的管理与旅游业的问题

张家界要统一规划，但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上面总是强调归谁管，别人插不上手，这不好。要研究一下，哪些归林业部门管，哪些归旅游部门管，哪些归文化部门管，上面有个机构统起来。风景区与森林保护区不一样，旅游部门参加，可以搞一些旅游设施，帮助规划旅游路线。现在外国人喜欢几日游，买一张票，按照旅游路线游几个地方。张家界开放，与那些旅游点连起来好，要有所考虑，不能孤立地搞一个点。旅游有个流向，有个路线，过去南京搞了很多旅游点，但由于上海旅游点少，人家不好孤立地到南京来，结果任务不饱满。湖南比较封闭，到张家界应从哪里来，大概不会从长沙来，长沙没有多少旅游点。你们说从桂林到这里，到桃源，还可以考虑从三峡、武汉到张家界。

四、关于大水面发展渔业的问题

我们大的水面的经营体制没解决，能够找到一个适合的办法就会好些。大的水面究竟以一个什么样的管理形式比较好，要很好地探索一下这个问题。大水面我说第一个还是管理体制问题。我们这几年的经验证明，有很多问题管理体制不解决，技术问题很难解决，先进技术推广不了。大水面里面，现在是大家都捕捞，没有人放养，要用个什么好的管理体制把它统起来。大的森林可以划开，但是水面划不开，水是流动的，鱼也是流动的，你要放点鱼苗，投点饲料，它可以流动。第一是管理体制没解决，第二是捕捞问题没完全解决。这么大的水面，这么深，究竟用什么方式来捕捞？总的来讲，我觉得小塘小坝问题容易解决，只要承包到户就好解决。大河大湖，还有一些大的水库，究竟怎么利用，有个管理体制，有个捕捞的办法。大水面好多是跨行政区域的，两省之间、两专区之间、两县之间的矛盾怎么处理好？南方水的资源和荒山用得不够，一些小的荒山可以包给专业户种草、种水果。水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我们国家现在在副食品供应方面，鱼是最紧张的，价格比猪肉高，更主要的是少。海洋捕捞问题没解决好，内湖的养殖问题也没解决好。现在好像很成功的经验还不多，如果能找到一种比较好的办法就好了。主要的问题是经营的方式，把经营方式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好解决。有人讲过，他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收渔税银子，收渔业税，你要他来领执照就可以打鱼。大家乱捕这个问题好办，就是没人去下鱼苗，去下饲料。不投饲料，有鱼大家来打，就是吃大锅饭嘛！收渔税银子是《打渔杀家》里面的一句话，我想这也有点道理。你打鱼多我收的税也多嘛！把大家的利益和税收结合起来，打鱼的只管打，我收税的负责培养渔业资源。所以，有人就说可以采取这种渔业税制的形式。总之，水面的利用问题要很好地研究，利用好了可以增加一部分蛋白质，对改变人民的食物构成有好处。

五、关于茶叶生产的问题

茶叶不好销，就放开，减少环节，让他自己去销，产区直接向销区推销。要面向农村市场，农村是最大的销售市场。如果北方农村都吃茶，市场就大了。现在农副产品一部分是价格定高了，特别是外贸产品，根据国际市场定价，把价格定得很高，市场一变化，就销不出去，这是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是，经营环节多，转来转去，价格就高了，减少环节很重要，多渠道，少环节。特别要注意研究农村市场。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农民购买力高了，就是近一亿人口，等于一个日本。当然现在太贵了的东西农民还买不起。我们要减少环节，产销直接见面，薄利多销，薄税多销。

六、关于农村改革税制和发展专业户的问题

财政包干后，大家都抓收入。农村税收，从长期来讲要改革。我国农村税收，过去只一个农业税，都由土地承担，随着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也要征所得税。税收问题，一开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要一下搞得太多太猛，可以轻一些；再是不要乱来，乱插手，都到农村争利，农民吃不消。

有的专业户经营不下去，并不是由于税收过重造成的，要作具体分析。最近内参上讲到河南省两万多专业户垮了，我问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同志是怎么回事？刘杰说，做生意的不可能都发财，专业户，有的经营不善，有的本来就是盲目发展起来的，垮掉了是正常现象。我同意他这个看法。既然有市场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分化。总的趋势是发展，但有分化，改行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专业户有盲目性，经营跟不上，社会化条件跟不上，规模搞得很大，搞了以后就参观，大肆宣传，好像专业户越大越好，结果助长了形式主义。专业户要量力而行，支持也要适当，主要是在政策上支持，不能拔苗助长。什么事情都有个过程，都要顺乎自然，因势利导。有一部分会经营、有本事的人，发展起来了，可能要雇工，扩大规模。有的搞一下不行，又种田去了。在一定时期，农村专业户是两头小中间大，就是说，真正搞专业的，完全离开土地，到城镇去，恐怕是一小部分；还有一部分粮食专业户，也不会很多；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以粮食为主，经营一些别的东西。总的就是逐渐分离，分工分业。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很多东西会不断分化，有发展，有淘汰。优者生存，弱者被淘汰，形成分工的过程，改组的过程。我国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交通不发达，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在沿海可能短一些，内地会长一些，这和社会化程度分不开。我们的路子算是定下来了，但作为一个路子往前走是需要较长时间的。

专业户送礼是半真半假的。有的是准备将来应变的，给社队干部多少，给社员多少，一旦有事他不会孤立。

七、关于推广南山牧场经验的问题

南山牧场的经验很好，为开发利用南方草山走出了一条路子。南山牧场实行责任制后扭亏增盈，同澳大利亚搞技术合作，改良草种，提高载畜量，这又一次证明了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重要性。试办家庭牧场，这个办法好，可以保本保值，付利息，租赁制，搞好了还允许雇工，中央一号文件定了，两个帮手，三个学徒嘛。将来在国营大牧场内部，很可能有许多自负盈亏的家庭小牧场。大牧场要为这些家庭小牧场提供良种、肥料、除草剂，病害防治以及产品的收购、加工、储运、销售等产前产后的服务工作。我国南方有十亿亩草山，国家要开发这个资源。大草山可实行放牧，小草山应实行割草圈养，以免破坏植被。南山牧场要好好努力，要出经验，出人才，出技术，出草籽，出优良畜种，支援别的地方。

划给社员的丘陵，种草行不行？种草养奶牛，采取圈养的办法。农区、粮产

区，如果有草，可以发展奶牛，小片经营。听南山牧场的同志说，改造的良种草场，一亩地可以产一万多斤草，能养一头奶牛，牛奶可以到城镇加工。你们有劳动力，又有粮食，加上良种草，我看可以试一试。当然，丘陵可以种树，种果树，但不能都是果树。边远的大的山可以造林，有的也可以种草。我们国家食物以粮食为主，但总得增加点奶，增加点肉，增加动物蛋白，改变一点食物构成。

八、关于农村大好形势的问题

农村能有今天的大好形势，主要是两条：实行责任制，给农村恢复了生机。多年来农民的积极性不高，搞包干到户，调动了积极性，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这是基本的。但还应当看到一条，如果当时不下决心进口一千三百万吨至一千五百万吨粮食，农村不可能有这个形势。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城市基本上不吃农村粮。这样，才给了农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这是恶性循环变良睦循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加上大包干的积极性，粮食上去了，多种经营也就上去了。当然，如果只有进口粮食，没有包干，也解决不了问题。过去湖南调出十亿斤粮食，广东在“文化大革命”前调出八亿斤，后来调三亿斤，贵州基本上自给；四川那就调出更多，后来搞垮了。现在广东调进二十亿斤，如果三年前不给广东调进二十亿斤粮食，那什么都是空的。云南、贵州各调进十亿斤，甘肃调进十二亿斤，内蒙古调进二十亿斤。那时我在内蒙古，有同志说不要调进粮食了；我说不能这么讲，要调，不调怎么做到以畜牧业为主呢？过去，我们在农业上，一个是“左”的政策，一个是不进口粮食，吃进口粮就是修正主义嘛！现在看来，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关系很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陈云同志就讲要进口二千万吨粮食，不进口粮食，调整不过来。一条包干，一条进口粮食，起了很大作用。当然，还有第三条，农副产品提价，提价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价格倒挂，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大的一个成效，就是解放了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过去把许多问题都看死了，三中全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鲁西北三个地区，从一九六五年以来，农业一直是下降的，不从实际出发，都强调种粮食，越种粮食越不够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从实际出发了，把盐碱地种棉花，沙地种花生，好地种粮食，一下富起来了，棉花大发展，粮食还东调。河南省兰考县也是这样，种花生比种粮食收入高两倍，但过去就是不能种。三中全会以前禁区太多，不解放。三中全会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从实际出发想问题，办事情。

九、关于交通运输的问题

商品经济发展了，没有交通运输不行。能源、交通两个因素，第一是交通，第二才是能源。如果我们现在交通条件好，可以多运一千万吨煤。总的来讲，我

们的铁路修得少，公路也不够，质量也比较低，但数量是增加的。而航运相当一部分地方则是减少的。航运问题要引起我们重视，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从全国来讲，如何利用长江，还有海运问题，内河问题。中国是一片大陆，但海岸线长，如何利用海运，是个大问题。过去封建皇帝都知道修运河。湖南水运条件好，当然，与广东比，广东离海近一些，但湖南总比西北好一些，比四川好一些。你们的基本条件并不算差，四大河流，加上洞庭湖，还有铁路，这比西北、四川好多了。“七五”计划要研究一下航运，鼓励航运，支持航运。

交通问题很值得研究。湖南四条河流，都能通到山区，加上洞庭湖，然后出长江，可以使山区的物资通往上海。航运的体制问题很大，各管一段，环节多，运价就高了。但总的讲，比修铁路、公路合算。许多同志都说，长江为什么不能利用，什么原因还不太清楚。有一种说法，说工业布局不是按长江布局的。贵州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十二元钱一吨的煤，现在卖不出去，只要能够从长江运，老百姓就可以多挖煤。疏通航运的问题要很好研究。交通也要靠多种途径，水路还是能利用的要利用，不能走大船的就走小船。铁路只有那么多，大家都挤铁路，你挤我，我挤你，解决不了问题。汽车主要是跑短途，现在公路的问题，主要是质量差，效率低，吨位小。中国的交通原来就没有基础。印度三百万平方公里，在甘地独立时有六万公里铁路，我们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解放时只有二万八千公里铁路，其中东北就占去一万八千公里，关内才一万公里。美国面积比我们小，铁路最多的时候达到五十万公里。苏联在帝俄时代也有十七万公里的铁路。世界上的趋势开始用航运，以后搞铁路，搞公路。现在，铁路很不景气，又转过来了，搞航运，搞公路，美国已拆了二十万公里铁路。而我们的情况却相反，公路不景气，水运不景气。中国公路的潜力大，问题是质量差，吨位小，加上装卸问题。外国公路运输比较便宜，我们一下做不到。交通问题，我们要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条件多开辟一些渠道。我国的水运条件，特别是南方，解放以后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大大恶化了，修水库，修水电，根本不考虑航运问题，交通部门与水利部门打官司，交通部门没有不打输的。过去大家都站在水利部门一边说话，好像只要粮食多了，还怕运不出来，结果吃了大亏。

十、关于水电站建设的问题

现在正式告诉你们，修三峡已经定了，今明两年准备，后年开工。在上三峡的前提下，再处理其他问题。如贵州提出修吴罗河，四川提出修狗皮滩，湖南的五强溪。三峡一定，“七五”规划要重新考虑。三峡是一百五十米正常蓄水位，坝高一百六十五米，加十米防洪堤，共一百七十五米。防洪问题解决了，对湖南有利，万一发生像一九五四年那样的大洪水，原则上是淹上不淹下。淹上，群众可以往山上跑，回来后国家再救济；淹下，下游地势低，据有关方面估计，国家至少要损失一千个亿。三峡后年开工，八年装第一台机组。三峡一上，电的问题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电站总装机XXXX万千瓦，往东可送到华东，往南可到广

东，还可往西送电。你们第一是拥护上三峡，第二要求上五强溪，有个第一第二就好办了。现在前期工作做得比较充分的，一个是五强溪，一个是四川的宝珠寺。上三峡，要投资XXX亿元，全国开人代会要通过一个决议，全国要支援上三峡，三峡的下游省份都要出钱，湖南、湖北、安徽等省都要出点钱，准备发行有偿债券，将来发电分红。现在中央定了两个项目，一个是上海的宝钢，要投资XX亿元；一个是三峡，要投资XXX亿元，其他地方怎么搞，“七五”规划还没有讨论。

十一、关于“小三线”企业发展方向的问题

小三线[4]要搞活一点，让它自找出路，自己闯。小三线设备好，技术人才多，比地方厂子要好，要让它成为地方工业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要研究搞活的政策，你们的办法是盈亏包干。大三线要作为军民结合之间的企业，不是军工厂生产一些民用产品，而是军民结合型。小三线主要搞民品，现在过渡一下，分点军品给它吃，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但将来主要是搞民品。小三线要搞活就要给它条件，亏损企业搞亏损包干，微利企业也可以包干，利润多的企业，可以采取八级累进税的办法，像集体企业那样对待。总而言之，小三线要搞活，要有给出路的政策，让它自己去搞，搞几年以后，有些不行的就关了，大部分企业就会走出一条路子来。小三线的体制问题，要纳入各省的企业体制里面去。

国防工厂的家属农场也要搞大包干，“五七”农场、“五七”工厂要搞包干，不要吃工厂的大锅饭。上面负责抓管理，抓规划，农场内部可以搞家庭承包，这样农场就办好了。当然，建厂（场）时，可以投点资，支持一下，但在经营上要包干，自负盈亏。这样，就可以不要补贴，而且收入还会增加。

十二、关于军工系统科技人员的使用问题

国防工业有的单位那么多技术人员窝在那里，你们可以借用出去。知识也是生产力，也可以租赁，家属不动，有的可以离厂一段又回来，有的也可以不离厂，交给他一个任务。大家都没有事干，这是个很大的浪费，窝在那里，时间久了知识也陈旧了。军工系统的技术人员，凡是没有事干的，都可以出来，所有制不动，临时调用、借用，出题目、给任务，统统是合同关系。中央有这个方针，你们可以组织。这件事由中央各部去搞很困难，由地方去搞就搞得好。地方和国防科工办要抓这个事。承担任务、临时借用，出来搞培训，搞电视大学、培训中心，这比在厂里闲着好。现在有很多攻关任务，技术改造任务，没有科技人员去干，而军工又大量窝工，要赶快让他们出来，为四化出力。省里要好好组织调查一下，抓一下。这是个很大的潜力，很大的财富。要有偿借用，对厂子要有偿，对个人要给点补助，给予优待。

十三、关于发展电子工业的问题

现在国际上电子计算机技术发展很快，每隔五年到八年，体积缩小十倍，功能提高十倍，成本下降十倍。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像当年搞氢弹、导弹那样，把电子计算机搞上去。

电子工业引进的先进技术，定下来以后就要生产，一边生产，一边搞科研，不能像过去搞军工那样，试制完了，一看不行又改。还是不断革命论、革命阶段论。现在国外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过去叫做十年一大步，三年一小步。我们引进技术，人家给你的本来就不是最先进的，加上谈判，试制，一搞就是四五年过去了，等你搞出来，他又前进了一大步。对国外的先进技术，我们应当赶，但不能亦步亦趋，天天在赶。要走一步、定下来，然后推广应用，再跨一大步。老是赶，产品就定不了型，只能天天变，年年变。当然，我们要密切注视国外的技术进步，进行技术研究，作好技术储备，不能闭关自守。过去军工犯过这个错误，到国外参观一次，就改一次，产品老是定不了型。我们确定了起步点，就搞一步，过几年再跃进一步。

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亿次计算机，为国家、为中国人民争了气。国防科大研制亿次机的方向是对的。现在我们强调微型机的利用，微型机的应用，和有计划地生产与研制一些巨型机并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的。

十四、关于石煤利用的问题

益阳石煤发电厂从最困难的起点搞科研，九百大卡能发电，一千多大卡的煤研石就更有条件利用了。这件事对煤矿很有意义，为煤矿利用煤奸石闯出了一条路子。各个煤矿都要用这个经验搞煤研石发电，这既能增加能源，又有利于推动煤矿选煤，开展综合利用，增加盈利，减少亏损。发的电自己用，如果送出来，不能赔钱，电力部门要支持煤矿办这件事。

十五、关于发展食品工业的问题

对保健食品要很好研究。我们中草药多，把中草药同食品、饮料结合起来，制成保健食品，在国外可以打开市场。福建的乌龙茶在国外畅销，就是因为它有减肥的作用。

有了奶，食品工业也上来了，奶是重要的食品工业原料，有肉、奶、糖和粮食，就可以生产高级的食品。食品要有高档的、中档的、低档的。中国将来的高档食品会有销路，如果城市有百分之十的人购买力提高，农村有百分之五的富裕户，就是六千万人，比一个法国的人口还多。中国市场大，这两年很多没有预料到的事情都出现了。农民现在有购买洗衣机、电冰箱的，将来的高档食品也一定

会有销路。将来人们的购买力提高了，要多增加食用加工品，现在受购买力的制约，比如蔬菜，只能吃新鲜的，加工的吃不起，水果只能吃新鲜的，加工的吃不起，随着城乡购买力的提高，吃新鲜的要变成吃加工品。

十六、关于推广小氮肥生产经验的问题

全国小氮肥经验没有很好总结。作为行业来说，一个是纺织部，他们没有直接管企业，抓了几个机械厂，组织得很好，整个基础工作好；再一个就是化工部抓的小化肥，做了不少工作。这两个部的经验很值得注意。中央各部的工作如何做，要注意他们的经验。

十七、关于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问题

现在我们国家好的形势讲了很多，也应看到，我们还存在着很多的矛盾。我这次出来给你们讲困难比较多。总之一句话，我们现在国力有多大，能承担多大的建设规模，这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要说需要确实有这个需要，各方面都要发展，很多新的项目要上，生产上的要上，生活上的要上。但是，我们财力只有那么多，地方多了，中央就少了；中央多了，地方就少了；生产建设多了，消费就不能增加；消费和建设多了，生产上的就少了。建设规模，最大的问题就是物资，第一是木材，第二是钢材，两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我们只有三千九百多万吨钢，究竟能支撑多大的建设规模？木材就是那么多，水泥还好办，就是这两材。解决钢材问题，路子无非是两条，一是自己上钢铁，二是进口钢材。上钢铁可不简单，首先要上矿山，第二要上煤炭，第三要上交通，现在交通紧张，要上钢铁更紧张。所以现在不敢大上钢铁。现在都要盖房子。老百姓一年盖八亿平方米的房子，好是好事，但八亿平方米的房子要多少材料，烧砖瓦要多少煤炭？你不给他钢材，就要用木材。城市里面如果还是原来的规模，一年又是八千万平方米。这都是在我们重点建设没开始的情况下就有的规模，现在我们再开始重点建设，就有个国力的承受问题。如果弄不好，物价就控制不住，物价一上涨，我说最后的结果是转一圈又要转回来。转一圈转回来，两百元钱等于一百元钱，两百元的投资等于一百元的投资，三百元的投资等于两百元的投资，转一圈转回来并没有扩大规模。所以，要看我们国家究竟承受能力有多大。我们现在因为政策对了，带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好的形势都看到了，但要考虑到我们究竟能进行多大的建设规模。在我们目前国家财力、物力困难的情况下，第一，能进行多大建设规模？第二，进行这个规模里头，中央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民用建设各占多大的比例？这里头就有一个局部和整体的问题。现在来看，特别是“七五”计划，甚至包括“八五”计划，只能在这个框框里面做文章。如果现在规模搞得过大，超出了我们的能力，那我们最后还要来回折腾。刚才讲的木材问题，国内

要保护山林，不能采伐那么多，国外进口也不能太多，即使算上进口木材，我们的规模也不可能太大。为什么现在生产资料紧张？生产要消耗钢材，消费也要消耗钢材，各种建设都需要钢材。

十八、关于企业实行奖金不封顶的问题

我赞成这么一个意见，在利改税的同时，不一定等第二步，包括第一步现在已经实行了利改税的企业，可以选择一些行业、一些企业，实行奖金不封顶的办法。实行奖金不封顶，但前提一定要建筑在厂内的各种责任制落实的基础上。这个事情如果搞得好，确实可以发挥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可以挖掘企业的潜力。这点农村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现在大家都欣赏首钢的经验，把首钢的效果都归结到包干问题上。我看不完全是。首钢能取得那么很好的效果，很重要的是实行了厂内的各种责任制，把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到现在还认为实行了利改税以后的企业，同样非有这个条件不可。这样的企业，内部就有了落实各种承包责任制的条件。过去我们奖金封顶是不得已的办法，奖金一封顶，本身就变成了平均主义；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实行奖金不封顶。当然，我主张有步骤的实行，过去往往有些事情是由于我们普遍号召，全面推广，结果本来是好事，却变得不那么好了。奖金不封顶和又要有奖金总额来控制，我看也不矛盾，就是国家还应当有个奖金总额。确实挖掘了潜力的，可以超过这个奖金总额，但得有个奖金总额。奖金加工资，总额如果超过了的话，还应当有个制约的办法。刚才刘正[3]同志讲的是又封顶又不封顶，我是讲不封顶，但要个制约的办法，不仅使它不滥发奖金，而且适当制约一下消费基金的增长。

工业这个问题比农业复杂，它有个价格的问题。主要的企业是按照国家计划生产的，你要它生产这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它价格又不合理，由于价格的因素，企业有些利润高，有些利润低。如果按利润高低来发奖金，就会造成企业之间苦乐不均，就会引起很多新的矛盾。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小企业我们放宽可以，农村放宽可以，假如是我们的国营骨干企业，如果有个企业突然冒上来，突然增加了一倍工资，就会引起社会的许多连锁反映。首先是知识分子的反映，知识分子要提高工资，一下提高不了那么多，你从事体力劳动的，一下增加了一倍，就会引起很多新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哪个工厂的利润高，那个工厂工人的工资就高，它也是有一个平均的水平。所以，我们在骨干企业里面搞的结果不能使有些工资冒得很高。北京的同仁堂去年奖金一下冒得很高，就引起很多反映。我们的骨干企业是按计划生产的，而且它生产的产品价格是国家规定的，有些利润很低，有些利润很高，有些没有利润。还有学校、科研机构，还有机关干部，由于价格不合理，往往费力大的企业利润低。如果确实是它劳动的结果，作为一个人来讲问题不大，作为一个工厂的平均水平，它一下冒得很高就会影响整个社会。所以，我主张不宜多宣传万元户，可以允许两万元的、三万元的，都可以，但是从农村来讲，不可能都这样，往往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这些万元户

是允许的，但是在报纸上宣传过多也不好。现在城市工人有误解，说过去共产党是依靠工人阶级，现在是不要工人了。再就是以为我们把钱都转移到农民那里去了。我们这个社会很复杂，所以我说还是要有个制约的因素。

价格不合理，实行了利改税会稍好点。今后价格高的、利润高的，产品税要高，利润低的产品税要低些。调节一下价格的不合理，这些会好些，但是不能完全解决。价格的改革比较复杂，是个很大的问题，理顺经济，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研究来研究去，这个决心不好下。算了一个账，我们的生产资料价格走半步，解决一下现在严重不合理的情况，国家每年要拿一百五十亿元的财力，这个决心谁也不敢下。当然这样搞了以后，今后的效益要好，但是，如果在现在这样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要搞一次价格改革，那很多重点建设项目要停下来。北京有些同志这样主张：宁肯大胆缩小基本建设规模，换来理顺经济。从长远来讲是可以的，但是从现在这几年来讲，困难太大，这个决心不容易下。我的想法，我们一开始搞稳当点。这次我们解决奖金封顶的问题，也不要一下把步子迈得太大，往上提是容易的，往下降就困难。从步骤来讲，全省不要一下都铺开，像集体企业、小企业问题不大，一些比较大的企业、骨干企业，国家还在实行计划指导的这些企业，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要有步骤地实行，不要一下铺开，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先实行。

不封顶，还得有个制约的办法。用什么办法制约？除了你们刚才讲的那些条件，还可以加些条件，譬如说奖金要怎么同上交利润的增长挂钩，和上交税收挂钩，如何控制单位成本工资含量等。在什么条件下奖金可以多发，可以超过奖金总额。除此以外，超过部分还得交税，这样也限制一下企业，使他们不过多地把钱用于奖金，而是用于技术改造。今天早上广播了福建的办法，联利计奖责任制。北京如果能出一个办法也可以，如果暂时出不了，各省自己议个办法也可以，定几条，先试行。超出的要收税，超过多的高税，超过少的低税，超过得太多，税收要重，累进的办法，不能搞得太多，因为消费资金太多，没东西给他。至于企业里面责任制怎么搞法，办法可以多样。有些适合搞计件的搞计件，适宜承包的承包，采取浮动工资的办法也可以。如果这个搞得好，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工资的改革，今年先开始解决奖金封顶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主张搞稳当点。还是一句老话，好事不要一次办完。如果提上去不恰当再降下来，比没有提以前的积极性还低。当然可以有一种办法，只要超过奖金总额就要收一点税，分几档，奖金超过工资总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恐怕税收要逐步加重一些，百分之三十以下的收低税，反正没一个税收的办法不行。奖金不封顶以后，如果没控制的话还容易助长企业单纯追求利润：炼铁的不调铁，要炼钢；炼钢的不调钢，要轧材；轧材的利润大的就轧，利润小的就不轧。这样就会冲击计划。奖金不封顶不捆死，但要有个原则，有个制约的办法。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参照福建的办法，选择几个管理好的行业试行一下，然后再看情况。我在四川讲了这个问题，在贵州也讲了，回去我们也再研究一下。经济工作会议上没讲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没把握。

除此以外，厂里面某些权力可以扩大一些。关于厂长的权力有个规定，现在没落实。譬如说，可以允许厂长从自有资金里面，一年提升百分之一的工资，表现好的工人、技术人员可以提级，表现差的可以给你降。还有开除工人的问题，厂长应当有开除工人的权力。

十九、关于能源交通建设的问题

现在的“七五”计划里面，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国家的重点建设。解决能源交通的重点建设，往往周期比较长，但必须进行这种建设，如果不进行这种建设我们就没一个后劲。这些周期比较长的大的项目必须办，还要鼓励地方办一些周期比较短、投资比较少、见效比较快的能源和交通建设项目。另外，地方上也应当想办法把地方上的资金尽量多地用在这些方面来。这就是说，第一，从全国来讲，中央必须加强能源交通建设，但规模不宜过大，搞得过大，势必把地方挤得很紧。第二，地方应当尽量把自己的资金集中到周期比较短的中、小型的能源交通建设上，另外还有一个技术改造。不如此，我们的“七五”、“八五”可能问题比较大。如果“七五”、“八五”的能源交通不能不断补充，我们就不可能实现二○○○年的目标，“九五”、“十五”的经济振兴就很难。所以，能源问题，完全都搞大的不行，交通完全都靠全国大的建设不行，要发挥多种渠道大家来搞，大家都把能源交通建设作为重点。中央有个适当集中资金的问题，地方也有个如何把钱更多地用在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大家都高度集中资金用到长期的大的项目上去，那我们国家的情况就是长期投入而没有产出，又会产生新的问题。这两年我们的煤炭没有那么紧张，小煤窑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北方小煤窑不赔钱，你们的要赔点。小煤窑的毛病是缺乏技术指导，可以帮助它。不仅是小煤窑，包括小水电，也包括其他的矿山，只要认真规划一下，是可以依靠老百姓搞的，这是个方针问题。中国农村人口很多，将来农村除发展农业多种经营，搞养殖业，搞开发性的农业生产以外，要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逐步地转向其他方面，转向工业、转向矿业、转向服务业。在沿海一些地方，在大的城市周围，可以搞加工业；不是沿海这部分地区，特别是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可以搞开发资源。前不久姚依林同志到陕北，提出搞大电站、小煤窑。过去耀邦同志也讲过这个观点，中国农民的劳动力本身是一种资源，如何把这种资源变成生产力。中国农民将来应当从事开矿，有条件开矿的开矿，有条件治山的治山，有条件搞建筑的搞建筑，这个恐怕是将来中国式的一个道路。

在路上你们讲到，矿山实行轮换工，我是非常赞成的。四川已经实行了，它是三年一轮换。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国家投资。将来我们的建筑队伍、井下工人要大部分利用民工。建筑公司可以搞一个架子，搞承包，工作可以承包给民工，各种建设单位也可以直接包给民工。这样几亿农民可以从这方面找一条出路。在讨论“七五”计划的时候，这个问题要考虑。你们的小煤窑，包括有些大煤窑，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强化开采。我们中国几十万吨的矿井，都是上百年的服务

期，要缩短服务周期。假如缩短到五十年，比新搞一个基地要省钱得多，就要考虑缩短，这方面有潜力。什么东西都有利弊，缩短服务周期可能有弊，但要全面衡量利弊。就是五十年，也不算短。资本主义国家是很注意投资收回效果的，就是我投资，多少年收回成本就行了，搞十五年，或者搞二十年，就不要了。外国在我们这里建旅馆就是这样的，它的周转快。一个矿井，譬如搞一百年，一年产一百万吨；我一年采两百万吨，就只要五十年。五十年也不短，科技进步五十年以后就大不同了。现在国际上没哪一个国家一开始就反映工业化很好，工业化过程中间环境污染很厉害，只有到工业化一定程度以后才开始治理。当然我不是反对要搞环境治理，但如果要求太高了的话，是搞不成的。资本主义最早国家之一的英国伦敦，为什么它的雾那么多，现在才搞清楚，原来主要是烧煤多，现在治理好，房子变白了。美国也是这样。

二十、关于国家财政的问题

现在我们要有一个指导思想，不管用什么办法，至少在十年之内，我们财政非常困难，既要建设又要改善生活。如何渡过这个财政困难，又使我们的经济继续保持繁荣，以后的事就好办些。这是我考虑“七五”的一些想法。我们大项目要考虑一些，另外还有很多可以挖掘潜力的政策，包括建设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考虑。当然，这些搞法在过渡时期有困难。譬如说，你建筑队伍就比较多，再吸收民工他就没事做。四川有个地方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成了大包袱。但这是暂时的。我们搞固定的长期的建筑队伍，这个路子是不成功的。固定的长期的井下工人，也是不成功的。建筑工人搞一个大的工程都住下，完了以后又不能搬家，一大堆问题。本来中国劳动力很多，劳动后备军是一个很大的资源，但我们的政策搞死了。这个问题可以作为一个措施或者一项政策来考虑一下。

注 释

1．毛致用（1929—），湖南岳阳人。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张平化（1907—2001），湖南炎陵人。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曾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委书记，中宣部部长，国家农委第一副主任。

3．刘正（1929—2006），湖南长沙人。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曾任省政协主席。

4．“小三线”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根据中央“要准备打仗”的战略部署，由有关省（区）市参照中央三线建设的做法，在本地搞的一些战备建设项目。当时在习惯上把中央的三线建设叫“大三线”，把地方的三线建设叫“小三线”。

给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的复信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并全体同学：

谢谢你们给我来信。

对于你们在信中所表达的赞成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爱国立场，我十分赞赏。你们出于对香港前途的关心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已交有关部门认真考虑研究。

现在香港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变，相信你们一定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香港的稳定繁荣不断作出贡献。你们也可以完全相信，中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一定会符合香港同胞的愿望和利益。

谨祝

学业进步！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三月廿六日

妥善解决经济工作和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想就当前经济工作和体制改革讲几点意见。

一、在对企业实行利改税的同时，要认真抓企业的内部问题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实行了利改税的第一步，效果是好的。现在，财政部正在积极准备，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即实行产品税、所得税等，将税利并存改为完全征税，进一步解决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问题。实行利改税，有这样一些好处：一是可以保证国家得大头，使国家财政收入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稳步增长；二是可以使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实行自负盈亏，逐步削弱条条块块行政隶属关系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三是通过征收产品税，确定不同税率，也可以使目前价格严重不合理的影响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使各个企业能够在利润水平悬殊不太大的条件下展开竞争，鼓励先进，鞭策落后。所以，实行利改税是改革的方向，应当积极推行。

在实行利改税，解决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以后，还必须解决企业内部的关系，即企业和职工的关系，使企业不吃国家的大锅饭，企业内部职工也不吃大锅饭。这样才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企业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许多利改税试点的企业，像北京市的十户企业，四川的老五户企业，他们之所以效益大大提高，很重要一条是企业内部建立了严格的责任制，责、权、利分明，不搞平均主义，不吃大锅饭。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从实践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实行利改税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得到解决，这就为企业内部建立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前提；也只有企业内部落实了责任制，使企业同职工的关系得到很好解决，利改税的优越性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企业内部的问题包括很多方面。首先要解决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问题；还要注意加强劳动纪律，加强质量管理、财务管理和定员定额工作。这些都

是提高企业素质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此外，还要认真落实国务院颁发的《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中所规定的厂长的职权，认真把企业办好。这里，着重讲一下奖金不封顶和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落实厂长职权问题。

奖金封不封顶，是关系到企业内部责任制是否落实，关系到在目前条件下企业内部按劳分配原则能否体现的问题。从原则上讲，奖金封顶，是不合理的，它容易造成平均主义，有碍职工积极性的发挥。但是，实行奖金不封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是要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否则，就会发生不从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上想出路，而只从挖国家方面打算盘的作法。这点和农村不同。前两年因为条件不具备，规定奖金封顶，在当时是必要的。但这毕竟是不得已的办法，应当创造条件改变它。现在，我们已经推行了利改税的第一步，并准备加以完善，在今年第四季度推行利改税的第二步，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基本上得到解决，这就基本具备了实行奖金不封顶的条件。奖金不封顶，应当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不宜一下子全面铺开。目前可以在建筑、矿山、搬运三个行业，以及各地选一批经过整顿、基础比较好、领导比较强、生产正常的企业先行试点，在今年四季度随着利改税第二步实施以后再进一步铺开。请经委和财政部提出方案，一边实践，一边总结经验。奖金不封顶，不在于奖金本身如何，而在于要通过解决这个问题，把企业内部的责任制落实，把企业的经营管理大大推向前进。

实行奖金不封顶，也并不是毫无节制。由于目前我国的价格体系很不合理，形成行业、企业之间利润水平相差很大，即使实行了利改税第二步，这个问题仍不能根本解决。而企业职工的劳动报酬是同企业的经营成果，同企业的利润挂钩的，但利润又不合理，所以，还得从某些方面加以制约。还应该看到，我们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在宏观上国家对消费基金的增长幅度要有所制约，这是综合平衡的主要内容之一。既不能再继续采取封顶的办法，也不能过多地、毫无节制地让消费基金的增长失去控制，从而使经济生活产生混乱。封顶，是捆死的办法，现在要把它解开。解开后，恐怕还得有一点“软绳子”，总得有点制约。我们的原则是：第一，职工的劳动报酬，要同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是否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挂钩，同本人劳动成果挂钩。第二，奖金的发放额，不得超过按规定比例提取的职工奖励基金数。第三，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利税比上年增加的企业，奖金可以相应增加，不封顶。第四，取消封顶后，要征奖金税。幅度越大，税率也越高。征奖金税，不是向职工个人征收，而是由企业从职工奖励基金中交纳。

奖金税怎么征？大体划几条杠子：奖金发放额不超过两个半月标准工资的不征税；四个月以下的征轻税；四个月到六个月的，要征中税；超过六个月以上的课以重税。具体税率，财政部正在拟订。

上面讲的奖金额，是作为计算标准用的，并不是说都一律采取发奖金的办法。可以发奖金，可以实行计件工资或浮动工资，也可以把工资和奖金总额捆在一起，进行自费工资改革。不论采取哪种形式，都必须与实行严格的内部责任制结合起来。这笔钱用得好不好，效果大不一样。如果搞平均主义，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劳动人事部同志的意见，最好结合搞自费工资改革，真正体现按劳分配，

把职工的劳动热情激发出来。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制订这些办法，就是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弊病，如果在执行中搞平均主义，那就失去了意义。总之，这笔钱采取什么形式使用，工厂有自主权，一定要把它用好，真正出效益。

照这样规定，是不是每个企业都要发二三个月甚至更多的奖金呢？这也不能搞平均主义。奖金发不发，发多少，一定要看条件。搞得好的多发，搞得一般的少发，搞得不好的不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即企业完不成国家计划，不能依法向国家交纳税金和各种费用，就不能发奖金，直到扣发一定的基本工资，首先从企业领导人做起。

这是与奖金不封顶相辅相成的。有奖有罚，才能真正建立起经济责任制。各地要掌握这个原则，严格制止滥发乱分。

另外，有些办得很好、经济效益很高的企业，他们看得更远一点，宁愿暂时少发一些奖金，而把这部分钱转为技术改造投资，以便取得更大的效益，为职工今后更多地增加收入创造条件。对这种情况，国家无疑应当支持他们的积极性，并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

这几年，农村放活了，农民的收入有大幅度的增加；小企业也放开了，那里的职工收入也大大增加了。如果不采取恰当的政策措施，真正担负国家指令性计划生产和按国家价格销售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像钢铁、煤炭、重型机械等工厂的职工收入，几年之后有可能成为锅底。对这些骨干企业，总得有个办法使他们相应增加收入。当然不能靠国家多拿钱，而是要促使他们从挖掘潜力上找出路，从提高效益上增收入，并得以持久地发展下去。现在我们制订的办法，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国家对一些劳动强度大、工作艰苦的行业，例如井下、矿山、建筑、搬运等，要予以优待。在合理确定劳动定额的基础上，可以实行计件工资或其它形式，不封顶。在征收奖金税时，予以照顾，免征或少征，使他们的收入有较多增加。

对集体企业、小企业和亏损企业怎么办？现在集体所有制企业还是沿用五十年代的八级超额累进税，起征点是三百元，太低了。起征点应提高，下边砍掉两级，往上再增加两级，搞个新的八级超额累进税。征税以后，把集体提留留够，就由他们自行分配。今后要扶持集体企业的大发展，使他们真正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国营小企业也要放开。去年实行利改税时，曾规定固定资产原值在一百五十万元、利润在二十万元以下的，算作小企业。现在看，还可以再宽一些。对这些小企业，可仿照对待集体企业的力、法，征八级超额累进税后让它自负盈亏，干得好多得，干得差少得。一些以劳务为主的小企业，如服装、修理、饮食、理发、浴室等，也可试行租赁给经营者的办法。对亏损企业，实行盈亏包干是有效的，要继续实行。对微利企业，可以采取征轻税的办法，或者实行包干。

我们分别企业的不同情况，采取以上办法，目的是为了把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发挥出来，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保

证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

为了使企业真正有活力，必须围绕利改税和解决企业内部分配问题，相应地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使之形成一个小的配套。这是发展经济工作大好形势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在产品的生产、销售、原材料采购、技术改造和人事管理等方面，都可以考虑适当给企业一部分权力。比如，在计划管理上，在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的前提下，应允许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安排一些生产。所生产的产品，超计划部分，应允许有一部分自销权，即使属紧俏物资，也应这样办。过去的经验证明，有些产品往往是越紧越统，越统越少，如果网开一面，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东西反而多了。在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上，大厂、大项目，必须管住，至于一些小的，不必过分害怕重复引进，盲目建设。这方面的审批权力，应当下放一些。在人事制度上，上级只管厂里的主要领导干部就行了，其余的应由厂里自己去管。总的原则是：当集中的集中，当分散的分散；大的管住，小的放开。现在各级主管部门具体事务揽得太多，要层层下放一部分权力，以利于抓大事。究竟企业扩大哪些权力，请经委会同有关部门，对今年能办的确定几条，以国务院名义下达一个文件执行。这算是一个最低纲领。将来随着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再搞一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最高纲领。实行利改税，落实企业内部的责任制、奖金不封顶，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这三个重要环节互相配套，狠抓落实，将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为了推动企业健全内部的各种责任制，还要抓《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的贯彻落实。一九八二年颁布这个条例以后，许多条款都没有执行。这种现象必须改变。要强调厂长对全厂生产经营活动的指挥权和人事任用权。按照厂长工作条例，厂长有权对职工进行调动、任免、升迁、奖励和惩罚。对有特殊贡献的职工，有权晋级。原来规定每年晋级面不超过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一，国务院准备修改，适当提高一些。对违反纪律的职工，有权处分，直至开除、辞退。这个权用好了，会起很大的作用。要像许多先进企业那样，赏罚严明，“管理上从严，生产上抓紧，经营上搞活，生活上关心”，才能把我们的工厂办好。

我们采取上述的扩权措施后，也可能出点小乱子，比如有的企业一下冒上去，奖金搞得很多等。但我们有了制约的办法同步出台，就不至发生消费基金失控等现象，影响大局。总的看，还是利多于弊。当前，我们要抓紧工作，认真把企业内部的责任制落实，把厂长的职权落实，进一步搞好企业的整顿。只要这些工作做好了，我们确信，在两三年内，企业的经济效益就会有个较大的提高，企业的面貌也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二、能源交通建设的几个方针政策问题

第一，能源交通建设要大中小结合，长短兼顾。

在我国能源交通建设中，大型骨干项目和中小型项目，远期发挥效益的和近期发挥效益的必须全面安排，统筹兼顾。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问题，关系到今后

的投资方向。

从去年以来，我们在全党全国着重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要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要坚定不移地建设一批投资大、周期长、具有战略意义的骨干工程。这是为下一个十年甚至下个世纪我国经济的增长打基础所必需的。如果不这样办，那就不能实现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就不会有后劲。与此同时，必须继续搞一些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保证我国经济在今后几年内能够持续增长。这也是为今后的发展积蓄力量。除了中央财力集中保一些大型项目外，要引导、鼓励、支持地方和部门多搞一些中小型能源交通项目，集腋成裘，这方面也有不小的潜力。有骨干工程作主体，又有众多的中小工程作支干，互为补充，能源交通的紧张状况就会逐步缓和。为了把零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办成几件事，建议首先在兴办电力工业时发债券、股票。据财政部统计，去年征收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各地超收十四多亿元。去年超收的这笔钱就不上收了，留给地方，专款专用，用在地方性的能源交通建设上，不准挪用。搞哪些项目，报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备案。这样做，可能比中央直接投资要节省，速度要加快。

第二，要正确处理新建和改造、扩建、挖潜的关系。

当前我国的财政有困难，在编制“七五”计划的时候，许多矛盾都暴露出来了。中央和国务院已确定要上几个特大项目，像三峡工程、核电站等，投资很大，七八年乃至十多年以后方能见效。电，在“七五”期间必须保证每年新增装机五百万千瓦才过得去。加上其它各项开支的增加，财政收入虽逐年好转，仍然入不敷出。鉴于这种情况，在近几年内，我们应尽可能不把矛盾集中在一起，能分的就分开一些，能推的就推迟一些。除了保证大型项目外，现有的财力物力应考虑如何用在经费省、效益好、周期短的项目上，多从这方面想办法，找窍门，以利于渡过目前的财政难关。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我们应当具体分析能源交通的新增生产能力，哪一些宜于新建，哪一些宜于扩建，哪一些改造挖潜更合理。新建一些大型骨干项目不能动摇，但对扩建、改造、挖潜，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近几年。

比如煤炭工业，有必要重新考虑规划和部署。我国计划建井的服务年限一般都偏长，起码是五十年以上，有的在一百年以上。不少国家的开采速度比我们快得多，基建完工后采煤量比我们大。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矿井服务年限短一些，开采强度大一些；另一种主张服务年限长一些，开采强度小一些。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我认为至少在十年、二十年内，加强开采，有利于缓和我们目前遇到的矛盾。再过十年、二十年，我国的经济状况就根本不同了，我们没有必要把困难都集中到这一段。所以，在煤炭基本建设的战略展开上，设点布局，既要开发必要的大型露天矿，又要加快老矿区的开发，使近几年、十年如何能够投入省一些，产出多一些，快一些。首先要在现有具备条件的矿井加强开采，在老矿区多打一些井，多开一些工作面。在老矿区扩建，多打井，多开采，比新建投资可省三分之一，时间可提前二分之一。这样做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交通运输也要从综合经济效益、从多种运输方式去考虑。全国的运输干线应当有个基本的布局。但如果只有干线，而区域性的交通不能解决，短途运输、中途运输不解决，干线也不能发挥作用。所以要考虑多种运输方式，水路、陆路、空运，长途、短途，铁路、汽车、轮船、飞机，要综合考虑，互相配合，形成最合理的综合运输生产能力。在“七五”期间，大同至秦皇岛长大列车的铁路干线必须修通，这样能新增运煤能力七千万至一亿吨，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很大，要下决心搞。但是，到西藏的铁路，近期内就不必修了，不如发展空运。像新疆、内蒙古也可以考虑设立地方航空公司。主要的交通干线要靠国家，但区域性的、地方性的交通建设，要调动地方、部门、企业和乡村的积极性。最近，我到贵州遵义，那里有条赤水河，除三个月枯水期行船比较困难外，平时通行无阻。赤水河两岸煤炭资源丰富。发动老百姓开小煤窑，在沿长江处搞煤场，用省的船队能把煤顺长江而下运到江苏。这样做产地有钱可赚，江苏也有利可图。采取这些办法来运西南地区的煤，比修铁路要省得多、快得多。这些都属于地方性的交通建设，如果我们在政策上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运输的路子就能够搞得宽一些。

第三，围绕电的发展通盘考虑能源交通建设。

我们讲以能源交通为重点，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看来，还应该进一步明确：能源交通建设要围绕着电的发展来考虑。能源、交通不完全是为了解决发电问题，但现在压力最大的是运煤发电，我们工业卡壳就卡在电上。今天我们的能源交通最大量的是为了解决电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围绕着电的发展来统一规划、安排其他有关方面。制订全国或区域性发展规划，首先要确定电力工业规模搞多大，火电、水电、核电搞多少，相应地如何建电站，如何开煤矿，如何运输，一系列的问题，都根据电的需要来展开，同步进行建设，避免互相脱节，在决策上失误，造成大的浪费。这样，综合经济效益肯定会大为提高。

此外，还要顺便讲两个具体问题。一是要从政策上鼓励煤矿搞煤研石发电，可收一举数得之效。在湖南益阳，国家科委办的泥河口石煤发电试验站，石煤的发热量只有九百五十大卡，发电成本每度七分四，现在卖八分。从这件事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既然石煤都可以发电，为什么热值比它高的煤研石不可以用作发电呢？现在全国的煤研石有十亿吨之多，用作发电既可以减少堆场，减少运力，节省开支；又可以多发电，降低煤矿成本，增加收入，是煤矿的一条生财之路。煤炭部初步打算在“七五”期间建一批小型煤研石发电机组，装机一百万千瓦，发电五十亿度。这是一件大好事。要推广开来，关键要解决政策问题。这种煤电联营的办法，国家应大力支持，水电部应给予优惠待遇。在政策上要规定一条：联网后把煤研石发电的利润留给煤炭部门。这样煤炭部门就有经营积极性了。

二是要加强选煤、洗煤和型煤等工作，尽量减少运输量。现在运输很紧张，应从多方面想法解决。一方面要加快运输建设，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运力的浪费，省去无效运输。拿运煤来说，从产区运到沿海地区，运了不少石头，高的含研量达百分二十。动力煤一般不需要洗，但应该选。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价格是个主要因素。一定要实行优质优价、劣质劣价，鼓励就地选

煤。对动力煤，要考虑按含热量计价；折算成标准煤，热值高的，价格就高；低的，价格就低。在价格上鼓励一下，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最近耀邦同志批了一个材料，提倡搞型煤，也是个好办法。

三、关于劳动制度的改革

整个劳动制度如何改革，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我看建筑、矿山井下、林业甚至搬运行业，用工制度现在就要改革。改革的内容就是要大大减少固定工，积极推广轮换工、民工包工等多种用工形式。

矿山井下，建筑行业，包括水电队伍、铁路公路建设队伍等基建队伍在内，都要尽量减少固定工。这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基本建设造价和矿山成本将起很大的作用。现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城里人下井很困难，包括矿工的子女下井都难动员。看来，矿山必须走用轮换工的道路。三年到五年换一次比较好，而且要逐年分批换，以保留大部分熟练工人。建筑业也不要那么多固定工，要大量启用民工承包，搞招标。将来建筑公司还是要的，保留少量行政人员和技术骨干，主要是搞好领导、管理、设计、技术、安装等工作。实行改革后，建筑业把许多工作量承包给民工，矿山启用轮换工。特别艰苦的工作，工资可以提高一些。比如井下工人，搞计件工资，他努力干，一年大约得二、三千元，五年就是一万几千元，自己用掉一部分，还剩下大部分，回到农村老家可以盖房子娶媳妇。林业也有这个问题。当然，实行起来也还是要有一个过渡期，原来的固定工还得由企业管起来，设法开辟新的生产门路。但从发展方向看，从提高经济效益看，现在是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

推行上述改革，关系到如何动员和充分运用农村几亿农民劳动力的问题。这是有深远意义的事。我们在用工制度上改革，用轮换工、临时工，用民工，对国家建设来说，比较经济节约，效益好；对农村来说，开辟了农村多余劳动力参加建设的途径，为他们找到了出路。这个用工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过去八亿农民搞饭吃，是我们穷困的一个特征。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这种局面一定要改变，否则国家富不了，人民富不了。到本世纪末，农村可能只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搞种植业，有更多的人离开种植业去从事多种经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如搞林业、牧业、渔业；搞副业、手工业；开发山区、草原、海洋等。在我国东部沿海大中城市附近的农村，可能通过引进技术，同城市协作，发展一批这样那样的小工业。在比较偏僻的西南和西北，利用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可能在一水电、二开矿、三搞建筑建材上，闯出一条致富的路子。这些地方虽然加工业比不上沿海地区，但那里的农民能吃苦耐劳，在开矿、建筑、开土石方等方面有优势。将来我们国家东部与西部将有合理的分工，形成各具特色、互为补充的优势产业，使我们农村的丰富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那时我们整个国家不论城乡，不分东西，都一定会富裕起来。

顺便说一下，农民开矿和破坏资源不能当成一个概念。小矿要看怎么办，搞

得好就会合理利用资源，搞不好就会破坏资源。要把它变成一个积极的事情，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只要加强对社队小矿的技术指导和业务训练，搞好规划，合理布局，搞好安全生产，是会起很大作用的。这不但有益于农民，而且对工业的发展有利。事实说明，小矿也在不断变化，逐步由小到大。如能加强工作，善于引导，小矿就会发展壮大，对国民经济作出贡献。

四、城市要搞贸易中心

这次我们在重庆看了市里的贸易中心。四川把省的二级站放给重庆市，和市商业系统的专业公司合并。这个贸易中心是重庆一商局组成的一个经济联合体。它有一座七层的交易大楼，不论是本市本省的、外省外市的工厂都允许去卖货；也不论是全民、集体、社队企业、个体户、专业户，都可以到那里进货。贸易中心实行自营业务与代理业务结合，大批发与小买卖结合，可以代购、代销、代储、代运和加工订货，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把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直接联系起来，减少了中间环节，改变了过去按行政区域层层分配商品的老办法，打破了条条、块块的界限。重庆这样一搞，中心城市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如果不搞贸易中心，不按照经济活动的流向来组织生产和流通，中心城市就很难发挥作用。同样，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也可以搞贸易中心。就地进货发货，产销见面，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公私，都可以来做生意，这样就把农副产品的流通搞活了。所以，贸易中心不只在重庆可以搞，其他大中小城市可以推广，农产品集散地也可以搞。一个地方单独建立也行，几个城市联合搞也行。先从消费品搞起。除了国家统一掌握的重要生产资料以外，其余的或计划外的，也可以参加到贸易中心去交换。上海等大城市的一级批发站也可以研究一下，能不能与所在的市搞联营批发，联营搞贸易中心，除了某些重要产品掌握起来按计划分配外，其它产品放开，进行自由选购。批发站的一些业务也参加到贸易中心里去，和大家一起搞。

我们要从建立贸易中心着手，促进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过去斃门长期存在消费品匮乏的情况，当时商业部门的任务是掌握货源，安排市场（内部计划分配）。按行政区划来分配商品，紧俏商品就发票证。这是当时的情况决定的。现在，有了很大变化，除少数重要商品要安排市场外，许多商品都比较充裕，主要问题不是要安排市场，而是要开拓市场，扩大销路。商品生产一发展，就要解决流通环节的问题，使货畅其流，物尽其用。旧的封闭式、多环节、按条条块块组织起来的流通体制已不适应，有必要改为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建立城乡通畅、内外交流、纵横交错的流通网络。看来五十年代初期，即实行统购统销前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要抓紧研究流通体制的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

五、进一步注意运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当前，不论城乡都面临着商品化生产迅速发展的趋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发展，经济要搞活，就要求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从根本上讲，必须改革旧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会受到很大限制的。但全面改革价格体系，涉及的面太宽，影响太大，因此经过反复研究，两三年内价格不宜大动。在价格体系不大动的情况下，要研究如何运用价值规律，运用其他经济杠杆，如何在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可以运用以下一些办法：

（一）进一步完善利改税，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前面讲过，通过征产品税，可适当缓解价格不合理带来的问题。

（二）某些生产资料的价格调整走小步。比如生铁、南方人工造林地区的木材，适当调整一下价格，幅度不大，可以让使用企业自己消化，靠改善经营管理，抵消由于调价而增加的负担，市场销售价格可暂时不动。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有控制地给一点补贴。此外，有些小商品价格和商品的质量差价要继续有步骤地放活。

（三）农副产品要进一步放开，增加市场调节的部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市场供应的改善，有计划地减少统购派购的品种和数量。我们对农副产品要少用行政的办法去限产或增产，应当运用经济杠杆，通过市场调节的作用去影响和指导。田纪云同志建议，对粮食、棉花这些大宗产品，国家计划收购多少，其余的放开，搞市场调节，这个意见可以考虑。至于非统购派购的产品，那更应该放活一些。

（四）进一步搞好同农民的商品交换。商品交换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现在农民购买力很大，农村社队存款一百四十五亿元，社员存款三百四十亿元。要很好地研究用什么商品、什么办法与农民交换，以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并增加国家财源。从农村的调查看，农民急需的，一是农用生产资料，二是建筑材料，三是某些生活必需品。针对农民购买力不断提高的情况，除了搞一些大路货外，也要搞一些高中档商品。这方面的销路正日益扩大，要采取措施跟上。

（五）农村税制要改革。解决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一个是靠商品交换，另一个就是税收。目前我国农村正处在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多种多样的商品生产日益发展。过去农村基本上是搞饭吃，征的是粮食税，而且是固定的。这种税制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现在农村真正是多种经营，应有尽有。应根据新情况，设计、改进农村税收制度，引导农民发展商品生产，为发展经济服务。这比只依靠提高供应农民商品价格的办法好，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

（六）农副产品要搞精加工。我们长期是“低标准，瓜菜代”，不加工或粗加工。现在应当改变。在农副产品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搞一些深度加工，可以减少国家补贴，满足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国家在计划上应加以扶植，增加一些投资、贷款和材料，帮助加工厂搞好技术改造。

（七）适当调整新区、老区的征购基数。现在不论粮食、棉花还是油料产地，新产区和老产区的矛盾都比较突出。新产区的征购基数低，收入大幅度增加。而老区基数高，感到吃了亏。前两年，我们强调不要急于改变是必要的。到现在已有三四年，应该而且可能对征购基数作些合理的调整。以省为单位核算，新产区增加一些基数，老产区减少一些基数，或实行比例价。请有关部门提出方案，从明年起陆续实施。

上述七条，都是属于在价格体系不能大动的情况下采取的过渡办法、改良办法。既可以缓解价格不合理的影响，又可以适当缓解财政困难，并使城乡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除了以上讲的五个问题外，小平同志最近讲的对外开放的问题，这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现正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落实。

上面讲的这些意见，是从这样一个思路考虑的：形势大好，财政困难，又要大规模开展重点建设，又要理顺经济关系，如何采用一些妥善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避免矛盾过于集中，使国民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增长，能够有后劲。当前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和解决，我们需要从实际出发，进一步解放思想，去改革、去创新。

关于怎样管好企业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听取吕东关于提高企业素质问题汇报时的讲话。

一、小企业可以分三种：全民所有集体经营、集体承包，经营者（个人）承包。对江苏省社队企业的生命力过去估计不足。小的要放开，集中力量把大的管好。

二、厂长负责制，应当选几百个工厂试点，看看有什么问题。外国有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大事情董事会讨论。有些年龄大的同志参与决策有好处。我们也实行过董事长，如石化、船舶、汽车，可以总结一下经验。中国有党政工团，谁来调节相互关系？都由厂长来做，可能困难。

三、坚决实行定员定额，多余的人培训，宁肯养起来。

四、企业取消奖金封顶以后，是采取提级的办法，还是发奖金办法，请劳动部与经委提出意见。但权要交给企业。采取什么形式，企业有自主权。

五、婆婆多的问题。我的想法，除了少数企业搞全国联合以外，大部分放给城市。特大型企业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单列户头。部门不管直属企业。大量合并部门（什么时候合并再说）。小氮肥厂搞得好，并不是化工部直属。事实证明，一个部抓几个企业并没有真正管好过。基本上部门不管直属企业。大托拉斯，有的归中心城市，有的归计委、经委。像鞍钢，鞍山市解决不了，辽宁省也解决不了。一个部，有的企业是他管的，有的企业不是他管的，部就不能超脱，也搞不好行业规划。一个部管几个企业，搞得四分五裂。到一个市，这几个企业是部的，这几个是省的，很难协调。企业最好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部门一管，企业就联合不起来。研究清楚再动手，不要急急忙忙。

六、层层下放权力，今年就开始。比如，计委、经委，多少权放给部，多少权放给省。这个问题比较紧迫。要打破好像我管就能管好，别人管就管不好。计委、经委的权必须让出一部分给部、给省市。要权放一格。可能出点乱子，但好处比乱子多。现在还是部门过多，权力过于集中。权力少一点，扯皮就少一点，效率就高一点。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只能利弊相权，取其利大者。今年就搞这件事，这个问题是当务之急。中国怕乱的思想太厉害，而对于活起来发挥的积极作用重视不够。引进也不能管得太死。进口设备五万美元就得报批，这就得拖。完全整齐划一、一律，结果是官僚主义严重。

七、要给企业什么权？分配权，人事权（除厂长外，其他上面不要管）。产品采购要给他权。物资紧张，分配权高度集中不一定是好办法。去年煤炭很能说明问题，小煤窑增产二千多万吨。物资紧张就高度集中，一集中就少了。什么东西一放就多，越统越少。紧张物资，只要企业增产，都给他一部分分成，鼓励他多搞一点。完全放开，国家不掌握一点东西不行。因为紧就搞死，三十多年事实证明不是好经验。用计划外补计划内不足，允许有一部分自销权。中国的事情，除了重大的以外，不要太怕重复，太怕盲目，大计划、小盲目就搞活了。没有点盲目就不能活。大的不行，小的盲目一点不要紧。总之，不能捆得太死。捆得太死不是好办法。当然，不能放弃计划，大的不抓不行。

八、分配上有些道道了，能不能在计划上搞它个小配套。扎扎实实给他几条。这些跟不上去，利改税未必见效。利改税后，要发动职工去挖潜。利改税，分配上的企业自主权实行以后，搞个小配套，这样就活起来了。包括计划、劳动工资、原料采购、产品销售。有些事情可能现在不习惯，冲来冲去就会冲出一条路子来。用苏联的模式看，现在这些办法就不对路。原来的一套已经冲破，再回到原来已经不行了。要驾驭这种形势，只能因势利导，去弊存利。

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

一、小平同志这次提出沿海城市要进一步开放，确实是个大政策，对于我们进一步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加快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迎接新的技术革命，以及促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都有十分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小平同志一作出这个指示，就得到沿海省市的热烈拥护，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应。

二、从这次会议看，不仅参加会议的地方的同志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中央有关的部门，对沿海城市进一步开放的政策也是积极支持的，说明这一方针充分反映了大家的愿望。经过与会同志十二天的共同努力，会议是开得好的，已取得了一个成果，就是会议纪要。这个《纪要》，我认为基本上是个好的文件，体现了小平同志要进一步开放的指示精神，也从我们现在的实际出发，考虑到我们如何才能把这项工作搞好，搞成功。比如说，要分步骤，要采取不同的开放形式。这对我们把小平同志的指示贯彻好，是很重要的。我们虽然搞了几年开放政策，但是不能说我们在这个方面经验就已经很丰富了。有一些事情，看得比较清楚的，有把握的，那就先搞；有一些事情，我们现在还看不很清楚，或者还存在许多矛盾，国家还需要再创造条件的，我们就稍微缓一下。我们一方面要坚决贯彻进一步开放的方针，另一方面又一定要把它搞好，搞成功！

沿海城市的开放，总的说现在还是刚刚起步。今后的趋势，是还要进一步开放。如果某些方面今天开放得还不够，也不要紧，明年我们再继续放。同意刚才谷牧同志讲的，今后还可能有第二、第三个进一步开放的文件。但不要因为没有经验、没有把握，一下子搞起来而出现问题反而不好。所以，我主张分步骤，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北海要搞特区，我看将来也是可能的，但是现在不一定马上成为特区。一个是特区，一个是经济开发区，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沿海港口城市利用外资进行技术改造、技术合作的自主权，采取这三种形式，我看比较恰当，可以不断地总结经验。我国不是岛国，也不是内陆国家。我们和欧亚大陆连在一起，但是我们有两万公里海岸线，与海外有许多联系。这个有利条件我们过去利用得不够。从将来的发展看，恐怕不仅是沿海城市的问题，很可能扩大到沿海一大片。将来很可能在整个经济管理体制上，沿海地区会建立一种和内地不同的体制。当然，这是后话，且听下回分解，现在还难讲。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觉得现在放得还不够过瘾，我们还是得一步一步走。也许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些慎重过

度。这次会议的《纪要》，一定要体现小平同志提出的进一步开放的方针，同时又要说明要分步骤，采取不同的形式，以后还要继续发展。

刚才同志们对《纪要》提了一些意见，我看大体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属于具体化的意见。这是一个纪要性的文件，不可能写得那么具体，将来还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来作些规定，那是属于具体化的问题，或者是后续工作的问题。这个会只是定一些重要的改革和措施，我看后续工作的量还很大。另外一个方面的意见是要求放得更开一些，认为《纪要》现在的写法还放得不够。这里面我觉得可能又有两个方面，有一些意见是可以和应当吸收的，也就是说有些方面还可以放得再宽一些；还有一些意见从发展上讲也是对的，但恐怕还是要缓一步来考虑，将来可能一年还要总结一次，还要有一些补充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点也要和大家讲清楚。

总的讲，我觉得这次会议是开得好的，这个文件基本上也是写得好的。会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再改一下，就可以提请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审阅。

三、沿海地区的开放主要是靠政策。当然，不是说对这些地区，在财政上、投资上一点也不考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沿海这十四个城市，再加四个特区和海南岛，是很长一条线，在目前这种财政情况下，要中央拿出较多的投资来支援沿海开放，确有困难。因此，主要还是靠政策，加上中央必要的支持。这一点，请大家不要希望过高。从全国来考虑，现在主要是搞能源、交通，能源和交通搞不好，沿海地区的开放也没有条件。当然，能源、交通中有一部分是在沿海地区。比如，将来会有很多电站部署在沿海地区，包括核电站，还有港口、机场等。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要靠政策，靠发挥沿海地区的有利条件。本来沿海地区有这个潜力，过去由于政策和制度的束缚而不能充分发挥，这是主要的问题。

政策主要是两条：

第一，要给外资、外商以吸引力，就是“蚂蚁政策”，使他一来就能够吃到甜头。这里面一个是税收，一个是市场，主要是这两个。刚才我和王丙乾同志商量了一下，会后可以再讨论一下，我看沿海港口城市的合营企业，税率可以比我们已经公布的《合营企业法》降低一些，如果搞的结果比较好，还可以整个修改《合营企业法》。究竟降多少，还可以讨论。市场怎么让，还要研究出一些办法。不外乎两条，一个是让我们现在大量进口的东西，一个是让我们国内市场供应很紧张、很需要的东西。这些将来可以搞个目录，给各地配额。给了配额，和外商谈判就有数了。

第二，扩大沿海地区对外搞经济技术合作的权力，就是扩大它的自主权，不要什么事都到北京来。外商对我们一条很大的意见就是办事太慢。只要权力下放，办事就快。比如天津市，给它划个大框框，里面的事它自己定，不用来北京审批。这样当然办事就快，效率就高。扩大权力的问题，我看这个《纪要》上反映得比较好了。还有些不够的地方，根据大家的意见，会后再研究。

四、根据沿海地区目前的情况，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如何在对外开放中积蓄力量？《纪要》中也讲了，应当把重点首先放到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上，或者兴办

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中小企业。当然也不是说不搞大的，但大量的还是搞中小企业。这十四个进一步开放的港口城市，这样搞，经济效益恐怕会更好一些。不要一下子贪大，兴趣放在投资时间很长的项目上。资本家一开始也是先搞小的，尝到甜头了再搞大的。

五、沿海地区一定要利用进一步开放的条件，在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方面做出贡献。我们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内地和沿海地区发展是不平衡的，沿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好一些，信息也快一些。将来要搞一些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企业，首先要靠沿海地区。也就是说，在迎接新的技术革命中，沿海地区要做出自己的贡献。

听取中国石化总公司工作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七日、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陈锦华[1]等汇报时的谈话要点。

现在高价油卖不出去，你们就发信到乡、镇，直接卖。商业部如果不提货，你们就自己卖，这是我定的，高价油这部分可以产销直接见面，实行市场调节。

对经济效益差的厂，应该关、停、并、转。石化总公司也要实行关、停、并、转。你们效益要是不高的话，那就把原油出口。让经济效益好的炼油厂先吃饱。否则，成立石化总公司就没有意义了。要给效益好的炼油厂多加工一些原油，对效益差的厂停产整顿。

可以从国外引进塑料加工的技术，多搞点塑料。也可以买点技术，要舍得花这个钱，把技术买回来。技贸结合的问题，可以讨论，在没有解决以前，也可以买技术。人才可以请回来，退休的专家，请回来指导。要研究这些问题，买人、买技术。我们有些技术攻关了多少年，攻不下来。如果请回人来，能提前三年就可以产生很好的效益。这些方面，看准了一项、两项，赶快下决心搞，软件、硬件都可以搞。两年前在听化工部汇报的时候，我就答应化工部搞，但到现在没见搞成。燕山石化公司也可以和国外合作，搞加工嘛，花不了多少钱。生产单位可以搞些加工试用，不搞下游产品不行，当然和轻工部要有所分工，但不能截然分开。你们可以搞部分产品，开发新的品种，为了搞好原料综合利用，可以搞产品的加工，也可以搞关联公司，通过关联公司的办法，和轻工部、地方合搞。产品开发是个大事情。

关于一九九〇年乙烯生产规划准备搞到二百万吨问题，上乙烯生产设备钱不够，宁可上海不上，把齐鲁先搞起来，经济效益是第一位的。现在有两个矛盾，一个是财政，一个是经济效益的问题。财政就是紧张，效益还不够。加工多少这是次要问题。搞到一亿五千万吨原油，到底是我们自己吃掉划算，还是出口划算？要算个账，这是个大政策。国家把石油化工看作是生财之道。你们要考虑怎么样出钱，要考虑改造、深加工。还要考虑投入产出的问题，逐年搞个表，每年投入多少，产出多少。如果你们老企业不改造，不搞深加工，你们效益就不大。但是，搞改造、深加工，投人太大也不行，要考虑投入产出的问题。

石油化工总公司要研究一下投入产出，效益要好，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情况下，搞大的产出，下一个五年要有比较大的产出才行。钱到底投到什么地方效益

比较好，这要考虑。上海那套乙烯还能不能再放几年？（答：不行，放久了损失太大。）老厂的改造问题，整顿问题，调整问题要考虑，首先要把效益搞上去，这是投入少、效益高的一条路子。你们要用国际价格来计算，如果还能有盈余，才能够站得住脚，要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经济效益的标准，就是用高价原油还能赚钱，要算这个账。石油化工是个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行业。我们现在是资金密集做到了，但是技术密集没有搞上去。“七五”期间，一定要把技术搞上去，和国外合作，引进技术，改造我们企业落后的那一部分。否则，将来会投入很多，却拿不出很多的效益来。至于加工多少原油，只要解决经济效益问题，就可以吃饱，甚至还进口原油来加工。日本、新加坡，还有些地方不就是靠进口原油搞加工的嘛。没有技术或技术搞不上去的话，不但不能够用进口原油，就是国内的原油也吃不到。

我们不要什么都全部自己搞，可以买关键的部件，自己组装，还是划算的。这次“银河”亿万次计算机，我们引进的只占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都是国产的，看来还是合算的。因此，你们的设备问题也不要什么都国产的，可以买一部分。这样对我们效益还是好的。

设计院必须改成工程公司，和国外可以合作，合作设计。中国配的设备质量差的，材料质量解决不了的，可以进口。设计可以国内外合作，设备也可以国内外采购；国内做的也要用投标的办法，按时交货，就奖励、加成。用招标的办法可以保证时间，保证质量。过去我们为什么上军工配套搞得好？因为有个政治任务在哪里，地方的配套没有这一项，所以质量不行，也不按时，就差了。今后，咱们就搞经济办法，签订合同，质量好的我们就优待，这样尽管多花一点钱，但是对建设单位来讲还是便宜。缩短了周期，保证了质量，经济效益还是好的，宁可多给点钱，真正按合同，我们就加成，这样就有积极性。现在修船，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奖励的办法。前次中曾根[2]来的时候，中日友好医院有个锅炉就盖不起来，后来就包工搞计件，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结果盖起来了，搞上去了。当然，工人干活也不能无限制地干很长时间。大的成套设备的工程必须采用特殊的办法。一是质量，二是时间，质量不能坏，时间不能拖。大型的工程，必须要给点甜头，这样对建设单位的造价还是便宜的。现在有些设备厂，出的产品不好，并不是它技术不能制造，而是不认真。为什么愿意找外国的厂商做总包？关键是通过外国厂商做总包，它认真。这次冶金部搞宝钢二期，它就由西德人总包，技术上他负责，西德人再反过来包给我们的，就会保证质量。我们搞这个事情，一是要给点利，就认真了；军工订货，是政治任务，制造厂比较认真。另外是要派人验收，设备制造过程中要有验收制度，要从头到尾地检查，军工搞订货就是这个样子。宁可我们多花点钱，但是这样比国外的设备还是便宜的。我们所有配套的工程都有这个问题。

上海聚酯短丝设备制造做得不错。现在我们国内有十大设备攻关小组，应当把上海的聚酯短丝设备的经验认真总结一下。

上海那套乙烯，能不能把齐鲁那套搞上去以后再搞？石油化工基建也可以搞

包干。搞二百万吨乙烯，到底怎么搞法，你们考虑一下。按你们的账上缴，多了自己搞，如果有钱，上海也可以包进去。

你们石化总公司至少要发挥关、停、并、转的优势，多搞点钱还是可能的。到底上缴多少？剩下的你们可以多搞些项目。

到一九九〇年你们能不能实现利税二百亿元？你们考虑一下。另外，逐年到底多少？你们搞得多一些就可以搞些计划外的项目。

劳动工资你们可以改。现在国家已经决定：两个半月的奖励免税；发四个月奖金的企业要交给国家百分之三十的税；四至六个月的交百分之百的税；六个月以上的企业交给国家百分之三百。至于说你们内部怎么奖励法，国家不管。你们是搞工资改革，是搞浮动工资，还是搞奖金？由你们自己决定。

企业人员要按需要定编。超编的部分，可以组织他们学习，也可以搞绿化，年纪大的就休息，有些也可以搞卫生。不要把人都堆到车间里。不这样，企业没法紧张起来。要下这个决心，搞定员，能搞出来就好。

石油化工，要用国外贷款，是能贷到的，只要有效益就可以贷款，不受限制，你们可以对外谈。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贷款还没有用，你们可以用这些钱，只要你们还得起账，就可以用。可以搞补偿贸易，也可以买出口原油五百万吨，只付油费，挖潜加工，用余利你们自我壮大。中原油田的油质好，天然气多，全部用在国内搞石油化工，这部分油和气不要出口。中原油田的伴生气和气体的综合利用问题，由计委牵头，石化总公司统筹规划。国家经委百分之三十收回的折旧费，可以返回给你们。利税国家留百分之八十七问题不大。可以考虑利改税以后留给你们百分之十三，可以和田纪云同志商量一下。用包干分成的办法不太好，还是用利改税这个渠道给你们留下百分之十三，无非是把调节税压下来。

你们可以借外债搞些新的技术。另外，要给你们底下的企业相当的自主权，不然你们底下的企业没有动力，归了总公司以后感觉不到什么优越性。把权都收到你们那里去了，底下没有动力，你们总公司也搞不好。

关于借款的问题，借外债的问题，你们好好研究一下，你们石化总公司要借款是有条件的，该借就得借。

石化总公司留百分之十三，原则上可以，就看什么形式，最好用利改税的形式，无非是调节税改一下，上缴利税占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五至百分之八十七，留给你们百分之十三至百分之十五，你们可以设计一下方案。如果利改税以后拿不到这么多，我们就在调节税里想办法改，使你们能拿到百分之十三至百分之十五。油品可以出口，进口材料，工贸结合。外贸上要给你们几个什么权利？要给多少进口设备的额度？现在给沿海几个城市是三千万元以下，进口设备自己就可以批，总公司也得有这样的权。当然不一定有沿海那么大的权，但你们可以利用沿海这个优越条件。

注 释

1．陈锦华（1929—），安徽青阳人。时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曾任纺织部、轻工部政研室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国家体改委主任，国家计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1918—），日本群马县人。时任日本首相。曾任日本众议员，自民党总务会长、干事长，科技厅长官，运输大臣，防卫厅长官，通产大臣，行政管理厅长官。

运用科学技术加快油田发展大有可为*

一九八四年四月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胜利油田听取汇报时的讲话。

我这次到这里来，是想看看在胜利油田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做一些什么事。经过考察，听了你们的汇报，我讲三点意见。

一、我国石油战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石油战线的工作是做得好的，石油部的工作是做得好的。

去年十二月石油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讲了石油战线经过几年工作，出现的可喜变化，提出了今后的工作部署。我们都感到这个报告令人振奋。在一九八○年前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确实有些担心。那时海上石油的勘探才刚开始，将来究竟怎么样，心中无数。而大陆的石油能不能稳定住一亿吨，是逐年递减，还是经过几年工作可以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当时也不落实。现在，四年来的工作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四年石油的产量不仅稳住一亿吨，而且逐年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还为石油工业的新发展作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对此，我们必须充分估计。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探明的地质储量增加了。这是多产油的一个前提条件。吃饭就得找米，有米才能做饭。这几年几乎全国每个油区的地质储量都在向好的方面变化，后备储量增多了，为今后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二，对地质构造规律、找油规律，在认识上提高了一大步。这方面，我们的视野比四年前更广阔，认识的领域和深度都提高了。也就是说，我们找油的本领比以前大了。

第三，找油的装备、技术也都提高了。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有很大关系。通过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和部分关键性的先进设备，使石油工业的装备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从以上可以看出，这四年我们采取一些政策措施，给石油战线一种机会、一

种可能，使它能够稳住产量，准备新的发展。这是完全必要的。由于石油战线全体职工的努力，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已经到来。今后我们的任务是：我国陆上的石油要在稳步增产的基础上，既要为进一步的新发展作充分准备，同时又要力争逐年为国家多作一些贡献。

总的来讲，石油战线在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在三中全会以后的四年中，工作是做得好的，有很大的成绩。当然，从总结经验的角度看，任何时候都还有缺点，还有不足之处，应该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但从总体来讲，中央和国务院交给石油部门的任务，是完成得好的。否则，不可能出现今天这样令人高兴的局面。

二、石油部门要为四化建设、为缓解国家财政困难多作贡献

我国大陆石油正进入一个更大发展的新时期。但是，这个发展，一定要立足在科学的、可靠的基础上。这样才能稳产高产，才有后劲。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地质储量的不足，仍然是石油战线的一个主要问题。因此，加强地质勘探，增加地质储量，仍然是石油战线第一位的任务，是工作的重点。搞石油的几个主要领导同志—秋里、世恩同志以及唐克同志，他们都持这个观点。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

我们要努力增加地质储量，但储量有多大，能拿出多少油，在这样一个领域里，还有很大的潜力。这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不断发生变化，不要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框框。我们开采石油才几十年，经验不算很丰富，水平也不高，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要看到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快，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运用到油田以后，将会极大地提高石油的产量。我们过去在技术比较落后、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所计算的那些数据，将来是会发生变化的。当然，这个变化，要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既不要把已有的数据固定化、绝对化；又不要在没有新的数据之前，把它轻易否定掉。我看不要说得那么死。由于新技术的出现，情况很快会起变化，像过去我们认为没有油的地方，不是找出油了吗？过去认为打到花岗岩就没有希望了，现在不是花岗岩里面也含油吗？认识深化了，技术进步了嘛。我们要不断解放思想，并且要把解放思想和尊重科学结合起来。解放思想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尊重科学，持科学的态度，本身也包含着解放思想的问题。既不要盲目蛮干，又不要把一切东西看得很死。这几年我们利用对外开放的机会，不断地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们找储量，计算储量，找得更快一些，计算得准确一些，提供了很多过去从不具备的有利条件。这方面还大有可为。

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增加地质储量，使油田的大发展建立在科学的、可靠的基础上。这始终是重点。不能说经过这四年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还需要做大量的艰苦工作，任务是长期的。另一方面，从全国四化建设的需要来讲，特别是在六七年内，在“七五”期间，石油战线应当想方设法多出一些油，为国家建设起

个“雪里送炭”的作用。这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全局提出的。

当前我们国家的形势是很好的。无论农业，无论工业，发展的情况都是好的。这几年虽然处在调整时期，仍保持了相当的速度，比我们原来预计的要高，而且经济效益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转。去年就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今年一季度情况继续好转，工业、农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消费品工业都是向前发展的趋势。从国营工业来看，开始基本上做到产值、实现利润和上交税利同步增长。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使我国经济出现的好形势能够持续发展下去，同时又能为九十年代甚至下个世纪初新的发展准备条件。在今后两年和“七五”期间，为了给全国的经济建设在下一个十年，甚至下一个世纪初的发展打下基础，在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能源交通和资源开发方面，需要搞一些规模大、投资多、周期长的骨干工程。比如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就要上。这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工程，在世界上也是数前几位的。建成投产以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将长期起巨大的作用。但是它的建设周期长、投资大，估计要二百多亿元投入，而在近十年内却没有什么产出。还要建几个核电站，宝钢二期也要上，这些大工程每个都是几十亿、上百亿元的投资，要七八年才开始受益。现在电力供应也很紧张，缺电百分之二十左右。再加上国民经济每年要增长百分之六七，缺电的现象就更加突出。这七八年内大的项目要投入，但是还不能产出，不能靠它。那一碗饭虽然很大，很好吃，但离这很远，马上吃不到。人，一天不吃饭不行；工厂，一天没有电也是不行的。长远的应考虑，当前经济增长的需要也应考虑。交通、通讯也是薄弱环节。此外，教育、卫生、环境保护、职工生活等等，都有许多事需要办。但现在我们又恰恰处在一个财政情况比较困难的时期。为了实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我们既要有长远的投资，又要为近期经济不断增长的需要而投入，还要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不断提高，而我们的财政又相当困难，很难担负这么多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对这种情况我讲过三句话：第一形势很好，第二财政困难，第三我们又面临着一个大规模开展建设的时期。矛盾比较集中，需要出台的东西很多，但是门很窄。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怎么能把口子、把门开大一点，让需要出台的能够及时出去。也就是说，要广开生财之道，渡过财政上暂时的困难。

最近，我们研究来研究去，看来在石油上打主意比较现实。我们希望石油战线能在为缓解国家困难方面作出突出的贡献。我看是有条件办到的。因为经过四年来的工作，后备储量的情况有所好转，今后后备储量还会不断增加，是很有希望的。而且，我们还在开发海上石油，万一不行的话，海上总是可以出些油的。近期内，我们有意识地在那些储量较多、能多采油的地方，想办法多采一些油，多作一些贡献，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近期多采一些油，适当加快开采速度，将来有三种可能：一是这一段我们多采一些油，由于我们有后备储量，以后后备储量找到更多，完全不影响今后石油的持续增长。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了。二是这一段多采了一些油，新找到的储量又不那样令人满意，以后的增长速度可能受一些影响，不会更高。三是搞得不好，这一段多采一些油后，过上六七年，又得回头

搞一次我们前面四年作过的工作，再来个积蓄力量，准备条件。我们应当避免这种可能。这里，关键是要在后备储量上下功夫。只要大家努力，我看实现第一种情况是可以做到的。当然，我们近期内多采一些油也不是无限的，还是要选择那些有条件的地方，依托现有油田和它附近储量丰富的油区去搞。这样做不需要搞很多新的基础设施，不需要新修铁路，新建港口，投资省、见效快。在近几年内多采一些油，投入少一些，产出多一些，这对国家的贡献就更大了。前面说过目前国家财政困难，口子就是那么大，如果石油部要投入的盘子很大，那就不能把本来很窄的口子打开，反而使口子更窄了。石油部门这个大个子投入少一些，产出多一些，不硬往外挤，这个口子、这个门就好过了。从全局看，东部油区要加强工作，在老油田和老油田周围多采一些油。这样可能一些油井要缩短服务年限，可以从其它方面想办法去弥补。也有可能，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适当加快一些开采的速度，对老油田的寿命不会有很大影响，那就更好了。

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方针，是从国家的全局出发，从挖掘潜力、缓解财政困难着眼的。我看这是符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的正确方针。

三、胜利油田大有希望

这次到这里以后，大家都感到，几年来胜利油田的工作是做得好的。油田现在的好形势，出人预料之外。记得在一九八○年的时候，大家还有些担心，胜利油田究竟怎么样？是稳住产量，还是继续下降？现在油田的同志们向我们展现出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前景。耀邦同志给胜利油田题词：“建成第二个大庆，献给开国四十年”。这对胜利油田广大职工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寄予很大的期望。胜利油田从党委到全体职工，勇于挑担子，自己给自己加压力，自觉往前赶，为国家分担困难，这是很好的。这种精神状态变成全体职工的统一意志，就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我们认为，胜利油田是大有希望的。

这几天，油田党委书记李晔同志在路上给我讲，他们有个说法，叫做两手抓：一是抓后备储量。油田对这一点很重视，今天油田总地质师刘兴材同志也讲了地质构造、勘探的情况。这里虽然地质复杂一点，是个复合式油气盆地，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对储油、采油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了。这几年，油田大力搞勘探，除了老油区外，又在加紧勘探五号桩和郑家两个新基地。二是抓“精兵巧用”，讲究经济效益。我的理解就是投资少一点，产油多一点，得到最佳的经济效果。这种抓法，我认为是正确的。

我们坚信，全国石油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灿烂的，大陆石油的前景也是光明灿烂的。很有可能，大陆油田的前景并不一定比海上差，甚至比海上更好、更现实一些。胜利油田面积虽然没有大庆大，但从储油构造的深度上看，还有很大潜力。现在讲，要建成一个大庆，将来也可能是两个大庆。至于什么时候办到，要看你们的工作。全国石油队伍和胜利油田的全体职工，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改造主观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聪明，本领也将越来越

大。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将会越来越提高，越来越深入。对自然界来讲，我们将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

最后，祝胜利油田全体职工在向四化进军中，以及在石油战线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能够起到带头作用！

我国石油工业发展潜力很大*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中原油田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前不久我看了《岳阳楼记》，上面有句话："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现在我们国家也可以说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政通人和"是讲政治局势，"百废俱兴"是讲经济文化建设。我们的政治形势很好，经济建设经过调整，各条战线欣欣向荣，正逐步展开大规模的建设。今后一段时间内，为了达到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要准备今后的后劲，需要展开重点建设。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就是财力不足，资金缺乏。我们河南有句土话："罗锅上树，前（钱）紧。"我们讲生财之道，就想到石油这条战线。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就要想办法筹集资金。既要维持今后几年经济逐年增长的速度，同时又为以后十年的发展准备后劲。想来想去，我觉得石油部门在近期内是最能为国家积累资金，帮助国家渡过财政困难的。我在胜利油田讲了石油战线要为国家建设"雪里送炭"。"雪里送炭"和"锦上添花"意义不同。"锦上添花"，多一枝、少一枝差不了多少。而"雪里送炭"，是很急需、也很解决问题的。这是从整个经济建设的全局出发，向石油战线提出的希望。石油工业过去就为国家送过炭。像一九六二年前后，国家非常困难，那时石油工业起步不久，对渡过当时的困难，起了很好的作用。还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经济搞得一团糟，那个局面可以维持下去，没有石油不得了。那些年石油一年一千万吨往上增加。石油工业是在国家很困难的条件下上去的。用你们的话说是"迎着困难上"，如果那时候大庆退下来还得了吗？过去你们是支援了国家的。我们现在的形势不同，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困难。现在是为了发展大好形势，为实现四化进军中遇到的暂时困难。希望石油工业能多出点油来缓解这个困难。

我国石油工业的潜力是很大的。原来寄希望于海上采油，当然海上前景还是好的。现在看，陆上采油的前景也很广阔，很可能陆上比海上更好一些。因此，我们要解放思想，开阔视野。

石油工业要多出油，第一位的工作是要多搞储量，第二是要加快建设，多打井。要多出油，就要多投入。我们要在本世纪末把石油工业搞到相当大的规模，没有相当多的投入不行。但是，近几年内，石油工业要真正为国家多作贡献，帮助国家缓解财政困难，就要很好研究如何做到既要多出油，投入又不要那么多。这对石油工业当然是很高的要求。又要增加后备储量，又要多出点油，而且投入

又不要那么多。石油的产出，除了供你们自己扩大生产之外，必须在近几年内给国家提供相当数量的资金。对石油部的包干，外部条件没有包进去。随着石油的发展，还有外部条件的配套，什么电、公路、铁路，还有港口啊，都需要资金。除了为石油发展配套的资金以外，你们还要能为国家提供资金，多作贡献。这个要求当然是很高的。因此，对石油战线怎么搞，不能只从石油部门本身考虑。从国家的现实状况出发，不仅要考虑本世纪末搞多少油，必须考虑“七五”和“八五”的前期，除了石油工业本身的需要之外，在帮助国家减少财政困难方面如何能够多作贡献。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要求石油战线少投入、多产出、多出油的原因所在。我们相信石油战线对这个要求是一定会做到的。

石油工业要进一步发挥政策的威力，进一步发挥科技的作用。要真正做到少投入，多产出，提高经济效益。正确的经济决策很重要，全国的决策，每个油田生产建设的决策，如何选定突破口，这个仗怎么打，这涉及到经济效益问题。除了正确的决策外，还必须强调靠政策，靠科学技术。

我们要靠实行正确的政策，把石油战线全体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石油战线的政治思想工作有好的传统，还有大庆的岗位责任制，“三老四严”等，都是好的。这些好的传统要继续发扬。除此之外，石油企业内部要实行各种各样的经济责任制。如何搞，如何适合石油系统的具体情况，你们要很好研究。今天早上，宋振明同志给我讲，在钻井队搞改革，纵向搞包干制，横向搞合同制，超额奖励，效果很好。看来，必须把职工的物质利益同企业的经济效益、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挂起钩来，奖勤罚懒，多劳多得。

第一线的钻井工人，试油队，井下作业，这些最艰苦的工种，可以先进行些试点。比如实行超额奖励，节约奖励等，完成任务好、效益高、贡献大的，工资奖金可以高一些。国家要取消奖金封顶，具体办法很快就要发下来。当然不封顶以后，还有一个超额制约的办法，要实行奖金征税。在国家限额以内的不征，超过多的多征。国务院原来考虑建筑、矿山井下、搬运工人，奖金超额不征税。石油系统内有些工人工作很艰苦，像打井的，试油的，还有地震的，还有什么队，也可以不征。你们研究一下，提出方案报国务院。首先使最艰苦工种的工人增加收入。这对工人有利，对国家有利。石油系统应该把大庆的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岗位责任制，同目前全国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办法结合起来。政治思想工作加物质利益，就能有效地把石油战线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发挥出来。

石油要想少投入，多产出，必须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这里我想指出一点，引进技术，中外技术合作，在新形势下需要大大加强。软件也好，咨询也好，关键的先进设备也好，要引进过来，消化吸收，为我所用，使石油战线能够逐步采用先进技术装备。这个领域，我们这几年有许多突破。但是要看到，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到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更新的周期大为缩短，过去是十年一小变，现在是三年一大变。包括物探的技术，打井的技术，采油的技术，都是日新月异，一天一个样。所以，我们应根据我们的特点，我们的需要，选择经

济效益最好的方面，放手来搞，拿来以后对我们有很大的作用。实际上，有些东西价格也并不贵。买技术，买关键设备，可以放手一些，你们也有外汇，这方面要扩大石油部的自主权。

石油战线要少投入，多产出，扩大后备储量。这是首要的，是基础。除此以外，还有两条很重要：一是要抓一批高产井，二是要在提高单井产量上下功夫。这也是个设备、技术、工艺问题。当然还有管理水平、政策问题。昨天晚上同专家们座谈，他们就提出买电动潜油泵，一台七万到八万美元，进口一千台，只有七千万至八千万美元。首先选好井，选资源条件好的把它安装上，按一口井平均日增产三十吨算，一年就可多采油一千万吨，按一半算也是五百万吨。五百万吨，就是一亿美元，当然也还得扣除成本。这是很有利的。听说安装也不难，一口井几天就可以改。还有测井、压裂、酸化、采油等方面，也要重视引进先进技术。这可能是个好的办法。今天出个题目，你们再研究一下。总之，要运用先进的工艺、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装备、先进的管理，还有正确的经济政策，来提高石油的产量。一个是打出一批高产井，一个是现有油井中选择资源条件好的，加以武装，提高单井产油量。这样就可以收到少投入、多产出之效。

最后，我对中原油田说几句话。中原油田这几年的工作做得是好的。现在干部、职工情绪高涨，干劲很大，充满信心。中原油田确实是前景很好的地方，完全有条件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原油田的发展，也是出乎原来预料，我们都感到高兴，满意。我同意专家们的意见。专家们也认为中原油田计划在一九九〇年产油一千万吨有把握，一千五百万吨很有可能。你们按争取一千五百万吨来安排工作，很有可能实现，甚至可能超过。但是，根据我们历来的经验，把余地留给你们。

这里特别说一下，你们这里工农共建文明村、文明矿的经验很好，对整个工矿企业有普遍意义，尤其是对远离城市以外的工矿企业有普遍意义。经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四人帮”的破坏，工农关系普遍紧张。现在虽然有所好转，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你们开展精神文明教育，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实行联防承包责任制，对油区及附近乡村实行综合治理，正确处理工农矛盾，密切了工农关系，改善了油区的社会秩序，促进了油田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个经验对四化建设非常可贵。当然，许多方面的工作要结合起来，如打击经济犯罪、打击刑事犯罪等，使它互相配套。这个经验报纸宣传过一下，还有进一步总结、宣传、推广的必要。我们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希望中原油田全体职工继续努力，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听取建材工业发展纲要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

现在国内旅游宾馆用的卫生陶瓷和其它新型建筑材料大多是进口的，我们生产的不行，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还须下很大功夫。要把质量、品种搞上去也不难，关键是建材工业要有搞活的政策。应采取招标办法，从进口卫生陶瓷、装饰材料花费的外汇中拿出百分之七十在国内招标组织生产，产品按国际价格计价，这样一定有人干，在三年内肯定能搞上去。高档的建筑卫生陶瓷、建筑小五金和灯具、室内装修材料等，这些产品工艺并不复杂，但批量小、产值小，如果没有特殊政策，就没有人愿意干。现在由一些小厂粗制滥造，搞出来在旅游宾馆不能用，结果只好大批进口。这种情况应该改变。连国防用的特种陶瓷我们都能搞出来，为什么卫生陶瓷搞不上去？高档的东西生产批量不大，要像组织军工产品那样，当作重要任务去完成。除了解决价格问题以外，还要采取与外商合作经营的办法，引进一些技术，并组织专门班子去抓，这样就可以做到“三年小配套，五年大配套”。

上次我到新型建材公司座谈时确定的几件事落实了没有？（杜恩训同志：正在落实。祁峻同志：今年给的两个三千万元花不出去，主要是体制和政策问题。）发展新材料这件事，是四年前小平同志确定了的。我去年11月去紫竹院看过，当时确定新型建材公司要跳出现有的框框，给它很大的自主权。为什么还落实不了，到底有什么问题？要很快搞个班子，选个年轻的同志当经理。

我记起上次到新材料公司时，有个体制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那时我说放在建材局下面，但要求局放开手，给公司很大的自主权。如果处理得好，没有问题。现在看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请吕东同志抓一下，研究怎样解决好。

我们的一些部门处理问题不是从事业出发，而是看重你管我管，把很多事情都耽误了。去年我去新材料公司座谈时，曾确定公司是建材局领导下的一个单位，但给它很大的自主权。当时也考虑到公司的问题还要不要经过建材局党组讨论？能不能和计委、经委等直接挂钩？公司完全离开建材局有困难，很多事还要建材局支持，离开了要扯皮。不离开局，公司自主权又可能受到限制。我当时讲不离开建材局，但要放开手让公司搞。如果把公司和局分开，就会形成两个建材局；如果不分开，公司的工作又可能受影响。这个问题，请吕东同志把它进一步解决好。

你们收企业的几条理由站不住脚。纺织行业技术改造搞得最好，它的厂都在地方。机械厂也不一定收，可以与工厂签订合同嘛！小化肥这几年也搞得好，企业也在地方。国务院各部门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发挥行业管理作用，越有直属企业越不能起行业管理作用。中央部门主要应起行业管理作用，一年抓几件大事。我看你们文件后面还有收企业的意思。不要收企业。要改变过去那些老的做法。

你们的利不算低：一年税利四十五亿元，去年利润比前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七。利改税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可以实行两种价格，超产加价，要想法把建材工业搞活。我感到你们这个纲要没有着眼于研究分析建材工业当前存在什么主要问题，要采取什么重大方针、政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加快建材工业的发展，改变落后状况；而是提出不少大指标，着重讲要搞多大产量，要多少投资。十七年后的指标定多大，现在定不了，等以后在“七五”、“八五”规划里才能确定。你们讲这些，不大符合我去年八月讲十个问题的精神。搞纲要不同于搞规划。当然你们也提出了一些好意见，但是提得不集中，很分散。比较起来，建筑业那个纲要抓住了几个大问题。李锡铭同志，你是建筑、建材纲要领导小组组长，看来你们两家纲要是各搞各的。

（李锡铭同志：开始是一起座谈的，以后两家分头起草。本来准备合在一起再研究一下，以后因为整党没有时间。）

整党同业务两不误嘛！历来有这个经验：各部门各搞各的，文件是不可能搞得好的。各自都想趁机会要钱要物，而不是从全局来考虑问题。浮法生产玻璃上的争论解决了没有？听说有一种意见，认为浮法不适于生产二、三毫米的玻璃，而现在最急需的是玻璃。是这样吗？（杜恩训、祁峻同志作了回答。当汇报到对利用工业废渣的产品应减、免税时）减、免税是什么意思？现在建材利用工业废渣生产多少产品？利用工业废渣作原料搞低标号水泥，一年用多少？（大家作了回答。）

（当汇报到省、市建材机构紊乱，要求恢复省、市建材局时）这个问题就不要讲了。我看“紊乱”一点好。不一定建材机构“紊乱”的地方建材就发展慢，不“紊乱”的地方就发展快。你们去年机构有了变化，利润不是增长27%吗！我看机构是可以变化的，目前机构“乱”一些不是什么问题。

（当汇报到企业多头领导时）多头领导不好，一个头领导我赞成，但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搞又是恢复五十年代的办法，这不行。

（李锡铭同志：上次建筑业汇报时，提出要成立一个农房材料配套公司，是民办的，可以吸收农民投资。）不能是农民办的，应该是国家办的，这样才能把农民的钱回笼到国家手里。要搞通渠道，搞市场调节。这个问题要专门研究一下。

今天先定几件事：

第一，农房材料公司问题。这件事谁都可以搞，社队也可以搞。现在要定的问题是国家的公司搞一个好，还是搞几个好？搞公司，主要问题是材料而不是资金。资金可以由银行贷款，给予优惠。公司要对农村成套供应建房材料和制品。

供应的办法是搞市场调节，不是按国家牌价，而是“高来高去”。农民现在实际上也是买高价材料，只是大部分钱没有回到国家手里。要给这个公司很大的自主权。农民手里钱很多，在若干年内，光靠日用消费品不可能把那么多钱收回来。建筑材料农民很需要，可以回笼很多货币。

现在国家一年供应给农民十万吨建房钢材不够，可以多拨一点，还可以专门进口点钢材。玻璃也要多拨一点给农房材料公司，多搞些市场调节。公司大家都有可以办，搞多渠道。但是要有个主渠道。主渠道是依靠建设部好，还是建材局好？

（建设部、建材局、物资局都讲了自己搞公司的优势。）

那就由建设部和国家建材局各搞一个公司吧！物资局供应他们钢材、水泥，价钱可以高一些。各方面都要支持他们把公司办好。要定几条政策，给公司创造条件。

国家办的公司，一不搞垄断，二要搞市场调节。对乡镇工业和其他部门搞农房材料不要排斥，不要阻挠、干涉。要多渠道，少环节，避免中间环节牟利过多。吴明瑜曾提出这个公司还可以包建房屋。今后要打破部门界限，建筑部门可以搞建材，建材部门可以搞建筑。

第二，建筑业的问题。建筑业要搞较大的改革，有步骤地进行。一是搞招标承包制，先从大城市实行；二是实行包工包料，材料归承包单位，不归发包单位。物资部门可以拨指标给甲方，拨物资给乙方。银行拨给流动资金。这样搞，材料便于调剂，有利于节约；三是改革劳动制度，搞民工，农民可以进城；四是有条件的地方搞统一开发，从基础设施到整体工程全部建成好后交钥匙。搞招标和包工包料，不可能全靠国家供材料，不能提“不留缺口”。不足部分还得靠市场调节，由建筑部门一家去解决，不用千家万户跑材料，总的说对社会是个大节约；五是建筑部门内部实行经济责任制，搞施工队包干，奖金不封顶、不保底，等等。有关建筑业改革的问题，由国家计委牵头研究解决。

第三，建材工业的问题。建材工业目前要大改革还不可能。主要考虑解决下面几个问题：一是农房材料问题；二是发展新型建筑材料和新材料公司体制问题；三是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问题。要给建材以活力，要拟定几条促进建材工业发展的行得通的措施。

建材的问题由经委吕东同志牵头研究解决。这两个行业的纲要研究好了，再谈一次。

在庆祝我国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

同志们：

我国试验通信卫星的发射已经获得了圆满成功。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都为之欢欣鼓舞，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取得了这一新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所有为这项工程的研制、试验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各单位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我国第一次进行通信卫星发射试验成功，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敢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信心和勇气。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已经跨入了世界的先进行列。我们取得这次试验的胜利，就有可能为改善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的现状，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开拓广阔的前景。它对于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实现四化建设的总目标，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道路上顽强拼搏，取得了很多新的科技成果。一九八○年，你们取得了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的胜利。一九八二年，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一九八三年，“银河”亿次电子计算机通过了国家鉴定。今年，又传来了成功地发射通信卫星的喜讯。所有这些成果，也是各有关部委和有关科研院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数以千计的单位，数以万计的科技工作者、工人、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晶。

这一系列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力协同，联合攻关，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解决重大科技课题的有效的组织形式。尽管我们国家的科技力量比较薄弱，但是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我们善于把各方面、各部门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明确分工，密切合作，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就可以形成巨大的优势，许多本来无法解决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现在，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客观条件比过去好得多了。我们应该在新的情况下，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地组织协作攻关，用以解决四化建设中具有重大效

益的关键性的科技课题，迎接新的技术革命。

这一系列实践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要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必须尊重科学，尊重知识，使广大科技工作者人尽其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各部门、各地区，都应当进一步肃清“左”的思想影响，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同时，我们也希望各条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树立为祖国争光的雄心壮志，坚持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优异成绩。

同志们！你们的成就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赞扬。希望你们认真总结经验，戒骄戒躁，再接再励，为攀登科学技术新高峰，为把更多的科研成果用于经济建设，为祖国四化建设宏伟目标早日实现，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深化改革搞活企业*

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汇报时的讲话。

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要简单明了，赶快出台

我们搞个文件，就是为了能够执行，不能够执行的东西就别提。你们（指经委）搞了这么个大本子怎么执行？我看只要简单明了，搞个一、二、三、四、五，就行了。不讲虚的，要实的东西，规定性的东西。

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本来是可以办的，许多措施也是可以执行的，但是你把问题的范围一扩大，必然引起争论，争来争去半年也出不了台。这同我的原意不一致。我的意思是，简单明了，赶快出台。

比如，你们在文件上讲“国家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应由下达计划的主管部门认真做好各项计划指标的综合平衡，并保证相应的物质条件”。这一条就做不到。其实有一句话就行了：完成国家计划以外的超产部分，可以全部留给企业或者分成，由企业自己做主，换东西也可以，议价出售也可以。当然，生活资料不能涨价。我看有这么一句话就行了，不要讲那么多的废话。我在广东工作时，广州市的工业生产，只有百分之六十的物资是国家给的，百分之四十是自己解决的。那么多年没有给足物资，它的计划也完成了嘛！你们讲得虽然有道理，但是行不通。何况，什么是指令性计划，什么是指导性计划，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不能把那些理论上的争论拿到这里来解决。否则，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写那些实质性的问题，既解决问题，又没有争论，定下来，马上发下去。至于计划怎么制订得更科学，怎么下达，这些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等到这些都解决了，我们的计划体制改革也就完成了。

二、要给企业一点实惠的、能拿到手的权力

优质优价、季节差价我是赞成的，但是不要在这个文件里提。现在要解决的，是企业超产自销那一部分，准不准议价？能否纳入市场调节？企业争自销权，无非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国家不收购、又不准它自己销售的问题；

一个是解决价格上的不合理，它自己销售，价格就可以浮动。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做起来很简单。

在价格问题上，要注意，不要出现大的浮动。现在货币这么多，购买力这么强，计划外的市场调节了，计划内的价格再浮动，极容易引起社会上的不安和反对。对这个问题要十分注意。我们说的浮动，是指计划完成后超产那一部分，而且是指生产资料。实质上就是搞两种价格，就像对农民那样，完成国家计划后，可以议价自销。至于优质优价，这个很难讲，因为价格同供求关系有直接联系。如手扶拖拉机，现在供应很紧张，出厂后一抢而光，它不一定都是优质的。所以，价格怎样浮动，有个供求关系问题。只要供不应求，价格就要向上浮动。现在我们要解决的不是价格体系如何改革，怎么定价才合理，而是解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小配套”问题。把能够解决的先定下来，没有把握的先不要写进去。有的将来可能解决，但现在还不成熟。如果都要写进去，很可能把现在能够解决的问题也拖住了；或者勉强执行，出了乱子又得退回去。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给企业一点能够拿到手的、实惠的权力。优质优价、季节差价都不属于扩权问题，而是价格政策问题。属于企业扩权的主要是个自销权。自销权可以给两条：一条是国家不收购的允许自销。比如高价油，我这次在山东就碰到这个情况。炼油厂积压很多高价油，商业部门不收，农民要求买又买不到。我就在那儿开了个口，让炼油厂自销，农民、渔民都可以买，市场调节，敞开供应，卖完为止。第二条是属于国家调拨的物资，完成计划以后的超产部分，可以自销，计划内的也可以按一定比例自销。自销产品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实行价格浮动，可以向高浮动，也可以向低浮动。有这两条，企业就比现在活多了。

三、不能因为外部条件未解决而影响企业内部改革

我们企业的外部条件，有许多是一下子解决不了的。但不能因为外部条件解决不了，企业内部问题就不解决。比如，我们每年都要有四、五十万复员转业军人安排到地方，许多人都要安排到企业里去。这个问题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需要从长计议。但是，不能因此就影响企业内部、车间、班组实行定员定额。也不能因为我企业人多就不接受。企业内部可以组织多余人员搞劳动服务。

四、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对待企业办社会的问题

我们国家在劳动力安排上的根本问题还是就业问题。我们的国情不同于苏联，我们不是因为劳动力不足而鼓励企业节约劳动力，而是要在劳动力富裕的情况下，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多余劳动力还要解决就业和吃饭问题。所以，把企业减少用人而省下来的工资额留给企业用于工资改革的办法，虽然会把企业的多余人员减下来，但是减下来的人还得另外发工资，这部分人的工资从哪

里出？这不是要另外增加开支吗？所以，只往外调人而不调减工资总额的办法恐怕行不通。当然，搞些试点我不反对，但都这样干，就有问题了。

我们的企业要不要办社会？这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要老抱着一个固定的观念，就是企业不能办社会。恐怕企业办社会可能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们查一查，过去中国华侨到美国淘金的时候，哪一个淘金企业不包社会？去年我到加拿大，看到一个很先进的企业，就是办社会；澳大利亚的米德尔曼特煤矿，整个一座城市都是这个煤矿建起来的，占了煤矿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职工住房的房租都是煤矿补贴的，个人拿的租金很少。如果它不办，工人就不上它那儿去。我们考虑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鉴于中国的劳动力多，比较实际的办法，是企业把多余的工人组织起来，做各种各样的安排，使之各得其所，开辟生产门路，开辟生活门路。这比拿到社会上去解决要可靠得多，也比较容易解决。如组织服务公司，搞服务行业。至少在今天，企业办社会，不一定就是错误的东西，中国的大庆就做通了，搞“五·七”家属队。大庆就是包社会，它不包谁给它包？企业也可以搞多种经营嘛！外国的大托拉斯也是什么都搞嘛！一些跨国公司也是什么都搞。工厂有很多优势，领导也强，还有技术力量，边角余料也多，可以组织各种行业。当然，绝不要塞到原来车间、班组里边去混岗。而是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也要企业化。澡堂、食堂、礼堂、汽车队等等，都可以对外开放，使之企业化、社会化，既为本企业服务，又为社会上服务。这样下去，也可能走出一条路。不然，老讲企业不办社会，也解决不了。

五、关于厂长负责制

实行厂长负责制，我看没什么大问题。但是，现在搞什么样的厂长负责制，是五十年代的，还是苏联那样的？我认为都不行。我们很需要注意一下南斯拉夫以及匈牙利的提法。南斯拉夫提的是两条：一条是反对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高度集中管理。这一点我们也在改，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二是强调工人自治，这个我们不能采取。匈牙利最近很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强调工人参加管理的作用。对这一点我们要注意。最近，保加利亚日夫科夫[1]发表了一篇讲话，他说全民所有制企业要把所有者和经营者分开，国家是所有者不是经营者，经营者是企业，包括车间。当然也讲了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也讲到了企业的独立的法人地位。他还说全民所有制不一定就要国家的高度集中管理，要把所有制和管理分开。这些和我们这两三年来所想的问题是大体相同的。我觉得我们的企业，第一个就是要明确党委的作用。应当明确地讲，企业党委就是起保证作用，就是管党务工作，管思想政治工作，不是什么都统一领导于党委，不是党委一元化领导。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企业，总要体现社会主义性质，总要体现工人当家作主，明确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不如此，完全把权力集中在厂长一个人身上，是要出问题的。过去毛主席总强调工人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强调工人政治上的地位，参加管理。不强调按劳分配，当然不行。但是反过来，在实行按劳

分配以后，不使工人在政治上感到在企业中有发言权，工人的长期、持久的积极性也不能保持。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企业管理方法，也讲工人参加管理，提合理化建议。因此，我建议搞厂长负责制试点的企业，要注意体现工人当家作主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企业的改革方向问题。不然的话，我们的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有什么区别！过去，不能很好地体现工人当家作主。现在我们把企业的权力扩大了，如果工人和厂长还是简单的“雇佣关系”，除了多劳多分配，其他方面体现不出工人当家作主，我看不行。究竟怎么体现？应当同厂长负责制同时加以考虑。

六、权放一格

权放一格，就是层层把权力下移一格。总的意思是把一些批准权，原来属于国家计委的，可以放一些给省、市和部里，原来属于省、市和各部的，可以下放给局一级；原来属于局的，可以放给公司；原来属于公司的可以放给企业。下放一格，当然，如何放，还要具体化。

关于人事管理权，书记处会议已经定了原则：企业的上一级，只管企业的书记、厂长或者只管企业的领导班子。企业的副书记、副厂长，或者企业内部的中层干部，都由企业自己定。是书记定、厂长定，还是企业党委定，还可以再研究。因为现在还没有实行厂长负责制，企业还是党委书记当家。不管你这个企业是部管的、地方管的，上一级只管书记、厂长两个人，或者管一个班子。

企业内部机构设置，企业完全可以按照实际需要自己决定，上级机关不得干预。

七、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

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是：计划是必须坚持的，在这个基础上放开一些，出不了什么毛病。农村四年多的改革经验已经证明，放开以后东西就多了。老是怕这怕那是不行的，要解放思想。我们的社会潜力很大，煤炭有潜力，铁路也有潜力。江苏买一百五十元一吨的煤，也没有天下大乱，反而把江苏的工业逼上去了，这有什么不好呀？一部分物资实行市场调节以后，显然我们的计划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占领一切阵地了，但是我们还可以搞一个预测嘛！比如，我们的年计划的增长幅度可以订到百分之六，预测可能达到百分之八。我也不按预测给材料、给东西，我也不按预测调东西。计划外的就属于市场调节的范围了。

我们这四年多来，搞来搞去，有点路子了。如果说有点乱的话，看来是乱中有治。就像一股水，冲来冲去，有的渠道不行了，有的渠道需要改进，有些渠道看来是可以的，就要因势利导，这个渠道还可以扩大。比如山西稿经济煤就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小煤窑，一九八二年放开了以后，一九八三年一下子就增产四千

九百万吨，其中有二千多万吨是小煤窑的。如果从原来我们那个计划观点来看，这就是乱；但从国民经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来看，这就是治。小矛盾肯定有，有也不怕。我看，就是物资局同志讲的那个意见，给你煤矿规定每年增长百分之几，比如百分之三，百分之三以外超产的是你的，我不要，让你搞经济煤。至于价格提高多少，可以研究。东西多了以后，价格就可以稳住。在农贸市场，粮食放开以后就证明了这一点。对于物资管理和分配，一个是紧俏的东西实行递增包干，超过了的留给企业，有的也可以分成，上交多少留多少。再一个，国家没有计划的，或者国家不收购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安排。即使国家有计划，但国家商业部门、物资部门不收，自己又销不出去的，企业可以不生产，转产别的东西。这是当前企业扩大计划权的两个关键问题。没有什么可怕的。最多不过是它蚕食国家计划，不要紧嘛，我们还可以反蚕食。最后，东西还是多了。有些消费品，比如名牌自行车，你超产了，国家也不多调你的，但不能涨价，你可以用它去换东西，搞协作，多换点原材料。也可以进口一些材料，亏损自己负责。生产资料超产的，可以实行价格浮动。企业活了，对国家也没有多大损失。过几年生产上去了，我可以再调一次基数。总之，我们要千方百计为解放生产力而奋斗。要让企业把劲用在自己多发展生产上。计划内的不能削弱，这方面还要逐年增加一些；计划外的让企业努力增产一些，适当增加市场调节的部分。

今后我们的经济究竟怎么搞，我看是要从实践中去解决。实践证明这样搞是有效果的，它就是正确的，就是符合中国特点的。当然，这样搞可能有矛盾，但矛盾既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要进行分析。如果都躺在国家身上，都不计较，那就会死水一潭。你们看江苏搞得那么活，老百姓是满意的。如果按我们原来那个框框搞，江苏的生产一下子就得下降一大块。

注 释

1．日夫科夫（Todor Hristov Zhivkov，1911—1995），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1989年被解职，1992年被判七年监禁，1996年被无罪释放，1998年5月病逝。

应用科研单位应实行
有偿合同制和课题承包制*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对赵东宛关于湖南株洲市电子所等技术开发科研单位实行有偿合同制情况报告的批语。

株洲电子所试行的对外实行有偿合同制，对内实行课题承包制，经费由国家事业费开支改为经济自立，是科研单位，特别是一切从事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的科研单位改革的方向。抓住了这一关键，科研单位长期存在的各种弊病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应积极推广。国家应给予从事改革的科研单位以大力支持。文件中所提出的几条建议，原则上都是可行的。请国务院科技小组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尽快予以落实。株洲电子所的经验应公开报道，并就此发一评论。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

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国内建设

根据一九八三年六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各级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一年来，我国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形势的发展很好。

国民经济在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中稳步前进。一九八三年，农业生产在连续四年增产的基础上又获得大丰收。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商品率高的专业户成批涌现，农民自愿组织的有各种内容的经济联合体日益增多，广大农村欣欣向荣。轻重工业协调发展，能源生产稳步上升，交通运输量进一步增长，经济效益也有所提高。基本建设的投资结构有了改善，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进度加快。国内市场繁荣活跃，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有新的进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一九八三年，职工家庭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费收入达到五百二十六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四；农民按人口平均的纯收入达到三百零九点八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七。一九八三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点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九点五，工农业总产值以及粮食、棉花、原煤、原油、钢、钢材、生铁、水泥、化肥等三十多种主要产品产量，提前两年达到或超过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八五年指示。今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生产增长速度，上交利税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一定能够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

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试验通信卫星的研制、发射和定点成功，表明我国航天技术、电子技术和材料科学有了新的突破，对于实现通信、广播和电视转播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普通高等学校、各类成人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规模继续扩大。与此同时，各种函授刊授学校、广播电视学校、职工轮训学校和农民技术学

校大量兴办，职工自己组织的读书活动蓬勃开展，无论城市和农村都正在掀起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的热潮。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社会科学研究等部门，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出现了一批深刻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创造性生活的优秀作品和成果。体育、卫生事业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对改善人民健康状况和提高人口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大家知道，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去年举行的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曾经指出思想文化领域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随后，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和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又进一步着重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思想文化领域各部门按照国家宪法规定的原则以及党和政府规定的正确政策，为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刹住了前一时期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依法查禁了淫秽书刊。在反对精神污染中，由于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作法，但一经发现，我们就及时予以纠正。群众要求美化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完全正当的，是应当提倡的，决不允许把它同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混淆起来。实践证明，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发扬健康纯朴、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具有积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

政权和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情况明显好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行政公署、省辖市政府机构的改革基本完成，县级政府的机构改革和政企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在全国陆续展开。经济立法和行政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果。根据一九八三年九月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全国依法开展了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收到了很大效果，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既保护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和安全，又教育挽救了一批失足的青少年。这场斗争，维护了法制的尊严，保障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已取得巨大的成绩，今后要进一步同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其它措施配合进行。我们相信，经过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必将根本好转。

我国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新的进展，国防更加巩固。部队深入进行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军事训练和后勤建设，开展学习科学文化、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活动，提高了素质，增强了战斗力。人民解放军积极参加和大力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蓬勃开展，军政、军民的亲密关系不断得到发展。

一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健康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巩固。通过实践，全国各族人民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拥护，对实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

标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前景更加充满信心。

各位代表！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根据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艰苦奋斗，更加扎扎实实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而在各项工作中，中心的任务仍然是要把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我们还存在不少困难。经济效益虽开始有所提高，但仍不理想。至关重要的是经济关系没有很好理顺，特别是价格体系不合理，而短期内又不具备全面改革的条件，这对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影响极大，国家财政补贴负担很重，中央财政相当困难。我们面临着开展大规模建设的任务，但资金不足，矛盾比较集中，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决不能因为总的形势很好而掉以轻心。为了搞好重点建设，理顺经济关系，实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我们要有为长远发展所需的投资，又要有为近期经济增长所需的投资，还要使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提高，要办的事很多，而国家财力有限，这就需要挖掘潜力，提高效益，广开财源，善于运筹。特别是在近几年内，要做到少投入，多产出，以缓解国家财政困难。为此，各行各业都要继续搞好整顿，努力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厉行增产节约，在扭亏增盈方面做出显著成绩，做到工业产值、实现利润和上交税利三者同步增长。要继续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总规模，集中财力物力加强重点建设，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并力争用较少的投资和较短的时间取得更大的经济效果。在能源、交通建设的安排上，要坚持大中小相结合、长期和短期兼顾的方针，并正确处理新建和改造、扩建、挖潜的关系，在建设大型骨干项目的同时，根据可能条件，适当加快现有矿区、油田的开采速度。要鼓励地方和群众把相当一部分财力、物力用于中小型能源、交通和通信项目的建设。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顺利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既可以保证国民经济近期的稳定增长，又能够保持后劲，为今后经济的振兴打好基础。

国务院认为，今后在经济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件大事。农村改革，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发展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继续改善农业结构，支持农民积极扩大商品生产。城市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要从解决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入手，把适合于当前情况的各项改革措施初步配起套来，同步进行。这里着重讲以下几个问题。

一、认真地有步骤地改革城市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端，更好地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当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课题，是要彻底改变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职工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状况，做到企业不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不吃企业的“大锅饭”。

首先要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既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又要使企业在经营管理和发展上有一定的财力保证和自主权。近几年，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革试点。实践证明，在国营企业实行以税代利的制度，

较之其它办法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去年已经实行了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务院决定，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进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从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具体做法是：合理调整产品税税率，增设资源税、增值税和几种地方税，在征收所得税后，区别不同情况征收调节税，税后利润留归企业支配。国营小型企业，可以实行集体承包或个人承包、租赁经营，也可以依照集体企业的办法向国家交纳税金。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一，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用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国家财政收入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稳定增长；第二，企业将从新增加的利润中得到较多的收益，从而增强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动力；第三，通过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可以缓解目前价格不合理带来的矛盾，使企业在利润悬殊状况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开展竞争，有利于鼓励先进，鞭策落后；第四，企业不再按行政隶属关系上交利润，有利于合理解决"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以税代利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坚决把这项改革搞好。

实行利改税后，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基本得到解决，这就为打破企业内部的"大锅饭"创造了前提条件。在每个企业内部，都要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严格规定职工必须完成的任务，严格按照职工劳动成果给予相应的报酬，把职工收入的高低同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贡献大小紧密联系起来，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向国家照章纳税以后，企业对工资奖金的发放有自主权。企业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按分计奖、计件工资、浮动工资或职务工资、岗位津贴等多种形式。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自费工资改革。对职工的奖金，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办法，即企业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税利比上年增加，就可以相应增加奖金；企业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税利减少的，要减发或停发奖金，直到扣发部分工资。企业发放奖金超过一定限额，除劳动强度大的矿山采掘、搬运和建筑行业外，国家要向企业征收奖金税，以防止消费基金的增长失去控制。上述办法，目前先在领导班子强、生产正常、内部经济责任制比较健全的企业中试行，随着利改税第二步的实施，再全面推广。

为了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必须相应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国务院已经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十个方面，给企业以应有的权力。在国营企业中逐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的生产指挥、经营管理由国家委托厂长（经理）全权负责。与此同时，必须采取一系列有效办法，切实保障职工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审定企业重大决策、保障职工权益等方面发挥它的作用，充分体现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这是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特征。

实行利改税，建立企业内部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职工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的一

次较大的调整。各部门、各地区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简政放权，纠正和防止对企业不应有的干预，尊重企业的自主权，支持厂长行使职权，把企业办好。同时，要改进国家的计划指导，发挥财政、税务、物价、银行、审计、统计、工商行政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对违反财经纪律的，要严肃处理。真正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

二、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的管理体制，大力提高投资效益。

建筑业的经济效益如何，对整个国民经济关系极大。长期以来，建筑业缺乏独立经营的必要条件，普遍存在着工期长，消耗高，浪费大，技术上不求进步等问题。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会严重影响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城乡人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建筑业历来有承包的传统，任务比较明确，国家同企业的关系比较容易划分清楚，牵动面较小，加以建筑产品的销路有保证，因此，在城市各业中，建筑业可以首先进行全行业的改革。建筑业的改革，要围绕缩短工期、降低造价、提高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来进行。关键是要推行投资包干制和招标承包制。

今后，凡是有条件的建设项目，都要签订投资包干协议，由建设单位对国家全面负责。凡是有偿还能力的项目，都要按照资金有偿使用的原则，改财政拨款为银行贷款。国家将投资包干协议规定的总金额拨给建设银行，由建设银行根据工程进度，按实际需要付款，在不超过投资总额的前提下，可以不受年度的限制。要制订鼓励缩短工期、节约投资、提前投产和达到设计能力的政策。由于提前竣工而节约的资金，应归承包单位。由于延误工期而多贷的资金，由承包单位负担。这样既可以提高建设单位、承包单位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又可以发挥建设银行统一调剂资金的作用。

要积极推行以招标承包为核心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凡重要工程和城市开发建设的承发包，都必须进行招标、投标。在国家统一计划和监督下，由发包单位通过招标，择优选用设计、施工单位。国营和集体的设计、施工单位，不论来自哪个地区、哪个部门，经审查合格后都可以参加投标。要鼓励竞争，防止垄断。

要着手组建多种形式的工程承包公司和综合开发公司。工业、交通等生产性建设项目由专业性的工程承包公司投标，从可行性研究、设计、设备配套、工程施工到竣工试车进行全过程的总承包；然后再由工程承包公司向各设计、施工、设备供应单位招标，签订分包经济合同。城市住宅区、新建工矿区及其公共设施工程的建设，由开发公司承包，按照城镇总体规划，统一办理土地征用事宜，进行设计和配套建设。要保证承包企业的法人地位，给以必要的自主权。上级行政部门不得干预其正常的经济活动，同时要切实加强质量监督和财务监督。

在整个工程、整个开发区实行承包后，建筑企业内部还应当结合自己的特点，落实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比如工业、交通项目实行施工图预算包干，民用建筑按最终产品实行小区包干、栋号包干，对建筑企业实行按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等。

要改革建筑材料供应方式，实行包工包料。过去材料供应环节多，层层设

库，余缺不能调剂，经常处于停工待料的被动状态。今后应逐步改为由物资部门将材料直接供应给承包单位，并相应改革材料和设备订货程序。与此同时，要允许一部分材料和设备实行市场调节。

目前国营建筑企业固定职工的比例，已由五十年代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管理机构和后方基地庞大，生产第一线人员很少，包袱重，拉不动，改革用工制度势在必行。要逐步降低固定工的比例，大大提高临时工、季节工的比重，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要允许农村民工建筑队伍到城市参加投标，承包施工。

设计是整个工程的灵魂。要改革设计工作，积极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修改不合理的设计规范，制订新的标准、定额。设计单位要逐步向企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设计中，不仅要注意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安全性，而且要十分注意经济效益。要实行严格的技术、经济责任制，调动设计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要处理好多样化和标准化的关系，改变建筑造型千篇一律的状况。对有重要贡献的设计人员应予特殊奖励。

城市住宅建设，要进一步推行商品化试点，开展房地产经营业务，通过多种途径，增加资金来源，逐步缓和城市住房的紧张状况。

在基本建设的管理上，必须简化审批程序，下放审批权限，减少环节，提高效率。今后除限额以上、需要国家计委综合平衡的项目，报国家审批以外，其余的实行分级管理、分级平衡。需要国家审批的，国家计委拟将过去的五道手续简化为两道手续，即只审批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有关单位在设计任务书批准后，即可先行询价和预订货。

我们相信只要把以上一系列改革工作做好了，建筑业的面貌就会改观，投资效益就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三、改革流通体制，疏通流通渠道，做到货畅其流。

我国现行的商业体制，是在过去商品经济不发达、商品供应紧张和对资本主义商业、个体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在，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大多数农产品、工业品日益丰富，面临着开拓市场、扩大销路的新课题。如果不根据新的形势改革流通体制，目前农村和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卖难买难问题将很难解决，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必须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适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要求，本着促进生产、服务人民的精神，把原有的按行政区划、行政层次统一收购和供货商品的流通体制，改变为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形成城乡畅通、地区交流、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流通网络，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

农副产品要有计划地减少统购派购产品的品种和数量，扩大自由购销的范围。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副产品，在保证完成国家收购计划的前提下，实行多渠道经营，允许长途贩运；一般农副产品的购销，更要随着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放活，随行就市，灵活经营。国营商业和供销社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加强对购销

活动的引导和调节。国家要在加强市场管理的同时，运用经济手段指导各种农副产品的生产和购销。

适应农村商品交换发展的新形势，供销合作社的体制必须改革。最根本的是要变“官办”为“民办”，把供销社办成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要恢复供销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放手吸收农民股金，取消对农民入股的限制，在经济上同农民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要改革供销社的劳动人事制度，干部实行选举，能上能下；职工实行合同制，能进能出。在分配制度、价格管理、经营范围和服务领域等方面，都要有新的突破，使供销社更好地为农村的供销、加工、储运、技术推广等方面服务。

商业批发和物资供应体制，也要积极探索改革途径。要冲破一、二、三级批发的层次。所有批发企业都应办成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相互之间是平等的经济业务关系。重庆等地把省的二级批发站与市的专业批发公司合并，同时，建立了工业品贸易中心，实行大量批发与小宗买卖相结合、自营业务与代理业务相结合，不论国营、集体和个体经济单位，不论哪个地区和部门，都可以参加交易，相互竞争。实践证明，通过贸易中心进行商品交换，有利于产销直接见面，有利于打破地区、行业之间的界限，是疏通流通渠道、加速商品流转的好形式。所有城市以及农副产品集散地，都应当逐步建立各种类型的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除了某些重要生产资料和紧缺消费品仍由国家掌握并按计划供应外，计划外的和非计划的商品都可以在各种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自由购销。不准实行封锁，保护落后。

社会主义市场在国营商业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需要多种商业经济成分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应当把国营商业中的小型企业，特别是其中以劳务为主的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和小的零售商业进一步放开，改由集体承包经营或租赁给经营者个人经营，开拓服务领域，方便人民生活。大中型商业企业内部也应结合本身的特点，有计划地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要实行全面考核，合理计奖，奖优罚劣，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所有商业企业，不论国营的、集体的还是个体的，都要遵守商业道德，开展优质服务，文明经商，不准转嫁负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此外，对商办工业的改革也应加以重视。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商办工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的状况，要在税收、投资、贷款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在政策上进一步放宽，帮助企业搞好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

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外贸体制也必须逐步改革。对外贸易，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和归口管理，克服政出多门的现象，同时又要适应新情况进一步搞活，采取有力措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外贸体制的改革，要着重从有利于工贸结合、技贸结合，有利于政企分开两个方面来进行。实行工贸结合、技贸结合，是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加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项重大方针，要坚定不移地认真贯彻执行。外贸系统要逐步实行政企分开。各进出口专业公司、联营公司和地方性的外贸公司，要向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成为经济实体。公司和企业的内部事务，由他们自己放手去搞，各级主管部门着重抓统

筹、协调、服务、监督，制订政策、规划和标准，颁发许可证，主要运用经济调节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立法，促进外贸事业的发展。

四、积极办好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放沿海城市，打开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新局面。

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在国家统一政策的指导下，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特别是在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方面放得更开一些，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国务院决定，要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开放一批沿海港口城市。这是一个重大决策，牵涉面很广，我们要采取积极态度，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务求取得实效。各经济特区要不断总结经验，发扬成绩，扎实工作，加强先进技术的引进，采取有效措施吸收外资。厦门特区的范围要扩大。同时，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扩大它们的权力。在这些港口城市，外商投资办厂，在税收方面可以按照规定享受更优惠的待遇；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和引进技术的审批权限，简化外商入境出境手续；允许外商兴办独资企业，适当延长合资企业的合营期限；对确实提供了先进技术的产品，允许在国内市场部分销售。这些港口城市和四个经济特区，在沿海联成一线，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这样，既可以加快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在吸收先进技术、推广科学管理经验、传递经济信息、培养输送人才等方面，支持和带动内地，有力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当前，国际上正在出现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场挑战。我们应该抓住时机，有选择地应用新的科技成果，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缩小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这里的关键，是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制定我们的技术发展战略，既不能亦步亦趋，一切都照人家走过的路子从头走起；也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一哄而起。要采取统一领导、全面部署、组织协调、密切合作的方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准目标，集中力量加以突破。新技术的运用，要着眼于我国现有行业和企业的改造，使它们较快地转到现代化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的基础上来。沿海地区工业基础比较好，科学技术力量比较强，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经验比较多，应该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迎接新的技术革命和振兴我国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更加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加强智力开发，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

改革经济体制，迎接技术革命，推进经济建设，都迫切需要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人才。现在，各方面的专门人才都很缺乏，职工队伍的思想和技术素质不高，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在适当增加教育经费、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新的人才的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提高现有职工的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技术业务水平。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把这项工作抓好。所有经济工作干部，都要努力学习经济管理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他们的学

习成绩应作为考核、晋级、晋升的一个重要依据。要开辟多种途径，加快经济工作干部的轮训速度。对于厂长、经理，国家要组织统一考试（包括考绩），不及格的不能继续任职。各企业事业单位，要在定员、定额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培训职工；要按照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确定不同的培训内容和要求，以期收到切实的效果。今后企业招收新职工，要进行就业前的培训，通过考试，择优录用，以保证职工队伍的素质，保证厂矿的劳动纪律、生产安全和设备完好。

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合理使用各种人才。要大胆地、大量地选拔中青年科技人才到科技工作的重要岗位上来。现在，一方面人才缺乏，一方面有些部门和单位又大量积压和严重浪费人才。也有一些人宁可守在大城市无所事事，却不顾国家和地方所给予的优惠条件，不愿到急需他们去工作的较艰苦的地方。为了促进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希望社会舆论能够配合政府做好工作。我们必须改革科技人员和专业干部的管理体制，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做到人尽其才。我们还要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于排斥、压制、打击知识分子的事件必须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对于那些至今仍然对党和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思想上严重抵触，在行动上拒不执行的领导干部，必须坚决调离领导岗位。要努力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以及知识的扩展，尽可能创造必要的条件。评定学术、技术职称的工作，在经过整顿以后，要继续进行。要采取适当办法，根据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和一定的职务、职称，逐步增加知识分子的工资收入，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并且十分认真地关心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状况，尽现有可能改善对他们的医疗条件和其它条件。对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要大力表彰、奖励，破格提拔、任用。

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各级政府应当把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的改革，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近年来在教育、科研战线已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试验。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改革管理制度，层层扩大自主权，实行定编定员，人员流动，挖掘学校科研潜力，承担经济建设研究课题，制订教师工作规范，明确干部岗位责任，试发岗位津贴和职务工资，提高了教学质量，出现了科研新局面。株洲电子研究所等一百多个科研单位，面向社会，对外实行有偿合同制，对内实行课题承包制，由国家事业费开支经费改为经济自立。这一改革抓住了关键，使科研工作长期存在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一是有力地推动科研单位面向经济建设，急国家建设之所急；二是有利于打破部门和地区的界限，促进科研人员的合理流动，使有才干的人能够展其所长；三是大大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科研单位本身有了活力，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条件，同时对经济建设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也能较多地增加收入。这是科研体制改革的方向。尤其是从事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的科研单位，要按照这一方向，结合本身的特点，积极进行改革。有关部门要注意发现、总结、推广这方面的经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认真做好上述工作，将有力地促进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为加强重点建设、繁荣城乡市场、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和改善人民生活，争取

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打下巩固的基础。

关于外交工作

一年来，我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同各国的联系和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发展和改善了我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

我们同友好邻邦朝鲜、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缅甸等国的关系更加亲密。我们同东盟国家在为维护东南亚地区和平和安全的斗争中，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中印关系在继续改善。我国和不丹开始举行会谈，着手解决正式划定边界问题。在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斗争中，我们同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发展。我们同其它许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友好关系也不断增进。我国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合作日益加强，同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我国和欧洲共同体实现全面建交，并建立起定期的政治磋商制度。中荷恢复了大使级关系。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同西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有所扩大。经过两国政府首脑互访，中美关系有了发展。中苏副外长级的磋商继续进行，两国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也增多了。一年来，我国领导人出访了许多国家，有二十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先后来我国访问。高级官员之间的会晤和磋商更加频繁，民间的各种活动也十分活跃。我国新参加了一些国际性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们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进一步扩大我国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开始收到了效果，显示了这种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我们坚持原则，伸张正义，旗帜鲜明地支持各国人民反对侵略扩张、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积极为维护和平、促进裁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在国际上赢得了信誉和朋友。

在过去一年的国际交往中，我们既捍卫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又履行了自己承诺的国际义务；既发展了我国同其它国家的关系，又为维护国际正义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更加扩大。

我们所以能够取得上述的成就，是因为坚定不移地执行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对外政策总方针，努力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同时，我们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一些具体政策和措施，进行及时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使之更加切合实际，更好地体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

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任何时候，我们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的政策，决不迁就于一时的事变，也不受任何外来压力所左右。我们珍视自己得来不易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决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

义。我们一贯遵循国际关系准则，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正是因为这样，尽管国际风云变幻，我们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把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措施结合起来，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顺乎时代的潮流。

现在，我就维护世界和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这三个方面，对我国的对外政策作些阐述。

一、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我们要坚持不懈地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停止军备竞赛、促进实现裁军、防止世界战争而努力。

中国要和平，不要战争。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当然需要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我们不仅今天需要和平，到将来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同样需要和平。我们绝不愿意让自己经过千辛万苦取得的建设成果遭到战争破坏，绝不愿意让自己同胞在战争中蒙受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也不希望看到人类再一次蒙受世界战争的浩劫。令人不安的是，当前国际局势依然紧张动荡。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性争夺继一九八四年续加剧，核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它们在欧洲的军事对峙更加尖锐，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扩张活动有增无已。世界各处的“热点”没有降温，有的冲突还有扩大的趋势。世界战争的危险并未消除。面对严峻的现实，中国人民不能不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感到严重关切。

中国既反对热战，也反对冷战。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首先应当结束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和它们在东南亚、西南亚、中东、南部非洲、中美洲等地区策动或支持的局部战争，消除由于它们的争夺而引起的动乱。我们希望美苏缓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希望它们加剧对抗，增加战争的危险。我们也赞成东欧和西欧各国改善关系，消除两个军事集团的严重对立。我们衷心希望整个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区域性的武装冲突和紧张局势，都能得到缓和。一切为此而进行的努力，都将得到中国的支持。

中国赞成裁军，反对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主张全面禁止与彻底销毁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太空武器，主张大量裁减常规军备。中国正在集中全力进行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将和各国人民一起，为促进裁军的实现，缓和紧张局势，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

中国是个有核国家，但是我们早就庄严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保证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中国对歧视性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批评态度，不参加这个条约，但是并不主张核扩散，也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广大无核国家普遍要求一切有核国家对它们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它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我们主张，所有的有核国家都应当无条件地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就承担互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达成协议。

我们一向认为，只有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才能够真正消除核战争的威胁。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我们主张，拥有占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核武器的美苏两国应当率先大幅度削减它们的核武器；只有这样，其他有核国家参加核裁军才是有意义的。这是我国在核裁军问题上的

原则立场。为了推动核裁军，我国在去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新的倡议，主张在两个核大国率先停止试验、改进、生产核武器并就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库达成协议之后，召开包括所有核国家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讨论共同裁减核武器的问题。中国准备履行自己所应当承担的核裁军义务。

中国赞同核裁军应与常规裁军结合进行的主张。美苏拥有庞大的核武器库和常规武器库，它们对裁军负有主要责任，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主张。只要符合两个超级大国率先裁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一根本原则，一切切实可行的裁军建议，我们都支持。

目前，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核优势，正在欧洲竞相部署新的中程导弹。这样发展下去，只能使它们之间的核军备竞赛轮番升级，大大增加对欧洲和全世界的核战争威胁。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应当促使美苏两国停止这种危险的较量，恢复谈判，达成不损害其他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协议。我们要求美苏在世界任何地区，不论是欧洲还是亚洲都不部署新的导弹，已经部署的导弹应当大大削减和销毁。

维护世界和平是人心所向。近年来在欧洲、日本和其它许多国家兴起的反对核武器、核威胁、核竞赛的强大和平运动，参加者包括了差不多所有社会阶层。这是当今世界政治生活中值得重视的事件。它反映了各国人民反对核军备竞赛和核战争威胁、要求和平和裁军的强烈愿望。我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同情和支持。

具有广泛基础的不结盟运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同它的联系和配合。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中，许多旨在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多边国际活动，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将继续积极支持和参加这些活动，并且遵守有关国际组织的章程，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

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霸权主义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特别是反对超级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中国决不谋求霸权，也决不屈服于任何霸权主义的压力。不管是谁在什么地方搞什么样的霸权主义，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的这一立场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当前，世界和平受到的威胁是严重的，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并不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我们坚信，只要各国人民加强团结和斗争，不断地挫败超级大国推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防止的，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我国十亿人民将坚决站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一边，积极支持维护世界和平的一切符合正义的努力。

二、我们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并且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当遵循五项原则，使它真正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载人我国宪法，它是我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友好合作；各个国家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做主，别国无权干涉。这是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依据。

如前所说，我们特别重视发展同邻近国家的睦邻关系，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安全和发展，而且影响到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今天，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既存在着迅速发展的前景，又存在着使人忧虑的多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和邻近国家建立和保持稳定的良好关系，发展积极的友好合作，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同我国和睦相处的国家，我们努力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于同我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分歧的国家，我们力争同它们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分歧，使相互关系逐步得到改善；即使分歧一时不能解决，我们也愿意耐心等待。我们同各国和平共处的愿望是真诚的，个别国家对我们的疑虑终究会消除。对于至今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的越南，尽管它继续强化侵柬战争，侵犯泰国领土，在中越边境加紧武装挑衅，我们仍然期待它改变侵柬反华的政策。中越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两国关系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令人痛心的。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只要越南承诺和宣布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并开始见诸行动，我们就愿意同它恢复谈判，谋求改善两国关系。

我国同兄弟邻邦朝鲜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友好相处的亲密关系，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加强合作，不断获得新的发展。我们支持朝鲜政府关于实现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主张，支持朝鲜人民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的正义立场。我们希望通过有关方面的谈判把朝鲜停战协议变为和平协议，并且赞成朝鲜南北两方和美国能早日举行三方会谈。中日两国领导人着眼于二十一世纪，就发展两国关系作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双方共同确定“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四项原则，为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决心同日本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愿望成为现实，使两国的外交政策都沿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

中国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友好合作关系具有坚实的基础，我们将继续发展同它们的全面合作。我们支持罗马尼亚政府为维护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而斗争的正义立场，高度评价南斯拉夫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在不结盟运动中的重大贡献。我国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也有广阔的前景。我们愿意为进一步增进同它们的经济技术合作和友好往来，作出积极的努力。

我国同西欧各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许多发达国家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和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愿望，就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进一步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交流。我们准备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上，加强同这些国家的政治磋

商；在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方面，加强同它们的合作。

我们处理同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的关系，同样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们重视发展中美关系，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发展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障碍，这就是台湾问题。只要美国严格遵守历次中美公报共同确认的原则，真正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拿出看得见的实际行动来逐步地和大幅度地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导致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中美关系就有可能稳定持久地发展。里根总统不久前来我国访问时，重申美国愿意恪守美中关系三项公报。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并期待着美国政府切实履行自己的承诺。

我们真诚希望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愿意同苏联发展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大家知道，中苏两国曾经在革命和建设中长期合作。中苏两个大国和睦相处，不但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最近中苏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有所增加。但是，苏联至今仍在中苏边境和蒙古派驻重兵，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和对中国挑衅，武装侵占中国的邻邦阿富汗。上述情况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苏联方面既然表示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就应当采取实际行动来排除上述障碍。

我们处理对美、对苏关系，是有原则的。我们不会因为反对它们的霸权主义，就不同它们改善关系；不会因为要同它们改善关系，就放弃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也不会因为要同它们之中的某一国改善关系，就损害另一国的利益。

今年是我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十周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越加显示出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适用于指导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指导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如果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睦相处，友好合作；如果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可能尖锐对抗，甚至发生冲突。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好坏，关键在于双方是否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在相互关系中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局势就可以稳定，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就可以实现，世界和平就可以维护。

三、我们任何时候都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作为自己的国际义务，坚决支持它们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努力加强同它们的合作，积极促进它们之间的团结。

由于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它们面临着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迫切任务。我们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扩张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斗争，只要是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我们都坚决支持。不管它们的斗争锋芒是指向哪一个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我们决不会因为考虑国家关系而对侵略和干涉行为姑息迁就。我们赞成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但是解决的办法必须是公平合理的，必须使被侵略和干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保证。我们对第三世界国家为实现世界

的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进行的各种努力，都会给予坚决的支持。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已进入了以发展民族经济为中心任务的历史阶段。他们渴望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迫切要求改革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且强烈希望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主张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根本目标和解决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紧迫问题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高度评价七十七国集团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中国支持南北对话，愿意积极参加南南合作。大家知道，为了发展同非洲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我们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并且得到许多非洲国家的赞同。我们认为，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我国同一切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对于同第三世界国家原有的合作项目，我们愿意向有关国家继续提供各种服务，并和它们共同努力，充分发挥这些项目的经济效益。对中国已经承担建设的项目，我们将保质守约，认真建好。对第三世界中最困难的和特别需要帮助的国家，我们将继续给以力所能及的援助，主要是建设一些投资少、效益好、直接为当地人民服务的项目。

第三世界国家是我们患难与共的朋友，长期维护这种宝贵的友谊是我们的重要义务。我们要经常对人民群众进行国际主义和民族平等的教育，使人人都尊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情况、社会制度、地位处境、发展程度不尽相同，在执行对内、对外政策方面总会有所差异。但是，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谋求发展这样的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这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点。第三世界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们决不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我们赞成它们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有的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同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关系比较密切，接受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援助，这并不影响我们同它们发展友好关系。我们这种以诚相待的态度，有利于我国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合作，有利于整个第三世界的团结。

加强团结是今天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领土等问题和民族、宗教等原因，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纷争，甚至发生武装冲突。超级大国又往往竭力挑拨和利用，从中混水摸鱼。对于这种状况，我们深感关切。我们历来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它们之间的分歧和争执，应当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排除外来干涉，通过和平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即使一时得不到解决，有关各方也应当以大局为重，采取克制态度，防止事态扩大。我们决不介入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纷争，也反对任何外来势力插手。当然，这决不是不讲是非。对于那种恃势凌人的地区霸权主义的行径，我们是坚决反对的。总之，有利于第三世界团结的事，我们就努力去做；不利于第三世界团结的事，我们就坚决不做。我们永远坚持这一方针。

一年来的外交实践，证明我国奉行的对外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今后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进一步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更好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

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目标服务。

各位代表！

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赞成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主张，并且正在为此作出积极的贡献。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鉴于历史的经验和台湾的现实，我们提出了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我们的各项建议和设想，都是诚心诚意的，通情达理的。对于台湾当局任何有利于海峡两岸同胞接触来往、增进了解和有利于祖国统一的言行，我们都将表示赞赏。我们认为，只要在和平统一问题上国共两党具有共同语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湾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任何犹豫、拖延，都是违背民心民意的，希望台湾当局郑重考虑。我们坚信，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够实现。一切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我国将在一九九七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坚定不移的决策。为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我们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并在五十年内不予改变。这些政策包括：根据我国宪法第三十一条，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人自己管理，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将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继续同各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有关的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受到照顾。中国政府的上述政策，是充分考虑了香港的历史和现状后制订的，是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实事求是和合情合理的。我们希望并且相信，香港问题一定能够早日得到圆满解决。

各位代表！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我们将热烈隆重地庆祝这个节日。让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加奋发努力，在国内建设和外交工作两方面都取得新的优异成绩，迎接伟大祖国光辉节日的到来。

团结起来发展石油工业战线的大好形势*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全国石油工业局厂领导干部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你们这次会议开得好。石油工业形势好，石油战线高兴，党中央、国务院高兴，其他行业高兴，全国人民高兴，大家都高兴。

根据大家讲的，今后七年你们提出的石油工业发展目标，是比较可靠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国家在向“四化”进军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是个大的贡献。

现在，陆上石油形势很好。我看石油部的同志，全体石油战线的同志，要很好地团结起来。因为这么大的事业，这么有希望的事业，大家要很好地团结起来向前看，为国家多做贡献，取得更大的胜利。

世恩同志的讲话，秋里同志的讲话，唐克[1]同志的报告，都讲得很好，符合这个精神。

建国三十年来，石油战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近四年多来，石油战线同样取得了很大成绩。耀邦同志和我对世恩同志报告上批的话，都反映了这个意思。耀邦同志批语中提到这几年世恩同志带病坚持工作，石油工业取得很大成绩，这不仅是指世恩同志一个人，而且是指整个石油战线的。没有这四年的工作，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形势。这个好形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作为总理，对石油部的工作表示满意。石油工业历史上的成绩很大，国务院对你们近四年的工作是满意的。这就包括世恩同志代理部长期间的工作，唐克同志回石油部后的工作，也包括宋振明[2]同志那一段期间的工作。一九七九年全国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现在看得很清楚，如果不进行调整，全国不会出现这么好的形势。现在全国还在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石油工业也是如此。

国务院确定对石油工业实行一亿吨产量包干。所谓包干，不外乎是给石油工业一个条件进行调整，或者叫做休养生息。要不提包干，你们也会上不来。四年的休养生息，才会有今天。当时，全国基本建设都在大量地压缩投资，石油部门也不可能给多少钱，所以给你们这个包干政策，使石油工业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多搞一些油，多搞一些资金，多搞一些勘探。

我这样讲，是符合历史上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对自然界的认识过程的。哪个人认识自然界都不可能一次就完成，既然是不断认识，有时认识得接近实际

一些，有时认识得不接近实际一些，都是允许的。重要的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认识，不要坚持被实践证明是错的东西。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因为最后决策还是领导上的事情。

我还要讲一下，如果不是中央的对外开放政策，引进了数字地震技术，地下情况也了解得不那么清楚，地质勘探上的形势就不一定这么好，储量也是上不去的。中央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你们与国外交流了经验，技术也发展了。

我希望，也是国务院的希望，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石油部门的同志，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团结起来向前看，迎接和发展大好形势。

一、今天见见你们。我看了几期简报，你们的会开得好。康世恩同志也给我谈了一下。我给世界银行的外国人讲了，一九九○年产油一点五亿吨，指标放低一些，产量越多越好。

二、你们的汇报中，我看关键是给国家贡献七千万吨原油。

三、刚才提到的能源税问题，我看还是不改，从你们上缴的贡献油中抵扣。因为涉及面广，现在不好改。

四、（当汇报到近期要打一批高产井，同时各油田要搞好“三个接替”时）这就是说，产量可以上去，还可以接替得上。你们的账都算好了吧？外部配套条件怎么样？

你们找计委开次会，研究一下安排得怎么样？是不是安排得了外部配套条件？你们安排多少？计委安排多少？

注 释

1．唐克（1918—2013），江苏盐城人。时任石油部部长，曾任石油部地探司司长，石油部副部长，冶金部部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康华公司董事长。

2．宋振明（1929—1990），河北馆陶人。曾任玉门油矿采油厂厂长，大庆油田党委书记，石化部副部长，石油部部长，国家能源委副主任。

关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问题
致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看到黑龙江省全国人大代表陈俊生致函彭真委员长对长期稳定国家根本大法和基本法提出的建议后，写给邓小平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他看了陈俊生的信后有感而发。他从如何保持国家长治久安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出发，建议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健在的时候，为党制定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此信旨在“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这是他写此信的唯一心愿。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1]同志建议[2]—件，请参阅。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国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集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国家立法上去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要在党的领导制度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倡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业已走上轨道，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注在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起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当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访欧前夕

（并抄送陈云同志）

注 释

1．陈俊生（1927—2002），黑龙江桦南人。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曾任黑龙江省委政研室主任，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国务委员，全国供销社理事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陈俊生建议，即刊登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简报组1984年5月21日编印的《快报》第20期上陈俊生致彭真的信。建议全文如下：

陈俊生代表致函彭真委员长
对长期稳定国家根本大法和基本法提出建议

彭真同志：

看了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登载您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受启发。你提出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靠健全的法制；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是一致的。我衷心拥护您的讲话。照这样办，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会得到保证。党中央抓这件大事，真乃抓住了根本大计。如果我们党建国之初即抓法制这件大事，也许不会吃“文化大革命”那样“无法无天”的大苦头。

现在党中央领导下的这个时期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是这样的时期，尤应清醒地考虑长治久安的大计。现在强调法制确实是抓了长治久安的根本。

在反复学习您的讲话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使我们的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真正做到像邓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使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就应当对保证民主制度和法律本身进行立法，即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的宪法和基本法进行立法。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还不能使宪法和基本法保持长期的稳定性，隔若干年就全面修改一次宪法。说是修改，实际上把旧的全面推翻，废除重写。这种做法有其历史原因，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给法制带来不良的后果，它使人们感到我们的各种法生命力很短，随着领导人变动而变动，甚至随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变动。因而人们不那么严肃地对待它，法的权威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现在都说目前这部宪法和若干基本法很好，但是谁也不敢保证说，隔若干年后不会再来一次废除重写。因为我国并没有就法的稳定性、连续性进行立法。在这方面还是靠人来保证，不是靠法来保证的。这样就使人们有一种担心，在若干年后，会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影响法的变动，法制能不能持续下去？当然，人们对法制是充满信心的，但是这种信心也还是建立在对现在党中央的信任上。也还是由于人们对党中央的信任，所以对在现在的党中央领导下所制定的法律就要求保持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允许今后有任何人破坏它。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无论根本法还是基本法，都有需要做些相应的修改，但这样的修改，不应该采取全面推翻，废除重写的办法。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补充，即需要增加某项条文时，就通过法律程序增加某项条文；需要去掉或修改某项条文时，就通过法律程序去掉或修改。增加和修改之条文，应从公布之日起生效，不应追溯既往。也就是说，人们不触犯当时的法律即为合法，而不必担心将来可能通过的任何新法律。如有违法行为，也只能按当时的法律进行处罚。这应当成为一条立法原则。这一原则，对保持法律的严肃性和可信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欲实行法制，不使根本法和基本法都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并使法的尊严逐渐成为人们的习惯和生活常规，是不可思议的。为此，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立法，宣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宪法和基本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今后不论再遇到什么情况，谁也无权将它们废除重写，也不能用将来的法律追溯现在，谁这样提出问题，他本身就是违法。要规定修改宪法必须经过什么程序，使修改宪法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

想，这样从立法本身来解决法的稳定性、连续性，可以大大增加法的权威性，使人们对法产生严肃感，会大大坚定人们的法制观念，更加自觉地遵守法律，这使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有了法律上的保证。

以上意见，如有错误请指示。

黑龙江省代表团
陈俊生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

实事求是地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汇报关于整党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的谈话。

一、关于整党（包括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和经济工作的关系，我完全同意耀邦同志说的，要以整党促进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检验整党。这两句话概括了整党和经济的关系。整党（处遗）都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做什么都不能忘记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这个大目标。我们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我看《广西日报》发表的耀邦同志讲的“广西要先翻身”这句话很好，应当用这个口号来动员广西各族人民把经济工作搞上去。

二、关于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三种人”要坚决清理，小平、陈云同志很关心这个问题。但清理“三种人”一定要慎重，要防止扩大化。明显的、有把握的先定，对比较复杂的、没有把握的可以放后一点。另外，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都要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要在思想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不等于凡是在“文革”中沾边的，都要打倒，都要否定。不管那时是在台上的还是台下的，他们的问题都要放在当时的环境下来考虑。“文革”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十年之久，因此，对人的观察，要看他十年的变化，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在十年中间，有的人由坏变好，有的人由好变坏，也有的越变越坏，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历史的分析。

三、关于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广西过去觉悟迟，拨乱反正是慢了。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涉及的人是很多的，情况是复杂的。总之，我同意纯束[1]同志的意见，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要严格掌握政策界限，不要牵连太多人，否则不能团结大多数。广西“文革”中死人比较多，如果只死一个人，那就好办，现在死了好几万人。正是因为死人多，就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死者加上受害者家属，有几十万人，一定要处理好，不处理好就不能安定团结；二是要看到牵连的人也多。如果不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处理杀人凶手和有牵连的人时，搞过了头，同样也不能保持安定团结。我同意纯束同志的意见，今年再用一年时间，决心处理好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问题的标准，也要实事求是，适可而止，搞过头就会出乱子。这个话早讲不好，在一年前讲不好，现在可以讲了。你（指韦纯束同志）讲现在对处遗工作有两种反映，一种认为搞过头了，一种认为走了过场。有两方面的反映，恰恰说明了情况正常；如果只有一种反映，一个方面满

意，可能就不那么正常了。广西过去就有过这种情况，一边倒，一方面反映很满意，结果问题潜伏下来了。

四、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文革”是要彻底否定的，不这样就不能统一思想，同中央保持一致，因此各地都要补好这一课。“文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犯错误的人比较多，如果把当时发生的事情都要作为个人的责任来追究，把沾上边的人都打倒，把犯错误的人一律都追究，那就要把事情搞乱。我在广东的时候，“文革”中也想早点站出来工作，想早结合，后来因为两派都要打倒我，站不出来。如果我当时也站出来工作，情况还不知道会怎样，肯定也会犯不少错误的。所以，要考虑历史条件，不管当时在台上台下，都要作历史的分析。同意纯束同志的意见，要团结大多数，要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特别是对广西来说，团结是很重要的。要通过整党、处遗提高觉悟，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加强团结。

五、关于如何对待反映情况不实事求是的问题。现在确实有些人反映情况不实在，有些记者和人民来信反映的情况也有些是失实的。现在就有这样一种不良倾向，要整一个人，就把一切错事都往他身上推，这是不对的。当然有意见可以提，可以反映，不让反映是不行的，不要怕有不同意见。但是你们领导头脑要清醒，他反映他的，你干你的。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如果按错误意见办，出了问题，以后他还要找你，擦屁股的也还是你。所以，各方面的意见都要听，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按正确意见办，不能听到风就是雨。不能偏听偏信，要防止出乱子。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犯错误的人的思想感情要转过来是有个过程的，但要相信绝大多数是可以转变的。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做到在政治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注 释

1．韦纯束（1922—），壮族，广西象州人。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曾任桂林临时工委副书记，桂平县县长，自治区交通厅副厅长，南宁市委书记、市长，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区党委副书记。

坚持改革加速改造使鞍钢做出新贡献*

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鞍钢开工三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我是第一次到鞍钢，应该做自我批评。这次来恰恰是鞍钢全体职工欢庆开工三十五周年，这样给我个机会，同鞍钢各级领导同志在这里见面。在座的有多年来为鞍钢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劳动模范、领导干部，还有一些年富力强正在和将要为鞍钢建设做出贡献的一些同志。我和大家一起庆祝鞍钢开工三十五周年，感到非常高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鞍钢二十万职工和他们的家属，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鞍钢三十五年来为我们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三十五年来，提供了一亿四千万吨钢材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五倍于鞍钢投资的三百亿元支援国家建设，给国家提供了大量资金，调出了领导干部和熟练工人、技术人员五万多人支援全国钢铁战线建设。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回顾三十五年，确实很不平凡。当然，刚才郭峰同志讲了，我们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这么一个非常艰巨而伟大的任务，下一个世纪再奋斗几十年，使我们国家真正走向世界前列、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经过这几年奋斗，从达到的目标来看还是小康指标，但是再经过十五年开创新局面，可望使我们国家走上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算了一下，大概在本世纪末，就是一九九九年，也就是你们开工五十周年。过去三十五年成绩很大，今后十五年，我们有了条件，也应该再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鞍钢已有个很好的基础，各方面条件很好，而在钢铁战线来讲，你们是最大的一个联合企业，质量、品种、人才、经验这些方面都是好的。有两句话，一个是坚持改革，一个是加速改造。坚持改革，加速改造，使鞍钢成为全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用将要兴起的新的技术革命来武装和改造我们原来的钢铁工业基地。只要真正能够按这一点做，那我们鞍钢一定可以担负起到本世纪末，也就是开工五十周年的时候，在开创全国新局面的历史任务中，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使鞍钢老工业基地能够继续保持目前在全国钢铁战线的地位。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只要我们鞍钢全体职工、各级领导能够真正坚持改革，加速改造，我想这样一个目的，这样一个目标，这样一个要求，是一定可以达到的。

扬长避短革新改造
走出一条发展我国冶金工业的新路*

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鞍钢汇报后，关于鞍钢和中国冶金工业发展问题的讲话。

冶金系统这几年成绩很大。但成绩大是逼出来的，就是宝钢这么一压没有钱了。这个经验很值得重视。如果没有宝钢压了一大片，冶金工业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宝钢现在还没有出产品，但是投资都占去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冶金工业有很大的变化。第一，从产量来讲，达到四千多万吨。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才三千多万吨钢，就这几年增加一千万吨钢。第二，能源消耗大大下降。第三，质量品种也提高了。主要就是没有投资了，无路可走，就逼出一条路，改造，挖潜，上品种，上质量，降低消耗，等等，就走了这条路。这个问题说明我们钢铁工业战线是有潜力的，就是领先原有的企业，走技术改造的道路，花钱不多，见效快，周期很短。

我国冶金工业的发展看来要走这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从后边搞起来，发挥自己的长处，尽量避免自己的短处。主要是个矿石问题。过去我们都要靠国内矿石。当然，鞍钢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矿石的条件很好。从全国来讲，我们大都是贫矿，距离又很远。而且一搞就从矿山搞起，从矿山到炼铁、炼钢、轧材，投资很大，周期很长。因此，搞钢铁实在困难，"元帅"一升帐其他就压垮了。搞钢铁的这个办法要改，不能完全从开矿一直最后搞到轧钢，有些就可以进口矿石，特别像沿海没有采矿的条件，就可以进口，应该从后边搞起。国外资本家跟我们完全封闭式的搞法不同。现在经常讲是开放式的还是封闭式的。什么叫开放式的？开放式的就是对外要搞经济技术合作，哪样搞划算我就搞，哪些我能搞就搞，哪些我搞不划算就不搞。有些可以从国外进口，以国外之所长，补自己之所短，这样搞就快。不如此，要想在本世纪末搞到八千万吨钢我看是很难的。照过去的搞法从头搞起，那个账单一开下来不晓得要多少投资。而且这样搞的结果，钢材的质量还不行。把很多钱都用到前边去了，精力放在搞数量上，质量搞不上去，品种搞不上去，就会变成大路货，设备制造还不能过关，真正要搞一些重要设备又没有合格钢材。所以，有矿山的，条件好的，就应当依靠自己搞矿山；没有矿山的就从国外进矿石，甚至进口钢锭。反正轧材最划算，我就从后边搞起，为什么非要从前面搞起呢？"无米之炊"，从国内来讲，封闭式的搞法就是无米，开放的

搞法怎么会没有米呢？比如，澳大利亚就向咱们卖矿石，你能说没有米呀！

第二条路就是，要坚决依靠原有企业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当然也要搞必要的改建扩建，这样使老企业也可以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不能搞了宝钢丢了鞍钢，搞了宝钢丢了攀钢、太钢，搞一个丢一个。难道再过十年宝钢也落后了，我们又搞一个新宝钢，丢一个老宝钢？这总不是办法。我看要坚决地依靠原有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技术革新，采用新的技术。这样原有企业就可以永葆青春，水平不断地提高。这样搞实际上不仅质量上去了，数量也会搞上去。这几年原来三千万吨钢现在变成四千万吨了，这一千万吨是从哪来的？还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搞起来的。像鞍钢这些地方，就要坚持搞技术进步。上一次我在讨论新的技术革命时讲过一句话，就是中国要用世界的最新技术来改造我们的传统工业。钢铁工业，现在也是面临新的技术革命的前夜，究竟将来怎么样，我看难说。将来炼钢可能不要高炉，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当然材料工业我们也要想宽一点。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究竟要多少钢材，这个问题我们制订长远规划时思路也要广一点。日本就是七千万吨钢材，它出口大量的钢材，还要出口大量的设备，同时还可以支持本国相当于我们两倍的工业。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万亿美元，我们国民收入是四千多亿元。为什么它国内用的只有三分之一钢材，即三四千万吨钢材，就能支持它这么大的工农业基础？可能有设备问题，有钢材质量问题，废钢铁也可能比较多一点。另外，还有很多新材料将来可以代替钢材，如新型陶瓷材料，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能出现一个什么局面还很难说。这个东西如果搞成了，它的成本比较低，可以代替许多钢材。所以我们的视野要广一点。我们要翻两番，究竟材料怎么办？当然首先还是搞钢铁。搞钢铁、钢材，要依靠原来的基础，进行技术改造，扩建改建，再加上引进一些新技术，我看产量也可能搞上去。鞍钢的规划还可以看到下一个十年。你们设想搞一个新钢铁基地，再搞四百万吨或六百万吨，但首先要考虑鞍钢原来这样一个摊子，只要大力搞好技术改造，加上采用新的技术，到一九九〇年产量可能不只是八百万吨，可能是一千万吨，一千二百万吨。当然有些东西一下还说不清楚，可以从长计议。

我们搞建设没有资金周转的观念，就只有个投资多少的概念，这是不正确的。比如六十亿元投资，建设周期十年算上利息就是一百二十亿元，要是五年就是九十亿元。资金要从动态上看，不是静止的东西。要是搞活了的话，会经营的话，资金加在一起看来很多，但是及早得到效益，及早变为收入，投资就收回来了，就划算得多。十年不产出，和十年中间有很多产出，是不大一样的。外国资本家首先就是讲投资多少，什么时候能收回来，什么时候能还账。对老基地来说，投资后周转快，虽然投资是一样的，但效果不一样。比如你们改造转炉，三个月搞上去了，或者两年搞上去了，投资可能是一样的，但周期不同，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老基地进行技术改造，看来投资加在一起可能是多的，因为要拆一些，改一些，但实际上是周期短，见效快，总的来讲投入少，产出多。“七五”计划要很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上了宝钢，原来说是压了一片，现在是激活了一大片，叫做“穷则思变”嘛。冶金系统这几年节约能源，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成绩

是很大的，实际上产量也上去了，增加一千万吨钢。

我们要从这几年的经验里，进一步认识今后钢铁工业的发展应走什么路。钢铁工业大小摊子不少，像鞍钢是最大的。还有很多小摊子，像唐山、邯郸、水钢、湘钢等等，有领导班子在那里，有些技术工人，有个基础，有个摊子。在这样的基础上要研究大的怎么搞，小的怎么搞，有条件的怎么搞。搞技术革新，走技术改造的路，有些中小钢厂也可能发展成大的基地。这是一条比较多快好省的路。

宝钢这么个摊子还是可以扩大的，反正钱已经花了，摊子已经铺在那里了，以后再搞高炉、搞轧材，就和重新搞不一样了。像攀钢、马钢、武钢、太钢、包钢、鞍钢，有先有后，都可以走技术改造的道路，技术也上去了，产量也上去了，因为它有基础。中国钢铁工业近几年，就要考虑这两个问题，就可能多快好省。一是要利用同国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条件，不一定什么都依靠国内；二是主要依靠原来的摊子来搞，走技术革命、技术革新的道路。这样的好处就是，老企业不会越来越老，不会设备技术越来越差。这两个问题很值得冶金部研究一下，这样搞肯定会多快好省，到本世纪末搞八千万吨钢，也不一定那么难。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都从矿山搞起，又加上焦炭，加上铁路，这一系列的东西，问题多得很。鞍钢“七五”规划搞到八百万吨。下一步，就是一九九〇年以后，鞍钢怎么样，是集中力量另外搞个新基地，还是搞技术改造、技术革新，那时可能出现新技术。改造高炉，搞转炉，连铸连轧，炼焦等，都有很大的潜力。

最后一点，我原则上赞成鞍钢的“七五”规划。“七五”技术改造规划，可以考虑采取包干办法，采取经济办法，具体账还要有关方面算一算。今天看了齐大山铁矿，我觉得你们这里矿山的条件是很好的。品位虽然差一点。最大的好处是离冶炼基地非常近，储量大，还有就是选矿问题。选矿如果真是采用节省能源的新办法，不是用焙烧办法，效果又和实验的效果一样的话，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就可以大矿大开，除了鞍钢用以外，多的还可以外调。现在价格不合理，搞矿山的都不愿意搞，搞生铁的也不愿意搞。今后可以搞个鼓励政策，适当提高矿价，比用进口矿要便宜一点，这样矿山也就划算了。前天我讲唐山和首钢的关系，首钢现在钱多，除它自己改造而外，还可以拿三十亿元，它就想自己拿钱开矿山，同唐山钢厂联合。一种是联合搞个经济实体；一种是搞松散联合，建立经济关系，开矿石供给唐山，唐山炼钢赚的钱要返回一部分给首钢。这样搞矿山比较划算。煤炭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将来矿山也可以做到。当然能够全国调价就更好了，全国不调价，也可以采取煤炭的办法。

对你们的“七五”规划，我讲是原则同意，因为这个账还得具体算一算。总的来讲，“七五”规划依照你们的想法，大体上是可行的。因为国家在五年之内，从你们算的总账中并没有少拿，还多拿了一点，而你们自己还要改造，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当然，算账财政部比你们还要算得紧一点，你们自己还要挖掘一下潜力。至于调节税的问题，究竟减多少，还是全部不收，再算个账。如果你们的账已经是很积极的了，那当然也是可以的，不收就是了。如果财政部门觉得你那个

账还可以算的更紧一点，那可能就比你们现在要的要少一点。这个事也不好在这里就决定，回去我再听听他们的意见。但我认为你们的“七五”规划原则是可行的。而且原来经过很多同志研究了，冶金部、王玉清[1]同志、梅行同志、徐驰[2]同志都研究了这个问题。还有计委也原则同意了。所以回去以后再研究一下，正式对你们的“七五”规划批复一下。

矿山明年你们先搞一个选矿厂，两年可以建起来，以后就知道什么样了。如果矿山这个问题解决了，鞍钢潜力也可能将来不只是八百万吨，一九九○年以后可能还要多搞一点。我看这个路子是对的，方向是对的，措施也是大体可以的，具体账再算一算。

关于电的问题，回去再商量一下。计委跟水电部先谈一谈，主要就是说水电部来搞，还是当地来搞。另起炉灶不太好，这个电厂又在企业里边，又有能力改造。这个意见水电部不一定不同意。现在整风，大家都注意考虑全局，只要有道理的事，还是容易通得过的。

鞍钢的领导体制问题，由冶金部和省政府自己定，我没有意见。这样一个大企业，究竟怎么搞，还没有想清楚。鞍钢问题，小平同志多次讲过，像鞍钢这样的企业，怎么能放到地方呢？如果你们两家都同意由冶金部管的话，我没有意见。

鞍钢要求扩大对外自主权，先定一下技术引进自主权。你们的“七五”规划批准以后，属于引进的部分，像谈判等等，当然有些可能还要有关部门参加，但是基本上是在这里定，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减少层次，减少手续。在“七五”改造计划以内所要引进的设备，同国外合作的事情，可以交给鞍钢，由鞍钢自己负责。有些事有关部门可以参加。

今天我讲的这些冶金工业问题，计委的同志可以回去讲讲，“七五”计划以及“八五”计划都要考虑钢铁的问题。你们的“七五”技术改造规划，我表示原则同意，具体账还要算一算。这是一句话。再一句话，我赞成老基地改造，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来改造传统工业，来改造老的工业基地。第三句话是，鞍钢“七五”计划批下来以后，属于对外技术改造的项目，你们有自主权，这个权可以交给鞍钢。就讲这么三点。其他对冶金系统的评价等，到北京后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是必要的，在计委可以先讲一讲。这些意见不是我个人意见，国务院议论过。宝钢占了投资，使冶金工业逼出一条路，逼活了一大片。经过这几年时间，回头来看，很可以研究出一条发展中国冶金工业的新的道路。

注 释

1．王玉清（1911—2002），江苏江阴人。时任冶金部副部长。曾任鞍钢副总经理、冶金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顾问。

2．徐驰（1913—2012），山东省沂水人。时任国家经委顾问。曾任四川省攀枝花特区党委书记、攀枝花特区工地指挥部总指挥，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委书记，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机械委副主任。

靠改革开放加快我国石油工业发展*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辽河油田同部分干部座谈时的讲话。

我这次出来，一个是到鞍钢看一看，一个是到下辽河看一看。当然，其他地方也准备去一下，但主要目的是看鞍山，看下辽河。鞍钢这么大的钢铁基地，我过去没去过。这次去很凑巧，正是他们开工三十五周年。下辽河这个油田，我很早就知道，这个地区很有希望。以前康世恩同志就跟我介绍过这个地方，而且他跟我说，辽东湾很有希望。今年以来，又听到很多关于下辽河的情况。全国年产三百万吨以上的油田，我大部分都去了，就是你们这里，还有一个华北油田没有去。找个机会到华北去一下。这样，年产三百万吨以上的油田，我都去了。

同志们都知道，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石油战线讲过很多话。石油战线的工作，以康世恩同志代表石油工业部写的报告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那个报告，是经过石油部研究，去年十二月底向中央写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全国油田出现了一个新的很好的形势。陆上油田勘探开发的步子可以加快，比原来预料的情况要好得多。今年二月，耀邦同志、秋里同志到了胜利油田。以后，我也去了胜利，去了中原。接着，石油部五月份开了一个全国局厂领导干部会议，康世恩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秋里同志讲了话。这次会议，对整个石油工业的形势，对石油工业在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如何加快发展，确定了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政策、措施。我是第一次到你们这里来，也是在中央对石油工业提出新的要求，石油部召开局厂领导干部会议以后，第一次到油田来。

昨天听了党委书记邓礼让[1]同志、局长周永康同志的汇报。今天看了欢喜岭油田几个单位，还有一个钻井队；刚才又听了两位总工程师的发言。我总的觉得，下辽河的形势是很好的，正在积极贯彻石油部会议的精神，布置和落实各项措施，时间虽然不长，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油田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要求，对石油部所作的一些部署，都热烈拥护。看来这些要求和部署，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反映了石油战线广大职工的愿望。

辽河油田同志提出的目标，受到了耀邦同志的肯定。这就是到一九九〇年，你们要争取在全国油田中排行第三，叫油老三。现在你们的位置是第四，要往前排一个档次，名列第三位。体现这个雄心壮志的具体目标是，一九九〇年产油一

千五百万吨，探明地质储量十五亿吨。这两天给我的印象，觉得你们这个想法是有根据的，你们为自己规定的目标是有根据的。你们提出产油一千五百万吨，可能还是留有余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们这里的地质勘探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地质储量把握比较大。你们一千五百万吨产量，用十五亿吨的地质储量作后盾、作基础，这个比较可靠。现在已经拿到了十二亿吨，今后还有几年嘛，再增加三亿吨，比较可靠。

地质储量非常重要。我在胜利油田谈过这个问题。国家希望石油工业加快发展，希望石油产量能够增加得快一些，特别在近几年能够增加快一些。但是，归根结底，要靠地质储量。当然，在地质储量比较有把握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开采，尽可能多出一些油，这是对的，但最终还得有地质储量作基础。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够保证生产的持续增长。康世恩同志和石油部领导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布置，要求近期内尽快地把产量增加上去，同时又要保证能够持续增长，不仅不会很快掉下来，而且在几年之后，也不会又出现一个徘徊，不再停顿。这就必须把地质储量搞上去。

我觉得，你们这里各种工作，各项落实措施，抓得比较扎实。昨天我听了汇报以后有这么一个印象。这里包括你们所讲的知识分子政策，你们挑选一位原来做技术工作的同志担任组织部长，加速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步伐。这些措施都是很好的，工作是比较扎实的。今天我从听的当中、看的当中，觉得这个地方很重视采用新技术。无论是地质方面，还是在采油方面，都在努力采用新的技术，包括技术引进，也包括自己攻关。这两天，我接触了油田的一些职工，感到精神很振作，精神面貌是很好的。我虽然第一次来，时间也不长，但留给我的印象很好。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通过这两天了解，我觉得，今年以来中央、国务院以及石油部关于石油工业方面的很多指示，都是正确的。这次石油部召开局厂领导干部会议，是开得很好的。从你们这里可以看到全国，看来石油战线的形势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我国石油工业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今后我们国家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局面中，石油战线将会继续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为我们国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重大的贡献。最近我在石油问题上讲过的一些话，同志们都知道了，我就不再多讲了。

这里，我想讲一讲，这次《政府工作报告》虽然是采用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但实际上是党中央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今后我们经济建设主要抓两个，一个叫改革，一个叫开放。我们要迎接石油工业这个新的发展时期，加快石油工业发展，我看也要抓这两个，一定要在这两个问题上做文章。

所谓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改革的形式、政策和办法，各个行业、各个厂矿、各个企业不完全一样。但是，改革贯穿一个总的精神，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通过政策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仅要调动部的积极性，还要调动局的积极性，调动厂的积极性，调动大队的积极性。你们大队下边是队、站、车间，这些积极性都要调动，一直调动到每个人的积极性。前方的积极性要调动，后方

的积极性也要调动。

现在，石油部很注意这个问题，各级都在抓这个问题。但需要说一下，最近我在北京讲过，石油部就是一个大企业，是一个大的联合企业，虽然没叫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石油公司，因为部直接管局嘛，通过局管厂嘛，人、财、物，产、供、销，很大部分是在石油部那里定的。石油工业部虽然是政府部门，实际上是石油工业的一个总管部，一个总的经营管理部。正因为这样一种情况，一定要分权。我这个意见还没有明确地跟石油部讲过。我讲这个观点，就是大企业，全国性的大企业，一定要分权，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最近我给有色金属总公司讲过，给石油化工总公司专门讲过。我说，他们成败的关键，搞好搞坏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把所有厂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要让归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工厂，自主权小于没有参加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厂子，不然的话，将来谁也不参加你这个总公司，都愿意独立出来。鉴于我们石油工业也是一个大企业，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大企业，所以要注意各级的自主权，要给各级以必要的权力，这样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改革的中心问题，是要调动各级的积极性，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使企业能够在一定程度或某种程度上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有一定的人权、财权、物权。当然，石油的产、供、销是统一的，但企业也要有一定的生产权和供销权。生产权，是没有问题了，生产嘛。将来也要有一定的销权。石油部有销权，你们有没有？应该有一定程度的销权，如计划外的。这个想法是建立在调动人的积极性基础上的。

在中原，在胜利，我讲过石油工业过去有个传统，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好的传统，你们有丰富的经验。现在，我们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承认各级、各个经营单位，以及每个人的物质利益。搞得好嘛，承认他一定的利益，搞好搞坏不吃“大锅饭”。所谓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二叫开放。开放的含义很广泛。沿海城市开放，是对外做生意，办合资企业，同国外进行经济技术合作，要扩大这个自主权。对我们石油工业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采取国外先进技术，把国外所采用的石油先进技术，能够及时地引进来为我们所掌握。石油工业贯彻对外开放的方针，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方面，譬如在海上搞合资经营，在陆上搞一些地质勘探方面的合作等。另外，测井技术法国比较高明，还有地球物理勘探，也可以找外国人签订一些合同。总之，通过合同的形式也好，买进技术也好，买进设备也好，请外国人帮助也好，我们自己出去学习也好，目的就是要掌握先进技术。

石油工业这个领域，是一个技术更新、技术进步比较活跃的领域。一方面是节能，就是节约石油的技术，国外这几年有很大变化，在石油使用上确实比过去节约多了。另一方面就是勘探、开发石油，石油化工的综合利用，出现了很多先进技术。今年上半年，国务院讨论过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要加强一些新兴的工业领域，如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激光、新型材料等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用新技

术来开发我们的资源。这在我们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是个很重要的、主要的问题。我们迎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就是要及时把国外最先进的技术、新兴的技术引进来，同我们的传统工业相结合，用之于我们的资源开发，改造我们的老企业，改造我们老的工业基地。

石油工业，包括石油化工在内，在我们国家算是新兴工业。现在国外对石油工业都在采用新技术上做文章。我们石油工业贯彻对外开放方针，就要特别注意采用国外先进技术。这因为：一个是需要，你要加快发展，就必须采用先进技术，如果不采用先进技术，还是在一种封闭的、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来搞，就慢得多。一个是可能，现在中央、国务院对石油工业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使石油战线完全有条件这样做。实行原油产量包干，包干基数以外的油，你们可以出口，外汇归石油部支配，用来大量引进新的技术。最近国务院又给了石油部引进设备、引进先进技术的很大的权力。在规定的范围内，你们要买什么，只要开出单子，自己就可以买，不必层层报批。现在，石油部门搞了包干，自己可以出口超产原油，有了外汇，又给了你们引进方面的权，进口什么东西也不干预，这样，石油工业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就有了可能性。

我想，这项工作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完全是买外国的，但要注意通过合作生产的形式，也就是国内机械制造厂与国外厂商合作制造的形式，不但把先进设备引进过来，而且逐步把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转移过来。这样一来，就有可能通过石油工业、石油化工这两家，还有有色金属正在准备采取这个政策，冶金工业也给了一点权利，把中国机械工业的水平带上去。

石油工业一开始，可以完全是买国外的设备，然后就可以请国外厂商来搞合作制造。容易造的东西，外围的部分，辅助的部分，通用的部分，我们在国内配；核心的部分，最精密的部分，搞合作制造，这样用钱少、造价低。开始时国内可能只能配到百分之二十，以后可能配到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七十，最后还可能剩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需要较长时间依靠国外来配。现在，世界上的机械制造，特别是大的成套设备，很少是由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公司，从头到尾全部制造的，大多数是配起来的，是“万国牌”。一个设备里边，好多国家的东西都有，但是每一个部件，特别是关键部件，在国际上又是最优的。哪个国家的这个部件好，就用那个国家的，用来组成一个成套设备。这样，我们可以逐步地做到，既不是长期一直买外国的，也不是完全不用外国的，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因为今天周建南同志也在，他是搞机械的，给大家服务的。石油工业将来能够与国内机械工业很好结合起来，需要买的就买，需要国内造的就造，最好买和造两者搞在一起，叫做合作制造。这对我们国家来讲有利，对石油工业来讲也有利，因为合作制造可以保证质量，造价可以降低。如果我们有几个工业部门能够带头，好好地抓一下，就可能使我们的机械制造工业有个大的改造，水平有个大的提高。

一个国家机械制造水平上不去，搞工业化就很困难。像一些阿拉伯国家，产

那么多石油，生活上比美国还要富，为什么还说是发展中国家呢？除了科学文化技术水平以外，我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的机械制造或者其他工业太差。他们就是靠一个石油资源，而且主要还是外国开采的，开采以后就拿去卖。那个地方叫石油美元，实际上就是卖资源。当然，阿拉伯国家也在用石油美元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工业，打下自己工业化的基础。阿拉伯国家采取了这个政策，北非阿尔及利亚也是这样一个政策。

我们石油战线形势很好，大有希望。辽河油田情况很好，工作做得不错，也比较扎实，比较可靠。希望按照中央、国务院的方针，今后能够继续在改革的问题上，在开放的问题上，也就是说，在调动人的积极性这个方面，在采用国外先进技术这个方面，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取得更好的经验。我们到这里来看了以后，心里更踏实了一些，感到石油部局厂领导干部会议以后，石油战线的同志正在努力落实，努力工作。根据现在形势来看，石油部提出的一九九〇年原油产量达到一亿五千万吨的目标，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在计划上还是留有余地，准备列一亿四千万吨。搞得好，完全有可能超过。

最后，祝大家再接再励，加倍努力，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的成就！

注 释

1．邓礼让，湖北郧西人。时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曾任石油部地质司调度处、勘探司钻井处处长，参加了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的勘探开发工作，后任辽宁盘锦市委第一书记。

进一步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七月七日至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辽宁考察经济工作时的谈话。

一、进一步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

一个上海、一个辽宁，是我国两个最大的老工业基地，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他们都面临着不少困难，需要很好地研究，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进一步发展。这是需要摆在当前经济工作日程上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辽宁是我国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四百七十亿元，居全国之首。多年来工业产值都在四百至五百亿元，仅次于上海。特别是辽南（包括辽东半岛）这一大片，经济相当繁荣，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像营口、锦州、丹东等城市工业产值都在三四十亿元以上。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相比，辽宁有不同的特点，它基本上是重型结构，重工业占三分之二，轻工业占三分之一。钢铁、机械、石油化工、建材是具有优势的四大产业。辽宁近年来在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工业产值已被江苏超过，退居第三位。全省骨干企业主要是老厂，装备老化、技术老化的问题很突出。它的四大钢厂、四大化工厂、五大水泥厂和许多骨干机械厂都是五十年代以前建的。当务之急是要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有不少企业已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上海也有类似情况，遗留的问题多，财政任务压得重，活动余地小，这几年的发展速度均低于全国，工作感到十分吃力。

对上海、辽宁这样的老基地，我们必须要有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要帮助它们进一步发展，在四化建设中起更大的作用，而不是让它们衰落。在辽宁听到一种说法，认为这样的老基地，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西方发达国家确实有一些传统工业基地已经或正在走向衰落。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传统工业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十亿人口的市场容量极大。在新的历史时期，老工业基地不仅不应衰落，而且应当更兴盛，作出更大的贡献。像辽宁、上海这样的老工业基地，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代替。我们不能让它停止不前，无以为继，而应创造条件，改造老基地，振兴老基地。这对全

国有利，对长远有利。沈阳市提出一个方针，叫做“振兴沈阳，服务全国，走向世界”。我看是可以和应当做到的。

怎样改造老基地，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呢？我在鞍钢讲过，要坚持改革，加速技术进步，运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改造我们的传统工业，武装我们的老基地。也就是说，要通过改革，通过革新改造，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把潜力充分挖掘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依靠对老基地、老企业加以改造，比起新铺摊子效益要好得多。要铺一个新摊子，搞一个新基地，周期长、投资大。我们过去讲投资多少，都没有利息的概念。如果建设周期长，算上利息，投资会成倍增长。改造老基地、老企业，有时算投资也不一定少，但它周期短、产出快，利息负担少，实际上是很省的。这次我听了鞍钢的汇报，到一九九〇年，他们只要加以改造，花三十多亿元的投资，就可以使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很可能是一千万吨。而且可以做到不停工，生产逐年增加。比起在鲅鱼圈附近新建一个四百万吨到五百万吨的钢铁厂不知要省多少。冶金工业这几年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上宝钢，投资占用了，冶金系统只好在原有基础上改造、扩建，钢的产量从三千多万吨上升到四千万吨，几年增加了一千万吨钢，质量、品种也有不少进步。这样实际上投资省、周期短、见效快。

要改造好辽宁这个老基地，首先必须做好规划，立足全国，通盘考虑，注意保持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辽宁省委提出，要以沈阳为中心，同附近的中小城市群组成经济网络，从而在辽南形成专业化协作、互相联合、各具特点、城乡结合的现代化工业基地。这个设想是正确的。我看还要把沈阳和大连联系起来，一个是腹地，一个是前沿，密切协作，就可以把辽南城乡这一整块带动起来，成为一个相当发达的地区。这样，不仅辽南这一片能繁荣起来，而且将对东北、对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一片，是可以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媲美的。辽南这一片组成以沈阳和大连为中心的城市群，有很好的条件，而且是在一个省内搞经济区，比起跨省跨市，矛盾少得多，比较好搞。希望辽宁做好工作，为全国提供新的经验。

要使老基地振兴，必须坚持进行改革，把各级、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进一步把经济搞活。辽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下放权力、改革体制、放宽政策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大体是可行的。你们可以边实践，边总结。省里要求增给三亿美元的外汇额度，国家也准备适当增拨一些。国家简政放权以后，省里也要注意，对大型骨干企业应给予应有的自主权，不要捆得太死，以免形成小企业很活，而大企业反而很死的状况，影响积极性的发挥。

发挥老基地、老企业作用的重要环节是要搞好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这一工作要同运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结合起来，重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不要再复制古董。这次我们看到的鞍钢第三炼钢厂，他们采用新技术，将平炉改为一百八十吨的转炉，改氧气顶吹为顶底复合吹炼，一边改造，一边生产，质量、产量都上去了，能耗、成本也下降了，这是成功的经验。钢铁工业应当改

造高炉，发展转炉，提高连铸、连轧的比例，增加优质钢材，这是世界钢铁技术发展的方向。现在新技术日新月异，国外已在试验炼铁不用高炉，如果成功后能用于工业化生产，那将是钢铁工业技术上的一场大革命。对老企业的改造，要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一个一个厂搞，取得实效。

这次到辽宁来，听说东北三省和西北一些地区开了经济技术协作会议，开得比较好。这实际上是一种松散的联合形式。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辽宁，不仅要在省内搞经济联合，而且要同外省区搞协作，加强经济上的横向联系。这方面的潜力也是很大的。在技术协作、物资交流、人才交往、联合对外方面，都是可以加强合作的。比如这次辽宁把电石生产压下来，支援能源比较充裕的宁夏发展电石生产，对双方、对国家都有好处。当然，双边的或多边的协作要两厢情愿。也就是说要扬长避短，互通有无，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此外，还要注意发展对外贸易，把商品打入国际市场。

像辽宁、上海这样的老基地，还是应当“内联外挤”，开拓市场。

辽宁省的技术改造，已经有了一个初步方案，请计委、经委和有关部门及时研究办理。对上海市，也要专门讨论一次。在今明年工作和“七五”计划中，都要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抓。

二、增产市场需要的产品和用活积存的外汇

从全国、从各地的情况看，这两年人民购买力增加很猛，市场显著扩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一九八○年的两千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去年的两千八百四十九亿元，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多亿元。主要消费品的销量大幅度增长，其中有些已经脱销。主要的有三大类：一是比较高档次的消费品，如优质纺织品、新式家具、新的四大件等。彩色电视机前两年还有积压，今年上半年就销售六十万台，相当于去年的总和，许多地方已脱销。二是汽车、摩托车，特别是农村富裕起来后，农用汽车的销量急剧增长。去年生产汽车二十四万辆，进口二万五千辆，一购而空。三是比较高级的食品，如名烟名酒、奶制品、儿童食品、风味食品等也很畅销。市场的兴旺是前所未有的。

对这样一种形势，这样广阔的市场，外国资本家是垂涎欲滴的。我们必须好好加以利用，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根据这两年的趋势，对中国市场的容量，对人民购买力增加的速度，要有新的观点，研究新的对策。据统计，到去年底全国结余的购买力已达一千四百五十亿元（其中手持现金四百五十八亿元，储蓄存款九百九十二亿元），比上年增加二百七十亿元。今年还是增长的趋势，购买商品越来越要求高档的、优质的。对此如果我们运用得当，善于引导，就会成为促进经济振兴的非常有利的条件。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采取单纯控制消费的办法，商品不够就发票证。现在靠这种办法来抑制消费，那就会把消费对生产的反馈作用搞掉了。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也能刺激生产。从宏观决策上考虑，应当努力增产适销对路、质地优良、价格合理的商品供应市场，缓和供需之间的矛盾。这样既

可以促进生产，活跃市场；又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回笼货币，安排就业。这是关系经济全局的又一重要问题，有待于我们去研究、解决。

面对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如果不采取措施跟上，就有可能出现两种不正常的现象：一是各地盲目发展，二是竞相大量进口。这两种现象对国家都不利。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国内的生产就必须相应地跟上去。不仅要有数量，而且要讲求质量，要质优价廉。现在我们有不少产品质次价高，群众不欢迎，而名牌产品批量又不足。市场要求商品要不断更新，不断升级换代。既不能靠大量进口消费品，也不能闭关自守，最根本的是要搞好技术改造。为了使产品在质量上过关，在价格上有竞争力，一定要十分重视引进技术。过去老是闭门攻关，不是办法。引进技术和自己组织攻关能够相辅相成，少走弯路。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如合资经营、合作生产、请进来、派出去、购买专利等。根据一些单位的经验，可以从后面搞起，见效快。就是先进口散装件搞总装，逐步增加国内配套的比重，依靠自身的积累，一步一步往前加，很快就发展起来，技术也消化、掌握了。造船工业是这样做的，打开了局面。这次我在营口市看的洗衣机厂也是这个办法。他们和日本松下集团签订合同，三年组装二十万台双缸洗衣机，日方负责提供技术、关键设备、人员培训等，每台抽头三点二七美元。产品属七十年代末的水平，现已投产。起点较高，速度较快，效益是好的。这样可以少进口成品，并避免了国内低水平的重复建厂、盲目发展。当然，其它一些方式，也可以采用。

轻纺产品、耐用消费品、汽车、食品等工业都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可以预料，它们将越来越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列入议事日程。就拿汽车来说，随着整个国民经济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它的大发展是必然的趋势。它可能是今后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工业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市场对汽车和摩托车的需要量急剧地、持续地增长，供不应求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汽车这样的商品与小商品不同，不能在生产上出现大的盲目性，大家纷纷办汽车厂，搞“小而全”是行不通的。要避免这种情况，就要善于因势利导，运用经济调节手段，从产业结构、管理体制、经济政策、行业管理、技术规范等方面采取有力的改革措施。要支持质高价优的汽车进行专业化、大批量生产，占领市场。同时，要有计划地进口散件，在基础较好的大厂组装，作为过渡，逐步增加国内配套的比重。有些关键性的零部件，可以长期进口。什么都想一下拿过来，全部自己制造是不现实的。对外开放是长期坚持的国策，我们利用开放的条件，与国外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也要有长期观点，长期打算。

适应引进技术、对外经济交流的需要，就必须解决外汇问题。这几年我国的外汇储备逐年增加，到一九八三年达到一百四十三点四亿美元，其中国家现汇结存八十九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又是上升的趋势，到五月底，国家现汇结存增为一百一十六亿美元。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从国家的整体利益来考虑，把外汇压在那里，对我们正在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是不利的。而且名声在外，东欧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要向我们借，我们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也因此而受到非

议。因此，如何有计划地把积存的外汇用好，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就成为当前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是一个正在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发达国家，当前贸易上略有逆差、外汇上有些欠款对我们较为有利。过去我们曾经设想过，把积存的外汇用在重点建设上。这方面固然可以用出一些，但有些建设项目，可以使用国外的贷款，特别是优惠贷款。我看应作出这样的决策：这几年内放宽一点，利用这些外汇，用在加速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进步上，用在进口一部分商品（主要是散装件）回笼人民币上，用在商品的革新上。这样，国内市场就活了，而且可以促进国内消费品工业、机械工业和其他工业提高技术水平。有些产品的质量上去了，花色品种改进了，还可以进入国际市场，至少是可以少进口了。今后，对外贸易总的是发展的趋势，搞得好的话，外汇也并不会少，这方面担心是不必要的。这件事方向看准了以后，就要作为一项重大决策很好去抓落实，银行在这方面要发挥积极作用。请计委、经委、财政、银行研究，提出放宽政策、简化手续的意见，报国务院审定。我看这个环节抓好了，有可能使我国的市场更加繁荣起来，使国内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

关于机械工业领导体制改革问题*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和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等负责人的谈话要点。

主要讲六个问题。

一、《机械工业领导体制改革汇报提纲》的思路是对头的，措施、步骤大体可行。改革的方向、措施可先定下来，或者是步子再大些，或许会有相当大的困难，现在还说不清，要在实践中再看。

二、比较起来，机械工业是最需要组织起来的行业，最需要专业化协作。现在机械工业条块分割特别厉害，产品也复杂。其他行业产品较单一，有的可能成为全国性的大企业。所以，体制改革从商业、外贸、加上机械工业先行。机械工业部带个头，下放企业后就一身轻，超脱了，可以总归口，成为国务院管理全机械行业的部门。中心城市的政企如何分开，时间可能长一点，至于组织跨城市的协作，也好办。总之，除军工外，机械工业先走一步，各地方、各部的机械工厂即使一时政企没有分开，也都是机械全行业中的一部分。首先是你们部超脱了，你们就好说话了。机械工业包括船舶，电子工业。机械部不是通用机械部，而是面向机械全行业的部门，是国务院的机械行业管理部门。你们就是起机械委的作用，计委、经委有关机械工业的问题，可以通过机械部去管，同计委、经委、体改委一样。

三、下放企业后，要有调节手段，包括经济的、立法的手段，包括重点基建及技术改造项目，以及优惠利率贷款的建议等，先从机械部提出，纳入国家计划。没有调节手段不行，否则，规划得好，也可能不一定听。机械工业部受国务院委托，进行有关机械行业的立法、政策、调整、改组方案的拟订。

四、先抓两个环节。一是搞活产供销，包括开放生产资料市场。企业产供销要面向市场，有相当一部分供销活动通过市场，国家重点任务可搞指令性计划，把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结合起来。二是企业下放，除军工外，所有各部的机械企业都下放，在下放中组织起来，首先是各部、省不直接管企业。可以通过三种形式组织起来，即主要在一个市内组织的公司，跨城市的公司及跨省、市、区的公司。有许多中、小企业，独立发展能力强，也不一定都要组织到公司里去。

五、“户头”问题较复杂，还需要研究。我倾向于多搞松散的公司，少搞实体性的公司。因为搞实体公司，可能成为封闭的，和地方矛盾就大，要多种形式

的，如合同联系、合作经营等。愈松散愈易组织起来。松散联合不存在“户头”问题，“户头”就要所在市，所得税交那里，如都统由总公司交，则成为紧密联合了。在企业有充分自主权的基础上，跨城市的公司、跨省市区的公司松散些好，就在所在地方注册，本地的企业也可紧密些，外地的企业可松散些。二汽联营公司的组织就较好，实际上就是一种合作形式。如果“户头”一挂到部，就相当直属企业了，你们就不好说话了。都挂到计委、经委，他们也受不了。下一步全面政企分开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分开了，这时候就好说了，到那时再说。指令性计划和产供销可纳入国家计划，通过部下达，不限于现在机械部的厂，也包括其他部的机械厂，一视同仁。总的先过渡一下，怕一挂“户头”，部和省、市又被牵住了。再考虑一下，也可能还有中间的形式。

企业下放中心城市后也要政企分开。中心城市如何搞法，中心城市间如何协作，经济区内如何协作还得研究。企业都要扩权，这是没有问题的。市里可能加强经委，局大大减少，中心城市内的经委、局、企业的关系，城市之间的关系问题，可先不急，再看看。

先明确部是机械行业的综合管理部门，二是企业真正扩权，并把产供销搞活，那时，城市也控制不住企业。城市很难自成块块。你们说，除国务院关于企业扩权的十条暂行规定外，企业还提了十几个扩权的问题，可以试点。

重庆的情况我了解，主要问题是省、市矛盾。重庆、武汉、沈阳一列“户头”矛盾就来了。中央各部具体工作可少管些，从几个部来突破，从中心城市突破，企业有了自主权，又有了市场，现在企业间、城市间的协作就正在发展。

六、几个具体问题。

利改税问题，企业有些反映，这是另外一个专门问题，已开会解决，可不放在这里讲了。

对企业的外贸权问题，《提纲》中写的原则上是对的，但要统一研究解决。可写明希望在外贸体制改革中定，这些都是涉及其它部门改革的一些问题，不可能单独来定。

为解决机械行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先行一步问题，赞成你们提出的提高折旧率，三年内每年递增百分之一，留给企业用于改造。

《提纲》第二十页关于制造部门与使用部门关系问题，“事在人为”也对，但制度上也要解决。可否逐步发展能连接制造部门与使用部门的公司。外国这类公司多，在中间为大家服务，直接与双方联系，有一批强的技术力量，既为使用部门服务，又与制造部门挂钩。工厂设计与工程承包要结合起来，既管设计，又管设备订货。上次开建筑业改革会议时，许多同志提出要搞一些工程开发、工程承包公司。先要让设计院独立起来，进行招标。这些可否由城乡建设部管，它可能超脱些，可再研究。《提纲》最后一段说在政企分开后可采取招标、投标办法，看来还笼统一些，要再研究。一九八五年底前抓十件事，可以。

回去后，找有关部门议一下，加以修改，并代拟批语，报国务院，准备正式讨论一次，这也是一件大事。

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改革计划工作方案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对这次提的方案你们说有两种反映：一种意见认为这样会引起经济失控，一种认为还放得不够。有两种意见比较正常，一种意见反而不正常，说明提出的意见还比较符合目前的改革精神。

有一个问题，是在这次解决，还是在下次解决，下次解决也可以。就是有些大企业完全由部、地方来领导不行，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部或地方向国务院要权时，站在企业一边。权一要到手，就高度集中，把企业管死了。如煤矿、钢铁厂、水泥厂、玻璃厂，要把余地留给企业，才能搞活。部门和地方不往企业放权，而且还层层加码，加计划外的指令性计划，使生产重要生产资料的大企业得不到好处。至少一些特大型企业，如鞍钢，要把权放到企业，当然也给部里一点权。现在我们有个危险，小企业搞活了，大企业搞不活。这同农业情况差不多，原来的低产区现在活得很，原来的高产区活不起来。越是大企业，特别是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不把权放到企业，活不起来。价格肯定要上涨的。价格上涨不可怕，这是制约基本建设规模的因素。一吨钢材原来四百元，涨到一千元，由于涨价搞不起，这就制约了。问题是属于计划调节占很大比重的生产生产资料的大型企业，如何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要“松绑”松到它那里就不松了。对这些企业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按一定比例实行产量递增包干，一包多少年，如有新的生产能力投产再改变。这样，企业有底了，它就可以放手挖潜，只要东西多了，事情就好办，部和地方不要在大企业之间抽肥补瘦。

关键是要把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价格上有市场价、调拨价。思想要解放，两种价格并存不会出多大问题。我记得当年讲粮食问题也是这样。当时有人讲，粮食一上自由市场，统购的就没有了。我说过，粮食统购任务必须完成。实践证明，粮食上了自由市场，统购任务没有发生问题。煤炭也是如此，说有计划外的议价煤，就会完不成调拨价的煤，实践证明也没有影响实行调拨价的统配煤。

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大企业搞产量递增包干，如钢材，递增多少。大型企业，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任务不要层层加码。国家计划部分，对地方、部门适当照顾，中央和省最好一本账，不然势必层层加码。指令性计划占很大比重的，

特别是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要搞活一点。可以有几种办法，有的包干，有的递增包干。大企业有的由中央直接定计划，这与利改税没有关系，是物资分配问题，当然也涉及超额利润分配问题。

计划体制，总的看将来还要进一步改革，但现在条件不具备。凡不具备条件的就不要改，以免将来出问题再走回头路，走回头路不好。现在提的改革意见是不是够？可能不够。不够也不要紧，总比原来要好一点。

计划体制改革，归根结底是两个问题：一是增加市场调节比重，缩小计划调节比重。即扩大市场调节，缩小指令性计划。二是指令性计划缩小以后，使企业的活动不与宏观的需要发生矛盾。为此，必须采用经济调节手段。匈牙利也是如此。过去我们不用经济调节手段，而用批准权来卡，效果不好。你们批，不一定正确；我们批，也不一定正确。宝钢是批准的，以前不是也有很多意见吗？要防止这个，就要有经济手段。

计划工作要搞长远规划，而且要真正搞好。过去是分钱、分物、排解纠纷，现在要搞长远规划，搞总体规划。国家计划能不能实现？要靠经济手段。尽管不完善，但要利用。如不解决问题，经济调节手段可以及时改变。不要走过去的老路，先从审批权限来控制，这是消极的。要避免企业活动与宏观经济发生矛盾，就要采用立法和运用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手段。这个文件对这两个问题有所体现。

关于消费基金我没有研究，但奖金税很起作用，现在大家要求将奖金税的起征点放宽到四个月。匈牙利提出的控制消费基金办法，开始很严，现在放宽了一些。既然是调节手段，是活的东西，闸门大了开小一点，小了开大一点，要有弹性。

计划体制主要矛盾是什么？要改什么？一是计划体制过于集中，比一九五七年还集中，部的权利不如过去大，企业的权利也不如过去大。我们国家经济落后，交通又不方便，又要搞一个高度的集中管理，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是我们的根本问题。过去高度集中，重复建设问题也没有解决。不要迷信高度集中，高度集中并不能加强计划性。我们的计划实际上对国民经济的指导作用很少，而是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多条条框框。什么“计划就是法律”，能行得通吗？计划要求多的东西发展不起来，计划要求少的东西大量发展。拆船，我说了几年，一直不落实，今年解决了，拆船拆下来的东西可以到市场去卖，这就落实了。现在农村这样活，小企业这样活，指令性计划还这么大，只能是生产发展的桎梏。但也不能一下子都变成市场调节。江苏每吨一百元的煤可以用，一百五十元的煤就用不起，如把江苏这一块纳入计划调节，财政收入、生产就会立刻下降。材料紧张，如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会更紧张。如钢材，对钢厂解决一个你给我多少，多了是你的，情况就要好些。玻璃也是如此。但全部取消计划价格，震动太大。从农村看，搞两个渠道就搞活了。一家一个月供应两斤豆腐，你要多买就高价，现在已经习惯了。生产资料也要搞两个渠道，现在企业实际就是这样干的。生产资料价格浮动部分将越来越大，官价部分比重越来越小，但也不能把价格全部放

开。江苏生产很大一部分是用计划外价格，由于没有搞死，所以搞起来了。如果江苏都由国家调煤，都给二十元一吨的平价煤，又给不了那么多，那就都搞死了。一头抓死，必需的东西要控制起来，一头搞活。文件上没有讲统配部分占多少？（柳随年：占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外边一部分肯定要增加，生产资料只要国家计划内那部分控制住。供不应求的生产资料如果把价格压低，基建规模就控制不住；价格高了，基建就能受到制约。国家重点项目由国家供应平价物资来保。过去我们害怕市场调节，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敢搞市场调节，供不应求的不敢搞。

计划工作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忽视市场调节。如计划不讲市场调节，其他改革就都不行了，因为卡在计委这儿了。计划上没有一点相应措施，整个改革无法前进。（吕东：轻工市场供应的材料保持一九八四年水平不动，要带来消费品涨价问题。保重点建设，不保轻工市场，连国家计划速度也不保，恐怕不行。）（陈先[1]：先把重点建设稳住了。要把企业搞活，国家增加的物资就不会太多。如增长部分统统由国家保，这就放不开了，要让一些，才能放得开。）

有一些完全靠国家低价原材料不行。搞市场调节，靠国家的经济调节手段，可以搞好，我也许乐观一些。在重庆，两个军工厂，门对门，都生产摩托车，都是五机部的。一个部的应控制住，为什么控制不住？如果军工卡住不搞重复建设，地方也会重复。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不发挥经济杠杆作用不行。这种体制，三十年证明不解决问题。计委过去强调指令性计划占领阵地，还发生这么多问题。我们全国之大，问题之复杂，哪能管得了。这个规定是放多了还是放少了？有的人说是放多了，有的人说放少了。可以总的评论一下，我看不一定会出大问题。即使出一些乱子，也可以解决。规模大了，我加税，运用调节手段。

这个文件叫体制改革可以，也可叫做改进计划工作的几个问题。这个文件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是大问题，一是集中分散问题；二是计划与市场问题，生产资料问题；三是开始用经济手段问题。将来也是这三个问题。计划体制搞不好，根本问题是价格问题，经济杠杆也是价格问题。市场调节扩大了，如何引导用经济手段、立法手段。市场调节发挥作用，经营不好的企业就得关门。

我们国家什么时候经济体制改革完成？我对外国人说，价格合理了，改革就完成了。否则事倍功半，理不顺，要费很多力量。

是不是这样：（一）文件改个题目[2]；（二）赞成这些措施，有些没把握的，有争议的去掉，早些出台。但这项工作并没有完成，要研究进一步改革问题。现在一下子改很多，改不过来。没把握的事控制紧一点，摸着石头过河，但要有所前进。

有个提议，可否明年一方面搞“七五”计划，一方面搞本世纪的长期规划。光搞五年的不行，搞本世纪规划，很多矛盾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耀邦同志也提过这个意见。年度计划今后不要下很大功夫，今年多了明年减，少了明年再加，没关系。五年计划必须和长远规划衔接，把十五年计划议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矛盾。当然，“七五”计划必须拿出来。这是个提议，你们研究一下。这就是提高

计划工作水平，不搞长远规划就难免盲目性，计委也不知将来怎样，地方也不知怎样。（陈先：原来想搞“七五”计划时，后十年一起搞，五年计划细一点，后十年粗一点。）粗一点不要紧。电的问题要解决，将来若干年都卡在电上。要把经济搞活，要把电解决，有电才能产生别的东西：上次我讲过，围绕电来考虑能源交通。有一些联系到能源交通，有一些不涉及，如坑口电站就不涉及交通；有些是有没有水的问题。从全面来讲，必须切实抓住电，电多了就好办。

廖季立从匈牙利考察回来后，就讲把计划放开，计委必须掌握经济手段。机械部带头不管机械厂，如定下这一条，国务院授权它管全行业，因为它没有亲疏了。调节问题，资本主义比我们灵活得多。法国发展新兴工业就准备好贷款，日本、南朝鲜也是如此，他们计划性比我们强。日本通产省是有手段的。我们行政办法，批准画圈，你们画了我也画，好多事是处长、科长的意见。这样搞计划，看来是高度集中，实际没集中。这几年搞出些东西，原来看不是好事，现在看是好事，江苏就是一例。

注 释

1．陈先（1919—），浙江宁波人。时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顾问，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区协调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物价小组组长，国家计委计划研究中心总干事。

2．“改个题目”指的是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意见，国家计委把文件题目改为《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增加了改革的内容，放宽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审批限额。国务院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将《暂行规定》发至全国执行。

我国汽车工业面临大发展的新形势*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邀请吕东、黄毅诚、周建南、王品清、饶斌、李刚等座谈发展中国汽车工业问题时的讲话。

一、最近，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有一个《关于汽车工业大发展和改革工作的报告》，一波同志写了一段批语，很重要。我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总公司无论如何不要形成垄断；二是不要影响企业应有的自主权。现在没有参加总公司的企业都有了自主权，如果参加总公司的企业反而没有自主权，那就不好了。总公司应当为企业服务，帮助企业解决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使企业感到方便，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是否可以建立汽车行业协会，搞行业管理，协调对国外的合作，提供国内外汽车工业的信息。中汽公司在协会里是主力，要起作用，但不要垄断。垄断对汽车工业的发展不利。外国人讲垄断，是讲大企业廉价倾销，在竞争当中把别的企业挤垮，威胁中小企业的生存。这样的垄断，我们这里没有。我们要反对的是利用行政手段进行垄断。中汽公司不要把自己作为一个行业管理部门，而要办成一个企业。过去我们一讲经济实体，就是人、财、物、产、供、销高度集中。一般地说，全国性的联合不能这样搞，这样搞必然是官僚主义，这已经是外国失败了的经验。第一是要有几个公司，不要只此一家；第二是公司内部的决策权应该下放。现在日本一些公司都在这样改。凡是高度集中的大公司，基层权力太小，弹性太小，上层信息失灵，就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形势。外国的跨国公司是比较松散的，它在各国的分公司有很大的独立性。我们国家这么大，有的公司也相当于跨国公司，再加上我们交通、信息又不那么灵通，更不能搞高度集中。全国性的公司，石化公司也好，汽车公司也好，都不是行政，而是企业，具有法人地位，但人财物、产供销必须适当分散。总公司对一汽、二汽这样的大企业，应当给它们以很大的决策权。对其他直接参加汽车公司的企业，或叫紧密联合的企业，也要给他们以相当的自主权；至于松散联合的企业，经济上完全自负盈亏，那就更不用说了。

二、汽车工业面临着大发展的形势，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我国的交通运输结构要改变。我们的铁路不够，当然还要修，但高速公路也应有所发展。这是势在必行，因为有经济上的需要。有人计算说，一条高速公路至少等于五条铁路的

运量，而投资比五条铁路少得多。所有的发达国家，铁路衰落，高速公路兴起，都不是偶然的。经济不发达的时候，货运量不多，距离又比较长，在这种情况下，用铁路合算；如果搞高速公路，运量不大，就不经济。但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必然要有高速公路出现。中国如果搞一条横贯东西的高速公路，肯定要赔很多钱。但在北京至天津、沈阳至大连、上海至南京、广州至深圳修建高速公路，肯定是赚钱的，因为货运密集，又不像铁路那样需要很多中间运输环节。我们国家幅员这么大，铁路是要修的，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就要考虑修高速公路。整个公路运输都要扩大，这就对汽车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我们国家里，不要很久，出租汽车就会有大发展，招手就来的出租车是最受人欢迎的。目前，家庭私用车不会有很多人买，而出租车对市民来说是非常方便的，送人、接人、上医院等，都离不开它。这样，城市用量就不少。我看出租汽车还会很快发展到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因为它比公共汽车更方便，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很需要。

再看远一点，将来，在经济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私人买车（包括轻型车、小汽车）也会有相当的数量。我们有些同志，对高档消费品的购买力估计不足。现在买电冰箱、洗衣机这么猛，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并不是中国人都富起来了，而是因为农村放开了，小企业放开了，大企业也扩大了自主权，这样搞下去，很快会有一部分人收入大大增加。这在全国虽然是很小的一个局部，但中国大，人口多，全国加起来就相当可观。中国十亿人口，有百分之十的人富起来，就是一亿人口，等于一个日本；百分之五，五千万人，就是一个法国；百分之一，一千万人，也相当于人家一个国家。对市场形势要足够估计，现在我们往往估计不足。资本主义不怕购买力增加，不怕市场需求量扩大，如果哪个国家出现了这种形势，简直成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当然，我们不是说中国也要搞高消费，但不要把购买力看成可怕的东西，而应当利用人们的购买力，促进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促进包括汽车在内的高档商品的发展。

三、发展汽车工业，当然要避免盲目性，但首先必须着眼于解决供需矛盾。现在汽车的需求量很大，到处供不应求。你不能满足人家的需要，人家就要想方设法去发展。如果无视供需矛盾，盲目性是很难控制的。

根本的办法是以现有的大汽车厂为基地，在专业化、大批量的基础上，大量供应质优价廉的汽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两种可能：第一，避免“你搞我也搞”，大家都去搞那种质量低劣的盲目生产；第二，也可以避免大量进口外国汽车。

汽车工业大发展，向你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不要一见到盲目生产就害怕，就急于出来限制，而要研究如何使自己的工作适应于这种情况。不要光靠老的办法。单纯用行政手段是难于奏效的。

当然，我也赞成有点行政干预。日本的《振兴法》，是一面限制，一面大批量生产，大量供应。有个材料说，五十年代末，日本有个汽车厂当时产量和我们一汽一样，二十多年来，人家是大发展，质量也大大提高了，而我们一汽还是老

样子。这也说明，无视市场的供需关系，单纯依靠计划指标，定点，行政手段，这种做法是不行的。一定要用新的办法。这样，汽车工业发展了，供需矛盾解决了，盲目生产限制了，经济效益也提高了。你们要用新的认识，新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来解决新的问题。

四、看来当前完全依靠国内生产解决不了供需矛盾。要充分利用与国外合作的条件，利用沿海开放的条件，利用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来发展汽车工业。一汽、二汽，除了自己生产以外，也可以搞一些组装车，从国外进口一些关键部件，国内组装，廉价出卖。这样，汽车工业的水平会很快提高。沿海开放城市的条件比较好，也可以让他们进口一些组装件。军工企业也可以组织进来。哪些零部件由一汽、二汽供应，哪些零部件由军工供应，哪些零部件进口，要好好组织一下，这样就可以把一般的盲目发展抑制住。

有了这一条，然后再逐步地增加自力更生的能力，通过进口组装零部件，技贸结合，合作生产，逐步向国内生产转移，什么时候试制成功了，再代替进口。有一些散装件，也可以长期进口，比如冷气、密封件等，如果国内解决不了，为什么不可以进口呢？进口一些零部件，不要怕。即使进口百分之二三十的零部件，我们自己还有百分之七八十嘛！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总比进口成品车便宜得多。而且，质量提高了，车好用了，批量增大了，汽车工业发展起来了，供需矛盾也解决了。这样解决供需矛盾，起点就高了。不然，汽车工业水平老是上不去，供需矛盾也长期解决不了。为了进口组装件，可以动用一些历年积存的外汇。顺便说一下，我们的外汇主要用到哪里去？看来，基本建设方面很难用出去，但可大量用于技术改造，用于引进必要的设备、技术和零部件。老怕没有外汇，总是放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种守旧的思想。可以用一些外汇，用于沿海城市的技术改造，改造老企业，发展新产品；进口一些当前市场很紧张的东西；进口一些散装件，国内组装后供应国内市场；甚至可以引进一些组装线，从最后工序搞起，逐步往前开拓。能把外汇变成人民币，也是很合算的。南朝鲜、新加坡和台湾都从组装散装件入手，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加工能力。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工业基础，比他们那个时候好，我们又有广大的国内市场，条件比他们好多了。这样搞下去，我们的工业面貌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工业品的质量上去了，外贸出口换汇率就可以提高，外汇也会增加。应该看到，让一定数量的国外产品进来，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国内工业的发展。当然，如果不加限制地大量进口，会把民族工业扼杀。但完全绝对地保护是不行的，对促进国内工业进步没有好处。

五、汽车行业要开一次会，由国家经委、计委、机械部、中汽公司联合召集，把汽车工业的形势、方针、政策等大的问题议清楚，然后作出规划，有个大体的安排。汽车行业协会也可以在这个会上产生。

有了规划以后，最后能不能实现，关键还得通过经济的办法。比如沿海城市，他们也搞汽车，他们与中汽公司之间就会有协调、有竞争。这就出现了新的关系。如果你本身搞得好，批量大、价格低，就容易进行协调；如果你自己比人家落后，他们就不听你的。我们希望通过竞争，通过协调，使汽车工业走上一个

正确发展轨道。这样做，符合经济规律，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开会事先要作好准备，对规划有所设想，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汽车工业确实面临着大发展的形势，但也确实存在一种盲目发展的危险性。汽车工业和小商品不一样，固定资产比较多，如果盲目发展，浪费也大。因此，又要有规划，又要有协调，有竞争。通过不断协调，不断竞争，有所前进，在前进中避免大的盲目性。

沿海城市开放以后，对他们的积极性要找个出路。一个沿海，一个军工，他们都有条件搞汽车。三线大的军工厂那么多，要把他们的力量发挥出来。沿海城市、军工企业和中汽公司，要有点竞争，加快发展。对大的汽车厂，没有点挑战是不行的。不能让他们把“地盘”把住，心安理得地去搞。这样没有危机感。没有危机感就很难进步。要避免低水平的盲目发展，但是中汽公司不能把“地盘”把住，要允许沿海搞，允许内地军工企业搞，中汽公司可以组织一下，因势利导。同时，相互之间要有竞争，最后“鹿死谁手”还得看一看。沿海城市可以向大汽车厂挑战，中汽公司可以用自己质优价廉的产品来抑制沿海城市的盲目性。在国内允许互相竞争，但是在外国人面前不准互相拆台。既要反对盲目搞小而全，又要反对垄断。中汽公司要有意识地创造一点竞争条件。孟子有一句话，叫做“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意思是说一个国家没有强敌威胁，太安逸了，就会衰败灭亡；相反，遇到挑战，发愤图强，必有崛起的一天。国家如此，企业也是如此。像一汽、二汽这样的大企业，也得有点危机感才行。总之，既不要盲目发展，又不要死水一潭。

对《人口控制和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1]的批语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日

我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一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指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有什么了不起。

注 释

1．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中堂根据农村实行一胎化的实际困难，经过仔细测算，1984年春向中央建议在农村开放第二胎生育，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办法达到控制人口总量的目的。当时国家计生委干部张晓彤和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的马瀛通根据梁中堂的建议重新测算后，共同撰写了这份研究报告，并向中央建议城乡都可以采取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办法开放第二胎生育。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也对这个报告作出批示给予肯定。后来有关部门确定在山西省翼城县进行允许农民生两个孩子的试点，从1985年7月起一直坚持至今，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山西省和全国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线企业调整必须搞军民结合型*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听取鲁大东、郑汉涛关于三线企业调整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我们军工很多尖端技术解决了，但很多民用技术没有解决，现在军用技术要向民用转移。为什么军工转民用那样困难？国外行，我们就不行？因为国外的军工尖端技术向民用转移，有个叫“商业化阶段”。那就是说，新技术的开发，先要经过理论研究，再中间试验，进行商业开发，把成本降下来，过好“经济关”，然后投入生产。但我们军工搞尖端技术不计成本，搞出来了，没有进入“商业化阶段”，即技术过关了，没有过“经济关”，转到民用就用不起。军工要加强经营管理，过“经济关”要有人来组织和衔接，想办法使民用用得起才行。现在，苏联有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

三线企业调整要认真搞好，要在原有基础上发挥作用。二汽是三线企业，建设是成功的。有段时间，有的说它不行，讲它运输距离长了。我去看了，还可以嘛！运输问题，可以把公路修好一点，汽车的容量加大一点，也就解决了。贵州平坝的飞机厂，我去看了一下，也还是可以的。这里，顺便提一个事。三线地区搞了一些战备电台，我知道四川剑门关那里就有一个，谁去过问一下？计委去问一问，了解一下，要有个解决办法。一是撤掉，一是利用起来。这样的单位，也要调整改造，发挥作用。能不能利用起来转播电视？有的虽然打了洞子，洞子也是建筑物，做其他不行，用来做仓库也可以。

三线企业职工子女的升学问题怎样解决？这些企业中，有那样多的技术人员，至少可以把中学、中专办好。我到处都讲这个问题。一个企业办不行，可以联合起来办，有条件的还可以办大学。如新疆马兰基地，我去了，给他们讲，可以抽点技术人员办自己的大学。青海湖边有个221厂，我去后也讲了，可以自己办大学，至少要把中专办好，中专毕业出来，就可以到西宁，那里需要人才。光办中学不行，要大量办中专，培养中等技术人才，这样最容易就业，还可向城市输送。

对第三种情况企事业单位的调整，大东同志讲需要国家拿点钱，并提了具体意见，我看问题不大，就按大东的意见办。对解决企业调整自筹资金方面的一些政策措施，原则上都可以同意。一是有条件的企业，在一定年限内免交税利，资金集中用于调整；二是对亏损或停缓建企业，将几年的亏损补贴和停缓建维护费

一次拨给企业；三是银行给予一定年限的低息或贴息贷款；四是企业的折旧资金全部留给企业。但对搬迁企业免征建筑税的问题，现在都没有开口子，不要定。这几条要区别不同情况处理，有的部门钱多一点如兵器部，有的部门则差一些，要分别对待。

今后，大三线的军工厂，除少数外，很大一部分企业要搞成军民结合型的厂。军工厂不能临时搞民品，也不能光是为了找饭吃才搞民品。军工企业能力强，问题是经营管理差，成本加百分之五的利润作为销售价对生产不利，是大锅饭。搞民品抱临时观点不行。要把军工厂的民品纳入国家计划。

还有一件事，今天说一下，就是我们在“七五”期间以及“八五”前期，主要是搞老厂的改造和扩建。今后发展生产力，提高质量，要靠老厂。这要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针。这样，投资周期短，产出快。我们国家如果走新建厂的路，那就发生资金是用在新建厂上，还是用在老厂改造上的问题。用在新建厂上，老厂的技术改造就没有足够的资金。结果，新厂在相当时期不能投产，没有效益；老厂的技术改造又没有足够的资金，衰退老化，不能改造，这个路子不行。我们要对老厂进行改建、扩建，生产发展了，质量提高了，生产就上去了。老厂进行改建、扩建，产出快，周期短。搞交通运输，也是如此。煤、铁矿、铁路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国家交通压力最大的，不是不通路的地方，而是那些通路的地方。因此，交通、公路、煤炭、火电、钢铁，也是要按改建、扩建的方针去搞。这次我到鞍钢去了，鞍钢将来通过改建、扩建，很可能搞到年产一千万吨钢。第三炼钢厂，把平炉改为一百八十吨的转炉，改建后就增加一百万吨钢，而且还不停产。高炉同样可以利用大修由小改大。通过改建扩建，产量增加了，水平提高了，在十年后就会有很大的改进。国外现在是一步炼钢，不经过高炉，用煤气还原铁，今后鞍钢、宝钢也可以如此。我一直表扬冶金部，这些年，投资都集中花在宝钢上，其他方面没有投资，但这几年却增加了一千多万吨钢，每年增产二百万吨。过去人们议论是“保了一小撮，压了一大片”，现在看来是“保了一小撮，活了一大片”。过去，交通方面，各建成各的网，到处先铺摊子，然后再填平补齐，这不行。要改变过去的办法，“七五”期间和“八五”前期确定了要扩建、改建老厂这么一个方针。

三线企业要选一部分工厂，打破部门界限，实行联合协作。现在机械工业部不管直属企业了，全部下放地方，它作为国务院的部门，代表国务院进行立法和制定经济政策，是管理所有机械行业的归口部门。这个问题，明天国务院就要讨论。

三线要选一批军工企业加以充实，承担“七五”、“八五”的建设任务，不要再去新建了。把现有的设备、大型机械用上去。有些在民用部门改建、扩建，有些在三线军工厂去搞，去配套。三线企业在调整、改造的基础上，选一部分好的企业，加以充实，担负大的任务。前提条件是军工企业必须是按军民结合型来办，不能只搞军品，这样可以挖掘军工企业的潜力，发挥作用，也是解决投资少、资金不足的途径。三线工厂的大中型企业，是可以承担大的任务的。

另外，出口产品问题，军工企业要好好研究。三线的出口能力很大，现在没有列入计划，国家也未纳入规划，力量不能发挥。将来要给些政策和优待，把它搞活并提高水平，以发挥三线企业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

大东同志，你们可以先抓企业调整，然后再研究哪些企业可以充实、改造、改建、扩建，这里所说的充实，也就是配套的意思。军工企业搞民品，起点应该高一些，要抓开拓性的产品，要搞一般民用企业过不了关的产品。军工搞民品，既要过技术关，也要过经济关。军工的设备技术与国内的民用企业比，要先进一些，但与国外比，还是落后的。所以，军工转民品也要抓技术引进。要从国外引进技术，因为总的来说，我们技术水平低。军工技术人员多，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能力强，要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对军工企业要提出要求，不能停留在不亏损、找饭吃这个低水平上。否则，军民结合型的企业就建不成。问题是两个方面，从国家来讲，要帮助军工企业挖掘潜力，发挥作用；从军工厂来讲，要积极转变为军民结合型的企业。总之，要发挥三线的作用，为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在欢迎参加第二十二届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宴会上的祝酒辞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八日

同志们：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参加了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以后胜利归来。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代表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同志和今天在座的领导同志，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表示衷心的感谢！

代表团出发前，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了你们，嘱咐要在比赛中多夺金牌，而精神文明这块金牌一定要夺到。你们没有辜负中央的期望，获得了比赛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我注意到，国外的舆论说，中国体育代表团不仅在运动比赛项目上拿到了许多奖牌，特别是表现了崇高的比赛风格和道德风貌。对此，我感到分外高兴。你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四化的信心和斗志。

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和展示的崇高精神风貌。全国各族人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为你们取得的胜利感到光荣和自豪。

我在一九八二年底欢迎参加亚运会回来的我国体育代表团时曾经说过，你们这次彻底把“东亚病夫”这顶帽子甩掉了。今天，我要说，你们不仅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且已经开始向世界体育的先进水平迈进，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建国三十五年来，体育战线的成绩是突出的，有很多经验值得很好地总结。

我国体育健儿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朝气蓬勃，勇于创新，平时高标准、严要求，勤学苦练，比赛时顽强拚搏，奋勇进取，不断向新的高峰攀登。党中央、国务院希望，全国各条战线的同志们，认真学习体育健儿这种精神，解放思想，奋发图强，锐意改革，积极进取，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作出更大的贡献！最后，我提议：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胜利，

为各条战线的同志们在四化建设中取得更大成绩，

为同志们的身体健康，

干杯！

对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草稿的修改意见*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起草组谈话的要点。

总的看，涉及改革的问题基本上都讲到了，许多好的观点都提到了，作为草稿，基础是好的。但作为中央全会的文件，问题还讲得不够集中，也讲得不透，比较散一些。城市改革的内在联系究竟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给人的印象不是非常明确。中央和国务院经过最近一个多月的议论，体制改革的眉目更清楚了。草稿的架子可以不大动，有几个问题必须讲清楚：

一、改革的性质是什么？草稿的第二、三两部分应当回答这个问题。草稿中这方面内容都有，但不够清晰。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两方面互相适应，我们历来都是这个理论，搞合作化、大跃进、“一大二公”时，都是这个理论。讲不断完善和改进生产关系，苏联也是这样提的，不要泛泛地讲这些。应当说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是如何提出来的，性质是什么。在进行农村改革时，当时是不很自觉的，开始只是说把一亿人口的地区放开，没有想到发达的地区也要放开。结果，这些地区变化那么大，很快超过了发达地区，后来发达地区也放开了。在四川搞企业改革时，开始也只是从提高物质利益入手。现在有必要对改革的性质问题讲清楚，不要抽象议论，不要含糊其词。

我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这是完全对的，问题是模式没有搞对。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是研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对社会主义如何搞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十月革命初期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围攻，经济只能集中。不久，列宁搞了新经济政策。但后来斯大林的做法与列宁的设想不同，当然有它的特殊原因，就是帝国主义的封锁，经济不发达，必须先搞重工业，勒紧裤带搞军事工业，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完全按经济规律办事。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就反对经济工作按政治道义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苏联当时基本上是不讲经济规律的。因此，我们的改革，只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还不行，因为那样讲也可以解释为还要搞“一大二公”，就看你怎么分析。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过去照搬了苏联模式，脱离了我国的实际。按照中国的情况，改革必须搞多种经济形式、家庭承包、商品生产。这要从中国的特色讲起，从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讲起，限制和束缚生产力的障碍到底在什么地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什么前进与后退的问题。草稿中二、三两部分，有些内容可以不

写。如果讲三十多年的错误，就不只草稿中的八条。这八条许多不是改革的内容。关键应讲清楚经济体制改革是什么性质。要从理论来讲，但要有的放矢，然后引出下面的改革来。

二、改革的中心问题是要解决企业活力，这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义最集中的弊病，就是企业缺乏活力。但缺乏活力不是原因，原因是整个模式不对。我们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有活力的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也不是搞没有活力的社会主义。苏联搞的就是没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弊病很大。通过改革建立起生动活泼的有活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一条新路子，是最正确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罪恶很多，但它战胜了封建主义，把生产力发展起来了，而且有一定活力，这是它的很大功绩。我们把经济搞得这么死，肯定不符合马克思的设想。经济工作不讲价值规律，肯定搞不好。由于没有活力，我们的浪费大得很，投入多、产出少，有的甚至投入大于产出。没有活力不可能有经济效益。列宁在论帝国主义时说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发展已经枯竭，现在看不完全是这样，它们的技术发展仍然很快。我们的技术更新慢，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毛病，而是受体制模式的限制。这就是改革的实质所在。

各国必须解决企业的活力、劳动者的活力问题。从这个问题出发，必然涉及整个体制问题。这样就可以把一系列问题点出来。其他问题不进行相应的改革，就不可能把企业搞活。以解决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相应进行其它改革，这就是改革的要点和蓝图。

其他方面的改革，内容很多，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计划体制必须改革。计划体制不改，企业活不了。

二是必须运用经济手段，主要是价格。价格体系不改革，一切改革都无法展开。过去靠行政官僚办法分配实物，可以不讲价格；现在放开了，必然要靠价格。价格不合理，东西就没了。社会上生产的东西很复杂，价格不可能由国家一一规定，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说法不确切，把计划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了。没有合理的价格政策，是无法搞好计划工作的。现在谁讲话也不那么灵，但价格最灵。新疆的羊毛，如果按质论价，就不会大量掺沙子运到上海去。煤炭按发热量计价，就不会大量运煤矸石。这几年棉花、油料发展很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价格提高了。广东的鱼为什么增长很快，就是价格放开了。问题在于我们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还是违背它而受到惩罚。

三是改革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各级政府要管经济，问题是如何管。改革原则主要是政企分开。政企不分开，条块问题解决不了，也不可能有竞争，不可能有合理的联合和统一的市场。政企分开，企业自然就会发展横向联系了。横向经济联系，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我们搞社会主义，反而把它退回到封建割据，这是很不合理的。

上面讲的三个东西，是计划经济的主要标志。我们过去不是这样，主要靠指令性计划、行政手段、政府直接管企业。靠计划去卡，控制审批权，虽然也起了

点调节作用，但把经济搞死了。苏联那样搞，有它的背景和包袱；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已经没有任何包袱，可以做到该如何搞就如何搞了。

三、关于计划体制改革问题。“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可以作以下的解释：

（1）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2）“市场调节为辅”，指的是盲目的自发调节的部分，只是小商品、服务修理业、三类农副产品，这些都可以放开。

（3）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计划经济不等于都要搞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这都是计划管理的具体形式。

（4）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要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

这样，就把计划与价值规律统一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发展商品生产，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来为计划经济服务。价值规律是完成计划最重要的手段。

文件要有一段，好好把计划经济说清楚，既区别于苏联，又区别于资本主义。体制改革根本的是要解决计划体制问题。计划不改革，讲别的改革就很困难。现在是到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陈云同志早就说过，中国不可能把什么都计划进去。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国家，不能都搞指令性计划。不要把计划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这次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四、文件要比较系统地讲价值规律与改革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成败，就在于价格体系的改革。价格体系搞好了，其他改革就事半功倍，否则就事倍功半。如果价格不改革，企业活力就受到制约。东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体制改革不改价格不行。价格不合理，投入产出算不清，谁赔谁赚是一笔糊涂账。改革的具体措施可以不讲了，但关系一定要讲清楚。党内相当多的同志至今不懂得这种道理。企业放开以后，必然要以利润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而利润是同价格直接联系的。在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情况下，企业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企业的经济利益、工资奖金同经济效益挂钩，只能是同利润挂钩。企业向哪里增加投放，关键决定于价格。山西小煤窑为什么这几年发展快，去年一年就增产二千多万吨，主要就是允许它提价，不提价，靠计划怎么也上不去。要使经济活而不乱，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手段，这是最根本的办法。其它方面的改革，包括指令性计划缩小到什么程度，企业放活到什么程度，都取决于价格改革的进度。

要调整不合理的价格结构。同类产品内部质量差价的调整，要跨大步。这种调整，一般不涉及利益再分配的问题，要争取两三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价格改革，是改革价格不合理部分，不是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不是冻结物价。现在国际市场价格经常在变动，我们要搞对外开放、扩大外贸规模，价格不变是不可能的。群众的顾虑不在于物价是否调整，而在于实际生活水平是否提高，银行存款的利息能否抵销物价上涨的因素。合理调整物价，可以刺激生产

的发展。

价格改革要稳步进行。文件要讲清楚价格改革与体制改革的密切关系。“七五”期间，把企业搞活了，计划体制改革了，价格合理了，三者配合在一起，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可能出现一个飞跃。

改革价格的基本路子，是逐步缩小国家定价的范围，扩大市场价格的范围。对于必须由国家定价的部分，价格也要逐步进行调整，使之接近市场价格。实践证明，什么东西的价格放开了，什么东西就多了，东西多了价格就降下来了。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能源与其他产品之间，国内产品与国外产品之间，不合理的价格都要改革。但涉及人民生活的，都要通过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险等办法，使人民生活不致下降。为了保持市场稳定，国家可以掌握一批物资，甚至进口一批货物，在必要时抛到市场上去。这方面，在三大改造以前我们有许多好的经验。

前几天，匈牙利部长会议副主席马尔亚伊对我说，中国现在是改革价格的黄金时期。匈牙利在改革时，没有抓好这种时机。当时，他们生产增长较快，工资增加很多，但没有相应改革价格。现在生产增长幅度下降，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价格就不好改了。但是他们决心还要改。他认为，中国现在生产增长率高，人民生活有改善，为什么不能抓紧改革价格？要把工资和价格结合起来进行改革。

讲经济杠杆，还要讲银行的作用。社会主义应当很好运用资本主义银行作用的经验。

五、关于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解决条块问题、企业合理联合问题、国家机关的组织机构问题，方向就是政企分开，现在已经开始有了好的现象，但要解决这个问题，任务还很艰巨。

六、关于文件的题目和结构。题目可以改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是否还要加“城市”二字，也可以再研究。

第一个问题写得是好的，可以保留。

第二、三个问题，合起来，讲改革的性质。

第四，讲计划体制改革。

第五，讲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

第六，讲改革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

第七，分配，单独写一条。两方面都要说一下，一方面说社会主义要合理分配，不是两极分化，而是要真正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分配；另一方面讲合理分配，必须要有差别，重点可以讲差别。责任制，可以放在这里面写。厂长负责制这里可以不写。讲分配中，可以把责任制展开写。企业之间的关系，可以放在政企分开中写。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可以放在解决企业活力问题中写。

第八，关于人才问题，要单写一条。人才对于改革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可以围绕改革来讲人才，不是一般地讲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问题，要着重强调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经济专业的课程设置，也要相应改革。同时，联系讲几句教育、科技体制的改革。

对外开放，可以不写。

第九，讲加强领导，保证改革健康发展。

把上述九个问题讲透了，人们就能看到中国的体制改革究竟如何搞。这样写，内容突出，篇幅可以减少，可以有点气势。改革的方向、路子和思想，必须写出来，集中一点，扣紧一点，有理论，有方针，有大体方向。改革的具体内容可以不写。

在安徽省党政军负责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日

一、关于安徽省的工作

我这次是第一次到安徽，但是我对安徽的情况、安徽的经验是很注意的。不是现在，早在四川工作的时候我就很重视看安徽的材料。比如凤阳的“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这个材料，我在四川就印发了。这一次来的目的，一个是补课的性质。另外一个，我们在北京搞经济工作，比较关心煤炭、关心钢铁。黄磺[1]同志在京开人代会期间，约我一定要谈一次，我答应一定要到安徽来。安徽整个形势很好。但是淮河有那么一小块地方非常困难，主要是自然灾害太频繁了。所以想来看一看，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总之，一个是补课，一个是学习，听听安徽的新鲜经验，是带着这个目的来的。

中央对安徽的看法，大家都知道。安徽的工作是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尤其是农村的改革，安徽是立了功的，安徽一直不断地创造这个经验。现在，这个问题在全国来讲已没有异议了，但开创不容易啊，万事起头难。全国有这么好的形势，安徽有一份很重要的功劳。另外，我讲改革，安徽走在前列，不只农业，比如教育方面改革也是走在前面的，尽管教育改革还刚刚开始，还需要完善，但科技大学是带了头的。工业方面的改革你们也不落后，当然工业原来基础差，工业项目过去国家投资少，昨天黄磺同志讲了，效益差，这是一方面。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在工业方面也是积极探索的。我原来在四川时，就已经注意到安庆石化厂，那时张大为[2]同志在那里嘛，他提出了经理、厂长“组阁”的问题，后来我在四川相当一部分县以下企业都实行了这个制度，就是经理确定下来以后，或者厂长确定下来以后，副经理、科长一律由他“组阁”。这个“组阁”是我在四川取的名词。当然，国营企业不行。安徽的工农业生产形势一直是好的。尽管安徽这几年灾害比较多，但是没有妨碍安徽的前进（黄磺同志：这与中央的支持有很大关系）。我印象最深的是大米二角二分一斤，我最先就是听到你们安徽大米价格这样低。这些就不多讲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很高兴地听到昨天黄磺同志讲到你们整党的情况，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断巩固发展的。黄磺同志跟我讲了，调整后的各级领导班子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事业心强，干劲大，团结好，都想干一番事业，我看这个非常重要。特

别是省级班子，老同志支持新同志，新同志尊重老同志，互相学习，团结战斗，讲原则，讲改革，讲效益，经常深入基层，注意解决实际问题。我来时间不长，也是这个印象。你们讲到整党，第一条抓了路线问题，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各个同志提高了执行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政策的自觉性，使各个部门把三中全会以来总的路线、总的政策同各个部门的具体政策、具体业务联系起来，统一起来了。第二条正在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这是来自于军队的经验。中央书记处认真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意义极大，虽然过去实际上也是这样看的，但是没有这样明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育，不仅是为了解决路线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团结问题。"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有些是早出来的，有些是晚出来的，有些是这个时候出来的，有些是那个时候出来的，有些是最后出来的。反正都是老人家发动的，很多东西是通过老人家定下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同志来讲，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处境，当然，他都有个不同的牵连。如果是一直打倒，一直到三中全会才出来，那就是一身轻。我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的没有一个人没有账，我有我的账，你有你的账，你要抓我，我也可以抓你。恩怨甚深。"文化大革命"以人排队，以派排队，这个流毒非常深广，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党不可能兴旺发达，我们给下一代，给第三代不可能留下一个很好的团结的基础。所以，军队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意义极大。现在中央正在抓这件事，只有这个搞好了，团结才能促进，"三种人"才能正确的清理，第三梯队才能正确的建立。

我们"七大"解决了两大问题：一个是路线问题，第二个是团结问题。毛主席当时由于整风的政策正确，经过整风，党的面貌焕然一新，觉悟很高，思想非常一致，非常团结，因此，我们很快就把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消灭了，那是不容易的。那一次斗争是十分成功地进行的，团结了绝大多数，只跑了张国焘一个嘛，当时王明还是中央委员嘛！这你们老同志比我更清楚了。没有那一条政策也不行，光讲路线，你把所有沾了王明路线边的，历史上沾有错误路线边的，都排挤在外，那也不行。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批人的问题。那次整风把好人都团结起来了。当然讲团结不是没有原则的，就是先把路线搞清楚。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都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去看，不能割断历史。我经常在中央书记处讲：我当时是省委第一书记，两派都打倒，谁也不敢保；我要是个农业书记或者是工业书记，恐怕现在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讲了。那可能有一派要保，有一派要打倒。如果有一派保，如果保的这一派是当时中央文革支持的，这就可能要结合，结合以后就要办错事、讲错话，就要上台。我说不想上台的人是很少的。说句老实话，我是想上台、想结合的，问题是没有条件，人家不要你，谁也不敢沾你的边。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没有一派保，到以后反而主动一点。那时很想有一派保一保，当然我也不敢支持一派，也没有这个条件。总之，那时候如果在台上，我看这次整党大概总得要检讨就是了。当然"文化大革命"有些坏人造摇，诬陷，这是个人品质问题。如果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就要作分析了，因为你那时哪知道是毛主席的主张，还是"四人帮"的主张，我说"文化大革命"根本的还是毛主

席的主张。当然，“四人帮”就利用他这个东西，造成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我没有参加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但是，在中央讨论整党时我多次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在开工作会议的时候，我就讲了对过去的事，要宜粗不宜细。当然，光讲这个不行，首先还是要讲路线，三中全会路线，在这个前提下讲团结。要讲团结，讲谅解，一切问题要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所以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现在还在争自己正确，那就不可能搞好团结。我认为有两个东西意义很大：一个是耀邦同志讲的，各个部门要把三中全会路线和本部门业务工作结合起来。第二个是军队提出的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在这个基础上，清理“三种人”，建设第三梯队。这样，我们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肯定会出现一个兴旺发达的景象。现在看来没有这两条，“三种人”也不能正确清理，第三梯队也不一定搞得好。因为有派性的地方，你讨论别的问题可能没有意见，要说到干部意见就不一致。要彻底否定两派。作为具体人来讲，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作为这个派来讲，不能说哪一派就是一贯正确，哪一派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因为那时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错的嘛，错误地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嘛。现在看来，有些同志还没有完全搞通六中全会决议，本来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结论嘛。我认为，在整党中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很重要。当然不是赞成翻腾过去批两派，就是把思想搞清楚，这样大家都从派性中解放出来，往前看，搞四化，不要再争谁正确谁不正确。干部都按干部标准来衡量，“三种人”就是“三种人”，犯错误的人就是犯错误的人。我们如果能够消除了派性的痕迹，对我们国家，对我们党的建设，对我们的千秋万代意义极大。如果我们第三梯队选得不好，还有派性的残余，那第三梯队将来在选第四梯队时还会把这个东西带下去。这样危害就比较大，就不能团结全党，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所以，黄磺同志昨天提到这个问题，我就讲中央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重点就在于彻底消除派性，不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派性不能彻底消除。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将来一定会出现一个非常好的形势，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大家心情就舒畅了。当然，具体怎么搞，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有很多具体的指示，这里不多说了。我就说这个意义。清理“三种人”是很重要的，选拔第三梯队是很重要的，要结合整党来搞，也不一定等整党。我这是就全国来说的，当然我想这对安徽也是适合的。你们安徽这方面的情况我没有了解，不太清楚。我是就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问题的。

这次我来这么几天，省委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省委的汇报，一些单位的汇报，市委的汇报，都向中央提了一些建议和要求。提这些问题无疑都是正确的，都是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大概可分三类：一类问题这一次已经解决了，这我就不说了。第二类问题要带回去，也有可能不要很久的时间得到解决。第三类问题在安徽虽然提得有道理，在全国现在还排不上队，以后时机成熟再去解决。我看不外乎三类。至于哪些属哪一类，就不必来讲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昨天我说对安徽没什么话讲了，因为汇报时都插了话了。今天这么多同志在，对安徽一句话不说，好像也不好交待。下边我想着重向同志们吹点风。三句

话不离本行，我在北京是主管经济工作的，所以我想讲一讲经济工作方面最近北京议论的一些问题，中央书记处、国务院议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多是没有定案的，但是看来大部分可能将来是要这样做的，当然方案还没有。这一段我们开了很多会，应该说这一段议论的问题，在我们经济建设中都是相当大的问题，我想简要说一下。今天我想说两个问题：一个是建设方针问题，一个是改革问题，吹这两个方面的风。

二、建设方针问题

（一）建设方针问题。“七五”计划现在明确了。主要是依靠老企业、老基地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为重点。这包括“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间花掉一千亿元搞的大三线。不是说新的一个也不搞，关系到整个国家建设，起关键作用的某些大型项目，当然还要新上一些。不只是“七五”，“八五”前几年，也就是大约七八年的时间，要贯彻这个方针。为什么要这样来考虑？

一是从我们国家的整个生产力布局来考虑的。大概经过一九五八年，以后经过三线建设，经过“文化大革命”，应该说生产力布局这个战略问题基本上展开了，但是效益不怎么样。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再搞一次大的战略展开，就是现在不要再打一次运动战。我觉得过去我们中国经济建设吃亏，这个运动战，也可以叫摆屁股吃亏比较大。这个吃亏和打仗不同，打仗就是步行军，半个月也可以把部队调过去，扑了空还可能调回来，而经济建设不能这样。我们解放以后大摆了几次屁股，吃了很大的苦头。一开始说一线、沿海不搞工业，因为那是什么国防前线。本来我们刚刚接收摊子以后，沿海工业基础比较好的，没有很好地进一步让它发挥作用。在提出处理“十大关系”以后又重视沿海，刚刚重视不久，到了一九六三年提出三线建设，又把沿海丢掉了，花了很多投资去搞三线。三线是应该搞的，不是说搞三线是错误的。但是，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搞那么大，这是值得考虑的。如果那个时候不是花一千亿元，拿二、三百亿元给沿海，那情况就不同了。都搁在山沟里头，有些地方根本没有人，没有生存条件，也有这样的厂啊，现在必须要转、要迁。那时毛主席讲备战，打洞，归纳说什么“山、散、洞”，好像洞越深越好，山越大越好，距离越远越好。三线一千亿元投资没有发挥作用。当时强调从备战出发，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形势估计得过于悲观。这不能都讲了，反正是摆了一次屁股。这几次摆屁股对中国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在一块地方，把它搞起来，然后依靠这个经济实力，逐步开发。美国是从东部向西部开发，澳大利亚也是从东部向西部开发，加拿大是从西部向东部开发，苏联是从西部向东部开发。我们是东边搞一下子，西边搞一下子。我看这个不怎么样，当然那时候我们也不懂。我们这次不能再搞新的战略展开，今后就是到二○○○年，只能够按部就班，循序前进。当然现在也不能绝对化，新的还是要搞一点，三线还是要搞，大项目还是要搞。

二是，我们原有企业潜力很大，改造老企业是花小钱得大利。有一些如果你

要是再搞新摊子，就是花大钱不得利，几年不见利。有一些就是花小钱见大利。因此，要搞老基地、老企业改造。同时，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上有一个很大的经验教训，就是搞上一个项目以后，就把它的利润搞得一干二净，使它一点再生产能力都没有，然后把这钱一块拿来搞新企业。新企业搞起来了，老企业也差不多了。搞老摊子改造，可以花小钱见大利。我原来对这个有点想法，还是一般化的，这次去鞍钢具体化了。鞍钢如果不铺新摊子，就在那里搞技术改造，改建扩建，搞一千万吨能力都是可能的，甚至也有可能搞到一千二百万吨。这样，花钱大大节约，技术人员成套，领导班子成套，生活区都在那里，而且还可以不停产，边建边干。像你们淮南、淮北，也可能还有个马鞍山，有个攀钢，还有个包头钢铁厂、太原钢铁厂，也有这个条件。煤炭，如按原来的想法，花钱很多，到一九九〇年还出不了多少煤。要按现在的方针，按高扬文等同志现在的想法，同样的投资，一九九〇年可以多出七千万吨煤。你看这多划算。还有一个大教训，就是过去搞一个新企业，挤掉一个老企业，把一个老企业老化了。现在进行老企业改造、扩建、改建，生产能力扩大了，生产水平提高了，技术前进了，提高到新水平。像原来一汽、二汽，现在都搞到几十万辆车的生产能力，技术也前进了。你如果把一汽、二汽丢掉以后，另外再搞个汽车厂，一汽、二汽就落后了，不行了。丰田五十年代跟我们长春汽车厂一样大，现在他们年产几百万辆，我们还是六万辆。现在我们不是说要搞新兴工业吗，新的技术革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新兴技术去武装老企业，这个潜力大，花钱少，见效快。

因为中国没搞过资本主义，不懂商品生产，不会搞商品生产，所以我们在搞工业、搞基本建设这个问题上，没有周期观念，只有一个花多少钱的观念。我们有些单位不注意，花国家的钱花多少他也不心疼啊！光看投资多少，这不科学，不能说明问题。你投资一亿元，是三年投产，还是五年投产，还是十年投产，情况就大不相同。现在我们许多同志搞建设，一没有利息观念，二没有投入产出观念。我花了一亿二千万元，三年建成了，过了四年，我收入了五千万，实际上支出只花了七千万。你如果花了一亿元，你是搞了十年才投产，也没有产出，你就不止花了一亿元，另外还有利息，这样一亿元搞十年就是两亿元，哪是什么一亿元啊！这个利息是个客观的东西，不是人为的东西。我们过去不加利息这个东西，对资金形成一个错误的信息。旧社会也好，现代国家也好，没有哪个国家是没有利息的。没有利息是过去土老财的观点，我有三块银洋，埋到地下，过了十年，还是三块。金融必须有利息，资金也必须有利息。我原来也不懂，是哪个事情启发了我呢？就是跟法国搞了个核电站，法方提供十八亿美元的设备，大概八九年的时间，就要还他四十亿美元。我就觉得这个怪啊！我们国家搞个核电站，用国内设备只合十八亿美元，那为什么买外国的设备，到时就还他四十亿美元？买我们的设备，过上十年，还是十八亿美元？那不过是银行、国家吃了亏就是了。银行少收二十亿美元，国家少了二十亿美元，也就是等于我们再投资的资金少了二十亿美元。没有利息的观念，没有产出的观念，带来了基本建设设计上一系列的错误。人家外国搞煤炭设计，两年出煤，三年出煤，我们要搞一个大井，

八年出煤还是好的。你们的潘一矿就是十年出煤，（袁振[3]同志：十五年出煤。）十五年出煤啊！外国人千方百计要快产出，因为他们筹集资金与我们不同，他们都是银行贷款，因而一开始建设一个项目，脑子里天天想的是什么时候把钱还了，还了他就解放了。我们中国就是年年给我投资，然后我搞多大规模，根本没有一个资金归还的观念。所以我们国家基本建设浪费很大。当然，除了计划，一上一下也是一个浪费原因。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改造老企业，对老企业改建、扩建，最大的好处是建设周期短，第一背利息少，第二产出快。我是一点一点扩的嘛！今天扩大一点，明天扩大一点，我又不想大量地搞三通一平，而是一件一件地改，搞了一年，第二年就有收益了，加在一起就是数量好大的数字啊！这就不错嘛。（苏桦[4]同志：我们最近改造合肥钢厂的方案就是这个办法。）那好啊，结果等于你没有投资。所以只讲投资，不讲产出，这是个死账。所以要下决心，普遍搞技术改造，充分利用国外好的技术、设备等条件。特别是大的工厂，大的项目，一定要技术改造，改建扩建，一起来搞。五年到八年，就按这个方针办事。最近讨论“七五”计划，我说，别的不多讲，主要就是把这个方针定下来，现在正在按这个方针跟各部算账。

（二）要搞好消费品生产。国际上认为我们这几年形势好，主要看我们市场好了。他们并不看你那个增长率，因为他们不相信你讲增长多少，他就看你那个市场。如果市场上什么都排队，什么都没有卖的，你再讲增长率，他也不肯信。中国的购买力强，外国人非常羡慕我们这么大的市场，但是我们自己长期不懂得这个市场的作用。当然，讲不懂也懂一点，毛主席的文章里就有，他讲我们中国有个大市场，可作为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大市场。对重工业，我们还懂得一些，如农民需要拖拉机，我们就搞拖拉机厂；农民需要化肥，我们就搞化肥厂。但在消费品问题上，长期不懂得这个东西，用抑制消费的办法搞建设。最近袁振同志给中央发了个电报，主张适当鼓励消费。这个中央是同意的，最近几次议论过这个问题。当然，在我们国家，我们也不必提倡什么高工资、高消费，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这个条件。就是发达国家，现在按这个路子走的结果也并不好。但是我们要适当鼓励消费，要运用市场这个优越条件促进建设。低工资、低消费的办法，不利于加快建设速度。所以我们最近研究，首先要把外汇用活。为什么呢？我们国家现在压了一百亿美元外汇，把这么多外汇放在那里实在是蠢事，不但没有发挥作用，还压了银行的资金。原来我有个想法，要从外汇中拿出五十亿美元搞重点建设，现在证明用不出去。再一个，我们搞一些重点建设，对成套设备，往往外国还提供一些优惠信贷，所以我们的外汇压着。我们现在定了个方针，就是要在几年之内，把外汇用出去，放手一些。在北京我讲过这个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要怕将来没有外汇，到没有外汇时再说。（袁振同志：咱们不是黄金很多嘛？）黄金有，但黄金现在不好卖，我们也不保密，还没有卖，价格就降了。当然也包括黄金在内，黄金也应当要卖的。你比如说金子啊，铜啊，你就可以搞一些别的消费品来销售。不要光考虑战备的需要，打起仗来还是有办法的嘛，可以收啊，动员老百姓交嘛。你放到仓库里干什么，你搞成制成品卖

了，到时候要用再收嘛。反正都是中国人，还在中国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压缩库存。我现在不讲这些了，要讲用活外汇。把外汇用到什么地方呢？我们在北京定了这个方针，用于技术改造，甚至可以用于进口散装电子件。如果我们搞个组装线，我一下子搞不起来，可以进口散装件，进行组装。这样，第一满足人民需要，第二可以回笼货币，第三通过这个东西，我们可以逐渐往前搞。这样市场繁荣了，人民需要满足了，财政收入增加了，企业的面貌改变了，将来外汇也会有了。我们现在要下个决心，准备拿个七八十亿元来搞这项工作。就这么个指导思想。这当然有些风险，关键是这几年我们要把经济搞活。

（三）“七五”计划要突出电力。我原来讲过，能源、交通要围绕着电力，我们现在经济建设的主要矛盾还是电力不足。现在还是要突出电力建设。交通很重要，但是主要是电。像坑口电站就没有交通问题。交通也不是没有潜力。另外，交通结构是个大问题。这几年我们中国交通结构没有搞好，主要是条条为主，铁路系统要搞铁路，公路系统要搞公路，不是考虑整个运输网，这也是重复建设，浪费很大。现在我们要突出一个公路建设。我给你们讲个小故事：今年人代会期间，有个政协委员，我找他谈话，他要在广州修高速公路。这个人是香港的地产企业家，五十多岁，很有点魄力，他讲话不会外交辞令，直来直去。这次我跟他谈了谈，探讨交通问题怎么搞，他就跟我当面讲了，交通啊，你们的指导思想我看还是三十年代的指导思想，因为我还是讲铁路怎么搞，煤怎么搞。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没有研究，现在外国、发达国家为什么铁路会衰退？三十年代，铁路景气；进人四十年代以后，铁路就衰退了。你为什么不研究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外国铁路都衰退了，你还在这里搞铁路？他这个话很有道理，我们是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啊！他然后就跟我讲，他说一条高速公路等于五条铁路，高速公路加集装箱优越性很大。但必须有个条件，就是货运很紧张的地方，而且不是单一的品种，光是运煤还是铁路划算。我后来听说我们哪个综合运输研究所有个数据，如果一天有一万辆载重汽车通过，修高速公路比修铁路划算得多。所以，至少在长江三角洲，在沈阳、大连、广州，在珠江三角洲，要搞那么几条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最大的好处是在工厂把集装箱装上去，哪里需要就运到哪里去，没有什么中转环节，损耗可以减少。用铁路运输，从首钢到西直门外，要两天到三天，如果用大吨位汽车，那只用几十分钟就到了，差多少啊！所以在运输结构上，海运要发展，河运要发展，特别是公路要发展。公路一定要提高质量，提高公路质量是非常划算的，可以节约能源。

（四）我们国家“七五”规划以后的发展战略问题。在我们这个国家，一个是要搞新兴工业，一个要搞传统工业，一个要搞第三产业。因为我们国家大，有不同层次的结构，当然各地方不完全一样，像上海、沿海，它们的新兴工业就要多一些，但我们考虑的重点，是用新兴工业的技术改造老企业。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条。这次张劲夫同志到日本去考察，他看到一个厂，机械也不太行，他们就是加了一个数控机床，加了一个电子计算机，马上质量就不一样了。

我在这里想着重讲一讲第三产业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到处是第三产业不

够，第三产业是容纳入员最多的。昨天黄礦同志讲，人家到黄山旅游，吃的、住的还很困难。那么好的地方，那么多人去，本来是最好的发财机会，但是没有人去发这个财。你一开始不能盖大饭店，可以先盖小饭店嘛。我这次在路上给黄礦、袁振同志讲，去年国家给北戴河一百四十万元，今年也只有二百八十万元，他一下子宾馆也盖不起来。那里的老百姓就搞旅馆，已有二百家，四千个床位。我访问了三家，三个月的收入就是六七千元。这些小旅馆一个床位一天两元，一间不大的房子可以摆四张床，稍大的可以摆六张床。这样一间房子一天收入八元到十二元。服务项目也在增加，有的打算买彩电，看一场收几分钱。我还看了一个旅游户，搞了太阳能洗澡间，不用烧火，洗一次一毛钱，真发财呀！现在旅游是是热门啊，谁搞谁发财。但是我们国家搞就赔钱，主要是价格搞得太死。我对北戴河的同志讲，你北戴河要大搞第三产业，一个为港口服务，一个为旅游服务，你们是小城市，怎么搞都不影响大局，可以变来变去，随行就市，只要买者愿买，住者愿住，卖者愿卖，就可以。这样一搞就活了。

工矿区搞第三产业也有很多门路，可以养活很多人，解决就业问题。这方面我们过去想得很单纯，没有重视发展第三产业，所以老讲就业困难。其实不仅旅馆、饭馆，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搞，除了商业以外，在服务业方面，比如城市双职工现在洗衣服都很不方便，但是没有人去帮助洗，为什么不能组织搞洗衣服呢？我最近在北京讲，中国要大搞出租小汽车。这个谁搞了，肯定发财。现在职工送个病人，老婆半夜生孩子，老人出门，都很不方便，搞出租小汽车呀，只要一招手就来了，那肯定赚大钱。这个不仅在城市，将来发达的农村都可以搞。（王光宇[5]同志；现在有的供销社搞了出租彩车，谁娶媳妇谁用。）这是个开始嘛。这个搞起来肯定方便群众。同时，现在老百姓有钱没有地方花，都存到银行，这样搞他不就花钱了？也就是增加了消费了嘛。将来还有信息服务。现在外国各种各样服务性公司多得很，都养了很大一批人，这都是第三产业，为大家服务的嘛。

发展食品工业是个大事，这方面的路子非常宽广。黄礦、王光宇同志都讲了这个问题。我看安徽发展食品工业的条件很好，问题就是要搞先进技术设备，搞开发中心，不能光停留在生产传统食品上。你们有丰富的原料，可以加工出很好的东西。要由低逐步到高，不能一下子好高骛远。有些太高级的东西，现在也卖不出去。但是按这个路子走下去，将来肯定前途无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搞第三产业的占百分之七十，搞工业、农业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他们还讲，下一个社会是“服务社会”，有的叫“信息社会”，像美国、日本等国家，将来就可能不多搞工业、农业生产了，主要靠第三产业，为其它国家服务，赚这个钱就够了。过去讲工人有蓝领阶层、白领阶层，将来蓝领阶层越来越少，白领阶层越来越多，坐在办公室工作了。我们国家既有新兴工业，也有传统工业，过去对用新兴工业改造传统工业，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重视不够，同时传统观念上也有问题，许多人不愿意搞这个事情，现在慢慢有点转变。我有个孩子，可能要去饭店里面的餐厅部工作，带个头嘛。第三产业大有作为。当然，要由低档到高档，农村乡镇企业不能搞那么高级的东西，而是要面向农村市场。现在，我国的食品真正经过工业

环节制造的不到百分之十。将来，人民购买力提高了，他就要买制成品。外国食品中，一般都是制成品。现在我们也有了方便食品了。我认为将来就业没问题。农民就业，除了种粮食，就是挖矿、筑路，搞轮换工，去造林，去养鱼，搞乡镇企业，搞建筑材料，等等。在城市，我看主要就是搞第三产业。乡镇也要搞第三产业，现在乡镇群众在很多方面都不方便，放个电影都没有地方。目前，我们发展经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价格搞得太死了。由于这方面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服务行业、公用事业都是亏损企业，没有活力，谁办谁赔钱。但是，要调整价格，特别是对一些东西涨价，很不容易，往往要挨骂。过去有一段时间，广州骂得也很厉害，后来逐步搞活了，东西上来了，现在都讲好话了。解决这方面问题，上海要困难一点，我跟陈国栋同志讲，你这个班，别人是不好接的呀，你什么价都不敢涨，什么东西都比全国便宜，这怎么得了？这样搞发展不起来。群众的生活水平要逐步提高，有一些公用事业我们要随行就市，公园也好，煤气也好，不要搞得那么便宜，但也不能提得太高。你使企事业有了活力，能够获得利润，有了收入，国家不干，集体可以干；集体不干，个人也要干，结果是大家都一起干。现在是国家不干，没人干。例如，现在一些城镇洗澡还排队，建成一个澡堂子要上面给多少钱，这是一种把自己捆死的办法。对这一类事，地方上要大胆一点，广州、福建都敢干嘛。

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这个问题讲简单一些，讲几个观点。我们农村的改革非常成功，正在完善，向广度、深度发展。现在我们主要是搞城市改革。城市改革的中心是解决企业活力问题，使企业都活起来。企业活了，什么都好办。我们讲要搞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特征之一，就是使企业有活力，或者叫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我们就是要搞这么一个社会主义。过去很长时间，我们搞社会主义的一个教训，就是没有活力，搞得死气沉沉。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定义，要概括很多条，其中有一条，就是企业要有活力，没有活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我们搞改革就是要解决企业的活力问题。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真正发挥出来。这就要解决企业自主权问题，使企业成为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还要解决好企业内部的各种问题，包括企业利益、职工利益、企业经营同个人劳动挂钩等。要真正解决企业的活力问题，可不简单，必然要涉及到现行体制的一些重大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三大问题：

（一）计划体制问题。在计划问题上有几个观点要讲清楚：首先，中国现在还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第二，我们所说的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市场调节，只是指的那小商品、小企业，不关系国计民生的。盲目的、自发的调节，这叫做市场调节，“为辅”只是指的这一部分。我们有个口号，叫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三，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而指导性计划，主要是通过价值法则来实现的。这是最重要的观点。通过价值规律，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

计划，不是通过指令，而是通过指导来实现计划。这个观点同过去相比是个大变化。将来这个问题作了决议后，在中国是个创举。我们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只能是越来越少，指导性计划应当是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价格手段、经济手段、通过信息来实现我们的计划。这将越来越成为我们的主要手段，越来越成为主要的部分。

（二）运用价值规律的问题。计划和运用价值规律是一个统一的东西，不是矛盾的东西。不能把计划和价格看成是对立的东西。运用价值规律，这个比谁的讲话都灵。哪些东西供应紧张了，把价格一提，马上就不紧张了；你说哪个东西多了，卖不出去了，把它降一点价，马上就卖出去了。你说你要优质产品，把优质产品价格提一下，马上优质产品就多了。如果不懂价格，天天讲提高产品质量，不能说一点作用没有，但至少是事倍功半。要是运用价格手段，运用经济调节手段，那就事半功倍，不用操那么多心。过去讲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我个人认为恐怕不科学。它们不是老大老二的关系，价格是实现计划的主要手段。当然，我们是公有制，也正是由于我们是公有制，计划占主导地位，就不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价值规律完全盲目地、自发地起作用。我们是可以加以运用，加以调节的。斯大林讲过价值规律不能创造，但是，我们能够运用它，限制它的消极作用。我想从缩小指令性计划开始，然后再来加强经济调节手段，这是计划改革的两个要点。要增加企业活力，就要改变计划体制。

企业权力扩大了，独立自主经营了，计划体制又改了，下面的问题，就是对价值规律的运用。我们必须注意运用价值规律，运用以价格为中心的经济调节手段。企业自主权扩大了以后，又让它利益和职工挂钩，肯定是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作为企业来讲，那很简单嘛。你总不能当一个经理、厂长，利小大干，无利大干，利大小干，这不可能啊。问题是我们对利大利小要调节得合理，这个东西如果跟不上去，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前进。因此，现在集中的问题是个价格问题。当然，价格体系很复杂，解决价格问题要很慎重。目前，我们暂时用税收来调节，用税收的办法来缓解价格的不合理。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从现在起，真正把价格体系的改革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用几年的时间，把价格搞合理。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最后要看价格体系改革。如果价格体系的改革没有搞好，我们的改革也很难发展、很难成功。这是外国人的以及我们自己的切身体会。大家都感到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楚了。我们中国的价格体系的毛病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社会很需要的东西，它可能价格很低；社会不怎么需要的东西，它可能价格很高，就是这么个问题。因此，我们老讲什么长线啦，短线啦，喊了这么多年，问题解决了吗？还是没解决，越喊越差。加强短线、缩短长线，谁听你的？没有用。就是说，我们的价格不能反映供求关系。总之，我们要改革，已经研究定了。怎么改？要去研究嘛，总能研究个办法出来。中国的价格体系改革没有很大的危险，大家不要太怕，因为我们不属于通货膨胀，而属于结构不合理的调整。结构不合理，不可能带来你提我也提，而是有的提有的不

提，到一定的时间，它就大体上合理了。

稳定物价，不是绝对的稳定，不是冻结物价。过去把稳定物价看作是冻结物价，这是错误的，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外国人听到中国建国二十多年以来物价没有变动，直吐舌头，讲不可想象。为什么要讲价格，为什么要讲价值规律，我们现在已清楚了，因为社会主义生产还是商品生产，这个价值规律就是商品生产规律。哪有搞商品生产而又不让价值规律起作用呢？这根本就行不通嘛。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总是别别扭扭，我看就是这个问题。马克思明确指出，价值规律就是商品生产的规律。问题是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盲目地在起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自觉地运用它。我看就是这么个差别。过去我们既承认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又不承认价值规律起作用，这不是自己跟自己作对吗？至于价格怎么改，现在还没有现成的方案，正在研究。我们已组织了一个研究价格的班子，新老合作，有老的经济学家、新的经济工作者，还有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今年年底以前要把方案拿出来。我开了一次会，出了一些题目，现在继续在研究。看来有希望，意见比较接近。价格改革的迫切性，这是大家共同的看法。我在那次会上讲了，长期讲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活而不乱的关键问题是合理价格，能够反映供求关系的价格。这是关键，其他的都靠不住。

（三）政企分开，解决条条块块问题。就是要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管理经济，这个问题我觉得社会主义国家也未搞清楚。根本问题是要改变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现在我们的各级政府，都等于是一个大公司经理，各部也是个大公司经理。条条经理、块块经理干涉企业，这个要改，根本问题就是要政企分开，企业独立经营，政府管政策的事，当然要逐步实现。我在国务院常说，我们这个桌子上坐的代表政府的，我是一个，万里是一个，几个副总理也算，另外加个计委，财政部，他们也还算政府，其他都不能代表政府，屁股都坐在他那一边，不是坐在轻纺工业一边，就是坐在机械工业一边，或者坐在他的那个直属企业一边，他不是政府，又有政府的权力，所以就有一个限制别人、发展自己的问题，因此就变成条条块块。这个块块都不是创造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人家来这里搞企业，然后收税，而是直接干预企业。外国的州长总是设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吸引人家来投资。当然，这要有个长远的规划。我们现在大体是这样的：产品单一的如冶金部，已经变成公司。其他稍微面广的，机械部带了头，下放企业，报上登了，这是个大改革。我说，你只要带个头，你就是国务院对机械工业的总管，可以代表国务院，因为它没有轻重之别了，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了。屁股变了，脑袋也变了。另外，外贸部政企分开，也开会定了，就是说今后外贸部不管公司了。公司完全自负盈亏，外贸部对全国公司一视同仁，执行政府的职能。交通部改革，书记处会议也讨论定了。交通部将来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没有一个自己“亲生的儿子”，它也可以代表国务院。我讲，凡是政企分开的，它就可以代表国务院，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凡是政企没有分开的，就不能给它这个权力。国务院的政企分开，现在还在搞，要把企业都放在中心城市。下一步，还要在中心城市搞政企分开。不然，你放给它，

它仍搞政企合一，那不行啊！条条块块不破除，搞商品生产，加快发展中国经济是不可能的。

（四）人才问题。我们要搞这样一套，人才是个大问题。我们原有的知识、经验显然不够了，就是刚才袁振同志讲的，有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我们原来会的那一套已经不适用了，如农业就是什么时候栽秧，什么时候收割，催耕催种，工业就是调度等等。作为党委、作为政府，应当管的事情没有管，不应当管的事情管得太多，结果管得不好，官僚主义很厉害。除了官僚主义以外，还有一些人为的问题，在这次整党中，应当很好地揭露一下，抓紧处理一些典型案件。但是，我还是要讲一句话，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不改革，国家机关不可能实行根本的改革，官僚主义就解决不了。当然有些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这次整党中，对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还要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官僚主义那么多？因为在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我们每个人都不能驾驭自己的机构，为机构体制所制约着。

说到人才问题，我们今后不能光要搞自然科学的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必须注意培养经济管理人才。这个问题很重要。你们现在技术人才很缺，经济管理人才更缺，有些甚至还是空白。袁振同志不是说要办商校吗？就是要抓这个问题，要培养人才，特别要注意培养经济管理人才。这样，从学校就要作些改革。现在课程也没有，教师也没有，讲经济管理讲什么？这里还有个培养师资的问题必须解决，有些方面。我们可以跟国外合作，慢慢形成自己的一套。

还有个金融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银行的作用还要大大扩大。一九八○年，我刚当总理不久，新西兰总理马尔登[6]来访，我和他会谈，简单说了一下我们的经济改革问题。他说，你这个改革好是好，就是你没有银行人才。他比我们懂，过去我们不懂这些，现在知道了银行的重要。那次会谈，马尔登还说，我们新西兰银行还是很有名的，我们可以同你们合作，帮你们培养银行人才。

总之，我们的体制改革过去几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整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展望未来，任重道远，还有很多问题。中国人是聪明的。美国经济学家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和苏联一样，但是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比较灵活，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比苏联灵活。我们比较注意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就这几年来看，我们的农业改革搞得非常成功，路子越来越明确了。城市体制改革大体上也有个初步的轮廓，包括出发点是什么，落脚点是什么，还要围绕着什么搞，最后大概是个什么结果，或者叫做什么样的模式，通过各地这几年摸索，也逐步清楚了。这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很有希望的。中国很有可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搞得好，对其他国家也是一个贡献。

注 释

1．黄璜（1933—），江苏涟水人。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任霍邱县委书记，六安地委副书记，江西省副省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

2．张大为（1932—），河北抚宁人。时任安徽省副省长。曾任安庆石化总厂厂长，合肥市市长。

3．袁振（1917—2003），山东莱州人。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曾任山东泰西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鞍钢党委第一书记兼经理，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河北省承德市委第一书记，安徽省顾委主任。

4．苏桦（1922—1989），安徽全椒人。时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滁县专署专员，蚌埠地委副书记，马鞍山市委副书记，安庆石化厂厂长，安庆市委书记，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

5．王光宇（1919—），安徽霍邱人。时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曾任皖东北区委书记，阜阳地委书记，安徽省委秘书长、农工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书记、副书记。

6．马尔登（sir Robert David Muldoon，1921—1992），新西兰前总理。爱尔兰移民后裔，19岁参军，曾参加过二战盟军太平洋战争的一些重要战役。

中国科技大学要为国家建设输送更多人才*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日

* 这是赵紫阳视察中国科技大学时的谈话。

科大办得好，教育改革、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很有成绩，科大在教育改革中要更上一层楼。人才问题是发展经济的重大问题，缺乏人才的问题不解决，经济建设是无法发展的。科大要为国家经济建设输送各方面的人才，当前要着重培养应用技术方面的人才。

科大有多少系？（答：共十三个系，六个理论系，七个应用系。）发展新技术学科好。科大学制几年？（答：五年。）许多外国人说五年长了，搞四年好。国家急需人才，学生毕业，做两年工作再学习。科大什么时间实行五年制的？（答：创办时即是五年。）一直五年，就不要改，六年太长。（答：六年是缩短，包括研究生学习的两年。）那不能搞六年的呢？（答：一部分不适宜作研究生的仍五年。）（汇报到青年教师要接老教师的班，新兴新学科要年青人去搞时，）赵总理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要年轻人去搞新的。

在科大，赵总理首先来到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在听取汇报后，赵总理说："这台加速器是搞应用的，很好"。接着问："什么时候能够建成？"回答："一九八八年可以建成。"赵总理重复好几次说："一九八八年建成，四年时间，好！建成后是否马上可以应用？"回答："建成后即可应用。"赵总理点头说："好！加速器建成了是你们自己用，还是全国用？"赵东宛插话："是全国用的。"赵总理说："好，要全国用。你们是否派人学习去了？"答："已派人出国学习，有的已回来了，正在这里工作。"赵总理满意地说："要提前培训人才，否则建成了没有人做实验。"

在参观时，赵总理问："你们自己有加工力量吗？"并多次强调说："你们要注意，关键的、重要的设备可以引进，只要划算就进口，不要什么都是自己做出来的才叫自力更生，不要沽名钓誉。关键的东西，我们用外汇买进来也是自力更生，因为外汇是我们自己用劳动挣来的。"

赵总理问："你们这台直线加速器是全国最大的吗？"回答："是全国最大的电子加速器之一。"当汇报到台湾也在搞这一类加速器时，赵总理说："台湾主要与你们比，而不是与北京比，是吧？!"

参观时赵总理问加速器总工程师何多慧："你们的钱落实了没有？"何多慧

说："国家计委正在办审批手续，这七千万元还得赵总理您批！"赵总理说："我批，我批，给钱就是了。"

赵总理来到科大新建的教学大楼接见少年班学生。在一片热烈掌声中，赵总理健步走上讲台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和小朋友大学生打交道，很高兴。"然后指着八三级学生周峰问："你是哪儿来的？今年多大？"周峰回答："来自江苏海安县，今年十四岁。"接着赵总理又关切地询问了几个同学家在哪里，想不想家，生活会不会料理。

赵总理问同学："小朋友上大学吃得消吗？"当前排同学回答吃得消后，赵总理满意地点了点头。赵总理接着又幽默地问了一句："要不要保姆啊？"教室里顿时一片欢声笑语。

校领导和少年班班主任简要地汇报了少年班情况：少年班自一九七八年创办以来共招收八期智力超常的少年大学生279人，头三届毕业生117人中有81人考取了国内外研究生。今年又招收48名高考平均成绩533分的少年大学生。当汇报到十六岁的干政已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学位、谢彦波十五岁时考取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生时，赵总理问："他们都学高能物理吗？"回答："不是的，前几年少年班学物理的多一些，这几年同学们开始转向应用学科了。今年少年班还开设了软件专业。"赵总理说："这就对了，要搞电脑。"

赵总理接着指出："我们要注意搞应用，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然现在同时也要搞些基础研究。把我们的智力用在四化上，一个目标就是本世纪国民经济翻两番。下个世纪再奋斗几十年，站到世界前列。本世纪只要翻两番，那时教育科技不仅要大搞应用，也要大搞基础。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如果不这样办，就不会有那么好的效果。但是，我不反对搞基础，不要误解，也不是都搞应用。"

赵总理称赞少年大学生们说："你们这些人，照中国过去的说法叫'神童'，智力发展早，成才也比较早，特殊材料，不简单。将来各个领域、各个岗位都要有年轻的科学家做出贡献。你们少年班一开始大家就认为比较好，前几年有些议论，经过这几年实践证明，这样搞是对头的，要继续力、下去。中央很关心你们，胡耀邦、邓小平同志很关心你们，我代表他们来看望你们，并向你们问好！"（热烈鼓掌）

"你们正处在发育时期，照理讲是应该多运动少读书，要特别注意身体，以便学成本事能有更多时间为国家做贡献。你们智力发展很早，学习也好，如果将来身体不好未老先衰就不好了。建议你们（指学校领导）不要把他们的课程压得那么紧。"

赵总理题词勉励少年大学生们："希望少年大学生同学们为迎接新的科技革命做出自己的贡献！"题完词，赵总理又补充说："没有写完全，我的意思是在前面加上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将来请校长解释清楚。"

赵紫阳总理为中国科技大学题词："希望科技大学在教育改革中更上一层楼！"

在江西考察听取省委常委汇报时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

本来想在江西多呆几天，自从到北京后还没有来过江西，从来没有到过安徽，这次在安徽呆了八天。我现在出来有一个困难，先要看外事安排。我和耀邦同志有个约定，出来了，只要没有外事活动，我就不回北京。先念同志十一号回北京，我必须赶回去接。

一路上，栋材[1]、增益[2]同志介绍了江西的一些政治、经济情况，也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地方。总的看，江西的形势很好，也有不少新鲜经验。我完全相信，江西今后的发展速度会更快一些。过去耀邦同志对你们说过一句话，（栋材同志：耀邦同志说江西干部的进取心要更强一点。）总的是希望你们搞得更好一些。从栋材、增益同志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江西今年的工作搞得相当活跃。接触了几个单位，感到现在干部、群众都在想问题。景德镇是个老城市，要考虑采取什么政策、措施来改造。贵溪冶炼厂、洪都袜厂的改革想法都是好的。洪都袜厂把科学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经济责任制这三个东西都结合起来了，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有自己的特点，我看可以总结一下。还有江西宾馆的改革是成功的，效果是好的。对外开放搞得不错，你们那句话（指"解放思想，门户开放，互惠互利，甚至让利"）很好，围绕开发资源，引进技术，引进资金，这恐怕是国内搞活经济的一个重要形式。你们提出解决两条短腿，克服两个不足，这些想法都是很好的。省委对经济情况的分析，提出的战略设想和发展方向，都是正确的。总的感觉，江西的工作比较活跃，过去不很清楚。

现在全国正在抓两件大事，一个是整党，一个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也有两件事，就是改革和开放。整党，我理解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通过整党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得到更好的贯彻，提高各个单位贯彻执行的自觉性；一个是彻底否定"文革"，消除"文革"产生的派性、隔阂、恩怨，增进团结。这两个问题的意义都很大，一个是路线问题，一个是团结问题，我在安徽也讲了这两个问题。我们党的"七大"也主要是解决这两个问题，当时解决团结问题，主要是消除山头、宗派，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这样党就会兴旺起来。很明显，一九四五年以后，我们党发展很快，胜利地进行了解放战争，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新中国。我们这次整党搞好了，就一定会大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里我着重说一下彻底否定“文革”，最早是军队提出来的，尚昆[3]同志在军队有个讲话，中央书记处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提得很好。中指委第九号通知开始没有这个内容，后来加上了这一条。彻底否定“文革”的意义，主要是要消除派性，进一步促进团结，达到团结的目的，不是要把“文革”中的问题重新翻腾出来。因此，彻底否定“文革”，我认为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联系实际，主要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消除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派性影响，多作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文革”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账，有的人往往容易想到自己正确的一面。要消除派性，就要避免再分什么谁正确、谁错误。江西“文革”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要紧紧掌握这个原则，就是彻底否定“文革”，是为了消除派性，消除隔阂，进一步安定团结，不能把“文革”中的问题再翻腾出来评个是非。

经济建设的问题，中央最近议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七五”计划的方针问题，较为重要的是要在原有企业基础上改建扩建，当然不是讲新的项目一个不搞。现在看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总的讲，我们经济建设的布局展开了，有一个很大的摊子。因此，“七五”计划不是要搞一个新的布局，新的摊子。要做到投入少，产出多，也要求改造原有的摊子。如果我们丢下原有的企业不管，去搞新的，恐怕等新的搞起来，老的也差不多了。老企业的潜力很大，煤炭也好，铁路也好，钢铁也好，各个方面的潜力都很大，今后主要是搞技术改造、改建扩建，当然不是完全不搞新的。铁路光讲通车里程不行，现在一条铁路的年通过量不过二千万吨，经过改造至少可达七千万吨，差多少呀？鞍钢在目前这个基础上改造一下就可以搞到一千二百万吨。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周期短，投产快。资金的概念，没有建设周期，概念是不准确的。一个项目，周期十年，投资十亿元；另一个是八年，投资也是十亿元，另产出三亿元，这实际上只花了七亿元。另外，中国由于商品生产不发达，经济建设普遍没有利息观念。今后基本建设将有个改变，项目定下来后，就一次拨款，拨到建设银行按工程进度付款，基建年度不受限制，主要控制总的概算。为什么要讲挖潜力改造？至少可以周期短一些。周期短，受益就快，相对地讲，就节约了投资，这是“七五”计划一个重要的方针。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消费品工业的问题。在我们国家，搞高工资、高消费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但低工资、低消费，抑制消费也不行。过去这样做，把很多可以成为经济支柱的产业变成了福利事业。外国人很羡慕中国的市场，而我们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市场，害怕市场购买力，不是利用市场购买力来促进经济发展，像房地产、食品、建筑业、各种服务业发展不快，这个大家都感觉到了，特别是第三产业是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把人民的购买力压得很低，积累资金用于基本建设，基本建设又往往用之不当，所以就搞得很穷。我们国家大，市场大，要适当地注意消费，自觉地运用市场，促进经济发展。交通结构在我国问题也比较大，这与过去的部门所有制有很大关系。搞铁路的只搞铁路，搞公路的只搞公路，铁路、公路、水运等都没有形成综合运输网，花了很多冤枉钱。空运要发展，水运要重视，铁路要挖潜，但是要特别注意发展公路。美国过去建了很多铁路，后来

拆了不少，改建公路。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像英、法等，公路发展，铁路倒萧条。中国不能走人家的老路了。我们国家公路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一是质量差，二是车型小，再是铁路运费太低。搞高速公路，加上集装箱，一条高速公路每年货运量可达一亿吨，等于我们现在五条铁路，而且中间环节少，时}可决。首都钢铁公司从西直门运货到厂区，用火车得花两天，可是用汽车运顶多半小时。今年人代会期间，香港一位代表提出要建高速公路。我说我们国家幅员辽阔，铁路少。他很不客气地对我说，你对交通的指导思想还是三十年代的。他说，高速公路比铁路划算得多。我们自己组织专家算过账，结论和他的一样。襄渝铁路投资花了三十七亿元，一年货运量不到一千万吨。还有水运问题，我们有很长的海岸线，但过去修铁路一搞就是南北线，为什么不搞东西线通到海边，再搞海运？秦皇岛就是可以通九江嘛。过去我们不注意运输结构，这也是“七五”计划方针方面的问题。

改革问题我不准备多讲。中央确定十月中旬开三中全会，主要研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文件已经起草好了，我先在这里吹吹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围绕解决企业的活力为中心的。要使企业有活力，就要扩大它的自主权，建立经济责任制，不吃“大锅饭”。要解决这些问题，又涉及到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第一是计划管理体制；第二个是运用价值规律、价值法则；第三是改变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即实行政企分开。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城市经济改革就搞不好。中国是什么样的计划体制？第一中国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第二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三是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在我们国家，指令性计划不能多，范围要逐步缩小。指导性计划主要不是靠指标，是靠自觉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实行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就要运用价值法则。因此，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要充分注意价值规律、价值法则的运用，这就涉及到价格问题。价格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合理的价格，就很难做到活而不乱。所以价格体系的改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经济改革的最后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要取决于价格问题的解决。我们价格体系的调整，属于结构性的调整，调整价格不会引起物价失控、通货膨胀，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我们的价格不合理，调整到一定程度就会合理了。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谁讲话都没有价值法则灵。新疆羊毛为什么一百斤有四十斤沙子？还不是价格不合理！煤炭中含煤研石的问题也是因为差价小，我们统统都是讲原煤，没有按质论价。广东和你们赣南种甘蔗，群众就喜欢种糖分少、产量高的品种，但澳大利亚就是按含糖多少论价。所以说，价格不合理，浪费了很多社会劳动。如果羊毛有沙与无沙的分开论价，煤炭按大卡、甘蔗按含糖量论价，我看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目前工业企业都面临一个产品质量问题，质量好的可以提价，不好的就要降价。“利大大干，利小小干”，你说它不合理？如果没有利还生产什么？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成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问题关键是一个价格问题。价格不合理，什么思想政治工作都不行。价格体系的改革，虽然难度大些，但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就要讨论这些问题。改变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实行政企

分开，还要解决条块问题。

调整价格，我看没什么了不起的，粮食最能说明问题。价格上去了一点，生产发展了，东西多了，调整到一定程度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路子，一是放开，小商品放开，大产品计划外的放开；二是国家计划管理的价格正在作逐步调整。当然计划管理内的调整要和工资改革结合起来，按物价指数调整工资。

我在北京讲过，我们的改革，就是要解决各个企业、各个单位、每个人都有活力的问题，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这至少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

注 释

1．白栋材（1916—2014），陕西清涧人。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曾任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吉林省工委秘书长、组织部长，江西省委第三书记兼南昌市委书记、市长，江西省委书记、省长。

2．赵增益（1920—1993），山西平定人。时任江西省省长。曾任二野三兵团作战处处长，昆明市委第一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省顾委主任。

3．杨尚昆（1907—1998），重庆撞南人。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秘书长。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委，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北方局副书记、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司令员，中央后方委副书记，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

* 赵紫阳在这封信中就中国计划体制、价格改革和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三个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建议，得到了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胡耀邦、陈云、李先念的一致赞同。后来，赵又在这封信的印刷稿上明确批示：“‘计划经济为主’的‘为主’两字可考虑删去。”他的这些重要意见，为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的目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耀邦、小平、先念、陈云同志：

去年八月六日，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出了十个需要调查研究的题目。向政治局常委报告后，常委各同志都有指示，肯定了进行调查研究的必要，也肯定了提出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方向。

按照小平同志批示“希望如期实行”的精神，一年来，各专门小组和有关部委就上述十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议过多次。除电子工业发展纲要尚待进一步组织讨论外，其他九题都已理出一些头绪。

具体的进展情况是：（1）引进人才工作正在逐步开展。（2）建筑建材业和食品饲料业的发展纲要，已有一些初步设想，拟通过编制“七五”规划，进一步研究并加以落实。（3）在讨论提高企业素质问题的基础上，制定了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十条规定，已于今年五月公布实施。（4）利改税，去年已实行第一步，第二步也有了实施方案，待人大常委审议批准后，即可在今年第四季度全面推行。（5）计划工作改革（第一步），价格改革（今明两年），外贸体制改革，劳动工资改革已有初步设想；机关工资改革正在草拟具体方案。（6）除了十个问题以外，在此期间，还讨论了建筑行业体制改革、机械行业体制改革和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分别形成了一些文件，正在付诸实施。

一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是从提高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出发的。以利改税作为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有利于解决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关系，使国营企业逐步做到自负盈亏，也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得以稳定增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可能避免大的社会震荡，较为平稳地顺利推开。

下一步，是要具体落实“扩权十条”和其他业已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由于经

济体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看来，有以下三个原则问题需要进一步确定，以便在统一的方向下，使各项改革配起套来，互相协调，尽量做到同步进行。

第一个问题：计划体制问题

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关于这个问题，《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已有原则规定，现在需要进一步加以具体化。根据多年和这一段的实践，反复考虑，建议把我国的计划体制概括为以下四层意思：

（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二）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

（三）计划经济为主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我国幅员辽阔，现代化手段不发达，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编制包罗万象的指令性计划，不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方针应该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

（四）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应该如实地把两者统一起来，而不要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

看来，明确以上四条，可以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既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相区别，又不与苏联模式雷同。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但苏联模式清规戒律太盛，把企业捆得死死的，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企业失去了活力。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企业有活力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计划经济，应该是自觉依据并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

第二个问题：价格改革问题

这个问题，必须同计划体制改革配合起来考察。放，绝不是撒手不管。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比计划指标灵得多，这已为多年来的实践所反复证明。价格不合理，必然给人们以错误的信息，引导企业走上错误的方向。过去“一放就乱”的症结正在于此。今后要做到活而不乱，关键是要有合理的价格体系。因此，计划体制改革的步子到底迈多大，也不能以主观愿望为转移，而应取决于价格改革的进程。

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同类商品内部，质量有优有劣，差价没有拉开。这个问题对社会效益影响极大，但不难解决。完全可以在稳定该类商品总的价格水平的前提下，积极拉开档次。第二个层次是不同商品之间比价不合理，特别是煤炭、生铁、木材等初级产品（同时也是短线产品）与加工产品的比价不合理。

第三个层次是同类商品的购销价格倒挂，主要是粮食和油料。第四个层次是房租等公用设施收费过低，使这些本应成为经济支柱的产业无法发展，甚至趋于萎缩。后三类问题比较复杂，但都必须解决，也有办法解决。现在正在进行论

证，年底以前有可能提出改革的方案和大体的步骤。

除了调整价格体系以外，还有一个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现在小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粮棉除了集市贸易价格以外，计划收购价格和超购加价已合并为一种价格（比例价格）。燃料和原材料过去是一种价格，现在已出现多种价格（国家规定的价格和企业超产自销的价格），将来的趋势很可能是：（1）国家定价的范围逐步缩小，放开的比重逐步扩大；（2）国家规定的价格，通过调整，逐步向市场价格靠拢。这种趋势，大体上将同计划体制的改革相适应。

有一点需要说明：我们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的比价不合理，而不是由于财政性发行；因此，它是结构性的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在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的条件下，国民党时代那种恶性货币膨胀的现象是完全有可能防止的。当然，在调整物价时，一定要积极慎重，采取负责态度，把工作做细，把生活指数算准，以便同时对工资、社会救济金、储蓄利率等进行相应的调整，务必使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仅不降低，而且尽可能有所提高。

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一条是计划体制改革，一条是价格改革，这两条奏了效，对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将是又一次大解放，很可能要引起一次飞跃。近几年来，国外许多不同学派的经济专家，都建议我们在适当时候进行价格改革。最近访华的匈牙利部长会议副主席马尔亚伊同志也说，改革价格最好选在经济发展较顺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现在有此条件，正处在改革价格的黄金时代，而匈牙利则错过了机会。这个论点值得重视。

第三个问题：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在这方面，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这也需要一个过程。准备从外贸商业系统和机械行业开始。实行利改税，加上政企分开，发展经济上的横向联系，条块分割等一系列的老大难问题是有可能解决的。

与此联系的一个问题是公司的体制。这几年成立了许多公司，有的办得好，有的办得不好。经验是两条：（1）公司必须是企业性的，不应是行政性的。（2）全国性的公司也不应垄断；而且一般不宜过"实"，不应把所属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权收上来。主要的经济实体应是大企业，应以大企业为基础，以城市为中心，在互有需要的基础上发展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进行改组联合，可以是紧密的联合，也可以是松散的联合。不符合这两条的，要进一步改革。

以上三个问题，都涉及方向、原则，对今后改革关系较大。现将一些看法报告如上，当否，请指示[1]。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

注 释

1．中央政治局常委看过赵紫阳的这封信以后，分别作了批示、复信，或就有关问题发表了意见：

邓小平批示

我赞成。这个文件可印发三中全会，连同体制改革的决定，一并讨论。

邓小平

九月十日

陈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给赵紫阳的信

紫阳同志：

你提出的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我完全同意。

关于计划体制的四层意思，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了。因此，对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现在不能也不应该套用。即使在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工作也不是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如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们采取的是分步骤进行，即从“加工定货”直至“定息”的做法；对资本家、小店主、小摊贩，采取的政策也不相同。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年并不是这样做的。

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上次化纤降价，棉布提价没有引起社会震动，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鉴。

关于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活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国家领导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有时间议大事，加强宏观方面的指导和控制。

这几年，农村的改革已取得极大的成功，城市改革总的说来，还处在积累经验的过程，广大干部不是都很熟悉。因此要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务使改革健康发展。

以上供你参考。顺致

敬礼！

陈云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三日

李先念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给赵紫阳的信

紫阳同志：

你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很好，概括了这几年改革的经验，提出了今后改革的方向和原则，我都同意。这三个问题确实是根本性的问题，解决好了，将会大大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价格改革。我国的计划经济，要自觉地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很需要把价格体系改革好。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已逐步成熟。看准了，就要抓紧进行。虽然价格问题很复杂，很敏感，但是又非改不可。只要设计周密，价格结构合理，步子稳妥，就会进一步理顺经济关系，推动经济的大发展，得到人民的拥护。

以上意见，供你参考。

李先念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

胡耀邦关于物价问题的重要批示

一、课本可以适当提点价，但只能限于“保本微利”，绝不许在小孩身上赚钱。这一条务必同各省市同志说清楚。出了乱子要追究责任。

二、过去由于我们没有经验，物价全由国家统一定，因此谈不上按价值规律办事。今后物价怎么管，国家只管什么，地方能管什么，三中全会决定会有明文规定，大家必须遵守。

三、中央已决定要有步骤调整物价，这是正确的决策。但到了某些同志面前，就以为什么都要涨，有些部门的同志正在计划涨自己生产的产品，而不下苦功改善自己的经营管理，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极错误的观点，甚至是一股准备出笼的歪风。大家要警惕。

胡耀邦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

附录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分析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这几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一、改革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经过了几年的酝酿和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着重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那次全会以后，全党在拨乱反正和调整国民经济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在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近两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推动了各项改革的广泛深入发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八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目前农村的改革还在继续发展，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这种形势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为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开拓市场，同时满足农民对工业品、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

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几年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已经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使经济生活开始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但是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目前，城市企业经济效益还很低，城市经济的巨大潜力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中的种种损失和浪费还很严重，加快改革是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只有坚决地系统地进行改革，城市经济才能兴旺繁荣，才能适应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需要，真正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还应该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

当前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前完成，国家财政状况逐步好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大为增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愿望更加强烈。特别是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全面整党的健康发展，已经和正在端正各条战线现代化建设的业务指导思想，明确改革的方向。现在，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利于统一和提高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认识，使改革更加卓有成效地进行，使社会主义优越性进一步得到发挥。中央希望并且相信，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行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那样，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制订全面改革蓝图，加快改革步伐，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也必将起到伟大的历史作用。

二、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一百多年人民灾难深重的历史，消灭了剥削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我国各族人民从长期的历史经验中深切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必然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建国三十五

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那个时候，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上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有很大的创造。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原来为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大会前后，党中央特别是中央主持经济工作的同志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某些改进措施。但是，由于我们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毕竟经验不足，由于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特别是由于一九五七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结果就使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

其间多次实行权力下放，但都只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没有触及赋予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中央认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

需要。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必须下定决心，以最大的毅力，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愿望。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

三、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城市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现在，我国城市企业，包括工业、建筑业、交通业、商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已有一百多万个，职工共达八千多万人。仅城市工业企业提供的税收和利润，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城市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八千多万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就是说城市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活力，对于我国经济的全局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对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关键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而现行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恰恰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所以，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围绕这个中心环节，主要应该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

过去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为了使各个企业的经济活动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社会主义的国家机构必须通过计划和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管理、检查、指导和调节，通过税收等形式从企业集中必须由国家统一使用的纯收入，委派、任免或批准聘选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员，并且可以决定企业的创建和关、停、并、转、迁。但是，由于社会需求十分复杂而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企业条件千差万别，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错综繁复，任何国家机构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和迅速适应这些情况。如果全民所有制的各种企业都由国家机构直接经营和管理，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压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因此，在服从国家计划和管理的前提下，企业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有权依照规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选举本企业的工作人员，有权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方式，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确定本企业产品的价格，等等。总之，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

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这样做，既在全体上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统一性，又在局部比毛证各个企业生产经营的多样性、灵活性和进取性，不但不会削弱而且只会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当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业的各项制度中得到切实的保障，他们的劳动又与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的时候，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就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我国农村改革的经验生动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正确解决职工和企业的关系，真正做到职工当家做主，做到每一个劳动者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工作，人人关注企业的经营，人人重视企业的效益，人人的工作成果同他的社会荣誉和物质利益密切相联。现代企业必须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生产指挥，必须有高度严格的劳动纪律。因为我们的现代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在实行这种集中领导和严格纪律的时候，又必须坚决保证广大职工和他们选出的代表参加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领导者的权威同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是统一的，同劳动者的主动性创造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发挥的必要前提。

确立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这两方面的正确关系，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内容和基本要求。要实现这个基本要求，势必牵动整个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需要进行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国家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中央认为，这些改革，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和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分别轻重缓急和难易，有先有后，逐步进行，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达到这个目标的步骤，另行部署。

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使生产符合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之一。建国以来，我们实行计划经济，集中大量财力、物力、人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应该是统一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体制。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考虑到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完全改变，考虑到我国目前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实际情况，建立这样的计划体制的需要就更加迫切。如果脱离现实的国情，企图把种种社会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并且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加以实施，忽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在计划的指导思想上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计划同实际严重脱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经在制订电气化计划的时候产生这样的思想：“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

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今天我国同当时俄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但是我们的实践经验证明列宁的这个思想不仅适用于当时条件下的俄国，而且具有长久的意义。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只能是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当，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因此，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做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应该对我国计划体制的基本点进一步作出如下的概括：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按照以上要点改革的计划体制，就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计划工作的重点要转到中期和长期计划上来，适当简化年度计划，并相应改革计划方法，充分重视经济信息和预测，提高计划的科学性。

五、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由于过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其他历史原因，

存在着相当紊乱的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不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就不能正确评价企业的生产经营效果，不能保障城乡物资的顺畅交流，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就必然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也会严重妨碍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执行。随着企业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价格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调节作用越来越显著，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更为急迫。各项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计划体制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它们的成效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当前我国价格体系不合理的主要表现是：同类商品的质量差价没有拉开；不同商品之间的比价不合理，特别是某些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主要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倒挂，销价低于国家购价。必须从现在起采取措施，逐步改变这种状况。

价格体系的不合理，同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有密切的关系。在调整价格的同时，必须改革过份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比较好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改革价格体系关系国民经济的全局，涉及千家万户，一定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根据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力负担的可能，在保证人民实际收人逐步增加的前提下，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的原则是：第一，按照等价交换的要求和供求关系的变化，调整不合理的比价，该降的降，该升的升；第二，在提高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时候，加工企业必须大力降低消耗，使由于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而造成的成本增高基本上在企业内部抵销，少部分由国家减免税收来解决，避免因此提高工业消费品的市场销售价格；第三，在解决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和调整消费品价格的时候，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确保广大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不因价格的调整而降低。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职工工资还要逐步提高。必须向群众广泛宣传，我们在生产发展和物资日益丰富的条件下，主动改革价格体系，解决各种比价不合理的问题，决不会引起物价的普遍轮番上涨。这种改革，是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迫切需要，是符合广大消费者的根本利益的。一切企业都应该通过大力改善经营管理来提高经济效益，而决不应该把增加企业收入的希望寄托在涨价上。决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任何人趁改革之机任意涨价，人为地制造涨价风，扰乱社会主义市场，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调节市场供求，调节对外经济往来，等等。我们过去习惯于用行政

手段推动经济运行，而长期忽视运用经济杠杆进行调节。学会掌握经济杠杆，并且把领导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到这一方面来，应该成为各级经济部门特别是综合经济部门的重要任务。

六、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

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就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项基本职能。建国三十多年来，总的来说，我们的国家机构履行了这方面的职责，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国家机构特别是政府部门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以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是一个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过去由于长期政企职责不分，企业实际上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揽了许多本来不应由它们管的事，而许多必须由它们管的事又未能管好。加上条块分割，互相扯皮，使企业工作更加困难。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可能发挥基层和企业的积极性，不可能有效地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联合和竞争，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而且势必严重削弱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应有作用。因此，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是搞活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

根据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计划、方针和政策；制订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的方案；协调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的发展计划和经济关系；部署重点工程特别是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汇集和传布经济信息，掌握和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制订并监督执行经济法规；按规定的范围任免干部；管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等等。这些职能，需要各级政府付出极大努力来履行，而过去有些没有做好，有的还没有做。但就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来说，今后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至于少数由国家赋予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责任的政府经济部门，也必须按照简政放权的精神，正确处理同所属企业的关系，以增强企业和基层自主经营的活力，避免由于高度集中可能带来的弊端。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公司，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互有需要的基础上建立的联合经济组织，它们必须是企业而不是行政机构，不能因袭过去的一套办法，而必须学会现代科学管理方法。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以后，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在进行这种改革的时候，有必要提起各城市的领导同志们注意，城市政府也必须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不要重复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的老做法，以免造成新的条块分割。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做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整治，指导和促进企业的专业化协作、改组联合、技术改造和经营管理现代化，指导和促进物资和商品的合理流通，搞好文教、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和各项服务事业，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创造良好的

社会风气，搞好社会治安。同时，城市政府还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当地的条件，做好中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互相协作、互相支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排斥竞争。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竞争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其实，只要有商品生产，就必然有竞争，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竞争的目的、性质、范围和手段不同。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弱肉强食根本不同，它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计划和法令的管理下，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前提下，让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优胜劣汰。这样做，有利于打破阻碍生产发展的封锁和垄断，及时暴露企业的缺点，促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各级有关领导机关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加强教育和管理，认真注意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国家立法机关要加快经济立法，法院要加强经济案件的审判工作，检察院要加强对经济犯罪行为的检察工作，司法部门要积极为经济建设提供法律服务。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次深刻改造。体制改了，组织机构和思想作风也要改。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为人民服务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改造机关作风，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改变那种长期形成的领导机关不是为基层和企业服务，而是让基层和企业围着领导机关转的局面，扫除机构重叠、人浮于事、职责不明、互相扯皮的官僚主义积弊，使各级领导机关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切实转移到为发展生产服务，为基层和企业服务，为国家的繁荣强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服务的轨道上来。

七、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这几年城市改革的试验充分表明，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同样适用于城市。为了增强城市企业的活力，提高广大职工的责任心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在企业内部明确对每个岗位、每个职工的工作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在把农村经验运用到城市中来的时候，必须考虑城市企业的特点，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农村的具体做法。由于行业性质、企业规模和生产条件各不相同，城市企业实行责任制也不可能有划一的模式。这就要求我们的同志，特别是企业的领导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逐步创造出适合自己情况的具体形式，使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生根、开花、结果。

现代企业分工细密，生产具有高度的连续性，技术要求严格，协作关系复杂，必须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高效率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系统。只有实行

厂长（经理）负责制，才能适应这种要求。企业中党的组织要积极支持厂长行使统一指挥生产经营活动的职权，保证和监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加强企业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对企业工会、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在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必须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在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权力和作用，体现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绝对不容许有任何的忽视和削弱。

随着利改税的普遍推行和企业多种形式经济责任制的普遍建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将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这方面已经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就是企业职工资金由企业根据经营状况自行决定，国家只对企业适当征收超限额奖金税。今后还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使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更好地挂起钩来。在企业内部，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充分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之间的差别。当前尤其要改变脑力劳动报酬偏低的状况。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要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的原则是使职工工资同本人肩负的责任和劳绩密切联系起来。在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改革工资制度的同时，还要加快劳动制度的改革。

长期以来在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上存在一种误解，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要平均，如果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收入比较多，出现了较大的差别，就认为是两极分化，背离社会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是完全不相容的。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当然，社会主义社会要保证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是，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老弱病残、鲜寡孤独等实行社会救济，对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积极扶持，对经济还很落后的一部分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其他贫困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并给以必要的物质技术支援。由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产生的差别，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差别，而绝不是那种极少数人变成剥削者、大多数人陷于贫穷的两极分化。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我们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这个传统。在新时期坚持这个传统，主要是发扬不怕任何困难，为祖国为人民顽强奋斗的献身精神，在各项生产和建设事业中十分注意节约，反对挥霍国家资财的行为，力求避免造成浪费的决策错误，而不应该把坚持这个传统错

误地理解为可以忽视人民消费的应有增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是整个经济活动的起点和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它决定消费，而消费的增长又是产生新的社会需求，开拓广阔的市场，促进生产更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又决定生产。我们一定要在生产发展、经济效益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和正确处理积累消费关系的前提下，使我国职工的工资收入逐步有较大的提高，使人民的消费逐步有较大的增长。不顾生产发展的可能提出过高的消费要求，是不对的；在生产发展允许的限度内不去适当增加消费而一味限制消费，也是不对的。

八、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

我们要迅速发展各项生产建设事业，较快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互守信用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对于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决不应以限制和排斥其他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发展为条件。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领域的生产建设事业都可以放手依靠集体来兴办。我国现在的个体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不同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个体经济，它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当前要注意为城市和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并给予法律保护。特别是在以劳务为主和适宜分散经营的经济活动中，个体经济应该大力发展。同时，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个人经营。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决不是退回到建国初期那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城乡占绝对优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决不会动摇而只会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经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在当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尽管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国际性的经济技术联系仍然很密切，闭关自守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在实践中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今后必须继续放宽政

策，按照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实行统一对外的原则改革外贸体制，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的规模，努力办好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

对外要开放，国内各地区之间更要互相开放。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和比较不发达的地区，沿海、内地和边疆，城市和农村，以及各行业各企业之间，都要打破封锁，打开门户，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大力促进横向经济联系，促进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的合理交流，发展各种经济技术合作，联合举办各种经济事业，促进经济结构和地区布局的合理化，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九、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既有现代化的经济、技术知识，又有革新精神，勇于创造，能够开创新局面的经营管理人才，特别是企业管理干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管理干部队伍的状况同这个要求很不适应。这支队伍中的大批老同志，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表现出来的优良作风、组织才能和信守党内生活准则的坚定性，教育和影响着广大中青年干部。但是，他们大都已到老年，不能要求他们再担负繁重的领导工作。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大胆起用和积极培养成千上万中青年经济管理干部。

应该看到，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整党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和正在成长大批优秀人才。各级党委一定要细心地深入地去发现和考察他们，务必不要为那些过时的老观念老框框所束缚，务必不要搞烦琐哲学、求全责备，务必不要受派性和种种闲言碎语的干扰。只要我们这样做了，大批优秀干部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当然，中青年干部有缺乏领导经验的问题，但这种经验可以而且必然能够在实际锻炼中逐步取得，决不能以缺乏经验为理由压抑年轻干部。对经验应该采取分析态度。我们的同志在过去革命和建设中积累起来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在新时期的崭新任务面前，不论老中青干部，总的来说都缺乏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新知识新经验，都要重新认识自己，都要重新学习。那种抱残守缺，老是停留在过了时的经验上的态度，是不对的。

中央要求，在一九八五年底以前完成企业领导班子特别是骨干企业领导班子的调整任务，并且订出规划，采取切实措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造就出大批能够卓有成效地组织和指挥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厂长（经理），能够有力地加强企业的技术管理、推动技术进步的总工程师，能够切实加强企业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总经济师，能够严格维护财经纪律、精打细算、开辟财源的总会计师，能够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团结企业广大职工的党委书记，形成一支包括这些人才在内的，门类齐全、成龙配套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宏大队伍。

中央已经多次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一切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坚决纠正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视知识分子的状况，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我们的一切改革，都必须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调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和个人进行智力开发的积极性，有利于鼓励广大青少年，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加速提高文化技术水平。对有重大发明创造和特殊贡献的，要给以重奖。

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中央将专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将在相当广阔的领域内和相当深刻的程度上展开。这个改革，关系国家的前途，关系亿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全党同志要站在改革这个时代潮流的前列。改革是极其复杂的、群众性的探索和创新的事业。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总的说来还处在积累经验的过程，广大干部不是都很熟悉，这就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保持清醒头脑，进行精心指导。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进行，尤其应该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特点。改革中的一切做法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经验。失误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要尽一切努力去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失误。当发生失误的时候，必须力求及时发现，坚决纠正，吸取教训，继续前进。改革的步骤要积极而稳妥，看准了的坚决改，看准一条改一条，看不准的先试点，不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全国性重大改革的实施，由国务院统一部署。要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进行改革的探索和试验，但一切涉及全局或广大范围的改革要经国务院批准才能进行。

明年将有更多地方和大批企业的党组织进入整党。改革工作要与整党密切结合起来，以整党促进经济，以经济检验整党。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整党的领导，切实保证整党不走过场。越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就越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越要注意克服那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克服一切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就越要加强党风党纪的建设，维护和健全党内健康的、正确的政治生活。在新的时期，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必须坚定地贯彻执行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来进行的指导方针。对于锐意改革的干部和群众，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于在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除了严重违法乱纪者必须依法处理外，都

要采取疏导的方针，批评教育帮助的方针，而不要戴政治帽子。改革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和不同理论观点，可以展开讨论。不要在干部和群众中分什么“改革派”、“保守派”，要相信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的同志会在改革的实践中提高认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过五年时间，许多原来抱怀疑态度的同志都在事实的教育下转变过来。中央在指导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耐心教育的方针，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是在重大政策问题上解决党内思想认识问题的极为宝贵的经验，今后一定要坚持这样做。要结合改革的实际，对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关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的生动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充满活力，既区别于过去那种僵化的模式，又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自觉投身于改革的伟大实践。

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要努力在全社会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克服那些安于现状、思想懒惰、惧怕变革、墨守陈规的习惯势力。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毛泽东同志说过：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自然界发展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生动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人以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反动统治下，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为推翻旧制度而奋斗；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进行改革，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当前改革的形势很好。广大群众在改革的实践中有伟大的创造。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改革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总任务和总目标一定能够胜利实现。

团结起来开创科委工作新局面*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宋健汇报国家科委工作时的谈话要点。

要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次科委的人事变动，是中央决定的，是正常的调动。不是哪一个同志不能在科委工作，更不是犯了什么错误。现在有人说“谁是谁的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以人划线，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流毒。我们为此已经吃了苦头，绝不能再重复这种错误。我们要看每个同志本人的工作情况，不能是因为与哪一个同志共同工作过，或与哪一个同志关系密切些就不用。说这种话的人自己也一定有共同工作过的同志，那么就是他的人？以后绝不许说“谁是谁的人”。谁讲也是不对的。要通过整党肃清这种以人划线的流毒。这种流毒不消除，我们就永无宁日，就无法团结奋斗。坚决不能听这种话。不搞五湖四海，无论是科委，还是全党、全国的工作都是不会搞好的。科委要通过整党，认真学习中央文件，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消除隔阂，搞五湖四海，团结奋斗。

要给科委的各位领导同志做工作，他们应该自觉地起积极作用，不要把过去的隔阂向新班子传，不要造成一批同志思想不通，给以后的工作增加困难。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应当起模范作用。希望在团结大多数这个问题上，老同志、领导同志能更自觉一些，否定“文化大革命”，带头消除隔阂。隔阂如果不消除，就不可能团结好，这对科委有什么好处呢？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呢？对他们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希望大家出于公心，加强科委干部的团结。处理问题一定要公正，今后新的班子一定要团结起来开创新局面。

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存在个别问题也是可能的。但是，对干部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要历史地全面地考察干部。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用其所长。好人也会有缺点，有些事，前几年看问题很大，过一段时间看问题就不大了。我劝同志们对别人的缺点不要加码，不要用显微镜找毛病，而对自己则认为一贯正确。我们要持相反的态度，对自己要严格一点，对别人要宽容一些。否则，我们这个党、国家就会无安定之日。把事情搞得很复杂，绝不是好事。

你们以后的工作要有新的起点、新的面貌，不以人划线，要搞五湖四海，团结大家，不论是和谁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和谁比较密切的同志，都要看他本人的水平、能力和其他条件。我赞成你独立思考。将来新班子组成后，应该使大家放心，使大家有信心，出现一个团结的局面，对委内、委外都要有一个好的形象。

千万不要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做不利于团结的事，一定要把问题解决好。

关于科委的工作方针，要在整改过程中进一步明确起来，科委的任务就是协助国务院管大事，管方针、政策、立法、协调等等。凡是别人、各部委能做的事，你们不要揽权。你们要团结各部委、科学院、科协等一切部门，组织大家共同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不要有亲疏之分。否则，别人是不会尊重你们的。你们科委的方向对头了，形象好了，我们都会高兴，中央书记处、国务院、计委、经委都会支持你们的工作。总之，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要引导同志们向前看，从积极的方面看，要着眼于改革，按照中央的要求，走向正确的轨道，进一步发挥作用，提高科委的威望和办事能力，这是我们改革的目的所在。要引导同志们面向全国、面向未来，团结起来向前看，大家努力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

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设方针*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最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了“七五”计划的建设方针问题。与此同时，我又先后到辽宁、安徽、江西等地调查，征求了地方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七五”计划中，应当采取以下一些方针。

一、以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为主，充分挖掘潜力

“七五”期间，是我国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我们既要保证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又要为下一个十年经济的振兴理顺关系，打好基础，同时还要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而我们的资金又不足，国家财政仍然存在困难，矛盾比较多。因此，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方针，关系极大。国务院初步议定，“七五”计划基本建设总规模大体上定为四千亿元，每年平均八百亿元。投资就是那么多，能不能解决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矛盾，这就需要从投资少、效益大的方面多想办法。这是在制订“七五”计划时，需要很好研究的总题目。看来在整个“七五”期间以至“八五”前期，必须首先采取这样一个重要方针：坚决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原有企业、原有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凡是能在原有基础上改建、扩建增加生产能力的，就不要搞新建。当然，也不是说不搞新建项目，关系经济全局的重点项目，还是要上一些，但重点必须明确。这是关系“七五”计划能否搞好的关键。

为什么必须采取这个战略方针呢？

第一，从我国整个生产力的布局来看。建国以后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包括一九六三年以后开展的三线建设，应当说生产力的战略布局已经展开，不论沿海和内地，不论一线和二、三线，工业都有了一个不小的摊子。虽然仍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要逐步解决，但从总体上说，在生产力的配置上，今后一段时间主要不是要再搞一次新的战略展开，而是要在现有基础上着重提高能力，提高水平，把现有几十万个企业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从而加快我国的建设。

第二，采取这样的方针，周期短、产出快、效益好。要铺一个新摊子，搞一

个新基地，周期长、投资大。改造老基地、老企业，加以改建扩建，有时算也不一定投资少，但最大的好处是建设周期短，不需要一下铺很大的摊子，有不少是边建设、边产出，实际上是很省的。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许多同志不懂得商品生产，也不会搞商品生产。长期以来我们在搞建设、办企业中，缺乏资金周转的观念、利息的观念和投入产出的观念。搞经济工作的同志一般只注意建设项目投资的多少，但是对建设周期的长短、利息的多少、产出的快慢却不重视。这样来计算投资是很不准确的。广东核电站，安装两台九十万千瓦的机组，加上基础设施、安装费用等全部投资是20亿美元，但因为周期是十年，算上利息需要40亿美元。外国企业家搞建设项目，普遍的特点是周期短、产出快。开煤矿，三、四年就开始出煤。如英国帮我们设计的济宁二号井，岩井掘进少、巷道少，三年出煤。他们搞石油化工、搞钢铁等，也不都是从头搞起，而是从生产过程的后面一段或从中间搞起。因为，他们的钱是贷款来的，一开始就要考虑利息和如何偿还。而我们缺乏这个观念。其实，一个建设项目，如投资一亿元，五年投产还是十年投产，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五年投产，加上利息，整个投资就是1.5亿元；投产后如每年获利一千万元，五年就是五千万元，那么实际投资就只有一亿元。如果十年投产，投资过程中完全没有产出，加上利息整个投资就是二亿元。两者差别是很大的。资金必须计利息，这是理所当然的。周期短，利息负担就少；产出快，效益也就好。我们过去很少考虑这些因素，吃大锅饭，在基本建设的设计和施工上，造成的浪费不知有多大。建设的周期长短、产出的快慢，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周期短，投资少，产出快，国家就富得快。相反，如果周期长，投资多，产出少，就难以富起来。

最近，我到了鞍钢、马钢，对这个方针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鞍钢只要加以改造和扩建，花三十多亿元投资，到一九九〇年钢的生产能力就可以达到八百万吨，很有可能上千万吨，而且基本上可以不停工、不停产，钢产量逐年增加。比起在鲅鱼圈新港附近新建一个四百万吨的钢铁基地，要省几十亿元投资。我们看过的鞍钢第三炼钢厂，采用新技术，将平炉改为180吨的转炉，改氧气顶吹为顶底复合吹炼，一边改造，一边生产，一年要增加一百万吨钢，而且质量、成本都有显著改善。冶金工业系统这几年由于上了宝钢，把绝大部分投资占用了，无路可走，就逼出一条路，对现有企业搞改造挖潜，上质量、上品种，在宝钢没有投产的情况下，钢的产量从三千多万吨，上升到一九八三年底的四千万吨，五年来产量增加近一千万吨，质量品种有很大变化，全行业的能耗也大大降下来。这个经验值得重视。

据煤炭工业的材料，吨煤投资开统配大矿新井是225元，老井改造是120元，地方中小矿是75元。依托老井改造扩建要省得多。煤炭部最近根据国务院确定的方针，在计划中调整了新建和改建扩建大型矿井和中小型矿井建设的比例关系，加大了改建扩建和中小矿井建设的比重，工期短，出煤快。“七五”中基本建设投资由372亿元减少到315亿元，而到一九九〇年统配煤产量将由原来的4.75亿吨增加到5亿吨，地方煤产量将由原来的4亿吨增加到4.45亿吨，全国煤炭产量比原来

的计划增加7000万吨，并能确保“七五”期间每年平均递增4000万吨。因为我们的煤炭资源丰富，矿井设计的服务年限一般都是几十年，上百年，这样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说明两种不同的方针，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铁路建设我们过去重视建设新线，这是必要的，但对老线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重视不够。今后应当把改造老线作为重点，这方面潜力非常大。据统计每万元投资新增能力，修新线为七万吨公里，改造旧线为27万吨公里。我国现有铁路52000公里，真正运输繁忙的是几条干线和卡脖子区段。铁路的技术是相当落后的，认真进行改造，如加强信息管理，采用重载列车，改变牵引方式，提高行车密度，改造站台等，能够使运载量加大，一列货车可以由原来的二、三千吨，增加到四、五千吨。这不是很困难的事。如石（家庄）太（原）铁路，在铁道部调查组的帮助下，采取了三项改造措施，投资一百多万元，只用了四个月时间进行初步改造，年运量就由四千五百万吨提高到六千万吨，增加运力近三分之一，远期的年运量可达七千万吨。要是修一条同样长度、同等运力的新线，就要花投资三、四亿元，时间也要三、四年。

这些都说明，在原有企业的基础上，走技术改造、改建扩建的路子，事半功倍，花小钱，得大利，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多快好省的路子。

第三，采取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把重点建设的任务和技术改造的任务结合起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些老企业、老工业基地，它们都欠账很多，破旧不堪。尤其是上海、辽宁这样的老基地，迫切需要进行改造。如果我们只注重建设新的，新的企业可以是先进的，而众多的老基地、老企业却处于更加落后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上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建成一个项目后，把它的利润搞得一干二净，使它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而把这些钱集中起来拿去新建企业。等到新摊子建起来以后，原来已建的企业在各方面又落后了，不能使企业建成以后，不断新陈代谢，不断技术进步。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未很好解决。如一汽原来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起步时差不多，现在丰田年产几百万辆，产品花样翻新；而一汽的“解放牌”汽车基本上还是老样子，技术落后，年产只有六万辆。最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了汽车工业公司和一汽的汇报，决定改造一汽、二汽，上水平、上质量、上生产能力，到一九九〇年或更多一点时间，使一汽年产二十万辆，二汽年产二十万辆。采取改造老厂老企业的方针，不仅能扩大生产能力，而且能用新技术武装老企业、老基地。这样，新老企业都能在技术上不断进步、比翼齐飞，实现现代化就更有希望。

我们讲依靠原有企业进行改造扩建，也包括三线地区的企业在内。三线建设投资一千多亿元，建成了一千九百多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事业单位。总的来讲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效益很差，需要改变这种状况。在三线有相当一批企业装备比较先进，技术力量比较强，是经济建设一支重要的力量，应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

过去我们已不只一次讲过这个方针，但没有真正落实。这次要下决心来一个

转变，使“七五”计划真正体现以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为主的方针。不论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还是加工工业，不论轻工业还是重工业，不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必须坚决贯彻这个重要方针，狠抓落实。这是“七五”计划的主要问题。今后准备对钢铁、石油、煤炭、石化等部和公司，在计划方法上加以改变，实行投入（投资）产出结合的包干制。给多少投资，形成多少生产能力，调出多少产品，包给各部和总公司。你把投资用在哪里最有效益，有自主权。这样就进一步促使投资使用单位，把钱真正用在现有企业的改造和改建扩建上。

二、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

在“七五”期间，我们必须把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活跃城乡市场，满足社会需要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针。随着生产的发展，近年来出现了人民购买力大幅度提高、市场显著扩大的新形势。到去年底止，全国结余的居民购买力已达到1，336亿元，其中手持现金443亿元，储蓄存款893亿元。在消费品的需求上，吃、穿、住、用、行等五个方面，传统的消费习惯开始改变，消费构成发生明显变化。吃的商品中，副食品的比重迅速增长；穿、用的商品中，高中档商品的销量迅速增长；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由老“四大件”，转向家用电器新“四大件”。农村的消费需求，也逐步趋于城市化。预计这种趋势，在“七五”期间将继续发展。这对发展消费品生产是极为有利的条件。

对市场、对消费、对购买力，我们要有正确的观点。国际上认为我国这几年形势好，并不是看我们产值增加多少，主要是看我们市场繁荣了，人民生活改善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城乡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中国的市场将更繁荣，容量将更大。这点外国企业家非常羡慕。我们过去不大懂得市场的作用，用抑制消费的办法来搞建设。商品不够，就发票证。靠这种办法来抑制消费，就会把消费对生产的反馈作用搞掉了。生产决定消费，而消费的增长又会产生新的社会需求，是促进生产发展的推动力。当然，高工资、高消费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根据我们的观察，即使是发达国家走高工资、高消费路子的，结果也不见得就好。但是低工资、低消费、低物价的办法，也不利于促进生产，不是好办法。我们应当适当鼓励消费，运用市场广阔这个优越条件，积极发展消费品生产，加快建设的步伐。不但“七五”期间应当这样，在长远规划中也应当这样。

现在不少优质高档商品都十分紧俏，供不应求的矛盾比较突出。我们要根据市场的需要，抓住重点，发展优势行业。看来食品工业，家用电器工业，汽车、摩托车工业，以及建筑建材工业，这四大行业都呈现出大发展的趋势，很有可能成为国民经济的几个支柱产业，这种势头越来越明显。纺织工业是我国传统的支柱产业。过去出口、内销，满足市场需求，增加积累，大部分靠它，现在仍然有很大的活力。但是纺织行业技术落后，设备落后，必须进行改造。要看到目前我国纺织品越来越不适应国内市场的变化，更不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在西方市

场，已经成为低档货，甚至面临被挤出来的危险；在苏联、东欧市场，有可能进不去，或者进去后成为中低档货；在国内市场，大路货也销不出。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敏感，采取相应对策，保持我们的传统优势。

食品工业，在国外它的产值一般都高于农业产值，而我国仅及农业产值的27.6%。我国人民消费的食品，包括粗加工的在内，制成品只占30%左右，而在经济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0%以上。可见食品工业潜力大，大有可为。我国人民的食物构成，已经由吃粗粮向吃细粮发展，下一步将向增加肉禽蛋、增加奶制品、增加水产品方面转化，制成品也将越来越多。现在各地都在反映卖粮难。但我国人均粮食才七百六十多斤，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人均792斤的水平。单从口粮上看，目前确有一些剩余，可以说是低消费水平下的剩余。如果使粮食转化为饲料，用去发展畜牧业，改变食物构成，那么，这点粮食不是多了，而是不足。现在由于价格不合理等因素，妨碍了这种转化。我们要研究如何使粮食转化、增值，把畜牧业、食品工业发展起来。建筑建材工业，在很多国家都曾经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柱，而我们一方面供需之间很紧张，一方面建筑业又没有活力。现在，实行了改革，可望好转。中国的汽车工业肯定会出现一个大发展的形势。我国交通运输日益发展，城市用车、农用汽车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在城市、在郊区和沿海农村，出租小汽车可能会盛行，婚丧嫁娶，送人、接人、上医院、甚至旅游，都很方便。这些都为汽车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必须跟上这种新的形势。

发展消费品生产，要着重在质量、品种方面下功夫，使产品不断更新升级，力求做到品种多样，花色新颖，质地良好，价格优惠，适销对路。为了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在价格上有竞争力，一定要十分重视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把引进技术和组织攻关结合起来，使二者相辅相成。引进技术，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合作生产、合作经营、购买专利、购买关键设备、聘请人才等等。对一些市场紧俏的商品，国内相当一个时期生产又跟不上，可以有计划地进口零部件组装，从后面搞起，一步一步往前加，逐步增加国内配套的比重。这样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技术也消化掌握了。如营口洗衣机厂，就是这种办法，建设速度快，效益比较好。采取这种办法，既可以满足市场需要，又可以避免国内低水平的盲目发展，在起点比较高的情况下，使国内的生产较快地发展起来。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在引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的时候，要重视机械制造工业，特别是纺织机械、轻工机械制造厂的改造。据反映，上海纺织机械制造厂很多是五十年代的设备，设备老化、技术老化的现象很严重。不把纺织机械制造厂改造好，就不能提供先进的纺织机械，那就不可能生产出好的纺织品。此外，还要重视引进测试、检验的技术和设备。没有这些基本条件，消费品工业要想搞上去也是困难的。

三、突出电力建设，改变交通结构

“七五”期间，我们要继续搞好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等的重点建设。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我认为要突出电力建设，围绕着电的发展来通盘考虑能源、交通建设问题。这个意见，今年三月我就讲过。电力必须先行，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当前电力供应不足，拉闸限电频繁，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七五”期间不仅生产用电，而且人民生活用电会大量增加；不仅城市用电，而且农村用电也会大量增加，供电不足的矛盾将更加尖锐。因此，必须加快电力工业的发展。“七五”期间，必须保证新增装机三千万千瓦（年装机六百万千瓦）。要根据电力发展的要求，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其它方面的建设，避免互相脱节。

电力工业的发展，要贯彻大中小结合、近期与长远兼顾的方针，千方百计多安装一些机组，多发一些电。除了尽可能新建一批水电、火电、核电站以外，特别要重视现有电站的技术改造，凡是具备条件的，都要进行改建扩建。核电站也可以考虑，是多布点好，还是布点后多装设备好？比如在广东核电站的基础上，再装两台90万千瓦的机组，投资可能会省，产出可能会快。这个问题可以研究。电力工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也是比较落后的，电的质量差，周波电压不稳，物资消耗高，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

由于电力工业建设的加快，今后发电设备的供应将会出现缺口。应组织力量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攻关。同时要以生产发电设备的骨干企业为中心，组织各企业进行专业化协作，生产优质低耗的发电设备。军工企业、三线企业也应当组织进来发挥作用。全国可以考虑形成几个制造体系，分别生产30万、60万、80万千瓦的机组。各制造体系之间还可以交叉，有些厂生产的零部件可以供应全国。这样，我国发电设备的制造能力，将会大大提高。

交通运输结构在我国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重要问题。过去以条条为主，各自强调成网，只分别考虑铁路网、公路网、水路网、空运网，没有从整体出发来建立综合运输网。这样各行其是的结果，造成的浪费极大。比如襄渝铁路，基本上是沿长江同向走的，投资三十七亿元，年运量不到一千万吨，而解放以来我们用于长江航道的投资不超过十亿元。如果把修襄渝路的钱，拿来投入长江航道，可以肯定长江的运输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应当是陆运、水运、空运，河运、海运、公路、铁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互相配合，搞好联运，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独特优势，在全国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经济合理、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除了铁路运输外，内河航运和海运，也应大大加强。这里着重说一下公路运输。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的是铁路衰落、高速公路兴起，公路运输占了很大比重，这决不是偶然的。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运量不多，运距很长，用铁路合算。但在经济繁荣的地方，运距不远，运量大而集中，用高速公路就比较合算。据科研部门的材料，100公里运杂货，200公里运高档货，1,000公里运鲜货，直接使用汽车，中间不倒腾，这样方便、合算。现在我们短途运输都压在铁路上，一装一卸，费时很长，损耗又大。过去首钢把钢坯运到西直门的第一轧钢厂，用火车要一两天，用汽车几个小时就运到了。一条高速公路年运量达一亿

吨，相当于五条铁路的运量，投资却比修五条铁路省得多。据专家计算，如果日流量超过一万辆车次，修建高速公路就合算。像北京到天津，南京到上海，广州到深圳，沈阳到大连，这些地方应研究修高速公路。至于其他地方，可根据需要多修一些特级公路、一级公路，把路面搞好一些。“七五”期间，我们要提高公路货运量在整个运输中所占的比重。过去公路发展不快，除了铁路运价低外，主要是公路质量差，运输车型小，又没有采用集装箱，加上经营不善，成本就相当高。今后应当改善路面等级，配备大吨位的载重汽车，使用集装箱，有了这三条，公路运输就会改观，社会经济效益也会大为提高。为此，要制定一些政策，解决公路建设的基金问题。比如，修了高速公路、特级公路、一级公路的，要允许收不同等级的“买路钱”。就使用单位来说，他的汽车在高级路面上走，加快了车速，节省了油料，减少了损耗，也不见得多花钱。这样修高级公路就有积极性了。

要因地制宜发展空运。到西藏的铁路可以缓建。这些地方修机场、买飞机搞空运划算得多。将来应把更多的客运转为空运，把铁路腾出来运货。专家计算，在京沪之间只要增加三架170人座的大型客机，每天来回飞两趟，就相当于一列特快的客运量。而少开一列客车，可以通过三列货车，一年的货运量就可增加二百万吨。如运用合理，空运效益是好的。总之，综合运输网要作为专题，通盘研究，务期在“七五”计划和以后的长远规划中，尽快解决好这个问题。

四、用活积存外汇和库存物资

“七五”期间，由于资金不足，有必要利用一部分外资，但首先要把我国这几年积存的外汇用好。这是促进“七五”期间经济迅速增长、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之一。

这几年我国外汇储备逐年增加，到一九八三年底达到143.4亿美元，其中国家现汇结存89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国家现汇结存增为117.5亿美元。这种趋势可能还要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从国家的整体利益来考虑，把外汇积压在那里，对我们正在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是很不利的，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占用了人民银行的资金。要想办法把这些“死钱”变成活的生产力。我们国家是一个正在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贸易上略有逆差，外汇上有些欠款，这对我们较为有利。

如何把积存的外汇用活，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呢？以前我曾设想过，拿出五十亿美元外汇用于重点建设，事实上用不出去。重点建设的一些大型设备和成套设备，往往可以使用国外提供的一些优惠信贷。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决定，在几年之内对外汇的使用放宽一点，把七、八十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外汇用出去。用在加速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进步上，提高生产能力，提高技术水平；用在进口一部分换回人民币多的高档商品上，主要是进口散装件进行组装；用在沿海地区出口企业的改造和产品更新上。这样的好处，一是可以满足人

民需要，二是可以大量回笼货币，三是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四是可以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企业的面貌也将发生变化。既活跃了经济，又开辟了生财之道，有利于形成经济上的良性循环。所以，一定要下决心按这个方针办，不要怕将来没有外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事实上，只要把产品的质量和花色品种搞上去，就能够提高竞争能力，开拓国际市场，至少有些本来要进口的商品，以后可以少进口、少花外汇。何况我国对外贸易总的是发展的趋势，非贸易外汇的收入，如旅游业的收入也是增长的，搞得好的话，外汇也并不会少，不会有大的风险，不必过多地担心。这件事要及早动手，作好规划，制定政策，组织实施，在“七五”期间才能收到效果。银行在这方面要发挥积极作用。外汇使用时还是以贷款的形式，审批手续要简化，加强检查监督，小的东西不要怕重复引进、重复生产。我们设想，按上述方向在三几年内把七、八十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外汇用出去，收到好的效益，不出大的盲目性，就是一个大胜利。

另外，战略物资库存也需要进一步压缩。世界大战近期内打不起来，把那么多物资压在仓库里，占资金，背利息，物不能尽其用。不如把它使用了，用商品形式储存到社会上，实现这些物资的使用价值，使这些存在库里的死东西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转化为活的东西。如果将来打起仗来，全国总动员，把它拆下来还是可以用。外国的许多高速公路，就使用了大量的钢材、铝材，等于战略库存。把库存物资拿出来，是会产生很大作用的。一九八一年的时候，我国最大的镍生产基地——甘肃金川镍矿老矿区枯竭，新开的第二矿区尚未形成生产能力，面临矿山脱节的危险。当时，国务院批准从国家战略库存中借给八千吨镍，作为建设资金把二矿区建成。这条“借镍还镍”的措施对这个矿产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一九八三年产量第一次突破一万吨，实现利润一亿元；今年预计产镍一万五千吨，实现利润1.45亿元；一九八五年产镍二万吨，实现利润二亿元以上；一九九〇年将达到四万吨。最近他们与甘肃省合作，准备大矿大开，到一九九三年使镍产量达到八万吨，副产铜四万吨，硫酸七十二万吨，尽快把这些地下宝藏开发出来为国家建设服务。我看应当重点支持。去年以来，压缩库存作了不少工作，今后的步子还要迈大一点，这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五、逐步调整产业结构，采取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七五”期间，信息技术飞跃发展与日益广泛的应用，生物工程进人实用化，新材料、新能源、海洋工程等在某些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和开辟出新的应用途径，将使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必须相应采取对策，围绕着实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积极地、合理地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迎接新的形势，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我们国家幅员广大，经济不发达而发展又很不平衡，应该有多种层次的经济结构。一个新兴产业，一个传统产业，还有一个“第三产业”，我们在“七五”和以后的五年计划中，都必须予以重视，使之得到协调发展。从经济发展的进程看，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传统工业

仍然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任何忽视和放松传统产业的观点和作法，都是不对的。与此同时，必须注意跟上世界的潮流，有重点地发展新兴产业，逐步提高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的产业结构。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应利用自己的优势，多发展一些新兴产业，特别是上海这样的城市要在这方面多下力量，以便向内地移植。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运用新兴技术，加速传统产业的改造。在新形势下，我们有可能利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经验和成果，使传统产业跳过某些发展阶段，在技术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有可能借鉴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和运用新的技术手段，特别是借助于电子计算机、信息网、信息库，加快推进我国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应用微型机改造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效果很显著。这是加速传统产业的改造，推动传统工艺的革新，把我国工业逐步转移到现代化基础上来的一条有效途径。我们一定要十分重视，认真研究，做出规划，扎扎实实地、有步骤地去推行。

发展“第三产业”，也就是发展各式各样的服务行业，应当在“七五”计划中占一定的地位。对这个问题，现在宣传和认识还很不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第三产业”将迅速发展。在一些发达国家中，“第三产业”占了就业人口的60—70%，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了50—65%。我们国家的经济不发达，“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据统计仅占就业人口的15%左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现在城镇里一方面还有很多人等待就业，另方面服务行业人员又很少，处处感到不方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促进生产，方便生活，有利于安排就业。“第三产业”的门类繁多，容量极大，能够安排很多人。所有的城市和集镇，不要老是把注意力放在办地方工业上，以为办工业才能安排就业，而应当把主要力量放在搞基础设施，放在“第三产业”上。上次我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讲，你们的发展战略，第一要注意发展新兴产业；第二要搞第三产业，面向全国，为全国服务。在秦皇岛，我也对市委的同志讲，你们的特点是港口、旅游城市，应当为港口服务，为旅游服务，这两项抓好了，城市经济也就繁荣了。去北戴河旅游的，一九八三年是一百四十万人，今年是二百八十万人，住宿十分紧张。去年九月我去的时候，给他们讲，可以允许老百姓开旅馆，当旅游专业户。今年我去看，一下就发展到二百九十多家，拥有四千床位。我访问了三家，几个月的收入就是六千元至八千元之间，很快就把投资收回了。我国的各种服务行业，包括文化娱乐、旅游业等，前途无量，发展之快，将会出人预料。过去服务业、公用事业发展不起来，有一系列的问题。主要在于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企业，而是当成福利事业甚至慈善事业来办，谁办谁赔钱，根本缺乏活力。这种办法必须改变。要使“第三产业”发展起来，就需要从政策上解决一系列问题，使发展“第三产业”有“名”有“利”。今后，统计产值，也要统计“第三产业”，这样谁发展的多，产值也高，不要让“第三产业”人另册。要进一步把“第三产业”放开，许多都可以实行市场调节，使经营者有利可图。只要我们政策对头，大家就有了积极性去办，“第三产业”将出现一个飞跃发展的新局面。

六、坚持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是我们的国策。我们利用国际形势的有利条件，同国外进行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也必须具有长期的观点，长期的打算。这个问题我们在认识上还没有解决，不少作法并不是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方针看待。我们应注意从国外引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积极地加以吸收消化，不加区别地完全引进成套设备，连通用机械、普通管道都买进来，那是不对的；但是，也不要匆匆忙忙，急于在短期内什么都“国产化”，想全部立足于国内制造。对“国产化”要作具体分析。有些设备，可以而且应该做到国产化；但有一些机器设备，比较复杂或专业化程度很高，用量也很小，不一定要国产化，一切都自己制造并不一定经济，不必花那么多力量。国际上许多设备都是多国生产的。需要某些关键的、专业性的设备，可以进口，甚至长期进口，国内配套的占到百分之九十就很不错了。造船工业的经验已说明了这点。有些同志怕这样做影响自力更生。其实，我们用自己的货物去交换，用钱去买，就是自力更生。还有对国外产品的测绘仿制，也要作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有些机器比较简单，把它测绘下来后可以仿制成功；有些机器很复杂，虽然测绘下来，但就是那点诀窍你掌握不了，往往费时很长，花钱很多，走了不少弯路，仍不能仿制成功。正确的办法还是应当把技术引进和技术攻关结合起来，这才起步高，发展快。以上这些问题，说明我们思想还不够解放，对长期坚持对外开放还认识不足。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这几年对外开放、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经验教训，使“七五”期间在深度和广度上把这一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我们国家要对外开放，就省、市、地、县来说，就各部门来说，也要门户开放，不能搞封锁和闭关自守。近年来，各地的经济技术协作不断开展，据统计，一九八三年各地商定的协作项目，就有八千五百多项，其中技术协作占一半以上，经济联合项目占10%，物资协作金额近五十亿元。现在已从以物资协作为主，逐步转为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协作；从临时性的单项协作，发展成为长期性的多项协作和经济联合。除了地区之间的协作和联合外，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中央一些部门同地方合作或相互合作。如石油部、煤炭部、水电部、铁道部、有色金属公司、船舶公司等，同地方集资或部际之间集资联合开矿、修路、办电、炼钢等，今年资金总额已达到四十多亿元。这是值得重视的新情况。看来，这几年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加工业发达地区与资源丰富地区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在经济上增加横向联系已经走出了一条路子，这是搞活经济的一条很重要的渠道。这种经济上协作和联合的势头，正在全国蓬勃兴起。最近在天津召开了全国经济技术协作和对口支援会议，交流了这方面的经验，签订了一大批协议。在“七五”期间，我们要积极倡导和加强这种横向联系，形成不同特点的经济网络和经济区。一个实行利改税，一个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一个政企分开，再加上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按照扬长避短、互惠互利、互相支援、共同发展的原则，在经济上进行交叉协作和联合，发挥优势，互相补

充，将更加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阻碍经济发展的局面，促进入才、资金、物资、技术的合理流动和转移，从而使我国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的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化。这种经济技术协作是计划经济中非常生动而又丰富的一种新形式，是国家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计划中不应把它当成“异己”的东西。我们必须加强计划指导，搞好综合平衡，制定经济政策，抓紧经济立法，保障协作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这一工作的顺利开展。

对方毅同志开发有色金属报告的批语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九日

金川镍矿要积极建设，大矿大开，八万吨方案希计委早日审批。有色金属总公司与甘肃及各省联合的办法好，煤炭、钢铁、电力也可以这样办。还有些问题已批注文中。

（在开发大西北要把有色金属放在重要地位旁批）同意这个看法。

（在地质科学上支援新疆旁批）这是开发新疆最重要的一项准备工作。

（在可否考虑将省里的信贷存差及其增长部分按一定比例留给省里使用旁批）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由银行研究。

（在有色总公司采用联合的办法调动各地办有色的积极性旁批）联合的办法好。

给李德生[1]同志的信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

德生同志：

我从辽宁回京以后，又看了一下你们关于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的情况报告。我认为会议开得很好，提出的各项意见都是好的。防治地方病的工作对人民生活、生产、国防关系极大，希望你们会同各地继续抓紧落实，务期必成。

顺致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

注 释

1．李德生（1916—2011），河南新县人。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曾任十二军军长，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大学政委，上将军衔。

接见出席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来宾时的谈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接见出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荣毅仁召开的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来宾时的谈话。

这是个盛会啊！这么多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的企业家、银行家、经济学家、法律专家，还有一些世界知名人士共聚一堂，参加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总经理举行的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多知名人士，还是第一次。今天在这里见到这么多老朋友、新朋友，机会难得。我听说，今天上午邓小平主任已经同大家会见了，谈话长达一个多小时，这是不多的。因为，你们知道邓小平主任已经八十高龄了，我国领导人为了照顾他的健康，为了减少他的日常事务，让他今后能够集中力量考虑一些大事，一般外事、外宾来中国就不多让他出面了。邓小平主任很高兴见你们，所以谈了一个多小时，这也是不多的，说明他非常重视你们这个会议，非常欢迎各位朋友到中国来。

今天我有机会和一些老朋友重逢，也认识一些新朋友感到非常高兴。我没有更多的话讲。因为，上午邓小平主任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只在这里代表中国政府表示：第一，对这次来中国参加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的各位外国朋友和港澳地区来宾表示欢迎、致意。第二，这个会开得很好，向你们表示祝贺。

希望各国的企业家、银行家能够更积极地参加到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中来。我希望你们到中国投资的步子加快一点，步子走大一点。希望在座的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和一些企业界的朋友多向我国提出一些建议，多帮助我们。上午邓小平主任讲，我们现在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是确定下来的一个长期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如果说将来会有变化，它只能是沿着这个方向来变化，而不会离开这个方向来变化。就是说，将来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而不是相反。但是，我们究竟怎么搞，还没有经验。开放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是个新课题，我们要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缺点，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希望听到你们的建议、批评，以便我们改进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十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我们大家很好地合作，使我国的经济能够繁荣起来，使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能取得成功，我看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愿

望，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会大大地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

关于我国的改革问题。我们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已搞了五年，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五年中间，我们城市改革也做了很多工作，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和探索。在我们这个国家，城市的改革比农村要复杂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农村主要是集体所有制。历来中国的计划经济对农村来讲实际上是间接计划，不是直接计划。但是，我们城市的主体是全民所有制，是国营经济，它大部分是在国家计划的控制之下，而且，产品的生产、供应、销售全部是纳入国家计划范围内的。因此，城市改革要比农村复杂一些。我们改革的重点，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要解决调动生产单位和劳动者的积极性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扩大企业自主，增强企业活力，使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这样就发生了一个计划怎么搞的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是计划经济。企业活了，计划怎么办？完全没有计划也不行，完全像过去那样把计划搞得很死也不行。计划搞死了，企业也就不活了。企业搞活了，搞不好国家计划就难以实施了。这对我们来讲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城市改革在前五年没有全面展开，主要就是要探索一下改革的道路。经过几年的试验和探索，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为城市改革制订出一个蓝图。不久，我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将反映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眉目和它的蓝图。它的要点我可以简单说一下。

城市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把企业搞活。要把所有的企业单位、工厂、商店，这些生产单位、经营单位搞活，使它们成为一个能够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单位，或者说成为一个具有法人地位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企业，将是具有充分活力的。这样就涉及一个问题，必须改革我们的计划体制。我们今后的计划将少采取行政手段，少采取指令性的办法，主要运用立法手段、经济手段影响企业、指导企业的活动。除了一小部分必须要保持指令性计划之外，大量的计划将变成指导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指令性计划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主要是采用经济手段，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来影响企业向着国家的计划目标去做。当然还有一部分商品将来就完全开放，由市场去调节，用你们的话叫自由经济。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采取正确的价格政策，有一个价格改革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价格是很不合理的。我们过去主要不是靠价格，而是靠指令性计划，靠指令性指标，我们今后想主要依靠价格，当然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个是方向。我们今后的价格将要反映投入情况，反映价值，而且还要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也就是说，紧缺的东西要提价，供过于求的东西要降价。这样我们的计划和价格将会成为一个统一的东西，而不是对立的东西。国家将正确运用价格来达到国家计划的要求，价格将成为我们达到计划目标的一个手段。我们国家今后仍将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但是，这样的计划经济将不同于我们过去搞的那样的计划经济，当然，也不同于苏联，不同于东欧。我们的计划经济将来就是一个依据和充分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也可以翻译成为依据和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你们都是行家，你们会意识到，这会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改革的方向已经定了，而且充满信心，我们将坚定地、有步骤地实行改革。相信用三年、五年的时间，我们的城市改革将会像农村的改革一样取得成功，为城市、为工业、为商业、为所有企业开创一个生气勃勃的局面。

给王震[1]同志的信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

王老：

您十月十二日夜的来信，和前寄给耀邦及常委诸同志的信，我都仔细地看过了。首先，我对您的这种“烈士暮年”仍“壮心不已”的精神和气概甚为感佩！

关于西南经济开发问题的确是我国四化建设中的一个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我当认真思考您老人家的一些想法与愿望。鉴于以什么样的规模与速度进行，势必涉及整个“七五”的建设方针及部署（大规模地展开，放到国家计划之外，恐难以办通），因此我需要把它提到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结合“七五”计划（明年五月前要把大盘子定下来）一并讨论。讨论情况容后向您汇报。

国庆节前后有机会几次和您见面，看到您老人家身体康健，精力仍然旺盛，甚为高兴！

致以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

注 释

1．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人。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曾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解放军一兵团司令员，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铁道兵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农垦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副主任，国家副主席。1955年获上将军衔。

贯彻中央《决定》稳步推进价格改革*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会议上就贯彻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发表的讲话。

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谈谈价格问题。我们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已经发表了，其它问题我看都好办，主要问题是物价问题。我把最近国务院关于物价的一些想法说一下。

昨天，耀邦同志向中央常委汇报，说目前我们国内有四件大事：一是整党，二是干部调整，三是经济体制改革，四是“七五”计划的制定。他说分个工，他抓两件我抓两件，他抓整党和干部调整，我负责经济体制改革和“七五”计划的制定。当然，这四件事由中央常委统一领导，耀邦同志抓总。所谓分工，是各有侧重。这四件事中，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有了。各地方、各部门都要集中精力把这四件大事抓好。

对我们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小平同志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很同意这个评价。我们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但是在理论上有很大的突破（万里：“美国之音”昨天晚上就广播，说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了）。我今天早晨也听了，他们讲了两条：第一，中国要削弱计划的控制；第二，强调价格改革。我看它抓住了要点。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最大的是价格，其它我看都好办，而价格改革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也是《决定》上的一句话。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外国人是这样看，中国人也是这样看。这一点，今天跟大家打个招呼，你们也琢磨琢磨。价格改革要真正搞好，小平同志讲需要五年，我看用五年的时间过了价格改革这一关，我们就可以对外宣布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个问题，一年来我想得比较多。

最近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你们都看到了。《通知》的主要精神：第一，《决定》公布以后，物价要稳一段时间。具体时间没有讲，因为各地具体情况不完全一样。现在我们党内没有秘密，如果讲稳多长时间，老百姓马上就知道，就要抢购商品，所以只说稳一个时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内价格不能动。《决定》公布以后群众的疑虑比公布以前可能要少一些。我主要是讲北京，因为北京的消息最灵通。《决定》上都是讲大问题，没有讲什么东西提价，什么时候

提价，提多少，什么东西降价，降多少。但是《决定》公布以后，我们要切记一九四七年土改的教训，文件还没有吃透，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就到处冒烟，自己把自己搞乱。关于物价宣传我还要说一下，《决定》一发，群众一看讲的是价值法则，“该降的降，该升的升”，而且把降放在前边，他们的疑虑就会消失。你们注意这个话没有？不能一说物价改革就光涨价，该降的还是要降。另外《决定》里还讲了“七五”计划，说到比价不合理。当然，群众认为总的是要涨，实际上总的也是要涨，价值规律嘛，但确实有升有降，不是说什么都涨价。我们讲一个时期不动，也不是绝对不动。有一些小产品要放开，多数地方放开了，还有某些地方没有放开，我看也可以放，不要把问题都积压起来，如火柴，还有北京的煤气，就要涨，那是早就定了的。如都积压起来，欠账越多最后越困难，现在有些地方就有这个问题（万里：今天早晨北京来了个报告，说已经决定的煤气涨价也不出台了，因为出现了一些抢购的情况）。当然不一定这两天就动。但是，如果一紧张就不动，往后压，最后更动不了，现在就有一些省份，被拉得掉了队。但总的来讲，要稳住。凡是原来没有确定的，或已经确定的但全国多数地方没有动的，先不要动；还未出台的，不要急着出台；已经确定了要出台但还没有通知各地的，先不要通知；已经确定了，而且通知了各地，但多数地方还没有实行的，现在也不要实行（除了煤气以外）。煤气我主张非要涨价不可，不涨价没有道理。烧煤球比烧罐装液化气要贵，烧罐装液化气比管道煤气要贵，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煤气发展不起来。第一句话，叫做在一个时期要稳住。

第二句话是，今后，即过了这个时期以后（至于时期多长，各地不一定强求一律，我现在不确定，将来国务院还要研究这个问题），除了放开的产品（有两种：一种是小商品，完全放开了；一种是物价管理权限完全放开了），或者是确定可以实行浮动价格的以外，大的部署一定要由国务院统一制定。这也是《决定》上明确了的，一定要全国统一部署，各地不得自行其是。最近一些地方随便把猪肉提价，是不得了的。猪肉是大商品，你提他就提，什么东西都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猪肉提价会带来什么问题，怎么能提价？在价格问题上，一两年之内不能自己把自己搞乱，要统一部署。（强晓初[1]：暗补变成明补可以不可以？）总而言之当前不能动，暗补变明补也不行，这是超越你的权限，这个权限在中央，不在各省。中央正在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讲的那个暗补变明补是要解决的，一个城市变了，各地方都变，变得又不一样，最后使得整个大的调整不起作用。对这些大的商品，不能自行其是。不合理的要逐步解决，但是有一条，要统一考虑。为什么要这样？主要是怕引起你搞我也搞，大家互相看，这样势必搞乱。今后一两年之内，至少今年和明年上半年，主要的危险不在于价格改革引起什么问题，因为价格改革还未出台，还没有定。主要的问题有两条：一是领导机关，自己在那里轻率地行动；二是机关团体带头抢，这就势必搞乱。搞乱的结果，就为这次整个体制的改革设置了很大的障碍。因此，为了价格改革，现在必须控制住，全国要适当地控制，有些允许各地方动的，可以动；凡是大的商品，一定统一部署，所以国务院就这个问题专门发了《通知》，这对稳定人心很有好

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要稳住。你们回去只是传达学习文件，至于整个价格问题，大的东西，什么粮食、油料、生猪、煤炭等等，都要稳住。

第二个问题，要沉住气。昨天小平同志在全会闭幕时讲的两句话很重要。全会开始之前，在休息厅，小平同志还说过《决定》写得好，“还是中国人胆子大！”我们这次的《决定》是有很大突破，我们心中是有数的，不是盲目的。我认为，只要我们全党认识一致，而且步骤上又比较谨慎一点，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因为我们对基本情况有个分析。现在我们的经济情况很好，东西还是有的，有一些东西由于事先估计不足，可能库存不够。如果市场需要了，还可以增加生产，原料不够可以进口，因此抢购也好，脱销也好，即使发生，也是暂时的。如抢呢绒，抢到一定的程度，没有了，我们就生产嘛，进口原料嘛，我们用点外汇，而且可以回笼货币，也可以把工厂开动起来。如上海的肥皂，有什么了不起？油脂现在有的是，生产就是了。为什么我说火柴各地方可以提呢？因为一方面影响不太大；另一方面，木材涨了价，工厂对火柴的生产实在没有积极性。对现在的情况，第一，我们必须得顶住，抢购也好，脱销也好，不要怕，脱销就脱销，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几十年都脱销嘛！况且，这个脱销是暂时的。第二，我们可以把三十年来的老办法拿出来，凭票、发证，都可以用。那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肯定要发生问题。抢鸡蛋，我们可以定量。过上几个月，问题就过去了。棉布不怕抢购，粮食也不怕，他抢就抢，反正你稳坐钓鱼台。有些东西，他抢完就完了，一天卖多少，到时候关门，不外乎排队，把这种现象说成中国的形势又坏了，我看不一定。总之，我今天就是跟各省同志打招呼，要硬着头皮顶住。这一段稳住，沉住气，给我们有计划地改革、出台新的改革措施，争取个时间。你们不要怕，形势大好，没有问题，现在不是一九六〇年，我们仓库里的东西多了。银行储蓄，提款也不怕，提就提，不外乎流动资金受点影响，他提走以后放到家里，过一两个月连利息也没有，还是要存起来。《决定》一公布，我看就是两条：一是稳住；二是沉住气。不要怕抢购和脱销，这是暂时的，对中国的形势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两条你们要注意，这样我们的大局就稳住了（胡启立：机关单位不准带头抢购）。有两个东西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第一，机关、团体不能乱搞，要加强检查（万里：要严格制止，这是纪律）。现在有些团体要制装，怕涨价，去大批地抢购，这个要制止。每一个地方都抓一些这样的典型，刹一刹这股歪风，该没收的就要没收。

第二，抢购以后就地高价拍卖的，以投机倒把论处。长途运输的不算在内。我看就搞这两条。机关、集团，是指国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审计署要组织一些部门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把这两条控制住。

顺便说一句，离休干部不准搞民间公司。离休以后搞民间公司，实际上是“国营公司”。老干部、老红军、离休干部去搞民间公司，都是自己发财致富。为什么不能搞？不是别的，这些人搞实际上是利用特权，找到老上级、老部下，主要是找老部下，要求批钢材、批材料、批尼龙丝，然后转手去赚钱，这都是不正之风。这不是今天才讲，是早就发了《通知》的。过去的没有关系，现在已经发了

通知了，再搞怎么能行呢？离休老干部可以在咨询、业务方面搞。这个再研究一下吧。（万里：在职的、离休的都不能搞。顾秀莲[2]：还有一条，解放军不能搞。）这样搞流弊很大，实际上是按国家的牌价转手赚钱。（万里：退休的老工人被乡镇企业请去，待遇高一点不能限制。）利用工作的关系，利用特权，这不行。解放军退伍的干部、战士、连排长，他们这个不能算。（胡启立：通知下去之后有的地方就改头换面，老婆孩子出来了，干部退出来了。）主要是老干部，我们规定一下，主要是有权的，以权谋私的问题。这是指在职的。（胡启立：日本的公务员法规定，退休以后二年之内不能经营与自己退休前五年内工作有关的任何一项，如果在职的公务员经营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处一年以下徒刑。）我们也立个法，搞个条例，搞个具体规定。不然的话，对社会风气的影响相当的坏。（胡启立：瑞典的公务员法规定本人不准搞，家属也不准搞。）改革是提倡自由竞争，而利用特权赚钱，是"四大家族"，是官僚资本主义。（强晓初：高干子女做买卖也是不行的，靠老子的特权去赚钱。）高干子女私人做买卖赚钱也是不行的。各地在国家没有统一规定前可以加点限制，做点规定，将来再按中央统一规定去办。不然流弊太大。（田纪云：越看这个弊病越大。万里：越看弊病越大，应该作为党的纪律来要求）。

另外还有一点，商业部门、物资部门、计划部门，要加强对市场信息的研究，对市场紧缺的东西，要及时组织生产，必要的时候进口一些原材料去满足供应。这样我们生产也搞上去了。抢购很厉害，要想个办法，脱销时间长了不好。还要加强调拨。有些商品，仓库里面多得很，没有及时调拨。这次会议可惜我们有关部门没来，光跟各省打招呼不够，纪云同志，负责跟中央各部门打个招呼。

第三个问题是报纸宣传。关于改革的宣传，耀邦同志有个非常重要的批示，这里我就不讲了。我建议把这个文件发到各部委，发到各省市。（胡启立：各新闻系统都发了。）我这里着重讲一个在宣传方面如何处理物价问题。我们的干部对经济体制改革要展开讨论，讨论里面往往就讲到物价，老百姓对这个问题很敏感，看看什么东西要涨价，比如说农副产品价格倒挂。今后报纸是不是定这么一条，纯理论性的探讨是可以的，凡是涉及到什么东西要涨价的文章和信息一律不上报纸。讨论会和机关内部研究可以，但不能上报纸，包括《经济参考》、《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这三家。（陈国栋[3]：还有各种经济、信息报，多得很。）这个问题，请《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几家报纸提个意见。（万里：今天恐怕也得对地方报纸讲这个意见，你们都是掌握报纸的，报纸不能起哄。你们也给你们的报纸、杂志打个招呼。改革不能起哄，一起哄就坏。凡是不成熟的经验，不要向外介绍。）过去晋察冀召开的土地会议，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会议还没结束，到处传开了，到处点火，到处冒烟，扫地出门，甚至乱打乱杀。所以后来中央接受了这个教训，建国以后搞土地改革，报纸宣传工作就改进了，那是毛主席、少奇同志他们下的决心，避免了错误经验的传播。我们党内，好就好在一声号令，千军万马齐上，但是确实有闻风而动、一窝蜂而起的问题。我看这不是个好作风，在经济工作中更是如此。在经济

工作中我们应当提倡头脑很冷静，很好地分析研究自己的情况。但是，我们有的地方多年来形成的一个风气就是听风，闻风而动。这样做会使好事变成坏事。（万里：“文化大革命”是“不过夜”。）这不叫跟中央保持一致。当然，中央已经定了的东西，三令五申，顶着不办那不行；但是中央还没有正式决定，或者中央定了以后允许各地根据自己情况办事，事情还没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往前赶，很多好事变成了坏事。这个风气现在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

这里我还要讲，农村改革所以成功，没有走弯路、没有倒退、没有发生曲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没有压各个地方，完全允许各个地方独立思考。这次《决定》上专门写了农村改革的这一重要经验。我觉得不论办什么事都得给各地一个思考的时间，应当有一个把正确的东西真正变成他自己的东西的时间，这样他才能够正确地执行。没有在思想上真正理解，唯恐人家说他落后而赶风，这样往往搞不好。我们这次改革，很重要的也是这个问题，不要闻风而动，要沉着点，搞到后边的可以借鉴前边的各种经验，可能搞得更好一点，后来居上嘛。过去我们经常讲形势逼人，但又不注意稳步前进，搞成了人逼人，你逼我，我逼你，上面逼下面。结果许多好事办坏了。所以这次耀邦同志讲，报纸宣传改革无论如何不能多登动态性的东西，非常重要。报纸一搞，这里搞什么东西了，那里登什么东西了，他就沉不住气了。当然这是我们上边的问题，要冷冷静静地去总结经验，少登动态性的东西，少登大造舆论的东西。舆论已经够了嘛，不要再造什么舆论了。这次陈云同志非常强调这个问题，陈云同志对这个文件评价很高，但是认为我们主要的还有一个总结经验的问题。现在我们的文件发了，这个文件确实表现了中国人的勇气，也表现了中国人的思想确实是解放了。我们必须按照《决定》把工作搞好，搞不好，今后对国内外都是不好交待的。报纸宣传要注意一下，不要在物价问题上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审稿要严格一些，宁可少发一些，不可因为工作上的疏忽给社会造成动荡。我看物价问题就是这样。当然，属于基本理论问题，什么计划经济、价值规律，商品生产，这些理论的东西可以探讨。但是要注意里面不要带个例子，给人一个信号。要注意这个问题。（胡启立：还有工资问题，所有敏感问题不要在报纸上造气氛。）所以，这一次《决定》上本来加上了什么基本工资、年功工资什么的，后来就笼统了一下，实际上我们还是准备这样做，方案正在制定，但是这一次没有写。还有一个问题，文件原来有“我们每一次调整物价都要同工资挂钩”这么一句话。后来陈云同志意见还是圈掉。做当然还是要这么做，将来我们调整物价而影响到人民的消费品价格，要适当跟工资挂钩，但是不写上去。中央没有定下来的东西，没有实行的东西，没有部署向外讲的问题，不得讲。要严格这个纪律，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改革能够有步骤地、健康地进行。

第四个问题，有必要把我们物价改革中大体上要解决些什么问题、可能做些什么的考虑说一下。究竟怎么改，大家还要进一步讨论。

物价改革大概是三个字，第一个字叫“放”，第二个字叫“改”，第三个字叫“调”。什么叫“放”？现在我们已经有放的了，有一些小产品就是将来逐步放开

了，国家不管了。现在已经有些在做了，有些做的效果也是好的，只要不过于集中，效果都是好的。小商品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新产品。完全是新产品和集体搞的一些新的行业，我们根本不管它，价格他自己去定，自负盈亏嘛。

像将来的一些第三产业，集体的、个人的第三产业，你可以不必管它，老百姓嫌它的价格高，可以不到他那儿买嘛。比如说咨询，价格你管他怎么管，技术服务怎么管？你也可以自己定价，群众、使用单位也可以自由选择，可以找你，也可找另外一家。像这些都属于放的东西，不要统统国家背起来。（万里：都是两利的问题，不两利他不干。）协商、两利。这叫一个“放”的问题。

第二个“改”。这次《决定》上写了，就是改革物价管理体制。我们现在物价管理过于集中，有一些将来放到省、放到市，有一些将来恐怕还得放到县，有一些完全放给企业，比如说试制根本没有的新产品，企业可以自己定价。还有市场上供过于求的东西，也可以企业自己定价，这叫改革物价管理体制。对这个问题，看法还不一致。最近，体改委的调查报告就提出了广东的经验，以改为主，以调为次。这个东西，我看也不一定完全就是这样，广东仅是一个局部。全国如果统统放开，可能出现互相来搞，互相影响，这个要有步骤地来搞，按《决定》上讲的，走一步还得看准下一步再走；如不行，就先停一下。一下子大放恐怕不行。解决的途径要这样，因为地区的差别也很大。现在总的来讲，中央的物价管得过于集中，应该放，分散一下。分散一下，矛盾小了，冲击力小了，承受能力也好一些。统统什么都由北京来定，然后算账，算的不会很准确。比如粮价，可以按一定的标准包给各省，由各省自己去定。你们愿意把价钱搞高一点就搞高一点，愿意把价钱搞低一点就搞低一点。搞低一点就可以向外卖了，搞高一点就多贴补一点了，中央只是按一定的收购量，按一定的价格包给你。这样有利于各地的调整，充分发挥各地方的优势。

另外，本来应当还有一个内容，我原说是“参”，这样说可能不很准确，意思就是我们价格放活以后，国家必须参与市场调节。比如说钢材，现在市场价格是每吨一千二、三百元，国家就应该有一批钢材，一百万吨也好，二百万吨也好，我按一定价格往外抛。当然按六百元向外抛就不行了，抛完了就完了。有些价格很高，就是通过随行就市进行吞吐，使一些紧俏商品不要搞得过高。当价格到一定的幅度，我就不参与调节了；当你的价格低的很多，我还要收。我们五十年代三大改造以前就是这个办法。那时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那时的市场，除了加工、定货以外，主要是通过国营经济进行参与市场调节来稳定物价。这个很重要。将来国家要准备进口物资参与国内市场调节。现在市场木材价格高得厉害，如果我们能进口一批木材，就会好一点。还有电视机，特别是汽车。我今天给你们打个招呼，汽车要提高关税。你们不要紧张，还要给地方留一点利，我们关税不会把你们的超额利润全部拿走，要拿一半。另外，国家要直接掌握进口汽车，平抑物价。如果一辆汽车赚一万元，通过税收要把五千元上交国家，你还可以赚五千元。解决的办法就是“放”、“改”、“调”这三个字，加上国家参与市场调节。国家物资部门、商业部门，以及各个掌握物资的中央各部，像煤炭部、石油部、

化工部，将来我们除了一部分按指令性计划，按牌价分配的以外，还要有一部分要拿来参与市场调节，不要使放开的那一部分失去控制，无限制地涨价，搞投机倒把。

刚才讲了一个“改”、一个“放”，现在讲一个“调”。“调”就是调国家指令性这一部分，牌价这一部分。主要是生产资料，如煤炭、生铁、矿石、木材、电力这一类东西，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这个调整只能是小调，不能大调。应该采取小步，就是大体上使企业能够消化，不至于带来连锁提价。就是这么几个字：“放、改、调、参”。我们今后物价就是这么一个路子，是一个多种方式解决物价的路子。

注 释

1．强晓初（1918—2007），陕西子长人。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曾任松江地委第二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松江地委第一书记，东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秘书长，机械部副部长，山东省委书记、副省长、中纪委书记。

2．顾秀莲（1936—），江苏南通人。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曾任化工部部长，计委副主任，计生委副主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陈国栋（191卜—2005），江西婺源人。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部长、财委副主任，粮食部副部长、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上海市顾委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给薛暮桥同志的信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暮桥同志：

半个世纪以来，您孜孜不倦地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做出了大家公认的贡献。我谨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

您坚持的求实精神和严谨作风，是非常可贵的。在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时候，我希望您和所有的经济理论工作者，进一步发扬这种优良学风，面向实际，不断研究新的课题，取得新的成就。

敬祝

健康长寿！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 这是赵紫阳访美前夕应约为美国《大西洋》杂志而作，原载该杂志1984年11月号。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宣布对外开放是中国富民兴邦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不是“收”而是进一步“放”，不是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前进，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曾经被视为“非开放的”国家。但闭关锁国是违反中国人民的意愿的。

早在三十五年前，即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昭告世界：内外交流是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基本政策之一。

遗憾的是，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相反，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某些大国先后对中国采取了封锁或压抑的政策。这种不利的国际环境使进出口总额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长期处在很低的水平，中国人民被迫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从事建设，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也在客观上助长了中国国内的一种忽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十年间曾盛行一时。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错误的政策和观点业已被事实所否定。那种认为可以用封锁和压抑来遏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政策，在国际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不明智的。不同十亿人口的中国打交道，实际上只能把自己排除在这个广大的市场之外。在中国国内，实行对外开放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已为广大人民和干部所普遍认识，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一项不可动摇的政策。

七十年代末是一个转折点。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一般只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1]。但在四年以后，即一九八三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比例提高到了百分之十八。现在中国利用外资的总额已达一百四十六亿美元，相当于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国内基本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十五。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三年的四年间，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二，而进出口总额则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也就是说，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超过了国内生产增长的速度。这一趋势，今后将继续保持下去。

实行对外开放，同实行对内搞活一样，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已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不久前，我在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学会的演讲中指出：

——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富民兴邦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就意味着中国同世界各国经济合作的发展。

——在对外开放上，我们的指导思想，不是“收”，而是进一步“放”；不是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前进。中国已经开放了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再关上。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展开，中国市场同国际市场的联系将更加密切，中国同外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将越来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这些论断，已被证明是符合实际的。

有些外国朋友对中国能否持久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持观望态度。他们还要看一看。应该欢迎他们继续观察。需要指出的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能够得到实惠的政策，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也就是说，是不可逆转的。

积三十多年的经验，应该不应该实行对外开放这个问题，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解决了。现在我们正在探讨的是，如何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使对外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收效更好一些。今年年初，中国政府作了一项新的决定：进一步开放东部和南部的十四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这十四个城市，包括天津、上海、广州在内，拥有七千多万人口，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精华地区，交通方便，基础较好，工作效率也比较高，能够为外商提供各种方便和优惠条件。这是一个大决策。这些地方的对外开放工作做好了，不仅可以大大加快渤海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东部地区的发展，而且可以为进一步开发中部和西部地区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关键性的设备，借鉴国外的管理经验，利用国外的资金，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这当然也包括美国在内。中美两国人民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欢迎美国的企业家到中国来做生意，投资办厂，开展业务，参加竞争。在这种交往中，美国企业家将会发现，来中国做生意是有利可图的。中国人民是倍守信义的。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上各具优势，在许多方面可以互通有无。只要双方各自作出应有的努力，中美之间经济技术交流的前景无疑是非常广阔的。

注 释

1．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当年国民收入的比例，1950年是9.8%，1959年是12.2%，1969年下降到6.6%，1979年回升到13.6%。

广东要继续在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中走在前面*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考察广东期间和听取省委常委汇报后的谈话要点。

一、广东可以在开放和改革两个方面为全国提供更多的经验

广东，我在一九八二年来了一次。那次来，珠江三角洲没有看。特区的建设还刚刚开始。隔了几年，这次主要看珠江三角洲。又看了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一路所看到的情况，确实变化很大。开放和改革确实大大加快了这些地方的建设速度。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社会秩序和人们的精神风貌总的讲也是好的。我觉得你们开放和改革的实践为全国其它地方提供了一些很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这是总的看法。

我来到这里，一个很突出的、最深的印象，就是许多建设项目周期很短。从破土动工到投产，有的半年，有的一年，两年的就算长了。当然，投资数量并不省。但因建设周期短，能早投产，这就很划算。这是很大的进步。我们国家很多建设项目搞得周期很长，效益很低，而这里却搞得很快。中山港从破土到使用总共才八个月时间，是相当快的。赤湾港的建设时间也相当短。这个经验很值得重视。

另外，我感到广东开始搞活后，在改革方面的承受能力增强了。特别是在价格改革方面。希望你们继续提供经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讲到，改革能否搞好，关键在于价格体系。许多外国人评论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胆子是大的，但有风险。希望中国改革能成功。他们担心的主要是价格问题。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改革的一系列问题联系起来了。如讲到企业活力，就必须改革计划体制。如果光讲企业活力，不讲计划体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就是一句空话。过去我们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不搞指导性计划，一切捆得死死的，这样企业就活不了。而要搞指导性计划，要搞活，价格体系不改革，是不行的。我们现在的价格体系很不合理，影响企业生产。国家给企业自主权，企业要搞活，它就要按利润来生产。如果价格不合理，市场需要的，企业不愿意生产；市场不需要的它却生产，造成产销脱

节。这对小企业来说，问题不大。因为它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是自由价格；但大企业不同，国家要求它按计划生产，要是价格不合理，企业就拣有利的生产，社会的需要就不能满足，就会发生产销脱节。所以，价格体系改革是个关键问题。当然还有一个金融问题。经济搞活后，金融制度不适应，不改革，也不行，这个问题现在正在研究。你们广东在价格改革方面有一些好的经验。由于人民收入增加了，搞价格改革，承受能力也增大了。那天讲的广州蔬菜购销完全放开问题，如果在北京，价格一下子提高30%，就会成为问题。但广州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要按小平同志讲的，在局部地区先搞，成功了再扩大。一步一步走，走一步看一步，一步走好了，再走下一步。哪一步走得不好，再改回来。小平同志这个话很重要。现在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处于试验、实践的过程。《决定》把改革的路子指出来了，但尚未具体化。到底如何走，还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广东在改革方面，很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包括反面的经验。广州市蔬菜放开，就是好的经验。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都应当为开放和改革提供经验。

这几天我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利用特区和沿海地区把外引和内联结合起来。这是开放的概念。同时也要通过沿海地区创造改革的经验。我们可以通过特区和沿海地带，对引进来的外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和方法起筛选的作用。外国的东西，一下子拿到内地还不适应，不能发挥作用；通过沿海地带和特区，看哪一些适合，哪一些不适合，起筛选的作用。日本人讲是过滤，我讲的是筛选。沿海地带和特区，一个是开放的结合部，一个是把国外的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制度等在这里进行筛选，再转移到内地去。比如说，可以搞一些跨部门、跨地区的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和成套工程服务公司。这在国外是一种很普遍的形式，通过中间商，也就是我们讲的“皮包公司”，把一个个企业联合起来。这种公司，可以总承包某项工程，然后它去找承包商，从设计到成套设备都包起来。通过投标承包，然后组织成套设备供应，谁的设备好，就买谁的。广州珠江外资建设总公司就是这种形式，它现在是搞民用建筑，还没有发展到搞工业建筑。我和深圳的同志讲，你们也可搞这种公司，最好搞中外合营的，这样可以把国外的信息、技术、管理同国内的服务连结起来。公司搞起来，可以承担北京、上海的工程。这种公司，在沿海搞比在内地有利条件较多。

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有一套适合它的情况的经营管理制度、形式和知识，我们要引进来，得有个地方进行消化、筛选，通过沿海，就可以找到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情况结合的东西。刚才仲夷同志讲的我很赞成，沿海的开放，不单是在沿海的作用，而是在全国都有要发挥的作用，沿海要为内地提供经验。我看除了沿海十四个进一步开放的城市外，要考虑从辽东半岛到广西北海市整个沿海地带的逐步开放。将来我国的经济会出现不同的模式：一是特区，二是沿海地带，三是内地。这样，在管理、价格等方面，将会有先有后地出现这种那种新的形式。整个改革也就会形成一种滚动的形式，从外到内、从沿海到内地滚

动。现在我们就要更有意识地注意这个问题，要利用特区、开放城市和沿海地带创造推进改革的经验。

二、关于广东的电力建设问题

广东前进中的困难，突出的是电。你们集资，首先要把力量放在这个方面。你们的宾馆越盖越多，家用电器越来越多，加工工厂越办越多，迫切需要解决电的问题，我主张你们首先在发展电力方面发债券。发债券办电，可以按债券分电，也可以分利息。债券，可抵押，也可以在银行贴现。我们还没有定出搞交易所，但可以通过银行来搞。除了发债券办电外，我还主张你们想办法把海南岛的天然气用管子引到大陆来。这一点你们要下大决心，要下大力量。这是一本万利的事。电价是要提高的，但不能用提高电价的办法来搞基本建设，来搞天然气管道。搞电的基本建设还是要靠发债券。此外，中央一部分企业也可以到你们这里办电。总之，我主张你们把资金集中一点用于办电，通过发债券、引进外资的办法，还有别的集资办法，或者把这些办法结合起来。有了电，别的就有了。要千方百计增加发电能力。

你们还可以研究一下，在核电站再加一台机组，发的电供你们自己用，目前计划的是两台机组，在这个基础上让你们再增加一台。有了基础，再加一台就省钱。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和风险，可能就是将来核电站的电费贵一点。此外，还有红水河，也可以利用外资来办，这个没有什么不好。

对于广东来说，交通和电力都重要。但对比起来，电力比交通更重要，你们要想办法。不然，工厂开得越多，停工时间也越多。解决这些问题，光依赖中央不行，要发动大家集资来办。

三、关于广东的外汇平衡问题

广东前进中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外汇如何平衡。一路走一路看，感到这是一个大问题，各地都是用外汇多，创外汇少。引进设备用外汇，引进技术用外汇，甚至连大宾馆的食品、水果都用外汇。但引进项目所生产的产品大部分是内销赚取人民币，而不是创汇。这样下去，我看广东外汇平衡就有问题了。从全国来说，中央目前还积存一些外汇。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有那么多外汇，不是正常现象。我估计，三年以后，国家的外汇会出现逆差。我们国家不应当把外汇积压在银行，要采取措施用到建设上。从广东的情况看，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搞得很多，引进了不少设备和技术，这是好的，但产品很多都是内销，这就必须考虑将来的外汇平衡问题。平衡在珠江三角洲我注意了这个问题。进口原料和零部件，加工装配后内销，当然非常好销。但是，你们这个地方，人民币多，外汇少，要拿人民币去高价买外汇。因此，从发展来看，你们的外汇平衡就

是个大问题。在广东，人民币值跌得厉害，如果不注意，就会从广东发展到全国，冲击人民币。我原来只担心特区发行了特区货币冲击人民币，现在是广东的外汇自己不能平衡，外汇出现黑市，冲击人民币。这反映了一个趋势。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搞外汇。

用什么办法搞外汇呢？原来想靠工业品打出去搞外汇，现在看来这个路子不会太宽，包括特区也是这样。要看清这么一个形势，今天我们沿海开放，跟过去新加坡、南朝鲜、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同。它们过去搞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加工出口，很快把经济发展起来。现在情况不同了，国际市场条件不如过去。现在的国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保护主义盛行，引进设备、进口原料加工成产品后拿去出口，当然不是不可能，但这个前景并不太好。要把产品打出去，会遇到相当多的困难。所以要自己想办法创汇。如果光走来料加工后出口的路子，三年或两年以后，抢购外汇不知要搞到什么程度，因此，必须另找一条路子才行。

另一条路子是什么呢？我在中山市讲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将来出口前途比较大的大概有两类：一是传统的轻纺工业，二是新兴的食品工业。我们的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要认真搞技术改造。食品、轻纺工业能够通过沿海的技术、设备，提高质量，改进包装，就可以增加出口。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输出原料，别人拿去加工赚钱。中国的蚕丝，香港拿去加工，不知赚了多少钱。现在要把后面这些加工转到国内来，首先转到沿海，使产品增值，然后出口，多创汇。一个是把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引进到沿海和特区；一个是把内地的东西在沿海加工增值后再出口。这方面广东有很大的优势，这里信息灵通，交通方便，关键是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提高产品质量，搞好速冻、密封，改进包装。这样，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上去了，然后把沿海加工、机械业搞上去。这样，外国占我们的市场，我们也占国外的市场，外汇的平衡问题就可以解决，而且还能创造更多的外汇，就循环起来了，可以引进更多的先进设备和技术。

为了实现这一设想，我有个想法，除了特区和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外，还准备把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开放地区。两个三角洲都有大三角和小三角之分。具体划多大范围，恐怕先搞小三角好，试一试，搞二、三年，搞好了再搞大三角，然后再扩大到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我看这个没有什么危险，而且有利于利用外资，引进技术。

中国的纺织品不是数量问题，根本问题是提高质量，搞增值。搞好了，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外汇不成问题。搞低档产品在国外挤来挤去，是没有前途的。引进设备、技术，一开始就要把起点搞高一点。我们的轻纺产品，到苏联还有很大的市场，但苏联也不是50年代的苏联了，东欧也不是50年代的东欧了，人家的产品也是有改进的。我们的传统的东西不改造不提高是不行的。波兰、巴西、墨西哥都碰到一个钉子：引进大量工业设备，但产品打不出去。我们要搞高档产品，打出去。除了继续发展旅游、来料加工、通过落实华侨政策促使华侨投资和捐赠、劳务出口等，多搞一些外汇外，主要的是改造传统的轻纺工业和搞新兴的食品工

业。我们的产品要创自己的商标，也可以利用外国的名牌，等到出了名，外国都知道是中国的产品以后，就可以打自己的牌子。

至于你们的外汇分成问题，这次外贸会议把全国外汇留成比例从13%提到25%，大家都高兴，就广东和福建两家要求提高比例，保持比全国高7%的差距。外贸会议的这个盘子，总的来讲留成比例是提高了，不分计划内、计划外。但考虑到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外汇包干，广东用外汇又比较多，可以用别的办法照顾一下。请郑拓彬同志回去研究一下，在全国基本办法的前提下，找个照顾的办法，体现一点特殊政策，以示区别。

还有侨汇的比例，留给侨乡多一点，中央不拿了，省里也不要拿，都留给侨乡，让侨乡利用这些侨汇来加速侨乡的建设，落实侨房政策。土改、“文革”占的侨房很多，要加紧侨房政策的落实。侨汇政策、华侨投资优惠政策，原来中央书记处讨论过一次。华侨投资优惠待遇搞了一个条例，还没有来得及通过，要催促办理。

关于广东办理个人外汇存款，外汇存取自由问题，我原则上是赞成的，由人民银行刘鸿儒同志回去研究提出办法。

四、关于广东的财政体制问题

落实广东包干绝对数，我看没有什么问题，我在北京已经讲了这个问题。不会因为明年实行新的财政制度，而一下子使广东多上交中央几亿元。这个你们可以放心。我可以先定这么个原则。总之，广东的既得利益不会受影响。全国的政策都是保护既得利益。

这次财政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不是中央克扣地方，不会增加地方的负担，因而也没有使中央集中更多的财力。今年中央财政赤字是50亿元。明年的赤字还会增大。我们现在先给你们打个招呼，今后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大致有三个，就是“多借债，少拨款，银行挑重担”。第一个办法就是借内债，发国库券。国库券可以搞中期的，也可以搞短期的，利息可以高一点，可以到银行抵押、贴现。第二个办法，就是中央少拨款，由各地自己集资，很多事情自己办，特别是能源、交通。有的项目可以集资去办，然后收费补偿。第三个办法，银行多挑重担，许多事情通过银行资金去办。总而言之，地方的钱，企业的钱，中央不想多拿，把钱留给地方和企业，让地方自己多办事。当然，重大的项目还是由中央来办。

关于退税问题，我还是这个态度，绝不会因为实行新的财政制度而增加你们几亿元的上交数，我相信财政部也不会这样。总的原则就是这样。

五、关于广东的外贸问题

这几年外贸为什么会亏损？用简单的话说就是多出口了高亏产品。如果今年

初不下决心缩减高亏产品出口，今年的外贸亏损恐怕不会少于去年，还可能会比去年增加。今年初下决心把高亏产品缩减30%，全国出口亏损就减少了20亿元。但是，开始时各省都哇哇叫，说失业工人有多少，出口要减缩多少。各省纷纷给国务院打电报要求增加出口。明明是高亏产品都要争着出口，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有个利益问题，得利归地方，亏损由中央包。后来国务院表了一个态度，如果你一定要出高亏产品，我就不承认，亏损我不负责任，可以实行代理。结果今年出口也还是增加了，但亏损却比去年大大减少了。不然的话，高亏产品照出，亏损由中央包。所以定了这一条，高亏产品中央不出口了，要出你们自己出，自己负担亏损，中央不负担。

我主张珠江三角洲，地方外贸要有直接经营出口权，但要有一个管理力、法把价格管住。价格怎么管？可以采取管低不管高的办法。低价竞销我就管它。比如说，确定某个产品要卖五块钱，你出口可以卖到高于五块钱甚至可以卖到到十块，也准你出；低于五块钱就不准出。这样珠江三角洲的鲜活产品，基本上可以放开让它直来直去，直接到香港，根本不用采取外贸收购办法。你可以直接去卖，也可以找代理商，只要你有本事就多出，没有本事就少出。广东有条件，内地的省份就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有一条必须要管住。价格必须往上增，不能往下降，低于规定的价格就不准出。只要有这条就可以放开。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例如欧洲共同体，在钢材不景气的时候，它就走这条路。它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好几个国家，为了不降低钢材价格，就必须减少出口。还有石油输出国集团也是这样做，甚至有几个国家虽然没有参加石油输出国集团，但它们基本上也都采取统一行动。为了输出石油，它们有时也会展开激烈的竞争，使价格下跌，但只能降到一定价格（现在降到一桶29美元）。低于这个价格就不准出口。一个国家也好，跨国公司也好，国家集团也好，都是采取这个办法。我看有了这一条基本上就可以管住。当然，还要有配额，不然会自己挤自己。

珠江三角洲放开鲜活产品直接出口很有好处。现在很明显，蔬菜放开后，质量提高，损耗减少，管理水平也提高了，还可以提高产品的换汇率。珠江三角洲可以先放开。香港市场的鲜活产品，逐步由广东或主要由广东来占领。现在香港市场，台湾、南朝鲜、新加坡的食品还占很大的比重。只要符合刚才我讲的原则，香港食品市场可以由广东占领。我们何必从很远的地方把鲜活产品运到香港市场？没有必要。香港市场的水果，广东也可以去占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靠提高质量，搞好包装，提高竞争力，才有可能占领香港市场。我在珠江三角洲已讲了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这种试验。组织地方公司，民间公司也可以，鲜活产品可以直来直去，国营专业公司逐步地不直接经营鲜活产品。香港需要什么东西，要由地方直接经营。将来哪一个公司搞得最好，就多给配额。南朝鲜全国性的外贸公司有六家，国家赋予它出口的权力，但它六家公司不像我们的专业公司那样一挂起牌子就永远是它经营了，它是三年一换，三年搞得好就可以继续搞下去，搞得不好就轮换，这样有利于提高对外的竞争能力。我们现在也有竞争，但不会一致对外，对外竞争的能力很差，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国内的竞争要有利于

提高对外的竞争能力。国内的配额，谁经营得好就多给，谁经营不好就减少。各个直接经营对港澳出口鲜活产品的公司，可以组织个协会，管理配额和价格等问题。这个问题，请广东外贸局同经贸部商量个办法，由广东省组织实施。办法一开始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方向应当是这样。第一步搞鲜活产品，像蔬菜、塘鱼、花卉，还有荔枝、香蕉等水果，直来直去，地方经营。先搞这几样东西，搞个试验，搞成功了，再扩大。总的来说，香港这几百万人吃的东西，广东要去占领市场。这样一来，就把广东的、珠江三角洲的食品工业带起来了。这个问题，原则就这样定。办法由你们去研究。

关于出口许可证问题。将来有些产品的许可证可以授权给省发，不一定都统到经贸部，可以给省一个控制数，由省来发。这个问题，请郑拓彬同志回去研究。我看来料加工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由部批，第二类由省批，第三类不发放许可证。对国际市场的变化，我们还不适应。有些需要发许可证的没有发，有些需要放开的没有放开，造成很大的混乱。这个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国际市场的情况来决定。国际市场天天变，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对许可证问题要灵活掌握。

关于鲜活商品的边境小额贸易，原则上都应允许。广东有本事到外国去办企业，我也赞成。

外贸体制改革不是后退了，而是前进了。主要是实行政企分开，企业自负盈亏。现在下面感到卡死了，一是由于有些原则还没有具体化，二是还没有经验。我讲过，第一，经贸部不能把政府的权交给专业外贸公司，而是要把权收归政府，否则就不是政企分开；第二，政府的权有的要分散；第三，中央、地方的政府对专业外贸公司与对地方的外贸公司应一视同仁。现在有的问题还未具体化，有的可以先搞几个月，看一看，实践一段。总的是政企要分开，不是划分条条、块块，像过去那样搞法。

六、关于珠江三角洲农业结构问题

在粮食暂时过剩的情况下，你们这里一些地区可以少种粮食。现在粮产区的粮食没有出路，非粮产区特别是山区又还得种粮食。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形势，就是在粮食暂时过剩的情况下，能解决调整农业结构的问题。宁夏河套地区粮食丰收，压了十三亿斤粮食。他们的办法是由供销社经营计划外粮食。按三七开的价格收购粮产区的粮食供应山区，运费和手续费国家负责。农民按收购价买粮，山区不用种粮食了，可以改种别的，这样山区农民就能增加收入，比种粮食划算。我这次到珠江三角洲，就是宣传这个主张。你这个地方需要粮食，可与湖南、江西签订合同，一年供应你多少粮食。按什么价格呢？按国家收购价，你们也不要财政赔钱。

我们的粮食其实并不多。发达的国家人均需要一千五百斤粮食，苏联人均也需要一千多斤粮食，中国平均只达到八百斤粮食，为什么又多了呢？作为口粮来

说多了，光是吃饭吃不了这么多，就是因为没有加工成为饲料，没有转化为肉类。这里也有价格问题。

适当少种粮食，改种其它作物，要有一个逐年实施的过程。不可能把几百万亩土地都种了香蕉，只能逐年调整。可以采取佛山市委提出的办法，以促进农业结构的改革。愿生产粮食就生产粮食，不适宜种和不愿意生产粮食的，就不生产粮食。

珠江三角洲调整农业结构，还要考虑适应外贸创汇的需要。要看国外需要些什么东西，我们就种植什么，就加工什么，把珠江三角洲变成出口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全国不能讲贸易立国，但珠江三角洲可以讲“贸易起飞”，以进入国际市场为主要目标。为此，珠江三角洲的生产方针，应当是贸一工一农，而不是农一工一贸。不是你种什么就加工什么，加工什么就出口什么，而是倒过来，由外贸牵头，看国际市场最需要什么，然后考虑加工什么，再考虑种植什么，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结构应围绕这个来调整。首先考虑港澳吃什么东西，然后来搞什么食品加工。这里交通方便，信息灵通，要引进先进设备来搞加工，这样就会有竞争力。光明畜牧场的经验就是证明。就是说，要按贸一工一农来安排。这个搞好了，完全可以占领香港市场，然后打入东南亚、日本，还可以进入阿拉伯。

顺德的同志说到的出口蚕丝亏损问题，我的印象蚕丝不能出口那么多，卖不出去；可以转一部分内销，又需要补贴。你们这里有这个问题，江苏、四川也有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丝绸公司统得太死的问题又当别论；如果是生产结构问题，你们就可以改过来，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来安排种桑养蚕。过去珠江三角洲也有挖桑种蔗的例子。国际市场的蚕丝好销，就挖蔗种桑；不好销，就挖桑种蔗。珠江三角洲种蚕桑不一定很划算。不划算就少种。

关于生猪问题，猪肉要提价，再不提价，明年就没有猪肉吃了。根本的问题是粮价高，猪价低，农民不愿养猪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水平，还是猪肉为纲。没有猪肉吃，别的顶不上，人民不赞成。广东生猪取不取消派购任务，你们自己考虑。你们如果放开，一斤猪肉补贴消费者五角钱，这不增加国家负担了吗？你们职工工资水平高，放开也可以考虑，但从外省调进的生猪的差价，就保持目前的水平，不再增加。

七、关于经济特区问题

特区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做得很好，最重要的是进行了改革的探索，为内地提供了经验。管理体制的改革，你们是先行的。特区是起“窗口”的作用，也是改革的跳板。你们的经验内地可以借鉴。现在国内外都对特区一致叫好。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特区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非常重要。是否物质多了人就变得不文明了？我看不是的。日本的社会风气就比美国好。香港的社会风气也不好。新加坡的社会风气却比较好，他们提倡儒道，提倡孝敬父

母。连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1]也说，物质文明要学西方，精神文明要保持东方的传统。我们在经济上要赶上发达的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的技术要引进来，但千万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东西全盘搬过来。我们不提倡封建道德，但要把中华民族固有的文明和优良传统保持下来。

特区不要笼统地讲以“块块为主”。属于政府职能这部分的权力，你是块块为主；属于企业的，你就不要去干预，否则企业就不能指挥生产了。你们讲的应该是立法权这个“块块”。特区政府的功能是什么？要研究清楚。然后才好考虑你要的是什么权力，哪些权力要扩大，哪些权力要缩小。直接管理生产的权力恐怕要缩小。要靠价格，靠市场调节，这样扯皮的事就少了，很多矛盾就解决了。过去我们把很大的精力花在这个方面。今后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围绕市场信息转，谁搞得好谁就发展。特区要以市场调节为主。你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办事。有了法律就应该按法律办，如立法不完善可以修改，有纠纷就到法院去打官司。部门之间的利益靠市场调节，关键是个法律问题。什么叫重大方针？重大方针主要表现在立法和法律上。法律是很具体的东西。你们那个税率是百分之十五，就是百分之十五。搞市场调节，特区政府领导经济根本是两条：一是为企业创造好的环境；二是企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企业“组阁”、“聘任”后，将来党委对干部也少管了。当然现在还需要有个过渡。政府管理经济的概念要来个彻底的革命，尤其是特区。当然，中央各部和海关都要支持你们。将来就是个配额问题，哪些能进出，哪些不能进出，都要写在法律上。现在要有个过渡，最后过渡到立法这个环节上。立法本身包括你们的权力，也包括中央的权力。你们不要侵犯中央的权力，中央也不侵犯你们的权力，都按法律办事。所以，目标要搞明确，这次三中全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叫做“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这句话不要小看，是个大方针。这同我们过去传统的管理办法有很大的不同。

特区的经济是“外向型”的还是“内向型”的呢？这个问题也要很好研究。大量搞加工装配、进口原料，我看相当一部分产品外销的前景并不乐观。我同中央几个部的同志说过，是否可以利用国内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搞些产品打出去。现在外国人到中国投资，第一，他们看中的是中国的市场；第二，是廉价劳动力。他们垂涎的是市场。我们要让出一部分市场。我们利用外资引进设备、技术和进口原料，产品要全部出口或大部分出口的希望是不大的。如果依靠国内工业基础，加上你们的有利条件，引进国外技术和关键的零部件，搞技术开发，也许有较多的产品能够打出去，比如皮鞋，沿海城市搞得好，就有可能进入国际市场，至少一双皮鞋可多卖五美元。意大利卖五十多美元，而我们的皮革质量比它的好，却只能卖五美元。主要是加工和样式问题。这一点内地不容易做到，但特区和沿海城市条件较好，可以做到。依靠国内的原料，通过技术改造，把加工产品搞好，使内地的粗加工，到你们这里变成精加工，有些是把包装搞好就可出口赚更多外汇。日本就是把从中国进口的东西改包装再卖出去赚钱的，我们的特区和沿海城市也可以这样干。你们这里要研究后方工业，要利用后方工业的基础，要给它提供信息。

特区，通过加工搞产品增值很重要，不是简单地搞转手买卖。特区，包括沿海城市，是我们对外开放的桥头堡。通过这个桥头堡，一是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内地，二是把内地的东西在这里加工增值再出口。现在军工方面已在特区这样做。特区这个窗口，就起了枢纽的作用、交换机的作用。这样搞，特区也就不孤立了，沿海城市也就不孤立了。外引和内联就有机结合起来了。这是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做好了，我们就可以通过特区和沿海把全国的经济带动起来。

特区的财政包干问题，我们对省里的包干不动，省里对你们动不动，我不好干涉，这是你们省里的问题。

对中央各部驻深圳的企业所获利润，你们可以收地方市政建设税，不要收所得税。如果所得税收了归你们，就有一个要不要调整包干基数的问题。收地方市政建设税是合理的。特区的建设费用比较大，投资环境比较好，市政建设税征多一点我赞成，这没有连锁反应的问题。为了使地方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将来可以不用包干的办法，可以划分税种，哪一种税收归地方收入，哪一种要上交，哪些是共享税，将来可以研究，这样做可能比较合理一些。

八、关于广州蔬菜全面放开经营问题

五十年代初，广州没有感到什么蔬菜问题。那时候都是市场调节，旺季价格便宜一点，淡季价格高一些。淡旺季是用价格、供求关系来调节。一九五五年以前，那时候主要是菜栏的形式，农民一家一户到城市，把蔬菜卖给菜栏，由菜栏来经营。一九五七年在省委五楼开会，魏今非[2]提出蔬菜问题以后省委一直讨论蔬菜问题。

你们选在冬季放开，这个时候是蔬菜旺季。这个季节选得好。过去这个季节供过于求，国营蔬菜公司收了以后又不卖出去，国营公司赔钱主要是赔在这里。现在这个时候实行放开，国营公司不用赔这个钱了，农民自负盈亏了，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的角度来讲，旺季放开有利于使蔬菜价格不至于向上浮动过大。

蔬菜放开后，总的价格水平会向上浮动，但从全年来讲，不会浮动很高。为什么呢？全部放开以后，蔬菜价格有时向上浮动，会刺激蔬菜生产增多。因为现在生产蔬菜比生产粮食划算，这样，在蔬菜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它的结果就会促进蔬菜生产。价格的浮动是正常现象。问题是头几年不能浮动太大。因为这个东西比别的东西影响大，关系到每一个人。广州每人每天要半斤蔬菜。蔬菜一放开，价格浮动是不可避免的，淡旺季差价也肯定存在。这对我们调节余缺，调节季节差价、品种差价、质量差价都有好处。只要不发生大的波动就行。从道理上讲，蔬菜放开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小城市蔬菜市场一直是放开的，近几年来几乎所有的中等城市也都是放开的，像湖南岳阳，也是放开的，结果没有事。

北京研究过这样一个问题，看来这个趋势不可避免，就是蔬菜从近郊向远郊转移。远郊种菜，比种粮食的经济效益好。如果农民自己经营，自己用汽车来运输，不经过中间环节，装了车就运走，大概二百公里以内没有问题。拂晓装车，

大清早就可以上市。现在北京的蔬菜往远郊转移，过去蔬菜的主要产地玉渊潭，还有四季青，现在这些地方对种蔬菜毫无兴趣。近郊土地搞什么都比种菜好，搞工厂比种菜好，建仓库比种菜好，种花也比种菜好。因此它不愿意种菜，千方百计对付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控制面积？你不能天天去丈量。过去还可以靠行政命令，现在这些不行了。过去还可以靠扣粮食。现在粮食也控制不住了，稍赚点钱就可以买到粮食。所以面积是控制不住的。广州可以到远郊，还可以到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县签订蔬菜合同。南海、番禺、中山、顺德，还有清远、花县，都可以。签订合同也可以，让开一部分市场也可以。广州蔬菜紧张，除了其它一些原因之外，与条块分割也有很大关系。过去南海东一乡、东二乡、大沥都是种蔬菜的；番禺的大石都是种蔬菜供应广州市的；后来花县也种蔬菜，但以后改种粮食了。蔬菜要向外县发展，可以更远一点。

为了方便农民卖菜，城市可以搞一些网点，可以搞一些菜栏，农民运来后自己交给菜栏。这样慢慢地来解决城市蔬菜供应，调节旺季淡季。旺季，近郊的蔬菜比较多，远郊知道这个时候价钱比较低，他就不会来了。淡季，广州蔬菜价格水平最高的时候，外面的菜就来了，价格就不会涨那么高。当然必须保留一点季节差价，否则淡季人家就不种菜了。这样搞的结果，有利于调整广州郊区的农业结构。近郊将来不一定种菜，要种的话，就种些细菜。

广州的蔬菜放开以后，要采取一些措施解决淡季的问题。旺季放开，要设法做到淡季不发生大的波动。放开以后，淡季的持续时间会缩短，农民会想办法提前上市，他们适应市场需要的步子会快得多，过去国营的反应很慢。价钱一高，外面蔬菜都来了，价钱一低就不来，它会自动调节。要是淡季价钱涨得很高，国家要随行就市收购一部分蔬菜，调剂余缺。过去补贴，就补在旺季和供过于求的情况下，造成很大浪费。现在把过去补贴亏损的钱补在调剂余缺，平抑价格，有利于蔬菜的稳定供应，这是一个办法。另一个是要从外地组织菜源进来。这样，淡季的蔬菜供应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注 释

1．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Romu垃ldez Marcos，1929—），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曾利用其在娱乐界和政界的关系力挺马科斯连续执政，终因贪腐和奢华导致马科斯下台流亡美国。

2．魏今非（1903—1983），江苏句容人。时任国务院财办副主任，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广东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商业部顾问，国家工商总局局长。

深圳特区要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经验*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接见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成员时的讲话。

你们这几年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做得很好，最重要的是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为内地提供了经验。你们改革先行一步。如工资改革、物价问题的解决。这里搞了广州搞；管理体制的改革，你们也是先行。内地叫改革现行体制，对你们，我过去讲是完全跳出现行的体制。特区是技术引进等的“窗口”，也是改革的跳板。你们的经验内地可以借鉴。不少外国朋友称赞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又担心我们搞乱，劝我们稳一些。这么大的国家嘛。整个改革你们要研究。深圳到底起些什么作用？就是两个任务，一个是“窗口”作用，另一个是为全国的改革提供经验。你们的地方不大，但你们的任务很大，可以说是尖兵，是开拓者。

你们特区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非常重要。是不是人一富就变得精神文明不好呢？我看不是的。日本的社会风气就比美国好，美国很糟糕，特别是好莱坞。香港的社会风气也不好。新加坡的社会风气却比较好，他们提倡儒道，提倡孝敬父母，物质文明要学西方，但要保持东方的文化。我们在经济上要赶上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技术要引进来，搞起来，但千万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东西全盘搬过来。我们不提倡封建道德，但要把中华民族固有的文明和优良的传统保持下来。

现在国内外对你们特区都一致叫好。对此，市委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过去压力大，你们卧薪尝胆，压不垮；现在一片叫好声中，你们更要夸不垮。你们特区担负的任务很重，要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又要为全国改革提供借鉴，很有点名气。最重要的是市委班子要团结，要同心协力，不能互相抵消，要发挥各人的长处，像机器一样，部件要配套，统统都成为关键部件就成不了机器。人无完人，要各自发挥所长，长短搭配，取长补短，互相支持，互相谅解。深圳市委的班子以梁湘[1]同志为核心，总的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班子。梁湘同志工作是很好的，大家要支持梁湘同志，梁湘同志也要放手让大家干。在改革中，深圳特区要为全国提供经验，不仅提供建高楼大厦和服务员也穿西装的经验，更重要的还要提供领导班子团结的经验，搞好改革的经验。要记住，领导同志之间，团结和友谊非常重要。

注 释

1．梁湘（1919—1998），广东开平人。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曾任广州市副市长，广东韶关地委副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海南省委副书记，首任海南省长。

振兴上海充分发挥全国经济中心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上海经济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

振兴上海的问题，七月间就提出来了，现在快半年了。上海的同志和北京的同志一起，作了很多调查研究，开过一次上海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上海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我看这个文件基本上是好的。至于其中一些具体建议和要求，依林同志已经回答了。这个文件讲了上海对内对外开放，讲了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技术、发展第三产业，也讲了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可以作为振兴上海的一个系统性的文件。就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把这几次讨论的东西补充进去，作一些修改，定下来。当然，这个文件只能是初步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这次我们到上海来，主要想研究一下为改造上海、振兴上海所必需的经济政策和重大措施。刚才我讲的那些大的战略，文件基本上都写了，要实现那些战略，就必须解决某些经济政策和某些重要措施，也就是说，要给上海一定的条件。我讲的是一定的条件，目前还不可能是充分的条件。前天听了上海的汇报，昨天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志又与上海同志具体交换了意见。大家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就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利于上海，又要有利于全国；既要使上海过得去，也要使全国也过得去，这是一致的。上海的地位决定了这一点。上海过不去，全国也很难过得去；反过来，全国过不去，上海也过不去。因此，大家在主要问题上，看法是比较接近的，不是差得很多。大家关心的问题，依林同志都讲了，我完全同意。

中央和国务院对上海目前的处境是非常关切的。上海目前的情况，我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来概括：第一，上海对全国四化建设来讲，地位极为重要，作用非常大，是其它地方所不能代替的。第二，目前上海确实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如果不适当加以帮助，困难就难以顺利渡过。昨天国栋同志讲得很恳切，我们是完全理解的。对上海的困难，如果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那确实是对四化不负责任。第三，同时也要看到，上海确有很多优势，很多有利条件。在北戴河一开始我就谈到这一点，只要搞得好，上海振兴是大有希望的。过去对上海有利的条件、上海的优势，看得多些；对上海多年积压的问题，看得不够。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上海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看不到上海很多优势，很多

有利条件。“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这样对鼓舞全市人民的信心有好处。

现在，改造上海，振兴上海，开始摆到全国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上海正处于关键的转变时刻。我说这个话，有两方面的依据：一个方面，上海到了不转变不行的时候了。现在不转，将来会困难更大，当然也不是说再拖两年就不行了，但总以及早考虑、及早着手为好。另一方面，全国的情况，也可以开始为上海的转变提供一定的条件。如果全国没有这个条件，你要转也不行。如果全国进行大调整，那你还转什么，恐怕还得挤一点出来。但是，究竟给上海多少条件，能给多大，还必须考虑到国家的可能。现在还没有条件充分满足上海的要求。这个条件要逐步创造。将来全国条件更好一点，中央就有可能再为上海提供点条件。上海已进入了关键的转变时刻，如何开始给上海一些条件，帮助上海逐步克服困难，使上海转上良性循环，从而改造上海，振兴上海，使上海为全国作更大贡献，这就是我们到上海讨论的目的所在。总的来讲，从北戴河，到你们的研讨会，到这次，讨论得很好，在思想认识上进一步明确了很多重要问题，也切实地帮助上海解决了若干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

下面，我说几点：

第一点，上海的地位和作用。

上海的作用在什么地方，我看就在于它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产值占全国九分之一，收入占全国六分之一。上海的作用，是其他省、其他城市都没有办法代替的。今年八月在北戴河，十月在北京，我都讲过，不要把经济中心的作用，仅仅看成是，或者等同于，或者局限于工业基地的作用。上海当然是全国最大最老的工业基地之一。但是，不能把上海仅仅看成工业基地，它同时是最大的港口，最大的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中心，最大的科技中心，它本来是也应该是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也应该成为我国最大的信息中心。这一切都是客观存在的。改造上海，振兴上海，必须从这些出发。如果仅仅从工业基地来想问题，思路就不可能那么宽广，也会使它对全国的贡献受到限制。如果从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出发来想问题，眼界就开阔了，思路也就活了，路子也就宽了。这次研究上海的发展战略，总的来说体现了这一个指导思想。

应该指出，在过去条块分割的情况下，三十多年来，上海对全国尽管起了很大作用，但它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的功能，客观上受到很大的限制。解放以后，体制的限制使上海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逐步减弱。但在对内对外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已经和正在起变化，上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尽管目前上海开放和改革的程度、政策特殊的程度、措施灵活的程度，还没有其它某些地方快，但要充分估计到开放和改革将会对上海带来什么变化和什么好处，这一点要有足够的估计。一时可能讲不清楚，五年以后回过头来看，就清楚了。今天是提出一个问题：开放与改革，外引与内联，将会对上海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好处？（陈国栋同志：科技交流会、人才交流会、信息交流会、各种交流会蜂涌而来。现在是我们主观条件跟不上，工作跟不上，房子也没有。）我说造房子要放开，只要房子能赚钱，就会有人来盖房子。允许外国人来盖，也允许外地人到上海来盖。举

个例子，江门人和广州人合作，要在北京建几十层大楼，已经签了合同。他要来赚钱，你就可以收税。你是经济中心嘛，不是简单的上海的一个圈。

正是根据这一点，我说过，考核上海经济工作，应该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首要指标，这比工农业总产值重要，世界上都用国民生产总值。要把上海对全国四化建设作出的贡献，作为评定上海工作的主要标准。实际上，上海把经济中心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经济越活跃，本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不仅不会受影响，而且可能发展得更快。单纯从工农业总产值出发想问题，可能是费力大、效益小，用力很大，不一定很理想。我们过去以钢为纲，钢上不来；不以钢为纲，钢上来了。过去我们在鲁西南不让种棉花，结果是粮食也没有吃，后来放手种棉花，棉花上来了，粮食也上来了。很多东西，我们从内在联系上想得不够，因为过去我们不懂商品经济，不懂商品经济的互相作用。这两年，中央、国务院没有强调速度，没有给各地压指标，结果速度还可以，都是这个道理。

上海地位重要，作用很大，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考虑上海问题，要从发挥这个经济中心的功能出发，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上海的困难。

中央与国务院都知道，上海的财政负担过重，住房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市政建设欠账最多。就这一点而论，你们可以说是全国最大的困难户。说到这个程度，可以了吧！大家都公认，三十多年来，上海在支援全国建设上是出了大力的。我还要补充一句，在支持全国已经进行的和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上海也是出了大力的。我不是讲上海的改革本身，我是讲上海支持了全国的改革。

回顾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路子是怎么走过来的：大体上是从农村到城市，从集体到全民，从小企业到大企业，从小商品到大商品，从新基地到老基地，总之是从易到难。小平同志最近讲了，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改革只能先易后难，只能一步一步过渡，走一步看一步。这里有一个经验的探索问题，也有一个社会承受能力的问题。所谓承受能力，包括经济上和政治上两个方面。小城市，小的特区，先放开，出不了什么大问题，出了问题也不会影响全局。小地方改不好，甚至还可以改回来，大城市就经不起折腾。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其影响就不是半壁河山的问题。中国人聪明就聪明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事先制订一个完整的方案，全国一声令下，宣布从哪一天开始，全国统统去改。那样搞法，如果下不来台，就要大乱。农村改革好就好在这里，没有一声号令如何搞，可进可退，有些弹性。就像走冰凌一样，第一个人走的时候，总是把后面一只脚站稳，迈出前脚试探一下，着力点仍然在后面的脚上，前脚站住了再挪后脚，万一不行可以退回来。改革也是这样。走一步看一步，一步一步改，这是我们的经验，今后也是这样。这样做，我们的改革是可以成功的，可以减少振动，避免大的曲折。改革是先易后难，所以现在农村的日子好过，小企业、小城市的日子也好过，相对地说，大企业、大城市的日子不大好过。如果倒过来，一开始就把大企业、大城市放得很活，在中国条件下，恐怕是办不到的。刚才我讲的是要用过渡

的方法，走一步看一步，既有一个先易后难的问题，又有一个承受能力的问题。上海一九八三年财政收入一百五十三亿元，上交国库一百三十一亿元，再加上其他一些老基地、老企业的上交，中央手里有了这些钱才能过得去，才能把农村放开，把几个小特区放开，把小企业、小商品放开。我们知道，放开以后，收入最终是会增加的。但是，在开始放开的一段时间内，上交收入是可能减少的。这里减少了，总得由那里来背。农村粮食提价，要有人背；没有人背，农村怎么提价？我在嘉定与县里同志讲过这话，中央手里如果没有这笔钱，恐怕解放军的军费、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行政经费都开不出，更不用说重点建设了。所以说，上海的人民在建设和改革中支持了全国。对上海的困难，我们要作历史的分析。现在，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来了。国家整个经济形势已在逐步好转，上海的活力已经并即将进一步扩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上海的困难不可能马上消失。上海过去的负担是很重的，现在只能适当减轻一点负担。今天还不能说轻装前进这个话。只能放开手脚，适当减负，发挥优势，逐步改变局面，转上良性循环。五年够不够？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

我同意国栋同志的估计，今后五年，特别是今后两三年内，上海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从外地进来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是上涨的趋势；上海的工业品，其中至少相当一部分将是下跌的趋势。当然，在物价作重大调整而引起利益的再分配时，中央会对各地、各企业的收支作出调整。所以也不必人心惶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过去吃廉价原材料和廉价能源的时代快要结束了。全国如此，上海也是如此。今后上海的企业靠什么吃饭？当然，不能说上海工业过去纯粹靠吃廉价原材料，那个说法也不对，上海吃廉价原料，别的地方也吃廉价原料，同样吃廉价原料，为什么上海的效益比别人高，可见你们也有自己的本事和优势。但今后毕竟越来越吃不上廉价原材料和廉价能源了。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靠什么？建议上海各个企业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认清这个形势。今后靠什么？靠进一步提高技术，靠进一步提高质量，靠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靠信息灵通，靠优质服务。你们过去也是靠这些，但那是在价格低廉的情况下。今后材料价提高了，如果这些因素不提高，你就消化不了，效益就会下来。我们讲改造上海的迫切性，如果原材料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改造就不那么迫切了。上海的录音机厂是很好的了，我问了一下，我们的销售价格高于国外四倍，主要是技术上的问题，可见还是要进一步提高本领。可能最困难的是今后两三年。估计五年之后，这一关过去了，可能达到良性循环。总的说，既要看到上海面临的严峻挑战，又要切实抓住开放和改革对上海带来的新的振兴的机会。开放和改革将会把上海所蕴藏的各种优势释放出来，发挥出人们在今天所想象不到的威力。我是相信这一点的。对这一点，在今天的情况下，只会估计不足，不会估计过分。

第三点，为了使上海渡过暂时的困难，中央必须帮助上海解决一些问题。

中央的困难，你们也知道：一个是要搞重点建设，一个是要理顺物价，一个是要改革工资制度，这些都要钱，但又不能搞通货膨胀。这是中央面临的困难。全国的经济形势，比五年前好多了，但也只能说是逐步好转，还不是根本好转。

过去粮棉一丰收就形势大好。这两年粮棉大丰收，却有相当一部分压在仓库里。在全国当年新增加的产值中，占了相当大的数量。国家在收购农产品时把钱给了农民，但东西堆在那里，卖不出去，国家不能把这笔钱拿回来。所以不要以为农村形势好，国家手里就宽裕了。中央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尽管如此，也要尽可能帮助上海解决点问题。现在只能对上海的一些关键问题作一个初步的解决。依林同志刚才讲了，给上海支出基数增加十五亿元。其实，我们原来在北京时，没有准备给这么多，当时考虑，大体是十亿至十三亿元的盘子。现在除了原来已经确定的降低上海调节税二亿元以外，再把支出基数提高十五亿元。上海支出基数增加十五亿元后，可以占上海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三以上。刚才你们几位发言，要求把上海的分成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要求很强烈。我看，这件事暂时先按依林同志说的定下来。你们的要求，现在留个活口，回去再研究。虽然道涵同志讲的那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对全国来说多两亿元少两亿元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现在是在十五亿元的基础上再加两亿元，这就不同了！昨天，你们开了常委会，我们也开了国务院办公会，还打了电话给北京，不好一下骤然变，还得回去看看情况。倒不是怕连锁反应。比如说，每年给你三亿美元贷款延长到一九九〇年，其它地方延长不超过三年，肯定也会有连锁反应。那就告诉他们，没有多少别的理由，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这样定了。为什么？就说上海大，上海困难，上海重要，需要解决。现在就有两种考虑，一是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能不能再提高一些；二是再过一年，到了后年，对上海的企业再减一点调节税，不从你们这个十五亿元中减，而是从中央收入中减。因为关键是要把企业搞活，企业搞活了，其它情况都会慢慢好转。企业搞不活，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将来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多年来的经验教训。（陈国栋同志：我们拥护这个意见，企业搞活了就行。）这个问题留作下一步考虑，现在不能改，暂时先按依林同志讲的定。

我还是要说，有了这些办法，有了十五亿元，有了每年三亿美元的外汇搞技术改造，再加上把金融中心办好，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我们毫不怀疑上海市委、市政府一定会把这笔钱用好的，用在刀刃上，用出效益来。希望这批钱，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用在上海，能对全国产生最大的效益。

银行问题，这次讨论没有展开，没有具体化。我是很想让银行在上海多办点事的，我们将来主要靠金融啊！将来基础设施也可以用点银行贷款。（汪道涵[1]同志：你在听取技术改造、技术进步汇报时讲金融的作用，我们非常拥护。）周期比较短的，不太长的，可以用银行贷款。有的还可以贴息，一亿元的投资，贴息只要五百万元，地方财政拿五百万元贴息，就可以干一亿元的规模。基础设施搞起来了，你就收费，很多桥梁、隧道、高速公路都可以这样。所以你们要办好银行，发挥银行的作用。全国也准备这样搞，不能什么都由财政负担，财政上没有那么多钱。我在广东讲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可以考虑三条办法：一是借内债；二是减少财政负担；第三是银行多担担子。当然银行力量也有限度，不能靠发票子。

金融中心问题，我简单说一下，要把上海这个金融中心恢复和发展起来。我主张三条：一是扩大中央银行和四家专业银行在上海的分行的自主权，包括中央银行的上海分行，也包括专业银行的上海分行。这些上海分行的职权应大于其它分行。二是在中央银行之下，设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银行，与四个专业银行平起平坐，总行设在上海，任务是拾遗补缺，经营对内对外长期短期存放款业务，可以与其它银行业务交叉，允许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三是银行也要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市政府也不要过多干预，不要把这些银行办成上海圈子内的银行。具体怎么搞，请你们提出方案。我认为，这件事办好了，其作用大约不亚于财政拨款。

第四点，要改造、振兴上海，就要把上海搞活。

要把上海搞活，首先要把上海的企业进一步搞活。希望市委、市政府再认真研究一下，如何把企业搞活。企业活了，上海就活了。这里涉及很多问题。北京来的几个同志认为，这里由于组织形式的关系，公司啊，局啊，中央已经作出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企业应当得到的权力和利益，还没完全落实到企业，且不说再进一步扩大了。搞活企业，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从企业内部条件来说，一定要把经营好坏同本企业职工的收入挂钩，与工资基金总额挂钩。这一条可以放手一点搞。对大企业来说，还有个外部条件问题。大企业怎么搞活，是改革中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希望你们这里能出一些经验。你们汇报中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指令性计划不仅要留有余地，而且要逐步缩小；大企业超产部分的产品，要允许高进高出；大企业也可以搞多种经营，以辅补主；生产资料要办公开市场；除少数影响国计民生的产品外，大部分日用工业品要允许企业自销。今后，凡是不影响国计民生的商品，可以不经过商业部收购，由上海自己去销售。你们自己可以向外地去推销，外地也向上海直接订货。这样，上海的优势就容易发挥了。有些商品的价格可以放活，有些价格不能放活。我看，彩色电视机目前如果放开，价格马上就会涨得很高，不利于市场。再过一段时间情况可以好一些。我们国家将进口一些高档消费品，供求关系会起变化，问题就不大了，那时把价格放开，不会大乱。因此，这里还有个步骤问题。

我认为，上海搞活，主要是两条，一是企业要搞活，第二是要有重点地改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必须搞。没有电、没有路，没有土地商品化，就没有办法开发。现在上海欠账很多，但总得有个重点，钱就是那么多。投资环境改善了，外商就会来，开放的好处，外引内联的好处就会大量涌向上海。随着这些问题的改善，其他情况都会逐步改善。污染治理问题，民用建筑问题，要搞，不搞是不行的。但是不是一下子就搞那么多，这要平衡一下。我也知道住宅问题是上海的爆炸性的问题。如果大家看到企业搞活了，工人工资增加了，外商来了，路也在修了，大家就看到了希望，承受能力就会增加。（陈国栋同志：一个市场物价适当，一个工资福利提高，视线就会转移一点。）比较起来，为生产服务的、为开放服务的基础设施恐怕要摆到第一位。其它方面的设施，欠账固然多，但这一方面钱用多了，就限制了外引内联，光搞住房和治理污染就会没有

后劲。我知道上海住房的尖锐性，但只能逐步来，当然房子也得造，使人们看到问题确实在一步一步解决。但钱就这么多，总得有个重点。搞活上海，我还是讲两条。一个叫做搞活企业；一个就是改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增强对国外和内地的吸引力，同时也给人民以希望。

第五点，最后一点，讲一下今后五年上海的发展重点。

传统工业要改造，新兴工业的比例要高于全国，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根据这样一个战略方针，最近几年内，最重要的是要搞好技术改造。技术改造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传统工业的改造问题，同时也包括一些新兴工业。新兴工业本身，很多也不一定要另起炉灶，还是要通过技术改造，提高技术水平，增加一些新兴工业的比例。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今后几年内，大量的资金要用于技术改造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今后三五年内，上海的经济速度究竟怎么样？如果抓得好，在考虑到技术改造和基础设施的时候，还要尽量研究一下怎么搞法，上海就可能有一个较好的速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有三条理由：

第一，技术改造周期比较短，并不都是五年以后才能生效的，而是逐步投入、逐步生效的。要特别有意识地注意一下，把比例分配得恰当一些，搞一些周期比较短的、见效比较快的技术改造项目。这样，这几年技术改造的效益本身就会出速度。

第二，上海的商业和第三产业今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对内对外搞活以后，商业是大有可为的，流通搞活了，上海会增加很多税收，增加收入。不仅是服务行业，不仅是饮食业，不仅是旅游业，就是商业，万商云集，到上海来买进卖出，成交量越大，你的收入也就增加得越快，收入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也增加了。商业和第三产业的问题，刚才道涵同志讲的我是赞成的，上海第三产业现在占百分之二十一，到本世纪末，很可能发展到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东京现在光服务行业，不包括商业、科技、教育，光是从事饮食、旅游、澡堂、理发的，就占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今后上海的第三产业会有很大的发展（汪道涵同志：要放手支持个体），国营、集体、个体，大家一起上。

第三，你们有这么大一个郊区，有这么多乡镇，再加上上海经济区，以及和全国的经济联系，有许多有利条件。要充分挖掘郊县的潜力，在内联上好好做点文章，这可以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工业的发展。上海可以把一部分产品扩散到农村，或同乡镇企业协作，这样你们市区的工厂就可以腾出力量来了。利用农村的资金，利用农村的场地、城市的技术，这样结合起来，联营也好，协作也好，光十个县就是相当大的力量。另外，还要认真抓一抓改变农业经济结构的问题，这个产值也是了不起的。

这些方面抓好了，今后几年上海的发展速度不会很低的。

今天就说这些吧！主要就是要搞活企业，要看到有利条件，要把上海经济中心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要搞好技术改造，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在技术改造方面作出显著的成绩。这样，困难就可以逐步克服，转上良性循环，上海大有希望。

注 释

1．汪道涵（1915—2005），安徽芜湖人，原籍安徽嘉山县，时任上海市市长。曾任华东工业部长，一机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外国投资管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书记，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上正式签字以后的致辞。《联合声明》规定，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赵紫阳参加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谈判。1982年9月22日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9月2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与撒切尔夫人进行会谈。撒切尔夫人陈述英国政府立场，强调有关香港问题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以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以单方面废除。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赵紫阳断然拒绝了撒切尔夫人所说的主张，声明中国政府决定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的时候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的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赵紫阳强调，国家主权与经济上的考虑相比，始终是第一位的问题。

尊敬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阁下，尊敬的杰弗里·豪外交大臣阁下，尊敬的英国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我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同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一道，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我们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为此，我要向首相阁下和其他英国朋友，以及应邀前来参加签字仪式观礼的香港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圆满地解决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又为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双方达成的协议，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它受到了包括五百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的普遍支持，也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广泛赞扬和欢迎。

《联合声明》的达成，是我们两国共同努力的成果。两国政府在两年的谈判过程中，都能以大局为重，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状，显示了相互谅解和友好合作的精神。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特别提及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所表现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家风度。她为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所作的重大贡献是值得称颂的。我还要向不辞辛劳两次前来北京的杰弗里·豪外交大臣以及所有为中英会谈的成功作出辛勤努力的英国朋友和中国同事表示感谢。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一项国策。根据这一构想，中国政府制订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已经体现在《联合声明》及有关附件之中。实现这一伟大构想，意义将十分深远。我们欣赏英国朋友对这一构想的理解和赞誉。

确保《联合声明》不受干扰地全面贯彻实施，是中英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我们双方共同的责任。中国政府愿继续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同英国政府一道，力促这一目标的实现。我们也希望广大香港同胞和各界居民同心协力，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贡献。

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为中英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开拓了新的前景。中英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将会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发展中英友好，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愿望，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让我们为此而继续共同努力。

谢谢各位！

注释

1．时任中国总理的赵紫阳与时任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Hllda Thatcher）分别代表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的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满意地回顾了近年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一致认为通过协商妥善地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有助于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有助于两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此，经过两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同意声明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以下称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如下：

（一）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

（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任职的中外籍公务、警务人员可以留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政府部门可以聘请英籍人

士或其他外籍人士担任顾问或某些公职。

（五）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罢工、选择职业和学术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利和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均受法律保护。

（六）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

（七）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继续流通，自由兑换。

（八）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

（九）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同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

（十）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签发出人香港的旅行证件。

（十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

（十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自本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止的过渡时期内，联合王国政府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以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给予合作。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为求本联合声明得以有效执行，并保证一九九七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在本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联合联络小组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二的规定建立和履行职责。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关于香港土地契约和其他有关事项，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三的规定处理。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同意，上述各项声明和本联合声明的附件均将付诸实施。

八、本联合声明须经批准，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批准书应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前在北京互换。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具有同等约束力。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代表

赵紫阳（签字）玛格丽特．撒切尔（签字）

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上旬，我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志去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调查，先后到了广州、佛山、江门、中山、珠海、深圳和上海、嘉定、无锡、沙洲等地，参观了一些工厂、港口、商店、农村，同各地负责同志、基层干部、技术人员进行了座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开放和改革，这里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人民生活显著提高，社会秩序和精神面貌也很好。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进一步实行开放和改革以后，对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区将带来什么影响，什么变化，从而采取正确的决策，迎接这一新的形势，促进这一地区经济的更快发展。

一、必须坚持“外引内联”的方针

我国沿海地区大约有二亿人口，在全国经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地处沿海，交通方便，信息比较灵通，工业基础较好，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历史上就与国外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是赵紫阳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考察时的讲话要点。他通过这次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实地考察，提出了著名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对于中国进一步抓住机遇，扩大对外开放，形成沿海经济开放带，带动内地经济发展，使中国迎头赶上世界经济国际化、现代化的潮流，发挥了关键作用。

实行开放政策，首先把门户打开、把经济搞活的是沿海地区。我们应当使沿海地区成为一个开放地带，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着，有极大的意义。

从珠江和长江三角洲这几年的实践看，要发挥它们的作用，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关系。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目的是通过经济特区，通过开放城市，通过沿海开放地带，把对外引进和对内联合、把沿海的发展和内地的开发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解决我国东西关系问题，使全国经济振兴、人民富裕起来。特区、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应当是我们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要起跳板的作用。一个是要把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引进来，加以吸收、消化、创新，向内地转移；另一个是要把沿海生产的“洋货”向内地销售，

把内地的原料、初级产品在这里精加工，梳妆打扮后再出口，打入国际市场，取得更好的效益。形象地说，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特别是像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应当是“两个扇面，一个枢纽”。即形成对内辐射和对外辐射两个扇面，开放城市居中起枢纽的作用。应当使它们在对内对外经济交流的辐射扇面更宽广，能力更强。这是一篇大文章，如果做好了，将不仅使沿海地区先繁荣起来，而且会带动整个内地经济的发展。

我们已经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我看还应该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进而陆续开放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北起大连港，南至北海市，构成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地带。这是我们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是进出口的重要基地。它们应该主要是外向型的，要面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增强竞争能力，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为此，必须在这一地带认真搞好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使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不如此，就休想在国际市场立住脚。在外贸上也要搞活一些，给予应有的权力，使他们能放开手脚到国际市场去竞争，占领市场。

特区、开放城市、沿海地区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的对外辐射力越强，越需要有后盾，越离不开内地的合作和支持。沿海和内地各有优势，如能加强经济上的合作和交流，扬长避短，就会发挥出巨大力量。要看到，在内地包括三线地区，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有大批科技人才，有丰富的资源。如能和沿海地区结合，弥补信息不灵、知识老化、管理落后等缺陷，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和设备，搞好技术改造，就有可能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进入比较先进的行列。外引和内联结合得越好，沿海和内地的繁荣也越快。

发展沿海和内地的经济联系，内容是广泛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技术、资金、人才、物资、信息等方面都可以进行合作和交流，如共同开发资源、联合办厂、联合对外对内销售等。凡是中国和外国合作采取的形式，都可以仿照采用，如合作生产、合资经营、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技术咨询、工程承包等。特区、沿海城市应当热情欢迎内地的企业来投资，兴办企业，并积极支持本地企业与内地联合开发资源，联合生产名牌优质产品，交流人才和技术。要有气魄使万商云集，近悦远来。从内地特别是大三线来说，也不是要把工厂都搬到沿海来，那样做是不妥当的。但是内地的大企业应当把“触角”伸到沿海，派一些得力的经营人员和科技人员到沿海开放城市或特区，开设窗口，依靠后方基地，把触角伸到前沿，洽接业务，收集信息，使人才得到锻炼，技术得到提高。最近，已经出现了一些内联的好形式。我们参观的由航空工业部系统组织的深圳工贸中心，独资和与客商合资经营了十八个企业，形成了一个企业集团，主要生产经营航空精密仪器、光电仪器、微型计算机及各种应用软件。航空系统的许多企业包括三线的企业，派人参与这里公司的经营，从中获得信息、技术和订货。应当有更多的部门或地区组织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在沿海城市、在特区，建立据点。通过各种形式，加强沿海和内地的横向联系。

搞好外引内联，需要解决好有关政策问题，最重要的是在经济上要做到扬长

避短，互利互惠，互相支援，以求得共同发展。国家统计局已作出决定，今后除了统计“在地区产值”外，还有一个项目叫“属地区产值”。比如广东在贵州投资办企业，“在地区产值”算贵州的，但“属地区产值”仍然算广东的，这样互相有利。

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电力建设

从广东看，经济发展中突出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能源不足，电力缺乏；二是外汇短缺。不仅广东，上海、江苏和所有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都共同面临这两大困难。这些问题制约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我们在两个三角洲看到，加工工业越办越多，宾馆越盖越多，家用电器越来越多，停电拉闸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少工厂是每周上四天班甚至上三天班。如果不及早解决，矛盾会更加尖锐，工厂办得越多，停电停工时间越长。这显然是不行的。中央当然要下大力帮助各地解决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问题。但光依赖中央也不行，必须发动大家办。地方各级也要首先把力量放在这个方面。可以采取集资的办法，或发电力债券的办法，千方百计增加发电能力。我在江苏说过，新增电力，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招股？比如华东电网明年预计新增装机120万千瓦，其中绝大部分理所当然要保新建成的重点项目用。与此同时，要考虑能不能挤出一部分比如几十万千瓦，像商品房子那样拿来招股，谁出钱就给谁用，然后把这笔钱又返回来用于电力投资。这样就可以促使大家把资金转到能源建设上来，谁要办加工工业，首先必须考虑电的投资。国家得了这笔钱，用于加速在建电站的建设，地方也用不着盲目去办经济效益很差的小电站，而把分散的资金集中到建设效益较好的电站上。

电，也有一个商品化的问题。采取目前的办法，办电的，一并网，就是低价出，高价进，不仅无利，而且吃亏，影响了办电的积极性。在政策上要研究能不能想办法使办电的也得到平均利润率，甚至略高一点？要使它把电卖给电网，有利可图；电网为它服务，也取得合理的收入。这一点，小水电比较难办，火电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电厂和电网都是法人，相互之间应是合同关系。办电的单位把电并人电网，第一，能得到合理的利润；第二，又能优先用电。有了这两条，办电就会有积极性。当然电网自己需要有一些骨干电厂，使电网调度有可靠保证。

沿海各地区一定要重视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办企业创造条件。要及早动手，做好区域性的规划，因地制宜积极解决电力、交通等问题。比如广东，由于南海海洋天然气的开发出现了新局面，就应当想办法集资把天然气管道从海南岛铺设到大陆来，用以发电，发展天然气化工工业。这对广东经济的起飞将起重大作用。规划，要近期与长期结合，大中小结合，有重点地抓一些关键措施、关键项目，以便尽快收到效益。

三、开辟创汇途径，解决外汇平衡问题

外汇紧缺，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另一个困难。这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表现得更突出。在这些地方，工厂设备和原材料大部分是进口的，而产品的大部分却是内销的，用出外汇多，而收回的外汇增加并不多。由于外汇短缺，广东黑市的外汇价格高出牌价一倍多，要六、七元人民币才能换一美元，港币也比牌价高50%至80%。从这里就提出必须解决外汇平衡问题。靠国家增拨外汇，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不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外汇收支平衡问题，再过两三年，就会捉襟见肘。像现在这样进口设备、原材料，生产“洋货”内销赚钱的办法就玩不转，就难以保持经济的良性循环。还要看到，在广东，人民币值跌得这么厉害，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冲击人民币，那就成为重大问题了。所以，解决外汇问题是当务之急。过去不顾一切地取得外汇，用以进口高档消费品到国内牟取暴利，已经好景不长了。应当立足于发展壮大自己的创汇能力，开辟创汇新途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增加创汇的路子在哪里？以前那种靠加工装配，再大量出口挤出去的时代，从总体上说已经过去了。现在，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竞争非常激烈。靠引进设备，进口原料，加工后返销国外，可以搞一些，但前景并不宽广。波兰、巴西、墨西哥就碰了钉子，大量工业设备引进了，而产品打不出去，外债累累，经济困难。我们应当开辟一些创汇的新路。过去的一些办法，如“三来一补”、劳务出口、侨汇、旅游等，我们要努力巩固现有阵地，进一步扩大成果。我认为中国将来出口商品前途比较大的，一是传统的轻纺工业，二是新兴的食品工业。我们有很多商品是输出原料、半成品，如坯布、生丝等，让香港、日本等地外商去加工赚钱。

现在要把在国外加工那道工序转回到国内来，首先转到特区、沿海城市来，使产品加工增值，然后出口，这样就可以多创汇。我们出口的纺织品，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档次。同样数量的商品，如果低档变高档，外汇收入可以增加五、六成甚至一倍以上。由于出口配额的限制，我们的产品只有在花色、品种、质量上下功夫，才能在世界市场站稳脚跟，并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阵地。

中国的食品在世界上久负盛名，问题在于我们要引进世界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搞好速冻、密封，改进包装。还有个原料的品种改良问题。首先要占领港澳市场，进而占领东南亚、日本以及中东的市场。

另外，还必须重视软件行业、劳务出口的发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软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并直接影响计算机及其应用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据有关专家预测，由于中国人多手巧，软件行业很可能成为出口的一个重要行业。这是有道理的。劳务出口、在国外搞工程承包，目前正在发展，我们要认真解决一些政策问题，这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可以预料，如果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上去了，将会带动沿海地区加工、机械工业，带动各种服务行业。这样，外国占领我们一部分市场，我们也占领外国一部分市场，路子搞对以后，外汇平衡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就可能形成。

四、改变沿海农业生产结构，按贸、工、农安排生产

沿海地区的农业，过去也是自给或半自给的，近几年才转上商品经济的轨道。随着对外开放出现的新形势，现在要求进一步转到以对外贸易的需要来考虑生产，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应当如此。为此，必须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抓紧改变农业生产结构。

珠江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结构怎样改变？围绕什么来改变？从调查的情况看，应当利用珠江三角洲濒临港澳的有利条件，把珠江三角洲进而把长江三角洲改变成为出口农副产品的基地、食品工业的基地。就是说，要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根据出口的需要来考虑农业结构的改变。三角洲的方针，应当是贸一工一农，而不是农一工一贸。不是你种什么，就加工什么，加工什么就出口什么，而是要倒过来，看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就考虑加工什么，种植什么。就全国看，不能讲贸易立国，但珠江三角洲可以讲“贸易起飞”，按市场需要特别是国际市场需要生产。我们搞产品“一条龙”，要以出口的最终产品为龙头，往前推。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是发展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当然，这也不是说盲目跟着市场转，而是要面向世界市场，分析市场变化趋势，作出预测，有些要与外商签订合同，使产品的生产同市场需要衔接，把改变农业生产结构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上。

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重点是要缩小一部分粮食作物的面积，恢复传统的优质大米（如丝苗、马坝油粘、血糯米等），增加一部分出口所需要的经济作物，发展养殖业。这些地方历来有出口的经验。珠江三角洲的农民说，种经济作物，就是要先“经济”，后作物，看什么最划算，就种什么，按价值规律办事。五十、六十年代，我在广东，曾提倡过发展多种经营，“立体农业”，“一步三元”。就是说一步远的地方，可以收益三元钱。这次我到新会，据说实现了“一步六元”，到中山古镇，听说已达到“一步十元”。现在港澳的食品、鲜活商品我们占的比重还不大。甚至珠江三角洲的一些高级宾馆，供应的水果，也是外国的。在北京的一些高级宾馆，要吃牛排，要吃外国品种的蔬菜，还要到香港去买。这真是咄咄怪事！为什么这个钱我们不会赚？在沿海，首先是两个三角洲，要把这件事提到议事日程，第一步要争取把港澳所需的鲜活商品基本上包下来，其次要逐步进入日本、东南亚市场、中东市场。我看是有条件办到的。这样做，也有利于使三角洲，使沿海地区尽快富裕起来。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要解决粮食问题。现在有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全国粮食出现了低消费水平下的相对过剩。在珠江三角洲，在苏南地区，适当减少种植粮食，改种其它，是划算的。广东佛山市准备采取农民交“代金”的变通办法，以钱代粮，顶国家任务。即把公粮、余粮、三超粮加在一起，计算一个平均价，再与市场议价粮价相比得出差价，由农民补差价，不用交实物。据试点反映，群众是欢迎的，国家也不吃亏。这些地区所缺粮食，可以和邻近生产粮食多的省签订合同，由他们负责供应。这是两利的事。宁夏采取的是另一种办法，那里河套地区丰收了，积压了十三亿斤粮食。他们由供销社经营计划外的粮食，按倒三七的比

例价收购粮产区的粮食供应山区，运费和手续费由国家负担。这样山区农民就少种粮食，改种别的价值高的东西。这个办法也可以参考。总之，要解决好粮食问题，以利于农业内部和农林牧业之间的调整。

珠江三角洲放开后，外贸上要支持这里把鲜活商品直接到港澳出口。鲜活商品从别的地方运到香港市场，运距长，损耗大。今后除个别品种外，应当主要由广东直接供应。珠江三角洲可以组织地方性的公司直来直去，减少环节。这次我去看了深圳光明农场，他们生产的鲜奶，直接用汽车运到香港，占领了香港70%的鲜奶市场。鲜活产品放开由地方经营以后，要注意统一协调，防止各地各自为政，自己人与自己人打架。应当使所有对外经营的单位了解，只有在提高质量、搞好包装上提高竞争力，才有可能占领港澳市场。竞相削价出口，挖自己的墙脚，那是自杀政策。一方面要放活，一方面也要加强统一协调。广东省和经贸部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全省性的食品工业出口协会，进行协调，管理配额和售价。出口去香港的鲜活商品的配额，也由广东省掌握，经贸部不再管了。我主张谁经营得好，就多给配额，谁经营得差，就少给配额，一年评一次。这个办法，先在珠江三角洲试验一下，然后再在长江三角洲、辽东半岛等地推广。这几个地区也要各有侧重，珠江三角洲要对准港澳；辽东半岛要利用与日本有历史关系的有利条件，发展鲜活商品和食品，打入日本市场。

农业生产掉头比较快，两三年就转过来了。只要我们方向正确，政策合理，措施得力，经过几年，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就会大见成效。随着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这些地区就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象顺德、东莞以及无锡等县，从事农业的劳力和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力的比例，已经是对开，以至四六开、三七开。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正在缩小，经济收入和消费正在向中等水平发展，我们应当加快这个进程。

五、特区、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要为全国的改革提供经验

中国总的趋势是由沿海向内地逐步开放。在经济结构、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等方面都将引起一系列深刻的改革。这就要求不仅要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而且必须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方法。由于特区、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所处的地位，它可能而且应当对国外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形式和方法，起到筛选、过滤的作用，使这些有用的东西，经过扬弃，经过消化、吸收，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结合起来，为我所用，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将通过特区—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多层次的探索和实践，滚动式地由外到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这样可以走一步看一步，一步一步过渡，一步走得不恰当，还可以退回来，是积极稳安的万全之策。从这点说，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在开放和改革上，担负着为全国提供经验的探索者、先行者

的重要任务。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决定，指明了改革的方向，描绘了改革的蓝图。但具体怎么走，还有待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现在我们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最大的是价格体系的改革。价格不合理的问题不解决，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加企业活力的问题就无从谈起，理顺经济关系就成为空话。我们对此既不能掉以轻心，轻率行动；又不能犹豫不决，错过时机。我认为，五年内能不能过关，主要看这一条。这次我到珠江三角洲调查，感到广东在开放以后，在改革方面的承受能力加强了，特别是表现在价格改革上。广东这几年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对物价管理逐步放开，如前年放开鱼的价格，今年九月广州市又放开蔬菜价格。放开以后，经历了“一放就活，一活就多，一多就稳”的过程，物价的趋势由上升转到稳定甚至逐步下降，塘鱼原来三元钱一斤，今年已下降到一元二角。蔬菜价格也较为平稳了。广东人民在这点上已经有了经验，思想上不是那么紧张，加上开放以后，经济活跃了，人民收入也普遍提高，从经济上、政治上看，社会承受力都比其它地方强。像广州市的蔬菜，购销都完全放开，前一段价格一下提高30%，这在北京、上海就会成为问题，但广州却没有多大波动。我们相信，利用这个难得的条件，在广东、在沿海地区先实践，进而推广，物价体系的改革也是可以找到办法的。

这次到广东了解，不论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各县市，都已进行了若干改革，其中有不少可供参考和借鉴。比如：

（一）在物价改革上实行调、改、放、参相结合。即分别商品的不同情况，有的实行调价（有升有降）；有的把过于集中的物价管理权限下放给各级；有的完全放开（如小商品、部分农副产品），实行市场调节。我看还应当加上国营商业参与调节，通过吞吐一部分商品稳定物价，抑制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实行“调、改、放、参”相结合的办法，就较为妥善了。广州市和武汉市，把蔬菜价格放开是成功的。放开初期，菜价上涨百分之三十，但菜的质量好、丢抛少，实际上差不多，所以产、供、销三方都较满意。只要在淡季国家注意余缺调节，用过去补贴亏损的钱来弥补淡季供应蔬菜的差价，完全可以在淡季解决菜的供应问题。看来可以先在南方大中城市放开，逐步在北方大城市也放开。猪肉、粮食等的价格，广东也准备陆续放开。可以让其先走一步进行探索。

（二）围绕缩短基本建设周期，改革基本建设体制。到广东参观后给我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许多基建项目周期很短，投资虽然不很省，但投产快，资金周转快，所以经济效益是好的。如年产睛纶膨体线750吨、“拉舍尔”毛毯40万条的鹤山毛纺厂，只花了十一个月就建成投产；年产涤纶长丝五千吨的新会涤纶厂，十七个月建成投产，投资比国内同样工厂省25%，三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中山新港第一期已建成码头四个，可泊五千吨轮船，年吞吐量一百万吨，只用了八个月时间。在深圳、珠海、中山等地，六天就修建一层大楼，许多宾馆都是上层还在建设，下层就已开始营业。他们建设周期短的主要原因是：实行了招标承包制和投资包干制；包工包料，避免停工待料；县市加强领导，统一征地建设等。

（三）组建工程承包开发公司、咨询服务公司、成套设备工业公司，为社会服务。如广州外资建设总公司先后承包了十四项现代化项目，对建设单位实行一揽子承包，再分包给建筑专业队伍，负责交“钥匙”。他们负责设计、承建的白天鹅宾馆，获得了国家质量审定委员会颁发的金质奖章。这是一种好的专业化、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可以更好地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为工程的建设和资源的开发服务。（四）集资修桥修路，改革公用事业的投资办法。珠江三角洲河渠纵横，公路车辆增多，常常几百部车等待过渡，浪费极大。他们改变一切依靠上边投资的办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采取集资修桥，收费回收投资的办法，先后修通了广深公路的中堂、江南两座大桥和广珠公路三洪奇、沙口等大桥，大大方便了车辆行驶，而且三年左右即可收回投资，为今后公用事业的投资开辟了一条新路。

（五）多种方式、多条渠道经营，搞活流通。到珠江三角洲各地，大家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城乡市场繁荣活跃，商品琳琅满目，几乎是应有尽有。主要原因，是让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个体商业已发展到53万户、70多万人，相当于国营商业职工的80%，还有十万人从事长途贩运。去年全省集市贸易就达42亿元，占全国集市贸易总额的n%，居全国之首。互相展开竞争，经营方式灵活多样，服务态度也大为好转。

（六）开拓技术市场，促进技术的转移。珠江三角洲的许多企业都注意引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这是他们成功的诀窍之一。技术也是商品。他们根据引进技术的先进性及其经济价值，付予对方相当的费用。对向内地转移先进技术，也同样采取有偿转让的办法。这有利于扩大技术的交流。

（七）大胆放手启用经营型、开拓型人才，改革人事、劳动制度。对企业干部改委任制为选举聘用合同制；对劳动用工实行“报名考试，择优录取，签订合同”的办法，改固定工为合同工。把一批勇于创新、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大胆破格提拔到各级岗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特别是他们注意引进人才。他们说，不仅要重视引进电脑，更要重视引进人脑。根据工作需要情况，有的请一两个外国专家，有的则请一个“管理集团”。如广州中国大酒店就聘请德国人为总经理的管理集团，他们有一整套办高级宾馆的经验。我们配上副职，很快也就学会全套本领。实践证明，培养这种“管理集团”的人才群体，是个较好的办法。

以上所举，只是一些方面。随着开放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还会有许多新鲜经验涌现出来，我们应当注意发现、总结，结合各地实际推广。

促进农业协调发展
逐步放开农副产品价格*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与出席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座谈时的讲话。

一、农业要有一个协调的发展

当前农业生产总的形势是好的，粮棉等各种作物连年增产，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全国农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比如现在粮食和棉花都大增产，出现了卖粮难、卖棉难的现象，而某些社会需要的产品又发展不快，不能满足需要。目前除四川、湖南等少数省以外，生猪是下降的趋势，猪肉供应紧张。其它如药材、禽蛋、水产品等也供不应求。归根到底，是农业的产业结构还不那么合理，农业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不很协调，农业的生产同社会的需求有某种程度的脱节。

这几年粮食和棉花生产发展迅速，预计今年粮食将达到八千亿斤，棉花将达到一亿一千多万担。当然，也不是说已经多得不得了，而是低消费水平下的相对过剩，一时超过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种情况是我们原来所没有想到的。我们对农业结构的改变，对农业内部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对农业应当逐步地由量到质的转化，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及时跟上形势。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同我们的农业计划体制有很大的关系。过去在商品匮缺的时候，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有它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产品统购包销，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农民用不着根据社会需要来安排生产；自上而下的生产计划和收购计划也很难订得准确，很难真正和及时反映市场的需要。

现在，农业生产已经进入商品生产的新阶段。既然是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就得面向市场，考虑社会的需要。而旧的农业生产结构显然不相适应，这就要求适应商品经济的新形势，来改变结构。农业内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内部的各品种之间，以及农业与畜牧业、林业、渔业之间，都有个调整的问题，协调发展的问题。我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调查时，就讲了这个观点，强调三角洲要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围绕出口的需要来改变农业的结构。不仅沿海地区农业结构要调整，现在全国农业战线都面临着根据社会需要

和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

农业只要按商品经济的规律去办，自然会形成不同的分工。像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过去按照上面的计划指标，只是追求高产，不讲质量，不管销路如何。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就不愿意种粮食了。佛山市就提出取消统购统销，采取农民交“代金”的办法，不交粮食。他们腾出田来种甘蔗，种花卉，种蔬菜，垒鱼塘，种香蕉和其它水果，赚更多的钱。我国沿海地区发展食品工业，很有前途。港澳和国外市场需要什么品种、什么规格的商品，就生产什么，完全按国际市场的要求去办。像深圳光明农场，和外商合作，把消毒搞好了，鲜奶三年就占领了香港70%的市场。广东、苏南出现的这种情况，当然在江西、湖南等内地省份就不会出现，他们的优势是生产粮食。还有些地方，适宜于发展林业，畜牧业，他们就搞这些，不一定要求粮食都要自给自足。沿海、内地、山区、丘陵，应该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发展优势产业，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交换，协调发展。此外，对一些农产品，还应当开辟新的应用领域。比如薯干，加工成淀粉后可做成异构糖，经济价值很高。像皖北、豫东南，就可以保留种一些白薯，产量也高，收入也多。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结构也发生变化。广东、苏南商品经济发达，有60—80%的劳力都转入工副业和第三产业。而内地这个进程就慢得多。改变农业结构，需要掌握信息，提高技术，增加资金积累，进行人才培训，因此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应当从各方面努力，加快推进这一过程。

调整农业结构，是利国利民的措施。多年来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使农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卡壳就卡在粮食问题上。现在粮食多起来了，各方面对农业的需求增多了，市场日益扩大，这是很好的时机。农业掉头比较快，只要因势利导，认真做好工作，几年就可以大见成效。

二、农副产品的价格放开势在必行

调整农业结构，使农业本身协调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实行市场调节，逐步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现在农产品多了，粮棉出现了暂时的相对过剩，具备了放开的条件。因此，增加市场调节部分，实行市场浮动价格，可以从农村先开始。农副产品，首先是鲜活商品、生猪、蔬菜可以有步骤地放开，粮、棉等作物也可以逐步放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进而把这个基本经验推广到工业，到城市。这次价格体系的改革，也要先从农业开始，从农副产品开始。这样就会注入新的活力，使农村经济更活跃。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搞好了，具有重大的意义，将创造一个奇迹。

当然，价格放开，不等于国家不参加市场调节。对于粮、棉等大宗产品，国家对其大部分仍然按优待价收购。粮食就按倒三七开的比例价，收购一千五百亿斤或者更多一点，超过部分实行市场价格，自由浮动。但低于统购价时，国家还是要收。这就是保护价。国家要参与市场调节，吞吐物资，平抑物价，避免市场

调节的盲目性而造成价格的大起大跌，既保护生产者的利益，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猪肉、蔬菜、水产品逐步放开以后，可能一段时间价格要上涨。根据广东等地的经验，放开以后，开始涨一段，东西多了以后，价格就由上升逐步转向平稳。为了保证城市供应，有些生活必需品，如粮、油、猪肉，可以对定量部分实行平价供应；对有些商品，国家参与市场调节，通过补贴经营环节、低价出售，使消费者利益不受损害，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放开以后有没有危险？会不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生猪、蔬菜、鲜活商品等放开以后，肯定会使农民得到好处，积极性大为提高。大家比较担心的是粮食，我看也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因为国家按优待价已经收购一千五百亿斤以上，占了商品粮的大部分，而且这个政策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变。剩下的几百亿斤参加市场调节，只占一小部分，随行就市。市场价高就卖高价，市场价低就卖低价。但低到统购价时，国家就保护，予以收购，有多少收多少。这样农民是"两头保险"。种粮食多的地方，就不会愁粮食没有销路，谷贱伤农；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的地方，改种别的价值高的东西，也可以增加收入。这样可以各自发挥优势，尽快富裕起来，对国家、对农民都有好处。

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实行改革，仍按过去的老办法，统购包销，种什么就收购什么，农民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产需脱节，那就会给农民带来错误的信息。粮、棉等产品都已大量积压，还要全部按倒三七开比例价包下来收购，刺激农民大量去种植，结果又收不了那么多，或者收了以后压在仓库里，甚至露天堆放，内销也销不掉；有支付能力的国际市场也有限，出口出不了那么多，那就会使损耗大量增加，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农民所投入的劳力、资金等于白花了，而且占用了国家许多资金，影响了资金的正常循环和周转，从全局来看是很不利的。现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要作具体分析。一般地说，农业增产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有好处。但并不等于增加得越多，对国家的经济循环越有利。相反，有些东西过多以后，既占用国家资金，造成浪费；又不利于促进农业结构朝合理的方向转化，实际是一盘死棋，不是活棋。所以，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全面衡量一下，还是改变统购包销的办法，把价格放开，利大于弊。从根本上讲，这是把农业进一步搞活的重要措施。这样做目前可能遇到困难，但这是前进中的困难，转变中的困难，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全党要认识这个问题，也要使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认识这个问题，上下左右、群策群力去战胜困难，使农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总起来说，当前农业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农业一定要按照商品生产的要求，搞好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产品是通过市场交换，使农民的劳动得到社会承认的。要引导农民关心市场变化，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安排生产，使生产和社会需求互相衔接。二是要把农副产品的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国家要运用经济手段和经济办法，参与市场调节，加强市场的管理和监督，以克服盲目性，引导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关于国家尽力支持农业结构调整

会议的简报我看了，同志们提出的问题，集中起来是两个：第一，大家都赞成农业结构非调整不可，是大势所趋。但又感到转得陡了一些，有些地方困难大，怕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二，在农业进行结构调整时，希望国家多给一些支持，帮助农业实现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对第一个问题，大家感到陡一点，主要是指国家对粮食的收购量，是不是不要减得那么多。这件事，国务院是经过反复多次考虑才定下来的。棉花，明年国家计划收购8500万担，实际上只要7000万担就够开支了，这个数字中已经多收了一部分。粮食，按优待价收购1500亿斤或更多一点，这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多收。有一种说法需要纠正一下，不能说这是“限购”，应该说这是放开。搞了几十年的统购统销，今天有条件改变一下，把粮食的价格放开，这是很好的事。粮食放开以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品种质量，市场价格会有升有降。如优质米价格可能上升，劣质米可能要下降；产粮区可能要下降，缺粮区可能要上升，总的趋势可能往下浮动一点。国家按优待价收购后，剩下的部分，在市场上如果低于统购价时，国家仍按统购价收购，加以保护。某些产粮区，在一定时期内还要适当照顾，过渡一下。我主张将优待价收购的1500亿斤，按三年安排，省与省之间有个变化，广东、福建、浙江、苏南等地，一九八五年购多少，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还可以少购一些，把这个数字加到产粮的省区，如湖南、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四川、东北三省。总数不变，但地区之间有增有减，搞个“三年早知道”，便于及早安排。各省区之间还可以签订供应粮食的经济合同。这样有利于各地发挥优势，改变结构，调整农作物品种，提高农产品质量，活跃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对大家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国家当然要尽力帮助农业实现结构的改变，明年国家计划中，已经作了一些安排。但什么都想国家拿钱也不行。帮助农村，不仅是财政问题，归根到底，还有个货币投放的问题。估计今年票子要比去年增发二百四十多亿元。明年究竟怎么样，票子再发行多少，这关系到经济的全局。所以，要通盘考虑。各地方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比如苏南、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一斤粮食，要补五分钱，少生产一斤粮食，就少补五分钱。只要一放开，农民会转得很快，改种别的作物，那里的应变能力很强。把他们那里减少的粮食收购任务，转到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去，发挥这些地区种粮食的优势。有些产粮多的省，想多出口一些粮食，如果能自己找到门路，经贸部应当支持和协助，不一定都要经过总公司出口。问题是要有一个控制价，不能低于控制价倾销，自己挖自己的墙脚。有些山区半山区很不适合种粮食，应当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种草植树。但要有一个时期才有收益，而调进的粮食又要钱买。这也得有个解决的办法。除了国家已经决定拿出一笔粮食、棉布、炸药，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发动群众修公路外，还决定再拿出二、三百亿斤粮食，贷给山区、丘陵区，支持他们两三年，等他们经济上转过来以后归还。这样既解决了山区调整农业结构中的困难，又不增加贷款指标，同时也把仓库腾出来了。可以促使那些很不适合种粮食而又被迫种的地区，改种别的东西，换来个经济上的良哇

循环。问题比较大的是东北三省，那里主要是玉米多了。长期以来是东北玉米调往关内，关内猪肉调往东北，运输非常紧张。东北把粮食、猪肉放开以后，猪肉价格会上涨，农民感到卖猪比卖粮食合算，就会多养猪。过两三年猪多了，猪肉价格也会下降，使粮、猪的比价趋向合理。东北农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有利自然条件，要大力养猪、养牛、养羊，使东北猪肉能基本自给。浙江省想把粮食购销完全放开，进行试验，我们也赞成。条件是钱由省里出，自行负责，不要到中央报账。可以搞个具体方案，有关部门帮助研究一下。

总之，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进行农业结构的调整、转化。门路是很多的，比如调整品种，劣质改优质，潜力就很大。优质米虽然产量低一些，经济价值却高得多，是合算的。要根据不同情况，找出办法，给以不同形式的支持。

棉花问题，明年国家收购的数量已经不少。棉花多了转化比粮食还要困难。所以希望各地从大局出发，多做工作。听说鲁西北等地困难大，要从多方面想办法，广开门路，尽量使那里的农民能够渡过困难，实现转化。

这次会上，各地同志对国务院对粮棉所采取的措施都表示支持，我代表国务院向大家表示感谢。大家提出的要求，原则上都是合理的，能够解决的就立即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也请同志们谅解。实现农业结构的合理化，迎接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形势，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关于改造和振兴上海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赵紫阳在这个报告中根据上海的重要地位，首先提出了改造和振兴上海的战略构想和实施举措，对于恢复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充分发挥上海国内外贸易中心的功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为上海后来发展的实践所证实。

耀邦、小平、先念、陈云同志并书记处、国务院常务会议各同志：

十二月上旬，我和依林同志到上海去，目的是和上海同志一起，研究一些为改造和振兴上海所必须解决的政策措施问题。因为涉及的面比较宽，组织了九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同行。在上海，听了市委和市府的汇报；各部的同志分别就有关问题和上海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最后和同行的同志开了一次办公会，议定了一些事项。看来，这些办法能够帮助上海解决一部分问题，上海同志基本上是满意的。现将主要情况和研究结果简报如下：一、上海地位重要。人口占全国百分之一，工业产值占九分之一，财政收入占六分之一。三十五年累计，全市财政收入占全市国民收入百分之七十六。投资效益居全国第一位。在十四个沿海城市中，国外投资者最感兴趣的还是上海。上海繁荣，全国受益；上海衰落，损失巨大。上海的改造和振兴，是全国四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二、今年八月，国务院听取了上海经济工作汇报，随即派出调研组，和上海同志一起，组织各方面的干部、专家、学者，共同研讨，提出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总的设想是：充分利用对内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广泛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工业，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改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这个文件，比较系统地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原则上可以先这样定下来，待今后在实践中再逐步完善。

三、实现这个经济发展战略是有可能的。上海的优势，不是个别的、单项的优势，而是综合的、相当全面的优势。它在历史、地理、经济、科技、文化、人才、信息等各个方面都有许多有利条件。而且可以肯定，开放和改革，外引和内联，必将给上海注入新的活力。综合运用各种有利条件，上海就完全有可能成为全国四化的开路先锋。上海的前景是光明的。

四、现在上海正处在战略转变的关键时刻，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由于历史的

原因，上海的产业结构是不合理的。在缺乏原材料和能源的情况下，一般加工工业发展过猛。对第三产业注意不够。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欠账过多。人口过于密集，住房紧张，交通阻塞，污染严重。就这些方面而论，上海的困难确实是很大的。特别是技术改造任务很重，资金短缺显得更加突出。

目前上海财政负担确实过重。我们的改革，是先易后难，一步一步推开的。农村，小企业，小城市，新基地，这几年已逐步放开，日子比较好过。相对地说，大企业，大城市，老基地，承受的负担比较重。特别是上海，去年全市国民收入为三百零三亿元；而财政收入（不包括中央直属企业）即达一百五十一亿元，上交一百三十一亿元，地方支出只二十亿元，地方支出占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大低于全国各省市。

今后，在调整和改革物价过程中，外地进入上海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一般是上涨的趋势；上海加工产品的价格，相当一部分是下降的趋势，这对上海也是一种压力。

如不采取措施，今后两三年内，上海的处境可能会更加困难。

五、因此，有必要为上海创造一些条件，帮助上海渡过困难，转上良性循环。

这次在上海主要议了这样几条：

（一）上海的财政体制，由目前的统收统支，改为“核定基数，总额分成，六年不变”（国家对物价、税收等进行重大调整时，上海的财政基数也要作调整）。收入，以一九八三年的一百五十一亿元为基数；支出，在一九八三年的二十亿元基础上，增加十五亿元，共三十五亿元。这样，上海的分成比例，将由目前的百分之十三点二上升为百分之二十三点二（上海同志要求把分成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

（二）过去确定每年给上海引进技术用的三亿美元外汇额度，将于明年到期；决定延长到一九九零年，可以跨年度使用，并核拨相应的人民币贷款。

（三）上海贸易外汇留成比例，同意按全国统一规定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地方性以进养出和物资串换而增值的外汇留成，同意由目前的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七十。

（四）以一九八三年底上海银行存放款差额为基数，同意把今后增加吸收的存款全部留给上海的银行周转使用。

（五）恢复上海金融中心。原则是三条：一是扩大上海各个分行的自主权。二是在中央银行之下，设立一个新的全国性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允许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任务是拾遗补缺，经营对内对外长期短期存放款业务，可以与其他专业银行业务交叉。三是市政府不干预这些银行的业务。此外，允许外国银行到上海开业，但要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把金融中心办好，其作用不亚于财政拨款，上海的回旋余地就大了。

以上几条，是为了解决上海的特殊困难。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其它地方不得援例。这样，上海可以真正解决一些问题，中央财政也可以过得去。

六、对上海来说，除了负担过重以外，还有一个捆得太死的问题。要把上海搞活，主要是两条：第一是搞活企业，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要把经营管理的自主权真正放到企业，而不要揽在行政性的公司手里。同时，在企业工资基金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方面，在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方面，应该更放手一点。企业的经济效益上去了，财源就活了。第二是改善基础设施，首先要改善为生产服务和为开放服务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改善了，可以增加上海对内对外的吸引力。开放的好处，外引内联的好处，就会大量涌向上海，这样后劲就大。上面说的那些融资措施，应主要用于进行技术改造和改善投资环境。总之，放开手脚，适当减负，发挥优势，上海是能够较快地转上良哇循环的。

七、解放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忽略了经济中心的多种功能。以上海为例，它不仅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最大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中心，最大的科技中心，今后还应该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所有这些为全国服务的综合功能，单纯用“工农业生产总值”这个指标是很难反映出来的。很多经济学家建议，考核上海经济工作，应以“国民生产总值”为首要指标，这个意见有道理，可以促使上海把注意力放到为全国服务上来。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应该把上海对全国四化建设作出的贡献，作为评定上海工作的主要标准。对其它经济中心，也应该这样要求。把经济中心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经济越活跃，本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不仅不会受影响，而且可能发展得更快。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关于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给中央的请示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耀邦、小平、先念、陈云同志并书记处、国务院常务会议各同志：

最近我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志先后到广东、上海和江苏调查，大家认为有必要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开辟为经济开放区，利用开放和改革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优势，加快建设步伐。现将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

一、珠江三角洲地濒港澳，长江三角洲环绕上海，两个三角洲都顺江临海，交通方便，信息比较灵通，工业基础较好，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历史上就与国外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开放和改革，这里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把门户打开，把经济搞活，各项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显著提高，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显示了开放和改革政策的威力。这两个三角洲，面积十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一；人口六千五百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五；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五亿元，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但是，由于没有作为经济开放地区，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仍受种种限制。当地干部和群众纷纷要求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采取更为灵活的措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当前两个三角洲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如能因势利导，像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那样，把这里开辟为经济开放区，在政策上进一步放宽，既可以加快这一地区的开放和建设；又有利于通过外引和内联，促进与国外、与内地的经济技术交流；同时对稳定和繁荣香港，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我们的方针，是要通过开放和改革，发挥这两大三角洲的优势，在全国最先建设成为内外交流、工农结合、城乡渗透、现代化的、开放式的文明富庶的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金三角”。如果试验成功，下一步将陆续开放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进而使北起大连港、南至北海市的沿海大约二亿人口的地区，成为沿海经济开放地带。在这一地带，改革的步子可以走得更快一些，经济政策更灵活一些，市场调节的部分更多一些，同国外的联系更便利一些，信息更灵通一些。通过特区、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的筛选和过滤，把国外先进技术和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引进来，加以吸收、消化、创新，向内地转移。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将通过特区—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内地这样多层次的探索和实践，滚动式地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这样就把对外引进和对内

联合、把沿海的发展和内地的开发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解决我国的东西关系，带动整个内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全国经济振兴，人民富裕起来。这是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着。

开放两个三角洲，在步骤上，可以由小到大，即先开放“小三角”，再扩大为“大三角”。初步意见，长江三角洲先开放：上海市所属各县，江苏张家港和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及所属十二个县，浙江嘉兴市及所属嘉善、海宁、桐乡、平湖、海盐等五县。珠江三角洲先开放：佛山、江门两市和中山、番禺、增城、南海、顺德、新会、台山、开平、宝安、斗门、东莞等十一县市。这样较为稳妥。

三、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是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是进出口的重要基地，应该面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增强竞争能力。为此，必须认真搞好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使产品不断升级换代。同时，要把内地的原料、初级产品在这里精加工，增值出口；把沿海生产的“洋货”向内地销售。要改变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结构，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根据出口的需要来安排生产。不是生产什么就加工什么，加工什么就出口什么，而是要倒过来，看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就考虑加工什么，种植什么。就是说应当是贸一工一农，而不是农一工一贸。要把传统的轻纺工业和新兴的食品工业的优势发挥出来，打入国际市场，扩大阵地。第一步争取在几年内把港澳市场所需鲜活商品基本上包下来；其次逐步进入日本、东南亚市场和中东市场。这样有利于增加外汇收入，促进三角洲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

四、我们的开放，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四个特区，是一个层次；十四个开放城市，是一个层次；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又是一个层次。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两个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可以参照十四个开放城市实行的政策，给予一定的权力（比开放城市略小一点），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特区办公室拟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五、上述意见经中央批准以后，再按立法手续，报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1]。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注 释

1．1985年1月1日，邓小平与谷牧谈话。邓小平问：紫阳同志关于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报告你看了没有？谷牧说：我看过了。邓小平说：沿海连成一片了，这很好嘛！谷牧说：紫阳同志今天下午要找我谈，我想提个建议，再加一个三角洲，泉州、漳州、厦门那个闽南三角洲。对台工作很需要这个三角洲。这样，广东有个珠江三角洲，上海经济区有个长江三角洲，福建有个闽南三角洲。邓小平说：好嘛！再加上闽南三角洲。赵紫阳同意谷牧的建议。

后记

一、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者检索查看，这部文集以时间顺序编排，按年份分为四卷：第一卷（1980—1982年），第二卷（1983—1984年），第三卷（1985—1986年），第四卷（1987—1989年）。

二、编入本书的所有文稿，均系第一手原始文献资料。为了保存文稿的原貌，在编辑过程中只对原稿进行了文字订正和必要注释，有的添加了标题。文中的数字和计量单位等，亦沿用当时的习惯表述，未按新的规定改动和换算。

三、参加文集收集、整理、编辑、录入、排版、校对工作的同志，都是一批热心改革开放事业和关心党史国史研究的志愿者，还有许多老领导和老同志给予了热情鼓励和鼎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四、限于条件和水平，在本书编辑中难免有疏漏、错讹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知情者批评指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5年10月17日

赵紫阳文集：三

第三卷

1985—1986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赵紫阳文集
第三卷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编
赵紫阳文集：三
中交六李公服社
《赵紫阳文集（1980—1989）：第三卷（1985—1986）》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编
@香港中文大学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
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
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国际统一书号（ISBN）：978962—996—808—3
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传真：＋552 2603 7355
电邮：cup@cuhkeduhk
网址：?chineseupresscom
㓛e Collected WorksofZhaoZiyang（1980-1989），Volume3（1955—1956）
（inChinese）
Edited by Editorial Gro即of角e Collected works ofZhaoZ岁a叮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HongKong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978—9629968083
Published饰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NT，Hong Kong
F日X：＋852 2603 7355
Email：cuP@cuhkeduhk
W七bsite：?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出版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收录了赵紫阳自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至1989年去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函、批语等，共498篇，180余万字，依时间顺序分为四卷。

《文集》涵盖经济、政治、党务、外交、国防、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展示了1980年代中国高层推行的各种政策主张、理论观点及相关政治博弈，呈现了改革开放最初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细节。

《文集》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原始文献编纂而成，来源可靠、编排规范、忠实于原件，多数篇目属首次公开或首次完整公开。《文集》虽非同期文献的全部，却是迄今为止最系统、也最具规模的赵紫阳文献汇编，为还原和理解早期中国改革开放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对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也极具文献价值。

《文集》出版过程中，本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文本考订、原件比对、史实核查、信息增补等工作，力求达至文献史料出版的最高准确度、客观度。除文字史料外，本社对视觉史料也极为重视，试图通过对历史图片及原始文献的搜集和选用，将其携带的历史信息传递给读者。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6年5月

编辑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主要汇集了赵紫阳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件和批语等，近500篇。其中有一部分曾公开发表过，大部分则在当时党政机关的文件、简报上印发或传达过，是首次公开出版。

文集所涉及的十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和奠基时期。当时，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四化建设掀起了新的高潮。其间经历了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两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进行了国民经济大调整，制定并胜利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七五”两个五年计划，彻底扭转了文革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的被动局面，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第一步目标（头十年翻一番），从而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决心。

这十年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改革创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由工业、商业发展到其他第三产业，从承包经营、股份制试点到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到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对外开放；从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到实行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和保护环境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从立足国内到坚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主动迎应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勇攀世界科技新高峰。这套文集既见证了这十年间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逐步重新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也反映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工作难度异常巨大，为政者甘苦备尝的秘辛。这十年既有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有些不尽人意的遗憾；既积累了改革成功的经验，也有出现通货膨胀的教训。

从文集中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领导支持下，本书作者与胡耀邦、万里等同志一道认真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从而大彻大悟，立志为民，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崇尚法治，勇于开拓创新，努力遵循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在日新月异的新产业革命、新科技革命中尽心竭力，弃旧图新，不断探索新的为政之道、治国之策、兴业之本和强国之路，以掌握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主动权。这十年他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奉献给了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书中所反映的每一项巨大成就或一些难以避免的失误，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真实记载和深入研究这段难忘的史实和第一手文献资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学习和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让历史告诉未

来，促使我们进一步开拓思路，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融入世界，为实现振兴中华，攀登世界强国的新高峰而奋斗！

本书编辑组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组成。为保持文稿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在编辑中均保持了原貌，编者仅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4年4月

目录

一九八五年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
控制货币发行稳定经济形势
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五日
对制定“七五”计划总体设想和有关方针的意见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至三月八日
接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第二期学员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六日
放开农产品价格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在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接见全国省长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二月九日
慎重初战务求必胜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
在全国省长会议上的插话摘要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
林业要进行改革和发展多种经营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
大企业要下放权力以增强内部活力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东北搞好粮食加工转化可以成为中国的动物蛋白基地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对陆定一同志来信的批语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给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的贺信
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
放手让大企业发展综合利用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日

科技体制改革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多出成果和人才

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上的祝酒词

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

审计工作是加强管理和监督的重要保证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

认真解决现存问题继续推进企业改革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划清不正之风与改革探索的界限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

——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必须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

搞好城市改革发挥城市功能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在首都各界人士纪念亚非会议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编制“七五”计划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五月二日

切实支持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

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

加强省区之间在自愿、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协作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二日

对报纸连续发表批评“超高速”评论的批语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三日

会见新加坡吴庆瑞博士的谈话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

对国家科委抓一批“短平快”科技项目的批语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积极开拓技术市场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要保证名牌产品的材料供应
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接见“中国面对未来”国际研讨会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
听取四川省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解决城市蔬菜供应问题要有新思路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
对《关于提高我国机械工业水平几个关键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教师所从事的事业是神圣的
实施分税制改革给田纪云同志的信
对《关于一、三线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的情况报告》
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精简机构的批示
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的说明
必须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对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批示
给《李约瑟文集》的贺词
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给马海德同志的复信
给中医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的贺信
在宝钢一期工程投产仪式上的讲话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把革命老区建设好
下大功夫把旅游基础设施和管理培训搞好
在第六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
“星火计划”是科技为农村经济服务的好形式
绝不放松粮食生产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在河南省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给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八四级全体同学的回信

一九八六年

关于一九八六年的经济工作
端正党风要从中央领导机关带头做起

希望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
接见体改研究班第四期全体学员时的讲话
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年经济工作的任务
关于统计信息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
发挥军工系统优势向军民结合型转变
发展旅游业需要“硬件”与“软件”相结合
就三峡工程和核电站建设安排问题给邓小平同志的信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与部分专家座谈时的讲话
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扎扎实实地把海南的开发建设事业进行下去
进一步贯彻“大家办建材”的方针
国有森林不能下放
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要慎重
赞成搞“火炬计划”
就“国际和平年”对世界各国听众的广播讲话
今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
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当前生产问题
关于核电站问题的谈话和批示
维护世界和平是各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关于制定“八六三计划”的讲话
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视察秦山核电站时的谈话
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八六三”计划的方针与措施
给全国护理工作会议的贺信
给《廉洁奉公的改革者张洁世》一书的题词
在省（区）市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给北师大北国剧社的复信
关于撤销三峡省筹备组给万里等同志的信
祝叶剑英同志九十寿辰的贺信
正确对待农村党员雇工和发展私人经济问题
为促进中澳友好合作做出新贡献致第三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的贺词
科技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关于核安全问题的讲话
在第三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关于发展乡镇煤矿和建设大型煤矿等问题
给《中国日报》的题词

加快发展煤炭工业
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经济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积极参加援外项目管理使当地人民受益
对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价格改革方案的看法
在全国省长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会见世界银行首任驻华代表林重庚时的谈话
改革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
天津要走发展外向型轻加工经济的路子
进一步发挥沿海城市的作用
关于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办成一个有活力的企业集团
对武钢引进国家两个急需项目申报四年多未办完审批手续问题的两次批示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给中央常委的信
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六三”计划）给中央常委的信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七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致第六十届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贺信
处理好价格改革与搞活企业的关系
外贸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接见农村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在“走向二○○○年的亚太经济北京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听取组建机械工业委员会汇报时的讲话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在广西视察期间的讲话摘要
不要在我家乡搞纪念性的东西和要求照顾
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纠正行业和部门不正之风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
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后记
教师所从事的事业是神圣的
一九八五年九月九日
实施分税制改革给田纪云同志的信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三日
对《关于一、三线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的情况报告》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四日
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精简机构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
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的说明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
必须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十日
对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
给《李约瑟文集》的贺词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
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给马海德同志的复信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给中医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在宝钢一期工程投产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把革命老区建设好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
下大功夫把旅游基础设施和管理培训搞好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日
在第六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六日
“星火计划”是科技为农村经济服务的好形式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
绝不放松粮食生产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在河南省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给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八四级全体同学的回信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八六年
关于一九八六年的经济工作
一九八六年一月八日
端正党风要从中央领导机关带头做起
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

希望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接见体改研究班第四期全体学员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年经济工作的任务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三日
关于统计信息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发挥军工系统优势向军民结合型转变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发展旅游业需要“硬件”与“软件”相结合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就三峡工程和核电站建设安排问题给邓小平同志的信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与部分专家座谈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
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
扎扎实实地把海南的开发建设事业进行下去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进一步贯彻“大家办建材”的方针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日
国有森林不能下放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要慎重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
赞成搞“火炬计划”
一九八六年三月八日
就“国际和平年”对世界各国听众的广播讲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八日
今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一日
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当前生产问题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
关于核电站问题的谈话和批示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九日、二十六日
维护世界和平是各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关于制定“八六三计划”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
视察秦山核电站时的谈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八六三”计划的方针与措施
一九八六年四月七日
给全国护理工作会议的贺信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
给《廉洁奉公的改革者张洁世》一书的题词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
在省（区）市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
给北师大北国剧社的复信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六日
关于撤销三峡省筹备组给万里等同志的信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日
祝叶剑英同志九十寿辰的贺信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正确对待农村党员雇工和发展私人经济问题
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
为促进中澳友好合作做出新贡献
—致第三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的贺词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
科技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
关于核安全问题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七日
在第三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日
关于发展乡镇煤矿和建设大型煤矿等问题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给《中国日报》的题词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加快发展煤炭工业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

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经济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
积极参加援外项目管理使当地人民受益
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
对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价格改革方案的看法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十二日
在全国省长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八日
会见世界银行首任驻华代表林重庚时的谈话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改革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
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
天津要走发展外向型轻加工经济的路子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进一步发挥沿海城市的作用
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关于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六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
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办成一个有活力的企业集团
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
对武钢引进国家两个急需项目申报四年多
未办完审批手续问题的两次批示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十一月一日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给中央常委的信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六三”计划）给中央常委的信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七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日
致第六十届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贺信
一九八六年十月四日
处理好价格改革与搞活企业的关系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十一月一日
外贸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至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接见农村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在“走向二○○○年的亚太经济北京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听取组建机械工业委员会汇报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在广西视察期间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
不要在我家乡搞纪念性的东西和要求照顾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
纠正行业和部门不正之风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九日
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后记

1986年2月，在海南岛考察，与田纪云、胡启立、谷牧讨论洋浦港平面规划方案
左上：1985年10月23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在联合国会议大厅中国代表席上就座，与钱其深外长、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鹿野等聆听各国代表的发言
左下：1986年11月，在贵州省农村地区考察，询问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右：1985年9月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庆祝中国第一个教师节大会上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稿（首页），经修改后于1985年1月3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1985年4月15日，在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上关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批示
下．
1985年9月13日，就实施分税制改革问题给田纪云的信
1985年10月24日，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英文版，封面及前两页）
1986年11月18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前三页）

一九八五年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

同志们：

刚才仲勋同志已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了话，我又听了各个民主党派和政协的领导同志的讲话，都讲得很好，我听了以后深受启发和教益。我这次来，是向大家拜年的，当然，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共勉。我希望今年，也就是一九八五年，各条战线的工作比去年做得更好，希望一九八五年我们整个国家的光景比一九八四年更加美好。我想，这既是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志的愿望和责任，也是全中国人民和各条战线上的工作人员的愿望和责任。

去年，中央公布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就是说要把我们的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个文件公布以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可以说，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总的反应（包括国外）是好的，都认为我们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构思是合理的，认为如果改革能够这样下去，我们中国确实大有希望，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当然，也有另外一面。除了反对改革的人以外（这总是有的，是少量的人），也还有一些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志、好心人，有一点担忧，担忧我们的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国外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大概都看到了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中国要搞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改革价格是不行的。价格是关键，是改革整个体制的关键，也可以讲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但是价格的改革会出风险，会带来物价上涨，担心物价上涨，因此希望中国这场改革搞得稳当一点。现在要求中国改革搞得稳当一点的人多起来了。首先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第二，既然大家有这些想法，这更加提醒我们，在进行这场非常深刻的、关系到我们国家四化前途的重大改革，一方面我们对改革的方向、改革的决心要坚定不移，要有必胜的信心，不要为了出现那么一点小的波折，或者一些小的乱子而动摇；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改革的步骤、改革的方法一定要谨慎从事，这就是邓小平主任最近不断讲的，要走一步看一步。总之，一定要搞好，不能也不允许发生大的曲折。这一点，我们头脑清醒一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今年是我们体制改革决议公布以后的第一年，作为城市改革来讲，作为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讲，也可以说是一次初战。古今中外不少有经验的战略家都遵循一条原则，叫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第一仗要慎重一些，一定要打好。慎重初

战当然不是不迈步、停滞不前，而是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有准备地、有把握地迈出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一步。我想这大概就是今年体制改革的方针。

一九八五年，我们究竟要改些什么东西？我想大家可能比较关心。首先你们大概都知道了，不久前开了一个农村工作会议，已经公布了，农村的价格体制改革的步子我们可能要迈得大一些。就是说，要把三十年来我们国家长期实行的对农产品的统购包销这个制度，要逐步地取消。对农副产品要逐步地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国家、国营公司、国营的力量积极地参与市场调节。这将是农村五年以前联产责任制改革之后第二个大的改革。解决吃大锅饭问题是从农村开始的，现在到了城市；价格改革，看来这一次又是农村带头，因为今天农村具备了这种条件。农村价格全部放开，总的趋势价格不会上涨，而是下浮。当然主要是由于这几年农业连续丰收，农副产品丰富，具备了这个条件。这恐怕是多年来我们想搞而不能搞的、也不敢搞的一件事，现在时机成熟了。这是一件大好事。这个改革将进一步促使农业合理化，将会进一步搞活农业经济，对我们国家整个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价格体制改革，将发生莫大的意义。在其他领域，譬如在工业品方面，在价格问题上的改革，当然我们今年要迈出一些步子，要选择那些影响面比较窄，而对我们、对工业、对促进工业内部合理化又能起推动作用的小量的产品进行些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与此同时，我们今年开始将要给中小学教师提高工资，对国家机关，包括科技、文教、整个的国家机关，将进行工资改革。在企业里面，将比较大面积地、大幅度地推广企业的工人工资增长同企业经济效益直接挂钩这个办法。今年准备大量推广这种办法，使企业的工人可以从自己生产、节约，从经济效益提高当中来提高自己的工资，而不受国家所谓几级工资制的束缚。过去的所谓八级工资制在企业里将很快就要打破。

有一些同志对调整和改革物价有些担心，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的调整和改革工资，一方面要使生产者从生产中增加自己的收入，同时要使消费者不降低收入，不降低自己的实际购买力。就是说，既要保护生产者利益，又要保护消费者利益。当然，我们在调整、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当中，将要仔细考虑这些问题。现在北京也好，各地也好，都有些街谈巷议，什么粮食要涨价了，电视机要涨价了，抢购的不少，这都是不了解情况，也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测，主要是教育工作、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我相信，明年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见面的时候，就听不到这种议论了。我们明年这个时候将会看到，一九八五年我们确实是进行了一场十分重要的而又非常成功的改革。

祝同志们健康长寿，新年愉快！谢谢！

控制货币发行稳定经济形势*

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五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委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昨晚我一夜没有睡好。今天主要说经济形势，不是一般地说，集中讲去年票子发得这么多（初步统计全年新发行二百六十亿元，超过原计划八十亿元的两倍多）。十二月份像飞机撒票子一样，三十一日就增发了十亿元，完全失去控制。发这么多票子，怎么看？给一九八五年带来什么问题。一九八五年票子发多少，要预计一下。

改革，一九八五年不出台不行。国内外议论很多，改革势在必行。但风险在于通货膨胀。一九八五年改革是在多发了二百六十亿元票子的基础上，这是有风险的。一九八五年必须有几条硬措施，应付风险的措施。我们国家不要只看形势很好，有一天一拥而上地抢购，你看会发生什么问题。一个城市挤兑抢购，就会带起一大片。要有应急办法。否则突然发生问题，大家就会措手不及。货币投放要从紧，不是一般地提抽紧银根。也可能票子不多，但不能立足于此。立足点要谨慎一些，风险冒不得。改革不能停，风险又不能冒。

票子发多了，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农副产品收购量增加，多投放了一百亿元；二是农村信贷过猛；三是城市消费基金迅速增加。问题不出在基本建设，主要出在消费基金。消费基金，下半年直线上升，基本上是失控。钱从哪里来？问题在于企业生产基金全部用于奖金。利改税，国家这一头定死了。工人这一头，有钱就发奖金，互相攀比。中间那一块，生产基金基本上没有了，所需资金只好从银行贷款，实际上是用贷款发了奖金。这就是秘密所在。第四季度出来的问题，主要是消费基金失控。对此要有几条措施：

一、出售黄金。充分准备好，下决心拿一百吨黄金。也有可能卖不出去压在那里，准备对付风潮。现在人心相当浮动。这么多粮食还发生抢购风潮。北京二万台彩电预售，几天就光了。

二、进口高档商品。进口汽车、彩电、长丝，花二十亿美元有没有可能，这就是一百亿元人民币。

三、发股票，出卖小企业固定资产。

四、卖房子，包括旧房子，新房子拿出一部分。优待价，分期付款。

五、规定票子发多少，不得超过。银行会议说要发三百亿元，这不得了。一

方面多回笼，一方面少发票子，从严控制。今年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亿元。太紧张了，也不好，急了不行。专业银行搞起来了，中央银行没真正抓起来，对专业银行控制不住。资金吃大锅饭，所以专业银行就竞相贷款，中央银行处于无力状态。票子发多了，对改革是很大的威胁。又要改革，其他方面又很松，漏洞很多，问题就大了。

六、今年消费基金要有个说法。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不搞不行，但必须加强监督。怎样监督，要研究办法。你到我这里贷款，我就得监督。银行有顾虑，怕企业向银行保密。

七、国库券，再发一种一年的。

现在仅靠行政办法不行了。靠计委控制不住，关键是银行。财政是一小块，银行是一大块。我讲过，不能这边用外汇进汽车，那边贷款给专业户买汽车，货币回不了笼，白忙活了一阵。票子一年增发百分之五十，国民收入增长百分之十。如果不控制，一九八五年真可能增发三百亿元到四百亿元。可不能不加小心。

（赵紫阳在听取吕培俭[1]同志发言后说）

一、去年票子情况继续研究，多少正常，多少不正常。真正看清楚，要过半年。继续观察，估计一下子说不清。

二、鉴于去年一下子发这么多，今年又有两项改革出台，在票子、信贷问题上必须谨慎。谨慎了没有坏处。两三年内要为改革创造条件。决议已经发了，改革两三年纹丝不动不行。

三、措施还要认真研究。回笼的措施，控制投放的措施，控制消费基金的措施。有的同志向我说，一九八五年工资同经济效益挂钩一定干不得。我想了，不搞不行。但一定要有控制措施。增发一百五十亿元票子，也可以再研究一下如何控制使用。既要控制，又要搞活，银行一定要作为问题研究，有严有宽。

关于货币发行情况、基本看法和拟采取的措施，请依林、纪云同志负责，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名义，起草一个向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的报告。

注 释

1．吕培俭（1928—），江苏洪泽人。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曾任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副部长，国家审计署审计长。

对制定“七五”计划总体设想和有关方针的意见*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至三月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制定“七五”计划总体设想以及“七五”能源、运输、邮电、原材料、人民生活、轻工市场、基本建设、财政和信贷计划的初步设想时的几次讲话要点。他在这些讲话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涉及的25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制定“七五”计划的总体设想和具体方针，如首次提出实行住宅商品化等，对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发挥了引领作用。

一、关于研究“六五”后三年出现的新情况

“六五”后三年的路子与前两年不一样，模式变了，规律变了，很多事情原来预测不到。现在生产资料市场趋向缓和，事先没预计到。要从这五年的变化，“温故而知新”，预测今后五年。这几年能源增长少，工业增长快，这是由于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要认真研究这三年中出现的新东西，哪些将在“七五”期间继续起作用，哪些只是暂时起作用。

“六五”经济的发展已经突破旧的规律，现在对“七五”计划的考虑还没有突破旧的模式，正处于从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之中。“六五”期间出现的新情况，总的说对“六五”计划的执行起了好作用，有的在“七五”期间还将继续起好作用，有的在今后如果不受制约可能起另外的作用。目前正处在变化过程中，很多因素捉摸不定。现在看来，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把“七五”计划搞好，另一方面可能要准备不断进行调整。

二、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出发点

消费结构影响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又影响消费结构。你们汇报提纲中已经提到：认真研究城乡居民的消费变化，研究市场的动向，预测消费品增长的可能及其对生产资料需求的数量及结构，应当作为“七五”计划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而现在编计划的做法是先测算生产增长率多少，人民消费水平提高多少，基建规模安

排多大，材料、外汇平衡怎样。这基本上是传统的方法。现在是否从另外的角度再测算一下，即从消费开始。预测一下“七五”人民消费会是什么样的需求，几个主要方面大体达到什么水平。首先是农业、轻纺、食品工业，然后是原材料、能源、交通，然后是进出口。看看问题在哪里，看看城乡消费对生产建设结构提出什么要求。当然，一开始不能算得很细、很准。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消费出发，社会主义国家搞生产建设却不从消费出发。现在我们的生产结构不适应消费需求，人民需要的东西供应不上。如果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吃的比重就不会占那么大（现在占百分之六十）。今后，生产建设应该根据国内市场需求和国外需求来安排（包括数量和结构）。总的原则是生产适应消费。如果生产方面不可能做到，则要引导消费。

这次搞“七五”计划，重点是搞“七五”的，也想想后十年。到本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大体要有个设想。比如住，如果每人八平方米，建筑面积实际要十六平方米，算下来一年要三百多亿元投资。这么多投资，如果没有个政策，不可能做到。再有，建材工业如果不改革，还用水泥、砖瓦，那也不行。又如穿，达到什么水平（包括数量、质量），用什么纤维，从哪里来，怎么解决？石油化工怎么搞，技术改造的方向怎么定，都要有个考虑。又如吃，食物构成、食品加工怎么搞等，也要有考虑。另外，还有个购买力的问题。这些，都要有个说法。

三、关于实行住宅商品化

要改革现行的房租办法。现在居民迫切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由于我们的住房政策不对头，促使居民的消费过早地转向家用电器，出现消费早熟。如果住房政策正确，在城市可以吸收大量购买力。要下决心早点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房租，这个问题可以想法解决，不外乎提高房租，把暗贴变明贴，实行按定量补贴包干。设想按每人使用面积十平米计算，房租由现在的每平方米每月两角提高到每月一元，增加的八角国家予以补贴。实际住房少于定量面积的，国家照样拿出补贴，但不按月交给住户，而由国家统一存入银行，等住户买房时划拨。使用面积超过定量的，超过部分的房租由个人负担，国家不补贴。这样才能鼓励人们少要房子，自己攒钱买房子。

要实行住宅商品化。什么都商品化了，技术也都作为商品，住房非商品化不可。设想住宅每平米二百元的造价对折（一百元）出售十平方米房子（房租每月十元钱）、用十年的房租（一千二百元）即可买下来。现在由房管局掌握的住宅共九亿平方米，房租提高后，一年可回收资金一百亿元。加上国家现在每年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二百亿元，可有三百亿元用于住宅建设。在国外，建筑业是几大经济支柱之一。我们实行住宅商品化，就会促进建筑业的发展。

这样，情况将比现在好得多，既可以减少国家对住房的投资，而且通过回收资金，房子建设还可加快；耗能少的新型材料也发展起来了，整个建筑业、建材

工业也活了；人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消费结构也会趋向合理。否则，房子建得再多，也解决不了房子问题。同时，人民过早地把购买力转向高级消费品，彩电、冰箱年年大量进口，引进生产线越来越多，到一定时候，生产力饱和过剩，就造成损失。

看来，今后要把消费基金压得很低，恐怕难以做到，只能设法吸收它。如果房子变成商品，即使消费基金扩大也不可怕。

四、关于电力建设

我们国家影响经济发展的，我看主要不是煤，关键的，第一位的是电，第二是交通。如果现在项目要调整，就要加强电，加强交通。要不受任何牵制，下决心加强电和交通。

“七五”计划总的还是要讲综合平衡，但要把电、交通加强。交通也要围绕电来安排。整个计划以电为中心配套安排。电是我国发展中的主要薄弱环节。如果电的情况好一些，工业生产情况就会更好一些。“七五”计划电力装机三千五百万千瓦的方案，用什么方法把它实现？搞电，有个燃料问题，即煤的问题。煤是有的，我国煤炭资源比较丰富，开采也不十分困难，主要是运不出来。解决了交通，煤还是有的。

现在看，政策的作用很大。石油上去靠包干，煤炭上去靠小煤窑。电，不能大家用一家办。大家办电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落实。工厂办了电，卖给电网一度电四分，而电网卖给工厂要八分，这样谁还办。电力部门要鼓励地方办电，要支持大家办电，不能大家办起来你拿走。

五、关于煤炭建设

能源工业问题，关键是个政策。过去总认为搞煤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实际上，政策对了头，煤炭产量上得较快。从煤矿的发展，得到这样的启发，就是有些矿山，或者比较分散的矿山，可以让老百姓去开。全部靠国家去干，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而且有些也不合算。发挥农民办矿的积极性，速度可加快，投资可节省，国家可以腾出一部分投资转到别的方面。

煤的开发要大中小并举，以中小为主。这个方针，还可以管几年。小煤矿可以搞改造，规模也可扩大。这样，可以做到周期短、投资少、见效快；可以把筹集到搞煤的资金和外资更多地用到电上。要搞几条政策。当然也有个布局问题。大煤矿还是要搞的，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要有后劲的问题，这就要考虑“八五”怎么办？

煤矿可以搞“小煤中电”。例如锦州电厂周围有很多小煤矿，可以用附近的小煤矿的煤，根本不用从营口运煤来解决，关键是个价格问题。搞“小煤中电”，电

厂规模不要搞得太大，单机二十万千瓦，逐步滚动。陕北煤也很多，可以沿黄河摆电站，附近搞小煤矿。真正能搞小煤矿的是黑龙江东部，山西、陕北以及内蒙古西部。

雁北的煤矿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大秦线通车后会不会没有煤？要认真在那里搞地方煤，靠老百姓去搞，好好支持一下地方煤矿。那里老百姓很穷，稍加支持，局面就可铺开。那里煤炭储量很大，搞好了，可搞几千万吨煤。计委要专门组织一个小组去规划一下。

平朔露天矿哈默不干，我们自己搞。跟加拿大合作也好，自己搞也好，反正要搞下去。如果平朔自己搞，准格尔矿就要推迟。两个大露天同时搞，国家没有那么大力量。原来要搞准格尔，是因为哈默要搞平朔。准格尔现在还没有开工，完全可以推迟。这样大的项目，搞不清楚，就撤下来，要下决心推迟，不背这个包袱。一定要从效益出发。日本能源贷款，可以用于其它项目。平朔自己干以后，要把造价降低，把煤炭成本降下来。

今后凡是开发基本上国内用的资源，一般不要搞中外合营企业。一搞合营企业，土地贵了，工资高了，建设标准也高了，成本也就大了。宁可借外资，从中国国情出发，按中国的标准搞。陆上石油一般不要与国外搞合营。

六、关于节能

发电烧油机组要搞替代机组。原来烧油的机组，凡是能改的都要改过来。剩下的机组，如果不能改，或者勉强去改不合算的，可以作为备用，烧些高价油，用于电站调峰。

压烧油是个小的综合平衡，没有条条块块约束。它有主动权，自己可以预测到一九九○年有多少钱，今年安排什么项目，明年安排什么项目。围绕电，把所有条块结合起来了。

七、关于建立能源交通基金

搞基本建设基金制，一下子搞不起来。搞能源交通基金，我赞成。从基本建设总投资中划出一块，或者每年财政拨款定个比例，财政收入多，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就多；财政收入少，基金就少，让它自己去滚动。钱统统放人银行，可以成立能源交通银行。这样能源交通建设的资金就会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搞了能源交通基金，能源交通部门主动了，财政部、计委也超脱了。

八、关于把发展交通运输作为重点

我国整个经济卡在电上，但电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交通问题。有了交

通，煤就运出来了；有了煤，电也就解决了。因此，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现象是电，根本的是运输问题。“七五”一定要把重点放在交通上。一是加快建设；二是放宽政策，国家搞重点，其它靠地方和老百姓搞。要好好研究这方面的方针、政策，研究得透一些。

现在交通困难，大家用交通，一家办交通，这是个问题。要促使大家力、交通。

发展交通要考虑利用外资。过去打算在煤炭方面利用点外资，国外有人愿意贷款给我们搞能源，我们就把自己搞能源的投资调出来，把钱转到办交通上。因此，煤炭部也可以修铁路。

九、关于铁路建设

运输建设不要到处布点、开花。不然花很多钱，见不到效果。铁路，集中力量把大秦线搞上去，把大秦线的下半截修通。上段和下段配了套，能力至少可以达到一亿吨，搞得好可以达到一亿四千万到一亿五千万吨。可以考虑，把东胜到包头接通，一百多公里，主要地方集资，国家支持一下。东西大通道搞通了，宁夏、内蒙古东胜、准格尔和神木的煤都可以从这条线运出来。铁路建设修三条线：一条是大秦线；一条是晋东南到石臼所；一条是焦枝线，这条线可通长江、汉水，潜力大得很。大秦线修起来以后，煤源一定要落实。如果菏泽铁路也能用大马力机车，晋东南的煤就可以大搞一下。

运输这么紧，铁路又不是一下子能修起来，比较快的办法是进口大马力机车和国内增产车辆。为什么大家搞汽车的劲头那么大，搞机车不积极？是不是价格问题？下决心把车辆价格提高，让生产厂有利可图。现在有些军工厂、机械厂没事干，机车车辆提价以后，它们有利可图，是可以干的。这比进口机车车辆合算，而且投入使用后，投资很快可以收回来。提高价格后买车辆多花的钱，由财政部补，从铁道部上交利润中扣。请财政部搞个政策。

十、关于公路建设

当前，公路拥挤现象非常严重，大马车、小马车、小四轮、拖拉机、大汽车、小汽车，六七种车拥在一条道上。要有个管制办法。比如搞单行线、分快慢车道。紧张路段，要辟个便道，让慢车下公路。也可以规定白天一个方向，晚上一个方向。特别繁忙的路段，要设公路警察。当然，根本的是要修公路。明年下决心，铁路短途货运，每吨公里加价四分，短途客票价也相应提高，使用户感到不合算，不如用汽车。这样，汽车增多，公路运输就会发展起来，铁路运输也就缓和了。

十一、关于港口建设和沿海运输

我国海岸线长，不论从国内来说，还是对外开放来说，港口都是个大问题。沿海港口建设，没有一个长远规划，五年、五年地搞，不行。要有一个长远的到两千年或更长一些的部署。“七五”计划和长远规划要研究这个问题。

过去沿海搞煤码头，是为了出口煤炭。现在看来，煤炭出口量不可能很大。秦皇岛、石臼所的码头都有一个从对外转为对内的问题。也不要再搞二十万吨级大码头了，可以采取过驳的办法。

港口建设，没有点办法，光靠国家投资不行。沿海港口，可以一吨货物收两元过港费，用于码头建设，使码头建设有一个固定财源，长年累月，“驴打滚”。

长江口的港口问题要论证一下，北仑港、张家港、南通港、黄浦港都要论证。罗泾港是洼地，建港投资很大，不少人认为不合算，建张家港比罗泾港投资少。建不建罗泾港，交通部要从全局出发考虑。黄浦港搞一亿吨差不多了。长江口搞一些专业码头，我赞成。

有同志建议开辟从南到北的海上运粮通道。这是一个大问题，“七五”计划要考虑。从长远看，北方是玉米带，南方需要玉米作饲料。要研究搞一条海上运粮通道，从北往南运玉米，从南往北运大米。现在吉林积压玉米二百亿斤，压一年一斤粮亏三分，压三年就报废，请赵维臣同志重点帮助吉林缓解缓解。

十二、关于航空

民航机场建设，应尽量利用现有机场扩建，军民合用。民航买飞机，原定利用结存外汇，现在外汇平衡较紧，除已签协定的以外，不足部分向中国银行贷款，国家拨给贴息的外汇定额。

十三、关于大家办原材料工业

发展原材料的方针，除国家支持一部分外，要让大家去搞。要调动一切积极性，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国内的国外的，国内各个方面的，打破资源垄断和行业部门界限，让大家办原材料。

过去对原材料工业统得太死，都是指令性指标，办起来也没有利。要放开，让大家办，农民办、企业办、省市办、部门办。此路一开，一些行业就打开了。近几年发展原材料有两条经验：一条是让大家搞，一条是要给利。有了这两条，大家才去办，看上去很难解决的事情都可以解决了。煤炭为什么活了，就是因为放开了。现在煤炭打开了，建筑材料打开了，铁矿也打开了。

要充分利用中国地大物博和农民的优势。中国很多地方有“鸡窝”矿，矿很小，但品位不低，国家搞不合算，可以让农民搞。辽宁、四川、西昌都有小铁

矿，可以让群众搞。农民去开矿不一定就是破坏资源，部和公司还可以指导。过去对这个问题不那么自觉，现在回过来看，应该让大家来搞，要有计划地搞，要很好研究由老百姓开铁矿、磷矿、有色金属矿的问题。化工部也要着眼全国，让大家搞化工，不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是你化工部的。煤炭、冶金部门都可以搞化工。计委牵头研究一下原材料的政策。

开矿、筑路，这是使农村多余劳力不向城市挤的一个很大出路。大同、太行山地区的农民开煤矿，河北迁安一带的农民开铁矿，由小到大，逐步扩大，投资比国家搞少得多，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沿海交通方便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农民，可以像现在这样发展社队工业。内地相当一部分农民要搞矿山，搞建筑，建小电站，修公路等。这样，国家节省了投资，农民富起来了，第三产业也发展起来了，农民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过去农民“以粮为纲”，只能国家搞矿，搞死了。今后要分工分业，适合发展轻工的发展轻工，宜于搞矿山的搞矿山，有的可以搞养殖业、搞畜牧业。

要大家办原材料，除主管部门不要过多干预外，还要给利，就是要在价格上放开。现在原材料价格太便宜，既不利于原材料工业的发展，也不利于促进加工工业的技术改造。要把原材料价格搞活，老产品不动，新产品提价，促使企业改进产品工艺，搞技术改造。要实行两种价格，现有的基数按平价，新增加的提高价格。价格提高后，农民、企业、地方办原材料的，可以分材料或分钱，这样，他们就会搞原材料。国家就可以把钱集中用在发展原材料的加工和提高质量上。

要算个账，究竟是用人民币向农民高价买原材料合算，还是用外汇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合算。山西、贵州很多小铁矿附近有煤矿，可以对这些小厂进行技术改造，只要比进口合算就可以让他生产，这比运煤运矿出来合算。黄金也是这样，发动老百姓去搞。

十四、关于综合利用

要发展综合利用。现在国内自己搞原材料就不能加价，进口却可以补贴。这不利于综合利用和原材料工业发展。所以，对搞综合利用的，要优惠。只要对本行业外的多种资源进行利用，其产品价格可以提高。这样煤矿就不会采煤弃硫，冶金焦炉也就会回收焦化产品了。

现在建材局支持各部门搞建材，而不是都统到它那里，不让别人搞。化工部门也应当这样。很多部门搞综合利用，都有化工问题，要支持有条件的部门、地区、企业都来搞化工。化工部可以同冶金部签个协议，要冶金部搞化工。同样，非冶金部门也可以搞钢铁。

要专门研究从国内废旧设备中扩大废钢来源。国内就有很多旧船不应再用，还有旧拖拉机、积压的钢材，都可以利用。特别是旧设备，要规定哪些不能再用，作为废钢重新冶炼。利用得好，可以少进口废钢。这几年节约能源有成效，但原材料节约成绩不大，要很好研究如何节约原材料。大企业吃干榨尽，综合利

用，很有潜力。过去一直说要搞综合利用，由于条块限制，加上价格低，就是搞不起来。现在一是打破条条，二是打破块块，三是企业有自主权，有利于搞综合利用了。搞计划外的非本行业产品的综合利用，其产品企业可以自销卖高价，利益归己。企业搞余热发电，水电部搞代理，收手续费，这样，企业都去搞了。

十五、关于协作问题

什么都由国家包下来不行，要采取合股的办法。国家倡议，吸收地方资金去搞。解决“东西”关系问题，全靠国家也不行。东部需要资源，西部需要资金，可由国家加以组织，互相协作。还有一个内外关系问题，企业生产有潜力，别的地方来投资，要允许分享成果。

十六、关于外汇、外贸

对外开放，扩大引进，可以加快经济发展，但要有外汇，否则快不了。利用外资，要还外汇。借外债也要还。扩大消费，如果外汇多，也不可怕。所以关键是外汇，要培养创汇能力。这要作为一个大问题来研究。“六五”计划注重调整，前几年外汇有节余，所以大家脑子里没有外汇的问题。现在搞“七五”计划，如果没有扎实有力可靠的外汇基础，其他方面很难立论。

“七五”计划，焦点恐怕是出口创汇问题。今后五年，如何从我国实际出发，从国际市场出发，使外贸真正能立于不败之地。多搞点外汇，这是很重要的课题。要从政策上下功夫。要发挥我国的优势，采取措施，以我之长补我之短。如果设想一九九〇年我国外债余额三百亿美元，只要一年能出口收汇五百亿美元，按百分之十五计算，能还本付息七十五亿美元，就可支持下来，关键在于那时能否一年出口五百亿美元。

开放，有两重意义，不仅引进，还要有出去。光有进来，没有出去不行。要多出口，多换汇，出口要从国际市场需要出发，要考虑什么最赚钱就出口什么。要解决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和花色品种问题，还要发展旅游。

要研究进口，研究进口商品的结构，哪些东西可以多进口，哪些可以少进口，哪些现在进口将来不再进口。有些东西如钢材、木材势必扩大进口，但有些东西要减少进口。还要很好研究大量进口的东西如何替代。比如，与其大量进口钢材，不如多进口矿石、钢坯，因为搞后头的工序，利用外资比较容易。又如，进口单体自己搞抽丝，可以省很多钱，因为石化的裂解部分投资很大，但产值较低，国内搞后头的，技术引进也比较容易，现在国外很多闲置能力，我国的原油掉头后到国外加工，这比全部进口长丝纤维合算得多。有人说这是搞“无米之炊”，但比全部进口“大米饭”省钱。要通过利用结余外汇，培植增加外汇的能力。手中还是要有点外汇，如果外汇很少甚至没有，人家就不借钱给你了。

十七、关于消费基金和工资

“七五”期间消费基金的估计可能小了。

对消费基金问题，要用新的观点来研究，否则很多问题不好解决。这几年，消费基金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所以没有发生大的问题，是因为多年没有动工资，这带有还账性质，今后几年消费基金的增长估计还会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也可能是正常的，当然不能长期下去。现在企业劳动生产率不反映经济效益，因为劳动生产率是以产值计算而不是以上交利税来计算的。例如有的工厂，产值增长不多，劳动生产率就不高，但利税增长却较多。现在农村搞活了，小企业搞活了，收入都上去了。如果大企业内部搞活了，经济效益就可以提高，工资也可以增加。我们三十多年铺了个大摊子，但工资水平很低。现在还了账，进入了挖浮财阶段。动员挖浮财阶段就可以提点工资，过几年再控制工资。这条路子可能会出风险、出漏洞，但能解决很多问题。工资高了，物价改革也好办。我们如果不把劲用在降低原材料、燃料消耗方面，光把劲用在控制消费基金，这不是高明之策。还是要通过搞活企业，提高效益，增加职工工资。

对工资问题，现在既要承认机关、教师等人员比较苦，又要看到目前财政有困难。等国家富了，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提高收入，必须先从农民、工人搞起，从小企业、大企业搞起。它们搞好了，机关才能提高，这叫后天下之乐而乐。

给小学教师增加工资，学校做团的工作的人也要增加，人事干部、事务人员也要加，每人轮一圈。小学要加，中学要加，大学、机关都要加。这样，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工资差距就拉不开，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十八、关于人才流动

现在大企业知识分子工资低，人才外流，这样冲一冲有好处，可以使大企业知道知识分子可贵，工人也就认识到知识分子重要了。不冲一下，知识分子工资提高不了。要造成一种形势，才能解决问题。现在先让他跑一些，然后国家再来解决。现在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有些问题是很不合理的，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当然，不能认为这就是方向、是合理。制止企业人才外流，可以采取收所得税的办法。国家培养的技术人员，到别的单位去，超过原工资水平的收入要征收工资所得税，同时，要半年前提出离职报告，办离职手续。不能要走就走，不能停薪留职。

十九、关于吃、穿、用问题

吃穿用的问题关系到我国的长期决策。对这个问题，无论是“七五”时期还是到二○○○年，都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搞清楚。

世界银行认为我国从食物摄取的热量，已经达到世界中上等水平，问题是动物性蛋白质少。我们的食物构成必须改变，但要研究一下食物构成改变到什么程度才适量。不要把食物的胃口吊上去，吊上去就不容易下来。苏联人均占有粮食一千五百斤，还要进口粮食。我们人均粮食八百斤，还可以出口粮食，主要原因是食物构成不同。中国以素食为主，是长期形成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我国耕地少，人口还要增加。世界银行说，中国动物性蛋白质比重达到百分之十五就要进口粮食了。现在粮食多了，应该转化，但转化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再转了。一九九〇年动物性蛋白质比重要达到百分之十，算过账没有？要研究一下食物的合理配方，不要单纯吃大米。要搞个专门机构，研究合理的食物构成，搞点材料，让中央领导知道。这既是一个宏观问题，也是一个微观问题，决策不当就是一个大包袱，因此决策要适当。

啤酒和饮料生产。一九九〇年啤酒消费量平均每人十斤，比现御曾加五斤，肯定不够。要作点典型调查和研究，对农村人口的啤酒消费量要估计够。

要多搞饮料，这是我们的优势。山里野东西多，山上不宜种粮食，可以种水果，搞饮料加工。轻工业部对发展饮料要有政策。对各地的饮料，全国开个会鉴定一下，选择几个有发展前途的好品种，大批量生产，占领市场，指导消费，不要各搞各的，普遍发展。这是一个方针问题，不仅是五年的问题，也是二○○○年的问题。

穿的问题，呢绒不应该提倡纯毛的，我们没有这么多的羊毛。要限制纯毛织物生产，要提高价格。应该向混纺呢绒发展。

空调器现在要作为奢侈品，不能多搞，要征收奢侈品税，提高销售价格。进口也要少进，要加税。凡是耗电大的奢侈品要限制，若干年内不能普遍进入家庭。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等一般消费品，价格已经很高了，不要再加价了。

二十、关于第三产业

搞活第三产业意义很大。我们不仅要为第三产业鸣锣开道，还要开绿灯。明年对发展第三产业要采取措施，放开价格。要靠大家办第三产业，企业可以搞，农民可以集资搞，国家也要搞。这样，就业好办了，社会化程度也就提高了。

二十一、关于价格

消费品要实行质量差价，生产资料价格也要逐步放开。计委要逐步减少计划分配的部分，包括基本建设用的材料。要实行两种渠道，两种价格。一是计划调拨，一是市场调节。这样做以后，全国的价格情况是：农产品价格放开，生产资料价格放活，消费品搞质量差价。价格这样放开后，利润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可以增加，工资也增多。一部分生产资料涨价以后，对基本建设、重点建设，无非

一是多拨一点钱，二是少搞一点。

两种价格要坚定不移搞下去。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旧模式向新模式过渡中，一个重要特点是，两种价格并存，逐步向一种价格过渡。这样搞，有副作用，毛病、漏洞不少，但好处很大。人为地来确定价格的做法不行，一是不能正确定价，二是连锁反应较大。所以，价格还是走农村的路子，世界银行也说这可能是一个好办法。两种价格并存，容易出现投机倒把，要加强管理，搞个管理制度。

实行两种价格，对各个企业的负担要平均。老企业用平价油，新企业用高价油，这样老企业即使不进步也有利润，新企业负担却很重。对此石化公司要在内部加以调剂。计委对生产原材料和负担国家指令性调拨任务的直供厂，按定的基数供应平价油，要开出单子，并逐年按照一定比例加以调整。

二十二、关于财政

“七五”计划不能打财政赤字。解决的办法就是借外债和借内债，加强税收的征管工作，有些财政支出甩出去，由企事业单位自收自支，自求平衡。至少在一九八七年应该实现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

借债主要是靠发国库券。可以考虑一律按工资百分之十购买国库券，发工资时扣，像长期储蓄一样，到期偿还。这样硬性摊派的办法名声可能不太好，但国家能得到实惠。开始可能要挨点骂，但没什么危险。对农村如何购买国库券也要研究一个办法。将来立一个法，这就是中国的办法。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城市工资总额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到一九九〇年，国库券发行能不能达到五百亿元，最少三百亿元如何？

关于征收职工个人所得税问题。不能全面开征，可以把起征点提高一些，按三百元、四百元和五百元三个等级实行累进征收。这样，面会小一些。先把税种建立起来。起征点高一些，可以减少广大职工的火气。

今后财政支出中，要定出各项开支的比例，如基建占多少，国防费占多少，行政费占多少，教育经费占多少，援外占多少，等等，不能要一点给一点。在国外，预算一经通过，不再追加，要钱下年再说。

国防费要搞固定比例，不能年年批。军委的意见要求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我原则上赞成，你们研究一下。

二十三、关于信贷

消费基金失控的提法可以再研究。是不是可以这么讲，一九八四年，由于工资要改革，各地区、部门和企业纷纷增加消费基金数额（包括突击提职提级）。由于信贷体制要实行“实存实贷”，各专业银行和地方银行都纷纷争贷款基数。这

两条是非正常发行和非正常增加贷款的原因。工资总额和贷款，以什么时候作为基数，将来研究时，可以考虑用一九八三年的。

对于去年票子多，要作分析，不是普遍的多，主要多在一部分地区，主要多在广东和江苏等省。

可以买点黄金、减少外汇储备。如果看准了美元要贬、黄金要涨，可以买进，每盎司三百美元以下就可以买。

陈云同志对外汇库存讲了两点意见：一是不要有点外汇库存就烧腰包，我们有一、二百亿美元的库存也不算多；二是外汇库存不要少于连信用证都开不出去。要正确理解陈云同志的意见。外汇库存不要增加了，只要进口平衡就可以，就没有风险。

非贸易外汇，我们要好好研究，这方面有潜力。对出国用汇要实行定额控制，没有钱就不出去，或者拖到下一年再出去。农民旅游不能搞了，没有外汇给他。要由财政部搞个办法。

世界银行经济考察报告对我们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二○○○年工农业翻两番可以做到，但能源不够；第二，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资金市场，中国的重复建设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资金市场。有商品市场就必须有资金市场；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光抓工农业实物生产，不抓第三产业，结果工农业生产的效率是低的。要提高工农业的生产效率，必须发展第三产业。

借鉴世界银行的意见，我们要研究中国的资金市场。我们的预算外资金增加很快，“七五”期间将要超过国家预算内的资金，再加上银行的信贷资金、农村资金和城市居民资金，社会的资金量很大。通过资金市场，发行股票，发行债券等办法，把资金的横向联系搞起来。

“七五”信贷计划的根本问题，要考虑体制改革。改革就是要研究资金市场，研究增加储蓄，研究怎样把呆滞的资金集中上来。居民手上有八百亿元现金，吸收一半就是四百亿元，通过银行媒介使之用于生产建设。

我们的商品经济不发达，银行不发达，结算方式很落后，存取款不方便。要用发达的银行促商品经济的发展。信用卡能不能在中国搞？“七五”期间银行工作要跟上。

要研究怎样能利用香港资金。可以把我们在香港的银行同其他银行联合起来，搞一个财团，到国内来投资。要坚决把那些投资少、见效快、有偿还能力的项目，转到用香港商业信贷上去，把沿海城市的利用外资项目转到商业贷款，在税收上给予照顾。把这一批转出去，就可以把那些优惠贷款转用到周期长、赢利少而又急需的项目上去。请计委和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这个路子一打开，我们的路子就宽了。

二十四、关于国营企业管理体制

世界银行调查报告中，提出国营工厂实行社会主义股份制。中国国营企业应

该实行多种国家机构所有制，国家机构组成董事会，这样可以打破条条块块。我觉得，社会主义机构股份所有制加董事会也是个办法。私人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国家可以收买股份，插进去。

二十五、关于计划方法

我们的计划方法要改。我们现在的理论是僵死的，经验是旧的。搞“七五”计划纲要要按照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围绕开放、改革、搞活，用开拓的精神去研究。这一轮汇报总的感觉开拓精神不够，提出的问题太少，新的构思太少，思路太窄。世界银行研究问题的方法，是宏观的、内在联系的，写的东西一看就清楚了。要研究他们的方法。他们先是收集材料，回去写，写完后再来考察，还有很多计算公式。我们的计划方法都是一些经验方法，我们的知识也不够。要组织几个人就世界银行报告写出研究意见。一是分析是否符合中国情况，二对其中几种建议，我们怎么选择。此事，由马洪、房维中，再加几个青年人组织起草小组，写出报告。

对南朝鲜要好好研究，他们的计划比例较大，控制更多，比起日本，对我们更有参考价值。对台湾也要搜集材料，注意研究。还有新加坡的做法，也要研究。

还可以研究一下里根的经济政策。里根的办法是这边减税，那边用高利率，要找人研究一下美国的高利率经济。

对国内，我们要研究江苏的经验。江苏的经验是国家对地方实行包干以后，地方活了，省的财政收入从一九七六年的四十四亿元增加到一九八五年计划的八十四亿五千万元，八年翻了一番。江苏的办法，主要是发展集体经济。集体企业除上交国家税收以外，百分之五十的利润留给企业，用于发展经济。我们要给地方活力，竭泽而渔非英明之策和治国之道。

搞一个社会保障方案很重要，但是不能由一个部门来搞。根据经验，重大问题都不能由一个部门来搞，要实行主管部门、跨部门单位和理论界结合起来的办法搞。

二○○○年的目标，用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比用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好。现在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用工农业总产值这个指标外，别的国家都用国民生产总值。外国人说，只讲工农业总产值不讲国民生产总值，不搞第三产业，是效率低的表现。有人建议，上海、天津、北京和其它大城市，不要用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指标，否则给自己套上了紧箍咒。我们的一些大城市，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比例可以低于全国，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比例一定要高于全国。

多年来，我们是产值高，国民收入少。据世界银行调查报告，如果使国民收入翻两番，积累率在百分之二十六就够了。“七五”计划如果积累率达百分之三十，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超过两番。我们可以按照世界银行报告的路子，组织一下，以计委为中心，好好地讨论讨论，先搞几个问题，同他们研究。

搞“七五”计划，计委是个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也是一个方面。四月下旬、五月上旬再听一次计委总的思路汇报（包括企业放活后计划工作怎么个搞法），把矛盾摆一摆，议它两三天，把思路定了，各部门搞各部门的。再用两个月的时间汇总研究，到七月拿出“七五”计划纲要。要吸收青年人参加进来。

接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第二期学员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六日

（在谈到工厂的工资基金如何与经济效益挂钩的问题时）还是按利改税的办法，先核定工资总额基数和上缴税利挂钩的比例，一个厂一个办法，先分到各部门各地区，再分到各厂。要照顾原来的基础，有的基数高，有的基数低，有的潜力大，有的潜力小，当然就会不合理，以后可以再调整。到底按什么比例挂钩，这是一个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现在设想：上交税利增加百分之一，工资总额增加百分之零点七。各厂的比例不一样，有的可能零点三、零点四、零点五，有的零点七还不行，因为先进的企业原来水平就比较高，增长很困难。但一下子要求完全合理也不可能。第一步先通过这一改革把工资制度推到一个新的轨道上，然后在这个轨道上逐步调整，逐步完善。利改税就是这样。利改税第二步也是有问题的，对部分企业实行调节税，越是先进、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调节税越多，不这样，国家财政吃不消。后进企业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时，国家暂时先让一块。现在看，先进企业目前留利水平不低，但今后潜力小，后进企业留利水平可能比先进企业增长快。将来的趋势是逐步降低先进企业的调节税，逐步调高后进企业的调节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第一步走上一个新的轨道，但照顾原来的基数，先进的多负担，后进的留的余地比较大，随着差距的缩小，逐步进行调整。

（有的同志提出企业工资改革是否控制得住时）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搞来搞去，还是“大锅饭”。效益好的企业靠自己的经济效益解决工资问题，这是正当的。听说有一些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一方面挪用发展基金、生产基金发奖金；另一方面又向银行贷款搞生产，等于用贷款发工资。这种倾向必须制止。

（在谈到今年的改革如何搞时）今年怎么搞法，我在元旦政协座谈会上讲了。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国内外绝大部分评论都是肯定的。看来这个《决定》作为一种构思，作为一种蓝图，作为一种大的方向、政策，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把这个《决定》付诸实施，变成具体的政策、步骤，还需要时间，需要不断地探索，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有了大的框框，有了方向，一边实践，一边总结，就可以走出一条路子来。要采取这样一个原则：从大的方面

讲，这是我们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要有信心，坚定不移。但具体步骤还要谨慎，一步一步地走，一边走一边看，这样走上几步之后，就会更顺利一些。

中央《决定》的出发点、落脚点、主要目标，就是把企业搞活。企业活了，生产活了，整个社会也就活了。解决企业活力，第一个就碰上计划体制问题。计划体制问题不改革，企业不可能活，这和农村有很大不同。严格地讲，农村历来是指导性计划，只有收购计划是指令性计划。但在城市里，特别是骨干企业，就涉及到计划体制问题。今后不能搞那么多指令性计划，即使是指令性计划，也必须给企业留下余地。计划体制一变，就发生一个问题，过去靠指令性计划管企业，今后靠什么引导企业？这就要发挥价格的作用。目前价格不合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多年积累的问题，动小了不解决问题，动大了社会承受不了。因此，城市改革只能一步一步走，想一个早上搞一个方案，宣布全国怎么搞，这在中国行不通。怎么走法呢？首先要有一个轻重缓急，先搞什么，后搞什么，要先易后难。我们这几年的改革实际上是这样走过来的。改革从农村先开始，农村的改革牵制比较少。农村除农产品价格外，主要是农民自己内部的问题。承包是农民内部的承包，国家对农民的关系就是农产品价格问题。社队、乡镇企业也比较简单，城市集体所有制比较好办，小企业也比较好办，现在这些都活起来了。商品也是这样，农副产品、小商品也活了。对大企业、骨干企业、大商品的这部分改革放在了后边，如果对大企业也采取像小企业一样的办法，国家吃不消，要创造条件逐步解决。错综复杂的旧体制只能逐步解决。再者，改革不能只搞某一个方面，改一个方面，不搞另一个方面，必须互相适应，因为它是互相牵制的，不能孤立地搞。每一年搞些什么，什么事能搞到什么程度，既要分步骤走，有个轻重缓急，又要考虑到连锁反应，尽可能地逐步配套、小配套。整个改革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从某一个地方开始，其他方面同步配上套，然后再前进一步，再进一步配套，相互配套，把纵深和横向结合起来。改革只能逐步进行，不仅要看需要，还要看可能。提出需要和可能，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经验，还不具备那样的经验，一下子规定得很细，设想今年怎么搞，明年怎么搞，大后年怎么搞，我看不具备条件；二是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问题。三中全会《决议》大的轮廓有了，现在是逐步实行的问题。逐步实行，就要分轻重缓急，逐步配套。

一九八五年价格问题、工资问题都要迈出一步，但总的看来不可能迈大步，只能迈小步。要迈步，就要迈步前充分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尽可能事先设点防线。物价要迈出一步，物价迈多大，要很好研究，物价迈出后会带来什么问题，要有预防措施。工资也一样。今年希望迈出不大的一步，但是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务求必胜，一定要办成功。今明两年体制改革是重要的两年，一定要迈出重要的步子。只考虑到困难，就会犹豫不决，丧失时机。这两年搞成功了，我们就有了经验，社会的承受能力也会增强，以后就可能加快改革的步伐。用五年左右时间使《决定》的原则逐步实行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今明两年。为使这两年的改革既迈出重要的步子，又能取得成功，其它方面要为它创造条件，包括货币

发行、建设规模，甚至包括工农业增长速度问题。在改革中间，为了使改革不发生问题，不一定在这两年把速度搞得很快。为了把经济理顺，必要时要让点路。

希望体改研究班第二期学员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后，积极探索，多提供一些经验，有什么建议和想法，可以通过通信方式与体改委建立联系。

放开农产品价格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红旗》杂志曾予转载。

农业要有一个协调的发展

当前农业生产总的形势是好的，粮棉等各种作物连年增产，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全国农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比如现在粮食和棉花都大增产，出现了卖粮难、卖棉难的现象，而某些社会需要的农副产品又发展不快，不能满足需要。这说明，农业的产业结构还不那么合理，农业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不很协调，农业生产同社会的需求还不相适应。

这几年粮食和棉花生产发展迅速，预计一九八四年粮食将达到八千亿斤，棉花将达到一点一亿担。当然，这不是说已经多得不得了，而是在低消费水平下一时超过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种情况是我们原来所没有想到的。我们对农业结构的改变，对农业内部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对农业应当逐步地由量到质的转化，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及时跟上形势。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同我们的农业计划体制有很大的关系。过去在商品匮乏的时候，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产品统购包销，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农民用不着根据社会需要来安排生产；自上而下的生产计划和收购计划也很难订得准确，很难完全和及时反映市场的需要。

现在，农业生产已经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既然是商品经济，就得面向市场，考虑社会的需要。而旧的农业生产结构显然已经不相适应，这就要求适应商品经济的新形势来改变结构。农业内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内部的各品种之间，以及农业与畜牧业、林业、渔业之间，都有个调整的问题、协调发展的问题。我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调查时，就讲了这个观点，强调三角洲要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围绕出口的需要来改变农业的结构。不仅沿海地区农业结构要调整，现在全国农业战线都面临着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

农业只要按商品经济的原则去办，自然会形成不同的分工。像珠江三角洲和

长江三角洲，过去按照上面的计划指标，只是追求高产，不讲质量，不管销路如何。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就不愿意多种粮食了。佛山市就提出取消统购统销，采取农民交“代金”的办法，不交粮食。他们腾出田来种甘蔗、种花卉、种蔬菜、养鱼、种香蕉和其它水果，赚更多的钱。我国沿海地区发展食品工业，很有前途。港澳和国外市场需要什么品种、什么规格的商品，就生产什么，完全按国际市场的要求去办。像深圳光明华侨畜牧场，和外商合作，把产品质量搞好了，三年就占领了香港很大一部分鲜奶市场。广东、苏南出现的这种情况，在江西、湖南等内地省份就不会出现，他们的优势是生产粮食。还有些地方，适宜于发展林业、畜牧业，他们就搞这些，不一定要求粮食都要自给自足，更不要都去搞商品粮基地。沿海、内地、山区、丘陵，应该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发展优势产业，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交换，协调发展。此外，对一些农产品，还应当开辟新的应用领域。比如白薯干，加工成淀粉后可做成异构糖，经济价值很高。像皖北、豫东南，就可以保留种一些白薯，产量也高，收入也多。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广东、苏南商品经济发达，有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劳力都转入工副业和第三产业。而内地这个进程就慢得多。改变农业结构，需要掌握信息，提高技术，增加资金积累，进行人才培训，因此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应当从各方面去努力，加快推进这一过程。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是利国利民的措施。多年来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使农村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卡壳就卡在粮食问题上。现在粮食多起来了，各方面对农业的需求增多了，市场日益扩大，这是很好的时机。农业掉头比较快，只要因势利导，认真做好工作，几年就可以大见成效。

农产品的价格放开势在必行

调整农业结构，使农业本身协调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扩大市场调节，逐步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现在农产品多了，粮棉出现了暂时的相对过剩，具备了放开的条件。因此，增加市场调节部分，实行市场浮动价格，可以先从农村开始。农副产品，首先是鲜活商品、生猪、蔬菜可以有步骤地放开，粮、棉等作物也可以逐步放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进而把这个基本经验推广到工业、到城市。这次价格体系的改革，也要先从农业开始，从农副产品开始。这样就会注入新的活力，使农村经济更加活跃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搞好了，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价格放开，不等于国家不参加市场调节。对于粮、棉等大宗产品，国家对其大部分仍然按优待价收购。粮食就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收购一千五百亿斤至一千六百亿斤，超过部分实行市场价格，自由浮动。但低于统购价时，国家还是要按统购价收购，有多少收购多少。这就是保护价。这样，农民是“两头保险”。国家要参与市场调节，吞吐物

资，平抑物价，避免由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而造成价格的大起大跌，既保护生产者的利益，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粮食放开以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品种质量，市场价格会有升有降。如优质米的价格可能会上升，劣质米的价格可能会下降；产粮区的价格可能会下降，缺粮区的价格可能会上升。总的趋势可能往下浮动一些。猪肉、蔬菜、水产品逐步放开以后，可能一段时间价格要上涨。根据广东等地的经验，放开以后，开始涨一段，东西多了以后，价格就由上升逐步转向平稳。为了保证城市供应，有些生活必需品，如粮、油、猪肉，可以对定量部分实行平价供应；对有些商品，国家参与市场调节，通过补贴经营环节，低价出售，使消费者利益不受损害，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放开以后有没有危险？会不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生猪、蔬菜、鲜活商品等放开以后，肯定会使农民得到好处，积极性大为提高。大家比较担心的是粮食，我看也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因为国家按优待价已经收购一千五百亿斤至一千六百亿斤，占了商品粮的大部分，而且这个政策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变。剩下的几百亿斤参加市场调节，只占一小部分，随行就市，市场价高就卖高价，市场价低就卖低价。所以，不能说这是“限购”，应当说这是放开。这样，种粮食多的地方，就不会愁粮食没有销路，谷贱伤农；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的地方，改种别的价值高的东西，也可以增加收入。国家按优待价收购总数不变，各地区之间有增有减，搞个“三年早知道”，便于及时安排。各省区之间还可以签订粮食的经济合同。这样可以各自发挥优势，改变结构，调整作物品种，改进农产品质量，活跃农村经济，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对国家、对农民都有好处。

国家当然要尽力帮助农业实现结构的改变，今年国家计划中，已经作了一些安排。实现农业结构的合理化，迎接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什么都想国家拿钱也不行。帮助农村，不仅是财政问题，归根到底，还有个货币投放的问题。这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所以，要通盘考虑。各地方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比如苏南、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一斤粮食，要补五分钱左右；少生产一斤粮食，就少补五分钱。那里的应变能力很强，只要一放开，农民会转得很快，改种别的作物。可以把他们那里减少的粮食收购任务，转到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去，发挥这些地区种粮食的优势。有些山区半山区很不适合种粮食，应当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种草植树。但这要有一个时期才有收益，而调进的粮食又要钱买，也得有个解决的办法。除了国家已经决定拿出一笔粮食、棉布、炸药，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发动群众修公路等外，还决定再拿出二、三百亿斤粮食，贷给山区、丘陵区，支持他们两三年，等他们经济上转过来以后归还。这样既解决了山区调整农业结构中的困难，又不增加贷款指标，同时也把仓库腾出来了，可以促使那些很不适合种粮食而又被迫种的地区，改种别的东西，换来个经济上的良性循环。问题比较大的是东北三省。那里主要是玉米多了。长期以来是东北玉米调关内，关内猪肉调东北，运输非常紧张。东北把粮食、猪肉放开以后，猪肉价格会上涨，农民感到卖猪比卖粮食合算，就会多养猪。过两三年猪多了，猪肉价格也会下降，使粮、猪的比价趋向合理。东北

农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有利自然条件，要大力养猪、养牛、养羊，使东北肉类能基本自给。

总之，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进行农业结构的调整、转化。门路是很多的，比如调整品种，劣质改优质，潜力就很大。优质米虽然产量低一些，经济价值却高得多，是合算的。要根据不同情况，找出办法，给以不同形式的支持。

进一步搞活农业的重要措施

把农副产品价格逐步放开，促进农业结构的改变，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是个很好的时机，如果不实行改革，仍按过去的老办法，统购包销，农民种什么就收购什么，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产需脱节，那就会给农民带来错误的信息。粮、棉等产品都已大量积压，还要全部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包下来收购，刺激农民大量去种植，结果又收不了那么多，或者收了以后压在仓库里，甚至露天堆放，内销也销不掉；有支付能力的国际市场也有限，出口又出不了那么多，那就会使损耗大量增加，造成社会的极大浪费，农民所投入的劳力、资金等于白花了，而且占用了国家许多资金，影响了资金的正常循环和周转，从全局来看是很不利的。现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要作具体分析。一般地说，农业增产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有好处。但并不等于增加得越多，对国家的经济循环越有利。相反，有些东西过多以后，既占用国家资金，造成浪费；又不利于促进农业结构朝合理的方向转变，实际是一盘死棋，不是活棋。所以，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全面衡量一下，还是改变统购包销的办法，把价格放开，利大于弊。从根本上讲，这是把农业进一步搞活的重要措施。这样做目前可能会遇到困难，但这是前进中的困难、转变中的困难，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全党要认识这个问题，也要使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认识这个问题，上下左右、群策群力去战胜困难，使农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起来说，当前农业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农业一定要按照商品生产的要求，搞好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产品是通过市场交换，使农民的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要引导农民关心市场变化，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安排生产，使生产和社会需求互相衔接。二是要把农副产品的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国家要运用经济手段和经济办法，参与市场调节，加强市场的管理和监督，以克服盲目性，引导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今天下午座谈会结束，耀邦同志、启立同志和国务院的一些同志都来了，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同志。我看这个会开得是好的。谷牧同志开始时的报告、同志们的发言、会议简报我看了，大家讲了许多好的意见。刚才谷牧同志就会议讨论的问题，需要重申的，需要特别注意的，又扼要地作了总结。我们实行对外开放，不仅是在特区、沿海港口城市，而且要进一步扩大到整个沿海地带，大家都拥护中央这个方针。对开放的范围、政策、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大家的意见都是比较一致的。除个别地方还有一些要求没有解决外，其他看法比较一致。所以我认为这次会议开得是好的。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

关于开放、改革的意义，这里不多讲了。外国人评论说，邓小平同志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叫开放、改革的道路。去年春天，胡耀邦同志提出，中国的四化，一靠改革，二靠开放。同年五月，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用了这个基调。改革和开放，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长期实行的重要方针。加快我国四化建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实行改革和开放。我们改革总是一天天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我们的开放也是地区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这是确定下来的国策。

改革和开放是分不开的。开放就是改革，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革。我们的改革实际上也是围绕着开放来进行的，特别是从包括对外和对内这两个方面开放的含义来讲更是如此。现在大家都喜欢用“封闭式”经济、“开放式”经济这些说法。我们的改革就是由过去的“封闭式”经济改为“开放式”经济，由对外封闭改为对外开放，由对内相互封锁改为对内相互开放。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不能闭关自守，就必然要开放，就必须改革过去的“封闭式”经济模式。所以，改革与开放是分不开的。

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大的方向定了，这条路子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可是究竟怎么走，具体怎么搞，老实讲我们还没有经验，还得通过实践，积累经验，

逐步完善，在实践中来发现和总结符合客观实际的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和具体做法。中国的改革大体上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我们的改革不是盲目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目的、有计划展开的。我们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的指导思想，有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规定了我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基本构思、总的方向和总的政策。说我们的改革不是盲目的，就在于我们总的设想有了，总的构思有了，总的蓝图有了，我们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也要看到，实现我们的构思、设想和蓝图，必须一步一步地实践和积累经验，一步一步地探索，这又规定了我们的改革必须是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第二，我们的改革既不是盲目的，也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由专家们先行设计一整套方案，然后大家在一个早晨步调一致地按此行动。这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且这样做，也不一定能成功。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对《决定》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一大创造，是一个很有胆量和勇气的《决定》。但是，小平同志同时说，要走一步看一步。既要有勇气做出关于中国的改革方向、改革蓝图的大胆的决定，又要在步骤上走一步看一步，避免大的失误、大的曲折。因此，在今年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我用了三句话来表达以上的思想：一句叫做“坚定不移”，这是说从战略上、从改革的总方向上，我们要坚定不移，不要犹豫徘徊。第二句叫“谨慎从事”，就是说在具体的行动、步骤上，要谨慎从事，不要鲁莽轻率。第三句叫“务求必胜”，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能允许出点小乱子，不能允许出大乱子。只能允许出那些可以及时调整的某些偏差，出了偏差有灵活反应，能及时地加以调整、纠正；而不能路已经走得相当偏了，问题已经相当多了，然后再来一次大的调整，出现一个大的曲折。我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央关于改革问题的战略和策略的指导思想。

在改革、开放上，如果出现一点问题就裹足不前，动动摇摇，是不对的。但是，在改革中不承认我们的经验不够，不承认我们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也是不对的。中央和国务院往往在一个时期，在改革和开放上，提出一些重大的设想、重大的政策或重大的部署，但在具体行动的时候又往往强调步骤、强调领导、强调有秩序地进行。这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是“雷声大、雨点小”，问题提得很高，步子不是很快。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去年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当时也有一些同志反映“不过瘾”。一说开放，大家都兴高采烈，都拥护，但是一谈到具体政策、具体步骤，同志们又觉得不那么过瘾。后来经过工作，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认识也一致了。这次也是这样的，我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调查时说，要使沿海大约两亿人口的地区形成一个从南到北的开放地带，设想讲得很大，但是具体做起来还是要先搞“小三角”，还是要由点到面，有步骤地进行。这样把脚站稳了，实际上以后的速度会加快。我们的国家总是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开放。

讲到改革和开放，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存在一种习惯作法，就是很喜欢一拥而上，一哄而起。要么不搞，要搞就一拥而上，一哄而起。这是我们多年来搞运动

的做法，好像成为习惯了。至今在经济工作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仍然受到这种习惯做法的影响。比如，在国际贸易上已经给外国人造成了这么一种印象，就是中国人很容易“刮风”，搞不清楚一个时期刮一个什么风。当然，这里也可能有经验不够、信息不灵的问题。确定要搞什么就大家都来搞，一说不搞大家都不搞，缺乏准确的信息和正常的做法，往往采取突击、“刮旋风”的办法。一九八二年日本报纸就报道中国生铁旋风，对中国各地竞相降价出口生铁很惊讶，一下日本的生铁都顶不住了，时隔不久又竞相进口。现在进口彩电也不得了，听说有人托驻日本大使馆买彩电，大使馆说很困难，因为我们进口太多了。还有进口汽车之风，进口电脑之风，进口化纤之风，外国人也摸不着底，不知中国今后又刮什么风。无论是国外市场还是国内市场，大宗商品突然增加很多、突然又下降很多的做法都是不适当的，要尽量地把它缓解一下。在今后若干年内，我们要增加进口些什么东西，也只能逐渐地增加。要出口些什么东西，也只能逐步增加，不然一下子拥到国际市场，价钱降得很低，对我们不利。现在很多事情我们都摸不清楚，今年怎样，明年怎样，国内市场怎样，国外市场怎样，若明若暗，不甚了了。这需要加强计划工作，加强调查和预测。经济工作是很复杂、很细致的，有它的特点和规律，需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搞，绝不是一哄而起所能奏效的。搞经济工作，“刮风”的办法是不行的。什么事一拥而上，一拥而下，肯定不会有好的效果。中国太大，如果每个地方少用一点，加到一起就节约很多；如果每个地方多用一些，加到一起就差额很多。如不注意，就往往使国际市场某些产品暴涨暴跌，对我们极为不利。从根本来讲，是我们没有经验。经过这两年，我们应当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这个问题。

以上讲了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问题。谷牧同志的讲话也好，工作部署也好，《纪要》也好，都是本着这么一个精神写的。这次开放的两个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应当根据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去办，才能办得好。

二、开放要由沿海到内地、由点到面逐步推进

作为开放地带、开放地区来讲，全国是从沿海到内地发展。当然内地也不是不开放，内地也可以出口、进口、引进技术，也可以搞合资经营、合作生产、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这都是开放。但从全国来看，作为开放地带，总的还是由沿海到内地，由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从沿海开放地带本身来看，我们现在的部署大体上是由南到北，一步步地走。从经济发展的水平看，从宏观上考虑，还是先南后北好一些。如果南北统统一起开，这又和刚才讲的指导思想不一致了。反正得有个步骤，分个先后，轻重缓急要排队。就全国而论，一个长江三角洲，一个珠江三角洲，还有一个闽南小三角，条件更为优越一些，可先走一步。这不是忽视胶东半岛的优势、辽东半岛的优势。但总得一步一步走，先开放这些地区，下一步再考虑胶东和辽东半岛。

内地也有这个问题。有些内地的同志认为，沿海本来条件就好，还要给他们

优惠的条件，而我们内地的条件本来就差，还不给优惠条件，所以内地也提出要开放。反正事情只能一步一步走。中国的事情要是大家都挤在一起搞，就搞不成了。对于尚未开放的地区来说，别人先开放一步，也正是为自己开放准备条件，积累经验。要是你开我也开，结果谁也开放不了，谁也迈不开步。所以还是由沿海到内地，由南到北，逐步推进。

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开放，也应该是由小到大，由点到面。我们确定要开放什么地方，步骤上也应该分细一点，多走几步。这对于改革和开放的健康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多分几个步骤，就可能顺利发展，而结果是加速了整个开放的进程、改革的进程。要是几步并一步，急于求成，结果反而快不了。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次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但是，你们回去以后，可能会遇到县里、乡里的同志思想不通。他们可能会说：“为什么让别的地方开放，而不让我们开放呢？”要把这个道理给他们讲清楚。我们既能在大的方针、政策上一致，又能在具体的步骤上取得一致，就能够战胜困难，取得新的胜利。

三、开放要有“进”有“出”

我们对两个三角洲、沿海地带，要给一些条件，给一些政策，使他们进一步开放。但进一步开放，绝不能理解为只是“进”，只是把国外的东西引进来。开放是有进有出，既要“进”，同时要“出”，要扩大出口。而且，从全国对沿海开放地区的要求来说，今后必须努力做到出大于进。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开放？一方面为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利用一部分外资；另方面就是要利用开放地区的有利条件，通过改革和开放，能够多创汇，使我国的产品更多地打入国际市场。从目前的需要来看，从长远来看，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都有这样一个重要任务，为国家多出口、多创汇。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资金来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而运用外国的技术和资金，需要用外汇去偿还。这就有一个外汇支付能力、支付手段问题。因此，我们应利用开放之机，努力提高自己外汇支付的能力。当然，一开始就要求开放城市和开放港口一下创多少外汇，节余多少外汇上交给国家，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他们引进一些设备和技术，进口一些材料，还需要花一定的外汇。但是，总的来讲，对这些地区的要求不仅是个外汇平衡的问题。我在珠江和长江三角洲讲过，这些地区从长期来看外汇平衡是个大问题。你们的建设速度也可以加快，设备也可以引进来，外资也可以借得到，材料也可以买进来，关键是外汇怎么办？当前在珠江三角洲，这个问题很突出。长江三角洲和所有开放的城市、港口、地区都有类似问题。要进一步加快引进，解决外汇问题就更加迫切。沿海开放地带的任务，将来绝不能仅仅是使本地区的外汇平衡，还必须为国家多创外汇。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要内地一下子多创汇，是有困难的；相比之下，沿海开放地带创汇能力更强一些，应当多担负任务。不然，我们国家的外汇靠哪

里？要看到，外汇困难是长期的，现在国家积存了一些外汇是暂时的现象。不能因为存了这点外汇，就误认为我们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外汇问题。我们国家外汇紧缺，努力创汇，争取外汇平衡是个长时期的任务。

大家都知道，国际金融市场有一个特点，你越是有外汇，他越是争着借给你；而当他发现你外汇紧缺，急迫需要借债时，他反而不借了，或借贷条件很苛刻。直到今天，外国还是想借钱给我们，因为中国的黄金储备和外汇积存还有相当数量。但是，一旦我们的外汇结存下降到正常储备的警戒线以下的时候，借款的条件就会发生变化。巴西就是一个例子。几年以前，所有的国际金融组织都借钱给他，但是到前年就谁都不借给他钱了，都上门逼债，因为知道他不行了。墨西哥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特别应该懂得我们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情况不同。美国等国际金融资本同拉丁美洲有个经济共存的关系，所以墨西哥、巴西发生债务危机，美国会救它；中国要是发生那种情况，他是不会救你的，我们也不能指望靠他救。所以我说，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严重的任务，就是利用开放和改革之机，增强创汇能力，扩大出口，提高出口创汇率；不能光考虑进，必须同时考虑出，有进有出，开放才能继续下去。从长远讲，沿海地带必须为国家提供外汇。如果沿海地区开放后只有用汇的本领，而没有创汇的本领，那就会走不通，就不可能出现经济上的良性循环。你们的任务是要多创外汇。至于怎么搞，你们回去以后好好研究一下，这是硬功夫、苦功夫、真功夫。要按小平同志讲的，一项一项地下功夫搞好，要认真落实。不要光挂在嘴上，不见行动。

上次我在佛山市讲过，你们现在的情况虽然很好，去年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二，老百姓收入也大幅度增加，如果你不解决出口问题，再搞三年就玩不转。不能光靠用人民币抢购美元，抢来抢去，人民币就会贬值，外汇也增多不了。现在外汇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大家高价抢购外汇，造成人民币贬值。本来一九八四年我们外汇创汇额是不错的，在美元坚挺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约是三点五元人民币换一美元。但是在国内一些地方，是用五元人民币换一美元，甚至更高。这反映外汇紧缺，花外汇的人多，创外汇的人少。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不仅开放不能持久，而且发展下去会冲击人民币，把国内金融搞乱。所以，一定要给开放地区的同志们讲清楚，中央之所以把一些地区提前列为开放地区，就是为了让你们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多出口、多创汇，为国家作出贡献。不能一说开放就要国家多拨外汇，多花国家的外汇，而不把多创汇放在议事日程上。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有条件开放，我们就开放不起。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在经济特区，在开放城市以及开放地带，都必须十分明确。当然，实现这个要求要有个过程，但是必须有这个明确的指导思想。

四、改革开放与加强管理

现在到了把这个问题真正摆到议事日程的时候了。我国过去的体制是高度集中，统得过多，管得过死。这种管理体制，必须坚决破除。不破，就无所谓改

革；不破，就谈不上开放；不破，也绝不能搞活。但改革也好，开放也好，搞活以后必须有相应的、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不能认为一开放就不要管理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开放，越是改革，就越要有一套适应新形势的、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非常薄弱。这是一个新课题。我们讲加强管理，也绝不是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采取旧的办法，而是要学会和加强开放中的管理，改革中的管理。资本主义国家是开放的，香港是最开放的，但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而我们现在与改革、开放相配套的管理却非常薄弱。旧的管理办法不适用了，现在还要继续破。要改革，要搞活，就要继续破除同改革、开放相矛盾的旧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建立一套适应改革和开放的新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小平同志经常讲我们要有两手。一方面，我们必须开放，不要怕开放以后，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要因噎废食。当然，好的东西进来，坏的东西也可能进来。因此，只有开放这一面还不够，还要有另一手对付这些坏东西进来。他说一个整党，一个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搞好了能保证开放顺利进行，即使出点问题，我们也能及时处理，不使蔓延开来。这两个方面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不是矛盾的。我也很赞同广东同志在会上讲的“加强管理、强化管理”这句话。这是指导开放、促进开放、保证开放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越加强管理，就越敢开放。比如深圳的二线不搞起来，你敢开那么大吗？现在之所以在有些地方不敢放那么宽，就是因为二线跟不上去，就是因为管理问题没有解决好。加强管理，才能保证开放健康发展，使开放不会夭折。

究竟怎样加强管理，要下功夫研究、探索。将来在这方面，我们要立法，要有些规章制度。特别重要的是执法要严，有了制度不执行等于是空的。一旦有了规矩，有了法律，执行就要严格。当然我们要把界限划清。过去也搞了一些错案子，不该打击的也打击了。但也不能因为出了一些问题，就不敢讲加强管理了，这一点我们思想上要明确。至于说管理制度怎么定，立法怎么搞，什么时候才能健全起来，还要有个过程，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

另外，炒卖外汇的问题，一定要引起注意。现在仅仅开放了几个经济特区，加上几个沿海城市，但是炒卖外汇的问题，已经对我们国内金融产生很大的干扰。对此，我们也应当有两手：一是坚决搞好开放，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一是同炒卖外汇的投机倒把行为作斗争，要有一套有力的办法和措施。现在这股风已经刮到北京、上海来了。北京有些商店、出租汽车和饭店，给外汇券是一种脸色，不给外汇券马上又是另外一种脸色。这种情况广东早已有了。将来开放的地区越来越多，同国际上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广泛，估计开放以后突出的问题，就是外汇问题。在外汇平衡上不能出大的问题，不能没有支付能力。与此相联系的就是会出现倒买倒卖外汇，在国内相当一个范围内会形成两种货币，其结果就会冲击人民币，造成人民币不断贬值。这样下去，对国内经济建设是非常不利的。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要有一套很严格的对付办法。炒卖外汇的现象是会长期存在的。但要严厉地取缔，这样才能控制得住。绝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为是难免的，任其蔓延。要是任其发展下去，到最后就会不可收拾。所以必须从严

管理，坚决刹住这股歪风，不管是什么人，坚决不允许搞这类活动。特别是将来沿海两亿人口的地区都陆续开放，如果外汇再倒卖起来，在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形成两种货币，内地怎么顶得住？那样，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建设就有可能乱套。我认为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都大，很值得我们重视。请搞金融的同志，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的同志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逐步建立一套办法、措施。下一步外国银行也可能逐步进来，国内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也会增加，比如上海酝酿要恢复交通银行，天津酝酿要恢复金城银行。将来还可能设外汇商店，开展外汇自由存取的业务。这些措施一实施就会搞得更活。但是，另一方面就要坚决制止外汇的倒买倒卖和外汇在国内流通，采取坚决而有力的措施，严格执行。

这次会议最后要形成一个《纪要》，将来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和常委同志审阅通过后，就批发下去按《纪要》办。另外还有个立法的问题，上次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也是由人大授权的。人大已授权国务院，对改革中间的问题可以相机处理。这次开放两个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在宣传口径、说法上，也要搞得周到一些。请谷牧同志找有关同志研究一下，作一些布置。

接见全国省长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二月九日

这次会议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二次省长会议。我们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召开的，主要的、中心的议题就是如何巩固和发展我们当前的非常好的经济形势，就是如何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以后，今年真正在改革问题上迈出重要的一步，同时又不至于带来物价的较大波动。既要使改革走出一步，又不要带来物价的较大波动，这是如何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中心问题。如果我们怕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年不迈出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小平同志最近讲的要丧失时机。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今年在迈出一步时掉以轻心，而最后使物价出现较大的波动，人民是不会满意的。世界上一些好心的朋友，包括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对我们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都给了很高的评价，都希望我们取得成功。但是他们不少人也有一些忧虑，怕中国的改革带来大的通货膨胀，使改革发生困难。东欧的改革情况当然同我们不一样，但他们发生的一个共性问题就是如何防止物价出现大的波动。目前我国人民反映，也是集中在两点上：第一要求改革，第二怕物价上涨。广大人民希望改革，但不要物价上涨。所谓物价上涨，就是乱涨价。有计划地价格调整，人民是理解的，会接受的。总之，不改不行，但如果改的结果带来物价的较大波动，我们就会脱离群众，改革就不能算是务求必胜，不能算是取得胜利，而且会给以后的改革造成新的困难。当然，要做到这两点很不简单，需要大家共同仔细研究。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的主要精神，会议要集中讨论这些问题。

本来这个会议要十号开，为什么提到九号呢？因为耀邦同志要出去。我们省长会议开得不多，四年开了两次，这个会议又很重要，大家又希望见到耀邦同志，请他讲讲话。因此我向他提出，希望他改变一下日程，和大家见见面，耀邦同志答应了。所以这个会议提前半天，耀邦同志见见大家，刚才已经照了相，讲了话。耀邦同志的话虽然讲得不长，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大的界限划清楚了，我们就按这个精神，按耀邦同志的意见开好这个会。

刚才耀邦同志讲到整党问题，我觉得这个意见很重要。现在我们整党要保证改革，既要促进改革，使我们决心改革，也就是解放思想；又要使改革健康发展。我们党风如果不正，纪律松弛，改革就会遇到困难。所以整党要促进改革，

保证改革，这个很重要。

慎重初战务求必胜*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省长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省长会议，互相通气，交谈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以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大家认为开得很好。正如耀邦同志所说，是用轻松的办法，解决重大的紧迫的问题。这种形式，我们以后还要采用。会议期间，耀邦作了重要讲话，依林、启立、纪云分别就经济形势、工资改革、物价改革作了报告，万里同志也讲了话，都讲得好，我都同意。

一、当前经济形势确实很好，不是一年好，而是连续几年都好。主要表现在：两大部类比较协调，生产、流通、消费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好势头，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这是在调整经济的基础上，改革、开放、搞活的结果，是进一步改革的有利条件。问题是货币投放过多，信贷资金和消费基金增加过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结存外汇急剧下降。这是今年改革的不利条件，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二、一九八五年是贯彻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第一年，在改革上，必须不失时机地迈出重要的一步。关于改革的指导思想，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既不要丧失时机，又必须走一步看一步，在实践中探索，防止出现大的失误。在改革的总方向、总目标上必须坚定不移，在具体步骤、具体行动上必须谨慎从事。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曾经发生过消费基金、信贷资金和基本建设投资失控的现象，最后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使改革被迫停顿下来。对此我们要引以为戒，避免发生类似的问题。当前特别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我们的改革，只能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不顾国家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一哄而起，一拥而上。第二，我们的改革，要考虑到宏观上引起的反映，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第三，我们的改革，是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下功夫提高经济效益，不能损国家以肥私，损消费者以利己，靠歪门邪道捞取外快。这样，才能使改革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

三、今年的改革，是在去年货币投放过多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既要在物价和工资改革上，迈出重要的步伐，又必须在宏观上加强控制，防止物价发生大的波动。这是巩固和发展当前大好形势的关键，也是这次会议的主旨。现在人们的心理是，要求改革，害怕涨价。不改革，坐失良机，不能理顺经济关系，就会

失去群众；但是，如果搞不好，物价失控，轮番涨价，也会失去群众；这种危险性也不是不存在的。避免物价发生大的波动，需要四个条件：一是改革的方案、步骤本身要妥善，要切实可行；二是群众的心理因素不可忽视，要早出安民告示，稳定人心；三是要严格制止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趁机乱涨价；四是取决于货币的发行数量，这是最根本的。治本治标，双管齐下，就有可能既搞好改革，又不使物价失去控制。

四、货币发行量必须适度。这是宏观上最重要的措施。为此，今年的信贷规模要适当控制。中央银行对各专业银行、各省区分行都要有存贷差的控制数，不得突破。与其失之过宽，不如先紧一点，这样可以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即使当年经济发展速度受一点影响，少增长百分之一、二，也要下决心这样做。该抽紧的，一定要抽紧；当然，该支持的，也要支持。申请贷款的企业，不论国营、集体或个体，必须有一定的自有资金。信贷资金要管紧一些，用好一些，用在刀刃上，不搞一刀切，以取得良好的效益。

五、今年的物价改革，重点是解决农产品价格问题和运输价格问题，以利于农业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同时，拉开质量差价和地区差价，以促进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商品的交流。这是承受得了的，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有益的。今年在价格上所采取的措施，步子已经不小了。因此，主攻方向要明确，不要打乱仗干扰中央的部署。物价体系的改革牵动全局。放开生猪和蔬菜的价格，今年何时执行，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除此以外，什么调，什么不调，什么放，什么不放，一定要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执行，不得各行其是。

六、今年的工资改革，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是要推行包括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和工龄工资在内的结构工资制；工业企业单位，是要逐步推行工资总额与上交税金挂钩的办法。连续几年消费基金都有相当大的增长，带有还欠账的性质。现在，消费基金的增长应适当控制。特别是滥发奖金、补贴、实物，乱提工资级别的现象，必须坚决制止。今年的工资改革，主要是要转上新的工资制度的轨道，国家力量有限，标准不能过高。这一点要向全体干部和全体职工讲清楚。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务工资，绝大多数应按最低一格执行，以后再逐步拉开距离。工矿企业的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是好的，问题是如何挂得好，如何控制得住，要制定一套控制和监督的办法。实行挂钩的企业，一是工资基数要认真核实，定得合理。对去年工资总额中的那些不正当因素，应予剔除。二是要开征工资调节税，以防止由于企业外部条件不同而造成的工资水平悬殊过大。目前推行工资基金与上交税金挂钩，主要卡在还贷款如何计算上。把归还贷款完全视同上交税金是行不通的，但也不能完全不予考虑。要研究出适当的比例，具体办法另定。今年不具备条件实行挂钩的企业，仍按原来的办法执行。同时征收奖金税，可比去年适当放宽一些。但去年的奖金税必须照章缴纳。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收益分配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也应做适当规定，以利于扩大再生产，不能分光花尽。某些地区的工资区类别过低，可分步骤逐年解决，今年拟先把四类地区调为五类地区。

七、严格禁止乱涨价。国营企业应参与市场调节，平抑物价。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紧俏的耐用消费品的批发业务，要牢牢掌握在国营商业、物资部门、生产单位手中，不准集体和个体商业经营这些商品的批发业务。应该看到，我们国家有力量控制得住市场物价，怕就怕国营和集体企业自乱阵脚，趁机乱涨价，扰乱市场。这是危险的，是破坏改革的行为，绝对不能允许。

八、这几年行政经费增加很多。今年的行政经费预算，从中央到地方，一律先削减百分之十，节省下来的钱归各级财政。去年社会集团购买力达到三百二十亿元，比前年增加四分之一。今年一要压缩总额，要求比上年核减百分之二十；二要控制商品购买范围，对市场紧缺的汽车、彩电、空调器、录像机、家具、呢绒等十七种商品，未经授权单位批准，任何单位都不得到市场购买，与民争货。要重申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的方针，发扬党和政府的优良传统作风。

九、对党政军机关开办的各种公司和企业，要按照中央和国务院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日的决定，认真进行清理和整顿。对经营商业的各种公司，要重点加以整顿。各级政府的公职人员不得兼营商业，不得担任各种公司、中心等经济实体的顾问、名誉董事长等职务。对利用权力，钻多种价格的空子，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招摇撞骗的，要坚决取缔；暴利必须没收，偷漏税款必须补税，并科以罚金。从事工业、交通、技术咨询、服务行业的，可以允许继续办下去。但经营方向必须端正，必须符合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所有这些公司和企业，都要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在人、财、物上与机关单位脱钩。此事各级政府要切实抓一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检查督促，各机关单位要具体负责，于今年上半年完成。对各种民办企业，也应当进行整顿，加强管理。

十、这几年结存一部分外汇是暂时现象，去年四季度以来外汇结存急剧下降。外汇紧缺将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存在，实现外汇平衡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开放，是有进有出，进出平衡，不能只进不出。要利用开放的条件，使我国的商品更多地打入国际市场，努力提高创汇能力和外汇支付能力。在这方面，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带担负着特别重要的任务。各地各单位都要努力完成今年的外贸出口计划，提高换汇率，减少亏损。要坚持统一对外，联合对外，防止互相削价竞销，“肥水不流外人田”。要加强外汇的统一管理，取缔黑市，严禁炒买炒卖，不准在国内市场流通。对去年机关团体企业单位炒买炒卖外汇的要坚决清理，情节严重的要加以惩处。全国各地各单位利用外资、借用外债、使用外汇的情况要加以登记和审查，不能心中无数。现在结存的外汇已是“一女多嫁”，如竟相使用，就有可能出现巨额亏空。属于各地各单位的外汇，所有权不予变动，但如何使用，国家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管理、指导。国家计委要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外汇的分配使用计划，经国务院批准后下达执行。一个票子，一个外汇，只要在宏观上控制得住，就出不了大问题。

十一、控制货币发行量，必须同时加速货币回笼，包括非商品回笼。否则就会成为单纯的紧缩，对生产建设不利。不要指望上边增加多少信贷资金指标，那是不现实的；要把眼光转到大量回笼货币和吸收存款、收回贷款上来，这方面潜

力很大，大有可为。今年对回笼货币要有一些特殊措施，力争多回笼一百亿元。利用结存外汇，进口一些差价大、赚钱多的高档消费品，对于活跃市场，回笼货币，为改革准备资金都是必要的，这几年要抓紧落实。工业、商业、物资部门要压缩库存，把紧俏商品拿出来供应市场。国库券的发行量要增加，条件要更优惠一些，期限要缩短，利息要提高。居民储蓄存款不仅要稳住，而且要增加，存款利率要适当提高，以利于把一部分消费基金转为生产基金。计划拿出一百吨黄金，制作首饰出售，回笼货币，稳定金融。

十二、今年市场情况不可过于乐观。回笼货币，繁荣市场，从长远看，从根本上说，必须立足于国内，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要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把我国消费品工业提到一个新水平，大力增产价廉物美、款式新颖、适销对路的商品，满足社会需要。

十三、住房改革势在必行，应提上议事日程。兴建住房，是人们的迫切需要，是吸收社会购买力的一大产业，回笼货币的一大财源。国家把城镇职工住宅包下来，低房租、吃大锅饭的办法，不仅使建筑行业失去活力，而且使消费结构畸形发展，大量的社会购买力转而集中冲击某些高档耐用消费品，对经济发展很不利，必须进行改革。要把住宅出售和房租改革结合起来，通盘考虑，找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路子来。这件事要专题研究，积极试点，拟订方案。

十四、增强企业的活力，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现在小企业、集体企业放活了，要注意解决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活力问题。国务院确定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十项规定，要真正落实到企业，不要层层克扣。企业内部也要建立和健全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对经营管理水平高、对国家贡献大、留利水平过低的少数大中型企业，应逐步降低调节税，或适当调低指令性计划指标，使它具有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要允许大企业搞跨行业的多种经营。

十五、我们进行这样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改革，没有一个安定团结、遵守纪律的良好社会环境，是不可能成功的。在改革过程中，在开放、搞活过程中，一定要加强管理，强调纪律性。一方面要改革、开放、搞活，一方面要讲管理、制度、纪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强调管理，不是要回到老路上去，沿用老办法，而是要建立一套同改革、开放适应的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要搞好立法和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立法要从实际出发，执法要严肃认真。财政、银行、审计、税务、海关、物价、统计、工商行政等部门，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加强监督检查，同违犯财经纪律和法律的行为作斗争。

十六、搞好整党，纠正不正之风，促进改革，保证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改革的决策和部署是否正确；取决于能否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当前出现的几股新的不正之风和纪律松弛的现象，对改革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如果不加以纠正，改革很难顺利进行。除了必须采取经济的、行政的、立法的手段以外，还必须强调党性、党风、党的纪律。

十七、今年的改革，要慎重初战，务求必胜，巩固和发展大好的经济形势。今年工作的要点是：抓好物价改革和工资改革，加强宏观控制（控制信贷资金、

消费基金、固定资产投资和外汇），防止物价发生大的波动。我们的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改革确实大有希望。对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要重视，不能听其蔓延。只要及时提出，及时解决，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当前是改革的重要时刻，掌握动态，研究政策，至关重要。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都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应当在党委的领导下，从全局出发，在微观搞活的同时，多研究一些宏观方面的问题，和我们多通气，共同做好工作。全国从上到下，在重大的决策、部署、措施上，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就一定能够使我国的改革取得预期的成功。

在全国省长会议上的插话摘要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

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这是我们当前经济形势好的重要特点。持续发展很重要，一年好一年坏，走一步又退一步，这不叫好。一九八一年我们实行调整以后，连续几年，生产一浪高过一浪。做到持续协调发展也很不容易，多少年来文件上都这么说，但真正做到，还是没有几年。现在确实是很好的形势。对当前的形势怎么估计？我同一些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开会座谈，认为这次和一九八一年调整的时候不同。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很乐观，认为我国经济起飞的时期已经到来。多数人认为还不能这样看。后来我考虑，是不是可以讲我国经济已经开始走上了良隆循环。现在看，还是应当谨慎一些。形势好的方面是要有足够的认识，对存在的问题也应有正确的估计。去年四季度票子发得那么多，不正之风来得这么猛，这两个东西究竟对今年有多大影响，一定要有冷静的分析。所以，对当前形势的估计，“起飞”呀，“良性循环”呀，“财政经济基本好转”呀，都没有说，留点余地好。对存在的问题，对今年改革的不利条件，要重视，不可掉以轻心。把这些问题看得过重，甚至认为大事不好，惊慌失措，那是错误的。但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听之任之，也会造成损失。去年第四季度出现了一些问题，把矛盾暴露了，我们加以重视，加以解决，工作就会前进一步，不利条件就会转化为有利条件。

二、去年第四季度，特别是十二月份，不仅是多投放了票子，增加了消费基金，减少了外汇结存，而且是带来一个信号，就是在改革问题上全党的思想不那么统一，不正之风对改革的干扰相当严重。如果大家认识一致，不正之风就可以顶住；如果认识不一致，不正之风就会蔓延。不正之风有些是划不清界限，把改革、解放思想和不正之风混淆了；有些明知不对，也不敢管，甚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带头去干。这包括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内，有些就是从北京刮起的。有些领导干部，慷国家之慨，化公为私，假公济私，不顾国家整体利益，为自己争选票，或想在退休以后给自己留“根据地”。这些不正之风，对改革是极大的危险。在改革中，必须统一认识，坚决纠正这些不正之风。

三、在改革中加强管理，首先要把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管住。我们的改革能否成功，可以说决定于“官僚资本”是否捣乱，只要把“官僚资本”管住，我们的改革就会顺利进行；否则，改革就要失败。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

集体所有制是占绝对优势的，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官僚资本”不捣乱，个体企业、小商小贩就掀不起大浪。今年要把物价改革、工资改革搞好，而价格又不至发生大的波动，使调整物价引起的冲击波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乱涨价，那就必须加强管理，主要是要管住“国”字号的，还有与国营经济有直接联系的集体企业，对这些单位一定要严格。当然，我们也不要“不教而诛”。事先要明令公布，哪些准搞，哪些不准搞，令行禁止。对乱涨价的，对搞不正之风的，坚决惩处。有些要撤职，开除党籍。违犯国家法纪的，还要法办。经济上也绝不能让他们占到便宜。

四、对“变通”办法也要作具体分析，需要划一个界线。比如前些时候讲“松绑”，也不能什么都“松绑”，党风能“松绑”吗？纪律能“松绑”吗？这些都不能松。看来，对“变通”也应有个正确的说法。有些是全国的统一规定，地方、部门、单位无权变通，也不允许变通；有些不影响全局的具体规定，可以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加以变通。耀邦不是讲要“立”吗？现在我们“立”的东西太少，没有一套比较稳定的、比较长久的规定性的东西。多年来我们是习惯靠“精神”办事，办一件事，要看上边什么精神。往往一件事没办完，新“精神”又来了，下面不知所措。我们要记取这方面的教训，搞些稳定性、规定性的东西，有些要“立法”，使大家都有所遵循。

五、改革要有先有后，互为条件。我们的改革，如果大家都不动，那就是死水一潭；如果要改大家一起改，那就会乱套，改革就无法进行。改革有个分步骤、分层次，有先有后、互为条件、互相支持的问题。我认为，我国的改革能成功的妙诀也在这里。从全局来看，农村的改革先行一步是好事。如果城乡一起改，首先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钱从哪里来。当时城市稳住不动，支持了农村的改革。农村改革后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加了，有了原料，有了市场，反过来也就支持了城市，使城市的改革具备了必要的条件。我们的大中企业担负了财政任务和指令性计划的相当大一部分，支持了小企业、乡镇企业的放开；现在，小企业和乡镇企业活了，国家的税收增多了，就有可能逐步减轻大中企业的负担，使他们也具有活力。我在上海也说过，这几年上海每年上交财政一百多亿元，支持了全国的改革。现在有可能来解决上海适当减负放活，发挥优势的问题。我们这样做，可以使改革有条不紊地进行。

六、关于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要看到把沿海地区开放，大大有利于内地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再过两三年还会更明显。不要认为把开放的优惠条件给了沿海，沿海开放后发展起来与内地无关。事实上，沿海是全国的沿海。沿海经济的繁荣，势必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为什么现在横向联系增加？就是因为沿海开放了，有了与内地加强经济联系的可能性。沿海开放后，背靠内地的工业基础，面向国外市场，就能使沿海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内地的骨干企业，主要科研部门，也可到沿海开个窗口，沟通信息，更新知识，承接订货，使内地工业基地的作用也发挥出来。这两年沿海与内地的横向联系正在发展，看来大有可为。不能认为是优待沿海，不管内地。什么事都有个主要环节，抓住主要环节就把整个链

条带动起来了。沿海不是孤立的沿海，开放沿海不是对内地毫无关系。时间越长，越能看清它的意义。

七、我们的国家这几年形势很好，但我们家底薄，还是一个穷国，而且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发展生产，是要搞建设，不能认为现在就富的不得了了，可以享受一番。前些时候，我们在宣传上也讲得不够清楚，好像到处都是万元户，给人民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共产党这几年把农民大都变成了万元户，现在该轮到工人、知识分子成为万元户，把胃口吊起来了，因而在增加工资和消费基金上，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应当把我们的家底向群众和干部讲清楚，很多事不是不想办，而是办不起。我赞成一些同志提的意见，今后有些事情要多做少说，没有普遍意义的，就是做了也不说。顺便说一下，我们不赞成组织农民、组织万元户到国外去旅游。实际上出去看一趟，并不能学到多少适合中国的东西，弄不好还可能把那个万元户搞破产。我们国家刚刚好起来，不要去搞形式、搞虚假、搞浮夸等不正之风，那些东西是不祥之兆。现在我们国家应该励精图治，要扎扎实实工作。

八、工资、奖金问题不能互相攀比。一攀比，你搞我也搞，要搞大家搞，效益好的发一百元，效益差、经营差的也发一百元，结果还是平均主义。这样搞下去，改革就无法进行。我们贯彻按劳分配，使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就一定会出现差别。同一地区、同一行业、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工资收入都有差别，搞得好的与搞得差的，要拉开档次，体现差别，承认差别。当然靠工薪收入的同担风险的个体经营者、农民还不一样，工薪收入者之间悬殊不宜过大。但是绝不能攀比，搞攀比就搞成新的吃大锅饭，并不能真正调动起积极性，相反，却会成为当前改革的一大障碍。这点，在思想教育中必须明确。

九、关于提高猪肉收购价格问题，产猪多的省像四川、湖南等，要从长远考虑。如果四川的猪肉价格提得太高，将来可能四川的猪肉会出不去。因为各地会算账，如果加上运费，你的猪肉价格高于本地，他就会转而支持本地养猪，不吃你四川的猪肉。同时，猪肉价格提高了，猪皮也要相应提价，补贴和成本要增加，地方财政也受不了。你们要下决心少提一点，肉便宜一点，销路就可以打开。如果把猪肉价格提得很高，你们的优越性就没有了。弄不好，又会出现卖猪难。

十、关于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要搞双轨制。一个是国家的计划价格，即调拨价；另一个是交易中心的价格，即议价。进口的钢材出售不要再搞一种价格了。进口的钢材，抽一部分到交易中心去卖，就可以解决亏损问题。一律搞牌价，就搞死了；都搞议价也吃不消。生产资料的两种价格，经过一段时间，逐步调整，逐步接近，就像粮食的价格一样，最后搞一个统一的比例价。农村走的这条路子，生产资料也可以走。这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既解决了问题，社会又不至发生大的波动。

十一、关于南方木材价格放开问题，上次书记处讨论时，提出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通过合同，国家收购二百五十一万立方米。现在，放是放开了，但收

购二百五十万立方米的合同却没有落实。这样，整个南方的造纸厂都面临停产或纸张全面涨价的危险，还有木制品、家具等也要大幅度涨价。应该落实合同，或者按比例也可以。比如三七开，你出产一百立方米木材，三成交国家按计划价格，七成可以放开。当然现在已放了，不改了，但全国收购问题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否则，各地都不好办。

十二、在农业结构的调整中，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就是交通运输问题，影响了各地优势的发挥。比如江西要多产粮食，多养猪；福建要少种粮食，着重发展多种经营。但是江西的粮食运不过去，或者运去了价格比当地加价收购的还要贵，这就会限制两省经济的交流和农业结构调整。又如从全国来说，南方大米多，很需要玉米作饲料。东北玉米多，特别是吉林，是我国很好的玉米种植带，现在积压了约二百亿斤，需要调出大量玉米，调进少量大米。南方没有玉米，把大米拿来喂猪，很不合算。如能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和价格问题，全局就活了。除了陆路运输以外，要充分利用我国的海运和河运。要在“七五”和长远规划中，考虑建立海上运粮通道，把东北的玉米运往南方沿海，再转运到陆上。

十三、现在农村涌现了一批专业户、重点户，有些地方还叫专业大户。但整个农村经济发展，还得有个过程。专业户的出现，同整个农村经济的社会化是分不开的。扶植专业户，切忌盲目性。专业户如果没有那样一个经营水平，没有那样高的技术，没有那样合适的厂房设备，没有一个社会化的服务机构，就经营不好。揠苗助长，急于培养成专业大户，结果反而害了他。广东高要县养鱼专业户陈志雄，开始包四百亩鱼塘，养得很好，赚了钱。以后县委动员他，包了二千二百多亩，发展有名的“文庆鲤”，结果亏损十多万元，欠国家和集体十万八千元。他本人和国家在经济上都蒙受损失。我国农村的专业化分工，这几年在开始发展，这是一个好现象。但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和专业分工的发展，毕竟有个相当长的过程。我认为，中国农村将来大量的还是兼业户，而不是专业户。有一些地区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比较高，像长江、珠江三角洲也可能出现一些专业大户。但专业大户也是他自己发展的结果，专业户的资金，应该是自己一部分，再加上国家一部分贷款，不能主要靠贷款。盲目地去扶持，不但对专业户本身不利，而且国家也会背上包袱。所以，我在书记处讨论中央一号文件时讲过，不要专业大户的提法，以免产生副作用。

林业要进行改革和发展多种经营*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视察黑龙江省伊春林区时的讲话要点。

一、木材价格问题。木材价格太低，我们大家都承认，我们不是不同意木材提价，但是木材影响面广，牵涉太多。如果木材调价，那就是所有用木材的产品都得涨价，老百姓也用很多木材。因此，这个账很难算。木材如果提价，提少了不解决问题，提多了影响太大。是否可以考虑采取这个办法，即逐步加大木材加价的比重，也就是在国家统配材内先提百分之十，过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可以加点，逐步使木材的价格趋于合理。这样既可以把国营林场搞活，又不至于使整个木材价格上涨。

二、新林场的开发问题。现在是一部分林区因为基本建设条件比较好，采伐比较容易，出现了过量采伐的问题。而还有一些林区，因为路没有修进去，林子出现了过熟的现象，应该想办法把这些林区的木材拿出来，否则木头就烂了。新林场的开发，不要照搬国营林场的一套了，是不是可以采取新章法呢？如补偿贸易的方法。江苏省需要木材，让它投资，入股也可以，用这个钱修路，搞基本建设，然后给它木材。另外，家庭承包、小组承包都可以，事先规定几条。第一，划好了地方，搞承包，个人可以承包，也可以集体所有制，税收照缴，经济利益定个分配办法。第二，规定一年只能采伐多少，按照永续利用的原则，不能过量采伐，还得基地更新。这些，都签订合同，包给他，他就有积极性了，他可以自己筹点资金。新林场采伐后，老林场的采伐量就可以往下调减一些，以减轻老林场的压力。

三、林区搞多种经营的问题。林区搞多种经营是有有利条件的。一是有资源，二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技术设备基础。交通、电力等条件都具备。我看，只要政策对头，方向对头，搞多种经营，因地制宜，能搞什么就搞什么，生活出路不成问题。像桃山林业局搞旅游，这也是个资源嘛！还可以开发许多新的生产项目，如畜牧业，很有价值，我看是个很大的出路。可不可以找到一些种草的地方，搞优良牧草。另外，种药材，挖金子。中国人多，可以到处去搞，砂里淘金，一天搞几块钱还是可以的。过去国家一年只产十吨金子，提价呀，放开呀，去年就搞了三十吨。我国搞到五十吨是可能的，最近又提出也可以搞到一百吨。还有，乡镇企业、社队企业也可以发展，搞一些第二、第三产业。总之，林区有

这么大个摊子，这么多干部，一是搞多种经营，二是搞各种各样的承包责任制，个体的也可以搞，家庭的也可以搞。这两条结合起来，就会有办法了，积极性就起来了。另外，再和外边合作不仅对外国开放，对国内也开放，这样就活了。当然，问题要逐步解决，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我们国家也有个承受能力，一下子变不过来，把不良循环转成良性循环需要有个过程。不能不动，不能不转，不转不行，一下子转也不行，需要各种条件。

四、林业上缴利润的问题。农场搞大包干了，林场是不是搞？林场搞森工，情况不同。它的利润高低同伐木头多少有关系，伐多了利润就高。鉴于林业资源情况，有些老林区不能伐的越多，企业越多得。某些企业，亏损企业或微利企业，可以搞亏损包干或微利包干。一个一个林业局算，有的林业局没有利了，可以搞微利包干。分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有的企业亏损，国家有政策可以搞亏损包干。工业企业也有这种情况。林业是个大问题，最难解决的是林业。

五、关于林区政企分开问题。政企分开没有涉及到企业办不办社会的问题。企业不办社会，要看你是什么地方。我说过多次，中国资本家修铁路也办社会，辅仁中学、辅仁小学，就是这么来的。再比如，美国淘金，每一个淘金点都是一个社会，因为它那个地方荒无人烟，不像城市，需要有一套机构，有一套设施，你自己不办社会，谁给你办社会。我到澳大利亚，有个煤矿，附近的镇子就是它投资的，全部工人宿舍都是企业办的，房租特别低。房租不低点，工人不到那里去，没个镇子工人不来。这个镇子占它整个企业投资的百分之二十。现在企业办社会，只是“社会”的那部分要单独核算。什么俱乐部、食堂、澡堂，对社会开放。投资，固定资产还是企业的，管理上可以搞承包。这算不算政企分开了？企业办社会和政企分开，不是一个概念。政企分开，就是企业的事政府少干预。它的主要意思，就是减少政府对企业内部经营的干预。你们政府又是管理机关，管理机关又是政府，将来经营权力要下放，上层不直接搞管理。企业办社会则是另外一个概念。

大企业要下放权力以增强内部活力*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吉林省长春市视察第一汽车制造厂时的讲话。

（当黄兆鉴[1]厂长汇报到“七五”期间汽车改型、工厂扩建共需资金24亿元，其中6亿元由建设银行贷款时）记得在北戴河时讲，不要国家投资嘛！银行贷款也是国家投资呀，今后的投资都是贷款了，你们要争取不要国家投资。你们报建设银行贷款6亿元，计委同意吗？（答：建行同意给我们贷款。）

（当汇报到一九九〇年生产汽车十五万辆，生产能力达到二十万辆时）你们规划到一九九〇年汽车产量达到十五万辆，生产能力达到二十万辆。我看生产能力也不一定搞那么急，搞急了对生产矛盾很大，主要先把产量搞上去。计委的意见是一边改造，一边扩建，一边抓紧生产。要把生产抓得紧一点，计划生产能力可延长两年再达到，把产量多搞一点，这样可以多积累资金，投资、引进都好解决。你们把这些考虑一下，计委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他们感到你们的协作任务还不够落实。

（当汇报到外汇不足时）你们还有没有节省外汇的办法呢？就是说，计划生产能力的形成往后推一推，一些不急需的设备缓一缓；一些关键的部件用进口设备生产。一般的、非关键性部件用国产设备生产；一些部件对水平虽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国产的差一点就差一点，不要进口设备；一些关键部件对水平影响大的采用进口设备生产。这样就可以节约外汇。看你们的报告要增加八千多台设备，其中有多少是国产的？多少是进口的？

（答：进口300多台。）引进300多台设备就要用三亿美元外汇？再算一算账吧。你们再研究一下，外汇要给你们一些，但原来全国算的外汇宽，答应的多一些，现在情况有些变化，可能给不了那么多，再算一算细账，尽量多节约一些外汇。

（当汇报到一汽在国家计委单独立户头以后，有些事情还要找一机部和中汽公司，原想单立户头办事效率可快一些，现在反而慢了时）这就是说单独立户还没有具体落实，要由计委协调一下，把各方面关系疏通好。

你们这个厂子就是一个大公司，大的联合体。过去我们的工厂都是下设车间，权力比较集中。下边没有一点经营权，企业内部没有活力。大企业如何从内部增强活力，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这种办法（指专业厂、下属厂独立经营）

是企业增强活力很重要的措施。大企业首先要解决车间、分厂、厂这一级的权利问题，扩大它们的自主权。这恐怕是大企业搞活的重要步骤之一。你们已经走了一步，要继续探索。像你们这样的大厂，如果下边只搞生产不搞经营是不行的，下边也要搞经营。总厂对分厂，车间对班组，都要独立经营。厂与厂之间的活动和联系，不一定都经过总厂。厂与厂、下属厂与总厂之间，应变成经济关系。按照这样一个方向研究一下。现在我们确实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队办企业比乡镇企业活力大，乡镇企业比城市集体企业活力大，城市集体企业比国营小企业活力大，国营小企业比大企业活力大。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原因，即大企业担负着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由国家规定了生产什么产品和价格，影响它的活力。这是外部原因，外部原因也要逐步解决，但这只能根据国家的承受能力逐步解决，不可能一下子都下放。如果都下放了，谁愿意搞什么就搞什么那也不行。因为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一方面是指令性计划，一方面是指导性计划。大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总要占一定的比重。今年你们生产汽车将近九万辆，只有四万辆是指令性计划，多数是指导性计划，你们就成了市场调节为主了。大企业终究要担负一些指令性计划，这是我讲的外部原因。但不要因为外部原因掩盖了内部原因，不要把管得死、没有活力的原因都归到国家来，还要研究你们内部影响活力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你们这里分厂也都大得很，它们那里怎么样？它们之中也有个活力问题。现在世界上大企业的经营管理都趋向分散，包括跨国公司。公司太大，经营不太灵活，调动不灵。我在接见比利时企业家协会一位负责人、化工集团的董事长时，他说，他成功的经验有三条，他管三件事：第一，决策；第二，用人；第三，机会（市场信息）。我说，你这三条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理一个国家也不外这三条。最近这次他再来中国时，又对我说：我现在权力都下放了，只管了一条，就是掌握一部分投资，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由我掌握。我看哪里需要增加投资，哪里不需要投资，只管这件事，其它我都不掌握，都下放了。他说，经营要分散，权力要下放，过去的办法不适应技术发展、市场变化快的新情况。美国一些跨国公司有的经营管理都分散了。我们这样的大企业（包括156项中的大企业和以后搞的一些大企业），要从内部把活力搞起来，不能因为外部没有完全放开而掩盖内部影响活力的一些问题。有些企业对上要求下放权力，但在内部不下放权力。国营大企业怎么搞活也是个主要问题。要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地解决。

还有一条，现在你们是黄金时代，容易掩盖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忽视产品质量。现在产品质量再坏也有人买，“皇帝女儿不愁嫁”。你们无论如何不要因为东西紧张了就不讲质量。水平搞不上去，质量搞不上去，没有竞争力，好景不会长。汽车工业的情况不会总是这样的。到一九九〇年时的情况可能就不会是这样。到那时，如果质量上不去，水平不高，竞争力不行，好景一过，东西就卖不出去。所以要趁黄金时代把技术改造搞上去，把水平搞上去。外国也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都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进行技术储备和新的技术革命，没有经济危机，技术就上不去。如果经济非常繁荣，销售很好，技术就不会进步。都

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在销售困难的时候，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的时候，就找诀窍，搞技术储备，等到经济繁荣开始的时期，那些技术就会发挥作用。我们前两年调整的时候，丢掉了这个机会。一九八○年生产任务不足，但没有抓紧机会搞改造、上水平。现在汽车非常好销，又要上产量，又要上水平，就发生了矛盾，这一点要注意。当然，你们已经注意了，从国外引进，搞技术合作上水平，这是好的。但在一般情况下，销售好的时候，往往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服务态度也不好，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要注意。

注 释

1．黄兆奎（1924—2015），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曾任一汽副厂长。

东北搞好粮食加工转化 可以成为中国的动物蛋白基地*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后的讲话。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结合起来抓。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好的经验，要注意发现、总结。按理讲，物质文明好的，精神文明也应当好；精神文明好的，物质文明也应当好。过去搞空头政治，没有基础，一时搞好了，也不能持久。这几年讲经济、讲致富，形势确实是很好的。当然也发生了某些思想作风上的不正之风，农村还有一些封建迷信活动，但总的讲形势是好的。解决好这些问题也是长期的，要不断解决。一般地说，物质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有了保证，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前途，社会秩序也好，人民精神状态也好，都是可以好起来的。

吉林这几年工作成绩是很明显的，工业、农业成绩都很明显，经济方面有很大变化，现在摆在你们面前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问题。我们整个国家形势好转，是从农村经济形势好转开始的。农村形势好，促进了整个经济形势好，没有农村的经济形势好转，也不可能有全国经济的好形势。但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农村的好形势也是不可能持久的，同时又会影响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有人说，刚刚好一点，就说粮食多了，要调整产业结构。我说，没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农村形势是不可能继续好下去的。对现在的新矛盾不采取正确的办法解决，必然严重影响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农村只有专业户而没有价格的改革也不会是商品经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今年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但我们相信一九八六年会比一九八五年好一些。农村的问题不会太大，二、三年内就会走出一条更广阔的道路，问题就可以解决。如果按照原来的老路走，就会越拖越被动。这个问题一定要看清楚，要讲清楚。

你们现在搞粮食转化，也要多方面研究这个问题，多方面找门路，即使一九八五年粮食受一点影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对农民也要造成一种形势，不造成形势，他也不可能积极搞结构改革。这是进一步发展繁荣农村经济的方针。吉林要围绕粮食问题做文章。这方面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要使你们的粮食优势继续发挥作用，不要受到抑制。要围绕这个问题把这篇文章做好。这样，我看吉林的形势就会更好。

从中央来讲，要考虑到北粮南调问题。但从你们来讲，对粮食转化、粮食加工、粮食增值要解决好。粮食可以搞很多东西，究竟搞什么，你们应当很好研究一下，也要借鉴外国的经验，看以粮食做原料可以搞哪些东西。也不一定搞很多种，尽可能搞一些小型的，这样来得快，社队企业可以搞，农民也可以搞，不需要国家投资，就是让农民把农业生产延伸。不仅种好粮食，还要搞好粮食加工，由粗加工到精加工。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发展畜牧业。一九八○年我来东北讲过，东北应当成为中国畜产品、乳产品、肉食品基地，动物蛋白基地。中国的动物蛋白基地，近期放在大西北是不现实的。不是有草就有畜牧，必须要有工业条件、交通条件、技术条件，还要有贮存、运输条件等等。西北交通不大方便，气候不好，人又少，加工技术不高，办工业很困难，特别是运输困难，有些东西运不出来。东北地方大，粮食多，还可以种草、搞饲料，发展畜牧业。有了畜牧业，有了粮食加工，就可以促进各种食品工业发展。

动物蛋白、食品工业是东北很大的优势，也是吉林很大的优势。但不是一下子可以搞起来的，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打开一条路子。你们这里比关内哪个地方都优越，比西北更优越。西北虽然有不少优越条件，面积也大，但工业、交通不如东北。你们这里是可以搞好的，只是过去不习惯。现在是北粮南运，将来就要就地加工，搞饲料，发展畜牧业，把粮食转化成动物蛋白，多吃动物蛋白更好一些。广东受外国人影响，吃奶制品比较多。这样就把农村工业搞起来了。

社队工业各地都要搞，也能搞好。原来我想山西雁北地区社队工业得怎么搞呢？到了那里一看，他们搞起来了。先是搞小煤窑，小煤窑发展起来以后，就围绕小煤窑搞“配套”：首先是搞运输，把汽车运输业先搞起来了，县运输公司、乡运输队、煤矿运输队、运输专业户等等，都搞起来了，都是很赚钱的；第二是烧石灰专业，用小煤窑烧石灰，也是赚钱的；第三是汽车修理业；第四是石料场，搞采石加工，为基本建设服务；第五是搞煤矿设备厂，生产挖煤用的钢钎和铁钉；再就是办服务业，洗澡、理发等等。雁北就是这样搞起来的。一个小镇子，什么都有，就是搞小煤窑带动起来的，如果没有小煤窑，什么也搞不起来。

发展城乡经济，一是要发展乡镇企业。我们的路子走对了，将来中国一部分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不是进大城市，而是搞乡镇企业。现在乡镇企业体制灵活，不是吃大锅饭，便于发展。二是要因地制宜，适合搞什么就搞什么，还要结合市场需求。所以你们要围绕粮食加工、粮食增值、饲料工业、畜牧业来搞，这就会在农村、乡镇形成很大优势。当然，短期内是有一定困难的，但只要努力，一定可以搞起来。你们应当组织一批技术人员攻这个关，组织一些专家专门研究粮食转化、粮食增值、粮食加工问题，发展畜牧业究竟应当走一些什么路子，向哪个方向发展，你们应当研究这门经济学。

对陆定一同志来信[1]的批语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启立、兆国[2]同志：

建议将定一同志的信作为中央参考文件印发（并发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我是赞成定一同志的见解的。

关于速度问题，十二大定的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从近几年的实际及其趋势看，是可以达到的。原来，我的想法是头一个十年要少于一番，第二个十年要超过一番；现在看来，头一个十年也有可能做到翻一番，即平均每年可递增百分之七左右（有的条件好或潜力大的地方会高于此数，有的条件差或潜力小的地方会小于此数）。这样的速度，既可以达到总的战略目标的要求，又可以稳定而持续增长。

目前确实已经出现了追求高指标、竞比增长速度的现象。勉强追求、比赛过高的速度，既助长讲假话、搞形式、浮夸风一类的毛病，又超过电力、交通所能承担的能力，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去进口所需要的原料、材料和设备。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强求过高的速度，即使一时一地勉强上去，也是无法保持下去的。这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危害。我们需要的是适度的高速，这样才可能稳定、持续地发展下去，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利。

现在需要在速度问题上提醒各地注意实事求是。为此，建议各级领导和宣传部门，凡是容易引起下面一味追求高指标、比赛高速度的话都不要去说。

赵紫阳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注 释

1．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25年入党，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部部长。

陆定一给赵紫阳的信原文如下：

紫阳同志：

一月份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百分之二十以上。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翻两番”不

成问题。惧的是，原料、市场、动力、交通、金融、财政，特别是动力、交通，肯定跟不上，缺口要扩大。这样，势头是否保得住？下降了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形势好，但类似“大跃进”的风，似乎吹起来了。不来自中央，而来自地方。谁也不甘落后，自定高指标，而且都有理由。我的儿子在河南安阳，那里要搞三个大工程，把地方所有的钱都用光了，又因为是“试点市”，自定年增长不能低于百分之十。两全其美办不到。硬搞，势必走歪门邪道，不实事求是，讲假话等等。但是形势所逼，非硬搞不可。这是儿子对父亲说的，不会假。公开场合一定不会说。这就是新的“大跃进”要来了。

中央怎么力、？要有“宏观控制”，要强调在形势好的时候严格实行实事求是，要在宣传上不再多鼓增产之劲，而鼓质量之劲，鼓实事求是之劲，鼓头脑清醒之劲，鼓避免比例失调之劲。不要鼓“翻三番”之类的劲。多讲政策、经验，少夸数字。还有别的。

敬供参考。顺祝

新春之禧

陆定一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六日三时

2．王兆国（1941—），河北丰润人。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曾任二汽副厂长、党委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中央台办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给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的贺信

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

毛文书[1]教授并转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全体同志：

我热烈祝贺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成立二十周年和陈耀真[2]教授回国执教五十一周年，热烈祝贺广州国际眼科学术会议的召开！

我殷切希望您们继续努力，深入钻研，在防治眼科疾病，发展眼科医学，造就眼科医学人才上取得新的成就，为发展我国卫生事业，造福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致以

崇高的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

注 释

1．毛文书（1910—1988），四川乐山人。时任中山医学院眼科中心主任，国际著名眼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1965年与其丈夫陈耀真创办了中国高等医学院校最大的眼科医院，是亚太地区人工晶体植人协会创办人之一。

2．陈耀真（1899—1986），福建福州人。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博士，时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名誉主任委员。曾任齐鲁大学医学院眼科主任，华西大学、岭南大学医学院眼科教授，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院长。

放手让大企业发展综合利用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日

今天请大家来，主要谈大企业如何发展综合利用问题。这个问题在“七五”原材料工业规划时谈到过，但没有进一步落实。这个问题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很重要。过去由于部门、行业分割，很多企业的综合利用没有很好开展。例如开矿，只采自己管的，不采其它用的；开煤矿只采煤，对煤矿中的硫铁矿、粘土矿就不管。又如，对焦炉气的回收、建筑材料中的综合利用、火电厂的炉灰利用等，都不很积极。在这些方面有很大的生产力没有解放出来。

过去没有搞起来，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门、行业的分割，企业有这方面的潜力，但主管部门不关心这件事。主管部门有两种：一种是只管本部门产品，不关心搞别的行业的产品；另一种部门是限制别人搞自己的产品。二是企业按指令性计划生产，上边要求什么搞什么，不是根据可能来搞，企业是被动的。三是有些综合利用费力不少，但由于价格、销售权的限制，企业得不到好处，无法搞或搞了也生存不下去。

我这次在沈阳视察，煤气厂反映，如果回收的产品允许自销，就可以回收综合利用。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凡是由于综合利用生产指令性计划以外的产品，可以允许自销。这样放开后，可以综合利用的东西可多了。环这是赵紫阳召集国家计委、经委、体改委，财政、水电、冶金、煤炭、化工、轻工业部，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总公司，建材、物资和物价局的负责人讨论研究大企业如何发展综合利用时的讲话。

保工作中也可回收很多东西。企业中有些事，如果统过来就没有积极性，只要不统过来，给企业自销权，就可以发挥积极性，把这一部分生产力解放出来。这样，完全可以多生产一些化工原材料、建筑材料、有色金属等等，还可替代一部分原料、燃料。请大家研究研究，这样搞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危险？企业自己搞，只要有利它就可以干，是否这样一来，该上交的不上交了？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这次会后，搞个具体规定的文件出来。不光是强调对综合利用的认识，还要有具体的办法与规定。

（当有人谈到有些综合利用的产品已纳入指令性计划时）计划外的综合利用部分可以让企业自销，原有的计划任务要保留。

（当有人谈到对利废企业需要免税或低税时）凡是不用国家投资的可以免

税。各部门要发动大家的积极性来搞本部门、本行业的综合利用，发动大家搞建材，大家搞化工，大家搞电。企业发展生产，凡是计划外的、超计划的均可自销；企业自有资金用在哪里有利，就允许它在那里发展。

电力部门的指导思想不对头，不支持人家办电，这个问题提了好几年，不知为什么老改不了，该是到改的时候了。小水电比较复杂，可以另议，火电就比较稳定，电力部门不能低价进，高价出；电力这样紧张，为什么不支持人家的积极性。我看对企业的自备电站，电力部门只收手续费，只是代理。电力部门要首先考虑如何发动大家多搞电，不能限制大家办电。要定一个政策，即电力部门对自备火电站实行代销代供，只收手续费。搞好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德政。在这方面要开明一点，电的紧张就可以解决。

大企业潜力很大。现在有些人老是说小企业很活，是船小好掉头，大企业不好活。大企业不能这样攻国家，攻垮了国家，大企业也活不了。大企业潜力大，大手大脚浪费惯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次在东北参观沈阳电缆厂，该厂去年产值增加24%，利润增加90%，主要原因有两条：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上海国棉十七厂也是这两条。沈阳电缆厂的具体经验：一是划小核算单位，大厂变小厂，这也是落实责任制；二是提高质量与降低成本同工人的利益挂起钩来，该厂每降低成本1万元，可得奖600元，只占6%；三是用能人。这样一搞，企业起了很大变化。所以，厂内的责任制要和提高产品质量（优质优价）、降低成本挂起钩来。大企业在这方面潜力是很大的。越是部管大企业，浪费越是惊人，它的潜力越是大。今天请几个大部门来，就是要求你们把这个问题抓一下。要搞活大企业就要抓这些大企业的内部问题，不是再开什么口子、让什么利的问题了。大企业要多种经营，综合利用，从大企业内部搞活，不要靠国家给你活，而要大企业自己活起来。各部要选一批厂子搞起来。

（当有人谈到搞综合利用要投入时）有些投资可以由厂内工人集股来解决。我看搞综合利用，一要价格放开，二要工人集股，可以滚动发展，只要有利可图。简单地说就是两条：产品自销，工人集股。

现在国家有两种价格。对两种价格，你找它的毛病会很多的，但东西会增多的；一种价格，东西就少。农村也是从两个价格上突破的，农副产品多年来走了两个价格的路子。实行两种价格有好处，但要防止倒来倒去。完全防止恐怕不行，只要不泛滥就是了。两种价格，要逐步缩小差距。现在的粮食两种价格，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才高价收购一部分，否则两者的差距会变得很小的，很可能变成一种价格。工业有没有可能也走这一条路子？这几年有了些外汇，进口了好多原材料，所以发展速度高了，同时搞的两种价格，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原材料的增加。农村的两种价格，矛盾不少，但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如何适应这两种价格的发展形势？当然不能一劳永逸，要防止泛滥。防止是可以的，但也防不完全，不要使其泛滥，不能把计划冲掉。工业消费商品也是这样。

我看有两条可以放开干：一是企业的综合利用，二是依靠农民搞建筑材料、煤矿、铁矿等，均可搞，要把浅矿、鸡窝矿划给群众去开。群众开矿很解决问

题。山西雁北地区可以大开，根本是运输问题，那一带不是煤源问题而是运输问题。在那里根本不是讲买多少煤的问题，而只讲买上火车的权，只要能运出来，要多少有多少。很多地方由小到大，越开越大。山西北部，内蒙古的南部大有希望。还有铁矿也要选些地方给群众开，这样可以节约国家的大量投资。现在这一带最富的要算山西雁北地区了，一个县的财政收入有3000万元，人均收入800元以上。总之，我看大家搞得话，原材料紧张情况是可以解决的。不要一家办，要大家办，包括各个企业也可以办，只要有利。简单讲就是两条：大家办，要有利。最后由经委、计委、财政部牵头，代国务院起草一个文件，向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后发下去。

科技体制改革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多出成果和人才*

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这次会议集中讨论科技体制改革，讨论得很认真，很热烈。

面临着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现在许多国家都在讨论科技体制问题，研究对策。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研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在研究。他们存在的问题并不相同，但强调的重点颇有类似之处，都是要推动科技和生产进一步结合，使科技和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以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新形势。

我国现行的科技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曾经显示过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某些重大科技课题的优点，但现在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我们四化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要求。这种体制的一个极大的弊端是科技和生产脱节。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十分关切。近几年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每年都要专门讨论几次科技工作，在讨论经济工作时也经常结合讨论科技工作。无论是专题讨论还是结合经济工作讨论，着眼点都是想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一、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大家都在贯彻。讨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也都力求体现这个方针。我们既要通过技术改造，使原有企业转上新的技术基础，也要建设一批用现代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新企业。技术进步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制定了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的政策，也制定了鼓励科研单位为企业服务的政策，尽管还不够完善，但都在逐步落实。情况确实是在一步一步好转。但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方针、规划、政策、体制四个方面必须配套。现在应当着重解决体制问题。

科研和生产之间，本来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应当有横向的、经常性的、多方面的、千丝万缕的渠道。我们过去的体制，把它们之间直接联系的渠道堵塞了。科研单位只有一条垂直的对上负责的系统，没有通向社会、为生产单位服务的渠道。长期以来，科研工作不能适应生产的需要，有需要的成果又往往成本太高，或技术上无法配套，很难在生产中应用推广，原因就在于此。这是老问题了。多年来，大家都着急，都不大满意，想改变现状，又似乎无能为力。在老体制的框

框里打主意，确实很难改变。当然，出路是有的。出路在于改革。

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两方面都得改。经济体制正在改，情况已经起了很大变化，并将继续发生更大的变化。现在对科学技术最热心的，第一是农民和乡镇企业，可以说是如饥似渴。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也有了紧迫感，很积极。大中企业的情况就不同了，相形之下，它们中间的不少单位，变化还不够明显，对技术进步的要求还不够迫切。这种现象，乍看有点反常，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企业的活力越大，竞争越激烈，对科技的要求就越迫切。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逐步推开的。农村经济，乡镇企业，改得最早，搞得最活，它们在竞争中体会到技术落后的苦头，也尝到了依靠科学技术的甜头。竞相采用新技术，已成为它们的内在要求。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也放得比较活，有了采用新技术的压力和动力。大中型企业目前还不够活，但这是暂时现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它们也会跟上来的。因此，现在是把科技体制改革提到议程上来的时候了。再晚，就会误事。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为了更好地进行四化建设，为了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科技体制非改不可。

二、现在，经过调查，试点，多次座谈，十易其稿，形成了一个文件。对这个改革方案应该怎样估价？能不能解决问题？有没有副作用？正反两个方面，都得仔细考虑。最后当然只能靠实践来检验，而且也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完善。但是，事先总是尽量考虑得周到一点为好。大家已经发表了很多意见，讨论得很好，今天我也简单地谈一些看法。

现在设想的新的科技体制，和原来的科技体制相比，有许多不同。主要的一点是考虑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的科技体制必须与此相适应。三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在存在着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无视商品货币关系，无视价值规律，无视经济杠杆，同经济有关的事情就办不通。硬要去办，常常是事与愿违，劳而无功，最多也只能是事倍功半。你要农民向城市提供粮食、棉花、肉类，下死命令不行，最重要的是得按照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你刮共产风，平调，农民就不干。你要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也得讲价值规律。如果谁支援谁赔钱，越积极越吃亏，一天两天可以，长期就办不到。科研也是这样。要科研面向生产，就必须承认智力劳动创造的价值，就应当允许绝大多数技术成果成为商品。要使科研单位为全社会服务，就必须打破条条块块的限制，开拓技术市场。要科研单位经常地主动地到企业里去找课题，就必须改变过去单纯由国家拨款的制度。要科研单位与生产单位休戚相关，就应当通过技术合同等多种经济办法，使他们在利益上联系起来。试点的经验证明，运用这些经济手段，非常见效，多年来三令五申解决不了的问题，有的地方开始得到解决。技术成果很快发挥了作用，社会增加了财富，企业得到了好处，研究所也壮大了力量，添置了设备，科技人员增加了收入。生产单位和科研单位都很高兴，劲头都很大。当然，试点的单位只有五百多个，不算很多，时间也不长，但可以看出一个方向。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之间的关系肯定还会进一步发生变化，支持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体系就能够逐步形成。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在互有需要

和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将会出现多种形式的科研和生产的联合。研究所内部也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大批既懂科技又懂经营的新型管理人才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造就出来。

有两个不大好解决的问题，这次文件上有意识没有提。一个是有些研究所，水平很低。一个是有些研究所，人员过多。这两个问题，都应该解决，也有办法解决。但目前不必把过多的精力牵扯在这些事情上，操之过急没有好处，单纯用行政手段也难以奏效。转上了新的体制，科研单位之间出现了竞争，大锅饭吃不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形势也就成熟了。当然，从领导上来说，要积极地帮助他们提高，安排那些不适合在科研单位工作的人改行。

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同志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有的怕步骤过急，震动过大，打乱研究工作的秩序，特别是怕影响重大攻关计划的进程。有的怕忽视必要的基础研究工作，影响科技研究的纵深部署。有的怕事业费削减过猛，一时难以做到经费自给等等。这些顾虑都值得重视。现在提出的改革方案吸收了大家的意见。

第一，对重大的科研课题，包括重大的攻关项目在内，可以继续实行计划管理，也可以由国家同研究单位签订合同。计划管理这种形式要保留，对实行计划管理的项目，也要提倡采取招标承包等新的手段。技术成果商品化有多种形式，既包括企业在技术市场上向研究单位购买技术成果，也包括研究单位同政府部门签订科研承包合同。

第二，在改变拨款制度的同时，对事业费如何管理，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对不同类型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机构，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有的不削减，有的少削减，有的要取消，但对后两种情况，都不是骤然削减，而是分步骤实施。这样，可以使研究机构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削减下来的事业费仍将全部用于科技，而且通过新渠道投入科技事业的经费今后将不断增加。

第三，在推进开发研究的同时，要注意加强应用研究，并为基础研究提供稳定持续发展的条件，使各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工作都能各得其所，协调发展。推行基金制，以同行评议、择优支持的办法代替“领导批条子”，这可以使研究经费分配得更加慎重，更加合理。

当然，现在的方案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但看来大的方向是正确的，构思是合理的。科技体制改革应当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稳步前进，力求避免大的震动和损失。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随时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我们不仅不要求一刀切，而且反对一刀切。过去政治运动多，形成了一种习惯，喜欢“刮风”。搞经济建设，搞开放，搞改革，不能靠“刮风”，要防止一哄而起，一拥而上，要多采取积累的方式，扎扎实实地循序渐进。

三、改革科技体制，目的何在？书记处讨论这个文件时，耀邦同志说，改革科技体制，就是要动员千军万马上山摘桃子。千军万马，是指整个科技界，知识界。上山，是指投入四化建设的洪流中去。摘桃子，是指把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四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耀邦同志这段话很明确，是我们改革科技

体制的目的。请同志们务必掌握这一点。改革科技体制，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要堕人烟海，把根本的宗旨忘掉了。第一，不要忘记千军万马。改革科技体制就是要解放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他们的知识和才能发挥出来，使他们有用武之地。第二，不要忘记上山摘桃子。解放出来干什么？出成果，把又多又大又好的桃子一筐一筐摘下来，在经济建设方面作出贡献。这是我们的目的所在。至于经费自给等等，那都是手段，不是目的。

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当前最迫切的，是要把我们现有科学技术力量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使之对经济建设作出在现有条件下可能作出的最大贡献。将来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其他问题都好办了。这是大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评价我们科技体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的、根本的、最后的标准只能看是否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也就是是否促进了我们振兴经济、实现四化的事业，而不是其他。

四、去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尖锐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科技体制改革来说，更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尊重知识，不爱惜人才，肯定没有希望。中央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不是资源，不是资金，也不是体制。我们国家基本上不缺资源。资金问题，从长远看，也是可以解决的。体制问题，现在就在改革，大有希望。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才，缺乏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我们一定要看到，当今世界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更新的周期大为缩短，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的经济能否起飞，有没有后劲，就要看科技工作和教育工作能否大大发展，人才问题能否顺利解决。我们在人才方面有两大问题：一是人才不足，二是现有人才的作用远没有充分发挥。比较起来，后一个问题更为迫切。新的人才当然要大力培养，但首先应该把现有人才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现在的工作靠他们，为未来培养人才也要靠他们。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调动老知识分子和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里说的中年知识分子，不仅包括四十多岁而且包括五十多岁的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骨干在内。在年龄问题上，对他们的要求应该同对行政干部的要求有所不同。科研单位、学校、企业、国家机关，都要切切实实为知识分子解决具体问题，特别要注意知识分子的合理报酬问题，一定要逐步而又切实地解决好。

听说，有些同志对人才流动表示担心。总的来讲，提倡人才流动，方向是正确的。现在的流动，大部分是流向搞活了的小企业，因为它们生产搞活了，需要在竞争中求生存。小企业需要科技人员，它们过去长期分配不到大学生。不少大企业和研究所又积压了相当数量的科技骨干不能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技术人员转向小企业，这是无可非议的。当然也要防止副作用。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应采取简单的行政办法去堵，而应通过疏导的办法，因势利导，存利去弊。最近有个材料，上海有个工厂有四个技术骨干被小厂拉走了，原定的攻关计划无法继续进行。要注意防止出现“老基地垮掉了，新企业又上不去”的现

象。为了缩小副作用，可以规定一些办法，例如必须保护原单位的技术权益；科技人员必须在半年或一段时间以前向原单位提出申请，办理正式离职手续后才能离开；以及规定最高工资额和开征某种所得税等等。现在确有一些技术人员，流入新单位后，工资待遇过高。这种现象，反映了人才奇缺。随着今后小企业技术人员的增多，随着技术市场的开拓，特别是随着骨干企业对技术人员工资待遇的改善，大多数技术人员是可以稳定的。

五、把千军万马动员起来，摘桃子的问题就好办了。摘什么桃子？大桃子小桃子都要。请同志们注意一个趋势：现在经济建设对科学技术人员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要求。

农村越出了单一粮食生产的小天地以后，多种种植业，多种养殖业，各种类型的乡镇工矿业，在产前产后包括咨询、服务、储存、运输和深度加工等各个环节上，都在不断地向科技界提出新的要求。

小企业不可小看。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对中小企业的作用重新进行估价。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在内，机制非常灵活。这种很有活力的组织形式一旦同科技力量结合起来，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我们四化建设中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面向经济建设，既要面向大中企业，也要面向小企业。

能源、材料、交通、通信、机械、建筑、消费品等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技术改造的任务，存在着大量的生产技术问题急待解决。我们既需要很先进的技术，也需要“不显眼的”适用技术。世界银行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也说，在中国，大量地不断地采用“不显眼的”技术，比采用非常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缩短同一行业中先进工厂和落后工厂在技术上的差距，比兴建少数最先进的工厂更重要。我认为，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量大面广的企业的情况的。

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消耗，对于所有工厂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我国工业品的成本构成中，原料、材料、燃料的消耗一般占百分之七十五左右。降低消耗，潜力很大，可以提供显著的经济效益。国内市场的需求已经起了变化，产品结构必须相应变化。国际市场的竞争更是日益加剧，首先是质量方面的竞争。质量比不上人家，只好放在地摊上贱卖。高技术的产品，一时比不上人家，还情有可原。有些事情实在说不过去。在西欧的文字中，瓷器和中国是一个词，瓷器来自中国，是中国的象征。但我们现在大量生产的瓷器远远不如人家。同样是衬衣，人家一件可以卖到几十美金，我们只能卖几块美金，而国际市场上的纺织品配额，只讲件数，不讲金额，我们就吃了亏。这样的事情多得很。我看要出榜招贤，科技界责无旁贷，同企业界一起，首先把我们各类出口产品的质量一步一步地提高，变劣势为优势。

综合利用很有前途。在旧体制下，一涉及两个部门，综合利用就发展不起来。现在情况正在起变化。国务院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准备确定一些鼓励综合利用的政策。特别是大厂，通过综合利用，过去的大浪费就可以成为大潜力。这方面，有许多能产生重大效益的课题。

六、改革，开放，搞活，既向科技界提供了新的条件，也向科技界提出了新

的任务。几年来，国家花了很大的投资从国外引进技术，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使用单位和研究单位、制造单位之间，应该彻底打破部门和地区的界限，同心协力，加速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发展过程，共同提高我们的生产技术和研究工作的起点，加强我们自主开发的能力。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通过改革，出现新气象，取得重大进展。

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势必影响全世界，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人估计，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遥感遥测技术等方面，有可能首先出现具有重大效益的突破。我们必须密切注意新技术革命的动向，及时掌握信息，定期作出分析。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已经开始了，今后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这对我们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建立，对我们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的确定，关系重大。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是个发展中的大国，需要各种门类各个学科的科学技术，需要各个层次的科学技术成果。各方面的科技人员，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千军万马，勤学苦练，无非是要有用武之地。过去，是我们体制上的一些弊病束缚了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发挥。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出人才，出成果，为人民造福，这是科技界自己的愿望，也是我们大家的愿望。科技体制改革，国家科委和各级科委当然要负起责任来，但这不单是科技界的事情。科技界、教育界、企业界，还有国家的各有关部门，我们大家都要努力，坚定而又有步骤地推进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实现我们预期的目的。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上的祝酒词

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

尊敬的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和大家一起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我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向我国妇女和世界妇女表示热烈的节日祝贺！

请允许我向在座的各国驻华使节夫人、向正在北京访问的女外宾表示祝贺，祝愿中国妇女和世界妇女的友谊与日俱增，为保卫世界和平、维护国际正义携手共进！

请允许我向在华工作的各国女专家、女学者和专家们的夫人表示祝贺，感谢你们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支援和帮助，祝愿你们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今年是实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第一年。农村改革继续向纵深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逐步展开；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将开始。这场意义深远的改革，关系着国家的前途，也关系着妇女的命运。

我向在城市和乡村投身于改革和建设的各族各界妇女表示祝贺，祝愿你们发扬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在生产、工作和各项改革中取得新的胜利！

这里我要特别向辛勤劳动，从事妇女工作、幼儿工作、教育工作、保健工作等方面的全体女同志表示祝贺，祝愿你们为之献身的神圣事业蒸蒸日上！

我还要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表示祝贺，表达我们的骨肉手足之情，祝愿我们炎黄子孙共同渴望的祖国统一的大业早日实现！

现在，请大家和我一起，

为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七十五周年，

干杯！

审计工作是加强管理和监督的重要保证*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打电话给于明涛[1]审计长对全国审计工作会议所作的指示。

这次审计工作会议开得不错。审计工作在我国逐步开展起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说明审计工作很重要。经济越是搞活，越需要加强管理和监督。审计工作是加强管理和监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使开放、搞活、扩权健康进行的一个重要保证。希望全体从事审计工作的同志做出新的努力，使审计工作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 释

1．于明涛（1917—），河北深州人。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广州市委书记，中南局秘书长、常委，陕西省委书记、省长，河南省代省长，中央委员。

认真解决现存问题继续推进企业改革*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

一、去年发生的一些问题，要认真清理，你们财政、税收部门要认真地抓下去。国家规定的税收一定要征收，税收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没有修改以前，还必须征收，要确立这一条。奖金税一定要收。最近我去了石家庄，据河北高扬[1]同志反映，去年滥发奖金的主要是一些小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商业部门及银行系统，真正的国营大企业还比较好，主要是它们没有太多的钱。今天广播了，有一个地方的农业银行每人发1000元以上的奖金。

二、总的来讲，建筑行业去年有明显的进步。由于过去浪费大，招标承包后，效果比较显著，但是肯定也有问题，有些甚至是很不像话的。一搞活肯定有空子，有空子就有人去钻，所以要防止这些钻空子的事。我们的改革是长期的，看来有两条要确立起来，作为长期的政策：一是坚持改革，二是加强管理，或者说继续改革，勤于检查。

三、关于人才流动问题。我总的看法是，不主张人才流动自由化。目前有些人才流动，我看可以利用这个形势，冲击它一下，有利于打破平均主义，但不能立足于此。有好多人在原单位被压着，不被重视，不使用，别的单位要，本单位就是不放，说自己要用、要提。过了一段依然故我。有些单位对知识分子要发些补助、津贴或解决一些问题，其他人员也就叫要同样对待，冲击波一个接一个，大锅饭、平均主义老打不掉。文艺界著名的演员，体育界优秀运动员要加一点工资就加不上去。平均主义不打破，人才很难脱颖而出，只能按部就班。现在人才很多，就是没有发现，如果允许人才流动，可能出些问题。也不要怕，可以想些办法，逐步建立章法，加以限制。

我考虑有这么几条：一是你要流动，必须在半年以前提出，不能说走就走，这一条我在科技会上讲了；第二条，在本单位的成果不能算你的，这是企业的成果，你不能拿去，作为与原单位竞争的对手；第三条，国家培养的人员要法定在国家企业中固定服务若干年，不到限期不能离开；第四条，你到新单位后超出原单位的工资部分要收税。总之，要因势利导，要定出几条来。韩信不走，也就拜不了将。所以我们的大企业，冲它一下，它就会对如何发挥有能力的人的作用问题真正加以解决。不冲一下，好多能人无用武之地，冲它一下，可解决一些能人

的问题。有些能人如名医，他们也不会去小单位，因为有些小单位缺乏科研、试验设备，无法施展本领。人才流动这种事不能全面推开，一推开就会出乱子，所以要因势利导。改革中可能有乱，乱中要有治，但心中要有数。

四、我这次去石家庄，有些感受。那里有两件新事：一件是生产资料高价结算。计划内调拨的也高价，统统进入市场。凡是需要的，统统去市场买，如果是计划内的补你差价。听说这件事连物资局李开信[2]那里也同意，已经办了几个品种。一、二月份实行以来，去市场买的人很少，因为大家都先利用库存了。买的人也不去抢购了，反正有货。也认真节约材料消耗了，品种调剂等也可以搞起来了，周转加快了。第二件事是大企业在利改税基础上搞承包制试点。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订出各种计划，经营者组织起来搞承包，承包合同完成了，奖励给经营者。有的是本单位的人搞承包，有的是别人来承包。石家庄国棉四厂一个副厂长组织班子，把各个环节的能人15个人组织起来承包，承包后拿出两名工程师专搞节约棉花，降低成本，仅节省这一项就增加收入500万元，而这个厂去年利润为800万元。这说明过去厂内浪费实在太大，管理无人负责，承包后，就发现了能人，大抓经营，抓节约，效果显著。像这种类型的经营者中，有些人不是为了钱，是想争口气，不相信这个企业在自己承包过程中搞不好。他们取得经营资格很不简单，有的是招标的。招标时承包方案要通过答辩，然后拿到职工代表大会上去通过才允许承包。这样搞才真正地解决了经营问题。这类经营承包制往往是划小核算单位，像石家庄的一个拖拉机配件厂，去年拿出两个车间搞承包，大承包下去配小承包，对能进行核算的商品组织承包。石家庄的经验证明，企业的潜力很大，现在大企业的中心问题是潜力未挖掘出来，经营者的积极性未挖掘出来，小企业活就活在潜力挖掘出来了，大企业就是躺在国家身上。承包后生产者变为经营者，经营者就抓节约，抓挖潜；层层承包的结果，经营者层层挖掘出来了，积极性也层层挖掘出来了。这样抓住关键，打破平均主义，效果大不一样。越是大的国营企业在利改税后越要解决挖掘经营者的积极性问题和挖掘全企业的潜力问题。石家庄国棉四厂过去派性干扰，一直疙疙瘩瘩，调整了几次，未见成效，这一次先是五个人组织起来承包，后来扩大到巧个人，都是关键环节上的人，这些人有一股子劲，要把国棉四厂翻个身，真正改变面貌，这种精神就很可贵。另有一家新建的印染厂，过去搞得一塌糊涂，领导班子不行，确定对外招聘承包，由一个曾在该厂工作现在化工厂工作的人承包。他承包后，干劲很大，从一月份到现在一直待在厂内工作，没有回过家。所以在利改税的基础上搞经营承包，明确责任制，企业中的潜力就能够发挥出来。

五、我看石家庄的经验有两条：一是在利改税基础上搞经营承包，经营者自愿结合。另一条是搞联合，松散的联合。在联合体内部实行期票贴现，这样搞大大压缩周转资金与贷款。有家东方塑料联合公司，在这个联合体中有生产厂与销售单位，生产厂为了生产借贷款，生产出来的东西给销售单位，销售单位以销售的钱来还生产厂的贷款。它们相互之间用期票不用现钞，这样贷款少了，周转也快了，普遍讲究效益了。还有一个新事物，有一家光明实业公司，是一个有300

多亩地的农村大队搞起来的企业集团，集团内搞了好多企业，还有旱冰场、电影院等。他们50%的税收照交，余下的利润60%留给公司，40%发给农民，每人的月工资达300元。我问了一下为什么赚这么多钱，公司的总经理即原来的大队长说：我们不是按你们大厂的办法办，而是我们农民的办法，劳动态度好，效率高。去参观时看到，车间中的农工都是埋头操作，根本不抬头看你，我们的一个农工可以顶上大厂的几个工人，现在他们每天工作七小时，另一个小时搞学习。看来看去，国营工厂的中心问题是效益问题，也要解决浪费问题，许多承包后的厂子都是从这个问题上突破的。石家庄如此，全国也是如此。像北京的印染厂、沈阳电缆厂都说明这个问题。所以，国营大企业要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大厂子搞好了，我们的经济可以上一个新的水平。

六、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看来得要几年时间。采用市场调节，肯定价格会有波动，几年内不可能就平衡了，将来在不断的震动中间趋于平衡，不能一下子平衡。例如：现在猪肉贵了，可是鸡蛋便宜了；过一段鸡蛋可能贵了，其它东西便宜了，或者到那时猪肉可能也便宜了。那就吃便宜的东西吧！总之市场是无情的。

注 释

1．高扬（1909—2009），辽宁辽阳人。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曾任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化工部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农垦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

2．李开信（1919—2015），山西原平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物资总局局长。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秘书长、顾问，机电设备招标中心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

划清不正之风与改革探索的界限*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最近在武汉召开了一个城市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会议，五十多个城市参加，会上大家有两个建议。一是希望这一次纠正新的不正之风，要注意划好界限。我们党的教训很多，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有过教训，反对精神污染又有过教训。他们建议中央注意一下界限的问题。二是他们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最大的不正之风”的提法有不同看法，认为这个话过于强调了，说绝对了。因为整个来讲，我们处在一个探索改革的过程，正处在由旧的东西向新的东西转化过程中，有很多问题还要探索，有许多事情要逐渐从过去的许多不适应的规定中解脱出来。比如前几年各地方讲的“变通”。我在省长会议上讲，不能什么都变通，要划个界限，有些能变通，有些不能变通。特别是在纠正不正之风时，必须令行禁止，绝不能再发生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但反过来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最大的不正之风”，探索就没有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最大的不正之风”，这句话本来是中纪委提出来的，我觉得很好，接过来了，用在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上面，这句话写不写上去，现在还没有想好。但是，真正严格执行起来，不能每个新的试验都经过中央批准。有些试验错了，可以改；有些试验是违法乱纪，可以处罚；有些试验还是属于改革，没有改好，可以再退回来，大概几年之内就是中央的决策也难以避免这种情况。小平同志讲改革的问题要走一步看一步。我根据小平同志的话跟外国人讲，改革中间“如履薄冰”。就是说，像在薄冰上行走一样，一只脚踏实以后，再迈出另一只脚，迈的时候要注意，迈不好就收回来，立足点、重心不要一下子转到另一只脚上，一脚踏空就会栽到河里。改革中间要有回旋余地，就是说，不能保证每一项试验都成功，有些试验不合适，可以退回来，不至于造成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分寸要恰当。

因为这是给人民代表讲，政府工作报告不能讲那么多道理，在党内讲这个问题，就要两面都讲，当我们刚发现并正在纠正这个问题的时候，要讲得很严厉，所以最近报纸上连篇累犊。但也必须看到，这是在改革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最重要的在于是不是能够及时发现。如果能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就不可怕。我的看法，去年总的评价，我同意定一同志的话，是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好的形势。第四季度特别是十二月出现的问题，很多事先没有预料到。但是应当说，问

题一旦出现，我们发现比较早。我认为现在这个问题的危险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个话我是认账的。去年第四季度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耀邦同志提出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比较早，在书记处议论形势时我也谈过两次，我说形势问题要议票子，现在心中无数，票子的情况不议清楚，形势就说不清楚。后来国务院连续开了将近一个月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找了一些青年经济学者议，一开始大家讲得比较好，说中国经济进入起飞呀，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呀。后来我说不能这样说，要围绕票子议形势，先把票子的情况分析清楚。我说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国在今后几年之内，要想不出问题是困难的，要想事先想得很周到，然后再去改革，那就改不了，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水平，就是吃这么几碗干饭，事先要把下一步棋都看得很清楚，现在没有这个本事。但是迈出一步留有余地，不要一下迈出去收不回来，这个我可以做到。所以我讲，出了问题是否能够及时发现，对于我们今后改革能否最后完成，是个关键问题。当然，去年十二月份出的问题，要把它挑出来，确实是突出的，但时间就那么长。问题一出来能及时发现就不可怕。

有一些问题，现在还无力解决，比如奖金问题，我也摸过，奖金发得最滥的一般是小企业。现在工资非常不合理，许多乡镇企业的工资大大高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放活的小企业工资都高于大企业。这也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不可能长期这样下去的，但现在急于早点解决这个问题也不一定有利。拿汽车运输来讲，过去所有国营企业搞运输的汽车，基本上是赔钱的，运费吨公里二角钱；现在汽车包干到人，大体上一辆汽车一年的利润是八千元，个人得的也比较多，大概一人一个月得一百多二百元。大学教授会说，开汽车的拿那么多，我一个大学教授一个月才二百元钱，这叫什么重视人才、重视知识？是乱搞嘛。但是，现在要把汽车司机的工资拉下来，只有改掉包干，还照样亏损。何去何从？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在研究。汽车运输有没有乱涨价？我不敢讲没有，但是总的讲汽车运费比过去降低了，大部分运费吨公里是一角八，有些地方降到一角五，汽车运输形成了竞争的局面。为什么这样？因为效率提高了。就像农民一包干收入马上增加一样，小企业一放开，收入马上增加。对汽车司机工资现在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多年来就是国家办运输公司，赔钱，或者盈利很少，现在基本上改变了这个局面。现在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有些富的地方一个支部书记月工资五百元。我前几天刚从石家庄回来，石家庄郊区有个西里大队，土地大部分被占用了，就办了一个光明实业总公司，下属十九个企业，农民一个人一个月工资三百元。我问公司干部你这样得了啊？他说我怕什么？我们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用于积累。究竟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效益高。这个公司是七小时工作制，我说你们为什么搞七个小时？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说，现在农民要学技术，给一个小时学技术。他说你最好到我们厂子看一看，你在那里走一圈，有没有人抬头，有没有人跟你说话？没有人抬头。可惜我没有去。后来石家庄市委的同志告诉我，这个公司的劳动效率比同样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高一倍以上。乡镇企业工资大大高于国营企业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但这是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有的企业过去浪费很大，现在一包，不浪费了，效益出来了，要是不包，那就他们也很苦，国家也拿不

到。

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国家机关。我估计人代会如果敞开讲的话，大体上意见多的就是这个方面。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科技人员、知识分子、文教卫生人员，工资没有什么提高，物价又有所上涨，生活水平没有多少提高。但是农民收入大大增加，小厂子工资增加。为什么现在要着重解决大中型企业的问题？因为大企业工人工资并不高，奖金乱发的也比较少。（胡耀邦同志：大企业里面，石油、煤炭工人的工资是高的。）大同矿务局的井下工人月工资一百五十元，附近小煤窑的井下工人月工资三百元，但是小煤窑的煤价比国营的还要低，就是因为效率高。这也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一个很大的潜力，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改革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需要解决，但有些问题要创造条件才能解决。比如一个技术人员到小企业，马上给房子，给高工资，大企业就留不住，这很不合理，需要解决，但要创造一定的条件才能解决。因为这是向人大的报告，不好讲那么多道理。听说丕显[1]同志要在党员会上讲话，有些道理恐怕要说一说。估计这次人代会上，农民代表会讲好，工人代表大部分也会讲好，大企业可能有点意见，机关的同志大概意见相当多，知识分子说你们光打雷不下雨，雷声大雨点小，讲来讲去，落到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什么也没有，都是空话，都是为工农谋福利。这是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农村也有这个过程。农村一开始改革的时候，凤阳的农民说好得很，苏南的农民不一定说好，因为他们的征购基数高，越是困难、落后的地方，放开以后一下子富起来了，国家高价收购农产品，他们高兴得很。又如鲁西的棉花，大部分是高价卖的，南通的棉花大部分是牌价。当然，现在用比例价，大家基本上接近了。工厂里面看来也得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很不合理的现象，但是有了这一段才有条件逐步趋于合理，这个问题要向大家说清楚。不是说不知道，不想解决，问题是要创造条件。

注 释

1．陈丕显（1916—1995），福建上杭人。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任东南局青委书记，苏中区党委书记，华中野战军七纵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云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顾委常委。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
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各位代表：

刚刚过去的一九八四年，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实现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的三大任务方面取得伟大成就的一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的形势越来越好的一年。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使我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新的提高。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构思，本着友好合作、互相谅解的精神，经过同英国政府的平等协商，终于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使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中英两国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为通过协商途径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经验。“一国两制”的构思和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对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也必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继续取得了人民高兴的重大成就，在对实现本世纪三大任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上有了新的进展。当前，怎样把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顺利地、健康地推向前进，巩固和发展我国大好的经济形势，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现在，我就以此为题，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一、关于经济形势

一九八四年，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代化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总形势很好，不只是一年好，而是连续几年好，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前景，已经开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九八四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一万亿元，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七点九的基础上，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二，各方面的经济效益也有提高。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都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二，国家财政状况继续好转。

一九八四年，我国农业又获得了大丰收。粮食产量达到四亿零七百多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一；棉花达到六百零八万吨，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一。农村多种经营有较大发展，商品经济越来越活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期求自力更生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但是由于过去农业政策上的失误和其它原因，粮食、棉花的产量长期增长缓慢。随着农村改革和农业新政策的实施，近几年农业生产连续大幅度增长，去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近八百斤，棉花十多斤，按照我国人民当前的食物结构和衣着水平，一般已可以达到温饱有余。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全国有少数地方的农民生活还比较困难，我们已经和正在采取许多措施来努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应该看到，十亿人口的大国，能够在农业上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一九八四年，我国工业生产继续全面增长。特别令人高兴的是能源的生产超过计划的要求，原煤产量达到七亿七千多万吨，原油达到一亿一千四百多万吨，都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保证了整个工业的持续增长。冶金、化工、建材、机械、电子、轻工、纺织、食品、医药等行业，都有了新的发展。军事工业部门在发展民品生产和向民用工业转移技术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效。交通运输业通过挖掘潜力，运输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列入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六十五种主要产品的产量，到一九八四年已有四十三种提前达到一九八五年的指标。

一九八四年，我国重点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技术改造的步伐明显加快。国家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一百二十三个大中型项目，工程的进展比较顺利。一批重点煤矿、电站、油井、建材企业和铁路新线建成投产，有利于克服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有利于为生产的持续增长准备后劲。全国人民关心的宝山钢铁总厂建设，第一期工程已有部分项目投产，其余也进入全面调试阶段，炼焦、炼铁、炼钢、初轧可望在今年内陆续投产。科学研究、文教卫生和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建设投资，比上年都有所增加。全年施工的更新改造项目七万四千个，全部建成的三万九千个，对增加生产、提高质量、改进品种和节约能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近几年来得到了比较合理的安排。随着生产建设的持续增长，通过各种渠道，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安排了四千二百多万城镇劳动力就业，职工和农民的收入继续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去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达到六百零八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五；农民的纯收入，全国平均每人达到三百五十五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七。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吃穿用各类商品都继续向多品种、中高档和多样化发展。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去年农村建成住宅约六亿平方米，城镇建成住宅

约一亿平方米，又有大批农户和部分职工住上了新房。

各位代表！经过几年的调整和改革，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在走上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新路子。这几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一个是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国民经济的基本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一个是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二者互相促进地共同增长。这是过去多年来我们希望做到而没有做到的，现在开始做到了。这对于我国今后经济的长时期发展将产生重要作用。

这几年来，我们从加强农业入手，以发展农业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了重工业的发展。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农业总产值（包括村办工业）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九，一九八四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五，远远超过了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六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二的速度。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和全面发展，为工业提供了原料、市场、资金和劳力，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同时我们对加快发展轻工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并且要求重工业调整服务方向，更好地为发展农业、轻工业服务，促进了轻工业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轻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二，一九八四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九。许多轻工产品特别是呢绒、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中高档产品的产量急剧增长，花色品种不断增多，质量逐步提高，丰富了市场供应。在农业和轻工业持续发展的推动下，因经济调整而速度一度下降的重工业迅速回升。一九八二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八，一九八三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四，一九八四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二。重工业的产品结构和产品质量也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改进。这些事实说明，我们在实现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上一个有深远意义的变化。

与上述特点密切联系，这几年我国经济的增长是在居民收入首先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推动下实现的，消费需求的扩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又为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条件。一九七九年以来我们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同时在城镇扩大劳动就业，增加了职工工资和奖金，使城乡人民的收入和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三年，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由一百七十五元提高到二百八十八元，一九八四年达到三百二十元左右，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百分之七点三，远远超过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六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二的速度。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资金积累也逐步增多。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调整初期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降低到一九八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从一九八二年起略有回升。这几年我们在调整中纠正了过去片面强调积累而忽视消费的做法，正确认识和发挥人民消费对于促进生产的积极作用，生产、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也显著改善，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上又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

各位代表！前几年特别是一九八四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和成就，是坚

决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结果，是正确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的结果。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开始突破长期形成的僵化和封闭的模式，城乡经济越来越活跃，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横向经济技术联系日益增多，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迅速扩大，改革和开放健康发展，这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流。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农村展开了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党和国家的各项农村政策顺应强国富民的历史要求，符合亿万农民勤劳致富的共同愿望，广大农村劳动者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促使了农业生产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同时，我们在城市改革中也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一九八四年，从正确解决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入手，在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建筑业体制、商业体制、外贸体制、金融体制、计划体制，以及在进一步发展城镇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城市经济开始出现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特别是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确定了基本原则。这个纲领性文件的通过和公布执行，标志着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积极搞活国内经济的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特别是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工作的发展。去年，全国进出口总额达到一千二百零一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点七，扣除价格和汇率变动因素，实际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六，超过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全年共批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七百四十一个，超过前五年的总和。全国以各种形式实际使用的国外资金达二十六亿六千万美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七。计划内签约成交的技术引进项目有一千多项，成交额比上年大幅度增加。

一九八四年我国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继续好转。各级政协、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积极为四化献计出力，我国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很大成绩，我国国防更加巩固。全国人民从一年比一年好的发展形势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因而对党和政府更加信赖，对实现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前景更加充满了信心。

各位代表！我们说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很好，并不是说一切都好，我国经济在发展中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除了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仍然紧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还不够合理，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以外，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对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管理不严，货币发行量多了一些，再加上乱涨价等不正之风的影响，致使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初步分析，一九八四年增发的货币，就其主要部分来看是合理的。这是因为，随

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需要增加货币投放，在搞活城乡经济的过程中，生产经营单位增多了，个人收入增加了，单位和个人的手持现金也要相应增加；农业发展了，许多农副产品国家要收购。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超出了正常需要的范围，主要表现在信贷增长过猛和工资奖金增长过快。一九八四年银行的各项贷款总额比一九八三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八点九，其中十二月一个月的增长额就占全年增长额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四。一九八四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其中第四季度增长百分之三十八。出现这样的问题，同以下的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去年下半年在酝酿一九八五年金融体制改革和企业工资改革的过程中，有关部门曾经提出过各专业银行可以自主支配的信贷资金数额，以一九八四年的实际贷款数为基数核定；在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时，工资总额以的实际数为基数核定。结果一些金融单位不顾大局，为了增大信贷基数，竞相放贷；一些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从本单位利益出发，为了增加工资基数，乱提工资，滥发奖金和补贴，致使银行信贷和消费基金急剧增长。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采取任何比较重要的改革措施时，都要周密考虑可能引起的各种反应，拟定出保证改革健康进行的相应的规定和办法。这是一条重要的教训。

总的来看，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是支流，但必须予以重视。其中，有些是改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得到解决；有些是因为我们事先考虑不周或事后检查不严，是应当引以为戒的。我们在去年第四季度发现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了研究，采取了一系列解决措施，并于今年二月召开全国省长、自治区主席和直辖市市长会议作了进一步的统一部署。现在，全国各地正在认真贯彻落实省长会议的精神，并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今年春节以后全国的货币回笼情况和财政收入情况是比较好的。实践再次证明，只要全国上下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做好工作，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解决前进中存在的问题，一定能够把今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继续健康地推向前进。

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一九八五年，是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第一年。在前几年农村和城市的改革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今年的改革工作，是巩固和发展当前经济大好形势的需要，是保证整个改革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分关心和支持改革。现在，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和发展，城乡生产全面增长，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国民经济充满前所未有的活力，是改革的大好时机。我们必须充分运用各种有利因素，积极进取，不失时机地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当前，指导改革的行动方针应该是：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有了正确的构思和决策。在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上，必须坚定

不移，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不懈努力，以实现国家兴旺发达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根本目的。在改革的方法与步骤上，必须谨慎从事。从今年的改革来说，一定要慎重初战。这是因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涉及面广，关系复杂，我们还缺乏经验；我们的国家底子薄，经济和财政力量有限，各方面的承受能力不强；经济生活中去年出现的货币发行偏多等问题，又给当前的改革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我们必须足够估计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认真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如果不积极进行改革，坐失良机，不能理顺经济关系，就会失去群众；操之过急，草率从事，造成失误，也会失去群众。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看准了的坚决改，看不准的先试点，使工作有充分的回旋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根据上述精神，国务院决定：今年的改革一定要继续把经济搞活，促进各方面的经济效益有一个较大的提高，迈出工资制度和价格体系改革的重要一步，同时切实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为今后的改革打下较好的基础，为进一步理顺经济关系创造更好的条件。同经济体制改革相密切联系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两件大事，今年也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展开。

为了进一步搞活经济，在农村，要继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继续抓好粮食生产，努力开辟粮食的多种用途。根据市场需求，大力发展畜牧业和水产业，发展林木、水果和药材种植业，发展饲料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小型采矿业、小水电工业、建筑建材工业以及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逐步建立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农工商运综合经营的合理的产业结构，使我国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农村劳动力得到合理的利用。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鼓励农民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在加工、销售、运输等领域中，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经营，逐步完善农村合作经济。积极组织城乡商品交换，广泛设置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认真加强储运系统，使农副产品更多更快地变为在城市适销的商品，以适应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

在城市，小企业要继续搞活，并要着重解决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问题。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推进的。前几年首先是搞活农村经济，接着在城市中先赋予小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而让大中型企业担负较多的财政上交任务和指令性计划的生产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前几年是城市支持了农村的改革，大企业支持了小企业的改革。实践证明，这样逐渐推进的改革步骤是正确的。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应该把进一步搞活大中型骨干企业的问题逐步提到日程上来。为此，必须全面落实国家已经确定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各项规定。对于经营管理水平高、贡献大、而留利过少的少数大型企业，要逐步降低调节税，适当减少指令性计划任务。从大企业自身来说，必须强调挖掘内部潜力，千方百计降低成本，降低消耗，增强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上，要分别不同情况，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适

当划小核算单位。在经营方针上，要实行多种经营，积极开展综合利用，发展跨行业、跨地区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和协作。国营大中型企业在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方面有着许多有利条件，而它们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少，浪费很大，我们一定要通过改革把它们的巨大的潜力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在工资制度和价格改革上迈出重要的步子，是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任务。我国现行的工资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职工队伍本身建设的需要，严重阻碍着技术进步和劳动效率的提高。许多商品的价格，仍然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直接影响对企业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的正确评价，影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进行这两个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已经成了进一步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理顺各种经济关系，促进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由于工资制度和价格体系的改革既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全局，又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全国人民，必须上下一心，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加强纪律，保证改革取得应有的效果和成功。

一九八五年的工资改革，重点是改革现行不合理的工资制度，逐步消除工资分配中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积弊，初步建立起能够较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新的工资制度。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工资制度，使职工工资同本人所肩负的职务、责任和劳绩密切联系起来。在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过充分准备，逐步推行职工工资总额随同本企业经济效益浮动的办法，把职工和经营者的工资、奖金同所在企业的经济效益高低、本人贡献大小很好地挂起钩来，既保证工资增长同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保持必要的比例，又有利于国家对消费基金的合理控制。在不具备条件的企业中，仍可沿用现行的办法，并加以改进。经过改革，工资制度和工资工作将转上新的轨道。今后我国职工的工资，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得到经常的稳定增长，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工资分配中要么长期不动、要么大家“齐步走”的局面，这将是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重大进步。

目前工资改革的各项具体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实行新的工资办法，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从今年七月开始算起，中小学教员从今年一月开始算起。通过这次工资改革，我国职工的工资水平虽然将有一定的提高，但也不能要求很高，不可能把过去二十多年工资制度中积存的所有问题全部解决。这是因为，一定时期职工的工资可能提高多少，客观上受着社会生产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高低的严格制约。近几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的幅度，已经超过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今年的情况还将是这样。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现在要求有更多的提高，显然是不现实的，是根本做不到的，也是不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的。我们应该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引导广大职工充分认识这次工资改革的目的、意义和前景，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工资改革中，各地方、各部门和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从全局出发，自觉遵守有关工资改革的各种规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要坚决停止扩大编制、增设机构和机构升级，认真核定各级行政职务和专业技术职务的结构比例和人数限

额，不许超过国家下达的增加工资的控制指标，不许动用地方财力额外增加工资，也不许自立工资标准和进行自费工资改革。企业单位，必须核定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指标（一般为上交税利）的基数，以及两者之间挂钩浮动的比例，认真剔除去年工资总额中的种种不正当因素。同时，要合理规定企业留利中用作生产发展基金和其它基金的比例，严格限制工资基金开支的范围，不许挪用银行贷款、企业生产发展基金和其它基金来发放奖金、补贴和实物。对于当年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超过国家规定幅度的企业，要征收累进的工资调节税。对沿用过去的工资、奖金办法的，要征收超额奖金税。对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的职工和其他社会成员，准备征收个人所得税。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应当有合理的差别，但不能过于悬殊。

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经过多方面的权衡比较和认真测算，考虑到当前国家财政负担能力、企业消化能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一九八五年决定采取放调结合、小步前进的方针。在改革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认真贯彻价格“有升有降”的原则，努力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今年价格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合理调整农村粮食购销价格和棉花收购价格并实行合同定购，把其余农副产品的价格逐步放开，实行市场调节，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二、适当提高铁路短途运价，以利于调整运输结构，充分发挥公路和水运的作用；三、适当拉开质量差价和地区差价，减少和淘汰质次价高、不适合市场需要的产品，促进优质名牌产品的迅速增长，促进商品的合理流通；四、对原材料、燃料等重要生产资料，计划分配部分的价格基本不动，按规定企业自销的部分，实行市场调节，推动生产资料进入市场。这个改革方案是积极而又稳妥的，有利于在保持经济全局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这样做风险较小，成功的把握较大。各地方、各部门必须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集中力量把已经确定的改革搞好。

今年的价格改革，是在去年货币发行偏多、部分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既要在改革价格体系上迈出重要的一步，又要坚决防止物价出现大的波动。为此，必须坚决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国务院已经决定：第一，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盲目增长，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财务上乱开口子，乱提工资，乱发奖金、津贴和实物。从一九八五年起，恢复工资基金管理制度，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工资基金，都要在银行开立专户，先存后用，由银行按规定监督支付。现在不少单位一方面不顾客观条件，互相攀比，盲目扩大消费基金；一方面又要求物价不上涨，这是自相矛盾的，是办不到的。第二，统一制定信贷计划和金融政策，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和调节职能，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和现金投放。适当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增加信贷资金来源。中央银行对所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和各专业银行，要统一规定货币发行控制数字，各专业银行和各地分行必须按计划执行，不得突破。第三，从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预算外投资的规模。对超过限度的投资，要征重税。第四，坚决压缩行政费开支，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今年的行政经费预算，从中央到地方，一律削减百分

之十，集团购买力要按上年实际数额核减百分之二十。严格执行机关团体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的审批制度。第五，在坚决控制货币投放的同时，进一步抓好消费品工业的生产，积极增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和名牌优质产品，增加市场供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速货币回笼。目前各地正在认真贯彻以上各项措施，希望各级人大及其常设机构加强监督，使这些措施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执行。

从我国现实的经济情况来看，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绝大多数商品的货源有较多的增加，只要人们按照需要购买，不发生抢购现象，是可以满足供应和保持价格基本稳定的。对于极少数供不应求的高中档商品，如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名牌洗衣机等，国家已决定采取预售办法，直接供应给消费者，禁止中间倒卖，价格坚持不动。少数农副产品，主要是一些鲜活商品，价格放开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有所上升。但根据一些地方的经验，价格放开后将促进生产的迅速增长，随着生产的上升，价格也必然逐步趋于平稳和合理。在这个过程中，对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重要产品，如城镇居民吃的粮食和食油，继续实行定量供应，销售价格不动；肉价放开以后，国家将对城镇消费者采取定额补贴的办法，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各地方、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必须切实加强对市场物价的监督管理，严格禁止违反国家规定随意增加提价的种类和扩大提价的幅度，特别要坚决制止国营工商企业乱提价和变相涨价。对于违反国家物价政策和财经纪律，任意涨价、哄抬物价、就地倒卖、牟取暴利的，要给予严厉的惩处。各地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消除人们对价格改革的顾虑，避免思想波动，防止抢购风。我国有十亿人口，两亿多户，市场容量很大，如果都去集中购买某种东西，国家储备再多也经不起冲击，这样就会人为地造成供应紧张，而且会给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长期的实践经验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实行基本稳定物价的政策，避免物价大幅度波动，这对于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社会的安定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不能把物价基本稳定理解为物价冻结，认为任何价格的变动都必然带来人民实际生活下降。这是因为，产品价格随着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情况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变动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从我国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合理调整和适当放活价格，注意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同时切实处理好价格变动和人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不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近几年为了解决长期违背价值规律所造成的价格严重混乱问题，我们对价格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农副产品价格的提高，显然是直接对农民有利的。就城市职工来说，生活费指数的上升确实比过去高了一些，但由于就业面扩大和平均工资提高，除去物价上升的因素，绝大多数家庭实际收入仍然有较大的提高。近年来城乡居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是广大人民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都能感受到的。一九八五年，我们要迈出价格改革的重要一步，职工生活费指数还会有所上升，但由于同时进行工资改革和对某些副食品给予价格补贴，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平仍将有一定的提高。总之，在改革价格的过程中，保证人民

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但不下降，还将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这是我们必须坚持做到的，也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在国家机关和科研、文教、卫生等事业单位中工作的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近年来虽然收入增加较少，其中有些同志家庭负担较重，生活还比较困难，但他们仍然忠于职守，积极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许多贡献。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表现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思想和风格，这是广大群众都看得到的，是值得大力表彰的。当然，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关心他们的困难，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财力的增强，逐步改善这部分职工的生活。我们这几年进行的经济改革，先解决社会生产发展和企业职工、农民增加收入的问题，后解决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增加收入的问题，这是从我国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社会生产发展了，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进一步增加收入的问题也就更有条件解决了。对于这种情况，相信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在今年的改革中，我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干部，特别是城市广大职工，肩负着光荣而又繁重的任务。无论是进一步搞活城乡经济，还是改革工资制度和价格体系，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各地方、各部门和各企业事业单位，都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物资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在这些方面下苦功夫，比真本事。我们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都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社会提供多种多样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和优质服务，为繁荣社会主义市场和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作出贡献。而那种把增加收入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涨价上的想法和做法，是同改革的目的相违背的，是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各位代表！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为了保证各项改革健康地、顺利地向前发展，推动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进，有必要在以下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把人们的认识进一步统一起来。

第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方针，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比赛增长速度的现象。这几年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已经相当高了，只要大体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完全可以实现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的。我们当前应该着重强调的，还是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而不是追求不适当的高速度。现在，有的地方不顾社会的需要和市场供求情况，不顾财力、物力的可能，不考虑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收支的平衡，片面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互相攀比增长速度。对这种现象如不及时加以纠正，不仅会助长讲假话、搞形式和浮夸风，助长乱集资和平调风，而且会造成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紧张，妨碍改革的顺利进行。追求过高的速度，即使一时一地勉强搞上去了，也会因为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原料、材料的供应无法承受而难以为继，那将会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大城市是全国或区域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担负着

从各方面支持全国或地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它们不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业产值的翻番上，而应当更加注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推动社会技术进步，大力发展包括商业、外贸、交通、邮电、旅游、金融、保险、咨询、技术服务和其它社会服务在内的第三产业。这样，大城市的工业增长速度可能低一些，但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却不会低，很可能还会高一些，对全国所起的作用也会更大。因此，应当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作为考核大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

第二，既要搞活经济，又要加强管理。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深刻的改革，一方面要继续解放思想，强调开放、搞活；一方面要加强管理，健全制度。这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原则仍然是：小的方面放开放活，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当然，强调管理，指的是要针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建立一套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各个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经济综合部门和监督检查部门，要加强对宏观经济情况和经济调节手段的研究，做好必要的协调平衡和调节工作，严防重大经济活动失控，做到经济改革不出大的偏差，即使出点偏差也能及时得到纠正。财政、银行、审计、税务、海关、物价、统计、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都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要从实际出发，继续制定好各项必要的经济法规和规章制度，并且严肃认真地贯彻执行。

第三，加强全局观念，克服本位主义。经济改革是关系全国人民根本利益和经济发展全局的大事，有关改革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必须由中央通盘考虑，统一部署。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应当在遵守中央统一部署和政策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决不能逾越权限，各行其是，更不能只从本单位和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干扰中央的统一决策和部署，损害全国的大局。各地区、各部门对于新出现的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可资遵循，要及时向上级请示报告，绝不能自作主张，擅自行动。在改革中，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加强全局观念，在改革中采取的行动和措施，都应当考虑到在宏观方面所引起的反应，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现在有的地方、部门和单位，把改革曲解为可以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谋取本单位的利益，可以不顾生产发展的长远利益去追求眼前利益，损大公肥小公，甚至损公肥私，这是完全错误的，是必须坚决加以纠正的。

第四，必须继续坚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继续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我们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忽视人民生活消费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不积极满足人民生活消费正常增长的需要，是错误的；不顾生产发展的可能，脱离我国国情，盲目追求高消费，也是错误的。企业事业单位都要正确处理收益分配中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以利于扩大再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要坚决反对把生产基金变为消费基金分光花尽的错误做法。我国人民的消费结构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要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加以正确的引导。这几

年我国经济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总的来说国家的底子还很薄，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还很低，只有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才能逐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才能为人民生活持久的改善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五，必须继续纠正各种不正之风，排除对改革的干扰。前个时期，乱发奖金、实物和补贴，乱涨物价牟取高利，利用权力倒买倒卖紧缺物资，以及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等不正之风有所滋长。这些新的不正之风，对改革具有极大的危害。如果不坚决加以纠正，不仅败坏改革的信誉，妨碍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破坏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制止新的不正之风的各项规定，采取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刹住这些歪风，绝不允许再发生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必须切实加强组织纪律，严肃政纪法纪。在纠正不正之风的过程中，要执行正确的政策。对由于在改革中缺乏经验、界限不清而办了错事的，应着重教育，吸取教训。对为本单位或小团体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应没收其不正当收入，并给予情节严重者以必要的处分。对借改革之机，违法乱纪、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者，决不能姑息纵容，必须彻查严办。对一切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必须继续给予严厉打击。在这同时，对严守纪律、勤奋工作、有能力、有贡献的优秀职工要提拔重用；对勇于检举揭发不正之风的一切工作人员，都要保护和表扬。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国家的法律。我们的全体干部和人民都应该胸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坚决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办事，按照国家的法律办事。有了一个安定团结、纪律严明的良好社会环境，我们的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总起来说，全国从上到下，在有关改革的重大的决策、部署和措施上，必须统一认识、统一步调。我们的改革，只能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确定的正确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决不能不顾国家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一哄而起，一拥而上；我们的改革，要认真考虑到在宏观经济上引起的反应，决不能只顾局部不顾整体，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我们的改革，是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下功夫提高经济效益，决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损国家以肥私，损消费者以利己，靠歪门邪道捞取外快。坚决贯彻执行这些原则，就能够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各位代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国家这几年执行了一系列符合历史要求和人民愿望的正确政策，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是大有希望的。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继续前进，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谦虚谨慎，兢兢业业，艰苦奋斗，扎实工作，我们的经济就一定能够振兴，我们的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我们的形势就一定会蒸蒸日上，我们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必须保持国民经济
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各省市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趁各省市负责同志来京开人大的机会，今天请大家来开个短会，主要是想向大家通报一下宏观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形势任务、大政方针，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讲了。今天是要补充讲讲涉及经济全局的几个问题和我们的一些设想，同大家通通气，对对话。同志们在下面，从本地区、本单位，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看得比较多，很需要了解宏观方面的情况，以便能够看到在全局上，在稍远一点的未来可能发生什么问题。

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很好。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用了这样一个提法：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要做到“持续”、“稳定”、“协调”，这三点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巩固和发展这样一个大好形势。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搞得好，就有可能使这样的好势头保持和发展下去。这是我们应当努力争取实现的。如果搞得不好，也不排除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丢掉这种好势头，在经济上出现曲折，甚至大起大落。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需要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

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巩固和发展大好经济形势，中央、国务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各地正在积极贯彻执行，存在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情况已有所好转。但是，从各地反映的一些情况来看，要真正消除可能发生的风险，继续保持好的势头，还需要各级党委、各级政府继续努力，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抓紧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已经采取或即将采取的各项措施。姚依林同志已经讲了宏观方面的一些情况，万里同志也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讲到当前应注意的问题。这里，我就外汇、票子、速度等三个问题讲些意见。这三个问题，核心是速度问题。

一、关于外汇问题

这几年我们结存了一部分外汇，中国银行也还有一部分可以使用的头寸。加

上国家的几百吨黄金储备，就我们国家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是可以办成一些事情的。只要我们使用得当，真正用在关键上，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将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们去年就考虑要怎样把结存外汇用好。去年底外汇储备由一九八三年底的89亿美元，下降到82.6亿美元。尽管如此，也还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并不是国库空虚。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基本情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引进一些关键设备，还要进口一些必需的原材料。因此，从长远来看，外汇的基本状况不是宽裕而是偏紧，外汇短缺的现象将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存在。即使目前我们还结存了一些外汇和黄金，如果大家以为情况很好，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任意乱花，那么这些家底很快就会搞光。今年三月底，结存外汇已下降到68亿美元。问题还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大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按照现在大家的想法去搞，不加控制，外汇结存还会急剧下降，今年或明年就可能出现外汇困难。国外资金当然可以利用一些，但要看到外国资本一般都是这样，当你外汇多、底子厚的时候，他想方设法要借钱给你；而当你外汇紧缺的时候，他就会卡你，不借钱给你，或者借钱给你要附加许多苛刻的条件。世界上一些负债累累的国家都有这个痛苦的教训。最近，日本报纸已有消息说，中国外汇急剧下降，好像中国经济又出现了什么问题似的。对此我们不能不加以注意。

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出口增长缓慢，进口大量增加。这种局面不改变，是非常危险的。

今年到三月底止，出口51.5亿美元，完成全年计划的19.1%，比去年同期增长2.7%；进口60.4亿美元，完成年计划的19.9%，比去年同期增长54.9%。进出相抵，贸易逆差＆9亿美元。除石油出口增加、纺织品持平外，其他产品出口都在减少。特别是一季度对港澳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20%，影响很大。

出口为什么上不去？主要是由于消费基金增加过猛，计划外固定资产扩大太多，造成国内的需求过度膨胀。而国内需求膨胀的结果，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价格上涨。现在出口产品的成本大量增加，价格上涨很多，特别是一些紧俏商品大家抬价收购。据经贸部统计，去年全国出口商品实际成本2.79元换一美元，今年二月份上升到2.%元。冻猪肉外贸收购价5500元一吨，现上升为6200—6500元；对虾收购价原为每斤3.7元，现在议价已达10元；兔毛收购价特级每斤27元，上升到100多元；鳗鱼苗去年收购每公斤300—350元，现涨到1000元以上，最高达到3500—5000元。看来今年出口亏损会大量增加。二是货源紧张。由于国内需求增加，这几年本来已趋缓和的内外贸争货源的矛盾又加剧。很多商品在国内畅销，价钱也好，于是许多地方和单位愿内销而不愿外销，以致出口商品收购困难。为什么进口增长过快呢？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维持生产的超高速度和维持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投资。我们的工业产值去年的增长率是13.5%，但第四季度比上年同期增长达17.9%，今年一季度又比去年同期增长23%。这不仅是高速度，应该叫做“超高速度”。要支撑这个超高速度，只好大量进口原料、材料和组装件。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也过分膨胀，各地竞相上项目，引进生产线，

你引我也引，要引大家引，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的生产线多引进了几十条，都靠进口部件装配过日子，原材料不够也大量进。据粗略计算，去年进口的钢材相当于国内生产量的36%，进口的汽车和底盘相当于国内生产量的犯%，进口的化纤和长丝相当于国内化纤生产量的60%，彩电的组装件70%以上是进口的。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发展。这是难以为继的。

由于出口上不去，进口大量增加，现在已出现一个危险的信号：到二月末开出的进口信用证与可收的外汇已出现较大的逆差。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信号。这样大的进口规模，这样的办法乱花外汇，是我们国力无力承担的，完全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要不了多久就会把我们的外汇储备花光，到时候只有大幅度削减进口，挤商品出口，造成国民经济大起大落的严重现象，势必在经济生活中产生紊乱。这种情况我们无论如何应当避免。

对于目前外汇平衡上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解决，及早解决，以免陷入被动。这是关系经济全局的一件大事，必须认真抓好。但是在步骤和方法上，不搞急刹车、一刀切，要有区别地、逐步地进行。既不要在国际上引起大的震动，似乎中国又出了什么大问题，又不要在国内经济上引起大的波动，使生产能够正常进行。

解决外汇问题，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努力开辟创汇来源，增加外贸出口，提高换汇率，并注意增加非贸易外汇收入；另方面要节约外汇，压缩支出，把得来不易的外汇真正用在刀刃上，发挥最好的效益。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大力增加出口。这次会后请各地无论如何要集中抓一下出口问题，务必保证今年出口任务的完成。目前货源很紧张，国内需求一下子还压不下来，在内外销货源发生矛盾时，我看要实行“出口优先”。各地区各单位都要顾全大局，安排货源要先外后内。要认真检查一季度出口计划完成的情况，坚决扭转进度迟缓甚至下降的现象。

要加强对出口的管理，坚决纠正抬价收购、低价倾销、互相挤占市场的现象。要严格实行出口商品许可证制度，按照商品类别，分别由经贸部和各省、市发放出口商品许可证，一些大宗的、关键的商品必须由国家管住。具体办法由经贸部拟定实施。

第二，必须控制进口，用好外汇。今年的进口用汇计划必须调减一部分，使进出口基本平衡。原来批准给各地区各部门使用的外汇额度，用汇时间要延长，额度要压缩。有些原来规定三年用的，现在拉长为五年用，每年的用汇额度就减少了。凡是与外商签订了合同或协议的，不能失约，但今后再签订新的合同，就应当从严掌握。下达给各地各部门的年度外汇使用额度，不得突破。如何用好外汇，今后要划几条杠子，应当把有限的外汇用好，出成果出效益。首先应当用在能够增加出口、提高创汇的项目上；其次，要用在四化建设所急需的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上。外汇的使用方向，不能是用来维持生产的超高速度，不能是用来维持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膨胀和重复引进，这点我们必须很明确、很坚

决。

第三，沿海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带在创汇中、在出口中担负着特别重要的任务。我们实行开放，并不是为了多花外汇，而是要发挥沿海的优势，打入国际市场，多创汇。我不久前讲过，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既要“进”，更要“出”，今后要努力做到出大于进，为国家多出口，多创汇。不然，全国的外汇平衡怎么实现？当然“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开始的时候，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带也需要一些外汇作周转。但用汇一定要和创汇结合起来，不能靠吃国家外汇来发展。应当发挥对外辐射的作用，在国际市场上显身手。

二、关于货币投放问题

要使货币的投放避免失控，必须解决好消费基金增长太猛和信贷资金增长过快的问题。

消费基金必须继续控制，不能松懈。去年全国职工工资性支出比上年增加258亿元，增长22.3%，超过了生产的增长幅度。其中支付奖金、补贴等增加105亿元，增长46%。今年一季度工资性支出仍比去年同期增长34.9%。当前我们要认真贯彻省长会议精神，决不能使今年的消费基金再冒上去。去年规定的奖金税，必须如数上交，不得不了了之。河北省比较严格，奖金税已收2200万元，其他各省市都要认真去抓，务必不能让那些不老实的人占到便宜。

信贷资金投放过多的问题，过去讲得不够，应当抓紧解决。为了维持超高速度，就要多建厂子，多搞基本建设，多引进生产线，于是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都大大增加。去年年底，工业贷款余额为131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大大超过了工业的增长幅度。流动资金贷款全年增加762亿元，其中十二月份就增加425亿元，相当于一九八三年全年增加额的1.4倍。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去年发放乡镇工业贷款290亿元，比一九八三年翻了一番多。今年第一季度的贷款也是上升的趋势。农业贷款一季度增加56.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4.5%，其中集体和承包户贷款增加13.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5.4%；乡镇企业贷款增加24.3亿元，增长318.9%。另外信用社还发放给乡镇企业贷款22.4亿元。由此可见，一季度银根并未抽紧。春耕需要用些钱，是季节性的问题，而乡镇企业信贷太多，发展太快，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稍高于国营企业是应该的，但今年一季度乡镇企业却增长45%，显然过高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村调整产业结构的必然趋势。它对活跃农村经济，促进农民致富有重要作用。各地因地制宜搞一些养殖、开矿、小水电、农副产品加工、建材、运输服务等行业是必要的，但也不能过急过快，盲目发展，拔苗助长。特别是加工工业一下搞多了，社会需求减少后就会发生问题。各种工业包括乡镇工业追求高速度，必然造成各方面的紧张，外汇紧张，资金紧张，能源交通紧张，原材料紧张，支持不了。电没有那么多，工厂只得停三开四，拉闸限电，或者买高价油，搞小柴油机

发电，得不偿失；公路没有那么多，汽车一下增加许多，只能造成交通堵塞，运输效率降低，两台车顶一台车用；资金没有那么多，就多发票子，那就会引起通货膨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货币发行，一定要在宏观上控制和管理好。货币发行如何才适度，超过什么限度才是多发了，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新课题。现在我们正处在从自给半自给的封闭式的旧经济模式向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经济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一些旧的计算公式已不适用，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研究出新的计算方法。现在城乡经济搞活了，流通领域扩大了，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营方式发展了，经营核算单位增多，货币流通速度减缓，相应需要增发一些票子。我们要研究出适合中国情况的计算公式。对于去年货币投放多了多少，现在一下还说不清楚。我们从十二月份猛增的情况分析，估计全年大约多发80亿元。因此，今年的票子发行应从紧掌握，上半年要力争多回笼一部分票子，才能应付下半年投放的需要。今年三月份，除了把一、二月份投放的51亿元票子收回外，净回笼4.5亿元；回笼比去年同期少，第二季度的回笼任务相当重。上半年如果不多回笼一些票子，全年货币投放的数量就难以控制得住。下半年大量的农副产品要上市，不能说不收购；工资改革要出台，也不能说没有票子不搞；维持正常生产用的投资和流动资金，也不能让银行关门不贷了。所以，上半年的银行工作必须为下半年的货币投放准备条件。上半年多回笼几十亿元，下半年就主动了。以前我曾经讲过，我们要适当地把银根抽紧一点，以便为改革创造一个好的条件。今年工资改革、物价改革都要迈出重要的一步。目前物价上涨的指数已不算小。二月份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升5.3%。如果票子再发行过多，几件事凑在一起，那就要给改革增加很大的困难。

总之，今年的货币投放要先紧一些，一是要控制消费基金，二是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除了正常生产和建设所需的资金、收购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必要的资金以外，其它的要压缩。城市工业贷款和农村乡镇企业贷款都要压。要区别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情况，把银根抽紧一点，走一段再看看。为此，需要把信息搞灵通一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断调整，避免出现大的问题。

三、关于经济增长速度问题

外汇问题，货币问题，归根到底是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分不开的。为了维持过高的速度，就大量使用外汇进口，大量投放货币支撑，各方面都绷得很紧。因此，要控制外汇的下降和货币的投放，从根本上说，就必须抑制社会需求的过度膨胀，放缓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一个比较松动、留有后备的经济环境。这样，既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又有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

对经济发展速度，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达到十二大提出的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只要保证每年递增7—8%的速度就绰绰有余了。“六五”计划期间，看来可以超过这个速度。从目前我们国家的国力来看，有

个7—8%的增长速度就比较正常，这在世界上来看，也算是高速度了。这样可以集中力量把经济关系理顺，把基础设施搞好，把后备力量准备充分一些，为进入九十年代的经济振兴打下坚实基础。在连续几年好的形势下，我们又有些头脑发热，现在已经出现了片面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竞相攀比增长速度的不好的苗头。增长10%都不过瘾，要向更高的指标看齐。你提10%，他就提15%、20%，似乎指标越高就表示思想越解放。春节期间，我去东北。辽、吉、黑三省的能源那么紧张，工业产值年初的头两个月增长11%—13%，应该说这已经是相当高的速度了。他们还说，思想不如某些省市解放，没有增长那么多。我对他们说，怎么才算思想解放啊？难道10%以上的速度还低吗？能保持下去就不错了。还有乡镇企业，各地都想向江苏、浙江和广东看齐。农牧渔业部安排今年全国平均增长29.8%的速度，已经是很高、很高的了，不少省市都安排增长40—50%，大大超过全国平均速度，地县又层层加码，压任务。这样做怎么吃得消呢？

竞相攀比，追求超高速度，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对改革的进行是不利的。我们的着眼点，是要使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而不在于一个时期要搞得多么高。一个时期搞得过高，很多矛盾解决不了，会留下来不少隐患。陆定一同志前些时候写信给我，认为现在形势好，但类似大跃进之风，似乎吹起来了。大跃进的教训，我们应当记取。追求超高速度的结果，使社会的总需求超过社会的总供给，因此表现为物资的短缺，物价的上涨，表现为要大量进口物资来填补。但这是不能持久的，当外汇短缺、紧缩进口时，就会形成生产的大起大落，将被迫来一次大的调整。为了短时期的超高速度，务虚名，就会带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低速度，造成经济的不稳定、社会的不稳定。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就吃过这种亏。还要看到，追求超高速度，势必把经济方面的各种关系搞得很紧张，我们的改革也很难成功。现在工资改革还没有开始，票子已经投放过多，如果发展下去，物价轮番上涨，人心就会浮动，改革就难以进行，难以奏效。又如，要扩大企业自主权，要提高经济效益，使我们的产品上品种、上质量、上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物资很紧张，什么东西都好像缺乏，“萝卜决了不洗泥”，那么，改进经营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提高企业素质等都会成为空谈。现在有些企业和单位，又在大量“复制古董”，重新生产那些已被淘汰和更新的老式机床和老式锅炉。而且成本上升，亏损面扩大，质量下降，这是不好的征兆。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什么经济效益，什么现代化，都会被抛掉。更为重要的是，这样搞的结果会在政治上给国内国际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搞错了，中国这一套不行了。我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保持冷静的头脑，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这里还要说一下大城市的增长速度问题。这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讲了大城市不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业产值的翻番上，而应当注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推动技术进步，发展第三产业，发挥城市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的功能，更好地为全国经济建设服务。因此不应当把工农业总产值、而应当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考核大城市经济的主要指标。这个报告是经过中

央政治局、书记处讨论通过，人大批准的。应该说是把大城市从产值指标的重压中解脱出来了。但是某些大城市仍然提出来工农业产值要提前翻番，把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不是把绳索往自己身上套吗？万里同志也经常说，像北方的某些大城市，不仅能源、交通很困难，连用水都很困难，工业增长速度能比小城市、比乡镇企业高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条件不同，要求不同，地区之间、单位之间都不能攀比。

当前正在纠正新的不正之风，这是非常必要的。不正之风和超高速度是有密切联系的。搞超高速，也会助长不正之风，使它很难纠正。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整党，坚决纠正不正之风，大力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但是经济上的问题，还得通过经济的办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为此，就必须在宏观上加强经济管理，一是要搞好经济立法，制定经济法规，堵塞漏洞，使正常的经济活动有章可循；二是要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促进生产，调节供需，繁荣经济。适应新的形势，迫切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同步建设。

去年的经济形势是很好的，今年的经济形势也是好的。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到巩固和发展这种大好的势头。我们绝不能在经济上再出现一次大的波动，关键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接受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反反复复的教训。当前必须适度地抑制社会的需求，控制消费和投资的过度膨胀，逐步放缓增长速度。当然陡然一下降低很多，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步子要稳当一些。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对形势要有正确的分析，冷静的估计。只要全国上下有统一的认识，一致的行动，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就一定会实现。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

告马洪、房维中、袁木[1]同志：

此件值得一看。发展第三产业，对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调整具有重大意义，对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也作用很大。同时，也是我今后加速国民生产总值及国民收入发展速度可靠的潜力。望能组织几个人就此专题作进一步研究和规划，并提出应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它既是关系调整，又是一项大的经济改革。这个问题，在“七五”纲要中应是一个重要部分。

赵紫阳

四月十五日

注 释

1．袁木（1928—），江苏兴化人。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曾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中组部调研室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全国政协常委。这是赵紫阳对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1985年47期《国外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一文的批语。

搞好城市改革发挥城市功能*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湖北省和武汉地区党政军党员负责干部会上的讲话。

这次到湖北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城市改革的情况，重点又是武汉市的改革情况。这几天听了省里和市里的汇报，找了一部分同志座谈，总的来说，我感到湖北的形势、武汉的形势是很好的。湖北省委在关广富[1]同志主持工作以来，工作是做得好的，中央是满意的。

就全国来讲，政治形势、经济形势都很好。在省长会议和这次人大会上对经济形势有个概括的说法，就是：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如何继续巩固和发展这个形势。我们过去历史上有过教训，形势好了，就不谨慎，结果反而会出问题。所以现在要提出如何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问题。

如何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概括来说有四点：

第一，要坚持改革。我们多年来经济工作中的一些积弊，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因此，坚定不移地、有步骤地把改革推向前进，这是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关键。

第二，要加强宏观的控制和管理。特别是在三个方面要控制好。一是控制信贷资金，包括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和流动资金的贷款；二是控制消费基金；三是控制外汇支出。现在我们经济工作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旧的管理办法正在改变，而新的管理办法还没有系统地制定出来，这就往往会出现一些漏洞。因此，在微观放活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和加强宏观的控制和管理，包括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经济立法，都需要加强和完善。

第三，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

第四，要逐步地把目前的超高速度减慢下来，使经济发展速度成为可以稳定的、持续发展的、正常的增长速度。全国去年工业的增长速度全年平均14%，其中第四季度达到18%，今年第一季度是23%。这个情况，一方面要看到是好事；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发展速度过高，势必大量贷出流动资金，大量搞固定资产投资，并且大量动用外汇进口原材料。就我们的国力来说，靠这样的办法，长期维持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的。如果不保持清醒，很可能有一天会大起大落。大量投放货币和大量支出外汇，同搞超高速有直接的关系。速度太高，国民经济的

弦绷得太紧，也会助长不正之风。在速度上不应盲目地互相攀比。当然也不宜急刹车，那样也会使经济受到影响。因此，要妥善安排，逐步减缓。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下城市改革，特别是大中城市改革的几个问题。

一、充分发挥城市的功能

城市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中心，是城乡经济网络的枢纽。城市改革不仅仅是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而且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改革。因此，不能就城市论城市，城市改革的意义远远超出城市本身的范围。这是由城市的地位、任务和功能所决定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现在城市改革已经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只有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才能把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链条带动起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城市的改革。抓好城市的改革，也会进一步带动农村改革。

城市的功能是什么？任务是什么？城市工作应当搞些什么？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过去我们对城市功能的理解比较狭窄。一提到城市，往往只想到它是工业基地。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城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工业生产的基地，而且应当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有些城市还是科学、教育的中心。城市的工作和各项经济活动，不应该局限于为本城市服务，更重要的是为它所辐射的整个经济区服务。城市的规模不同，辐射的范围不同，服务的范围也就不同。比如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应该为全国服务。武汉地处中原，首先是为华中地区服务，进而影响到西南、西北。城市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城市的多种功能发挥出来，推动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城市工作的考核办法要改进。城市作用的大小和作用发挥的程度，主要是看它辐射面的大小和吸引力的强弱。因此，考核大城市（也包括一些中等城市）的工作，不能单纯看工农业总产值，而应当看国民生产总值。只讲工农业总产值而忽视其他方面，就会限制城市功能的发挥。

我们要重新认识城市的功能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意义。城市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城市的多种功能，把城市首先是大城市，改变成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社会化的、现代化的经济活动中心。要紧紧地把握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打开思路，进一步解决城市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二、简政放权，敞开大门，搞活企业

当前城市改革中要抓些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这么三个要点：简政放权，敞开大门，搞活企业。

搞活企业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

节。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都要从搞活企业出发来考虑，改革的结果要使企业能真正活起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首先应该是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企业的活力问题，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我们要通过改革，解决好这个问题。

简政放权，敞开大门，这是搞活企业的前提条件。简政放权，才有可能使企业不再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敞开大门、打破封锁，才有可能使企业从条块分割中解放出来。没有这两条，企业就活不了。

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敞开大门，对外省、外市、外地实行开放。开放才有竞争，才能进步，才能发展。武汉市在改革中提出“敞开三镇大门”，“让企业见市场的世面，经竞争的风雨”，敢于把大门打开，不怕外地商品冲进来，不怕个别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这体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一个有胆略的决定。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带来了商业繁荣，而且促进了工业和其他行业的进步，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怕在竞争中失败，采取封闭的政策，只能是保护落后，助长守旧依赖思想，越封闭越落后，最后只能被淘汰。

我们要实行对外开放，更要实行对内开放。前一阶段，我们对实行对外开放讲得比较多，对内开放讲得不够，抓得不狠。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开放。对外开放是发展国际范围内的商品交换，对内开放是发展国内的商品交换，都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条件。我们今天的城市与过去的“城堡”不同，城堡是封闭式的，城市则是商品交换的中心。城市的这一功能决定了它不能封闭，只能开放。先进的城市要开放，后进的城市同样也要开放。搞封闭是没有出路的。搞封闭，搞条块分割，只能人为地切断城市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既不能扬长，也不能避短，更不能带来落后变先进的转化。多年来条块分割的体制，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使城市没有真正起到经济中心的作用。这个问题必须在改革中认真地解决。

简政放权，政企分开，要有步骤地进行。中央各部和省除少数部门和行业外，所属企业原则上应下放到所在城市管理，首先打破中央部门这些条条和省这些块块。企业下放到城市以后，要避免城市变成新的块块。城市一定要简政放权，政企分开，改变多年来政企不分，干涉企业内部事务过多的现象。市政府的职能同城市的功能是有区别的。随着企业下放，市政府管理经济的部门应进行相应的改革，可以先改变职能，后改变机构。形象地说，就是先撤“香火”，后拆“庙”，可能比较有效。改变职能，就是要多用经济杠杆去引导企业，多用经济法规去管理企业，少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更好地为企业服务。改变机构，就是要加强综合经济部门和经济监督部门，裁减专业行政管理部门。

当前要着重解决好局以下行政性公司的问题。这种公司上面有局，下面有企业，把权放给企业，它没有多少事可干了，总是要截留一些权在自己手里，使规定下放的权力无法落实到企业。因此，这类公司有的可以撤销，有的应改为服务性的公司，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规定下放给企业的权力，一定要全部下放给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有活力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三、开辟多种市场

城市与市场是不可分的，大城市是大市场，中小城市是中小市场。要逐步开辟多种市场，不仅有消费品市场，而且应当开辟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各种市场配起套来，经济杠杆的威力才能显示出来，城市的多功能作用才能落到实处。

过去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实践表明，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有害的。现在，我们把生产资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指令性计划，按计划价格进行内部调拨；另一部分是计划内允许自销和指令性计划以外的，可以进行市场调节。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前一部分所占的比重会逐步缩小，后一部分会逐步扩大。我国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主要不是通过统一调价来解决，而是通过逐步扩大进入市场调节这一部分的比重来解决。我国农副产品价格的改革就是走了这样一条路，事实表明这样做是成功的。这是中国独特的做法。我国粮、棉等农副产品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统购派购占绝大部分，后来逐步加大超购、议购部分，最后形成了比例价。既调整了价格，又没有引起大的震动。许多生产资料也要走这条路。石家庄市采取了一种变通办法，把计划调拨给企业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不直接拨给企业，改由城市组织进入市场，按市场价格销售，市场价同调拨价的价差按计划指标返回企业，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开辟金融市场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商品生产要求发展横向联系，而目前我国的金融则是纵向联系，各方面的资金难以互相融通。这是一个矛盾。开辟金融市场，首先要解决横向融通问题。要鼓励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投资，通过融通，把资金引导到社会需要和宏观效益较好的方面来，以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

要积极发展技术市场。技术市场是科研和生产的媒介，它能够沟通科研部门和生产单位的联系，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既推动了生产，也促进了科研。有了这种场所，就可以把科研部门和生产企业的潜力释放出来。许多城市都有一定的技术力量，有条件建立技术市场，把它搞好。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过去认为劳动力不是商品。但是，劳务市场实际上已经存在，劳务方面的招标、承包正在发展，很多第三产业也是搞劳务的。我们应当有领导有步骤地把劳务市场搞好。

搞好市场，搞好流通，必须相应地解决交通问题。武汉市提出搞活“两通”（流通和交通），这是对的。没有交通，当然就很难流通。我们现在交通紧张，运输结构不合理，运输效率很低。城市是交通枢纽，水、陆、空运大都在城市里交叉。要更好地在中心城市建立综合运输体系，组织联运，提高运输效率，并且根据不同的情况，改革运输的管理体制。

四、调整产业结构

农村改革中有个调整产业结构的问题，城市改革中也同样要把这个问题放到重要的位置。每个城市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把优势发挥出来。要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包括周围中小城市群和集镇在内的经济网络。不要每个城市都搞“小而全”、“大而全”，城市的产业结构要各具特点，城市之间要相互补充。每个城市、每个经济区都要研究自己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城市要注意合理地分配和使用资金。过去，城市有了钱就去上项目，办工厂。今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应当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功能，首先要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和发展第三产业，加强智力投资，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增强城市为本经济区服务的能力。

我国的第三产业很不发达。每个城市都要把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第三产业不仅包括为生活服务的行业，也包括为生产服务的行业。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益和效率如何，与第三产业发展的程度是有很大关系的。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低、发展慢，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把第三产业搞好，把为生产、为生活服务的行业搞好，在现有的条件下，企业的经济效益就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提高。第三产业要为整个经济区服务，不只是为本城市服务。发展第三产业，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逐步解决好价格问题，使第三产业企业具有活力，使办第三产业的单位和个人有积极性。

住宅建筑业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要积极进行城市房租改革和住宅商品化的试点。温饱问题解决后，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住房问题。把城市住房改革搞好，可以满足人民的迫切要求，改善居住条件；可以大量地吸收人们的消费资金，回笼货币，使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可以大大促进建筑行业的发展；可以克服在分配住房中的不正之风。住宅商品化涉及到房租问题，要研究出具体办法，既不增加入民的负担，国家又能承受得了。

五、增强企业活力

现在许多小型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搞得比较活，而担负指令性计划任务较重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却搞得不够活。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它们拥有的固定资产多、技术力量强、计划供应的原材料比重大，具有自己的优势。只要认真加以改革，提高管理水平，一定能够改变效益低、浪费大的状况，使巨大的潜力较快地挖掘出来。

大企业必须加强企业内部的改革。现在有些大企业主要不是想方设法在企业内部挖潜力，而是要求上级减税让利。这种精神状态是不对的。简政放权，打开大门，适当调减某些负担过重的大中型骨干企业的调节税和指令性计划指标，这是搞活企业的外部条件。但要把大企业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关键是要眼睛向内，搞好企业内部的改革。除了适当划小内部核算单位，搞好内部的经济责任制，积极抓好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以及开展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等以外，要把企业变成开拓型、经营型的企业，关键在于改革企业的人事制度，把优秀人才选

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企业可以采取考察任命、民主选举、自荐推荐、招聘任聘等形式选拔干部。人才选准以后委以重任，常常在短时期内就可以使工厂发生显著的变化。

我们要重视调动企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同时还必须重视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加强他们的责任感。这个问题很多企业没有解决好。因此，在实行利改税，解决国家和企业关系的基础上，还可以实行企业的厂长、经营者的经营责任制。就是说，主管部门与他们签订明确的经营责任合同，包括厂长、经理的责任、任务、职权和奖惩办法等内容，严格执行。加强厂长、经营者的责任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可能把企业办得更好。

企业之间要加强横向联系，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联合和协作。提倡跨地区、跨行业、跨城乡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以骨干企业和名牌优质产品为龙头的专业化协作和联合，富有生命力，应当推广。有的大城市提出，企业的技术改造原则上不搞土建，是一个好办法，有利于产品向小城市和乡镇企业扩散，减少大城市过于拥挤的现象。城市要在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方面，多作协调和组织工作，把社会生产力更好地组织起来。

六、搞好价格体系的改革

对搞好价格体系改革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价格是有力的经济杠杆，开放、搞活，理顺经济关系，发挥城市的功能，都离不开价格的改革，离不开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当然也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工作中，我们要牵“牛鼻子”，就要抓好价格体系的改革。

我们当前的价格体系改革，是在物资比较丰富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一种结构性的价格调整，这和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全面上涨根本不同。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就是物价有升有降，使各种商品的比价趋于合理。在价格调整和放开以后，在一段时间内，物价的总水平会上涨一些，但由于生产发展，工资提高，特别是家庭就业人口增多，加上国家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实行必要的补贴，因此，对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实际生活水平不至下降，生活质量能够提高，人们会感到更加方便，在经济上能得到实惠。武汉市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武汉市蔬菜、肉、鱼等副食品价格放开以后，总的情况是好的。食堂管理员对我说，放开以前买进的菜，能吃的只有六七成，三四成要扔掉；现在，从集市上买的可吃到九成，从国营菜场买的，也能吃到八九成，可食用的部分增加了。过去吃菜是老、粗、蔫，现在吃菜是嫩、细、鲜；过去吃冻猪肉，现在能吃到鲜肉；过去吃死鱼，现在能吃到活鱼。而且品种增加，节令提前，营业时间延长，服务态度改善，随要随买，任意选购，群众称便，商品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也大为减少。我们的物价改革，完全可以做到既能促进和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能保障

消费者的利益。旧社会通货恶性膨胀，“金元券”成为一张废纸，人们现在余悸犹存，形成一种对物价变动的紧张心理。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冻结物价，不懂得合理调价的积极作用。事实上长期冻结物价，造成商品匮乏，甚至有价无市，价格看起来便宜，买不到东西，或者只能买到质量差的商品，对广大消费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实惠。

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低，根本原因是生产不发达。价格不合理，既不反映价值，又不反映供求关系，必然影响生产的发展，阻碍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提高人民生活就会遇到很大困难。如不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理顺经济关系、搞活经济，都会成为空谈。当然，也要看到，价格放开以后，在一段时间内某些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增加消费者的支出，但东西多了以后，价格也就会趋于平稳。价格体系的合理化，带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的发展，产品的丰富，社会服务质量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改革已给我们以启示。长期以来，我国粮、棉价格过低，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调价以后，加上其他措施，出现了生产大发展的新局面，棉花自给有余并能出口，粮食从六千亿斤很快上升到八千多亿斤，农民生活也有明显的改善。所以，改革物价体系，是进一步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需要，是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价格体系的改革牵动全局。既要把价格关系理顺，使之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又要避免大的震动。这是必须掌握的一条原则。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和宏观综合平衡的需要，当前在价格改革上要采取放调结合、小步前进的方针。把改革的步子走稳一些，工作做细一些，比较稳妥。要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价格改革。一定要制止乱涨价。应该改的，要坚决改；该管的，要严格地管；不允许涨价的，坚决不准涨价。要做好群众性的监督检查工作。国营商业要参与市场调节，平抑物价。这几条抓好了。我们的改革就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改革价格，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要围绕价格体系的改革，有针对性、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改变那些旧的观念和习惯。各个城市、各个单位，都要通过一些生动具体的事例，来进行宣传解释，消除群众的担心和顾虑。这是当前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改革过程中，有大量的思想问题，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应该结合改革的实际去进行。

我国的物价改革，这几年小商品已经放开了，市场供应趋于缓和的消费品正在逐步放开，市场活跃，花色品种增多，过去很多买不到的东西能买到了，价格上涨的幅度也不大。一九八五年我们放开了农副产品和鲜活产品的价格，步子也迈得不小。生产资料实行计划调拨和市场调节两种价格，市场调节部分将逐步扩大。今后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还要逐步放开和调整第三产业的价格，解决房租和住房商品化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后，就可以说，我国的价格问题已初步摆脱了旧的体系，而纳入了新的轨道。沿着这个轨道，再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不断采取渐进的方式，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这样就有可能

在没有大的震动的情况下，基本上完成价格体系改革这个最关键、最困难的任务。那时，我们的城市和整个经济生活的面貌都将大为改观。

一九八四年十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为城市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现在武汉以及其他城市改革经验使我们看到，城市改革的路子已经更加明晰地展现出来。我们应该对改革具有充分的信心。

注 释

1．关广富（1931—2016），黑龙江穆棱人，满族。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曾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在首都各界人士纪念亚非会议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朋友们：

三十年前，二十九个亚非独立国家的领导人，根据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的建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会议通过了最后公报，发表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制定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鲜明地表达了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保卫世界和平，开展友好合作的共同意志。在万隆举行的这一会议，作为二次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的产物和它进一步迅猛发展的象征，载人了人类进步事业的史册。

三十年来，在万隆精神的鼓舞下，亚非地区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又有几十个国家赢得了民族独立，登上了世界舞台。这对于促进世界力量对于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对于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入类进步，都有深远的意义。

当然，亚非地区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对柬埔寨和阿富汗的侵略战争仍未停止。大片阿拉伯土地还被霸占。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没有得到恢复。纳米比亚的独立尚未实现。种族歧视在南非依然猖獗。亚非人民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捍卫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还没有结束。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军备竞赛，使广大亚非国家和人民深感不安。

三十年来，在经济领域，亚非地区各国在不同条件下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已开始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总的来看，亚非国家的经济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它们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受害者。

亚非地区三十年来所取得的进展和今天还面临的问题，从正反两个方面激励着和敦促着亚非国家更高地举起民族独立、世界和平、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旗帜，为更好地实现亚非会议所提出的各项目标做出更大的努力。在这方面，中国决心同亚非国家一起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中国珍惜自己得之不易的独立。我们也尊重别国的独立，同情和支持其他国家和人民采取他们所选择的方式去争取和维护他们的独立。我们认为，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中东问题以及南部非洲问题，都应该按照联合国大会多次做出

的公平合理的决议尽快获得解决。我们主张在亚非地区和全世界根除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制止大国欺侮小国、强国侵略弱国的霸权主义行径。

中国同印度和缅甸曾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国也参与制定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我们一向根据这些原则同亚非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同周围的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同许多亚非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在日益加强，友好合作在不断发展，并期待着同其他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

亚非地区有近一百个国家，在民族构成、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程度乃至于社会制度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再加上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有些国家彼此间发生矛盾和分歧难以完全避免。外来势力也从中挑拨，以售其奸。

亚非国家为了发展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必须排除外来干涉，像当年亚非会议那样，善于“求同存异”。所谓“同”，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就是要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并为贯彻这些原则而共同奋斗。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曾倡议亚非国家进行区域性经济合作。近几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提出并积极进行“南南合作”，这比亚非会议当时的设想前进了一步。我们认为，加强“南南合作”既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又能有力地开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我两年前访问非洲期间，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这就是：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我们决心按照这四项原则，探索各种途径和方式，同广大亚非国家一起，为“南南合作”做出贡献。

亚非地区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在这里曾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化。后来这两大洲都长期沦为殖民主义者侵略和奴役的对象。三十年前亚非会议的召开，是亚非国家新觉醒过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纪念亚非会议三十周年的时刻，让我们亚非人民更密切地携起手来，进一步发扬万隆精神，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当前这个伟大的时代，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做出无愧于前人和无负于后代的光辉贡献。

编制“七五”计划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五月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七五”计划纲要起草小组汇报时的几次谈话要点。

一、第三产业问题

第三产业在我们国家是个大题目。为什么没有搞起来，怎样才能搞起来，对这个问题现在心中无数，不甚了了。笼统地讲，发展第三产业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但具体提高多少，没有量的概念。过去忽视第三产业，影响了第一、第二产业的效率。第三产业占的比例达到什么水平经济效益最大？过头了也不行。总之，一、二、三产业要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发展第三产业要研究许多政策问题。中国第三产业落后，很多人搞采购，外国人打个电话就行了。如果第三产业发展了，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就不用回家洗衣做饭了。这些都可以提高效率。当然，第三产业发展与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有直接关系。工资不多，没有钱，就是第三产业发达了，他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要很好认识第三产业的地位和作用，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中国的第三产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如何划分，哪些是福利，哪些是产业？这些问题，都要组织人好好研究。

二、新兴产业问题

迎接新的世界技术革命，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在“七五”计划的蓝图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苏联、美国、日本、西欧都在讲新技术革命。西欧的基本观点是，欧洲经济会不会衰落下去，关键在于能不能联合起来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发展新兴技术，有一个正确决策的问题。不从我国国情出发，不量力而行，光搞新兴技术，把传统产业丢掉，这样不行；但还是按老一套搞，只发展传统产业，到了二〇〇〇年还是老水平，差距还会拉得更大。中国发展新兴技术必须为改造传统产业服务，这一点要明确，这是个大决策。

发展新兴产业，重点是发展电子、新材料和生物工程，这是对的，特别要突出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不是一个专门的产业，一向是同其他产业融合在一起的。要把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地位放得很高。发展新技术，必须集中力量。西

欧每年用于科研经费约五百亿美元，超过美国、日本，但是效益不如美国和日本，原因是他们国家多、分散搞，现在提出要联合起来，要搞“技术共同体”。他们的经验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对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元器件这些关键东西，我们必须集中攻关，资金集中使用，这样搞十年、八年就会见成效。至于这些元器件的装配使用，可以分散。大规模集成电路、基础元器件要像搞“两弹”那样，集中攻关。彩电、显像管、微型机的生产不能集中，可以分散。新兴技术不能完全靠引进，要结合引进集中攻关。经过十年，至少要缩小差距，而不是拉大。过去说同世界先进水平差二、三十年，现在还是拉大差距的趋势，弄不好，到二○○○年会相差四、五十年。

在科学技术问题上，要抓两头：一头抓“不显眼”的技术，一头抓决定前途的关键技术。抓两头，管中间。

三、外贸、外汇问题

外贸、外汇是我国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集中起来，一个是外贸体制，一个是汇率，一个是进口替代。我到北京以后，外贸体制改了两次，退了两次，其它方面改革都有前进，外贸改革还没有找到门路。外贸权力下放，要同完善汇率、关税、补贴等经济杠杆结合起来，首先要完善经济杠杆，然后才是下放。不然就会放了收，收了放。权力下放以后，才能解决技贸结合、工贸结合问题。首先要管住，然后再搞经营权力的分散。我们的问题是，先把经营权分散了，杠杆的完善没有跟上。当然，经济杠杆不是一下子能够完善的，要配套，又要逐步，还是动态的。对汇率，到底采取什么方针？这个问题是不是“牛鼻子”？外汇兑换，是管严还是放松？汇率可能采取人民币贬值的办法有利，可以刺激出口。贬值以后对国内物价有何影响？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不应该是冻结的，而应该是浮动的；不能与美元背离太大，也不能天天自动浮动，要有计划、有领导、有控制的浮动，有升有降。汇率浮动，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外汇存款。对外开放，媒介是汇率，汇率不合理，是外贸的“卡脖子”问题。

发展中国家外汇是个大问题，出口不发展，进口就受限制，借债也就有困难。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要采取一些大政策。中国机械工业基础很大，利用这个基础，加上廉价劳动力，并改进技术，我们就可以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成套设备，向发达国家出口零配件。机械出口要提到战略地位上来，关键是要采取扶植政策，提高竞争能力。

中国这么大，完全靠出口平衡外汇不行，还要搞旅游，扩大劳务出口。中国劳力多，而且手巧，劳务出口潜力很大。

四、消费基金问题

现在，我国工人工资水平同工业生产达到的规模不相适应，工资水平低了。这是由于多年来体制不合理，早该提高的效益没有提高，早该提高的工资也就没有提高。今后几年，有无可能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配套后，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工资也相应地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个时期的工资增长和效益提高的幅度不成正常比例；当然，这段时间不会太长。农民这几年收入增加这么多，就是因为效益显著提高了。目前一些工厂提高效益的潜力非常之大。企业真正把潜力挖出来，纯收入的增长会大大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的工资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公式不适用。当进入正常阶段，这个公式是适用的。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提高效益上来，同时提高工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效益没有跟上来，多发了消费基金。如果效益能上去，多发消费基金有什么不好？“七五”时期，可能效益提高不多，工资也提高不多；也可能把效益搞上去，较大幅度提高工资，经济生活不会出大问题。

五、城市化问题

城市化问题要有个规划。中国这么大，到处发展小城市，但交通不发达，联不起来，搞协作也有问题。要以大城市为中心搞城市群。不是搞卫星城，城市带，而是要形成社会化、专业化的城市网络。通过大城市、工业基地、交通枢纽把中小城市衔接起来，发挥中小企业作用，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现在看来，搞经济区范围太大。

六、农村劳动力问题

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应当发挥这个优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会腾出一部分劳动力。要组织他们开矿、修路、造林、发展建筑业和运输业。开发矿业，一是乡镇自己开矿，一是到大矿当合同工。国家建筑队伍、林场都用固定工，不是个办法。技术工人可以用固定工，普通工人要用农民合同工。这样做好处很多，利国利农。利用农村劳动力问题，要作为一个大的战略方针提出来。

七、经济体制问题

你们写的这个初稿，第三部分讲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好不用这个题目。作为计划，就讲微观放活，宏观控制。控制主要是间接控制，利用和完善经济杠杆。要设计出一个方案，有步骤地进行。主要是价格、金融和财政，都要围绕微观搞活、宏观控制。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主要文章就在这里。没有经济杠杆，就没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党内管经济的同志最不适应的就在这里。

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以指导性计划为主，这是“七五”计划的特

点。这个问题重点要讲间接控制。有的靠指令性计划，有的靠经济杠杆作用，包括价格、金融、财政，实际上是讲计划体制改革。

八、价格问题

价格改革是带头的。价格是经济杠杆中最重要最有效的形式。价格改了，才能暴露矛盾，才能为金融、财政改革创造条件。价格不改革，企业放活就没有条件。搞活企业是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价格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价格不改，税收会很复杂，只好用调节税、产品税。价格不改革，金融改革也难以进行。

原来设想，价格先改生产资料，后改生活资料。东欧国家敢放开生产资料价格，不敢放开生活资料价格。现在看，先改生活资料价格是可以的。今年把影响人民生活最大的副食品放开了，剩下的价格调整都没有这么大影响。这么大的问题解决了，再把住房、第三产业价格放开，难关就过去了。

价格放开的趋势，总的来看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高于消费资料，原材料、基础设施价格上涨高于加工产品。消费资料价格放开受市场制约。原材料价格放开，迫使加工企业技术进步。至于生产资料价格如何改，相当时期内是又放又调，这样比较稳妥，不至于出乱子。计划内小调，计划外放开，这条路子可以走得通。看来，每年都动一点不行，一次调完也不行，搞不好要“翻船”。两种价格并存，可能比较好，从宏观方面考虑，关键是要有合理的比例。总的看，计划内价格的部分绝对量不增加，比重下降。还有一个合理负担的问题，对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的企业，价格要同步调整，相互配套，使它们能够公平负担。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计划调拨价格部分绝对量不变，比重下降。例如，钢材统配部分，现在大约二千万吨，占百分之六十；以后钢材总产量达到六千万吨，计划调拨部分还是二千万吨，但比重下降了，只占三分之一。另一种是，也可能出现一种新的价格，计划内和计划外形成综合价格，在一定界限内浮动。

石家庄将全部钢材都按市场价格投入市场，然后对实行指令性计划的企业给予差价补贴，效果很好。田纪云同志提出，也可以考虑在生产领域加价，不一定都在流通领域解决。

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国营商业具有吞吐、调节作用，也可以说是领导作用。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主要的不是表现为保留多少固定价格，而是表现为国营商业参与市场调节，起领导市场的作用。

总之，两种价格问题是一篇大文章，是能否达到价格改革彼岸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应当好好研究，如何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消极作用。

九、财政问题

财政改革，作为方向应当减轻企业税负，首先减轻调节税，修订产品税，同时国家财政也要减轻负担，二者要相适应。要下决心，从明年开始财政不打赤字，不向银行透支。一是增加外债，一是增加内债，一是甩包袱。

可以考虑，逐步增加企业的留利水平。到一九九〇年，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百分之十。这个问题要算算账，到底提高多少合适，可以是百分之十以上，也可以百分之十以下。国家的财政收入也相应减少。如果拿出百分之十，可以“一箭双雕”，一是用来调整价格和税收，使企业盈利水平大体接近，处于同等条件下；二是企业留利水平提高了，可以为融通资金，为实行股份制创造条件。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的这一块怎么办？物质不灭嘛，还在社会上。可以通过金融体系集聚起来。这与原来设想不一样，过去强调靠财政集中资金，现在要减少财政集中程度。靠银行吸引和调节资金。看来，基本建设投资完全靠财政不行，应当逐步地把盈利企业基本转到银行。建设周期长的由中央和地方财政贴息；不盈利、非盈利企业以及服务行业，由财政拨款。实际上是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财政集资来搞建设，另一种是通过银行来集资。

十、金融问题

外国管理经济，主要靠银行，利用利率、证券交易、放款、收缩银根等手段。我们国家要发展商品经济，又不利用银行，在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价格、银行、财政三方面的改革要统一考虑。

要提高银行存款利率。提高存款利率以吸收资金，提高贷款利率以控制投资。当然，也要考虑到提高存款利率以后，会不会把一部分利润转为消费基金，这与控制消费基金是否有矛盾。最近有个同志给我写信，反映现在抽紧银根，下面哇哇叫。他建议拿出一部分钱来实行高利率，谁能用得起谁就用。这样可以使一部分效益好的项目继续搞下去。这个意见是好的。过去用行政办法，一说上都上，一说下都下，搞一刀切。这样不行。实行高利率有三个好处：一是有利于筹集资金，二是能限制效益差的建设，三是通过贴息保证重点建设。这样，计划内和计划外资金就统一起来了。这种办法，比用行政办法进行控制投资的效果好，损失少。

货币发行量应该多少合适？现在事先不知道。货币流通次数没有办法计算。目前我们国家正在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从封闭型向开放型、从少渠道向多渠道、从一种计划向多种计划转化，到底需要多少货币，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国家交通落后，信息不灵，又要发展商品经济，需要货币比资本主义国家多，拿国外任何一个公式来套用都不行。

财政、税收、资金市场和股票是联系在一起的。对发股票，可以有领导有限制地试验、探索，既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消极作用的社会主义股票市

场。这是一种严格限制了的股票市场。中国人一说股票市场，就想到过去的上海交易所。我们现在所说的股票市场，不是那种投机者的市场。实际上，南朝鲜和台湾对股票限制很严，有一套管理办法。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很好研究。

关于发挥银行的作用，要特别提一下人才培养问题。现在我们整个银行的工作人员，知识、经营、业务管理水平同银行改革的要求都不适应。体制改革，必须考虑金融入才这种状况，只能在游泳中学游泳。我们要请一些外国金融专家作顾问，引进人才，培养干部，进行基本训练。现在的问题，不是知识更新，而是启蒙教育。这种状况，不能不制约我们的改革。

十一、市场问题

世界银行林重庚[1]对我说过，只有一个市场不行，要有几种市场相配套。这个道理是对的。发展商品经济不可能只有一个商品市场，还要有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焦点是资金市场，影响是多方面的。

社会主义市场应是统一的、开放的市场。我主张首先打破条条、块块，把企业放到城市，然后再解决城市的问题。要简政放权，敞开大门。各种经济的、法律的措施，都要有利于统一的商品经济市场的形成。对于打破条条、块块的界限，要打总体战、综合治理。“七五”计划要专门讲一下发展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问题。

十二、股份经济问题

我对搞股份企业是有兴趣的。企业扩大自主权以后，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谁代表固定资产所有者的利益？过去是靠计划、财政来控制，放开以后谁来代表？弄不好，就是职工利益代表一切，经营者是顶不住的。可以实行股份所有制形式，这可能成为公有制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形式把财产所有者代表具体化了。现在的财产代表太抽象，分解为几股有好处，所有者、经营者、工人三者之间可以相互制约。问题是，这种股份所有制发展的趋势如何？

十三、“七五”计划的编制方法和组织工作问题

在“七五”计划中，对一些重大问题要区别不同情况，提出不同要求。有些问题，“七五”可以完成；有些问题，“七五”完不成，但要规定做到什么程度；有些问题，如改变出口结构，发展新兴产业，“七五”期间不会有大的进展，但是发展方向应当明确提出来，不然，过十年还是变不了。对这些问题，都要联系二○○○年来考虑。

“七五”计划纲要，要虚实结合，总要有一些看得到、抓得到的东西。现在着

重从政策上写是好的，但不要写得太虚。不像计划，完全是一篇政策建议，也不好。

从消费出发安排计划，是我提出来的，但是预测很难准确，“七五”还做不到这一点。这个意思要讲到，但要说活一点，不要说得太死。从消费出发，作为战略是可以的，但作为计划安排的原则，只能逐步体现。

“七五”计划纲要，一方面搞文件，一方面要组织一些人讨论专题，比如第三产业、外贸、价格、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平行作业。经过讨论，成熟的意见，就写到纲要里；行不通的，就不写了。计委的力量也要动员起来，集中精力搞好这项工作。

注 释

1．林重庚（Edwin R.Lim，1941—），菲律宾籍华人，祖籍福建。时任世界银行首任驻华首席代表，经济学博士。曾任世行越南项目业务官员，世行中国业务首席经济学家，世行非洲局局长、印度局局长。

切实支持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

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

* 这是赵紫阳对国家科委《关于支持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的请示》的批示。

这是件好事，很需要办，但一出此题目，定会出现各地都要挤着上，结果力量分散，一事无成。报告中已注意到防止这类情况发生，但一定要

看到真正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就要有不怕得罪人的精神，不要当和事佬、“高级泥瓦匠”（抹平）。另外，要悄悄做，不要宣扬。文中就此谈了点意见，供参考。

（在“项目规模不要大，力求‘小、专、现’[小型、专业化、现代化]，不搞重复”处批注）

这一条很重要，切忌一下铺大摊子。

（在“从项目搞起，逐步形成新产业开发区，对批准的项目可采取若干特殊优惠政策”处批注）

很对。从搞项目搞起，各个小区可发挥自己的优势，不再求全。一开始也可不打出新产业开发区的牌子，以免各地争着挂号。

（在“更不能一哄而起”处批注）

这是多年老毛病，这次一定要避免。

加强省区之间在自愿、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协作*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对廖伯康[1]关于四省区五方（云、贵、川、桂、渝）经济协调会第二次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提出的方针（四句话）和建立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上，不要成为计划会议的翻版，而是一种跨省区、开放式、松散型的组织形式，都是正确的，可予同意。提出的五项建议，请计委牵头研究，如有必要可酌情予以批复。

（在“大家一致同意以‘自力更生，多方联合，国家支持，共谋振兴’作为会议的基本方针”处批注）四句话是对的。

（在“如果把经协会开成计划会议的翻版，变成五方争项目、争投资的场所，既使国家经济主管部门感到为难，五方也难以自求平衡”处批注）很对！

（在“按照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建立起来……有利于打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城市之间、企业之间的分割、封闭状态”处批注）应该如此。

（对报告提出的五项建议批注）

（一、建议将川、滇、黔、桂地区国土资源的综合考察和发展战略研究列入国家“七五”科研计划，并尽快组织力量实施，为开发大西南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可以考虑。

（二、为改善西南公路交通，四省区五方一致达成协议。在两年内修通省际间的断头公路，并对公路干道进行改造；除各方大力组织群众和自力更生筹集部分资金外，请中央主管部门拨出专款支持）应该适当支持。

（三、为了形成对沿海开放地带的有力支撑，把沿海与四省区五方紧密联系起来，建议在四省区五方建立“内陆资源开发区”和“内陆经济开放试验区”，准予实行特殊政策，对开发资源应采取更加优惠的措施，予以鼓励，使沿海地带的开放有一个纵深配置，使我国整个对外开放有一个更加扎实的基础。建议由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牵头，有关部门和四省区五方参加，进行专题研究后，报国务院审批）可放后考虑。

（四、建议把四省区五方在这次会议上协商一致的一批急需的交通、能源、冶金、建材、化工等重点建设项目及早列入国家计划。这些开发项目四省区五方都早有规划，并且作了长期间的前期准备工作，有些项目已经具备了上马的条

件）可酌情予以支持。

（五、川、滇、黔、桂的少数民族有三千六百多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建议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对改变这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面貌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专题方案，进一步放宽政策，实行重点扶持）可请统战部与有关部门一起进行。

注 释

〔1〕 廖伯康（1924—），重庆市人，时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曾任重庆市团市委书记、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市建委副主任，重庆市委副书记、书记。

对报纸连续发表批评“超高速”评论的批语*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对胡耀邦、胡启立批转王震反映不同意报纸连续发表批评“超高速”评论材料的批语。

我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即：不要把目前的超高速，比作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也不要在报纸上连篇累犊地发评论。但需注意，目前各地攀比速度的问题远未解决，认识也很不一致。纠正这种倾向，不能踩急刹车，要逐步使之降速，但必须继续采取措施和统一思想，否则对我经济的健康发展必将引起不良后果。因此在向报纸打招呼时，亦请注意此点。

以上请报告耀邦、启立同志考虑！

最近国务院将开会研究由于信贷、外汇控制后各地所提出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一下经济形势，容后再告！

赵紫阳

五月十三日

会见新加坡吴庆瑞[1]博士的谈话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

赵紫阳总理（以下简称赵）：我们有一年没见面了吧。吴博士是第三次来中国了。博士担任了我们的沿海开发经济顾问，使我们在老朋友之外又多了一层同事关系。今年一月，我国吴学谦外长到新加坡访问时，向李光耀[2]总理提出请您担任我国政府经济工作方面的顾问，得到李光耀总理的应允。新加坡经济建设的成就举世闻名，我相信新加坡的经验和您的才能会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很大帮助。博士这次来，到了上海、广州、深圳、珠海，看了些工厂、学校，同地方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博士的工作非常辛苦，我对您的工作表示感谢。

吴庆瑞博士（以下简称吴）：首先我向赵总理祝贺中英达成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这是贵国的成功，也是您个人的成就。香港现在非常繁荣，与前一段时间人心不稳的状况大不一样。中英达成协议后，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因为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这里显示了赵总理的外交才能，也使外界看到中国政府的诚意和能力。

赵总理工作很忙，有关经济特区的情况我已与谷牧先生交换过意见，受到很大启发。为了更好地利用会见时间，我只能想就贵国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我认为，影响贵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有两个，这两个因素可能会长期起作用。第一个因素是贵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来向国外购买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进行能源、矿业和交通等基本建设。这方面所需要的资金是无限的。现在中国主要是靠国内的积累。另一个因素是，需要获得足够的外汇，中国现在获得外汇的能力很差，需要通过扩大出口和发展旅游来解决。这两个因素是相互关联的。我曾和中国官员讨论过从国外商业银行贷款的问题，在讨论中我发现，中国对从国外贷款持谨慎态度，认真考虑将来如何还本付息，这是正确的。如能通过扩大出口和发展旅游业获得外汇，进而扩大从国外取得贷款，可以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在三十年前，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就是通过有计划地扩大出口来解决的。我相信中国扩大出口是能成功的，但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因为现在中国的产品主要是内销，因此，必须改变现有的工业结构。如果采取有力措施，用四五年的时间，就可以使贸易出口有较大增长。

在增收外汇方面还有一些可能采取的措施，首先是迅速地大规模地发展旅游

事业。我曾与贵国旅游局长韩克华[3]先生谈过，他是个有能力的人，韩认为中国在发展旅游业方面有很大潜力，中国地域辽阔，风景优美，还有大量文物古迹。韩局长强调了两个困难因素，即缺少旅游宾馆和民航飞机。我想，只要解决了旅馆和民航交通，客源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按常规发展的话，这两个因素的改善自然是缓慢的。因此，我认为韩先生所讲的规划是保守的。我向韩先生建议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尽管意见不成熟，韩先生认为还是值得考虑。例如采取预制房屋进行组装的办法来修旅馆。可以在北京、上海等地制造这种房屋，在这些地方制成后，运到旅游点进行组装。北京有一座丽都饭店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在新加坡制作后运来北京组装的。航空客运方面如果按现在的计划来发展，速度也会很慢。因为购买飞机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培训人员（特别是地勤人员）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建议，请美国的航空公司到中国来，与他们签订十年的合同，让他们承包几个城市间的国内航线。这样你们不用付钱就可以扩大吸收国外旅游的能力。目前美国国内空运能力过剩。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办的话，可以在两、三年内做出相应的安排。

不管怎么说，上述两个因素是中国政府必须考虑和解决的。我的这些想法很笼统，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后，才能提出更具体的措施。

赵：首先我就吴博士提到的香港问题讲几句。香港问题获得圆满的解决，首先是由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其次是由于英国政府采取了明智的合作态度。中英达成香港问题的协议书是双方合作的产物。我在这里要请吴博士转达李光耀总理：在香港的过渡期间和过渡期之后，我们希望在维持香港繁荣方面得到新加坡政府的合作，并愿意就这个问题听取新加坡朋友的意见。

刚才吴博士讲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把外贸、外汇、外资作为重要因素提出来。这的确是关系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正是我想向您请教的问题。我对您刚才提出的建议很感兴趣，并且要同有关的部门进行研究讨论。

我有个建议，就是想从今天上午邓小平同志同您谈到的您在中国的工作题目中，特别提出外贸和外汇问题，请您帮助研究。这并不是新增加的题目，而是希望博士在那些题目中重点帮助研究的题目。

您刚才讲得很对，就是中国要加快发展步伐，必须在利用外资，特别是在利用国外商业贷款方面要更大胆一些。但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在贸易、旅游以及劳务出口方面的外汇收入。最近世界银行提出了有关中国经济情况的第二次调查报告正在征求意见，准备定稿，其中就谈到了中国在利用外资特别是利用国外商业贷款方面过于谨慎。如果博士没有读过这篇报告的话，我可以随后给您送去。

吴：我很高兴能读一读这份报告。

赵：我国的外贸工作有两个问题，都希望吴博士能够加以研究。第一个是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说根据中国的国情应采取什么方针发展出口。第二个是外贸体制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对各个领域都有一些设想。我们的方针是一步一步地走。近几年我们外贸体制的两次改革却都不够成功。主要问题是，如果沿用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势必造成工

贸、技贸、国内生产与国际市场的严重脱节；但实行地方和企业分散经营，则又两次出现了国内一些地方和企业互相竞争，抬高进口价格、压低出口价格的现象。究竟哪些要集中，哪些要分散，什么条件下集中，什么条件下分散，我们缺乏经验。现在我们初步认识到，必须在完善经济手段和行政管理措施（即税收、价格、汇率、许可证等），搞好宏观控制的条件下，实行必要的分散经营。这两者必须同步进行。同时，还要加强经济立法和执法。

关于出口战略，我不想多讲了，吴博士比较清楚。我只说一点，就是赞同您所提出的大力发展旅游业（我国近几年的劳务出口也有较大增长）。世界银行的第二份调查报告中，对中国机械产品出口前景的估计比我们自己看得要乐观些，认为中国要多发展这类产品出口。

为了帮助吴博士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我想把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向您简要介绍一下。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出现了高速度增长的情况。去年第四季度的工业生产总值比前年同期增长18%，而今年1—4月份的工业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24%，这种意外的情况使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值得思考。我们经过初步分析，认为这种高速度的增长有正常的因素，这就是我们实行了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近几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多；开放和改革使企业职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目前的经济效益也比较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材料、能源生产形势很好。我们工业生产的高速增长是在电力年增长8%的情况下取得的，这说明在节能上也做了许多工作。还有农业连年大丰收。这些因素都是正常的，是要长期发生作用的。另一方面也有不正常的因素。前几年国家积存了一些外汇，去年下半年各地用来大量进口原料、零部件进行加工装配。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我这里也想请吴博士帮助研究一下，如果博士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要讲的话，我很想听一听。

吴：这是一个很大而且是很复杂的问题，我有些意见曾经与谷牧先生和经贸部副部长魏玉明[4]先生谈过。我想，仅仅在中国进行了两周的考察，就向您谈论这些复杂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一种“冒险”，我不想“冒”这个“险”。（众笑）

赵：吴博士到中国来帮助我们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我们中央的同志和地方的同志非常欢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中新两国有很大不同。中国不能照抄新加坡的经验，吴博士还要研究中国的具体情况。在这方面可以得到中国各级政府的帮助，您需要哪些方面的材料尽管告诉我们，我们将尽力提供。目前我们正在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两个月后，我们可以提出“七五”计划纲要，当然还不一定是最后定稿。届时我会送给您，征求您的意见。

最后，请吴博士转达我对李光耀总理的良好祝愿，欢迎他在今年九月第三次访华。我期待着同他在北京会面。

吴：感谢赵总理对中国形势所做的精辟分析性的介绍，并明确了我们应当做哪些工作，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而且中国的机构也很复杂。（众笑）所以我需要花一段时间了解各方面的情

况。

我们新加坡人相信中国的现代化计划能够成功，并希望能为此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注 释

1．吴庆瑞（Goh Keng swee，1918—2010），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祖籍福建，伦敦经济学院博士。新加坡前副总理，开国元老之一。1985年被聘为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

2．李光耀（Lee Guan Yew，1923—2015），新加坡华人，开国元老，祖籍广东大埔县。时任新加坡总理，后任国务资政，内阁资政。

3．韩克华（1919—2003），河南南乐人。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曾任湖北孝感地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驻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副主任。

4．魏玉明（1924—），山西榆社人。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曾任河南平顶山矿务局局长，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兼外资管委会副主任。

对国家科委抓一批“短平快”科技项目[1]的批语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这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长远利益的事业。农业结构改造不发展乡镇企业不行，发展乡镇企业不依靠科技不会有前途，两者结合将可能闯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因此应作为一项基本政策长期坚持下去，必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今年已过半年，可增拨一千万元先开张，明年从科技费用中自行解决。外汇可请计委适当照顾，但不能多。今后应主要先用在国内的科研成果推广上。

注 释

1．“短平快”项目，指科技商品化周期短，与中小企业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应用科学技术，取得经济效益快的技术开发项目。后来，国家科委对这类科技开发项目命名为“星火计划”项目。

积极开拓技术市场*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参加《首届全国技术成果交易会》时的谈话。

我看很好！我们长期以来，缺乏一个技术市场，因此生产需要技术的信息，科研单位不知道；科研单位新出来的成果，生产单位不知道。通过技术市场这个媒介，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沟通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同时，科研单位通过技术市场了解生产单位的需要，科研就有了方向。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又推动了科研。有了技术市场这个形式，这种场所，可以使生产和科研单位的潜力都释放出来。

要保证名牌产品的材料供应*

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写给张劲夫、吕东的一封信。

目前在全国减缓速度的时候，同时应注意解决一些名牌产品的材料供应。有一种可能必须防止：效益好的、名牌产品、骨干厂子，因材料不足，或材料价高消化不了而减少生产；乡镇企业、落后企业、质次产品则速度有增无减。

今日，上海陈国栋同志谈到：一方面上海货供不应求，一方面材料十分困难。因此应研究点办法。办法之一，就是由中央掌握的材料（包括进口的材料）要支持上海及其他类似地区。为此，年度计划中原来定的材料（指令部分）分配，可以予以调整。请酌！

接见“中国面对未来”国际研讨会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

这次会议将就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行探讨，这是在中国召开的空前规模的国际研讨会。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可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对发展中外经济、金融合作有重要作用。我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要认识和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首先要了解对中国未来有决定性影响的两个基本政策，也就是两个基本国策。第一，中国已经确定，不仅在本世纪末，而且一直到下一个世纪，中国将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现代化”，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做不但能使我国的经济得到发展，也可使我国的政局长治久安。第二个基本国策，就是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坚持改革。这一政策可以保证四个现代化顺利进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开放搞活、改革是长期的基本国策，不会改变。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只能是越来越开放，不会收缩或中途改变。

关于中国的经济形势问题，刚才查尔方特[1]勋爵提到了第六和第七个五年计划。我可以告诉朋友们，我国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好的，比预料的要好。“六五”计划的实际增长超过计划。过去的口号是保四争五，现在看来可以达到8—9%。从各方面的条件看，“七五”计划可以继续以7—8%的高速度发展。也就是说，第一个十年（一九八○年至一九九〇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可以翻一番，比原来设想的要快。原来想第一个十年不可能翻一番，如果第一个十年翻一番，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就更有把握了。不久前，我国召开了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我在这次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宜过高，应当是适当的高速度。报告后，我注意到这个提法在国际上引起一些议论，有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问题，又要进行调整。我可以告诉朋友们，这是不会的。去年第四季度工业增长快了些，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为23%。我们认为这样的速度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搞一个“适当的高速度”，但这还是高速度。我们现在不是要调整，而是要把中国的经济建设纳入正常的轨道。这样做不会影响我们的对外关系，这一点请朋友们放心。

我刚才之所以向朋友们讲了中国搞现代化的基本国策以及现在和今后的经济形势，是为了说明国外金融界、经济界、工商界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前景是非常好

的。他们可以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大展宏图，大有作为。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还缺乏经验，中国的投资环境还不太理想，经济立法也不太健全，朋友们对此有些担心和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朋友们从长远看问题，中国的投资环境和经济立法正在逐步改变和完善。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金融界的朋友，我们非常重视同外国的金融界发展合作关系。我们需要为四化建设筹措资金。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但缺乏资金、缺乏技术。我们愿意发展银行之间的合作，因为金融界的合作是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桥梁。银行除了搞信贷业务外，还可以提供咨询，探讨各种合作的途径和方式，提供信息，介绍客户，培训人员等。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银行的改革也很重要，希望朋友们给予帮助，发展这方面的合作。

中国银行是中国的国家外汇专业银行，是得到中国政府全力支持的。中国银行是我国同外国发展经济合作的重要渠道之一，有政府的全力支持。我们希望看到中国银行与外国金融界合作得到发展。

注 释

1．查尔方特（Lord Chalfont，Alun Gwynne Jones，1919—），时任英国上议院议员，勋爵。曾任英国工党政府协办外交事务国务大臣。

听取四川省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当前关键是农贷资金不要花在其他方面去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有80%以上是用贷款嘛！（田纪云：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是两个控制，一个满足。即：一个是银行货币投放要控制在指标以内，一个是贷款要控制在指标以内，这样收购农副产品的资金就可以满足。）

去年货币回笼很不理想。今年的货币回笼，不能说与去年持平或同期相比就好。去年光中国银行就花了外汇7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20亿元，去买商品。商品那么多，但回笼的货币比去年多不了多少。去年多发了100多亿元票子，引起物价上涨，人民担心。为什么说物价上涨，就是票子发多了，基本建设规模大了，人为地造成了紧张。为什么资金紧张，原材料紧张，归根结底，就是计划大，需求高，速度快了。对这个问题，全国认识不一致，没有一个省说它票子不紧张，没有一个省说它速度不正常，没有一个省说它回笼货币不好。这样全国潜伏着很大的危机，实际上这个危机并没有过去。如果我们的经济这样搞下去，是不行的，最后是要吃大亏的。我们没有条件把速度搞到20%以上。

现在的所谓高速度，一是把这几年节余的外汇用去大量进口原材料和消费品，二是银行大量发票子。没有这两条，就没有这样的高速度。一句话，就是需求过高。这样搞下去是维持不住的，到一定程度是要爆发的。一旦爆发，就要产生连锁反应。我们省的领导同志，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明确的认识。现在说法很多。有人说，我这个地方刚刚才开放你就紧缩银根，怎么开放。实际上讲开放就要外汇，就要进口东西。西南、西北的同志说，他们那里起步晚，建设速度慢，刚刚要上，你就要收缩。当然，民族地区要照顾。但这样的搞法是不行的，结果总有一天大家要倒霉。我这样讲，你们思想不一定通，但通不通都要顾全大局。

我这次访问西欧时，一些懂得经济的领导人都为我们这样搞法担心。主要是我们自己把需求搞得太高。现在到处喊票子少了，实际上今年发的票子比去年多得多。（田纪云：日本小林实过去鼓吹中国经济发展正常，最近变了。他的观点有三条：一是银行没有货币发行权，二是贷款必须讲效益，三是必须有还款的保证，但中国没有保证。这三个观点都值得我们考虑。）

为什么在全国人代会后，我们立即召开省长会议，集中到一点，就是速度过

高。要求要把速度降下来，因为没有那么多原材料，没有那么多能源，没有那么多票子。但是，在省长会上对控制基本建设讲得不够。今年全国1300亿元下不来，实际上要1400亿元，也可能还下不来，所以要下控制指标。

建设银行出了乱子，多投了80亿元。我们国家管得太多，但对许多又管不住。西德战后，其他放得较宽，但控制货币非常严格。这次汉堡市长施密特在我离开时对我说：货币供应要注意哟！里根的政策也是控制票子。英国的失业人员多，闹得那么厉害，撒切尔夫人坚持不改变政策，仍然要控制票子。我们不能完全像他们那样搞，但是像这两年那样发票子，是自食恶果。我在省里工作时，也是经常找银行，要他们支持生产，压银行。美国政府是不干预银行的，但我们各级政府都可以随便干预银行。

为什么去年发生问题，过去财政和银行是一个体系，财政管银行。去年体制改革，银行成了单独体系，有中央银行，有各专业银行，中央银行管发票子，专业银行管贷款。专业分行放活了，只考虑自己业务，拼命放贷款，而中央银行就管不住，出了一点漏子。改革对不对，还是应该改的，但不配套。（田纪云：现在不管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没有积压，都很畅销，这说明票子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一句话，需求太高了。大家都感到票子紧，是在20%以上的高速度的基础上要求票子的，当然货币不够。今年第一季度，商品消费量增长咒%，生产适销对路的只占23%。就是说，水不够加面，面不够加水。说穿了，就是把前几年积蓄的外汇，用去进口钢材和木材，不然全国的日子过得去吗？

票子发多了，物价就要上涨。总之，靠发票子把经济搞上去，是不行的，靠不住的，这没有多少理论。我们不懂，说明无知，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领导人都懂得这个道理。

解决城市蔬菜供应问题要有新思路*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的负责人研究城市蔬菜供应问题时的讲话。

一、关于蔬菜生产

大城市的蔬菜供应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牵动每家每户。蔬菜的种植面积要落实。从长期看，近郊菜田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但要衔接好，不能脱节，要有个安排，有个步骤。一些细菜可以搞塑料大棚，近郊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学习荷兰，小面积搞些园艺生产，产量很高，也节约土地。

蔬菜放开后，供应近郊菜农的口粮，没有执行倒三七价格[1]的，可以继续供应一段时间平价粮看看。已实行倒三七价格的，也不要变回来。这部分差价款，中央不收回，怎么用，由市里作为一种调节手段，自己决定。

二、关于鼓励外地蔬菜进城

我到武汉和保定，两家都有反映。一是湖北的莲藕进不了北京，他们那里一毛多一斤，北京三毛多一斤，但是不准进北京。二是保定的菜进不了北京。保定历来是种菜供应北京的。北京要把保定地区作为北京的蔬菜基地。可以和外地签订合同，如张家口的土豆，廊坊、保定的大白菜等。北方和南方不同，南方一年四季生产菜，但他们吃得细，要求高，成了习惯。北方淡季长，吃菜习惯比较简单，有几种大路菜，就可以解决好几个月的吃菜问题。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只靠近郊不行，还要和远处挂钩。将来能不能由地方上到这里办些货栈、商社，比如保定或廊坊地区来京办。大城市搞活完全靠小商小贩不行，要组织地方公司进大城市，有些地方以地区为单位，近的也可以县为单位进城。这比单由大城市到地方上收购方便，矛盾也少些，也比小商贩好管理。这样一搞，城乡就疏通了。城市里的国营商业主要掌握批发环节，进货的层次可以减少。但也要掌握一部分货源，调节市场。

三、关于蔬菜价格

前些日子，北京菜价上涨，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应。大城市的蔬菜比什么问题都影响大，一定要谨慎。现在已经放开了，要坚决放到底。万一出点问题，国家出点钱稳住，不要再走回头路。经营环节亏点钱，不要再补给消费者，逐步理顺关系后就好了。

四、关于国营蔬菜公司的经营

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国营蔬菜公司经营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国营公司应该怎样工作，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国营公司第一要学会按照市场价格参加竞争；第二要服从整个宏观经济的利益，包括平抑物价等。现在国营公司一种情况是采取消极态度，也缺少货源，造成经营萎缩，市场缺乏领导。另一种情况是仍然采取老一套的办法，国营系统占市场绝大部分，不考虑供求关系，价格还是死的，没有搞活。国营公司通过吞吐，平抑物价，应是社会主义国营商业的主要特征之一。我基本上不赞成主渠道的提法，应当讲对市场起领导作用、主导作用。讲主渠道，就必然造成垄断。如果长期是国营公司占主渠道，国营公司占市场比例很大，市场就活不了。国营公司占到百分之七十、八十以上，放开就是空话。当然，弯子不要转得太陡了，否则容易出问题。总之，一个大文章是在两三年内真正使国营公司的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既按宏观经济的要求对市场起领导作用，又不排斥别人。总的讲，将来国营商业要起批发作用，不要在市场上占到绝对的优势，平时经营额可少些，以利于把市场搞活。但必须保持合理的库存，要抛即抛。这是个大问题，对国营公司既是个新的考验、新的促进，也是个新的课题。国营公司由国家核定合理库存，贴给利息。将来国营公司能不能划小核算单位，独立经营，服务设施出租（刘毅：商业、服务业负担太重，平均两个人养一个退休职工，有的一个半人养一个退休职工，承包比较难。有的地方免征蔬菜企业营业税，解决了退休人员的经济包袱）。免收营业税是否解决退休人员的开支问题。可以考虑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企业免缴营业税后自己养退休人员，这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可能影响以后的改革。另一个办法是用营业税去解决退休人员问题，这样有利于改革，将来要走这个路。当然，已经免了的，也不必再恢复。

注 释

1．倒三七价格，是指当时国家定购农民粮食实行的合同定购价格，其作价方式是30%按粮食统购价格计算，70%按粮食超购加价计算。因这种综合比例价格以粮食统购价为基础且只占30%，故称倒三七价格。粮食超购加价系1979年国家将粮食统购价提高了20%，为鼓励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后多出售余粮，其超售粮食的价格在已提高统购价的基础上再加价50%。

对《关于提高我国机械工业水平几个关键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印发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各同志一阅。三位同志的报告[1]切中时弊，这也是我们经常强调而始终落实不了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只在机械制造业存在，其他行业都存在。但为了有所突破，还是首先抓住在机械行业中贯彻。过去所以落实不了，主要是抓得不狠，缺乏一套检查、监督、协调制度，对各部门出于本身利益而常常相互矛盾，缺乏及时权威性的仲裁，致使许多问题我行我素，久拖不决，或不了了之。目前中央特别强调质量问题，对外技术引进的用汇额也将有所削减，如何加强工厂管理，技术引进中如何技贸结合、节约外汇，更显得重要。此事请周建南同志牵头，同有关部委认真研究提出贯彻措施。

注 释

1．“三位同志”是指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王传善、国家计委机电局王洪太和国家经委机电局倪益瑾。他们随机械部超高压输变电设备考察团访日后，共同提出了《关于提高我国机械工业水平几个关键问题的报告》。

教师所从事的事业是神圣的*

一九八五年九月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北京师范大学庆祝中国第一个教师节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首先，我要感谢你们邀请我出席这个大会，和大家一起庆祝中国第一个教师节。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你们，全国的教师们和一切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礼！

全国人大常委决定九月十日为中国教师节，表明了我们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教师的尊敬。教师所从事的事业是神圣的事业，可以说，他们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他们起着巨大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果没有广大教师的辛勤劳动，就没有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振兴，就不可能培养出大批的、高质量的四化建设人才，就不可能真正提高我们全民族科学文化的素质。那样，我们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四化的成败，祖国的未来，取决于教育和教师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全党、全国、全社会都应该重视教育，尊重教师，在整个社会形成强烈的尊师重教的社会舆论，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成为文明社会的一种标志。

我们的教师既是现代化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又是社会主义精神风尚的传播者。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地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四化建设培养出又多又好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

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高等师范学校。它在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全国的高等院校，对整个教育战线有着重大的影响。希望同志们发扬不断进取的精神，使它越来越好，蒸蒸日上。

祝同志们身体健康，节日愉快！

实施分税制改革给田纪云同志的信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三日

纪云同志：

税制问题，可否从明年起开始实行（或部分省试行）中央、地方划分税种的新体制，为此，相联系的税制方面是否还需要作一些必要的调整、改善？之所以说明年起，就是从“七五”计划开始，不知准备工作是否跟得上去？

致礼

请酌！

赵紫阳

九月十三日

对《关于一、三线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的情况报告》[1]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四日

报告很好，会议也开得好。加强沿海与三线横向经济技术联系，对加快我国建设，提高内地工业技术水平，支持沿海实行开放政策都有重大意义。请计委、经委联合开会讨论一次这个报告，大力予以支持，把沿海、三线横向联系搞活起来。

注 释

1．指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主持召开一、三线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后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

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精简机构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

可印发仲勋同志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同志、中组部尉健行同志参阅。贺光辉[1]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机构改革设想和大体步骤，我基本同意。总之，机构改革必须建立在机关职能的改变上，不然仍然是老路重复。因此，机构的裁并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

注 释

1．贺光辉（1929—），陕西清涧人。曾任一机部研究院副主任，国家机械委办公厅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委员、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全国供销社监事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法制委副主任。

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的说明*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我完全同意耀邦同志所作的开幕词。现在，我受党中央委托，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作几点说明。

一、文件的性质和特征

这个文件是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持下，经过一年多来反复酝酿、讨论制定出来的。它还不是“七五”计划本身，而是关于如何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它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是：一、“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主要政策措施；三、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实施步骤。这些指导思想、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和改革设想，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提出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具体化。在起草过程中，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体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建议》中没有列很多数字，只讲了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与方向的一些重要指标。着重研究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是计划工作的一个重大转变，是这个文件的特征。它将有利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经济工作的大的矛盾上面，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编制“七五”计划和我国以后的中长期计划，都要这样做。这个《建议》经这次代表会议审议通过以后，将由国务院据以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然后提请明年春天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颁布实行。

二、当前的经济形势

正确估计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拟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依据。对形势的估量，对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的估计，估高了不好，估低了也不好，总的原则是实

事求是，如实估计。《建议》既充分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建议》指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作出这个论断，主要的事实依据是，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经过前几年的努力，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农业生产从缓慢发展走向全面高涨，轻工业生产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走向日益繁荣，能源生产从停滞不前转为持续增长，各项建设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看经济形势，主要看重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看经济能否以适当的速度，持续稳定地发展。这几年总的情况是一年比一年好。在整个“六五”期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有把握达到百分之十。在编制“七五”计划时，我们对经济发展速度进行多方面测算，看来仍将继续保持这种蓬勃发展的好势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可达到百分之七左右，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可以超过百分之七。在这样长的时期连续保持百分之七、八乃至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少有的，只有某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才出现过类似情况。这说明我国经济的活力越来越旺盛。现在的情况，与一九八○年底我们提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解决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的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了。过去我们的经济工作主要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当前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作为中国经济水平发展的重要阶段，今后将开始由温饱型逐步转向小康型，使我国人民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这种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财政改变了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收入连续下降、存在巨额赤字的状况，近几年在收入大幅度增长、支出显著增加的条件下，保持了收支基本平衡。前两年虽然还有些赤字，但数额较小，今年有可能做到消除赤字。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有少量财政赤字，影响不大，不能以此作为判断财政经济情况是否根本好转的主要依据。今年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预计达到一千七百亿元，加上地方、部门和企业拥有的预算外资金，总数将达到三千亿元以上，比一九八○年增长将近一倍。这说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确实增强了。

我们说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基本实现，并不是说已不存在问题和困难了。对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出现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信贷资金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部分物价上涨过多、国家外汇储备下降等问题，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和还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这些问题是能够逐步得到解决的。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认真解决新任务和新问题，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为巩固和发展当前良好的经济形势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形势而努力奋斗。

三、“七五”时期的任务

概括地说，“七五”期间的任务主要有三条：一、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使改革顺利展开，基本上奠定新的经济体制的基础；二、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条件方面为九十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三、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这三条任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当前，更重要的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一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基础。不改革，就没有今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建设服务的，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说，建设的安排要有利于改革的进行。追求过高的建设速度，经济生活各方面都绷得很紧，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为了给改革创造好的经济环境，我们一定不能片面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脱离国力的可能盲目扩大建设规模。但是，也必须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进行必要的骨干项目的建设，加强工农业基础设施，使经济发展有后劲，使人民的实际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增加。

“七五”期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两年要着重控制社会总需求，解决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在保持一九八五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条件下，作一些小的调整，改善投资结构，加强重点建设。这样用两年多的时间逐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比在今年下半年集中解决效果要好些，可以避免由于刹车过急而造成的损失和震动。但分散在两年解决，不易引起大家的重视，搞不好也可能控制不住。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特别加以注意。“七五”后三年，再根据情况，适当增加建设投资。但对建设总规模仍需进行必要的控制，这是多年来的重要历史经验。改革也大体上参照这两个阶段来安排，这样做比较积极稳妥。

四、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全面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争取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建立新的经济体制，要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主要抓好三个方面：一、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逐步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建立健全间接控制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企业活力的增强，商品市场体系的形成，间接控制手段的完善，三者必须互相配套。

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坚决地、有步骤地展开。过去几年，在放开放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

进一步完善微观经济活动和机制的同时，从宏观上加强对经济活动的间接控制，也就是说，要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完善经济立法和经济监督。必须认识，从宏观上加强间接控制，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它比之微观搞活，比之直接控制，更为复杂，更为困难，我们也更缺少经验。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与现在已采取的改革措施配起套来，并为进一步搞活企业创造条件，使企业能够对市场变化作出积极反应。在“七五”的前两年，改革的重点要围绕稳定经济的要求，从宏观上加强、完善间接控制体系。除了必须采取的某些价格改革措施以外，应更多地利用利率、税率、汇率等经济杠杆。要抓紧制定一批经济法规，建立和加强经济监督、经济信息系统，加强银行、税收、审计、统计、质量检验、工商管理和社会公证等部门的职能。与此同时，要继续落实和完善国务院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各项规定，特别是要下大力把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中型骨干企业搞活。除了引导企业眼睛向内，挖掘潜力，继续落实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调动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以外，当前还必须注意分别不同情况适当调减它们所负担的调节税，减少局以下公司等中间层次，制止向它们乱摊派、乱集资，减轻它们的负担，以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能使这些骨干企业越搞越困难，而应当使它们越搞越有活力。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七五”后三年，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的要求，进一步加强间接控制，认真搞好生产资料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税制，改革金融体制，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的改革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要按照既定的改革方向，鼓励探索，鼓励创新。这里必须指出，减少直接控制微观经济活动的范围、程度和步骤，应当同国家加强间接控制的能力互相适应，互相配套。

五、“七五”期间生产建设的两个关键

“七五”期间要为改革创造好的环境，又要为今后的发展准备后续力量，又要改善人民生活，矛盾很多。解决这些矛盾，关键有两条：大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积极增强出口创汇能力。

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高是我国经济的致命弱点，也是今后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开辟国家财源，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改善职工生活，出路就在于把这种巨大的潜力挖掘出来。要紧紧抓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这两个环节，来提高企业素质。我国企业技术落后，管理更落后。“七五”期间应当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但从现实的情况看，改进和加强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具有更大的紧迫性和更加现实的意义。“七五”期间，我们一定要通过改革和工作，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加强劳动纪律，搞好职工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和企业各方面的素质，真正把企业的工作转到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要使全体职工和干部明白，为提高质量、降低消耗而奋斗，就是实现“七五”计划的最好的实际行动。

“七五”期间我们面临着进一步开放的形势。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将不是短期的。我国与国际市场联系的程度如何，决定于自己的创汇能力如何。开放不能只进不出，必须有进有出，进多少取决于出多少，出得多才能进得多。“七五”计划能否实现的又一个关键，是要创造更多的外汇，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要认真研究和制定外贸出口发展战略和系统的政策措施，建立出口生产体系，充分发挥沿海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的作用，带动内地，发展更多的重点出口商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拓国际市场。在增加出口的同时，要努力增加旅游、劳务等非贸易外汇收入。在这个基础上，随着偿还能力的增强，要适当地多利用一些外资，包括优惠贷款和商业贷款，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我们既要学会创汇的本领，又要学会用汇的本领，使有限的外汇用在刀刃上，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这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提高效益和增加创汇是互相联系的，我们要把立足点放在提高企业的素质上，使我们的企业在国内外竞争中上水平、求发展，使产品经受国内外市场的检验，不断更新换代。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六、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

第七个五年计划，应该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进的计划。我们一定要坚决做到：一、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其它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二、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对于一切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必须绳之以法，对于一切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丑恶现象，必须予以制止和取缔；三、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深入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解决思想领域的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以疏导即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能重犯过去“左”的错误。在经济领域中，要大力提倡良好的职业道德，树立企业信誉，实行文明经商，文明办厂，为人民服务，遵纪守法，勤劳致富，抵制各种歪门邪道和腐朽的经营作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坚决贯彻“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充分重视和认真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发展。

同志们！

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做好这五年的工作，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对于更好地保证九十年代经济的振兴和繁荣，顺利实现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中央希望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同德，满怀胜利的信心，以改革创新和开拓前进的精神，为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

必须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姚依林、宋平同志讲话的基本精神，是国务院和中央财经小组讨论过的，我都同意。这里，我集中讲一个问题，就是必须下决心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这是一个涉及经济全局、关系“七五”计划能否顺利实现的重大关键问题，也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

巩固和发展当前大好形势的关键所在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作了估计：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这个估计是正确的，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是可以感觉得到的。问题是，这种好的形势，能否长期保持下去。应该说有两种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搞得好，这种形势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搞得不好，已经出现的好形势，也可能重新遭到破坏。这里的关键，在于能否坚决控制住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使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逐步做到基本平衡。

一九八○年提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以来，年年都讲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八一年到八三年比较好，三年平均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56亿元。但去年以来急剧上升，一年增加了464亿元，社会总规模达到1833亿元。今年增长的幅度预计不会少于去年，社会总规模将达到2300亿元以上。这就是说，八四、八五两年每年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都相当于前三年增加的总和。从总规模来说，五年翻了一番半。到八四年底，在建工程计划总投资数已达6178亿元，加上材料设备涨价和概算超支等因素，实际需要总投资达到7400亿元，除已完成投资3400亿元外，要完成这些工程还需要40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之大，战线之长，已经明显超出了我们的国力，而且还有继续膨胀之势。从投资的构成看，国家预算外投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预算内投资的增长；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全国重点项目；非生产性投资和加工项目投资比重上升，超过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幅度。投资规模过大，投资结构又不合理，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再不下决心，就定会贻误大事。

历史的教训

建设规模是否安排得合理，是否同国力相适应，是经济能否稳定的一个重要界限。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长期实践所证明的一条客观规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建国以来几次经济上的大折腾，都是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度膨胀分不开的。第一次是1958年到1960年3年“大跃进”，平均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0.2%，积累率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60年的39.6%。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一年内投资总额增长49%，以后几年积累率大都维持在32—34%的过高水平上。第三次是1978年，投资总额一年增长22%，积累率达到36.5%。这三次大的投资规模膨胀，尽管历史条件不同，发生的原因也不完全一样，但是都造成了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经济生活全面紧张，导致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带来的损失，不是几十亿元，而是上百亿、上千亿元。这种大上大下，使经济发展走了弯路，延缓了经济建设的进程，其影响之大难以计算。

还应该看到，过去几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大膨胀，带来经济生活的全面紧张，是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发生的。虽然通货膨胀，但物价基本上是冻结的，商品不够就靠凭证供应，或者有价无货。现在正在进行改革，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再发生那种问题，结果必然是物价的全面上涨。南斯拉夫今年物价上涨的幅度达到70%。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迄至今天一直是好的，物价上涨的幅度不超过10%，意见已不少。设想一下物价上涨不说70%，就是30%，哪个地方能承受得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成为政治问题了，改革肯定搞不下去。

从国外的情况看，投资规模膨胀，或者叫做“投资饥饿症”，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通病。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放了权，而宏观控制的有效手段尚未形成，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例如，波兰进入70年代以后急剧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积累率从60年代平均的25%左右猛升到30%以上，1974年达到317.3%，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恶性循环，财政赤字大量增加，国际收支逆差大量扩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是造成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兰局势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南斯拉夫从1976到1982年间，固定资产总投资增长四倍，而且项目多，建设战线长，以致加剧了财政经济的困难。苏联和东欧其他一些国家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投资膨胀的困扰。

从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看，经济上出纸漏、栽筋斗往往发生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几经曲折，但我们总是难以真正接受教训。每当形势好转，就容易忘掉这个教训，又把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很长，规模铺得很大，直到搞不下去了，才不得不来个大调整。这似乎形成一个忽冷忽热、忽上忽下的周期。这里，固然有经济机制、建设方针等方面的原因，但首先必须解决认识问题。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害处极大

我们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绝不是没有根据的推论，而是因为基建规模过大，的确是引起经济生活中一系列消极因素的症结所在。现在看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所造成的恶果，可以列举以下几条：

一、投入多，产出少，工期长，效益低。基本建设摊子铺得过大，超过了资金和物资供应的可能，必然拖长建设周期，不可能早竣工、早投产。1981年我国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86.6%，去年下降到71.8%，今年1至8月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又由去年同期的24.7%，下降为16.8%多。建设项目投产率，由去年同期的12.1%，下降到11.7%，其中大中型项目投产率由2.2%，下降到1.7%；房屋建筑面积竣工率由14.9%，下降为12.9%。据169个大中型项目的调查，原计划平均工期为6年3个月，从目前的进度来看，预计将比原计划延长近一半的时间。工期拉长，造价也就相应增加。有些项目虽然建成了，由于前后左右不配套，长期不能发挥效益。还要看到，由于在建工程占用的资金过多，挤掉了生产、流通所需的营运资金，使现有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所有这些都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我国的资本系数即每增加一元国民收入需要的投资数，历来都比较高。日本为2.8，南朝鲜为2.7，我国前几年为4.4，去年以来又有某种程度的上升。

二、严重影响重点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基本建设摊子过大，资金、材料跟不上，形成了计划外项目挤计划内项目，一般项目挤重点项目的现象，使本来已经紧张的能源、交通、材料等更加紧张。今年1至8月与去年同期相比，能源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由23%下降到21%；交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由16.6%下降到14.4%。从整个“六五”期间看，基本建设投资中能源、交通建设投资的比重，计划要求从“五五”时期的35.8%提高到38.5%，实际执行结果预计只能达到34.9%，比“五五”时期还下降0.9%。“六五”期间，原材料工业的投资比重，预计也将由“五五”时期的18.5%，下降到14.7%。这几年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重点建设虽然投资额增加了，但必须看到它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下降的趋势。各地方都去保自己的项目而挤重点建设，这种情况，从长远来说，对扭转能源、交通、材料短缺的被动局面是不利的。

三、妨碍技术进步。热衷于铺新摊子，必然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上。“六五”计划要求更新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应达到36%，据统计局预计，实际只能达到30%，而且，这五年的更新改造投资中，真正用于更新改造的，又只占其中的54%。从工程内容看，相当大一部分主要是用于增加生产能力，而能在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改进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方面发挥作用的投资只占17.4%。究其原因，仍主要是基建投资大大超过了计划指标，或挪用更改资金搞基本建设。这样下去，极不利于在经济建设上贯彻从外延为主转到内涵为主的方针极不利于贯彻充分利用原有企业和原有工业基地，以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为主的方针。

四、破坏信贷收支平衡，带动物价上涨。据人民银行分析，去年由于投资规模扩大而增加的现金支出近100亿元，占全年增发货币量的38%。今年1至8月，

基本建设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41.9%，其中国家投资只增长6.1%，而使用的银行贷款增长129.8%，自筹投资增长94.6%。这都要多发票子。票子多发了，信用膨胀，物价就会上涨。首先是刺激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984年“三大材”价格平均比上年上涨9.6%，机电设备上涨20%。目前议价钢材每吨已由去年的1200元涨到1800元左右。生产资料涨价，还会把消费资料的价格带上来。今年对物价问题，不少人议论纷纷。我看问题不是出在改革上，而是出在基建规模过大、速度要求过高上。

五、大量进口原材料，扩大国际收支逆差。我国的外汇有限，本来主要应该用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上，但基建规模一大，加上消费基金增长过猛，使国内需求膨胀，超过了国内物资供应的可能，就不得不把有限的外汇大量用于进口原材料、组装件和其它高档消费品。这几年钢材的进口量直线上升，1982年为394万吨，1983年为978万吨，去年为1331万吨，今年预计1900万吨，相当于国内消费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原木进口量也从1982年的470万方，增加到去年的790多万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膨胀，不仅耗用大量外汇，而且由于刺激国内的需求，使出口不如内销，严重影响了出口物资的收购和创汇任务的完成。一个进口耗用外汇大量增加，一个出口上不去，收汇减少，结果就是外汇收支逆差扩大，国家现汇结存下降。照此下去，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就难以持续下去。

六、削弱企业的活力。许多地方为了多上项目，除了盯着银行要贷款外，主要是以各种名目向企业乱集资、乱摊派。据锦州、石家庄等地的调查，各方面向企业集资摊派的金额占企业留利的8%至10%左右。其中大型企业负担最重，人均负担375元，中小企业人均负担307元，集体小企业人均负担84元。有些企业被摊派集资的金额甚至超过企业利润的总额，不得不借债缴纳。企业从扩大自主权、搞活经济中得到的好处，被四面八方伸手挖去了。这样下去，许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骨干企业就会陷于缺乏自我发展和自我改造能力的困境，越搞越破旧，我们的经济就不可能振兴。

七、助长各种不正之风。百废俱兴，需求膨胀，人为地造成物资的短缺，已经出现的买方市场，又会变为卖方市场。萝卜决了不洗泥，提高产品质量，改善服务态度，树立良好的经营作风，都会成为空谈。走后门，拉关系，请客送礼，行贿受贿，弄虚作假，以次充优，等等，从经济原因来说，也是与此分不开的。

八、造成积累率过高和消费需求膨胀。根据我国长期的经验，积累率以不超过30%为宜。1978年积累率曾高达36.5%，经过连续几年的调整，1983年降低到29.7%。但1984年投资规模膨胀过多，积累率又升高到31.2%，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上升。积累率过高，还会刺激消费需求的膨胀。据统计局测算，每增加1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就要直接间接增加消费需求4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过多，规模过大，将引起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再次失调，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央、国务院从今年初以来，就一再提醒各地注意纠正经济发展的超高速度。它不仅大大超过了能源、交通、原材料及其它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而且人为地刺激了社会需求过分膨胀。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只能带来通货膨

胀、物价上涨、外汇收支恶化的后果。而社会需求的膨胀，原因就在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因此，解决经济发展超高速度的问题，釜底抽薪的措施，就是必须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基金增长过猛。

总之，集中到一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就会引起经济生活的全面紧张，改革就无法进行，经济也不能稳定，甚至大起大落，被迫再次进行大的调整，造成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当前，我国整个经济形势很好，不是一年好，而是连续几年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投资规模过大的问题，虽然与历史上几次投资规模膨胀在性质和程度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不能简单地加以类比，但绝不能等闲视之，以免酿成大的问题。中央一再强调，在经济建设上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方针。只要下决心采取措施，建设规模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中央的方针能否变成自觉的行动，采取的各项措施能否认真落实，首先要把我们大家的认识统一起来。

我们过去的教训，主要有两条：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过“左”；二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要求过急，带来了重大比例失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前一个问题解决较好；而后一个问题在于部认识上还没有真正解决。有几种思想认识，需要加以澄清。一是“百废俱兴，全面大上”。现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积极性很高，都想多搞一些建设，多上一些项目，使本地区、本部门发展得快一些，这种心情和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看到，我们国家的底子还是比较薄弱的，一年新增加的国民收入不过几百亿元，除了保证新增人口的需要和人民生活还要改善之外，能够用于增加基本建设的资金有限，加上借用一些外资，数量也不会很多。形势大好，不能成为一哄而上的理由。如果什么都要大上，国力肯定承受不住。即使一时上去了，最终还是要退下来，导致大批基建工程下马，大量施工队伍窝工，给整个经济工作造成极大的被动。

二是“你长我不长，只能切你，不能切我”。这是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特殊，不积极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的又一借口。应当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投资规模过大，不是个别地区、个别部门的问题，而是带普遍性、全局性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据调查，今年1到8月份，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银行贷款投资超过了国家计划控制指标，其中有12个地区超过70%以上。这种情况说明，控制投资规模是各地区和各部门共同的任务，应当忍痛下刀，把全国投资总规模压缩到合理的水平上。首先是要压缩，要控制，在这个大前提下，才能根据轻重缓急，区别对待，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如果各个地区和部门都指望只砍别人的，保留自己的，过大的基本建设总规模就不可能压缩下来。这里有个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问题。有些项目，从地方、部门来看是合理的，但从全局看就不一定合理。有些项目从全局看也是需要的，但目前无此可能。小合理应当服从于大合理，全局

活不了，局部也活不了。

三是“我们管微观，中央管宏观”，“放活是自己的事，控制是中央的事”。宏观上管住管好，微观上放开放活，是互相联系、互相配套的，既是中央和国务院的事，也是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的事。宏观不管住，就会一放就乱；微观不放活，就会一管就死。宏观控制措施如果在微观上不发生反应，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我们的目标，是要经过实践和探索，逐步建立起防止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的新的宏观管理制度和微观自我调节机制，走出一条新路来。

这次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过猛的问题，不采取急刹车的办法，好处是可以避免损失和震动。缺点是分散在两年半的时间解决，不易引起大家的重视，搞不好可能会控制不住。这一点，拜托在座各位，务必抓紧，按照计委的方案，坚决压一批，缓一批，保一批。否则，势必被迫再来一次急刹车。这件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无非是大彻大悟，下决心少搞一点基本建设。与其将来又大调整，不如现在开明一点，少搞一点。基建规模搞大了，形势就要逆转，少搞一点，与国力相适应，形势就会发展。现在很多地方都是新班子上台，希望你们在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上露一手，千万不要在扩大基建规模上露一手。

我们既要控制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又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出路在哪里？我看很可能逼出一条路子来，使大家集中力量抓改革、抓效益。一是要大力提高企业素质，特别是把大中型骨干企业进一步搞活，提高经济效益。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要围绕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突出地抓管理，抓劳动纪律、规章制度。这些基础工作不抓好，设备再先进也不能发挥作用。各级干部应当钻进去，学会经营管理，变成内行。二是要搞好出口创汇，千方百计增加出口，并增加旅游、劳务承包等非贸易外汇收入，多为国家创汇。这里只是提出这个任务和课题，希望从中央、国务院到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把大上基本建设的兴趣转到这两方面来，切实在这些方面动脑筋，下功夫，抓好这两件大事，使“七五”期间的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好、更健康。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十日

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周年的前夕，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临今晚招待会的各位来宾和各国使节表示热烈欢迎，向同情和支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举国共庆的时刻，我还要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为振兴中华而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各族人民，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工作人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节日的问候！

今年是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预计可以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我国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争取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在经济建设中，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在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切实加强经济的宏观控制，特别是对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控制，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今年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扩大出口企业自主权，改革价格、工资制度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增强横向经济联系等方面都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已经开始。我们一定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坚决地、有步骤地推进改革，争取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包括太空军备竞赛。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仍需警惕，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越了战争因素的增长，维护世界和平是大有希望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同第三世界各国一道，为争取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而奋斗。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为促

进国际合作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努力。

刚刚胜利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十二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是我党历史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对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的连续性和党的集体领导的稳定性，对于保证我党今后更好地肩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和建设的历史重任，对于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最后，我提议：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周年，

为祖国统一大业和四化宏图的早日实现，

为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为世界和平和发展，

干杯！

对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

* 这是赵紫阳对新华社《山东各地乱占滥用耕地的情况严重》一文的批示。

杜润生同志：

乱建房修房，每天都在减少土地这种生产资料，在这个无政府主义问题上，不及时注意必将酿成大的问题，给后世留下大灾难。请考虑采取何种措施解决。

赵紫阳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

给《李约瑟文集》的贺词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

李约瑟[1]博士致力于中英友好，悉心研讨中国科技史，成果累累。在他八十五岁高寿之际，《李约瑟文集》在中国刊行。这是很有意义的，谨致祝贺。

赵紫阳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

注 释

1．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近代生物学家和科技史专家，剑桥大学生物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学术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著有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科技交流影响深远。二战时期曾任英驻华使馆科技参赞，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

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　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召开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派出赵紫阳总理率代表团出席有一百多个会员国参加的盛会。赵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着重阐述了中国关于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发展、平等合作的世界的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推动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实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他的这一重要发言，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重视和欢迎。

主席先生：

联合国诞生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

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政治性的国际组织具有像联合国这样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它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俱增，是少有的。尽管联合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现在也还有它的弱点，但联合国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它对世界的影响，是不可代替的。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需要联合国的存在，正如联合国需要世界的支持一样。我们在这里举行盛会庆祝联合国的生日，就是为了重申它的宗旨，加强它的职能，期望它今后更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发展和平等合作的世界，是人类的共同愿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就是这种愿望的反映。为了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作了不懈的努力，联合国也在各种复杂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四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新的世界战争虽未发生，但局部性的热战和东西方的冷战时断时续。殖民体系已经土崩瓦解，而侵犯主权、武力征服的事件仍然屡有发生。大小国家应该一律平等，而强权政治仍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作用。种族隔离制度虽已遭到举世谴责，但南非当局倒行逆施变本加厉。人类创造的财富有了无数倍的增长，南北之间的贫富鸿沟反而更加扩大。军备竞赛吞没了巨大的财富和资源，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亿万男女和儿童继续在饥饿、疾病和死亡线上挣扎。总之，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对抗、动乱和冲突，存在着许多不安全的因素和令人忧虑的现象。

联合国确定把“争取美好世界”作为纪念它成立四十周年的主题，是符合不同肤色、不同国度的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究竟什么样的世界才能算是美好的世界，对此会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来看，一个美好的世界，

离不开和平，离不开发展，需要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合作。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遗憾的是，战后四十年的历史，恰恰是东西方对抗、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的历史，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战争危险并未消除。为了保障国际安全，防止战争，东西方之间应当消除对抗，缓和气氛，发展关系。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以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都应当和平共处。每个国家都应当承认其他国家人民有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社会制度的权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以维护自己的安全为借口，而损害别国的安全。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都不应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推行自己政策的手段。可能导致冲突的国际争端，是世界和平的隐患和局势动荡的因素，有关方面应通过谈判，以和平的方式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国际安全的机构，联合国理应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现在，摆在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面前的一个共同任务，是要制止军备竞赛。不论是常规的、核的、地面的、太空的军备竞赛我们都反对。“威慑力量”也好，“恐怖平衡”也好，都不能确保和平，而必然会引起军备竞赛的轮番加剧。人们有理由要求两个拥有最多核武器的超级大国率先采取行动，大幅度裁减其核军备，从而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创造必要条件。我们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关注美苏两国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希望他们顺应世界人民的要求，真正放弃谋求军事优势，通过谈判达成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协议，并付诸实践。

由于第三世界的兴起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战后国际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少数列强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奋斗，世界和平是能够得到维护的，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避免的。

世界能不能实现共同的发展和繁荣，同人类能不能防止另一次世界战争一样，是人类面临的又一重要任务和重大历史性挑战。由于长期殖民统治遗留的沉重负担和现存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振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广大地区的潜力，将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繁荣起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不但需要发展中国家本身作出艰苦的努力，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积极加强南南合作，而且应当改革国际经济秩序，推动南北对话，加强南北合作。尽管四年前的坎昆会议进行了探索和努力，但全球性的南北对话迄今未能实现，南北关系的现状仍无多大改变。联合国应当认真对待这一重大问题，在金融、货币、贸易、债务、援助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推进南北关系的改善。这对南北双方经济的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都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起，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是联合国宪章最根本的原则，也是联合国组织所赖以建立的基石。这种平等权利，不能仅仅理解为在联合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它还应当包括任何国家的主权独立不受侵犯、内部事务不受干涉的权利。在这个问

题上，世界的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无视小国权利，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现象仍然存在。更严重的是，侵占领土、蹂躏主权的行为尚未得到制止。联合国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寓于所有会员国的平等之中。只有使弱者不受强者欺凌，小国受到大国尊重，才能使联合国充分发挥作用，使世界保持和平与稳定。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清楚地理解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一贯倍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活动，主张加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职能和地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一贯支持各国人民维护和平和主权独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和平、发展、平等和国际合作的正义事业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中国热爱和平，中国需要和平。为了彻底改变长期落后的面貌，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需要有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中国希望同所有邻国和一切国家和睦相处，也愿意看到世界各国都能和平共处。中国以主动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的实际行动，再次表明反对军备竞赛的坚定立场。中国在国外不建立军事基地、不驻军、不称霸，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同南北东西广泛进行经济技术交流，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对于一切谋求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中国永远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主席先生，联合国已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它仍然面临着繁重的任务。为了争取一个和平、发展、平等、合作的美好世界，联合国的成员国和各国人民还要继续进行巨大的努力。让我们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共同奋斗，朝着这个崇高的目标前进。

谢谢主席先生。

给马海德[1]同志的复信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马海德同志：

您的信收到了。知道中国麻风协会、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和麻风福利基金会即将成立，并将召开第一届麻风国际学术交流会，令人高兴。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为到本世纪末在我国基本消灭麻风病而努力。

赵紫阳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注 释

1．马海德（Shaflck George Hatem，1910—1955），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医学博士，性病和麻风病专家。1936年到延安，1937年入党，1949年加入中国籍。时任卫生部顾问，全国政协常委。

给中医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医研究院全体同志：

　　中医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祝同志们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遗产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赵紫阳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在宝钢一期工程投产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各位同志、各位来宾：

我国目前技术最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宝山钢铁总厂，经过七年的建设，第一期工程终于胜利建成投产。这是参加宝钢建设的全体职工和外国专家通力合作、辛勤劳动的结晶，是全国各族人民和各地区各部门各协作单位大力支援的生动体现，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丰硕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宝钢一期工程，是第六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它的建成投产，对于加强钢铁工业、支援四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战斗在宝钢建设第一线的全体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向宝钢建设中同我们友好合作的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国的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宝钢建设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宝钢一期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我国钢铁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我们要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建设好第二期工程。我相信有了一期工程建设的经验，在国内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外国朋友的友好合作下，宝钢二期工程一定能够建设得更好！

宝钢的建成，来之不易，但要管好宝钢，充分发挥它的效益，更非易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建设好宝钢，管理好宝钢，从高从严要求，使它成为国内和世界第一流的钢铁企业。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对宝钢的殷切希望，也是宝钢今后的奋斗目标。

宝钢已经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但是还不够，还应该有先进的经营管理，培养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的队伍。今后，宝钢不仅应该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钢材，而且应该为我国钢铁工业输送掌握先进技术、擅长现代管理的优秀人才。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发展迅速，日新月异。建成后的宝钢，应该不断发展，不断提高，开拓前进，永葆青春。党中央、国务院希望宝钢全体职工，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主动迎接挑战，不断改革创新，为四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把革命老区建设好*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山东临沂接见老红军、老党员、贫困村村干部和包点住村干部代表时的讲话。

山东沂蒙山区在革命战争时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里的老战士、老干部和老区人民，为了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过去没来过，这一次留下深刻印象。今天，我借此机会向沂蒙山区的老同志，向在贫困山村扶贫致富的各级干部问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发展变化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变化很大，有些地方有一些变化，但不明显。那些变化小的地方，往往是山区、库区、老区，往往是过去对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的地方，这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现在，中央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但还不平衡。

在路上，省、地的领导同志告诉我，沂蒙山区在帮助贫困村、贫困户脱贫致富方面有些好的做法，开始有些变化。今天大家介绍的经验很好，很不错。山东省政府在这里现场办公，帮助贫困村、贫困户脱贫致富，时间虽不长，收效是显著的。我看，一个是领导重视了，从省开始，各级都重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信心增强了，干劲大了；一个是路子有了，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山区资源很丰富，只要能够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致富的门路是多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发展商品经济，这就为发展山区经济，解放山区资源，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你们是走在前面的。我相信照这样走下去，办法会越来越多，路子会越走越宽，致富的步伐会越来越大，是很有希望的啊！我希望你们带个好头，创造出好的经验，为其他贫困村庄、贫困户起个示范作用。

下大功夫把旅游基础设施和管理培训搞好*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曲阜听取山东省旅游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既要重视国际旅游，又要重视发展国内旅游。可以让农民搞一些低档的家庭旅馆，国家收税。一开始他可能搞得很简陋，一旦发了财就建房子，就改善设备，非常快。前年五月我在北戴河提过这个意见，看来他们是搞起来了。去年有两千个床位，今年差不多四千个，都是一家一户搞起来的。他们那个家庭旅馆简单得很呢。像这间大房子，至少可以摆八个床，啥也不管，就是睡觉，一个床收费两元多，一天就是十六元，一百天就是一两千元，第二年就可能建房，再有一年，再扩建一些设备。一个家庭搞，一个地方搞，比方说县啦、乡啦，投资搞旅馆，搞低档的，接待国内旅客。国内旅游也要重视。如果你只搞外国的，国内的不解决就会影响外国人。国内旅游不要轻视，这是一大批财源收入，薄利多销嘛！就说北戴河吧，有兄弟两个，盖了三层楼，本来是要自己住的，后来一看办旅馆可以，他就把这个地方办成了旅馆，一百多个床位。东北有个什么单位全包了，一包包半年。他有钱了，就改善设备了，讲究卫生了，活跃了经济增加了地方财源。

有个外国朋友讲了这么一个观点，我觉得讲得有道理。他到我们中国，看到比较大的旅游饭店都与外国合营，他说这样做吃亏。为什么与外国合营？为什么不自己干呢？有人说自己没钱。外国人他也没钱，都是从银行借的钱。咱们中国人过去没经验，总想与外国人合营，风险少些，还有个政策问题。现在外国人到中国搞旅游是自费，华侨、华人、港商到国内来，别的他不干，就干饭店。为什么？他看准了。将来我们的饭店要自己干。设计可以和他们共同搞，干起来就自己建，自己拿钱，自己经营，经营不好，可以拿钱请经理。另外就像北京长城饭店那个办法，包给他们管。国外有一些专门搞饭店管理的，这个办法很合算。饭店管理国外有个网，它给你组织客源，帮你经营，经营以后它就抽多少。长城饭店一由西斯来芬集团管，马上客就满了。世界上有个大的旅游集团是管理集团，它不开饭店，就是搞管理，总部设在夏威夷，长城饭店与它签订合同，就委托它管。它花了一百万美元广告费，另外在夏威夷为它接管长城饭店开了个盛大的酒会，它有很多管理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客源拉上了。一个是请外国人当经理，一个是委托外国集团管理，你管理，我出资，签订合同，五年或者几年，学会了自

己经营。与外商合资，他也是借钱，有一些是借的中国银行的钱。与他们合营，他到国外借款，钱尽他赚。吴庆瑞说，你要办旅游，没有钱我新加坡银行里可以借给你，你借多少都可以。这是个很严肃的事，不要很宽了。国内人民币为什么不行呢？没有材料、没钢材、没水泥，借的钱很多就要抢材料，就要物价上涨。我说是借自由外汇，不是政府信贷什么的。有了自由外汇，就可以进钢材，进水泥，也可以进其他东西，在国内换成人民币，用自由外汇搞饭店相当划算。国内外一部分人民币可以借，大量的靠自由外汇、商业贷款。商业贷款这个钱有好处，你不要投标，也不要买外国人的设备，可以倒换。可以进口化纤啦，进口一些高档的商品，在国内销售，这本身就是赚钱的，当然有些钱中央拿走啦，关税抽走啦，但还是不会吃亏嘛！将来这个外币还是有偿还能力的，旅游饭店还是有偿还能力的。但一些基础设施没办法偿还，像公路啊，现在可以捆在一起，看看除了偿还旅游饭店外汇贷款外其他项目还能不能偿还，人民币完全是可以收回来的。主要问题是外汇，旅游饭店收入的外汇可以担负一部分，实在不行，省里、旅游局再还一部分，这样搞得比较快。关键是搞得准，只要搞得准，这个我看就很保险。因为外国人都看透了，像日本人投资不愿干别的，首先是搞饭店，华侨都搞饭店，什么冯景禧[1]啊，什么胡应湘[2]啊，都搞饭店。为什么？他们懂，我们不大懂，他们对合营别的没兴趣，就是对这个最有兴趣。他们出钱，搞十五年，就是你的了。他们就是这个干法。吴庆瑞不是当我们沿海开放地区的顾问吗？这是他讲的真话，这是他亲自对我讲的。他讲来讲去，就是讲了三条：第一，是基础设施，主要是旅馆；第二，是交通，主要是民航，因为外国人时间很紧，这是我们现在比较困难的事情；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训练，是管理，是培养人才，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要有个好经理，对导游、翻译、工作人员都训练得非常严格。只有这样才能把旅游的事情搞好。这一些东西不仅是对饭店，还包括汽车、包括民航，都有个经营管理问题。新加坡为什么能够搞上去？就是在管理上下功夫，在训练人才上下了大功夫。不然的话，房子盖了，基础设施搞了，钱也花了，就是管理不好，这个可以研究一下。我在上海看了一个锦江饭店联谊大厦，那是上海了，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条件。北京可以搞，还有沿海一些城市，像青岛，将来也应搞。我们现在最困难的是民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体制。旅馆应当比较好办，公路也应当比较好办，人员训练吗，反正抓紧吧，突出的是民航问题（李昌安[3]：山东军用机场较多，我同王海[4]同志交换过意见，下一步都可以利用。）有一些合用，有一些可以单独搞个跑道。这要根据情况。地方搞旅游，要一块块地搞，配起套来，你不配套，有了旅馆，没有航空，有了航空，没有公路，有了公路，没人会管理。搞几个重点，一块块地吃，要同步，要配套，这样才能够正常运转。

注 释

1．冯景禧（1923—1985），广州市人。香港房地产商，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时任新鸿基证券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与广州和上海联合经营酒店业。

2．胡应湘（1935—），原籍广州花都，生于香港。时任合和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是改革开放后首批进入大陆投资的香港实业家之一，与广州联合经营酒店业。2004年获授香港特区政府紫荆勋章，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事务顾问。

3．李昌安（1935—），辽宁台安人。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曾任北京市计委副主任，七机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保利集团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4．王海（1925—），山东威海人。时任空军司令员，曾任志愿军空军大队长，荣立一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历任空军航空兵团长、师长，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空军上将。

在第六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六日

这次使节会议开得很好，学谦[1]同志代表外交部党委做了报告，先念同志讲了话，今天上午耀邦同志又做了长篇讲话，这些讲话都很重要。这次会议就以学谦同志的报告，耀邦、先念同志的讲话为准。一九八二年驻外使领馆政工会议以来，外交部的工作是做得好的，积极而又稳妥地贯彻执行了中央对外政策的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各使领馆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央和国务院是感到满意的。外交部开了个问题单子要我讲讲，我想就经济形势、外交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三个方面，谈一些情况，也讲一点看法。

一、国内经济形势

我们常说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估计合乎事实。建国以来，我们搞过六个五年计划，“一五”是成功的，二、三、四、五这四个五年计划都不成功。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大跃进。第三个五年计划情况还是好的，主要是恢复。“四五”、“五五”是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七八年、七九年、八○年有一次大的调整。今年是“六五”的最后一年，实际上“六五”计划已超额完成了。我们当时提出的平均年增长率是“保四争五”，执行的结果：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这四个方面的平均年增长率都在10%左右。为什么讲这四个方面的数字，而不是专讲工农业总产值呢？要讲工农业总产值，我们解放以来差不多每个时期速度都不算很低，但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相当低，说明经济效益不好。“六五”计划有了变化，无论是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不管用什么口径统计，年平均增长率都在10%左右。剔除物价因素以后全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年增长率可以达到7.6%左右，这是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外没有过的情况。所以说“六五”期间是我国国民收入增长最快，人民生活提高最多的一个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七九、八○两年连续下降，因为调整的关系，每年大概要减少收入二十多亿元。八一年同八○年持平，八一年即“六五”计划的第一年结束了下降的局面，八二年开始回升。八三年增长一百多亿，八四年比八三年增长二百多亿。今年财政收入预计比去年增收三百多亿，增长幅度达20%。当然这里也有一部分物价因素，一部分物价放开

了，譬如钢材，企业里计划外的钢材高价卖了，水涨船高，交税也多了，这一部分可能有几十亿元。还有今年进口比较多，关税收入大大增加，大概又有几十亿元。

当然，全国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就总体来讲，现在消费结构正在起变化。过去是为吃饭穿衣操心，现在除了少数贫困地区外，人民的要求已不再限于温饱。中档消费品的生产，某些高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城乡住宅建设，都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六五”期间城乡新建住宅面积达35亿平方米。据抽样调查，人均居住面积一九七八年到八四年的六年间，城镇从4.2平方米增加到6.3平方米，增加了二分之一；农村从8.1平方米增加到13.6平方米，增加了三分之二，但建房趋势至今有增无减，还在继续。从温饱型到小康型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就全国多数地区来讲开始由温饱向小康型转变，有些地方还在为温饱继续努力。随着人民购买力的提高，消费结构肯定将进一步发生变化，并将继续推动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化，这是近几年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趋势。

总的形势是好的，生产发展了，流通搞活了，国家的实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国家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提高这二者关系处理比较好，历史上这二者关系往往处理得不好。主要原因，一是没有做到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再就是改革。这一时期不是说没有问题，也经常出现一些这样的和那样的问题。不同的是：过去往往等到这种或那种倾向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才被迫进行调整；这几年，问题一旦发生就引起注意，就加以解决，就加以防止，因此没有形成大的曲折。这与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与接受过去几次经济工作受挫的教训有很大关系。实事求是，广开言路，有话可以讲，不戴帽子，这条很重要，所以有问题能及时发现。政治上安定团结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前提，经济形势好又巩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形势。

问题也不少，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经济过热，超高速。这个问题去年下半年开始冒头，第四季度工业的增长比前年同期增长18%，今年上半年的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3%。全世界的经济是不景气的，我们来了个超高速。速度高一点是好事，但这样高的速度难以维持。为什么出现这么高的速度？前几年在调整时期压缩进口，国家积累了一部分外汇，有这么一个回旋余地，可以拿这些外汇进口一些原料和材料，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要想搞这样的高速也不可能。但这样的高速能不能持续下去？不可能年年拿那么多外汇进口原料和材料。这个问题提出来还是比较早的，今年初就看到了，今年一年花了很大的精力抓这件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主要出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因为经济搞活了，财政情况好一些，国家财政预算外的资金也比较多了。今年预算收入一千八百亿元，预算外的收人即各单位、各企业的自留资金大体上也是这个数字，这样加到一起，我们全国的家当就有三、四千亿元，说明经济实力比前几年大大增强了。但基本建设光有货币还不行，光有粮食、棉花也不行，还要有钢材、水泥以及其它许多配套的东西，而我们国家现在钢材、木材很多材料还是缺的。因为有了钱，预算内的也好，预算外的也好，加上形势比较好，大家希望搞快些，因此固定资产规模就比

较大，基本建设加上技术改造这个数目比较大。今年钢材涨价涨得这么高，就是这个问题的反映。

今年，我们开了几次省、市负责人会议，春节以前开了一次，人代会以后留下各省的同志又开了一次，党代会后又开了一次，万里同志还主持了八个省的省长会议，共开了四次省长会议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思想比较一致了，措施也开始见效了。今年，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大体上可能在一千五、六百亿元。十一月份速度降到18%，上半年是23%，估计今年工业生产的速度是16%或17%，这还是高。我们没有急刹车，而是采取各种措施使它缓缓地下降。这样比较好，对社会的影响、各方面的震动、损失都比较小。原来担心不急刹车能不能刹得住，现在看来还是可以刹得住的，基本建设规模控制住了，工业速度在缓慢下降。估计这种缓慢下降的情况明年还要持续一年，才能进入可以长期维持的正常速度。明年速度还可能高一些，因为一下子刹下去也不容易，可能比计划的要高。经过明年一年，今后的工业速度有可能降到10%左右，这样就可以持续下去。明年10%恐怕还不行，会超过10%。明后两年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综合运用，准备把投资总规模控制在今年的水平。当然，项目会调整。这个问题说容易也容易，主要是下决心少搞一点基本建设，但实际上难度很大，因为大家都想多搞，有钱不让用似乎比没有钱还困难。但这个问题关系很大。党代会的报告讲我们进入了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今后两年固定资产规模必须要控制到今年的水平上，具备这个条件，就能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如果明年冒上去，或后年冒上去，这个局面就会被破坏，这关系非常大。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的关键是协调，重大比例关系协调了就能持续稳定，这是同志们所关心的问题。外国也议论纷纷："中国经济失去控制。"我看没那么严重。这也是我们自己讲出来的，如果我们不讲，而作为一个好的经验宣传，可能外国人讲我们是奇迹。我们说搞得太快了，外国人也跟着喊。这种超高速搞一年还是可以的，问题是不能持续下去。

同志们都很关心物价。今年全年城乡零售物价预计平均比去年高9%，其中城市高14%。农村物价上涨的幅度低一些，城市涨得比较高。因为物价上涨主要是蔬菜、副食品。这个大体上6%是由计划调整带来的，这是正常的，是原来有准备、预计到的，也有措施加以补偿。物价问题，城市反映大，特别是大城市，集中是蔬菜和副食品价格，主要是五月、六月、七月三个月，各地不完全一样，大体上各大城市都有那么一两个月物价上涨幅度比较大。进入九月份全国物价趋于稳定，也就是说在五月、六月上涨的水平上稳定下来了。有领导地放开一部分，调整一部分，使价格逐步趋于合理，对发展生产有利，这是必要的。问题是放开以后，国营商业要参与市场调节，平抑物价，这个问题到今天解决得还不算好。过去，国营是垄断，商业系统一统天下，现在一放开，多种渠道，价格比较活，国营商业如何适应市场，参与市场，指导市场，真正按经济规律去办事，恐怕要一两年、两三年才能够解决。拿鸡蛋来讲，现在供应情况总的应当说是很好的，但由于国营经营上的问题，今年旺季（春季）全国很多地方鸡蛋价格很低，

应当多收购一些，商业部也作了布置，要全国收购七千万斤，但是各地方都不愿多收购，怕压资金，影响奖金。鸡蛋有季节性，差别很大，夏天一过就到淡季，旺季不收购，淡季就供不应求。所以对供求关系要进行预测，采取适当政策措施加以调节。

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明年物价会怎么样？明年在物价方面不准备采取大的动作，大体上准备稳定在现在的水平上。今年物价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是蔬菜，特别是北方，蔬菜是每个人一日三餐离不开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对生产蔬菜积极性不高，他们想搞工业和副业，收人比蔬菜要大得多。从长远来看，蔬菜应当逐步从近郊向远郊转移，国外也是这样。对远郊农民来说，种蔬菜是一种致富的门路，它比种粮食收入高得多，农民也有积极性。但把蔬菜由近郊向远郊转移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要几年时间，只能逐渐解决。因此，放开以后，在相当时期内还必须把近郊的蔬菜生产稳住。今年有些地方蔬菜出了问题，主要就出在这里，近郊农民不愿种蔬菜。原来是压在头上种的，一放开就大量减少面积，远郊一下跟不上，蔬菜供不应求。解决近郊种蔬菜问题，基本上要解决分配问题，要以工副业补蔬菜，使得从事蔬菜生产和从事工副业生产劳动所得差不多，这样才能把种蔬菜的积极性维持住。现在各地都正在这样办，估计明年会好一些，第四季度蔬菜供应情况比原来预计要好一些。

再谈分配问题。现在确有些分配不公的现象，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制止，也可能发生不安定的因素。在分配问题上，平均主义不符合按劳分配，悬殊过大也不符合按劳分配。企业内部根据贡献大小应该有所差别。企业之间如果由于外部条件不同而造成收入悬殊过大，就会引起不满，就会带来普遍要求向高收入攀比的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中国基本上是全民所有制，还有机关、工厂、科研单位、学校，如果一部分单位收入特别高，另一部分单位收入特别低，很难讲得过去，也很难维持下去。一个会引起不满，一个就会出现一种向高收入攀比的难以抗拒的压力。这次我到了南美四国，就更加感到这个问题。南美洲有许多国家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人们的平均收入不低，但分配上的悬殊过大，尽管大家收入都提高了，但社会不满、社会矛盾相当多，社会很不安宁。当然，我们制度跟他们不同，但是也要注意。现在正在研究准备制定一些政策，譬如对个体户要征个人所得税。现在事实上已出现私人企业，这些企业经营效益比较好，没有官僚主义，费用低，效率高，比国营企业经营得好。我们既要继续保护他们经营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得到合理的收入，但在雇工和盈利问题上必须对他们采取一些节制的措施。对发放奖金过多的企业要继续征收奖金税，对乡镇企业的工资奖金也应该有一定的控制办法。现在有些个体户的收入高于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工人的工资高于国营企业，小的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高于大中企业工人的工资，工人的工资有些又高于机关、高于科研单位、高于知识分子，这是不合理的现象。现在总的情况都比过去好，但是好的中间出现了这么些问题。这在开始来讲是不可怕的，也是难免的，但是不注意，不采取办法逐步加以节制、加以协调，听其发展下去，将来也会出现另外的问题，

所以现在要开始注意和研究这些问题。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今年已开始实行新的工资制度，但知识分子的职称还有待评定，明年可以解决。

有同志问，“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过去有过这种情况，现在和过去不同。尽管在改革中也出现过一些小的问题，不断做过一些小的调整，但总的来说，改革是在不断前进、不断深入，没有重复过去那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当然，我们的改革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的前进，但同过去打圈圈不一样。“一放就乱、一乱就收、收了就死、死了再放”，现在没有这种情况。根本的问题是改革不配套，改革是个系统工程。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微观继续放活的同时，必须加强宏观控制。今年经济建设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没有把微观搞死，而是采取宏观控制的办法，使情况逐步恢复正常，也就是说微观还继续放活，同时加强宏观控制。单靠直接控制一般会一管就死，没有间接控制就会一放就乱，所以逐步减少直接控制，相应加强间接控制，就会达到管而不死、放而不乱。改革的方向要坚定不移。加强间接控制比减少直接控制要更难一些，更复杂一些。这里有很多问题，有政策问题、制度问题、机构问题、经验问题，还有市场条件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成功。正因为这样，在改革的实施步骤上要力求稳妥。“七五”期间要把改革放在首位，这一条已经定了。明年改革的安排，要同对整个经济形势的分析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国务院和财经小组这几年每年冬季都要对经济形势进行讨论分析，现已有若干小组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大概从十二月份开始到明年一月将要系统地分析今年的经济形势，预测一下明年的情况，同时相应提出明年的改革措施。总的来讲，我们明年的改革是巩固和消化今年的改革。今年改革迈的步子不小，有些不够配套，有些不很合理，也还有些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对今年改革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明年必须加以消化，以便后年走出重要的一步。

二、外交政策问题

我同意学谦同志报告中的估计，现在我们的外交工作正处在建国以来最主动、最有利、最活跃的时期。所谓“最”是比较而言，五十年代也好，六十年代也好，七十年代也好，都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很难机械地去比，有其不可比的因素和条件，但同过去来比我们现在的主动权更大了。

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小平同志主持下进行的，总的原则是独立自主，过去也是独立自主，但现在外交政策的调整可以说是在新的情况、新的形势下体现我们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也可以说是更加或进一步体现了我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独立自主抓住了当今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两大问题，把一系列对外方针政策配起套来。一是维护世界和平，主张裁军缓和，既看到战争的危险，又看到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增长，既反对热战，也反对冷战。二是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支持改善南北关系，发展南南合作，但不介入第三世界内部的纠纷。三是不同超级大国结盟，也不搞无原则的等距离外交。四是坚持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亲疏好恶。五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对外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这五条很得人心，国内国外都能理解。我有这个体会，现在出去好讲话，到各国访问都可以找到共同语言。我们在全世界进一步树立了中国和平的形象、开放的形象、搞现代化的形象、平等待人的形象。超级大国不愿做的事，我们愿意做；中小国家不敢说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形象不仅是有分量，而且是有原则、讲道理、重信义。一九八一年以来，我访问了三十九个国家，亚洲十个、非洲十一个、欧洲九个、南北美洲七个、大洋洲两个，深深感到我们国家的形象是越来越好，威望越来越高，朋友越来越多。中国大，人家重视，这固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主要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内政外交政策上了轨道。我们过去有些口号人家很难理解，如“天下大乱，越乱越好”，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讲绝了，等着打仗就是了，战争不可避免，那为维护和平而努力就毫无意义了嘛！还有我们过去的一些做法，尽管有当时的条件，当时的形势，当时的背景，但太绝对化了，要不就是“一边倒”，要不就是“一条线”，从这个180度到那个180度。外国对我们的政策有疑虑，感到中国的政策不可测，不可捉摸，很怕我们一夜之间突然来个180度的变化，认为我们的对外政策连续性比较差。过去有过去的条件和背景，不能完全来比。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最适合当前的情况，也最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最有利于世界的和平，最得人心。

外交政策上了轨道不等于说今后就不再调整了，一切都定局了，一切都凝固不再变了。如果那样就没有文章可做了。外交工作应从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纵横裨阖，开拓新局面。从这个要求出发，今后还会有所调整，这是第一。第二是如何调整，调到什么程度，这要看时机。总的是两条，第一要看是否有利，第二要看是否有理。中美苏关系中，中苏关系从总的、从需要来讲还应当作进一步调整，中美关系也应争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样对我们更为有利。但是中苏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和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都不是一厢情愿的问题，要看条件，要看对方，在有这样时机、这样条件的时候，我们应当作进一步的调整。如果没有条件、没有时机，我们一厢情愿来搞，反而适得其反，达不到调整的目的。掌握时机，这有很大的策略性。中美苏关系中，现在中国处在很有利的地位，但今后如何驾驭这种局面，如何进一步发展这种有利的形势，那是很高的艺术。现在这种有利的局面，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当就不会这样有利，处理得好还可以继续推动这种局势，继续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对外政策调整必须高度集中，由中央常委决策。同志们在外要注意体察形势，随时反映信息，可以多提出建议，当然必须按中央的决策行事。现在最重要的是要领会和贯彻中央总的意图，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更活跃。

三、关于经济外交问题

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这对使领馆工作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外交应当为

中国的四化、中国的经济振兴和繁荣昌盛服务。缺乏经济内容的外交是没有坚实基础的外交，不可能巩固和发展。这次马来西亚总理来就是搞经济合作的，他比较满意。因为他经济有困难，有求于我们，到我们这里来看一看，确实可以搞些东西。他回到机场，自己讲马共问题不应成为两国发展经济关系的障碍。经济外交的分量正在日益加重，经济外交的实绩应成为考核使领馆工作的主要标志之一。

党代会上讲过“七五”计划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一是提高创汇能力。创汇问题既要提到各部门、各地区的议事日程上来，也要提到各使领馆的议事日程上来。我们国家可以多借点外债、多借点款，但是前提是国家的外汇收入必须增加。外汇收入不增加，借款不可能借那么多。国际上一般认为借款数的安全线是每年还本付息不超过本国每年外汇收入的巧%—20%。如我们国家每年能收入五百亿美元，20%就是一百亿美元，一百亿美元还本付息，大体上就可以借七、八百亿美元外债。即使以巧%计算，也可以借五、六百亿美元。多借债就要多创汇。出口、旅游和劳务等方面也可以增加创汇。旅游和劳务在“七五”期间必须大发展，现正在做规划，但是数量最大的还是出口贸易，石油、煤炭、粮、棉、油、土特产、纺织品、工艺品以及某些机电产品和军工产品。我们在出口方面，对几个大的市场要有个布局，对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要巩固和扩大。对苏联、东欧市场要恢复和发展。

我想着重说一说南南合作问题，即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发展贸易的问题。我国同第三世界各国发展贸易有很大潜力。特别在目前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形势：发展中国家必然要更多地把扩大贸易的期望放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上。因为现在世界工业国经济不景气，至少在近期内不可能再像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那样出现长时期的繁荣（但也不会一直衰退下去），工业国家不可避免要出现贸易保护主义。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外债比较沉重，想多出口少进口，以便积累外汇来偿付债务。一个国家如果老是多出口少进口是不可能的，多出口到哪里去？而且多出口少进口一定会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想和过去那样，依靠同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把第三世界国家带起来，我看希望很小，路子很狭窄。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互通有无，互相补充，却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关键就是要找到一个好的形式。现在看来，易货贸易，双边的易货和多边的易货，是很有前途的一种形式。现在一般是双边的，这比较简单，将来可以考虑三角的，多边的。发展中国家都缺外汇，将来可以不用现汇，以物易物，只是用美元来结算。这样就要研究，我们中国哪些商品是他们需要的，他们的哪些商品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过去和拉美来往比较少，拉美过去传统是向美国出口，现在美国不要他的东西，出不了那么多，而中国市场还是需要的。为了向中国出口，他就愿意买中国的东西。过去发展中国家愿意出口到发达国家，然后在发达国家买设备、买技术，现在出不去，这样就可能转过来。马来西亚就是这样，过去他的热铁块向日本出口，现在想向我们出口，既然向我们出口，有些东西也可从我们这里进口。不仅是双边的，将来也可以是多边的，如他的东西中国不需要，但可转口到第三国，

我们再从第三国进口我们需要的东西。这种三角的以至多边的易货贸易，很有文章可以做。就是同黑非洲之间也可以开展贸易，过去我们和黑非洲贸易很少，更多是经援。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援的路子是不会宽广的。经援可以援一些，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对最穷困的国家要继续采取传统的那种经援方式，援建一些项目，但不可能很多。贸易的路子就很宽，我们同非洲之间完全可以开展一些贸易，有些产品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东西，他需要得更多，纺织品、粮食、棉花、轻工产品、设备他都需要，问题就是我们要买他的东西。这里有个开拓市场的问题，有些商品中国人过去没有消费的习惯，卖不出去，但经过一段也就慢慢适应，可以销售，包括非洲水果，拉美水果，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进一点呢？现在中国消费市场有很大的变化，过去吃柑子、吃桔子的人很少，吃苹果的人也不多，现在大家都要吃柑子、吃香蕉，所以水果贵得不得了。东北人也到四川去抢购桔子，现在产区的水果贵得要命。我们拿些轻纺产品、热水瓶、缝纫机、粮食到非洲去换水果，就可以把国内的香蕉、桔子的价格压下来。芒果也可以进口一些。这方面要好好研究，多从贸易上想办法，贸易是最广阔的。经济往来，首先是贸易，这是互利的，越走路子越宽广。我们经常讲要发展南南合作，这作为一个方针政策要摆在什么位置上？现在的状况整个世界经济形势是很有利的时机，大家应该研究贸易问题。其他合作形式也很重要，如劳务、合营、合作开发、技术合作等。对第三世界的某些国家，在医疗、设计、管理、咨询，特别是人才培训方面还可以多给一些帮助。对那些很落后的国家，应当把援助放在培养人才上，这是治本的办法。如果不培养人才，没有人才，你就给它援建一些项目，最后它也管不好，帮它培养人才，这是帮到根本上，也是真正使它自力更生。至于经援问题，那还是以前说的，应当在投资少、效果好、影响大这方面多打主意。

经济外交领域很广，贸易、劳务、航运、旅游、技术合作、引进外资、引进人才、市场信息以及驻在国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等等，使领馆都有责任向国内反映。国内有关部门应该加强指导，通报情况。你们应该抓住重点，深入调查研究，每年切切实实地办成几件事情。要有开拓精神，别的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去的市场为什么我们进不去，有什么问题，报告国内改进。使领馆职权范围以内的事情，你们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大使要亲自抓经济外交，使馆党委要专题讨论。重点国家的商务处、经参处、科技处都要配备得力的干部。有些商务参赞、经济参赞条件合适的话，也可担任使馆党委副书记。外交人员要一专多能，要兼才，只懂政治不行，一定要政治经济结合。鉴于目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情况，要特别强调经济，政治终究还是有些底子，比较落后的是不懂经济，不熟悉经济，对经济没有兴趣。有些国家的外交人员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钻得厉害。我们到国外，也要根据互利的原则去研究问题，不要因为自己驻在那个国家，就想从国内抓一把给那个国家，这是不行的。大家都来抓，我们国家没有那么多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不去研究相互的经济来往、经济关系，而只想给那个国家多办几件好事，增加一些项目，增加投资，增加援助，好像这样大使馆工作就好做了，恐怕不能这样子。当然，也不能只想从那个国家搞一些东西，只从我们

这方面来考虑也不行，而要从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多想一些问题。同志们做了很多工作，有些使领馆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但总的来说经济外交还是我们整个外交工作比较薄弱的一环。今天只是出个题目，请大家开动脑筋，共同作好这篇文章。希望在下一次使节会议上能够得到好的答案。

注 释

1．吴学谦（1921—2008），上海人。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曾任上海地下党学运委员会书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长，中联部对外联络局长、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

“星火计划”是科技为农村经济服务的好形式*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

* 这是赵紫阳对国家科委实施“星火计划”请示的批示。

纪云同志：

这是件值得重视的大措施，建议予以大力支持。所提要求不高，希尽量满足。

科技要为农村经济服务，农村经济要依靠科技才能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这要成为今后一条重要方针而突出起来。

科技为农村经济服务，国家科委提出的“星火计划”是一个好的形式。建议以上想法（本报告中的一些好的提法）能写进明年一号文件。

赵紫阳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

绝不放松粮食生产
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听取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汇报时的讲话。

这次会议万里同志和纪云同志都作了很好的报告。刚才杜润生同志的汇报也讲得好，他归纳到会同志提出的要求，我认为原则上也是可以接受的。我想讲以下几点意见。

一、关于农村形势

从这次会议反映的情况看，大体上可以概括成这么两句话：形势很好，意见不少。我认为，形势好要充分肯定，意见要作具体分析。今年农村的改革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可以说是没有预料到的胜利。为了适应农村的新形势，进一步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今年我们改变了多年来在农村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使农业生产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实行这样的变革，今年又会是个什么状况。我看那就肯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好形势，无论出现以下哪种情况我们都吃不消。一种情况是，假使今年不适时改变农产品收购制度，不调整农业结构，老天爷再帮忙，粮食来个大丰收，大量粮食国家不能收购，那就肯定会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另一种情况是老天爷不帮忙，粮食减产，而我们又没有进行农业结构的调整，经济作物就上不去，农民收入就会大量减少。这同样也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今年的结果，以上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今年粮食预计减产500亿斤左右，减得多了一些，但总产量仍达到7600亿斤左右，不至发生大的问题。棉花减产3400万担，使库存不再增加，这是符合国家要求的。虽然粮棉减产，但各种经济作物全面增产，预计农业产值还可以增加10%左右，农民纯收入不但没有减少，每人平均还增加45元左右。这是很不容易的，是今年实行改革的结果。我国农村经济已走上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这是农村经济形势的主流。

会上反映出来的意见也不少，对此要作具体分析。反映的问题，大体上是两个方面的：

一是我们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新体制正开始建立，旧体制还在起作用，在改革中难免有不适应、不配套的地方。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许多是属于这种情况。某些改革措施，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拿我们实行的粮食定购合同制来说，由统购派购变成合同定购，方向是正确的，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现在只是开始走上轨道，要求完全通过经济手段来搞，统统用平价的生产资料与农民交换，目前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在只能做到，既是经济合同，要尽量给农民平价供应一部分生产资料，同农民交换；同时又是国家的任务，必须完成。从不大完善的合同制，发展到真正的经济合同制，需要有个逐步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不适应、不配套的问题，只要引起注意，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二是有些问题是由于要求过高，胃口过大带来的。执行的结果达不到，就反而容易产生埋怨情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一个包产到户，一个进口粮食，一个提高粮价，几项措施一配套，就把潜力挖掘出来，农业生产一下子上去了。现在，我们的改革还在深入。改革的结果仍然会使农民得到实惠，但发展速度不可能那么高，增收的幅度不可能那么大，像前几年那样，一年增加上百元，年年如此，个别地区也许有可能，全国就办不到。我们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如果不立足于客观可能，主观提出过高的要求而又达不到，本来成绩很大，也会感到不过瘾，不满意，甚至怨天尤人。

会上，有同志反映说，国家给农民的好处现在把85%都拿走了。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农村特别是对困难地区，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证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政策收到了效果。现在生产资料涨了一些价，农民负担增加，固然是事实，但不能光算这些账。让农村休养生息，调整农业结构，改变收购制度，整个农村经济活跃起来，对农民产生极大的好处。这个账怎么算呢？从总体看，从长期效益看，我们国家对农民的政策到底是伤害了农民利益，还是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我看只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是事实。要不然今年这么大的灾害，农民还增加纯收入45元，这怎么解释？前几年农村的活力来自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包产到户和休养生息的政策。现在和今后，农村的活力来自发展商品经济，推广科学技术。我们要在这个根本方面下功夫，扶持农业。同志们都是搞农业的，提出意见，出发点是好的，目的是要求给农业以更多的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值得重视和加以改进的。但不能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党的农村政策出了问题，甚至变成一种舆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就不对了。现在需要在农村形势问题上作些分析，统一上上下下的认识很有必要。

二、关于明年改革的指导思想

今年的改革无论城乡都迈出了一大步，各方面的改革，包括价格、工资、农副产品的收购制度等方面走的步子都相当大。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叫做走了勇

敢的一步。年初我在政协座谈会上说，今年的改革要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第一步要走稳一点。现在回头一看，这一步走得不小，的确是相当大的改革。现在改革的冲击波已经过去了。不像五、六月，那时大家还有些担心，怕弄不好出问题。现在到了年底，可以肯定地说，改革走了一大步，情况相当好。

在今年改革的基础上，明年怎么办呢？最近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了几次会，初步议了一下，明年一月还要议一下，提请书记处讨论后把它定下来。鉴于今年改革的步子相当大，明年总的指导思想，我想应该是：巩固今年的改革成果，并为后年（1987年）的改革再迈出重要的一步作好准备。明年的改革要包括这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我们对现有改革成果，要巩固、消化、补充，存利除弊，解决突出的问题，使改革发挥出更好的效益。比如物价改革、工资改革，都有不少遗留问题。明年不出台什么大的措施，着重把已有改革发生的一些突出问题解决好，使之配套。这有许多工作要做。

另方面，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进行探索试点，为下一步改革迈出重要的步伐作好准备。比如现在农村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流通。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得搞好流通。现在很多问题都在流通领域内发生了梗阻，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改变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以后，解决这个问题更迫切。经济搞活以后，国营商业很不适应这种新形势。今后国营商业怎么搞，合作商业、个体商业怎么搞，都是重要课题，体改委、商业部要很好研究一下。

明年把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才能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才能使我们的改革有步骤、有秩序地不断发展，不断提高，达到预期的目标。

三、关于“无工不富”、“无农不稳”的问题

“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这些提法都是正确的。事实已经证明，农村许多有条件的地方工副业兴起后，就富裕起来了。在我们国家，在若干年内要想通过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使农业得到像工副业那样大的利润，是不现实的，无法做到的。要富裕起来，要靠发展工副业、第三产业。“无农不稳”，这也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我认为，我们应当把“无工不富”、“无农不稳”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把二者看成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援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去想问题，定政策，立措施。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实际上这几年我们所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这几年工副业发展起来，有几千万人转入非农业部门，就是因为粮食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有它作基础。而农业包括种植业之所以能持续地迅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以工补农，工副业和农业、种植业互相促进。光靠种植业，农民对农业不会有那么多的物质投入，也就不可能有那么高的产量。除了长江、珠江三角洲等地以外，典型的是鲁西、雁北等地。这些地区要是没有多种经营，没有小煤窑，粮食能够搞上去吗？发展多种经营，办了地方煤窑，增加收入，支援农业，支援粮食生产，多投入多

产出，农村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今后这条路恐怕还是只能这样走。

工副业和农业、粮食是互相促进的关系，所以，需要协调发展。如果不协调发展，只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那就一定会出问题。有些地区把农业当成包袱，把土地撂荒去搞工业，搞商业，不可能长久搞下去，此路不通。反过来如果像过去那样，要八亿人口去搞饭吃，强调农业第一线要多少劳力，劳力归田，结果怎么样，大家都是很清楚的，都有切身的体会。从根本上说，是要把二者的关系摆恰当，协调好。唯一正确的方针是：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在这样一种方针指导下，才能保持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以工补农，以副养农，以工业、副业支持种植业，以经济作物支持粮食作物，从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应当作为长期实行的政策。虽然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产业结构不同，所占的比例因而有所不同，但总的应当是实行这样的政策。

四、关于粮食问题

考虑粮食问题，我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注意：一个是生产问题，即解决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问题；另一个是流通问题，即解决调出地区的积极性问题。

当前，的确有一个农民种粮兴趣减弱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及早引起注意。尽管今年粮食产量下降原因很多，但我们要从中看到这个苗头，见微知著，加以重视。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苗头，在工作上忽视它，明年和今后就有可能真正发生问题。要看到随着农副产品收购制度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粮食生产带来的影响。现在许多地区，种粮不如搞工副业，不如搞第三产业，农民种粮兴趣日益减少。因此，如何保持和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我认为需要重新调整粮食的合同定购任务。去年订合同任务时，本来只想搞1300亿斤；但在“卖粮难”的气氛中，大家争着要多定购，一下搞成1580亿斤。合同任务搞这么多，没有那么多平价供应的生产资料去交换，特别是增产潜力大的地方，不能从增产粮食中得到更多的利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定购1000亿斤就比较适当。为慎重计，可以逐步过渡，建议明年调减到1200亿斤，让种粮农民从增产中多得收益。

从全国来看，调减粮食合同定购任务，要考虑到三种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

第一类是商品经济发达、多种经营门路很多的地区。这类地区现在确有撂荒土地，大量劳力转入工副业、第三产业的现象。必须稳定粮食生产，保证完成合同规定的粮食生产任务。办法是实行以工补粮的政策，使务工人员和务农人员的利益得到调节。这样，不仅对搞工副业、搞乡镇企业没有损失，而且有利于农村经济的专业化、社会化，使粮食生产和工副业、多种经营都能充分地、协调地发展，土地也会相对集中，由种田能手去种。根据中国的情况，将来农业生产上的基本形式可能是拥有一、二公顷到几公顷左右的家庭农场，这样的规模比较适当，便于搞机械化、集约化。

第二类是发展粮食生产有潜力，搞多种经营门路不多的地区，包括新商品粮产区和一部分老商品粮产区。对这类地区必须进一步激发他们增产粮食的兴趣。办法是减少合同定购任务，鼓励他们从超产中增加收入。

第三类是以吉林为代表的大商品粮产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土地较多，粮食商品率较高。对这些地区，可以不降低合同收购数量。并且要特别注意根据合同，做好平价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尽量满足农民扩大粮食生产的需要。

上述地区，在实行合同定购以后，超产部分，价格可以随行就市（但国家收购最高不超过统购加价）；即使在粮食大丰收的情况下，国家也按照稍低于“倒三七”比例价确定保护价，予以收购，使种粮地区的农民放心，放手发展粮食生产。

除此以外，还有极少数贫困地区，商品率很低。可以考虑不订粮食定购合同，按市场价格收购。

以上几种地区，各省回去后还可以以县为单位划分一下。国家调减合同任务落实到省，你们再落实到地、县。大家要瞻前顾后，不要统统要求一下调减很多，到了明年秋后粮食多了，又叫卖粮难。

另一个要解决地区之间粮食的流通问题，调拨问题。现在调出粮食的省区要负担补贴费用，多调多吃亏；而调入粮食的省区，不负担补贴，吃调进的平价粮去搞工副业和多种经营，这是很不合理的。现在不解决，将来矛盾会越来越大，路子会越走越窄。调拨问题，一定要考虑生产粮食的省、地、县的积极性。要规定几条基本政策。一是调入粮食的费用，国家只负担一部分，另外的部分由省、区自己负担。你认为调人粮食合算，就可以多调整你那里的农业结构。你认为不合算，你就多生产粮食。这样可以减少盲目性，促使调整农业结构健康进行。省对地、县也可采取类似办法。二是国家每年储备一部分粮食，哪里发生自然灾害，国家增拨粮食仍按平价，有备无患。有了这两条，使调出者有利可图，调人者不吃大锅饭，流通不畅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五、关于增加农业投资问题

这个问题要摆到议事日程上来。我国的农业要进一步发展，如不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可能三、五年后就会出问题。现在就应当考虑到“七五”后期、“八五”期间的农业后劲问题。当前粮食生产达到8000亿斤水平，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到9000亿斤，不增加投入是办不到的。因此，在“七五”计划中，应当考虑这个问题，对农业投资适当增加一些。明年中央财政开支已作安排，追加投资有困难。好在大部分省区都有财政节余。现在大家都想拿这个钱搞基本建设，要求计委追加指标。我主张，明年可以给地方增拨一些有关农业建设的专项指标。

今后对农业的投资，各级要有所分工。国家增加投资，主要用在大江大河的综合治理和开发上。省以下，要更多地用于一般水利工程，用于发展商品生产的基础设施。至于小型水利工程、农田基本建设，应主要依靠县、区、乡的力量，依靠农民自己搞劳动积累。

这里，想提出一个问题和大家研究。今后我们国家的建设规模不能过多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必须加以控制，而农业的投资又要增加，矛盾怎么解决呢？只有从别的方面挤一些出来。“六五”期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非生产性投资比例上升，已达42%（“一五”到“五五”只占21%），其中住宅投资又占49.5%（“一五”到“五五”占35.8%）。据统计，“六五”期间，城镇通过各种渠道新建住宅面积六亿多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增加1.8平方米。当然，城市住宅仍十分紧张，还是第一大矛盾，要继续抓紧建设，不能动摇。但是也不能一下要求过高过急，要腾出一些力量去加强农业建设。这一点也要向城市人民讲清楚。农村里，也要进行教育，过去“先治坡，后治窝”不对，但也不能只搞住房建设，不搞农田基建。农村集中一些劳力、财力、物力，用于农田基建和基础设施，用于科学技术，这是长远利益所在。各地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采取一些有效措施。

为了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我建议在明年计划进口800万吨化肥（其中地方200万吨）的基础上，再进口100万吨化肥，同时还可以通过换货贸易的方式，再多换一些化肥。国内的化肥特别是大化肥如何多增产一些，也请有关部门研究一下，提出方案。

还有一个科技支援农业的问题。国家科委提出了一个“星火计划”，这是一种好的形式。科技要为农村经济服务，农村经济要依靠科技才能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这应当成为今后一条重要的方针。农业增产的一些关键科研课题，要争取突破。对乡镇企业的改造和提高，也要争取做出成效。我们应当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去武装乡镇企业，改造乡镇企业，提高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

六、关于发展乡镇企业问题

这几年乡镇企业有很大发展，今年产值将超过2300亿元，比去年增长35%；从业人员已达6000万人，占农村劳力的20%，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尽管乡镇企业和村办工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人们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总的来讲，我国农村只能走这条路，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应当支持乡镇企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壮大。

今年以来加强宏观控制，全国性的紧缩银根，控制货币发行，取得了很大成绩。银根抽紧，对乡镇企业也有好的作用的一面，减少了盲目性，促进了经营管理的改善，提高了效益。当然，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制，还不可能做到宏观既能控制住、微观活动又很合理。宏观上加强控制的结果，自然会发生某些不合理的现象，这是难于完全避免的。今年已经采取了一些改进的措施。明年我们不仅要加强宏观控制，而且要改善宏观控制。在金融方面，银根要继续实行紧缩，货币发行要继续控制，在这个前提下，有条件、有目标、按地区、按项目适当地放松一些。对乡镇企业、对整个工业都将这样办。比如，固定资产投资总的是要控制，但其中的技术改造项目可以稍微放松一些；对流动资金的控制也可以略微放宽一些。还有一些行业，比如乡镇开矿、建材、农副产品的

加工等，也可以放宽一些，支持一下。总之，宏观控制要尽量做到适度，过紧了就放一点，过松了就抽紧一点。

还有一个增加劳务收入问题，将来中国农民的劳务收入大有前途。今后要确定一条，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特别是采矿、修路、建筑等行业，应主要依靠农村的劳动力资源，把相当多的劳务让给农民干，增加他们的收入，这对国家建设、对农民本身都有利。我们在劳务政策、用工制度上，都要根据这个原则加以考虑。

七、关于流通问题

在流通领域里，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增加一些新的渠道、新的商业形式、新的商社，从各方面解决流通不畅的问题。明年要试办一些跨地区和部门的农工结合、农商结合或农工商结合的新型商业企业。这是一种新型的商业，既不同于过去一统天下的国营商业，又不同于农民直接进入流通领域的个体商业。它的好处是可以打破地区、部门的界限，沟通城乡关系，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农业部门和工商部门的关系。比如蔬菜经营，就可以考虑由生产地区和大城市的商业部门联合组建合营公司，从产地直接进菜到城市批发。北京市就可以研究与附近的保定、廊坊地区搞合营公司，把菜直接拉到北京的批发市场，产销结合，利润分成，流通环节的费用大大减少，城市蔬菜供应得到改善，产区销区都得到利益。又如生猪的调运，像湖南和广东，就可以考虑建立一种经营生猪的合营企业，利益均沾，以解决湖南不让调猪，或调猪加税等问题，广东的猪肉供应也可以得到改善。湖南、江西向福建、广东调运粮食，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还有一种形式是加工厂与原料产地直接挂钩，签订合同，由产区直接供应原料，农民从减少中间环节中得到好处，工厂也有稳定的原料供应，而且可以根据工厂的需要，改进原料的质量。

明年还可以就商业服务设施社会化进行一些试点。像商业部门的仓库、冷库、车队、货栈等，应该面向社会，谁用谁付费，提高利用率。不采取这条措施，新型商业发展起来很困难，这条路子如果走通了，有利于国营商业、集体商业与农民的结合，可能成为很有发展前途的一种事业。

八、关于扶植贫困地区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贫困地区也同全国一样，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有的已摘掉贫困落后帽子，但确有少数地区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今年以来，扶植贫困地区的呼声比较高，这个问题如何看？我认为：

第一，在我们国家里，富裕起来的地区已经出现，这是一小部分；许多地区是在致富的道路上有显著的变化，但还谈不上富裕；还有一小部分地区至今没有

摆脱贫困状态，温饱都未解决。因此，提出贫困地区的问题，对我们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形势，在大好形势下保持冷静的头脑，很有好处。

第二，只要我们采取措施，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是完全能够得到解决的。这些地区的人口究竟有多少，要弄清楚。估低了固然不好，估高了也不好，我们党内往往容易受刮风的影响，去年出现全国性“卖粮难”，就说农村怎么好；现在又说有一亿多人口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越报越多。所谓温饱没有解决，是指食不果腹、衣不御寒的，那不会很多，我看就是几千万人。解决这些地区的问题，不能要求过高。当前只能解决不饥不寒的问题，还不可能要求一下就富起来。要求明确了，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国家有很多优惠的政策，照顾的办法，只要配起套来，认真落实，调动人民摆脱贫困状态的积极性，从那里的实际情况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温饱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工作做好了，两三年就可以见效。

现在全国支援贫困地区的经费，各种项目加起来总数不少。要想办法如何把这些钱用得集中一些，合理一些。不要撒胡椒面。救济款也不要单纯搞救济，应当用于发展，帮助群众摆脱贫困状态。

第三，要使贫困地区致富，是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长期存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解决少数地区温饱问题不是很困难，但脱贫后要进一步致富，就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我们有些同志到了沿海地区后，再到贫困地区一看，拿沿海地区的标准来要求，自然会感到问题很多。但贫困地区要像沿海地区那样富起来，没有那么容易，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发展商品经济致富，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和基础设施，涉及到一整套东西。贫困地区大多是一些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地方。过去打游击是好地方，现在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困难了，很多条件都不具备，交通运输、服务设施、经营管理的社会水平都很差，要搞起来并不容易，要有许多基础建设。当然，我们对贫困地区要关心，但扶植这些地区脱贫致富，终究还是应当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能把贫困地区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把根据地人民忘了”。我们不能脱离那里的客观条件—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那样，不仅不能达到目的，还会带来相反的结果。所以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经济，走上小康，是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相联系的，只能逐步解决，只能是渐进的。这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把以上三点联系起来看，我们对扶植贫困地区问题就有个全面看法了。

在河南省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这次在河南看了一些地方，总的印象，河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方面的变化比我想象的要大。新乡、焦作也好，开封、郑州也好，都有很大变化。三中全会以来，河南的工作做得是好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当前看，无论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一派大好形势，广大干部的精神面貌、团结状况都比较好，信心十足，人民的生活有了提高，衣着也发生了变化，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河南的干部结构也有很大变化，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方面给人的印象较为深刻。这是我的第一点感受。

第二，你们省委设想，要把河南建设成为小麦商品粮基地，这是农业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很赞赏。你们打算种七千多万亩小麦，平均亩产七百斤，总产达到五百亿斤。达到这个目标，几年时间可以考虑，但这是很有希望的。农民有这个积极性，国家有这个需要，你们又有条件，所以你们的规划是可以实现的。小麦种得多，产得多，也就增加了收入嘛！当然还要注意提高小麦的质量。总之，你们的设想很好，我们要给以支持。但你们不要“开大账”，以你们为主，我们给以适当帮助。你们的条件比较好，有人有地，水利设施也不错，不需花很多的钱。要推广花小钱的经验。豫东排水要花点钱。农民要搞点农田基本建设，搞点义务工，有力出力，不出力出钱。至于一个劳动日出多少钱，要从实际出发。温州一个劳动日十元以上，你们豫东两三元就可以了。施工时可采取包工的办法。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注意农业的投入，如果不增加投入，三、五年以后，中国的农业就可能出问题。过去我们对政策注意不够，而这几年农业得到发展，主要是靠政策。现在，农业上还要抓两条：一是贯彻一号文件，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二是推广科学技术，实行科学种田，包括适当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农田基本建设主要靠群众，地县也要拿一些钱帮一下。省里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农业基本建设方面的指标，只要你们有钱，国务院可以增拨给一些自筹基建指标。国家的投资主要搞一些大的项目，比如大江大河的综合治理和开发。现在，大江大河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包括黄河大堤，谁能保证哪一年不出事？淮河流域年年淹，长江也有问题，对武汉的大堤也是提心吊胆的。当然，这些大江大河也不是马上就能治理好，要逐步解决，但必须投资，要尽力保证不出问题。

第三，你们要发展同外省外地的经济技术联系，来促进河南的经济建设，这

个方针很重要。工作如果做得好，会给河南的经济建设带来想象不到的效果。河南要对外开放，就要发展对国外的经济技术合作，但重点应放在外省、外地，特别是对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上，南至广东、福建，东到上海、江苏。这样做比较现实。河南有几个有利条件，一是地上地下资源丰富，是很大的财富；二是地处中原，交通方便，与沿海开放地带运距比较近；三是有相当的工业基础，有不少骨干工厂。既要看到你们的有利条件，也必须正视你们的不足之处：一是资金短缺，二是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比沿海差，人才不足，文化科技知识不够。从整个社会的水平来说，河南人是“朴实有余，精明不足”。我是河南人，这个话我可以讲。前些时候，我到温州，觉得那里人的“点子”多，本事大。古人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礼记·大学》）一到温州就给人一种感觉，有人此有财。他们没有什么资源，就是靠人的努力，不少事他们一干就成功了。你们要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把沿海地区的技术、人才、资金、管理经验吸引过来，和你们的有利条件结合起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合作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你们也可以在沿海开个“窗口”，“东西对话”。这对于加速河南经济的发展，资源的开发，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都会有很好的作用。

第四，关于横向联合问题。我在北京就听人讲，这两年对企业实行简政放权，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联合出现了很好的势头。这次我听了郑州、开封、新乡、焦作的汇报，印象就更深了。在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打破了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界限，扩大了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这方面有很多新鲜经验，对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意义。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把它作为改革中一个重要问题来看待。有的地方对企业没有放权，处处限制，使企业很困难，也就谈不上经济联合。只有对企业实行放权，企业才有可能更好地进行联合。联合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不要限制在一种模式。目前，经济联合已经开始兴起，正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我们要重视这些经验，因势利导，加以促进、推广，对联合中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帮助排除联合中的障碍。要把“撞击反射”的经验，用到联合上，促进联合的发展。这样，不仅能打破部门、地区的界限，削弱部门、地区的观念，而且必将促使企业结构的合理化，并可能进一步形成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企业群体、企业集团。这种集团和我们过去的部门所有制，和我们行政上搞的公司都不同，这是企业在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围绕生产的需要发展起来的，其结果必然会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今年企业的改革，要在经济联合上多下一些功夫。在对企业扩权的基础上，注意及时把发展联合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上来，研究一些必要的政策。从发展趋势看，企业的联合有可能包括资金的融通，通过联合的形式把资金、设备、劳力、技术用到合理的地方，利益均沾。这样，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就会出现。为了促进其发展，我们可以研究，国家的投资对象也要逐步放在企业集团上，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新型的股份所有制。当然，这些企业集团仍然是全民所有制或

全民所有制为主，但这种所有制和原来的不太一样，性质不变，在办法上更加灵活，因为它打破了地区、部门的限制，更注意经济效益。

原来改革的思路是把中央管的企业、省管企业下放到中心城市。这是因为城市比省和地区受块块思想观念的影响要少一些，想通过这个办法来解决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当时考虑企业先下放到城市，然后解决中心城市对企业领导体制问题。中心城市如何领导下放来的企业，包括原来的企业，在观念上、方式上都需要有一个大的改变。不能把企业由厅下放到市里的局来管，继续搞条条分割。必须改变城市那种由行政的、部门的管企业的方法，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这势必涉及城市的机构改革。我希望城市的机构改革更积极一点，步子迈得大一点，不要等省里和国家的机构改革以后再去改。如果城市的机构不作相应地改革，不改变过去传统的领导观念和领导方式，我看企业的自主权也很难真正落实，放下去的权也会再收回来，还会限制企业的对外联合。所以，一定要把中心城市的机构改革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不然，原来改革的成果也不能巩固，更不能发展。这个问题，在北京我也感觉到了，在你们这里又受到了启发，回去以后要进一步研究。当然，中心城市的机构改革，困难大一些，这主要是涉及人员安排问题。所以既要积极进行，又要稳妥前进。我昨天到了开封，通过了解情况，更使我坚定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原来有的同志说在改革中机构不能撤销，怕撤销后上边给“小鞋”穿，我看这是一个次要的原因，根本原因是人员安排。说来说去就是不少同志不愿放弃那个“码头”（工作单位），只看到既得利益，而不看整体效益，要足够地估计这个困难。我们一定要从大局出发，要积极稳妥地进行中心城市的机构改革工作。

第五，抓好流通问题。我听了郑州市关于发展商品市场、贸易中心的汇报，析综[1]同志也讲了这方面的问题，讲得很好。大家对发展商品经济的认识提高了。过去有的地方限制外地人、乡下人到城里做生意。现在认识到，人们到城市来做生意并不是坏事，可以促使城市充分发挥多功能的作用，特别是对商品的流通作用更大。城市首先是商品流通、交换的枢纽，任何城市都是商品集散地。武汉市提出要打开城门，欢迎外地人来做生意。上海市过去是一再让中央、国务院发通知限制各地去上海的人数，而现在不同了，提出要使万商云集。城市工作的水平提高了，视野开阔了，这样一来，经济活跃了，服务设施也有了，渠道也通了，市场繁荣，财政收入也增加了。要重视这个问题。你们的想法、打算很好，我赞成。

进一步改革，还要注意到金融市场、劳务市场问题。一九八六年要探索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继续探索，一方面看准了就改。比如金融方面已经出现了资金融通的现象。登封县不是就有外地来投资开煤窑的嘛！另外，在金融方面，按照有利于增加储蓄的方向进行改革，那就是正确的。但储蓄增加后，钱用在哪里，需要研究。从当前看，首先要用于流动资金。现在金融方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票子发多了，不得不控制一下发行量，这样一来流动资金就比较少了，包括收购农副产品，有的地方只好打白条，有些工厂互相赊账。一边票子多，一边通货不

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根本原因是基本建设投资过多，消费基金增加过多。银根一抽紧，首先是流动资金吃紧，不少地方把流动资金占用了。所以，在储蓄增加的情况下，要把这部分钱一是用作商业流动资金，包括农副产品收购；二是用作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企业的流动资金。千万不能把这部分钱用于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上，也不能用于扩大消费基金上。如果那样干，影响周转的流动资金仍然解决不了，而周转不灵，就会影响生产。这部分钱的使用，要在宏观上加以控制，这样比较稳妥。至于集资问题，也正像析综同志讲的，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地采取慎重的措施，不能一哄而上，如果大家都去搞，就会造成基本建设过分膨胀，物资将更为紧张。集资只能有条件地进行，集多少，用在哪些项目上，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作为金融体制改革，很多问题都可以进行探讨研究，但要行动的，明年主要就是增加储蓄，改进服务，把资金用好。

劳务市场也是一个大问题。要存利去弊，进行研究。工厂招工、离退休后的社会保障等，都有许多问题。各个企业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有的是新企业，技术设备、工人结构都比较好，退休的工人不多，负担不重，但再过二十年，他们的问题也会出现。总之，不管是金融、劳务市场也好，科技、商品市场也好，还有国际技术市场问题，都要发展，这样才能适应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因此，需要我们下功夫进行探索研究，看准了的就改。

第六，现在改革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企业放活以后，有的企业搞得比较好，工资福利就可能高一些，但这样搞的结果，又引起了左邻右舍的互相攀比。搞得好的企业收入高一些是应该的，但搞得不太好的企业也要攀比。还有企业与机关之间，也互相攀比，越攀越高。现在就面临着这个问题。这样一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攀来攀去，你高我也高，如果不加以节制，最后的结果仍是吃“大锅饭”，改革从克服吃“大锅饭”出发，最后还是回到吃“大锅饭”上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恐怕这是改革中的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可能成为决定我们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不照顾先进企业，不提高一些待遇，就不能进一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而这样一来，后进的企业也要攀比、照顾，这还叫什么鼓励先进？这里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企业间有很多不可比的条件，不能在平等条件下竞争，如厂和厂间占有的固定资产不同，生产的产品不同，利润也不一样。总之要找出一个避免相互攀高的办法出来，既能鼓励先进企业，又不使这些企业职工收入和同类企业过分悬殊，其它企业也不能攀比。这是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有些办法，本来想用以奖励先进，但搞得不好的企业工人也会说，我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你发我也发，没有钱，甚至动用生产发展基金。原来提出机关调资要和企业割掉联系，结果怎么样呢？看来是割不断的。今年机关干部平均提高了十八元的工资，工厂企业也要提高；那么明年呢？明年如果工厂企业的工资增加，机关也去攀比，这样机关、企业之间，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之间，大企业、小企业之间，上交税利多的企业和上交税利少的企业等，都互相攀比，互相提高福利待遇，结果就把消费资金抬上去了。单从一个企业、一种情况看，形势也不错，从大的方面看，从

宏观上看问题却相当严重，互相攀比的结果，生产没有搞上去，而消费资金却膨胀起来。现在我们就面临这个问题。全国不少地方都是购买彩电、电冰箱成风，这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称的。有人估计，中国人现在的消费水平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时的水平。我们是消费过早、超前，叫“消费早熟”吧。要看到农民增加了收入，着重用于生产投资；而城市人民增加收入以后，着重用于消费，买高档消费品。收入增加了，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大家知道，过去吃红薯面窝窝，现在买电视机，黑白的还不要，彩电十四时还嫌小。要买十八、二十时的，而西欧不少地方还有黑白电视机。应该看到我们的生产水平还是很低的，但消费水平已经超前了。实际上我们人均并不多，按一美元折三点二元人民币来算，只有三百多美元。当然这个算法也不尽准确，世界银行估计，大概人均达到四百至五百美元之间，我也赞成这个看法。这个水平在日本那是根本不行的，就这么一些钱，你要吃饭、住房，就不能去买彩电、电冰箱。我们的物价低，房租很少，每人平均只有五百美元的水平，却有了上千美元的消费欲望，胃口很大，消费水平超前，搞不好我们国家的经济就会出现未老先衰。为什么西欧、南美一些国家的经济没有多大活力？就是因为他们的消费水平超过了生产发展的水平；新加坡也是这种状况，李光耀已公开指出了这一点。总而言之，在经济高速成长时期，消费基金搞得太高是自杀政策，必然造成未老先衰。同志们知道，过去十几年没有提工资，这几年消费基金多增加些是应该的，那是属于还账性质的，如果今后仍然这样消费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那是绝对行不通的。互相攀比就可能产生这个结果，不要看现在城市形势好，农村形势好，这个问题不切实解决，就会发生问题。在下边工作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危险性感觉不那么大。我也不主张走原来的路子，把先进企业限制得很死，但总得找个控制、节制的办法，好的不能太高，差的也不可互相攀比。要有差别，但差别也不能过于悬殊。

第七，控制基建规模中非生产建设的比重要注意。基建投资规模要加以控制，不能再扩大。在党代会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后来在省长会议上我又进一步讲了这个看法。明年、后年的基本建设规模都要稳定在今年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一条，国民经济就不能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现在上上下下对这一点原则上也是赞成的，认为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现在有个问题，要引起注意，就是基本建设里面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中的比例问题。过去我们只注意搞生产性建设，不注意搞非生产性建设。近几年，非生产性建设的比例搞得大一点也是对的，还账嘛！过去有些我们叫非生产性建设的实际是生产性建设，如道路、城市建设等，旅游业包括你们的“宋城一条街”也是生产性建设。由于住宅紧张，多建一些住宅也是必要的。住宅建设在我们的基本建设中比例应该大一些。但究竟我们的非生产性建设应该占多大比例？有一个统计资料，从“一五”到“五五”，非生产性建设占21%，现在占42%，你看增加多少！在非生产性建设中，住宅建设过去占38%，现在是近50%。当然房子是要盖的，但按这样的比例干下去，把钱都用在房子上就不行了。我们的住宅建设要占适当的比例，但不可能一口吃个胖

子。有的企业一年建的住宅每人平均四平方米，如果都这样搞，就不得了。基本建设中非生产性建设的比例，住宅建设在非生产性建设中的比例，都有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后劲问题。如果今后还是这样搞，我们的经济建设就可能没有后劲，现在不是没有这个危险。

“七五”期间，我们面临的任务，一是搞好改革，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总供给和总需求失去控制，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二是使经济建设有后劲。消费基金的规模在一段时间内高一点是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设在一段时间内高一点也是应该的，但过分了，长期这样下去，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后劲。三是提高人民生活。这就发生了人民生活和后劲的关系问题。因此，改革不能改来改去只考虑生活，还要考虑经济发展的后劲问题。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生产不断发展，有后劲，改革的成果才能巩固，人民生活才能不断提高。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要有明确的认识。我们的改革，今年迈出一大步，一九八六年不准备迈出更大的步伐，要巩固、消化、补充原来的改革措施，存利除弊，解决突出问题，使之带来更好的效果、更高的效益，同时进一步探索，弄清楚一些问题。

注 释

1．杨析综（1928—2006），四川大邑人。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曾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给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八四级全体同学的回信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八四级团支部并转八四级全体同学：

你们的信，我收到了。感谢你们的新年祝贺。

这里，我祝贺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进步。你们是未来的人民教师。我们国家的振兴，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建设者。为了将来按照这样的目标去造就你们的学生，现在你们就要按照这样的目标来造就你们自己。这是几句很平常的话。唯其平常，我相信只要努力，都能做到。

赵紫阳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八六年

关于一九八六年的经济工作*

一九八六年一月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一）对去年经济形势的估计。去年一年，加强宏观控制，消除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应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整个经济情况正处在由紧向松的转化之中。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经济生活中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社会总需求仍然超过了总供给，而且稍一不慎，还有加剧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抽紧银根、控制货币投放上，确实存在不区别情况、一刀切的问题，有些不该紧的也抽紧了。这在去年那种情况下，是难以避免的。如不加以改进，也不利于增加生产，改善供给。在解决当前的供需矛盾上，一方面必须抑制需求，另一方面必须改善供给。不把膨胀了的需求抑制下来，经济就无法稳定；但如果不从改善供应上做文章，生产也会萎缩。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在宏观上加以注意。

（二）改善宏观控制。今年在微观进一步放活的同时，不仅要继续加强宏观控制，而且特别要注意改善宏观控制。既能控制住，又不要“一刀切”。这就需要改善宏观控制，否则，没有前途。“改善”，有许多内容，要求我们提高工作质量。无论在基本建设上、信贷上，既要注意控制总的规模，又要注意使该上的上，该支持的支持，该紧的抽紧，以改善投资结构，提高经济效益。这样既能避免重新出现超高速；又能在讲究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保持适当的速度。因此，一九八六年可以说是“改善年”、“质量年”。

（三）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这是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发展的关键。第一，必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今年基本上保持去年的水平；第二，调整投资结构，清理在建项目。当前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已经相当大了，问题是投资结构很不合理。据统计局分析，去年非生产性建设增长幅度大大超过生产性建设；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投资比重下降；用于更新改造投资比重也连年下降，其中用于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消耗的投资比重也在下降。这些现象不利于当前经济的稳定增长，更不利于今后经济发展的后劲。因此，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控制总规模，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和项目清理。如不进行调整，规模就控制不住；勉强去控制，就会给将来的发展造成困难。调整结构的难度比控制规模更大，工作的重点要放在这里。

据统计，去年十月、十一月，各地就新上七千多个项目。首先必须清理去年第四季度新上的项目，定几条界限，除能源、交通、出口创汇和其它经国家批准的项目外，一律停止拨款，听候清理。这件事要赶快发出通知，春节前就要把风刹住。然后组织力量，清理其它在建项目，下决心停建缓建一批，保证重点。不仅预算内的要清理，对预算外的项目，也要清理。由计委牵头，制定办法，把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和调整方向管起来。

农村乡镇企业要有控制地给予支持。主要应帮助乡镇企业和村办工业搞好技术改造。也有一些基建项目，如建材、采矿、交通、农副产品加工和为城市工业配套的，可以分地区、分项目、有条件、有目标地予以扶持。总的精神还是：第一，要控制；第二，根据去年情况，给一个信贷指标，规定用途，保留检查权，使乡镇企业向符合宏观的方向发展。农业投资要适当增加。去年大部分省区都有财政节余，今年国家可以增拨给一些专项指标用于农业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

技术改造投资要增加一些，并要使用得当，不能用于基建，不能再搞长线产品。应当把有限的投资用于适销对路的紧俏商品上，提高质量，改善供应。

今年还要适当多利用一些外资。纯粹利用外资而增加的基本建设部分（不包括国内配套），可以另行计算，不列入今年计划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

基本建设投资的管理还有一个体制问题。有人建议把建设银行办成像世界银行那样的投资银行，这个问题可以探讨。可以考虑，将来把中央和国务院直接决策的项目搞得很少，其余的交由建设银行按照世界银行审定基建项目的方式去决策。

（四）控制消费基金的膨胀。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要逐步改善，但消费基金总额必须加以控制。这几年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是带有还账的性质，不可能长期如此。当前在工资福利问题上，互相攀比的现象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要看到，我们国家的现实状况是高就业、低效率，相应的只能是低工资，而不是高工资。我国人口多，劳动力价格便宜，是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互相攀比、轮番抬高的结果，就会形成消费基金的过分膨胀，这一优势就有丧失的危险，最终将导致经济的未老先衰。世界上一些国家在经济成长时期把消费基金过高地增上去，使经济失去活力的教训，我们应当记取。

（五）努力发展生产，改善供应。今年要支持适销对路商品和出口商品的生产，把它摆到重要位置。去年我们面临的是超高速，各项工作都围绕着抑制需求、紧缩银根去做；今年情况不同，在抑制需求的同时，必须在增加供应、改善供应上做文章，大力增产适销对路、质优价廉的商品，满足市场需要，回笼货币。这就需要在流动资金上加以支持。在货币问题上，既要紧缩，又要合理供应，两个方面都要做好。不该贷的贷了，要纠正；应该贷的不贷，也要改正，这样才符合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今年银行增加的储蓄、筹集的资金要首先用于工业和商业的流动资金上，加速流通，扶植生产。为此，银行信贷工作必须提高质量，一边实践，一边改进。今年金融体制的改革，要围绕改进服务（以减少旅途携带大量现金）、增加储蓄、合理使用资金这三个问题进行，创造一些新的经

验。

（六）把出口搞上去。出口的好坏对我们整个经济的影响极大。今年出口如果好一些，回旋余地就大，很多事情就比较好办。发展外贸出口，归根结底要解决三个问题：一要有一套调动企业和职工生产出口产品的积极性的政策；二要实行多种形式的工贸结合、农贸结合；三是外贸部门必须把重点从国内收购转向国外销售。当前最紧迫的是要有几条明确的政策，把出口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最好在春节以前公告全国，使今年的外贸出口有可靠保证。

要研究在银行的领导、管理下，设立外汇调剂市场的问题。至于整个外贸体制的改革，另外再议。

（七）经济体制的改革。去年我们的改革迈出了一大步，今年主要是“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八个字，同时为明后年再迈出重要的步伐作好准备。

价格体系的改革，今年不采取大的措施。要尽量想法把蔬菜、副食品的价格稳住。钢材价格实行双轨制，计划外的搞专营，实行市场调节，规定最高限价。可从进口钢材和统配钢材中，挤出一部分投入市场，使钢材价格稳中有降。

机关的工资改革已经走上轨道，今年要解决一些遗留问题，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企业的工资改革，去年从奖金拿出12.5元用于自费改革，今年允许其中的5元进入成本，也就是说全年人均增加60元。这要早出安民布告。与此同时，要研究制订今后企业工资改革的方针和方案。在分配政策上，今年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社会成员之间苦乐不均过于严重的问题，另一个是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由于外部条件不同而收入悬殊的问题。要制定一些调节措施，把突出的矛盾缓解一下。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按劳分配，不搞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又不能悬殊过大，造成社会问题。

今年要进一步解决大中型企业搞活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要采取调减调节税、增提折旧基金、减少中间层次等方式，把扩大的权力真正放到企业；同时要改进和健全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使大中型企业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

今年的改革要突出抓一下跨地区和部门的经济联合。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围绕生产、流通的需要，企业之间加强横向联系，冲破地区、部门的束缚，必将促进企业结构的合理化，形成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企业群体、企业集团，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通过联合的反馈，进行有关规章制度的改革，从政策上予以支持，从立法上予以保障，促进横向联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流通领域里，今年要试办一些跨地区和部门的农工结合、农商结合和农工商结合的新型商业，增加一些新的渠道、新的商业形式。商业服务设施社会化的问题也要进行试点。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要认真研究如何解决流通不畅的问题。

明后年如何进一步改革，可用今年一年时间好好研究一下，拿出方案来。

（八）今年经济发展的几项主要指标。计划全年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8%，不再变动。根据各方面预测，如把工作做好，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可能达到以下水平：

——工农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10%左右，其中工业产值增长在10-12%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实际增加5%，技术改造要增加一些，还有物价上涨的因素，因此总规模仍大体相当于去年。

——货币投放量200亿元左右。同去年比，有多投的因素，如农产品收购可能增加，利用外汇回笼货币比去年少。但也有少投的因素，如速度比去年低，物价上涨比去年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规模比去年小得多。——外汇收支基本打平，国家外汇结存保持去年年底水平。

——物价指数比去年上升6%左右，其中3%左右属去年翘尾巴因素。

达到上述水平，可以避免速度一下降得太多带来的问题，使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势头，并为明年改革创造较好的经济环境。

总之，今年的经济工作要着重把以下四条抓好：一是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住、调整好；二是进一步把生产搞活，努力增产适销对路商品，满足市场和出口需要；三是把外贸出口搞好；四是千方百计增加储蓄。只要今年工作做好了，明年的经济环境就会更宽松一些，改革就有可能进一步展开。

端正党风要从中央领导机关带头做起*

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机关端正党风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中央机关端正党风动员大会的正式议程已进行完了。我原来没有准备讲话，耀邦同志、启立同志再三要我讲一下，我就在正式议程完毕以后讲几句，表态性的。

我完全同意耀邦同志刚才所作的重要讲话，我认为，这是一篇高度概括、十分重要的讲话。纪云同志、兆国同志、尚昆同志的讲话都讲的很好，我也完全同意。

我们国家社会风气如何决定于党风，党风如何决定于领导机关的风气，领导机关的风气又决定于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一句话，就是决定于北京这个地方。三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好风也好，坏风也好，都是北京带头，传遍全国的。我们中央党政军机关如果风气正、面貌新，全党的风气、整个社会风气肯定会好转。所以，端正党风从北京做起，从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做起十分必要。

端正党风，首先要抓住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中所指出的六个严重问题，这是很现实的，看得到、摸得着的，通过解决这些方面的不正之风，必然会触及到机关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组织纪律性、责任心等等，这些问题暴露出来进而加以解决，就能把领导班子的精神状态以及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革命精神振作起来，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为基层服务，为人民服务。

我们必须看到，从总体上讲，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是好的，是健康的，不是腐败的，但在某些方面、某些环节确有些腐败现象，这也是不能讳言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敢于揭发这些腐败现象，并且我们完全有能力来除掉这些腐败现象。整顿党风，中央是有很大决心的，也有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在方法上，书记处经过研究决定抓住重点，着重解决中央党政军机关的作风，首先从解决六条不正之风入手，我看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使中央党政军机关从一九八六年起能够以新的风气、新的面貌投入宏伟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设。

希望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会见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时的谈话摘要。此后国务院成立了协调领导小组，专门研究此项工作。

中国希望恢复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这是为了适应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我们感谢邓克尔[1]总干事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秘书处为促进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过程中作出的努力。

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个政策是不可逆转的。如果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得以恢复[2]，它同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将进一步扩大。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不但要扩大出口，同时还要增加进口。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同关贸总协定大多数成员国在某些方面，如外贸体制、价格和汇率方面的差异将缩小。

注 释

1．邓克尔（Arthur Dunkel，1932—2005），瑞士人，1950—1993年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干事，推动各国间自由贸易。1991年草拟乌拉圭回合谈判内容，并成功促使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参加成立世界贸易组织。

2．赵紫阳会见邓克尔提出希望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以后，1986年7月11日，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常驻代表团代表钱嘉东大使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正式提交了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席位的申请，从而开启了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大门。

接见体改研究班第四期全体学员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南海接见中央党校和国家体改委共同举办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第四期全体学员时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五年的价格、工资等项改革迈出的步子不算小，这一步取得的收获和成绩，比预料的好，就是说步子大、效果好。当然，有些改革还不配套，但在很多方面，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对今后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沿着大的方向不断探索，不断前进，而且一年比一年的路子更清晰，因此对改革应充满信心。

一九八六年的改革有两项任务。一个是，对去年出台的改革措施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另一方面的任务，就是要为明年后年迈出新的一步进行准备。这就是今后三年，走完两大步，去年加今年一大步，明年后年一大步。另外对宏观控制问题，今年要继续加强宏观控制。要支持企业的横向联系。由于客观因素的制约使企业之间产生收入悬殊、苦乐不均和社会成员之间分配不合理的现象，要认真解决一下。今年把这些主要的工作做好了，对巩固去年的成果和今后的改革都有好处。

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年经济工作的任务*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全国计划、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最近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连续开了几次会，分析了经济形势，研究了今年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工作。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我讲以下七个问题。

一、对经济形势的估计

一九八五年是全面改革的第一年，看经济形势，离不开改革的形势。去年，改革的步子迈得比原来预料的大，效果比原来预料的好。农副产品价格的放开，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搞得是好的，已进入新的轨道。针对前年四季度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的现象，去年一年着重加强宏观控制，消除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各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成绩很大，集中表现在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从生产上看，工业总产值比前年增长17.7％，这个速度还是过高，但从趋势来说，已从上半年的23％减缓到第四季度的10.2％，趋于正常。农业总产值比前年增长10％。国民收入增长n％。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27.5％。财政收入按老的可比口径为1770亿元，增长20.8％，做到了收支平衡。货币发行190多亿元，比年初的计划减少。可以说，整个经济正处于由紧向松的转变之中。

去年初，我曾说改革要慎重初战，务求必胜。五、六月间，人们对情况到底怎样还没有把握。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初战必胜的要求达到了。对于这个胜利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足够的估计。我们不仅要看到改革对当年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长远的作用。几年以来，特别是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经过反复实践、认识、实践，从微观的放活到宏观的控制，从商品的生产、流通到消费，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有益的探索。应当说，我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轮廓，认识上不是更模糊，而是更清晰了；对今后改革的路子如何走，不是更渺茫，而是更明朗了。这是极为宝贵的收获，对今后的改革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时间愈久，将愈益

显示出它的意义和作用。不能因为目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妨碍我们看到主流，看到最本质的东西。

当然，为了更好地前进，对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应当看到，当前经济生活中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社会总需求仍然超过社会总供给，而且稍有不慎，还有加剧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抽紧银根、控制货币投放上，也确有不区别情况，一刀切的问题。这在去年那种情况下，是难于避免的。

针对这种情况，今年的经济工作要继续注意解决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问题，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们既要继续加强宏观控制，又要特别注意改善宏观控制，避免一刀切；既要把膨胀了的需求继续加以抑制，又要改善供给，把生产进一步搞活；既要把超高速度降下来，又要在讲求效益的基础上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这是指导今年经济工作必须注意掌握的几点。

二、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

这是经济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去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的势头虽然得到抑制，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现在许多地方还是大上的劲头，从乡村到地县，到处大兴土木，百废俱兴。去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预计达到1610亿元，增长35.9%，加上集体所有制和城乡个人部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2340亿元。规模相当大，特别是投资结构不合理。现在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大大超过生产性建设投资增长速度，据去年一至十一月统计，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增长57.4%，而生产性建设投资只增长24%。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的投资比重下降，更新改造投资比重也下降。去年能源的投资比重，由1984年的23.5%下降到22%左右。更新改造投资比重，由1983年的30.6%下降到25%以下，其中，用于增加产量的比重由1984年的34.5%上升到41%，而用于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消耗的比重都下降了。这些现象不利于当前经济的稳定增长，更影响今后经济发展的后劲。因此，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当务之急，应作为重要的任务来抓。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既要控制总规模，更要注意调整结构和清理项目。如不进行调整，规模就控制不住；勉强去控制，也会给将来的发展造成困难。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能否控制住，今后经济的发展是否具有后劲，关键在于调整投资结构。调整结构的难度比控制规模更大，工作的重点要放在这里。

据统计，去年仅十月、十一月，各地就新上七千多个项目。首先必须清理去年第四季度新上的项目，定几条界限，除能源、交通、出口创汇和其它经国家批准的项目外，一律停止拨款，听候清理。这件事国务院准备很快发出通知，春节前就要行动起来。然后组织力量，清理其它在建项目，下决心停缓建一批，保证重点。不仅预算内的要清理，对预算外的项目，也要清理。由计委牵头，制定办法，把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和调整方向管起来。

农村乡镇企业要有控制地给予支持。主要应帮助乡镇企业和村办工业搞好技术改造。也有一些基建项目，如建材、采矿、交通、农副产品加工和为城市工业

配套的，可以分地区、分项目、有条件、有目标地予以扶持。总的精神还是：第一，要控制；第二，根据去年情况，给一个信贷指标，规定用途，保留检查权，使乡镇企业向符合宏观要求的方向发展。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要适当增加。去年大部分省区都有财政节余，今年国家可以增拨给一些专项指标，用于农业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

技术改造投资指标要增加一些，并要使用得当，不能用于基建，不能再搞长线产品。应当把有限的投资用于适销对路的紧俏商品上，提高质量，改善供应。

现在沿海地区电力非常紧张，用柴油机发电，很不经济。而大电站的建设又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建议在沿海地区集资建设一批二万五千千瓦至五万千瓦机组的中、小型火电站，以取代柴油发电机。这些设备完全可以自己制造，下决心抓，两三年就可以见效。

今年还要适当多利用一些外资。纯粹利用外资而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部分（不包括国内配套），可以另行计算，不列入今年计划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由国家计委统筹安排。

三、控制消费基金的膨胀

随着生产的发展，这几年职工工资总额有很大的增加。去年工资总额达到1420亿元，比1984年增长25.3%，扣除物价因素后，增长12.5%；比1980年的773亿元增长83.7%，扣除物价因素后增长50.7%。职工的生活，去年继续得到改善。前几年消费基金增长较快，有的年度超过了经济发展增长速度，带有还账性质，不可能长期如此。现在要注意消费基金膨胀的问题。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考虑消费基金的问题，要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我国是高就业、低效率，相应的只能是低工资，而不能是高工资。现在有一种看法，把改革看成是工资大提高，这是一种错觉。我国和西方国家根本不同。我国人口多，劳动力价格便宜，是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如果我们过早地、过快地把工资水平抬上去，超过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优势就有丧失的危险，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就不会有竞争力，甚至最终将导致整个经济的未老先衰。我到过北欧、西欧一些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没有多大活力，不如日本，不如美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搞了过高的工资福利，现在都很困难。新加坡也出现这个问题。看来，在经济高速成长时期，把消费基金搞得太高，实际上是一种自杀政策，我们要吸取这一教训。

第二，必须注意在消费基金上互相攀比的倾向。现在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在工资、奖金、福利上互相攀比的现象相当严重。攀来攀去，你高我也高，如不加以节制，最后还是吃“大锅饭”。有些赢利少的企业迫于压力，甚至挪用发展基金、流动资金，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互相攀比的结果，势必导致消费基金的膨胀，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并且诱发和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安定。这是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始终要密切注意的问题。现在

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危险性、严重性还认识不足。我们的分配政策，是按劳分配，一方面要克服平均主义，承认差别；另一方面又不能悬殊过大。先进企业工资福利高一点是应该的，但必须瞻前顾后，适当照顾左邻右舍，不能过分。后进企业应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上向先进企业学习，而不应在工资福利上看齐。今年在分配政策上，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社会成员之间苦乐不均过于严重的问题；二是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由于外部条件不同、机会不均等而收入过于悬殊的问题。要制定一些调节措施，把突出的矛盾缓解一下。

第三，当前面临企业同机关攀比的问题，机关工资改革以后，企业有些职工认为吃亏，要求向机关看齐。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形势教育，向企业职工讲清道理。在工资上体力劳动应高于脑力劳动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不是脑力劳动者的工资高了，而是相反，必要的差距没有拉开。实际上，即使去年机关工资改革以后，机关团体工作人员的工资，无论绝对值还是增长速度都低于企业的水平。一九七八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是644元，一九八五年为1239元，增长92.4%；而机关团体职工一九七八年平均工资是662元，一九八五年为1173元，只增长77.2%。机关团体职工调整工资后和工业企业职工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现在有些职工提出这样那样意见，主要是不了解情况。各级党委、政府、工会和宣传单位，都要重视这个问题，切实做好宣传教育，要提倡领导和工人间的对话，像抓学生的工作一样抓好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四、大力增产适销对路的商品

去年我们面临的是超高速，各项工作都围绕着抑制需求、紧缩银根去做；今年情况有些不同，在抑制需求的同时，必须在改善供给上做文章，大力增产适销对路、质优价廉的商品，满足市场需要，回笼货币。去年还利用结存外汇，进口了一些高档消费品供应市场，今年这方面的进口大大减少，因此更加重了国内生产的任务。各地都要把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和出口商品摆在重要地位。

为了支持生产，当前突出的是要解决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去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工厂互相打白条，周转不灵，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今年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在货币问题上，既要紧缩，又要合理供应，两个方面都要做好。不该贷的贷了，要纠正；应该贷的不贷，也同样要改正。这样才符合支持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今年的货币投放和信贷指标，还是要加以控制，决不可以敞开口子。要采取多种方式，增加储蓄，开辟资金来源。除了银行系统以外，要把整个邮政系统的力量运用起来，开办储蓄业务。这件事银行和邮电部已达成协议，希望各地认真抓一下。对支付方式也要本着方便群众、有利流通的原则加以改进。现在有些专业户和商贩，携带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票子出去买东西，这是很不便利、很不安全的一种落后的支付方式，必须想办法改进，做到既能减少票子的投放，又能满足生产和流通的需要。增加的储蓄、筹集的资金首先要用于工业和商业的流动资金上，加速流通，扶植生产。地方财政有节余，也要增拨一些解

决流动资金不足的困难。今年金融体制的改革，就围绕着增加储蓄、改进服务、合理使用资金等三个问题去进行，创造一些新的经验。

五、把出口搞上去

出口任务完成得如何，对整个经济影响很大。今年如果出口创汇情况好一些，经济上的回旋余地就大一些，很多事情就比较好办。今年计划完成270亿美元的出口任务，是很艰巨的。面临着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竞争激烈的情况，我们必须从年初就抓紧，落实各项措施，千方百计把外贸出口搞上去。

当前主要是要解决外销不如内销，调动出口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问题，特别是要使出口企业有积极性。对出口产品的生产，要在外部条件上予以支持。同时要从退税、让利、奖励等方面，迅速制定出几条政策，在春节以前公告全国，使今年的出口有可靠保证。此外，还有一个“水货”问题，经济上损失很大，政治上影响很坏，各地一定要注意一下，决不能削价竞销，自乱阵脚，经贸部要加强对许可证的管理。

六、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去年改革的基础上，今年主要是“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同时为明后年改革再迈出重要的步子作好准备。

今年的改革，主要抓以下四件事：

第一，改善宏观控制。前面已经讲了，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信贷等方面，不仅应当管住，而且应当管好。今年的宏观控制，应该有一个新的水平，在“改善”上取得一点新的经验。

第二，对已经出台的价格改革、工资改革作一些消化、补充，解决突出的遗留问题。价格改革，今年不再采取大的措施。要尽量想法把蔬菜、副食品的价格稳住。钢材价格实行双轨制，计划外的可以搞专营，实行市场调节，规定最高限价。尽量争取从进口钢材和统配钢材中，挤出一部分投入市场，使钢材价格稳中有降。机关的工资改革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年要抓紧解决。企业的工资改革，去年从奖金拿出12.5元用于自费改革，今年允许其中的5元进入成本，也就是说全年人均增加60元。这要早出安民布告。与此同时，要研究制订今后企业工资改革的方针和方案。

第三，进一步把大中型骨干企业和出口企业搞活。今年准备调减企业的调节税20亿元，增提折旧基金10亿元，以解决他们负担过重的问题。

国家拿出这30亿元，是很不容易的，一定要把它用好，不能撒胡椒面，平均使用，更不能把它用在工资福利上。不是看谁的留利水平低就减税，而是看谁的

调节税率高、贡献大才减税。这笔钱主要用在企业的技术改造上，应该说是可以解决很大问题的。国务院规定扩大企业的权力，应确实放到企业，不准层层克扣。企业内部，要注意健全经济责任制，适当划小内部核算单位，改善经营管理，使大中型骨干企业具有自我发展的活力。

第四，大力促进跨地区、跨部门的横向经济联合。在企业扩权的基础上，从生产、流通等方面的需要出发，企业之间包括一线、三线企业之间，开始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横向联合。这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新事物。它的好处是资源的开发、资金的使用、生产力的配置都比较合理，经济效益普遍比较好，符合社会需要，有很大的发展前途。企业之间加强横向联系的结果，将冲破地区和部门的束缚，促进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企业横向联系发展下去，必将形成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新型企业群体、企业集团，在企业隶属关系、所有制结构、计划体制、金融体制、流通体制等方面都将引起新的变化。我们要通过抓联合，促改革。在联合的过程中，暴露和发现现行体制、规章制度中阻碍联合的东西，加以解决，这是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今年要作为一件重要工作来抓。对联合要从政策上予以支持，从立法上予以保障。比如投资保护、双重税收、纠纷仲裁、投资指标和产值的计算等，都需要明确规定一些办法，有所遵循。

此外，在流通领域里，今年要试办一些跨地区和部门的工商结合、农商结合和农工商结合的新型商业，增加一些新的渠道、新的商业形式。商业服务设施社会化的问题，也要试点。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要认真研究如何解决流通不畅的问题。

明后年如何进一步改革，可用今年一年时间好好研究一下，拿出方案来。

七、对今年经济发展的几点预测

今年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维持在8%，各地仍应按此进行布置。根据各方面的预测、执行的结果，今年的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可能达到以下水平：

——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可能比去年增长10%左右，其中工业产值在10—12%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有可能比去年实际增加5%，技术改造要增加一些，还有物价上涨的因素，因此实际上的总规模仍大体相当于去年。

——货币投放量大体上200亿元左右。同去年比，有多投的因素，如农产品收购可能增加，利用外汇回笼货币比去年少等。但也有少投的因素，如速度比去年低，物价上涨比去年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规模比去年小等。

——外汇收支基本打平，国家外汇结存保持去年年底水平。

——物价指数比去年上升6%左右，其中3%左右属去年翘尾巴因素。

执行的结果，如达到上述水平，就相当好。可以避免速度一下降得太多带来的问题，使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势头，并为明年改革创造较好的经

济环境。

总之，今年的经济工作要着重把以下四件事抓好：一是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住、调整好；二是进一步把生产搞活，努力增产适销对路商品，满足市场和出口需要；三是把外贸出口搞好；四是千方百计增加储蓄。只要今年工作做好了，明年的经济环境就会更宽松一些，改革就有可能进一步展开。

关于统计信息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家统计局党组汇报时的讲话。

一、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性。统计工作很重要，要加强，要改革。统计要提供准确、灵通的信息。准确、灵通的统计信息对宏观控制和决策是很重要的依据。

二、关于统计工作改革的方向问题。统计工作要改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方向要搞清楚。外国的经验，我们要学习，但全学西方那一套恐怕不行，苏联的模式也不一定适合，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打破框框，走自己的路子。第一，是统计的准确性。单靠行政机构层层汇总上来的数字，不一定可靠，有些信息也不一定能够掌握；有时越求全越不准确。在国外，银行是一个掌握经济信息的非常重要的系统，此外还有一些社会机构搞民意测验等，搜集提供许多统计信息。政府统计部门应当利用各种信息，联系的单位越多越好，利用各单位的信息越多越好。第二，是及时不及时。第三，才是信息多少，也就是全不全的问题。宏观决策，有些数字没有分地区的，关系并不很大，当然会有些矛盾。哪些数字全国的和地区的要挂钩，哪些可以脱钩，你们研究一下。在方法上要灵活，要区别对待。掌握全国的数字很重要，但我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统计上要区别对待，对东部地区的要求可以细一些，对西部地区的少数省、区，如西藏、青海等，就不一定花那么大的力量，因为占的比重很小，而且条件困难，你费了很大的劲不见得就准确。要多种方法灵活运用，要加强抽样调查，我看你们抽选多少户调查就不错，资料也比较可信。

三、关于统计管理体制和工作条件问题。我看你们的汇报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管理体制问题，二是人员和钱的问题，三是统计手段问题。统计管理体制是垂直，还是不垂直，垂直了能否排除干扰？各省意见怎样？需要好好论证，请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马洪同志、体改委安志文同志主持开个会，邀请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论证论证。

关于人员、经费、计算手段的问题，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定下来的，你们还可与有关部门商量。

经过论证、协商，提出意见，报请国务院领导考虑确定。

发挥军工系统优势向军民结合型转变*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接见航空和兵器工业部部分专家时的讲话。

国防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对国家做的贡献是很大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我们国防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基础是很好的，科技队伍的素质也是好的。这几年在搞军民结合方面，是做出了成绩的。但是，应当看到，国防工业还有潜力没有发挥出来。

军工部门要发挥自己的两个优势，一个技术的优势，一个装备的优势，这是任何部门归口、条条块块等都无法限制你们的。为什么大家到外国去引进，花了外汇，还到外国买东西？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崇洋媚外的问题，但我看都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外国的东西好。军工发挥自己装备和技术优势，生产出一般工厂生产不出来的设备、产品，谁也封锁不了，轻工部封锁不了，煤炭部也封锁不了。不是讲在重复引进吗？哪个部门管得了啊！下面搞重复引进都管不了。所以军工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正因为你们不归口，没有人保护你们，就要靠自己拼搏，发挥自己装备的优势、技术的优势来竞争，谁也封锁不了。你们若不是靠自己的装备，不是靠自己的优势，就是让人家保护起来，最后还是没前途，还是要被淘汰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军工系统从总体上讲，装备是好的，技术力量也是好的。现在军工任务不足，这是正常情况，不要当成不正常的情况。我们所处的是和平环境，这一次中央军委确定的国防建设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我们要加强科研，集中力量上水平，打基础。但是这么大的生产能力，这么大的队伍，光靠军工任务是不行的，是保不住的。如果领导上不是自觉把你的队伍，把你的设备，把你的生产能力面向社会，面向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你的队伍就要散，科技队伍要散，工人也要散，不管过去有多高的荣誉，拖上五年就把队伍都拖垮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你是有领导地站到前边来转型，还是被动地在那里等待。转型是大势所趋。顺乎潮流的就能发展，不合潮流的就无立足之地。

军工本身有极大的优势，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当然还有很多制度上、体制上的障碍。国防战线上的科技队伍是第一流的，是我们国家科技队伍的精华。工厂的设备，总体上来看，也是我们国家机械工业的精华。现在就是怎样把这个队伍、这些设备面向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把事业和服务对象转移一

下。肯定地讲，这个力量，在国内竞争，转到民品上去，转到为整个四个现代化服务，它的起点是高的。我以前讲过这个观点，我们国内和国外合作生产，首先军工应该搞起来。因为军工有比较高的水平，再加上同国外合作，就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石油伴生气回收装置的事例，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是一个很差的地方，很落后的企业，队伍不行，设备不行，在这个基础上与国外合作，必然是以外为主。如果用我们国防工业系统比较先进的设备、最好的队伍来同国外搞技术合作，这就高了一头，那就有很多合作项目可以以我们为主，时间也可以缩短。这就是我们的优势。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够把优势发挥出来，当然这里有其他问题，还有体制上的问题。

我们的发电设备制造生产能力不足，有没有安排军工系统？有的当龙头，有的当配角嘛，搞技术转让，技术合作出卖技术嘛，也可以技术承包，你们那么多科技人员，可以出来专门搞技术承包，帮助设计、帮助制造。

如何保持科技队伍这个问题很重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的路子在什么地方，我还是讲，如果企业不搞活，你是保不了的，企业如果没有活力，你是保不了的。时代不同了，现在我觉得我们作为保军的问题来讲，我是完全赞成的，我们必须有一批很精干的队伍，精干的科技队伍，去攻关，去打基础，去上水平。但问题是我们这个国防工业是个很大的摊子，所以现在国防工业里面，工人积极性、干部积极性、技术人员积极性，归根到底，决定于这个企业有没有用武之地。企业如果把局面打开了，具有非常大的活力，大学生就会去了，尖子大学生也就会去了，攻军工尖端的人生活条件也会改善。如果离开这个大前提，离开这个大趋势，孤立去讲如何改变军工系统的状况，我看你保也保不了。现在我们总的看要提出这么个问题，我是从总的来讲的，我不是说具体的问题，不只是兵器工业部，也不只是航空工业部，现在到了这么个时候，今年是一九八六年，“七五”计划第一年，整个国防工业战线（包括兵器部、航空部），应当是为国防现代化、为整个国家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的新时期，到了应该和能够做出更大贡献的新时期。

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很大，设备在全国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科技队伍，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们为了组建国防工业队伍，特别是组建国防科技队伍，把最好的大学生，最优秀的科技人员，分配到军工，集中到军工，不仅是觉悟高，而且要业务尖子，因此，我们才有这么大的队伍。现在我们到了什么时候呢？我们这个队伍，这个生产力，这个基础，第一要继续地、进一步地为国防现代化做出贡献，加强科技攻关，打基础，上水平。还有一个新任务，就是它要为整个四个现代化做贡献。根据新的国防建设方针，主要是在技术上打基础、上水平，科技攻关；而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职工，更多的科技力量，要面向四个现代化。这一个局面如果打开了，企业就会生气勃勃。我认为，保军转民，或者说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继续为国防现代化服务，如果军工系统不打开这个局面，不把自己的力量转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保军会受影响。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当然具体到一个企业，情况可能不一样。因此，什么叫军民结合型？我觉得，一个是认识

的问题，我们的认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如果孤立地保军，我看困难会更多。整个国防工业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打开局面，保军更有意义，对保军是很大的促进，现在国防工业许多困难，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什么山沟问题啊，治病问题啊，什么生活问题啊，才能解决。整个队伍才能朝气蓬勃。如果这么大的队伍，没有事情干，光是中央首长接见一下，登个报纸，宣传一下，就想把队伍稳住，这是不可能的。我说这是时代不同了。过去那个时候，是天天准备打仗，现在，我们一个是面临着四个现代化的繁重任务，一个是确定了相当长的时期内打大仗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中央确定了新的国防方针。这样的情况，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最好的设备，很大的生产力，国内第一流的科技队伍没有多少事情干。要把国防工业转向整个四个现代化，而不是只为国防现代化，这样也会有力地促进国防工业在国防现代化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要讲军民结合型这个观念。

为什么提军民结合型，我在这里说一下。这同军工企业搞民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一开始提军工企业搞民品，没有触及到体制问题，没有触及到企业的性质问题。当时是军工企业以民保军嘛！就是没有多少事干，我就干这个事。军民结合型，就是说，我们的工厂、企业，不是军工企业搞民品，既不能说这种企业是军工企业，当然也不能说它是民用企业，它的机能，它的性质，决定它既搞军工，又搞民品。当然，各个不同的企业，比例不完全一样，企业里面的人员也可以有分工，车间可以有分工，科技人员也可以有分工，但是就企业来讲，不能说它是搞军工的企业，它是既搞军品又搞民品的企业。平时民品任务更大一些，战时军品任务更大一些。只要不发生比较大的战争，这个企业就是这个性质。当然，战争打得大了，不仅是军工企业，还有别的企业也要转。这样一个思想确定下来，对我们的企业和搞军工的同志来说，就能够把手脚放开，能够作长远打算。打开这个局面，我看有很大意义。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事情干，或者临时搞一搞，或者为了发工资、发奖金，当然这个阶段也会经过。这个认识，牵涉到一个企业的发展战略问题、长远规划问题，以及围绕长远规划的企业改造问题，也涉及到企业如何领导、如何经营管理的问题。因为军工企业一般是封闭的，就是大家经常讲的成本加百分之五，企业不可能是经营型，而是供给型，厂长、党委书记根本不研究市场，也不研究信息，企业就不能适应现在这个状况。当然，这两年有很大变化，但不是说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军工企业如何变成军民结合型的两用性质的企业。

还有一个横向联系问题。军工企业如果把横向联系打开，相当一些军工企业可能是带头的。当然军工企业要搞横向联系，首先要解决军工企业的自主权问题。这几年反复证明了这一条，企业有横向联系的要求，上面这些“老子”是不愿意横向联系的。横向联系可以解放很大的生产力。所谓生产力联合，就是专业协作。生产要素的联合，就是人才、资源、资金、技术的联合，就是城市松散的或者紧密的联合。总之，联合很有文章。但联合有个前提，只有企业在有了自主权的时候，联合才有可能。企业没有自主权，一切都听上面安排的情况下，那就不

可能联合。所以，联合是一篇很大的文章。从上面来讲，比如从北京来讲，有个归口到哪个部门的问题。对企业来讲，它不太考虑，它看联合有没有利，能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就是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企业联合就是这样考虑的。但一到北京来，它就有个部门问题。我是搞冶金的，我这是一机部，我这是军工部，企业之间就没有这个问题。当然，下面联合会受到上面阻挠，但是如果大家都把企业自主权扩大了，这种联合的形式就会顺利了。现在我们的联合里面确有这个问题。什么叫联合呢？就是打破行业、打破地区、打破部门界限，企业根据互相的需要联合起来。这是一篇很大的文章。我认为联合真正搞起来，军工优势就可以进一步发挥，因为军工光是技术就有很大的优势。当然这个问题也不简单，联合问题直接与现行体制有很多矛盾，要真正联合起来并进一步发展，可能要打破部门隶属关系，可能出现很多企业群体。就像重庆嘉陵摩托车厂，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群体。它自己参加了四家，联合起了一百多家，参加联合的企业分别属于各个不同部门，不是属于一个部门。所以，一个是军民结合型，要看到这个趋势，真正把我们的军工企业变成军民结合型；一个就是要搞联合，要促进联合。一线、三线的联合，也有很多内容；沿海和内地军工之间的联合，也有很多内容。大体上我们现在与国外合作的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引进资金、引进技术等，在国内都可以用。这种合作是多形式、多层次的。我们如果按这个方向来搞，军工企业就会活起来。军工一活起来，军工任务更容易保，军工企业现在面临的困难也就更容易解决。当然，我这不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在保军的问题上，不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或者说对现在的三线工业企业里面存在的一些困难，不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是，从总体方面讲，这个局面不打开，很多问题就难以解决，这个局面打开了，军工企业有用武之地了，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要使全体搞军工的同志都认识这个总形势。不要被迫的、被动的，不适应这个形势，还是留恋过去的状况。留恋的时间越长，最后越被动。请军工部门的同志考虑这个问题。

要解决创造平等条件开展竞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还是部门所有制，还不能在平等条件下竞争。有两方面，第一，要逐渐地为军工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条件；第二，军工要有这个气魄，依靠自己的优势，打破这个壁垒。由兵器部带个头，把企业下放，下放了就有平等条件竞争了。现在是机械部的企业下放了，电子部的企业正在下放，接着，各个部的机械工业都要下放，什么邮电部的呀、铁道部的呀、轻工部的呀，都要下放，我看兵器部的要下放。企业一下放，联合的形势就造成了，就能平等竞争了。大家都没有直属企业，都变成地方企业了。

最近我们决定了两条，核工业部情绪就高涨了。第一，就是我们要搞自己的核电站；第二，今后核电站就归它，从建设到将来运转，到它给电网卖电。这两件事一定，核工业部就认为大有可为，变成第二个电力工业部。第一是水火电力工业部，第二是核工业部。这样一搞，它再搞什么氢弹、原子弹，就比较好办了。飞机将来也是很有前途的。兵器部是应该比较容易转的，当然，同你竞争的对手多，但你很有优势。现在，你还是要解决企业的体制，企业的领导思想。

刚才他们提了在平等条件下竞争的问题。有这个问题，互相都有。实际上是个部门所有制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把企业放下去，大家都没有直属企业了，就比较好了，企业自主权也有了。当然在现有体制的情况下，也应尽量改善，比如一些重要的设备招标，我们曾讲过多次，要一视同仁。话说回来，不管是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军工这几年在军民结合这个问题上，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有不少的企业尝到了甜头，自觉性也越来越高了，也就是把国防工业企业变成军民结合型企业的认识和自觉性高了。这应该首先肯定。

我们的国防工业，总的要作两条估计。第一条，就是过去几十年搞了这么好的一个国防工业基础，有这么好的一个科技队伍，这是很大成绩，是很宝贵的财富。第二条，确实要看到这个力量，这个科技队伍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发挥得很不够，潜力很大。现在就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体制上的原因，体制就包括你们说的别的部门、地区封锁你们，对你们不开放，也包括你们对别的部门、地区不开放，还包括企业自己还没有相应的自主权。军工企业自主权比民用企业小。军工企业多年来养成的依赖思想比较大。这不怪军工企业和军工部门的领导同志，更不怪科技人员，主要是多年来体制造成的。要改变，当然要有适应的过程，但是要有信心，肯定是可以转变过来的。现在有些企业就搞得比较好。嘉陵厂就是个好的证明。现在，要因势利导，推动这个好的形势。

现在军工各个部门都有一些保军的重要的科研任务和生产任务，这可以根据需要组织一批力量，各方面要保证条件，使这个队伍稳定下来，剩下的这些，生产设备也好，生产线也好，生产能力也好，研究所也好，科技人员也好，往民用上转。一开始转，也可能大材小用，这不可怕，这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过渡。军工可以搞几个大项，除了归口给你们的，像飞机、核电站以外，可以搞出口。机械行业的出口，我认为还是军工的条件比较好。当然有些机械产品出口完全自己配，配不起来，可以和其它民用企业结合起来。另外就是搞技术改造。国防工业可以对我们现有的工业进行技术改造，并同引进结合起来，哪些能搞哪些不能搞，往往是百分之九十可以搞，就可以达到国外给搞技术改造的水平。我们一般地说机械工业是技术装备部，可以改造各个工业，但是军工因为科技人员、设备水平比较高，质量比较好，所以可以改造现有工业，包括民用机械工业。我看军工可以做很多事。另外就是为国内的一些重要设备搞配套。总之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再结合逐步改革体制，包括整个国家的和军工的，这个路子可能是越走越宽。

发展旅游业需要“硬件”与“软件”相结合*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接见全国旅游工作会议部分代表时的谈话纪要。

国家发展旅游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汇的三大支柱之一，即贸易、旅游、劳务。“七五”计划要收到经济效益，就要增加创汇收入。我们要明白，创汇越多，利用外资、借外债的余地越大。如外汇少，借外债也不敢多借。外汇多了就可以多借外债。国际上一般借外债，其还本付息总额不超过当年外汇收入的巧%。比如全年外汇收入一百亿美元，借债的还本付息总额不能超过十五亿美元，否则会出问题。如创汇一千亿美元，即可多借外债，一年借外债的还本付息额可达到一百五十亿美元。当然各国的情况不同，并不是说百分之十五这个比例就是正确的。去年我在人代会上讲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外汇收入是个关键问题。现在要把发展旅游业列入各级的经济发展计划，国家要列入计划，各地也要列入计划，要作为发展战略来考虑，作为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来考虑。

下面我讲一讲旅游业中的“硬件”和“软件”问题。

发展旅游业，需要有“硬件”，也就是要有饭店、飞机、公路等等。搞旅游，不搞好物质条件是不行的。大家对这个问题很注意，在会上讨论得很多了。

但是，旅游还有个“软件”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旅游队伍的素质，包括翻译导游、工作人员、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旅游的管理水平问题，我们搞旅游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队伍，要搞到什么水平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得很差，是非常薄弱的。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情况是硬件很差，软件也很差，两者相比，软件更差。

有了硬件，没有软件，旅游业也是不可能搞好的。软件没有搞好，即使有了基础设施，有了硬件，它们也发挥不了作用。

李光耀来中国，对我们饭店够不够的问题没有讲，却突出讲我们的饭店管理。他说这几年你们大饭店增加了很多，但管理得很差。

目前，我国的旅游业面临着大发展的形势，但还处在初创的阶段。将来发展成什么样子，决定于我们现在打个什么样的基础，决定于我们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旅游队伍，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人员，一是管理人员。在初创阶段，从一开始就要注意建立什么样的队伍的问题，就要很好地研究培养旅游人才、提高队

伍素质、树立良好作风的问题。

中国要把旅游事业真正发展起来，绝不仅仅是饭店、公路、飞机的问题，更是个人才问题。中央关于体制改革决定的第九条就是强调人才问题。

国家旅游局要下很大功夫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饭店很好，但管理很差，不正之风很厉害，一开头就搞坏了，以后就很难再搞好，现在我们不能说这个头是开得好的。旅游业是个新兴事业，在初创阶段，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打好。今后在发展旅游事业的工作中，各级有关领导部门，都要把搞好软件，主要是抓好队伍的素质和管理水平，摆到首要的位置上。过去，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是不够的。

首先要下决心把学校搞好。把学校的领导干部、师资配备好，这样才能把人训练好，经过“六五”、“七五”、“八五”，我们的基础打好，队伍训练出来了，我们的旅游事业就可以健康、扎实地发展。

因此，我觉得，在旅游业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上，首先要把质量搞好，使中国的旅游业在国际上有声誉，得到国外人士的赞扬。现在，我们的声誉并不那么好。在旅游工作中，我们不能滥竽充数，搞瓜菜代[1]。

我们只有把软件搞好了，物质条件才能发挥作用，才会出效益。

要把质量搞好，关键是人的素质，队伍的素质，是对人的培养和训练，要舍得在这方面下功夫。我们可以请外国人讲课，请外国人来管理也是需要的。

注 释

1．瓜菜代，原指1958年“大跃进”后全国粮食供应空前紧张，为了发动群众度荒，当时中央号召城乡居民多吃南瓜、冬瓜等瓜类和蔬菜及小球藻等代食品，以弥补口粮不足，简称瓜菜代。后来泛指某些临时凑合、应付的不规范做法。

就三峡工程和核电站建设安排问题给邓小平同志的信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小平同志：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最近讨论了三峡工程和苏南核电站问题，现将纪要送上，希抽空一阅。

根据浙江秦山核电站建设情况（国产装机容量30万千瓦）和各方面条件，我们自己有能力搞60万千瓦的核电站（配套的常规部分—6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也已引进了制造技术），至多再进少量的关键部件就可以了。这比成套引进90万千瓦的，既可大量节省外汇，又可以使我掌握大型核电站制造技术的时间大大提前（制造60万千瓦后，再进而制造百万千瓦级的也不困难），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原来苏南核电站成套引进的方案需要重新考虑。

您对此事比较关心，先将以上想法告知，待您回京后再进一步汇报，并听取指示！[1]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注 释

1．邓小平1986年2月4日在赵紫阳的这封信上批示："赞成，退紫阳同志。"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与部分专家座谈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

最近，由耀邦同志带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接见了军工各部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先是一月二十一号，耀邦同志和方毅、李鹏、尚昆、郝建秀等同志接见了核工业部的专家。接着在二十四号，启立、方毅、尚昆同志和我一起接见了兵器工业部和航空工业部的一些专家。今天，我利用将要过春节的机会，见一下军工几个部的专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军工各部的专家，多年来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在发展尖端技术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启立同志说你们是无名英雄。过去由于保密关系，对军工战线上一些多年来埋头实干、苦干，对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同志宣传很少。而且他们和中央同志接触的机会很少，因为，很多同志都不是住在北京，所在的基地、研究所、工厂都在山沟里面。启立同志有个建议，对那些无名英雄，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在适当时机加以宣传，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今天到这里来，也是表示感谢和慰问之意。这是一方面。

另外，就是要传达一个信息，中央和国务院认为国防系统的科技队伍，先进的工业设施、先进设备，都有很大的潜力，是很大的生产力，寄予很大期望。我们国防工业战线的科技人员，是整个国家科技队伍的精华。为了加强国防，攻尖端，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来，把全国科技战线工作的优秀人才调到了国防工业战线，把许多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优先分配到国防科研战线。另外，我们国防系统的设备也是整个机械加工工业中最精华的。所以，一方面看到国防工业战线科技队伍和国防系统的各个工厂、设备，已经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还有潜力。所以党中央有个期望，小平同志讲得更早一些，就是说今后这支优秀的科技队伍，这么一个大的生产力，先进的设备，不仅仅是应当为国防现代化做贡献，而且应当为我们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应当为经济建设做出贡献。这也就是我利用今年春节前的机会见见国防工业各部，包括发射基地的一些同志们，想传达的这么一个信息。中央对大家寄予殷切希望，希望进一步挖掘潜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现在我们的广播电视是租国际卫星，为什么要租呢？当然是租一个用钱少一些，过去广播电视部是坚持要买，而且国务院已经批了，要花多少个亿？（有人

插话：2.8亿美元。）后来又确定不买。不买我们就租用，租用卫星大概已有几年的时间了。现在租用，以后就是两个可能，一个是买，一个是自己发射。现在，我们国内就是航天工业部、电子工业部这两家，还有基地发射，能不能在三年以内或到三年的时候，能够满足广播电视部的要求，如果能满足要求，那当然就不要在国外买了。这里有个用户问题，打开电视机，他看着不大好啊，他也会天天骂。他买了电视机，是为了看节目，牵扯到千万个家庭。所以你们只要能搞好，肯定会买你的，这没有问题；但是要搞不好呢？肯定他不会买，我也不敢作主，要他一定买，一定要买我们自己发射的。因为你有个质量问题。而且这个东西，三年以后和现在又不是一个样子，这个领域进步非常快。我们的卫星，不仅要考虑到现在国际上电视卫星的质量，还要考虑三年以后会有什么变化。这样吧，或者两年，或者三年，希望能够发射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买外国的。总之，质量要有保证。

我们国防工业系统这么多人，将来干什么？有没有饭吃？我这不是从消极方面来讲，而是说我们现在除了完成军品，除了完成原来生产的那个产品转成民用以外，还有很大的潜力，应当为国民经济服务。

我跟兵器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座谈时，讲了一点看法。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当时我们有一个整个形势的估计，对战争的估计，那时，确实花了很大的力量组建了这支队伍，这支队伍确实是很优秀的。现在，我们对这支队伍的要求，就不能要求它是仅仅继续搞军工。这支队伍是从全国各个战线调来组建的，我刚才讲了，是我们国家科技队伍的精华，是我们国家整个工业生产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现在，应当要求这个工业基础，这个工业生产力特别是这支科技队伍，要给它加任务，不能只担任军工任务，也不能只限于你原来搞的那个产品转成民用，而必须把自己的力量转上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你们有这个潜力，有这个可能。我这样想，不管我们这个卫星怎样搞，航天工业部那么多人总是不能光搞卫星，恐怕是个浪费，是生产力量的浪费、科技力量的浪费。当然，我也赞成你们搞传统的东西，不仅要把它们维持住，而且要继续发展、继续开发，但总不能只搞这个东西。发射基地恐怕也是这个问题，听说国防科工委有几万人，光是放原子弹、氢弹啦？将来还有别的什么弹。你们也不能光搞这个东西。航天部也好，就是核工业部也不能光搞核导弹，我们国家能搞多少核导弹？我们国家现在总的一句话叫做技术人员缺，工业基础、工业设备、先进设备少。但是我们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组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很大的力量在那放着，现在无用武之地。不管怎么讲，这是窝工，而且窝的不是普通的工，不是那个简单的劳动，不是那个担土的工，而是技术人员的工、专家的工。所以现在我认为：第一，国防工业各系统到了为整个国家现代化做贡献的时候了，当然我不是要你不搞军工，也不是要你不搞原来的产品。第二，国防军工这个力量，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大有用武之地。当然，有很多体制方面的问题，有很多困难。但是，首先我们思想上要明确这一点。为什么？这是由于这支队伍在我们国家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我前面讲了，它是精华，我们国防工业的这支科技队

伍，是我们全国科技队伍的精华，也是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门。不仅是技术水平高，而且政治觉悟也高，组织性、纪律性强。至于怎么搞法？可以研究一下。现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坚决打破军工部门对外不开放这样一种状况。还是老认为自己是军工部，首先要改变这种状况。不是军工部，我们国家不能有单独的军工部，这并不是说不搞军工。只有开放才能把这个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当然，这种转变开始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很高级的技术人员去搞一些普通技术人员所作的事情，但那也是暂时的。我在飞机上和李绪鄂[1]同志谈了这种看法，将来军工各部，特别像航天工业部技术力量这么强，你们将来搞民用品时，很大的内容是要发挥你们的技术优势，就是解决我们国家现在一般情况下技术上还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不仅是搞卫星、搞导弹是这个问题，就是其他方面的技术，也有很多是我们国内很多地方所不能解决的。为什么我们要引进呢？为什么要引进外国的关键设备、关键技术呢？当然也有重复引进，也有不该引进的引进了，但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国内有些技术落后，所以需要引进。

我们这个国防工业系统，为什么自己不去集中力量搞一些国家现在还要从外国引进的技术呢？与其到国外引进，倒不如从航天部引进了，为什么航天工业部不可以搞这些东西？譬如说现在同国外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叫关键部件。设备没问题，但是一些关键部件不能解决，需要从国外引进。而我们这个国防工业系统里头有这么大的技术力量，又有自己的工厂，为什么你们不供应一些关键部件呢？当然过去消息不灵通，你们也不知道需要什么东西，或者你搞了以后，还有一些崇洋媚外的人，国内生产的他不要，而一定要进口。但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如果我们国防工业系统能够在一些关键部件问题上攻关，除了攻上天的技术以外，还攻一些我们国内工业改造、技术改造、成套设备和关键部件的关，那你们的贡献就是很大的了。你们有技术力量，又有设备，就是讲同国外合作，这个话我们不是现在才讲，我在两年以前就讲过了，同外国合作生产，合作设计，我们如果能在军工这个科技队伍、军工技术的基础上，同国外合作，起点就比较高，需要引进的东西可能就没那么多，要掌握这个技术就可能比较快，我们整个科技队伍的水平就会比较高一点。如果不是这样呢？假如按西昌市它这个科技队伍去同国外搞合作，那肯定要全盘引进。如果是四川成都来搞呢？可能就是引进一点，也可以自己造一些，但是可能引进的还是多一些。如果军工各部的技术力量能去攻这个关，也包括国外合作，不能说攻关一定要这个部件由我完全上，也可以同国外结合嘛。从我们军工技术这个起点，这个基础上同国外搞技术合作，搞一些我们国内还不能解决的成套设备中间的一些关键部件，我看它这样的技术就掌握得比较快。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方针。

原来，我们想从国外买90万千瓦的核电站，这个90万千瓦的核电站，如果由地方来搞，主要是由水电部来搞吧，就是买上四台，还不一定能掌握技术。就说他给你，你也不一定掌握得了。现在交给核工业部，30万千瓦他就可以自己搞，如果搞60万千瓦，我们一方面自己干，一方面还要同西德合作。恐怕很多东西我们就是自己做，只有极少部分要同西德搞。而且这样很快，我们就可以自己干全

套，自己搞。我是讲这样一个道理。我看广播电视要真正立足于国内的卫星，恐怕也要走同国外合作的道路。我就很赞赏你们那个银河亿次计算机，我到长沙看过，很赞赏这个搞法。为什么？它整个计算机里头真正引进外国的部分只有二百多万美元，但是它的机械的性能就很好。要是全部买呢？一个是国外不卖给我们，再一个要花很多钱，要上亿。全部自己搞，那二百万美元不花，名誉可能好一些，肯定性能不如现在。所以我们还是要彻底的实事求是。现在两种倾向都有。一种倾向就是离开我们自己的基础重新搞，从外国买，这个路子使我们国内的人没事干，我们的专家没事干，这种倾向要花很多外汇。另一种倾向什么都是我们自己做，好像名誉更好一点，我看不见得。要是在我们比较高的起点上同国外合作，这样，我们很多尖端技术可以攻下来，很多东西可以搞下来。搞下来之后，我们很快就可以上去，这不是很有利吗？当然，这些事要真正变成一种实践，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政策和体制方面。但是，从指导思想上，我们要明确这一点，这样就比较符合我们的情况。

注 释

1．李绪鄂（1928—2001），湖北武汉人，导弹专家。时任航天工业部部长，曾任七机部副部长、部长，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西昌听取四川省和凉山彝族自治州负责人汇报时的讲话。

四川长江以南的小煤窑要放手开采，以水运出川。山西这方面搞得好。四川没有多少东西，这样长江以南就搞活了。要在产煤区就地搞二到五万千瓦的坑口电站，这样也缓和了铁路运输紧张的问题。四川人多地少，要给老百姓找些增收的路子。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居住在十万平方公里的丘陵地区，相当于孟加拉一个国家，这些地方解决吃饭问题还好办，但要致富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地下也没有啥矿藏，靠什么致富？要好好研究。四川虽然很大，但不很富，背不起原属西康省的阿坝、甘孜、凉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所以就带不起来，这个问题应另案解决。

要把原西康省的问题解决一下，不要把对原西康省三个州的补贴都背在四川身上，中央要负担一点，这个问题今年不解决，明年一定要解决。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怎么把军工企业搞活。这在四川是一个很大的潜力，当然不是说一下就可以搞好的。应该说国家对四川的投资是很大的，修了成渝线、成昆线，搞了工厂，给了那么多科技人员，花了几百亿元，现在还没有很好发挥作用。科技人员是国家的精华，在这里窝工浪费，有力没地方使，这是个极大浪费。这个问题要靠军工系统抓一下，不是简单地抓，而是要很好地研究，推广一些好的经验，要推动联合，发挥军工优势。四川有这么一个好的条件，有很多大工业，很多科研机构。科学就是生产力，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短是人口太多，长是摆了那么多设备和科技人员。如果能挖掘潜力，发挥长的优势，就能给四川做出较大贡献。别的省没有这个条件。当然现在有很多困难，很多束缚，需要很多政策。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你们要提建议，要和我们共同研究一下。但政策要军工部门同意，如果定了的政策军工部门不高兴，给了你们政策也不能用，要两方面都有利，都有这个要求。总之，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越往后这个优势越容易发挥。

西昌是个好地方，这里气候好，物产丰富，交通方便，还守着一个安宁河平原，是川南、川滇结合部的“黄金地带”。既利于发展粮食、畜牧业、林业，又有条件搞工业。而你们现在才四千万元工业产值，工业上不去，很多事情就难办。

西昌市的工业第一步搞四亿元，第二步搞十亿元，什么时候搞到二十亿元，凉山就繁荣了。

要研究西昌的工业问题，包括省里都要很好研究一下。所以你们搞个规划，怎么把这个地区搞活。四川西南部一直到甘孜这一带，宜宾以南、昆明以北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所以你们要把西昌这个地方建成川西南和川滇结合部的中心城市。通过这个中心再辐射带动其它地区，这样整个凉山经济就会迅速发展起来。

你们要求建有色金属冶炼厂，我们回去可以说一说。冶金部、有色金属总公司可以来看一下，能不能在这里投资。现在要搞有色金属冶炼，有个电的问题，现在可以吗？（凉山州委领导：现在电没有问题，可以解决。杨汝岱[1]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搞的都是国家需要的原材料，不跟国家争能源、争原材料，有个指标就行。给民族地区增加“造血功能”，要给点政策才行。）

三月份要开一个联合会议，准备解决这个问题。凡是一线资金向二线、三线投资、搞技术改造、原材料生产、加工生产的，指标、准备另外计算，不算在你们省里。

昨天，我们看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那么多的科技人员，这次发射后在近期内没有事干。你们要好好联系，让一些懂工业的帮助你们，支援你们嘛，它有潜力呢。它有一千多技术人员，本科毕业生就有三百多人，离这里又这么近，请他们帮助西昌搞上去嘛。过去，可能我们在观念上有一个问题，就是只想很大的开发计划，没有想这个地方经济怎么样发展起来。当时，这里搞过一个很大的班子，叫什么“攀西开发委员会”，省上想问题只想攀钢的问题，第二基地的问题，整个地区如何开发排不上计划。从基本条件来讲，西昌这个地方是可以搞得好的，省里要把这个地区重视一下。这里比甘孜条件好，也比雅安条件好，地下资源丰富，各种矿产丰富。你们刚才讲群采，当然搞得不错，但不能算是快的。冀东的一个遵化、一个迁安、一个迁西，一九八五年耀邦同志去，给他们说，铁矿为啥不自己开呀？就是要群众办矿嘛。后来他们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搞了精矿粉100多万吨。几年之后就可搞到1000多万吨。凡是搞了的老百姓都富了，包括小选矿场都是他们自己搞的。他们有个口号，叫做“群众采，定点收，集中选，国家炼”。那里的唐山钢铁厂就帮助群众开采，一个技术员就管几个小矿点。你们这里，不仅会理县，还有几个县都有小富矿，你们可以派人到迁安、迁西，看看那里的老百姓是怎么采矿的。你们守着一个攀钢，也可以请他们帮助一下。所以你这个地方，除了农业以外，可以大力发展采矿，这不是很大的收入吗？你们要注意一下安宁河沿岸，加上西昌市，搞上去，州里的财政收入也多了，对那些穷的地方，你们才有力量支援。你们省里要落实，思想一定要转过来，回去给有关部门打个招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可以搞快一点。

凉山农房建设主要有个习惯和文化知识问题。有的你给他修了，他也不愿住。我那个家乡，过去一到冬天，人都到牲口棚里去睡觉，睡在里边他比较暖和。这是一个经济条件和文化知识、生活习惯问题。不改变生活习惯，你盖了房

子，他也不一定到那儿去住。过去有个牧区，花了很多钱盖房子，废除蒙古包，牧民还是不愿意到那儿住，为什么？很简单，他住在那里，牲口没有草吃，冬天畜草不可能解决，他就不可能住进去。所以花了很多钱，拿四川话说，还是在那里摆起。我看，还是要宣传教育。随着农民生活的提高，文化、卫生条件的改善，他们有了钱，他自己就可以解决了。现在，一个是没有这笔钱，一个是有了这笔钱是不是要花在这个方面？如果搞不好，花了很多钱没有用。只要把农民生活搞好了，文化提高了，再加上宣传教育，这个问题逐步会解决。现在农村里有这么一种情况，有些缺文化的地方，就是收入多了，房子也盖得不错，但是一进那个家里头，乱七八糟，脏得要命。有些地方文化比较高一点，收入不那么高，家里却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这就是个文化问题。

你们要求允许硅铁出口，可以嘛，回去专门解决。如果国家将来还在进口硅铁，那就减少进口，把你们的顶上去，节省点外汇，给点优待嘛；如果国家不进口，那当然可以出口了。这个可以研究一下。水电资源丰富的地方，水电都有一个用不完的问题，可以发展些用电较多的工业。我到九寨沟就说，你们那么好的水，落差那么大，为什么不搞点水电站？他们说我们电还用不出去呢，修来干什么。这倒是个办法，水电资源丰富的地方，可以办一些高能耗的工业。

关于三州（凉山、甘孜、阿坝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问题，今年不能解决，明年要解决，把你们三州的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注 释

1．杨汝岱（1926—），四川仁寿人。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曾任四川省副省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扎扎实实地把海南的开发建设事业进行下去*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在海南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我和启立、纪云同志以及中纪委、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几位领导同志来海南岛，看了一些地方，沿途和林若[1]、姚文绪[2]、孟庆平[3]等同志议论了一些问题，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海南的同志要重新振作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扎扎实实地把海南的开发建设事业进行下去

这个问题是海南各级领导、驻岛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全岛各族人民迫切需要回答和希望回答的问题，也是全国各个方面所关心的问题。

这次我们在海南岛住了十天，跑了八县二市。听了海南行政区、自治州、县（市）和一些基层单位的汇报，总的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海南岛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海南全岛的开发建设事业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取得了很大成绩。过去我多次来过海南，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八三年二月又来过。这次沿途看了许多地方，感到海南的面貌确实有了相当明显的变化。区党委汇报说，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五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8%。外贸出口发展也很快，一九八五年全区出口总额7613万美元，比一九八○年增加了三倍。人民生活也有显著改善，一九八○年全区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39元，一九八五年上升到380元，增加得相当快。海南岛从五十年代就讲要开发，中央各部和广东省各有关部门也多次派人来，规划也搞过多次，但海南的开发一直进展比较缓慢。这几年却大不相同了。实践证明，实行开放、搞活的方针，就可以使海南具有的独特优越条件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加快开发和建设的步伐。

海南实行开放、搞活以后，在一九八四年发生了倒卖汽车的事件，使正在顺利发展的形势受到一定的影响，带来一些困难。但是我认为，只要全岛各级领导认真总结经验，正确吸取教训，就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今后海南的开发建设事业在继续开放、搞活的过程中，沿着正确的方向健

康发展。如果因为出了汽车事件就怀疑开放、搞活方针的正确性，或者对海南的开发失去信心，都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当前，海南各级干部应当重新振作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把海南岛的开发建设事业扎扎实实进行下去，取得新的成就。

汽车事件确实给海南在经济上带来一些困难。这是暂时的，主要应靠海南的同志自己去解决，而且也是不难解决的。为了使海南的开发建设尽量少受一些影响，更快地渡过困难，中央和国务院也要尽可能给以支持和帮助。因为海南的开发和建设是全国的事业，是举国上下关心的。海南的同志应认真吸取教训，严重违法乱纪的理应受到党纪、政纪、法纪的处理是一回事；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使海南的开发建设不要因为汽车事件而受到大的影响，又是一回事。我曾经说过，不要把对犯错误的人的处分甚至法律制裁，变成对海南几百万人民的惩罚。因此，中央也好，广东省也好，对海南的困难要尽可能地给予帮助。

汽车事件给海南造成经济上的沉重包袱，就是欠下银行四亿元人民币的债务，而且还要付利息。另外，进口积压物资还有四亿多元债务。这是一个不小的包袱。鉴于海南的困难，去年十二月中央和国务院已拨给一亿元补助款，这次决定再增拨五千万元。另外，海南的同志讲，上交给国家的五万多辆汽车，成本核算上和利息上，国家物资局还要补给一笔钱，大概也是几千万元。这三笔加起来，就是二亿元左右，相当于你们债务的一半，把这个钱用好，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你们要分别情况，具体规划一下。有些单位有偿还能力的，应责成它如期还清；有些单位虽然可以偿还，但要延期付款的，可以代它付一部分利息，助它一臂之力，使它分期还清；有些单位如妇联、青年团等，根本没有偿还能力的，首先由各地的市、县政府帮助它偿还一部分，不足的，行政区、自治州再补助一部分。你们要作出具体的、细致的安排，争取一、二年，把这个包袱解脱，把欠银行的钱还清。应该说有了这二亿元，是可以做到的。此外，你们提出增加两亿人民币贷款指标，我回去同人民银行商量一下，尽量予以支持。

这里要说明，为什么海南在汽车案件上犯了错误，中央和国务院还要拿出一笔钱帮助解决困难呢？是不是鼓励犯错误呢？不是！主要是为了不因汽车事件而影响海南的开发。这一点海南的同志要正确对待。那么，为什么又不完全帮助海南把包袱解脱呢？第一，中央也有困难，再多给没有这个力量；第二，完全解脱，对海南吸取教训也没有好处。欠债还得自己还，背一些是需要的。这样解决，当然你们的资金还有困难，你们自己可以多搞储蓄，这是解决流动资金困难的一个好办法。希望全岛从上到下好好组织一下，认真把城乡储蓄抓起来，如果能增加一、二亿元的储蓄，资金周转就好解决了。

对汽车案件的处理，前一段中央和省的纪检部门、司法部门帮助海南做了很多工作。胡耀邦同志在这里也作了很重要的指示。这次中纪委强晓初同志在这里开了座谈会，讲了很好的意见。总的来说，海南区党委在汽车事件中应负的领导责任已经解决了，包括对雷宇[4]同志的处分、对姚文绪同志的处分，也已经解决了。由于海南区党委的错误决定，影响到其他同志也跟着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

如果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情节，没有中饱私囊的，那主要是接受教训的问题。对于那些虽然个人没有中饱私囊，但情节非常恶劣，拒不改正错误的，也应当按党纪政纪作出处理。还有一些不属于这类错误，而是涉及到违法乱纪的问题，特别是属于贪污受贿、中饱私囊问题的，那就应当根据党纪国法，依法处理。有一些虽然中饱私囊、贪污受贿，但数量不大，而且态度很好，退清赃款的，也可以免于刑事处分。汽车案件涉及了不少人，在处理上应当有个方针。晓初同志讲的两点意见，我认为是对的。第一，要抓大案、要案，尽快把它搞清楚，查证落实后严肃处理。第二，要贯彻区别对待的方针，解脱大多数。这也就是要抓两头。我看在处理上大体有这么两个界限，一是是否中饱私囊，二是情节态度如何。采取这样的方针，可以申张党纪、政纪、法纪，又照顾到海南汽车事件的特殊条件，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投入海南的开发建设。

按照党章、法律的有关规定，凡是需要追究党纪、政纪以及法律责任的，都要按规定手续报批，首先由海南各级严肃认真地、主动地处理好，该由当地审批的就在当地解决；该报广东省和中央的就逐级上报，注意不要把矛盾上交。中央和省的纪检、司法部门也应继续帮助和指导海南把案件处理好。为了使上下能够统一政策，协同动作，建议由海南搞几个不同类型的案例，比如哪一类属党纪、政纪问题，哪一类需要追究法律责任，还有个量刑标准问题。把案例搞出来以后，向中纪委、中央政法委员会、高检院、高法院汇报，共同研究，确定下来，以指导和推动整个汽车案件的处理。我们回去以后把这个意见向耀邦、乔石和中纪委的领导同志报告一下。

采取以上办法，把汽车事件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案件问题处理好，将有利于海南各级领导和各级干部把主要精力转到抓开发建设、抓改革的事业上来。这是海南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

二、海南岛开发和建设的方针

海南岛的建设和开发，主要应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要有利于充分发挥海南的优越条件，扬长避短，加快前进的步伐。海南，大家叫它作祖国的“宝岛”，“南海明珠”，喊了很多年。为什么过去发展缓慢呢？我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从海南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建设方针上没有发挥海南独具的优越条件。当然，这有历史的原因，有别的因素限制。过去长期给海南定了一个方针，要粮食自给。在海南种粮食并不是优势，这样做，恰恰是扬短避长，不是发挥优势而是发挥劣势。结果年年喊粮食自给，年年自给不了。其次，是种橡胶。发展各种热带作物，本来是海南的优势，但过去长时期在农场单一种橡胶，“文化大革命”中还批判种其他热带作物是“搞修正主义”，兴隆农场就把咖啡也砍了。而且过去还规定橡胶只准农场种，不准农民种，从一九六三年以后才逐步解决，但也没有推开。这样单一种植，多种经营的优势就根本不可能发挥。再次，是生产上搞过瞎指挥。如一

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全岛大种油棕，每个公社每个大队都办农场种油棕，投入了很多资金和劳力，油棕长得很茂盛，但不结果或很少结果，也失败了。对海南开发影响最大的，是长期以来采取封闭的方针。那时有关海南区的一些文件上经常引用一句话就是“孤悬海外”。对外不能开放，对内地又隔着一道海峡，既不能外引，又不能内联，当然只能孤悬海外了，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海岛优势的发挥。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海南岛的经济之所以不能较快地上去，主要是方针问题。这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我们在认识上也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海南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第一，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由于是海岛，对外交往比较方便；第二，海南地处湿热带。全国有五万平方公里湿热带，海南就占了三万多平方公里，物产和资源较为丰富。这就是海南独具的特点和优势。应当围绕这两大特点来确定发展战略和开发方针。开放、搞活的政策，为发挥这些优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今后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实行，不予改变。在生产方针上，要重视发展热带作物的生产和加工，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捕捞，发展旅游业，有资源的地方还要发展采矿业（包括群众办矿），要把这些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逐渐形成海南的支柱产业。胡耀邦同志视察海南时，也讲过这个意见。只要认真抓落实，我看海南的开发建设是大有希望的。

这里着重谈一下发展海南的旅游业问题。海南的旅游资源很丰富，热带风光，海滨浴场，名胜古迹，黎村苗寨，非常吸引入。从亚龙湾到黄流一带，是少有的好海滩，可以建设成为天然的冬季海水浴场，比夏威夷的浴场也不差。我到夏威夷，听说那里每年光旅游收入就有二、三十亿美元。海南岛开发以后，每年旅游收入第一步如果能搞到五亿美元就不简单了，第二步再向高的目标前进。海南不仅对国际游客、对港澳游客有吸引力，而且也是内地人向往之地。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将会有更多的人到海南来旅游观光。我们不应该把旅游业只看成是盖旅馆饭店，搞游乐设施，应该把它作为一项重要产业、一项建设事业来对待，通过旅游业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海南岛要把旅游业放在重要的地位，目前要把基础打好，搞好规划，培训人才，抓好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海南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热带风光特色的旅游胜地。

三、外引内联，大力创汇

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必须实行“外引内联”，同时要“大力创汇”。两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多创汇，才更有利于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引进资金，引进人才。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方针。引进是受外汇制约的，我们引进的能力如何，归根结底决定于创汇能力如何。如果不积极发展出口，不积极发展旅游业，不能多创汇，多引进就会多负债。事实上没有外汇，外国人也不会借钱给你，即使借一点，条件也非常苛刻。为什么这两年对外借款比较容易，比较优惠？为什么中国银行在日本发行债券，是“三A级”，利息比较低？因为外国人知道中国每年还本付息占出口创汇的比例较小，还有一定的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

有偿还能力。如果你的外汇少，资信差，你那个“三A级”就要降下来，借款也不容易借到。照国际上的通常看法，一个国家每年还本付息的数额占出口创汇的巧%，就比较适当，超过这个比例，就有危险。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没有外汇可以借，他不了解，你没有创汇能力，就借不到钱。前年冬天在珠江三角洲我就说过，技术靠引进，设备靠引进，原材料也靠引进，而产品又是内销的，如果不加改变，外汇一紧，就玩不转。现在广东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海南这个地方要开放，要搞活，要利用外资，归根到底也要看你外汇有多少。现在你们创汇每年不到一亿美元，只相当于广东全省的三十分之一，这同宝岛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所以，在海南，要把多创汇作为开放、搞活的出发点。没有这样的指导思想是不行的。

要开发海南，需要对外开放，但首先是对大陆各地开放，搞好内联。海南要利用自己具有的独特优势和特殊政策，吸引国内各地区、各部门的资金、技术、人才到这里来，参加海南的开发事业。海南这个宝岛，是全国的宝岛，要打开大门，把全国各地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办工业也好，办商业也好，办运输业也好，办旅游业也好，都欢迎来。独资也好，联营也好，合作生产也好，补偿贸易也好，各种形式都可以。海南区党委的想法很好，不要怕内地来投资分得一些利益，他们在海南办了这样那样的事业，终究对海南人民是有利的。国内许多人对海南是感兴趣的，当然这不能用行政办法叫他们来，而是要靠互利互惠的政策吸引他们来。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搞经济技术合作，有几条原则，叫做“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多种形式，共同发展”。我看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海南和内地发展经济联系。你们要制定一些政策，敞开大门，放宽限制，鼓励内地各行业各单位到岛上投资办各种事业，给以优惠待遇，在税收、分配上适当照顾，使大家来投资有甜头。为了积极鼓励内地到海南来，中央和国务院今年就准备给海南增加几千万元内联的基建指标。有些地方有钱没有基建指标，到海南来就可以解决，这个指标，是特别拨给的，不占本地原来的基建指标。当然，搞什么要定向。只要政策对头，建设资金就可以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流向海南。海南也可以从内联中，学会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水平，锻炼出自己的建设人才。

四、进一步把国营农场搞活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海南岛国营农场已发展到九十一个，职工近五十万人，农场的产值占全岛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在技术、管理、资金、人才上都有很大的力量。我认为，海南行政区也好，自治州也好，各县市也好，都应当把农场系统看成是开发海南、建设海南的重要力量，这支队伍今后在建设海南中是大有作为的。据我所知，海南的不少干部对这点还认识不足，往往容易看到场群关系上暂时存在的一些矛盾，因而对农场重视不够。从总体上讲，农场系统的发展，不仅不会妨碍当地人民的利益，而且必然会促进和带动当地经济的繁荣。所以，地方党委、地方政府，要鼓励支持农场和农场职工参加海南的各项建设，充分发

挥他们的作用。

从国营农场本身来说，必须进一步改革、放活。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要扩大农场经营管理和生产上的自主权，使每个农场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活力的经济实体。各级农垦局一定要简政放权，不要干预农场内部事务。

第二，要学习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实行大农场套小农场，把广大农场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调动起来，办好家庭农场。农场职工中有各式各样的能人，把他们的作用发挥出来，可以办成许多事情，有利于把经济搞活。将来每个家庭农场都是一个具有经济活力的经济单位，与大农场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三，要实行多种经营。海南国营农场的生产方针，我建议不再提以种植橡胶为主的热带作物。种什么要因地制宜，从本地的优势出发。橡胶生产当然不能放松，要继续搞，但有的适合种热带水果，有的适合种咖啡、可可、胡椒，有的适合种南药，不要局限于种一种作物，要发展其他热带作物。同时，也不要局限于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林业等也大有用武之地；不要局限于农业，工业、商业、运输业、旅游业都可以搞。总之，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向农工商运、牧工商运综合经营方向发展。

第四，农场不能是封闭式的，要打开大门走出去，积极发展横向经济联系。海南岛的每个地方，农场都可以去投资，办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第三产业。国营农场和职工家庭农场都可以和地方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专业户建立经济联系，发展经济联合。农场系统办的企业，包括加工厂、商店等，既要为农场本身服务，更要面向社会，为当地的生产、生活服务。这样在经济上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过去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像场群纠纷等，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样发展下去，将形成多种层次、多种经营方式的经济联合体，在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要进一步把束缚农场发展的绳索解开，使它搞活，为海南的开发作出更大贡献，农场本身也得到发展。在新形势下要用新的观点，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观点，来考虑农场的体制改革问题。过去农场系统在管理体制上，收呀，放呀，都搞过，都没有走出一条新路。这几年路子渐渐清楚了。根本的方向，是要在扩大农场自主权的基础上，搞好多种经营，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海南的农场，全国的农垦系统都应这样办。

五、大力培养人才

海南岛的自然条件很好，现行政策也很多，有很多优越的条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缺乏。我看开发海南最大的制约因素，不是资金，不是设备，而是人才。没有人才，再好的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再好的政策也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当然，外地来投资，办企业，也会把各种各样人才带进来，但是主要要靠自己培养。当务之急是要积极兴办各种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培养大批合格的建设人才，满足各项建设事业的急需。海南各级都要把智力开发、人才培养作为大事，摆在重要议程，下功夫抓好。

六、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海南岛要开发，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电力、港口、道路、机场、通讯等。国务院批准你们的二十四项重点建设工程，除了长坡煤矿及电站还要继续论证外，其余的可以按计划继续进行，争取在“七五”期间使海南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个较大的发展。

现在海南的基本建设摊子铺得相当大，也同样有一个调整结构、保证重点的问题。前年你们有个想法，想靠倒卖汽车赚一大笔钱，于是基建上铺了不少新摊子。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需要的，但有些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并不需要，不是你们的优势，应当根据国务院的指示，认真加以清理，下决心停建一批，缓建一批，以便加强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一些必要的加工业。这件事早调整早主动。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分个轻重缓急，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还是应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保证重点，缩短工期，提高效益。

电力工业，在海南岛是个薄弱环节，先搞什么，后搞什么，要充分论证，制定规划。长坡褐煤发电的问题，由于褐煤煤质差，发热量只有一千多大卡，开采褐煤发电，经济效益如何，还应该请专家详细研究，提出可行性报告，未弄清以前，不要盲目上马施工。海上天然气引到岛上来搞电站是可行的，但利用多少，建多大的电站，还要研究。我们国家煤炭工业的前景很好，你们可以在沿海港口建电站，从海上运煤来。你们还提出修建大厂坝水电站，可以装机二十六万千瓦，并增加灌溉面积一百多万亩，解决岛上西部地区的干旱问题。这个方案也可以论证。电力建设也不能齐头并进，先搞哪里，后搞哪里，重点搞什么，要有个全面安排。

机场问题，从全岛来看，北边是海口，南边是三亚，都得有个大机场，否则，发展旅游业是困难的。海口市的机场要改造好。三亚的老机场，靠市区太近，以后会影响三亚市的发展，从长远看不如在凤凰村新建一个机场。听说原来作过勘测，请有关部门再组织论证一下，如果论证可以搞，就集中力量争取在四、五年内基本上建成，投资可以由中央、省和海南三家分担。

海南西部的铁路，你们提出交由你们经营。听说铁道部也同意。你们可以提高一点运价，增加收入后以铁路养铁路，逐步建设新线，由现在的昌江延伸到洋浦，再到海口市，靠自己的力量滚，形成西环铁路。这个方案我们赞成。你们也不要搞什么机构，就由交通部门统一管理就行了。

最后讲一下海南岛开发建设的一体化问题。海南这个地方既是一个海岛，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海南的行政体制、经济管理体制，一定要考虑到两个

方面：一方面要十分重视民族区域自治，充分尊重各兄弟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要加强行政区党委和政府对全岛一体化建设中的统一领导，实行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合理布局。这并不影响自治州属地区一级的地位和享有的自治权力，而且能够把海南这个宝岛拥有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合理开发利用岛上的各种资源，使全岛的经济尽快得到振兴。至于海南的体制怎样才合理，可以进一步研究，从长计议。

为了加快全岛的开发建设，海南的同志要求计划单列。我们经过商量，同意采取类似广州市的办法，除财政仍归广东省外，其他的都由国家计划单列，这样比较有利。当然，计划单列以后，海南仍然要靠广东省的支援。

注 释

1．林若（1924—2012），广东潮安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曾任东莞县委书记，湛江地委副书记、书记，南方日报党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人大主任。

2．姚文绪（1925—2010），辽宁瓦房店人。时任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曾任惠州地委副书记，佛山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湛江地委书记，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南省政协主席。

3．孟庆平（1937—），辽宁黑山人。时任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党委副书记。曾任海南铁矿矿长，海南省副省长，湖北省副省长。

4．雷宇（1934—），广西横县人。曾任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行政区公署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

进一步贯彻“大家办建材”的方针*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林汉雄[1]1986年2月15日一封信上的批示。

去年建材工业取得了很大成绩，希望今年能得到更大发展。进一步贯彻“大家办建材”的方针，建材部门由部门管理转向行业管理，把骨干水泥厂进一步搞活是关键。对乡镇村办建材厂要给以技术指导，提高质量，提高效益十分重要。

会议我不参加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可召开一次办公会议听取汇报。向到会代表问好，祝会议圆满成功。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日

注 释

1．林汉雄（1929—），湖北黄冈人。时任国家建材局局长，曾任水电总局副局长，葛洲坝指挥部参谋长，国家科委局长，国家经委委员，建设部部长。

国有森林不能下放*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国有林，我从来不赞成下放。历来是这个态度。我重申，森林和别的不一样，树木要几十年、上百年才能长起来，分下去谁能保证不乱砍呢！有的说林木下放了，破坏就少了，山林火灾也少了，似乎农民比圣人还高明，有那么高的觉悟吗？我抱怀疑态度。有的人还把这个叫做放宽、搞活，这样下放只能带来破坏。这几年，农区造林在发展，有森林的地区在大量破坏，你们讲风景林、防护林遭到破坏，我看其它林子也在遭破坏。国营林场、成片林绝对不能下放，荒地可以。你们要收集材料，反映情况，破坏完了再反映就晚了。林业部不反映这类情况就是默认。主管林业的不讲谁讲呢！你们要很好调查这个问题。

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要慎重*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胡乔木一封信[1]上的批语。

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

注 释

1．胡乔木的信原文如下：

“耀邦、紫阳、启立、厚泽同志：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日前寄来一份《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为一家之言，似还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另送力群、胡绳同志，故不再报。原附件较多，从略。胡乔木三月一日”秦柳方把当时经济理论界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指责为“自由化倾向”。3月5日，胡耀邦也在信上批示：“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请厚泽同志将紫阳同志的批语转告乔木同志一下。”厚泽，即朱厚泽，时任中宣部部长。

赞成搞“火炬计划”*

一九八六年三月八日

* 这是赵紫阳和宋健的谈话要点。

美国在搞战略防御计划。西欧提出了尤里卡计划。苏联东欧也有他们的计划。

过去，在“两弹一星”的竞争中，我保持了大国地位。现在进入了新的一轮竞争，我应采取什么方针？花钱太多，超过国力，固然搞不起，但也不能无动于衷，无视这场竞争。

最近，王大珩[1]、王淦昌[2]等四位科学家给小平同志提了个建议。他们提出两条，一是跟踪，二是我们也要有一点。小平同志很重视这件事，要我们提个意见，以凭决策。这是一件大事，宜早不宜拖。最近打算开个座谈会，找少数几位同志谈一次，议出了思路来，向常委报告，你们也要好好考虑一下，准备个意见。

（宋健[3]同志谈到科委有个“火炬计划”的设想，专门搞尖端技术）

赞成搞“火炬计划”——中国的尤里卡。包括不包括军用尖端技术在内？恐怕以包括在内为好，以免重复。当然，原来已列入国防科工委计划的，仍由国防科工委负责。把军用和民用的尖端技术都包括进来，可以考虑由科技领导小组协调。

“火炬计划”，主要是搞跟踪，有的东西我们也可能走在前沿，有的也可能搞点开发。要多少钱？除现有投资外，“七五”、“八五”期间每年加2亿元够不够？

主要是要把方针定下来。从何着手？重点是什么？特别要注意，一是力所能及的，二是对建设有重大作用的。

七、八月份能不能拿出个“火炬计划”的初步方案来？这件事早一点定好。落实下去，也有利于队伍的组织。将来搞个精干的队伍专搞这件事，不能断了，散了。队伍定下来，其他的人愿意去搞技术转让，适当流动，也可以松动一点，有利于改革。

注 释

1．王大珩（1915—2011），江苏苏州人，应用光学家。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曾任中国

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中国光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2．王淦昌（1907—1998），江苏常熟人，核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曾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3．宋健（1931—），山东荣城人。时任国家科委主任，曾任七机部总工程师、副部长，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国务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长，中日友协会长。

就“国际和平年”对世界各国听众的广播讲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八日

听众朋友们：

你们好！我很高兴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就开展国际和平年活动向各国朋友们讲几句话。

去年十月二十四日，在联合国举行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仪式上，联合国成员国一致通过了《国际和平年宣言》，宣布一九八六年为“国际和平年”。当时我能够代表中国政府亲自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感到很荣幸。“和平”是人类千百年来所憧憬的美好理想。我自己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还是作为中国一个普通公民，同你们大家一样，对世界和平有着热切的向往。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渴望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繁荣发展、平等合作的世界。联合国组织确定今年为国际和平年，倡议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争取和维护和平的活动，符合世界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真诚愿望。我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和支持。

大家知道，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关系到全人类命运和前途的两大根本问题。各国人民深深懂得：没有和平，就不会有发展，人类的幸福也就无从谈起。几年来，我访问了六大洲的许多国家，在国内也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朋友。在这些交往中，各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与反对军备竞赛的愿望，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也向他们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和平与裁军的强烈愿望和诚意。去年中国政府宣布裁减百万兵员的决定，就是中国人民支持和平与裁军事业的一个实际行动。

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吃尽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强加于自己的侵略战争之苦。近百年来战火连绵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新中国成立以后，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更加深感和平生活的可贵。当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身的现代化建设，这就需要我们有几代人的艰苦努力，需要一个持久而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我们的既定国策，永远不会改变。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各国人民和睦相

处中可以信赖的朋友。

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一贯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努力。当前世界上还存在着紧张局势和“热点”，战争的威胁也始终存在。然而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发展，制止战争的因素在增长，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我们对世界前途充满着信心。让我们和你们携起手来，负起责任，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为了让和平的阳光普照每一个家庭竭尽自己的努力！

谢谢大家！

今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与鲍彤[1]、白美清[2]的谈话纪要。

明后两年的改革，要有个设想。最近酝酿了几件事：

一、价格。主要是逐步把“种主要生产资料的价格理顺。这是比较大的变动，涉及初级产品和加工企业之间利益调整。

二、税制。有两个方面：一是配合价格改革所必须相应采取的措施；二是为了发展商品经济，税制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如：土地税、资源税的设置，产品税和所得税的比重，增值税的扩大，调节税的调减以至取消等等。从税种到税率都要通盘考虑。可以说，这是利改税的第三步，工作量比第二步更重。

三、财政体制。不仅是调整基数，而且有重要的改革内容，如中央与地方在新税种基础上如何合理划分收支。

四、外贸体制改革。同前面所说的几个方面都有关联。如关税问题，退税问题，进口生产资料的价格问题等。

五、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改革。直接关系到生产资料的市场问题和价格问题。

六、金融体制改革。也要有相应的考虑。

这些改革配起套来，可以说是一个大战役。直接影响到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消费者，也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对市场零售物价指数影响多大，要认真测算，如不超过10%，可否下决心同工资挂一次钩？

配套改革比单项改革好。配起套来，可以互相开路。单项改革，则矛盾重重。房租改革，先搞试点。全面铺开的时间，可以考虑晚一点。

最近研究两种体制并存的问题，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不可避免。二是矛盾和漏洞确实很多。新体制也罢，旧体制也罢，总要有个基本的框架。一九八四年以前是以旧体制为主。一九八五年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处在某种均衡、对峙状态。改革是渐进的过程，但这种相峙、胶着状态不宜拖得太久。拖久了，摩擦剧烈，绝无好处。两种价格并存也将是相当长的时间，但两种价格过分悬殊的状态也不宜延续过久。明后年迈个比较大的步子，基本上转上新体制为主，条件成熟不成熟？这是讲质的变化。至于量的发展，时间长一点，关系不很大。

总之，在企业、市场、宏观调节手段这三个方面，明后年主要抓市场体系和宏观手段（包括检查、监督、法规等在内）。这两方面如能抓出个头绪，就可以为进一步放活企业创造条件。横向联系是削弱条条块块的，税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改革也是削弱条条块块的。这几步棋一下，企业的环境就会有大的变化。

现在是提出问题：明后年的改革路子怎么走？可以是这样的思路，也可以考虑别的思路。总之要有所设想，然后认真准备方案。工作量肯定很大。要组织班子，全力以赴。国务院由一位领导同志抓总。各综合部门都要有相当强的力量专门抓这件事。具体的组织协调工作，由体改委负责。

不打无准备之仗。关键是要把方案设计好，考虑周详。什么时候出招？要看时机。今年的速度可能不会太高，明年继续严格控制投资规模，明年或明年下半年可能是个时机，不要因准备不足而贻误战机。

注 释

1．鲍彤（1932—），浙江海宁人。时任国务院总理秘书兼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后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

2．白美清（1931—），四川双流人。时任国务院总理秘书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任商业部、内贸部副部长兼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中谷粮油集团、大连北良公司董事长，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中国粮食经济学会、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会长。

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当前生产问题*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汇报时的讲话。

一、关于横向经济联合

这次会议，是全国第一次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横向经济联合，很有必要。从现在起，应该把横向经济联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作为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抓。抓联合可以出效益；抓联合也可以促改革。

横向经济联合的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都比较明显。联合的领域是很广的，包括生产领域的联合，生产与科研之间的联合，生产与流通之间的联合，以及流通领域的联合等等。生产领域内部的联合，目前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名牌优质产品为龙头的专业化协作；一种是资金、原材料、厂房、设备、技术、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联合。这两种形式的联合，一般具有配置合理，投资少，技术进步快，产品品种新，质量好，劳动生产率高，物质消耗少的特点，因而经济效益比较好，是单个企业所不能比拟的。单个企业，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他们的长处容易被短处所抵销。比如沿海地区许多老企业有技术上和经营上的优势，但往往缺乏原材料，电力紧张，厂房拥挤，发展受到限制。内地有原材料，有劳动力，但缺乏技术指导，信息也不大灵通。有些原材料产区往往缺乏资金。三线企业有先进的设备和强大的技术力量，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作用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一经联合，扬长避短，互相补充，情况就会改观，就可以形成一种新的优势，比较全面的综合的优势。先进的企业得到发展的机会，后进的企业得到提高的机会，一些濒于破产的企业也可以起死回生。这是讲生产领域中的联合。其他各种联合也是如此。今年一月提出要发展一种跨地区的新的商业形式，如粮食联营，蔬菜和畜产品联营，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这种跨地区的新的商业形式，不能货畅其流，农民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折，城市供应也将无法改善。所以，联合起来，对参加联合的各方，对整个社会，都非常有利。这是讲联合的效益，联合本身就可以出生产力，出效益。

横向经济联合对城乡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具有重大意义。这里讲的是重大意义，不是一般意义。可以分三点来讲。

首先，横向经济联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是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前年中央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贯穿了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必须符合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既然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当然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它既然是商品经济，就不能违反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不能无视商品经济的基本条件。横向经济联系正是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这个条件，就不成其为商品经济。人为地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把企业约束在条条块块之中，是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不符合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商品经济不是自然经济，要求相互开放。资金、物资、人员、技术，都要流动。这是讲方向、目标。现在在条条块块之间，没有横向联系，这是同发展商品经济背道而驰的。经济体制改革，改来改去，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指出，条块分割同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改变条块分割，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应该更有利于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按劳分配同条块分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计划经济同条块分割也没有必然联系，可以是条条块块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但也可以是没有条块分割的计划经济。条块分割，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障碍。我们过去的经济活动，是按照条条块块的纵向隶属关系组织起来的，现在也基本上还是这样。商品经济则要求发展横向联系，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和四通八达的经济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讲，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广泛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破除条块分割的过程。要彻底解决条块分割，需要全面改革，需要各方面改革的互相配套。每一项改革的方向对不对，看它是有利于削弱条块分割还是强化条块分割。条块分割的问题不解决，统一的市场就不可能形成，改革就不可能成功。而横向联合本身，正是对旧体制的冲击，对条块分割的挑战。在推进联合的过程中，势必同旧的经济体制特别是计划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物资分配和流通体制发生矛盾，把现行规章制度中各种阻碍横向经济联系的东西全面地暴露出来。这不是什么坏事。整个改革，将在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横向联合的发展，同削弱条条块块，是相互促进的。当然，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早晨就能做到的。

随着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叫做企业群体，或者叫企业集团。它们和行政性公司完全不同。一群一群的企业，自愿联合，互相服务，互相依存，休戚相关，协调行动。嘉陵集团、二汽集团以及常州的某些企业群体，就是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的萌芽。它们之间的联合，广度深度不同，紧密松散不同，还处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看来，抓住横向联合，因势利导，我国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很有可能通过这条路子逐步得到解决。因此，发展横向联合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我们宏观控制的能力。世界上有跨国公司。我们现在首先要促进跨省区跨部门的企业组织形式。这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企业组织形式，新的经济纽带。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还有可能在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及企业内部的组织制度上引起变化。条块分割，容易使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成为部门所有、地区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部门、地区的依赖性极大，吃大锅饭太容

易，企业行为很难端正。企业间的横向联合，以各种生产要素互相投资入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方利益互相制约，各方利益都有自己的具体代表，企业行为就比较容易端正。在横向联合的过程中，在公有制基础上，中国的一部分企业也很可能实行一种全新的股份制。股份制，在我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个企业向那个企业投资，这个地区向那个地区投资，这不是股份吗？由于价格问题没有解决，现在主要是投资分物资，将来也可能成为投资分利。单个企业不一定实行股份制，也不必勉强去搞股份制。企业联合起来后，很可能实行股份制。在中国，将来职工个人入股很可能是小量的，主要是全民企业与全民企业之间、全民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集体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互相参股。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联合起来以后，仍然是全民所有制，但联合各方都有了具体的代表，都关心自己的投资利益，这就同现在由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管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同。所以，通过横向联合，全民所有制的主导作用将进一步渗透到四面八方，更好地带动集体经济和专业户、个体户沿着符合宏观利益的方向前进。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明朗，但很值得注意，加以探讨。

所以，横向经济联合对改革的意义，绝不能低估。

现在提出要抓横向经济联合，怎么抓法？不是要大家一哄而起，更不是要自上而下地去"梳辫子"、"装口袋"，拼凑或者捏合这样那样的名义上或形式上的联合。主要是宣传联合对解放生产力、对改革的意义，提高大家的认识，从政策上鼓励联合，从法规上保障联合，改变不利于联合的规章制度和上层建筑，为联合排除障碍。纪云同志讲了六条，只要符合这六条的联合，就必须支持、扶植，不准阻挠、刁难。综合部门，专业部门，军工，民用，各地区，各中心城市，大家齐心协力，都来促进联合。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国务院审议以后，要登报，一律遵守。这是一个初步的规定，初步扫除障碍，主要是解决一下税收、资金融通以及投资规模和产值计算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将来，随着联合的深入发展，还要不断加以充实。

联合能否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必须维护企业的自主权。要在维护企业的自主权的基础上推动联合，绝不能削弱企业的自主权。企业要求联合本身，也是一种自主权。主管部门如果不准自己所属的企业联合，就是侵犯企业的自主权。我们提倡的横向联合，是企业之间自主的联合、平等的联合、互利的联合。联合不联合，参加联合还是退出联合，由各个企业自主决定。联合的内容和形式，参加联合各方的权益和义务，必须平等协商，谁也不能强加于谁。各方都有利，联合才能巩固。这种联合，就有生命力，拆也拆不散。企业都看到了联合的好处，就会朝这条路上走。领导的责任，在于注意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因势利导。

这里，要特别强调三线与一、二线的联合，科研（包括高等院校）和生产的联合。军工不同民用结合，是没有出路的。科研不同生产结合，也没有前途。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对军工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都有很大的推动。在这方面，要多下功夫，多做穿针引线的工作。

工贸结合，铁路、公路、海运、空运的联运，也是联合的重大课题。这两个

问题，由体改委、经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继续探讨，请各地区、各中心城市也注意调查研究，提出意见。

二、关于明年改革的准备工作

今年改革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明年、后年的改革作好准备。

首先，要研究明后年改革的步子究竟走多大，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什么程度好，步子走大一点比较有利，还是走小一点比较有利？大家可以酝酿研究一下。当然，这不能完全从我们的愿望出发，要看主客观的条件。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我认为明后年改革的步子走大一些似乎较为有利。这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的：

一方面，去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争取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也就是要使整个经济体制进入新的轨道，或者说基本上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的框架。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七五”期间是全面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由于去年改革迈出了不小的步子，今年主要是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已有的改革措施。明后年是“七五”的第二、第三个年头，这两年搞得如何关系极大。我认为在充分作好准备的前提下，明年乃至后年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或者说再打一个大的战役，才有利于使我国的经济体制在“七五”期间进入新的轨道。如果明后年不迈出重要的步子，要在“七五”期间实现中央提出的任务就相当困难。

另一方面，目前我们正处于新旧两种体制并存、交错的时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添了很大的活力，城乡经济空前活跃起来，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里矛盾很多，摩擦很多，漏洞也很多。社会上也议论纷纷，讲成绩确实很大，谈问题也的确不少。原因就在于目前经济生活中新旧两种体制都在发生作用。我国的体制改革不是把总体方案预先设计好，在一个早上施行，把旧体制统统改掉，而是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使新体制逐步建立健全起来。这就决定了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从旧体制过渡到新体制的时间不会很短，我看至少要十年左右，如果从农村改革算起，那就要更长一些时间。前几年我们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从整体上看，旧体制在各个领域仍起着主导的作用。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特别是去年改革迈出了相当大的步子以后，可以说改革已开始进入两种体制的均势、对峙状态，新旧体制谁也起不了主导作用，因而矛盾很多，冲突和摩擦也很多。两种体制对峙的这种状况，不宜拖得太久，拖久了，对改革、对经济建设都是很不利的。前几年改革的结果，新体制发挥出它的作用，使我国经济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新局面；但出现的问题也不少，这些消极因素不及时解决，新体制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就会受到制约甚至会消失。由于新体制还不能起主导作用，当我们在消除这些消极因素的时候，有时不得不借助于旧的体制和旧的控制手段，这样势必强化某些旧机制的作用，结果反过来又影响继续搞活，影响新体制的活力，形成一种

胶着状态，此消彼长，此长彼消。如果能够创造条件，早一点解决这个问题，结束两种体制均势、胶着的状态，进入新体制处于主导地位的时期，这样将大大有利于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利于进一步搞活经济。当然，即使新体制上升到主导地位后，一下子也不会很完备，需要在积极完善新体制的条件下，利用旧体制中某些需要加以利用的职能。因此权衡利弊得失，在“七五”期间，我们应当考虑尽快结束两种体制均势的状态，进入以新体制为主的阶段，也就是把新体制的框架建立起来。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的步骤。

改革也有一个时机问题。经过前几年的实践和探索，改革的路子和轮廓越来越清晰，领导和群众都积累了一些经验，社会的承受能力增强了，如果我们今年再努力使经济生活更宽松一些，那么在明后年迈出改革的重要一步，应该说是有现实可能性的。

其次，如果明年改革迈大步，到底着重改什么呢？在“七五”期间，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增强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国家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这三方面是互相联系的，明后年的改革，要在第二、第三方面的改革上迈出大步子。我看主要应围绕为企业实行真正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和能在一个大体上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创造条件来进行改革。现在，这两个方面的条件都还不具备，企业还谈不上真正自负盈亏，企业之间由于条件不同而苦乐不均的现象也较普遍。只有在两个方面的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企业才能进一步搞活，宏观上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也才有可能。

具体说来，明年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

我国的现行价格体系很不合理，许多产业、许多产品的价格严重扭曲，非调整不可，明后年应当把价格体系的改革摆在第一位。在前两年放开农副产品价格和小商品价格之后，要重点解决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资料计划价格偏低的问题，使两种价格的水平逐步趋于接近，差价有所缩小，把这一序列产品的价格大体理顺。同时，要考虑逐步缩小国家计划内分配的数量，扩大市场调节的部分。这对搞活经济，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大有好处。

价格一改革，相应地税收也要变动。税收问题，一是要随价格的变动而进行调整，二是要随形势的发展而进行改革。调整和改革税收，对价格不合理可以起到某种缓解作用，能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实行利改税以后，企业纳入了税收的新轨道，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税制本身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为了给企业创造一个大体平等的条件，下一步的税制改革要考虑通过产品税来缓解产业和产品间价格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通过资源税、资金占用税来解决级差收入问题。价格、税收的变动，企业之间、地区之间，都是一次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势必在财政上要相应地进行调整。财政，不仅是调整，也要结合进行改革。财政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明确各

级财政担负的不同职能，有利于削弱条条块块的分割，以支持生产的进一步搞活，培植财源。

价格、税收、财政的改革必须配套。这是改革工作的一项重大系统工程，应统一来搞。从单项来看，改起来可能变动较大；综合来搞，有些因素可以互相抵销。这三项改革同步进行，虽然计算起来很复杂，工作量很大，但实施起来却比单项进行要容易一些，而且这主要是涉及国家与地方、部门、企业的利益分配，不像食品价格的改革涉及千家万户。比较起来，三者同步改革，解决问题大，承受能力也较大。这是“七五”期间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改革，不论是深度和广度上都迈出重要的一步，企业的外部活动条件将会大为改善，宏观控制也将大为改善。

另外，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外贸体制改革的问题。要不断完善宏观的经济调节手段，运用汇率、税收、关税、出口信贷等经济杠杆，辅以出口许可证和配额管理等行政手段，合理调节利益关系。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手段的前提下，解决产销结合、工贸结合、技贸结合的问题，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外贸进一步搞活、搞好。

明后年改革迈出这样大的步伐，能否成功，我看主要取决于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物价指数能不能控制住，二是基本建设规模能不能控制住。

各项经济体制的改革，它们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正如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的，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改革价格体系，是很重要也是很困难的工作。进行以上几项改革，首先要考虑的是对物价影响有多大，我们的承受能力怎么样。这次设想的价格体系的变动，有它的特点，虽然变动的幅度大，但主要是动生产资料价格（原材料、能源），而不是消费品价格，更不是副食品价格。尽管它涉及到地区、部门、企业的利益的一次大变动，可能有相当的震动，反应也会是激烈的，但比较起来，它对市场的影响，对消费品价格的影响不会很大，风险没有调副食品价格大。但这次动原材料、能源等价格，总还会影响到市场的一部分，对这点我们应当正视，采取对策。调价的幅度有多大，波及面多宽，连锁反应多大，事先需要详细计算。可不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影响不大的话，为了取得这次改革的胜利，即使部门、地区、企业牺牲一点眼前利益，也要服从全局，把它搞好；如果对市场物价确有比较大的影响，物价指数上升比较多，我们也可以考虑，职工的工资增长与物价指数挂一次钩，不至影响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即使财政上一时少收一些，也要下决心搞。总之，要采取措施使市场物价不至发生大的问题，使人民生活不受影响。

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能否控制住，是这次改革成败的另一个关键。投资规模如果过大，物资紧张，票子发行多，经济生活绷得很紧，就很难进行改革。为了使改革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宁可要基本建设让一次路，也要下决心搞。基本建设让路不外乎这两年少搞一点，从长远看，这对经济建设的影响不很大，只是暂时的，以后可以补救，而换来的却是改革的一次重大胜利。基本建设争投资、争项目、铺摊子，把规模搞得过大，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一种“顽

症”。前些时候我们进行的一些改革，并没有减弱这种顽症，有些方面还有所加剧。我们必须切实改变企业要上、部门要上、地区要上，只由中央控制的被动局面。因此，对基本建设的管理体制也要彻底改革，并且要制定一系列的调控措施，系统地加以解决。这应作为计划体制改革的中心来抓。

价格、税收、财政的改革，加上外贸、基本建设体制的改革，就是五大项。它们是互为作用、互相联系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围绕价格改革来进行。可不可以这样搞，怎样有步骤地搞，请大家研究。今年就要立即着手组织班子，认真准备。要划分几个专门的小组，并要有一个综合研究的机构，把这次改革作为重大系统工程来进行。要组织力量，吸收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的同志和地方的同志、老同志和中青年参加，集思广益，设计好方案，供中央和国务院决策。

我讲以下五点意见：

第一，对二月份的生产怎么看。今年二月份的工业生产不太理想，这次会议反映大家很着急。我看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家分析一下也是必要的，应解决的问题要切切实实地去解决，应抓紧的事也要抓紧去做。但要提醒大家，领导上不要急，更不要责备下边。在速度问题上，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二月份生产速度为什么下来？去年速度过高就是一个原因。去年二月份增长23%，今年二月份增长0.9%，加在一起还是增长24%，平均增长12%。我看了一、二月份的生产报表，觉得问题不大。首先是市场紧缺的商品增长幅度不小，能源和原材料生产是好的，财政收入情况也不错。计委给我送来一张从“四五”到“六五”的平均生产速度按月升降的曲线图，从十五年的规律来看，今年一、二月份的工业生产情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正常。根据这个曲线图推算，上半年速度低一些，下半年速度高一些，全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仍可达到8%。我们在年初讲今年可达到10%的增长速度，那是预测，计划还是按8%安排的，即使低一点，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不能看得过重，要沉住气，不要负担很重。抓生产也不要沿用过去开电话会、催进度、压产值的老办法，那样会助长企业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等弊病。各级领导要深入调查研究，有的放矢地去解决出现的新问题，扎扎实实做好工作。

第二，要加强企业干部和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落实经济责任制。据各地反映，现在企业干部和职工的思想比较乱，意见不少，一是气有些不顺；二是经济责任制受到冲击，松懈下来了。这和去年企业工资调整时思想政治工作太粗有关系，没有把调整工资作为一件大事来认真抓，对调整工资会对经济责任制产生什么影响也估计不足。当前不少企业工人之所以松松垮垮，很大程度上是干部的问题带来的。有些企业于部对去年自己没有像机关干部那样去调工资有意见，对职工中的问题该管的也不管了，该做工作的也不做了。针对这种情况，各地有必要认真抓一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做好干部的工作。其次，要整顿和落实经济责任制。为了给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一点条件，原来决定把去年企业工资改革时从奖金拿出的12.5元，今年允许5元进入成本，这次再增加2.5元，共7.5元

进人成本，这就等于一个半月的奖金，加上原来的奖金，应该说对落实经济责任制，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是可以起到良好作用的。实行7.5元进入成本的办法以后，各地前一段时间有用地方财政收入补企业奖金的，也要相应地减下来，以免奖金增加过多，互相攀比。

集体企业怎么办呢？最近纪云同志召开了会议，作了研究。奖金税还是要照章缴纳。但是，一要提高计税工资扣除额，也就是提高了起征点；二是所收的这笔税款，国家不要，留给当地用于集体企业职工的统筹社会保险，乡镇企业还要用于以工补农。这样集体企业包括二轻企业、街道企业、乡镇企业的问题也初步解决了。

第三，贯彻厂长负责制的问题。最近，对厂长负责制有一些议论，我认为是理解上的问题。现在试点的二万多个企业，还是要按照原定的办法继续试验下去。怎么改进，怎么完善，以后再说。大家提出厂长的人事任免权问题，我认为党管干部的原则是正确的，厂长、经理还是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任命的；有一些招聘的厂长、经理，也要经过党委任命；副厂长、副经理，也是由厂长提名，上级党委批准的。党管干部，并不是说每个干部都要由党委任命。现在要重申，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单位，厂长有权任命中层干部，这一条不改变。厂长在任免干部时，应尽可能同其他领导干部商量，走群众路线。有些争议很大的干部，也不一定马上作出决定，你叫他干，许多人不支持，工作也难搞好。厂长要有民主作风，提倡同大家多商量，其他干部也应尊重厂长的权力，尽量采取合作态度。

第四，纠正不正之风要注意界限问题。开放、搞活以后，必然会有漏洞，会有少数人乘机搞不正之风，搞经济犯罪活动。我们既要开放、搞活，又必须长期坚持反对不正之风。小平同志最近讲，一要开放、搞活，二要法制。在纠正不正之风当中，要划一些界限，哪些允许搞，哪些不允许搞，要有明确规定，逐步形成一些规定性的东西，把经济法规逐步建立健全起来，这也是改革的内容。有个规定，有个界限，便于大家有所遵循。不然的话，就容易一会儿紧，一会儿松，紧的时候，紧得不得了，松的时候怎么干都可以。我们多年来习惯于搞运动，凭精神办事，运动一来什么都不行，运动一过又什么都可以。有些运动本来也没有包括那么宽，但“闻风而怕”，什么都不敢动作了。听说现在许多地方的采购员也不敢出去了。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几个月不行动，就吃不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要注意及时划清一些界限，作出一些规定。有些事中央统一规定一下子拿不出来，可以由各个城市、各个地方先搞。比如在经济交往中，有一些应酬和招待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可以由各地规定一个标准，出一点招待费。最好不要一个厂搞一个，应由省或地、市统一搞。一时不完备也不要紧，宽了将来可以再规定严一点，严了将来可以规定宽一点。我主张一个城市作一个规定，这不算“土政策”。这样逐步划清一些界限，形成一些规章制度和经济法规，可以堵塞漏洞，有利于经济的进一步搞活。

第五，解决流动资金问题。我们既要注意解决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又不要多发票子，还是应当把储蓄搞好，这里有很大的潜力。今年一、二月份城镇储蓄

存款就增加71亿元，要进一步把这项工作抓好。对流动资金问题，最近财经领导小组开了几次办公会议，议定了几条：（一）凡是新投产的企业，产品又是适销对路的，需要的流动资金应解决。（二）凡生产适合市场需要的产品，在流动资金上要给予支持。（三）对企业之间互相拖欠的，银行要帮助他们搞好清理结算，避免影响一大串。总之，流动资金要优先解决，还是先生产后基建，先解决生产转不动的问题，基建投资、技术改造投资都要服从生产，先保生产。

以上讲的第二、三、四个问题，是属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问题，第五个问题是属于资金保证问题。我看只要我们扎实工作，把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今年的工业生产是会正常发展的，为明年改革创造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关于核电站问题的谈话和批示*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九日、二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与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等人的谈话要点和对核反应堆安全标准的批示。

一、核岛应采用每回路30万千瓦的国际标准型技术方案，以便向国际标准靠拢。

二、秦山二期工程采用60万千瓦核电机组。

三、核电站工程设计建造以我为主，与联邦德国合作设计。60万千瓦常规岛可利用已从美国引进的技术。

四、进口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要货比三家，但最后要尽量和联邦德国成交。

五、60万千瓦机组第一批可以先搞几套，然后升级再上100万千瓦机组，或直接上120万千瓦机组。

六、从长远战略看，有的国家靠不住，不愿真正转让核心技术，核电站还是要和联邦德国合作，联邦德国科尔总理给我来了信，我准备亲自约见联邦德国大使谈一下。联邦德国电站联盟执行副总裁弗莱厄来华之事，原则上同意。三月份会谈时签了新的会谈纪要，下次再谈时要前进一步。具体时间再定。

以上这些意见，请你们向李鹏同志报告一下，征求他的意见，然后再定。

三月二十六日，赵紫阳对核反应堆安全标准作了批示：关于反应堆安全标准问题是否变动太大，宜慎重。一则国外安全标准也在向高靠挂，再者，如变动过大，可能造成与联邦德国合作设计的困难。可论证时研究一下。

维护世界和平是各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这个集会，是我国人民为响应联合国关于开展国际和平年活动的倡议而举行的。它表达了中国各族人民深切的和平愿望和同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团结、维护和平的决心。我预祝联合国倡导的这一活动在世界各地都能取得圆满成功。

在本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蒙受过惨重的牺牲。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的四十年来，世界虽然没有发生新的大战，但是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告诉人们，战争危险并没有消失。世界能不能在和平中安然度过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并争取在二十一世纪得到更加持久的和平，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

中国需要和平，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和平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只有进行和平建设才能繁荣昌盛。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经济上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有待于几代人的持续的努力。我们不但需要本世纪的和平，也需要下一个世纪的和平。中国又是一个拥有将近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它在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进行的努力，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会在世界范围里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意识到历史赋予的这一重任，愿意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中国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我们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不断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我们积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和友好合作。我们决不同任何超级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我们反对对任何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和进行武力威胁，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国际争端。无论世界局势如何演变，我们将坚持不渝地执行这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对外政策。

当前，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引起各国人民的不安。裁军的方案和建议虽然数不胜数，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产生安全感，因为裁军是不能靠言词而要靠行动来实现。

中国反对军备竞赛，决不参加军备竞赛。我国的军费开支和军备水平虽然远远低于其他大国，我们还是不断主张采取措施，压缩军费。中国拥有一支有限的核力量，完全是为了防御的目的。从中国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明确承担义务，在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

同志们，朋友们，现在世界上都在议论裁军问题，我愿意借此机会概括地阐明中国政府在裁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一、核军备竞赛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核裁军的最终目标应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二、美苏两国拥有最大的核武库，理应率先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大幅度地削减并就地销毁各自在其国外任何地区的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这样，就有可能为召开由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核裁军国际会议创造积极的条件，以商议进一步核裁军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步骤。

三、为了防止爆发核战争，所有核国家都应当承担在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在这个基础上缔结一项由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国际公约，确保禁止使用核武器。

四、苏美部署在欧亚两洲的中程核导弹应当同时均衡地裁减和就地销毁。

五、在核裁军的同时，应当大幅度地进行常规军备的裁减。各国的常规军备应该只用于自卫防御，而不能用来威胁他国安全。

六、外层空间应当专门用于和平目的，以造福全人类。任何国家都不应以任何方式发展、试验和部署外空武器。应尽快谈判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外空武器的国际协定。

七、早日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在此之前，所有具有制造化学武器能力的国家应当保证绝不使用化学武器并停止试验、生产、转让和部署这种武器。

八、为了确保裁军的实施，裁军协议必须规定必要的、有效的核查措施。

九、裁军问题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安全利益，不能由少数大国包办垄断，它们之间的裁军协议不得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世界各国，无论国家大小或军力强弱，都应享有参与讨论和解决有关裁军问题的平等权利。

中国政府关于裁军问题的上述立场和主张，考虑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有关各方的立场。我们支持一切真正有利于裁军的建议，并且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为推动裁军取得真正的进展而继续努力。

当然，裁军问题不是有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唯一问题。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侵犯一个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就是危害世界和平。中国政府重申，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消除地区冲突，在国际关系中应当严格遵循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这样，才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同志们，朋友们，维护世界和平是各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和神圣职责。人类的

命运应当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和平因素的增长正在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只要全世界人民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够赢得和平。

谢谢大家。

关于制定“八六三计划”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召集宋平、宋健、伍绍祖[1]、马洪等讨论如何制定中国高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时的讲话。这个计划始于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对王大琦、王淦昌等四位科学家建议的批示，后来根据赵紫阳的提议，被命名为“八六三计划”。

今天就如何制定中国高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计划的设想

到本世纪末，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主要是两大部分：一部分属于科技进步概念范围的，主要包括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和应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这都是属于直接面向经济建设，是为本世纪末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两番服务的；另一部分还必须要有一个从“七五”计划就开始，一直到本世纪末，即十五年的高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这一部分主要是跟踪性的，是跟踪世界上高技术的发展并争取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这后一部分是为下一个世纪服务的。科学技术也有一个后劲问题，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很有影响。过去我们有了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成了所谓五大国核能俱乐部的成员，这后一部分叫个什么名字，你们可研究，比如说可以不可以叫“七五”到二○○○年中国高技术研究和开发计划，将来也可以叫做“八六三计划”，因为这是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批示的。当然你们还可以研究。

二、计划的内容

我考虑主要有三个方面，想得不一定完善。

（一）空间武器方面要有一点对付的手段。专家们说，我们要“有一点”。我想总要有一点对付的手段。当然，我们不能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那样的话，将会牵扯我们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最近，中央书记处研究了苏共二十七大的内容，会议决议有很多好的想法，但很大一个问题是他们军费负担太大。能否如愿实现，有很大困难。我们不参加军备竞赛，但要多少有一点对付空间武

器的手段。具体搞什么，你们可以研究。我们可以不可以设想到二○○○年能够用定向能武器打下飞机，搞一个小型空间站等等。我们主要意图不在这儿，而是通过武器方面的跟踪，促进我国高技术的发展。美国总统里根可能相信通过搞星球大战计划真能保障安全，但为他们出主意的人们主要是想通过这项计划来带动高技术。我们的目的第一位的是带动高技术的发展。其次，有一点对付空间武器的手段，在这方面有点发言权。保持大国的地位也是重要的。

（二）我赞成把生物工程突出一下。生物工程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对农业、医学、食品等关系很大，在这方面要多下点力气好好抓一下。还有新材料也可以放到计划内。

（三）其它高技术领域也要进行必要的、可能的跟踪研究。概括地说，第一方面军用，第二方面民用，民用也要争取有所突破。

三、基本工作方法

你们好好想一下，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组织制定和实施这个计划。上次会上，你们讲要用带动办法。张劲夫同志讲“以任务带学科”，选择什么作为带头的东西很重要。譬如，用航天、定向能来带动一部分。生物工程是个很大的领域。用什么来作为带头的也要具体化。要抓带头的目标和任务，用“一条龙”的办法，把相关方面都带动起来。要有明确任务带头产品，以它为主组织有关力量，绝不能按一般学科、部门或研究所来切块。要搞横的，不要搞纵的，以任务来搞横的联合。要按目标、任务力量来组织，这是一个基本方法。否则钱花得很多，效果不一定大。我过去有一个比喻，用伞形辐射，一把雨伞端部，称作“枢纽”，然后辐射到若干方面。要有一个总目标，然后层层分解，最后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人。一定要打破部门界限，任务分解后要有一个评议机构，把任务落实到科研机构和有水平的科研人员，要给他们机会。这样既可以提高他们的水平，也能够培育新生力量。

四、拨款制度要改变

要特别重视拨款制度。要想避免低水平重复，避免很多人等着用这笔钱，关键是拨款制度。要避免一哄而起，大家都争着抢着挤进来，同时也要注意把真正有水平的人员和机构组织到这个计划中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根本办法，是改变拨款制度。如按部门切块拨款，肯定是低水平重复。如按目标任务拨款就会好得多，有水平的就拨，没水平的就不拨。我们要重视发挥优秀人才的作用，这个计划也是智力投资。他们自己工作稳定了，还可以培养后继人才，这是个知识库。搞好了，对我国中长期发展意义很大。

五、组织领导

大体可以采用你们的意见（指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整理的几个部委的意见）。这项工作总的由科技领导小组来抓，在小组下面搞个协调机构，科委来一两个人，科工委来一两个人，还有其它单位的。将来计划的执行、督促、检查，还是各部门来抓。主要是两个口子：一是科工委这个口子；一个是科委这个口子，但要注意把科学院、学校的力量组织进来。你们要把有实力的单位和优秀人才的单子开出来。当然，开进单子的不等于将来就一定给任务，还要招标、评标。

你们要花多少钱？这个账再算算。你们上次提的那个数，我看问题不大。到本世纪末，能搞起来就不错了，把量入为出和量出为人两者结合起来。

目前，不少科研单位处于任务吃不饱的状况，在他们知道国家要搞高技术时，有可能一拥而上，甚至有些已转向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人，也会再转回来。但执行这项计划只能是精干的队伍，只能用精华来干这件事，实际上只能用少数力量。大部分科技力量，无论是军口，还是民口，都要毫不犹豫地转向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要面向当前，面向生产。

我再强调一下，搞好这个计划，一是抓好目标选择；二是改变拨款制度。总的原则是要让那些确有水平的机构和人员参加进来，而不是另起炉灶，铺摊子，或者按部门、按单位分钱。

实现这个计划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有利于巩固提高现有科技人员的水平，不然这支队伍可能会散掉。我们要有一支高水平的科技队伍，使他们不断、不散。如果50岁、60岁的人没事干，那么30岁、40岁的人也就成长不起来了。

今天我说的不是什么具体计划，是个意图，是个方针性的原则问题，你们可根据这些再充实一下，整理出若干条。下个月初专家定了之后，我可以见见他们，当面再谈一谈。

注 释

1．伍绍祖（1939—2012），湖南来阳人。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政委。曾任全国学联主席，国家体委主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

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请审议。

早在一九八三年，国务院就着手进行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〇年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拟定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和预测。一九八五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七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一系列适应新形势的方针政策。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对计划安排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反复进行综合平衡和各种计算，同时征求了各部门、各地方的意见。经过三年多的工作，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已制定完毕，现提请大会审议。下面，我先报告一下“六五”计划的执行情况，因为这是制定“七五”计划的重要依据。然后，再就“七五”时期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建设方针，这个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作若干必要的说明。

一、“六五”计划执行情况的回顾

经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要求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的五年中，“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五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上述要求已经圆满实现。“六五”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国内外贸易、教育科学文化、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任务和指标，绝大部分都已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全国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成就和变化，无论同建国以来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情况相比，还是同世界各国同期的情况相比，都是很突出的。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其中工业总

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二（包括村办工业），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一（不包括村办工业）；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相当于“一五”时期，高于其它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也高于世界许多国家同期的增长速度。特别是这五年我国农业发展十分迅速，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我国农业总产值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年的二十八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五，其中增长较快的“一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五，“五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一，而“六五”时期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比这两个时期都高得多。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的迅速发展，为我国整个经济的全面稳定增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若干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六五”时期同“五五”时期相比，我国粮食的年平均产量由三亿零五百三十万吨增加到三亿七千零六十二万吨，棉花由二百二十四万吨增加到四百三十二万吨，猪牛羊肉由九百三十七万吨增加到一千四百六十二万吨。从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五年，我国原煤产量由六点二亿吨增加到八点五亿吨，原油由一点零六亿吨增加到一点二五亿吨，发电量由三千亿度增加到四千零七十三亿度，钢由三千七百万吨增加到四千六百六十六万吨。我国有十亿多人口，目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人均产量还相当低，但由于前五年上述各项产品的产量都大幅度增长，它们的总产量不仅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而且在世界上所占的位次也大都提前了。这标志着我国总的经济实力有了显著的增强。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了重大成就。“六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五千三百亿元，新增固定资产三千八百八十亿元。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四百九十六个，其中能源、交通项目一百零三个。五年内新增发电装机容量一千九百五十万千瓦，采煤能力八千万吨，原油开采能力五千万吨，铁路通车里程一千五百公里、复线里程一千五百公里、电气化里程二千四百公里，港口深水泊位吞吐能力一亿吨。现有企业更新改造的步伐加快，共建成投产项目二十多万个，一些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机械行业和电子行业达到国际上比较先进水平的产品品种，在过去的五年中有了成倍的增加。这些不仅促进了“六五”期间的经济稳定增长，而且为“七五”时期和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财政收入由下降转为上升，后三年出现了大幅度稳定增长的可喜形势。“五五”末期，国家财政出现较大的赤字，一九七九和一九八○两年合计近三百亿元。“六五”期间，通过调整和改革，生产发展，流通扩大，效益提高，收入增加。一九八三年国内财政收入增加一百二十七亿元，一九八四年增加二百五十五亿元，一九八五年增加三百六十二亿元，全年总收入达到一千八百二十九亿元，实现了收支平衡。在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收入增加最多的是“五五”时期，一九八○年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二百二十六亿元，而“六五”期间的增加额大大超过“五五”时期，一九八五年比一九八○年增加七百八十六亿元。在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预算外资金也大幅度增加，一九八五年达到一千四

百三十亿元，预算内和预算外两项资金合计比一九八○年增加了一倍。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重新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六五”期间，国家财政用于这些方面的经费共为一千一百七十二亿元，比“五五”时期的五百七十七亿元增长一倍。这五年共取得重要科研成果三点三万项，有九百三十七项获得国家科技发明奖，其中一部分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取得了显著效果。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由一九八○年的一百一十四万人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一百七十万人。中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开始取得成效，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很快，普及初等教育的工作有了进展，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在全国展开。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各项文化事业和卫生、体育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打开了新局面，对外开放的广度或深度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六五”期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合计达到二千三百亿美元，比“五五”时期翻了一番，在世界上所占的位次明显提高。一九八五年同一九八○年相比，国家外汇储备有了增加。全国通过各种形式使用国外贷款一百零三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五十三亿美元，在各地建立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五年间全国共引进国外技术一万多项，其中有一部分是具有国际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水平的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通过引进技术和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使许多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此外，我们还在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旅游业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改善幅度之大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五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七，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九。五年合计在城镇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到三千五百多万人。二是，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迅速提高，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人民吃得比过去好了，衣着向多样化发展，耐用消费品特别是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销售量大幅度增加。三是，人民的居住条件有了改善。“六五”期间，城镇住宅竣工面积达六点三亿多平方米，农村新建住房三十二亿平方米。四是，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一九八五年末达到一千六百二十三亿元，比一九八○年末增长三倍。

上述成就和变化，使得我们长期希望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一些经济问题，在“六五”期间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过去我国农业发展缓慢，粮食产量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八年间平均每年只增长五百多万吨，棉花产量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八年间长期停滞不前，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逐步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终于较快地实现粮食自给，棉花自给有余，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情。过去我国城乡市场的商品供应，除五十年代前期比较宽松以

外，一般都比较紧张，许多商品不得不采取定量分配、凭票供应的办法，有些时期有些地方票证多达几十种，排队购货现象十分普遍。“六五”期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消费品货源比较充足，全国除粮、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过去我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长期严重失调，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六五”期间，经过调整和改革，提高了农业和轻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明确了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积累率在一九七八年高达百分之三十六点五，“六五”期间五年平均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重大经济比例关系的改善，对于促进和保证我国经济持久的健康发展，已经起了并将继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六五”期间取得的各项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定不移地把全部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并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各项政策，这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重要前提。就经济工作来说，“六五”期间实行了以下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转变，这也是取得各项成就的根本原因。

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战略上，从片面追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值产量的增长，开始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农轻重协调发展，注重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在制定“六五”计划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高积累、高速度、低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的状况，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并且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十项经济建设方针。编制经济发展计划，既强调挖掘潜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强调要根据国力的可能和留有适当余地，注意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在国民经济内部，坚持把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加快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合理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并且使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大体协调，促进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把经济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互相促进，使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好形势。

在经济体制上，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僵化体制，开始转向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重大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以及其它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城市的改革，紧紧围绕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在计划、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使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逐渐增强，社会主

义市场不断扩大，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显著发展，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系日益加强，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有利于搞活经济的许多变化，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经过“六五”期间的实践，特别是经过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这一年多来的实践，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轮廓越来越明晰了，路子越来越清楚了。

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从封闭半封闭开始转向积极利用国际交换的开放型经济。我们冲破了“左”的思想和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的束缚，克服了把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在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正确地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可以取别人之长补我之短，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但不会妨碍而且只会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以及在这些转变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说明我们正在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向前迈进。总的来看，对于怎样根据我国的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不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我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认识正在日益明确和深化，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正在日益配套和完善，各方面的实践经验正在不断积累和提高。回顾“六五”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没有料到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越来越相信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对祖国的光辉前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一切，是我国人民已经取得并将长久起作用的巨大精神财富。

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在实行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中对规律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都要有一个过程，工作上还存在某些缺点和失误，前进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我们前几年虽然注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但对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有时还是注意不够；在处理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对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产品质量还缺乏有力的措施和有效的监督；在着重增强企业活力的时候，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的措施未能及时跟上；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在某些时候也有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的情况。特别是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以后，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一度出现追求超高速现象，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进口控制不严，经济生活中产生了某些不稳定因素。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过去年一年的工作，有的问题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总的来看经济环境正在从紧张向宽松转化，但对目前经济工作中仍然存在的许多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搞好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努力巩固和发展当前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好形势。

二、“七五”时期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建设方针

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进一步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继续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基本方针，以奋发进取的精神和扎实稳妥的步骤，促使我国经济走上充满生机和活力、富有效率和效益的良性循环轨道。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以及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提出的基本任务是：

（一）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二）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九十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

（三）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

上述三项任务，是相互联系、紧密结合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项任务。综合考虑这些任务的要求，“七五”计划草案规定，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四十四。按一九八○年不变价格计算，一九九〇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一万六千七百七十亿元，比一九八○年增长一点三倍；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亿元，比一九八○年增长一点六倍。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五年为八千九百六十亿元，比“六五”期间增长近百分之七十。改建扩建和新建一批重点骨干工程，改造一批重点企业，使能源、原材料的生产能力和运输、通信能力有较显著的增长，现有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有较明显的提高。推广一批效益好的科技成果，在若干具有关键意义的新技术攻关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争取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主要工业产品在性能和质量上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的水平。逐步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通过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教育五年共培养近五百万高级专门人才，比“六五”期间增长一倍。进出口贸易总额一九九〇年比一九八五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并相应地扩大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规模。城乡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五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七左右，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在这五年内，将继续保持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将使我们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有力的新步伐。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国务院在拟定计划草案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方面着重考虑和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确定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高效益地向前发展。

根据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和综合各种生产条件的可能，“七五”计划草案规定，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七，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包括村办工业为百分之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五（不包括村办工业为百分之七）；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五。

这个增长速度比“六五”期间实际达到的速度低一些。我们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主要是考虑了经济生活中各种内在因素的变化和要求。今后农业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需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要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突变，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的增长速度。就工业来说，“六五”后两年的过快增长，主要是受过大的投资需求所刺激，靠大量进口原材料来支撑的。这种情况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同时，目前能源、原材料供应仍然很紧张，交通运输能力严重不足，适当控制加工工业的过快增长，有利于协调能源、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协调生产和运输的比例关系，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是我国经济的致命弱点。“七五”期间对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提出适度的要求，有利于把各个方面的注意力进一步引导到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上来。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需要有一个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而国内外的实践都反复证明，只有经济的适度增长，才能避免经济关系过分紧张，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七五”计划草案规定的经济增长率是积极的，也是留有余地的，在执行中有可能超过。在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上，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当然要在提高效益和质量的前提下努力争取有一个持续的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也决不能认为速度越高越好，更不能盲目追求高指标和层层加码。看不到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社会生产蕴藏的巨大潜力，把经济增长速度订得过低，就会影响生产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妨碍经济的健康成长和社会需求的满足。无论是国力的增强还是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求有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视这一点是不对的。同时也要看到，脱离现实条件的可能，盲目追求过高的速度，即使一时上去了，也难以持久，最终还要掉下来。增长速度上的大起大落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极大，这种危害往往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消除。历史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只有认真地从需要和可能两个方面考虑问题，瞻前顾后，保持适当的增长率，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使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得到可靠的保证。

（二）规定恰当的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努力提高投资效益。这是“七五”计划的关键性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七五”期间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也关系到九十年代以至更长时期经济发展的后续能力。经过多方测算和对财力物力的反复平衡，“七五”计划草案规定，五年内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为五千亿元，比“六五”期间增加百分之四十九；更新改造投资二千七百六十亿元，比“六五”期间增加百分之八十七。考虑到“六五”后期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猛，“七五”前两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大体维持在一九八五年的水平，后三年再适当增加一些，但也不能增加太多。

投资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是保证经济稳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客观规律。无视这个规律，把投资规模搞得过大，必然造成重大比例严重失调，使经济发展走弯路，延缓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应当看到，前两年出现的投资过分膨胀的势头，经

过大量的工作有所缓解，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许多地方和单位仍然在盲目地上项目、铺摊子，使投资规模潜伏着继续膨胀的危险。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经过多年努力开创的好形势就有可能重新遭到破坏，已经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下去，为九十年代经济持续发展准备物质技术条件的任务也会落空。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统一思想认识，从上到下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务必把“七五”期间的投资规模控制在国力所允许的水平上。

当前，不但投资规模偏大，投资结构也不合理。主要表现是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投资比重偏低，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偏高；更新改造投资不足，而相当一部分更新改造投资又被用于基本建设。不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其结果要么是投资总规模控制不住，要么是经济的发展缺乏后劲。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过度扩展，势必加重对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压力，要求对这些方面追加更多的投资，导致整个投资规模日益膨胀。同时，一般加工工业大量发展，而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由于资金不足得不到应有的加强，骨干企业的技术面貌又不能较快的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就会缺乏强大的基础和支撑。所以，能不能恰当地控制住投资总规模，能不能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关键在于合理调整投资结构。“七五”期间调整投资结构的方向是：一、继续增加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投资，适当增加农业、科学、教育事业的投资，相应压缩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二、适当控制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增长，使同样多的投资规模形成更多的生产能力和事业发展能力。除必要的旅游设施之外，楼堂馆所的建设要严加控制。住宅建设也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稳步进行。城市市政建设要把重点放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基础设施上，其它方面只能在有余力的条件下适当进行，形式主义的东西坚决不要搞。三、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提高更新改造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四、在投资的地区分布上，要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带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资源条件，确定不同的投资重点和恰当的投资比例，使东部地带的发展和中部地带以及西部地带的开发更好地结合起来。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要落实到正确确定建设项目上。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建设项目过多，建设周期长，投资效益差。“七五”期间，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争投资、铺摊子，长期不能竣工投产的状况，增强时间观念、利息观念和资金周转观念，坚决按合理工期组织施工。这是缩短建设周期、提高投资效益的核心问题。从“七五”计划开始，新上的大中型项目所需的资金、材料、设备必须落实，然后才能列入开工计划，并按合理工期分年拨足物资和资金，否则只能作为预备项目。在建的大中型项目也要认真清理，进行排队和调整，争取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步做到按合理工期组织施工。

为了控制投资规模和调整投资结构，最重要的是必须改革固定资产投资的决策体系和管理体制。要研究和制定科学的系统的投资管理和调控制度，并逐步加以实施，要统一计划、综合平衡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正确划分中央、地

方和企业的投资范围，并注重采取经济手段把不同主体的投资兴趣引导到宏观经济要求的目标上来。与此同时，要完善投资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在项目决策、勘探设计、施工组织和设备供应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推行和完善全面的招标投标体系。这样，我国基本建设的面貌才会有一个大的改观，投资效益才会有一个明显的进步。

（三）坚持把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更好地发展科学、教育事业。

“七五”计划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使我国经济的成长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是抓好两头。一头是大力开发和普遍推广效益好、见效快的科技成果，积极帮助广大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加速实现技术进步。这是密切科技和生产的结合，使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另一头是真正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提出的关键性技术课题，认真开展科技攻关，同时争取在新技术和高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开发中取得较大的成果，大力采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并继续加强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必须强调，努力掌握当代的新技术和高技术，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长远意义。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支有较高水平的科技攻关队伍，今后应当继续培养新的优秀人才，壮大和提高这支队伍，为跟踪和接近世界高技术的发展水平而奋斗，力求在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核技术、新材料和现代自动化生产技术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为国民经济转向新的技术基础创造条件。我们希望并且相信，过去为建设祖国已经奉献出巨大心血的广大科技工作者，一定能够在进一步攀登科学高峰、使科学技术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伟大事业中，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国经济建设中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有赖于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我国经济的发展能不能具有强大的后劲，最深厚的源泉也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世界新技术革命正在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转到发展科学技术上，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正确的对策很好地把握这个时机和迎接这场挑战，那么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不仅不能缩小而且会扩大，在经济上技术上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任务就越来越艰巨。当然，摆在我们面前的科学技术课题很多，不是一个五年计划能够解决的，需要作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当前最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普遍树立起重视科技进步的战略观点，使各个方面都有一种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的紧迫感。要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即生产、建设、流通和各项经济事业的发展，都要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要进一步面向经济建设，通过技术有偿转让以及共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进行技术改造等形式，发展同生产单位的横向联合，形成新型的科研和生产的经济联合体。这样做将有效地克服地区分割、部门所有的弊端，改变长期以来科研和生产相互脱节的状况，有利于经济和科技的协调发展。要认真贯彻执行专利法，保护发明权，进一步调动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发明创造的积极性。我们还要继续贯彻执行军用和民用相结合的方

针，把国防科技成果更加普遍、更加有效地运用到经济建设中去。

科技进步以至整个四化建设，都离不开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的发展。重视教育是我们坚定不移的长远战略。必须切实加强基础教育，积极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继续整顿和提高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逐步建立和完善对科技人员进行继续教育的制度。五年内，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事业费一千一百六十六亿元，比“六五”期间增长百分之七十二，超过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此外，各级地方政府还应该拿出较多的财力用于发展教育。同时要广泛动员、鼓励和指导企业、集体和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努力举办多种形式的教育事业。

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要在适应四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合理调整教育结构的同时，特别注意提高教育质量。近几年，有些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专科院校不合理地升格，有些学校不顾办学条件和教学能力过多地扩大招生规模，有些成人教育单纯追求学历和文凭，这些问题必须认真解决。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方针，并根据各自的特点适当加强劳动教育，坚持把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放在首位，在这个基础上因地制宜地、稳步地发展数量。要加强教育事业的管理，逐步建立系统的教育评价和监督制度。加强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大力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提高教材质量。认真办好各级师范教育和加强教师的培训，逐步建设一支在质量、数量和结构上基本适应需要的稳定的教师队伍，特别是中小学的教师队伍。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为教师在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

为了促进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两个决定，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把这方面的改革不断推向前进，争取在“七五”期间取得有决定性意义的成就。

（四）以增强出口创汇能力为中心，推动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我国“六五”期间在实行对外开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应该看到，就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潜力来说，这方面已经迈出的步子还很不够。前几年在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地区、部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多头对外，盲目竞争，重复引进，过多地进口一些高档消费品。对于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切实加强和改善管理，认真加以解决，但决不能因此而对开放政策产生疑虑。“七五”期间，必须以更大的力量，扩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规模，同时积极发展旅游业，兴办国际空运、海运、保险、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事业。

努力增加出口，创造更多的外汇，是更大规模扩展对外经济贸易与技术交流的基础和关键。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外汇短缺在相当长时间里都将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出口贸易是我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的出口创汇能力，决定着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的范围和程度，制约着国内经济

建设的规模和进程，是关系对外开放前途的重大战略问题。把出口搞上去，我们的经济发展在全局上的回旋余地就更大了。

要扩大外贸出口，创造更多的外汇，最根本的是要采取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和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战略。一是要坚持把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放在首位，逐步建立健全在国外的推销系统和服务网络，努力做到质量稳定，服务周到，讲究信誉，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二是要努力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逐步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制成品转变，由主要出口粗加工制成品向主要出口精加工制成品转变，提高轻纺出口产品的质量，增加新型食品和机电产品的出口。三是要进一步改善出口产品的生产布局，在沿海地区和其它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各种不同类型、各有特色的出口商品基地和出口专厂，逐步形成完善的出口生产体系。这是提高出口经济效益、增强出口商品竞争能力的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措施。外贸部门要同有关地区和部门紧密配合，对此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四是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在继续巩固和发展已有市场的同时，进一步面向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做到出口市场多元化。当前我国许多产品外销不如内销盈利多，严重影响出口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对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从多方面给以鼓励和支持，使出口创汇多的企业和职工得到应得的实际利益。总之，各部门、各地区都要把增强出口创汇能力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花大力气抓紧抓好，抓出显著成效。所有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也要把扩大出口、多创外汇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面向国际市场，努力开发更多的具有竞争能力的出口产品。特别是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在出口创汇方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特区要朝着建立外向型经济的目标前进。

认真总结前几年的经验，切实改进进口工作，对于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根据有利于促进国内技术进步，提高出口创汇能力和节约使用外汇的原则，合理调整进口商品结构，坚持把重点放在引进软件、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上，严格控制一般的加工设备和耐用消费品的进口。对国内有条件生产的产品，要积极搞好并立足于国内生产；对进口国外散件、零部件进行加工装配的生产线，要严格审查，限制进口和避免重复进口。要积极发展进口替代，努力提高国产化水平。一切浪费国家外汇的行为，都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在增加出口创汇、提高偿还能力和吸收能力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形式适当扩大利用国外资金的规模，重点用于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特别是电力、港口、石油等方面的建设，以及机械电子等行业的技术改造；用于发展出口产品和实行进口替代，以增加外汇收入和节约使用外汇。要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利用外资的政策、法律和法规，正确掌握外资的使用方向，大力提高经济效益。

前几年，我们对于外贸体制进行了一些初步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很不适应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的需要。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首先应着重于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和管理体系，注意运用汇率、关税、税收、出口信贷等经济手段，同时辅之以加强进出口许可证和配额管理等行政手段，合理调节进出口贸易。随着宏观管理体系的逐步完善，进一步调动地方、部门增加出口的积极

性，扩大出口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发展外贸企业同生产企业的直接联合，更好地实行产销结合、工贸结合、技贸结合的原则，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五）按照兼顾生产建设和生活消费的原则，恰当地确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幅度。

“七五”期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要继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根据到本世纪末全国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和今后五年生产发展的可能，计划草案规定，全国农民的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左右，加上就业人口的增加，城市居民的年平均收入的增长率将高于这个数字。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加，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将进一步提高，消费结构进一步改善，消费内容日趋丰富多彩。计划草案安排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幅度，基本上与同期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同步。

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政策，使生产建设和生活改善相互协调地前进。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片面强调生产建设，忽视人民生活，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也使生产建设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坚决地纠正了这种偏向，今后也仍然要注意避免这种毛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时候都要十分重视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也要注意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量力而行。我国有十亿多人口，每年城镇有几百万人需要就业，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我国现在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创业时期，各方面的建设都需要积累资金。在这样的经济成长阶段，如果生活消费的步子迈得过大，势必减少资金积累，提高生产成本，降低产品竞争能力，造成经济的发展缺乏后劲。因此，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依靠努力发展生产，不能挤占必要的建设资金。生活消费的增长速度不能高于生产发展的速度，职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在社会分配方面，要继续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着重克服平均主义，同时要防止企业间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不合理的过分悬殊，并运用税收杠杆适当调节各类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以保障社会的安定团结和更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目前在工资福利上存在着的互相攀比、滥发现金和实物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必须严格控制。

在恰当确定生活消费增长速度的同时，还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有计划地引导居民消费需求的方向，使消费结构的变化符合我国社会性质、资源条件和民族特点。我国人口众多，相对来说耕地和草地比较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民食物结构的改善不可能很快，只能逐步增加肉、禽、蛋等动物性食物的消费；衣着方面要提倡多穿棉织品和化纤混纺织物，纯毛制品和皮革制品只能适当增加。由于电力供应紧张将是长期的，家用电器的消费只能适度增加，尤其要

注意控制耗电高的空调器、冷热机等的生产和进口。人民的居住条件当然还要不断改善，但住房面积和建筑标准也不宜过高。总之，国家要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杠杆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人民的消费结构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各位代表！

以上讲的五个问题，贯穿着一个总的精神，就是要加强和改善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以保证我国经济进一步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保证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各地方、各部门都要从大局出发，严格遵守和坚决执行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不断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我们要继续抓紧粮食生产，努力保证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目前有的地方滥占耕地和部分农民种粮积极性有所下降的情况，必须引起各方面的充分重视，并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加以改变。要在保证粮食稳定增产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改善农村产业结构，促进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和乡镇企业的全面发展。为了加快农业的发展，一要继续执行正确的农村政策，深入进行农村改革，进一步活跃农村商品经济，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二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开发研究和推广应用，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科技人员到农村去，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水平。在这两方面，我国农业的发展还有着巨大的潜力。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都要逐步增加对农业的物质投入，尤其是地方要把更多的财力用于支持农业，加强农村建设。为了扶持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和贫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七五”计划草案中对这些地区增加了资金、物资和技术的支持，在计划执行中还要根据国力增强的情况适当予以增加。特别重要的是，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着重增强上述地区自身的活力，同时促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同它们之间的协作与联合，使它们能够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较快地摆脱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此外，计划草案还对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以及对人口控制、社会保障和环境治理等方面，都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作了适当的安排。在今后的五年中，我们一定要继续按照经济建设要同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方针，切实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

三、“七五”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各项建设方针，圆满实现“七五”期间的建设任务，关键在于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充分调动广大企业和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当前，更重要的是对于九十年代的经济振兴和繁荣，对于本世纪末宏伟目标的全面实现，以至对于下个世纪前五十年在经济上、技术上接近和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所有的地方、部门和企业，都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争取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七五”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概括起来说，主要的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继续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包括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减免调节税，提高折旧率；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革企业的工资奖励制度和劳动制度等，以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使企业真正具有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完善企业的行为机制，加强企业的自我约束。到“七五”期末，除极少数企业外，绝大多数都要实行自负盈亏。对长期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要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进行改组和关停并转。特别要按照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大力促进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合，逐步形成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企业群体或企业集团，以促进企业结构的合理化，推动资源合理开发、资金技术合理使用和生产力的合理配置。要通过发展横向联合，进一步推动整个改革不断前进。要排除横向联合的障碍，合理规定联合各方的权益，从政策上支持和从立法上保证企业间各种联合的健康发展。

（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要继续减少国家统一分配调拨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完善农副产品合同定购制度，积极发展跨地区、跨部门的商品流通，逐步建立农工商结合、农商结合、工商结合或商商结合的新商业形式，不断扩大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与此同时，有步骤地开拓和建立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和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关键在于进一步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七五”期间，价格改革的重点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计划价格偏低的问题，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这两种价格的水平逐步趋于接近。要结合工资调整，研究、确定合理的房租和住房销售价格，以利于逐步推行住宅商品化。要逐步合理调整劳务收费标准，以利于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经过改革，逐步建立起对极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由国家定价，其它大量商品和劳务分别实行国家指导价格和市场调节价格的制度，较好地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在改革价格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坚持稳步前进、放调结合的原则，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三）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七五”期间，要逐步完善各种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的运行。国家计划是从宏观上引导和控制国家经济正确发展的主要依据。要进一步改革计划体制，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比重，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把计划工作的重点逐步转到主要运用经济政策和价格、税收、信贷、利率、汇率、工资等经济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全面管理与调节的轨道上来。要特别加强银行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职能，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既强有力又灵活自如的金融控制和调节体

系，充分发挥金融系统筹集融通资金、引导资金流向、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和调节社会需求的作用。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制度，按照税种划分中央、地方的财政收入，明确中央、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逐步实行宏观经济控制的分层次管理，提高地方特别是中等以上城市对搞好宏观管理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在进行上述各项改革的时候，必须十分注意加强经济信息和决策咨询系统，建立健全各项经济法规和经济司法工作，充实加强各级经济检查监督机构，以保证各种经济活动沿着健康的轨道运行。

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是不可分割和缺一不可的。第一个方面的改革，目的是使企业拥有必要的自主权并正确地加以运用；第二个方面的改革，目的是使企业活力的发挥能有一个既有动力又有压力的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第三个方面的改革，目的是促使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能够更好地符合宏观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三个方面的改革必须配套进行，相辅相成，不能孤立地突出某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认真搞好这三个方面的改革，逐步形成一整套把计划与市场、微观搞活与宏观管理、集中与分散有机地、恰当地结合起来的机制，就能够更好地做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统一，做到经济发展速度、比例和效益的统一，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

由于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十分艰巨和复杂，改革的进行又不能不受到经济和社会条件以及干部条件的制约，上述三方面的改革不可能在“七五”期间全部完成，我们只要求在这个期间大体形成新的经济体制的框架，使经济的运行走上新体制的轨道。这个要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经过前几年的实践，我们已经确立了正确的改革目标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定的改革经验，只要继续把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做好工作，上述要求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为了完成“七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这里着重讲几个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认识问题。

（一）充分认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现代化，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决定了我们原来那种统得过死、管得过多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必须改革，也决定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必须符合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当然，我们所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就其总体来说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是有计划有控制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从深刻总结国内和国际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它把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深入

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各种途径，坚决变革一切不符合这种要求的思想观念和规章制度。目前，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落后于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还不善于对丰富的实践作出新的概括。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鼓励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大胆探索和开拓创新精神。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认真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总之，在整个改革中始终明确上述的基本认识，我们就能够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经过艰苦的实践和探索，真正建立起既区别于过去那种僵化半僵化的模式，又与资本主义模式有本质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二）充分认识新旧体制转换过程的艰巨胜和复杂性。

在我国的改革中，旧体制的消亡，新体制的形成，都只能是逐步的，都需要时间。改革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种体制同时并存，交互发生作用，新体制的因素在经济运行中日益增多，但还不能立即全部代替旧体制，旧体制的相当部分还不能不在一定的时间内继续存在和运用。这就决定了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问题和矛盾复杂纷呈的局面。由于新体制需要逐步成熟，旧体制又在许多方面失去效应，因此宏观控制的难度增加，微观机制一时也难以完全合理，管理上势必出现这样那样的真空或漏洞，某些不法分子就会利用这种情况进行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行贿诈骗、走私贩私等犯罪活动。由于改革的进行必然要触动和调整原有的经济利益关系，而新的利益关系的合理格局又不可能一下子形成，势必存在各种利害关系的摩擦和矛盾，出现种种机会不均的现象，有的单位和个人就会利用这种情况谋取小团体或个人的不正当利益，引起人们的不满。由于改革只能在探索中前进，经验只能在实践中逐步积累，工作中产生某些失误也就难以完全避免。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而又持久的大变革，它对固有模式、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在思想上对此也必然要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对改革中的问题有不同的认识，甚至议论纷纷，是很自然的历史现象。这种种情况，客观地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新旧体制转换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足够的认识，对改革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决不能因为出了点问题就惊惶失措，甚至因噎废食，放弃改革。另一方面，在各项改革的实际进行中，必须精心指导，周密规划，全力以赴，谨慎从事，认真试点，提高预见性，力求减少失误，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边实践边总结经验边前进。应该充分认识到，尽管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问题，但正是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改革，搞活了经济，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兴旺局面。这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是改革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标志。改革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的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改革中的问题，也只有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才能得到解决。

（三）充分认识改革中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必要性。

我们的改革能否顺利地推向前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否恰当。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就可以减少阻力，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否则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目的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阻碍，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在改革的过程中，随着生产的发展，应该也能够给广大群众带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前几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每项改革都会给每个社会成员立竿见影地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有许多改革的措施，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实践，才能发挥出它们的效益。有的改革措施，甚至需要一些地方、部门、企业和群众暂时牺牲某些经济利益，但它们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持久改善，将发挥重大的作用。希望我们的干部和群众都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自觉地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并使当前利益服从于长远利益。我们的改革必须合理确定地方、部门的权益，特别要扩大企业的权益，以便更好地调动它们的积极性，把经济搞活。但是，只有在坚决遵守和执行国家宏观经济决策，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权力才能得到正确运用，利益的实现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它们积极性的发挥也才不至于陷人盲目性。因此，一切地方、部门和企业都要自觉地树立全局观念，决不能用损害全局利益的手段去谋取自身的利益，而只能在有利于增进全局利益的条件下去讲求局部利益。

（四）充分认识改革的新形势对企业提出的严格要求。

经过前几年的改革，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初步改变统购包销、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局面，既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也加重了企业的责任。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自负盈亏的程度将不断提高，决不能只负盈不负亏，它们的责任也就必然要进一步加重。今后，在新经济体制的运行中，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职工物质利益的增进，将更加取决于企业自身管理水平的高低和经营的好坏，这对所有企业及其领导者都是严峻的考验。过去对这方面讲得不够，以至有些人把改革仅仅看作是给企业放权、减税、让利，这是一种误解。在全面改革的新形势下，所有企业都要增强质量观念和效益观念，增强适应市场和社会需要的观念，增强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多作贡献的观念，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水平，讲究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改善服务态度，增加经济效益。不然的话，就会落后于改革的形势，甚至被形势所淘汰。企业的领导者、经营者和全体职工，都要清醒地认识这种形势。希望我们企业的领导同志们都能自觉地掌握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坚决依靠党的组织和职工群众，为提高企业的素质而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希望我国工人阶级充分发挥高度的主人翁作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积极参加企业民主管理，广泛开展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活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充分认识政府机构转变管理职能和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性。

为了适应国家对企业的管理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的要求，政府

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也要相应地转变。各级政府的经济部门要改变过去那种把主要精力放在订指标、批项目、分资金、分物资上面的做法，逐步转到主要搞好统筹规划、掌握政策、组织协调、提供服务、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和加强检查监督方面来。随着管理职能的变化，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和经济检查监督机构要充实和加强，专业性管理部门要适当合并和精简。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和巩固其它各项经济改革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次重大变革。各级政府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必须充分认识这种变革的必要性和历史意义，自觉地适应这种变革，提高自己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经济知识和专业知识，深入基层，深人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提高科学决策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企业的自主权，认真做好为基层服务的各项工作。必须坚决清除官僚主义的陋习，克服种种扯皮现象，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努力提高工作效率。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漏洞，这就更加要求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要提高觉悟，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忠于职守，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六）充分认识加强法制对于改革的促进作用和保证作用。

为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要求把更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准则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法律成为调解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控制和调节经济的运行，是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促进改革的顺利进行，保证改革的健康发展，巩固改革的胜利成果。前几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经制定了一批重要法律，国务院也制定了一批必要的行政法规，今后还将抓紧各项立法工作特别是经济立法工作，力争在“七五”期间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逐步使各项经济活动都有法可依。现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依法办事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必须强调，法律一经颁布实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服从，决不能因为领导人的更替或注意力的转移而影响它们的贯彻执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自觉地接受广大人民群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同时在工作中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总之，“七五”期间的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积极探索、开拓前进的精神，同时在实践中深思熟虑、瞻前顾后，把工作做深做细，以保证改革的健康发展。

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是动员全国人民专心致志地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发展计划。为了这个计划的顺利实施和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必须继

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当前的国际局势依然是动荡而令人不安的。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对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美苏恢复对话，重开裁军谈判，是值得欢迎的。但是，世界人民期待于美苏双方的不是"和平"、"裁军"的言词，而是采取真正的有利于和平和裁军的实际行动。它们双方都应当放弃谋求军事优势，停止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干涉。中国人民对同自身安全直接攸关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严峻形势，特别是柬埔寨、阿富汗等"热点"问题，不能不尤为关切。我们一贯主张，外国军队应当全部撤出柬埔寨和阿富汗，让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条件下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由于超级大国的对抗和争夺，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对此应当保持必要的警惕。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受超级大国的任意摆布，积极采取各种行动，努力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广泛的不结盟运动，是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欧洲和日本，以及大洋洲等地区的发达国家，也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全世界人民都热切地希望和平。我们深信，通过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种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我们是乐观主义者。尽管道路曲折，世界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的对外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同世界各个地区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国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往与合作日益扩大，文化交流和其它方面的往来也不断增多。我们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同英国通过谈判圆满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把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提供了新的经验。我国在对外工作中坚持原则，注重信义，言行一致，光明磊落，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越来越高，朋友越来越多。可以说，我国对外工作已经打开了新的局面，正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

我国对外工作的进展，是同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卓有成效的体制改革和全面稳定发展的经济形势分不开的，也是同我们根据国际局势的客观变化及时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充实和完善分不开的。我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中国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

第二，中国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而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中国自己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

第三，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

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

第四，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中国坚持谋求的是，中美关系在严格遵守历次中美公报所规定的原则基础上稳定发展，中苏关系在采取实际行动消除三大障碍的过程中切实改善。

第五，中国信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努力在这个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同或不同作为占领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并且认为只有铲除产生这种活动的社会根源和政治根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第六，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中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谋求改善南北关系和发展南南合作的努力。中国殷切希望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团结，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反对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涉。

第七，中国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中国在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就提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并且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当前的首要问题是，两个超级大国应当率先实现大幅度裁减核军备，从而为所有核国家的核裁军创造条件。中国还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在进行核裁军的同时大幅度裁减常规军备。

第八，中国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开放政策面向全世界，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

第九，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中国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努力增进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第十，中国重视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各群众团体、民间组织和各界人士开展同各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新闻、卫生、体育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我国的内外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建设与和平，改革和开放，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有十亿多人口的大国，我们深知自己在国际上应尽的义务和担负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在国内和国际两条战线上继续努力，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

进，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各位代表！

第七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宏伟的，任务是艰巨的，经过努力也是能够实现的。它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现了令人鼓舞的光辉前景。完成了这个计划，我们就可以大体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关系，把经济体制基本纳入新的轨道，使我国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要进展，全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将进一步提高。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地促进九十年代经济的振兴和繁荣，更有把握地全面实现到本世纪末的伟大目标。

今年是实行“七五”计划的头一年。做好今年的改革和建设工作，使“七五”计划的实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今年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在改革方面，要认真做好一九八五年已经进行的各项改革的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工作，同时深入调查研究，拟定方案，争取为明后年迈出新的重要的改革步伐作好充分准备；在建设方面，要继续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努力改善供应，把各项生产和流通事业进一步搞活；要继续防止盲目扩大建设规模，同时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努力搞好重点建设和企业的技术改造；要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大力增加出口，节约使用外汇，实现外汇收支的基本平衡。根据这些要求，国务院已经拟定一九八六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请各位代表一并审议。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我们既定的长期战略方针。无论是一九八六年计划的执行，还是为了完满实现整个“七五”计划，都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工作是中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的保证。随着经济搞活和对外开放，人们开阔了视野，锻炼了才干，增长了许多符合现代文明的新知识、新观念，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的不健康的因素。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改革工作的内容，创造新的形式和方法，发挥更大的作用。放松或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就会走上邪路。我们必须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坚持对外开放，但同时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我们要继续发挥物质鼓励的作用，但也要反对“一切向钱看”、损公肥私的思想和行为。要通过大力表彰和宣传各条战线先进人物、先进单位的模范事迹，以及采取其它生动活泼的方式，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教育，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振奋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和献身精神。

思想文化工作部门及其广大工作人员，在建设精神文明中担负着特别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以及博物馆、图书馆、文化站等各项文化事业，在“七五”期间都将有新的发展。希望广大思想文化工作

者，都能够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联系群众，深入生活，勇于开拓创新，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以丰富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培育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生活情趣和健康的审美观念，激励人们满腔热情地献身四化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经济理论研究，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探索和解决改革和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努力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相信，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已经尽了很大努力的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一定能够在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宏伟事业中，为中华民族作出更大的成绩和贡献。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各级政府机关要作表率。我们各级政府机关的广大工作人员，努力为人民服务，积极投身改革，忘我工作，富有成效，主流是好的。但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性质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有的利用职权，违反规定，经商谋利；有的走私贩私，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有的利用公款游山玩水，滥派人员出国；有的官僚主义严重，失职渎职，使生产建设遭受重大损失等等。这些现象既损害了政府机关的威信，也败坏了社会风气，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义愤，必须坚决加以纠正。纠正不正之风，要由领导带头，从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做起，从各级负责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严格要求，以身作则。对于有缺点错误的干部，要批评教育；对于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必须追究责任；对于严重玩忽职守构成渎职罪，参与经济犯罪和其它犯罪，或者徇私枉法、庇护罪犯的，必须依法惩办。不合法的经济收入一定要没收。要切实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认识到抵制和纠正不正之风，清除腐败现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思想残余作斗争的一项重要的长期任务，也是对每一个干部的新的考验。必须树立起扶正压邪的风气，表扬和鼓励那些坚决抵制不正之风的好干部，坚决支持那些敢于坚持原则、秉公执法的好同志。对于一切打击报复、诬告陷害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我们要力争纠正不正之风迅速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坚决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推动整个社会风气尽快实现根本好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公安干警，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者。“六五”期间，人民解放军在英勇地保卫着祖国安全的同时，胸怀大局，精简整编，加强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广大公安干警为维护社会治安，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希望人民解放军和公安干警在“七五”期间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为保卫和建设祖国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体现着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它的顺利实施必将有力地推动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七五”期间，我们一定要继续按照“一个

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同台湾同胞以及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炎黄子孙一道，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为和平统一祖国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公安干警，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劳动者和爱国者，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艰苦创业的愚公移山精神，为胜利完成第七个五年计划而共同奋斗！

视察秦山核电站时的谈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秦山二期三期工程可安装四台60万千瓦核电机组，若场地许可，也可安装五台。这个问题要论证后很快定下来，一次订货就订四台或五台，有利于组织生产和降低成本。第一台60万千瓦机组并网发电后，紧接着一年一台陆续投入运行。大体设想是："七五"二百万千瓦（包括广东），"八五"三百万千瓦，"九五"三百万千瓦。

二、在设计建造60万千瓦核电机组的同时，可组织少数技术力量，进行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的研究与开发，争取在本世纪末能有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投入运行发电。

三、60万千瓦核岛采用双回路国际标准化方案，100万千瓦级机组采用三回路方案，每回路30万千瓦。

四、核电站的设计和建造，采取以我为主、与联邦德国合作的方式。与美国、日本合作搞核电站，问题很多，苏联也靠不住。不要使国际上认为我们与西欧合作的方针改变了，对我政治不利。但60万千瓦常规岛可采用已从美国引进的技术。

五、核电站部分关键设备、部件和材料，可以从国外进口，在同等条件下，最后一定要尽量和联邦德国成交这一点要心中有数。

六、核电站的建造要特别注意工程质量和安全可靠。60万千瓦核电机组要充分利用"七二八"30万千瓦机组的成功经验，并尽量采用国际成熟技术，加以改进和扩大，确保一次安装调试成功。安全标准要采用国际标准，不宜搞得过低。否则，万一出了问题，后果很难设想；同时和联邦德国合作也有困难。

七、核电设备制造一定要确保质量，降低造价，争取将来出口，在国际竞争中锻炼提高。核燃料要多出口一些，大锻件也可出口，以便取得外汇平衡。

八、国内设备制造工厂的选定，要采用招标竞争、择优定点的方式。评比条件主要是：质量可靠，不向国家伸手要条件，价格合理，交货及时，服务周到。

九、核工业部要加强经济核算和项目管理，尽最大努力确保工程质量、缩短建设周期、降低电站成本。

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八六三”计划的方针与措施*

一九八六年四月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科学家关于发展中国高技术“八六三”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着重阐述了中国“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高技术发展方针，提出了制订高技术发展计划须确定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着眼长远，充分发挥高技术对中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采取伞形辐射法，由伞的枢纽辐射到各个方面。他还决定每年拨款20亿元支持高技术发展，通过实行新的拨款制度、建立责任制等改革措施，充分发扬协作精神，注重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并对发展高科技的组织领导作了相应部署，使中国高科技事业进入了一个成果丰硕的崭新发展阶段。

这次请大家来，主要是征求大家对发展我国高技术的意见。

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到本世纪末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属于通常讲的科技进步的范围，包括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和以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也包括许多重大技术的攻关，都是为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服务的。这是科技工作的首要任务。绝大部分的科技人员和科技单位要摆在这个主战场上，面向经济建设。这个正确方向要继续坚持下去。另一部分，还必须有一个从“七五”计划到本世纪末的高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这一部分主要是跟踪性的，跟踪世界上高技术的发展并争取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这主要是为下一个世纪服务的。

不久前，王大珩、王淦昌等四位科学家向中央写信，提出要跟踪国外高技术发展，对空间武器也要有一点对付的手段的建议。小平同志三月五日作了重要批示：“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耀邦同志和其他常委同志也都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小平同志批示后，我找一些同志商量过几次。决定召集部分专家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帮助中央进行决策，以便最后形成一个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可以叫“七五”到二○○○年中国高技术研究和开发计划，也可以用个代号，叫作“八六三”计划，因为是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三月批示的。今天我先讲点意见，提出一些题目，请大家讨论。

一、发展高技术的方针

一九八三年十月，我曾邀请部分同志，就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讲过一些意见。以后，由马洪同志牵头，组成一个小组，在座的不少同志都参加了，一九八四年三月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国务院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从政策研究的角度看，应该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思想准备。

当时，世界上对新的技术革命，高技术的发展，议论很多。对它的发展和由此而引起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提出了许多设想和预测。这一两年，情况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在制定计划，组织力量，把发展高技术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一九八四年美国政府公布了一项庞大的所谓战略防御倡议，又叫“星球大战”计划。计划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早期预警监视系统，以定向能武器为主要手段，多层次拦截导弹的战略反导系统。它的重要意图在于增强其战略威慑力量。准备用二十五年，耗资上万亿美元。一九九〇年前就投资二百六十四亿美元。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我们是反对的，我们反对一切称霸世界的军事部署。应该看到，里根的这个计划，其意义不仅限于军事，一旦实施，它的经济意义很可能超过军事意义。有人说，也许里根本人真的相信通过这个计划能保证他的国家安全，增强威慑力量，但为他出这种主意的人，看来主要是想通过这项计划，带动一系列高技术的发展，刺激经济增长。

西欧国家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一方面想参加，希望拿到一些高技术；一方面又担心受美国的控制。去年，在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倡导下，十八个西欧国家联合起来搞了一个“尤里卡”计划，这是西欧共同体的高技术发展计划。据报道，已初步选定了今后五年二十六个重点项目，联合投资五亿英镑（约七亿美元），十年内准备投资二百四十亿美元。“尤里卡”计划主要用于民用，我们已作出反应，表示赞赏。

日本制定了一个“三年行动纲领”和“十年基本对策”，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强化对科技的投资，重点是发展高技术。据说，日本在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制上，已同美国并驾齐驱，有可能搞出世界第一台五代机。日本的经济发展是快的，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它想通过高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进入世界技术大国的行列。

苏联、东欧国家也有他们的打算。苏联一直在军用技术、国防实力上同美国争霸。苏联的经济发展是缓慢的，问题很多。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两大措施：一是推行经济改革，二是抓科学技术进步。去年十二月，苏联、东欧国家的首脑们，在莫斯科开会宣布了到二○○○年科技发展综合纲要，计划联合开发五个高技术领域。强调谁投资，谁就可以受益，用高技术推动经济发展，要求到二○○○年使经互会成员国的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科学技术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

加速高技术的发展，已成为国际上的潮流。我们也必须及早作出相应的决策。

在发展高技术问题上，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昨天，四月六日，小平同志有个

很重要的批示，他说："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小平同志这个指示，体现了我们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国工作重点的总方针，反映了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采取这个方针，在政治上也比较有利，不要使人误解为中国也要参加空间武器竞赛。

发展高技术，本身并不是目的。要讲目的，主要的，第一位的，归根结蒂，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这里有个周期问题。说得确切一点，我们到本世纪末的高技术发展计划，主要是为下世纪初的经济建设服务的。因为中国的经济振兴，中国的现代化，从长远来看，必须依靠高技术。我们到本世纪末在经济上的发展目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八百美元左右，使人民过上小康生活。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通过依靠我们已经掌握的技术，加上引进一些国外先进技术，组织科技攻关，改造传统产业，是可以实现的。问题是进入下个世纪以后，我们能不能用三、五十年时间，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更高的目标，需要新的技术储备。到了下世纪初，如果我们在高技术上没有什么成就，要用三、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恐怕很困难。国际上高技术的竞争十分激烈。高技术和尖端技术从来是买不进来的，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进行研究和开发。从现在算起，花上十几年功夫，集中一部分精干力量，在几个最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他们的差距，并力争在我们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这样，到本世纪末，既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同时又为下世纪的发展作了技术上的准备，进一步实现下个世纪的目标，也就有了把握了。

当然，高技术也必须为我国的国防建设服务。这一点也很重要。高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代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倡导、主持下，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依靠一大批有抱负、有才华的科学家，在座的不少老科学家们都是当年的中坚骨干力量，我们搞出了"两弹一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使我们国家进入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今后，我们要保持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提高在国际上的威望，仍然需要有选择地发展一点高技术，增强国力。我们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不参加美苏军备竞赛，这一条已经定下来了，但也要有一点对付空间武器的手段。当然，也只能是"有一点"。搞多了，搞大了，搞不起，办不到，而且会对经济建设带来极不利的后果。这一点从苏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苏联实力比我们大得多，但由于军备竞赛包袱沉重，经济发展缓慢。我们更不能那样搞。

发展高技术，必须军民结合，以民为主。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方针。现在国际条件不错，我们要抓紧时机把经济搞上去，我们这样的国家，最怕是经济搞不好，经济建设搞好了，什么都好办了。所以在发展高技术问题上，第一是不搞不行，第二是不能搞得太多。我说的不仅是军用技术，整个高技术计划都应这样考虑。不搞，下世纪没有后劲。搞得太多，不适当，也会冲击本世纪的发展，更谈不上下个世纪的发展了。

二、计划的性质和目标

方针问题明确以后，就要进而考虑如何制定计划，搞个什么样的计划？规模多大？目标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的发展高技术计划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制定。也就是说，要研究我们自己的需要和可能。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苏联。我们不称霸，也不参加他们的军备竞赛。中国幅员广阔，回旋余地很大，和日本西欧国家不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底子薄，只能量力而行，不可能全面开花。我们在高技术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一点又和第三世界的其他许多国家不一样。

从这样的一些具体情况出发，我们在二○○○年以前有必要也有可能搞一点高技术，但只能是一个目标有限、重点突出的计划，而且主要是跟踪性的计划，不可能包罗万象。订大计划容易，问题是实行不了。多少年的经验证明，目标定得很高，摊子铺得很大，只能是纸上谈兵。量力而行，集中力量办几件事，倒有可能办成。

前一段和一些同志酝酿，有个很不成熟的考虑，这个计划可否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空间技术方面，二是生物技术方面，三是其他方面。

空间技术方面，可以考虑搞点对付空间武器的手段，但目的不在这件事情本身，而在于保持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是要把一系列民用技术带出来，为经济建设服务。要从这一点出发来选择目标。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具体目标，第一是力所能及，第二能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第三又能带动一系列的有经济效益的民用技术，值得认真研究。

生物技术很值得重视。相对地说，花钱可能少些，但对农业、医学、食品等关系很大。看来，我们要在这方面下点力气，好好抓一下。中国的人口是个大问题。人口不断增加，耕地还要减少，光靠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要使十多亿人口生活过得很好，有不少困难，希望能够通过发展生物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把生物技术摆在比较突出的位置，可能是我们这个高技术计划的一个特色。但生物技术领域很广，究竟从哪里突破，选什么目标受益最大，也要认真探讨。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之外，还需要搞什么？比如说，搞不搞机器人，或者搞别的什么东西？

最重要的是要选准目标。前面说的都是一些很初步的设想，在座的都是专家，请大家发表意见。在考虑目标问题的时候，我认为需要掌握这样几条：

第一，一定要体现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

第二，目标只能是有限的，少数几个，决不能多。多了，什么都是目标，什么都实现不了。选少了不要紧，将来看准了再加嘛！选多了，上不去，那个时候再收缩，损失就大了。

第三，这个计划和近期的技术开发任务不同，应该看得远一点，面向二十一世纪，但也应当选择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确有实现可能的目标。更长远的，目前难以考虑，只好以后再说。将来经济发达了，国家财力物力雄厚了，就有条件办更

多的事，但现在不行。

第四，目标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本身的价值，而且要看它能带动哪些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技术，对整个国民经济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选准目标很重要。现在恐怕只能提出一些设想。有些目标也许可以初步定下来，有些目标很可能定不下来，还需要作预研究或可行性研究。这次选目标，同五十年代不一样。五十年代，就是两弹，人家都搞出来了，我们攻关就是了。现在高技术多得很，好多东西人家也没有完全搞出来。我们究竟搞什么，是篇大文章。目标选准了，几乎就是成功了一半。为了选准，宁可在目标选择上花点时间花点钱。目标选准了，少走弯路，就是最大的节约，反而争取了时间。

确定目标的过程，也就是择优的过程。所谓择优，就是看哪些目标花钱少，收效快，得益大。同样一着棋子，落点不同，后果就可能大不一样。因此，确定目标要从振兴中国的全局着眼，不能从部门出发，也不能从学科出发。我们不提倡为本部门、本学科争短长，而应当为国家经济振兴、为国家增强实力找出最佳方案。请大家在讨论中都能掌握这个精神。

三、工作的方法和步骤

如何制定和实施这个计划，这里有一个基本工作方法问题。在前一阶段酝酿过程中，有的同志主张采取所谓带动的方法，我赞成这个办法。先定目标，从目标出发，搞一条龙，用目标来带动相关方面的各种课题，把有关力量组织起来，像一把雨伞一样，由伞的“枢纽”辐射到若干方面。譬如要搞某种武器，就从目标出发，辐射到材料、能源以及各种监测控制手段等等。这种方法，可以叫伞形辐射的方法。

这种方法，不同于泛泛地从学科、专业的发展需要出发，来提项目、定任务，那是经常性的工作，可以通过自然科学基金等方面来安排。这次制定的高技术计划，无疑可以带动相关学科的某些课题的发展，但不是某一学科的发展计划，更不是所有学科的全面发展计划。

这种方法，也和按部门、按研究机构来切块分任务不同。如果按部门去切块，局限在条条的纵向范围内组织力量，钱花得很多，效果不一定大。这次制定计划，一定要打破部门界限，要按任务组织横向联合，把真正有实力、有优势的研究机构，有水平的科研人员，组织到这个任务中来，由他们来挑重担。这样做，可以避免低水平重复，也不需要另起炉灶，铺新摊子。

整个计划可以安排到二○○○年，即用十五年时间办这件事。鉴于预测十五年，甚至下个世纪初的事情，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要把目标都选得很准，也是有困难的。高技术的研究开发计划，同经济计划相比，具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探索性更强。因此，这个计划，应该是动态的、滚动式的计划，边走边看，探索前进，及时调整，逐步逼近我们预期的目标。也可以考虑，把十五年分成几个阶段，分别提出阶段目标。

现在还谈不上制定计划，恐怕只能搞个初步方案。制定方案的步骤，第一段，听取专家意见；第二段，六月底以前，形成方案的轮廓设想。然后再提请中央审议批准。

四、几项主要措施

（一）要下决心拿出一笔钱。国家财力有限，但每年挤出一点来还是需要的。这个问题，国务院没有讨论，我个人初步考虑，是否“七五”先拿十亿元；“八五”翻一番，二十亿元；“九五”再翻一番，四十亿元。届时确有需要，也可以根据情况，再多拿一些。如果花上百亿元，真能办成几件大事，我看是值得的。这个盘子，比王大甭等同志提的两个亿大得多了，大了几十倍。可否大体上先按这样一个盘子来考虑，量入为出，作个试安排。这笔钱，一般地说，要安排到把目标产品拿到手。个别大的项目，也可以考虑安排到完成实验室原型样机，此后的工作，如型号研制或新产品试制，可根据需要，另拨经费，列入国家其他计划。因此，前期工作，实验室阶段的经费，要从严掌握，真正花钱是在最后出成果的时候，绝不能前松后紧。这有两条好处：一是可以促使我们把调研工作做得更周密些，把目标、方向看得更准一些，避免盲目性；二是免得前期摊子铺得过大，把钱都花光了，到了中间试验和生产阶段无以为继。

（二）实行新的拨款制度。执行高技术计划，从一开始就应当解决好这个问题。不能再走按部门、按单位切块拨款的老路子，必须按任务给钱，让钱跟着任务走。任务的委托，要实行招标，通过专家评议，择优支持。与目标相关的、水平高的、有能力承担任务的，才拨款，不撒胡椒面。只有改变拨款制度，才能保证把有限的钱管好、用好，发挥应有的作用，避免低水平的重复。

我们搞高技术计划，只能吸收少数人和少数机构来干这件事，只能把需要而又适宜于承担这项工作的部分人员和机构组织到这个计划中来。绝大部分科技力量，都仍然要毫不犹豫地为到本世纪末的经济建设服务，要面向当前，面向生产。

（三）建立责任制。在计划的制定和组织实施过程中，应当学习军工部门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按照系统工程的办法，建立管理网络，建立明确的严格的行政和技术责任制。

每个项目都要任命技术负责人，大的项目还应设立专家小组。要特别注意起用中青年科学家，让他们在攻关中锻炼提高，精力旺盛地奋斗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把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放到主要的技术岗位上来，因为这个计划一直要干到下个世纪。要放手发挥他们在技术上的领导作用。各级领导要在人员的选配、方案的制定以及经费的使用等方面，给他们以充分的自主权。要创造必要条件，使参加这项工作的科技人员能够专心致志地工作。对工作做得好的要给予表彰，作出突出贡献的要给予重奖，对不适应工作的应及时加以调整。要采取措施使这个队伍能不断吸收确有才干的新生力量，保持

攻坚能力。

实施高技术计划，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出人才是这次提出高技术计划的重要目的之一，实际上是进行智力投资。发展高技术，需要高水平的科技队伍，需要他们求实、探索、开拓和献身。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很好的队伍，这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今天在座的同志都是这支队伍的精华。有了明确的任务，这支队伍不仅不会散、不会断，而且还能不断提高它的水平，培养造就新一代年轻的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形成后继有人、持续兴旺的局面。人才是最重要的，是个知识库，搞好了，对我国长远发展意义很大。

（四）要充分利用开放的条件，尽可能汲取国外新的技术，利用国际上的各种合作渠道。有些研究工作，国内可以少投资或不投资，就是派科学家到国外的实验室里去做合作研究。正因为如此，更要注意做好保密工作，不能给自己设置障碍，造成被动。

（五）要发扬大力协同的精神。过去，我国搞战略导弹时，协作单位上千家，包括几十个部委和二十几个省市，靠的是大力协同，一方有难，多方相助，这是非常成功的经验。今后实施高技术计划，仍要继续发扬大力协同的精神，不得互相扯皮。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对某些急需的设备和人才，必要时应统一调配，各部门都要从大局出发，积极支持。

五、组织与领导

执行高技术计划，必须实行高度集中领导，搞好横向协作。根据前一段的酝酿，这项工作可以考虑由科技领导小组抓总，宋健、衡高[1]同志牵头，宋平、嘉锡、马洪和其他有关同志参加，在计委协同下，抓好计划的制定和协调工作。至于计划的具体实施、督促和检查等日常工作，由科委、科工委分别按军、民两个口子来组织。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行不行，也请大家议论一下。总之，既要考虑过去的成功经验，又要考虑今天的新情况。

同志们！今天在座的，既有老一代的专家，还有不少中年专家，这个阵容很好。老专家们为国家的事业苦干了几十年，现在后继有人，大家都感到欣慰。在老同志的指导下，争取把这个计划制定好，最终完成这个计划，恐怕要寄希望于中年人、青年人。

注 释

1．丁衡高（1931—），江苏南京人。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曾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局副局长、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上将军衔。

给全国护理工作会议的贺信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

卫生部转全国护理工作会议全体代表：

我热烈祝贺全国护理工作会议的胜利召开。护理工作是崇高的事业，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现在全国护理队伍已达六十多万人，是一支很好的队伍，今后要不断发展壮大，进一步提高医护水平和服务质量，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希望你们加速发展我国的护理学科，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借此机会，我通过你们向在平凡的岗位上辛勤劳动的全国医护人员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

给《廉洁奉公的改革者张洁世》一书的题词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

坚韧不拔的改革创新精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作风，是张洁世[1]同志的突出优点，也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体现。希望《廉洁奉公的改革者张洁世》一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学习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改革者的崇高品质，从而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

注 释

1．张洁世，时任北京长城风雨衣公司经理，曾任北京服装三厂厂长，1986年3月因病去世。其先进事迹曾被广泛传播，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在省（区）市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

一、关于工业生产问题。影响一、二月份工业生产的几个因素，诸如企业套改工资引起的职工思想波动、纠正不正之风中某些界限不清、流动资金不足、小化肥积压、石油供应紧张等，都已经有个解决办法了。各地方、各部门如把工作抓紧，落实已有的办法，工业生产情况是会逐渐好起来的。三月份的情况已经比一、二月份好转。但是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一是要讲求产品质量，防止盲目追产值、速度；二是要围绕市场需要组织生产。有些产品，如汽车等，目前虽有积压，但从较长一点时期看还会转俏，要从资金等方面给企业以支持。

二、关于农业生产问题。在农业方面，我们又要发展商品生产，又还没有把各方面关系理顺，给农民的信息有时不灵、不准。因此，这几年反复出现某些大宗农副产品忽多忽少的现象。如何运用经济手段，使这种现象逐步减少，这应当作为领导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

三、关于外汇外贸问题。依林同志讲了今年外贸工作中的有利因素和石油降价所造成的困难，要求各地抓紧做好外贸出口工作，努力实现今年外汇收支的基本平衡。

四、关于财政问题。财政状况，现在不能说已经很好了。今年的经济发展速度肯定比去年低，这样财政收入的增长也会比去年少。但是，目前各地开支的胃口很大，同财力状况很不适应。各地要注意这个问题，抓紧收入，控制支出，保证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

五、关于横向经济联系。现在既有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又出现了城市之间、省市之间的联合。这两种形式互相推动，地区联合为企业联合穿针引线，开拓道路，企业联合的发展使地区联合得到落实。据一些地方的企业反映，现在联合的主要阻力来自行政性公司和主管部门，希望各地在排除这种阻力方面能有所作为。商工、商农、商商之间的联合，应摸索经验，以解决流通领域的问题。国营商业退出了一大块阵地，但农民和个体商业未能完全补上去。农民办商业，腿短，信息不灵，缺乏组织性。应当提倡国营商业与农民商业、集体商业联合，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个问题，各地应认真研究。

六、关于劳动制度的改革问题。国务院即将发布几个规定，一个是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一个是关于辞退工人，一个是关于社会劳动保险，还有一个是关于

招工制度。这几个规定互相配套，是劳动制度的重大改革，有利于企业加强管理，加强劳动纪律，提高职工队伍素质，也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这项改革，可能在职工中引起一点震动。各地要把工作做好。可以组织职工展开讨论，使大家认识这项改革的必要性和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意义。

给北师大北国剧社的复信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六日

北京师范大学北国剧社全体同学：

来信收到。知道你们利用业余时间排演莎士比亚戏剧，最近即将公演，很高兴。谢谢你们的邀请。但我四月中旬日程已满，且即将离京去外地。我已转请朱厚泽[1]、王蒙[2]二位同志去看你们的演出，他们都已欣然允诺。此复，并祝演出成功！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六日

注 释

1．朱厚泽（1931—2010），贵州织金人。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曾任贵州省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委书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2．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时任文化部部长，曾任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

关于撤销三峡省筹备组给万里等同志的信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日

万里、依林、启立、纪云同志并报耀邦同志：

四月二十五日到五月一日，我从鄂西经万县顺流而下，到达武汉，了解三峡工程的情况，沿途和水电部、长办及三峡省所属地区的同志交换意见。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一时还定不下来，有些问题还要从经济上、技术上进一步论证，而三峡省筹备组要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实体，势必在人大、政协引起更强烈的反映。这就使这一地区出现目前湖北、四川两省不便管，三峡省筹备组无力管的现象，对这一地区的开发极为不利，如久拖不决，必将给这一地区造成大的损失。三峡地区的干部普遍要求迅速结束这种不上不下的局面。我们同三峡地区和两省的领导同志商量，大家赞成撤销三峡省筹备组，所属地县仍归两省领导和管辖，国务院成立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指导和帮助这一地区搞好开发和移民试点。三峡省筹备组撤销后，今后无论三峡工程上与不上，都不会受影响。即使今后三峡工程上马，这一地区的移民和开发等工作仍依靠两省承担不再变动。为了及早解决这个问题，我和李鹏、任重同志商量，代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一个《关于三峡省筹备组有关问题的通知（草稿）》，请审阅。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日于武汉

祝叶剑英同志九十寿辰的贺信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敬爱的叶帅：

在您九十寿辰的时候，我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

几十年来，您献身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大节凛然，在万里长征的紧要关头，在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岁月，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在向四化进军的新的历史时期，您为党为人民做了杰出的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无论建国初期在广东，还是以后到北京在中央工作，您的言传身教，使我们深受教益。像您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受到举国上下的敬仰。现在，我正在外地调查，不能来看望您，故写这封信，聊表敬意。

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正确对待农村党员雇工和发展私人经济问题*

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农村整党汇报时的讲话。

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农村中的党员雇工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要在这次农村整党期间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现在对农村中的个人经营和雇工问题的认识，各方面争论很大，因此，要实践、试验，要研究、讨论，不可能马上拿出办法来。如果在这次整党中就对有雇工问题的党员不予登记，势必会引起大的震动。所以，这次农村整党不要涉及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员雇工问题。

第二，随着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在农村工业、服务业、商业、运输业、种植业新品种试验等等方面，必将出现更多的个人经营的私人经济，这在一定时期内对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会有相当大的作用。问题在于我们允不允许，如果不允许，将会阻碍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允许这样做，也会有一些问题，但并不可怕，在实践的过程中，总会有办法加以解决。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看主要是两条：第一，一定要保护和发挥农民企业家和农民经营家的作用。这一批人是很可贵的，他们的经营相当成功，有相当的活力，发展了农村经济。第二，我们完全可以采取许多经济的法律的形式，对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中消极的东西加以限制。这样做，既发挥了他们的积极作用，又限制了消极作用，就不会出大的问题。因此，一方面在理论上要探讨、要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在国营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分散的、规模不大的私营经济不可能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不要怕承认它是私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有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经济、个人经济和私人经济，但公有制总是占绝对优势的。再一个是形式和实质的问题。形式上是雇工、私人经营，但实质是什么？如果使他的个人消费部分受到限制，使他的经营所得大部分转入固定资产，实质上个人消费部分即变成了经营者的工资收入。当然，我们将来要立法，明确规定他们的经营所得，必须有百分之多少（绝大部分）要转入固定资产，将来这些固定资产变卖，也还必须购置另外的固

定资产，不能转化为个人消费。这样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即在我们国家里，所有固定资产都要长期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服务，而不能转化成个人消费。另外，我们还可以逐步对经营好的、规模大的个体经济采取参股的办法，经营方式不变。用这个办法把它改变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性质，但目前不宜过早地搞。所以，危险并不大。将来中国农村基本上还是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因耕地面积少、人口多，很难发展成大的私人农场，而可能是规模不大的家庭农场。但为种植业服务的其它行业，如各种农业机械、基础设施、运输、加工、新产品试验等等，势必将是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状态。

现在怎么办？我主张两件事同时做：一是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探讨，百家争鸣；二是开始进行试点。可以先在相当发达的地区进行试验，试验中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尽量做到既发挥积极作用，又限制消极的东西。理论界同时讨论，百家争鸣。这个问题是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在实践中进行试验、创造、发现，才能搞清楚。当然，这中间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搞不好，会出一些问题，但是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大的突破。即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够发达、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现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情况下，如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闯出一条新路来。

这是一个大问题。总而言之，我们国家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光靠家庭承包还是解决不了全部问题，势必分化，一部分人离开家庭，去搞多种经营，这样生产力就发展了。在实现这个转变中，靠我们过去的办法已经不行了；靠国家铺摊子来干，也不行；还是要利用能人来干。这样做，很有可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道路来。

为促进中澳友好合作做出新贡献
致第三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的贺词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

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祝贺第三次中国一澳大利亚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并预祝讨论会圆满成功！

前两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表明，中澳之间不仅能在经济、贸易、科学技术等方面进行合作，而且还可分享彼此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这是近年来中澳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次讨论是在中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情况下召开的。“七五”计划将为中澳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也为两国企业界沟通经济信息和交流管理经验提出了新的要求。我相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将会一年比一年办得好，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

科技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你们坚持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为社会创造和节约了巨大的财富，为祖国为人民立了功。党中央、国务院感谢你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对你们劳动成果的肯定和尊重。

这次获奖的1761个项目，都是具有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项目。许多项目年效益在一百万元以上，不少项目在一千万元以上，有的项目在一亿元以至十亿元以上。这是你们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探索的结果，也是你们和广大体力劳动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你们作为这些项目的主要完成者，在创造和应用这些科技成果中，无疑起了特殊的关键性作用。前天我参观了“六五”科技攻关展览。这次攻关完成得很出色。98%符合合同的进度和要求，80%已经投入应用。这些情况说明，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尽管我们原来的基础比较薄弱，现在的条件也比较差，但是，中国的科技人员是有志气、有能力的。我们应该为这支科技队伍感到自豪。

“六五”已经过去了。现在全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为全面完成“七五”计划而奋斗。“七五”的任务，比“六五”更艰巨，但实现以后，肯定会给全国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因而也更伟大、更光荣。“七五”计划对科技界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列入“七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不能复制“古董”，绝大多数应该达到国际上七十年代末以至八十年代初的技术水平，许多科技难关有待攻克。在积极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必须对传统产业加紧进行技术改造。各种产品，特别是加工机械、精密仪器、日用消费品和出口产品，都应该不断提高质量，更新换代。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原材料，必须大大节约。各种先进而又适用的技术，应当尽快在大、中、小型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普及。农、林、牧、渔，都需要研究对生产有突破性作用的新技术和新品种。村镇百业的兴旺发达，要求科学技术在产前产后各个环节上提供优质服务。为了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开拓新的技术，弄清我国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的特点，我们还需要加强相应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把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经济管理，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的尚待开发的

领域。为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服务，为提高十亿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改善生活环境服务，这是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是我们科技战线的主战场。同时，我们要组织少数精干力量，在若干最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国际水平，为下世纪初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好技术上的准备。同志们！所有这些任务，都摆在你们面前，都是你们的用武之地，要求你们为国家建立新的功勋。

“六五”期间，我们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回过头来看，不是困难压倒了我们，而是我们战胜了困难。在今后的五年里，随着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随着各种政策的进一步配套和完善，可以预期，必将为科技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密切结合提供新的动力。党中央、国务院相信，在具有光荣传统和实干精神的广大老、中、青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科技工作一定会做得一年比一年好。到“七五”计划全面完成之时，我们再来为大家庆功。

关于核安全问题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召开的核安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核安全局“关于秦山核电厂的焊接质量”的报告我看了。我想谈一些意见，主要是跟大家议一下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我们应注意些什么问题。总的讲有两条：

第一，不因苏联事故改变我们的核电计划。苏联发生事故说明，大的、灾难性的事故是可能发生的。过去外国人说三里岛事故是美国不同利益集团造成的，但是这一回可是真的。苏联事故会影响核电的发展，至少在以后一个时期欧洲会受到影响，美国也会受到影响。我们怎么办？我认为我们不应因此影响自己的计划。我们的核电计划也不大，核能是解决能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一是火电，二是水电，第三才是核电。

第二，我们要重新认识如何加强安全保证，确实做到不发生重大事故。因此要重新研究过去重视的程度够不够，措施够不够。今后要切实做到从设计、制造、施工、管理保证安全，以及事故发生后怎么办。我看苏联还是有一些办法，他们用飞机在上面封，下面还要打隧洞从下面也包起来。过几年我们核电站发电后也要有些办法，包括辐射病的治疗方面要准备。

今天主要是谈谈怎么看，可不可以定这两点，也就是建设方针不变，确实需要重新认识、加强核安全，以防万一。一旦出事故要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首先是搞这项工作的同志提高认识，落实措施。此外，在浙江、广东、香港，对人大、政协要有个说法。现在为民请命的人很多。有什么办法保证安全，要向人民交代。现在对香港也要有个说法，台湾也可能发动香港人说话。总之，对人民要有个说法，有个说的口径。苏联事故后我们总要有个态度。当然，你也可以说苏联的落后，我们的堆型不同。李鹏同志，你这次去深圳也可能会碰到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题目，我看了核安全局的报告，主要是要把工作落实。有个专职部门比较好，旁观者清嘛！

我看整个世界上核电还会搞，但安全要加强。

首先是设计，然后设备制造、施工、运行、人员培训、包括抢险等。我看二十年内不能说安全过了关，因为还没有丰富的经验。现在要注意苏联发生的事

故，戈尔巴乔夫[1]说这是第一次失去控制，没想到这样厉害。

厂址要有安全地带，是几公里，核安全局要立法。厂址确定后，几公里内不要搞大型工业。不然出事故后又要抢险，又要处理其它问题。今后选址要注意。

广东核电站也要注意。第一个电站搞好了会加强全国人民的信心。将来也许不一定出大事故，但总出毛病，人也不放心。

注 释

1．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1931—），生于前苏联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曾任苏联总统。

在第三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日

霍克总理阁下，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第三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今天开幕了。我十分高兴和霍克总理一同来参加这个盛会，我代表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在我国召开表示热烈的欢迎。

你们的会议已是第三次了。我愿高兴地指出，是霍克总理在一九八四年访华时倡导和推动组织了这样的双边讨论会，前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证明，中澳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领导人进行直接接触，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发展友谊，从而为开展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创造有利条件。我相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必将在双方今后的友好合作中日益显示出它的作用。

我国今年开始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在“七五”期间，我们将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在优先位置。改革的深入进行，将为我国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开辟日益广阔的前景。

中澳两国是同处太平洋地区的两个大国。澳大利亚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发展农牧业、采矿业、制造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有着自己很好的经验，其中不少适合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具有十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将会进一步扩大。因此，中澳两国可以成为更好的贸易和合作伙伴。这对发展两国经济都是十分有利的。

澳大利亚在结合本国的实际，学习和应用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有很多成功经验和创造。特别在发展对外贸易、提高产品质量、有效利用能源等方面的经验，正是我国企业目前所十分关心的。我们可以从你们那里学到不少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次会议为双方相互学习和交流经验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它将使两国企业界之间的友好合作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长期国策。中国要走向世界，就需要培养一大批能够走向世界的干部。企业要发展对外合作，也必须培养一批对外合作业务的领导人和管理人员。“七五”期间，我国将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和智力投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会议，利用双方企业界和学术界代表业已建立的联系，以“请进来”、“派出去”等形式，促成更多的人员交流，以利于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培养中国的管理人员。

祝你们的讨论会圆满成功！

关于发展乡镇煤矿和建设大型煤矿等问题*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视察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和听取山西省政府汇报时谈话的要点。

一、关于乡镇煤矿的整顿、改造、提高问题

我想了解一个问题：小煤窑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有什么新情况、新问题？现在大家担心，乡镇煤矿上得这么快，到一九九五年，未挖完的还得挖；有的挖得差不多了，需要延深、改造，产量就会减少一些；还有一些矿这几年已经改造好了，会有新的增长。这样许多因素交叉的结果，是不断上升、逐年增长的趋势，还是哪一段要停顿一下？会不会哪几年突然没煤，出现停滞不前？大家比较关心。

雁北小煤矿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局部地区还可以布一点新点，总的来说不是布新点的问题，而是要改造、整顿、提高。要搞企业化，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企分开。内部要建立领导制度，真正成为一个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不要买一台设备还要到党委书记那里批条子。要使每个矿长真正成为企业家、经营家，不合条件的要换。矿长不一定要有文凭，有文凭的不一定会经营。总之要有本事，办事公道，善于经营。现在有一些矿长不行，要训练提高。乡镇煤矿不是一锤子买卖，它是发展煤炭工业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既然要依靠它，就要把它搞好。虽然乡镇煤矿很小，但要使它真正成为一个企业，领头的应是企业家，会经营。归根结底，乡镇煤矿有两个问题：一是要改造、延深，提高技术水平，不要把钱都吃完了。通过扩建、改造、延深，继续为解决国家能源问题挑重担，不要昙花一现，兴旺了这两三年又不行了。二是要整顿、提高。虽然它规模很小，但它是很有希望的，要加以培养，逐步提高文明生产水平。不一定小矿就死人多，就安全差。省和地区要把小煤窑的整顿、巩固、提高工作搞好。至于你们说的运输问题不是很大。我们国家还是需要煤的，而且你们的煤成本比较低。我看只要有煤，总是要想办法运出来的。至于怎么运出来可以商量。你们着急，宋平同志也着急，铁道部也着急。大秦线明年铺通比较有把握，后年就可以试生产，当然第一年拉不出多少。修那么大一条路，花那么多钱，要把各方面管理抓紧，不能拖拖拉拉，好多年才达到设计能力。你们地

方上也有许多工作要做，如修支线、建集运站等。

对小煤窑，大家还是不大放心，当然这两年小煤窑立了功。大家在北京想这个问题，还是觉得不踏实，究竟怎么样？不要过几天又不行了。另外，死人这么多，不敢叫外国人来看。你们努努力，到什么时候，也可以向外国人开放，叫他们来小煤窑看看，看了以后觉得还可以嘛！办矿不一定设备那么先进，主要是认真管理。这件事，山西省要认真抓一抓，抓好了可以出经验，走在前边。神木现在刚开始挖浮财，你们已经挖了这么几年浮财了，也有点资金、有点基础了，应该再提高一步，更上一层楼，很可能走出一条路子来。我们国家还有一大片地方，如果走得通的话，国家不需要办很多大矿，就可以出几千万吨煤，解决很大问题。国家修干线，合作修支线，群众办煤矿。这是多快好省的事，很大的一件事，现在还未很好理顺。

不要光讲小煤窑的好处，也要讲它的不足，只有看到不足，才能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不行，提得太晚也不好。小煤窑可以和大煤窑搞联营，这样可以取长补短，解决小煤窑技术力量不足问题，资源纠纷也可解决。小煤窑抓好本身的技术改造，由小到大，由浅到深。要准备转变，不能总是老小不大，老浅不深。小煤窑把资源固定住了，它就得向下延深。

二、关于乡镇煤矿发展后的环境保护问题

雁北小煤窑这样发展下去，环境会出什么问题？比如水土流失，地下水位下降等等。大家要研究一下，不要将来有煤没水，山西还是缺水的，从长远看，山西国土治理，水是大问题，要把水放到重要位置。对这个问题，第一，要把情况弄清楚；第二，靠什么去解决，总得有个办法。不能只顾眼前，而无长远打算，这样就会出大问题。整个北方都有这个问题，不光是山西。

三、关于煤炭加工转化问题

小煤窑发展起来后，小水泥、电石、建材、铁合金都可以搞。小焦化也可以搞。煤化工不是那么简单，花钱很多。山西可以考虑搞一些小的火电站，搞一万、两万的机组合算不合算？反正煤运不出来。电发展了可以搞工业，这样，就不是运煤，而是输电，运铁合金。还可以发展点钢铁，进口点矿石，煤往外拉，矿石往里进。

四、关于出口煤自主权问题

关于煤的出口，还是用合营的办法，由煤炭部中煤公司统一出口，通过合营解决你们的问题。现在看来，凡是采取合营出口，效果都是好的；凡是想自己另

外搞个摊子，当时想得很好，最后办的都不好。现在资本家到中国做生意，最怕的就是抄后路，这一家本来很便宜，那一家比他还便宜。所以很多人现在不敢跟中国做生意。过去我们一开始说权力分散，外国人很高兴，现在一致呼声要求中国权力集中，因为他没有办法，不知道找谁。在山西搞煤化工，你们可以跟煤炭部对外搞合营，这样就把优势都发挥了，你也不吃亏。外贸比较复杂，最近外贸部采取了很多合营的办法，效果比较好，当然不算十全十美，但也算是一条路。

五、关于引黄问题

从黄河少引一点水可能是个好办法，小引黄可以考虑，地方拿钱。（王森浩[1]同志插话：地方干不起，两家抬可以，国家拿大头。）这个地方我原则上赞成从黄河引一点水进来。等青岛引水工程完了以后再干。山西水资源问题不能光靠引黄，地下水还是不错的嘛！问题是怎么用。有些没有搞清楚，这边说没水，那边煤矿往外抽。

六、关于古交区西曲矿的失火问题

西曲煤矿失火那件事钱虽然不多，但暴露的问题是严重的，反映了有关方面作风的腐败，涉及市、区、管理局等单位。那套设备是从美国引进的，引进的目的是出国，谁沾个边谁就出国，都是些可去可不去的人。东西拿回来往那儿一搁，就没人管了，结果发生了火灾。要好好把这件事总结一下，汲取教训。对各个环节的官僚主义、违法乱纪、不负责任、突击出国等，写个总结。这些人的精神状态是很少考虑国家，要从这个侧面解剖一下我们内部上层领导的问题。

七、关于小流域治理问题

合股治理小流域的经验是好的，这叫股份制，也是合作经济嘛！有钱的入股，没钱的投工，投工给现钱，农民马上有收入，这种办法比较好。合股经营的关键是要有个能人，没有个能人搞不起来。总之要有一个真正的经营者，股份比较多的，他责任心比较强，因为搞不好自己的损失最大。黄土高原的潜力很大，一定要治理好水土流失。

八、关于平朔露天矿建设问题

平朔矿说贷款利息高，难以偿还，要求国家优惠。优惠就等于国家投资，要优惠国家就得补贴银行。银行的钱是老百姓的，现在银行存款利息提高了，长期

存款利息八厘多，贷款利息十厘多就不算高，否则谁还向企业投资，都存在银行算了。国外股票的利息都高于银行存款，否则，谁还买股票？股票有风险，银行存款无风险。

根据这个矿基本建设的这种搞法，我们在其它地方照它这个样子自己搞，行不行？包括使用大型设备，国内可能还要搞这样的矿。以后再同国外合作搞煤矿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各有各的国情。外国的国情是人少劳动力贵，我国是人多劳动力便宜。现在争得很厉害，神木小煤窑六元钱一吨煤，当然很浅，但也是煤，雁北一吨煤十二元，大同矿务局二十四元。固定资产多当然省人，但成本很高，另外不好安排就业。都用大机械，老百姓干什么？当然不是完全不搞机械，而是不搞太多的机械，比如将来搞准噶尔煤矿，还要不要搞这么大的设备，值得研究。看来设备不是越现代化越好，那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当然不能只靠小煤窑，只靠地方矿，也要搞一些骨干煤矿，搞一些大矿。

你们要好好学习外国专家管理的经验，外国人有一套办法。以后再合资搞这样的煤矿情况不多了，所以更应该利用这个矿好好学习。通过这个矿，找找他们开露天矿的窍门，看看人家怎么设计，怎么采掘，这一套我们还不太懂。

九、关于用工制度问题

现在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今后再招收工人，包括固定工都叫合同工，五年签个合同。在五年内不愿干了，可以不干；厂里认为你干得不好也可以解雇，另外再找别的人签合同。这大体还算固定工，但它也是合同制。还有一种合同工叫轮换工，从农村招的，五年或六年一轮换。这样做，第一，五年可以积五千元钱，可以盖房子、娶老婆；第二，技术有了，头脑也灵活了，可以搞专业户；第三，可以独立经营，搞小煤窑，成为小老板，当农民企业家。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一系列好处，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减轻国家负担。所以，要搞好劳动制度的改革。

十、关于企业的管理体制问题

有一个问题要很好了解一下，西方工业的发展，管理体制经过了一些阶段。一开始资本家自己经营工厂，自己当老板，请个管理人员，但事事他得过问，这叫家族工厂。后来演变为股份制，很难讲谁是老板，买了股票就是老板，股东很多，多少万人，因此出现董事会，大事由董事会决策，经营管理是经理。现在多数是这样。有些就是董事长管事，董事长不一定股份最多。联邦德国二次大战后，建立了监事会，大的决策是监事会，经常性管理是董事长。我们国家在建立厂长责任制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谁代表国家利益，谁代表企业利益，谁代表工人利益。有的说厂长代表国家利益，有的说代表工人利益。厂长是选举好，还是

上级委派好，职工代表大会推荐好。这个问题还在讨论。很多国家出现了一批管理工厂的能人，或者说阶层也好、集团也好。这批人专门管理工厂，谁要聘请了他，他就为谁负责，把工厂管好。他不是股东，财产不是他的，但他非常负责，有着一种责任感，一种职业道德，为了一种信誉。这个情况日本不太明显，联邦德国非常明显，美国、加拿大也有。联邦德国有位经济学家施奈德，我给他出了这么一道题。我说我们有道难题，企业的厂长屁股究竟应该坐在哪里？是听上级的话，还是听工人的话？我们现在许多厂长，有的一上台不管经营好坏先给工人许愿，给大家多发点奖金，工人都说这个厂长不错，至于这个厂将来搞得怎么样他不管。当然有的厂长为了提拔，给上级印象好一点，也对上负责。还有一些厂长搞污七八糟的事情。我问联邦德国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一开始也未回答清楚。他讲我们国家有竞争，你们无竞争，还讲什么所有制，说你们吃大锅饭。我讲你们也是所有制和责任制分开的嘛！我还讲了克虏伯这个例子。现在克虏伯财团根本没有克虏伯家族。当时克虏伯立下遗嘱，委托七人委员会管理。当然有待遇，但财产不属于他们。他后来回答我联邦德国的企业家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他在社会上的声誉如何，与他管过的工厂管得如何有很大关系，如果这个厂长在哪个厂管得很不好，结果被解雇了，以后他就很难找到好的职业。好的企业家大家都争，当然工资比较高。国际上还有管理旅馆的集团，但不是旅馆托拉斯，他根本没有一个旅馆，专门为别人管理，从总经理到服务员，全套人马，专门替别人管。

十一、关于劳务市场问题

有社会工资，就有劳务市场，现在不仅实际上存在，形式上也存在。劳务市场的劳动力价格是浮动的，对劳动力有个需求变化，所以才叫市场。修铁路的工钱就提高了，有煤矿的地方工资也就高一点。劳动力价格随着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上下浮动，这不是劳务市场吗？再一个是契约关系。一个契约关系，一个价格，就是劳动力市场。这个东西一搞就活多了。

注 释

1．王森浩（1933—），浙江慈溪人。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曾任大同矿务局总工程师，潞安矿务局石屹节矿矿长、副局长，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总经理，煤炭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给《中国日报》的题词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五年来，《中国日报》在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我希望报社全体人员继续努力，把《中国日报》办成内容丰富，鲜明生动，为中外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一张报纸。我还愿借此机会，向关心和支持《中国日报》的读者致意。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加快发展煤炭工业*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主持召开加快发展煤炭工业和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我国的煤炭储量大，品种齐全，煤质好，开采容易，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个优势。我国的石油，看来不可能出口很多，但煤炭除国内消耗外，可以多出口。

发挥我国煤炭的优势，关键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开采问题，一个是运输问题。这几年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就是依靠农民采煤，把我国最丰富的煤炭资源和最庞大的劳动力队伍结合起来。结合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农民办矿，如乡镇煤矿，这种形式适合开采埋藏比较浅的煤炭；另一种是国家办矿，招用农民采煤，实行轮换工制度。这是一条多快好省的路子。煤炭问题，归根结底是运输问题。对运煤问题不作根本的考虑，我国的煤炭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但是，煤炭只靠外运不行，还要考虑在产煤地区就地消化的问题。要在产煤地区搞电、搞耗能重工业，如搞火电、钢铁和铝等。

煤炭运输和就地消化要解决体制问题。大家办电，统统交给一家，这个办法要改变。水电部要鼓励、支持大家办电，使整个电力事业发展起来。一家办铁路、一家管铁路的状况也要改变。主要铁路干线当然要靠铁道部修建和管理，但一些专用铁路和支线，要提倡大家办，地方办，煤矿也办，自办自营。煤炭部可以考虑有一些投资用于开采煤炭，有一些投资修建铁路，收购煤炭往外运。铁道部对地方和部门办铁路要给予优惠，在技术上给予指导，并帮助他们加强管理。

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经济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一、关于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工业增长速度问题

今年的经济形势，总的来看，第一、情况很好；第二、有些问题值得注意。今年的形势有两大特点：一是能源、原材料生产情况好。这一条很重要。过去经济出问题，都不是出在加工工业上，而是出在能源、原材料生产缓慢上。二是市场紧俏商品生产增长比较快。所以，今年一至四月工业生产速度低一点不可怕，这种速度有后劲。当前，总的情况可以归纳为四句话：（一）市场比较稳定，物价趋于下降；（二）货币投放减少；（三）库存增加；（四）速度降低。为什么会同时出现这样四个问题？当然，有非经济因素，但根本的是经济原因，要很好地研究。

对当前的工业增长速度怎么看？有一个人给我送了一张表，说这几年每隔两年调整一次，因此每年的第四季度和第一季度的速度就要低。今年头四个月速度降低，有一个工业生产水平的问题。我们现在每月的工业总产值也就是七百亿至八百亿元，去年上半年超高速增长，今年头四个月的速度慢下来是必然的。我看，对头四个月的速度怎么分析都可以，关键是后八个月。我是不压速度的，速度过低不好。今年应当争取搞到百分之七到八，不能低于百分之七。如果只达到百分之五至六，就有一个要不要调整计划的问题。因此，今后八个月要注意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要避免不稳定因素的加剧；另一方面要积极地切实地去解决一些问题，使有条件增长的行业和地区把速度搞快一些。总之，今年既不能把速度搞得太高，又不能太低，应争取增长百分之七至八，而且要求质量高、效益好。

二、关于改善产品结构和引导消费需求问题

最近看到一些理论家写的文章，他们认为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开始看还相信，后来越看越怀疑。问题是什么结构，如何调整。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比如彩色电视机等，你能一下子搞上去吗？那有多大市场？中国的市场，最大的是农村，是轻纺产品，而不是城市里那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当然，城市需要的高档商品也很重要，但这个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我们要把思路搞正确，不能把质量好的商品都理解为高档商品，只去发展高档商品。实际上，各种档次的商品，都有个质量高低的问题。

当前产品结构不合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价格太死，质量好的商品不能优质优价，大路货不能降价。要趁今年市场物价上涨幅度小的机会，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真正放开小商品的价格，特别是要放开那些市场短缺的小商品的价格；二是名牌、优质、高档产品和新产品，实行购销议价，或者提价；三是质量基本上是好的大路货，可以降低价格，或者把管制价格放开。这种调整，不完全是结构性的价格调整，而是对消费需求的引导。提高一些产品的价格，也不在于限制高档商品的销售，而是促进低档商品的销售，促进商品结构的调整。当然，一下子都提高价格也不行，应当有选择地提高。看来价格指数提高百分之一，问题不大。这件事要认真研究。

至于“关、停、并、转”问题，值得研究。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好多了，相当一部分工厂安排生产要考虑市场需求，市场需求减少了，它就不生产或者少生产。所以现在用行政办法关、停、并、转不行了，而要用价格手段，用经济办法。小化肥去年为什么停产，就是因为卖不出去。乡镇企业也是这样，你要它关，它不关；它的产品卖不出去，自己就不生产了。

三、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问题

一年来，对基本建设投资的控制很有成效，但问题是项目没有减下来，这是潜在的危险。关键是要下项目。如果只压投资，不下项目，必然拉长周期。而且，这一年投资压下来了，如果项目没有减，下一年的投资规模又会上去。好像一个葫芦，暂时按下去了，一松手又会上来。更新改造，要提倡设备更新。这样，企业的生产技术上去了，机械产品也会有销路。

四、关于财政信贷问题

财政问题，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在省长会议上要谈一下。

我们现在的财政开支盘子，是建立在生产超高速增长基础上的，而生产超高速是不可能持久的。应当根据财政承受能力，重新考虑财政开支的盘子。现在，有些地方倒算账，说必须有多少财政收入才能过日子，再根据需要多少财政收入来确定生产增长速度。这是不对的。从长期看，我国的工业增长速度也就是百分

之七至八，最多百分之十，把财政开支增长维持在百分之十以上是不可能的。要把这种幻想去掉。现在胃口太大，要压缩，吃点冷饮，缩小财政开支盘子。去年生产超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增加较多，实质上是上百亿美元转化为人民币。今年生产速度降下来了，又没有美元转换了，财政收入速度当然要降下来。弄不好，可能出现几十亿元或者一百多亿元的赤字。所以必须压缩财政开支，首先是压经济建设开支，消费开支不能压。要搞一个紧急压缩财政开支的措施和办法，在六月份省长开会以前拿出来。将来的方向是，财政不开支搞工业建设，工业建设由银行贷款。

现在，不少地区有这样一种情况，地方拿钱去搞自己的建设，而要求上边谁出题目谁出钱。如果这样，我国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了。今后，地方首先要保证经常性费用的开支，然后再去搞建设；搞建设，又应当首先搞教育、道路、公用设施等方面的建设，然后再去搞工业项目。

流动资金，今年一至四月有很大放松，今后几个月不能笼统地放松，而要排排队，支持那些适销对路商品和效益好的企业。有些则要收紧一些，比如钢材积压很多，就应当收紧。

五、关于流通问题

流通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有些商品商业部门不收购、不进货，生产企业没有流动资金，生产遇到困难。有些积压商品，不是长线，是流通不畅，应当扩大销路。属于季节性销售的商品，要支持商业批发部门多收购一些。当然，长线的又没有销路的，不能收购。城市滞销的大量中低档商品，应当直接拿到农村去推销，避开中间环节，价格可以便宜一些，商品就容易销出去。

六、关于中外合资问题

中外合资合作企业问题要很好讨论一下。这方面存在不少毛病，国外反映很大。日本现在有大量资金要输出，我们应当搞一个比较宽松的办法，以利于多吸收他们的资金。对日本在中国办合资企业，可以在地皮、税率、服务等方面给他们以优惠条件，换取他们在外汇汇出方面给我们以优惠条件，争取他们不汇出或少汇出。

日元升值，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我们要抓紧研究，如何趁机多出口，如何多引进一些日本的资金。

今天提出的财政、信贷、价格、流通等问题，要再研究一次，在省长会议之前拿出办法来。

积极参加援外项目管理使当地人民受益*

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同扎伊尔第一国务委员肯戈会谈后，就如何搞好中国同非洲国家合作的问题对中方人员的谈话要点。

一、我方应积极参加援建项目的管理工作，把援建项目变为合营项目

扎伊尔要求把我援建的制糖联合企业改为中扎合营企业，我看可以试验。把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贷款变为我们在这个项目的入股股份，这有利于我直接参加企业管理。暂时不赚钱，也不要紧。过去我们怕干涉人家内政，不愿派人参加管理，这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态度。项目建成后就交给对方，由于他们不会经营管理，往往投产两、三年后因亏损而垮台。有时他们请别国人来管理，这实际上是我们给别人作嫁妆。我们干了许多傻事。我们参加项目管理，搞好了，外方一些项目的负责人可能因个人捞不到好处而不高兴，但受援国的领导人和人民会满意的。

今后我们援建的项目，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可以接受搞合资经营。单纯搞技术合作不行，因为在企业中没有发言权。搞合营，我们可派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进去。我主张少搞官方对官方的合作形式，争取多同民间私人搞合营。即使政局发生变化，也不至受到损失。

二、利用受援国的本国货币还款，在当地进行投资

扎伊尔这样的国家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等处得到资金，也希望我们出一些资金，去扎承包项目。我们不要指望非洲国家以外汇偿还我提供的贷款。可以接受受援国用本国货币还款，把还款在当地再投资，作为我们在合营企业的股份。要争取搞一些承包项目，承包项目赚的钱，可用在当地搞其它项目。

三、要搞可使人民直接受益的项目

在非洲援建体育场人民会高兴的。体育场是人民可以去的地方，比人民宫一类的大建筑要好。工业项目如管理不好容易背包袱。农业可以搞一些，医院、学校可以搞，这些项目使人民直接受益。

对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价格改革方案的看法*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安志文等关于经济体制总体改革思路、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意见、财政税制改革意见和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基本思路汇报时的谈话要点。

我们搞改革，一开始搞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什么扩权走到一定程度走不通了？我现在不赞成这个说法，说改革仅仅为了形成生产资料市场也不全面，改革是要形成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不创造这个条件，什么股份制，资产经营制都排不上日程。我们扩大企业自主权，受到许多外部条件限制，经营差的不一定得益少，经营好的不一定得益多。归根结底，商品生产要有商品生产的条件，条件是市场条件，市场离不开价格。计划体制改革，如不涉及市场问题、价格问题，也不行。我们的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一直到今天。我认为股份制是一个问题，但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行。华生[1]提的资产经营责任制，我听了两次，没解决问题，他也承认是逐步起作用。我们的企业占有资产多的，不一定效果好；占有资产少的，如果价格不合理，也难以负责。现在走到这一步，要改革就要考虑价格改革，考虑价格改革就有风险。想尽量少动一点，风险少一点，但矛盾又解决不了。价格改革是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最后是以放为主，时间可以拉长一点。放为主与税制如何配合起来，小步动作震动也不小，但没解决问题。

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减少计划的调拨部分，增加市场价格部分，减少指令性计划。如现在每年统配钢材二千多万吨，每年可以减少几百万吨，拿到市场上去。若干年后，每年统配只有一千万吨或一千五百万吨，统配这部分中，成为补贴的，要与国家强制订货结合起来。进入市场后，重点建设就要相应增加投资。还有最大的问题是税收如何配合？必须要限价。现在地方的材料价格是你减他不减。因此，也可以考虑另一个路子，就是把计划外的高价压下来，通过市场交易来施加影响。如果采取计划内调价的办法，会水涨船高。两个路子考虑哪个？

可不可以把计划外的价格向下降，最后达到平均价，如钢材达到每吨一千元。也可以考虑两条路子同时走，计划内统配的每年减少一百到二百万吨，计划外的要施加人为的影响，使价格向下压，经过几年压到一千二百元。

把进口钢材投进市场，也等于减少统配钢材二千万吨，这不是个小数。要有

措施，钢材涨价，减少补贴，要将所得追加一部分作为重点建设投资。中央、地方各级都进口钢材，都要补贴一点基建。

计划体制的改革证明价格不合理已冲击到各个方面。企业扩大自主权和计划体制有矛盾，我们就改革计划体制，下放计划权力。计划权力下放后又发生价格问题。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把思路理顺了。第一步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第二步下放计划权力，改革计划体制；第三步是价格改革；第四步是转变政府职能。这是内在规律，关系已弄清了，就是步子怎么走。实际是所有制和经营权分开的问题。

钢材，我看是个特殊品种，价格涨得太多，分配必然不合理。放开这部分产品价格是鼓励企业积极性，以后流向问题不管不行，放开这部分也有个市场组织方法问题，日本叫大商社。

明年粮食、饲料必须丰富内容，我主张统购再减二百亿斤，留下的一千亿斤，给柴油、化肥以及高档消费品等挂钩，保证城市居民口粮，其他都采取议价。城市口粮只能长期背，其他都放开。将来发展方向，计划内要有一定数量，工业中有一部分重要生产资料、大型设备生产要走粮食统购的路子。国家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订货，给予一系列优惠措施，供应能源，企业给国家多少设备、钢材，国家控制起来。慢慢形成一种市场价格。另一种国家订货，国家给条件，建立在经济基础上，实行指导性计划，逐步丰富内容，变成经济合同，这样国家就可掌握多少钢材、电力等等。指导性计划通过价格、通过合同实行。

有几个问题大家研究一下。

一、物价不合理的问题。现在原材料产品情况好转，加工产品相当难过，尤其是国营大工业，沿海地区工业日子难过。明年这样调价会给企业带来什么后果，究竟改革结果是初级产品日子好过，还是锦上添花？现在原材料工业情况比三年前好过多了。钢厂好过，煤矿好过，但加工工业不好过，沿海加工工业困难比较多，利润多，但税拿走了，明年要它再消化百分之二十，这个问题如何办？原因是财政收入是在原有基础上换算过来的。

二、价格改革方案好处究竟有多大。要先把这个落实，包括中方案、大方案。如果确实好处很大，那么风险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可以采取其他措施，为改革让路。不外乎基本建设两年减二百亿元来承担这个风险，换来长远利益。如果基建压两年，对五年计划影响有多大。有没有兼顾的办法，影响不一定那么大。应付风险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如果所有财政收人冻结百分之二十，也可以做到。这样做了，下文如何？如以后下文还是进行不下去，那这个方案就不行了。从这点来讲，我主张步子大一点，可立于主动地位。两年让路，以后可立于不败之地。

三、地区封锁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共同利益，不行。如何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对省里来说，不能说人民生活和它没有责任。中国很不平衡，完全要各地不干预经济不行，但现在地区分割也不行。地方也要管宏观，和全局发生矛盾时从全局着眼。要承认差别，可以有一定的干预，但是要在一定利益的基础上，搞共同市场，有共同利益就行得通。这次要走一条新路，不能按原模式集中划块，

完全按资本主义方式也不行。

价格改革一是道理要讲清楚；二是对企业要算个长期的账，算五年的，每个城市也算五年的；三是明年也要照顾一下眼前，搞光了也不行，当年不吃亏，而且多少要好一点。

物资改革包括在流通中。流通，解决地区分割，包括物资在内，劳动力流通暂时不讨论可以。

生产资料要研究指导性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只讲一个偏低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是两个扭曲，要解决两个扭曲。计划外的必须加强管理纳入指导性计划；计划内的价格要提高。大宗的生产资料要研究指导性价格，市场要有，但要有指导。经济煤开始加二十七元，这是指导性价格。有领导的市场怎么搞法要研究，一个是计划内的价格提高，一个是计划外的价格要向下压。钢材，过多少年计划外价格如只比计划内价格高百分之五十，计划价九百元，市场价一千四百元到一千五百元或一千二百元到一千三百元，这就好多了。钢材是长期紧缺商品，完全放开不行。

我们搞指令性计划的经验有，放开的经验也有，但指导性计划的办法还没有，用经济的、法律的办法，而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搞指导性计划。计划要有立才行。我们要走一个计划与市场结合的路子，就表现在指导性计划上。要使计划体制基本上转到指导性计划的基本模式，从总体上转到指导性上来，改革就是改这个。

美国是一种模式，日本是一种模式，南朝鲜又是一种模式，台湾也不是纯市场经济，新加坡也不是。

风险，要明年一年不发生问题并不十分困难，问题是后果如何？下一年怎么样？明年不涨价，后年会不会涨，还有一个经济会不会萎缩，高度控制结果，会不会带来一个萎缩问题，后劲问题。两次调价都有失控。

（安志文谈到：体改委内部对这个方案，机关里一般人都忧心忡忡，这样改究竟好处是什么，担心改不好又走上集中的体制。地方上也有看法。接触实际多的，都担心很大，改后生产资料形不成市场，觉得要慎重再议论一下。）

这个思路究竟怎么样？是不是可以重新研究一下。一是我基本赞成这个方案，而且倾向于大方案。二是如不走这条路，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可走？

研究过其他的思路，你们不是讲两个扭曲、跑漏吗？能不能把计划外商品作为指导性计划，要国家计划指导下，逐步成为指导性办法，把计划外市场价压下来。问题是放的办法，涨价部分国家收得太少，坏处是慢，好处是顺乎自然。现在确实有个问题，计划内调价小了不解决问题，我所以赞成大方案六百亿元的架子，五百亿元的方案煤不提那么高，电少提一点，但动这么大的干戈，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钢材提到九百元，但市场下不来一千五百元，两个价相当悬殊，还要相当长时间。放的办法，企业之间不均衡，这能不能改变，使生产原材料的企业计划外、计划内比例差不多，加工企业的原材料来自统配的与市场的也大体差不多。能不能再议论几天，比较一下。

哪年搞，争取明年搞。大动只能一次，不是一次到位，而是逐步达到设计能力。

价格反馈，要考虑到加工工业，现在原材料工业劲头很大，但不合理，不均等。

调计划内价格并不解决问题，调了以后差别还很大，特别是大企业。能不能做到使生产原材料企业计划内、计划外分配的数量做到均等。消耗原材料的加工企业也做到计划内、计划外分配原材料均等。这样震动就小，有没有办法调过来。（周小川[2]等认为品种太多调不过来）事实上是个均等问题，要解决生产积极性就是均等问题。现在是两种思路，一种是通过调计划内价格的思路，一种是通过解决计划内、计划外原材料均等问题来解决。计划内外实行三、七开或几几开，可以分几步解决。上海现在百分之七十是计划内的，每年减少一点，相应调整任务（周小川等认为形不成市场）。要形成市场，市场价格是最好的信息，能都放到市场价格吗？首先要控制需求，第二因势利导，放开这部分如何防止其副作用。企业均等机会可以找到，一是以大中型企业为对象；二是核定一个目标，计划内多少，计划外多少，逐渐达到。另一个均等是指令性多少，如百分之三十，有多少上市场。粮食就是三、七开。做到企业均等有没有办法解决（中青年干部认为难度比现在还大）。现在也有计划内、计划外。

要控制需求，但钢材如调到九百元，五年以内不可能解决供求问题。钢材品种是若干年内不能解决的。但不是国家急需的产品要控制。正因为如此，不调价也可以改。钢材市场怎么搞，要设计一个办法，市场进行交易，价格要有浮动价或最高限价。中国太大，没有一亿吨以上钢材很难满足需要。中国煤炭比较容易解决，一是资源丰富，二是农民可以挖，是值得乐观的。电的问题是没有放开的问题。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物资是长期紧张的，目前钢材到市场能随便买到还办不到。

调生产资料价格走什么道路值得论证。还有，是调生产资料价格还是调消费资料的价格也值得论证。搞生产资料的企业都能搞下去，搞加工工业的企业困难多值得注意。现在问题不是原材料，也不是电，而是加工工业，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去年财务大检查把企业整得很苦，检查的人很多，解决问题的人很少，尤其是沿海城市。原因是消费品不能涨价，原材料涨了价要它消化。

地区封锁像现在这样不行。我上次在流通组讲了，新疆原料不给上海，而产品又要上海的平价商品，越边远地区上海的东西越多，这样地区工业也发展不起来。如要调上海货，原材料也应给上海。当然调上海产品有个照顾民族地区的问题，但要逐年减少一些，否则这些地区自己的工业也发展不起来。

价格问题，还可以反复研究一下，如别的路走不通再回过来，基本思路再议一下，以后再讲一下。

注 释

1．华生（1953—），时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曾任北京侨联副主席，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2．周小川（1948—），江苏宜兴人。时任国家体改委委员，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历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全国省长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八日

一、下半年工作的指导方针

今年前五个月的经济情况总的来说是好的，工业发展速度基本上是正常的。在去年超高速的基础上，今年前五个月工业增长4.3%是不容易的。今年与去年不同，今年可能是上半年速度低一些，下半年速度高一些。

下半年工作怎样抓？有些省市的同志提出，下半年需要留一些时间，对已出台的改革措施，进行消化、补充和改善的工作，让各地把存在的问题理顺一下，使企业干部和职工的气更顺一些，劲更足一些，把生产搞得更好。我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们的改革是波浪式前进的，一个时期迈出重要的一步，一个时期巩固、消化一下，瞻前顾后，再迈出新的一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大家也要有精神准备，就是在当前工业增长速度不高、市场物价趋于平稳、货币回笼较好、人心比较安定的情况下，下半年让一些很需要搞、牵动又不很大的改革措施出台，这也是必要的。如劳动制度的改革，价格上某些局部的变动，银行体制某些方面的改革等，也还要搞一些。这样做，可以把改革的承受力分散一下，为明后年较大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二、调整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和消费结构问题

当前，我们的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同消费结构、市场需要不相适应。市场畅销的产品，生产能力不足；市场疲软、滞销的产品，生产能力又有余，一些商品出现积压现象。这是影响当前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下半年可能更突出。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同时进行：

第一，对生产结构、产品结构要逐步调整。对市场不需要的长线产品，要停下来，及时转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对一些本来有市场、但因为质量差而影响销路的产品，要逼一逼企业，迫使他们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在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要讲提高产品质量、改进服务态度，很难办到。现在市场比较缓和，某些产品出现滞销现象，要有意识地利用这个机会，引导企业面向市场，增强市场观念，掌握市场信息，适应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经营管

理，改进服务态度，促使企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化。这项工作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但必须逐步进行。

第二，电力、原材料，要集中保适销对路的商品。各地在生产组织、生产调度中要注意这个问题，使那些生产适销对路商品的企业得到支持。

第三，搞活流通，打开销路。当前许多大中城市滞销的商品，特别是一些大路货，是中小城镇和农村所需要的。往往是城市市场基本饱和的商品，在农村却成为畅销货。因此，下半年城市商业部门要大力组织商品到内地、到农村销售，送货下乡。广大农民以及城市中的低收入者是消费大路货的主要对象，市场的潜力很大。商业部门要创造一些新的经营形式，如工商结合、产销结合，城市和销区的批发环节联营等，打开销路，使货畅其流，满足社会的需要，促进生产的发展。

第四，引导消费，调整消费结构。解决生产结构、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不适应的矛盾，固然需要改变生产结构、产品结构，使之适应市场的需要；但同时必须引导消费，逐步调整消费结构。现在，持币、储币选购的现象很普遍。我们国家一方面现在还很穷，另一方面人们的购买力又很快转入高档消费品，形成消费的畸形发展。现在社会上流行"三双一彩"，洗衣机要双缸的，电冰箱要双门的，收录机要双卡的，电视机要彩色的，这种现象有点超前。生产和消费，都不能离开我国的现实情况，高档消费品，只能是一部分人的消费对象，而大量的应当是消费中、低档商品。我们不可能把大量生产力转向高档商品的生产上。过早地、不恰当地把人们的消费引导到高档消费品上，对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消费上出现的这些不合理现象，与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有直接的关系。引导消费也好，调整消费结构也好，最有效的经济杠杆是价格。价格上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档次差、质量差、季节差、地区差没有解决。我们的价格体系基本上还是过去产品经济的模式，产品靠调拨的办法分配，不按商品流转规律来考虑价格差价，因而阻碍商品的正常流通，刺激消费向不合理的方向发展，影响了生产。产品的档次、质量差价不拉开，高档价不高，优质不优价，就助长了人们对高档商品的消费欲望。季节差价不拉开，淡旺季价格一个样，人们就不愿意储备商品。地区差价不拉开，边远地区都靠调用上海货，地方工业也就发展不起来。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得按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规律办事。应当运用价格这个有力的工具，来引导人们的消费，推动生产的发展。

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在价格上作些小的调整，中心是把档次差价、质量差价、季节差价、地区差价以及批零差价适当拉开。在价格上作一些小的动作，也可能会引起一些震动。三十年来，我们习惯于东西不够就凭票供应，人们也适应发票证，但在国外就不行。现在，我们应当引导人们适应价格的正常变动。这需要我们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三、认真解决财政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今年从四月开始，就支大于收，五月赤字更大，如不抓紧，全年财政收支可能出现不平衡。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支出盘子大了。前几年我们的增长速度都比较高，特别是去年出现超高速度，我们的财政收入和支出都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而超高速度是不能持久的。在财政上应该是“量人为出”，但是，我们现在不少地方是倒过来了，是“量出为人”。不是考虑我们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而是首先算财政上必须多少钱，要工业上搞多少速度。这是很危险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从上到下必须明确，今后工业的发展速度，几年之内大体在7—8%以内，我们不能把财政收支押宝押在每年增长10%以上的速度上，把支出的胃口搞得很大，那是要出问题的。所以，当前在财政上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是要压缩空气，要“吃冷饮”，把胃口减下来。地方财政开支，首先要开支人头费，保吃饭，有了多余的钱，先搞基础设施和智力投资，然后有钱再办工厂。像现在这样从城市到乡村到处盖房子，修一条街，百废俱兴，是难以为继的。财政支出搞大了，又负担不起，只好向企业打主意，甚至“竭泽而渔”，那就必然会使生产萎缩，没有后劲，必然造成需求过大，物价上涨。

财政上，总的讲应当增收节支，当前重点是要压缩开支。从中央到地方，都要重新审核一下收支盘子，紧缩开支。一要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要把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控制住，把非生产性基建投资控制住。要下决心砍掉一批项目，保证重点，缩短建设周期，提高经济效益。二是要坚决纠正各级机关、团体、部门、企业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现象，刹住这股不正之风。要采取有力措施，力争实现今年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这是一件大事，各级都要抓紧。

四、继续抓一下把企业搞活的问题

把企业搞活，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新的经济体制，将是企业具有无限生机与活力的体制。我们的各项改革，都要围绕在宏观指导下如何把企业搞活来进行，要把握住这个中心环节。

去年下半年以来，加强宏观控制，解决超高速带来的问题，这是必要的。但也有一些做法，影响企业的活力。当前许多企业感到处境困难，特别是沿海大中城市的加工企业，他们的企业效益好，担负国家任务很重，但近来增长速度放慢，企业干部和职工思想有些波动。他们反映，前几年扩大企业自主权所得到的东西，不少去年又收回去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在改革过程中难于避免的，有的则是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应当而且可能解决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下半年应当通过我们的工作，使企业能够搞活。对企业面临的问题，存在的困难，要排排队，梳成辫子，分别轻重缓急，切实加以解决。总的精神，还是要坚决把中央和国务院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一系列政策落实。下半年要注意抓以下几点：

第一，要坚决制止对企业的乱摊派。现在四面八方向企业伸手的现象很突出，企业负担沉重。下半年对企业乱摊派的问题，各地应由经委、财政等部门组

织一次检查，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尽量减少企业的不合理负担。关于用提高电价的办法“集资”办电的问题，实际上是挖了中央财政，挤了企业。这个口子不能开，除经国务院批准的以外，一律停办。已筹集的资金要上交，或退回给企业。

第二，去年的财务大检查，成绩很大，应当肯定。但有的地方在某些方面也搞得苦了一点，把一些属于搞活中必需的变通办法也视为违反财经纪律处理了，因而影响了某些企业搞活。有这类问题的地区应当检查一下，少数确属不恰当的，应按有关规定酌情退回一部分。

第三，由于原材料涨价，某些行业（如纺织行业）、某些企业确实消化不了的，以及沿海大中城市的加工企业，经济效益好，创造的利润多，担负国家任务重，现在确有困难的，应当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不能使那些先进的、贡献大的行业和企业生产萎缩。方向是逐步减少调节税。除此以外，还要采取其它办法。

第四，认真解决行政性公司和主管局层层克扣企业权力的问题。现在行政性公司很多，对企业管得很死，应当实行撤并，或改为服务性的。现在不少城市建立了工业局党委，把企业的党政工作和社会工作都统统管起来。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党章规定的。作为政府的厅局，只能建立党组，它不是一级党委，不能直接管企业党委。在城市改革中，对行政性公司和工业局的改革问题，要加以研究解决，核心是人员安排问题。这应作为城市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切实抓好，把企业解放出来，使我们的企业真正具有生机和活力。

五、适当解决流动资金问题

经过前几个月的工作，目前流动资金已有所松动，但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下半年在流动资金上，要有区别地适当放宽。对那些产品有销路的企业，要支持他们发展生产。其次，对技术改造资金也不宜卡得太死，适当放宽一点，对当前生产和以后的发展都有好处。

这里要强调，解决流动资金问题必须与压缩计划外基本建设同时进行，否则，就达不到目的。现在一方面流动资金紧张，另方面计划外基本建设又急剧膨胀，不知钱是从哪里来的。下边各级对搞基本建设的劲头很大，可以说是具有全民性的。挤掉流动资金、技术改造资金，搞计划外基本建设是普遍的现象，留下这个缺口就靠银行贷款来填补。上基本建设项目时，都说自己有钱，只缺“粮票”，但一说到流动资金，就伸手要现款，这是相当普遍的情况。如果我们对计划外的基本建设不坚决压缩，增加的资金不可能真正当作流动资金用在周转上，最终还会通过各种方式流向计划外的基本建设。这件事下面也管不住。这样下去，流动资金、技术改造资金的状况不仅不能缓解，还会继续恶化。所以，下半年一定要想办法把计划外基本建设控制住，这是关系经济全局的关键问题。

六、充实、完善粮食合同制

去年取消粮食统购派购，实行定购合同制，农副产品价格放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巩固这一改革成果，不能走回头路。最重要的措施，是要不断充实粮食定购合同制，使它一年比一年完善。明年要充实粮食定购合同的经济内容。我们应当把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农民的物资集中起来，通过粮食合同，交换给农民，使种粮食的农民能从国家平价供应的生产资料中得到好处。各方面供应农民的平价商品还是不少的，捆在一起，和粮食定购合同挂钩，是可以做一些事的。国家可以按比例价收购合同任务以内的粮食，供应城市的需要；农民也可以相应得到平价的生产资料，收到实惠，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此外，明年还准备适当调减一点合同定购任务，以保证城市居民口粮的需要，合同任务以外的实行议价，使种粮农民多增加一些收入。至于工业用粮等，要逐步转为议价粮。

粮食问题一定要抓紧。小平同志最近说，不能粮食情况刚好了一、两年又紧张起来。我们既要避免粮食生产萎缩，徘徊不前；又要避免被迫提高粮价而引起轮番涨价。除了一些具备条件的地方实行"以工补农"外，从全国看，就是要抓充实合同制。如何充实合同的经济内容，通过合同促进粮食生产，有关部门要进行研究，下半年做好准备，提出方案，明年的一号文件要作出规定。

七、办好中外合营企业问题

兴办合营企业，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是我们实行开放的一项重要政策。近来国外在中外合营企业问题上意见很大，投资兴趣在减少。当然，这是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想压一下我们。但在工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要让外国人来投资，又不给人家好处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研究如何发挥我们的优势，避开我们的弱点，使外国人来投资有吸引力。外国人来中国投资，是看到我们有几个优势，主要是劳动力便宜、地皮便宜、费用便宜，另外就是羡慕中国市场大。现在由于外汇紧张，市场受到很大限制，合营企业产品在中国销售，换成外汇兑出去较为困难。加上我们技术水平差、管理落后、效率低，使外国人感到在中国投资很不方便。这样合营企业就很难办好，发展下去对我不利。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日元大幅度升值，而且今后还有上升的可能。日元升值后，日本的商品竞争力相对地削弱，许多中小企业倒闭，大财团在日本扩大生产成本高，企图转移资金到国外办厂。日本已把面临的这个问题，作为重大的经济战略提出来研究。国际市场出现的这种新情况，一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扩大出口的机会，应当乘机组织出口，占领市场；二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利用日本资金的机会，应当从大的方面研究一下合营企业的问题，采取对策，引进日本和其它国家的资金，为我所用。

综观我们的优势和弱点，我们在外汇问题上回旋余地不大，在让出市场上作

为有限，但在具有优势的其它几个方面，应当采取一些适当的政策，给合营企业以便利，吸引外国人来投资。可以分别以下情况采取措施：

第一，对合营企业产成品主要是出口的，我们要特别给予优惠。包括地皮、工资、税收、费用等都特别优待，基本上同对待国内出口企业差不太多。要用事实表明：在中国办厂出口，费用比在其他国家办厂便宜得多，具有特别高的竞争力。为此，要制定一些暂行条例和规定。

第二，合营企业的产成品主要不是出口，而是在我国销售的，如果外商的资金不拿回去，继续在我国用于再投资的，我们也给予优待。如果外商要中国产品，如煤炭等，可以采取补偿贸易或易货贸易的办法。

第三，必须给合营企业的中方代表（董事长、经理）以相应的自主权，使他们能独立负责地进行工作。这就需要离开现行的体制，给以应有的权力。

合营企业搞了几年，要总结一下。我们要认真分析一下，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弱点在什么地方，如何扬长避短。要解决揩油多、扯皮多的问题。一沾个“外”字，就想揩油，工资、费用等搞得高高的，在宏观上是不利的。我们要研究，在中国办厂如何对外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中国生产出口商品具有特别高的竞争力，使其他国家和地区都竞争不过我们。这次会后，谷牧同志还要专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

会见世界银行首任驻华代表林重庚时的谈话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赵：本来早想见见你，但一直没能安排上。今天主要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不久前，我在人代会的报告中，讲了“七五”期间改革的设想或基本构思；另外，我们考虑明年改革要迈出一大步。这些，安志文同志对你讲了。你谈了一些意见，我都看了。不仅是改革，中国经济还有些什么问题？应当怎样看？想听听你的意见。

林：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是分不开的。那天我和安主任谈了。我想，改革可以走得快一些，特别是价格改革。价格、税收、财政，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有金融改革，资金市场，外资管理。大体是这么几个方面。关于价格，一九八三年您讲过，实行双轨制，但这是过渡性措施，不能持续时间太久。从那时到现在，时间不短了。双轨制有它的优点，但是造成的问题较多，而且为其他方面的改革造成阻力。特别是物资分配，这是老体制的特点。没有什么好处，不改不行。不改，不仅影响经济，而且影响社会风气。政企不分，对一些企业分配平价物资，等于政府送钱给它。其实，为了照顾重点方面，可以采取补贴办法。

赵：石家庄有个办法，就是不论物资来自何种渠道，价格如何，统统进入市场。在石家庄市范围内，在生产资料方面，企业间互相开放。比如钢材，不直接给企业，一律进入全市统一组织的钢材市场，由各企业按各自的指标到市场上去买，如市价是一千五百元一吨，分给企业的是平价钢材，六百元一吨，企业多花的每吨九百元由市里从市场收入中补还给你。这样各企业自己的仓库里就不再大量储存了。这是开始时的办法。今年又改进了，大体上是按照钢材来的渠道、价格，企业从市场上购买吃亏多少，市里从企业上交税利中核减。

林：中国很大，有些地方会想一些办法。我认为，补贴，不应该全补。你得到的是平价物资，不补贴你吃不消，那么其他企业怎么办？因此，你要求补贴，应提出申请，经过批准。有一个问题，就是工资问题，应当在理顺价格以后放权给企业。在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工资同利润挂钩，这不合理，不是公平竞争。工人会说，企业亏了本，我也应该得奖金，因为并不是因为我干得不好。价格理顺以后，能不能挂钩，也需要研究。工人个人劳动得好坏，与企业是否盈利关系不很大，主要在于国家投资多少，市场情况如何。工人工资不应和企业利润挂

钩，但厂长的工资应当和企业利润挂钩。工资总额由国家规定，厂长有权支配厂内的分配。万一厂长如果平均分配也可以调动工人积极性，那也允许。在价格理顺的条件下，厂长的工资可以与利润挂钩，但工人的工资则应在国家规定的总额、工资增长率和最低工资这三个范围或条件下由厂长决定。

赵：工资问题还可以深入讨论一下。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工资分配走什么路子，劳动人事部还在讨论。工人的工资收入，固定工资部分占多一点好，还是奖金占多一点好？

林：工资分配是一种经营手段，没有办法一般化，厂里工资如何分配，应当由厂长确定。国家应当规定最低工资。

赵：最高工资呢？在我国，在东欧，工人工资只能提高，不能降低，主要是如何防止过高的问题。

林：国家控制了工资总额，规定了最低工资，企业内部如何分配，包括最高工资应由厂长去决定。中国明后年进行价格改革，在这期间工资应当控制。价格改革过程中，行业、企业、地区的利益会发生变化。两年内，价格改革中，把工资控制住。企业亏了，盈了，工资仍保持不变。这有利于社会安定。地方与地方，也应这样。价格改革，需要税收、财政与之配套，税收要大动。

赵：在外国，工资中是否有固定部分是主要的？干得好，年终可以拿双薪，平时可以升级。在我国，开始的时候为了调动工人积极性，实行承包制，奖金是从这里来的。

林：改革，简单地把农村的办法移到城市，这不行。两者实际上很不相同。城市改革是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不宜实行包干办法。听说冶金包了，铁路包了，港口包了，还有其他的。实际上各个都是个大的系统工程，包干把它分得一块一块的，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问题。按劳分配，在工厂，盈利与否和厂长经营有密切关系，但与工人、工种没有密切关系。

赵：包干办法，不是简单地从农村移来的。一开始，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以后就搞企业扩权，企业为了调动工人积极性，所以就搞承包、奖金。搞了以后，有个问题，就是企业的固定资产是国家的，企业工人和经营者成了利益共同体，而不是互相制约的关系。厂长应付不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奖金的压力。比如一个厂经营好，工资高，另一个厂经营不好，但工人也要求提高工资，向工资高的厂攀比。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厂长对股东负责，而不是对工人负责，工人要听厂长的。所以经营者有责任感，为工厂的长远利益着想。我和施奈德谈过，德国也有个所有权、经营权的问题，经营者为什么那么负责？当时他说德国已形成一个经理阶层，他们受聘于工厂，只有干得好，才能继续干下去，或得到其他工厂的聘请。如果他干得不好，没有人聘请，他自己就完了。

安志文：德国企业的监事会，监事会的人也是聘请一些名人担任，也有股东代表、工人代表。

赵：监事会为什么有很强的责任感？

林：监事会也有压力。工厂的股东成千上万，很分散。股东如何给监事会以

压力？是通过市场股票价格的涨跌。股票价格反映出民众对企业的评价。这是股东们间接地向经理施加压力。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一）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二）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资金市场？从中国、东欧来看，政府对企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关键在于所有权的问题没有解决。全民所有，“全民”是抽象的。实际上，中央的企业，是中央各部所有，地方管是地方所有，一放就无人所有了，变成南斯拉夫企业的状况。部门所有，地方所有，搞来搞去不行，是因为企业的所有者问题没有解决。对企业，国家用政策来保护国家利益，但是并不解决所有者问题。国家所有，政府可以搞个固定资产部，但是，这在大国也很难。法国的国营企业，所有者是财政部，但是企业的一部分股东是外来的。经理每天看股票的价格，价格一下降，就有压力。还有个国营企业委员会，每年要汇报，并在报上公布，加以评论。所以，两个方面，一个行政，一个股票市场，给经营者以压力。

赵：我们搞横向联合，也出现了这种企业，有财产所有者代表。比如江苏、常州、重庆联合办的一个企业，财产属于三方共有。

安志文：我们虽有合资、集资企业，但还不是正式的股份制。

赵：联邦德国的工会，有三百亿马克的财产，与政府是分开的。三百亿马克投入企业，变成股份。法国、英国的企业也有国营股份。我们的企业，一是变成股份制；也可以把固定资产归到国家资产部，企业经营是另外一码事。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法国政府有正式代表，而且有一定的否决权。但企业搞什么他不限制，他关心的是利润分配。

林：所有权、经营权分开，这是对的。重要的是所有权的含义、内容，一个是委任经理、厂长，一个是税后利润如何分配（分红和再投资）。把所有权交给企业不行。企业的税后利润，不是企业经营者可以决定的，不能用来增加工资，工资是成本的一部分。税后利润，一是所有者分红，一是用于再投资。所有者认为不需要投资，就把利润拿过来。一个经理的委任，一个税后特别注意的使用，不可把权放给企业。两个权，不该给部门，也不该给企业。我感到你们在下放经营权的同时，似乎有的厂把所有权也下放了。所有权放给企业，不行。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大企业可以直接管；小的，可以放开不管；中间的是大多数。

赵：中国的改革，没有一定的模式，都是从解决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入手。

林：方向比较清楚了。

赵：方向，基本构思，是明确的。剩下的是行动方案，如何到达彼岸去。

林：工人报酬应计人成本；厂长的工资应由上边定。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工资总额权不能给企业，但总额内的个人分配权应给经营者。

赵：我们的工资制度还没有定。这几年的情况是，一部分是固定工资，一部分是浮动工资。计件工资没有什么问题。不容易计件的，变成工作量，超过了，可以多得。好处是调动了工人积极性，效果明显；问题在于，这样发展下去，浮动工资部分会越来越大，两个半月，四个月，如此下去，简直可能有发展到相当于十个月、十二个月的标准工资的危险。有的人主张，中国的工资应以浮动工资

为主。但是浮动工资能升不能降，而且一线、二线工人差别较大。年轻工人在一线，浮动工资比重大，老工人相反。西方企业，固定工资是主要的，干得好可以升，干得不好可以降。企业之间，工人之间，工资水平差不多，因为有失业后备军可以调节。经营者的工资可以差别很大。中国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工资有高有低，矛盾很大。

林：中国目前没有条件实行工人工资与企业利润挂钩。一般工人的报酬，应当基本一样。没有道理的差距应当拉平。价格改革期间，工资应当不动。

赵：世界银行搞了一次金融方面的调查，我看了摘要，所提意见很好，在中国基本可行，主要是比较实在，符合实际。有些可以早搞，如利率、汇率、储备金、再贴现率、多种金融机构形式等。有些方向是对的，但要分几步走，如把建设银行变成世界银行式的投资银行。

林：资金市场，应当快点搞起来。这个很关键。金融改革要早考虑，倒不是说马上就什么都搞，但准备需要时间。

赵：逐步搞。有个资金、人才问题。我听说，南朝鲜的经济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政府干预较多。你看有什么特点？

林：南朝鲜计划搞得好。它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它和中国不同，不重视资金分配问题。大银行，对某些经营好的大集团，大量投资。这对经济增长带来了好处，但对分配、对政治带来了问题。南朝鲜的经济权利集中在大集团手里。所谓它计划好，主要是用经济杠杆干预经济搞得好。它一度利率很高，达20%，但对个别行业则用低利率贷款给予支持。用利率来引导投资是个有效办法。政府通过金融手段来干预经济，但不干预到企业。

赵：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是一种模式，南朝鲜又是一种模式。南朝鲜也曾是发展中国家，值得研究。它一个是宏观管理，一个是经济发展战略。它的外债不是大问题。

林：它对外资利用得好。

赵：它原来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政治也不稳定，军事上负担也重，人才、教育也不发达。

林：南朝鲜教育水平不错。

刘鸿儒[1]：它教育搞得不错，人才素质好，劲头大，有竞争感。

林：南朝鲜很愿意与中国交流，包括政策方面的交流。

赵：可以由世界银行出面，组织一批发展中国家包括南朝鲜在内交流交流，这样，我们可以参加。发展中国家，不主张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要有国家的干预。市场机制与计划如何结合，中国的改革方向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林：解决这个问题，银行的作用很重要。其它是次要的。银行应是多种形式的银行。

赵：好，谈到这里。谢谢！

注 释

1．刘鸿儒（1930—），吉林榆树人。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

改革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

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前南斯拉夫访问接受该国《新闻周报》总编辑米·杰基奇采访时对他提出问题的回答。

问：请总理同志谈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方针和已经取得的成就。

答：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七十年代末从农村开始的。近两年来，改革的重点已转到城市，正在三个互相密切联系的领域中展开。一是增强企业的活力。二是发展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和完善宏观调节手段，特别是发挥价值规律和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

我们认为，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必须着眼于增强企业的活力。社会主义是生机蓬勃的制度，要求企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发挥高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将是使企业能够具有充分活力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既赋予企业以大体均等的竞争条件和自负盈亏的责任，也赋予企业以自主经营的权力和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

改革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我们准备把改革的总体设想同解决一定时期经济发展中的迫切问题结合起来，根据需要和可能，分步骤地配套实施。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在步子上力求稳健，但方向是坚定不移的。

至于讲到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就，我想指出这样一点：中国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即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已经实现。在最近五年中，中国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都在百分之十左右；而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年的二十八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

第六个五年计划所以完成得比以往几个五年计划好，反映了我们采取的新的建设方针和经济政策比较符合实际，也反映了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问：经过这几年的改革，中国城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现在中国的农民和企业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独自负责？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的措施？

答：农村改革已经进行了七年。在这七年中，先后实行了从社队集体耕作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和农产品由统购统销制改为定购经济合同制或进入

市场交易的转变。第一个转变已在全国农村普遍彻底实行。第二个转变是从去年开始的，尽管目前还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充实，但也已在全国普遍实行。从根本上说，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如果说，农民过去是为完成行政指派的任务而生产，那么，现在已是为完成经济合同或直接满足市场需求而生产。正因为如此，所以农村经济空前活跃，农民积极性也空前高涨。

在过去的五年中，农业总产值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十一的速度持续增长，农村人均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则达到百分之十四。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谈到城市改革，许多外国观察家往往首先注意到中国个体经济的出现。确实，现在全国城镇已有四百五十万劳动者在从事个体经济，他们在拾遗补缺方面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毕竟是很小的：在工业总产值中不到百分之一，在零售商业和服务行业的营业额中则占百分之十五。因此，我们对公有制企业所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才是近几年来城市经济日益活跃的决定因素。我们采取的主要的措施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削弱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减少指令性计划部分，扩大指导性计划部分，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放开对各种小商品的价格管制，允许计划外的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市场上自由成交，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初步改为纳税的制度，把对企业基本建设拨款的制度初步改为由银行贷款的制度，打破地区间、部门间的封锁，为企业之间在资金、技术、生产、流通等各方面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创造条件等等。

现在公有制的小企业放得比较活，相形之下，公有制的大企业还缺乏应有的活力，这是我们正在继续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微观放活和宏观控制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不宜偏废。国家对企业的关系，将由直接控制为主逐步过渡到间接控制为主。

问：为什么中国要同外国伙伴搞合资经营？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中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哪些形式？

答：现在中国已有二千五百多家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还有三千八百家同类企业正在筹办。允许和鼓励国外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闭关锁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利用外资方面，我们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为了给国外投资者以更大的方便和利益，中国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十四个开放城市，和一些开放地带。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其他地方不对外开放。当然，由于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是中国经济发达、交通方便的地区，加以手续较为简化，政策更加优惠，因此，上述二千多个有外国投资的企业，百分之八十分布在沿海地区。

在中国办厂，诚然有一些不方便的条件，但中国工资低，费用低，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对外资有很大的吸引力。过去我们没有充分利用这种可能性。最近，我们正在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准备给国外投资者以更多的优惠。在新的政策逐步形成和付诸实施以后，外国商界的朋友们将会发现，在中国办企业确实是

具有竞争力的。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面向全世界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我们对外经济合作的领域，不限于使用国外资金，也十分重视国际贸易和科技合作。凡是国际上通行的经济技术合作形式，中国都愿加以采用。

问：中国的改革在国内外是否有阻力？

答：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传统观念，习惯势力，官僚主义，是改革的阻力。但是，既然绝大多数人民都从改革中已经得到并正在继续得到看得见的利益，而且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旧体制阻碍着我们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提高和国家的富裕，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是得到全社会支持的事业。某些人，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一时不太理解，不太适应，但最后终究是能够理解和适应的。

我想指出，在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中，在坚持改革方向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大家的认识没有分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一致通过的。

至于国外，我很高兴，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解和同情中国改革的同志和朋友越来越多。如果说阻力，我们把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看成是对中国改革的阻力。因此，我们决心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为反对战争、维持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努力。

问：中国是否正在考虑改革政治制度？

答：近几年来，我们已经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后将继续这样做下去。

我们有一条方针，叫做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说，人们的精神境界、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应该既能适应于改革和开放的新形势，又能防止和抵制在新形势下可能出现的新问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政府的职能将有所转变，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也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就不可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问：中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迄今的改革尝试是如何评价的？可能的话，请您谈谈对南斯拉夫改革的看法。

答：近几年来，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掀起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流。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我希望所有这些国家的改革，都能够达到造福于人民的目的。

南斯拉夫是改革的先驱。三十多年来，在铁托同志的倡导下，南斯拉夫人民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改革，中国人民对此表示钦佩。中南两国，历史背景，民族传统，地理位置，并不相同，两国的改革当然也各具自己的特色。这反映了我们两国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共同信念。中国人民对南斯拉夫改革的成就感到鼓舞，从南斯拉夫改革的经验中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发。

天津要走发展外向型轻加工经济的路子*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天津市委、市政府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

要继续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

刚才听了你们今年财政任务承包的办法，我看这个做法还不同于税后承包，等于还是向企业下达财政任务。你们今年临时实行这种办法是可以的，如果长期实行，又会回到老路上去，又成了国家年年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下达财政任务，只是超产的多留一些。这样，究竟明年、后年怎么样，企业自己就没有个底。我记得你们一九八三年这样搞过一次，任务分不下去，最后来个包干就搞下去了。北京也搞过，辽宁也搞过。前两年，我们搞利改税时有个想法，一开始想只搞一个所得税，税率都差不多。由于各企业利润悬殊过大，利润水平低的企业加不上去，利润高的企业国家一下子让一大块，国家财政吃不消，因此倒算过来搞了个调节税。调节税从设计的那一天开始，就明确了一条，就是逐步减少，直至最后取消，目标是要最后取消调节税。这两年每年都在减，但沿海城市特别像上海这样的地方调节税的尾巴可能拖得稍长一些，因为它原来的利润比较高。像内地，一开始设计就没有什么调节税，因为它原来利润就比较低。调节税是个尾巴，是个遗留问题，将来要过渡到企业交了产品税、所得税就行了。

一九八一年全国搞了经济责任制，就是实行财政包干。我还曾经讲是不是把它作为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后来感觉到，这种办法是有效的，但是暂时的，靠这种办法走不出一条新路来。包上几年以后副作用就来了，就是原有既得利益保住保不住的问题。今年包好了，明年再搞些新的东西，可三年以后，到一定水平它上不去了，利益也就保不住了。职工到手的东西你给他降下来，很难，吃不消。这就发生了环比还是定比的问题。总的一句话，这个办法暂时的作用是有的，但它走不出一条新路。这样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按田纪云同志的话说，很难走上一条规范化的道路。我们国家改革总的一个方向是企业要变成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要有一种长期稳定的形式。

瑞环[1]同志说要加大地方政府对盈亏悬殊企业的调节能力，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个税制设计以后，通过调节税，或者所得税减少一点，增加一点机动的

余地，增加一些地方上的调节手段。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在税制上也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原来考虑国家与企业统统变成税收形式，不搞利润，现在看我们国家完全是税收的形式也不允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将来所有制要发生变化。有一些是国家直接投资，有一些资金是企业自筹，有一些企业是到另外一家企业投资。可我们搞的是利改税，利变为税，它的税要统统交给当地政府，这就发生了一个投资者的利益问题。现在我国的税收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因为我们是把红利变为税收，我们的所得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一样，我们是除企业留一点外基本上国家都拿走了，资本主义国家则是交了所得税后仍然有百分之十几的利润率。因此，我们这里就产生了税前还贷还是税后还贷的问题。将来我们的国营企业里边资金来源有一部分要采取股份形式。比如说中央和地方合营，一部分是地方的资金，一部分是中央的资金。还有一种是跨省市的联营，现在主要是分产品，这是因为有些物资还比较紧张，有些产品可能实际价格比较高，通过分产品可以得到一定的利益。一旦以后物资不紧张了，它对分产品就没兴趣了。比如煤炭、玻璃，这方面的联营对分产品就没多大兴趣了。所以分产品是一时性的，将来分产品没意义了，投资者的利益怎么体现？我们实行企业扩权，企业的资金势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投资，包括原来国家投资转为固定资产的部分；另一部分是企业自己发展积累的部分，如果在税收上完全没有区别的话，也不大合理。所以，将来在税收上要考虑到两部分资金的区别。比如，将来是不是要把固定资产和资金分一分，国家投资的部分产生的利润作为税收，要高一些；另外那部分产生的利润，税率就不能高，因为它要有一部分作为红利分配，这样对鼓励企业用自有资金发展生产，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会有好处。总的来讲，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在当前税收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需要一些补充的办法，你们刚才讲的就属于这类。作为一种过渡的办法不要给这个总的方向造成障碍，不要影响税收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税收制度还要进一步完善。

要鼓励出口企业重视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我还要讲一点，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不仅是就天津来讲，沿海大城市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样的投资用在哪里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益。比如用在市政建设我完全赞成，但是如果搞很多大的消耗能源的项目，一上去，马上电的消耗就要增加，还需要新的投资。如果我们不搞这些东西，把电力用在刚才讲的那类工业上去，投资就省多了。沿海城市完全应当这样考虑，这样做就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另外我考虑，作为沿海城市，总有那么几个因素制约着，如果搞消耗原材料很多、消耗能源很多、消耗水很多的项目不行，特别是北方城市。水的问题天津也应该从长远来考虑。华北这些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解决水的问题还没有很多很好的办法，万里同志也是这个观点。现在引滦工程刚结束，天津暂时还可以缓和了一点，将来海水淡化，实行循环用水，这都可以。但是总的来讲，像天津、

青岛、大连这样的城市，依靠南水北调究竟能不能搞，哪一年能搞，能调多少水来，不能打得太满。水的问题要不留点余地，将来这个地方可能是很难混的。因此，我觉得，要发挥沿海城市的优势还是在“活”字上多做点文章，少搞一些大量消耗能源、消耗水的大项目，大项目摆得越多，基础设施压力越大。当然，从一个城市来讲有很多大项目那是好的，但是真正从产值、从收入、从人民富裕、从效益看，大项目在沿海城市不见得是己之所长。这并不是说不搞上面讲的那一类项目就不能把城市搞得非常繁荣。香港发展为什么那么快，它靠什么，当然现在也搞了一些钢铁厂，但一开始不是。台湾也是这样，新加坡更是这样。所以沿海还是要从自己的特点出发，华北还有个水的制约，现在水的情况不像原来说的那么糟糕，但是从长远来讲，从本世纪末、下世纪来看，解决天津水的问题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地下水、地面水就那么个情况，南水北调也不能指望太大。上海也不是说要搞多少新的基础设施，而是要还老账，老账不适当还一下，搞别的很难上去。

关于利用外资问题，总的讲，我有这样一些看法：第一，我们必须利用外资；第二，我们利用外资的关键在于用得是否得当；第三，总的额度必须有一个限制。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利用外资，不用不行；利用外资风险的大或小，关键是用得是否得当；要有对策，必须有一个总的额度，总额度不能过多。我所说的利用外资的总额度不能过多，不是说多少年累计起来，而是说借款余额总的加起来不能超过多少。总额度应是多少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是必须有这样一个东西。外国人有个说法，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数量，占出口创汇的百分之十五是一个安全线，超过百分之十五，各金融机构就比较警惕了。最近世界银行已经发了一个信号，对我们国家不很有利，说中国的外债余额已经达到四百亿美元，超过了警戒线。他们这个统计结果是怎么来的我们弄不清楚，可能把所有合营企业的资产都算作外债了，而我们算只有二百多亿美元。总之，对中国承受外债的能力，借款余额总的达到多少，不能超过多少，我们要考虑。余额的数量一下子恐怕也算不那么清楚，这个问题还带有探索的性质，但一开始不宜定得过高，如果达到这个余额后比较安全，可再扩大一些，一开始就定很高，万一出了风险问题就很大。现在世界上对这个问题议论不一，我们中国对此议论也不一。像东欧国家，比如罗马尼亚，它就完全否定利用外资。这次我到罗马尼亚，他们讲第一我们再用三年咬紧牙关，把全部债务还清；第二以后永远不再借外债。南斯拉夫也在集中力量还外债，认为以前最大的失误是借外债过多。但我问他们总理米库里奇，对以前南斯拉夫借外债究竟怎么看，他说，总而言之，外债如果用于生产，而且确实是经济的，没有浪费，用的得当，不可怕；如果外债用于消费，一分钱也不敢用。所以我觉得，第一，根据我们国家的情况，究竟用多少外汇，第一步安全线划在什么地方要考虑；第二，一开始设安全线，不能搞得过高，因为有很多未知数还不清楚，在国际金融方面我们的本事不是很大。比如日元贷款这个问题，三年以前谁也没想到，两年以前我看也没想到，人民币与日元的比值从一比二百四一下涨到一比一百五日元，一下子升值这么多。日元升值使我们原来的欠款都

要加，而且加很多，中国的日元借贷包括从国际银行借的基金，原来利息很优惠，现在都相当高。国际上商业贷款的利息究竟是往上涨还是往下降，我们掌握不准。有时碰上个好机会占个便宜，这当然很好，但如果碰上许多不利因素，就会增加许多困难。因此，设计安全线还要谨慎一些。国际上是有妖风的，你的情况，名誉好的时候，大家拼命给你吹，说你怎么怎么好；忽而风向一变，遇到很糟糕的事，他拼命给你扩大，我们要防止将来出现这股妖风。像石油这个问题，我们谁能想到。当然，石油到底怎么样我们还要看，早几年凡是用借款搞了石油的现在都觉得不好办，不得了啊！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债务简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有一条，拉美国家与美国及美国银行的关系千丝万缕，债多了不发愁，他们之间有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主要是美国利用他们，他们是在这么一种关系下债多不发愁，而中国则不行。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太谨慎了不行，但借外债的数量要有个安全线，即使发生了风险也不至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影响，有回旋的余地。如果定安全线时押宝，建立在完全乐观的估计上，一旦发生问题，回旋余地就很小，这恐怕对国家政治、经济影响都比较大。

企业工资要逐步与企业管理水平和职工素质挂钩

我们主要不在于通过提高自动化水平来提高劳动效率，而在于向合资企业学习，使每一个工人紧紧张张地工作，严格质量、工艺和操作规程，只要能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工厂的质量、效率就都能上去。我考虑我们将来怎么能够把工资同工厂的效率挂一挂钩，有计划地搞一批工厂，开始可以少一些，只要进来的工人素质比较高，工资可以适当高一点，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我看没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慢慢走这条路。我们的工人总是这么点工资也不是办法，但是像目前这样，要提高大家都提高，工作还是懒洋洋的，这也不行。南斯拉夫搞了这么多年，到今天这仍是他们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他们说，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使广大工人的生活、福利建筑在他所付出的劳动上？而不是少干活，多消费。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弊病是这个问题没解决好。

在我们国家在各方面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工人的工资完全同企业的利润挂钩，这里边有很大的问题。比如第二汽车制造厂，同样搞承包制，汽车一滞销立刻就不行了，上交利润更不行，国家还得救它。我在考虑这个问题，工人的工资一定得和工厂的管理水平结合起来，再一个就是素质。管理严的企业，工人的素质比别的企业高，这里的工人工资可以高一些，一批批地扩大。小平同志讲一部分企业收入可以高一些。这个企业的面貌应当明显地与其它企业不同。将来百分之八十的企业都变成这样的企业了，对我们国家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工资上去了，质量、产量也得上去。如果其它方面没有要求，工资只同利润挂钩不行，因为利润非常不稳定。突然发点大财，然后突然降下来，工人的工资马上也会降下来，不降不行，又保护不了。在现有条件下，存在很多不可比的、不平等的、机会不均等的情况，工资完全同利润挂钩不行。而实行上述办法会搞出一批好企

业，同时能培养一批好职工。我赞成这样试试，开始可以少搞，逐渐扩大。这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付出的劳动数量多、质量高，收入就可以高。

沿海工业要努力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

最近我脑子里想这么个问题，我国沿海地区过去是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原材料发展起来的。现在看，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工资搞得很高，原材料价格也提得很高，那么整个沿海地区工业甚至会变得大量亏损。这就要我们明确一个观点，在中国这个国家，劳务费用和初级产品价格都不能搞得很高。不如此，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就没有竞争力，就不可能出口。另一方面，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是原材料价格一定会提高，劳务费用也要提高。因此就发生了一个沿海工业消化能力的问题。即使我们的原材料价格不提那么高，不向国际市场靠拢，劳务费用也不向国际市场靠拢，但总要有所提高。这几年原材料价格实际上是在提高，劳务费用也在提高，当然接受新加坡的教训，我们不能提得那么高。总之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沿海的多数工业企业消化能力都比较低。为什么沿海工业这一两年效益低，我看归根结底是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而销售价格又不能大动，大动了就是轮番提价。沿海工业的消化能力不高，主要是技术水平、设备不行。资本主义企业为什么可以吃那么贵的原材料？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管理。因此，沿海工业的技术改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是管理问题。香港、台湾、南朝鲜的劳务费用比我们高得多，原材料也比我们贵，可他们的产品比我们的竞争力大得多。什么原因？归根结底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威讲了一篇话，我最近重读了一遍。对改革他只表示了一种决心，改革的内容他还很模糊、很抽象，我们接触了的问题好多他还没提出来，但是，他对技术落后、产品落后的问题讲得非常具体。他们下了这样一个决心：所有在建项目只要是原来的设备一律停止。我看这个决心下得很好。他很反对新厂子采用老设备、老的技术水平。解决我们沿海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我认为一是技术改造，一是改善管理。

总起来说，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沿海工业的消化能力不可能提高得太快，因此我们的原材料、劳务价格不能一下子提得太高和国际搞平衡；另一方面，原材料价格的提高已经是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价格再这么低，内地不干，它自己搞，你还是没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在这种形势的迫使下，沿海工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提高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沿海工业出现衰落。当然不可能都这样，我们也不希望这样。

沿海要走开放型、外向型、轻加工型经济的路子

沿海工业要向开放型、外向型、轻加工型发展。我国出口各方面的潜力不

小，比如煤炭、农产品、食品等。但在一定时间内，我看潜力比较大的还是轻纺工业包括一些轻加工、零部件加工。我现在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同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竞争，确实有许多条件不具备，当然也不是说一点条件也不具备。但为什么同台湾、同香港比也差那么多？南朝鲜、台湾、香港基本上都是出口轻纺工业和轻加工产品，我们为什么不行？我想除了外贸和体制上的问题外，主要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差、档次低。我们轻纺产品出口从数量上发展有很大困难，它有一个贸易保护和配额，同我们国内的消费也有矛盾，把东西都挤出去也不行，这么多人口还要用啊！如果我们真正提高轻纺产品档次，应该说这比搞其他方面容易得多，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同台湾、香港、南朝鲜的差距不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把档次提高到南朝鲜的水平，在国际市场上就把它代替了。要逼南朝鲜再上个台阶，让它感到再不转变也不行了。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步，那就意味着这方面的国际市场继续让南朝鲜、台湾占领。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合营办厂；一个途径就是请国外懂得国际市场情况、有国际消费观念的人来当厂长。我们总要想一个办法，把台湾和南朝鲜的市场挤掉一大块。如果我们出口产品的质量搞到台湾、南朝鲜的水平，价格又比他们低，就可以同他们竞争。我总觉得这个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解决起来要容易一些。要开发一个资源总得五、六年，作为沿海城市还得靠进口原材料搞出口，当然我们内地有资源也可以用了。这个观点我一九八一年在这里讲过，我说中国从总体来讲不能搞外向型的经济、出口型的经济，但是，我们沿海城市确实应该发挥这个优势，有进有出。像香港、台湾、新加坡、南朝鲜都是这种类型，既没原材料，又没市场，他们就是这样搞，有进有出。这四个地方除了南朝鲜以外大多是华人。如果我们沿海城市搞这样的经济型，投资少、见效快，经济效益也一定好，这样搞沿海就活了。当然这需要给一些政策。沿海企业如果能像合资企业那样一批一批去搞，技术搞上去了，管理也搞上去了，出口产品的质量也提高了，工人生活也好了。这样搞也需要搞很多基础设施，需要搞许多条件，但比较来看投资需要少一些。

我想，中国的东部沿海、中部、西部需要适当分工。所谓适当分工，沿海要搞成完全开放型的经济、外向型的经济，同时是轻加工型经济，当然也要有一些重工业，也要搞一些跟踪世界水平的新的先进的技术。这样一来，沿海恐怕还要大量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掉头转向快。现在有一个很可喜的现象，全国乡镇企业一年创汇达到四十亿美元，大量在沿海这一带。南朝鲜就是走中小企业的路子，是不是它走过的路子我们不能再走呢？恰恰相反，它这个路子已经走不通了，我们却能适应形势走下去。西部一下还跟不上，主要搞点农牧业、手工业。中部地区需要开发点资源，一方面支持沿海，另一方面自己也需要。这样就是让沿海搞得更活一些，发展更快一些，利用外资权力更大一些，还包括出口贸易搞得更活一些。同时，也要让中西部地区有个奔头，各得其所。当然各类型经济有相互交叉和渗透，但总的说沿海工业结构应该轻一些。沿海大体上能不能按这个思路来发展。

你们前几天提出来的那个思路，总的来讲我是赞成的。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是

在梯度发展。当然有些话没那么讲，不能讲得太突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呼声都有。西部的呼声就是讲沿海已经那么活了，我们也要活，机会应均等。另一种说法是我们条件不方便，应该对我们优惠些嘛。沿海的条件已经很方便了，你们还给他们那么多优惠。中央从整个布局上始终认为，东部如果不发展起来，中、西部就很难发展起来，但是太绝对也不行。沿海条件好的地方应该发展得快一些，小平同志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天津这个地方，我认为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应该更放手，我们回去研究一下独资企业的批准权限问题。你们这里盐碱地很多，现在开发了三平方公里，以后还有几十平方公里，一批批地来，一批批地搞基础设施。在独资企业方面，我们至少可以把上海、天津这两个地方放开，还有大连。我主张放开，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一样对待，不必要搞得更严一些。我认为这没什么危险。而且你们有开发区这么个地方，矛盾比较少，不外乎是消耗一些电，搞一些运输、服务设施。如果给你们天津这么一个政策，就可以引进来一大批外资嘛！当然最后还以文件为准。

围绕刚才我讲的想法，我赞成给天津定一个数额，由你们利用外资，主要用于我上面讲的那些方面，轻纺、轻加工、技术改造。你们列出具体项目，搞出可行性研究，到北京研究一次，如果能定下来，下一步就不干预了，怎么谈、怎么改中央就不干预了，但总盘子要到北京去定。不讲年限，只讲你搞什么事情，大致用多少钱，不讲“七五”用多少，“八五”用多少，就是讲一批项目得用多少钱。如果你执行得很好，过两、三年我们还可以再谈一次，再定一个计划。一边走一边看。这个权力可以给你们。比如第一批提十五亿美元的计划，不是说只这么多，这是计划外的、你们自己偿还的十五亿美元的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到北京还要议。在上海时，他们讲的摊子也很大，讲来讲去通不过，后来通过了那么个东西。你们的计划，应该主要围绕扩大出口，围绕提高轻纺工业出口产品质量，还可以办合资企业，办合资企业也可以借外债。至于三百万吨钢铁厂问题另议，原来在这个事上我是点了头的，后来他们没有把天津列进去，不知为什么，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考虑。现在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们能找到二手设备，确实条件比较优越，我想可以考虑单列项目。你们先物色一个二手设备的对象。找对象要注意，现在外商纷纷传中国人要借钱搞钢铁，价钱会上去。国务院最近发了文件不让单独同外商接触了，你们可以直接接触，但要在抓钢铁的那个小组挂个号。最后你们找到的二手设备如果价钱合适，与老厂改建扩建差不多，我想是没理由不同意的。如果你们这十五亿美元搞得好，还可以再增加。但是，我不赞成在天津搞那么多消耗能源的大项目。如果那样的话，势必要搞好多能源，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我所以不同意这样搞，是因为国家有几个大的、节约外汇的项目必须要搞。第一个就是钢铁，钢铁包括电、交通配套要一百多亿美元。这个问题还不大，因为我们要进口那么多钢材嘛。第二个是石化，现在我们每年进口石化产品三十亿美元，进口原料再出口要五十亿美元。如果我们在石化方面，首先是原料厂，能够填平补齐，扩大能力，深加工，那我们就可以节省二十亿美元。原来我们主要是出口原油、进口石化产品，那时原油价格比较好，看来以后这样不一定合算。

第三个是有色金属，我们每年进口的有色金属大体要八亿美元。通过利用外资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它搞起来减少进口。从全国来讲，借外资搞进口替代。这个账算下来就需二百多亿美元。这个是原来“七五”计划没有的。方针已经定了，正在具体搞，而这些项目很难说一定要摆在沿海或摆到内地，要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定。这当然还是些初步的想法。这个想法还远远达不到你们想的那个程度，但路子是一致的。你们那个想法还可以继续讨论。我想现在这样考虑较为稳妥。你们包括基础设施、电厂，加上轻纺，总数做一个十五亿美元的计划。可以用一点外资搞基础设施，把外资换成人民币，把外汇用在必须用外汇的那些项目上，像上海那样搞综合还汇。钢铁厂的问题另议，不包括在十五亿美元里。当然，大项目原则同不同意，最后还得到北京再议。定了之后权力可以交给你们，我们不干预了。

天津这几年变化很大，工作做得很好，有很大起色。以前我就讲过，天津这样的城市不帮一帮，位置会下降。但你们比上海好多了，首都嘛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讲的基础设施问题可以提出一个盘子嘛，十五亿美元做个计划，到北京去议，议的结果可能是完全同意，可能是部分不同意，也有可能全部推翻。当然，我相信，小平同志已经说了话，全部推翻大概不至于。反正是这样的，政策和上海一样。你提十五亿美元可能砍掉一些，但是不排除这一批你执行得好将来还可以再批项目。我主张按项目，全部投资多少，至于每年多少再算，项目快时间就短，项目慢就长，这批计划执行得比较好，然后还可以再批十亿美元给你们，小配套，行就再批，不行就停步，风险不会太大，不至于造成最后下不来台，这样留有余地嘛。我之所以同意天津搞，是建筑在对天津有很大的信心上，天津的工作效率是好的，工作抓得很有成效。我这次来天津看，你们的市政建设搞得不错，你们有很多窍门。你们城市建设这一套究竟怎么样推广，这件事很复杂，要好好研究一下。又是规划设计，又是综合开发，又是义务劳动，又是民心民意等，很复杂。大家都说好，而学起来很难，容易走样。

注 释

1．李瑞环（1934—），天津宝坻人。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曾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市总工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主席。

进一步发挥沿海城市的作用*

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青岛市听取市委汇报时的讲话。

你们要求与大连有相同的权限，这个要求，我看是有道理的。青岛这样的城市，在我们国家不多。大连很重要，在辽东半岛，你们在胶东半岛嘛。（梁步庭[1]：我们记录在案。）当然，能不能马上实现，得回去具体研究一下。

现在看，企业与外贸系统联合，好像矛盾少一点。你们“青纺联”是一种形式，天津还有一个“津纺联”，都碰到类似的问题。不过，你们“青纺联”比他们放得还宽一点，有两纱、两布，还有一定配额，但也有出口退税、补贴、配额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种形式，外贸企业与工厂联合。“青纺联”与纺织局是什么关系？（刘鹏[2]：一身二任。）现在的矛盾焦点就在这里。“青纺联”归工业口，纺织局办外贸，因此外贸公司就歧视你，因为你是工业嘛。但是由外贸来搞呢？工业就感到非常被动。所以要研究一下，“青纺联”能不能成为企业的联合，与纺织局脱钩。我在天津讲了这个意见，他们都赞成。天津外贸纺织品公司讲了个意见，我觉得有道理。他们说：不是要竞争嘛？你搞了个“津纺联”，我如果不卡你，还有什么办法跟你竞争？因为你纺织局是后台老板。天津这个意见，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如何真正把“青纺联”变成一个纺织企业的联合出口组织。归口到哪里呢？我的意见，可以归口到外经委，既不归到外贸公司，也不归到纺织局，反正是个试点嘛。不然，联合的厂子越多，矛盾就越大。山东外贸纺织品公司设在青岛，你们纺织局自己又搞了个出口公司，他们当然要卡你，因为你也是条条，也不是企业的联合。如果纺织局作为后台，纺织企业就要归他管，现在政企又没分开，但是外贸很多权力又在外贸公司那里，什么配额等等，都在他们那里。他们卡你，纺织局就利用自己的行政领导权力卡他们，结果就互相卡。如果“青纺联”成为一个完全的企业联合，与纺织局脱钩，这样，同外贸的关系就可以改善。

青岛市计划单列问题，如果作为像南京、成都这样的模式，省里自己就可以解决，中央不持异议，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作为正式计划单列，你们省市如果有共同意见，可以考虑。（李昌安：省里同意。梁步庭：我们已经报过。）原来有个意见，先搞那么多，各地都想搞，也不再增加了。但青岛市确实有些情况，正像你们讲的，又是沿海城市，又是开放城市，又是比较大的城市，可以考虑。你们可以搞个具体意见。这就是说，你们有两个问题，我认为基本上

可以考虑。一个是赋予同大连相当的权限，向大连看齐，学大连嘛；第二个，计划单列问题，也可以考虑，回去商量一下。你们省、市要提出一个具体意见。像青岛这样的开放城市，无论是历史地位，还是现在的地位，在全国不多嘛。但我估计，将来计划单列也好，还是在省里单列也好，都有个财政问题。广州计划是单列的，财政就没有完全单列，没有像武汉、重庆那个办法搞。将来计划单列，基数怎么划，有个山东省的问题，因为它的财政主要靠青岛。我估计可能要降一下基数，照顾省，这有个财政部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如果中央原则上认为还可以再增加一个计划单列城市的话，你们提个具体意见到北京去谈。

我这次来，一是过去没到过青岛，来看一看；二是有些问题谈一谈，请大家考虑。总的题目是，如何进一步发挥沿海城市的作用问题。我们的沿海城市，过去一般都是搞加工业，不少城市是搞轻纺工业，主要是轻纺出口。过去，沿海城市的特点，就是靠工资比较低，特别是原材料价格比较低，因此，利润就比较高。过去国家积累也主要是靠沿海城市。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有些变化，工资有些提高，今后还会提高；原材料价格首先是农副产品价格提高了，今后也还会有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将来都会提高。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沿海城市消化能力的问题。沿海城市，特别是过去以加工业为主的城市，对工资和原材料价格的提高，有个消化能力问题，表现在工业利润下降，特别是纺织工业利润下降。说起来，我们这个国家的工资就是再提高，还是低工资；原材料价格再提高，也还是低廉的。但是，我们国家已经很快就发生了一个沿海工业负担不起的问题。你们这里的情况好像稍好一些，这与你们省里去年对纺织行业采取的政策有关系，所以消化能力强一些，但是从整个纺织行业来讲，棉花提价以后，利润大大减少，因为布的价格不能提高。这就是说，我们沿海城市，特别是一些加工企业，虽然原材料价格不算很高，产品的价格不算很低，但已经发生了一个消化不了的问题。如果沿海工业不提高消化能力，将来会越来越困难。如何提高沿海城市的消化能力，直接涉及到将来沿海城市的活力问题和企业的活力问题。为什么我们原材料价格比较低，工资也比较低，但就是消化不了呢？从根本上讲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差、装备差、产品质量差，因而产品卖不出好价钱，这就属于技术改造这个范围了；另一方面，是管理问题，在我们国家这个问题比较大。特别是同南朝鲜、台湾、香港比起来，他们的工资比我们高得多，原材料价格也高得多，但他们产品的竞争力比我们强得多。这除了设备、技术外，管理是个很大的原因，也就是我们劳动生产率太低。虽然工资低，但劳动生产率也低。不要说现在我们的国营企业，就是合资企业，我们的整个劳动工资，也就是劳务费，只相当于香港的四分之一，比台湾和南朝鲜也低得多。我们合资企业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却赶不上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在那些地方办的合资企业，竞争不过他们在南朝鲜、台湾、香港办的厂。照他们的说法，就是我们的职工队伍素质太差，劳动生产率太低，他们觉得在中国办企业成本还是比较高的。至于我们的国营企业，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我们的国营企业比我们的合资企业效率还要低。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沿海城市主要是向外向型发展的问题。我们整个国家不能成为外向型经济，但我们沿海城市将来要逐渐地变成这样一种经济，出口产品比例要增加，原材料要从国外来。过去，我们沿海城市的原材料主要靠内地，当然将来还要尽量靠内地提供，但相当一些材料要从国外来。实际上，这些年也是按这个方向发展的。台湾、南朝鲜、香港、新加坡，都是这样。他们没有原料，也没有市场，原料靠外进，产品靠外销。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特别是轻纺工业，设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不像高档的重、化工设备，就是进口也花不了很多钱，有些我们国家也不是说不可以制造；就是在技术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沿海城市为什么不可以同南朝鲜、台湾的同类工业比一比？我们的差距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台湾，一年有一百几十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它的原料是进口的，产品出口，南朝鲜、香港都是这样。他们的技术、设备，都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这有个外贸体制问题，但也不单纯是这个问题。我们要找一下差距，哪些方面可以赶上他们？我们应当解决一些什么问题？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南朝鲜、台湾过去走过这么一段，现在走不下去了，新加坡已经走不下去了，因为他们工资高了。我们现在还有这种条件，有这种可能。如果我们能够跟上去，就可能把他们那个档次代替了，他们的市场我们就可以占领。当然，他们可以再往前走一步，搞技术密集型的，等等。如果我们这一段上不去，这个市场就继续被他们占领。本来我们可以有很高的竞争力，因为他们过去也是搞劳动密集型产品，靠劳务费用低，当然又有相当的技术。我们能不能挤他们这个市场？除政治方面的因素外，我们能不能挤这个市场？我们的困难在什么地方？他们的产品水平也不是很高。我们沿海这么一个广阔的地带，从广州，中间一个上海、青岛、天津到大连，我们为什么赶不上一个台湾、一个南朝鲜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想一想。从全国来讲，当然我们腹地的交通不方便，我们是个大陆国家，但作为沿海地带，我们这么一片地方，为什么不可以同他们竞争？这个问题很值得想一想。如果同他们竞争，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这里，一是设备、技术问题；二是管理问题，也就是劳动生产率、职工素质问题，这涉及到很多企业内部的机制问题、权限问题；三是外贸体制问题，如产销结合、信息等等。

我们同自己的过去比，同内地比，有很大进步。目前，要同美国比，同欧洲一些国家比，那是没法比的。但是，从沿海的经济结构、类型来看，南朝鲜、台湾能做到的，他们似乎同我们的距离并不太大，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到。一时做不到，可以经过些努力做到。这个问题作为题目提出来，请大家考虑，准备再找个机会座谈座谈。

注 释

1．梁步庭（1921—），山东微山人。时任山东省委书记，曾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农办副主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顾委主任。

2．刘鹏（1924—），山东曲阜人。时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任山东省副省

长、省顾委副主任。

关于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六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

* 这是赵紫阳1986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在天津、山东、北京等地几次讲话的综合摘要。

一、消化能力和竞争能力

这是两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现在是提到沿海地区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了。

最近几年，职工工资和原材料价格逐步有所提高，虽说比国际市场的水平低得多，沿海地区许多企业已感到消化不了，集中表现为工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

过去，我国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很快，国家的积累也主要靠它们。但是必须看到，这是以很低的工资和非常廉价的原材料为条件的。这两个条件，把那些经济效益不高的企业的真实面貌掩盖起来了，似乎凑凑合合也还混得下去。现在这两个条件已经并将继续起变化。职工工资不可能老是那么低，原材料也不可能老是那么便宜。当然，即使在多少年后，我们的工资水平和那些资源丰富的原材料的价格水平，同国际市场比，仍将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不应该也不可能提得很高，这样易于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对我国的长远发展较为有利；但是，要求它们老是保持过去那种低下的水平，那是不可能的。工资和许多原材料的价格，将在经济改革和生产发展过程中逐步调整，适当提高。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有利于调动广大职工和原材料产区的积极性。所以，这不是什么坏事，应该说是好事。但在一段时间内，确实会给沿海地区的企业，特别是那些消化能力不强的企业，带来困难。从国家来说，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总要给沿海城市和企业一些照顾。但从沿海企业来说，不应当把希望寄托在这种照顾上，更不应当企图把负担转嫁给消费者。那是没有出路的。

出路只有一条：积极提高自己的消化能力。吃廉价原材料，当然容易消化，但是，那个时代快要过去了。今后靠什么过日子？不能再指望吃便宜饭，要靠降低成本，降低消耗，提高产品质量，创造更多的附加值。沿海地区，沿海企业，必须认清这种形势，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像游泳那样，不仅学会“换气”，而且学会“第二种呼吸”，才能在改革和开放中掌握主动。提高消化能力的过程，就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进步的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

还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看看亚太地区、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动向。现在国外不少人都在议论环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崛起。有人甚至说，欧洲正在衰落，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也有点言之过甚。但亚太地区确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发展很快。有人把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称为“四小龙”，最近二十多年，它们的经济确实在起飞。1965年的时候，我们的出口额是22亿美元，它们四个加在一起，也不过24亿美元，其中，南朝鲜1.7亿美元，台湾4.5亿美元，香港8.7亿美元（另有转口2.6亿美元没有计算在内），新加坡9.8亿美元。1985年，我们的出口额扩大为273亿美元，它们则发展到9%亿美元，其中，南朝鲜295亿美元，台湾307亿美元，香港166亿美元（另有转口135亿美元），新加坡228亿美元。

说这些，不是灭自己的威风，而是用来激励我们自己的志气。要注意两点：第一，它们发展得很快，它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第二，它们还在继续发展，从劳动密集的出口产品向更高的层次即技术、知识、资金比较密集的出口产品转移。它们是靠劳动密集的出口产品起家的，但他们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这个优势正在逐渐丧失，逼得它们非向更高层次的出口产品转移不可。这就给我国沿海地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挤上去，替代他们，占领它们现在在国际市场上的地盘？这里的关键，是积极增强我们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所以说，亚太地区的崛起，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工业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很好的机遇。这是一种新形势，不能熟视无睹，必须认真对待。真能借鉴人家的经验，增强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又能扬长避短，就赶得上这班车。否则，难免掉队。

二、外向型经济和轻纺出口工业

我们有广大的国内市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有利条件。就总体而言，我们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沿海地区不同。如果沿海地区的工业品打不进国际市场，整个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外汇就没有着落。为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沿海开放地区特别是沿海各大开放城市应当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转到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轨道上来。这是就需要而论。

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世界上的岛国和沿海国家的经济发展，一般都比内陆国家快得多。它们的优势，如海岸线长、口岸多、交通方便，我们也有。我们还有许多沿海小国所不具备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广大的内陆腹地，可以直接供应许多原材料。如果不是同发达国家比，而是同许多发展中国家比，那么，我们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并不比人家差多少，甚至比人家好。应该说，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1]，加上长江、珠江三角洲，综合优势不是比“四小龙”差，而是比它们强。跟欧、美、日本比，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跟“四小龙”比，它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条件？我们现在落后，只是暂

时的，原因一是过去长期封闭，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现在吸取了教训，实行开放政策，光景就一年比一年好。把我们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肯定可以超过它们。广、大、上、青、天的商品，应该挤出去，占领国际市场。内地的商品，也应该升级，供给沿海市场。这样，大家都升级。大家都进步，大家都有利。

沿海出口工业要以轻纺工业为重点。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出口潜力比较大的还是轻纺工业和其它某些轻加工工业。除此之外，也要搞一些技术密集的附加值大的工业，如电子工业等。在沿海，把有限的资金用在这些方面，比用于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的重工业，投入少，创汇多，得益快。因此，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要适应出口的需要，调整得尽量“轻”一点，也就是说，在沿海地区，应当把承担出口任务的轻纺工业，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

纺织品（包括服装、印染布、坯布、纱、丝，不包括棉花等纤维原料）是我国的大宗出口商品之一。我国1985年出口总额273亿美元中，各类纺织品出口达6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2%。看来比重相当高，但同“四小龙”一比，就可以看清问题的所在了。1985年，它们出口的纺织品总额是213亿美元，相当于我们的三倍半，其中南朝鲜是70亿美元，台湾是55亿美元，香港是79亿美元，新加坡是9亿美元。差距在什么地方？主要不在数量，而在档次和质量。我们出口的纺织品，大量的是两纱、两布，印染布少，服装更少，加工深度越小的商品，出口的比例越大，当然就卖不出好价钱。

我们能不能定个目标，用上多少年时间，使纺织品出口额超过200亿美元、超过“四小龙”的总和？我看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把广、大、上、青、天和长江、珠江三角洲的力量好好动员起来。把我们的综合优势发挥出来，我们肯定可以超过它们。问题是要把力量放在提高档次、提高质量上。力争以同等数量的出口产品，创造更多的外汇。如果继续把重点放在那些附加值很小的初级产品和半成品上，那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从以扩大数量为主转向以提高质量为主的轨道，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技术改造问题，经营管理问题，体制和政策问题。

不宜泛泛地谈技术改造。开个大单子，要求全面铺开，只能到处撒胡椒面，最后什么都办不成。应当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目标，现在就是要紧紧瞄准香港、台湾、南朝鲜。我们和他们的关键性差距究竟有几项？纺织工业部应当首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进行分解，看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据潍坊第四棉纺织厂的同志说，我们清花、梳棉、并条、捻线都还不错，主要是粗纱机不过关、不匀，细纱机的加压部分不稳定，织布机同人家差距比较大，特种整理和染料不行。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况，那就针对这些关键性的差距，排排队，哪些自己攻关，哪些同国外合作生产，以后再逐步国产化，怎么快就怎么干。规模也不要一下铺得很大，应该精打细算，首先按照出口的需要进行安排。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否则，这个环节是第三代，那个环节仍然是第一代，还是卡住了脖子，上不去。总之，分解矛盾，弄清差距，有目标地、有重点地按照出口需要互相配起套来，进行技术改造，问题是可以较快得到解决的。这里并

没有多少高不可攀的东西。

管理方面，潜力很大，见效也快。有人说我们纺织工业队伍的素质差，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的纺织工人，在亚洲是资格最老的，中国人又肯吃苦耐劳。问题是管理上不去，稀稀拉拉，职工素质再好也发挥不出来。一定要有赏有罚。赏罚分明，鼓励大家端正劳动态度，掌握先进技术，在工作时间内必须认认真真、紧紧张张地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合格率。

最复杂的是体制问题。现在，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服装、印染、织布、纺纱等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经贸、轻工、纺织等部门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互相牵扯，抵消力量。于全局有利的事，不是这家扯皮，就是那家挡路，简直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把这些关系理顺，什么都谈不上。因此，外贸体制必须改革。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思路，责成外贸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进一步论证和设计。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城市政府，应当对此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工贸结合和出口联营是个好形式，应当在企业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推广。有条件实行代理制的，应尽可能采取代理制。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外贸的收购制和代理制很可能将并存一个相当时期。协调各方关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在研究体制问题和政策问题时，应当找出并紧紧抓住各方共同利益的结合点。即使实行收购制的产品，也要进行最后结算。出口创汇多，按比例返回，各方都有利；最后创汇少，按比例扣除，大家都吃亏。这样，就有可能把各类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共同为最终产品能在国际市场上卖个好价钱而通力协作。

三、改善投资环境和办好合资企业

我们是资金短缺。但现在许多发达国家是资金过剩。他们正在为过剩的资金找出路，哪里投资环境好就投向哪里。日元和西德马克升值后，这个动向已日益明显。南朝鲜和台湾正在搭这一班车。我们不应坐失良机。外国人来不来踊跃投资，不取决于中国人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中国的投资环境。这里的投资环境好，吸引力大，他就会千方百计投进来。如果投资环境不好，已经投入的资金也会抽走。

讲到投资环境，许多同志首先想到的是各种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如电站、运输、电讯等等。这些硬件，无疑是很重要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服务行业不发达，是我们的短处，我们正在努力改善，但也不可能一墩而就，总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的设施条件不好，外商是知道的。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要来投资呢？这是因为设施只是投资环境的一个条件，而外商在评估投资环境时，一般要考虑四个条件：市场大不大，设施好不好，费用低不低，效率高不高。中国尽管设施条件不好，但市场容量大，劳动力价格低，对外商很有吸引力。现在所以有六千多家“三资企业”前来登记，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的市场容量确实很大，问题是购买力不高。这一点，许多外商过去估计

不足。而且，如果“三资企业”主要搞内销，我们拿什么去偿还他们的投资本息？他们的利润所得如何能以外汇汇出？所以，尽管他们要求打进我们国内市场，我们还是要求他们打到国际市场上去，力求外汇平衡，即使不能在一个企业内自我平衡，也应在一个城市内综合平衡。在外汇平衡和国内市场问题上，我们回旋余地有限，很难让步。

我们的主要优势在什么地方？在于费用低，那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原材料价格比较便宜，特别是劳动力价格便宜。这是我们的王牌，可以说是绝对优势。欧、美、日本比不上我们，南朝鲜、台湾、香港也比不上我们。新加坡搞高工资政策，失去了这个本来具有的优势。在其它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我们本来应该特别注意发挥劳动力价格和其他各种费用比较低廉这个最大的优势。但前两年，我们有些同志目光短浅，一见“三资企业”就想伸手捞一把，外国人意见很大。今年在北戴河着重议了这个问题。国务院不久即将发布文件，这个问题要抓紧解决。

同费用密切相关的是效率。我们的劳务费用相当于香港的四分之一，但是，如果劳动效率也只相当于香港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就会把优势抵消。所以，提高效率，应该是办好“三资企业”的当务之急。

所谓效率，有两个方面：一是外部条件，即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效率；一是内部管理，即企业内部的生产效率。现在，两个方面问题都不少。政府部门办事拖拉，企业管理稀稀拉拉。外国人最头疼的，就是这个。

这当然牵涉到整个体制问题。我认为，在改革过程中，在大气候没有形成之前，应当给“三资企业”创造一种“小气候”。

现在企业办一件事，往往要几十个部门盖章，谁都有否决权，缺一个图章就办不成。外国人谁懂你这一套“关系学”？办起事来就难上加难。我看应该发明一种“盖章流水作业线”。其实，台湾的高雄加工区就有这种办法：每星期一，各有关部门的主管人员集体办公，图章随身带，一经裁决，统统盖章。我们为什么不能采取这种办法？在处理“三资企业”事务方面，国务院各部门应进一步向市政府放权，市政府也应采取特殊措施，由市长或副市长主持，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凡是不违反法规和政策的，大家开绿灯，提高办事效率，及时为“三资企业”解决问题。福州市已经这样做了。他们最近开了两次“三资企业”现场办公会，当场解决了九十多个难题。我看凡是开放城市，都应当这样做。这是一种小气候，市政府为“三资企业”提供方便。

另一种小气候是允许“三资企业”跳出我们现行的企业管理体制，允许他们按照国际通行的办法来管理“三资企业”，也就是说，允许外国资本家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按照他们管理资本主义企业的办法来办“三资企业”。什么叫企业的自主权？对“三资企业”来说，最大的自主权就是这个，包括管理中方职工的权力在内。要允许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招聘职工，也允许他们按照企业规章奖惩职工，可以重奖，也可以辞退和开除。这方面，不应该有什么顾虑。反正他们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不得打骂职工。公开招聘，人都涌到“三资企业”去怎么办？其实它们的容量很有限，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去，因为一到他那里，

待遇固然高，但要求严，不能迟到早退，不能随便请假，不能磨洋工，劳动成果还有严格的考核，必须按期把合格产品拿出来，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青岛第二食品厂有个出口车间，工人是从其它各车间招来的，进来就浮动一级工资，奖金也多，但工作艰苦、紧张、必须一丝不苟，结果效率高，合格率也高。当时也议论纷纷，有的人愿意去，有的人不愿意去，那就各听其便。你要报酬高，就得考试合格，进去后还得好好干；你爱吃大锅饭，就给你低工资。原单位不放怎么办？允许在原单位办辞职手续，将来离开“三资企业”，劳动部门还可根据你的具体表现，适当安排工作。我看这种办法可以一试，没有什么危险。总之，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是我们落后，我们应该积极采用国际通行的管理办法，而不应该强制外商来采用我们那套吃大锅饭的管理办法。否则，硬件是人家的，软件是我们的，配不成套，发挥不了作用。

办好“三资企业”，意义很大。一是能使外商真正看到在中国投资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确实具有明显的竞争力，比投到南朝鲜、台湾更合算，这样，到中国来投资的外商就会越来越多。二是这些企业办好了，还可以把它们的管理经验有选择地移植到国营企业中来，使中国尽快出现一批采用现代管理方法的高效率的新型企业。

注 释

1．广、大、上、青、天，指中国沿海地区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五个大城市。

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办成一个有活力的企业集团*

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一、在开展外贸业务上，我建议在地区上切一块，即把中南美和阿拉伯地区划给中信公司，让公司去开辟市场，发展业务，进口出口，有来有往，搞综合贸易，成为面向那两个地区的综合商社。那两个地区是新的市场，潜力很大；而且那里与经贸部的业务碰头比较少，矛盾不大，你们可以去开创新的局面。当然，国家也要适当划拨一部分货源给你们公司。你们也可以和外贸各专业总公司联合，同上海、天津等地的地方公司联合，并注意与内地省、区发展横向联系，利益均沾，这样就可以搞活。

二、中信公司可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集团。你们投资入股的企业，可以形成一个集团，发展经济联系和联合，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有松散的，也有紧密的，不拘一格。这要靠去闯，同意你们进行试点。

三、发展钢、铝和电力工业，由国家统一计划，统一安排。你们可以投资入股，不要单独搞，不必采取你们公司包二百万吨的办法。你们集资入股，可以分红利，也可以分物资（如分钢材）。办电，也要和水电部或地方联合搞。

四、原则上同意你们公司扩大自主权。你们所投资的项目，具备一定条件的，可以授权你们自己决定。比如，凡是地方上电力、原材料、运输等外部条件具备，不需要国家再拿钱去搞配套工程，能综合平衡的，在总规模确定以后，具体项目可以授权公司自行决定，不必什么事都要上边批。可与计委研究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授权给你们公司，什么情况下需要计委协调解决。

五、中信公司在“七五”期间借款筹资的额度，四月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会议上已确定为十五亿美元。你们还想多筹一些。这次再开一个口，比如你们参加国家扩大钢铁生产能力一千万吨的规划所需要筹集的资金，可以另外计算，不算在原来的十五亿美元以内。你们在国外发行债券，国家也给你们一个额度，在哪里发，在总额度内一次发多少，可以由公司自己确定。但要与中国银行取得联系，互通信息，避免发生问题。

六、你们要求中信公司利用外资在国内直接投资的企业，享受与中外合资企业同等待遇的问题，原则上赞成。但这个问题不仅你们公司，还涉及到光大公

司、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和香港中资集团的投资，要通盘考虑，请谷牧同志处研究。

七、中信公司几年来做了许多工作，有很大成绩，你们好好总结准备一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准备听取你们一次汇报。我们的改革是不断前进的，改革、开放、搞活是大势所趋，扭点秧歌的现象也会有，但总的方向是向前走，你们存在的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对武钢引进国家两个急需项目申报四年多未办完审批手续问题的两次批示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十一月一日

俊生同志：请国务院办公厅负责把这件事[1]的情况弄清楚，并加以解剖，从中找出改进的办法。

赵紫阳

九月十三日

俊生同志：同意调查报告[2]。机构重叠，手续繁杂，办事拖拉，相互扯皮的官僚主义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够典型、够严重的了。但这样的情况甚至比它还严重的情况，恐怕还有不少。这种状况，已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严重障碍，必须下决心整改。根本上要靠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未能改革前，在简化手续、下放权力、提高责任心、采取联合办公（包括委、部内部有关司局联合办公）等方面，仍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建议将此调查报告及新华社动态清样一并印发国务院各部委、国务院常务会议。请各部门结合自己情况进行检查，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和建议。国务院常务会应专门议论一次。请酌。

赵紫阳

十一月一日

注 释

1．指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117期刊载的“武钢要引进两个国家急需的项目申报四年多至今未办完审批手续”一事。

2．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武钢引进两个国家急需项目申报四年多至今未办完审批手续问题的调查报告》。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给中央常委的信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耀邦、小平、先念、陈云同志：

九月十八日，我邀请启立、纪云、一波同志，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如何起步一事，进行了座谈。议了以下五条：

一、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员五人：我们四人加上彭冲同志。这是考虑到彭是主持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书记处、国务院、中顾委、人大都有同志参加这个小组，商量问题有可能较为全面一些。

二、所以定名为研讨小组，是因为它不是权力机构。这个研讨小组的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常委决策。要求在明年十月党代表大会前，把头绪理清楚。其间，应向常委作几次阶段性的汇报。

三、在研讨小组下，设一个办公室，人员力求精干。办公室的基本工作方法是阅读材料和议论问题。他们应组织一批人认真阅读材料，他们自己也应认真阅读材料，并选择最重要的材料向研讨小组推荐。他们应有计划地召开一系列座谈会，他们内部也应经常座谈，并把议论的主要内容向研讨小组报告。办公室每月至少应向研讨小组报告一次。

四、这个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1]、贺光辉等同志负责。（以后还要酌情增加几名负责人，但总数不超过七人。）授权办公室挑选十至二十名有研究能力的人，组成具体工作班子。这是一个总的办公室。将来，随着讨论逐步深入，再确定专题，组织若干个专题研讨小组。

五、办公室成立后，即应紧张工作。在最初一个月左右的期限内，应当集中力量，搜集和研究当前国内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议论，提出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重点的初步看法。研究问题的着眼点，应当是：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二、有利于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特此报告。如无不妥，请批送书记处、国务院、中顾委、人大常委各同志阅知。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注 释

1．严家其（1942— ），江苏常州人。时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曾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青联常委。

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六三”计划）给中央常委的信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小平同志并耀邦、先念、陈云同志：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六三”计划）已酝酿讨论了五个月。四月间，由宋健、丁衡高同志组织一百二十四位专家，分十二个组，进行第一轮论证。五至七月，由“八六三”计划编制小组负责筛选和进行第二轮论证。八月十八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计划编制小组的汇报。会后，专门就航天技术问题再次征求航天、航空方面部分专家的意见。八月三十一日到九月二日，由专家组组长会议进行第三轮论证。现已形成“八六三”计划的《纲要》、《领域和主题项目》、《汇报提纲》三个文件，一并送上，请审阅。

从世界高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选入这个计划纲要的，共十五个主题项目，分别属于七个领域。这些都对我国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国民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增强有重大影响。文件中对每个项目，都概述了国内外背景，估计了可能产生的效益，提出了目标和内容，安排了大致的进度，并对经费进行了匡算。预计到本世纪末，大致需要经费一百亿元。其中，“七五”期间需安排十亿元。

十五个项目中，十三个项目大家看法一致，没有异议。现在感到看不准的，是第四项“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第十四项“先进核反应堆技术”。

“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是航天技术的关键性项目。纲要中所列的航天技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载人空间站的本体；二是发射这一空间站的大型运载火箭和能往返于天地之间的运输系统。关于空间站和大型运载火箭，没有异议。大型运载火箭涉及进入国际商业市场的竞争能力问题，宜优先发展。往返于天地之间的运输系统，看来以能多次使用、效益优于美国航天飞机方案的为好，这也没有异议。但是，在适应上述要求的多种途径中，能全部重复使用的往返运输系统的技术路线，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尚在探索过程中。从我国的科学技术基础和财力物力出发，宁可在可行性论证和预先研究方面多下一点功夫，不宜轻率上马。如果花冤枉钱，也让美苏它们先花。待它们有了突破性进展，我们再跟上去。与此相应，空间站的研制进度也应安排得从容一些，不必急于求成。因为如果能多次重复使用的往返运输系统上不去，即使载人空间站上了天，也无力维持，难以起到

应有的作用。因此，在《领域和主题项目》的第十四页和十六页末尾都注明："本项目的目标、内容和阶段成果等，尚待进一步论证。"

"先进核反应堆技术"肯定要搞。问题是选择什么堆型——快中子增殖堆，还是高温气冷堆，还是裂变—聚变混合堆—需要多做点论证工作，看准了再定。因此，在《领域及主题项目》的第四十六至四十七页说明："鉴于上述三种堆型各有特点，需深入进行论证和预研，抉择实施"；"'七五'期间，开展论证、预研和单项技术研究，选择堆型"。

需要说明的主要问题，大致如上。常委或书记处如需听取汇报，请小平、耀邦同志决定后通知我。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七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日

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我们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在这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七周年。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公安干警，向全体劳动者和一切爱国人士，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我还要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来宾和驻华使节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关心和支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国际友人表示诚挚的感谢！

今年是我国实行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经济工作中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曾经一度出现的经济发展“过热”造成的紧张状况已得到缓和，我国经济正在协调、健康地发展。工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市场稳定繁荣；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当前，我们要紧紧抓住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环节，继续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大力增收节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逐步改变产品结构同国内外市场需要不够适应的情况，使经济形势发展得更好。

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保障。去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初战告捷。今年以来，我们采取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方针，使经济发展得到了新的活力，并为下一步改革实施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环境。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还要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和酝酿，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使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互相适应，互相促进。

在坚持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当前，要特别注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投资环境，以不断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刚刚胜利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召开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次全会的召开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深远的重大影响。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

彻“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以保证“七五”计划和本世纪末宏伟目标的胜利实现。

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心愿。我们真诚希望台湾当局能从全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认真考虑我们关于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的建议；在统一以前，能顺应民意，允许台湾与大陆通商、通航、通邮，使分离三十七年之久的海峡两岸骨肉同胞得以相会、团聚。

和平与发展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坚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积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我们愿意同所有邻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我们将一如既往，同第三世界国家一道，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军备竞赛，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而努力奋斗。

现在，我提议：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七周年，

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兴旺发达，

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日益增长的友谊与合作，

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干杯！

致第六十届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贺信

一九八六年十月四日

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我热烈祝贺第六十届广州中国商品交易会的召开！三十年来，交易会为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交流起了很好的作用。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既定的基本国策。希望大家团结奋斗，以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把交易会越办越好，为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出更大的贡献！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十月四日

处理好价格改革与搞活企业的关系*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十一月一日

* 这是赵紫阳听取杨培新[1]关于联邦德国专家施奈德（HanS Karl sChneide：）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意见和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改革方案汇报时的两次讲话摘要。

对初级产品价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不仅施奈德有些意见，瑞士专家林德也认为现在中国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搞价格改革，应把注意力放在发展生产上。当然他也讲了不要怕赤字，只要用在建设上，有点赤字没关系。国内经济学家也有这种论点，比较系统的是厉以宁[2]。厉认为要搞市场机制，在法制不完备情况下，不宜搞价格改革。这种观点，可以慎重考虑。调物价与放开物价不是一个概念。涨价往往转嫁给消费者，效果不像预想的好，出的问题却很多。汇率调整也影响了产品成本。归根到底是企业的机制问题，不是价格问题。公有制涨价就转嫁给国家或消费者。再加上企业困难很大，企业也没有多大实际利益，现在的困难还没有缓解，调价后会增加新的困难。一九七九年出台的政策（原材料调价），加工企业还没有完全消化掉。钢材提价，企业活力是增加还是减少？这个问题要讨论。解决增强企业活力一贯是重点，现在还应是重点。还有一个分配问题。是否把重点放在这里。把精力放在搞物价上可能失大于得。钢材不动，也会自发涨价，不动也有问题。可是，搞不好，工业品与农业品，初级产品与加工产品，会轮番涨价。物价问题怎么办，是不是：

一、供求相适应的，放开。

二、比较紧俏的，对人民生活影响不大的，个别的也可以涨价。如呢绒，老百姓不会因此造反。

三、其他的，不是通过调整价格，而是通过税收、折旧来解决，使生产初级产品的企业有利。目前这种初级产品通过价格理顺很难，搞不好可能水涨船高，对多方面影响很大。

四、生活必需品，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还要国家定价，给予补贴或减税。初级产品是否暂不作大的变动。

两种价格主要决定于宏观控制。

一、多年形成的传统观念要改变。工资上涨影响物价，物价上涨影响工资。物价局汇报工资增加百分之七，影响物价百分之一，可见老观念要改变。现在许多物价憋在那里，就是怕工资上涨。看来可以不必怕。广东现在无人谈物价，工

资也没涨多少。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工资才增加百分之一点四，也没什么可怕。

二、物价上涨百分之一，财政上增收多少，要算一下账。

三、企业搞活要采取措施，农产品和消费品势必调价，所以要重新考虑调价方案。明年搞钢材调价，不是急大家所急。一起动，风险大。只动钢材价格不动消费品价格，方案不可取。

四、现在财政规律有点改变了，有一百亿元赤字影响不大，主要看发了多少票子。

五、结论：

——搞活企业必须首先解决。

——影响当前生产的价格必须先解决。

——把上述两者放在首位，相应增加工资。

——钢材价格另议，明年上半年肯定出不了台。明年下半年搞不了，后年搞也行。非当务之急，要看形势再定。

——物价与工资问题要好好研究。改革就是理顺关系，老概念不行了。可能物价上升很大，工资也增长，生产增长很快，这应是正常的。关键在于物价是否趋于合理。无限恶性循环是可怕的。如是良性的，应是好的。过去我们顾虑过多。广东已有经验，要好好研究一下。

——搞活企业和轻纺产品调价的两个文件要早点搞出来。

注 释

1．杨培新（1922—），广东大埔人。时任国务院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秘书、金融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

2．厉以宁（1930—），江苏仪征人。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曾任北大工商管理学院、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外贸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关于外贸工作情况汇报时的谈话。

现在我们国家最大的大锅饭就是外贸。不管成本高低，你出口我也出口，反正亏损由国家负担，不管怎样，只要留成外汇拿到手就行。至于换汇成本，大家都不负责，最后到财政部报账。现在的体制，外贸企业经营得好坏与它的直接利益没有关系。降低成本，交货及时，对它没有什么好处，它一个钱也不能多留，亏损少就少补贴，亏损多就多补贴。

吃大锅饭和不吃大锅饭是大不一样的。“饭”反正就是这么多，分开吃，很多人就把“饭”省下来了。而吃大锅饭，越吃，需要的饭越多，越吃锅要越大，最后大家便没得吃了。总之，不能吃大锅饭。如继续吃下去，中国的外贸竟争力会越来越差。必然出现这样一种循环：亏损不起了，就要扭亏，扭亏就要减少出口；外汇减少了，就强调发展外贸，出口多了就要大量补亏。这样恶性循环，生产企业、外贸企业都不会改善经营管理。

外贸工作将绕着两个大圈转：一是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然后又放；二是外贸一上去，就大量亏损，一扭亏，出口就大量减少。这是外贸体制存在的大问题。我们增加出口有办法，扭亏也有办法，但是要提高外贸经济效益，既扭亏又增加创汇就没有办法。现在这样的搞法，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既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没有风险，风险全由上面承担；不高兴的是权力小，限制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不担风险，当然也就不能享有那么大的权力。

搞农村改革有一条基本的经验，就是从联产承包责任制搞起。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规定了农村改革的发展方向，一系列问题就解决了。外贸改革也要坚持这条经验。外贸问题多得很，也要抓住根本问题，找到突破点，其它问题就好解决了。现在就是要通过按产品核定换汇成本，实行自负盈亏，来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

关键在于按不同产品核定换汇成本。同一种产品换汇成本相同，全国一个政策，不管东西南北，你的产品超过规定的换汇成本，要么不出口，要么由地方自己负责补亏。自负盈亏后，他就精打细算，加强经营管理了。企业搞好了，可以多留利，可以发奖金。广东规定企业每超额完成创汇任务一百万美元就奖励一万元人民币，这个做法可以。企业创汇得来的奖金，可以不征收奖金税。

要自负盈亏，各个企业、各个外贸公司都要自负盈亏，规定统一的换汇成本，否则是搞不下去的。广州绢麻厂的出口产品是五元人民币换一美元，还亏损；外贸分公司是七元人民币换一美元，他也可以出口，就是因为分公司是吃财政部大锅饭的，可以不考虑换汇成本，绢麻厂最后坚持不下去，就把自己的一部分产品卖给分公司，价钱就高了。问题就出在：绢麻厂是自负盈亏的，而分公司不必自负盈亏。如果大家同一个换汇成本，在同等条件下竞争，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没有这样的政策，因此就不能择优，优的不能发展，劣的不能淘汰，甚至劣的还要发展。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对所有企业，第一是一视同仁，同等条件下竞争；第二是自负盈亏。

下放权力，必须自负盈亏；要自负盈亏，必须有个合理的统一的换汇成本。比如规定，珍珠是两元人民币换一美元，机床是六元人民币换一美元，地不分南北，也不分“中央军”和“地方军”，统统实行这个规定。你的产品出口之后，银行凭单据看你出口的是什么产品，然后按该产品的换汇率给你结算。你是盈是亏国家不管。这样，经贸部就不下达指令性计划了，只有指导性计划，经贸部也不承担创汇任务。

换汇成本必须逐个产品核定，而不能综合核定。给地方下达综合换汇成本，不能保证合理的出口商品结构。比如你给一个地方定个综合换汇成本，原想能多出口一些机械，但他一算账，出口机械不合算，它就不干了，而去抢购那些低于综合换汇成本的产品（如珍珠等）去出口。这样，就天下大乱。如果我逐个产品核定换汇成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开始可能不那么完善，有一些漏洞，有些产品的换汇成本定高了就会有人去抢购，但不要紧，你去抢购就告诉我一个信息，我就可以去调整。结果你越抢，促进我的办法越完善。

现在国内价格不合理，有些国际市场上便宜的东西，我们国内价格高；国际市场价格高的东西，我们国内便宜。要一下子理顺很困难，我们可以通过按不同产品分别规定换汇成本来调整。这就是宏观指导，用这个办法把人们引导到注重效益的轨道上去。在产品出口方面，我们用换汇率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只要把逐个产品核定换汇成本的办法搞起来，外贸体制改革就可以做起来，外贸权力就可下放，让大家去竞争。在换汇率面前人人平等，大家在同等条件下竞争。这有一个好处，可以择优。包干也好，下放也好，前提就是分产品核定换汇成本，不然中央根本不敢下放权力。我看，有三年时间，一套经验就出来了，就会出一批调整换汇成本的专家。

国家按产品核定了统一的换汇成本，但是，你的产品究竟能卖多少钱，还要看产品质量和卖出的时机。每个企业对这些都会非常关心。往往你能及时交货，就可以卖到好价钱。国际市场涨价，企业就会多出口。如果跌价，它就不出了。每个企业都关心国际市场价格，就这一条，我们就可增加很多外汇。这个利益要放给企业，放给地方，这会比现在吃大锅饭不重视效益好得多。现在什么时候卖给你都是那么多钱，无形中造成的损失不知有多少。国家让企业自负盈亏，企业就必然会争取比较好的售货机会。外贸企业还可以给交货及时的生产企业以一定

的利益。因为它自负盈亏了，它有这个权力。总而言之，实行自负盈亏有风险，有机会。按中国现在的情况，机会比较多，风险不会太大。只要包下来，换汇成本肯定会下降。地方要看清这个巨大的潜力。

逐个产品核定换汇成本。我们不要看得太复杂。捷克斯洛伐克的价格改革方案（后来因一些原因没有实行），一提出就包括几万种产品的价格。只要大类能够核定，小类也照样可以核定。哪种产品，哪年出口多少，卖多少价钱，大家都知道的嘛。当然开始可以搞粗一点，但要尽量搞细，能细到什么程度就细到什么程度，搞得很粗是不行的。换汇成本按中等卖价来定，你的产品质量高能多卖钱，你就占便宜，质量低的就吃亏。

可把出口产品分为三类：一类完全交给地方经营，约占百分之三十；另一类是国家垄断性商品，如粮食、石油、煤炭、棉花等，必须由中央指定国家公司经营，其它单位不能插手；还有一类产品，现在由国家、地方、企业一起经营的，可逐步分开。

按产品核定换汇成本的办法如能行得通，中国的外贸就会起大变化。沿海外贸会大发展，内地出口困难会多些，但也不怕。内地的产品内销，沿海的产品外销，内地、沿海加强横向联系，互惠互利，互相促进。中国发展外贸基本上要靠沿海。将来哪个地方口岸出口合算，商品自然就到那里去了。这样的结果，内地的资源肯定要与沿海挂钩。哪个地方经营管理好，哪个地方肯定要大发展。这样，出口产品的质量才能真正提高，才能适应国际市场。从根本上来讲，这样才能促使我国外贸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合理化。

一定要注意调动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可以多给企业一点利。企业产品外销不如内销合算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出口商品的收购价格，要跟国内价格拉平，当然还要考虑到搞出口商品的其它待遇，如留成外汇等。如果算起总账来，仍不合算，那就不能出了。地方如需要外汇，让它出口，那就由地方在其他环节上调节一下。外贸企业为了调动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对出口畅销、换汇率比较高的产品，可以提高收购价。

按照上面的设想对外贸体制进行改革后，外贸部的职能主要是：（一）管换汇成本；（二）管配额、许可证和掌握国别政策；（三）控制关税。关税不仅是财政问题，而且是调节进出口的手段。关税设计应归外贸部门，由它设计税种、税目、税率，将来还要包括汇率。

许可证可以允许转让。发许可证是个宏观预测，不可能发得很准，势必有些地方领到的许可证用不完，有些地方却不够用。解决的办法不外乎两条：一是许可证发多一点，但这有风险；二是允许许可证转让，如何转让，由双方协商。

“三资”企业的产品需要出口许可证的，凡是过去订的合同就应该履行，不然，既不让它出口，又不准它内销，它就没有出路了。但今后签订合同再遇到需要出口配额的问题就应该慎重处理。

实行新的外贸体制后，对过去地方留成外汇被中央已使用的部分如何解决？无非三种办法：一是先挂账，待中央的外汇情况好转后还给地方。二是都由国家

收购，财政能否负担，还不太清楚。三是一风吹。究竟采用哪一种办法，还要研究，从长计议。至于实行新外贸体制后，地方留成外汇的使用，我主张中央基本上不管了。不限制用汇指标，至多规定一下用途，只规定什么可以进口，什么不可以进口。

外贸体制改革后，地方出口创汇，让地方留七成，交中央三成，因为地方和企业真正自负盈亏了，要承担风险的。一些重要产品由国家专业公司统一经营的，外汇给地方留成百分之三十。这样，国家的外汇就减少了。当然，还有另外一笔账，中央外汇少了，中央的进口就少了，很多需要进口的原材料等商品，要由地方自己解决。

深圳的办法，还在试验，还不能推开。如试验成功了，我们一定推广。在经济体制没有解决好之前，各种经济杠杆起作用都有一定的限度，而且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外汇调剂得多了，调剂中如果汇率上升得很高，就必然造成一种形势，使国家的汇率非提高不可。目前，外汇调剂中心，只能先在深圳办。

外贸体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关系由地方处理。地方需要让企业以高于国家规定的换汇成本出口，亏损由地方负责，国家不干预。地方可以贴息贷款，也可以贴息出口，这和政企不分是两码事，地方政府可以有这个职能。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至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 根据邓小平的提议，1986年9月23日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赵紫阳为组长，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为成员。这篇文章就是1986年11月7日到1987年5月28日赵紫阳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七次会议上的谈话要点的辑录。政改研讨小组的主要成果是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决定将其主要内容写人十三大政治报告。在研讨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意见，均通过会议纪要或简报等形式，随时报告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例如，根据政改研讨小组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从十三大开始，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十三大以后在一些地方实行“两公开一监督”即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依靠群众监督的改革试点，开展对话协商等。由于种种原因，改革进展十分艰难。

我们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是讨论共产党是否执政的问题，而是讨论共产党怎样执政的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党政关系、中央地方的关系、人事制度等等，理顺社会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党政分开就是党政职责分开，党与政是不同的职责，不同的功能。近期的工作从哪里开始？要以解决党政关系和党内民主为重点。党政关系中，主要是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解决党与人大的关系、人大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的问题。我们这次改革，终究是要解决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防止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少数人、个别人、一个人。以党代政，这就势必使各种社会组织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需要着力进行研究的，一是改革的基本目标、基本模式；二是过渡措施。目标模式能否选择恰当，是很重要的问题。体制改革完成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要弄清楚。此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过渡。否则，目标是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相当明确，但是如何达到彼岸，开始的时候路子并不十分清楚。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这样。所谓过渡，就是首先搞什么，先达到哪一步，步子怎么走，还有配套的问题。不能一个方面孤军深入，要有个配套。还有承受能力，即适应程度、适应能力的问题。过渡措施的问题，并不比目标设计简单。当然，可以在实践中不断补充修正。

有必要重复强调：第一，我们要解决的不是共产党是否执政的问题，而是如何执政的问题；第二，我们是讨论人大如何发挥作用，不是搬西方的议会制。有些东西可以借鉴，但不能搬。也不能搞三权分立，当然其中一些东西可以借鉴。

因为我们的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是一体的，所以不能分立。既要发挥人大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又不能三权分立，这样，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就不能是无限的。现在所列的题目中，有关人大的分量不够。政治体制改革中，人大问题不作为一个重点提出来不行，人大问题不能回避。问题究竟在哪里，改什么？一是人大的作用发挥不够，这是主要的；二是人大的权力与作用如何发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什么东西都要人大决定。有人认为人大不能干预政府日常政务，只是法律监督。要提出党和人大、政府和人大的关系问题，讲清楚。人大的构成等问题也要谈。中国的人大中要有一些荣誉职务，但不能都是，不能都是安排第二线，也不能全不安排，可以搞个比例限制。

党内民主的重点，是解决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等之间的关系。要真正依法办事，按党章办事。我们现在实际上往往过分强调核心，变成了政治局领导中央委员会，常委领导政治局、书记处。缺了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局要置于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常委置于政治局的监督之下。这要立规矩，还要成为习惯。现在这样的制度，没有事很好。这种制度很难保证不出事。中国人当面客客气气的，背后计较。讲社会民主，重点是党内民主；讲党内民主，重点是中央一级。中央的民主健全了，可以影响全党。党内民主健全了，可以带动全国。我们要形成一种风气，建立制度、程序，要党中央带头，由上而下。

干部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重要问题。党管干部是管干部工作的宏观，包括干部规划、干部的交流、培养以及属于干部纪律方面的综合工作。组织部就管宏观，管综合，管规划，管大的事情。而考察、任免、考核、奖励、处罚等等，政府系统的干部应由政府部门来管。党管干部工作，不一定管到每一个干部。现在党管干部就是党任免干部，就是组织部任免干部。而组织部又不管具体的事情。管事的不管人，管人的不管事。这也是大家议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干部管理制度要有一个改革。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和八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谈话）

选举，一个是基层选举，一个是全国选举。基层选举确实值得注意，不仅是县级选举，也包括学校。基层的选举，选民一定要认识你，否则不如不选。选举党代会、人代会的代表，代表比例是个问题。你可以聘请，可以在选举之外另外特邀一些代表。如果比例定的过死，怎么选举？现在学生闹事，当然是自由化泛滥，受西方民主影响。但是我们的选举制度也实在太出格了，学生第一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就作不了主。可以明确地提出，代表中有多少是选举出来的，有多少是请来的，也可以用团体内选举的办法。选举也搞指令性计划，流弊太大。当然，代表的组成不要缺了一些方面，要有恰当的办法。凡是需要保证的，就用别的办法保证；选举的，就要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不要混在一起。

我们的选举要逐步有些改进。有两条要注意：第一条，下面选什么人，上面不知道，也不行。候选人名单还要上报，不过上面只是同意，最后一定要服从选举结果，服从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前报名单，然后承认选举结果，中间不得干涉

选举。另一条是差额选举，这个问题比较大。群众可以在十五个人中选十个。现在搞民意测验，就是要看看人们喜欢哪一个。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通过选举来尊重民意？可能有些结果不那么理想，也可能更理想。为什么一定要这个不要那个？有些事，上级不一定看得那么准。笼子大一点好，候选人机会均等，并不是有的人是陪绑的。这样可能更能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省长提名副省长，干脆选一个提两个，由人大表决选择一个。这个办法可以考虑。又是差额选举，又是事先经过领导批准的。我们现在的选举制度一定要改革，不然，很多话不好说。一下子搞得那么民主不可能。但是，货真价实地只搞形式，也不行。

究竟能做一些什么事，来扎扎实实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一个提法，比如苏联东欧提自治，他们把群众参加管理叫自治，我们是不是也用这个词？要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搞，两党制不能搞，无政府主义不能搞；二是要积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人们要求民主是一个潮流，我们要尽可能满足人民这个要求。这方面究竟能做些什么事？选举制度要改进，这是个大事。基层民主非扩大不可。农村的条件差一些，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工厂等，文化水平就比较高。我们基层，黑暗的事不少，必须有个办法。否则，基层干部拿反自由化来压制民主，所有正常的民主要求都被说成自由化。一方面，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方面要积极扩大基层民主。否则，好像搞自由化的人才是维护民主权利的，这怎么行。

过去对基层民主认识不够。看来，要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把基层民主、人民参加管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人们对我们党的意见比较多，基层一些很不像话的事受不到监督。自己监督自己是不行的。厂长有哪些权利工会可以监督。工会不能罢免厂长，但是可以提出不信任。对党委书记，也可以提出不信任。这会引起上级注意，厂长、党委书记会有所收敛。过去是党委领导，有这个问题；现在是厂长负责，也有这个问题。没有制约不行。现在基层领导与被领导之间，许多事处理不公，群众不满意，要求解决，却没有说话、出气的地方。光靠上访不行，要从组织制度上解决。也许，受到过批判的工团主义，正是我们现在要恢复的东西。

与此有联系的，工会问题要好好研究。工厂里的问题，一个渠道是不行的。工会工作要总结经验，究竟应该怎么搞？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理顺关系。我们的工会与党完全是一个声音，党包揽、代替了工会。党群关系好的时候，没有问题；如果党群关系发生了问题，工会就起不了任何作用。过去批判工团主义，使我们失掉了一个联系群众的有效纽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党包揽一切，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有问题。党、政、工、团各司其职，相互之间总会有点矛盾；完全没有一点矛盾，不一定是好事。只要大方向一致，如果绝对一致就没有纽带。

（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二月四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谈话）

福建省龙岩市的选举的例子很值得研究。龙岩市连续三届市长候选人都没有得到人大批准。第一届是从外地派来的，来了十天就选，结果没有选上，当选的

是原来当地法院的院长。可是他当选不久就给调走了。第二次，上级指派的候选人也没有当选，原来一个副市长当选了，后来就调任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第三次又是类似的情况。其实，选出来的三届市长执政都不错，相当有政绩。党员不选党委提的候选人，这是否符合党章，暂且不说。我们要分析，要冷静、理智地分析一下，教训是什么。选举问题是人大改革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党委决定提名，但是通不过，一些老干部在那里起作用。于是搞预选，保险。可是，大家学乖了，预选的时候通过，选举的时候通不过。中央的先不说，省一级也要实行差额选举。人大主任、副主任，省长、副省长，放手选举有什么不可以？倪献策[1]不是我们考察的吗？可以三个人都是批准的候选人，放手选去。要真正搞点民主，不搞点民主不行。我看没有危险。三个人都考察过了，让代表去选。省长、省委书记也可以这样搞，无碍大局。全国工作主要是靠全国政策的正确，具体谁干没有什么大差别。

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扎扎实实地搞些什么事？我们的民主要是扎扎实实的，不搞那些花花草草的。工人的意见要受到重视，真正在生产单位有发言权。要搞民主，搞监督，基层不合理的事情要有人上诉，不光是来信来访，而且是有系统。基层不舒畅，分配不合理，意见没人听，就要出问题。基层认真搞民主，搞社会监督，没有坏处。

我们说自己是真民主，但是我们也有不民主，不能说成真民主。过去的选举，是没有选择的选举，很难说是真正的民主。这个问题不能回避，搞社会主义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关于社会监督，列宁早就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可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建立苏维埃，本来是要解决人民自己掌权，但是，还没有找到办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宰。关于公民权利、新闻、出版、言论等等，不能说完全自由，也不能没有自由。要在这个方面立法，这对自由化是一种限制，对基本的必要的公民权利则是法律的保障。

我们在民主问题上要少说多做。不是不做，而是多做，但是不要许那么多诺言。多宣传一些集中，多讲一点整体，实际中多给人们一些自由，扎扎实实搞点民主，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四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谈话）

中央的工作规则是必要的。能不能区分一下，哪些事常委会可以决定，哪些则要报告政治局？能不能这样划分：常委会决定日常问题，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书记处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要划很清楚也不可能，不划也不行，连个方向也没有。规定性的东西可能不完满，但是要有，可以在实践中完善，这就走上轨道。没有个条条，怎么叫制度化？法律也是这样。都怕繁琐，规定的都是些原理、原则，太粗了，没有办法执行。要规定得具体，就要有很多条条。总的方向，还是要规定。我们党多年的习惯是不愿意搞具体的东西，这个确有难度。延安的时候，刚进城的时候，毛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可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就没有了。美国总统和国会的职权，有许多条条来规定。当然，总统与国会各自利用相

关规定中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来发挥作用。任何条文本身都有制约作用，当然行动起来又与条文有区别。我们总是怕繁琐。有的事情，完全不规定，也没有问题；而有的不规定就没有起码的制约，会出大问题。工作规则呀，要有这个东西，又不能完全靠这个东西。并不是有了规定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但是要有个起码的规定。这里有法治和人治的问题。先要有法，人再去发挥作用。

中央的同志下去调查研究要能够了解真实情况，不能一说话就是指示。要严格区分个人意见与代表组织的意见。个人意见不是指示。建议是可以提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提建议，下面就要办。这要区分是个人建议还是组织建议。个人建议不必照办。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四次会议上的谈话）

我们的机构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体制上的，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个问题。第二个原因是因人设事，这个更难解决。干部那么多，又要有个安排，许多局、处所以设立，就是因为有干部要当局长、当处长。第三个原因是新旧体制的交替。旧的机构没有撤销，新的又要建立。专业管理部门没有减少，新的综合部门又要增加，如审计署、监察部、新闻署。原来的机构没有怎么撤。关于临时机构的问题，要做些分析。临时机构的症结，在于部门分得太细，结果部门之间扯皮，又不能都拿到国务院会议上来，因为问题太多，就是说，部际问题太多，结合部太多。所有的临时机构，都是事务性的，任务是协调，是要解决矛盾，很难起咨询作用。临时机构就是上一层人出来裁决问题的机构。既要裁决，就要找几个人熟悉材料，于是有了机构。联合办公也是临时机构。机构一撤销，马上抓不动。临时机构与其说是组织机构，不如说是工作方法。精简机构的注意力不要放在临时机构上。如果环境和条件不改变，临时机构这周撤了，下周又会搞起来。根本办法是减少部，企业下放以后，经济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减少，减部可以搞得快一些。

关键是人员安排问题。机构改革有精简有加强，人员调整不容易。人多的部门，往往凝聚力强，有好处，都不愿意去清水衙门。再则，工作人员对原单位有很大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关系网。部里要放的人，又不适合工作。新机构也不愿意要别的机构的人，它需要的就从社会上进，多的就走不出。设计合理的机构，并不是个很大的问题；关键是人员，这个工作很艰巨。

中央国家机关的改革条件已经成熟，再拖不利。七届人大以后就可以动，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要搞。过去条件不具备，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条件具备了。企业下放了，投资体制改了，大的企业集团可以在计委单列户头，别的由省市去管，中央专业部门不再担负这个职责了。这就为国家机关实行政企分开创造了条件。要设的设，要并的并，通过这个改革，可以巩固和促进经济改革。经济与上层建筑就是这个关系：经济创造起码的条件，然后上层建筑走一步，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要有系统地改革，逐步搞出基本模式。有些一下子搞不清的，把职能先放到计委。专业部门要超脱，才能精简，要大胆精简。

学会和协会。学会是搞研究的，协会代表企业与政府对话。学会要比协会粗，协会要细，学会要粗一点。一些干部要转到协会去，要统一考虑干部的安排问题。协会不能成为二线，到学会去的要是在学术上有发言权的人。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谈话）

将来人事制度划一个大杠杠、大制度：选举产生的，实行任期制；非选举产生的，实行公务员管理。我们不用“文官”这个词，用“国家公务员”。公务员就是指不是选举产生的、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决定任命的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过去分工不发达，一个干部，一个群众，指挥员和战斗员，合称指战员。解放后，这样的概念不够用了，还这么套，带来许多问题。今后除了行政学院毕业的、公务员考试合格的，都不能进入国家机关。这有利于提高公务员的质量、消除派性。日本是很严格的，大学毕业后最优等的学生进行政学院。我一九七九年访问法国，陪我的就是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个毕业生，毕业以后在大区当办公室主任。

问题是，国家机关原来的这么多人怎么办？台湾的办法是依法铨叙[2]合格后任用，我们也要有个办法。新进来的要考，原来的则冻结，可以依法审核，合格者继续留用。实行公务员制度，首先就遇到这个问题。要首先在政府系统搞起来，政府要搞得精简、有效率、廉洁、制度化。

什么叫荐任、委任、简任和特任？我们就这么分：选举的和任命的，是一种；另一种是非经选举和非任命的。我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就是文官制度。打了天下就要搞科举，从战时体制转到建设体制。看《官场现形记》，其中就有简任等等这些说法。这次机构改革以后，人事部就真是个吏部了。大的干部由党统一管，各类干部由各部门去管，各系统建立各系统的干部制度。这是一个大杠杠。再一个杠杠，就是区分两层干部：选举的，实行任期制；公务员，实行考试和退休。党管重要干部，就是管负责决策的那些干部，通过正当法律手续来推荐和管理。党管干部的总政策、规划等等，即宏观问题。各级党的组织部就管这个。工资则要国家劳动部门统一管，编制也要统一管。

在中国搞公务员，政治标准很重要。外国就是业务问题，我们要有个政治标准。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谈话）

要回顾一下，看看这一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情况。最近小平同志讲了一个意思，是小平的一贯思想，说无论如何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那是几个政府。我们没有搞，要注意不要受它的影响。小平着重讲了要保证效率，这是社会主义的优势，不能丢。要保持很高的效率，不要互相牵制得很厉害。行政机构要有很高的效能。这就涉及到立法、行政、党委，主要是党的领导、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关系，怎样搞得好一些。中国究竟怎样搞？原来的搞法不行。人大处处是橡皮图章，这怕不行。党的领导、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关系怎样处理？要有

个笼子。又要改变最高立法机关流于形式的做法，又要考虑到党的领导，立法与行政之间不能牵制太多。过去权力机关职权不具体，虽然有规定，但是难以实行，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话很空。如果权力机关的权力规定实了，党的领导虚了，也是个问题。权力机关的权力很虚，不行。现在如果反过来，党和行政都很虚，会不会又发生另外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与法制。两者要结合，又要相适应。民主的制度化就是法制，法律对实行民主也有所制约。在什么框框内民主，也要相互适应。如果这一方面很具体，那一方面不具体；这一方面放开了，那一方面不适应，就会有很多问题。

目前的现状不改变，不行；步子走得太大，也不行，各方面跟不上。要使民主化进程健康发展，重要的是开始就不出问题。如果出了问题，就要退回来，难以健康进行。

要考虑如何保证安定团结，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际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凡是讲到一个方面的问题，要考虑配套的问题。比如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一旦真正发挥了作用，将来又有一些什么问题？体现人大权力机关的作用，现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对于最高权力机关，都有个反制约的问题。比如美国国会通过的东西，总统可以否决。另外有些国家可以解散议会。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启动以后，干部任免和财政问题，会成为人大与党委矛盾的两个焦点。干部问题怎么规定？既然已经选了省长，由省长提出政府人员。你如果老是否定他，又要他工作，又否决他的人选，这怎么办？有人说不会出事情，我看不一定，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文革”以来，就有所谓你的干部、我的干部。财政问题，也很复杂，没有互相制约不行。仅仅人大通过了就可以制约政府，缺少另一方面，能行吗？比如发票子，人大决定了发多少就发多少，恐怕不行。政府也决定不了，这是由经济运行决定的。中国的经济情况，能看得那么准？又比如预算问题，如果权力机关只讨论政府提出的议案，那可以。如果由权力机关直接提出预算案，就不行了。总之，比较大的就是人和钱的问题。仅仅一个方面的制约，不行。作为改革，这些问题都要考虑，不能一个方面走得快而另外的方面跟不上。搞得很繁琐也不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付国会要占很大的精力，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内部消耗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把行政工作搞得很困难，是不行的。人大既是最高权力机关，又在党的领导之下，政府也是这样。

社会民主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基层民主，一个是社会协商对话。政协是很重要的协商形式，但是，只靠政协不行。工会是很重要的渠道，但是，工会本身要改革。现在政府与工会对话，工人不承认。党与工会理顺关系，工会本身的改革，要有个过程。所以，政治协商的问题也不能说解决了。我们必须与不同利益的人协商和对话。党和政府与他们对话，这可能比较重要。将来，大型对话可以临时选代表，召开对话会议。与现有组织对话不解决问题。除了政治协商，还应有更多方面的协商。将来应该有代表农、工、知识分子等与政府对话的渠道。

对话虽然麻烦一些，不至于出了事不可收拾，社会生活也活跃起来了，否则就出无政府主义。对话要制度化、经常化。社会主义民主，一个基层民主，一个对话。要搞这些东西，社会生活就活跃起来了。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谈话）

注 释

1．倪献策（1936—），20世纪80年代中期任江西省省长，后因腐败案被撤职查办。

2．铨叙，中国旧时的一种授官制度，按资历或劳绩核定官职的授予或升迁。现在台湾地区设铨叙部。

接见农村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今天是和你们见个面。杜润生同志那里起草的文件稿，要解决的问题都谈到了，写得很好。万里、纪云同志的讲话，今天的汇报，都很好。农村的情况和今后怎么搞，比较清楚了。还有些问题，议论议论。

一、农业投入问题

农业是有个投入问题，我们对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但投到哪里，要总结历史经验。水利还是要搞的，但像过去那种不讲效益的搞法，浪费很大，效果不好，不能再重复了。农业生产完全靠工程来稳定，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国家。美国、澳大利亚也做不到，苏联更不用说了。国家对农业的投人用到哪里，要考虑效益问题，符合科学原则，合理原则。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今后，还要靠政策，靠科学更有文章可做，潜力很大。不要一讲加强农业，只想到投入问题，而不研究钱用到哪里，如何用，如何才能效果好。如果又回到以前的那种指导思想，那是没有出路的。

最近农研室、农牧渔业部研究了十项实用科技措施，比如地膜覆盖作用就很大，值得重视。小平同志讲了多次，化肥问题根本是要解决复合肥问题。各地都要把指导思想搞正确，根据实践不断总结，因地制宜地提出关键的措施。

我们要研究农业投资的体制和渠道，现有的办法弊病很大，是否干脆切一块给银行用于贴息贷款搞农业的基本建设。外国都是这样，没有什么财政拨款。政府支持什么，就将增加的投资划出一块来搞贴息，这样效益最好。

以工代赈，用于搞基础设施，可能是个好办法，你们可以试点。如果成功可以推广。为此就需要在农村多发点货币，这危险不大。农村购买力主要对象是中低档货，对市场冲击不会大，但是却可以支持社队企业和城市一般工业的发展，刺激中低档商品的生产。当然，数量也不能发得太多。关键是要细水长流，用这个办法坚持年年搞，几十年下来，就会有很大效益。在贫困地区首先是要解决修公路的问题。不通路，什么也说不上，不可能发展商品生产。

二、粮食问题

粮食问题，在我国将是比较长期的难题。一九八四年出现的情况，应当承认当时看得不太清楚。连续几年的农业丰收，又因为农业结构没有较大调整，粮食多了，还有前几年的粮食在里面，因此一时变成卖粮难，转化不了。

整个农业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不仅改革有很大的潜力，而且农业资源的利用也有相当大的潜力。只要政策对头，今后的五年或十年，农业的发展不一定是很慢的。中国农业资源虽然不能说很丰富，但利用还是很不够的，对农业还应当是乐观的。当然，粮食不是个简单问题，人多地少，要像前几年那样快的发展，今后看来是困难了。粮食问题，在我国长时期内都是个难度比较大的问题，搞得不好，会重新发生粮食紧张的局面，这不是不可能的。现在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地方，搞粮食的兴趣就越小，但是，完全靠价格来解决种粮积极性，解决种粮农民得到搞其他经营一样的收入，恐怕难以做到。光想靠价值规律让农民种粮食，恐怕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当然，靠政治动员、压指令计划也不行。要尽量让农民种粮有一定的收入，以缓解矛盾。有些同志过去曾想我国成为大量农产品出口的国家，现在看来不可能这样。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粮食能做到基本自给，在长时期内进口出口大体上平衡就不错了。在粮食生产达到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充分开发农业资源，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中国要像前几年那样大量进口粮食，对整个经济影响太大，不能那样去考虑问题。粮食问题，应按这样的思想来考虑：完全按价格解决不行，无视粮价过低也不行，只能按国家承受能力，逐步解决。全部放开粮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粮食价格上的“双轨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取消。但这种状况必须逐年有所改善。一是逐年减少平价收购粮食，增加议购部分；二是定购粮价每年加一点，细水长流，合同内粮食挂钩的物资增加一点；三是平价供应的粮食，逐年减少一点，逐步增加议价销售部分。就是这么一个方针，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这个方针可进可退，情况好一些，步子可以大一点；情况差一些，步子可以小一点。总而言之，不要让矛盾激化，但也不要设想一下子解决矛盾。像苏南、浙江杭嘉湖、珠江三角洲那些地方，粮价提多高，也提高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那里还是要靠发展乡镇企业、出口产品、多种经营，搞以工补农。

明年的粮食定购，总账就是一笔，从一千二百亿斤减掉二百亿斤，其中包括原来加价的一百二十亿斤。二百亿斤各省按比例照减。到了省里怎么办，给各省自主权。

三、农业资源的开发问题

农业资源的开发，有很大潜力。广东、山东提供了这个经验。广东最近在东莞开了一个农业资源开发会议，说广东农业进入了第二个高潮，比较乐观，着重在开发上多做文章，不一定改粮田种其它的。山东也开了个会，提出在工业资源

少的地方能不能富？结论是可以致富。务农不一定必穷。山东诸城产供销一条龙，外贸搞得好。农产品就地加工，路子是对的，但要一步一步地走。涉及到粮食系统、商业系统，要逐步把一些加工企业往下放。山东下决心这么搞。当然，棉花就不能到处办小纺织厂。

农村开矿潜力很大。现在定了个方针，支持农民搞。在冀东地区，国务院决定扶植农民搞二千万吨铁矿石，等于七百万吨精矿粉。支持农民办矿，只相当于国家办矿投资的三分之一，是经济合理的。

中国资源能够讲得上丰富的就是煤矿。有一部分煤矿农民开采有困难，但相当一部分埋藏不太深，群众是可以开采的。山西雁北农民致富就靠挖煤。国家把路修通，办好电站，老百姓就可以挖煤。把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农村丰富的劳力资源结合起来，成本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与我国竞争。陕西神木农民开矿把周围不少劳力都吸收进来了，一部分劳力转移了，人平均占有的农业资源就相对地增加了；搞了工业，地方也就富了，增加了积累，反过来又支援了农业的开发。如造林，光靠国家不行，地方一富起来，就好办了。

农业的规模经济，也要靠这一条。工业不发展，劳力不转移出去，土地也不能集中，也没有条件装备农业机械化，只能搞自给经济，小农经济。搞几十亩地的家庭农场，需要提供水利、肥料、机械等配套服务，没有这一套，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效益也不高。苏南、杭嘉湖、珠江三角洲将来是有条件这么搞的，包括开矿的那些地方，一部分人开矿去了，另一部分人搞农业，规模就可大一点。

四、农村果园、养殖场和乡镇企业进一步搞活的问题

最近讨论增强企业活力问题，有这么个看法，根据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精神，小工业、小商业、饮食业可以实行租赁、承包，有的可以拍卖，类似农村的包产到户、大包干，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沈阳、武汉在中等企业试行招标承包。经委和体改委在研究国营大企业实行经营责任制的问题，由经营者或经营者集团承包经营。给他们以经营自主权。在所有权、经营权分开的问题上认真做做文章，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上明确规定了的。二者分开，根本问题是经营权放开。我今天讲这个问题，就想到农村果园、养殖场以至于乡镇企业可以有几种形式：家庭果园、农场，由家庭经营，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形式，财产是公有的，集体与他订合同，经营权放开，报酬和他经营好坏直接挂钩。经营好了，工资可相当于现在工资的多少倍。只要真正解决经营权放开和经营者的利益问题，人才就会涌现出来。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可能出企业家。要出企业家，不一定非改变所有制不可。你们看过《反败为胜》这本书，亚科卡[1]是老板，是个企业家。董事长一年给他九十七万美元的收入，当然大部分要交所得税。我了解了一下，所有西方国家的企业集团，作为经营者的企业家的工资都特别高，都高于国家官员，形成一个经营者阶层。你只要雇了我，就可以把你的企业办好。将来，我们的农村也好，城市也好，当然首先

是城市，大中企业可以搞“经营承包制”，就是刚才说的办法，把经营权交给你，你可以使用这些财产。你为企业谋了多大的利益，把企业效益提高到什么程度，你的工资就可相应提高。农村也要这么搞，你经营个养殖场，干到什么程度，工资就相应增到什么程度，除国家宏观控制要服从外，内部怎么搞，不加干预。我们现在一方面要为企业创造外部环境，如价格、计划体制等；另一方面，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必须改。根据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精神，在农村社队企业、养殖场、林场等，都可以研究和试行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

注 释

1．亚科卡（Lec Iacocca，1924—），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时任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曾任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技术员、推销员、副总裁、总裁。

在“走向二○○○年的亚太经济北京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有机会出席“走向二○○○年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北京会议”的开幕式，感到十分高兴。

这次会议是由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心倡议召开的，得到了亚太区域各国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和高级官员聚首一堂，共同探讨亚太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景，生动地表明亚太区域各国对促进本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合作的重视。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对来自亚太区域各国和地区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大批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枷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它们在不断巩固政治独立的同时，积极发展民族经济，通过探索和实践，制定并实行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战略，取得了经济建设的显著成绩，为促进整个亚太区域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

近二十年来，亚太区域的经济发展引入注目。亚太区域已成为世所公认的经济增长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亚太区域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都拥有巨大的优势和潜力，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到本世纪末，亚太区域的经济实力将会有进一步的增长。这不仅会造福于本区域的人民，而且必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今后，如何保持亚太区域各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如何把亚太区域二○○○年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变为现实，是亚太区域各国面临的挑战。

和平与稳定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亚太区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发祥地。只有各国在相互关系中严格遵循这些原则，才能使本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得到维护，从而使本区域的经济合作和发展得到保证。

亚太各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方都应在政治上互相尊重，经济上平等互利，理解和尊重彼此的差异，考虑和照顾它方的需求和利益。

亚太区域国家从各自的国情出发，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不同程度地都在调

整各自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各国可以在这方面加强交流，相互借鉴。

亚太区域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各有优势，互有需求。各国应当加强交流，促进合作，特别是在走向二○○○年，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中，本区域的主要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应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政府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主张是互相尊重、加强交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我们将遵循这些原则积极推动和促进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并愿意同亚太区域各国一起，继续探索亚太区域合作的途径和方法。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在积极努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力求到本世纪末使经济达到小康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继续前进，在三、五十年内接近先进国家的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坚持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并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在今后几年内，我们的改革将全面、深入地进行，逐步完善我国经济的运行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体制。

中国是亚太区域的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的相当部分是在这一区域进行的。中国坚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面向亚太区域，面向全世界。我国的十四个开放城市、四个经济特区和三个开放地区，全部位于西太平洋沿岸一带，这种布局有利于加强我国同亚太各国的交往。最近，我国政府公布了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并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健全和完善各种经济立法，改善投资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将会越来越大，中国同亚太区域各国的经济往来会更加密切。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亚太区域，反过来中国经济发展了，也必将对亚太区域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愿与各国一道，为推动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加速亚太区域的经济发展而共同努力。最后，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各位。

听取组建机械工业委员会汇报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以后企业集团计划单列是否在你们这儿单列，不在计委单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要研究一下。现在整个体制还没有改变，你们先改了，变成行业管理，计委和经委原来管各部的一部分权力要分给你们，但他们还是全国的综合部门。要把这个关系划分清楚。行业管理不管计划是不行的。机械委不是只管机械部和兵器部，而是管整个机械行业的，包括纺织机械、交通机械、邮电机械等各种机械。至于机械同其他的平衡还是在计委。技术政策也由机械委管。对于其它各部的机械行业问题，基本方针还是要督促他们下放企业。企业下放了，行业管理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将来机械委管理分两层，一是整个机械行业的规划和机械行业的技术政策，包括进出口的政策，哪些能进，哪些不能进。现在是经委管的，将来转到这儿来，经委就不管了。（万里同志：新机构的主要任务，应把研究制订行业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放在头一条。）二是管一般的机械装备，包括投资、外汇等。各部的职能有些你们还代替不了，他们不光是从计委那儿拿到一块投资，自己还拿了些投资、外汇，挤出来搞机械。你统统要揽过来，这些就没有了，他们不管了，结果机械行业的投资反而少了，物资也少了。现在要都统起来，企业也不高兴。所以属于投资、外汇、材料这一部分，机械委搞好规划后还是按原来的渠道比较好些。这个问题要很好地具体研究一下。总之有两条，又要能体现行业管理，又要考虑到实际的情况，逐步过渡。

车辆农业机械局包括不包括汽车？汽车怎么办？（何光远[1]同志：包括汽车，管一点政府的职能。）对，行使政府的职能。协会的工作由汽车协会去管。企业下放到地方去，对一些亏损企业要研究一下，实在不行，有些财务问题暂时挂一挂。

今天汇报的关于机构的设置，由陈俊生、尉健行[2]等同志和两部一起研究的。关于机械委的职责范围，今天在这儿也议不清楚，不好定，因为涉及与计委、经委分工的问题，还有与各部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此，请安志文同志负责，找你们和计委、经委在一块具体协商研究。方针是两条：第一条，要基本上能体现出新组建的机械委是一个行业管理部门，原来计委、经委管的属于机械行业管理的相当一部分权力转到这儿来，不然没有办法实行行业管理；第二条，恐怕还得照顾到现在各部门那么多的机械制造工业的情况，一切都统到机械

委来，也统不起来，而且企业也不一定赞成。因此，大体上是这样，原来属于这两个部管的事，你们今后可能还要管得多一些，因为原来的兵器部、机械部都没有了，有些事目前交不出去，还得管一管；属于其它各部机械行业的事，要分一分，你们只管某些事，不管某些事。但这都不是指具体管企业。请安志文同志召集议论，提出一个方案，报国务院批准。要体现上面说的两条，没有改革的精神不行。不要听这个讲、那个讲，困难很多，搞个不解决问题的方案。总的还是由陈俊生、尉健行等同志抓，贺光辉同志也参加。

我还要讲一个观点。机械工业和兵器工业两个体系统起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两个机械工业制造体系的问题。为什么这次把这两个部搞到一起，因为原来兵器部和机械部所属企业的机械设备、技术力量，特别是包括兵器工业今后转民的力量，在整个机械行业中占很大比重。当然，航空、船舶工业也是机械制造，还有其他各部机械制造，但是就通用的机械来考虑，成套设备和一些大型机械的制造，这两个部原来管的企业统起来搞，对解决我国两个机械制造体系的问题，就迈出了一大步。原来我们说的两个机械制造体系，首先是讲军民，军工当然还有导弹、飞机等，但大量的还是在兵器部，这个力量没有发挥出来。现在采取这样一种形式，至少从明年开始，把兵器部和机械部的机械制造任务统一起来了。这对于推动原来兵器部的工厂生产民品，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当然，这还不彻底，还有其它军工部没有归过来，还有其它各部管的机械企业，将来专用、通用机械也要统一。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按这个方向搞，另一方面还要承认一定的过渡性，不承认点过渡性恐怕也很难行得通。

另外就是人员的问题，你们说的这些办法，我看是可以的。先把一千人定下来，（万里同志：赶快把头定下来。）不能把三千人摆在那里慢慢往下减。两千多人的安排问题，我估计一年也搞不完。现在这个办法好，不是合并，就是重新组建。原来两个部没有职责了，撤销了，人员还在，那就慢慢解决，工资照发。现在你们有很多人，别的单位可到你们那儿去招，有很多单位需要人的，监察部成立后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招。要鼓励自谋职业，有些年轻人鼓励他们到下面去，到企业去。真正搞行业管理，一千人也就可以了。

关于老干部和行政管理的机构问题，这些事你们不要急，步子可缓一点，先把搞工作的机构建起来。如果一齐搞，就可能搞得乱糟糟的，牵扯的力量很大。最好少牵扯领导的力量，先把职能转变、班子、干部配备等搞起来，那些生活、后勤保障、老干部管理，目前还是老办法，两千多人的事没人管就会乱套，影响其他的改革。但目前搞生活的机构不能搞成两套，不能一套管新的，一套管老的，只能搞成一套。现在中心的问题，一个是把新机构组织起来，一个是把两千人安排好，其他都是次要的，早改晚改关系不大。这些服务机构社会化也不那么简单，整个城市没有社会化，你一个部门去搞社会化不可能。

退休人员的待遇问题，在国家没有新的规定以前，你们要和劳动人事部衔接一下，（赵东宛同志：定得高了降下来不好办；启立同志：如果你们这么搞，全国所有的老干部，包括已经退休的，都要重新算账；王兆国同志：全国有许多超

龄的，七十万人在等着。）没有把握的事先不定。关于新机构的名称问题，经过议论，就叫机械工业委员会。

汽车搞行业组织的问题，原则同意你们的意见，机构搞精干点。名称可以按你们意见叫汽车产业公会，只要你们支持改产业公会就行，这样就可以多管点大事了。

注 释

1．何光远（1930—），河北安新人。时任机械部副部长。曾任一汽铸造分厂厂长，长春拖拉机厂厂长，长春市副市长，农机部副部长，国家机械委副主任，机械电子部部长，机械部部长。

2．尉健行（1931—2015），浙江新昌人。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曾任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厂长，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监察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主席。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耀邦、小平、先念、陈云同志：

十一月七日上午和八日下午，研讨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听取办公室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重点的汇报，着重议论了以下问题：

一、涵义和目标。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领导体制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它适应于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不适应于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建设的需要；适应于实现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不适应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因此，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层涵义：一是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的转变，二是实现从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向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转变。

小平同志最近多次指出：要使党和国家的各种机构充满活力；要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这确实是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之计。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

近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要求，可以考虑概括为一句话：改革领导体制，调整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和职能，使之走向制度化。内容主要包括：（1）通过党政分开，使党和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制度化，各司其职，增强活力；（2）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使之制度化，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3）通过权力下放、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行政法规，使政企关系和机关工作制度化，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

二、党政分开。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根据党政性质不同、功能不同提出的，是针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提出的，比“党政分工”的提法好。有没有更好的提法，还可以再议。

党政分开，不是讨论共产党要不要执政的问题，而是解决如何执政、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

实行党政分开，需要理顺党同政府和党同人大的关系，同时也要理顺政府同人大的关系。三个关系中，重点是党同政府的关系，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具体化、制度化。

党政分开，首先要从中央做起。这几年，中央一级的党政关系已有较大改进，积累了经验，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至于地方各级党组织、政府、人大，它们的具体职权和功能同中央一级不一样。要区别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制定相应的规范。

三、党内民主。以积极促进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现实、可靠、有效的途径。这几年，我们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不足之处是制度不够健全，特别是缺少程序性的规定。现在，党中央的政治生活是很好的。鉴于文化革命的历史教训，考虑到今后三十年、五十年的情况，对党的中央组织内部的相互关系、议事规则、表决程序，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化，建立起相应的监督制度。基本国策的连续性，要有稳定的领导体制加以保证。这样，在大政方针上就有可能避免因领导人的更迭或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产生波折。这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处理好了，立下规矩，可以长期得益。

在民主问题上，党带个好头，中央带个好头，意义十分深远。

四、权力下放和机构改革。这方面的情况很复杂，牵扯面很宽，改革的难度也比较大。

权力下放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需要同时满足三个基本要求：（1）保证中央政令统一，能够实行有效的宏观控制；（2）保证地方有权从实际出发，及时地解决地区性的问题；（3）保证企业有自主权和充分活力，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

目前正处于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时期。权力下放从何入手，有些问题还看不太清楚。看来，政企分开是企业最迫切的要求，应当优先考虑。搞活中心城市，近期也有不少工作可以着手进行。

一九八二年机构改革后，又出现了新的膨胀。原因主要是：（1）由于官僚主义、因人设事、形式主义和搞运动而设置的机构；（2）由于党政不分而重叠设置的机构；（3）由于政企不分而过多设置的机构；（4）由于社会分工不发达，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为机关自身服务而设置的机构。因此，搞好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克服官僚主义并逐步扩大社会分工，精简机构是可以办得到的。

机构改革要综合治理，第一要转变职能；第二要与经济改革的进程相适应；第三要建立有针对性的制度，包括预算控制和法规控制；第四要妥善解决好有关人员的调整和出路问题。

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各个环节都涉及到干部人事制度。政府、人大和某些重要组织主要负责人应由中央和地方党委提名，这在今后也是

确定无疑的。但现行的由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统一管理干部的体制，需要进行改革。

党政分开以后，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除管理党务干部外，主要职能似应有较大变化，即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把重点放在综合研究干部人事制度、干部人事政策、干部的现状和需求预测上。

“干部”这个概念包括的范围太庞杂，应该加以分解，实行分类管理。各个系统的干部，在用人之权与治事之权相统一、用人之责与治事之责相统一的原则下，分别由各系统考察、任免，并确定具体的管理办法。政府系统可以考虑建立适合我国特点的文官制度。各企事业单位也可以考虑按照各自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建立大致统一而又各具特点的用人制度。

第三梯队的办法，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措施，对实行新老交替很有必要，但长期搞下去，也有弊端，似应考虑替代办法。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有助于创造一种使优秀人才得以脱颖而出的环境和制度保证。

六、发挥人大和政协的作用。要着重研究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建设。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不照搬国外的议会制度和两院制，也不搞国外那种三权分立，但对国外一些好的经验，对我们有用的做法，可以有选择地吸收。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但最高权力不能是无限的，不受任何制约的。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更好地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作用，这就需要研究它们的职能范围、议事规则和议事程序等问题。人大代表及其常委的构成、人数和产生办法也需要研究。

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协、民主党派、其它群众团体和舆论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方面的呼声较高。考虑到我们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只能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而逐步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各方面的要求既要有适度的满足，胃口又不宜吊得过高。

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对实行“一国两制”也有重要意义。

七、健全法制。法制建设贯穿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当前拟着重考虑：（1）加强公、检、法、司的相互制约和独立办案，改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状；（2）加强行政立法和行政监督。

八、如何过渡。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除了目标和重点外，还需要研究从何入手、难点何在、适应程度如何、步子怎么迈、如何过渡等方面的问题，切实做到“拿定主意再动手”。

下一步准备成立几个专题小组，开展专题研究，各自提出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方案。明年三月前，我们将分别听取各专题研究小组的汇报。四、五月间，有可能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送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中顾委、人大有关同志阅知。

赵紫阳 胡启立 田纪云 薄一波 彭冲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在广西视察期间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

一、关于农业问题

一定要因地制宜，在“山”字上下功夫，认真抓好林业生产，大力发展畜牧业。南方山区有很大潜力，路子比较宽，见效比较快，大有作为。我看，现在南方发展畜牧业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你们这里山很多，搞十大基地，首先要把畜牧基地重视起来，大力提倡养牛、养羊，还可以养奶牛，并努力搞出经验来。目前主要是注意抓好三件事：一是改造草山、草场，改良牧草；二是推广人工授精，改良牲畜品种；三是制定一些政策，鼓励和调动农民饲养牛、羊的积极性。要搞好家庭牧场，让一些有条件的家庭来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如技术培训和经济上的必要支持等。还要抓一些好的典型，一个村如有一、两户家庭牧场办得好，其他的就会跟着学。养牛，主要是草场问题，要把草场承包到户，让农户自己建设，自己使用，并保护草场的经营权，不能一家把草场搞好了，大家都来放牛。一定要改良草场，发展养牛、养羊。

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经济，要注意长短结合。种柑橘到盛产期需要六、七年，杉木十五年，八角七、八年，都有一个投入与收益时间较长的问题，这对于比较富裕的地区是可行的，但是，对于较穷的地区，就要考虑群众眼前的困难问题，群众投入要等七、八年才有收益，其积极性能不能保持下去。因此，要搞长短结合，如林粮兼种。一些毁林开荒比较严重的地方，要退耕还林，可以采取先种上树，利用幼林地搞好林粮间作，等树长大了再退耕的办法，以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的矛盾。林粮兼种是南方的一个习惯。贵州省兴义地区现在群众种芭蕉芋的积极性很高，每年出芭蕉芋淀粉二亿斤。你们发展芒果、杉木等经济林和用材林，也可以套种芭蕉芋，还可以套种黄豆、生姜、花生等其他短期作物。贫困地区要发展商品经济，根本的问题是要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

无论是大自然村还是小自然村，都建立村民委员会行不行？我们多年来不重视自然村，可是，自然村是客观存在、自然形成的，不能人为地把它分开，也不能随意合并。自然村，既是一个居民点，又是生产点，还是个文化点，两个村合在一起，事情就搞不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农村基层建设必须考虑把村委会建在自然村上。村干部的设置要精干，村民委

员会设一正一副，小的自然村只设一个主任。对这个问题，我回去向有关部门谈。

二、关于工业问题

搞活企业，进一步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明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中心。要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认真解决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营机制，给国营企业以充分经营自主权，这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关键。原来我们有些设想，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和“七五”计划的建议，原想从明年起把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整作为一个主要环节，理顺生产资料价格，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或形成一种市场调节，使企业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以至能够走上完全自负盈亏。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步总是要走的。但经过研究，觉得调整生产资料价格和运输价格，怕涨价幅度较大，各方面承受不了，所以又考虑明年主要是调整钢材价格，后年调整其他生产资料价格。这个方案，中央已讨论过多次，基本上定了。但是，从今年第三季度特别是第四季度以来，我们感到有两个问题更需要优先解决：第一，是企业活力问题。这几年搞来搞去，企业的活力还是很不够，尤其是国营企业中的大中型企业、加工企业、轻纺企业和一部分老企业，活力很不够。同时，这几年生产资料价格实际上是上涨。生产资料价格提高了，技术改造和管理水平一时很难相应跟上去，企业就普遍消化不了。消化不了，企业负担就要转嫁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转嫁。这样，从国家来说，表现为税收利润减少；从企业本身来讲，困难就增加。在全国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要解决企业的活力问题。第二，是农副产品的价格问题。粮食势必要提高点价格，主要是通过减少合同定购任务，增加议购。粮价一动，势必涉及到鸡、蛋和其它农副产品等。要把农业稳定下来，继续保持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看来价格要有点变动，但不能大动。如果明年要提高钢材价格，又对粮食价格适当调整，两方面同时搞，物价指数上升就超过15%，我们可能承受不了，因此，不能同时搞。如果明年我们集中力量调整钢材价格，一下子很难收到明显的效果，而若不搞活企业，不解决农业的问题，就会影响明年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所以，这样考虑的结果，现在初步确定，钢材调价问题推迟出台。明年集中力量解决搞活企业的问题，以促进工业生产；适当调整农副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粮食价格，以维持和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关于搞活企业的问题，国务院有个文件很快就发下来，还有一个搞活轻纺工业的文件也将陆续发下来。除了中央确定的一些政策外，搞活企业问题，我觉得地方上也得认真抓一抓。我们现在要上上下下，共同努力，进一步把企业搞活，在目前可能的条件下，减轻企业负担，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活力。过去，中央、国务院已经明确了，还没有落实的政策，要抓紧落实。这次文件下来后，各地也要抓紧贯彻。搞活企业，大家都赞成，但涉及到地方或部门的利益，意见就不统一了。我不客气地说，大家都希望中央进一步放宽政策，

但自己那一部分早就应该放宽的却没有放宽。所以，我们上下要同心协力，把该下放到厂的权力真正放下去，增强企业的活力，这是一个根本。政要简，权要放，一定要简政放权，不要层层截留，希望你们很好落实。

上面所讲的是搞活企业的外部条件问题。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已接触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问题。企业本身的内部机制，如果不改变，光是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解决企业的外部条件，企业仍然没有活力。现在看来，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活力大得多，个体企业又比乡镇企业活力大。当然，乡镇企业、个体企业有一些条件比国营企业优越，没有调节税，只有八级累进所得税，特别是指令性计划少等，但乡镇企业也有很多困难，设备差，技术力量差，资金比国营企业少，而国营企业却比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的活力要小得多。这主要是国营企业内部的结构不合理。最近，报纸刊登了太原冶炼厂硅铁车间临时工武吉龙承包的消息，很有启发。这个车间多年亏损，领导班子换过多少茬，最后采取租赁的办法承包给这位临时工，就扭亏为盈，去年上缴几十万元。石家庄黄磷厂也把硅铁车间包给他，结果也扭亏为盈。这说明我们国营企业内部的机制问题很多，潜力还大得很。

搞活企业，小企业容易些。但我们归根到底是要解决国营大企业搞活的问题。搞活企业，只解决外部条件是不行的，还必须解决企业内部的机制问题。现在，改革已接触到一个根本问题：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问题。而要真正解决企业内部机制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根据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把权、责、利全面落实到企业经营者身上和企业中去，创造条件，逐步放开企业的经营权，让企业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从外国来说，所有权和经营权都不是合一的，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是两码事。当然，中国如何把经营权放开，还有很多问题，但这是改革的方向。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就专门有一段论述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问题，我们的宪法也讲搞多种经营方式。这样一搞，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就没有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了。经营者从国家把企业的权责利接过来，国家同企业经营者的关系只是照章收税，财产分红。至于企业怎么经营，由经营者全权处理。这样，社会主义企业的活力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我们多年来的改革，只是解决国家同企业的关系问题，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基本没有变化，企业只负盈，不负亏，小锅饭有利时吃小锅饭，大锅饭有利时吃大锅饭，国家规定的政策，对它有利就干，无利就不干，所以基本上还是躺在国家的大锅饭上搞改革，企业不可能有活力。很多同志主张用改变所有制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改变所有制非常复杂，恐怕同我们的意识形态也不相符合，因为我们是公有制，不能改来改去变成私有制。但股份制可以搞，将来还是国家的股份占绝大部分，地方股份也可能占比较多，个人的股份肯定很少。如果我们既解决经营的机制，又解决股份，两个配套，就可能搞得好。这里，决定性的问题是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

关于厂长负责制问题，要认真抓一下，《三个条例》发下去以后，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贯彻。多年来，好像一讲厂长负责制就贬低了党委的作用，所以

要认真落实。厂党委书记思想不通的，要做工作，调整一下，组织上不调整，就很难搞下去。当然，有一些党委书记能力强的，可以任厂长。这个工作要抓紧，搞得好，对明年可能是个有利因素，搞不好就是个消极因素。一是要统一认识，二是组织调整，抓得越快越有利。

三、关于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关系问题

有的同志建议，国家对属于后进地区的广西在政策上再放开一些，多给一点扶持。这不光是一个广西的问题，还有许多省、区都还落后。他们也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只能说适当地照顾。而且，沿海的条件非常有利，为什么不趁此机会让它发展更快点？因此，看问题要全面，不能光看一个地方。

东部、西部的关系问题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怎么做？西部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要逐步开发，这是一条方针。但从总的来说，没有东部地区的发展，西部的开发就没有力量。限制了东部，要外汇没有外汇，要财政收入没有财政收入，西部靠什么来开发？现在西部地区绝大部分要国家补贴，要想增加一点投资，还得靠东部。说要等东部整个发展了再来开发西部是错误的；但离开东部的发展，开发西部也是一句空话。所以东、西部的发展是结合的。东、西部的差别将是长期存在的，西部的发展只能循序渐进，逐步开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下一个世纪，我们伟大的希望在西部，这个世纪只能主要依靠东部增强活力来发展经济。但西部不发展，东部也发展不起来。世界有个“南北对话”，中国也有个东部西部问题。东、西的关系对中国经济全局影响很大。广西也有这个问题。

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吃亏在于甩了几次尾巴。沿海经济基础本来很好，人才也集中，但五十年代一开始，不搞沿海建设，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说了要调动沿海的积极性。但还没有搞几年，到一九六三年，又搞备战，搞三线建设，投入一千多亿元，没有多少效益，国家损失很大。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除了“左”和阶级斗争外，在经济战略上变来变去，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我们现在只能是发挥东部和西部的积极性，发挥各自的特长，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按这样的路子稳定地走下去，我国的经济建设才能少出问题，健康地向前发展。

落后地区到沿海地区去参观学习是可以的，但有个怎样学习的问题。珠江三角洲有很多做法，搬到你们这里来，不一定行得通。不要老是和外地比，有许多条件是不可比的。不能完全否定主观努力的作用，但也不能说，广西经济落后都是工作没有做好。不能离开这里的特定条件谈问题。不能指望来一个什么人，有什么灵丹妙药，就可以很快搞上去。改变落后面貌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开放，首先是开放沿海，因为它最有条件开放。开放对内地的作用就没有像沿海那样大，且不说人才比你强，信息比你灵通，就是外商到内地投资，要加那么多的运费，这怎么能同沿海竞争？对内地，国家也要给予适当照顾。国家在财

政补贴上每年递增10%，就是对西部很大的照顾，这些钱都是从东部拿来的。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工作，但要想把东、西部的差距很快地消除，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想法不切合实际。这样想必然会出现两种倾向：第一，老是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这不可能做到；第二，就是悲观失望，不满意，认为搞来搞去还是这样。其实，广西有很大进步，这几年的工作是前进的，有成绩的。

现在不是东部越富、西部越穷的趋势，但有可能某些地区与先进地区的差距拉得更大一些。这是会有的，但也是暂时的。总的来讲，都在前进，从长远看，差距还是在缩小的。要使这种差距接近，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你们广西内部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一个国家内部有差距，一个省内部有差距，一个县内部也有差距，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这次我走了几个省，都提到这个问题。有些问题提得有道理，中央会考虑的。比如乡镇企业这个问题，东部发展比较快，西部起步晚，宏观控制以后，影响了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这样的问题，适当地支持西部是应该的。

四、关于奖金税的问题

有些企业经济效益好，多发些奖金是可以的。问题是不同的行业怎么办。你们的经济效益好，除了你们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机会的问题，至少对这个机会要交些税吧？用奖金税调节一下，是必要的。现在有的地方劳动生产率很低，工资却很高，这是不正常的。超越物质生产水平搞高消费是错误的。我们的消费水平不宜提得太高，那样是要吃亏的。廉价的劳动力正是中国的优点和优势。企业实行自主权后，留利水平会有很大的差别，但奖金不能有很大的差别。同时，国家给企业让利，也不能使工人的工资成倍的增加。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的收入也是有所控制的，不同行业的工人，收入不会成倍相差，因为有个产业后备军问题。在我们国家，如果工人的收入相差很大，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两个工厂的工人从事同样的劳动，技术水平差别不大，收入却相差很大，收入低的工人会没有意见吗？因此，没有通盘的考虑不行。奖金税也是不得已的办法，现行的奖金税办法可以改善。企业当年的奖金多，不一定发完，可以作为工资基金留在厂里，到企业经营不好时，再发给工人。将来企业的工资、奖金具体怎么发，由企业自己定，国家只控制其总额。但从事同样劳动的工人，收入不能有成倍的差别，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所以奖金税可以改进，但一点不收不行。要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工资福利的增长，只能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水平，不能搞低效益高工资。

五、关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

我们国家这几年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是相当可观的。到全国各地走一走就可以

看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大城市到农村，到处都在大兴土木，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国能有现在这个状况就很不容易。日本的振兴时期和香港的经济起飞，也不过如此。大家都希望加快发展速度，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就全国来说，有个财力、物力承受能力的问题。无论是基本建设也好，技术改造也好，都得靠财力、物力。有多少钱和物，办多少事，这是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某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照顾一些？我不是说不可以照顾，但各地都有特殊性。沿海有沿海的问题，内地有内地的问题，东部有东部的问题，西部有西部的问题。银行贷了款，就要有物资来支付，而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物资。我们国家所消耗的钢材近二分之一是靠进口的。前几年的建设速度，靠过去出口积累的外汇支持。这几年能维持这个局面就是靠农村。过去我们进口粮食、油料和糖，现在把这些钱用来进口钢材。目前粮食生产并不乐观，今后可能还要进些粮食。今年的外贸又是逆差。因此，我们要注意到建设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我不担心中国的问题出在速度低上，而是担心问题出在速度高，最后支持不了。中国如果能在政治上有安定团结的局面，经济上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以每年平均递增7%—8%的速度向前发展，就大有希望。恐怕我们也只能保持这个速度。世界上连续10年保持10%速度的国家是有的，就是日本和几个小国，大国还没有。连续保持20年的国家一个也没有。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中有过，但大家都有亲身体会，年年说经济大幅度增长，大家却穷得要命，这个速度是假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一下子变成发达国家，尤其中国是这么一个人口多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投资规模要想有很大增加是困难的，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要有很大变动也不可能，当然，局部的、小量的调整是可能的。不要都向三角洲看，全国有几个三角洲？因此，不要离开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度。要重视质量和经济效益，保持国民经济能稳定、协调、持续、全面地向前发展。

不要在我家乡搞纪念性的东西和要求照顾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共滑县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

你们好！

根据紫阳同志的意见，有两件事需要通知你们：

第一，不要因为滑县是紫阳同志的家乡，就搞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带纪念性的东西，如保留和修缮他曾住过的房屋等。这种做法，只能脱离群众，造成不良影响，而绝无一点好处。紫阳同志多次向我们说过，坚决反对办这类事。

第二，请转告紫阳同志家乡的乡村党组织和干部，绝不能因此自恃特殊，向上级、向其他单位伸手要东西、求照顾。同关心全国一样，紫阳同志对家乡的建设和父老兄弟的生活也十分关心，但他多次强调，家乡的繁荣和群众的致富，只能靠政策、靠科学、靠群众勤劳的双手去创造，不可这封信是根据赵紫阳口授的内容，并经他本人审定，以赵紫阳办公室的名义发出的。

存在依赖思想，更不能搞特殊。切望你们对乡村干部多加教育，使他们在各方面起模范作用。

此致

敬礼！

赵紫阳同志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抄送：河南省委、安阳市委）

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

刚才王伟[1]同志的汇报，我觉得是好的。我说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计划生育工作一定要继续抓紧，不能动摇。

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全党要统一认识。我们国家的人口确实是个大问题。人口增加得太快，如果失控，对我们的“四化”就会带来很大的困难。

到本世纪末的人口指标，我们提过十二亿。就是说我们的人口不能增加得太多，这体现了我们的一个基本政策。当然不可能到时候十二亿一个不多，或者一个不少。我们现在提出个“左右”，有点弹性，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绝对不是说我们的人口可以不严加控制，可以不抓紧计划生育，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本世纪的人口控制从严一点，从紧一点，我看是对的。因为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又要经历一个生育高峰。如果这一个高峰比较高的话，不仅影响本世纪，而且影响下世纪。当然，人口从严控制，也可能带来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心中有数，在适当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还来得及，比如人口老化问题。独生子女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应当认真考虑，要有综合的办法。独生子女也不一定都是娇生儿。现在的情况可能对独生子女的身心健康、健康成长产生影响。父亲、母亲，还有上一代人，围着一个小孩转，太娇了，他们在家里称王称霸，出了门就没有多大本事。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要懂得点科学知识，纠正娇生惯养现象，要注意进行教育，要在社会上形成一个舆论。但是不能因此动摇在本世纪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心。什么事都有利有弊，但要比较利弊大小，选择利大害小的办法。

现在在人口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侧重点不一样。但从全局来讲，人口不能增加过多，不能增长过快，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当然，经过一个时期，政策可以放宽一点，比如十五年以后，到时候再看。在这个时期内，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应尽量把它的影响缩小。这也是中央书记处的方针。中央常委也很关心。这是基本态度，基本方针。这是第一点。

第二，统一认识，稳定政策。

这几年计划生育政策应当说更加完善了，更加符合实际了。我赞成稳定政策，稳定现在执行的政策，不要变来变去。计划生育工作本来很艰巨，政策老变来变去，下边不好办。在汉族地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仍然是主要的政策。

首先是城镇仍不变动，不要松口子。但是农村，中央考虑，书记处考虑，我同耀邦同志、万里同志主张，农村不能完全一刀切。农村一对夫妇只生一个，不考虑任何特殊情况，执行起来难度很大。这样，反而助长了多生，多胎制止不了。因为它在群众中没有基础。所以，我们一直主张农村应该有个长期、稳定、得到多数农民支持的计划生育政策。除了过去规定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生两个孩子以外，加一个独女户，只有一个女孩的，间隔几年以后允许生二胎。我认为严格按这个去办，不会因此而使中国人口爆炸，但是可以大大减少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可以密切党和农民的关系，就不会发生那种大量外逃抢生的现象。再一个是可以防止溺婴。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胎这条政策不动，允许这样搞，允许这样做。问题是不要因此而产生错觉，以为计划生育工作不那么重要了，计划生育可以不认真抓了。实际上我们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严格控制人口，为了使农村计划生育更好地推行，减少阻力，有利于减少多胎。

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山东多出生了一些人。我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执行一种政策常常有这种现象，由于大家思想准备不足，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在理解上不完全一致。譬如说，原来我们说只准生一个，搞“一刀切”，强迫命令就比较严重。后来说可以适当地照顾一点，有的地方工作就放松下来了。这不奇怪。但是不要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对计划生育政策要正确地理解，正确地执行。开小口是为了堵大口，为了把计划生育政策能够建立在长期稳定的基础上，能够得到多数农民的支持。从长远来讲，这样做对计划生育有利。当然，大城市近郊不要开这个口子。大城市近郊文化比较发达，生育观念也不一样。我们都是从农村长大的，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不让只有一个女孩的夫妇再生一个，农民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女儿是要出嫁的。这不是重男轻女，是承认现实。这是中国的国情。经过多年来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现在我们可以做到不多生。对生了一个男孩的就要求他不要再生了，经过艰苦的工作，多数农民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说是勉强可以接受的。我们经常到农村去，有时到农户去访问，比如碰到四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问他有几个孩子，他首先一定要向你解释说：“我这个孩子是没有开展计划生育以前生的”，说明他知道多生孩子不合法，多生孩子不光荣。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对有特殊情况的允许生两胎，是为了控制人口的增长。允许生两胎还得按计划，就是说要有间隔。我相信这个道理，加大间隔可以降低人口高峰，人口增长就不会过快，我觉得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有间隔对孩子的教育有好处，对家庭、对母亲的健康有好处。但是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和正确执行，认为可以松了，甚至放任不管，就会发生开了小口等着开大口，小口没开就先放开大口的现象。所以，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么一个政策，长期执行下去，至少十几年内不要再打算改变。我相信，这样一个政策，只要统一认识，正确理解，正确执行，不会带来人口过快增长，而有利于减少计划生育工作的阻力，取得群众的支持，也有利于解决多胎问题。有些农村，交通、工农业、文化不是太发达的地方，如果群众多数思想不通，那多胎生育就很难制止，因为群众不支持。

对放松计划生育工作的现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这两年在酝酿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使政策更加符合实际的时候，可能造成某种错觉，至少在基层干部中造成某种错觉，认为中央的政策在继续变，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现在抓那么紧，你将来又要变了，不是又要挨群众的骂了吗？”因此，他现在就等，对计划生育工作就不管或者至少不那么理直气壮地去管。这样就会出现某种生育自流的现象。这种情况的产生，除了开始进入人口高峰，除了早婚等等原因以外，还应当看到，这两年我们在酝酿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中，可能发生了某种副作用，有某种自流现象。但是这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是暂时的现象。要敢于承认它。我们全党都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这是不可怕的。这种自流的现象不应该也不会继续发展下去。对我们计划生育的形势要作这么一个估计。

现在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两年“开口子”确实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或者说是不小的副作用；一种认为副作用没有那么大。要讲清楚，不能因此就说开个小口，就是政策本身有什么问题，不能这样看。最近我从统计材料上看到，山东人口增长是多了一些，可能有这个现象。另外一种情况在山东也确实存在，就是跑到辽宁讨饭、生了孩子后又抱回来的现象减少了。这说明党群关系缓和了，但是也可能工作放松了一点。因此现在要稳定政策，统一认识，并且正确地去执行。我认为经过几年，我们的情况就会变好，这样计划生育就能够长期稳定地坚持下去。

这里顺便谈一个问题，人口理论界有些争论。就是“只生一个子女”和“晚、稀、少”。有一部分学者主张不仅在农村，也包括城市都生两胎，只要晚婚、晚育、间隔生，人口增长的结果与“只生一个”的结果一样，这是一种意见。我认为这种意见现在也不能轻易加以否定，但是现在不敢就这样办，因为这个理论没有经过实践。我说不敢现在就推广，更不要动摇现行的生育政策。但是允许给一块地方进行试验，给个地盘，实践一下，因为这不是一、两年可以说明问题的。如果经过十年，证明了实行这种办法人口增长率并没有提高，那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个政策。（万里同志插话：可能只能在大城市附近文化高的地方实行。）现在已经选了几个地方，山西翼城县已经搞了一年多。全国指定几个地方试验，不要宣传。但是我们还寄予希望，如果这几个地方最后实践的结果证明是好的，顺乎民心，合乎民心，又能控制人口，那当然好了，何乐而不为，但是现在没有把握。我对这些同志的意见曾经讲过一些支持的话，我是觉得如果能论证一下，如果确实这样，那当然很好，那就是个很好的政策，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既不能对这部分同志的主张加以否定，也不能轻易地就拿来在全国推广，因为这个后果不清楚，所以允许试点。至于理论上的辩论、讨论，可以百家争鸣，但报纸上不必宣传这些东西。内部讨论，学术刊物上争论、辩论是可以的，允许在一些指定的地方试验。最后要看实践的结果怎么样。反正两种办法，全国绝大部分地方实行我刚才说的那个政策，个别地方实行这个政策，最后再作决定。

第三，注意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你们讲到的实际问题我们都需要认真研究，中央应该解决和能够解决的尽量

帮助解决。财政部、计划委员会研究一下他们提出的属于中央应该解决的问题。另外也支持大家回去向各级领导汇报，取得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但是这次我们不能讲一些硬性规定的话。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央开一次会，就规定地方怎么办，中央出主意让地方出钱。但是我觉得各级党委总的来说对计划生育工作是重视的，因此这个问题你们回去向各级党委汇报，应该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是可以得到党委、政府支持的。第四，讲一个你们汇报中没有提到的问题，就是在基层政权建设变动中要防止出现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没人抓的问题。

计划生育在我们的工作中是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现在有两件事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是计划生育，这是第一位难题；一个是合同定购粮。计划生育这件事确实很不容易。最近基层政权建设有变动，原来的公社后来变为乡政府，乡政府下边的大队，现在改成村民委员会，变了个名称。村民委员会是选举的，宪法规定是自治单位，所以在变动中间要防止基层计划生育没人抓的状况，这是难度最大的。广西给我谈了一个情况，认为基层现在有些半瘫痪，乡以下是半瘫痪。计划生育有些放任自流，主要原因是基层有些半瘫痪，没人抓了。当然他们那里可能是特殊情况。他们主张不管怎么变，乡政府要建派遣机关。乡相当于一个区是政权机关，村民委员会是自治单位。基层搞得好的地方，可能问题不大；搞得不好的地方，村民委员会可能认为计划生育这件事可抓可不抓。所以他们认为关键是乡怎么加强领导的问题，不仅是计划生育的问题，还有另外的政府工作问题。这个问题我想另外找民政部门来研究。

在本世纪末计划指标的上限是十二亿左右。什么叫左右，如果你搞到十二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那就不叫左右了。接近十三亿，就是十三亿的概念了。这个问题不必说得那么死。总的提法是左右，你们分配指标时，大体上可以按这个进行控制。因为一般人口计划很难做到比经济计划还要准确。分配过了不必改它，实在不够可以适当加一点。也不必现在就把十二亿五作个指标喊出来，我看就是十二亿左右。如果哪里实在政策和指标发生矛盾，在做好工作的情况下，你们再酌情对指标适当加以调整。就是这个原则。

注 释

1．王伟（1919—），河北肃宁人。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全国青联主席。

纠正行业和部门不正之风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九日

* 这是赵紫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基本上同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这个报告。

对形成行业不正之风的原因，要做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对不正之风这类社会现象应怎么看，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不正之风的产生是有其政治、历史、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的健全，制度的严密，教育的加强，改革的配套，随着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这类不正之风只会越来越少，不会愈演愈烈，不可收拾。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不正之风肯定会大大减少。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讲廉洁，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之一，资本主义没法与我们相比。我们现在正处在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社会生活有了活力，一方面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也跟着出来了。要全面地看问题，既不要怕，也不要放任自流。

前一段一些部门在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不要估计过高，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任务，千万不要放松。要长期地、持久地、综合地、坚持不懈地做工作。首先是领导层要清醒，对这些现象想雷厉风行地一下子都压下去，一劳永逸不太可能。但是，我们也绝不可等闲视之，只要认真对待，是可以解决的，要有这个信心。

纠正行业和部门的不正之风，要与改革、发展生产建设结合起来进行，要靠教育、法制和监督，必须注意综合治理。一方面要揭露，一方面要搞建设。要抓好职业道德教育，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社会监督等几个重要的环节。

纠正行业和部门的不正之风尤为重要，要把端正局长、部长以上干部的作风，放在重要的位置。只有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领导能做到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有可能解决好各个行业的风气问题。领导干部的作风正了，一般干部和职工群众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领导如果不抓，下面就抓不起

来，因此，各部委的党组要把这件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我讲两点意见：

一、你们常委开会，大家都讲到李立功[1]同志很多长处，忠厚、民主、稳当。我是相信的。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省的主要领导同志来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必须态度鲜明。作为一个省的主要领导应该是政治家，政治态度不明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作为政治家，作风上老实很重要，但光老实不行，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不明朗、不鲜明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山西出现这些问题，恰恰反映出这么一个问题。当然不是说你们没有就事论事批过，但没有把这个问题当成相当大的政治问题来看待，态度不鲜明、不明朗。这个问题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对山西派性问题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这些问题，注意团结大多数，缩小打击面，作为政策来讲，这完全是正确的。但山西要消除派性，把大家团结起来，光这一条还不行。对派性的干扰和活动，要有得力的措施解决，态度要明朗。我觉得山西的常委特别是立功同志要注意这么个问题。总之，对重大政治问题，旗帜要鲜明。这次中央找你们来北京开会，无外乎是交待这件事。现在看来，你们那里的问题，恐怕就是这么一种性质的问题。本来山西出现的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大家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信上也是一种写法了，经过你们这几天谈，加上中央很多领导同志了解立功同志，就是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缺陷、很大的弱点。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老实说，你这个省委书记是不称职的。仅仅你们常委说的那些，不能作为一个省委书记的主要标准。光有那几条就当省委书记呀？恐怕不行。这需要立功同志自己很好注意，也需要其他常委帮助。作为一个集体来说，就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弥补。

二、王建功[2]同志我这次才认识，但名字听到很久了。在雁北当县委书记就听说了，以后又到了太原。你最近在党校参加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的发言我也看了。建功同志有很多优点，思想解放，政治上比较敏锐，工作也还有魄力，在各地方工作是有成绩的。根据你们这次生活会上讲的一些问题，我原来也听到一点，前几天也听到仲勋、兆国同志说的一些情况。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中上来的一些同志，有一些这方面的优点是很突出的，思想解放，政治敏锐，知识面比较广，工作局面比较大，活动能力比较强，有开拓精神。这些同志应当说是很有培养前途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必须要过一关，就是党性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

面，一个是正确对待名、位、权。我所知道的一部分年轻同志优点很突出，但这一关并没有完全过。我不是说建功同志就有这个问题，但提醒一下很有好处。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终究是要栽跟斗的。（胡耀邦：要栽大跟斗啊！）第二是公道正派，不搞权术，不搞小圈子，不搞小动作。我们一部分青年同志也没有过这一关。我们要爱护这一批很有培养前途、很有发展前途的同志。必须帮助他们克服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也必须时刻注意这个问题。如果不时刻警惕，将来也可能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很难健康地成长。现在，我们有一部分青年同志优点很突出，缺点也值得重视。我这不完全是针对你们讲的，反正有这么一个问题。你们省委里面，建功同志优点很多，但是恐怕这方面的问题是时刻要注意的，也希望常委的同志在这方面多帮助。

注 释

1．李立功（1925—2010），山西交城人。时任山西省委书记，曾任山西省顾委主任，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2．王建功（1936—1998），河北望都人。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曾任太原市委书记，山东省泰安市市长、副省长，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后记

一、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者检索查看，这部文集以时间顺序编排，按年份分为四卷：第一卷（1980—1982年），第二卷（1983—1984年），第三卷（1985—1986年），第四卷（1987—1989年）。

二、编入本书的所有文稿，均系第一手原始文献资料。为了保存文稿的原貌，在编辑过程中只对原稿进行了文字订正和必要注释，有的添加了标题。文中的数字和计量单位等，亦沿用当时的习惯表述，未按新的规定改动和换算。

三、参加文集收集、整理、编辑、录入、排版、校对工作的同志，都是一批热心改革开放事业和关心党史国史研究的志愿者，还有许多老领导和老同志给予了热情鼓励和鼎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四、限于条件和水平，在本书编辑中难免有疏漏、错讹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知情者批评指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5年10月17日

赵紫阳文集：四

第四卷
1987—1989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赵紫阳文集
第四卷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编
赵紫阳文集：四
中交六李公服社

《赵紫阳文集（1980—1989）：第四卷（1987—1989）》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编
⑥香港中文大学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
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
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国际统一书号（ISBN）：978962996—809—0
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传真：＋552 2603 7355
电邮：cup@cuhkeduhk
网址：?chineseupress￡om
几e Collected Works of ZhaoZiyang（1 gso--1989），Volume4（1957--1959）
（inChinese）
Edited by Editorial Gro即of角e Collected灿rks ofZhaoZ州ang
⑥The Chinese Unlversity ofHongKong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978—9629968090
Published饰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HongKong
Sha Tin，NT，Hong Kong
Fax：＋852 2603 7355
Email：cup@cuhkeduhk
W七bsite：?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出版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收录了赵紫阳自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至1989年去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函、批语等，共498篇，180余万字，依时间顺序分为四卷。

《文集》涵盖经济、政治、党务、外交、国防、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展示了1980年代中国高层推行的各种政策主张、理论观点及相关政治博弈，呈现了改革开放最初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细节。

《文集》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原始文献编纂而成，来源可靠、编排规范、忠实于原件，多数篇目属首次公开或首次完整公开。《文集》虽非同期文献的全部，却是迄今为止最系统、也最具规模的赵紫阳文献汇编，为还原和理解早期中国改革开放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对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也极具文献价值。

《文集》出版过程中，本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文本考订、原件比对、史实核查、信息增补等工作，力求达至文献史料出版的最高准确度、客观度。除文字史料外，本社对视觉史料也极为重视，试图通过对历史图片及原始文献的搜集和选用，将其携带的历史信息传递给读者。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6年5月

编辑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主要汇集了赵紫阳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件和批语等，近500篇。其中有一部分曾公开发表过，大部分则在当时党政机关的文件、简报上印发或传达过，是首次公开出版。

文集所涉及的十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和奠基时期。当时，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四化建设掀起了新的高潮。其间经历了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两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进行了国民经济大调整，制定并胜利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七五”两个五年计划，彻底扭转了文革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的被动局面，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第一步目标（头十年翻一番），从而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决心。

这十年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改革创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由工业、商业发展到其他第三产业，从承包经营、股份制试点到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到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对外开放；从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到实行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和保护环境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从立足国内到坚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主动迎应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勇攀世界科技新高峰。这套文集既见证了这十年间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逐步重新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也反映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工作难度异常巨大，为政者甘苦备尝的秘辛。这十年既有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有些不尽人意的遗憾；既积累了改革成功的经验，也有出现通货膨胀的教训。

从文集中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领导支持下，本书作者与胡耀邦、万里等同志一道认真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从而大彻大悟，立志为民，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崇尚法治，勇于开拓创新，努力遵循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在日新月异的新产业革命、新科技革命中尽心竭力，弃旧图新，不断探索新的为政之道、治国之策、兴业之本和强国之路，以掌握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主动权。这十年他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奉献给了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书中所反映的每一项巨大成就或一些难以避免的失误，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真实记载和深入研究这段难忘的史实和第一手文献资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学习和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让历史告诉未

来，促使我们进一步开拓思路，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融入世界，为实现振兴中华，攀登世界强国的新高峰而奋斗！

本书编辑组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组成。为保持文稿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在编辑中均保持了原貌，编者仅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4年4月

目录

一九八七年

总结经验 稳定物价
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至七日
进一步使我国经济发展建筑在长期稳定的基础上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九日
给《中国建设》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一月
给外文出版社《中国手册》英文版的贺词
一九八七年一月
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在研究经济改革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日
祝贺超导体研究取得重大成果
一九八七年三月五日
关于组织机电设备攻关的意见
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
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三日
在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
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给邓小平同志的信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对《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的批示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用新的观点分析形势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问题
一九八七年四月六日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

在上海市调研时谈深化企业改革等问题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

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成立三十五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意见

一九八七年五月八日

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

在中央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八七年一月至五月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搞好智力开发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

在全国整党总结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关于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的一封信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发展与东欧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关系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

继续稳定物价控制通货膨胀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五日

就联合国“五十亿人口日”发表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日

关于改革物资管理体制的意见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

把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推广到全军全社会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国家计委要成为真正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一九八七年八月五日

搞稳一点 收紧一点

一九八七年八月八日

在改革中加强对执行国家政策的严格监督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立足国情面向未来制定我国长远经济发展战略

一九八七年九月四日
让农民企业家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中起带头作用
一九八七年九月六日
关于海南建省筹备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一日
在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二次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
使创汇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先导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在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第二次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汤姆·布罗考问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在全国计划会议与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
一九八七年九月三十日
给中国记协成立五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九月三十日
关于党政分开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四日
附录：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日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
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闭幕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
会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时的谈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
致陈守一教授的信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九日
关于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在全国政协举办的党外人士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给《经济日报》创刊五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总结实践经验提高贯彻十三大精神的自觉性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关于一九八八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对我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思考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以改革总揽全局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
接见第八期体改研究班学员时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下决心把住房制度改革搞好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给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新的动力和新的政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八八年

党对于具体文艺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一九八八年一月
对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逝世发表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国家计委汇报经济形势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给《文汇报》创刊五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采取积极态度对待外贸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一九八八年一月三十日

向瑞士达沃斯一九八八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电视演说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日
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二月四日
关于起草制定私营企业管理条例的三次批示
一九八七年十月至一九八八年二月
致沈阳电工机械厂厂长李正治的电报
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
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一九八八年二月七日
关于《对今年物价形势的分析及“双紧”方针的看法》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
接见全国企业承包责任制座谈会部分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二日
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规章制度要有利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
给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全体同学的回信
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
落实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两个关键问题
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
在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五日
给中央团校成立四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关于发挥我国稀土优势的两次指示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六月三日
在研究改革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日
在全国第一次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对杜星垣和吕东关于闽粤两省对外开放调查报告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

认真研究解决经济发展和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九八八年五月九日
同安志文和马洪谈物价与工资改革问题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三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物价和工资改革方案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六日、十九日
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发挥辐射作用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关于胜利油田挖潜增产的两次批示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二十七日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
想办法把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建设资金
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
对《中国的企业管理要害何在》一文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三日
在西安飞机制造公司视察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在晋陕两省视察工作时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
关于信访工作的批示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三日
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在中央军委授予军队离休干部功勋荣誉章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
会见瑞士苏黎世大学林德教授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
认真整顿流通秩序 坚决控制物价上涨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
在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四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五日
同弗里德曼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在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关于形势教育问题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肃贪工作必须有制度有机构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
物资部门在价格“双轨制”下要有一套反腐蚀的办法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
改革开放是我们确定的长期方针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
农业发展关键靠政策、靠科技、靠投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
在会见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菲雪时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在调整经济结构上下功夫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日
在治理整顿中进一步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
建立国家调控下的生产资料市场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六日
进一步用十三大的理论武装全党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同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录：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在新形势下保持廉洁问题的会议纪要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八九年

在全国政协元旦茶话会上的致词
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
在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一月四日
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妥善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
社会治安问题必须综合治理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八日
关于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在老同志迎春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
在听取国家科委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
对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批示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
关于一些集体企业将资产折股划给职工问题的批示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
关于制定长期规划的谈话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四日
会见香港前途研究会邬至庄等人的谈话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八日
关于厂长如何领导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认真搞好治理整顿 调整结构深化改革
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
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治理整顿的问题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一日
全国全社会都来重视教育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
在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中朝友谊有利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
后记

1987年中共十三大时期的赵紫阳
左上：1987年10月，和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上（⑥Getty Images）
左下：1987年8月，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乡访问贫困户，与农民群众交谈
右：1989年2月，与新上任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北京会谈（@Ap lmages）
为准备1987年5月13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所拟的讲话提纲（首页），及手写的给邓小平的请示。邓在其上批示“完全赞成”。
1987年12月1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首页），收入本书时以《以改革总揽全局》为题
1988年1月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一文（首页）和邓小平的批示
1988年3月2日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的批语

一九八七年

总结经验　稳定物价*

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至七日

* 这是赵紫阳对稳定物价、总结经验的几次批示和指示。

一、一月五日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四十一期上批示："纪云同志：看来物价问题，值得反思一下，请组织几位同志系统加以研究。"

二、一月七日在王任重的信上批示："送依林、纪云同志阅。请考虑物价问题，是否进一步明确表一下态，并让各城市加强物价检查。各地反映如此强烈，我们不能不认真重视，请酌。"

三、一月七日晚对白美清作了如下指示：物价问题，要认真重视一下，要搞一点安定民心的东西，要总结一下经验。第一，今年物价打算出台的东西，要重新考虑一下；第二，在报纸宣传上，要进一步表态，物价要基本稳定；第三，要加强物价检查，反对乱涨价。物价问题要很好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出乱子。

进一步使我国经济发展建筑在长期稳定的基础上*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省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关于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

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是好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八年。八年来，国民收入每年递增8.6%，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1%，高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六年的平均数。在这一时期，虽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经济上没有大起大落，保持了稳定、协调发展的势头。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

积八年的经验，积建国三十多年的经验，我认为，在经济建设上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这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应当长期实行的根本方针。经济上的稳定发展，比大起大落、忽快忽慢效益要好得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才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八年来，我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今后十年、二十年，我们仍应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这一方针。

现在我国经济建设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全国城乡到处都在大兴土木、百废俱兴，需要我们冷静地从宏观、从长远想一想，怎样才能使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局面保持下去？究竟还存在哪些不稳定的因素要排除？这次省长会议集中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讨论得很好。这不仅对当前，而且对今后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问题

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财政出现较大的赤字。一九八六年财政预算收支本来是打平的，但执行的结果有七十亿元的赤字。今年采取了措施以后，估计仍有七、八十亿元的赤字。如果搞得不好，还有扩大的可能。财政赤字，是与货币发行紧密相联的。少量的赤字，并不可怕，但赤字大了，时间持续长了，

票子发行势必过量，造成通货膨胀。稳定经济，最根本的是要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迄今为止，我国票子的投放大体上是适度的。前几年每年都增发一两百亿票子，这是必要的，是同我们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相适应的，对发展生产、活跃经济有好处。但今后绝不能每年再以20%以上的幅度增发票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认为，我国现阶段每年增发票子的额度以13—15%为宜。看来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轻度的通货膨胀，我们还是有承受能力的，现在人民币的信誉是好的，储蓄年年大幅度增长，到去年底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达2237亿元。这么大一笔钱，其中相当一部分由消费基金转为积累基金，在支持国家建设上起了重大的作用。但也必须看到，如果连年出现大量的赤字，发大量的票子，物价大幅度上涨，那么这两千多亿元存款就会成为一个隐患，一旦人心不稳，排队提款，就会不可收拾。那时就会被迫回到统制经济的老路上去，只好把一切管得死死的，不但物价改革无法迈步，而且在其它方面取得的改革成果，也会付诸东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们面临的财政赤字，是在前进过程中发生的。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并没有萎缩，财政收入也由下降转为大幅度上升，从一九八○年的收入1085亿元，上升到一九八六年的2058亿元，六年翻了一番。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出现财政赤字呢？主要原因是两条：一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二是整个财政开支的盘子急剧膨胀。财政赤字只是现象，这个问题才是本质。稳定经济，当前必须从解决这两个问题下手。

三、关于控制固定资产规模，调整投资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规资规模过大，从一九八四年以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九八四年比上年增加463亿元，一九八五年又比上年增加711亿元。去年压了一下，仍比上年增加457亿元，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已达3000亿元，相当于一九八三年的1.2倍，大大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这是国力难以承受、因而也是不能持久的。

不仅投资规模过大，而且投资结构很不合理。几年来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投资比重增加过猛，而能源、交通、原材料和基础设施所占比重相对下降。在全民所有制投资中，“一五”时期非生产性投资占33%，“六五”期间上升为42.6%。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六年，全民所有制投资用于能源、交通、原材料的，由386亿元增加到907亿元，绝对额有较大增加，但所占比重却由57.7%下降到46.3%，这说明其它方面的投资膨胀到了惊人的程度。现在全国都普遍感到电力紧张，根本原因是投资结构失调引起的产业结构失调，电力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五五”时期的6.84%，下降到一九八五年的3.91%。能源、交通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种投资结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显然是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必然会形成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恶性循环。

从认识上说，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速度要求过高，改变面貌要求过

快，摊子铺得过大。什么好事都想办，而且都要在短期内办成，头脑过热，空气过热。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压缩空气，解决过急过热的问题，在这个根本指导思想上要统一认识。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通病。赫鲁晓夫讲要进行共产主义建设，勃列日涅夫讲自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现在戈尔巴乔夫也降调了，承认自己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我们应该从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现实出发，来考虑我国的建设问题。

这个问题在一九八五年九月的省长会议上我就突出地提出来过，历数了投资规模过大的八大罪状。但当时认识还没有完全一致，措施也不落实。现在，思想认识问题有可能解决了，就要同时考虑采取过硬的措施。过去所以控制不住，归根结底就是由于预算外的钱多了。钱多了，就要投资。所以，这次要釜底抽薪，通过借款、发债券等方式，把预算外的资金集中一部分，用于国家的重点建设，解决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即使用方向合理的问题。当然，这样砍一刀也不尽合理。下一步需要进一步研究财政税收体制和投资体制的改革问题。但今年还做不到。今年要积极调查研究，提出一套办法，既能搞活企业，保护和发挥企业以及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性，又能把资金适度集中起来，引导到合理的使用方向上去。

四、关于削减财政支出盘子

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超高速的后果之一，是形成了一个高支出的盘子。一九八五年财政支出比上年增加303亿元，把当年的一次性非正常的收入都打进去开支掉了。去年的财政支出，又比前年增加379亿元。现在要满足这样大的支出盘子，谁也没有这个本事。而且，财政收入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预算外资金所占比重大大上升，预算内资金比重相对缩小；地方财政所占比重上升，中央财政所占比重下降；统收改变了，而统支没有改变。中央财政收入捉襟见肘，只能维持正常的需要，不可能承担现在这样大的开支。这几年，各种补贴大量增加，行政事业费也大量增加，去年行政费猛增20%，是不正常的。现在会议费、招待费、公费旅游、请客送礼，大手大脚，讲排场，比豪华，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我认为，行政经费应当继续压缩，这要作为一个硬任务，层层落实。这个问题不解决，财政开支下不来，赤字无法解决，而且败坏风气，腐蚀干部，脱离群众。我们不仅要压基建支出，而且更要压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这件事有很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五、关于增产节约，增收节支

今年在深化改革，搞活大中型企业的同时，要抓好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这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困难，而且要作为长期稳定经济的重要措施。增产节

约、增收节支活动，要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广泛开展起来。特别是在企业中，要把降低成本，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作为重要内容，力求在今年取得新的成绩。这也是增强企业的消化力和竞争力所必须的。在国内资金、物资的使用上要精打细算，各方面要努力增产节约，在创汇和用汇上也要增收节支。

今年的外汇平衡是个严重问题，不可忽视。

对人民群众的生活要十分关心，能够做的事要扎扎实实做好。总的精神是应当量力而行，少说多做。许愿不能过多过高过早，宣传上也要注意不去刺激高消费的欲望。要提倡勤俭建国，艰苦奋斗。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相当一个时期只能是较低的工资，这样对我国经济发展较为有利。提倡高工资、高消费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现在已经出现了消费超前的现象，如果把消费的胃口吊得很高，势必引起很多社会问题，造成群众不满，使我们陷于被动。前一段时间，我们引导得不够，有些人有点昏昏然，“热风吹得游人醉，错把中国当美国”，也有“错把内地当沿海”的。今后在实际工作和宣传工作中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把我国建成中等发达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级干部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掉。

六、关于搞活企业、保护企业

搞活企业，是我们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不能动摇。当前最重要的是抓好三条：一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的八条规定（国发[1986]106号文件）。二要坚决制止对企业的乱摊派、乱筹款。除城市建设、文教事业的正当需要可以开点小口外，要把四面八方向企业伸手的现象坚决刹住。三是要根据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进一步探索和试验各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改善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把企业的潜力挖掘出来。要注意把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上下功夫，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创造出较好的经济效益。

我们在集中资金、解决财政赤字时，一定要注意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不能挫伤企业的积极性，坚决防止把向地方、部门筹款的措施，转嫁到企业头上。如果把企业搞得一点活力都没有，那就是失败。

七、关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这是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解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问题，主要在思想理论战线进行，不在经济领域里搞。不要刮风，不要任意发挥。改革、开放、搞活的方向不能动摇。我们常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指什么呢？一个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个是坚持改革、

开放、搞活。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只谈一个方面，不谈另一个方面，就不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现在实行的城乡各项基本政策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一律不变，都应继续贯彻执行。政策稳定，人心稳定，经济才能稳定。

今天围绕贯彻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讲了以上七点。总之，是要在增加和改善总供给的同时，坚决抑止过高的总需求，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力求避免大的波折。经济生活是很复杂的，改革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一个矛盾解决以后，总会出现新的矛盾。在前进的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于避免的。重要的是，要察微知著，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决，通过自觉的小调整，避免被迫的大调整。这次会上，党中央和国务院把全国的家底告诉了同志们。希望大家从全局出发，同心协力，完成今年的经济工作任务，做好稳定经济这篇文章。

给《中国建设》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一月

《中国建设》杂志是宋庆龄女士生前亲自创办的，三十五年来在宣传新中国的政策和成就，增进各方人士对中国的了解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我国全面改革的新时期，希望编辑部的同志继续努力，坚持严谨的编辑作风，把它办成准确鲜明，生动活泼，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广大海内外读者所喜爱的刊物。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一月

给外文出版社《中国手册》英文版的贺词

一九八七年一月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发生了世界注目的变化。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愿意加强同一切对我国实行平等互利的国家合作，加强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我相信这本《中国手册》，对想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外国读者将会有所帮助，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介绍中国的好书出版。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一月

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春节。我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大家拜年，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我们的子弟兵拜年！请允许我以在座各位的名义，向台湾、港澳和远在海外的同胞们，按照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表示节日的祝贺之情。我也想借此机会，向一切支持和帮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和我们一起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外国朋友们致意。

最近，中共中央再一次郑重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为重要，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大家都非常关心。因此，我想今天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和大家谈谈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唯一的宗旨是为了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八年了。八年来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世界上许多人都说中国欣欣向荣。十亿人民都身受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之惠。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最亲切的政治概念，但并不等于都已全面地深刻地理解了它的涵义。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究竟是什么呢？中共中央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路线的基本点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不讲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没有方向，没有保证。不讲改革、开放、搞活，就不可能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谈不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讲一条，不讲另一条，不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不讲改革、开放、搞活，不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农村不改革，城市不改革，对外闭关锁国，对内把城乡经济搞得死死的，那还是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乡人民哪能得到今天这样的实惠？我们国家怎么能达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这个道理，一听就懂，我今天不想多讲。

我要着重谈谈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和内容是载之于宪法和党章的，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党员还必须遵守党章，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我们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建设和改革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多，家底薄，发展很不平衡，由穷变富，困难矛盾不少，必须集中精力进行建设。如果出现动乱，哪里还能集中精力搞建设？同样，改革、开放、搞活，也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改革、开放、搞活，集中到一点，都是改革。改革已经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今后也一定会继续给大家普遍带来更大的利益。但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经常产生某些利益的变动，需要及时地恰当地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各种矛盾，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如果政治上是动荡的，社会秩序是混乱的，改革怎么能进行得下去？大家都渴望中国经济能够起飞，谁有本事能在地震中起飞？政局稳定，经济稳定，中国才有希望。我们大家都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头，在那种局面下，能改革吗？能建设吗？别说一个国家，我看如果有一个省、一个市处在动乱的局势下，就会闹得大家不得安生，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既然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不是什么复杂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中国不是没有而是已经有了一个强有力的能够领导并正在领导改革和建设的核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资产阶级自由化，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小平同志说得好："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稳定全国的局势，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行改革和建设。有的人名为共产党员，却热衷于丑化党的形象，散布对党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他们想过没有这样做究竟会造成什么后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就会陷入混乱状态，起码是一盘散沙。诚然，中国共产党在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犯过错误，但是，最坚决最勇敢地纠正这些错误的，不是别人，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内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但是，主动地公开地揭露和纠正这些缺点的，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正因为如此，所以人民信赖我们的党，我们也力求不辜负人民的信任。我们并不把执政看成是自己的特权，相反，我们历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得谋取个人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力。我们在履行自己责任的同时，过去和现在都在力求改善我们的工作。

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好。是谁提出了和领导着改革？谁都知道，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和领导推进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适时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我们把高度民主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之一。但要最后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需要进行长期努力，创造各种条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现在还存在着党政不分的现象，但主动提出党政分开并正在研究具体步骤加以实施的，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八年来，我们党一直致力于在我国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还准备进一步采取各种切实

的步骤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包括开辟各种正常的民主协商、生动活泼的社会对话渠道在内。不少人关心选举问题。今年对县级选举的办法将进一步改进，包括普遍实行差额选举在内。今后，我们还要继续改进和完善选举制度。但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盲目追求某些形式，对实现民主未必有益，相反，却会劳民伤财，分散人们对当前建设和改革的注意力。我们这样考虑，无非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集中力量扎扎实实、平平稳稳地进行建设和改革。

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格限于中国共产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农村不搞，企业、机关只进行正面教育。

有人担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不会又是一次政治运动？我代表中共中央负责地向大家说明：我们不搞政治运动。我们深知，搞运动无助于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靠一次或几次运动也根本不可能消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同改革、开放、搞活一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长期的、持久的。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这项工作，严格限于中国共产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进行。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是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质上也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当然，对极少数错误严重、后果严重、而又不守纪律的党员，应当按照党的章程，执行党的纪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为准绳，既要坚决，又要谨慎。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必须十分注意政策界限，不仅不伤害而且诚心诚意地团结绝大多数，包括在政治思想领域内从事工作的绝大多数同志在内，我们欢迎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我们将十分注意改进我们的工作和作风，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都应该努力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进一步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活跃民主团结的气氛。我们党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加成熟了。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中，决不会也决不允许重复“左”的那一套错误做法，因此，它不是也不会酿成什么政治运动。

有些同志和朋友担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不会影响当前的改革和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已经正式宣布，城乡内外各项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变，不仅不变，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因此，在向大家祝贺春节的时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全面地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努力提高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认识，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和各项政策，按照既定的部署，把当前各项工作特别是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工作做好，全面地出色地完成今年的各项任务。

同志们，朋友们！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

的，也是邓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提出这两个基本点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好好学习小平同志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基本内容。为了深刻理解和全面掌握这些基本内容，我建议，一切希望中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大家都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国现在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中国十亿人民在现阶段的最基本的要求，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经验，如何脚踏实地地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什么是改革、开放和搞活的基本保证，等等。我相信，只要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些实际问题，就会得出和我们相同或者非常接近的结论，从而更加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加坚定地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在面向实际，认真研究中国国情的过程中，我们大家一定会更加亲密无间地团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我们的国家已经一年比一年好。在更正确更全面地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今后的岁月里，我们的国家肯定会一年比一年更好。

我今天是提出一些想法来同大家座谈。我也希望能引起年轻同志们和从事理论工作以及各种实际工作的同志们注意，请大家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今天，我们高高兴兴地团聚一堂，互相问候，互相祝福，并且利用这个机会，来讨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件关乎四化建设成败的大事，是很有意义的。

祝大家春节愉快，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

在研究经济改革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日

可否拿两、三个月的时间研究一下今后改革的路子，这涉及到对过去要反思一下，四月份以后要有个结果，八月份以前要把明年的改革方案定下来。如何组织，范围是否可以搞得大些，类似搞政治体制改革那样，开座谈会，搞专题小组，这样可以很快出成果，比泛泛地议论好。

“七五”计划报告中，对改革提了三条，还是对的。但由于在搞活企业时，企业本身的机制没有改革，宏观很难对它有影响，有利的事就让它拿过去了，不利的事就让国家背着。创造市场的条件很难加快，宏观控制也很难。现在企业的承受能力差，在企业里仍然是吃“大锅饭”。所以，如果企业的问题不进一步解决，其它改革很难办。企业的经营方式需要认真讨论一下，使我们在宏观方面的控制措施进一步加强，使企业真正受到影响。去年稍稍放松一下，结果奖金发得很厉害，比工资改革时发得还要多，但企业的行为没有什么变化，很值得研究。要想办法做到，使企业有一个活跃的功能，以应付各种挑战，而不是单靠物质刺激。究竟如何解决，要认真考虑。要研究一下到底把企业搞成什么样的企业，经营方式是什么样的。我们常常考虑企业的活力问题，忽略了市场和宏观管理；在考虑市场和宏观管理时，又忽略了企业的承受能力。要从搞活企业出发，考虑全部配套的问题。企业的经营责任制，要搞一个细则，搞成之后就在大面积实行，而不是试点。试点是各取所需，无法推广，所以不搞手工业式的试点。日本、西德也搞过军事管制，但企业还是独立经营的。所以中国的企业如果等完全具备市场条件和宏观管理条件之后，再搞独立经营是不可能的。独立经营和市场调节、宏观管理是相辅相成的。原来的设想有些理想化。在公有制下的自负盈亏是最大的难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大中型企业要改变公有制性质，这个意见不可取。经营方式是另一个问题，要在这里做文章。经营方式有很大潜力，但又怕出百万富翁，如果出现就很难搞下去。承包租赁和资产责任制都不能出百万富翁，否则会在社会上造成很多矛盾。中国不能搞平均主义，也不能搞悬殊政策，这都会引起社会不满，造成增加工资的压力。大工业搞承包租赁，证明企业潜力很大，但很快就会出现像有些人说的高薪阶层。中国不能搞百万富翁，要有节制的办法，将来也不能出。一种由厂里职工集体承包的办法，武汉叫全员承包制，这种承包制职工要成为经理的后盾，但经理又不能得的过多。

在解决好这个大前提的情况下，再解决财政、价格、工资、税收、计划的配套问题。计划的宏观改革措施要相适应，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宏观控制，才能发挥作用。要有个过程，这样工资、价格改革才好进行。根本是要解决企业活力和积极性的问题，农村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大家不去挖这方面的潜力，所以你抓宏观控制就没有承受能力。悬殊过大，工人和社会就不会干，但又要使经营者有合法利益，并对此要加以保护。

接下来是工厂领导体制如何搞，这个问题要提出来，企业干部是实行聘任制还是选举制，总之不是组织部那一套考察的办法，要配套，要有个实施细则，明令公布。工会的责任要加强，厂长责任制不能对职工负责，工人可以提出对厂长不信任。所以现在有个理顺党政关系的问题，也有个理顺党和其它社会组织关系的问题。工会同政府不能是服从关系，工会要有维护工人利益的职能，这是波兰的经验。波兰的工会，原来是不代表工人的利益，完全和政府是一个调子，后来出现团结工会，但政府对团结工会没有承认，又成立了新工会。新工会注意了维护工人的利益，现已有一半人参加。

青年团也要影响青年，增强工人主人翁的感觉。

价格问题要重新理一下。过去物价改革每次都不理想，花钱很多，对生产有影响但不大，带来的常常是一次物价上涨。大家都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国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方法去研究，究竟物价怎么搞是一个值得深议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垄断性很强，要稳定可以，但放开之后可以随便涨，一调就涨。小商贩主要看国营。本来价格改革是结构性的改革，结果引起全面上涨。副食品价格改革，国家补贴没有减少多少，老百姓意见很大。我们说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现在看难度很大，提价后连锁反应大。现在农产品新的一轮涨价又开始了，你不涨他不生产。

工资怎么搞？工资制度还是平均主义，这个问题没解决，改进不大，钱花得不少，但不满情绪在增加。很多厂长年终千方百计想给职工发奖金，但不起作用。

“七五”计划规定的三条是正确的，现在在实行的步骤和相互关系上有很多问题要认真研究，对改革难度的认识比前两年更深了。

企业发展基金都搞技改，不搞流动资金，要规定流动资金的比例。现在流动资金全由银行包的办法不行。另外要改变中央收入比例太低的问题，中央的财政收入应不低于百分之六十。企业留利要先留流动资金，这样投资规模也就下来了。现在企业和财政都不负担流动资金，把钱全部用于消费和投资，最后增加流动资金和收购农副产品，只能强迫银行发票子。

很多国家财政都是中央的多，中央给地方补助。我们对地方要收紧，要分点地方的钱，这是个方向。财政太分散后，将来会搞成联邦制度，我们不能搞联邦制度。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一向主张要集中，耀邦同志主张分散一些，我是折衷，现在看财政问题就是要集中一点，这个问题放在下半年解决。

祝贺超导体研究取得重大成果*

一九八七年三月五日

*　这是赵紫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北京大学超导体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庆祝会上的讲话。

我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北京大学在超导体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取得这一成果而付出了辛勤劳动的物理所赵忠贤、陈立泉和北大甘子钊等在座的十几位同志表示亲切的问候！你们所取得的振奋人心的成果，对整个科技界，对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国人民，都将是一个有力的鼓舞。

物理所和北京大学有关的同志在超导体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再一次证明，我国的科技人员是有志气，有水平，有智慧的，他们有能力去攀登世界科学高峰，攻克科学技术难关。赵忠贤、陈立泉、甘子钊等同志在科研工作中，之所以能够专心致志，忘我劳动，不怕艰难，不辞辛劳，是由于他们具有为国争光、为民造福的思想境界，具有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和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这正是我们在进行改革和建设时所应当提倡和推广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这样一支科技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是难能可贵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很大成绩，有很大发展，不论科技界的精神面貌，还是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的结合方面，都是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几年来，党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政策正在落实，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科技人员、知识分子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他们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说，现在是他们施展才能、发挥所长、报效国家的极好时机。我国绝大多数科技人员、知识分子亲身体验到人民的期望，党的关切，都自觉地把自己的前程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宏伟事业联系在一起，积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今后，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进一步形成一种民主、团结、和睦、活跃的气氛和更加融洽的关系，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任何挑拨知识分子与党和人民的关系的企图，都是不会得逞的。

我们的科技工作已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实现在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服务，这是我们的主战场。另一方面，要充分注意高技术的发展，为中远期经济发展打下技术基础。我国高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规划已经制定，从今年起正式开始实施。

你们所从事的工作，在不少方面涉及到基础研究。历史经验表明，基础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有可能引起生产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新的飞跃。我们是一个大国，对基础研究也要给以重视，给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从“六五”计划开始，在“七五”计划期间，我们要继续建立一批国家的重点实验室和若干基础研究较大型设施，去年建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拨款有所增加。诚然由于我们的家底不厚，目前，我们投入基础研究的财力还很有限，但请同志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投入基础研究的财力和人力必然会逐步多起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我国经济建设中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能否有效地解决，有赖于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我国经济的发展能否具有强大的后劲，最深厚的源泉也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当中，当然也包含基础研究工作的贡献。

希望你们今后在这方面要迈出新的一步，虚心学习国外的光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经验，在合作、交流和学习、竞争中，做出更好的成绩。在你们研究集体中绝大多数都是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最小的只有三十几岁。由此，看到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潜力，看到了我们的希望。对此，我十分高兴。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重担，正逐步落到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肩上。希望我国广大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继承和发扬我国老一辈科技专家的优良传统，勇敢地肩负起历史赋予你们的重任。

你们在研究工作中要加强领导，注意多种学科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一点很重要，很值得称赞。这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科技工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团结协作，再攻难关，以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更大的成就！

关于组织机电设备攻关的意见*

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

* 这是赵紫阳听取国家机械委主任邹家华汇报时的讲话。

现在国家外汇困难，还大量进口机电设备，各个部门技术改造也进口很多的设备，这是不行的。你们机械委能不能调查一下，到经贸部去了解一下，大量进口的机电设备是些什么？要组织机械工业的力量，特别是把军工的力量动员起来，组织攻关，把各部门、各行业技术改造中所需要的关键设备制造出来，逐步做到大部分能立足国内。可以搞个规划，立点项目，先搞什么，后搞什么。组织攻关，也可以招标，然后落实任务。这件事要组织一下。

机械工业最要紧的是抓好质量和服务。要有市场观念，一是要面向用户，二是要了解国外机械制造技术。首先要了解各个产业部门需要什么，进口什么，机械工业就要瞄准这些关键设备，组织攻关，组织生产，为他们服务。只要国内能够制造了就停止进口。机械工业要围绕解决各部门的需要来改造自己，发展自己，用户对机械产品的性能要求也要有一段稳定时期。不能国内制造出来的就不要了，一个劲儿光要国外的、先进的，性能即使差一点，也要先用国内的，稳定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机械工业要积极发展新的，待新的搞出来后，再换代用新的，通过这样不断前进和提高。

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三日

这次宣传部长会议是在全国正在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围绕着如何搞好这场斗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主题明确，会议开得是好的，是必要的。下面讲几点意见。

一、必须认真地全面地贯彻落实中央四号文件

从去年十二月底传达小平同志的指示和中央几个文件以来，经过全党的努力，两个多月的时间，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开始扭转，正如会上同志们所说，“大气候”改变了。这是很大的收获。

下一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怎样继续开展？我看最重要的，还是要坚决按照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四号文件）的精神办，继续抓紧落实这个文件。

中央四号文件，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阐明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规定了开展这一斗争的范围、重点和政策界限。四号文件下达以后，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好文件，规定的指导方针、政策界限、部署作法都符合实际，大家都很拥护。这个文件，体现了党中央对开展这场斗争的决心，同时在作法上又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方向是坚定的，办法是正确的，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很多人反映，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到，我们党更加成熟。

据会议反映，现在有一部分同志仍然有顾虑，怕执行中扩大化，还存在等待、观望的情绪。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没有根据的。因为斗争一开始，中央就在四号文件中规定了明确的政策界限。这与历来的搞法不一样。过去搞运动，总是先反右，普遍发动，出了问题再制定政策去纠偏，去甄别，去落实政策。过去运动的失误，很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中国地方这么大，消息又不灵通，等问题发生后反映到中央，再制定政策一层一层传达下去，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因而遗留的问题很多，运动的成果也很难巩固。这次我们改变了过去的作法，一开始就想得周到一些，规定了明确的范围和界限，这样就可以防止过去一些不恰当的作

法。还应看到，现在大家都怕重复过去搞政治运动的作法，党内夕卜泊，国内外也怕，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过去都吃过不少苦头，记忆犹新。再重复过去“左”的作法，搞扩大化，第一不得人心，第二没有市场。因此，出现这种偏差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某些地方出现了，大家都比较敏感，很快可以得到纠正。回顾一下一九八三年反对精神污染，开始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大家很敏感，问题一发生，中央和国务院就及时研究了一些措施，很快得到纠正。那次反对精神污染，主要问题不在于开始出了点偏差，或出了偏差没有及时注意，而是在于出了问题以后，就否定这场斗争，不了了之。这次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所以，从总体上说，扩大化的作法，“左”的一套作法可以防止，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到这一点，用不着担心。如果忧心忡忡，顾虑很多，就会影响斗争的开展。

另外也有些同志认为文件太稳了一点，运动刚开始，就划了一些条条框框，是不是有点“束缚大家”，感到有些“不过瘾”。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没有根据的。对待思想政治领域的问题，不能操之过急，采用简单的办法，特别是不能沿用过去搞运动的作法，那样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效果不好。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工作，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央正是从这样一个高度来考虑开展这一斗争的，因而在四号文件中相应规定了正确的政策界限，规定了必要的范围和妥善的步骤。这是使这场斗争健康地、深入地开展下去的正确作法。

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大家的认识首先是各级领导的认识统一到四号文件精神上来，全面地、认真地、准确地贯彻落实这一文件。这样既可以避免“左”，又可以避免右；既可以防止扩大化，又可以防止走过场，保证这一斗争健康地向前发展。

最近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件长期的事情。现代化建设需要五十年至七十年时间，整个五十年至七十年都会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问题。既然是长期的，就不能搞运动，基本方法是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小平同志的讲话，讲了两个主要论点：一是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要不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起来，这比较容易做到。过去一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泛滥，主要是领导的问题。但要真正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使它没有市场，这就很不简单。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涉及到两种制度谁优越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过去我们长期封闭，不知道外界的事，认为自己什么都好。一开放，接触外界，走出去到西方世界一看，国外是那个样子，而我们这么落后，势必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产生两种制度谁优越的问题。我看即使将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了，在经济上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也还是有市场的。当我们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以后，大概那个时候，它的市场就会很小了。所以要真正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使人们在思想深处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那是很长期的、很艰巨的。我们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

性，不能掉以轻心。对这场斗争要有充分的估计，下决心锲而不舍地搞它几十年，绝不能半途而废。二是讲了不搞运动。正因为是长期的，所以不是开展一两个运动，开几次会所能解决的，要靠深入细致的教育工作，要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法，不能急躁，不能简单从事。我认为，很好领会小平同志讲的这两个基本观点，就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执行四号文件，避免盲目性，领导好这场斗争。

这里还要说一下，有些搞经济工作的同志，他们是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但是有些担心，怕把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说成是“自由化”。据这次会上反映，有的地方在联系实际时，把租赁承包、甚至厂长负责制都视为“自由化”的表现。这是错误的。四号文件讲了，这场斗争着重解决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进行，并明确规定，“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请各地务必掌握。我们的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允许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允许实践中进行试验，即使出点问题也不要怕，可以总结经验，好的予以推广，不好的予以改进，绝不要随便戴什么帽子。有些东西是属于资本主义的，有些东西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必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中的问题要进行探讨，不要忙于下结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使认识深化，不断地存利除弊。总之，我们要牢牢掌握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在反对自由化的斗争中，注意保护改革的积极性，促进改革、开放、搞活进一步开展，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二、培养、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前一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也暴露了我们理论工作的薄弱。从长远来看，严重的任务是如何培养一支能够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既要能够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勇于探索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我们的改革，正如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的，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本来是优越的，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优越性发挥得不够。中国也好，苏联也好，东欧国家也好，都存在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起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根本上讲是具有极大优越性的。改革，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显示出来，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我们的理论要去指导这场斗争。毛泽东同志讲过，要“有的放矢”。在今天，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矢”，去射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之“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探讨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是理论战线的根本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提出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不少问题，需要在理论上作出回答。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在一部分同志的认识中，还分不清楚。就拿社会主义来说，苏联过去的模式是一种搞法，戈尔巴乔夫现在又是一种搞法，匈牙

利、南斯拉夫、波兰等也都有自己的搞法，我们现在都承认它是社会主义。以我们自己来说，五十年代是一种搞法，“文化大革命”又是一种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又是一种搞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的内涵有哪些，特点是什么，都需要很好研究。在一九八一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去年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又重申了这个论点。我认为这个论断非常重要，对中国的改革和建设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第一，它指出了我国是搞社会主义，而不是搞资本主义，不能倒退，走回头路；第二，它指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能超越这个最重要的国情，要求过高，急于求成。如何从理论上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我们制定正确的改革方案、部署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既可以避免右，也可以避免“左”。大家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取得的。这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是有很大不同的。中国过去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处于自给、半自给的状态，商品经济没有充分发展。这样的国家胜利后要不要先搞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发达了再搞社会主义呢？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胜利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人主张中国先搞资本主义，搞两极分化，然后搞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应研究一下，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是不是与那些发达国家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作法有所不同呢？是不是应该采取措施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呢？实践告诉我们，还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又比如，在所有制问题上，应该采取全民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多种经济成分和经济形式；在分配形式上也要相应地有它的特色；在经营上，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等等。总之，要从中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重要的实际出发。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考虑问题的思路。把以上这些重大问题研究清楚了，将有助于我们统一思想，正确地进行改革和建设，有助于缩小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调的市场，也有助于理论界本身改变脱离实际的学风。

我们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如果不与当前改革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这样的“理论”是没有用的。这支理论队伍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壮大呢？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在斗争中不断发现，培养那些既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于改革、开放的同志。一开始，他们的水平也可能不很高，但他们的基本方向对头，在斗争中可得到锻炼提高。我们应该以他们为骨干，去团结绝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包括有这样那样片面性的同志，使大家都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我们要使广大理论工作者都团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础上，同心协力，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

建设。这样，就可以有效地缩小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市场和影响。

各级党委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深远意义，把它作为一件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正确地指出过："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党有了一批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列主义的同志，能够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那么，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这是我们全党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全面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加强。我们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就必须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不改进，只是干巴巴地说教，说不到群众心坎里去，加强就是一句空话。这几年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有许多进步，创造了一些新的经验。但如何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有效果，这还是很大的问题。不少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简单生硬，不联系实际，不从群众的切身体验出发，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我们学校里的政治课，恐怕也有这个毛病，较多的是只要求学生背条条，不注重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分析能力。有些学校上政治课，教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台下看别的东西。这当然和"大气候"有关，前一段受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对政治课不感兴趣。但也与我们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有关系。我们的一些报刊文章，只一般讲什么对、什么错，至于为什么对，为什么错，则缺乏说服力。前不久陈俊生同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许多读者包括大学生反映可以看下去，觉得写得不错；在美国的留学生和美籍华人中，也觉得可以接受，通过大使馆发来电报，希望我们的报纸上能有更多这类文章。这篇文章也没有多少新观点，但是它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有一定的说服力。这件事对我们如何改进报纸的文风，改进思想工作的方法，也有一点启发。我们写文章也好，做思想工作也好，处理社会矛盾也好，都应当注重效果，你讲的，别人能够听得进去。因此，一定要看对象，看人家关心什么，症结何在，把话说在点子上，才能扣人心弦，加深理解，把积极性调动起来。过去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有许多好的传统，现在丢掉了不少。这是不是与我们多年来搞政治斗争有很大关系？多年来政治机关用很大精力去搞政治斗争、政治运动，对思想工作下功夫很差。军队比地方好。特别是最近中央军委总结了经验，作出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央已经批转。这是政治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它的基本精神，对地方、对各部门和各条战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都是适用的。地方上要认真研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切实研究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思想政治工作要围绕当前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来做，要有针对性地回答人们在改革和建设中出现的种种认识问题，引导广大群众为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做出贡献。各级党委和宣传部门要根据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进行研究和部署，推广一些好的经验，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真正收到实效。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改革，需要创造适应新形势的新经验、新办法。今天我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都下功夫去研究。

最后，我还要对宣传部门的同志说几句话。同志们反映，宣传工作难做，人也难找。这是事实，做好宣传工作的确不容易。同志们的困难，我们也理解。但宣传工作是党的重要事业，我们应当服从党的需要。前一段各级宣传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当然，在一段时期内，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问题上，有的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这与当时的“大气候”有关，绝大部分是属于执行中的问题。这个责任应主要由上面来承担。当然，你们对存在的这些问题要正视，要总结教训，采取措施认真加以改进。希望在这次会后，从中央宣传部到各级宣传部门的同志，都振作精神，增强信心，积极地、主动地开展工作，当好党委在思想政治领域的助手和参谋。

在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

各位常委，各位同志：

邓大姐[1]要我同大家来见见面，谈谈心。我想借这个机会，就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件事，讲一些看法。先谈谈经济形势，然后谈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最后谈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政协的工作。

一

当前的经济形势怎么样？许多同志感到存在着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感到形势很好，另一方面，又感到问题不少。我看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经济形势很好，这个基本估价是有实际内容的。到商店到市场里去转一圈就可以看清楚了。我们的市场不是在萎缩，而是越来越繁荣。进入市场的商品不再像过去那样单调，而是越来越丰富。消费品不再像过去那样凭证供应，广大消费者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余地。这些情况，在实际生活中处处都可以感觉到。从宏观上也可以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将近一倍，企业拥有的预算外资金增加了三倍多。这都说明我们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停滞，而是在不断地提高和发展。尽管前年经济发展一度“过热”，出现了“超高速”，但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发展速度正在逐步地趋于正常，弯子拐得比较平稳。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在朝着合理的方向进行。过去多年存在的一些老大难问题，比如一强调生产就给生活留下许多欠账，一强调基本建设就挤掉了技术改造，一强调重工业就要轻工业让路，一强调建设就闹得“三材”紧张，等等，这几年通过改革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过去互相卡脖子的因素，现在不少已开始互相促进，看来我们确实走出一条新路子来了。这不仅在当前发挥着作用，而且是今后长远起作用的因素。由此可见，经济形势确实不错。

但问题也确实不少。街谈巷议，谈得比较多的是物价问题。这几年物价有所上涨，当然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仍在继续提高。我们过去的物价结构极不合理：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人为地压得过低，许多列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价格严重

背离价值，许多消费品价格是靠国家财政补贴维持的，财政上背的包袱越来越大。这种状况，对经济发展不利，不改不行。改，又有一个事实上的和心理上的承受能力问题。所以，在改革中应力求稳妥，保证价格的调整不至于影响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从去年的情况看，物价的放开和控制大体上还算适度。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并尽力做得更好一些。

货币发行情况怎么样？近几年来，每年增发的票子数量都不少。这是有原因的。这几年的改革，推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过去内部结算的交易，现在许多都得改为现金支付。农产品收购，过去同集体单位结算，现在同每个农户结算，也得用现金。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交易量的扩大，货币发行量当然必须相应增加。但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减缓，对增加货币流通量在相当程度上起了抵销的作用，所以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并没有酿成什么危险。当然，现在的情况已开始与过去有所不同。金融改革的进程，已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因此，今后要注意控制货币发行量，务求货币的发行与经济的发展大体上互相适应。

财政情况怎么样？去年有几十亿元赤字。是不是财政收入减少了？不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我们的财源在不断扩大。问题是在整个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支出也在增长。去年的财政赤字，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仅此一项，我们石油出口就损失了三十亿美元，为了弥补这一项，只好多出口其他产品，因而增加了几十亿人民币的外贸补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也有由于盲目投资或铺张浪费引起的支出增长。这是我们应当着重分析和解决的。

这几年我们一方面已经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改革，打破了统收的体制，另一方面改革又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统支体制。也就是说，地方上已经开了许多小锅饭，而中央的大锅饭仍然照开。这几年，就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的比重来说，预算内收入相对下降；就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比重来讲，中央收入相对下降，尽管绝对额都在上升，但相对地说，预算外收入比预算内收入增长得快，地方收入比中央收入增长得快。而财政支出不仅没有减下来，反而有所膨胀，特别是中央的支出增加很猛，因而使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这是改革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但也确实增加了宏观控制的难度。

既然存在着这种客观上的困难，我们就更应该加强指导。因此，继前年下半年提出控制“经济过热”以来，最近又进一步提出了在经济建设中“压缩空气”。这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从长远来说，我们必须执行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良性循环，才能有后劲，才能避免经济上的大起大落大折腾。第二，从当前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具体特点来说，更要强调执行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为改革创造一种较好的环境，而新的宏观控制机制的最后形成，也只有通过改革才有可能。所以，在今年年初的省长会议上，我们把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强调两增两节（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强调三压三保（压计划外建设保计划内建设，压非生产性建设保生产性建设，压非重点建设保重点建设）。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都很顾全大

局，现在已经行动起来了。当然，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多半还是应急的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靠深化改革，比如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物资供应体制等。我们正在总结这几年改革的经验，制定明后年的改革方案。

总之，现在经济形势确实很好，但问题也确实不少。只看到形势很好这一面，不去认真对待和切实解决各种具体问题，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难以进一步顺利发展。只看到问题不少这一面，看不到形势很好这个总的趋势，就无法正确地把握全局。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长期稳定发展经济方针的贯彻落实，我们的经济形势肯定会越来越好。

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其他问题，再过十天，国务院还要向人大作报告，今天我就不一一讲了。

二

现在讲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如果说，“压缩空气”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带动许多工作。经济稳定，政局稳定，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

有些外国朋友不大了解中国的事情，以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最近提出来的新问题。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共产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讲改革、开放、搞活，同时，也不断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党从来反对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采取退让或者容忍的态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本来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去年冬天的学潮和思想理论界一度发生的问题，使我们全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卷入学潮的学生，不到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一，时间很短，城乡居民的态度是平静的。这就告诉我们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还有一定的市场，不可忽视；第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民厌恶动乱，不希望出现任何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当然应该明确、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从深入分析这一事件中得出应有的结论。

现在事态早已平息了。在发生学潮的那些地方社会生活也已恢复正常。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情况也已经扭转了，“大气候”起了变化。正像小平同志最近说的，“麻烦”已经过去了。那么，能不能就此把这件事情放下呢？不能。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种事情，中国共产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向全国人民表示：坚决支持全国人民珍惜安定团结的愿望，决不允许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度泛滥，决不允许任何社会动乱再来干扰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前一段时间我们党内极少数党员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必须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有人担心，“会不会波及到党外”？不会，既不应该，也不必要。问题既然主要发生在党内，我们就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我想特别应该指出：在这次平息学潮的过程中，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中共中央向你们表示感谢！当然，这决不是说，在共产党内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同时，党外人士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今后，在向全国人民持久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中，在共同维护安定团结以至长治久安的过程中，我们相信，一定能继续得到党外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会不会搞乱？”不会。划清党内党外这条大界限，可以有效地防止扩大化。当然，在党内，也有必要划清各种政策界限。中共中央已为此制定了专门文件。认真执行这一文件的各项规定，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健康发展的保证。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了刹住前一个时期的势头，我们采取了一些切实的和紧迫的办法，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尽量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减轻这个问题性质的份量。因为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既然是长期的，就不能搞运动。基本的方法是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我们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又明确指出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和必须严格执行的各种政策规定，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

“会不会影响改革和建设？”不会。第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为改革和建设创造更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一点，最近已讲得很多。第二，现在的问题是开放得还很不够，必须进一步开放。经济体制改革还处在开始全面展开的阶段，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比如探索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各种具体形式，搞活大中型企业，发展生产资料市场，开辟资金市场，研究改善和加强宏观控制的各种办法等等，事情多得做不完，怎么能够就此止步呢？政治体制改革现在还处在酝酿阶段，正在研究具体方案。不改革，不开放，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近不少外国朋友来问这些事，小平同志对他们讲得非常明确：行之有效的方针和政策，为什么要改变？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变，开放、改革的政策不变，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变，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也要继续贯彻下去。总之，“我们一切照旧干下去”，这就是我们的回答。第三，从根本上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扎扎实实地把改革和建设搞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日益充分地发挥和显现出来。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因此，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必须抓紧进行而绝不能放松我们的改革和建设。

“会不会影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会。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懂得，在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我们就不可能繁荣富强，社会就会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也会激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全国人民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所在。认为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将会反到广大知识分子身上，完全是一种误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都是党的既定方针，都将长期地认真地执行下去。一切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人，都将继续受到鼓励。他们的聪明才智，也只有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我们要努力逐步为知识分子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还要努力创造一种民主、团结、融洽、活跃的气氛，使大家精神奋发地工作。

“会不会影响社会的正常民主生活？”现在有的单位确实发生了把向领导干部提意见说成是“自由化”的现象。但这是个别事例。我们党不允许这样做。一经发现，要立即制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解决的问题，是根本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问题。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不得以“反自由化”作为压制民主的借口。相反，我们还要切实开辟多种形式的社会对话渠道，进一步健全民主生活，鼓励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在四项基本原则更加深入人心的条件下，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的条件下，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也将有秩序地、逐步地、切实有效地展开。

目前有些人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存在着一些顾虑。但是，斗争的健康发展，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终将会消除各种疑虑。实践终将证明：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泛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把它刹住，是必要的，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针也是正确的，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保证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

最后，我想讲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人民政协的工作。

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成绩很大，政协的工作成绩很大，爱国统一战线正在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各项政策都已走上轨道。这是一个基本的估计。

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应该得出这样一个总的结论：我们有关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都不必变，也不应该变。这就是说，“一国两制”的方针不变，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不变，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不变，既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也统统不变。我们赞成、你们赞成、全国各族人民赞成、海外侨胞赞成的方针政策，为什么要变呢？所有这些政策，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要变呢？

如果一定要说变，就应该变得更好。所谓更好，就是说，团结的人要更多，要团结得更亲密更融洽，使大家积极性更高，大家都来共同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统一祖国的进程。为了这个目的，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对我们党有什么批评，我们都非常欢迎，愿意同大家一起讨论，共同改进。

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注 释

1．邓大姐即邓颖超（1904—1992），祖籍河南光山县，生于广西南宁市。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二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

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给邓小平同志的信*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 邓小平1957年3月25日在这封信上批示："这个设计好。"

小平同志：

十三大报告正在草拟大纲。三月十八日，我邀集一波、尚昆、万里、乔木、启立同志座谈。大家都认为，这个文件，关系重大，一定要写好，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写清楚，写出分量来。

初步考虑，报告主要写七个部分。一、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包括十二大以来，我国出现了哪些历史性的变化。二、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着重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所以必须采取现在这样的方针政策而不能采取别的方针政策的基本根据。三、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四、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五，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六、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包括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党内民主和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党的干部、党的风气。七、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着重阐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指出在新的实践中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

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般地泛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初级阶段，而是特指由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必须经历而不能逾越的初级阶段。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不是脱胎于资本主义，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产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一系列特点。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仅与发达国家不同，而且与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其它国家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确认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是明确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能倒回去搞资本主义，全盘西化是害国害民的；二是明确指出我们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急于求纯"，必须允许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存在，必须允许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原则长期存在，必须致力于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育，正确处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必须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逐步地展开。看来，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立论，有可能把必须避免“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很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也很有好处。

“初级阶段”这个提法，在党的文件中已三次出现（历史问题决议、十二大报告、精神文明决议），但都没有发挥。如您同意，报告的起草工作就准备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预计五月初可拿出一个粗线条的稿子来，推敲到七月，再在北戴河提请中央审议。

当否，请指示！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对《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的批示*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对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的批示。

此文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值得认真研究。

资源的合理配置，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是决定宏观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的现阶段，单靠市场的作用，单靠企业、地方、部门的自由竞争是不可能做到的。要靠国家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进行干预。而要使干预达到预期目的，必须运用经济手段，运用一系列调控手段，以改革促使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的落实。这样就把经济发展战略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了，也体现了计划与市场的结合，符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搞，可能会减少改革中的困难和矛盾。可能更易于显示改革促进发展的作用。而对计划的改革，也就有了方向。

建议印发体改委（及方案小组）、国家计委、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请安志文、马洪、房维中同志主持讨论几次。

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一、当前国内形势和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十亿人民在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引下，团结奋斗，开拓前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建国以来更加突出的成就。全国安定团结，经济持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城乡绝大多数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明显提高和改善。我们的国家正在日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人民的创造活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改革中日益发挥出来。一九八六年是开始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并取得显著成就的一年，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一年。

在经济领域，过去一年里取得的最重要的成绩，就是把一九八四年末至一九八五年一度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初步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继续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全国社会总产值达到一万八千七百七十四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一；其中工农业总产值一万五千一百零四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三。国民收入七千七百九十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四。粮食产量达到三亿九千一百零九万吨，比上年增产一千一百九十九万吨。林业、畜牧业、渔业、其它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继续有了新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的比例基本协调，产品结构有所改善。钢产量达到五千二百零五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二；发电量达到四千四百五十五亿千瓦小时，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五；原油、天然气产量持续增长，煤炭供应充足。多年来生产资料供应紧张的状况开始有所缓和。适销对路的工业消费品，增长幅度超过整个工业发展速度。市场活跃繁荣，多数商品供求正常。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对外贸易在面临国际石油价格暴跌、世界经济激烈震荡等许多困难的条件下，经过艰苦

努力和采取一系列措施，超额完成出口计划，压缩了不适当进口，缩小了外贸逆差。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

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巩固前几年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在一些方面取得开拓性进展。横向经济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较大发展。劳动制度的改革迈出重要一步。多种形式经营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的推行，为健全企业经营机制创造了重要条件。小商品价格的进一步放开和部分产品质量差价、地区差价、季节差价的适当拉开，对发展生产和活跃市场起了积极作用。金融体制改革和资金市场的发展，有助于资金的融通和合理使用。这些既保证和促进了当前经济的稳定增长，也为今后的改革作了有益的探索，必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现在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去年国务院采取的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的措施，实行的“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改革方针，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经过自觉的有节奏的调整和改革，把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置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上。

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科技、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过去一年里也取得许多可喜成果。广大科技工作者满腔热情地继续贯彻执行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认真组织科技攻关，大力开发和推广科技成果，积极落实振兴农村经济的“星火”计划。全国去年取得重要科技成果一万多项，其中大部分已应用于生产建设，取得比较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几千名专家经过几年反复研究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和颁布了能源、交通运输、农业、机械工业等十二个领域的技术政策，以及涉及生物工程、信息、航天、自动化、能源、激光和新材料等领域的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这对我国当前和长远的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将发挥重大作用。经过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改善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以及提高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质量等方面，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新进展。广大的思想文化工作者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促进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学艺术、卫生、体育、文物、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中作出了新的贡献。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我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必将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过去的一年里继续得到巩固，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为推进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作了很大的努力。在前几年不断加强立法工作的基础上，去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通过了十一项法律，国务院制定和颁布了五十九项行政法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造成的国家活动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法律体系很不完善的状况，正在逐步得到改变，在政府工作人员和全体公民中广泛开展的普及法律知识的教育，使政府工作人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得到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得到增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同共产党和政府间的长期合作共事关

系，全国各民族之间平等互助、亲密团结的关系，得到新的加强。经过继续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和其它刑事犯罪，经过对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以及对各种不正之风的认真纠正，我国社会秩序安定，社会风气正在好转。实现长治久安是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国家的基本国策，我们坚信这个目的必定能够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在过去的一年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新的成就，精简整编、减少员额一百万的任务接近完成，官兵的军政素质有了新的提高。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和发展新型的军民关系，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保卫祖国领土和边境安宁等方面，都作出了新的贡献。我们坚信人民解放军在这些方面将继续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人民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安定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新的成就。

以上事实和基本情况充分说明：总的来看，我们的国家生机勃勃，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兴旺，形势是很好的。

各位代表！当着我们如实地对全国形势的本质和主流作出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前进中仍然存在不少困难，我们在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和问题。在经济领域，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虽已有所缓解，但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仍然存在着某些不稳定因素。国家财政出现一些赤字，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较多，外汇收支还不平衡。工业生产建设的经济效益不高，部分产品质量下降和滞销积压，物质消耗过大，生产成本上升。在政治思想领域，消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各级政府广大工作人员总的来看是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但政府工作中还存在着某些预见性不强、措施不够有力等缺点。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等弊病，还需要下很大力量去努力消除。对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高度重视。

实践证明，坚定不移地、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我们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和力量源泉。根据这个基本的实践经验和当前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在本次人代会到下次人代会的一年间，我们要集中力量办两件大事：一是在经济领域，坚持正确的建设方针，广泛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深入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努力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一是在政治思想领域，深入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各级政府，各行各业，所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都要围绕这两件大事，根据中央的部署和自己的实际情况，扎扎实实地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希望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人民警察，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发努力，为办好这两件大事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二、坚持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总的来看，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这是国家安定团结、社会显著进步的基础。努力把这种发展势头长期保持下去，使之不受挫折，这不仅对于巩固和发展当前很好的经济形势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经济实力的加强，人民利益的增进，乃至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都必将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全部经济工作必须以此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并为此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那么，根据建国以来三十多年特别是近八年的经济建设经验，根据当前经济生活的现实情况，要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需要着重解决好哪些问题呢？

第一，必须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大国里，农业这个基础是否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对于国民经济全局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发展所以很不稳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业发展缓慢和收成不稳定。这八年来，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首先是由于农业生产连续多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为工业生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我们必须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继续改善农村产业结构。这几年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农业生产全面发展，但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忽视农村工作。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目前我国按人口平均的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占有量还很低，无论是粮食生产还是林业、牧业、渔业等项生产，基础都还比较脆弱。同时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仍然处在开发时期，不仅通过深入改革还可以挖掘出很大潜力，而且农村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也有极大的潜力，农村经济的发展前景仍然是很广阔的。我们必须从深化改革和增加投入这两个方面入手，努力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劲。要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一系列新的制度性建设，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使正确的政策逐步法律化，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要切实保护农业耕地和森林、草原，大力加强农田基本建设，积极推广科学技术成果，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必须保证粮食种植面积，注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力争粮食生产有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在这个基础上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全面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努力做好“老、少、边、穷”地区的脱贫致富工作，使这些地区的人民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尽快解决温饱问题。这既是一项重要的经济任务，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第二，必须按照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的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是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去年，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度增长的工作初见成效，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三，大大低于一九八五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四点六的速度。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计划外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还没有得到很好控制，已经铺开的摊子过多，在建项目总规模过大。更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很不合理。在建项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一般加工工业，还有许多是在当前国力条件下不该办的或标准过高的楼堂

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工程，而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工业等建设投资不足。这样的投资结构如不及时加以合理调整，要么大量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设施得不到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方面的必要保证，形不成生产能力或不能投入使用，将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要么就不得不再增加几百亿元的资金来扩大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就必然导致投资规模恶性膨胀。为了进一步改变在建规模过大和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国务院已于今年初作出决定，对基本建设坚决实行“三保三压”的方针，即保计划内建设，压计划外建设；保生产性建设，压非生产性建设；保重点建设，压非重点建设。目前各地正在认真贯彻落实这一方针，但有的部门和地方仍然行动迟缓，措施不力，需要切实改正。我们一定要坚决把建设规模严格控制在国力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并使关系全局的重点建设得到切实加强。

第三，必须把消费的增长切实建立在生产发展可能的基础之上。这些年来，认真纠正了过去片面强调积累、忽视消费的偏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人民生活方面的问题，使城乡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今后，我们还要坚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但是必须指出，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增长过快，消费欲望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特别是在集团消费方面，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讲排场，摆阔气，比豪华，请客送礼，滥发实物，挥霍公款，奢侈成风，各项设施盲目追求现代化，铺张浪费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工资、奖金和集团消费等开支增加过多，既提高了生产成本，又加剧了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矛盾。这几年许多高档耐用消费品生产大幅度增长，而且花费不少外汇进口了这方面的大量整机和散件，但市场供需矛盾仍相当尖锐。消费结构的这种趋向，脱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可能。如不加以正确引导，不仅将使资金积累减少，造成经济后劲乏力，更严重的是会败坏社会风气，滋生贪图享乐、不求创业的思想，形成现实的人均国民收入较低而又消费欲望过高之间的矛盾，引起种种社会问题。生产是消费的前提，生活消费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在正常情况下，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必须低于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居民购买力和集团购买力增加的幅度必须同社会消费品生产增长的幅度相适应。这是不能违反的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创业阶段，需要积累大量建设资金，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而不能追求过高的消费。前几年对这个方针讲少了，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教训。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根据经济的现实情况和发展可能来恰当安排人民的消费水平，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严格控制集团消费，并对人们的消费需求、消费档次、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调节，使之符合我国的资源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此外，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执行关于计划生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第四，必须努力做到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这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原则，也是稳定经济的重要保证。去年，国家财政出现一些赤字，银行信贷也出现一些差额。财政赤字虽然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石油价格暴跌、出口收入减少等原因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支出规模偏大。经济发展从前两年一度出现的过热现象纳入正常发展轨道以后，某些非正常收入因素逐步减少，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减缓，而在超高速发展中已经抬上去的过大的支出规模还没有减下来。几年来，地方、部门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都下降较多，但不少应当由地方、部门、企业用自有资金办的事情，仍然要求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负担。与此同时，在资金比过去分散很多的情况下，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可以有效引导社会资金投人合理方向的制度和机制，这就一方面为地方和部门盲目发展加工工业和扩大非生产性建设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使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负担过重，捉襟见肘。如不及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有效的措施改变这种状况，今后几年财政赤字还有进一步增大的可能，信贷差额也有扩大的趋势。财政赤字和信贷差额是同货币发行紧密相联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某些年份出现一些财政赤字和信贷差额并不可怕，但如果数量过大，持续的时间过长，就会导致货币过量发行，造成通货严重膨胀，引起物价急剧上涨，使经济生活发生混乱。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把过高的财政支出压缩下来，同时要根据新的分配格局，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结构，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今年，国家还将通过发行债券等形式，从分散的预算外资金中集中可以集中的部分用于重点建设。银行要大力吸收储蓄，筹集社会闲散资金，积极扩大资金来源，适当安排各项贷款。除了合理保证企业流动资金和收购农副产品的资金以外，其它贷款都要从严控制，坚决把货币发行量控制在国家计划的范围之内。

第五，必须继续防止盲目追求过高增长速度的倾向。只有兼顾需要和可能，讲求按比例和高效益，保持适当的增长率，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我们已经确定的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和以推进科学技术进步为依靠的，是切合实际和完全可以达到的。如果不顾经济效益和技术进步，脱离本地区和整个社会的实际可能，一味追求提前翻番和快翻多翻，就会严重干扰正确建设方针的贯彻执行，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使经济大起大落，欲速而不达。去年，就全国来说已经使经济增长由超高速状态转入正常轨道，但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企求改变面貌过快的思想尚未完全克服。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家底薄，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和文化发展又很不平衡。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发达，人民普遍富裕，必须经过坚韧不拔的持久努力，而决不能急于求成。我们必须确立长期稳定增长的战略方针，脚踏实地前进，而决不能盲目追求过高速度，以利于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和理顺各种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

第六，从根本上说，要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当前经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

近八年来，由于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我国社会财富和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加。一九八六年同一九七八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由三千四百八十亿元增加到九千三百八十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二；国民收入由三千零一十亿元增加到七千七百九十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百分之九十四点九；国家财政收入由一千一百二十一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二十亿元，增长百分之九十八；部门、地方、企业拥有的预算外资金由三百四十七亿元增加到一千六百七十亿元，增长百分之三百八十一；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一百七十五元增加到四百五十元，扣除物价上升因素增长百分之八十六点九。这些数字和事实充分说明，当前遇到的困难，是在生产建设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不是在经济萎缩和人民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我们具备着克服这种暂时困难的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同时还要看到，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改革顺利推进的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必须也只能通过深入改革来加以解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新老体制交替的过程，目前原有体制已在许多方面被冲破，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还没有作为一个系统建立起来，已经进行的许多改革还有待于进一步配套和完善。这种新老体制并存的状态，是宏观经济前两年一度出现某些失控，以及目前财政、信贷、投资、消费等方面产生某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和积极稳妥地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并要努力使运行中的经济体制在一定条件下保持它的整体性和有效性。为此，国务院已经组织各方面力量认真总结前几年的改革经验，精心研究进一步配套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以便更加卓有成效地推进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民经济进一步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各位代表！除了前面讲的几个问题以外，无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来看，要真正使经济建立在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必须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这项运动是长期以来我国促进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法宝不仅不能丢掉，而且要更好地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努力增产增收，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不仅能够合理地和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更好地发展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增加社会财富，而且可以发扬光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优良传统，使之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动力。这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长远意义。

这次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是在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提出来的，因此一定要同深化改革很好地结合起来。近几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凡是改革搞得比较好的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有了较大的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就有了显著的增进。所以我们说，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是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改革是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直接动力。各个地方、部门和企业都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它们紧密联系，互相促进。

在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中，要把重点放在全面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上。就

工业生产来说，要在保证正常增长速度的同时，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力增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以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所有工业企业都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节约资金，开展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十分注意收旧利废，切实加强综合利用。在流通方面，要积极开拓城乡市场，认真清仓查库，减少商品积压，加速商品和资金周转，节省流通费用，减少企业亏损。在建设方面，要围绕合理调整投资结构，降低工程造价，缩短建设周期，提高投资效益。在其它各个方面，包括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战线和机关、团体、军队等，也都必须充分考虑提高经费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坚决纠正目前普遍存在着的严重挥霍浪费现象。国务院决定今年行政费、事业费和管理费等各项开支要比去年预算执行数节约百分之十的总要求，必须努力做到，今后，财政支出要长期坚持从严控制的方针。

在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中，必须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生产、建设、流通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建筑业和商业等各个行业，都要关心和促进科技进步，把增产节约和改善经营管理纳入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科技部门要继续执行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坚定地把主要力量放在为企业技术改造和振兴国民经济服务方面，同时组织精干的队伍积极研究和发展高技术，并继续搞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充分发挥所有企业以及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进取精神，对于圆满实现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任务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希望，生产、流通、建设领域中的各类企业，都要把着眼点和立足点放在挖掘自己内部的潜力上。要切实加强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健全经济核算，严格财经纪律，加强审计监督，严明奖惩制度，大大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特别要坚决整顿劳动纪律，下决心改变目前许多企业严重存在着的管理不严、职责不清、纪律松弛等落后现象。必须坚决保护企业的正当权益，严格禁止一些地方和部门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的行为。广大职工要进一步增强对企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主人翁责任感，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和业务水平，在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中热情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全部力量。全体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头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励精图治。各行各业、各个地方都要切实加强领导，制定出具体规划和措施，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把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努力取得实效。

三、深入改革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

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既要靠坚持正确的建设方针，又要靠深入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把正确的建设方针同正确的改革、开放部署结合起来，使它们互相适应，互相促进，这是我国近几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进一步顺利推进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适应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商品经

济的要求，以增强企业活力、完善市场体系和健全宏观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实践证明，这个既定的改革方向和总体部署是正确的。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善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改革的具体步骤和配套措施及时作出恰当安排。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确定一九八七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着重改革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内部的领导体制，继续发展横向经济联合，适当加快金融改革步伐，进一步扩大生产资料市场，逐步改革和完善企业劳动工资制度和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办法，并积极为下一步各方面的配套改革做好必要的准备。

第一，深化企业改革，建立和健全责权利相结合的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过前几年的改革，总的来看企业活力有了一定的增强，但还很不够，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没有真正活起来。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国家规定下放给企业的一系列自主权，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被中间环节所截留，至今没有真正落实到企业；另一方面在对企业的扩权中，责、权、利没有很好结合，为企业放开经营权和真正实行自负盈亏创造条件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这就使企业行为往往不能主动适应国家宏观决策的要求，不能对市场变化及时作出合理反应，企业内部制度的改革和潜力的发挥也受到很大局限。为了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除了已经规定下放给企业的权力必须坚决放给企业以外，要把改革的重点放到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上，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认真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要根据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的特点，灵活确定企业合理的经营方式。一般来说，小型企业可以推行承包、租赁责任制。大中型企业可以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用签订合同的办法明确规定企业主管部门与企业经营者和职工集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对所有企业以及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正当利益，必须切实予以保护。总之，我们要积极探索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多种有效形式，逐步走出一条既符合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又使企业具有旺盛活力和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路子。

同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相配合，要加快企业内部领导体制的改革。必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普遍推行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全面责任，要广泛实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和任期终结审计制，促使企业经营者同全体职工一道切实加强各项基础工作，建立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逐步形成企业自我约束的行为机制。这样，也有利于培养和造就我们的事业所迫切需要的一大批有作为的社会主义企业家。

第二，继续发展各种横向经济联合，鼓励建立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在深入改革企业经营机制的同时，必须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进一步推进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科研单位之间的横向联合，逐步建立起适应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新的企业组织结构。通过几年来的改革，目前在全国注册登记的各种经济联合体有三万二千多个，已形成二十四个跨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网络。一九八七年

要在这方面改革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研究拟定更为具体的政策和办法，继续促进横向经济联合蓬勃地向前发展。要鼓励和支持地方、部门、企业之间实行生产要素的联合，相互投资和相互参股，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条件成熟的，可以建立跨地区、跨行业的各种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并使它们之间责、权、利关系的处理逐步规范化。军工企业也要根据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原则，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横向联合。根据几年来发展横向联合的经验，当前需要注意处理好四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坚持以骨干企业或名优产品为"龙头"，防止把企业集团搞成变相的行政性公司或单纯的行政管理机构。二是在同一行业，可以形成若干个规模不等、各有特点的竞争性企业集团，不能搞成独家经营的垄断局面。三是各级经济综合部门和专业主管部门要大力支持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发展联合，坚决排除条条块块出于局部利益而进行的种种干扰，保证横向联合和企业集团的健康发展。四是建立企业集团要重视吸收科研单位参加，促进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加强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

第三，深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管好用活各种社会资金。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既是国家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搞活经济的必要条件。去年以来，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短期资金市场发展较快，对于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短缺和促进社会资金合理使用起了重要作用。今年要不失时机地在这方面迈出新的步伐，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强化和改进中央银行的宏观控制职能，积极发展多种金融组织和有效利用多种融资工具，开辟多种信贷业务，大力发展城乡保险业务，在各种金融组织之间适当开展竞争；有条件地实行省以下专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企业化，逐步做到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改革银行利率体系，逐步理顺存贷款的利率，实行期限差额利率和浮动利率；改善企业流动资金管理办法，改变银行包企业资金供应的做法；逐步实行外汇、外债的集中统一管理，搞活外汇资金；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金融中心作用，有领导有步骤地发展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资金融通市场，发挥金融市场筹集调剂资金、引导资金流向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作用。

第四，进一步扩大生产资料市场，为增强企业活力创造良好环境。目前大中型企业普遍活力不强，从外部条件来说主要是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全的生产资料市场。今年要积极发展和改善钢材、煤炭、水泥、木材等重要生产资料的市场。国家准备拿出一部分统配钢材，集中投放到指定的重点市场，切实加强指导和管理，并通过必要的经济办法，引导生产企业自销的钢材和使用单位超储积压的钢材更多地投入市场流通。鼓励企业之间按照互利互惠的原则，建立稳定的供货关系。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有步骤地推广石家庄等地的经验，对一些重要生产资料，无论是计划内还是计划外，都实行"同一销价、差价返还、逐步放开、扩大市场"的办法，以利于扩大企业择优选购的自主权，减少社会物资库存，有效防止倒买倒卖现象，更好地促进生产资料市场的形成。

第五，改革企业劳动工资制度，逐步理顺企业分配关系。所有企业今年都要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改革劳动制度的各项规定。今后全民所有制单位

新招用工人，必须面向全社会并全部实行劳动合同制。同时要积极建立职工待业保险制度，逐步推行以省、市或县为单位统筹职工养老保险金的办法。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除近期内国家还将规定大体统一的工资参考标准以外，今后国家只规定企业工资、奖金增长的限额、幅度或同效益挂钩的定额和比例，企业内部分配的具体形式和办法由企业自主决定。企业可以根据各自的不同条件，分别采取计时加奖励、计件工资、浮动工资、单位产品工资含量等不同的分配形式，把职工的劳动报酬同他们的劳动贡献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真正打破平均主义，搞好按劳分配。与此同时，国家要进一步完善对消费基金加强宏观管理的制度和办法，使消费基金的增长同生产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相适应。

第六，改进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益。这几年在基本建设中推行各种形式的投资包干责任制和招标投标制，对调动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合理使用资金和增进投资效益，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今年要进一步推广和完善各种形式的投资包干责任制。与此同时，要在固定资产投资的管理中简政放权，适当放宽项目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并使部门、地方和企业相应承担投资决策的责任和风险，实行责、权、利的统一。在不突破国家"七五"计划规定的投资总额的前提下，放宽各包干部门对项目的审批权限；对非包干部门和地方，也适当放宽一部分行业的项目审批权。扩大计划单列的大型联合企业、国家重点支持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在组织实施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方面的权限。改进年度计划投资安排办法，在从严控制投资规模的条件下，各部门、各地方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对项目之间的投资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整。改进建设项目的审批办法，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办事效率。建设项目从设计、施工到设备供应和设备进口，都要打破地区、部门和军工民用的界限，全面实行招标制，择优选定中标单位，逐步改变过去单纯用行政手段分配任务的办法。

各位代表！价格改革和物价问题是当前人们普遍关心和议论较多的问题。由于过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国家对价格管得过多过死，我国的价格体系很不合理。如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形成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可能有效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不可能正确引导社会消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就建立不起来。因此，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非改革不可，但价格改革涉及千家万户，难度也很大。我们的价格改革总的来说是结构性调整，但由于农产品和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还由于许多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因此在改革中总的物价水平势必有所上升。当然，这同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的轻度通货膨胀也是分不开的。由于物价总水平上升，这就必然产生一个国家、企业和人民的承受能力问题。这里，既包括实际经济的承受能力，也包括社会心理的承受能力。从政府来说，每一项价格改革措施的付诸实施，事先必须仔细研究和周密测算，进行多种方案的比较，力求把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幅度控制在社会和人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从群众来说，也要提高对价格改革必要性的认识，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价格变动的适应能力。只增加工资，物价不动，是做不到的，要

么只能回到过去那种经济缺乏活力，工资和物价都长期冻结的状况，这显然对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很不利，也是绝大多数人所不愿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努力保证广大群众的收入增长幅度不低于物价的上涨幅度，实际生活不仅不下降，而且还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有所改善。在前几年的改革中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然，由于人们收入水平、消费档次和赡养人口多少的不同，物价上升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也会很不一样，有少数收入增加不多以至没有什么增加的人目前生活确实有困难，有的甚至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这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的，也是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要着力加以解决的问题。有些地方、部门和企业乘价格改革之机乱收费、乱涨价、变相涨价，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引起群众不满，必须坚决加以纠正。今后的价格改革一定要坚持既定的正确原则，继续实行“调放结合，稳步前进”的方针，谨慎从事，做得更加稳妥和周到。今年的改革只限于调整和放开极少数非动不可的产品价格，要把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幅度严格控制在低于去年的幅度之内。要继续发挥国营商业平抑物价的作用。特别要切实加强物价管理，严格禁止各种形式的乱涨价和变相涨价。这是一条必须坚决执行的重要法纪，并欢迎广大人民群众对此加强监督。

在改革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人们普遍关心和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问题。随着新老经济体制的逐步转换，各方面利益关系必然要作相应的调整和发生新的变化。原有的利益结构和分配关系将逐步被突破，新的合理的利益结构和分配关系将逐步形成。这同整个新老体制的转换一样，也只能和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总的发展趋向来看，各方面的经济利益都将随着改革的进展而得到增加，这已经为前几年改革的实践所充分证实，也是我们的改革得到人民拥护的根本原因。但是，人们利益的增加不可能齐头并进，必然有先有后，有多有少，甚至有些方面的利益还会暂时受到某些损失。而且，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不是一下子就能定型的，在某项改革中得到的利益有可能在另一项改革中部分丧失，又可能在另外的改革中得到补偿。这种利益关系的复杂变化，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待改革的态度。这就要求我们十分注意在这个问题上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采取改革措施的时候要立足于尽可能做到增进各方面人们的利益，从而使改革能够始终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以保证其顺利发展。与此同时，也要结合各项改革，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人们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对个人利益的增进抱有脱离实际的奢望，增强人们思想上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前个时候我们的某些宣传恰恰在这一点上注意不够，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训。在关系社会每个成员实际利益的分配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克服平均主义，坚持拉开合理差别，鼓励一部分人依靠辛勤劳动先富裕起来，引导人们充分认识这样做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也将有利于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另一方面，对通过合法的正当途径获得的高收入，也必须实行合理的调节，以防止收入差别过于悬殊。至于对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的，必须严加取缔，触犯刑律的，必须依法予以制裁。

各位代表！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经过前几年的努力，

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经济特区的建设，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的开发，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以及其它方面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都有显著进展。一九八七年，我们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在有效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增加出口创汇等方面打开新的局面，使对外开放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利用国外各种资金，吸引外商在我国举办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或独资企业，是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补充国内资金不足、增加出口创汇能力、提高我国技术和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国务院已经颁布的对外商来华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必须不折不扣地加以落实。要抓紧完善涉外经济法，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和借鉴国外的经验，利用外资必须把握三条原则：第一，借外债的总额要有控制，外债结构要合理，要同自己的偿还能力和消化能力相适应；第二，一定要用在生产建设上，重点是出口创汇企业、进口替代企业和技术先进的企业；第三，利用外资要讲求经济效益，创造的纯收入，无论如何不能统统花掉，一定要留足及时还本付息的部分。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国际信誉，立于不败之地。

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我国出口创汇能力的增强。为了增加外汇收入，必须立足于促进生产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改进花色品种，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和工资成本较低的优势，大力发展进料加工出口和来料加工出口。积极推进工贸、农贸之间的横向联合和合作。逐步建立出口商品生产体系，发展创汇产业，使专门为出口创汇服务的企业信息灵通，并真正能够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为外贸出口的持久稳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进一步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尽快增加工业制成品特别是轻纺、电子和机械等深加工、精加工产品的出口。努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出口生产经营协作和联合，搞好销售服务网络，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要使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逐步形成外向型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它们发展外贸生产的优势。要加强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外贸经济效益。在增加出口创汇的同时，要积极发展旅游事业，进一步开展对外承包业务和劳务合作，使它们成为我国增加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我们不仅要多出口，多创汇，还必须合理用汇，节约用汇，努力保持外汇收支平衡，把有限的外汇真正用在发展我国经济最迫切需要的地方，使之发挥出更大效益。严格控制不适当的进口，国内能够生产并满足需要的产品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积极发展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努力提高国产化水平。我们还要认真总结经验，研究制定既有利于联合统一对外又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外贸体制全面改革方案，并有计划有步骤地付诸实施，为进一步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创造良好条件。

四、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我国的建设、改革和开放，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当前政治思想领域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广泛深入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根本上保证建设、改革和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载人我国宪法的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是我们立国治国的根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由于思想战线领导上软弱涣散，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重视和支持不够，甚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纵容，使这股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共同意愿的错误思潮滋长蔓延。这种状况搅乱了部分人的思想，蒙蔽了一些缺乏历史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青年，影响了安定团结，干扰了建设、改革和开放。去年年底波及若干城市的少数学生闹事，尽管直接引发的原因各地各校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继续泛滥下去，就会影响更多的人特别是一部分青年迷失方向，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动乱的社会，建设和改革统统将无法正常进行。所以我们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于这场斗争，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决不能犹豫和动摇。

经过去年年底以来几个月的工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情况开始扭转，但要清除这股错误思潮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从当前来说，要集中力量抓好以下几件事：一、继续深入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观点；二、认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教育；三、进一步整顿、充实和加强舆论阵地；四、切实加强和改进各条战线特别是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五、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我们还要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精心地指导好这场斗争。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更好地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更加卓有成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基本点是两条，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遭到破坏，改革和开放就会失去根本的政治保证，甚至会走到斜路上去。不实行改革和开放，社会主义就会停滞和僵化，不可能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就不能在实践中真正有效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行改革、开放、搞活，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的统一整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为了正确地、全面地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绝不是也绝不会影响改革和开放的进行。必须看到，有的人赞成改革、开放但思想不够清醒，或者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思想不够解放，这些都属于认识问题。通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评，分清是非，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取得越来越明显的成效，我们相

信，对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理解得不全面、不完整的人们，必将在实践中提高认识，更加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场艰巨复杂的长期斗争，既要态度坚决，不可半途而废，又要政策和方法正确，始终以理服人。我们必须认真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不搞政治运动，决不重复过去“左”的错误做法。几个月来，中共中央在这场斗争中已经明确宣布和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主要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严格限于共产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和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农村不搞，工厂和机关只进行正面教育；不层层找代表人物，不搞上挂下联，不搞人人过关；要把极个别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同有某些自由化观点、但不固执己见、遵守纪律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坚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方针；要把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和有一般性错误的作品，以及探索中的失误，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严格区别开来；对学术理论和文化艺术上的不同意见，在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下，继续用正常的自由讨论、批评和反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对人的处理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对犯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的人，既要认真进行批评帮助，又要给他们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欢迎他们进行自我批评。对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而发表过错误言论和错误文章的人，主要是鼓励他们在学习和实践中提高认识。极个别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即使被撤销了领导职务，仍然要在适当岗位上安排他们的工作，用其所长，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

实践证明，上述方针政策有力地保证了斗争的健康发展，今后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在这里，我还要再次郑重宣布：在整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不变，进行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不变，农村和城市的各项现行政策不变，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各项政策不变，继续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政策不变。不但不变，而且还要长期地、更加正确有效地坚持下去。

不断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向前进，是我们一贯坚持的战略方针，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的。各级政府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要认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在新的历史时期，适应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削弱，必须加强。但为了加强，又必须改进，否则加强的目的也难以实现。这是需要全国企业、学校、机关、部队、各行各业下功夫探索解决的新课题。我们应当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宣传国内国际形势以及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但必须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和耐心疏导的方法，讲究实际效果，不搞形式主义，防止简单粗暴。要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教育群众，鼓舞士气，动员人们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建设和改革。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担负着教育人、塑造人的光荣使命，更要注意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给教师积极提供了解实际情况的方便条件，有领导、有组织地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扩大视野，丰富实际知识。各级政府都要很好地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继续努力改善广大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切实加强和认真改进学校的行政管理和后勤工作。要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受教育者各方面的素质，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必须进一步努力促进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党和政府领导的报纸、时事政治刊物、广播、电视等传播工具，要按照各自的特点，完整地、正确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创造、贡献和奋发团结的精神。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发表或反映各方面人们对党和政府工作提出的负责任的建议、意见和批评。努力为人民同时也为党和政府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对社会舆论提供正确的引导，对广大读者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繁荣文学艺术是陶冶人民道德情操和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希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注意倾听群众和实践的呼声，积极深入生活，深刻反映时代，创造出更多的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优秀作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进一步发展出版事业，改革出版发行体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图书。各级政府都要重视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博物馆、展览馆、影院剧场等群众性文化事业的建设，把它们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社会科学研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中，要在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下，继续实行创作自由、学术自由、讨论自由以及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提倡勇于实践，大胆探索。我们必须坚持在对外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认真汲取国外一切有益的思想文化成果，但同时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说和文学艺术思潮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鉴别，而决不能一味地盲目推崇，更不能把资本主义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当作所谓的“新观念”加以传播，否则就会腐蚀人们的思想，污染人们的心灵。以生产和传播精神产品为主要任务的各项文化事业，当然也都应该积极改善经营，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但必须坚持以社会效益作为最高标准。国家对于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各项文化事业发展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对于优秀的创作和研究成果，对于成绩突出的思想文化工作者，将继续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始终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我们反对美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错误思潮，不赞成搞“大民主”，正是为了更

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有领导、有步骤地继续推进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建设，特别要活跃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和健全民主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当前，各级政府领导部门和负责工作人员，应当积极地、主动地开辟多种渠道，经常同广大群众对话。要把方针政策、工作部署、建设和改革的成绩以及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同时也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接受合理建议和正确批评，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更加热忱而有效地为人民服务。通过对话，沟通思想，加深理解，消除隔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民主团结、相互帮助、共同前进的新型关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工作必须主动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我们还要在加强行政监察工作的同时，充分重视和发挥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重视和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群众组织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任何时候，决不允许借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压制民主，决不允许抵制甚至打击对实际工作缺点、错误的正当批评。

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制度，现在尚不完善，需要有一个长期建设的渐进过程。我们一定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巩固发展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前提下，通过有秩序地、自上而下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加以完善。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内容、重点和步骤，然后付诸实施，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断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民族政策的教育，深入进行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政府各部门以及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要努力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帮助，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要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使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日臻完善。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大发扬起来，以团结全国各族同胞为加强祖国统一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保障。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并且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定不移地执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切实保证全面改革和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一切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进一步提高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带头做守法、执法的模范。在全体公民中普及法律知识的工作，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具体指导，使之进行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久前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

要认真学习和贯彻。公安、司法部门和广大人民警察要继续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树立廉洁奉公、执法如山、文明礼貌、忠诚积极的职业道德，形成良好警风，密切警民关系。我们要继续依法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依法惩处经济犯罪和其它刑事犯罪，依法禁止一切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及时正确地调解和处理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切实做好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保障社会安定。

各位代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需要几代人锲而不舍地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当前的国际局势尽管错综复杂，战争的因素仍然存在，但和平力量不断增长，经过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争取实现世界和平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受到了世界各国日益广泛的欢迎，在去年一年的外交工作中又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就。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我国为维护和平、实现裁军、推动合作、促进发展所作的不懈努力，在国际上赢得普遍赞赏。我国作为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愈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同超级大国结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既是中国实现振兴经济宏伟目标的需要，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有力推动，完全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我国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什么问题，也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将坚定不移地把独立自主的和平夕咬政策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谋求按照“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主张愈益深得人心。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正在顺利实施，我国将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已载人协议的关于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业已圆满结束，并将于明天由两国政府代表团草签有关协议。这是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另一个成功范例，是朝着最终全面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迈出的又一个重要步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合情合理的方针，它已经为愈来愈多的台湾同胞所理解。我们殷切希望台湾同胞继续发扬爱国精神，为实现祖国统一各展所长；希望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继续为沟通海峡两岸各方面的交往发挥桥梁作用。我们也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采取切实的步骤。

总之，当前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建设和改革都是有利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不断发展同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友好合作，继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努力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任何力量和干扰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同时满怀着必胜的信心。

用新的观点分析形势
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问题*

一九八七年四月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对经济形势和改革问题的讲话。

对需求膨胀要加以分析，膨胀的是投资还是消费？有些同志脑子里一讲膨胀就是投资膨胀。但现在建设规模并不大，计委不是有个材料吗？消费膨胀很厉害，现在还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消费膨胀，平均主义。消费不解决，一刀砍向重点建设，消费会更加膨胀，生产力会萎缩。钱发得多，又没有效益。消费放开了，但没有找到路子，在平均主义路上放开了。有些企业就是应当很苦，有些企业就是要多发一点，现在平均主义大发展。这几年在消费问题上，工资问题上，步子迈不开，收又收不住。挂钩有顾虑，不挂的比挂的差得多。虽然在巴山轮会议[1]上中外许多专家都不同意挂钩，但实际结果，效果很好。

这种局面再搞三年，改革要出大问题。这是改革的十分重要的问题。解决了，症状可以缓解，不解决就会加剧。出路在于改革，加快分配制度改革、企业责任制改革。还有投资体制改革，投资结构调整。同时要压缩开支，不下很大决心，压不下来。再就是压缩进口。压缩进口，亏损减少。原料投资要少压，机械加工投资要多压。

现在的问题是：用新的观点分析形势，还是用老的观点分析形势；是用改革的办法，还是用别的办法解决问题。

我是讲自我批评，放开了，办法没跟上去，结果平均主义发展。这个问题不制止，下半年可能消费基金大膨胀，效益下降，结果势必压基本建设。需要防止惊惶失措，悲观情绪。不要认为大事不好。有这种情绪，措施不会得当。国民收入“超分配”怎么算出来的，根据什么？借外债算不算超分配？“超分配”的概念是为了说明什么问题。借外债超分配，根本没有什么问题。

“超分配”的说法甚嚣尘上，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

多发了票子，到底占多大因素。物价上涨，不完全是政策造成的，但有政策因素。不能说政府控制不住。前年是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去年是几种差价拉开。今年就提出了价格改革出台不出台的问题。可见，政策是重要因素。票子到底占多大比重。借外债、“超分配”是一九九〇年以后的问题。借外债，一九九〇年后可能速度低。是怕将来低，现在就低，还是现在高将来低好。

借外债是偿还问题。我不是说没有“超分配”，而是把“超分配”说得这么悬乎，是否从实际出发。

既然决定借外债，就应当借了用，用就是“超分配”，这有什么问题？一九八五年外汇用得不当，我承认。一九八○年没有什么外汇结存，负十亿美元。一九八六年底结存七亿美元，五年增加十七亿美元。

把“超分配”说得很重，传得很广，需要澄清。外汇结存增加十七亿美元，反而说把外汇消耗光了，不符合实际。“超分配”一词是我第一次用，受了南斯拉夫久拉诺维奇的影响。因为经济学家不同意，后来不用了。现在都出来了，成了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总根子了。

如果说“超分配”也要列出哪些是正常的。借外债就是“超分配”而“超分配”为什么成了问题呢。借二百亿美元，就是八百亿元人民币，这不应当成为问题。借外债，“超分配”，与经济困难有什么关系。不借外债不是困难更大嘛！

票子，有没有过去通货不足的问题。一九八一年书记处研究室有个材料，说票子发多少。陈云同志说，手存现金，并不构成问题。通货不足问题还存在不存在。

物价上涨究竟与票子有多大关系。

虽然国内分配超过了国内生产，但借了外债，这也是一种分析方法。说用得不当，可以。

票子问题我也承认。在政协讲大体是适度的，可能多了一点。但到底多了多少，不能说多得不得了啦。没有量的分析，问题怎么能够解决。

现在有一种悲观情绪，对几年改革发生了动摇。不是说不正视前进中的问题。不是对你（马洪同志）一个人。现在搞法好，还是过去搞法好？说国家财政困难，你把预算外都统算起来，预算外一千六百亿元就没有了。为什么不这样分析问题。说基础工业投资不够，什么时候有现在这么多。讲比例关系，也要看到什么时候都不如现在好。钢一年增加三百万吨，煤什么时候搞过这么多。有很多问题，要承认，但要有一个基点，没有基点要出大问题。

现在问题是思想很不统一。

我是有感而发，不是无的放矢。不是对马洪同志一人。现在说“超分配”的空气正在发展，必须同这种空气划清界限。首先国务院要统一思想。

正视问题，采取措施解决，但要有一个正确认识。否则会迷失方向。

有一个严重程度的认识，是前进中的问题，还是多年来积累结果的集中暴露。这个不能含糊。对形势如没有一个清醒看法，就会乱套。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必须有统一看法。存在对形势如何分析和看法的问题。我很闭塞，但也听到不少议论。你们了解情况不会比我少。如果确实是多年失误的总爆发，那就得改弦更张，不能继续走下去嘛。

几年经济发展了，国家实力增强了，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预算内预算外四千亿元，内债外债也成问题了，还款还可以再借嘛。要分析，不分析不得了。不管问题有多少，都可以同八年前比一下。我在政协讲，形势大好，问题不少。

“超分配”就是多年失误的爆发。一千多亿元“超分配”，寅吃卯粮，那就只有勒紧裤带。如果说有“超分配”，没有实现的购买力，也就是一两百亿元。为什么我这样不感兴趣，就是没同多年失误的观点划清界限，说我们是虚假繁荣。

今天讲措施，根本问题还是落实省长会议的措施。是落实的问题。不要给人的印象，刚开了会，又出了问题。

前进中的问题，不是多年失误的暴露。关键是落实省长会议的措施，不是又出了什么新问题。

票子要注意，但究竟多少算多，多少算少，谁也说不清楚。是不是少发票子情况就一定好。发票子要谁批准，谁能掌握得了，农产品该收购你不收购，行吗？

消费基金控制是个大问题。用什么办法好？简单办法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建立在调动大家积极性的基础上。

注 释

1．巴山轮会议，指1985年9月2日至7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联合召开的“宏观经济国际讨论会”，有30多位中外知名经济学家参加，重点讨论了如何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防止通货膨胀等问题。由于这次会议是在从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号游轮上举行，又称“巴山轮会议”。会后，赵紫阳总理在北京会见了来华参加会议的n位外国经济学家。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他主持召开的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对经济形势的估计

对目前经济形势应该如何估计呢？概括地说，就是形势大好，问题不少。这个估计既不很乐观也不悲观，是实事求是的。形势大好，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条件。问题不少，但也不能看得过于严重，悲观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我们要在肯定大好形势的前提下，对存在的问题认真对待，绝不可掉以轻心。今年是很关键的一年，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贯彻年初省长会议的决定，我们的经济就可以继续得到稳定发展，不会出大的问题；如果今年一点小的牺牲都不愿意做，把时机失掉了，那明年的困难将会加大，大好形势的继续发展将会遇到困难。无论如何要避免今后几年进行大的调整，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请各地方、各部门以大局为重。

二、关于压缩财政支出和搞活大中型企业问题

今年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多，出路何在？

第一，必须把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至一九八五年超高速带来的开支大盘子压下来。超高速带来高支出，带来一个讲阔气、讲排场、大手大脚的不良风气，压缩空气首先要把这个压缩下来。各部门、各地方可以认真统计一下，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你们的财政支出增加了多少？很多不必要的支出，必须压下来，早压早主动。现在我们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只有一、两百亿元，而各项增加的支出加起来多达几百亿元，这种作法很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压缩支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压缩行政费。现在我们行政费的支出增加很多，各种会议、各种旅游团到处都是，铺张浪费特别严重，而且互相攀比，好像各个单位都富得

很。这种不正之风如果继续下去，我们的政府就不能成为廉洁政府。把钱都用在行政费支出上，我们还搞不搞经济建设？当然基本建设搞多了也要压。财政部门要认真核算一下，以一九八三年的开支为基数，计算出每年的合理增长，对不正常增长的部分不能承认。这个问题要引起各地方、各部门的注意。

第二，真正把增产节约运动和企业的改革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现在大中型企业一是搞得不活，二是蕴藏的巨大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缺少激励企业职工去挖掘潜力的政策和制度。今后我们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一个大的转变。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几年以后，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就会增加一个很有利的因素。今后的重点应放在改革企业的经营机制问题上，对大中型企业实行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一些小企业一租赁，效益马上就上来了，税收也增加了。石油、煤炭、铁道等行业实行包干办法以后，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证明各方面潜力都很大。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不可能十全十美，没有问题。但是，利弊相较，利大于弊。承包经营责任制，要有步骤地实行，不要一哄而起。这件事搞好了，将对实现“七五”计划起很大的作用，也会把改革向前推进一步。

三、关于制止乱摊派、乱涨价问题

一月省长会议上讲了要搞活企业、保护企业，但各地的情况很不一样，有的地方基本建设不压，把发行的债券转到企业，各种摊派也很多，这就谈不上把企业搞活，使企业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乱涨价问题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现在钢材、木材、水泥、有色金属、化纤原材料，还有电力、运输等，乱涨价的现象相当严重。生产资料乱涨价，会使加工工业的负担超前加重。这就带来两种结果，一是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降低；再一个就是迫使加工企业的产品也涨价。中国的主要生产资料基本上是垄断的，生产资料的涨价引起加工工业的涨价是必然的。实行价格双轨制后，容易搞鬼，因此必须进行监督和控制，使这种情况不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在有的钢铁厂不执行国家的合同制度，调拨任务不完成就去卖高价，国家一定要调拨，还得另给他好处。要研究制定一些监督办法。对企业，一是把它搞活，保护它的合法利益；二是它违法一定要给予制裁，这样才能培养出一大批善于经营的守法的企业家。违法就必须制裁，不能迁就姑息，必须强调守法。不这样，我们的改革就会受到干扰。这一点要向下面讲清楚，并研究制定出监督、制裁的措施，做到违法必究。

四、这次人代会议讨论中涉及到的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厂长负责制的问题。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实行厂长负责制、特别是要使企业党委起监督保证作用，思想上还不通，甚至还把它和是不是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联系到一起。这个问题和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现在重申：（一）各地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厂长负责制的通知执行，不能有任何动摇、犹豫和观望。（二）要使不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同志，更多地接触、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让他们清楚为什么必须这样办。我们要继续按照中共中央通知去做，做的效果好了，就会获得更多同志的了解和支持。

第二，关于村民委员会的问题。村民委员会这个组织放在哪里好？我主张放在自然村，不要放到大队一级。南方自然村虽然小一点，还是有个自然村，北方就更没有问题了。农民对村的观念很强，再说村里防火、防盗、种树护林、修房屋、修道路，将来还要设各种基金、搞各种互助性活动，总得有个自治组织来协调。村民委员会设在自然村，乡政府可以考虑在大队一级设代表机关，一个人带一、二个助手，算乡政府的派遣机关，负责征粮、计划生育等工作。这就解决了乡政府下边没腿的问题，又不必增加很多编制。这是个人建议，供各地同志研究。

五、关于外贸问题

一季度外贸出口的情况很好，全国出口创汇八十三亿美元，比去年增加的幅度相当大。广东省一季度完成了十四亿美元，全年预计可以搞到五十亿美元。各地也都认为今年出口形势很好，出口创汇可以超过去年。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日本、台湾、新加坡、南朝鲜货币升值，在国际市场上给中国产品出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二是我们这几年搞了一些鼓励出口的政策调动了外贸出口的积极性；三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没有完全形成法律。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争取多出口。为了解决好因多出口而增加的亏损问题，前天我和经贸部等单位的同志开会研究出以下办法：（一）超额出口部分的外汇“倒三七”分成，各地多出口部分的亏损自己解决，但是多创汇的70%归你。留成外汇按季度结算，按比例归你的你就可以使用。（二）用这些外汇可以进口一些能够弥补亏损的生产资料，但不能进口生活消费品。（三）在超额留用的外汇中，国家按批准的换汇成本买一部分。看来今年如果我们搞得好，有可能出现外贸顺差。总之，计划、外贸、财政、银行等部门要协同动作，互相支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把今年的外贸工作搞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

今天我和卡瓦科·席尔瓦[1]总理分别代表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2]。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热烈祝贺两国政府本着友好和谅解的精神圆满地解决了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署开辟了中葡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新的前景。

在中英两国政府圆满解决了香港问题之后，中葡两国政府在较短的时间里又就解决两国之间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圆满达成了协议，为在当今世界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树立了又一个成功的范例。

《联合声明》解决了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同时也为澳门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包括澳门居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和葡萄牙人民的普遍欢迎和支持，也博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联合声明》的签署，是中葡双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两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都能以中葡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为重，并从澳门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互谅互让、平等协商，充满了认真和合作的精神。对于席尔瓦总理本人对促成协议达成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表示高度赞赏！对于在中葡会谈付出过辛勤劳动的葡萄牙朋友和中国同事致以诚挚的谢意！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是中国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制定的一项重大国策。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是实事求是的，因此也是完全行得通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继续遵循这一方针，为全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协议是中葡双方经过认真谈判达成的，它体现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确信中葡双方对这一协议将会全面和认真地贯彻执行，希望广大澳门同胞和各界人士同心协力，为促进澳门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及其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

注 释

1．卡瓦科·席尔瓦（Anlbal Ant6nio Cavaco Silva，1939—），生于葡萄牙南部的阿尔加维地区。时任葡萄牙政府总理。先后任葡议会议员，葡萄牙财政和计划部长，社民党主席，葡萄牙总统。

2．由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与时任葡萄牙共和国总理的卡瓦科．席尔瓦分别代表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的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满意地回顾了两国建交以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一致认为，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有利于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此，经过两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同意声明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迷仔岛和路环岛，以下称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对澳门执行如下的基本政策：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二）澳门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三）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均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澳门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担任主要职务的官员由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澳门任职的中国籍和葡籍及其它外籍公务（包括警务）人员可以留用。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任用或聘请葡籍和其它外籍人士担任某些公职。

（四）澳门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澳门居民和其它人的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和迁徙、罢工、选择职业、学术研究、宗教信仰和通信以及财产所有权等各项权利和自由。

（五）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有关文化、教育和科技政策，并依法保护在澳门的文物。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机关，立法机关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

（六）澳门特别行政区可同葡萄牙和其它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葡萄牙和其它国家在澳门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将依法得到保护。

（七）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以自行签发出入澳门的旅行证件。

（八）澳门特别行政区将继续作为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地区进行经济活动。资金进出自由。澳门元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继续流通和自由兑换。

（九）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征税。

（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

（十一）澳门特别行政区除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外，还可使用区旗和区徽。

（十二）上述基本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所作的具体说明，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自本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止的过渡时期内，葡萄牙共和国政府负责澳门的行政管理。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将继续促进澳门的经济发展和保持其社会稳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给予合作。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为保证本联合声明的有效实施并为一九九九年政权的交接创造妥善的条件，在本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联合联络小组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二的有关规定建立和履行职责。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关于澳门土地契约和其它有关事项，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的有关规定处理。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同意，上述各项声明和作为本联合声明组成部分的附件均将付诸实施。

七、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

批准书将在北京互换。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具有同等约束力。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葡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葡萄牙共和国政府代表

赵紫阳（签字）　　　　阿尼巴尔·安东尼奥·卡瓦科·席尔瓦（签字）

在上海市调研时谈深化企业改革等问题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

当前要普遍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并同深化企业改革结合起来，有步骤地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搞活大中型企业，努力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势在必行

和全国一样，这几年上海有很大变化，大家都反映形势很好，令人振奋。但是也要清楚地看到我们前进中存在的困难，看到完成今年任务的艰巨性。要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缓解存在的困难，继续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出路就在于要真正把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同深化企业改革结合起来，特别是要把作为国民经济骨干的大中型企业搞活，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前一段许多小企业实行承包、租赁以后，效益很快就大为提高，税收利润也大幅度上升；几个实行投入产出包干的行业，也都取得良好的效果，这些都充分证明企业的潜力确实很大。现在大中型企业搞得不活，蕴藏的巨大潜力没有挖掘出来，主要是激励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没有解决或没有真正落实。解决企业活力的问题，不能再靠国家减税让利，而是要引导企业向内部挖潜。为了改善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看来实行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势在必行。通过改革把企业的潜力挖掘出来，促使企业上质量、上水平，调整产品结构，降低物资消耗，增产适销对路的商品，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强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和消化能力。这样，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利益都能够得到兼顾。这不仅对当前有利，而且也是今后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要把工作做细，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计算好经济技术指标，签订好合同。要根据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形式，不强求一律。要注意存利除弊，搞好配套改革，加强宏观管理，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要进一步解决企业内部关系问题

在明确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后，还要进一步解决企业内部的关系问题，把职工

和经营者的利益同企业的经济效益联系起来。目前一些企业采取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工资含量包干、计件工资等具体办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推行，并使它不断趋于完善。总的原则是工资奖金的增长应同生产的发展相适应，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要注意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搞平均主义，防止消费基金的膨胀。

各地应撤销行政性公司解放企业

为了搞活企业，给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解决企业“婆婆”多的问题，上海市从去年起，就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陆续清理撤销了全市的行政性公司，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下放权力，减少层次，搞活企业的要求。上海市的这一经验应当在全国推广。各地的行政性公司应予撤销，要把企业解放出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城市政府各管理局的职能也应当转变，要努力为企业服务，搞好规划、协调、监督等工作，不要去干预企业的内部事务。要切实检查纠正层层截留国家下放给企业的权力的现象，使企业真正能够实现责、权、利的结合。

厂长负责制应大胆探索不断完善

推行厂长负责制是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厂长负责制的通知，把这一工作搞好。厂长负责制是一件新事物，应当在实践中大胆探索，认真总结，不断完善。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形式。只要实践证明是好的，就应当予以支持并帮助改进。但不论什么形式，都要体现两条原则；一是厂长对工厂负全面责任；二是企业党组织起监督保证作用。目前上海和其它城市实行的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等形式，有利于厂长把长期目标和短期行为统一起来，效果是好的。

企业之间要注意发展横向经济联系

大型企业要带动中小企业，形成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经济联合体或企业集团。对跨地区、跨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型联合企业或企业集团，要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在上海，在其它城市中，也可以对一些重要企业集团和企业群体实行市计划的单列。这是改革计划体制、加强宏观管理、搞活大型企业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样做，能够冲破条条块块的束缚，发展横向联合和专业化协作，促使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上海市和内地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协作，发挥优势，搞好内地初级产品的加工增值，扩大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为国家多创外汇。希望所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双增双节”和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为完成今年的任务做出新的

贡献。

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成立三十五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

在你会成立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深入改革，坚持开放，搞好服务，为促进我国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做出新贡献。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意见*

一九八七年五月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改革计划体制的十二条意见》汇报时的讲话。

计划体制改革的问题，在上海时同安志文、柳随年同志一路上议论，有了一些思路，要点是：

一、我们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

商品经济的基本要求，就是经济活动要建立在等价交换上。我们的计划也要建立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这样就把有计划和商品经济统一起来了，有别于过去的产品经济。过去我们搞的不是商品关系，而是调拨关系，这是一种吃大锅饭的体制。大家都想少调出、多调人。因为不是等价交换关系，不等价多调出就吃亏。我们过去理解的计划经济就是这样一种计划经济，没有把协作计划作为计划的重要内容，而是认为通过调拨才是计划。

斯大林晚年发现了一条规律，就是农民同工人、城市的经济联系，等价交换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原则。实际上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唯一可以接受的原则就是等价交换，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计划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不论国家订货还是地区协作都要体现等价交换，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在一个时期内有的地区可能调出多一些，调人少一些，但目标是等价交换。国家除了保留必要的订货以外，其余的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地区之间的交流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企业联合来实现。

能够把这个问题弄通了，计划的天地也就打开了，同过去的计划模式脱钩了。这个观点在文件中要写得突出点。现在价格体系不合理，可以不用等价交换的说法，用商品交换，用这种思想解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是计划是无偿调拨，市场就是等价交换。

二、实行分层次计划的问题

我们是一个不发达的大国，地区大、发展很不平衡、信息很不灵通。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中国的计划必须是分层次的。中央管什么，地方管什么，要把这种情况划分清楚。有些事情，过去中央根本不该管，管长了都变成习惯，改起来很困难。例如西藏需要的消费品，本来可以到四川去交换，很长一个时期通过商业部调拨，西藏用上海货，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还有把上海货运到新疆，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其实除了粮食等重要消费品外，现在不存在安排市场的问题。有夹克的穿夹克，没有夹克的穿西装。不必哪个地区都得调西装、调夹克。

中央管得那么多、管得那么细，只能起坏作用，不能起好作用，乱点鸳鸯谱。

这几年，我们对地方政府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权限，一直没有定下来。现在看，对地方一级的作用要肯定，要规定方向。

中国地域广阔、商品经济不发达，地方政府不管经济不行。要把计划调拨逐步变成地方之间的贸易，要大力提倡地区之间的对销贸易、换货贸易以及资金技术的联合。可以由地方签订合同，有短期合同、长期合同、五年协定或十年协定，这都是计划。这样才是真正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才能把横向的经济联合打通。

我们老讲合理流向，通过调拨就没有合理流向。搞协议、交流这样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合理化，各地区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山西过去认为搞煤吃亏，现在通过搞煤什么都有。不挖煤，去搞提高轻工业，只能越搞越糟糕。

搞调拨制度，一层层把东西调上来，一层层把东西分下去，人们的观念就不同，他就同你争。一搞协作，观念就改变，就不会同你争，这样，透明度也高了。

国家计委不要只搞国家安排的那一块，而要鼓励、促进、保护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交换。这样做，能源、原材料产业和沿海加工区，就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联合和交流解决互利的问题。

现在地区之间的协作贸易正在发展，上海有个很大的办公室。要把这种协作看作是计划的一种重要形式，国家计委就要对它加以支持和保护。

在投资方面，过去我们老是想中央搞基础，地方搞加工。这样地方越积极，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就越落后。现在看，中央不能把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包起来，可适当集中搞一些，同时拿出一部分投资用以扶持和补贴地方，鼓励地方搞原材料和能源建设。地方的能源、交通建设也靠地方搞。有本事多搞，没本事少搞。这也解决了省一级的自我约束问题。

采取高度集中的办法解决不了能源交通问题，都把它放开也解决不了问题，要把权责利和权责害统一起来，有的是权责利，有的是权责害。搞好搞坏由你负责，要加重地方的责任。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建设，要把很大部分放给省市，在这基础上，国家搞好重点建设。

三、关于投资体制改革问题

搞基本建设基金制，这个我赞成。今后国家可以不向部门分投资，统统放到投资公司，给它下达任务，给你多少投资，你给增加多少能力，然后由他们找地方、企业去谈。地方也可以搞投资公司。各搞各的。

基本建设的改革要联系招标投标制度的改革。招标投标现在看来效果很好，从鲁布革和水口电站招标看来，效果很好。问题就出在设计、施工单位属部门管，搞假招标。

是否搞一个监督部门，克服这种舞弊现象，有没有办法把这种现象查出来。建行管这个事情行不行，是不是可以专门建立一个机构，专门负责招标投标制。招标投标制必须在真正的竞争条件下进行。没有竞争的招标投标就只能是形式主义。

要组织好评标。评标由中间人士、公正人士参加，把全部资料公开，评定后在执行中监督。不许你搞假账。谁这样搞谁就是违法。如果把招标投标搞好，建筑费可节省三分之一，搞好了是很大的潜力。

整个基本建设要好好改革一下。要把现在的基本建筑队伍变成真正能打仗的队伍，老的建筑队伍可以另外解决。把年老、体弱的单独划出来，不要把它背在建筑队伍身上，把队伍拖得不能打仗。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是将来的事情，一下解决不了，先解决这个问题。使队伍能够打仗，这个队伍就有生气。把施工队伍变成精明强干的，工期也能缩短，造价也能降低。

招标投标制要铁面无私，施工队伍要进行认真整顿，这样基本建设就可以面目一新。要把基本建设的招标投标和施工队伍的改革形成一个统一的东西。这件事就由计委来抓。

四、关于改革中需要认识的几个问题

反思我们以前的改革，有几个问题要重新认识。

（一）原来设想改革要有宽松的环境，看来这是幻想。环境宽松了，还改革干什么？短缺是体制上的弊病带来的，改革就是要消除这些弊病。不消除这些弊病，环境怎么能宽松呢？当然也不能搞得太紧。

（二）市场的作用不要神化、不可理想化。商品经济不发达，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全国统一的市场，这是不可能的，还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发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不能主要靠竞争、靠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必须有政府的政策加以引导。国家对初级产品、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对这些生产和分配的影响应当比对其它方面的影响要大些，这部分活动如果动荡不定，整个经济就会动荡不定。计委搞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文件，就要解决这一点。

（三）价格问题。原来曾经想过要过这一关，二、三年过去后形成市场。这

种想法是按照一般公式，联系实际不够。价格必须改进，但合理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能够逐步形成，不可能集中二三年时间解决。我们只能在市场不充分、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解决企业的活力问题。对价格各级政府要干预，在这方面要有立法。

五、关于企业承包问题

厂长租赁企业，权责利加风险这一点和过去不同，现在是厂长讲什么，工人就听什么，一下子就改变了工人吃大锅饭、依赖国家的观念。

厂长有了风险就有权威，从公家的官成了经营者了。

承包租赁问题的关键是：改变经营者在工人中间的看法。这事靠减税让利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是把企业中经营者的权威树立起来，经营者有了风险，权威就起来了。风险越大，经营者的权威就越高。

现在有一种观点不大恰当，老是要解决大型企业技术改造的自有资金问题，这个想法实际上行不通。大型企业的改造得有计划地进行。对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要有一定的解释，全靠自有资金是不可能的。税后还贷是好的，可以约束自我的发展。这方面要好好算个账，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所得税让百分之三十，然后税后还贷。看看这样是否可以走得通。

企业承包包给谁的问题，不外乎包给厂长和劳动集体。

这次保加利亚日夫科夫来访，我问他们企业承包给集体，谁来签字，日夫科夫讲是厂长签字。

说承包给劳动集体实际上是一种概念束缚，怕讲承包给厂长就是资本主义。因此承包就是要解决这一个问题：谁来签合同，出了问题以后谁来负责。

作为大的路子，十二条意见可以了。还有一个“计划与市场结合”思路的文件，把这两者配合起来，今后改革的路子大体就有了。

“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思路，还要专门讨论一次。至于今、明两年财政体制如何改、投资体制如何改，要拿出具体办法来。

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

今天开个会，部署一下舆论宣传工作。两个方面：一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深入；二是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久也将在十三大提出设想。怎么做好这两个方面的舆论宣传工作？请中央宣传部主持，好好讨论一番。今天我先谈点意见。

一、如何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引向深入？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进行了四五个月了。在全党努力下，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了。具体表现，可以举出这么六条：（一）学潮已经平息，学生的情绪趋于稳定；（二）全社会继续保持了和发展着安定团结的局面；（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失去了公开的市场，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讲的人少了，报纸也不登了；（四）几个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受到了应有的批评和处分；（五）个别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软弱退让态度，党中央已经坚决果断地加以纠正；（六）全党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害性有了新的认识，对四项基本原则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虽然认识与理解的深度不尽相同，但是无可否认，全党思想更加清醒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更加坚定了。总之，同去年冬天相比，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定，保证了国民经济继续稳步发展的好势头。

半年来形势的发展说明了什么呢？我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点，说明党中央决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决心下得正确，下得果断。如果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迷失方向，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的建设和改革无法正常进行。这是违背全国人民的利益的。只有进行这场斗争，才能避免动乱，排除干扰，保持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和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点，通过近半年的实践，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第二点，形势的发展说明了党中央确定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各项政策是

完全正确的。鉴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开始，中央四号文件就明确规定了这场斗争的指导方针、范围、重点和一系列政策界限、工作方法，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搞政治运动，严格限于共产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不搞，企业、机关、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等等。当时，有的同志怕扩大化，也有的同志觉得是“划框框”，怕走过场。现在实践已经证明，中央四号文件提出的政策起了指导斗争和稳定人心的作用，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我们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绝不是说这场斗争进行得差不多了。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把这场斗争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就当前来说，前一段已经提出的任务，还有不少没有落实，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而且，我们的眼光还应该看得更远。小平同志说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存在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还要进行几十年。小平同志四月二十六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讲得非常透彻：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小平同志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远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人们已经初步见到了社会主义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还会有一定的市场。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在这个很长的过程中，要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不表现出来，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日益显现，逐步缩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市场，是应该做到和可能做到的。至于像去年冬天那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局面，更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必须指出，我们是在改革和开放的条件下做工作，不可能把人们封闭在温室里，不可能使人们不接触腐朽的丑恶的东西。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增强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识别力、免疫力和抵制力，就必须提高宣传教育工作的水平。因此，如何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不断引向深入，是我们应当着重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什么叫“深入”？深入不是搞运动，不是要人人过关，不是要把政治空气搞得很紧张，也不是要大家都去一字一句地抠理论概念，死记某些条文，不是要大家去搞形式主义，硬性规定用多少小时去搞政治学习。深入，就是要深入人脑，使绝大多数人都懂得，什么是四项基本原则，为什么必须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才是最要紧的。人们都知道吃饭穿衣的重要，因为衣食是社会生活的必需品，是不可须臾或离的。现在要使我们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也懂得，对于我们来说，四项基本原则正同布帛寂粟一样，也是不可须臾或离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政治运动，必须靠正面教育。因此，深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必须紧紧抓住正面教育这个环节。在正面教育中，要通过八年来建

设和改革的实际成果，生动地全面地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使全国各族人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基础上更加自觉、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更好地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更加卓有成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成绩显著，国家面貌日新月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市场就会大大缩小。

弄清楚了什么叫做“深入”，紧接着就有一个如何深入即如何做好正面教育的问题。使正面教育真正深入到人的头脑中去，起作用，有效果，需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对人们所关心的各种实际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正确的回答。我们有的理论工作者，写“大批判”文章比较顺手，但不善于搞正面教育，不善于写深入人脑的文章。前一段有四、五篇文章反映不错，群众觉得文章读得下去，道理听得进去。这样的文章，效果就比干巴巴的党八股好。党八股，简单生硬的说教，好比广东人说的“水过鸭背不透毛”，不能深入到人们的头脑里去。据说有的同志抱怨文章没有人读，政治课没有人听。当然有个别的是立场问题，根本不听我们的。但总的说，这个问题，不能埋怨读者，埋怨学生，倒是值得我们有些作者和教师反躬自省，从主题、内容，到材料、论证，乃至语言、篇幅，都要研究一番，看看到底为什么不能深入人脑，打动人心。过去我们宣传真理，唤醒和团结了千千万万的群众。今天我们有了执政的条件，应该把宣传真理的工作做得更好而不应该做得更差。所谓好和差，主要看效果。正同经济工作必须讲效益一样，宣传工作必须讲效果。正面教育一定要做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形式和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比如说，可不可以组织一些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熟悉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实际的、比较有水平的同志，到群众中去直接对话，解答他们关心的问题，澄清一些模糊认识。互相对话，你问我答，有来有往，有针对性，又生动活泼。然后加以选择，把好的、成功的对话的记录整理出来，在报刊上发表，效果也许会好一些。宣传工作，不仅宣传部门要做，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人，也应该尽可能抽点时间出来，到基层去，接触群众，对群众做点深入浅出的宣传工作。总之，要多想点办法，动员一切力量，扎扎实实地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让广大群众能够既从理论上、也能联系身边的实际生活，确确实实认识到：四项基本原则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定不能搞。今天我是提出任务，至于到底用些什么办法，把正面教育进行好，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深入进行下去，请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责成中央宣传部会同各方面研究拿出一个意见来。

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深入进行下去，当前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做好那些有错误的同志的工作，使他们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里，我不是指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他们违反了党的纪律，已经开除出党，当然，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但这里说的不是他们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是四号文件中讲到的：“有些同志持系统的错误观点，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

行同志式的批评”。这个问题，从组织上说，当然一定要掌握好界限，核对清楚事实，还要允许本人申辩。另一方面，从有错误的同志本人来说，则应当虚心地接受党的批评与帮助。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遵守党纲党章。既然你违反了党纲党章，说了错话，做了错事，难道不应该承认错误、积极挽回影响吗？连个检讨也没有，这哪里还有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呢？这难道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吗？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党给了治病救人的政策，团结的政策，有错误的同志应当接受这个政策，否则，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起作用。坚持错误，于国于党，于民于己，都是无益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长期的事情，不要企望一阵风过去之后就可以不了了之。有了错误，必须作自我批评，不能顶着。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先要把话说明白。

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引向深入，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整顿报刊，中央已有文件，要认真落实。从长远来说，还有个理论队伍的建设问题，要真正摆到各级党委和宣传理论部门的议事日程上来。今天，我只着重讲两点，一是使正面教育深入人脑，二是继续教育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

二、加强对改革的舆论宣传

前几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小平同志要我们开个会，组织写一些文章，为改革做好宣传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党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决定了党的宣传工作也必须牢牢掌握这两个基本点，缺一不可。道理非常明白：改革，包括开放、搞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新贡献、新内容。建国以来，我们一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是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才提出了改革，提出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从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上说，改革也是革命。现在连苏联都在改革。

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不改革没有出路。四个坚持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必然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大大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现出来，使社会主义真正具有吸引力。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了大忙？所以，两个基本点是统一的，既不应拿这个来排斥那个，也不应拿那个来排斥这个。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整内容，才是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有生命力的、有血有肉的、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

可是，在一部分干部中，却存在着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的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似乎一说改革开放，就可以不再注意四项基本原则；又似乎一说反自由化，改革开放就得“收”。我们的改革、开放，在具体步骤上，有时某些方面加快一点，有时某些方面放慢一点，但从总体上说，无疑必须进一步深化和展开，根本不存在“收”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出现了一些实际上对改革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错误观点，比如说：

——在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上，有的实际上认为现在经济形势很糟，是经济体制改革把经济搞乱了。

——对经济体制改革，有把企业承包租赁看成是“搞私有制”的。有把厂长负责制看成是“取消党的领导”的。有把家庭联产承包看成是“破坏集体经济基础”的。还有把计划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认为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干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

——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人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了。小平同志讲了几次之后，这个问题澄清了。但仍然有把政治体制改革同否定党的领导划等号的。还有的对党政分开持怀疑态度，有的借口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要求扩大政工机构，多设政工干部。一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连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解放思想也不敢说了。还有把正当的民主要求当成自由化的，甚至以此来压制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不正之风的正当批评。

——对开放也有一些议论，认为对外开放是自由化泛滥的根源，有的把我们的对外政策歪曲成“过去东倒，现在西歪”。

当然，持以上观点的同志人数并不多，而且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改革是个新事物，有不同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在改革的实践中，这些不同的认识是可以逐步趋于一致的。事实上，回想一下八年以来人们对改革的各种议论，就可以看到我们大家的认识都在提高，都在深化。但也不能不指出，尽管改革已进行了八年，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

直到最近，也还有极个别的人说，“要反政治上的自由化就必须反经济上的自由化”，“现在反自由化，只反说自由化的，不反干自由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有的提出要打破四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这种意见对不对？不对。中央在四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明确的范围，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以及其它等等。所以要这样规定，一是因为现行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不存在什么自由化不自由化的问题；二是因为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谓打破四号文件“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这种论调，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宗旨没有共同之点。尽管这种论调只是极个别的，但已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我们在

宣传工作中也不能忽视。

前一段，为了解决当时的紧迫问题，较为集中地宣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必要的。今后，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教育和对改革、开放、搞活的宣传应该并重，不仅不能偏废，而且要互相促进。一切从事宣传、教育、理论、新闻工作的同志须知，排斥改革，实际上只能导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同样，排斥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也只能导致否定改革。只有牢牢掌握这两个基本点，才能使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和经济上的繁荣活跃互为条件，才能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

经济体制改革要好好宣传。要宣传这几年改革在实践上的成就和理论上的发展。要宣传我们这几年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宣传现行政策的正确性和稳定性。要宣传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要宣传我国的国情和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断提高人们对改革的思想认识和承受能力。要宣传把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振兴的出路在于改革。

宣传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于写出多少文章（这一段报刊用于改革的篇幅并不算少），更重要的是用什么观点来分析问题。现在，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已被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些同志却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的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统一起来加以考察。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否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是判断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而实践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在经济理论工作中，脱离实践、脱离生活的观点，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还相当严重，还束缚着我们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排除习惯势力的影响，打破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因此，在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这样，理论工作才能进步，才能指导实践。

不仅要宣传经济体制改革，还应当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十三大将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应当为此做好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小平同志已同意今年“七一”重新发表他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一定要组织好宣传、学习，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这个讲话和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上来。发表小平同志讲话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同时要发表社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很敏感，要特别慎重，注意分寸，需要专门组织写几篇文章，供报刊刊用。

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都要注意宣传小平同志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关于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小平同志这些思想是我们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集体智能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的范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做理论工作，一定要学习、研究、领会、宣传八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新发展，这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努力，就要像小平同志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回答实际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

总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一定要深入，社会主义的改革一定要宣传，两点必须并重，不能偏废。具体办法，由中央宣传部研究，拿出方案来。

在中央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八七年一月至五月

一、为什么要召开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讲这篇话

一次在小平同志那里谈到，我们离十三大只有几个月了，十三大的政治报告现在正在写，这个报告的基调，只能是一个改革的报告，不能是其他的报告，只能这样子，也必须这样子。因此，我们从现在开始就需要为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作一些必要的舆论准备。如果我们宣传的调子不注意衔接，宣传改革的气氛不那么浓厚，十三大报告拿出来的时候人们就感觉突然。因此，现在就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这是一方面的问题。

另外，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讲改革，而且都提得很高，我们也认为这是应当的，社会主义必须要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中国的改革在世界上引人注目，大家都在看中国怎么办。我们去年发生了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问题，所以我们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组织一些文章，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教育，这无疑都是必要的，而且这个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但是，不要因此就影响到我们对改革的宣传。因此，小平同志要我找宣传、理论、新闻、党校方面的同志开个会，把改革的宣传问题布置一下。这是小平同志交代的主要的一件事，一个任务。这就是这次讲话的背景，本来是专讲改革的。但是，鉴于去年发生自由化泛滥，我们正在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而且有些认识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仍然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做为一个天平的两端，此抑彼长，此长彼抑；这边高了那边低，那边高了这边低，没有把两者完全统一起来。如果这一次只讲改革，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事实上，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除了原来布置的任务，需要继续落实、抓紧进行以外，根据这几个月的情况，也需要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所以，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也讲了一段，然后重点讲关于改革的宣传问题。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部分，我主要讲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正面教育如何深入。我们有一些同志习惯于搞运动，感觉不够热闹，不过瘾，有些同志有这么个感觉，这当然是不对的。那么，在大气候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下，如何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引向深入？主要是把深入的问题引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去，既不能仅仅满足于过去这一段做的事情，又要防止别出心裁，比如说，要扩

大领域，搞到经济领域，现行政策等等。因此，就需要宣传、理论等方面把思想统一到正面教育上来。不然的话，深入也不知道怎么深入，又不能像过去搞政治运动那样搞法，这件事无形之中也就会不了了之了。当然，深入的问题恐怕不会一下子就完全能够解决，这是个很长期的问题。

改革的宣传问题，是我讲话的重点，也是小平同志交代的。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改革的理论太落后于实践了。中国改革的步子不能算慢，但是理论、思想指导太落后于形势，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方面，有一些相当旧的观点。经济理论方面一些陈旧的、僵化的、过时的观点，在我们一部分同志头脑里边还相当地凝固。现在我们国家有这么一种现象，广大基层的工作同志都知道怎样做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我们经济的振兴。但是，他们始终心里不够踏实。明明是实践证明是好的东西，甚至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心里也始终不够踏实。这就是说，在理论上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讲得很清楚，使他们更加放心。一般来讲，我们这么大的一场改革，一开始就应该在理论战线破除一些旧东西，但破得很不够。过去，我们因为没有经验，也不知道怎么搞，所以一直比较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实际行动上，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是对的，但是理论上造舆论不够。这一次反对自由化，问题就暴露得更清楚了，有些思想不通的同志，原来不讲话，一反自由化，他拿出的观点还是八年以前的旧观点。改革已搞了八年了，有一些人的观念还停止在八年以前原封未动。而且很多早已经过时的观点，苏联、东欧国家都已经抛弃的观点，在我们这里竟然还有市场。这样一些东西如果我们不解决，不仅不能够推动改革前进，势必要起阻碍改革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理论工作方面，反僵化的问题，还很值得重视，不是说中国理论方面僵化的观点没有了。这个问题今天不展开讲，我只是提出这个任务，中国在理论上必须有所发展，不然的话，与我们这个大国、大党的地位不相称。但是，理论方面要想联系实际，进行大胆探索，回答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就非常必要。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讲话提纲》时的讲话）

二、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

我觉得各条战线都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坚持的问题，一个是改革的问题。不能只讲改革不讲坚持，也不能只讲坚持不讲改革。这个问题常常难以避免，但我们力求这一次把两者的关系讲得清楚一点。绝不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看成天平的两端。如果看成是天平的两端，今天强调这一方面，以后势必会有一个时期又翻过来强调另外一个方面。因为现在我们实际上经常存在这个问题，一讲坚持就忽略了改革。这一点我们需要在党内进一步阐述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立国治国之本；一是改

革、开放、搞活，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总政策。两者缺一不可。有个别人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方法。我认为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如果改革、开放只是方法，只是“目”，那还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现在理论界有这个观点，这就走上另外一个极端了。过去讲改革可以完全离开四个坚持；现在讲四个坚持了，好像改革、开放只是个方法，只是具体方针了，这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作了根本错误的解释。我们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它必然是两个内容，没有改革、开放，还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革极左路线口头上也在讲“四个坚持”，当然它达不到四个坚持的目的。因此，不讲改革、开放不行。我们不是一般讲“社会主义的路线”，我们是讲“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我们这条路线基本原则是四个坚持，总的方针、总的政策是改革，开放，作为总的指导思想要提出来。只有一坚持，二改革，才能建立一个好的秩序。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包括政法战线。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纪要》时的讲话）

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时，有这样一种观点：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这两个基本点看成是纲和目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在我春节讲话后不久，就有人发起一次讨论会提出这种论点，其目的不外乎要贬低改革。打着四个坚持之旗帜，否定改革、开放之政策。就是要把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向贬低改革、否定改革的歧途上去。所以文件中引话要注意。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治国之本，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我看就引到此为止了。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都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哪能说制定政策的基础不考虑改革，不根据改革？小平同志很明确地说，苏联改革要搞下去，对外政策势必要变。说明它的对外政策也得根据改革的发展来考虑嘛，要根据这个总的精神来看。如果把这些都孤立起来引来引去，不外乎就是有人要抓住所谓“之本”、“原则”，来否定改革，至少是贬低改革的意义。也可以说就是要抓住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我们从来坚持的立国之本，来贬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新的内容。这个苗头已经有了，我讲那一篇话（指五月十三日讲话）不是没有所感的。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整党总结时的讲话）

在我春节讲话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两个基本点之后，有人就不同意讲两个基本点，只同意讲一个基本点。我说，讲一个基本点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我们从来就是讲四个坚持，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哪里还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也没有邓小平同志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说两个基本点提法不科学呀！那是借口，实际上就是要借反自由化把改革压得很低很低。没有改革还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原来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最初的稿

子把四个坚持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写成两个东西，一个四个坚持，一个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即开放、改革。我提出意见，我说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也包括四个坚持在内的。现在一反自由化，又有人借反自由化贬低改革在我们国家的作用。我们一部分同志对改革缺乏热情，我不是说他有意反对，但缺乏热情。这是要走弯路的。所以在全面分析时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我不是说不可讨论，怎么表述得更确切一些。但他们的用意很明显，借反自由化贬低改革、开放。照他们的提法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是基本纲领，改革、开放是具体政策。不能这样说。改革只是具体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搞了八年岂不是白过了。有些事情现在下面非常敏感，下面搞了很多东西非常好，用这些办法经济就可以发展快，但是这些东西和传统的讲法不大适合，基层干部始终提心吊胆，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摇摆、动摇。我在上海开了个厂长座谈会，大家一方面说这样好，一方面又怕变。他们比我们注意，天天看报纸上怎么提。这就说明我们理论上就事论事太多，破得不够。比如温州的情况，我也不主张讲什么“模式”，但是，温州这样做的结果使老百姓得到了好处。反自由化以后在温州引起很大的震动，这就涉及几百万人的生活问题。改革问题，不仅中国，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搞，中国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对改革的必要性更容易理解。苏联、捷克、保加利亚几十年应当说是平稳发展的，生产力有相当发展，人民生活有相当改善，他们现在都感到非改革不可，中国更应当思想解放一点吧！苏联的改革不像中国在人民中间这么有基础，戈尔巴乔夫经常讲人民中的因循守旧思想。我们过去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搞得饭都没得吃，还要什么因循守旧？城市人民也不那么因循守旧，二、三十年没有提高工资，房子越住越小。但在苏联是因循守旧的，他们还感觉到不改革不能迎接新的科技革命。不要因为去年发生了一个自由化泛滥问题，而对我们整个八年来对“左”的遗毒的清除产生怀疑或放松。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绝不能影响了这条路线。总的来讲，我们国家要进一步贯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改革这么一条路线。当然，我们如不解决自由化泛滥问题，改革就不可能为我们党所领导，就搞不下去，我认为是这么一个关系。这次捷克总理有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说，他们一九六八年的改革没有党的领导，当时杜布切克[1]不行，为真正的修正主义者所包围，改革要走到邪路上去。我认为我们也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对自由化泛滥必须刹一下，风向变一变？因为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都打着改革的旗帜，我们是要改革，他们是要把我们改革的方向引向邪路，所以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我们必须改革，不改革不行。所以反自由化绝不要使“左”的东西又滋长、复生。我认为自由化泛滥问题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再进一步解决自由化问题就必须做为长期斗争，一个要靠教育，一个要靠工作。归根到底，如果人们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不能得到好处，生活的各方面不能得到改善，人们就不会拥护我们，就不会接受我们这种社会主义；也只有我们搞的这种社会主义提供的东西使人们切实得到好处，人们才会支持这种制度。这在我们国家是相当尖锐的问题，因为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确实给人们的好处还不是太多。当

然这八年来给人们不少好处了，房子盖那么多，生活水平总的是提高了。我们现在无论如何不要影响改革、开放前进。小平同志说，我们去年发生了风波现在扭转了，还有很多工作要继续做，但我们要逐步地把我们的注意力更多转到改革上来。归根到底，只有在改革、开放中间才能真正解决自由化的问题。

（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召集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邓力群等讨论《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话提纲》时的讲话）

三、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吸引力的问题

小平同志最近同捷克总理什特劳加尔[2]谈话很有新意，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小平同志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我觉得这是很有新意的，很可以开窍的。总的讲，我们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对生产力的标准很不重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不重视，离开社会生产力，来抽象地讲所谓社会主义的原则，这在我们党内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多“左”的东西之所以能够存在，与这个问题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小平同志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怎么是社会主义呢？照马克思讲的，贫穷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但是后来我们理论上“左”的东西变成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抽象地讲社会主义的原则。按社会发展史来讲，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很落后，怎么能是社会主义？除了原始共产主义。所以，要使我们在贫穷的条件下，在经济很落后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本身就必须带有若干的限制。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应该注意到我们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是特定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形式，目的是要很好地发展生产力，如果生产力不发展，这种制度终究站不住脚。这个话现在说不清楚，但是非常开窍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个生产力的标准，可以制约很多“左”的东西，没有生产力的标准，“左”的东西就可以不受限制，推论下去，我们现在也可以搞共产主义制度。所以，可以这样说，如果说我们也是社会主义的话，我们的社会主义只能说是初级阶段。如果说社会主义没有生产力的标准，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这就是主观随意性了，我要搞个什么制度就可以搞个什么制度，我要搞个社会主义，就可以搞个社会主义，我要搞个共产主义，就可以搞个共产主义。

（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召集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邓力群等讨论《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话提纲》时的讲话）

这段话（指小平同志同捷克总理的谈话）是小平同志自己改的话。原来记录

得不完全，“真的搞社会主义”，后来他加了“了”，“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并且亲自加上了“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为什么要引小平同志这个话呢？我们要领会小平同志改革的思想，最近小平同志连续几次讲话，讲得相当深刻，他讲了够格不够格的问题，针对性很强，针对我们传统的理论。不应叫“传统”，应当说是后来附加的东西，恐怕就是一些“左”的东西。好像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生产力的标志，就是一个公有制、分配。就是很穷、很穷，像尼雷尔他也说是社会主义，越搞越没有饭吃。几内亚杜尔说是搞社会主义，越搞越没有饭吃。其实我们过去那个搞法，后来极左那一套搞法，也就是这个搞法。本来发展中国家搞社会主义，必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然的话，这种制度存在不下去，没有优越性。捷克总理讲，那就是没有吸引力。

社会主义要有吸引力的问题，在我们国家还比较好讲，因为原来蒋介石[3]很糟糕，我们搞了几十年总比那时候好。这次捷克总理讲，过去奥匈帝国，真正的工业力量在捷克，既不在匈牙利，也不在奥地利，可是现在奥地利比他们高出一大截。什特劳加尔说，这有什么吸引力？我们搞社会主义怎么能说比他们那个好呢？说不过去呀！我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附加的问题太多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是决定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附加的东西太多。马克思没有讲过，恩格斯也没有讲过，而我们附加了很多东西，并且把这些说成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固有属性。我觉得我们应当组织一些人好好清理一下，附加了哪些东西。当然，“文化大革命”中间附加的那就更多了。农村搞工业是资本主义，广东养鸭子是资本主义，说什么“鸭子吃掉了社会主义”。特别在经营管理方面，附加了很多根本不决定社会性质的东西。包括计划经济怎么搞？苏联搞社会主义建设，他有很多是战时经济的体制，我们把它作为计划经济的模式。什么都统制的经济一定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固有属性、固有特征吗？我看不能这样说。因为苏联建国以后，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面临的首先是苏维埃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当然他就必须按照统的观点，也就是像“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那个观点，拿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布置一切，还有什么一切。所以什么重工业、军事工业、什么高度集中、分配调拨，如果我们把这种制度就说成社会主义的固有属性，希特勒岂不也成了社会主义，因为高度统制经济希特勒搞得最厉害。而且老实说，他这个计划的程度超过了苏联。同志们读过《第四帝国的崛起》吧，他有一个部长，那是真正物资分配专家。所有工厂材料调拨，都是他指挥的。哪一个工厂，生产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品种，什么样的数量，每天生产多少都由他指挥。他们的通讯、交通也发达，他是按照图表指挥的。所以，到盟军占领德国以后不是出现混乱吗，又把这个人请出来，恢复鲁尔工业也是这个人来搞分配物资的，当然后来结束了这个统制经济。我们看过《阿信》，日本战时也是统制经济，也是配给制呀？东北被日本占领时期就是配给制，一个人几两高粱面、几两棒子面，也是统制经济。所以，我们如果把经济管理方面一些东西，很多战时经济的作法，对付帝国主义包围时的搞法，变成搞社会主义就得这个搞法，那就会大大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我讲这一段话的意思，主要就是讲我们对社会主义附加了很多东西，根本不是我们老祖宗定下的那个基本的定义。列宁曾经对此做过评价。我们中国要彻底地从中国实际出发。我看在经济建设方面最根本的原则要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能不能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关于“左”和右的问题，小平同志在同西班牙工社党副总书记谈话时讲得非常透彻，他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在社会上已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我们不能因为在思想理论战线一度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就认为我们主要的问题改变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还是说这个话，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是根本不应当发生的，是可以避免的问题。现在我们态度一明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有市场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当然，教育很重要。但是，根本上是一靠教育，二靠改革。没有改革是不行的。你没有改革，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能显示出来。反正就是两条：一条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必须要改革，必须要坚定地改革。中国的改革绝不能降温。要说投鼠忌器，我们反自由化这场斗争要十分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说投自由化这个鼠，要切忌伤害改革这个器，要十分小心谨慎。

总之，第一是有一个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第二，改革、开放按照什么方向。从中国整个的改革来讲，我认为中国的阻力可能比苏联小。但是，决不可低估中国改革的阻力。老实说，我们的改革还刚刚开始，改革的路程远得很。改革过程中间，主要还是一个克服阻力的问题。而阻力根本上是来源于习惯势力，来源于一些陈旧的观点。就是说，来自于“左”的东西。当然，我们随时都要注意排除在改革中间企图把改革拉向另外一个方向的问题。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一度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这对改革是一个很大的干扰。这个问题不能不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当泛滥的情况已经解决，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正如小平同志讲的，要照常进行下去。就还是首先要解决阻力的问题，同时要注意到排除干扰的问题。这样认识比较符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绝不能那样看：就是自从去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以后，中国的主要倾向，我们主要应该解决的问题改变了。我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问题解决之后，还是要勇于改革，继续大胆地进行改革。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地排除干扰。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话提纲》时的讲话）

四、关于团结大多数和建设理论队伍问题

这场斗争要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对我们的思想理论队伍的状况究竟应当怎么估计，这是我们今后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我们采取什么

政策的一个出发点。对我们思想理论队伍怎么估计？看来大体上可以作这样的估计，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改变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和改变中国的四个坚持为己任的，我看还是极少数，这些人中有的恐怕很难教育过来了。第二种人，坚决反对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积极拥护过去“凡是”路线，拥护过去极左路线，尽管八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他闭起眼睛一概不看，总是要寻找一切机会，准备再干，这种人也是极少数。包括过去给林彪、“四人帮”写文章的人，大部分也不属于这种人，他当时是奉命写作的。第三种，现在能自觉地站到拥护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前列，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方法、武器，能研究、说明、解释我们国家新情况、新问题的，也不多。也就是延安时期毛主席讲的，中国如果有百把个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加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中国现在还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有多少个真正能够站到中国国情这个土地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积极热情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间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经验，那对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贡献就大了，现在这样的同志实在太少。我相信，只要我们中央的指导思想正确，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一批同志出现，我们党有这个任务。要扩大这个队伍，要培养这个队伍。

在我们理论队伍中绝大多数，现在还处在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中间，处在一个理论同中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间。这些同志中间，我觉得这方面不足的人也是有的，那方面不足的人也是有的，都不是一贯正确。这方面不足，不外乎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认识不够，对新问题、新情况敏感不够，注意了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注意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认真了解我们改革、开放、建设中的实际情况，用他们的理论知识对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来说明一个两个问题。那方面不足，不外乎一部分理论工作同志虽然热心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并且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但他们对严格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不太重视了。他懂得马克思讲过什么东西，但他对武器不太重视，或者想从世界其他地方找出什么新式武器，来解释我国目前的一些现实问题。这些同志探讨新问题的兴趣是好的，但是他们不注意我们还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就够了，外国一些新的学术思想，新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有领导、有选择地加以吸收，洋为中用嘛。这两部分人占我们理论队伍的绝大多数，基本上都是好同志，现在处在一个发展阶段。我认为，我们的方针应该是团结起来，互相多考虑一下对方的意见，吸收对方的长处，逐步消除鸿沟。在什么基础上团结起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结合起来，实现我们的新任务，认识我们的新情况，解决我们的新问题，那么我们中国的理论战线必将出现一个新局面。中国的建设、改革、开放实践是丰富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修养也还是可以的，关键是缺乏结合，或者是这样的结合不够，或者是那样的结合不够。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贯彻团结大多数的方针。不仅现在，而且今后也要这样。从事理论工作的，从事研究工作的，面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这么多新的问题，

这么多新的情况，总的来说，还得允许探索，还得鼓励探索，还得鼓励提出新的见解，不如此，那就僵化，就不能进步了，我们改革出现的问题就始终不能从理论上得到概括，得到说明。我们有一些理论家搞来搞去最后跑到完全西化那一边去了，想拿西方的东西救中国，那是根本救不了的。另外一些同志越搞越固守到书本里面，离中国的实际越来越远，这两种情况都救不了中国，都不为中国所需要。大家都要提倡面向实际，理论修养不够的同志多读点马列主义，同时认真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不要闭着眼睛去想美国怎么样，日本怎么样，英国怎么样。英国是英国，美国是美国，那里是那里，拿到中国不适用。你那个办法，在美国可以，摆到中国就不行。这一点，不是现在，一百多年了，这个路子走过了，走不通。另外，苏联那个路我们不能再走了，苏联他现在也不走了，不能走了。有了这么一条方针，我们这些同志同舟共济，很好地合作，发挥优点，互相求教，互相借鉴。正常的工作中间有一点争论，有一点不同的侧面，也有好处，也是允许的。探讨中间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不外乎有的思想解放过头了，脱离了中国国情；也不外乎有的注意了根本的原则，但是对实际情况联系不够。不外乎这两方面嘛！思想解放过头了，思想解放还不够，这种情况会长期存在。甚至在某一个人身上有时都会存在两种状况。我就有这种情况，有时某一个问题我可能想得很天真，过头了；有时某一个问题猛一听，就感到根本不行，那还能搞？过两天，想想，好像也不是不可以搞。所以不要受外国人挑拨，划分什么“改革派”、“保守派”，很多都是认识上的问题嘛！特别是被奉为“开明派”的同志，不要自认为真正是开明派，那不一定。所以，同舟共济，互相补充很重要，我们有了这一条，就可以把我们理论战线相当大一部分同志，引导到理论和中国建设改革丰富的实践相结合中去。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解决我们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搞改革、开放这样一个伟大的、丰富的实践。符合这个要求的理论队伍为什么不能够出来呢？一是过去我们缺乏明确的观点去选择。选择是选择，用什么观点去选择？抱着自由化观点的人就去选择自由化的人；抱着理论僵化观点的人就选择思想僵化的人。当然，抱着正确观点的人就去选正确的人。反正什么人去找什么人就是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社会上还没有注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脱颖而出的那些人才。他们写了一些文章，当然，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大体上方向正确，而且有新意。这些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着重讲了一个培养理论队伍的问题。我们必须依靠那些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又对改革、开放抱有热情的人。我为什么讲抱有热情？我不是说他对改革、开放马上就能回答什么问题，水平不高马上回答还回答不了，甚至还可能回答错了。但是他基本上立场正确，而又对改革、开放有热情，这些人就大有希望，就叫方向正确。毛主席过去讲过，我们中国人按一个人一个人来讲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可以把国民党打倒，关键就是我们方向正确。这一批人是大有希望的。现

在我们真正要把这个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我不认为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现在就是要真正能统一这个思想，去物色、去发现这种人。首先是要理论队伍的组织者能够统一这个观点，各级党委理论队伍的组织者、各级宣传部门能真正本着这个观点去组织队伍。宣传部门如果是按照自由化的观点去组织队伍，也是可以组织起一批力量；“四人帮”也是可以组织一大批写作队伍，像“梁效”写作班子呀。我们现在如果还用那些早已陈旧了的理论家做基础，叫他去招兵买马，肯定招来一批对我们改革没有什么用的理论家。这些同志也很好，但是靠他解决问题是不行的，靠他没饭吃。这个话说的挖苦一点，也只能是在这个范围内讲。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讲，我看我们再过多少年，这支队伍还是要重新组织。一句话，真正按照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按照小平同志倡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包含着大家智慧结晶的路线，去了解人，去衡量人，去组织队伍，我们的国家就大有希望。所以我觉得首先是素质结构，然后才是年龄结构。现在来讲，第一位的不是年龄问题，第一位是挑选方向对头的人。在理论队伍中第一不是年龄，第一是方向搞对头，依靠他们就可以搞起个队伍。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整党总结时的讲话）

注 释

1．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1921—1992），生于斯洛伐克。1939年加人捷共，曾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9年9月被撤销一切职务，1989年12月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联邦议会主席，1992年9月遇车祸身亡。

2．什特劳加尔（Lubomlr Strougal，1924—）生于捷克州。时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政府总理。曾任农业部长、内务部长，捷共中央书记，政府副总理。

3．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1908年加入同盟会，曾任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总统，病逝于台北。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搞好智力开发*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祝贺中央警卫团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取得好成绩的一封信。

中央警卫团：

祝贺你们在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方面取得的好成绩。

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大力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是军队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部队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持之以恒，在完成军政训练和保卫任务的前提下，积极搞好智力开发，组织广大指战员学科学、学文化、学习各种专业技术，不断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和科学文化素质，使重视知识、勤学上进在部队蔚然成风。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

在全国整党总结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讲四点意见。

第一点，对整党的估计。我完全同意薄老的分析。三年整党，取得了成绩。尽管有干扰，有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现在整党告一段落，今后应转入经常的党的建设工作。

第二点，今后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党的建设，任务很重，可以举出多少条，但归结起来是一条：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贯彻执行。

什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这条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这两个基本点，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唇齿相依的。要全面理解这两个基本点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必须正确理解这两个基本点本身。能不能用僵化的观点来理解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如果用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必然得出排斥改革、否定开放、搞活的结论。能不能用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搞活？不能。如果用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搞活，势必得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结论。相反，丢掉自由化和僵化的观点，就必然得出两个基本点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结论。无论缺了哪一条，都谈不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必须不断地克服和排除自由化和僵化的影响和干扰。我们全党要不断提高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识别能力。

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组织路线服从政治路线。既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党的建设就必须保证这两个基本点。这应当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工作、纪律检查工作，都应当体现这个指导思想，为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服务。这是一篇大文章，希望各级党委，各级组织、宣传、纪律检查部门，各级党校，认真做好这篇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大文章。如何围绕着党的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来进行党的建设，如何使我们党站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的前列，如何使我们党胜任愉快地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我们的党就一定能够建设好。当然，不是这次会上就能系统

地作出回答的，而是提出问题请大家沿着这个方向去探索，去努力。

第三点，就是如何在改革和开放的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工作，提高党的建设的水平。第二点讲的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指导思想问题；第三点讲的是党的建设的客观环境、客观条件问题。

开放和不开放大不一样。封闭在温室里边做工作，比较容易，但温室里的花朵毕竟比较脆弱，不大容易经得起风雨。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放弃改革、开放、搞活，回到过去那种封闭的条件下去工作。所以，我在五月十三日的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了，要使我们的工作能够适应这种新的环境，新的条件。经常有灰尘，就得经常扫地，但又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建设和改革都停下来去扫地。经常有腐蚀，经常拒腐蚀，而且应把拒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应该说，我们过去有搞运动的经验，但是，如何寓拒腐蚀于建设和改革之中，还知之不多。客观条件已经变了，不光是封闭变为开放，而且，许多改革已经出台或即将陆续出台，如党政分开，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选举，改革人事制度，社会对话，社会监督，都将一一付诸实施，这都是我们做工作时必须考虑到的新环境、新条件，都要求我们把党的建设工作提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如何把整个建设和改革，同党的工作、党自身的建设和改革、民主监督、公开监督、法制建设、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等各方面的工作配起套来，综合治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新课题。搞好了，可以互为条件，走出一条不靠群众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来，这也需要大家去悉心探索。

第四点，谈谈干部工作。干部四化的方针是正确的。这几年，选拔年轻干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退休离休制度等等，成绩要充分肯定。回想一下，几年以前，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老化，在那种情况下，突出地提出干部年轻化，无疑是符合实际需要的。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能说干部老化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当然，由于缺乏经验和其他原因，也有缺点，如有一刀切的现象，对梯队配备注意不够，在强调知识化、专业化的同时，有的对实际的领导和组织能力重视不够。还有选拔干部的时候，有时只注意他本人优秀不优秀，忽视了在客观上有没有政绩。政绩的原则，应该是我们选拔领导干部的一个主要标志。还有对一些五十岁左右的各方面条件较好的，如何使之发挥作用，解决的也不够好。以上这些缺点，都需要克服。但不能因此而不充分肯定成绩。今后要继续抓紧领导班子的建设，既要注意稳定，加以充实、提高，也要作一些必要的适当的调整。同时注意保持稳定。总之，领导班子的建设，一定要符合党的路线的要求。过去干部四化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后仍应坚持。今天不是改变这个方针的问题，而是要更好、更全面、更切实有效地执行这个方针。

关于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的一封信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法研究会：

为了做好经济法规的普及宣传，你们组织一批专家、学者讲授经济法课程，录制了教学片，这种办法很好。

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搞好经济立法，是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加强经济法包括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对于促使我国经济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意义。希望广大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在经济战线工作的同志，认真学习、掌握和执行经济法规，保障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同一切违法行为作斗争，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促进我国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发展与东欧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关系*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第342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这一次我到东欧五国访问，我想利用今天的机会讲两个问题。

首先，东欧国家都有一个愿望，就是都希望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往来。根据我们的需要和可能，如果要发展同东欧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不发展恐怕不行。从现在我国外贸的格局来看，对日贸易在我们对外贸易总额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们的外贸总额约六百亿美元，日本占了近一百四十亿美元。其次是美国，然后是欧洲。苏联加上东欧所占的比例很小。另外，我们国家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出口有一定的限制，我们有很多东西出不去。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相当饱和了。但是，东欧也好，苏联也好，我们出口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如果想同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光出口，不进口，以此来弥补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贸易逆差，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如何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对外贸易，增加出口，是一项战略任务，也是我们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对外经济问题上的必然反映。现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中出口占我们国民生产总值大概是百分之十四。将来我们国家恐怕也应当占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更多一点。东欧有些国家的对外贸易规模相当大。保加利亚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是通过外贸实现的。至于匈牙利那就更多了，约占百分之五十。捷克、民德也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额还要扩大，占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要扩大。作为方针来讲，我们的对外贸易的对象也要多样化。一是以日本、美国为一块；二是西欧为一块；恐怕另一头就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当然还有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我觉得对日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恐怕不能再增加了，甚至还要逐步减少一点从日本的进口。因为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使对日贸易平衡。我们与西欧的贸易比例是要扩大的，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现在还有一个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占我们国家贸易的比例也要扩大。当然究竟能扩大多少，还要进行专题研究。如果说我们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的话，这就需要认真考虑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交往。鉴于我们的外汇长期紧缺，对外出口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上有相当大的限制，所以我们扩大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对我们来讲还是需要的。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我们向苏联、东欧国家出口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潜力。同时，鉴于我们外汇短缺的情况，将来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东

西，应当更主要的是搞真正先进的技术，包括关键设备。当然，如果是借款，如世界银行贷款等，那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就是说直接用我们国内的外汇，向西方国家进口，要主要进口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少用点外汇，可以减少我们的贸易逆差。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往来，我们要认真研究一下。我们国内大量的技术改造项目，像一般工厂的技术改造，是不是应当更多地考虑这些国家。对西方国家，主要是引进一些关键性的先进技术。这些先进技术你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是找不到的。但是一般的技术，一般的设备，从总体来看，苏联和东欧国家比我们多数企业还是先进一些。很好的东西它没有，有些还不如我们现在的水平，因为它们封闭了许多年。捷克什特劳加尔访华时看到了一些地方，印象很深。回去以后真正成为“亲华派”了，天天讲中国怎么怎么好，甚至讲得有些过头。他在深圳不知看了一个什么电子工厂后说，他绝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先进的技术。他当着胡萨克[1]的面讲，中国的电子工业非常先进，这些技术现在在东欧都没有。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一些先进技术，在他那儿确实没有。但是传统工业的一些东西，它比我们先进。我认为这方面跟他们合作有很大的可能。所以我考虑我们大量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是不是能加强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合作。通过这个合作来改造我们的企业，然后再把我们产品向东欧出口。虽然这样，他们的机械产品会向中国出的多一些。特别是一个民主德国，一个苏联，一个捷克，至少这三个国家。另外波兰有些领域，保加利亚某些领域，匈牙利某些领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了。这个问题是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这几年来，从对西方开放以后，现在我们整个经济界，经济管理部门，包括企业，盲目地依赖西方的倾向非常严重。不管什么，只要是西方的就买。一说苏联、东欧国家的他不感兴趣。实际上一方面我们并没有那么多外汇，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工业基础的总体水平比较差，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有些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我们的对外贸易的方针究竟怎么定，对哪些国家怎么搞，对哪些国家搞什么，应当认真地重新加以研究。具体讲，就是说哪一些我们可以从日本、美国进口，哪一些我们可以从欧洲、从苏联、东欧国家进口。这样，我们进口的路子就比较宽了。同时我们也应当研究我们能够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什么，哪一些能够向苏欧国家出口，这样我们的出口的路子也就比较宽了。用这样的方法来建立我们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战略，使之同我们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配合起来。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解放初期，由于西方的封锁，我们完全依靠苏联。近年来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后，又完全跟西方发展经济联系。恐怕现在我们的对外经济战略也应当像外交战略一样，实行多元化的对外经济战略。不能够完全偏到西方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必要。这对我们不利。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在我们国内可是困难很大。即使方针定了以后，如果不系统地从思想上、政策上、措施上采取有效的办法，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现在从各单位来讲，都愿意同西方做生意。因为和西方做生意，可以到西方国家去看一看。如果到苏联，他们不大愿意去。现在东欧几个国家接受我们劳务出口，就是通过青工培训的形式，他们都愿意要，而且完全可以逐渐扩大，因为他们劳动力缺乏。我

们的青年工人到他那儿去，他给我们训练人，同时使用我们的劳动力，这对我们很有好处。因为他们的技术比我们高，等于帮助我们培训熟练工人。像民主德国，工厂管理很严格，这还是从原来德国的传统下来的。我专门见了我们在那里培训的青年，问他们在那儿干了半年以后的感受。他们讲，比我们的工厂厉害多了。但有一条，现在我们的青工都不愿意去那儿。因为到西方国家去挣点外汇就可以买彩电什么的，到东欧国家去没有。现在我们一些单位向东欧国家出口劳务，就向人家要外汇，结果没谈成。总之，我们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有些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我们现在的确要从方针上、思想上、政策上、措施上解决发展与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往来。比如说，苏联、东欧国家与我们发展旅游的问题，我们长期也是没解决。原因是中国的旅游饭店不接受他们的游客。为什么不接受？因为他们没有外汇。当然，从旅游饭店来说也是有困难，因为他是借了外资办的。但是中国还有很多饭店不是借外资办的嘛。北京饭店就不是借外资办的，还有很多饭店也不是借外资办的。所以将来他们那里客人来，可以先到不是借外资办的旅游饭店里。如果这条路能打开，东欧国家那些人到别的国家旅游去不起，到中国可以旅游得起，他是很愿意到中国来的。所以这条路一开，东欧国家加上苏联的游客会大量地到中国来旅游，我们可以增加一大批收入。

在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往来中，除了旅游之外，还有劳务出口的问题。劳动力在苏联和东欧比较缺乏，将来他们可能接受我们派青年到他那里进行培训。现在越南人在东欧国家有几十万。将来通过这种形式，对我们学习技术，青工培训还是很有利的。这一次我们铁道部有一部分人在民主德国的一个车辆厂进行青工培训。现在五个月过去了，效果很好。他们去了以后搞了五个月，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是知道了外国人生活好是干出来的，不是混出来的。这些青年人去了以后开始都吃不消，因为民主德国的劳动时间、劳动纪律、劳动质量检验制度比我们不知道严格多少，他们去了以后一开始都不行。当然与食物结构也有关系，吃不消。我专门问了带队的同志，究竟你们在民主德国劳动怎么样？他说，质量要求比我们严格多了，还有材料的节约。他说材料比中国不晓得节约多少。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现在都有决心回来搞个样版出来。

再一个问题，东欧几个国家非常明确，讲集约化，讲节约材料，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技术革命来节约原材料。在民主德国，它几年来基本上是材料不增加，能源不增加，每年保持3%的增长率。这值得我们学习。它的技术革命抓得很紧，他们上上下下的调子非常响，他们的特点是把改革和集约化、改革和技术进步结合起来。他们认为他们吃了一个比较大的亏，就是经互会集团技术革命抓晚了，落后了。他们说没有估计到近一、二十年内，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技术进步这么快，差距扩大了。所以现在他们把技术同改革联系得十分紧密。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保加利亚也好，民主德国更不用讲，都是如此。现在民德和联邦德国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这个我们原来不知道。当然民德和联邦德国的关系搞好了，从联邦德国来讲，也是经济渗透，他们是有政治目的的。波兰也好，捷克也好，

这次都在我们面前毫无顾虑地说，民德为什么经济发展好呢？就是因为联邦德国的帮助，他不说就是了。他们说，联邦德国大概一年给民德有二、三十亿马克的好处。包括贸易方面的照顾。保加利亚也是这样。所以现在他们比较注意同日本和联邦德国搞好经济合作。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2]专门在车上问我与日本打交道要注意什么问题。东欧国家也很重视日本和联邦德国的技术。我看他们突出强调的一个是讲技术革命，一个是讲节约，节约材料。相应地，他们工厂的管理比我们的工厂好，恐怕比我们要高一个层次。所以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进行研究。通过承包制等多种形式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解决了以后，对工厂内部的管理水平还是要想办法提高。当然，如果没有解决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企业都躺在国家身上，它的内部管理也不可能搞好。这就是说，承包制搞好了，工厂管理水平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得到提高了，我们中国的工厂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从整体上来讲，比较落后。所以，我们在同东欧国家的交往中间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就是把改革真正同效益，真正同推进技术革命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很重要的。技术进步的问题，在我们国家虽然经常说，但并不落实。我们的科技革命的问题，技术进步的问题，也必须同我们各项改革的措施结合。所以，我们应当围绕着促进技术进步来制定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当然也只能是逐渐的，要根据我们财力和可能承受的能力。但这个东西不能不及早抓。在十三大的工作报告中将有这个内容。这件事如果我们不早抓，不认真抓，将来我们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相反还要扩大。的确有个中华民族将来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问题，搞不好将来就没有我们的地位了。现在经互会这方面的调子是非常高的，承认技术落后，狠抓技术进步。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讲了。所以如何促进技术进步，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国家将来生死存亡的问题。当然我们要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简单说，经济上的问题我就谈谈访问后有这么两点感觉，准备几个材料，然后国务院再去研究。

注 释

1．胡萨克（Gust合v Hus泣k，1913—1991），生于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伐州，时任捷共中央总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曾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1989年12月辞职，后被免去党内外职务，1990年2月被开除。

2．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923—2014），生于波兰卢布林省。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武装力量总司令，大将军衔。曾任波军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长、国防部长，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总统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1990年被解职。

继续稳定物价控制通货膨胀*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五日

* 这是赵紫阳1987年7月2日至8月15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讨论物价问题会议上的三次讲话。

一、七月二日的讲话

物价局对今年以来涨价原因的分析是对的，提出的措施也是适宜的。去年物价调整对今年有“翘尾巴”影响，目前食品涨价主要是粮食问题；日用消费品涨价的原因是原材料涨价，而且产品又能卖出去。今年没有出台大的涨价项目，主要是市场自发涨价。市场物价上涨，工厂就要多发奖金，反过来又刺激物价上涨。现在看来既要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又要控制原材料的涨价，不能只抓中间，就物价论物价。

第一，对垄断性、紧缺性的商品涨价，如何制止，要制定出有效的办法，否则改革就会失败。监督管理要加强，依靠国家法律，加上群众的力量，不然的话，改革很难进行下去。

第二，现在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互相转嫁涨价，这样做的结果，后果严重，不断地促使物价上涨。

第三，要研究价格与奖金的关系。涨价多了，企业为保护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就设法多发奖金；多发奖金，刺激需求，又引起物价上涨。

第四，承包与监督的关系。承包以后，企业就会设法多搞钱，而涨价来钱最容易，所以必须堵住乱涨价的口子，没有监督措施不行。加上目前法规还不健全，容易出现投机倒把。放开是对的，承包也是对的，但是要有监督措施。检查监督有利于促进宏观控制，限制承包以后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听说，现在有人倒卖锦纶丝袜，从国营商店买出来再卖高价，对这种行为要制止，对在农贸市场出售工业品超过国家规定价格的要取缔。

物价局认为，涨价的主要原因是商品供不应求。这当然是个重要因素，但也不完全是供不应求的问题。改革当中要有限制和管理的措施，对消费基金要研究控制的办法。现在东欧各国主要是控制消费基金，因为他们的基建已经没有多少。南斯拉夫同志说，改革以后，群众收入增多了，消费基金膨胀不是一朝一夕

所能解决的。现在我们的不少工厂管理不严，松松垮垮，如何把劳动生产率搞上去，是个大问题。

对于消费基金，一要解决消费基金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二要克服平均主义。承包以后，怎样搞好消费基金的管理和控制，是个大问题。对先进企业怎么办，对落后企业怎么办，东欧各国改革一深入就碰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开始接触这个问题。最近，武汉派人到民德的工厂去，了解到外国人生活好是干出来的。民德的工厂劳动很紧张，我们有些工人去了吃不消。大家都说，中国工厂干活的节奏不行，民德工厂的劳动强度比我们高出一倍以上，他们对产品质量要求严格，劳动得好，得到的好处就多。看来，工人的报酬要同劳动生产率拴在一起，劳动多的报酬多，劳动少的报酬低。我们的企业在承包以后，要解决劳动生产率与报酬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克服平均主义。企业税后还贷，有利于控制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对财政也有利。要逐步解决消费基金与劳动生产率挂钩的问题，逐步实现企业税后还贷。

必须加强监督，加强检查，监督检查要专业与群众相结合，要有强大的监督检查力量。在实行承包租赁以后，存在着某些商店降低服务质量、有些工厂偷工减料的问题，要有群众的监督。群众对涨价有意见，让涨价的部门来回答，如果说得清，群众会谅解；如果说不清，把价格降回去。加强管理和立法，是个长期的任务。东欧国家的法制很严格，我们的立法工作和管理工作都比人家差。要制定一些办法，防止价格上涨，特别要防止垄断性的涨价。违反的要处分，严格监督检查，打击投机倒把。我们的方向是，既要放开搞活，又要加强监督。我们有党纪国法，应当管的事还是必须管，党员乱涨价的要给予党纪处分。放任自流不得了。如果你涨我涨，大家一起涨，涨价后就多发奖金，这样循环下去真不得了。

稳定市场物价，除应急措施外，还要从根本上研究一下。当前，首先要把大城市的主要副食品价格稳住，宁可补贴一点。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农产品、副食品都有价格补贴，我们不补也不可能。同农民的关系，当然也要解决好。价格补贴是长期的，根据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多补一点或少补一点。副食品问题，实际上是粮食问题。要支持四川等主产区，给点议转平的粮食，给点补贴，多调点肉出来。总之，一是要贯彻稳定物价的救急措施，再是有关部门要好好研究一下长期的改革措施。东欧老百姓的生活好，但国家财政相当困难。匈牙利搞调节税、所得税，搞以增值税为中心的改革，我们要关注这个问题。

要搞个界限，取缔暴利。一倒手就赚大钱，要取缔、限制。批发商店可以搞批发，零售商店不许搞批发、卖大户。要防止垄断，但不应否定承包。对生产资料要限价，反对垄断，加强监督。组织物价检查，要依靠群众。对于检举乱涨价的人，要给予奖励。为了加强监督检查力量，物价系统可以适当加点人。

二、七月二十日的讲话

现在对物价问题议论纷纷，特别是有些老同志担心物价出问题。因此，这件事情应提起我们注意。要不要以国务院负责同志名义发表公开的讲话，说明物价为什么上涨，政府的态度，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什么重大措施。现在要坚决控制物价的不合理上涨，违反物价管理规定的人要惩治一批。要抓几个大单位、大户头，登报批评。

对投机倒把发财的人，已引起人们极大不满。“倒爷”已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现在看，对“倒爷”需要处理了。纯粹倒把的，从商店买出来转手就卖高价，这要禁止。有些紧缺的东西，就是不允许二道贩子插手。有些允许经营的，价格要严格管住。这种倒买倒卖的行为，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在老百姓不满意的，生产这么多啤酒，但在国营商店买不到。北京啤酒都跑到外地去卖高价，然后进外地啤酒也是卖高价。这反映我们主管部门信息不灵，缺乏有效措施和手段。这种现象应该管嘛，这同搞活没有矛盾嘛。凡是老百姓反映多的，政府应当直接干预。

现在改革的情况很好，唯一威胁是物价上涨。前几年物价上涨，是因为我们出台了调价措施。今年我们没有出台什么调价措施，就涨开了。

现在一件事是物价上涨议论很多，第二是“倒爷”现象，对二道贩子大家意见很大。现在一些不合理的机会，造成很多人发大财，把改革的形象搞坏了。因此，政府应该发布公开制止滥涨价的告示，要指出这种滥涨价是破坏物价改革的行为，这是一场长期的斗争。企业承包以后，可能有些企业靠涨价获得高额利润。不要以为承包制搞下去就万事大吉，守法与违法是长期斗争。企业拼命赚钱就很容易走黑路，走黑路就坚决打击。对于那些搞活而走黑路的人不整，就不能鼓励人们去走正路而搞活。要立法，有法可依。要发表一个讲话出个安民告示，既要制止滥涨价，也要解决“倒爷”问题。政府公开发一个通告可以增加透明度，使群众了解物价问题，这也是政务公开。今后国家有一些重大事情，难以决策的事情，要交群众讨论。

此外，急需搞一个反垄断的措施。现在有些企业靠它垄断的地位提高价格。还要搞一个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社会组织，使消费者有说话的地方。现在部门基本上代表下属企业利益，不代表消费者利益。有一个代表消费者利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对话，不要什么都是政府出面。

下个决心，首先在北京整顿无证摊贩，搞他一个月，整顿市场以后不定期地突击检查。

我们现在说市场不发育，发育市场要加强市场管理。一方面搞活，一方面立规矩，加强管理，加强监督，二者不可偏废。

三、八月十五日的讲话

当前，乱涨价的问题很严重，群众街谈巷议，各方面反映较多。如果继续下去，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和今后的改革，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要稳一下局势，刹一

刹乱涨价之风。不稳一下，继续哄抬，物价上涨过多，引起群众不满，等到闹起来就得冻结物价，解冻以后，会涨得更多。

对今年物价上涨的问题，要具体分析。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但光这样简单地讲，还说不清问题，还要分析具体原因。今年的物价上涨有很多特点，有一些我们预料不到的问题。过去几年是国家调价的冲击波，带起了物价上涨，国家不主动调价，物价一般不上涨。今年情况不同，上半年我们在物价上没有什么动作，但是物价上涨的很厉害。我看，粮食涨价是带动物价上涨的很大因素，引起了肉、菜、蛋等副食品涨价。工业品涨价，有中间环节倒卖的问题。所以，对物价上涨只讲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还不够，除了解决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问题之外，还要着重研究影响人民生活最大的食品价格问题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大城市要研究这个问题。

涨价原因，单纯就物价论物价是说不清楚的。从副食品讲，主要是从粮食来的。去年粮食市价上涨，必然影响今年副食品涨价。不少地方西瓜不少，价格也下不来，因为有个与粮食比价问题。有人说，宁肯不提工资，也不要涨价，这是办不到的。工人的生活要提高，农民的生活也要改善，而农业只靠劳动效率的提高，解决不了农民改善生活的需要，非涨点价弥补不可。要向群众讲清楚，粮价非提不可，农产品价格非涨不可，要发展工业，不支持农业不行。肉价不涨，国家每斤贴两角，当前是需要的，但不能持久，而且只能限于大城市。蛋也如此。北京蛋价低，外流就控制不住。

我们的价格相当一部分已放开，不是政府物价局能控制住的。放开的商品价格，也不要今天放，明天收，对其中的抬价问题，可作为投机倒把来干预。

对今年的零售物价水平，可能超过预计目标问题，可以讲三句话：对原定的控制目标不能松口，而且应继续要求大家积极按预定的目标去努力工作，控制物价。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稍一松口，就会涨得更多；各地情况不同，物价控制指标同年底的实际结果，不可能完全吻合，不会恰好不多不少，领导上对今年的物价要心中有数，现在就要开始研究，如果出现物价上涨幅度超过原来的控制指标，如何向各方面说清楚。总之，要尽可能使人民群众对物价的反映少一些。

希望大城市从现在到明年春节做到：主要副食品和主要消费品不要缺货断档；价格不要暴涨，市场供应尽可能丰富一些。

蔬菜的价格补贴不要减少，国营菜场的调节作用也不能少。从这两年放开菜价的情况看，放开了要取得更好的效果，比我们预料的难度要大得多。

关系人民生活的基本商品，如粮食、棉花，主要的生产资料，从中国的情况看，是否都要进入市场？值得考虑。看来还是要计划。既要有市场竞争机制，又要有干预措施。

为保持物价稳定，必须强化管理。我国市场发育还不健全。资本主义市场发育过程中，包括了健全管理措施。资本主义市场开始时也“无法无天”。我们要一方面搞活市场，一方面立规矩，加强监督管理，二者不可偏废。要找出管住与放活的比较好的结合点。

当前，有的人靠投机倒把、乱涨价发了大财，已引起人民不满。需要划清界限，进行处理。农产品远距离运销，有些是必要的。有的纯粹是投机倒把，内外勾结，紧俏商品卖大户，二道贩子卖高价。对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紧俏产品要限制个体经营，如彩电、冰箱、自行车、毛线、啤酒、袜子等，不让小贩插手。对允许个体经营的，也要限制价格。

“倒爷”已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要引起注意。打击“倒爷”、整顿市场要首先从北京抓起，工商管理局等部门要做好安排，武警部队要配合。清理无证商贩，搞好市场秩序。

要严禁乱涨价。乱涨价是破坏改革的行为。垄断性的行业涨价，承包企业涨价，你涨我也涨，这不行。承包后，守法、违法的斗争是长期的，监督是个大问题。管理与反管理的斗争不容忽视。物价检查是长期的任务。要号召群众监督。要抓紧案件处理。

明年的物价是继续稳定的方针，不是大调的方针。明年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幅度不超过百分之六，上半年看看票子和财政情况怎样，有些动作下半年再说，不要开年就涨价。

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是正确的措施，但是避开价格改革，看来是不行的。承包后，价格可能不是向理顺的方向发展，很可能更趋扭曲。因此，在推行承包的同时，应考虑逐步把确实不合理的价格解决一下。同时，严格制止承包企业的涨价。

对农产品价格，明年还是采取微调的方针，以后几年做大的提高也不行。目前把粮食的生产收益用提价办法提到和经济作物、工副业收入一样的水平，是难以办到的。如果把粮价提那么高，将来对整个经济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只能用征特产税的办法抵制某些农产品过高的收入。特产税收进来再补贴给种植业。

把粮价稳住，只作微调。粮价稳不住，吃的东西价格不稳定，会影响群众对改革的信心。

棉花收购价格明年可以不动，再观察一下。农产品要以粮食价格为基点来考虑，如以其他经济作物和工副业的收入为基点，物价要起很大的变化，价格会抬得很高。

苎麻收购价格每斤三点五元，现在看还是高了，明年再降一些。糖料提价不如采取价外补贴的办法好，影响小。国家拿四、五亿元，食糖价格可以暂时不动。

土地既然是生产资料，也就是商品，虽然所有权不能自由买卖，但允许使用权有偿转让。土地有转让、有市场，就要有价格，通过价格差别体现土地的质量。要研究一个既符合宪法的有关规定，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在我们国家，要宣传什么叫奢侈品，要列出品种来。我们菜价敢动，奢侈品价格为什么不敢动？对电冰箱、空调器，要从价格上限制需求。严重供不应求的高档消费品，价格偏低，就会助长投机倒把。对严重供不应求的高档消费品，在调价上要勇敢点。不会因此推翻政府。巧克力糖价格是否便宜了？黄油等趁大家

还没有普遍吃，把价格定高点。物价局要研究高档消费品价格的指导方针，要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限制一些高档消费品的过多消费。

卷烟是中国的一大财源，要全面研究一下，要认真地当作一件事去搞。生产卷烟，技术、设备很简单，根本的是个利益关系问题，要协调好。卷烟划分销区的办法也要改，各方面支持一下。解决好这个问题，见效快，税收多。高级卷烟要通过提价限制消费。

名酒提价，不会有什么影响。

明年电价每度提价二分的方案是可以考虑的，这比现在各地五花八门的自行加价好。现在不少企业用电的电价实际上已经涨上去了，有的企业已经消化。正式提价，无非是企业增加负担不平衡。

民用电可以实行两种价格：规定用电限额，限额下的，即基本上不用家电的家庭，电价不提高；限额以上的，提价。这样，可以体现一个抑富扶贫的政策。凡是买不起电视、冰箱的家庭，电费不涨价。超额用电的家庭，超过用电的家庭，超过的部分，每度加二分。超过再多的多加价，甚至可以累进加价到几倍。这也是一种价格改革，是发展中国家也在推行的“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价格改革，要提出这个原则，既要发展商品经济，也不要把一些保护低收入家庭的政策改掉了。群众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步拉开，在这个过程中，价格政策要体现保护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不要采取说提价一律都提价，说补贴一律都补贴的办法。

总的讲，明年物价不可能有新的方针，大体上还是今年的办法。因为，要把物价完全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在中国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也不宜采取对物价一下子大幅度上调的做法，我们要做到在物价改革中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要明确地告诉群众，物价要涨一点，但是生活水平不会下降。我们不能给群众这样的信息：物价可以不涨，生活可以提高。这两个都要，是办不到的。从方针上讲：一是物价还要有所上涨；二是人民不会因物价上涨而生活降低。中国不存在匈牙利、南斯拉夫的形势。我们控制物价比他们容易。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从全社会讲，群众的收入增加幅度高于物价上涨，今年也是这个趋势。但是收入增加不平衡，苦乐不均，有的增加多，有的少，而且不合理，处理的办法也不好。

对于物价问题，除了讲明年怎么办之外，还要研究根本的问题，并且在一些问题上统一认识。例如，我们多年怕轮番涨价，农产品提了价，必然要影响工业品价格上涨，这个是否叫轮番涨价？要解放一点思想。对物价与工资挂钩的问题，是否我们顾虑多了一些。由于迟迟不拿出办法，各单位就“自谋出路”，钱也没有少花。

就联合国“五十亿人口日”发表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日

朋友们：

今天已经有五十亿人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全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联合国发起的“五十亿人口日”活动，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和重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国发展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坚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人口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同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相协调，以求得迅速摆脱贫困状态，使国家富强，民族繁荣，家庭富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我们建立健全各级计划生育机构，制定有关法规，制定人口发展计划，制定人口发展方针政策，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向广大育龄夫妇提供避孕节育技术和社会性服务，加速科学技术研究，推动全社会和各有关部门关心和支持计划生育工作。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的。我们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懂得为了国强民富必须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自觉按照政策要求实行计划生育。实践证明，我国一方面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一方面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明显下降，平均预期寿命明显延长。这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尽管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但是我相信，只要坚持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的总数控制在十二亿左右的要求是有希望达到的。

值得重视的是，世界人口增长的百分之九十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生活水平较低的地区。

人口的过快增长将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些国家制定和执行适合自己国情的人口政策和计划是必要的。当然，根本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首先必须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应当承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妥善有效的人口政策，以及为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所做的努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已经而且愿意继续同世界各国一起，

为稳定世界人口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深信，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随着人们对人口问题认识的不断提高，依靠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正确有效地解决人类自身发展的问题，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关于改革物资管理体制的意见*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发展企业集团和横向经济联合座谈会上的讲话。

计划体制改革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物资体制，二是投资体制。最根本的还是物资体制。

沈阳电缆厂与沈阳冶炼厂只有一墙之隔，但电缆厂用的铜只有1%是沈冶供给的，其余99%是从外地运来的。这种计划有什么优越性？我们的计划能这么搞吗？指令性计划现在都在搞“三角阵”，请房维中同志研究解决一下。像这两个厂的问题，沈阳冶炼厂发多少吨货到沈阳电缆厂，开个收据。拿这个收据到国家计委、物资局报账，可减少周转环节，为什么就行不通？现在有一千多个大型企业，它们的计划内物资供应，能不能作一张大表。有些是企业之间愿意干的，上面行不通。只要上面愿意作这笔账，全国就可节省很多运力。

在物资管理体制改革以前，供应的方法也可改一改。要研究一下，能不能不搞实物分配。石家庄放开钢材市场的办法，为什么在全国不能用？都是一样的办法，一样的道理，不只是一个城市用，全国都可用这个办法。我说的这个问题你们考虑一下。补贴的问题，你能分钢材就能分补贴嘛，有什么复杂的？这样做就把品种问题彻底解决了。补贴完后，你需要什么品种到市场上去买就是了。譬如说全国有多少计划调拨的钢材，统统都放到市场上去。分配就分钱，不分钢材了，大家都到市场上去买钢材。这对企业来说不就稍好一点吗？物资部门还是要从钢材厂拿钢材。对钢材来说它是两个渠道，一个上市，一个是交给物资部门。你物资部门分给哪个省，就把钱补给哪个省，分给哪个企业就把钱补贴哪个企业。这样品种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们对钢厂怎么办呢？统统按市场价折算。譬如说你这个钢厂，我给你调拨计划，矽钢片多少吨，什么钢材多少吨，到时候，你交了我什么东西，这个价钱都要折算一下。规定你这种价钱比较高的钢材要交多少吨，你不交，你交另外的钢材，也可以，我给你收下来，但是你同时要交我多少钱。内部分配的利益关系和价格问题是两个渠道，不要搞一个。不是实物形态，而是货币形态。你们对钢厂的钢材调拨都按市场价格结算，与用户的关系就是补现金，而不交实物。现金按市场价格结算。实物通过市场投放。你不是有品种、价格嘛。比如说，普钢1600元一吨，这是市场价，牌价是700元一吨，到时候你交我普通钢，我给你700元。你交我好的钢，交一种市场价是2000元的钢，

你少交了一吨普通钢，多交了一吨优质钢，比如说是2400元，那我要补你多少呢？补你400元。因为那一个市场价1600元，这个市场价2400元。这样，钢厂就要算算账了。我把好钢材都留下，我卖了钱，最后还得交你。这里头的关系，就是说你按计划交货，如果是以次充好的话，同时要补贴，这个钱就可以从财政方面扣掉。这样你才能够按计划去分配。你首先要把跟企业的关系这一头搞清楚，由国家订货这一部分，都不得按市场价格算账。它交你什么东西，你给企业分配什么东西，这是一种关系；另外一种关系是统统经过市场交易，这也是一种关系。

我认为，现在大中城市不能这么搞，问题在你物资局，而不在大中城市。你给各个部门分配的物资，都不给地方，这个账根本不在地方，你现在叫地方把物资放开，地方无法跟各部物资部门结算。将来你可以在几个大城市，把所有分配给各部门的物资统统扣掉它，跟各部门讲清楚，你在上海用的物资我包了，然后我再来办站。这样，联合的机构就可以办通了。因为它这个物资渠道有物资部门分的，有各部门分的，你叫上海来搞，而且是只拨少数钢材给他，他就不愿意搞，品种问题他也调剂不了。根本问题在物资局，而不在地方。因此，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全国打破城市这个框框，全国都搞；第二个方案就是到几个城市去搞，由国家部委带头到几个城市去搞，先搞三个市，由国家物资局和地方物资部门联合起来搞。各部的物资都扣掉它。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个利益关系没有理顺，你必须理顺这里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办得通。

能不能考虑把各级物资部门加强，把各部的物资权取消，搞生产资料批发公司，紧缺物资就由这个系统凭票供应，按照中央计划和地方计划发票，定量供应。我看，各部的这个权是非削弱不可。把各部的物资分配统统集中到生产资料商业系统，这样仓库肯定会少一些，中转环节少了，物资流通就加快了。要加强中心城市的物资贸易，你们再研究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我是赞成把石家庄的办法和这个办法统一考虑。这样，到省、市设批发站就好办了，各部都不管了嘛。现在先抓钢材，钢材能搞得通，其它也好办了。

把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推广到全军全社会*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在全国各族人民欢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的时候，隆重召开了全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英模代表和全军指战员致以节日慰问！

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是我军建军的唯一宗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同全国人民一道，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新中国的创建，立下了可歌可泣的不朽功勋。建国以后，人民解放军继续保持英雄本色，为反对侵略，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军队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的军队，不愧是党的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不愧是人民利益的英勇保卫者，不愧是光荣伟大的军队。

伟大的军队造就伟大的战士。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同志，是全军英模和先进集体的优秀代表。你们在保卫边境的斗争中英勇顽强，在抢险救灾中舍身拼搏，在科研和教学中勇攀高峰，在教育训练中勤学苦练，在生产、施工、后勤保障中埋头苦干。你们的岗位各不相同，但在你们的身上都同样闪烁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现了压倒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你们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典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楷模。

任何民族要振兴，社会要变革，都需要适应时代要求的强大精神力量把人们感奋起来，凝聚起来，推动历史前进。社会主义时期也是如此。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巨的创新事业，更需要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但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精神的作用。因为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利益关系的调整，各种困难的克服，都离不开高尚的理想和道德。我们提倡勤劳致富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丝毫不意味着可以贬低先进分子的集体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价值和意义。因为这种精神的发扬，正是实现共同富裕所绝对不可缺少的。我们鼓励搞活经济和尊重自主权，但丝毫

不意味着可以削弱严明的纪律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因为只有树立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严守法制纪律的自觉性，改革开放才能顺利进行。同志们，你们之所以是英雄、是模范，就因为你们用实际行动，率先体现了这种革命精神。中央军委表彰你们，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就是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全军、全社会去。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总方针，不能没有这种精神。在加快改革的今天，召开这个大会，提倡这种精神，意义就特别重大。

国防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保障。我们要在全社会进行国防教育，使全体公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增强国防观念，自觉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关心、尊重和爱护人民子弟兵，从各个方面支持军队的改革和建设。要继续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军政团结和军民团结。

社会主义时代应当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同志们走在了前头，希望你们珍惜自己的光荣称号，为祖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希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条战线的同志们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艰苦奋斗，发愤图强，迎接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家计委要成为真正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一九八七年八月五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七五”后三年改革计划体制的若干意见》汇报后的讲话。

“七五”后三年计划体制改革，题目是好的，思路也对，但要深入一层。所提的意见，有了措施的就可以做了，没有措施的要进一步研究。有些问题要具体化。计委要好好务务虚。

有一个大的问题，宏观调控措施应由谁负责，主管者是谁？现在计委说话不灵，大部分放在财经领导小组，但财经小组只是协调处理一些临时性的事情，没有自己的办事机构，不是系统地搞宏观管理。原来想成立财经办公室，后来成立经济调节办，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计委应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你们应认真讨论。要敞开思想，“大鸣大放”，进行辩论，在十三大前拿出个具体方案来。过去传统的计委不能搞了，要下决心只管大的，不管小的，这就有个小的放给谁、大的怎么管的问题。一九八○年我就讲计委应管大事，不要管小事。计委要成为管宏观经济的部门，必须掌握一定的手段，包括掌握经济参数、经济杠杆，势必银行、财政都到你那里。最近苏联搞一个经济委员会，由国家计委主席担任主席，财政部、物资供应委员会、物价委员会、科委、劳动部、统计局的第一把手参加，负责协调各部门在改革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解决改革进程中的问题。

宏观调控措施的提出、协调和执行，总要有一个部门来管。像现在这样临时性的协调，是不行的。国家调控要系统，要有调控数据、调控经验。将来宏观调控是不是放在计委那里。现在的计委不是计划委员会，是计划部，委员都是部内委员，每个专业局都替专业部说话。你们那个机构就不是管大事的机构。计划体制要改革，计划机构性质、计划工作方法、计委内部机构设置、计划观念都要改变，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计划改革有了方案，计划机构、计划观念改变了，宏观控制职能才能交给计委。现在的计委，宏观控制职能不能交，交给你了，还要为你过去那一套服务。苏联成立经济委员会，协调改革中的问题。将来体改委搞调研、设计方案，实际的宏观调控和改革的实施方案交给计委。

建国初期的计委，不存在宏观协调问题，因为当时是高度集中的统制经济。我曾讲过，整个体制改革就是改高度集中的体制。计委还是集中的那一套。我说过“改革在前进，计委在后退”。计委没法综合平衡，改革应当首先改革计划体

制。计划改革，务虚还不够。你们不要等革你，应当研究怎么革，主动地积极地提出在新情况下计委成为什么机关，起什么作用，即计委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组织机构应当怎么改。前年指令性计划革了一大块以后，计委就不好过了，那确实是很大一个改革。现在的计委不适应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很难在宏观上发挥调节作用。要起作用，必须适应改革的要求。归根结底，是解决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的问题。现在直接控制少了，将来还要少。计委应当管整个经济的计划，不是只管直接计划的计委。

汇报中讲地区协作，改变调拨办法，要提出怎样才能体现这一方针。我曾说，上海与四川进行协作，进行横向交流就是最重要的计划。这个观念要解决。斯大林说过，城乡交流中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是商品交换。计划只能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计划就是商品交换的计划。就拿全民所有制来说，宝钢和四川一个县办的造纸厂，都叫做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在层次上相差很大，这相当复杂。

像这样复杂的层次用什么办法联系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商品交换。中国现在的商品交换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还存在，云南个别地方还以买卖为耻。国家计划如何引导市场、组织市场、管理市场、调控市场是个大学问，但非这样做不可。

改革模式，首先要考虑计划模式。计划还要有，是宏观管理的方式。我倾向于搞个组织机构管宏观，就是计划委员会这个形式，有关管经济手段的部门、综合部门参加，把计划制定同运用经济参数、实现计划结合起来，一些问题就在这个层次上解决，解决不了的再提交国务院。

分层次管理是对的，但要具体化，搞实施细则。单列的省辖市也要算一层，也应写上。关于民用电价问题，我看可以实行两种价格。对家庭用电规定个限额，超过这个限额的加价，对超过很多的，电价可翻番。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用这个办法，这是扶贫抑富。用一度电涨价，用一百度电也涨价，这不合理。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一点社会保障措施，就是保护低收入。把低收入的人稳定下来，有些商品提价也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不至于矛盾激化。现在说提价就都提，对贫困户没有照顾，这样不行。

关于反垄断、反封锁问题。能不能搞一个反垄断、反封锁法。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哪些能反，哪些暂时还不能反。应区别对待，笼统地提没有用，不加区别也不行。

搞稳一点　收紧一点*

一九八七年八月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家计委计划安排汇报时关于1988年经济工作思路的讲话。

一、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八八年计划安排总的思路是对的。赞成计委的精神，搞稳一点，收紧一点。原则上同意按这个思路去办。明年的货币、财政要从紧安排，基本建设要收紧，价格和工资要有一点办法，城市供应要有具体措施。

二、要压缩财政开支。估计明年企业承包会发挥作用，把货币、财政从紧，不会对明年的生产发展速度影响很大。财政部的同志要研究，除了经济建设支出，整个财政开支怎么能压下来。现在所有国家机关、群众团体都在搞公费旅游，招待所都成了旅游接待点。伙食费搞得很高，钱是从哪里来的？公费旅游，愈演愈烈，就没有办法解决？北京市反映，今年春节发实物是国家机关带的头。国家机关发实物，有的相当出格。各个部门都要查一查发了多少实物。各单位要限期自报，实物发了多少，钱发了多少，实报的出个账单就完了，对于以多报少的单位要追究责任。国务院追查这件事有好处，可以防止今年第四季度再发生这种事，国家机关就是不能搞这个。今天没有到会的单位，由国务院办公厅通知他们。

三、要改革信贷制度，促进企业压缩库存和改善经营管理。超储的钢材由物资部门强制收购能否落实，如果能落实，银行对超储的企业应停止贷款。关键是用什么价格来算账。如果允许库存钢材按市场价出售，每吨可赚八百元，可能会刺激企业继续增加库存。目前全国至少超储钢材一千万吨，要研究为什么超储那么多。现在钢材市场上，大路货有货有价无人买，又不愿降价，因为一降价就发生亏损。库存物资报损，财政、银行都不愿意负担，只好存在那里。现在流动资金制度问题很大，机制不灵。要运用信贷进行宏观控制，信贷制度必须改革。要核定企业的正常流动资金，超过的银行就减少贷款。对经营不好的或流动资金使用不合理的企业，可以拒绝贷款，这个权交给银行。当然银行工作要改进。促使企业提高效益，可以从流动资金做起，这比笼统地抽紧银根好。现在银行搞压缩流动资金，是运动式的。今年又放松了，对乡镇企业贷款是要多少给多少。最近林重庚说：你们抽紧银根很有效，现在为什么又放松了。银行信贷方面，基本建设贷款就是一定的额度，主要是流动资金贷款问题。现在企业向银行贷款很容易，不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今后对仓库损失定个基数，由企业自负盈亏，承

包制要解决这个问题。企业承包不仅要承包产量和税利，而且要承包资金、库存和还贷。处理得好的，利益归企业；处理得不好的，由企业自己补亏。这方面问题解决了，有利于压缩库存。

四、要压建设总规模。重点建设、技术改造都要缩小一点。现在的建设总规模仍然偏大，到处都在大兴土木，看不到在压缩规模。这是造成经济紧张的根本原因。

五、对今年物价上涨要认真进行分析。前几年物价上涨是国家调价带来的，今年物价上涨有很多特点，国家基本上没有调价，而物价上涨了。物价和票子有关系，但有时少发了，物价也上涨，有时多发了，物价又没涨。今年物价上涨，主要是粮价上涨带来猪肉、蔬菜价格上涨。粮价上涨又是什么问题，除了歉收以外，还有没有措施上的问题？作为物价方针，已很明确，明年不可能有多少新的方针。物价每年总得涨一点，完全不动物价做不到，因为价格还要调整。当然中国的物价不宜上升很多，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在物价上升的情况下，人们的实际购买力不能降低。从整个社会来讲，这几年群众总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并不低于物价上涨的幅度，问题是苦乐不均，有的降低了。中国不存在匈牙利、波兰那种情况，他们过去生活提得太高了，今天通过涨价往下降。我们不是这种情况。明年物价要上升一些，人民生活也还是要提高的，不能因物价上涨而影响生活。物价上涨，工资问题怎么解决，要找一条出路。今年物价上涨，不仅是总供给、总需求问题。人们对物价最敏感的是菜篮子，物价平均上升百分之六，一到菜篮子就是百分之十以上。总的要控制需求，但还应该着重研究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物价指数。工业品涨价，很大一部分是商店把商品卖给小贩，小贩去涨价。化肥也是这种情况。要采取措施，稳定人民生活，特别是大城市职工的生活。

六、工资要有个章法。工资方面，除存在消费膨胀问题之外，还有就是没个章法，钱没少花，问题没解决。今后工厂企业就是搞计件工资，劳动生产率高的工资就高，搞计件就不再搞奖金。如果确定了这一条，剩下的就是如何完善定额问题。现在实行奖金税，规定三个月以上征税，效益差的企业也想办法发三个月奖金，这不如计件合理。如果物价上涨率平均每年在两位数以下，工厂企业就靠计件来补偿。国家机关工资也得搞个办法，不一定年年变，总之是步步高。我们不敢采取工资与物价挂钩的办法，至少得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没有个具体办法，最后是由各单位自谋出路，钱并没少花。

七、钢厂要按需生产，大路货钢材要降价出售。究竟库存钢材是些什么品种？如果企业继续生产大路货，钢材库存积压问题就解决不了。库存的大路货钢材要降价，扩大销路，大路货钢材的销路不解决，库存压不下来。前两年“盘条”钢紧张，一放开问题就解决了。当然，要增加薄板的生产能力并不容易，得搞建设。解决钢材库存问题要专门开会，研究到底超储原因是什么，从哪里着手解决。市场多余的品种，钢铁企业就可以少生产甚至不生产。

八、明年的有些工作要从今年后四个月就抓起。控制基本建设，控制信贷，控制财政支出，现在就要采取措施。还要考虑第四季度会出现什么问题。已经提

出的政策措施，第四季度就要体现出来。

在改革中加强对执行国家政策的严格监督*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就路透社记者谈驻京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对某些国营企业不执行国家政策感到惊讶所作的批语。

这个材料建议印发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同志一阅。其中提到的许多国营企业团体不执行国家政策的问题，确实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大问题。能否保证改革、开放不出现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因此在坚持改革、开放中，必须加强对部门、地方、企业团体执行国家政策的严格监督。请纪云同志就此问题找一些同志议一下，提出办法，由国务院讨论一次。

立足国情面向未来
制定我国长远经济发展战略*

一九八七年九月四日

* 这是赵紫阳在讨论2000年经济发展战略会议上的讲话。

一

在分析我们国家的情况和问题时，思想要解放一些。过去我们一讲矛盾就说人口多，建设和消费是很大的矛盾，基本矛盾是不是就是人口多？从全国来说消费量是很大，但人均消费基数很低，工资很低，这应该是我们的优势而不是劣势。中国建设和消费的矛盾原因究竟在哪里，是不是因为人口多、消费基数大？从现实情况看，恰恰是人口少的地区更困难，人口多的地方并不一定很困难，像温州地区、珠江三角洲并不困难嘛。按省讲，浙江每平方公里人口最多，但浙江并不困难；西北人口少，不是很困难吗？当然，我并不主张人口多，我是要大家分析一下，真正的矛盾是不是就在于人口多。我们常说中国人口多，人口多是因为国家大的关系嘛，如果把我们国家分成20个国家，人口不就少了？那样是不是就会好了？说人口多道理上总不那么讲得过去。人口多是从北京这里说，全国人口到本世纪末加在一起有12亿，那是因为我们国家大嘛。要按人口密度说，中国并不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日本、新加坡人口密度很大，台湾地区，人口密度也很大，荷兰人口密度也不比我们小。从我们自己说，按省分的话也不见得人口就很多。目前很多矛盾是中国发展阶段中暴露出来的矛盾。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效益很差，我觉得我们过去没有着重从这方面来揭露矛盾。

如果仅仅说中国人口多、资源少，特别是说中国消费量大，这都是传统的看法，这么说中国落后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中国的局面就无法改变了？归结到人口多，消费量大，这没有道理。如果只有三亿人，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建设浪费很大，同样消费和建设的矛盾仍难以解决。要是我们经济效益好的话，就是有20亿人也没有问题。归根结底不是人口总量的多少，而是人均经济效益如何。我们人口多，如果人均经济效益好，那么加在一起我们的效益就非常高，一个人能提高一块钱效益，全国就是10亿元。人口多、消费大，建设与消费的矛盾很难解决，这是传统的说法，我也常跟外国人这么说，听起来有道理，但是经不起分析。

我认为，归根结底是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这与我们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关系。当然，我们的效益还不是很差的，有些发展中国家搞了工业化反而更困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用农业来补贴工业的亏损，我们也经历过这个阶段。现在有些国家不搞工业化日子还能过下去，一搞工业化，国营的都亏损，搞得老百姓更加困难，像非洲，有相当一部分国家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说是搞什么样的工业化问题，有些工业化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造成更大的消耗。

我认为，我们分析问题时要破除一些框框，要研究一下这种说法是不是真正有道理，不要因为是多年的说法我们也就跟着说。要分析原因究竟在哪里。要说人口多是个大包袱，包袱究竟在哪里呢？我看就在于劳动生产率低，浪费大。要说中国人口多，吃粮食多，但是按人来说，一个人一年也就是吃800斤粮食，还是很低嘛。现在我们消费还是以人为单位消费的嘛，怎么能说消费基数大呢？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人口多，需要几千亿斤粮食，而是出在一个人平均只有800斤粮食，问题出在这儿，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一下。

另外，我认为对有利条件分析得太不够，需要认真研究一下我们中国搞现代化的有利条件是什么，优势是什么。我看我们在座的没有几个人预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些变化。回忆一下，一九七九年时对一些问题的预计是什么？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情况没有预计到。在这次十三大报告里我将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多长期以来困扰着我们的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大大缓解了，很多变化是过去不能想象的。包括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城乡有现在这样的繁荣景象吗？那时候我们拼了老命，把什么都拿出来搞了建设，有现在这么大规模吗？当然我不是说现在的建设规模好，就算是压掉30%，中国还是繁荣兴盛。压掉30%的建设规模，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更好了。这种形势是从哪里来的呢？靠政策。过去我看过一本书，作者认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快慢，不决定于资源，不决定于人口，也不决定于是岛国还是内陆，根本决定于两条：一是人的素质，二是社会结构。我认为很有道理。世界上各类国家都有发展得快的，也都有发展得慢的；人口密度大的国家有发展快的，人口密度小的国家也有发展快的；岛国有发展快的，内陆国家也有发展快的，像瑞士就完全是内陆国家；资源丰富的国家有发展快的，像美国；但是世界上真正发展快的恰恰有许多是资源缺乏的国家，而且发展非常快。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我们的优势，大家的注意力不要老集中在人口多上。要看到我们主要的劣势是人的素质和社会结构问题。中国的条件应该说不是很差的，我们的祖先找到这块地方不愿离开有它一定的道理。你们说人多消费量大，其实我们消费量小，这是我们的优势。如果把所有人的消费加起来当然多了，1000人总比100人消费得多，100人总比10个人消费得多，这是个总量的问题。但是家难当不难当不决定于总量，而是决定于按人均所能供给的数量，富和穷也决定于这一点。要使我们搞经济工作的人思想为之一震，要解放一些，真正找到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过去的看法要研究一下是否科学，是否能够真正站得住。我们对自己的有利条件认识得还很少；我们应该从九

年的发展中得到启发。我不赞成毫无根据地唱高调，但我们需要真正认识我们国家，正确地认识我们自己。我总觉得我们过去的一些说法不科学。从我们自身分析也看得很清楚。分省来讲，人少的地方不一定好过，人多的地方不一定难过。当然，这么说不是提倡增加入口，而是分析问题究竟在哪里。

二

我们的工业化该怎么搞是个很大的问题，应该好好回顾一下，中国工业产值达到了国民总产值的70%，可中国的农业人口基本上没什么变化，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工业效益太低。任何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必然同时减少农业人口，这就是富裕的表现。哪个国家都是这样，唯独我们工业搞了那么多，农业人口却没什么变化。我们建设的浪费太大，从建国开始，建设用了那么多钱，究竟提供的效益怎么样？我说中国建设和消费的矛盾不是人口多了，首先是建设搞得不好，没有提供必要的效益，把老百姓的钱拿来，铺了那么大摊子，结果没有提供什么效益。如果建设提供了效益，就应该是建设和消费的矛盾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把那么多钱拿来搞了无效劳动，这都是过去的问题了。主要还是结构的问题，钱拿来了，集中了资金，可没发挥作用。相当一部分钱等于拿了去打水漂了。建设搞了，但没有提供多少物质的东西，没有真正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人民也没有得到消费上的好处。这是问题的要害，是造成现在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极其尖锐的原因，我认为这是第一位的。为什么矛盾尖锐？就是浪费，劳动生产率很低，造成建设资金困难，不仅资金困难，还使我们发展了工业却不能减少农业人口。工业多了，工业产值多了，农业人口还是不能减多少，效益低是主要原因。

我们要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到二○○○年还有十三年，还来得及研究。要有点新观念，新思维。什么是新思维？就是认真地科学分析，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时期两种做法，应该给我们一些启发，很多问题应该使我们重新加以认识。过去广东汕头简直没有出路，按过去那样搞法，他们悲观极了。那里五十年代支部书记就带头绝育，就是怕人口增长。当然现在也要节育，可是现在汕头地区就充满信心，因为有门路了，就不觉得人口多了，反而外地人大量的到那里去，梅县地区有人就到汕头平原去。过去珠江三角洲的人口也是多，现在韶关的人口还大量到那里去，反而是人口少的地方到人口多的地方去谋生。当然中国是一个整体，沿海发达与后方支持有关系，但这恐怕只是一个因素，这说明并不是人口多了就不能发展。这件事可以研究一下，我们过去的做法是农村劳动力不准出来，还要城市劳动力下放，结果就那么一点地，劳动力都压在那里，劳动力多了并没有多生产东西，其它的又不让搞。我们现在总的讲还是就业的人太少了。有个问题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当然我不是主张这么搞，像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搞起来，马上就有大量的盲流人口进城，这些盲流人口不管怎样还能在那里活下去，这说明城市里还能养活一些人，这些人不是靠偷盗，不是

靠政府救济，像巴基斯坦卡拉奇，就有许多盲流人口。这些人由盲流睡大街，到盖一座小房子，然后就站住脚，就业了。墨西哥城这个过程最明显。这说明按我们现在的城市工业，还有些就业的机会，但由于人为地限制，能就业的没有就业，所以城市里物价居高不下。蔬菜那么贵，无外乎种得少，一些卖菜的不能进城。当然，还要想办法使城市秩序不乱，但这说明城镇还有一些就业机会没有开发。现在城市就业人员比过去多多了，北京市流动人口有多少？（答：120万）妇联搞的家庭服务员就有好多！这些人实际都在城市就业了。我觉得我们讲效益不要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高效益就要搞大工厂，现在的效益高低不在于是大、是中还是小，不管是国营还是集体，效益高的都是有竞争机制的，有竞争机制者效益高，无竞争机制者效益低。我的意思是要把我们国家的优势、劣势、优点、缺点、主要矛盾好好研究一下，一般的传统的说法经不住检验。

就像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耕地、水源、森林和某些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少，严重地制约经济的发展”的说法，我们要分析。我们资源是不丰富，但就当前经济发展来说是不是就这么一个问题？苏联耕地很多，到现在他粮食没有过关；我国有的地区水源也不一定很缺乏，可是工业为什么上不去？有资源的地方也没有搞起来。我们煤炭资源丰富，可过去也是长期闹煤荒，后来我们把丰富的煤炭资源同丰富的劳动力一结合，煤就缓和了，从这里得到什么启发？我们不是资源贫乏的国家，但也不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不要再讲资源丰富，但也不能说今天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就是资源贫乏。这种说法很容易使人觉得经济上不去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不是资源问题，长期看，可能有资源的因素，但当前，资源还不是主要问题。要就资源来讲，西北地下资源还是未知数，谁知道资源怎样？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地下都搞清楚了？资源丰富、人员稀少的地方经济很难搞，根本是人的问题。现在到一个地方认真搞得话，都会感到是领导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我这次到了额济纳旗，额济纳旗一万四千人，10万平方公里土地，那么大的地方，比浙江省面积还大，搞不上去，就是人的问题。

三

农业问题，是眼前的事，也是长远的事。只要把两条搞好了，还可以上一个台阶。一个是农用塑料薄膜，一个是复合肥料。长期看，还有科技进步、生物工程等，真正对目前生产有效的，是上面两个问题。农用薄膜，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效，薄膜一盖，少浇一次水。印度粮食怎么过关的？就是一场“绿色革命”。中国粮食在六十年代上了一个台阶，就是矮化种植，也是“绿色革命”。我曾经说过，真正的“绿色革命”起源于中国，我们过去搞矮化，比菲律宾早。要下功夫搞复合肥，当然氮肥也要搞。复合肥要列入计划，坚韧不拔地采取些措施，把它搞上去。最好搞煤化工，用煤作原料。现在我们不讲具体项目要认真考虑一下复合肥的问题。本世纪靠得住的还是这个，生物工程十年之内难出个新品种。这

次我到河西走廊访问农户，问他们有什么要求，有一个青年举着手喊“多给薄膜”，其他农民也跟着喊。投资一亩地原来是20元，现在40元他们也干。农业生产向这方面倾斜，粮食生产肯定会上个台阶。磷氨、硝酸磷氨都要上。用煤来搞氮肥便宜吗？（答：不便宜。）我们原来搞合成氨都是用煤的。要认真研究一下，本世纪能够有效的因素有这两个：一个复合肥，一个薄膜。不要一般说一说，要真正列入计划，从“七五”后三年开始抓，与民德或联邦德国长期合作，搞煤化工，搞合成氨，另外搞薄膜。下决心把它抓上去，肯定会见效。

除了政策之外，措施上要抓紧。有了薄膜，棉花种植面积会大大扩大。新疆这几年不错，调了36亿斤粮食出来。我在天水见到一个家庭工厂专收废薄膜，500元一吨，然后搞原料出售，每吨1300元，除了成本，每吨赚300元，这个人发大财了。中国把废旧原料的回收作为乡镇企业的一条出路，前途无量。“星火”计划可以把废料废品的研究利用包括在内，乡镇企业搞废料的再加工，给乡镇企业开辟一条路子，这样可以减少污染，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又是一条就业的路子。这就要发挥中国人多的特点，让人们来搞。这件事让国营搞成本就高，农民搞就可以发财，要把技术交给乡镇企业，让他们因地制宜，既节约资源，又解决就业问题，一举两得。

四

中国的能源主要是煤，因此，中国的能源结构不可能有大的改变，当然也应尽量改变。要使以煤为主要燃料的情况下环境不过分恶化，要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神（木）府（谷）的煤开采出来，沿海大城市都用神（木）府（谷）的煤，环境就可以大改变，因为它含硫很少，在1%以下，储量又很丰富。中国开发的天然气，要大部分用于工业原料，而不是烧掉，天然气化工比煤化工好。在能源结构上做大文章很困难，要研究如何减少煤的污染，这应成为到二○○○年科研的一个重大课题。水煤浆还是有希望的，要研究燃烧技术，选择一些好的煤种，加以治理，减少大气污染，这比改变能源结构容易，投资要少。在煤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就真正立足我们自己的资源，包括将来出口、交换。充分、合理地利用煤，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问题。因为说到底，我们的资源优势，一个是有色金属，一个是煤。

五

关于突出抓好机械基础零部件和电子元器件、基础技术和基础工艺、基础原材料和基础机械的问题，这几年我们一讲机械工业就讲这些问题，但一直很难落实，是不是政策上有问题？任务是对的，要有一些政策来促进实现。凡是经常讲而又上不去的问题，凡是经济工作中急需解决而又没有解决的问题，都是我们政

策有问题。要认真加以解决。

六

关于推行住宅商品化问题，最近看了一个材料，我写了几句话送给陈俊生同志了。说北京有人转手买卖住宅居住权，发了大财，能有人出高价买房子，说明我们原来的售价太低了。对转价买卖居住权的不要马上干预，终究是件好事，不是坏事。全国其它城市是否也有这种情况？找人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是好事，北京有人经营房地产了。专业户有钱，我们直接卖给他，可以回笼一部分货币。将来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卖给发了大财的，一种是解决一般的住房户。

七

煤层气搞塑料是一个大事情。我国木材、钢材不够，天然气可能是丰富的，搞了煤层气就搞塑料，缓解木材、钢材的短缺，用地下木材代替地上木材。我们技术能突破，设备自造，投资也不一定很大。乙烯现在已经能生产120万吨了。煤层气搞塑料是个大事，应该作为一个大的方针。

八

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离开本地区劳务出口值得总结，现在看来，劳务出口在贫困地区是带头的东西。甘肃定西是20万人，也是这个地区培养人才、广开眼界、积累资金的一个好办法。劳动人事部应该有计划地在这方面进行投资、训练人员。这些地方劳动力多，应该出一些能干的建筑行业的包工头。贫困地区4000万人，2000万劳动力，这2000万中出去200万劳动力就可以了，经济就会起变化。这是合理流动。

九

关于规模经济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提出了一个第三产业的问题，提出了一个轻纺工业的问题，还有一个乡镇企业的问题，它造成了一种欣欣向荣、大家都有用武之地的局面。关于我们投资的重点和其它方面的发展，在政策上要把这些问题的关系恰当地说清楚。比如说规模的问题，有一些需要有一定的规模，有一些规模大了反而不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争取有骨干，又有广泛性。没有面就没有市场，就没有充分就业，没有这些，我们就又走到老路上去了。

对这个问题看怎么个说法。我们这几年，虽然面上发展了，但是重点并没有削弱，按绝对值说，重点都加强了。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进一步加强重点是为了更好地加强目前这种局面，支持轻工业、纺织工业、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商业，现在不加强重点没有后劲，但是加强重点绝不是孤立的。如果说这个不能搞，那个不能搞，过分地反对盲目性，我看不行。就是说，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总的方针里来讲，孤立地讲搞重工业、搞原材料工业、搞基础工业，恐怕是不行的，这不一定是我们的全面的发展战略。这个问题的关系你们要写得很清楚，不一定这样写，但精神应该是这样的。

计委在看法上总是看到他自己投资的那一块，他能调拨的那一块，老想讲他的那个东西，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说清楚，如果这样，就会走到过去的老路上去。杨培新有一个说法，他说你们又要搞重点建设了，一搞重点建设就该收了，这话当然不对，但是确实有一个拿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搞的问题。我们要维持这样的局面必须加强哪些东西，加强那些东西必须和什么东西相配合，采取一个较为全面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是采取了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这种新的发展战略实际上没有影响基础设施，总的来讲，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在加快。它说明了一个关系，没有基础工业的发展就不会有重点工业的发展，但是没有重点工业的发展，没有一定的倾斜，也很难支持整个经济的繁荣。但是倾斜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倾斜的东西必须是大家来搞，大家来搞很重要。如果倾斜的东西只能国家来搞，或者只能由西部来搞东部不能搞，那是不行的。

十

关于我国的东西部关系，我们要提倡东西部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主要是由东西部自己来搞。目前这个发展趋势是符合我们的发展战略的，是符合整体利益的。过去我们无非是这样，就是从东边调消费品到西边来，从西边调原材料到东边去，但是由于通过国家无偿调拨，把两边的积极性都搞掉了。它虽然也是要解决东西部关系，但是它是通过调拨国家统收统支的办法，结果两边都没有积极性。现在东西部自己搞，都建立在自己需要的基础上，目前这种形势还在发展。比如说现在宁夏、甘肃都从东部吸收很多资金。这种流动是完全符合我们计划要求的，但是它不是通过国家指令性调拨的形式出现的，是互利的形式，这样的关系更牢固。所以我这次在宁夏讲了一个观点，他们老问我“国家什么时候把重点转移到西部？”我说现在什么叫把重点转到西部？让国家转，目前国家财力有限，没有多大可能，主要就是要通过你们东西部交流，通过互利的形式来转。就是通过东部开发西部，通过西部供应东部，这样西部就不会讲什么我原材料不给你、我自己要搞加工了，因为他需要东部的资金、技术。所以，我们国家将来要引导东部的资金向西部流动，要注意引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说，上海要到西部搞投资，那我国家给你加一点钱，你出一点钱，西部自己愿意搞，三家来搞。我们国家的钱很少，要加强引导。比如说，我们国家要在西部搞一个什么

项目，就请西部到东部、南部筹集资金去，组织一些资金，我国家再加上一块，这样三方联合，国家一块，当地一块，东部一块，资金、材料大家分。这样搞就减少了矛盾，这样做是增加计划性。尽可能少搞调拨，东部调给西部、西部调给东部，两家都不落好，两家都不买账。我们全国的大计划要建立在东西部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要在开放的基础上、在东西部经济技术合作的基础上来解决计划问题，这样就真正有了地方计划。我们要真正改变过去的那种计划方式，就是说，要改变那种你们要搞我就退出，我要搞你们就不要沾边，国家就是国家的、地方就是地方的、你们合作的就是你们合作的这种计划方式；现在我们要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策，我的钱就用在合理地推动联合上来，推动地区之间的合作上来，这样我们的计划作用就会加强。如果我们还是采取板块的办法，越搞我们计划的作用就会越减小。东西部关系我们要考虑，实际上现在是在发展，将来沿海必须要考虑他的原材料问题。我们有政策，另外还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引导，不是由自己来包办，而是用资金来引导。在计划工作中，现在价格问题没有解决就分材料，谁来投资谁分材料。所以计划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个办法，就是要建立在商品交换和地区交流的基础上，这样我们国家计划的作用就加强了。

十一

这个报告是专家讨论以后提出的，根据今天大家议的，再作进一步地修改，然后再在一定的范围内组织讨论一下，看这些提法怎么样。我想对二○○○年的几件大事展望一下是有必要的，然后再组织讨论一下应怎么搞法，怎么才能实现的问题。

我总觉得这个报告里还缺点什么东西。作为一个发展战略，这里面还缺一个整个经济发展的问题。总而言之，我们要搞商品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很多新的东西，我们对此的认识还不很够。乡镇企业先都是家庭工业，搞起来以后再雇几个人，一下子就翻腾起来了。这次我看了几个地方，有些问题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事情那么一搞就解决那么大的问题？这次我去看了宁夏西海固，那是个很穷的地方，它那里有一个村发了财，开始发的是树苗的财，有几个专业户，带头搞树苗，一家搞树苗发了财，带起全村搞树苗，全村都发了财。这两年树苗不行了，大家就又都去搞烧瓦，因为大家富了以后，还没有条件盖砖房，就先盖瓦房，结果烧瓦的赚了钱。第一个发财是发树苗财，第二个发财是发烧瓦的财，至于第三个是发什么财就不知道了。我们中国的农民由穷到不穷，每个人增加十块钱，每个人都要增加一点消费，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市场，就会缺很多的东西。它那个地方，只要有一台手扶拖拉机每年可以赚六千元钱，这说明运输的市场很大。他那个村有八十多部拖拉机，我就找了几个人，他们烧砖瓦和运输都很赚钱，但是一到农忙就不干了，我问为什么农忙都不干了？他们说农忙庄稼没人收；我问为什么不雇人？他说也雇人，但是雇多了不行，雇多了要钱很

多；我说你算账嘛，你搞运输一天可以赚二十元，雇工充其量八元钱，赚二十元钱开支八元钱不是很合算吗？你为什么不搞呢？他说那也合算，可是雇人麻烦，到哪里去雇啊。这些东西是我们过去想不到的。在农民生活改善了以后，可以增加很多就业的机会，增加很多收入的机会。我原来以为温州还有些特殊性，现在看来，这些发展快的地方都是向温州的方向发展，过上两年都是那个样子，都是那种方式，就是从农村个体户搞起，那些落后的地方都是从商业、运输开始，然后搞加工。像温州那个地方，有的是从搞钮扣开始，富了以后自己形成一个购买市场，然后发展别的；再富了以后就向外面的市场发展，经历了这样一种发展过程。不懂商品经济的人都不明白，他到底是从哪里搞的那么多钱？实际上是他积累滚动发展起来的。我觉得有些问题我们没有完全懂得。所以说是一活百活，人也聪明了，能人也出来了。

中国的发展依托什么，特别是这么多人口怎么转上工业化，是个大问题，仅仅靠国家办些工厂就转上工业化是不行的。要走商品经济发展的道路，商品经济发展了，什么都有了，有经商的，有服务行业，然后发展到工业。很多东西都有一个过程，都是先从商业变为工业，特别是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先搞运输。我们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加以帮助、引导，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缩短技术很差、资金积累很慢的过程。

现在下面谈问题都不一样了，我这次到甘肃谈问题，李子奇和贾志杰[1]同志给我汇报工作，讲来讲去，他们落到一句话，什么地方没有办法呢？就是有七十万人的傻呆占很大比例的地方，确实没有办法，其它的地方他们觉得都有办法。这就涉及一个本质的问题了，还是人的因素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注 释

1．贾志杰（1935—），吉林扶余人。时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后任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湖北省委书记。

让农民企业家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中起带头作用*

一九八七年九月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全国十位最佳农民企业家鲁冠球、肖水根、常宗林、禹作敏、区鉴泉、卢志民、李桂莲、武吉龙、周作亮、郭建民时的谈话。

今天主要是和大家见个面，认识一下。你们有些情况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没有见过面。现在送给你们一个称号叫做“企业家”，“农民企业家”。我们过去叫干部，什么“企业领导干部”，现在有个称号叫“企业家”。什么叫“企业家”？跟干部有什么不同？当然企业家也是干部，但是干部不一定是企业家。企业家可能是厂长，可能是经理，可能还是将来的董事长。但是董事长、经理、厂长不一定是企业家。不是说当厂长就是企业家。所以什么是企业家，还应当把它推敲一下。我想，“家”就是专家。什么是“企业家”？就是善于经营管理企业的专家。什么叫“农民企业家”？就是这些专家不是来自什么专门学校，也不是从大工厂派下来的，而是土生土长，从农村干部中成长起来的。我认为“企业家”这个称号是个很好的称号，光荣的称号，但不是所有的乡镇企业的厂长都是企业家，也不是所有的只要搞了工业的就是企业家，或只要搞了企业的就是企业家。所以，我们说他不是“官”，不是做官的人，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干部。当然，刚才说了，我们原来的厂长，原来的经理，也就是原来的干部，可以变为企业家。我们的企业家也是干部。乡镇企业也好，集体企业也好，国营企业也好，但是干部不等于就是企业家。我想明确这一点很有好处。这就是说，你们作为一个企业家，就必须是善于经营管理，经营管理企业有方的人，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一个企业家，才能配得上这个“企业家”的称号。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现在我们要发展农村经济，要繁荣农村经济，要发展农村商品生产，迫切需要大批的农民企业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这样说，农民企业家的涌现，就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没有大批的农民企业家的出现，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经济的繁荣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反过来也可以说，农民企业家之所以能够出来，所以能够涌现，就是由于繁荣了农村经济，是因为有了发展商品生产这样一个方针才应运而生的。如果没有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方针，没有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方针，那么这些企业家就出不来了。你们在座的二十年以前都不是企业家吧？都不可能是企业家。因为那时还没有这个条件。所以

是时势造英雄。有这么一个条件，有这么一个环境，就可以出来了。我们怎么样做农村才能够富裕，农民怎么才能够富裕？就是必须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农民才能够富起来。你们刚才讲了很多例子，你看你们现在所有这些工厂的工人的工资都比城市的工人高，有一些比城里大学的副教授还高，我们大学的副教授平均约二百块钱。我们机关里边，司局长没有二百块，才一百多。所以要富的话，就得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什么呢？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可以搞。什么是第一产业，当然第一产业也包括农业中间某些企业，比如你办了养殖场，那也是一个企业吧。养殖场、养虾场、养牛场，这当然是企业了。另外就是采矿、挖煤、淘金，这都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就是加工，农村以农业为原料的加工也好，以矿产为原料的加工也好，都是第二产业；还有第三产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开旅馆办旅游都是第三产业。为什么说要搞一、二、三产业呢？因为各地条件不同，有些地方能搞第一产业，有些地方能搞第二产业，有些地方能搞第三产业。有些地方一、二、三产业都可以搞。在每一个产业里边，门类很多。第一产业有农业，有矿业，有畜牧业；采矿也有各种各样的，有挖煤的，有淘金的，有搞有色金属的，等等；第二产业就是加工，有轻工业，有重工业；第三产业也很多，运输、交通、商业、服务行业等。因为我们中国人口比较多，按人平均，不能说我们资源很丰富。但是现在我们农村里头，很多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很多可以开发的资源没有开发。当然有些资源的开发是容易的，有些资源的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那就先从容易的地方搞起，积累资金，然后再去开发，有个先后。总之，待开发的资源、还没有充分开发的资源，或者没有合理开发的资源还很多，不是说中国农村就没有什么事可以干了，一、二、三产业这个路子宽得很。

现在我们农村里头，出现了一种情况，叫“专业村”。一个村都是搞这种产品的。为什么出现专业村？就是这个地方有一种资源，人们还不会利用，突然有两个能人发现了这个资源，他一搞发了财，赚了钱，其他家家户户都学着干，你干我也干，你怎么干我也怎么干，一个村都干这种东西。干起来以后，有了积累了，这一种资源可能又不行了，但他有了钱，然后就可以转移，看市场什么东西有出路他就搞什么。我这个意思是说，门路是很广的。当然不能照搬，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不同情况。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同原来搞农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不影响农业。我们中国农村这么多人，一个人只平均有两亩土地，如果都去搞两亩地，肯定富不了。你怎么能富？提高粮价也富不了，你能提高多少粮价？一块钱一斤，一亩地也不过是一千块。现在如果提高到每斤一块钱，城市里还吃得起呀？农村里猪也养不起。所以中国没有大量的农业人口离开农业转到一、二、三产业上去，农村经济难以活跃，农民也难以致富。

我们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使农村相当多的劳动力，逐步地转到工业、商业、运输业，转到二、三产业上去。你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它富了，结果农业人口还占百分之七、八十。哪个国家只要很富，你

去问他吧，他的农民就一定很少。农民少不一定粮食少，这就是你们刚才讲的那个道理。农民富了，农村经济活跃了，一个人可以种一百个人的土地，搞农业这个人也富了。一个人种一百个人的地，和一个人种两亩地，你看不一样吧，你搞两亩怎么也富不了嘛。你要搞一百亩，像你们那个大邱庄就更厉害了，十六个人每人平均三百亩，他不就富起来了？就按他说的算吧，他的劳动生产率也相当高。所以在中国这是个历史任务。我们真正完成工业化，要包括这个含义。工业化只是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结果大量的人口还在农村种地，搞饭吃，还不行。过去毛主席有个话就是说“八亿人口搞饭吃”，这肯定是个贫穷的表现。搞来搞去，你肚子还吃不饱，连买食用油的钱都没有，这怎么行？所以真正工业化，不能离开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应该是一个概念。而真正要实现现代化，就必然要使农村经济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我们应该有这个方针，鼓励支持农村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逐步地由直接从事农业，转为从事其他行业，包括劳动力外流我们都赞成。在贫困的地方，当地一下子也不知道干什么，有些资源可以利用，他没有资金和技术去开发，他也可以跑到别的地方，先搞劳务。比如说，在山东牟平现在从外边去了多少人呢？二千多人，一个人再养一个人就是四千人，等于四千人是到你们那里谋生的。你那里（问禹作敏[1]）有没有外来人呢？有三千人，等于六千人。他们搞上几年，就有了资本。有了资本了，他也可能回到老家去，脑子也转变了。还有一个，关系也拉上了，就有了协作关系，等于培养能人。所以，我到了宁夏的西海固，这个地方非常困难，去年有十几万人出去到外地，原来都是没办法的。还有甘肃定西，二十万人出去搞。我是说，我们要坚持这个方针，不是要强调固定在那块土地上，把几万、几亿的劳动力固定在小片的土地上，要鼓励转到别的方面去，包括转到外地，只要有出路就好。浙江不是有好多人到外地去呀？温州人到外边做衣服，到外边修理什么东西，他们起了个很好的作用，外地都学会了。最近我到甘肃河西走廊武威县去，他们说原来是浙江人到那里去做衣服，现在他们当地人也学会做衣服了。我们有这个方针，也有这个条件，就是我刚才讲的，没有利用的可以利用，或者是已经利用的没有充分利用，或者利用的不大合理。尽管我们资源不是很丰富，但是没有利用、没有充分利用的，还有很多，有待利用。有了这个方针，也有这种可能。但是，究竟能不能利用呢？能不能搞起来呢？关键是有没有善于经营、善于经营管理的人才。

农村有本事的人，在农村里原来是干部也好，原来不是干部也好，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我们要善于发现这些人，善于支持这些人，鼓励这些人，使他们能够在发展农村经济，开发农村资源，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上，起个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先是带头搞起来，搞好，然后一带一大片。带头、骨干，引路的嘛，开创一条路子。就使我们原来农村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单纯的农业，转上农工商、建运服这么一条多种经营、商品经济的道路。为开创这个路，起个带头作用，引导的作用。因此，发展农村经济，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迫切需要农民企业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方针、任务，这样一个条件下，已经有了农民企业家一批一批涌现和成长出来的这种空前有利的条件。这一些人出来以后，完全可以大有用武之

地。要把农民企业家同我们现在这么一个历史任务联系起来。

我们的农民企业家，现在多数经营集体的企业。也有一些是经营个体的企业，有些企业还比较大，将来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个体企业，实际上是私人企业，这都是允许的。经营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农民企业家，在发展商品经济生产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在我们国家是允许的，是合法的，也是应当受到鼓励的。当然我们国家将来有些已不是一个家庭规模的个体企业，而实际上是一种私营企业，就是说他雇相当一些工人，是他自己的企业，那当然是私营企业。私营企业我们也应当是允许的，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活跃农村经济，他同样起积极的作用。虽然他是私营企业，但他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出现的一部分私营企业，它同过去那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私营企业不同，它所起的作用不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私营企业，当然只能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起作用。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一部分私营企业，这种企业实际上也是起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作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作用。所以我们对这些也不排斥，因为它这个经济不是孤立的，它和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私营企业，企业家，他们的素质也不一样。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些企业家，他们很多人首先主要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致富，而是想为我们国家现代化尽一份力量，这和过去资本家不一样。他们同工人的关系也不一样，现在这样一些私营企业家，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完全可以尊重工人主人翁的地位，发挥工人的积极性，尊重工人的合理化建议。所以说这样一些企业家，我们完全能够使他们正确处理他们同国家的关系，就是守法经营，遵守法律，为国家多做贡献。他们把企业办好，向国家多提供税利，向社会多提供商品。当然他们合法的利益，合法的利润，个人的收入，我们要保证，这是合法的。但是他们完全可以从一个更高的境界，更高的角度来处理他的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当然还有一个守法经营，不逃避税收，有个正确地处理同工人的关系等等问题。刚才我讲的，完全可以使我们国家出现这种私营企业的企业家，他能够尊重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尊重工人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性。一方面国家要保证他们自己的合法收入，另外我们也应当鼓励他们、推动他们能把更多的收入转向再投资，不要把自己所应得的利润统统消费掉。而他把利润转到投资，转到固定资产，实际上就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商品服务了。

当然，经营集体企业的企业家，或者个体的企业家，或者是股份制的企业家，也都有个如何对待国家，如何对待企业，如何对待职工，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如何对待自己，就是说，自己以什么样的境界，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经营企业，也有这么一个问题。经营私营企业，我想他们绝大多数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这个同国家保证他的合法利益，保证他的合法收入，并不矛盾。我们国家是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你们最近开这个会，开得很不错，希望今后能够对全国各个地方的企业家起一个很大的鼓舞作用，使我们在农村有经营才能的人变为农民企业家。为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生产，使农村富起来，贡献自己的力

量。我们这个会应当并一定可以起这个作用。你们是最佳的十个农民企业家，希望你们能够通过你们的实际行动，通过你们榜样的作用，使更多的企业家能够更好地成长起来。

注 释

1．禹作敏（1930—1999），天津静海县大邱庄人。时任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曾任村党支书，获天津市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因犯窝藏、非法拘禁等罪被判刑。

关于海南建省筹备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与许士杰、梁湘等研究海南省筹备工作时的谈话。

一、关于海南省的机构问题

海南建省搞个什么样的机构，要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出发，应成为全国省一级机构全面改革的试点。党的十三大以后，国家机关机构改革的工作就要开始，海南是新建省，又要搞特区，机构设置要突破现有省、自治区的机构设置，也要比现在的经济特区更精干、有效一些。绝不能照搬现在的办法。一条要坚持党政分开，一条要坚持政企分开。机构要搞小一点，多搞些经济实体。可搞若干个开发公司，给它以较大的经营权力，政府不要干预。要搞小政府，大社会。王全国[1]同志写了一封信，讲了很好的意见。贺光辉同志帮助研究一下。

二、关于撤销自治州问题

为了适应建立经济特区的需要，中央已决定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成立自治县，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一定要落实到县。自治州撤销后，通什市的房子不要随便占用。保亭县机关不要往通什市搬。市里有些房子可以做为旅游宾馆，有些可以办学校，也可以给科技人员住。通什市地处黎族聚居区，交通方便，气候好，可以发展为旅游城市。

三、关于海南的经济开发问题

海南建省后，经济开发要加快进行。原则上可以仿照现有经济特区的政策，有一些比现有经济特区还要放宽。

海南开发、建设要一块一块地搞，先搞几块。大块中也可以划分小块。先从沿海开始，不要全岛全面铺开。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发，都是先从边上开始的，如美国、加拿大都是从东到西发展的。这一边搞完再搞那一边。切忌全面开

花，到处铺摊子。

搞开发公司，也要按几块分别来设立。开发公司可以是自己办的，也可以是中外合资办的，也可以是外资独资办的。开发公司一定要和政府分开，这要立法。我们开始搞经济特区时，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海南开发建设资金，主要靠外资。第一，主要靠吸引港澳投资；第二，要比现在特区的政策放得更宽一些。当然对国内其他省市到海南投资也要鼓励，但更多的是吸引外资，吸引港澳的资金。要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可以做房地产生意，首先是政府把土地收上来，级差地租归政府。这是海南开发的重要资金来源。也要允许外商来经营房地产业。政府把土地收过来后，谁开发就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谁，期限可以长一些，比如三十年，五十年也可以。他开发好了，谁来建厂他再把使用权转让给谁。当然他自己建厂也可以。也允许他把使用权拿到外国银行抵押。大体上按照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采用的办法办。这是一篇大文章，要做好。

海南吸引外资，要有比现在的经济特区更优惠、更开放的政策，外资、外贸、外汇、关税等等，要通盘研究一下。要制定几项开放、搞活的基本原则，明年人大审议建省议案时，一起审议通过。国务院要搞一个海南省开放、搞活、实行特殊政策的条例，现在就着手搞。海南建省筹备组和国务院特区办同时搞，然后综合起来，协调各有关部门意见后，形成一个统一的东西，经国务院批准，从明年开始实行。有些事现在就可以先试着办。

海南开发建设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这是个关键问题。建省筹备组要抓紧研究制定吸引大陆上更多的科技人才去的政策。在国外的留学生也可以吸收一些。要盖一些房子，为科技人员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生活条件。明年人大一通过海南开放、搞活的政策，可能愿去海南的人会多起来。你们要注意一个问题，调人去，一定要过滤，党政干部要尽量少从外地调人，主要是更多地吸引科技人员进去，参加开发、建设。

四、关于海南建省筹备组问题

中央确定许士杰[2]、梁湘、姚文绪、孟庆平、王越丰[3]五位同志组成筹备组。许士杰为组长，梁湘为副组长。你们既要大胆工作，又要谨慎。要互相支持，互相尊重，要开创一个好的局面，开辟一条好的路子。建省的筹备工作现在就开始进行，实际工作要抓紧开展，与外商也可以接洽。重大事情由筹备组决策。行政区党委、政府的工作在筹备组的领导下，照常运转。筹备组的日常工作姚文绪同志多管一些。筹备工作有什么问题需要国务院办的，由陈俊生同志负责联系。

注 释

1．王全国（1919—2015），湖北襄阳人。时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广东

省建委、计委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湖北省委书记。

2．许士杰（1920—1991），广东澄海人。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曾任澄海县委书记，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3．王越丰（1930—1999），海南琼中人，黎族。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成员。曾任白沙县委书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副书记、州长，海南区党委副书记，海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在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二次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

尊敬的阿卜杜斯·萨拉姆[1]先生，朋友们、同志们：

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二次大会今天在这里隆重开幕了，我代表中国政府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第三世界科学院是在萨拉姆先生等人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几年来，它为发展第三世界的科学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萨拉姆先生为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次大会，是第一次在第三世界国家召开。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著名科学家在一起讨论科学发展问题，这本身就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科学力量的发展壮大和科学界的团结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九年来，中国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得到了包括第三世界广大科学工作者在内的国际科学界的支持，中外科技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将继续保持和发展这种合作。应邀出席这次大会的，还有许多来自发达国家科学界的著名学者、知名人士，他们关心第三世界科学的发展，共同参加讨论。我希望，这次大会不仅是一次在科学事业方面推动南南合作的大会，而且是一次促进南北合作的大会。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科学院建立以后，我们为朋友们做了一些事情，但我们的经济还不发达，心有余而力不足，做得还不够。旧中国长期受人欺辱，经济上贫困落后。新中国成立后才取得了今天的发展，因而最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心情。即使将来中国发达了，也不会忘记第三世界的朋友。我们将继续本着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加强交流、共同发展的精神，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加强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友好合作。

我们将继续实行面向全世界的对外开放政策，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我衷心地希望，第三世界和全世界科学界的朋友们，和我国科学界进一步建立起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对于促进各国科学的发展，无疑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希望，这次大会为进一步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做出自己的贡献，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注 释

1．阿卜杜斯·萨拉姆（Mohammad Abdus Salam，1926—1996），巴基斯坦物理学家。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83年创建第三世界科学院。

使创汇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先导*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对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我国农副产品出口的情况、问题和对策”一文的批语。

润生、拓彬、岚清[1]同志并纪云同志：

此件对农副产品出口的情况、分析和建议值得一看。前几年曾提出过沿海搞创汇农业，搞贸、工、农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似应作为整个农副产品出口的一个战略方针。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出口农副产品换取外汇和国内市场需求日益扩大的矛盾。实现这一方针，必须把促进换汇农业的现代化（科学技术、规模经营）作为重大措施，使换汇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先导。以农业为原料的制成品出口，也应按此方针进行。此事涉及外贸及农业整个布局，希望组织人共同探讨，提出实施方案。以上请酌。抄计委、财经小组。

注 释

1．李岚清（1932—），江苏镇江人。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外经贸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在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第二次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主席先生、各位议员、各位来宾：

在“世界五十亿人口日”的警钟敲过两个月后的今天，亚洲各国的议员们风尘仆仆，聚首北京，商讨人口和发展问题。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第二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国议员、国际组织的代表和来宾、专家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各位议员先生，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而人口问题与这两者均有密切的联系。

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兴旺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人口问题解决好不好，不仅关系到各国目前的社会发展，还关系到人类的未来。正确处理人口问题，已成为当代政治家议事日程上一项紧迫的重大的议题。

在世界人口问题上，亚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全世界五十亿人口中，有二十八亿多生活在亚洲地区，几乎占了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近二十年来，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引人注目。亚洲地区已成为世所公认的经济增长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亚洲的不少国家，推行控制人口的政策，采取适当的措施降低生育率，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还没有遏止，提高人口素质的任务也很繁重。亚洲人口很快就要达到三十亿，多数国家正面临着人口生育高峰。如不立即采取对策，这一地区的人口将更加膨胀，给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压力，严重地影响这些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是亚洲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三十八年中，我国大陆人口由五点四亿增加到十点六亿，几乎翻了一番。在世界百分之七的土地上，养育着世界上近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使我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中国从自己国情的实际出发，采取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办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支持与参加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不仅是为了我国的富强、民族的繁荣和家庭的幸福，而且会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人口稳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议员先生们，亚洲是古老文明的发祥地，对人类的发展曾经做出过光辉的贡献。我们应当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亚洲人口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亚洲各国政

府、各国议会、民间团体和亚洲人民的共同努力。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的成立，促使更多亚洲国家的议员们认识到了自己所肩负的重要使命，加强了各国议员在人口和发展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愿意继续同亚洲各国和世界上其他关心人口问题的国家加强合作，继续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和其他国际组织加强合作，为稳定亚洲和世界人口，为亚洲和世界的繁荣与和平，做出不懈的努力。

预祝大会成功！

谢谢主席先生，谢谢大家！

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汤姆·布罗考问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改革的步子肯定会加快而决不会放慢

布罗考（以下简称布）问：赵总理，现在人们都估计，在将要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您将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我想问一下，十三大之后中国前进的步伐将会加速，还是放慢，还是跟现在一样？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答：十三大的主题是改革。会议将总结我国九年来改革的经验和取得的成就，并且要指明今后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作出总体部署。我们将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前进，改革的步子肯定会比现在快，而绝不会放慢。我们没有理由放慢，因为几年来的改革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人民得到了利益，人民衷心拥护改革。所以，改革不应该、也不会放慢。中国的发展只有靠改革，别无他路。如果中国不进步，不能较快地发展，地球上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

对偏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言行都要批评

布：邓小平主任曾说过，现在要依靠年轻一点的人来领导中国。邓主任曾批评一些僵化的思想。但是，当有人批评僵化思想，批评领导的某些政策时，党却对他们进行惩罚。这是为什么？

赵：我想，你讲的是我们今年春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要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你知道，我们经常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于改革开放，有一个按照什么方向去改革的问题。保守的、僵化的、不赞成改革开放的思想当然要批评。但是，对那种想把改革开放引向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也要批评，因为这都不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也不符合人民的愿望。我们国家这么大，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无法保持安定团结，国家和社会就会动乱。如果天天动乱，连安定的条件都没有，你搞什么现代化，搞什么发展？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能不能顺利进行，能不能取得成功，一方面取决于我们能否排除来自保守的、僵化的思想的干扰，同时也取决于我们能否排除来自右的方面，就是要使改革脱离

社会主义方向的那种干扰。

中国青年对党的政策认识越来越清楚

布：总理先生，中国的年轻人过去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最近又看到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被镇压。你是否担心中国共产党在年轻人中的影响会削弱？

赵：这取决于我们党所奉行的政策能不能取得成果。今年春天，我们开始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青年中确实有一些人不大理解。但是我要告诉记者先生，从这半年多的变化看，青年人比刚开始时理解得深了些。伴随着他们自身的实践，中国青年将会越来越认识清楚，只有按照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既要坚持改革开放，排除保守僵化的倾向，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取得胜利。我对中国的青年是有充分信心的，正同我对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充分信心一样。

我们尊重知识分子但党员要遵守党规

布：请问，中国公民有哪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赵：中国的宪法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规定。如果你有兴趣，可以送你一本中国的宪法。当然，宪法的实施还需要制订很多具体的法律。我们这方面现在还有缺欠，就是还不够健全。我们近几年来正在做健全法制的工作。我们在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方面，应该说一年比一年进步。我们今后还将为此做出努力。政治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改善这方面的情况。布：请问，十三大以后，是否可能释放那些因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领导人而被关进监狱的人？

赵：据我所知，没有因这种情况而被捕或被关进监狱的人，没有因为批评我们党的政策、批评党的领导人而被关进监狱的事，不存在这种情况。当然，如果触犯法律，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仅仅是批评了领导人，就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那种事。

你大概听说过我们中国有一位方励之先生吧。

方励之教授是一位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前几年，他一直在许多场合，包括在大学的讲台上，批评中国政府和党的政策，也涉及到中国的领导人。但是，他现在仍在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从事科研工作。不久前，他出国参加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最近还接受了台湾来的两位记者的采访。他到现在也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观点。他曾经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能继续是党员了。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仍然受到尊重，仍然在一定的岗位上发挥他的才能。这个例子是不是把你提的问题说明白了呢？

最近，我们有几个知识分子党员被开除了党籍，还有几个党员被劝退党。是不是美国有些人把这看成是中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镇压了？我不同意这种看

法。

党员和公民不同。既然是一个政党，就会有它的党章和党纲。即便不叫党章、党纲，也会有它的规矩。既然参加了这个党，就要遵守这个党的党章、党纲，遵守党的规矩。如果一个党员本身又是作家、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将像对待其他知识分子那样尊重他，注意发挥他的作用；同时，他作为一个党员，我们又要要求他遵守党纲、党章。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请他不要当党员。我想他有自由，有遵守或不遵守党纲、党章的自由；我们党也有自由，就是同意或不同意他留在党内的自由。他们虽然离开了党，但作为知识分子，依然会受到尊重，依然可以在一定的岗位上继续发挥他们的才能。我想这不能叫镇压。

我们绝不去做不利于两伊和解的事情

布：总理，美国政府对中国向伊朗出售蚕式导弹感到非常担忧。中国是否向伊朗出售了蚕式导弹？

赵：我们多次声明过，中国没有向伊朗出售武器，自然也不会出售导弹。我们一直在为尽快结束两伊战争而努力，我们绝不做不利于两伊和解的事情。你知道，世界上军火市场很复杂，一个国家只要有钱，肯出好价钱，找到获得武器的渠道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至于世界上哪个国家向伊朗出售的武器最多，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布：总理先生，我希望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的政策是不向伊朗出售蚕式导弹，但是伊朗有可能通过国际军火市场得到中国的蚕式导弹？

赵：这个我不敢保证。中国同不少国家有军品贸易。我并不相信有人所说的伊朗的导弹是中国制造的。但我们也注意到国际上的反应，我们正在努力防止今后中国出口的武器通过别的途径转到两伊。

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

布：总理先生，中美十五年前发表了“上海公报”。中美之间重新建立了关系。十五年后，你认为中美关系应该在哪些领域得到改善，你对中美关系的哪些问题感到担忧？

赵：自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发表以来，应该说，中美关系总的来讲是好的。近几年来，关系比较平静，在有些领域有发展。我们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中美关系能够继续得到发展。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障碍、最困难的问题，也是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对中美关系始终是个很大的阴影，不知道哪一天会出什么事。我们希望中美双方共同遵守已经达成的三个联合公报的有关原则，排除这个障碍，消除这个障

碍，使中美关系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

还有一个贸易不平衡问题。美国还在不断酝酿搞保护主义的贸易立法。另外，虽然美国对向中国技术转让的限制有所放松，但限制仍然很多。在这方面，也希望美国继续做出努力，使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技术合作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在国际事务方面，我们两国在有些问题上有共同点，在有些问题上有分歧。我们主张通过磋商增进了解，逐步扩大共同点，减少分歧。中苏政治关系改善取决三大障碍消除

布：总理先生，有人说，中国同苏联就要改善关系了。您是否相信苏联人？

赵：应该说，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有了一些改善，在经济、贸易、技术、文化、人员往来方面有了一些改善。我看，因为对双方都有好处，中苏关系今后在这些领域还会继续得到改善。另外，我们双方已经恢复了边界谈判。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但迄今，总的看来，进展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中苏之间的政治关系没有变化。中苏之间的政治关系不取决于其他，而取决于三大障碍[1]能不能消除。

我们希望美苏双方改善关系减少对抗

布：看来，华盛顿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比较热乎起来，您对此是否感到担忧？

赵：我们对美苏原则上达成中导协议是欢迎的。我们希望美苏改善关系。它们双方改善关系，减少对抗，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缓和，也有利于世界和平。我们不担忧。

我们的政策是努力选拔培养妇女干部

布：总理先生，为什么在中国的领导层没有妇女？

赵：我的印象是，中国各级干部中妇女所占的比例并不算特别小。当然，妇女在各级领导层中的人数所以比较少，除了其他原因以外，恐怕还因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教育和文化条件受到限制。但是，我们的政策是，在各级政府机构里努力选拔、培养妇女干部。城市计划生育已有好的基础，困难在农村。

布：赵总理，您最近说，在控制人口方面中国似乎打输了一仗。你们在执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方面，是否还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赵：我不知道记者先生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没有说过中国计划生育失败了诸如此类的话。我只是说过，中国将进入一个生育高峰，这是从人口年龄结构上讲的。我国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人口增长比较快。当时出生的人现在正在进入结婚生育期，所以，中国将出现一个人口生育高峰。在我们的城市和经济

比较发达的地区，计划生育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人口增长率比较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问题。计划生育的困难在农村，尤其是在比较偏僻的农村。那里还存在多胎、早婚、早育的问题。在那里，从根本上说，从长远说，是整个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问题。

美国国会有人说，中国计划生育所取得的成就是采取严厉措施的结果，这是一种误解。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农民这么多，如果依靠强迫命令就能把计划生育搞起来，那简直是神话。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美国公众致以良好的祝愿，并祝你们主办的《中国电视周》节目取得成功。

注 释

1．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在蒙古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重兵，70年代末，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后又出兵阿富汗。这就是当时中国所说的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重大障碍。从1982年起，中苏两国政府特使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时，中方提出，为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苏方必须消除上述三大障碍，即从蒙古和中苏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并从柬撤军。

在全国计划会议与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这次全国计划会议与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一起召开，这很好。把经济工作的部署同改革的部署结合起来，这是一条经验。同时，如何把经济发展同改革结合在一起，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工作报告中，也准备讲一讲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经济工作的方针和经济工作的部署，要考虑到改革的内容和改革的部署；改革的部署，也要考虑到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工作的部署，两者相互结合，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这样，效果会好一些，也容易全面一些。我下面讲几个问题：

一、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方针问题

关于明年发展经济的方针、经济工作的一些重大措施和明年计划的安排，姚依林同志在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报告；关于明年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李铁映[1]同志在会上也作了报告。这两个报告都讲得很好。最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讨论了明年的经济工作。总的认为，明年必须进一步贯彻稳定经济的方针，并且要突出稳定物价。稳定经济，突出的是稳定物价。财政、信贷要从紧，要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规模，控制消费基金的膨胀。同时，要保持生产的稳定增长。对此，依林同志在报告中都作了详细的阐述。明年改革的中心和重点是，落实和完善企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以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活力，挖掘企业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在计划体制、物资体制、投资体制、外贸体制、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方面，都要进行必要的配套改革。总的来讲，明年就是两句话：经济要进一步稳定，改革要进一步深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

这次会议上，同志们讨论中间反映一些顾虑，集中起来有三点：第一，担心承受能力有问题，主要是讲省、市、自治区的承受能力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年出台的财政体制、投资体制、外贸体制的改革，都要加重地方的负担。地方能不能承受得了，主要是一个财力的问题。财政体制改革要挖地方一块，投资体制改革要甩到地方一块，外贸体制改革要让地方代理一块。挖一块、甩一块、代理一块，都要地方拿钱，“三管齐下”，地方感觉承受不了。二是明年经济

体制改革的方面比较多，步子也不小。再加上政治体制要改革，国家机关机构要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明年要换届。大家感到经济、政治任务都比较繁重，而且变动比较大，所以担心承受能力问题。第二，担心明年生产萎缩。财政从紧、信贷从紧后，担心会发生类似一九八六年上半年生产下降的问题。第三，担心地方负担加重后，势必要转嫁给企业，结果使企业也加重了负担，把正在搞活的企业搞死。这些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需要引起中央、国务院以及综合部门的注意。但是，我们认为，总的来讲，还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当前各种条件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也有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是有条件并且能够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当然我们还要认真研究和仔细考虑大家的意见，无论如何要防止发生地方承受不起，生产萎缩，或企业丧失活力的情况。这次会议讲的，还不算最后定。但我要打个招呼，看来计划和改革的盘子大的变动恐怕不可能，因为有很多方面制约着。大势已定，也只能如此了，大家要作好思想准备。这次会议定的盘子，同志们回去要向党委和政府汇报，认真研究落实，在思想上、工作上有个准备。我们也要认真研究同志们的意见，看哪些需要重新斟酌。等到十三大和一中全会以后，准备把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留下来开个中央工作会议，最后定案。

二、关于物价问题

物价问题是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成为严重影响经济稳定的因素。群众对此反映很大。城市、农村，机关、事业单位，反映都比较强烈。农民主要是对化肥、农用薄膜等乱涨价反映大，城市居民主要是对副食品、蔬菜和一部分工业品涨价反映大。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我们警惕。今年的物价上涨与往年不同。往年物价上涨，主要是国家调价，进行价格的结构性调整带来的。今年物价上涨，是在国家的调价措施基本没有出台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几年来没有过的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所以明年稳定经济，首先是要稳定物价。各种稳定经济的措施，要围绕稳定物价进行。改革也必须有利于稳定物价。稳定物价，是稳定经济的重点。

今年物价为什么上涨这么多？原因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票子发多了一些。前几年票子发得比较多，主要是为了适应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流通领域扩大而发生的。几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商品经济扩大了，货币流转速度放慢，货币需要量就要增加。因此，前几年票子多发，总的来讲问题不大，当然也多了一些。但究竟多了多少，这个账也算不清楚。特别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份一个月就发了100亿元，那是多了。去年下半年票子发放也偏松了一点，但总的看问题还不大。今年的情况就不同了。今年多发票子是在金融改革、拆借融资的步子加快，票子周转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发生的。据统计，今年资金拆借将达到500亿元。我们今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12%多一点，物价上涨6%多一些，而今年的货币发行却超过了这两者之和，将增长

20%以上。显然票子发多了。再加上前几年有些多发的票子还没“消化”完。前几年，除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容纳了增发的货币和物价上涨“消化”了一部分外，还多下来一些票子。现在的情况同产品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变的那几年，同银行没有进行改革的情况不同了，我们不能再多发票子，今后要严格按照货币发行的规律去办。二是供给不足。今年物价上涨，是蔬菜和副食品带的头，大体上占物价上涨的60%。而副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是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上涨，带动了副食品价格上涨。蔬菜价格上涨，除了受粮食、生产资料涨价影响外，今年还受倒春寒影响。当然，蔬菜工作上也是有些问题的。从这几年的经验看，蔬菜有蔬菜的规律，用一般对待小商品的办法对待蔬菜是不行的，关键是抓好增加蔬菜的供应。三是掌握紧俏的、重要物资的一些垄断性行业和国营企业哄抬物价，扰乱市场。这是个新的问题，从去年以来这点越来越看得清楚。今年物价发生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例如，粮价上涨，一方面是粮食不足，另一方面也与某些国营公司抬价抢购有很大关系，引起了“玉米大战”、“薯干大战”等。在钢材、有色金属和铁路运价等方面也发生过类似问题。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垄断性企业的行为，因为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很大。如果他们有越轨行为，干扰就非常大。许多地方反映农民根本买不到平价化肥。各地回去要认真查一查化肥渠道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虽然货源中有一部分是高价，但统配、挂钩的化肥是平价，为什么化肥转到农民手里都成了高价？这说明中间盘剥太多。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就不能顺利进行，经济就不能稳定。还有外贸部门收购哄抬物价，它也是垄断企业。湖南的苎麻价格就是外贸部门抢购抬起来的，还有兔毛也是这样。国际市场销售好的时候，兔毛抬到每斤八十元，现在降到二、三十元。豫东、皖北白薯干，去年抢购的价格比大米都贵，结果造成仓库大量积压。抬价抢购农产品，还给农民一个很不正确的信号，引导农民盲目扩大某种作物的面积；产品多起来以后，又来一个压价收购。这样，不仅扰乱了市场，而且对生产破坏极大。

对物价问题必须进行综合治理，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解决：第一，要控制票子的发行。第二，搞好工农业生产，增加蔬菜、副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的供应。第三，坚决同垄断性企业扰乱市场、哄抬物价的违法行为进行斗争。这不是一般的党风不正问题，而是扰乱市场的违法行为，必须严格查处，追究法律责任。

从长远看，今后稳定物价的方针也有三条：第一，一定要避免或基本避免通货膨胀，不能靠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当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能长期实行紧缩政策，总搞紧缩不行。一个时期膨胀得多了一些，就必须紧缩一下，明年就要这样办。就是说，货币发行要适度，既不能搞通货膨胀，又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有步骤地进行物价改革。总的来讲，物价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不行。当然，明年物价不能有大的改革措施出台。因为今年物价上涨，票子又发这么多，经济不太稳定，人心有点浮动。但从长期来讲，不搞物价改革不行，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这一关必须过。今后进行物价改革，总会有一部分价格上涨，但基本上是属于结构性的价格调整，与通货膨胀是两回事。当然，上涨幅

度要控制，究竟控制到什么水平，是一个课题，要很好研究。第三，找出一种生活指数与工资挂钩的办法，物价上涨就相应给以补偿，使绝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不致降低。怎么挂法比较复杂，如果找不到一条出路，对物价改革牵制就太大。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办法，因此群众特别敏感，领导上决心也不好下，一讲改革就感到物价非改不可，一考虑到群众承受能力又不敢出台。实行挂钩补偿的办法，就解决了这个矛盾。需要研究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只要物价是结构性改革，不是通货膨胀，同工资进行某种形式挂钩，是没有大的风险的。

当前，要采取措施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重点要放在对垄断行业和国营企业的违法行为作斗争上。要系统研究如何反对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和利用放开搞活以后的权力，依靠掌握的重要的紧俏的生产资料来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行为。要制定进一步加强管理和监督的有效措施，要立法，严惩违法者。根据我国的情况，生产资料，特别是一些紧俏的重要生产资料，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不会是很短的时间，在这样一些领域如何搞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看来，这种生产资料搞活同一般商品的搞活不能是一样的，对于重要的紧俏的生产资料，只能形成国家管理、领导下的生产资料市场。要按这个方向搞，而不能按一般自由议价那种市场的办法去搞。我们原来设想，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采取放和改相结合，计划外的放，计划内的改，使两个价格逐步接近。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不大现实，不大适合中国的情况。如果那些重要的紧俏的上游产品价格经常处在动荡之中，那么中游和下游产品的价格就不可能稳定。看来，在市场问题上，上游、中游、下游产品不应一个样。重要的生产资料将来恐怕还是可以实行两种价格，但两种价格都应置于国家的规定与参预之下，而不是一个计划价格，一个自由价格。具体说，就是一个是计划价格；一个是优待价格，即比较高的价格。至于高多少合适？这要看货源等方面的情况。总之，要使企业有利可图，有兴趣生产。而且这些生产资料必须公开进入市场，只能在市场上成交。计划内的，计划外的，将来都要通过市场成交，这才真正叫做有组织的市场。这里面可以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国家规定价格，包括国家限价；第二种是最紧张的产品实行“发粮票”，或者是采取石家庄的办法；第三种是有一些确实是供求缓和的，可以议价。但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叫做国家管理的生产资料批发市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控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乱涨价、变相涨价和中间盘剥。

这里，有必要讲一下对今年总的经济形势应该怎样看的问题。应当说，今年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也存在不稳定因素，物价上涨较多，票子多发了一些。但判断形势，不能只看这些。不要一说涨价，就认为形势不好，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峻。从宏观上看，今年工农业生产都是好的。工业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2%以上，农业情况也比较好，粮食总产量估计接近八千亿斤，棉花、油料也获得丰收。今年外贸出口创汇创历史最高水平，可超过300亿美元。外汇储备、黄金储备都是增加的。估计年底外汇储备可达到25亿美元以上。我们的外汇结存一九八○年还是负数，从一九八一年开始逐年增加，到一九八三年增加到80多亿美元。

以后两三年外汇基本上用得差不多了，去年年底外汇结存剩下14.7亿美元，今年又开始回升。今后我们还要逐渐积累一些。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搞建设，不可能储备得太多。

从总体来讲，我们的问题终究是大好形势中出现的问题，是属于前进中的困难，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当然，对目前出现的问题，不引起严重注意，不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是不对的。

三、关于控制货币投放问题

明年要实行从紧的信贷政策。由于今年的票子多发了一些，明年货币投放定在略低于经济增长率加物价上涨率的水平，是合适的。如果明年经济增长8%，物价上涨6%，明年货币投放就应略低于14%。这种货币投放是与明年整个国民经济的安排相适应的。工作做得好，不应该对生产建设有大的影响。关键是银行工作要改进，要做好。第一，融资、拆借和储蓄还有很大潜力。这个工作搞好了，就不会发生一九八六年第一季度企业之间经济往来开白条、互相拖欠的情况。第二，一定要在信贷结构调整上下功夫。现在，很大的问题是信贷结构不合理。现行银行机制还不适应这一要求，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改善信贷结构。应该贷的贷，不应该贷的不贷。坚决改变过去那种要放松时就一律放松，要收紧时就一律收紧的状况。银行信贷政策和信贷行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能否健康稳定发展关系极大。银行怎么搞，今年、明年一定要当作大问题，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切实改进。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一定要压缩预算外投资，基本建设也好，技术改造也好，都要压计划外、预算外投资。在流动资金方面，要压缩积压物资和长线生产所占用的资金。明年的信贷工作要与生产建设和产品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促短线、压长线。长线要限产，流动资金要减少，对适销对路的产品则要支持。生产工作要抓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计委、经委都要抓调整，银行工作一定要跟上。这样，对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保证国内外市场所需产品的生产，提高经济效益，都有好处。总的来讲，要保预算内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保必需的流动资金和农副产品的收购；压缩预算外投资，压缩积压物资和长线产品生产占用的流动资金。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希望各地党委、政府帮助银行研究出办法。要改变过去那种你让我支持就多发票子，你不让我多发票子就一律紧缩的作法。

乡镇企业必须逐步地、有计划地发展，这是我们的一条基本方针。不发展乡镇企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无法转移。没有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没有农业的规模经营。没有规模经营，就没有现代化农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不能大幅度提高，农村贫困面貌也不能得到根本改变。所以，乡镇企业应当发展，但要稳步前进。这几年发展速度过高，每年增长30—40%。速度过高以后，不仅资金、电力、材料等方面承受不了，而且也不容易把经营管理搞好，把产品质量搞好。我们认为，今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从全国来说每年增长15—20%可能比较合适。这几年信贷一松，乡镇企业就高速发展；信贷一紧，乡镇企业就停步不前。这种

状况不行，必须给它创造一个稳定发展的条件。目前乡镇企业占用的资金过多，必须适当压缩和控制。

总之，只要做好了工作，实现货币投放略低于经济增长率加物价上涨率的水平，生产也不会萎缩，而且经济效益肯定会有改善，适销对路产品就会增产，库存积压就会下降，长线产品、盲目生产也会改变，预算外投资也会减少。这样制约因素就会变成积极因素。

过去国家搞建设，资金主要靠财政，现在已经主要靠银行了，今后将越来越依靠银行。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因此，今后建设工作能否搞得好，能否顺利发展，银行工作抓得好不好，关系很大。

四、关于增加生产和改善供给问题

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从根本上讲，必须通过发展生产，改善供给去解决。明年的工业生产速度，高了低了都不好。今年的工业增长速度偏高，明年大体在10%左右比较适当，计划指标定的是8%，大家努力去完成。明年在工业生产上要着重抓两条：一是落实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这样很多问题都可解决，企业活了，效益和积极性就都有了。二是制止生产资料乱涨价。这两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事情就好办了。当然原材料供应等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明年的生产还有一个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问题，要促进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限制和停产长线产品，这些都要下些功夫。明年财政、信贷要实行紧缩，要把这个限制因素变成促进因素，紧缩一下，促进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业问题，除了大力抓好粮食生产以外，要注意搞好蔬菜和副食品的生产。这几年城市经常发生“菜篮子”问题，影响很大。我看，解决城市的蔬菜问题，主要有两条：一个是大路菜，一个是多样化。大路菜要保证供应，并且价格要稳定；在这个前提下，实行多样化，把精菜、细菜放开，搞自由议价。看来，城市蔬菜采取完全放开的办法不行。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议一议，我们总是要不断地总结经验的。大路菜，看来基本上还是要实行计划生产，安排播种面积，进行等价交换，签定合同，保证上市，使大城市居民都能吃上大路菜。有了这一条，其他细菜、鲜菜、大棚菜价格高了，也有话讲了。收入多的家庭，大饭店，可以多吃细菜、鲜菜；低收入的，主要吃大路菜。副食品生产，主要是粮食问题。现在猪肉紧张，我看这是暂时现象，估计明年下半年情况会逐步好转。国务院已下决心年内净进口1000万吨粮食，今年农业的情况也比较好。粮食情况长期可能是偏紧的，但只要安排得好，紧张的情况会逐步缓和下来。现在是暂时困难，忍受一下就是了。有的地方恢复了猪肉凭票供应，这也是暂时的，主要是防止城市猪肉外流，不会又进入凭票时代，不要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粮食生产必须继续抓紧，千方百计争取有个好收成。明年一定要把化肥、农用薄膜、柴油、农药的供应搞好，把价格降下来，消除中间盘剥。这是关系工农联盟的问题，从上到下要把它当成个大事。农民对这件事意见太大了。现在农民

所以不愿意把粮食卖给国家，这是一个主要原因，认为是不等价的交换。化肥、薄膜、柴油等乱涨价，问题主要是出在中间环节上，谁经手都想抓一把，形成“商品大旅游，价格滚雪球”。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加以解决，今年发生的，要认真去检查，严重的要追查责任。明年要采取有效措施杜绝这种行为。

在外贸上，总的来讲，我们面临着一个出口的大好形势。明年我看形势也会是好的。由于日元升值，台湾、南朝鲜、新加坡货币升值，给我们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出口产品的生产、收购和开拓市场都要抓紧，不要丢掉这个机会。各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要抓好外贸出口工作。最近广东等地区搞来料加工、“三来一补”，发展很快，这是一种好的形式，大有发展前途。沿海有条件的地方如何迎接这种新的形势，要很好研究，提出对策。

我们要增加出口，而某些产品国内市场又紧张。这样，国内、国外市场就需要进行统筹安排，这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关于农副产品出口方针问题，统计局搞的一个材料写得很好。我们过去出口主要靠农副产品，大约占出口总额的23%。加上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产品，则占全国出口额的一半以上。但是出口的农副产品大都是低档的东西，数量很大，创汇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多创汇就要多出口，多出口就同国内市场发生矛盾。这里就提出了农副产品的出口方针问题。农副产品出口，总的来说，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努力上档次，因此需要发展创汇农业。要同国际市场结合起来考虑，从外贸需要出发，来考虑加工，再考虑加工需要的农副产品原料。过去我说过搞“贸工农”，现在不少地方叫创汇农业。不是在数量上、而是在质量、在花色品种和上档次上做文章，创汇也必然会多。在沿海地区这应作为整个农副产品出口的一个战略方针。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出口农副产品换取外汇和国内市场需求日益扩大的矛盾。实现这一方针必须把促进创汇农业的现代化作为重大措施，使创汇农业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先导。所谓现代农业，我看有两条，一条是搞规模经营，包括实行机械化；一条是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提高质量，增加产量。沿海地区要注意发展创汇农业，内地有些具备条件的城市，也可以搞。采取一切措施，多出口，多创汇。

五、关于控制建设规模问题

当前影响经济稳定发展的，主要有两个干扰因素：一是一些国营垄断性的行业和企业哄抬物价；二是预算外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控制建设规模的重点，是控制预算外投资的规模。这个问题年年讲，但年年解决不了。发展下去，可能出现两种后果：一是预算外投资控制不了，继续膨胀，而必要的一些重点建设还继续搞，这样两者加在一起，就造成建设规模更加膨胀，超过了国力的可能，难以为继，最后有可能被迫进行大调整。二是预算外投资规模压不下去，为了控制投资规模，只好压缩计划内的，伤筋动骨，结果重点建设规模越来越小，搞不下去。这样，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同加工工业的比例就越来越失调，没有后劲，最后有可能造成经济萎缩。现在，已经有这样一种苗头。计划外固定资产投

资膨胀，已是一种顽症，是稳定经济的一个主要威胁。这次，同志们反映了很多矛盾和困难。我看，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找到出路。全国要保重点建设，银行信贷要控制，矛盾如何解决？看来要从银行信贷结构上去研究这个问题。银行的资金中，应当从短期资金中转变一部分作为长期资金，用于支持重点建设，支持计划内的建设。这样，一则使重点建设资金有了保证，二则可对预算外建设进行釜底抽薪。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重点建设、预算内建设压缩得越多，反而给预算外建设投资创造更加膨胀的条件。因此，可以考虑，今后国家要向银行发放建设债券。银行的资金包括存款，必须拿出一定的比例购买建设债券。当然，这里需要研究解决财政的贴息问题。过去也曾经考虑由银行向社会发行债券，但由于债券利息高，少发一点问题不大，发行多了势必与储蓄打架，竞相抬高利息。所以，根本的办法，是银行要购买债券。今后，基本建设要实行基金制，基金来源有两个：一是财政方面划出一部分财源作为基本建设基金；二是银行购买建设债券。请大家再进一步研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明年就开始实行。

再有，现在城市建设摊子也太大，标准太高。从京、津、沪三大市一直到县城、集镇，建设规模都很大。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和适应城市人民生活的需要，重视城市建设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摊子太大，要求太多，标准太高，互相攀比，搞形式主义。这是不符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的。过去，在这方面补一补课是需要的，但像现在这样铺开大搞不行。要解决城市建设规模过大的问题，必须严禁摊派。国务院已发文件作了明确规定，立了规矩，就要执行。现在摊派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主要是检查不严，处理不力。“人民城市人民建”这个口号，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好多事可以发动人民去做，但是不能以此为借口来随便摊钱、摊物。所以，解决预算外建设摊子过大的问题，就是两条：第一，银行要购买建设债券，用于重点建设，减少用于一般加工工业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的资金；第二，严禁城市搞摊派，适当缩小城市建设规模。

六、关于控制消费基金问题

在压缩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必须注意控制消费基金的膨胀和解决消费超前的问题。我们连续几年都是工资奖金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前几年带有还账的性质，今后就必须注意控制了。消费基金膨胀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改革中很容易发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必然要影响改革。不仅我们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东欧国家也有这种情况。最近，卡达尔[2]同志在匈牙利国会上有篇讲话，讲得非常深刻。他说：“自从我们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来，实际上一直在我们制度中存在着一种自然错误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先炫耀成果，规定发展年金、补贴，还实行免费教育，全民公费医疗，等等。其实我们尚不具备这样的物质基础。其结果是我们的许诺不能百分之百的兑现。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也是这方面的好例子。我们在进行各种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然后去执行。‘支出’部分我们总是能够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而‘收入’部分则不

是这样。其后果是我们的消费和分配总是高于实际生产。多年来情况就是这样。看来，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薄弱点。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们这个教训对我们是非常有益的。现在，南斯拉夫所遇到的困难，匈牙利所遇到的困难，都与这个问题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

这几年，我们年年注意控制消费基金，但是没有多大效果。因为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办法。平均主义的办法，控制严了，生产消极；控制松了，财政吃不消。今后，我们基本上要推行计件工资、定额工资，推行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挂钩等。这样有一些企业虽然工资奖金可能高一些，但这是效益高、劳动生产率高带来的。实行这种办法，可以避免平均主义，国家、企业、职工都从挖掘潜力，增加效益中得到好处，社会财富也会大大增加。

在消费基金里面，还有个消费结构的问题，有个高档消费品的供求平衡的问题。中国十亿人口，消费结构包括衣、食、住、行都应当有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国策，如果没有一个长远方针，再盲目搞下去，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持久的，也是行不通的。就拿啤酒来说，西方国家人们普遍喝。中国几年以前只有100万吨啤酒，现在已搞到600万吨，正在建设的还有300万吨。如果大家都喝啤酒，并由城市向农村扩展，那粮食消耗量就会大大增加。现在一年光啤酒消耗粮食就将近100万吨。还有，中国人以后都放开吃猪肉，那猪饲料的消耗也受不了。生活好了，大家穿衣服都穿纯羊毛织物，国家也受不了。中国的消费结构怎么改变，值得研究。虽然现在看起来问题不大，但这个趋势值得注意。应当看到，随着购买力的提高，人们的生活仿照西方的模式可能是一个趋势。但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人均只有800斤粮食，按照西方的消费模式，一个人就要有2000斤粮食。那怎么行呢？我国的食物结构、穿衣结构、住房结构，都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定了这么一个国策以后，还应有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加以引导，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只能按照小康水平来设计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对高档消费品，要通过征消费税等方式加以限制。住房问题要好好研究，住房改革，实行房屋商品化，应当积极有步骤地进行。这对引导大家把钱用在住房建设上，改变消费早熟、消费超前的情况很有好处。

此外，还有对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的税收问题，要认真研究。在我国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都是合法的，允许其发展，但对他们的收入必须用税收来调节。我们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调节政策。现在对一些个体工商业者、私营企业主没有很好地执行税收政策。所以，大家不满意，感觉不大公道。这一方面是平均主义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现在确实出现了不公正，需要通过税收等经济杠杆加以调节。这也是合理的，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七、关于明年的改革部署问题

明年，经济体制改革要进一步深入，重点是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企业的承包

经营责任制。现在经委正在制定一个实行承包制的条例，征求大家意见，将来修改以后要颁发。我们要按这个条例，进一步地完善承包制，逐步使它制度化。实行承包经营中，还有许多新的问题，包括防止企业短期行为的问题，企业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承包经营者的待遇问题，经营者、经营集团同职工的关系问题等，我们要进一步解决。当然，不可能完全规范化，不一定是一种模式。但是，总是要逐步制度化。实行承包制是一项长期的政策，明年生产能不能搞好，效益能不能上去，财政收入能不能增加，关键要看承包经营责任制能否进一步完善、进一步落实。我认为，明年是我们的企业通过承包制发挥效益的时候，将会把企业存在的巨大潜力挖出来。

物资体制改革，第一步就是由各个条条管物资统一到一个物资管理委员会来管。当然，这首先是统配物资。只要有了这样一步，才能够进一步搞国家管理下的生产资料市场；没有这一步，搞起来就非常困难。石家庄的经验为什么这样难推广，原因就在这里。这样做看来好像是更加集中，实际上更加集中是为了创造形成国家管理下的生产资料市场的条件。这个问题大家也提了一些意见，有些顾虑。这一改革，我们的意见是坚定不移，而且要加快。为了稳妥起见，省这一级可以暂缓改，不忙动，中央各部先动。第一要坚决搞，第二步子要加快。所有你们反映的那些顾虑，只有通过加快改革才能解决。

投资体制改革主要是三个问题：基金制、投资公司、招标制。大家对投资公司的问题讲了不少意见。这个问题，看来需要好好研究。究竟投资公司怎么搞，各种关系怎么搞，我看不外乎三种情况：弄清楚了，就坚决干；研究不那么清楚，明年可以先试点，在一两个领域，或者某一个地区、某一个省、市试点；现在投资公司还没有章法，其他的还按原来的部门先安排明年计划。

外贸体制改革，明年就是在三个行业试点，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这要坚决搞。面上，主要是完善承包，尽量减少补贴，控制换汇成本。另外，原来由国家统一进口的那部分物资要甩到地方一部分。这个问题，大家感到比较困难。我们也担心如甩得不恰当，会向企业转嫁负担，引起涨价。现在有两个“甩”：一个是原来由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中甩一部分给地方；一个是物资进口甩一部分给地方。看来，不甩给地方是不行的。甩多少，还要研究一下。

财政体制改革，一是把今年向地方借的钱，做为明年中央财政收入的基数。同时，要划分税收。这是个重大改革，势在必行。二是明年要继续开展“双增双节”运动，而且要更加广泛深入地进行，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今年第四季度的收入要抓紧，开支要压缩，不能等到明年；货币投放，今年第四季度也要从紧安排。

总的来看，十三大以后各项改革的步子要加快，明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在新的形势下迈出重要一步，任务相当繁重，各地要切实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妥善安排，精心指导，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明年的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搞得更好。

注 释

1．李铁映（1936—），湖南长沙人。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曾任沈阳市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兼海城县委书记，国家电子工业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卡达尔（Kadar Janos，1912—1959），生于今克罗地亚里耶卡市，1931年加入匈共。时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政府总理。曾任布达佩斯市委书记，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八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

一九八七年九月三十日

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今晚，我们在这里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八周年。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警察，向全体劳动者和一切爱国人士，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来宾和驻华使节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关心和支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以来，在深化企业改革和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好势头。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农业呈现丰收年景，城乡市场日趋活跃。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完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充分挖掘潜力，千方百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我们要把“双增双节”运动深入、持久、扎实地开展下去，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严格控制消费基金膨胀，千方百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年初以来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使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巩固了。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行之有效的路线，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下去，排除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我们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教育继续引向深入。

当前，全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奋战在各条战线上，争取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三大将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大会将对九年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进行全面的总结和系统的阐述；将继续坚持和发展深受全国人民拥护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同时把群众普遍关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上重要议程。我们深信，这次大会必将全面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值得庆贺的是，继香港问题解决之后，澳门问题也通过谈判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又向前

迈进了一步。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按照“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台湾同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并在此之前实现“三通”。如果台湾当局能够放宽到大陆探亲旅游的限制，这将符合海峡两岸同胞盼望已久的骨肉团聚的愿望。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我国将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我们反对军备竞赛，欢迎美苏达成销毁中程核武器的原则协议，希望它们认真做到，并继续大幅度裁减各类军备，以减少对各国安全的威胁。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世界各国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互利合作。我们反对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主张采用和平方式，公正合理地解决国际争端。我们将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边，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而竭尽自己的努力。

现在，我提议：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八周年，

为伟大祖国的统一和富强，

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干杯！

给中国记协成立五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九月三十日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在中国记协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特致以热烈的祝贺！五十年来，中国记协和全国广大新闻工作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希望你们进一步团结全国新闻工作者，搞好新闻改革，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充分发挥新闻工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坚持全面宣传两个基本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九月三十日

关于党政分开*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预备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这里，我想着重讲一下党政分开的问题。因为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

这次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十三大报告》有这个内容，《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也有这个内容。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从展开。在全会讨论两个文件之前，我想作几点说明。

现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讲政治体制改革。所有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无例外地都提出要克服党政不分的弊端，要充分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看来，在社会主义各国，党政分开是个大的潮流。这项改革，非搞不可，或迟或早，总得进行。还需要指出一点，就是在党政不分的程度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是搞得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撇开中央一级、地方各级的情况不说，至少在基层，在企业事业单位中，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多少年来一直是搞行政首长负责制，企事业单位的党委则同我们的机关党委差不多，行使保证监督的职能。而我们，除了在解放初期，在东北和其它某些地区，曾经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实行过一段厂长负责制以外，从五十年代后期起，一直是强调党委对企事业单位的一元化领导，甚至把是否承认这种体制作为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标志之一。每搞一次运动，这种体制就强化一次，以致使党委包揽了许多行政事务，并且相应地建立了相当庞大的办事机构，配备了许多脱产干部。所以，对我们的同志来说，从一元化领导到党政分开，这个弯子是拐得相当大的。对此，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现在提出党政分开，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体制的一大改革。党政分开，有中央、地方、基层等几个层次的内容。（1）党中央，要对各方面工作实行政治领导，即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内政、外交、经济、国防等重大决策方面实行领导，并向中央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2）省、市、县各级地方党委，应在执行党中央统一路线和国家统一政令的前提下，在本地区实行政治领导，具体规定了五条职责[1]。（3）乡镇一级的党政分开，打算有意识地推到县一级关系理顺后再加考虑。（4）企业党委，一律起监督保证作用；事业单位的党委，随着行政

首长负责制的执行，逐步转变职能，起监督保证作用。看来，中央一级，困难不大。现在党中央并没有什么与政府对口的工业部、财贸部、文教部等，今后要做的，是把政府各部的党组逐步撤销，国务院提请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决策的议题不再经过中央书记处“过滤”，同时注意改进领导方式、工作方法。地方各级，过去设立了一些与政府对口的机构，而且还配了一些工业书记、农业书记、财贸常委、文教常委等等，包揽政府的工作比中央多，实行党政分开的工作量就比中央大。但是，既然中央一级可以实行党政分开，地方上就不应该有什么党政分不开的理由。问题在于基层，过去配了那么多的专职党务干部，包揽了那么多的行政事务，要转过来，就得有很坚决的态度，做很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转变过去那种党委包揽一切的老习惯、老传统。在步骤上，企业党委应该坚决地、主动地转到执行保证监督的职能方面来，以配合经济体制改革，保证厂长负责制和经理负责制的顺利推行，不能犹犹豫豫，动动摇摇；学校、研究所党委的职能转变，步子应该稳妥，但方向也必须明确。

我们许多同志在党政分开问题上之所以存有某些顾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党政分开的好处没有多少体会。好处讲多了，顾虑就会减少。希望大家在全会上多议一议党政分开的好处。我在这里也着重讲一下党政分开的好处。我想至少可以讲四条：

第一，党政不分不是提高或加强了党的领导，而是降低、削弱了党的领导，党政分开才能真正提高并加强党的领导，才能真正提高党的政治领导的水平。领导者直接包揽被领导者的事情，是把自己降低到被领导者的地位。党委包揽政府事务，就把自己变成了政府；包揽企业事务，就把自己变成了企业。党是政治领导者，应当做政治领导的工作。分钱，分物，定项目，批条子，这些都应该是政府部门的日常事务，党委直接出面干预，不仅不能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且也使自己放弃了自己应起的作用。领导，一定要很冷静，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不能陷到事务堆里。成天陷在琐细的事务之中，不可能真正成为好的领导。这里有个放心不放心的问题。有人认为把工作交给政府不放心，怕抓不好，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许多同志今天当书记，明天当市长，不是照样抓了工作？如果书记不管具体事务，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倒是有更高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屁股坐在具体事务堆上，看问题就有局限性。

第二，党政不分使党顾不上抓党的建设，党政分开才能真正做到“党要管党”。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党委就应该把自身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必须善于摆脱各种繁杂事务的干扰。别的方面的工作，有政府，有人大，有各种社会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在做，应当把他们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但是，党的工作、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党委责无旁贷，其它各种组织无法替代。在执政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使我们党胜任愉快地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如何使我们党经得起执政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如何使党在群众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这是一个崭新的重大课题。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党的群众工作，必须由各级党委亲自

抓，而且必须认真抓好，千万不能“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第三，党政不分使党委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甚至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党政分开，可以使党处在超脱的、驾驭矛盾和总揽全局的地位，从而发挥“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各种社会成员当然具有共同的利益，但决不能无视它们的特殊利益。有矛盾，就要协调。政府固然要协调各种利益、各种矛盾；党委更要善于做协调工作。地方党委的五条职责中，就有一条叫做“协调本地区各种组织的活动”。党委自己包办了政府的工作，又包办了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的工作，什么都是党委自己决定、自己执行，就使党委变成了当事人的一方，毫无回旋余地，实际上使自己丧失了本来应该具有的协调矛盾的资格。

第四，党政不分使党委自己成了执行者，党政分开才能使党委真正具有监督的职能。为了提高效率，必须强化行政系统，但也唯其如此，必须加强监督。自己不能监督自己。你自己包揽了行政工作，就失掉了监督行政的资格。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中，克服官僚主义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党委包办行政工作，自己就会成为滋长官僚主义的温床；相反，党政分开以后，党委不管日常行政工作，就能使自己真正成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力量。

我就讲这四条道理。这四条道理，都说明了一点：党政分开的方向必须明确。为了不降低党的领导作用，为了使党委具有协调各方和监督行政的作用，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都必须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至于具体的形式、方法，那是技术性的问题，应该在实践中探索。干部配备，那是根据党政工作的具体特点如何适当调整的问题，也不应该成为党政不分的理由。如果从上到下，大家都认识到党政必须分开的道理，都认真地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转变，党政分开是可以较为顺利而又平稳地付诸实施的。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其它各项措施也就能够较为顺利而又平稳地逐步展开。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

当然，对党政不分这种状况，要作历史的分析，不能简单化。过去采用这种体制，有过去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这种体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是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强化的，是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现在情况不同了。现代化建设需要发挥各种组织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需要把各种组织的正常秩序建立起来。战争年代的体制不能适应和平时期的需要，群众运动的体制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高度集中的体制适应不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形势、任务起了变化，领导体制就不能固守原来的那种方式，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实行党政分开，也要讲清这方面的道理，千万不要把做党的工作的同志搞得灰溜溜的，好像犯了什么“错误”。千万不能这样。相反，要使大家认识到，所以必须实行党政分开，是因为形势发展了，党的事业发展了，对党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自觉地、积极地、高高兴兴地投人这场改革，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注 释

1．省、市、县地方党委的五条职责是：（1）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2）保证国务院和上级政府指示在本地区的实施；（3）对地方性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4）向地方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5）协调本地区各种组织的活动。（见《十三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部分）

附录

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日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决定将其主要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宗旨、目标和内容

1、改革的宗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改革的长远目标：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3、改革的近期目标：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以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4、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1）党政分开和完善党内制度；（2）权力下放；（3）机构改革；（4）人事制度改革；（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7）加强法制建设。

二、党政分开

1、党的领导作用：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内政、外交、经济、国防等重大决策的领导，并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党政分开的原则：党政分开是指党政职能分开。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制度化。党政分开不是降低和削弱党的领导，

而是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政分开，有利于提高党的决策水平，有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有利于发挥党的“协调各方”的作用，有利于加强党的监督职能。实行党政分开，是党的领导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必须坚定而又稳妥地进行这项改革。

3、调整工作关系：（1）实行党政分开后，中央财经小组、外事小组、政法委（可改称中央政法协调小组）仍保留，职能是研究大政方针，不直接分管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政府及相应部门的负责人可参加有关小组的工作，议定事项由政府按法定程序执行。（2）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提出的有关议题，不再经由中央书记处审议，直接提请政治局或常委会决策。

4、改革党的组织形式：（1）各级党委不设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2）撤销各级党委办事机构中与政府重叠对口的部门。（3）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党政工作的不同特点，调整领导干部的配备，并精简各级党委机构，减少专职党务干部。（4）企事业单位中的党组织，原则上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逐步向少设或不设专职机构和尽量少配脱产干部的方向过渡。

5、关于党组：政府各部（厅、局）的党组原则上都应撤销。具体实施时，先撤经济部门的党组。至于政府文教部门、公安司法部门和法院、检察院的党组，如条件不成熟，也可以暂保留一段时间，待条件成熟时再撤。为协调党员代表在人大中的活动，应考虑在人大常委会中设立党组。

6、中央、地方、基层的党政关系：（1）党政分开，精简机构，调整干部，中央、地方、基层各级都要进行，但它们的职能并不完全相同。（2）党中央对各方面的工作实行政治领导。（3）省、市、县各级地方党委，应在执行党中央路线和保证国家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对本地区实行政治领导。它们的职责是：执行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保证国务院和上级政府指示在本地区的实施；对地方性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向地方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协调本地区各种组织的关系。它们应该抓方针性政策性的大事和党的建设，不应干预政府的日常工作。它们与同级地方国家政权组织的关系，应当因地制宜，在实践中进行多种形式的探索，逐步形成相应的规范。（4）乡镇一级的党政分开，涉及面太大，可以有意识地放一放，待县一级关系理顺后再考虑。这样有利于稳定农村局面。（5）企业党委不再对本单位实行一元化领导，而应起保证监督作用，支持厂长（经理）负起全面领导责任。事业单位的党委也应随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推行，逐步转变职能，起保证监督作用。

三、党的制度建设

1、理顺中央领导机构的内部关系：（1）十三大后，党的日常决策职能由政治局的常委会行使。书记处是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办事机构，不再召开决策性的例会。中央书记处书记改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名，中央委员会通过。书记处人

数要精干，尽量避免与政府交叉。（2）政治局常委会负责对政治局授权处理的日常工作和需要紧急处置的问题进行决策。一般每周召开一次例会。（3）政治局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决定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人事问题，并听取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一般每月召开一次例会。地方各级党的领导机构，也要制定相应的制度。

2、加强中央委员会的作用：中央全会每年召开一至二次（必要时可随时召开），听取和审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决定大政方针。

3、关于代表大会常任制：党的八大曾决定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这是个好办法。在和平条件下，五年开会一次很难发挥代表大会的最高领导机关作用。但目前条件不具备。将来可考虑实行代表大会常任制。每届代表一经选出，任期五年，在任期内如有必要，即可召开会议，审议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决定重大事宜。

4、关于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一九八二年明确指出，设顾问委员会是过渡形式，经过十至十五年取消。如何逐步实现这个设想，请中顾委提出方案。

5、关于纪律检查委员会：今后，法纪和政纪案件分别由国家司法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处理，纪委应集中力量抓好党纪、党风。各级纪委常驻各部门的纪检组原则上可以撤销。请中纪委提出改革方案。

6、加强党的制度建设：（1）进一步明确，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要向选举它的代表大会或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执行其决定。（2）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原则，健全党内的表决制度和选举制度，制订维护集体领导的具体制度，对党的各级领导人实行必要的纪律制约和民主监督。（3）制订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具体办法和纪检工作规则。（4）党的重大决策要听取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见，要提高党的领导机关活动对党员的开放程度，及时向全党通报情况，并逐步形成制度。

四、权力下放

1、权力下放的基本原则：在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凡是适于下边管的事，都应由下边去决定和执行；适于地方管的事，交给地方去管；适于企事业单位管的事，交给企事业管；适于群众组织和群众自己管的事，由它们自己管。

2、重点是扩大企业和中心城市的权力：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随着政企分开，企业的自主权应当进一步落实。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心城市的作用将显著提高。因此，下放权力必须以扩大企业和中心城市的权力为重点。凡是规定下放到城市和企业的权力，一律不得截留。这是打破条块分割的必要措施。

3、相应改革规章制度：下放权力，要做的事情很多，不可能通过一个文件解决所有的问题。各级各部门都应从全局出发，结合转变职能和改革机构，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意见，逐项作出具体规定，形成制度。

五、机构改革

1、机构改革的原则和实施：机构改革应同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并以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和实行政企分开为关键。这项工作应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展开，但不应强求上下“机构对口”。现在就要抓紧研究和设计改革中央政府机构的方案，经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后组织实施。

2、妥善处理机构变动中的人员安排：机构改革要做到工作能正常运转，人员有妥善安排。从总体看，现有人员主要是结构和分布不合理，业务素质不够高；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人员太多，综合、监督、调节、信息、咨询、法律等部门和某些企事业单位则需要增员。应抓紧转移人员，合理调整分布，同时抓紧做好人员转移前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工作，以减缓改革过程中的困难，使现有人员各得其所。今后，各级政府应及时公布准备增员的部门和单位名单，凡自愿转入这些部门和单位工作的人员，都有权前往这些部门应聘或应试，原单位不得留难。

3、建立对机构和编制的约束机制：为了防止机构和编制的再度膨胀，必须严格实行定编定员的制度，并用法律手段和预算手段对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行政经费进行“硬约束”。

4、逐步建立行政工作的合理规范，提高工作效率：改革机构，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建立行政工作的合理规范和提高办事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各级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职责，以及办事程序，都要用行政法规和制度明确下来。必须层层建立责任制，特别是强化行政首长负责制，改变实际上无人承担责任而又效率不高的状况。

六、人事制度改革

1、加快领导干部年轻化：首先是加快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年轻化，为此，建议在十三大和十四大之间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选举，进一步实行新老交替。

2、着手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1）设立国家人事部，主管起草国家公务员法规和提出各种配套措施，负责职位调查和分类，组织国家公务员考试，并直接管理一定层次的高级公务员。（2）尽快制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先在国务院各部门和部分省市人民政府试行。待条件成熟后，由全国人大修改通过，正式颁布《国家公务员法》。（3）选调一批有现代管理知识、有较强组织能力的

同志，在北京和若干城市筹建有权威、有水平的国家行政学院。

3、实行人事分类管理：（1）党务系统人员，由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管理。（2）政务类的国家公务员，由各级党委推荐，按照宪法和组织法进行管理。（3）业务类的国家公务员，由政府人事部门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或《国家公务员法》进行管理。（4）对人大、法院、检察院的人员，实行类似国家公务员的管理制度。（5）对其他各类人员，应充分体现各类人员的具体特点，原则上由所在组织或单位依据各自的章程或条例进行管理。

4、促进入员合理流动：实行人事分类管理，需要创造人员能合理流动、职业有选择余地的社会条件。需要制定一些具体规定，在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逐步放开人员流动，并使企业、教育、科技、文艺工作者等等，在一定范围内先流动起来。

5、实行任期制：由选举产生的各级党政领导人实行任期制。在任期内，无特殊理由，一般不调离或交流。任职期满，没有继续当选，又未到退休年龄的，应根据本人实际条件，能上能下，改做其他工作；其中符合公务员条件的，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公务员系列。任职期满，没有继续当选，而又到了退休年龄的，同其他国家公务员一样，严格实行退休制。

6、改革退休制度：现行的退休制度弊病不少，需要结合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和建立社会统筹退休基金，尽快制定互相配套的政策和制度。

七、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1、协商对话的主要原则：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传统，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的情况要让人民群众知道，重大的决策要由人民群众参加讨论。

2、建立协商对话的制度：当前要办的，是制定具体的办法和规定，明确哪些重大的情况，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让人民群众知道；哪些重大的决策，通过什么形式，让人民群众参加讨论；哪些问题，在什么范围、什么层次征得人民群众同意后才作决定。例如可考虑规定：（1）政治局、国务院、人大常委会讨论的重大问题及其决定，除特殊事项外，及时向全国公布；（2）物价政策及分配政策的重大变动，要同可能波及利益的那部分群众协商；（3）城市公用事业的重点投资项目，可由该市公民或人大代表投票公决；（4）企事业单位福利基金的分配原则，可由本单位职工讨论决定。此外，还可以考虑逐步建立中央和省（市、区）两级主要领导人同某些基层单位（工厂、商店、学校等）定期联系并同基层群众进行对话恳谈的制度，等等。

3、沟通协商对话渠道：政协、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都应是协商对话的重要渠道。同时，还要注意开辟新的渠道，包括组织一些受到群众信任的、新的代表人物开展协商对话。

八、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

1、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从办得到的事做起：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克服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影响，根本在于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这方面的工作，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有秩序、有步骤、扎扎实实地进行，不宜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

2、改进人大工作：（1）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在逐步实现委员比较年轻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委员的专职化。这一工作，从七届人大起，就要开始着手。（2）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3）适当增加非共产党员在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中的比例。

3、更好地协调政府与人大的关系：（1）各级党委及其常委会有责任协调人大和政府的关系。在各级人大常委内部有必要设立党组。重要的问题先在党内统一思想，避免把党内的不同意见带到人大去。（2）制定党员代表和委员在人大活动的具体规定，明确哪类问题党员代表必须按党的决定表态，哪类问题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

4、制定保障公民行使基本权利的法规：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现在的问题是缺少具体的制度和法规。应抓紧制定若干有关保障公民权利和公民申诉的法规，争取在七届人大期间（1988—1993）陆续颁布实施。

5、改进选举制度：（1）各类选举原则上均应依法实行差额选举。（2）不再层层下达代表结构比例的指标，提名和选举均以地区为主，辅之以界别（由法定的团体提名和选出）。明确规定上届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可担任下届的当然代表（例如上届政治局委员可担任下届党代会代表，上届委员长、副委员长可担任下届人大代表等）。（3）改进介绍候选人的制度。

6、加强对各级领导人的民主监督：制定具体的法规和制度，完善党内民主监督以及社会的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这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政策持续稳定的重要措施。

7、完善政治协商制度：（1）加强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工作，并逐步制度化。（2）人民政协可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人大或政府提出建议案。

8、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体制：（1）党和群众团体的关系也要理顺，使群众团体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各种群众团体，特别是工会，今后应在代表群众方面起更大作用。（2）有同志建议，将来的方向，除共青团仍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外，对其他群众团体实行以本系统垂直领导为主的体制。这个问题，一时难以论定，可以暂且放一放。（3）现在群众团体建设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加强它们与各自代表的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联系，积极参与管理、监督和协商对话等各种活动。因此，工作重点应放在基层，而不是放在领导机关。（4）科协、文联、作协等团体的全国性组织，与其要它们起领导机关的作用，不如让它们起某种类似联谊会的作用。这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九、加强法制建设

1、用法制保障和推进改革：法制健全，是我们治理国家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宪依法。要经常加强法制教育，使每个公民包括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都懂得，遵守法律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当前，特别要强调使法制成为改革的保障，并且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步走上制度化。

2、政法工作体制改革：（1）在政法体制上也要实行党政分开。法院、检察院应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要严格履行法定的办案程序，不宜再用党委领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案"的形式。（2）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和省（市）委的政法委员会可考虑逐步由政法工作的领导机构转变为调研和协调机构，地（市）委和县（市）委的政法委可逐步撤销。（3）明确规定各级法官、检察官的任职资格要求，延长法官、检察官的任期，规定在任期内无违法行为和重大过失不得免职或调离，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国家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依法行使职权。这是加强法制所必须采取的一项具体措施。（4）改变国家包办律师事务的现状，制定律师活动的有关法律或条例，推动律师事务的开展，完善辩护制度。

3、抓紧行政立法：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行政立法的工作量很大。同加强行政立法相适应，还要加强行政法庭的建设。

4、近期要制定的法规：除经济法规外，主要有《国家机关编制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新闻和出版法》、《社团法》、《游行集会法》、《律师事务法》等等。如条件不具备，也可考虑先制定条例。除法律外，还有许多规章制度也要尽快制定，不一一列举。

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应把握的一些原则

1、保证安定团结：在我国，安定团结是顺利进行建设和改革的基本条件，没有安定团结，什么事都办不成。必须以谨慎的态度和妥善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不可失去警惕，今后很长时期内，专政的职能不可忽视。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内容，都应当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维护社会秩序。

2、兴利除弊，发扬优势：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注意兴利除弊，扬长避短。现行政治体制中的弊端一定要克服，但不能丢掉我们好的东西，特别是不能丢掉我们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定问题比较快，决定了就办的优势。

3、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应由中央统一部署，慎重从事。当然，事前考虑再周全，也难免出点问题，遇到这种情况，也只有靠坚定不移地排除阻

力，推进改革，并在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制度来解决，决不能退回去。

4、不要一刀切：各级各地情况不同，改革的方向应当明确，具体措施应当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和边远地区的改革应采取更为稳妥和切合当地实际的步骤。经济特区的改革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军队的改革部署由中央军委另行决定。

5、上下结合，党作表率：一些改革，如政府机构改革，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需要从上至下进行；也有一些改革，中央确定大的原则后，地方、基层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积极性、创造性，不搞一刀切，例如地方和基层的党政分开，领导干部年轻化，加强基层民主与开展协商对话等等。这样有利于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党带个好头，中央带个好头，十分重要。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应当积极地投身到政治体制改革中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十一、其他几个重要问题

1、改革的大体进程：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施各项改革，必然有先有后，有主有次。设想十三大后开始布局，党政分开、党的制度建设、机构改革和建立协商对话制度，抓得紧，通过三至五年可以有一个基本格局。其他各项改革都应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逐步实施，但不可能很快达到预期目标，必须有个过程，才能逐步走上轨道，配起套来。

2、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政治体制改革很敏感，宣传性的报纸必须同中央的提法保持一致。但学术刊物、内部刊物应该搞得活跃些，组织一些专门问题的讨论，这对发展理论和指导实践有利。

3、党章和法律的修改：中央办公厅已牵头起草了一份部分修改党章某些条款的文件。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内容，还涉及某些立法的修改，建议由人大法工委牵头，组织研究。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他把向十三大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当时，邓小平就曾经评价说，十三大报告着重阐明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一年零七个月以后，邓小平又强调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可见，在邓小平看来，十三大报告不仅要管一届，而且要管长远。这个报告所确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框架设想、党的建设、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胜利等等重要思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同志们！

我受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托，向大会作报告。

一、历史性成就和这次大会的任务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和发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十二大以来，党中央召开了七次全会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及时作出正确决策，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和开放，加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到这次大会，共九年时间。这九年，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开辟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紧紧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九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大体上翻了一番。现在看来，到本世纪末实现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完全有把握的。随着生产的发展，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或者找到了解决的途径：

——十亿人口的绝大多数过上了温饱生活。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生活前进。还有部分地区，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也有了改善。

——城乡广开就业门路，城市新就业的劳动力达到七千万人。农村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八千万农民转入或部分转入了非农产业。

——市场供应大为改观，基本扭转了过去那种消费品长期严重匮乏的局面。

——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显著改变，逐步转上大体协调发展的轨道。

应当说，这九年是建国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这同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年中，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屡遭挫折，人民生活改善甚微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九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在拨乱反正基础上坚决推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

改革和开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经济活跃起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沿海地区，从南到北，正在形成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依靠广大群众积极性的发挥，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

改革和开放，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九年之所以不平凡，所以举世瞩目，就是因为许多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思想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体制的基础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奠定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又一次革命。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政治、思想、文化、国防、外交等领域，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推进建设与改革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及时排除各种“左”的和右的干扰的结果。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健康发展，提高了人们的觉悟，进一步积累了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正面教育和正确批评来反对错误思想的经验。在全面改革的深刻变革中，保持安定团结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逐步发展。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人民政治生活日趋活跃。爱国统一战线空前扩大。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各民族的兄弟团结更加巩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进展。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展开。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事业欣欣向荣。九年制义务教育正在逐步实施。

——国防建设从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战略性转变。军队的整编和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在裁军百万的同时，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新的进步，防卫作战能力有了新的提高。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抢险救灾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中英、中葡已就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我们还要按照这个原则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历史将证明，按“一国两

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和实践，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

——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更多了。

同志们！九年来的实践，证明了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这条路线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条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九年来的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请允许我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感谢人民对我们党的信任和支持。一切亲身经历这九年伟大变革并贡献了自己力量的中华儿女，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炎黄子孙，都有理由为我国的历史性变化感到自豪。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自满。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还很多，比预料的多。我们在领导工作中还有不少失误。新旧体制正在交替，许多制度尚不健全，各方面的管理和监督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仍然存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尚未根本缓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有市场，僵化思想仍然束缚着一些同志的头脑。特别是对不少环节上不同程度存在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是很不满意的。我们一定要正视它，努力去消除它，不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以后的路程更长，任务更艰巨。我们原来的基础很差，过去耽误的时间又太多了，现在还相当落后。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紧迫的严峻的。如果对这种形势缺乏认识，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上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历史决定了我们这一代和下几代中国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必须警醒起来，团结一致，奋起直追。

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我们要总结经验，坚持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一步确定今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确定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正确解决这个任务，将有力地促进全党团结和党与各族人民的团结，保证我们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唯一的出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经过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我国当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作过有益探索，取得过重要成就，也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曾经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

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我们还曾经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由此而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教育我们，清醒地认识基本国情，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极端重要的问题。

那末，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

总起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们应当确立哪些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呢？

第一，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必须始终不渝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

第二，必须坚持全面改革。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前进的社会。在初级阶段，特别在当前时期，由于长期形成的僵化体制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更成为迫切的历史要求。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是推进一切工作的动力。

第三，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当代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尤其要发展对外经济技

术交流和合作，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闭关自守只能越来越落后。

第四，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平均。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第五，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应当有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在初级阶段，不安定因素甚多，维护安定团结尤为重要。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既因为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很深而具有特殊的迫切性，又因为受到历史的社会的条件限制，只能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

第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要根据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巨大的促进，同时也对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努力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克服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和保守习气，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振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

同志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在初级阶段，在我们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之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将长期存在。如果思想僵化，不改革开放，就不能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也就会在实际上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滋长和蔓延。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

三、关于经济发展战略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分阶段的努力奋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现在，最重要的是走好第二步。实现了第二步任务，我国现代化建设将取得新的巨大进展：社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位次明显上升。工业主要领域在技术方面大体接近经济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农业和其它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也将有较大提高。城镇和绝大部分农村普及初中教育，大城市基本普及高中和相当于高中的职业技术教育。人民群众将能过上比较殷实的小康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又基础落后的国家，人民普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无疑是一项宏伟壮丽而又十分艰巨的事业。

实现第二步奋斗目标，我们有很多有利条件，也存在不少困难和矛盾。矛盾的焦点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只有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争取年年有所进步，才能逐步缓解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等矛盾，保证国民经济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为此，必须着重解决好以下三个重要问题。

（一）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成长阶段的主要支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落后，管理落后，靠消耗大量资源来发展经济，是没有出路的。离开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不可能在有限耕地上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不可能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保持目前的温饱水平，更谈不上向小康以至更高水平前进。不改变设计落后、装备陈旧、工艺粗糙、管理松懈的状况，工业和其它部门的发展也难以为继。产品水平低，质量差，消耗大，成本高，不仅糟踏资源，不能缓解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也站不住脚。尤其在世界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

下，如果我们不抓紧时机，急起直追，就无法缩短我们在经济技术上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一切说明，科学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在根本上决定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关系民族振兴的大事。

加速科技进步，应当立足我国实际，放眼世界，选准发展方向和重点。科技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振兴国民经济。要着重推进大规模生产的产业技术和装备现代化，使农业、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机械制造等重点产业主干部分的技术面貌有明显改善；积极推广普遍适用的科技成果，加速企业的技术改造，继续实施以发展农村经济为宗旨的“星火”计划。与此同时，要组织精干力量不失时机地开展高技术研究，特别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继续加强基础研究，大力发展软科学。必须加快改革，形成科技同经济密切结合的机制，增强企业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应用科技成果的动力和压力，推动技术市场的发展和技术成果商品化的进程，缩短科研成果运用于生产建设的周期。要继续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同国内的科学技术研究密切结合，切实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建议国务院制定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合理组织全国科技力量，通力协作，尽快实施。

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要逐年增加教育经费，同时继续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集资办学。要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按照实际需要，改善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克服教育脱离实际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必须进一步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继续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努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充分发挥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一切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优异成绩的人们都要给予奖励。必须下极大的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和在职继续教育，努力建设起一支素质优良、纪律严明的劳动大军。在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科技人员的作用的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国际人才交流的工作。

（二）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

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稳定发展，必须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平衡。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适当控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使之与国力相适应；合理掌握生活消费增长的幅度，使之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做到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的各自平衡和相互之间的基本平衡。在各项实际工作中，要善于审时度势，自觉地及时地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平衡，以经常性的小调整来避免比例严重失调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大调整。对目前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种种挥霍浪费、奢侈成风的现象，必须坚决加以制止。对今年以来出现的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趋势，必须采取坚决措施进一步加以控制。

经济总量平衡同经济结构有着密切关系。只有在结构合理的基础上实现总量平衡，才能取得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这个问题越往前去会越加突出，这是因为：第一，在向小康水平前进的过程中，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对发展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要求愈益迫切，居民对档次较高的消费品的需求增大，选择性明显增强，所有这一切都对产业结构的改造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第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我国扩大商品出口的需要，也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造。因此，能否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后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

我国国内市场广阔，传统产业存在着很大的发展余地；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又为我们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要把这两方面的有利条件很好结合起来，以运用先进技术改造和发展我国传统产业为重点，同时注意发展高技术新兴产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向前发展。根据这样的考虑，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坚持把农业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在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同时，充分重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加快发展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工业，以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原料为重点的原材料工业，以综合运输体系和信息传播体系为主轴的交通业和通信业；努力振兴机械、电子工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装备；以积极推行住宅商品化为契机，大力发展建筑业，使它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要重视发展第三产业，努力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我们必须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否则经济发展没有后劲。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也不能孤立进行，要同其它方面的发展相协调。在产业发展的地区布局上，既要重点发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作用，又要逐步加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开发，使不同地区都能各展所长，并通过相互开放和平等交换，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地区经济结构。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要给予必要的支持，进一步研究和制定符合这些地区实际情况的政策，增强它们的发展活力，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荣。

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达到资源优化配置，不仅要发挥市场和自由竞争的作用，而且要依靠国家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并运用价格、财政、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来进行干预和调节，以改革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发展为改革创造较好的经济环境。这样，就有可能把发展和改革、计划和市场、宏观管理和微观搞活结合起来，并在计划工作上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这里有必要着重讲一讲关系建设和改革全局的极端重要的农业问题。农业的稳定增长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善，是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农业生产条件还比较落后，发展还很不稳定，加强农业建设尤为迫切和重要。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粮食生产，争取在今后十多年内粮食产量有较大增长，这是实现到本世纪末战略目标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又必须继续合理调整城乡经济布局和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并且把它同

支持和促进粮食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保持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要巩固和完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鼓励兼业经营，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有条件的地方，要在坚持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提倡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逐步达到合理的经营规模。要注意城乡改革的配套，处理好城乡矛盾，巩固工农联盟。在深化农村改革的同时，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都应当增加农业投入，地方财力要更多地用于农业，以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防治水旱灾害，改善农业的基础条件。积极加强土地管理，努力抑制耕地大面积减少的现象。要大力增加化肥、塑料薄膜、农药、柴油和农业机械等农用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加强对农业的物质支持。要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积极运用科技成果，努力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在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要对居民的消费结构特别是食物结构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调节，使之同我国农业资源的特点和生产水平相适应。总的来说，我国农村还处在开发时期，许多资源还没有合理利用，潜力很大，农林牧副渔各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前景都是十分广阔的。

（三）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

出口创汇能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范围，影响着国内经济建设的规模和进程。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和我国的优势，积极发展具有竞争力、见效快、效益高的出口产业和产品，大力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合理安排出口商品结构，多方位地开拓国际市场，以争取出口贸易较快地持续增长。同时，积极发展旅游业，发展劳务出口和技术出口，努力增加非贸易外汇收入。进口的重点要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上。凡是适宜于国内生产的重大设备和其它产品，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做到立足于国内。积极发展替代进口产品的生产，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加快国产化进程。为了更好地扩大对外贸易，必须按照有利于促进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方向，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外贸体制。

对于国外资金的利用，要根据偿还能力和国内资金、物资配套能力，保持适当的规模和合理的结构，大力提高外资使用的综合经济效益。要进一步健全涉外经济立法，落实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以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

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已初步形成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正确确定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地区的开发与建设规划，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开展同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以充分发挥它们在对外开放中的基地和窗口作用。

同志们！这里还要特别指出，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我国在人口控制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必须看到，我国人口基数大，现在又正值生育高峰，计划生育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否则势必影响既定奋斗目标的实现。必须强调优生优育，提高人口质量。同时，还要注意人口迅速老龄化的趋向，及时采取正确的对策。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

国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人民解放军和国防工业、国防科技战线的广大职工，顾全国家建设大局，努力支持和参加经济建设，同时在推进国防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十分可喜的进展。应当加强国防教育，提高人民的国防观念。今后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国防技术，改善部队装备，把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从根本上说，要依靠经济体制改革的加快和深化。同时，改革的部署和实施又必须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样，就能够使改革和建设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给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了加快和深化改革，必须加深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的科学理解。我们已经进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例如发展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发行债券、股票，都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出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并在实践中限制其消极作用。过去的许多做法，如直接向企业下达过多的指令性指标，实行统购统销和供给制式的分配，有的是在建国初期国内国际环境中为加快奠定工业化基础而采取的，有的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求的固定不变的东西，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改革就会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总之，我们已经进行的一切改革，都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全党同志应该进一步提高和统一认识，更加坚定地把改革推向前进。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

个问题上，需要明确几个基本观念：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第二，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把计划调节和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应当通过国家和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签订定货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第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渐进过程，必须为此积极创造条件。

当前深化改革的任务主要是：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一）按照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

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可能由全体人民经营，一般也不适宜由国家直接经营，硬要这样做，只能窒息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把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理顺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关系，切实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这决不会改变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只会使企业更加生气蓬勃，使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

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具体形式，可以依产业性质、企业规模、技术特点而有所不同。无论实行哪种经营责任制，都要运用法律手段，以契约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都要通过竞争产生合格的经营者，以企业经营成果包括资产增殖作为奖罚经营者的主要依据，促进大批精明强干、勇于开拓的企业家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涌现出来；都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完善企业内部各种经济责任制，整顿劳动纪律，严格科学管理；都要注意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经营者的管理权威和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相统一，形成经营者和生产者相互依靠密切合作的新型关系。目前实行的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是实行两权分离的有益探索，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形式，包括国家控股和部门、地区、企业间参股以及个人入股，是社会主义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方式，可以继续试行。一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可以有偿转让给集体或个人。

（二）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进一步发展

横向经济联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和企业群体、企业集团的兴起，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我们要因势利导，在深化改革中继续加以推进。

企业之间的联合，是横向经济联合的基本形式。应当坚决抛弃自我封闭的自然经济观念，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落后状态，通过联合投资、相互参股等多种方式，促进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合理的流动与重新组合。应当主要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优质名牌商品为龙头，以促进科研和生产的联合为重点，积极发展企业群体或企业集团，以适应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要求。要把联合的决策权交给企业，坚持扬长避短、形式多样、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防止采取行政办法拼凑各种行政性公司。

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必须充分发挥城市的作用，把城市首先是大中城市建设成为多功能的、现代化的经济中心。城市也一定要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并敞开大门，实行全方位开放，不仅为本城市服务，还要为周围农村服务，为它所联系的整个经济区服务。

（三）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单一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很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还必须是竞争的和开放的；垄断的或分割的市场不可能促进商品生产者提高效率，封闭的市场不利于发展国内的合理分工和促进国际贸易。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必须积极而稳步地推进价格改革，理顺商品价格和各种生产要素价格。要逐步建立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其它大量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制度。进行价格改革要同调整收入政策相配合，保证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不致在改革中下降，并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积极发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型商品流通组织、外贸组织、金融组织和技术、信息、服务网络，促进市场发育。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和物价管理，严格执行市场管理法规，形成正常的市场秩序。

（四）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

宏观调节与搞活企业、搞活市场三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离开了宏观调节，市场会乱，企业也会乱。但是，采用原有的直接管理方式，对生产要素实行调拨分配，企业没有自主权，市场难以形成，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也无法建立和发展。因此，必须从有利于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优化产业结构出发，加快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的改革。计划管理的重点应转向制定产业政策，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促进产业政策的实现。深化金融

体制改革，加强银行在宏观经济调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按照货币流通规律适当控制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银行为主体，发展多种金融机构，运用多种方式和多种金融工具，聚集和融通资金，以推动经济的协调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根据公平税负、促进竞争和体现产业政策的原则，合理设置税种、确定税率；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的前提下实行分税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关系。

在一定时期，国家对极少数重点建设工程和特殊企业，以及某些重要而又短缺的商品，仍需保持必要的直接控制，但也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改进控制方式。

抓紧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并加强司法、严肃执法。对企业、市场和各经济部门，都要实行必要的监督、管理，整顿和加强财经纪律，以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的全局利益。

（五）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它经济成份，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公有制经济本身也有多种形式。除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外，还应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联合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以及各地区、部门、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的公有制企业。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允许有所不同。

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必然同占优势的公有制经济相联系，并受公有制经济的巨大影响。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它们的合法利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

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应当切实保护国外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六）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除了按劳分配这种主要方式和个体劳动所得以外，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就会出现凭债权取得利息；随着股份经济的产生，就会出现股份分红；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风险补偿；私营企业雇用一定数量劳动力，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以上这些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

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对过高的个人收入，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节；对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要依法严厉制裁。当前分配中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互相攀比，必须继续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加以克服。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当在严格质量管理和定额管理的前提下，积极推行计件工资制和定额工资制。

消费的增长持续超过生产的增长，是改革初期很容易发生的问题。它影响经济稳定，削弱经济发展的后劲，给改革带来严重困难，最终导致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消费膨胀势必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失去活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要坚决防止消费膨胀，保证社会消费基金的增长率不超过可分配的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奖金的增长率不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形成企业自我约束的机制，同时在宏观上建立一套有效的调节制度和办法。

深化改革的每一项措施，归根到底，都要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当前影响经济效益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少企业产品质量低劣。必须认识，一个国家产品质量的好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民族的素质。各部门、各企业和全体社会成员，都要为不断提高我国产品质量而努力。

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既要革除或矫正生产关系中各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又要培育和建立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新组织、新机制和新规范。目前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经济生活中出现种种矛盾和问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改革的深化将引起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更为深刻的调整，不可能没有阻力。我们是在经济环境还不宽松的条件下进行改革的，这又增加了改革的困难。我们经验不足，在指导工作上也难免有失误。干部队伍的素质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还不完全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现在看来，建立新体制框架所需的时间，会比原来的估计要长一些。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改革的步伐；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立足于现实条件，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确定改革重点，分阶段配套进行，使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五、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年八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是说，我们最终要在

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这些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要用这些要求来检验改革的成效。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样，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决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大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各项改革措施，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从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着手。

（一）实行党政分开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新的形势下，只有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作用。近几年来，我们在改善党的领导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它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

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国家政权、群众团体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党应当保证政权组织充分发挥职能，应当充分尊重而不是包办群众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它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

中央、地方、基层的情况不同，实行党政分开的具体方式也应有所不同。党中央应就内政、外交、经济、国防等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推荐人员出任最高国家政权机关领导职务，对各方面工作实行政治领导。省、市、县地方党委，应在执行中央路线和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对本地区的工作实行政治

领导。它们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保证国务院和上级政府指示在本地区的实施；对地方性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向地方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协调本地区各种组织的活动。它们与同级地方政权机关的关系，应在实践中探索，逐步形成规范和制度。乡、镇一级的党政分开，可以在县一级关系理顺后再解决。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是保证监督，不再对本单位实行“一元化”领导，而应支持厂长、经理负起全面领导责任。事业单位中的党组织，也要随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推行，逐步转变为起保证监督作用。

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今后，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销，它们现在管理的行政事务应转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各自向批准它成立的党委负责，不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要逐步撤销。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党纪，协助党委管好党风。现在由上级行政部门党组织垂直领导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要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

从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是我们党的领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必须指出，党政不分实际上降低了党的领导地位，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党政分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党政不分使党顾不上抓自身的建设，党政分开才能保证做到“党要管党”；党政不分使党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容易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甚至处在矛盾的焦点上，党政分开才能使党驾驭矛盾，总揽全局，真正发挥协调各方的作用；党政不分使党处在直接执行者的地位，党政分开才能使党组织较好地行使监督职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全党同志都应该自觉地、积极地、高高兴兴地投入这场改革，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二）进一步下放权力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不仅表现为行政、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还表现为基层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一方面，领导机关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陷于事务主义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基层缺乏自主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难以充分调动。克服这一弊端的有效途径是下放权力，这一点已为农村改革所证明，应当在其它方面进一步实行。

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责任是提出大政方针和进行监督。在政府同企事业单位的关系上，要按照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原则，将经营管理权下放到企事业单位，逐步做到各单位的事情由各单位自己管，政府的责任是按照法规政策为企业服务并进行监督。在党和政府同群众组织的关系上，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

地方、部门和单位，都要树立全局观念，严格依照法规和政策办事。为了使企业具有充分活力，为了更好地发挥城市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作用，下放权力必须以扩大中心城市和企事业单位的权力为重点。凡是规定下放到城市和企事业的权力，各中间层次一律不得截留。这是打破条块分割的重要措施。

下放权力涉及到许多规章制度的改革，各级各部门都要结合转变职能和改革机构，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的意见，逐项做出具体规定。

（三）改革政府工作机构

官僚主义现象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依然严重地存在着。由于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历史的原因，我们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都将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应该看到，政府机构庞大臃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互相扯皮，也是形成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下决心对政府工作机构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建议国务院立即着手制定改革中央政府机构的方案，提请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查批准后付诸实施。

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要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要从机构配置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出发，适当加强决策咨询和调节、监督、审计、信息部门，转变综合部「 ］的工作方式，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要贯彻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清理整顿所有行政性公司和近几年升格的机构，撤销因人设事的机构，裁减人浮于事部门的人员。

为了保证机构改革顺利进行，必须认真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要做到工作能正常运转，人员有妥善安排。从总体上说，这次机构改革在人员问题上要解决的，主要是调整结构，提高素质。要把人员的调整和培训密切结合起来，有计划分步骤地将一部分人员调整到需要加强的国家机关以及经济、文化组织。

为了巩固机构改革的成果并使行政管理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必须加强行政立法，为行政活动提供基本的规范和程序。要完善行政机关组织法，制定行政机关编制法，用法律手段和预算手段控制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要层层建立行政责任制，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要制定行政诉讼法，加强对行政工作和行政人员的监察，追究一切行政人员的失职、渎职和其它违法违纪行为。

（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活力、效率、积极性的提高，离不开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近年来，我们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但是，现行干部人事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国家干部”这个概念过于笼统，缺乏科学分类；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人与管事脱节；管理方式陈旧单一，阻碍人

才成长；管理制度不健全，用人缺乏法治。这使我们长期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年轻优秀的人才难以脱颖而出，二是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难以避免。进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即制定法律和规章，对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依法进行科学管理。国家公务员分为政务和业务两类。政务类公务员，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组织法进行管理，实行任期制，并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依照法定程序向人大推荐各级政务类公务员的候选人，监督管理政务类公务员中的共产党员。业务类公务员按照国家公务员法进行管理，实行常任制。凡进入业务类公务员队伍，应当通过法定考试，公开竞争；他们的岗位职责有明确规范，对他们的考核按法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他们的升降奖惩应以工作实绩为主要依据；他们的训练、工资、福利和退休的权利由法律保障。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人事工作的领导，有利于造就德才兼备的政务活动家和行政管理家，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国家行政管理的稳定性。建立和完善这样一种制度，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当前要抓紧制定国家公务员条例及相应的配套措施，组建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筹办国家行政学院。

在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同时，还要按照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管人与管事既紧密结合又合理制约的原则，对各类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主要有：党组织的领导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由各级党委管理；国家权力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建立类似国家公务员的制度进行管理；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原则上由所在组织或单位依照各自的章程或条例进行管理。

无论实行哪种管理制度，都要贯彻和体现注重实绩、鼓励竞争、民主监督、公开监督的原则。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管理，为优秀企业家和各种专门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已经并将继续引起企业人事制度的一系列变化。应当适应这种形势，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使新的企业人事制度建立和完善起来。竞争机制还应当引入对其他专业人员的管理。各行各业，都要按照各种人才成长的不同规律，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方式和制度，使各种专门家和事业家能够成批涌现并且迅速成长为各方面的骨干和中坚。党内党外，都要创造人员能合理流动、职业有选择余地的社会条件，破除论资排辈等压抑进取心和创造性的陈腐观念。这样，人尽其才，各展所长，大家都有奔头，增强党和国家机关以及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就有了希望。

（五）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个重大课题。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只有建立在倾听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切合实

际，避免失误。领导机关的活动和面临的困难，也只有为群众所了解，才能被群众所理解。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必须有渠道经常地顺畅地反映上来，建议有地方提，委屈有地方说。这部分群众同那部分群众之间，具体利益和具体意见不尽相同，也需要有互相沟通的机会和渠道。因此，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当前首先要制定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规定，明确哪些问题必须由哪些单位、哪些团体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把它作为领导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去做。要进一步发挥现有协商对话渠道的作用，注意开辟新的渠道。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着眼于实效，着眼于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要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近年来，各级人大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今后应继续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加强立法工作和法律监督。要进一步密切各级人大与群众的联系，使人大能够更好地代表人民，并受到人民的监督。要加强全国人大特别是它的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在逐步实现委员比较年轻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委员的专职化。要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

人民政协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代表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要加强政协自身的组织建设，逐步使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历来是党和政府联系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社会主义民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要理顺党和行政组织同群众团体的关系，使各种群众团体能够按照各自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能够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各自所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群众团体也要改革组织制度，转变活动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协商对话、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克服“官”气和行政化倾向，赢得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信任。

近年来，我国选举的民主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但是，选举制度还不够健全，已有的制度也还没有全面有效地贯彻。今后应当更充分地尊重选举人的意志，保证选举人有选择的余地。要继续依法坚持差额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完善候选人的介绍办法。实践证明，在选举各种代表大会的代表时，硬性规定候选人的结构比例，不利于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为了使候选人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今后除继续坚持按地区选举的制度外，可以辅之以按界别选举和其它方式产生部分代表的办法。

基层民主生活的制度化，是保证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当家作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维护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础。目前，侵犯群众权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因此，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同时依法制止滥用权利和自由的行为。必须指出，在一些部门和基层单位中，封建家长式的领导仍然存在。为了破除这种状况赖以存在的条件，应当制定促进人员合理流动的法规，建立劳动仲裁制度，积极推进公共福利事业的社会化。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要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要继续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教育全党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努力做好民族工作。

（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可分割。没有全社会的安定团结，经济建设搞不成，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搞不成。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应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我们必须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法制建设必须贯串于改革的全过程。一方面，应当加强立法工作，改善执法活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法制建设又必须保障建设和改革的秩序，使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用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这样才能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逐步做到：党、政权组织同其它社会组织的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总之，应当通过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的，是在大规模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不适应在和平条件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不适应发展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对这种状况，要做历史的分析。这种体制，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在形势发展了，党的事业前进了，必须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采取坚决、审慎的方针，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展开，尽可能平稳地推进。在新旧体制交替期间，特别要注意防止工作上的脱节和磨擦。各项改革都要注重试验，鼓励探索，注意找到切实的过渡措施和办法，做到循序渐进。各地条件和情况不同，改革不能“一刀切”。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和边远地区的改革，应当采取更为稳妥的切合当地实际的步骤。经济特区的改革，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军队的改革已取得重大成效。军队情况与地方不同，改革部署由中央军委另行研究和决定。

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有限的。但是，达到了这个目标，就能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良好的基础，进而逐步实现我们的长远目标。这是一项宏伟的事业。全党同志都应以积极的姿态，投身到这场改革中去。党的各级组织，都要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并且以自身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带个好头。

六、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经受了长期斗争锻炼的坚强的党。为了胜利完成这次代表大会确定的艰巨复杂的任务，更好地担负起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责任，我们必须研究新的条件下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转变不适应新形势需要的观念和做法，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问题，从来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新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应当体现这个指导思想。

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必须全面宣传党的基本路线，牢牢掌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各级组织和党校，应当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经常地深入地向党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以党的基本路线统一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使广大共产党员都成为自觉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的先锋战士，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模范。党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必须改革，克服形式主义，讲求实效。

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封闭状态，禁止人们接触形形色色的思潮，更不能回避人们在建设和改革中产生的种种思想认识问题。这就要求抛弃空洞乏味的党八股，用群众切身的经验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和教育，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真正深入人脑。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革开放中，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这是件好事情，是合乎历史规律的现象。我们要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好传统，并且努力创造适应新形

势的各种有效形式和具体途径，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领域，激励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热情和献身精神，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来。

干部队伍的素质对于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具有决定的意义。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治路线相适应，我们党提出的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坚持革命化，最重要的是看他是否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应当重用德才兼备、公道正派即忠诚于党的路线并能够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的干部，而不能重用那些只说空话，不干实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缺乏热情和责任心的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要看实绩，要以此为标准，评价干部的功过是非。必须大胆起用那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实际贡献，得到群众承认和信任的干部。对其中优秀的年轻干部，要敢于压重担子。要爱护和支持在改革中勇于探索、创新的干部，允许他们犯错误，帮助他们不断总结经验，增长才干，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这样做，才能使各级领导机构充满活力。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当前的重点是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年轻化，建议这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迈出较大的步子。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的领导成员也要年轻化，但不能机械地要求省、地、县、基层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逐级递减。领导班子内部的年龄结构，要注意梯次配备。坚持干部知识化、专业化，要注意不同工作岗位的不同要求。这几年来，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很有成绩，各级领导班子基本上符合党的路线的要求。今后要继续充实、提高，进行适当调整，同时注意稳定。

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从中央做起。主要是：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要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明确规定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近期，应当把差额选举的范围首先扩大到各级党代会代表，基层党组织委员、书记，地方各级党委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委员。要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制定保障党员权利的具体条例。侵犯党员的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必须受到党纪处分。要疏通党内民主渠道和健全民主生活，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直接参与的机会。

执政党的地位，容易在党内滋长脱离群众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对人民产生的危害也比执政以前大得多。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使党的作风建设的任务更加突出起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和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

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党的路线和政策，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过去那种高指标、瞎指挥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动辄批斗等恶劣现象，已经大大减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绝大多数的党员干部，积极地忠诚地为人民服务，表现了很大的实干精神和创造力量。就这些方面而论，应该如实肯定，现在我们党和群众的联系是大大地加强了。改革经济和政治体制，实行党政分开，还将进一步防止党内官僚主义的滋生，使党成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坚强力量。现在广大群众议论多、意见大的，是少数党员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干扰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败坏党的声誉。这是特别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的严重问题。

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之后，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党是完全必要的。前几年的整党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同时必须指出，解决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是一项长期的经常工作，不可能靠一段时间的整顿解决所有的问题。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出来。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我们党正在领导改革开放，也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最重大的课题。应该作这样的估计：从总体上讲，我们党是能够经得起严峻考验的，是有力量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但也必须估计到，会有少数党员经不起考验。几年来，偷税漏税、走私贩私、行贿受贿、执法犯法、敲诈勒索、贪污盗窃、泄漏国家机密和经济情报、违反外事纪律、任人唯亲、打击报告、道德败坏等现象在某些共产党员中屡有发生。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有少数党员经不起考验而改变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也不能停下建设和改革去专门打扫灰尘，必须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内反对腐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容忍腐败分子留在党内，就会使整个党衰败。对经不起考验的党员，首先要满腔热情地进行教育。但经验证明，仅仅靠教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对于那些败坏党和人民事业的腐败分子，必须采取坚决清除的方针，一经发现立即处理，有多少清除多少，绝不能姑息养奸。

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地不是取决于党员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党员的质量，取决于他们执行党的路线的坚定性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长期以来，我们在吸收党员的工作中存在着忽视质量的倾向，有一部分党员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条件。因此，从严治党，除了必须把少数腐败分子开除出党之外，还必须着眼于对绝大多数党员经常地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队伍。是党员，就必须符合党员标准，严格接受党的纪律约束，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对在党政领导机关工作的党员，特别是担负主要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应该订立更加严格的规矩。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要经受牺牲个人生命的考验；今天，必须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共产党员同非党员相比，任何时候都必须为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觉地更多地牺牲个人的利益。共产党员的称号之所以光荣，就在这个地方。党章对党员的要求，当然不能要求非党群众做到，但党员必须做到。如果不能做到，不履行党章规定

的义务，经过教育，仍不能改正的，就要劝他们退党，或者从党内除名。劝退和除名是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对离开党的队伍的人，各级党组织仍然应当热诚地团结他们，不得歧视打击。他们还可以做一个好公民，有什么长处还可以发挥出来，有些人还可以继续担任适当的领导干部。我们还要把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具备了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不断吸收到党内来。扶正才能压邪。应当积极地及时地表彰有坚强的党性和自觉的献身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完成党的任务的好同志。所有这些，都要作为基层党组织主要的经常工作来做，经常地进行教育，经常地加强监督，经常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经常地整顿纪律，经常地清除腐败分子和妥善地处置不合格分子，经常地吸收优秀分子，经常地发扬正气和抵制歪风，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党的领导机关有责任指导基层组织做好这些工作。这些经常性工作做好了，我们就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将为我们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我们一定要适应这一伟大的变革，把我们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建设好。这样，我们党就能以崭新的姿态，站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成为一个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选贤任能、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的党。

七、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思想基础，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世界在发生巨大变化，人类文明在突飞猛进，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事业展现了新的前景。这一切都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必然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

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包括：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它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推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就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当时，我们之所以必须把阶级斗争摆在中心的位置上，那是因为只有首先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使劳动人民政治上不受压迫，经济上不受剥削，才能解放生产力，现在不同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劳动人民已经当家作主，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直接的中心任务。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公有制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一句话，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和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标准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因为在当代中国，只有这样做，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解放仍然受到束缚的生产力，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离开了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

判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我们承认并且充分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但是，只有在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承认生产力是根本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而不致陷入主观随意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我们既不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手脚的教条，也不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必须在实际工作中鼓励探索和开拓，在理论研究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没有探索，没有创新，没有不同试验的比较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的事业就没有生气。努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振奋起全民族探索创新的勇气，是我们的理论和事业不断发展的希望所在。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赞成改革开放的；固守僵化观念的人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极少数。但是在我们党内，认识上的偏差是会经常发生的。同一个人，在一种情况下有这方面的片面性，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可能有另一方面的片面性。不要把思想一时跟不上改革步伐说成是僵化，也不要把思想解放中讲了点过头话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偏差和片面性的产生，说到底，是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克服的根本办法，是引导大家面向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仍然是我们的基本口号。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很多，尤其需要全党同志加强团结，统一思想和认识，同心协力地开拓前进。党的队伍团结一致，生动活跃，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必定兴旺发达。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中国十亿人民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如此丰富生动的实践，为我们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当前，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状况，同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相比，是很不相称的。改革开放已进行多年，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摆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高中级干部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同各条战线和各个地区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党正处在新老交替的重要历史时刻，大批新同志加入党的队伍，大批新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在这样的时刻，认清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新的大发展这个现时代的大趋势，向全党提出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务，并且建设一支包括大批新生力量的富有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意义更为迫切，更为深远。

同志们！历史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伟大而艰巨的。让我们党同全国各族人民，

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让我们大陆同胞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

我们的事业是走向未来的事业。党和人民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蓬勃向上的青年身上。中华民族的振兴，美好未来的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胜利，要靠全体人民的努力，归根到底，要靠广大青年继往开来，脚踏实地，艰苦奋斗。

同志们！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在世界各国人民为维护和平、谋求发展所作的巨大努力的推动下，制止军备竞赛和侵略扩张，主张实现真正裁军和早日解决地区冲突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苏最近就中导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东西方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达成这种原则协议仅仅是朝着裁减军备迈出的第一步。军备竞赛远未停止。“热点”一个也没有消除，个别地区的冲突还存在着升级的危险。国际形势真正实现缓和，还将经历一个漫长、艰难甚至曲折的过程，各国人民仍须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将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努力推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继续发展。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曾经震撼世界，增强了世界进步力量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必将对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贡献，进一步增强科学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征途上，我们已经取得了第一步胜利。我们还要为夺取第二步、第三步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我们坚定地相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

我和李鹏、乔石[1]、启立、依林同志商量了一下，认为有必要在十三届一中全会结束时讲几句话。

首先，我们感谢全会的信任，同时也深深感到，把我们五个人放在这样的岗位上，我们的责任是很重的。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党的历史这么长，而且在国际上又处于这样重要的地位，相形之下，我们这几个人的份量显然是太单薄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全会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郑重选择，我们将会竭尽全力，在全会和政治局的领导下，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坚决执行十三大规定的任务。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革命家，我们的小平同志，先念同志、陈云同志，还有彭真[2]同志等其他几位老同志都健在，他们的丰富经验是我们党的财富，我们仍然能够得到他们的指教和帮助。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小平同志。十三大通过的报告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专门讲了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做出的重大贡献。确实，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经过历史考验并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所公认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小平同志没有担任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但实际上是小平同志在掌舵。今后小平同志虽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但小平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没有改变，我们仍然需要小平同志继续在重大关头掌舵。政治局常委认为：今后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常委仍然有必要向小平同志请教，小平同志仍然可以召集我们开会。我们恳切地向全会和小平同志提出这个请求，因为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我相信全会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热烈鼓掌）好！我们这个请求得到了全会的热烈赞同，我们把它看成是对政治局常委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支持。

同志们！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很多。但是，也有许多有利条件。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已经有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条路线，已经为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九年和以前的二十年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我们对这条路线充满了信心。有这条路线和没有这条路线是根本不同的。小平同志、先念同志、陈云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已经为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今后的任务是继续沿

着这条正确的路线走下去。这条路线所指明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指引我们前进的、长期起作用的航标。只要我们牢牢掌握这条路线，我看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在这条路线基础上形成的团结，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团结，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乃至全党四千六百万党员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是我们事业必胜的保证。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地团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切切实实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经验不足，可以学习。有阻力，或者是很大的阻力，也可以克服。改革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建设就会取得更大的成效。这样，再过五年，到了十四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确实完成了党的十三大所托付的任务！

注 释

1．乔石（1924—2015），浙江定海人，原名蒋志彤，生于上海。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任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中联部副部长、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组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原名傅懋恭。1923年入党，曾任北方局组织部长，晋察冀中央局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中组部长、城工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政委，北京市委书记、市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闭幕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

我们对外国记者关于十三大的报道是满意的

美国记者：请谈谈对记者有关十三大报道的评价。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我们是满意的，报道基本上是积极的。国外反应主要有三点：一是说我作的报告是实事求是的，对国家的情况是清楚的；二是说我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三是说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现行政策将会继续下去。这个评价不高，也不很低。谢谢你们！

日本记者：在您的报告中，为什么外交问题只讲那么一小段？

赵：我的报告已经有三万五千字，外交方面的内容如果要加进去，还可以加五千字。如果那样，我的报告在一个上午是做不完的。

记者：对日中关系你有何评论？

赵：至于中日关系，我认为是良好的，在良好的大前提下当然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我希望日本方面能为此作出努力。总之，主流是好的。

以改革派和保守派势力的消长来分析中国局势，将会不断犯错误

外国记者：你是否认为十三大的结束意味着中国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结束？

赵：国外一些朋友总认为中国有一个改革派，一个保守派，并以两派势力的消长来作为分析中国政治局势的依据。我要说，持这种观点来分析中国局势，将会不断犯错误。我已注意到，我们这次大会前，一些国外政论家、新闻界的朋友，已经因此犯过错误。这次参加大会的一千九百多人，全体举手通过了我的报告，没有不同意的，也没有弃权的，你们大家都看到了，这能说明我们有改革和保守两个派别吗？如果说一千九百多人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都举手赞成了我的报告，岂不是又合二而一了吗？当然，中国有十亿人口，有四千六百多万党员，不

可能没有反对改革的人，搞自由化的人，但在骨干分子中间没有保守派、极左派之分。一个领导集体，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步骤问题上，具体政策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谁也不能说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你们不是不赞成我们“舆论一律”吗？为什么又把我们意见有一点不一致当成是了不起的事情呢！我认为在领导集体中，甚至在我们五个人当中，如果有点不同意见，反而可能成为我们今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少犯错误、不出大错误的重要保证。我希望你能同意我的分析。外国记者：在中国，是否对不同意见有自由？

赵：有自由，但是没有绝对自由，任何国家都没有绝对自由。你出国不是还要持有护照吗？你也没有绝对自由嘛。（大厅里引起一阵欢快的笑声）赵（介绍南斯拉夫记者后）：你们作了大量报道，是客观的、友谊的。南斯拉夫记者：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

赵：我先讲。我们在搞改革，你们国家也在搞改革。我们国家同许多国家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这就需要拿出相当长的时间解决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就是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我的报告是针对中国的情况讲的。现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努力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最佳的方案，你们的最佳方案和我们的最佳方案不一定一样。我们之间可以互相借鉴，互相交流，但是都不能照搬。祝你们国家的改革取得成功。南斯拉夫记者：我们南斯拉夫记者向你祝贺你的报告和你担任总书记。你当选总书记后，准备完成的第一个具体任务是什么？

赵：我们首先需要研究一下新的政治局常委、新的政治局和新的书记处如何进行工作。我们必须采取新的方式工作，因而需要具体研究一下。这是我们要做的头一件工作。

美国国会中一些人经常大喊人权，
支持在西藏恢复农奴制度难道符合人权吗？

美国记者：最近中美关系有点问题，遇到了西藏问题。你对中美关系如何看法？

赵：有个问题总使我迷惑不解：美国国会中一些经常大喊人权的人，为什么支持在西藏恢复农奴制度？在西藏恢复农奴制度难道是符合人权的吗？我希望你回去把我这个问题向你们国会的有关人士提出来。（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和笑声）

美国记者：我回去后一定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

外国记者：请你谈谈中日关系。

赵：中日关系总的说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讲了。我祝贺竹下登先生就任总裁，希望有机会同他见面。

苏联记者：我们是来报道十三大的。

赵：非常高兴见到你们，你们在北京过得怎样？

苏联记者：过得很好。

赵：我想我刚才对南斯拉夫同志讲的那些话，同样可以对你们说。祝你们改革成功。

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在国内做的，希望你专门发一条消息

日本记者：向你提一个私人问题。你现在穿的双排扣的西装很漂亮，是在国内做的还是国外做的？

赵：我的所有衣服都是在国内做的，我希望你专门发一条消息，就说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在国内做的，而且很漂亮，这样可以推动中国服装向你们国家出口。（全场活跃）你看，李鹏、胡启立同志穿的西装也都是中国做的，都很漂亮。

荷兰记者：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比苏联的改革快，您对此怎样看？

赵：中苏两国国情不同，改革不可能一样。我们没有同苏联在改革上发起竞赛，不准备在改革上同苏联比谁快谁慢。各国都应当按自己国内实际情况办事。我们很重视苏联的改革。

我在四川的工作被传奇化了，我们的问题还很多

（十三大新闻中心的同志把《新的长征》的作者索尔兹伯里介绍给赵紫阳。）

赵：我们认识，我们约好要在十一月五日见面，你是以朋友的身份而不是作为记者来见我。朋友之间可以随便交谈。

索尔兹伯里：我要问的问题是，你过去在四川工作时，四川人有句话说，“要吃粮，找紫阳。”现在你担任了党的总书记，中国人民将用什么话来概括你的工作？

赵：我在四川的工作被传奇化了。我们的问题还很多。当然，总的来说，我们对我们的事业是有信心的。我在报告中讲过，我们现在的改革比原来设想的时间要长一些。我刚刚在一中全会上讲，我们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同志要努力工作，再过五年，希望在十四大的报告中能够说，我们完成了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

（新闻中心的同志介绍苏联记者。）

赵：好，你们在北京常驻的有几位？这次派来采访大会的有几位？

苏联记者：常驻的有七人，这次又派来四个人。

赵：那加起来有十多人。

苏联记者：对。苏联《真理报》和塔斯社天天都有关于中共十三大的报道。

赵：你们做了许多工作，不辞辛劳，谢谢你们！

香港记者：十三大对统一祖国有什么贡献？

赵：我已经注意到国外有这样的评论，说中国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将作为今后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这将有利于香港的稳定、繁荣，有利于解除香港人民的疑虑；将有利于“一国两制”构想的实现。

日本记者：毛泽东说中国解放前有三座大山，请问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有几座大山？

赵：我没有统计。请你帮我统计后告诉我，我将表示感谢。

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将进一步加强，
但我们军费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不会增长

英国记者：您现在当选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国防力量将加强？

赵：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将会进一步加强，但我们军费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不会增长。你知道吗，中国已经单方面裁减了一百万军队，我们大量的军工企业都转为生产民用产品。我们国防现代化的进展主要表现在质量上，这要依靠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香港记者：香港是否可以直接选举？

赵：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已多次讲过，讲得很清楚，香港人民都知道，今天没有必要再说。这个问题要由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基本法中解决。联邦德国记者：您认为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赵：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者互为条件，都需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就个人来说，我认为我做总理更合适，
但大家一定要我做总书记，我只有努力把工作做好

香港记者：你曾说你更适合当总理，现在你当了党的总书记，请你谈谈你的感想。

赵：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还是认为我做总理更合适。但是大家一定要我做总书记，我只有努力把总书记的工作做好。没有绝对的自由嘛！外国记者：最近美国关于人们所说的中国向伊朗出售武器一事，有很多不好听的言词，你有什么看法？

赵：不仅是言词不好听，而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想把加剧海湾紧张局势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是不公正的。

人民有满意的地方，有不满意的地方，满意是主要的

外国记者：最近我听到，中国许多人对物价上涨不满意。

赵：这个问题应当这么说，人民有满意的地方，有不满意的地方。满意是主要的。改革九年来，我国人民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物价也确实上涨了。人民希望有这样的总理：只提高工资，而不涨物价，甚至降低物价。看来，我这任总理是做不到了，希望下一任总理做得比我好一些。

现在中国领导人中，政治经验和智慧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遇到重大问题向他请教，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何乐而不为？

香港记者：我们是香港记者……

赵：你们香港记者来了多少人？

香港记者：有五十多。请问邓小平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决定重大事情你是否会和他商量？

赵：我会这样做的。我会向他请教。我非常尊重小平同志。我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中间，无论是在职的还是退下来的，政治经验和智慧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的。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经历了历史的考验的，是党内外、国内外公认的。遇到重大问题向他请教，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呢？

香港记者：改革的第一项任务是什么？

赵：你们总是喜欢分第一项第二项，不能分的。经济体制改革明年主要是增强企业活力。我向你们透露一个信息：明年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很可能通过企业法。

我当然非常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够实现祖国统一，但这不决定于一个方面

台湾记者皮介行：赵总理，你好。在你的任期内，是否希望实现两岸人民要求统一的共同愿望，是否希望实现“一国两制”?

赵：我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你在大陆多去一些地方，实际地看一看。大陆这三十八年来，有很多进步，但也有些地方比较落后，你要去看好的，也要去看坏的。我还希望你回去不至于遇上什么麻烦。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当然非常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够实现祖国统一，但这不决定于一个方面。能不能统一是一回事，总不能背道而驰吧！我看，目前的形势是向着好的方向在前进。你赞成吗？

皮介行：赞成、赞成。

北京记者：我们去台湾采访，你批准吗？

赵：我们方面毫无问题。你们要去我都批准。可惜光我批准没有用。

中国的政治气候没有冬天，一直是春天

香港记者：有人比喻说你们的冬天来得快，去得也快。

赵：不知道你指的是自然气候还是政治气候。如果指政治气候，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们这里没有冬天，一直是春天。

记者：这次政治局中为什么没有妇女？

赵：我们大家都希望女同志能参加政治局，但没有能推选出来：这并不是我们调整了妇女政策。

在最近即将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上，我就要提出辞去总理职务

外国记者：明年开人代会，谁将担任总理的职务？

赵：明年人大、政府都要换届。国务院的人事，将由全国人大决定。过去，外国人不是批评我们把人大当成橡皮图章吗？我们今后要尊重人大的职权。属于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我不能随便发言。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我不准备等到明年七届人大，而在最近即将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上，我就要提出辞职。我将提出一个代总理的人选。我的提名现在也不能告诉你们，但我可以对你们说，他比我年轻。

保加利亚记者：你访问东欧五国以后，有什么感想？

赵：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很好，党的关系都恢复了。可以说，进入了全面友好发展的阶段。我对东欧几国的访问都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你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比我们搞得好。向你们学习。美国记者：胡耀邦已经被选进政治局，他将负责什么工作？

赵：我们还没开会嘛！刚才我说了，我们将开会研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如何工作。你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

外国记者：现在你们搞改革，有些人很快富起来了、有些地区很快富起来了，有些地区赶不上，差距大了一些。你们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赵：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不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这种情况在改革过程中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什么事情都有先有后，走路也总是先迈一条腿嘛！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

这次会议即将结束，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对这次会议的看法

这次会议开得不错，比原来预想的要顺利。之所以开得顺利，是因为在十三大前，开过一次全国计划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当时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和所要采取的措施向大家谈了，征求了各地的意见。大家主要对明年中央向地方借款打入财政基数后还要实行分税制，意见比较多，感到承受不了。会后我们作了研究，接受各地同志的意见，确定明年暂不实行分税制。更重要的是那次会议依林同志和我都讲了全国的经济情况，讲了为什么必须实行进一步稳定经济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针。回去传达以后，使各地的同志对全国的大局有了理解，因而对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方针容易接受。这次会上，大家又提出了一些意见。中央和国务院在会议结束以后还要再认真研究。但总的来讲，回旋余地已经很小了，不可能再有大的变动，需要调整和照顾的，只能是少数地区的小量问题，请大家对此做好精神准备。明年的盘子，不论地方也好，企业也好，基本上是可以承受的。任务带回去，大家努力完成。

我同意会上许多同志的分析，如果我们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确定的方针去办，明年的经济形势肯定会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不会因此而出现生产萎缩、滑坡的现象。实行这一方针以后，可以预期，第一，明年的经济会进一步稳定；第二，会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经济效益会进一步提高。“双增双节”，今年才实行一年，还有很大的潜力，明年要继续深入开展。还必须看到，承包经营责任制今年刚刚推行，明年进一步加以完善，它的作用将有力地显示出来。可以说，明年将是承包经营责任制进一步完善的一年，经济效益进一步显示的一年。所以，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明年的经济工作方针，是积极的方针。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做好工作，使中央的方针真正落实，以促进明年经济形势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第二点，发展农业问题

在十三大期间，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都讲了许多发展农业的意见。经济要稳定，首先农业要稳定，要把发展农业摆到重要位置上。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大家对农业的认识更深入了。农业问题，既不能像前两年那样，一阵子出现卖粮难，就过分乐观；也不要因为当前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猪肉、食糖比较紧张一点就悲观起来。今年农业形势是好的，出现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解决农业问题，需要增加投入，增加支农物资的生产和供应，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后国家应当尽力增加一些农业的投资，地方上的财力也应当主要用到这方面来。我多次讲过，在农业上，一个化肥，一个农用薄膜，一个柴油，这三条对增产有很现实的作用。从科技上讲，还有推广良种，采用先进技术，改进耕作制度等，增产的作用都很显著。但是对这个问题也要实事求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下子增加很多投资和物资方面。这个问题，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计划地逐步加以解决。就拿化肥和农膜等农用物资来看，近年来国家鼓励生产，发展很快；从国外进口也成倍增加，但毕竟国内扩大生产能力要有个过程，国际市场的容量也有限。国内生产也好，进口也好，都只能逐年增加，不能刮风，大上大下，大出大进。

解决农业问题究竟靠什么，我们应当很好地回顾一下历史经验。我们不能再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农业的指导思想上去。现在，有这么一点苗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那时当省委书记、当省长的，每年到北京开会都是争投资，争水利，搞来搞去，跳不出圈子。当然，投资是需要的，水利也是要搞的。但解决农业问题，除了要增加投入以外，还要讲另外一面。根据多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农业问题，如果不建筑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基础上，不建筑在农业本身的活力上，那是没有前途的。在讨论十三大报告的时候，任仲夷同志提出，价值规律讲得少了。我看要讲价值规律，首先要在农业上体现出来。如果离开价值规律，离开经济手段，是不行的。农业现在出现的问题怎么看，今后的路子怎么走，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需要大家很好地研究一下。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的基本经验，我们必须继续记取和遵循。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的情况所以好，也是同过去二十多年的基础分不开的，不能只归结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它与过去多年搞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肥料等都有关系。没有这个基础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国的农业上了一个新台阶，现在出现了新的停滞的局面。要解决这个问题，也绝不能忘了这个基本经验。农业要上一个新台阶，有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要有物质条件保证，但同时必须有好的政策，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有活力。我们应当根据历史经验，认真分析一下现实，展望一下将来，研究今后的措施。

农业要有活力，必须研究解决农产品的价格问题，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当前农产品的价格不合理，不动是不行的。但目前不能大动，只能在国家、社会能承

受的条件下有步骤进行。同工业品价格的结构调整不一样，农副产品价格的问题，特别是副食品价格的调整，涉及到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农副产品价格太低，农民无利就不生产；要提价，使农民有积极性，城市居民又负担不起，要相应普遍提高工资，国家又没有那么大的财力，问题就卡在这里。看来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的价格在相当长时期都只能是“双轨制”，要想粮食价格全部放开，恐怕近几年还不行。现在，粮食还得一部分合同定购（当然合同定购也要体现等价交换的要求），另外一部分放开。大城市的蔬菜也不能完全放开，大路菜要有计划生产，同时要兴建一些贮存设施。农副产品价格的变动影响城市的问题，如果只靠国家提工资发补贴，就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我们要总结一下经验，研究一些新的办法。在工厂里，能否主要靠承包制、计件工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等措施，来增加职工的收入，国家只相应把工资调节税、奖金税放宽一些，增加企业职工的承受能力。这几年广东就是这样，副食品涨价，工人完全从增加的收入中消化了，并没有反映承受不了。剩下的主要是机关、学校、医院和一部分没有额外收入的科学研究单位，全国算起来大概有两千万人左右，也可以研究一下。能不能把开会、公费旅游、买高档家俱等方面的钱节省下来，适当增发一部分奖金或生活补贴，帮助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解决生活困难。这样办，财政上也用不着多拿钱，少数单位收入少的，国家再帮助一下，困难也就解决了，而且工厂职工也不会攀比，能与工厂脱钩。采取这种办法后知识分子待遇低、生活困难的问题，也可以缓解。大家可以研究一下，用这个办法有什么矛盾，有什么困难，利弊如何，能不能这样搞？研究清楚以后，再制订一些具体办法，经过批准实行。总之，要找到一条出路才行。

现在有些地区主要是经济发达地区，像京、津、沪的郊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农业不振，靠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些地方已经有60—70%的农民去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收入相当高，而搞农业的，一家承包几亩地，劳动生产率非常低，农产品价格再提高几倍也不行。实践证明，这些地方如果不解决农业规模经营、生产专业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那就不可能调动起农民积极性的。这条路子不走，这些地方的农业就成为附带性质的，土地就会丢荒，农业就会丧失活力。像珠江三角洲、苏南等地，搞粮食成为搞工副业的额外负担，主要劳力去搞工副业，剩余劳力去应付一下农业，或雇请外地的劳力种地。当然，在其他地方不存在这种形势。过去我们实行联产承包，搞大包干，土地划到一家一户去种，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的，那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水平，现在全国大多数地方也是这样的。但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有些能够开矿的地区，60—70%的劳力都转到第二、三产业上去了，如果不搞规模经营，那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北京市郊区的顺义县，实行了规模经营、生产专业化，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都大为提高，粮食增产了一亿多斤，一些直接经营农业的人的收入高于搞工副业的，农民从不愿种地转变为要多种地。这说明像这样一些地方，解决规模经营的问题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应摆到议事日程上。这次我在广东与南海县平州等地的同志座谈。这里主要是水田，比北方复

杂一些，他们也说，这个问题不解决，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就无法前进。看来，根本是一个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解决规模经营后，就有条件解决了。当然，规模经营的大小要因地制宜，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承包给农场、专业队，也可以承包给专业大户。具备了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摸索一些经验。

为了调节种粮食和种其他作物的经济利益关系，除了价格以外，还可以考虑运用其它经济手段。在广东南海县，我就讲过，可以征特产税。种粮食的，与种经济作物、种农村特产的，收入差距过大，需要通过税收手段来调节一下。我看像特产税这样的小税，就留给地方，留给县、乡，用于发展农业，发展粮食或补偿价差。地方也有积极性。

第三点，实行党政分开的问题

十三大报告中突出地讲了这个问题，大家都赞成，国内外反映也相当强烈，但工作量很大，到了下面，思想也比较复杂。希望各地在这个问题上，要认真做好思想工作。各级干部的思想搞清楚了，认识提高了，把这件事搞好，就一定会发生很好的作用。如果有一些同志的思想不通，憋着劲，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可能发生。因此，请各级党委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细、做好。

党政分开的具体行动，当前主要是在企业里要进一步解决厂长负责制与党委的关系问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所带来的企业经营机制、领导体制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就要解决企业领导体制各个方面的关系，不仅有厂长与党委书记的关系，还有与工会的关系等，这些都需要妥善处理好。厂长负责制，也不能完全是厂长个人说了算，一点监督都没有。这些既是需要研究的课题，也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在承包制的情况下，在党政分开的情况下，企业究竟怎么搞好，在明年人代会通过企业法以前，各地要好好调查研究，工作上要抓落实。

第四点，党风、社会风气问题

这次十三大报告以后，有两种反映，一方面反映对这个问题还讲得不够，抓党风的决心还不够大，措施不力；另方面更多的认为，这次对几年好转也不敢提了，对能不能解决党风、社会风气的问题表示担心。在起草报告期间，我也感到党的建设部分难度最大，一些问题还没有研究清楚。党风问题，包括社会风气问题非抓不可。我提议，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下点功夫，组织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去抓党风。整顿党风，不仅有个决心问题，还有一个如何把我们的认识放在科学的基础上的问题。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科学的分析，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有效的措施。现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完全沿用老办法效果也不好。当前我们处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容易滋生坏

的作风，腐败的现象，但绝对不允许它在我国泛滥起来。现在的确有这种苗头，而且来势很猛，值得我们重视。用过去那种简单的办法来解决，恐怕也不能奏效。中央书记处、组织部、党校和各省市的同志，都要把它当成一个重大问题，用很大的力量去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在搞活经济的条件下，防止不正之风的泛滥，还得科学分析，综合治理。

解决党风问题，要从严治党，加强纪律，加强教育和监督。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如何减少滋生这些不正之风的温床的问题。例如过去上大学，走后门很严重，谁能上，谁不能上，机会不均等。改革招生制度以后，主要看考分，好坏你考试就是了，这样舞弊也大为减少了。又如在房屋分配上，如果真正实行住宅商品化，不靠内部分配，不靠批条子，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也会大大减少。在烟台、蚌埠实行房屋商品化试点的地方，都有人退多占用的房子，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房屋商品化对引导改变消费结构，对克服不正之风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意义很大，希望各地把它摆在一定的地位。这就是说，我们解决党风、社会风气问题，还要注意如何堵塞漏洞，减少滋生这些坏东西的土壤。当然，有的可以马上减少，有的要逐渐减少，要长期做工作。

总之，党风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很重要的改革，解决它不简单是有无决心的问题，还要研究它的规律性，把它置于科学的基础上。

第五点，沿海地区要迎接新形势

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美元贬值，日元、南朝鲜货币升值，台湾货币升值，给沿海一些地区确实带来一个机会。这主要是指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金三角地带。珠江三角洲地靠港澳，闽南金三角以及浙江面临台湾，都有许多有利条件。当前确实有一个新机会，大量的货单转到香港，香港劳力不够，厂房不够，生产力不够，根本承受不了，于是又大量向外转，首先是转到珠江三角洲。随着台湾海峡形势的变化，台湾的资金、订货也可能往福建、浙江一带转。我们要注意迎接这一形势。我们已经向广东、福建的同志打了招呼，这里向长江三角洲的同志也打个招呼，大家要研究对策，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们应当很好研究外贸发展战略。最近国家计委副研究员王建[1]同志建议，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换取外汇支援基础设施建设，过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这一关，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路。我看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目前世界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还占相当大一部分。我国最大的资源是劳动力资源，这个资源在广大农村。我们的优势不仅在于人多，最主要的是工资低。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包括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就具有极大的竞争力。我国沿海地区人多地少，资源不丰富，如果不走出一条路，要富起来就很困难。将来中国沿海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领国际市场，是完全可能的。首先从沿海地区开始，将来乡镇企业可能在全国的出口中占很大比重。世界各国包括发

达国家在内，在出口总额中，中小企业也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西欧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都是这样。所以，迎接新的形势，要研究这个战略问题。将来在沿海地区，一个是乡镇企业以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个是发展创汇农业，两个方面同时并进，就可能使沿海地区大为改观。这两个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潜力，都有一些试点的经验。今后应当作为一个课题，很好加以研究。

注 释

1．王建（1954—），北京人。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后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被授予“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专家”，被评为“1988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青联委员。

会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1]时的谈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

索尔兹伯里（以下简称索）：你们的十三大开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会议，现在你们是新的领导人，在新的时期，用新的思想、新的工作方式进行工作，我是非常高兴的，你和我都有同样看法吧！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国内对我们这个会议看来很满意。国外的反映总的来说是积极的。我们在十三大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表述了在这个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一条路线，当然十三大对这条路线的表述更完整、更明确了。

这条路线在我们国家产生了这样大的效果，这一点我们原来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的。这条路线为什么使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问题就在于这条路线符合中国的国情。坦率地跟你这位老朋友再说一遍，开始的时候，我们搞改革开放，并没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理论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我们并不是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理论出发去改革去开放的。我们是从实际出发的，从实际出发搞改革带来了好的效果。这个效果引起我们的深思。

我们这样做是符合毛主席的实践论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贯的思想作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完整地提出了三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希望全党同志考虑任何问题只能够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是毛泽东同志的行动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贯彻到他的晚期，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毛主席的行动违背了他自己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你已经知道我国农村改革是从生产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我们的工厂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开始的时候，这些做法都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是来源于基层，来源于人民的创造。三中全会并没有具体地讲到这些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只是一条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社会效果看，尊重群众的创造，一切看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符合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利益。十一届三中全会有这样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因此当基层出现了包产到户这些办法以后，我们不是像过去那样，马上简单地把它否定掉。这些办法，群众中的这种创造实践，在60年代初也出现过，那时就叫

做联产到户，各地都出现过，工厂也出现过自负盈亏，也出现过工厂要重视利润。但是，当时我们的思想路线不对头，把这些都做为修正主义压下去了。批判了这些东西。这一次就不同。1978年以后出现了这些办法，我们采取的态度与1962年就不同了，我们很重视这些新生的事物，我们要看一看这些办法的效果怎么样。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看到了这些做法对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很有好处，我们就把它肯定下来。那时我们还没有预料到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给农村带来这样大的改变，对农业生产带来这样大的好处。所以我们只提出，包产到户只在1亿人口的地区，交通条件比较差，生产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先搞，为什么呢？就是还想再看一看。我们当时并没有在全国马上推广它，而是说，究竟怎么搞好，请各地干部群众自己去创造，去选择。当时有人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说，可以。结果联产责任制效果很好。这样，我们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推行开了。当然具体形式是不一样的，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一开始安徽搞了包产到户，但是农民和干部都不愿意说它是包产到户，说是包产到组，实际上是包产到户。我所工作过的四川省，下面也叫做包产到组。名义上说，只有养花的、养鱼的专业户搞了包产到户，实际上是普遍地搞了包产到户。我给先生介绍这段历史，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群众性大讨论，那么农村出现的这种改革，城市的改革，都不可能受到我们的重视，可以说根本就发现不了，更谈不到发展了。小平同志在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大功劳的。

我国农村普遍推广包产到户以后，又出现了专业户，一部分农民脱离开土地，搞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叫做乡镇企业。比如浙江温州搞的乡镇企业，各地方也搞乡镇企业。这个，开始也是少数人搞，以后效果很好，我们看准了它的经验，就把它全面推广开。人民中的这种创造，被我们承认，被我们推广，得到这么大的好效果，在起初我们又是看得不那么很清楚。以后工业也出现了另外一些新生事物，比如合股、租赁、债券，我们也都是经过这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人民群众在那里创造，我们先看一段，看准了就加以推广。

国外有人说，中国是在搞资本主义。国内的人很支持这种改革，但是心里不是很踏实，都说效果不错，但是解释不清楚，在理论上说不清楚。十三大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充分阐述，算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所以这个观点在国内外受到了普遍的重视，普遍的赞成，我想原因就是这样。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几十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即从实践出发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步是群众在那里创造，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第三步是我们总结了群众的这些创造，加以推广，并完善了我们的概念，完善了我们的理论。这就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实践再到理论的过程。这个理论对我们今后的实践会起很大的作用。我希望先生写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反

映出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经过的这个过程。

索：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你刚才介绍的情况，你把中国的改革作了简明的介绍、解释。当时（指1960年）你们的情况很困难，农民就提出联产责任制，这个办法本来很好的，但是毛泽东不赞成。七十年代末，中国民谣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你们碰到同样的状况，为什么就能很快肯定群众创造的联产责任制呢？请再谈谈你的感受。

赵：我个人是相信这套东西的。因为50年代、60年代，我在广东工作，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一九五八年我们搞大跃进，失败了。失败以后，农民的生活非常困难。农民为了渡过这段困难，自己想出办法，就叫做联产责任制，也就是包产到户。结果凡是搞了包产到户的，生产都恢复得快，农民生活都好一些。当时为了渡过这个困难，我是赞成这个办法的，但是当时觉得包产到户这个提法太危险了，我就把它改了个名字，叫做联系产量田间管理责任制。一九六二年秋在北戴河开会，我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中说，联系产量田间管理责任制，是人民公社的高级管理形式。起草文件以后，我送给陈伯达[2]看，我问陈伯达，这个文件行不行，他不置可否。他说，最后看毛主席怎么说吧。当时类似的这种做法，许多地方都有，安徽叫责任田，所有搞责任田的，情况都比较好，死人都少。这个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毛主席否定了它，否定了包产到户，批评“三自一包”。我幸运，没有直接批评我，但是我在广东不得不停止这个办法。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一听到安徽搞包产到户效果好就深信不疑。为什么呢？就是上边说过的，一个原因是，我已经听到小平同志，听到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要从社会效果出发这样的思想；另外一个原因是，联产责任制效果很好，我过去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一听说安徽这样搞，我就放心地在四川搞了联产责任制。至于农村的改革为什么先在安徽、四川搞开？因为1962年曾希圣在安徽那里搞过联产责任制，我在广东也搞过，所以安徽、四川这两个地方搞包产到户搞得比较早。我说的这段历史，杜导正[3]同志也清楚，当时他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工作。

索：我也可以作证明，因为我在沿长征路走的时候，也看到了这种情况。现在能不能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当中，现在中国农民生活是最宽松的？

赵：这个，还要研究一下。中国唐朝有个“贞观之治”。听说那一段农民生活不错，当然还要研究。但是从清朝中期以来，中国的农民生活，现在可以说是最好的。还有一段，就是土改到初级社那一段，中国农民生活是不错的。现在你到农村去问，解放以来什么时候生活最好？农民都说，现在生活最好，另外就是互助组、初级社那一段好。现在可以肯定，中国农民生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段是最好的。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作为领导人敢不敢承认事实，敢不敢承认事实的真相，不管这个真相是否符合你的主观愿望，四川老百姓对我印象比较好，除了联产责任制以外，还有一件事……

索：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因为毛泽东同志非常的实事求是。当时中国党内另外一些人，要按照欧洲的办法搞，结果那套办法不行。

赵：噢！噢！

索：毛泽东这么聪明，为什么到他晚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走到另一面去，为什么呢？

赵：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做了很好的回答。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人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加工的产品好不好，首先取决于材料来源。还有就是加工的能力。毛到了晚年，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他不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真实的情况很难反映到他那里。50年代毛主席除实地考察外，还做到了好话要听，不好的话也听，后期他就不行了。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党内的关系太紧张了。所有向上反映情况的，都要考虑毛主席想要听什么，不想听什么。所以我们这次政治体制改革，党政要分开，搞社会民主，首先要解决党内的民主制度问题。搞政治体制改革，发扬党内外民主，我们这样做时，尽管可能会不那么方便，但是可以避免大的失误。

毛主席另外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做“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这些观点都是很对的，但是毛主席晚期，因为党内生活不正常，虽然他自己知道这些道理，但是他的行动和这些道理是背道而驰的。毛主席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很多，因为我是远距离的，中央其他的老同志看得比我可能更清楚些，但是我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当时对我来说，感受也是很深的。

一九六一年春天，国民经济很困难，毛主席找我，我说了几件事，他都赞成。我说征购粮的问题，农民是希望一头搞死，一头搞活，意思是国家征购的数字是死的，留下的都是他自己的，国家要多少定下来，别的归他们自己支配。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农民希望定下来，是这样”。我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的人希望国家要他上缴多少粮食、多少东西也定下来，毛主席也同意。那个时候正在搞食堂化，食堂浪费很大，农民又吃不好，拼命吃。我举例：小孩子闹肚子，不吃饭少吃饭，他爸爸揍小孩，说饭是公家的，吃饭不要钱。我说农民自己在家吃得好，毛主席当时也同意。所以毛主席的晚期，主要是完全不了解情况。有人说，当时毛主席对国内的情况没有对国外的情况了解得多。

索：我向中国很多老同志了解过，他们对毛主席的这一些错误采取严厉批评的态度，比如食堂，比如人民公社。

赵：毛主席打了二十二年仗，他指导战后中国的建设和工作的时候，往往使用战争时期的办法，这方面有几个例子。战争的时候，开始的红军，后来的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当时是不谈物质利益的，也不可能谈物质利益，但是仗打得很好，所以毛主席非常相信供给制，非常相信思想工作，不相信物质利益。再者，毛主席过去指挥战争，主要运用了运动的战术，部队经常转移，毛主席战后搞建设，也搞过几次大转移。开始建设内地，不建设沿海地区，而中国那时是沿海地区发达，他却要在内地搞。一九五七年以后又要搞沿海建设，把内地的经济向沿海转移。一九六四年又要备战，又把经济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就这么来回调屁股，调了几次，损失非常大。

索：是这样，现在内地还有许多山洞。

赵：毛主席是很讲辩证法，但他的后期形而上学很多。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战争时期得不到什么外援，他都提力争外援。建国后他反倒提出自力更生是绝对的，谁要利用一点外援，谁就是修正主义。一九六二年开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说："不吃进口粮，不搞修正主义"。本来我们可以进一点粮食，中国的劳力很多，搞经济作物要靠劳力，经济收入比较高，都搞粮食，把经济作物给搞掉了，得不偿失。

索：我觉得毛主席尽管有缺点，但是也有很好的优点。一个是对邓小平，开始让邓小平当秘书长，后来又当总书记，"文革"后期，周恩来病危的时候，又把他重用起来。

赵：毛主席对邓小平有过很高的评价，但是毛主席始终坚信自己路线的正确。他看出来，如果让邓小平主持工作下去，他的路线就贯彻不下去，所以起用了一段邓，马上又批判他。我虽然和毛主席接触少，因为地位关系，但是我坚信毛主席不是个人品质上的问题。到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天，他都认为自己的路线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悲剧。索：我与邓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是我接触了他的材料，邓小平与毛主席的后期正好相反。邓小平的后期是真正的实事求是，一切看效果，我这个说法对吗？

赵：对。邓多次给我们讲过这个问题。讲到邓小平从第一线退下来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反复给我们讲，我现在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但是总是80多岁的人了，再过几年，如果我思想糊涂了再退，那就不好了。我们说，你现在身体还好，可以多搞几年。邓坚持说，正因为我现在还不糊涂，我退下来有好处。

索：我觉得邓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品德，我希望世界上很多人都能够记住这个事情。世界上很多人也觉得自己可以退，但是总认为别人没有我办得好。

赵：1963年毛主席跟我说过，说他见过几个大人物，这些大人物的名气可大了。当然这个请你写书的时候不要写进去。有一次他对我说，他见到孙中山了，他觉得孙中山老是那么干巴巴的几条。人到了晚年，是他声誉最高的时候，也往往是他最脱离实际的时候。

索：我作为记者，见过许多重要人物，比如丘吉尔，战争时期他了不起，战后选举的时候他落选了。后来又把他选上来了，但是他能力和精力都不行了，但是他又不下。邓小平正是在他晚年，失去他灵敏的思维以前，就做出了明智的决定，把重担子交给像你这样的一些领导人。你们有能力，干劲充沛，我祝贺你们成功。

赵：你沿着长征路线走了一趟，这不仅仅是你的体力好，而是你怀着一颗对中国人民炽热的心。这条路我都没有走过。

索：我写长征是因为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光看书是不行的，所以我要爬红军爬过的山，趟红军趟过的河流。路上我和夫人在一块，当时比较困难，我夫人说，我们可能走不到头就会死在长征路上，结果很好，一路上她根本没有害病。现在全世界在注视着你们新的长征，新的进展。你们现在的长征和过去不同，新长征不是枪林弹雨，而是和计算机打交道。我相信你们会成功，当然也可能会犯

错误，但是你们已经有思想准备。你们说，你们要成功要上百年的时间。你们有宏伟的计划，你们是无私的，都是为人民做事情，这都非常好。

赵：在北京工作的中央机关的同志，大多数，我不是说全部，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工作的，而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利益，希望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有了这样基本的一条，还不够，还得加一条，就是求实精神。光有为人民谋福利，不谋私利，还不行。如果光有为人民谋福利不谋私利这一条，思想不对头，方法不对头，同样地也可能给人民带来灾难。如果你立场不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为个人谋利益，这当然不行。一定要有为人民谋利益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再加上一个求实的精神。我的信心就是建筑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

我们从一九七八年工作到今天，九年来总的看我们的事情办得是好的。但是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国家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至于十三大以后，我们的前景是什么？总的说有两条：第一我们有希望，第二前进当中我们还会遇到困难，问题肯定不少。但是我们不谋私利，又能够做到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我想我们不至于出现了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当然我们对困难已经作了充分估计。有了这两条，就没有什么问题不能想清楚。我这个人是顺台阶被提上来的，20岁当县委书记，20岁多一点当地委书记，以后在省委、在中央。几十年的经验使我相信，辨别是非并不是非常困难。未来我们肯定会碰到困难，但肯定可以解决。n月2日晚上我和你见面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国家虽有变化、有成就，但困难还很多。我说了两条：第一我们在前进当中，中国是个大国，我们原来的基础差，困难很多，这一点我们宁肯估计得多一点有好处，我们还可能出现曲折，但总的说我们有信心。你写《长征》那本书中有一段“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近日，《美洲华侨日报》说，我作的报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艰难历程中的新觉醒。我很赞成这个话。我告诉先生，国内人民，大学生，对我这个报告最满意的是，我这个报告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听了比较踏实。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大学生对十三大报告有这么大的兴趣。有人说，反自由化后中国大学生对政治淡漠，现在看来不对。十三大期间，学生看电视，听我那个报告的情况，是很动人的。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胜利三十八年了，经历了成功，也经历了失败，现在我们确实悟出一些新的东西，人民也悟出许多新的东西，包括大学生。现在对中央谈什么问题，什么正确的，什么错误的，什么是符合实际的，他们心中有数。

索：我非常高兴你提到大学生，我们接触到中国许多大学生，包括留美的学生。你们留美大学生是优秀的青年，他们很用功，很爱国，关心国内形势，对美国学生很有影响。我想这些青年回来后，能不能找到发挥才能的场所。今天我看到《中国日报》，讲一些单位不要大学生，他们认为这些人格格不入。……

赵：我了解的情况是：（1）女大学生很多单位不要，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2）学校的结构有些不合理。教改包括这个内容：理科多，工科少，理科基础知识是好的，但接受单位希望工科。留学的也是理科多工科少。大部分高材

生都是搞理科。今后为了四化，理科也要，但更多地是应用。教育结构存在问题，还未解决，要逐步解决。工厂要中级人才，大专学生多、中级科技人员少，大学生到工厂去，往往从事中专工作，浪费了。教育和科技改革，要与现代化建设结合。

索：你们的教育投资不大。你们的超导了不起，走在世界前列。你们的教育投资比例小，美国教育投资很大。

赵：我同意，国内也是这样，民主党派经常提意见，每次人代会我都挨批评，但是这几年我们投资教育的经费还是有很大增加。我们的基础教育要注意。不久前我批了一个文件，支持超导的研究。但是中国教育的投资是廉价的，我们只要你们十分之一的投资，就可以达到你们十分之十的结果。

我和你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国庆，第二次是十三大。祝你健康，祝你写作成功，再见。

注 释

1．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1908—1993），美国著名记者、作家，生于明尼阿波利斯。曾任合众社驻莫斯科记者，《纽约时报》副总编辑。著有《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等，获普利策奖。

2．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原名陈建相。1927年入党，曾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中科院副院长，《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判刑。

3．杜导正（1923—），山西定襄人。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任《晋察冀日报》记者，新华社河北和广东分社社长、国内部主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长。

致陈守一[1]教授的信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九日

守一同志：

　　十月二十三日来信阅悉。获知《中国现代生活法律百科知识》即将问世，甚为高兴。该书作者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对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所表示的热情非常之好。您年事已高，仍在不辞辛劳培养研究生，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尽力，令人钦佩。来信中要我题写书名，因我从不题词、题字，未能从命，请予原谅。

　　敬颂

教安！

注 释

　　1．陈守一（1906—1995），江苏那州人。1927年入党，时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曾任司法部五司司长、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北京法学会会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关于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召集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和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座谈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时的讲话摘要。

一、关于对“两权分离”的理解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中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对两权分离的理解直接关系到企业能不能有充分的活力。我们提出两权分离的目的是扩大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权力，不是为了扩大、强化资产所有权对企业承包的制约。一部分同志认为，企业作为法人，不能没有所有权，两权分离妨碍了企业的自主权，似乎这个提法比原来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提法后退了。另一些同志想强化资产所有权对企业的干预，比如想建立一个拥有至高权力的董事会作为资产所有的代表者，不仅要分红利，而且还要负责资产的经营。这两种想法，问题都出在对两权分离的出发点和目的的理解上。我们强调两权分离的出发点、目的，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已经讲得很清楚。过去说全民资产必须全民管理，全民管理不能由全体老百姓都参加，只有国家代表去管理，因此，就带来了全民所有、国家管理的问题。讲两权分离，就是说不能国家管理，而要经营权、管理权下放。经营权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我们对经营权应广义的理解，不能作狭义的理解。狭义的理解，经营权就是经营权，就是日常管理，具体的经营活动。这样理解不完整、不全面。广义的理解，就是像马克思那样，把经营权同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作为同一个概念。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直接生产者，不是所有者，而是占有者”，“所有权留在贷款人手中，而对货币的支配则转到产业资本家手中。”过去地主出租土地这点表现得最明显，土地所有权归地主，而怎么种，包括转让就归承租者。马克思还说：“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的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马克思举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即“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我们搞的一些股份制企业，持股者都是单

纯的所有者。入了股，到企业按股分红就是了，或者是按股分产品。所有者对企业有一些制约，但制约不能过大，不能干涉企业的经营管理。

我们实行两权分离应坚持两条：第一，不改变所有权。这不是说不实行所有制的多种形式了，而是说我们重点不在改变企业的所有权。不是说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就把所有权也交给企业。有些同志想变国家所有制为企业所有制，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比如有的主张全国只保留几千个国营大企业就行了，其余的可以拍卖或转让。沿海有的地方对少量的小企业可以试一试，但全国不能那么搞。如果大量的企业转为私人的，出现很多百万富翁，社会矛盾就会加剧，社会就不得安宁。在今天，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如出现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那样的矛盾，那是经受不起的。如果那样，很可能物极必反，现行的政策也坚持不下去。有的经济学家只讲效率，而政治家就要审时度势，从政治、经济各方面考虑。关键还是在于解决经营权的问题。

第二，这种所有权正如马克思所说是单纯的所有权。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情况下，要强化企业在经营上的责任，使企业成为真正的法人，企业是资产的占有者、使用者、支配者。当然，要保证所有者的利益。如果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利改税的办法，它交税就是了；如果是承包制，按合同交钱就是了；如果股份制，就按股份分红利、分产品。至于企业如何经营，如何活动，如何发展和扩大，资产所有者不应过多地干预，而应由经营者去做。当然，资产所有者要有干预，要有监督，但不能强化所有权，不能使资产所有者成为实质上的法人。如果那样，我们的整个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就要改变。多年来我们的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就是，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如果强化资产的所有权，使所有者成为法人。企业的自负盈亏、独立核算，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成为法人等等，就不能成立。企业资产的使用，资产的转移包括相互参股，相互投资，相互组合，都可以由经营者去做。比如大企业可以收购小企业，可以租赁小企业，可以承包小企业，也可以向小企业参股；反过来，小的也可以搞大的。当然拍卖应经过资产所有者的同意。现在，上述的几种资产转移形式已经出现，这对发展企业之间的联合非常有利。我们应当大力提倡通过股份的形式、租赁的形式、拍卖的形式、承包的形式，发展企业之间的经济联合。联合老是松散的，老是“三不变”也不行，不进则退。对企业联合、企业集团都要进一步促进它，在条件具备时，要逐步改变“三不变”的状况，让企业能够向外扩展，给企业一个发展余地。当然，这种改变是在承认利益的基础上逐步进行的。所以当前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正确理解“两权分离”问题。否则有些人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顾虑。

承包制是目前我国实行“两权分离”的最可行的一种形式。承包制落实了，企业的经营权落实了，经济效益才可能提高，企业相互之间的联合也才有可能。在这方面，吉林省的经验值得重视。吉林省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搞承包制。搞到现在五年了，效益显著。过去吉林是补贴省，工业管理非常落后，现在它的财政收入每年增加几个亿，工业生产、管理水平都大为提高，进步很快。一些同志现在所担心的问题，他们都在实践中解决了。今天印发赵修[1]同志的调查报告是介绍吉林

省如何完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充分发挥“厂内银行”作用的，这个材料写得好。企业内部管理如果真正按这个经验去办，厂内各种经济关系都通过厂内银行的形式、货币的形式来实现等量劳动交换，什么平均主义，什么吃大锅饭等弊病都能较好地得到解决。真正按这个经验搞，就把企业的各种基础工作带起来了，将极大地推动企业内部各个环节的经济核算和企业的科学管理，使承包制显现出明显的经济效益。

有人说承包制不规范，怎么不规范？我们前几年把利润变成税收，现在又回来了，是利税并存。将来要把利润部分一分为二，一部分为税收，一部分为利润，具体办法还可以研究，但现在不要变。在实践中逐步摸索，逐步完善，就规范化了。

把利改税变为利税并存，还有一个好处，现在企业处在条件不均等的情况下，通过承包可缓解这种不均等。这个企业利润比较高，承包基数就高一点，国家分成多一些；那个企业亏损，承包基数就低一些。如果现在让企业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那就涉及到价格体系、计划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问题，目前很难很快解决。如果继续吃大锅饭，继续搞平均主义，企业也不会去挖掘潜力。企业不去挖掘潜力，外部条件就始终不具备。而承包经营责任制把企业推上自负盈亏的轨道，使企业想办法挖掘潜力，这样，企业的情况就会好一些，国家的情况也好一些。这样也给我们以时间，使我们逐步理顺企业的外部条件。外部条件、内部条件是互为条件的，不可能会突然有一天出现一个好的环境，等是等不来良好环境的。承包制就是把企业推向自负盈亏的重要一步。农村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农村刚开始承包时，也是外部条件不平等。通过联产承包，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情况就逐步好起来，就为农副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如果当时我们不搞承包制，等待农副产品价格放开，那么，等到现在农村恐怕也不会有多少变化。所以，从任何角度来考虑，承包制都不会加大改革的难度。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使改革迈出一大步。

现在有一种提法，说企业承包后容易出现短期行为，这不对。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是，不承包就没有短期行为，似乎承包后反而有了短期行为。应当说企业的经营权越充分，短期行为就会越少。企业的经营权越不充分，职工仍然不把企业当成自己的，短期行为就越严重。现在的承包还不能完全解决企业不重视长期行为的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承包制，解决这个问题。企业的行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关键在于承包制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政策。如果政策是长期的，企业就会有长期打算；如果把承包作为权宜之计，政策摇摇摆摆，企业当然会有短期行为。解决企业长期行为、短期行为的问题，一定要明确承包制是方向，要长期坚持下去，是要进一步完善、发展的。我们不要把承包制同股份制、租赁制对立起来，可以容纳、兼容并蓄。不搞承包制，根本出不了企业家。承包制进一步完善之后，才有可能涌现出一大批企业家，企业行为也才会好一些。国家对企业要有监督、制约，但企业的短期行为完全靠外部来监督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

目前搞理论的、搞实际工作的，都应集中力量去完善承包制，发展承包制。

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可以互相结合。实现企业之间的联合，这可能就是中国式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一条路子。这里有很多关系要研究。第一，关于与所有者的关系问题。可以成立个机构，如国营资产管理部、管理局管理国营企业的资产，大企业还可以派专员，这方面的形式可以研究，可以创造。总之，所有者不能干涉太多，不能妨碍厂里的经营权。第二，关于与职工关系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职工应该发挥主人翁的作用。过去就发生过对由企业家承包和全员承包的关系的理解问题，有些同志主张全员承包，感到这样做是社会主义性质，好像企业家承包似乎性质就变了。我们认为，谁承包都一样，主要是要使工人有主人翁的责任感，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石家庄棉纺四厂是经营者承包以后，再向职工作治厂方案报告，职工投了信任票，他再干。吉林推广的一种办法也很好，主管部门向社会招标，筛选留下三个厂长候选人，然后把这三个人推荐给职工代表大会，最后由职代会决定接受谁。在此基础上，再搞一个全厂风险承包，搞好了全厂职工都有利，搞不好要减发或停发工资。这样做，效果也好。乡镇企业搞得比较活，最重要的是政府机构对它们干预少，企业自负盈亏的观念比较强，一句话，它们基本上是自负盈亏的体制。将来我们可以把一些小企业的所有权转到县、转到区，这样做就是使所有权具体化了，有利于建立自负盈亏的机制。第三，厂长与集体决策的关系问题。厂长也不能事事个人说了算，大事还要集体决策，大企业尤其如此。我看可以搞个管理委员会，但不要在厂长之上再搞个企业委会。管理委员会可以有工人、技术员、管理人员参加，集思广益。第四，承包以后与党委的关系如何摆，要进一步研究。一些中小企业，最好是党委书记由选举产生，选上谁是谁，谁当选就给谁一定的待遇。

完善、发展承包制，还要研究发包单位和承包市场问题。可以设想，一是在财政部门里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这个机构就代表国有资产；二是以市或县为单位，设立一个承包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仅管投标、招标、发包，而且还管协调承包中间出现的分歧。这个委员会是市或县政府领导下的机构，是一个有权威的协调部门，和资产所有者是两回事。要研究一下承包市场问题，要创造一个市场条件。有了承包市场，就有了媒介，谁想承包企业，谁想找承包者，可以到这里来登记。市场可以推荐一些企业家，但也要担保。这样，企业家就有了“俱乐部”，企业家集团的形成也有了一个条件。也可以通过企业家协会来搞承包市场。可以先在几个城市试点，创造经验。

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法（草案）》的修改问题

党的十三大以后，很多东西都明确了。大的原则应当反映到《企业法》中去，当然，不成熟的不要写进去。要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袁宝华、安志文、宋汝棼[2]同志参加，把《企业法》再改一遍。要反映十三大的精神，反映企业承包发展的新情况。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思想必须写进《企业法》的总则，如果不明确规定这一条，企业法就失去了灵魂。《企业法》必须反映新的东西，同时要注意

和防止有哪些写法将来可能会限制承包制的发展，限制改革的深化。《企业法》一定要明确地体现承包制，体现厂长负责制。企业党组织应起保证监督作用，支持厂长负起全面领导责任的内容可以写得原则一些。争取最近修改好，明年提请人大审议通过。

注 释

1．赵修（1921—1992），河北井隆人，原名赵辛酉。时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曾任湖北省副省长，武钢党委第二书记，农业部副部长，吉林省委书记、省长。

2．宋汝棼（1922—2014），山东烟台人。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曾任北京市地方工业局局长、计委副主任、建委主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在全国政协举办的党外人士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今年三月我出席了全国政协的常委会议，讲过一次话。现在八个月过去了，我看这八个月形势的发展同那时的预料是吻合的。那时有个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干扰的问题，这八个月中，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是健康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更加牢固了；改革也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发展了，更深化了。整个来讲，我们改革的步伐不仅没有放慢，而是加快了，有些改革今年已经出了效果，明年效果将会更加明显。

最近我们党召开了十三大，这次大会开得比较开放，透明度较大，在座的一些老朋友还亲自列席了大会，其他朋友也通过电视、报纸、广播，了解了大会。老朋友对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提出来。这样，大家讲，大家听，大家议，直接对话，比一个人讲许多人听好得多。

多党合作是我们的优点，统一战线会更加牢固发展

大家讲了许多好的意见，是很值得重视的。十三大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会有深刻的影响，对爱国统一战线当然也会有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和实施，对政协的工作，各民主党派的工作，肯定会有深刻的影响。十三大对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意味着什么？这是个大题目，很值得深入研究。中共中央统战部要研究，请政协和各民主党派也来研究。总而言之，十三大将意味着我们的统一战线会更加牢固，更加发展。两面旗帜：一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一面是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旗帜。在这两面旗帜下，我们的统一战线肯定不会削弱，不会萎缩，相反，团结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团结一定会越来越亲密。

政治体制改革，是要兴利除弊。弊端，要除；优势，要发扬。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都是我们的优点、长处，应当在兴利除弊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并且逐步走上制度化的道路。具体怎么做，如何逐步形成更规范的制度，如何赋予好的形式以更充实的内容，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共产党准备听取大家的意见。首先是集思广益，然后分别轻重缓急，从办得到的事情做

起。

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会迈出较大步子，但资金短缺是一大问题

十三大以后，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会迈出较大的步子，经济建设和教育、科技之间的关系会处理得更协调一些。我是相信这一点的。当然，这要靠经济界和教育界、科技界共同努力，大家都来促进。

教育的重要性，十三大讲得很多。“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经费怎么样？我想讲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我们的教育经费确实不够用，这是事实。第二，我们的教育经费确实在逐年增长，而且它的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国家每年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这也是事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九年，年年如此。一九七八年，国家财政总支出是一千一百一十一亿元，一九八六年，国家财政总支出是二千三百三十亿元，九年增长了一点一倍。列入国家预算的教育部门事业费开支（不包括各地方、各部门、企业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一九七八年是六十五亿，去年是二百一十四亿，九年增长了二点三倍。一九七八年，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六，去年占百分之九点二。有些同志和朋友经常为教育费用呼吁，我们理解这些同志的心情，也理解教育界的困难。我现在说一说这几年教育费支出的实际情况，是希望同志们也了解政府已经做了的事情和政府的困难。资金短缺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大问题，将来很长时期内估计也不会富裕到哪里去。工业，农业，交通，通讯，市政建设，到处都是资金短缺。教育经费在总开支中的比例由百分之六上升为百分之九，实际上就意味着其它方面开支的相对压缩。今后，政府还是要尽力增拨教育经费，做到逐年有所增长，并且尽量使增长的幅度继续大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幅度。但是，要求更高，是办不到的。今天我专门说一下这件事，希望大家理解国家的全面状况和实际困难。我是要辞去总理的职务了，希望大家将来还能理解新总理的困难。

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很多，包括工资，职称，住房等等。过去几年，有所改善，但仍有不少问题。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近期可以做的事，国务院有个初步考虑。过两天，可以请劳动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讲一讲，通通气。

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在十三大报告中，把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作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来。这个论断，是从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居住在祖国边疆比较贫困的地区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得出来的。

今后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一方面在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同时，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必须给予更多的关注，继续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强自身的活力：一是加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本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培养本民族的干部和经济管理、科技人才；二是采取更为稳妥的切合当地实际的步骤，走改革、开放之路，逐步改变封闭状态，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发挥本地区的优势，加强同其它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迅速提高生产力；三是继续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教育，不断巩固发展本地区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最近西藏极少数人配合在国外的达赖集团煽动民族分裂情绪，成为西藏地区不安定的因素。国外宗教敌对势力在内地一些地方的渗透，也影响了当地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对于民族分裂活动和非法的宗教活动，我们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坚决反对，并且依法严肃处理。当然，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有什么改变。坚持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也是国家的法律，不需要改变，也不应该改变。

做好台胞探亲接待工作，促进“三通”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台湾当局最近采取放宽台胞来大陆探亲的措施，这是我们多年来力争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影响和台湾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随着探亲而来的还会有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通商问题也或迟或早会提上日程。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趋势吧！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台湾来大陆探亲的接待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不仅有助于沟通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联系，增进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信任感和向心力，而且对促进“三通”、实现和平统一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听说一些民主党派中央已经要求各级组织和成员认真做好有关接待工作，这很好。这方面党外朋友都是有着自己的优势，你们在接待中遇到什么困难，可请台胞探亲所到地的统战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协助解决。

十三大制定的宏伟目标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中国共产党要努力，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也要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任重道远，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种种困难。我们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

给《经济日报》创刊五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经济日报社：

在《经济日报》创刊五周年的时候，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你们坚持改革，不断创新，把这张报纸办得更有生气，更有深度，更有特色，为宣传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全面改革做出更大的贡献！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国家体委转第六届全国运动会：

在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开幕的时候，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体育爱好者以及为这次体育盛会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向前来参观盛会的朋友们、同胞们表示热诚的欢迎！

我希望今后在全国更加广泛展开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创造优异成绩，加速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预祝第六届全运会获得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总结实践经验 提高贯彻十三大精神的自觉性*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井冈山听取江西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我讲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江西要走改革开放之路。江西是个内陆省，离沿海比较远。如你们说的，信息不那么灵通，商品经济观念、市场观念，不像沿海地区那么强，要差一点。这次要利用传达党的十三大精神的机会，好好地把干部的认识提高一下。要有针对性，明确在江西干部思想上主要应该解决几个什么问题。学习、贯彻十三大精神，不是很短的时间，不是一阵风。要有针对性地来传达、学习、贯彻十三大精神，看看在江西干部中间应当主要解决几个什么问题，抓住这几个问题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要结合总结回顾改革九年来的工作，结合干部自己的经验，有的搞得好，有的搞得差，每个地区都有成功的例子，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一些教训。结合这些，使干部思想能够进一步解放。

我们走改革、开放的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我们现在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原来就很明确的，而是通过实践认识到的。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解决了认识路线、思想路线的问题，解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那时有很多问题并没有提出来，承包制的问题没有提出来，农村包产到户也不是很明确。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搞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修改六十条，把反对包产到户改为不要包产到户。但是我们跟过去不同，我们有个正确的认识路线、思想路线，就是对凡是群众中间出现的东西，我们都不轻易否定，先看一看怎么样。好，我们就承认它；不好，我们就改正。在群众中间，比如说一九六二年，我们在农村也出现过许多好东西。广东就搞了联产责任制，叫田间管理联产责任制，那时有意识地说是田间管理。在安徽搞了责任田。当时这些对农民渡过困难，都有好的效果。还有更多的地方搞包产到组，也取得了效果。但是那时候我们思想路线不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那时候从“左”的观点出发，都把它否定了，作为错误的东西批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解决了认识路线、思想路线的问题，农村这个路子我们提倡由各个地方自己去走。一开始说边远山区可以包产到户，以后讲在一亿人口的困难地区可以搞，以后说除了少数经济特

别发达的地区，一般都可以搞。给群众一个选择的机会，给各级干部一个选择的机会，最后大家看到这个效果好，在三年时间内，农村以联产、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这场改革，就基本上在全国推开了。以后承包又进入了城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问题，虽然提得比较早，但是当时提这个初级阶段，究竟意味着什么，好像并不是很明确。我们那时候进行的许多改革，包括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也不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就去改革。九年来，主要是根据一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点我们是做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凡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都承认它，都允许试验，允许探索，实践证明好的都允许推广。我们就是这样取得成功的。一方面，我们这些办法都是有效果的，人民都看到了，得到了好处，大家都觉得好，拥护这些办法。但是另一方面，过去并没有提高到理性认识这个水平上，因此一边做，一边还不那么踏实，很多干部心里不那么踏实，经不起风吹草动。有些比较谨慎的同志还与这些办法保持一定距离。现在我们经过九年，十三大最大的收获，就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认识到为什么这套办法、这套政策能在中国发生这么好的作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必然性。就是说，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必须采取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方针，这样的路线。所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情况那就不同了。我们在十三大总结了九年来丰富的实践丰富的经验，在认识上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用这个认识去武装全党同志，改革开放就更加自觉了，精神状态就不同了。我们应该把十三大总结出来的东西，有力地去指导中国的实践，有力地去促进我们更加自觉地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全国都应该这么做的。就江西来讲，更有这个必要。江西的同志讲，更加需要在干部中间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贯彻改革开放方针的教育。当然，你们说的从外地请进来，本省到外地学习等等都有必要。我看你们自己中间，干部中间，就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把正面的反面的、成功的和不那么成功的经验，好好总结一下，干部的思想就会有很大的提高，就会再实现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我想这对今后江西的工作会有很大的意义，也会发现很多的干部。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就是要开发江西丰富的优势资源。尤其是农业资源，当然矿产资源也是很丰富的。你们的农业资源，在周围这几个省份中，是比较突出的。包括木竹资源、土地资源和气候、水面等等，总之，相对来讲，你们人口比较少，面积比较大，资源比较丰富。你们的弱点，主要在资金、技术、交通、信息等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恐怕要走这样的路子，就是利用你们的资源优势，同沿海地区进行合作，他们需要你们的资源，你们利用这些资源同外地合作，来克服技术方面、资金方面、管理方面以及信息等方面的不足。江西不是沿海，但是靠近沿海，附近有福建、广东、浙江、江苏，还有上海，你们是他们的腹地，是比较近的腹地，合作比较有利，有很多好的条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沿海省份实行开放，实行大胆的开放政策，与沿海发展经济技术合作，把你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对资源的开发，通过各种各样的合作形式转化为对资源的开发。凡是资源比

较丰富的省份，都有一个资源开发的问题，都有一个资金、技术、管理的问题，资金积累的问题。要通过合作的形式吸收外来的资金，吸收外来的技术。通过合作来积累资金，有了资金就可以扩大开发。我看确立这个思想很重要。如果拒绝同外面合作，光依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去积累资金，这个时间恐怕就拖得比较长。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如果说，利用自己的资源，吸引外来资金、外来技术进行开发，那么，开发资源的资金可更多地依靠外地。你们自己的资金，恐怕还要用在改善自己的基础设施，多考虑改善投资环境。如果你电也没有，交通也不通，运费很贵，虽然你的资源很丰富，也不一定就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讲讲承包引进竞争机制的问题。我们在北京进一步研究过这个问题，工业企业的承包看来不是短期的。这几年，对这个问题有些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经过几年反复看来看去，中国还得要走这条路。像农村一样，过去曾经讲过“包”字进城，看来还要这么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承包制这个办法，是在目前我们市场调节、市场环境、市场条件并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能够把企业推向自负盈亏的比较可行的办法。而企业只要走上自负盈亏这条路（当然是相对的，相对的自负盈亏），企业的潜力就可以挖掘出来。我们现在的国营企业，各个层次的国营企业，大家公认潜力大，甚至越是落后的企业潜力越大，越是亏损的企业潜力越大。就像我们开始搞农业承包一样，潜力是很大的。这个潜力之所以不能挖掘出来，就是因为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统收统支。只要能把企业推向承包这样一条路，在几年之内，企业效益就会有明显的提高。比如，吉林省，全省工业搞承包，连续搞了五年。这个省过去的工业管理、工业效益在全国的位置都是很靠后的，经济效益不好，管理不好。搞了五年承包以后，经济效益连续提高，在全国各个省份中，除了广东因为有出口、来料加工等等以外，以一个省为单位来讲，连续五年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的，就是吉林。吉林过去是个补贴省，财政不能自立，五年实行承包以来，几乎每年都增加几个亿。现在他们的经济效益在全国的位置大大靠前了，吉林的财政早已经不需要国家补贴了。这说明，承包是大面积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的办法。

在我们的国家，形成新的经济体制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东西。当然，我们只有形成一个新的经济体制，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真正提高；但是，如果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提高，我们根本就无力去形成这个新的经济体制。你财政很困难，价格改革不敢进行，那你怎么样去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所以我觉得企业搞承包经营制，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形成的，有利于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有利于加快结束新旧两种体制并存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农村的经验很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在农村突出是解决一个大锅饭，当时农村改革也没有想到其它的问题。当然，现在的农村改革远远不是仅仅一个家庭联产承包的问题。农副产品价格的放开，农副产品市场条件的形成，都是因为先有了承包制。将来工业也是这样的结果。实行了承包制，把竞争机制引入了承包，效果是很好的。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这就有利于克服承包中间某

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国家对企业搞了承包制，不等于说企业内部的管理就搞好了，但是这为解决企业内部的管理提供了动力，提供了条件。所以我们有了承包制，还必须进一步解决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就是各个环节的经济核算，包括企业内部管理的基础工作，企业内部的领导体制，这样，就有可能使多年来管理落后的企业很快改变面貌。首钢承包制的效果所以特别明显，这与首钢内部管理原来基础就比较好有很大的关系。当然，首钢过去的企业管理虽然比较好，但整个企业缺乏活力，到后来有了承包制，企业活力增加了，加上他们原来管理的基础比较好，因此首钢的效益就特别明显。这说明，搞了承包制，还要解决好内部的管理。我们要利用承包制来促进企业内部的管理。

在这里我说两个情况你们可注意一下。吉林这几年要企业搞了厂内银行，有二百个企业搞得非常好。他们省的人大主任赵修同志写了份材料，《人民日报》海外版登了，昨天广播了。这个材料我看过，并批复了。厂内银行过去我听说过。从吉林这个材料可以看出，如果真正去搞，认真去搞，这个厂内银行的办法对推动企业内部各个环节实行核算制有极大的作用。厂内各个环节人与人之间，班组与班组之间，上道工序与下道工序之间，基本上是一个等量劳动的交换。搞厂内银行，通过内部价格的结算，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克服大锅饭，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第二个情况是石家庄有一个工厂，搞满负荷工作法。这个厂的厂长很有点头脑，他这个满负荷工作法基本上集中了中国的和外国的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集其之大成，而且参照了中国的特点，现在有很多人去参观。满负荷工作法，很适合现在的情况，有利于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包括设备潜力。最近经委总结了，认为很值得提倡。

所以，承包引进竞争机制，有了这个条件以后，将促进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从现在看，厂内银行和满负荷工作法这两个东西可以结合。估计承包制完全落实之后，对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企业之间的相互联合，将会有很大的推动。企业之间的相互联合，这就包括企业之间相互承包，企业之间相互租赁，企业之间相互参股，企业之间相互有偿转让财产，或者就叫兼并，一般就是兼并体制、兼并机制，这样，我们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合，慢慢地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经济上的合同联合、合同关系，或合同协作关系，它就触动了企业的所有权的问题。所以参股呀，承包呀，租赁呀，这对今后企业组织结构的改变有很大的推动。吉林承包搞得比较早，现在它已经这样开始了。比如吉林化工厂，就把吉林市和外地的很多小的化工厂和它搞到一起了。这些小的厂子，原来有的是县的厂子，有的是别的市的厂子，现在都作为股份和它搞在一起。它是新的组合，优化组合，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条块关系的问题，其意义是很大的。所以人们讲，承包制，股份制，还有什么租赁制，这都不矛盾。只要经营权真正落实到企业，企业之间相互关系就会多样化，就丰富多彩了。看来中国企业的社会化问题可能从承包制开始，从承包制突破。

我顺便说一说，北京理论界搞研究工作的人已经接触了两个问题。承包制搞

了以后发生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的同志说搞承包制是企业所有权的倒退，因为我们过去一直讲企业所有权，企业是法人，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后来我们说两权分离，我们这个承包制就是根据两权分离，好像财产所有权跟企业没有关系了，财产所有权是政府的，经营权是企业的，这样一搞，是不是企业自主权反而缩小了。这是一种认识。还有一种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那就是过分强化企业所有权，想把经营权缩得很小。一些大的权力都要集中到董事会手里，在厂长之上还要设立一个有着至高权威的一个董事会机构。看来这种意见并不符合中国的情况。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化所有权，而是为了扩大、强化经营权。是强化企业的经营权，而不是强化国家财产所有权。不是用国家的财产所有权来制约、限制企业的经营权。要明确这一点。将来这个所谓经营权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包括财产的占有权，财产的支配权，财产的使用权。而所有权则是单纯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将来主要的就是分配关系，分红利，拿股息，股金分红，或者按股分成等等，法人仍然是企业，厂长仍然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这个问题，你们下面不一定接触到，但它在北京各方面的认识曾经有一段不是那么一致。这个问题不明确，就失去了我们强调的两权分离的原来的用意。

总得来讲，承包制还是开始，它需要充实、完善、丰富、发展。我们搞经济的同志，大家应当对承包制进行很好的研究，不断地总结经验，注意承包制在实践中间的发展，提供一些新鲜的经验，它在两三年内可能给我们国家带来明显的效益。刚才，你们讲的是明年，可能还不止明年，恐怕在几年之内可能对我们的工业，并且不仅仅是工业，还包括商业、交通可能会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对缓解各方面的矛盾，改善我们整个经济环境，克服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紧张因素，减少我们在改革中、前进中的困难，都会有好处。现在北京组织一些同志正在研究《企业法》，想把这些重要问题，近年来关于承包制的发展，特别是两权分离的思想，以及承包制的原则，承包制大的方面的改革，在《企业法》中有所反映。使这个《企业法》能反映我们两年来在工业改革方面取得的新的经验。

关于一九八八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体改委等单位汇报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的讲话要点。

明年的改革问题主要是工资、物价、大企业搞活方面。总的是巩固、消化，需要做些补充，解决一点突出的矛盾。比如房租改革明年就不能迈大步，只能试点。明年改革主要解决改革中不衔接、不配套的问题，解决当前改革中冒出的新问题。

改革要存利除弊，因势利导。明年企业搞活方面也不迈大步子。但大企业要搞活，它们的税负比中小企业、集体企业重，任务也压得重。某些行业要解决点问题，如纺织行业的问题要解决一下。可否大企业搞活一点，小企业多收一点税，双方就接近些了。

对银行省市行的职权要划分一下，中央管哪些，地方管哪些。现在银行都是国家的，但地方不管银行，所以它拼命向银行要钱，或者自己搞信用社。地方没有框框，没有笼子了。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挂钩，中国这么大，完全没有地方利益不行，各省都搞省银行也不行。要想办法让地方自己管住金融笼子，地方有资金，也就有笼子，他会按这个框框用钱，也不会搞银行以外的东西了。把储蓄划分一下，哪些地方用，哪些中央用，开始给地方的笼子可以小一点。

固定资产投资要甩一些到利用外资上去。真正看准了的项目，去借外债搞。广西红水河水电站和平果铝矿可以借外资搞。上游搞好了，下游的发电能力就可以提高。

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能否有个办法变成地方自己的要求，不光是我们要求地方控制。全国各地联合起来对付你北京，你不好办。

铁路包干的问题还值得研究，怎么包法？如果铁路包干，钱是它的了，就不听你了，你要修的路他不修。修哪条，不修哪条，由不得你。所以铁路的投入产出怎么包，要计委研究。可否按项目包？包营运？不要笼统地上交利润都包干。

企业的工资同效益挂钩的问题要慎重。如果百分之四十的企业工资实行挂钩，其余百分之六十的企业就要攀比，就会顶不住。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总工资水平必然都要上去。百分之十五的企业试点，影响还不大，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你就挡不住了。在宏观经济讨论会上，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

经济学家，都不赞成我们搞工资与税利挂钩。企业搞工资挂钩，工资上去了，机关事业单位也就要求加工资，轮流加钱，物价就上涨，物价上涨又要求加工资。这样不行，这个问题你们好好讨论清楚。

明年工资总额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企业间工资可以有差别。现在搞来搞去只搞了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在企业内部恐怕大都还是大锅饭。工厂管理人员的工资不能工厂自己定，特别是工厂领导人的工资要由上面定。

现在职工收入增加了，生活提高了，可还是不满意，主要是工资分配不公平。工资应该有差别，不能平均主义；但又不能太悬殊，这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所以工资上的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要解决。南美国家经济增长，收入提高，但收入悬殊，所以有不满情绪。启立同志介绍一本书《日本高速增长的社会问题》，值得一看。日本经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上反倒有不满，甚至有点动乱。这也是由于分配不公。生活都提高了，也可以有一片不满声，“不平则鸣”!

明年企业奖金就按四个月为限，超过照收奖金税。企业内部合理分配。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哪个企业工资特别高，我想主要是有失业后备军，它有劳动力市场，由劳动力的平均价格来决定。

钢材专卖，叫不叫专卖？可以叫国家加价订货，强制收购。你们再研究，反正不能把价格好处让中间人拿去。

地方企业不及时结汇，钱反正还在，只是我们没有拿到。当然要抓紧让他们结汇。

看来，物价问题，其实是生产资料价格问题，特别是钢材问题。工资问题，是机关、知识分子问题，还有企业和效益挂钩问题。挂钩试点，可以，但不宜扩大，否则工资水平、消费控制不住。

对我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思考*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苏州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把在广东和到这儿看了以后的一些想法一起谈一下，基本的想法是一句话，我们要把沿海这片地方甩到国际市场上去，靠国际市场来发展自己。小康也好，现代化也好，都要以对外贸易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发展经济要依靠对外贸易，我国还是个经济弱国，整个中国发展贸易立国、贸易兴国，可能还不行，但沿海地区完全有这个可能。广义来讲是沿海，也可能讲是二亿人口。以前我们讲的都是讲城市人口，现在看来不只是城市，包括沿海的农民，农民中要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转出来搞二、三产业。沿海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农民转向二、三产业，完全靠国内市场是不可能的，有许多矛盾无法解决。哪些矛盾无法解决呢？首先是原料无法解决，而且同中部、西部地区的矛盾非常尖锐。原料问题、市场问题都无法解决。中国要兴旺发达，不挤上国际市场，不在国际市场占据应该占的份额，这不行。如果沿海地区把二、三亿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转向二、三产业，相当部分需要靠外向型经济，依靠国际市场，靠国际市场养活自己，那我们国家的情况就会有比较大的改变。如果将来整个沿海地区城市加农村，依靠国内的原料加工，占领国内市场这个路子是走不通的。因为整个国内的原料很不够，市场也不是那么大。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把沿海地区二、三亿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转到外向型这样一个轨道上去，那就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有很大的好处，不仅可以同中部、西部地区减少矛盾，而且势必要把中西部的经济带上去。

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刚才我讲的是必要性，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样做对我们十分有利。有没有可能？我看是很可能的。根据最近的情况看，也是非常可能的。就是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的这种农业廉价劳动力，生产出口产品，依靠国外市场，依靠国内和国外进口原料，然后我们自己加工，再出口到国际市场，等于劳务输出，是可能的。整个国际市场上有相当数量的属于劳动密集型商品，或者劳动密集加知识密集。我们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国际市场是有的，总有相当数量的这种商品。当然，所谓劳动密集是相对的，现在的劳动密集与上个世纪的劳动密集不一样，下一个世纪的劳动密集商品和现在也不一样，在成本

构成中，终究有一个商品劳务费用比例较高。生产这一部分商品，谁能够具备条件？首先是要劳动力便宜，谁的劳动力便宜，谁就具备条件。当然，这种劳动力，光便宜不行，还必须有一定的素质、技术、管理，能生产出质量比较好的产品。这个条件我们差一些，但差一些是可以解决的，特别是依靠乡镇企业这种灵活的机制。这一部分企业是在竞争环境下产生的，因此它的机制也适合竞争的环境。我们乡镇企业有这个条件，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完全有条件使我国的劳动力尤其是沿海的农村劳动力成为既是费用廉价的，又是有技术水平的劳动大军。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比韩国、香港差，更不应该比马来西亚和泰国差，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

最大的问题还是制度、体制问题。我们能不能转到这个轨道上去，能不能适应这个条件，最大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完全有这个可能性，但体制的限制很大，所以需要很好地研究体制，现在我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我们费用是很低的，如果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它的机制也是好的，将来会出现很多很会经营的人才、企业家。现在我们整个体制特别是出口贸易体制，问题比较突出。刚才大家提了很多意见，也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怎样解决比较好，需要很好地研究。但是我相信这一点，总之我们会逐步改善的，总会把我们的制度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但也不可能一个早晨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只要在三个问题上解决了，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这个思路是完全可能的。一是廉价劳动力，这个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二是比较好的企业机制，包括管理、劳动力素质；三是整个进出口贸易机制，解决这个问题难度最大，影响最大的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只要这三个问题解决得好，沿海的劳动力在国际上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总之，主题就是如何搞好沿海地区，首先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利用现在这种机会，利用我们的优势，加快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这个问题在政治上也有意义，特别是“一国两制”的问题。如果我们沿海有几块地方，不要说有两亿人口，一亿人口，就是有五、六千万人口，经济真正搞得比较好，对我们解除香港人的疑虑，非常有好处。对实现祖国统一，解决台湾问题，也非常有好处。现在，相当一部分人，我说的还不是台湾当局，主要是中间人士，甚至赞同统一的人，也认为统一时机不成熟，主要是经济差别太大。只有等到将来经济差距缩小了，就为统一问题的解决创造了一定条件。台湾只有两千万人口，我们大陆上如果有五、六千万人口不要说接近台湾的水平，只要发展确实比较快，那统一中的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就可以减少台湾人的顾虑。这在政治上，对实现祖国统一，不论是解决香港问题还是台湾问题，都有好处。所以就提出这个问题。

这两天讨论对需不需要这样做，可能性怎么样，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政策上提出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还要回到北京去研究，现在《纪要》主要是把江苏和浙江两个省提的意见写进去，究竟是不是采取这样一些办法，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到北京还要进行研究。

现在长江和珠江两个三角洲地区都是外贸比较多的，今年发展比较快，但出口额也才占这里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所以潜力很大。沿海地区如果搞到百分之五十就很可观了，世界平均水平是百分之二十二。如果我国出口额将来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那沿海地区就必须百分之五十以上。关键是原料，还有一个是市场。市场就决定于你的竞争力如何。另外就是进口原料，正因为你的原料必须进口，进口以后再出口，所以你就要有点本事，没有本事进口原料，吃国内的低价原料来出口，这不是本事，而且这个时代也没有了。过去沿海主要靠内地的低价初级产品，经过加工卖出高价。现在有些原料比国外价格还高。进口材料——出口创汇——再进口，如果这条路走通了，这个路子就非常宽广了。所以在沿海可以用周转外汇的形式，大进大出，一定要给许多方便和条件。沿海地区外贸体制如何改革，你们研究一下如何写法。现在这个写法比较碎，没有一个纲。外贸体制改革，关键是要真正下放权力，要使这个地方进出非常方便。当然要下放权力，要使进出非常方便，又不要发生问题，这就必须解决一个自负盈亏的问题，有了正确地解决自负盈亏的办法，有个制约。这要作为一个原则写进去。不下放权力、放开经营，来去就很不方便，就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很多的条件也不能利用。放开经营，乡镇企业也好，一个公司也好，它要进什么货，出什么货，它就可以立即拍板，不是半年，而是一两个月要进的东西能进，要出的东西能出。沿海地区如果不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和条件，对外贸易就发展不起来。改革外贸体制在我国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一个早晨就解决，但我们总得按这个方向来解决问题。当前必须解决什么问题，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可以列出来，可以带回北京去讨论。

现在已经证明，沿海经济发展对带动内地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连劳动力都转移出来了，沿海地区的劳务不是直接出国，是变为物品出国，内地的劳务直接“出口”，也可以到沿海地区来。

从国际市场来看，我们实行这个设想有三个依据，第一是和平环境；第二是我们制定了长期开放的政策；第三，资本主义市场虽然动荡不稳定，但是从总体来讲，资本主义经济还会取得一定的增长，这是大趋势。我国在国际上贸易份额占得太少了，只要我们有本事，就是国际经济没有大的增长，靠我们劳动力的便宜，靠我们的技术素质，我们应当占到一定的份额。美国人讲我们出口得太多了，我讲我们中国出口货物只占美国进口货物的百分之二，我们中国在美国贸易额中应当占多少份额？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出口份额没有占多少，不应该只看增长多少，而应该看到我国还没有达到应该占的份额。香港、台湾这些地方原来就是靠它的低成本，当然他们也有个条件，就是质量和管理。但首先是劳务费用低。日本在币值升值以前，劳务成本一直比美国低，所以有巨大的竞争力，当然它现在币值升高了，这是另外一码事。

我们的乡镇企业要和科学技术结合这个论点没有写进去。乡镇企业机制好，如果把科技力量和灵活的机制结合起来，它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会增强。一方面我们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非常需要科技，科技单位与乡镇企业结合更容易些。这

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很好研究。乡镇企业也是公有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潜力？现在乡政府同企业的关系究竟是不是搞得很好了？需要很好地研究。乡镇企业的经济负担要制度化，不能是想派多少，就派多少。比如说国家收多少税，乡里头收多少？你要企业交的就是那么一块，我的财产给你了，你赚了利润的多少给我，剩下的对企业恐怕就不能够干预了，企业的事情就不要干涉了，真正使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这才真正是法人。既然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这个企业和各个企业之间，将来就完全可以采取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组合形式。譬如说，股份制，将来有一天就可能表现为：没有哪一个说，你这个企业归哪一个乡，就没这么回事儿。至于说企业里头有你乡里头多少股份，还有另外一个乡有多少股份，还有国营企业多少股份，甚至还可能有外国人多少股份。要突破这个障碍，给它开这个路，让它向这个方向发展。这样企业慢慢就离开了地区、政府，股份制将来恐怕是乡镇企业的一种主要形式。企业必须有兼并的机制，我能够把你买过来，你合到我这儿，才有生产社会化，企业结构就合理了。将来也可能有那么一天，我们真正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大公司，不是现在我们这种国营公司，而是某些在乡镇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集团，很有可能。和一些乡镇企业厂长一谈话，就感到他们不简单，头脑不一样，想法不一样。

我们资源丰富三个方面：第一，劳动力；第二，可以说煤炭是丰富的；第三，石头是丰富的。中国应当下决心，建筑材料占领国际市场。我们第一个是有煤，这三年是中国建设规模最大的三年。水泥是特别紧张，但还是缓和了。你们浙江为什么不可以下点力气，把石头搞出去，就是下决心搞石头，花岗岩、水泥、陶瓷。所以我们中国要发挥煤的优势，一个煤直接出口，一个把煤变成载体出口。中国煤是丰富的，长期来讲，中国的电不应当是紧张的。有煤就有电。电要靠自己。耕地资源我们比澳大利亚差多了，澳大利亚多少人口啊？一千六百万人口，七百多万平方公里。我们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十一亿人口。总而言之，工业收入多了，农业就好办了。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阶段，都是依靠殖民地来解决原料和农产品，典型是英国。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出口的东西越来越多，依靠第三世界的原料和农副产品，除了石油以外，依赖的程度比原来小多了。为什么他把农副产品的出价压得那么低呢？欧洲现在的黄油为什么堆积如山呢？资金多啊，科技发达啊！所以现在没有饭吃的还是第三世界。只要农村工业多了，二、三产业多了，农业肯定会兴旺的，通过税收也可以，通过上缴利润也可以，支持农业发展，总之那时就好办了。

还有一个问题，不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吗？苏锡常地区的企业都希望和上海联合，例如昆山那个地方，都希望同上海联系。由于上海客户好，信息好，外贸也有本事。总而言之，上海这个码头，有两百多年了，它同国际市场的联系、经验、信息、交通、知识，它应当为长江三角洲进入国际市场服务。当然像那样上海就繁荣了，上海市绝不是你自己六百万人口的那个上海，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但现在这个行政区划、利益关系，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当然我们今天的行政区划不能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们的计划是切块的，以省为单位来计划的。现在这

些地方都跟上海联系了，江苏、浙江的利益确实是会受影响的。那天浙江嘉兴的同志讲，基本上两条，计划内的通过杭州，计划外的通过上海。两个账户，两个户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从上海出口，客观上非常有利，由于人为的行政区划、行政体制的关系受到限制，这也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这是体制的必然。你到上海就是一个观点，到杭州又是一个观点，这是自然的，这有个利益关系。怎么样才能协调利益，需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像苏锡常，像杭嘉湖，要按口岸有利，大量商品应通过上海走，应当纳入上海的外贸体制。当然，江苏、浙江怎么办？是不是上海和两三个省，整个搞个外贸联合体、联合公司，解决这一带农副产品出口问题，及整个出口问题。外汇怎么分？这种形式可不可行？我没有很好考虑。总之，现在这个问题，企业通过上海口岸，大量搞来料加工，特别是进料、出料，从上海进，这些企业加工后再出口。但是如果江苏、浙江离开了这一块，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这不是简单的利益问题，这是个实际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协调，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且听下回分解。要解决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转到外向型轨道上去，必须解决口岸如何为这些地方服务的问题。

如果上海有十亿美元的外汇，就把外汇调剂稍微放开些。深圳的外汇市场是放开调剂的，最近下跌，现在已经降到六元一角兑一美元，他现在不是没有外汇，是没有人民币。

外向型经济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是这么两种说法：一个叫做进口替代型，一个叫出口导向型。什么叫进口替代型？就是借外债发展自己的工业，减少对国外的进口。比如说，墨西哥、巴西和拉美这些国家，还有东欧这些国家。我们中国现在也还是这一种。另外一种是出口导向型，一个日本，一个韩国，一个台湾地区，基本上都可以把它们列入出口导向型。虽然情况不完全相同，看来借外汇发展工业的路子，进口替代，好像往往不如出口导向型。这是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个东西还要从实际出发，我们国家恐怕两个都要搞。有的地区，大的重型的工业当然还是要搞，另外一个，能够出口还是尽量出口。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就是两种策略：进口替代、出口导向。一般搞出口导向经济轻型的多，进口替代型重型的多。

外贸体制必须要搞活，以进口原料出口的必须要搞活，将来我们要大进大出，没有一个非常灵活、非常灵敏的体制，确实是很难适应，一个进不来，一个出不去。

这次江苏、浙江两个省的意见，包括地委、市委的意见，很重要的就是，主张外贸改革实行包干制。包干以后，基本上有两种办法，一是中央调节，企业自负盈亏，这是一种思路。或者是规定不同的换汇成本，或者是增加一部分调节税，或者增加海关税。譬如说，换汇成本比较高的，你还得给补贴。这是一种。这一种形式的好处是离将来的规范化可能比较接近，但是很难避免地区与地区之间打仗。要搞一个调节手段，没有半年是出不来的。今年发生的问题，明年才搞调节税。包干这个办法，可能将来不是那么规范，但是有可能比较早一点走进自

负盈亏。地区一自负盈亏，它势必往下放，不然它自负盈亏怎么负？最后还得给企业定个规矩，你这个企业生产这个东西利润比较多，我给你外汇留成就少。你这个企业出口成本比较高，而且必须，我就给你外汇多留一点。大体上像我们现在搞企业承包。通过这种办法，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使企业的差别平衡了。有可能是这个结果。当然，从形式上看来，好像是有点不那么规范。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你们省、地区的同志都主张包。通过包干使利益协调，基本上和现在的承包制差不多。包干的结果实际上对不同的企业，采取不同的外汇待遇，不同的换汇率。这个办法看起来不太合理，但可能比较简便易行，因为这是个经验的方法。在我们目前全国各种统计、资料、信息都不那么有把握的情况下，在全国规定一些调节手段，譬如不同的换汇率，现在又讲搞不同的税收调节，结果地方与地方之间怎么样？要想出办法加以解决。

江浙的优势，那不用讲，不管外贸体制改革用什么方案，都会使沿海大发展，内地搞不起，内地最后没有办法就势必要和沿海联合，这是必然趋势。我们去年曾在青岛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管用什么方案，沿海都是占便宜的。至于说差别嘛，恐怕将来包干以后还会有所不同，不过换汇成本比较低的，今后可能要外汇要得多一点。凡是换汇成本比较高的，像西南、西北，那些地方恐怕就基本上不能再上缴了，他自己补也不够。外贸包干，关键一个是基数，一个是增长部分要研究个好的办法。这个定下来之后，对企业来讲是自负盈亏的体制，政策就是这样了。企业和企业之间上下之间就不可能吃大锅饭了。这跟我们乡镇企业包干的道理是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要说不合理，确实是不那么太合理。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目前这个办法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现在也无力继续下去。假如明年我们大家都继续搞出口，究竟中央财政要补贴多少？要说中央不补贴，要控制补贴，马上外汇就没有了。我去年下了很大的功夫，在青岛找了好几个人，还带来几个人，设想了一种方案，下决心今年搞，搞来搞去出不了台。原来说今年出台，今年到十二月一看不行了，各地方都心里没有底。今年不搞了，明年不搞了。现在搞来搞去搞了三个公司。我现在听这三个公司讲，这个搞法也不行。但是如果真正包，尽管多少不合理，我想它至少有几个好处：第一，中央财政不再补贴；第二，出口积极性不会受影响；第三，首先地方上要讲究经营。总的来讲，省里抓，它就比中央抓成本要下降。如果把企业再搞得落实一点，如果再搞代理制，这个潜力就很大。外贸企业的创汇成本潜力大。快交货，早交货就多收汇。你们这里把文件修改好后送到北京，再请国务院讨论决定。

以改革总揽全局*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召开的最后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在十三大胜利召开后，中央决定赵紫阳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这是他在国务院总理工作交接会上的临别讲话。他在讲话中总结了在国务院领导岗位上八年工作体会，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以改革总揽全局”。他说：“我认为国务院的工作尽管千头万绪，关键是一条，以改革来总揽全局，推动各方面的建设和工作。”“不能把改革和各项日常工作平摆起来，必须把握改革和各项工作的内在联系，紧紧抓住改革这个中心环节，才能高屋建领，在整个国务院工作以至国家建设中掌握主动权。”这是他对八年来在国务院工作的科学总结和心血结晶，对治国理政有着深远、重要的指导意义。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今天的会议打算这样开，我先讲几句，然后主要是李鹏同志讲话，最后请万里同志和其他各位副总理、国务委员都讲一讲。

我简单地讲三点意见。

我已辞去总理职务，人大常委会已经同意。大家也都知道，人大常委会已经决定，由李鹏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行使总理职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就由李鹏同志全面领导。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国务院的任务十分繁重，特别是在党政分开的情况下。但是，我认为李鹏同志领导国务院工作是胜任的。同志们知道，在十三大以前，经过中央常委、政治局和一些老同志反复酝酿，大家都认为李鹏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担任总理的合适人选，国务院在他主持下是能够做好工作的。党中央的态度是全力支持国务院主动开展工作，希望国务院的同志们大胆放手地履行职权。我也希望国务院的全体同志都在李鹏同志领导下团结一致，通力合作，把国务院的工作做好。

第三点，今天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1]的同志都在座，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改革。我认为国务院的工作尽管千头万绪，关键是一条：以改革来总揽全局，推动各方面的建设和工作。

我们国家不改革过得去过不去呢？肯定过不去。以前我们常讲，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说，速度问题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同志，都认为这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对不对？也对，但是看来，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更带有根本性，更尖锐。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解决好这两

个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科技进步不解决，经济效益不提高，国家和人民就富不起来。当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发展很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对发展生产和提高效益所发挥的作用非常巨大。如果在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没有很高的觉悟，没有紧迫感，不真正下决心抓好，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落后，即使国家的经济发展能保持一定的速度，同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不会越来越小，而且会更加扩大。几十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上恐怕连现在的地位也保持不住，那就有可能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被开除“球籍”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在这里。要解决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这两个问题，传统的路子走不通，非对现行体制进行全面改革不可。所以，“七五”计划讲了，在“七五”期间一定要把改革放在首位。十三大报告也讲了，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从根本上说要靠改革的加快和深化。只有着眼于改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较为准确地判断事情的轻重缓急；也只有使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才能带动各项工作更好地前进。因此，我认为，不能把改革和各项日常工作平摆起来，必须把握改革和各项工作的内在联系，紧紧抓住改革这个中心环节，才能高屋建瓴，在整个国务院的工作以至整个国家的建设中掌握主动权。

我们的改革不是盲目的，我们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模式是什么也是明确的，各个领域的改革怎么进行，大的方针、政策也都有了。但是，改革确实面临着非常复杂而又困难的情况。现在是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如何较为平稳地到达彼岸，过渡到以新体制为主，是一个必须处理好的最大难题。需要集中精力探索、寻找风险较小的过渡形式，需要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改革不可能没有困难。经验证明，每当我们考虑改革要前进一步、深入一步的时候，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情况，各种各样的顾虑反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求我们必须细心体察情况，根据各方面的实际承受能力，制订改革实施方案，不能操切从事，鲁莽轻率；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一种勇于开拓的精神。小平同志经常提醒我们，改革要有勇气。要不怕承担某种风险，及时作出决断，不然就会久拖不决，贻误时机。当然，在作出决定之前，要反复论证，体察一切情况，力求搞得准确、周到一些，尽量减少失误，减少震动。在实践的过程中，有些已决定的改革措施即将出台时，或者在执行中发现情况发生变化，遇到意料以外的困难，原来的方案难以执行，在这种情势下，应当根据新的情况，坚持改革的总方向，从实际出发，调整原来的方案和部署，某一些改革措施可以放缓，而某一些改革措施则要加快。有时甚至要采取一些迂回的办法，以便创造条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务必不要使改革停顿下来。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遇难而进，不能停顿，停顿就会导致后退，退到老路上去。总之，在改革的措施、步骤上，必须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必须坚韧不拔，锲而不舍。这个办法不行，用另一个办法去改，这个部署不行，用另一个部署去改，坚定不移，不断前进。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国务院各部委的同志都能够统一思想。企业制度的改革，物资、投资、财政、税收、金融、外贸体制的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以至机构改革，我希望都能本着这样一种既要审时度

势又要遇难而进的精神，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只要改革能够一步一步地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各项工作就都有了希望，我们就有可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迈出新的步伐，取得新的胜利。因为这是我在国务院工作中多次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自己的一点切身体会，所以今天着重说明一下。

现在大家都在学习十三大精神，通过对十三大文件的学习，将会更加统一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各项政策的认识。过去对有些问题是知其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出发，就可以进一步知其所以然。结合各部门的具体情况和这几年改革的实践学好十三大文件，就会进一步提高我们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解放思想，使改革、开放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够执行得更有成效。

注 释

1．国务院全体会议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组成，由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一）讨论决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事项；（二）部署国务院的重要工作。国务院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接见第八期体改研究班学员时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 体改研究班是国家体改委和中央党校联合举办的。

明年体改内容是丰富的，步子也不小。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以及今年国务院自北戴河会议以来做出的明年改革的部署，步子不小，是多方面的。最近国外对我们改革有误解，说我们改革停顿了，这不符合实际。我们改革有些未按原来的设想进行，主要是价格问题。价格是整个改革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价格改革的过程可能要长些。现在已看得很清楚，这里不仅有价格改革为其它改革创造条件的问题，还有其它改革为价格改革创造条件的问题。原来想先搞价格改革，以为价格改革搞好了，形成市场条件，其它改革就迎刃而解。这不符合实际。价格改革与其它改革渗透在一起，由浅到深，贯穿其中，是这样一个过程。仅仅看今年没有大的价格改革出台，明年也没有大的价格改革出台，就认为我们改革迟缓下来、停滞下来，这不符合我们的实际。

明年改革有许多方面。告诉大家一件事，外贸体制改革已经定下来，要迈一大步。国务院李鹏同志主持定下来明年一月份开省长会，外贸也要走包干的路，通过包干，使外贸一直到今天还是吃大锅饭的情况有个大的改变。同一九七八年相比，我国吃大锅饭的体制已有相当大的改变，虽然不平衡，有的真正实行按劳分配，有的大锅饭改成小锅饭，有的大大锅饭改成小大锅饭，这也比吃大锅饭好。但外贸全国一口大锅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所谓对外开放，很重要的是要加强和扩大中国在经济上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这就要通过外贸。现在外贸有很多严重的弊病，质量差，交货不及时，货不对路，浪费，信息不灵，不讲究做生意等等，根子就是吃大锅饭。这次十三大对外贸体制讲了四句话，实际是五句，有一句不好公开讲。四句话是自负盈亏，放开经营，产销结合，推行代理制，还有一句是统一对外。关键是前两句，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外贸不放开经营，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但要放开经营，一放开就出现多头对外，削价竞争，水货充斥，最后大家都搞不好。现在，哪一年外贸出口多一些，财政就吃不消，哪一年外贸出口少一些，财政就好一些，但外汇就困难。外汇和财政是跷跷板，这几年我们就在跷跷板上过日子。企业在改进外贸经营，提高外贸质量上有极大潜力，关键是外贸机制不行。想来想去，现在比较可行的办法还是外贸包干。中央对地方包干，地方与企业包干，大体上还是农村承包的路。中国已走了一条成功的路子，

在许多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解决自负盈亏比较好的形式是包干。包干也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陷，但有利于解决吃大锅饭。有了这一条，许多情况就会逐渐发生变化，许多问题就可以在变化中解决。外贸不搞包干，仍然吃大锅饭，这样下去不行。我一到北京，国务院最先讨论的问题就是外贸体制，因为要开放，搞来搞去找不出一条路子。现在找到了，明年下决心搞外贸包干，不是三个公司试点，是全面包干。明年一月份就开省长会，现在正在研究方案，初步听到反映各省都赞成。这是很大一步，明年不一定见很大效果，二、三年后会见很大效果，不仅是创汇数量，还有出口质量。这样，开放这一头就会搞得很好。

其它方面的改革，如投资体制、金融体制、物资体制也是很大的问题。物资体制改革明年这一步走好了，就会在中国找到生产资料市场的路子。明年成效不一定明显，但为今后的生产资料市场创造了条件。还有如工资制度、劳动制度都在改。要循序渐进、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总的方针是全面推进改革。至于哪一年走哪一步，走多大步子，放在什么位置上，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总之，现在中国的改革不是盲目的。外国人说，中国石头已经摸到了，怎么还不过河。我们改革有蓝图，目标是明确的，方针是明确的，具体路子怎么走，要靠实践。关起门来靠电子计算机搞出完整方案，中国做不到，哪个国家也做不到。改革总目标十三大已经明确了。

明年改革要把进一步完善发展企业经营机制作为重点。现在看得很清楚，在全国目前这个条件下，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深入、完善、发展可以进行，当然要相应搞些外部配套改革。在一段时间里，整个改革的出发点、落脚点都是要把企业搞活，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这样讲的。把企业搞活，应当是中国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当然，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实践。增强企业活力是中国改革的着眼点，也是目的，在最近几年要抓住这个环节。这个环节抓好了，就有可能为其他改革提供条件。农村就是这样。现在农村改革与五、六年前大不相同了，提出了许多新问题，面临着大量农民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转向第二、第三产业，为农业规模经营提供条件。当时是从包产到户入手，家庭经营开始。但这样搞的结果恰恰促进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兴起，为农村规模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现在我们的企业一般来讲都有很大的潜力，外国人看了都是这样评价：原来以为中国企业的厂房、设备都很落后，看后认为设备很不错，技术力量不差，但效益太低，这是普遍问题。台湾、韩国都有这个看法，认为企业装备比他们十年前好得多，但效益很差，浪费太大。前不久我去浙江嘉兴，沈祖伦[1]讲了一篇很好的话。他接待了许多人，都反映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管理太差。中国的问题单纯从管理上去解决不行，基本问题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没有竞争机制，许多老大难问题解决不了。我在农村干了许多年，农村多年来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撒化肥在田边上，不撒在庄稼窝里，锄草不锄干净，多锄几遍可多得工分。实行联产承包制，这些问题就解决了。要抓住这个问题搞好企业。搞活企业必须有外部配套，但同时也要看到，企业搞活了将为整个改革创造条件，许多困难可以缓解。

改革中很大困难是财政问题，现在如果一年能多搞二百亿元，许多改革如价格改革、工资改革就容易了。关键是把企业搞活，企业效益提高了，财政就好了，市场也好了，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改革中的矛盾。今后几年紧紧抓住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不放，把企业搞活，就可以出效益、出商品、出人才、出经验，带动整个改革前进。

企业经营机制怎么改，主要是通过完善、发展承包制入手，这个问题也是几年来反复实践的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最可贵的是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框框。我们有两条，第一条，我们是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第二条，是从实际出发。我对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说过，有了这两条，我们就无往而不胜。目前我们困难不少，但信心很足，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这两点上。实践证明是好的就干，不好的就不干，没有任何框框。当然，能否想出更理想的办法，要实践。承包有许多好的经验，在实践中还会有许多新的创造，如吉林就有许多新创造。吉林搞承包制时间最长，从一九八二年就开始搞，开始时我们不大赞成，他坚持搞，现在搞得好，搞得正确，我们就学习。承包制要搞清几个问题：

第一，承包制的理论根据。搞承包制不是从理论根据开始搞起，是从实践开始搞起的。现在找到了理论根据，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也是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根据，要明确这一点。现在理论界，各个方面看法不一致，这不要紧。社会主义民主嘛，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可是总的要向这个方向去。提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个理论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如果提出的理论和办法不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而是把企业这几年已有的自主权拿上来，那就是背道而驰了。因为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把企业搞活。原来基本模式是：因为是全民所有制，所以一切由政府直接管理。现在提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不能由政府管理，而要让企业自己来管理，这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根据。不是强化企业的财产所有权，而是强化企业经营权。要明确企业是法人，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不能越搞企业的法人地位越不明确，不能变成财产所有者是法人，政府是法人，企业是雇员，那就把改革方向颠倒了。改革转了一圈又转回去了。过去一些人不赞成扩大企业自主权，主要理论根据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权不能放下去。现在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又讲经营权不能搞得太大。通过强化财产所有权，为财产所有者过多干预企业找出理论根据，这不是两权分离的初衷。因此发生什么是所有权，什么是经营权的问题，不能拿过去资本主义时代家族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的模式来看所有权。而要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期，特别是股份制出现后的所有权形式。最近查了书，马克思早就说过，自从大公司特别是股份制出现后，财产的所有权是单纯的财产所有，经营权包括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应按照马克思说的来理解所有权和经营权。全民所有制企业中，企业财产是国家所有，企业代表者即厂长的经营权应包括财产的使用权、占有权、支配权，还要加上个处置权。有人怕企业出现短期行为，影响国家固定资产。其实越是经营权落实，企业越会爱护公共财产。当然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根本上讲，企业短

期行为是经营权不落实带来的，是我们政策一年一变造成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把经营权真正落实到企业，当然国家可成立一个机构对国家财产进行监督、管理，按规定收取一定收益。但不能干预企业经营，不能成为一个权威很大，过多干涉企业的机构。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以后企业一家一户，企业财产经营有的发展，有的破产，生产要素如何组合，资金如何流动？要走农村的路子，首先将经营权落实到企业，这样必然会发生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租赁、相互承包、相互参股、买卖设备、财产转让，就会出现企业组织结构改革，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企业之间相互租赁、承包、设备相互转让，当然要有一定手续。农村也是走这条路，先搞承包责任制。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大城市附近的农村出现规模经济。这个过程相当快，七、八年时间就出现了。承包、租赁、参股可兼容并蓄，可以相互融合，而不是相互排斥。

第二，企业承包要引入竞争机制。这个意义很大。我们对其意义现在还估计不够，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现在还看不太清楚。它对企业人事制度、人的观念、人才培养都会带来一系列变化。对这个问题要重视，抓紧研究，及时总结经验，因势利导，推动它向纵深发展，形成制度。将竞争机制引人承包制会形成人才脱颖而出的局面。可以设想，全国企业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势必会扩展到其他事业单位，如科技等事业单位，以后机关推行公务员制，企业搞竞争机制，这两块一搞，中国的人事制度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在很大范围内出现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我国过去的僵化机制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人才不能脱颖而出，大大影响干部质量。这个问题是从企业承包这一具体事情上开始突破的。你不愿意承包，我来承包，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承包本身的意义。

第三，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承包制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后，为企业内部的科学管理提供了条件，但不能代替企业内部的科学管理。首钢承包制搞得好，出了那么大效益，重要原因是厂里历来管理基础好，与承包一结合，就显示了很大效益。现在许多企业内部管理很糟糕，要通过承包制把内部管理扎扎实实搞上去，最近我们批转传阅了两个文件，宣传了两个典型：一是吉林的厂内银行，二是石家庄塑料一厂的满负荷工作法。总而言之，不论用这种办法还是那种办法，都是要把企业内部管理搞上去。这样企业内部的改革如工资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就有了条件。将来工资、劳动制度不能全国一个样。必须根据每个企业的不同情况确定，当然现在一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企业之间会攀比，但必须要从观念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根据企业不同情况，收入水平有高有低。

总之，承包制将来要发挥的积极作用，将要显示出的效益会很大。承包今年刚刚开始，不是所有企业实行了这个办法。已经实行的企业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完善和发展。用三年时间，理出个头绪就是很了不起的事。三年时间锲而不舍，把企业机制搞好，相应地把其他改革搞上去。我想整个改革形势将会出现很好的局面。

注 释

1．沈祖伦（193卜），浙江宁波人。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曾任绍兴市委书记，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省长。

下决心把住房制度改革搞好*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住房制度改革问题时的讲话要点。

一、住房制度改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重大意义

现在许多城市有两大问题，第一是物价问题，第二是房子问题，或者说第一是房子问题，第二是物价问题。有些城市的住房问题已成为群众与政府关系的一个焦点，也是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上人们注意的一个焦点。从长期来说，房子问题比物价问题还严重。房子问题无非是分配不公，再一个是房子太少。我们一下子不可能建那么多房子，如果住房能进入商品化轨道，就从经济上有了制约。愿意多住房的就多花钱，愿意多要钱的就少住房。这个路子一走，不仅可以正确引导和调节消费，促进消费结构趋向合理，在经济上有很大意义，而且，在住房这个领域的不正之风也会大大减少，人们在这方面的不满情绪会大大缓解，这在政治上有很大意义。这方面原来讲得不够。

二、住房制度改革要列入计划分期分批完成

这项改革，如果自愿的就搞，不愿搞的就不搞，或者开始积极，一算账就不搞了，那就拖得时间很长，问题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开始时搞些试点是需要的，大体上摸出路数了，就要有计划地搞。从明年开始，不能再像原来的讲法搞试点，而是要分期分批地搞，分几年完成。今年多少，明年多少，大后年多少，全国多少城市，分几批，都列上名单。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研究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这项改革大概需要多少钱，银行需要安排多少贷款，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要分担多少，都列入计划，然后坚决干。中央要拿钱，地方也要拿钱。改革嘛，总得出钱嘛，一点不出恐怕不行。你同意也得搞，不同意也得搞，列入计划，按计划实行。总之，住房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越早越好，晚了不利。价格改革放缓了，住房改革不能又像搞又像不搞。经过前一段住房改革试点，看来情况比预想的要好，困难比原来想的要少一些，现在要下决心来搞，积极地搞。

除了上面讲的把城市分几批，有计划有步骤地搞以外，有些办法全国各个城

市都可以先行一步。第一，像沈阳那样，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先搞，全市搞与企业自己搞并不矛盾，不管城市什么时候搞，企业都可以搞。第二，新房新租，新房新办法。第三，老房超标加租。超标准就要按照规定加租，如果超过了规定标准，又不严格执行，等于是空的。第四，类似天津那样集资建房预售。还可以深入研究一下，还有哪些其他办法可以普遍先搞。

住房改革，不管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只要全国都动员起来，人们观念就会开始发生变化，就会觉得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势来临。北京现在还没有改，老百姓就在议论这个问题了。最近我听到有的人说，他们单位发生了那么一件事，有人原来机关里分配给他两间房子，叫他退另外两间房子，他坚决不退，想两边占。现在他提出来，在机关附近只要很小的房子，而且把原来的房子退了。为什么呢？他说看来房租很快要变了，要那么大的房子，将来一提高房租，我交不起，以后再到附近去找房子找不到了，现在干脆在附近找个房子，哪怕小一点，一劳永逸。因此，只要搞起来，人们的观念就开始变化，就会考虑这些问题，这对抑制走后门，抵制多要房很有作用。

三、住房制度改革要促进个人买房

住房制度改革要坚持多住房的多付钱，少住房的得好处。改革不能促进个人买房，不能推动住房商品化，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住房少、领住房券多的让不让沉淀，给不给兑现，这个问题要解决。改革没有一点震动也是不行的。提租以后超支很多的搞点“减免补”我也赞成，但如果各地怕人家反对，这个照顾，那个照顾，“减免补”很多，而分不到房子、住房少的，发了住房券又怕他沉淀，这样一搞，住房多的照顾，住房少的吃亏，那还有什么动力？住房券沉淀就是为了留作买房子，不沉淀人家怎么买房子？那就让政府赶快给我分房子吧。住房券限制一下，只能用于交新增加房租或买房，不让流通是可以的，不让沉淀、不让兑现是没有道理的。这么大的改革，国家一毛不拔是不行的。价格改革一搞几十个亿，住房改革一个钱不拿能行吗？当然我们要尽量缓解困难。但如果搞来搞去没有什么改革味道，有其名无其实，最后就没有意义了。为什么没有意义，就是不能促进住房商品化，不能用经济机制来使人们不多住房。这个问题要注意。

四、私房缓一步改革要抓紧研究解决办法

关于私房问题，我原来也讲过暂不考虑，但你不考虑也得考虑。因为公房一提高房租，私房就要提高房租，私房一提高房租，职工就要多交钱，能不给补贴？现在怕把问题搞复杂，可以缓一步。一时不动可以，将来不动是不行的。不动有一系列问题。私房为什么要往后推一点时间呢？因为负担比较大。有两部分人参加住房改革是要真刀真枪拿钱的，要增加投放的。一是住私房的职工，二是

家住农村的职工。住公房的职工提高工资，他们也要提高，但住私房的不交租金，家在农村的职工在城里住单身宿舍，交的房租很少，发出去的钱不能通过交租金收回来。除了这两个部分，其它都是钱能不能转换过来的问题，是一年转回来，还是两年转回来的问题。这个单位与那个单位，企业与机关，机关、企业与社会之间，都是这种性质的问题，基本上属于周转中间的问题，只要好好研究一套科学结算办法，是可以解决的。上面讲的这两个部分人，全国共五千万职工，小城市可以自己解决，大中城市不能一下子解决，要逐年解决。看来，将来要通过卖旧房回收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少数企业住私房职工比较集中的外，其余都是分散的，不是集中的。私房原来房租高，一般每平方米在三角以上，现在企业就负担了一些钱，职工自己也负担一部分，以后可以逐年解决，企业分散消化。企业住私房职工比较集中的，国家可以帮助解决困难。

五、要制定政策加快现有旧住房的出售

住房改革的资金，只要算大账能转得过来就可以。我认为总的来说没有多大危险，因为宏观上这个手发出去那个手收回来。房子是国家建的，房租是国家收的，这边发补贴那边把房租收回来，这边建了房子那边卖出去把钱收回来。运转中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要亏一部分，或者叫沉淀。解决这个问题，很大的潜力就是出售旧房。现在一大批旧房放着，卖出去可回收一大笔资金，这个钱为什么不赚？财政拿很多钱有困难，银行贷款太多也不行，要抓住出售旧房这个环节。要使财政负担不太重而加速这项改革，要好好研究一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把旧房卖出去。出售房子，一要给优惠政策，二要提高房租，三要提供银行贷款，有这几条就能推动了。房租一提高，他就会算账，是交房租合算还是买房合算。不搞改革，不提高房租他就不会买。一平方米每月才花一角多钱房租，住得挺好，当然不愿意买。只有提高房租才能促进买房。卖旧房子价格不要定得太低，但定高了老百姓承受不了，就卖不出去，适当定得低一点，卖了它，并没有损失。吉林省四平市原来卖的价钱太低了一点，当时定的是按三、三、四的比例出售旧房，个人只负担百分之三十，从长远看不合适。那时租金没有提高，价格高了没有人买，租金一提高，房子价格高一点也会有人买。另外，如没有银行贷款，要出售旧房只能压低价格，提供了银行贷款，旧房价格就不必压得太低，职工可以申请贷款，分期付款，就能负担得了。现在要着眼于让职工拿一部分现金出来，按你们算的，出售旧房每平方米一百二十元，付现金打四十元，二十三亿平方米旧房出售就是九百多亿现金，有一半出售就是四百多亿元，再少一半也有二百多亿元。这二百多亿元现金，是从群众消费基金中拿出来的，这是房改的一大笔资金来源。有了这笔钱，整个房改中的资金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按你们算的，全国住公房职工房改需要二百五十亿元，出售旧房，加上每年建成的新房卖出去一部分，回收一批资金，再就是银行给予贷款，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适当给予补贴，我看这是比较现实的路子。我们研究政策的着眼点，要放在如何能加快旧房

出售，把整个住房改革转动起来。

从个人来算账，旧房平均每平方米一百二十元。当然这是平均数，有的太差的一百二十元没有人要，质量好的可以卖二百元以上。一套五十平方米的住房就是六千元，先付三千元或再少一点，其余申请银行贷款，分期付款。如果不买房而是租房子住，提高房租以后，即使算他一平方米增加八角，五十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增加房租四十元，一年要多交租金近五百元，十年就要多交五千元。把房子买下来只多拿一千元，过几年房子是他自己的了，得到个房子所有权。买房以后，照样发住房券给他，双职工一年算他五百元，如果买一套旧房先付三千元，当年实际只拿二千五百元，其余三千元，分五年还的话每年六百元，用住房券顶上以后，自己一年只拿一百元，以后自己负担一点维修费，根据财力再搞点改造。要造成一个与其多交房租不如买房的环境。提租以后，对买房的给予优惠政策，好好宣传一下，会有极大的吸引力。第一次付三千元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一时拿不出，但不少家庭一、二千元钱不算一回事，自己的储蓄拿出来，亲友再借一点就解决了。有一对青年医生最近结婚，我问他们花多少钱，他们说一共五千元，两个人凑了三千元，双方父母各拿一千元。当然结婚同时买房子可能有困难，存三年钱再买也可以。有的今年买，有的明年买，有的后年买。旧房一律出售，一批批卖，分期分批卖，分几年出卖完。你住的有优先购买权，价格优待，提供贷款，如果住户不愿买，要允许别人买。这样来推动旧房出售。

新房出售也不可忽视。新房出售是回收资金的问题。现在房管局的房子基本是旧房，新房一个是在企业，一个是在机关。新房如按每平方米二百五十元的价格出售，五十平方米的一套房子是一万二千五百元，价格不高，等于交二十年的房租。自己先付一部分，其他向银行贷款，分期付款，偿还后房子归他。实行长期贷款好处很多。一是使人买得起，二是房子一买下来，就欠了国家的账，欠上十五年、二十年，就得还账，每月工资、奖金得先还了贷款以后才能安排别的用场，就不搞“超前消费”了。

这些还不是真正的住房商品化，还有一种完全商品化的。华侨、万元户、个体户、还有的人得了几万元奖金要买房，那些都采取另外的形式，通过自由市场，议价出售高价房。

六、下决心加快住房制度改革

现在我们说的改革还是初步的，还不可能为建筑业带来多少活力。一平方米造价一千多元，卖二三百元目前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很困难，要通过土地有偿使用等办法逐步解决。目前我们主要从分配领域来解决，搞得合理一些，发生的变化会很大的。一是多住房的多付款，住房少的多收入；二是使消费结构合理化。只要把大量的消费基金转到住房方面来，就可能出现很多健康现象。

通过这项改革把住房不合理造成的社会不满大大缓解，这个意义极大。既然这样，步子要加快。办法可以多种多样，进一步完善，但步子要加快。要改革就

有风险，一点风险不担，搞来搞去，什么棱角都磨掉了，改与不改差不多，空转空改，最后变成空的了，什么矛盾也没有了，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这是一项较大的改革，实际上也就是有限制的、有目标的价格和工资的改革。只是为了怕连锁反应，限制一下，提高房租以后发住房券，不发人民币，只能用于交租或买房。如果同有关部门一商量，这也不行，那也不保险，都空对空来搞，大概也就改不了什么东西了。

住房制度要改革，就得付一点代价，这种代价最终当然财政要承担一点。按照分级负担的办法，我看也不是很大的问题，特别是还要以旧房出售来缓解这个矛盾。再一个就是银行提供优惠贷款，银行要支持这件大事情。反正信贷就这么多，这里用了，那里就少用嘛。比较来讲，用到这里比较合理。应当说，住房改革在全部改革里面意义甚大，而所付代价看来比较小。当然不是没有一点风险，也不是不付一点代价，但比较来讲，风险和代价较小，而可以发挥的作用很大。要下决心搞好这项改革。今天定一下方针，具体怎么搞，请国务院再研究。

给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新的动力和新的政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厦门经济特区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特区可以多办些独资企业。从现在的情况看，在一个时期内，我们恐怕得老老实实地向外方人员学习，主要学习他们那一套管理办法，并加以研究。

保税仓库有利于搞大进大出，加速资金周转，应该好好研究。如果货物进出口大进大出先交税，后退税，企业就要背利息；而大进大出不交税，大有好处，企业可以不背利息，节省了资金。我看这个办法不仅适用“三资”企业，国内企业也可以推广，这是一条路子。

福建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如何利用这些条件吸引台资，你们要好好研究。如果将来引进二、三十亿美元，对福建的经济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合资企业要给外商管理权，或委托他们管理。如台湾商人跟我们搞合资，虽然他们的技术、设备不是非常先进，但是管理比我们好。现在外国人、华侨、台湾人来我们这里考察，得出的结论都认为，我们的设备并不是太差，规模也相当可观，主要是经营管理吃大锅饭。他们认为，如果用他们先进的管理方法，让他们来管理，效益可以提高50%以上，产品质量也可以大大提高。特别是台湾在这方面经验多。从台湾的发展历史看，他们基本上是在技术很落后的基础上发展起家的。

台湾在50年代、60年代也还是很落后的，但在70年代后期搞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工厂。70年代他们因陋就简，搞了大量出口。出口赚了钱，回过头来搞技术改造。即使搞了技术改造，他们的技术设备在今天也还不是很先进。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么多钱，关键的问题在管理，我们还不很懂得管理。当然引进设备，搞技术改造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最合算的办法还是要靠提高管理水平，所以，“三资”企业要给外商管理权。对合资企业我们特别要重视管理问题，要尊重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管，甚至可以采取承包的办法。我们国内不是搞承包了吗？为什么对外商就不行？不要搞什么以你为主还是以我为主。这样就搞不好，搞不好还是我们吃亏。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把合资企业搞好。要让外商按照国际惯例来管理，不要使他们那一套管理办法到我们这里就行不通了。开发区、特区从根本上讲，要摆脱国内这套体制。我们既然尊重外商的管理经验，就

应当尊重他们的管理工作，老老实实地学。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考虑这个问题。

特区的体制要研究，特别是深圳和厦门。但是不是直接归中央？深圳曾经有人提出，要把特区办成中央、国务院的特区。这个办法不好，你们这次没有提（王建双[1]：我们还是要接受省委的领导。）但是我看这两个特区的管理不能像其他地方一样，就是说省里的各个部门、条条不要管它们，也就是实行计划单列。单列后，厦门还是福建的一部分，深圳也还是广东的一部分，但中央各种计划都单独切一块给他们，在这一块里头怎么搞，由特区政府自己负责。也就是给一个笼子，只要不超出国家计划，在这个笼子里面怎么跳，不要去管他。至少两个地方，一是厦门，一是深圳，珠海和汕头都小了点。你们写个报告嘛。省里意见怎样？（陈光毅[2]：我们同意，已经有报告了。）研究过吗？（张戈[3]：国家计委的意见认为现在要求单列的地方太多了。）他们两个是特区嘛，可以先实行。我看计划单列没问题。这两个特区搞计划单列，中央切块，有利于它们搞活，跳出现行体制之外。我看原则上可以同意。

国际金融可以搞，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些，还需要好好研究。特区外资银行搞汇率浮动、银行挂牌，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看只能搞外汇调剂市场。在特区的外资银行、合资银行、中央银行可以互相拆借、业务交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都可以搞，但不能一开始都像国际市场那样搞法，放得那么开。要做到可进可退，有管理、有控制、有领导。回去再研究一下，拿出个办法来。

你们要求今后厦门全岛逐步成为免税区，我看厦门与深圳不同，四周是海，比较便于管理。我看第一是海南，第二是厦门，第三是深圳。你们可创造条件，能搞就搞。二线要管住，岸上设关，海上巡逻。防止水货，防止套汇。

自由港的概念搞清楚了没有？我们已经用经济特区这个概念，还要不要用自由港这个概念？我并不是说不要自由港，外国人来投资并不一定看你是不是自由港，而是看你的政策怎么样。经济特区的概念我们也可以丰富，可以发展。外国很多用的是“加工区”，台湾也是用“加工区”，它们也没有都用自由港。厦门特区是要更特一点。经济特区搞了几年，已打下基础，证明是成功的。现在我们的特区，应该更加开放，搞得更活，吸引外资，扩大出口，更好地促进我们发展外向型经济，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使它在引进外资方面有更大的吸引力，这个我看没有问题。

总的来说，经过这几年的建设，深圳、厦门几个特区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初具规模，而且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目前，我们面临着一个很有利的形势，日元升值，韩国、台湾货币升值，港币也肯定要升值，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遇。我们整个沿海地区都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促进沿海地区向外向型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战略任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觉得经济特区应该进一步开放，进一步搞活，使特区在吸引外资方面能够有更大的吸引力。要给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新的动力和新的条件。在已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进一步发挥和增强沿海经济特区的吸引力。你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原则上讲应该给予支持。明年春天的沿海开放会议要研究这个问题。一月份要开一次利用外资会

议，二月份开一次沿海开放会议，着重解决沿海如何进一步开放的问题，特区的问题也要列人会议内容。经济特区的工作要进一步给政策，进一步跳出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进一步具有吸引力，给它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活力。这才能适应目前国际上有利的机遇，也才能适应我们整个沿海一线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形势。经济特区不是要起带头作用、起“窗口”作用吗？我们整个沿海开放层次，第一是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牵头的。整个中国实行开放政策，特区处于领头地位。对于具体问题，哪些能搞，哪些不能搞，搞到什么程度，要进行研究。你们可以再搞个方案，省市搞个报告，提出今后进一步开放的意见，其中有些深圳特区也可以实行。有些东西很多地区都可以实行，如外汇调剂、土地有偿转让，沿海地区，至少开发区、开放地区也可以这么干。

我感到有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吸引外商到中国投资。我们要鼓励外商到经济特区以及开放地区办独资企业，要有个积极态度，要看得远一些。对中外合资企业，一定要使它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来办企业，来管理企业，一定要给它这个自主权。因此，对合资企业，一定要尊重外方的管理权，这样做对我们还是利多弊少。这方面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我们所以要引进它，主要是以往我们对管理重视不够，只重视投资多少，设备多少。我们多年来实行产品经济，实行产品高度集中管理，整个管理和国际先进管理差距很大。特别是经济特区，由于它可以摆脱、跳出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完全应该这样做。就是其他地区，不是经济特区，甚至不是开放区，只要是合资企业，我们就要尊重它们。至少在经济特区和开放地区，我看完全应该做到。这样搞，效益可以明显高出一大截，可以为我们改革企业管理，提供一个榜样。在这方面，你们厦门解放一下思想。合资经营也可以搞承包，让外商承包，让外国企业家承包，或者委托给他，什么形式都可以研究。我们中方不强调再设副总经理，或暂不设中方副总经理，以调动外方经理的积极性。

管理权里面很重要的是人事管理。现在合资企业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企业不能向社会招工，不能辞退工人，因此劳动纪律很难整顿。你们特区与开放地区，要创造这个条件，要允许企业向社会招工，辞退解雇工人，搞社会保险，这样对合资企业和我们国内企业都有好处。要解决人员完全流动，职工、技术人员、干部都可以流动。这个条件不给外商，他们管理就很难。当然，我们的工会组织维护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将来劳资发生纠纷先调解，调解不了再由法院来判决。在法律方面，现在存在最大的问题，一是立法不健全，二是过于原则，三是有法不能执行。总的一句话，现在我们要使外商按照国际惯例来管理企业。要给这个条件，这不仅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他也才会来，来了工厂才能办好，才能出效益；没有给他这个条件，就失去了办特区的意义。办特区就是要引进资金、管理经验和技术，而不是为了好看。

提高职工队伍素质是个重要问题。我们职工队伍素质与一些国家比，如比联邦德国差很多。我们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管理经验。有几个外籍华人到浙江考察后，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你们工厂有这么好的厂房，有这

么好的设备，有较多的技术人员，但管理相当糟，他们说，如果让我们来管理，不再增加什么投资，就可以提高50%以上的劳动效率。他们认为浙江还是个“未曾开发的金矿”。可见，我们现在企业的潜力还大得很，关键就是管理不行。我看了台湾发展史，他们开始搞进口替代，但失败了，后来转向出口导向。为了出口，也搞了一些技术改造，主要是充分利用原来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因陋就简，突出了管理，投人不多，结果很快就发展起来，然后反过来引进技术发展基础设施和重工业，提高产品出口等级。沿海经济特区可搞些高技术，但当前大量的是发展劳动密集、知识密集的产品。

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中国的科技人员水平还是很高的。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能达到我们国家水平的还不多。新加坡李光耀就想借用中国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科学家。香港也很羡慕我们的科技开发能力。我在今年三月人大会期间，接见香港各界人士时，讲了两句话，在香港反映非常好。我说大陆的优势，一是科技开发能力；二是生产能力比较强；香港的优势是信息、管理经验和销售网络比较好。香港可以和内地的科技开发力量相结合，我们两个优势加在一起，一起向外挤，共存共荣。我们是个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相当大，科技力量也相当强，关键还是管理。我们多年来实行产品经济，加上封闭状态，对外信息、贸易网络非常差，对这个问题我们恰恰要通过对外开放来弥补，发挥我们的优势，取长补短。这个观点非常重要。不要把重点放在引进设备，而应该放在引进国外的管理。要把重点引向直接投资。借款搞企业，我看将来会困难重重。当然，不是不要借款，而是不要借那么多。借款利息相当高，而且我们没有多少国际货币知识。我们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应该在政策上、特别是在管理上多下功夫，给外商管理权，吸引他来投资，多办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解决管理问题。另外，还要通过改革，使科技力量能用上去，使科技围绕产品出口，存在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我为什么说不要借很多钱搞企业呢，一个是货币问题，另外你借了钱，他要稳收利息，你的厂搞好搞坏它不管，我们国内办事又慢，借了钱再来谈判买设备，设备引进了，国内还要有配套资金，这样搞来搞去，三、四年还搞不起来。现在国际上技术更新越来越快，更新周期越来越短，以前更新周期是几十年，后来变成十几年，几年，趋势是越来越快。我们花了好多钱买设备，等到搞起来，技术又落后了。我们国内，包括经济特区，对世界上这种日新月异的技术更新很不适应。外商合资、独资企业就没有这个问题。外商信息很灵，我们把管理权给他，他很快就能反映出来。所以在沿海的政策上，我们宁可在吸引外资问题上从各方面解决吸引力问题，而不要我们直接借那么多外债搞企业。要有一个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你们要求进一步解决政策问题的方向是对的。现在，我们的职工队伍还不适应严格的管理。很多地方外国人管理可以，我们一管就不行了。我们现在需要利用外资企业的条件来严格训练职工。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考虑一下。我们的小商店、小工厂改革慢了一些。大企业两权分离好办，小企业两权分离就比较麻烦。小的工业、小的商业、服务业可以

招标拍卖。把小企业的固定资产拍卖出去，收回的钱拿来增强大企业，搞技术改造。这是加强而不是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将来搞合资企业需要配套资金，就把一些小企业卖出去，用来增加配套资金。小企业服务态度好，可以解决很多矛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马克思提出两权分离问题，是在股份公司出现后，小企业在过去资本主义一开始也并不是就两权分离，是自己经营，所有权是老板的，或者一个老板一个经理。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后来到了办股份公司，产权就分散了，决定企业命运的还是企业家。小企业我看可以个人经营。还有一种是大中型企业，我看在特区里，可以实行股份制。你们厦华公司经营得很好，就可以卖股份，本地的、外地的、个人的都可以买。小企业拍卖，大企业实行股份制，逐步创造一个全社会人才可以流动的环境。人才搞活了，科技也要搞活。

我就讲这些。总之，你们的汇报方向是对的，我原则上支持，具体问题我们带回去研究。

注 释

1．王建双（1936—），福建同安人。时任厦门市委书记，曾任福建省工业厅厅长，省委组织部长，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

2．陈光毅（1933—），福建莆田人。时任福建省委书记，曾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福建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

3．张龙，时仟国务院特区办癸室副主任。

一九八八年

党对于具体文艺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1988年全国思想宣传工作安排时的讲话。

邓小平同志最近在会见外宾时讲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解放了党和人民的思想，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我们学习十三大文件的重点应当放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因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更加提高执行十三大路线的自觉性。作为十三大的标志，我们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经过实践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九年，我们的政策收到很大的效果，这是全党都认识到的，外国是这样评价，党内也是这样反映。但是过去没有提高到理性上去认识。十三大报告中，经过理论的概括，使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了理性认识，反过来还要用这些理论武装干部和群众。我这次到江西、福建去，看到这方面好是好一些，但还有很大的问题，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建国四十周年成就展览搞不搞可以研究一下。成果都摆在那里还展览什么？不展览人家也知道。搞展览花费很多的气力，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又不生动活泼，一展览就拔高，拔高就不那么可靠。因为展览就是为了说明成果嘛！今后，图虚名的东西少搞，不是十分必需的东西不要搞。

建国四十周年纪念也要本着改革的精神。当然，四十周年要纪念，不纪念不行，怎么纪念法可以研究。四十周年党史展览也不要搞。那不只是“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反而好搞，倒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是非不好搞。四十周年纪念要改革，规模不宜过大，要避免形式主义。扎扎实实，生动活泼，规模不要太大。总的来说是中调处理，高调低调都不好，也就是说要适度。

最近香港报纸透露两个人要当政协委员，说什么“又要放宽了”。对安排刘宾雁等人当政协委员，不要节外生枝，原来是政协委员的不要取消，原来不是政协委员的也不要安排。外国把这些事都作为对某些人的态度，对这些敏感的东西，我们尽量地不要再增加热度。这几个人能不能当党员是另外一个问题，吴祖光本来就是政协委员，不当党员了，还可以继续当政协委员。

对文艺界的方针问题，建议经过考虑以后要在常委会上议一议。我有个基本主张，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就是少管、少介入，既不要轻易表扬什么，支持什么，也不要轻易批评什么。这样的方针才能够持久。真正要管的话，管大的。什

么具体作品，具体剧目，具体电影都要少介入，具体人的问题也要少介入。当然，我们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但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看，这方面的领导工作，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经验是成功的。只要基本上在政治上不反党，不是为了颠覆我们政权的，其他事不要管，也不轻易表扬，什么这个作品怎么样，那个作品怎么样，根本不管这个事。

我主张今后搞两套演出团体。一套是由国家搞的少数重点演出团体，这类演出团体要代表国家的艺术水平。这类团要少而精，是高层次的，不靠营业性收入，由国家高价养起来，列入计划。在这些团里，国家的演员要有代表国家的样子。演员如果打算在这些团里呆下去，就要守规矩，不能到社会上搞第二职业。这些人工资待遇可以很高。逢年过节，有重要的外宾时拿出传统节目，这是代表中国的，很严肃的节目。人员公开招考、聘选，演员到这里来工资可以增加，但要守这里的规矩。工资谁也没法比，你要比你也去唱唱嘛！

其他的文艺团体可以不搞国营的，自由组合。社会上的文艺团体，什么派都可以，歌星也好，一边唱一边跳迪斯科也可以，老百姓对它没有兴趣了，它就没有市场了。中国的事情就是你越管他越想看，越说这个不能看他越看。你不管它，人们就不看了。社会上的文艺团体，完全由政府去管，党委和宣传部门一概不管。政府部门则依法审查，什么戏要禁演，只要不犯法一概不管，至于能不能卖到票，那是他们的事，我们也不管。

现在这个办法不行，国家演出团体的名演员待遇很低，结果很多名演员就到社会上去演格调很低的东西，叫做“走穴”，影响很不好。演格调低的东西民间剧团可以，但国家演出团体和演员则不行。我们必须有开放的那一面，同时也要有严肃的那一面。完全搞得那么严是不行的，不适应我们今后的情况，统统自流地搞也不行。对文艺团体的改革要有宽有严，完全是社会方面办的看来可以放宽。

其他的文艺团体，比如电影制片厂、电视节目要不要这样搞也要研究。总之，要宽就统统放宽不行，要严就统统很严也不行。像经济工作搞双轨制那样，文化工作恐怕也得搞双轨制。这样一来群众也不怪罪我们了。现在一演坏电影，群众就说政府也不管一管，党委到哪里去了？一管，就有哪些应该管、哪些不应该管的问题。老实说我们对这些东西是外行。我多次讲过，我不是内行，凡是让我审查的影片我都不看，我也不会发表什么意见。在有些问题上群众可以反映我们不够开放，因为我们国家过去封建传统很厉害。有一些东西确实也很有问题，这些都让文艺界自己去争论，让文艺评论家自己去评论，党不要轻易介入，党要管大的方面。总的是少管、少介入。

文艺界、小说界都应采取这个方针。琼瑶小说在台湾热过一段，然后转到大陆，一开始很热，现在看过瘾了，就没有人看了。其实，言情小说中国过去就有，什么《啼笑因缘》啦，三十年代也是很热的，但都是热了一阵子，就消失了。这类事情也少管它。什么是黄色，什么不是黄色，有些界限很难分。当然很明显的不行。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应认真研究一下多少年来的经验教训。

我看采取这么个方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请宣传思想小组好好研究，提

出报告，提交常委讨论。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一九八八年一月

* 这是赵紫阳多次到沿海有关省市现场调查研究后提出的一个发展战略报告。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新形势下，掌握战略机遇，推进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强国富民的重大战略决策。邓小平于1988年1月23日立即在此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去年十一月下旬以来，我和一些同志先后到沿海地区数省市进行调查，看到各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形势很好。尤其是外商前来投资的大量增加，引进外资、出口创汇出现了越来越好的势头。大量事实说明，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今后一个时期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可能大大提高一步。

一、有利的机遇和我们的发展战略

当前，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有利的机遇。

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随着劳动费用条件的变化，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是向劳动费用低的地方转移。从亚太地区看，早期是从美国向日本转移，以后又向台湾、南朝鲜、香港、新加坡转移。那两次转移，我们国家还没有对外开放。现在又面临着一次新的转移。日元升值、台币升值等因素，更加推动了这个转移的过程。订货单和工厂，都在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外转移。转到哪里去？当然是转到劳动费用低廉的地方。中国沿海地区应当是很有吸引力的。这里劳动力费用低廉，素质比较高，交通方便，基础设施也比较好，特别是科技开发能力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要强。这是我们的优势。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把大批外资吸引进来。这是一个对我们非常有利的机遇。

目前国际经济活动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发达国家股市下跌，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萧条和衰退，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减小，但我们的出口商品多属中低档，受影响比较小；二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日元升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费用低的地方转移，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这个转移过程还会继续下去，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我们在历史上曾经错过了几次发展良机，这次不应再错过。我们做工作要有紧迫感。

为了抓紧利用当前的机遇，沿海地区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总的来讲，沿海地区一亿多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要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对待。

如果我国沿海这一片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还有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能够真正走到国际市场上去显身手、找出路，真正转到外向型经济的轨道上来，那么，不仅沿海地区的经济能够加快发展，能够提高水平，而且势必有力地带动中、西部的发展。另外，说到祖国统一问题，香港、台湾有些人总是讲经济差距，说台湾人均三千七百美元，大陆才四五百美元。我想，中国这么大，都搞得很快很富不容易，但是，首先搞好一块或几块地方是可能的。我们如果在沿海有一块地方，哪怕几千万人口的一块地方，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好一点，达到较高的水平，我们就好说了。人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实有优越性。由此可见，推动沿海地区转上外向型经济轨道，加快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实现这个发展战略，要把握住几个要点。首先，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然参加国际交换，就要研究我们当前能够拿什么东西和人家交换？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国不是资源大国，但是我们有几种资源是真正丰富的，一是人力，二是石头、砂子，三是煤炭。我们的人力资源不但非常丰富，而且费用低廉，劳力素质比较好。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将能够长时间保持竞争力。“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实际上是一种以产品为载体的劳务出口，应当积极发展。我们的煤多，可以发电。沿海地区要把电力建设搞上去，为兴办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能源条件。我们既有丰富的费用低廉的劳动力，又有煤炭和砂石，这就可以大力兴办建材工业，这也是一项很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的建材出口竞争力比较强，很有潜力和发展前途。沿海地区的广大农村，要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努力把创汇农业搞上去。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经济特区、中心城市和某些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搞些高技术产业。但从当前总的情况来看，大量的还是要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如搞电脑软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可以不用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因陋就简地进行生产，容易起步，适合我国沿海许多地方当前的条件。

其次，沿海加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去。沿海地区的加工工业，如果只靠国内的原材料，它的发展势必受到很大的限制。我国的自然资源、原材料资源不能说很贫乏，但是按人口平均起来并不丰富，不能再用“地大物博”的说法自我陶醉。随着沿海地区对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和内地经济的日益发展，如果还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沿海和内地争原料的矛盾势必越来越尖锐，这是

行不通的。因此就要提倡和鼓励沿海地区到国际市场上去进口原材料，加工增值之后，再把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大进大出。大进必须大出，不能大进小出，更不能只进不出，否则外汇就不能平衡，循环不过来。要鼓励地方把留成外汇用作周转外汇，大力开展“进料加工”。对“进料加工”要按规定给予优惠待遇，还可以在指定地区建立保税仓库，以方便“进料加工”业务的开展。当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发展替代进口的元配件生产和原材料工业，以提高增值量和出口产品的等级。

还有一条，利用外资的重点应当放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即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外债不是一点不能借，但重点决不能放在举借外债上。从前一段实际情况看，借外债自己办企业，特别是办大型企业，多数效果不佳，建厂周期长，产品销不到国际市场上去，还债能力差，往往使我们背上包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办“三资”企业，就使外商和我方有了共同利益，外商不仅可以带来投资，还会带来技术，带来营理经验，带来销售网。外商会主动关心、产品质量，关心、技术的更新，关心企业管理和产品销路，这对我们也是有利的。

总之，沿海地区当前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首先注重发展“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多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工业要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同时着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兴办“三资”企业，尽快转上外向型经济的轨道。按照这个设想，我国沿海地区有可能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较快地发展起来。

二、加快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

实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对原来的外贸体制进行改革，为地方和企业创造一个随时能进能出的环境和条件。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和条件，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

我国现行外贸体制的根本问题是吃大锅饭。解决了吃大锅饭的问题，就可以发挥出很大的潜力。现在，好像仍有不少人觉得，大锅饭还可以继续吃下去，问题不大，反正已经吃了三十多年了，再吃几年也无妨。没有紧迫感。三年以前，我们就下决心要改革外贸体制。改来改去改不了。一改，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顾虑那个顾虑都来了。其结果，外贸方面的许多老大难问题，就是找不到解决办法。外贸不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就无法前进，路子将越走越窄。

在改革问题上，我们是要谨慎、慎重。我们够谨慎的了。小平同志多次向我们讲，胆子要大一点，不要怕冒风险。当然，我也不主张冒险主义。但是，老这样犹豫来犹豫去，“足将进而越超，口将言而慑懦”，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把时机都耽误过去了。要有一点决断。在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上，如果不下决心前进，今年不搞，明年还是存在这个问题；明年不改，后年还是这个问题。再吃上三年大锅饭，外贸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浪费严重、交货不及时、产销不见面、换汇成本越来越高、亏损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不下决心解决是不行的。

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我在十三大报告中说了四句话："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实际上还有一句话没有写上，就是"统一对外"。因为对外不好讲。这里面关键是自负盈亏和放开经营。自负盈亏是基础。只有自负盈亏问题解决了，才好放开经营。没有自负盈亏就不敢放。放了，抬价收购，亏损都到北京报账，不得了。没有自负盈亏，放开了就要大乱。香港市场上水货一再冲击，在那里看中国人的笑话多了。做到了自负盈亏，才好搞代理出口，也才能真正搞工贸联营。自负盈亏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不解决，这样的改革、那样的改革都无法很好地进行。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解决了放开经营的问题，产销才能结合，工厂才能在国际市场的较量中得到锻炼，逐步适应国际市场上的千变万化。我们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同志，看盲目性的一面往往多一点，对放开经营的好处往往认识不够；地方的同志都希望放开经营，却不大重视或不大愿意自负盈亏。我看大家都要加深对改革外贸体制重大意义的理解，克服各自认识上的片面性，共同努力，为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企业能够及时地大进大出，创造条件。

我们是在国内价格体系很不合理、换汇成本很不一致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外贸改革最卡壳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现实条件下，要提出一个好的自负盈亏的方案是很不容易的。我从浙江到江苏，听到要求包干的呼声很高。包干的具体方案需要好好研究，但这种办法恐怕是目前惟一可行的一种办法，比较简便易行。它的好处是：第一，把地方和企业初步推上了自负盈亏的轨道。现在地方没有降低换汇成本的积极性，大家都吃大锅饭，最后到中央报账。中央要外汇，就得负责亏损；要减少亏损，他就不出口，就减少外汇。他两手轻松，没有什么压力。包干以后，县长也好，省长也好，就要关心他的外贸亏损了。同时，这样也可以使地方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二，中央财政的负担不用再大量增加了。第三，出口积极性不会受影响。把这项工作做得扎实一点，潜力大得很。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核定基数。从中央来讲，当然要尽可能地考虑到各种因素，力求把基数订得合理一些。从各地来讲，要准备出点高价买个好政策，要勇于承担任务，要打一点积极性在里头。又要包干，又要中央让一块，不行。要包干，就要准备承担任务。地方的同志不要只考虑现在那个基数，要往前看，看到自己那里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如果总是斤斤计较包干基数，这个事就搞不成。搞不成以后，一拖几年，再吃几年大锅饭，我们国家就会再一次地贻误时机，最后大家都得做检讨。

与外贸有关的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我建议各地要尽可能挤出一些留成外汇，用于周转外汇。当然，中央也可以拨一些外汇给地方作为周转。这是解决大进大出所需外汇流动资金的有效办法。早在六十年代初我就在广东搞过。当时我请叶老（季壮）[1]支持，要了三千万美元给广州周转使用，以进养出，一年可以周转四次，这三千万就等于一亿二。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广东靠这个解决了大问题。那时非常困难，我就找香港的华润公司，问他们外贸到底有什么窍门。他们讲来讲去，我听了就叫以进养

出。我还给中央写过一个关于外贸以进养出的报告，说明把外汇拿来做流动资金是合算的。现在沿海各省市的周转外汇，一年是应该能够周转四次、三次的。要说不能周转那么多次，那是工作问题，当然还有政策、体制问题。这些我们都可以在改革中解决。比如上海，如果能拿出四亿美元作周转外汇，一年周转四次就等于十六亿美元。每年进口十六亿美元的原料，年年在那里周转，那不得了，进料加工、以进养出、进出结合，也就可以搞活了。

第二，要建立农副产品风险基金。沿海地区的经济要更加密切地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就有一个如何缓解国际市场波动造成的影响的问题。国际市场上有几种东西的需求和价格是经常大起大落的。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吞吐体制”。大落的时候仍要收购，保持一定的库存；大起的时候就抛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必须有一点吞吐库存。这样国内的价格可以适当稳定。有些东西国际市场容量有限，外贸要加强出口控制。不能在国际行情好的时候，大家都来抬价抢购；国际行情不好的时候，就停止执行合同。这样一个鞭子，一个斧头，少了就赶，多了就砍，搞得农民不知所措，碰上了就发大财，碰不上就倒霉。这对生产力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在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奋斗纲领中，就提出要建立初级产品基金，稳定初级产品价格。我们在制订农村政策时，也要考虑这一条。资金从什么地方来，完全靠国家给恐怕不行。要动员农民参加保险。这样一个“储备基金”建立起来之后，抵御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就可以大大加强。

三、进一步搞活企业机制，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生力军作用

沿海地区要发展外向型经济，产品要打进国际市场，原有的一套体制是不适应的，原来的那种企业机制也不行。一定要认真解决政策、体制和企业机制方面的问题。我们政策的着眼点，应是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潜力挖掘出来，让大家紧紧张张地去干事，各方面都围绕着产品打进国际市场而积极工作。这样，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才有希望。

这几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机制，潜力无限。反过来，机制不好，必然困难重重。中国人很聪明，过去的问题是让不好的机制把人们捆住了。从前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后来从实践中懂得了这一点。近两年，我们在改善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上做了很多工作。这方面的工作还要扎扎实实地做下去。地方的同志把大中型企业比作老虎、狮子，小企业比作猴子，提出要让老虎下山，给狮子松绑，放猴子上树，使大中小企业全盘活起来。应当继续努力，争取做到这一点。

但是也要看到，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大中型企业要想搞得很活是困难的。而小企业，主要是乡镇企业，机制非常好，一开始就搞得很活。现在看，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将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乡镇企业一出生，就有一个自负盈亏的体制。它是在市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竞争得好的才能发展，竞争得不好要改行，再不好就得关门。它的竞争意识、生存意识特别强。它经营灵活，架子小，具有应变能力，服务态度好，交货

期短，外贸企业就很愿意和乡镇企业打交道，外商也愿意与乡镇企业合作。一般说来，乡镇企业没有那么多多余的人员，他们是认真地干满八小时的，是满负荷运转的。由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乡镇企业一般都关心技术进步，注重开发新产品。乡镇企业的这种机制，对于生产出口商品，是很有利的。它不仅适合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而且非常适合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最近几年，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乡镇企业已形成很大一片，朝气蓬勃，发展非常迅速。许多乡镇企业是在很简陋的条件下搞起来的。现在改变了模样。在苏州吴江县，我看了一个纺织厂，用的是瑞士产的先进设备。不少工厂盖了新厂房。就乡镇企业的厂房设备来讲，与我们的国营工厂相比并不逊色。一九八六年，全国乡镇企业直接出口创汇达四十六亿美元，一九八七年达七、八十亿美元。乡镇企业出口创汇在沿海地区出口创汇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直线上升，苏州地区已占了百分之十五，珠江三角洲估计约占百分之二十。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沿海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上外向型轨道，增加出口创汇的新的生力军。

乡镇企业要进一步发展，第一，必须继续发扬勤俭节约、因陋就简的精神。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初期，资金不足，不要急于铺新摊子。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厂房、设备，进口原料，进口零部件，搞加工、组装。产品打出去了，积累了资金，赚取了外汇，再置办一些新设备和基础设施。这样往前滚动发展。有的材料说，台湾的经济发展有四个特点：一是有强烈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意识；二是从因陋就简做起，在原有简陋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延伸和拓展；三是有一支廉价而且素质较好的劳动大军；四是资源、市场、资金、技术依靠国外。这些正是他们的成功之处，其中的大部分可供我们借鉴。我们的乡镇企业也要立足于现有的基础，把产品打到国际市场上去，在国际竞争中求发展。

第二，劳动大军要保持素质高、费用低的优势。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劳动力素质和劳动费用的高低。现在我们的竞争能力，与劳动费用的低廉程度是不成比例的。工人的工资低，但劳动生产率也低，算总账生产成本并不很低，其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素质还比较差，管理水平太低。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加强职工培训，努力提高职工素质。乡镇企业的效益增加了，要相应地提高工人工资，但切不可提得太高。否则劳动力费用低的优势就要丧失，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就要发生困难。当前只有保持费用低而素质高的劳动大军，我们才有希望更多地占领国际市场，并立于不败之地。

四、切实提高管理水平，
让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来中国管理企业

沿海地区要加快经济发展，特别是要向外向型经济转变，必须下大工夫加强企业经营管理。长期以来，不少工厂劳动纪律松弛，产品质量的检查监督马马虎虎，钱和物资的管理十分混乱。总之，企业经营管理落后，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这方面造成的浪费大得惊人。比之国外，我们的设备是比较落后，但更为落后的是管理。管理上的差距，比设备上的差距更大。我们的企业劳动费用低、技术开发能力强、厂房设备条件好等许多优势，往往都被管理落后抵消了。很多外国人到中国看了以后，都讲有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你们的设备这样好，这样多；一是没有想到你们的管理这样落后，效益这样差。我们有些工厂的设备，如果放到香港、台湾资本家手里，不晓得要多赚多少钱。这几年随着改革的深入，在改进和加强管理方面，各地出现了不少好的经验。例如在实行承包的基础上，搞全面质量管理，满负荷工作法，厂内银行等，都是成功的，应当在更大范围内介绍和推广这类好的经验。

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和改进企业经营管理，必须下决心搞承包。承包以后，两权才能真正分离，厂长的经营权才能真正加强。承包以后，多余人员就要处理，有些可以由社会另行安排。工厂真正需要的人，可以公开招考录用。如果能这样办，企业效益就将大为提高。当然，一开始不一定所有的厂都这样办，可以一批一批的搞。我在沈阳找厂长座谈，发现厂长的承包风险越大，权威就越高。有些厂里的厂长为什么没有权威，工人不听他的话，原因是他没有任何风险。企业搞得好坏，与厂长个人的利害没有多大关系。厂长本人责任感不强，工人也觉得你根本没有必要管我，你管我干什么！承包的企业就不同了。有个从营口来的副厂长承包了沈阳的工厂，他一上阵就规定工人怎么干、厂长怎么干。他对工人说，工厂搞不好，我全家出路就完了，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现在不只是为国家干，也是为我们自己干。这样一来，工人都觉得应当服从厂长的管理，厂长与工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还有个油泵厂，本来非常破烂，根本不像个工厂的样子。后来租赁了，管理迅速得到改善，由亏变盈。工人说，现在工厂是租赁的，厂长责任大，搞不好他自己要赔本，千万不能马虎。总之可以看出，厂长的责任越大、权威越高，管理越能得到改进和加强。有的地方在承包中推行集体风险办法，招标承包，搞好了大家得利，搞不好全体都有风险，每个工人都要少得奖金、福利。这样，你干不好要影响我，我干不好影响你，互相影响，大家一条船。总之，一承包，许多具体的管理经验就产生出来了，管理水平随之得到提高。现在不论是先进厂、落后厂都有很大潜力，问题就在经营管理上需要有个机制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大家非干不可，义无反顾，非办好不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承包可以带来这样一个机制。

每个企业究竟用什么办法把管理搞好，可以在实践中创造。原则是要能人治厂。谁有办法把工厂管理好，给国家和职工都能带来利益，谁就来治这个厂。中国人可以，外国人也可以；本地人可以，外地人也可以；大企业来治小企业也可以，小企业来治大企业也可以。办法就是承包、租赁、参股等等。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企业一下子都这样搞，可以一批一批消化。能先搞好三分之一，就势如破竹了。

在“三资企业”中，要让外商直接管理。其中独资企业有个好处，即都由外商直接管理。独资企业只要产品是出口的，其他一般都好说。它一兴办，就要交土

地占用费，我们的劳动力增加就业，国家得到税收，一批职工得到训练，很合算嘛。我们又不用还债，不用承担经营风险，有什么不好？所以，对独资企业没有理由特别从严。过去我们对独资项目卡得太死，应当放得开些。

合资、合作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上也应让外商来管理，或以外商管理为主，让他们按国际惯例管理企业。所谓国际惯例，就是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包括在社会上公开招工，按照合同和规定辞退工人等等。总之要创造一个使外国企业家能够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管理企业的环境。投资环境好不好，最主要的是看投资者能不能赚钱。为此，关键的一条是让外商直接管理企业，尊重他们的管理权。不要非得争那个“共同管理权”，绝不要把扯皮体制带进合资、合作企业。我们应当利用外商管理企业的机会，老老实实学他几年，等我们有了经验就好办了。中方的合法利益当然要维护，但不必现在去争那个管理权。外商把企业管好了，多出口，多赚钱，我们也能分到应得到的一份嘛。

过去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就是认为让外商管理企业就是丧失主权。这种观念必须转变。请外国人管理，替我们赚钱，有什么不好呢？现在世界上跨国界聘用职业经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种发展趋势。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大公司的经理，也不一定都是本国人。一九八二年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日本丰田公司合办的新联合汽车公司，总经理是日本人。英国钢铁公司一九八一年后聘请的总经理是美国人。西方国家一些大公司的董事会在选聘经营者时，主要以才干为标准，而极少考虑国籍问题。为什么在我国办的合资企业，不能让外国企业家来管理呢？我们的国营企业，如武汉的柴油机厂，还可以请“洋厂长”格里希来管嘛，事实上他管得很成功。

合资、合作企业让有管理经验的外商直接管理，或由外商在国外聘请人才来管理，好处很多。一是可以摆脱国内旧体制的束缚，摆脱关系学的困扰，进行严格管理；二是他更关心产品质量、技术更新和国外销售市场，并认真解决这些问题，使工厂出效益；三是他赚了钱，会吸引更多的外商来投资；四是可以为我们培养现代企业管理人才；五为我们训练工人队伍，提高工人的素质。总之，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想得开一点，应该有这个胸怀，虚心向别人学习，然后赶上去。

五、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充分发挥我国科技开发力量强的优势

我们的科技力量是比较强的。从发展中国家来讲，有我们这样强的科技力量的国家还不多。经济上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上我们是超发展中国家。新加坡李光耀看到中国的科技力量这么强，羡慕得很。香港也很羡慕。与我们的科技力量相比，台湾不行，南朝鲜也不行，非洲就更不要比了。问题在于，由于政策上、体制上的原因，我们的这一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科技力量带来的加快发展的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性。要把科技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做：一是通过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竞争机制，推动企业关心

科技进步；二是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使科技更好地为生产、为产品出口服务。为此，要把科技力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为参与国际交换、国际竞争做贡献。科技人员积极而有效的参与，对于实现沿海发展战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要改变一些科技人员看不起小企业，认为到乡镇企业去干有失身份的观念。其实，乡镇企业是最容易吸收科研成果的。科学技术与乡镇企业灵活的机制相结合，大有作为。

要打破科研与生产相脱节的现象。要把科研单位的利益与科研成果更紧密地挂起钩来，使科研单位能够依靠科研成果吃饭。这样就有竞争了。成果越好，越为社会需要，科研单位的日子就越好过。有人说，这样一来，大家都搞短期研究，不搞长期的了。这个不怕。现在短期性的成果也并不是太多，而是还很不够嘛。有一些带有长期性的课题，对国家或一个地方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长期科研课题，各级政府可列为计划内项目，给予特别重视和支持。谁来承担这样的重大课题，也要通过招标。

要允许科技人员直接办企业，特别是那些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有一种人才搞科研很行，经营能力差，他们就可以专门搞科研，发挥自己的长处；还有一种人既有科研能力，又有经营能力，就可以去直接办企业。在科研中心、学校周围创办一些知识密集型企业，办一些体现和运用科研成果的企业，对科研开发很有好处，对提高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很有好处。如何推动科技工作，并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把科技成果运用到生产中去，这是一个大课题，中央和地方都应重视，认真研究解决。

六、既要加快沿海经济发展，又要稳定全国经济

当前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矛盾，一个是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矛盾，一个是沿海同内地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妥善处理，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求得一个合理的“度”和最佳选择。

我国内地和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条件差别很大，要把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同样搞得很快，是不可能的。然而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对我比较有利，沿海地区又有很多优势，如不利用这个机遇和优势来加快沿海经济的发展，那是很可惜的，是个很大的损失。可是，从全国来说，又必须稳定经济。二者应该统一起来。

为此，首先要求沿海地区在采取进一步改革、开放措施的时候，要注意避免同全国稳定经济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和摩擦，特别是涉及物价问题的时候，步子要稳一点，尽量减少对内地的冲击和影响。全国稳定经济要考虑到沿海，沿海的发展也要考虑到全国。

第二，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要避免和内地争原料、争市场，一定要努力做到“两头在外”，向外向型经济转化。沿海的优势就在于能够做到“两头在外”，具备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有利条件。沿海地区只要坚持这样做，到国际市场上去显

身手，就和内地减少了矛盾。

第三，沿海地区在利用外资的时候，尽可能不要采取借外债的形式，而要把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兴办“三资”企业上，着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样，就可以减少国家举借外债的总规模，对稳定经济有利，经济效益也好。特别是要尽量吸引外资到老企业来，把利用外资同改造老企业结合起来，用我们现有的厂房、设备，与外商搞合作经营，不要都另外铺新摊子。吸引外资改造我们的老企业，由于有原来的基础，外资主要用在关键设备、关键技术上，因而我方需要的配套资金就可以大大减少，这有利于国家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总规模。另一方面，这些老企业的管理水平也能很快提高，事半功倍。沿海地区认真抓好这件事，同内地不会产生什么矛盾，同稳定经济也没有矛盾，只有好处。

引进外资改造老企业并让外商来管理，需要解决好对原有资产的合理评估、原有管理人员的精简、多余劳力的安置等问题。因此，引进外资改造老企业，不仅可以节省配套资金，较快地提高老企业的技术水平，而且必将促进我们企业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意义很大。应当在这方面摸索经验，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把这件事办好。

第四，沿海地区发展经济，要多从当地开辟资金来源。要开源节流，搞好双增双节，提高经济效益，这是最主要的。沿海地区有许多不便管理而又长期亏损的小商店、小工厂，已成为财政包袱，可以拍卖给集体、个人或其他善于经营管理的企业。拍卖之后，这些小企业本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会很快得到提高，国家也可以从中收回大批资金，然后用来进行重点建设，用来发展技术先进的企业，这对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是有利的。土地实行有偿使用，也是一大财源。在沿海许多城镇，出卖旧房也可以筹集一大笔资金，并能促进住房制度的改革。要积极进行股份制试验，更多地把短期资金变为长期资金，以扩大建设资金来源。

总之，沿海地区的发展，要按照上面的思路进行，主要是靠政策，靠好的机制，靠“两头在外”的优势，进行自我发展。不能指望国家给多少钱，也不应挤占内地的利益。不仅不应挤占内地，而且要带动、帮助内地经济的发展，并为全国稳定经济做出贡献。按照这个路子来搞，各种矛盾有可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注 释

1．叶季壮（1893—1967），广东新兴人。1925年入党，先后参加过广州起义、百色起义和长征。曾任右江苏维埃政府财委主席，红七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部长，东北银行行长，东北人民政府财委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外贸部部长，国务院财办副主任。

对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逝世发表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

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1]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悼。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做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了一定的努力。

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希望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日结束我们国家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做出积极贡献。

台湾人民有着爱国的光荣传统，盼望统一，反对分裂，近年来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起，为推动和平统一，促进国共两党和谈做出了努力。我们愿与台湾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

我们由衷地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注 释

1．蒋经国（1910—1988），浙江奉化人，蒋介石长子。1925年赴苏联留学并加入中共，1937年回国。历任国民党江西赣县县长，赣州督察专员，中央青干校教育长，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1949年初赴台，曾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中国国民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国家计委汇报经济形势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一九八七年有很多好的东西要好好总结一下

计委汇报中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几年存在的问题，可不可以说开始出现了缓解的趋势。货币、消费、工业增长、外贸增长，除了物价这一条外，整个情况是向好的方面发展。证明一九八七年的搞法是好的。继续这样搞下去，存在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切忌不要有了一个物价问题，就满脑子物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搞宏观经济的，对物价问题必须正视，但物价的位置要放对。一九八七年的财政不错，工业也相当好，这同一九八五年的情况不同，那时靠大量进口原材料。一九八七年在进口大量压缩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速度是相当不错的，当然速度是否搞得过高了一些，有些市场紧缺的东西是否是出口多了一些，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这几年电是个很大的成绩。钢铁、有色金属这几年也不错，货币去年发行比前年好得多，当时估计去年是险象环生，结果去年出现了很多好的情况。速度很高，各种关系向着合理化的方向前进，至少不是更加不合理。汇报中对形势的分析是对的，应更加深入地分析各方面的关系是更加合理的。

稳定和速度是可以统一的，不是一讲稳定，经济就要萎缩。一九八七年应当给以信心。赞成汇报提纲中讲的，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有所作为的，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完，但都比上年有所改善。因此，一九八七年的经验应当给我们以信心，找到其中可贵的东西。这是分析一九八七年形势的总的指导思想。

有些问题想要一下子解决不可能，只能逐步解决。通货膨胀不是改革开放出来的，几十年就存在通货膨胀，当时是有钱买不到东西，还是需求大于供给，是隐蔽的通货膨胀。当然这几年票子发的多了些也是事实。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没有通货膨胀，没有物资紧缺。一九八七年是重要的一年，可以得出重要的结论，给我们以信心，可以从中找到解决重大矛盾的途径，如何总结一九八七年，这个题目要做半年。

二、我们对农业问题的两个观点

农业生产力发展本身有个制约的问题。《北京日报》有一篇文章，叫“一亩半地的思考”，连载了两天。关键是我们现在一个人只有一亩半地。这是基本的生活条件。另一个概念到二○○○年时，每个人占有的粮食就是四百公斤，粮食产量要上两个台阶到一万亿斤。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矛盾，居民收入多了，就要吃的好一些，就必然超出一亩半地的负荷。从长远来考虑，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找出个出路来。现在是温饱型的产业结构和要求富裕型的食品结构发生矛盾。北京市现在是一年一个人消费粮食一千二百五十斤，同过去比，动物蛋白一年增加了七十公斤的粮食消耗，而这种趋势有增无已。最近《中国食品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吃的选择”，讲这是强国利民的战略，专门讲食物结构。我们必须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食物结构。中国人必须接受这种选择，不能自流地发展。中国的问题一是计划生育，一是食品结构，难是难，但必须解决。把十亿人口带到哪里去，要设计一种食物结构，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日本人吃得很少，主要是吃鱼。有个材料说，猪肉一斤要四、五斤饲料，猪的动物蛋白比其它动物蛋白需要的饲料多出好几倍。还有材料说，动物蛋白比植物蛋白所需能量多十五倍。计划委员会考虑四个现代化，一个人口问题，一个食物结构，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中国食物价格太低不划算，动物蛋白应当贵一些，让居民去选择。中国的大豆问题应当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过去我们年产一千五百万吨，现在产一千一百万吨。巴西原来是八十万吨，现在是一千五百万吨，美国产量也很多。中国大豆很多作为油料，很浪费。这是说对农业的观点。这几年出口问题与此无关，问题不在这里。这几年在农业上主要是农村变为商品经济之后，我们对市场信息的反馈不够。猪的问题几上几下，有一个时候发生卖猪难，一九八四年上半年猪的生产下降，下半年宣布了提价收购，城市给补贴。这样，养猪又多起来。这次我们对猪肉的问题反应慢了，一九八五年情况有好转，但当年冬天由于农业减产、粮价上涨，我们没有把猪的价格相应调整，南方有的地方收购仔猪二角一斤。我们当时有个想法，怕提了猪的价格影响物价上涨，想挺过去。其实如果解决点价格，生猪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下降，最后还不是提价了。粮食问题是二种因素加在一起，过去粮食几年丰收的积累，又加上我们有几年大量进口粮食，有些地方粮食仓库不够，这就发生卖粮难的问题。有些地方停止收购粮食，这时又减少了进口，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下来了。这几年农业上的问题基本上是农村已转向商品经济，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用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也可以说是违反价值规律受到的惩罚。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对情况进行客观的分析，使我们心中有数，来改进宏观指导。表面上看都是些老问题，但这些都是新情况，不能够用老办法去解决。对于农业，从长远来看，要研究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对当前问题要做具体分析。

我们要定一个长期政策，不能引导人们去多吃肉，房子也不能住得太宽，因此房租不能太低。

三、价格问题

去年我们价格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如果我们能够在食品价格上找到一个办法，就能够大大解决问题，因为食品占居民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农产品价格要逐步提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农产品价格提高的情况下，要在食品的价格上找到一个办法。我们讲基本生活费和生活费指数挂钩，就是要同食品的价格指数挂钩。对食品价格上涨，国家要给予补偿，只要农村收购价提高，消费价提高，我们就给城市居民以补偿。这样做，连锁反应就不会大，要把这一点作为工资改革的一部分，当然是指定量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不是无限的，农产品之间有个相互比价的问题，大路菜要实行计划供应，粮食、肉、禽、蛋涨价要按定量给予补偿。我们要规定个长期办法，搞它一、二十年。这样做，有利于我们调整工业品价格，大家就心中有底，人们的心里也不恐慌了。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销售价格也提高，然后给予补偿，这件事应该做，也能做到。这件事要下决心解决，这对稳定城市很有利。当然什么时候解决，从哪里解决，要做过细的研究，但作为原则，这一条要定下来。对物价问题我们过于谨慎，对于明显妨碍生产发展的该调的要调，不然生产下来了，你还得调，代价太大了。总供给与总需求这个概念应该承认还在起作用，但要做具体分析，并不是价格上涨都是需求膨胀。糖由于价格太低，就刺激了浪费糖，另外也影响了生产的积极性。不能只考虑物价，还要考虑生产。总的还是稳定经济、稳定物价的方针。稳定物价必须建立在供给增加的基础上。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要分开来分析，有些物价指数上涨并不反映通货膨胀。比如，把暗补改为明补，暗补不反映物价，可是一改为明补，就反映到物价上，实际物价并没有上涨。对于物价的上涨，如果先没有措施，让它自发上涨有危险，如主动调整物价，问题就少得多。比如我们说百分之七物价上涨指数，如都是自由上涨，那后果是严重的。如果有百分之三到四是我们主动地去调整，问题就会少些。不敢主动地进行价格改革，最后是物价自由上涨。同生活费挂钩就是同食品挂钩，不要同其它工业品联系，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将来物价指数也要分开统计。

四、要更好地开展“双增双节”[1]运动

请财政部、计委、经委要好好谈一谈。今年解决矛盾的出路，除了我们讲的稳定物价和同食品的价格挂钩外，就是要认真地搞好“双增双节”与企业承包相结合，在这方面真正收到效益，这对缓解矛盾会起大作用，我们要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这里。经委在二月份开一次企业承包制座谈会，我赞成。对社会集团购买力要动大手术，要大刹一下，这对财政和信贷都有好处。各种集团购买力包括企业都要采取行政干预、严厉措施，可以缓和市场的紧张，也可以少发票子，又不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压缩集团购买力要雷厉风行，停止一年购置，沙发、空调不准买、房子不准改建。搞一年行政干预，狠一点。要树立起朴素节约的风气，这样

一搞，今年的形势会更好。

五、要研究一下今年的出口

有些东西出口是否可以减少一点，国内市场紧缺的东西不能多出口。外贸不能硬要求出现顺差，平衡就可以了，纺织品要控制出口的总量。在开放的条件下，国内很紧张的东西就可以多进口一点或少出口一点，国内不太紧张的就可多出口一些。考虑外贸时，不能只是考虑创汇，还要考虑国内市场需要。据海关报告，去年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五十亿美元。

六、消费税是不是出台要再考虑一下

今年我们主要把物价挂钩搞好。再出台消费税对今年财政可能有利对今后可能不利。如烟加税，可能把生产搞下来，是不是现在把卷烟生产搞上去。我国的财政有一个很大的潜力，就是烟的生产，搞好了一年多增加几十亿元的财政收入是可能的，这比什么都有效。计划委员会应把卷烟作为重点建设来搞。酒的消费税我赞成搞，因为有个粮食问题，而且年轻人喝啤酒也不在乎几毛钱。主要是烟和彩电搞消费税我不赞成。

注 释

1．“双增双节”即增产节约，增收节支。

给《文汇报》创刊五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文汇报》社全体同志：

祝贺《文汇报》创刊五十周年。希望你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发扬好的传统，紧密联系广大知识分子和各界读者，把报纸办得更好，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

赵紫阳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采取积极态度对待外贸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一九八八年一月三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会见经贸部、各外贸专业总公司和工贸公司负责干部时的讲话。

今天是我第一次和经贸部各专业总公司及工贸公司的同志们见面，我感到很高兴。

首先，我要说去年大家干得不错，工作很有成绩。去年，我们的出口情况很好，一些不必要的进口也得到了控制，外汇实现了平衡，并且略有节余。这是同志们包括地方的同志和生产企业努力的结果，也是外贸体制改革的结果。去年我们的外贸体制只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但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主要是实行了包干制，虽然这个包干制还要进一步完善、深入、发展，但是实践证明包与不包大为不同。今年，我们的外贸体制要进一步改革，对外贸易要进一步发展，所以希望从事外贸工作的同志进一步努力，一定要使今年比去年做得更好。

第二，目前我们的外贸队伍有五十万人，这是我们国家从建国到现在几十年培养建立起来的一支队伍。总的来讲，我们这支队伍是好的，他们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我们从事外贸工作的骨干和精华。今后，我们的外贸体制要改革，同时，我们这支队伍的经验和作用应该进一步发挥。可以这样说，我们改革外贸体制，绝不会影响和削弱这支队伍的作用，恰恰相反，是为了使这支队伍更有用武之地，更能发挥作用。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一是要搞外贸体制改革，二是要更好地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这样我们的外贸工作才能真正做好。今后我们要对外开放，要使外贸有更大的发展，特别是最近我们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支队伍，就不能适应这种情况；如果没有这支队伍，即使体制改了，我们也会有很多困难。当然，没有新的体制，我们这支队伍不会有充分的用武之地，作用也不会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当把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同外贸体制改革统一起来。我们这支队伍也应当在今后的体制改革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外贸体制改革。不改革我们就不能很好的迎接新的形势。其一，过去我们没有开放，我们出口仅仅是为了进口一些必不可少的商品，而现在我们要改革开放，要发展外向型经济，要不断密切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其二，国际市场是个竞争的市场，瞬息万变，如果我们长期实行那种封闭状况下形成的机制，高度集中，产销不见面，那就没有办法应付市场，就只能经营大路货，而且

即使经营大路货也不可能把握有利条件和时机。因此必须解决放开经营、工贸结合、产销见面等问题，并相应建立自负盈亏的机制。实践证明，如果不建立自负盈亏的机制，放开就乱。十三大报告中关于外贸体制改革讲了四句话，实际上是五句话，还有一句统一对外没有讲。这五句话中关键是两句，就是自负盈亏，放开经营，有了这两条，其它都有了。所以我们必须改革，不改，我们不可能迎接新形势，也不可能真正贯彻落实十三大提出的方针政策。但是，在改革过程中还有很多困难，也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所有从事外贸工作的同志应当勇于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为它终究是改革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只能在前进中解决，退回去是没有出路的。在对待改革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时，我们都应该站得高一些，看到大趋势。这样我们有可能在坚持改革中，经过几年的摸索，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路子。不改革，这个路子是出不来的，不准备在改革中去解决那些难以避免的问题，这条路子也是出不来的。经过了这个过程，这个路子就出来了，不经过这个过程，这个路子永远出不来。我们应当争取不花大的代价，但是一点代价都不花是不可能的。一碰到问题，就想回到老路上去，这是没有前途的，那只能在原地上打圈子，是不行的。我想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从事外贸工作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看到了这一点。我也听说，我们各公司的同志都认识到了这次外贸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而且都采取了很积极的态度，这是很好的。

除了总的外贸体制改革以外，各个外贸公司也要改革，也要改进。改革的方向就是向综合性、多功能、国际化的大商社转变。将来我们经贸部的几个大公司，都应当变成像日本、南朝鲜那样的大商社、跨国公司，要走出去。当然这要经过一个过程，但我们的方向是要这样改，也要让这些公司自负盈亏，放开经营。我们现在实行的承包制是体现这种办法的一个方式，我们还要对所有企业都实行承包，并进一步配套、完善、深入、发展。我想，首先是国家给公司充分的自主权，让它放手经营，同时让它自负盈亏。当然是在一定条件下自负盈亏，这要签定合同。各总公司应当有自己的利益，搞得好的就应当多得，搞得不好，就得自己负亏。在服从统一对外，统一协调，服从国家法令的情况下，公司之间还应当允许展开竞争，人才也应当竞争。所以我赞成专业公司逐步地把竞争机制引进公司内部，实行招标承包。不是说总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要通过招标确定，但是下边的人员应当通过招标确定。应当推行承包招标制，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内部。我们外贸系统有很多能人，要给他们一个显身手的机会，创造一个能人能够脱颖而出的环境，打破一潭死水的局面。当然这要有领导地进行。所以今后要完善总公司承包制，总公司同国家承包以后，内部还要层层落实承包制，并在此前提下，引进一些竞争机制，以后还可以不断地把这种机制扩展开。这样我们的外贸企业就会面貌一新，人心就会振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使总公司逐步地把经营的注意力放到国外，而不是放到国内。要彻底改变我们所有总公司重点是在国内搞收购，而不是在国外搞经营的局面。当然这也要经过一个过程，但是必须这样做。

总的来讲，我觉得我们国家多少年来培养的这支队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当在我们国家不断开放的过程中，在外贸体制不断改革的过程中，使他们大显身手，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应当是我们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我相信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我们这支队伍里能人多得很，关键是要把方针和指导思想搞明确。

向瑞士达沃斯一九八八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电视演说*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向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一九八八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电视演说。

主席先生，谢谢您周到的安排和友好的介绍。

我能够身在北京而“出席”万里之外的达沃斯会议，感到非常高兴。这件事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大大缩小了各国间的距离，而且人类的相互了解比过去更加容易了。

相互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我指的是了解和被了解。正因为如此，你们的会议引起了中国各界人士的兴趣和关注。如果我的发言也能有助于增进世界经济论坛对中国的了解，我将引为荣幸。

三个月以前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了解中国现状和发展的一把钥匙。我们把这次大会称为改革和开放的大会。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是九年前开始的。九年中，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大体上翻了一番。这次大会确定了进一步加快改革、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的方针。大会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确认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凡是有利于发展我国生产力的措施，都是我们所要求的，我们都鼓励，都允许；凡是为发展我国商品经济所必需的手段，我们都不拒绝采取。这个认识上的飞跃，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和开放的进程，促进我国国内市场——包括各种要素市场——的发育，加速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并进一步加强我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使我国同国际市场的关系更为密切。十三大的路线，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因而是不可逆转的。

我想专门谈谈中国的对外开放。我们深知，在国内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参与国际交换，是我们的困难所在。因此，我们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条是以经济体制改革来改善投资环境，提高经济效益。过去九年是这样做了，已经初见成效，今后我们还要坚持这样做。一条是采取“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种格局，来逐步推进对外开放。现在，在沿海地区，正在形成

一条有一亿多人口的、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工业基地，有富庶的农作物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群众文化技术水平比较高，熟练劳动力比较多。九年来，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这里还涌现出了星罗棋布的乡镇工业，每年以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速度蓬勃发展。因而，这一地带更加具备参与国际经济交流的条件。总之，中国的劳动费用比较低廉；在改革过程中生产效率正在日益提高；各种法规也在日趋完善。希望不要很久，人们就会普遍认识到，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沿海开放地带，是投入资金和技术的很有吸引力的场所。

我还想透露一个信息：中国政府已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把现在隶属于广东省的海南岛改制为海南省，并且把它确定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岛的面积相当于瑞士的四分之三，地处湿热带，自然资源丰富，可以说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同其它经济特区比较，这里将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给国外企业家以更多的优惠和方便。我们正在为海南岛的开放进行各种准备工作。欢迎各国人士到海南岛来投资，来开发资源，来做包括地产生意在内的各种生意。当然，也欢迎大家来旅游。因为即使在达沃斯飞雪连天的严冬，海南岛也可以下海游泳，在海滩上享受阳光的沐浴。这也可以算是我对参加达沃斯会议的已经相识和尚待相识的朋友们的一个建议。

女士们和先生们，谢谢大家。

会议主持人、瑞士联邦前主席库尔特·福格勒问：中国是否打算在日本、欧洲以及美国的经济合作中做到更加平衡？

赵紫阳说：我们对欧洲、美国和日本一视同仁。他们都是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最有竞争力的伙伴是最有吸引力的伙伴。竞争力是各种因素的综合：包括投资多少，期限长短，利息高低，包括商品的质量、价格和交货期限，包括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的条件；也包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的配额和关税，因为中国的支付能力不能不受到出口规模的制约。谁在竞争中得胜，谁就可以同中国做更多的生意。

中国的开放是面向全世界的，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说的原则，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适用于西欧，也适用于东欧和苏联；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整个北美和拉丁美洲；同样也适用于非洲和大洋洲。

福格勒问：为了完成其进一步发展经济和工业的计划，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地理政治环境，尤其在亚洲需要这样一个环境。

您如何估价美苏关系最近的演变？这一演变对贵国的安全以及贵国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赵紫阳说：最近美苏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我认为是值得欢迎的，特别是同持续许多年的严峻对抗相比较而言。同时，我认为，这是相当有限的一步，因为军备竞赛还未停止，“热点”一个也没有消除。因此，要真正实现缓和，还将经历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不能排除出现曲折。最近出现的这一缓和趋势，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推动的结果。要使形势进一步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归根结底，需要我们大家继续努力。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根本立场是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和平。美苏两国所采取的有利于缓和的措施，我们都是欢迎的。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要美国或苏联所采取的措施符合五项原则，就将有利于发展中美或中苏之间的关系。最近几年，从总体上说，中美关系在稳定发展，中苏关系也在逐步改善。但是我想不必讳言，在中美关系上还不时出现一些问题，在中苏关系上迄今仍然存在着障碍。责任都不在中国。我希望美国政府恪守它和中国政府共同发表的三个公报。我也希望苏联在消除障碍方面做出它应有的努力。和平和主权太重要了。大家都来讲和平，尊重对方的主权，这个世界的事情就好办了。

时间到了，请允许我“退席”。再见！

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二月四日

今天，中央请刚参加过省长会议的同志们来，见见面，听听大家的意见，中央的同志有什么要讲的也讲讲。

这一段，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了经济工作中一些重大的问题，主要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外贸体制改革、经济形势（包括物价和食品问题）等。在省长会议上，开始时纪云同志有个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报告；接着依林同志有个关于经济形势的报告；最后，李鹏同志作了总结。大体上，这个时期中央所议论的也就是他们讲的这些问题。

三月份还准备开一个关于开放地区的会，预定三月十五日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半年主要有这么些会议。

这几天同志们讨论了不少问题，有一些（如经济形势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在政治局讨论。先听听各省的意见，然后再提到中央政治局讨论更好一些。

利用今天座谈的机会，我说一些意见，和同志们交换一下看法。

一、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体制改革问题

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进行了讨论并发了纪要。我在这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过一些话，各地流传很多记录稿，我本人没看，不清楚有多少，听说不少。正式的有一个东西，就是后来整理的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稿子。除了发政治局这个范围，各省、各部都发了一份。开始，我把这个文件送给一些老同志看，送给了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小平同志批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小平同志后来又就这个问题跟薄老讲了一些话，基本精神是希望加快，希望坚决搞，不要犹犹豫豫，不要再失时机，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陈云同志也是很赞成的，我最近直接和他谈了一次，他认为"两头在外"，这样搞，好。先念同志不在家。彭真同志来电话说完全同意。我们在财经小组讨论时，大家对这个战略都同意。常委同志都赞成。据已经了解到的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也是赞成的。在政治局还要再讨论一次。

如果外贸体制不改革，沿海发展战略最后将是一句空话。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使外贸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所以，这次是当机立断。本来，一直到去年的十月份以前，还只是说在三个外贸专业公司进行承包试点。后来因为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外贸体制就非改不可了。现在要下决心干。这次李鹏同志他们专门召开省长会议进行部署，就说明这是非常紧迫的。

沿海发展战略提出以后，也有一些同志表现了这样那样的顾虑。有待澄清的大体上有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

这次到会的一些内地省的负责同志提出，沿海本来搞得比较快，现在又要进一步开放，这不是锦上添花吗？现在需要雪里送炭啊！东部有个沿海战略，西边搞个什么战略？看来，对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讲清楚。我们说的沿海发展战略，实际上是涉及中国经济全局的战略，它决不仅仅关系到沿海地区，而是涉及到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现在国际经济局势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一个机会，或者叫作机遇，使中国经济能够更多地进入世界市场，在国际上进行商品交换。这样一种机会，当然全国各地都可以利用。但是，从总体上来讲，从客观可能性来讲，真正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条件的是沿海地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既有沿海，又有内陆，纵深很大，幅员辽阔，在信息、基础设施、技术条件、管理经验以及国际联系等方面，各地差别很大。现在我们不可能把整个中国变成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国家，变成一个贸易立国的国家。那样做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既没有那种条件，也没有那个必要。但是，我国沿海这一块，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甚至以外向型经济为主。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还是立足于国内，以国内市场为主。这两点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以整个国家为后盾支持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沿海地区的发展反过来又帮助和促进内地，加快全国的四化建设。

另外，提出沿海发展战略的出发点之一，就是为内地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有利条件，提供新的机会。这个战略决不仅仅是从沿海经济的发展来考虑的，而是从有利于全国的发展考虑的。最近，四川杨汝岱同志有篇讲话，他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大进大出，对四川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沿海发展了，不仅可以为内地让出原料、提供市场，而且可以逐步向内地转移资金和技术。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很对的。

长期以来东部与中西部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东部基本上是一个加工工业区，原材料主要靠中部和西部提供。沿海经济发达的地方，已经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因为种田的人少了，土地集中了，那些地方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显著提高。沿海地区的这个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假如让沿海地区农民办的二、三产业萎缩下来，让农民都再回去种田，那整个沿海地区、甚至全国就会发生一场危机。沿海地区大量乡镇企业兴起，大批农民转到二、三产业，土地开始出现规模经营，农村逐渐富裕起来，这都是新事物，是好现象。但是，

有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这个路子能不能一直走下去？它会带来什么问题？起初，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到沿海几个省市去考察的。考察的结论是，按原来的路子走下去，矛盾会越来越大。沿海地区人均占有的资源是很少的。它长期以来都是把内地的原材料运来，加工成产品以后再返销内地，也就是说市场和原料都建筑在内地。沿海的发展建立在内地长期提供初级原料的基础上。沿海有的地方原来说的“两头在外”，就是在省外、在内地，而不是在国际市场。保持这样一种格局，照这样发展下去，沿海可以小康，内地就很难小康。内地农民怎么办？如果每人只种那二亩地，是小康不了的。三亩地也小康不了。所以，照原来的路子走，我国只能有一部分地方达到小康，另一部分不能小康，就是这个结果。或者内地将来搞封锁，原料自己加工，市场自己占有，那沿海怎么办呢？沿海就得回到原来的一人一亩半耕地上去，已经出现的好势头就不能再发展下去了。

所以，沿海地区必须寻找一条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就是把“两头在外”的两头摆到国际市场上去，从国际市场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再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实行大进大出。沿海恰恰有这种可能性。事实上，有些地方已经在这样搞，搞得相当不错。有一个县主要靠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一年就创汇两亿多美元。沿海上亿人口的地区如能推到国际市场上去，必将为我国广大内地的发展提供更大的余地。

从这两个方面来讲，这个沿海战略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这个战略如能行得通的话，将是保证我国进入小康水平的一个重大措施。

第二，我们的沿海战略和亚洲“四小”[1]走过的路子是否一样。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沿海发展战略是采用亚洲“四小”在六七十年代用过的办法，未必行得通。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实行沿海发展战略的必要性，现在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可行性。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首先，不能说我们走的就是“四小”的路子，不能说我们要确定一个方针去学“四小”，他怎么搞，我们就怎么搞。我们的沿海发展战略是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根据国际经济发展出现的可能性提出来的，决不是模仿“四小”。亚洲“四小”的特点就是小，而我们的特点是大。他们是岛子或半岛，而我们总体上来讲主要是大陆。我们的情况和他们极不相同。我们现在的工业基础、技术力量都比他们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开始搞的时候要强，用不着完全按他们的路子走。另外，也不可能完全按他们的路子走，这里面主要还有个社会制度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对他们亲一些，他们之间好商量一些。有些发达国家把我国视为潜在的对手。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发慈悲，来支援中国四化建设。

但是，也不能说凡是“四小”用过的办法我们就不可以用。“四小”发展外贸的许多方便条件，我们沿海地区也有。当前的机遇，和他们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遇到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四小”发挥沿海优势，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来发展自己，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国际市场对劳动密集型产品

有相当大的容纳量，而这种商品只有在劳动素质比较好、劳动费用比较低的地方才适于生产。光费用低不行，光素质高也不行，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优势。现在我们沿海地区恰好具备这两个条件，劳动费用是很低的，素质也基本上是好的，而且还可以继续提高。有这些条件，中国沿海就可以在国际上进行竞争。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律，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是向劳动费用低的地方转移。从太平洋地区来讲，开始是从美国转移到日本，以后又从美国和日本向“四小”转移。现在又从日本、“四小”向外转移。小平同志说，这个机会我们不要再丢掉。如果我们反应不快，措施不得力，确有可能再次错过时机。

第三，有没有风险。

风险肯定是有的。有竞争就有风险，有机会就有风险，没有风险也就没有机会。国际市场瞬息万变，商品有时销路好，有时销路差，不像过去我们的国内市场那样保险，生产好生产坏，销得出去销不出去，都照样有工资发。进入国际市场，对某些企业、某些商品来说，风险有时是很大的。国际经济如果出现衰退，我们肯定也会受影响。但是我相信，我们整个沿海地区可以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不会有非常大的、承担不了的风险。为了减少大的风险，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建立风险基金和保险，在特别繁荣的时候积累一些东西，储备一些力量，以便在不景气的时候渡过困难。总而言之，为了利用这个机会，就不能怕冒风险。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从总体上来说，不会有很大的根本不能承受的风险。至于说假定打起世界大战来怎么办，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如不抓紧有利时机加快发展，将来真打起仗来岂不更被动。

第四，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发展劳动密集产业与发展技术密集产业的关系问题。

沿海要发展外向型经济，城市、国营企业当然要起骨干作用、带头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前一段在论述沿海发展战略时，我们所以要着重讲乡镇企业，是因为沿海廉价的农村劳动力要参加国际交换，乡镇企业无疑是主要形式，仅仅靠城市工业是不能解决这样一个战略问题的。

在产业结构方面，我们最近多次讲到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从发展乡镇企业，从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上来讲的。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是向劳动费用低的地方转移，所以，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将会有大批外资和这类企业向中国转移。我们两个月以前就这样讲，现在这个趋势比两个月以前更明显了。当然，我们绝不是只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只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国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营企业，当然还有个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问题。凡有条件的企业，都要争取多出口高价值、高档次的商品。我们还要努力发挥中国科技开发能力强的优势，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开发高技术产品，这也是确定无疑的。

第五，加快发展和稳定经济的关系问题。

对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辩证地看。从总体上来讲，不发展，停滞不前，必定不能稳定。发展恰恰有利于稳定，而不是妨碍稳定。我们一些发展快的地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都很好，社会也更安定，就是很好的证明。沿海地区加快发

展，总的来讲有利于全国的稳定。全国都搞得很快不可能，但我们要有意识地让某些有条件的地方搞得快一些。执行稳定经济的总方针，本身必须考虑到沿海地区的发展，必须准备承受一些冲击。从沿海地区来讲，应当主要靠政策、靠“两头在外”的优势，进行自我发展，尽量防止和避免对内地造成冲击。沿海地区的发展，指望国家给多少资金和外汇的支持是不可能的。相反，他们应当对国家多做贡献。但是，属于放权方面的合理要求，国家应当积极给予解决。放权以后可能出点盲目性，不要把这类问题看得过重。只有积极性而完全没有任何盲目性，是不可能的。只要不发生大的盲目性，有点小的盲目性随时加以纠正，就可以了。

实行沿海发展战略和改革外贸体制，是有密切关系的两件事。改革外贸体制，是执行沿海发展战略的关键性条件。实行沿海发展战略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使地方和企业能够很方便地大进大出，随时进随时出。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把政策调整到这样一个程度：使生产企业、出口企业和地方能够大进大出，随时进随时出，能真正实行工贸结合、产销结合。要参加国际竞争，没有这个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解决外贸放开经营的问题，肯定来讲，这次机会还是要眼看着它丢掉。而放开经营是有危险的。过去搞过多次了，一放就乱，一放就发生抬价收购，削价竞销等问题。看来，关键是必须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放开经营。怎样解决自负盈亏的问题，可以设计出很多方案。前年夏天我在青岛专门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请一些人座谈讨论，搞了一个方案，看来挺好，但是未能行得通。有一些搞理论的同志也设计过这样那样的方案，看来实行的条件也不具备。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方案，再等三年也没有希望。现在看来，在中国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包干。对包干的办法也可以挑出很多的缺陷，随便可以讲十条八条。但是能够比较好地把外贸推到自负盈亏轨道上的，现在只有这个可行的办法。既然找不到最理想的办法，还是要用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个土办法，不完善之处可以在实践中完善。为实行外贸包干，李鹏同志、依林同志、纪云同志做了很多工作，经贸部的同志也比较积极，这个问题现在基本上解决了。

包干以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希望经贸部马不停蹄地继续抓紧，根据既要联合对外又要放开经营的原则，认真审查原来的规章制度，对不适应新形势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抓紧进行修改。如果只是包干下去就算了，停到这里，过去的规章制度都不变，很多妨碍放开经营的问题都不解决，那么，这个改革是不能成功的。审查修改规章制度这件事，估计要搞一到两年。两年内不解决，这个机会差不多就溜过去了。经贸部要组织一个班子，有关部门一起参加，同地方座谈，研究哪些事应当管，哪些权应当放，成熟一批解决一批。

二、正确认识形势，总结发扬去年的好经验

前几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形势是相当好的，认为去年有许多好经验是值得我们总结和继续运用的。我们应当

从去年的经验中领悟到一些道理，学到很多东西。

首先，去年工业增长速度快，而又比较健康。全年工业增长14.6%，但和1985年的经济过热不同。去年的速度，第一不是靠消耗外汇储备，大量进口零部件，组装产品内销来实现的，去年在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外贸出现顺差、外汇结存也增加了。第二，产品没有积压，工业销售收入的增长大大高于生产的增长，说明产品基本上适销对路。第三，经济效益好，亏损企业减少，亏损额第四季度比第一季度减少约四分之一。特别是下半年以来，企业上交利税稳步增长，产品质量提高，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降低，流动资金周转加快，劳动生产率提高7.9%。第四，预算内国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也明显加快，不像往年，只有小企业发展快，大企业速度降低。总之，去年的速度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速度。我们反对片面追求高速度，但是对健康的正常达到的发展速度不应反对。去年的快速增长，从各方面看，没有危险因素。种种情况说明，我们国家具备了发展快一些的条件。

其次，几年来经济工作中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去年开始缓解。前几年，经济发展速度一快，不稳定的因素就加剧，多发票子啊，基本建设规模失控啊，消费基金失控啊等等。长期积累下来的不稳定因素去年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它趋于缓和了。货币发行和信贷增长速度是近四、五年来最低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得到控制，投资结构向合理的方向变化，重点建设项目完成较好，特别是电力建设成效显著。财政收入完成了预算，支出得到控制，财政赤字比预料的少。社会总供给的增长速度（13%）略高于总需求增长的速度（12%）。消费增长也比往年低。

去年对经济工作抓得比较全面，形势好是全面的。不仅工业均衡协调发展，农业也丰收，粮食产量可达8100亿斤，接近一九八四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出口创汇增长20%以上。特别是基层的状况，农村、工厂的状况，都比往年好。今年一开始，各个主要方面的有利因素就比较多，呈现出好势头。这样全面的好形势，以往还是少有的。

总的可以看出，去年宏观控制既没有影响搞活，又确实起了控制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一九八七年最值得我们重视的经验。当然，我不是说去年我们把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但是，去年是第一次出现微观进一步搞活，宏观控制也起到良好作用的情况。过去几年中，往往一加强宏观控制，就影响微观搞活，一说搞活，宏观控制就不起作用。去年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许多方面都出现了好经验。例如，承包是很好的经验，它既有利于微观搞活，又有利于宏观控制。金融体制改革也搞得较好，票子控制了，又没有影响正常生产和流通。企图把经济上不稳定的因素一下子都消除，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沿着一九八七年开辟的途径前进，不稳定的因素将会逐年减少。

我们必须把稳定经济和改革结合起来。稳定经济，要用改革的办法去实现。不稳定经济，改革很难进行下去；不改革，稳定经济也做不到。这是近几年大家的一个共同认识。遇到问题，第一要正视它，不正视问题是不对的；第二要坚持

改革，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一遇到问题就用老办法，也是不行的。在这方面，一九八七年有非常宝贵的经验，现在我们总结还不够。认真总结一九八七年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可以从中增加信心。只要我们沿着这么一个路子走下去，不断实践，不断完善，我们的经济是可以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的。

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要有一个正确的基本的观点。去年春天分析形势的时候，有一些同志看得很悲观，说是“险象丛生”。今年又有一些同志说是“非常严峻”。我看这都是缺乏科学分析的。当然，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是好的，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但是，现在回头来看，1987年开头那种悲观的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没有为实践所证明。今年对形势的悲观看法，肯定也不会得到证实。为什么经常发生这样的不正确的估计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用老观点来分析新问题。

三、物价和食品问题

1987年各项经济指标完成得都好，唯独物价情况不好。物价上涨幅度大已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这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当前物价问题实际上主要是食品问题。物价上涨，最突出的、反映最强烈的是食品价格上涨。一些大城市实行凭票限量供应的都是食品，而不是别的东西。

由此我们应当认清一个道理：食品问题确实是极大的问题。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人口众多，首先在吃的问题上稳住群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去年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55%用于购买食品，是开支的大头。物价指数上升，食品价格因素占65%。食物是必需品，家家不能少，天天不能缺。食品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不仅影响经济，也影响政治安定。所以说，食品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一点认识得不够。只有对食品问题找到了妥善的解决办法，群众才能安心、放心，改革才能迈开更大的步子前进。所以，在全部经济工作中，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把食品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认真研究，经常关注，切实解决。

食品供给不足，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有人认为食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是进行改革和搞活经济以后出现的，仍然怀念过去的“物价稳定”。其实通货膨胀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搞活经济以后出现的。应当说，在旧的经济体制下，这个问题更严重。有钱买不到东西，几乎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从五十年代后期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凭票限量供应的商品越来越多，买东西排队越来越长，那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货膨胀，是隐型的通货膨胀，也有人叫它压抑型的通货膨胀。票子发出去了，没有那么多商品来兑现，工人领了工资买不到东西，那还不是通货膨胀？要说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过去一直都超过。如果不超过，为什么实行凭票限量供应。

食品问题，既然是长期困扰我们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又是当前物价问题的核心，我们就必须找到食品涨价的真正原因，从而对症下药地去解决。

一说涨价，有的同志就喜欢笼统地说什么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是票子发多了。这当然也有道理，但光讲这种一般的道理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去年货币增长速度比近几年都低，这方面的情况有了改善，为什么食品价格反而涨得更厉害了呢？总需求必须和总供给相适应，这个观点是成立的。去年的货币投放仍然多了些，这也是事实。但是，具体说到食品问题，就不能拿这个来解释。事实上，人们并不是因为手里票子多了，就多吃了多少蔬菜，也不会因为收紧银根就能使猪肉的供应增加，这都是很明显的道理。

说到底，当前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供给不足。从统计数字看，蔬菜、猪肉等食品在一个时期的供应量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银根松些还是紧些，供应都必然紧张，价格必然上涨。而食品供给量减少是农业生产问题，造成蔬菜、生猪生产不稳和下降的是政策原因。

回顾几年来走过的路子，可以从农业生产的严重的波动中得到不少教益。这几年的农业问题，总的不是发生在农业增长速度上，而是发生在波动上。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甘蔗、麻类生产都发生了大起大落、忽起忽落的严重波动。这反映了生产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主要是收购政策引起的，是违反价值规律造成的，而不是别的原因。如粮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包括提高粮价，结果粮食连年丰收。一九八四年，连雁北挖煤的地方也大量增产粮食，出现了许多新的商品粮产区。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多了200斤。再加上连续几年进口粮食的积累，仓库放不下了。一时“粮食太多”的呼声高起来了，许多地方停止了收购，农民吃尽“卖粮难”的苦头。粮食收购政策的改变，又使新商品粮产区受到了打击，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很快就降下来了。又如棉花，也是一度发展很快，刚好了一阵，就感到“多了”。我们信息不灵，但又常常夸大某个信息。把棉花生产压下去很容易，再要恢复就要费力气了。又如生猪饲养，一度也发展很快，后来出现了“卖猪难”的情况，农民养猪积极性受挫，小猪价格降到五角钱一斤，说明农民不愿意养猪了。一九八四年下半年，我们订了几条鼓励政策，一九八五年生猪产量回升，避免了凭票供应。一九八五年下半年，粮价上涨，猪价不动，养猪普遍变得不合算。小猪价格跌到两角钱一斤，这对生猪生产是破坏性的。我们当时估计不足，怕提高生猪收购价会引起物价指数上升，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最后出现了现在这种猪肉严重紧缺的情况，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蔗糖，前几年广东就反映，再不提价，生产要萎缩。我们也是长时间下不了决心，拖到现在还得解决，代价更大了。

几年来农业生产的波动，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首先，农村经济已经转到商品经济的轨道上来，指导农村经济需要有灵敏的信息反馈，但我们信息不灵，或者虽有信息却没有及时作出必要的反应，造成了很大损失才被迫采取措施，往往是马后炮。其次，我们在价格改革上过分谨慎。明明知道某种商品不提价就会打击生产，因为考虑物价指数而不敢提价。现在看，物价指数是个重要指标，但不

能机械地只看物价指数。购销倒挂，暗补，实际上也是涨价，但不反映在指数上，有多少道理？从实践来看，如果是在改革中有计划地提价，同时给消费者以补偿，那么即使提价多一些也没有什么危险。该提价的不去有计划地提价，结果伤害了生产，加剧了紧缺，最后自发涨价，涨得更厉害，危害很大。

由于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等多种原因，从长远来看，农产品逐步涨价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如果硬是不准涨价，就必然伤害生产，结果就会带来更严重的紧缺。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涨价，而是用什么政策和方法来对待食品涨价问题。出路无非是两条：

一是走老路，恢复统购统销，全面恢复凭票限量。这一套驾轻就熟，很容易搞。但必须看到，现在就是恢复统购派购，也不灵了。过去基本上还行得通，但也不那么灵，有些农副商品多年来怎么抓也抓不上去，就是证明。现在，农村都在发展商品经济，再恢复老办法，就更行不通了。

二是找一条新的路子。下决心逐步提高食品的收购价，让农民有利可图，促进生产的发展，同时给城市居民发食品补贴，把过去倒挂暗补的钱拿来给市民明补。实行补贴和食品价格挂钩。过一段时间，食品再涨价，补贴就再增加。把这作为一项基本的制度，长期稳定地执行下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之策。这样一来，农民有了积极性，食品生产有了活力，市民心中有数，也就稳住了。这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过去在农村低价派购、在城市暗补以后低价销售食品的老办法，既抑制生产，又鼓励消费，连不大喜欢吃肉的人也要把凭票供应的肉买出来，因为这是福利，不买就吃亏了。新办法所产生的机制正相反：促进生产，抑制消费。补贴发到市民手里，他觉得不必要的或不合算的，就不买了，减少了很多浪费。

暗补的老办法如果不改，财政负担必将越来越重。因为暗补的办法是补给经营环节，不是直接补给消费者。从补贴面来看，暗补不但要补按人基本定量部分，还要补餐馆饮食、糕点等，并且助长经营环节的管理不善，多补了好几块。食品多的时候，各个环节都不收购，甚至还抛售存货，加剧农民的卖猪难、卖菜难。食品货源不足的时候，各个环节都提价，都揩油。近来生猪调拨价抬得那么高，农民并没有得到那么多好处，大部分利益都让流通环节占去了。有几个原已实行了凭票供应的城市，最近把暗补改成了明补，他们的主要考虑就是按老办法搞下去财政补不起。

实行新办法以后，有一些配套措施必须跟上。

首先，要继续加强对食品生产的组织工作。提高收购价，但不能取消任务。对猪、禽、蛋、菜等，还要和农民订合同，定任务。既要让农民有利可图，又要下达任务，要求完成。特别是大路菜，必须坚持计划生产，规定种植面积和商品量，要通过计划和合同的约束，以及财政补贴和乡镇以工补菜等措施，保证完成生产计划，保证稳定供应。副食生产，要逐步发展规模经营，办好国营、集体养猪场和养鸡场，积极扶持专业大户，同时也不忽视千家万户的分散生产，要两条腿走路。

其次，在食品问题上，外贸出口和国内市场要统筹安排。凡是国内市场紧缺的，要下决心少出口或不出口。粮食、饲料等还要适当进口。特别要避免外贸抬价收购，防止把国内市场价格抬得很高。

再次，要努力减少流通过程的中间环节。过去很多补贴都花在中间环节上了。减少流通环节，是商业改革的一大课题，一定要认真解决。

还有一点，就是必须制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暴涨。对紧缺的生产资料，要采取综合对策，包括促进生产，限制消费，增加进口，减少出口，反对垄断抬价等。

总之，抓好以上几点，食品问题将可得到较好的解决，不仅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且可以走出一条长期稳定的解决食品问题的路子。

在食品问题上，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现实必须考虑。食品问题归根到底是农业问题，而中国农业有一个根本的制约，就是人多地少。现在全国每人只有一亩半地，将来人口增加了，每人平均占有的耕地还会越来越少。即使实现了我们粮食生产的发展目标，由于人口的增长，到本世纪末人均占有粮食也不过800斤，仍和现在一样，不会有多大改善。生产一斤猪肉需要四斤粮，比转换任何其他肉类消耗的粮食都多。所以猪肉吃得太多是有问题的。苏联、东欧有个教训，就是猪肉价格定得太便宜。苏联、东欧国家总的生活水平比西欧低，

但吃肉比西欧多，因为肉价太低，靠国家补贴。东欧的同志自己说，这是他们的一个失误。中国人历来重视吃，中餐比西餐复杂，讲究吃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的资源有限，没有条件大吃大喝。所以，必须把我们吃的文化，向更科学的方向引导。从长远讲，在各种食物的比价上，肉价不能太低，特别是猪肉价格不能低。要提倡吃鸡、吃兔、吃鱼，吃植物蛋白。要不断进行科学研究和探索，采取综合措施，逐步形成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食物结构。

四、进一步推行承包制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承包制的认真贯彻和落实，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要坚决地抓好承包制的配套、深入、完善、发展。

很可能和农村情况一样，从承包开始启动，激发出巨大活力，带来许多新的事物。

现在农业规模经营，好像和包产到户是矛盾的东西。其实严格来讲，它也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在承包基础上产生的。现在有的同志讲：我早就认为包产到户不行，你看现在又搞规模经营了吧，又回来了吧。其实现在的联合体和过去的生产队是两码事。没有家庭承包制，就不可能解放农村的生产力，不可能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也就没有专业户，没有新的联合和新的规模经营。

现在看，企业承包制也是这个发展趋势。第一，承包以后会大大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加强，为“满负荷工作法”等科学管理方法的推行提供条件，同时还必将促进企业内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第二，承包以后将会出现

真正有生命力的企业之间的联合，企业之间产权的有偿转移和互相参股，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等等。第三，尤其重要的是，承包还将推动企业关心和加快技术进步。第四，将使各种人才脱颖而出。总之，承包之后，许多新经验、新事物将会出现。如果不从承包制开始启动，这些东西就出不来。

把承包制抓好了，不只是今年，至少三几年内将是一年又一年地向我们提供巨大的经济效益。下决心推行承包制，是使我们渡过改革中各种困难的一项重要措施。推行承包制，本身是重大的改革，又是使我们能够顺利进行其他许多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五、坚决压缩集团购买力，反对奢侈风气

现在机关、企业，铺张浪费、摆阔气的现象非常惊人。去年全国的集团购买力高达553亿元，相当于一九八三年的两倍多。这不仅耗费了公家的大量钱财，而且败坏了风气，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

今后要下决心把各级机关搞得很简朴。从中央机关做起。对行政开支和涉及集团购买力的事情，要进行仔细审查，除了真正必要的开支以外，该禁止的禁止，应限制的限制，可暂停的暂停。今年先实行若干个暂停，如暂停买沙发，暂停买空调机，暂停公费旅游式的活动等等。若干种类型的会议也坚决停止召开。一律暂停一年。在此期间研究有关制度的改革。以后怎么办再说。

同时，行政经费要实行包干。超支或节余，要使干部本身的利益受到影响，以便形成一种节约机制。

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具体办法。今年如果能从五百多亿元集团购买力中压缩100亿元下来，财政最紧迫的困难就解决了，可以避免多发票子，风气也变好了。

反对奢侈之风，提倡艰苦朴素，不只涉及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各级党政领导在艰苦朴素、反对奢侈方面都要带头，带出一个好风气来。

总之，今年我们要把几件事搞好：一是贯彻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外贸体制改革，这是全局性的大事；二是把食品问题认真加以解决，主要食品价格和补贴一挂钩，老百姓心里安定了；三是大力推行和完善承包制，把企业的积极性和活力进一步调动起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四是把集团购买力坚决压下来，缓解财政困难，造成一个好风气。这几件事真正抓出成效，一九八八年的整个形势会更好。

注 释

1．“四小”指当时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四小龙”，即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

关于起草制定私营企业管理条例的三次批示*

一九八七年十月至一九八八年二月

* 这是赵紫阳请陈俊生负责布置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先后作的三个批示。

对《温州农村一批私营企业主患有“百万恐惧症”》的批示[1]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四日

陈俊生同志：

迫切需要拟定私营企业管理条例，以便有所遵循，而私营企业主也可以放心依法经营，请予布置。

对《武汉市发布私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的批示[2]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日

岳琦[3]同志：

请财经领导小组收集一下各地自定的私营企业管理条例和规定，加以研究。（我已告福建、浙江两省，也搞个管理条例）

对《孙起孟[4]、冯梯云[5]谈民建开展对私营企业的调查和工作问题》的批示[6]

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

俊生同志并告明复[7]同志：

私营企业管理条例，一定要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不是此稿子差不多了再拿出来征求，在没有稿子前就可先和他们座谈。也可考虑请民建也着手起草一个条

例，以后再根据两个稿子比较修改。请酌！

注 释

1．这是赵紫阳1987年10月14日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58期刊载的《温州农村一批私营企业主患有“百万恐惧症”》一文所作的批示。

2．这是赵紫阳1988年1月10日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65期刊载的《武汉市发布私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一文所作的批示。

3．张岳琦（1938—），山东省枣庄市人。曾任辽宁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常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吉林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4．孙起孟（1911—2010），安徽休宁人。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副理事长、理事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副秘书长。

5．冯梯云（1925—），浙江慈溪人。曾任民建浙江省副主委、省工商联副主委、省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监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6．这是赵紫阳1988年2月6日对《零讯》第12期刊载的《孙起孟、冯梯云谈民建开展对私营企业的调查和工作问题》一文所作的批示。1988年2月8日，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小组会议听取陈俊生等关于私营企业条例起草情况的汇报，确定了私营企业立法的指导思想和重大政策问题。

7．阎明复（1931—），辽宁海城人。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致沈阳电工机械厂厂长李正治的电报

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

中共辽宁省委转沈阳电工机械厂厂长李正治同志：

在公开招标承包、聘请厂长的改革试验中，你果敢地应聘到沈阳电工机械厂当厂长，与广大职工一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使这个厂的经济效益大为提高，企业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并向你表示祝贺。

沈阳电工机械厂招标承包取得成功的事例，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坚持“两权分离”、实行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通过这种改革，将使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脱颖而出，并把我们工业企业中蕴藏的巨大潜力进一步挖掘出来。

我相信，你和全厂职工在初战胜利的基础上，只要进一步搞好企业内部的各项配套改革，精心加强经营管理，努力推动技术进步，今年一定会取得更为巨大的经济效益。

希望你再接再厉，更好地团结全厂职工，发扬首创精神，进一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在承包经营的配套、深入、完善、发展上继续下功夫，大力开展双增双节，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赵紫阳

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

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一九八八年二月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邓小平同志最近在会见外宾时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解放了党和人民的思想，也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这是对十三大的科学评价，也对我们如何学习十三大文件和贯彻十三大精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学习十三大文件，重点应当放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这样学，才能提高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自觉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能真正有收获，起作用。否则，即使文件读了多少遍，如果思想依然故我，习惯于用老眼光去分析新问题，还是等于没有学，或者没有学好。

为什么要把解放思想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回顾一下我们九年来所走过的路子，就会得到有益的启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收获是，在明确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同时，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尽管当时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但是，有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就给广大群众和各级干部提供了在实践中探索的可能和选择的机会。大家都清楚，我国农村的改革是从生产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我们的工厂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起步的。这些办法，六十年代有些地方也出现过。但当时我们的思想路线不对头，批判了这些东西，把它们都作为修正主义压下去了。一九七八年以后，群众再度提出这些办法时，我们的态度就不同了。我们很重视这些新生事物，认真观察它们的实际效果，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看到了这些做法对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很有好处，就把这肯定下来了。即使如此，我们当时也没有在全国马上推广它，究竟怎么搞好，请各地干部群众自己去创造，去选择。当时有人说："你过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他们所说的"阳关道"就是"一大二公"；"独木桥"就是包产到户。中央允许大家独立思考，在实践中进行比较，不出一年，结论就出来了，实行责任制才是真正的阳关道，大家都走到这条道上来了。这个结论，不是哪一个人作的结论，而是实践作的结论。全国农村普遍推广包产到户以后，又出现了专业户。一部分农民脱离开土地，搞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就是乡镇企业。开始也是少数人搞，以后效果很好，我们总结了它的经验，逐步推广。人民解放了思想，进行了创造；我们也解放了思想，承认和总结他们的创造，才得到了这样好的效果。对城市改革中出现

的各种新事物，比如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租赁、合股、债券等等，我们也都是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求去处理的。可以说，这几年每一项改革措施的提出和推广，都是解放思想的产物。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就谈不上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现在这样一种局面。思想解放了，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创造，没有办法可以有办法，没有方案可以出方案。由此可见，我们国家这九年之所以欣欣向荣，集中到一点，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得益于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这是讲过去九年，思想上的解放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今后，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仍然有赖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从根本上回答了我们国家为什么只能实行这样的政策而不能实行另外的政策的问题，使我们对国情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这是九年来解放思想的结果，应该成为我们今后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的起点。

解放思想当然不是提倡胡思乱想。恰恰相反，解放思想的实质正是敢于实事求是。对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事情由于这样那样的考虑而不敢肯定，对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事情由于这样那样的考虑而不敢革除，都叫做不实事求是，或者说，思想不解放。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我们都应该承认，应该试验，应该探索。生产力越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越有吸引力。怕生产力发展是没有道理的。顾虑重重，唯独不怕束缚生产力，归根结底，是被一些不从实际出发的框框禁锢住了，不敢解放思想。这样就很难同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实践合拍。十三大总结了九年来改革和开放的丰富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把生产力标准提到第一位，使全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认识发生了一个飞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现在应该通过学习十三大文件，用十三大的精神来武装全党同志，使学习十三大文件的过程真正成为解放思想的过程。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思想上的解放必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的党就能更有朝气，充满创造的活力。各级党组织都要按照这样的要求来领导十三大文件的学习和十三大精神的贯彻。

关于《对今年物价形势的分析及“双紧”方针的看法》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一份物价和经济情况分析报告的批语。

此件很值得一看。建议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财经小组、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家计委、体改委、人民银行、社会经济技术中心、财政部、物价局各同志一阅。

在我国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不要超过人民的承受能力，这个原则还是对的。但是抽紧银根措施只能是适度的，否则会造成生产滑波，供给紧张，加剧财政困难，也达不到稳住物价的目的。因此，宏观指导方针，不能只注意稳住物价一头，而必须兼顾物价与增长两个方面。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增长速度，也不可能有稳定，其他矛盾更无法解决。去年第四季度已开始紧缩银根，今后需要开始注意这方面的动向，以便发现问题，随时调整。

接见全国企业承包责任制座谈会部分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二日

一、承包要引入竞争机制

对现在竞争招标不能估计太高。真正搞竞争的还不多，有些名义上搞竞争，实际上没有做到。现在真正引入竞争机制还有很大的困难和阻力。要研究一个冲破阻力的办法。今年推行承包的重点是要引入竞争机制。在承包中，真正引入竞争会有很大动力。今天早晨电台广播吕东同志的讲话，意见是对的。承包竞争先在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内进行，首先要在本企业，可以是原班子，但要搞竞争招标，目标要面向全社会。实行竞争招标现在一般还是讲中型企业，鞍钢、首钢搞招标还有困难，但下属二级厂矿可以搞。总之要想个办法去冲破障碍和阻力。承包的潜力大得很，没有承包的企业要实行承包，短期承包要改为长期承包，同时要引入竞争机制，这是最大的潜力。承包饭至少可以吃三、四年，农村承包也是吃了四、五年。工业企业承包现在远远没有达到高峰。去年承包是起步，今年要明显见效益，明年会大见成效，然后再继续发挥二、三年，城市承包至少也可以吃四、五年饭。

二、承包要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一方面要强调厂长的权威，另一方面要使工人发挥主人翁作用，使他们感到是为自己而劳动。今年要总结、探索这方面的问题，如何从厂长承包变为全体职工的承包，如何从厂长承担风险变为全体职工承担风险。这样厂长就不会孤立，也不会妨碍厂长的权威。只有全体职工承担责任，把厂长的责、权、利变为全体职工的意志，这样风险才能落实，这是我们今年要在实践中研究的一个问题。总之，今天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竞争机制目前多数企业还没有落实；二是厂长承包如何变为全体职工承包。

三、承包要创造机会均等的竞争条件

（当汇报说，企业对国家承包以后，内部层层签订合同落实承包，工人干得好，收入还可以超过厂长，要给每个人提供均等机会，也就是岗位靠竞争，实惠靠劳动时）对！机会要均等，工人多得了，厂长也敢拿了。机会均等在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但机会应该是均等的。如果机会不均等就会引起一部分人不满，就像考大学一样，分数达不到就没有办法了。总之，岗位靠竞争，收入靠贡献。有本事、肯干谁都可以，没有本事、不干，走后门、拉关系也不行。企业风气好转了，整个社会也就好办了。

四、承包要搞好配套

（当江苏省提出要实行地方财政包干时）将来地方财政都要实行包干，企业承包，要有其它方面的配套，不能企业承包地方不承包。将来财政都要搞包干，可能多数是搞递增包干，这个问题还要专门再讨论。总之一句话，城市搞包干了。

五、承包要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增加工资收入

工人工资随着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增长。工人收入增加了，但工资含量不提高，就是经济效益的提高要大于工资提高的幅度。这样就可以使企业职工从互相攀比转到注重提高经济效益。将来城市规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职工收入可以试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个问题劳动部门正在研究，但要经过试点。

六、要研究承包以后企业效益不均等的问题

现在企业的水平相差得很多，往往是经营好的企业工资并不高，经营差的企业工资也不低。现在一搞承包，肯定是落后的企业，工资收入就大幅度增长，上升以后，就成为既得利益，降不下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办法可以是在一个城市的同行业确定一个平均先进基数，差的企业基数可以定得高一点，好的企业基数不能定得太高，同时要实行工资福利与经济效益挂钩，如果没有把握，可以先定一年再看。现在往往是越落后的企业油水越大，这部分企业如果工资奖金高于经营好的企业，将来全国一规范化，既得利益就保不住了，企业自身就没有竞争力了，这个问题要研究。

七、关于推动企业联合问题

原来讲的联合实行三不变和松散的原则是对的，但不能停止在这一步，这样

不仅不能前进还要后退。现在迫切的是要向前进一步，向真正的企业集团发展，不进则退，不聚则散。吉化的办法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回去你们要总结一下大厂包小厂的经验。企业联合迫切需要法律保护和仲裁，要搞个法规，法院也可以按此进行调解或判决。八、关于两权分离问题

我们说实行两权分离，强化经营权，弱化所有权，但采用什么样的形式还没有解决，看来光有方针政策还不行，还要搞一个文件，怎么样强化经营权，怎样弱化所有权，这个问题《企业法》一下子还解决不了。总的是弱化所有权，但由谁来代表所有权，要有个办法。股份制的企业可以搞董事会，只处理财产关系，但不能搞成权力高于一切的董事会。

今年企业推行承包制，就是配套、完善、深化、发展，按这个方针搞下去，今后几年会大见成效，这对于我国经济局势和整个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经济日报》登载的“财政靠工业，工业靠承包”，这是对的。承包的意义很大，承包这一着棋牵动全局。一九八八年将是承包制取得更大效益的一年，去年是开始起步，今年显示明显效益，明年效益会更大。这两年很重要，要毫不动摇地抓下去。今年也是经验丰富的一年，配套、完善、深化、发展都是要出经验的，不要过早地提规范化是对的。今年将是效益更明显的一年，经验更丰富的一年。希望今天到会的省市和企业要带头做出新的贡献。

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广东视察时的谈话要点。

广东的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说，前几年有些人还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现在这种顾虑已经很少了。对广东的发展，有口皆碑。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广东提供了生动的证明。不久前，中央又决定把广东作为综合改革的试验区，要求广东在改革中继续先走一步。现在看，不仅广东，全国的经济发展都将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相当的速度，形势很好。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保持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实际上，在对外开放的初期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的初期，贵族当权，商人有钱，那时行贿受贿十分盛行。以后，他们逐渐找到了一些解决办法。但在有些国家和地方，行贿受贿之风依然盛行。现在东南亚有些国家，经济很繁荣，官场很腐败，官员花商人送的钱仍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国家决不能走这条路，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富裕起来了，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收入也比较高，各级党政机关的干部收入要低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党政机关干部继续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廉洁奉公的作风，是个必须认真解决的新问题。有的部门，企业和专业户不给它点好处，就不好办事。对这种现象不能见怪不怪。不是说，现在已经发生了多么严重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必须清醒，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越走越远。等到严重了，再纠正就困难了。

我们的要求是：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企业按商品经济规律办事，不必管得太细太死。主要是对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要管严。用一句老话来讲，就是要整饬吏治，保持吏治廉洁。人们出国常常看到，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往往越阔气，贵妇人们珠光宝气。发达国家反而不这样。所以，政府机关讲排场、摆阔气，是落后的表现。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奢侈之风决不可任其发展。我们要做到：经济日益发展，市场物资丰富，人民群众越来越富裕，而党政机关很廉洁，公职人员很清廉。为此，要加强对党政机关干部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改革人事制度，健全相应的规章和法制，

当然也要逐步提高公职人员的待遇，等等。总之，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希望广东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并在实践中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

规章制度要有利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视察广东深圳经济特区和大亚湾核电站时谈话的要点。

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确定之后，外贸体制改革以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要破除旧的阻碍这个战略贯彻落实的规章制度。要真正使大进大出、随时能进能出的方针实现，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按照过去的一套办法，要耽误很多时间，本来可以快一些办成的事，但搞来搞去，要花费几个月，这样，还怎么发展外向型经济？在海关、进出口审批、外汇管理等方面，都还存在一些不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比如海关，企业进口原材料要纳税，产品出口再退税。从进口到出口，要花费三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仅利息负担企业就承受不了。再比如外汇管理，我听古耕虞[1]说过，旧社会结汇是很方便的，而我们现在搞得很复杂。这个东西能不能改一改？首先要把企业这一头搞活。企业一结汇，就分成两部分：属于上交的就由银行收购了；属于留成的部分变为外汇储蓄，企业可以随时使用。这个办法行不行？外汇管理如果不简化，大进大出也会变为一句空话。

现在有些事情管得太细太死，使进出不方便，又有一些在宏观上该管的事情没有管住。因此，今后一方面要放宽、搞活，同时又要在宏观上对该管的进一步管严管住。在这方面，要研究一下发达国家的做法。怎样加强宏观控制？有什么办法，立什么规矩？看来，要有一套东西，需要逐步健全起来。

应当鼓励外商来中国投资办实业。到中国来投资建设，不同于无偿捐赠。香港有些知名人士搞捐赠，拿一千万美元就不错了，拿两千万就很好了。他们什么也不要，非常大方。但我们光靠捐赠就能把四个现代化搞起来吗？合资搞项目，总要在商言商。他是资本家，为什么要来投资，就是为了赚钱嘛！关键在于既要让他占便宜，又对我们有好处。对方按合同多赚了钱，别人不应当眼红。如果没有钱赚，谁还来投资？项目有钱赚，是中外双方合作成功的表现，对我们也有利。

今后是否可以这样考虑，开发区主要的或更多的是兴办外资独资企业，尽可能多引进技术档次比较高的项目。当然，在起步建设阶段，也可以搞一些其它项目。开发一片新的地方，多办独资企业有好处：一是外商容易带进更好的新技

术；二是中方不需要配套资金；三是外方独立经营管理，见效快。

以后搞合资企业主要放在对现有国营企业的技术改造上。这实际上是一种“嫁接”的办法。也就是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嫁接”在我们的国营企业上。前不久，我到北京吉普车制造厂参观过。这个厂是与美国一个厂商合资的。基础还是原来的，厂房没有增加，对方出了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这些股份主要是先进技术投资。结果，就生产出了很好的汽车。这是非常合算的。我们要提倡这种办法，把一些国营企业转为中外合资企业。我们可以告诉外商，他们要搞什么，对什么有兴趣，我们都愿意与他们合作。这样做，外商可以把技术带进来，把科学管理经验带进来，把销售网络带进来。最大的好处是我们不用拿配套资金。现在我们新办一个合资企业，从开始洽谈到投产要几年时间。但利用现有国营企业去与外商搞合资经营，当年就可以投产，资金回收非常快，效益非常好。如果各地都这样搞，特别像上海那样大的城市，拿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国营企业来搞合资，那就会很了不起。这里面有什么困难呢？我看主要是多余人员的安置问题。中外合资，由外商经营，首先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既要减少一般工人，又要减少一些科室干部。这样，有一部分工人和干部就要另行安排。这会增加我们工作上的困难，一些工人干部思想上也会产生问题。但要看到，这样做对企业有利，对国家有利，工人干部的思想工作还是可以做通的。对现有的国营企业引进外资来加以改造，通过中外合资经营的办法来实现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我看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潜力也很大。如果北京和上海、天津、广州、大连等沿海城市都这样搞，外商进来投入三分之一的股份，就可以使我们大批国营企业生产能力发生很大的变化。

注 释

1．古耕虞（1905—2000），重庆市人，祖籍广东。曾任川畜公司总经理，其经营的古青记虎牌猪鬃占当时全国出口总量的80％以上，被誉为“猪鬃大王”。解放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1]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

这篇调查报告很值得一读。建议印发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下周一）。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是讲情况和经验。第三部分是把中关村作为科学工业园区（或新技术开发区）试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此事可以议一下。第四部分是讲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经验中，启迪我们如何解决科技与生产结合的一些思路，这一部分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很值得重视。

赵紫阳

三月二日

注 释

1．这份调查报告是根据赵紫阳的指示，经芮杏文、温家宝布置，由国家科委、教委、中科院、中科协、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和中办调研室七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从1987年12月到1988年1月，分11个子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后，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交的综合情况和政策建议的报告。

给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全体同学的回信*

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

* 这是赵紫阳为祝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创办十周年给全体同学的回信。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全体同学：

来信阅悉。获知你们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非常高兴。中华民族的振兴，需要大量的人才，也为广大有理想的青少年展现了锦绣前程。殷切希望少年班越办越好，希望你们不骄不躁，锲而不舍，笃志博学，大器早成，努力把自己造就为德才兼备的能够负重致远、担当大任的栋梁之材，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赵紫阳

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

落实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两个关键问题*

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沿海省、区、市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党中央、国务院确定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以后，国务院做了大量工作，连续开了几个会议。一个是外贸体制改革会议，外贸体制改革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时间不长，就基本上落实下去了。在外贸体制改革会议之前，开过一个外资座谈会，研究改善外商投资环境问题。再就是这次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进一步总结九年以来开放的经验，适应新形势，扩大开放，推进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这几个会议，都是围绕沿海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召开的。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来说，部署已经就绪。这对今年和今后几年的工作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中央确定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但这件事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能不能顺利实现，对沿海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很大的考验。沿海地区扩大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到国际市场上去，既要看到必要和可能，看到有利条件，又必须充分估计到它的难度。难度就在于，国际市场完全是个买方市场，而且瞬息万变，竞争激烈。我们说有可能实现这个战略，基本上具备条件，又应当说实现这个战略还有许多不适应的方面，我们必须有紧迫感，努力使沿海地区各方面的工作有大的改进。中国实行沿海战略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重视。总的看，反映比较好。但也有些人认为搞不成，说大陆那一套办法不行。我们有些落后办法，确实必须改。现在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既然定下来了，各方面都要考虑适应这个战略的需要。

第一，在政策上、规章制度上、作风上、办事效率上都必须适应国际市场上千变万化的情况，要有个比较大的改进。

外贸、银行、外汇管理等方面不适应的规章制度要修改。有关的各个部门都要为大进大出、随进随出很好地服务。当然，这个改进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要随着时间推进，不断暴露问题，不断解决问题。

第二，要组织科技力量支持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

实施沿海战略，搞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我们有个优越的条件，就是劳动力比较充裕，费用比较低，这是参与国际竞争非常重要的条件。这一次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为我们充分利用沿海几千万劳动力资源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但要看到，沿海地区的企业，乡镇企业也好，大中型企业也好，总的来讲，管理水平、技术

水平还不高，许多劳动力的素质还比较差。因此，沿海地区要实施这个战略，必须使我们的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人员素质有大的提高，不适应新情况的旧观念有大的改变。否则，就不可能有好的产品，不可能有竞争力。

我们国家的科技力量比较强。当然，比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还不行，但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我们科技力量是比较强的。据科委分析对比，总的来说，我们比印度还要强。香港、新加坡、南朝鲜，还有台湾都不行。我们的科技队伍可以搞出很多尖端的东西。但问题是，旧的科技体制使这个力量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科技力量不能很好地和生产结合起来。

沿海地区要适应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迅速改变工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技术水平比较差、管理水平比较低的问题，就必须抓科技力量同企业的结合，把科技更好地转化为生产力。这既有一个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有国营企业体制改革的问题。乡镇企业机制比较好，比较灵活，跟科技力量容易结合，只要科技体制的改革解决好了，就可以有大批的科技人员同乡镇企业结合。但是一些国营企业由于体制上的问题，对技术进步的要求并不怎么强，技术进步的兴趣也不怎么高。因为还是吃大锅饭，或者还是卖方市场，产品好坏照样可以卖出去，所以缺乏要求技术进步的动力和活力。让国营企业转向国外，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实行经营承包制，国营企业对科技的需求就会增加。因为在新的情况下，如不提高产品质量，不增加花色品种，不降低成本，就没有竞争力，有没有竞争力又与企业本身的利益紧密联系着。总之，既要利用乡镇企业的机制，促使大批科研人员同乡镇企业结合，又要通过国营企业体制改革，推行经营承包制，特别是把国营企业转向外向型经济，促进国营企业也关心科技进步。为此，科技体制本身的改革又必须跟上。

科学技术，广义的讲，也应当包括管理，管理也是一门科学。技术和管理上的要求，要使广大职工适应和掌握，就必须抓好职工培训。现在许多国营企业平均劳动费用虽然比较低，但效率也非常低。前几天我看了北京和美国公司合资的巴布科克锅炉有限公司，是外方管理的，这个公司每天职工在岗位上的纯劳动时间是五个半小时。用同样的办法测算，我们其他企业的工人劳动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这说明我们的许多企业松松垮垮，很不适应国际竞争的环境。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没有条件参与国际竞争。当然，我们不能等条件具备了再发展外向型经济。我们必须在转变过程中，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提高职工素质。

搞科技体制改革，坚持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技，当前最突出的是要抓好科技力量支持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要把学校、研究所和各种科研机关动员起来，好好抓科技体制改革，抓科技人员同企业的结合。

这里要指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绝不等于档次低、质量差的东西，不是这个概念。劳动密集型的商品也必须是质量好的，它也要上档次，也要上水平。有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是技术比较高的，有许多同时就是知识密集型产品。我们的传统

商品、传统产业，也要采用新技术。把劳动密集产品当作低档的东西，那是误解。

总之，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各个方面、各个部门要适应大进大出这个要求，提高效率、提高服务质量。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沿海地区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抓科技力量与企业的结合。我们的企业要重视国外的管理经验。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让外商来管理。通过办合资企业，训练我们的干部，培养管理工业企业的人才，改变企业管理落后的状况。

在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五日

十三大以后，全党的中心任务是，以改革总揽全局，组织实施十三大的决议。四个半月来，中央政治局在落实经济发展战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工作。我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向全会作工作报告。

一、关于人大和政协的换届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都将于本月下旬举行第一次会议。

政治局经过充分酝酿，并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拟推荐杨尚昆、王震同志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人选，万里同志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李鹏同志为国务院总理人选，邓小平同志为国家军委主席人选，李先念同志为政协主席人选；对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国务委员的人选，也提出了推荐名单。政治局认为，上述人选是适当的，请全会审议。

十三大对人事的安排，党内党外反映都很好，认为这个安排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全面实现十三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提供了组织保证；国际上反映也很好，认为这个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局的稳定和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国家主要领导人选的推荐名单，是安排十三大人事时经过长期酝酿、统盘考虑提出来的，实际上是十三大人事安排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政治局认为有必要提请全会讨论并作出决议。政治局要求，参加这两个大会的全体党员同志正确审慎地行使民主权力，积极发挥党员的作用和影响，同党外的代表或政协委员一道，把这两个大会开好，使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总格局得以顺利实现。

这次人代会将审议批准国务院机构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已经政治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李鹏同志将在政府报告中专门作出说明。机构改革是十三大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次改革仍然带有过渡性质，重点不是撤减机构，而是转变政府机构的职能。无论是新组建的机构，还是继续保留的机构，

都要着重解决好转变职能、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和人员、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的问题。政治局要求在国务院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做好机构改革的各项工作，努力创造政府工作的新气象。

二、关于经济形势

春节前，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去年的经济形势和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形成的意见已作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国务院也作了全面的部署和具体的安排。

去年我国的经济形势是好的。建设和改革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增长速度比较高，也比较正常健康。过去在传统体制下，往往是要稳定就只好减低速度，要速度就盲目扩大建设规模，出现不稳定。去年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开始出现了增长与稳定相统一的新情况，这是坚持改革的结果，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和继续应用。最宝贵的经验是：以改革总揽全局，整个经济生活就会出现微观搞活与宏观控制相互促进，速度与效益相互统一，改革、发展与稳定相互推动的局面。

今后的趋势如何？今年以至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在注重效益、稳定协调的前提下，保持一种较快的、持续增长的势头？政治局认为，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因为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将继续推动经济的顺利发展。特别是企业承包制的推行，使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有了较好的基础。第二，我国正处在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过渡期，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动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大批农业劳动力陆续向工业转移，有条件出现工业生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势头。第三，当前国际产业结构正在又一次进行大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劳动力素质较好而费用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对开发和利用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十分有利，给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第四，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使我们有可能利用国际市场，互通有无，调剂长短，来平衡经济，有利于改善过去那种受某些短线产品的制约而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第五，尽管我们遭受了“文革”十年破坏，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十年的准备，为今后十年的持续发展创造了一些好的条件。“六五”期间完成的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项目和技术引进项目，开始发挥效益。近几年来在建设和改革中积累的经验，也增强了我们工作的预见性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总之，今后我们应该而且有可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稳定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更大的解放。

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稳定，都是必需的。经济不稳定，无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整个社会的安定；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许多矛盾会更尖锐。总之，经济要稳定，又要增长；要有较好的效益，又要有较好的速度。两者要统筹考虑，适当安排。要允许各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探索和掌握两者的最佳结合。要运用价值规律来稳定经济，也要运用价值规律来促进经济发展，按照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来分析和处理经济生活中的新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要上好价值规律这个大学校。在传统体制下，想学也无从学起。现在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中，必须向全党特别是从事经济工作的党员负责干部，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游泳，学会我们过去最不熟悉的东西。

当前经济形势中突出的问题是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物价的焦点是食品价格。这是城市居民最关心的大问题。去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7.2%，其中65%是农副产品涨价引起的。解决食品价格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副产品供应。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单纯依靠国家投资来发展农业是行不通的。最重要的是学会运用价值规律来同农民打交道，把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广泛地吸引到农业生产上来。农村已经走上了商品经济的道路，价格是指导农业生产的最有效的信息。对扭曲的价格，该调的不调，该放的不放，忽而抬价抢购，忽而杀价停收，就会给农民以错误的信息，导致某些农产品生产和供应的忽上忽下，造成结构性的供需失调和价格失控。所以，必须消除把稳定物价等同于冻结物价的误解。我们在价格改革和物价工作上要采取这样的方针：一是对那些阻碍生产发展的不合理价格，要自觉地有步骤地加以调整，使物价的起伏有利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同时坚决制止乱涨价的行为。二是在主要食品价格上涨时，给职工以适当的补偿，以免使群众生活受到大的影响。如何做到既保护生产者的利益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们的经验还不足，要积极在实践中探索。把食品价格问题解决好，可以为整个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创造条件。

为了解决好食品价格问题和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要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务必抓好以下工作：第一，有计划地逐步调整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要纳入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规划。第二，积极改革流通体制，减少流通环节，发展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试行建立风险基金，使国家掌握调节供求和平抑物价的强大手段。第三，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运用包括价格杠杆在内的各种手段，正确引导消费，形成合理的消费结构。第四，把主要食品人均定量供应部分的补贴，由暗补改成明补。这在物价改革期间要作为一项制度定下来。第五，严厉压缩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集团购买力，缓和市场压力。第六，统筹安排好国内外市场。凡是国内供应紧张而又影响很大的主要农副产品，要适当减少出口。这样几管齐下，有助于人心稳定，改革也可以加快。

三、关于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最近，政治局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这个战略，不只是地区性战略，而且是全国性战略。实施这一战略，能够促进沿海的发展和带动内地的发展，并将有力地推动外贸、科技、财政、金融、价格等方面体制的改革和企业内部的改革，是我们落实十三大提出的建设和改革任务的一个重要环节。近两个多月来，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布置落实，一些部门和地方也已行动起来，围绕这个战略的实施，主动提出本部门、本地区的改革方案和改进工作的措施。

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我们有利条件很多，但难度也很大。特别是做到销售在外，进入国际市场，要进行多方面的巨大努力。现行外贸体制、企业管理水平、劳动者素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等方面存在的严重不相适应的状况，必须加以改变。实施这一战略，关键在改革。

外贸体制要大刀阔斧地改革。海关、进出口和外汇管理等方面，都要主动创造条件，改进工作作风，为大进大出、随时进出服务，以适应国际市场瞬息万变的剧烈竞争。不适应这个要求的规章制度和工作作风都要抓紧改。这次外贸体制改革，要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能够做到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放开经营，工贸结合和推行代理制就都好办了。同时，宏观的统筹协调不可忽视。

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科技力量较强是我国的一大优势。问题是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没有解决好，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太长。科学技术一经与乡镇企业灵活的机制相结合，情况就迅速改观。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当把乡镇企业作为推广运用已有科研成果的一个重要基地，鼓励科技人员直接到生产第一线，通过科研成果的有偿转让，技术入股，以及经营承包等多种形式，大力创办一批高素质的外向型乡镇企业。毫无疑问，大中型企业应当在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中起骨干作用。在大中型企业进一步搞活和科技体制进一步改革后，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将会解决得好一些。从目前实际条件出发，沿海地区要大力发展高质量的、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同技术密集相结合的产品出口；从长远看，必须积极发展技术先进的产业，力争有较多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沿海发展战略的成功，归根到底寄希望于科技。我国的科技力量应为此多作贡献。

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商到中国来投资。要更多地鼓励外商来兴办独资企业，也要更多地以中外合资来改造老企业，把先进的技术、管理和销售网“嫁接”过来。从几年来的实践看，按照国际惯例，外资独资企业由外商直接管理，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由外商来管理或以外商为主管理，好处很多，应当肯定下来。认为让外商管理我们的企业就是“丧失主权”，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必须加以转变。现在我国的不少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硬要将这些落后的管理方法引入“三资企业”，势必把这些企业搞得非驴非马，不死不活，外商赚不了钱，对我们自己也毫无好处。真要振兴我国经济，就应该把“三资企业”办成培养管理人才的学校。把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真正学到手，我们自己企业的管理水平也可以提高。现在，我们的企业不论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都有很大潜力。管理搞好了，劳动力素质和工作效率都会提高，经济效益就能一倍、两倍地增长。

我们国家，总的来说，必须立足于广大的国内市场，但沿海地区确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决不意味着内地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无所作为。沿海搞“两头在外”也不是绝对的，而且有个发展过程，内地能够提供的资源仍然要用，沿海与内地应继续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积极开发内地资源。内地许多“三线”企业，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应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这些问题，

都要全面地看，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处理。

最近，邓小平同志指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他在谈到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时，再一次指出：时机有利时，要坚决些。这是小平同志近几年来一贯的、正确的主张。他总是鼓励我们要勇于改革，勇于开拓，不要怕担风险。他担心的是我们犹犹豫豫，过于谨慎，贻误时机。小平同志这些考虑，是建立在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当着经济振兴的重大机遇到来的时候，很需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胆识和勇气，很需要紧迫感。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我们应当认真贯彻这个精神。

四、关于《企业法》的制定和实施

今年一月中旬，政治局第三次会议讨论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人大常委会已决定把这个草案交付全民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拟再作修改后提请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为什么现在要制定《企业法》？因为我们面临这样的情况：近几年企业改革的实践有了很大发展，十三大报告从理论上阐明了许多问题，各方面的认识已趋一致。这是一。二是已有的企业改革成果，需要得到法律保护；企业改革要再上一个新台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也需要法律提供依据。三是几年来在改革企业内部领导体制方面虽有一定进展，但各种关系并未完全理顺。企业扩权以后，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在这种情况下，厂长（经理）的法定代表人地位就非确立不可了。因此，颁布和实施《企业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企业法》的灵魂，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第一，不改变所有权，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全民，但经营权必须交给经营者掌握。第二，下放给企业的应当是广义的经营权，即对企业资产的占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企业如何经营，如何发展，企业资产如何依法转移，包括相互参股，相互投资，相互组合，相互转让，都可以而且应该由企业依法自主决定。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只要不违背《企业法》及有关的法律，都是合法的。这应当成为检验是否认真执行《企业法》的一个标准。贯彻《企业法》，必须紧紧抓住企业承包制的配套、完善、深化和发展。企业承包制是我国现阶段实行两权分离的普遍可行的有效形式。这是经过反复实践得出的经验。当前要把引入竞争机制作为推行企业承包的一个重点，抓紧落实。通过竞争和承包，将造就一批又一批精明强干、具有开创精神而善于依靠广大职工的优秀企业家，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企业承包企业，是最近企业承包的又一具有深刻意义的新发展，体现了我们多年来提倡的“优胜劣汰”和“扬长避短、保护竞争、促进联合”的原则，有利于用经济办法打破地区封锁、条块分割。企业要以实行承包制为契机，大力推行“满负荷工作法”和企业内部的各种经济责任制，使责、权、利层层落实到全体职工，把

蕴藏在企业中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潜能发挥出来。

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贯彻《企业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十三大已经明确指出，无论企业实行哪种经营责任制，都要着眼于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前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重点要放到完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改进企业工会的工作上来。既要保证企业经营者能够独立行使经营权，具有管理权威；又要保证工人能够充分行使民主权力，发挥主人翁的作用。这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厂长、职代会和工会的共同任务。关于工会在企业中的地位、作用等，中央正在研究并制定文件，待在实践中完善后再提请立法机关形成有关法律。

搞好企业的党政分开，是贯彻《企业法》的一个核心问题。《企业法》规定，厂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企业法》体现了现阶段党对企业改革的主张。企业党组织贯彻《企业法》，首先必须保证监督落实厂长负责制。企业党组织必须严格按照十三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办事，也就是说，不再像过去那样起统一领导的作用，而是行使保证监督职能，通过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作用和党的群众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带动全体职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令、计划的贯彻执行，保证企业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

五、关于党的建设

政治局在作出若干加速改革开放重要决策的同时，把加强党的建设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政治局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中央领导机构新的工作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加强集体领导和实行党政分开的原则。

去年十二月间，中央书记处开了两次座谈会，专门讨论了当前党风建设问题。总的看法是，正确认识党风问题，离不开改革开放；正确解决党风问题，也离不开改革开放。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能从根本上减少产生不正之风的土壤。这是治本的办法。我们要有意识地把制度改革同从严治党结合起来。要从群众意见最多、制度改革的条件又比较成熟的问题入手，逐项认真解决。要抓紧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给人们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这样人事方面的不正之风就会减少。要配合《企业法》的实施，把企业人事制度改革搞好。要坚持实行差额选举制度，使干部在生动的民主生活中受到教育和监督。要结合机构改革，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作风，尽可能地开放政府各部门的办事制度，便于群众监督。住房商品化的改革，也应加快步伐，以减少住房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何使党政机关干部继续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廉洁奉公的作风，是个必须认真解决的新问题。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为此，必须加强对党政机关干部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健全相应的规

章和法制，加强经济监督部门的建设和对公职人员的监督；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家财力的增加，还要逐步改善公职人员的待遇。制度建设要抓紧，但总要有一个过程。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起共产党员的作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于弄权勒索、贪污盗窃、出卖国家利益等严重违法行为，必须严格按照法纪、政纪查办。对党内的腐败分子，必须清除出党。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在繁荣经济和保持廉洁奉公优良传统这两件事情上，沿海开放地带都应当走在前面，为全国创造经验。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严厉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狠刹奢侈浪费之风的问题，这里还要再强调一下。现在不少机关、企事业单位奢侈浪费、摆阔气成风，群众很不满，不狠刹不得了。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节约资金，更重要的是为了改变风气，联系群众，振奋人心，艰苦创业。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所有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要发扬勤俭建国、艰苦创业的优良作风，在这方面做出显著成效。

必须大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十三大对基层党组织提出了七个方面的经常工作，即“经常地进行教育，经常地加强监督，经常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经常地整顿纪律，经常地清除腐败分子和妥善地处置不合格分子，经常地吸收优秀分子，经常地发扬正气和抵制歪风”，这对加强党的建设有着重大意义。较长时期以来，不少基层党组织忙于行政事务，无暇顾及这些极其重要的经常工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基层党组织职能发生很大变化，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当前要着重抓好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的领导机关有责任指导基层组织转变职能，做好党的各项经常工作。

应该以党的建设来推动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改革和开放，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繁荣理论研究、文艺创作和其它精神产品的生产，使整个社会保持一种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良好风气。近几个月来，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作了若干部署，包括拓展和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筹备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理论讨论会和第五次全国文代会，积极而审慎地推动新闻、出版、文艺领域的改革，以及加强对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和指导。所有这些工作，都要扎扎实实抓出成效来。

政治局建议，各级党委把党的建设包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党纪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等问题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作好准备，以便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央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些问题。

六、关于社会协商对话

十三大以来，许多地方、部门和单位举行了多种形式的协商对话活动，一般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协商对话的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正确的方针，不是激化矛盾，也不是回避矛盾，而是及时地恰当地处理矛盾或缓解矛盾。许多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改革得到解

决；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新的利益调整和摩擦。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协商对话要为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服务，为协调社会矛盾服务，为巩固安定团结服务。社会协商对话应分层次进行。

全国性的协商对话不宜过多。重点应放在重大改革问题上。前面提到《企业法（草案）》的全民讨论，可以说是一次全国性的对话。今后，这一类涉及重大改革的法律草案，以及重大改革的方案，如物价的调整、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等，也应在事前或事后与群众协商，认真听取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共同分析利弊，商议对策。关系到社会安定的重大事件，要及时向全国人民说明真相，解释政策，通过广泛的对话，争取群众的支持和合作。有关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会、妇联、共青团的作用。

地方性的协商对话目前可主要以城市为单位进行。着重讨论与群众利益休戚相关的市政问题，如公共交通，住宅建设，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商业服务，环境卫生等，推动这些社会问题顺利解决。

基层单位的协商对话是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围绕本单位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进行。本单位的改革问题，制度建设和劳动纪律问题，安全生产问题，以及其他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基层单位的领导必须同群众认真协商。基层单位福利基金的使用，住房分配，以及生活设施（如食堂、小卖部、浴室、托儿所等）的管理，应该由群众自己讨论，按照群众认可的程序进行管理。基层的民主生活，干群关系，对干部的监督，应成为基层对话的重要内容。总之，基层协商对话应该成为群众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和学习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学校，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基层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如何使协商对话生动有效地开展起来和坚持下去，如何逐步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制度，也应该同群众一起商量决定。各基层单位的领导应当学会通过协商对话，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同心协力解决本单位的矛盾，推动和改进本单位的工作，切不可使矛盾积累下来，波及社会。

协商对话不仅是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方式，也是各社会集团之间的沟通方式，这对在人民内部形成自我调节和约束的机制，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十分重要。上面讲的几个层次的协商对话，都要注意吸收各群众团体和各方面代表参加。行业间、单位间的协商对话，现在还很不普遍，要认真加以提倡。

今后，应进一步提高党务和政务活动的开放程度。这是开展协商对话活动的前提。建议尽快地把人大、国务院及其各部的发言人制度健全起来，定期举行有实质性内容的新闻发布会。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社会协商对话的内容和形式肯定会有许多新的发展。要使各级领导和各方面的群众都懂得：一切协商对话活动，必须有利于维护而不得妨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都应当提倡顾全大局，平等协商，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谅解，找出解决矛盾的途径，而不应扩大和激化矛盾；都必须有充分准备，讲实话，办实事，办不到的事情不能开空头支票，办得到的事情务必抓紧落实，不能敷衍搪塞。应当牢牢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宗旨和建

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爱护群众参加社会协商对话的积极性，在实践中探索规律，提高实效，总结经验，逐步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

以上报告的是政治局四个多月来的主要工作和今后进一步贯彻十三大精神的思路和布局。十三大以来，中央的许多工作，包括一些重要会议的开法和一些重要活动的安排，都力求体现改革的精神。这次中央全会，也要开得生动活泼，讲求实效。各地区、部门、单位贯彻十三大精神有什么重要的情况、经验和问题，对政治局的工作有什么建议，欢迎同志们畅所欲言。充分依靠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和全党的集体智慧，我们就能紧密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

给中央团校成立四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中央团校的同志们：

值此中央团校成立四十周年之际，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青年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教育、培养青年干部，是保证我们民族振兴和党的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希望你们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再接再厉，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教育青年干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刻苦学习，深入实际，艰苦创业，谦虚谨慎，带领广大青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赵紫阳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关于发挥我国稀土优势的两次指示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六月三日

发挥我国稀土优势[1]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现在国际上一些有识之士说，在新的产业革命中，稀土与新材料关系重大。世界上80%的稀土资源在中国，因此，中国在这场革命中如何打好稀土这张王牌很重要。

对《关于在新产业革命中如何发挥我国稀土优势的报告》的批示[2]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

这也是一个战略问题。各方对此有不少议论，建议交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议一次。议时除提出报告的三位同志外，计委、有色金属部门可参加。

注 释

1．这是赵紫阳在召集有关人员座谈新产业革命时的谈话摘录。

2．这是赵紫阳对方毅、叶青、吴明瑜三位同志《关于在新产业革命中如何发挥我国稀土优势的报告》的批示。

叶青（1933—），江苏苏州人。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组长。曾任黑龙江省鸡西矿务局总工程师、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委副主任。

在研究改革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日

* 这是赵紫阳邀集李铁映、马洪、陈先[1]、项怀诚[2]、王兴家[3]等座谈改革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时的讲话。

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议论一下生产资料价格问题。生产资料平价和议价两种价格问题太大了。生产资料价格是个上涨的趋势，许多涨价来自中间环节的盘剥，平价原材料有不少卖给了个人、“公司”，层层转手倒卖，现在管也管不住。实行两种价格以来，各方面都出现一些矛盾，而且越来越严重。企业虽然承包了，但原材料价格不平等，就不是在平等条件下的竞争。生产资料价格改革要进一步减少两种价格。从方向说，是向活的方面发展。减少平价供应部分，也就是减少倒卖。

目前是否有条件取消生产资料两种价格。现在形式上是计划调拨，执行国家定价，实际上有的卖议价，有的虽然卖牌价，但价外还要给东西，或带有其他附加条件。上海的同志反映，国家给上海的原材料平价部分占百分之三十七，实际上工厂拿到的平价原材料都加了费用或其他附加条件，就是说，不再是平价了。如果情况属实，说明这部分加价，用户没有得到补偿，完全自行负担了。这样一来，由于成本推动，工厂要求涨价，我们又不让涨价，结果下面乱涨价，对生产很不利，到后来，价格也稳不住，有些钱跑到个人腰包里去了。分析一下，会不会百分之六十的国家定价的部分实际上都变成了一种市价，而我们还在怕调价和变动价格产生成本推动，引起加工产品涨价。生产资料平价进，高价出，名义上执行牌价，实际上进来的却是加价的，到底占多大比重？这件事想请你们摸一摸。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大部分还是平价、相当多的部分是平价加附加条件、还有议价三部分。汽车的价格是不是这种情况，你们摸一摸。

消费者买彩电，看起来国家定价没有涨，实际上一张买彩电的票卖三、四百元，还是由消费者负担了涨价部分，只不过涨价部分国家没得到，都落到中间环节和倒卖者个人腰包里去了。因此说越是供应短缺、紧张的东西，越没有低价（平价）的，大都是在平价基础上加了附加条件或加了价的。这些都是产销、卖者与买者之间协议的。

生产资料由“双轨制”改为一种价格，怎么过渡？不放活，不能刺激增加生

产；放得步子大了，又怕受不了。从现在的情况看，一种产品两种价格的副作用越来越大，怎么改革，又不走回头路？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继续维持两种价格的现状，还是下决心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少“双轨制”价格。从生产企业来说，平价材料都涨了。涨价部分实际上已经承受了，为什么我们不去把它改革呢？

从两种价格逐步向一种价格转变，步骤怎么走法，要看实际情况来定。有些产品取消议价，由国家定价，即恢复统一计划。有些产品取消平价，实行市场价格，减少牌价品种。总之，工业生产资料要逐步地变为一种价格。逐步地变为一种价格，就带来一个年年变的问题，年年变会使承包、财政包干等也要年年变动。如果“双轨制”不改变，继续照目前的办法放任自流下去，只能是越搞越乱。要改变，就要有个方针，总的是要采取多种形式向一种商品一种价格过渡，即一种是国家定价，一种是市场调节价格。

原材料价格采取统一提价办法，好处是有个来回账补偿问题。搞两种价格，初期可以起到增加生产、缓和供求的作用，一旦供求紧张，放开部分就控制不住，大涨价。经过一段实践来看，如果涨到国际价格水平或高于国际价格也好办，到那时，就可以通过外贸进口来调节供求。放开的市场价格，基本上是向国际价格靠拢，因为中国实行的是开放政策。生产资料价格向国际价格靠拢，有利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是否可以说，中国长期实行稳定物价的方针是不行的。每年物价指数都要上升，物价上涨，是要解决问题的。如果每年物价也涨了，却又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是不行的。

两种价格向一种价格转变，要分品种、分步骤、分轻重缓急进行。生产资料价格接近国际价格水平，国内不足的部分可以进口，使用国外原材料。关键是现在价格的实际水平已经达到了什么水平？这一点反映不出来，而大家都在反映价格不合理。如果实际价格水平不高的话，那就别改了；如果实际价格涨得很多，就要下决心改革，使其合理化。

应该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东西少了，是不按价值规律办事造成的。比如火柴要加一分钱，硬是不敢加，结果工厂不愿意生产，大家买不到火柴。洗衣粉也是这么个问题。生产资料价格垄断性很强，消费品价格竞争性大，供应一紧张就要求提价。我的想法是，消费品价格不要压住不动。我们现在是生产资料价格、消费品价格都压着不让动，这不行，不能是一头乱，一头死。牛奶不让提价，就没有牛奶喝。不通过调整价格，增加生产和供应是不行的。消费品价格要年年调整一些才好。现在是国家每年强调稳定物价，怕乱涨价，不敢主动调价。实际上是每年都将会有些价格要动的，这种情况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价格改革，理顺价格，要为促进生产、增加供应、调整生产结构服务，不仅仅是为稳定物价服务。有些价格问题是要在动中调整，逐渐使其合理。从某种意义上讲，轮番涨价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要不断地调整，把物价指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通过不断调整向合理方面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市场调节。我们是有计划调节，反映不了实际。我看目前猪价很可能是高了，搞不好又要出现卖猪难的问题。当然最困难的还是蔬菜问

题。

生产资料价格怎么改，要搞个改革办法。消费品哪个价格过不去就调吧。我看在价格改革上，不前进就会出现一些畸形的东西，这些东西又同整个改革的要求不协调。现在是怕涨工资，就去控制消费基金，不敢提工资改革方案，实际上消费基金也增加了不少。价格也是如此。怕涨价承受不了，不敢调价，结果自发乱涨价；越乱越不敢涨价，结果越理不顺。目前我国工业是处在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要理顺各种关系。不理顺各种关系，它就要自发地理顺，结果就出现各种各样畸形的东西。实际上价格涨上去了，消费基金也上去了，各种关系却更加不合理了。导致这种后果的关键是缺少主动地去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轮番涨价要承认它，关键是如何驾驭它。如果物价涨了，工资也能提上去，经济又发展了，我看就不可怕。我们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物价改革如果不前进，而是退回去，那将有许多矛盾不好解决。

注 释

1．陈先（1919—），浙江宁波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物价小组组长。1939年参加新四军，曾任华东财委计划局副局长，国家计委综合局局长、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顾问、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全国人大常委。

2．项怀诚（1939—），江苏吴江人。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曾任财政部副处长、副司长，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财政部部长，中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

3．王兴家，时任国家物价局副局长。

在全国第一次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同志们：

我很高兴参加今天这个大会。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

出席大会的有我国各民族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有的为繁荣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教育和普及科学技术做出了显著成绩，有的在抢险救灾、守土戍边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建立了功勋。你们的模范事迹，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的民族关系是良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你们做出了突出贡献，各族人民感谢你们，国务院表彰你们，我向你们、向一切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敬意。

在今天这个各民族同志欢聚一起的盛会上，我想讲四点意见。

一、必须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充分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

在人类历史上，民族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民族和国家不是一个范畴。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同一个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而许多国家又都是由若干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和多民族国家都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

民族问题往往同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在当今世界上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在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民族问题依然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民族问题也不会随之消失。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并正确处理它，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安定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问题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中国五十多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各民族既有各自的民族特性，又有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中国现有各民族组成中华统一国家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极强，一贯地维护统一，热爱祖国。当国家受到外来侵略和威胁的时候，中国各民族总是一致对外。远的不说，打开近代史和现代史看一看，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直至现在，各民族都为维护中国的独立、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涌现出了不少爱国民族英

雄。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我们一定要维护和发扬这个伟大的民族传统。

二、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

我们党一贯认为，民族不论大小，应当一律平等。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差异，但差异是不断变化的，民族之间并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我国各兄弟民族都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都对祖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古到今，我国各民族都有值得自豪的创造和优秀人物。

在当今世界上，民族歧视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我们国家，不但不准许歧视少数民族，还在法律上、政策上为保护、尊重和优待少数民族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主张，也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很多问题，今后必须努力改进我们的工作。

以前说过："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句话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从全国来看，我们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然彼此离不开。从局部来看，许多地方是多民族聚居的，各民族的劳动共同繁荣了那里的经济和文化，构成了当地总的经济文化生活，也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不管是在汉族占多数的地方，还是在其他各民族占多数的地方，民族之间都要互相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平等和睦相处，不应有任何民族歧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和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各有优点，各有所长，应当紧密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汉族干部特别要尊重、团结少数民族干部，注意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大家齐心协力把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设好。归根到底，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的繁荣昌盛和国家的统一富强，这应当成为我们观察问题的着眼点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也是中华得以振兴、现代化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要团结，要统一，不要分裂，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现在有极少数人妄想分裂祖国，不难看出，他们根本不代表本民族的利益，他们不过是外国反华势力的代理人。即使是在中国衰弱的历史时代，任何分裂祖国的行为也都遭到各民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唾弃。今天，当中国已经巨人般地屹立在世界的时候，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和支持他们的外国反华势力妄想分裂中国的图谋，更是绝对不能得逞的。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他们没有那个本事。

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我们一方面要继续认真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克服"左"的影响，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依法坚决制裁和打击分裂祖国的活动。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三、坚持改革开放，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我国的民族问题，当前更多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发展经济文化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地区同我国沿海地区相比，生产力水平不高，商品经济不发达，因而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更为艰巨。国家对沿海地区主要是创造条件，让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机会，把经济搞活，从而对国家多做贡献，而对少数民族地区，除了放宽政策以外，还应当坚持从其他各方面给以支持和帮助，以促进其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必须处理好。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幅员广阔，拥有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这本身就是巨大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各民族干部和群众都在发展经济方面积累了许多独特的经验。有的擅长畜牧业，有的长于从事“绿洲农业”，有的在开发建设高原、山地方面有特殊能力和适应性，等等。有的民族地区还具有发展边境对外经济贸易的有利条件。正确认识这些优势，坚持改革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是可以更快地发展起来的。

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团结也好，各民族共同繁荣也好，民族区域自治也好，都不能离开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潮流和社会环境。整个国家不改革开放，没有出路；各个民族不改革开放，同样没有出路。我们必须把改革开放这个总方针总政策进一步贯彻到民族工作的各个方面去。

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特别要注意引进人才。哪里人才多（包括科技人才、管理人才以及有本领的能工巧匠等等），那里的经济文化就发展得快。从全国看是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也是这样。如果人才缺乏，自然资源再丰富也无法开发，即使有钱、有项目，也不能发挥作用。这一点，已被大量的实践所证明。所以，关键是人才。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也要特别重视从智力上，从培养、教育和引进人才上给以帮助，这样才能帮到点子上。

民族地区在注重引进人才的同时，还要积极引进国内外资金和科学技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勇于参加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在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要善于吸收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

民族地区的进一步开放，会不会导致珍贵民族文化的消失呢？不会的。古今中外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正确的选择是开放，而不是封闭。可以肯定，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将逐渐增多，民族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的趋势会有所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将继续受到尊重。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本民族进步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在新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至于那些阻碍民族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旧思想、旧习俗，

当然将在现代工业化建设的进程中被本民族群众所自觉摒弃，但这本身是一种进步。真正兴旺发达的民族，是开放的民族。各个民族只有开放，才能从同别的民族的比较中发现本民族优良传统和文化价值，才能更珍视它和发展它。在现代化过程中，我国各民族一定都会有自己更加光明的前途。

我国各少数民族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现在的发展也不平衡。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能完全照搬内地的做法。搞经济建设，必须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不同的地区，不可盲目攀比，也不能机械仿效。各民族地区的建设应当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优势，扎扎实实地搞，讲究实惠，重视效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国家对民族地区在改革上要更加放宽，各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允许试验。已为实践证明在民族地区行之有效的特殊政策和做法，要继续实行，逐步加以完善。民族地区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应当采取切合实际情况的步骤，该稳的一定要稳妥，该加快的就不要放慢。民族地区如何搞社会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还不够。中央希望各民族的干部群众继续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积极改革，努力创造和完善真正适合民族地区发展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体制。

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东部、中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将长期存在。近几年来，我国有些民族地区同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差距有所扩大。应该看到，这种差距是在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也有较大发展而沿海地区发展更快的情况下出现的。我们的目标是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但不可能做到完全同步。面临当前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让沿海地区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发展，这是符合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沿海地区如不利用这个机会，对内也没有好处。反之，沿海地区发展了，必将带动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整个国力增强了，国家就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建设。当然，我们对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带来的问题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并采取正确有效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今后要制定中西部与沿海地区互补互济、各展所长的发展战略措施。就是说，不是通过放慢沿海地区的发展，而是通过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逐步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国家和发达地区必须继续从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帮助。这种支持和帮助要采取一套合乎经济规律的做法，以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对民族地区资源的开发，务必重视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合法经济权益，使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能够随着当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而得到相应提高。

四、更好地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决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

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必须有相适应的法律和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载人我国宪法的，是我

国人民的一大创举。它既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保证了我们多民族国家空前的大统一、大团结，又保障了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有利于每个民族的进步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扬。经过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它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是适合我国国情的。

一九八四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结晶。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和自治地方、汉族同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对于这部关于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法律，各级、各部门都要全面地、坚决地贯彻实施。一定要保证各个自治地方充分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它们的自治权。不能认为贯彻自治法只同少数民族有关，只是各自治地方的事情。前一时期自治法规定的某些自治权利未能很好地兑现，有干部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相应的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因此，必须把实施自治法，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进一步抓紧抓好。各有关部门都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制定出贯彻自治法的具体办法和细则。在做各种具体规定和进行工作部署的时候，对民族地方和内地、沿海，不能“一刀切”。

为了贯彻好自治法，应当突出强调的是，必须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大量培养各级少数民族干部。这是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核心问题。只有培养出大批政治思想好、热爱祖国、密切联系本民族群众、有文化、有能力的少数民族干部，各民族的素质才能大大提高，各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才能更好地落实，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才更有保障。所以，今后一定要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上，花更大的力量，做出更大的成绩。在民族地区工作的许多汉族干部，多年来诚心诚意地为各族群众服务，深受他们的信任和欢迎。中央希望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要继续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信任，亲密合作，共同为各民族的团结和繁荣做出新贡献。

同志们，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整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政领导和各族人民都要继续给以高度重视。让我们按照党的十三大确定的基本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紧密团结，励精图治，沿着业已被实践证明了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

对杜星垣和吕东关于闽粤两省对外开放调查报告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

印发财经领导小组各同志一阅。在治理整顿中要坚持对外开放、对沿海地区要网开一面的方针，不应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应具体体现在政策、措施上。请纪云同志综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向国务院提出建议。

认真研究解决经济发展和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九八八年五月九日

* 这是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座谈当时经济发展和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时的讲话。

一、推广石家庄发展生产资料市场的经验

山东省还在继续推广石家庄发展生产资料市场的经验，在全省范围内建立统一的钢材市场。石家庄是在流通领域，山东搞到钢铁厂。办法大体是分两块：钢铁放开部分，搞市场价格；省统一分配部分，属于省的，确定一个价格一千三百元一吨（牌价八百元），通过订货会议，价差两个月返还给用户，用户比较欢迎。用户希望钢材价格全部放开。现在钢材价格层层加码，有的钢铁厂认为奇货可居。请体改委、物资部好好支持山东把这件事情搞好。

二、认真研究解决生产资料价格的方案

生产资料价格要认真摸一下，不外乎三个方案：

（一）维持现状。

（二）指令性计划部分也放开，调整企业利益。关键是弄清楚按国家计划，企业能拿到多少按指令性计划调拨的东西。钢材现在说是二千万吨，实际上转来转去也都加价了。

（三）把指令性计划再缩小，使国家真正能控制住，真正变成国家订货。如果采取第二方案，还要加一条，特别紧俏的物资要统管，统一定价，实行专卖。国家统起来保证最必需的用户。如硅钢片、薄板、某些化工原料，品种不多。一般钢材放开，紧张的统起来。

这三个方案都可以讨论，但有一条，不能回到过去统一定价的老路子上去。现在乡镇企业已经全靠市场调节了。

三、经济工作中需要研究解决的三个问题

（一）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过去产品经济那一套经济秩序，现在已经不适应了。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秩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新的经济秩序要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企业和企业的关系等，都要用法律加以规范。对地方和企业的利益，既有需要保障的一面，也有需要制约的一面，防止在利益上的互相侵犯。应当加强经济监督，同时对经济监督部门也要有监督。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必须具体，必须有确定性，以便于掌握和执行。建立一套新秩序需要时间，不可能一墩而就，但必须有清醒地认识，自觉地抓紧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二）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工资制度问题

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比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人工资低，这种现象不可长期存在下去。而且物价不断上升，工资问题究竟怎么办，必须从长远着想来研究，从工资制度上解决，只采取临时应付的办法是不行的。各单位自行发补贴、发实物等等，不规范，很不透明，弊病很多。要重申不准机关经商，不然就会发生官商不分、以权谋私等问题，发展下去，积重难返。

要调节个人收入。对低收入职工要给予补助，对高收入者要坚持征收个人所得税。当前有一部分人收入很高，但不缴所得税，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所以，对高收入者依法收税，这不仅仅是与财政收入有关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社会公正的政治问题，必须认真抓好。

最近各种公司新办了不少，需要认真清理。有些是名为“公司”，实际上继续行使原来行政部门掌握的审批权、物资分配权等等，借以谋取本单位的利益，获取不正当收入，妨碍经济的健康运行，危害很大。凡是行政性公司，除了个别经过国务院准许的以外，应一律撤销。正当的公司，其职工的工资待遇也不能定得太高。特别是对大公司上层管理人员的工资收入，应当规定限额；离退休党员干部去公司工作要经组织部门批准，转人公司后的超额收入应作为党费上缴。

（三）进一步深化流通领域的改革

当前流通领域中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弄清楚，需要认真研究，找到解决的办法。重点要解决好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的流通体制问题。

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大大减少流通过程的中间环节，缩小“双轨制”的范围。要创造条件尽可能使产销直接见面。对紧俏的农业生产资料要实行专卖，不准乱插手。

近来，地方之间和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有了新的发展，这是好的现象。看来在全国范围内一下子形成完全的统一市场还有困难。可以研究有两种市场；

一种是全国统一市场，许多商品应在全国自由流通，不准搞地区封锁；另一种是共同市场，在维护地方自己合法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地区之间可以采取合同、契约形式进行经济联合和交流。总之，既承认地方、部门的合法利益，又防止垄断和封锁。

同安志文和马洪谈物价与工资改革问题*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与安志文和马洪等人谈当时物价和工资改革问题时的谈话。

对物价怎么看，今后几年怎么搞，工资怎么搞？

物价问题，工资问题，都无法回避。临时处置往往考虑不周。都属于宏观管理上必须有计划解决的问题。如：物价每年动多少，幅度多大，解决多大问题，工资怎么办。总的原则，不能使劳动者生活水平降低。当然，在分配上有个稳步调节问题。是一九九〇年前搞，还是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搞。这个东西不下决心，发展搞不下去。

今年的问题比较大，物价指数比较高。不能年年如此。每年如此吃不消。但价格问题多，不理顺不行。看来，趋势无法避免。只有市场调节，价格向放开发展。市场调节，国家如何影响市场。一方面，经济不能失去平衡；另一方面，有些一时放不开的，要有步骤地进行。

工资问题，中国工资制度的路子究竟怎么走。中国越搞透明度越差，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合理。企业以奖金形式出现，机关也以奖金形式出现。发展下去，会积重难返。我们国家将无所谓工资制度。谁搞到钱谁就多分，谁搞不到钱就少分。还有个机关与企业脱钩。脱不了钩是死路一条。要专门组织一些讨论会，到北戴河开会要有一些说法。从明年开始，几年计划，出安民告示，宣布这几年就这样搞。像现在搞临时措施，群众都心中无数。企业里边，不能完全靠奖金，也要搞工资制，死工资、活工资。

机关在脱钩以后好办，必须下决心提高工资。学校、医院、公用事业单位、警察、国家机关，工资要解决，与工人工资是什么比例，要有个原则，非解决不可。

中国还有个大问题，就是各省发展不平衡，全国不可能一个标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工资就得高。实行不同工资会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全国统一工资加地方附加工资。退休以后怎么办。全国完全一种工资，行不通。胶东民办教师工资高于公办教师。国家不通过工资来解决，他就想多种办法补偿，久了就变成官商不分、公私不分，为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

从当前出发，展望未来，看工资问题、物价问题怎么办。经济高速发展还有几年时间，趁此时间理出头绪，避免出现东欧的情况。经济好的时候没有理顺，

速度下来了，各种矛盾都出来了。再改革，理顺这些东西，就得靠降低人民的收入。

工资中还有一个大问题，如何在克服平均主义中，减少不合理的过分差别，体现公平的原则。有个人所得税，但没有认真收。从政治上考虑不够，很多人不交。对不交的要处置，依法办事，向社会公布。

通过计划，体现这些东西。“七五”还有两年多，搞一个五年计划，搞到一九九二年。一九九〇年以前搞什么，一九九〇年以后搞什么，能不能基本搞好。首先要有一个模式，如公务员制，有个总体方案，有些地区先走，有些地区后走，有些措施先行，有些措施后行，但要在总体设想下进行。

今年物价太高了。今后要有个总的控制。比如，在发展比较快的情况下，每年物价指数大体百分之十以下，百分之八、九、十连续搞几年。相应地，把需要解决的物价问题解决掉。把物价指数压得很低，时间放得很长，也不利。物价上涨，就有个收入问题。要研究一下国际上的路子是怎么走的。达到这个程度以后，每年物价指数只能百分之二、三、四、五，长期下去。但现在我们没这个经验，如何驾驭这个东西。在物价上涨情况下把价格理顺，在收入增加情况下使分配合理。这几年消费有很大增加，但分配制度没改进，是个损失。宏观上没有一个东西，等到时机过去后，要动价格就得降低收入。

几年内以物价上涨多少解决物价问题，以消费基金增长多少解决分配问题。不至于像东欧国家，不改革经济下滑，要改革就承受不了。

物价的承受能力比过去大大增强。山东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学石家庄，生产企业赞成，阻力大的是钢铁厂。农产品价格，最后剩下城镇居民每月二十七斤口粮，可以长期不动，作为社会福利。再有如何解决低收入职工的工资问题，好的办法也很多。例如，宁肯分出来一些人去种树，照发工资，让另外一些人去搞技术培训，这也是一种智力投资。等到哪一年，矛盾不是太多的时候，认真把这件事情搞一下，把制度立下来。

工资、物价改革，以体改委、计委为主。

北戴河会议，就讨论工资、物价、流通体制。

五年之内，消费不能搞高了。分配超过生产，东欧都走进了死胡同。这一条要注意。货币投放走这条路：国家减少财政投资，以企业为投资主体，向社会发行股票和债券。一定要使生产增长超过消费。企业有盈利的可以扩大再生产。另外，分配到个人的，可通过债券和股票使其转为长期投资，以减轻国家投资负担，减少货币发行。股份制势在必行。

若不把消费资金转为再投资，货币发行少了也不行。要有一系列鼓励措施，发行债券和股票。这样，企业就会愿意用自有资金和入股资金，而不愿意用贷款。

资金太廉价，不可能改善经济管理。

多余的工人要有解决的办法。

对亏损企业必须有政策。有些就是不能照顾，长期亏损的只能让它倒闭，或

者被实力强的企业兼并。

要从体制和政策上逼着大家去提高效益，优者生存，劣者被淘汰。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物价和工资改革方案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六日、十九日

一、今年的物价问题

今年物价上升幅度很大，城市达到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八，是改革以来上升幅度最大的一年。

据物价局讲，今年国际国内市场价格差缩小，有些产品比价不合理的情况也有改善，但形势是严峻的。现在我们决心搞好物价改革，看主要采取些什么措施。大家集中力量过好这一关。搞好了会给今后的改革打下好的基础。过好这一关，不出大的问题，要进行全面的部署。

二、今后工资和物价问题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打算，有一个系统的方案，纳入改革的规划之中

工资物价问题，计委和体改委要有一个长远打算。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最难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苏联现在价格还未动，南斯拉夫搞晚了。我们如果再拖下去，没有系统的决策，再搞几年可能会走上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道路，那时再来解决难度就大了。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有一个系统的方案，分步实施。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过这一关。今年北戴河会议要讨论这个问题，先搞一个现在到一九九二年的五年规划。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我们的纲领，市场调节是必要的，但不理顺价格，市场调节便是一句空话。动价格，物价就上涨，如果没有长远打算，势必避重就轻、避难从易，耽误了时机，最后解决的条件没有了。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都是前车之鉴。今年物价上升幅度很大，今后几年之内，群众和社会最高承受能力达多少，在此限度内，连续几年把价格理顺。要弄清楚物价要理顺什么东西。每年上涨多少，要几年的时间才能理顺，都应有规划。如我们说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五年时间就是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上涨幅度，五年时间这个幅度，把物价基本理顺有无此种可能？也可分别计算，每年上涨百分之六、百分之八，百分之十，这样需要十年、五年或三年时间？时间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要算账。

物价定到这个盘子，必须在工资方面有措施。要考虑物价、工资和经济的发展，三者统一考虑。例如，在我国，工厂和机关是否要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只要工厂和机关能够脱钩，实行不同的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解决的难度就不大了。现在怕互相攀比，在工资方面我们应有个明确的制度，向人民宣布，使人民接受。在机关搞公务员工资制，在企业搞企业工资制。

工资中有三个问题：第一，消费不能超过生产，必须给人民以正确的思想引导，分配超过生产必将导致生产衰退、下降。改革要使人民得到利益，但消费必须低于生产的增长。现在到了该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使人民改善生活的期望值冷却下来。否则，必然出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结局。人民没有正确的精神准备，收入多仍会不满意。生产的增长速度要高于消费增长的速度，消费的增长速度要低于生产的增长速度，这是任何社会必须遵守的规律，任何国家都不例外。第二，真正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第三，调节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这几年我们走过的路，一是消费过大，膨胀过快，二是平均主义继续发展，三是分配不公，这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

三、公平分配的问题

个人所得税虽然国家有规定，但没有认真征收，没有认识到征收个人所得税是调节社会矛盾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从现在起要下决心建立一套制度，城市中个人收入要申报，首先从大城市开始。先申报，后抽查，不申报的查出来要严肃处理。对非法收入、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要取缔。

四、党政机关廉洁的问题，要当作一件大事情扎扎实实地搞

我们的口号是党政机关廉洁。首先解决党政机关的问题，地区和部门可结合自己的情况自己制定措施，通过正常的程序进行，建立和制定严格的制度。

五、改革和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是提高工业企业效益

财政问题根本是工业效益问题。这也要有长远规划。必须把工业企业劳动制度的改革放到重要地位，作为长远问题。现在企业用人太多，不仅提高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劳动纪律难于建立，松松垮垮。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在外围打圈子，一触及难度大的问题都绕开了。如物价、工资、劳动问题。现在工人不能辞退，多余人员不能减，城市工人已很多，但有些活不干，又从农村另招临时工，现在厂长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搞下去，改革的成果都将被多余的劳动人员冲销了。现在我们的一些观念、法律、政策都没

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劳动制度以及多余人员问题，我们要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搞。

六、思想政治工作

现在思想政治工作面临一个如何加强、如何改善的问题。现在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方法还是老的，不能为群众所接受。中央要专门讨论。

总之，今后几年是改革的关口，如何坚决而又谨慎地度过，是摆在全党面前的紧迫任务。这些都不能回避，不能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样拖下来，把有利的时机丧失，最后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来解决。对此，我们必须有统一而清醒的认识。

总之，物价改革，不有计划地搞，各地就自流地搞，自发地搞，付出的代价大得多，造成的矛盾大得多。物价乱动，工资就乱动。广东的办法，不能推广，透明度太差。

现在的形势是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有三个问题：

（一）使全党、各级负责同志，对改革面临的形势和我们必须采取的方针，有个统一认识，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二）要有一个好的方案，由国务院来搞。

（三）必须考虑为改革创造一个稳定的局面。要准备出点事情。排除干扰，保持局势的稳定。要搞一个保证改革秩序的紧急治安法，授权国务院，需要时就公布，不需要时就解除。波兰公布半年内不许罢工，不许上街。这么多矛盾，没人反对不可能。

为了制定今后五年物价和工资改革方案，国务院成立物价委员会，以姚依林副总理为主任。

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发挥辐射作用*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的谈话。

我们沿海地区办了十几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总的看发展得不错，当然也花了不少钱。从天津开发区的情况看，今后建些大工厂当然是需要的，但是一个一个工厂地办，虽在这个地方很成功，却很难带动天津市的工业，不能起更大的作用。我们的天津、上海、大连、青岛、广州、福州等城市，有很多大工厂或较大的工厂，技术人员很多，设备很多，但是观念落后，体制落后，管理落后。所以我对沿海地区提出了“嫁接”的口号。好比工厂是棵树，树长得还旺，就是品种不好。现在欢迎外商来“嫁接”，“嫁接”技术，“嫁接”管理，“嫁接”销售网。你们这个开发区，作为“窗口”，体制比较顺，办事比较方便，外商来天津可以经过你们这里来“嫁接”。你们更多地考虑在这里搞增值，搞组装。在你们这里搞一个工厂，作为龙头，其它工序放在后方，加强联合，搞专业化协作生产。后方有许多产品可以拿到你们这里加工增值出口，包括大包装改小包装。改包装、“加耳朵”、“加眼睛”，梳妆打扮，改头换面，提高附加值后进入国际销售网。你们背后有个大工业城市天津，往后还有北京、内蒙古以至西北。这样做，只要工作做得好，就把天津及其周边地区的工业生产和技术进步带动起来。要注意研究香港的经济模式，那里基本是外面的东西进去加工后转口。特区、开发区应当发挥这种作用，例如把坯布搞成印染布，印染布搞后整理，这就增值了。当然，也可能会出点毛病，发生“水货”、走私等问题。但不能因噎废食，要通过健全法制和加强管理，保护合理合法事情的存在和发展，防止不合法现象的发生。

我们过去把合资的期限看得很重，搞什么合营期限多少年，没有多大意义。长期合作有什么不好？外国人是会算账的。你规定二十年他有二十年的办法，最后你占不了他的便宜。合资时间短，对我们并不利，越是技术高的项目越不利，因为合资期短，他就不更新技术。现行规定要通过立法程序加以修改。

开发区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实行外方向董事会总承包，不包搞不好经营；一包，利润多了，他把钱弄走了，可能我们有些人又要眼红了。其实，销售网络学问大得很，你不利用他的销售网，产品就不可能出去那么多。你要叫他来销售，他就要赚一大笔钱。因为国外的批零差价比我们大得多，批零差价带给销售商的利润非常高。你们是不是读过《亚柯卡自传》？那是一本讲美国汽车生产经

营的书。你看他多么重视销售商，要用相当大一部分的精力去讨好销售商，调动销售商的积极性。因为他考虑到，离了销售商是不行的。我们中国过去的产品，生产出来后物资部门统一收购，这是产品经济。作为商品经济，销售网是个非常大的学问。销售网本身的信誉，要靠好多年的努力。现在我国从总体上来讲，要建立自己独立的销售网，但这不是一、二年能搞得起来的。目前，还得利用外商。

沿海已经开放了这么大的地区，在开展对外经贸活动中要有个共同规划，各有侧重，避免相互摩擦撞车。

关于胜利油田挖潜增产的两次批示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二十七日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批示

对胜利油田今后如何开采及挖潜问题，听说有不同意见，如何支持他们增产更多的原油，有重要意义。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批示[1]

印发财经领导小组。鉴于今后几年内胜利油田的前景，对我国整个石油生产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建议在下星期一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议一下。

注 释

1．康世恩和房维中受赵紫阳委托，召集有关部门及胜利油田的有关人员召开了三次讨沦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提出了胜利油田挖潜增产的报告。这是赵紫阳对报告的批示。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

最近，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当前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形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大家认为，当前形势总的是好的。政治上保持了安定团结，生产发展相当快，财政收入和出口创汇增长幅度比较大，国家的经济实力在迅速增强。但问题也不少，特别是物价上涨已成为社会议论的中心，引起了广泛的不安。看来，我国的改革确实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十年来，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新旧两种体制仍处于交替过程中，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有待于我们去建立。当前，改革已经进行到这样一步：许多难度很大而又不能绕过的问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必须像小平同志最近指出的那样，冒点风险，迎着风浪前进。现在是不进则退。退回去，将前功尽弃，是没有出路的。继续前进，克服困难，闯过难关，就将坦途在望，出现新的局面。

大家认为，我们不能回避矛盾，不能把难题都推到最后去解决。如果那样，最终会失掉解决问题的条件，代价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多。像物价问题、工资问题等，到了该解决的时候如果不下决心去有计划地加以解决，它就会自发地盲目地膨胀，最后物价没少提，工资奖金没少发，结果什么也没有理顺。我们应当避免这种结局。现在有个好条件，就是生产在蓬勃发展，人们的收入在不断提高，对改革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东欧一些国家的经验证明，如果错过了这种好时机，等到经济增长放慢下来再去解决改革的难点，那时就只能被迫在降低人们收入的条件下去理顺关系，困难和阻力会更大，很可能引起社会更大的震动。现在经济情况好，老一辈革命家又健在，我们一定要抓住历史给予我们的这诸多有利条件，迎着风浪前进，坚决把改革中不可回避的一些难点解决好。全党全国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同心同德，共渡难关。这一关非闯过不行，工作做好了，也一定能够闯过去。

政治局常委会在讨论中认为，要闯过难关，把改革推向前进，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好下面几个问题：

一、关于物价问题

今年将是我们改革以来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有国际市场商品涨价、特别是进口原材料大幅度涨价的原因，也有国内的原因。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按价值规律办事，这就必须理顺原来极不合理的价格关系，包括国内外市场的不合理比价，工农业产品的不合理比价，原材料与加工品的不合理比价等等。理顺这些关系，就不能不引起物价的上升。这是绕不过去的。今年以来，我们通过减少对进口原材料的补贴，对副食品暗补改明补，调高某些政策性亏损产品的价格等等，向着理顺价格的目标前进了一步。所以，物价上涨的代价并没有白白付出。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的整个物价体系还远没有理顺，例如粮食价格、石油价格、运输价格等等，都还是极不合理的。许多生产资料实行“双轨制”价格，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生产，但长此以往，流弊很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为了过好物价改革这一关，要作通盘打算，制订一个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物价改革计划，不能只是应付临时遇到的问题。例如，考虑到社会承受能力，物价指数每年上升多少为宜，大致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初步理顺，在工资、利率、思想工作等方面采取什么配套措施等等，这些都要纳入计划之中。能否考虑，大体在五年左右，把价格问题初步理顺。物价改革总的方向是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并使之接近国际市场价格。但是，少数属于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如电力、交通、邮政等等），必须由国家定价。

需要放开的物价，有些可以一步到位，有的可以先实行“调放结合”，然后再一步到位。在物价改革的五年总体方案中，明年这一步如何走非常重要。要尽可能做到社会震动不过大，而又能在理顺价格和促进生产方面真正解决一些问题。这就需要研究在生产资料、公用事业、农副产品三个方面，明年价格改革的重点放在哪里，步子如何走。明年这一步走得好，有利于增强以后改革的社会承受能力。

二、关于工资问题

工资问题和物价问题是紧密联系着的。既然要主动地理顺物价，就必须相应地解决工资问题。改革应该使人民得益。过去九年，这方面做得很好，改革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物价改革过程中，仍应保护人民的利益，使之不受损失，至少应使绝大多数人民实际收入不下降。这样，就有可能较为平稳地渡过物价改革这一关。物价改革和工资改革，这两个问题难度都很大，但不能回避，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迟早都要过这一关。实行工资制度的改革，既要有利于增强对物价改革的承受能力，又要解决原来工资制度中很多不合理的东西。现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报酬，层层“倒挂”，这种现象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各单位自行发奖金、发补贴来解决职工收入问题的做法，

很不规范，很不透明，苦乐不均，甚至为了多发钱就搞机关经商，以权谋利，弊病很大，发展下去就会积重难返。应当通过工资制度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工资问题要考虑三个原则：一是消费的增长不能超过生产的增长，否则，就会引起经济衰退，最终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过去长期执行抑止消费的政策是不可取的。近几年人民生活的迅速提高带有“还账”性质，也不可能长期支持下去。今后的改革应当继续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但个人增加收入的期望值不能过高，这一点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二是要克服平均主义，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现在，平均主义思想还很严重，合理的必要的差别往往还不能被某些人所接受。目前不少地方在职工收入中，工资占一半，奖金占一半（甚至占一半还多），而奖金不少是平均发放的。企业之间平均主义、互相攀比的现象更为严重。有些改革，本来的宗旨是克服平均主义，但因攀比成风，搞来搞去又回到了平均主义。攀比问题不解决，对提高经济效益极为不利。三是要认真调节收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看来不可能搞全国一刀切的工资标准。具体来讲，地区与地区不能一刀切，机关和企业也不能一刀切。非这样区别开来不可。过去也曾多次想解决工资问题，就是因为怕攀比，一搞全国都得一个样，结果搞不起，只得放下来。可以设想，今后全国干部统一的工资标准，只作为档案工资（调动工作和退休时有用），在不同地方工作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水平而有不同的附加。企业工资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要考虑脱钩。企业承包以后，应普遍实行经济效益与工资总额挂钩，允许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和有关的政策自主决定本企业职工的工资。这样，剩下需要国家决定的就只有机关和一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问题了，而这一部分人员的工资也可以按照财政体制分级解决。如能按照这样一条路子，把工资问题大体理顺，纳入正常晋级的轨道，我们就解决了改革中的另一个最大的难点。

工资问题，必须和经济的发展、物价的变动联系起来考虑，制定系统的解决方案。每年经济增长多少，物价上升多少，相应地工资提高多少，使人们收入的增长略高于物价的增长，这要有一个统一的盘子，并纳入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

关于分配不公问题，也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一方面，当前分配中吃大锅饭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同时，随着经济逐步搞活，人们的收入也拉开了差距。这种差距，有的是按劳分配的体现，是对平均主义的克服，是合理的；但也有不合理的，有些人得到的收入与他们付出的劳动的质量与数量很不成比例。分配不公现象，已经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也会降低社会对改革和物价波动的承受能力，必须认真对待。

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可以考虑采取三个措施：第一，征税调节。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也可考虑是否开征遗产税等），鼓励私人经营者把其收入的绝大部分投入扩大再生产，或用于公益事业，从而有益于社会。对高收入者一定要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现在有很多人该交税而不交，税务部门也不认

真去收。看来，对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意义需要提高认识。征收这个税，不只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为了调节收人，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与此相配套，要逐步建立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先从大城市开始。不管从什么途径来的个人收入，都要申报。一开始执行就要严格，认真抽查，查出瞒报的就严格处理。经过几年，逐步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第二，对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要坚决取缔和制裁。当然必须严格划清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划界从宽，执法从严。第三，对低收入者，要给予补助。最近，国家给了低收入者一点补助，虽然钱不多，反应很好。要逐步完善社会保险和救济制度。

三、关于企业经济效益问题

财政问题、物价问题、工资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经济效益，特别是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近几年来，国家的基建投资基本没有增加，军费基本没有增加，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基本没有动，但财政仍然十分困难，有很大的赤字，根本原因在哪里？除了行政费用增加过快以外，主要是企业效益太低。归根到底，国家财力要靠企业来提供，涨价因素要靠企业来消化。所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实在是我们渡过难关、摆脱困扰的根本途径，全党一定要提高认识，在这方面下大功夫。

提高效益，既要靠好的政策，靠技术进步，更要靠严格的先进的管理。目前，我们许多企业的管理状况相当落后，管理落后比技术落后更普遍、更严重。企业实行经济承包、引入竞争机制以后，只是为改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承包本身还不等于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承包之后，在加强管理、健全制度、严格纪律等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现在许多地方对亏损企业没办法，许多企业对多余人员没办法，这对加强管理、严格纪律是极大的障碍。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改革，造成一种机制：使亏损企业自负其责，经营不善难以为继的企业能够破产，能够被关停并转；使兼并真正成为优化组合，而不是让先进企业替落后企业背包袱；使企业多余的人员能够拿出来去从事其他有益的事情，不再继续吃企业的大锅饭；使企业在实行承包制后，不仅能负盈，而且真正做到能负亏，创造利润少了，就要少发或不发奖金，甚至少发工资。这就需要进一步改革劳动制度，在这一点上也要敢于“碰硬”。

中国人本来是以勤劳闻名于世的，而现在由于企业管理松松垮垮，纪律松弛，使许多人丧失了传统的美德，变得怕苦怕累。一些青年人对外资企业的严格管理不能适应，不愿意紧紧张张地工作。所以，企业管理能不能改进和加强，对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和四化建设的前途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决不能小看这个问题。

在今后几年的改革中，如果不能甩掉对亏损企业补贴的包袱，不能让一些经营不下去的企业破产和关停并转，不能把企业多余人员拿出来，总之，如不能通过改革促进企业结构调整，使优者发展，劣者淘汰，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调整，

不断地优化组合，企业的管理就很难加强，效益很难提高，消费超过生产的后果也难以避免。这也是难度极大，极易引起社会震动的问题，但要发展商品经济，这个问题就无法回避。

四、关于流通领域的改革问题

效益问题不限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里的潜力也大得很。当前，要着重解决好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的流通体制问题。生产资料流通体制的改革，方向是放开，形成市场调节的机制，最终取消“双轨制”。现在实际上也已大部分放开。农副产品方面，应该有步骤地再适当减少一些合同定购，在城市里把口粮以外的粮食供应放开。大城市要与邻县订合同，解决好城市的大路菜供应问题。

近来，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地区封锁，设置关卡、路障，乱堵截，乱罚款。这是一种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错误做法，必须坚决制止。二是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有新的发展，这是好现象，要加以鼓励和引导。

我们既不可能再回到完全靠计划来“统”的产品经济状态，也不可能一下子把市场机制搞得很健全。因此，可以设想，在一定时期内允许两种市场同时存在：一种是全国统一市场，绝大多数商品应在全国自由流通，不准搞地区封锁；一种是共同市场，由地区之间采取合同、契约的形式进行经济联合和交流，各自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在此基础上实现互利和互补。应当通过立法解决这个问题。

流通领域里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中间环节太多。有些中间环节，对商品流通不起任何积极的作用，它们所起的作用只是增加流通费用，抬高物价，滋生倒手牟利等不正之风。必须取消这些起消极作用的多余的中间环节。流通领域的改革，应当尽可能促进产销直接见面。

许多物资过去实行统配制，形成了一些机构，其中许多工作人员对物资渠道很熟悉，这些机构还掌握着仓库、车辆等许多设施。改革之后，在新体制下，必须寻找新的途径来发挥这些人员和设施的作用，但必须防止以权牟利和增加中间环节。近来，不少新的公司纷纷成立，其中有些并不是企业性的经济实体，而是以“公司”之名，继续行使原来行政部门掌握的审批权、物资分配权等等，从环节上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这类“公司”，对经济的正常运行妨碍极大，需要进行清理。凡行政性公司，除个别有特殊需要，经国家批准的以外，应一律撤销。

五、为物价和工资改革创造一个较好的经济环境

这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如何使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的问题，改革、发展与稳定经济的关系问题。

看来，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创造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再去进行物价、工

资改革的主张，恐不现实。继续放松货币发行，以无控制的通货膨胀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也是行不通的。如继续通货膨胀，恐怕物价、工资改革方案就难出台。因此，只能是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兼顾。为了不使经济环境过于紧张，就不能去追求过高的速度。当然，在我国如果没有较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很多问题也难以解决。从具体地区、部门讲，应该快的不要慢，不能快的不要勉强。不以速度去评价一个地区的工作。从全国讲，不可能较长时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沿海一些地区应该也可能更高一些，不要失去机遇。

今后货币发行应适当紧缩。为了既适当抽紧银根，又能继续使经济的发展保持一定的速度，就必须在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上下工夫，使需要发展的得到支持，不需要发展的得到抑制，而不是简单的要松都松，要紧都紧，搞一刀切。为此，关键是改进机制，多用经济办法控制银根。几年来，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应当认真汲取，以便今后有更大的改进。

这里，想提出一个资金利率的问题。可否设想，较多地提高利率。一则解决因物价上涨而产生的负利率的问题，二则解决资金价格太低，助长资金浪费的问题。适当地提高利率，可以起控制基本建设膨胀的作用，可以促使企业提高效益和合理调整结构。对国家需要支持的重大基建项目，以及有特殊原因需要国家支持的企业，可以另行照顾。通过这种形式抽紧银根，副作用要小。

六、关于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问题

党和国家机关能否保持廉洁，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和改革的成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许多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初期都发生过官商勾结、贪污受贿盛行的问题。现在仍有一些国家，经济繁荣，政府很腐败，当官的靠贪污受贿、花商人送的钱过日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决不能学他们的坏样子，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坚决地自觉地抵制和反对贪污、受贿、勒索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为一己之私利，不惜损害人民的利益，玷污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败坏改革的声誉，这是国法党纪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今后不宜把各种消极现象笼统地称之为党风问题，而应根据各种问题的不同性质，如违法犯罪问题、政纪问题、党纪问题等等，区别对待，具体地加以解决。总的提法是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反对一切不廉洁的现象。开展这项工作的范围，限于党政机关，不要搞到企业里去。企业和机关性质不同，情况也不一样，搞在一起界限不清，弄不好不利于搞活经济。

从根本上解决为政清廉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贪污受贿和不正之风的土壤。但制度建设需要有个过程，我们不能等。当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反对贪污受贿和弄权渎职，狠刹歪风邪气，不能让它泛滥。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改革和制度建设，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采取搞运动的办法，但务必扎扎实实、锲而不舍地抓下去。要依靠各级组织，依靠监察、司法、纪检等部门，作

为正常工作去开展。应当着重对干部进行教育，同时必须加强监督检查工作。要建立并逐步健全人民检举制度，监察部门要专门设立受理群众检举揭发的机构。立案，销案，都必须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对案件应及时认真查办，切实做到不纵不枉。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明确自己那里的重点问题，作出具体部署，认真去解决。这项工作，要多做少说，不要在工作尚未开展起来的时候就大张旗鼓地宣传。

七、改造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处在改革关键时刻的中国共产党，有责任把全民族的力量振奋起来，团结起来。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只讲物质需要，只讲个人利益是不行的。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必须有精神支柱，有一股精神力量。所以，我们既要讲经济规律、按劳分配，又要讲理想、道德、纪律，必须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二者不可偏废。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利于政治的安定，不利于改革、开放，也不利于发展生产力。

我们所需要的精神支柱是什么？能够把亿万人民激励起来、团结起来去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什么？现在只能是“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也就是十三大提出的今后世界上有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的问题，会不会被开除“球籍”的问题。要在这个奋斗目标下，使一代人充满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是照搬具体结论），兼收并蓄，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东西，学习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但决不能引进西方的个人主义。在“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这个大目标下讲个性、民主、自由，是正确的，有利的。离开了这个大目标去讲个性、民主、自由，是错误的，有害的，只能使中国陷于混乱，变成一盘散沙，现代化建设也就没有希望了。

思想政治工作，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要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教育，树立和维护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还要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为群众排忧解难，与群众随时对话和沟通思想。党的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成为深受群众信任和爱戴的知心人。

今后五年改革面临的形势，改革的方针和政策，大家应作什么精神准备和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些都应当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思想政治工作不单纯是一个加强问题，还有一个改造问题。过去毛主席提出过“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著名的口号，今天我们也应该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改造。不改造就无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既要发扬过去真正的好传统，例如红军时代对士兵和群众进行教育的民主主义传统，又要按照新时期的要求进行改造。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只进行训斥和说教，提些又空、又高、做不到的口号。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对象，总结新经验，赋予生动丰富的内容，采取有积极效果的方法。事实上，各地已有不少新鲜经验，例如把思想工作寓于对人的关心之中，把理想、道德、纪律的宣传寓于各种有益的有吸引力的活动之中，把

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及进行广泛、深入、平等、双向的社会协商对话等等。有许多好经验有待我们去发现、总结和提高。全党同志，包括从事党务工作的同志和从事行政业务工作的同志，应当共同努力，担负起这个改造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荣任务。

八、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基层建设

党的基层组织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任务就能顺利地落实到基层，不安定的因素可以消饵在基层，意义非常重大。现在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基层组织和党员不起作用。所以，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认真进行整顿。最近，中央组织部会同一些地方党委，抓了一些试点，对不愿意履行党员义务，不参加组织生活，不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不响应党的号召的不合格党员，首先进行教育，经教育不改的劝其退党，结果广大党员为之一振，党的威望也随之提高，不少群众要求人党。这项工作，前段只是在农村进行，下一步还应在工厂、机关里开展。要使广大党员认识到，人了党就必须永远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所作所为必须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否则，就不可能置身于共产党员之列。当然，处理党员要慎重，不能为劝退而劝退，不能追求指标。这是一项经常工作，要细水长流，一批一批地坚持进行下去。

九、为改革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总是容易引起一些社会震动。当前，我们的改革又面临着一些难度很大的问题，矛盾比较多。我们的工作不可能没有缺点，每项改革措施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人反对。国外敌对势力一直在对我们进行渗透和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所有这些，构成了错综复杂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有应付闹事、对付动乱的长期思想准备。头脑要清醒，要准备出些事情。有这个准备比没有这个准备要主动些。

首先要加强基层工作，认真进行基层的民主建设和法制教育，努力克服官僚主义。这是最重要的。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都要扎根于群众之中，支部、党员、团员都要起作用，工会、妇联等各种群众团体都要起作用，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各地，特别是大城市，要有应付突发事件的预案，要有相应的人员和物资准备。要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要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应当在平时就做好必要的法律准备。许多国家有紧急状态法，必要的时候就宣布生效，我们也要考虑这个问题。这是在万不得已情况下为保障改革秩序而采取的非常措施，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并不矛盾。

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安定的环境。排除干扰，保证社会的稳定，以便集中精力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应当力争做

到有备无患。

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我党历史上有过“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当代第三世界正在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每个社会、每种经济制度都必须有它自己的秩序。

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去产品经济那一套经济秩序逐渐不适应了，必须逐步地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秩序。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大课题。它不仅包括经济活动新规则的建立，还包括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新观念的形成，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包括法制的完善，等等。现在在我国，一方面经济欣欣向荣，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混乱现象，就反映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尚未完全形成而函需建立这种过渡时期的情况。许多社会矛盾，要靠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来解决，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任务。

新的经济秩序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与地方的关系，企业与企业的关系，国家、地方、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都要用法律加以规范。要建立反封锁、反垄断的法律和法规。对国家、地方和企业的利益，既有需要保障的一面，也有需要制约的一面，防止互相侵犯。特别要加强经济监督，对监督部门也要有监督。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需要制订大量法规，这是很大的工程。如每项法规都完全要自己研究，时间将会拖得很长，可以考虑有选择地参考和移植国外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成熟的法规。

在新旧两种秩序的交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矛盾和混乱。而新秩序的逐步建立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跳而就。这个过程，就是改革的过程。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努力把工作做得周到一些，争取把新旧秩序交替中的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要自觉地抓紧改革，以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步伐。

近期工作准备这样安排。这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确定了下一步改革的方针以后，由国务院组织班子，精心设计方案；七月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要听取汇报；八月上旬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此期间，还要与党外、各界进行对话磋商。

想办法把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建设资金*

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把消费基金转化为建设资金的工作，今后几年要搞一搞。要与工资、物价改革一起考虑。现在方针已经定了，三、五年内要进行一次较大的改革。如果货币发行过多，通货膨胀，物价改革就要增加难度；如果紧缩过度，又会带来新的问题。

今后几年如何抑制消费，尚无好的办法，再加上物价上涨，问题就更多。因此，除了经济体制改革外，还要缓和物价中的矛盾，要通过各种办法，把消费基金（就是老百姓手中的现金）转为建设资金。如果做到，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即基本建设不太压，票子又少发。当然，一部分消费基金要转为购买力，债券也要还，但不必顾虑太多，要缓解这几年，因为这几年要进行大的改革。如果这次改革解决了机制问题，以后就不怕，实在不行再严格紧缩。那时紧缩与现在紧缩的后果不一样，因为今天还没有好的机制。如果今年票子少发会有什么后果不清楚，弄不好又是紧一年松一年。但如果基本形成市场机制就要好得多。特别重要的是这几年，要用各种办法，比如卖债券、股票，卖企业，卖房子等等，即想一切办法把一部分消费基金转为建设资金，减少人民的购买力，充实一部分建设资金，就两面得利，即市场压力小，紧缩影响不大，为价格改革创造了条件。

有些问题不必顾虑过多。如国债问题，将来还账与现在不搞了意义不一样，因为现在要过一关。只要银行储蓄稳定，把钱多搞些为改革创造环境。如果这方面不开些路子，紧缩确有很多困难。消费基金转为生产资金，就是要老百姓少买东西，多买股票、商店、房子等等。如果这几年这条路子能走下去，胆子大些，决心大些，即使出现一些问题，从宏观上有利，帮助我们过了关，以后有些事还可另外考虑。当然这样做不是完全不顾后果，就是不要搞来搞去，都不解决问题，而物价、工资改革又要出台，事情就不好办了。

小平同志再三鼓励我们，不要怕冒风险，给我们撑腰，还讲“有那么严重？反正比一九六二年好吧！”当然，股票、所得税、资产评估等工作很难一下子搞好。要有一些鼓励作用才行，但不能从国家这一头开支。要确定个利息标准（银行、股票），都要放手来搞，管你什么东西，反正老百姓冲击市场的钱少了，银行少发票子就可能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着棋，包括卖企业。这不是从一般改革上说

的，是这几年现实的需要，为工资、物价改革创造条件。因此，只要对这几年有利，有利于消费基金转为建设基金，以后的问题就再考虑。关键是时间要错开，以后会有办法的，就怕现在议来议去解决不了问题，老百姓手中还有很多钱，冲击市场。怎么办？光靠银行少发钱，最后机制很不合理，基建下不来，生产下来了，农产品没钱收购了，最后又得发票子。这就是一年紧一年松，松的后果是原病复发。我们现在要为改革创造条件，要下这个决心。

对《中国的企业管理要害何在》一文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对《光明日报》驻东京记者采访日本企业管理专家三上辰喜谈话的批语。

此件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白头文件，发中央财经小组、书记处、国务院、政治局各同志，并发有关部委。

我们的改革今后要转到解决物价工资的难题上来，承受力如何，能否顺利过关，关键在于提高工厂、企业的经济效益。三上辰喜先生这篇谈话，所指出的我国工厂、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的严重情况，一方面是弊病，另一方面正说明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有着极大的潜力。因此我们在部署物价、工资改革的同时，一定要加强工厂、企业的管理工作和企业内部的机制改革。只有对企业实行承包制，并在这一基础上加强管理，加强内部机制改革，工厂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得到明显的提高！

在西安飞机制造公司视察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近来，航空工业方面传来一些好的消息。我前几年到过贵州一个飞机工厂，去年又到了沈阳飞机公司，还听了黎明公司的汇报。看来航空工业的形势是一年比一年好，现在已经开始找到一条路子。我相信今后的情况会更好一些。

我们航空工业，也包括其他军工企业，在我们国家，设备是最好的，技术人员是最多的，而且水平是最高的，有一个很大的摊子，固定资产也是最大的。但是，由于整个国际形势是一个和平环境，愈来愈缓和，因此完全靠军队装备来支持这么大的一个摊子、这么大的固定资产、这么好的设备、这么多的技术人员，看来是很难的。在这样一个形势越来越缓和的情况下，完全或主要搞军工，搞军工产品，难于有用武之地。设备也好，人员也好，完全靠国内，生产国内的军队装备，恐怕没有用武之地。也就是说，完全靠国内，大部分设备要闲置起来，大部分技术人员、工人就没有事情干，这恐怕不是暂时性的，整个军工者阵在这么一个问题。怎么办？我看现在你们走的路子是对的。我们这个潜力怎样能很好发挥出来？设备、技术、固定资产如何能够发挥作用？如何能够派上用场？我看就是姜圣阶副部长讲的两句话：一个是军转民，一个是内转外。就是要充分利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充分利用开放的条件，更好地把作用发挥出来。军转民是搞民品，内转外既包括民品，也包括军品。只有利用开放的条件，才能使军品有发展前途；只有利用开放的条件，才能够使我们现在的民品、军品的质量、技术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这两天，我和省委同志议论过这么一个看法。在我们国内，军工系统，当然包括航空工业，起点是比较高的。我们应当在这样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同国外合作。我们发展国外合作，最好是在比较高的起点上。这样引进技术消化比较快，国内配套、国产化步骤也比较快。无论民品，还是军品，都要走这条路子。从民品来讲，军工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生产我们国内现在还需要引进的设备。我们国家在四化建设中要引进国外许多设备，要花很多钱，要花很多外汇，所以军工系统应当把主要力量用到这个方面，搞进口替代产品。我们国家需要引进什么样的设备，军工企业就应当生产这样的设备，改造我们国内的企业。军工力量比较强，科技力量也比较强，要尽可能搞这些产品。但又不是什么东西都完全由自己来搞，应该发展同国外合作，叫做攻关加合作。一是攻关，我们自己能

搞的就自己搞；二是合作，有些不能搞的，关键的东西就引进国外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生产出来代替进口的设备，花钱也比较少，比如纺织机械等。我们各行各业都有一个设备更新问题，都有一个技术改造问题，都有一个现代化的问题。机械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我看应该把潜力尽可能多地挖掘出来。自己生产加上同国外合作，实现外汇平衡，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现在采用的办法。我们的引进要以国内市场为谈判筹码，因为大家都想进人中国这个市场，确实中国这个市场很大，他愿意挤到中国来。我们要利用这个条件，进行国际合作。那么外汇怎么平衡呢？就要找一部分零部件来干，并且是劳动密集型的零部件，因为我们的劳动力便宜，他一个工时48元钱，我们才12元钱。我们给国外配的东西，他们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做，但在我们这里做比较便宜。这样再加上他们自己做的技术密集的东西，由他们总装后卖给我们，赚钱是他们的。这是由于一些技术密集的东西我们还不能做，或者做出来以后质量不行。这当然是不等价交换，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这样的不等价交换是不合理贸易。他们买我们一些劳动密集的、价钱比较便宜的零部件，再用他们一部分技术密集的东西装到我们的产品上，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外汇平衡问题。

回过来再讲质量问题。我们的很多设备往往就是那么几个东西质量不行，往往是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就影响整个设备的质量。我们过去的办法是完全靠自己，测绘啊，模仿啊，当然在不开放的情况下这也是一种办法。今后的趋势不应该是这样，要争取大部分零部件由我们来做，关键部分买国外的，而我们又把一些零部件卖到国外，这样外汇平衡了，质量也可以上去了。只要我们国内哪一家工厂能够生产这样的设备，同国外引进的差不多，基本上接近国外水平，国家就可以给你保护，禁止进口，限制进口。如果你的东西不行，或者说虽然比原来的好一些，但还比国外的差得很多，国家就很难订货，否则用户就不满意。因为用户生产的产品要出口，用你的设备很难保证质量。军工企业要搞国际合作，一般机械工业也要这样搞，但他们没有军工企业的水平高。总之，我们现在既要反对一切都要引进，全部靠买；但也不能完全关起门来，封闭自己，都靠自己攻关，这样最后也可以搞出一些东西，但往往时间太长，或者质量不好。现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是，一些大的设备完全由一个国家搞是没有的。

军工生产，我看也是两条，一条是合作生产的办法；另一条是军品必须到国际市场上去，开辟国际市场。把军工企业搞活，就是你们所说的，军转民，内转外，我看还要加上一句，攻关加合作。民品主要是生产国民经济技术改造所需要的装备、设备，通过国际合作的办法，自己生产大量的好设备来替代进口。军品就是通过合作提高技术，打到国际市场上去。这样，发展的速度就快了。现在你们的路子开始在这样走，我看这条路还是很宽的。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我们有这样大的力量，这样好的队伍，这样好的基础；另一条是我们有开放的环境，有开放的政策，而且这个开放的政策、开放的环境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世界的大趋势是国际交往越来越多，过去那种封闭的做法，过去时代那种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苏联也想走这个路。所以，这个路子是长期的，不是

暂时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看是很有希望的。航空工业有几十年建设起来的这么大的一个基础，有这么好的一支技术队伍，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以这样说，你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今后会一年比一年好，前途是光明的。

在晋陕两省视察工作时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

一、关于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在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沿海和内地必然形成互补和互相促进的关系。沿海的开放和发展，对内地来说，是极好的机遇。不可能沿海发展了，内地不发展；内地不发展，沿海也不可能加快发展。沿海的发展迫切需要内地提供原材料，这给内地原材料丰富的地方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强调沿海地区的加工业可以实行“两头在外”，是为了让沿海地区有个思想准备，在原材料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不要与内地争原料，也不要与内地争市场，而应主要立足国际市场来解决自己的原材料来源和商品销路问题。实际上，沿海地区一下子不可能完全做到“两头在外”，它势必还要大量使用内地的原材料。这对内地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工业的发展是很大的促进。如果内地能够向沿海地区大量供应原材料的话，那当然比依赖进口更有利。可以“两头在外”，最好是“一头在外”，即用国产原材料生产出口产品。沿海的开发和发展，对内地的大型科研单位、机械工业、军工企业的发展和提高，同样也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沿海发展了，还将有大量资金、技术、信息输往内地，从而促进内地资源的开发和整个经济的发展。

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沿海和内地各有自己的优势，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包括那些严重缺乏自然资源，只有丰富劳动力的地方，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以适合自己的方式把经济发展起来。山西的优势在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化工业。陕西的优势在科技力量强，大型骨干企业多，煤等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各地都要研究和认识自己的优势，在发挥自己的优势上做文章。

过去说搞原材料工业不合算，是因为那时搞的是产品经济，现在发展商品经济，搞原材料工业就不会不合算了。有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就是大量发展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生产，也实现了现代化，它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向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的。山西雁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围绕着煤来展开的，乡镇企业很多都是挖煤，不挖煤的也大都和煤有关系，第二、三产业也靠煤，财政收入主要也是靠煤。这是雁北的特点。近年来，它就是利用这个优势，使当地经济发展得相当快。从前有人把燃料、原材料工业和重化工业叫“傻大黑粗”，认为凡是搞“傻大黑粗”的都吃亏。今后情况肯定是不同了，从发展看，这种“傻大黑粗”会越来越吃

香。山西的经济，沿着重视发展能源、重化工业这条路走下去，是大有前途的。

内地要想把自己的潜在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靠大家办企业。不仅轻纺工业可以靠大家办，能源和重化工业也可以靠大家办。这几年电上得快，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放开让大家办电，冲破了一家独办的局面，允许地方、企业集资办电。前几年国务院成立“压电办”，集资解决以煤代油的问题，办成了好多事，起了很大作用。这几年的公路交通，也是大家办。煤炭工业的发展，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得力于地方和群众办的小煤窑。小煤窑投资省，吨煤成本低，发展很快。过去说，小煤窑不安全，资源利用率低。在开始阶段，那是难免的，经过一段发展，积累了资金，现在山西小煤窑的技术装备已有很大改善，事故少了，伤亡率显著降低，对深层煤也能开采了。现在乡镇企业已经可以搞洗煤、炼焦，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小炼铁、小水泥、小化肥，还可以进一步办小电厂，搞电石、塑料，炼铝。这里的乡镇企业发展小型耗能产品是很合算的，竞争力强，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办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由土到洋、由小到大是符合规律的。开始可以因陋就简，从低处起步，随着生产的发展，增加积累，改进装备，逐步升级，几年之后局面就不同了。如果一开始就要求搞得很先进，就想搞到一百年也不落后的程度，那是不现实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到几十年以后，许多问题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但我们眼前最现实的问题是要尽快起步，尽快发展起来。只要能发展起来，以后的回旋余地就大了。

内地和沿海互相不要封锁。内地要注意利用沿海的窗口。大企业搞横向联合，建立企业集团，发展出口产品，省和中央有关部门都要给以支持，对他们放开些，允许他们选择最合适的龙头厂和口岸来出口自己的产品。内地的原材料，如果在沿海精加工之后再出口更合算，就可以到沿海去加工，不一定非得自己精加工。过去内地的原料和初加工产品，经香港再加工和包装之后，就大大升值。将来沿海地区可以起这个作用。当然，沿海也不可能完全代替香港的作用。还要允许人才合理流动。内地一些高级人才，特别是在当地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高级人才，或与沿海联合起来才更能发挥作用的高级人才，将向沿海流动；而沿海一些实用技术和相应的人才，包括能工巧匠和经营者，可能向内地流动。浙江人很有开拓和冒险精神，全国许多地方都有浙江人去做工和做买卖。人才在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双向流动，是个趋势，是符合客观需要的。

当前，内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内地与沿海的经济联系，受制于交通。从山西、陕西来看，有运力就有煤，主要的制约是交通。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地方和企业积极集资开发煤炭和其他资源，有利于国家腾出力量，集中更多的财力物力去办交通。

二、关于加快企业内部改革

现在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必须着手解决那些难度较大的问题，主要是物价、工资的改革。物价、工资改革之所以难度很大，讲来讲去，主要是个承受

能力问题。而承受能力的大小，关键在企业效益。财政困难的解决，涨价因素的消化，都要靠企业效益。如果企业不改革，社会对物价和工资改革就没有承受能力。当然，如果不进行物价、工资改革，新的体制建立不起来，企业的改革就没有好的环境和条件，也很难深入下去。归根结底，物价、工资改革，要靠企业效益的提高。

现在一些国营大企业在经济效益方面落后于中小企业、乡镇企业，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小企业、乡镇企业设备差、所用原材料价格贵、技术人员少、工资高、负担重，除了上交税收外，乡镇企业还要拿出一部分利润给乡政府以工补农；而国营大企业设备好、技术水平高，职工工资比较低，但经济效益却不如许多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原因主要是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内部机制好，真正实行自负盈亏、按劳付酬，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而一些国营大企业管理落后，内部机制不合理，仍然是“铁饭碗”、“大锅饭”。国营大企业在改革中不能老是像前几年那样要求国家让税让利，一定要解放思想，加快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

国营大企业的内部改革，已经有不少经验。看来，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起带头作用的还是承包制，关键又是要把承包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改变在确定承包条件过程中“一对一谈判”的局面，真正实行招标承包，使大企业从总厂到分厂、车间、班组都建立起竞争机制。少数特大型企业目前在总厂一级还不好实行招标承包，但其内部的分厂、车间可以搞。在竞争基础上的招标承包，是企业改革的突破口。这一条搞好了，企业内部的其他改革就将势如破竹，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就都有了条件。

竞争承包方面的许多经验，要很好地总结、推广，结合起来运用。如有的企业搞招标抵押承包、全员风险承包，其办法是从工厂到车间、班组，层层承包，每一层的承包者，以至广大职工都入股，股金也是风险押金，把承包制和股份制结合起来了。这种办法大大增强了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还有的企业运用承包制在一厂之内搞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形式，放手让各个单位在完成承包任务的条件下自行开发新产品、自找经营门路、自行创造更多的效益，非常灵活，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做法效果都很好。

必须创造一种环境，使能人能够脱颖而出，使多余的冗员能够减下来。为此，企业的人事劳动制度需要认真改革。现在许多大企业人浮于事，特别是二线职工太多。在劳动制度改革中，一些企业采取了这样一种很有效的做法：按工作量给每个单位定编定员，然后在竞争基础上招标任用每个单位的负责人，而后每个单位再按照公开的原则选用职工。企业的生产第一线也实行优化劳动组合。多余的人从岗位上退下来，有的从事第三产业，有的经过重新培训，用其所长，干更适合的工作。现在有些大企业抱怨“企业办社会”影响了他们的效益。大企业如果完全不办“社会”，把现在为职工服务的事情都推给地方政府，从企业本身来看也许能提高经济效益，但从整个社会效益来看是不合算的，目前也是行不通的。问题不在于企业办了一些为职工服务的事，而在于这样办，是不计盈亏、吃大锅

饭，还是承包、租赁，用商品经济的办法去办。企业为生产服务和为生活服务的部门，都应尽可能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的可以变成独立的企业，也实行招标承包，并与原来的大企业建立契约关系。有些因为劳动条件艰苦而没人乐意干的工作，可以提高工资，人们争着要干的工作，工资不要太高。要把工资作为调节劳动力分配的杠杆。在劳动制度改革中，必须重视退休职工的养老问题，方向是实行统筹，逐步完善这方面的社会保险制度。现在工人的奖金和浮动工资增多，固定工资占的比重减少，退休时如何计算退休金，需要研究一个合理的办法。有的企业把工人退休前三年内的工资、奖金总额加以平均，作为计算退休金的依据，这也是一种探索。总之这个问题必须妥善解决。

企业内部改革，特别是人事劳动制度的改革，看起来很难，但是，只要真正按照竞争承包的原则，认真去做，是可以取得很好的成效的。关键是要增加透明度，怎样改革，按什么条件承包、聘任，组合，要让广大职工都知道，并造成舆论；其次，要坚持机会均等，在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企业内部机制改革方面，国营大企业一定要重视并认真学习、借鉴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经验。大企业的有些经验，如组织跨省市的大型企业集团，利用开放条件，自己攻关加对外合作，开发高技术产品等，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不容易学；而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好机制和内部搞活的经验，大企业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移植。如果搞得好，国营大企业的经济效益应当而且可能比小企业和乡镇企业更高。西安黄河机器厂，产值一度只有三千万，以后通过内部改革，工作搞上去了，现在产值达到七个亿。同样一个厂，产值可以是三千万，也可以是七个亿，潜力就有这么大。应当看到，现在很多大企业的能量还远未充分释放出来。大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应当有领导地加深和加快。

企业内部改革，需要有一定的外部条件。国家经过这几年在宏观上的改革，包括许多政策的制定和企业法的颁布实行，应当说基本的外部条件已经有了。需要强调的是，地方和上级有关部门，一定要认真按企业法办事，对国营大企业真正放开，不要乱加干预。美国的哈默为了与我们合作开办平朔煤矿，他用每年十八万美元的高薪聘请了一位经理，然后就充分放权给他，哈默自己很少管。外资企业的有些管理方式，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有的地方对长期亏损的国营企业，充分放开，结果也很快实现了扭亏为盈。现在有个大问题，就是许多掌握行政权力的公司成了改革的阻力和企业的枷锁。他们名为“公司”，实际掌握着若干审批权和紧俏物资的分配权，以及其他特权，对企业进行控制。这种状况不改变不得了。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还必须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不仅要有高水平的经营管理才能，而且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职业道德。从长远看，必须造就这样一批人。

在改革过程中，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造和加强，绝不能削弱。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在有些企业里，厂长和党委书记的关系总是摆不好。强调党政分开以后，党委书记如果没有行政职务，对党外群众做工作也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原则上党委书记可以兼任副厂长，作政治副职。这样，他在党内是书

记，主持党委的工作，起监督保证作用；在行政上是副厂长，既便于对职工作思想工作，也便于厂长对企业实行全面领导。除特别大的企业外，原则上都可这样办。

三、关于军工企业发展的新路子

我们的大型军工企业设备好，技术力量强，优势很多。但当前处于和平环境，军费有限，解放军买不了多少武器，这就产生了军工企业何去何从的问题。近年来，军工企业在改革中前进，开始找到了一条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路子，即：军转民，内转外，攻关加合作。当然，这是简单的说法，具体来讲就是：充分发挥军工企业的设备、技术潜力，在完成军品生产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发和生产民用产品；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条件，发展对外合作和产品出口。不论是生产民品还是军品，起点都要尽可能高。军工企业搞民品，主要不是搞一般的低档的产品，而是要努力开发和研制我们原来需要进口的设备，提供先进装备，代替进口。西安军工企业研制和生产的纺织机械，就属于这一类。要开发高起点的军品和民品，就不能只是关起门来自己研究，而应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条件，与国外合作。这就是攻关加合作。军工企业搞对外合作，有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你买我的零件，我买你的零件”。我们的军工企业可以发挥劳动费用较低的优势，通过来料加工、来图加工，为外国公司生产零部件，换取外汇，实现外汇平衡，同时逐步掌握那些重要零部件的图纸和生产技术；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用赚来的外汇购买我们所需要的技术、设备和零部件。我们的飞机制造厂为美国波音公司搞来图加工，就是很好的例子。合作一段以后，这种型号的飞机的许多部件我们就都能生产了，再进口一些最关键的部件，就可以生产整机了。这样生产出来的飞机将是具有先进水平的关键性零部件，在条件不具备时不必勉强国产化，可以继续进口，搞“国际拼盘”，以提高整机的质量。开发先进产品，无非这样几种办法：一是自己攻关、研制；一是对进口设备进行测绘、仿制；一是与国外合作生产。实践证明，走“攻关加合作”的路子往往效果更好些。今后，大型军工企业生产的军品和民品，除了供给国内需要以外，都应努力进入国际市场。这条路子会越走越宽，军工企业最困难的时期看来已经过去。

四、关于榆林治沙和高陵养鸡的经验

榆林地区治沙很有成绩。这里原来的大片沙漠，现已变成良田、草地和森林。林木覆盖率大大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这确实很不简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两条：一是人进沙退，沙漠一年年减少；二是农民争着要承包沙地，大家都掌握了一套有效的治沙方法。这套方法是榆林的“专利”。榆林的同志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解，认为今后几年是治沙的好时机，这个看法有道理。现在虽然治每

亩流沙只补助一元钱，农民也愿意干，因为其他赚钱的门路还不多。再过几年，榆林的工业和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起来了，劳动力费用必然上升。应当预见到这个发展趋势，自觉地抓紧今后几年时间把尚未治好的流沙治好。有关部门要给以支持。

陕西高陵县群众养鸡的经验，值得推广。他们用笼子养鸡，科学饲养加一定的规模经营，每家养几百只、几千只，效益很好。开始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有利可图，别人就跟着学，于是出现许多专业户，形成一个个专业村。过去有许多其他的专业村也是这样形成的，都是完全出于农民的自愿，不用国家投资，生产发展很快。从现实情况看，解决城市里的鸡蛋和鸡肉的供应问题，主要还得靠农民养鸡，而且要靠离大城市远一些的县来养，那里劳动费用低。国家为支持农民养鸡，要办好几件事，主要是提供雏鸡、浓缩配合饲料、技术培训和防疫服务。现在市场对鸡和蛋的需求很大，这不是坏事。消费可以推动生产。没有西安等大中城市的消费需求，高陵的大规模养鸡也发展不起来。过去市场供应一紧张就凭票供应，就搞地区封锁，使需求推动生产的积极作用反馈不到生产上去。现在发展商品经济，机制不同了。今后产地要多考虑发展生产，并主动去占领市场。

五、关于加强团结，克服“内耗”

省里同志提出要克服“内耗”，这很重要。要为加强团结，克服“内耗”造舆论。搞“内耗”不符合时代潮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越搞“内耗”越落后，谁也占不了便宜。过去的一些政治运动，有不少后遗症，留下一些恩恩怨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应当说，大的是非已经解决了。中央的方针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团结起来向前看。要提倡一种好风气，看人看事要有个正确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这是看事的标准。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进行四化建设当中，一个人的实际表现如何，实际工作成绩如何，这应当是看人的标准。要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这方面来，使大家向前看，从恩恩怨怨中解放出来。省委要旗帜鲜明地坚持这种态度。

六、正确认识形势，宣传改革

我国进行改革，至今十个年头了。十年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世界都承认这一点。我们身在其中，有时反而不觉得怎么样，但只要把现在的情况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对比一下，改革所带来的变化就很明显了。看形势，要有分析，有对比，而且一定要坚持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凡是被实践证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对的，反之就是不对的，绝不能不看这一点，而用过时的教条主义的观念去衡量是非。改革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我们的经济实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并且继续蓬勃发展下去，各种社会问题

才更有条件解决，这也是明显的道理。因此应当说，改革是对的，是成功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小平同志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过去有些陈旧的教条主义的是非观念，不符合中国的情况，但至今还束缚着一些人的思想，成为改革的障碍，必须认真克服。回顾十年，要理直气壮地宣传改革的成就。如果对改革的成绩不充分肯定，而对某些阴暗面又过分加以渲染，那只能动摇人们对改革的信心，绝没有什么好处。

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也要加以分析。现在的情况是：经济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发展很快，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混乱和腐败现象。怎样认识形势的这种特点？实际上，这是新旧两种体制交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对混乱和腐败现象必须正视，必须努力去解决。但如果因为怕出现这些问题，就不敢通过改革来打破旧体制，那是因噎废食，是找不到出路的。我们一方面要认清暂时的混乱是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一种代价，不必惊慌失措；另一方面，我们要自觉地把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有领导地抓紧进行，尽量缩短新旧秩序交替的过程。

目前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必须解决物价、工资等难度很大的问题，必须闯过这一关。为此，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务必加快内部改革，提高经济效益，以增强社会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还要求研究制定一套可行的通盘的改革方案，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尽量减少风险；除此以外，还特别需要全党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同心同德，带领全国人民共渡难关。在此关键时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而不能削弱党的领导；要加强政府的权威，而不能削弱政府的权威；要加强纪律性，而不能削弱纪律性。只要我们按照十三大精神正确地去做，这些要求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从根本上说，这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

关于信访工作的批示*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报送的《今年上半年群众来信来访情况的汇报》所作的批示。

信访工作很重要，过去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今后应该做得更好，特别是在解决党政干部廉洁问题上，信访工作应该和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对吕东报送的中国工业协会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若干意见的批语。

进一步深入进行全民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改革，使之能真正自负盈亏，放开经营，是增加其活力的关键。此件印发财经领导小组同志并综合部门负责同志一阅。

在中央军委授予军队离休干部功勋荣誉章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

同志们：

在光辉的“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央军委举行隆重仪式，向军队离休干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这是我军建设的一件大事！我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军荣获功勋荣誉章的老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六十一年战斗历程，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无数的革命老同志，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为我们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现代化国防，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忘我工作。其中，许多同志还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对于全军所有老同志的英勇业绩，我们全党全军和各族人民，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将铭记在心，永世不忘。

今天接受功勋荣誉章的，是在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中久经考验并做出了贡献的老同志。你们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顾全大局，甘当人梯，积极扶持大批年轻干部成长，完成了老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项重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我们今天授予军队离休干部功勋荣誉章，就是对你们几十年革命历史和戎马生涯的表彰，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体现了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对你们的亲切关怀，表达了全军上下和全国各族人民对你们的敬仰之心和爱戴之情。

尊重老同志，就是尊重我党我军的历史。没有他们长期的浴血奋斗，就没有我们军队的今天，国家的今天，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今天。我们要继续关心和爱护军队离退休老同志，各级政府和军队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使他们安度晚年，健康长寿。要在全社会和人民群众中广泛进行国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使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了解我们党和军队英勇奋斗的历史，增强国防观念，形成尊老敬贤，崇尚英雄的良好社会风尚。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学习老一辈的好思想、好作风，进一步激发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国家和军队的改革和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志们！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继续稳步前进。随

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现在一些难度很大而又不能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国的改革到了关键时刻。我们必须抓住历史给予的有利条件，按照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加快和深化改革的方针，迎着风浪前进，坚决而又稳妥地把改革中面临的问题解决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努力奋斗。

军队的改革也和全国的改革一样，正在不断深化。不久前召开的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已经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草案正在进行审议。实施这些条例和规定，是我军干部工作的重大改革，对于加强新时期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上述条例、规定和军队其它各项改革措施的贯彻落实，我军建设必将呈现出新的面貌。

同志们！在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面前，中央军委希望全军离休老同志，进一步增强荣誉感和责任感，和全国人民一道，振奋精神，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坚定不移地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推向前进，为军队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争取更大的光荣！

会见瑞士苏黎世大学林德[1]教授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

* 这是赵紫阳与林德教授的谈话摘要。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欢迎您，很早想认识你。听说最近几年你到中国来过多次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今天想当面听一听你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建议。

林德：（以下简称林）感谢您邀请我到您这里来，我能到这里来感到很荣幸。您说的很对，我的确几次来过中国。我应该这样说，在几次访问中，我试图努力理解中国的经济。与此同时，我也做过一些设想，这都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不知总书记您是否知道，我曾经带了一批学生到中国考察旅行。在今年九月份我计划再带一批学生到中国考察旅行。另外，总书记先生，您可能更不知道了，在您访问波恩时，我曾作为观众见过您，当时人太多，您肯定没注意到还有我。

赵：我也到过瑞士，那时我是作为四川省的省委书记率代表团到瑞士访问的，当时可惜没有到苏黎世去。

林：那太遗憾了，苏黎世是瑞士最重要的城市，是在经济上最重要的城市。

赵：林德教授在七月二十二日同国家体改委贺光辉副主任、高尚全副主任座谈过一次，我看了座谈材料，你们谈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林德教授很了解我们的改革情况。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搞个什么样的模式，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我们不准备在所有制的问题上进行什么根本的改变。在中国有庞大的国有经济、国营企业，这种状况我们不准备做根本的改变。当然将来可能在国营企业里有一部分另外的股份。但总的来说，国营企业的所有制不准备做更大的改变。我们要实行多种所有制的形式，个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都允许存在和发展。但国有经济，特别是在工业这个领域里，公有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种情况我们不准备改变，这是一方面。但是，我们这样集中的管理体制必须根本改变，要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句概括性的话，就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基本目标是，不管是国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或者公私合营企业，都将最终把它们推到竞争市场中去。这就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我们的设想和改革的目标，在现在的世界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现成的经验可用来借鉴或供我们移植。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大部分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而实行公有制的国家，包括苏联、东欧和我们的过

去，都不依靠市场调节经济。又是公有制、又要用市场调节，把二者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也是我们改革的难点。很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我们没有经验，国际上也没有现成的经验。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不得不一边实践，一边总结。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在改革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修正错误”。这样来逐步健全、逐步推进我们的经济改革。

十年来，我们对国营企业进行了很多改革，扩大他们的自主权，国家减少对国营企业的税收，在分配制度上注意了用物质鼓励和物质刺激的原则，这几年我们也搞了承包制。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有关部门可能都向教授介绍了。但是，我现在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国营企业改革直到今天，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这就是企业的权利和风险的关系问题。我们扩大了企业的权利，并没有建立起使企业能够承担风险的机制，如何使企业在扩大权利的同时，能够把风险也承担起来，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搞。几年来企业所谓自负盈亏，实际上只负盈不负亏，如何能够使企业真正自负盈亏，如何能使企业把利益和风险同时都承担起来，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并没有解决，还没有拿出很好的办法来。结果，在企业扩大权利以后，微观组织的行为并不合理。常常是企业扩大自主权以后，盈利的企业扩大了自己的利益，这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对亏损的企业国家还是要承担起来，还要给予保险。国营企业有保险的机制，没有风险的机制。我想告诉林德教授，我们国家有一种乡镇企业，由乡政府办，是乡一级的公有制企业，由于乡的财政力量很小，再加上这类企业从来都是在国家计划之外，所以这种企业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市场竞争、自负盈亏、承担风险的基础上。因此，他们特别具有活力，经济效益也比较好，劳动生产率几乎普遍高于国营企业，我们很想把乡镇企业的这种办法用来改造国营企业。当然小企业与大企业不同，多年形成的观念也不同，目前有一定的困难，但这条路我们可能是要走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听一听林德教授的意见，如何使国营企业能够承担风险，在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真正做到能够自负盈亏。

林：首先我对您讲的第一部分做个小的说明，我对中国的改革是能够很好理解的，我赞成中国改革的基本路线，我认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最根本的是应该提高经济效益和资源的利用率，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在经济发展以后才能提高，在经济体制当中有它自己特有的规律，通过这些规律来达到一定目标。关于经济政策，有个名词叫做“秩序经济学”，这个词实际上是联邦德国40年代末期产生的，在40年代末期联邦德国进行了一场经济改革。关于中国在保存公有制或叫国有制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经济改革，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都表明，提高经济效益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市场竞争。当然市场有多种形式，这里“秩序经济学”这个名词就可以起作用了，就是说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应该以是加强还是削弱市场竞争这一点作为判断对或错的依据。加强了市场竞争，实际上就增加了经济效能，反之就降低了经济效能。在这方面的确没有一个国家类似现在中国走的道路。但是我认为存在一个类似的逻辑。在世界上通货膨胀的现象都是一样的，当然通货膨胀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此我认为中国将来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不要走成一条不能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当然，这里所有制的形式是起着重要作用的，我当然理解中国从根本上不愿意放弃国营经济，但同时我愿意强调，所有制形式对提高经济效益是起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中国是不愿意放弃现存的国营经济的，但可以看出中国愿意使国营企业有更多的支配权。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使企业有真正的决定权。比如讲，一个企业真正有权决定它如何进行生产，就让这个企业的人有权支配企业，如果不给企业支配权，企业任何决定也做不了。因此我设想，将来的情况是一方面这些工厂、企业都是国营企业，属于国家的，但另外一方面这些厂子、企业有对工厂和企业的支配权。这也是你们本身制度所决定的一个逻辑。我愿意提醒您，应该走这样一条道路，在所有制形式不改变的情况下，我们不谈意识形态，仅就作用上来说国有企业同私人企业应该是一样的。这就是说，当企业有支配权以后它的作用同私营的也就一样了，所有制形式也不会改变。我所设想的这种经济体制，跟私有体制是不同的，表现在财产最后属于谁不一样，尽管他们的财产都是从市场上得到的，但最后的所有权不一样。比如讲，我在瑞士买一条船，我本人即是船主，又可以使用这条船；在中国，将来可以设想，一个企业买了一条船，这条船所有权是国家的，使用权却是企业的，但最后国家还有权重新分配这条船。

请允许我对风险问题再谈几句，我在中国参观了不少企业，其中有不少是国营企业，我感到中国给企业的权力太少，国家对企业的指导太多。中国的权力下放主要是在政治领域里进行的，也就是把中央的权力下放给省里，省里的下放给地方，但最后权力却没有真正下放给企业。省政府和地方政府把上面下放来的权力又集中起来，并没有到达企业。因此企业很难自主做出决定，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企业经营不好，责任由谁来负，是由企业本身来负，还是由省里或地方做决定的人来负呢？（紫阳同志：谁也不负责任。）因此，责任制变成了非责任制，并使企业产生这样一种态度，一旦企业经营不好，就会把责任推给省或地方政府，企业会说这是你们的事。在市场经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条，就是企业既有自主权、又有责任。应当把权力坚决放到企业中去，应该给企业这样一种机会，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努力去工作，如果经营好就该盈利，如果经营不好就该亏损，如果企业工作实在太坏，这个企业就应该从市场中消失。我认为企业这些性质都应在市场竞争的机制中体现出来，市场机制本身是对企业的一种监督，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企业前进。在风险这个问题上，应该使每个企业都有这样的观念，它必须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才能生存发展，或者消失。我发现中国有这样的问题：权力下放到省或地方后，在省和地方停止下来，每个省或地方都会给自己搞个保护主义，保护自己的企业，这对市场竞争有害。中国应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正如欧洲要形成一个大的市场一样，这样才有经济活力。在这种机制下，那些生产好的企业才能盈利，那些生产不好的企业就会亏损乃至倒闭。企业的决策权和承担决策失误造成的风险，两者应为一体，否则企业不会做出好的决定来。不承担风险的企业做不出好的决定来，统制型经济中的企业是不用承担什么风险的。当然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错误，一个企业也可能做出错误的决

定，如投资方向的错误。所以还要给企业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权力，在他们从市场上消失之前，给他们创造一个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机会，但不应让企业有什么问题都找国家解决。应该让企业把盈利中的一部分留成或投资，保存起来，作用是用来改正错误或重新在市场上立足。中国不要害怕有些企业会在市场上消失，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并不一定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也不要担心那些产品不受欢迎的生产企业倒闭，这当然会出现工人失业的社会问题，这就要国家和企业共同兴办社会保障事业，使破产企业承包的人员各得其所。我认为企业工人不应成为企业错误经营者的牺牲品。

我的话总结起来就是，首先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把企业推向竞争市场，即把企业扔到冷水中去，让他们在市场上立足；企业有自主权，也应该承担风险；企业实在不行了，就应该让它从市场上消失；如果企业破产了，对在该企业从业的人员应当给予社会保障。

赵：听了你的意见，很受启发。我们在认识上、理论上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国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这种观点，引经据典是马克思曾经阐述过的观点。最近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企业法，有明确的规定，企业对国家赋予的资产有使用权、经营权、支配权、处理权。现在确有像你说的那样，中央把权下放了，部门没有下放。地方政府没有下放。我们的企业法是今年四月初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贯彻企业法还有很多不太清楚的问题。现在确有这样的情况，在部门和地方政府把权全部交给企业后，对企业能否承担风险有顾虑。比如说，有一些国营企业由于经营和决策失误造成了损失，还是要由国有财产来补偿，不可能利用另外的财产来补偿，国有财产不像私有财产那样有股东或董事会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也是目前部门和地方政府所以不大愿意把权力完全放给企业的一种理由。这可能是借口，但是也可能确有这方面的问题。

林：这就是所有制问题了。请允许我向您提个问题，关于权力下放问题，仅仅从职能上来看，我觉得这跟私营企业没有什么区别，正如曾在许多国家所发生过的现象一样，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变国营企业的性质。我去过上海，觉得有点悲伤，我看到上海老区的房子非常破旧，我问上海市政府的官员，为什么不采取点措施呢？他们说：上海市政府没钱。实际上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能解决，就是把这些房子全部卖给个人，因为每一个房子的主人都愿意使自己的房子处在最好的状态，这些房主会节省开支，把积累下来的钱投到修房子上来。这样实际上上海市政府也就有钱了。这个例子说明只有所有制改变才能发展。

赵：我们准备推行住房私有化。盈利比较多的企业，我们也准备增加一些私有成份，将来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制，就是说除了有国家的股份外，还允许有本企业职工的股份、其他企业的股份，也可以有私人和外国的股份。但是我脑子里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公有制企业就一定不能办好呢？比如说，瑞士工会系统是不是有一笔很大的财产？我知道联邦德国工会系统有一笔很大的财产，它这个财产应当说是公有财产，也是聘请经理来经营，不知道它的经营怎么样，我听说有些企业经营得还不错，关键是能不能聘请到比较好的经理。

林：企业的好坏，很大程度是取决于经理，一个国家的好坏取决于他的政府。

赵：瑞士工会是不是也有财产？

林：瑞士工会有财产，但属于非集中化性质，我们的工会组织跟联邦德国不一样，联邦德国的工会组织都是统一管理的，瑞士的工会都不是集中管理的工会。

赵：请问林教授，据你了解，联邦德国的工会企业经营得怎么样？

林：工会企业工作办法同其他产业所有者的工作办法是一样的，如果他们的企业想到市场上去的话，他们必须按着市场机制去进行工作。联邦德国工会的财产不像您所说的意义上的公有财产，准确地讲，其工会的财产是工会成员的集体财产，工会的财产是在一旦发生罢工的情况下用作救济的资金，换句话说，就是斗争基金。但瑞士同联邦德国不一样，我们瑞士的政治体制不是建立在社会各阶层成员相互斗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社会各阶层成员利益平衡基础上。因此，在瑞士实际上是没有罢工的。在市场竞争的机制下，一个工厂干得好与不好，监督者首先是市场本身；第二个是工会，工会代表劳方；第三是工厂给劳方规定某些权利。

赵：今天听了林德教授的话以后，我有这样的感觉，可以使企业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具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同时也自己承担风险。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到前者，首先要解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使企业有条件参与市场竞争，有了这样的条件，承担风险的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我们原来考虑，是想把两者平行地提出来，互为条件，这就并列起来了。听了教授的话以后，似乎首先应当解决第一个问题。

林：改革的逻辑是由制度本身延伸出来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应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因此，给企业自主权时，产品价格应由市场本身来确定，这样才能反映出产品在市场上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同时，还要进行价格改革，不搞价格改革，尽管搞了其他改革，工厂还是不会有多大的动力。但是价格改革要十分小心和谨慎，不能搞得太快。如果物价指数升得太快，改革的气氛、大的环境会受到破坏，改革本身一定要坚决，但步子又要稳当。中国的先生们告诉我，说在五年内把价格调整好，我认为五年是个很好的时间。价格改革太慢也不行，太慢就像走进了沙子里。匈牙利是一九六八年开始搞价格改革的，搞了二十年还没搞完，这是不好的例子。价格改革不到底，真正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起来。另外，在投入和产出各个方面都要给企业自主权，给了自主权以后，一定要有一个竞争的市场机制，否则企业会滥用自主权。我在体改委同他们讨论了如何进行市场竞争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否则市场竞争机制就会受到各个封闭市场的损害。

赵：我想同林德教授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统一市场问题，要发展商品经济，毫无异议必须发展市场，发展全国性的自由贸易，但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增加了建立统一市场的难度。

林：您的说法是正确的，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瑞士山区发展水平比其它地区就低，在意大利有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欧洲共同市场当中，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这三个国家是经济比较弱的国家，而其他国家的经济比较强，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的想法可能不一样，如果中国建立一个统一市场的话，经济发展可能更快，因为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太高的地区来讲，统一市场对他们有好处。在市场经济中有一个词，叫做“结构政策”或叫“结构政治”，这就是说中央和地方政府有一个结构性的任务，都要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这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我认为对那些经济发展弱的地区，应该通过建立基础设施对他们进行帮助，使这些经济发展弱的地区能够参与经济发展的过程。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使经济发展弱的地区同经济发展强的地区一下子拉平。但我们可通过多建立基础设施的办法来帮助他们，不应该制造人为的边界，商品的边界，也不允许搞一些人为的保护主义措施，否则就会影响经济效益的发挥。一个国家不应该把钱补贴在下列三个方面，第一补给企业，第二补给物价，第三补给那些应当消失的企业。应该把这些补贴转到补给基础设施，特别是补给经济发展比较弱的地区建立基础设施。在这方面也要建立一个改革的战略，应减少物价的补贴，也应该向企业讲清楚，企业自主权扩大了，盈亏是自己的事，国家要把钱拿出来用到真正落后地区需要建设的基础设施上去。

赵：今天同林德教授讨论的问题很有意思，总的说来，我赞成你的见解。从你所提的一些看法可以证明你对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了解得相当深入。今天讨论了企业问题、市场问题，还有个重要的金融问题，今天来不及讨论了，货币问题也没说，但你讲过的意见我已经看过了。我们今后几年内要下更大决心搞价格改革，价格改革不是孤立的，价格改革能否成功，不仅决定于价格改革本身的方案是否妥当。而且决定企业的效益、企业机制的改革以及决定于市场条件的形成，用你的话来说，就是统一市场条件的形成。还要有一个正确的货币政策。没有这三条，价格改革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我们非常重视您的建议，希望您今后以更大的兴趣继续研究中国的改革。

林：感谢您跟我的谈话，这些谈话非常有意义，我对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激动。作为教授迄今为止，我更多的是站在课堂上，站在讲台旁，但在中国我看到了实际，所以我对中国的兴趣非常之大。当然看中国的问题不能只戴经济眼镜，中国还有其他的问题，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讲，经济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感谢您的接见，谢谢！再见！

注 释

1．林德（wilhelm Linder），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著名的“秩序经济”学家。

认真整顿流通秩序　坚决控制物价上涨*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物价和工资改革方案时的讲话。

物价、工资改革，依林同志让我讲一讲。

一、物价改革的方向不变，在步骤上应重新考虑。全国发生提款抢购风，货币发行量超过北戴河政治局会议’的预计，至少多发了一百亿元票子。再加上今年农业歉收已成定局。这对明年物价改革增加了难度’。在物价改革方向不变、五年改革方案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在步骤上应当重新加以考虑。作为五年实行价格改革的第一年，步子要小一点，以避免大的风险。钢材价格放开不搞。

二、明年改革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和建立经济秩序上。同时，深化和展开进一步物价改革所必需的各项配套改革。

三、明年必须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把物价上涨幅度控制住，使之大大低于今年。这对提高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缓解一下紧张心理，为改革创造条件，极为重要。这既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必须千方百计达到。有些同志信心不足，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中央工作会议时先确定物价指数只能多少，然后再考虑措施，必须下此决心。关键是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这是对党的能力如何，政府能力如何的严重考验。我们要经得起这次考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政府还是有能力的。

四、下更大决心，采取更坚决态度压缩基本建设。这是治理经济环境最重要，最容易见效，又影响比较小的措施。在控制基本建设这个问题上，手段还比较有效。中央、国务院下决心，制定措施，地方、部门要大力配合。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说起来难，做起来也不一定难。关键是部门、地方牺牲一下自己的利益。关键是两条：中央、国务院有没有下决心，有没有得力措施；地方、部门支持不支持中央、国务院。

五、认真整顿流通领域的秩序，制止各种混乱现象。这是最得人心，对整个社会、整个经济有大利而无小害的事情。流通领域中问题很大，大量的钱为中间环节拿走，生产者没得到利益，消费者付出了大钱，这是减少财政收入、增加成本、增加计划外基建的重要根源。根本消除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要靠市场发展，改变“双轨制”，这需要时间。目前应强化经济、行政、法律手段，清理行政公司，制止层层加码、层层抽头、倒来倒去。官办公司、民间团体办公司、协会

办公司，垄断性的多头多环节而又是垄断的经营。计划高度集中放松了，这是对的，但出现了垄断性的多头多环节的抽头。不能等到市场发育，那会愈演愈烈，市场根本不能形成。流通领域要严格管理。

几个重要产品，要一个一个地把流通领域理出来，一个一个地加以规定，直接订货，一竿子到底，不许中间插手。

六、控制消费基金增长。恐怕大体上只能进一步完善企业消费基金增长与效益挂钩，经济效益不好的，要解决攀比问题，严格控制集团购买力。

七、明年工业增长速度适度降低。大体控制在百分之十或者更低一些。出口增长也要适当降低。

八、抓紧提高经济效益的各项工作。深化企业机制改革，劳动工资制度改革。促进企业集团的建立，推行兼并。十一月破产法生效，明年必须认真搞。

九、采取措施回笼群众手里的票子。四季度开始认真搞住房商品化、私有化，以及发行股票、债券等问题。紧俏耐用消费品预售要同储蓄挂钩。

十、市场供应必须进一步搞好。粮食库存是好的，可以经受一年歉收。去年净进口一千万吨粮食基本未动。目前在国际上大量购进粮食不利。可以进口一些粮食，要大量压缩国内库存。问题是可能调不动。不是指地方库存，是指中央库存。要把库存情况通知省委书记，哪里拒绝调动，就撤省委书记的职。轻工市场生产也要搞好。

以上这些能否实现，都不是客观有无可能的问题。关键是主观上能否做到，能否充分实现这些可能性。关键是发挥政治优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严格纪律，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的核心作用。在这样关键时期，更需要全党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更需要维护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既然十三大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七届人大选举了中央政府，就必须使他们有威信。不能讲原来那个人干什么，我可以不听你的。就个人来讲，现在每个人都比不上老一辈革命家，但他们是一个集体，政治局权力一点没减少。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党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的领导。党的纪律，国家的法律，都要严格执行，令行禁止。要重申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以上这些，都是全面改革攻坚阶段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很多都是深化改革的问题，有些是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的问题，也是为今后物价改革创造条件的问题，对于实行五年价格改革方案来说，也是有重要作用的。

注 释

1． 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七日

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这一方案是在充分酝酿和认真准备的基础上制定的。中央政治局第九次全体会议决定要制定价格、工资改革的系统方案。从六月二日起，中央责成专门机构组织有关部门反复研究今后五年特别是明年的价格、工资改革配套措施问题。经过几上几下的论证，有关机构提出了初步方案。七月十一日，赵紫阳同志主持专门会议对初步方案进行了讨论。根据讨论意见，有关机构又进行了测算、修改。八月五日至九日李鹏同志主持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对初步方案进行了讨论。

这次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的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价格、工资改革的必要性；改革需要遵循的主要原则；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三年改革的轮廓设想；一九八九年改革的初步方案；改革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风险和基本对策；必须采取的配套改革措施。

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现实的可能，今后五年左右的时间，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即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同时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工资分配中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

会议强调指出，价格、工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价格、工资改革的成功要依靠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最重要的是要转换企业机制，加强市场的组织与建设，改进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从而显著提高经济效益和整个经济运行效率。为了保证价格、工资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同时搞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继续做好政企分开和精简机构的工作。总之，价格、工资改革实际上是改革的全面深化。搞好这一改革，对于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会议除了审议方案本身的有关问题外，还集中讨论了方案出台后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必须相应采取的对策、措施。会议强调指出，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时期。进行价格、工资改革时机是有利的，尽管面临的问题不少，但克服困难的潜力和回旋余地很大。只要我们把这些潜力充分挖掘出来，就一定能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明年的改革至关重要，迈好这一步将为后几年的改革创造条件。会议认为，明年要围绕价格、工资改革认真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加快企业内部改革，切实提高工业企业的效益。企业要完善承包责任制，逐步放开经营，自负盈亏，行政部门不得滥加干预。这是改革得失成败的关键所在。

——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特别是要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减少对钢材等生产资料的需求，为改革创造一个较大的回旋余地。

——厉行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狠刹奢侈、浪费之风，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

——认真清理和整顿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惩处贪污受贿和非法牟取暴利的行为，反对垄断、封锁、地区分割和囤积居奇，积极治理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

——改造和加强思想工作，广泛开展协商对话，使广大群众更加理解和支持改革。

会议号召，党的各级组织要更加生气勃勃地工作。当重大措施出台的时候，一定要统一行动，令行禁止。全体共产党员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大力发扬我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明年改革和整个改革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会议决定，九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届三中全会，讨论和审议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在此之前，还要在党内外人士和有关专家中就这一方案广泛征求意见。

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五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人。中央政治局委员二人因公缺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同志主持了会议。有关方面负责人列席了会议。（新华社发）

2． 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向中央政治局的汇报提纲，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
国务院物价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第十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我们根据会议讨论精神和当前经济形势，对方案作了进一步修改，现汇报如下：

一、价格、工资改革的重要性和指导方针

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攻坚阶段，难度很大而又绕不过去的价格、工资改革是这个阶段的关键任务。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如果现在再不着手从根本上解决价格问题，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入，经济的发展也会遇到严重障碍。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较多，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群众的严重不安，但在理顺价格关系方面又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如果不主动抓紧改革，听任这种状态发展下去，价格改革就会越来越困难，最终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在价格改革的同时，工资也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随着物价总水平的提高，必须给职工群众以适当补偿。当前分配领域中仍然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和某些分配不公现象，已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束缚着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性的发挥，也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从总体上看，今后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价格、工资改革为主线的深层次改革。只有取得这方面改革的成功，才能顺利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为下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

搞好价格、工资改革，需要遵循以下指导方针：

——坚持边改革边治理经济环境。治理经济环境的关键问题是，坚决把目前已经连续几年存在的过大需求压下来，坚决把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势头遏制住，逐步实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如果不下决心治理环境，在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情势下，硬性推进价格改革，就必然会造成各类商品价格轮番上涨，工资和价格竞相推进，导致在更高物价水平上的不合理比价复归，不仅不能达到改革的目的，而且会带来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因此，在改革进程中，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坚决控制建设总规模，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信贷结构和消费结构。必须努力增加有效供给，并采取多种办法，吸收、转移和推迟结余的社会购买力。今后五年内，必须确保每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升幅度10%左右，货币供应增发率不超过经济增长率和结构性物价上涨幅度之和。

——坚持边改革边整顿、建立经济秩序。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条件下，各方面的生机和活力日益激发出来，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跟随不上，许多方面存在着种种摩擦和漏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混乱现象。为了保证价格、工资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当前整顿和建立秩序的重点是：整顿流通环节，清理各种公司，坚决取缔和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中间盘剥等行为；严禁经济上的垄断、割据，反对封锁和分割市场，制止层层抽头、乱收费、乱摊派等错误作法；端正企业行为，坚决纠正乱摊成本、偷税漏税、截留收入，以及弄虚作假，制造和出售伪劣商品，坑骗国家和群众等违法乱纪现象。解决这些问题，绝不能手软，不能一阵风，必须持之以恒，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和法治。这样做，不但不会妨碍而且会有力地促进改革、开放、搞活。

——坚持把推进改革同执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稳定经济、深化改革，并使二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这是必须继续贯彻执行的重要方针。在价格、工资改革过程中，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否则许多矛盾都不好解决。但是，我们的发展速度必须以提高效益为前提，绝不能靠过多地占用银行贷款和过多地消耗能源、原材料，追求脱离实际可能的过高速度。目前，我国经济形势总的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着经济过热、速度过快的现象。速度过高，经济生活绷得太紧，既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行。必须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坚持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在速度问题上，不要排位次，不要助长攀比之风，不要把产值增长速度的高低作为评价工作好坏的标准。

——坚持综合配套改革。价格、工资改革涉及经济体制的全局，不可能也不应当孤军深入，必须同时搞好各方面的配套改革，并相应采取正确的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和收入分配政策。要加强市场的组织和建设，培育和健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要改进宏观调控机制，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切实提高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最根本的，是要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机制，逐步把企业推向市场，放开经营，真正做到自负盈亏，切实提高经济效益。这是增强企业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承受消化能力，克服国家财政困难的基础。

——坚持积极稳妥的改革步骤和方法。价格、工资改革是一项势在必行而又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既要坚决推进改革，又要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精心筹划，稳步前进。经济生活中许多因素复杂多变，事先很难看得清楚。因此，对改革的方向要坚定不移，步骤要积极稳妥，具体方法要走一步看一步，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出必要的正确的调整。

以上这些指导方针，在全面改革攻坚阶段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认真加以贯彻执行。明后两年更要着重注意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既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为了保证这些指导方针的贯彻执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在改革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上，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做到令行禁止，绝不能各行其是，自由行动。全党上下要同心协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争取全面深化改革的胜利。

二、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三年价格、工资改革的轮廓设想

（一）关于价格改革

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有些商品价格逐步接近国际市场价格，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完成这个任务，需要较长的时间。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现实的可能，今后五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价格改革的目标，只能是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即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具体说，有以下四个方面：

1、逐步放开原材料和加工产品的价格，基本上取消双轨制，在价格形成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放开价格的商品包括：黑色和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绝大部分化工原料，以及机械电子产品。放开的步骤和方法，要根据商品的重要性和供求状况区别对待，有的进一步放开，有的先调后放，少数特别紧缺的重要品种，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实行指定供货，保量不保价，有的要实行专营。在价格放开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国家对市场价格新的调控机制和管理办法。

2、通过有计划地调价，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交通、通信、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的价格和收费，以促进这些基础产业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增强后劲。

3、有步骤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并使农产品内部比价逐步趋于合理。

4、消费品价格逐步实行市场调节，并在价格总水平上涨过程中，使内部比价同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大体协调。除城市口粮等个别品种外，基本上解决购销倒挂的问题，减少国家的财政补贴。

结合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改革，大力整顿流通环节，扭转流通领域与生产领域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局面。

实现上述改革目标，双轨制价格的混乱现象可以得到基本上解决；工农业之间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产品比价关系将朝着合理方向前进一大步；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商品总额，在社会商品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将由现在的50%左右提高到70%至80%左右。

进行以上改革，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大约上升70%左右，其中城市上升80%左右，农村上升60%左右；职工生活费上升90%左右。

关于价格改革的实施步骤，总的想法是，通盘计划，分步推进。前三、四年把主要措施推出台，后二、三年进行巩固完善。

（二）关于工资改革

五年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工资和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着生产的发展有所改善；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适当解决工资分配中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特别是脑体收入倒挂问题；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取缔非法牟取暴利行为，解决分配不公的矛盾；健全工资基金的宏观调控机制。

具体要求是：

1、对职工继续实行若干生活必需品涨价后给予适当补贴的制度，对离退休人员也建立相应的补贴制度，并健全对低收入职工的生活补助制度。

2、全面推行和进一步完善企业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使职工工资增长主要依靠本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企业工资与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脱钩。在企业内部积极推行计件工资制和定额工资制。

3、逐步建立与国家公务员制度相适应的行政机关工资制度，建立符合各自特点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系统的工资制度，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正常升级、增加工资的制度。通过多增加一些脑力劳动者工资，以及放宽政策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增加收入等办法，逐步改变脑体收入倒挂的现象。

4、逐步建立工资和个人的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加强银行、税务、审计、物价、统计等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能，合理控制工资总额增长，建立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对高收入者严格征收收入调节税。

5、统盘考虑职工养老、待业、医疗等项保险，建立由国家、企业、个人合理负担的社会保险制度，并实行社会化管理。同时，减少各种津贴、补贴在职工个人收入中的比重，改善职工个人收入的结构，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

实行以上改革，五年内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将增长一倍左右，扣除生活费指数上升因素，平均实际工资每年增长1%到2%。脑力劳动者平均工资水平，将由现在低于一般体力劳动者平均工资的状况，转为高于一般体力劳动者。

上述价格、工资改革的轮廓设想还很粗略，无论是放调价格的范围、幅度和实施步骤，还是工资改革的目标和要求，都需要进一步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测算，并在实践中根据条件和情况的变化加以补充和修正。

三、一九八九年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明年是价格、工资改革新起步的一年，这一步迈得好不好，至关重要。安排明年改革方案考虑的基本原则是：在着重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的条件下，适当出台一些改革措施，确保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同时为后几年的改革创造条件。改革的具体设想和初步综合平衡的情况如下：

（一）价格改革的方案

明年的改革，主要是：适当调整农产品价格，提高客运价格并调整其他少数函需调整的不合理价格。

1、调整农产品价格。

粮食合同定购和公粮合计一千亿斤不变。对城镇居民定量供应的粮食、食油价格一律不动。

合同定购的粮食，稻谷每五十公斤提价不超过五元三角，小麦每五十公斤提价不超过一元五角，玉米每五十公斤提价不超过一元。在这个限度内，按提价款由中央和地方依据现行办法分担，以及调出省外部分相应提高调拨价的原则，由各地具体安排。预计合同定购粮食提价总金额约三十六亿元。

粮食议转平的收购任务取消，改为随行就市收购。中央财政补贴的每斤六分四厘仍留给地方。地方必须收购的粮食，价差由地方财政补贴，谁用粮谁出钱。以上国家合同定购和议价收购的粮价总水平每五十公斤提高四元三角六分，提高幅度为18.7%。

是否取消化肥、柴油、预购定金三挂钩，将价差款转为粮食收购的价外补贴，由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在不影响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生猪价格上涨的条件下，自行决策。

逐年压缩城镇口粮以外的行业平价粮食的销售。争取在两三年内，将行业用粮价格全部放开。放开的原则是：先农村，后城市；先中小城市，后大城市；先压与群众生活没有直接影响的行业，后压其它部分。农村水库移民、救灾用粮、直接影响市场零售物价的用粮，为了保持市场稳定，明年先不动，或采取补差价的办法。行业用粮价格放开价格后，原来议转平的差价仍留给各地，主要用以解决影响职工生活的暗补改明补，以及充实粮食丰歉的调节基金，不得移作他用。明年全国压销大体按一百亿斤左右安排，具体实施方案另定。

合同定购的油料中，花生、油菜籽适当提价，提价金额五亿七千万元。加上议价油料价格上涨，油料提价总金额约十五亿元。

棉花收购价格不动，明年看一年。国家定价的其它经济作物，价格也不提高。

2、提高陆、水、空运的客票价格。铁路客票提高一倍，人公里从二分提到四分；行李、包裹运价和站台票价格适当提高。民航客票价提高77%。公路客票价提高20%，水运客票价提高80%。货运价格基本不动，只对矛盾特别突出的价格进行局部调整。客货运提价金额合计九十六亿元。

3、调整少数急待调整的不合理价格，合计提价六十一亿三千万元。其中包括：每斤食盐零售价提高八分，盐及盐化工产品提价三十五亿元；报纸提价十八亿元；尿素每吨从四百一十元提到五百元，提价金额八亿三千万元。

4、二十八种进口补贴商品除粮食、化肥、洗衣粉原料、木浆外，改为代理价，并考虑到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因素，预计将推动市场物价上涨0.5%。按照以上设想，明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上升10%左右，其中城市12%左右，农村8%左右；职工生活费指数上升13%。

（二）提价利益的分配

1、交通运输和生产资料的提价收入，基本上拿到国家手中，以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负担。

2、银行调整利率净增加的利息收入，全部上交财政。

3、已确定的财政包干体制不变；价格、工资改革中的开支，按现行体制由中央和地方分级负担。中央对地方财政既不挤也不让，个别突出不合理的问题个别解决。各地应努力通过增收节支解决自己的财政问题。

（三）职工工资的安排

考虑到明年价格改革中，有些措施对职工的实际生活影响较小，例如提高客票、报纸价格等主要影响集团消费，因此，明年职工平均工资按增长10.4%考虑。机关事业单位明年出台的工资改革措施有：

——调整工资标准。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普遍调升一级工资，去掉现行工资标准各职务的最低档，并适当延伸等级，增加高档。这样，大约人均每月增加工资八元，全国年约增加工资二十六亿元。

——适当解决工资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主要是：提高教授、讲师、助教（含科学、卫生等系统相当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水平，提高大中专毕业生的定级工资水平，提高教育龄、护龄津贴标准，以及解决其它一些突出问题。这些，全国需三十一亿三千万元。

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明年主要通过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工资。初步测算，由于企业经济效益提高，职工每人每月可增加工资七元五角或者至九元，全国共计六十五亿元。这部分资金原则上由企业自主安排使用，可以允许企业从中拿出一部分用于调整工资标准。

从明年一月起，对全国离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离退休费八元。

（四）调价对农民收入和支出的影响

初步测算，由于提高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它农产品涨价，明年农民将增加收入约二百八十八亿元。由于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调价，农民需要增加支出一百四十七亿元。农民增加的收入超过增加的支出一百四十一亿元。随着明年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将进一步增加。

（五）财政收支平衡情况

1、初步预算，由于提高客运和生产资料价格，财政减收三十九亿元；由于提高农产品价格，财政增支五十九亿元。两项合计财政减收增支九十八亿元。

2、由于增加工资和补贴，财政增支减收一百四十四亿元。

3、由于调整利率和开展保值储蓄，财政减收三十一亿元。以上三项，将扩大财政收支差额二百七十三亿元。

4、据财政部初步测算，明年农业生产增长4%，工业生产增长10%，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国内财政收入可能达到二千五百九十亿元。各项支出从紧安排，总支出为二千七百五十亿元。差额为一百六十亿元。加上调价和增加工资后发生的收支差额，明年财政支大于收四百三十三亿元。

现在想到的增收节支措施是：

——对彩电、冰箱、小轿车征收特别调节税，增加收入五十亿元；国家专营一部分彩电，增加收入二十八亿元（所需六亿美元外汇尚待落实）。

——整顿和强化税收征管工作，包括加强农林特产税和乡镇企业税的征管，增加收入二十三亿元。农林特产税和乡镇企业税的收入留给地方，作为提高粮价和支援粮食生产的资金来源。

——借新债还旧债四十五亿元。

——向国外发行政府债券或借低息贷款八亿美元，用以偿还到期的外债本息三十二亿元。

——建立养老保险信托基金，发行特种长期债券十五亿元。

——压缩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十亿元。

——动用112专项基金二十亿元。

——提高建筑税、烟酒涨价收入、工商企业扭亏，以及出售公房、土地、股票收入等措施六十七亿元。

采取这些措施后，财政可增收减支二百九十九亿元，还有差额一百四十三亿元，需要进一

步研究解决。

四、必须采取的若干重要经济措施

中央政治局第十次会议在讨论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过程中，除了要求对方案本身继续作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之外，特别强调要进一步研究稳定发展经济和积极治理经济环境的政策措施，以保证改革取得成功。会后，我们在原方案已经提出的措施的基础上，又作了认真的研究和补充。归纳起来有以下二十条：

（一）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除了保住必要的重点建设以外，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非生产性建设、过分的城市建设和盲目发展的加工工业建设压下来。明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要比今年的实际规模压缩五百亿元，相应减少钢材需求四百万吨左右。

（二）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这几年，集团购买力急剧膨胀屡禁不止。明年要采取严厉措施，把全国的集团购买力中可以压缩的部分坚决压缩下来。

（三）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在价格、工资改革进程中，如果发生消费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要核定工资总额和奖金总额，实行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由银行、财政、审计和监察等部门加以监督。

（四）千方百计稳定金融。开办保值储蓄和多种形式的有奖储蓄、预购实物储蓄，稳定和扩大储蓄存款。积极发展债券、股票市场，大力开展各种保险事业，加强资金融通和吸收社会游资。

（五）认真清理、整顿公司。对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对那些倒买倒卖、非法牟取暴利的公司，对那些破坏和捣乱金融的公司，都要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整顿以至撤销。

（六）实行农业生产资料专营。农民急需的化肥、薄膜、农药等，一律由供销社统一经营，保证农民增产增收。

（七）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安排好城市居民的肉、蛋、蔬菜等副食品供应。

（八）健全钢材、有色金属等生产资料的市场管理，严禁封锁资源、垄断价格、倒买倒卖、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行贿受贿等非法行为和不正当竞争手段。

（九）压缩国内紧俏商品和物资的出口，严格控制洋烟、洋酒、洋饮料及水果等消费品进口。

（十）积极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出售公房，逐步实现住房私有化。

（十一）选择一批盈利的大中型国营企业发行股票，出售一部分国营小企业。

（十二）在沿海部分城镇和集市出租或转让一些国有土地使用权。

（十三）坚持和完善企业经营承包制。对那些供求大体平衡、生产工业消费品的企业，坚决放开经营，进一步把他们推向自负盈亏的轨道，实行优胜劣汰。

（十四）广泛推行企业的兼并和联合，发展企业集团，改善企业组织结构。

（十五）优化企业劳动组合，严格按劳动量、工作量定额定员，加强培训，严格考核，严肃纪律，提高职工素质，扭转纪律松弛、效率低下的现象。对多余人员实行留职离岗、厂内待业等多种办法消化。

（十六）调整就业政策，引入竞争机制，允许一定比例的失业率。与此相适应，尽快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明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减员的二百五十万人，由职工队伍内部调剂解决，不再向社会招工。现有的一千多万计划外用工，要进行清理和压缩。

（十七）坚持每年实行财务、税收、物价大检查。

（十八）强化税收征管工作。税权不得分散，不许乱开减免税的口子，已经减免的要进行认真清理。税务系统实行双重领导，以垂直领导为主。

（十九）加强对外债的统一管理，认真检查外汇收支和上交情况，堵塞漏洞，改进外汇分成办法。

（二十）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努力开源节流。

以上这些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拟定具体的方案和办法，将尽快地陆续付诸实施。现在的关键是，必须努力做到措施得力，执行坚决，真正落实。如果说了不做，或者做得很不好，党和政府的威信以及改革的声誉就将受到严重损伤。除了以上各项经济措施之外，为了保证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还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开展协商对话，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维护安定团结，创造出更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时期。从明年起抓紧进行价格改革、工资改革，时机是有利的。尽管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不少，但是克服困难的潜力和回旋余地也很大。只要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一致，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把各方面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就一定能够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

在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四日

同志们：

今天，中央军委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官军衔的仪式。我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代表军委邓主席，向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全军授予中将以下军官军衔和士兵军衔的仪式也将相继举行。在这里，一并表示热烈祝贺！

这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十七位同志，都是担任我军高级领导职务的军官。这些同志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贡献和才能的肯定，也体现了国家对军队的关怀，同时表明了这些同志肩负责任的重大。这是被授衔同志们的光荣，也是全军的光荣。

实行新的军衔制，是新时期军队改革和建设的需要。这一制度着眼于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特点和我军军官队伍的实际状况，吸取了历史经验，借鉴了外军的有益作法，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实行这一制度，对加强我军建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必将产生推动作用。

同志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肩负着保卫四化、建设四化的光荣使命，军队的改革和建设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通过新的军衔制的实施，每一位军人都应看到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与重托，更自觉地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不计个人名利，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忠诚地献身于国防事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进一步搞好军政军民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要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加强作风培养，提高军政素质，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英勇顽强，锐意进取，进一步焕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希望全军在实行新军衔制以后，展现出新的雄姿和新的风貌，把我军建设推向更高的水平。

军队的改革和建设，是国家总体改革和建设的一部分，它的成功有赖于国家总体改革的深入，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我国的全面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我们在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困难不少，但克服困难的潜力和回旋余地也很大。改革必须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每一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都应满腔热情地拥护和支持改革，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做到令行禁止，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党的高、中级干部，更要以身作则，克已奉公，俭以养廉，艰苦奋斗，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为夺取改革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胜利而努力。

同志们，军队在新时期的任务，光荣而又艰巨。我们深信，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邓主席的领导下，随着包括新的军衔制在内的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今后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必将迈出更大的步伐，全军广大官兵一定能够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做出新的卓越贡献。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五日

刚才依林同志讲了《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并作了说明。为了帮助同志们理解这个方案，更好地进行讨论，我想强调讲几点意见。

一、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要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

明年后年要不要把我们改革的重点，建设的重点，坚决地、突出地放到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上面来，这是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政治局和国务院在研究明年及今后五年物价改革方案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现在不下决心，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物价改革就很难进行，其他改革也难以深入，整个建设的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回顾一下，我们从搞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就存在这么一个老问题：经过一段大发展，然后进行一次大调整。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与我们整个经济体制、经济机制有极大的关系。这种经济机制带来经常性的投资饥渴，需求缺乏约束。虽然经过十年的改革，但我们还没有解决企业自我约束、部门和地区自我约束的问题。因此，至今还一直严重地存在着需求超过供给的问题。我们差不多每年都讨论这件事，在一九八五年曾突出地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时候，我们希望能采取与过去不同的另外一种办法来解决，就是：不进行大的调整，而是踏步三年，不是马上多压，而是原地踏步，叫“软着陆”，这样损失要小一些。这个方针在全国贯彻之后起了作用，突出表现在：预算内、计划内的基本建设规模，从一九八五年以来没有增加，甚至还减少了一些。但是，只控制了计划内的基本建设规模，而全社会的建设规模仍继续膨胀。如果说在去年以前，这种膨胀，这种需求过旺，社会还能承受的话，那么，现在已到了不能继续承受的时候了。这几年，经济发展了，建设扩大了，同时问题也潜伏下来、积累起来了。集中的表现就是银行发了那么多的票子。这件事情有一定的量和度，不到一定的时候好像问题不大，但是达到一定的度，就会爆发。现在回头来看，如果今年一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就像现在这样提出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问题，情况会好一

些。当时更多地看到去年经济形势中好的方面，对潜伏的问题分析研究不够。这一点，从中央来讲，我们还是见事迟，抓得晚了。当然现在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也来得及。但如果再犹犹豫豫，左顾右盼，因纠缠一些局部、枝节问题而影响下决心，那就要出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我们面临着一个转折点。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认识问题：现在要不要下这个决心，要不要扭转这种局面。这个事情要说难也很难，要说容易也容易，就看全党是不是共同下这个决心。方针定了、决心下了以后，还有很多具体的措施、具体的方案有待研究，但首先认识要统一。

一直到今天来讲，我们应当说，中国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改革十年来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充分认识。引起乱涨价和乱抢购的触发性的原因很多，包括许多谣言和误传，但根本的问题是几年以来，一年一年积累起来的需求过旺，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如果不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难以前进，还会损伤十年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对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这次会要好好议一下。

所谓治理经济环境，主要就是治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前年是5%，去年又5%，今年可能是17—18%，三年加起来大体30%以上。其中真正属于物价改革引起的，不超过10%。去年由于物价改革措施出台而引起的物价上涨只占2%，其余5.5%是自发涨价。为什么自发涨价，就是钱多了要买东西。今年物价上涨如果是18%，就全国来讲，真正属于物价改革措施带来的，不会超过一半，也就是说，一半以上是自发涨价。可见物价上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物价改革，而是由于通货膨胀，是需求超过供给所带来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在通货膨胀未能控制的情况下，去搞价格改革，其结果，就会是火上加油。

总需求过大，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基建规模过大。刚才我说了，基本建设，计划内的不怎么多了，但是整个社会的规模过大。从北京到一个乡镇，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全国到处都是工地。生产性的、非生产性的，加工的，基础的，全面大上。城市面貌这几年的变化也太大了吧，标准太高了吧。过去是光搞加工不搞基础，这几年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也上得很猛。港口、机场、电厂、公路都上了不少。钢铁已搞到6000万吨，有色金属产量也大幅度增长。但由于加工业增长更快，需求极端旺盛，所以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仍然供不应求，十分紧张。从计划内到计划外，从生产到非生产，全面铺摊子，规模太大了。同时，消费基金特别是集团购买力也猛烈增长。工业发展速度过高。过去说，我们国家的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不行，这是对的，但今年全国工业增长速度搞到17%，八月份还在上升，达到18%，这个速度是太快了。

另外，我们某些商品出口也太多。现在出口的商品总值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4%，这个比例不算小了。美国现在的出口总值只占他国民生产总值的n%。中国是个大国，终究不能搞贸易立国。某些国内很需要又比较紧缺的产品出口多了，会加剧国内市场的供应紧张。所以，外贸发展速度搞到多快比较合适，需要很好的研究。各个地区不能完全一样，有些地方应朝外向型发展，有些地方

则应主要面向国内市场。中国这么大，不能要搞什么都搞什么。

治理经济环境，最主要的就是缓解需求与供给的紧张关系，因此，必须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控制消费基金，压缩集团购买力，调整进出口，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各个地方条件不同，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可能一样，但总的速度必须适当降下来，消除经济过热现象。

整顿秩序，主要是整治在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混乱现象，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由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在转换过程中漏洞确实很多。发生一些混乱现象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是决不能听之任之，必须进行有效的宏观控制。通货膨胀助长流通领域中的违法乱纪，给流通领域的混乱提供了土壤；而流通领域里的混乱反过来又推动物价上涨。两者相互助长，互相推动。所以对流通领域必须认真整治。要整顿公司，官商分开，减少流通环节，制止流通环节上不合理的层层抽头。部门有权力，地方也有权力，商品流通过程中都可以加价，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流转环节很多，又是垄断性的多头经营，造成层层盘剥。譬如山西小煤窑产的煤，每吨大概是十七、八块钱，到了上海是一百零八，这中间一吨煤加了九十块。这里面有应该加的，如运输费用，但是大部分应当砍下来。很多商品都是这样子的。整顿流通领域的工作，还应包括加强全国统一市场建设，促进市场发育，逐步建立起既有竞争又有秩序的市场。

在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的同时，还要用很大力量去增加有效供给，增加生产，特别是农产品和轻纺产品的生产。

明年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是否成功，集中表现在明年的物价指数能不能明显低于今年。这个问题已是个政治问题了。公开的提法还是使物价指数明显的低于今年，但工作必须按照百分之十去布置，去做。我们过去也讲压缩基本建设，稳定经济，类似的口号讲得很多，老百姓的感觉是你们的用心是好的，但讲的根本没有作用，你讲你的，物价还是照涨，因此没有信心。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明年的物价指数能不能明显低于今年，这已成为对我们党和政府领导能力和能否驾驭局势的一个考验，人民现在就看我们这一条。如果我们明年做不到这一点，后果是严重的，以后我们再讲话人民就不会相信。相反，如果我们明年说到做到，这就可以使人民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二、关于五年改革方案思路上的两个问题

今后五年，我们必须坚定地推行价格改革，原因依林同志刚才已讲了。概括地说，就是我们的改革到了这一步，价格不改革，整个改革就很难深人。目标是五年或再多一点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大部分市场消费品，也就是下游产品，和粮、棉、油以外的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不是一步做到，而是用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逐步做到。

这里我着重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既要进行价格改革，又要控制每年物价上涨幅度不超过

10%。现在看，10%是个界限。进行物价改革，还要求降低物价，当然不可能；但物价如果大幅度地上涨，在中国也行不通。这就是说，价格要改革，但改革的步子只能够在10%的物价指数这个框框里来考虑，要受这个制约。积极而又稳步地进行价格改革，就表现在这个问题上。这是社会的承受能力和企业的消化能力所决定的。

物价改革归根结底要由企业效益来承受，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不提高效益，必然是轮番提价，结构改革的目的达不到。譬如，原材料提了价，加工产品也提价，加工产品提价以后，原材料价格又显得低了，还要提价；农产品价格提高了，工厂成本高了，工厂要提价，工厂一提价，农产品的价格又低了。最后总是旧的比价复归。因此必须提高企业效益，使之能够消化大部分涨价的因素。但如果每年价格改革的步子太大，企业就消化不了，就要造成轮番涨价，比价复归。

能不能在10%的幅度内五年达到初步理顺价格，关键仍然是控制需求问题。因此控制需求不是一个短期的方针。既然要走市场调节的路子，如果市场需求过大，大部分商品供不应求，结果就要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在旧的体制下，需求也过旺，但那时实行票证供应，由票证限制消费，购买力不能实现，外国人说那是隐形通货膨胀。所以，如果不控制需求，或是通货膨胀，或是隐形通货膨胀，总之是通货膨胀无法避免。如果我们控制需求，需求与供给不是悬殊过大，不过于紧张，使每年的物价上涨指数大部分能用于物价改革，再结合着税收、财政等等配套改革，那样初步理顺价格就不需要物价上涨幅度很大。所以，只要能够控制住需求，就有条件在物价上涨幅度不太大的情况下初步理顺价格。

第二个问题，根据我国的情况，放开价格，主要应当是指下游产品，也就是最终产品。除一些垄断性的公用事业，如运输、电力等需要国家定价外，相当一些上游产品的价格“双轨制”也不能过早取消。一段时间，我们曾想早一点取消“双轨制”，现在看来不行。因为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原材料，包括粮、棉、油等主要的农产品，在相当长时间里会是供应不足。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完全实行市场调节，就会无限制地大幅度涨价，而每种上游产品涨价都会影响一大片，结果，将造成整个工业成本大大提高，使中国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很快地丧失竞争力。同时，上游产品完全由市场调节，并不能够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的产品现在也不是都靠市场调节，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不一样。当然，我们还要有一条政策，就是必须使国家定价的产品的生产者有利可图，获利不低于平均利润，而且还应超过平均利润。在当前情况下，一些重要的原材料全部由国家定价也不行，因为不可能把全社会的生产都纳入国家计划。中国的工业成份比较复杂，特别是有占工业产值四分之一的乡镇企业。比如钢材，如果统统是国家定价，实行“单轨制”，按计划供应，那样，乡镇企业就根本买不到钢材了。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实行“双轨制”，一部分价格由国家控制，来适当稳定物价，同时又放开一部分价格，由市场调节，来满足社会上的多种需要，满足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需要。

这看来在中国是不能不实行的一个政策。我们这几年也是慢慢走上这条路的，一直走到现在。前一段由于看到“双轨制”弊病很多，助长投机倒把，我们曾设想早一点取消“双轨制”，现在看来行不通。

既然“双轨制”在一定的时期还不可避免，就必须研究如何减少它带来的混乱现象。这是对宏观调控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农村的“双轨制”已搞了多年，有一套办法。当然现在农民对国家下达任务内的那一部分农产品，也不太愿意卖了。这个问题我看关键还在各级领导，只要积极做工作，农民还是可以说服的，如果我们大家动摇，当然就很难办了。农产品中棉花是“单轨制”，粮食和油一直实行“双轨制”。农村多年来已经这样办了。工业中的重要原材料，也有条件实行“双轨制”。生产这些重要原材料的工厂大部分都是国营企业，如生产钢材的，主要是十大钢厂，是比较容易进行统计和监督的。

以上讲的是我们对“双轨制”思路上的一个变化。上游产品在相当时期内还实行“双轨制”，这同前边讲的以每年物价上涨不超过百分之十进行价格改革的设想是有直接联系的。如果上游产品价格过早放开，物价肯定会大幅度上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源不足，又没有大量的外汇去进口。因此，一些原材料在相当时期内难以避免供给不足。所以要通过“双轨制”适当稳定上游产品价格，以便创造条件使下游产品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上游产品一般也比较容易控制。而下游产品则是千千万万，如不让供求关系起主要调节作用，就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很大浪费，社会需要的不生产，生产的社会又不需要，造成积压，这样也就无法将大批企业推向市场竞争，企业的改革也很难前进。

三、价格改革，实质上是整个改革的深入

小平同志最近讲：深化改革，不仅是一个价格改革，而是多方面的改革，只有多方面才能创造价格改革的环境和条件，但是，最后真正建立新的秩序，不理顺价格不行。他还说：对深化改革的概念要改变。深化改革，是全面改革的深入，各种改革的深入，不单纯是指价格改革。小平同志这些话，讲清了价格改革和全面改革的关系。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讲，价格改革不能孤军深入，必须和多方面改革相配套，必须是全面改革的深入，但前一段强调得还不够，价格改革与其他多方面改革是互为条件的。我们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把系统进行价格改革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但价格改革不能离开其他改革。

在多方面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企业机制的改革。中国不能走国营企业私有化的路，但要进行企业机制的改革。经济改革中要抑制需求过旺，必须有一种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企业机制。今天，我们的企业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机制，既不能真正自负盈亏，也不能自我约束。社会主义国家物价改革所以非常困难，实质就是企业缺乏自我约束机制。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这个问题，资本家不会滥发工资奖金，也不会不顾效益地乱搞基本建设，他是要算细帐的，银行也不会像我们这样

随便贷款。政府基本上不要为这些事操心。而我们的国营企业是公有财产，没有形成自我约束的机制。我们进行改革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企业改革，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放权、让利，这是一段。后来搞承包制。承包制应当说是相当成功的。如果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到今年，我们企业没有承包制，发生的情况比现在要严重得多。但是现在看来，还很不完善，而且光这个还不行。企业的改革，势必要在承包制的基础上向股份制的方向发展。股份制并不是私有化，而是产权的明确化。现在全民所有制的产权不明确。经营权明确了，归承包者、经营者。产权归谁？谁关心产权这个问题呢？国营企业的产权是谁的？是财政部的，还是计划委员会的？没有哪一个具体部门能代表财产的所有者关心这些财产。我们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但是我们必须解决产权明确化问题。股份制就是把笼统的、不明确的产权变为比较明确的产权。最近中办组织了一个调查，有几个部门参加，写了个材料，不是笼统地讲股份制，而是有一套具体的设想，特别是着重研究了如何通过承包制的完善和发展而过渡到股份制。体改委可以组织一些人好好讨论一下这个方案。当然，搞股份制也不能一哄而起，还要试点。

再一个问题是政企分开。要使有条件的企业真正能自主经营，放开经营。产品供求不紧张的企业，可以放开经营。这种企业不隶属某一主管部门，他就是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按合同办事，参加市场竞争。

企业改革中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事物，就是跨行业跨地区的企业集团的涌现，这是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的产物。它的出现，有利于企业活力的增强，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应当予以鼓励和支持。企业集团进一步发展，要求突破“三不变”（所有制不变、财政上交渠道不变、隶属关系不变）。

解决的办法，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看来主要应通过自愿联合、兼并、参股、控股等方式来实现，不能走硬性上收企业的老路。发展企业集团要根据实际条件，有步骤地进行，不要一哄而起，特别要防止为了取得优惠待遇而硬凑“企业集团”。

另外有几项对治理通货膨胀有重大作用的改革，全党要重视，认真把它抓好。

第一个就是住房私有化的问题。企业不能私有化，私人住房可以私有化。当然不是绝对不能租房子，但基本上要实行住房私有。我们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现在看，比较可靠的容易使用的回旋余地就是房子。全国公房有多少？光城市就有二十亿平方米。算大账，如果一平方米一百五十元，就是三千亿。照道理讲，房子卖给职工，对职工是有利的，买房子保值比什么都可靠。现在一平方米一百五十元，十年以后起码要值五百元。当然要允许他卖。很多人是有钱的，银行里存有几千亿嘛。当然这里头也有很多具体问题，都得解决，应当好好研究，看究竟怎样才行得通。办好这件事，对改变消费结构，对购买力的分流，对治理通货膨胀，都有极大的意义。

第二是出卖国营企业股份。这个问题刚才依林同志也讲了，我认为这也是大

有可为的。

第三个就是紧俏高档商品的销售与储蓄挂钩。一部分收入不高的人，积蓄多年，就是想买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现在需要采取储蓄预购或与储蓄挂钩的办法，使他们积蓄的钱不贬值，想买的东西能买到，或推迟一段时间能买到。这样做，对群众有利，又能吸收大量储蓄，对稳定金融大局也有利。

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全面改革。这个问题，我们这次会议不可能详细讨论，我只把思路说一说。

四、保证改革的成功，要靠全党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要靠加强纪律

不少同志反映，这个方案提出的政策、措施是好的，好是好，就怕实行不了。我认为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不能实行，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必须实行，必须落实。怎样才能保证它实行？我们这次会议要认真研究，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讲。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统一认识的关键是解决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问题。

这几年来，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分权，承认利益的多元化，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可忘记，局部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毕竟得服从整体利益。小平同志最近跟一波同志谈话，着重讲了小局服从大局的问题。我们承认有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但归根结底，小局利益不能任意膨胀，不能不受制约。现在，在不少同志的头脑里面，局部和整体、小局和大局的正确摆法，确实有些模糊了，淡薄了，甚至颠倒了。有的只顾本地区本部门，把它置于整体、大局之上，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惜损伤整体和大局的利益，极力扩张地方和部门的利益。现在，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这种倾向。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落实下去，就必然要求地方、部门承担一些艰巨的任务，忍受一些痛苦，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我看落实的结果必然要落到这个问题上。为了整个经济的稳定，为了改革能够继续进行，必须做到这一点。

现在有一股愈演愈烈的攀比风。地方、部门之间，比产值增长速度、比投资、比工资水平、比物价水平，竞相争先，竞相争利。这是基本建设规模控制不住、信贷膨胀、速度过高、产生种种经济过热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受到一股很大的压力，促使他们攀比。群众说，人代会一开会有的代表就说，人家为什么搞得那么快，我们为什么搞得这么慢；人家的工资那么高，我们为什么比人家低；人家跑到北京解决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你们到北京不能解决问题。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跟我讲，他们感到压力很大。中央、国务院的有些做法需要研究，应避免给地方造成这种攀比的压力。比如有的统计表发到下面，各地就经常拿来对照，当地工资水平原来在全国是第几位，现在是第几位；工业原来是第几位，现在是第几位。位置往后排了，人家就说你这个领导不行。各地方条

件不同嘛。从国家大的部署来讲，也总是有先有后嘛，哪能齐头并进。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齐头并进。这个话今天讲清楚，以减少地方领导所受的压力，改变竞相攀比的精神状态。毛主席过去就讲过，不管怎么比，只能有一个第一。过去说力争上游，都是上游也不可能。现在有个很大的变化，各个地方好像并不很怕涨价，而是要求涨价，认为谁不涨价谁吃亏，先涨价者先得利。这是目前涨价制止不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种盲目攀比的倾向极为有害。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幅员又这么大，中国的发展不平衡将长期存在。总的来讲，我们不可能搞得过快，当然我们需要有一定的速度。在总的不可能过快的情况下，肯定会有一些地方，根据全局的考虑和当地的条件，发展可以稍快一些；而有一些地方就得慢一些。中国是一个国内市场比较大的国家，是有广大内陆腹地的国家，虽然我们海岸线也很长。我们要对外开放，要发展对外贸易，但是我们不可能以贸易立国，还是要以国内市场为主。具体来讲，沿海地区应当根据自己的有利条件，较多地发展对外贸易，内地的对外贸易就不宜搞得过多，也不可能搞得过多。这一点不能相互攀比。根据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沿海地区要实行“两头在外”。如果沿海高价抢购内地的原材料来发展出口，国家承受不了。提出沿海发展战略，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利用沿海的劳动力，利用沿海对外交通方便等有利条件，发展以进养出，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在国内加工，然后出口，主要靠劳务和技术赚钱。现在重申这一条，沿海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建立在“两头在外”的基础上。

要治理环境，必须加强宏观控制。现在的宏观控制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旧的产品经济那一套控制办法失效了，很多都不能用了，新的控制办法又没有完全形成，因此出现了许多漏洞和自流现象。如何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加强宏观控制，这次会议要好好议一下。我们要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但也不可丢掉行政手段。当然，现在运用行政手段，要考虑到经济体制转换时期的特点。所谓行政手段，主要是纪律手段。小平同志讲：你什么经济手段，都是国家财产，你罚他他才不怕罚呢！因此，必须强调纪律。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实质。我们既要搞活，又必须强调纪律，不能把纪律和搞活对立起来。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企业利益，我们要承认，不能随便侵犯，但是，地方和部门如果超越了自己的合法利益范围，侵犯、损害了全局利益，损害了别的部门和地区的利益，这就要制裁。现在要强调集中。应当给地方、部门、企业的权力要给，应当集中的权力必须集中。我们党过去战胜过许多比现在严重得多的困难，靠的就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局部服从整体，全党服从中央。目前要克服困难，推进改革，必须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党，必须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小平同志讲的四项基本原则，核心就是党的领导。大家都说目前的困难和过去没法相比，有利条件多得很。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涣散，思想不那么一致，行动不那么一致。现在如果不强调党的作用，不强调纪律，就没有办法把全国人民凝聚起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党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国务院的权威，在重大问题上一定要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令行禁止。现在流行一种“红灯、绿

灯”之说，很多人说这是广东介绍的经验。广东的同志讲，他们从来没有介绍过这种经验。不管怎么说，流传很广。这种说法实质上就是可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可以自行其是。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害的，不能这样做。

价格、工资改革的任务、目标、措施，依林同志刚才说明的方案中都有了。为了使同志们在讨论中抓住重点，我根据最近两次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做这么个补充。

同弗里德曼[1]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热烈欢迎弗里德曼夫妇一行的到来。今天机会难得，主要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对我们的改革很关心。在经济学方面你是个大教授，我是个小学生。你从远道而来，话应该由你多说，我多听。

弗里德曼教授（以下简称弗）：八年前，即一九八○年，我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来华访问了北京、杭州、上海、桂林、广州等地。此次再度访华，从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来到北京。与上次相比，中国有很大变化，改革取得了很大发展，使我感到很惊讶，也很高兴。

赵：为什么不到西安去看看？

弗：我们明天去。

赵：在听取弗里德曼先生意见之前，当然我应该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中国的改革整整进行了十年，刚才弗里德曼先生说，同上次相比有变化，这主要是显示了经济活力。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总的来说，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要由原来的经济模式转换到另一个经济模式，的确问题不少，也比较复杂。

一九八四年我们中央全会决议上就讲了，中国要建立一个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去年，我们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确定我们经济运行的机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按照这么一个方向，十年来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现在，我们感到改革要深入，就要进行价格改革。当然，过去我们在价格方面做了不少事，但现在应把价格改革摆到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价格改革不是简单的价格调整，主要是形成价格体系的机制，即由市场来决定价格。

目前，中国的现状是这样的：百分之五十的价格是放开的，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主要是日用消费品、大量的机电产品和除粮、棉、油料以外的农产品；另外一部分重要的原材料、农产品是双轨制，即一部分是国家价格，一部分是市场价格，比如钢材、有色金属、粮食等；还有一部分完全是国家价格，如航空、电力、运输等等。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说进一步改革，就是要把实行双轨制的部分减少，把国家控制价格的部分减少。

但是，正当我们准备进一步进行价格改革时却出现了难题，即明显地出现了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能不把今后的价格改革同治理通货膨胀一起来考虑。当

然，通货膨胀不是今年造成的，而是几年所积累的，但我们感到今年的通货膨胀比较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治理通货膨胀考虑进来，放开价格就意味着物价上涨。物价大幅度上涨的话，人们就有实际承受能力的问题。这个承受能力有经济上的，也有心理上的。中国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六年，二十六年物价是冻结、不变的；中国人民是在这二十六年物价不变的环境中度过的。因此，人们对物价变动，心理承受能力很低。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八年，人们在物价观念上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心理上还是承受不了，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有储蓄的习惯，把大量的钱存入银行，如果物价上涨过猛、过大，就很难避免银行存款大量下降，这也是中国经济所不能承受的。如果物价大幅度上涨，银行存款利率提得很高，企业就可能承受不起，就会使不少企业倒闭、破产。我赞成破产是好事、可以新陈代谢的观点，但是如果大批企业一下子破产的话，就会有大量失业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动荡。因此，中国的物价改革要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考虑到承受能力。中国的物价改革与治理通货膨胀，二者要同时并举。

这里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通货膨胀？你知道，我们国家过去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有一个通病，叫短缺经济，需求超过供给，跟市场经济国家情况相反，西方是供给超过需求。现在，我们虽然进行了十年改革，但仍没有解决企业和部门的自我约束问题，或者说没有根本解决。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情况比改革前更坏，但改革还没有达到地方部门和企业有自我约束的地步，所以，这几年我们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地方消费基金增长速度过快。由于这样几个原因，带来了货币供应量过多。因此，我们准备在价格改革的同时，减少固定投资的规模、降低消费基金的增长，使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条件，即能够继续进行价格改革，进一步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同时进行企业机制的进一步改革。

无论是价格改革，还是治理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企业的机制问题，提高企业内部效益。价格改革是靠企业提高经济效益，降低成本，来消除由于原材料涨价对企业带来的影响，而不应该因为材料价格上涨，推动物价上涨。因此，我们决定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同时，通过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的自我约束力，使企业真正建立起自负盈亏的能力。

这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怎样增强国营企业的自我约束和自负盈亏的能力。我们想走这样的路：第一，实行两权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企业的经营者对企业有经营权、财产的使用权、占有权和处置权。打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财产的所有者就像一个乐队乐器的所有者，而经营者就是乐队的指挥。目前，能够体现两权分离的大量形式就是承包责任制，即国家把企业承包给经营者。另外我们准备试行股份制，以便明确国营企业财产的所有权。

现在我们的财产所有权不明确，国营企业的财产究竟归谁，归我？归他？还是归财政部，归计划委员会？不明确。财产的所有权不应当是笼统的，而要明确。比如说，某个部占多少股，某个地方政府占多少股，企业的职工占多少股，

当然也还有国外公司占多少股等等。笼统的国家财产要分解为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公司和不同的企业的股份。这就是说，今后企业的改革，一是实行两权分离，一是实行股份制，产权明确。这个问题我们是受到乡镇企业启发的。近几年，乡镇企业迅速崛起，这是中国最富活力的企业，弗里德曼先生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去苏州和无锡参观一两个乡镇企业。

弗：我已经去过了。

赵：他们的财产不是私人的，财产的所有权是明确的，归乡镇政府。当然我不能说他们这种所有制同西方企业私人所有制哪个有活力，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它比国营企业要有活力。因此我想，在中国实行股份制把产权明确，是对国营企业的一个极大的改造。这个问题在中国已讨论了近三年，现在国内学术界的意见大体趋于一致，所以可以说，在中国推行股份制已经有了条件。当然这一点我也是受到西方，如联邦德国情况的启发。这个弗里德曼先生比我知道得多得多，联邦德国很多企业是工会的，但他们经营得很好，比国有化企业经营的好得多。

今后，中国的主要任务，进行改革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是价格改革；其二是治理通货膨胀；其三是实行企业股份制。当然，中国治理通货膨胀经验不多，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遇到不少困难，实行股份制也是个新问题。因此解决上述三个问题难度不小。但是有一点需要向弗里德曼先生讲清：中国改革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会一步一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然啦，有些问题要探讨，但方向不会变，具体步骤、方法可能会根据中国的情况不断地调整和改变。

最近，香港报纸对中国的改革进行了很多报道，说什么中国高层领导发生了分歧，哪个人和哪个人有分歧。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领导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需要经常针对中国的情况，不断地进行研究，进行讨论。中国有句话，即成都武侯祠有副对联所题的："审时度势，宽严适度"。治理国家既要"审时度势"，又要"宽严适度"。说起来，这也有点人治的味道。做任何事首先应该确定方向，这非常重要。要到美国去，方向定了，但怎样走要研究，因为要绕大山啊，要过大洋啊！这就是"审时度势"。什么事情都不是永远不变的，需要不断分析变化了的现状，就是说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领导层有了分歧，而是我们要经常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会面，如果不是在现在，而是三个月前，我的话就不是这样讲了。如果我们明年再见面，我也会讲些不同的话。我讲得很长了，现在想听听弗里德曼先生的意见。

弗：非常感谢总书记给我们介绍情况，您讲得非常清楚、全面。刚才你说我是教授，你是学生，但听到你对中国经济情况的分析，你的本质是教授呀！

赵：（大笑）我只读过中学。

弗：不要把在学校时间的多少与学问的高低混为一谈。有些人在学校念了很多年书也没有什么学问；有些人念书不多，但学问却非同小可。

赵：中国也有这样两种人的。中国古话叫做"不学有术"；有的是"学而无术"，有的是"不学有术"。

弗：我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不是专家，在座的每位先生都远比我更

了解中国的情况，因此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我就不准备谈了。我曾用许多年研究进行改革的许多国家的情况，每个国家的环境都不尽相同，都认为自己的情况是特殊的；但有些情况并非如此，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适用于每个国家。比如，物理学的原理在每个国家都适用；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在每个国家也适用。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经济繁荣与私有产权的关系。有一条重要而有简单的经济规律，你是知道而同意的，这就是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更谨慎。这解释了为什么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更有效，私营企业又更有效的原因。因此，中央权力下放是个关键，下放得越多越好。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通货膨胀，价格改革和企业活力。我不想具体地谈这些问题，具体问题你比我更清楚。通货膨胀的现象已经有了许多个世纪，很多国家都出现过。我们不能用控制个别价格的办法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许多国家曾试图过，结果都失败了。远在一千六百年前，罗马帝国使用过这个办法，当时罗马的皇帝想控制通货膨胀，但失败了。

赵：我们过去就是用这个办法。

弗：再举一个新的例子—美国。它一九七一年通货膨胀率是百分之四点五。当时尼克松总统说百分之四点五太高了，他采取控制物价和工资的办法，把个别物价和工资冻结了。三年后，由于这种控制措施使美国经济发展很不顺利，不得不放弃了，但那时通货膨胀率已达百分之八。这是七十年代美国通货膨胀的开端。

关于通货膨胀最大的教训是把价格上的通货膨胀与个别价格的上升分开。许多国家并没有采取控制个别价格，而是控制了货币量就抑制了通货膨胀。比如日本就是这样。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日本通胀指数是百分之二十五，货币的增长率也是百分之二十五。于是日本政府决定放慢货币发行，通货膨胀很快得到控制，其后通货膨胀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结果为日本后来经济顺利发展打下了基础。

关于经济改革问题，其实这里有个重要条件，即以控制货币发行量来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通货膨胀，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很大。抑制通货膨胀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约束货币供应量，在中国就是要少印钞票。中国的银行不能像西方银行那样通过机制降低货币发行量，中国银行是受中央政府的命令印钱，向企业提供资金和贷款的。我认为中国的通胀问题不在于投资和消费，而是钱印得太多了。当然社会需要投资和消费，但这些钱应来自于储蓄和生产。

放开价格对控制通货膨胀是有利的，因为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鼓励储蓄和防止浪费的现象。您讲的工业的例子是个很好的例子，您讲储蓄利率如果低于通货膨胀率，人们就不会去储蓄，而企业就因为利率低便争着到银行借钱，但这种不考虑经济效益的投资，实际上是一种浪费。如果把利率放开，完全由市场调节，就可以鼓励人们去储蓄，也可以避免浪费的投资。第一个（通胀）问题要讲的还很多，但怕占你的时间过长，现在讲第二个问题。

刚才讲要放开价格，但最关键的问题没有提到，这就是汇率问题。我开始认

识到这个问题时，是三十年前。我当时是印度财政部长的经济顾问。当时印度有几种汇率，最简便的发财致富途径就是通过关系搞到一张进口许可证，这样，一些人成了富翁，但更多的人成了贫民。还有，这种制度非常容易引起腐化。我当时向印度政府提出取销外汇管制，建议放开汇率，但印度政府没有采纳。正因为他们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印度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跟三十年前没有多大变化。

我认为印度经济失败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批准进口许可证和多种汇率。一次，我访问印度的一家纺织厂，发现这个厂的设备很先进，都是进口的先进设备，省人省力，而另一方面印度的许多人在等待就业。我于是问工厂厂长为什么进口这么先进的设施，他回答说，这是因为政府批准以官方汇率买机器，合算。这样的事情对自己来说，当然是便宜，但对国家不利。

据我了解，中国也有好几种汇率：较低的国家汇率，中等的半官方汇率和更高的市场（黑市）汇率。如果你们取销了双轨制，高的向低处降，低的就会向高处升，采用双轨制其市场汇率就必然较高。

我认为放开价格，实行价格改革，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官价低而买不到东西，实际不是低价。如果花五个小时排队抢购，也不能算价格低。我的夫人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古老的故事。同一条街上的两边有两家肉店，一位家庭主妇到一个店里买羊肉，说这个店里的肉贵，店主就说，你认为价格高，可以到对面那家去买，那里低。但那家肉店没有羊肉，这样的便宜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我说双轨制是使价格更高，而不是更低。

再谈第三个问题。权力下放问题，我已经谈到了，但我想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企业要有活力，最主要的是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我再谈谈印度的例子吧。过去三十年，我多次访问印度。在印度建厂要得到许可证，给了某个人许可证，他就有了权，这和国家垄断一样糟。重要的是，要使每个人都能自己经营商店、企业，当然对经营者要征收适度的税。只要有很多的私人自由建了企业，自负盈亏，就会迫使国营企业要么提高生产效益，要么破产。美国的国营邮政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这邮局有垄断权，是合法的，但现在其他人也有权传递这种快件，把国营邮局的快件生意杀得片甲不留。要是美国的国营邮局在其他邮件上也没有垄断权，我就可以肯定地推断这邮局会破产了。因此我提出中国要取消许可证。我认为要使企业有活力，就要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它们来竞争，无论是乡镇企业或私人企业都要让它们来竞争。

最后简单地再说一点。改革的最关键问题，就是不要半途而“胶着”，不进不退。南斯拉夫是个先例。过去我几次访问南斯拉夫，第一次是由俄国去的，当时是从一个经济衰退的国家到一个经济发展的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从奥地利去又是另一种感觉。那时南斯拉夫采取了工人合作社制；苏联是全民所有制的国家计划经济。但是南斯拉夫只走了一半，它没有把产权交给工人；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可以分红，但却不能将权利卖出或转让。这些企业为赚钱就不想多雇工人，也不想多投资，工人也难以另谋高就。如果南斯拉夫的工人有产权转让的

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工人合作社制如何好，而是要说明改革不要半途而被“胶着”。我非常赞赏总书记刚才说的，中国改革要继续下去，方向是不会变的话。现在我非常愿意回答总书记提出的问题。

赵：非常感谢弗里德曼先生谈了很多好的意见。关于物价问题，我们不打算采取控制个别价格的办法，而是要通过管理货币流通量来控制通货膨胀。正如弗里德曼先生所说，要利用银行机制。但是中国银行的改革刚刚开始，因此很难像西方那样，通过银行抽紧银根，就可以控制通货膨胀。国家银行必须同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现在抽紧银根，可能抽紧农业，而重复建设的并没有抽紧。

弗：这是由于权力部门在上层，上层完全控制了权力。

赵：两个问题都有，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控制，一方面是银行本身性质不合理。

弗：我理解，因此提出建立相互竞争的体制。目前，中国与一百五十年前的西方相似，当时西方小城镇建立了银行，银行利率根据市场来决定，这些小银行发挥了作用。中国也可以在小城镇建立银行进行调节。

赵：刚才讲到私人企业，今年三月份人大会讨论、修改、通过了个法律，允许私人企业的发展，对私人企业没有特别的限制。

弗：两天前，我曾在无锡访问过一个做私营生意的个体户，他说要开店就需要取得许可证，要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还要请客，很困难。究竟他所指的困难是今年三月份以前的事呢，还是三月份以后的事呢？

赵：法律上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完全消除还要一段时间，这个现象还不少。不是说法律一定下来，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弗：请允许我再提一点。中国邻近的地区，如香港、南朝鲜、台湾、新加坡等，它们发展得很快，用了三十年等于西方用了二百年。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香港，香港困难最大，但取得的成绩也最大。香港中央干预最小。中国由于国家大，遇到的困难自然也大，但我想，中国也可以用三十年的时间取得西方二百年所取得的成就。中国邻近的地区都从西方汲取教训，其中包括借鉴技术和工艺等等。我希望中国人民更加富强，希望中国改革成功，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南朝鲜和香港等地区的发展对美国带来很大的利益，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对美国有好处，这是友好的竞争，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冲突。

赵：谈谈汇率问题。两年前，一个叫邹至庄的美籍华人教授向我提出汇率浮动的建议。

弗：他是我的学生。

赵：他告诉我，他多次向蒋经国提出过这个建议，但蒋开始并没有采纳。他希望中国也能实行浮动汇率。

弗：即使是台湾也没有完全浮动它的汇率，政府在不断地进行干预外汇市场。

赵：我们国内不少人也提出建议，中信公司的老板荣毅仁就多次讲过放开汇率问题。但我们有这么一个困难，中国正在进行价格改革，中国的价格与国际市

场价格结构不一致，我们的换汇成本不高，大体是四元人民币换一美元，当然做为某种商品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在国内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放开汇率就可能出现汇率价格不合理的现象，使原料的成本提得很高。

弗：但是放开外汇管制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解决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避免浪费资源，可以促进改革。

赵：价格改革与开放汇率要结合起来，价格放开与汇率放开应大体是一致的。

弗：当然二者一起来考虑是非常可取的，但是，如果有政治上的障碍，不能同时解决，则解除外汇管制是最重要的。

赵：我再次对你提出的有益建议表示感谢，我和我的同事们会很好研究你的建议的。总之，中国的改革是不会变的。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中国的发展完全符合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利益。

今天就谈到这里。

注 释

1．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院资深研究员。1975年因其对货币供应和消费分析的贡献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创立的芝加哥学派以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行政干预闻名于世。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一、关于这次会议

这次会开得是好的。全党高层次统一思想的任务，在这次会上解决得不错。这个层次包括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同志、各部的主要领导同志，都是高级干部、实权派。到会所有发言的同志都表示，完全接受中央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以及中央所制定的关于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的方针和重大措施。同志们都表示要小局服从大局，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准备作出牺牲。大家没有什么不愉快，没有什么埋怨情绪，没有什么勉强。会议开出这样一个结果，确实令人鼓舞和高兴。这又一次证明，我们这个党是很有力量的。

在关键的时候、关键的问题上，只要中央把情况讲清楚了，把为什么必须采取这样的方针而不能采取另外的方针，为什么只有这样才符合人民利益的道理讲清楚了，就可以得到全党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事实多次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央在这里开会可以把部长、省委书记、省长的思想统一起来，我相信你们也可以把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专员、县长的思想统一起来。当然，对中层、基层干部要多做一些工作，做更细致的工作。逐层去开会，逐层把道理讲清楚，把情况讲清楚，我相信我们是可以把全党的认识统一起来的。全党的认识和行动统一了，我们就可以带领人民前进。

这次会议需要统一认识并已统一认识的，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明后年要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作为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第二，关键是要消除经济过热，抑制需求过旺，治理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为此必须坚持小局服从大局。第三，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加强纪律，发挥我们的传统优势。这样，我们的困难就可以克服。希望大家按这个精神，把会议的中心内容一级一级地传达下去。

二、关于价格、工资改革方案

与会同志对这个方案提了一些意见，民主人士和专家们也提了不少的意见。政治局将要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考虑，凡是能够吸收的都加以吸收。

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大家觉得明年的措施和要求还是绷得紧了一点。我想，对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虑、斟酌。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明年务必使物价上升幅度降下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做到了这一点，其它问题才比较好解决，也有时间解决。否则，整个方案实施起来很困难，矛盾还会增加。社会上的票子，不可能完全靠商品来回笼，还必须靠增加储蓄。只要物价稳定了，再加上提高利率，社会上的钱就会回到银行里来。在这种情况下，毕竟群众把钱放在手里或买些不合用的东西，都不如存入银行有利。有了社会上储人银行的这些钱，银行就不必再多发新票子，反过来又有利于稳定物价。这对大局至关重要，对人民群众也最有利。实现这一条的关键是采取一切手段先把物价稳住。所以我们明年工作的最主要之点不是价格改革出台多少，也不是工资提高多少，而是把物价稳住，在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上有显著的进步。其他小道理都要服从这一个大道理。各地各部门的工作都要本着这个精神来安排。

三、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组织的核心作用

最近不少事情，例如抢险救灾，制止抢购风，包括中央发的关于严肃党的纪律维护改革大局的通知所引起的强烈反响，都再次证明我们这个党还是有战斗力的。在完成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这场艰巨任务中，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应当而且可以依靠这个政治优势来克服当前的困难。

应该看到，当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党的观念有些淡薄了。因此，现在要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强调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强调党员的模范作用。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好，建设民主政治也好，都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如果削弱了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就会陷于混乱。

在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中，要使每个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和党的组织，经受严格的考验。我们不是要加强党的建设吗？从严治党，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和清理不合格党员，开除腐化分子等，这些工作都要在这次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来进行。要通过发挥党的作用，保证这场斗争的胜利；通过这场斗争，整顿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纪律性。这是我们整党、建党的一个好机会。在和平时期入党，在和平环境中锻炼党员，用什么来考验呢？当然，对敌斗争也还有，水灾、火灾、风灾也是一种考验，但日常大量的还是如何对待个人利益的考验。究竟是把个人利益放在前面，还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前面，这在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中最容易看出来。要看一个党员在改革中间考虑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还是一心谋取私利。总之要有意识地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要依靠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来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同时，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考验每一个党组织和每一个党员。

四、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中，向广大群众进行一次深入、系统的形势任务教育

人民群众只有认清形势，看到光明，明确任务，才会齐心去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奋斗精神。在需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时候，认真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进行这次教育，主要是向广大群众讲清十年改革的成绩、当前面临的问题、今后任务和我们必须采取的方针。要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地向人民群众讲清这些问题。还要向群众解释，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没有变，明后两年重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是为了给改革、开放创造更好的条件。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把这件事做好，改革、开放以及整个建设事业，就会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改革十年，惠及全国人民。可以说，至少80%以上的人得到了比较明显的好处。但是，同时人们的意见、牢骚又很多。这到底是为什么？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用一句话来形容这种现象，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最近，洛阳一个干部给我写信，完全是善意的，他说，改革以来，他个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发生了极大变化，职务提高，收人增加，家庭主要成员的变化几乎和他一样，是“多喜临门”。但他对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分配不公和其他不良现象“愤怒难忍”，禁不住“骂娘”。我觉得，写信人很坦率，他的想法和情绪也很有代表性。

人们所以不满，首先是因为在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上和我们的工作中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人们有理由对这些问题感到不满意。但从这种有时十分强烈的不满情绪中也可以发现，许多人对改革、开放的期望值过高（自觉或不自觉的），总认为社会的一切应该比实际情况更理想，改革带来的好处应该更多；另一方面，对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一时难以避免的某些消极的东西，又缺乏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

人们所以产生对改革期望值过高的心理，又可以从我们的宣传舆论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的缺点中找到原因。

首先，我们没有充分地、如实地向群众讲清十年改革做了哪些艰苦而又复杂的工作，取得了哪些成就。在这方面，领导知道的情况，群众不一定知道。有一种说法：“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现在看，不讲成绩也不行，不利于增强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和支持。如果一方面不去实事求是地宣传改革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对改革的某些缺点和问题不断地渲染、夸大，其结果就会使人们渐渐对改革的好处淡忘了，而怨气和不满却滋长起来，互相感染。这种现象的消极作用绝不可忽视。改革的十年使整个国家的面貌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不少人对改革的认识与这个基本事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很不相称。这与我们如实宣传改革的成就不够，有直接关系。

其次，我们对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和失误，对可能遇到的风险和困难，对

改革、开放中难以避免的问题等，也都讲得很不够。世界上的事情，利和弊总是联系着的。改革、开放对人民和国家有大利，但也难以避免有小弊。“小弊”，从局部或某一角度来看，人们可能感觉并不小。例如随着经济的搞活和市场调节成份的增加，生产发展了，人们的生活也方便了，但同时也会出现投机倒把、非法谋利、不正之风等问题。对外开放使我们引进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好处很多，但同时也会传人和诱发一些不良风气和丑恶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方针是兴利除弊，努力把消极的东西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这要有一个过程，而且只能随着新问题的不断暴露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才能解决，兴利除弊的制度、办法只能逐步建立和完善。人们如果只准备接受改革，开放的好处，而不准备接受另一方面的现实，那肯定会感到非常失望。所以，我们必须花足够的精力和功夫，耐心细致地向群众解释这些道理，帮助群众很好地进行分析。

再次，我们对改革的重大方针、政策、措施，向群众宣传解释也很不够。人们不很了解为什么必须采取这样的方针而不能采取另外的方针，因而常常产生误解。这样的事例很多。

尽管人们有一些不满和意见，但我们对改革大业绝不能动摇。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向人民群众做工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核心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办事，一心想把中国建设好。但由于改革事业复杂而有风险，我们又缺乏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因此，工作肯定有缺点和失误。对此，我们可以胸怀坦荡地实事求是地作自我批评。但总的来说，改革的十年还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我们对人民群众没有什么讲不清楚的问题。

当前群众的不满和意见，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物价上涨，二是某些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三是社会分配不公。关于物价上涨问题，通过传达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方针，可以讲明中央的决心，统一群众的认识，并动员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与通货膨胀作斗争。关于腐败现象问题，主要讲清在新旧体制交替中产生这种现象的复杂原因，讲清党为实现党政机关廉洁而正在进行的努力，号召群众进行监督检举。至于分配不公问题，既需要认真解决，又需要认真解释，因为其中既有实际问题，也有观念上的问题。由于管理办法不健全和制度上的漏洞，出现了非法牟取暴利的现象，投机诈骗的现象，这些都是必须取缔的。有些单位（特别是某些公司）自定高工资，与其他单位形成不合理的收入悬殊，这也是必须解决的。对正当的高收入，要依法征税，政府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都是实际问题。至于观念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合法收人差距看不惯。有些合法的高收入，也许并不是从任何角度看都很合理，但那是政策允许的。例如个体户，只要他合法经营，多赚钱是允许的。又比如出租汽车司机，赚钱也比较多。如果我们改变这个允许一些人多赚些钱的政策，会是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回到过去的状况，社会财富减少，群众生活不便，只有全民和集体这一个就业门路。那样，人们的收入可能比较平均，但是，真要回到过去的样子，恐怕谁也不满意。我们政策的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从而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生活的提高。但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一些人会

比另一些人得的更多，这是难以避免的。对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不赞成的人不少。但是，如果一定要绝对的平均，谁也不准先富，结果只能是大家一起穷。平均主义，我们搞过，因为实践证明不好才改的嘛。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讲明白。还有个知识分子待遇低的问题，那是长期遗留下来的，我们也正在积极地逐步地加以解决。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的状况也不是没有改善。知识分子收入也不平衡。写作多、讲学多、有发明创造和有机会出国的，情况就会好些。总之，我们一方面要扎扎实实地去解决实际存在的分配不公的问题，同时又要随着改革的进程，逐步改变人们平均主义的价值观念，增加对改革的承受能力。

这次进行形势任务教育的方法，除了宣传舆论的适当配合以外，主要是由各级党政领导与群众对话。改革十年的巨大成绩，要如实地向群众讲明。要让群众知道我们的工作有缺点失误，知道改革是会有风险和失误的，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要向群众讲清，并同群众商量。要求大家共同完成的任务，应向群众交底。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把道理讲清楚。让群众把疑问提出来，领导同志要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理直气壮地讲成绩，但也决不隐讳问题，特别要着重引导大家向前看，使人们对出现的问题不是一味埋怨，牢骚，而是团结起来去奋斗，去解决。改革大业，匹夫有责，每个人都应自觉地出一把力。我们要相信群众，通过形势任务教育，将使人民群众进一步树立起“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统一意志，进一步增强凝聚力，更加理解和支持改革，使人民群众看到光明，看到前途，增强信心和力量。

很多同志提到，传达贯彻中央的精神还是要先党内后党外。当然，什么事情都先党内后党外也没有必要。但是，许多重要精神的传达，重要任务的部署，解决复杂问题的动员，都需要实行先党内后党外，首先把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统一起来，一齐去做群众的工作。这样有利于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有利于克服巨大的困难和完成复杂的任务。这一次统一思想，就需要先党内后党外，党内层层开会，层层武装骨干。实际上只要把党内思想问题解决了，群众的思想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

各级都要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叫“改进”、“改造”、“改革”，都是一个意思，目的是为了使思想政治工作更有力、更有效。要通过加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形势任务教育卓有成效地进行，同时通过这次形势任务教育，进一步探索、研究在新形势下怎样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走出一条路子来。

五、要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

昨天，王芳[1]同志讲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维护社会的安定。请各地的同志都注意这个问题。要多做群众工作，经常进行协商对话，有问题及时解决，尽量避免激化矛盾。越是有困难，越要重视内

部团结。当前，国内外的各种敌对势力肯定会加紧活动，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且要有应付的办法。小平同志最近说，专政的问题，不必多讲，但是不能没有。由于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任务十分艰巨复杂，敌对势力肯定会利用我们的困难，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我们不能麻痹。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还不至于出多大的事。但是恐怕要准备出一些事，专政的武器不能丢。

六、要重视大中型企业的深化改革

这对我们克服困难是非常重要的。大中型骨干企业效益有所提高，我们的困难就会减少。而大中型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根本的问题还是深化企业的改革。明年价格改革的步子要放慢，但大中企业的改革步子不能放慢。

原来我们说过，今年应该是企业承包制明显发挥效益的一年。各地反映，这个作用确实是明显的。但由于原材料过分涨价，效益抵消了一些。今后几年随着承包制的完善、深入，股份制的逐步试验、推广，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等，大中企业还会发挥出很大的潜力。为了深化企业改革、提高经济效益，还有三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报纸上讲的“三害”，要认真解决一下。第一害是政企不分。现在很多权力放来放去，放到了主管部门，放到了主管局或者行政性公司。企业应该得到的权力在中间被拦截了很多。第二害是流转环节太多，层层抽头，造成原材料涨价，使企业增加了很多负担。第三害是对企业的摊派。对企业的摊派与城市建设的高标准有直接的关系。应当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制止城市向企业摊派。如果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企业的环境就会有很大改变，企业的积极性会提高，活力会增强，这将大大有利于我们克服困难，并为改革的全面深化创造重要的条件。

七、要千方百计地增加供给

明年基本建设规模要压缩，但市场需要的商品要抓紧生产，有效供给要尽量增加。长线要压缩，但短线的、紧俏的、人民日常需要的商品的生产要保证。对为生产市场紧俏商品服务的技术改造还要很好地支持。

农业问题大家讲了很多好的意见，纪云同志发了言，我赞成。农业上的许多问题，都要认真解决。同时对农民、对基层干部也要进行教育。道理不能只讲一面，好像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就一点道理都没有。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比城市居民的生活变化还要大些。当然，粮价还是低，生产资料供应也不太好，国家正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农民不把粮食卖给国家，国家的困难怎么渡过？国家的困难渡不过，农民的日子怎么能过好？我看得进行这个教育，得讲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讲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正像企业要向国家交利、交税、交产品一样，农民应当向国家交粮食，卖农副产品。公民对国家都要尽自己的义务，而国家则为全体人民服务。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帮助

农民解决困难，对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另一方面也要向农民讲清道理。有些道理不讲清楚，就会气不顺。

八、检查整顿必须集中力量

我们宣布过不再搞政治运动，开始是讲政治领域不搞运动，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在其它方面一般地也不提搞运动，这是对的。我们今后解决问题，主要靠立法，靠制度，逐步建立新的秩序。但是，这要有一个过程。有些单位、有些情况很严重，有关的法律、制度又不很健全，只靠少数人去查，根本查不进去，常常不了了之。我在会上插话说的要搞不叫运动的运动，是指某些单位某些问题的整顿。第一、要集中地搞，第二、要发动群众。这丝毫不意味着重复过去搞运动的作法。过去搞运动，是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宁左勿右。现在不能那样搞。当然，为了避免误解，可以不用“不叫运动的运动”这个提法。但是，在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中，某些单位问题很严重，就要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去搞，这样才能突破。对群众检举揭发出来的问题，要认真查证，坚持实事求是。要在法律范围内行动，依法办事。

注 释

1．王芳（1920—2009），山东新泰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旅保卫科长，军保卫部长兼组织部长，解放军三野七兵团保卫部长，浙江宁波地委书记，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副省长、省委书记，公安部长，国务委员。

在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1988年9月26日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十三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鉴于当时进行价格改革时，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一些地方出现抢购商品等现象。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中央决定1989和1990两年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前进中面临的复杂问题，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的新秩序，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坚决而稳步地全面深化改革。

十三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半年中，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多次讨论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最近，又为此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认为，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不理顺价格就谈不上真正确立新经济体制的基础，但深化改革又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改革问题，而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为了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把改革的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认真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步骤和方法应当审时度势，力求稳妥。现在我向全会报告政治局在讨论过程中形成的意见，提请全会审议。

一、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是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

我国改革已进行了十年。十年改革，为国民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改革，我国就不会有这十年的大发展、大前进。改革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它结束了封闭和停滞的局面，开辟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我国当前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突出的是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还不可能从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更需要从工作上加强管理和控制。近几年我们在控制预算内基本建设规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预算外基建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如果今年年初抓紧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更好一些。看来，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当然，现在解决还来得及，如果再犹犹豫豫，当断不断，那就会出大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坚

决遏制通货膨胀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机立断，下最大的决心，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否则，不但价格改革很难进行，其他改革也难以深入，整个建设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损害我们十年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第一，明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压缩五百亿元，大体相当于今年实际投资规模的百分之二十，只能多压，不能少压。要对重点产业采取倾斜政策，对涉外项目采取保护政策，切切实实合理调整投资结构，把全社会的投资规模真正管起来。第二，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特别要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在集团购买力的使用中，虽然相当部分是合理的、正常的，但其中确有严重的挥霍浪费，必须坚决砍下来。第三，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办好保值储蓄，开辟多种渠道，包括出售公房和发行股票、债券，吸收社会游资，引导购买力分流。第四，克服经济过热现象，把明年工业增长速度降到百分之十甚至更低一些。这是就全国范围来说的，各地都要实事求是，从本地实际出发，不要相互攀比速度。

控制投资规模和社会集团购买力，过去所以屡禁不止，教训有两条：上面的原因主要是手软，抓得不实；下面的原因主要是本位主义作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两条教训不允许再重复。明年要采取非常措施，要真压、真砍，而不是假压、假砍。坚决砍掉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设和重复建设，砍掉集团购买力中用于铺张浪费的部分，一不会影响有效供给，二不会削弱发展后劲，三不会降低人民生活水平，而得到的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和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这个问题事关改革和建设的大局，现在就要预先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打招呼，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明年必须照办，今年第四季度更不许突击上项目、乱花钱。

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现在流通领域中问题很多。物价上涨助长了流通领域的违法乱纪，流通领域的混乱又推动了物价上涨，两者相互助长，情况越来越严重。对此，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坚决整治流通领域的混乱。首先，要坚决刹住乱涨价风。国务院已经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物价、财务、税收大检查。各地必须认真组织力量，加强领导，依靠群众，切实抓好，坚决制止一切违反国家规定哄抬物价的行为。非法涨价收入必须上缴国家财政，严重违法乱纪的必须依法惩处。要通过检查，进行教育，严肃法纪，堵塞漏洞，把物价、财务、税收监督制度和市场规则建立健全起来。第二要整顿公司，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所有公司，除极少数经国务院特别批准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的以外，都必须限期同党政机关脱钩，依法经营，否则就吊销营业执照。第三要尽快确立重要产品的流通秩序。对流通秩序混乱的重要产品，尤其是紧缺的重要生产资料，要一个一个排队，认真解决多头和多环节经营的问题，有的要实行专营，有的只准在国家统一市场上交易。高价抢购粮食、棉花和生丝等产品的“大战”，必须立即制止。第四，要加强宏观监督体

系。必须在中央集中统一指挥下，强化计划、银行、财政、税收、海关等部门的宏观控制职能，充分发挥这些部门的监督作用，同时加强对它们的监督，形成严密的监督系统。第五，要制止各方面对企业的摊派、抽头和盘剥。所有这些都应当作为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工作。

解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问题，一方面要抑制总需求膨胀，另一方面要用很大力量来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否则，市场供应就会出大问题。必须努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产品、轻纺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以及紧俏产品的生产。压缩建设规模腾出来的能源、原材料、运输能力，就要用到这些方面去。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和必要的消费品，要减少出口量，保证国内市场供应。特别要解决好粮食和“菜篮子”的问题。今年我国自然灾害较多，预计粮食比去年减产百分之三左右。今年农业歉收是世界性的，大量增加粮食进口对我不利。总的说，目前我国粮食储备的情况是好的。为确保在粮食问题上不出乱子，一是必须坚决制止高价抢购、哄抬粮价、扰乱粮食市场的行为；二是中央在全国各地的粮食储备，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调度。在粮食调度这个重大问题上，务请地方同志以大局为重，支持中央。如果出现拒绝中央统一调度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唯省委书记和省长是问。这一点现在就要说清楚。“菜篮子”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大意不得。去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菜篮子”涨价因素占三分之二。今年以来这方面涨价也较多。全国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要确保今年第四季度特别是春节的市场供应。有关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问题，今年将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专门进行研究。

这次治理环境、整顿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小平同志最近指出：宏观控制要体现在中央能够说话算数。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这几年，我们如果不放，能搞出这样一个规模吗？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向小康社会过渡的宏观管理。小平同志的这些话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既要搞活，又要制约，既要放开，又要管理，宏观控制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五管齐下，进行宏观调控。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尤其不能过早地轻率地放弃行政手段，以免出现经济生活的混乱。加强行政手段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而不是走老路，对这一点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我们要在实践中努力学习，积累经验，逐步掌握和提高宏观调控的本领。

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是长期要注意的大问题，最要紧的是明后两年，首先要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已成为对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能力和驾驭局势能力的考验。人民现在就看这一条。说到做到，取信于民，深化改革就好办了。所以，这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明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就是当前的大道理，明年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一点。

二、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相互配套的全面改革

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前进中面临的复杂问题，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坚决而稳步地全面深化改革。

姚依林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将向全会作关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说明。关于价格改革，这里着重讲两个问题。

第一，明年物价上涨幅度必须明显低于今年，此后几年每年物价上涨幅度必须控制在百分之十以内。这是衡量我国价格改革是否积极而又稳妥的一个尺度。从当前我国社会的承受能力和企业的消化能力来看，一般地说，如果物价上涨幅度达到两位数，企业就消化不了，势必造成轮番提价，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搞得人心惶惶。

那么，在上述物价上涨的控制幅度以内，用五年或较多一点的时间能否达到初步理顺价格的目标呢？这就要看我们能否有效地控制住社会总需求。只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缺口不大，自发涨价的压力就会相对缩小，价格改革的回旋余地就会相对扩大。因此，紧紧抓住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这两个环节，切实控制住社会总需求，我们就有可能在物价上涨幅度不太大的情况下，用五年或较多一点的时间，初步理顺价格。我们要力争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

第二，某些重要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双轨制不可能也不应当在短期内取消。我们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价格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做到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适应“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但是，这是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放开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只能逐步进行。近期可以放开的，应当是供大于求和供求矛盾不大的产品，主要是为数众多的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国家垄断的公用事业，例如铁路运输、通讯、电力等，仍由国家定价。对极端重要并将长期短缺的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包括粮食、油料等农产品，煤炭、原油等燃料，钢、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不能硬性地过早取消双轨制。这些产品，如果没有市场调节这一轨，整个经济就无法搞活，特别是占工业产值四分之一的乡镇企业就无法生存；但如果没有国家定价这一轨，就会造成包括人民生活必需品在内的众多产品的价格全面暴涨，物价上涨就无法控制，并将大大提高整个工业生产成本，使我国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很快丧失竞争力。价格双轨制是我国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市场远未发育的情况下，硬性取消看来是行不通的。既然双轨制在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就必须强化管理和监督，减少混乱现象，尽量限制它的弊端。这是对国家宏观调控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工资制度和社会分配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价格改革过程中，必须保证绝大多数职工生活水平不下降，并能随着生产的发展有所改善，这是我们既定的方针。工资制度要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着重克服平均主义。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医疗卫生工作者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待遇偏低的问题，要有计划地解决。有些新办的国有公司，工资待遇过高，国家要加强管理，严格控制。对合法的高收入，要通过税收加以调节。对一切非法收入，必须依法严加取缔。

深化改革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必须互相配套。价格改革不应当也不可能离开其他方面的改革而孤军深入。在多方面的综合改革中，必须特别注意认真贯彻执行企业法，深化企业改革，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它们真正建立起在国家宏观控制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机制。有了这样的机制，企业的经济效益就能提高，消化能力就能增强，轮番涨价和比价复归的现象才能避免，国家的宏观调控也才能更加奏效。明年，价格改革的步子应当放慢，企业改革则必须抓紧，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化。

一是进一步推动政企分开，使有条件的企业真正放开经营。目前严重影响企业活力的，主要是：应该下放给企业的权力被部门或地方截留；各种各样的行政性公司或中间环节对企业进行种种限制或盘剥；四面八方对企业的摊派名目繁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给企业造成更好的外部环境，关键是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今后，政府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要求应当是：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履行合同。对违法的，偷税漏税的，不执行合同的，必须严肃查处。国家不干预企业的正当经营，也不包它的亏损。企业放开经营，可以首先在那些全行业产品供求大体平衡的国有企业，以及县属国有企业中推行。

二是认真完善承包制，逐步推行股份制。企业改革，我们已经走了两步。第一步是放权让利，对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步是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普遍推行企业经营承包制。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当前要继续搞好企业承包的配套、深化、完善、发展，包括真正引进竞争机制，优化劳动组合，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大力促进科技进步。要注意借鉴和吸取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有益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要认真研究，逐步推行。我国国有企业决不走私有化的道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不是私有化，而是把笼统的、不够明确的产权变为比较明确的产权，以利于促进企业机制和企业行为的合理化。发展企业集团是一件好事，应当通过自愿联合、兼并、改组、参股等方式进行，切忌硬性捏合。推行股份制和发展企业集团，都应进一步试点，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规定明确的政策界限，不要一哄而起。

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企业，整个企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办好企业，要靠经营者和工人共同努力。既要保证企业经营者独立行使经营权，又要保证工人能够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经营者的管理权威和工人的主人翁作用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在深化企业改革的各项工作中，都应当掌握并体现这个原则。

全面深化改革，还包括计划、劳动、商业、物资、外贸、财政、金融、投资等各个方面。特别要抓紧推进那些对治理通货膨胀有重大作用的改革。加快出售公房，逐步实现住房私有化，坚持数年，有可能回收一批巨额资金，并有力地促进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有领导、有步骤地公开出售国有小企业的产权，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发行股票，可以将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抑制市场商品价格的上升，还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益好的方面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以上这些改革，同有偿转让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一样，都不会

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恰恰相反，可以充分利用社会游资，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于国有益，于民有利，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切实抓紧抓好。

三、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

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全党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党的领导作用、核心作用和保证监督作用，必须切实加强。党的每一个基层组织，都应该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在群众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全党要有铁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级组织服从党中央。过去，我们依靠这些政治优势，战胜了许多比现在严重得多的困难。现在，我们必须继续充分发挥这些政治优势，从严治党，强调党的作用，强调党的纪律，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同心协力，克服困难，为实现这次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而奋斗。

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能否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的关系。近几年来，中央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这是正确的。今后，中央仍将尊重和照顾地方的利益。但是，应当属于中央的权力，必须集中，不得分散和削弱。各地方，各部门，都有责任维护和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这种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不能模糊，更不允许颠倒。在治理经济环境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全国的经济环境是一个整体。中央财政过不去，全国日子都不好过。货币控制不住，全国市场都会受到冲击。治理环境，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忍受一定的痛苦，作出必要的牺牲。越是困难，越要同舟共济，不能各顾各，各行其是。更不能做于局部有利而于全局有害的事，搞什么“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近几年来，各地兴起了一股攀比之风。真要比，应该比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实绩，这对全局和局部都有利，中央是赞成和支持的。但是，决不能盲目攀比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更不能竞相攀比楼堂馆所、工资福利和涨价收入。这种攀比，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此风不止，中央的决策和宏观的调控就无法贯彻。各级党组织都是党的组成部分，都必须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执行党中央的号令。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最近，小平同志在谈到治理经济环境时指出：党中央、国务院要有权威，没有这个保证不行。措施定下来，要坚决执行，宁可从严，不可从轻。就是过分一点，也得这样做。政治局认为，今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对于顾全大局、模范地执行中央政令的党员和干部，应该给以支持和表彰；而对那些不顾大局、自行其是、目无组织、违反纪律的党员和干部，必须严肃处理。我们一定要用事实使全党同志特别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党的纪律是一定要执行的，决不能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政治局相信，我们党的绝大多数领导骨干，都能认清形势，认清自己的责任。能否以大局为重，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决策，这是当前对领导干部党性的最实际的检验和考核。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要紧密结合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来进行。

最近，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纪律、维护改革大局的紧急通知后，各级党组织立即传达，把广大党员动员起来，对刹住提款抢购风起了重大作用。经验再次表明，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能否起作用，关键在于上级党组织抓得紧不紧。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党是一个有战斗力的党，绝大多数党员是守纪律的，在关键时刻是能够起作用的。重要的是，党组织必须讲清道理，讲清形势，把任务和要求及时地明确地告诉大家。重大改革措施出台时，一定要首先并着重做好党员特别是领导骨干的工作，使他们心中有底，便于他们向群众做工作。在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任务面前，一切共产党员都应当诚实劳动，增产节约，艰苦奋斗，严守法纪。一切违法的事情，都不能做。一切中央明令禁止的事情，都不能做。如果连这些要求都做不到，就没有资格当共产党员。这也是对共产党员党性的最实际的考验。

总之，当前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要牢牢掌握两条：一是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切实保证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的胜利；一是通过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的实践，切实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提高党员的觉悟。

用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广大群众，也是我们党历来的政治优势。我们的力量在于群众。当前，要以治理环境、整顿秩序和深化改革为中心内容，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形势教育。广大群众是拥护改革的。群众中意见最多的，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物价上涨，二是社会分配不公，三是党政机关中的某些腐败现象。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工作逐步解决的，也是可以说清楚的，应当在形势教育中使大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改革十年的巨大成绩，要如实地向群众讲够。我们面临的种种困难，要明明白白地向群众讲透。克服困难的办法，应当同群众一起商量。要求大家完成的任务，应当向大家交底。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为什么提倡，为什么反对，都要把道理讲清楚。对群众提出的疑问，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一一加以分析和解答。这样的形势教育，是最现实、最受群众欢迎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掌握了真理，大家齐心来干，我们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要把这次形势教育作为我们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的起点，并从此经常坚持下去。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得实际，生动，有吸引力，有说服力。要彻底抛弃过去在“左”的路线下形成的脱离实际、形式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要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在党政分开的条件下，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企业、农村、学校、机关，对象不同，思想政治工作应从各自的特点出发，认真总结经验。这次提请全会审议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就是这种探索在企业范围内的初步总结。思想政治工作，不但宣传工作干部要做，全党都要做。全党干部，全体党员，包括从事全面领导工作的同志和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都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领导工作和群众工作的一部分，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作出贡献。

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是现阶段党的建设中一个极为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从历史的经验看，一个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的一定阶段，法制、规则和各种秩序尚

未确立，政权机关往往难以避免发生各种腐败现象。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共产党的领导，党和政府应当而且有能力约束自己的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使他们奉公守法，为政清廉，从而把各种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决不能听其泛滥。十三届二中全会郑重地提出必须保持党政机关廉洁，表明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严肃的。共产党员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能否做到为政清廉，就是这样一种考验。我们既要学会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游泳，又不要被腐化的漩涡所吞噬。目前，发生在某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受贿、勒索、倒买倒卖紧俏物资，以及挥霍公款、奢侈浪费等等，是群众最痛恨的。影响所及，已经不只是党员、干部个人的品德问题，而且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失掉人心。近几个月来，各级党委、政府已经行动起来，做了不少工作，包括尽可能公开办事制度和办事结果，建立各种举报中心，完善有关制度和纪律，查处违法乱纪案件等，都取得了好的效果。最主要的经验，一是要把廉政工作真正提到领导机关的重要议程上来，不能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二是要提高办事的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三是要切切实实进行制度建设，使行政管理工作一步一步走上规范化、程序化，使弄权营私者无可乘之隙。各地在廉政方面已经开始的试点和其他各项工作，都要坚持进行下去，做到办一件，成一件，整一片，治一片。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十三大提出的原则，扎扎实实地推进。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都迫切要求保持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政治局面。必须妥善地处理社会矛盾。要总结近年来处理局部性风潮的经验教训，努力扩大基层民主，认真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学会在民主和法制的范围内解决可能出现的磨擦和冲突，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为了确保社会稳定，不排除在必要时采取强硬措施。力求不出乱子，出一点乱子也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和建设，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必须坚持。我们固有的政治优势，必须继续发扬。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要坚持党政分开，使党组织从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更好地加强和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保证监督作用。要理顺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使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都能依法行使自己的职权，并进一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行政权威。要完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我党同各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之间更加亲密的合作共事关系，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这些根本道理，应该使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懂得。牢牢掌握这些宗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进展得更加顺利，经济环境的治理、经济秩序的整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也就有了坚强的保证。

关于形势教育问题*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摘要。

前一个时期，全军结合传达贯彻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普遍进行了一次形势教育，收到了一些效果。但从部队反映看，还有许多认识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形势教育还需要持续地进行下去。人们对形势的认识，并不是一次教育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例如，前一个时期，由于物价上涨、分配不公和某些腐败现象，在人们思想上引起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而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治理整顿贯彻下去，又出现了新的认识问题。所以要不断地进行形势教育。不仅军队，在全国都要认真地进行形势教育。但是，很多地方和单位还没有真正把形势教育抓起来，因此迫切需要引起各级领导的进一步重视，不断总结经验，真正抓出成效来。

开展形势教育，实质上是要结合当前实际，对干部战士进行关于改革开放这一总方针、总政策的再教育。改革开放是我们的总方针、总政策，这是十三大提出来的。这不是一时的政策，而是一个长期的总的方针、总的政策。形势教育，实质上就是进行十三大确定的路线的再教育。

形势教育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改革十年来，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问题是主要的？要使干部战士正确认识十年改革的成绩，增强对改革的信心。过去有一种说法：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这个话也对。但是现在看来，不重视把成绩讲清楚也是不行的。特别是涉及到国家的形势，涉及到对改革开放这一总方针、总政策的看法，更不能不把成绩讲清楚。不实事求是地讲清成绩，人们就看不到光明，得不到鼓舞，也就不能增强信心和凝聚力。现在，存在着一个凝聚力的问题。如果一天到晚总是渲染阴暗面，散布灰色情绪，人心就涣散了，本身就会成为极大的不安定因素，这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有些同志总有一股子情绪，只愿意讲阴暗面，不愿讲光明面。这样搞，即使动机是好的，效果肯定是不好的。现在看来，一个国家，并不一定人民生活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社会就一定越来越安定。有一些国家，生产发展很快，人民生活也不错，但国家非常不安定。这种事例，在国际上并不鲜见。就我们国家而言，如果不加强领导，不通过教育引导人们认清成绩，看到光明，那么，也可能经济越发展，生活越改善，民主越扩大，人们的不满和牢骚反而越多。事实已

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说，经济的发展常常并不能自动地带来人们的满意和社会的安定。当然，经济情况好，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但是，如果其它方面做得不好，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形势教育和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是必要的。

形势教育还必须解决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的性质，认清出现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出现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这些问题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的。无论是暂时的通货膨胀，还是党政机关的一些不廉洁现象，还是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单就这些问题本身而言，都是消极的，都是坏事，有些甚是在我们国家早已消除了的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但是，我们还要看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它们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借着新旧体制交替之间的漏洞和不完善之处而产生的，它们也将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消失或减少、减弱。尤其应当看到，与这些问题同时存在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局面，是各个领域生机勃勃的发展，是诞生中的新体制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发展中的问题同衰败中的问题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衰败中的问题是不可克服的，不可救药的；而我们面临的这种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是可以克服的，而且正在克服中。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这些问题正在采取措施，进行大量的工作。现在看来，很多问题是在破除旧秩序中间，新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建立新的秩序。

总之，经过形势教育，要使干部战士认清我们的改革既有成绩也有问题，比较而言，成绩是主要的；其次，认清我们的问题，其性质是前进中、发展中的问题。这样才不致于迷失方向，不致于对改革开放发生动摇，从而使干部战士增强对改革的理解、信心和支持。

这次形势教育，还应当引导干部战士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使他们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学会用历史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分析的观点看形势。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例如，我们面前的制度、体制、经济技术条件以至人们的传统观念，都是历史形成的，我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建设，不可能脱离客观条件，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得那么完美，那么合乎理想。改革是我们的希望，改革的成功将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示出来。同时又必须认识到，改革没有现成的可以照搬的经验，改革需要探索，不可能一帆风顺，困难和曲折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大家对改革的困难越理解，越能同心同德地去承受它、克服它，我们付出的代价就越小，渡过困难所需要的时间就越短。这里关键是引导大家摆正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的关系。改革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将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但生产的发展只能是逐步的，人们也不可能同时获得同等的利益。在某个时候，有些人甚至暂时失去一些利益。这就要求人们自觉地以个人眼前利益服从整体长远利益。在形势教育中，要人情入理地向干部战士讲清这些道理，以增强人们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

最近越来越感觉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进行这样深刻的一场改革，人们的

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比较差。可以看出，人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比较低，固然与改革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关，但同时也反映了思想和理论准备不够。现在较为普遍的是人们对这场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缺乏思想准备，对在改革中间会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甚至会出现某些痛苦和利益变动，思想准备不足。而另一方面，对改革可能带给每个人的实惠，期望值又过高。所谓实惠，就是立竿见影的利益。现在，对为什么要在中国进行这场改革，不少同志认识不那么清楚。改革当然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但我们中国所以要进行这样一场改革，最主要的还不在于马上会给人们提供多少实惠。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社会主义国家一开始发展、进步是比较快的。社会主义一度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有相当的吸引力。在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还是这样，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很多优越性。但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越来越显得社会主义原来的那种模式对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束缚。为什么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改革，就是这个问题的反映。不改革，就无法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改革，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竞赛中将会掉在后边。根本的问题，还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那么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旧模式的问题。不要把社会主义的某种模式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混为一谈。我们要通过改革，建立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新体制，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要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理解改革，不能只从眼前实惠的观点来看待我们这场改革。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但是，他们现在的结论，都不是要停止改革，更不是要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而是要进一步进行更大的改革。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我曾同外国人讲过，社会主义国家今天不改革，将来也得改革，越改在后面越落后，总是要改的。原来的模式将会越来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我们有了这种精神准备，就会认识到这场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就不会因出现某些困难而犹豫，坚定性和承受能力也会大大增强。

在形势教育中，要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十三大对这些科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我们要结合形势教育，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入人心，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生产力标准的观点、商品经济的观点深入人心。用这些理论武器去观察分析我们面临的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才能统一人们的思想。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思想建设。

总之，无论是军队，还是全国，形势教育都要注意解决这么几个问题：一是正确认识改革的成绩与问题，特别是问题的性质；二是要用正确的方法观察形势；三是提高对改革的认识，解决干部群众对改革思想准备不足的问题；四是要用十三大的理论来武装头脑。

肃贪工作必须有制度有机构*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北京市东城区廉政工作汇报时的谈话。

城市管理分工过细，部门很多，各管一套，遇到问题就会互相推诿。香港警察管的事比较多。人家怎么管的，要考察考察。城市管理，部门过多，不便监督。谁来管，怎么管，要好好研究。

执法人员要有手段，又要受监督。老百姓和执法部门发生争执，要有地方仲裁，民可以告官。要使受害者有申诉的地方和部门。

商人有钱无权，执法部门有权无钱，因此就发生权钱交易，拿权去换钱，政府就贪污受贿，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我们过去搞产品经济，一是分配上平均主义，二是高度集中，所以就不产生这些问题。现在发展商品经济，情况发生了变化，腐败现象容易产生，所以必须相应地有一套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迫切需要解决反贪污受贿问题。要有反贪污受贿的机构，要有一批专家和特殊手段。趁中国贪污受贿分子经验不多时赶快搞。廉政也好，肃贪也好，如果没有有力措施和手段，解决不了问题。设立了举报中心，如果搞不出案子，一年以后就没有人相信了。不搞则已，要搞一开始就要把信誉建立起来。举报中心要真正起作用。

监察部门要抓反贪污受贿。如果别的事没办好，这件事干好了，也是好成绩；如果什么事都干一点，这件事干不好，就是不及格。

我们过去搞运动，几年一次。现在环境变了，运动不搞了，保持廉洁必须有制度、有机构。光有制度没有机构也不行。公开办事制度开始很新鲜，但制度公开后，有的人不照办，又没有机构去监督，群众就没有信心了。不靠群众运动靠制度，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的机构。

当然你们东城还是按你们设想的去搞，我今天讲的不是一下就能办到的。

总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肃贪就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能促进经济繁荣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保持廉洁。如果繁荣而不能保持廉洁，最后繁荣也保持不住。当然也不能只要廉洁而不要繁荣，那又是走老路，也维持不下去。

既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要经济繁荣，又要廉洁。同贪污

受贿作斗争，必须赋予反贪污受贿的机构很大的权力。监察部和检察院之间要协调好。纪委、审计署、检察院、监察部四个部门要协同动作，集中力量同贪污受贿作斗争。

你们说的两大措施，公开办事制度和设立举报站，都很重要。但要真正搞好，并不那么简单，必须有一系列配套的东西。有了办事制度，是否真正执行，需要监督检查。有了举报站，是否真起作用，也要有人去查，总之，不能使这两个新的东西变成形式。

物资部门在价格“双轨制”下要有一套反腐蚀的办法*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物资部部长柳随年工作汇报时的谈话。

一、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问题大、弊病多，原来想取消它，现在看不可能。对此要看远些。许多初级产品，较长时期还会供不应求，完全放开将要年年涨价，有些产品可能会涨得没边，甚至要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已确定不取消“双轨制”，这就要研究一个问题，即在“双轨制”条件下如何加强管理，如何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要下大力量来研究。物资部门是个集中受腐蚀的对象，你们要有一套反腐蚀的力、法，要做出明确的规定，譬如：干部的亲戚朋友、老领导、老同事介绍来要办的事，不予受理，一律按正式手续办。办法制定后，要在报上公布，要贴在办公室里，增加透明度。这样你们也就好办了。同时，还要有单位监督你们，内部也要有监督办法。

二、要研究如何改善供给的问题，不能仅仅理解为增产一般适销对路的产品。日本有人向我们提出，要特别注意加强基础工业建设，包括原材料、燃料动力、运输等，这个意见是对的。即要制定倾斜性的产业政策，我们现在缺这个。同时，在税收、信贷、物资供应等方面，也要相应跟上去。

改革开放是我们确定的长期方针*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代表团时的谈话。

我很高兴能够见到来自五大洲的朋友们。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与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召开了第八次企业管理国际讨论会，可以说这是一次全球性的企业家的盛会，我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今天见面，看来还要回答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大家最关心的是哪些问题？我想到的是：我们现在治理经济环境对改革有什么影响，中国的改革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十年来我经常向朋友们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朋友们对改革、开放政策问题有疑虑。自从我担任总理后，已经历好多次了。一九八一年，在我担任总理的第二年，经济出现了问题，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我们不得不进行调整。那次调整比较大。例如我们从国外引进的很多设备，那时不得不封起来，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搞那么多项目。当时在国际上就引起了很大疑虑。特别是日本朋友，他们以为我们要撕毁合同，但后来他们都看到经济调整的负担全部由中国承担了。例如宝钢合同经解释后，对方还是同意延期了。我们在很困难的条件下维持了合作。那次虽然调整很大，但外国朋友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

第二次调整也比较大。当时中国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年一月，我正在美国访问，差不多每次招待会或宴会上，美国朋友都提出这个问题。那时有很多传说，说中国反对精神污染，妇女不能涂口红、戴耳环。我告诉他们，不会有这种事，你们可以亲自到北京看一看嘛。大街上妇女涂口红、戴耳环的有的是。当然后来他们的疑虑打消了。

还有一次比较大的调整。前年底、去年初，中央人事变动。我们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国外引起了怀疑，国内也有很多人怀疑。他们认为胡耀邦总书记是主张改革的，他不当总书记了，就标志着改革的政策变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中央领导与外国朋友见面，总是要做解释。

以上是我记得的几次比较大的调整。可能还不止这些。对于国外的朋友经常产生“中国的改革政策会不会坚持下去”的问题，我们很理解。因为十年以前，中国确实有问题，发生过突然的变化，容易使人产生疑虑。

我叙述这一段历史，也是为了告诉朋友们，改革开放是我们确定的长期方针。我们把它叫做总方针、总政策，不是具体的方针、政策。它管的时间很长。

我们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如果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算起，大概要到二十一世纪五十年代。在这个阶段里，我们为自己制定的方针有两个基本点，一个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改革开放。这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奉行的政策。这个总方针、总政策决不会因为暂时的政治、经济的变动而变动。一个国家政治上、经济上在一个时期有所变动，是经常发生的。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变动。在座朋友的国家很多都是多党制。竞选总统，每四、五年就要变动一次。在座美国朋友不少吧，再有六天美国就要换总统了。所以在你们的国家，内阁改组是经常发生的，经济上的变动也是经常发生的，利息有时高，有时低。我相信这种变动不会影响你们国家总的发展方向。我们国家过去十年是这样，今后也还会这样。我是以十年的历史、经济发展过程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今年我们提出明后两年主要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这个问题，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1]同志已经做了详细介绍，我就不想多占用时间了。简单地说，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短短的十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座的，过去来过中国的朋友们也像我们一样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们确实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问题，但不是严重的问题。请注意我没有用严重这个词，我用的是“明显”，在经济学中大概没有这个词。我为什么要用“明显”呢？因为中国人都感觉到了。但这些问题与国际上其它国家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的通货膨胀不过是17—18%，现在是15--16%，到年底可能会达到16%多点。巴西总统访华时，我向他请教过，为什么我们的物价指数上涨16%就承受不了，而你们的通货膨胀率是200%，你们还不觉得什么？总统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说，你们现在的通货膨胀率是我们国家努力的目标。所以国家与国家的情况确实不同，中国人有储蓄的习惯，银行有大量存款，物价上涨后，储蓄大量下降，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现在虽然还不能叫严重，但是要认真治理。

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我国的经济过热。北到松花江，南到云南，东到上海，西到甘肃、新疆，到处大兴土木，百废俱兴，这样的大规模建设，任何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时都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另外经济增长速度太快，从前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今年大体上也会达到这个数字。这样的速度和建设规模带来了需求过旺。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膨胀，但都不表现为物价上涨，因为那时的物价由国家统一制定，所有的产品都是统一定价的，所以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表现为有钱买不到东西，大量的建设工地停工待料，人们买东西排长队，但物价是稳定的。现在不同了，虽然物价是比过去高了，但有钱就可以买到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压缩。我曾讲过，这是旧体制的弊病在新经济情况下的反映。进一步放开物价，这是我们的目标。经济改革就是要放开物价，靠市场调节。如果通货膨胀不能制止，放开物价就困难。所以要治理经济环境。压缩经济膨胀的目的还是为了放开物价。我们虽然改革十年了，但旧体制还在起作用，新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企业还不能真正自负盈亏。现在治理通货膨胀，一是靠继续深入改革，一是治理经济环境，这两点正是为了进行全面经济

改革做准备，这是物价放开的基础。

中国不存在走回头路的问题，中国走回头路没有条件，也没有群众基础，当然中央领导更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国家不改革没有希望。十年改革证明，改革能使经济得到发展。在十年改革取得这么大成绩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走回头路呢？不可能！治理经济会不会影响改革的政策呢？从长远观点讲，中国采取的措施不会影响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恰恰是为了与国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当然从具体年度来讲，哪一年步子迈得大一些，哪一年步子小一些，贸易规模小一点，各有不同。比如说这两年要缩小建设规模，引进先进设备和资金可能受发展速度的影响。但已签定的对外合作合同一定会切实履行。增加一些新项目，如引进外资，先进设备还是有可能的，还会继续签一些合同。这里我要说一点，中国很欢迎外商来华办独资企业，因为现在中国资金困难，要收缩，但独资不影响收缩。还有，能不能发展另外形式的合资？在中国原有企业基础上发展合资，以中国的厂矿设备作为投资，国外增加股份，我们可以提高技术，好处是不需要增加更多的资金，周期短，见效快。北京有一个中美合资的吉普车厂，效果很好。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在中国原有的树上嫁接外国的技术、设备和资金。中国有很多企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我想也可以成为合资企业的形式。总的来看，所采取的措施，丝毫不影响对外合作。但在一定时间内，某些项目不搞那么多，不是由于政策改变，而是由于我们存在着实际困难，中国没有那么多资金。顺便说一下，今年春天，中央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虽然时间不长，但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沿海发展战略也会继续下去，不会改变。要利用沿海地带逐渐发展，将经济逐步推向国际市场。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不仅有利于沿海的发展，也可以带动内地发展。中国的发展战略不仅对中国发展有利，对世界经济发展也有利，首先是对亚太地区发展可以助一臂之力。

谢谢大家。

注 释

1．高尚全（1929—），上海嘉定人。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国家体改委副局长、局长、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农业发展关键靠政策、靠科技、靠投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形势，要有个正确的分析。总的说，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应当盲目悲观。悲观没有根据，也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我们对农业面临的困难和制约因素，要认真对待，积极解决；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许多有利条件。不但整个农业的开发潜力很大，就是粮食生产同样也有很大的潜力。从开发性农业讲，我们还有很多资源，这是没有异议的。就从粮食生产来讲，虽然耕地少，但在相当一部分地区，提高单产还是有潜力的。今后粮食总产量的增长，不要说更多，只要每年提高2%，到本世纪末就能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而每年增长2%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今后农业的发展关键要靠政策调动积极性，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以及靠增加投入。主要靠这三条。

一、靠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总的是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发展多种形式的生产服务。家庭承包制、家庭经营形式，需要在稳定的条件下，加以完善、充实、发展。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项目，承包和经营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因地制宜，不拘一格，顺乎自然，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优选，只要有利于生产，当地群众又欢迎，这种形式就可以发展。城市郊区和沿海地区土地规模经营问题，有条件的可以搞，只做不说，不登报宣传，没有条件的不要勉强。在农副产品流通中，要重点抓好粮食合同定购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定购粮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取消，但要采取多种方式使种粮的人有利可图。完全放开没有条件，只靠行政命令也不能持久，所以粮价还要逐步调整。如果粮食同生产资料挂钩是个好办法，可以逐年增加挂钩数量。总之，农民要有义务观念，国家要注意照顾种粮农民的利益，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在这方面采取措施。

二、农业生产下一步的突破点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农业科技要大力开发新成果。可以推广的现有成果也不少。总之，在发展和运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需要下大气力。

三、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要靠增加投入。要采取措施增加化肥、农膜、农药等农用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近年内要保证化肥的进口。安排经济发展计划，必须考虑加强支农工业，尤其是化肥工业。在一些老产粮区，只要合理改变一下化肥

结构，由单纯使用氮肥改为多用复合肥，粮食生产就可以再上个台阶，大量增产。山区、高寒地区，如果能广泛使用薄膜，单产也会明显提高。从长远看，把农业的基础建设和农用工业搞上去，对农业的发展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坚持做好，扎扎实实地抓下去。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切实际的要求，对工作也不要进行不切实际的责备。不能指望什么人突然想出一个好办法，就能搞到全国粮食多得放不下。不会有那种奇迹。但是，靠上面讲的那样一些政策逐步地搞，我国农业还是可以稳定增产的。至于将来，到下个世纪，15亿人口会怎么样，这些更长远的事，可以议，学术界也可以讨论。社会、经济、科学、技术都在进步，人类的事情总会有办法，总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可以从长计议。

明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抓好明年的农业生产，增加粮食等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在实施党中央、国务院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部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各地区、各部门要千方百计做好工作，争取来年农业有个好收成。我们有这个条件。除了其他条件之外，还有一条，就是已连续四年粮食产量基本没有什么前进。明年不是在大丰收的基础上争取更大的丰收，而是在连年徘徊的基础上提高，这应当比较容易。只要我们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包括把教育农民的工作搞好，争取明年有个好收成是可能的，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

在会见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菲雪[1]时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很高兴会见副行长先生。我们和世行之间多年的合作不错，合作项目也很有成果。世行对中国经济的几次调查研究对我们很有帮助。这次听说你来参加一个高级宏观经济管理研讨会，我们对此很有兴趣。现在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很想听听副行长先生的见解。

菲雪（以下简称菲）：非常感谢你，总书记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说，在此见到你是我的很大荣幸。我过去长期颇有兴趣地注视着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当你们一九八七年决定走新的路子后。如你所知，世行认为过去八年与中国的合作是世行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科纳布尔[2]行长请我转达向你的问候。他也请我告诉你，世行认为与中国的合作不仅重要，而且很有意义。世行认为，关于中国经济的两个报告是世行形成对中国看法的重要文件。我们正在准备的这个报告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控制通货膨胀问题。这将在这次的研讨会上讨论。

赵：我们之间有13个专题研究的合作，又有25个专题研究，这是其中的一个吗？

菲：这是25个专题之一。关于通货膨胀，短期来说，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你们几个月前决定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定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正确的。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碰到通货膨胀问题，有的国家决定在通货膨胀达到20%之前就加以解决；有的国家则设法伴随着通货膨胀前进。巴西就是后者的例子。开始几年取得了成功，但后来巴西遇到了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很难治理。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要平衡发展速度和通货膨胀这一困难问题。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是个长期的任务，不是能一劳永逸的事情。中国现在决定在放权的同时加强经济管理是正确的。控制总需求是极为重要的，这样才会在放开部分价格时不引起通货膨胀。如果能在需求和供应之间保持大致平衡，放开一部分价格对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是小的。反之，如果放开价格的时候，总需求仍然增大，这就会引起较大的通货膨胀问题。除此之外，并没有理由说明改革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问题。中国近二、三年中所面临的短期问题和五、六年后可能碰到的中期问题是不同的。短期内一般难有有效的宏观手段来控制通货膨胀。看来投资过猛是造成通货

膨胀的直接原因。只有通过控制投资这一手段才能制止通货膨胀。但同时，要逐渐建立起货币和财政控制的手段和机制，从而避免使用直接控制手段。就货币控制而言，从这几天的会谈和我们世行的研究表明，你们只要严格执行现行的办法就会生效的。但要防止省一级当局通过各种途径超过原来的信贷指标。我读过你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这是个十分重要和正确的报告，思路深刻，重心对头。两年之后，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金融市场来控制通货膨胀，特别是建立全国性的银行体系和全国货币、债券和股票市场。一旦做到这一点，就可在中央控制货币发行量，从而影响利率和投资。要在解决通货膨胀的同时发展金融市场。在其它国家，宏观管理的另一手段是财政政策。由于改革放权，地方政府的权限和自主权大了，这给中央执行财政政策造成了困难。现在的体系中，税率和税收额是通过中央和地方的谈判来决定的，这给每年的中央财政平衡造成困难。当然原来下放财权是有理由的，今后几年有必要适当收回已下放的一些财权。在省一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也有紧密的联系，需要有很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预算赤字是造成货币发行过多的原因之一，现在省当局有可能通过其它途径找到信贷，这给人民银行造成压力。概而言之，宏观经济管理中最为重要的是货币政策，这是和信贷控制紧密联系的，此外还有财政政策。在中期，有必要对这两大政策体系进行调整。

赵：我们财政还有个问题，中国地域非常大，如果在税收上地方政府持不关心的态度，我们的税就收不上来。当然可以采取分税制，把难以征收的税种划给地方。但作为中央主要收入的那些税种，如地方完全不关心的话，不知是否产生影响，我们现在还无把握。这就是为什么财政税收政策演变为中央和地方的包干制度。中国的法制还很不健全，地方政府的行为往往有很大影响。

菲：就中央和地方的分税政策，正如赵总书记所表明的，许多国家的税收体系就是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各级政府征收不同的税种。以美国为例，地产税、销售税是地方税，所得税是联邦税。这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就分成而言，既使地方遵守规定，大多数的税收还是留给地方。现行体系是否为最好的办法，仍待研究。短期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政治问题。就长期而言，政府对向哪个方向发展需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将取决于中央和地方讨论的结果。

赵：关于通货膨胀，我们现在遇到这么个问题，中国由于长期的价格扭曲，价格改革不可避免地造成物价相当大幅度的上涨。这种供小于求的问题是我们多年实行产品经济积累下来的。物价放开，需求大于供给是否能得到控制，不仅取决于当年的供求状况，还取决于多年形成的供需矛盾。这表现在人们中间有大量的储蓄存款。物价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物价上涨，这就有一个储蓄利率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实际利率是负数，因此今年储蓄增长下降，这也是今年货币发行过多的原因之一。我们从一九七八年以来，大概是这样的，货币发行，一部分通过商品回笼资金，另外一部分通过银行储蓄收回。居民储蓄相当大，如果这一部分发生了问题，那对通货膨胀就会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提高

储蓄利率，但同时又要相应提高贷款利率，这又会推动企业成本上升。解决办法，除采取压缩总需求，压缩投资和基建，降低发展速度的传统办法之外，还有储蓄利率和贷款利率这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解决的问题，现在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不一致。

菲：如赵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价格放开本身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只是在需求过度时才会造成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的二、三年里要严格控制总需求。如能做到这点，放开价格并不会造成过高的通货膨胀。在这方面，对你十三大报告中的分析，有一点我有不同意见，这就是关于价格放开这个问题。你在报告中提到先放开长线产品，然后放开短线产品，这样你先解决容易的问题，而把困难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最好是既放开长线产品，又放开部分短线产品，从而使两者得到平衡。其它国家有过这样做的成功例子。关于储蓄问题，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人们手头持有大量的货币等待购买商品。重要的是创造人们可以拥有其它资产的机会。某种程度上，这可通过提高储蓄利率来实现。出售住房的建议是解决人们手头储蓄过多的一个好主意。因为在许多国家人们储蓄的大部分用于购房，如有这一可能的话，就可稳定住储蓄。提高贷款利率，肯定会造成成本上升。但你不得不面临这一个问题，因为在一个银行体系内存贷利率倒挂是不可行的。如果银行支付的存款利息很高，几年下来，政府就得提供补贴，这本身也会带来通货膨胀。因此，要适当提高利率，开始略为提高一点，最终几年达到3—4%的实际利率。各国在对付通货膨胀时有这么一种倾向，短期中对产品提供补贴，但这使长期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变得更难。

赵：我们国家的通货膨胀还有其特殊性。西方有一些对付通货膨胀的力、法，如提高利率就很有效。我国除需求大于供给造成通货膨胀外，还有因为长期的产品经济体制正在向商品经济转换中的情况。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我们收紧银根，利率上升，企业的成本就会上升；但如果有竞争的制约，企业就不敢随便提价。但中国没有竞争，因为企业改革不深入，没有竞争的制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确定了一个方针，即物价上涨必须保持在一个适当的可以承受的水平。我想，如果物价上涨不超过两位数，即低于10%，许多问题就容易解决。尽管物价每年上涨，会造成通货膨胀预期。但如果银行储蓄利率能大致保持在10%左右，居民的银行储蓄就能得到稳定。中国人有储蓄的长期习惯，别说3—4%的实际利率，只要有1%的实际利率就可以了。如果维持1—2%的实际利率的话，企业的信贷就比较容易解决，这就不致于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带来我们现在还不能承受的社会问题。这对成本推进造成的通货膨胀也会有限制，充其量不过是1—2%。这能使我们赢得时间。我们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第一，住房私有化；第二，小企业拍卖。我们国家公有房产价值可能有几千亿，是相当大的一批国有财产。如能卖出500亿，就能解决不少问题。还有大量的小型企业可进行私有化。至于大、中型国有企业，可搞部分股份化。这样就可收回人们手中的节余购买力，使之分流，从而减少市场压力。但住房私有化和小型企业拍卖短期内不能产生太大的效应。因为中国人没有买房子的概念，不买房子也可以有房

子住，为什么要买呢？因此要提高房租，这又要相应增加工资，但在现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提高工资，人们不一定马上去买房。实现住房私有化是可能的，但这是个渐进过程，需要多方配合。在这些措施发生较大的效应之前，如果过早或过多地放开物价，带来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压缩基本建设总规模，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储蓄的原因，创造条件，为着手研究上面提到的改革措施做准备。而这些，没有时间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在我们处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治理通货膨胀既要采取其它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又要和新旧体制转换这一特点结合起来，否则许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一些外国朋友经常跟我们说，你们的政府可以说很穷，也可以说很富。中国政府除拥有大量的公房和企业外，还有大量的地产，从中可以回笼资金，但要做大量的配套工作，包括人们观念的转变，而这在一、两年内是收不到效果的。今年开始卖公房了，总的来说，出售的房子很少，回收的资金也只有几亿元。

菲：利率推动企业成本的问题，我认为，对企业来说这个因素往往会被夸大。利率提高对企业的成本上升造成的影响是一次性的，但不会造成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利率每提高1%，总的来说，企业成本的上升远低于1%。就你提到的关于企业需花多少时间才能吸收利率变化带来的影响一事，我认为，这取决于企业根本性改革的深入进行，取决于谁是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国际经验同你刚才所说的是一致的。如果通货膨胀率不超过10%的话，局面就不会失去控制。另外，关于继续推进价格改革或是等一等，我认为一方面要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控制总需求，从而减少总需求压力；另一方面要继续放开价格，其原因是，你刚才谈到的问题有许多是由于价格控制的结果。你不能进行企业改革的原因，是由于不能让它们承担成本增加带来的负担，因为它们现在没有权力定价。这样拖延了价格改革，从而使以后的通货膨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我们的分析中尚看不出储蓄到底有多大的重要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有必要出售公房，回笼货币。人们需要确知，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可以用储蓄来交换其它资产。新旧体制转换过程是非常重要而且困难的。关键的是要冲过这一过渡阶段，而不能等待，否则又不得不再次面临过渡阶段。

赵：我们现在国内对价格改革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价格改革时间不宜太长。如联邦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夜之间从统制经济变为市场经济，帝国马克迅速贬值，从而刺激了生产、改善了供应。我们曾有个方案，估计放开价格之后，市场物价上涨一倍，其好处是不会产生通货膨胀预期，物价猛涨以后每年上涨2—3%。但这样做的风险也很大，我们很无把握，所以不敢采取这一方案。另一种主张是不断地调整物价，从而控制通货膨胀的任务也是长期的。总的说来，在控制物价的同时进行价格改革，使每年的物价水平上升不多，即通货膨胀率不超过10%。价格改革的步骤大小服从于价格指数，如果价格工作做得较好，物价改革进展就快一些，反之亦然。一边控制物价，一边进行物价改革，使物价上升总幅度低于10%，同时进行全面配套的改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明后两年价格改革要放慢，因为明年要使通货膨胀率降到10%以下的难度极大。听说，世界银行

有个预测，认为明年通货膨胀率降到14%以下的难度很大，我赞同世界银行的预测。明年物价不可能下降太多，后年情况会好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明后两年物价改革的步子要放慢，我们不想走得太快，主要是人们手头尚有大量储蓄。如果通货膨胀高于20%，银行的储蓄利息达到23%，所带来的问题就变得难以解决，这就是最核心的问题。在这两种考虑中，我们基本上选择了后一种。不知副行长先生和其他世行朋友的意见如何。

菲：关于这两种意见，我想起你最近见了弗里德曼，他肯定建议你采取第一种意见。但德国一九四八年的情况和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当时，西德有很大的生产能力，只要理顺了价格，生产就可迅速搞上去。

赵：我在此还想补充一点，从统制经济转换为市场经济，西德和日本是成功的例子。但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处于军事占领之下。看来，军事占领下的人民忍受力可能强些。如果政策确实好，人们不接受也只好接受。

菲：当时的西德财长是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经济改革搞好，这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所以经济改革要放慢，但要保持合适的速度，不能太慢。当决定放开价格的程度时，重要的是知道最终的上涨幅度。只要商品生产能增加的话，物价上涨的压力就会减少。如果同时紧缩货币和财政的话，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现在应该有这样的政策。在你的分析中，你认为人们手头的储蓄是极其重要的，这取决于你们所采取的其它政策和利率政策，后者决定人们是否会把钱存在银行。在采取紧缩性政策的同时渐渐放开一些价格的效果会比只执行紧缩政策要好，后者只会使问题在两年以后变得更大，扭曲更为严重。

赵：副行长刚才说的这些看法，我们将认真考虑。你同我们有关各个部门见面时，可更多地了解情况，也可和他们交换意见。

菲：谢谢！作为结束语，请允许我谢谢总书记抽出时间见我。我再次向你保证，世行非常珍惜与中国的关系和有机会继续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我重申一下我的主要意见，在旧新体制转换过程中，建立起能够控制总需求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机制是很重要的。

赵：我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想跟你交换一下意见。我们物价改革的总方向已经定了。这是说绝大多数商品价格要放开，即实行市场调节。但是有这么个问题，是一下全部放开呢？还是有一些产品先进行调价，后放开。美国有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克莱因[3]教授。最近我看到一个他的谈话材料。他的基本论点是：有一些紧俏商品、短缺严重的商品，也可先调价，后放开。还有一位原来的苏联经济学家，现在住在美国，叫里昂梯夫[4]。据说他现在受苏联的委托，帮助苏联搞价格改革方案。我听说他也主张先调价后放开。好像还有这么个主张，先搞批发价，尔后解决零售价。大量的一般商品看来还是放开比较好，有的商品品种多、市场千变万化，完全靠调价有困难。但重要的品种单一的产品，市场供应紧张，可以先调价，等条件具备时再放开，如钢铁、煤炭等，还包括一些有色金属。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虽然我们对外开放，但我们外汇紧张，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有一些建设周期长的产品，如钢铁，如价格放开，价格会上升得很高，但对资源

的配置作用不能很快地发挥，造成某些产品价格长期居高不下，会把整个物价水平抬到不适当的高水平。不知副行长先生有何看法？

菲：我认为供需均衡相差很大的重要产品恐怕还是先调价，然后才放开比较好。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基础产品。调整一种相对价格之后，很重要的是理顺这一调价对总物价水平的影响。但如煤炭提价会对生产有刺激作用，这有助于遏制物价上升。我想你提到外汇紧张时，肯定想到利用进口短缺产品来制止国内物价水平上升一事。可能的时候，可通过适当进口来调剂国内短缺，作为稳定经济的一种手段。

赵：我们现在好多了，可通过国际市场调剂国内短缺。过去我们要从最短线产品的平衡做起，从而使其它产品不能平衡。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进口一部分平衡国内供需状况。如木材只依靠国内供应的话，我们什么建设也搞不了，现在，我们可以进口木材，而过去我们只好在国内资源上进行平衡。因我听说副行长先生是经济学家，对治理通货膨胀很有研究，所以我们今天谈话的主题都是涉及如何治理通货膨胀。关于中国和世界银行的合作，我没说许多的话，丝毫不是说我对合作不太重视。我们非常重视这一合作。我认为我们合作得很好。今后我还会像过去那么重视。我很感谢世行几任行长、副行长和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感谢你们在北京的代表林重庚先生，我同他有密切的工作关系。希望副行长先生回去后转达我向行长先生的问候。

菲：非常感谢你。我将一定把你的问候带回去，让我再次代表我的同事对你给我们这一珍贵的会谈机会表示感谢。

赵：我感到我们的交谈很有意思。你今天讲的意见很好，也很重要，我很重视。

菲：非常感谢。

赵：再见。

注 释

1．菲雪（Stanley Fischer，1943—），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局副主席。1988年至1990年，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2．科纳布尔（Barber Benjamin conable，Jr.，1922—2003），美国纽约州人。军人出身，曾任美国国会众议员，财经服务规律委员会主席，1986年起任世界银行行长。

3．克莱因（Lawrence R.Klein，1920—2013），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计量经济学家。1980年因其建立的不同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4．里昂梯夫（Wassily Wassilyevich Leontief，1905—1999），俄裔美籍经济学家。曾来华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顾问，美国哈佛大学、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分析研究所所长。1973年因其创立的投入一产出分析法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在调整经济结构上下功夫*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出席全国计划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的部分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次全国计划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这个方针要通过这次会议具体贯彻落实。

今天是党中央请同志们来座谈。我想着重讲的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一定要在调整经济结构上下功夫。就这个问题，讲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措施要坚决贯彻实行。全国贯彻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已经两个多月了，现在听到的反映，除了赞成、拥护以外，主要有两个担心：一个担心是怕贯彻不下去，使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走过场。目前，这种担心是主要的，反映也比较多。第二个担心是怕控制过头或者方法不当，使经济萎缩，造成“滞胀”。估计今后几个月内，这种担心可能增加。我认为，现在还是应该强调下定决心，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防止遇到困难就动摇以至使治理和整顿半途而废，走过场。这是各级领导者在思想上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同时，要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对出现的新问题及时研究，采取对策。在治理、整顿中，如果我们能够自觉地在调整经济结构上下功夫，并且真正做好了，第二种担心，即出现“滞胀”的危险，就可以消除。

第二，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坚定不移。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对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全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是能够迅速见效的最重大的措施。这个措施的消极影响也比较小。但是，对各个地方、各个部门来说，确实有个痛下决心、忍痛割爱的问题。如果大家不下这个决心，全局的困难就不能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如果压不下来，即使其他工作做了一些，也很难对全局有大的影响。今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强调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要求地方和部门准备作出一些牺牲，首先就是指的这个问题。现在不要怕压得过甚，而是要防止决心不足。如果压得不够，就可能把整顿的时间拉长，使通货膨胀继续加剧。

这次压缩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要解决好三个问题：

一是要把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调整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紧密结合起来。我们过去多次搞调整，在政策和措施上没有很好地把压缩同调整相结合，因此，

经过一次压缩、下马之后，结构并没有大的改善，过一个时期，在旧的结构基础上又会出现新的“过热”。当然，把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同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起来，难度相当大。计划综合部门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手段也很不够。但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次计划会议之后，中央、国务院和各地还需要下功夫研究这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二是不仅要压缩计划内的基本建设投资，而且一定要研究和制订控制计划外、预算外投资的措施和手段。也就是说，必须找到控制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有效措施和手段。近几年计划内的投资，按实物量讲，并未增加，而是在减少。不断膨胀的恰恰是预算外的基本建设投资。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有效地压缩预算外的基建投资，那我们的治理和整顿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计划内投资压缩过度，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计划外、预算外的投资压不下去，整个投资规模就会继续膨胀。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找到控制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计委要用很大的力量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计划必须覆盖全社会。如果只能控制指令性部分，指令性以外的根本没有办法调控，那么计划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小。当然，必须注意到指令性计划和非指令性计划是不一样的，不可能用改革前的老办法全部统起来；但是，必须能够对基建总规模和产业结构进行有效的控制。找出能覆盖全社会的办法，研究用不同的办法来控制指令性部分和非指令性部分，这是计划改革的一个大课题。

三是在这次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中，要制订一套不让老实人吃亏的办法。不能形成哪里积极压的就压了，不压的也没有事。决不能让那些不认真执行政策的地方和单位占任何便宜。

第三，紧缩信贷同稳定储蓄要结合起来。如果单靠控制信贷规模，不重视稳定储蓄，治理通货膨胀就难以成功。在我们国家，能够大容量地吸收人们手中货币的手段是储蓄。

为了稳定储蓄，看来提高储蓄利率势在必行。存款利率提高后，就要相应地提高贷款的利率。也可以考虑贷款利率分步提高，或者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差别利率。

如何减少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是一门学问，必须重视。这也是有通货膨胀的国家或地区普遍遇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我们不大懂得这一点。今年夏季，我们就吃了亏。当时只是在内部研究物价改革，却通过报纸大讲放开物价，造成了整个社会对通货膨胀的极大心理预期。这种心理预期就是人们对今后物价将要上涨的一种估计。人们的心理预期过高，就必然引起对市场、对储蓄的不正常的冲击，造成很大的混乱。许多国家就如何减少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却很不注意。今后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小心，要研究怎么做才有利于减缓人们的心理预期。前几个月发生的提款抢购风，一方面有我们去年物价指数上涨过高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我们人为地提高了群众的心理预期，宣传不当，给人们造成一种全国物价很快就要普遍大幅度上涨的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我们确实没有经验，原来以为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人们都

赞成的，物价上涨后，只要使人们的收入相应增加，保证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不降低，问题就不大。但没有充分估计到，一旦引起人们对物价上涨的过高心理预期，就会产生一系列盲目的冲击。抢购商品，挤提存款，一下子就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本来充足的商品，一抢购就不能正常供应了。本来能够正常周转的资金，储蓄一不稳，也就紧张了，逼着你多发票子。这样，就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今后从中央到地方，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和做宣传工作的同志，都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回笼货币要采取多种手段。除了千方百计增加有效供给以外，还应当通过住房商品化、出售小型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等办法，来使一部分购买力转化和分流。但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从当前来讲，只有把储蓄稳住，大力吸收存款，才能为治理通货膨胀赢得时间。

第四，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增加有效供给。我们既要把过高的工业生产速度降下来，同时又必须把有效供给搞上去。有效供给，首先是粮食和副食品，再就是人民生活必需的轻工纺织产品、出口创汇产品、对回笼货币有重要作用的产品，当然还有人民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的能源以及某些重要原材料。需要开个单子，然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落实。这实质上也就是生产结构的调整。要明确哪些生产要降，哪些生产要保，对于最必需的要确保，要根据生产的条件和能力来排队。产品排队之后，还要挑选企业。生产同样商品的企业，有的效益好，有的效益差；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有的消耗大，有的消耗小。所以，商品结构的调整必然涉及企业结构的调整，有的要保，有的要压。在调整中降低速度是不可怕的。应当把不必要、不急需的基本建设，以及长线的、不适销的产品和经济效益差的企业所占用的原材料、资金、能源、运力，转到能增加有效供给的生产上来。只要认真组织好，落实好，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关键是要在调整上做文章。如果一说压都压，一说保都保，或者“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能源、原材料不够就大家分，那样问题就很难解决。当然，全国怎么排队，怎么保，会不一样。调整工作不是两三个月就能够见大效果的，但是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认真去做。

第五，寻找有效办法控制消费基金的盲目过快增长。不控制消费基金的盲目过快增长，就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现在，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的手段还不多，不够有效。迫在眉睫的是要找到能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的有效办法。国外的办法也可以研究，看哪些适合我们的情况。要将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存款或债券。现在不少地方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总的反映还好，但不够完善。效益提高了他就挂，降低了他就不挂，奖金能升不能降。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现在我们还是要下功夫去完善这个挂钩的办法，这比较现实。有的地方实行整个城市的效益挂钩，这也可以试验。

另外，要加强对企业账外资金的管理和监督。企业消费基金的盲目增长，很多是靠账外资金支付的，因而形成失控。加强对企业账外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属于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范围内的问题，不是权宜之计或临时措施。国家一方面要扩

大企业自主权，同时必须加强对企业的监督。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包括账内的和账外的，都要纳入国家监督的范围。许多国家对此都有些办法。当然，也不是一讲管就能完全管得住，完全管得好，但是我们必须着手来加强管理。至少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可以把这个工作先抓起来。

关于分配不公，这个问题虽然从我们整个社会来讲，现在还不很严重，高收入的人并不多，但是影响很大。看来这确实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它影响到改革的承受能力，助长了人们的不满。现在人们之所以一方面增加了收入，一方面还有很多牢骚和不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分配不公。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找到调节的办法。

允许个体工商户的存在和发展，是既定政策，必须坚持，但同时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监督。对违法经营、非法牟利的要取缔。要坚决同偷税漏税的不法行为作斗争。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由于这方面税收不多，是零星的，而且难管，各地往往不认真去收。应当强调，各级都不能只从经济上来考虑这个问题。哪个地方对这项工作放任不管，就会增加那个地方人们的不满。加强管理和监督并不是政策的改变，而是改革中应该完善和配套的内容，也是属于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的问题。

第六，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中要保教育，这要作为一项重大政策定下来。对教育不仅不压，还要加强。我们正要着手进一步解决教育问题的时候，恰恰碰上这次调整。如不注意，很可能也压到教育头上。所以，必须特别强调一下，各级都要引起注意。

第七，在治理和整顿中要利用对外开放的条件，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同过去历次调整不同，这次调整是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且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如果利用得好，可以减少我们治理、整顿中间的困难。我认为这方面是有很多文章可做的。我建议组织一个专门小组去研究，提出方案。充分利用开放的条件和好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们的经济，有些事情可能同我们国内的治理、整顿有矛盾，但是，很多方面是没有矛盾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避免互相矛盾而使之互相促进的办法，就是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这包括发展以进养出、三来一补。另外，在引进外资方面，要多利用国内老企业“嫁接”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吸引外商兴办独资企业等。靠国内劳动力和技术来创汇的，要积极搞。在治理、整顿中发展这些方面，也属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沿海地区，认真搞好这种调整，进一步实行沿海发展战略，积极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既不会妨害治理和整顿，又有利于防止生产萎缩，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第八，继续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的改革。企业改革不能放松，步子不能放慢。当前主要还是进一步完善承包制，在承包制的基础上改革企业经营管理机制。

深化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治理、整顿中研究并建立符合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的新的宏观调控方式和手段。经过多年的改革，在我国多种所有

制和多种经济形式发展了，商品经济发展了，企业有了自主权，整个经济搞活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宏观调控、宏观管理显得更为重要。但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工作显得薄弱。研究改革，应当很注意研究这个问题。现在有人不是提出要防止旧体制复归吗？要防止旧体制复归，就必须去寻找并建立新的宏观调控手段、新的宏观调控方式。由于我们还处在新旧机制转变时期，治理、整顿所采取的办法大体上有两种：一种属于建立新的调控方式，加强新的调控手段。这不是后退，也不是复归，而是本来就应当解决的，现在应当有意识地利用治理、整顿的时机，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另外一种，虽然还是旧的调控方式，但今天不得不用。因为新旧体制的过渡没有完成，新的办法、新的机制还不健全，原有的一些行政手段暂时不能不用。但是，要心中有数，要运用适当，不能无限制地强化它。当然行政手段也各不相同。经过改革，有些行政手段逐渐不用了，但也有许多行政手段，特别是法律手段，是要长期使用的。我们新的调控方式中也包括行政手段，而更多的属于经济手段、法律手段。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建立和培育有调控的市场。我们的经济机制，十三大确定的目标，叫“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一定要研究如何建立这样一种机制。我们所要建立的这种市场，不是一种盲目的、没有调控的市场。一部分小商品主要靠市场自发地进行调节，但在必要时也应当是可以调控的。重要的商品，除了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以外，一般都不能实行独家经营和主要靠内部调拨的办法，而必须通过市场。这个市场应当是国家能够管理、能够调控的一种市场。很多西方国家的市场也有国家调控，我们要研究。我们的外汇市场，经过前一段的运行，证明国家对它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控制了人民币的投放，控制了进口，外汇的价格就下降。人民币多了，进口多了，外汇的价格就上升。国家可以通过宏观措施影响外汇市场，银行和外汇管理局也可以进行指导，但不能取消这种市场。外汇市场尚且可以如此，为什么别的市场不能调控？要么失控，要么管死，总是走这种老路是不行的。多数商品的价格不能采取冻结的办法，也不能由国家定价，但也不能不加管理。市场机制发达的国家对物价也要管理，也有物价申报制度，一些商品和服务项目如果要涨价，必须申报，提出理由，政府要审核它的利润率。我们全国一时还做不到，大中城市可以先做。对企业制定价格，既不能完全不加干预，又不能一说干预就冻结，就变成官价。总之，今后更多的注意力要放在探索新办法上，加快建立国家指导、调控下的市场。

第九，防止“滞胀”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过热”引起物价上涨。如果生产停滞，物价还上涨，就叫“滞胀”。“滞胀”是比一般通货膨胀更麻烦的问题。前面讲的八个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就不会发生“滞胀”。应当指出，一个时期的低速度，甚至短时间没有速度或负增长，并不等于“滞胀”。明年第一季度的工业增长速度可能相当的低，我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在结构调整基础上的低速，是不可怕的。可以回顾一下，一九八五年我们连续紧缩银根，结果出现了一九八六年初的生产滑坡，整个上半年没有速度。由于生产结构没有调整，一滑下来就经受不

起，结果不得不放开。由普遍收紧到普遍放松，结构没有改变，效益也没有提高。因此，不应当再重复这种一紧一松的做法。如果不在调整结构上做文章，一直紧下去，生产就停滞，放松了，就又会出现过热，导致新的一轮通货膨胀。所以，关键在于调整。要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使生产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投资结构、信贷结构、商品结构都有变化，朝着合理的方向变化。随着治理和整顿工作的展开，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也要逐步展开。对此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同时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细致周密地做好大量的组织工作。

把经济结构的调整搞好了，既可以防止生产萎缩，又可以避免新的一轮通货膨胀，而且会使我们的整个经济结构进一步合理化。这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取得成功的重要关键所在。所以说，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本身就是一次结构调整。不单是投资结构的调整，而是涉及整个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商品结构、企业结构的调整。在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如果在结构调整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就有极大的意义。经过这么一次调整，我们整个经济的质量就会提高，效益也会提高，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今后更加蓬勃地健康地发展下去。建国以来，我们的经济有过几次大起大落，这同我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有极大的关系。其直接表现是，每次调整或紧缩都未能有效地在结构合理化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如果说总结历史经验、接受历史教训的话，很重要的一条是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对这个问题，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工作部署上、措施上，都需要非常认真地去研究解决。

在治理整顿中进一步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沿海地区开放工作会议部分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田纪云同志在沿海地区开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很好，听说大家也都表示赞成。今天的座谈会上，大家反映了许多很重要的情况。根据这些情况，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现在沿海地区确实出现了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的好形势。这同近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分不开，同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也分不开。国际上尤其是亚太地区出现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这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是，目前恰逢我们国内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这样，两者之间就出现了一些矛盾，不能不对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应当看到两面，既要看到制约的一面，或者叫作困难的因素，又要看到有利的一面、有利的因素。关键就看我们怎么搞。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既能利用这个机遇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又同全国范围内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不发生矛盾而使两者互相促进的路子。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去做的一篇大文章。我赞成田纪云同志的那个提法，就是两个“坚定不移”：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要坚定不移；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也要坚定不移。我们既不能因为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就不继续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把良好的机遇白白地失去；也不能不顾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部署，而另搞一套。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使之互相促进。

第二，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国际经济环境比较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同过去历次调整不一样。如何利用开放的条件和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以减少我们在治理和整顿中间的困难，我认为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的。这不只是讲沿海，也包括内地。我们国内有相当大的生产力。我们的机械工业，包括军工企业，都有很大的潜力。许多企业可以逐步转为外向型，利用现有的生产设备、劳动力和技术力量，搞各种形式的对外合作生产，或者进口原材料生产能够出口的产品。这样就可以使不少企业在调整中间继续运转，而且可以创汇。

灵活地利用国际市场来解决我们经济中的问题，这里面学问大得很。六十年

代我在广东办过这样一件事，就是用优质大米出口转换普通大米，来解决粮食问题。那时国内吃的都是普通大米。我们把出口优质大米所得外汇，一部分用来进口普通大米，弥补粮食缺口，剩下的外汇进口化肥，用化肥向农民换购粮食。在省内，一斤化肥可以换一斤半大米，出口以后，一斤优质大米除换回同等数量的普通大米外，还可以换两、三斤化肥，这样来回一串换就赚了很多。化肥多了，粮食也增产了。原来广东粮食不能自给，后来各种账算下来，每年还可以调出大米十亿斤。所以，会不会利用国际市场来互通有无、扬长避短，效益大不一样。现在我国有很大的生产能力，有一支很好的技术队伍，就是比例不协调，能源、交通和资金缺乏。要是只着眼在国内搞治理的话，就会使很多工厂停下来，很多人失业。如果善于利用国际市场，一大片就活了。当然，不能搞乱，有关的章法和监督措施必须跟上。

如何利用开放的条件来减少我们在治理、整顿中间的困难？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次治理、整顿，沿海地区如果不从发展外向型经济中找出路，就会发生相当大的困难，整个生产水平就要下降很多。因为各方面一紧缩，国内找不到资金，靠消耗内地的原料来搞加工业也难了。沿海地区要在治理、整顿中求发展，就必须利用国际上的机遇，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我们的劳动力、技术力量、基础设施和工业能力，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更多地走向国际市场，发展“以进养出”、“三来一补”，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我们的老企业进行“嫁接”，以及鼓励外商前来兴办独资企业。这些方面的发展，对我们进行治理和整顿不但没有妨害，而且大有好处。对保持经济的发展、增加有效供给、扩大出口创汇，都大有好处。

发展外向型经济，各地都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哪些东西能搞，哪些东西不能搞，哪些企业能搞，哪些企业不能搞。还要防止不走正当的路子而走邪路。“以进养出”，有的能赚钱，有的可能赔钱。因此，一开始要谨慎一点，选一些好的厂子来搞，这样比较容易控制，也好监督，搞出了名堂再逐步发展。

第三，沿海地区走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样一条路，必须认真地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因为能源、运力等都有限，不停一些、压一些，出口的生产就保不了，外资企业也保不了。因此，必须进行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投资结构、信贷结构的调整。通过调整，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不利于全国治理经济环境的要坚决控制，对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要积极促进。对那些不适销的、浪费能源和原材料的产品，对那些效益极低和亏损的企业，要压缩，让出一部分能源、原材料、运力和资金，来保效益好的外向型企业的生产。从一定意义上讲，治理、整顿对沿海地区旧模式的发展是一种抑制，对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促进。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得越好，对全国经济越有利。

第四，对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网开一面的方针，同时必须有一套保证其健康执行的办法，使之不走邪路。网开一面，其余三面就要堵。不堵就变成网开四面了。大家都要乘这个车，都往里挤，最后就搞乱了，什么都搞不成。因为没有这

个承受能力，最后只有全部关起来。因此，我们在确定这个方针的同时，就必须研究监督办法，切实加强监督，以保证有关法规、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尤其是权力下放以后，各级地方政府更要把监督当作自己的主要职责。

建立国家调控下的生产资料市场*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六日

* 这是赵紫阳同物资部部长柳随年的谈话摘要。

一、物资部门的工作要解决好两个问题

一个是计划内物资，如何防止倒出去；另一个是计划外物资，如何形成市场。当前要研究怎样才能形成国家调控下的生产资料市场。苏州物资贸易中心搞得不是很好吗？国家调控市场，要尽量用经济手段，少用行政手段。不能物资一紧张就搞垄断，一多了就放任不管。如果调控过度，就可能把市场搞掉，那将是一个损失。现在，经济搞活了，要因势利导，兴利除弊，走一条国家调控市场的新路子。至于计划内物资，如何转向市场，可以下一步再说。

要加强生产资料市场的管理。在我国现在搞完全的自由贸易还不可能，要建立一个有弹性的市场，即国家调控下的市场。在市场上，有些东西可以管得紧一些，有些就可以管得松一些，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

我不同意“只有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市场”的观点。我国基本上是物资供不应求的条件下搞市场，要建立有领导、有组织的市场，多搞产需直接见面。外汇可以形成市场，生产资料怎么就不行呢？

二、市场问题关键是价格问题

我同意搞最高限价，那主要是解决防止囤积居奇的问题。最高限价是人定的，但如果限价与实际情况差别太大，那就没有市场了。制定最高限价，要考虑市场供求情况，并注意及时进行调整，不能一年定一次价就不管了，这样会影响生产和流通。

三、对物资部门的企业要有一套监督的办法

现在企业行为很容易违背宏观经济的要求，在政企不分的条件下，很难解决

这个问题。不能搞部门垄断，现在农副产品方面也应注意这个问题。

四、加强对物资流通体制改革的研究

究竟从哪里搞起，要解决些什么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很薄弱，要加强、重视。

进一步用十三大的理论武装全党*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的时候，党中央委托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理论讨论会，这是很有意义的。今天，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许多同志到这里来，是为了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国的理论工作者表示党对理论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的历史功绩在于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和意志，打破了“左”倾思想的长期禁锢，构成了全会的主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卓有成效地从事实践创造和理论创造的十年。中国改革的序幕，是这次全会揭开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体制，是由此发轫的。指导我国改革和建设的理论，是在这次全会的推动下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伟大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经过十三大，我们已经形成并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轮廓。它是全党实际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同全国人民一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号召下集体创造的成果。它总结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近四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基本经验。它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状况，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和发展趋势。它分析了我们的国内条件和新的国际环境。它论证了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指明了这条路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它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提出了我们所以必须采取现在这样的方针政策而不能采取别的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它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同时也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与建设实践的统一。这一理论，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已经对我们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起了指导作用。今后，它将在实践中继续丰富，继续发展，并进一步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当前我们党在理论工作上的首要任务，是用十年来逐步形成的十三大的理论

进一步武装全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要把这项任务摆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这里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应当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反复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和回答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检验；另一方面，应当根据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这一理论不断地得到拓展、充实和深化。各级党校，都应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教材。全党同志，特别是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都有责任向群众宣传十三大所确立的基本理论观点。理论的作用在于指导和支持实践。理论必须从实际出发并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回答得越清楚、越透彻、越全面，它的作用就越大。具体工作中的各种方案计划和措施，当然只能在实践中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做出抉择，但是，解决规律性的问题非常重要。正确的理论，可以提高我们的预见性，增强我们在实践中的勇气和坚定性。理论掌握了群众，就会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我们的改革和各项建设事业，就会进行得更顺利，更有成效。

中国在前进，世界也在变化。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要求人们做出回答。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其实，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挑战正是发展的契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不回避现实，不害怕挑战。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从中发现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并在实践中继续进行检验。在生动丰富的实践和复杂纷纭的事物面前，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对此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理论研究是艰苦的劳动。党中央尊重你们的劳动。在十三大确立的一系列的基本理论观点中，凝聚着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无论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是文化艺术领域中，党中央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创造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工作环境。理论工作者内部要团结，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也要团结，要同命运，共呼吸。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都应该为改革和建设的胜利而团结，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团结。

十年来我们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发展，是个大题目。大题目也可以开短会。我们赞成你们开短会，我也不占用你们更多的时间，就讲这几句短话。祝理论讨论会成功，祝大家在今后理论研究中不断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同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你们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会议。会议内容不仅仅涉及党员教育，实际上是一次党的建设会议。当前开好这个会议很重要，很必要，对于贯彻、落实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十三届三中全会强调了要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的建设，除了党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外，我看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党员的素质。因此，加强党员教育，提高党员素质，是党的建设中最基本的工作。我们全党有不少的同志从事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是艰巨而又光荣的。

一、各级党委都必须十分重视和切实抓好党的建设

要从中央开始，真正把党的建设摆到各级党委的重要日程上。你们会议反映，加强党的建设，最重要的是解决党委重视的问题。我同意这个观点。党的建设确实面临着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党委重视起来，认真去抓，才可能逐步得到解决，而且我认为一定能够解决。重视了，大家就会去研究，并在实践中创造经验，问题就会得到解决。经济建设是中心，党委当然要关心和重视经济工作。但党委抓经济工作主要是抓大的方面，决不要把党委的精力用在经济工作的日常事务上。否则，一方面会形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另一方面会使党委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抓党的建设。党委不能不过问经济工作，但有个抓哪一些、放哪一些的问题，只能抓大的方面。什么是大的方面？各级都要在实践中逐步地划一划界线。党委总是要用更多的精力去抓党的建设。

二、必须研究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历来如此。毛主席专门论述过这

个问题。现在，我们党的建设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个大环境，党的建设必须适应这样一个形势。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党的建设要为改革开放这个总方针、总政策服务，保证党的总方针总政策的贯彻执行，要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理解、支持并坚决贯彻执行这个总方针、总政策。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后还要继续做。另一方面，就是要看到改革开放这样一个环境给党员、党组织带来了新的考验，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严格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要防止一部分党员经不起考验而走入歧途。必须使广大党员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保持坚强的党性，保持严格的纪律，保持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只有广大党员经得起考验，党组织才有条件、有资格去领导改革开放。当然，有很少数的党组织和党员发生一些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不足怪的，但在总体上，我们党必须经得起这个考验。否则，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小平同志有个明确的思想，就是要两手抓。他讲的这个两手抓，意义很广泛。又要改革开放，又要整党，这是两手抓；又要改革开放，又要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这也是两手抓；又要改革开放，又要加强法制，也是两手抓。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又要改革开放，又不能丢掉我们的政治优势，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当然，这个价值观念也是发展的，会有很多新的东西，但在根本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上，不能把我们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既要使党组织成为改革开放的促进者、推动者、领导者；又要使党组织和党员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发展商品生产中间，必须使我们的党不涣散、不腐败。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把党的建设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结合起来。要通过发挥三个作用（党的领导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保证十三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实施，保证治理、整顿的进行；同时，三个作用发挥好了，本身也就是党的建设的加强。

当前，抓党的建设还要和保证党政机关廉洁结合起来。明天，书记处就要开会讨论如何保证党政机关廉洁的问题。在这场斗争中，党组织要起领导作用、监督作用，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只有起好模范带头作用，才能很好地发挥领导和监督作用。

三、加强党员教育的问题

你们会议的材料讲，在党员教育中要重视和加强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路线的教育，我认为这是对的。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实际上就是党章、党纲的教育。这是最基础的工作。作为一个党员，如果连党的最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那怎么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党员呢？不可能。现在新党员很多，其中有不少人不懂得党的最起码的规矩，这是值得各级党组织严重注意的问题。所以，一定要重视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不仅对新党员要进行教育，即使是老党员，也要对他们

重新进行基本知识的教育。因为长期不教育，就容易淡忘。同时，还要对党员进行基本路线的教育，也就是十三大精神的教育，用十三大的理论武装党员。这两个方面的教育都是重要的。陈云同志说，每一个党员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我们在党员教育中要抓好这一条，使广大党员都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

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凝聚力

过去每个历史时期我们都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或者叫使命，用它把全党、全民族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比如，推倒三座大山，打倒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等等。现在以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任务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全民族要为什么样的共同目标而奋斗？每一个人要为什么目标做贡献？现在，这个目标只能是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我们一定要通过经常的、深入的、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人民中间树立起这样一种信念，就是要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做贡献。这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做贡献的具体化。每个人都要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贡献自己的力量。应当把这个精神贯彻到各个方面。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功过的标准，就看他是不是全心全意地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作了贡献，看他是不是尽了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就集中表现在这里。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应当提倡的一种价值观，一种道德规范。

多年来一直有个矛盾，就是一讲境界、觉悟，就不讲物质利益原则，不搞按劳分配，就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混淆起来。反之，一讲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物质利益原则，好像就不能再讲觉悟，不能讲奉献精神。其实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必须把它解决好。按照我们提倡的价值观、道德标准，一个人工作和行动的动机和出发点，应当是为四化，为国家，为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政策，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行物质利益原则，鼓励勤劳致富。报酬是国家和社会对一个人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贡献的一种承认，一种鼓励，一种奖赏。谁为国家、为人民出了更多的力，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他就应该得到更多的荣誉，得到更多的奖励，得到更多的利益。但是，作为价值观，作为道德规范，则应提倡自觉地为国家、为人民作奉献，而不是追逐个人利益。两者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其实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真正把国家的按劳分配政策同人们无私奉献的道德精神结合起来，这不但不会带来什么矛盾，反而会使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矛盾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因为国家的政策是多劳多得就否定奉献精神，否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就必然助长极端个人主义、一切向钱看，使人心涣散。追逐个人利益、一切向钱看的人，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他更有可能做出对国家和人民有害的事情。我们应当提倡每一个人为国家、为人民，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要在全体人民中提倡这种精神，共产党员要起表率作用。这种精神发扬起来，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会大大

增强。

共产党员应当有更高的情操、更高的境界，就是树立起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共产党员的现实目标也是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奋斗。共产党员要带头树立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无私奉献的精神。当然，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政策，对共产党员也一样，也是实行按劳分配，对他们的贡献，也要给予应得的报酬和奖励。但是，从觉悟上，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境界上，对共产党员应当要求更高、更严。要通过党内教育，使广大党员都来发扬这种精神，并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全社会。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既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按劳分配的政策，又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精神风貌，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

五、关于从严治党的问题

这首先是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要搞好现代化建设，搞好改革开放，就必须有从严治党来保证。另外，这也是党组织本身建设的需要。现在确有一些党组织存在着松、散、乱的问题。绝不能对这种现象听之任之，必须下决心、下力量来从严综合治理。我们要解决社会上的松懈、涣散、混乱现象，就得由从严治党着手。因为中华民族的精华、精英是在共产党内，党的状况对社会有极大的影响，有决定性的影响。

从严治党，必须认真清理不合格党员。能教育好的，一定时期内要教育、提高；教育不好的，该劝退的劝退，该除名的除名。这项工作已开始做了，要继续搞。

从严治党，必须切实抓好基层支部的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通过支部去贯彻，如果支部是强有力的，许多非常困难的任务在下面都可以完成，许多乱子也可以解决在基层。所以，加强基层支部建设非常重要。要配备好支部的主要干部，健全支部生活制度，真正把党的各个支部建设成战斗堡垒。

从严治党，还必须加强监督，包括党内的监督和群众的监督。要进一步搞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各级党委都要支持纪律检查工作。

从严治党，解决松、散、乱的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严格执行全党统一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小平同志说过，没有这个纪律，我们党就形成不了一个战斗集体，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这个纪律历来都是写在党章里的。不严格执行这个纪律，党就没有战斗力，就无法担负起领导任务。在当前情况下，重申和强调这一点尤其必要。强调全党统一的纪律，同发扬民主没有矛盾。严格党内纪律，正是社会民主健康发展的保证。严格执行全党统一的纪律，对党内民主的发扬也不会有妨碍，因为这个纪律本身就包含着党内民主最基本的原则。

附录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在新形势下保持廉洁问题的会议纪要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正确认识当前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状况

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政府是廉洁的政府。党和国家机关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奉公守法、廉洁自律的，是经得起改革开放考验的。十年来，我们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是同广大党员、干部的克己奉公、艰苦奋斗分不开的。如果不实事求是、理直气壮地肯定这个主流，就不能正确认识当前党和国家机关的状况，就会挫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不利于廉政建设。

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条件下，党和国家机关中确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受贿贪污，弄权勒索。这种腐败行为尽管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它玷污党和国家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败坏改革开放的声誉，直接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干扰、阻碍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强有力措施加以解决，绝不能任其发展，侵蚀我们的健康肌体。

在商品经济开始趋于活跃，而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尚未通过法制形式严密规范的时候，权力和金钱交换等腐败行为最容易滋生蔓延。我国正处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阶段，改革过程中的新旧体制交替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有待确立。在这种情况下，这类问题的发生也会比较突出。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允许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只要充分发挥党的作用，特别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发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只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依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只要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特别是依靠群众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我们完全能够在繁荣经济的同时保持廉洁。全党同志对此要有充分的信心。

二、把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中央早就强调指出：改革开放，繁荣经济，要坚定不移；保持廉洁，反对腐

败，也要坚定不移。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不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就很难发展，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不进行廉政建设，任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社会主义方向就难以保证，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进行。

近一年来，特别是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结合经济领域的治理、整顿，采取了一些廉政措施并取得了成效。但是，廉政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某些腐败行为尚未得到有力的遏制。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仍然是党和政府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组织，必须把廉政建设作为保证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任务摆上议事日程。党委主要领导要亲自动手，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作出部署。要建立明确的责任制，加强检查监督，切实抓出成效。

当前，开展廉政建设的时机是有利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的建设、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的精神，正在得到贯彻。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为做好这项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在进行的财务、税收、物价检查和对各类公司的清理整顿，各级举报中心的建立和开展工作，都为查处受贿贪污案件提供了重要线索。法律的震慑和政策的感召正在发挥作用。各地进行的廉政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积累了一些新鲜经验。各级党委要继续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治理、整顿中抓紧廉政建设，同时通过加强廉政建设推动治理、整顿工作，把廉政建设同治理、整顿紧密结合起来。只要思想重视，措施有力，扎实工作，我们就能在保持廉洁和治理整顿两个方面取得更为明显的成效。

三、综合治理，突出重点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如何使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有效地抵御和战胜各种腐蚀，经受住严峻的考验，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解决这个课题总的思路，是坚持我们党一再强调的“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手抓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一手抓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工作。要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保持廉洁的自觉性，从根本上防止和克服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必须沿着这个正确的思路前进。

保持廉洁、反对腐败，必须综合治理。所谓综合治理，就是要运用法律的、行政的、制度的、纪律的、教育的手段，五管齐下，互相补充；就是要使查处危害严重的案件、抓紧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从严治党和加强思想教育等项工作相互配合，同时进行。根据各地开展廉政工作的经验，当前有必要突出抓好重大案件的查处和廉政制度的建设。

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索贿、受贿、贪污行为，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危害特别严重。因此，打击受贿贪污是当前廉政工作中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同时，对非法倒卖牟取暴利，利用公款公物营造私房，弄权勒索等违法违纪行为，

以及群众意见很大的以权谋私、挥霍浪费等行为，也必须严肃查处和认真解决。

四、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危害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

当前，必须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危害严重的受贿贪污等经济犯罪案件，严惩一批民愤很大的犯罪分子。这样做，能够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同各种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推动整个廉政工作的开展。

查处经济犯罪案件，要很好地依靠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犯罪分子再隐蔽、再狡猾，也逃不过群众的监督。对群众的检举揭发，我们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凡属比较重要的线索，一定要抓住不放，追查到底。

查处经济犯罪案件，要充分依靠各级监察和检察部门，党的纪检部门和工商、审计、税收等部门要大力协同配合。当前查处案件任务繁重，专业队伍力量不足的，应及时加以调整充实。要注意研究犯罪分子在新形势下作案的特点，并采取必要的手段。在立案侦破、调查取证等方面，要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做法，不断提高办案水平和破案效率。同时，要抓紧完善惩治受贿贪污的立法工作。

各地方、各部门党的领导机关，在查处经济犯罪案件中要注意发挥指导和协调的作用。在组织人员、提供经费和创造其它工作条件方面，单靠一个部门无法解决的，应由党政领导机关出面，统筹安排。

五、加强制度建设

在严肃查处案件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和抓紧廉政制度的建设，以堵塞漏洞，完善管理，建立秩序，减少乃至消除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办事公开和群众举报，是党的十三大以来在保持党和国家机关廉洁方面的两项重要制度建设。要认真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建立制度，办事公开，切实抓好这两条，就能消除工作人员的随意性，从制度上保证谁办事都一样。各部门特别是掌握执法、审批等权力的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要在总结建国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吸取改革中的新经验，建立和健全一整套明确具体的审批和办事制度。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必须抓紧做好。当前，应从直接与居民和企业打交道的部门开始，从群众最关心和最容易舞弊的环节抓起，从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逐步延伸和完善。为群众办事的规章、程序、结果和期限，应向群众公布。该办的不得刁难不办，不该办的不能徇私舞弊。这样做，既有利于提高效率，又有利于保持廉洁。我们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将在政务公开、民主监督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开创新的局面。

设立举报中心，是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依靠群众揭露腐败现象的有效形式，也是人民监督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全国县以上监察和检察部门普遍

设立举报中心，很有必要，应切实做好，不要流于形式。对群众的举报，要认真查处，适时反馈。要表彰和保护举报有功人员，并酌情予以奖励。对打击报复举报人和利用举报诬陷他人的，要依法查处。

六、建立和完善监督体系

建立和完善监督体系，加强对党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的监督和制约，对于保持廉洁、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纪检、监察、检察等部门，在同腐败行为作斗争和发挥监督作用的过程中，既应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严格执行法律、政纪和党纪，又应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和配合。

纪检、监察、检察等部门，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人员素质，完善法规。监督部门也应接受监督。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要不负人民的重托，秉公办事，无私无畏地同各种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作斗争。

广大党的纪检干部，是同党内各种违纪行为作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各级党委要对纪检工作加强领导，使这支队伍在履行党内检查、监督的职责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七、舆论监督

利用报刊、电视、广播来宣传法制和弘扬社会正气，揭露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舆论监督。关键是运用好这种手段。新闻报道在揭露腐败现象时，必须注意事实准确，依据法律和政策，把握分寸。结案处理前，新闻报道不得随便给当事人肯定罪名。对所有公开揭露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公开交待处理结果。如果报道严重失实，要公开更正。

新闻报道要特别重视宣传廉政建设中的好典型、好经验。这对提高人们的信心，交流经验，推动廉政建设的深入，很有作用。近几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有一批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保持廉洁的好党员、好干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在保持廉洁、整治腐败现象方面也创造了宝贵经验。前一段，对这些事迹和经验宣传不够，今后应大力加强。

八、发挥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

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和群众团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监督作用。要按照干部管理规定和法律程序，吸收符合条件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监察部门的领导职务。要为群众团体在所在地区和单位发挥监督作用提供条件和方便。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经常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和群众团体对廉政建

设的意见和建议。要吸收他们参加经济案件和其它有关案件的查处工作。他们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廉洁行为的举报，监督和司法机关应认真查处。

九、从严治党

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对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全国各级政府机关任职的干部中，党员占大多数。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为政清廉，就能从根本上保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因此，一定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从严治党。

当前，要特别注意把好两关。一是把好干部关。要把廉洁奉公这一条突出出来，作为推荐、考察、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绝不能提拔和信用那些不廉洁的干部。二是把好党纪关。对有不廉洁行为的党员，应按党纪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党籍。对触犯刑律的除给予党纪处理以外，还必须依法惩处。

各级党组织在廉政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监督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克己奉公，自觉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做保持廉洁的表率。一切共产党员都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在廉政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机关党委要把保持廉洁作为机关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要结合形势教育、民主评议党员和民主考核领导干部，经常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廉洁奉公和遵纪守法的教育，增强保持廉洁的自觉性。

一九八九年

在全国政协元旦茶话会上的致词

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庆新的一年的来临，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在座各位，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节日的问候。

实行改革开放十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增强，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根据中国的国情，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来寻找一条道路，使曾对全世界劳动人民具有伟大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摆脱其越来越难于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旧体制，重新显示出它固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当然也是艰难而复杂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这样一场巨大而复杂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面前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去年以来最突出的就是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我想大家都知道，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曾经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我们国家不应该以高通货膨胀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要使一九八九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一九八八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求得稳定中的发展。但是，也正由于我们是在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商品经济，所以遇到了许多在国内外都没有现成经验可供运用的新问题。例如，在公有制条件下，放权、搞活以后，如何建立固定资产投资的约束机制，如何有效地控制消费基金的自发过快增长，以及相应地如何保持信贷的总量平衡和合理结构等等。在未经一定实践的情况下，许多新情况很难完全预见到；对许多新问题，很难预先就设计出一套完美无缺的对策。工作中也难免有缺点、失误和挫折。但是，随着经验教训的积累，我们解决这些新问题的办法正在多起来，措施将会越来越完善。

自从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开始生效。大批应当停缓的基建项目在陆续压下来，银行储蓄在增加，物价涨幅在减少，一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格开始下降。在这次治理、整顿中，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着重在调整经济结构上下功夫，按照产业政策，该压的压，该保的保。这次调整如获成功，将

使我国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合理化，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得到真正的改善，并能大大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将意味着效益和质量的提高。因此，治理、整顿完全是积极的，和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

治理、整顿才开始不久，对已取得的成效决不能估计过高，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容不得半点松懈。必须把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治理、整顿的措施，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同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控制的新的手段和方法。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因为困难而对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发生动摇，是错误的；那种因为困难而从根本上怀疑、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更是错误的。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有着共同的认识。在前一段治理、整顿工作中，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都作了不少工作。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工作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国的改革一定会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抓紧经济建设的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地、扎扎实实地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我国，加强民主建设，要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这些根本制度，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进一步完善，而决不能削弱。这些根本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尤其适合中国经济文化振兴的需要。这些制度可以保证选民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按照个人的意志投票选举；在这些制度下，国家重大决策和立法，是经过广泛协商对话，有些则经过全民征求意见之后，由人民代表组成的权力机关决定的。我们需要有不断完善的民主，同时我们又需要有安定的秩序，以使经济文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动荡和混乱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这一点上，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广大群众，有着最广泛的共识。我们希望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同志一起，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提高国家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更好地实行互相监督，特别是加强对共产党和政府的监督，下大力量搞好党政机关的廉洁，进一步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我国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政治局面，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为祖国的统一，进行不懈的努力。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

在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一月四日

第一，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不能变

现在，国外有一些人，国内也有一些人提出，中国的改革，经济上必须搞私有化，政治上必须搞自由化，学西方的轮流执政和议会制，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当然还有另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改来改去，出了这么多问题，还不如过去的老办法稳当，因而对十三大提出的改革方针表示怀疑，对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表示怀疑，想回过头去。我认为这是两个极端，都是对改革的干扰。当然，也不奇怪。改革遇到了困难，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药方，但是对两个极端的话都不能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战略不能变，也没有理由变。

现在，确有一些同志对困难认识不足。我们讲治理整顿，消除经济过热，要打通这些同志的思想也很不容易。所以要把情况摆明，使大家充分认识到不治理整顿不行，听任问题发展下去不得了。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持消极悲观论点，甚至不愿意听人们讲成绩。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经济情况是好的，对此不应该有什么怀疑。有的人不爱听这个话，听了就反感。其实，我们不外乎用两年或再稍多一点的时间，把基建规模搞小一些，把速度降低一些。我认为，按照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方针，用两年时间，把这几年积累起来的问题大大缓解一下，是完全可能的。不下决心治理整顿，当然不行，再拖下去会使困难加重。但是一讲治理，就认为不得了啦，消极悲观，这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中国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基础，有了这么大的生产能力，这是过去任何时候都不能比的。过去也曾发生几次“过热”，调整一下，就解决了，这次也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的情况与1960年完全不同。那时是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现在是生产力大发展基础上的过热。我们现在的基本建设规模，压缩以后还是相当可观的。经济增长幅度即使降到百分之七，还是相当高的速度。在治理整顿中即使发生短时间的萎缩，也不可怕，过去也发生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年之间，我们进行过两三次调整，但总的经济还是提前翻了一番。

把困难看得过大，就容易产生两个问题，一是要退回去，另一个就是从西方找药方，照搬西方的东西。这两条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有的外国经济学家认

为，要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得改变所有制，公有制不改没有办法。我向他提了个问题：为什么私有制企业也有大批经营不好而破产的，而联邦德国工会的公有制财产却经营管理得不错？对这个问题，他也回答不了，无法从所有制上来解释。事实上，现代多数西方大公司的经理，都是受雇管理别人的财产，企业并不是他私有的，不是也可以管好吗？从我们的情况看，私有化并不能解决当前人们关心的经济问题，公有制企业也可以经营管理得很好，而且公有制还有它自己的优越性。总之，我们只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行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能使中国振兴起来。

我们这条路，这个改革、开放的方针，到底行不行？事实证明是行的。小平同志开始提出翻两番的目标时，很多人不相信，但是不到十年我们就翻了一番。当然，即使翻两番以后，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但是，我认为中国在本世纪翻两番就很了不起，我们可以为此而自豪。因为在十年前那样的基础上提出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确是大胆的设想，是宏伟的目标。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十年以前小平同志讲翻两番，有多少人相信？很多人认为不可能，现在不是翻了一番吗？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产品是按市场的需要生产的，这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共产党是真心为人民办事、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而且有能力办好。十年改革，我们无负于人民。我们应当增强自信心，进一步振奋精神。去年尽管发生了通货膨胀，但在总体上我们还是前进了，而不是后退了。当然，发生问题就要正视它、治理它，不治理不行。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贯彻执行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不松劲，不半途而废，坚决地搞下去，就一定能够见效果。到明年这个时候，有些话就比较好讲了。在有困难的时候，怨天尤人、消极悲观情绪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大夫、这样那样的药方都出来了，这也是很自然的，不过我们要清醒。总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不能变，不需要变，也没有理由变。

第二，要认真抓好形势教育

如果人们对形势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就很难正确理解和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各条战线包括新闻单位，都要把形势教育摆到重要位置上，认真地去抓。对改革开放的宣传，也要通过形势教育来进行。形势教育要面向基层，不能用千篇一律的办法。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在教育的内容、方法上不应当完全一样。这项工作不简单，难度很大，要使教育收到好的效果，很需要下一些功夫，要重视各方面的实践，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好的路子、好的方法。报纸、电台、电视台的宣传要增强效果，就必须在方法上作些改进。各条战线在进行形势教育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好的方法、好的路子，宣传舆论工具应当加以介绍，不一定要长篇大论。前不久，内参登了一个材料，辽宁大学校长、经济学教授冯玉忠在学生中讲形势，效果很好，他讲的内容比较适合大学生。农村、机关、学校、部队的情况不一样，各有自己的经验，我们要注意总结和推广。

形势教育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必须使人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人们看到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看到中央和各地都在认真解决；特别要着重向人们讲清楚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性质，讲清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要通过有说服力的事实和道理让人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把困难看成是主流，或认为无法解决，因而助长悲观消极情绪。正因为是发展中的困难和前进中的问题，因此，都是可以解决的。一定要看清问题的性质。例如，有些消极丑恶腐败的东西，是在社会大发展大变动中趁着新秩序还没有完全确立，我们主观上警惕和预见不够等空隙而泛起的沉渣，并不是新体制所固有的。这些问题随着新秩序的建立和完善，都可以逐步解决。

第三，必须使人们认清改革的意义，并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有精神准备

改革虽然进行了十年，由于前一段总的还比较顺利，人们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还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很多人对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改革，为什么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进行改革，也缺乏深刻的认识。

现在有的国家在改革中发生了很大困难，那里的人们对现状不满意，但如果让人们选择的话，他们还会选择改革，而不会羡慕某些不改革的国家，尽管那些国家看起来很平静，控制得很好。愿意走回头路，回到旧的模式中去的人，肯定是很少的。我认为，中国也是这样。不要说现在这些困难，即使遇到再大一点的困难，人们可能很不满意，但是如果说回到1978年以前去，我看绝大多数人不会赞成。历史车轮不会倒转，没有这样的形势，也没有这样的群众基础。

为什么进入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无例外地都要走改革这条路，这绝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发展都比较快。但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社会主义的旧模式越来越束缚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好，是旧的模式不好，所以必须改革。再不改革，就会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越来越落后，连原有的地位都不能保持。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采取集中的方式搞建设是必要的，不能分散搞。否则，在当时会站不住脚。苏联也是一样，当时不集中就不可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工业化基础较差的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的时候，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能那样搞。实践也证明有成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的这种模式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但是，以后越来越不能适应了。资本主义不断地在变、在改，特别由于科技的发展，使它原来的那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而在这期间，社会主义却把苏联模式固定下来了，越来越束缚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改革，目的是为了打破旧模式，建立新体制，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重新显示出来。

这场改革，小平同志讲，实质上是一场革命。要把过去那种模式变为一种新

的模式，这确实是相当大的变革，包括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对这样一个变革的复杂性、艰巨性，人们精神准备不足，对改革的意义理解也不深。人们往往把改革的目的看作就是为了得到实惠，对获得眼前利益期望甚高。这是对改革缺乏正确思想准备的突出表现。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在生产长期停滞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下去后，很快就使农民得到了明显的实惠，农民的生活在三、四年之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的。但是，这引起了人们的一个更大的期望，就是希望城市一改革，也很快就得到很大的实惠，而对改革会遇到的困难没有思想准备。对改革太理想化，觉得改革什么问题也不应当出，改革后发生好的变化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认为还不够，但对出现困难却没有精神准备。这些都需要在这次形势教育中，深入浅出地讲清道理，使人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增强对改革及改革中困难的承受能力。

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 妥善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考察湖北省时谈话的要点。

形势教育，就是要统一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对形势和对改革开放这个总方针总政策的思想认识。现在看来，在干部和群众中出现某些思想混乱，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改革的思想准备不足，弄不清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现在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搞改革决不是偶然的，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显示过优越性，可是后来这种体制越来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改革具有必然性。我们要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但是，一场大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有困难和挫折。对改革的艰巨性缺乏思想准备，把得到眼前的实惠寄托在每一项改革措施上，期望值很高，这样碰到一些问题就会对改革产生怀疑，发生动摇，就会发牢骚。

当前形势教育中难度较大的问题，是怎样引导人们正确看待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丑恶现象、腐败现象。对这些现象人们意见比较大，当然，意见比较大的还有分配不公、物价上涨等问题。我们要在形势教育中把这些问题讲清楚。要告诉人们，党和政府对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视的，正在设法逐步解决。同时要指出，这些终究是前进中、发展中的问题，是在社会变革时期一些丑恶的东西乘隙而出，是所谓"大江东去泥沙俱下，沉渣泛起"。当然，这些问题确实不能任其泛滥下去，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手抓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廉政建设、政法工作都要认真抓好。

如果我们不较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得不到发挥；反过来，生产发展了，社会风气搞得乌七八糟也不行。过去我们的社会风气比较好，但对发展生产力不够重视；现在我们注意了较快地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同时必须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如果经济搞活了，但经济秩序、生产秩序混乱，政治上、思想上和社会治安混乱，也是不行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于富有活力的经济和良好而安定的政治的结合。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方面必须走出一条路子来，也可以走出一条路子来。

我们一定要加强党的建设，抓好党的工作，发挥党的作用。十三届三中全会

提出发挥政治优势，这就必须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的党是非常强大的党，只要党认真去抓，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抓与不抓大不一样。不管多么困难的问题，只要党组织认真去抓，就会有经验，有办法，就会见成效。各级党委在重视经济工作的同时，一定要下大力量、更加自觉地抓好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细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研究有效的政策、措施，恰当地解决前进中、发展中的问题。党委不要陷于经济工作的日常事务，而要拿出更多的精力抓党的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抓好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各项工作。只要认真去抓，混乱现象就会大大减少，各项工作都会出现新局面。

当前我们正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治理、整顿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压缩基建投资和控制过分膨胀的消费基金。压缩投资，不是简单的一律平均的压缩，而是要注意研究和认真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样，治理、整顿就是一个积极的方针。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宏观调控办法，做到管而不死。所谓宏观调控办法，不仅包括中央对地方、地方对企业的领导方式，还包含很多把经济搞活、保证活而不乱的管理措施，如工商行政管理、税收制度等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不可能一下子从旧体制中脱胎而成，它的形成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要在这方面继续下功夫。

要重视企业里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贯彻《企业法》，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后，企业党组织要搞好职能转换，尽快理顺党、政、工、团的关系。厂长和书记都要适应新的体制，尽快进入角色，到达自己的位置，不要犹犹豫豫。从旧格局进入新格局的时间不能太长，这个转变过程拖得越长，损失就越大。现在有许多企业已经创造了实行厂长负责制和在新体制下发挥企业党组织作用的好经验，要及时总结，认真推广，坚定不移地把《企业法》贯彻好，把企业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社会治安问题必须综合治理*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同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各级党委在抓经济工作的同时，必须下大力量抓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民主和法制建设等工作。一个地方只有经济发展了，同时又抓好了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那里才会有安定团结的环境，才会有巨大的凝聚力，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才能持续高涨。

这些年来政法部门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广大干警在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的政法队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可以信赖的，整体上是一支优秀的队伍。

在和平建设的时期，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中，在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大业中，政法部门处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担负着十分繁重的任务。政法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给政法工作以更大的重视、理解和支持。

当前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很多，必须进行综合治理。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各级党委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发展商品经济，一手抓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

有这样一个大的方针，形成一个大气候，再依靠全社会力量进行综合治理，社会秩序就可以好转。

建立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应该包括新形势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首先应该把大中城市、交通要道、沿海地区管理好，要建立一套办法。这些地方有条件先管好。

加强社会治安，一定要把综合治理和集中打击、集中整顿结合起来。某项犯罪活动特别猖獗，就必须进行集中打击；某个地区、某些场所问题很突出，就必须进行集中整顿。在集中打击、集中整顿的同时，认真抓好制度建设，搞好综合治理。

关于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建研究班上的讲话。

党的建设研究班已经办了二十四天，讨论得很好。中纪委正在开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也开得很好。现在党建研究班的专题讨论还没有结束，我趁这个机会，就当前党的建设中的若干问题讲几点意见，作为我的一个发言，和同志们一起讨论。

第一点，必须把党的建设摆到各级党委的重要议程上来。党委的工作千条万条，归根到底是两手抓：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手抓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而要抓好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关键是抓好党的建设。我们党是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党把这两手抓住了，抓好了，就能够提纲挈领，驾驭全局。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的社会既不能停滞，又不能动荡。停滞和动荡都不符合十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如果不改革开放，不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就快不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会停滞，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越拉越大。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如果忽视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就会滋生蔓延，就会把我们的社会搞得乱糟糟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改革和建设也很难顺利进行下去。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包括意识形态、新闻舆论、政法工作、廉政建设、群众工作、社会风气等许多方面，都是很重要的，但必须抓住党的建设这个重点和关键。党有了战斗力，思想政治领域的各项工作就有了主心骨。所以，总起来讲，就是三句话：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行；抓商品经济而不抓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不行；抓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而不重点抓党的建设也不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两手抓。小平同志说，“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小平同志又说，“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整党”，“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这是从不同侧面讲的，意思是一贯的。小平同志还多次讲过，抓打击经济犯罪也好，抓整党也好，抓法制也好，都是为了保证改革开放能够顺利进行。没有这一手，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很难搞好，很难顺利地进行。我理解，两手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牢牢掌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针。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委的工作要围绕一个中心来两手抓，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两手抓中的思想政治领域这一手，很重要的一条是为了防止腐败现象。因为改革开放确实带来了一种腐败的危险，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我们说，现在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改革开放直接带来的，但改革、开放、搞活的环境，确实存在着滋生腐败的危险，也就是有土壤、有温床、有空隙。因噎废食，怕有腐败的危险，就不改革、开放、搞活，怕苍蝇进来而不打开窗户，或者打开了又关上，是不对的。但是窗户打开了，飞进了苍蝇不去扑灭，也是不行的。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所执行的一整套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尽管在经济工作方面，人民群众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我看改革、开放、搞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条，绝大多数人是公认的，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能够把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能更充分地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我觉得应该这样看：我们只有在促进生产力较快发展的同时，又能够防止腐败现象的蔓延，才能充分显示出我们路线的正确、制度的优越。我们的经济应该是富有活力的经济，我们的政治应该是良好而安定的政治，两者密切结合，就有可能以较少的代价和较快的步伐，求得中华民族的振兴。

第二点，对党的现状的估计。同志们讨论得很热烈，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我看基本估计是一致的，就是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问题，不能只从一个方面来看问题。这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方法。十年大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不少新的创造。党的各级组织在总体上是有战斗力的。绝大多数党员是为人民努力工作的。这些都是基本的不容抹煞的事实。如果我们的党是漆黑一团的，过去的成绩怎么能够取得呢？将来的希望又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党内确实存在着腐败和涣散的现象。这些消极的东西，正在腐蚀党的肌体，损害党和群众的联系，危害党的事业。我赞成同志们说的，要动态地看问题。就是说，对我们党的现状作出估计后，还要看今后党究竟会怎么样。现在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但有许多消极现象在发展，在滋长。采取正确的方针，我们党今后就会沿着正确的、健康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如果采取另一种方针，那就会是另外一种结果。所以要从动态上来看问题。如果放任下去，听之任之，是会泛滥成灾的。这是一种可能性，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坏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做到的，是实现好的可能性，这就是正视问题，从严治党，认真地坚持不懈地同这些腐败涣散的因素作斗争。这样，党就能进一步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就能进一步加强，党的事业的发展就有了坚强的保证。

为什么一方面是党的事业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相当严重、不容忽视的问题？乔石同志在研究班开学的时候讲，我们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时期。这个话讲得很好，指出了观察党的状况、研究党的建设的大背景。我们研究党的状况，一定不要忘记党处在历史性的大转变时期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凡是在历史性的大转变时期，都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有的对党的路

线迷惑不解；有的经不起新的考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从十年内战转变为国共合作，就有人对统一战线的政策想不通，也有人经不起统一战线环境的考验。进城也是这样，从革命战争转变为和平建设，有人经不起糖衣炮弹的侵袭，也有人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退坡了。现在的转变，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可以称之为又一次革命。从产品经济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转变，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不理解，有人经不起考验，同样也是不足为怪的。唯其如此，我们就应该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大转变是对每一个党员的考验，也是对我们整个党的考验。客观的考验是严峻的，因此，从主观上讲，我们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对党员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必然会有一部分党员被淘汰，但我们党和党的事业必将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党在以往六十八年的斗争中，胜利地通过了多次严峻的考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现在和今后，也一定能够胜利地经受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并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全党对此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和足够的信心。

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反复论证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密切地联系于党的政治路线。

一句话，党的建设一定要联系于党的政治路线，不能离开党的政治路线。这是我们在党的建设上的最宝贵的经验。党的十三大和十三届三中全会在谈到党的建设问题的时候，都着重指出了这个指导思想。我们党内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归根到底，是党的状况的某些方面同党的路线不够适应，或者很不适应。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进行党的建设，需要紧紧抓住三个问题：廉洁问题，党内的凝聚力问题和党在群众中的吸引力问题。这三个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只要我们的队伍是纯洁的，步调是一致的，又能把广大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们党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点，保持党政机关廉洁是当前党的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经济越是繁荣，商品经济越是活跃，共产党员在保持廉洁方面的觉悟就应该越高，党的纪律对这一方面的要求和约束也应该越严。我们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而且为了发展商品经济，我们也需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我们决不是学习资本主义私有制，决不能羡慕和模仿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而造成的损人利己、贪婪、欺诈和其它一切坏东西。在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有些社会现象是难于完全避免的。经济搞活了，内外交往扩大了，人、财、物都广泛地流动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管得像过去那样“净化”，确实难度很大，需要有一个法制建设的过程，需要有一个人的素质提高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总结和积累经验。但是，对党政机关应该管严。现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百分之六十九是共产党员；担负领导职务的人员中，共产党员的比例更大。共产党员不仅应该廉洁自律，而且应该成为维护廉洁、反对腐败的最勇敢最坚决的力量。热心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就应该热心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借发展商品经济混水摸鱼，利用行使公共权力之机索贿受贿、弄权谋私，是破坏改革开放的害群之马，是违反国法党纪的蠹虫。共产党员，工作能力有大小，认识水平有高低，但是，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决不能犯拿权力同金钱作交易这种性质的错误，如果犯了，就玷污了共产党员的称号。我们所以要把党政机关管严，不仅是党的性质、政府的性质有这个要求，而且这也是制止腐败现象在社会上蔓延的最有效的办法。所谓腐败问题，当前主要表现为拿权力同金钱作交易。社会上有些人需要通过利用掌握权力的人取得方便，而掌握权力的人主要在党政机关，其中有些人又想以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这种现象，一般讲，许多国家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都很突出，特别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时候。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应当而且有能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绝不能听其泛滥。我们把党政机关，包括执法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管严，把这些部门存在的问题真正解决好，遏制住权力同金钱交易的现象，就可以制止腐败现象在社会上蔓延。

中央书记处最近讨论了廉政问题，认为这是从严治党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需要综合治理。当前要着重抓两件事。一件是认真查处案件，凡是有线索的一定要查到水落石出，凡是违反国法党纪的一定要严惩不贷。涉及法纪政纪的，当然要由国家司法机关和政府监察机关查处。但是，对有关的共产党员还必须绳之以党纪，党纪的要求应该比政纪、法纪更严。这是党的各级纪委当前的中心工作。从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责任重大，一定要铁面无私，坚持原则。再一件是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直接为居民、为企业办事的行政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一定要加强制度建设。办事的规章要公开，办事的结果也要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照章办事和公开办事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一大建设，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建设。行政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应该在本单位的制度建设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但是，北京东城区、上海黄浦区、山东郊城、河北嵩城等试点单位的经验已经证明，只要认真去做，坚持下去，逐步完善，必有成效。山东姜春云[1]同志对乔石、宋平同志和我说，他们的邦城、昌乐抓得很有效果，群众反映非常强烈，而抓的时间并不长。可见，廉政建设这件事说难也难，但抓和不抓大不一样。河北邢台抓廉政，几个月时间就有了变化。所以关键还是要坚决去抓。领导态度坚决，亲自去抓，带头去抓，方法也就会出来。抓什么？从人们关心的、意见最多的、议论最多的热点问题抓起，逐步地扩大。现在下面还是有新鲜经验的。总之，把查处案件和制度建设这两件事抓好了，既能防范于前，又能惩戒于后，我们党就有了反腐蚀的机制和能力。

第四点，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内部的凝聚力。在中国的大地上，只要我们党内不出大的问题，国家就不会出大的问题，出了问题也有力量解决。这就是上一次我在党校座谈时说的那句话：我们中国的问题，关键还在我们共产党身上。我们党是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是国内政局稳定的主导因素。全党四千七百万党员，多数是社会的优秀分子。全党团结，没有什么困难不

能克服。那些不喜欢我们党的人，稍微现实一点的，也知道无法从外部取代我们，摧毁我们。他们寄希望于我们内部涣散。中国人长期被讥为“一盘散沙”，孙中山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他没有做到。我们党由于有正确的理想、理论、政策和工作，由于有强大的献身精神和严格的纪律，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了，使中国革命得到了成功。陈云同志关于党的建设问题讲过一句言简意赅的很深刻的话：要使每个共产党员时刻记住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我理解，记住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增强党的观念，执行党的路线，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原则。大家都这样做，党就能巩固，否则势必涣散。我们的党很大，这么多党员，分布在各个方面，岗位不同，有的在中央，有的在地方，有的在党委机关，有的在政府、人大、政协、群众团体，有的在企业、学校、农村。但是，大家都应该时刻记住自己是个共产党员，都有义务执行党的路线，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原则，增强党的观念。这样，我们的方向、目标、步调就能一致，党就有战斗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靠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其中，首先是思想建设，也就是用党的十三大的理论和路线来武装全党。这次党建研究班在讨论中，也把这个问题很突出地提出来了，说明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都看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十三大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或反对改革开放，是党的政治纪律所不能允许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懂得这个道理，是拥护党的路线的。但党内确也存在着模糊观念，对改革开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有的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缺乏思想准备，不大了解这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由之路。有的对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缺乏思想准备，希望改革的路直而又直，走得快而又快。有的对改革必然会付出代价和遇到困难缺乏思想准备，幻想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能对每一个人立即带来巨大的、直线上升的利益，遇到困难就灰心丧气。这些都是导致思想涣散的因素。还有一些人，看问题的方法不对，过去在封闭状态下，不了解国外的情况，现在开放了，把中国同发达国家一比，好像社会主义不行了。其实，要比，应该看两条，一条是看社会制度，再一条是看发展阶段。离开发展阶段，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好像一切问题都是社会制度带来的，好像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了。应当如实地看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几百美元这样的水平上作比较，在社会安定、分配公平、生活质量、教育水平、卫生条件、社会福利、民主和法制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状况比处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好。且不说我们有十亿人口，有更多的困难。和我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国民收入几百美元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政局动荡。可以放眼去观察，可以去比。还有一种比法，把我们同欧洲、美国、日本比，这种比法不是科学的、客观的，因为我们原来就落后，不是现在才落后。他们经过一百多年、两百多年的发展，其中还包括殖民掠夺的阶段。怎么能将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相比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上是领先的，这是公认的事实。将来，到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我们的社会状况在许多方面会比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好，甚至在某些方面有可能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好。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对比，只能用同等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水平比，不能把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不同的社会制度混淆起来。我们处在比较落后的发展阶段，这不能怨天尤人，更不应归结到社会制度上，而应该发愤图强，同心同德执行十三大的路线。十三大路线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现在，大家对我们落后的状况不满，我看不需要开什么新的药方了，就是认真地、老老实实地执行十三大路线，发愤图强。尽管十三大的理论、路线还要充实、完善、发展，但只有坚决贯彻十三大的理论和路线，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别的药方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这一点，全党必须坚定不移，首先是各级领导要坚定不移，不能摇摇摆摆，不要受这样那样错误思潮的干扰。十三大的理论和路线的教育，应该结合形势教育去做，要做得很认真，深入细致，生动活泼，有针对性，有说服力。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会产生，这个热点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别的热点问题。党内的模糊认识是经常会有的强调党的凝聚力，同发扬民主是统一的。党内民主的发扬，是增强党的凝聚力的强大因素；而党的凝聚力的增强，又可以提高我们的承受能力，成为进一步发扬社会民主的必要条件。在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是为了使党在伟大斗争中充满活力，是为了巩固党的队伍和推进党的事业，充分有效地执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如果以民主为借口，给党的形象和党的路线抹黑，损害党的事业，那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所不能允许的。

第五点，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同时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增强党在群众中的吸引力。吸引力大，党就能更好地实现领导。党的内部要讲凝聚力，党对非党群众要讲吸引力和说服力，这样，党才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做群众工作，要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学会新本领。毛主席讲过，“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主席的这段话，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讲得很好，我们应该悉心体会。这就需要更高的领导艺术。战争年代尚且应该如此，和平建设时期我们更应该努力这样去做。

共产党的领导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在中国搞反对党，既无条件，也无需要。在我们国家里，有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关系。我们党和民主党派都赞成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这种制度，是历史形成的，符合我们的国情，已经起了很好的作用，今后还会起更好的作用，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格局的基本内容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内容要进一步充实，形式要进一步完善。这要根据实际条件一步一步走，要靠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政治体制改革，决不是取消我们党的领导的大格局，而是要更充分地发挥这个大格局的优势，使我们党和民主党派之间合作得更好，更亲密，更有成效。

十三大以来，党政分开有明显的进展。这是正确的，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县以上各级党委从日常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中摆脱出来，可以更好地履行政治领导的职能，集中力量抓改革，抓党的建设。党的政治领导，很重要的是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有的同志提出什么叫“重大”?我们说中央同地方党委的职能、权力不同，但都负有在重大方针政策方面实行政治领导的责任。地方各级党委具体怎么做，可以在实践中探索、研究。改革是统揽全局的，各级党委应责无旁贷地抓起来，抓好。党要真正管党。这个问题讲了多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除了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外，同过去党政不分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党政分开以后，在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工作的党员同志应该和在党委机关工作的同志一道，共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体现党的领导作用。改革涉及到各方面关系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强调相互之间的谅解、支持和友谊。《企业法》颁布以来，不少企业在理顺党政关系方面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各级党委要注意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使更多的企业党组织能够坚定不移地按照《企业法》和中央的《通知》的规定，转变自己的职能。企业党组织应当真正把本企业的党员管好，使党员（包括担任行政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能起作用，都按党的政策和原则办事，都按国家的法律和计划办事，都密切联系群众，把保证和监督的任务担当起来。

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加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各级领导班子的状况如何，对党的事业关系极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领导班子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上是好的。当然，由于缺乏经验，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有些年轻于部原来是搞技术、专业的，不熟悉党的工作；一是在年龄结构上没有拉开，如不注意，将来会出现一起退、一起换的问题。现在不能再来搞大的变动，只能在经常工作中逐步调整、改善。总的来看，现在需要注意稳定和提高。鉴于新成分大量增加，当前在领导班子建设上要特别强调学习和团结。学习非常重要，包括在实践中学习。进了领导班子，就必须认真学习身为领导班子成员所必须掌握的东西。我们不要教条主义，也不要经验主义，但是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地学马列，学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学党的方针政策，学党的基本知识。要结合实际工作，反复深入地学。在领导班子里的同志，还要增强党性锻炼，加强党的观念，解决好个人同党的关系。有一些年轻干部有开拓精神，很能干，但由于缺乏党性锻炼，在对待名、位、权的问题上，缺乏正确的态度。共产党员应该多做工作，多做贡献，但不能伸手要权、要位、要名。团结也非常重要。进了领导班子，应该更顾大局，更守纪律，更严格要求自己，更密切联系群众。班子内部应该有组织生活制度，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前面说的廉洁问题、涣散问题等等，都应该从领导班子抓起。对严重不团结和问题比较多的领导班子，上级党委要采取措施帮助解决。把领导班子建设好，各项工作都可以开展得生气勃勃，也可以把好的队伍、好的作风带出来。

第六点，扎扎实实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建设面临的各种问题，大量

地体现在基层组织的建设上。这方面的工作，抓与不抓大不一样。许多典型经验证明，只要认真去抓，就会发现问题，就会找到办法，就会取得成效。现在我们有些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有的甚至瘫痪了；但也确有一些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一直发挥得比较好，各地都有一些。而且，最近一两年来，还有一些新经验，就是对原来涣散的党组织，上面一抓，情况就变了。乔石、宋平同志看过一些农村，我也见到确有一些党组织，那里经济发展了，思想政治方面的情况也好，主要是党组织带领群众致富，同时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工作不放松。有的农村，一说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各顾各的，支部不管。而有的村子是党组织带领群众致富，那里的党组织威信就高。所以，关键是要抓，而且要经常抓。一手抓发展经济，一手抓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可以做到的。大学也一样，有些党组织的状况好，有些不行。要从好的典型、好的经验、包括近几年出现的新经验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增强我们的信心。

十三大提出了基层党组织的七项经常工作：经常地进行教育，经常地加强监督，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地整顿纪律，经常地清除腐败分子和妥善处理不合格分子，经常地吸收优秀分子，经常地发扬正气和抵制歪风，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这些经常性的工作十分重要，真正做好了，并使之形成制度，党的作用和威信就一定会提高。上级党委，要关心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要经常出题目，给基层党组织分配任务，基层党组织也应给党员分配任务。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起作用，首先要抓。不抓，没有任务，没有要求，没有检查，就会涣散甚至瘫痪。有的地方，党员不起作用，就是因为支部没有要求他们起作用，支部没有给他们分配任务。好多支部，在发展商品经济中，要求党员帮助群众致富，党员有了任务，也很高兴，在带领群众致富中也就提高了威信。看来在党组织瘫痪的问题上主要是我们没有认真去抓，没有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必须坚持，这是列宁提出的建党原则之一，否则党的组织就会松松垮垮。现在有一种思想，认为在和平建设时期，要淡化党组织的作用，淡化党的领导，不能像战争时期那样，强调组织，强调纪律。这是错误的。中央组织部在不少地方进行了民主评议党员的试点，即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条件，对照党员在实际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评议党员是否合格，效果很好。下面的反映是："风声不大雨点大，雷声不大震动大"。通过党的组织生活和民主评议，可以动员全体党员都来关心党，爱护党，都来做党的工作，都来起作用；可以使批评与自我批评落到实处，使党内的监督有约束力，有利于党员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顺利地处置不合格的党员。另外，提高党员素质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次我就不讲了，因为刚刚开了党员教育工作会议，那个会议主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第七点，讲几个原则问题。有的同志问：现在搞改革，好像很多东西都在变，究竟有哪些不能变？我想，简要的回答就是两句话：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变，

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能变。

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变。党的领导作用必须坚持。政治体制要改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能改的，执政的具体方式则是可以改变的。党政分开是讲具体的工作体制，充实和改进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是为了密切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丝毫不意味着改变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领导作用。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产品经济的管理体制要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可以探索，所有权和经营权应该分离，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发展个体经济，也可以发展私人企业，但中国经济不能私有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不能变。至于公有制形式，可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规定它的具体形式。我们允许非劳动收入，但按劳分配应该是主要的形式，这也不能变。我们过去采用过于集中的管理模式，曾经起过好的作用，但后来情况发展了，暴露出不少弊病。怎么改呢？要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我们的公有制成为一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充满活力的形式。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人民内部应该逐步扩大民主，但对敌对分子实行专政不能丢。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这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新的发展，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丢，基本原理不能丢。把四项基本原则丢掉了，中国一定大乱，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国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国民生产总值提前两年翻了一番，为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不改革，能做到吗？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为了更好地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步骤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所调整，但改革开放的方针和战略不能变。从国际国内形势看，都没有理由改变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把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丢掉了，中国也一定大乱，现代化也没有希望。

顺便说一下，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要进行科学的阐述，不能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比如靠拼设备，搞短期行为，来追求增加利润，这是曲解生产力标准，恰恰是破坏生产力。有人说既然讲生产力标准，为什么又要搞生产关系的变革？在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改变生产关系，这是坚持生产力标准的行动。反过来，只是追求生产关系的所谓高级形式，而不顾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那就会犯“左”的错误。我们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但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理解生产力标准，不能把生产力标准同利润、产值等简单划等号。

至于讲到党的建设，必须明确：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必须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必须坚持。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必须坚持。干部管理制度要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要建立，但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必须坚持。党员的模范作用必须坚持，党员为人民服务、为实现现阶段的任务、为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而奋斗的宗旨必须坚持。党的社会政策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行物质利益原则，鼓励勤劳致富。但是，对于共

产党员来说，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应当是自觉地为国家为人民作奉献，而不是追逐个人利益，不能“一切向钱看”。我们需要把社会政策同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价值观区别开来。这种世界观、价值观也要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当然，不能用这种世界观、价值观去要求人民群众，但对共产党员则必须这样要求。总之，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

第八点，讲一讲研究班这种形式。办研究班，把负责干部集中起来，用不太长的时间，采取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讨论一两个重大问题，这是一种好形式。大家把实际工作中的感受和考虑向中央反映，中央同志的考虑也同你们交流，这对帮助中央决策和改进地方工作都有好处。长期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抽出一段时间，坐下来，冷静地思考思考，同其它地区、其它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讨论讨论，对个人也是一种收获。我看这种形式可以继续采用。这次是专门研究党的建设，对推动全党重视党的建设会起重要作用。将来，可以继续办党建研究班，也可以根据需要，开办廉政建设研究班、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班、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班等等，推动各方面的工作。可以通过这种形式，集中大家的智能，帮助中央决策。也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推动工作。同时，对参加研究班的同志来讲，也有利于提高。这个办法，花的时间不长，也易于实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党的建设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要用全党的力量来做好这篇文章。这次办研究班，可以说是破题，还要继续研究，认真去抓。上星期日我到党校同全班同志见了面，前后又找一些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和老同志座谈了三次，对我也很有启发。今天就谈这些，和同志们一起研究，讲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听到同志们的批评。

注 释

1．姜春云（1930—），山东莱西人。时任山东省委书记。曾任山东省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省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南海西楼文学艺术家新春聚会上的讲话。

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是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必须在全国人民当中树立爱国主义和发奋图强的精神，必须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在所有这些方面，文艺工作者都是大有可为的。党和人民需要文艺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振奋民心民气，增强全国全民族的凝聚力，为创造健康、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风尚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文艺还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的精神需要。总之，文艺的天地是宽广的。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很艰巨，也很光荣。

在我国，文艺家同党和人民是同甘苦、共命运的。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顺利，人民高兴，国家兴旺发达，文艺家的日子也就好过，成就也就丰硕。反之，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遇到挫折时，文艺家和文艺事业也必然受挫折。在我国，党的事业与文艺家的事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今后各级党委要进一步贯彻两手抓的方针。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手抓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在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中，文化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同志继续和进一步关心、重视文艺工作，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和党对文艺工作的各项政策，注意与文艺家们对话、谈心，听取文艺家们的意见、要求，积极帮助文艺工作者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在老同志迎春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

同志们：

我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就要到了。今天，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委，在这里举行老同志迎春茶话会，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在座的各位同志和全国离休、退休的所有老同志拜个早年，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

当全国千家万户欢度春节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正是老一辈革命者浴血奋斗、长期努力，才创造和赢得了今天的和平、安定和繁荣。老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立下的功勋将永垂青史，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党和政府感谢你们，军队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

同志们都很关心当前的形势和工作。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向到会的老同志作一个简要的通报。

大家都知道，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改革。十年改革，使我国的经济技术力量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的意义，还不仅在于已经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探索和建立一种既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又能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完善，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示出来的新体制。当然，这是一条曲折而又充满困难的道路，任务是极为艰巨复杂的。在这样一条道路上，要想完全避免任何挫折和失误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毕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一九九〇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任务已提前完成，证明我们选择的方向是对的，证明我们党所制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走下去，并及时注意解决新的问题，我们就将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既定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邓小平同志多次讲，必须坚持两手抓。现在，我们就是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一手抓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如果不发展商品经济，就只能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就显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不抓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社会就不能安定，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盛行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就会滋长起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条件做到既发展商品经济，又不让消极腐败现象发展起来。前提是必须坚持两手

抓。

去年九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确定把今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和整顿上来。此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采取一系列措施，治理、整顿开始取得成效。当然还是初步的，工作决不可放松，还必须继续努力，扎扎实实地抓下去。

十三届三中全会在部署治理、整顿的同时，还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据此，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陆续抓了几项工作。围绕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问题，中央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研究，书记处进行专门讨论，发了纪要。去年十二月底，中央召开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讨论部署了党员教育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今年一月中旬，召开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研究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的问题。一月下旬，召开全国纪检工作会议，按照从严治党的方针，讨论和部署在治理、整顿、调整、改革中进一步加强党风党纪建设。从今年一月四日开始到月底，中央把一部分省委书记、副书记，集中到中央党校，举办党的建设研究班，深入讨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问题。

中央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行；抓商品经济而不抓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不行；抓思想政治领域而不以党的建设为重点也不行。在当前党的建设工作中，特别需要认真解决几个突出的问题，如：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保持党员干部的廉洁，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保持全党思想的统一，增强党内的凝聚力；在全体党员中（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和担任何种职务），保持严格的统一的纪律，克服涣散现象；通过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来增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吸引力等等。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确有不少新问题，但是只要从中央开始，各级党委认真去抓，摆到重要日程上来，就会有办法、有经验，就能抓出成效来。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各方面的工作，中央将会继续抓下去，并希望得到老同志的大力支持。老同志有很高的威望、广泛的影响和丰富的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中央要求各级党委进一步重视老干部工作，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爱护老同志，认真听取老同志的意见和建议，为老同志参加力所能及的、适合个人特点的活动创造条件。要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提倡和发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

实现四化、振兴中华，需要老中青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持续奋斗。我们全党全民族要同心同德，发奋图强，一代接一代，继往开来，百折不挠地奋斗下去。中华民族的振兴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在听取国家科委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南海听取国家科委宋健等人关于基础性研究工作汇报时的谈话。

大中型企业在技术进步方面投资仍嫌不足，一方面是企业钱少，另一方面还由于机制的原因，对技术进步的需求不够迫切。乡镇企业肯花大钱去买技术，聘请技术人员，就因为他们有这个迫切需要。

电子对撞机的应用是为基础研究服务的，但这个工程本身又是高技术开发工作。

我在河北、河南等地看到，科技人员去农村搞技术承包，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单位组织的，一种是由个人牵头的。后一种在开始的时候是某一个技术员，从一项技术业务承包开始，有了成效之后，其他技术人员也参加进来，逐步扩大成集团，扩大到更多技术领域，成为企业化、社会化的集团公司，这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好形式。

我们的科技体制改革一方面抓“横向收入放开”，引导研究所改变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又要靠搞拨款制度改革的“推动”。此外，你们在搞改革的同时，还提出了几个研究和开发的计划，这就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了，实践证明这一套办法效果是好的。“星火”、“火炬”计划起到了这个作用，名字也起得好。

“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方针早已经确定了，这并不是什么新精神，新方针。当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也不是先搞这个，后搞那个，关键是要继续贯彻，全面落实。王大甭同志提出与其说基础性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后劲”，不如说是“后盾”更合理，这个意见是好的。应当强调基础性研究要为高技术开发提供支持。过去我们曾提出过“任务带学科”的口号，现在当然不必重提，但仍要特别注意围绕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来选择重大课题，组织力量开展这类基础性研究工作。比如农业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最重大的课题，中国人口多，土地少，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选题不只是为了写论文，脱离实际的论文不仅近期不能解决重大问题，长远也解决不了重大问题。因此，主要还是应当围绕四化建设中的重大任务来选题。

我们国家财力有限，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实验室要真正发挥作用，要使其社会化，不要搞成单位所有，部门所有，实验室要向各方面开放。重大科研装备搞一点是必要的，搞起来就要为全国服务，不能只为本单位、本部门服务。例如，

电子对撞机之类的装备，可以做什么研究课题，让大家来提，供大家使用。这样就可以少投资，多办事，提高设备使用率，提高投资效益，发挥更大作用。

基础研究目标也不应该过于笼统，应当有明确的阶段性目标，要有一点竞争机制，及时评价，好的要及时给予表扬奖励。可以组织科学家们评论优劣，不要由政府指定。

在发达的信息社会中，知识、信息都是财富，在国民经济生产总产值中应当逐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关知识产权的法规也要抓紧制定，使其逐步完备起来。

我还要再次强调农业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不管主战场、高技术、还是基础研究，农业问题都是重点课题，人口、土地、粮食，对中国来说不论近期或长远都是关键问题。科技也是一种投入，看你投到那方面，要在“科技兴农”上想办法。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也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要动员更多的力量投入农业发展，包括种子、饲料、农用工业等等各个方面的研究开发，“星火”计划对提高农业科技作用是好的，特别是科技人员大面积承包效果显著，收效很快。日本也是人多地少，为提高覆种指数和提高产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例如农用薄膜、地膜，都是日本搞起来的。希望我们的科技人员在农业问题上多做文章。科技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对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批示*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

* 这是赵紫阳对孙维本[1]、马国良[2]《关于齐齐哈尔市搞活大中型企业的调查报告》的批示。

告孙维本同志：齐市搞活大中型企业的调查报告很好。特别是提出抓生产要素的流动与优化组合的重要性，看了很受启发。并告计委、体改委。

注 释

1．孙维本（1928—），辽宁营口人。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曾任辽宁省委副书记，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马国良（1936—），黑龙江哈尔滨人。时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后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主席。

关于一些集体企业将资产折股划给职工问题的批示*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

*　这是赵紫阳对马洪来信反映一些集体企业甚至有的国有企业将资产折股划给职工个人问题的批示。

应明确国营企业不得私分股份。原来的集体企业（如二轻、乡镇、街道、大集体等）也不得把财产作为股份分给职工。至于像海威这类企业，原来已分了的，可进一步完善，未分者暂时停止，尽快研究出几条原则，再有领导地试行。

关于制定长期规划的谈话*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约丁关根和房维中谈对制定长期规划的一些想法。

这次搞长期规划，要先务虚。总的想法是，要着重分析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劣势在什么地方，找出我们的优点和缺点。

对国际形势要作很好的分析。世界的情况不同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不同了。戈尔巴乔夫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世界是相互依存的，这是大势。集团也好，地区保护主义也好，都还是要相互依存的。中国是处在世界之中，中国的现代化也不是孤立的。我们的发展战略，要从国际经济联系上考虑，发挥我们的优势，避免我们的劣势，大的文章就在这里。搞清楚这一点，可能代价小一点，收效大一点；反之，则可能代价大，收效小。也就是毛主席讲的要多快好省。要组织人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现在同美国封锁我们的时期不同了，八十年代，我们已开始与世界联系，但还不完全自觉，没有充分利用。

规划要搞到本世纪末，搞十年规划。“八五”计划可以细一点。但有些问题五年看不出来，在十年规划中才能解决。

我们有很大的优势：一是劳动力多；一是人比较聪明；二是有相当大的生产力，工业制造能力尤其是军工能力很强，虽然有些产品参加国际交换不适应，但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基础，三线也开始走出了新路子；四是我国的科技力量相当强，在发展中国家是数一数二的。我们的劣势：一是资源不够；二是基础设施太差，首先是交通太差，形成“瓶颈”。现代化，交通是第一位的。没有交通，怎么搞现代化？应当发挥我们的优势和优点来弥补我们的弱点。不要关起门来自己想自己的问题。应当很好地考虑利用国际形势。

我不主张中国越慢越好，慢下来也很容易。脱离实际的快要栽跟头，但如何运用正确的战略保持一定的速度，仍然是执政党和政府应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如果不以优点来补缺点，不利用优点集中攻弱点，很可能事倍功半，闹出很多紧张来。毛主席讲的十大关系，思路是好的，想把关系搞顺，绕过一些暗礁。我看，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没有7%的速度不行，7%也不简单，工业就得有8%到9%，农业4%。中国人口这么多，如何缩小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差距，而不是扩大，这仍然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八十年代的十年，我们的发展战略与过去已经有所不同，过去感到非常困难

的问题现在已有所好转。例如轻工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很大进步。钢铁工业，国家的投资也不是很多，但发展很快。煤炭当前紧张，但前几年发展很快。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钢铁徘徊不前，煤炭紧张，轻工业挤掉了。这几年能源交通仍然很紧张，那是工业速度过快带来的。抛开这些，钢、煤、电、运、轻工、有色发展的规模是空前的。

我们要回顾一下十年，哪些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找到了办法，哪些还没有找到办法，哪些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现在能源、交通、钢材紧张，如何缓解这种状况，如果集中力量去攻这个坚，情况会怎样？如果轻工萎缩、外贸萎缩，怎么办？过去集中力量搞钢铁，结果没有搞上去，这几年没有集中力量搞钢铁，结果也搞上去了。这里就有一个利用优势的问题。一九八○年向小平同志汇报时讲，我们有一个十年倍增计划，当时感到没有把握，实际上达到了。我到北京时就碰到了煤的问题，提出增产与节约并重，以节约为主。后来进口钢材节省了不少能源，进口钢材和矿石也节省了不少投资。

世界各国经验都证明，不是资源多的国家就一定发展得快，不是没有资源的国家就一定不能发展。日本有什么资源，联邦德国除了煤之外也没有什么资源。这主要说明一个观点，制约因素不能用一种办法解决。一是靠自己，二是通过国际交换。小平同志讲，要利用外资搞一些基础工业。对于国内投资大，制约因素大的产业，还是要用国内的一些东西到国外去交换。

对外贸易怎么看？现在出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且是在石油、粮食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取得的。这说明中国还是有本事的。只要多出口就能多进口，国内条件好的自己搞，条件差的用出口去交换。过去军事上反对死打硬拼，在经济上也应如此。因为现在国际形势比较有利，国际间的对话、贸易、缓和是大势所趋，战争的威胁越来越小，经济上的往来越来越多。我们是从长期战争中过来的，后来又遇到国外封锁，对自力更生有不正确的理解。如果这个思想不清理，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国内资源中重要的是煤炭，现在紧张，原因要好好分析。铁路要下决心搞，中国幅员这么大，长期规划里要解决。我们有这么大的基础，好好搞管理，提高素质，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口。过去谁也没有想到，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这说明中国还是能打出去的。以我之长，补我之短，就是自力更生。

长期规划要务虚，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困难会越来越少。反之困难会越来越多。因此发展战略不能回到老路上去，走老路必然不能自拔。不是说不要搞自己的基础工业，还是尽可能搞得更多一些。第一，要研究基础工业如何搞，利用外资搞进口替代。只要我们外贸出口能搞上去，还债问题就能解决。第二，搞基础工业也要充分利用国际条件，没有资源也可以搞，南朝鲜钢铁工业就是这样搞上去的。所以抓基础工业也不能走老路，如果花大量的投资，从头搞起，其他方面要萎缩。要根据新的情况研究新的发展战略。

农业同样也有这个问题。中国的农业，第一是人口多，第二是土地少，究竟怎么办？既要搞粮食，又要搞棉花、油料，还要发展畜牧业，也有一个怎么搞比

较好的问题。大量进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不行，运也运不进来，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广东、福建、江浙）就那么点土地，种什么东西在国际上交换价值最高要研究。当然，一下子转不过来，但是，在长期规划中要研究。一种办法是自己生产粮食自己吃，一种是生产附加值高的产品换回粮食，当然还要看国际粮食市场的情况，但问题不大，进口一些粮食是可能的。过去工业化国家用制成品换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现在反过来了，美国、加拿大、欧洲农产品都多了。中国可以搞创汇农业换回更多的粮食。必须从开放、国际交换来考虑这些问题。如果沿海地区因为目前粮食紧张又回过头来主要搞粮食，这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我国劳动力多，要发挥这个优势，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有些技术密集型产品，参加国际交换。

总之，搞长期规划不要在矛盾没议论清楚之前就搞方案。要好好分析一下国情和国际环境，如何搞才有利于工业化进程，如何利用比较好的国际环境，通过交换，趋利避害，加强薄弱环节，绕过或减缓“瓶颈”部门的制约。要搞十年规划，五年时间短了些。十年规划主要搞展望、情况分析和应当采取的对策，最后形成计划，还是五年计划。

会见香港前途研究会邹至庄[1]等人的谈话*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香港前途研究会邹至庄等人的谈话中关于香港问题的摘要。

一、关于香港的中资问题

中资到香港本来有两个目的：一是起窗口作用，通过香港引进资金，引进技术，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二是搞转口贸易。后来，中资公司的规模和经营范围越来越大。现在要进行整顿，在港设公司的出发点不是要去占领阵地，也不是单纯为了赚钱，而是要有利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有利于内地搞四化，这是我们的宗旨。我们不是要在香港的经济中占多大份量，没有这个考虑，也不应该这样做。

有人说中资在香港有多少多少实力，我看恐怕没那么大，言过其实。内地较闭塞，各省市都想在香港设窗口，掌握国际市场的信息。刚才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指邹至庄等人提出的在港中资建了和买了很多大厦，各省的公司很多，很难查清等意见），我们许多公司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做的结果却不太理想，出格的事也是有的。现在正在整顿，要撤销一些，但不会撤得很多。（胡应湘表示：我们不怕中资赚钱，怕的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它们是国营企业，不怕亏损，有国家垫底。有的公司在香港做投机生意，搞股票买卖，这对香港不利。）我们言行一致，将按照上面所谈的方针来整顿。你们来了，正好多听听你们的意见。

二、关于香港的前途问题

直到现在，国际上尤其是香港人很关心一九九七年后的香港前途，我是看好的。但是你无论怎么解释，人家总会有疑虑。从中英谈判开始到现在已经七年，总的说香港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也有问题，如移民，这与信心有关，也有别的原因，如外国放宽了移民限制。这在一九九七年前不会完全停止。对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多做解释工作，使港人有信心，另一方面也不必过分紧张。对此，我们要认真做工作。一九八○年以来我们做了几件大事，都比较顺利，首先中英谈判，接着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英土地委员会，我看他们的工作做得不

错，解决了不少困难和棘手的问题。基本法起草工作情况是好的，征求意见后，对《征求意见稿》作了一百多处的修改，但还有一部分人仍不满，主要是对民主的进程和选举的条文。这个问题我看还得从维持香港的稳定来考虑。香港这个地方，没有稳定就没有繁荣，从英国搞的殖民体制到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制的过渡不能太快，太快了对香港不利。香港今后如果像意大利和戴高乐[2]前的法国一样政局不稳，几个月换个政府，港人能有信心吗？搞民主一定要从香港的实际出发，不能为民主而民主，一定要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出发。对此，你们研究会应多向香港人讲清道理。我们国内的目标也是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我认为不能操之过急，发展中国家过早引进西方民主制度搞好的不多。民主问题要与发展联系起来，步子多快问题不在中央，而要看实际，一切从香港的实际出发。

三、关于一九九七年后香港仍然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

现在大陆一发生什么事，香港就敏感，这不好。我们已经讲清楚两地的制度不同，将来香港还是搞它的资本主义。前年反自由化时，我会见港澳人大代表，我对他们说，香港不会反自由化，一国两制就是让你们搞自由化。这一条要跟港人讲清楚。还有一条，就是中国的前进道路上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但总的趋势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现行政策不可逆转。现在我们有困难，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充其量把今后二、三年的速度降低一些，但还能达到本世纪末的目标。我提出两条：一是时刻记住大陆与香港是不同的制度，香港受基本法制约，搞资本主义，大陆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大陆与香港的距离不会越来越大。我不是学者，而是政治家，不会完全执行哪一派学说的主张，治国要审时度势。中国政局是稳定的，中国总的趋势是不会变的，有了这个，香港人的疑虑可逐渐减少，信心也会逐渐增强。

四、关于留学生回国工作的问题

关于留学生回国工作问题，有些研究项目国内没有条件的，不一定非要回来不可。留学生回来可以去特区，也应该允许他们去香港。（鲁平[3]同志插话：去中资机构港府已同意，去香港的其他公司尚未同意。）公费派出的最好能回来，也可以两头挂，留在当地也可以，这个搞得死了不好。发展中国家都有规定，要求公费培养的留学生回来服务多少年才可以再出去，但实际上行不通，我们也有这个问题。

五、关于香港产业结构调整问题

香港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应该上一个新的层次，可以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内地沿海地区，把中国内地的科技力量与香港的商品经济结合起来，今后香港可多发展一些技术密集的产业，以提高香港产品的竞争力。

注 释

1．邹至庄（Gregory C.Chow，1929—），生于广东广州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计量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经济学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

2．戴高乐（Charles Andre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1970），生于法国里尔。二战时领导自由法国运动反对纳粹占领，战后曾任法国临时政府总理，1959年任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1969年4月27日因其地方区域改革和参议院改革方案在全民公决中失利宣布辞职。

3．鲁平（1927—2015），祖籍四川间中。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历任《中国建设》杂志副主编，国务院港澳办秘书长、副主任、主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

关于厂长如何领导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在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思想政治工作研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

办研修班专题讨论如何领导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如何贯彻《企业法》和中央关于加强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建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体制、新格局，这个办法不错。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厂长工作怎么做、党委工作怎么做，都有不少新的问题。通过研讨的形式，用总结交流经验的办法，既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又解决具体的工作方法的问题，对于促进新体制的建立，是会有帮助的。一个新的事情，开始不要怕少。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讲到合作化时谈过，大家说农村搞合作化问题很多，但总有一些是搞得好的。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好好解剖一下，为什么这个社能办好，别的社就不能办好？为什么这个社有优越性，别的社就没有优越性。通过分析研究就可以找到其他的也可以做好的办法。现在听起来好像新的体制面临的困难很大，但不要一听困难很大就觉得不行了，现在全国大中型企业至少有5—10%是上了路的（王忍之：恐怕不只这个数。王维澄[1]：据北京调查，有20%），就说只有20%上了路，那说明这个路是可以走通的嘛！如果说它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这5—10%是怎么起来的？那不是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所以，总结经验非常重要。不要一听有多少这样和那样的困难就犹豫不决。你就抓住那些搞成功的，他为什么会成功，就推广这些东西。既然人家能搞成功，你为什么不能搞成功？为什么他们这里能到位，你那里就不能到位？你们这个班上就念一本经，搞好的说一说是怎么搞好的，大家都对照对照嘛。当然各个企业有不同的情况，但我们集中一下搞得好的经验，把那些特殊性，比如厂长、党委书记哥俩好的去掉。不能说5—10%都是哥俩好的。总可以找到一些共性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是要下功夫总结、推广、宣传那些搞得好的经验。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为什么我们必须实行厂长负责制？为什么我们要实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体制？这个道理要讲透。天下本无事，何必庸人自扰啊？本来就挺好，为什么又颁布了《企业法》，又搞了思想政治工作通知？这必定有它的道理。要把这个道理讲透，认清为什么必须这样搞。刚才大家说了一些了，这种体制的好处很多。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必须是融为一体的，绝不能搞“两张皮”。采取厂长

全面负责的新体制，有利于克服企业长期存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经营“两张皮”的现象，有利于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成为企业现代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现代化管理，特别是社会主义企业现代化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注意到现在一些企业的科学管理工作法，其中就包括一些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例如，工人参加管理，尊重工人提合理化建议，等等，这既是一种管理，又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山东的新泰毛纺厂搞三大民主工作法，由于厂长尊重工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工人的积极性就相当高。企业怎么搞管理，这里边既有经济管理方面的，又有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而且它们本身是互相促进、互相结合的东西。这样才有利于调动企业各方面的力量，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我们多年来形成车间主任不管思想政治工作，不抓思想，厂长不管思想政治工作。我认为这种新的体制真正能够解决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问题，有利于解决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民主管理相结合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要体现在各个方面，渗透到各个方面。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同经济工作、管理工作，和分配、民主管理等结合起来，和企业精神、企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它就不是空洞的东西了。所以，只有这样搞，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实处。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工作或保证经济工作。所以说，这个制度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建立厂长全面负责的新体制，是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企业里的一个必然结果。要搞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企业就必须实行这样的制度。我们现在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厂长，就不能不对企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负全面责任，就不能不既管物又管人。人是最活跃的生产力。讲生产要素，人是最主要的。一个工厂只见物不见人，那是不可能搞好的。因此，就要既管物，又做人的工作。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仍然像过去那样，实行厂长管生产经营，党委书记抓思想政治工作，这就发生一个问题，企业发展的成败，究竟由谁来负责？那一种体制只能是在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在企业是经济管理部门附属物的情况下的一种产物。可以说，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必然要实行这样一场改革。这样一个道理，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完全讲得很透。要告诉大家，必须这样做，也只能这样做。

第三，现在所以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对新体制不适应或不熟悉的问题。原来的制度，我们搞了几十年了，我们的干部，厂长也好，党委书记也好，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工作的，或者说是在那样一种制度下培养起来、成长起来的。现在有个新的制度，自然就发生了一个不适应、不熟悉，或者还要加个不理解的问题。因此，就要帮助企业的同志，厂长也好，党委的同志也好，让他们理解、适应、熟悉。只有这样一条路，没有别的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不理解、不适应、不熟悉，是任何一个制度进行较大的变动的时候都会发生的，这没有什

么奇怪。如果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制度，我们的干部已经适应了多年习惯和熟悉的制度改变了，现在推行一个新的制度，一下子都那么理解，那么适应，那么熟悉，倒是不可想象的。有一些不熟悉，有一些不理解，有一些不适应，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应该因此就徘徊犹豫，举棋不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通过我们的工作，通过各个城市、城市党委的工作，好好抓一下这个转变。就是建立了这么一种新体制，如何使我们的干部、企业的同志能够熟悉它、适应它、理解它。这种过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尽量缩短这种转换、过渡的时间，尽量减少损失。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有这么一个态度，坚定地去做，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体制，坚定不移地贯彻《企业法》和中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通知，坚定地按这个精神去做。只要坚决去做，路子就可以走出来。态度越是犹犹豫豫，抓得不紧，这个路子走出的时间，就会大大推迟，造成的损失也就会大。其次，就是要很好总结那些好的经验，宣传好的经验，推广好的经验。这一点，我今天听了大家谈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启发。

看来，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帮助厂长就位。首先厂长要到位，坚决按这个路子去做。应当说，我们现在企业中的多数厂长距这个要求还有些距离，就是刚才说的不适应、不熟悉。因为我们的厂长长期以来是管理型的，这几年搞商品生产，叫经营型。厂长们对如何统揽全厂，还不熟悉。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他们推到这个位置上，把担子加在他们身上，慢慢地适应，逐渐地熟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到了这个位置，把任务加上去，绝大多数厂长能够适应。现在应当把重点放到这上面来，要求厂长到位，把任务担起来。各地方也应该采取研修班、讨论会、短期培训班的形式。当然，也可能有少数厂长的素质实在不适应这个工作，那当然可以作一些调整了。但这只是少数。绝大部分厂长应该让他在实践当中学习、提高、适应，担负起这个任务来。

对于党委书记和党委的其他同志，很重要的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所谓“失落感”，我看是应当改变、应当丢掉的东西。要认识到这场改革是必要的。要理解这样做对整个四化、对企业的兴旺发达，是必须进行的一场改革。党委书记首先应当把自己的精力真正用在抓党的工作上。很多同志说，现在新的改革、新的制度是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党的工作。我认为，恰好是要加强党的工作，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实行这样一种新的制度。过去党委书记的大部分精力陷于企业的日常工作中去了，没有很多的精力去真正抓党的工作。刚才有的同志讲得好，所谓管党的工作，就是围绕企业里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围绕本厂的任务认真抓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员宣传群众，带领群众。一个企业的党委，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好了，那么企业的凝聚力问题、企业的精神风貌问题、企业职工的积极性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怎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首先要认真把党的工作抓起来，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我在中央党建研究班讲过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所谓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只要把党员的工作做好了，党组织的工作做好了，这个问题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厂长到位，党委书记也有个到位问题，就是要认真

地把党的工作抓起来。同时，应当协助厂长去抓思想政治工作。中央的《通知》上是推荐了党委书记兼任副厂长这种办法。这个问题不一定要求统一，如果有些地方觉得不愿采取这种方式，也不必勉强。但是有两条要强调，首先党委要把党的工作抓起来，真正去管党的工作，管党员、党组织。我们企业里，一方面行政各级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融合在一起抓起来了；另一方面，党委把党的工作抓起来了。这样，企业也就能够搞好。

第四，我们的治理、整顿能否顺利地进行，能否使我们从困难中走出来，关键是企业的效益问题。因此可以说，企业改革对于治理、整顿能否顺利完成，能否从困难中走出来，能否使我们的整个经济出现一种新的好形势，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围绕提高效益的企业改革绝不可放松。企业改革的问题，今天我不准备多说，就讲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企业特别是大中型骨干企业一定要搞现代化科学管理。我们现在推行承包制、股份制、自负盈亏、放开经营，等等。都是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光有积极性不行，还必须有科学的管理。如二汽“一个流”的工作法，并没有增加什么投资，就是采用日本的管理方法，结果半年时间，人员减少了百分之二十，效益提高了百分之三十。现在我们已经有一部分企业在探索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最近企业管理协会开会，把各地方的方法集中了一下，有一些是比较全面的，他们称为“综合”的，有些是专项的，共有二十多种方法，都有比较好的效果。为什么我们国家一采用什么方法，就能提高百分之二三十的效益？说明我们的企业管理实在不好。现在日本很厉害，好像很多困难都挡不住它。日元升值，现在看它还可以渡过；石油涨价的困难，它早就克服了。美国的工厂，日本人买过去，派几个管理人员一搞，效益比美国的工厂提高百分之二十。要认识到，整个来说，我们的工业管理是非常落后的。有的大企业好一点，也不理想。劳动力浪费严重，我们的有效劳动时间在很多企业一天最多也就是四个小时。物资消耗浪费很大。同样一种商品，我们消耗的材料、能源，要比日本、比其他发达国家大得多。所以，外国人到中国工厂一看说我们到处是“黄金”，生产上、管理工作上造成的浪费是很严重的。这说明我们的落后。我们中国人比较注重引进先进设备，但许多地方买了设备用不上，放在那里。我们的管理工作没有做好。虽然也一直在抓，但是不是很有力。所以，这样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中国的工厂设备是落后的，技术也落后，但是更落后的是管理。如果在管理上认真下功夫，不需要花很多钱，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效益。对于企业，将来我们要实行这样一种政策，企业的自主权不能缩小，还要按照《企业法》的规定进一步落实，进一步把应当给企业的权力交给企业。只有这样，企业才有条件把管理搞好，把效益挖掘出来，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恐怕要树立一个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即今后企业挖掘的经济效益，企业新创造的国民收入，应当是国家得大头。过去多少年，我们采取扩权让利的办法，总的是对的，现在权还要进一步扩，至少扩大的要落实，但现在到了企业为国家多作贡献的时候了。企业说，目前我们已经很困难了，都过不下去了，还要多作贡献？那你就去挖掘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国家对企业的政策不能过于苛刻，搞“苛政”；但是

过分宽容，对企业也没有好处。所以，今后我们国家对于企业的政策的基点应该是这样，即承包也好，税收也好，真正搞得好的企业，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或留利，可以有较多的自我发展能力；经营一般的，恐怕只能维持，或者有较小的自我发展能力；经营差的企业，就不能存在下去。我们必须是这样一种政策，而不是马马虎虎也能混得下去，稍微好一点就得益很大。这样，国家吃不消，社会也承受不了，而且对于推动企业改进经营管理，自我挖掘潜力也不利。我们的企业要通过进一步改革，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有条件的要放开经营。这个路子必须继续走下去。另一个方面，企业要为国家、为社会多作贡献。企业既要有动力，也要有压力，让压力变动力。这个观点，我到几个省去陆陆续续讲了几次，上一次同袁宝华等同志谈企业管理问题时，我主要讲了这个问题。企业要搞管理，要提高效益，多作贡献。

注 释

1．王维澄（1929—），浙江桐庐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任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研究室主任。

认真搞好治理整顿　调整结构深化改革*

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同出席全国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座谈会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为进行治理整顿制定了一系列措施，这次李鹏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对今年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提出了一套政策和办法，人大已经通过了，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贯彻执行。

治理整顿工作是由国务院直接负责抓的，半年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项任务非常复杂，非常困难。在治理整顿中间出一点问题，发生一些顾此失彼的现象，在所难免，今后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希望地方的同志给以理解和谅解。

从中央和国务院来讲，应当注意发挥地方积极性，作决策之前，尽量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这也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所要求的。从地方来讲，则应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做到令行禁止。当然，地方有意见可以积极地反映，中央、国务院对各地的意见应当重视，如发现已经做出的规定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就及时加以修正。总之，上下要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同心协力。只有这样，才可能把治理整顿工作做好。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意见，这次治理整顿，与历次调整有不同的特点，认识它并把握它至关重要。

这次治理整顿是在国民经济和生产力大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过去的几次调整，如大跃进之后一九六〇年的调整，“文化大革命”之后一九七八年的调整，都是在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认清这一点，可以增强对搞好这次治理整顿的信心。

这次治理整顿又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间，也就是说，是在新旧体制交替、价格存在“双轨制”这样一个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治理整顿的复杂性和难度，对我们的工作也就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过去进行调整所采用的一些很有效的办法，现在有些已很难奏效，因为我们这几年把经济放活了一大块。指令性计划容易调整，而现在的经济已不完全属于指令性计划。对放活的那一块，用老办法控制很难见效。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再把已经搞活的经济重新搞死。恰恰相反，这次治理整顿，应该巩固改革成果，并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地寻找既能解决治理整顿的问题，又有利于改革，至少不为今后改革增加困难的新办法。新的宏观调控办法当然不是一下子可以找到的，这需

要探索，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现在控制消费基金，难度就很大。压缩基本建设，也是对搞活那一块感到难办。价格也是这个问题，已经放开的价格不好管。在治理整顿中采取的有些办法，有的看起来像是后退，但这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是暂时付出的一种代价。例如现在用行政手段控制物价，虽然明明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符合改革的方向，但从当前的全局出发，只能这样。因为不把物价稳住，就不能为其他问题的解决赢得时间。对这类问题我们要清醒，要心中有数，并积极地创造条件，逐步地用新的办法来代替它。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情况，建立新的宏观控制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的新课题。这个课题能否解决好，关系到治理整顿的最终成败。

这次治理整顿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国际条件比较有利。参加国际交换与竞争，我们有几个优势：一是劳动力充足，而且费用较低；二是我们已经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包括军工企业在内的工业加工能力较强；三是有相当大的科技力量。整个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趋势正在发展。有利于我们进行和平建设的国际条件，看来不会一年两年就消失，有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样一个好的机遇，发挥我们的优势，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换来缓解我们的困难。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有它的制约因素，有个“瓶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短线。由于有开放的条件我们就不必完全按照短线在国内求平衡，这和以前在封闭条件下不同。不仅沿海，全国都是这样。过去十年来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国的外贸有了很大发展，进出口总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出口47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例已接近美国。这说明中国的商品是出得去的，如果有东西，还可以多出，问题就看你有没有。这同有些国家欠了大量外债而自己的产品又出不去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十年来我们的产品不仅出口数量有很大发展，出口结构也有很大变化。过去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石油、矿物原料和农产品。近年来，上述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明显下降，而工业制成品包括机电产品比例大大增加，势头很好，方兴未艾，看来大有可为。从中央、国务院到各个地方，都需要注意研究这方面问题，在安排今后十年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时，应当充分考虑如何利用对外开放的条件。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的机遇，我们过去丢掉了，因为我国长期处于被封锁的情况下，后来自己又搞了“文化大革命”。但是，现在好的机遇又出现了，这次并不比以前的那几次机遇差。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状况都比过去好，有条件利用这个机遇。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发挥。所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没有理由悲观。重要的是，我们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坚持改革、开放，自觉地抓住有利时机，做好工作，使有利的机遇为我国的四化建设所用。

第三点意见，当前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要抓好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一是农业。一九八○年、一九八一年的调整所以比较顺利，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农业情况比较好。当时整个调整时期，是农业大发展的时期。所以一经调整，农产品丰富了，轻工业原料充足了，出口也增加了，连续几年出现大量顺差，有了外汇我们可以多进口钢材和其他原材料等，促进了整个工业的发展和市场的稳

定。所以，一定要看到夺取农业丰收是搞好治理整顿的基础和关键。各地区、各部门都要重视农业、支持农业、保证农业，措施要落实到实处。

二是坚决压缩基建和制止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解决需求过旺的问题。在治理整顿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是我们能够抓得住、作用也最明显的措施。如果真正按照国务院的决定把基本建设压下来，情况就肯定会向好的方向发生明显变化，下半年或明年就可以看出这个变化。控制消费基金比较复杂，但是总要解决，要认真研究、试验、总结出有效的办法来。

三是认真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过去历次调整，都注意了总量的控制，但结构调整做得比较差。这次无论如何要把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说，总量能不能控制得住，控制的结果能否为今后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更好的条件，关键在于结构调整。国务院已经提出了产业政策，要进一步研究、落实和制定配套措施，保证产业政策的实现。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落实产业政策不容易，但是必须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坚决搞好。

除了投资结构以外，企业、产品结构也要认真调整，使之合理化。电力、资金、原材料不能不加区别地投到经营不好、效益很差的企业，而应当集中保效益好的企业。这样，对能源、资金、原材料的需求总量可以减少，而效益可以提高。政策不仅要按照产业的划分向农业、交通、能源等方面倾斜，而且在同一行业的各企业之间也要倾斜。下一步的问题是切实整顿落后企业，改善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开展企业之间的联合、兼并。

四是金融问题。国际上尤其是东方国家，治理通货膨胀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利率、增加储蓄。我们前一段这样做了一下，也证明是有效的。这个办法既可以治理通货膨胀，又可以缓解资金的紧张。多发票子会有严重后果，用行政手段控制物价也不是长久之计，归根结底得把票子收回来。陈云同志在六十年代的经济调整中提出了几条办法：一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二是精减职工两千万人，三是通过高价商品回笼四十亿票子。这些办法实行以后非常有效。今天的情况和当年已不完全相同，对货币除了进行商品回笼以外，还必须增加一条信用回笼。这就需要适当提高存贷利率。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像外国那样把利率一下子提得很高。只要基本上能保值，再加上有较好的服务，存取方便，群众就会积极储蓄。中国老百姓是有储蓄习惯的。群众知道，把钱拿去买些用不着的东西并不合算，不如储蓄。为了引导消费基金变成长期稳定的建设资金，还需要逐步研究开展住房、劳保、教育等多种专门储蓄，还可以搞债券。当然这些事情不可能马上都办起来或者马上就见效，但要认真研究，朝这个方向走。当前比较迫切而有效的，主要还是通过吸引储蓄把流散在社会上的货币尽快收回到银行里来。

五是重点抓好企业改革。现在的根本问题是提高企业效益，不然很多问题最后还是解决不了。例如控制物价、提高贷款利率，最后还得企业负担。提高企业效益，要靠深化企业改革，这方面的潜力很大。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承包责任制。其次要大力推行企业的科学管理。企业要在完善承包制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就必须实行科学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为了让企业有条件加强改善管理，就

必须给它自主权，认真贯彻《企业法》，进一步抓好政企分开。企业就通过加强管理，提高效益，对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现在一方面国家财政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企业的管理很落后，潜力没有挖出来。所以，今后国家对企业原则上是给权不让利。使企业自主权多一点，同时贡献大一点，这将是一条重要的出路。

人代会上有代表提出，不但要治理经济环境，还需要治理社会政治环境。我觉得这个精神是对的。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一定要抓紧，否则，经济上的治理整顿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最近中央在党校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作了一系列部署，希望各地抓紧落实。

有些地方反映社会治安问题很突出，必须高度重视。中央专门开过一次会议，作了部署，希望各地按照部署精神主动做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把社会治安搞好。

计划生育的问题，我赞成李鹏同志刚才讲的意见。现在有些同志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宽严尺度有争论。实际上人口的过量增长并不是由于现行政策宽严尺度的问题，而是没有认真执行现行政策，没有按计划落实。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处于自流状态，这是最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计生委不久前开了一次会，提出了要求，请各地党委、政府把工作抓紧。四月十四日是中国十一亿人口日，趁这个机会，全国要对计划生育工作做一次大的宣传动员，进行一次有力的推动。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基本国策的高度上来，进一步抓紧抓好。

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治理整顿的问题*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一日

* 这是赵紫阳在同出席全国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座谈会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这次治理整顿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间，也就是说，是在新旧体制交替、价格存在双轨制这样一个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治理整顿的复杂性和难度，对我们的工作也就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过去进行调整所采用过的一些很有效的办法，现在有些已很难奏效，因为我们这几年把经济放活了一大块。对放活的那一块，用老办法难以控制。但是，我们也不能再把已经搞活的经济重新搞死。恰恰相反，这次治理整顿，应该巩固改革的成果，并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地寻找既能解决治理整顿的问题，又有利于改革，至少不为今后改革增加困难的新办法。在治理整顿中采取的办法，有的看起来好像是后退，但这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给其它问题的解决赢得时间，是暂时要付出的一种代价。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并积极地创造条件，逐渐地以新的办法来代替它。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情况，建立新的宏观控制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的新课题。这个课题能否解决好，关系到治理整顿的最终成败。

这次治理整顿又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一点对我们有利。我国劳动力充足，而且费用较低；我们已经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包括军工企业在内的工业加工能力较强；我们有相当大的科技力量。这些是我们参加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的有利条件。当前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趋势在发展，这是一个好机遇。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们不必完全按照“短线”在国内求平衡，而可以通过国际交换克服困难，促进发展，这和在封闭条件下不同。不仅沿海，全国都是这样。过去十年来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有很大发展，出口增长快，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看来大有可为。在研究发展战略时，应当充分考虑如何利用对外开放的条件。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发挥。所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没有理由悲观。重要的是，我们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坚持改革、开放，自觉地抓住有利时机，做好工作，推动治理整顿和整个四化建设。

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治理整顿已取得初步成效，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不能半途而废。应当特别强调，在治理整顿中，必须重点抓好深化企业改

革。要坚持和完善承包制。在承包制的基础上，大力加强科学管理。现在一方面要认真贯彻《企业法》，进一步落实企业自主权；另一方面，企业要运用国家给的权力，下功夫挖掘内部潜力，提高经济效益，为国家多作贡献。

承包制还没有完全解决消费基金膨胀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承包制助长了消费基金膨胀，也是没有根据的。要使企业既能负盈又能负亏，这里当然有机制问题，但也有当地政府的决心问题。一些地方的经验证明，只要下决心兑现承包合同，是可以使企业既负盈又负亏的。

全国全社会都来重视教育*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

* 这是赵紫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天，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士进行座谈，就是要听取大家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意见，希望同志们本着肝胆相照的精神，畅所欲言，共同把这个文件修改好。

各民主党派一直非常关心、重视我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近年来，大家一再呼吁，为发展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对中共中央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我觉得，在发展我国教育事业这个问题上，中共和民主党派切磋琢磨、真诚对话，很好地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精神。

文件起草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过两次，国务院讨论过三次。文件中大量吸取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关于教育问题的宝贵意见。四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十七次全体会议对《决定（草案）》进行了讨论，决定对这个文件进一步征求意见。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又作过一些修改的文件。

我们相信，只要全国、全社会都来重视教育，下决心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我国的教育事业是大有希望的。《决定（草案）》表达了这样一个决心和信心，也提出了发展和改革教育的一些重大措施。这些认识和措施行不行，需要进行哪些删除、修正和补充，请同志们提出意见。民主党派和一些无党派人士对教育事业不但热心，而且内行，今天到会的有许多是教育专家，不少同志对我国教育事业的状况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是有真知灼见的。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把这个文件修改好，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新的贡献。

在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

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在长达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对于我们的党和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胡耀邦同志从青少年起就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是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九二九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在江西、湖南和福建革命根据地从事青少年工作，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同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一九三四年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战斗中负伤，他的身上至今还留有敌人的弹片。

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等战役。

他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诞生后，胡耀邦同志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从一九五二年起，他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十分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采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一九六四年底后他在兼任中共中央

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努力工作，推进了所在地区的各项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同志遭到严重迫害。但他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七五年他担负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工作，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科学工作的破坏坚决进行整顿。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胡耀邦同志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是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处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所作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十一年来，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他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他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他重视调动我国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参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他为扩大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党的科学工作、教育工作、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他在关于当代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讲话中，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四化建设实践中去，经受磨练，健康成长。他先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他为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族经济文化，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了《马克

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长篇讲话，充分表达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为了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纪律和组织建设，推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和干部制度的改革，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关系，为发展我党同外国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他政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重大调整，作出了努力。

胡耀邦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我们的伟大事业。他深深地热爱党和人民，党和人民也深深地热爱他。全党全国人民深切悼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伟大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德。

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忠诚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献身精神。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不知疲倦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近两年来，他仍以很高的热情关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不辞劳苦，到基层调查研究，鼓励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形势和光明前途，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振奋精神，继续前进。

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他始终注意广泛结交朋友，通过同人民群众包括知识界和党外朋友的直接联系和坦率交谈，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从中汲取政治智慧和营养。他曾多次长途跋涉，深入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边远地区和穷困山区调查访问，同当地干部、群众促膝谈心，共商脱贫致富大计，促进这些地区的开发和对外开放。他还多次深入祖国边睡和海防前哨，亲切慰问人民子弟兵。他在处理党和国家重要事务的同时，亲自阅处了大量人民群众的来信，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谦虚好学，廉洁奉公的高贵品德。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胸怀坦荡，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正确的东西，敢于坚持；自己错了，勇于自我批评。他以身作则，待人宽厚，作风民主，手不释卷，追求新知，保持共产党人不断进取的活力。

胡耀邦同志与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我们要同心同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完成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坚韧不拔，努力奋斗！

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中朝友谊有利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 这是赵紫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在这春光明媚、万象更新的季节，应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邀请，我和我的同志们满怀着对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的深厚情谊，来到贵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感到格外高兴。

我们一踏上你们美丽的国土，就受到了朝鲜劳动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欢迎，沉浸在友好情谊的海洋之中。今晚又能同朝鲜的各位领导同志欢聚一堂、共叙友情，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转达邓小平等同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其它领导同志对尊敬的金日成总书记同志和朝鲜的各位领导同志的亲切问候，并通过你们转达全体中国人民对兄弟的朝鲜人民的良好祝愿。

一九八一年我曾率党政代表团来贵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那次访问，使我难以忘怀，朝鲜的悠久的历史文明、朝鲜人民在捍卫国家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斗争中的革命精神以及你们取得的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早就期待着再次访问贵国。我担任我们党的总书记以后，多次表示，如果出访，我将首先访问我们的亲密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金日成同志会晤，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加深相互了解，增进中朝友谊，并亲眼看看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现在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自从我上次访问贵国已有7年多了，这7年间，朝鲜人民紧密地团结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同志的周围，发扬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新的、巨大的成就。你们的成就再一次证明，朝鲜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朝鲜劳动党是英明的党。目前，朝鲜人民正积极响应金日成同志和劳动党中央的号召，为提前完成第三个七年计划，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此深表敬佩并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用鲜血凝成了伟大友谊；今天，在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又互相支持、互相信赖和互相理解。这种友谊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亲自缔造和培育的，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并且有利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十分珍惜这种友谊，并将和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一道为把这种友谊推向一个新阶段而

作出积极的努力。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支持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我们密切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与稳定。去年以来，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提出了关于祖国统一的一揽子和平方案以及各项合理倡议，为缓和朝鲜半岛局势、创造有利于朝鲜和平统一的气氛和条件作出了巨大努力，我们表示坚决支持。我们历来主张，美国应从南朝鲜撤走其全部驻军和军事设施，应该停止有可能加剧本地区紧张局势的联合军事演习，因为这与当前世界局势转向缓和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是不利于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的。我们认为，应该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和平统一问题。我们相信，经过全体朝鲜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朝鲜的和平统一终有一天能够成功。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着转折性的变化，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这已经在全世界形成强大的潮流。尽管导致国际形势紧张、动荡的各种因素仍未消除，但经过世界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争取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面对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九七八年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由于坚持这条路线，这十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已提前两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实践证明，我们实行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满怀信心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奋勇前进，克服一切困难，为早日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

* 这是赵紫阳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

青年朋友们，同学们，同志们！

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是中国青年的伟大节日，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节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四十周年快要到来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新时代已达十年的今天，在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克服困难，维护社会安定，推进建设和改革的今天，我们来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吸引广大青年和各界人民投入这次运动的最普遍最深刻的原因，是他们对国家危亡和民族命运的强烈关切，对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热情向往。五四运动又是一次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伟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那时的广大青年开始用新的眼光看自己，看中国，看世界。一部分最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对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和救亡方案的探索和比较，通过对世界潮流的观察和思考，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一九二一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长时期的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这个人民大革命的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也是五四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不断发扬的进程。

人民革命的胜利，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破坏—破坏阻碍中国前进的旧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心的任务转到了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破坏到建设，这是中国人民历史使命的极其深刻的转变。我们过去没有能够充分自觉地有效地实现这个转变，“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更是一场完全违背历史要求的大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全党全国人民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围绕建设，提出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这样，我们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时代。

我们现在纪念五四运动，就应当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即建设的要求，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使它们具有新的内容，达到新的高度。

我们今天讲爱国，就是要把中国建设好，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就是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和支柱，通过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学教育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繁荣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科学的文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说，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指在政治上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支配和反动阶级的统治，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了。现在我们还要说，中国人民站起来这个任务并没有最后完成。只有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才能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上，在综合国力的世界较量中，完全站起来。也只有在这样的奋斗过程中，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地充分显示出来。我们一定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使它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鼓舞起亿万青年的献身精神，鼓舞起广大工人、农民、技术人员、教师、学生、记者、医生、科学家、文艺家、企业家、国家公务人员和人民解放军官兵等各行各业劳动者的献身精神，为建设一个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我们今天讲民主和科学，也同样要紧紧围绕并服务于建设的目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工程，必然是整个社会改造和整个民族素质提高的伟大工程。我们要改变落后状态。要摆脱贫穷。要克服愚昧。要把社会生活和人民意识中种种不民主不科学的思想和习惯，一步一步地加以消除。要在十一亿人口的大国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改革建设的一切工作中，发扬民主精神，建设民主制度，发扬科学精神，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办事，并使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逐步地得到极大的发展。没有民主，没有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进程中，学习民主，发扬民主，学习科学，尊重科学，是摆在我们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也是摆在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同志们！我们宏伟艰巨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任务，只有在稳定的而不是动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才能顺利地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贯彻实施，改革和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大家都切身感受到的成效，最重要的一条是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维护的结果。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各民族，各党派，各界人士，都为稳定出了力，也都从稳定受了益。在稳定这个事关全局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同心协力，不容易啊！身在稳定之中，有时不大觉得稳定之可贵，但是，如果一旦失去稳定，就会痛悔莫及！我们渴望办成的事，就一件也办不成；连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会毁于一旦。如果把稳定破坏了，能得到什么呢？能得到民主和科学的进步吗？能得到改革和建设的果实吗？能得到祖国的振兴吗？都不能！只能得到动乱。动乱的日子难道我们过得还少吗？从一八四〇年到今年一百五十年间，我们只争取到二十几年安稳日子。其余一百二十多年，一百一十年被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搞得乱七八糟，还有十多年被林彪、“四人帮”和我们自己的主观指导失误闹得人心惶惶。如今大家共同感到欣慰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确实实过了十年好日子。如果再发生动乱，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无政府状态，乱了人心，乱了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学习秩序、工作秩序，乱了人民自己，闹得国无宁日，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如果出现那种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就一概都谈不上。不仅如此，那些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愚昧甚至野蛮的东西，就会泛滥和横行。全党、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秩序的法制化的正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是一种建立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新秩序，无疑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所必需的，也是维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所必需的。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这是建设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按照这样的要求去想问题，做工作，我们的事业就能取得胜利。

我们宏伟艰巨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任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和坚强的领导下，才能扎扎实实的推进。我们的党，是坚持并且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坚持改革、坚持开放的党，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党，是依靠人民、依靠青年的党。六十八年来，我们党在为中国人民作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的同时，也犯过大大小小各种错误。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党是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生机蓬勃的党。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之心，是同人民之心、青年之心连在一起的。让我们大家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在安定团结、同舟共济的气氛中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吧！我们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我们的社会，我们整个民族，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造。我们党也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造，这种改造的目的，当然不是要改掉我们党的性质和固有的优势，而是要使我们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中国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泡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今天，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前途和希望。要讲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就是最重要的一条规律。懂得并且尊重这条规律，我们的事业就能胜利。

同志们！当年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反复地表达了这样的信念：青春中华之创造，全靠青年之觉醒。他们对于青年的信任与期望，他们的这种远大眼光和乐观主义，在我们今天观察中国青年和中国命运的时候，同样是极其重要的。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党和人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对当代青年在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寄予殷切的厚望，他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

希望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中，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作为时代的主旋律，始终召唤着青年一代跟随党在伟大的历史事业中前进。

青年要在建设中树立开拓进取的探索精神。没有探索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不能推进建设和改革。青年人要求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的价值，这种积极性应当受到保护，使青年能够在现代化事业的大海洋中乘风破浪，锻炼自己，提高自己。青年人爱思索，勇于探寻各种新知，这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没有思索，怎么能够前进呢？没有各种新知，就不能丰富自己，并进行比较。在思索过程中，难免有偏颇和迷惘。但是，只要有爱国精神，把自己的责任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只要有民主精神，把个人的作用同集体的力量联系起来，只要有科学精神，把美好的理想同现实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一定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体验到人民的真正利益和要求，体验到时代的呼唤和潮流，体验到自己的努力同前辈努力的历史联系，体验到自己对国家未来负有的崇高使命。这样，青年就一定能够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必然性，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历史必然性，从整个国家的前途中认清自己的道路。

青年要在建设中树立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精神。把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长期的、极为艰难复杂的伟大事业，需要我们全民族几代人进行持久的努力。历史注定了你们这一代青年，只能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艰苦创业、埋头苦干的一代。改革和建设没有快捷方式可走，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人民尤其是青年的劳动和奋斗。我们需要的是坚韧不拔、扎扎实实的长期奋斗。认清历史的使命，清醒，理智，坚毅，沉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这是当代中国青年最可贵最需要的品质。

共青团作为我国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在近七十年青年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在改革开放十年全面开创青年工作新局面的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要更加重视、关心和支持共青团的工作，共青团也要不辜负党的希望，联合青联和学联等青年团体，同最广大的青年群众保持密切的、生动活泼的联系，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党和政府同青年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青年利益和要求的社会代表作用，把共青团真正建设成为引导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从现在起，再过十一年，我们就要跨入二十一世纪了。未来是属于青年的。处于世纪之交的青年一代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党寄希望于你们，人民寄希望于你们！全国青年们，全国同胞们，让我们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为中华的振兴而共同奋斗！

后记

一、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者检索查看，这部文集以时间顺序编排，按年份分为四卷：第一卷（1980—1982年），第二卷（1983—1984年），第三卷（1985—1986年），第四卷（1987—1989年）。

二、编入本书的所有文稿，均系第一手原始文献资料。为了保存文稿的原貌，在编辑过程中只对原稿进行了文字订正和必要注释，有的添加了标题。文中的数字和计量单位等，亦沿用当时的习惯表述，未按新的规定改动和换算。

三、参加文集收集、整理、编辑、录入、排版、校对工作的同志，都是一批热心改革开放事业和关心党史国史研究的志愿者，还有许多老领导和老同志给予了热情鼓励和鼎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四、限于条件和水平，在本书编辑中难免有疏漏、错讹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知情者批评指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5年10月17日